经济学大辞典

梁小民　睢国余　刘伟　杨云龙　主编

团　结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赵润庭　孙　展　陈　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大辞典/刘伟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
ISBN 7-80061-954-0

Ⅰ．经…　Ⅱ．刘…　Ⅲ．经济学—词典　Ⅳ．F-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6344 号

经济学大辞典
梁小民　睢国余　刘　伟　杨云龙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天津市武清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1994 年 9 月（16 开）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92 千字　印张：88.75
印数：5000 册
ISBN 7-80061-954-0/F・61
定价：198 元

经济学大辞典编撰者

顾问　陈岱孙

主编　梁小民　睢国余　刘　伟　杨云龙

副主编（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　彪　朱善利　何小锋　张立宪
郑洪亮　姜斯栋　蔡志州

编撰者（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益　马兴宏　马桃秀　王　沂
王　欣　王　刚　王　波　王开国
王松枝　王东京　王永保　凤　芹
孔繁敏　叶普万　石士均　冯　晴
刘　宏　刘　伟　刘　波　刘宏彦
刘应书　刘春旭　刘　彪　刘宇飞
朱秋莲　朱善利　孙　凯　吕随启
吕之喜　何　静　何小锋　陈灿华
陈享光　张少龙　张玉英　张一驰
张立宪　肖治合　肖　评　杨　加
杨　基　杨云龙　宏　亮　把多勋
李　月　李　敏　李向红　李凤圣
李维平　李长伟　李晓东　李心愉
林夏阳　武　成　郑超愚　郑宏亮
周安军　姚长辉　姚月华　俞金林
姜斯栋　赵欣舸　骆洪涛　欧阳红武
梁小民　董　迎　黄　彬　曹金彪
晶　丰　焦乃洹　曾　前　蒋　萱
睢国余　蔡志洲　裴　松　颜惠兰

责任编辑：

赵润庭　陈　佩　孙　展

总　序

目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体制的总体和分体方面，都在发生全面的、重大的、甚至带有根本性的变革。这些体制方面的渐变和激变都与社会科学息息相关。一方面，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体制改革是绝无可能取得成功的。另一方面，改革与发展又催生着新的理论和方法，而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就植根于社会发展之中。这一点一直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在新的历史变革中，新旧理论演变和交替，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融合、替代；信息量急剧增长，社会科学领域中各个学科互相交融、渗透、借鉴、影响，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都给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复杂的要求。

作为科学理论工作者，我们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责任，并产生了通过合作，推出一批社会科学成果，出书、出思想，出人，为自己也为他人创造一个机会，检验自身实力的想法，并付诸实施。首先，于1986年始，协助华夏出版社组织和出版了大型国外社科名著翻译丛书《二十世纪文库》，至1990年已出齐100种。待条件成熟后再继续出下去。接着就组织编纂这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辞典》，计划出10种（现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6种，1995年再出4种）。然后从1992年起还组织编写了《社会科学系列哲学丛书》。这样，在翻译（引进）——总结归纳——研究的三部曲中，都做了一些工作。

近些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成熟期比以往缩短了。这应归于：继承以扎实的成果基础，大量汲取国内外新理论新方法、敢于站到科研前线，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

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之一，聚集着一大批各学科学术骨干及带头人。这是《社会科学系列大辞典》得以完成的基本条件。

编纂这套辞典，我们强调的是阶段研究成果，尽快使之产生社会效益，以后再进行修订完善。这样才能将时效与社会效益尽可能好地协调结合起来。

这套辞典在内容上力求全面，新、深；在结构上力求合理，中外比较，古今衔接，各分支学科自成体系；在文字上力求释义准确、简明；表达做到深入浅出。在编写过程中老一辈权威以顾问形式作具体指导。在作者方面，主、副主编都是学科中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著名学府、科研机构，有硕士以上学位，副教授以上职称，有多年教学及研究资历，有著（译）作发表，同时在编纂词典方面亦有较丰富经验。在整体水平上我们是有信心的。

这套辞典，每种规模均为四、五百万字的鸿篇钜著，其读者对象亦很广泛，适用于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各级各类企、事业，机关干部及学校的教学师生及研究人员。

尤其应当肯定的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需要很大的决心、魄力。团结出版社为作者和读者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感到，如果不继续组织编纂出水平更高、质量更好的稿件，实在无法表达我们的敬佩与感激之情。

在组织编写及出版这套辞典的全过程中，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协助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减轻了出版社的压力。这也体现出改革中我国出版业的一种新机制。

由于这个工作要求标准高，时间紧，规模大，可能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恳请同行及读者指正，帮助我们在修订中加以解决。本系列辞典是集体项目，任何成功都离不开参与工作全体同志的努力。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贾　湛

1994 年 4 月

前　　言

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有近百名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参加编写的《经济学大辞典》付梓在即。鉴于迄今为止，国内尚缺涉及多经济学科领域、内容齐整、叙述经典而又富于学术价值的经济学辞典，因此，这部辞典的问世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摆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辞典，不只是一部方便检索的工具书，同时是一部复盖诸多经济学科的教科书，是一部对基本经济范畴、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准确概括、深入分析的学术著述。

《经济学大辞典》的编者，自始至终遵循科学性、严肃性、准确性和稳定性原则，十分注重辞书内容的质量，而不在意形式的样式和叙述的技巧。考虑到本辞典的学术价值和历史稳定性，因此，凡是流行但没有学术价值、迎合时尚而未经实践验证、形式华丽而内容贫乏或刚刚产生但尚未发育成熟的走俏“经济范畴”“理论用语”专业术语”概不收录在内。收入本辞典的条目，视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学术价值的大小而作不同的文字处理。凡是重要的条目一般给予系统而深入地描述，甚至不受篇幅的限制。

马克思经济思想无疑是人类经济思想宝库中的瑰宝。博大精深的创世之作《资本论》则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经济学大辞典》在创作伊始，曾把马克思经济思想作为单独一卷。但考虑到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特殊地位以及以“资本论”为依托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辞典”早已十分普及，因此后来认为既不能把马克思经济思想同其他经济理论并列到《经济学大辞典》中去，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经济学大辞典》的顾问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陈岱孙老先生，为此，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同时我们要由衷地感谢经济学界的前辈和我们的老师胡代光、厉以宁、陈振汉、杜度、赵靖、范家骧、张友仁、刘方棫、肖灼基、洪君彦、晏智杰、陈德华等教授。没有他们的哺育栽培和悉心指导，这部大辞典是不能问世的。

这部辞典实行主编负责制。全书由北京大学教授梁小民、雎国余、刘伟及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杨云龙主编。刘彪、朱善利、何小锋、姜斯栋、蔡志洲等任副主编。其中，西方经济学卷主编梁小民、朱善利、何小锋、姜斯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卷主编雎国余、刘伟、郑洪亮；产业经济卷主编刘伟、杨云龙；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卷主编蔡志洲；综合经济卷主编杨云龙、张立宪、刘彪。

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学大辞典》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及讹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赐教。但是，我们相信并希望这部辞典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编者

1992年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篇 西方经济学

一 画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 画

十二　画

十三 画

十四 画

十五 画

十六　画

第二篇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　画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 画

十二 画

十三 画

十四 画

十五 画

第三篇 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

一 画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 画

十二 画

十三 画以上

第四篇 综合经济学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 画

十二 画

十三　画

十四　画

十五　画

十六 画

第五篇 产业结构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 画

十二 画

十三 画

十四 画

十六 画

第一篇　西方经济学

一　画

一切险（All Risk）　一切险是海运货物保险险别中的一种。一切险的承保责任范围是被保险货物在海运途中由于海上风险所造成的全部和部分损失以及由于一般外来原因所造成的全部和部分损失。也就是说，一切险的承保责任范围是平安险、水渍险和一般附加险的承保责任范围之和。

一切险的承保责任范围是海运保险险别中承保责任范围最大的。但是，诸如战争险、罢工险等，属于特别附加险，不在一切险承保责任之内，而需要另行加保。

对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引起的货物损失，以及由于货物自身的特性，运输延迟等原因造成的货物损失，均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这些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切险由于承保范围大，则保险率也相应地比平安险和水渍险为高。

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　也称初级市场，或称发行市场（Issuance Market），其职能是为新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提供销售场所，使资金不足的单位通过证券发行向资金有余的单位（包括个人）筹集资金，其作用主要有：（1）给资金需求者（筹资者）提供发行股票和债券而获得营运资金的便利；（2）给资金盈余者提供投资、并争取获得收益的机会。

一次总付税（Lum-Sum Taxes）　一次总付税是一种征收数量固定的税。这种税的特性是纳税人采取任何行动都不能改变他的纳税义务，除非他自杀或移民。在实际纳税种类中很少有完全符合一次总付税定义的税种。人头税近似于一次总付税。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它例子。以能力、收入、财富、支出等方面的差别为基础而进行征税不是一次总付税。能力可以被掩盖起来，财富可以被消费掉，储蓄可以用于替代支出，闲暇可以用于替代收入。所有这些行为都会减少税额。因此，用于收入再分配目的征税或者按支付能力所征的税被排斥在一次总付税之外。一次总付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纳税人负担恰好为国库所得所平衡，因为对于一次总付税来说，在边际点上不存在税收。如果在边际点上存在税收，纳税者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而改变纳税负担。这显然不符合一次总付税的定义。边际点上不存在税收意味着不会通过在交易双方设置障碍来取消任何交易。非一次总付税的税收是交易双方的一种障碍物，在存在这样一种障碍物的情况下，使双方会相互受益的交易将受阻，一方的损失也未被任何国库所得所平衡。

一次总付税还是经济学中进行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工具。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一次总付税或补贴的实施等于调整要素的最初禀赋，它不会改变均衡的特征，而只会改变均衡点的位置。在福利经济学中，一次总付税被用于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的社会福利状况的调整。帕累托最优条件表明，在最优条件达到时，只有通过使一方受损的情况下，才会使另一方受益。但达到这种最优状态时社会财富的分配可能是很不平均的。极端的情况是一个人拥有社会的全部财富，而其余人则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用一次总付税办法可以纠正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状况而又不会破坏帕累托最优条件。

一次总付税对于经济理论的分析意义重大，但实际运用价值较小。因为除了人头税与之相近似外，很难找到类似于此种税的税种。但是可以利用它来衡量实际税收脱离最优税收的程度有多高。

一批产品（Vintages）　是指在相同时间点上得到的耐用货物。因此，不同时间点上得到的耐用货物就是不同批货物。资本服务的流量是不同批耐用货物作为资本投入的数量指数。在不同批耐用货物间有完全的替代性的条件下，资本服务的流量就是过去投资的加权总和。权数就是不同批资本的相对效率。在动态生产理论中，我们定义在 t 时间上产量为 y_t，在 t 时间上的投入量为 X_{jt}，j 代表某种投入物（j = 1，2，…，J）同样，产出的价格为 q_t，J 投入物的价格为 P_{jt}（j = 1，2，…J）。为了说明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我们还有下面的定义：

A_t 为在 t 时间上得到资本货物量

$K_{t,\lambda}$ 为在 t 时间上年数为 λ 的资本货物的资本服务量。

$P_{A,t}$ 为在 t 时间上得到的新资本的价格

$P_{k,t,\lambda}$ 为在 t 时间点上年数为 λ 的资本货物资本服务价格。

如果不同批资本的服务是可分的，那么生产函数为

$y_t = F[G(K_{t0}, K_{t1}, \cdots K_{tz}, \cdots), X_{2t}, \cdots X_{nt}]$ 这里 K_t 是资本服务的流量，是资本投入量的指数，$K_t = G$，G 是不同年数的资本投入物的函数。如果不同批资本间存在完全替代性，那么 $K_t = \sum_z K_{tz}$，如果资本服务比例于初始投资，则 $K_t = \sum_{z=0}^{t} d_z A_{t-z}$。$(d_z)$ 为不同年数资本间的相对效率。在稳定的规模收益条件下，产出的价格是投入品价格的函数：

$q_t = Q[P(P_{kt0}, P_{kt1}, \cdots P_{ktz}, \cdots), P_{2t}, \cdots P_{nt}]$ 这里 P_{kt} 是资本服务的价格指数，$P_{kt} = P$。P 是不同年数的资本投入物的价格的函数。在完全替代条件下，资本投入的价格等于新资本货物的服务价格，$P_{kt} = P_{kt0}$。如果资本货物所提供的服务比例于初始投资，则不同年数的资本货物的价格为 $P_{ktz} = d_z P_{kt}$，$(z = 0, 1, \cdots)$ d_z 依然是资本服务的相对效率。不同批资本在生产函数中取决于相对效率，其价格与相对效率有关，因此将资本分为不同批，并决定其相对效率是建立生产函数和价格函数的重要条件。

一体化（Integration） 又称"整合"。一般认为，社会文化系统可能具有不同的一体化过程，特别是在同化或文化变迁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W·G·萨姆纳认为，一体化是建立社会文化均衡的平衡力，但一体化不可能完全实现。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一体化是统摄文化的所有部分，并因此达到完满状态的那种本质。一体化包含着多种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含义。一体化可以是指某种形式的共同体内部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强制所形成的团结统一和协调发展，从而使该共同体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也可以是指少数派集团逐渐使自己适应于多数派集团的社会文化的变化过程。60 年代开始以后，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用一体化论述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变化，因此现代社会中有的也把一体化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体化。马尔库塞认为科技革命、工人参与等使得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领导阶层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世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民族解放运动，发达国家中没有特权的阶层、青年学生马尔库塞认为，技术革新使得资本生产过程不断地自动化、机械化，剩余价值理论消失了，劳动者中白领阶层日益增多，劳动条件逐渐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已经走向了稳定性强的一体化进程之中。

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 研究各种系统的同型性，揭示系统活动的一般规律，探讨系统研究和开发的基本理论方法的科学，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奥地利生物学家 L·V·贝塔朗菲是一般系统论的主要倡导者。贝塔朗菲认为，不论系统的具体种类、其间的关系如何，都存在着适用于一般系统的模式、原则和规律。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确立适用于不同系统的一般原则，数学和逻辑是一般系统论的主要工具。一般系统论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范畴：系统和要素、结构和功能、整体性与加和性、机械化与集中化、终极性与等终极性以及等级结构等。系统是一般系统论的中心范畴。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要素的综合体，这一定义适用于各种系统，乃是一切系统概念的基础。等级性原理是一般系统论的主要原理。系统与环境组成一个特殊的综合体，任何系统都是较高系统的一个要素，该要素通常又是较低一级的系统。这说明任何系统既自成体系，又互成系统。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都呈现出一种特级性，等级秩序的一般理论是一般系统论的主要支柱。贝塔朗菲认为，结构是要素的秩序，功能是过程的秩序，结构和功能是统一的。整体性原则是一般系统论的主要原则。系统的整体性是指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将影响系统的其他要素，并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相反，任何要素的变化又依赖于系统的所有其他要素。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集中化是系统活动的主要特征。集中性是系统的有关部分或要素相互作用的系数增大过程，结果该部分的不大变化引起整个系统的根本变化。上述有关系统的定义、原理、原则和特征，反映了各种系统的同型性和系统活动的一般规律，构成一般系统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CIF 加利息价(简写为：CIF&I) (Cost，Insurance，Freight And Interest…Port Of Destination) CIF 条件的变形，除了附加利息之外，所有的交易条件与 CIF 条件完全相同。这里所谓的利息是指出口地银行在购买卖方提交的跟单汇票时，自购买之日起至全收回票款之日所应收取的利息。对于此项利息，除非买卖合同中另有约定，否则应归卖方负担。但实际上卖方总是将此项利息加计在成本之内，而以 CIF 价向买方报价。

CIF 加佣金价（简写为：CIF&C）(Cost，Insurance，Freight And Commission…Port Of Destination) CIF 价格术语的变形，除附加佣金外，其它交易条件与 CIF 条件完全相同。按照 CIF 加佣金价，卖方向买方所开立的货物价格中所包含的佣金通常是卖方委托国外代理商推销货物而应支付的回佣(return commission)。卖方报价时已将回佣计入 CIF

价格之内，而代理商无须在此价格基础上再加报酬。

一般集中（General Concentration）　在发达国家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上，存在着一批从买卖双方来看，都是极其活跃的经营多角化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其中许多是巨型跨国公司，这些企业不仅在单个产业具有市场势力，而且在几个产业、一个国家全部经济甚至世界经济中具有经济支配力，这种现象称为一般集中。反映一般集中程度的指标是一般集中度。一般集中度通常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前位企业（如前100位、500位企业等）的销售额、资产额占整个国民经济的销售额、资产额的比重表示。发达国家的一般集中度，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二次世界大战后，总的趋势是稳定上升的。至于一般集中度变化的原因也因国而异，原西德和英国，为对抗美国大企业和欧洲共同体内其它国家的竞争，政府实行鼓励合并的政策，是一般集中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政府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反垄断政策，一般集中度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企业在竞争基础上的合并以及能源、新兴产业大企业发展较快。日本在二次大战后实行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在1952年才开始放松反垄断控制，但由于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再加上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因而一般集中度长期呈下降趋势。60年代后，由于政府实行了旨在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合并鼓励政策，一般集中度才开始上升。

一般均衡分析（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一般均衡分析是同时对市场上所有单个决策单位的行为进行研究。一般均衡分析所涉及的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价值问题、分配问题、福利问题等。在经济学中，均衡是指市场上各种力量处于平衡状态。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都描述了这种状态。但一般均衡又与局部均衡不同。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假定某些商品的价格是不变的，并且忽略了各个市场间的相互影响；而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则要求各种商品价格自由变动，并要求所有市场是结清的。在一般均衡中，各个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任何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都会影响其它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例如，采煤工人工资的提高会造成煤的价格的提高，这依次又会造成以煤为燃料的钢的价格上升、以钢为投入的机器价格的上升，以机器生产的许多产品价格的上升等等。

尽管某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早在二百多年以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已经涉及，因为他分析了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促进了社会的福利，达到社会均衡状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最早对于一般均衡分析作出系统而又精确表述的是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瓦尔拉斯开拓性地研究了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特征仍然体现在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一般均衡分析中。瓦尔拉斯创立了一般均衡分析以后，这种分析方法不断发展、完善。埃奇沃思、帕累托在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发展了福利的概念。它代表了一般均衡分析早期的发展。后来，沃德、阿罗、德布鲁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分析，利用高深的数学方法证明了竞争经济下一般均衡的解的存在。更近些年来，纳西、斯卡夫、布尔登布兰德则探讨了博奕论与一般均衡分析之间的关系。内杰西等人则把用一般均衡分析研究竞争的经济扩展到研究不完全竞争经济，扩大了这一方法的分析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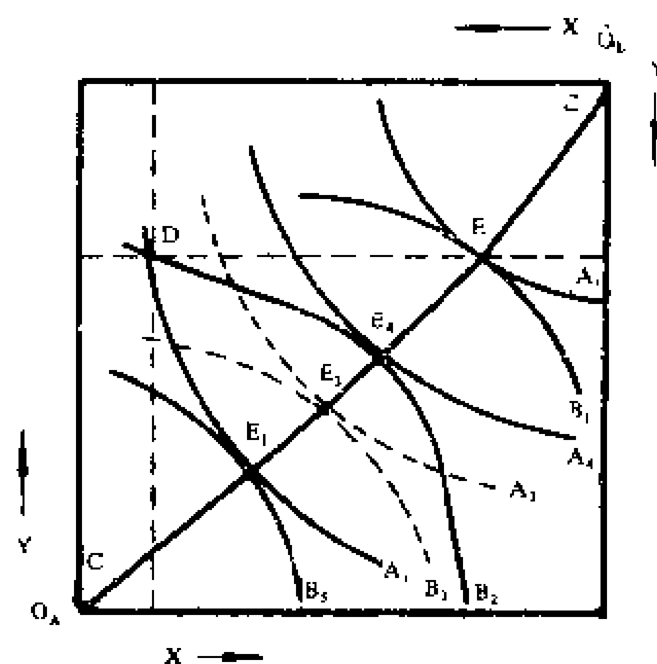


图1　交易的均衡

一般均衡分析所用方法较深，它的许多定理都是用拓朴学、博奕论等来证明的。一般均衡分析所研究的范围也较广。它既有静态均衡分析，又有动态均衡分析；既有完全竞争分析，又有不完全竞争分析。一般均衡分析的要点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这一简单的模型所分析的是静态的、完全竞争经济的情况。在分别描述了交易的一般均衡，生产的一般均衡后，该模型描述了交易与生产同时达到均衡的状况。

交易的一般均衡

交易的一般均衡所指的是当社会生产状况既定，分配状况既定（要素的禀赋状况既定），通过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使得交易者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状况。均衡的条件是任意两种商品X、Y的边际替代率（MRS_{XY}）对于所有参加交易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以社会只有两个消费者（A与B）、两种商品（X与Y）的交易为例来说明交易的一般均衡（见图1）。图1给出了由简单的两人经济中A、B两个消费

者只消费X、Y两种商品的无差异曲线所构成的艾奇沃思盒状图。图的横坐标表示社会所拥有的X商品的数量。图的纵坐标表示社会所拥有的Y商品的数量。消费者A的无差异曲线以O_A为原点，越靠近坐标的右端表示A所拥有的X商品的数量越多；越靠近坐标的上端表示A所拥有的Y商品的数量越多。因此，A的无差异曲线离开原点O_A越远，表示A的效用水平越高。例如，$A_1<A_4<A_5$等等（A_1、A_4、A_5为分别表示A的三种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消费者B的无差异曲线以O_B为原点，越靠近坐标的左端，表示B所拥有的X商品越多；越靠近坐标的下端，表示B所拥有的Y商品越多。因此，B的无差异曲线离开原点O_B越远，表示B的效用水平越高。例如$B_1<B_2<B_5$等（B_1、B_2、B_5为分别表示B的三种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A所拥有的X商品量X_A与B所拥有的X商品量X_B加总等于社会拥有的X商品总量X_0，即$X_A+X_B=X_0$；A所拥有的Y商品量Y_A与B所拥有的Y商品量Y_B加总等于社会拥有的Y商品总量Y_0，也就是$Y_A+Y_B=Y_0$。图中任一点都表示社会产品X、Y在社会成员A、B间的特定分配状况。不管社会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都可以通过A、B之间的交易达到最优的均衡。所谓均衡，是指在最优点达到后，A、B间进一步的交易不会在不损害一方的情况下使另一方得到好处。例如、D点是社会的最初分配状况。在这一点，A所拥有的X产品较少，拥有的Y产品较多；B则相反，拥有的X产品较多，Y产品较少。在D点、A的无差异曲线是A_1，B的无差异曲线是B_2。B的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与A的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不相等。A、B之间通过交易（A用一部分Y产品交换B的一部分X产品）可以使双方都得到好处，或者说，可以使在一方不受损害的情况下使另一方得到好处。例如，通过交易可以使A得到全部好处，而B的效用保持不变，E_4便是这样的点。在E_4点，A的无差异曲线与B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即两条曲线在这一点的斜率相等。在切点，A的效用水平由无差异曲线A_1提高到了A_4，但B的效用水平仍然保持在B_2不变。也可以通过交易使B得到全部好处，而A的效用水平不变，E_1便是这样的点。在E_1点，A的无差异曲线也与B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在切点，B的效用水平由无差异曲线B_2提高到了B_5，而A的效用水平仍然维持在A_1的水平不变。还可以通过交易使A、B两人都得好处。在E_1点与E_4点中间的任一点，当A的无差异曲线与B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时，都给A、B两人同时带来好处。例如，在E_3点，A的效用水平由A_1提高到A_3，B的效用水平由B_2提高到B_3。究竟是在E_1到E_4点中间的哪一点，由A、B两人的谈判水平决定。但是，在最初分配为D的状况下，交易的均衡点不会超出E_1点与E_4点，否则交易的结果使得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在各种可能的分配状态下，可以通过交易得到许多个可能的均衡点。在所有这些均衡点，A的无差异曲线都与B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连接所有这些可能的均衡点，便得到一条连接O_A与O_B的C–C曲线，称为契约曲线。所有在契约曲线上的点都是最优均衡点，也称为帕累托最优点。因为一旦交易达到这条曲线上的任一点后，进一步交易只有在一方受损的情况下才能使另一方受益。契约曲线上所描绘的均衡点便是交易的一般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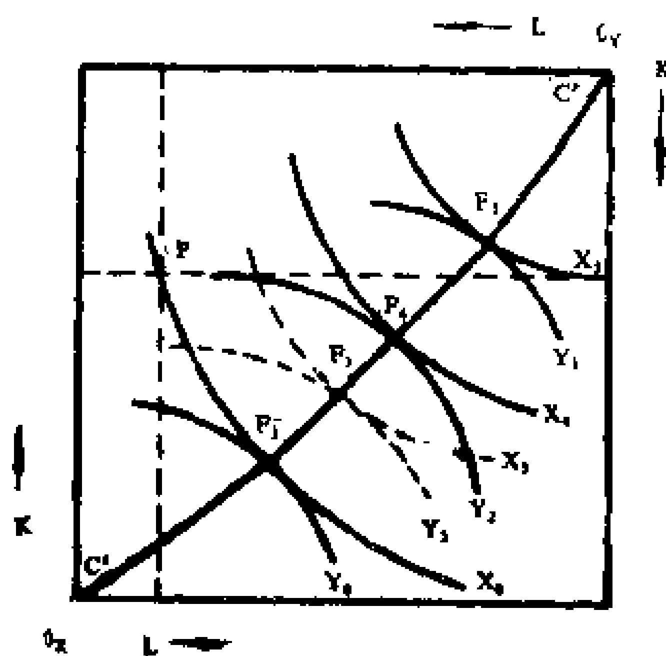


图2 生产的一般均衡

生产的一般均衡

生产的一般均衡所指的是在技术与社会生产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假定用于生产各种产品的资源最初配置状态给定，那么通过重新配置这些资源可以使得生产达到最优，即产品产量达到最大的状况。均衡的条件是任意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对于使用这两种要素而生产的商品来说都是相等的。以两个生产者A、B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与劳动L生产两种产品X、Y为例来说明生产的一般均衡（见图2）。图2是生产的艾奇沃思盒状图。图的横坐标所表示的是社会所拥有的劳动L的数量。纵坐标所表示的是社会所拥有的资本K的数量。用来表示X产品生产的坐标原点为O_x，越靠近坐标的右端，表示投入X产品生产的L要素越多；越靠近坐标的上端，表示投入X产品生产的K要素越多。因此，离开原点O_X越远的生产X产品的等产量曲线所表示的X产量水平越高，例如$X_0<X_4<X_5$等等（X_0、X_4、X_5分别表示三种不同的X的产量水平）。用来表示生产Y产品的坐标原

点为 O_Y，越靠近坐标的左端，表示投入 Y 产品生产的 L 要素越多；越靠近坐标的下端，表示投入 Y 产品生产的 K 要素越多。因此，离开原点 O_Y 越远的生产 Y 产品的等产量曲线所表示的 Y 产量水平越高，例如，$Y_1<Y_2<Y_0$ 等等（Y_1、Y_2、Y_0 分别表示三种不同的 Y 产量水平）。图中任一点都表示生产要素（资源）L 与 K 在 X、Y 两种产品生产上的特定配置状况。不管资源的最初配置状况如何，都可以通过资源在 X、Y 两种产品生产上的重新配置使社会生产达到最优均衡点。所谓均衡是指，达到这一最优均衡点以后，进一步重新配置资源不会在不减少一种产品的同时增加另一种产品的数量。例如 P 点是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最初状况。在这一点，用于生产 X 产品的 L 资源较少，K 资源较多；而与此相反，用于生产 Y 产品的 L 资源较多，K 资源较少。在这一点，X 与 Y 两种产品等产量曲线的斜率不相等，也就是说 L 与 K 这两种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不相等，因此不是最优均衡点。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将用于 X 产品生产的一部分 K 要素撤出而用于 Y 产品的生产，同时将用于 Y 产品生产的一部分 L 要素撤出而用于 X 商品生产）可以同时提高 X 与 Y 两种产品的产量，或者至少在提高一种产品产量的同时而不会减少另一种产品的产量。例如，从 P 点开始，通过在 X 产品的生产中减少 K 的投入而增加 L 的投入，与此同时在 Y 产品生产中增加 K 的投入，减少 L 的投入，使得在 X 产量增加的同时而不减少 Y 的产量（在 F_4 点），或者使得在 Y 产量增加的同时而不减少 X 的产量（在 F_1 点），或者使 X 与 Y 的产量水平同时提高（在 F_1 点与 F_4 点中间任一点，例如 F_3 点）。在 F_1、F_3、F_4 点，生产 X 产品的等产量曲线与生产 Y 产品的等产量曲线的斜率相等，或者说用于生产 X、Y 两种产品的 L 与 K 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在这些点相等。这些点都是最优均衡点。从生产的艾奇沃思盒状图中的任一点出发，对于资源配置的任何非最优均衡点都可以通过对资源配置状况进行改进而达到最优均衡点。这样的点有无穷多个，连接这无穷多个最优点，便得到一条 C′−C′ 契约曲线。这条曲线上的所有点都是生产的最优均衡点。在这条 C′−C′ 线上的所有点，X、Y 两种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 L 与 K 两种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都是相等的。一旦 X、Y 的生产状况处于契约曲线上任一点，生产状况都达到了最优，要想增加一种产品的产量，只能以减少另一种产品的产量为代价。图 2 的 C′−C′ 线所描述的就是用 L 与 K 两种要素生产 X 与 Y 两种产品时生产的一般均衡状况。

可以将图 2 的要素空间的生产契约曲线变换为产品空间的相应的产品转换曲线。图 3 是这种变换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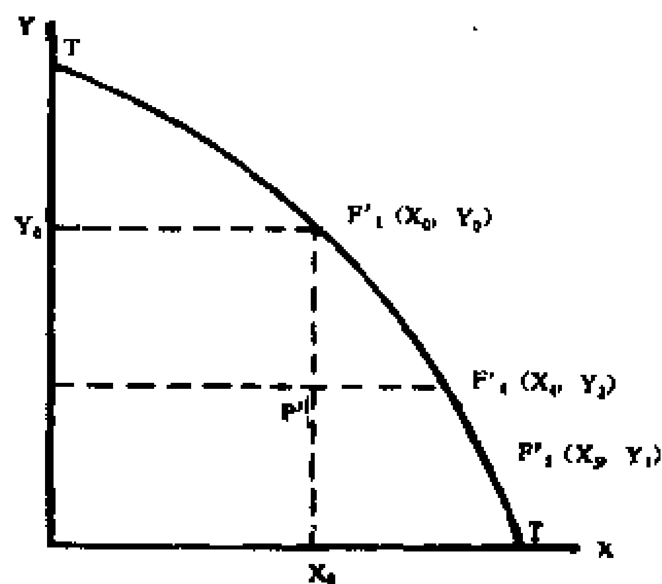


图 3　产品转换曲线

在图 3 中，横坐标表示产品 X 的产量，纵坐标表示产品 Y 的产量。T−T 为转换曲线，它表示在社会既定技术条件下，充分使用 L 与 K 两种资源所能生产的 X 与 Y 这两种产品各种最优产量的组合。转换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对应着图 2 中契约曲线上的点。例如，转换曲线上的 F_1'（X_0,Y_0）点对应着图 2 中契约曲线上的 F_1 点。转换曲线上的 $F_4'(X_4,Y_2)$点对应着图 2 中契约曲线上的 F_4 点等等。因此，转换曲线表示当处于一般均衡条件下社会所能生产的 X 与 Y 两种产品的不同数量组合。转换曲线以内的点是表示经济没有处于均衡的点。例如，图 3 中的 P′ 点不是一个均衡点，P′ 点对应着图 2 中的 P 点。通过在 X、Y 两产品的生产中重新配置固定的资源 L、K，该社会可以提高 Y 产量（F_1'点），或提高 X 的产量（F_4'点），或同时提高 X 与 Y 的产量（例如 F_3'点）。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该社会不可能用既定的 L 与 K 两种要素生产出在转换曲线以外的产量。转换曲线上每一点的斜率为边际转换率（MRT_{XY}），表示该社会为了用足够的 L 与 K 多生产一单位 X，它必须减少多少单位 Y 产量。边际转换率实际上反映了生产 X 与 Y 这两种产品的机会成本。

生产与交易的一般均衡

生产与交易的一般均衡是指生产与交易同时达到均衡的状况。均衡的条件是任意两种产品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等于该两种产品在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即 $MRT_{XY}=(MRS_{XY})_A=(MRS_{XY})_B$。将交易的一般均衡与生产的一般均衡结合到一起分析，便可以得到生产与交易的一般均衡。图 4 是将图 1 与图 3 结合起来描述了生产与交易的一般均衡。图 4 中，先在转换曲线 T−T 上任找一点 F_1' 点。一旦确定了这一点，社会资源 L 与 K 的配置状态也就确定了，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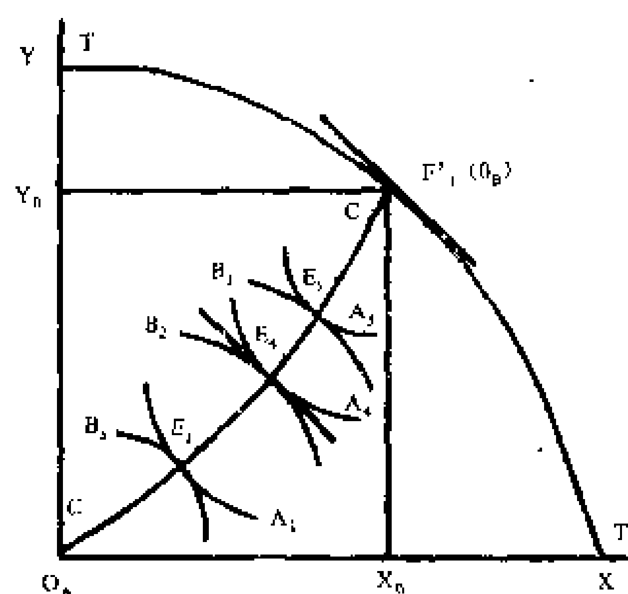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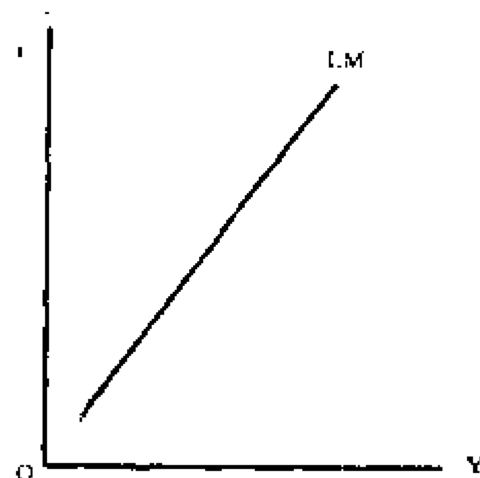


图4 生产与交易的一般均衡

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F_1的特定的X与Y两产品产量所分别需要的资源L与K的数量是确定的，在既定的产量X_0与Y_0下决定了社会中A、B两人进行交易的X、Y两种产品的总量，于是得到交易的艾奇沃思盒状图。消费者A的坐标原点是O_A，消费者B的坐标原点是O_B（F_1点）。交易的均衡点有无数个，由契约曲线C—C上的点表示。由于生产与交易的一般均衡的条件要求两种产品X、Y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等于该两种产品在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而在F_1点，边际转换率既定（该点的切线斜率既定），因此，只要在表示无数个交易均衡点的C—C线上找到这样一点，在该点，A的无差异曲线与B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并且切点的斜率与F_1点切线斜率相等，便可以满足$MRT_{XY}=(MRS_{xy})_A=(MRS_{XY})_B$相等这一生产与交易同时达到均衡的条件。由图4可以看出，E_4点满足这一条件。也可以在给定社会成员既定效用水平的条件下导出资源L、K的最优配置状况。例如，从E_4点所确定的A、B两人的效用出发，由于E_4点A、B两人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既定且相等，因此，只能在转换曲线上找到唯一点，该点的边际转换率等于E_4点的边际替代率，这一点便是F_1点。在F_1点，X与Y产量被确定为X_0、Y_0。由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X_0、Y_0这一产量水平所分别需要投入的L与K的数量是既定的，因此，资源配置状况也就确定了。如果能够找到一组与生产和交易同时达到均衡时的边际转换率、边际替代率与边际技术替代率相一致的产品价格（P_X、P_Y）与生产要素价格（P_L、P_K），则这些价格为效率价格。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这种效率价格是存在的，这就是完全竞争的均衡价格。用伯鲁瓦不动点定理可以证明一般均衡中完全竞争均衡价格的存在，在达到一般均衡时，市场上各种产品与要素的总供给与总需求都相等。超额供给与超额需求都是不存在的。上述图形中，两个人、两种资源、两种商品的分析可以很容易推广到多个人、多种资源、多种产品的情形中去而不改变结论的一般性。

一部门经济增长模型（One Sector Growth Model） 只包括一种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这种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又可以作为投资品。与此相应，经济中也只有一个部门。这种简单化的假设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它有助于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从中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经济增长理论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新剑桥模型等都属于一部门增长模型。这些模型都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探讨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途径，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重要结论。这些结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制定实际经济政策都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LM曲线（LM Curve） 描述货币市场达到均衡，即货币需求（流动偏好L）与货币供给（M）相等时，国民收入与利率之间成同方向变动关系的曲线，如附图1所示。



附图1

在附图1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纵轴Oi代表利率，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表示，国民收入低，则货币市场上达到均衡时，利率低；反之，亦反之。根据凯恩斯的利率理论，以$\frac{\bar{M}}{\bar{P}}$代表实际货币供给量（$\bar{M}$和$\bar{P}$分别代表既定的名义货币供给量和价格水平）；L代表由L_1和L_2组成的货币需求，即流动偏好，其中L_1代表货币的交易需求与预防需求，取决于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记为$L_1=L_1$（Y），L_2代表货币的投机需求，取决于利率，与利率反方向变动，记为$L_2=L_2$

(i)，$L = L_1(Y) + L_2(i)$，则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

$$\frac{\bar{M}}{\bar{P}} = L = L_1(Y) + L_2(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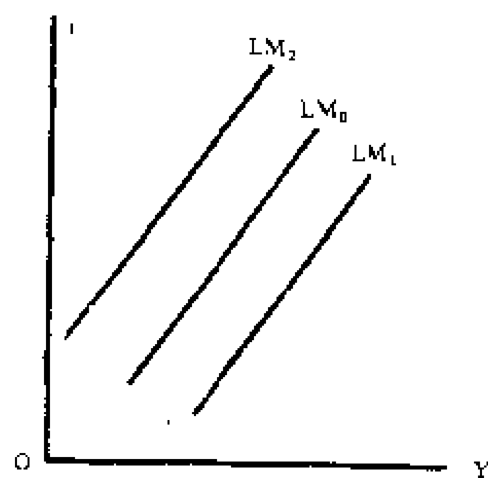
由上式中可以说明，当货币市场均衡时，利率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的原因。当国民收入较高时，货币的交易需求与预防需求（L_1）增加。在货币供给量既定的情况下，为了使货币市场均衡，货币的交易需求与预防需求（L_1）增加，就使货币的投机需求（L_2）减少，货币的投机需求（L_2）与利率反方向变动，从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减少就意味着利率上升。同理，当国民收入较低时，利率也下降。因此，在保持货币市场均衡的情况下，国民收入与利率成同方向变动。

以 K 代表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即货币需求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h 代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即货币需求变动对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则 LM 曲线的函数式可以写为：

$$i = \frac{1}{h}\left(K \cdot Y - \frac{\bar{M}}{\bar{P}}\right)$$

上式不仅表明了国民收入（Y）与利率（i）的同方向变动关系，而且也表明了 LM 曲线斜率的决定。LM 曲线的斜率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K）和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h）。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越小，则 LM 曲线的斜率越大，即图中的 LM 曲线越陡峭，从而既定的利率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越小。相反，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小，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越大，则 LM 曲线的斜率越小，即图中的 LM 曲线越平坦，从而既定的利率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越大。

LM 曲线的位置取决于实际货币供给量$\left(\frac{\bar{M}}{\bar{P}}\right)$的变动，如附图 2 所示。当实际货币供给量增加时，LM 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即从附图 2 中的 LM_0 向右下方移动到 LM_1；当实际货币供给量减少时，LM 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从附图 2 中的 LM_0 向左上方移动到 LM_2。在 LM 曲线斜率以及 IS 曲线不变的情



附图 2

况下，LM 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使国民收入增加，LM 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国民收入减少。实际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又以由名义货币供给量和价格水平的变动所引起，但主要是由货币当局改变货币供给量所引起的。

由 LM 曲线上任何一点表示的利率与国民收入的结合，都是 M＝L，即货币市场的货币供求均衡。在 LM 曲线以外的任何一点上利率与国民收入的结合，都是 M≠L，即货币市场的失衡。在 LM 曲线右下方的任何一点，都是 L>M，即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在 LM 曲线左上方的任何一点，都是 L<M，即货币需求小于货币供给。LM 曲线的决定与性质是 IS—LM 模型的基础。

参见“IS—LM 模型”。

二　画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一国在居民的教育与技术上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区别在于，其他资本包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无形资本等的回收是快的，例如固定资本通过折旧形式，无形资本通过摊销、流动资本则一次性地计入生产成本。人力资本却不然，其投资是明显的，但其收回却是遥遥无期，原因是用于教育和技术的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其收益转移到其他产品的收益中去，其为国家所创造的效益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正因为如此，人力资力被一些人所忽视。人力资本的发展是美国经济制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人力资本的增长，特别是教育投资的增长，是过去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之一。据某些权威人士的看法，人力资本的收益对美国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比物质的厂房设备要大。根据发展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的增加，投资既依赖于一国的储蓄水平，也依赖于利用国外的储蓄。但投资的投向首先要解决的是一国瓶颈部门，而瓶颈部门中的物质生产领域是显而易见的，但人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力的缺乏却易被忽视，所以投资的产出水平

低，但如果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作用，增加该项投资，其效益就会在较长的时期里表现出来。如果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较长时期里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人力资本的间接效益性以及产生效益的滞后性是一国忽视该项投资的主要原因。

人口出生率（Fertility）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出生和增长速率的一系列指标的总称。人口分析中有多种计算人口出生率的方法。平时所讲的出生率主要是指粗出生率，计算公式为：

粗出生率＝全年出生总人数（B）／年中总人口（$\bar{P}$）×1000 其中年中总人口$\bar{P}$为一年的平均人口，即为年初人口和年末人口平均数或每季度或每月时总人口的平均数。人口粗出生率所需数据容易取得，计算简单，因而被广泛采用，但它有两个缺点（1）受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婚姻状态分布等因素影响，往往不能正确反映人口真实出生水平；（2）它也不能反映生育年龄分布，如生育早晚、生育峰值、整个生育期的长短等情况，因此，在分析人口变动（特别是生育变动）时它不能反映人口变动的内在趋势与水平。从比较分析的角度看，运用标准化方法，方能比较不同的人口增长水平，分离出人口结构因素生育强度、婚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粗出生率具有较大的政策价值和研究价值。除粗出生率以外，一般人口出生率、年龄别出生率年龄、孩次别生育率、婚后年数别出生率等指标也是衡量和分析人口出生水平的有用指标。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如生育年龄、孩次、婚后年数、生育间隔等）描述人口出生情况，一般用于人口趋势的深入分析。由于分析目的的不同，还运用其他的一些分析指标。此外，总和生育率的运用也非常广泛，几乎可与粗出生率相比，它所反映的是假定按目前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一个妇女平均一生可生的孩子数。一般地，粗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结合运用更有意义。总之，人口出生率可以理解为新出生人口与原有人口的比率，但由于统计上的困难和技术以及不同的分析目的，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Demographics and Economics）

1.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与经济状况从来都是密切相联的，适度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以及年龄结构可以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否则，它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

（1）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应当与该国的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人口过多会造成经济负担过重，人均收入水平低以及失业等问题，而人口过少又会造成资源闲置，经济增长迟缓。控制人口适度规模应当从控制人口增长率着手。

（2）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率指的是一定时期内增加的人口数在整个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人口增长率应当以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相协调，过快或者过慢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取决于两个因素：生育率与死亡率。当某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的生育率大于死亡率时，这段时期内的人口出现正增长；当生育率小于死亡率时，人口出现负增长；当生育率与死亡率相等的时候，人口数不变，称为零增长。影响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因素很多，它们的影响通常都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例如，家庭观念的改变可能导致生育率逐渐下降，医疗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死亡率不断降低等等。但是另外有些因素却会造成生育率与死亡率的突然改变，例如，战争与自然灾害导致死亡率上升，生育率下降，这种突变影响深远，因为它最终决定着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内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决定着不同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速度。美国在战后曾出现了一次生育高峰，那个阶段出生的一代人到了工作年龄之后，美国的劳动力数量会迅速上升，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代人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劳动力数量会骤减，老龄化问题会日益突出。

（3）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在某段时期内，如果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较大，那么就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也容易提高；相反，如果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那么创造财富的人就相对少了，生产必然因此受到影响。此外，年龄结构的不同还极大地影响到衣、食、住、行以及健康保健等方面产品与服务的特点。

既然人口对经济发展有着如此重要的影响，那么就有必要对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以及年龄构成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其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因此，人口统计学应运而生。

2.人口统计学

人口统计学指的是对有关人口方面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并分析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人口学的一个分支。

对有关人口方面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追溯到古时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统计分析体系日臻充实完善。在英国政治算术学派与数理统计学派的影响下，人口统计学逐步建立起来。

对人口状况进行调查要从如下几方面入手：（1）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职业；（2）人口的出生、死亡、婚姻、迁移以及数量；（3）人口的地理分布。进行人口调查的主要方法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人口登记与统计报表等。

将人口资料通过调查等方法收集起来之后，还要对它们进行整理和分析。主要方法有分组法、相关分析法、断面分析法等等。最后，还要对人口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通过以上处理，可以得到生育率、死亡率等等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指标，这极大地有助于对经济现象与问题作出分析，而后者正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可见，人口统计学的发展是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人口统计学也要借助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方法论与数学工具。二者关系紧密，相伴发展，近年来新兴的人口经济学就是这两个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

人力计划方法（Manpower Planning Approach） 关于分析和预测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力需要的方法。通过利用有关的历史资料，对过去人力需要趋势进行估算，然后推测出未来的趋势，为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服务。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教育水平与职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人力计划理论以这种联系为基础，假定某种职业必须要由受到某级教育的人来承担，进而认为，经济计划对知识劳动者的需要可以预测，并且有可能通过计划教育体系的发展来避免人力短缺或人力过剩。因为人力短缺可能使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而人力过剩又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引起知识失业。人力计划可以有多种方法。其中较为复杂的一种是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计划中推断出人力需要情况的廷伯根-帕恩斯方法。这种方法包含了5个连续的步骤：(1)确定计划期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增长率，由于培养中、高级人才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所以计划期至少应在5年以上；(2)按达到目标增长率所需要的原有部门，估计产出的结构性变化；(3)使用一套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假定或使用一些相对于产出增长的就业人数增长弹性假定，估计各个部门的就业量；(4)使用每个行业所需的就业结构的假定，按行业将就业人口划归各种职业类别，然后进行跨行业汇总，求得整个经济所需要的各类职业的人数；(5)做出某级教育适合某种职业组别的假设，将职业需求转换成教育计划。按照这5个步骤，可得出未来某年的人力需求的估计数。通过对人力存量和流量的调整，可以使这一年的人力供应刚好与需求相符合。其中人力的经常性存量必须根据因退休、死亡、迁出等而预计的减少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未来某期人力供给和该期估算出的人力需要之间的缺口，假定必须通过学校体系的产出来满足，这样，一旦确定了人力需要，剩下的工作就是作出计划，使学校体系培养的各种专业学生的流量，刚好填补有计划的人力需要的缺口。这套方法要用到一套固定系数，计算人力需求量的推导过程是：国民生产总值→行业结构→行业总就业→就业的职业结构→就业的教育结构。其中第一个箭头表示行业结构，第二个表示每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或就业弹性，第三个表示职业混合，第四个表示教育和职业的联系，每个箭头都是一套固定的系数。人力计划方法的主要困难在于各种固定系数的不现实性。因为在实际生活中，这些系数通常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化，因而是不稳定的、难以预测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考虑教育的成本。尽管如此，由于人力计划所作的人力需要预测毕竟能给有关部门提供教育发展的大致方向，发展中国家仍在使用这种方法来制定教育发展计划。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人力资本亦称人力资源，指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它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将使国民收入增加。人的生产能力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其获得的渠道包括医疗保健和营养、教育和训练两个方面，前者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和精力；后者提高一个人的生产技能。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生产能力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包括直接的支出和因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放弃的收入。由于这些成本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有关，所以称其为人力投资。人力投资越多，人力资源存量就越大。6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考察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普遍认为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主要表现为：(1)提高物质资本使用率。以利用外资为例：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大量引进外资，以求经济迅速发展。然而，2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并未产生预想的效果。与此相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受严重创伤的西欧和日本在利用外资方面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明确指出，原因在于人力资源的巨大差异。而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极为低下，资本吸收能力低，在这种人力资源的约束下，大量地引进外国资本并不能较快地提高经济效益。(2)产生余值增长率。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国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国民资源增长率的差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1967年对英、美、西北欧等9国1950—1962年的经济增长来源作了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都大于其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产出与投入同比例地增长，而且，若再考虑到报酬递减的因素，产出的增长应慢于投入的增长。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余值增长率呢？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一是劳动者素

质的提高。后一个因素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因素。据舒尔茨估计，美国1929—1959年的余值增长率大约是$\frac{3}{5}$，其中教育的收益可能占这个余值的$\frac{3}{10}\sim\frac{5}{10}$。丹尼森也计算出，教育、医疗卫生、知识增进等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在一起，占余值增长率的60%以上。（3）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研究后的结论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年限与他所获得的收入成正比例变动关系。一般认为，收入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这样，从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中又可以看到人力资源是增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共识，于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人力资源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也随之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一项必要的研究内容。

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和政策（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of Human Resource） 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发展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建议和政策措施，包括人口、就业、教育三个方面的内容。由于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因而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应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发展中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过高和教育投资效率低下。相应地，其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目标也应该是：降低人口增长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教育投资效率。当今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持续下降的死亡率和居高难下的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是经济进步的必然趋势。因此，要减慢人口增长速度的唯一途径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高的原因在于抚养子女的成本很低。所以，控制出生率的关键在于，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子女的抚养成本。主要措施有：（1）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扩大妇女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2）提高各级正规学校教育的个人学习费用，特别是大学教育的私人费用。（3）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险制度。（4）建立一套计划生育奖惩制度，使国家可以直接干预家庭的生育决策。（5）改善公共卫生医疗条件和儿童营养状况，提高婴儿存活率。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不仅表现为很高的公开失业率，更重要的是非公开失业规模巨大。失业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因此，解决失业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减少劳动供给；一是增加劳动需求。对此，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比较一致地赞成全面的城乡就业战略。内容是：（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具体方法可以是：发展乡村工业，主要是那些能吸收大量劳动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改变不利于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把现在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和舒适的环境逐步向农村扩散，以减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动机等。（2）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缓和人口流动。可以采用取消或调整最低工资法，实行城市工资的最高限额和收入累进税制等。（3）消除要素价格扭曲。（4）选择适宜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投资效率不高。具体表现为辍学率高、教育脱离实际、知识失业和智力外流。对此，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提高投资效率为中心的教育发展战略与政策。具体内容是：①调整教育体制的投资方向。即放慢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加快中小学教育特别是乡村小学教育的步伐。②改变教育体制以外的各种刺激，包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和企业改变按文凭挑选劳动者的方法等。③减少对高等教育的补贴。④改善各级学校教育体制。包括编写适合本国特点的教材和参考书；开设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的课程；创办和发展本地所需的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机构；按照对本国的贡献来衡量学术研究成果；等。⑤制止智力外流。一般认为，为国内专门技术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尽量缩小穷国科技人员收入水平与富国的差距，将是留住人才的较好的战略措施。上述人口、就业、教育三个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主张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全面考虑人力资源问题，统筹制订综合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和政策，使人力资源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一致。

人才外流（Brain Drain） 见“智力外流”。

人口迁移（Populatien Migration） 人口自愿地从一个地区迁到另一个地区。分为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两种情况。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极其复杂，因为迁移是一个人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教育和民族等多方面的背景下所做出的选择。一般认为，与人口迁移有着密切关系的非经济因素有：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人口因素、文化因素、交通通讯因素，等等。但是，人们一致认为，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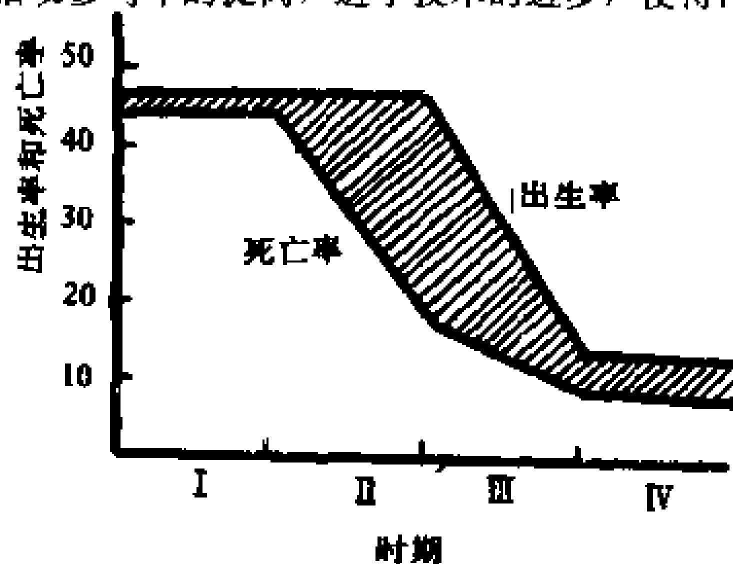
国际迁移指人们为着寻找较好的经济机会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流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许多国家实行了劳动力流动政策和国际航空运输的日益发达，使人们能够为了寻求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从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迁移。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高低不等的收入水平差距，劳动

力迁移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大量出现。关于国际性人口迁移的经济影响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曾有分析认为，劳动力输出国至少可从中获得5点好处，包括：(1) 有助于减少国内失业；(2) 迁移者对国内家庭成员的汇款，会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和储蓄的增加；从而对物质资本的形成提供刺激和外汇来源，推动长期经济增长；(3) 过剩劳动力从乡村流出会提高土地——劳动的比率，刺激乡村部门的经济增长；(4) 归国的迁移者会带回发达国家的先进技艺，有利于国内人力资本的形成；(5) 处于不利状况的劳动力迁移到国外并取得高工资，有助于改善国内的收入分配状况。但是，还有一些从深入考察发展中国家实际状况的研究，却对上述有益性提出了否定意见。他们认为，(1) 迁移到国外的劳动者大多是熟练工人，由此造成了劳动力输出国的人材外流，一旦造成熟练工人的总量短缺，也就必然加剧了不熟练工人的失业；(2) 由于国外汇款往往被迁移者的家庭成员用于消费而很少用于储蓄，造成了过多的消费需求；(3) 在乡村，一方面年轻、强壮劳动力外流，另方面迁移者寄回的高收入会引起闲暇对劳动的替代，致使农村处于劳动力过度迁移，农业生产总值下降的困境；(4) 大多数情况下，学到技艺的迁移者不愿回国工作，或有的劳动力回国后发现他们所学的新技术不能在国内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运用而成为"过于熟练"的劳动力；(5) 由于出国需要的诸如机票、代理费之类的最初投资，显然是贫困阶层所难以承担的，所以来自国外的汇款也只会流入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使其富上加富，加剧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此，他们建议，允许国际性劳动力迁移的政府，须采取有效的手段控制国际性人口迁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此外，还有一些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或种族方面的原因的人口迁移，形成了日益增多的世界性难民。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迁移，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隐蔽失业者为了改善自身的贫困境地，大规模地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其影响因素包括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两个方面。拉力因素是城市中较高的劳动报酬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与农村的农民相比，发展中国家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要高出2–3倍，这一原因强烈地吸引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来自农村传统部门的推力因素，与农村中有限的工作机会和教育、运输通讯的发展有关。农村由于较高的生育率产生了剩余劳动，由于补充资源有限，剩余劳动很难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因此这些劳动者流入城市的损失或机会成本是很小的，从而刺激了他们到城市去找新的就业机会。此外，教育、通讯和运输的发展，使农村的青少年开阔了眼界，并且较为便利地迁移到城市去，也成为一个刺激的因素。由于城市的失业率很高，迁移者有可能在一定时期找不到工作，使得农村的隐蔽失业转变为城市公开失业。托达罗模型对于这种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

人口转变（Demographic Fransition）　人口统计上，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稳定人口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过程。是对世界各国人口变化过程的概括反映。人口增长率等于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依照这种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动关系，西方经济学家将人口增长过程描述为四个阶段，并统称为人口转变。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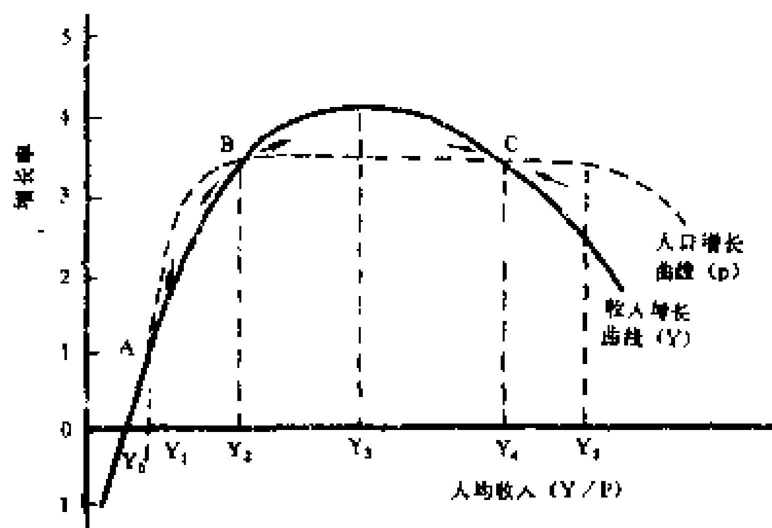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率非常缓慢。这个阶段基本上反映了19世纪以前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这一时期的人口再生产没有受到人为的控制，出生率接近生物学的最大量。同时，由于饥荒、瘟疫和战争，死亡率也很高。第二阶段，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却没有下降，二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人口增长率激增。这一阶段发生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和医学的进步，健康和营养状况大大改善；但人们生育观念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使得出生率并没能伴随着死亡率而下降。第三阶段，死亡率仍在下降，但速率放慢。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人口增长率逐渐减低。这一阶段大致反映了本世纪初到50年代的人口增长情况。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妇女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率的提高，避孕技术的进步，使得出生率



下降幅度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第四阶段，出生率、死亡率下降趋缓，人口增长率趋向于零。这一阶段出现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进一步降低死亡率的代价越来越大；从而越来越难于达到；较低的出生率反映着希望建立较小家庭的新愿望；以及其他人口的和经济的力量，使得低出生率伴随着低死亡率，人口变动趋于稳定。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接近完成了这种转变，即开始进入了人口转变的最后阶段。但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处在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

段初期，人口增长仍然迅速。

人口陷井（Population Trap） 马尔萨斯提出的解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又称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井。如附图所示：



在人均国民收入最小值 y_0 上，人口增长率的变化是0，形成稳定的人口规模。这时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抵，人们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绝对水平，处于贫困阶段。在超过 y_0 的水平上，人口规模在死亡率下跌的作用下开始增大，这时较高的收入意味着饥饿和疾病的减轻。由于出生率总是被限定在生物极限内，下跌的死亡率推动了人口的激增，在人均收入水平 y_2 上，人口增长达到了最大值。图中，总收入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首先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总收入增长速度也就越快。其经济原因是储蓄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成正比例变化，但是当人均收入超过一定点 y_3 时，收入增长曲线就停止上升并稳定下来，然后又开始下倾。这是由于投资增加，更多的人寻求工作，而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却固定未变。图中的两条曲线相交成A、B、C三点。A点是一个均衡点，它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值是 y_1，在A点左右，任何小小的运动都会使人均收入均衡值重新回到 y_1。由于当人口增长快于收入增长时，人均收入肯定要下降；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从 y_1 走向 y_2 时，人口增长率就会超过总收入增长速度，即图中显示曲线P的点都高于Y的点。所以，A点的右方人均收入一定会从 y_1 —— y_2 之间所有的值上返回到它的最小值 y_1；A点左方收入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也会使人均收入水平的均衡值重新回到 y_1，也就是回到A点的低水平均衡，即人口陷井中去。按照马尔萨斯的解释，除了通过节育这一预防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外，穷国永远也不可能把它的人均收入提高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上。在缺乏预防措施的条件下，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方法——饥饿、疾病、战争等——必然发挥其控制的作用。另外，图中的B点是一个非均衡点。假如人口得到一定控制时，由于投资和工业化的作用，人均收入能够迅速从 y_1 跳跃到 y_2，那么人均收入将继续增长，直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C，反映到人均收入水平上就是 y_4。可见，B点这一非均衡点的特征在于，它或向左或向右地运动着，最终达到A点或C点才能稳定下来。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理论因没有考察技术进步的因素，同时又假定一国的人口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有着直接的正相关的关系，而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反对者认为，迅速和持续的技术进步可以使收入增长曲线向上移动。这样，在所有人均收入水平上，收入增长曲线都能够高于人口增长曲线，因而人均收入将一直稳步增长，所有的国家都可能逃脱人口陷井。

人口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 世界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高自然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并存所导致的人口的快速增长，称为人口爆炸。人口增长的趋势主要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对比。如果出生率小于死亡率，人口将绝对减少；如果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人口则绝对增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死亡率下降，但由于教育水平和传统观念等因素，出生率却仍被维持在过去的高水平，致使出生率大大超过死亡率，造成人口爆炸性增长。人口增长过快，以至于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就会使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因此，人口爆炸将导致饥荒形式的灾难。到目前为止，节制生育被认为是防止这一灾难的唯一办法。

人寿保险（Life Insurance） 人寿保险属于一种个人保险。它由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合同规定，在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公司向被保险者所指定的受益人支付一笔费用。被保险人到一定年龄后，保险公司向他或指定受益人支付一笔费用。人寿保险有多种形式，其中定额终身保险与定期保险是人寿保险的两种主要形式。定额终身保险规定，由被保险人每年向保险公司交纳一笔固定的保险费，直到他死亡为止。保险费的多少因被保险者的年龄不同而不同。定期保险情况下是按年龄分组，分若干年龄段，每一年龄段为一组。被保险者所交给保险公司的费用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每一年龄组的被保险者所交纳的费用的高低由该年龄组人的平均死亡率决定，平均死亡率越高，被保险者所交纳的费用越高。

人类技能理论（Human Skill Theory） 又称为新要素理论（a neofactor theory）人类技能理论的思想最初是在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基辛（D·B·Keesing）提出的，是基辛试图解开里昂惕夫之谜而对生产要素的概念重新探讨的结果。

人类技能理论认为，生产要素中资本的定义也应包含人类技能，称为劳动技能，劳动技能的创造需要储蓄和投资，因而，人类技能可视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要素而加入赫克歇尔——欧林理论中。以此为基本论点，基辛利用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来探索劳动技能与美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之间的关系。基辛将劳动力资源按照技术熟练成度划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两类，又依据统计数字，得出了美国外贸商品结构中出口品与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所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比例，如下表：

美国进出口品中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比重表(%)

	出口品		进口替代品	
国家	熟练劳动	非熟练劳动	熟练劳动	非熟练劳动
美国	54.6	45.4	42.6	57.4

从上表中就可以看出，美国的外贸商品结构中，出口品中熟练劳动的比重较进口替代品中熟练劳动的比重高出12个百分点，而出口品中非熟练劳动的比重则比进口替代品中非熟练劳动的比重低出12个百分点。与其它国家，如德国、印度等相比，美国的出口品中熟练劳动的比重是最高的，而进口替代品中非熟练劳动的比重又是这些国家中最低的。这表明美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进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由于美国的教育水平普遍地高于世界上其它国家，可以认为美国最为充裕的生产要素是人类技能，这样，美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进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与赫克歇尔—欧林关于一国要素禀赋状况决定其贸易结构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更进一步，人类技能理论认为人类技能是总资本的一部分，与有形物质资本共同构成资本这一生产要素，从而在讨论美国外贸商品结构的时候，不仅应将有形物质资本计入总资本，而且应将人类技能做为人力资本同时计入总资本，这样最终就会较大幅度地提高美国外贸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劳动比率，而形成高于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从而消除了里昂惕夫之谜，表明了美国的外贸商品结构是：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验证了赫克歇尔——欧林要素禀赋理论。

西方学者认为，人类技能理论的提出扩展了赫克歇尔——欧林要素禀赋理论的内容，丰富了赫——欧理论中关于生产要素的概念，在特定角度下解开了里昂惕夫之谜。

人力政策（Manpower Policy）　又称"就业政策"，是一种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提高劳动市场职能，以减少失业的经济政策，属于供给管理政策之内。劳动市场的不完善是引起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因此，改善劳动市场的结构，完善其职能，是减少失业，特别是降低自然失业率的重要途径。人力政策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在现有的劳动供给与需求为既定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职业介绍与指导机构，为劳资双方传递信息，进行指导，使工人和工作机会更好地配合，以减少寻职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第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利用各种短期培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按社会需求培训有某种技能的工人，改变劳动市场结构，使之适合社会的需求，消除由于技术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失业与空位"并存现象，或技术性失业。第三、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协助工人进行流动，特别是鼓励工人由劳动力过剩地区向劳动力不足的地区流动，以消除劳动的地区性结构而造成的失业。此外，还可以采取一些增加就业机会的措施，特别是为那些在劳动市场上"处境不好"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以便消除这部分工人的"失业硬核"。这些人力政策现在得到广泛运用。

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　一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的思潮，战后在美国形成，并在50—60年代盛行于美国等西方世界。这一名词最早是美国商会会长E·约翰斯通（E·Johnstone）在1942年出版的《不受限制的美国》一书中所提出的。他认为人民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第一、普遍都有储蓄的人口，即人人都有资本。第二、对所有想以储蓄进行投资的人都普遍开放投资机会。第三、公平的竞争使物价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956年2月美国新闻总署和美国广播公司在华盛顿举办了一个名为"人民资本主义"的展览会，以宣传"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是资本家"为宗旨。此后，人民资本主义一词就广泛流传了，人民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也不是经济学，而是一种社会思潮。宣扬这种思想的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新闻记者、政论家，及政治家等各种人物，其代表作有M·萨尔瓦多里（M·Salvadori）的《自由经济学：当代美国资本主义》，L·凯尔索（L·Kelso）和M·阿德勒（M·Adler）的《资本家宣言》，以及一些文章。这种思潮的中心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消灭或纠正了重大的缺陷，成为一种具有人民性的资本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资本民主化，即股权分散化。20世纪初以来，由于股份公司的迅速发展，股票广泛发行，不仅是中产阶级，而且普通人民也拥有了一定量股票。这种股权分散的现象在二战后更为普遍。从理论上说，持股票者就是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之一（但实际上大量持有小量股

票者根本无法参与公司经营），由此就推导出，资本已民主化，人人都是资本家的观点。第二、经理革命的出现与经济制度的建立。股份公司的特点之一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这样，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就出现了一个专门负责经营管理的"经理阶级"，建立了一种"经理制度"。这种变化被称为"经理革命"。经理们不象资本家那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关心工人，关心社会，这就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三、收入革命，即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实现。由于所有权的分散，工会的斗争，政府实行累进所得税与福利政策，使收入分配趋向平等化，从而人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贫富差距缩小。这些观点反映了战后美国的某些变化，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思潮只是一种宣传，并不是什么理论。所以，60年代后期以后，这种思潮就不再盛行了。但它的某些观点对某些经济学流派仍然是有影响的。例如，股权的分散与经理革命的观点是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二元体系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 也称次级市场或称流通市场（Circulation Market）。它与一级市场相联系，其职能与一级市场的职能互补，即为已发行的证券提供变现能力的市场。其作用主要是：(1)使证券持有者在需要支付现金时能够出卖证券，使之变成可以支付的资金（即现金）；(2) 使新的资金盈余者有投资的机会。

七十七国集团（Group Of 77） 七十七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与压迫、打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在1964年3月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与会的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七十七国集团由此得名。目前该集团的成员国已大大超过了77个，但七十七国集团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该集团的宗旨是加强发展中国家间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团结和合作；在贸易和经济发展问题上，确定共同的目标，制定联合行动的纲领，采取集体谈判的策略，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推进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与发达国家开展的斗争；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七十七国集团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它通常是通过举行部长级会议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而这种会议往往在重要国际经济会议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之前举行，以便协调立场，判定共同的对策。1967年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拟定了发展中国家在第二届贸发会议上采取的立场；1974年的部长的会议为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起草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并在联大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1979年的第四次部长会议通过了《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1988年的部长级会议签署了第一个多边全球贸易优惠制，与会的48个发展中国家将就1500种商品的贸易互相提供优惠。总之，七十七国集团在其成立以来同发达国家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它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迫使发达国家不断作出让步，这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X–效率（X–Efficiency） 是指某厂家购置和使用投入物品的效率。这个名词是H·利本斯坦于1966年首次提出的。过去，许多人认为，关税和垄断等限制条件对于最适度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负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实际结果却很低，这部分作用大约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原因解释方面，利本斯坦认为，一般公司的经营水平原来就比人们想象的低，尚达不到X–效率的要求，即达不到购置和使用投入物的最佳效率状态，所以各种限制条件，对这些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例如，某厂商受政府的保护，在竞争条件不充分或者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着效率不高的经营活动，从而降低了本可以达到的利润水平。由于垄断，厂商可以从其价格上轻易获得利润，必然不注意节约，因此总体经营水平也下降了。因此，随着垄断的存在并加强，竞争压力减少，X–效率开始下降。X–效率在人际关系方面是指管理者与受雇佣者的关系，如管理者如何分配受雇佣者的工作，如何刺激其生产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等。X–效率是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为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提供了一个努力方向。

X—非效率（X—Inefficiency） X—效率是指某厂商购置和使用所投入物品的效率。如果这一效率低于本可以达到的最适状态，那么就称之为X—非效率。一般情况下，企业的非效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非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一般要伴随着成本支出的增加，但非资源配置的效率的提高一般不会伴随着成本支出的增加。原因是由于厂商在经营过程中由于有各种条件的限制，经营水平没有达到X—效率的要求，因此，努力消除这些限制，X—非效率就会减少，从而提高效率。例如，管理者和受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和协，以致于受雇佣者的劳动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此时如果改善劳资关系，在不增加成本支出的情况下，就会提高经营效率。

二元体系理论（Dualitty System Theory）　美国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在1973年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系统论述，用以分析当代美国社会的一种理论。加尔布雷思认为，尽管现代美国社会已经是一个“丰裕社会”，但仍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贫穷和其他丑恶现象，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社会。其根源是由二元体系所引起的权力分配不公平。二元体系理论正是要分析这一问题。所谓二元体系是指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两部分，两个体系所构成的。一部分是有组织的经济，即由1000家左右大公司所组成的计划体系，另一部分是分散的经济，即由1200百万个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所组成的市场体系。这两个部分各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它们既互相联系，又有着显著的区别。由大公司所组成的那一部分之所以称为计划体系是因为大企业规模大、技术复杂、投资大，所以从筹备建厂到生产出产品，中间经过很长的时间。因此，大公司要求安全与稳定，需要有预测与计划。于是，它们实行计划生产与销售，并且要控制价格。各大公司有自己的计划，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使整个体系都有计划，因为这些大公司之间更易于达成协议，采取一致的行动。在计划体系中，生产者控制了生产与价格，用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市场调节的作用已让位于计划原则。另一方面，由于某些行业在地域上的分散性，行业本身的特点，或者大公司生产或社会生活的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分散、弱小的经济单位。在这部分经济中，市场原则仍然在发挥作用，生产与价格仍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生产者仍要受市场力量的支配，所以称为市场体系。在经济中，这两个体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计划体系由于权力已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手中，所以，不再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而是以稳定和增长为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增加内部积累以摆脱银行界的控制。大公司的这些变化，使它们有控制产品和原料价格的权力，有控制产品销售量的权力，有控制资本来源的权力，有影响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权力。这样，计划体系在经济中就处于有利的地位，它们的目标——增长——也成为社会的目标。而市场体系在经济中却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主要在于：生产者难以影响消费者，这里仍然是消费者主权占支配地位；资金来源仍然依靠银行体系；缺乏进行技术革新的资金与力量；在与工会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小企业之间缺乏联系；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二元体系并存而且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它们之间权力与收入的不平等，计划体系处于权力结构的上层，剥削市场体系。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减少支出，提高利率或增加税收的政策对计划体系损害并不大，有时还有好处，而对市场体系则打击甚重。从而这就加剧了两个体系的不平等。两个体系的这种状况使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引起了其他社会问题。因此，加尔布雷斯主张改革二元体系。这首先要在信念上实现解放，即打破计划体系的目标——增长——也是公共目标的信念。然后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扶植市场体系，限制计划体系，使它们的权力平等化，收入平等化。二元体系不平等的消除就是“新社会主义”的实现。二元体系理论是加尔布雷思理论的中心，在当代新制度学派经济学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厂商理论（Firm Theory）　厂商是市场经济中基本的生产组织单位，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曾经形容厂商是“市场关系的大海中的自觉协作的小岛，就象凝结在黄油牛奶中的一块块黄油那样”。商号、合伙以及公司都是厂商，在许多现代文献中，合作社、非赢利单位（如大学、医院）以及某些政府机构也都以厂商论处，生产同一种产品的厂商组成产业。厂商的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利润最大化。既然厂商是“自觉协作的小岛”，而协作一般都认为是针对某个或多个确定的目标，对于厂商来说，这个目标通常是假定为利润最大化。在这个假定中，如果成本和收益是由一些可控制的变量诸如产出、存货、广告支出等决定的，那么厂商理论就不过是一个微积分练习。例如，令收益和成本都是产出的函数，分别为R（q）、C（q），厂商将选择产量

$$\max\pi = R(q) - C(q)$$

一阶必要条件为

$$\frac{d\pi}{dq} = \frac{dR}{dq} - \frac{dc}{dq} = 0$$

这个方程隐含着厂商的供给函数，但是，近期一些文献开始研究了非利润目标和多重目标，这些被考虑的目标有总收益、收益增长率以及管理者的特权等，在存在多重目标场合，厂商使其效用函数最大化，这个效用函数包括利润、收益和收益增长率等。

2、其他目标最大化。假定厂商的目标不是使其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利润之外的某个目标的最大化，例如，在大量的文献中，都把工人合作社当作厂商，并且假定，合作社是追求劳动的平均净收益产品最大化。还有，对于非赢利的医院，假定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合理的，医院是使其效用函数最大化，这个效用函数包含有医生的收入和名望等。在厂商理论中，成本函数通常都是从给定的生产函数中推导出来的，生产函数一般表示为$q=f(x_1, x_2 \cdots\cdots x_n)$，q为产量，$x_i$为第i个投入量，“好的”生产函数都具有这

样的性质：$\frac{\partial^2 f}{\partial x_i^2}<0$. 这个性质描述了报酬递减规律，生产函数代表了厂商的给定的可利用的技术，这个技术也可以由成本函数描述。$C=g(q,w_1,w_2\cdots\cdots w_n)$，$w_i$ 是第 i 种投人的价格，函数 g 是通过使 $\sum_{i=1}^{n} w_i x_i$ 最小化（在前面方程的约束下），从 f 中推导出来的。厂商的收益函数是从需求条件中推导出来的，假如这些需求条件是确定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对于厂商是一个给定的参数，因此，收益与产出成正比；在垄断条件下，价格将随产量增加而下降，因此，收益的增加小于产量的增加，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将在低于社会有效产出处生产，这意味着资源配置低效率；在寡头垄断中，厂商收益函数可能不能确定，因为此时厂商的收益不仅要依赖于其自身的产出量，而且还要依赖于其对手的产出量，如果对手的策略不了解，厂商的收益函数也就无法确定，这个问题在寡头垄断理论中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3、追求满意。在假定厂商追求最大化时，我们总是认为厂商的决策者具有完全的理性并拥有无穷无尽的信息。但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此提出了批评，他建议以满意代替最大化，追求满意程度的决策者并不追求最大化，而是追求满意水平的利润（收益、增长率等），一旦达到满意水平，决策者就适可而止。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有限理性理论对于厂商理论中的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回答，例如，它不能给出一个很好的供给函数，因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继续依赖于最大化理论。还有一些研究指出，由于垄断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更多是由于厂商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不能生产出其所使用的资源所能生产出的产量，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 X—非效率，不过，如果垄断地位保护了 X—非效率的存在，那么由于垄断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就会比上述研究所表明的要大得多。在厂商理论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厂商？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个体活动都是由市场来协调？在厂商内部的个体活动为什么不是由市场来协调？这个问题是由科斯提出来的，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关注。

三　画

工厂形态（Factory Form） 指为了生产产品在一定的场所集合生产设备的形式。取决于产品的生产形式的工厂形态有以下类型：1、单一产品生产工厂，即生产特定的单一产品的工厂。2、多种产品生产工厂，指生产二种和二种以上产品的工厂。多种产品生产工厂可区分为以下形态：(1) 结合生产工厂。指通过共同的过程或设备结合生产多种产品的工厂。典型的如炼焦厂同时生产焦炭和煤气；汽车厂在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多种汽车。(2) 垂直集中的工厂，指生产的连续性阶段集中于一个工厂。典型的如炼铁、炼钢连续化生产的工厂。(3) 多角化关联型工厂。指生产在生产技术上互相关联的多种产品的工厂。典型的如，多种产品的某些生产阶段通过共同的生产过程完成，其它生产阶段则分别完成。(4) 非多角化关联型工厂。指通过多条生产线生产在生产技术上几乎互不关联的多种产品的工厂。

工厂规模（Factory Scale） 指工厂的生产能力，一般用单位时间内工厂的最大可能生产量度量。

工厂委员会 在许多西欧国家，劳资关系比较集中，大多数集体谈判是在国家产业一级和地区一级工会与资方之间进行的，工会在工厂里不起积极作用。而且由于政治或宗教原因，在同一工作场所或同一职业中，相互竞争的工会代表着不同的工人团体，各种工会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分歧，要在工厂成立一个强大的工会十分困难。因此，法律规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工厂委员会，它具有代表工厂工人的代表权。在一些国家，工厂委员会的成员仅由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而在另一些国家，工厂委员会的成员由工人代表和资方代表组成。尽管工会在选举工厂委员会代表时常常起着重要作用，但工厂委员会与工会之间没有正式的工作关系。不象工会那样仅代表其会员，工厂委员会有责任照顾到一个企业全体工人的利益。工厂委员会不进行集体交涉，在有些国家，法律禁止它处理属于集体谈判内容的问题。瑞典的工厂委员会的法律责任是监督合同和一般劳动法的执行情况。在荷兰和其他几个国家，如果资方打算解雇工人必须向工厂委员会进行说明。在西欧，工厂的管理权限受到法律上任命的工厂委员会管理办法的限制。

工厂交货价（Ex Works，EXW） 国际贸易价格术语中的一种，属出口国内陆交货的价格术语。在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将矿山交货价(Ex Mine)、农场交货价(Ex Plantation)、仓库交货价（Ex Warehouse）都列入工厂交货价中进行统一解释。依照解释通则的规定，在工厂交货价下，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分别为：

A、卖方义务：

1.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货物及有关凭证；

2.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货物置于买方控制之下，并使装上买方提供的运输工具；

3.自费提供货物的惯常包装，以便买方得以受领货物；

4.合理地通知买方，货物于何时置于买方控制之下；

5.负担将货物移交买方控制而需支出的检查费用，如品质检查费、过磅费等。

6.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和费用，直至货物依照合同的规定时间，置于买方控制之下为止，但以上项货物已清楚地划收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7.根据买方请求，并在买方负担风险和费用的情况下，给予买方协助，以使买方获得交货地或原产地国家签发的，为买方所需的出口、进口或必要时经由第三国过境运输的任何凭证。

B.买方义务：

1.在卖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货物置于买方控制之下时，受领货物，并依照合同的规定支付价金；

2.自货物移置于买方控制之下起，负担货物的一切费用和风险，但以上项货物已清楚地划收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3.负担因货物出口而征收的一切海关捐税；

4.对受领货物或选择交货地点，如曾保留一定期限，而未能届期给予指示，则应自该期限终了时起，负担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和货物的一切风险，但以该项货物已清楚地划收为该合同项下为限；

5.负担因领取卖方义务(7)条款下所述证件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原产地证明书，出口许可证及领事签证费用在内。

采用工厂交货价格术语，交货地点是出口国内陆约定地点，所标明的交接货物地点都在陆地上，不涉及海上风险，只涉及陆上风险，价格术语下的买卖合同，在出口国家签订并执行，受卖方所在国家的法律管辖。

在工厂交货价格术语下，进口商在出口国家的工厂、矿山、仓库等地买进货物后，需自行负担接货后的风险和费用，并办理货物出口手续。事实上，采用工厂交货价格术语，卖方是依照国内贸易的方法进行交货，而买方只有在卖方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或派有常驻代理的时候，才会接受这一做法。工厂交货价格术语主要是应用于陆地接壤的国家之间。

工贸结合（Combination of Industry & Trade）

工贸结合是我国发展外贸的一种新方式，它是指通过各种途径把生产部门和贸易部门结合起来，以推动外贸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企业和外贸企业互相脱节，严重影响了外贸的发展。工贸结合将密切产销关系，更好地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和发挥各自的优势，不断提高外贸工作的效率，更好地发展出口贸易。从我国开展工贸结合的实际情况来看，工贸结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生产企业获得出口权，成为工贸合一型企业；工贸双方共同投资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企业，对生产和贸易进行共同管理和领导，风险共负；建立包括众多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企业集团，由企业集团董事会统一领导生产和外贸；实行外贸代理制；等等。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在经济发展中，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或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渐进的、长期的。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衡量一国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工业化的内容一般包括：(1) 逐步建立起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门类齐全、结构和分布合理的工业体系；(2) 在国民经济中，工业的地位超越了农业，成为工业国家；(3) 在工业中，重工业或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占主导地位；(4) 能够不断地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工业化的过程一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比资本品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成为主要的工业部门；第二阶段，在消费品工业仍占主要地位时，资本品工业增长加速发展，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迅速发展，超过消费品工业而占据主导地位。世界历史上的工业化过程是自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以后，美、法、德、俄、日等国家相继开始了这一进程，并且逐步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鉴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发展中国家也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纷纷制订发展工业的战略规划。大多数国家采用了进口替代的方法，也有些国家采用出口鼓励的方法。结果，只有少数国家取得成效。大多数国家则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令人失望的困境。有些国家是由于忽视农业，将大量可利用资源集中于工业，造成了经济结构失衡；有些国家则因市场规模狭小，国际收支恶化、与进口商

品竞争之前的保护代价太高，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等各种不同情况，并未获得预期的明显好处。于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业化目标和战略。

工业集中（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垄断竞争的现象之一，指的是少数几家大企业在某产业中的产量或销售量等占相当大的份额的情况，因此，工业集中相当于寡头垄断。

工业国有化（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y） 政府把以前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工业部门或工业部门中某一企业的所有权及其业务接收过来的行动。有人认为能通过国家资金的直接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和更有效地协调运转来提高生产效率。理由是：第一、国家信息丰富而准确，国家的投资是产业中急需发展或者短缺的部门，因此，国家投资有较高的效率；第二、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集中庞大资金，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第三、国家可以对国有企业进行各方面的扶持，为企业提供帮助；第四、国家掌握所有权，可以实现分配的合理、降低贫富差距。但有的人则认为，政府的接收和管制是不必要的，而政府所有制通常表现出来的特色是机构庞杂和过度集中因而费用太大。理由是：第一，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除了部分经济手段外，更主要的是行政手段，而这种手段与市场机制相比要差，它不会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为现代社会信息丰富而又千变万化，由于政府工作效率缺乏机构庞杂而错过大好时机。第二，政府的企业由于依赖性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只是生产者，因而无法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致使企业营运效率低下。工业化国家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部分地实行国有化，如铁路等行业的国有化，但由于这些企业无法和私营企业竞争，后来又逐渐地私有化了。除了上述定义外，工业国有化被一些国家用作消除其基本工业中外国所有权的手段。这些国家主要是二战后新成立的国家。

工业化城市（Industrialized City） 工业化革命发生后出现或形成的城市。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迅速而起的城市化潮流，使城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前工业化城市相比，工业化城市具有如下方面的特点：(1) 自然特征。一般都是有面积大、开放型的性质。城市人口占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在社会成员中，等级、职业和宗教方面的交流相对增加或提高。(2) 功能与社会结构。城市成为社会中制造业、金融业、商业和社会文化活动协调的中心。基本上不存在固定的社会阶级结构，上层社会由少数的商人、科学家组成。中间阶层由大量的参加技术工作的人组成，科学劳动的地位大大提高。(3) 经济结构。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社会财富主要来自工资和资本；商业活动的地位提高，市场一般具有国际性，存在着大量整年度的存货；有全国的工会；生产经营专业化程度提高，服务区域广；价格制度比较统一；讲究时间效率，工作时间规划，生产也出现标准化。(4) 宗教组织。政教分离，宗教组织权力薄弱，并为中间阶层所操纵，其神秘色彩逐步消失。(5) 政治结构。政府建立在公民民主制度之上，政府的功能是通过警察、法院来管理社会，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合理地征收税负。(6) 教育与传播。教育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主要进行技术、科学教育，并进行广泛普及。重视文字传播，广泛保持文字纪录，推行标准化语音，使用印刷体。文化传播一般是大众化和通俗化。

工伤事故发生率 它是工伤事故及其发展趋势的一种测定指标，指每 1，000，000 人一时工作中工伤事故发生的次数。这一指标显示出工伤事故发生的频率。

$$发生率 = \frac{工伤事故发生次数}{人-时数字 \div 1,000,000}$$

工伤事故严重率 测定工伤事故及其发展趋势的一种指标，指每 1，000，000 人一时工作中由于工伤事故而损失的工日。它表明了工伤事故的严重程度。

$$严重率 = \frac{损失工日}{人-时数字 \div 1,000,000}$$

工会（Labour Union） 工会是工人为了在工资水平、工作时间以及就业条件等方面与雇工进行谈判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工会是个民主机构，其核心目的是改善其成员的经济条件。工人们或者按行业或者按专业组成工会，并且地方工会可以加入全国性的工会。美国有 210 个工会及行业协会，代表着两千多万名工人。1978 年，参加工会的工人比率是全部劳力的 22%。全国性、地方性的工会参与就工资及就业条件等问题的与雇主们的谈判。与雇工们签订的合同可能是一个行业的，也可能是跨行业的。有的也许是关于一个工厂的。通常认为工会趋向于提高工资，但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工会没有能力把工资提高到超过均衡水平。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工会表现出作用：解决个别的怨恨、提供解决劳资关系的新途径。在与雇工的谈判中，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工会可以组织工人罢工去迫使资方接受工会提出的条件，但发生

罢工的情形很少，只占谈判总数的3%。工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劳资关系法的保护。而这里工人不仅包括入会的工人，也包括更多的非工会会员。1936年的瓦格纳法促使工会力量增大以致于排斥非工会会员。为此美国于1947年通过塔夫脱——哈特法案重新调整劳资关系。工会作为保障工人合法权益的机构在世界范围得到发展并不断完善。一些工会已经形成世界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会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机构。

工会民主 由于大多数工会并不具有两党制特征，所以工会民主是一种不同于两党政治制度的民主制度，它的理想形式具有以下必备条件：工会会员应该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利，全面地、自由地参与本工会的管理；每个会员应该有权定期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地方工会领导人员，并通过代表选举全国工会领导人员；选举领导人员的权利还包括在会员确信某些领导人滥用职权时对之撤销的权利；工会会员确保有权利在本组织内、在同一资格的基础上竞选，并且执行领导人员职务；要确保工会会员有权无所畏惧地表达自己对工会政策的意见；最后，每个会员还应该具有在公正的工会规章下享受公平待遇的权利。1959年的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力图保障上面提到的所有工会会员的权利，并规定全国工会领导人员至少每5年改选一次，地方工会领导人员至少每3年改选一次，选举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1957年—1959年的麦克里兰国会调查委员会对工会内部的民主程度作了调查，其调查结论是：绝大多数工会的管理是忠诚、民主的，但有些工会明显地缺乏民主程序，比如有些工会章程被滥用或者无视了；个人独裁的情况盛行；工会会员因为恫吓甚至暴力而被剥夺了对工会事务的发言权；在许多工会选举中，并没有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以及全国工会对地方工会滥用托管制度等。1959年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设立的若干条款，其宗旨正在于保证工会程序更具有民主性。

工会代理制企业（Agency Shop） 在这类企业中，工会与资方达成协议，决定不参加工会的所有受雇人员必须每月向工会缴纳服务费（通常相当于正常的工会会费），以供交涉服务之用。这种办法具有分化雇员的性质，且不能为工会提供多少保障。一般工会不愿接受这种协议来取代工会制企业协议，因而集体谈判合同中含有工会代理制协议的比例很小，但有增加的趋势。根据塔夫脱—哈特利法，工会代理制企业是一种合法的工会保障形式，在那些制定了把工会会员作为一项就业条件的法律的州里，都建立了工会代理制企业，除非它也受到州法律的明确禁止。

工会企业（Union Shop） 在工会行业的企业中，一个人无须是工会成员就可以申请工作，不过他必须在受雇佣的一定时间（通常为30天到60天）内参加工会。这种方法为当事的工会提供了很大程度的会员保障，同时对雇主选择雇员却没有什么限制，这同封闭行业或优先工会企业的情况不同。产业类型的工会也愿意采取工会行业而不是封闭行业或优先工会企业，因为它不象技艺工会那样渴望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在美国19个禁止封闭行业的州，工会行业也是非法的，但这19个州都不是高度工业化的。联邦法允许工会行业存在。在其余的31个州，只要当事的公司同意，工会行业就是合法的。由于塔夫脱—哈特利法禁止了州际的封闭行业，而且钢铁工业也从实行会员资格保留条款转而开始实行工会行业，所以工会行业在美国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工会保障制度。

工会会员资格保留条款（Maintenance of Membership Clause） 集体谈判协议中的一种工会保障形式，它要求签约时属于工会会员的工人，在契约有效期内一直保留会员资格。但它通常规定有15天到30天的逃避期，使工人可以在契约生效前脱离工会。这种条款还经常规定，所有新雇员都得填写一张入会申请书，如果新雇员在15天之内不撤销其申请，申请书就自动生效，健忘和惰性常使有些新的工会会员成为这种安排的俘虏。会员资格保留条款虽然并不要求新雇员必须加入工会，不过一旦过了逃避期，它就为工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会员保障。工会一般都不喜欢这种工会保障形式，因为无论同封闭行业还是同工会行业相比，这种方式都不够确定和广泛。1946年美国1/4的工会会员在他们的契约中都有这一条款，但到1960年，在集体谈判中有这一条款的就只有不到7%了。根据联邦法，会员资格保留条款是合法的，而在19个禁止封闭行业和工会行业的州，它都是非法的。

工会的次级内部活动 它是工会基本内部活动的辅助活动，或者说为加强基本活动而进行的支援活动。工会的次级活动包括罢工、联合抵制、纠察、列好名单和坏名单、宣传、破坏以及罢工投票等等。工会采用次级活动，主要是为了加强它在集体交涉中的力量，最后还是要通过集体谈判达到其目的。与雇主相比，工会更倾向于采用次级活动。这是因为，首先，工会通常是攻方，是它要求在劳资协议中增添某些新东西或作出某些改动；其次，由于财经力量的悬殊，工会始终比雇主具有较少的支撑能力和等待能力，这就使工会不能不对雇主施加现时的和大规模的经济压力，以便在他们受迫于经济困境而不得不返回

工作岗位之前求得迅速解决。

工会基本的内部活动 工会在劳工—经理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称为内部活动，其中包括基本的内部活动和次级的内部活动。基本内部活动是工会在这一范围内所进行的主要活动，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工会的承认。一个工会在进行集体交涉之前，必须确保雇主承认它是交涉单位中大多数工人的正式代表。从本世纪30年代瓦格纳法颁布以来，对工会的承认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项法律程序。第二，集体谈判。代表工人同雇主或雇主协会进行谈判，达成定期的劳资协议，这是工会基本活动的核心。因为劳工组织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试图以更有力的集体谈判取代个人交涉。

工作权利法（Right-to-work law） 这是一项州的法律，它禁止在劳资协议中订入诸如工会行业、工会会员资格保留条款以及优先会员企业之类的工会保障条款。在州一级的立法斗争中，雇主及其集团投入大量款项，使其得以通过，工会也同样采取行动来阻挠它通过。州"工作权利法"的重要性，由于1947年通过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第14（b）条的规定而得到增强。14（b）条规定：如果一个州禁止工会保障条款，则该禁令适用于州内所有雇员，包括那些适用联邦劳资关系法的企业中的雇员。因此，如果工作权利法在每个州都被通过，就等于消除了全部工会保障条款，即使这些条款按照联邦法是完全合法的，且其雇员在其他方面受联邦法律约束。在美国，大约有20个州，主要在南部和中西部，通过了工作权利法，在各主要的工业州中实施这项法律的只有印第安纳州。赞成这项法律的人认为工人在不加入任何组织的情况下，也应当有工作的权利；反对者则认为，既然所有的工人都受益于工会，那么就应该交纳会费。这项法律的主要作用是使强迫工人加入工会的规定成为非法，然而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工会在有这种立法的州里比在其他准许"要求工人加入工会"的州里较为薄弱，或是发展缓慢，所以这项法律并不十分有效。

工时立法 早在19世纪前期，劳工组织就在争取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或工作周的长度以缩短工时。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与最低工资法制定的情况相反，联邦政府先于州政府制定工时立法，即使在今天，联邦一级的工时立法也比州一级的立法更为详细。联邦政府最早关于工时立法的规定，是1840年范布伦总统以行政命令规定海军造船厂为10小时工作日。1886年，国会把海军造船厂工作日降低到8小时。20年后，美国政府印刷所的雇员和邮政人员由国会规定了8小时工作日。1892年，8小时工作日扩大到适用于联邦政府雇用的全部工人。1912年，8小时工作日又由国会规定适用于与政府订有契约的公司雇用的全部工人。1916年，国会以亚当森法案为铁路工人制定的工时立法，规定州际铁路服务人员为8小时工作日。联邦政府最全面的工时规定见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一般称为工资和工时法）。该法规定，制度工作周为40个小时，但40个小时并不是每周工作小时的绝对最高额，只是雇主必须对超出每周40小时的工时支付一倍半的工资。联邦政府虽然不禁止工时超过法定标准，但额外的津贴费用，使大多数公司在大多数时间内，工时不会提高到远远超出规定的标准。只有在十分繁荣或全面战争期间，对一般的公司来说，这种额外的工资标准在市场上才是合算的。州立法一般不试图对工时加以总的限制。大多数州法律只限制妇女、童工或有害健康职业男工的工时。许多州对铁路这样的产业规定了工时，因为在这些产业中，工人的疲劳将危及大众的健康和安全。从历史上看，工作周已大大缩短了。1840年美国平均每人每周工作70至80小时，而现在制度工作周一般为40个小时，在某些行业如印刷业、酿酒业以及大城市的许多办公室工作，工作时间更少一些。1940年以前，大多数行业每周的工作时间就降到了40小时；二战以后，平均的工作周长度稳定在40小时，而且增加了节假日天数，在某些带头行业里，节假期超过了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加，固然有工时立法的作用，但更主要的可能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成果。

工资控制（Wage Control） 中央政府实行工资管理企图阻止工资扩张而采取的稳定性措施。在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时，如美国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正常经济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政府被迫对工资实行控制，防止通货膨胀。控制工资的方法，一般是在一定时期内冻结工资，在此期间内工资变动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冻结工资期间，为消除不公平现象和抵消生活费用的上涨，允许进行工资调整。美国工资控制最严格的一次是二战期间，当时成立了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来解决工资纠纷和稳定工资，并成立了经济稳定局来调整工资和管理物价。劳工委员会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撤消，其间共处理了46万份增加工资的申请，使2900万工人提高了工资。从1971年8月15日开始，美国为制止通货膨胀，冻结工资90天，1971年11月13日以后，工资委员会力图使工资增长率每年不超过5.5%。

工资委员会（Pay Board） 美国一个由15人组成的3方委员会，其中资方、劳方和政府代表各占1／3。其职能是制订和执行工资和薪金政策。该委员会成立于1971年10月28日，根据总统所属机构的经济稳定计划而正式行使其职责。工资委员会规定的平均工资和薪金的初始调整标准是5.5%。凡是根据1971年11月13日以后签订的合同或规定的发放工资办法而进行的工资调整，都受该标准的约束。该委员会设在华盛顿。

工资谈判理论（Bargaining Theory Of Wages） 见集体交涉的工资理论条。

工资率（Wage Rate） 工人根据某种单位（如每小时，每星期，或所生产或所出售的每一单位产品）而得到的工资额。一种已经确定的工资率表就是某一家公司或某一个工业部门的基本工资结构。这种结构有以下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计时工资率结构，一是刺激性工资率结构。领取计时工资的雇员每单位时间领取数量固定的工资，而领取刺激性工资的工人则随着所完成产量的不同而领取不同的报酬。

工资（Wages） 所谓工资是指雇员提供劳动，雇主向其支付的报酬。若以实物形式作为工资，是称为实物工资，若以货币形式作为工资，则称为货币工资。工资与薪金（Salary）两者相比较，薪金特别是指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报酬，而工资指普通工人或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从工资理论的发展来看，可分为四个阶段。(1) 生存理论（Subsistence Theory）。生存理论产生于18世纪末，直到19世纪初，是由李嘉图在斯密和马尔萨斯（T.R.Malthus）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得出的。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雇主人数较少，彼此都容易协调，而工人人数多，则不易彼此间协调，雇主通过雇工，购买原材料从事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而控制整个生产过程通常雇主支付工资的总数是固定的，因此，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愈多，工资水平越低，劳动力愈少，工资水平越高。李嘉图在此基础上，结合马尔萨斯人口论而提出，如果工资水平超过了工人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须的工资水平，那么劳动的供给便会增加，而促使工资水平下降，直到降至维持工人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须的工资水平为止。这样，从长期动态均衡的观点来看，工资水平就是维持工人基本生活的工资水平。李嘉图所提出的这一工资决定原理又称为'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2) 工资基金理论（Wage Fund Theory)。工资基金理论是19世纪中期李嘉图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基础上提出，而由穆勒（J·S·Mill）加以修正的。李嘉图认为，在短期里，人口数量不会发生显著变动，因而劳动供给数量是固定的，同时，雇主的工资基金是固定的，对劳动的需求也就固定，这样，工资率的高低便完全确定了。穆勒进一步认为，工资基金的大小虽然由生产法则决定，但所得分配却是由制度与文化决定，雇主通常是尽量压低工资基金水平，工资率的水平并不是绝对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也是有可能的。(3) 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边际生产力理论是在19世纪末的边际革命基础上所产生的工资理论。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在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均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工资率水平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工资率时，厂商会增加劳动的雇用量，反之，则会减少劳动的雇用量，直到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率。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为了维持最大利润，厂商雇用工人数量的决定原则是使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Marginal Revenue Of Product）等于工资，从而厂商获得了'经济租'（Economic Rent)。(4) 议价能力理论（Bargain Power Theory)。20世纪以来，工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组织工会与雇主谈判，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这时，工资率的水平则取决于工会与雇主双方力量的对比关系。工会组织力量越大，工资率的水平越接近于工会要求的水平，而雇主谈判的力量越大，工资率水平的提高则只是很有限的。从而，工资由劳资议价方式决定，各国政府也常常制定工时与工资的法律。

工资物品（Wage Goods） 工资物品在分配理论中，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政治意义。作为维持工人生存的必需品，将工人与地主和资本家分成了不同的阶级。这主要表现在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中。亚当·斯密首先对工资物品概念进行了理论分析，不仅将工人生活必需品归入工资物品，而且包括生活设施，将工资物品的存量作为对劳动的需求。作为货币工资的对应物，工资物品概念也成了斯密探讨谷物价格和货币工资之间关系的基础。大卫·李嘉图则集中将工资物品概念用于解释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工资物品进入了所有产品的生产过程。而非工资物品，即奢侈品则不然，这使得李嘉图对于工资物品与奢侈品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讨论资本构成和工资获得者的纳税能力时，李嘉图和T.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都区分了绝对必需品与工资物品，他们认为劳动者在工资名义下获得的要多于其维持本人和家庭生存的数量。

现代学者已放弃了古典经济学家对工资物品和非

工资物品的区分。但庇古（A·C· Pigou）在其《失业理论》中又一次使用了工资物品概念，庇古的“工资物品”概念是指工资获得者购买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奢侈品，各部分的组成随消费偏好和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凯恩斯也在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使用了工资物品概念，凯恩斯认为实行膨胀性的银行政策，会提高工资物品的平均价格，而降低实际工资率，使得无法出清劳动市场，从而造成非自愿失业。

工资一物价螺旋式上升（Wage-Price Spiral） 一种关于工资与物价互相促进引起或加剧通货膨胀的理论。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工会对工资决定的压力使工资上升，工资上升引起生产成本增加，成本的增加引起物价上升。但这种物价上升又会引起进一步提高工资的压力，因为工人要维持自己的实际工资水平。这样，就会由于物价上升而引起的进一步工资上升而加剧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工资与物价的互相推动，使通货膨胀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引起工资一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关键是工资成本的推动，即工会凭借对劳动力供给的垄断而提高工资，解决的办法是控制工资收入的增加。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通货膨胀可以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工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实际工资而要求增加工资，工资一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关键是物价水平的上升，解决的办法是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无论根据什么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在各国通货膨胀过程中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工资——工资螺旋式上升（Wage-Wage Spiral） 又称“交互跃进”（Leap-frogging），指工资增加引起以后工资进一步增加的一种螺旋式上升过程。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者认为，这是引起和加剧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次工资的增加之所以引起以后工资的持续增加是由于工资确定中的三个特点。第一，工资协议中的攀比效应。只要一个企业或行业提高了工资，其他企业或行业的工会就会不顾本企业或本行业劳动生产率与其他企业或行业的差别，要求向工资增加的企业或行业看齐。这样就使某一特定企业或行业的工资增加标准扩大到了其他企业或行业。第二，要求维持由技术、职业或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工资差别。这样，在社会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后，某些企业或行业的工人为了保持或重建传统的工资差别而要求进一步提高工资。第三，工资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时，工资增长慢的企业或行业的工人就会蒙受实际工资下降的损失，从而会要求增加工资。这样，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工资增加就会引起整个社会工资的增加，一次性工资增加会引起持续的工资增加，从而就引起或加剧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在各工业部门各自进行工资谈判时表现最明显。在各企业或行业内部，在各个等级与工种的工人之间，尤其在计时工人和计件工人之间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工资——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根源在于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即工会对劳动供给的垄断。此外，社会习惯、风尚、人们的心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工资冻结（Wage Freeze） 政府采用法律强制措施，禁止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工资率，是供给管理中收入政策的一种具体形式。这种措施一般是在特殊时期，例如，战争时期或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时期才采用的，一般实施的时间都比较短。例如，英国在二战以后曾几次实行短期工资冻结，在此期间停止履行一切有关工资增加的协议。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工资冻结的同时往往还有物价冻结，所以又称为“工资——物价冻结”。例如，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为了控制当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曾冻结工资与物价三个月。冻结工资除了解决一些特殊时期的困难外，主要有助于在短期内有效而迅速地控制通货膨胀。但是，这种作法有很多副作用。首先是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在长期中不仅不能制止通货膨胀，反而还会引起资源配置失调，给经济带来更为严重的困难。其次，冻结工资不利于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会使劳动生产率下降，降低经济效率。最后，一般的作法是，在冻结工资时期实行法定工资标准，对以后的工资决定有不利的影响，何况在实际执行中也有许多困难。因此，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办法仅仅是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计，应尽量少用，如确实不用不行，也要缩短实施期限，并有其他相应的措施（如稳定物价、稳定就业等）相配合。

工资与物价指导线（Wage And Price Guidelines） 政府规定出工资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标准，用以指导工资和物价的调整。这是政府控制工资与物价的一项措施，也是收入政策的一种形式。根据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通货膨胀产生于工资成本的增加。因此，政府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就根据劳动生产率和其他因素规定出货币工资调整的标准，用以指导劳资双方在工资谈判中确定货币工资调整的幅度。政府规定的货币工资调整幅度被称为工资指导线，它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同时，为了保证工资指导线得以实施，政府往往还要规定物价的上涨率，即价格指导线。由于这两种指导线一般是同时使用，所以合称工资——物价指导线。但限制的重点是工

资，所以，有时也称工资指导线。这种指导线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政府对违背这种指导线的企业一般是采用税收等手段进行惩罚，有时这种指导线仅仅有劝说作用，并没有使之实施的具体手段。由于这种控制工资的作法较为灵活，在许多国家被广泛运用。

工资指数化（Indexation Of Wage）　按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调整工资契约中的名义工资率，以保持实际工资率不变的一种作法。当经济中发生了通货膨胀时，如果名义工资不进行调整，实际工资就会下降，从而引起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雇员的收入再分配。为了保持实际工资不变，在工资契约中就应确定有关条款，规定定期地根据消费物价指数来调整名义工资。例如，"自动调整条款"就是工资指数化的一种具体作法。在实际中，尽管工资指数化也并不能完全抵消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但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工资指数化的不利影响是易于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加剧通货膨胀。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工资粘性假设（Wage Sticky Assumption）　一种关于工资决定特点的假设。其含义是，工资会随着劳动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变动而变动，但工资的变动慢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这就是说，当存在失业时，工资会下降，但这种下降是缓慢的；当存在过度充分就业时，工资会上升，但这种上升也是缓慢的。这是因为劳资之间的工资协议一般是长期的，签订长期工资协议一方面可以节约双方进行谈判，或为进行谈判收集信息等的费用与时间，另一方面工人可以得到较为稳定的工作，资本家也会维持一定的工人数量，尤其是一定的技术工人队伍。从整个社会来看，工资协议是在不同时期签订的。当就业增加时，工资协议已到期的工人在签订新的工资协议时会要求提高工资，但工资协议未到期的那部分工人仍维持原工资标准，这样，整个社会工资的提高就慢于就业的增加。当就业减少时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工资是有粘性的，它的变动慢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然而，工资最终还要随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在长期中，工资的调节仍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种假设较符合工资决定的实际情况。工资粘性假设可以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交替关系中存在的时滞，以及短期总供给曲线变动的时滞。

工资下限假设（Wage Floor Assumption）　一种关于工资决定特点的假设。其含义是，在短期中，工资具有向下的完全刚性和向上的完全伸缩性，即工资有一个最低标准，无论失业水平如何，工资也不会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但当就业增加时，工资却会随劳动需求的增加而增加。根据这一假说，失业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使工资不能下降，以致于无法通过工资的调节来实现劳动市场的供求平衡。这个假说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所以，这种失业被称为古典失业。

工资基金说　一种工资学说，主要流行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该学说认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资本额以及其中用于支付工资的部分即工资基金都是固定的，因此工资数量的多少就取决于工资基金与人口之间的比例。这就是说，工资基金对人口的比率增高，工人的报酬才能上涨，反之，人口对工资基金的比率增高，工人的报酬必然下降。显然，它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归咎于自身人口的过多增长，露骨地为资本主义剥削辩解。该学说的基本思想早就散见于许多经济学者的著述中，但给予明确完整的阐述则出现在约·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一书中。由于一些人的激烈抨击，穆勒后来放弃了工资基金说，但其继任者凯尔恩斯却又成了该学说的坚定捍卫者。

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Wage-push Inflation）　指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不顾劳动市场状况，对雇主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使得工资上升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这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中最重要的一种。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工会垄断了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在工资的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市场上不存在对劳动力过度需求的情况下，工会可以凭借自己对劳动力供给的垄断而要求提高工资，这就可能使工资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企业雇主迫于工会的压力不得不提高工资，并把工资的提高加入成本之中提高商品的价格，从而就引起了通货膨胀。这样，有组织的劳工要求提高工资的经常威胁就形成了一种长期的通货膨胀趋势。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工会是一种和大公司一样的垄断力量，它可以操纵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因此，这种通货膨胀也根源于垄断，属于操纵价格类型的通货膨胀。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例如，英国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J·罗宾逊，反对把工会作为一种与大公司类似的垄断组织，反对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咎于工会组织。这种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演变形式就是"工资——物价螺旋式通货膨胀"。

土地税（Land Tax）　土地税是一国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依法对土地征收的税。在资源配置中，土地占有独特的地位。它不同于资本与劳动。

土地是自然的恩赐，人不能用土地的资源来创造土地。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不象资本和劳动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因此，地租作为土地的收入既不能增加土地的供给，也不能减少土地的供给，不象工资和利润那样能刺激劳动与资本的供给。地租的主要作用是将固定供给的土地在不同的用途上进行配置。对土地征税的理论基础是政体的机能理论。土地的全部价值，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被认为是从政府得到的利益。这与 A · 马歇尔"土地的公共价值"的概念是一致的。按照这一概念，土地的价值是自然、政府、以及毗连土地的开发所产生的溢出价值这三项因素的产物。所有这些价值都不是个别土地持有者挣得的，因而应对其征税。

土地改革（Land Reform） 农业部门改变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以实现繁荣增长的政策措施。土地改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土地改革，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土改，指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即土地所有权由传统的封建地主到其先前的佃农和工资劳动者的再分配。广义的土地改革，包括土地占有制度和土地租佃制度的改变。一般有 4 种形式：（1）地租契约的改革；（2）降低地租；（3）土地所有权的有偿转移，（4）土地所有权的无偿转移。其中第（3）和（4）属于狭义的土地改革范畴。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一般说来，土地改革对于促进农业新技术的采用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收入分配公平、贫困的消除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发展组织都把土地改革作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必要条件。因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缺乏必要的刺激，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当今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多种土地占有制度，但就大地产而言，一般可归纳为 3 种形式：租佃制、庄园制、种植园制。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存在着制度垄断。大土地所有制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决定因素，也是抑制新技术采用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改革现行的土地所有制，解决了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土地改革的代价也很高。包括：需支付给放弃土地的地主一定的补偿费；把土地划分为小块时，需要增加诸如篱笆、水利等一些其他设施；需要提供各种信贷、销售、技术推广等辅助性服务；使原来隐藏于地主-佃农制内的农业服务成本，改由国家直接负担等等。

下降的利润率（Falling Rate of Profit） 亚当 · 斯密、大卫 · 李嘉图、卡尔 · 马克思、约翰 · 穆勒和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都认为利润率在长期中将会下降，但他们的理由是不同的。

斯密一般被认为对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农业中生产率是不变的，而在工业中则将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逐渐提高，所以全社会的生产率是上升的。人们一般都会认为上升的生产率将带来上升的利润率，但如果考虑到农业，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就不是这样了。斯密假设谷物都是按不变的生产率生产的。如果每个农业工人谷物的固定产量是 Q_a，工资是 W_a，那么剩余就是 Q_a-W_a，也就是利润，但是农业将变得越来越资本密集，资本与产出比将会上升，那么因为利润的份额不变（P／Y），资本与产出比上升（K／Y），利润率 $(P/K)=(P/Y)\div(K/Y)$将会下降。而农业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将导致资本被转移到其它部门，使其它部门也变得越来越资本密集，从而利润率也就下降了。

李嘉图认为土地所有者从边际土地中得不到地租。所以土地的全部收益 Q_a 都将成为工资或利润。如果均衡工资被确定为一定的谷物产量 W_a，那么从雇佣一个边际农业工人中得到的均衡利润就是 Q_a-W_a，雇佣该工人所需的资本是 K_a，那么利润率就是$(Q_a-W_a)/K_a$，而 Q_a 将随着边际土地逐渐推向较差的土地而下降，K_a 将随着耕种较差的土地而带来的运输费用的上升而上升，而 W_a 不变，利润率 $(Q_a-W_a)/K_a$ 就将呈现下降的趋势，而自由竞争将使工业和商业的利润率同样下降。

穆勒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他认为农业收益下降的不利影响将超过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使工人生活必需品的费用不断上升，从而使利润率下降，这一观点首先由李嘉图提出，继而由穆勒完善。

马克思认为一个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可分为两部分，其中 V 是必要劳动价值，m 是剩余价值，m／v 是剥削率，由于机械化和劳动分工的加强，工人的生存需求可以在较少的时间里完成，那会 m 上升，v 下降，利润和总产出的比 P／Y 也会上升，但是马克思还认为资本——劳动比和资本——产出比都一直会在上升，而且速度会超过 P／Y 上升的速度，那么利润率 P／K＝（P／Y）÷（K／Y）就会下降。

凯恩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将利率降到一定的程度，既能保持充分就业，又能使所有的储蓄都用于投资，这就会使资本极为丰富，从而使资本的边际效率为零，从而得出了利润率下降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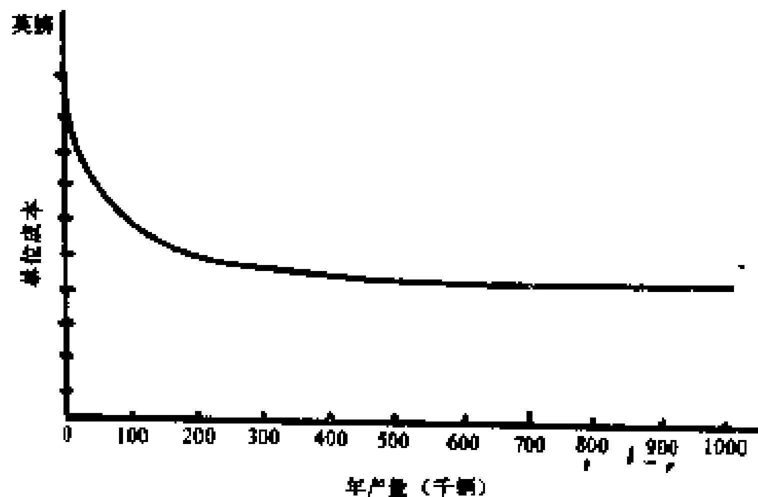
下承包体制 日本特有的一种大小企业的组织形式。指下包企业接受资本金或就业人数更多的发包企业的委托，生产发包企业生产所需要的零部件、原材料等、或者制造、修理发包企业进行生产时需要的设备、器具、工具。发包企业与下包企业间法律关系的

基本形式是承包契约、销售契约、制造修理委托契约或者混合形式的契约。发包企业、下包企业间与一般企业间市场关系的最根本区别是，下包企业一般必须接受发包企业关于规格、品质、性能、形状、外形、服务的规定和订货。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构成下承包体制的必要条件有：(1) 下包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发包企业自己也可以提供。发包企业之所以向下包企业订货，是因为下包或外包订货比自己生产更有利；(2) 下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一般只能提供给特定的一家或数家发包企业；(3) 发包企业与下包企业间的关系比较稳定；(4) 发包企业的规模较大，多为大企业，而下包企业多是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因此发包企业较易培养和选择下包企业，而下包企业因其产品市场的进入壁垒较低、市场竞争压力较大；(5) 由于上述4项原因，发包企业具有买方支配力，而下包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发包企业的依附性，双方的市场关系是不对等的，因此下包企业必须接受发包企业的多种要求。下承包体制有多种特点，不同的特点又成为对下承包体制和下包企业分类的依据。(1) 下包内容广泛。下包的内容包括提供零件、部件、原材料辅料，各种制品再加工，各种维修、清理、运输、销售服务等。根据下包内容，下包企业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提供成品的叫成品下包厂，提供零件的叫零件下包厂，提供制品加工的叫加工下包厂，提供销售，修理服务的叫服务下包厂。在有制造——组装生产特点的各种机械制造业，各种成品和零件下包厂是下包厂的主体，而在钢铁、化工等材料流程加工产业的下包企业中，以服务为主的服务下包企业较多。(2) 依赖程度不同。下包企业对发包企业的依赖程度是不相同的。据此下包企业可以分为专属下包企业和非专属下包企业两种基本类型。专属下包企业基本上只为一个发包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而非专属下包企业通常为两个或更多的发包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一般成品，零件下包厂专属程度较高，而服务下包企业专属程度较低。(3) 发包与下包企业之间存在多种交易关系。除基本的订货和服务契约关系外，通常还有各种业务指导乃至融资、参股、兼职关系。融资额较大或有参股、兼职关系的下包企业通常就成为发包企业的系列企业，与发包企业的关系特别密切、稳定。系列企业特别是核心系列企业往往能得到发包企业的特别照顾，如发包企业通过较高的订货价格向系列企业转让部分超额利润。核心系列企业通常是生产主要部件的下包企业，如汽车业的油泵总成生产厂。(4) 金字塔形的结构。在制造——组装批量生产类型的制造业，如汽车业、家用电器业，下承包体制呈现一种多级的金字塔形的结构。生产最终产品的主体厂处于金字塔形的顶端，按最终产品→部件→零件的后向顺序，上层企业对下层企业逐级控制、多级下包，企业数量随层次下降而增加。通常，一次下包企业能提供有独立功能的完整的部件或部件主体。一次下包企业的再下包企业叫二次下包企业，主要生产部件的主要零件和部件内部的总成。再下层是三次乃至四次下包企业，还有一批生产简单零件、工具的独立劳动者挂靠在下包企业之下。通过这种结构，发包的大企业可以控制和影响数量众多的中小下包企业。在钢铁、化工、纺织等流程阶段加工产业，大小企业之间的下承包体制也很发达，但多级下包相对较少，且随着流程从初级加工阶段转向最终加工阶段，企业规模逐步减小，下包率逐渐降低。其作用为：(1) 下承包体制是集团竞争和分层竞争的组织基础。在日本，垄断竞争主要表现为以大企业为主体的，通过下承包体制形成的集团的竞争。而集团内的企业也有竞争，但不是大小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中小下包企业围绕争夺大企业定货集中在产品质量、交货时间、价格三方面的竞争。这就界定了大小企业的竞争空间，避免盲目的过度竞争。(2) 下承包体制具有特殊的资本积累、集中机制。由于作为发包企业的大企业处于市场支配地位，因此不仅能在定价和业务指导上控制下包企业，还可以根据景气的变化，增减对发包企业的订货量。这就保证了大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率。大企业利润率高，不仅直接促使资本向大企业集中，而且有利于增加对银行资本的吸引力，产生更大的资本集中效应。同时，通过下承包体制，大企业资本实际上起着组合中小企业资本的核心集聚作用，可提高资本的总体使用效益。(3) 下承包体制有利于大企业率先技术进步，并形成大企业向下包企业传播的链条。有利于资本集中的下承包体制，使大企业有可能高强度地使用资本于关键技术的发展上，从而使大企业率先技术进步。同时，大企业为使下包企业所生产产品符合需要，会对下包企业实行技术指导，从而向下包企业传播先进技术。(4) 下承包体制的形成原因。日本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兼有组织和市场交易的特点，并且存在利益和市场地位不平等的下承包体制，有着三方面的基本原因。(1)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承包体制适应二元结构，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又是二元结构的产物。这可以从劳动就业和经济技术两方面看。日本劳动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小企业的工资水平差别较大；二是日本大企业实行年功序列工资制和终身雇佣制，而小企业一般不实行年序工资制和终身制。下承包体制使日本的大企业，既能够在经济景气时利用小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又能在经济不景气时较容易地通过解除合同保证本企业的稳定，从而保持骨干职工队伍的稳

定，而不实行年工序工资制和终身制的小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易于通过直接解雇职工消化大企转嫁的损失。日本经济技术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大企业资金相对比较雄厚，技术水平较高，而下包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技术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动，下包中小企业只能依附大企业。(2) 企业家的经营意识和观念。长期以来，重视组织和集团的观念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企业家的经营意识。特别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从资源小国的实际出发，大小企业家乃至全民都意识到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并且认为应当实行集团主义，这种意识和观念，有利于下包企业的经营者和所有者能够较主动地接受没有资产权益关系的大企业的指导。(3) 政府政策的引导。日本政府经常通过各项产业组织合理化政策直接鼓励大企业发展，鼓励发展专业化和发展经济规模。日本在50—60年代实行了发包企业对下包企业的贷款担保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发展专业化，同时强化了下包企业对发包企业的依附性。1956年日本制定了旨在控制发包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损害下包企业的"下包垫金延迟支付防止法"。这些政策对下承包体制的完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尔萨斯效应（Malthus Effect） 当今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出现的曾被马尔萨斯所描述的情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曾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生活资料则按算数级数增加。人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是受自然规律限制的，因而要求两者必须平衡。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造成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必然使两者之间恢复平衡，其过程就是贫困和罪恶。所以人们必须有效地抑制人口的增殖。马尔萨斯认为，饥饿、战争、疾病、贫困等一系列积极抑制办法和节育等预防抑制办法都可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如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而人口不断增长，平均生活水平恶化，出现了贫困、饥荒、时疫、平民的大批饿死和迁徙等现象。这种情况被认为正是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口超越经济发展而迅速增长的结果，故而称之为"马尔萨斯效应"。

马克西—西尔伯斯通曲线（Maxcy—Silberston Curve） 英国人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在1959年合著了《汽车工业》一书，书中计算并绘制了汽车工厂生产线的长期平均费用曲线，这条曲线就是举世闻名的马克西—西尔伯斯通曲线（见图）。根据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对汽车生产线长期平均费用曲线所作的分析，就一种车型的生产批量同成本的关系而言：当年产量由1千辆增加到5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40%；当年产量由5万辆增加到10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15%；当年产量由10万辆增加到40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5%；当年产量超过40万辆时，成本下降的幅度急剧减少，在达到年产100万辆的水平后，再加大批量就不再存在规模经济了。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进一步估算：一条汽车组装生产线的最小最佳规模是年产6万到10万辆；发动机生产线为年产50万台；冲压设备为年产100万套。马克西、西尔伯斯通还认为，汽车工业整个生产过程的最小最佳规模，应当是各生产工序最小最佳规模的最小公倍。比如，既然汽车生产的冲压工序的最小最佳规模在100万套，那么配上两条年产50万台发动机的生产线和10条年组装10万辆汽车的组装线就构成最小最佳规模。这种组合的生产过程是成本最低的。



马歇尔两难处境（Marshall's Dilemma） 规模经济与垄断的矛盾。1890年，A·马歇尔发表了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在该书中，他较早地触及了规模经济问题。所谓规模经济，简而言之就是大量生产带来的好处。同时，马歇尔注意到，企业追求规模经济会导致垄断的发展，而垄断会使价格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扼杀自由竞争这一经济运动的原动力，使经济活动失去活力，破坏资源的合理分配。这样，在马歇尔那里，规模经济和垄断的弊端就成了一对难分难解的矛盾，以至后人称这对矛盾为马歇尔冲突。马歇尔面对这对矛盾，试图用任何企业的发展都有生长—发展—衰退过程，来说明垄断是不会无限发展的，即规模经济和竞争是可以获得某种均衡的。然而，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后来受到斯拉法等人的抨击，因此，引发了本世纪20年代末的一场有关马歇尔冲突的论争。马歇尔冲突中规模经济和垄断两者的关系，正是产业组织理论所要探索的中心论题之一。

马歇尔·A（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英格兰银行高级职员的家庭，自幼接受正规严格的教育。1861年在剑桥大学专攻数学，毕业后兼教数学多年。1867年开始研究经济学，翌年又担任剑桥圣约翰学院道德科学特别讲座的讲师，教授政治经济学。1877年至1882年间，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学院院长，并兼政治经济学教授。1883年至1884年，又接替阿·汤因比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师。1885年起，继已故的福塞特教授之后，长期荣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在此期间，同时供职于皇家劳工委员会（1891～1895年），常常同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一起讨论劳工问题，退休后，仍继续从事研究的著述工作，还先后完成了两部早年就计划撰写的著作。

马歇尔曾公开出版过多部重要著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工业经济学》（1879年）是同其夫人的合作产物，1892年曾经再版。1919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共有三卷，主要从经济史角度来概括和研究欧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经济组织演变等状况。《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年）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反映了他对货币理论和对外贸易理论的重要贡献。此外，他经常接受政府的咨询，就工资、币制、关税等实际问题发表过不少见解。他死后，其门徒约·梅·凯恩斯将它们汇编成册，用《阿·马歇尔官方文献集》的书名公开出版（1926年）。

马歇尔的主要代表作则是《经济学原理》（1890年）。该书先后发行过8版，其中第3版（1895年）和第5版（1907年）有过较大的修改更动。60年代初，H·E·吉尔博又出版了该书的第9版，将前8版删改增补的内容和篇章结构的变动情况一并列出，以便于研究马歇尔思想的发展演变。《经济学原理》一书充分展示出他所构筑的经济学新体系，为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这是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发生过很大影响的一部重要著作。

经济学说的主要特点　博采众长、善于综合是马歇尔学说体系的基本特征。它关于经济学对象的规定，既坚持财富研究为中心的古典学派思想，又采纳后来一些反对派所强调的研究“人”及其行为的观点。它对经济学说史上久负盛名的各种学说，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直至当时颇为时髦的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都巧妙地加以吸收利用，可谓是集诸“精华”于一体。其研究方法也融合了其时之大学派的抽象演绎法、历史归纳法和数理分析法。即使是围绕同一理论问题的不同观点，这也常常尽可能地兼收并蓄。此外，马歇尔学说还十分擅长于吸收融合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因此，这种集众学说之大成的特征，史称“马歇尔的综合”。

马歇尔的综合，总结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说业已取得的理论成果，从而保持着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力，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但是，马歇尔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综合又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较大程度上都是对庸俗的经济学说或庸俗成分的吸收融合，这无疑须作严肃的批判。应当看到，将马歇尔的综合视为只是加以拼凑捏合的折衷主义，则完全是一种误解。

以供求均衡论为基轴来展开经济分析，是马歇尔学说的根本特点。其整个体系先分别讨论了商品需求与供给的有关理论，进而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阐发了价值论和分配论。它由此首创和运用了局部均衡论，即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只分析经济生活中的某一变量以寻求供求之间的经济均衡。此外，广泛而深入地展开边际分析、强调时间因素对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使用大量几何图示法来表述重要的经济学原理等，也都是其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这些都有力地推动着西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迅速发展。

然而，马歇尔学说本身却又带有浓厚的社会学倾向。马歇尔声称，经济学只是实行社会改良、推动人类进步的工具，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是启迪、寻觅、发展人们的利他主义。他所分析的经济行为主体（消费者和生产企业），既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经济人”，也不是奥国学派注重的那种鲁宾逊式的孤立的人，而是一个经济动机和社会情感兼备的现实的人，同时又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份子。这样，马歇尔学说一方面阐发了大量的经济学原理和定律，另一方面却时常强调社会、伦理等因素对于全面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重要意义，反映出其学说具有明显的社会学倾向。这同一般的微观经济分析颇为不同。

需求理论　在马歇尔看来，需求与消费问题才刚刚在经济研究中受到重视，因而亟须补充和发展这种需求理论。为此，他提出许多新的理论主张：(1)用货币间接衡量货物的边际效用。因为货物的效用是一个主观的心理概念，无法直接加以测度，因而可用该货物的边际需求价格（即消费者购买边际量货物所愿支付的价格）予以代表。(2)需求规律。关于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的关系，马歇尔先后用表格形式（需求表）和几何图形（需求曲线）作了形象直观的表述，进而总结出一条普遍的需求规律：在其他情况不变下，商品的需求量随其价格下跌而增大，或随其价格上涨而减少。必须注意，这里讲的需求量与需求状况是不同的概念。(3)需求弹性。商品价格变动究竟能引起其需求量有多大的变动，可以用需求弹性作较精确的说明。所谓需求弹性，是指商品价格下降（或上升）后其需求量增加（或减少）的程度。若一种商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如2%）大于其价格变

动的百分比（如1%），则称其需求弹性大，反之就是该商品的需求弹性小。可见这里讲的是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马歇尔在此基础上还详尽探讨了需求弹性的诸种规律。(4)消费者剩余。马歇尔注意到，消费者在购买中通常会得到多余的满足，若进行经济衡量，它就是购买一件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减去购买此物实际所付的价格之剩余额。这个剩余额可称为消费者剩余。在马歇尔看来，它对租税和补助金的政策分析以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阐释，都有显然的实用价值。

总的看，这些理论内容虽则都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马歇尔的主要理论成就。除了消费者剩余学说外，其他内容都是他对别人的思想见解的系统总结和深入发挥。因而他的需求理论不宜评价过高。

供给理论　马歇尔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生产供给问题，提出不少独特的理论见解，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主要有：

关于生产要素。马歇尔指出，经济学史上通常都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其实组织也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能大大提高生产力水平。此即著名的"生产四要素论"。在论述劳动要素时，他十分强调提高人口质量问题，主张要非常重视社会有用人才的挖掘和培养，要充分认识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要牢固树立教育投入应是国家投资重要部分的思想，在论述资本要素时，他起劲地鼓吹美化剥削行为的"等待说"，声称资本利息是资本家因延迟消费所作的"等待"或"牺牲"的报酬。这实际上是"节欲论"的翻版。在论述组织要素时，马歇尔从多方面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特别强调它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经济效率，即获取"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前者是指企业内部进行适度规模生产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后者是指产业部门扩大生产规模而使部门内企业获得的生产节约。他还充分肯定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的关键地位，认为企业家的经营才能又是组织要素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重大手段，其供给却比较稀缺，因而应给予优厚的报酬。鉴于组织要素能够增进生产报酬，马歇尔还明确提出了三种不同报酬律的思想，即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报酬递减、不变和递增的三种规律。这就扭转了以往学者只看重报酬递减律的理论倾向。

关于供给规律。同需求理论相对应，马歇尔也专门考察了商品价格与其供给量的函数关系，并同样画出了供给表和供给曲线。然而，与那条由右向左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具有普遍意义不同，这条由左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只适用于多数情况（特别是短期供给状况）。这是因为，决定商品供给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因此，当一种商品的产量增加时，其供给价格有时会增加，有时又可能减少，有时甚至交替增减。这样，供给曲线完全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状。马歇尔强调，错综复杂的供给状况无法只用一条供给曲线加以概括，同样亦不存在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供给规律。

关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是商品供给量的重要决定因素，马歇尔对此作了颇为详尽的探讨，并丰富和发展了有关的供给理论。(1)提出两种费用说。由于传统的生产费用说用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来解释商品本身的价值，实际上陷入了循环论证，为了弥补其理论漏洞，马歇尔阐述了"实际成本"和"货币成本"两种费用说。实际成本指的是劳动者的"负效用"和资本家出借资本所忍受的"牺牲"，而对这些负效用和牺牲所必须付出的货币额即为货币成本。在他看来，实际成本是货币成本的基础，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生产成本还是应以货币加以计量。(2)区别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所谓的短期，是指该期间来不及变动生产规模和设备数量，但可依据需求状况增减生产设施的利用程度；所谓的长期，则指该期间的一切生产要素都会依据需求状况而随意变动。因此，同种商品的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是有差异的，而且对商品供给状况起着不同的作用。(3)划分主要成本与补充成本。前者包括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力，原料以及其他加工的诸种费用，又称直接成本；后者包括维持厂房设备等全部固定生产要素的费用以及管理人员的薪金，亦叫间接成本；这两者构成了生产总成本。马歇尔指出，划分这两者的意义在于指明它们对于供给状况产生不同的影响。在长期里，商品的价格必须等于生产总成本，若成本得不到补偿，生产者必然减少甚至停止有关商品的生产。但在短期里，即使商品价格不足以补偿生产总成本，只要尚可收回一部分已投下的间接成本，生产者仍会继续维持生产。因为投下的间接成本已无法变动，一旦完全停止生产，它们就只能全部浪费掉。所以，主要成本与补充成本的划分只在短期具有突出的意义，同时也是说明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之差异的重要分析工具。(4)阐释替代原理。马歇尔指出，生产者总会选择供给价格之总和最小的诸生产要素来替代其他任一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社会也总用效率较高的企业来代替效率较低的企业。这可叫做替代原理，它总是运用于边际上。在此基础上，他又采用"边际成本"（即在边际上的生产成本）的概念，以分析其与各种商品价值决定的关系。

价值理论　马歇尔所谓的价值，实际上是供给与需求相均衡时的价格，因而其价值论实质上是讨论需求与供给的一般关系。按他的说法，商品的价值决定因时间长短不同而可分为四个类型。第一类是极短时

间的均衡价格，又称市场价值。由于时间很短（如一天），这类价值往往更多受到短期性因素的影响。这种供求的暂时均衡，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取决于现有的存货量，因而与商品的生产成本并无关系。第二类是短时期的均衡价格。这通常是指一年之内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进行调整后所获得的正常价格。在此时期里，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变动，生产者可以提高或降低现有厂房设备的利用率来调节供给量，但无法增减生产设施或改进生产组织与技术来适应需求的变动。第三类是长时期的均衡价格。在马歇尔看来，这种长期均衡价格称得上是真正的正常价格，由供求双方相均衡所决定（见均衡价格论条）。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价格较大程度上受到生产成本的影响。第四类是极长时期的正常价格。这是指正常价格的长期趋势，由各项基本要素（如人口、技术、组织等）发生变动所形成的经济均衡加以确定。

总之，马歇尔把需求和供给视作价值决定的两股基本力量，犹如剪刀的两刃，并无孰轻孰重之分，故其均衡价格论史称"剪刀式价值论"。不过掺入时间因素后，他仍承认这两者的实际作用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论，时期越短的价值决定，需求的影响越需注意，而时期越长的价值决定，生产成本的影响越加重要。

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学说的核心。作为一种价值学说，它用价格冒充价值，回避生产关系分析，抹煞所有制的决定作用，显得浅薄而庸俗。作为一种价格分析，它剖析了决定商品需求与供给的诸多因素，揭示出供求双方与商品市场价格的内在联系，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

分配理论　马歇尔的分配论实际上是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理论。它以四大生产要素为主体，论述了它们的价值仍然由供求均衡所决定，因而是均衡价格论的直接延续。

在论述分配理论的重要原理时，马歇尔突出了两个思想。一是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着厂商对该要素的需求，因而只能是决定其价值的一部分原因。换言之，单纯用边际生产力来阐述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是不全面的，它忽略了供给方面的原因。二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这种抹煞阶级剥削、鼓吹劳资合作的论调，较集中地体现了马歇尔分配理论的辩护色彩。

关于工资即劳动的收益，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原因来决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着其需求价格，而培养、训练和维持有效率的劳动所用的成本又影响其供给价格。马歇尔在这里还提出若干令人瞩目的论点：反对历史上曾流行的维持生存说，力倡给劳动者以优厚的报酬；主张实行"效率工资"形式，按工人的效率和能力运用来付给报酬；认为工人在与资本家进行劳动报酬的议价上，一般总处于不利的地位；强调劳动的供求调节比较困难，因为人才培训周期很长，而劳动市场却经常变动等。

关于利息即使用资本所支付的报酬，由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决定。其需求是一切企业主的资本需求总量，与资本的价格是反方向变动。其供给是劳动和等待的产物，亦即人们的储蓄。按马歇尔的讲法，这两者都是利率的函数，即只有恰当的利率水平才能促使资本的供求均衡。

关于利润即经营管理才能的报酬，其决定大体与工资论相同。不过马歇尔强调，这种供求的适应和调节比较困难，而且对于那些依靠稀有的天赋和费用浩大的特殊训练才具备的突出的经营管理才能，须给予优厚的报酬。应当看到，马歇尔的利润定义模糊不清，因而其有关论述显得结构松散，内容混杂，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同上述诸种报酬不一样，地租即土地的报酬主要由需求所决定，因为土地的供给是固定不变的。必须注意，土地可由人力加以改良，因此土地的价值一部分由人的劳动所产生，其余则为自然力所致。一句话，土地收入不全是纯粹的地租。据此，马歇尔使用"准租"一词来概指各种长期投资的收益（包括改良土地所得的收入）。这是因为，在短期里这类投资品类似土地，即供给固定，其报酬完全由需求决定，性质同地租一样；但从长期来看，这类投资品又可根据收益多少来决定是否继续投入或撤出，而且其收益应计入生产成本，这又与地租不同。他强调，"准租"与地租的划分对经济科学极端重要。

其他理论　马歇尔还阐述过一些后来归入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其中发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

1.货币理论。1911年，著名美国学者费雪提出所谓的"交易方程式"，补充和发挥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说。马歇尔不赞成这种从商品交易过程着眼来展开货币分析的思路，批评它并未指明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原因。于是他进而阐述了自己的货币价值决定理论。他主张，货币的价值由一国人民从通货形式保持的实物价值（称为实物余额）和该国流通的货币量这两者的比例关系所决定。若一国货币流通量不变，实物价值下降，货币价值也随之下跌，从而物价水平将上升，反之则反然。若一国的实物价值不变，一国流通的货币量增加，货币价值反而下跌，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反之则反然。因此，货币的价值实际上涉及到实物余额与现金余额（即根据前者的价值须保持相应的货币额）的关系。马歇尔这种新颖而又粗略的货币学说，曾遍称之为"现金余额说"，后来经过其弟子庇

古、约·梅·凯恩斯、丹·罗伯逊和霍屈里等的发挥补充，又形成所谓的“剑桥方程式”，成为一种公认为有重要意义的货币理论。

2.国际贸易理论。长期以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后来约·穆勒又提出“相互需求说”，从需求角度作了补充和发挥。马歇尔认为，“相互需求说”就是一种供求均衡分析，但其缺陷是无法精确指明两国交易均衡时的具体交换比率。为此，他提出了有名的提供曲线图。该图分别画出贸易两国的提供曲线，表示两国在一定交换比例条件下，各自需求进口货的数量和供给出口货的数量。由于该图反映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下的易货贸易，这两条提供曲线必然相交于某一点。该点即为供求均衡点，即甲国需求的进口量恰好等于乙国的出口量，乙国需求的进口量恰好等于甲国的出口量。这样，联结原点与均衡点的直线称作贸易条件线，表明只要按照它所代表的交换比例进行贸易活动，双方的相互供求就能达到均衡。马歇尔的提供曲线图较形象地把供求均衡分析运用于国际贸易理论中，又较精确地说明了均衡贸易条件的形成，从而成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内容。

3.福利思想。马歇尔反复宣扬，人们关心经济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十分重视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不仅主张国家采用适当的税收与补贴政策来调节有关生产部门的产量，以增进社会的利益和福利，而且宣扬应大大提高劳动阶级的收入份额和改进他们的生活条件与教育文化水准，真正做到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庇古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这类福利思想，以后才创建了福利经济学。

马西·约瑟夫（Joseph Massie，？－1784）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然利率论》（1750年）等。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是一个典型的保护贸易论者，有人视之为重商主义者。马西的功绩在于第一次指出利润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并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进一步认为，决定利率高低的原因就是资本所带来的利润，正是资本积累以及引发的利润下跌导致了利息降低。不过马西几乎没有讨论利润本身的源泉问题，而且探讨的只是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 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英格兰一个小土地贵族家庭，曾在剑桥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1798年加入英国教会的僧籍，并在萨立郡的一小镇担任牧师。同年匿名发表《人口原理》的小册子。为了充实该书的内容，他曾于1799－1802年在欧洲作了三年旅行。1803年，他用自己的名字出版了该书经过修正和扩充的第二版，以后又经过数次修订再版。1805年起在东印度公司创办的海利贝里学院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去世。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著作。

他的经济学著作除了《人口原理》（1798年）外，主要有《地租的性质和进化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1820年）、《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等。

马尔萨斯是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理论学说从总体上看具有很多庸俗的乃至反动的货色。他以亚当·斯密的学生自居，却阉割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精髓和科学内容，并同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李嘉图展开激烈的论战。同时他又站在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马尔萨斯在西方常常被推崇为颇负盛名的第一流学者，但就其基本经济理论而言，他并无很多创见。

人口理论　《人口原理》是使马尔萨斯声名大噪并造成久远影响的一部著作。但其人口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简单明了的。他从两个所谓的“公理”出发，即人类生存必需食物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阐述了他的核心命题：人口增殖力同土地生产的人类生活资料力相比，是无限的较为巨大，即人类有一种比粮食增加更快的趋势，具体地说，在没有任何障碍时，人口以几何级数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由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受到土地数量有限的制约，要保持粮食与人口平衡的唯一出路在于抑制人口增长。他明确指出，抑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手段是“积极的抑制”，即“罪恶和贫困”，这是用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如战争、瘟疫、灾祸、贫困和饥荒等）来直接减少现有人口的数量，使之适应于生活资料量，故又称“直接抑制”。另一种方法是“道德抑制”，即出于远虑的动机而实行禁欲和晚婚，这是预先防止人口增长过快所采取的措施，亦可叫“预防抑制”。马尔萨斯把上述论述内容说成是永恒的人口自然法则，声称它支配着人类的命运。

马尔萨斯宣扬私有制是保持人口与生活资料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是提高人类品德和能力的最理想的制度。他认为，由于平等和财产公有的制度无法实现“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即使它建立起来，也会被人口原理的作用所毁灭。他还胡诌广大劳动者的贫困是由于自身放松人口约束带来的。

因此，尽管马尔萨斯人口论包含某些合理成份（如强调人口增长应与生活资料保持适当比例等），

但它鼓吹私有制的天然合理、贫困和罪恶的积极作用、贫困的根源在于劳动者自身一类思想，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在政治上则十分反动，充分反映出其鲜明的辩护性质。这正是该理论一出笼就受到反动阶级热烈喝采的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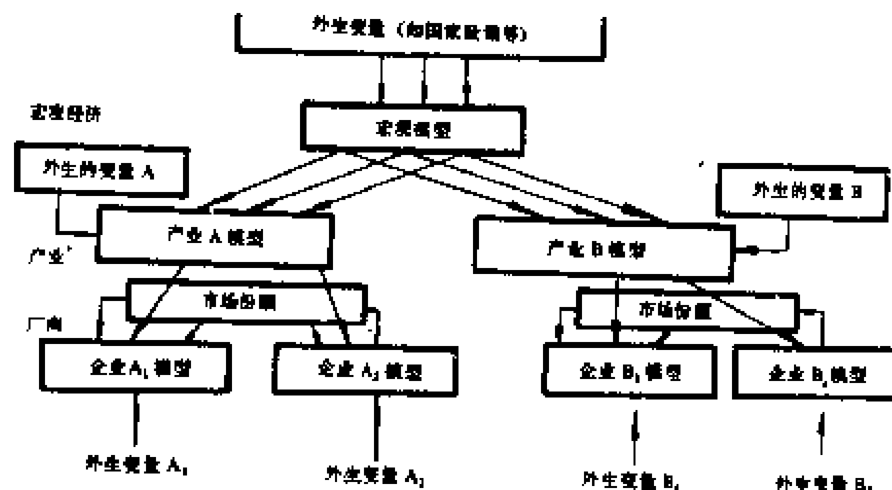
价值理论　马尔萨斯继承和发挥亚当·斯密价值学说中的庸俗成份，提出一个十分混乱的价值理论。他针对李嘉图理论中存在的矛盾，坚决反对劳动价值论，声称斯密关于价值由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定义。他进一步指出，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则取决于商品的生产费用，它由直接劳动、累积劳动和利润三者所构成。但是，生产费用又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供求关系是“同需求相对比的供给状况”，供给是具有出售愿望的待售商品数量，而需求分为“需求程度”和“需求强度”，前者是指“单纯的消费程度”，后者则为现在称作的“有效需求”，即真正能影响商品价格和生产费用的需求。马尔萨斯还强调，“供求关系就是决定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最主要的因素，而生产费用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这就陷入了循环论。

可见，马尔萨斯的价值论是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购得劳动说的混合物，是一种庸俗的理论学说。它始终未能讲清决定价值的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甚至无法对价值下个确切定义，事实上考察的只是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

地租理论　地租论在马尔萨斯的庸俗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对当时人们普遍指责地租收入来自对土地的垄断的说法，竭力维护土地贵族利益，论证了地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按他的说法，地租是农产品总价值超过生产费用（工资和利润）的余额，它产生的基本原因在于土地具有生产剩余生活必需品的性质，是自然对人类的赠与，完全与垄断没有关系。这个余额通常是不断增加的，这是因为资本积累导致利润下降，人口增加使得工资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就业人数减少，从而都会减少生产费用，同时农产品需求增加又推动价格上涨。这样，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费用的差额不断扩大，地租收入自然增长。马尔萨斯由此推论，地租收入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繁荣的标志，倘若用法律来降低农产品价格（如废除谷物法），导致地租减少乃至取消，就会阻碍社会发展。因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全体利益完全一致。这种蓄意抹煞地租剥削性质的做法，充分暴露出其作为地主阶段辩护士的真面目。

产品实现理论　马尔萨斯明确反对李嘉图、萨伊等人关于资本主义没有普遍经济危机的论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须依靠足够的有效需求加以维持，否则不断增加的产品就无法找到扩大的市场和增长的消费，从而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他看来，仅仅靠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并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以解决全部产品的实现问题。这是因为，生产劳动者本身创造的需求肯定低于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然资本家无利可图就不会雇佣他们。同时，资本家的利润无非是由商品流通过程中供求关系产生的“让渡利润”，他们在出售商品时获得它，又会在购买商品时丧失掉。因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不会产生利润，并不能为商品的实现提供有效需求。因此，全社会必须存在“第三者”，即维持一个非生产性的消费者阶级，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以避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生。他明确指出，这种不从事物质生产而又对商品具有实际需求的纯粹消费者，是由地主及仆从、官吏、军人、牧师等类人所组成，他们的收入来自地租和赋税，所以，地租和赋税越高，他们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就越大，从而社会生产可以更快地发展，资本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他由此得出结论，“第三者”阶级的存在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正常运转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且对社会进步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可见，马尔萨斯的产品实现理论尽管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危机问题，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矛盾，但它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替土地贵族这类寄生阶级的奢侈挥霍进行辩护，最集中地暴露了马尔萨斯经济理论的地主阶级性质。

卫星模型（Satellite Model）　经济预测以及政府预测，政策的模拟常常需要非常复杂的模型，如产业模型、地区模型、商品市场模型和厂商模型。卫星模型是指在诸如国家和世界经济的模型构架中增加一些更小的模型单位，这些较小的模型单位与大模型的关系正如卫星与地球的关系，因而就叫卫星模型，可是卫星模型是一个模型体系。下面我们用一个瀑布图来说明经济分析预测中所用的卫星模型。



最顶上的宏观经济模型所描述的是产业的运行环境。第二个层次产业的模型所描述的是市场的运行，

在这些市场中，处于最下面的厂商实现其经营战略。卫星模型体系是一个无反向的流动图，产业和厂商模型依赖于宏观模型但没有反向影响，这常常是一个很有用的简化，国家的发展对特有产业和厂商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反向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则很小，这正好是一种卫星关系。在卫星模型中，宏观模型的设计必须能提供许多必要的资料，这种复杂的宏观模型的一个优点是能提供经济预测的细节，而它们可以被包含在宏观模型较低层次的模型中。厂商又是产业的卫星，它们一般受产业的影响。反过来产业也受厂商的影响。厂商层次的决策诸如生产能力的确定、新产品新技术的引进等常常影响整个产业。单个企业的发展战略及它们竞争者状况在厂商层次受到特别重视，这就是在厂商模型中特别考虑了市场份额问题。外生变量在每一个层次都对模型产生影响。卫星模型系列相当大，经济能分解为多少个产业，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地区、厂商，这个系列就可能有多大。

卫星城 一般是指在大城市管辖区范围内与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既有一定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人口规模在数万人以上的城镇。建设卫星城的目的在于控制大城市的规模。疏散大城市的工业和人口。根据母城经济、科学及文化发展状况和当地的自然条件，可以修建不同类型的卫星城，卫星城的类型按其性质可分为卧城、工业城市、科学城和大学城等。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卫星城在解决大城市工业过度集中和人口膨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使新建卫星城对大城市具有"反吸力"的作用，西方国家大都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给搬迁企业发放低息贷款，减少税收；给在卫星城工作的职工发放奖金、补助费；并且在卫星城创造较好的居住、商业、服务、文娱、医疗、教育及体育等设施。如英国政府曾根据城市经济学家设计的"大伦敦控制"，最初在伦敦周围建成了哈罗·斯特文内奇等8个卫星城，法国70年代开始，在巴黎市区外建立了5座卫星城，为此两国政府都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干预政策。

大企业的经济性（Large Enterprise Economy） 指企业通过扩大经营规模获得的利益。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大量购入的利益，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购买投入品时，由于购买量较大，因此可以享受种种优惠。2.大量销售的利益。大量销售可以节省推销、运输等流通费用。3.资金供应上的有利性。大企业的筹资能力一般优于中小企业。4.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的专业化。大企业有可能专业化地使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这有利于他们发挥专长、精益求精。5.研究、开发工作的高效率。相对来说大企业研究和开发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较雄厚，这一方面有利于开展较多的研究、开发工作，另一方面有利于快出、早出成果。

大规模销售（Large-scale Sale） 指工业企业自建销售网络或原有销售组织发生变革，销售通过大量生产技术生产的大量产品。大规模销售既是大量生产发展的结果，又为大量生产开辟了巨大的市场。大规模销售的基本渠道有两个：一是在早期独立商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型批发商、大型百货商店、连锁商店、超级市场；二是制造企业自建的销售企业。

大推进理论（The "Big Push" Theory） 在设计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战略中，提倡全面投资的一种理论。是本世纪40年代，赞同平衡增长发展战略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这一理论强调了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和目标，说明了大规模的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思想根源是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通过把储蓄率和投资率最大化就可以使国民产出和就业增长最大。从这个观点出发，派生出了以形成国内储蓄和外汇为重点，把尽可能多的投资用到不断增长的产业部门中去的观点。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是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剩余、收入低下和资本投资规模太小；要摆脱贫困、失业和收入不均等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但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贫困、工业落后、基础设施不健全、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市场容量狭小，投资规模极小，而小量的投资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个工业部门投入资本，通过这种投资的大推动，来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与束缚，推进整个工业部门的全面、迅猛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经济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收入水平提高并且均等化的目标。罗森斯坦—罗丹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着的某种不可分性，认为只有采用大规模跃进式的投资方式才能予以克服。在供给方面，一方面社会分摊资本（即基础设施）的供给具有不可分性，由于这些项目规模宏大，并且互相联系、互为依存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建成才能发挥作用。因而一开始就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大量投资作为创始资本；另一方面，作为投资来源的储蓄也具有不可分性。储蓄是国民收入中扣除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在国民收入增长达到某一高水平之前，要相对地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是很困难的，从而使储蓄处在缓慢增长的低水平阶段；只有国民收入的增长达到并超过某一限度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使储蓄急剧上升

并达到一定的高水平阶段，才能为大规模的投资积累足够的资本，所以，每一阶段的投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大到足以保证国民收入的增长达到一定限度，使储蓄能够充足地迅猛增加，为下一期更大规模的资本形成准备足够的资本来源。在需求方面，市场需求具有不可分性。如果投资只集中于一个工业部门或行业，那么，即使这个部门建成了，也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独立部门，由于别的工业部门没有建立，它的产品只有被本部门的工人购买而没有其他的消费者，造成市场狭小和需求不足。最终，这项投资将因无法产生效益而告失败。因而，为了形成广大的、有保证的市场，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个工业部门同时并按同一比率进行投资。此外，罗森斯坦—罗丹还特别强调了"大推进"式的投资对厂商和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企业规模狭小，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尤其是缺乏"外在经济"效益。而孤立的、小规模的投资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无法迅速发展经济、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只有实行"大推进"式的投资，才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社会获利能力，最终实现迅速的经济发展。由于这种理论过分强调了工业化和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一种典型的唯工业化论，而受到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

大量生产（Mass Prouduction）　指利用机械化、自动化技术生产大量标准化的产品。大量生产把生产过程划分为许多可以机械化的工序，能够有效地应用现代化技术。大量生产的效益，是借助能节约成本的机器代替价格高昂的劳动力而实现的。大量生产适用于那些产品和生产过程可以标准化，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大量生产的技术，在20世纪初首先被应用于汽车制造业。此后，几乎所有高产量的产业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采用了大量生产法。

大地主领地（Latifundia）　古代罗马共和国末期出现的贵族奴隶主的大农庄。其性质、规模与结构在古代并无明确界线，现代经济学家也众说不一。或指包括中型农庄在内的大地产，或专指大型牧场地产，或说指公元前一世纪之后产生的由若干中型农庄连成一片的大农庄。大地主领地有以下几个特征：(1) 面积约在500—800尤格左右，与中等地产(80—500) 尤格和小地产 (10—80) 尤格并存。(2) 地产内是多种经济并存，有谷田、果园、牧场、森林、家禽饲养等；(3) 初期以使用奴隶劳动为主，以季节雇工为辅；后期逐渐转向使用隶农劳动为主。与此同时，大地主领地分为两块，一块是自营地，由地主委托管庄人员利用奴隶劳动直接经营；另一部分是出租地，出租给包租户和隶农。(4) 设置管理人员，包括总管、管庄和各种司事。(5) 大地主领地内有庄园建筑，其中有手工作坊、仓库、磨房、奴隶住所和牢房等。(6) 初期以商品生产为主，与市场联系密切，出租给隶农的土地也采取货币地租形式；后期随着奴隶制危机的加深，自给自足的倾向加深。罗马大地主领地是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瓦解中小土地所有制，促进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过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经济（Large Economy）　经济理论被人们想象为只是研究关于大多数人的一般行为模式，却很少描述个体的有特点的行为。例如，在竞争的市场上，一般假设个体对价格形成没有影响。个体的数量是无限的，每个个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而这些行为对整个市场价格的形成几乎不起作用。这样个体就是无穷小的。大经济与此不同，它是研究市场中个体是有限的，每个个体或者几个个体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市场均衡状况。古诺是给大数以角色的第一人。人们在研究竞争市场一般均衡时，对市场条件的研究极为重视。奥曼（Aumann）指出，个体行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情况是个体相对于整体而言是任意小，几乎不占任何空间。奥曼提出了非原子计量空间的概念来描述市场中的个体。不少经济学家在研究一般均衡市场条件时，逐渐转向对非一般均衡进行分析。部分均衡分析，寡头垄断分析，双头垄断分析等不断受到重视。大经济的研究的重要性是修正过去传统的竞争模型，并在很少的市场个体之间的竞争中得出结论。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是美国在历史上经历的时间最长、程度最深一次经济不景气。大萧条是以1929年10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指数暴跌作为开始，直到1941年下半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美国经济于1933年几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国民收入下降了将近一半；资本投资大幅度下降，净投资为负；失业率极高，几乎三个人中有一人是失业的；1933年3月6日，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被迫宣布了"银行假日"才避免了银行体系的完全崩溃。经济从大萧条中走出来是十分缓慢的。1933—1936年的短暂的经济扩张后，经济再次陷入更深度的萧条之中。在1941年，也就是纽约股票风潮的12年后，失业率依然高达10%，人均收入水平尚未达到1929年水平。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次长期的经济衰退。人们可以肯定的是战时的巨额支出使经济摆脱了大萧

条，但就连经济学家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经济如此衰退，一个事件以及一个因素是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的。可以对大萧条作出解释的因素有以下几个：(1) 资产价格的暴跌。1932 年底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价格水平只是 1929 年底的 20%。其他资产价格也同样地下降了。资产价格的下降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构成巨大的压力。(2) 银行无力供应货币。1929 年，美国有大约 25，000 家银行，到 1933 年只剩下 14，000 家。银行的破产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能力的下降，大大地降低了经济活力，从 1929—1933 年，货币供给能力下降了 20%。(3) 消费支出和投资的下降。(4) 美国经济的结构问题。罗斯福的新政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结构变化。1933 年的银行立法、机构。1935 年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股票市场管理是有效的；1933 年的农业调整法案以及最低收购价的实施，保证了农业稳定的发展；社会安全及失业保障系统的建立、瓦格纳法的实施等新政措施促使美国经济步出大萧条。新政的核心是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且从效果来看，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大副收据 (Mate's Receipt) 大副收据是指在班轮运输方式下，船方高级职员大副向托运人签发的收货单。采用班轮运输货物，货物装上船后，船方理货人员需在装船现场对货物的数量、包装等方面进行检查，而大副则有权在收货单上如实地记录货物的瑕疵，这一记录则成为承运人签发不清洁提单的依据。若货物在装船时表面状况良好，没有包装不固、残损等现象，船方大副也需在大副收据上予以确认。大副签发大副收据后，大副收据的持有人就有权持大副收据换取船舶承运人签发的提单。这样，作为大副收据，一方面是船方收到货物的凭证，同时也是货物托运人换取承运人签发的提单的依据。

依据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大副签发大副收据后，船舶承运人就应依大副收据中对货物数量和表面状况的记录填写提单，而不得拒绝接受大副收据中对货物状况的记录。一般情况下，大副收据不具物权凭证的作用，不能流通转让。

大陆桥运输 (Land-bridge Transpoit) 所谓大陆桥原意是指横贯大陆的将海洋与海洋连接起来的铁路运输，即是指在海运—陆运—海运这一联运方式中的陆运部分，或是指在海运—陆运这一联运方式中的陆运部分。大陆桥运输则是随着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以及集装箱运输的迅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陆桥运输是西伯利亚大陆桥运输，它采用国际标准规格的集装箱，拥有多种运输渠道，例如，可以将日本、中国等地的集装箱货物通过海运至原苏联港口，再过原苏联铁路运至原苏联西部边境，再通过火车或卡车转运至西欧各站。经营西伯利亚大陆桥运输的组织是原苏过境运输公司和国际铁路集装箱运输公司。

大陆桥运输不仅具有集装箱运输的优点，例如节省时间、减少货损等，而且还有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方式的优点，总承运人负责全程运输，不论途经国家以及运输工具如何变换，货物运出后即可凭联运提单结汇，手续很简便。

大道定理 (Turnpike Theorem) 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关以最高增长率通过最优增长途径实现平衡增长的理论。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多部门的经济体系中可能有多种均衡的平衡增长途径，或称多种黄金平衡增长途径。在这各种增长途径中，增长率最高者称为增长大道(turnpike growth path)，或冯·纽曼途径(Von Neumann path)，与增长大道相关的理论都称为大道定理。大道定理有悠久的历史。1927 年，英国经济学家 F·拉姆赛(F·Ramsey)提出了效用极大化的最适增长模型，1935 年美国经济学家冯·纽曼(Von Neumann)提出了一般均衡经济模型，寻找最大的平衡增长途径（即冯·纽曼经济增长模型）。1958 年，美国经济学家 R·多夫曼 (R·Dorfman)、P·萨缪尔森 (P·Samuelson)、索洛 (R·Solow) 利用纽曼模型建立了资本积累的效率模型。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 R·拉德纳 (R·Radner)、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道雄、美国经济学家 L·麦肯齐 (L·Mckenzie) 都对大道定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 R·拉德纳贡献最大，被称为"大道定理之父"。在大道定理中最著名的有：(1) 考虑联合产品情况的拉德纳——尼凯多定理；(2) 没有联合产品情况的森岛道雄定理；(3) 一般情况下的多夫曼·萨缪尔森——索洛——麦肯齐定理。各种大道定理的假设条件与模型都不同，但共同的结论是：在一个 N 期的经济计划里，最适的增长途径会由初始点的位置向增长大道靠近，继而沿着或极靠近增长大道前进，到计划期末时才归向计划的终点。计划的时间愈长，停留或靠近增长大道的时间比率将愈大。

小陆桥运输 (Mini-bridge Serrice) 陆桥运输是两洋一陆，利用大陆铁路作为中间桥梁，以海运—陆运—海运的联运方式，完成货物运输。其中货物运输仅是以海运—陆运或陆运—海运的联运方式，则构成小陆桥运输。比较著名的小陆桥运输是货物自东南亚一带运至美洲西岸，再以横贯北美洲大陆的铁路接运至美洲大西洋各港口，或相反，从美洲大西洋各港

口经铁路运至美洲西岸，再将货物从西岸港口运至东南亚国家。

小企业（Small Business）　由较少的人所拥有及经营、营业收入和资本额都较少的企业。根据美国商业部所给的定义，小企业是“任何雇工少于一百人的制造企业，年销售额低于20万美元的批发企业；销售额或收入额低于5万美元的零售商店、服务性企业、旅馆、娱乐场所以及建筑企业”。小企业对社会经济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小企业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小企业在组织创新方面往往优越于大企业；小企业的产品五花八门为民众提供了多种服务。美国政府在对待小企业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于1953年，建立第一个独立机构——小企业管理局，负责照顾小企业的利益。在美国也有专门为小企业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资本的私营公司，例如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由小企业管理局颁发执照并进行管理。政府为了帮助小企业，而对小企业投资公司给以两方面的资助：第一，它们可以向小企业管理局出售或借入债券；第二，特惠赋税制度。只有小企业才能得到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资金。小企业不是在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时而是随时可以得到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资金。从1958年8月到1972年6月30日，美国共有322家小企业投资公司，共向小企业发放了4万笔贷款，共计20多亿美元。

小额优惠（Fringe Benefit）　工人除工资外得到的任何非工资的津贴或付款，如辅助失业津贴、养老金、旅行津贴、节假日工资、健康保险等等。小额优惠包括法律规定的津贴，由雇主单方面提出的津贴，以及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取得的津贴。小额优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有，二战刺激了它的增长，因为战时工资是冻结的，二战结束以后出现了明显的侧重小额优惠的发展趋势。小额优惠在工人收入中已占一个日益增长的百分数，从1947年占工资总额的约15.1%上升到1975年的35.4%。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人们公认，工会在把工人的收入更多地转向小额优惠，提高小额优惠在收入中的比重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小额优惠同样受到了雇主的欢迎，有些小额优惠（那些在工人的整个服务时期内积累的，并且不能转移到另外的企业去的津贴）减少了劳工流动的费用，而且有些优惠津贴是完全不征税的或按优惠税率课税。但从经济的大局说来，小额优惠这种工资转移形式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这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和对变化着的情况顺利地进行调整。

小型开放经济（Small Open Economy）又称“小国开放经济”，指一种对外贸易量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率小，从而是世界市场价格接受者的开放经济。这种经济类似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小厂商。由于其产量在世界市场所占比率甚小，所以，它的产量变动无法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或者说，它不是世界市场价格的决定者，而只是既定世界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这种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小，但所受世界经济的影响甚大。这种经济往往是一些开放程度高的小国经济，例如，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等国都属于这种经济。

广告（Advertisement）　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引致社会购买或促使产品与劳务出卖的方法或手段，广告为私人、企业或政府提供关于某种产品，劳务或机会的信息，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出售。广告提供的信息包括它们是什么。有哪些用途，可以购买的地点以及价钱等等。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些信息主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介或以墙报等形式传递给社会大众的。在现代商品化经济里，广告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促销手段，它是一种产品从试制成功上市走向自动出售（即有稳定的市场需求）的第一步。通常用两种方法对广告加以分类，一是按广告客户出售产品和生产活动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将广告分为地区性广告和全国性广告，零售商是前者的主要广告客户，全国性的大型生产厂家是后者的主要广告客户。二是按广告所用的不同媒介将其分类，广告手段主要有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商业票据（Bussiness Paper）等，广播电视、户外手段（Outdoor）如墙报、广告牌等，直接邮件等等。二战以后，各国的广告业均有明显的发展，广告开支激剧增加。在美国，广告开支的增长速度大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当。1939年为20亿美元，到1980年增加到500多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所生产产品与劳务价值的2%。广告开支对经济周期很敏感，它的上升与下降与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基本保持同步。实业界的人普遍认为广告有助于他们将商品从货架上转移给消费者。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看法：广告是市场上纷繁的商品与劳务的信息来源，有助于消费者购买决策，但更多的经济学者则认为广告会增强产业集中。为新加入者设置障碍，从而加强垄断力量，提高市价，获取超额利润，再者广告会引起一部分人不是本意的欲望（Undesireable），导致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其收益难以弥补成本。但这些都还没有得到实际资料的证明。

干着学（Learning By Doing）　对各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的经验研究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一般劳动生产率与过去累积产量或累积投资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人们提出这样的假设：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经验，并且从经验中得到知识。换句话说，干着学是使得规模经济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如果从一个公司中得到的知识不能移转给其他公司，我们称之为不泄露的学。由于劳动者转移不畅的，一家公司不能将其全部知识转给其他公司。泄露的学是产生外部经济的一个特殊原因。在动态规模经济学以及外部经济性研究中，干着学是其中一个方面。人们在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认为不能把人均生产水平的提高全部归结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上。经济学家已经揭示了累积生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因此，没有被资本——劳动比率增长所解释的那部分增长就被干着学这一因素给解释了。人均生产水平的增长，无论其产生原因如何，都会使这一增长永远保持下去，原因是初始的增长会提高日后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这样，产出增长链又会造成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这一过程将周而复始。因此，即使在人口规模稳定的条件下，经济也会按着相应的系数值得到无限增长。

上升的供给价格（Rising Supply Price） 它最早是由局部均衡论者、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 · C · Pigou)提出的。1912年庇古就作了这样的论述："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其供给价格高于边际供给价格；在收益递减的工业部门，供给价格低于边际供给价格……。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益递增工业部门投资的边际净产品趋于超过整个工业的边际净产品，而收益递减的工业部门则相反。"从而他认为税收应加在收益递减的工业部门，慈爱给予收益递增工业部门。在庇古那里收益递减的工业部门指生产X+△X单位产品的费用超过生产X单位产品的费用加上生产△X单位产品的费用之和。也就是说，X+△X单位产品的生产费用减去X单位产品的生产费用之差要超过直接生产△X单位产品的费用。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供给价格由各种生产费用决定，因而这就是庇古的供给价格超过边际供给价格的含义。不难理解在收人递减工业部门存在上升的供给价格。对此杨（A · Young）认为某一产业中的企业的生产扩张（不同于别厂商的生产扩张）的供给价格的上涨不过是它使用的相对较多的土地或者其他资源租金的上涨。排除净物质上的外部非经济性，它与任何对实际资源利用的增加都不对应。奈特（F · Knight）也就上升供给价格的存在问题对庇古提出过批评。此后上升的供给价格在经济学界一度引起过一番讨论。

上位企业（Enterprise On Largest Scale） 是指特定产业内按市场占有率排名靠前的若干个大企业。如上位4家企业，说的是在产业内市场占有率或销售额位居前4位的4家大企业。

三角套汇（Friangular Arbitrage） 间接套汇中最常见的一种。利用三个不同外汇市场上同一时刻汇率的差异，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利润的外汇交易。

三角贸易（Friangular Trade） 三角贸易是指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在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开展的贸易。有时候，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彼此的进出口商品不对路或价值不相当，它们之间的贸易难以实现平衡，如果存在着外汇支付的困难，两国间的贸易就无法正常开展。这时，如能把双边贸易谈判扩大到第三国，在三国之间互相搭配进出口商品，实现贸易平衡，解决外汇支付上的困难，那么，双边贸易就变成了三角贸易。因此，三角贸易往往是双边贸易的扩大和发展，它提高了实现贸易平衡的可能性，有助于外汇短缺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

三个阶级和三种收入的理论 斯密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把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他们的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是社会的三大基本收入。这样，他已经依据人们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和取得收人的方式来划分阶级了。这是一个重要功绩。

关于工资，他认为是劳动的收入或报酬，在以前是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普遍被理解为雇佣劳动所得的报酬。这个见解多少揭示出资本主义工资所包含的剥削关系。但他又把工资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范畴，早就存在于原始社会。他还指出，劳动工资有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分，前者就是"劳动的价值"，相当于维持工人及其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后者是劳资双方在竞争中所确定的劳动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上下波动。但是，在这种市场竞争中，雇主由于种种原因经常居有利地位。他还提出，劳动报酬和劳动者生活状况是国民财富增进与否和社会前进或倒退的征兆和结果。斯密的这些见解颇具意义，但将劳动与劳动力不加区分，为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能不说是其工资理论的根本缺陷。

斯密最先系统考察了利润范畴。一方面，他把它看成是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也觉察到利润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者和劳动条件相分离，甚至把利润看作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般范畴。据此，他尖锐批评

了那种利润是资本家监督和管理劳动的工资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把利润当成资本的合理报酬，还是价值的源泉之一。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变动趋势时，斯密正确描述了其随经济发展而日趋下降的过程，认为资本量增加会提高工资而降低利润。他还把利息看成是由利润中派生的收入，利息率总的来说也呈下降趋势。

斯密对地租的阐述也是二元论。他强调地租是地主凭借土地私有权所得的特殊收入，无偿地占有着工人一部分剩余劳动。他明确规定资本主义地租的概念，认为它是全部劳动产品的价值扣除生产资料的价值、工资和平均利润之后的余额。他还看到地租的产生具有垄断方面的原因，但未能正确解释其垄断价格。然而，他同样把地租看成是价值的源泉之一，是土地的自然报酬，甚至认为它是自然力的产物。此外，他还把地租分为经营畜牧业、粮食作物和经营作物三类土地的收入，揭示了它们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还涉及技术进步因素。

斯密的三种收入理论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以及来源和本质的问题，但由于科学和庸俗两种见解互相交叉，毕竟没有能全面地揭示出三大阶级之间的真实关系。

亏损结转抵免（Carry-over Credit of Loss）　抵免限额的一种计算方法。它指的是，在计算跨国纳税人居民的抵免限额时，要求跨国纳税人首先将发生于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的某一纳税年度的亏损额结转到盈利年度来再计算抵免限额，以保证居住国（国籍国）的税收利益。

显然，跨国纳税人居民在不同年度间的盈亏情况并不是有规则地分布的，很可能某一纳税年度亏损，而下一纳税年度又有盈余。如果不实行亏损额结转，那么居住国（国籍国）政府在纳税人亏损年度没有税收收益而在盈利年度又给予一次性大幅抵免，就会丧失应得的税收利益，因此，有必要将亏损额结转到盈利额中来计算得出较低的抵免限额，以补偿居住国（国籍国）政府在纳税人亏损年度造成的税收收益损失。

已装船提单（Shipped Or On Board B / C）　已装船提单是指在货物装上船舶之后，由承认人签发给托运人的提单。与备运提单相对应。已装船提单必须写明货物的装船日期和船舶名称，这种提单保障了买方的利益，便于买方按时收到货物。

国际商会在1990年修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例》中，明确规定买卖双方如果以C·I·F为交货条件，卖方必须向买方提供已装船提单。此外，国际商会1974年修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也明确规定买卖双方如果采用信用证方式支付货轮，除非信用证有不同规定，卖方向银行提交的提单也必须是已装船提单。

个人外汇（Personal Foreign Exchange）　即"私人外汇"，见"私人外汇"。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价值观，它高度重视个人自由、认为应当允许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受外来约束地追求自身的体益。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是最具有价值的；每个人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人们应当彼此尊重；每个人都应当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标；社会只是为个人服务的工具，政府应当尽可能少地对个人施加影响与进行干预，它的职能应当局限于制订法律、维护公共秩序，进行监督，保障个人利益不受损害等等。极端的个人主义还主张应当废除国家机构，实行无政府主义。

作为一种经济价值观，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私有财产可以通过劳动获得，也可以通过继承遗产或者投机得到。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都有最大自由的处置权，可以用这笔财产进行投资、消费或者转让等等，别人无权干涉。此外，个人有权为了获得财富去进行竞争，只要这种竞争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竞争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只有强者才能得以生存。

"个人主义"一词是法国的A·托克维尔创造的，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种温和的自我主义，它使得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亲属与朋友，而对更大范围的事物却漠然处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哲学开始流传开来。17世纪中叶，英国的T·霍布斯提出了个人主义独裁哲学，后来，J·洛克又提出了天赋人权理论，主张个人的平等，这对个人主义哲学的流传起了很大作用。18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在西方国家中达到高潮。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了放任自由的原则，认为只要经济行为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市场上寻求最大的利益，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迅速发展、充分就业等等宏观经济目标。他主张将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降到最低限度，政府只充当"警察"与"守夜人"的角色，同时负责建设公共设施就可以了。这种放任自由的主张在西方经济学界以及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中统治了一个多世纪。19世纪，J·边沁发展了霍布斯的理论，提出功利享乐主义，流行一时。

19世纪30年代开始，约翰·穆勒发展了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认为不仅应当强调个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而且更应当重视个人个性的发展，他人无权干预与限制这种个性的发展。马克思在其庞大的政治经济理论中也分析道，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工人依附于机器，成了机器与大生产的奴隶，没有任何个性可言，这种人与物颠倒的现象必须改变，改变的方法就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见，马克思一直将个人的充分发展看成最终目的。

19世纪末以来，由于出现了大型社会组织，相应发展起一系列与个人主义背道而驰的理论与原则，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的盛行也进一步削弱了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仍有F·哈耶克与M·弗里德曼等人坚持提倡个人在获取与占有财富方面的自由，J·罗尔斯等人提倡充分发展个人的个性。再加上近年来，经济上的放任自由思潮又有抬头，个人主义仍将继续对西方社会以及世界其它国家施加影响。

IS-LM模型（IS-LM Model） 说明物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即同时达到投资（I）等于储蓄（S），货币需求（流动偏好，L）等于货币供给（M）时，国民收入与利率决定的模型，如附图1所示。在附图1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纵轴Oi代表利率。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上任何一点都是物品市场均衡，即I=S时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结合；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上任何一点都是货币市场均衡，即L=M时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结合。图中IS曲线与LM曲线相交于E，这时决定的均衡的国民收入（y_0）与均衡利率（i_0）使物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实现了均衡。而且，只有国民收入为（y_0），利率为（i_0）相结合的点才能使物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E以外的IS曲线上的任何一点上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结合只实现了物品市场的均衡，而没有实现货币市场的均衡。E以外的LM曲线上的任何一点上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结合只实现了货币市场的均衡，而没有实现物品市场的均衡。E以外又不在IS曲线与LM曲线上的任何一点上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相结合则是物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失衡。这一模型中包括了凯恩斯在分析国民收入决定时所涉及的四个变量：消费（在该模型中用收入减消费的余额储蓄来代表）、投资、货币需求（流动偏好）和货币供给，并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了这四个变量如何同时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所以，这一模型是用一般均衡方式概述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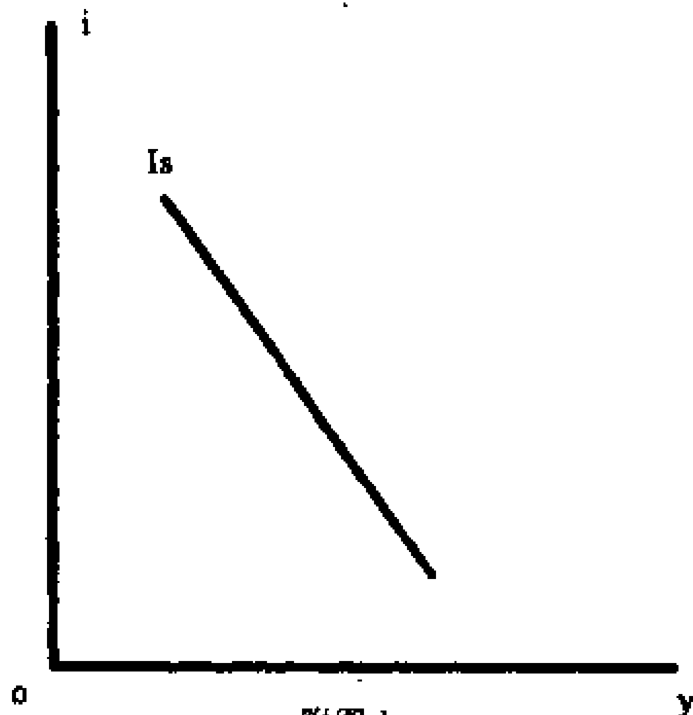
根据IS-LM模型对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表述，还可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应。附图2是运用IS-LM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当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即增加财政支出时，自发总需求增加。自发总需求增加使IS曲线从IS_0向右上方移动到IS_1。IS_1与LM曲线相交于E_1，决定了国民收入为Y_1，利率为i_1，即国民收入增加了，利率也上升了。相反，当政府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减少财政支出时，自发总需求减少。IS曲线从IS_0向左下方移动至IS_2，从而国民收入减少为Y_2，利率下降为i_2。

附图3是运用IS-LM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当政府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给量时，LM曲线从LM_0向右下方移动到LM_1。LM_1与IS曲线相交于E_1，决定了国民收入为Y_1，利率为i_1，即国民收入增加了，利率下降了。相反，当政府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即减少货币供给量时，LM曲线从LM_0向左上方移动到LM_2，从而国民收入减少为Y_2，利率上升为i_2。附图4是运用IS-LM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假定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自发总需求增加，IS曲线从IS_0向右上方移动到IS_1，决定了国民收入从Y_0增加到Y_1，利率从i_0上升到i_1。由于利率的上升会抑制私人投资，所以，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利率上升则具有减少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就减少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为了消除挤出效应，政府可以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给量。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LM曲线从LM_0向右下方移动到LM_1。LM_1与IS_1相交于E_2，使利率从i_1下降到i_0，这样就消除了挤出效应，国民收入从Y_1增加到了Y_2。这就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有力地刺激经济。同样可以推出，紧缩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有力地抑制经济，制止通货膨胀。（图见插页）

IS-LM模型最早是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J·Hicks）在1937年一篇论述凯恩斯与古典学派关系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后经美国经济学家A·汉森发展。所以，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汉森模型”。这一模型高度概括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认为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标准解释，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同时，这一模型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来表述凯恩斯主义，所以，又成为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基础。但是，另一个凯恩斯主义派别——英国新剑桥学派，反对IS-LM模型，认为它歪曲了凯恩斯主义的实质。60年代之后，以美国经济学家R·克劳尔（R·Clower）和J·莱荣霍夫德（J·Leijonhufvud）为首的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分析，IS-LM模型的均衡分析则完全曲解了凯恩斯理论的真正本质，从而全面否定这一模型。即使是在凯恩斯

主义内部，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模型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认为投资取决利率这样的假设并不现实等。但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IS–LM模型还是适用的，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

IS曲线（IS Curve）　描述物品市场达到均衡，即投资（I）等于储蓄（S）时，国民收入与利率之间成反方向变动关系的曲线，如附图1所示。在附图1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纵轴Oi代表利率，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表示，利率高，则物品市场上达到均衡时，国民收入小；反之，亦反之。当物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与利率反方向变的原因是：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利率与投资是反方向变动的，即利率上升，投资减少；利率下降，投资增加。这是因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纯利润的最大化，在利润率既定的情况下，纯利润的大小则取决于利率，利率下降，纯利润增加，投资也会增加；反之，利率上升，纯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投资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投资与总需求同方向变动。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总需求的变化则按乘数原理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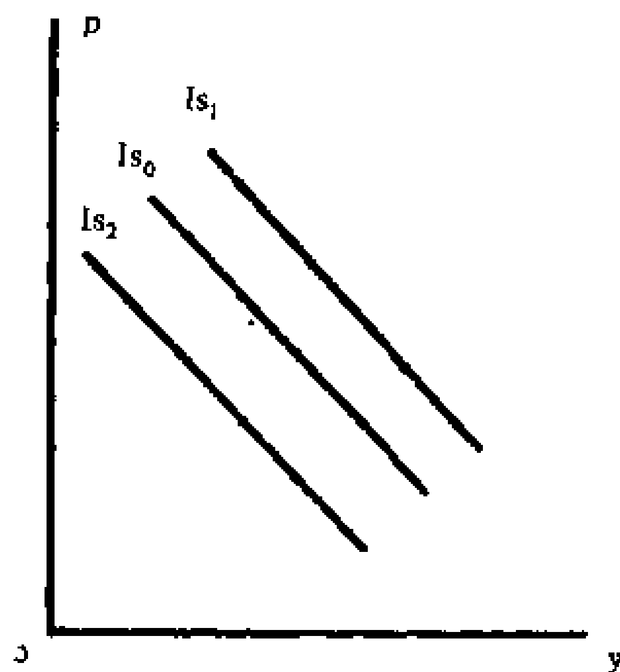
附图1

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所以，利率与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利率对国民收入影响的过程是：利率→投资→总需求→国民收入。以Y代表国民收入，α代表乘数，A代表自发总需求，b代表投资的利率弹性，即投资变动对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i代表利率，则IS曲线的函数式可以写为：

$$Y=\alpha\ (A-bi)$$

上式不仅表明了国民收入（Y）与利率（i）的反方向变动关系，而且也表明了IS曲线斜率的决定。IS曲线的斜率取决于乘数（α）和投资的利率弹性（b）。乘数越小，投资的利率弹性越小，则IS曲线的斜率越大，即图中的IS曲线越陡峭，从而既定的利率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小。相反，乘数越大，投资的利率弹性越大，则IS曲线的斜率越小，即图中的IS曲线越平坦，从而既定的利率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大。

IS曲线的位置取决于自发总需求（A）的变动，如附图2所示。当自发总需求（A）增加时（例如，政府支出的增加），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即从



附图2

附图2中的IS_0向右上方移动到IS_1；当自发总需求（A）减少时（例如，政府支出的减少），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即从附图2中的IS_0向左下方移动到IS_2。在IS曲线斜率以及LM曲线不变的情况下，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使国民收入增加，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国民收入减少。

由IS曲线上任何一点表示的利率与国民收入的结合，都是I=S，即物品市场的供求均衡。在IS曲线以外的任何一点上利率与国民收入的结合，都是I≠S，即物品市场的供求失衡。位于IS曲线右边的任何一点，都是I<S，即物品市场上存在着过剩的供给；位于IS曲线左边的任何一点，都是I>S，即物品市场上存在着过度需求。IS曲线的决定与性质是IS–LM模型的基础。

参见“IS–LM模型”。

飞奔的通货膨胀（Galloping Inflation）　又称“奔驰的通货膨胀”，指经济在较长时期内所发生的物价水平较大幅度的持续上涨。在这种通货膨胀时期，物价水平的年上涨率一般达到了两位数的幅度，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几十。这种情况下会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如不采取有力的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还会加剧。这种通货膨胀的破坏程度还不足以导致货币体系和经济生活的崩溃，但对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都有较严重的不利影响。人们为了避免物价大幅度上升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往往不愿意从事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活动，

而转向各种保值和投机活动，结果使经济活动收缩和生活混乱。战后50—70年代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都发生过10—70%物价年上涨率的通货膨胀，从而给这些国家经济生活带来困难。70年代之后东欧一些国家也发生过这种通货膨胀。

门格尔，C（Carl · Menger 1840～1921）　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

生平和著作　曾先后就读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专攻法学和国家学。1867年获克拉科夫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872年任维也纳大学讲师，翌年升任经济学教授。1876年担任皇太子的导师，讲授经济学和统计学，还伴随皇太子游历瑞士、英、法等国，1878年回维也纳大学再任教授，1903年退休后被聘为名誉教授。1900年还被选为奥国上议院终身议院。

门格尔的主要代表作有《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1883年）和《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1884年）。第一部书主要是价值及价格理论的阐发，被普遍看成是西方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的重要标志，并为形成影响重大的奥地利学派奠定了基础。后两书主要涉及经济方法论的探讨和争论。

经济思想　门格尔在经济学史上被认为主要有两方面成就：阐明边际效用论以及同新历史学派展开经济方法论争。他认为，历史学派用经济史代替和取消经济理论，是"理论的不生产"；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历史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分别来考察同一国民经济现象；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采用"抽象演绎法"，建立起永久的普遍原理。他的著作主要是阐述经济理论。

门格尔理论的核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在他看来，物品成为财货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需要量大于支配量的财货叫经济财货，而只有经济财货才具价值。价值的本质是主观的，即它既不附属于财货，也不是财货应有的属性，更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只是人们对财货满足欲望的强度的主观评价中得出的。价值的衡量尺度同样是主观的。因为人们的欲望满足呈现递减趋势，一种财货的数量越多，人们对其主观评价的重要性越低。这样，财货的价值就取决于该财货所能满足的各种欲望中其重要性最小的欲望。这就是后来称的"边际效用"决定着价值。

门格尔又把财货区分为低级（或叫第一级）财货和高级财货，前者指直接满足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后者指用以生产消费品的各种生产要素。高级财货的价值取决于它所生产出来的低级财货的价值，不过由于生产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只是取决于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叫做的"归算理论"。门格尔又认为，这种所谓高级财货价值决定规律，十分有助于认识土地利用、资本利用和劳动力价值问题。如土地的价值（即地租）取决于其农产物的预期价值，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由劳动生产物的预期价值所决定。这一来，各种收入都成为由欲望满足强度所决定的主观心理产物。

门格尔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完全诉诸主观心理评价，歪曲价值的本质、来源和衡量尺度，掩盖利息和利润的剥削性质、其庸俗性质十分明显。但其中包含的边际分析方法则对经济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的理论经过其学生维舍尔和庞巴维克等人的承袭、阐释和发展，形成为一套较完整的学说体系。同"边际革命"另两位创始人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比，门格尔及奥国学派的国际影响要远为显著，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了经济学史上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

凡勃仑·托尔斯坦·本德（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　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农村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的研读兴趣相当广泛，亦受到克拉克等著名经济学者的影响，这为他日后提出独特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1890年后，他曾先后在芝加哥、斯坦福、密苏里等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担任过教席，但因其思想激进而屡遭解聘。有一段时期还当过杂志编辑和专业作家。凡勃伦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异端派，主张制度分析或文化心理因素分析，倡导所谓"演进经济学"，并同主流经济学严重对立。有人称他是第一个有独创性思想的美国经济学者。

凡勃仑的主要著作有：《有闲阶级论》（1899年）、《企业论》（1904年）、《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以及《不在所有权与近代企业》（1923年）等。

经济学对象和方法　凡勃仑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而著称于世，这首先表现为他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的独树一帜。他指出，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结论虽则同其前提相符合，但这些前提却与现实相距甚远，因此，必须摒弃静态分析、均衡理论、边际效用概念以及享乐主义哲学，倡导制度分析和文化心理因素分析。他强调，经济学应该用"历史起源方法"研究从远古以来同经济有关的各种制度形态，说明它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以此研究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换言之，经济学应当研究"制度演

进"，即成为"演进经济学"。于是，凡勃仑及其追随者被称之为"制度学派"。

在凡勃仑看来，所谓的"制度"是指由人们的本能和心理动机所决定的风俗习惯等。这是用心理学解释制度的性质和由来。他又认为，既然制度是思想和习惯长期积累的产物，它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的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换言之，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就是制度各种形态的自然淘汰过程。按照这种进化论的解释，人类在经济生活中基本上有两种本能：改进技艺和追求利益，相应地，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存在两个主要的制度，即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它们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资本主义制度分析　凡勃仑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发展趋势。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两个主要制度分别表现为"机械操作"和"企业经营"，前者是指技术管理人员阶级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的制度，后者是指企业主阶级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制度，由于这两个阶级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都不同，就形成了"机构操作"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凡勃仑强调，正是这个矛盾的日益尖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本源泉。具体地说，"机械操作"要求无限制地扩大商品生产，而"企业经营"出自金钱利益的考虑，往往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可生产权力却控制在企业主阶级手里。这样，两种制度不可调和地严重对峙，导致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而"企业经营"依靠有利的价格来获取利润，却限制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缺陷，它决不是和谐和完善的。例如，"企业经营"统治"机械操作"所产生的重大后果之一，便是工商业长期陷于经济萧条的低谷。这是因为，当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使得生产量的增加超过其危险点，即产品缺乏销路的时候，企业就难于支付所借资本的利息或股息，于是那些不参与实际生产的投资资本家就会懈于行动。从而导致生产减退和失业增加，使得工商业呈现一种慢性萧条状态。

但是，凡勃仑又认为上述的制度缺陷会在社会进行过程中得以解决。按他的说法，技术管理人员阶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其作用和社会地位日见重要，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采取行动，就足以迫使企业主阶级交出管理企业和社会经济的权力，从而可以担当起变革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领导者，抛弃"企业经营"的制度。由此出发，凡勃仑在拟定其变革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中，提议成立技术人员委员会来掌握经济控制权，以改革资本主义的弊端。不过他又提到，技术人员阶级毕竟属于受雇者，力量薄弱，且对资本主义制度缺乏透彻的认识，故尚未成熟到能自觉组织起来进行变革的程度。后来他甚至作出悲观的预测，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最后崩溃并非没有可能。

在研究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凡勃仑还阐述了"有闲阶级"这种经济力量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描述有闲阶级具有如下的经济特征：1.生产性劳动的豁免，即该阶级从事的职业都是非生产性的。2.金钱的竞赛，即从现有的金钱标准出发去寻求财富的增加，以获取声誉和地位。3.金钱的崇尚原则，即金钱财富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和显示财富是一切活动的主要目的。4.炫耀性的有闲和消费，即他们之所以力图过有闲的生活和从事大量浪费性的消费，旨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高人一等。因此，有闲阶级在社会进化过程中阻碍文化的发展和保存废弃无用的事物，起着抗拒社会发展与革新的作用。凡勃仑又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思想习惯（如赌博心理、信仰命运、迷信宗教等）都同金钱制度相联系，也是有闲阶级的"素质"和特性的反映。这实际是对企业主阶级的批判。

凡勃仑学说立足于心理学和进化论之上，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鼓吹社会改良主义，这自然是错误的。但是，他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科学技术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批判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这些都应予充分的肯定。他提倡整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制度——结构分析，特别着眼于"机械操作"与"企业经营"的对立和斗争，这实际上已经涉及生产关系研究。他对西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比较深刻有力，在当时亦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给人们以诸多的启示。因此，凡勃仑建立的新颖而独特的经济学说，尽管始终只是一种"异端"，却具有深远的影响。30和40年代贝利、米音斯、白恩汉和艾尔斯等人关于公司的结构和管理以及制度演变趋势的考察，和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就都是对凡勃仑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四　画

以邻为壑政策（Beggar—My—Neighbour Palicy） 又称"损人利己政策"，指在开放经济中一国以损害他国利益来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经济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是密切相关的，一国的繁荣或萧条，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与之有密切贸易来往的国家，有重大的影响。这样，有的国家就又可以通过某种经济政策把自己的失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其他国家的损失来实现自己的充分就业。引起这种后果的经济政策就被称为以邻为壑政策。例如，通货贬值（汇率贬值）、出口补贴、进口限额等政策都可以增加本国出口，减少从他国的进口，从而把国内的失业输出到其他国家。这种政策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引起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汇率战、或关税战。因此，在长期内不仅对各国都无效，而且还会加剧国际经济关系的紧张，造成两败俱伤。各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采用以邻为壑的政策是国际经济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 德国经济学家A·瓦格纳（A·Wagner）在19世纪后期提出的一种假说。这种假说的基本内容是，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政府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日益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公共行政、法律和秩序，以及经济活动的管理费用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第二、国家提供的各种公共消费（文化、福利等）有较快的增长。因为对这种公共消费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一，即在收入增加时，对这种公共消费需求的增加大于收入增加的比例。第三、经济的发展使工业中的垄断增长。国家用于管理这种垄断的支出也要增加。以后的事实证实了瓦格纳法则的预言。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瓦格纳法则只是一些主张，其论据并没有以任何严密的有关人类行为或政府的理论为基础，很难称得上是一种严格的理论，或是对未来的科学预测。

瓦伊纳·雅各布（Jacob Viner，1892—1970） 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史家。出生于加拿大，192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6—1946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其间两度出任政府官员。1946—1970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其间担任过政府顾问。在经济学史上，瓦伊纳曾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但其声名主要来自国际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他是十分著名的新古典主义国际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1937年）一书里，他全面评述了重商主义以来的各种国际经济学理论，并批评哈伯勒的机会成本分析方法抽去了古典成本概念以人的努力的实际牺牲为基础的实质。他的《关税同盟问题》（1950年）还首先阐述有关经济一体化多种形式的理论和政策，成为以后许多国际经济学著作的出发点。他被公认为熊彼特之后最杰出的经济思想史家，学识渊博，论述广泛，对经济思想史的诸多问题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此外，瓦伊纳还对成本理论作出重要贡献，他提出的一整套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主要是包络曲线），已经成为标准教科书中，厂商理论的重要内容。

瓦格纳·阿道夫（Adolf Wagner，1835—1917） 德国经济学，财政学家，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生于德国的爱尔兰根，曾就读于戈丁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自1858年起，先后在四所大学担任教授达半个多世纪，其中在柏林大学任教40余年。曾任国会下院议员和上院议员。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1876年）和《财政学》（1877—1901年）。他起初研究实际经济问题，后来转向理论探讨，并在70年代提出了将经济分析与伦理学合二为一的"新经济学"。他尤其重视法律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作用，认为个人经济地位主要由法律制度决定，而一个时代的经济制度以及财产权利和契约关系等也同法律制度紧密相关，是一种随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历史形式，故他竭力主张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学。他是社会政策协会的创建人之一，也被视作最活跃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他十分推崇国家权力的强制性，鼓吹它应具有支配经济和社会的权威，必须采取断然的干涉措施去限制个人经济自由的范围和扩大公共事业，借以提高劳动阶级的道德水准和宗教修养，扩大扶助贫困的手段，保护老幼残疾等。由此出发，他后来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竟公然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所以，他虽则具有新历史学派的基本特征，却通常被称为"保守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就对经济科学的贡献而言，其最大功绩在于首先把财政学建立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故有近代财政学创立者之称。

瓦尔拉·马利—埃斯普里·莱昂（Marie-Esprit Leon Walras，1834—1910） 法国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创建者，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数理经济学的主要代表者。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法国埃夫勒的一个经济学家家庭，早年就读于巴黎矿业学校。青年时代先后担任过杂志编辑，合作社理事，银行职员以及教学工作，都未获成功。因受父亲的影响，50年代后期立志研究经济学并不断自学。经过10余年的坎坷经历，终于在1870年被聘任为瑞士洛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直至1892年退休由帕累托继任其职。此后过着隐居生活，并继续从事写作。

瓦尔拉的主要代表作是《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年），此外还有《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1883年）、《社会经济学研究》（1896年）和《应用经济学研究》（1898年）等著作。

经济学体系　瓦尔拉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区分科学、技术和伦理学，它们各有自己具体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对应，经济学应划分为纯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即经济伦理学）三部分。其中纯粹经济学是社会财富的一般理论，其核心内容则是价格分析，而其他两者则分别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论和分配论。换言之，纯粹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基础。瓦尔拉本人主要就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并因此闻名于世。他强调，纯粹经济学只有借助数学方法才能对有关理论进行准确的计算和验证，于是充分运用代数、几何等数学工具阐述了完全自由竞争下的价格决定理论，并集中论证了他的两个主要理论—"稀缺价值论"和"一般均衡论"。

稀少性价值论　瓦尔拉经济学说的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但它是以稀少性价值论表现出来的。他承袭了其父亲"价值起源于稀少性"的思想，既反对劳动价值论，又批评单纯的效用价值论，提出了自己的价值理论。所谓"稀少性"，被界说成人们消费一定量消费品时最后的欲望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它具有两层含义，即一是有用性，二是供给的有限性。这实际上就是边际效用。必须指出，尽管瓦尔拉的价值论围绕"稀少性"而展开，但同其他学派的边际效用论还有所不同。按他的看法，供求均衡是价格决定的基本条件，其中需求函数又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他是从客观的供求分析转向着重分析需求时，才引伸出"稀少性"价值论的，同时亦没有充分论述和过于强调"稀少性"所含的主观评价性质。这就使得其价值论的主观主义色彩不太鲜明。

一般均衡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对西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并确立了其在经济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一般均衡论的基本思想是：一种商品的需求或供给不仅取决于该商品的价格，也取决于其他商品的价格，这意味着，一种商品的需求量或供给量既是其本身价格的函数，又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函数。因此，一种商品的价格决不能孤立地加以决定，而必须同其他商品的价格联合作出决定。当整个价格体系使得一切商品的供求都相等时，市场就达到一般均衡。从数学角度而言，只要能建立一系列等于未知数数目的联立方程，便可演算出这些未知数的数值，从而使得任何数目商品价格的联立决定成为可能。所以市场的一般均衡是可以达到的。

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主要是通过交换理论和生产理论得以阐发的。他首先考察两种商品的交换，论证了交换者实现最大效用即交换处于均衡的条件为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恰好等于价格之比。在考察市场上全部商品的交换时，他假定一个"拍卖人"不断调整自己的喊价，最后达到每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实现均衡状态。在整个试探过程中，其他的所有交易人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但他们仅仅在均衡价格形成之后才开始成交。这就是瓦尔拉体系实现一般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

瓦尔拉的生产理论主要论述生产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问题，是对交换理论这种最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补充和引伸。按他的说法，关于生产问题的研究将求得生产成本法则，而该法则就是生产性服务（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的基础。在实现生产的一般均衡时，作为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和消费品的出售者，企业主将既不赢也不亏，即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恰好相等。在这里，生产成本等于消费品的价格是基本的均衡条件，但生产成本归根到底是由稀少性原理支配的。

瓦尔拉还进一步提出了"资本积累"和"货币和流通理论"两个一般均衡模型，先后考察了资本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和货币交换与窖藏的问题，从而把它们包容在一个统一的一般均衡体系中。

综上所述，瓦尔拉的价值论和其他理论在本质上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相对立，其基本方面是不足取的。但一般均衡论把市场经济体系当作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加以研究，力图把握其间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这对经济科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自然拥有一定的科学性。正因为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均衡论不仅被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理论和实用两方面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还须一提，瓦尔拉作为数学方法的热诚的鼓吹者和实践者，指责有些经济学者研究边际问题回避数学方法，坚信经济学很快会跻身于精密科学的行列，还用数学方法精密地描述一般均衡的经济体系，这些都对数理经济学的最终形成以及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全面广泛的应用，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瓦尔拉学说还提出了生产要素要实现最优配置和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量价值两个重要思想，实际上早于克拉克25年就倡导着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往往是人们忽略不及的。

瓦尔拉定律（Walras's Law）　又称为瓦尔拉法则。由经济学家瓦尔拉（L · Walras）在创立其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时提出。瓦尔拉定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在任何价格水平下，市场上对所有商品超额需求的总和为零。各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之间相互依存，均衡价格为相对

价格，而非绝对价格。由瓦尔拉定律可以推出，经济体系中存在几个商品市场，若其中 n−1 个商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那么，第 n 个商品市场也必然是均衡的。

以经济社会只是纯交换体系为例。设在纯交换体系下，经济社会中有 m 个消费者，n 种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P_i 为第 i 种商品的价格，D_i^j 为第 j 个人对第 i 种商品的计划需求（planned demand），S_i^j 为第 j 个人对第 i 种商品的可获数量，为计划供给(planned supply)。在任何价格水平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追求最大效用，则有：

$$\sum_{i=1}^{n} P_i D_i^j = \sum_{i=1}^{n} P_i S_i^j \qquad j=1,2,3\cdots m$$

$$=> \quad \sum_{i=1}^{n} P_i (D_i^j - S_i^j) = 0 \qquad j=1,2,3\cdots m$$

其中 $(D_i^j - S_i^j)$ 为第 j 人对第 i 种商品的超额需求，设 $ED_i^j = D_i^j - S_i^j$

则有：$\sum_{i=1}^{n} P_i (ED_i^j) = 0 \qquad j=1,2,3\cdots m$

将经济体系中所有超额需求加总，则有：

$$\sum_{j=1}^{m}\sum_{i=1}^{n} P_i (ED_i^j) = 0$$

$$=> \sum_{i=1}^{n} P_i \sum_{j=1}^{m} ED_i^j = 0$$

$$=> \sum_{i=1}^{n} P_i ED_i = 0$$

上式即为瓦尔拉定律，它表明在任何价格水平下，消费者对所有商品的超额需求总和为零。同样，可以证明，瓦尔拉定律不仅适用于纯经济交换体系，而且适用于生产与交换经济体系，也适用于货币经济体系。需要提出的是在纯经济交换体系和生产与交换经济体系下，瓦尔拉定律中的需求函数 $D_i(P)$为价格的零次齐次函数，超额需求函数 $ED_i(P)$亦为价格的零次齐次函数，但是，在货币经济体系下，由于货币需求量并不是效用函数的变数，这样，需求函数和超额需求函数都不再是价格的零次齐次函数，均衡商品价格的任何同比例变动，都会使该货币经济体系脱离其原来的均衡状态。

瓦尔拉资本理论（Walras's Theory of Capital）

瓦尔拉在其代表作《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理论，主要讨论资本品价格的确定问题。瓦尔拉认为，人们对资本品有需求主要是因为资本品能够提供各种服务，如土地服务、劳动服务、资本服务，并进而产生租金、工资和利息。资本品的价格基本上取决于其服务的价格，即资本品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收入。设 P 为资本品的价格，p 为该资本品的总收入，这是包括折旧费和保险费的该资本品服务的价格；uP 为总收入中属于折旧费的部分，vP 为总收入中属于保险费的部分，那么，可以得到资本品的净收入 $\pi = p-(u+v)P$，可以看出，资本品的价格与资本品的净收入是成正比的，在均衡状态下，资本品的净收入率 i 对一切资本品来说是相等的，其中 $P=\frac{P}{i+u+v}$ 或写为：$i=\frac{p-(u+v)P}{P}$。若确定了共同的净收入率 i，也就同时确定了一切资本品的价格。

为了确定净收入率和资本品的价格，瓦尔拉进行了一系列的假定，如假定资本品的售价等于其生产成本，假定土地和人口的数量是既定的，假定新生产的资本品与总收入对总消费的超过量进行交换，由此，瓦尔拉建立了 2l+2 个方程来确定 2l+2 个未知量，这些未知量包括新狭义资本品的 1 个产量以及 1 个价格、准备转变为资本品的收入对消费的总超过量和净收入率。进一步，为了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了解，瓦尔拉又扩展了其讨论的范围，对经济体系建立了 2n+2m+2l+1 个方程来确定 2n+2m+2l+1 个未知量，这些未知量包括：(1) 所提供的服务的 n 个总量，(2) 这类服务的 n 个价格，(3) 所需求的产品的 m 个总量，(4) 以第 m 种产品计的 m−1 种这类产品的 m−1 个价格，(5) 收入对消费总超过量的价值，(6) 所制造的新资本品的 l 个量，(7) 这类资本品的 l 个价值，(8) 净收入的价格，上述方程体系保证了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状态。

瓦尔拉在其资本理论中，还讨论了资本品的最大效用问题，讨论了资本品价格的确定和变动定律，以及净收入率的变动定律等。

支出转换政策（Expenditure Switching Policy）

把对进口品的需求支出转变为对国产品的需求支出，以同时实现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经济政策。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总需求支出分为对进口品的需求支出和对国产品的需求支出两个部分。在总需求支出为既定时，通过改变总需求的构成，即把对进口品的需求支出转变为对国产品的需求支出，既可以增加国内的就业，又可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支出转换政策的主要工具有：汇率政策，即通过汇率贬值来提高进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以增加出口，限制进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包括实行保护性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等等。这种政策对改善一国经济状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国际

经济关系中，受到这种政策损害的国家会进行报复，采取类似的政策，从而就引起国际经济关系的紧张。因此，这种政策的最终效用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

支出函数（Expenditure Function）　是表示消费者支出的函数。假定效用函数为 $u=u(x)$ x 是消费的向量，即 $x=(x_1x_2\cdots x_n)$，且有：$x>O_N$。P 为消费的价格向量，$P=(P_1P_2\cdots P_n)>O_N$，O_N 是零向量。在这种情况下，支出函数就可定义为：

$$E(u,p)\equiv \min_x\{p\cdot x: U(x)\geqslant u \quad x\geqslant O_N\}$$

$$p\cdot x=\sum_{i=1}^{n}p:x_i$$

意思是指消费者试图至少达到用指数 u 表示的效用或福利水平而使消费成本最小。因此支出函数的推导是在效用既定的条件下，从支出最小化的一阶条件中求出补偿需求函数 $q_i=q_i(p_1P_2\cdots P_n,u^0)$，则支出函数 $E(p,w)=\sum_{i=1}^{n}P_i\cdot q_i(P_1,P_2\cdots P_{nj}u^0)$。支出函数与效用函数存在对偶性关系。如给定特定的正则拟凹效用函数，则产生相应的价格上是一次齐次，在效用上是单调递增的支出函数，反过来，给定价格上是一次齐次的和效用上是单调递增的支出函数就产生正则拟凹的效用函数。支出函数除了价格上一次齐次，效用上单调递增的特性以外，通常还假定（1）为非负函数，即 E（p·u）>0；（2）对于 P 是非递减的，即 $E(p^1u)>E(p^2u)$，$u>0$　$p^1>p^2>O_N$。（3）E(pu) 是凹函数。也就是，$E(np^1+(1-n)p^2)u)>\lambda E(p^1u)+(1-n)E(p^2u)y>0$　$0<\lambda<1$　$p^1\gg O_N$　$p^2\gg O_N$。支出函数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的理论方法，它与生产理论中的成本函数极为相似，可参阅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词条。

支出指数（Expenditure index）　支出指数（E）是测度现期支出对于基期支出比率的指数。它表示为 $E=\frac{\sum p^1q^1}{\sum p^0q^0}$。p 为价格，q 为数量，上标"1""0"分别表示现期与基期。$\sum$ 为求和号。通过将支出指数分别与另外两种指数（即拉斯佩耶斯价格指数 L 与帕西价格指数 p）进行比较可以判断消费者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若 E>L 且 E>p，则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如果 E<L 且 E<p，则消费者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如果 P> E> L 或 L> E> P，则难以断定消费者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或是维持不变。

支出税（Expenditure Tax）　征收支出税的观点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霍布斯（Hobbes）就曾经争辩说：应该按照人们所吸纳的社会资源征税，而不应该根据人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征税。以征收支出税代替征收收入税的主张，长时期以来，一直引起人们争论不休，这些争论都是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对支出税和收入税进行比较，只不过是所得出的结论不同。从效率角度讲，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收入税实际上对人们的储蓄征收了双重税，因而使得人们储蓄所取得的收益要大大低于人们用之进行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而这两种收益上的差距，会扭曲人们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选择，使社会资源的使用出现浪费。不过，后来发展起来的最优税收理论对这个观点提出了怀疑，次优理论认为：评价税收体系不应该仅仅考虑扭曲的数量，而且还应考虑扭曲的规模和它们的相互作用。从福利经济学的观点看，支出税和收入税在效率上的比较完全取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政府影响不同时期之间消费配置的工具，以及象劳动供给的利率弹性等一些关键的模型参数。从公平的角度看，则更倾向于支持以支出税代替收入税，累进制收入税是根据纳税能力或支付能力征收的，但是，问题在于：用收入来衡量纳税能力或支付能力是否准确？首先，收入仅只是纳税能力的一种测量；其次，收入本身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最后，为了征税目的所定义的收入概念，并没有包括所有的收益，有的收益并未列人，因此，在征税时，就会出现有的收益要交税，而有的收益不交税的不公平情况。收人还作为是"支付能力"的一种代表，但是"支付能力"还有其他来源（如财富），它很难包括在由收入衡量的纳税能力之中。此外还有临时收益和资本所得问题。许多人认为：由于收入、财富以及资本所得三者之间缺乏可比性而导致的许多问题，在实行支出税时就可以获得解决。既然收入缺乏一个客观的、能够真实地衡量支付能力的定义，那么，从公平的角度看，就没有理由认为收入税体系要比支出税优越。卡尔多（Kaldor）第一个从全面的角度比较了支出税和收入税这两种税收体系，他认为：收入作为纳税能力的一种衡量肯定是含糊的，并且对支付能力也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衡量手段，因此，支出税即使不比收入税好，至少也不比收人税坏，而且，支出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优势，尤其是支出税是控制经济的一个更有效率的工具。不过，对于支出税也有一些人提出了反对，他们认为支出税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凯恩斯就曾经把支出税形容是一种理论上的声音，而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

支票（Cheque，Check）　所谓支票，是银行存款户出立的，要求银行对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无

条件立即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支付命令。依据英国票据法关于支票的定义，则认为支票是以银行为付款人的即期汇票。

支票的基本当事人有三方面，即：出票人(drawer)、受票人（drawee）（又称付款人(payer)）和收款人（payee）。从支票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支票有两大特点，一是支票的付款人或称受票人必然是银行，二是支票是一种即期票据。这样，支票只能起支付工具的作用，即用来进行结算，而支票的出票人必定是此受票银行的存户，在银行已开立往来存款帐户，如果支票的出票人本身也是支票的收款人，则表明出票人是为了从银行自己的户头中提取现款。

依据《日内瓦统一支票法》（Geneva Uniform Law On Cheque 1931），一张票据必须具备以下几项方可视为支票：

(1) 在票据上写明支票字样。

(2) 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命令。

(3) 受款人姓名或其指定人字样或持票人字样。

(4) 付款银行名称。

(5) 出票日期和地点（未载明出票地点，出票人姓名旁边的地点则视为出票地点）。

(6) 付款地点（未载明付款地点，则付款银行所在地应视为付款地点）。

(7) 出票人签字。

支票从种类上看，依据支票抬头的填写方式可以分为记名支票、指示支票和无记名支票。依照收款人收取款项的方式可以分为未划线支票和划线支票。还可依据银行是否对支票予以保证兑付，分为保付支票和未保付支票。支票虽然也可分为远期和即期，但远期支票并非真正的远期，而只是填迟日期，被填迟的日期应视为支票的出票日期。

按照银行惯例，支票的提示期限最多不超过半年，但是既使支票过了提示期限也并非立即失效，如果出票人同意付款，银行依然会对此支票进行付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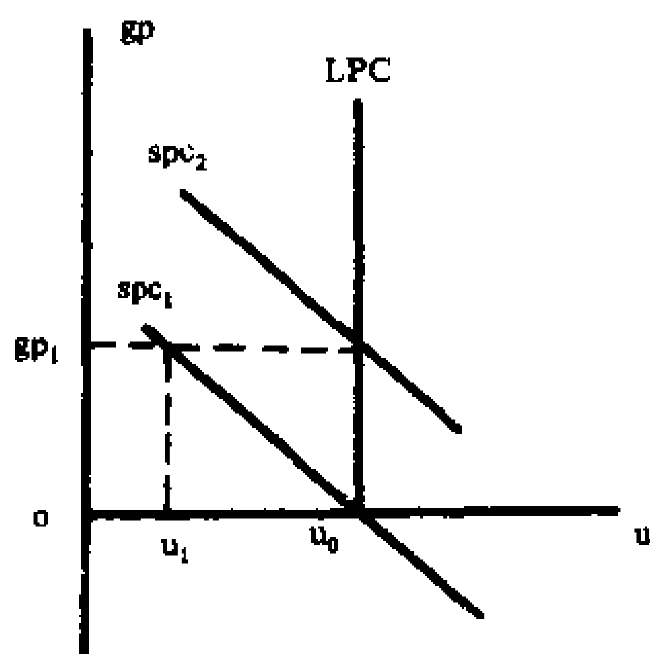
支付协定（Payment Agreement） 支付协定是指缔约国各方就贸易支付问题专门缔结的协定。根据支付协定的规定，各国通过贸易或其他往来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一般不需动用外汇，而是通过记帐和互相抵冲的办法进行清算，因此支付协定又叫清算协定(Chearing Agreement)。支付协定是各国国际收支危机和外汇管制的产物。贸易逆差、国际收支的危机使得一国没有足够的外汇来支付进口货款，影响和制约贸易的发展，而外汇管制使得外汇收支受到一国有关当局的严格控制，进口者使用外汇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为了应付外汇不足造成的困难，保证贸易的正常开展，有关国家不得不签订支付协定，使得进出口贸易通过记帐的办法完成结算。一般来说，支付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清算机构、设立清算帐户、规定清算时使用的记帐货币、清算帐户涉及的项目与范围、规定清算的程序和办法、双方债权债务抵偿后差额的清算办法等。原则上说，协定期内各方的进出口额应趋于平衡，以便实现互相抵冲而不必动用外汇。但在实践中这一点很难做到，因而就产生了一个贸易差额的清算问题。在支付协定中关于贸易差额的清算主要有三种办法：(1)超过"摆动额"的清算。它规定在协定期限内，清算帐户允许存在着一定的差额，这个差额就是"信贷摆动额"，它被当作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信贷。如果差额超过了"信贷摆动额"，逆差的一方就必须用黄金和外汇偿付超过的部分。(2)定期差额清算。有时支付协定的有效期比较长，协定各方就有可能定期对清算帐户进行平衡，贸易差额可以用黄金和外汇来偿付，也可用双方同意的其他不可兑换的货币偿付，也可把它转入下一时期由逆差国用出口商品来清偿。(3)协定结束后的差额清算。它通常由黄金和外汇来偿付，或者把它转人新签订的支付协定中。支付协定有助于各国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支付协定最早出现在1931年，以后曾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目前签订支付协定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支配效应 支配效应属于增长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的是，由于在现实经济中，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无论是大的经济单元之间还是小的经济单元之间，由于相互间的不均等影响而产生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一些经济单位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些经济单位则处于被支配地位。这种一个单位对另一个单位施加的或产生的不可逆或有部分不可逆的影响就被称为支配效应。一般来说，具有创新性的产业活动往往发生于较大的经济单位之中，它们能通过其规模、谈判能力和经营性质等特点对其它经济单位产生支配影响，因而这种经济单位就成为支配性单位。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创新企业，将产生一大批"群集的追随者"，即追随、模仿创新企业而出现的一批企业。

长期失业者（Hard —core Unemployed） 又称为"失业硬核"，指那些在已登记的失业人员中难以获得工作从而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失业者。这种情况的存在可能是由于：第一、文化技术水平低，智力条件差。第二、年龄大或体质差，体力条件差。第三、对工作的态度过于挑剔，能获得的工作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第四、种族或性别歧视。一般认为，这部分失业

者构成了一个无法减少的最低限度失业人数，成为失业者中难以消除的"硬核"。减少这种失业者是降低自然失业率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途径是对这些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改变他们在劳动市场上不受欢迎的状况，以及改变他们对工作的态度（通过改变失业补助方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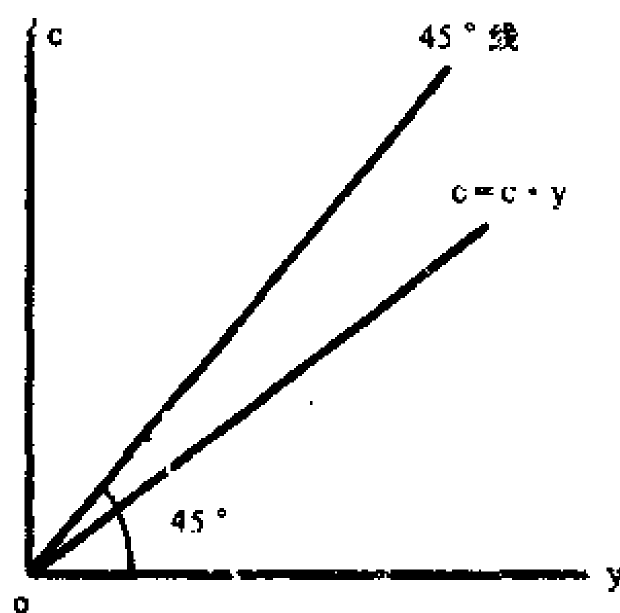
长期菲利浦斯曲线（Long—run Phillips Curve）　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时的菲利浦斯曲线。该曲线如附图所示，是一条向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表明在长期中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即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变动，失业率都处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M.·Friedman）和E·费尔普斯（E·phelps）用长期菲利浦斯曲线来说明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消除失业的无用性。可用附图来说明这一点。在附图中，横轴ou代表失业率，纵轴o，gp代表通货膨胀率，spc为第一期的短期菲利浦斯曲线。在短期中由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下降，从而产量增加，就业增加。附图中，当通货膨胀率上升为gP_1时，失业率由U_0下降为U_1。但当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调整，从而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一致时，就业又会减少，失业率回到U_0的水平，但通货膨胀率上升到gp_1的水平，短期菲利浦斯曲线移动到SPC_2。随着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提高，短期菲利浦斯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在长期中，尽管通货膨胀率在不断提高，但失业率一直是处于自然失业率U_0时，因为长期中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通货膨胀率必定是一致的。



长期消费函数（Long—run Consumption Function）　长时期内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以C代表长期消费，Y代表长期收入，c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长期消费函数为：

$$C=C\cdot Y$$

与短期消费函数相比，重要的差别是函数式中不包括自发消费。因为在长期中自发消费占的比例很小，可以忽略不计。长期中的消费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水平，这里说的收入水平指个人可支配收入。附图说明了长期消费函数。图中横轴OY代表收入，纵轴OC代表消费。45°线是收支相抵线，线上的每一点都表示收人等于支出。C=c·Y为长期消费函数线，该线在45°线以下，表明长期中收人大于消费，即边际消费倾向c小于一。长期消费函数线向右上方倾斜，表明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该线的斜率为边际消费倾向c。长期消费函数线从原点出发，表示长期中不考虑自发消费，全部消费都是由收入引起的引致消费。根据经济学家对长期消费统计时间序列资料的研究，在长期中，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平均消费倾向，其数值小于一，而且是相当稳定的。相对收人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人假说都论证了长期消费函数的稳定性。



长期停滞理论（Secular—stagnation Theory）　一种关于工业化国家由于能吸收储蓄的投资机会缺乏，从而经济出现长期停滞状态的理论。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就考虑到了经济发达以后可能会由于充分就业实现而出现长期停滞的问题。凯恩斯在《通论》中也考虑到长期中投资诱因减弱的问题。但最初系统地论述这一思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A·汉森。在30年代，汉森就提出，从产业革命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由于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新领土开拓等因素，投资的诱因十分强大，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但在1920年以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过度成熟的阶段，此后就是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他分析了引起美国投资机会明显减少的因素有四个：第一、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第二、领土无法再扩大。第三、缺乏能够使用大量资本的新产业。第四、；折旧储备日益重要，以致于公司不得不把新储蓄用于为重置资本的需

要。他强调投资机会缺乏的最重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率下降和对领土开拓的限制。这种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表示优虑，而唯一的可能出路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由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投资机会来刺激经济。但是，战后发达国家较为迅速的经济增长率打破了这一理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汉森的错误在于没有预见到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战后的许多重大科学技术突破。

长期与短期（Long-run And Short-Run） 长期与短期的概念在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中经常使用。这两个概念用来表示一种时间长度，在这一时间长度内一个厂商有机会改变其决策。这两个概念对于研究市场对变化的条件作出反应的情况是重要的。短期与长期的概念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时间长度来区分长期与短期。所谓短期是指厂商为适应市场变化而变更产量，需要变动要素投人量，但在这段时间内厂商无法变更所有的要素，而只能变动某些要素量。例如，厂商预测在未来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市场对于自己产品的需求量扩大。但短期内厂商的厂房设备是固定的，无法扩大，厂商只能变动劳动、原材料等要素投人量。对于厂商来说，凡是某些要素固定不变，而只能变动另一些要素的一段时期都是短期。所谓长期、是指在这段时期厂商投人的所有要素包括厂房设备等都可以变化。例如，某厂商预测市场对于它的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并将长期持续下去，那么厂商将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扩大产量。厂商可以扩建厂房、增加设备以满足市场对于其产品的需求。可以说，在长期内不存在任何固定的要素。在厂商的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的分析中都引进了长期与短期的概念。短期生产函数中，存在着固定的要素投人，产出的变化随变动要素投人的变化而变化。长期的生产函数中所有投入都会变化，产出变化是全部要素投人变化的结果。短期的成本函数有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分，长期的成本函数不存在这种区别。

长期趋势（Secular Trend） 这是一个统计术语，表示一系列经济数据的有规律的长期运动。长期趋势是通过对较长时期内时间数列资料的加工整理，利用动态统计表和统计图，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确定长期趋势应当用年度资料，这是因为年度是各项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的基本时间单位，而且消除了季节变动的影响。确定长期趋势，必须有较长期的时间数列资料，如5年以上，否则，代表性就不强。确定长期趋势的统计方法很多，常用的方法有移动平均法、直线法和曲线法。移动平均法是将动态数列的数值，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依次进行平均，如1–5年，2–6年，3–7年……等，然后将求得的平均数组成新的数列。用移动平均法确定长期趋势时，平均值所取时间间隔越长，其长期趋势越具有代表性，但所得移动平均数列上下两头的缺项也就越多。直线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半数平均法”，二是“最小平方法”。半数平均法是直线法中一种不十分严格，但简便易行的方法。它所依据的数学原则是两点决定一条直线，直线从中间通过。所谓“半数平均法”就是把时间数列资料，从中间分为两半，计算两个平均数，作为长期趋势线上的两点，配合一条直线方程，即代表社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过程的长期趋势线。最小平方法是利用数学上的“最小平方原理”。

直线函数 $y=a+bx$

限制条件 $\sum[y-(a+bx)]^2=$最小

可求得a，b的联立方程

$$\left.\begin{aligned} na+\sum xb&=\sum y \\ \sum xa+\sum x^2\, b&=\sum xy \end{aligned}\right\}$$

曲线法是按时间数列分布图所呈现的形状来选择合适的曲线形式。无论那种方法，都是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进行预测，但是，社会现象的变化趋势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进行预测分析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贝利—米音斯假说（Berle—Means Hypotheses） 关于股份公司中控股比例的论述，由美国经济学家A·贝利（A·Berle）和G·米音斯（G·Means）在1933年出版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提出，故名。股份公司的特点是股权高度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股权比例是有意义的，即能控制股权呢？贝利和米音斯研究的结论是：假如所拥有的股份大于20%的表决权股份，那么，该股权就是有意义的，即可以控制公司。如果一家公司中某个人或家庭拥有大于20%的股份而其他股权为分散控制，这种公司就称为“少数操纵”型。如果这一比例上升到80%以上，就称为“私人控制”型。如果没有这种单一的“有意义的股权”的公司被称为“管理控制”型。如果所控制的有表决权的股份在5–20%之间，就称为“少数管理混合控制”型。美国经济学家R·勒纳（R·lerner）根据这一假说调查了美国1963年最大的200家非金融公司的产权类型，发现从1929年到1963年“管理控制”、即经理人员所控制的公司比例从58%增加到85%，这说明30年代贝利和米音斯所预言的，由于股份公司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而引起的“经理革命”在60年代已趋于完成。贝利—米音斯假说对分析现代公司的结构以及对厂商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受到广泛重视。

贝里指数（Berry Index）　是衡量企业经营多角化程度的指标之一。该指数由贝里在 1975 年提出，它定义为 1 减企业经营活动在不同产业中份额的平方和，即：

$$D = 1 - \sum_{j=1}^{k}(X_j / X)^2$$

其中 D 为贝里指数，k 为企业经营的产业数，x 为企业在 k 个产业中的经营活动总量，x_j 为企业在 j 产业的经营活动量。当企业在其主要产业是完全非经营多角化时，指数值为 0；当企业在所有 k 个产业中的经营活动相等即完全经营多角化时，指数值为$\frac{K-1}{K}$。该指数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在不同产业中的份额进行平方，给企业的重要经营活动以特殊权数，因此，对较不重要的经营活动缺乏敏感性。

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　美国经济学家 K·加尔布雷思在 1958 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物质资料相当丰富，但仍然存在其他问题的富裕社会，即现阶段的美国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物质资料相当丰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大大改善，由于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的贫穷已经消灭，整个社会进入富裕与高消费的"丰裕"阶段。丰裕社会比起过去的贫困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但丰裕社会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首先，物质产品的增加并不等于幸福的增长。在丰裕社会中，尽管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社会道德却在堕落，个人的独立性受到压抑，精神空虚、贫乏。其次，生产者主权取代了消费者主权。商品的设计和生产不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而是由生产者先生产出来，再通过广告宣传等方式强加给消费者。这样，消费者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被迫成为追求物质享受的奴隶，失去了自己的幸福。最后，在丰裕社会中仍存在"富裕中的贫困"。这就是说，尽管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仍有极少数人由于缺乏教育等原因处于贫穷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定与犯罪现象增加。总之，物质产品的丰富与各种社会弊病的存在是丰裕社会的特点。所以，要提高生活质量并使社会进步与幸福增长相一致就不是让私人部门盲目发展生产，而是应该把资源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通过国家的力量发展社会服务，消灭贫穷与各种社会弊病，提高生活质量。加尔布雷思对丰裕社会的这些分析与主张，反映了他作为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的特点。丰裕社会理论成为加尔布雷斯其他理论的基础与出发点，在加尔布雷斯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引致投资（Induced Investment）　由过去的产量变动而引起的投资，影响投资的因素可以有许多种。在宏观经济学中，一般把由人口、技术、资源、政府政策等因素所引起的投资称为自发投资，而把由产量变动所引起的投资称为引致投资。由于产量变动对投资变动的影响有一个时间间隔，所以，引起引致投资变动的是过去的产量变动。加速原理所说明的正是产量变动与引致投资之间的关系。在乘数—加速模型中，非常重视自发投资与引致投资的区分，认为正是产量变动与引致投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引起了经济中周期性的波动。

引致消费（Induced Consumption）　消费中由于国民收入变动所引起的消费，即取决于收入的那部分消费。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社会消费风尚、消费者嗜好等非经济因素，也有价格水平、利息率等经济因素，在宏观经济学中主要研究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即研究引致消费。消费函数正是收入与消费之间的依存关系，各种消费函数理论正是要解释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在区位经济学和运输经济学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该模型说明了两地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程度取决于彼此的重要性和两地之间的距离。引力模型的一般公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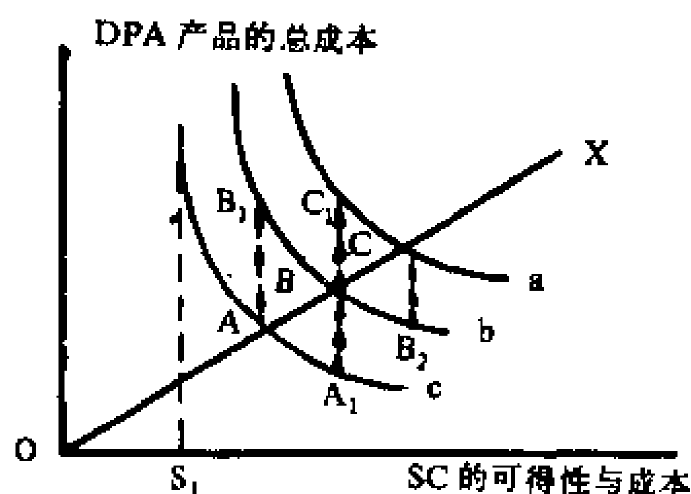
$$I_{ij} = \frac{A \cdot P_j^x \cdot P_i^y}{D_{ij}^z}$$

在上式中，I_{ij} 是地区 i 和 j 之间相互影响的数值，A 为常数，p 是人口或收入水平这类重要性程度的大小，D 是距离，x、y、z 是参数。这个公式说明了，两地相互影响的大小。这一模型被运用于研究两地之间人口流动的相互影响，以及两地之间旅行的相互影响。尽管在实际研究中，这一模型得到广泛运用，但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它缺乏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而只是一种经验估算。

引力原则（Attraction Rule）　指可供常设机构所在国选择的确定常设机构应税所得范围的原则之一。它要求常设机构所在国对一切通过常设机构和不通过常设机构但通过经营业务与常设机构类似或相同的机构所取得的所有收入都纳入常设机构应税所得的范围，行使税收管辖权。

显然，此原则虽然表面上捍卫了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但实际却是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不适当的扩大，也因而远不如归属原则应用广泛和普遍。

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Principle Of Maximing Indueed Decision Making） 赫尔希曼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内容之一。用于发展中国家选择投资项目的优先顺序，以说明在一系列可作为投资对象的项目中，应选择能通过自身发展导致其他项目最快发展的投资项目。赫尔希曼将投资项目划分为"社会分摊资本"（sc）和"直接生产活动"（DPA）两个部分，以二者之间关系的模型表述了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其中，前者包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指那些为许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并由公共机构或多个公共机构控制的私人机构向全国提供，但又不能进口的项目。其特点是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较慢，投资效率低却受益面广。后者包括直接投资于产业部门中并能迅速见效，直接增加产出和收益的投资。其特点是投资集中、周期短、收益快、投资效率高。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两者都可增加产出和收益，都是必须的。但赫尔希曼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有限，不允许同时使两者平衡增长，只能从中作出选择。



图中 a、b、c 三条曲线是从 DPA 中既定的投资所获得的 DPA 最大生产能力的产出的生产成本曲线，它是 sc 的函数。曲线斜率为负，表明：随着 sc 的增加，DPA 的成本递减，但要维持任何水平的 DPA，必须有一个最小量的 sc。如当 DPA 为曲线 a 时，sc 为 os_1。但随着 sc 的增加，sc 对 DPA 的影响越来越小，且 DPA 的产出递减。假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要在 DPA 和 sc 使用资源量最小的条件下获得 DPA 产出的增加。那么，在 a，b，c 上，DPA 与 sc 必要的最低限度组合点是 a，b，c，将各适度组合点连接起来，所得到的 ox 线，即为 DPA 和 sc 的最有效扩张线式"平衡增长线"。但是，假定现有资源不足以保证 DPA 和 sc 的最小量平衡增长，只能进行优先选择。如果优先发展 sc，就产生了由 sc 推动的 AA_1BB_2C 扩张线，称为"超能力的发展"；反之，如果优先发展 DPA，就产生了 AB_1BC_1C 扩张线，称作"短缺的发展"。赫尔希曼指出，传统理论认为应当选择 sc 优先的 AA_1BB_2C 扩张线，因为它能带来平衡增长。但是这样却不能刺激其他项目的投资。而 DPA 优先虽不是平衡增长，却能刺激进一步的投资，产生最有效的投资结果，使引致决策实现最大化。因此应当选择 DPA 优先。DPA 优先的具体含义是，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即暂时延迟对铁路、公路、通讯、电力、学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集中资本投于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以尽快地获得投资效益，增加产出和收入，待这些项目的生产发展起来并获得了较大收入后，再利用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基础设施，带动其增长。至于在 DPA 中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部门的问题，赫尔希曼进一步提出了另一重要理论——联系效应理论，予以解决。

认识时滞（Recongnition Lag） 又称"察觉时滞"（detection lag），意指从经济中发生了引起不稳定的变动到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某种经济政策之间的时间间隔。它属于内在时滞的一部分，在决策时滞之前。认识时滞的长短取决于收集整理分析经济资料所需要的时间，以及政策制定者对经济运行规律所了解的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作出决策的方法。如果政策制定者能正确地预测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动，并在这种变动发生之前决定是否采取相应的政策，那么认识时滞就可能是负的。但一般来说，认识时滞是正的。因为在经济中发生变动之后，收集有关这种变动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分析，以判断这种变动对经济稳定影响的大小与性质，并作出某种决策，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是以民主的方式作出决策，有关决策个人或机构之间要在决策上取得一致意见也需要一定时间。无论作出哪一项政策决定，都要以对经济形势的必要分析为基础。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认识时滞是相同的。内在稳定器是自动地发生作用，无须任何决策，也不存在认识时滞。迅速而正确地分析经济中出现的各种变动，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是稳定经济的必要条件。所以，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尽量缩小认识时滞。

太阳黑子理论（Sun—spot Theory） 又称"农业收获周期变动理论"，是一种用自然界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作物收成变化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主要倡导者有 19 世纪后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 W·S·杰文斯（W·S·Jevons）、20 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 H·S·杰文斯（H·S·Jevons），以及美国经济学家 H·穆尔（H·Moore）。其基本观点是，太阳黑子出现这样的自然灾害会使农业减产，农业减产减少了原料和粮食的供给，提高了工资水平，又使农民收入减少，市场缩小，从而使工业、商业、投资等活动收缩，经济进入萧条时期。相反，太阳黑子的消失使农业增产，农业增产增加了原料和粮食的供给，降低

了工资水平，又使农民收入增加，市场扩大，从而使工业、商业、投资等活动扩张，经济进入繁荣时期。根据杰文斯等人的研究，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大致为10年左右一次，这与经济周期的时间基本是吻合的。因此，经济周期根源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动。这种理论过份强调了太阳黑子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两点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因此，这种理论现在已没有什么影响。

太阳黑子均衡（Sunspot Equilibrium） 经济生活中总是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一类是内部不确定性，它可以由通过影响最基本的经济变量，如资源禀赋、技术、偏好，从而影响到其他经济变量的随机因素来解释。比如天气，降雨使小麦增产，增加总供给从而影响到小麦价格、降雨的不确定性就是一种内在不确定性，它会带来小麦供给与价格的不确定性。但不是所有的经济随机性都可作此解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使经济参数是非随机的，而经济后果却是随机的。这是由于经济是一个包含众多个体行为者的社会体系，这些个体行为者彼此的行为对对方来说都是不确定的。交易双方不仅不知道对方的打算，也不知道对方对已方的预测情况，如此等等。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市场不确定性，它可以由市场经济本身产生，也可以由市场经济以外的因素通过影响个体行为者的计划而产生。市场不确定性是外部不确定性的特例。由卡斯（D · Cass）和舍尔（K · Shell）提出的太阳黑子均衡理论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基础。他们赋予太阳黑子以特殊的含义，而且太阳黑子活动被看作是纯粹的外部不确定性。那么太阳黑子活动会不会影响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关键取决于个人对太阳黑子活动发生可能性的心理预测，如果个人间的这种预测不同，那么太阳黑子的作用就很重要。假定有两个消费者。两种状态，一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画出埃奇沃思盒状图，横轴表示 α 状态的商品消费，纵轴表示 β 状态的商品消费，由于不确定性是外在的，图是正方形的；即是经济资源与自然状态无关，而且个人禀赋也与自然状态无关，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冯 · 诺意曼—摩根斯特恩效用函数（Von Neumann—Morgenstern Utitity Function），竞争的均衡总是存在的。且有两种均衡情形：（1）当消费者对状态 α 和状态 β 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是一致的时候，两个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正切。竞争均衡点在对角线上，太阳黑子的作用并不重要。（2）当消费者对状态 α 和状态 β 发生可能性的预测不一致时，外在不确定性作用下的竞争均衡点只能在对角线以外的地方，这时，太阳黑子的作用就显然很重要。这里状态 α 和状态 β 代表外在的随机性，太阳黑子实际上就是外在随机因素，它通过影响经济行为者的心理预测而影响其他经济变量。对于这种太阳黑子均衡，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不稳定的，舍尔和卡斯也对均衡的稳定性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太阳黑子均衡解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解。

心理经济周期理论（Psycholog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一种用人们的心理预期变动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 J · 凯恩斯和 A · 庇古（A · Pigou）。这种理论强调预期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即人们在作出某项经济决策主要不是取决于现在的情况，而是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但这种预期的特点是其不确定性，这样，人们的经济行为就要受心理状态的影响。在经济周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繁荣阶段的乐观态度和萧条阶段的悲观态度。这两种心理的形成当然离不开具体经济环境，但由于企业家对经济状况反应的不确定性，就使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对经济周期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当任何一种原因刺激了投资活动，引起经济繁荣后，企业家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一般总会超过合理的考虑下所应有的程度。这种过度乐观引起投资过度，形成经济极度繁荣。但是，这种状态无法持久，当实际收益率低于预期收益率，或实际销售量低于预期销售量时，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就会被觉察。于是，又从过度乐观转变为不合理的过度悲观状态。由此引起紧缩投资，导致经济萧条。凯恩斯在《通论》中用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来解释萧条的出现，资本边际效率是预期的利润率，它的崩溃正是由于企业家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庇古则把过度繁荣称为"乐观下的错误"，把过度紧缩称为"悲观下的错误"。可见经济中繁荣与萧条的出现与交替是由于这种心理预期的不合理性所造成的，心理情绪的转变是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转变的关键。在持续的萧条中，企业家信心的恢复和乐观情绪的形成会再次引起经济复苏与繁荣。这种理论并不否认各种实际因素（货币、投资等）的作用，它只是在此基础之上强调了心理预期的不合理性。

心理学与经济学（Psyohology and Economics） 有这样几个原因促使经济学家去探讨本属心理学领域的问题：（1）经济学中的信息革命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以研究个人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微妙本质；（2）博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关于选择的概念，在任何一种市场行为中，都存在着与之适应的理论，经济学家被迫去寻找更系统的数据资料以及新的原则以便减少那些相互冲突的理论。（3）应用于

经济学的那些试验方法的迅速发展，给基本的经济理论在现实领域内进行了心理上的检验。经济模型与所建立的行为模式不相符，而解决的方法只有求助于心理学，这又使得经济学家去建立范围更广的经济模型。经济学研究心理学问题也与心理学家研究经济学问题密切相关。心理学家对风险一效益分析以及规范性的决策分析，不可避免地与福利经济学和决策理论相关联。心理学家还研究公共物品、外在经济以及刺激一动力等概念。事实上，在许多领域，经济学与心理学是交融的。经济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原则都是主观的，心理学领域的。如效用、安全选择、效益或满足最大化等。这些概念和原则，在心理学上也不是说完全肯定的，例如满足最大化。个体行为模式千差万别，以满足为目标并不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有人追求的是其他目标。因此，如果这些概念和原则在心理学看来是不合适的，那么经济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开放经济（Open Economy） 国际化程度或开放程度高的经济。开放经济有以下特征：第一、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的比率较高，即对外经济部门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即基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第三、国内货币体系要受到外汇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货币供给量要受外汇储备变动的影响，短期利率要受国外利率或预期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国内的货币政策无法消除这些影响。第四、国内物价水平不仅由国内因素决定，而且也要由国外物价与汇率变动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一般用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以及经常项目赤字或盈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前者说明一国实际生产部门的开放程度，后者说明一国金融部门的开放程度。开放经济是一种国际化经济，国内经济状况与世界经济关系甚大。因此，在研究这种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时首先要考虑到国际环境。

开盘汇率（Opening Rate） 又译作开盘价。收盘汇率的对称。外汇银行在一个营业日刚开始进行外汇买卖时报出的汇率。开盘汇率的决定应根据以下因素：(1) 前一时区外汇市场的收盘价。就欧洲外汇银行而言，应关心纽约和远东外汇市场的收盘价。了解了前一时区外汇市场的收盘价便把握了外汇市场的变化趋势；(2) 政治、经济状况的最新发展。它们对外汇市场有重大影响；(3) 本银行的外汇头寸状况，即应该买进或卖出的外汇种类及数额。

开盘价（Opening Rate） 又译作“开盘汇率”，“收盘价”的对称。见“开盘汇率”。

方法论（Methodology） 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式、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人对世界的基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就是世界观，而拿这种观点作指导，转过来去研究和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就是方法论。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方法论的研究不仅仅是哲学家的工作，经济学家也研究方法论。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想得到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无懈可击的根基。自然科学的成功使人们认识到存在着单一的、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在经济学上如果存在着这样单一而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建立一套完善的经济理论，那么人们自然是采纳这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关于方法论的论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争论，则最为激烈。这种论争实际是世界观的论争。在主流经济学中，不同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也是不一样的，方法论是经济学家所作经济结论的基础，也是所有决策者的重要出发点。自然科学也许存在着单一而正确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却不然。个体行为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不能期望个体之间有完全共同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方法。相同的资料，不同人处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说明其方法论上的差别。

方栓函数（Spline Function） 方栓函数是指一类分段光滑，各段交接处具有一定光滑性的函数。方栓函数来源于船体放样时用来画光滑曲线的机械方栓。它产生的背景是离散数据的处理。高次多项式插值过程具有数值不稳定的缺点，而利用分段低次多项式，在分段处具有一定光滑性的函数插值过程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收敛性，这种插值过程产生的函数就是多项式方栓函数。常用的方栓函数有三次方栓、多项式方栓和基方栓。在经济中多项式方栓函数较为常见。多项式方栓函数是：如果 s(x)在$[x_i,x_{i+1}]$$(i=0,1,\cdots,k)$上是 m−1 次多项式，在 x_i 处有直到 $m-r_i-1$ 阶的连续导数，而 $m-r_i$ 阶导数在 x_i 处有跳跃性间断，这里

$$0<r_i<m \quad (i=1,2,\cdots,K)$$

便称 S(x)为以 X_i 为 γ_i 重结点的 m−1 次（或 M 阶）方栓。结点 X_i 的重数不超过 r_i 的 m−1 次方栓可表为

$$S(x)=\alpha_0+\alpha_1 x+\alpha_2 x_2^2+\cdots-\alpha_{m-1}x^{m-1}+$$

$$\sum_{i=1}^{k}\sum_{j=0}^{r_i-1}\beta_{ij}(x-x_i)^{m-j-1}+|(m-j-1)!$$

这种方栓的集合作成 $n=m+r_1+\cdots+r_k$ 维线性向量空

间。m 为偶数的奇次方栓。具有三次方栓的许多类似的最佳性质。当 $m=3$，$r_1=r_2=\cdots=r_k=1$ 时，便得到二次单结点方栓，即抛物方栓。多项式方栓即分段多项式，能靠增加结点数目或提高结点重数来增加方栓空间的维数，它既有低次多项式的简单性，又有相当的光滑性和灵活适应性，还避免了高次多项插值的不稳定性．是函数逼近的重要工具。

计时工资率（Time Wage Rate）　计时工资率是指雇主按照时间单位，如月、周、小时向雇员支付工资的工资率结构。计时工资率与计件工资率不同，它是以雇员工作的时间计算工资额，而不是以产量计算工资额。计时工资率通常有三种基本类型：(1) 人工资率结构（personal—wage—rate structures），以具体的人来确定工资率；(2) 职务工资率结构 (job—title—rate structures)，以工作类型来确定工资率；(3) 工作评定结构（job—evaluation structures，以工作的基本特性和要求确定工资率。

由于计时工资率主要是将工作时间与工资额相联系，计时工资率可能产生雇员工作效率低、生产成本高的弊病，因而雇主通常要对实行计时工资制的雇员制定工作成绩最低标准。当今世界多数国家，企业雇员的工资都是实行计时工资率，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其工资必然采取计时工资率。

不平等（Inequality）　不平等一词是用来描述一个社会中一些价值属性在不同集团之间的不公平分配的。价值属性包括财富与收人、社会地位、知识水平以及权力等。集团则包括个人、家庭、性别、社会团体、民族等。不平等的原因很多，价值属性本身也可能构成原因。不平等则分为独立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人为，而且与生并存的。这种不平等包括智力水平的差异、健康水平等。另一种不平等是关联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于所处的社会团体的不同而存在的。例如财富的不平等。人们关注的不平等主要是后一种，这种的不平等则包括男女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国家不平等。在不平等中，有些并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善的，例如权力的不平等。这是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有团体之间的矛盾才能解决这个不平等现象。有些不平等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解决的，例如收人的不平等。但是低收人阶层的人要改变这种状况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例如被歧视的民族的一员，就必须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才能获得与歧视者同样的收人，而歧视者的收人则是几乎不努力就可以得的。衡量平等不平等的标准不是统一的。法国革命时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标准。一个国家不平等的现象越严重，则越是表现为动荡。西方社会提出了机会均等的原则，该原则的目标是实现社会进步，因为谁努力谁就可以得到机会，但关键问题是，不平等的要素之间是互相关联的，例如一个民族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影响该民族成员的社会机会的选择。不平等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来改变旧世界。西方经济学则提出两种解决方法，一是组成中性阶层，这一阶层在社会氛围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缓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方法是纠正市场缺限的方式来缓和社会冲突。

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　指商品（包括物品劳动力等）存在一个最小的物质单位，如果低于此单位，该商品的性质就要发生改变，或者此商品已不复存在。比如，一把椅子就是“椅子”这种商品的最小物质单位，小于此单位，如半把椅子就已不成为椅子，若作为消费品它已无法满足消费者正常效用要求，作为生产要素也不再有“椅子”所应有的作用。生产要素，特别是设备的不可分性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大批量地生产可以提高效率，而少量生产则会降低效率。经济生活中许多商品具有不可分性。而理论分析中常常将商品作为连续性变量来处理的。对于那些“最小的物质单位”相对较小而数量较大的商品，连续性假设可以认为是成立的，例如椅子销售以 1，000 万把增加到 1，000，000 把可视为连续的，而那些“最小单位”相对较大而数量较少的商品，如波音 747 飞机，则需要有特殊的分析方法，不可分性的存在，使得生产中会有旁置成本（sunk cost）产生。规模经济也多少与不可分性存在某种联系，不可分性也常有促进垄断的作用，从而成为新加人者的障碍。

不完全市场（Incomplete Markets）　大多数关于不完全市场的文献都产生于对不确定性状态下竞争性市场的分析，阿罗（1971 年）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一个市场如果不是完全的市场，那么它就是不完全市场。市场是完全的是指每一个厂商都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别的任一个厂商交换任一种商品。当市场不是完全的时候，完全市场的竞争均衡的两个基本的性质就不再满足。首先，股票持有者们在对工厂的最优生产计划上不能达成协议。其次，即使在一个纯粹交换的模型里，即使我们仅仅考察与市场结构相协调的配置，一个竞争的配置也可能不是帕累托最优，这是最优性性质的缺陷。

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on）　不完全竞

争是指个人或企业对一些产品来说面临的是下降的供给曲线或上升的供给曲线，它是与完全竞争相比而言的。完全竞争是个人或企业对所有产品来说都而临的是完全有弹性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完全竞争条件下，个人无法影响市场出清价格，面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个人则可以影响一部分均衡价格。在早期的经济学中，大加倡导的是竞争力量的重要性，亚当·斯密把竞争看作是社会的施恩者（benefacter），竞争一方面确保长期价格将不会超过生产成本，从而指导人们抵御垄断剥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促使企业不停地寻求新的潜在利润。与此相反，后来的经济学家对竞争力量的好处产生了怀疑，个人间或企业间的竞争会造成浪费这一观念逐渐获得了它的地位，不完全竞争的理论变得越来越时兴。在这一背景之下，本世纪20年代张伯仑（E·Chamberlin）和琼·罗宾孙（J Robinson）分别对不完全竞争第一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张伯仑那里，不完全竞争模型趋向于局部均衡模型。后来人们的研究沿袭了这一点。现在非常时兴的一环就是先假定各企业是以古诺—纳什方式相互作用，许多关于垄断竞争的模型都有其独到的特点。它们一开始都是去分析个人间或厂商间作为一积极过程的垄断竞争。但与完全竞争分析不同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垄断竞争的分析模型。不论是一般均衡的还是内部均衡的。也许不完全竞争模型必需是多样的。在具体情况下有不同的特点。

1、递增报酬的含义：以完全竞争到垄断竞争。递增报酬是运用于整个经济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厂商，为了理解此概念，有必要了解经济学家通常是如何确保整个经济的模型是完全竞争的。这是我们分析的基准点。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的是不变报酬。为了做到这一点，经济学家们假定存在有限数量的同质私人产品，然后保证商品的集合是固定的，他们通过不确切地增加每种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的数量的方式来复制（replicate）经济。其结果是每种商品都有许多买者和卖者，他们之间的竞争足以保证没有哪一个人会拥有垄断力量，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影响出清的市场价格水平，总之同质私人产品和有许多买者和卖者是完全竞争思想的核心。显然在完全竞争状态下，规模收益是不变的，在一种理想状态下，即效用是基数的，可加的，类比一种普通生产理论可以使问题的论述更为精确。这时可以类比整个经济和厂商生产函数（"加总的"生产函数），并且能够表明在有限经济中，前述复制过程能够产生一个不变规模报酬。此种理想情形对于分析不完全竞争问题同样有用。它的用处是如果假定效用是可加的，基数的，那么就可以得出整个经济是在为其参与者生产效用的大企业中，在此假定下，用g（s）等于来自仅包括个人S集合的次级经济（Subeconomy）中可能的交易的潜在收益。更明确地说，g(s)等于当S仅与它自己进行交易时所能获得的最大效用，g是整个经济的"加总的"生产函数的潜在收益，且g的范围定义在效用空间：整个经济生产它自己产品的效用。g的定义域是个人集合的子集：个人是以交易中获取收益的用于生产效用的"投人"。于是就可以定义每种生产要素—每个个人而不是每个商品，因为g的定义域是个人的子集的边际产品。特殊地，将个人对整个经济的潜在边际产品MP定义为：$MP_i=g(A)-g(A^i)$，A是全体个人集合，A^i是除去i以外的个人的集合。g是以经济交易中能够得到的潜在收益。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个人最终的效用水平u：正好等于他对整个经济的潜在边际产品，即$u_i=MP_i$。由于完全竞争的均衡是有效率的，这就意味着完全竞争经必定是"可加的"(adding-up)：所有个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产品之和等于经济的总体潜在产品，即$Mp=g(A)$。不变报酬与可加性是紧密相联的，二者都可以"复制"的方式得到：g函数最初显示出递增报酬，因为所有个人MP的和超过总体的潜在"产出"。但是对更大的或大规模的经济这个和会趋近于g(A)。在有限的封闭的个人集合的情况下，g函数是其次的，这样，有限经济中的可加性可由欧拉定理来保证。以此为起点可以分析垄断竞争的情况。完全竞争条件下，(1) $u_i=MP_i$（个人i的情形），(ii)$\sum MP_i=g(A)$，反过来，有了(i)，(ii)，就意味完全竞争的经济。这样完全竞争经济就与不变规模报酬等同起来。否则就不能靠欧拉定理来确保可加性。这是转入不完全竞争王国的关键所在，不变报酬是完全竞争的条件。如果没有报酬不变的条件，就是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但是在什么条件下，竞争是不完全的呢？在不完全竞争经济中缺乏足够的完全替代的卖者和买者来形成竞争力量以确保没有人能够影响市场出清价格水平。用前面的交易函数g进行表述，在非完全竞争经济中，个人（这里一直作为生产要素投人）在g函数中显示出递增的报酬，也就是说所有个人的MP之和将超过来自交易的总的潜在收益。考察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双头垄断中，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的MP之和会超过来自二者交易的潜在收益，买者和卖者相互竞争，力求以其MP的比例分配到其在经济g（A）中的份额，但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讨价还价以获取至少是他能赢得的份额，因为这时他已不是完全的价格接受者。整个分配过程都在讨价还价中进行，这就是所谓的浪费性竞争。双头垄断中每人的MP就等于潜在收益g(A)，所以$\sum MP_i=g(A)+g(A)=2g(A)$。垄断竞争与此类似。

2.浪费性竞争问题。可以引用一个双头垄断的例

子加以讨论。假定只有一个理发师 B 和一名顾客 C。又假定 B 理发可以是无成本的，C 理一次发最多愿付 W 元，g（A）＝W，也等于每个人的 MP。现在看看来自交易的所有潜在收益能否得到实现。假定开始时用客观条件使理发愿付 0 至 10 元的费用，w 就是其中的一个数值，再假定 c 明白他选择的 w，而 B 仅仅知道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使 C 选择 w，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 g（A）不等于二者 MP 之和。B 对 C 的信息不完全，每理一次愿收 5 元，这使他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但 C 愿支付的金额低于 5 元，如为 4 元，尽管 5 元对 C 来说是有效率的，但 C 仍不购买 B 的服务，g（A）就不能被实现。假定 C 向 B 提出降价要求，B 也不会相信 C 的确有成意愿从而不真会降低价格。这个无效率是由 C 谎示自己的真实意愿而引起的 —— 努力压低价格以争取在潜在边际产品中得到更大份额。浪费性竞争反映理发这种生产活动不能进行。实际上垄断竞争缺乏效率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解垄断竞争经济的一个核心，它同样有助于对垄断竞争下的市场失灵（即外部性）进行重新表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每个人的收益正好等于其边际产品，所以他就不会产生外部性。但在不完全竞争时，如果均衡分配是有效率的，就有外部性产生，因为总有一些人得到的份额少于其边际产品，但没有人去关心外部的利益，而仅仅关心可以内部化的利益，即正适于其边际产品的利益，这样，为了尽可能地将其贡献内部化，不完全竞争者就会玩弄一些市场策略，其中大部分会给其他人造成损失。在张伯仑的著作中，垄断竞争是多头的，在这样的情形中，递增报酬导致来自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易之收益无法根据 MP 计算出来，从而产生“剩余生产能力”。在前面的讨论中，都假定经济行为人之间不存在非市场的外部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行为人交换关系中不存在外部效应，即所谓“金钱方面的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这种与交易相关的外部性是不完全竞争的相互作用的本质和市场失灵的源泉。

3.不可分性、补充性与递增规模报酬。在传统理论中，不可分性是递增规模报酬的源渊，张伯仑在他与卡尔多（N. Kaldor）的争论中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因为他认为足够大规模的经济中仍可能存在垄断，而由不可分性所带来的递增规模报酬却消失殆尽。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复制经济。完全竞争有以下两个限制条件：（1）复制的只能是私人物品而不是集体物品，因为用集体物品来复制经济一般无法消除买方垄断，买者无法以集体物品单位与其他买者竞争。（2）在复制经济过程中，私人物品集合相对保持固定，如果此商品集合与买者与卖者以同样速度扩张，完全竞争就不一定出现，因为某些卖者仍处于某种特殊地位，从而面临下降的需求曲线。大规模经济是个人间补充性的不断扩张的联系关系，由于个人间补充性无法消除，递增规模报酬也就无法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讲，用个人间的补充性来解释递增规模报酬也许更为合适。

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　完全契约是指对于每件可想象的不测事件，都详细规定了每个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它不是在阿罗 —— 德布罗意义上的那种完全偶然性的契约。在现实中，把每个当事人的义务完全地、不是模棱两可而是明确地事先规定下来，通常是不可能的，于是大多数实际发生的契约都是很不完全的。不完全性有很多含义，比如它可以导致偏离最优。不完全性引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契约的当事人的行动是如何决定的。由于不完全契约没有充分地规定当事人的义务，就是说留下了一个“缺口”，这就需要有另外的理论来告诉我们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即在契约没有规定到的地方，当事人该如何行动。在这时，外界的影响（如习俗、声望）就变得很重要。此外，外界事物（如法庭、仲裁人）都可能发挥作用来填补缺口、解释模糊不清的地方。对于不完全性的研究，也有助于对决定权或控制权的配置的研究。如果精确地说明对一项财产如何使用花费很大，也许就简单地让某个当事人“控制”它，即他可以想对它怎样就怎样，但要服从一定的明确的限制。律师们早已充分认识到不完全性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不完全性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而经济学家们才刚刚开始正确评价不完全性的重要性。最后做为对不完全性的重要性的一个例证，可以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事人经常地签订一些有限期限的契约，希望在每一期满期后重新谈判签约，而不是在开始就签订一项期限很长、可以持久地存在于当事人之间有相互关系的整个期间的契约？这是由于不完全性的存在，而在完全契约里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不兑现纸币（Fiat Money）　不兑现纸币是一种不以贵金属为基础而完全凭信用发行的纸币。实物货币和不兑现纸币的区别在于：实物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不兑现纸币则需要用法律规范和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在交换中被接受，不兑现纸币如果被废除了的话，就将一文不值。但不兑现纸币也有其自身的优越性。货币要求具有同质性和匿名性，而不兑现纸币也具有许多货币应该具有而不为实物货币所具有的特点：如易识别性、持久性、便携性，防盗性等。不兑现纸币和信用不可分割。不兑现纸币就是一种信用，在这种信用中，国家是债务人，而作为债权人的

每个个人被取消了向国家的追索权，但国家以法律和强制力保证其在交换中被接受。

不变成本产业（Constant Cost Industry） 在要素价格为不变的情况下，其产品的长期供给曲线是与表示产量横坐标相平行的（供给价格与长期平均成本最低点相等）的产业为常数成本产业。以完全竞争的厂商与产业为例，以长期均衡点为初始点。这一点市场均衡价格等于各厂商平均成本最低点。假定对于市场需求较初始点而提高了，这将提高该产业产品的价格。短期内该产业内的厂商不能调整固定设备，而只能利用现行设备扩充产量，其它产业的厂商在短期内也不能转产生产该产业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该产业内的原厂商都会通过扩张产量而获得经济利润。由于该产业有经济利润存在，将有更多的新厂商涌入该产业生产，如果要素价格不变，该产业产品市场供给将增加，直到初始的市场价格重新建立。价格仍然与原来最低的平均成本相等。因此，该产业产品的长期市场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的直线，该产业被称为"不变成本产业"。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不确定性是指某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种行为其可能结果不止一个，这些可能结果所采取的形式是已知的，但其出现的可能性是未知的。例如，两个人以迎面开来的汽车车号是 A 还是 B 打赌，由于不知道这两个事件出现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是不确定性问题。

不确定性与风险（risk）是有区别的，在涉及风险问题时，某一行为其结果的可能性是已知的。例如，甲、乙两人掷硬币打赌，硬币抛出，得到硬币正面和反面的可能性是一样的，都是 1／2，这样，掷硬币行为，其结果的可能性是已知的，因此，这一问题是风险问题。

在经济学中，按照不同的分析角度，可以对不确定性进行分类。通常的分类方法是将不确定性分为外生不确定性和内生不确定性。外生不确定性是指所考察的变量是一些外生变量，如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厂商的生产技术，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中税收，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等。对于外生不确定性，经济系统是无法予以消除的，但是，通过保险制度可以减轻外来不确定性的后果。内生不确定性是指所考察的变量是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例如，在市场经济中，买主能否遇到合适的卖主是不确定的，反之亦然，成交的条件也是不确定的，这些不确定性产生于经济单位的决策情况，属于内生不确定性。内生不确定性是可以在经济系统内部予以消除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内生不确定性。

在现实世界中，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衡量不确定性的大小对于创新行为，投资行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确定性与一般均衡（Uncertainty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阐明了一般均衡的经济体系解的存在性和最优性所需具备的数学条件。最初的阿罗——迪布鲁理论只是针对确定性情况讨论经济系统竞争性均衡的问题，随着理论的扩展，逐步引入了不确定性的讨论，包括不同经济单位可获信息不同、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市场的有序性等，由此发展出暂时均衡，计划、价格和价格预期均衡，理性预期均衡等新的均衡概念，也使一般均衡分析中得以包括货币市场，证券市场等。

不正常的通货膨胀（Unvalidated Inflation） 又称为"未生效的通货膨胀"，指与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不一致的通货膨胀率。一般说来，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但在短期中，由于其他因素，例如，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产量增长率的变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等，通货膨胀率也可能与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并不一致。一般说来，这种与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不一致的通货膨胀率是难以长期存在的，因此，被称为"不正常的"。

不变性假说（Constancy Hypothesis） 理性预期学派提出的一种假说，其基本含义是：货币供给（或其他政策变量）中可预测的变动对产量、就业量和经济中其他实际变量不发生影响，只有不可预测的变动才会影响这些实际变量。因此，产量和就业量是不变的，即不受可预测的政策变动的影响。换言之，预料中的和意外的货币供给（或其他政策变量）变动都影响价格和通货膨胀率这些名义变量的变动，但只有意外的货币供给（或其他政策变量）变动才会影响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动。这是因为公众对可预测的货币供给（或其他政策变量）的变动作出正确的预期，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有不可预测的货币供给（或其他政策变量）的变动才会引起公众预期与实际情况的不一致，从而在短期中改变实际变量。可以用卢卡斯模型来推导出这一假说。这一模型包括一个总需求方程式、一个总供给关系式和一个货币供给规则方程式。总需求方程式为：

$$M_t = \overline{V}_t = P_t + Y_t \quad (1)$$

在（1）式中，M_t 为货币供给对数，$\overline{V}_t$ 为货币流通速度对数（假定为不变），P_t 为价格水平对数，Y_t 为实际产量对数。这个方程是用对数形式表示的简单交

易方程式。总供给方程式为:

$$Y_t = Y_p + \beta(P_t - {}_{t-1}P_t^E) \qquad (2)$$

在(2)式中,Y_p 为充分就业产量,${}_{t-1}P_t^E$ 为公众在 t-1 期时预期 t 期将出现的价格水平的对数。这一方程式说明实际产量 Y_t 取决于充分就业产量以及 t 期实际价格水平 P_t 与公众在 t-1 期时对 t 期价格水平预期值 ${}_{t-1}P_t^E$ 的差额,以及产量变动对这种差额的反应程度(β,为一既定值)。如果实际价格水平高于预期的价格水平($P_t > {}_{t-1}P_t^e$),则生产者会把这种差额看作自己产品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从而产量增加。反之,如果实际价格水平低于预期的价格水平($P_t < {}_{t-1}P_t^e$),则生产者会把这种差额看成自己产品相对价格下降的结果,从而产量减少。只有在实际价格水平等于预期的价格水平($p_t = {}_{t-1}P_t^e$)时,产量才不会发生变动。这就说明,当预期是合乎理性的、货币政策变动引起的价格变动可以正确地预期到时,货币政策变动不会引起产量变动。只有在货币政策的变动是随机的,不可预测时,才会发生产量的变动。可见产量的变动取决于价格预期。在卢卡斯模型中,价格预期不是固定的或事先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对货币供给量变动的预期。所以,给出了一个货币规则方程式:

$$M_t = x_1 Y_{t-1} + \epsilon_t \qquad (3)$$
$$E(\epsilon_t | I_{t-1}) = 0$$

这个方程式说明,t 期的货币供给 M_t 是 t-1 期产量水平 Y_{t-1} 和货币供给变动对产量变动的反应程度(x_1x_2 是既定的),以及一个随机的干扰变动 ϵ_t。上期的产量是可知的,货币供给变动中基于上一期产量所引起的部分($\alpha_1 Y_{t-1}$)也是可知的。所以,只有货币供给中的随机变动 ϵ 才影响价格预期,从而影响产量。如果货币供给变动是规则的,即 $E(\epsilon_t | I_{t-1}) = 0$,则货币供给的变动不会影响产量,这就是不变性假说。

卢卡斯模型进一步研究了价格预期的决定。根据理性预期,价格预期是在一个考虑到未来货币供给变动的模型中决定的。这一点可以用下列方程式来表示:

$${}_{t-1}P_t^e = E(P_t | I_{t-1}) \qquad (4)$$

方程式(4)表示,在模型结构和可获得的信息为既定的条件下,人们对价格水平的主观心理预期(${}_{t-1}P_t^e$)等于价格水平的数学预期值。这样,价格预期就成为模型的内生变量。

通过进一步分析(1)—(4)式可以进一步理解不变性假说的性质。把(1)式与(2)式联立得出:

$$M_t + \bar{V} - P_t = Y_p + \beta(P_t - {}_{t-1}P_t^e) \qquad (5)$$

在方程式两边取到 t-1 期时为止的数学预期值,得出:

$$\alpha_1 Y_{t-1} + \bar{V} = {}_{t-1}P_t^e = Y_p \qquad (6)$$

或者也可以写为:

$${}_{t-1}P_t^e = \alpha_1 Y_{t-1} + \bar{V} - Y_p \qquad (7)$$

把(7)式代入(5)式,求解 P_t,得出:

$$P_t = \alpha Y_{t-1} + \bar{V} - Y_p + \frac{\epsilon}{1+\beta} \qquad (8)$$

因此,实际价格与预期价格之差为:

$$P_t - {}_{t-1}P_t^e = \frac{\epsilon}{1+\beta} \qquad (9)$$

利用(2)式可以确定产量为:

$$Y_t = Y_p + \frac{\beta}{1+\beta}(\epsilon_t) \qquad (10)$$

方程式(10)说明了不变性假说。只有货币供给中随机的变动(ϵ)才影响产量。货币供给中可预测的部分只影响价格而不影响产量。如果货币当局不随意改变货币供给规则,即 $\epsilon = 0$,则产量不会由于货币政策而改变。这就是不变性假说。

不变性假说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中心。这一假说说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性。这就是说,如果政策变动是可以预测的,则政策并不影响产量。如果政策变动是随机的,尽管可以引起产量变动,但却是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最好的政策不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预先公布政策规则,取信于民。这样,经济就可以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而现实充分就业与稳定。

不完全预期的通货膨胀(Imperfectly Anticipated Inflation) 无法准确地预期通货膨胀率的通货膨胀,即不稳的通货膨胀。在飞奔的或超速的通货膨胀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温和的通货膨胀不稳定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当通货膨胀无法完全预期时,人们无法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从而这种不完全预期的通货膨胀就会给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收入分配、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本身的影响。在收入分配方面,由于无法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调整工资,货币工资的增长低于通货膨胀率,从而使实际工资下降,利润增加,发生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的收入分配变化。同样,由于无法调整利率,实际利率下降,还会发生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债权人的影响。如果没有实行税收指数化,在名义工资随通货膨胀率增加的情况下,还会使实际税收增加,发生有利于政府,不利于公众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方面,经济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经济学家根据这种通货膨胀引起降低实际工资增加利润的影

响，认为这种通货膨胀可以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发展。还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通货膨胀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即使在一定时期中对经济有刺激作用，也是弊大于利。就对通货膨胀本身而言，在这种通货膨胀所形成的不完全正确的预期往往会加剧通货膨胀，引起通货膨胀的持续甚至加速。

不清洁提单（Cloused B / C; Foul B / C, Unclean B / C） 不清洁提单是指承运人对货物的表面状况作有瑕疵批注的提单，如注明"包装不固"、"有渗漏"等。不清洁提单表明货物是在表面状况不良的条件下装船的。在不清洁提单下，货物到达目的港卸货时，如发现货物有残损现象，查明致损原因归结于承运人对货物表面的不清洁批注事项，则承运人可以减免赔偿责任。一见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灭失，若责任归结于承运人加注的不清洁事项，买方也不能要求承运人赔偿损失。因此，国际贸易中，买方不愿接受卖方提供的不清洁提单，银行也不愿接受不清洁提单作为议付货款的单据。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两难境地，卖方如果在买卖合同规定的装船期限内无法取得承运人鉴发的清洁提单，就无法向银行交单而议付货款；而承运人如果在货物表面状况并非良好的情况下签发了清洁提单，就要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托运人的卖方往往通过出具"保函"的方式，由托运人向承运人保证，如因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引起损失，由托运人向承运人赔偿损失。以此来换取承运人签发的清洁提单。

不定值保险单（Unvalued Policy） 不定值保单是指在保险单中不具体载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仅载明保险金额的保险单。对于不定值保单，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是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之后确定的。按照英国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不定值保单的货物保险价值应按该项货物的 F.O.B 价格加上运费、保险费确定，需要以商业发票.付款单、估价单等予以证明。这一保险价值不应包含买方的预期利润。

不定值保单由于保险价值在保险标的物受损后难以确定，不易于计算赔款金额，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很少使用。

不记名提单（Open B / C; Blank B / C; Bearer B / C） 又称空白抬头提单和持票人提单。它是指托运人在提单收货人一栏里只填写"交与持票人"字样。使用不记名提单，承运人应将货物交给提单持人，谁持不记名提单，谁就有权向承运人提取货物。

不记名提单仅凭交付就可转让，不需任何背书手续，提单的转手就意味着物权的转移，由于这种提单的转让手续过于简便，因此对买卖双方来说风险都很大，在国际贸易中也就很少使用。

不可抗力（Force Majenre） 所谓不可抗力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并对其发生和后果无法避免或克服的事件。作为不可抗力，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它是在签订合同之后发生的，此外它不是由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疏忽或过失所造成的，是当事人无法控制的。一旦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如约履行，则当事人可以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免除延迟履行合同的责任。另一方当事人无权要求对方履行合同或赔偿损失。

根据国际贸易实践和各国法律的规定、不可抗力事件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自然力量所引起的，例如：火灾、水灾、旱灾、地震、飓风等；另一类是由于社会力量所引起的，例如战争、罢工、政府禁令等。

不可抗力事件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解除合同，另一类是延迟履行合同。至于在什么情况下解除合同，或是在什么情况下只能延迟履行合同，而不能解除合同，这要看不可抗力事件对履行合同的影响程序来确定。一般来说，如果只是暂时的或在一定时期内阻止合同的履行，则只能暂时终止合同，反之，事件一发生既已经破坏了履行合同的根本基础，使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可能，那么就可以解除合同。

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通常都要写明不可抗力条款，不可抗力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写明不可抗力事件的含义和范围、不可抗力事件的法律后果、出具不可抗力事件证明文件的机构、以及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通知对方的期限和手续等。这样，对于不可抗力事件的本身和其后果，都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加以具体规定，对于不可抗力事件本身，即对于事件的含义和范围，通常有三种规定的方法：

(1) 概括式规定：不采取具体列举的方法，只对不可抗力事件进行概括说明，例如：由于人力不可抗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遭受意外的当事人与对方协商后，可根据实际所受影响，延长履行合同的期限，或撤销合同。

(2) 列举式规定：明确列举不可抗力事件，例如：如因火灾、地震、洪水、战争原因致使当事人无法按时履行义务，也可延迟履行合同或撤销合同。

(3) 综合式规定：将概括式规定和列举式规定综合在一起。综合式规定不可抗力事件的方法使用较多，它不象概括式那样抽象，也比列举式规定来得灵活。

由于不可抗力事件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对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着极大的影响，这样，在买卖合同中明确订明不可抗力事件的含义、范围和法律后果就显得非常重要。

此外，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无法履行合同的一方有义务及时将不可抗力事件情况通知对方，同时要求有关机构出具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我国出具不可抗力事件证明文件的机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不可撤销信用证（Irrevocable Credit）　与可撤销信用证相对应。它是指信用证一经开出，在信用证有效期内，除非经过受益人和信用证有关当事人的同意，开证银行不得擅自修改或撤销信用证。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证，开证银行就需履行付款义务。不可撤销信用证通常需在信用证上加注不可撤销字样。

在不可撤销信用证方式下，对于开证银行要求修改或撤销信用证的要求，受益人和有关当事人如果认为可以接受，可以以默示表示，而不必予以确认；如果认为不可接受，则需立即通知开证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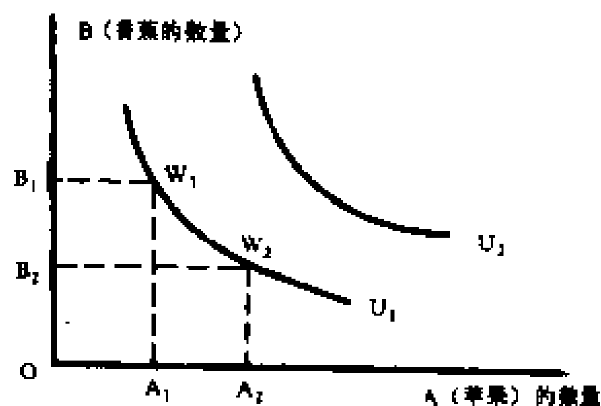
由于开证银行对于不可撤销信用证的责任是肯定的，此种信用证向出口商提供了可靠的银行信用，因此，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出口商通常要求进口商提供不可撤销的银行信用证，不可撤销信用证也因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

不足额保险（Partial Cnsurance）　不足额保险是指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保险。在不足额保险下，当保险标的发生损害时，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占保险价值的比例予以赔偿，称为比例摊赔原则。但是，也可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在保险金额以下的损失，不按比例摊赔原则，而按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不平衡增长理论（The Case for Unbalanced Growth）　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或战略的一种理论。与平衡增长理论相对立，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艾伯特·赫尔希曼和汉斯·辛格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C·P·金德伯格、W·罗斯托等人也都主张这一理论。支持这一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倾向生产的专业化，更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赫尔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希望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按照事先拟定的战略，故意制造均衡破坏的现象，然后逐步加以修正，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动荡情况下不断向前迈进。他是着重从现有资源的稀缺和企业家的缺乏等方面对平衡增长理论提出批评的。他指出，"大推进"所需要的大量资源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束缚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决策能力或企业家的才能。平衡增长论者为了强调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协调发展和工农业产品市场的全面形成，而过低估计了建设项目可能迟迟难于建成，建成后又缺乏效率的情况。他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在传统的落后经济上面增加一个巨大的现代化部门是不现实的。在论述不平衡增长理论时，他说明了"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并提出了著名的"联系效应"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相对于平衡增长而言，也许不平衡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这是因为：（1）不平衡增长理论着眼于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强调了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和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的。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妥善解决资本、要素投入等资源约束中的梗阻，培育大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提高投资效率，合理而有效地配置现有资源，就可能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2）不平衡增长理论既强调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如提出应以产品的需求弹性大小、联系效应大小来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提倡利用丰厚的利润来吸引企业家投资等等；对于逐步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学会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具有重要意义。（3）不平衡增长理论提出的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战略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人们从总体上和局部上认识一国的经济现状与特点，对于私人投资者和计划工作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有效的工具。（4）不平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或新的思路，启发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或战略。不平衡增长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低估了产业部门间不平衡增长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某些资源的进一步稀缺、产业间的不平衡差距过大形成经济总体发展不协调或结构严重失衡，资源稀缺可能会产生垄断，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构的作用，忽视了这些国家中市场残缺不全，价格刺激反应不够灵敏的现实。还有的学者用实证材料论证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部门不健全，各部门自给性很强，甚至很多部门自成体系，没有联系效应，很难使用优先发展部门的选择方法。休斯等人还根据史料分析认为，很少有哪个国家能提供不平衡增长成功的例证等等。现在发展经济学

家一般认为，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并且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因为不平衡增长战略是以创造短期的、事先的不平衡来求得长期的、事后的平衡。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支持者们也主张某种“更高级”意义上的平衡增长。同样，赫尔希曼也是根据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到高水平的、平衡的、发达的均衡的道路，提出不平衡增长主张的。所以，平衡增长应是发展的长期目标，而不平衡增长则可以当作是实现长期平衡增长目的的手段。

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 通常所说的无差异曲线是指消费者的对于两种商品的效用无差异曲线。假定有两种商品 A 和 B，不妨令之为苹果和香蕉。消费者食用 A_1 数量的苹果和 B_1 数量的香蕉，从中吸收维生素等，从而获得某种效用。我们将 A_1 数量的苹果和 B_1 数量的香蕉所组成的组合称为组合 1。又假设有 A_2 数量的苹果和 B_2 数量的香蕉，我们称之为组合 2。现在让消费者在组合 1 和组合 2 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认为两个都同样可取，食用哪一组对他都一样，那么，这两个组合就对他产生同样大小的效用，或者说，这两个组合对消费者产生的效用是无差异的。我们用一个 2 维坐标图来表示。



点 W_1 表示了组合 1，点 W_2 表示了组合 2。W_1 和 W_2 在同一条曲线 U_1 上，U_1 就是 1 条无差异曲线，它是由所有效用与 W_1（或 W_2）相同的点组成的。对于 U_1 上的点的效用到底多大，很难定义，但是上面每两点的效用是同样大小的，这可以很容易地确定。由于有无数的效用水平，也就有无数的无差异曲线。任何一个 A 和 B 的组合都在某条无差异曲线上。无差异曲线之间互不相交。U_2 是另外的一条无差异曲线，它在 U_1 的右上方，这表明它的效用水平高于 U_1。大多数的无差异曲线都是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它表明一种商品增加后，为保持效用水平不变，就要减少另一种商品。或者说，保持一种商品不变，增加另一种商品，就会提高效用水平。曲线的斜率表明效用不变下两种商品之间的替代率。由于边际替代率递减，无差异曲线通常是凸函数（如图中 U_1，U_2）。由于效用是一个主观的测度，因此，同样的商品组合对不同的人可能产生不同的效用，比如有人更喜欢苹果，有人更喜欢香蕉，所以不同人的无差异曲线往往不一样。需要指出，这种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是常用的，同时，商品的种类也不限于两种，3 种或更多种的商品的组合也是可以的，只是那样一来在分析上要繁难一些，在几何表示上 3 维坐标图不如 2 维坐标图直观、准确，至于更多维数的坐标图，对于没有受过专门的数学训练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般说来，两种商品已足可令人满意地表达所需表达的经济思想了。

无差别定律（Law of Indifference） 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 4 章中讨论了交换理论，这也是他的成就中最著名的一部分。他在其中谈到无差别定律。在同一类商品中，每个商品之间是同质的，服从无差别定律。这就是说，当两个商品从使用的角度看没有多大差异时，那么，不论购买哪一个商品对于购买者来说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在一个开放市场中，在任何时刻，对同一种商品不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价格。这个命题很重要，经济学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它做为基础的。它本身也建立在一定的较为隐含的基础上，即要求具有完全市场的某些条件。这些条件之一是不能存在垄断，至少不能使这种垄断力量发挥较大的影响。以当时的德国为例，不能使剧院的老板对士兵和平民，对男人和妇女收取不同价格的门票。这个定律还要求商品的无限可分性，否则定律的实现就可能受到阻碍。而商品的无限可分性在日常交易中大致上是可以满足的，特别是在大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中是可以满足的。这个定律与商品无差异曲线颇为相似，但它们毕竟不一样，从对象、内容、条件、应用等多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对于无差别定律来说，研究的同一种商品，不涉及商品的组合，而对商品的无差异曲线来说，研究的是至少两种商品的不同组合，这是无差别定律和商品的无差异曲线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区别。

无弹性供给（Inelastic Supply） 无弹性供给与无弹性需求相类似。要了解无弹性供给，需先明白供给的价格弹性。它是指价格变化的比率与其所引起的供给变化的比率之比，如供给用 y 表示，价格用 p 表示，供给的价格弹性$E=\frac{\triangle y}{\triangle p}\frac{p}{y}$。一般来说价格上涨，供给就会增加，所以 E 就为正，其数值的大小范围从 0 到无穷大。而无弹性供给就是指 0<E<1 时的供给，它的经济含义是指某种商品的生产者在市场价格变化时，在供给该商品方面反应比较迟钝，使得商品供给量在变化幅度小于其价格的变化幅度。当

然，我们照样可以将 E=1 时的商品的供给称为单位弹性供给；E>1 时的商品的供给称富有弹性供给。如果不管价格的高低，生产者供应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供给就完全没有弹性。假如在任何价格水平上生产者的供给都是无限的，供给就具有完全的弹性。根据商品供给的价格弹性的大小可以一般地判断价格上涨时该商品生产的影响作用。如果某类商品供应富有弹性，则价格上涨会引起更大比例的生产供给的增加，相反如果是无弹性供给则往往是价格上涨很大的幅度，供给只增加较小的幅度。

无弹性需求（Inelastic Demand）　首先我们看看需求弹性的概念，需求的价格弹性是指价格变动的百分比与其价格变动引起的需求变动的百分比的比率。假定价格用 P 表示，需求用 D 表示，需求的价格弹性就可用数学形式表示为：$E=-\frac{\triangle D}{\triangle P}\cdot\frac{P}{d}$。需求的价格弹性的数值可以是从 0 到无穷大。当弹性的数值在 0 与 1 之间时，即 $0<E<1$，我们就将这时的需求称之为无弹性需求或者叫缺乏弹性需求。其经济意义是：某种商品购买量变化的比率要小于引起该商品购买量变化的价格变化的比率。对于无弹性需求而言，价格变化的幅度要高于购买量变化的幅度。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弹性数值为 1 的需求称为单位弹性需求，弹性数值大于 1 的需求称为富有弹性需求。经济生活中不乏有无弹性需求商品的例子，最为常见的是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其价格变化对其需求量的影响比较小，价格再高，人们也得保证必要的消费，从而对食品需求的减少较小。相反价格降到很低的水平，在不考虑囤积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也是有限的，增加购买不会很多。无弹性需求的极端情况是需求的价格弹性为 0。也就是说价格的任何变化都不会引起需求量的丝毫变动，这个极端的例子在实际中极为少见。

无形贸易（Invisible Trade）　无形贸易又叫无形商品贸易（Invisible Goods Trade），它是指没有具体形态的非物质产品的贸易，也叫服务贸易或劳务贸易。长期以来，无形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战后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形贸易以明显高于有形贸易的发展速度迅速增长，至今，它已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战后国际无形贸易得到飞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重心逐渐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向服务行业转变，这就为国际无形贸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战后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一系列新技术并且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导致了国际间可供利用的服务项目和种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使得劳务的可贸易性有了急剧的提高，从而推动了无形贸易的发展。科技革命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许多劳务的生产成本，促使劳务部门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使得劳务部门得以不断走向世界。战后资本输出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直接推动了无形贸易的发展。另外，战后有形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带动与之相关的辅助性的劳务贸易不断发展，等等。当代无形贸易的内容十分丰富，具体地讲，有与有形贸易有关的各项服务业（包括仓储、装卸、运输等）、银行业务、保险、会计业务、旅游、教育与卫生服务、广告业务、设计与咨询服务、信息的整理与传递、租赁、许可证贸易、技术服务、要素劳务贸易（包括侨民汇款和国外投资收入等），等等。尽管无形贸易包括的内容复杂多样，但概括起来说，它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即国际投资收支、运输劳务、国际旅游、私人无偿转让以及许可证贸易等。

无限公司（Unlimited Company）　也就是无限责任公司，它由对公司债务负有连带无限清偿责任的股东组成。谓之连带无限清偿责任，就是当公司的资本不足清偿其债务时，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或其中任何一个股东，要求其清偿债务。而股东不论出资额多少，都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责任，也就是公司的全体股东必须以个人的全部财产来清还公司所欠的债务。其主要特征是：（1）公司是以个人信用为前提而建立的人合公司，具有明显的"人的联合"的性质；（2）公司的股东负无限责任；（3）公司股东的个人出资份额不能随便转让，要转让需经全体股东同意；（4）公司的盈亏可以在契约中规定各股东的分派额，也可以按股东人数或各自出资额的多少为准分配；（5）公司股东可以亲自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

无摩擦的古典模型（Frictionless Classical Model）　一种解释商品与劳动市场会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充分就业问题论述的概括。这一模型假设，工资有完全的伸缩性，可以随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动而迅速变动，从而使劳动市场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也就是说，当劳动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时，工资会迅速下降，使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受到雇用。当劳动市场上供给小于需求时，工资会迅速上升，使劳动的供给增加，直至满足需求。这样，劳动市场总处于一种充分就业状态。同样，物价有完全的伸缩性，可以随商品

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动而迅速变动，从而使商品市场自发地实现供求相等的均衡。这就是说，当商品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时，物价会迅速下降，使所有产品都可以出售出去，没有生产过剩。当商品市场上供给小于需求时，物价会迅速上升，刺激生产，使供求均衡。这样，商品市场总处于供求平衡的状况。根据这一模型，经济中不会出现失业与生产过剩，总是一种充分就业状态。而且，这一过程的调节是自发地进行的，其关键在于工资与物价具有完全的伸缩性。这一模型实际上是对凯恩斯革命之前在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萨伊定理的表述。但是，30 年代的大危机粉碎了这一模型的结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模型所假设的工资与物价的完全伸缩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实世界不是无摩擦的。

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 亚当·斯密于 1776 年首先提出来。亚当·斯密认为，凡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都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增进个人的最大利益。提出这一学说的目的在于指出，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一种干预都有害于社会，因为竞争本身能为个人的利己主义动机开辟道路，使他们自动地、虽说是无意地，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因为个人利益"象一只无形的手那样引导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们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例如，任何人都是自私的，唯利是图的、当他生产产品并出售产品，总想以最低的成本卖最高的价钱，因此，他们会做出一些诸如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非法的事情来。但是无形的手会促使他们走向光明大路，因为他想赚大钱，就必须有好的信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更稳定的消费者，而这样，就必须想着消费者的利益，想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亚当·斯密认为，放任主义被看作政府对经济事务应采取的最好的政策。无形之手这一学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看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不利影响，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无形的手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但对于现实经济生活来说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因为现实社会不是完全竞争的社会，有垄断的存在，即使没有垄断，信息的局限性，交易成本的巨大差异都会促使无形的手不发挥作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对经济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的形式是多样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则就是使全社会利益极大化，它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总之，不象无形的手这一学说，政府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必要的。

区域发展（Regional Development） 是指一个国家中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认为一个国家的地区间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不平衡发展意味着产业布局、城市化、交通等有利于一个地区，而不利于另一地区。增长极理论，是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形成的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聚集的地区。这一地区或产业就是增长极。增长极的作用是对它所影响的广大地区发挥扩散效应，形成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互相联系互相贯通的经济网络，产生外部经济效益，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增长极带动其影响的地区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化，促进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类自身的进步。增长极分为两类，一是吸引中心，二是弥散中心。区域发展中不均衡发展的理论，一直占据主要地区，增长极理论实际是不均衡理论的一种。不均衡理论还包括梯次理论，即经济条件好的地区例如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后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主张不均衡发展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力量有限，因此不能将有限的资源在地区间平均分布，而必须先发展那些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和产业。关于区域发展的理论很多，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等。

双边垄断（Bilateral Monopoly） 双边垄断是这样一种市场，其基本特征在于，供给方和需求方都只有一个企业或个人，一个垄断者。投入品市场的垄断和产出品市场的垄断可以采取任何形式，而双边垄断的必要成分却是单一的卖方和单一的买方的情形。由于一种产品的买主和卖主必然进行交易，显然，他们能够订立有约束力的协议。双边垄断是两人交易的一个特殊情形，交易双方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如果两个人对于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是恒定不变的，那么，任何帕累托最优的交易都将包含一定量的其他商品，只要双方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在标准的双边垄断模型中，假定卖方的利润函数是 $\pi^A = rx - c(x)$，其中：r 是企业的销售价格，x 是销售数量，c（x）是企业的总成本函数；买方的利润函数是 $\pi^B = f(x) - rx$，其中：x 是买方的投入，f（x）是作为 x 的函数的买方总收益，如果 h 是企业的生产函数，d 是企业反需求函数，那么，f（x）= d〔h(x)〕· h（x）。在这里，决策变量是 r 和 x，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是：

$$\frac{\partial\pi^A/\partial x}{\partial\pi^A/\partial r} = \frac{\partial\pi^B/\partial x}{\partial\pi^B/\partial r}$$

$$或\ \frac{r - C'(x)}{x} = \frac{f'(x) - r}{-x}\ 或\ f'(x) = C'(x)$$

可见，连带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买方的边际收益等于卖方的边际成本，连带利润分离的方式取决于销售

价格，即双方之间的转移价格。在一个双边垄断的市场上，卖方宣布一个价格，并为买方的数量选择所接受，卖方被约束在指定的价格水平上，交付买方希望购买的数量；或者反过来，买方宣布一个价格，在这个价格水平上，它将购买卖方提供的任何数量，然后卖方选择一个交易数量。买方可以计算卖方的最优抉择，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决定最有利可图的价格。然而，这些过程的前景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双边垄断模型的适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如它可以在劳工管理谈判中，用来解释协议的制定过程和最优协议的产生等。

双卖主垄断（Duopoly）　双卖主垄断是指在市场上大部分消费者消费的某一种产品是由两个企业提供的。每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都不足以影响产品的市场价格，即在购买方，市场是竞争型的。因此，本质上，双卖主垄断是两个参加者的变数对等。两个垄断者之一都是理性决策者，他的行动会影响到他自己和他的对手。尽管双卖主垄断者利益是纠缠在一起的，但他们不是完全一致的也不是完全矛盾的。与竞争市场上的主体行为对照的是：双卖主垄断者必须各自考虑另一个垄断者打算干什么，以采取相应对策。他们彼此分离，不能和对方达成协议。从这种意义上双卖主垄断者面临的形势是不合作的。这一点还依赖于所考察的是一个静态的市场还是由许多时期段所构成的一个市场。实际上，由于垄断者不仅可在产量水平或价格之间作出选择，还可以改变产品的设计以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因此，两个垄断者各自的产品就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双卖主垄断研究包含着不少困难，如判定这种商品的不同特点等等。

双重劳动力市场假说（Dual Labour Market Hypothesis）　一种分析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的理论。根据这种假说，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主要市场与辅助市场两个部分。从事工作条件好、收入高的工作的工人属于主要市场。从事工作条件差、收入低的工作的工人属于辅助市场。在辅助市场上，就业机会足以使所有的工人受雇，但由于工作不固定，收入低，缺乏吸引力。这种劳动市场结构特点的形成主要在于制度方面的歧视。这就是说，一些工人之所以被排除在主要市场之外，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低或缺乏必要的职业培训，而是由于受到工会、种族或其他制度方面的限制，或者是由于好工作的缺乏。一般来说，人们都想进入从事好工作的主要市场，因此，辅助市场上就业工人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是由政府创造更多的好工作，或打破制度方面的限制。这种理论更多强调制度因素，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归咎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观点。

双重汇率（Two-tier Exchange Rate）　"复汇率"的一种形式。一国货币对同种外国货币并存两种汇率。一般是对贸易外汇收支和非贸易外汇收支分别实行两种汇率，即贸易汇率和金融汇率。通常贸易汇率对本币定值较低，金融汇率对本币定值较高，一般接近自由外汇市场的汇率。如此出口收汇较非贸易收汇兑换的本币多、进口买汇的成本较高，可以起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70年代初法国曾规定将外汇市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受中央银行干预，继续采取固定汇率，适用于一切贸易收支。另一部分为自由外汇市场。贸易以外的其他收支适用于该市场的汇率。

双重税收管辖权（Double Tax Jurisdiction）　当不同国家同时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行使税收管辖权时，双重税收管辖权发生。

一般而言，双重税收管辖权主要有两类，一是指双重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另一是指收入来源与居民（公民）双重税收管辖权。

双重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指同一纳税人，同时具有两国的居民（公民）身份，因而同时处于两个国家的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之下，造成国际双重课税。解决的办法就自然人言是遵从习惯顺序，首先由永久性居所所在国征税，其次，若在两国都有永久性居所，则与其经济关系更密切或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优先行使课税权，第三，若无法分清经济关系更密切或重要利益中心的所在，则由其习惯性居所所在国（即居住时间较长的国家）优先课税；第四，若仍无法分别则按国籍课税；第五、若在两国均无国籍或均有国籍，则由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就法人而言，尚不存在上面这样的习惯性顺序，只能由有关国家协商处理，在协商不能确定之时，一般不允许该法人享受协定待遇。

收入来源与居民（公民）双重税收管辖权指纳税人居住（或国籍）在一国而其收入来源却在另一国，从而受到前者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和后者收入来源税收管辖权的双重管辖，造成国际双重课税。解决办法是分别对各国实行有关税收管辖权实行约束，比如对收入来源税收管辖权可以通过规定在非居住国必须连续停留一定天数以上加以约束；对法人而言，可以规定在非居住国必须有从事营业活动的常设机构加以约束。又比如对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可以通过规定收入来源税收管辖权的优先地位同时对来自国外的所得实行免税、扣除、抵免等对待的方法加以约

束。

各国出于维护主权和税收利益的目的往往有意实行上述后一种意义的双重税收管辖权，因此，对双重课税管辖权加以有效约束就成为国际税收协定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双边反避（逃）税措施（Bilateral Measure Against Tax Avoidence and Evasion） 指两国针对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逃）税行为而采取的合作措施，这种合作措施主要是相互交换有用的税收情报。关于这一点，在许多双边税收协定中，包括综合组织范本和联合国范本中都得到了体现。更早地，这种税收情报交换的作法还可以追溯到1843年比法税收条约。

现代意义上的双边税收情报交换包括以下几类内容（联合国范本）：(1)一般税收情报资料的交换，如各国法律文本、工作细则，说明书、执行税收协定的各种官方材料，税务部门对有关税务案例的处理意见及法院的判决书等；(2)有关跨国纳税人的档案材料的交换，如其联属企业的所在地，开歇业日期、经营业务范围和缔约国居民当地的收入情况等；(3)有关跨国纳税人的专门材料的交换，如其银行往来，利息收支，年度决算报表，利润分配和应征税种等；(4)根据特殊需要的其它情报。

上述情报的取得可以采用如下方式：(1)经常性交换或自动交换；(2)临时性交换；(3)三角交换（指允许将情报提供给第三方）；(4)互派常驻对方的代表直接收集；(5)对特定案件进行联合调查；(6)函索即寄方式；(7)主动交换，指主动将认为对方会感兴趣的情报提供给对方；等等。

但也需注意，进行情报交换往往不得涉及以下三类内容：（联合国范本）(1)按缔约国双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所得不到的情报；(2)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或专业秘密或贸易过程的情报；(3)与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相违背的情报；等等。

此外，由于税务情报交换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如不少国家对此还缺乏重视，而情报交换本身也存在不少技术性难题等，都使已写入双边税收协定的税务情报交换条款因难于贯彻而落空。

双边贸易（Bilateral Trade） 双边贸易是指两国通过签订有关的贸易与支付协定，在双边结算和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贸易。不少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存在着逆差，而外汇储备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外汇管制，以确保必要的进出口。但是，外汇管制总会起到制约该国外贸发展的作用。这时如能开展双边贸易，则可减少外汇支付上的困难，同时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贸易壁垒，推动两国间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开展双边贸易的多为发展中国家。

双档报价（Two-Way Quotation） 外汇银行报出汇率时同时报出买入价和卖出价。直接标价下前者为买入价，后者为卖出价。间接标价下前者为卖出价，后者为买入价。二者间的差价是外汇银行买卖外汇的收益，一般为1~5‰。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同业间买卖外汇的价差小于外汇银行同一般客户买卖外汇的价差。

双重价格（Duai Price） 是指一国的生产者在国内市场上根据协调（例如卡特尔）确定的垄断价格销售，而在国外市场上则以竞争价格销售。其目的是通过在国内的垄断或寡占地位获得高额利润，以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此时，如果该国不存在进口限制，就会出现将该国生产者在国外以竞争价格销售的产品反过来进口的企业。若加上运输等费用也能够以低于垄断价格的价格出售，那么，双重价格制就难以维持。

内在时滞（Inside Lag） 从经济中发生了引起不稳定的变动到决策者制定出适当的经济政策并付诸实施之间的时间间隔。内在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实施时滞，因此，它的长短也取决于这三种时滞的长短。各种政策的认识时滞基本是相同的，但决策时滞和实施时滞并不同。所以，各种经济政策的内在时滞并不同。一般来说，内在稳定器是自动地对调节经济所需措施作出反应，无需决策者作出任何决策，其内在时滞为零。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作为决定并付诸实施，所需内在时滞较短。财政政策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从作出决策到付诸实施都有一会相当复杂的程序，要经过一系列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所以内在时滞较长。缩短内在时滞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经济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

内生经济周期理论（Endogenous Business Cycle Theory） 用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原因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引起经济周期的原因在经济体系之内。例如，乘数-加速模型认为经济周期的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内产量与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纯货币理论认为是经济体系内银行信用的变动引起经济中周期性运动。根据这种理论，经济周期是由经济体系内某些因素变动所引起的正常变动。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是难于避免的正常现象。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也并不否认外部因素对经济的冲击，但它强调，外部因素只有通过内在因素才会发生作用，仅仅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不足以引起经济中反复出现的周期性波动。现代经

济学家一般都着重从经济体系内寻找引起经济周期的原因。

内生收入假说（Endogenous Income Hypothesis）　一种关于效用是消费支出和财产这两者的函数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消费支出与增加财产的储蓄都会给人们带来某种需求的满足，从而都具有效用，即商品和财产的边际效用都是正的。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支出与财产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根据这种理论，人们要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选择，即把收入分配于消费与储蓄。在达到某个最优财产水平之后，人们就会把所有的收入全用于消费支出，而不象过去所认为的那样，一直会有部分收入用于储蓄。而在达到这个最优财产水平之前，才有部分收入用于储蓄。这种理论是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来研究消费函数。这一理论提出了财产是对不确定的未来的一种缓冲器，而不是对潜在的未来消费的缓冲器。但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财产会被包括在各个效用函数之中，对于什么是最优财产水平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对这一理论的适用性仍存在着争论。

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又称"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　无需政府进行任何调整而能自动地减少经济周期中的波动从而稳定经济的某些财政政策工具。这些财政政策主要是：第一、比例所得税，如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这种税收有其固定的起征点与税率，它可以通过对纳税后收入的自动调节来稳定经济。当经济萧条时，由于收入减少，税收会自动减少，从而使纳税后收入与纳税前收入的差额减少，起到抑制消费与投资减少的作用，有助于减轻萧条的程度。当经济繁荣时，由于收入增加，税收会自动增加，从而使纳税后收入与纳税前收入的差额扩大，起到抑制消费与投资增加的作用，有助于减轻由于总需求过大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第二、福利支出、失业补助与其他福利支出有其固定的发放标准，它可以通过对实际收入的自动调节来稳定经济。当经济萧条时，由于失业人数和其他符合补助的人数增加，福利支出会自动增加，这就增加了实际收入，抑制了消费与投资的减少，有助于减轻萧条的程度。当经济繁荣时，由于失业人数和其他符合补助的人数减少，福利支出会自动减少，这就减少了实际收入，抑制了消费与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减轻通货膨胀的程度。第三、农业补贴。这种补贴也有一定的发放标准，可以自动调节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在经济萧条时，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增加农业补贴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抑制消费的减少，又可以使农业生产稳定，从而稳定了经济。在经济繁荣时，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收入增加，减少甚至取消农业补贴既可以减少农民收入的增加、抑制消费的增加，又可以抑制农业生产的过剩，从而也稳定了经济。在这些内在稳定器中税收的作用大于支出的作用。在经济中，这种内在稳定器自动地发挥作用，无须政府作出任何决策，其内在时滞为零。但是，这种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减轻经济周期波动的程度，而不能消除这种波动，无论在经济萧条还是繁荣时期，它都无法改变经济的总趋势，只不过是减轻萧条或繁荣的程度而已。当然，自动稳定器更无法刺激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了。因此，它只能对稳定经济的政策起到自动配合的作用，并不能代替经济政策。要使经济达到理想的状态，仍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

内生与外生货币（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Money）　内生货币指的是存量的变动受价格、利率或者产量等非货币变量影响时的货币。外生货币则指的是影响着价格、利率或实际产量时的货币。外生货币又分为弱外生货币与强外生货币，如果外生货币在一段时间受到来自内生变量的反馈，那么这种货币就称为弱外生货币、反之就是强外生货币。

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如果货币变量 m 可以表达为价格、利率与产量等非货币变量 x 的现值以及其它外生变量 y 的函数，则 m 为内生性货币。反之，如果将 x 写成 m 与 y 的函数，则 m 为外生货币。但是，如果 m 仅受 x 的过去值与 y 的影响，那么 m 就是弱外生货币。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的性质会出现变化，因此，需要结合具体实际情况来研究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例如，在商品货币的条件下，持货币数量论的学者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总是决定着市场活动的水平，如果货币量增加，那么迟早会导致价格的上涨。可见，货币数量论者眼中的货币是外生性的、不过，货币存量有时也受到贵重金属流入的影响，而后者又是由市场上这类贵重金属的价格所造成的，这一影响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所以，货币是弱外生性的，金本位经济下，由于世界各国都制订了统一的黄金价格，从而对货币供给量从外部加以制约，所以，这时的货币属于弱外生货币，不受政策的操纵。在金本位制度崩溃之后，世界各国纷纷通行纸币、这时，如果货币当局要求银行严格遵守规定的准备金库，而且在货币当局的控制之外没有现金的替代物的话，那么货币就是外生性的。

货币内生性的例子往往是与银行系统相联系的。

当存款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增加时，银行为了盈利，就提高信用与现金之间的比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时的货币供给量取决于经济中非货币因素的影响，因此它是内生的。这里通常指的是狭义的货币，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以及中央银行的储备金。但是，近10年来的金融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如信用卡、货币市场资金、电汇等等，这使得货币的替代物增多，流动成本下降。这样，非银行金融机构就可以通过提供大量的信用以及赊销等方式来创造流动性，以期获利。因此，广义的货币已经成为内生货币，它是随经济形势的需要而变化的量。

可见，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所处的货币经济的类型，另一个是银行与金融系统的发达程度。在现实生活中，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二者的数量发生变化，但比例不变，那么货币就表现为中性，说明这时的市场需求量没有变化，价格与产量也就不会因此而波动。

内生性与外生性（Endogeneity and Exogeneity） 内生性与外生性指的是经济模型中变量的性质。确定某个经济变量是内生性还是外生性的变量，这是设立模型的首要任务，也是相当关键的一步。经济模型分为确定性模型与随机性模型两种。在确定性模型中，如果变量 x 制约着变量 y，而变量 y 却不能反过来对 x 施加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变量 x 的值是在这个模型之外决定的，而变量 y 的值却要在所设模型内部决定，这时，人们就称变量 x 具有外生性，而变量 y 具有内生性。在随机性模型中，如果某个经济变量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值都与该模型所有阶段的随机扰动无关的话，那么这个变量就具有外生性，而所有其它不具备这一特点的变量就是内生变量。这类模型一般都具有线性关系，其扰动呈正态分布，而且可以用外生变量与随机扰动的值来表示模型的解（即内生变量）。此外，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并不是只有外生变量才能视为固定量，要根据具体需要而定。参见"内性变量"与"外生变量"条目。

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viable） 指在计量经济学中，数值由所研究的经济模型或者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变量。例如，在研究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状况的模型中，商品价格、供给量与需求量这三个变量就都是内生变量。数值在模型或者经济系统以外决定的变量叫做外生变量。一个模型的内生变量受模型外生变量的影响，但是不能反过来影响外生变量。把某个变量定为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这主要取决于模型所要研究的范围以及问题的性质。同样一个变量，在某个模型中作为内生变量，同时也可以在另一个模型中充当外生变量。例如，在企业计划模型中，利息率是外生变量，因为它无法由企业计划所决定，但是在研究该国总的经济活动的时候，利息率就成了内生变量，因为它的数值在这个大的经济系统内部决定。在加入了时间因素的动态模型中，所考察时期的内生变量叫做现期内生变量，考察期以前的内生变量叫做延迟内生变量，它可以影响现期内生变量，但不受后者的影响，它与外生变量统称前定变量。

内在经济（Internal Economics） 通常所说的内在经济是指规模的内在经济，即随着企业某种产品产量的增加，其平均成本会下降。也可以理解为就每个给定的产量，对最优生产工厂的最为适合的利用，就可获得内在经济。相反，随着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上升，平均利润下降，这就是内在不经济。内在经济还必须与外在经济区别开来，内在经济是就企业内部本身而言，而外在经济则是指随着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成本会下降。内在经济（或不经济）、外在经济（或不经济）最早由马歇尔（A·Marshall）使用。但马歇尔本人的意思与现在的含义有很大的区别。在马歇尔那里，内在经济具有更为丰富的实际内容。实际经济生活中，内在经济的例子并不少见，如产量的增加有助于企业对固定资本的更有效的利用，提高人们的技术水平，并使之得到更好的配置，总之最终的结果使企业的成本降低。

内含价格缩减指数（Implicit Price Deflator）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价格指数。内含价格缩减指数不仅适用于国民生产总值及其构成，还可以用其他经济序列的价格缩减。基于拉斯佩耶斯方式所建造的价格指数是用于对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各种支出序列进行价格缩减。当支出序列被拉斯佩耶斯指数缩减时，所得结果就是不变价的。将这些不变价的支出序列加总就形成了不变价的国民生产总值。当这一总数的国民生产总值用现价表示时，就有两个国民生产总值。内含的价格缩减指数就可以得到：它是用现价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不变价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即内含价格缩减指数为

$$\frac{\sum P_1 q_1}{\sum P_0 q_1}$$

这里P_1为现价，q_1为现时的数量，P_0为基数价格。用内含价格缩减指数乘以产出的拉斯佩耶斯指数就得到用现价表示的总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

$$\frac{\sum P_1 q_1}{\sum P_0 q_1} \times \frac{\sum P_0 q_1}{\sum P_0 q_0} = \frac{\sum P_1 \cdot q_1}{\sum P_0 \cdot q_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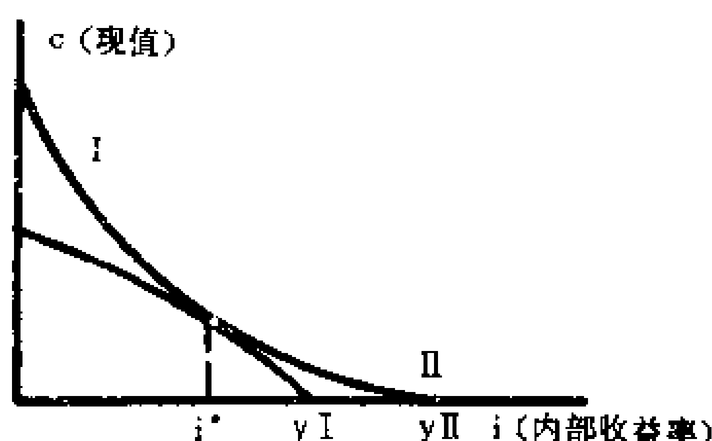
内含价格指数只唯一的能够包括固定权数的产量与个部价值序列的物价指数。该指数综合了计算期与基期的价格变化与数量变化。假定数量是不动的，内含价格缩减指数则反映了计算期与基期的纯价格因素的变化。该指数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数。

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一个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是指这样的一种折旧率或利息 r 的利率，它使项目产生的净收益流 x_t 的现值为零。它是下面方程中 i 的解，其中，θ 表示投资项目的物理寿命：

$$c(0,\theta)=\sum_{t=0}^{\theta} x_t(1+i)^{-t}=0$$

内部收益率是与市场利率相比较而言的，目的在于判断拟议中的项目是否应该施行。

在判断一个投资项目的利润大小的判断标准中，还有两个因素是经常予以考虑的。偿还期标准是一个关键性的标准，它不考虑各种收入在时间上的不同类型。净现值标准对于最优投资行为来说是关系最大的。如果一个项目的期望收益的现值（使用市场利率做为贴现率），比它的成本（包括贴现后的将来的运行与维持费用）要大，也就是说，如果净现值是正的，投资计划就可能是值得进行的。



净现值方法与内部收益率方法在两阶段情况或无穷长期情况下（在本质上，后者是两阶段情况的翻版），结果是一样的。但在多阶段情况下，两种方法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图表示了这样的现象。假定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投资方案，方案Ⅰ和方案Ⅱ。当 $i>i^*$ 时，对两个方案的选择会得出唯一的结果。因为Ⅱ的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都大于Ⅰ，故选择方案Ⅱ。但是当市场利率小于 i^* 时，采用不同的判断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时，Ⅰ的净现值高，而Ⅱ的内部收益率高。采用内部收益率法，Ⅱ的内部收益率大，故选择Ⅱ。于是，产生了矛盾。内部收益法的缺陷在于它隐含了一个假定：中间所产生的各种收入（不论正负），在进行有关复利计算时，均按"内部"收益率自身来进行。但是，唯一适用的"外部"贴现率是市场利息率。这涉及到中间收入的再投资问题。

当投资项目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具有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在其中借入和贷方的利率是一样的），一般说来，净现值法是唯一适用的。对多阶段情况来说，内部收益率法一般是错误的。进一步说，可以有一个复合收益率使项目的净现值为零。如果在项目的生命期中，收入不总是为正或为负，则会使这种复合收益率不唯一。

内向发展战略（Inward—looking Development Stratege）　见"进口替代战略"。

内部劳动力市场　所谓内部劳动力市场，即这一市场属于或完全处于一个大型企业之内。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是由克拉克·科尔在《劳动力市场巴尔干化》一文中提出来的。迈克尔·皮奥雷和彼得·多林格尔在 60 年代末提出了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其中详细论述了内部劳动力市场问题。多林格尔和皮奥雷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一般有了个特征。第一，它有高度的组织和管理。在该市场中，"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受一套管理规则和程序的调节，形同一个行政性单位"。这些规则和程序代替了供给和需求的力量。第二，内部劳动力市场把特权地位授予"内部人"（已经受雇的人）而不给外部人。一旦一个人被可靠地安置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他就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来自外部人的经常性竞争。外部人只能以有限数目的低级位置进入内部劳动力市场，这叫入港。其他空缺职位通常以提升形式由内部填充。往往其中存在着所谓的"工作阶梯"，即一个人可能合理地期望在若干年期间拥有一系列工作。第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常常制定得高于均衡水平。多林格尔和皮奥雷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规则和程序受外部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影响相对较少。由此可见，一个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多年的职工，他的经济状况的改善可能更多地（在一定限度内）取决于他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晋升，而不取决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力量。日本经济比其他国家的经济更依赖内部劳动力市场，因为它的大部分劳动力都终生受雇于某一个公司。

分工（Division Of Labour）　分工，或称劳动分工，是指把一个生产过程或工作分解成若干部分，每个部分由专人去实现。这包括社会中自由的职业分工，也称社会分工；还包括在工厂内部或一个行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与分工紧密相联系的是专业化和协作，这些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分工的社会形态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就已进行过分析。亚当·斯密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劳动分工是唯一的动力。虽然斯密对劳动分工的论述存在

一些不足，也没有多少人坚持他的关于分工是解释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论点，但是他的分工学说却已被证明是强有力的，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称赞。十九世纪以来，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日益增长着的灵巧的机器的更广泛使用，劳动分工的生产方式相当程度地扩展了。相应地，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许多新现象，并把劳动分工和大机器生产行业的发展、大规模生产及其优势联系起来。此外，劳动分工还涉及到国际间的分工和男女的性别分工等等方面。

分工、交换和货币的理论 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在他看来，增加国民财富主要依靠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劳动人数，但前者更为重要。他专门举了制针手工工场的著名例子，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增进正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于它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劳动技巧，可以节省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费的时间，还便于改良生产工具和发明机器。斯密的分工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且产生着久远的影响。不过它存在着忽视分工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明显错误。

斯密又从分工引出交换理论。他认为，分工是由人类固有的交换的倾向所引起的。因为人们在交换中发现，各自专门生产一种东西然后互相交换，比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可带来更多的利益。他又指出，分工的范围和程度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在大城市和其他交通运输发达的地方，交换和分工也都发达。在这里，斯密从"人类的本性"引伸出分工，并颠倒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这是错误的。

斯密从分工和交换再引出了货币理论。按他的说法，分工的局面一旦形成，人们都要依赖交换来生活，但物物交换会带来很多困难。于是，为了解决这种交换困难，人们在手头上总设法持有一定数量易被人接受的某种商品，从而慢慢出现了交换的媒介物。他叙述了历史上许多物品曾作过交换的媒介物，但贵金属的特性最适于充当这种角色，故最后成了货币。以后为解决称量贵金属和检验其成色的麻烦，又形成了铸币制度。斯密把货币看成一种商品，认为它是在交换中自发地客观地形成的，都是有价值的思想。但他不认识货币是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又把货币的职能只归结为流通手段，因而是不科学的。

分割的劳动市场（Segmented Labour Market） 这是在理论分析中或经济模型中，对劳动市场的处理办法，即把劳动市场可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若干部分，因而是对劳动市场特征的一种描述。分割(Segment)一词的含义介于分开（separete）和分层（stratified）之间，它可以指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地域范围，劳动者的不同种性，等等。例如可以把整个劳动市场看作是由工业部门劳动市场，农业部门劳动市场、服务业部门劳动市场等的总和，也可以继续细分。在对劳动市场运行及其后果的分析中，根据不同需要，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可采取多标准的结合，如劳动者种性的地域特点就是对地域和种性两大标准的结合使用。在理论分析中常常把劳动市场看作分割的劳动市场，但目前对分割劳动市场还没有一种理论和分类起主导作用。古典经济学就曾经将劳动者分为受过教育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力；并讨论不同劳动阶层的经济平等问题。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分割劳动市场问题的论述并不少见，如对结构性失业的讨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交易费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森（O·Williamson）的市场分级制度的分析中都能找到相应的例子。但怎么对劳动市场进行"分割"则各有不同。因此分割劳动市场与其说是一种观点和思想，倒不如说是一种分析问题（如劳动力市场）的方法。

分配的伦理学（Ethics of Distribution） 经济学的核心是福利生产。在那些创造财富的人们中间分配，在逻辑次序上甚至在重要性上是第二位的。但最重要的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命题是分配，如果这个术语被使用得足够广泛，它能使所有反映道德难题的经济活动得到解决。在涉及社会收入分配的道德问题的解决中，不仅依靠社会的安定程度，也依靠产业的成果。李嘉图的研究在有关分配的理论上把经济科学推向前进，缺少这一目标经济学就停滞不前了，社会搅拌机的作用是否加强也与此有关。很明显，李嘉图认识到了分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他认为"决定管理分配的法律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有关分配科学的失误对生产的有害程度要超过有关生产本身的学说的错误。无论什么时候，当产品被根据不公正的原则分割的信念散布开，都会危害工业生产。如普遍相信社会进化是沿着不平等的方向，即分配已经剥削了劳动者今后并将永远剥削，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社会秩序的强烈混乱。

在产品是由一种合作方式实现的地方，产出和生产的负担都必须根据一定的原则由不同的阶层的人们分担。必须确定的比例不仅应有产出，它代表正的价值，还应有代价，这可以被看作一种负价值。这样它才包括涉及道德问题的所有经济科学。在产出的分配中绝没有孤立的公正的标准。一个人从人们的集体收入中取得多少依赖于他在帮助创造它的过程中牺牲了多少。所说的正价值的比例不可分割地与负价值的比例相联系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必须告诉我们这二者之

间应如何分割。但是政治经济学至今还没有为正价值的实际分割提供一种理论，这已得到公认。它也极少试图为负价值的分配提供一种理论。伦理学也还没有在这双重比例之间提供一个明确的公平的标准。

对社会秩序的争议是源于社会给予各不同阶级的人们的差别的待遇。利润被合理地分配给各阶层了吗？在收益和牺牲的负担中社会发展是变化无常的吗？有些阶级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那个比例吗？社会发展趋势是平等的呢还是与之背离？这些都是理想的公平分配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分配的伦理问题。

在高级的分配理想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过于粗糙以致于只提供工业产品的比例而不考虑负担。平等收入而不平等牺牲的规则是没有多少道德支持的。这一领域的伦理研究事实作为它们的目标的是要找到一个规则去调整所谓的个人的工业成果，或如何在实践上找到一个使工业的净效益在不同阶层上能实现福利平等的一个规则。

分配公平（Distribution Justice）　社会公平是指所有社会关系的公平，包括对待罪犯、儿童、老人、动物以及外国人等一切的公平。分配公平是一个含义较窄的概念，它的另一名称是经济公平。它包括社会中所有经济关系的公平。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品交易、公共产品的供应等。最主要的是从这些交换特别是自愿交易中互惠互利。而分配公平，是影响分配安排中的公平，按那些参加者的角度，根据他们各自的努力、付出、机会成本和贡献的大小，在他们之间分配时实现公平。在早期，分配公平的讨论倾向于强调个人对那些与之做交易的人的责任。因此，一个雇主或是公平，或是不公平的，困难在于划定雇主公平的界限（这也是很难的）。随着政府再分配效力的增强和经济自由的扩大，强调的重点转向了中央政府的分配职责。让厂商和家庭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同时政府在它的能力范围内进行分配，分配公平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进行再分配的税收和津贴有关。津贴可采取如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公共支出的方法，也可采取对劳动力或低工资劳动力的工作发放现金补贴的方法。这可以发给雇主去分配，也可以直接分给雇员。在国际贸易领域内也存在着分配公平问题。南北问题中，南方的贫困国家认为北美和欧洲的富国应通过更合理的国际贸易机制，使南方从贸易中得到应有的份额。因此，分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和哲学问题。

分配法则（Law Of Distribution）　社会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给劳动的。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率的基础是所谓的工资基金。而每人工资额取决于这个基金的大小和参加分割者的多少。全部产品要在以下三部分人之间进行分配：一是那些为生产做出贡献的劳动要素，二是贡献设备或原材料的人，三是通过雇佣这二种要素，把它们组织到一起的人。其中，劳动包括管理工作，生产资料中包括土地。分配即要确定工资、利息、纯利润、地租和管理人员薪金的份额。分配法则则决定多大份额应与相应的生产要素功能的表现联系起来。它不测定个人的收入量，因为一个人总是执行着多种功能。一个资本家经常工作，一个工人也常有资本，一个企业家或劳动与资本的协调者，几乎总是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并做些直接工作，分配法则的科学制定旨在揭示是什么决定着与工作、储蓄及其协调相对应的收入。一个人是多种功能的，它会告诉我们在他的每种作用中应该得到多少收入，由此可以得出个人总收入。

社会产品是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合成物，而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分解，它一步一步分解这个合成。在一个有组织的生产中，一个产品不是完全由某一个工人完成的。每个工人只完成其中的一个环节，生产是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为使各中间环节的劳动与资本活动良好地衔接，一定的协调和管理工作是必要的。分配的实质是在各环节之间进行社会产品的逆向还原。总产品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最初是通过交易活动进行的，在交易中获得的其它社会成员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个集团产品的销售情况。这种销售活动完成了最初和最一般的分配过程，它决定着那些参加生产的各个成员的总收入。决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分配的还是交易活动。某一环节购买他人生产的中间产品，再附加上自己创造的使用价值出售给下一环节。它的买价与销价之间的差额就构成了这个环节的报酬。分配的下一步是确定各环节内部劳动者、资本家和企业家（即协调者）的收入份额。

分配理论（Distribution Theory）　关于国民收入在整个经济中的集团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机制的理论。收入分配可以区分为以下二种：一种是按生产要素的职能进行的收入分配，指社会总产品在土地、劳动和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的分配；另一种是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这主要涉及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而不管个人的收入与哪几种生产要素相联系。

在古典经济学中，尤其是李嘉图的论述中，收入的职能性分配理论强调资本利润率，固定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人口增长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对抗关系，每种生产要素收入的相对份额是由经济中的技术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是边际生产率理论，强调生产要

素价格的决定，认为生产要素与其它商品一样，价格是由供求力量决定的。这种微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受到那些强调市场的非竞争性的人的怀疑，也受到强调社会因素在收入分配中作用的人的批评。在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强调阶级斗争，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工人的组织程度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张活动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依存。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与M·卡莱茨基、J·罗宾逊、N·卡尔多等人的学说相联系。它强调市场结构、工人组织及在宏观经济中需求决定因素的作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研究中也强调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并引进了工资谈判模型。

分配职能（Distribution Function） 政府通过税收和支出来影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职能。美国经济学家R·马斯格拉夫（R·Musgrave）认为，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个经济职能之一。市场经济中，按效率进行分配，必然引起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不利于社会安定，也违背了平等性原则。政府的分配职能就是通过税收与支出手段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累进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支出都是实现分配职能的手段。政府在行使其分配职能中遇到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分配平等有损于经济效率，过分强调经济效率又会导致不公平。如何使效率与公平都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是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

分类普通股股票（Classified Common Stock） 指在股票市场发达的国家，有时会把普通股分为A级和B级两类。过去，这两类股票的区别一般在于投票权方面，即A级股票是对投资公众发行的、可参与利润分红但无投票权的股票；B级股票是由公司的创办人所持有的具有投票权的股票，创办人通过分类股票以较少的投资而完全控制企业。近年来，一些新的小企业对投资公众发行的A级普通股既有支付股利又有投票权，而B级的普通股则由公司的创办人购买，又有在公司的盈利达到预期的水平时，才支付B级普通股的红利。

分项限额（Line-item Limit） 计算抵免限额的一种方法。它指的是居住国（国籍国）政府对于本国居民（公民）在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的某些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项目实行区别对待，单独分项计算其抵免限额。

分项限额的提出旨在防止跨国纳税人利用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的某些低税率项目带来的不足抵免限额冲抵高税率项目带来的超抵免限额。

低税项目因国而异，在有些国家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给以低税优惠，另有些国家对于来自农业、林业、渔业及矿产的收入实行低税优惠。

分项限额与分国限额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可以保证居住国（国籍国）征到较多的税额。与分国限额不同的是，分项限额可以在一国内实行。

分国限额（Line-state Limit） 抵免限额的一种计算方法。它指的是居住国（国籍国）政府对于本国居民（公民）在各非居住国（非国籍国）同一纳税年度内发生的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只允许分别不同国家逐一单独计算其不同的抵免限额，而不允许纳税人用其在有些国家的不足限额弥补其在另一些国家的超限额。由于这一特点，分国限额往往要低于综合限额，因而对于居住国（国籍国）政府而言，可以比在综合限额法下征收更多的税额。当然同时，作为跨国纳税人就需缴纳更多的税收。

分区制（Zoning） 城市政府对土地使用进行控制的一种政策。典型的分区制是等级制，土地用途按最有害至最无害的顺序排列。沿着等级制往上移动到某一等级土地使用区时，在该土地使用区内一切更有害的用途都在排列之列。然而，有时候分区制立法规定每一分区土地的特定用途，力求把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尽可能地彼此隔离开。实行分区制的原因主要是，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私人土地市场中存在着一些内在的低效率，最明显的就是外部因素的存在。例如，许多工厂产生气体的，液体的和噪声的污染，以及有碍观瞻的固体废料。限制接触污染的家庭数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程度。这是一个把居民区和工厂区分开的重要理由。另外，分区制也是城市规划的内在要求和需要。一旦政府成为当地居民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它们就面临一个预测土地使用密度以确定居民所需水电等容积和容量的问题。进行正确预测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由政府下达指令一通过分区制法令，保证预测变成现实。但是分区制立法在实际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后果，根据现实西方国家的法律，几乎所有城市土地使用管制都是司法权力的行为，而不是征用权的使用，所以政府就不需要对因为管制而强加给财产所有者的成本进行补偿。这就使得土地使用分区方法的不同，带来土地价格成倍增长和土地投机的盛行，以及土地使用不当的现象出现，寻租行为的产生等。

公平（Equity） 人们对公平一词的运用颇为广泛，运用者们所讨论的主题不同，公平也许就有不同

的含义，因此公平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普遍得到接受的定义，其含义比较接近于平等（equality）、公正（fairness）。相比之下平等的含义较为明确，如在一个很简单的经济模型中，几个人共同生产一定数量的许多种商品。平等分配就可以看作是每人正好得到$\frac{1}{n}$份产品，但由于个人的偏好不一致，公平仍然难以确定。另外公平还有一个社会财富的转移问题，即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如果假定每人都拥有同等数量乃至同样种类的消费品组合、然后讨论公平问题就显然离现实太远。在充分考虑到社会偏好的情况下，如果个人i更希望拥有个人j的消费品组合，就叫i羡慕j，$U_{i(x_j)}$为i的效用函数，$U_{j(x_i)}$为j的效用函数，i羡慕j则是$U_{i(x_j)} > U_{i(x_i)}$，这时我们定义公平分配为每个人都不羡慕他人，即对所有的i和j都有$U_{i(x_i)} \geqslant U_{i(x_j)}$，显然公平分配是公平的。这种定义也有明显缺陷，它忽视生活中极其繁杂的内容，它们不是用效用函数u和消费品组合x所能包含的，如健康、美貌、家庭等这些不能转让的因素，于是有的学者结合帕累托效率来分析公平问题，在一个不存在生产的假想经济中，存在一个能使帕累托最优与公平同时实现的分配。而另一些学者又提出了反例，而且在考虑进生产的经济中，公平分配与帕累托最优被认为不可能同时实现。与平等相比，公平的外延似乎小一些，它的主要讨论对象在社会分配领域，但公平考虑进了个人偏好因素，因此公平与否更难以判断。而结果上的平等则是一种数量的平均。在许多经济学家那里，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公平与不羡慕是同义词，但对公平概念的这种理解会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

公平分割（Fair Division）　公平分割理论是关于在几个人中间分配一组商品的程序设计。这几个人在取得成组商品时有同等的权利。整个分配过程涉及到平等与效率的问题。现代关于公平分割的理论源于斯坦豪斯（H.Steinhaus）1948年的《如何公平切蛋糕》一文和杜宾斯（L.dubins）与斯潘尼尔（E.Spanier）1961年合写的《公平分割问题》的文章。他们分别描述了在几个人中分享蛋糕的方法。斯坦豪斯的方法中，人们切蛋糕方式都是安排好的。第一个人从蛋糕上切下一薄片，然后，其他人如果希望的话也会切取自己的一片，最后一个人所切的一片肯定是在他看来为属于他的那一份，如果没有人切取蛋糕，那么最后这一片就还原为第一个人的份额。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直到其他人从剩余的蛋糕中得到他的一份。在杜宾斯和斯潘尼尔所描述的相似的方法中，持刀者不停地切下事先已规定好的蛋糕片。其他的第一个人通过选择某一片显示他的意愿，从而以此作为他的一份，此过程如此这样地进行下去直至愿意分到蛋糕的人都有一份。以上的几个人公平分割实质上都是古典的两人分割和选择方法。即一个人将蛋糕分为两份，另一个人从中选取他的一份。在这个情况下，即使几个人的公平分割也不是一般化的情形。斯坦豪斯1950年提出了三人的一般化的公平分割图式（以后有人将其推广到几个人的情形）在此图式中，一个人将蛋糕分成n份，然后其他的人宣布他可以接受哪一份。如果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所能接受的一份，分割就算完成。所有的这些分割图式都被认为是公正的。因为在合理的一般条件之下，它能确保每一个人独立地（即不受他人行为影响）获得蛋糕的至少是在他看来的总值的第1／n份。不难看出在以上三种分割方法中都是这样。这个结论非常有趣，但并不完全。首先它忽视了效率问题。而效率是分配机制设计问题的核心，其次它虽没有直接涉及到个人间的比较，但所用的公平的观念却是以基数效用为基础的，这样，分割就很难实际操作。最后，当谈到在考虑效率的条件下的可操作的有意义的公平观时，就有这样的问题，由于每个人都有确保至少可以得到他的那一份的策略行为，这就不能保证分配的结果就是公平的：有人可能会放弃社会公平而取得多于他所应分的一份。现代的公平分割理论通过研究理性行为的含义和运用不同的平等概念来回答上述批评。公平分割的程度被定义为总是可以产生公平结果的程序，有人具体地表述为：一种分配是公平的：当且仅当任何一个人都不偏好于他人得到的份额。克罗夫德（V.Crawford）等人运用此观念来总结两人分割方法中的公平问题。他们认为在分割者明了选择者的偏好时，策略行为具有竞争均衡的特点。并且表明，在均衡时分割者进行分割以使他与选择者的选择无差异，然后选择者按照如同分割者的偏好那样进行选择。这个分割的结果是公平的，但并不是有效率的，除非分割者与选择者具有同样的偏好、或者说，如果分割者与选择者的偏好趋于一致，分割就会趋于有效率。但是当人们的偏好为众所周知时，分割者就处于有利地位，即如果让他进行选择，他总是不十分偏好他应得的那一份。这是基于如下事实：分割总是产生公平分配且分割者能进行分割以便任何稀奇的公平分配都是结果。但更进一步地，在几个人的情况下，分割和选择方法甚至不需要产生公平的分配。克罗夫德发展了传统的分配与选择方法。他认为在两个人的分割中，分割者给选择者一种选择——在分割者的选择所表明的建议与相等分割之间而不是在分割者的建议与其

相补充的部分之间进行选择，竞争均衡的结果既是公平的又是有效率的。分割者仍然处于有利地位，但不如在古典的分割和选择方法中表现的那么明显。这个结论可以推广到几个人的情形，此时分割者的地位被拍卖掉。这就完全消除了分割者与选择者地位的不对称性，并且产生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分配结果。这种方法固然有其缺陷，但与传统的方法（即选择一种分配使新古典的社会福利函数表示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相比，在研究社会分配问题时有以下优点：（1）它在处理公平问题时不涉及个人间效用的比较并且有一种客观意义。（2）古典的福利理论认为竞争均衡是有效率的，且在合理假定之下任何有效率的分配都能通过适当地选择最初禀赋的竞争均衡来获得。但要发现能使社会福利函数表示福利最大化的分配与计算完整的最优分配没有什么区别。与此相反，公平分割方法常常允许独立于各种环境细节的程度特定化（specification），但仍然能够得到公平与有效率的分割。（3）公平分割问题研究中的大部分分割程序是自我支配的（selfadministered），这一点很难进行具体描述，但在实践中非常重要。总之，公平分割是与社会福利方法不同的另一种研究社会分配问题的方法和理论。

公平价格（Just Price） 公平价格是与社会所公认的商品值相近的商品价格。如果商品都能按照与其价值相近的价格进行交易，那么这种交易便是在公平价格基础上的交易。卖者按照公平价格出售其拥有的商品后便能买到与他所出售的商品价值相等的另一商品。公共价格的概念是由中世纪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来的。当时，人们用某种道德标准来对经济活动进行判断。公平价格的概念便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判断的道德标准之一。只有在公平价格基础上进行的交易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按照这一道德标准，放款而取得利息在当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还款时支付了本金加利息，本金加利息大于原来放款额。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公平的交易。今天，由于主流经济学都强调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因此包含价值判断的公平价格的概念已经不再使用。但是在论及经济中剥削等问题时还用到这一概念。

公募（Public Offering） 又称"公开发行"。新发行的债券由承购辛迪加承购并在一公认的证券交易所登记上市交易，公众可按行市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或转让而无特别限制。大部分欧洲债券的发行都采用公开发行方式，由欧洲金融机构经销的多在伦敦或卢森堡证券交易所登记，亚洲金融机构经销的多在新加坡、香港登记。凡打算以公开发行方式发行债券，须向有关国家有关机构提交申请，债券发行后要按年度提交有关发行人财务状况的报告，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公募可以增强债券的流通性。

公募发行（Offering） 指由证券和银行业者从证券发行者那里承揽整个证券的发行，募集证券投资者，然后把证券分销给一般投资者，通常这种证券发行后会很快在某一国家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即它的市场流动性较高。

公量（Conditioned Weight） 公量是指在计算商品的交货重量时，使用科学仪器抽去货物实际含有的水分，再加上公认的标准水分得出的重量。在国际贸易实物中，很少以货物的公量毛重作为交货重量，只是在价值较高而水分含量差异较大的商品买卖中采用，例如：羊毛、生丝等的买卖。

公民税收管辖权（Citizen Tax Jurisdiction） 这是按照属人主义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它指的是作为课税权主体的国家只对具有本国国籍的公民的得自任何来源的所得和存在于任何地点的财产行使课税权，而对于不具备本国国籍的公民的任何所得和财产都不具有课税权。

这里的关键当然是纳税人公民身份的确定，一般而言，确定的标准均是看纳税人是否取得国籍。取得某国国籍则为该国公民，否则为非该国公民。

问题是不同国家在有关取得国籍的条件上有不尽相同的规定，因而导致了出现双重国籍和多重国籍的可能。多重国籍的出现使同一跨国纳税人同时处于不同国家的公民税收管辖权之下，出现双重课税的重负。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推行"一人一籍"原则，即要求各国在跨国自然人已合法取得它国国籍的情况下，原国籍国应同时取消其本国国籍。由此可避免公民税收管辖权对同一跨国自然人的重复行使。

公司债券（Corporate Bond） 是公司筹集资本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发行者承诺在一定时期内支付利息和偿还借款的凭证。其主要特征有：（1）债券持有者与发行者之间的关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持有者有权按规定的时间获得利息收益，但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活动；（2）公司债发行时注明到期日，期限到时，发行公司按票面金额偿还所借的款项；（3）公司债的票面上标明了固定的利息率，发行公司按固定的利息率与票面金额计算的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者。如果公司破产时，公司债持有人具有先于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股东提出偿还债务的要求。其主要种类有：抵押债券、信用债券、调换债券、收益债

券、可赎回债券等等。

公正交易委员会　日本负责执行《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以及为确保公正交易而制定的其它法律的机构。1947年7月成立。直属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由年龄35岁以上，具有法律经济方面丰富学识的委员长一人和委员4人组成，均由总理大臣征得国会同意后任命。主要任务是根据反垄断法调查各种违法行为；执行与反垄断法有关的行政事务，如审批卡特尔、企业合并、国际契约等；执行限制不公正交易行为的事务；审查、裁决所有违反《禁止垄断法》的案件；受理关于修改某些禁止条款的意见，制定规则等。每年须将此法实施状况向国会报告。该法经多次修正，"例外"立法不断增加，禁止垄断的作用大为削弱。1956年为保护中小企业制定《防止延迟支付下包企业垫金法》，1962年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制定《不正当赠品及不正当优待防止法》，均由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机构除有委员长和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外，还没有辅助委员长和委员工作的事务局，下设官房和经济部、交易部、审查部及7个地方事务局。委员会按规定应独立行使职权、委员任期五年，不得任意罢免。但事实上受通商产业者的牵制，委员多数由原来大藏省、通商产业省、日本银行、法务省的官员担任。公正交易委员会经过40多年的曲折历程，作为反垄断法治体制的中枢机构，其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

公司工会 Company Union　仅限于某一公司的工人组织。一般说来，公司工会的办事人是从该公司的雇员中推选出来的。因而他们只能用一部分时间从事工会工作。这样，雇主对工会就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劳工组织反对公司工会的理由是，只有完全独立的工会才能保护工人的权利。

公路使用费　见"交通拥挤税"条。

公平收益率（Fair Rate of Return）　公用事业公司为支付利息和红利并为购买新的厂房设备而获准可得的利润率。由于公用事业公司的收益率大都是根据管理的需要制定和调整的，所以确定一个公平的收益率是管理公用事业公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制订规章的委员会在确定一个公平的利润率时所考虑的因素有：某一公用事业公司吸引资本所必需的利润率，不受管制的类似企业所获得的利润率，以及该公司一贯的资本成本。还可以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该公司的经营情况，税收影响及竞争等。在有些州，公用事业公司的收益率可根据服务效能的高低而增减。大部分公用事业公司的公平收益率通常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之间。

公司征税（Corporate Taxation）　指的是西方国家对公司收入所征的税，因此又叫"公司所得税"。

公司税将以股份公司形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商企业视为法人，以这些企业为征税对象，征税的基础是企业的收入，它等于公司的全部营业收入除掉实际花去的各种开支、折旧和债务利息后余下的部分。在公司收入中用于向地方政府缴纳的其它税款以及慈善捐款的部分可以免缴公司税。因购买公司的证券而得的红利在个人或家庭的名义上征收个人所得税，证券所得的资本收益在实得基础上以优惠的税率征收。

早期对公司税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分析的是美国的一批学者。其中哈伯格（Harberger）在忽略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对公司税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如果不同投资的税后收益率趋于相等，那么对公司投资征收差别税将使资本重新配置到非公司的部门中去，这会造成各个产业收益率不相等，导致结构扭曲。哈伯格通过设立模型得出结论：整个经济的资本税后收益随着公司税数额的增长而下降，这表明整个社会承担了公司税的负担。此外，高的公司税还使得经济效率下降。学者们认为，如果降低公司税，消除税制扭曲，那么社会总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一定会有所提高。

在这一分析之前，美国的公司税相当高，1953-1959年间的公司税率为63%，而非公司所得税只有31%。后来，联邦政府不断降低公司税率，1981年，美国为了刺激投资，就曾颁布措施降低公司税率，1986年制定的新税法更是将税率从46%降到了34%。这样，联邦政府的收入固然减少了许多，但是经济却从此活跃起来。

由于公司税不包括债务利息，而且在实得基础上对资本收益征收优惠税，因此，公司希望能够不支付红利，将所有收入留存，借债只是为了应急。但是，由于持股人也是理性的人，所以公司最终还是要支付红利，从而增加债务的份额。

后来，高顿（Gordon）等人指出了忽视经济中不确定性的错误，设立了不确定性模型，认为公司税对投资的影响不大，反而会提高效率，导致收益的大量增加，公司税的负担落在高收入的持股人身上。但是其他学者反对说，公司税产生结构的扭曲，导致收益下降，应当对税收体制进行改革，设立更为中立的税制，减少扣除，这样才对经济有利。

公司债务与自有资产比率（Gearing）　这是一

个反映公司借入资本与股份资本的相对比率的指标。公司的债务比率越高，债务与股份之比就越大。债务与自有资本比率的大小影响整个资本成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一概念很难加以计量。最基本的量度方法是固定利率的资本的名义价值比股份资本的名义价值。这一方法忽略了应该计入分母中的储蓄资产的价值，通常被认为一种更好的量度办法是：固定利率股本（stock）的市场价值／普通股的市场价值。优先股原应该是被计入分母中的，但可以认为如果它们是不可兑现的，则它们是企业投资中的一个永久性部分，因此就不应包括在分母之中。因为这个比例忽略了诸如银行借款、抵押等其他计息资本的筹措形式，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公司在其资产结构中应选择什么样的债务-股份比率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这种选择（在英国叫债务—股份比率决策，在美国叫杠杆决策（Leverage decision））在公司财务主管，投资者、股票市场参与者等实业界人员看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传统的经济理论却认为公司债务—股份比率决策是无关紧要的 —— 选择这样或那样的债务—股份比率对公司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理论上与实践中的这种鲜明的对照迫使人们对理论的假定进行了许多的验证，一些进展已经表明公司债务—股份比率决策是重要的，但迄今为止，它的重要性仍没有被理论界充分理解。

公司清偿能力（Corporate Liguidity） 公司清偿能力是指一个厂商偿付其到期现金债务的能力。厂商清偿能力对于厂商的管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过分清偿或清偿能力不足都会给厂商造成损失。若清偿能力过分，将会使厂商减少盈利的机会。如果清偿能力不足，会使厂商获得贷款较为困难，甚至导致厂商的破产。在厂商清偿能力不足的条件下，厂商偿付到期债务的能力发生困难，这种情况下，厂商只有在非常不利的贷款协议限制下，并且在相对较高的利息成本下获得贷款。在极端情况下，厂商无力清偿将会导致厂商的破产，并对厂商资产进行清理。破产的成本可能会相当大，因为在破产时对厂商所形成的巨大压力需要按照比资产价值低的价格对厂商资产进行清理；此外，还需要若干破产的行政管理费，例如律师费、对清产者付费等。由于存在破产成本，因此对于清偿能力的管理将影响厂商的价值。

公司清偿能力往往通过公司持有的流动性资产来体现。尽管大多数资产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最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是现金与适于在市场上出售的债券。公司清偿能力手段反映了厂商持有的这两类资产的数量，清偿能力是衡量将这些资产转变为货币价值的能力的手段。

厂商清偿能力的地位不断变化。有一系列方法用来评价厂商清偿能力地位的变化。例如，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现金加可出售债券对流动负债的比率、现金加可出售债券对净收益的比率、净收入加折旧对总资产变动的比率等。这些比率的变动都具有一定的幅度。例如，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相对水平一般在 1.7 倍到 2 倍之间。现金加可出售债券占流动负债比率相对水平一般为 25%。这些比率会随货币或资本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不应使变化幅度离这些相对水平太远。若比率太低，会使厂商无力偿付债务的风险增加；若比率太高，又会使厂商丧失潜在的盈利机会。厂商为了尽可能避免无力偿付债务的风险，并求得收益的最大化，必须加强清偿能力管理。这包括加强有效的现金的流动；加强现金流量预测；加强流动资产的生产性使用等。

公正（Justice） 公正这一概念经常被用于评价一种经济制度。公正一词在经济学中的份量也越来越重。传统经济学强调效率，并认为效率提高会自然带来公平，但福利经济学却有不同的认识，它认为即使一国的国民福利足够大，也不能保证公正或整个福利的最大化，原因是有许多干扰福利最大化的因素，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消除那些干扰因素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公正经常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所从事的主要活动，而不仅仅把公正视为引导公众的一种思想。公正的理论多种多样，理论家们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公正。在功利主义那里，公正是福利主义、结果主义的核心。在公正与公平的关系方面，有人认为，每一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是相等的。也有人将公正与自由联系起来。有的人认为，对主要物品的占有权是公正与否的体现，并认为占有权的公正标准比福利主义的效用标准更为合适。总之，对公正的认识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对公正的不同认识基于三个方面，第一，公正的计量标准不同。这些标准包括效用，主要物品的占有权，能力指标、收入差别、资源等。第二，总量标准的不同。第三，需求的优先次序的不同。当然不同的公正概念，在经济学中出现是正常的，因为公正是个历史悠久的哲学术语。目前也很难对不同标准的公正进行评价，因为每一种公正的概念都包含着自身的价值判断。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公共产品是西方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经济学家们通常把政府提供的公共或集体利益称为公共产品。然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所普遍接受的公共产品的概念起源于萨缪尔逊。萨缪尔逊在他 1954 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分

析了其均衡的条件。按照萨缪尔逊的观点，公共产品是社会所有成员共同享用的集体消费品，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于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社会其余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尽管萨缪尔逊的定义遭到不少经济学家的批评，但研究公共经济学的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接受了萨缪尔逊关于公共产品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补充。尽管公共产品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使用，但是要想对这一概念下一精确的定义是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对于公共产品有不同的理论，还由于公共产品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不同的公共产品在供给与需求特征上具有很大差别。一种为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接受的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是奥尔逊（M.olson）在他的《集体行为的逻辑 —— 公共产品与群体行为》一书作出的。奥尔逊对公共产品的定义是："在一个拥有 x_1，x_2，…，x_i，…x_n 个消费者社会或团体中，如果某消费者 x_i 消费某一产品（任意一种商品）而同时不能适当地排斥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则该产品是公共产品"。换言之，该团体或社会不能排斥那些没有购买该公共产品或对该公共产品提供支付的人分享该公共产品的消费。而在非公共产品，即私人产品场合，消费者消费自己的消费品时可以有效地排斥其他人的消费（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布坎南（J.M.Buchanan）对于公共产品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布坎南在《民主过程中的公共财政，财政制度与个人选择》一书中指出："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或社会根据任何原因决定以集团组织的名义提供的物品或劳务被定义为公共产品。"这里所定义的公共产品都是广义的公共产品。按照这一定义，凡是由团体提供的产品都是公共产品。某一种公共产品只可以使很小的团体，比如只包括两个人的小团体受益，而另一些公共产品却可以使很大的团体甚至是全世界的人都受益。

公共产品的种类很多。在西方经济学中把公共产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另一类是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该产品的消费具有非严格的排他性与不可分性。这表明增加一个人消费该种公共产品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于该种产品的消费。不可分性表明，每个人所消费的该种公共产品的数量都是相同的。准公共产品则不同，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与可分性或局部可分性。排他性表明，增加一个人对某公共产品的消费会减少其他人消费该种产品的数量或质量。可分性或局部可分性表明，准公共产品消费的数量对于消费该种产品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同的，尽管从理论上将公共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是可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将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尤其是纯公共产品，很少产品可以归入这一类。不过，一般把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公共产品如国防、法律体制等归为纯公共产品。而大部分由团体消费的公共产品被定义为准公共产品。

对于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大多是从消费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实际上生产中也存在着公共产品，例如运河上的航标灯是一种生产性的公共产品，这类产品往往被称为公共生产要素。

从经济技术上讲，公共产品产生的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增与外部性。如果产品能够在常数规模报酬下生产，如果每个人对于某一种产品的消费都可以同时严格地排除其他人对于该种产品的消费，那么产品根本不需要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出现。只要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或者出现了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公共产品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达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均衡条件是在边际点上，所有消费公共产品的人愿意为公共产品作出的支付的总和等于提供这一公共产品的成本。若用 V_k^i 表示第 i 个消费者愿意为第 k 种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而用 P_k 表示第 k 种公共产品的生产价格，则公共产品的均衡条件表示为：

$$\sum_{i=1}^{n} V_k^i = P_k \qquad (1)$$

V_k^i 代表了第 i 个人对 k 种公共产品的支出意愿，它代表了第 i 个人对于第 k 种公共产品的边际评价，P_k 则代表了生产中的边际成本。这一条件既适用于纯公共产品，也适应于准公共产品。对于准公共产品来说，由于各个人的消费受到消费公共产品人数的影响，人数太多会造成消费中的拥挤状况，因此，除了上述均衡条件下，准公共产品还有一个成员规模条件。这一条件的最简单的形式表示为：

$$MRS^i_{N_{jr}} = MRT^i_{N_{jr}} \qquad (2)$$

$MRS^i_{N_{jr}}$ 表示第 i 个消费准公共产品 j 时，消费公共产品的人数 N 与货币 r 之间的边际替代率。$MRT^i_{N_{jr}}$ 表示边际转换率，它表示，只有当一个人从额外增加一个成员所得到边际利益 $MRS^i_{N_{jr}}$（由于拥挤问题通常为负值）等于因额外增加一个成员他所负担的边际成本 $MRT^i_{N_{jr}}$（由于增加成员负担既定的成本，通常边际成本也是负的）时，对于第 i 个成员而言，成员规模才算达到了最优均衡。

公共产品的均衡条件表明，只有当所有消费某种公共产品的人都按照自己对于公共产品的边际评价对于公共产品进行实际支付时，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供应量与社会需要量一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点是很难保证的。由于公共产品是众多人同时消费的产

品，每个人的支出只占整个公共产品支出的一部分。因此个人有可能隐瞒自己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以便通过由其他人的支出而生产的公共产品中得到好处，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特征表明不对公共产品作出支付的人同样能消费公共产品。这一问题被称为公共产品消费中的“白搭车”问题。“白搭车”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不存在象私人产品市场那样的公共产品市场。在私人产品场合，个人购买商品时支出的价格就代表了他的真实偏好。而对公共产品的支付通常并不是采取购买商品那样的支付方式，而是征税的方式。因此，个人往往不可避免地要隐瞒自己对于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制度设计得合理，并给人们以自由的表决权，通过投票的表决方式可以解决公共产品的有效生产，而不会产生“白搭车”问题。

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公共选择是一个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公共选择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传统的政治科学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公共选择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

正统的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是个人的选择。每一个独立决策的经济主体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事经济活动。生产者、消费者都面临着各种选择，他们所进行个人选择的环境是市场。个人根据市场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决策，以便在既定的限制条件下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按照公共选择派经济学家的理论，正统经济学的方法同样适用政治领域里若干问题的研究。政治家类似于生产者，选民类似于顾客，他们也都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政治家的目标是要谋求自己的政治目标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与社会地位。选民们则是要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来达到自己效用的最大化。政治家通过制定政策来促成生产公共产品，象厂商必须生产出符合消费需要的商品才能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一样。政治家也必须制定符合选民需要的政策才能达到其政治与社会目标。在私人选择场合，消费者通过投货币票来实现产品的购买。消费者货币票将决定生产什么和不生产什么，从而决定企业的命运。在公共选择场合，选民通过投政治票决定什么样的政策得以产生（往往通过由选民选举的政治家制定政策），从而决定政治家的命运。但是公共选择领域又不完全与私人选择领域相同。在公共选择领域，决策是通过官僚机构进行的，政府官僚机构不同于私人企业机构，政府官僚的贡献难以进行测度，也就难以进行控制，因此，公共选择场合必须克服官僚产生的弊端。

公共选择理论就是要研究上述各方面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与个人选择理论一样也涉及到实证与规范两个方面的问题。实证的公共选择理论涉及到选民，政治家、投票过程（将选民与政治家联系起来的过程）与官僚理论，运用象经济学中类似的实证方法，分析选民、政治家官僚的动机以及选择行为，分析投票以及官僚机构的运作过程。规范的公共选择理论则研究法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涉及到如何改进官僚制度，使政治制度更有效，更能体现选民的利益。

公共部门借款（Public Sector Borrowing） 是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企业的加在一起的总的收入超过总的支出的差额。与公共部门财政收支差额或财政赤字相比，它的范围要广，不仅包括财政项目，而且还包括公共部门财政所未包括的金融项目，短期和长期的金融证券即在它的范围之内，这些金融证券即有可能是为政府对商品、劳务的购买和转移支付筹资，也有可能是为公共企业的具有很高商业收益率的投资项目融资。此外公共部门借款还包括纯粹金融交易，如对私人部门的借贷，对资产的购买。所有这些对总需求，总实际产出以及货币状况的影响各不相同。纯粹的金融交易几乎与宏观经济毫不相干，但公共部门借款行为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且容易造成对金融的不必要的压力。它甚至不易显示政府在某一段时间内为某项活动筹集资金所发放债券的全部价值。所有这些缺点都没有能阻止公共部门借款成为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焦点。这是由于7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纷纷采用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而将货币目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而公共部门借款是货币供给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认为是控制货币增长从而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提高利息率的关键。但实际上，对公共部门借款的控制（用递增税率和对公共支出项目的削减）又容易对经济产生消极后果，影响实际收入的增加，这反而会引起对私人部门借款的需求，因为公共部门要维持正常开支和防止破产清算，就会挤占私人部门借款。如果不惜付出失业和经济增长下降的代价而采取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国家债务的办法，对公共部门借款实行控制最终会是很有效的。公共部门借款已成为许多国家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 公共财政是经济学最古老的分支。有关财政事务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古代。16世纪的经院学派，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各主要流派经济学家都涉足了这一领域。公共财政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公共财政研究公共部门产生的原因及其运行的规则；公共部

门运行对于市场产生的影响以及市场对此作出的反应。公共财政研究与福利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所强调的问题又不同于福利经济学问题。公共财政中所强调的许多问题是与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密切联系的。

公共财政所研究的内容很广，主要有公共支出、税收、财政政策的宏观作用等。

公共支出有两项重要的内容。一是公共产品的生产；二是转移支付。公共财政是从资源配置与收入再分配的角度来研究这两个问题的。关于公共产品的生产问题属于资源配置问题，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从私人产品生产转入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财政对于公共产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公共产品是符合个人偏好但难以通过市场自愿的交换生产的产品，例如国防、法律制度等都属于公共支出的范围。私人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也往往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加以解决。在以公共支出的方式生产公共产品时利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对政府的公共支出方案进行评估，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

转移支付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支出。转移支付的目的是要纠正收入分配问题，转移支付可以被视为一项负的税收。公共财政研究转移支付对于收入再分配与资源配置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福利经济学问题，也涉及到道德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公共财政还研究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于个人选择的影响。

税收是公共财政中与公共支出相对立的概念。税收是公共支出的资源，可以说没有税收，公共支出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共财政中所研究的税收问题涉及到税收的原则、税收的结构、税收的权限等问题。税收的原则涉及的是税收的合法性基础，即依据什么原则进行税收。公共财政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分歧。一般而言，税收的原则是两条：一是受益原则，二是牺牲原则。受益原则认为纳税者将从纳税所生产的公共产品中受益。牺牲原则强调纳税人的纳税负担独立于预算支出，纳税对于纳税者来说是一种个人利益的牺牲。强调牺牲原则的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如何以平等的方式分配这种牺牲。这涉及到具体税制问题，例如是比例税、还是累进税的问题。

公共财政中关于税收结构的研究，主要涉及的税收的种类问题以及各种不同税收对于资源配置与收入配置的影响。主要的税收种类有收入税、消费税、财产税等。在税收结构中，除了一种理想的一次性总付税（lump-sum tax）是中性的税收不会对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外，其余的税都是非中性的，即都会对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对于这些影响的研究成了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公共财政对于实行什么样的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以及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的税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就效率的规则探讨了最优赋税问题。此外，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问题、税收的负担以及转移问题也是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内容。

公共财政制度会对总需求、总供给以及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财政支出中政府的支出会影响总需求；政府的税收会影响要素供给；政府公共投资的增减会影响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财政制度这些宏观影响是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问题。

当代公共财政所探讨的问题大多是论述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如何通过税收与支出行为纠正因市场调节失灵，资源配置不当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但财政制度运行的结果表明公共财政政策本身也会失灵。如何纠正财政制度失灵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属于财政法学问题。它涉及到公共政策是如何运作的，它的运作又由什么决定等问题。公共财政从影响公共政策的投票者，政治家、官僚等的自利行为来研究公共政策的选择，得出许多有趣的结果。

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　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经济的经济学科，它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并非是纯市场的问题。例如价格机制调节下的厂商、用户的行为问题。而是公共部门的经济问题。例如公共支出问题、税收问题、政府调节问题、公用事业定价问题、公债与货币发行问题、汇率政策问题等。

从体系上讲公共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尽管它诞生于19世纪初期，但是由于西方放任主义思想在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一直很小，公共部门的支出比例也很小。公共经济学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极其有限，本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力量加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部门开支越来越大，到80年代各西方国家公共部门占用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30%以上，有的国家达70%。这为公共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本世纪60年代以来，自从1964年科姆（S.C.Kolm）第一次公开使用公共经济这一词，到现在为止，公共经济学在西方已得到长足的发展。

公共经济学有新旧之分。本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公共经济学称为旧公共经济学，80年代以后的公共经济学为新公共经济学。新旧公共经济学的共同点都是要改进对于经济关系的分析，但二者又有重要的区别。旧的公共经济学对伦理方面的问题分析比较原始也不够完善，仅用帕累托最优作为一种分析理论的标准。它所假定的社会福利函数是难以被接受的，而新

公共经济学则引进了道德哲学中的社会伦理探讨了伦理问题的有关特征，这些伦理问题涉及财产的合法性权利问题，自由交换与自由契约权利问题以及与这些权利有关的选择、谈判、政治过程的投票问题等。

在社会伦理观的基础上，新的公共经济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所研究的问题有公共产品、外部性、自由竞争的障碍、非歧视性垄断、贫困与公正的收入分配、失业、通货膨胀、公债交换与市场关系对于人、文化与社会造成的影响，政府的各种调节活动等。其中公共产品的研究是公共经济学的中心。象由政府提供的安全，公正与秩序以及各种公用事业等都被认为是由众多人集体消费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出现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交换往往不能以通常的私人产品生产交换那样的市场决策方式进行，而必须通过非市场决策的方式进行。公共经济学正是研究这些非市场决策行为，例如团体的选择行为、政治与公共行政选择行为等。不过在进行非市场决策行为的分析时，公共经济学借用了许多市场分析的方法，例如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分析等。公共经济学从理论上解释了市场的失灵与解决的办法，从而为完善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公共事业定价（Public Utility Pricing） 公共事业物品和劳务指在任一给定的经济和技术状态下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力享有而又不能通过市场渠道进行满意分配的物品或劳务，负责分配这种物品和劳务的组织我们称之为公共事业。它的特点是由管束它的法律体系所赋予而不是来自于其所用资本的特征。现实中的公共事业包括：(1) 当地和地区之间的运输、航空、汽车动力运货车、天然气及石油管道、铁路、水运。(2) 电话电报。(3) 动力、热、光。(4) 公共用水、卫生及灌溉等设施。在许多国家由国营企业来经营这项业务，但有的国家（如美国）则是大多由私人经营的，政府加以控制，控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公共事业赚过多的垄断利润和在各顾客、商品和地方之间收取不合理的差别价格。控制主要对象就是价格，包括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价格控制的标准是收人合理而对资本有吸引力，即允许所定的价格能够：(1) 包括营业费在内，(2) 使投资有合理的利润。用公式表示就是：

$$R = O + (V - D)\ r$$

其中 R 为全部收人，O 为经营费用，D 为有形及无形资产折旧，r 为利润率，(V−D) 是财产净值，称为计价基数。

上面介绍的美国公共事业委员会控制下的公共事业计价方法，由于公共事业产品和劳务的特性，市场定价制度对它们来说是不适用的，市场失灵在公共事业定价上同样反映出来。而人为定价该如何进行呢？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假定公共事业的伦理观也是有利于社会大众，那么定价过程首先是以下两个预备阶段：(1) 推断以对未来需求、未来技术、未来生产要素成本的期望。(2) 对技术和生产要素进行最优选择，使公用事业产出的折现成本最小。这个产出总是与需求一致，二者很小的差额被认为是必要的。那么公用事业定价就是在考虑经济的、金融的和社会限制的前提下，计算出一种价格，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社会公众。如果既不存在产品配额，又不存在过量的产出过剩，整个计价过程就是有效的，或者说这样的价格的调节过程会消除供需差额。总的看来上述定价过程是对市场定价过程的模拟，定价的目的还在于获取类似于帕累托效率的效率。如一度被讨论的边际成本定价就是这样。

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 是通过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增进身体与精神效能的科学和技术。包括所有有助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的预防活动。具体的有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指导，如关于抽烟、喝酒、饮食习惯、体育锻炼等方面的建议。所有的安全立法，许多的消费者保护以及传统的对污染的治理、卫生防疫计划和对流行病的控制。公共卫生的责任不仅仅在提供人们健康服务的部门，而涉及到其他许多领域。关于公共卫生的方法和人们对它的理解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变化。在原始社会对疾病的防御就是将患者隔绝或毁灭。在近代随着人们对传染病的病源和症状等有关知识的增加，政府就着手控制环境因素，比如公共自来水、牛奶及其他食品、粪便、害虫及各种污染。20 世纪以后，社会保障更注意保障母亲、儿童、残病人、年老人的福利，也注意到住房问题及特殊的病症，诸如梅毒、癌、心脏病及精神病。现在人们已经在研讨将卫生保健事业的全部作用范围 —— 提高健康水平，预防治疗疾病，以及恢复健康 —— 合并为成对个人和社会的综合系统。疾病及其危害性因地而异，各国处理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人们对公共卫生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原始民族有清洁和个人卫生习俗，往往是出于宗教原因。几千年来人们把瘟疫看作是神的惩罚，以后才逐渐知道它是自然原因。随着医学知识的发展和运用；医院开始大量出现，英法等国的政府在 19 世纪就成立各种机构，履行公共卫生职能。1909 年一个永久性国际卫生组织在巴黎成立，1948 年纳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现在公共卫生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被看作是提高国民福利所不能缺少的。公共卫生开支增加较快，尤其在发达国家。而且公共卫生已经从国家走向世界，联合国卫生

组织的作用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公共工程（Public Works）　政府资助或政府直接从事的各种建筑项目或开发项目。包括政府所从事业的公路建设、水利建设、住房建设等工程，或由政府资助的地区开发及其他工程。政府从事公共工程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兴建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但私人企业又无力从事或不愿从事的基础设施或社会福利项目；另一方面，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刺激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增加公共工程支出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种手段，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0年代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通过公共工程而摆脱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二战以后各国公共工程的支出一直在增加。但公共工程的增加也会引起财政赤字严重等问题。

公开市场业务（Open Market Operation）　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即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以调节货币供给量，是货币政策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的有价证券主要包括：国库券、其他政府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公开市场业务的基本作用是调节货币供给量。当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有价证券时就把货币投入了市场，从而会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增加货币供给量；当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有价证券时就把货币从市场收回，从而会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所以，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有价证券等于发行货币，而卖出有价证券等于回笼货币。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可以较为灵活而有效地控制货币量，并通过货币量的变化来影响利率，进而达到调节总需求的目的。因此，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最重要，而且最经常运用的政策工具。

公开的通货膨胀（Open Inflation）　完全通过一般物价水平公开上涨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通货膨胀。在这种通货膨胀下，物价上涨率就是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在市场经济中，除了某些实行价格制的特殊时期（例如，战争时期）以外，价格由市场决定，通货膨胀都采用了这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中，价格由有关部门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可以采用这种形式，也可以采用其他形式。计划经济中的公开的通货膨胀反映在自由集市贸易中的物价水平上涨与国营商业的零售物价上涨。由于自由集市贸易所占比例甚小，公开的通货膨胀就是由官方制定的国营商店的零售价格指数所反映出来的通货膨胀。这种价格并不由市场决定，而由有关价格部门确定。因此，公开的通货膨胀最终表现为官方公布的零售价格指数的上升。有些经济学家将这种通货膨胀称为"计划的通货膨胀"。正因为在计划经济中价格受到严格控制，所以，公开的通货膨胀往往并不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

风险（Risk）　风险的外延十分广泛，如有政治上的风险、道义上的风险等。这里只说明经济风险，它是指由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各个经济行为人在从事正常经济活动时，可能蒙受经济损失的概率及损失程度。所以衡量一项经济活动风险的大小往往从两个方面考虑：发生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有多大；一旦发生损失，程度如何？这个损失既包括直接经济损失，也包括我们可以称之为"机会收益"（即进行其他经济活动所能带来的收益）的损失。一种风险可能发生的概率很大但可能的损失小或者概率小，损失大，也可以是概率大，损失也大或概率小损失也小。对于后两种情况我们可以比较经济活动风险是更大，还是更小，但对前两种情况则很难作出判断哪个风险更大。风险是由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如果一切都在人们的控制之下，一切都在人们的预料之中，那么就不会有风险存在。根据风险产生的原因可以将风险分为：（1）自然风险，由于自然原因，如雷电、火灾、地震、火山爆发等无法预知的因素所引起的风险。（2）社会风险，由社会团体或个人某些行为引起，如战争、偷盗、政治动乱等。（3）经营风险，由经营管理和市场供求等因素引起。经济风险可能发生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投资阶段、生产阶段、销售阶段都存在风险。一般来说，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交换条件下，商品交换的范围比较小，产品更新周期长，生产经营者易于把握各种影响生产的条件，风险的作用不十分明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明细化，社会的需求结构变化多端，总之不确定性增强、风险随之增大。风险对于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

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　风险资本是指投资于崭新的、有潜力迅速发展的公司或增长很快的新式产品的带有风险性的资金。风险资本通常无法通过银行贷款筹措，而是以风险资本的投资者认购公司的普通股或优先股获得。这种方法不仅使投资者成为公司持股人，有权得到红利，也使风险资本不以借款形式出现，这对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进一步的贷款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风险资本是不具流动性的，除非公司重新购回股票或其它人愿意购买这些股票，否则风险投资者无法撤回其投资，由于投资风险大，风险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也很高，可以达到原投资的三至四

倍，而风险投资者也通常希望进入公司董事会，随时了解公司的运行情况。

现今已有大量的个人投资者愿意将资金投入风险资本项目中，一些银行和养老基金也加入了风险资本项目投资，为了吸引更多的风险资本，一些大公司已建立了风险资本基金。

勾结（Collusion） 勾结是企业之间合作以避免出现相互受损的竞争，取得这种合作的办法，包括非正式的串通或相互默契，例如共同达成一致标价，共享情报，以及在卡特尔组织内部规定对违反协议者给予惩罚的正式协议。

典型的勾结例子是卖方垄断者由于认识到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和作用，为了使本行业的利润达到最大化，不致使各自受损，因此采取联合的行动。这其中，每个卖方垄断者的产出水平，都在同一控制之下，其最终效果使整个行业产生了一种勾结式的垄断。

勾结可以用数学方式表达。设

$$R(q_1+q_2)=R_1(q_1,q_2)+R_2(q_1,q_2)=(q_1+q_2)F(q_1,q_2) \quad ①$$

其中，R是收益函数，表明产量与收益的关系，R_1、R_2是厂商A、B的收益函数，q_1是厂商A的产出水平，q_2是厂商B的产出水平。$F(q_1,q_2)$是表明价格与销售量关系的反需求函数。

所以总利润 $\pi=\pi_1+\pi_2=R(q_1+q_2)-C_1(q_1)-C_2(q_2)$ ②

②式中π_1、π_2分别是厂商A、B的利润，C_1，C_2分别是厂商A、B的成本函数。

然后我们对②式总利润求极大值或是对从①、②两式所得到的③式求极大值：

$$\pi=(q_1+q_2)F(q_1+q_2)-C_1(q_1)-C_2(q_2) \quad ③$$

用②式求极大值后，从一阶条件得出每个厂商的边际成本（MC）等于边际收益（MR），即：

$$MR(q_1+q_2)=MC_1(q_1) \quad ④$$

$$MR(q_1+q_2)=MC_2(q_2) \quad ⑤$$

综合④和⑤，则

$$MR(q_1+q_2)=MC_1(q_1)=MC_2(q_2)$$

通过一阶条件可以解出：厂商A、B的产量利润和市场上该种商品的价格。

例如：设反需求函数

$$P=F(q_1+q_2)=136-4(q_1+q_2)$$

$$c_1(q_1)=q_1^2, C_2(q_2)=bq_2^2$$

$$MC_1=2q_1, MC_2=12q_2$$

$$R=P(q_1+q_2)$$

$$=F(q_1+q_1)\cdot(q_1+q_2)$$

$$=[136-4(q_1+q_2)](q_1+q_2)$$

$$MR=136\quad 8(q_1+q_2)$$

根据一阶条件，

$$MR(q_1+q_2)=MC_1(q_1)=MC_2(q_2)$$

得到：

$$\begin{cases}136-8(q_1+q_2)=2q_1\\136-8(q_1+q_2)=12q_2\end{cases}$$

解出：

$$\begin{cases}q_1^*=12\\q_2^*=2\end{cases}$$

再根据反需求函数求出价格：

$$p=136-4(2+12)=136-42=80$$

所以：

$$\pi_1=pq_1=80\times12=960$$

$$\pi_2=pq_2=80\times2=160$$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Association of Natural Rubber Pioducing Countries）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是亚洲一些天然橡胶生产国于1970年2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建立的政府间机构，其成员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泰国。这些国家的天然橡胶生产和出口总量均占世界总量的90%以上，但长期以来天然橡胶的市场价格一直为作为主要消费国的发达国家所操纵，使这些生产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因此，该协会明确规定它的宗旨是协调天然橡胶的产销，促进技术合作，实现公平而稳定的价格。代表大会为该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各项政策，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负责执行有关政策和开展日常工作。协会成立后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同发达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减产、限制销售、建立缓冲存货等。1979年10月与消费国签订的"国际天然橡胶协定"对于稳定天然橡胶的国际市场价格，维护生产国的利益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该协会还经常就天然橡胶有关技术和统计问题举办讲习班和会议，以促进成员国间的技术合作。该协会的总部设在吉隆坡。

专门贸易（Special Trade） 专门贸易由专门进口和专门出口组成，它是一切进出入关境的商品的总和。专门进口包括直接从国外进入关境的进口商品以及从海关仓库提出进入关境的商品。确切地说，专门进口是指办理了海关进口手续的商品。专门出口是指办理了海关出口手续的商品，它包括本国生产的出口商品以及非本国生产，但已办理进口手续，未经任何改制又输出国外的复出口商品。

世界各国在统计各自的对外贸易额时，有的按总贸易体系来统计，如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有的则按专门贸易体系来统计，如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等。由于总贸易和专门贸易的统计口径很不一样，得出的结果必然会有很大的差异，缺乏可比性，因此，联合国发表的各国对外贸易额资料，往往都注明是按哪一种贸易体系统计编制的。一般来说，用总贸易体系统计的本国对外贸易额，总会大于按专门贸易体系统计的本国对外贸易额，这两个数字说明的是不同的问题。总贸易侧重于说明一国在国际商品流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而专门贸易则侧重于说明一国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的意义。

专业经纪人（Specialist） 即在交易所内固定地专门从事特定种类的证券交易人。他们既接受佣金经纪人或交易商的再委托买卖证券，也为自己买卖证券，因而具有经纪人和交易商的两重身份；其作用也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1）作为经纪人，协助其他佣金经纪人执行客户的委托；（2）作为交易商，他们固定地从事某一些股票的交易，通过低价买进和高价卖出来为自己所负责的股票“造成市场”。

专利持有公司（Patent Holding Company） 外国基地公司的一种形式，它的建立旨在利用避税地国家对有关特许权使用费等收入的减免税优惠避免高税管辖权下的纳税义务。它的业务活动涉及专利、商标、版权及其它工业产权的获得、利用、发放许可等方面，处于高税管辖权国家的制造商，通过将特许权使用费转入其设在避税地的专利持有公司可以免交或只缴很少的税收，然后又利用双边税收协定，在这部分收入免交预提税之后流回母公司或相互特许公司。

专利权（Patents） 发明人对其成果享有独占和经营获利的权利。为了鼓励发明者，并保护其合法权益，政府与一个发明者订立契约，订明为了酬报他完全公开他的发明，政府给他自给予之日算起为期17年的使用这项发明的专有的权利。在这时期终了时，专利权结束，并变成任何人都可使用的公共财产。1623年，英国首先制订了专利权法，在该国，对贡献给王国的发明或新的手艺的专利权限制在14年内。美国的第一专利权法是1790年4月10日成为法律的，而现行的法律是1836年7月4日颁布的。人类自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有了发明，但专利权的出现却是近代的事情。授予专利权是为了鼓励发明家将他的发明公之于众，从而促进科学和有用技术的进步。专利权的享有者是专有技术的发明人，虽然没有专利权，发明家也可以创造和发明，但是发明家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会损害发明家创造发明的积极性。如果这样，世界技术进步将放慢，当然专利权不仅仅指技术专利权，其内涵极为丰富。为了使世界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使经济和社会走入秩序之中，专利权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

专业化率（Specialization Ratio） 是衡量企业经营多角化程度的一种指标。它定义为企业中从事主要产品生产的职工人数与企业职工总数之比。对于经营多角化程度最低的专业化企业，该指标取值为1，对于把经营活动均等地分散于所有K个产业的完全多角化企业，该指标取值为$\frac{1}{K}$。

见单付款（Sight Payment） 见单付款是一种后付货款的方法，又可以称为先出后结。它是指出口商在发运货物以后，将有关的货运单据寄交进口商，而进口商收到货运单据后，则依照合同的规定将货款付给出口商。见单付款下的结算方式是汇款方式。进口商在汇付货款时，可以在电汇、信汇和票汇中进行选择，或双方在合同中具体订明汇款方式。

见单付款的方式与预付货款方式的情况相反，这种方式对进口商最为有利，而对出口商则面临较大风险，因为出口商在收到货款之前就已经发出货物并提交单据，进口商如拒不付款或拖延付款，则会对出口商造成损失。因此，除非出口商绝对信任进口商，而一般情况下则较少使用见单付款方式。

互惠待遇（Reciprocal Treatment） 互惠待遇是缔约国在签订贸易条约或协定时所依据的一项法律原则，它是指缔约国双方相互给予对方国民在贸易、运输等方面对等的待遇或权利。对等性和双边性是互惠待遇的特点，其他国家无法享受这种优惠待遇，因此互惠待遇是一种差别待遇。

互惠待遇与最惠国待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最惠国待遇是一种无差别待遇，而互惠待遇是差别待遇，这是最主要的差别。但是在实践中，缔约国双方给予的互惠待遇，由于它们与其他国家普遍签有含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贸易协定和条约而被其他国家所享受。因此，互惠待遇逐渐失去了它的原有特点而成为一种实质上的无差别待遇。由于互惠待遇多用于双边贸易条约和协定中，而最惠国待遇多用于多边贸易条约和协定中，加上互惠待遇必须规定具体内容而最惠国待遇通常不规定具体内容，这就意味着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会受到互惠待遇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惠待遇是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有时候互惠待遇仅仅适

用于这样一些双边贸易条约和协定，在这里，缔约国双方给予对方一种特定的权利，它具有双边性，而与最惠国待遇无关，不过这种情况目前已较少见。

互补品（Complementary Goods） 相关程度达到当一种商品的消费发生变化时，另一种商品的消费将会伴随发生类似变化的那些产品和商品。作为互补品，它必定补充了第一种产品（称之为主动品），也就是说为了满足相同的具体需求，互补品和主动品必须连在一块消费。如茶杯和茶托，汽车和汽油等。

可用汽车和汽油的互补关系来具体说明互补品。如果汽车的价格下降，对汽车的购买和消费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预期会增加；而汽车消费的增加，又必定引起对汽油需求的增加。这种互补关系的程度可用交叉弹性系数来衡量。在这个例子中，交叉弹性系数表明汽油购买量的变化与汽车价格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个系数的公式如下：

$$交叉弹性=\frac{Q_2的变化率(\%)}{P_1的变化率(\%)}=\frac{\triangle Q_2/Q_2}{\triangle P_1/P_1}$$

$$=\triangle Q_2/\triangle P_1\cdot P_1/Q_2$$

式中 Q_2 是互补品的数量，P_1 是主动品 1 的价格。互补品需求的交叉弹性为负，因为主动品的价格与互补品的数量变化呈反方向。

互助基金（Mutual Funds） 互助基金是一种股份不定的投资公司。这表明投资者若想拥有该公司的股份就直接向该公司购买，而不想持有该公司股份的股东可以直从公司收回自己的股份。由于这类公司可以不断地出售与偿付股票，因此其资产经常变动。当新的投资者购买股份时，公司的资产就增加，当投资者抽走股份时，其资产就减少。这与股份固定的公司不同，这种股份公司并不经常出售与偿付股票。当持股者不再想持有股份固定公司的股份时，他们不能抽回股份，而只能象其他公司的股票交易那样在股票市场出售。互助基金每股资产净值是总资产与负债之差除以股份数额。互助基金在出售其股票时要加上经销费或佣金。这些费用大都落入销售者手中。一小部分互助基金在持股者抽走股份时也收取少量费用。互助基金目标广泛。某些基金为股票持有者提供全部资产组合的选择；大部分基金用于增长、收入或高风险投资；还有一些基金用于债券、期权、货币市场、外国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有些用于能源、原材料、新技术等特定领域。

中美洲共同市场（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 中美洲共同市场是地处中美洲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等五个发展中国家于 1962 年 8 月建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总部设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该组织的宗旨是取消成员国间主要制成品的关税壁垒，成立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对本组织以外的进口产品实行统一关税，组成关税同盟；统一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并力求协调成员国的工农业发展政策。该组织成立以后，在发展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方面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促进了各国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但由于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各成员国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甚至发展成军事冲突，因此从 70 年代初以来，该组织的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中美洲经济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各国经济部长组成，此外，还有执行委员会、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经济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三方委员会、常设秘书处、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等机构。

中非国家关税及经济同盟（Customs And Economic Union Of Central Africa） 中非关税及经济同盟是中部非洲国家建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它于 1966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目前共有喀麦隆、中非、刚果、乍得、加蓬和赤道几内亚等 6 个成员国，总部设在中非首都班吉。它的宗旨通过取消贸易限制、建立关税同盟来促进本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国家首脑理事会为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执行委员会是常设审议机构，总秘书处主持日常工作。另外，还设立了中部非洲国家银行作为该组织的专门金融机构。该组织成立以来，已逐步建立起了关税同盟并在各成员国实行统一的投资法、单一税则和统一的所得税，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于 1983 年 10 月，它共有 10 个成员国，除了中非经济共同体的 6 个成员国之外，还包括布隆迪、卢旺达、扎伊尔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 4 国，总部设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它的宗旨是促进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进行协调和合作，向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每年一次的成员国首脑会议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还有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的部长理事会以及下设的总秘书处，咨询委员会及法庭等。该组织成立以来不断削减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逐步实现成员国之间商品、劳务、人员、资本等的自由流动；制订实施共同的投资法；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加强农业生产领域的合作，不断提高粮食自给率；对经济最落后的成员国提供一定的援助；等等。总之，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于推动中部非洲

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性包装（Neutral Packing）　中性包装是指不标明商品原产地名称、生产国家名称以及生产厂家名称的商品包装。中性包装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商品包装上不仅不标明生产国家、生产厂家等名称，也不标明商标牌号，称为无牌中性包装；另一种方式则是不注明生产国家、生产厂家名称，但注明商品的商标牌号，这一商标牌号可由买方指定，称为定牌中性包装。中性包装是增加商品外销能力的手段，特别在现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候，中性包装有助于打破限制进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中介贸易（Intermediate Trade）　中介贸易又叫中间贸易，它是指促成进出口双方达成交易而从事中间联络活动的一种贸易。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进出口双方可能由于彼此不太了解而难以达成具体的协议，这就需要有一个对双方都比较了解的第三国中间人从中撮合，以促使交易的成功。对于第三国的中间人来说，它没有同进出口双方发生买卖关系，商品也并不经过该国领土，它仅仅在商品交易中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交易达成以后，它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因此对它来说这是一种中介贸易。

中枢效应假说（Pivot Effect Hypothesis）　一种关于收入政策具有改变菲利浦斯曲线斜率的作用的理论。菲利浦斯曲线的斜率反映了货币工资变动率或通货膨胀率对失业率变动的反应程度，即失业率变动所引起的货币工资变动率或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如附图所示。在附图 a、b 中，横轴 ou 都为失业率，纵轴 o，gp 都为通货膨胀率（或货币工资增长率），PC_a，PC_b 为两条斜率不同的菲利浦斯曲线，PC_a 的斜率小，即 PC_a 较为平坦，PC_b 的斜率大，即 PC_b 较为陡峭。附图 a，b 中，失业率都从 U_1 上升到 U_2，但在附图 a 中，通货膨胀率反从 gP_2 下降到 gP_1，而在附图 b 中，通货膨胀率从 gP_2 下降到 gP_1。比较附图 a，b 就可以看出，当菲利浦斯曲线斜率小时，失业率变动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率小，而当菲利浦斯曲线斜率大时，失业率变动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率变动也大。中枢效应假说就是指收入政策使菲利浦斯曲线的斜率变小（即菲利浦斯曲线以与横轴的交点为中心向左下方旋转），从这样，就可以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为代价来换取一定的失业率下降。这是因为，收入政策控制了货币工资增长率，从而货币工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对失业率下降所作出的反应就比没有收入政策时要小。中枢效应假说和移动效应假说都说明了收入政策对菲利浦斯曲线的影响。当采用收入政策时，这两种效应都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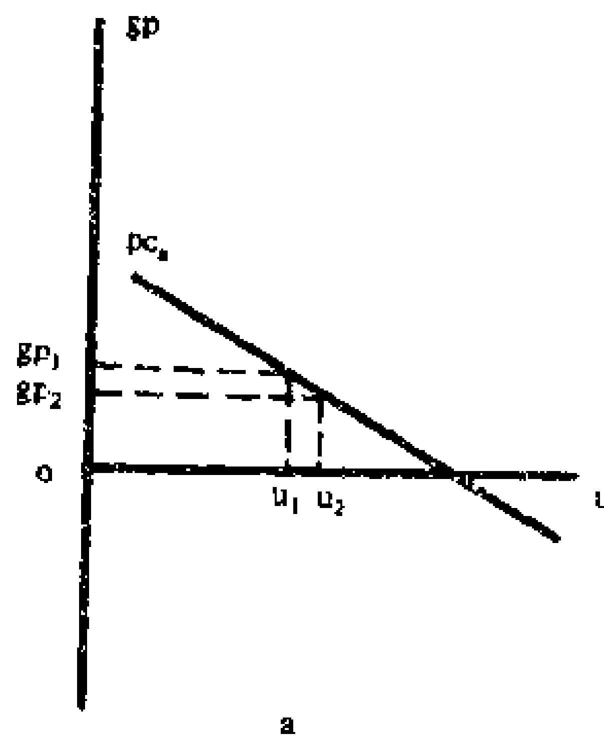


图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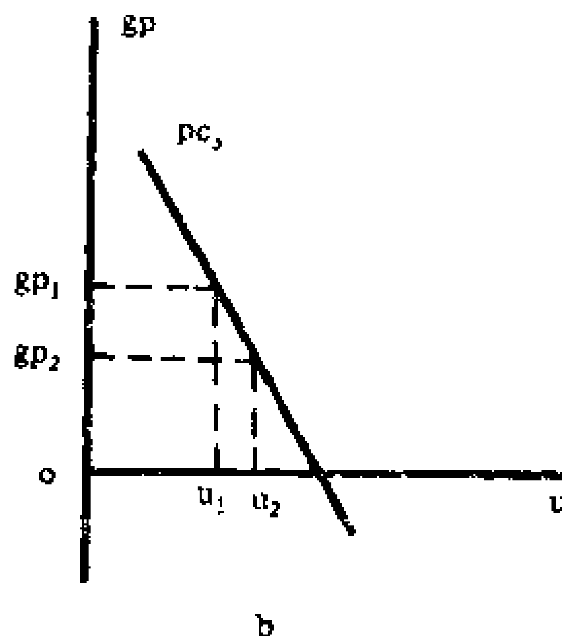


图 b

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一国金融制度的中心，是领导全国金融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最高金融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第一、统一发行货币。第二、代理国库，即办理政府收支，并为政府提供短期垫款。第三、保管各银行的准备金。第四、保管全国的黄金与外汇。第五、为各银行提供融通资金。第六、通过控制全国的信用，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第七、监督全国的银行业务。第八、办理全国的银行清算。中央银行一般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不经营普通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不以私人为经营对象。第二、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三、对存款不支付利息。第四、经营上的独立性，即不受政府干预。第五、资产具有较大的流动

性。中央银行调节全国信用的主要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政策和准备率政策；次要手段是证券信用的控制，消费信贷的控制、不动产信用的控制、进口信用的控制、企业信用的控制，以及道义上的劝说和银行放款的直接限制。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是1691年成立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以后各国都陆续建立了中央银行。在现代经济中，中央银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性税制（Neutral Taxation） 中性税制是指这样一种税制，这种税制下征税的对象的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这种税收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它既不影响资源在被征税对象间的配置，也不影响资源在未被征税对象中的配置。一般来说符合中性税收的税种很少。地租税、增值税是一种接近于中性的税。以地租税而言，由于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对其征税不会影响土地供给的变化。增值税由于是对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征收一笔统一的税，因此对生产要素的供给不会发生影响。因此，增值税属于中性税。

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Products） 参加其他产品生产过程的产品。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货物和材料要经过不同的生产阶段，常常需要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或由一家企业出售给另一家企业。例如，在汽车生产过程中，有很多中间产品。熔炉里炼成的钢锭，要先在轧钢厂轧成钢板，在压模厂压成汽车底盘，然后才能在装配厂把它安装进一辆汽车。在上述情况下，钢锭、钢板和汽车都是中间产品，虽然对于某工厂或企业来说可以是最终货物。一般情况下，一个成熟的经济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生产中间产品是正常的，原因是生产链的延长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原则上，中间产品的价值不能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但有些中间产品也可能是最终产品，如煤炭中用于居民住宅取暖的部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列为中间产品的，只是这样一些产品，它们被别的企业所购买，而且其费用成为某一会计时期的现期成本。也就是说，资本性产品之所以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是因为在资本性产品在迂回的生产过程中构成主要生产要素，而其价值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损耗的，也就是经过折旧这种形式将其价值转移到其加工生产的产品中去的。中间产品却不然，它只是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其价值不是逐渐而是一次性地转移到其后的产品中去的。

中心—外围理论（Center—Periphery Theory） 普雷维什在1950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首次提出的表述国际经济关系的学说。这一理论，指出了国际经济运行中发达的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平等的经济地位，推导出了改变不平等状况的有关政策建议，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之一。

普雷维什考察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描述成为一个“经济星座”。其中心是工业国，工业国多患于其中心的地位和早期技术进步，组成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外围是广大参差不同的生产和出口原料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以本国自然资源的功能与中心发生联系，从而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之中。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因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各个国家技术进步的发展程度不一样，从而在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产生了差异。一些国家技术发展快，劳动生产率高，善于进行创新，以制造品的生产为主，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另一些国家技术发展慢，劳动生产率低，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而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外围”。中心是技术创新者，经济利益获得者和发展的动力；外围则是中心的附庸、原料提供者和技术模仿者。就每个外围国家而言，它和中心联系的方式和程度，主要取决于它的资源和动员资源的经济及政治能力。在外围国家中，技术进步的渗透和推广总是太慢，以致不能吸收全部劳动力进入生产，从而技术进步及其成果集中在面向出口的经济活动，成为其中大部分人口依旧处于发展边缘的非同质社会结构的特点。所以，现有的国际经济关系事实上起着加强中心吸入外围收入的作用。普雷维什还进一步指出，技术进步开始于中心，其成果也基本上留在那里，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利润和工资的提高，并没有以提高生产率和全面降低物价的方式向外围扩散。外围的作用主要限于提供初级产品，初级产品生产率的提高虽然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都是价格的下降。这就使中心和外围之间产生了收入增长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又由于初级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低而日益扩大。所以，在中心，收入的增长刺激了需求和不断的技术革新，并大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而外围的工业化却被大大推迟了，而且是在中心继续不断的危机中进行的。这就加强了外围模仿中心的趋势，照中心的样子亦步亦趋，力图采纳它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追随它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并复制它们的体制。所有这一切都渗透到外围的社会结构之中，使其大大落后于中心的最先进的结构，并引起极为重要的变化和矛盾，扩大着经济、社会、政治上极大的不平等。

普雷维什针对改变外围国家经济地位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他认为，外向发展模式不能使外围国家充分发展。他所提出的发展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

克服先前模式局限性的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目的是工业化，其中心点是把资源配置在满足国内消费的工业生产方面，即是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从中心国进口机械设备随之增加，贸易收支恶化的压力随之加强。为了加强外围国的支付能力，还必须进一步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的出口。这就要求中心国开放市场，取消对外围国家的贸易保护。为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提出，挽救外围国家需要工业化。但是外围国家工业化不是其自身所能解决的。它要求在中心国家取消贸易保护的同时，加强外围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心—外围的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描述国际经济关系格局。普雷维什的理论不仅是拉丁美洲的区域性发展战略，而且对于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摆脱那种支配和依附的不平等关系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央储备城市　(Central Reserve Cities)　指美国的占了全国最大量银行活动的两个最大的城市，纽约和芝加哥。这两个地区所持有的储备基金一般高于联邦储备系统的任何其他城市的储备基金。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把某些城市列为或重新列为中央储备城市的权力已于1962年7月28日停止生效。

中间组织（Medium organization）　见"企业准集中"条。

水力资源（Water Resources）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统称。属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水力资源存在于海洋、冰川、湖泊、土壤、大气以及地表与地下河川中。水力资源有五个特征：(1) 动态性。水处于不断循环流动的运动状态。(2) 有限性。全球水量是一定的，在特定地质时期内不会增加或减少。(3) 不平衡性。不同地区及不同时间水资源分布是不同的，有些地区水力资源丰富，而有的地区则水资源贫乏。(4) 联系性。水资源通过循环流动，将自然界的各种水体联结起来，并且同其他资源联系起来。(5) 不可替代性。水的物理特征和人类利用的大量性决定了水的替代范围和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水力资源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合理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水力资源的利用类型和方式有：农业用水，如养殖、灌溉、冲洗等；工业用水，如冷却、清洗等；能源用水，如发电；生活用水，如饮用、食品加工等。开发利用水力资源的主要措施有三类：(1) 科学类，包括对水力资源进行普查、勘测、替划、扩大淡水水源、减少污染等。(2) 经济类。包括兴建各种用水节水工程、建立健全用水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3) 社会类。包括制订和实施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观念更新等。

水渍险（With Particular Average，简称 WPA）水渍险所承保的责任范围是平安险的承保责任范围再加上单独海损。其内容包括：

(1) 平安险所承保的责任范围；

(2) 被保险货物由于恶劣气候、雷电、海啸、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部分损失。

"水渍险"一词是我国保险业的习惯译法，它的英文原义为"包括单独海损责任"。保险人根据行业惯例，对于水渍险所承担的保险责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订有免赔率的水渍险条款，另一类是没有订有免赔率的水渍险条款，这一免赔率是针对单独海损而言的，如果单独海损的损失没有达到免赔率所规定的百分比，保险人则对这一损失不负赔偿责任；相反，如果损失达到了免赔率条款所规定的百分比，保险人则对单独海损的全部部分损失予以赔偿。

水渍险由于其承保责任范围大于平安险，其保险费率也较平安险保险费率为高。

水平贸易（Horizontal Trade）　水平贸易是指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开展水平贸易的国家之间，无论是在生产技术水平上还是在生活水平上都比较接近，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进出口商品的相互适应性比较好，进出口商品结构基本相同，这就使得它们之间的贸易比较平等合理，贸易规模也就比较大。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属于水平贸易。

水平合并（Horizontal Amalgation）　指在同一市场上提供同种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间的合并。

从量税（Specific Duties）　从量税是指以进出口商品的重量、数量、体积、长度和面积等计量单位为标准计征的关税。从量税的计征方法比较简单，只是在以重量单位为计征标准时有些复杂。目前，各国计算商品重量的标准主要有三种，即毛重、净重和法定重量。从量税与商品价格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商品价格的涨落却对从量税保护作用的大小产生直接的影响，两者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在从量税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商品价格上涨，关税负担相对减轻，从量税所起的保护作用就会下降。反之，如果商品价格下跌，关税负担相对增加，从量税所起的保护作用就会提高。两次大战以前，各国普遍采用从量税

方法计征关税，主要是因为此法简便宜行。而两战以后，各国逐步改征从价税，其原因是战后商品价格不断提高，从量税所起的保护作用不断下降，而各国普遍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为了有效地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不得不改征从价税。

从价税（Ad Valorem Duties） 从价税是指按照进出口商品价格的一定百分比计征的关税。按从价税计征的关税税额与进出口商品价格成正比，也就是说，进出口商品价格越高，关税税额越大，反之则越小。物价的上涨或下跌将直接影响到税额的大小，从而影响到关税保护作用的大小。计征从价税的关键问题是要确定进出口商品的完税价格，这也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所谓完税价格是指由海关审定的作为计征关税依据的商品价格，它直接关系到关税税额的大小。事实上，不少国家常常利用高估货价变相抬高进出口税率，更好地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限制进口。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以到岸价格（CIF）作为完税价格，也有一部分国家以离岸价格（FOB）作为完税价格。即使如此，在征收从价税时，高估货价的事情时有发生，为此，在关贸总协定（GATT）主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制订了"海关估价法规"，规定了依次使用的五种海关估价依据。

升值（Appreciation） "贬值"的对称，(1) 国外汇市场上外汇供求变化造成的本国货币对外价值，即汇率的提高；(2) 一国货币对外价值增加。包括由政府货币当局决定的法定升值及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造成的升值。

升水（Premium） "贴水"的对称。外汇市场上某种货币的远期价值高于即期价值。在计算远期汇率时：(1) 若即期汇率采取直接标价，则远期汇率＝即期汇率+升水；(2) 若即期汇率采取间接标价，则远期汇率＝即期汇率−升水；(3) 若外汇银行所标出的远期差额并没有说明是升水还是贴水，则当远期差额形如低／高，即线前点数低于线后点数，远期汇率＝即期汇率+远期差额，说明基础货币升水；当远期差额形如高／低，即线前点数高于线后的点数，远期汇率＝即期汇率−远期差额，说明标价货币升水。例如，在纽约外汇市场上：即期汇率 1 英镑＝1.4230／40 美元

一月期外汇 10／20(即 0.001／0.002)

一月期英镑的汇率为（1.4230+0.001）／(1.4240+0.002) 即 1 英镑＝1.4240／60 美元。参看"远期汇率"及"贴水""远期差额"。

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 乌拉圭回合是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第八轮也是最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1986 年 9 月，关贸总协定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召开了部长级会议，会上通过了"乌拉圭回合部长宣言"，宣布开始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故得名。参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105 个，我国虽然还未恢复在该组织的合法地位，但也正式参加了这一轮谈判。

乌拉圭回合的主要目标是完善和扩大关贸总协定的贸易规则，把更大范围的世界贸易置于总协定的法律约束之下，进一步减少和消除关税、数量限制和其他非关税措施，在实现世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世界贸易的发展和扩大。"乌拉圭回合部长宣言"还为该轮谈判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有谈判的透明性、统一性、让步的对等性、承诺和实施的一致性、给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待遇等。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涉及的议题十分复杂，一共有 15 项，这些议题可以分为四类，即：(1) 有关"进入市场"的议题，它包括农产品、纺织品、热带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等议题，这些议题最终归结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谈判；(2) 新领域议题，它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3) 有关贸易竞争规则的议题，即保障条款、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总协定有关条款的谈判议题；(4) 有关多边贸易体制和程序的议题，即争端解决程序和总协定体制的改进等。谈判议题的广泛性是乌拉圭回合的一大特点，它意味着关贸总协定开始全面处理国际贸易问题。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在国际经济联系不断密切、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开始的，它的成功与否将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各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存在着种种矛盾，但由于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在矛盾与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前 7 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已使得各国的关税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它的保护作用已大大下降，因此这轮谈判的主要任务将是不断削减非关税壁垒。乌拉圭回合大多数议题的谈判由于各方的观点比较一致因而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某些议题的谈判充满了尖锐的矛盾，这些议题主要有农产品、纺织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以及保障条款等。农产品问题上的矛盾双方主要是美国和欧共体国家，纺织品、知识产权、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上的矛盾双方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保障条款问题上则是成员国之间各持己见。由于发达国家在关贸总协定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通过各种措施迫使发展中国家在上述可能

对本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议题的谈判中作出让步，使得这些议题的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或者保持了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原状，因此，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最困难议题实际上是农产品贸易问题，具体地说，是取消农产品补贴问题。

乌拉圭回合原定1990年12月结束，因此，关贸总协定于1990年12月3日组织召开了部长级会议，会议将就全部15项议题进行最后谈判，以便通过一项内容广泛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的协议。但是，这次会议于12月7日中断，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在取消农产品补贴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美国主张在从1991年起的10年里削减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补贴75%，出口补贴90%，这一主张得到了由中、小农产品出口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凯恩斯集团的支持，而欧共体12国则主张以1986年为基准，到1996年实现农业整体补贴下降60%的目标。由于未能就削减农产品补贴取得一致意见，使得乌拉圭回合不得不延期，但发达国家又不愿这种状况长期维持下去，以免损害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就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协商，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991年1月25日到26日，欧共体和支持美国立场的拉美国家代表在乌拉圭开会，试图缩短双方在农产品问题上的立场的距离，为恢复乌拉圭回合谈判作努力。1991年2月26日，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终于在日内瓦恢复，主要原因是有关各方就农产品问题谈判的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此后，又经过多次协商和谈判，1991年12月终于达成全面妥协方案，乌拉圭回合正式宣布结束。

比较成本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Cost）

又称为比较利益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较成本理论是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由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最早提出。

李嘉图提出比较利益思想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产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工场手工业在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英国成为世界工业的中心，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比较利益理论的提出也是符合了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巨大变化，从理论上加以阐明。

另一方面，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看对于国际贸易的最基本问题，如为什么会出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国际间商品流动的方向由什么因素决定等等，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济学家讨论的重点均在于不同商品的生产成本在不同国家间的绝对差异，由于注重于商品在成本上的绝对差异，则无法解释当一国生产商品的成本均绝对地低于它国，或一国生产商品的成本均绝对地高于它国，即商品的生产处于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的国家如何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问题，而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学说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建立了新的国际分工原则。

比较成本理论的建立，是以下述假定为前提的，但李嘉图本人在其著作中并未明确指出。

（1）劳动为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2）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使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生产两种商品；

（3）各国的劳动是同质的，各国总劳动成本和劳动的供给价格，均与其劳动时间成比例；

（4）国际贸易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商品价格即为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

（5）生产要素在一国内部具有完全流动性，而在国际市场上完全不具流动性；

（6）国际分工实行完全专业化。

在这些暗含的假定的前提下，李嘉图以英国和葡萄牙为例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比较利益原则。同时，这一例子还为后世一直沿用，如下表所示：

生产定量商品所耗费劳动量表　（人／年）

国家	毛呢（一单位）	酒（一单位）
葡萄牙	90人／年	80人／年
英国	100人／年	120人／年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毛呢和酒的生产上，单位产品生产，英国都要比葡萄牙耗费更多的劳动，英国处于劣势，而葡萄牙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虽然葡萄牙在毛呢和酒的生产中所需的劳动成本都低于英国，但是葡萄牙制酒的成本要比英国低33%，而制造毛呢的成本比英国低10%，故而葡萄牙在制酒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较毛呢业更大，葡萄牙应当专门发展制酒业；相反，英国在毛呢和酒的生产中所需的劳动成本比葡萄牙都高，但是，两行业相比较，制造毛呢的生产成本却相对较低，故而英国在毛呢业方面的比较劣势较小，英国应当专门发展制呢业。这样，英国和葡萄牙实行完全的专业化分工。分工前和分工后情况如下表：

分工前所需劳动日　（人／年）

国家	毛呢(1单位)	酒(1单位)	总计
葡萄牙	90人／年	80人／年	170人／年
英国	100人／年	120人／年	220人／年
总计	190人／年	200人／年	390人／年

分工后所需劳动日（人／年）

国家	毛呢(2单位)	酒(2单位)	总计
葡萄牙	—	160人／年	160人／年
英国	200人／年	—	200人／年
总计	200人／年	160人／年	360人／年

两个表相比较，无论分工前和分工后，世界总的产出水平不变，均是2单位毛呢和2单位酒。各国总的消费水平也不变，均是一单位毛呢一单位酒。但是，在实行专业化分工以前，为了生产单位毛呢和单位酒，英国每年需要220人的劳动，葡萄牙需要170人的劳动，保持世界总产出水平共需要390人全年的劳动；在实行自由贸易，完全的专业化分工之后，英国专门生产毛呢，而葡萄牙专门生产酒，所需的劳动量却大大减少。这时，英国在消费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只需要200人的全年劳动，葡萄牙则只要160人全年的劳动，总计起来，保持世界总的产出水平所需的劳动则从390人降到了360人。通过专业化的分工。英国从中节约了20人／年的劳动，葡萄牙从中节约了10人／年的劳动，整个社会则从中节约了30人／年的劳动。被节约出来的劳动可以从事生产其它产品，即使生产成本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从自由贸易中得到了利益，各个国家的财富和世界总财富都扩大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比较利益理论的结论：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应当参加国际分工，通过完全的自由贸易，专业生产并出口那些单位总成本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商品，进口其单位总成本处于比较劣势地位的商品，则各国均可以自由贸易中获得国际分工的利益。

比较成本理论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的分析和结论是在许多前提条件下进行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与现实中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状况并不适应，其中例如：国际贸易领域并非是处于完全的自由竞争状态，各个国家政府都对本国的对外贸易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关税和非关税约束；国际分工在现实各国中也并非实行完全的专业化，许多产品在一国内进行生产，同时也大量进口；在现实中，生产要素在国内并非完全流动，而在国际上并非完全不流动；等等；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比较利益理论也进行许多重大修改，其中例如：放弃劳动价值论，生产成本的内容不再是单一的劳动，而是包括所有生产要素的总支出；放弃生产要素在国内流动、国际不流动的假定，等等；在进行了许多重大修改之后，比较利益理论的结论可以阐述为：各国都应当参加国际分工，在固定比率和工资率的前提下，通过自由贸易，每一国家生产并出口其单位总成本处于比较有利地位的商品，进口其单位总成本处于比较不利地位的商品，各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其获利大小，视此国家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强度和外国对此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强度而定；如本国需求强度大于外国的需求强度，则本国来自贸易的利益较小，反之，则本国来自贸易的利益则较大。

比较静态学（Comparative Statics） 指的是将不同状态的均衡加以比较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

在某种产品市场的静态模型中，某一时点上的供给与需求决定了此时的均衡价格，其中影响供给量的变量有生产成本、生产技术等等，影响需求量的变量有收入水平、消费倾向以及偏好等等。假设偏好发生了改变，消费者开始转向另一种产品，这时，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量就要下降，这种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下降，这必然使厂商调整生产、减少这种产品的产量，即供给量也下降了。当减少后的供给量与减少后的需求量又相等了的时候，新的均衡出现了，这时的价格便是新的均衡价格。将新的均衡与初始均衡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消费者的偏好对于价格与产量所造成的影响。同样，模型中任何一种变量的改变都会引起均衡状态的改变，将两种均衡状态进行比较，就可以分析出这一变量所起的作用。可见，比较静态学研究的是模型内部的变量在均衡状态改变中所起的作用，它只考虑变化的结果，即不同的均衡所处的位置，它不关心经济在不同均衡状态之间进行移动时的具体过程，也不关心这一移动所产生的时滞，它对初始均衡的形成也不作分析，因此，比较静态学的方法不能处理动态问题。

比较静态学的历史比较久远，早在1752年，休谟就用它来分析一国黄金存量的变动。后来一直被经济学家所广泛使用。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比较静态学可以用来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在给定的不同静态条件下，可以得到不同的国民收入水平。30年代末，希克斯首先创造了比较静态分析的新古典方法，后来，萨缪尔森又用微分方法来研究静态模型中变量的微小变化对均衡所产生的影响。50年代，人们开始转向研究均衡的存在性，阿罗与德布罗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从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使用大型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政策变化对各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首先模拟某个国家历史上的某个经济状态，然后让其中的一些变量变动，就可以计算出新的均衡状态。将两个均衡状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象税收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这类模型还可以将固定价格，政府干预以及某些简单的动态现象考虑在内。

孔塔多拉集团（Contadora Group） 孔塔多拉

集团是中美洲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墨西哥等4国于1983年1月在巴拿马的孔塔多拉岛建立的区域性组织。它的宗旨是消除加剧中美洲冲突的外部因素，力求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缓和中美洲地区的紧张局势。该组织成立以来，在缓和本地区的紧张局势、解决本地区的矛盾和冲突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Weber's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968~1958）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经济学家，他是工业区位论的奠基人，古典区位论的集大成者。韦伯的区位理论著作有二部，其一是《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于1909年发表；其二是《工业区位论——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该书一直未发表。前本书是纯理论的研究，后者则为结合实际的研究，包括对德国1861年以来工业区位分析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工业分布的综合分析。韦伯区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所有区位因素的合理组合，以使企业成本和运费最低，将工厂设置在生产和流通费用最经济的地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1、基本假定。韦伯认为寻找工业区位移动的规律，判明各个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及其作用的大小，是一种纯粹理论的探讨，为了理论演绎的需要，他作了以下假定：(1)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特定的地区或国家，只讨论工业区位的经济因素，而假定该国家或地区的实际因素如气候、地质、政治制度和技术发展水平是相同的或者说不起作用。影响工业区位的经济因素，就是影响工业生产活动在甲处进行而不在乙处进行的区位因素。(2)工业原料、燃料的产地为已知点，生产条件和埋藏状况不变，消费地为已知点，需求量不变，劳动供给点为已知点，供给情况不变，工资也是固定的。(3)生产和交易均就同一品种进行讨论。(4)运输费用是重量和距离的函数，即运输费同里程及载运吨位成正比关系，运输方式为火车。

2.工业区位因素的概念和体系。为了讨论工业区位的决定，韦伯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构成其区位理论的分析指标。它包括从自然到社会的各类工业区位形成的条件。其核心问题是属于经济性质的，即它们的主要目的是造成工业生产和运输费用的节约。由于区位因素的差异，不同地点的投资，其收益会有差异。在地域上对这些地点进行选优，就是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目的。

(1) 区位因素的分类。韦伯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区位因素有不同的类别；按区位因素的性质可分为一般区位因素和特殊区位因素，一般区位因素是对一般工业区位都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劳动力费用、运输费用、地租等。有了一般因素，才能建立工业区位的普遍性规律，所以这种因素是研究的重点。特殊区位因素是对特定工业区位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对水质，空气湿度、易腐原料的保存等要求，这是区位论中次要的因素。按照区位因素的作用方式来分又有区域因素和位置因素这二类。使工业生产活动固定于某一地点的因素，就是区域因素，如因运费而使工厂的原始分布趋向于某特定地方。一旦工业生产固定于某些特定地点后，又会产生一些伴生的区位因素，使工业趋于集中或分散，前者如协作，或成组布局，动力集中使用等因素；后者如地价上涨和环境污染等因素。这些伴生因素就是位置因素，按照区位因素的内容构成又可以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由于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资源的特殊性，使工厂取得效益的区位因素就是自然因素，由于社会经济形态和一定文化水平而使工厂取得效益的因素就是社会因素。韦伯在分析中主要考虑的是自然因素。(2) 作为区位因素组成项目的原料分类，韦伯特别重视运输费用的影响，因而对影响运输费用的原料进行了认真的分类。按照地理分布的条件来分，可有"遍布性原料"和"地方性原料"这二类。前者是指不论生产过程在何处进行，都能就地取得的原料，如大气、水、粘土和谷物等。后者是指只能产生于少数固定场所的原料，如煤、矿石等。按照生产过程的转化又可以分为"纯原料"和"粗原料"二类。前者是指在转化为最终产品后，重量基本上没有减轻，全部转移到成品之上的原料，如棉纱织布。后者则是指原料又把自己重量的一部分转移到成品之上，其余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损失掉，或者是在全部生产过程中丧失自己重量的原料。在这样的分类基础上，韦伯提出了"原料指数"的概念，用来作为分析工业区位决定因素的一个尺度。(3) 区位因素体系，韦伯主要研究的是一般区位因素，它主要包括运费、劳动力费用以及集中因素和分散因素。前二项因素属于区域因素，可以按照这种因素来确定工业区位的决定原则，而集中因素和分散因素只有在按上述因素形成工业区位基本格局以后，才能对工业区位的再决定产生影响。韦伯认为，区位确定后，通过生产和流通、产品可以取得销售价格，其中包括：a、利润；b、固定资本的折旧费；c、流动资金的支出、工资、原燃料的购入费、以及管理费、租税、保险金等一般费用、d、原燃料和成品的运费。其中可以构成区位因素的主要是以下各项：a、土地费；b、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购置费用：c、原料、燃料购入费；d、劳动费；e、运输费用；f、利率；g、固定资本折旧费。

在以上7个项目构成中，只有c、d、e项的因素

才能构成区域因素。由于原料、燃料的价格地域差异可以合并到运费差异中去，因而区域因素也就剩下运费和劳动费用。如果再加上集中因素和分散因素对工业区决定的调整，这就形成了三个区位因素构成的分析、计算体系。

3、工业区位的确定程序和原则。韦伯根据上面确定的区位因素指标体系，认为一个合理工业区位的决定可以按照以下三个步骤和原则进行：（1）根据运输指向，即运输决定的区位趋向来决定工厂的运费最优点。（2）根据劳动指向来修改由运输指向决定的区位形成结果。（3）根据集中或分散指向来再修改劳动力指向所重新决定的区位格局，从而最终得出合理的工业区位。

韦伯·马克斯（Max Weber，1864—1920） 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出生于德国埃尔富特一富裕家庭，曾先后就读于多所大学。1889年从柏林大学毕业后，在柏林、弗赖堡、海德堡和慕尼黑等大学都担任过教席，还当过政府顾问、编辑、作家等。韦伯一生涉猎广泛，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年）韦伯的论述大都同社会学分析相揉合，且晦涩难懂，常常引起人们无休止的争论，但他对方法论的贡献却为大家所公认。他针对新历史学派把经济学伦理化的倾向，公开提倡科学认识的超价值性原则，在本世纪初掀起一场关于价值判断的论战。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它的任务只是认识客观存在的事物，而不能作出应当如何的主张，因此伦理的社会的理想都必须绝对排除在外。换言之，不容许它作出社会的价值判断。不过他又提到，客观的技术的价值判断与主观的伦理的价值判断不同，它在有些情形下可以应用。他还倡制了著名的"理想型"概念，认为它是从现实世界抽象出的用于推论的思维型式，同时又是观察现实社会现象的重要手段，因而具有体系化，发现和因果归属的作用。韦伯本人还专门用这个概念来分析经济史的演进。此外，在管理学方面他又提出了关于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理论，从而荣膺"组织理论之父"的桂冠。

厄顿指数（Uttsn Index） 是度量企业经营多角化程度的指标之一。该指数由厄顿于1979年提出，它定义为：

$$W = 2\sum_{j=1}^{k} j\frac{X_j}{X} - 1$$

其中，W为厄顿指数，k为企业经营的产业数，x为企业在k个产业中的经营活动总量，x_j为企业在j产业的经营活动量。厄顿指数的取值在1到k之间，完全非经营多角化企业的指数值是1，而在所有k个产业中均等分配其经营活动即完全经营多角化的企业的指数值是k。

劝导性销售（Exhortatory Marketing） 是指厂商通过广告等活动，往消费者的潜在意识中灌输有关本企业产品的各种概念、形象，使消费者确立对本企业产品的印象，进而形成强烈的偏好。劝导性销售活动是形成产品差别的重要因素。

巴斯夏·弗雷德里克（Frederic Bastiat，1801—1850） 法国经济学家。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工商业者家庭。1825年因继承祖父遗产而经营酿酒业。1830年后曾当过地方法官。后迁居巴黎专门从事经济写作。1848年起两度被选为议会议员，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论辩》（1847年）和《经济和谐》（1850年）。作为法国其时最著名的经济学者之一，巴斯夏的理论思想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他是法国自由贸易派的旗帜，不仅竭力宣扬经济自由主义，而且组织起法国自由贸易协会。他的"经济和谐论"是典型的劳资调和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和谐的，它受到以人性（即利己心和利他心）为基础的自然规律的支配。人们在社会中的交换不外乎是"服务"的交换，即交换双方互为对方作出的努力和紧张。所以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比例关系。而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建筑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交换总是价值相等的，可见社会的利益总是和谐协调的。他还用这条捏造的自然规律来解释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完全阉割它们的本质，抹杀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巴斯夏在1848年革命中目睹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却仍然提出庸俗的经济和谐论，其浓厚的辩护色采不言自明。为此他还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所谓"乐观派"。

巴罗·恩里科（Enrico Barone，1859—1924） 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大半生从事军旅，后在潘塔莱奥尼的引导下研究经济学。1907年起担任罗马经济科学研究所教授。作为帕累托的学生，巴罗在阐述和深化边际生产力论和一般均衡理论方面作了较多探索，并用于分析厂商行为和确定有关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他借助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工具，证明保护关税往往会减少社会经济福利，因而是不可取的。但巴罗最著名的理论贡献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杰出阐述。20世纪初，帕累托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可能实现福利极大化的著名论点，巴罗在1908年发表的《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一文里则发展了他老师的观点。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试错法可

以求出其经济均衡方程的解。只要全部经济资源归集体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并使得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生产成本，使可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福利极大化。这样，他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均衡条件，不仅表示出对社会主义的很大同情，而且为论证该制度的合理性提供着一个较有力的理论依据。

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COCOM）　巴黎统筹委员会又叫“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和“战略贸易控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它成立于1949年11月，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由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多边出口管制机构，其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葡萄牙、挪威、希腊、土耳其、日本等15国。“巴统”的任务是协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它的具体工作包括编制和调整禁运货单、规定禁运国别和地区、确定出口审批程序、加强转口管制、讨论例外程序和交换情报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编制禁运货单。禁运货单上的商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绝对禁运的商品，它主要包括武器、军工生产设备、尖端技术和稀有战略物资等。第二类是属于数量管制的商品；第三类是属于监视项目的商品，即需随着形势的变化调整管制程度的商品；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的特别禁运商品。禁运货单一经确定，就以某种形式转告各成员国。各成员国有权扩大禁运货单而无权缩小禁运货单。美国作为“巴统”最主要的成员国，它为了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和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于1951年制订通过了“巴特尔法案”，其内容是：“巴统”的成员国如果突破禁运货单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那么它将得不到美国给予的军事、经济等援助。由于美国在当时世界经济、政治领域的霸权地位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因此，“巴绝”在推行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巴绝”的建立出于强烈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封锁和禁运来抑制和扼杀社会主义制度。“巴统”成立初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最为严格，主要表现在禁运货单所包括的商品种类最多，多达400—500种。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禁运货单所包括的商品种类不断减少，到70年代已下降到150种左右。“巴统”管制作用的下降，更主要地表现在“巴统”成员国出于自身的利益纷纷突破禁运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禁运货单上的商品。尽管“巴统”的管制作用有所下降，政治色彩有所淡化，但它目前仍然存在。

戈森·赫尔曼·海因里希（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　德国经济学家。出生于杜伦的一个税务官家庭。1829年到1833年先后两次人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和公共管理课程。毕业后担任律师多年，后又经国家考试录用，任地方政府税务官数载。1849年同人合作筹创保险公司，次年因失败而退出。此后专心从事著述，并出版了其唯一的经济学著作《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规范》（1854年）。最后因肺病而辞世。作为边际分析的主要先驱者，戈森主要是围绕如何最合理地组织消费和生产来展开其理论阐述的。他从边沁功利主义出发，声称追求享乐是人类行为的主要目的，发现享乐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为此，他首先关注的是消费问题，并系统论述了他提出的享乐法则。按他的说法，假定在一次持续的消费行为中，不断满足一种或相同的享乐，则享乐程度会连续递减，最终达于饱和；假定消费者单纯地重复满足某种已有的享乐，则反复次数越多，最初的享乐程度就越小，享乐的持续时间就越短，达到的饱和也越快。这条享乐递减法则被后人称为“戈森第一定律。”在此基础上，戈森又引申出如何寻找最佳的消费组合以实现最大享乐量的规律。在他看来，消费者要在一定时间内实现最大享乐量，必须依次选择各种享受中的效用最大者用于消费，直至最后各种享受的边际效用相等。这条所谓的享乐均等法则就是后来叫做的“戈森第二定律”。他又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把价值看成是物品满足人们享乐的能力，即一种基于主观评价的相对效用，而且物品价值量的大小随其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要获得最大的价值量，则应使每种物品的最后一单位具有相等的价值。这里已包含边际效用的思想。戈森的上述论述实际上成了以后边际效用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戈森的经济理论充斥着大量的几何图形和数学公式，因而他也被看成是数理经济学的发端者。戈森的理论在其生前始终饱受冷遇，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杰文斯重新发现和大加宣扬，才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奠定了它的重要地位。

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　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产生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又称旧历史学派。该学派的先驱者是亚当，缪勒和弗，李斯特，主要代表人物有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历史学派否认普遍的客观规律，反对用抽象演绎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概括，主张依靠历史归纳方法来建立反映民族和历史特点的国民经济学。该学派还猛烈抨击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强调国家干预

经济生活和实行保护贸易的必要性，宣扬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该派学者十分重视法律，宗教和道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批评那种偏倚物质而忽视精神的做法。总的来看，历史学派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的"历史的方法"，因而它总是致力于收集、整理和描述众多的历史资料，试图用历史过程的描述来代替理论研究。所以也有人认为它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流派。历史学派在19世纪70年代又进一步发展成新历史学派，长期主宰着德国经济学家。另外，它对美国的制度学派和一部分所谓"英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有过一定的影响。

历史成本会计（Historical Cost Accounting）
历史成本是根据已发生的实际支出而计算的成本，也称"实际成本"。在传统的财务会计中，实际成本是一切资产项目入帐的基础，主要是为了适应存货估价与计算损益的需要。以本期实际成本与上期同一产品的实际成本比较，可观察成本升降的情况或趋势。在会计记录中，资方计价的基础通常有好几种，如专业人员估价，市价、重量成本、历史成本等。由于历史成本比较客观，所以历史成本被人们视为最有效的计价基础。根据会计凭证和帐簿记录的历史成本进行成本计算的方法，称为历史成本会计。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所以用历史成本计价，主要是由于价值容易确定，比较客观，而且原始凭证的存在可以防止企业任意估价，影响资产价值的真实性。但是，利用历史成本作为资产计价标准也有缺点，主要是对于现行财务决策的参考用处不大。例如，在物价不稳定情况下，历史成本不能表示资产的现时成本，如果以此同现时收入相结合，就会造成损益的歪曲。另外，流动资产中的存货与证券，如果价值下跌，则在帐上的价值就要放弃历史成本，而采取继续经营的价值，即不用历史成本而用市场价格，要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的原则。因为以继续经营的立场出发，按照稳健主义的原则，这些资产的价值下落，将损失一部分价值，如仍坚持历史成本计价，则将虚增资产价值。

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LDC）
见"发展中国家"。

反垄断政策（Anti—monopoly Policy）　为了有效地、圆满地发挥作为私有企业经济体制的根本支柱的竞争性机制的作用，限制阻碍这一机制的行为的政策。它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禁止和限制垄断的政策，即为狭义的反垄断政策；二是禁止限制竞争和不公正交易的政策；三是禁止和限制诈骗、行贿等不道德商业行为的政策。后两类基本上是市场行为控制政策，而第一类政策还包括市场结构控制政策的内容，如通过审查和限制合并及分解企业控制市场结构，制止可能形成和已经形成的垄断。显然，结构控制政策和各种行为控制政策是配套的。因为如果形成垄断的市场结构，公平交易的基础就被破坏，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也很难防止和限制；反之，各种限制竞争和不公平交易行为又有促进垄断结构形成的作用，并且强化企业进一步垄断的动机

反垄断政策的法律表现就是各种反托拉斯法。1889年加拿大制定的《禁止限制性贸易的合并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托拉斯法。1890年美国制定《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继之又制定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其后又进行了若干补充修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仅挪威制定了反托拉斯法，其它各国都认为在一个工业部门中企业间联合是合法的。这种联合活动都以卡特尔的形式出现，即由参加卡特尔的各企业达成协议，采取瓜分市场，限制产量、固定价格等做法，以抑制成员企业间的竞争。战后欧洲各国对卡特尔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英国、原联邦德国、法国、奥地利、丹麦、瑞典、荷兰等，都制定了反托拉斯性质的法律，但各国名称不一样。英国称为限制性商业做法的法律，其它国家则称为反垄断法。在亚洲，日本也制定了反托拉斯法，并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到1979年，至少约有30多个国家先后制定了反垄断法规。迄今为止，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用，西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看法仍不一致。特别是6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经济学家一再宣称反垄断法是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而且效用未必很好。反垄断政策实际效用有限的原因：（1）从方法上看、分析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的关系及矛盾和结果的理论、技术还不够完善；（2）从基本制度上看、在私有制条件下，政府很难真正有效地实行反垄断政策。

反托拉斯政策（Anti—trust Policy）　指用来限制商业垄断及有意抑制竞争等不公平商业行为，以保护市场充分竞争的政策。

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中，出现了许多大型企业，其中有一些生产同类产品或者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大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垄断组织——"托拉斯"，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垄断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既抑制了竞争的进行，又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经济效率。为此，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法规对它进行扼制。

1.美国的"反托拉斯法"

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联邦反托拉斯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它规定，一切限制各州

之间或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合同或企图都是非法的，对于那些在各州之间或者与别国联合进行垄断或企图进行垄断的任何人都将处以罚款或监禁。自此，反对私人垄断成了一项国策。立法后，许多人与公司由于垄断市场与价格等行为而受到处惩，其中包括杜邦公司、烟草公司以及美孚石油公司等等。

1914 年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并建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该法宣布"不公平的商业竞争是非法的"，如发现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公司在商业贸易中采取不公平的竞争办法或者欺诈手段时，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取缔或处罚。

同年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修正和加强了前面的有关法案。它的重点不是取缔那些已经形成的垄断集团，而是要防止垄断势力的形成。为此，它把那些导致垄断的形成或者抑制竞争的不正当做法都视为非法，其中包括抑制竞争的专营契约、价格歧视、企业间相互持有股票以及连锁董事会等等。1936 年的"罗宾逊-帕特曼法"在价格歧视方面对"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进行了修正，它在控制垄断行为的同时，也注意了对小企业进行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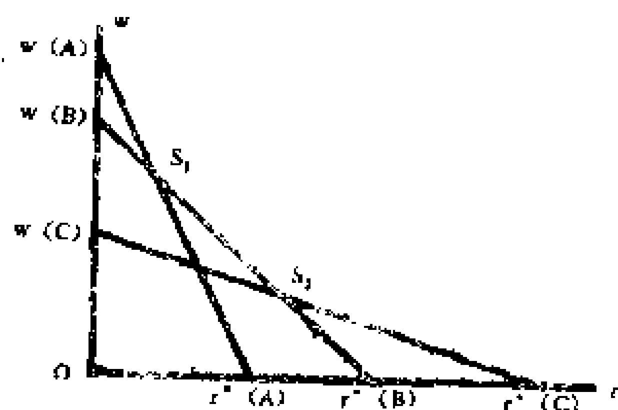
2.欧洲国家的"反托拉斯法"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许多国家对联合企业并不干预，有时还采取支持的态度，只有挪威一国通过了有关反托拉斯的法令。二战以后，人们开始倾向于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对垄断性联合企业的态度也就随之发生转变，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及北欧诸国纷纷颁布反托拉斯法案，英国也于 1956 年由国会通过了"商业行为管制法"。欧洲经济共同体所据以形成的《罗马条约》中也设有两条反托拉斯条款，并于 1962 年开始生效。

目前，反托拉斯法在各国还处于不断的补充与修正当中。它一方面要对不利竞争的许多活动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在有些情况下，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要大于它妨碍竞争所带来的弊端。因此，还需要权衡利弊，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处理。总之，反托拉斯法的宗旨是，要保护竞争，但不要保护竞争者。

反效用（Disutility）　又称"负效用"。指某种产品或劳务的消费所引起的令人不满意或不愉快的感受。参见效用（utility）。

反向资本深化（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利率（或利润率，在均衡经济中二者是相等的）与人均资本量存在逆相关关系，即随着技术进步，资本存量的增加，使得资本收益下降了。这一认识是建立在替代原则基础上的，即随着两类投入物相对价格的变化，总是较为低廉的投入物替代较为昂贵的投入物。在资本理论领域中，替代原则的存在使得经济学家们认识到，较低的利率总是与更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使用相关联，从而资本不断地替代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这一过程被称为资本深化。但这一认识有时不一定正确，因为较低的利率可以与较低的，而不是较高的人均资本量相关联。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向资本深化。反向资本深化现象很容易被发现，因为不可能根据技术选择与单纯的利率关系去排列技术的有效性。反向资本深化从而技术之间的转换在这样一种经济特质中是存在的，即工资一利润关系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图 1 中，工资一利润的三个线性关系，使得当利率水平从 O 增加到 $r^*(c)$ 时，



技术转换不可能。原因是任何一条工资一利润线与其它工资一利润线都只相交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与人均资本量存在着单纯的逆相关关系。当 $r=0$ 时，三条线与 w 轴的交点就是人均净最终产出。w (A>w (B) >w (c)。在交点 S_1 和 S_2 处，二种技术的工资水平相同。但在 S_1 点，A 技术的人均利润高于 B 技术，后者高于 C 技术。假如各技术之间的利润率相同，那么在 S_1 点上，A 技术比 B 技术有较高的人均资本。利润率的提高必须由"较少的资本"去替代"较多的资本"。传统的资本深化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但是，多数情况下，工资一利润关系是非线性的，即劳动力与中间投入物的比例关系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是不同的，这就使得工资一利润线之间多次相交，从而产生多重转换的可能。这样就存在这种情形，资本收益率与人均资本量存在正相关系。这就是反向资本深化。资本深化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资本和资本积累的基石，反向资本深化的提出，对传统资本理论提出了挑战。

反补贴税（Countervailing Duties）　反补贴税又叫抵消税或补偿税，它是对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任何补贴或奖励的外国商品在进口时所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根据一些国家的规定，进口商品在生产、加工、买卖、输出等过程中凡是接受了直接或间接补贴

或奖励的，不管这种补贴和奖励来自何方，都构成征收反补贴税的条件。一般来说，反补贴税的税额通常就是进口商品所接受的补贴或奖励的金额。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在于抵消进口商品所接受的补贴，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削弱它的竞争能力，使它不能在进口国市场上与进口国国内同类产品进行低价竞争，以保护本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长期以来，由于各国在反补贴税的规定上很不一致，因而经常就此问题发生争执。尽管关贸总协定为统一征收反补贴税的做法作出了一些努力，并通过了某些法规，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国间仍存在着矛盾和不同，它将对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反倾销税（Anti—Dumping Duties） 反倾销税是指进口国对在本国市场实行低价倾销并对国内同类产品造成重大威胁或损害的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保护本国市场和生产。反倾销税的税额一般是正常价格与倾销价格之间的差额，因此，要征收反倾销税，关键就在于确定什么是正常价格。因为只有确定了正常价格，才能确认某种商品的实际进口价格是否是倾销价格，然后才能进一步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征收多少。关贸总协定制定的确定正常价格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正常价格为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第二，正常价格为相同产品在正常贸易情况下向第三国出口的最高可比价格；第三，正常价格为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的推销费用和利润。尽管有上述标准，各国在征收反倾销税的具体做法上仍存在很大的差别。有的国家有意把正常价格定得较高，以便多征反倾销税，加强进口限制。有的国家不仅利用征收反倾销税阻止外国商品进口，而且还借助反倾销调查故意拖延时间，同样可以起到阻止进口的作用，有时候，它的作用比反倾销税本身还要大。

反增长论（Theory of Disgrowth） 对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的一种驳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使人们享受美好生活，反而使人们付出了十分昂贵的社会与文化的代价。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值得的，令人怀疑的。这种观点也被称之为"增长价值怀疑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米香于1967年在《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提出的。他在该书中，联系社会福利问题考察经济增长的后果。指出，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仅是物质产品的增加，并非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人们失去了无忧无虑的闲暇、田园式的生活等许多美好的享受；经济增长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增加，忽视了社会福利指标，使人类的居住环境，生存条件，社会福利遭到了破坏；经济增长虽然增加了个人收人的绝对量，却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他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从而也就不一定能够为他带来幸福。人们为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代价，使人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每个人的生活都毫无选择地受到损害。米香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即使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也不可取，应当停止经济增长，恢复田园式的生活。反增长观点显然是一种悲观的论点，停止经济增长的主张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米香所提出的许多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确实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因此米香的观点对于人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文凭病 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之一。由于社会上存在着根据文凭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中首先关注的不是传授知识技能，而是证书或文凭，使得文凭成为证明一个人是否适合于某项工作的标准。并且，因招工对文凭的过度要求，造成了为了就业就得接受过度教育的恶性循环。这一现象由罗纳德·多尔概括为"文凭病"。他在1976年发表的《文凭病：教育、资格的发展》中认真剖析过这一问题。他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教育过程中都在特定阶段举行全国性考试，以决定学生是否适合进一步深造或就业。这些考试极为重要，使得教师在课堂上拼命辅导，也常使学生在校外花费很多时间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这样就颠倒了教育的真正目的，一方面学生无法学到真才实学；另方面，会使人才选择过程的成本逐步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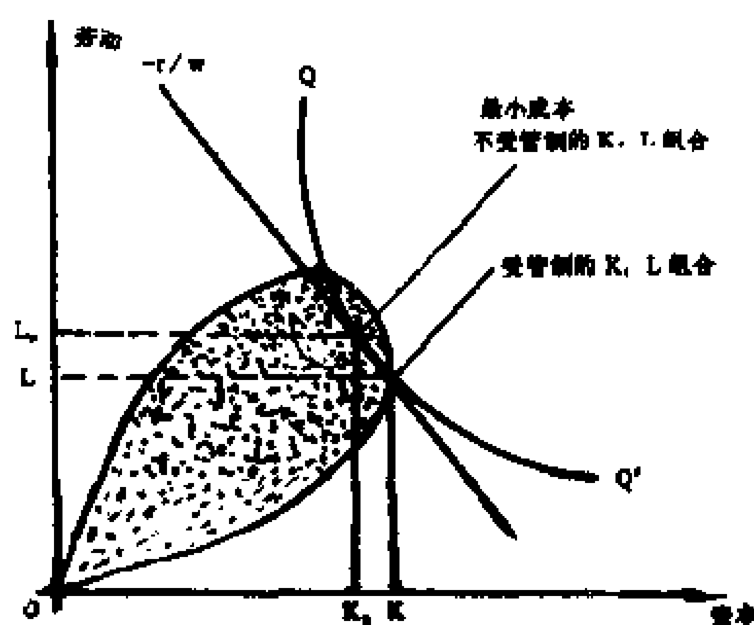
开放企业（Open Shop） 见"自由雇佣企业"条。

五　画

艾弗奇—约翰逊效应（Averch— Johnson Effect） 艾弗奇—约翰逊效应指受到管制的厂商在利润最大化方面做出的反应，是在公平收益率调节下的某些非故意的结果。同不存在给定收益率的情况相

比、这种管制可能使企业选择过度资本密集的技术，从而不在最小的社会成本水平上安排生产。尤其，艾弗奇—约翰逊效应的主要后果在于，与成本最小化企业的抉择相比，受到管制的利润最大化企业选择的资本—劳动比率会更高。如果公平收益率大于资本费用率，那么，企业将有动力进行和生产可能性不矛盾的投资，因为允定的收益率与资本的实际费用率之间的差额是纯利润。

如果存在艾弗奇—约翰逊效应，那么其作用是极其强烈的。在公平收益率不受限制的场合，它至少和资本费用率一样大，并且低于企业的赢利率；反之，在公平收益率受到限制的场合，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替代率低于允定收益率 r 和工资率 w 之比。这样，对于任何给定的产量水平，企业都不能使成本极小化，因为这样做要求企业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必须等于(r／w)这一结果可以图示如下：限制线内的阴影区域代表使收益率大于允定收益率的投入组合。由于资本的任何增值都会增加利润，企业总是尽可能地趋向于限制区内右方的组合。在最右方的等产量线与限制图相交点的产量可以达到，但生产这种产量的劳动和资本的最低成本组合，却在阴影区内资本劳动的边际替代率等于 r／w 的地方。这样，对于任何给定的产量水平，受到管制的企业不可能既在斜率为-r／w 的成本最小化的价格线上，同时又在限制线上。这就是艾弗奇—约翰逊效应作用的结果。



最初认为，通过管制迫使厂商提供更多产量，会增加分配的效率。如果更大的产量总是报酬率调节的结果，那么技术效率的减低将由分配效率的提高补偿。原则上，管制机关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允定收益率，使产量增加的边际收益正好等于效率减低的边际成本，然而产量却不一定增加。当允定收益率趋近资本费用率时，企业将更多地利用资本，劳动力的数量却未必扩大，因此产量也无需扩大。如果两个企业有相同的齐次生产函数，一个受管制而另一个不受管制，那么，不受管制企业的产量成为受管制企业的产量的下限，而受管制企业在平均成本等于价格时的产量则成为上限。在任何情形下，管制都不一定能增加创新的可能。在同样的生产和需求状况下，受管制企业的研究和发展支出并不一定比那些不受管制的企业更多。管制可能使某些利润转而用于创新，但受管制企业的创新动机并不一定更强。因为技术变革对企业并不完全是外生的，企业自身有合理创新的可能。事实上，尽管从观察实验来看，对于艾弗奇—约翰逊效应是否存在与作用大小尚存在争议，但它已被延伸到许多领域。首先是管制的时滞与随机检验问题。最初曾假定管制机构总是有能力找到允定收益率，然而管制者要使实际收益率接近目标收益率是很困难的。管制过程通过价格调整连续发生作用，管制者希望管制使实际的收益率即使不回到最初制定的水平，也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准。由于管制是一个政治的、官僚的、法定的过程，因此执行时总是存在时滞。相应地，企业或许能够逃脱长期的限制。连续的有效力的管制会阻止企业获取由于创新意外获得的利润。充分的管制时滞比没有执行时滞可能使企业更有创新精神。其次是需求的不确定性。一些人认为艾弗奇—约翰逊效应只有在随机需求函数的某些条件下才能成立。争论在于如果企业面对随机的需求，最佳资本存量是否会更大。再次是动态分析，即把时间因素引进静态的艾弗奇—约翰逊效应模型。从标准的微观经济理论来看，艾弗奇—约翰逊效应提供了日益复杂的、分析管制过程的模型的动力。它表明传统的、定性的管制理论可以模型化、实验化。这样做也是必要的，不如此考虑所有潜在的影响，行为及其规则就是有缺陷的。在公共政策方面，艾弗奇—约翰逊效应和大量后继研究，使经济学家、立法者和管理者对可选择的管制的非故意性后果更加敏感。现在，理论研究已试图寻求更能代表实际管制过程的模型。有人以随机需求的作用为目标；有人致力于管制时滞和随机检验过程；对经济福利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试图确定一个最优的公平收益率，然而却忽视了制定收益率中的政治、官僚行为。没有一个模型建立者阐明，企业和管制者作为相互作用的组织，要受约束理性和有限信息的制约。

本票（Promissory note） 又称为“期票”，依据英国票据法，所谓本票，是一个人向另一人签发的，保证于见票时或在将来的某一确定时间，对收款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书面凭证。也就是说，本票是出票人向收款人承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从而本票的出票人也就是本票的付款人，也就成为本票的主债务人。

根据《统一本票、汇票法》，本票必须具备以下项目：

(1) 在票据上标明"本票"字样。

(2) 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承诺。

(3) 收款人或其指定人。

(4) 出票日期和地点(未载明出票地点,则出票人地址则为出票地点)。

(5) 付款日期(未载明付款期限,应将此本票视为见票即付)。

(6) 付款地点(未载明付款地点,则出票地点就视为付款地点)。

(7) 出票人签字。

本票通常被分为一般本票和银行本票。一般本票的出票人是工商企业或个人,一般本票又可以分为即期一般本票和远期一般本票。银行本票的出票人是银行,银行本票都是即期本票。这样,如果本票的抬头不载明收款人,则此种本票就可以代替现钞在市面流通。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因此规定本票发行的最低限额。或明令禁止商业银行签发来人抬头本票。

在国际贸易中,通常不会采取进口商开立一般本票付款的方法。但是,当利用买方信贷进口大型机器设备时,进口商常常会开立远期付款本票,出口信贷保险部门予以保证,由进口方银行将本票购人,到期由出票人偿还本息。在国际贸易中开立本票,通常这种本票也附带货运单据,以便银行在要求出票人付款时作为凭证。

本能冲动(Animal Spirits) 又称为"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原是生物学中的术语,凯恩斯在《通论》中把这个词引人经济学,用来解释企业家作出投资决策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对投资的影响,以后被用于解释投资行为。凯恩斯认为,作一件事情的结果往往要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知道,在决定是否值得作这件事时,就不是先进行周密的计算,而是"一时血气之冲动"的结果。这种"一时血气之冲动"就是本能冲动。这种本能冲动可以解释资本家的投资行为。这就是说,资本家是否进行一项投资,往往不是充分理性地进行冷静的成本一收益估算的结果,而是一时血气冲动的结果。这样,投资是一种要受本能冲动影响的活动。私人投资不取决于种种实际因素、而且还受到资本家一时一地心理状态和情绪的影响。以后,英国经济学家J·罗宾逊在分析投资问题时也使用并通俗化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了投资行为的非理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正常的通货膨胀(Validated Inflation) 又译为"生效的通货膨胀",指与货币当局允许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基本一致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的最终根源在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在货币当局所允许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基本一致时,由此出现的物价水平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持续上升就被称为正常的通货膨胀。

正常进口税(Normal Import Duties) 正常进口税一般可以分为最惠国税和普通进口税两种。最惠国税适用于与该国签订了含有最惠国待遇原则条款的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商品,普通进口税则适用于与该国没有签订这种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商品。最惠国税率总是比普通税率低,有时两者的差幅还很大。之所以把最惠国税当作正常关税,是因为战后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多数国家成了它的成员国,它们之间互相提供最惠国待遇,享受最惠国税。另外,没有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国家可以通过与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签订有关贸易协定互相提供最惠国待遇,享受最惠国税。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常进口关税就是指最惠国税。

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 社会中某些集团的消费行为对另一些集团的示范作用,尤其是高收人集团的消费行为对低收人集团的示范作用。美国经济学家J·杜森贝利(J·Duesenberry)在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了这一概念。根据相对收入假说,人们的消费行为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一个集团或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消费支出,而且还取决于其他集团或个人的消费支出。这样,消费就取决于个人收入与社会收人的相对比例,即个人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低收人集团把高收入集团的消费行为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从而高收入集团的消费行为对低收人集团就产生了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使低收人集团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集团的边际消费倾向。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R.Nurkse)等人把这一概念运用到国际中。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各国的消费行为也存在着示范效应,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有示范效应。这一示范效应的过程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集团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集团又模仿本国高收入集团的消费方式。这种国际间的示范效应是发展中国家消费水平的提高快于生产水平提高,即"超前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主动主义者(Activists) 又译"积极主义者",指主张政府积极主动地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国家干预政策措施来稳定经济或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流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被称为主动主义者。他们坚信,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

而且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来实现，因此，他们主张政府积极主动地采取一切适用的经济政策，实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称他们为主动主义者是为了有别于那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流派，诸如，货币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或理性预期学派。这些经济学家坚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内在稳定性，无需采取任何人为的经济政策。

主要工业国家经济最高级会议（Economic Summit Conference of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主要工业国家经济最高级会议通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它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七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彼此间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矛盾而建立的一个协商组织，表现为每年一次的七国首脑会议，它始于1975年，从1977年第三届起欧共体主席应邀参加该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是在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召开的，每次会议都广泛讨论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能源、南北关系以及东西方关系等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缓解西方各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矛盾和冲突。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尽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并不能完全解决它们之间在贸易领域的尖锐矛盾，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从而使得国际贸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除了贸易问题外，首脑会议还着重讨论世界经济面临的紧迫问题，这种问题会因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最近几次首脑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问题。另外，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政治问题也日益成为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总之，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矛盾、协调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就有利于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还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主险（Basic Risk） 又称为基本险。主险是海运货物保险的险别，可以进行单独投保，主要承保海上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主险可以分为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三个种类。平安险承保的责任范围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海运货物全部损失和共同海损。水渍险承保的责任范围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海运货物的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一切险的承保责任范围除平安险和水渍险的范围之外，还包括海运货物由于一般外来原因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

主险的除外责任包括五个方面：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在保险责任生效之前，被保险货物已经存在的损失；被保险货物由于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如自然损耗、内在缺陷、市价变化等；属于发货人责任所引起的损失；战争险和罢工险条款所规定的承保责任和除外责任。

在正常的海洋运输情况下，主险承保责任的起讫是按照仓至仓原则，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或储藏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海运、陆运、内河和驳船运输过程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达保险单上所载明的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为止。如果被保险货物未抵达上述仓库或储存处所，则以此货物在最后卸货港全部卸离海轮后满60天为止。如果出现被保险人所无法控制的运输迟延、绕道、转运等情况，只要被保险人将情况通知保险人，并加付必要的保险费，那么原来的承保责任亦然有效。

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 能够带动国民经济起飞的一个或多个重要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与新技术相关，具有相当高的增长率，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带头部门。它们不仅能带来新的生产函数，而且能通过前、后向联系，对经济规模产生扩散效应。主导部门的确定时间，应该是在该部门增长势头很大，达到显著的规模，其扩散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主导部门的概念是罗斯托提出的“起飞”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主导部门是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以主导部门的优先发展来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发展，是他的起飞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一种发展模式。罗斯托指出，主导部门是由几个重要的产业部门组成的主导部门体系。这个主导部门体系又是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更替的，它的更替和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导部门体系可能是水泥、木材、建设、种植、采掘等产业；其次可能是纺织、服装、加工等轻工业；随后可能是机械制造、机床、电力、出口等工业；再后是汽车工业综合体系；最后是服务业、城建等生活质量部门综合体系。可见，主导部门体系越来越高级化，高技术化和高资本密集化。罗斯托认为，一些发达国家经济起飞和经济增长的历史，已经证实了主导部门的重要性和所起的作用。以英国为例，产业革命时期英国建立了以纺织业为主的主导部门，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棉花，畜牧，纺织机械，动力，服装，交通运输，外贸等等部门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罗斯托还指出了建立主导部门所应具备的一定条件。主要是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这就要求一国的净投资率必须从5%左右提高到10%以上（即投资在国民生产净值中的比重占到10%以上）。要做到这一

点，必须鼓励并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防止消费早熟，必要时应引进外资，要有充足的市场需求，来吸收主导部门的产出；要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为主导部门的发展提供组织，管理和人力等条件。

加工贸易（Processing Trade） 加工贸易是以加工为特征的再出口业务。笼统地说，它是指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机器设备等，利用本国的劳动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加工成成品用于再出口。加工贸易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加工贸易有助于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而推动出口贸易。加工贸易可以弥补企业资金不足尤其是外汇资金不足的缺陷，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扩大劳动力的就业，增加外汇收入。加工贸易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充足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多角度全方位地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还有助于我国企业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及其变化情况，不断改进商品设计和质量，更好地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发展加工贸易，近年来这种贸易的发展尤为迅速，其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正常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了使加工贸易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发展加工贸易时，必须处理好它同正常贸易的关系，对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好的传统商品以及国外对我国实行配额的商品，就不宜发展加工贸易，以免影响我国正常贸易的发展。要避免发展加工过程中耗能多或污染严重、容易损害职工健康的产品。要处理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的关系，在利用我国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要注意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发展，并把它当作未来的主攻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加工贸易的不断发展。另外，在发展加工贸易时，必须注意经济效益。加工费不应定得太低，当然也不能太高，应以国际市场的行情为基础。

加勒比共同体（Caribbean Community） 加勒比共同体是加勒比地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于1973年8月建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共有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格林纳达、圭亚那等14个成员国，总部设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该组织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以发展工农业生产，统一外贸政策，提高对外谈判地位，促进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它负责制定主要政策，代表共同体对外缔约，理事会负责制定一般政策并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及开发计划等，秘书处为行政管理机构。该组织成立以来，逐步取消了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关税并统一了对外关税，并且作为一个整体同西方发达国家就农产品贸易问题开展谈判，增强了谈判地位，较好地维护了成员国的利益，有利于各成员国外贸的发展。为了改变地区经济的落后面貌，各国还在农业、运输、金融、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 论证投资取决于产量（或国民收入）变动率的理论。它说明了由产量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变动大于产量的变动。以I_0代表由产量变动所引起的引致投资；a代表加速数，即投资变动与产量变动之比率；$\triangle y$代表产量的变动，即$\triangle y = y_t - y_{t-1}$，则加速原理的公式为：

$$I_0 = a \cdot \triangle y = a \cdot (y_t - y_{t-1})$$

如果考虑到重置投资（折旧），以I_t代表总投资，D代表重置投资，可以把加速原理的公式写为：

$$I_t = I_0 + D = a \cdot (y_t - y_{t-1}) + D$$

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加速原理的含义。设a=2，意指产量增加100万元所需要增加的投资为200万元，折旧率为10%，意指每年的折旧（即重置资本）占资本总量的10%。可以把某企业在不同产量时所需要的资本量，引致投资、重置投资、总投资之间的数量关系列为下表：

加速原理举例表（单位：百万元）

年	产量	资本量	引致投资	重置投资	总投资
1	100	200	–	20	20
2	120	240	40	24	64
3	140	280	40	28	68
4	160	320	40	32	72
5	160	320	0	32	32
6	150	300	−20	30	10

根据上表可以说明加速原理的基本含义是：第一、投资是产量变动率的函数，而不是产量变动绝对量的函数。这就是说，投资的变动取决于产量的变动率，而不是产量的变动量。第二、投资的变动大于产量的变动，这就是加速的含义。当产量增加时，投资的增加率大于产量的增长率。在上表中，从第1年到第2年，产量从100万元增加到120万元，即增加了20%，而总投资从20万元增加到64万元，即增长了220%。当产量减少时，投资的减少率也大于产量的减少率。在上表中，从第5年到第6年，产量从160万元减少到150万元，即减少了6.25%，而总投资从32万元减少到10万元，即减少了68.75%。因

此，加速原理的作用是双重的，产量增加时，投资加速增长，产量减少时，投资也加速减少。第三、要使投资增长率保持不变，产量就必须维持更高的增长率。在上表中，从第 2 年到第 3 年，第 3 年到第 4 年，要使引致投资增长率保持不变，产量的增长率应分别为 17%与 14%。从第 4 年到第 5 年，产量保持不变，总投资从 72 万元减少到 32 万元，即减少了 56%。这说明，当产量达到一定水平时，要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是困难的。加速原理说明了产量变动与投资变动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原理的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加速原理只适用于设备、厂房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如果设备、厂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则产量增加不会使投资有更大的增长。其次，影响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利率、风险、投资成本、投资者的预期，等等。加速原理的实际作用大小还要取决于这些因素。最后，按加速原理的理论分析引致投资和总投资可能有负数，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加速原理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 A · 阿夫塔里昂（A · Aftalion）和美国经济学家 J · M · 克拉克（J.M.Clark）分别于 1913 年和 1917 年提出。以后由英国经济学家 R · 哈罗德（R.Harrod）加以发展。美国经济学家 A · 汉森（A · Hasen）和 P · 萨缪尔森（P.Samuelson）把加速原理和乘数原理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乘数-加速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周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过多不现实的限制条件，加速原理在现实中的作用并不大。

加速系数（Accelerator Coefficient）　产量（或收入）增加所引起的投资增加的倍数。以 a 代表加速系数，△y 代表产量的增加量，△I 代表投资的增加量，则加速系数的公式为：

$$a=\frac{\triangle I}{\triangle y}$$

加速系数也就是增量的资本-产量比率。由于设备的价值一般大于其年产量，所以加速系数一般大于一。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加速系数是一个常数，其数值等于资本-产量比率。

参见"加速原理"。

加利阿尼，费迪南多（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　意大利经济学家。他大部分时间在担任公职，他的《小麦商对话》（1770 年）一书名扬欧洲，该书嘲弄重农学派的基本观点，重视经济制度的特点和时间与地点的特殊性，阐述了他的经济政策主张。加利阿尼的理论贡献主要反映在《货币论》（1750 年）这部名著里。他认为，价值是一种比例，它由"效用"和"稀缺性"的比例所构成；一种物品缺乏其中的一者，就不会有价值。这就第一次把价值归结为由稀缺的效用所决定。其意义更在于，物品由于数量稀缺（即有限），它的效用才可能呈现出某种界限即边际，从而在概念上就有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区分。加利阿尼在谈到交换和利息时，认为包括借贷在内的交换实际上是现在（或近处）与未来（或远处）这两个不同时间或地点的货币的交换，而不同时点的货币具有不同价值，可以用"贴水"来弥补它们的差额。这种利息思想是"时差利息论"的雏型。因此，加利阿尼被看成是经济学史上真正开创边际分析之先河的学者。

失业津贴（Unemployment Benefit）　对失业者支付的款项，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转移支付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款项来自国民保险基金，并与个人失业前的国民保险分担额水平相关。不能领取失业津贴的失业者，可以获得其他形式的补助或津贴。各国对失业津贴的领取条件、时期与数额都有不同的规定。失业津贴一方面可以保证失业者的最低生活水平，从而有利于社会安定，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有固定的发放标准），可以作为内在稳定器而起到自动地稳定经济的作用。失业津贴作为转移支付之一也被用作调节经济的政策工具。但许多经济学家还指出，失业津贴的存在与提高，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还增加了自愿失业、等待失业、寻职失业这些种类失业的人数，从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率。如果改革失业津贴仍是经济学家讨论的课题之一。

失业频率（Frequency of Unemployment）　每个时期内工人失业的平均次数，例如在一年内工人失业几次。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中不同企业之间劳动需求的变动，即使总需求不变，某些企业扩张，某些企业收缩，这就会引起这些企业劳动需求变动，而加快失业频率，所以，不同企业间劳动需求变动越大，则失业频率越高；反之，亦反之。二是新工人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率，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新工人越多，则失业频率越高；反之，亦反之。失业频率的高低，影响失业的严重程度及自然失业率的高低，是衡量失业的一个重要指标。

失业期限（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一个人在失业登记处登记的平均时间，即一个人处于失业状态的时间长度，故又称"失业持续时间"。在任何一个时期内，失业水平是所登记的失业者流量和平均失业时间的函数。在既定的失业率之下，失业期限越

短，则失业者的流量越大，即失业者越多；反之，亦反之。失业期限的长短取决于劳动市场的完善状况，劳动力的人口组成、失业者寻找工作的能力与愿望，现有工作的类型等。一般来说，年龄大文化技术低的失业者失业期限都长，这部分失业者构成了失业中难以消除的"失业硬核"。

失业（Unemployment） 凡在一定年龄范围之内、愿意按现行工资率受雇而未能受雇，或者正在寻找工作的人都是失业。各国对工作年龄和失业范围有不同的规定。例如，在美国，工作年龄是16—65岁。属于失业范围内的人包括：(1) 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第一次寻找工作，或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正在寻找工作已达四周以上的人。(2) 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而离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3) 被暂时辞退并等待重返原工作岗位，而连续7天未领到工资的人。(4) 非自愿被解职者，即被企业解雇而无法回到原工作岗位的人。以上四种人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就成为失业者。衡量一个经济中失业情况的最基本指标是失业率，失业率的公式为：

$$失业率=\frac{失业人数}{失业人数+就业人数}\times 100\%$$

经济学家们根据引起失业的不同原因，而把失业分为许多类型。总体上失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由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需求不足的失业，或称周期性失业；另一种是由于经济中各种难以避免的原因而引起的结构性失业，或称自然失业。后一种失业中又可以由于具体原因的不同而分为许多类型，诸如，由于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的摩擦性失业；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技术性失业；工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而引起的寻职性失业；等等。消除需求不足的失业，是经济政策的目标，而结构性失业的存在与充分就业并不矛盾。如何消灭前一种失业实现充分就业是各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失业率（Unemployment Rate） 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失业人数指到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失业人数。劳动力总数指失业人数与就业人数之和。所以，

$$失业率=\frac{失业人数}{失业人数+就业人数}$$

各国关于就业与失业的具体规定不同，进行失业统计的方法也不同。例如，美国是通过对55000户进行抽样调查来估算失业率，并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发表上月的失业率估算数字。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失业率不仅可以反映出失业的严重程度，而且可以反映出失业变动的规律及特点，因此，它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失望工人假说（Discouraged Worker Hypothesis） 关于劳动力参加率对经济周期性变化反应敏感程度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劳动力参加率与经济周期成同方向变动。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从而闲暇的机会成本下降，这时，有些工人就会放弃寻找工作而享受闲暇，从而劳动力参加率下降。还有一个因素是，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失业率高，寻找工作较为困难，且付出的代价高，从而就有一些工人放弃寻找工作的希望，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也使劳动力参加率下降。这种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工人是理性的，他们要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决定这种选择的是工作的收益与闲暇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工作的收益高时选择工作，当闲暇的机会成本低时选择闲暇。统计资料所表明的劳动力参加率与经济周期阶段同方向变动的事实证明了这种假说。但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理论适用于收入较高的工人，并不一定适用于低收入工人。

失业保险局（Unemployment-insurance Service） 美国劳工部人力管理署下面的一个机构。它负责 (1) 帮助各州的就业保障机构制订有充分的资金和良好的管理的州一级的失业保险计划，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的需要；(2) 提供有关劳动力市场和失业保险计划的情报；(3) 对有关失业保险赔偿总额，捐款，对保险赔偿费的权利和保险赔偿费的支付的资料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分析，同时作全国的分析；(4) 就那些可能影响失业保险制度的政府和私人企业的收入维持计划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该局还根据人力发展和训练法同各州就业服务局一起筹备训练补助费的支付工作。该局负责检查各州实施失业保险计划的情况，以判定是否有人没有得到根据州政府法律应该得到的保险赔偿费，并在劳工部长的同意下负责为前联邦政府文职人员和退伍军人落实联邦失业赔偿计划。

弗莱堡学派（Freiburg School） 又称"西德新自由主义"，是在本世纪20—30年代形成，战后又得到发展与运用的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因其学术中心为德国弗莱堡大学而得名。

历史渊源 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W·欧根(W.Eucken) 早期属于德国历史学派。尽管一战后欧根放弃了历史学派的传统，强调对现实经济形态的分析，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学派的影响。二战后弗莱堡学派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它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实际上来源于欧洲自由主义各经济学流派，例如：伦

派学派、奥国学派等。由于二战中德国人民饱受法西斯独裁统治之苦。所以，自由放任的主张得以盛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创始人为弗莱堡大学教授W·欧根，其主要著作有：《资本理论研究》(1934)、《国民经济学基础》(1940)、《经济政策原理》(1959)。战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是L·艾哈德(L.Erhard)，代表作有：《大众福利》(英译本为《来自竞争的繁荣》，1957)、《德国的经济政策》(1962)等。此外，属于这一派的德国经济学家还有：F·伯姆(F.Bohm)、F·卢茨(F.lutz)、A·吕士托(A.Ruston)、缪勒·阿尔马克(A.Muler·Armak)、W·罗勃凯(W.Ropke)等。这一派从1937年起编辑出版《经济秩序》丛书，1948年起主办《奥尔多：经济与社会秩序年鉴》。这些出版物代表着他们的观点。

基本理论　在战前这一派的中心理论是理念模型学说。理念模型不是描绘具体经济运行的模型，而是用以进行理论分析的抽象模型。这一理论把从古至今的经济分为两种理念模型：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管理经济。前者是由价格机制来调节经济，后者是由政府的计划与命令来调节经济。这两种经济都有其缺点。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会引起垄断，而垄断就破坏了价格机制的正常作用，使经济发生波动，进行引起国家干预，造成个人自由的丧失。在中央管理经济中，缺乏价格机制，计划无法使各个经济部门配合与协调，而且完全抹杀了个人的自由。正因为这两种经济都有缺点，所以应该建立第三种秩序：竞争秩序。这是由国家鼓励并维护的一种经济秩序，目的在于保证完全竞争的实现。这种经济秩序由价格机制进行调节，但国家要通过阻止垄断集团的形成和维持适当的货币供给量来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战后，这一学派则在理念模型学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行的，能保证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的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由价格机制调节经济的运行，又有国家保证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能使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与个人的自由协调一致。这是一种能保证生产效率、自由和人类文明生活的社会经济秩序，是介于自由市场经济与中央计划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基本经济目标是实现大众福利，即实现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这种“三位一体”的目标。第二、基础是市场经济。这就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保证自由竞争，整个经济的运行由价格机制调节。第三、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国家的作用包括兴建并维护基础设施，稳定货币、稳定物价，反对垄断，协调劳资关系等。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调仍然是强调自由放任政策，属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政策主张与运用　二战以后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L·艾哈德等人曾在联邦德国政府中任要职。因此，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则成为联邦德国实际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第一、控制货币量，稳定通货，稳定物价，战后联邦德国进行了币制改革，并在以后始终注意控制货币量。第二、限制垄断，保护自由竞争。为此在1957年制定并通过了《反对限制竞争法》，并在1958年成立了实施这一立法的“联邦卡特尔局”。第三、劳资共同决策制度，以协调劳资关系。强调企业内工人对企业经营决策的部分参与权。第四、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政策。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救济、文化和教育鼓励等一套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机构，以及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国家的这些政策保障了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之上发挥企业的主动性，通过价格来调节经济，并通过自由竞争来保证经济繁荣。70年代之后，联邦德国政府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即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政策调节经济生活。

评价　弗莱堡学派是当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派在经济理论方面并没有什么创新，但它们的经济政策有力地刺激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复兴与发展。战后德国经济奇迹与这一学派的理论与政策是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这一学派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

节欲说（Augument of Thrift）　一种利润（利息）学说。按照其提出者西尼尔的说法，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和利润所决定，而工资是工人牺牲安逸所得的报酬，利润是资本家牺牲眼前享乐所得的报酬。换言之，利润无非是对资本家“节欲”的一种报酬，鼓励他们放弃那些把资本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行为。显然，这种理论宣扬着劳动和资本地位平等、利益一致的庸俗思想，企图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节欲说出现后曾为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但由于“节欲”一词的辩护色彩过于露骨，它也遭到一些有力的批评。于是到19世纪末，马歇尔又用“等待”一词取而代之，声称资本利息是资本家“等待”的报酬。这种再版的“节欲说”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节约的悖论（Raradox Of Thrift）　一种关于消费对国民收入影响的似非而实是的理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增加消费会通

过增加总需求而导致国民收入增加，失业减少；反之，节制消费会通过减少总需求而导致国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根据传统的观念，放纵消费是坏事，节制消费是好事。但这种传统观念与国民收入决定论却存在着矛盾：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对个人来说是坏事，但消费的增加减少了失业，对社会却是好事；节制消费，增加储蓄，对个人来说是好事，但消费的减少增加了失业，对社会却是坏事。凯恩斯把这种对消费的矛盾评论，即个人的恶行与社会的善行，或个人的善行与社会的恶行之间的矛盾，称为"节约的悖论"。应该指出，这种悖论只是在短期中，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存在的。在长期中，或者当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这种悖论就不存在了。

节省劳动的技术进步（Labour-Saving Technical Progress）　一种技术进步的类型。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把技术进步分为三种类型，即节约资本的、节约劳动的和中性的。如果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换言之，如果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函数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低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就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使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润的相对份额上升，而工资的相对份额提高。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的解释是，如果在技术进步前后两个生产函数利润率相等的点上，技术进步以后的生产函数有较高的资本-产量比率（k／y），即为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简而言之，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就是在技术进步中更多地使用了资本，更少地使用了劳动，从而使资本——产量比率提高。

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Capital-Saving Technical Progress）　一种技术进步的类型。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把技术进步分为三种类型，即节约资本的、节约劳动的，和中性的。如果技术进步降低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换言之，如果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函数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大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就是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使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润的相对份额下降，而工资的相对份额提高。经济学家R·哈罗德的解释是，如果在技术进步前后两个生产函数利润率相等的点上，技术进步以后的生产函数有较低的资本——产量比率（k／y），即为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简而言之，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就是在技术进步中更多地使用了劳动，更少地使用了资本，从而使资本——产量比率下降。

议价（Bargaining）　议价在这里是指两方或更多几方就可能的合作而进行的谈判，这种合作也许是交易、雇佣（集体议价）或合资经营等等。下面仅讨论两方的议价，且假定具有完全的信息。议价的结果既可能是就合作的问题达成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叫冲突。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任何可能的结果都可表示为向量X＝（x_1,x_2），x_1,x_2是商品向量，且为对应于双方的两种结果。另一个方法是将每种结果等同于效用向量u＝（u_1u_2），其中$u_1=u_1$（x_1），$u_2=u_2$（x_2），分别表示按照双方的效用函数u_1，u_2，他们从商品支付（pay off）或货币支付中取得的效用。为了方便，将x＝（x_1，x_2）定义为物质结果，u＝（u_1，u_2）定义为效用结果。在物质结果上，议价的状况由其物质可行集F^*。（F^*是所有可能的结果x的集合）以及物质上的冲突点$C^*=(C_1^*,C_2^*)$（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在此点上两个部分C_1^*,C_2^*是双方应得到的商品或货币支付。）因为C^*也是一种可能的物质结果。所以$C^*\leftarrow F$。在效用结果上，议价的状况由其效用可行集F和效用冲突点C＝（C_1，C_2）（它规定在没能达成一致情况下双方的效用付出）赋予它的特点，显然

$$C_1=U_1(C_1^*)\qquad C_2=u_2(C_2^*)$$

$$F=\{(u_1u_2)|u_1=u_1(x_1),\ u_2=u_2(x_2)\ (X_1X_2)\leftarrow F^*\}$$

$$C\in F$$

大部分关于议价的经济文献都有以下假定即效用结果的充分性（sufficient of utility outcome）在由F和C＝（c_1c_2）定义的议价的分析中假定所有必要的信息都是具备的。

1.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议价

古典经济对两方议价的探讨：1个人理性（indiuidnal rationality）：一个理性的议价者将不会同意小于其冲突支付的效用支付，这样，$u_1>C_1$，$u_2>C_2$。2.共同理性（joint rationality）：两个理性的议价者如果在可行集F中，有另外的效用结果$u^1=(u_1^1,u_2^1)$，对双方产生更高支付（pay offs），$u_1^1>u_1$，$u_2^1>u_2$，那么就不会在效用结果u＝（u_1，u_2）上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双方同意的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或至少是弱帕累托最优——可行集F上的点（图1）。在图1中F是效用可行集，C是冲突点，三角区域bcd是满足个人理性条件的点集。F的左上方界线abde是所有帕累托最优点集，bcd与abde相交的区域是bd弧，它满足两个理性假定。对于bd线段，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叫法，我们现用"谈判集"这一术语，同时将b端点称之为1方的让

步限制点，因为它是1方所能接受的最次可能结果。同样将d点叫2方的让步限制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所谓的弱议价理论，因为它仅告诉我们谈判集bd，而没有进一步说明谈判到底发生在哪一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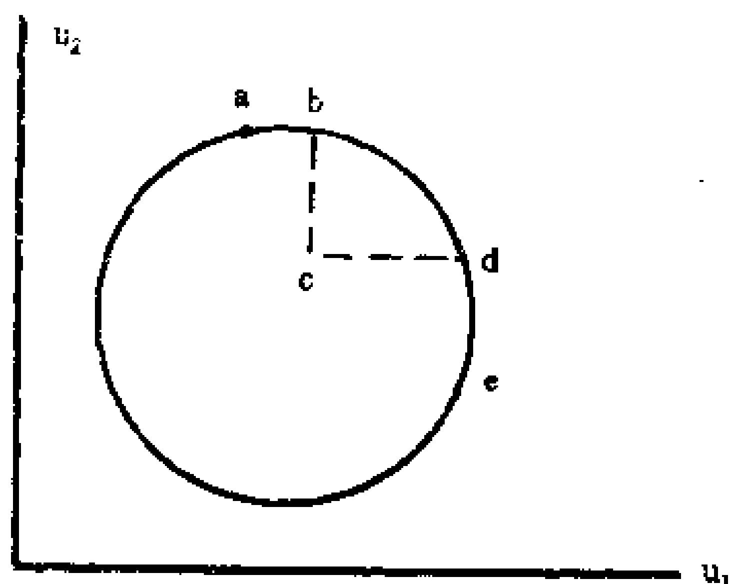


图1

2.纳什解：第一个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强议价理论来确定唯一的协定点的是丹麦经济学家左森(F.Zeuthen)(1930)，他首先认识到这样的理论是建立在双方对待风险的态度，特别是每一方都宁愿冒着冲突的危险而不愿接受不乐意的结果这样考虑的基础之上的。冯·诺意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特恩(O.Morgenstern)的理论是走向强议价理论的必要的一步，但他们的分析仍然没有走出新古典弱议价理论的范畴，不过他们为以后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特别是冯·诺意曼——摩根斯特恩效用函数，强议价理论是建立在冯·诺意曼——摩根斯特恩效用函数定义的可行集F和冲突点 $C=(C_1C_2)$ 基础之上(弱议价理论中的F和C是以序数效用定义的。)第一个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来建立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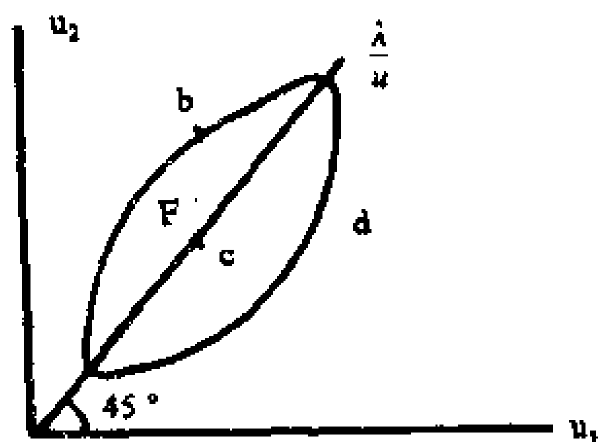


图2

议价理论的是冯·诺意曼的学生纳什(J.Nash)。他假定以冯·诺意曼——摩根斯特恩效用函数定义的F是一个密连的凸集，那么双方达成一致的点 $\bar{u}=(\bar{u}_1,u_2)$ (就是人们所说的纳什解)满足以下四个公理：(1)有效性(etliciency)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同理性的情形。如果博弈双方的相互转换不改变博弈G本身，那么就叫G是对称的。它的几何意义是可行集F必定是关于 $u_1=u_2$ 线对称的(图2)冲突点 $C=(C_1C_2)$ 肯定是在45°线上，这样才有 $u_1=u_2$。(2)对称性，一个对称博弈将会有一个协定点 $\bar{u}=(\bar{u}_1,\bar{u}_2)$，其中 $\bar{u}_1=\bar{u}_2$。因为交易双方正好有相同的策略可能性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任何一方也就不能指望有一个比他对手支付更少的协议产生。这两个公理确定了对称博弈有唯一的协定点 $\bar{u}$，就是45°线与bd的交点。后面两个公理是关于非对称博弈的。(3)线性不变性(inear invariance)。假定博弈G′是将G中一方的效用进行保留序列(order-preserving)的线性变换，且使其他的效用保持不变而得到的。这样，对于任何物质结果 $x=(x_1x_2)$，对应的效用结果 $u=(u_1u_2)$，由转换的效用结果 $u'=(u_1^1u_2^1)$ 代替，其中 $u_1^1=au_1+b, a>0, u_1^1=u_2^1$。如果在原来博弈G中，博弈者在对应于 $\dot{u}=(\dot{u}_1\dot{u}_2)$ 的物质结果 $X=(x_1x_2)$ 上达成一致，那么在新博弈 *G′* 中，博弈者在同样的物质结果和 $\dot{u}^1=(\dot{u}_1^1\dot{u}_2^1)$ 上达成一致。其中 $\bar{u}_1'=a\bar{u}_1+b\quad \bar{u}_2'=\bar{u}_2$。公理3保证了议价的结果独立于双方效用的个人间比较。实际上，常常有人将社会伦理因素纳入分析之中，这里则不作考虑。如一方向另一方让步不是因为利他，而是因为在此方看来如不作此让步就无法达成一致。(4)独立于无关选择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假定博弈G有冲突点C，可行集F，协定点 $\dot{u}$。G′从G转换而来，但限定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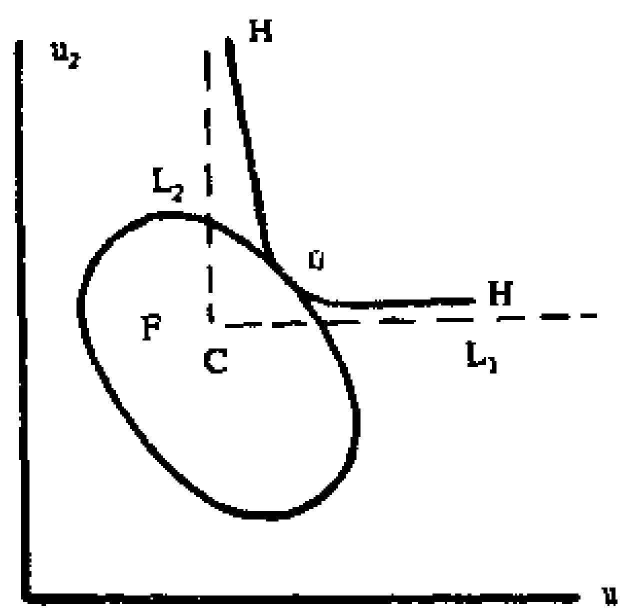


图3

的可行集F′CF，类似地使C和 $\bar{u}$ 都保留在新的可行集F′中，那么C也是G′的冲突点，$\bar{u}$ 是G′的协定点。另一种选择(alternatives)也是一种可行结果，无关的另一选择是指不被博弈者的协定点所选择的可行结果。博弈G′就将G中的一些无关选择的点排除在可行集之外，但不排除最初的协定点 $\bar{u}$ 本身。公理4实际上是说从F中排出一些无关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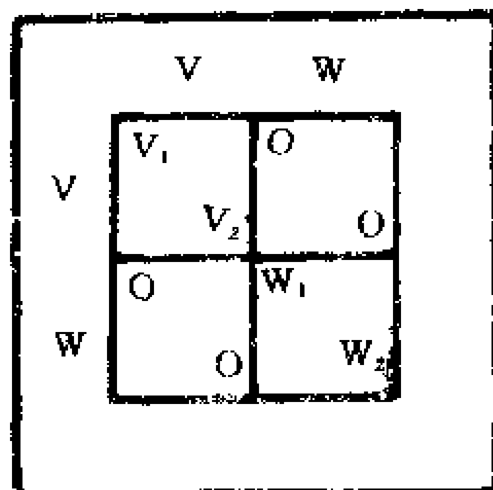
不改变博弈的协定点 U，排出由线性转换来完成。纳什表明上述四个公理隐含以下定理，我们叫定理 1：博弈的协定点是唯一的效用向量$\overline{u}=(\bar{u}_1, \bar{u}_2)$，使得产品（叫纳什产品）$\pi=(u_1-C_1)(u_2-C_2)$ 最大化。限制条件是$(u_1u_2)\leftarrow F$，$u_1>c_1$　$u_2>c_2$。如图三所示，L_1、L_2 分别是通过 C 点的水平线和垂直线，$C=(c_1c_2)$ 是冲突点，$\bar{u}$点是 L_1、L_2 渐近双曲线 HH 与 F 的右上方边界线的交点。这就是$\bar{u}$点的几何上的特点。

3.左森的议价模型。尽管左森的分析在技术上比纳什的要差，但它是纳什分析的有用的补充，因为它使得双方对待风险态度的相互依赖性更为明确。假定在议价的某一阶段，博弈者 1 的最后报价对应的效用向量 $v=(v_1v_2)$，博弈者 2 最后报价对应的效用向量 $w=(w_1w_2)$。$v\leftarrow\delta F$，$w\leftarrow\delta F$（δF 是 F 的右上边界线），且 $v_1>w_1$ 但 $v_2<w_2$。在这种情况下，哪方必须做出下一步的让步？左森认为让步肯定来自具有更小风险限制的一方。除非双方风险限制相等，这时双方都作让步以避免冲突。我们将此称之为左森原理，它与纳什解具有很紧密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定理 2：如果博弈双方遵循左森原理，下一次让步肯定是由最后报价所对应的纳什产品更高的那一方作出。除非双方最后报价对应相同的纳什产品，这时双方都作出让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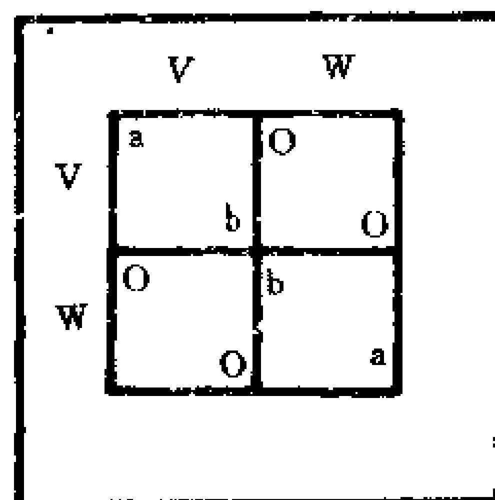
4.纳什解的塞尔顿（Selten）定理，左森——纳什理论中，有一个包括无限多可行点的可行集 F。现在我们看看仅有两个可能的协定点，$v=(v_1v_2)$和 $w=(w_1w_2)$的情形　如果二者在某一个点上达成一致，那么这个点就是结果。如果二者都不能被双方同时选择，他们就只有冲突支付 C_1 和 C_2。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选择双方的效用函数时，假定 $C_1=C_2=0$。那么 2×2 博弈可以用博弈 1 中的支付矩阵表示。假定结果 v 对博弈者 1 较好，w 对博弈者 2 较好，这样：

$v_1>w_1$ 但 $v_2<w_2$

塞尔顿（R.Selten）表明这个简单的博弈形式可以仅用两个定理加以彻底的分析。一个是线性不变定理，它与纳什定理 3 是一样的，另一个是单调性定理，下面将予以介绍。首先，我们作出如下定义：一个如图博弈 1 的 2×2 博弈如果 $v_1=w_2=a$　$v_2=w_1=b$，则它是对称的。这样一个对称博弈就是博弈 2 所表示的那样。很明显，在一个对称的博弈中，没有一个数学标准来选择两个均衡点 v，w 中的一个作为偏好于其他均衡点的解．单调性定理可作如下解释：G 是对称的，博弈 G^* 是 G 通过增加与均衡点$\overline{V}$（或$\overline{w}$）相对应的一个或两个支付而得来的。那么$\bar{v}$或$\overline{w}$就是 G^* 的解，线性不变性定理和单调性定理会有以下定理，这就是定理 3：博弈者 1 将$\bar{v}$或$\overline{w}$作为它的解是依赖于到底是$\pi(\bar{v})>\pi(\overline{w})$，还是$\pi(\overline{w})>\pi(\bar{v})$，这里$\pi(\bar{v})=v_1v_2$，$\pi(\overline{w})=w_1w_2$它们是分别与$\bar{v}$和$\overline{w}$相对应的纳什产品。



博弈 1



博弈 2

5.对冲突支付 $C=(c_1c_2)$ 的进一步讨论．到现在为止，两个博弈者的冲突支付 C_1 和 C_2 还是事先给定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C_1 和 C_2 由双方的报复策略 t_1t_2 决定。t_1 和 t_2 分别由博弈者 1 和博弈者 2 在不能达到一致时施向对方的，这样 C_1 和 C_2 可以写成双方冲突支付函数的形式：

$C_1=H_1(t_1t_2)$　　$C_2=H_2(t_1t_2)$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情况，纳什提出以下模型：博弈的进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宣布他们的威胁策略 t_1，t_2，它们是在不能达成一致时要用的报复策略，那么实际上就以上式表示的形式规定了冲突支付 C_1 和 C_2。在第二阶段，双方将选择一个协定点$\overline{u}=(\bar{u}_1\bar{u}_2)$，此点与定理 3 一致，现在就可以视 C_1、C_2 为给定的，在这个定理的议价模式中，每方都只有一个可能的威胁，就是一种简单的不合作。在刚描述的模型中，双方都可在许多威胁策略中作出选择。前者叫固定威胁的纳什模式，后者叫多威胁的纳什模式。在第一阶段，双方必须选择他们的威胁策略。以便使他们的最终支付$\bar{u}^*$、达到最大。如何选择此最优威胁策略这将是下述定理所要说明的问题。此定理是定理 4：假定博弈者 2 的威胁策略 t_2 给定，博弈者 1 必

须选择他的威胁策略 t_1，以便使下述比率最大化：

$$R=\frac{u_2-C_2}{u_1-C_1}=\frac{u_2-H_2(t_1t_2)}{u_1-H_1(t_1t_2)}$$

另一方面，如果博弈者1的威胁策略给定，博弈者2必须选择他的威胁策略以使R最大。

6.总结。纳什的二人议价的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强理论，它定义单一效用向量 $\bar{u}=(\bar{u}_1\bar{u}_2)$ 为两个理性议价者的协定点，对双方来说，这一点令对他们产生最高支付 $\bar{u}$。(1) 一方越想冒冲突的危险，他的对手越不想冒冲突的危险。(2) 如果他向他的对手作进一步的让步，他就能以对他来说是不变的效用成本授予他对手更小的效用，(3) 他的冲突支付 C_i 就越高，他的对手的冲突支付越低，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博弈者i在许多威胁策略中有一个选择，他通过使 $R=(u_i-c_i)/(u_j-c_j)$ 最大化而让最终支付 u_i 最大。R是i的冲突成本与其对手冲突成本之比。两个成本都以冯·诺意曼——摩根斯特恩效用形式量度。值得指出的是纳什的理论试图预测两个理性议价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但他的预测建立在双方对对方行为的预期是内生的。这个假定在许多情况下是不现实的。

冯·诺意曼射线（Von Neumann Ray）　1935年，冯·诺意曼（Von Nenmann）针对多部门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型，诺意曼通过这一数理模型证明了多部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最大的平衡增长路径，这一路径就称为冯·诺意曼射线，又称为增长大道（turnpike growth path）或诺意曼路径（Neumann path）。

设在经济体系中，产品比例独立于时间t不变，利用冯·诺意曼技术可以得出固定的经济增长路径x(0)……x(t)…，一般来说，固定的经济增长路径就是平衡增长路径，以式子 $x(t)=r^tx$ 表示，其中x=x(0)为初始状态。在冯·诺意曼技术z中，依据限制条件 (x，y)←z，y≥rx，得出技术比率α，α=maxγ，那么，如果y≥αx，作为冯·诺意曼活动(x，y)，其中的向量x称为冯·诺意曼向量，而通过向量x的射线就是冯·诺意曼射线。冯·诺意曼射线决定了在冯·诺意曼技术中最大的均衡增长比例，描述了经济系统在长期中所能达到的具有可能的最大增长率的经济增长道路。可以证明，对于每一个冯·诺意曼技术z，在经济系统中都有相应的一组（α，(x，y)，p），满足 (x，y) ←z，αx≤y，pw≤αpv ((v，w) ←z)，其中 (x，y) 为经济系统中技术上可行的活动，α为最大的可能增长比率，P为与α相应的独立于时间t的价格轨道，即冯·诺意曼价格向量。设经济系统在初始时间段t=0时，处于x(0)=X状态，那么通过技术上可行的活动 (x，y)，就可以在初始的产品比例不变的情况下，使经济运行达到最大的可能增长比率α，同时也使经济系统中利息率最大，并且等于最大的可能增长率，这种状态就称为冯·诺意曼均衡（Von Neumann equilibrium）。诺意曼指出，在经济扩张的过程中，某些产品的增长率可能会高于利率，但是，这种情况在平衡增长的经济中，会形成下期投入的过量供给，从而使这类产品的价格为零。

冯·诺意曼技术（Von Neumann Technology）　本世纪以来，动态经济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在这一领域出现了许多数理经济模型，冯·诺意曼技术就是为了对动态增长进行数学研究而提出的，用以分析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诺意曼技术表现为一个集合Z，其中的元素为技术上可行的过程或活动，即Z=(x，y)，x为投入向量，y为产出向量，均为n维非负向量。作为冯·诺意曼技术，其基本特征是：(1) 经济增长不受资源的限制，经济活动的强度是无限的，表示为，若(x，y)←Z，λ≥0，则λ(x，y)←Z。(2) 经济系统中各产业部门投入、产出的品种是多样的、经济中存在联合产品，表现为，若有(x，y)←Z，(u，v)←Z，则有(x+u，y+u)←Z。(3) 经济体系能够生产所有商品，这表明经济体系中存在某种活动 (x，y)，其中y向量的所有元素是正的。(4)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作为诺意曼技术，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作为狭义的诺意曼技术，又称为冯·诺意曼模型，诺意曼本人在建立模型时提出了许多严格的限制条件，如封闭经济系统，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投入——产出系数固定，不存在消费和储蓄行为，仅有生产过程等，在这些前提假设下，诺意曼技术Z是一对mxn矩阵，将投入矩阵设为A，产出矩阵设为B，u为经济活动的强度，那么则有Z={(x,y):x=Au,yBu，u≥0}。除狭义的诺意曼技术之外，只要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满足前述诺意曼技术的四个基本特征，就称为广义的诺意曼技术，广义的诺意曼技术又称为诺意曼——盖尔模型(Neumann— Gale model)。莫根斯特恩 (O.Morgenstern)、汤普森 (G.Thompson) 等人也进一步放宽了在狭义诺意曼模型中的严格限制条件，并在诺意曼技术中引入了消费、劳动、工资等因素。现今，诺意曼技术不仅用于建立模型，描述经济系统中的均衡状态，也用于分析经济体系的增长路径等问题。

未体现出来的技术进步（Dis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一种没有体现在新机器设备或其他物质

因素上的技术进步，从而这种技术进步也就与资本积累或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变量相关。这种技术进步往往表现为人的身体、知识或技术的提高，并由于这些提高而增进了劳动生产率。

末日裁判书（Domesday Boor） 指1806年英国国王威廉一世所颁布的，关于英国土地、财产、农民与牲畜等方面的调查清册。1805年底，英国国王颁布了进行全国性大规模调查的命令，到了1806年，调查工作就已经结束，从中可见其效率之高。调查的具体做法是，皇家特派员带着所要调查的问题下到各郡，在那里，地方陪审团发誓之后回答这些问题。经过调查所搜集到的数据与资料被呈送给国王，皇家官员把这些数据与资料归纳整理，编辑成提要，这就是末日裁判书。它按郡排列，详细记载着皇家地产与佃户的情况。末日裁判书共分两大卷，即"小末日裁判书"与"大末日裁判书"，前者是有关埃塞克斯、诺福克以及萨福克三个郡的全部详细资料，后者则是对这三个郡以外的其它各郡的调查结果。在每个郡的条目下开列出拥有土地人的名单，详细记载着庄园、封地、土地面积、雇工人数以及鱼塘、磨坊等等的数字，然后用英镑计算出每一项的价值。《末日裁判书》于1783年以对开本的形式印刷出版，当时出了两卷，1811年与1816年又分别增印了第三卷与第四卷，其中包括了更多的细节，还涉及到与那次调查有关的一些事件。《末日裁判书》中提供了有关英国的农业、价格以及租金等方面的大量详尽的统计数字，英格兰的许多村、镇的名字在《末日裁判书》中首次出现。当然，威廉国王进行这次大型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科学研究，而是通过对英国农村各方面的情况作最为详尽的调查与记录，来了解潜在的纳税情况，从而最大程度地增加政府的税收，可见，《末日裁判书》是一本指导纳税的手册。《末日裁判书》现存于英国伦敦公共档案馆，它对于历史学家与经济统计学家来说，无疑是一部珍贵的资料。但是，其中使用的公式与语言都相当晦涩，难于理解，这又为后人研究这部书增加了许多困难。

平衡预算（Balanced Budget） 财政预算的一种状态，即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政府支出与税收相等。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坚持平衡预算是健全的财政政策的基础，主张实现年度的平衡预算。凯恩斯首先打破了这一信念，提出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减少政府税收，增加政府支出，即以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A·汉森提出了"长期预算平衡"的概念，主张平衡预算不以年度为限制，而是通过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与繁荣时期财政盈余的相互补偿来实现长期中或周期中的平衡预算。在60年代，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提出了"充分就业预算盈余"的概念，主张打破平衡预算的旧框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来确定财政预算，其结果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却使财政难于实现平衡预算。

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APC） 消费支出在现期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y表示现期收入，c表示消费支出，则平均消费倾向的公式为：

$$APC=\frac{c}{y}$$

在一般情况下，平均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由于全部收入分为消费与储蓄两部分，所以，平均消费倾向与平均储蓄倾向之和必定等于一。平均消费倾向这个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所提出，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平均储蓄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Save，APS） 储蓄在现期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y表示现期收入，s表示储蓄，则平均储蓄倾向的公式为：

$$APS=\frac{s}{y}$$

在一般情况下，平均储蓄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由于全部收入分为消费与储蓄两部分，所以，平均消费倾向与平均储蓄倾向之和必定等于一。平均储蓄倾向这个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所提出来的，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平衡预算乘数（Balanced Budget Multiplier） 当政府支出的增加量等于税收增加量，即财政预算平衡时，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其数值为国民收入增加量与政府支出增加量之比率。这时，增加的政府支出完全由税收的增加提供资金。在简单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即不考虑利率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时，税收的增加量等于私人支出的减少量，从而平衡预算乘数为一。设政府支出增加（△G）所引起的总需求增加量为△AD，△AD包括政府支出增加所直接引起的总需求增加量，以及这种增加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增加量。这种消费量的增加为边际消费倾向（C）与政府支出增加量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量（△y）减去增加的税收量（△TA）之乘积，即为C·（△y−△TA）。由此得出：

$$\triangle AD=\triangle G+C\cdot(\triangle y-\triangle TA)$$

$$\triangle y=\triangle AD$$

$$=\triangle G+C\cdot(\triangle y-\triangle TA)$$

$$\triangle y = \frac{1}{1-c}(\triangle G - C \cdot \triangle TA)$$

又因为，在平衡预算的情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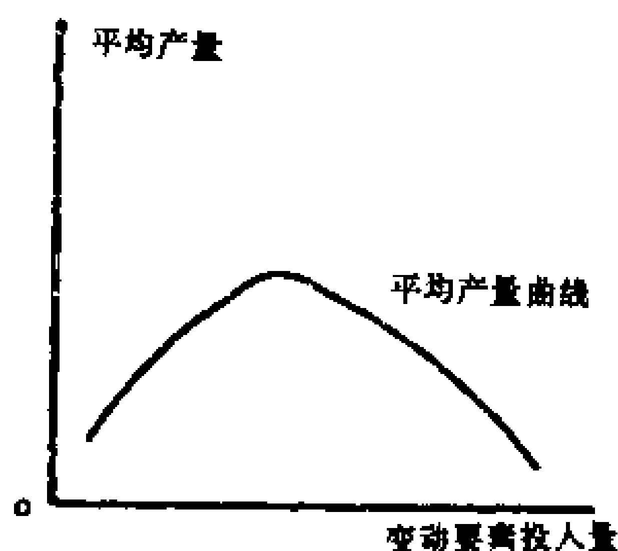
$\triangle G = \triangle 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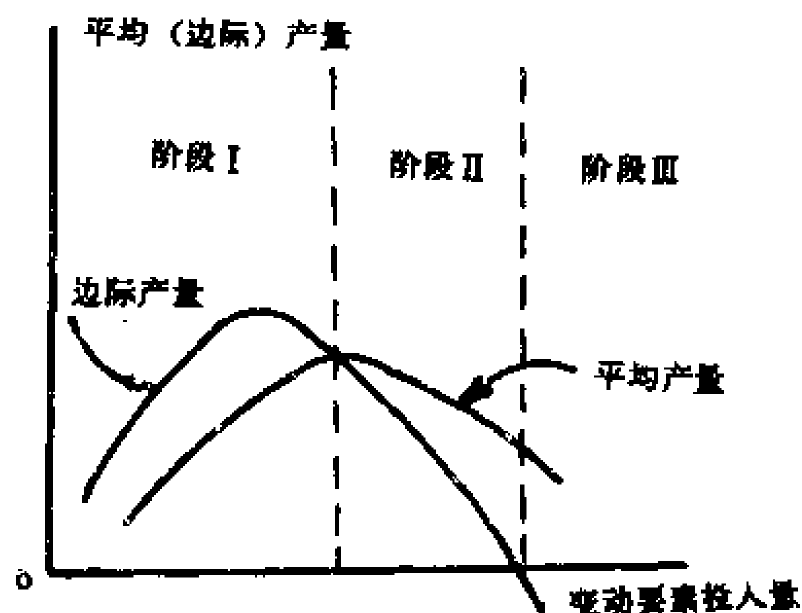
所以：

$$\triangle y = \frac{1}{1-C}(\triangle G - C\triangle G)$$
$$= \frac{1-C}{1-C} \cdot \triangle G$$
$$= \triangle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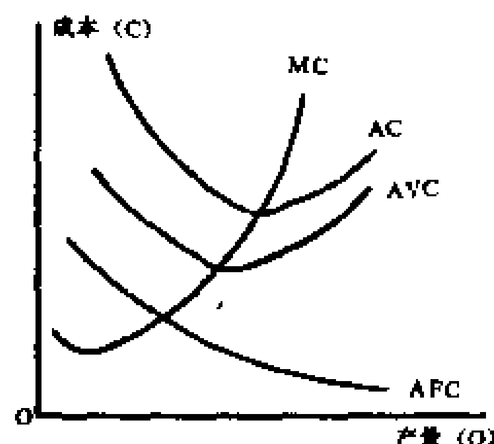
从上式中看出，在平衡预算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增加量等于国民收入增加量，所以，平衡预算乘数为一。但是，由于边际倾向小于一，增加税收所引起的消费的减少要小于税收的增加量，而这种税收的增加量却会由政府完全支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平衡预算乘数要大于一。在 IS–LM 模型中，当考虑到利率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时，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利率上所导致的减少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平衡预算乘数又会小于一。由此得出，在实际中平衡预算乘数的大小还取决于所增加税收而引起收入减少中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投资的利率弹性以其由这一弹性决定的挤出效应的大小。

平均产量（Average Product）　平均产量是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当研究某种产品短期的生产函数时，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发生变动，其它生产要素的投入固定，那么平均产量被定义为总产量除以投入的变动要素量。一般而言，平均产量的变化与边际产量的变化一样将先后经历递增、不变、递减三个阶段。因此，平均产量曲线是一条倒u型曲线。上图反映了平均产量这一变化特征。曲线表明，平均产量先递增，到达某一点时不变，然后开始递减。根据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的变化情况可以把生产分为三个阶段。从原点到平均产量的最大值点为第一阶段。从平均产量的最大值点到边际产量等于零这一点为第二阶段。超过了这一点以后为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以后边际产量为负的值。只能将生产推进到第二阶段，而绝不能将生产推进到第一或第三阶段。（见上图）





平均成本（Average Cost）　平均成本（AC）是指平均每单位产量所花费的成本，它是总成本



（TC）除以产量（Q），即$AC = \frac{TC}{Q}$。象短期内总成本可以分为总固定成本与总变动成本一样，短期内，也可以将平均成本分为平均固定成本（AFC）与平均变动成本（AVC）。平均固定成本等于总固定成本（TFC）除以产量，即$AFC = \frac{TFC}{Q}$；平均变动成本等于总变动成本（TVC）除以产量，即$AVC = \frac{TVC}{Q}$。平均成本等于平均变动成本加平均固定成本，一般产品生产中大都经历要素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的过程，这使得要素的平均产量先上升后下降，平均产量曲线呈倒U型。产品生产上的这一技术特征也反映在成本函数中，它导致边际成本先递减后递增，这使得平均成本先下降后上升，平均成本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都是U型（见上图）。这反映了成本函数与生产函数的对偶特征。右图所反映的是某产品生产的平均成本曲线。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关系是当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时，随产量增加平均成本

下降；当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时，随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上升；因此，边际成本过平均成本的最低点（见上图）。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关系是：长期成本曲线是无数个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线。

平衡增长途径（Balanced Growth Path） 经济增长中如果长期均衡的产量、消费与投资都具有相等的增长率，则这种增长状态称为平衡增长途径。这时资本——产量比率是固定的，人均产量、人均消费、人均投资与人均资本量都按同一比率增长，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是稳定的，劳动与资本的收人相对份额也是稳定的。长期均衡的产量增长率亦称自然增长率。平衡增长途径的各经济变量水平取决于自然增长率与储蓄率。当自然增长率为既定时，不同的储蓄率会有不同的均衡增长水平。一般认为，当总生产函数为线性生产函数时存在平衡增长途径。在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模型的技术矩阵是不可分的（即各部门之间的投人与产出相互依赖），则平衡增长途径是唯一的。当生产函数为非线性的（即有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或经济模型的技术矩阵可分时，平衡增长途径可能有几个。研究平衡增长途径的模型有W·列昂扬夫的投人——产出模型、纽曼的活动分析模型，以及纽曼—列昂扬夫混合模型等。这里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探讨平衡增长途径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假设生产要素为资本（K）与劳动（L），增长率为G，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率为λ，这时有效劳动力（effective labor force）的途径（E_t）为：

$$E_t = L_t e^{\lambda t} = L_0 e^{Gt} e^{\lambda t} = L_0 e^{(G+\lambda)t} \qquad (1)$$

（1）式中L_0为零期劳动力。

设总生产函数为线性生产函数，则有

$$Q = F(K, E) \qquad (2)$$

（2）式中，Q为产量，E为有效劳动力。其中F满足下列条件：

$$\frac{\partial F}{\partial k} > 0, \frac{\partial F}{\partial L} > 0, \frac{\partial^2 F}{\partial L^2} < 0, \frac{\partial^2 F}{\partial^2 K} < 0;$$

$$\lim_{K\to 0}\frac{\partial F}{\partial K} = \infty, \lim_{K\to\infty}\frac{\partial F}{\partial K} = 0.$$

$$\lim_{E\to 0}\frac{\partial F}{\partial E} = \infty \quad \lim_{E\to\infty}\frac{\partial F}{\partial E} = 0$$

根据线性生产函数的性质，当K与E按等比率（a）变动时，产量亦按此比率变动：

$$aQ = F(aK, aE) \qquad a > 0 \quad (3)$$

设$a = \frac{1}{E}$，则每一有效劳动力的产量（q）为：

$$q \equiv \frac{Q}{E} = F\left(\frac{K}{E}, G\right) = f\left(\frac{K}{E}\right) = f(k) \qquad (4)$$

根据F满足的条件，F（K，E）为一严格单调递增的凸函数，所以f（k）具有以下性质：

$$f'(k) > 0, \quad f''(k) < 0$$

$$\lim_{K\to 0} f'(k) = \infty \qquad \lim_{K\to n} f'(k) = 0,$$

这就是平衡增长途径存在的条件。

可以根据（4）式来探讨劳动力增加、技术进步和储蓄率对平衡增长途径的决定。假设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储蓄全部为投资所吸收，储蓄决定资本积累。再假定储蓄为产量的一个固定比率，则储蓄率S_t为：

$$S_t = SQ_t \qquad (5)$$

资本的折旧率为d，因此投资为：

$$I_t = \frac{dk}{dt} + d \cdot K_t \qquad (6)$$

由于$I_t = S_t$，所以，根据（5）式与（6）式得出：

$$\frac{dk}{dt} = SQ_t - dk_t \qquad (7)$$

在此基础之上，可以用经济增长的基本微分方程式探讨实际的资本——有效劳动比率（$\frac{K}{E} = k$）是否可以达到均衡的资本——有效劳动比率（k^*）。如果达到了，而且k^*是一个稳定均衡，则经济可否在各种变量变动的情况下实现平衡增长。

对$k = \frac{K}{E}$取自然对数得：

$$G_n k_t = G_n k_t - G_n E_t \qquad (8)$$

对（8）求导，得到k的增长率为：

$$R_t \equiv \frac{dk_t / dt}{R_t} = \frac{dk_t / dt}{k_t} - \frac{dE_t / dt}{E_t}$$

$$\equiv K_t - E_t \qquad (9)$$

根据（1）式和（7）式得出：

$$\overline{R}_t = \frac{sQ_t - dK_t}{K_t} - (G + \lambda) = \frac{SQ_t}{K_t} - (d - G + \lambda)$$

将上式中Q_t和K_t各除以E_t，得出

$$\overline{R}_t = \frac{sf(k)}{k} - (d + G + \lambda) \qquad (10)$$

（10）式说明k的增长率为其自身的函数。

均衡的资本——有效劳动力比率（$\frac{k}{E} = R$）是使得$\overline{K} = 0$的那个特定值，设该值为k^*，则

$$\frac{sf(R^*)}{R^*} = (d + G + \lambda) \qquad (11)$$

将（11）式写为：

$$q^* = f(R^*) = \frac{d + G + \lambda}{S} R^* \qquad (12)$$

(12) 式表示如果每有效劳动力之产量 (q^*) 为 $\frac{d+G+\lambda}{s}R'$ 时，$[K][E]$ 达到均衡状态。由于 $f(K)$ 为一严格单调递增凸函数，且满足 $f^1(0)=\infty$ 和 $f^1(\infty)=0$，因此，均衡的 k^* 为正数，而且是稳定的。当实现了这种均衡的 k^* 时，各有关变量为：

(1)每有效劳动力产出 $(\frac{Q}{E})$ 增长率为：

$$q=f(k)\Rightarrow \vec{q}^*=\vec{f}(k^*), \quad (13)$$

且 k^* 为稳定均衡，是一常数，所以：

$$\vec{q}^*=\vec{f}(k^*)=0 \quad (14)$$

(2) 总产量增长率为：

$$Q=q\cdot E\Rightarrow \vec{Q}=\vec{q}+\vec{E} \quad (15)$$

而且 $\vec{E}=G+\lambda$，$\vec{q}^*=0$，所以

$$\vec{Q}^*=\vec{q}^*+\vec{E}=G+\lambda \quad (16)$$

(3) 每劳动力产量 $\left(\frac{Q}{L}\right)$ 增长率为：

$$\left(\frac{\vec{Q}}{L}\right)=\vec{Q}-\vec{L},$$

因为，

$$\vec{Q}^*=G+\lambda \quad ,\vec{L}=\lambda,$$

所以：

$$\left(\frac{\vec{Q}}{L}\right)^*=\vec{Q}^*-\vec{L}=G+\lambda-\lambda=G \quad (17)$$

(4) 投资增长率为：

$$I=SQ\Rightarrow \vec{I}=\vec{Q}$$

所以，

$$\vec{I}^*=\vec{Q}^*=G+\lambda \quad (18)$$

(5) 每有效劳动力投资 $\left(\frac{I}{E}\right)$ 增长率为：

$$\left(\frac{\vec{I}}{E}\right)=\vec{I}-\vec{E}.$$

因为 $\vec{I}^*=G+\lambda,\vec{E}=G+\lambda$，

所以，

$$\left(\frac{\vec{I}}{E}\right)=\vec{I}^*-\vec{E}=G+\lambda-(G+\lambda)=0 \quad (19)$$

(6) 每劳动力投资 $(\frac{I}{E})$ 增长率为：

$$\left(\frac{\vec{I}}{L}\right)=\vec{I}-\vec{L}\Rightarrow$$

$$\left(\frac{I}{L}\right)^*=\vec{I}^*-\vec{L}=G+\lambda-G=\lambda \quad (20)$$

(7) 资本 (K) 增长率为：

$$K=E\cdot k\Rightarrow \vec{K}=\vec{E}+\vec{k}\Rightarrow$$

$$\vec{K}^*=E+\vec{k}^*=G+\lambda+0=G+\lambda \quad (21)$$

(8) 每有效劳动力资本量 $(\frac{K}{E})$ 增长率为：

$$\left(\frac{\vec{K}}{E}\right)^*=\vec{K}^*-\vec{E}=G+\lambda-(G+\lambda)=0 \quad (21)$$

(9) 每劳动力资本量 $\left(\frac{K}{L}\right)$ 增长率为：

$$\left(\frac{\vec{K}}{L}\right)=\vec{K}-\vec{L}\Rightarrow$$

$$\left(\frac{\vec{K}}{L}\right)^*=\vec{K}^*-\vec{L}=G+\lambda-G=\lambda \quad (22)$$

(10) 资本-产量比率 $\left(\frac{K}{Q}\right)$ 增长率为：

$$\left(\frac{\vec{K}}{Q}\right)=\vec{K}-\vec{Q}\Rightarrow$$

$$\left(\frac{\vec{K}}{Q}\right)^*=\vec{K}^*-Q^*=G+\lambda-(G+\lambda)=0 \quad (23)$$

(11) 每有效劳动力消费 $\left(\frac{C}{E}\right)$ 增长率为：

$$sf(k^*)=(d+G+\lambda)k^* \quad (24)$$

(12) 消费 (C) 增长率为：

$$\vec{C}^*=E^*=G+\lambda \quad (25)$$

(13) 每劳动力消费 $\left(\frac{C}{L}\right)$ 增长率为：

$$\left(\frac{\vec{C}}{L}\right)=\vec{C}-\vec{L}\Rightarrow$$

$$\left(\frac{\vec{C}}{L}\right)^*=\vec{C}^*-\vec{L}=G+\lambda-G=\lambda \quad (26)$$

以上这些数值则是平衡增长途径实现的条件。平衡增长途径并不是现实的增长途径。但它为研究实际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

平均成本定价（Average Cost Pricing）　指厂商对产品制定价格的一种方法。它的具体内容是，产品价格等于对该产品的平均成本进行一定的加价。

平均成本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定义，一种是指单位产量的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之和，或者被称为"全部成本"；另一种是根据生产能力利用率或者产品产量的正常水平来推算平均成本；还有一种只是指平均的可变成本而言。采用不同含义的平均成本进行定价时，加价的含义也就会随之有所变化。在前两种情况下，加价指的是厂商所能得到的单位利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加价中还包含了对固定成本的折让。

利润加价通常比较稳定，一般不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就主要取决于产品单位成本的变化。如果实际单位成本出现了变化，那么厂商就会对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调整不可能与产品的单位成本同步变动，二者之间必定存在一个时差。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由企业的内部因素造成的实际平均成本的变动以及由于企业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实际平均成本的变动。对于前者而言，如果厂商提高了工厂的使用率，从而在短期内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这就会使平均成本有所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时间的增长、加班费的增加以及红利的增加，会导致平均成本有所上升，从而削弱了该成本下降的程度。至于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平均成本的变动，则多是由协议工资率、技术条件以及原材料等因素的变动所造成的。

1959年，高得雷（Godley）首先提出"正常价格假说"。在这个假说中出现了"正常平均成本"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厂商处于正常的工厂利用状态时所产生的平均成本。这个假说认为，价格可以随着平均成本同步变动，而加价对于正常平均成本的直接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前面说过，价格的变动与平均成本的变动之间是有一个时滞的。但是，价格对不同的平均成本进行加价的反应是不尽相同的。研究表明，价格对正常的平均成本进行加价是不具有周期性的，而它对于实际平均成本进行加价都具有超前周期的性质。由此可见，相对于正常的平均成本而言，价格并不随着商业周期的波动而升降，它的变动只与过度需求直接成比例。

在某些产业中，边际成本并不增加。在边际成本几乎不变的地方，它等于平均可变成本。对这种边际成本进行加价就形成了最优的产品价格，其中的加价是厂商本身需求弹性的简单函数。这一结论强调了平均成本对于制定价格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需求效应对于制定价格的作用比较小，但是很重要。

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上，平均成本定价会使厂商产生不同的反应。

在工业市场上，厂商要进行平均成本定价，就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可能产生的变化，又要考验企业的竞争战略。在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之前，厂商首先要通过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从而提高产量，来降低平均成本，进而降低产品价格来满足市场需求。

而在拍卖市场上，由于价格对所提供的商品的种类不能传达足够的信息，因此，这就要求厂商与消费者进行反复交易。奥肯认为，这一市场鼓励发展互惠的定价政策，价格主要由成本决定。生产者的善良愿望会在需求提高时放弃由于提高价格而得到的暂时利益，力图维持价格的稳定，除非生产成本出现变化。厂商多半以生产多样化的方式，并通过非价格竞争来树立企业良好的信誉。

尽管在长期中，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目标之一，但是在短期内，加价的相对稳定意味着企业暂时放弃了这一目标。

平等（Equality） 平等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社会平等与否需要某种参照体系。通常人们所说的平等根据不同的参照体系可以分为法律上的平等（得到官方的平等对待），机会上的平等（经济制度中的机会均等）以及后果上的平等（社会产品的平等分配）。平等一词的内涵非常不确切，上述三个方面的含义并不相一致，往往互相冲突。为了克服平等一词运用中的混乱，有人利用下述方法对平等加以整化：假定这样的社会体系：

(a) 地位（position）的集合。拥有此地位有以下权力：(1) 它能使人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和劳务。(2) 处于此地位的人可以进行物质上或形式上的活动。

(b) 拥有以上地位的成年人集合。

(c) 这些成年人的孩子集合。

(d) 对具体行为的社会规范的和法律的约束的集合。

法律上的平等涉及（b），(e)，(d)，就是社会规范或法律对处于相似地位的人以相似地对待，而不会因为行为人本身的特点不同而有所歧视。机会上的平等涉及（a），(b)，(c)。就是在这个社会体系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能给所有人同样机会的地位。特别地，这个平等的意义指小孩拥有一种地位的机会不依赖于其父母。结果上的平等涉及（a）中的（2），即处于每一个地位的人的所获是相同的，而不依赖于他们的行为。法律上的平等、机会上的平等，结果上的平等也可以视为国家对已存在的和伴随日常社会事务而产生的不平等的态度。法律上的平等指国家对拥有某种地位所能从事活动的人是否平等对待，同时是否努力减小不平等。机会上的平等指国家进行干预以确保一代人的不平等不延续到下一代，孩子们所拥有的机会与他们的父母之间的不平等无关。结果上的平等指国家干预，不使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平等而有所积累，而是逐渐削减。在这里国家被赋予主持平等的角色。这又牵涉到怎么样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才能履行这样的职能的问题。三种平等并不是处处一致的。法律上的高度平等往往伴随着机会上的高度不平等。法律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但个人之间是否会获得同样的机会，还得受历史的个人天赋等方面因素的限制。社会机会的分配如以家庭为基础，那么在一个法律高于一切的社会，传统机构（如家庭）的功能被国家所产生的机构（如公共学校）所代替，法律上的平等与机会上的平等才有可能一致。机会上的平等与结果上的平等在某些意义上也不相同。二者意味着国家不同的干预方式。机会上的平等指国家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资源，这样具有同样的机会通过生产活动取得收益。同时结果的平等意味着对这种收益分配的干预。只有在国家干预下使得每一个地位的人获取同样的收益，二者才没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机会就失去了其意义。笼统地讲平等是没有意义的，要求社会平等还

有一个以哪种平等为重的判断，因为通向各种平等的途径并不十分一致，这本身又是一个难题。

平等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它不仅是哲学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也涉及到心理学领域，有人认为平等是"自然"的，先天的，它的存在不需要有任何条件，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罗尔斯（J · Rawls）在他的《正义论》中也论述道：只有这样的不平等才是正当的，它能使最不幸的人同不存在不平等时的状况相比感到有所改善。那么结果上的平等到底是否为先天的呢？这取决于社会产品的来源。当这种产品最初由某种自然物产生，或由国家所掌握。结果上的平等的无条件性不会引起太多的疑义，且它与机会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相一致。如果社会产品由某些人的劳动所产生结果上的平等就会同时引起某些不平等，平等在这时就不能被认为是自然的。平等还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判断，人们对社会平等与否的感受体现在他们的羡慕，不满和满足中。由于人们忌嫉心的存在。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社会的各种权力分配形成挑战，比如认为财产权力的个人所有就是一种社会不平等。而在新古典的经济学里。财产权利的平等分配依赖于自由市场制度。

平等也是经济学要探讨的对象，经济学中平等问题属于规范经济学。平等在实证经济学中没有地位，但实证经济学中讨论的自由（如市场的自由选择）却在某种意义上与法律上的平等、机会上的平等，结果上的平等有些接近。平等一直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边沁（J · Benlham）就曾认为社会财富的均等化会实现社会最大幸福。但遭到后人的批判。在庇古（A · C · Pigou）看来，货币同其他财物一样，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拥有太多货币的人的边际效用小于拥有较少货币的人的边际效用，社会收入的平等化会使社会福利最大。这个平等就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庇古的基数效用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上述观点也逐渐被丢弃。但庇古的分析远不至于此。他认为个人之间的福利存在相互的依赖性。一个人不能全部获得他的行为所产生的全部社会福利或承担减少福利的全部损失。只有个人之间资源的分配与他们行为对别人福利的有益影响相一致，社会福利最大化才有可能实现。但如何在生产单位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才能导致消费品满意分配，经济学界的分歧较大。一般地，最初分配对最终分配的决定作用的大小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在一个相互依赖性很低的社会，最初资源分配不平等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永久不平等。在相互依赖性很高的社会则不是这样。影响最终分配的因素较多。平等分配不仅是同代人之间的事，而且涉及到几代人。动态地考虑，情形就更为复杂。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我们也能找出对平等的讨论，如布坎南（J · Buchanan）就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总结出决定个人之间的平等的因素有出身、天赋、机遇、选择、努力等。

平安险（**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 简称 F.P.A**）　依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平安险的承保责任范围是保险标的由于海上风险和意外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和共同海损。具体包括：

1.被保险货物在海运途中由于雷电、海啸、地震、洪水自然灾害造成整批货物的全部损失和推定全损。被保险货物用驳船运离海轮，每一驳船所装货物可视为一个整批。

2.由于运输工具遭受搁浅、触礁、沉没、互撞、失火、爆炸意外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

3.在运输工具已经发生搁浅、触礁、沉没、焚毁意外事故的情况下，货物在此前后又在海上遭受恶劣气候、雷电、海啸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部分损失。

4.在装卸或转运时由于一件或数件整件货物落海造成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

5.被保险人对遭受承保责任范围内危险的货物采取抢救。防止或减少货损措施支付的合理费用，但以不超过该批货物的保险金额为限。

6.运输工具遭遇海难后，在避难港由于卸货引起的损失以及在中途港、避难港由于卸货、存仓以及运送货物而产生的特别费用。

7.共同海损的牺牲，分摊和救助的费用。

8.运输合同中订有船舶互撞条款，根据该条款规定应由货方偿还船方的损失。

"平安险"一词是我国保险业的习惯译法，它的英文含义为"单独海损不赔"，是基本险中承保责任范围最小的一种。平安险虽然原义为单独海损不赔，但这主要是针对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单独海损；如果保险标的所遭受的单独海损损失，是由于船舶或运输工具发生搁浅、触礁沉没等意外事故造成的，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

平等原则（**Equal Principle**）　涉外税收负担原则之一，又称负担相等原则，主要是要求对外国跨国纳税人实行与国内纳税人同等的税收待遇，适用相同的税法，负担相同的税收。

该原则的理论依据是税收中性原则，主张不对资本和商品在世界范围的流动进行歪曲和干预而放任其自由流动。

但在这一原则下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促进发达国家之间资本的流动，而另一种结果却是不能推动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前者在欧共体

国家之间表现最为突出，后者则提示各发展中国家仍然得用负担从轻的优惠原则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另外，这一原则只要求与本国纳税人相比负担同等，而并不是说在各国的税收负担都相等，因此，仍有可能利用各国之间税负的差异实现某种程度的避税。

平价（Par） 在外汇市场上买卖某种远期外汇时其远期价值和即期价值相等，即远期汇率和即期汇率相等。

平衡项目（Balconce Account） 用以平衡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借贷差额的项目。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主要项目之一。分为：(1) 错误与遗漏。是一人为的平衡项目，用以轧平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借贷双方最终总额。平衡表因采用复式记帐法，借贷双方总值应该总是相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A) 资料来源不一。有的项目来自海关统计，有的来自银行报表；(B) 资料不全。商品走私就很难统计；(C) 资料本身错误。故需设计该项目。(2) 官方储备。包括一国货币金融当局（中央银行、财政部、外汇稳定机构）持有的黄金、外汇、分配到的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对外国官方（即中央银行）债权债务变化。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或逆差，最终必须增减官方储备以获得平衡。

平均工作周（Workweek、Average） 每个工人每周得到报酬的平均小时数，其中包括支付薪金的节日、假日及病休等。美国的工作周统计数字包括全日性和非全日性生产以及领取任何一段时间工资的工人。由于支薪金的节日、假期和病休的时间日益增加，所以每周支薪金的小时数通常多于每周实际工作的小时数。由于同样原因，美国劳工统计局根据工资额编制的平均工作周统计数字，与美国人口普查局根据家庭调查编制的每周实际工作的小时数也是不同的。平均工作周是整个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全国经济研究所把它列为主要指标之一。由于工作周长短通常由拥有较大权力的工头掌握，而不由确定雇用人数的管理部门掌握，所以工作周的变化比就业人数的变化要大。

平衡增长理论（The Case for Balanced Growth） 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或战略的一种理论。主张在整个工业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工业或国民经济部门按同一比率或不同比率全面地得到发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对于如何实现平衡增长的问题，有着三种不尽相同的观点。第一种为极端的（extreme）平衡增长观点，主张对各个工业部门同时，并按同一比例进行大规模投资，使整个工业按同一速率全面增长，实现工业化。其主要代表是罗森斯坦-罗丹。他认为，在资本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的供给——尤其是社会分摊资本的供给、储蓄和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必须实行“大推进”战略，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进行大量投资，使各种工业部门都发展起来，才能互相依赖、互为市场。在全面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一些工业发展过快、产品过剩，在投资时还必须按同一投资率对各个工业部门进行投资，以保证各工业部门之间发展协调、比例均衡，按同一增长速度向前发展，使产品的生产和需求达到平衡。第二种为温和的（moderate）平衡增长观点，主张一切部门应同时扩大，但不一定按同一比例扩大。其代表是纳克斯。他也主张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量投资，但他认为对工业、农业、外贸、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生产、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应按不同比率进行大规模投资，应以各部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大小来确定不同的投资比率。因为价格与收入弹性大意味着这个部门发展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中梗阻，但生产的扩张却有潜力，多投资于这些部门可以使其迅速发展起来，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达到该部门产品的供求平衡。而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理应投入比率较少的资金，因为其发展还相对过快。第三种为完善的（perfect）平衡增长观点，其代表是斯特里顿。他提出了一种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并综合了各自理论特点的平衡增长理论。他主张按照产品的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大小选择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增长比率，并以温和的平衡增长的方式将现有资源全面地分配于各部门，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主要表现为新创造出来的收入恰好吸收尽新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这种理论，既强调扩大投资规模对于克服供给方面的“不可分性”与需求方面的“互补性”的重要作用，也强调取得工业、农业、消费品与资本品等各经济部门间平衡增长的重要性；既主张国民经济各部门按不同比例全面发展，实现平衡增长，也主张在达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可以依据各产业的产品的需求与收入弹性来确定不同的投资率和增长比例，通过个别部门的优先发展和快速增长，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适当比例平衡增长。这实际上是把平衡增长当作目标，把不平衡增长作为手段的一种动态的平衡增长理论。斯特里顿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基本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新的欲望随之产生。因而各部门的同时发展和产出的同时增长并不能一次性地或永久地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

题。有的部门或产品在需求暂时得到满足、市场扩大之后，会因人们的欲望转变和需求转移而重新使它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其他部门或产品的有效需求却过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优先发展某些主导部门，实行不平衡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不平衡发展并非永久性的，而是在经历了一定时期，一旦中梗阻问题解决，就应当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一定比例平衡增长。

关于如何保证平衡增长的实施，支持平衡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的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由国家来制订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其理由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健全，因而通常的价格刺激只能在很小范围内起作用，由于市场机制无力迅速筹集到大量的资本，并按一定比例配置于各个部门，只有靠宏观经济的计划化才能实现平衡增长。

平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指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路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50年代形成为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并被当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或模式而推广，应用于经济计划的制订与决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国内充分市场的形成和各部门平衡增长的必要性，以及依赖于计划化和国家干预，它也受到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的思想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崇尚个人追求最大快乐，认为社会利益与个人私利是一致的，通过个人追求最大快乐，最终实现社会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是英国学者边沁（J·Bentyam），因此，功利主义又经常称为边沁主义。但是，边沁本人的思想并未得到公众的注意，其学说是由穆勒父子，即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和约翰·穆勒（John Mill）的宣传而变得影响很广。在当时的英国，许多功利主义者就是根据功利主义的思想改革了英国的选举法，并促进了法典化运动。

功利主义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它主张个人主义立场，主张以数量明确个人的快乐和痛苦，要求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著名的经济学边际革命虽然并非起源于功利主义，但是至少早期的边际主义者在阐述效用问题时是从感觉快乐的角度出发的，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在边沁分析货币问题时也清楚地提到。此外，福利经济学也具有很强的功利主义意义，福利经济学测算个人欲望的满足程度，虽然这种测算是通过比较偏好，但它的分析与边沁的方法是相近的。

功利主义的理论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例如，功利主义者认为个人追求私利，最终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但事实上个人私利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要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经常需放弃个人私利的追求，如果人性是利己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无从实现。再如，功利主义者认为效用可以用基数方法计量，但许多学者认为个人快乐是无法精确计量的，从而也无法进行效用大小的比较。

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　是指通过将社会或文化现象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来研究它们在社会中的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瑞典经济学家G·缪尔达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进行功能分析是保守的社会学家的倾向，旨在为现存社会进行辩护，反对变革。以美国社会学家拉皮尔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功能分析的观点具有批判性、在批判上是实用主义的，本质上是激进的。功能关系的理论基础是相关学说和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组成的一个体系，单独地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都不可能正确地了解社会，而只有从各个部分的各个角度综合地看待社会，才能有正确的结论。功能分析通常采用三个相关假设：(1) 规范化的社会和文化项目对整个社会或文化系统是有影响的；(2) 各种社会和文化项目都具有某种社会功能；(3) 这些项目的存在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等人1953年提出了著名的"AGIL分析格式"。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R·默顿1949年提出了包括11个要点的功能分析格式：确定具有功能的社会项目、动机等主观意向的前因后果、客观效果、受功能影响的各个部分、功能的必要条件、行使功能的机构、功能替代、结构限制、社会动态与变迁、通过比较研究证实功能分析的结论，意识形态对功能分析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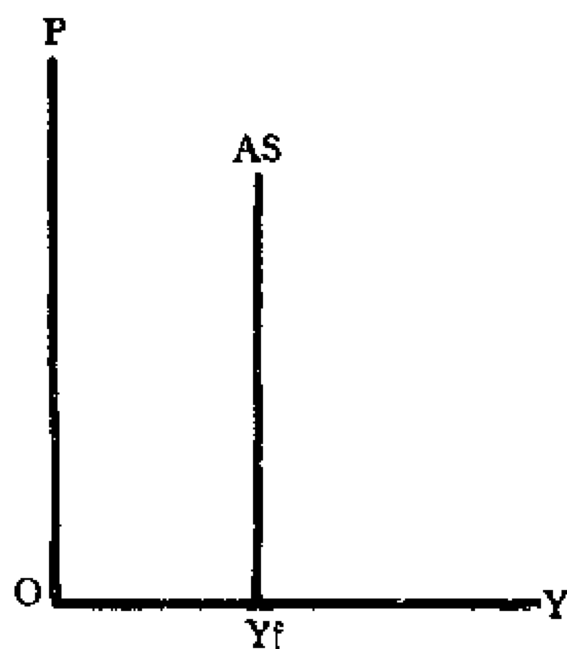
功能财政（Funcfional Finance）　一种财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的财政政策不仅要考虑收入政策，包括如何筹措或借到足够的钱，而且要考虑支出政策，就是考虑国民经济状况，如收入和就业水平，物价波动程度，经济增长幅度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在经济活动萧条时期，功能财政的倡导者常常建议政府实行赤字政策，而不管当时是否需要增加政府开支。其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使得萧条时期的过剩的供给找到销路，从而使经济走向复苏。当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时，他们则建议减少政府支出，实行结余的财政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社会需求，降低对供给的过度需求压力。同时也可以从社会上吸收流动资金，减少社会货币供

给量。功能财政的提倡者主张，当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而又不能向公众筹措时，他们往往支持增发货币，而不主张采取提高税收或增加政府债务的办法。其原因还是要直接扩大社会上的货币供给量，而增税或增加政府债务则一般不会增加货币供给量，只会造成货币供给结构的变化。总之，无论在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或者所采取的手段方面，他们总赞成更多的灵活性。但反对者认为，当明确的行为标准尚未建立和政策目标尚未确定时，过多的灵活性是不明智的。

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在经济学界，这个词有三种含义。第一、指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尼尔、约翰·穆勒、马尔萨斯，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人。代表作是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古典经济学中心研究国民财富如何增长，基本主张是自由放任。第二、指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凯恩斯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就是这种含义。他说："古典学派是马克思造出来的词，用来包括李嘉图、杰姆斯、穆勒和他们以前的经济学家。古典学派经济学是由李嘉图集大成的经济学。但我向来用古典学派一词，亦包括李嘉图之后继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而加以发扬光大的人，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艾其伟斯，以及庇古教授。"第三、指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具体来说，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到大卫·李嘉图，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这是马克思所用的含义。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建立了劳动价值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与阶级对立，具有科学成分。马克思用古典是为了有别于以后仅仅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

古典的二分法（Classical Dichotomy） 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货币理论和经济理论分为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的作法。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货币的作用在于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从而不会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任何影响。由此出发，经济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实物部分与货币部分。实物部分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范围，要说明商品的供求与商品相对价格关系，以及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决定。具体来说，产量取决于就业量和技术状况。就业量取决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又取决于劳动的供求关系。货币部分是货币理论研究的范围，要研究货币数量与绝对价格的关系，以及绝对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具体来说，绝对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量，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动。经济理论可以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来表示；货币理论则是货币数量论。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都是独立的，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凯恩斯否认了这种二分法，提出"只要我们论及何者决定社会整体的产量与就业问题，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关于货币经济的完整理论。"凯恩斯通过流动偏好理论打破了二分法，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溶为一体，说明了货币供求的变动如何影响利率，以及利率如何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这样，利率就成为联接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的纽带。货币理论不仅包括价格的决定，而且还包括利率的决定，经济理论所涉及的产量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就业量，而且还取决于利率。但是，货币主义者反对凯恩斯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短期货币数量的变动会通过对价格的影响而影响产量，在长期中产量由实际因素决定，货币量仅仅决定价格水平。这也就是否认了短期中古典二分法的意义，但肯定了长期中古典二分法的正确性。

古典总供给曲线（Classical Aggregate Supply Curve） 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的一种特例。如附图所示，古典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1／f）向上垂直的线，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价格水平如何变动，总供给量都



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总供给状况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故名。古典经济学家把充分就业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正常状态，这是因为工资与价格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可以随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变动而迅速地变动。通过工资与价格的调节，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都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这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即货币总需求的增加不能引起产量增加，只能导致价格水平同比例上升。古典经济学家正是以这一假定为前提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凯恩斯主义承认失业的存在正是对这一假设的否定。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短期中，失业的存

在是必然的，所以，古典总供给曲线并没有普遍的适用性。但从长期来看，当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后，古典总供给曲线就是适用的。而长期中经济是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因此，可以把古典总供给曲线作为长期总供给曲线。

古典失业（Classical Unemployment）　由于工资刚性所引起的失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设，如果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即工资能对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作出迅速而完全的反应，则通过工资的调节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也就是说，在劳动的需求小于供给时，如果工资能迅速而完全地下降，则失业工人一定会被全部雇用，经济中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人类的本性是愿意工作上升而不愿下降的，工会的存在与最低工资法及其他社会原因又限制了工资的下降。这就形成了工资能升不能降的工资刚性。这种工资刚性的存在，使工资无法下降，部分工人在劳动的供给大于需求时无法受雇，从而形成失业。这种失业是凯恩斯主义之前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失业原因的一种解释，故称古典失业。

古典生产理论（Production, Classical Theories）　古典生产理论是指法国重农学派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由于看到生产对于财富增长的重要作用，因而特别重视生产理论。法国重农学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描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因此它们都属于古典学派的生产理论。但是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的生产理论不同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生产理论。

法国经济学派的生产理论主要体现在魁奈（F·Quesnay）的《经济表》中。魁奈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概念的区分是独特的，他不是依据生产的物质特征来定义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而是依据所从事的活动是否生产净产品（net product）来定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他认为只有农业才生产净产品，因此只有农业生产才是生产性的，凡是非农业的活动，包括制造业的活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据此，他把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称为生产阶级，从事制造业活动的阶级称为不生产阶级。魁奈的净产品概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净产品量的大小是评价一国繁荣程度的重要依据。魁奈把社会生产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他认识到年预付（流动资本：种子、生活维持费）与原预付（固定资本）在生产中的重复性。年预付在每一年生产结束时完全耗尽，而原预付则不会耗尽，而是逐年折旧。正是由于年预付与原预付的不断进行以及生产部门（农业）与不生产部门（制造业）的交换活动使得社会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下去。

英国的古典学派的生产理论比起法国重农学派的生产理论又进了一步。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的著作中都强调了生产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对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定义已经超出重农学派狭小的范围，他们把凡是创造利润的活动都看成是生产性的活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象魁奈一样认为由于生产需要时间，因此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预付，这些预付是工资、原材料、设备等。这些预付构成提供这些预付的资本家的生产成本，生产结束时，扣除这些成本的净收益，构成资本家的利润。

古典经济学家还动态地考察了资本积累的过程与财富的增长。他们还分析了资本积累所达到的最终结果，由于人类的生存最终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经济的增长最终将趋向于一种不变的状态。但是各人对于这一状态所持的看法是不同的。例如，亚当·斯密持一种乐观的看法。李嘉图则是持一种悲观的看法。李嘉图的看法是基于他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观点。这一观点后来为边际学派所发展，到19世纪末的所谓边际革命后，古典学派生产理论已经不象在此之前那样在经济理论中作为理论的焦点。边际革命后，西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的焦点从生产转向交换，生产理论只是作为资源配置理论的一部分而加以探讨。

古典经济学中的工资（Wages in Classical Economics）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明确区分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斯密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可以变化的，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状况，而工资则围绕着劳动的自然价格变化。斯密反对重商主义者力图以低工资强迫工人努力工作的观点，而认为只有较高的工资才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认为一国的财富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金币。但是，在斯密的论述中，并未对"足够的生存品"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阐明工资、利润之间反向关系的含义。

李嘉图（D·Ricardo）在斯密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工资的生存费说（subsistence theory of wage）。在生存费说中，劳动的自然价格是指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最低生活费，而劳动的市场价格则是指劳动者实际获得的工资。如果劳动的市场价格高于劳动的自然价格，劳动人口必须增加，从而出现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过剩迫使劳动的市场价格回落；反之，若劳动的市场价格低于劳动的自然价格，劳动者无法获得足够的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劳动人口必须减少，从而出现劳动供给不足，迫使劳动的市场价格上升。劳动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

的关系表明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是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最低生活费为轴心变动的。从长期来看，劳动者仅能获得维持其本人和家庭生存的最低工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提出的生存费说又称为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

李嘉图提出工资铁律，指出工资水平会长期钉住最低生活费，随后，李嘉图主义者又提出工资是由资本——劳动比率决定的，穆勒（James Mill）分析了在资本与人口水平失衡的情况下，工资如何进行变动，而放弃了李嘉图的自然工资概念。穆勒的思想逐渐发展成又一新的古典工资理论，称为工资基金说（wage fund theory），认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资本总额是一定的，这就是工资基金，工资水平由社会的资本——劳动比率决定，要想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必须有意识地抑制人口的增长。穆勒的思想发端于马尔萨斯（I·R·Malthus）的人口理论。许多学者对于工资基金理论中提出的工资基金固定的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社会一定的工资基金并不存在。

在古典经济学中，工资决定是从历史，社会、经济各种角度进行讨论的，工资的作用是古典经济学价值和分配理论的一部分，工资是生产消费的一部分，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物质必需品。

古典增长模型（Ceassical Growth Models）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他们所处的时代正值工业革命的前夕，当时，工业技术迅速推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也正在形成，经济增长的任务摆在人们而前。在这种情况下，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并逐个加以剖析，还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进行了研究。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别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首次以经济增长为主题，进行了展开论证。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指的就是国民收人的增长，也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劳动、资本、土地与技术，除此之外，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因此可被列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归纳起来，古典的总生产函数为

$$y=f(L,C,N,T,E)$$

其中 Y 为全社会的总产出，L 为劳动投人量，C 为资本投人量，N 为自然资源投人量，T 为技术进步程度，E 为经济环境与经济政策因素。据上式可知，t 时期的总产出变化率可以表示为:

$$\frac{dy}{dt}=\frac{\partial P}{\partial L}\cdot\frac{dL}{dt}+\frac{\partial f}{\partial c}\frac{dc}{dt}+\frac{\partial f}{\partial N}\cdot\frac{dN}{dt}+\frac{\partial f}{\partial T}\frac{dT}{dt}+\frac{\partial f}{\partial E}\frac{dE}{dt}$$

从劳动因素来看，古典学家认为，一国的人口数量是趋于增加的，人口的增长将有利于产量的增加，即

$$\frac{\partial f}{\partial L}>0,\quad \frac{dL}{dt}>0$$

劳动可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与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如果生产性劳动在劳动投人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那么就会促进经济的增长；相反，如果非生产性劳动所占的比重比较大，那么就会影响到产出增长的速度。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劳动的供给量与需求量是相等的。其中劳动的供给量取决于劳动的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之间的差别，而劳动的需求量取决于资本投人与国民收人水平，它们都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从资本因素来看，古典学派认为，资本的投人量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而资本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从而间接地导致社会总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还直接影响着总产出的增加，即

$$\frac{\partial f}{\partial c}>0,\quad \frac{dc}{dt}>0$$

如果没有追加的投资，那么生产的发展就难以为续，可见，资本积累量是影响总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投人量取决于储蓄量，影响储蓄量的因素是实际利润率与最低利润率之间的差额，而这一差额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两个利润率之间的差额将会拉大，这导致储蓄的增加，进而导致资本投人量的增加。不过，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实际利润率有不断递减的趋势，当它降到最低利润率水平上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停止，整个经济处于静止状态。

古典增长模型中的自然资源主要指的是土地资源。土地的供给量是有限的，但是它的数量越多，肥力越好，就越能提供更多的产品，从而为经济增长作出更多的贡献，即

$$\frac{\partial f}{\partial N}>0,\quad \frac{dN}{dt}>0$$

要防止土地收益递减，就需要不断追加资本和劳动，维持肥力与生产效率。随着经济的增长，地租也会随着增加，这可能减少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技术总是在不断地进步的，将技术进步应用于生产，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即

$$\frac{\partial f}{\partial T} > 0, \quad \frac{dT}{dt} > 0$$

斯密认为，技术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发展可以直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要发展劳动分工，需要追加资本投入，同时在政策上予以引导。李嘉图则在书中通篇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重视生产工具的变革以及大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

从经济环境与经济政策的因素来看，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会保证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与此同时，市场也处于均衡状态，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经济不断增长。因此，他们恪守自由主义原则，认为应当最大限度地开展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通过这一办法，可以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延缓经济进入停滞状态的进程。政府不必干预经济生活，它只需以立法、税收等手段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的进行，同时保证合理的收入分配，以使得全社会的福利都有所增进。

古典学家在其经济增长的理论中，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视为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他们正确地将社会分为劳动、资本与土地三大部分，社会产品按照这三部分生产要素提供的数量进行分配，工资、利润与地租使用的规模与方式决定了积累的可能性。李嘉图重点考察的是分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利润率看成决定资本积累的关键性因素，从而将分配与积累联系起来。

他们还集中研究了作为投资来源以及再投资动力的利润率的运动规律，指出，在封闭经济中，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利润率不可避免地下降，积累过程成了它本身的障碍。

他们还引入了规模收益下降的规律以及边际生产力下降的规律，通过对一般经济原理的运用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整体，对它的实质、增长的源泉以及制约因素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当然，他们的分析局限于农业经济条件下，其中生产方式没有重大改变，也低估了技术进步对于改变生产条件所起的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古典学家的有关分析仍然是十分独到而难能可贵的，它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古尔诺，安东尼·奥古斯丁（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　法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数理经济学的先驱者。出生于法国的格雷。15岁进格雷学院读书，1821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科学，1829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曾短期担任里昂大学的数学教授，此后负责过多所大学的行政事务，并撰写出大量著作。1862年退休后，更积极从事著述。古尔诺的学术研究涉及数学、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均有不少作品。他的经济学著作有：《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38年）、《财富理论原理》（1863年）和《经济学说评论》（1877年），其中第一本为代表作。一般认为，古尔诺是经济学史上第一个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其实另一位法国人卡纳尔早在19世纪最初几年已这样做，不过此人的学识和数学素养不及古尔诺），因而被奉为数理经济学的鼻祖。他对市场和价格理论的深入探究，被说成是其对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也是其学说的基本内容。他首先研究了需求规律，认为需求是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它与商品价格的函数关系就是市场理论中能进行经验检验的内容。他提出，价格变化和需求量变化之间存在方向相反的依存关系，但在数量上不一定成比例。他还第一次运用了需求弹性分析工具（完整的需求弹性理论后来由马歇尔正式创立），指明价格变化所引起需求量变化的速度对不同商品是有区别的，有的商品（如制造品）较快，有的商品（如必需品）较慢，甚至出现价格降低反而减少需求量的例外情况。为此他专门制定出需求函数公式。古尔诺进一步探讨了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完全竞争等多种市场类型下的价格决定及其计量公式，其中关于无限竞争条件下商品价格由其最后单位生产费用决定的结论以及价格决定的计量公式，有着尤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可见，古尔诺已经论述到微观经济学的相当部分内容，而且为经济计量学在以后的出现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古尔诺的理论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看重，直至马歇尔在1890年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后，才确立了它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用户费（User Fees）　用户费一词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在美国使用很普遍，而70年代以后，美国公共财政教科书中的索引里也多数列入了这个术语。但是，用户费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也没有人将其与其它类似的词进行严格的区分。有些人将用户费当作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有些人将用户费仅指政府提供劳务所收取的费用；此外，许多人还将用户费视为政府对于污染环境行为所征收的费，在这一意义下，用户费就是排污费（effluent fee）的同义语。

用户费与受益税（benefit tax）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基本的区别是，在用户费下，消费者有权自由决定进行消费行为，而在受益税下，付税者无权自主决定，而且受益税是按获得的好处比例征收的。但事实上，理性消费者都不会在利大于税的情况下拒绝付税，因此，自愿、不自愿之分也就不重要了。实际

生活中，政府往往名义上是征收受益税，而征收的数额基本上就等于用户费，例如，汽油税。

用户费与价格之间的区别只是使用"用户费"一词时，商品或劳务的提供者是政府，使用价格时，是私人。但这种区分一般来说是多余的，从上下文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提供者的身份。

生计（Subsistence） 简单地说，所谓生计就是工人们获得的仅能用以维持劳动者自身进行工作并维持劳动者再生产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是维持劳动者的生命及其繁衍并使之有一定工作力的基本生活的收入水平，可以看出，这样的定义是有些含糊不清、对生计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课题。17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们大肆吹捧廉价劳动的好处。如孟德维尔（Mandevilie · D）等重商主义者认为，廉价的劳动力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它不仅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产生商业上的好处，因较多的人都主张鼓励人口增长和移民，并将工资定在生计水平。生计视现实条件而定。威廉 · 配第（William Petty）开始研究生计的标准和劳动者的生计与它们劳动的产出之间的差额问题，生计开始变为一个不变的价值标准，它是每年必需付给一个成年劳动者的以食物单位计量的商品的价值，并且他认为同样的标准适于不同的劳动者。这样食物单位就成为商品工资标准。此后人们对生计的标准与内容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洛克（John Locke）就曾研究过生计的心理上的因素。斯图亚特（Steuart，Sir，J）把生计分为物质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就是足够而又不多余的生计水平，政治上的需要是指习惯。教育等因素形成的及其派生的需要，因而生计也就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风俗、习惯、传统等级观念都起重要作用。此后，亚当 · 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人又注入了社会分配的观点，认为确实存在一种使工资下降的力量，因而用"给定工资"假定代替在此之前的不变工资假定，这个给定工资实际上就是生计水平，它由历史的、经济的因素和综合作用而决定。

生产（Production） 是指人们通过劳动创造适合于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生产的两个要素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也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过程。关于生产概念、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较大的分歧。法国经济学家魁奈是确立生产概念的第一人。魁奈认为生产首先要具有生产性，即能创造出物品来，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生产要带来净收益。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因为只有土地才能带来净收益。边际主义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交换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生产是交换的必备条件，所以在边际主义者看来，生产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新古典经济学极为重视生产、对生产问题的讨论也非常广泛。该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最小或利润最大是生产的目标。生产成本最小或目标利润最大在竞争市场上可以通过生产函数的方法实现。价格是供求平衡实现的。决定生产量的因素在短期内是劳动和资本以及生产规模。长期的因素则还包括技术变化、外部经济性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为了生产，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也就是再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在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起决定作用。决定性表现在：（1）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对象；（2）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性质。

生产力（Productivity） 生产力是产出与投入的比率。生产力可以是某一企业的生产力，也可能是某一行业的生产力、还可能是一国的生产力。由于投入可能不只一种，因此，计算生产力的方法就不一样，有总体生产力与部分生产力之分。若总产出比总投入（总投人以价值计算），则称为总生产力。例如某一企业在某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产量除以全部要素投入的价值便得该企业总生产力。部分生产力是指投入的某个别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例如劳动的生产率是总产量比劳动投入量，资本生产力是总产量比资本投入量。微观经济学中有关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就是建立在投入的单个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分析的基础上。例如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

生产力的测度问题（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Problems） 生产力是产量对于投入的比率。经济学家趋向于把生产力作为对经济中生产商品与劳务中所使用的技术状态的测度。并把用这种方法测度的变化解释为"技术的变化"，这种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变化。测度生产能力的变化问题成为测度技术变化的问题，因为在经济体制既定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提高往往是技术改进的结果。一般来说，一国生产力的增长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因素分析表明、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劳动、资本与技术。用 y 表示收入增长率，用 k 表示资本增长率，用 n 表示劳动增长率，用 λ 表示技术进步率，则：

$$y=\lambda+sk+(1-s)n \quad (1)$$

其中 s 是要素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占份额，（1−s）为要

素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占份额。通常把λ看作是收入增长率中劳动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所不能解释的余项，把它称为剩余的技术变化。由（1）式，剩余的技术变化表示为

$$\lambda = y - sk - (1-s)n$$

对于剩余的技术变化测度得是否准确，依据于各有关变量是否测度的准确，即收入增长率y，资本增长率K，劳动增长率n测度得是否准确。一般来说，这些变量都是难以准确测度的，以产出来讲，产量增长率y的准确测度有赖于产量统计的准确。然而对于产量统计很难做到准确，例如家庭生产对于孩子的投资的价值是否应计人国民生产总值中去？中间产品的消费与最终产品的消费又如何严格区分？教育与健康方面的支出在多大程度上是中间消费，在多大程度上又是最终消费。污染问题是否应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等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所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不准确的，在此基础上面估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就不会准确。

再以投入来说，资本增长率的准确测度有赖于对于资本测度得准确，但资本的定义争论很大，如何能够准确测度？测度资本是根据购买资本的支出来测度，还是根据资本所提供的服务流量来测度？应该如何计算资本的有形损耗？如果资本的测度不准确，资本增长率的测度也就难以准确。

劳动投入的测度也难以准确，因为技术工人的劳动与非技术工人的劳动不是同质劳动，男工与女工，年青人与老年人的劳动都不是同质劳动，应以哪种劳动来测度劳动的收人，对于劳动投入的测度不准确就难以使劳动增长率的测度准确。

对于劳动所得份额与资本所得份额的准确测度也是困难的。一般来说是假定资本所得份额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劳动所得份额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但是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且生产函数是常数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事实上经济中存在着不同的垄断情况和非常数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因此劳动与资本在分配中的份额都很难测度。

由于以上投入与产出的变动率都难以准确测度，因此对于剩余的技术的变化的准确测度问题就不可能。此外测度本身还有可能出现误差，尽管新的测度人的方法中把测度误差的情况考虑进去了，但上述有关投入与产出的本身定义与测度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剩余的技术进步不可能被准确测度，生产力的测度不可能十分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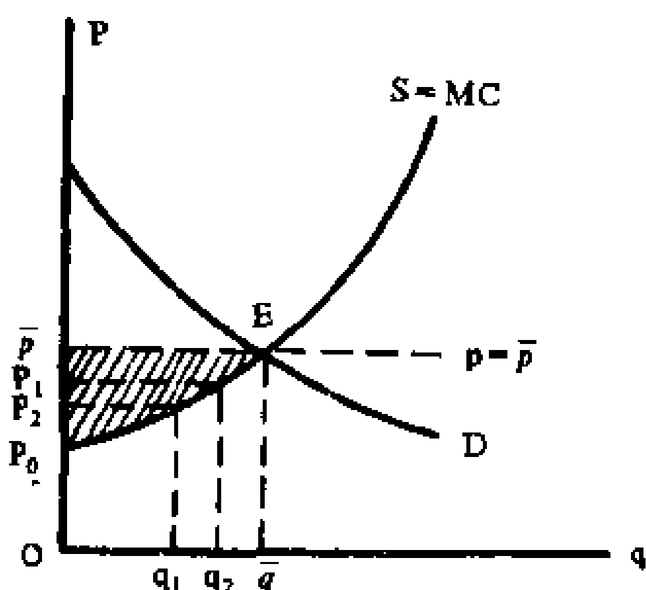
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　又称消费不足，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超过了消费者的需求。在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后继者所假设的那些条件下，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假设条件是：买主之间、卖主之间进行自由竞争、对市场情况的了解不受很多的限制，劳动力和资本的供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以及把货币仅仅当作交换手段来使用，等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某些市场上和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存在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但是，整个生产体系会自动调整，使得暂时性的不平衡恢复平衡。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因此不存在供求之间不平衡的问题。但萨伊定律受到反对者的严厉抨击。反对者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假设的那些条件是不现实的，认为，如果作出别的假设，就会得出普遍生产过剩的结论。例如，根据萨伊定律，每一次出售都必将为另一次购买提供必要的资金，因而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求。但货币的职能不仅仅是交换手段。货币还可以作为贮藏手段，另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出现争取流动资金和贮藏现款的风潮，"持币待购"就会产生需求不足。所以，反对者认为萨伊定律是不健全的，与经验相背的，因为世界经济出现过多次大量产品过剩。关于生产过剩与经济周期相联系的各种理论大量出现。这些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会导致超过人们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会导致价格降到无利可图的水平，导致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出现萧条乃至经济危机。这种萧条和经济危机直到过剩生产被吸收掉才能消失。

生产者市场（Producer's Markets）　任何一个市场都是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构成通过对某些特定的人赋予某些角色而将卖者和买者分开。这些角色形成一种可置换的结构，这种置换结构可以使供给之物扮演商品角色。生产者的市场也是一种涉及生产者扮演某种角色的结构，它是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考察市场，生产者的市场所从事的是生产者连续不断的市场。每个生产者与其它生产者一样在向市场提供商品，每一个生产者与其它生产者都处于一种竞争的地位。在生产者的市场上，生产者希望担当的角色是选择产品产量、产品价格、产品质量、产品的成本结构等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都是与其竞争者而言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生产者的市场是否稳定要看生产者将自己的策略与其它竞争者的策略进行比较的能力，若所有生产者都判断失误，各个生产者所担当的角色就是不确定的，市场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生产者的市场，其本质是贸易条件，这些贸易条件构成经济活动者决策的内在限制。不过这些贸易条件的基础恰好由生产者所做的选择决定。一种生产者的市场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结构，它按照自身的逻辑加以维持并加以再生产。这就要求生产者的

行为不能脱离常规，生产者未来的行动与它过去的行动应大体一致或至少其变化应能够被预测，生产者若以一种难以预期的方式行动将对生产者的市场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尽管是按照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来定义生产者的角色，生产者的市场的存在需要按照所建立竞争规则达成某种形式默契的配合。

生产者市场上存在两种流量，物质数量与价值让渡，生产者是交易的创造者，他们提出贸易条件，因此他们可以在客观贸易条件的限制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生产者市场上，购买者只是在与否之间进行选择。购买者拒绝任何不如另外一种交易的交易，购买者通过这种方法强化了贸易条件的要求。

生产者剩余（Producer's Surplus）　生产者剩余是生产者为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所实际接受的价格与他愿意接受的价格的差额，即，生产者剩余＝生产者实际接受的价格—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右图给出了生产者剩余的几何解释。图中，横坐标表示数量，纵坐标表示价格。假定市场为完全竞争，因此，供给曲线等于边际成本曲线。市场的均衡价格为$\bar{p}$，均衡数量为$\bar{q}$。生产者剩余为$P_0E\bar{P}$所包围的面积。由图可以看出，生产者出售第 q_1 单位时他愿意接受的价格是 P_1，出售 q_2 个单位的产品时，他愿意接受的价格是 P_2。但是由于市场不是对生产者出售的每一单位产品支付不同的价格，而是对生产者出售的所有产品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bar{p}$进行支付。因此，除了出售最后一单位产品时生产者所愿意接受的价格等于他实际接受的价格（为市场均衡价格$\bar{p}$）外，对于其余出售的各单位产品，生产者所愿意接受的价格都小于他实际接受的价格$\bar{p}$。因此，得到生产者剩余。在进行短期分析的情况下，生产者剩余又被称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准租。在进行长期分析的情况下，对于生产者剩余的解释争论较大。



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Consumption）　这两个概念最先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三版中出现，而穆勒将这两个概念引进经济学。穆勒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的区分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斯密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方法。穆勒认为，只有生产者的消费才是生产性的，但不是生产者的全部消费都是生产性消费。只有维持和扩大生产能力的那种消费才是生产消费。在重农主义者看来，经济中生产的消费品只是部分地作为必需品进入家庭，这部分消费品是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生产性消费就是保持人力资本完整所必需的消费。如果工资仅仅是生计所必须的，那么工人的全部消费都是生产消费。但是，如果工人消费了一定数量的奢侈品，那么这一部分消费就是非生产性消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的区别不见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包括了这些区别，但却根本没有利用它。马歇尔写到："所有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别都是狭隘的，缺乏现实性。现在介绍它们几乎是没用的，但由于它们拥有较长的历史，所以只能渐渐消失，而不能突然之间就被抛弃。"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的区别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经济学家，特别从新古典经济学诞生开始，失去了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生产性消费虽然影响就业，但就业量是怎么决定的几乎与这一区别无关。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两者之间对生产的不同作用，而是关心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价格需求弹性。

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And Unpraductive Labour）　在古典经济学中，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是重要的，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增加生产劳动者人数，减少非生产劳动的人数。不过斯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劳动是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非生产劳动是与收入相交换的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属于生产劳动，他生产的价值不仅能维持劳动者自身，而且为雇主提供利润；家仆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它不增加价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马克思也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马克思认为商业不是生产部门，商业不具生产性，商业利润是产业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经济思想史上，李斯特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完善的阐述。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生产力的理论，该理论需要价值理论来说明经济现象，但不仅仅是价值的理论。李斯特认为，斯密、萨伊等人的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一概念仅仅涉及到交换价值的创造。相反，生产性劳动是所有在创造生产力时的花费。李斯特的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是有用的。

例如，在传统的不发达社会中，教育是非生产性劳动，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将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那么，教育是先决条件，因为工业生产需要技术工人，需要企业家，也需要服务部门。总之，在社会转变中，我们需要增加生产力。李斯特的定义认为国家也具有生产力，这也是有益的。因为，为在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国家是有作用的。现代经济学、特别是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区别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是没有用的，原因是所有的劳动都生产有用的、稀缺的东西，因此这些劳动都具有生产性。

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s）　生产函数是描述产出与投入之间关系的一种函数。假定用几种投入生产一种产品。用 Y 表示产出量，$x_i(i=1,2,\cdots,n)$表示几种投入物的数量。用投入向量 X 表示投入

$$x=(x_1,x_2,\cdots,x_n)$$

则生产函数表示为：

$$y=F(x,t)$$

其中，t 为技术水平指数。以上是生产函数的最简单而又最一般的表达形式，每一种具体的生产函数都由其具体假定而呈不同的特征。可以用从多方面来刻划生产函数的特征，例如齐次性、替代性、技术变化的特征等。生产函数的齐次性定义为（假定技术不变为 t_0），若有

$$F(\lambda x,t_0)=\lambda^r f(x,t_0) \qquad (\lambda>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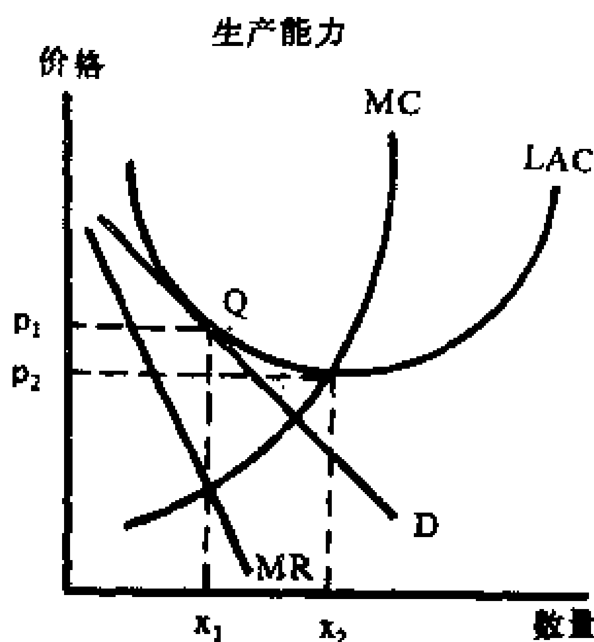
则称该生产函数为 r 次齐次生产函数，可以根据 $r>1$，$r=1$ 或 $r<1$ 来区分规模报酬情况，若 $r>1$，则函数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若 $r=1$，则函数是常数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若 $r<1$，则函数是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中要素的替代性体现在替代弹性上，不同的生产函数替代弹性是不一样的，最常见的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是常数替代弹性（ES）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 $y=AK^aL^bN^{1-a-b}$（其中 Y 为产出，A 代表技术变化参数，K 为资本投入，L 为劳力投入，N 为自然资源投入）是一种常数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其替代弹性等于 1。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也是一种常数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中技术变化分为几种情况，常见的技术变化分为中性的技术进步、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是指技术进步不会改变与产出的关系，例如不会改变资本一产出比率，产出一劳动比率等，而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或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则会改变这些比率。

如果对生产函数施加一些限制条件，则可以由生产函数推导出价格函数、成本函数，进而推导出投入函数、需求函数与产出供给函数，而且价格函数与生产函数具有对偶的特征，成本函数也与生产函数具有对偶的特征。

生产能力过剩（Excess Capacity）　过剩原理是张伯仑（E · Hchamberlin）垄断竞争理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张伯仑的论述，如果企业实际的产量水平低于长期平均成本最低时的产量水平，我们就说企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也就是说这时企业的实际产量低于与最低平均成本相联系的产量、企业的实际平均成本高于长期最小平均成本、如图所示，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面临的是下降的需求曲线 D，企业间竞争的长期均衡产生一个正切解（点 Q），这时由于边际成本 mc 等于边际收益 mr，所以实际的产量为 X_1，实际价格为 P_1。由于 Q 点高于 T 点，这就意味着每单位产品成本高于长期最小平均成本。所以尽管这时由于 MR＝MC，企业赚得的正常利润达到最大可能的限度，但垄断竞争的行业中的每一个企业都有剩余生产能力，即 X_2-X_1。剩余生产能力的大小依赖于厂商需求曲线弹性的大小，当此弹性很高时，每单位产品的实际平均成本与长期最小成本的差额会很小，产量也就更接近于完全竞争时的产量水平。显然出现在垄断竞争时的过剩生产能力是垄断竞争的长期均衡与完全竞争长期均衡相比较而言的。对过剩生产能力应作怎样的评断呢？一些经济学家从效率的角度指出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是一种效率的损失，因为完全可能以更少的企业生产出原有的产量水平。每个企业都可以扩大生产，使得其产量达到 X_2 点，平均成本下降到 T 点。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样的结果只能通过减少厂商的数量从而减少消费者能够购买的相近产品类别而获得。如果产品类别本身是有价值的，则我们应重点减少产品类别而不是设法降低单位成本价格。所以就说不清楚过剩生产能力是否就是一种损失，它也许是为了获得所要求的相似产品的种类而付出的必要成本。



生活标准（Standard of Living） 某一经济单位认为是生活所必需的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经济单位包括个人、家庭或集团，商品则包括食物、衣服、耐用消费品等，劳务则包括住房条件、运输条件、医疗条件以及保险、文化教育等。生活标准通常用货币来表示，因为构成生活标准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般是可以收集到的。由于各地区的价格水平不一致，又由于即使总体物价水平相一致，但其构成生活标准的各要素价格不一致，因此，获得同一生活标准所需的费用是不同的。由于价格水平一般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因此，在不同时间获得相同生活标准的费用是不同的。例如，某个人在第 7 年就达到了生活标准，而另一个没有达到，后者在 t+n 年的收入水平达到第 7 年的生活标准，但此人并没有达到第 t+n 年的生活标准。生活标准是动态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静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生活标准的因素逐渐丰富，过去认为是奢侈品，现在就认为是必需品了，必需品的质量随时间推移也逐渐提高、例如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就逐渐向高、精、美的方向发展。生活标准是个目标，许多人和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低于生活标准，所以达到较高的生活标准是许多人企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讲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原因是不同国家生活标准的要素不同，价格水平不同。

生活费用（Cost of Living） 为购买商品和劳务以维持一定标准的生活所需的货币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C=\sum_{i=1}^{n}P_iQ_i$$

P_i 为第 i 种商品或劳务的现价，Q_i 为消费者所购买的第 i 种商品或劳务的数量。

在一个国家和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标准，从仅能糊口的最低水平直到奢侈享乐的水平不等，因而各阶层和各地的生活费用也不相等，生活质量也不一样。生活费用的大小不仅与生活标准有关，还与一定的体制条件、消费模式、产生结构和价格结构有关。

与生活费用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生活费用指数，两者经常容易混淆。后者是衡量在一段时间内普通家庭日常购买的一组特定的消费品或劳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保持不变时，其价格的相对变化程度。计算时的权数以政府对家庭支出调查的资料为基础，以保证它符合当前的购买模式。在支出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在指数中有较大的权数。

生利曲线（Yield Curve） 生利曲线是一平滑曲线，描述在某一时点上，到期日收益和固定收入证券的到期年限之间的函数关系。生利曲线的假设前提是，影响收益的所有其它因素，如违约风险、流动性、购置成本等具有同一性。美国国库券基本就具有这一性质。生利曲线有三种基本形状。水平的生利曲线表明短期、中期和长期证券的收益大致相同，这时市场上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也大致平衡；向上倾斜的生利曲线表明到期日越长，收益越高，这时短期资金的需求大于供给；向下倾斜的生利曲线表明资金市场上，短期证券的收益更高，这时长期资金的需求大于供给。

生利曲线用几何图形的形式表明了利率的期限结构。利率的期限结构如此不同，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三种假说。(1) 流动偏好假说。流动偏好假说认为，投资者对流动性具有偏好，流动性使资产能够迅速变现，期限短的证券流动性高，价格高，收益就低。但事实上，这种观点并无确实根据，由于短期证券需要不断地再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反而会偏好收益率稳定的长期证券。同时，流动偏好假说很难清楚地解释水平和向下倾斜的生利曲线。(2) 市场分割假说。市场分割假说断言短期固定收入证券市场与长期固定收入证券市场是互相分离的，市场收益状况分别由各自市场上对证券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但是，市场分割假说否定资金在不同证券之间具有流动性。这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虽然各种证券之间并非具有完全流动性，但证券经营者还是会按照长短期证券收益的差别来改变证券期限结构的。(3) 预期假说。预期假说认为投资者对短期证券利率的预期决定了短期与长期证券收益间的关系，如果投资者预期短期证券利率上升，人们将购买短期证券，从而增大对短期证券需求，使短期证券价格上升，收益下降，使生利曲线向上倾斜。相反，如果投资者预期短期证券利率下降，则会导致生利曲线向下倾斜，而若投资者预期短期证券利率不变，对短期证券的需求不变，则生利曲线的形状是水平的。可以看出，预期假说与市场分割假说的前提是完全相反的，在预期假说下，各种证券之间具有完全的流动性，这与实际情况也有相当距离，商业银行就更为偏好短期证券，而人寿保险公司则更愿持有长期证券。

从实证角度来看，上述三种假说相比较，经过修改后的预期假说对利率的期限结构的解释能力最强。

生物经济学（Bioeconomics）　生物经济学的研究涉及两个领域，一个是生物系统经济学，即研究生物系统是如何充分地利用了有限的资源的；另一个是生物资源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生物资源之间的联系等等。可见，生物经济学是生物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1、生物系统经济学

生物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生物的行为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等等，其中生物的行为包括生物的通讯与定向行为、行为的进化和遗传等等；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包括环境对生物所产生的影响、生物因素、种群与群落的结构与数量变化等等。

生物系统经济学并不是要泛泛地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它所要分析的，是生物系统中与经济问题有关的那些方面，即生物系统是以何种方式有效地利用了空间、时间与其环境资源的。通过研究，人类一方面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生物系统有一个更为深入而广泛的认识，另一方面，人类还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从而在自身的经济活动中做得更好。例如，研究动物的通讯行为可以了解它们是如何以巧妙的方式进行觅食与求偶，从而保证了种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对种群内关系进行研究后表明，为了更好地生存，动物多采用群聚生活的方式，来共同捕食，共同防御敌人，从而更充分地适应环境。在其中的蜂、蚊等社会性昆虫的群体中存在着严格的分工，如白蚁群体中，雄蚁和雌蚁专司生殖，工蚁担负着筑巢、育幼和觅食的任务，而具有坚硬的上颚的兵蚁则负责防御和战斗。整个群体俨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经济社会，它保证了种族的繁衍与传递。这对于人类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2、生物资源经济学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也是其中的一环。人类曾经从猿演化而来，先靠摘采野果、捕食野兽为生，后来逐渐发展了农业、渔业、畜牧业等等，而这些都是与生物资源密切相关的。人类通过对生物的各种属性以及环境对生物的影响进行研究，就可以知道各种生物分别在怎样的环境下才能很好地生长、控制生物的哪些属性可以为人类而用。例如，对生物钟进行研究之后，人类可以通过改变光照等因素来改变某些经济作物或动物的生物钟，从而提高产量、增加经济效益。了解了食物链的关系，人们就可以利用某些害虫的天敌来消灭这些害虫。这些都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利用生物资源来为自己服务。

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人类改造了生物环境，同时也破坏了环境。例如，人类为了从事经济活动而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杂草群落取代了森林群落，森林动物减少。为了赚钱，人们大肆捕杀珍稀动物，造成食物链进而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另外，工业污染也对生物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人类取之于斯、用之于斯的生物资源终将面临绝种的危险。

庆幸的是，人类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保护生物资源，使得人类与生物资源之间的关系能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这正是生物资源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所在。

3、有关理论模型

生物经济学中常用的理论模型有两个，一个是最优化理论模型，另一个是博奕论模型。前者假设生物系统的进化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强适应性，引入了诸如期望的进食率和生存概率等变量，广泛地应用于对动物行为（如进食、繁衍、领土等）的研究中。博奕论模型中假设某一生物个体或种类所采用的战略总是与它的竞争者、捕食与被捕食者以及互利者的战略相互作用，其中包含着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近年来，J·史密斯等人正式将博奕论模型引入生物经济学，从而极大地完善与发展了生物经济学的研究。

生命的价值（Value of Life）　这里不是指一个生命的价值，而是挽救生命的价值。成本收益的比较不是一个共同接受的评定标准。因为在社会中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哲学家从人的自身价值的角度去评定生命，而经济学家则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去评定生命的价值。在经济学上，给生命以价值就意味着阻止死亡，而不是让新的生命降生。因此，很少有经济学家去关心那些没有降升的人的价值。而关于挽救生命的价值则主要从损失者和获益者二个方面去考虑。损失者包括死亡者本人、亲属、保险公司、福利机构、受益者可能包括亲属、社会中的其他人。一般情况下，死者的家属将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在心理上受到损失；在经济上，如果亲人依赖于死者的收入，这样死亡就会给亲人们带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损失，如果此家属无力养活自己，政府的或私人的福利机构就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如果此人曾投生命保险，保险公司则将承担一笔可观的费用。受益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

虑：（1）减少了社会的必要支出。例如一个肺癌死者。假定其死亡时间是平均肺癌患者的平均死亡时间，是65岁。而男性工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3岁。而80岁是平均的期望寿命。这样此人就减少了15年的期望寿命。这段时间国家就减少了对此人的退休金的支付。（2）其他人可因此增加对公共福利设施所占的份额。但有时费用与收益是相关的。例如，公共福利设施所占份额的增加意味收益，但是如果社会要减少死亡的风险，从而增加社会公共设施投资的话，每个纳税人就得多支付一些，这就又成了费用。在评定生命的价值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1）平等原则，人的生命价值是相等的；（2）公共设施的投入与生命延长的年限；（3）死亡与焦虑的关系，如何评价心理上的焦虑；（4）其他评价原则的使用。

生产者主权（Producers' Sovereignty）
关于生产者支配消费者的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1967年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所提出。传统的观点认为，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通过市场把自己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意愿进行生产。这种消费者支配生产者的情况被称为"消费者主权"。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并设法让消费者按它的生产来进行消费。这种生产者支配消费者的情况就被称为"生产者主权"。消费者主权基本是以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为前提的。生产者主权基本是以满足人的心理与社会需要为前提的。现代社会消费者对心理与社会需要的日益提高是生产者主权取代消费者主权的基础。现代大公司之所以要建立生产者主权是因为在公司中掌权的技术结构阶层追求稳定与增长的目标，这样，他们就要控制生产与价格。生产者主权的建立则使这种控制成为可能。而现代大公司建立生产者主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则是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来说服消费者。例如，汽车型式年年有新花样，汽车公司通过广告等方式向消费者劝说，使消费者感到不更换汽车就会比别人低一等，从而接受了汽车公司的命令，购买了汽车。无孔不入的广告和其他销售手段使消费者听命于生产者。生产者主权的建立加强了垄断公司的地位，使现代公司成为庞大的计划体系，在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消费者也要受到大公司的支配和剥削。加尔布雷斯把生产者主权的建立作为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
美国经济学家F·莫迪格利安尼（F. Modigliani）、R·布伦贝格（R.brumbery）和A·安东（A.Ando）在50年代提出的一种消费函数理论。其基本观点是：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取决于人一生所得到的劳动收入和财产。人是有理性的，他们消费的目的是实现一生中效用的最大化，这样，他们就要根据自己一生所能得到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来安排一生的消费，使一生中各年的消费相等。生命周期假说的消费函数形式为：

$$C_t = a_1 y_t^l + a_2 y_t^2 + a_3 W_t$$

上式中，C_t 为现期消费支出，y_t^l 为现期劳动收入，y_t^c 为预期未来的劳动收入，W_t 为现期财产。a_1，a_2，a_3 分别为现期劳动收入、预期未来的劳动收入、现期财产的边际消费倾向。预期未来的劳动收入取决于现期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率，所以，可以假设现期劳动收入与未来劳动收入之间有一种稳定的长期关系，即：

$$y_t^c = b \cdot y_t^l \qquad (b > 1)$$

这样，生命周期假说的消费函数形式可以写为：

$$C_t = a_1 {}^l / t^l + a_2 \cdot b y_t^l + a_3 \cdot W_t$$
$$= (a_1 + a_2 \cdot b) y_t^l + a_3 W_t$$

b为1+G，G为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可根据各种边际消费倾向、经济增长率、现期财产量、现期劳动收入这些实际资料计算出现期消费支出。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要根据一生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来安排一生的消费。人的一生（从参加工作之时算起）可以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两个阶段。这样，人们一生中消费与储蓄的规律就是，在工作期，收入大于消费支出，有正储蓄，在退休期，收入小于消费支出，有负储蓄。在工作期的最后一年，财产（即储蓄总额）达到最大，此后，储蓄减少。直至最后，储蓄全部用完，一生中消费支出与劳动收入和财产之和相等。工作期的储蓄是为了退休期的消费，即储蓄是一种延期消费。个人根据一生的收入来安排消费，因此，在长期中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相等，而且是相当稳定的。从整个社会来看，不同的人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只要人口结构是稳定的，则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就是相等而稳定的。

这一结论与长期消费统计资料所得出的消费倾向稳定的结论是一致的。F·莫迪格利安尼根据长期消费统计资料与横断面消费统计资料证明了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这种理论不仅解释了长期中消费倾向的稳定性，而且还可以用于人口结构变动、养老金制度及经济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学界受到普遍重视。

生产批量（Production lot）　指企业在一段连续的时间内，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产量。

生产费用论　一种价值理论，主张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该理论出现于19世纪初叶，但渊源于亚当·斯密价值论中的庸俗成分，即认为商品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所构成，而这三种收入也是商品的生产费用，决定着商品的价值。19世纪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信奉生产费用论，但他们对生产费用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有的人（如萨伊）认为它由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收入所构成；有的（如马尔萨斯）主张它等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加上预付资本的利润；有的如（西尼尔）强调它只由工资和利润所组成；有的（如约翰·穆勒）则声称生产费用就等于工资，而商品价值等于工资加平均利润，等等。生产费用论者犯有共同的理论谬误，即用生产费用的价值来决定商品价值的循环推论，其实质则在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本世纪以来，生产费用论继续为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信奉和宣扬，但对生产费用的解释越来越趋于主观心理评价，这同传统的生产费用论是不同的。

生产要素供求均衡论　一种分配理论。它由马歇尔所创立，是其均衡价格论在分配问题上的延伸和应用。在他看来，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取决于它们的供求关系，即由供求均衡时的价格所决定，而它们的需求决定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其供给则决定于各自的生产费用。可见，这种分配理论把边际生产力论只用来解释需求方面的决定原因，同时又考虑到生产成本对供给的重大作用。例如，它把工资这种劳动的收益说成由其供给和需求所决定，而劳动的需求由边际劳动的纯生产物与工资相等的这一点来决定，同时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养活、训练和维持有效劳动的费用以及劳动的“负效用”。不难看出，这种理论同样旨在渲染各种剥削收入的合理性和劳动收入的公正性。它和边际生产力论是流行于现代经济学中的两种主要分配理论。

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　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是指这样的现象：同一种商品生产过程中所需投入的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发生变化，致使原为某种生产要素密集度较高的商品转而成为其它要素密集度较高的商品。这种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也可以是这样：在不同的国家，同一种商品的生产所需投入的生产要素组合比例不同，从而在一国家为资本密集型的商品，在另一个国家却为土地密集型商品等。

举例说明：以机器制造业为参照，设机器在生产中，要素投入的组合比例很难改变，生产一台机器，必须投入一单位资本和一单位劳动。而另一方面，在制酒业中，要素投入的组合比例却很灵活，资本和劳动相互很容易替代。如果工人的工资水平较低，那么制酒业的厂商将会大量投入劳动要素的方法来生产酒，与要素密集度难以改变的机器制造业相比，制酒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将会低于机器制造业，从而与机器制造业相比，制酒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工人的工资水平很高，那么制酒业的厂商将会选择密集投入资本的方法以节省劳动力的投入，这时制酒业与机器制造业相比，又成为了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要素投入密集度变动的情况就称为要素密集度逆转。

若出现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就会造成赫克歇尔一欧林定理失效。例如：设世界上只有A、B两个国家，A国资本相对丰裕，而B国劳动相对丰裕，在制酒业方面，A、B两国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在A国制酒业属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在B国制酒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现今A、B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按照H-O定理，A国作为资本丰裕国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产品为酒，而B国作为劳动丰裕国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产品也是酒，这一情形是的。

在探索里昂惕夫之谜的原因时，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但是，利用技术资料却很难验证这种逆转现象，至今也没有很有说服力的统计验证表明里昂惕夫之谜是由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所引起的。

白搭车（Free Rider）　见“刺激共存”。

代际一般均衡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nm） 代际一般均衡模型是在萨缪尔逊（P·A·Samuelson）消费借贷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模型。萨缪尔逊1958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有无社会货币设计下的一种精确的消费借贷利息模型"一文分析了社会拥有或不拥有货币设计条件下的利率问题。在这篇文章中，萨缪尔逊假设存在一种各代人相交叉的人口结构，这种代际间交叉的人口结构延续到无限的未来。在最简单的模型中，假定每一代人仅生存两个时间，青年时期与老年时期。供每一代人生存用的商品的拥有情况是，年青时期拥有商品，年老时期一无所有。萨缪尔森从这一代际模型获得一个重要发现：尽管每个经济活动主体能够通过将年青时拥有的商品给他上一代人一半而从他下一代人那里获得下一代人拥有的商品的一半，使自己的状况变得好些，但是市场上根本不会存在任何交易。父亲可以从儿子的资源中得益，但他却不贡献出任何东西。市场只存在着次优，而无最优。市场的这种失灵曾引起长时期的争论。萨缪尔森把这种次优归因为缺乏双重的欲望巧合，他提议通过社会的货币设计来解决这一问题。萨缪尔森的消费信贷模型建立后，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重视。许多人对萨缪尔森的理论加以修正、发展，把萨缪尔森的模型放置到一般均衡分析体系中，得到代际一般均衡模型，用以分析社会产量的最优确定问题。代际一般均衡模型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它被运用于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税收负担问题、资本积累的遗赠、社会保障、菲利浦斯曲线、货币理论的基础、经济周期等理论的研究中。

代际模型（Intergenerational Model） 将阿罗-德布鲁模型向动态多期间经济的扩展不应被限制在面对无限视野的有限经济行为人模型中，这一点已得到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承认。代际模型就是动态多期间的经济模型。在无限视野经济中，个人（或居民户）生活在有限数量的期间中，这样在每天每时经济中都包含不同年龄的消费者，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且有不同的经济参数。如当前收入、长期计划等。这个例子有助于我们对代际模型进行理解，在代际模型中，对传统一般均衡模型中的经济变量按照时间期间重新分解或组合，如同样是消费者，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在代际模型中视为不同变量，从而研究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时间偏好和状态偏好方法中就有类似的情形。代际模型拓展了传统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领域。萨缪尔森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50年代末期就试图在代际（overlapping generations）均衡模型中解释费雪（I·Fisher）的利息理论。这个简单的市场经济模型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其特点是有一个有无限延续的，短期生活（short-lived）的，分代的，但又有必要同一性的居民户。现在西方经济学已经将代际模型方法成功地运用于分析宏观与微观问题，如资源的代际和时际（intertemporal）间的有效配置，代际转移（如社会保障），政府债务的最优筹资以及依其不同的动态特点运用于其他经济分析领域，一些人已经将其引入到国际贸易分析中。正如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代际模型主要运用比较高深的数学方法。

代理费用（Agency Costs） 或称代理成本，指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建立、管理和履行有关代理合同的总费用，它是一种契约性费用的总额，如交易费用、道义上的风险费用、信息费用等。代理费用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1）委托人的监控支出，由委托人支付，以限制代理人的行为；（2）代理人的契约性支出，由代理人支付，以确保代理人不进行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活动，或者确保对委托人利益损失的偿付。二者都是由于建立管理和履行合同而付出的费用。（3）剩余损失。是由于在同样的条件下，代理人的决策偏离了委托人的决策而造成的损失，是合同被最好地而又不完全地执行时，委托人的机会损失。

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是既定的，它以技术生产函数为条件，最佳产量取决于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相等。这种分析把企业看成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黑箱，尽管这在理解企业某些方面的抉择中颇有余地，但它却完全忽视了与投入的组织和协调有关的其他过程。代理理论通过对契约关系进行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代理理论中，合同当事人各方是根据其活动与费用的关系，来分担代理费用的。因此，只要契约性活动过程的边际费用低于由于剩余损失的减少而获得的边际收益，他们就有动力通过谈判，明确界定各自的活动内容，将代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建立最有效率的契约，这样，自利的契约当事人和整个社会都可以由此而获益。代理费用分析对于复杂的契约性排列的多维性，给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在可供选择的契约性排列中，通过研究代理费用的性质，人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暗含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组织行为中的有关变量。公司、个人所有、合股及共有等组织形式，其行为的不同和代理费用的分担不同有很大关系。此外，代理费用分析也被用于保险业和会计学中，对于理解组织结构的选择，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核算方法的选择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代理（Agency） 国际贸易中的代理是指出口方委托国外中间商在一定的时间和区域内代为推销自己的产品。在这里，出口方就是委托人，国外中间商是被委托人，也就是代理人。在代理方式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代销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代理人只负责穿针引线，在某一市场内介绍宣传商品，以委托人的名义与客户打交道，收集客户订单，然后由进出口双方直接签订和执行买卖合同。代理人不负责垫付资金和经营亏损，不承担任何风险。只要交易做成了，代理人就可以从委托人那里得到一定的佣金作为报酬。

在开展代理贸易时，委托人和代理人总要通过签订代理协议来确定它们的责、权、利，以便日后代理贸易的正常开展。一个代理协议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即代销商品种类、代销商品数量或金额、代销商品价格、代销的区域和时间、代理佣金、代理权限以及其他的权利和义务等。代理贸易由于国外代理人无须承担什么风险，容易为它们所接受。对我国的出口商来说，开展代理贸易，有利于推动我国外贸出口的发展。因为国外代理人往往具有较好的推销技巧和较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如能和它们建立代理关系，不仅能直接促进产品的销售，而且能通过信息反馈，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使我国的出口产品有更好的市场适应性和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另外，利用代理人，能更好地解决出口产品在目标市场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保证出口贸易的顺利开展。当然，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出口商能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代理人的基础上。这就要求出口商在开展代理贸易之前，必须慎重选择代理人。作为一个理想的代理人，它不仅应具有丰富的推销经验，广泛的商业关系网，良好的通讯联络设施，而且应熟悉代理商品的有关业务知识，以及在政治上对出口商态度友好等。

根据代理人权利义务大小的不同，代理可以分为三种方式：

①独家代理（sole Agency）。这是指代理人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内享有委托人给予的独家代销某商品的权利。在独家代理方式下，代理人享有专营权，即委托人不得再委托任何第三者在该地代销其商品，如果委托人没有通过代理人就在该地做成了一笔生意，那么代理人仍可取得一定的佣金。另外，代理人也不能同时经营其他来源的同类商品或相似品。独家代理便于调动代理人推销出口商品的积极性，作为委托人，它又可以通过控制商品的售价、数量等交易条件，较好地控制销售市场，取得较多的利润。为了避免独家代理人不努力推销商品可能给委托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签订独家代理协议时，必须认真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尤其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最低代销额。如果代理人完不成最低代销任务，委托人有权撤销它给予独家代理人的专营权。另外，必须结合代理商品的特点灵活确定代理佣金，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市场习惯、市场特点以及委托人的经营意图等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市场竞争激烈或滞销的商品，代理佣金可以定得高一点。在计算代理佣金时，有时以商品数量为基础，有时则以商品金额为基础。为了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可以根据代理人推销商品数量和金额的大小分别确定不同的佣金比例。

②一般代理（Agency）。这是指代理人不享有专营权的代理。也就是说，委托人可以同时在某地区委托几个代理人推销商品，也可以直接向该地区推销商品。如果委托人在该地做成一笔生意，无须向其他代理人支付佣金。在开展代理贸易初期，往往采用一般代理方式，以便分析比较不同的代理人，从中选择最佳代理人，开展独家代理，提高推销效率。

③总代理（General Ageney）。总代理意味着代理人成了委托人在特定区域内的全权代表，它有权代表委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包括代表委托人签订买卖合同，处理货物等。另外，它还有权代表委托人办理非商业性事务。由于总代理的地位十分重要，稍有差错就有可能影响委托人在该地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委托人在选择总代理时往往特别小心谨慎。我国一般不与国外代理人签订总代理协议，通常总是指定我国的驻外贸易机构作为我国进出口公司的总代理。

代位权（Subrogation） 又称为代位追偿权，代位权是针对被保险标的在运输途中遭受承保风险范围内的损失，但这一损失是由于第三者的过失或疏忽所致的这种情况而言的。它的具体内容是指保险人在依据保险合同赔付被保险人之后，被保险人应当将其对招致保险标的损失的第三者所拥有的损害赔偿权转让给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取代被保险人的地位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过失的第三者进行追偿。代位权表明若保险标的受到承保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的原因是第三者造成的，则应由过失的第三者承担最终赔偿责任，但是被保险人可以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先行赔偿，而后由保险人再向第三者进行追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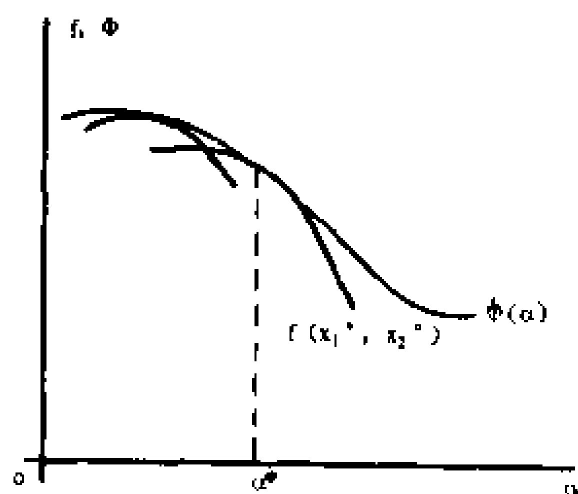
代位权包括所有权代位和追偿代位两方面的内容。所有权代位是指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之后，取得对残余货物的所有权；追偿代位是指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之后，取得向过失第三者索赔的权利。

在保险标的发生实际全损情况下，不存在所有权代位，只存在追偿代位。当保险标的发生推定全损的情况下，保险人通过办理委付手续，取得对残存保险

标的所有权，即使残存保险标的价值大于保险人付出的保险赔款，超出部分亦归保险人所有。当保险标的发生单独海损或共同海损，即发生部分损失的情况下，保险人仅有权取得追偿代位权，而且这一追偿代位权以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的金额为限。如果过失第三者的赔偿高于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人应将超出部分归还被保险人。

保险人取得代位权，是以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为前提条件的，同时，代位权的索赔对象是过失第三者，被保险人应先行享有索赔权，才可能将索赔权转移给保险人，如果不存在过失第三者，保险人也就无所谓拥有代位权。

包络理论（Envelope theorem） 这个著名的定理源于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和制图员翁（y·K Wong）之间关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关系的争论。维纳认为：既然在长期，平均成本应该是最小的，那么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不仅总是在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下方，而且还应该通过每条短期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翁则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这个问题最后是由萨缪尔逊（samuelson）解决的，他用一般的方法展示了长期曲线是短期曲线集的包络曲线。从此，包络定理就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之一。



考虑任意两个变量模型，使 $y=f(x_1, x_2; \alpha)$ 最大化，x_1，x_2 为选择变量，α 为单个参数，代表对最大化者行为的某种约束，这个最大化模型的一阶方程为：

$$f_1=f_2=0$$

解这个一阶方程组，并假定只有唯一解，于是可得一组选择函数

$$x_1=X_1^*(\alpha), x_2=x_2^*(\alpha)$$

这意味着，假如参数 α 变动，两个选择变量一般都会随之变动。

定义间接目标函数 $\Phi(\alpha)$ 为给定 α 时 f 的最大值，于是有 $\Phi(\alpha)=f(x_1^*(\alpha), x_2^*(\alpha); 2)$。包络定理考虑的就是在 α 变动时，$\Phi(\alpha)$ 相对于 $f(x; \alpha)$ 的变动情况。

上图中给出了一个典型的 $\Phi(\alpha)$ 示意图。对于一个任意给定的 α°，有 $xi=x_1^*(\alpha^\circ)$，$x_2^\circ=x_2^*(\alpha^\circ)$。考虑 $f(x_1, x_2; \alpha)$ 在 x_1、x_2 分别固定在 x_1^0、x_2^0 处的情况，当 $\alpha=\alpha^\circ$，正确地选择 X_i，则在该点处 $\Phi(\alpha)=f(x_1^0, x_2^0; \alpha)$

但在 α° 的左边和右边，错误地选择了 X_i（即非最大化）时，由于 $\Phi(\alpha)$ 为 f 在给定 α 时的最大值，所以在 α° 的任何邻域内 $f(x_1^0, x_2^0; \alpha)<\Phi(\alpha)$，这意味着 Φ 和 f 在 α° 处必须相切（假定它们是可导的），并且 f 必须比 Φ 更凹，或者 Φ 必须比 f 更凸。这是在 α 任意给定时的情况，那么在 α 取其他值时，类似的相切情况亦会出现。从上图中，$\Phi(\alpha)$ 对于每个 α 包络 $f(x_1, x_2; \alpha)$ 是很明显的；而在上图中不那么明显却最为重要的一个结论是：最大化模型中的全部比较静态定理都不过是 Φ 和 f 相对曲度关系比较的结果。

考虑一个新的函数，作为给定 α 时 f 的现实值与其最大值之差

$$F(x_1, x_2; \Phi)=f(x_1, x_2; \Phi)-\Phi(\alpha)$$

由于 $f<\Phi$，$x\neq X^*$；$f=\Phi$，$x_i=x_i^*$，所以 F 在 $x_i=x_i^*(\alpha)$ 时有最大值（零），于是对于初始变量 x_1、x_2 和 α，$F(x_1, x_2; \alpha)$ 有零偏导数，即

$$F_i=f_i=0 \quad i=1, \alpha \qquad (1)$$

$$F_\alpha=f_\alpha-\Phi_\alpha=0 \qquad (2)$$

方程（1）正是原先的最大值条件，方程（2）是因袭的"包络"结果：$\Phi_\alpha=f_\alpha$，而且，二阶充分条件为：

$$F_{\alpha\alpha}=f_{\alpha\alpha}-\Phi_{\alpha\alpha}<0$$

所有的比较静态结果都是从这个二阶充分条件中得出来的。由于：

$$\Phi_\alpha(\alpha)\equiv f_\alpha[x_1^*(\alpha), x_2^*(\alpha); \alpha] \qquad (3)$$

两边同时对 α 求导：

$$\Phi_{\alpha\alpha}\equiv f_{\alpha 1}\alpha x_1^*/\alpha\alpha+f_{\alpha 2}\alpha x_2^*/\alpha\alpha+f_{\alpha\alpha}$$

即

$$\Phi_{\alpha\alpha}-f_{\alpha\alpha}\equiv f_{1\alpha}\alpha x_1^*/\alpha\alpha+f_{2\alpha}\alpha x_2^*/\alpha\alpha>0 \qquad (4)$$

这个结果很容易推广到 n 维变量情形，其结果为：

$$\sum \partial x_i^*/\alpha\alpha>0。$$

如果参数 α 只出现在一个一阶条件 $f_i=0$ 中，即 $f_{j\alpha}=0$ 对于 $j\neq i$，那么，这个条件就简化为：

$$f_{i\alpha}\alpha x_i^*/\alpha\alpha>0$$

这就是著名的"共轭对"结果，在这种参数只影响一个一阶方程时，选择变量将于这种影响同方向变动。在许多经济模型中，目标函数都是参数的一个线性表出，例如，在单位成本不变时的总成本（负的）为 $-\sum P_iX_i$，此时 $f_{p_ix_j}=-1, i=j$ 时，$f_{p_ix_j}=0, i\neq j$ 时，因此 $\partial x_i^*/\partial P_i<0$，这里 α 为参数向量 $\alpha=(\alpha_1,\alpha_2\cdots\cdots\alpha_m)$，此时，条件（4）表述为 $F_{\alpha\alpha}=f_{\alpha\alpha}-\Phi_{\alpha\alpha}$ 为负定（或半负定）矩阵。从这个负定矩阵的主对线元素为负，就可导出通常的比较静态结果。包络定理也可以产生出一个非直观的互惠条件。假定有两个参数 α 和 β，由二阶偏导数的不变性有 $\Phi_{\alpha\beta}=\Phi_{\beta\alpha}$，由前面的方程（3）$\sum f_{i\alpha}\partial x_i^*/\partial\beta=\sum f_{i\beta}\partial x_i^*/\partial\alpha$

当目标函数包含有一个线性式 $P_1x_1+P_2x_2+\cdots\cdots+P_nx_n$，$fP_1x_1=1, f_{p_1x_2}=0\cdots\cdots, \partial x_1^*/\partial P_2=\partial x_2^*/\partial P_1\cdots\cdots$，这个结果在消费者理论的补偿需求中和生产者理论的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模型中都出现过。

这些结果在包含有一个或多个附加条件模型中的应用，依赖于其参数是否只出现在目标函数中，还是既出现在目标函数中，又出现在约束条件中（或者只出现在约束条件中）。如果参数只出现在目标函数中，唯一的影响是减少了 x_i 的维数，上述结果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如果参数出现在约束条件中，当参数变化时，约束空间也会变化，这就会破坏 $f_{\alpha\alpha}<\Phi_{\alpha\alpha}$，在这种情况下则为 $\Phi_\alpha=L_\alpha$，L 为条件极值模型中的拉格朗日函数，此时，二阶条件对于比较静态方程的符号的约束，就不再是充分条件了。

包装单（Packing List）　又称为装箱单、花色码单。包装单是出口商开出的表明货物实际包装情况的证明。它的内容主要包括：货物品名、规格、重量、体积、唛头；收货人名称、地址；装运港、目的港及船名；发票号码及合同号码。包装单也是一项重要的货运单据，它的内容须与商业发票提单、领事发票等单据内容严格一致。以备进口国海关或进口商收货时进行核对。

包销（Exclusive Sales）　包销是指出口人通过签订包销协议，将某种或某类商品在一定区域和时期内的专营权给予包销人，这个包销人实际上就是国外进口商，在包销方式下，出口人投向某一市场的商品只能由包销人来销售，而包销人则必须在包销的区域和时期内购足一定数量的商品，同时不能销售其他来源的同类商品，也不得把包销商品转移到包销区域以外的市场去销售。包销是一种买卖关系，它与一般进出口贸易的区别，仅仅在于出口人和包销人（进口人）分别给予和享有专营权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在包销方式下，出口人按买卖合同供货，包销人则根据买卖合同进货，双方自负盈亏并各自承担经营风险。对出口人来说，采用包销方式有不少突出的优点。把专营权交给包销人，有利于调动他推销该商品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扩大出口贸易。采用包销方式，避免了由多个客户经营同种商品可能引起的恶性竞争和自相残杀，不仅有利于提高该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而且还可能为出品人和包销人带来更多的利益。采用包销方式还有助于出口人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和组织运输，并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均衡供货，有助于提高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减少经营风险。当然，包销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包销人选择不当，就有可能形成"包而不销"的局面，从而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另外，由于包销商享有专营权，它就有可能利用所取得的特殊权利与出口人讨价还价，使出口人获利减少。为了尽可能使包销方式发挥最大的作用，出口人在选择包销方式开展外贸出口时，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包销商。二是要签订一个完整合理的包销协议，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时又要有某种灵活性。包销协议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点：（1）关于出口人给予包销人专营权的规定，这是包销协议的核心内容。（2）包销商品品种以及包销人订购的最低限额，选择包销商品时一定要慎重，品种不宜太多。对于包销订购的最低限额必须有一个明确合理的规定，以保证基本的出口，同时可以规定超额奖励的办法，以调动包销人的积极性。（3）包销的地区和时间限制。在确定包销地区和时间之前，必须认真了解包销人的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销售网点、销售能力以及市场情况等。（4）其他权利和义务。这主要包括出口人有义务向包销人提供样品等资料，便于包销人宣传推销，包销人有义务在包销地区积极宣传推销包销商品，维护包销商品的权益以及定期向出口人提供市场信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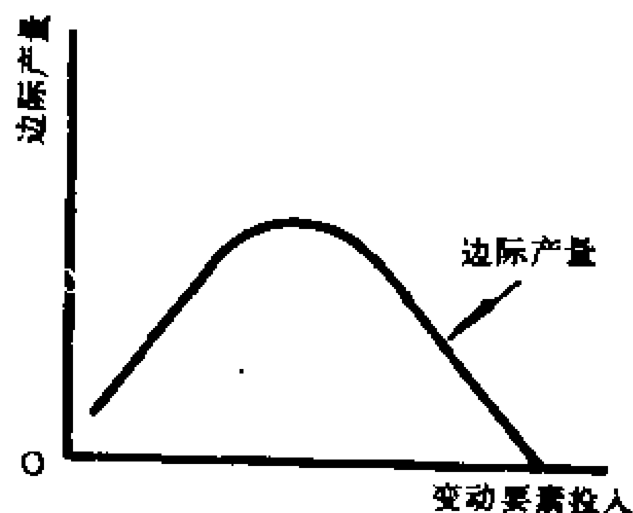
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　边际产量是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当研究某种产品短期的生产函数时，假定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可以变动，而其余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固定的。边际产量被定义为变动要素每一单位变化所引起的总产量的变化。它是总产量增量比劳动力增量。例如，在农业中，假定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固定的，而劳动的投入是变动的，随着劳动投入量发生变化，总产量也发生变化。例如，当劳动力投入为 1 个单位时，产量为 2 个

单位，当劳动力投入为2个单位时，总产量为5个单位。当劳动力投入由2个单位增加到3个单位时，总产量由5个单位增加到9个单位。第二个单位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量为3个单位。第三个单位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量为4个单位。

由于边际产量是分析短期生产函数时所使用的概念，而短期情况下，既然假定除一种要素外其余要素的投入是固定的，技术状况更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边际产量的变化一般将经历先递增，后递减的过程。之所以出现边际产量递增的过程，是因为要在生产中启动某种既定的固定要素，需要投入某一最低限度数量的变动要素。当变动要素的投入低于这一最低限度的数量时，就不能使固定要素的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随着变动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固定要素逐步得到有效的运用。因此，变动要素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固定要素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后，继续增加变动要素投入量不能再使总产量增加，这时边际产量将维持在零这一点不变。当变动要素的边际产量为零时，若再继续增加变动要素投入量，使得其超过固定要素所能容纳的限度，这时，不仅不会使总产量上升，反而

固定投入	劳动(L)	劳动增量(△L)	总产量(TP)	总产量增量(△TP)	边际产量(MP)
平均产量	10	0	0	0	0
(AP)		10	1	1	8
8		8	10	2	1
20	12	12	10	10	3
1	35	15	15	11.7	10
4	1	48	13	13	12
10	5	1	55	7	7
11	10	6	1	60	5
5	10	10	7	1	60

会使总产量下降，这种情况下，边际产量是负的值。下表反映了某种农产品生产中，劳动的边际产量变动情况。表中用固定投入代表土地以及其他固定要素，固定投入始终是10个单位。（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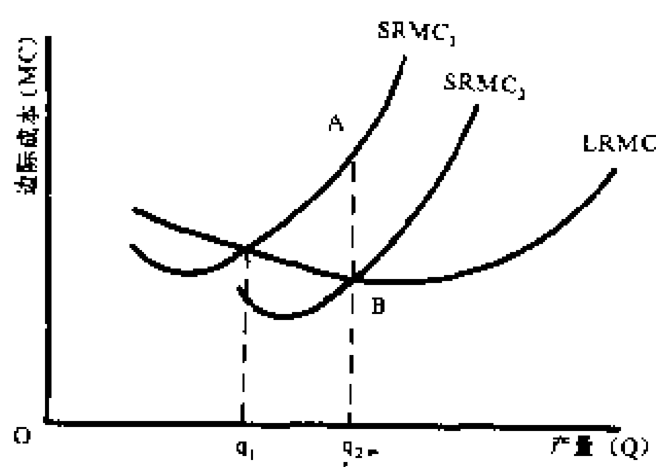
由于随着变动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边际产量经历先递增后递减的过程。因此，若用图形表示边际产量，边际产量曲线是一条倒U曲线。

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边际成本（MC）是生产者在生产中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引起总成本的增量。假定厂商生产的是单一的产品而非联合产品，则边际成本等于总成本增量（△TC）除以产量增量（△Q）。若产量从 Q_0 增加到 Q_1，总成本从 TC_0 增加到 TC_1，则产量增量 $\triangle Q = Q_1 - Q_0$ 总成本增量为 $\triangle TC = TC_1 - TC_0$ 边际成本近似表示为 $MC = \frac{\triangle TC}{\triangle Q}$。如果用导数表示，边际产量表示为 $MC = \frac{dTC}{dQ}$。

边际成本有长期与短期之分。厂商增加产量所引起的边际成本依赖于生产者预期对于所增加产量的需求是否会持久。若生产者预期所增产量的需求是短暂的，不会持久，则生产者不必通过扩大生产设备，调整所有生产要素来达到增加产量的目的，而只需要通过劳动力的加班加点以及通过加强现有设备的使用强度来达到增加产量，满足需求短暂增加的要求。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边际成本为短期边际成本。若生产者预期市场上对于其所增加产量的需求是持续的，则生产者可以通过调整各种生产要素，扩大生产规模来达到增加产量的目的，这种用扩大生产规模的办法来增加产量所产生的边际成本称为长期边际成本。一般而言，生产某一特定产量水平存在特定的最优规模，当预期对所增产量的需求能够持久的情况下应扩大规模，这种情况下的所产生的长期边际成本要小于靠利用现有规模增加产量所造成的短期成本。但若需求的增加是短暂的就不必扩大生产规模，而用通过现有生产规模的超常规使用来达到增产目的。因为一旦较大的生产规模建起来后，需求又降到原来的水平，用较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较小的产量水平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下图反映的是长期边际成本与短期边际成本的关系。

图中 $SRMC_2$ 与 $SRMC_1$ 分别表示大小两种不同生产规模所产生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LRMC 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若产量水平为 q_1，利用较小的规模生产，所产生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为 $SRMC_1$，现在厂商预期需求是增加到 q_2，因此打算增加产量。这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达到（在B点），也可以通过现有规模的超常规使用达到（在A点）。扩大生产规模生产产生长期成本，利用现有规模生产发生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曲线 LRMC 位于短期成本 SRMC 下方。究竟采取何种方法生产，要看需求的增加是否会持续下去。若需求的增加会持续下去，则扩大生产规模以生产 q_2 的产量，否则利用原有规模生产 q_2 的

产量。



边际成本还有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之分。在生产不发生外部性的情况下，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是一致的，在生产发生外部性的情况下，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是不一致的。在生产者生产发生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其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在生产者生产发生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下，其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例如向农田排放污物的工业品生产者造成外部不经济，其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未计入其私人成本。因此其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而在自己农田喷撒农药的农业生产则对相邻的农业生产者造成外部经济。某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因为后者可以少在农药上支出费用。

在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中，边际成本的概念与边际收益（MR）的概念一起被用于决定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在福利经济学中，边际成本的概念又被用于判断资源在各种不同市场结构中的配置情况。

在厂商生产理论中，若边际成本递增阶段将产出推进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一点，则厂商达到了利润最大化。若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厂商减少产量是有利的，若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厂商增加产量是有利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点是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

边际成本也被用于判断资源配置是否为最优。在商品生产中，在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若每一种商品的边际成本都等于该产品的价格 P，则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这时所生产的产品产量是社会最优产量。如果在均衡时，某种产品的价格小于边际成本，说明资源配置不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配置资源，将用于价格小于边际成本的产品生产中的资源撤出用于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产品的生产，这样将增加社会总产量。若均衡时某种商品的价格大于某边际成本，则将那些价格小于其边际成本的产品生产中的资源撤出转移到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产品生产部门，则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将提高。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增进了整个社会福利。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MU）是消费者在单位时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引起的总效用的增量。用 TU_X 表示消费 X 商品所得到的总效用，$\triangle TU_X$ 表示增加消费 X 商品所得到的总效用增量，X 为所消费的 X 商品量，$\triangle X$ 为 X 商品增量。则 X 商品对于消费者边际效用是 $MU_x=\frac{\triangle TU_x}{\triangle X}$ 或 $MU_x=\frac{dTU_x}{dx}$，$\frac{dTU_x}{dx}$ 是导数表示形式。在 $\triangle X$ 变动很小，以致于趋向于零的情况下，用 $\frac{dTU_x}{dx}$ 来表示边际效用更为精确。由于效用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存在客观的度量方法，因此，不同人的边际效用是不可以比较的。在效用分析中，一般是假定边际效用递减，即消费者每递增一单位某种商品的消费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例如，消费者口渴时需要喝水，在喝第一杯水时，这一杯水对他的边际效用很大，喝第二杯水时边际效用小于第一杯水的边际效用，喝第三杯水时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又小于第二杯水的边际效用等。边际效用递减被作为一条定律应用于消费者行为与市场需求分析。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因此，随消费者购买量的增加，消费者对于额外增加一单位商品的评价就较低。这时，要想使消费者增加购买，就必须降低商品的价格。只有价格降低，需求量才能扩大。因此，市场上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加以说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还被用于解释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的特征和边际替代率递减的特征。

边际效用递减定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又称为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它是指随着一个人对某种商品消费数量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例如，消费者消费的其他商品量不变），虽然这个人得到的总效用在增加，但是他增加一单位商品所增加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例如消费者消费汽水，随着汽水消费量的增加，每增加一单位汽水的消费所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下表反映了这一情况（效用单位是任意选取的）。

汽水消费量	1	2	3	4	5
边际效用		26	22	17	12
总　效　用	30	56	78	95	107

随着汽水消费量的增加，虽然总效用在不断增加，但是边际效用却在递减。第三杯水的边际效用（22 个效用单位）小于第二杯的边际效用（26 个效用单位）；第四杯水的边际效用（17 个效用单位）小于第三杯水的边际效用，等等。边际效用递减是消费者行为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假定。与消费者行为有关的许多

重要的原理都是由此种假定导出的。例如需求法则，边际替代率递减定律等都由此假定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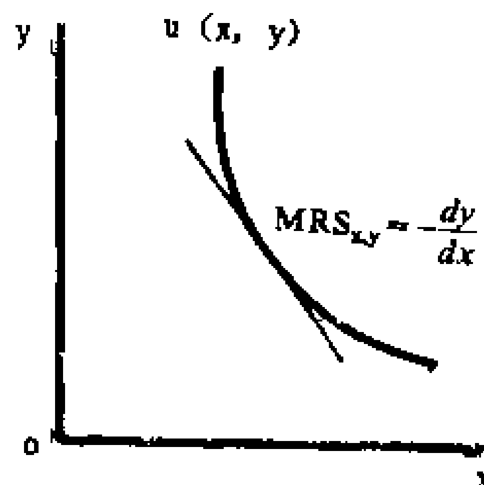
边际收益产量（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边际收益产量（MRP）是指要素的边际收益产量。它是在保持其它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一单位某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所增加的收益。增加一单位要素投入所引起的收入增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要素的边际产量，二是出售产品的边际收益。因此，边际收益产量等于要素所生产的产品的边际收益 MR 乘以要素的边际产量 MP。即 $MRP = MR \cdot MP$。要素的边际收益产量被用于分析厂商对于要素的需求及其工资率 W 的决定。厂商为了使利润达到最大化，总是令工资率等于要素的边际收益产量，即令 $W = MRP$。

边际技术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Technical Substitution） 边际技术替代率是厂商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减少(增加)一单位某种要素的投入而需要增加（减少）另一种要素投入的数量。假定厂商投入资本 K 与劳动 L 两种要素生产产品。生产函数为 $q = f(K, L)$。在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情况下，生产一定量水平的产量 q_0 既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又可以用劳动替代资本。为维持相同的产量水平 q_0，减少一单位劳动的投入，就要增加一定数量的资本投入。用劳动替代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 $MRTS_{LK} = -\frac{\triangle K}{\triangle L}$，或者，$MRTS = -\frac{dK}{dL}$。$\triangle K$ 与 $\triangle L$ 分别为资本与劳动的变动量。$\frac{dK}{dL}$ 是用导数的形式来表示边际技术替代率。用劳动替代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也可以表示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MP_L）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MP_K）之比，即 $MRTS_{LK} = \frac{MP_L}{MP_K}$。$MP_L = \frac{\partial q}{\partial L}$，$MP_K = \frac{\partial q}{\partial K}$，即产量分别对劳动与资本求偏导数。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几何意义是它是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如果生产过程中劳动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那么等产量曲线凸向原点。在曲线各点边际技术替代率是不等的，而且边际技术替代率是递减的。

边际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边际替代率 MRS 是在维持消费者满足程度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为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而愿意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如果消费者只消费两种商品 x，y，那么消费者用 x 来替代 y 的边际替代率 $MRS_{x,y}$ 表示为：

$$MRS_{x,y} = -\frac{\triangle y}{\triangle x} = -\frac{dy}{dx} = \frac{MU_x}{MU_y}$$

$\triangle y$ 与 $\triangle x$ 分别表示 x、y 两种商品的变动量，$\frac{dy}{dx}$ 是用导数的形式表示边际替代率，在效用函数为连续的情况下，它是更为精确的表达形式。MU_x 是 x 商品对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MU_y 是 y 商品对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边际替代率 $MRS_{x,y} = -\frac{dy}{dx}$ 的几何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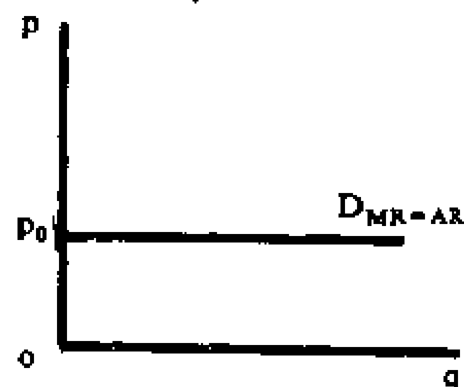


是它是无差异曲线在某一点的斜率。上图表示了这一点。由图形不难理解，$-\frac{dy}{dx} = \frac{MU_x}{MU_y}$。$\frac{dy}{dx}$ 是 y 商品的一个微小的减少量与 x 商品一个微小的增加量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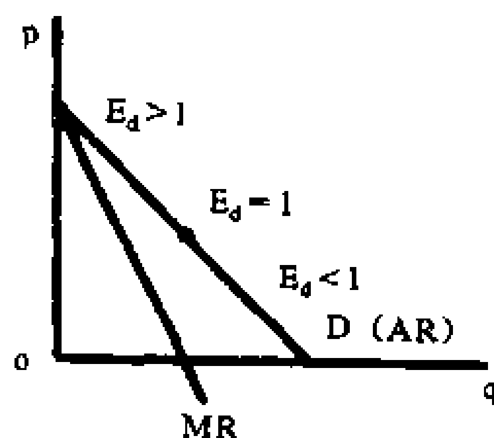
根据无差异曲线 U（x，y）的定义，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各点的效用相同，因此，增加 x 所增加的效用水平与减少 y 所减少的效用水平在绝对值上相等。当 x 的增量为 dx 时，增加的效用为 $MU_x dx$；当 y 的减少量为 dy 时，减少的效用的绝对值是 $MU_y (-dy)$（因为 $\triangle y$ 是一负值，求其绝对值时，在 dy 前加一负号）。由于无差异曲线的定义要求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因减少的 y 而减少的效用与增加的 x 所增加的效用在绝对值上相等，所以得到 $MU_x dx = MU_y(-dy)$，因此，$-\frac{dy}{dx} = \frac{MU_x}{MU_y}$。无差异曲线上各点的边际替代率是不同的。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的特征表明，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这是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为在用 x 替代 y 时，随着 x 的增加，其边际效用 MU_x 递减，而随着 y 减少，y 的边际效用 MU_y 递增。因此 $\frac{MU_x}{MU_y}$ 是递减的。

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 厂商产品销售量变化将引起总收益变化，连续增加销售量将连续得到总收益增量（可取正的值或负的值）。边际收益（MR）是总收益增量比销售增量。用 TR 表示总收

益，△TR 表示总收益增量，q 表示销售量，△q 表示销售增量，则边际收益 $MR=\frac{\triangle TR}{\triangle q}$。如果△q 的变化是很小的量，并趋向于零，那么可以用导数来表示边际收益，$MR=\frac{dTR}{dq}$。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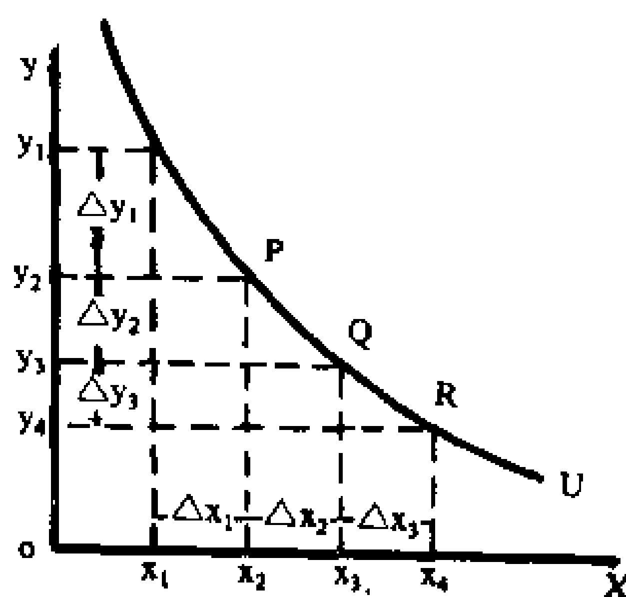
图二

边际收益的变化情况与需求曲线的形状或者说需求曲线的弹性E_d有关。若需求曲线是一条与代表数量的横坐标相平行的直线，那么边际收益是一个常数并且等于平均收益。它表明，在既定的价格下，厂商可以出售任意多的产量。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得到的收益增量是相同的。此种情况下，边际收益以及平均收益（AR）都等于价格P_0，边际收益线、平均收益线与需求曲线 D 重合（见图 1）。

如果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那么边际收益将是递减的。在每一种销售量下边际收益都小于平均收益。任一种价格的平均收益都与价格相等（因为 $AR=\frac{TR}{q}$，而 $TR=p\cdot q$，所以 $AR=P$），所以平均收益线（AR）与需求曲线 D 重合（见图 2）。对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说，边际收益 MR 始终是递减的。需求曲线在各点的弹性不同会影响边际收益的值。在需求曲线弹性 $E_d=1$ 的地方，边际收益值为零；在 $E_d>1$ 的地方，边际收益值是正的；在 $E_d<1$ 的地方，边际收益值是负的。

边际收益的概念在经济分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与边际成本 MC 的概念一起被用于分析厂商收益的最大化。成本-收益分析是建立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概念基础之上的。在利润最大化点，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 MC＝MR，若这时是边际成本处于递增阶段（$MC'>0$），则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边际替代率递减原理（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itution）　边际替代率递减定律是指消费 x、y 两种商品的消费者用 x 商品来替代 y 商品，若要维持其总效用水平不变，x 商品替代 y 商品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是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导出的。若消费者用 x 商品来替代 y 商品，随着 x 商品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而随着 y 商品减少，其边际效用递增，因此，每增加一单位 x 商品只能替代越来越少的 y 商品。边际替代率递减定律体现在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的特征上（见下图）。用 x 替代 y 的边际替代率表示为



$$MRS_{x,y}=-\frac{\triangle y}{\triangle x}$$

若函数连续可导，则表示为

$$MRS_{x,y}=-\frac{dy}{dx}$$

取$\triangle x_1=\triangle x_2=\triangle x_3$，用 x 替代 y 表示随 x 消费品的增加，y 消费量将减少，而使得消费者仍保持原效用水平（仍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 U 上）。随着 x 连续增加相同的单位（$\triangle x_1=\triangle x_2=\triangle x_3$），y 的减少量却是递减的（$|\triangle y_3|<|\triangle y_2|<|\triangle y_1|$）。因此，$-\frac{\triangle y}{\triangle x}$ 或 $-\frac{dy}{dx}$是递减的。即 R 点的边际替代率小于 Q 点的边际替代率，Q 点的边际替代率又小于 P 点的边际替代率。

边际储蓄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MPS）　增加的储蓄在增加的现期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Y 代表增加的现期收入，△S 代表增加的储蓄，则边际储蓄倾向的公式为：

$$MPS=\frac{\triangle S}{\triangle Y}$$

在一般情况下，边际储蓄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由于全部增加的现期收入分为增加的消费与增加的储蓄两部分，所以，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之和必定等于一。边际储蓄倾向这个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所提出来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这个概念也被用来解释乘数的决定。由于一减边际消费倾向就是边际储蓄倾向，即

$$1-MPC=MPS$$

所以，乘数是一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也就是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这说明乘数的大小与边际储蓄倾向成反比例关系。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unsumption） 又称"心理上的消费倾向"，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中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之一，用以解释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其基本内容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在增加，但在所增加的收入中，用来消费的部分所占的比率越来越小。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说的："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换言之，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但小于一。凯恩斯认为这一规律产生于人的心理，即"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这一规律"作为人性之心理而论，似乎非常合理。"凯恩斯把这一规律作为消费需求不足的基本原因。在整个凯恩斯主义体系中，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某些短期中也存在过。但从长期消费统计资料来看，并不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一规律。因为这些资料证明了、长期中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平均消费倾向，两者都是相当稳定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凯恩斯所提出的这一规律"主要是以内省和极偶然的观察为依据的"，没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因此，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根本不能成为一条规律。

边际效用论 一种价值理论，宣扬商品价值由边际效用所决定。它在19世纪70年代初由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各自独立提出。以后，奥地利学派的维舍尔尤其是庞巴维克作了系统的阐述，形成完整的理论学说。按照这种理论，商品的效用同消费者的主观评价紧密相联系，它是价值的源泉，但它只有与稀少性相结合时才形成价值。价值决定的尺度即为"边际效用"。这就是说，随着物品数量的不断增加，每单位物品的效用随之递减，其一系列递减的效用中最后一单位所具有效用，反映着稀少程度的变动对于价值量变动的影响，它直接决定着该物品的价值。很清楚，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反科学的主观价值理论，它完全仰赖主观心理因素，既割断商品价值与劳动之间的联系，又无法具体测量价值量的大小，更不可能寻找一个共同的价值量尺度。它的出现和发展，反映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价值理论上进一步庸俗化，还直接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迄今为止，边际效用论一直对西方经济学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

边际效用学派（The Marginal Utility School）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和英国以杰文斯为代表的边际效用论者的统称。广义的提法还包括剑桥学派、美国学派以及其时一切信奉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的经济学者。边际效用学派的共同理论特征是：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因袭古典学派重视供给与成本的传统做法，转而对需求与消费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崇尚抽象演绎法，大量采用边际分析手段，同时仰赖主观心理因素的作用；在价值论上，积极宣扬边际效用论，主张商品价值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评价，即由该商品最后一个单位的效用所决定；在分配论上，提出时差利息论，劳动负效用说等庸俗学说，反对古典学派的有关理论。其中宣扬和推崇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其核心内容。该学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为资本主义辩解，自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反对的态度。边际效用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西方经济学。

边际生产力论 一种分配理论。该理论声称，在自由竞争的静态环境里，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取决于它们各自对生产的实际贡献，换言之，它们的收入由各自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例如，当劳动量不变而资本相继增加时，每一单位资本增量所增加的产量会依次递减，最后一单位资本增量所增加的产量即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它决定着资本的报酬即利息的大小。同理，当资本量不变而劳动相继追加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着劳动的报酬即工资的高低。该理论由此得出结论，这个公正的"分配的自然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剥削，因而阶级斗争和革命完全没有必要。无庸赘言，边际生产力论是一种典型的否定剥削的辩护学说。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的屠能就提出边际生产力的思想，而直至该世纪末约.贝.克拉克才正式提出并系统发挥了这个理论。英国的维克斯蒂德为传播和发挥这种理论也做了很多工作。它一直是现代经济学中最为流行的分配理论，西方学者们至今常常用它来说明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决定问题。

边沁功利主义（Jeremy Bentham 1748—1832）　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边沁所创立的一种伦理哲学体系。他提出了"功利主义"这一术语，并把功利作为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在他看来，追求幸福是人类出于本性的根本动机，它集中表现为"获得快乐"和"避免痛苦"，因此，个人行为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加以平衡的计算结果。至于社会作为个人的总和，它的幸福只能是社会成员的幸福的总和。据此，他把"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作为其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进一步主张，只有个人才对自己的苦乐有真正的了解，因而人们追求自己私利的行为是正当和正确的，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应加以干预。他又指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在于它的效用，而效用就是指它具有的使人获得快乐和避免痛苦的能力，并且效用会随物品量的增加而递减。这样，边沁就把功利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乃至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边沁功利主义对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甚至欧洲大陆的许多经济学者，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在李嘉图、詹姆士.穆勒、约翰.穆勒以及杰文斯的经济学说里表现得最为典型。

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英国杰文斯、奥国门格尔和法国瓦尔拉先后提出的边际主义经济学说，导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发生着根本性的转折，经济学史上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常被称为"边际革命"。顾名思义，边际革命是以出现边际主义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其根本特征的。具体地说，它表现为：1.一反古典经济学历来注重供给（成本）分析的传统做法，转而从需求（消费）的角度来构筑新的经济学体系，完全扭转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方向。2.借助于微积分学一类高等数学知识，倡导边际增量研究方法，为经济分析的精确化和定量化提供着一系列有效的分析工具，从而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3.建立起一整套以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为两大支柱的理论体系，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产生提供着基本的框架结构和大部分理论内容。这些理论一方面以主观心理评价为出发点和基础，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否认经济关系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始终应用边际原理进行分析论证，较精细地探究了较低理论层次（包括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经济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经济科学或经济知识的进步和发展。

边际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面对劳资冲突日趋严重和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传统经济学在当时已穷于应付，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新的经济学。就理论渊源而言，前人早已先后开创主观经济学说的先河或提出若干有关边际分析的理论观点，同时高等数学的迅速发展解决了边际分析精密化的技术问题，这些都使边际革命水到渠成。边际革命的诞生还被有些人看成是"近代经济学"的起端。边际革命一般认为结束于本世纪30年代，在此期间，马歇尔、克拉克、帕累托、维舍尔、庞巴维克、威克赛尔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被说成对边际革命作出杰出的贡献。这场经济学革命的影响十分深广，它所确立的众多的经济学原理，术语概念以及分析工具至今仍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的或重要的部分。

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　增加的消费支出在增加的现期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y表示增加的现期收入，△C表示增加的消费支出，则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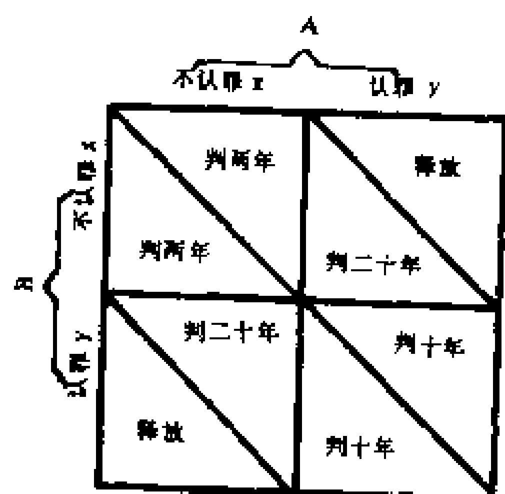
$$MPC = \frac{\triangle C}{\triangle y}$$

在一般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由于全部增加的现期收入分为增加的消费与增加的储蓄两部分，所以，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之和必定等于一。边际消费倾向这个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所提出来的。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这个概念被用来解释引起消费不足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以及乘数的决定（乘数的数值等于一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现代经济学家对长期消费统计资料的研究否定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证明了在长期中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平均消费倾向。

边境贸易（Frontier Trade）　边境贸易是指两国在边境附近进行的商品买卖活动。它包括小额边境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两种形式。小额边境贸易是指两国在其边境地区的一定范围内，为照顾双方边境居民交换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传统习惯，允许它们进行小额的商品贸易。双方居民开展小额贸易的地点、交易商品的数量和金额都有一定的限制。边境地方贸易是指两国边境地区的国营贸易机构或有关的企业在政府规定的商品范围和限额内，相互进行商品交换。这种贸易的规模要比小额边境贸易大，而且具有比较大的伸缩性。开展边境贸易，贸易双方通常都相互给予减免关税和简化海关过境手续等优惠待遇。当然，这种优惠待遇仅限于邻国间的边境地区，不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

囚犯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犯的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典型的范例。假定警察局收审了两名嫌疑犯。检察机关认为他们合伙犯了罪，但却没有掌握他们犯罪的确切证据。两名嫌疑犯被隔离关押，他们被迫作出两种选择：认罪或不认罪。如果两个人

都不认罪，就不会判他们重罪，但还要判以轻罪，判以轻微的惩罚。如果两个人都认罪，他们将被判以重罪，但地方检察机关会申请对他们进行宽大处理。但如果其中一人认罪，而另一人不认罪，认罪者将获得自由，而不认罪者将遭重判。A、B两人都陷入了认罪还是不认罪的困境。A、B两名嫌疑犯面临x、y两种选择，x选择为不认罪，y选择为认罪，这可以用图形表示下图表示的是A、B两名嫌疑犯不同选择的结果。四个小方格用斜线隔开，斜线的右上角为A选择的结果，左下角为B选择的结果。其中不认罪为x策略，两个人在假定对方不会认罪的情况下若能配合默契，则同时能免遭重判；认罪为x策略，双方在设想对方不会认罪的前提下通过自己认罪获得释放。在博弈论上，竞争的均衡而又稳定的解是两



人都认罪，两个嫌疑犯若能迁就对方，相互合作而不认罪，则会遭到轻判。但是在竞争的假设下，不会出现不认罪的结果，因为两人都被隔离审查，不能相互勾结。竞争者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只能导致两人最后都认罪的结果。从A、B单个人的角度讲，认罪对于个人是最好的策略，不管对手是认罪还是不认罪。因为他一旦选择不认罪，若他的对手认罪，他将被重判，而让对手得益。

囚犯的困境揭示了社会中各个人理性决策所达到的目标与他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所达到的目标的差异。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整体中，个人的行为会对社会其他成员造成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在有外部不经济存在的情况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有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例如，牧民在共有草场上掠夺性放牧的结果会导致草场的破坏。各国渔民在公海上掠夺性捕鱼会导致渔力资源的枯竭。因此，可以把由个人参与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看作是理性的个人通过这些活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个人面临的是竞争还是合作的选择，囚犯的困境同样存在于这些选择之中。

奴隶（Slavery） 奴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奴隶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和“私有财产”，任意买卖和屠杀。奴隶所生子女仍为奴隶。奴隶终年累月在奴隶主监督下为奴隶主进行劳动，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奴隶占有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以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最为典型。奴隶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在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罗马就已出现了很大的奴隶市场。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末欧洲及美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掠夺黑人，贩卖至美洲作为奴隶。美洲大陆发现后，欧洲殖民者把非洲视为掠夺黑人的场所，而以葡萄牙人贩卖奴隶为最早。十六世纪后半期，西班牙、荷兰、丹麦、法国和英国都参与了这一活动。十八世纪，英国夺取贩卖黑人奴隶的特权，利物浦成为贩卖奴隶的中心。十八世纪美国殖民者也参与了这一罪恶活动。殖民者从非洲掠取黑人贩卖至美洲，以高价出售给矿主和种植园主，又从美洲换取廉价原料运至欧洲。废除与维护奴隶制的矛盾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达到顶峰。林肯总统于1862年9月22日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规定从1863年1月1日起，南方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成为自由人。1865年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废除了奴隶制。奴隶制的废除，鼓舞了工人、农民和黑人，也使工业资本集团控制了联邦政府，扫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障碍。

凸性（Convexity） 在经济数学中主要研究集合与函数的凸性。设有平面上的集合C，如果C上任意两点的连线仍然在C上，那么就说C是一个凸集合。通过凸集合边界上的每一个点可以作一条直线，这就是该集合的支撑直线，它总是在该集合的某一侧，而不会把这个集合分成两部分。这些概念如果从二维空间推广到多维向量空间，支撑直线就变成了支撑超平面。任给一个凸集合C，取C的下限就可以得到一个凸函数：

$$f(x)=\inf\{\xi:(x,\xi)\in C\}$$

凸函数中，每一条弧都不高于其弦，或者说，函数的二阶导数非负。凸性在经济分析中相当重要，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许多前提假设都包含着凸性原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它要求生产函数的二阶导数非负，也就是要求它具有凸性，如果生产函数的二阶导数小于零，那么对于自由竞争条件下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生产者来说，其生产将不会受到任何制约，这是与经济现实不相吻合的。对凸性的系统研究发生在本世纪以来，人们为了寻找经济问题中的极点，对制约的最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二战以后，博弈论与线性规划的发展要求凸多面体理论的配合，从而为凸性在经济分析中的更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希克斯、冯·诺依曼、埃奇沃思、阿罗与德布罗等人

为凸性理论的创建与扩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目前，凸性在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相当广泛，涉及到竞争均衡的存在以及最优化福利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凸规划（Convex Programming）　是非线性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对凸集合与凸函数的性质进行深入的研究，来找出有关凸函数的非线性极值的方法。在凸规划中，目标函数一般都是求最小化问题，还涉及到凸的约束条件。例如，设某个经济行为人要进行生产，生产过程由参数向量 $x \in R^n$ 控制，此人可以按需要购买生产要素，数量由 $g \in R^n$ 表示，生产成本为 C（x，g）。如果参数指标 x 以及要素价格 P^* 是固定的，那么行为人应当选择可以使成本 C 达到最小的 q，对此问题求解就可以得出非线性极值。

汇率（Exchange Rate）　"外汇汇率"的简称，亦称"汇价"。以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或两种货币间的折算比率。其产生源于国际间债权债务的清偿及资本国际转移的需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汇率的作用极为重要：（1）它把具有不同名称、计算单位、价格标准的各国货币，按相互间的对比关系，折算成一定数量的别国货币，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2）汇率使各国物价间建立了联系，在和各国的商品交换中，有效的汇率可以反映出本国在各种产品上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3）体现了一国货币的国际价值。

汇率战（Exchange Rate Warfare）　即"外汇倾销"。见"外汇倾销"。

汇率上浮（Exchange Float Upward）　又译作"汇率上升"，"汇率下浮"的对称。在日常外汇交易中，一种货币兑换的另一种货币数增加。一种货币汇率上浮即另一种货币汇率下浮。例如，昨天 1 美元 = 135 日元，今天 1 美元 = 136 日元，说明美元汇率上浮，即日元汇率下浮。

汇率下浮（Exchange Float Downwatd）　又译作"汇率下跌"，"汇率上浮"的对称。在日常外汇交易中，一种货币可兑换的另一种货币数减少。一种货币汇率下浮即另一种货币汇率上浮。

汇率上升（Exchange Float Upward）　又译作"汇率上浮"，"汇率下跌"的对称。见"汇率上浮"。

汇率下跌（Exchange Float Downward）　又译作"汇率下浮"，"汇率上升"的对称。见"汇率下浮"。

汇款（Remittance）　汇款是一种国际结算方式，它是指债务方或付款方通过银行，将所欠款项汇交债权方或收款方。在国际贸易结算方式中，汇款方式是最为简单的一种，在贸易中，又称为买方直接付款。

由于汇款方式是由债务人主动通过银行将一定金额付给债权人，以结清其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此时结算工具的传送方向和资金的流动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汇款这一结算方式是顺汇，即汇付法。

汇款方式有四个基本当事人，它们是汇款人（remitter），即债务人；收款人（payee），即债权人；汇出银行（remitting bank），即受汇款人委托汇出款项的银行；和汇入银行（paying bank），通常为汇出行在此国的代理银行。

汇款方式的业务程序是：债务人做为汇款人向银行出具汇款申请书，委托汇出行办理汇款；汇出行接受汇款申请书，则依申请书中的指示向汇入行发出付款委托书，并将汇款拨交汇入行，这种拨交的方法称为偿付，如果汇入行和汇出行之间有往来帐户，汇款的偿付只需将汇款金额贷记汇入行在汇出行的帐户或将汇出行在汇入行帐户借记。汇入行收到付款委托书，就向收款人交付汇款。在汇款业务过程中，凡不属汇出行和汇入行的过失，例如文件遗失、传递失误等，汇出行和汇入行均不承担责任。

汇付方式通常有三种，即信汇、电汇和票汇，汇款人可以选择使用。

信汇（mail transfer；M／T）是指汇款人委托本地汇出行将付款委托书以航空邮寄的方法寄交汇入行，授权汇入行向收款人支付一定金额，在信汇方式中，汇款人需填写信汇委托书，提交所寄款项，并支付信汇手续费。在信汇方式中的结算工具就是信汇委托书。

电汇（telegraphic transfer；T／T）是指汇款人委托本地汇出行将付款委托书以电传、电报或电话方式至国外的汇入行，授权汇入行向收款人支付一定金额。目前国际上使用的电汇大部分是以电传方式进行的。在使用电汇方式付款时，汇款人需填写电汇申请书，向汇出行交纳汇出款项和电汇费用。电汇的结算工具则是汇出行发出的电报或电传。

票汇（demand draft；D／D）是指汇款人向当地汇出行购买银行汇票，自行寄交收款人，由收款人或其指定人持汇票向汇入行取款，票汇的具体作法是：债务人以汇款人身份，填写票汇申请书，将所汇款项和票汇手续费一同交给本地汇出行：汇出行则开立以其国外代理行为付款人的即期银行汇票交给汇款

人，由汇款人寄交收款人；同时汇出行将汇票通知书或票根寄给汇入行，即其代理行。收款人持汇票向汇入行取款时，汇入行将汇票和票根核对无误后，则向收款人付款。在票汇方式中，结算工具是银行即期汇票。这时汇入行是无须通知收款人的，而由收款人自行持票到汇入行取款。另一方面，票汇下的银行汇票是可以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的，因此，票汇方式还可能涉及汇票的背书人和被背书人。

汇票（Bill of exchange，简称 draft；bill） 根据1882年英国汇票法，所谓汇票是由一个人向另一人开立的无条件的书面支付命令。要求受票人在见票时或于将来一定时间，对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该定义较为完整准确地阐明了汇票的含义，一张票据须符合上述定义的各个方面，才可以称为汇票。

从汇票的定义可以看出，汇票涉及三个基本当事人，即出票人（drawer），受票人（drawee）即付款人（payer）和收款人，汇票的当事人身份是可以重叠的，如银行汇票，其出票人又是付款人。

各国法律对汇票的要求不尽相同，在国际上现有《本票、汇票统一法公约》，依照这一国际公约，作为汇票，必须具备下列几项：

(1) 汇票上必须写明汇票字样；

(2) 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命令；

(3) 付款人姓名；

(4) 付款期限（未载明付款期限的，作为见票即付对待）；

(5) 付款地点（未载明付款地点的，付款人姓名旁边的地点视作付款地点）；

(6) 受款人或其指定人；

(7) 出票日期和地点（未载明出票地点的，出票人姓名旁边的地点视作出票地点）；

(8) 出票人签字。

汇票按照不同的原则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依照有无附带货运单据，汇票分为光票和跟单汇票；依照出票人不同，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依照汇票的付款时间不同，分为即期汇票和远期汇票；按汇票收款人的不同，可分为限制性抬头汇票，指示性抬头汇票和持票人抬头汇票等。

汇票不仅可以作为结算和押汇的工具，还可以作为信贷工具。依照《本票、汇票统一法》汇票的提示期限可以长达一年，而汇票过了提示期限，则自动作废，过期汇票的执票人在遭到拒付的时候，是无权向出票人或前手背书人行使追索权的。

汉堡规则（Hamburg Rules） 汉堡规则的全称是"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这一公约于1978年3月在德国的汉堡签订，参加签约的国家多达78个。汉堡规则是对海牙规则的全面深刻的修改，与海牙规则相比，它的主要变化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扩大了承运人的责任。一方面，延长了承运人的责任期，承运人对货物的责任期变成了从承运人接管货物起，到货物交付给收货人为止。另一方面，废除了许多承运人所享受的不合理的免责条款，使得承运人在更大的责任范围内对于货物的损坏、灭失或延迟交货等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提高了承运人对货物损失的赔偿金额限额。第三，延长了托运人提出诉讼的时效，从原先的一年延长到二年。第四，规定原告可以自由选择诉讼和仲裁的地点。海牙规则对此未作规定，而汉堡规则则规定原告可以选择下列四个地点之一为诉讼或仲裁地点，这四个地点分别为被告的所在地、合同签订地、合同有关条款所规定的地点、装运港或目的港。这种规定有利于原告选择有利的诉讼或仲裁地点。总之，汉堡规则对承运人与托运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规定，这对促使承运人搞好运输工作、保证货物运输的顺利进行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也必将有利于国际贸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堡规则规定该规则只有在得到20个以上国家批准、接受、认可满一年以后方可生效。汉堡规则现已生效。

记帐外汇（Foreign Exchange of Account） 亦称"双边外汇"、"协定外汇"。见"外汇"。

记名提单（Straight B / C） 又称"收货人抬头提单"，由托运人指定收货人，在提单的收货人栏内，载明收货人的名字，承运人交货时只能将货物交给托运人所指定的收货人，而不能将货物交给收货人之外的其它任何人。这样，记名提单不具流通性，不能以背书方式转让，虽然可以避免提单在流通过程中的被盗、冒名背书等情况，银行也不愿接受记名提单作为议付货款的单据；另一方面，在货物发运后，如果买方破产，无力偿付货款，卖方却不能背书转让提单来转售货物，因此，卖方亦不愿采用记名提单。通常是在运送贵重物品时才采用记名提单。

记名股票（Registered Stock） 即该股票表明在股份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记有股东的姓名、住址，股票上也注明股东的姓名，为了保证持有人能行使股东权力，这种股票的买卖必须办理过户手续。无记名股票则不记载股东姓名。

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

世界粮食计划署成立于1961年，1963年1月开始工作，它是联合国和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合办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罗马。成立该机构的宗旨是通过提供国际粮食援助，减轻一些国家因各种紧急灾害所造成的困难，进而支持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世界粮食计划署下设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由30个成员国组成，分别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世界粮农组织选举产生，该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例会，听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报告，研究制定中长期国际粮食援助政策和计划，并在年终向经社理事会和粮农组织提出书面报告。

世界粮食计划署所提供的援助项目可以分为二大类，一类是紧急援助，即在受援国遭受天灾人祸给该国造成巨大损失时（向该国）提供的救济，另一类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主要涉及农业发展、工业建设、公共工程的完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等。援助的具体内容，除了粮食和其他各种食品外，还包括生产资料和医疗、运输及技术等服务。一般来说，只有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才有资格向粮食计划署申请援助，经该署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共同审查方可落实援助项目。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金来源于联合国成员国和粮农组织成员国以自愿认捐形式提供的现金、实物和劳务等。我国于1979年正式参加该署的活动，在向该署认捐的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的援助。

世界粮食理事会（World Food Council）　世界粮食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成立于1974年12月，它是联合国处理粮食问题的最高行政机构，总部设在罗马。设立该理事会的宗旨是协调粮食生产和贸易上的国际行动，研究世界粮食生产、贸易、安全、援助等方面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制定可行的综合办法。该理事会由联合国大会选出的36个国家组成，理事国任期3年，每年改选$\frac{1}{3}$，可以连选连任。理事会成立以来开展的工作中主要包括增加对粮食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的投资以促进其粮食生产，建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和国际谷物储备），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奠定基础、增加和改进对缺粮国家的粮食援助、减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粮食贸易中的壁垒等。我国于1982年当选为该理事会的理事国。

世界出口加工区协会（World Export Processing Eone Association）　世界出口加工区协会成立于1976年，其成员国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该协会的宗旨是通过协调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出口加工区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加强这些国家在同国外投资者开展谈判时的地位，以保证它们从各自的出口加工区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　联合国经济方面的专门机构之一，原名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因而其宗旨就在于通过为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和技术援助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复兴与开发。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都是按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决议成立的。世界银行宣告成立的日期为1945年12月27日，正式营业日期为1946年6月25日。1947年正式成为联合国金融方面的专门机构之一，行址华盛顿。

只有IMF的成员国才具备成为世界银行成员的资格，截止1983年9月，已有144个成员国。成员国认缴的股金构成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成立之初法定资本100亿美元，到1980年6月底，法定资本已增至705亿特别提款权。与IMF一样，认缴股金的多少决定了除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外的投票权的分配，每增加10万美元股金可增加一票。美国是认缴股金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拥有决定世行方针与业务的最大的决策权和否决权。

除各成员国认缴的股金外，世界银行的资金也来源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以及其本身的营业利润。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世界银行贷款的重点已由成立初期的西欧国家逐渐转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主要投资于各种基础设施及农业、公用事业、教育等项目，条件相当严格，要经过严格的程序，调查项目的可行性和贷款的必要性，在使用贷款过程中还要接受世界银行的相当具体的监督和考察。此外，如果不是政府机构贷款，还必须由政府给予担保，等等。

严格苛刻的贷款条件保证了该行的营利，但也限制了该行宗旨的全面实现，并且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世界银行先后成立了两个附属机构，即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国际开发协会（IDA），专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条件更宽松和优惠的贷款。其中国际金融公司于1956年7月成立，其宗旨是通过向不发达国家的私人企业提供不需政府担保的贷款和参与私人企业的股份来促进这些国家私人企业的壮大和国际私人资本的流人，进而促进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开发协会成立于1960年9月，其宗旨是向较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条件更宽、期限更长、负担更轻，并可部分用本国货币偿还的贷款以促成世界银行宗旨的实现，故又有"世界银行第二"的称号。

世界银行及其先后成立的附属机构往往被合称为世界银行集团。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方面完全相

间，由各成员国委派理事和副理事各一人组成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每年例会，决定重大事项并授权执行董事会处理日常业务。执行董事会由 22 人组成，持有股份最多的美、英、法、德、日各指派 1 人，其余 17 人由成员国按地区分组推选，我国单独列为一组可独自指派 1 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和"国际保护文学艺术作品联盟"的部分成员国于 1967 年 7 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共同缔约建立的，该组织于 1970 年 4 月生效，并于 1974 年 12 月成了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它的总部设在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政府间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以及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的配合，更好地保护全世界的工业产权；保证各知识产权联盟之间的行政合作。该组织的保护对象主要是专利、商标、设计等工业产权以及文学.艺术、音乐、电影、摄影等的版权。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鼓励缔结有关国际条约，协调各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办理国际商标、专利、版权等的注册登记，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各种技术转让等。该组织的有关决策由它的最高权力机构全体大会以及成员国大会作出，并由它下设的协调委员会和国际局负责执行和管理。我国于 1980 年 6 月 3 日加入该组织。

世界贸易系数（Ratio of World Trade） 世界贸易系数是指一定时期内国际贸易总额与世界生产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世界贸易系数 = \frac{国际贸易总额}{世界生产总值} \times 100\%$$

战后以来，随着世界生产的不断发展，国际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它表现为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反映在世界贸易系数上，就是国际贸易系数越来越大，这种状况还将不断持续下去。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World Trade Centres Association）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成立于 1968 年 4 月，总部设在纽约。它的宗旨是促进各国之间的国际性商业联系和相互了解，鼓励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支援，促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推动世界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该协会由包括我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团体及其他有关组织组成，它的主要活动是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

可调换优先股票（Convertible Preferred Stock） 即指在规定的时间内，优先股的股东可以按一定的转换比率把优先股换成普通股。它对于投资者而言，这种优先股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可撤销信用证（Revocable Credit） 与不可撤销信用证相对。它是指开证银行在开出信用证后，不经过受益人同意，也不必事先通知受益人，就有权随时取消或修改信用证。通常在可撤销信用证上都注有"可撤销"字样，对于没有任何注明的信用证，应视为可撤销信用证。

开证银行对于可撤销信用证的撤销和修改都无需征得受益人同意，此为各国银行界确认；在实际业务中，开证银行对可撤销信用证的撤销或修改通常均通知银行或议付银行，但在法律上却并非有此义务。如果通知行或议付行在确知可撤销信用证已被撤销或修改之前对信用证进行了承兑或议付，开证行通常承认此种承兑或议付有效，则可撤销信用证自动变为不可撤销信用证；而对于非通知行或议付行冒然议付可撤销信用证，而后发现信用证已撤销或修改，开证银行对此议付行为是不会予以承认的。因此，对于可撤销信用证，通常只有通知行或议付行才敢予以承兑或议付。既使对于通知行或议付行，通常也需在确认可撤销信用证未被撤销或修改之后，才对其予以议付。

在可撤销信用证方式下，开证银行并未向出口商提供真正的银行信用，出口商实质上依靠的仍然是进口商的商业信用，因此，出口商通常不愿采取可撤销信用证方式结算货款，在国际贸易中，采用可撤销信用证的情形也相对较少。

可赎回债券（Redeemable Bond） 即在债约中规定发行公司有权在债券到期之前，按照票面价值加上一定的补偿金给予赎回的债券。这种债券对发行公司有利。

可赎回的优先股票（Callable Preferred Stock） 即允许发行公司按照其原来价格加上一定百分比的补偿金予以赎回的优先股股票。比如，发行公司认为能够以较低股利的股票来代替已发行的优先股时，就可以行使这种权利赎回已发行的优先股股票。

可交易与不可交易商品（Tradeable And Non—Tradeable Commodities） 区分可交易与不可交易商品，其必要性主要是针对国际贸易理论而言的。在国际贸易中，有些商品是不可交易的，例如，某些商品运输成本过高，或关税过高，使交易无利可图，再如，有些商品交易虽然有利可图，但这些交易却是非

法的，等等。这样，区分可交易与不可交易商品，并进而进行理论分析，成为国际交易理论的一个特色。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就对可交易与不可交易商品进行了区分，他们认为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是国际性不可交易商品，这些生产要素在国际上完全不具流动性，而在一国国内则完全具有流动性，但是生产出的产品则属于可交易商品，在国际上具有完全流动性。这种区分方法不仅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Ricardo)、穆勒（Mill）等严格遵守，而且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如陶西格（Taussig），欧林(Ohlin)、哈伯勒（Haberler）等也接受了。这样，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就包括不可交易商品，而且认为不可交易的生产要素供给是固定的，消费者偏好对不可交易商品市场不发生作用。

区分可交易商品和不可交易商品意味着将市场分成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但是，并不能认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相互独立的，相反，这两种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对于可交易与不可交易商品的价格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几个著名的定理。如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Samuelson—Stolper theorem），这一定理指出在两种要素、两种产品的模型中，如果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那么在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较为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更大比例的上升，从而，这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将会有所增加，再如，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也指出，在国际贸易中，既使各国要素禀赋状况不同，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完全不具流动性，通过商品的国际交换，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也必然趋于相等。

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交易与不可交易商品的区分已不再象古典经济学那样简单地将产品均视为可交易商品，而将生产要素均视为不可交易商品。生产要素完全不具流动性的限制条件已经放宽，同时，不可交易商品中也包括了不可交易的产品。

可再生资源（Renewable Rssources）　所有的经济资源都可分为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是指任何可以借助于“自然”的方式得到部分或全部弥补的资源，也就是说它自身能够经常地得到更新与再生，并且这个过程能够持续下去。如生物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人类对它们的利用并不会导致这类资源的消失，它们本身可以“再生”，以确保这类资源长久的存在。不可再生资源则相反。可再生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们的可再生能力受人类对自然的开采利用程度的影响。其中有一部分会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趋于消失，属于可耗尽型资源。如生物资源：鱼、鸟、动物、森林、草地、耕地等。另一部分则受人类对自然剥夺程度影响较小，如阳光。地热能资源等。属于不可耗尽型资源。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看，任何资源都不可能是无限再生的，因此可耗尽型与不可耗尽型资源也可看作是根据其作为原始自然形态存在的历史时期的长短而划分的。

可变动年金（Variable Annuity）　年金是在相等的间隔期连续地分批支付金额相等的款项。例如，面额为1万元的债券，期限为5年、利息率为10%，利息的偿付办法是每年末支付。这样债券持有人每年末都有1千元的利息收入。这个相等的数额就是年金。可变年金是指年金的定期支付依赖于某些不确定的成果，因此每年的支付额就不是相等的。例如，在股份公司中的普通股，其股息的支付是根据公司利润的大小、有无而进行的；在优先股中的非累积优先股，其股息是按本期公司盈利水平而分发的，如果本期盈利不足以支付优先股股息时，后期盈利不予以补付。这样非累积优先股股息也是依赖于公司的经营水平等不确定因素，因此，它也是可变年金的一种。年金或可变年金既可以是为别人设置的，也可以是为自己设置的。最初采用的形式是为别人建立的年金，一般是用来代替一次赠与的礼物或遗产的，以保证该人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得到资助。为自己设立的年金或可变年金目前是更为普遍的形式。现代最重要的年金是某些形式的人寿保险，保险公司提供的其他年金合同，以及退休金和残废抚恤金计划，购买国家债券等。可变年金的形式主要是购买各种股票等。

可贷资金（Loanable Funds）　可贷资金是在一个给定的时期在某种价格下，供即期使用的所提供和需求的货币总量，包括活期存款、动用库存以及新增加货币供给。可贷资金一词由罗伯特森（D·H·Roberison）首先使用。他是可贷资金利息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可贷资金利息理论所研究的问题的是利率，即单位时间内使用可贷资金的价格必须由该种资金的供求决定。可贷资金的主要性质是流动性，现实社会中绝大部分货币存在于周转过程中。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购买物品或生产要素时，货币从前者手中转人后者手中变成其要素收入或出售商品的收人，而后者又会用这笔货币向第三者购买要素或商品，货币转入第三者手中，这样不断周转下去。这些不停周转的货币的一部分将转入支流产生货币市场,在这一市场上构成可贷资金的供给。可贷资金的借方将在该市场取走可贷资金并且将这笔资金重新投人支出与收入的周转过程。可贷资金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全部货币时

时处处都处于流动之中，确实有某些货币滞留在货币周转流的蓄水池中。不过可贷资金理论认为，退出周转过程的货币存量以及形成货币市场支流的货币存量对货币市场并不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当人们试图将货币从周转过程转入货币市场（储蓄），或者转人蓄水池（储藏），或者相反，试图将未实际处于流动中的货币从蓄水池中取出重新注人周转过程或投入货币市场（不储藏）时，利率才会受到直接影响。换言之，只有闲置余额（储藏与不储藏）与储蓄和投资流量方面的调整才会对利率产生直接影响。

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 可竞争市场是指这样一类市场，潜在的进人企业可以通过竞争压力对市场内的供应者行为施以很强的限制。对可竞争市场而言，不存在明显的、较大的进人壁垒。可竞争市场达到均衡时，不存在额外的利润吸引其它企业进入市场；而且均衡价格以及产量在各企业间的分配都很有效率。可竞争市场既可以只有一家垄断性企业，也可以拥有众多的竞争性企业。因为它强调的是潜在进人企业的潜在竞争压力，而不是现存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而且这种潜在竞争压力能有效地制约市场均衡的形成。

完全可竞争市场是分析市场结构的基准态，它建立在一系列理想化了的限制条件上。完全可竞争市场是开放性的，企业进人不会碰到现有供应商不会碰到的障碍。潜在的进入企业可以利用与现有供应厂商一样的生产技术、一样的投人品市场和投人品价格。对潜在企业的进人和存在，不存在法律限制，潜在进人企业也不会承当现有供应厂商不会承当的特殊成本。消费者也不会对哪家企业持有偏好，除非这种偏好来源于企业产品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别。

进人可竞争市场的潜在企业都追求更大的利润。他们通过现有市场价格来估价其市场营销计划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比如，他们预测供应商们降价，扩大需求，会获得超额利润时，他们就会进人。否则，如果目前的市场价格已无利可图，他们就不会进人。

潜在进入企业的这些行为特征对完全可竞争市场来说，非常重要。这样，完全可竞争性也就排除了进入成本、非对称信息和战略性行为，决定完全可竞争市场结构的关键就是需求和生产技术这些基本因素。

当然，完全竞争性市场也具有这些特征。但是，完全竞争性市场不能作为分析市场结构的一般性标准态，因为很多方面，它难以运用。尤其是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完全竞争性企业的表现与未接受补贴的企业的长期生存是不相符合的。

因此，无论规模经济存在与否，完全可竞争市场都可以取代完全竞争性市场，作为产生组织比较的一般标准。规模经济不存在时，完全竞争性的行为对完全可竞争市场的均衡是必要的，规模经济存在时，完全可竞争市场实现均衡所需的企业行为与完全竞争性市场的行为并不一样。换言之，完全可竞争性是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化。它对完全竞争不太适用的场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耗尽资源（Exhaustible Resources） 可耗尽资源这个术语一直和矿藏如煤矿、石油和铂联系在一起，这些矿藏自身是不能迅速更新的。任何资源都会耗尽，但除可耗尽资源外，绝大多数资源是可以很快更新的，而可耗尽资源的补充速度非常缓慢。森林、渔场和可耕种的土地也可以耗尽，但一般把它们作为与可耗尽资源不同的自然资源处理，可耗尽资源和非更新资源可以交换使用。由于森林和渔场一般都可以通过自然力更新自己，它们就称为可更新资源，土地作为一种生产手段，被单独对待，它既不同于可更新资源，也不同于可耗尽资源。

马尔萨斯的对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彻底开发的观念，导致了地租概念的建立和发展，格雷（L·C·Gray）第一个给出了来源于可耗尽的资源存量（如正在开采的矿藏）的固有的稀缺性的租金概念的精确表示。这里的问题是很清楚的：如果同质土地要求正的价格，是因为它的供给有限，那么存用的矿藏贮备也应如此。给定它的稀缺价值，这个矿体的收益同这个矿体的开采率成计划开采率有什么关系？格雷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描述供给固定的同质矿情况，他假定每个时期的开采成本是随着开采的数量的增加而递增的，使各个开采时期的利润的现值最大化，就可推导出一个最优开采计划和一个原始存量的最优现值以及这个矿体的租金。通过这个有约束条件的动态最优化问题，格雷解决了可耗尽资源分析中的核心问题。霍特林（Hoteeeing）研究了一个相关问题，他的成果被称为"霍特林定律"，这个定律最基本的含义是：各个时期所开采的边际矿藏（吨）应该产生相同的租金（用现值表示的），否则开采过程就必须进行调整。在格雷问题中，一个最优的开采计划应该是任何时期所开采的边际矿藏（吨）应该产生相同的利润（用现值表示的）。

马尔萨斯主义论述了经济中自然资源可耗尽性的含义，在可耗尽资源接近用光时，一个增大的社会就必然要面临着某种形式的调整，马尔萨斯曾经论述了食物供给和人口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其后继者则强调由于煤和石油的供给是有限的，工业增长必须停止。但是，也有经济学家强调技术进步和增加资本投资可以减轻可耗尽资源最后用尽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通过对资本品的投资，可以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资本品并不能完全替代可耗尽资源，但一般来说是有益的。

可转让信用证（Transferable Credit; Assignable Credit） 可转让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根据开证人的申请，授权通知行在受益人的要求下，可将信用证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地转给第三者使用。受转让人称为第二受益人。作为可转让信用证，须在信用证上特别注明可转让字样，反之，则不应视为可转让。

使用可转让信用证，通常是由于信用证的受益人实际上仅是中间商，而非实际供货人。在中间商和进口商订立买卖合同之后，其利用可转让信用证，以与进口商类似的成交条件，取得货源，此时中间商从中赚取差额利润，且无须动用自有资本。

可转让信用证仅限于一次转让，在信用证规定可分批装运前提下，虽信用证可分别转让给不同人，但需同时办理转让手续，并将此种转让视为信用证的一次转让。信用证的第二受益人无权再度转让。作为可转让信用证，并非必须转让，受益人如临时决定不转让信用证，仍可以自己的名义使用信用证。

对可转让信用证办理转让手续，通常是由通知银行进行的，通知行办理转让手续之后，实际上也就限定了只有通知行能够办理单据的议付。通知银行受开证行委托办理信用证的转让如遭受损失，由开证银行承担，而开证银行的损失又须由开证人承担。但是，信用证的转让并非意味着买卖合同的转让，如果出现信用证的第二受益人拒绝交单或交货等情况，第一受益人仍然承担买卖合同上作为出口商的责任，但由于此时出口商作为中间商常常是资力微薄的，实际损失最终还会落在进口商身上。

可见性假说（Visibility Hypothesis） 一种关于收入政策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其公开性的理论。根据这种假说，收入政策的作用取决于宣传与舆论。因此，收入政策对那些大家注目，即可见性强的工资协定和企业定价有最明显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收入政策一般缺乏法律约束力，它的作用大小取决于舆论与宣传的约束，那些可见性强，即为公众注目的工资协议和定价易于受到舆论与宣传的监督，所受到的约束程度也就高，从而收入政策作用大。而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工资协定与定价，即可见性低的情况下，收入政策的作用就不明显了。由此得出，收入政策对可见性高的企业和无工会组织的企业有着长期压低工资增长率的作用，而对其他行业作用不明显。

石油美元（Petrol Doller） 石油输出国在石油涨价后增加的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外汇资金。因世界石油交易多以美元计价结算权所创外汇收入主要是美元。70 年代两次“石油冲击”，形成大量石油美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石油输出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80 年代以来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下降，油价下跌，石油美元减少。

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它是第三世界一些主要石油生产国于 1960 年 9 月 14 日成立的原料生产与出口国组织。该组织的创始国有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内瑞拉等 5 个，目前共有 14 个成员国，除上述 5 国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加蓬、印度尼西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突尼斯。该组织的总部最初设在日内瓦，后迁至维也纳。该组织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以维护各成员国的石油利益；全力维护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稳定以确保各成员国获得稳定的收入；有计划地向消费国输出石油并使他们在石油业的投资中获得合理的收入。

由于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frac{2}{3}$，它的产量和出口量曾分别占世界总产量和总出口量的 45%和 75%，因此它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欧佩克成立以来同西方石油垄断资本开展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些胜利包括取得了原油定价权，实现石油资源的国有化以及较好地维护了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等。从 70 年代初开始，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度上升，1980 年的原油价格是 1971 年的 20 多倍，这就大大增加了产油国的出口收入，并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它较好地改变了这些国家原有的畸形经济结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巩固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1981 年以来，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非欧佩克成员国石油生产和出口不断扩大等一系列原因使得国际市场石油供过于求，最终使得石油价格不断下降，欧佩克通过协调各成员国的石油政策、采取限制石油生产和出口等措施在限制和稳定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使得油价得到了一定的回升。总的来说，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欧佩克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世界石油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长期存在而且欧佩克的产量和总出口量在世界总产量和总出口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另外，由于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欧佩克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它们经常围绕

着石油产量的确定和配额的分配展开尖锐的斗争并且往往突破配额超额生产，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欧佩克的影响力并使国际油价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尽管如此，欧佩克作为第三世界最强大的原料生产和输出国组织在国际石油市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欧佩克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两次的欧佩克大会，各成员国都派遣以石油部长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大会负责制定总政策及其实施办法，审议通过该组织的预、决算，批准理事会提出的报告、建议，任命该组织的领导人等。理事会是欧佩克的执行机构，由各成员国派遣的并经大会批准的理事组成，任期两年。理事会执行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并通过下设的秘书处开展日常工作。

欧佩克不仅注重维护其成员国的利益，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还不断加强对其他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这不仅推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还有助于维护和加强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和友谊，这对于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具有深远的意义。

东京回合（Tokyo Round） 东京回合是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1973 年 9 月，关贸总协定在东京召开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东京宣言"，宣布开始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故得名。另外，由于此轮多边贸易谈判是由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起的，因此它又被称作尼克松回合。参加东京回合谈判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99 个，其中 29 个是非正式成员国。东京回合原定 1975 年结束，但由于当时世界经济正陷于危机之中，国际贸易领域掀起了保护主义浪潮，尤其是非关税壁垒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谈判过程中不甘让步，使得各项协议迟迟难以达成，直到 1979 年 4 月才达成了最终协议，东京回合至此结束。尽管谈判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东京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最终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首先，各成员国的关税得到了进一步的减让。根据协议，全部贸易商品的关税平均下降 25−33%，从 1980 年 1 月 1 日起分 8 年完成，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关税减让幅度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减让幅度，其中美国的关税平均下降约 30−35%，而欧共体国家的关税则下降约 50%。东京回合的关税减让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从工业品扩大到了部分农产品，但是纺织品、鞋类、绝大多数农产品等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商品仍被发达国家以某种理由排除在减税商品范围之外。其次，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首次全面讨论了如何减少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并且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协议，这些协议主要包括政府采购制度协议，出口补贴和征收倾销税协议、进口许可证协议、技术、卫生和安全标准协议，海关估价协议等，所有这些协议旨在完善和统一国际贸易规则，限制和减少非关税壁垒，实现公平自由的贸易。

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 东非共同体是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三个东非国家于 1967 年 12 月建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总部设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它的宗旨是加强和协调三国间在工商等领域的联系和合作，建立和发展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成立之初，在协调成员国在交通、邮电、关税等方面的义务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劳务、资金的自由流动，加强了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后由于成员国间矛盾激化，终于在 1977 年 10 月导致该组织的解体。1980 年以后，三国又为解决原共同体遗留下来的问题并重建东非共同体作出了一些努力，恢复了某些机构的活动。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它是地处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五个发展中国家于 1967 年 8 月成立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总部设在印尼的雅加达，1984 年 1 月，文莱成了东盟的第六个成员国。东盟的宗旨是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奠定一个和平、繁荣的东南亚国家共同体的基础，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联系与合作。东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它决定大政方针，另外还有不定期的成员国首脑会议也将就某些重要问题作出决策。常务委员会是东盟的执行机构，它通过下设的 11 个常设委员会和 11 个特别委员会执行有关决议，开展具体工作。常设秘书处是行政总部。

东盟成立以来作为一个活跃的区域性组织在加强成员国的经济、政治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合作，在维护和推动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经济贸易领域，通过推行特惠关税贸易制促进成员国间的商品流通，而且不断削减成员国间的其他贸易壁垒。另外，成员国之间通过资金融通和工业合作等活动来促进相互合作，东盟还通过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团结以及发展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成了维护东南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在解决该地区的各种矛盾与纠纷，尤其是在推动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

北美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North America）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区域贸易集团。1988年1月2日，美国和加拿大正式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它的目标是消除两国间商品和劳务贸易的障碍，建立一个商品、劳务、资本得以自由流动的自由贸易区。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在协定生效后10年内，双方逐步取消两国间贸易商品的所有关税。另外，协定还就推动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1989年1月1日，该协定正式生效，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美、加经济贸易联系，推动两国经济的发展，并将对国际贸易尤其是劳务贸易的自由化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加强了国际贸易集团化的趋势，这有可能加剧不同贸易集团之间的摩擦，从而影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不久，美国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墨西哥的联系，进而开始了关于"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力求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从1990年起，加拿大开始参与了这一谈判。美国总统在1990年底希望最早能在1992年底达成"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大到墨西哥，从而进一步增强这个贸易集团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推动美洲经济一体化。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已正式生效。

归属原则（Attribution Rule） 指可供常设机构所在国选择的确定常设机构应税所得范围的原则之一。它要求常设机构所在国只对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跨国营业所得实施税收管辖权，而不能扩大化地将常设机构所依附的总机构在该国的一切营业所得都包括在内。

归属原则与引力原则不同，已得到广泛的承认。

目的港码头交货价（Ex Quay，EXQ） 国际贸易价格术语，属目的地交货系统。目的地码头交货价格术语通常分为两种，一种由卖方交纳进口捐税，称为"目的港码头交货（已完税）……"，（Ex Quay，duty paid…named port）；另一种由买方交纳进口捐税，称为"目的地码头交货（未完税）……"，（Ex Quay，unduty paid…named port）。若在买卖合同中使用目的港码头交货价格术语，需在合同中明确进口捐税的交纳问题。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目的港码头交货（已完税）价格术语下，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如下：

A：卖方义务：

1.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货物和有关的凭证；

2.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港口，将货物在码头置于买方控制之下；

3.自负风险和费用，提供进口许可证，负担所有的进口捐税，包括海关验关费用及因货物进口而需支付的任何其它费用；

4.考虑货物的性质和码头交货的事实，自费供给货物的惯常包装；

5.负担将货物交由买方控制而须支出的任何检查费用，如核对品质费，过磅费等；

6.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和费用，直至货物有效地交由买方控制时为止，但以该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7.自费提供买方提取货物及从码头运出货物所需的提货单及其它凭证。

B、买方义务：

1.在货物已有效地置于买方控制之下时，立即受领货物，并依合同的规定支付价金；

2.在货物已有效地置于买方控制下时，负担货物的一切费用和风险，但以上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依据解释通则的规定，我们可以认定，在目的港码头交货（已完税）价下，买卖双方责任、风险的分界线是目的港码头买方有效控制下。作为卖方，除了保证将货物运到目的港码头，还要自费提供进口许可证，负担进口税，海关结关费等，而买方只要负担收到货物之后的费用。这对于卖方来讲很不方便，除非出口商在进口国设有分行或代理人，出口商是不会轻易接受这一价格术语的。既使在目的港码头交货（未完税）价格术语下，虽然出口商只要保证将货物运到目的港码头交给买方，就算完成了交货义务，其它的进口税、进口许可证费等均由买方负担，卖方也不宜轻易使用这一术语进行国际贸易。

目的港船上交货价（Ex Ship…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EXS） 国际贸易价格术语，属目的地交货系统。依照《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于目的港船上交货价格术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如下：

A.卖方义务：

1.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货物及有关凭证；

2.按照合同的规定，在目的港通常的卸载地点，将船上货物有效地置于买方控制之下，以便买方得以将货物自船上卸下；

3.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和费用，直至货物有效地交由买方控制为止，但以上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4.自费供给货物的惯常包装，但依行业习惯，对该项货物的运送无需包装者，则不在此限；

5.负担因将货物交由买方控制而需支出的任何检查费用，如核对品质费、过磅费等；

6.自费无延迟地通知买方指定船只预计到达的日期，并及时提供买方提货所需的提单、提货单及其它凭证；

7.根据买方请求，并在买方负担风险和费用的前提下，给予买方一切协助。使买方获得装船地或原产地国家签发的，为买方所需的货物在目的地国家进口，或必要时经由第三国过境运输的任何凭证。

B、买方义务：

1.在货物已有效地置于买方控制之下时，立即受领货物，并按合同的规定支付价金；

2.自货物已有效地置于买方控制之下时，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和费用，但以该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3.支付应买方请求卖方领取的任何凭证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4.自负风险和费用，领取卸载或货物进口所需的进口许可证或其它类似凭证；

5.负担一切报关费用，税金、验关费用及其它因货物卸载和进口所应支付的任何捐税。

与目的地交货系统中其它价格术语相比，目的地船上交货价格术语使用较多，依据上述解释通则的规定，通常可以认定，买卖双方在对风险、责任和费用的承担上，风险转移是在货物在目的地越过船弦为界；卖方承担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全部责任，直至在目的港船上，货物交由买方有效控制为止。卖方除负担货物从启运地直至目的地的运费、保险费之外，还须负担货物从启运地直至目的地途中的一切意外费用和损失，并自行负责向保险公司或运输公司索赔。

在目的港船上交货价格术语下，卖方交付货物和买方支付货款是对流条件。卖方须在指定的卸货港将货物实际交付买方，才算完成了交货义务；买方也只有在收到货物的前提下，才向卖方支付货款。如果货物在途中灭失或损坏，卖方不能凭货运单据要求买方付款，既使买方已预付了全部和部分货款，也有权向卖方索还。此外，对于目的港船上交货价格术语，不同国家使用时还有不同的惯例和解释，应加以区别对待。

甲板货（Deck Cargo） 甲板货是指通常需装于船舶甲板上的货物，这些货物可能有危险性而会侵害其它货物，或者由于货物自身的性质而不宜装于甲板下船舱内。货物装载于甲板之上，如果是经托运人同意，若货物发生损害，则应由托运人承担损失；相反，如果承运人将非甲板货物装载于甲板之上，除非托运人同意，否则货物由此招致的损失由承运人负责。

电汇汇率（Telegraphic Fransfer Rate 简称 T / T Rate） 外汇银行卖出外汇后，立即以电报委托其国外分支机构或代理行付款给受款人时所使用的汇率。因电汇付款快，银行无法占用客户的资金头寸赚取利润，且国际间电报费用较贵，故电汇汇率较信汇汇率，票汇汇率高。由于外汇市场上汇率极不稳定，国际经济交易中为了避免外汇风险多采用电汇，所以电汇汇率成了计算确定其它汇率的基础。外汇市场上报出的汇率多为外汇银行电汇的买卖价。

出口汇率（Export Exchange Rate） “进口汇率”的对称。实行外汇管制国家的外汇管理部门对出口收入外汇兑换本币所规定的汇率。出口汇率可以只有一种，适用于一切出口收入外汇，亦可根据需要对不同的出口收汇规定不同的汇率。对于国内经济发展亦急需的产品为抑制其出口，出口收的外汇可兑换的本币较少，即适用的外汇汇率较低；对于鼓励出口的商品，收入外汇适用的外汇汇率较高，可兑换较多的本币。

出口信贷（Export Credit） 出口信贷是一国为了鼓励和扩大本国的出口，通过有关银行对本国出口商，国外进口商以及进口方银行提供的信贷。出口信贷是对发展本国出口贸易的一种有力的支持，它使得国外进口商在缺乏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及时进口急需的商品，使得本国出口商及时获得出口货款，保证出口生产的正常发展。出口信贷主要用在那些生产和交易时间较长、金额较大、付款期限较长的产品的出口上，如大型的机器设备、船舶、飞机等等。出口信贷可以分为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两种。卖方信贷（supplier's credit）是指出口国银行向出口商直接提供的贷款，这一方面使得出口商获得必要的流动资金，保证正常的生产，另一方面使得出口商得以向进口商提供延期和分期付款的优惠，吸引进口商购买自己的商品，从而促进商品的出口，尤其是那些大型商品的出口。买方信贷（buyer's credit）是指出口国银行直接向国外进口商和进口方银行提供的贷款，以支持进口商向本国出口商购买商品。买方信贷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贷款必须用于购买债权国的出口商品，因此买方信贷又叫约束性贷款，它对于推动本国商品的出口有很大的作用，而且这种推动作用往往比较直接和明显。有了买方信贷，国外进口商在购买本国出口商品时，只需一少部分自己的资金支付一部分进口

贷款，进口贷款的绝大部分则用出口国银行提供的买方信贷来支付，然后进口商按照贷款合同规定的期限、分期向出口国银行偿还贷款。由于出口信贷能对推动本国出口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不少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设立了专门银行，办理出口信贷业务，如美国的"进出口银行"、日本的"输出入银行"和法国的"对外贸易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资金大多由政府在预算中拨付，它们除了直接开办出口信贷业务以外，还向本国办理出口信贷业务的私人商业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或给予贷款补贴以示支持，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信贷业务多数是由私人商业银行办理的。随着保护贸易的重点从"限入"逐渐转向"奖出"，各国的出口信贷业务不断扩大，一些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增加出口信贷金额，进一步优惠贷款条件，使得各国之间在发放出口信贷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竞争和矛盾。为了缓和矛盾，使得出口贸易得以公平地开展，有关国际组织曾对出口信贷条件作出了某些规定，主要是制订了提供出口信贷的贷款利率下限，要求各国遵照执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国家往往突破这种规定，这使得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性加强，从而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National Export Credit-Guarantee System） 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是指一国通过专门设立的担保机构对于本国银行和本国出口商向国外进口商和进口方银行提供的出口信贷实行担保，当国外债务人拒绝偿还贷款时，本国担保机构就要按照承保的金额向出口商和本国银行提供补偿。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产生的原因，在于出口国银行和出口商在向国外进口商和进口方银行提供出口信贷时存在着种种风险，其中最严重的是收不回贷款，这就影响了出口信贷的发展和扩大、进而影响了出口贸易的发展。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的产生，减少了出口国银行和出口商的风险，这无疑将推动出口信贷和出口贸易的发展。

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担保的项目与金额、担保对象、担保期限与费用。担保的项目往往是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承保的出口风险项目，这些风险可以分为二类，即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变、暴乱、革命、战争以及政府实行禁运、冻结资金或限制对外支付等内容，经济风险包括进口商或进口方银行破产倒闭以至无力偿付贷款以及进口国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内容。由上述政治和经济风险造成的损失均可由担保机构给予补偿，政治风险的承保金额一般为合同金额的85–95%，经济风险的承保金额一般为合同金额的70–85%，有时对某些出口信贷承担金额可达100%。担保对象也可分为两种，即对出口国银行的担保和对出口商的担保。担保的期限总是与出口信贷的期限相联系，可以分为短期与中、长期。短期担保为6个月左右，承保范围往往包括出口商所有国外的短期信贷交易，这实际上意味着担保机构对短期信贷提供了综合担保。中、长期担保的期限为2–15年不等，中长期担保由于时间长、涉及的金额又较大，因而通常采用逐笔审查承保的办法。由于实行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的目的在于减少出口国银行和出口商提供出口信贷的风险，鼓励它们提供出口信贷，因此，担保费用一般不高，以减少出口国银行和出口商的负担，当然担保费用还是会因为担保项目、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及目标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总之，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是一国为了扩大出口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非关税措施。

出口信贷保险（Export Credit Guarantees） 又称为出口信贷担保。它是各国政府为了鼓励出口，减轻出口人的风险负担，而专门设立保险机构，来承保一般商业保险公司所不愿承保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这些商业风险是指诸如买方破产失去清偿能力，买方无理拒收货物或拒绝付款之类的风险；政治风险是指国家外汇管制而使货款无法汇回；买方国家政府限制进口之类的风险。

办理出口信贷保险的机构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英国称为出口信贷担保署（Export Credits guarantee Department，简称ECGD），在美国，有对外贸易协会（Foreign Credit Insurance Association，简称FCIA）专门负责商业风险，而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则专门负责承保出口商的出口政治风险。这些出口信贷保险机构的宗旨是发展本国的出口贸易，一般商业机构予以承保的险别，这些机构则不予承保，保险费率较低，无意追求商业利润。

出口信贷保险的承保责任范围通常包括短期信贷综合担保，中期信贷保险和长期信贷保险三类。短期信贷综合担保包括出口商的全部现金交易和全部不超过六个月的短期信贷交易。中期和长期信贷保险则主要针对出口商承包国外大型工程或基础设施提供特别担保。承保期限从出口合同成立时起，直至最后一笔款项付清为止。中期和长期信贷保险都是单独办理投保手续。

出口信贷保险的赔偿并不是被保险人在承保范围内的所有损失，而是按合同价格的一定百分比予以赔偿。

出口商品生产基地（Bases of Production for

Exprort） 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我国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而指定的专门生产出口商品的地区、工厂和矿区等。我国在发展出口贸易时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许多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而有竞争力的商品却由于无法及时组织到货源而影响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着手建立各种形式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主要有出口商品综合生产基地、单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以及生产出口产品的专门工厂及车间等。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建立首先有助于保证和扩大出口货源，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供应出口，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其次可以按照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不断改进并增加适销对路的出口商品，促进出口商品的更新换代，保证出口的稳定发展。最后，国家可以在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内重点扶植有发展出口潜力的商品生产，不断提高这些商品的生产技术，提高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出口贸易奠定基础。从我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发展情况看，这些生产基地生产的商品多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农副、土特、矿产品等，制成品的生产基地也在发展之中。

出口商品收购价格（Purchasing Price of Goods for Export） 出口商品收购价格是指我国的外贸公司在从国内生产企业购买用于出口的商品时所使用的价格。根据国家制订的确定出口商品收购价的原则，出口商品收购价应以内销价格为基础，优质优价，同质同价。针对外贸公司通过不同的渠道购得的不同商品，国家都规定了不同的作价办法。具体地说，由工业企业直接供应出口的工业品，按出厂价作价；由商业部门供应出口的农副产品，按交货地供货部门系统内部的调拨价作价；专门用于出口的商品，其收购价以合理的成本为基础加上应缴的国内税和适当的利润来确定；对于在国内销售能获得较高利润、用于出口亏损大的商品，出口收购价可以适当调低，低于一般的出厂价和国内售价，而对于那些在国内市场销售并无多大利润、用于出口亏损大的商品，国家可以通过对生产企业采取减税、免税等办法来降低出口商品收购价；工艺美术品尤其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美术品的收购价格可以参考国际市场的行情定得较高；新产品的收购价格由工贸双方协商解决并需得到物价主管部门的批准；对于属于国家计划外的市场调节的商品，收购价格可由供求双方自由确定。由于出口商品收购价主要以保障国内生产企业的基本利益为基础确定，因而往往与国际市场行情相脱节，其结果是国家不得不向外贸公司提供大量的补贴以维持出口，外贸的经济效益很差。

出口补贴（Export Subsidy） 出口补贴又叫出口津贴，它是指一国为了降低出口商品价格，增加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或弥补经营出口的亏损，在出口某些商品时给予出口商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优惠待遇等。现金补贴（Currency Subsidy）是一种直接补贴，给予现金补贴可能是为了拉平国内外价格水平，弥补出口亏损，也可能是为了增加出口商的赢利或者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因此，现金补贴有时候表现为国内外差价（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那部分），有时候则会大于差价。财政优惠（Financial Preference）是一种间接补贴，它是指一国免征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各种税收以及免征用于出口生产的各种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进口税。免征的国内税包括增值税、销售税、消费税、流通税、盈利税等等，提供财政优惠降低了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出口商品能以较低价格投入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去，有助于扩大出口。出口补贴在推动一国出口上往往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它作为一项明显的保护贸易措施，受到倡导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如关贸总协定的反对，而且也易受到别国的报复。因此，出口补贴的应用范围不断缩小，补贴程度也有所降低，不少国家不断寻求更隐蔽的补贴方式或者转而采用其他的保护措施。

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 出口管制是指一国为了达到某种经济、政治或军事目的，通过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商品的出口。

一般说来，实行出口管制的商品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战略物资以及有关的先进技术。有些国家对武器、军事设备、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以及有关的技术资料的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当这些商品运往政治制度对立的国家时，这种限制就会更严。第二，国内生产紧缺的原材料、半制成品以及国内供不应求的其他商品。比如说，西方有的国家往往对石油、煤炭等重要的基础能源实行出口管制，有时干脆就禁止出口，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行。第三，某些文化遗产如重要的文物、古董、艺术品等等。对于这类商品各国的出口管制都非常严格，而大多表现为禁止出口。第四，"自动"限制出口的商品。这类商品往往是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的商品，"自动"限制其出口主要是为了减少与进口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事实上，出口管制涉及的商品种类有时可能十分广泛。比如说，为了对某国实行经济制裁和封锁而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往往意味着禁止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商品对该国的出口。

出口管制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即单方面出口管制和多边出口管制。单方面出口管制（Unilateral Ex-

port Control）是指一国出于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等利益，根据本国的出口管制法，通过专门设立的执行机构，对本国商品的出口实行管制。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情况经常发生变化，各国的对外政策也经常实行调整，各国的出口管制法也因此而不断修改，以加强单方面的出口管制。多边出口管制（Multilateral-Export Cantrol）是指几个国家的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建立国际性的多边出口管制机构，协调各国在管制某些商品对某些国家出口上的政策和立场，以达到共同的政治和经济目的。

各国在实行出口管制时，总是借助于出口许可证制。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要出口属于管制范围内的商品，就必须向政府有关机构申请并取得出口许可证。出口许可证包括有效期限、商品名称、出口目标国以及出口数量和金额等内容。出口管制的具体执行过程分三步走。第一步，有关国家的出口管制机构根据出口管制法，制定出口管制货单和出口目标国别分组管制表。也就是说，要列出属于出口管制范围的商品名称，把管制商品进行分类编号，以便确定所需的出口许可证种类。同时，把出口目标国分成几组，以便实施程度不一的出口管制。第二步，准备出口管制商品的企业或个人向本国出口管制机构申请出口许可证。第三步，本国出口管制机构审批和颁发出口许可证。获得出口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在此基础上办理出口手续，而没有获得出口许可证者则不能办理出口。多边出口管制和单边出口管制的主要区别，在于管制货单的编制和管制国别的确定，前者共同协商决定，后者单独决定。至于有关出口管制的商品的具体管制和出口申报手续的办理，则仍由各国独自完成。

长期以来，出口管制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实行歧视和差别待遇的主要政策手段，它不仅仅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目标，而且往往和政治及军事目的相挂钩，从而成了某些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手段。二战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实行出口管制，而且有发展和加强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实行出口管制主要是为了实现经济目的，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国内紧缺原材料和半成口的出口。另外，有的国家为了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增加制成品的出口，而对某些初级产品的出口实行管制。尽管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出口管制有放松的迹象，但它作为各国重要的对外政策工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下去。

出口税（Export Duty）　出口税是指一国海关对本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征收出口税势必提高出口商品成本，影响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因此，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对出口商品一般不征收出口税，只有少数国家在特殊条件下征收一些出口税。概括地说，征收出口税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①增加财政收入：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在政府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征收出口税。②限制某些商品如战略物资，紧缺原材料等的出口；③限制出口以减少贸易顺差；等等。我国目前只对少数出口商品如矿产品、中药等征收少量的出口税。

出口盈亏率（Profits & Losses Rates of Exports）　出口盈亏率是指外贸企业的出口盈亏额与出口成本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出口盈亏率=\frac{出口盈亏额(出口收入—出口成本)}{出口成本(人民币成本)}\times 100\%$$

在这里，出口收入是出口外汇净收入与官方汇率的乘积。出口盈亏率实际上就是外贸企业的利润率，它与换汇成本密切相关，换汇成本越高，出口盈亏率就越低，甚至为负数；反之，换汇成本越低，出口盈亏率就越高。因此，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盈亏率正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正在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出口退税（Export Drawback）　出口退税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向出口商退还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被征收的各种国内税，包括盈利税、增值税、流转税、销售税、消费税等。另一是向进口商或出口商退还对先前进口的原材料、半成品等征收的进口税，只要这些进口商品用来生产出口商品，进口税的退还在由进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成的制成品走向出口时完成，它主要运用于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加工贸易当中。出口退税实际上也是一种出口补贴，它能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推动和扩大出口。相对于现金补贴和财政优惠而言，出口退税比较隐蔽，而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出口商品未在生产国国内销售以及它们在进口国国内可能被征收类似的国内税等，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对出口商品实行退税。

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　出口加工区作为一种经济特区，它是指位于一国国境以内，关境以外的特定地区，国家在这里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加工工业，并把工业产品主要或全部出口到国外。尽管人们有时把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混为一谈，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理解，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自由贸易区主要开展的是非生产性活动，如转口贸易、商品的储存和改装、运输等等，它所追求的主要是商业利益。而出口加工区主要追求的是工业利益，它开展的主要是生产性活动，如进料加工、来

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以及独资、合资生产等。通过发展上述生产活动，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提高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国家在出口加工区采取的优惠措施包括给加工企业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减免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关税（和国内经营税），允许外资企业赢利的自由汇出等等。两次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区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建立起来的经济特区多为出口加工区，通过发展出口加工区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特区是以出口加工为主，同时兼顾其他行业发展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由于出口加工区把引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生产和外贸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它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特别大，应该是那些希望更好地走向世界而又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区的方向。

出口替代战略（Export Substitution Strategy） 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之一。又称外向发展战略。指一国采取鼓励办法优先发展本国工业制成品生产，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品出口来代替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以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通常是许多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较小的国家和地区选择的道路。进口替代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所采取的外资发展战略，一旦进口替代发展到成熟阶段，就应及时转向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因为进口替代的进一步发展除了遇到资金短缺外，发展中国家还感到自己在规模和效率上都低于发达国家，坚持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只能使成本提高，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反而不利。他们从比较利益出发，认为可以发展轻工产品的出口，以便发挥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充足且工资低廉的优势，另外，一些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不成功或遇到了新问题，也迫使他们转而寻找新的出路。发展出口替代工业，可以利用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先进的产品，通过扩大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出口的扩大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人均收入、促进工业基础的加强，可以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加工工业和制造品工业出口的扩大，还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60年代起，一些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虎"的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台湾，就开始实行了出口替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行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表现在1960—1979年间出口增长率与GNP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如南朝鲜分别为30.1%、7.1%；新加坡为7.3%、7.4%；台湾为17.1%、6.6%；香港10.5%、7%；巴西6%、4.8%。实行出口替代战略一般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在初级阶段以发展加工工业，一般消费品为主。这些产品的生产方法相对简单，技术易于掌握，投入要素容易获得，而且出口的市场及产品在国外的需求弹性都较大，因而比较容易起步发展，风险也相对较小。当其中某些产品的市场容量日趋饱和或生产与外贸的条件开始变得不利时，就应当及时转向以发展机器设备、机床、电子仪器、机械工具、高技术产品生产为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出品替代战略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出品鼓励与国内生产并举型的。即在鼓励出口的同时，大力发展与出口替代有关的工业，以形成规模经济并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如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另一种是坚持出口扩张型，即一切以扩大出口为主，如日本、南朝鲜、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至于应选择哪种类型的出口替代战略，一般根据本国的资源状况，生产技术条件，人力状况，地理位置，区域范围等不同情况而定。发展出口替代工业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有外商独资、合资、侨资办厂、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出口加工特区，在国外办企业（跨国公司），劳务出口等。出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贸易保护，政府补贴和适当的汇率等政策与机制的调节。在出口方面，国家应当在价格、关税、利润、留汇等方面给予优惠，以保护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对需要进口的原料，半成品或资本品，技术专利等，应实行减免税，放宽进口配额。对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出口替代的有效保护率应当高于或等于进口替代的有效保护率；出口替代工业的利润率应与进口替代工业的利润率大体一致。出口替代战略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是：由于受到资源、技术、投资、人力资源等条件缺乏的限制，使出口替代工业难以建成，或难以产生应有的效率；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使出口替代战略不能顺利实施或半途而废；一些出口替代部门受到关税保护和价格补贴；其生产效率低下、成本与价格很高、缺乏国际竞争力；过度发展出口替代部门，会造成国内市场生产产品和部门的资源，资金缺乏、形成畸型经济；出口比重过大会使国民经济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波动会引起国内经济发生重大波动等。因此，实施出口替代战略会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如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容易成为发达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对象；忽视国内消费，追求高投资，加剧通货膨胀、出口扩大的同时，进口也会加快，仍然不能解决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问题。

出口性通货膨胀（Exported Inflation） 由于出口迅速扩张，以致出口生产部门的边际成本上升或国

内市场供给不足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外市场对国内市场产品需求过大而引起的，是国外的需求推动通货膨胀对国内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涉及成本，又涉及需求。就成本而言，出口需求增加，使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资源紧张，在资源无法迅速流动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需求而言，国外需求增加，出口增加，使国内供给相对不足，从而又导致国内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出口性通货膨胀也是通过国际渠道传递的通货膨胀，它反映了国外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换言之，它是把国外的需求拉动通货膨胀传递到了国内。开放程度高、出口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受这种通货膨胀的影响大。

付新股认购权公司债券（Bond with Subscription Warrant） 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一种允许该债券投资者在所规定的期间内，申请获得该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权力的债券。这种债券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区别在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是在债券到期时申请转换成公司股份，债券转换为公司股份后，债券本身债务即行消失；而付新股认购权公司债券则在许多情况下，投资者即使行使了公司新股认购权后，债券本身所表示的债务关系也依然存在，即这种公司新股认购权同债券本身可以分离。

付款交单（Document against Payment 简称 D / P） 付款交单属于跟单托收。付款交单是指出口商在发货后，取得货运单据，向进口商开立汇票，将汇票连同装运单据交托收银行代为托收时，在托收委托书中指示银行：银行只有在进口商将货款付清时，才能向进口商交出货运单据。它表明在付款交单结算方式下，出口商交单以进口商的付款为条件。进口商必须按汇票规定的金额付清货款，才能取得货运单据，并进而提货，反之，进口商无法取得货运单据，也就无法取得单据项下的货物。

按照付款时间的不同，付款交单可以分为即期付款交单和远期付款交单。

即期付款交单（D / P at sight）是指出口商所开立的汇票为即期汇票，代收银行将汇票和装运单据向进口商提示时，进口商见票需立即付款，并同时向代收银行领取货运单据。

远期付款交单（D / P after sight）是指出口商所开立的汇票为远期汇票，代收银行需要先将汇票和装运单据向进口商进行承兑提示，进口商承兑汇票后，于汇票到期日支付货款，同时取得货运单据，进而提货。在远期付款交单结算方式下，进口商虽然承兑了汇票，但在汇票到期付清货款之前，无法取得货运单据。这造成了国际贸易的实际困难，因为在汇票到期日晚于货物抵达目的地日期时，进口商由于还未付清货款而无法取得货运单据，也就无法及时提取货物，在实际业务中，对于这种情况常常实行一种变通方法，即在付款交单的范围内，允许进口商开立信托收据，凭信托收据（trust receipt）向银行借出货运单据，先行提货，而在汇票到期日再行付清货款，凭信托收据借单的方法与承兑交单有些相同，卖方通常只对信用可靠的老客户允许使用这种方法。

在托收方式中，付款交单较承兑交单风险为小，因为在付款交单下，出口商交单以进口商付款为条件，进口商在未付清货款之前，出口商也并未交出货运单据，从而仍然掌握着货物所有权，一旦进口商拒绝付款赎单，出口商仍然能够自行处置货物。如果这时货物已然到达目的港，托收银行既使不负责提货存仓，转售等手续，出口商也可以通过指定需要时的代理人（care of need）的办法来处理货物。而承兑交单下，进口商承兑汇票即取得货运单据自行提货，出口商收款完全依赖于进口商的信用，一旦进口商拒不付款，出口商则可能遭受货款两失。

付款提示（Presentation for Payment） 是指持票人出示即期票据或已到期的远期票据，要求付款人对票据付款。持票人在进行付款提示的时候，需亲自或委托代表，在法定的期限内进行。付款提示的地点是票据载明的付款地点。如果未载明付款地点，则应视票据载明的付款人或承兑人的地址为付款地点。若持票人经过合理努力，仍无法进行付款提示，则应免除付款提示责任，而认为票据遭到拒付。但是，即使持票人有理由相信票据的付款提示会遭到拒付，也必须进行付款提示，

为了保护票据出票人和背书人的利益，各国都规定了票据提示的法定期限，如果持票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票据提示，则票据的出票人及前手背书人对票据的责任自动解除，持票人在这时只能要求票据的受票人，即付款人付款。此项付款要求同样有法定期限，法定期限结束，持票人就此丧失对于此票据的一切权利。

外部性（Externalities） 外部性最早是由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但大约在 1960 年以后，这个概念被扩展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外部性存在于一个或多个团体的活动影响另一个或多个团体（后者对前者的活动是外在的）的场合。换言之，外部性是由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相等造成的，外部性会导致经济低效率。外部性分为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种，货币外部性影

响和改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个买者（或卖者）购买（或卖出）某种商品，可能会使该种商品的其他买者（或卖者）的价格上升（或降低）；技术外部性则是影响其他单位的生产和消费的技术方式。由于价格机制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因此，外部性也经常被描述为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1960年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一篇文章中讨论技术外部性问题，他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负的外部性，原因在于人们无偿使用了某种财产，假如这些财产的所有权是确定的，并且具有竞争性价格，那么这种技术外部性问题就可以解决，社会最优就可以达到。科斯同时还强调了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减少污染，可能会增加社会收益，但是为减少污染所需要支付的交易成本却有可能超过这个社会收益。科斯最重要的贡献可能在于：他指出外部性是双边的，从工厂里排放出来的烟雾会损害周围的居民，此时工厂将外部成本强加给居民，但是如果法律规定工厂必须减少烟雾的排放量，此时居民又将外部成本强加给工厂。

目前，处理外部性的政策有三种：a.在交易成本很高时，由政府接管那些受外部性影响的企业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政府接管后，也常常产生同样程度的低效率甚至更坏的外部性。b.对那些产生负的外部性的单位征税，而对提供正的外部性的单位补贴，但是，决定应征多大数额的税和提供多大数额的补助以及谁应被征税，谁应被补贴往往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C.在那些被两个或多个单位按相互排斥的方式共同使用的资源能被明确划分的场合，可以通过明确产权并由所有者对使用者收费的办法来解决。

许多其他问题也可以作为外部性、溢出效应或邻近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的例子来分析，例如，如果过多的单位都力图使用某种财产（如高速公路）时，就会出现拥挤。由于价格低于最优水平时的价格，每个使用者都把成本强加给其他使用者。公共品和连带产品也可以视为正的外部性的一种形式，还有免费搭车问题，甚至垄断也曾经被视为是一种外部性（此时，消费者指望得到更低边际价格的交易成本超过他们所能得到的收益）。

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外部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的外部不经济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改变。今天，它基本上不过是外部性和外部效应的同义语。生产上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或者正的外部效应（或负的外部效应）是指一个生产者的产出或投入对其他生产者的副效应，并且这个副效应并不为任何一方所支付。有时候，外部经济也用来指消费活动或对消费活动的未支付的副效应。

外部经济在现代意义上实际上是意味着一个规律，即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即出现了"市场失灵"，市场经济不能处于有效率状态，比如，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一个对其他生产者具有外部经济（正的外部效应）的生产者并不愿意将他的这个产生外部性的活动（比如他的产出）扩大到使其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社会收益的那一点上，这个边际社会收益等于其边际产品的市场价值加上他对其他生产者的副效应的市场价值。

在较早时期，现在所说的外部经济被称为是技术外部经济，这个外部效应在市场机制之外传播，并且改变被影响者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用标准形式表示即是：

$$q_i = f_i(x_i; e_j)$$

即第i个生产者的产出 q_i 不仅决定于他自身的控制变量 x_i（向量），而且也决定于其他某个生产者j所控制的变量 l_j。在20世纪的早期，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不仅包括技术外部经济（或不经济），而且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价格效应。这个价格效应既指一个厂商的投入要素的增加会引起其他厂商的要素投入价格的降低或升高。又指由于整个产业的产出的增加所引起的单个厂商的投入价格的降低或升高。这种厂商之间或产业和厂商之间的价格效应被称为是货币外部性。一些经济学家把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存在（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括货币上的）作为要求政府干预的一个理由。

外生经济周期理论（Exogenous Business-Cycle Theory）　用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原因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引起经济周期的原因最初是来自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例如，太阳黑子和气候和变化引起农业生产的变化，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波动；或者是某些新发明、新市场开辟引起的投资变动而引起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内的变动，因此，外生经济周期理论并不否认经济体系之内某些因素的重要性，它所强调的是，内在因素的变动最初是由外在因素所引起的。但一般经济学家认为，外生经济周期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周期的最初动因，而不能解释经济周期的全过程，离开了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外生经济周期理论是无意义的，因此，更加重视从经济体系内部探讨经济周期的原因。

外汇（Foreign Exchange）　外币货币及以它们表示的可用作国际支付的债权。后者包括以外币表示的有价证券（如外国政府发行的公债、国库券；以外币表示的公司股票、债券等）；以外币表示的各种支

付凭证（如商业汇票、银行汇票、银行存款凭证等）。和外币现钞相比它们在国际经济交易中的使用要广泛得多，是外汇的主体。能充作外汇的外国货币有两类，一类是自由兑换货币，即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兑换其它国家货币或对第三国进行支付的货币。例如，美元、英镑、法国法郎、瑞士法郎、马克等。此类外币及以它们表示的可用作国际支付的债权称为自由外汇。另一类是不经货币发行国允许不能兑换成其它国家货币或对第三国进行支付，只能用于签有贸易协定的双方间结算的外国货币。此类外币及以它们表示的可用作国际支付的债权为记帐外汇。用记帐外汇从事国际经济交易可以节约自由外汇，但顺差国不能用记帐外汇偿付它对第三国的债务，等于是逆差国无偿占用了对方的资金。见"自由兑换货币"和"结算货币"。

外汇人民币（Foreing Exchange Renminbi） 包括：(1) 外国银行或企业，在中国银行开立的特种活期人民币存款帐户上存放的人民币；(2) 境外居民为了应付在我国境内的零星支出用外币兑换的人民币兑换券。前者有两大来源：一是存款人用自己的自由外汇，向中国银行购买人民币后存在帐户上的；另一个是存款人接受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支付进口商品时所得的人民币。在持有人需要时，可以将外汇人民币再兑换成自由外汇。外汇人民币与自由外汇不同，不允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只能用于与我国进行的贸易和非贸易收支的计价和结算，外汇人民币的买卖需遵循一定的规定并通过中国银行进行。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国际储备的主要构成部分。一国政府为了稳定汇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偿还对外债务而积累的外汇。战前以英镑为主，战后美元占统治地位。随着美元地位下降，70年代以来西德马克、日元、瑞士法郎在外汇储备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外汇头寸（Foreign Exchange Position） 外汇银行和其它被允许经营外汇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持各种外币帐户的余额状况。某种外币买入超过卖出（即期及各种期限的远期交易合并计算）为"多头"，或称"超买"。相反，卖出超过买入则为"空头"，或称"超卖"。买卖持平称为"轧平"。若将各种外币的头寸综合计算出的余额称为"总头寸"。无论出现多头或空头有关机构都要承担外汇风险，故多实行平衡原则。对出现多头的外币同时要卖出金额相同的该种外币；对出现空头的外币则相反，此种交易称为"抛补"。那些未作抛补以避免外汇风险的头寸称为"敞口头寸"或"风险头寸"。例如，美国A银行买入瑞士法郎10，000，同时卖出8，000，头寸及汇率如下：

	买进	卖出	头寸
	瑞士法郎 10,000	瑞士法郎 8,000	瑞士法郎 2000 多头
旧汇率	1 瑞士法郎 = 1.7780 美元		$ 3556
新汇率	1 瑞士法郎 = 1.6780 美元		$ 3356

因瑞士法郎贬值该行又有2，000瑞士法郎的多头头寸，出现200美元的损失。若A行在买入10，000瑞士法郎的同时卖出10，000瑞士法郎，即轧平头寸，则不会出现该损失。

在计算外汇头寸时需注意：(1) 不要将银行持有的周转余额计算在内；(2) 不应将在海外的长期投资资金计算在内。

外汇交易（Foreign Exchange Dealings） 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间的交易。这种交易源于国际间商品、劳务的买卖及跨国投资活动。交易的货币形式主要是以美元、英镑等自由兑换货币计值的银行存款，相对说来现钞不那么重要。外汇交易一般是在外汇银行与顾客（外汇的最终供求者）间、外汇银行间、外汇银行与中央银行间进行。交易类型有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掉期交易、外币期货交易、外币期权交易。在外汇交易中经常使用货币术语和收付地点术语。货币术语如：美元交易、英镑交易、瑞士法郎交易等。收付地点术语如：纽约收付、伦敦收付、苏黎世收付等。

外汇交易员（Foreign Exchange Fracler） 外汇市场上利用自己的资金或借入资金作为交易的一方买进或卖出外汇以赚取利润的商号。多是银行或信托公司兼营，亦有个人经营的。

外汇交易品（Foreign Exchange Dealer） 在外汇银行中，专门从事外汇交易的职员。分为主任交易员或首席交易员、高级交易员、交易员、初级交易员和实习交易员。根据外汇交易员负责交易的币种不同，又有瑞士法郎交易员、日元交易员、英镑交易员等区分。在有的外汇银行中，同一个交易员也可能负责一种以上货币的交易。

外汇调剂（Adjustment of Foreign Exchange） 外汇调剂是指拥有一定外汇的我国企业和机构在外汇管理当局的监督和管理下，在特定的场合与需要外汇的其他企业和机构进行的自由外汇交易，外汇调剂价一般总是高于官方汇率。目前，我国各地尤其是沿海

地区建有大量的外汇调剂市场开展外汇调剂活动。开展外汇调剂，一方面有助于企业获得急需的外汇及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外汇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又使得拥有外汇的企业获得更多的人民币收入，有利于调动它们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总之，开展外汇调剂将有助于活跃我国的金融市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91年1月的外贸体制改革方案要求搞活外汇调剂，在保证完成上缴国家外汇额度和收购任务后，允许外汇额度进入调剂市场，并跨省调剂，各地不得用行政手段干预外汇资金的横向流动。

外汇资产（Foreign Exchange Assets） 存放在国外的各种财产、外国货币。以外币表示的各种债权及其它权益。包括：(1) 外币现钞；(2) 外币有价证券。如外国政府发行的公债、国库券、外币股票、公司债券等；(3) 外币支付凭证。如商业汇票、银行汇票、本票、支票、银行存款凭证等；(4) 在国外购置的不动产；(5) 其它外汇资金。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的普通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各种无偿援助、捐赠及侨汇等。

外汇增殖率（Rate of Increase of Foreign Exchange） 外汇增殖率又叫出口创汇率，它是指制成品出口外汇净收入与生产该产品所耗原材料外汇成本之比。用公式表示：

$$外汇增殖率 = \frac{制成品出口外汇净收入}{原材料外汇成本} \times 100\%$$

在这里，制成品出口外汇净收入等于出口外汇总收入减去出口过程中的外汇费用以及原材料外汇成本。原材料外汇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为生产某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所耗的外汇，有时候则是指国产原材料可能出口时的外汇净收入，它是依照该类原材料出口价或者国际市场价估算的。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外汇增殖率将告诉我们不同原材料的外汇增殖情况，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作出进口什么原材料及进口多少的决策；如果原材料是国产的，那么外汇增殖率将告诉我们出口原材料有利还是出口制成品有利，从而作出最佳的选择。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依照该指标作出相应的决策将有助于我们获取更多的外汇收入、更好地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

外汇平准基金（Foreign Exchange Equalization Fund） 即"外汇稳定基金"。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稳定本国货币汇率的专项外汇资金。英国财政部率先于1932年设立。1934年美国根据《黄金准备法案》设立了外汇稳定基金，其后加拿大、西欧各国竞相仿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外汇平准基金一直很活跃。在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上，外汇买卖可以自由进行，汇率由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决定，故外汇市场上的汇率很可能和政府的愿望不符。在外汇需求增加，外汇汇率上升与政府意愿不符时，平准基金进入外汇市场出售外汇或黄金，买入本币。在外汇供给增加，外汇汇率下跌到一定程度时，平准基金进入外汇市场买入外汇、黄金，卖出本币。在外汇平准基金干预下的汇率与固定汇率不同，其汇率不取决于法定平价亦无波动界限的制约。平准基金以外汇买卖者的身份，直接进入外汇市场，从事交易，所以原则上汇率仍由外汇市场外汇的供求决定。与不受任何政府干预的自由浮动汇率也不同，是一种管理浮动。

外汇投机（Foreign Exchange Speculation） 预测外汇汇率上升时先买后卖外汇，预测外汇汇率下跌时先卖后买外汇以赚取利润的外汇交易。外汇投机可在现汇市场上进行，亦可在远期外汇市场上进行。两者的区别在于，在现汇市场上进行的投机，因现汇交易要求立即进行交割，投机者需持有足额的现金。现金来源无关紧要，可以是自有的，也可以是借来的。在期汇市场上的外汇投机不涉及现金支付因而投机者不必持有足额现金，只需支付少量保证金即可。期汇市场上进行的外汇投机可分为：(1) 卖空。以先抛售为基础，在抛售外汇时投机者手中实际上并无此项外汇，只签订了一个远期合约，保证到合约规定日期以既定汇率卖出一定数额外汇。例如，某年7月1日，苏黎世外汇市场上美元和瑞士法郎间的三月期汇率为1美元＝1.8670瑞士法郎。一投机者判断美元将贬值，于是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抛出三月期美元10万，交割日10月3日，勿需付现。如果在交割日前，美元果真贬值，如9月1日时一月期汇率为1美元＝1.6670瑞士法郎，则该投机者再次进入远期外汇市场，买入同额（10万）一月期美元，交割日仍为10月3日。10月3日轧抵差额，这一卖一买使他获得了（10万×1.8670−10万×1.6670＝）2万瑞士法郎的利润。(2) 买空。以先购买为基础，在购买外汇时实际上并不需要立即付款也没有取得所买外汇，只签订一份远期合约，保证到期以规定汇率购买一定量外汇。例如，纽约外汇市场上美元和马克间的三月期汇率为1美元＝2马克。一美国投机者预测马克将大幅度上升，因此进入远期外汇市场买入三月期马克500万，在交割日需支付250万美元。到了交割日马克果然升值，即期汇率为1美元＝1.9马克，该投机者按此汇率出售500万马克，取得约263万美元，获利13万美元。真正的外汇投机指的正是在远期外汇市场上进行的买空卖空。

外汇交割（Delivery of Foreign Exchange）　外汇买卖中购买外汇者付出现金，出售外汇者交付外汇的行为。即期外汇交易在两个营业日（即有关外汇交易涉及的两个结算国银行都营业的日子）之内进行交割。但若涉及美元则会有四种情况。以一笔美元购买马克的即期交易为例，若交易成交日为星期一，(1) 在美、德两国银行星期二、三均营业的正常情况下，星期三交割；(2) 如果星期二是美国银行的假日，德国银行的营业日，星期三两国银行都营业，星期三交割；(3) 星期二为德国银行的假日，美国银行的营业日，星期三为两国银行的营业日，则交割顺延至星期四；(4) 星期二两国银行均营业，星期三两国中任何一国银行不营业，交割都顺延至星期四。远期外汇交易则在双方约定的日期交割。外币期货交易，只要未经对冲，则需按有关交易所规定的交割日交割。外币期权交易，若为美国型，则在期权到期日前任何时间都可根据期权购买者的要求交割；若为欧洲型，则只能在到期日交割。

外汇分成（Foxeign Exchange Divided）　又称外汇留成。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规定的有外汇收入的厂商可将部分外汇收入留着自用的作法。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有关厂商多创汇，以达到利国利己之目的。外汇留成的比例由国家授权的外汇管理机关规定，可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加以改变。有时对不同厂商或不同的外汇收入规定不同的留成比例。

外汇倾销（Exchange Dumping）　外汇倾销是指一国利用本国货币对外贬值来扩大出口。当本国货币贬值时，出口商品用国外货币表示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使得该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提高，贬值幅度越大，本国商品在国外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幅度就越大，从而有利于扩大出口。与此同时，本国的进口也会因为货币贬值受到一定的限制。外汇倾销作为一种特殊的手段在刺激和扩大出口方面有时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采用这种手段，但是外汇倾销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必然会引起国内物价的上涨，尽管物价上涨有一个时滞。如果国内物价上涨幅度等于货币贬值幅度，那么外汇倾销作用就消失了；如果物价上涨幅度大于货币贬值幅度，将对出口产生负作用。其次，对本国货币实行贬值，不仅会影响该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而且会引起其他国家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这不仅抵消了外汇倾销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还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因此，目前各国较少实行外汇倾销，贬值本国货币往往有各种客观的原因和理由，而不是一种特殊的政策手段。

外汇稳定基金（Foreign 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　即"外汇平准基金"。见"外汇平准基金"。

外汇留成（Sharing of Foreign Exchange）　外汇留成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要点是中央、地方、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分享出口外汇收入。实行外汇留成改变了出口外汇收入一律上交中央的传统做法，有利于调动各方经营外贸出口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外汇留成的做法上，不同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1988年的外贸体制改革中，国家根据出口地区及出口商品的不同，将外汇留成比例分为18个档次，最高达到100%的留成。1991年1月出台的外贸体制改革方案改变了外汇留成办法，将以往主要按地区不同实行不同比例的留成改为按商品大类实行统一比例留成，其目的在于消除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推动市场秩序向良性化方向发展。

外汇银行（Foreign Exchange Bank）　经货币管理当局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包括专营外汇业务的本国银行、兼营外汇业务的本国银行、外国银行在本国开设的分支机构。在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一般都设有外汇部或国际业务部兼营外汇业务。外汇银行是外汇市场的主体。

外汇战（Exchange War）　即"外汇倾销"。见"外汇倾销"。

外汇经纪人（Foreign Exchange Broker）　外汇市场上专门为买卖外汇的双方介绍交易并从中获取佣金的中间人。要取得外汇经纪人资格需经所在国中央银行的批准。外汇银行间的交易大部分是由外汇经纪人居间达成的，相互间直接进行交易的情况较少，但正在增加。通过外汇经纪人进行交易可使交易双方保持匿名，有利于达成较为公平的交易。例如，大银行买卖外汇的量很大，其交易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外汇市场的汇率趋势，若它们直接买入或卖出外汇，便会使汇率上升或下降，对自身不利。

外汇风险（Foreign Exchange Risk）　又称"汇率风险"。经济交易中，由于两国货币汇率变动给交易双方中任何一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实际交易的最终结果既可能使交易者获利，也可能使他受损。外汇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厂商或个人因进行和外汇交易有关的经济交易从而使这些厂商或个人本身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为狭义的外汇风险。当日元升值时，日本所有出口企业收到的外币货款兑换成日元时，所得日

元减少，此即狭义的外汇风险。因汇率变动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从而使得与国际经济交易无直接关系的厂商或个人亦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例如，1987年日元大幅度升值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减少，投资下降，转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抬高了房地产价格，不仅使原就交纳房地产税的房地产所有者纳税额增加，还使一些本不够纳税资格的所有者也升格成为纳税人。他们所蒙受的损失就是广义外汇风险造成的。

狭义外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

外来风险和损失（External Risk and Demage） 外来风险和损失是指海上风险之外的偶然的外来原因所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外来风险和损失也是保险人在海运保险业务中所承保的一种险别。外来风险和损失可以分为一般外来风险和损失以及特殊外来风险和损失。

一般外来风险和损失是指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串味、生锈、淡水雨淋、破碎、短量、偷窃、提货不着等一般外来原因所引致的风险和损失。

特殊外来风险和损失是特指由于政治、军事等特殊原因所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其中主要是指战争、罢工、海关扣留等风险和损失。

外国基地公司（Foreign Base Company） 简称基地公司，指跨国纳税人出于避税目的而以低税或无税国家（地区）为基地建立起来的从事转移和积累以及第三国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基本特点是受基地国以外的母公司所控制，试图通过各种形式利用避税地的低税或免税政策使在基地国以外的经营收入合法地转移到避税地积累起来从而实现避税，或者再通过基地公司在第三国从事的经营活动在更大程度上获得避税的好处。

基地公司的主要形式是信箱公司，信箱公司又有许多具体形式。(参见"信箱公司") 此外，在第三国从事经营的基地公司又被看作是典型的外国基地公司，它指的是甲公司通过在乙国建立的基地公司对丙国投资这种情形。与此相应，若甲公司通过在乙国建立的基地公司对甲国投资则被看作是非典型的外国基地公司。

外国债券（Foreign Bond） 发行人在某外国金融市场上，通过该国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以该国货币为面值的债券。例如，加拿大某公司在美国债券市场上发行的美元债券。外国债券的发行和流通是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业务，已存在几个世纪，其发行必须经发行地所在国政府批准，并受该国金融当局的管辖。在美国发行的外国债券称为扬基（Yankee）债券，在日本发行的外国债券称为武士（Samurai）债券。

外贸政策性亏损（Foreign Trade Deficit by Policy） 外贸政策性亏损是指外贸公司由于执行国家的有关贸易政策，按照有关部门确定的价格原则开展外贸收购、出口、进口、销售等业务所发生的亏损。比如说，某公司准备出口A商品，国家给它确定的收购价为每件20元．如果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1∶5，而A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售价为3美元，那么该公司每出口一件商品就要亏损5元人民币 $(20-3\times5)$，这就是政策性亏损．这种亏损同样会发生在进口业务上。外贸公司的政策性亏损一般是由国家提供的补贴进行补偿。前些年由于汇价不合理等一系列原因的影响，使得外贸公司的政策性亏损十分严重，国家每年提供了数以百亿计的外贸补贴，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包袱。以后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外贸政策性亏损逐渐减少。在今年初提出的外贸体制改革最新方案中，取消了国家的外贸补贴，促使外贸公司真正走向独立自主、自负盈亏。

外贸依存度（Ratio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又称外贸依存率，它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在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用公式表示则为：

$$外贸依存度=\frac{外贸总额}{国民生产总值}\times100\%$$

外贸依存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它不仅反映了一国国民经济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而且也反映了该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程度。战后，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加深，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不断发展，这使得国际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立足于某一个国家和地区来看，则表现为该国或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有些国家的外贸依存度高达50%以上。一般来说，外贸依存度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越大，该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程度也越高，反之，则越低，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低，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不密切，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市场庞大，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通过国内市场就可以实现。另外，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十分庞大，这也使得外贸依存度相对变小。事实上，美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美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如果发生较大的变动，必然会对许多国家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实际上说明了美国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领域所处的重要地位。

外贸代理制（Agency System of Foreign Trade）

外贸代理制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指外贸企业接受国内生产或用货企业的委托，代为办理进出口业务并收取一定的佣金作为报酬，而盈亏由生产或用货部门自负的外贸经营管理体制。在这里，外贸企业与国内生产或用货企业的关系不是原来的买卖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这就改变了风险由外贸企业独家承担的状况，对于我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出口贸易代理制中，作为代理人的外贸企业它的义务在于代为开展包括诸如选择销售市场、物色国外买主、签订买卖合同、履行一系列出口手续等内容在内的出口业务活动，并向国内生产企业及时提供国际市场行情以及其他一系列与产品销售有密切联系的情报和资料。如果买卖做成了，外贸企业就可以从生产企业那里得到一笔相当于出口货款一定比例的佣金，如果买卖没有做成，外贸企业也就一无所获。作为委托人的出口生产企业它的义务在于向代理人提供开展代理业务所必需的具体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产品的品质、规格、价格以及样品、宣传材料等内容，及时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出口产品等。生产企业对最后的成交与成交条件有决定权，并且承担出口贸易中的风险与盈亏，也就是说，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后果由生产企业自负，而不再由外贸企业来承担。出口贸易代理制的实行将贸易和生产企业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必将有利于充分调动双方的积极性，提高外贸生产和出口的水平与效率，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推动我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当然，由于出口代理制的推行时间并不长，这中间必然存在着许多欠缺，主要是贸易和生产双方的责、权、利还没有十分的明确，这就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这种制度，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进口代理制是指外贸企业代国内用货单位办理一切进口手续，国内用货单位不仅要按外贸企业的进口价支付进口货款，而且还必须支付一系列进口费用，并向外贸企业支付一定的佣金。进口代理制使得国内用货单位的责任和成本增大，这可以促使用货单位选择更有针对性的国外商品并提高这些商品的使用效率，这就能提高我国进口的效率，使进口商品在促进出口贸易和国内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外贸经营性亏损（Foreign Trade Deficit by Bad Administration）　外贸经营性亏损是指外贸企业在办理收购、调拨、运输、保管、进出口、销售、财务结算等一系列具体贸易业务时，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亏损，这种亏损一般由外贸企业自行承担。随着外贸企业逐步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它就必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克服这种经营性亏损，以保证外贸业务的顺利开展。

外贸收购制（Purchasing System of Foreign Trade）　外贸收购制是传统外贸体制下的具体做法，它是指外贸公司先从国内生产企业那里购得有关商品，然后再把它用于出口。生产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出口商品，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价格把商品卖给外贸公司。确定出口商品收购价格的原则是能促进出口商品的生产，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不低于内销产品生产者获得的经济利益，以便及时得到适销对路的出口货源。

外贸收购制对于我国外贸的发展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计划安排出口商品的生产使得出口货源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由专业外贸公司负责开展出口贸易将提高外贸出口的效率，这有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贸易，也有助于我国利用这些宝贵的外汇资金进口国内经济建设必需的先进技术设备，推动对外贸易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外贸收购制又有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使得出口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相割裂，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这种制度下，生产企业只需依照国家的有关计划完成出口商品生产任务并把这些商品按一定的价格卖给外贸公司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这些商品如何出口，是不是能出口则与生产企业无关，出口业务以及所有的出口风险都由外贸公司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感受不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它没有改进产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需要的紧迫感，其结果是，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与国际市场的要求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就严重影响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针对外贸收购制存在的上述弊病，国家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如实行外贸代理制、工贸联营等等，其目的就是要密切生产和贸易的联系，使生产者和贸易公司共同承担外贸风险，迫使生产企业花大力气改进生产和提高技术，以便使出口产品能更好地与国际市场的需要结合起来，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外币期权交易（Foreign Currency Option Transaction）　外币期权是期权购买者拥有的在未来一定时期或固定时间以特定汇率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某种外汇的权利。买卖此种权利即形成外币期权交易。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汇银行应顾客要求首先提供外币期权交易服务。以后一些交易所也开始经营此种业务，如美国费城股票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加拿大蒙特利尔、伦敦股票交易所等。外币期权对购买者而言可选择的"是否进行交易"，是一种真正的选择权；在择期远期交易中交易者也有一定的选择权，但

可选择的是"何时进行交易"。期权交易中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购买者有权买卖某种外汇，但没有义务一定要买或卖。出售者有义务应购买者的要求购买或出售外汇，但却不能要求期权购买者行使或不行使期权。利用外币期权交易可以避免外汇风险。和远期外汇交易相比它甚至是一个更为有利的手段，不仅可以避免汇率不利变动可能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利用汇率的有利变动。根据期权有效期不同可分为美国型期权和欧洲型期权；根据期权性质的不同可分为看涨期权、看跌期权。

外币期货交易（Foreign Currency Future Transaction） 在有关交易所内，买卖双方通过经纪人以公开叫价的方式，买卖在未来某一日期根据协议价格交割一定数量外汇的合同的交易。外币期货交易是借鉴商品期货交易的成功经验发展起来的。首创者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IMM）。国际货币市场成立时（1972年5月16日）经营8种外币期货合约：英镑、加拿大元、荷兰盾、西德马克、日元、墨西哥比索、瑞士法郎、法国法郎。以后荷兰盾、法国法郎、墨西哥比索停止交易后其它5种仍继续经营。目前除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外，经营外币期货交易的还有纽约金融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悉尼期货市场、新加坡期货市场等。

外币期货交易与远期外汇交易有很明显的区别：(1) 外币期货交易的合同是标准化的。每份合同的交易金额相同。例如，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每份英镑期货合同的交易金额为25，000英镑。这是最小的交易单位。合同的交割日期也是标准化的。远期外汇交易的合同是非标准化的；(2) 二者的交易方式不同。远期外汇交易是一无形市场，交易者一般私下用电话、电传同对方进行交易。外币期货交易则在特定场所通过公开叫价进行，是一有形的市场；(3) 二者的参加者不同。远期交易合约是外汇银行和顾客间的双方协议。外币期货交易则是买方、卖方及票据交换所的三方协议；此外远期外汇交易交易额较大，资信要求高，中小企业和一般人不敢问津。外币期货交易的参加者就广泛得多，银行、公司、一般人都可以参加。

利用外币期货交易可以避免外汇风险，也可以从事投机。

外币钞票价（Foreign Currency Rate） 又称"现钞价"、"钞票价"。银行买入外币现钞的汇率。一般国家均规定，不允许外币在本国流通，外汇银行买入外币钞票后必须将其运送到发行国才能使用，故外币钞票价通常低于电汇汇率及信汇汇率的买入价，等于电汇汇率中的买入价扣除现钞的运送费、保险费、邮程时间内的利息等费用。卖出外币钞票的价格和外汇卖出价相同。

外在时滞（Outside Lag） 从某项经济政策开始付诸实施到该政策对经济完全发生作用达到预期目标之间的时间间隔。外在时滞是一种分布时滞，即一旦政策付诸实施，它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政策的作用才能达到最大，并达到预期的目标，此后政策的作用逐渐减小，直至最后不起任何作用。外在时滞存在的原因是某项政策实施之后，首先影响中间变量，然后才能由中间变量影响所要达到的目标变量。例如，减税政策的基本作法是降低利率，在利率降低后首先影响税收与可支配收入（中间变量），然后才能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水平（目标变量），而且在对国民收入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乘数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货币供给量增加的货币政策也是先影响利率（中间变量），而后影响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目标变量）。外在时滞是由政策影响中间变量和中间变量影响目标变量所需要的时间构成的。不同经济政策的外在时滞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财政政策的外在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的外在时滞较长。在财政政策中，变动政府支出的外在时滞又要短于变动税收。要使经济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考虑到不同经济政策的外在时滞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形势时采取不同的政策。例如，当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状态时应该主要采用外在时滞短的政策，例如大量增加政府支出。但在经济形势只是出现萧条的迹象时，就可以采取外在时滞较长的政策，例如，通过在公开市场收购有价证券来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样，就可以使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减少经济波动。

外推法预期（Extrapolative Expectation） 一种关于预期形成方式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经济主体只是根据过去所观察到的经济变量的实际数值来简单地推测未来经济变量的数值。这种预期与适应性预期的相同之点在于，都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形成对未来的预期。但这两种预期又有重大的差别，即适应性预期要根据预期误差来调整现期的预期，而外推法预期并没有这种调整。所以，在这种预期时，过去的实际变量值就是未来的预期值。以 π_t 代表 t 期实际通货膨胀率，则 t+1 期通货膨胀的预期值 π^e_{t+1} 就是：

$$\pi^e_{t+1} = \pi_t$$

这是一种最简单而原始的预期形成方式。这时预期对经济行为没有什么影响。

外向发展战略（Outward_ looking development stratege）　见"出口替代战略"。

外援补充储蓄假说（Hypothesis of Foreign Aid Replenished Saving）　关于外援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观点之一，认为增加外援能增加国内储蓄，补充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的不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外援是一种额外的资源，只要它能改善资源的稀缺性，受援国资本形成的能力就会提高，从而可能获得更高的产出和更快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可追溯到哈罗德—多马模型。早在1948年，哈罗德在阐述其经济增长模式时就曾提出过，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增长率时，应当用国外储蓄来提高储蓄率。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各种外国储蓄的作用是扩大国内储蓄，以增加投资。如果其援助和其他外国储蓄增加到比如说占受援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它全部用于增加投资，并且资本产出率是3·0，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增加两个百分点。此外，两缺口模型也认为，利用外资能提供大量的追加储蓄和进口，是填补缺口的有效手段。当援助用于生产出口产品项目时，它直接形成出口；当援助降低了出口成本时，它就间接地促进了出口。例如，把援助资金用来修建从农场到港口的道路，就能降低运输费用，使得出口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诸如此类，外援能通过几个途径使国内储蓄相对于投资有所增加。如果外援的资源成功地用于投资，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储蓄的增加；较高的收入也可以使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又可从消费转向投资，从而提高经济的总的储蓄水平。事实上，这一假定已经见诸于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工作中。在许多发展规划模型中，投资的目标水平被规定为要达到一定的收入增长率，然后对计划储蓄做出估计。当计划投资超过计划储蓄时，人们就寻找国外资源来弥补这个缺口，并且假定，全部外国资源都将被用于国内投资。

外援替代储蓄假设（Hypothesis of Foreign Aid displaced Saving）　关于外援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观点之一，认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仅是代替并不能增补本国的储蓄。因为外援使得消费增加，而不是投资增加；或出口减少而不是追加进口。主张这种观点的大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派学者。他们认为，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他们从受援国的增长率并不很高的事实出发，指出，外[illegible]特别是外援，并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追加储蓄和进口。虽然援助国在提供援助时，希望所有援助都用于投资，以提高总投资的水平。但在实际中，受援国既可以相当自由地把援助转变为投资，又可能把它转变为消费。既使所有的外援都以特定的投资项目作为目标，替代也是有可能的，比如，项目援助也许用于政府或私人投资者在没有援助情况下也会进行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被替代了的资源就可以不受限制地用于消费了。当外援所资助的那些没有外援就可能不会完成的项目时，政府也许还会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要求提高消费的比例而简单地削减其编好的项目。道格拉斯·戴西还提出，外援甚至会使受援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最终有所下降。他假定援助的一部分或全部替代了政府本来应该储蓄和投资的资金，那么这部分本应节蓄的资金就会被耗用于公共消费。许多国家的政治形势使得这种公共消费一旦开始就难以收缩。那些在援助前用于投资，而在援助期间被替代了用于消费的公共开支，当援助用完时也已经不可能重新转向以前的投资项目了。这样，公共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将比不接受援助还要低。就间接的作用看，外援对一些相对价格所起的种种影响也会导致替代。通常，资本越多意味着投资回收率越低，因而受援国的消费趋势亦越大。外汇愈多，其价格往往愈低，因而象援助国所期待的那样对进口品的需求也更大，与此同时又会造成对出口生产的刺激减少。如食品援助可压低粮食价格，因为粮食援助满足了部分国内需求，由此减少了对国内农民生产粮食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说，外援为受援国提供了额外的购买力，因而有了增加进口品或粮食的可能性，受援国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去利用这种可能性。

对应原理（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原指本世纪20年代由物理学家N·玻尔提出的在物理学中选择新理论的准则，它要求新理论能解释旧理论已经能解释的一切现象。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在1947年所著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中引用这个原理来阐明经济动态学与比较静态学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萨缪尔森认为，从前的理论要求经济受优化目标支配，最终收敛于均衡状态。但是，不同的均衡状态中所包含的变量的均衡值不一定相等，因此，只有把比较静态与动态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对应原理认为，当某一个系统失去了原有的均衡的时候，经过一定的调节可以恢复原有状态下的某些均衡性质。换个角度说，从设定的均衡状态的性质中应当可以得到所处系统是否稳定的信息。萨缪尔森还举例说明动态的作用，在商品市场上，如果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导致价格离开了均衡点，那么实现市场稳定均衡的充分条件是，需求函数斜率的绝对值小于供给函数斜率的绝对值，这使得静态与动态结合了起来，其中还涉及到对优化目标的实现。开始，对应

原则只用于局部稳定问题的分析，到了70年代，萨缪尔森又把它发展成为一个一般模型。50年代以后，人们在分析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曾经利用对应原理，从增长过程的收敛条件中推导系统稳定状态的性质，同时从这些性质中了解过程的稳定性。但是在资本与增长理论中，总是假设经济经常处于均衡性质，因此，动态分析在此处的作用大为削弱。

对应原理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即使对于很小的非均衡系统，稳定条件对于均衡的性质的约束力也很小，而有关均衡性质的信息不足以判定这个非均衡系统是否稳定。即使稳定条件能够对均衡状态的性质起较强的约束作用，也存在着选择非均衡系统的问题。此外，如果对于非均衡系统来说，它的一个均衡子系统相当小，那么对此系统稳定状态的判断就很不可靠。还有，经济在变化的过程中一般是处于非均衡状态，动态的均衡很难实现。

由于以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对应原理对经济理论没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它的运用也主要存在于局部分析中，其中包括凯恩斯的简单宏观模型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小型一般均衡理论。尽管如此，对应原理毕竟跳出了传统的静态分析模式，提出了将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创见，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对偶性（Duality） 对偶性有时指的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事物，例如美与丑、善与恶等等；有时指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例如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一个人身上的长处与不足等等。在经济学中，这种互为相衬、相互对立的例子比比皆是，对偶性也就被广泛地应用于数学规划之中，成为对偶规划。对偶规划可以分为两类，即对偶线性规划与对偶非线性规划，其中对偶线性规划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相当广泛。例如，我们可以将线性规划问题

$$\begin{cases} \min S = cx \\ \begin{cases} Ax \geqslant b \\ x \geqslant 0 \end{cases} \end{cases}$$

与线性规划问题

$$\begin{cases} \max g = yb \\ \begin{cases} yA \leqslant C \\ y \geqslant 0 \end{cases} \end{cases}$$

称作互为对偶的线性规划问题，它们是实质相同但是表达方式不同的一对对偶问题。前一个问题可以是，在完成给定任务的前提下，如何使所耗费的人、财、物力最少，或者可以归纳为，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使成本达到最小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可以是，在给定的人、财、物力的前提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完成生产任务，或者可以归纳为，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使产量达到最大的问题。线性规划中的对偶理论由V·诺依曼等人创立和发展起来，它无论对于线性规划领域的纯理论研究还是对于解决实际中遇到的某些经济问题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开信用证（Reciprocal Credit） 对开信用证是指进出口双方把进口和出口联系起来，互相开立信用证。对开信用证主要使用在换货贸易中的两种不同商品的进出口。由于双方均担心对方只办理货物出口，却以易货为幌子，不履行相应的进口义务，因而产生了对开信用证结算方式。

在对开信用证方式下，第一张信用证的开证人（进口商）和受益人（出口商），又分别是第二张信用证（又称"回头证"）的受益人和开证人。第一张信用证的通知行通常是第二张信用证的开证行。两张信用证的金额通常相等，或大致相等。两张信用证可以分别生效或同时生效。

对开信用证是两张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各自向对方开出的信用证，虽然对开信用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易货贸易中双方互不信任的问题，但又有其局限性。如对于分别生效的对开信用证，形式上较为灵活，但风险较大；若改为同时生效，又牵制太紧，不够灵活。

对背信用证（Back to Back Credit） 又称为从属信用证（subsidiary credit）。对背信用证是指出口商收到进口商开来的信用证后，要求该证的原通知行或其它银行的原证为基础，另开一张内容近似的新信用证给另一人。通常在信用证的受益人是中间商而非实际供货人时采用对背信用证，其目的在于转售货物。

对背信用证是以原证为基础开给另一受益人的新信用证。开立对背信用证的同时，原信用证仍然有效，由对背信用证的开证行代受益人保管。因而，对背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是原证的受益人，而对背信用证的开证行又同时是原证的通知行或议付行。

对背信用证与原证的开证行和开证人，即进口商是无关的，其开证行对新的受益人承担独立付款责任，因而，只能凭不可撤销信用证方可开立对背信用证，使对背信用证的开证银行可以以原证为担保品，减少开证风险。

对背信用证虽以原信用证为基础，但其条款可与原证有所差别。如原信用证为不可分割信用证，而对背信用证是可以开成若干张，并以若干不同的供货人为新证的受益人。

对背信用证在外表上与可转让信用证相似，但却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在对背信用证下，开证行承担的风险较可转让信用证大，因而只有在实际供货人的

交货条件与出口商对进口商的交货条件相差很远，而无法使用可转让信用证时，才转而使用对背信用证。

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对某些海岛国家如日本、英国等来说，对外贸易通常又被称作海外贸易（Oversea Trade。从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来看，国际贸易是由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对外贸易组成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Foreign Trade by Commodities）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各类商品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或分别在该国的进口和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还与该国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有一定的联系。从现实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以制成品为主，比如说，制成品出口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达95%以上，虽然初级产品的进口在发达国家的进口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比重正在不断下降。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而进口则以制成品为主。

对外贸易额（Foreign Trade Value） 对外贸易额又叫对外贸易值，它是指按即期价格计算的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某一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它是由该国或地区在这个时期的进出口贸易额组成的，它反映的是该国或地区在这一时期对外经济交易的总体规模和水平。在这里，进口额通常按到岸价格统计，而出口额则按离岸价格统计。

对外贸易差额（Balance of 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差额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间的差额。如果进出口总额相等，则称为贸易平衡。如果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就叫作贸易顺差，也可叫作"出超"。如果进口总额大于出口总额，就叫作贸易逆差，也可叫作"入超"。

贸易差额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指标，它不仅可以直接反映一国对外经济交易的基本状况，而且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地位。当然，对外贸易差额还与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有时候，有的国家实现了贸易顺差，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国商品竞争能力特别强，它可能是国家强制推行的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政策的结果。

一般来说，一国政府总是希望实现贸易顺差，避免贸易逆差。因为如果存在着贸易顺差，一方面可以随时使用，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它有助于本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贸易顺差能够稳定本国货币的币值，这有助于本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较好的信誉。而如果存在着贸易逆差，尤其是存在着长期贸易逆差，则会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因为在长期逆差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压缩进口，扩大出口，其结果可能是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不能进口，人民的某些生活必需品得不到充分的供应，这就有可能造成国内经济的衰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果采取本国货币贬值政策，不仅会影响本国在国际市场的声誉，而且会推动国内的物价上涨，进一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贸易的顺差固然有好处，逆差确实有缺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国存在着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对本国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巨额顺差本身就是一种浪费，如果把它们用于进口国内建设和消费有用的商品，它们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本国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储备货币贬值，本国就会遭受损失。相反，贸易逆差并不一定是坏事，适当的逆差有时候对本国来说更有利。如果本国能抓住时机多进口一些本国急需的商品尤其是先进的机器设备，即使出现了逆差也不应盲目担忧。因为这些设备的进口可能会大大提高本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本国的出口商品生产能力，这对于真正改善本国在国际经济交易中的地位、促进本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是很有利的。

对外贸易政策（Foreign Trade Policy） 对外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对本国的进出口贸易所实行的政策。由于对外贸易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各国政府总是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管理本国的外贸。由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贸发展水平很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实行不同的外贸政策，即使在同一时期，各国的外贸政策也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行过的外贸政策笼统地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在资本主义世界外贸发展过程中，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曾被交替采用，今日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对外贸易地区结构（Foreign Trade by Regions） 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分布和国别分布情况。具体地说，它能反映该国的商品和劳务主要向哪些国家和地区出口，而它所进口的商品和劳务主要来自于哪些国家和地区。对

外贸易的地区结构可以表明现阶段一国同世界上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的广度和深度。

对外贸易量（Quantum of 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量是指按基期价格计算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对外贸易总额。对外贸易量的计算方法同国际贸易量类似，不过计算口径却不一样，具体说，对外贸易量不仅包括出口量，而且还包括进口量。因此，对外贸易量可以说是按基期价格计算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它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该国对外贸易的实际规模和发展变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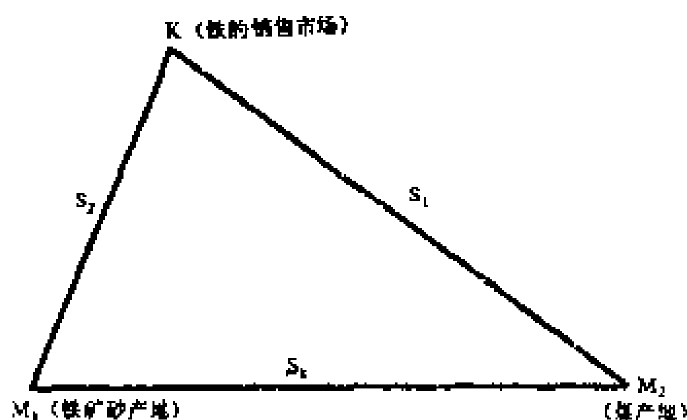
对外贸易国家统制（State Monopoly System of 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国家统制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曾长期实行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它是指一国政府借助各种政策、法令和计划，通过专门设置的有关机构，对本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实行集中领导和计划控制。简单地说，对外贸易国家统制可以说是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我国从50年代末开始全面实行对外贸易国家统制，这一制度维持了20多年。实行这一制度有利于国家集中掌握统一的经济力量，使我国外贸更好地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另外，国家集中领导和管理外贸，还有利于提高外贸工作的效率，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对外贸易国家统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指定或批准的有关公司和机构才有权开展进出口业务，其他单位一律不准开始外贸业务，即使有权开展外贸业务的单位，它的业务活动范围也受到政府有关政策的严格控制。国家对进出口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度，也就是说，有关单位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前提是必须拥有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许可证，没有进、出口许可证的货物一律不准进、出口。经贸部所属的专业外贸公司，如果它的进出口商品属于经营范围内的，则无须申请许可证。在外贸国家统制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汇实行国家集中管理、统一经营的方针。一切外汇收支都由外汇专业银行——中国银行统一管理，任何单位都无权私自使用外汇。另外，国家还通过专门机构来实施保护关税制度，进出口商品检验制度、货物监管和查禁走私制度。总之，对外贸易国家统制将我国外贸置于国家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得外贸的发展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我国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对外贸易国家统制也有它的缺点，尤其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它的缺点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缺乏灵活性，难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等。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我国对外贸易国家统制实行了不断的改革，大大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对外援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 To Foreign Aid） 一国在不使经济和社会效益下降的情况下使用外援资金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曾被建议作为分配外援的依据。它涉及资本引进，技术消化，管理等多方面的因素。与此同时，还特别取决于其基础设施的性质。一个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很差，缺乏适当的培训和教育设施而使管理技能进一步受到妨碍的经济，可能只有很低的吸收能力。由于吸收能力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进行实际估算比较困难。一般是以全部投资的利润率来衡量。也有人曾经提出过一些其他测算吸收能力的指标。如：前5年或更多年以前投资规模的增长；过去若干年中储蓄的增加额；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结构和管理结构的考察等。吸收能力约束，又称技术约束，即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企业家和管理人才，无法更多地吸收外资和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影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国内资源还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约束。具体策略应该是在使用外资中实行一揽子的资源进口计划，即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国外的适宜技术，管理知识和人才等软件，使进口资源能够得到有效而充分的利用。按照吸收能力分配外援的准则，在国际上受到了一些批评。有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按照投资生产率来分配外援，那些最贫穷的国家由于人口压力最需要外援，却有可能得到的最少。并且过去的投资收益也并不一定总是未来投资生产率的最可靠指标，储蓄以及产出——资本比率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改变。所以，他们认为，吸收能力原则的运用没有适当考虑不同国家中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同方式。

对通货膨胀的需求（Demand for Inflation） 通货膨胀对某些集团存在着潜在的好处，来自这些集团要求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压力被认为是对通货膨胀潜在的需求。虽然并没有一个集团公开要求进行通货膨胀，但有些集团的行为或要求却促进了通货膨胀。例如，纳税人抵制增加税收的压力使增加政府开支的通货膨胀成为必不可免；政府支出项目的受益者反对政府削减开支，也导致了通货膨胀；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会也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来源之一；等等。这些集团通过政治（投票或院外活动）压力来实现自己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集团的要求，政府不得不采用通货膨胀政策。因此，这些集团就被认为有潜在的通货膨胀需求。这种对通货膨胀的需求是通货膨胀难于制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区位三角形（Location Triangle）　这是早期区位理论中用来分析运输成本因素对工业区位决定影响的一种理论方法。在原料产地，产品市场的分布为已知的条件下，工厂选择厂址将去寻找运输成本最低（即运输里程尽可能短，所需要运输的货物吨位尽可能少）的地点，其寻找方法可以用三角形的图式来加以说明。最早提出区位三解形方法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龙哈德。其主要论文《商业区位的理论》发表于1872年，《工业合理区位的确定》发表于1882年。韦伯后来也使用了和龙哈德相同的分析公式，但韦伯的区位三角形更为完整和具有一般性。从数学上看，龙哈德三角形只是韦伯区位三角形的一个特例，从体系上看，前者也只是后者的一小部分。龙哈德关于区位三角形的分析要点如下："假定某炼铁厂的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不在一处，主要原料有两种，煤和铁矿砂，这两种原料的产地也不在一处。用K表示产品市场，M_1表示A原料（如铁矿砂）的产地，M_2表示乙种原料（如煤）的产地。以S_1，S_2，S_K分别表示K与M_2之间，M_1与M_2之间的距离。假定产品（铁）有一吨运到K，假定以M_1表示每产一吨铁所需要从M_1运出的铁砂吨数，M_2表示每产一吨铁所需要自M_2运出的煤的吨数。这样就可以下面三角形来表示这些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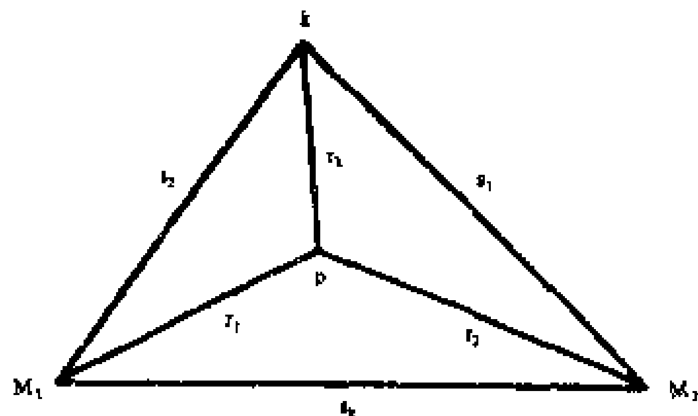


假定生产地点在M_1，以f代表原料和成品每吨公里的运费，这样，铁矿砂的运费等于零，煤的总运费等于煤的运输量×煤产地至工厂的距离×单位重量的运费（$m_2 \cdot S_k \cdot f$），铁的总运费等于铁产地至市场的距离×单位重量的运费（$S_2 \cdot f$）。这样，从生产到销售，每吨铁的总运费等于煤的总运费与铁的总运费之和[$f(m_2 \cdot S_k+s_2)$]。

假定生产地点在K或M_2，也可以根据同样方法算出这种情况下生产每吨铁的总运费。假定只有这三个地点可作为该厂地址的选择，那么可以很简单地找出运输费用最小的地点。

但是很可能在这三个地点之外还有运输成本更小的地点。假定这个理想的地点在上述三角形中间，以P来表示它，P应该满足什么条件呢？

以r_1、r_2、r_k来分别表示从P点到M_1，M_2和K三处的距离。以F表示把原料运到P点以及从P点把成品运输到K的每吨成品所需要的总运费。那么$F=(mr \cdot r_1+m_2r_2+rk)f$。这样凡是能使F的数值为最小的地点（P），就是理想的设厂厂址。从力学的观念上说，P将会位于来自M_1，M_2，K三方面吸引力的均衡点上（见图2）



韦伯在使用区位三角形的分析中，同样把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分布作为决定工厂区位的基本图形，并假定决定运费大小的基本因素就是距离和货物重量。但韦伯把决定工厂区位的基本图形分为几类：

1.原料一种，同消费地在一起，区位图形为一点；

2.原料一种，同消费地不在一起，区位图形为一线段；

3.原料二种（或原料、燃料），同消费地不在一起，区位图形为一三角形或称之为区位三角形。

4.原料多种，同消费地不在一起，区位图形为一多边形。

可见，1、2、3均为4之特例，龙哈德之区位三角形为韦伯区位图形的一个特例。

韦伯对于区位点的推求，采用了力学的方法，即所谓"范力农（Varignnon）构架"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扩大为多原料和消费点的合理区位模式。

设运费最小点为P，原料、燃料和市场有M_1，M_2……M_n个，运费为m_1，m_2……m_n，距P点距离为r_1，r_2……r_n，吨公里即运费模式为以下方程：

$$S=\sum_{i=1}^{n}miri=\sum_{i=1}^{n}mi\sqrt{(x-x_i)^2+(y-y_i)^2}$$

求最小值需满足以下方程组：

$$\frac{\partial S}{\partial x}=\sum_{i=1}^{n}\frac{m_i}{r_i}(x-x_i)=0$$

$$\frac{\partial S}{\partial y}=\sum_{i=1}^{n}\frac{m_i}{r_i}(y-y_i)=0$$

满足该方程组的最小解，即是最优工业区位点。

区位因素（Location Factors）　韦伯工业区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影响工业生产活动在

A 处进行而不在 B 处进行的经济上的因素，区域因素和位置因素就是这种区位因素的 2 个组成部分。区域因素就是指影响工业活动分布于各个区域的决定因素，而位置因素是指促使工业集中于某些区域而非另外一些区域的因素。它又包含有集中和分散二方面的因素。韦伯认为在区域和位置因素中又可分为普通因素和特殊因素，其中普通因素是指对一般工业活动都有影响的因素，而特殊因素是指对特定的工业有影响的因素。一般来说，确定工业区位的原则是按照区域因素中的普通因素来进行的。只有在工业区位的决定不能按照上述原则进行时，才考虑区域因素中的特殊因素。区域因素中的普通因素是指原料、动力和燃料成本，运输成本，工资成本。对工业区位的决定起作用的实际上只有运输和工资成本。因为，原料、动力和燃料成本的差别可以归因于运费的差别和各地区产品价格的差别上。而各地区产品价格的差别又可以看成是运费的差别。

区位经济学（Location Economics） （见"区域经济学"和"选址论"）。

区位商 区域经济学中的一种分析手段。它是关于任何工组数量特征在任何 2 个地区之间分布所呈现的不同程度的一种设计尺度。假如分别称数量特征为 x 和 y，地区为 A 和 B，又令 $x_{A(B)}$代表特征 x 在区 A (B) 的总量，$y_{A(B)}$代表特征 y 在区 A (B) 的总量，区位商就等于 $XA / XB \div \frac{yA}{yB}$。一般用区位商来表示特定工业部门在特定规模类别城市的相对集中程度或专业化程度（参见区域）专业化系数和集中化系数）。

在假定消费者消费形态、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不存在区域差异的条件下，某一区域的消费者在购物时，将就地取材，没有越区行为。因此，当区位商为 1 时，表示区域的需求和区域的供给相等，没有"出口"，也没有"进口"；当区位商大于 1 时，则表示区域的生产量大于需求量，属于区域专业化生产部门；当区位商小于 1 时，则表示区域的生产量小于需求，属于"进口"的部门。

区域（Region） 区域就是对描写、分析、管理、规划和制定政策来说被认为有用的一个地区统一体。对于区域这个概念具有根本意义的，是一个区域各组成部分在特性上存在高度相关性。既然区域内部结构中两种完全不同的特点都可以通过这种相关性反映出来，我们也就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类，均质区和结节区。均质区划界的根据是内部一致性。美国中部的冬小麦带就是一个均质的农业区，因为它的各组成部分都同样地种植同一作物。某种外部变化，例如，某种新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或贷款计划，连年干旱或是世界小麦需求的某种变化，都将同样地影响全区各地；凡是对该区某一部分适用的，对其余各部分也同样适用，而且区内各部分的相似程度高于它们与区外各地区的相似程度。在某些小的范围内，一个城市区内部的某种均质地带或聚居区（例如，少数民族聚居区，或其它种族集中聚居住区、批发商业集中区、或富人集中居住区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视为均质区。一般来说，均质区有助于形成独特的产业专门化。结节区的划分是根据内部相互关系或共同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功能一体化。其结构同生物细胞或原子相似，有一个核和一个互补的外围区。结节区的各行各业以各种方式互相影响。横向联系的基本含义是相似单位中存在竞争，由在空间互相排斥表现出来，结果是形成各自的市场区或供应区。纵向联系意即在空间互相吸引，以节约运输成本。若从根本说，买主被卖主吸引，这种纵向联系被称为前瞻联系，反之则称为回顾联系。互补关系所引起的互相吸引，既有发生于互补产品的供应厂商中的，又有发生于连带供应的产品用户中的，这种互补关系是聚集外部经济的基本原因，由此也可以形成产业的专门化。作为有用的区域分类，均质区和结节区都是有意义的。但它们在社会的空间阻碍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这对于贸易流向来说特别明显，均质区存在的一般基础是某种共同可出口产品：对于这种产品，全区是某种意义上供大于求的地区，因此其各组成部分之间几乎没有理由要进行广泛的贸易。相比之下，结节区内部进行的商品和服务交换就是该区存在的理由了。在这里典型的结构是有一个主要核心，也许还有若干附属中心，其余就是农村地区。该有机体的这二、三个专门化地区互通有无，并通过内部的运送媒介联为一体。

区域不平衡增长理论（The Regional Unbalanced Growth Theory） 这是与新古典区域增长理论相对立的一个学派。其基本思想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区域增长是一个非均衡过程，或者说区域间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差距通常会扩大，而不是趋于缩小。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赫希曼、卡尔多等。早在 1957 年，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他认为，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发达地区经济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不发达地区经济则表现为一种下降的正反馈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扩散和回流两种不同的效应。扩散效应是指发达区域到不发达区域的投资活动，包括供

给不发达区域发展的生产要素或者购买其原材料和产品。这种效应有利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回流效应则是从不发达区域流入发达区域的劳动和资本构成，它将引起不发达区域经济增长的衰退，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在循环累积因果过程中，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因此，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是倾向增加而不是减小区域间的差异。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独立地提出与缪尔达尔回流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和涓流效应。他认为，在一个私人企业经济中，先进地区的极化效应总是属于主导地位或者说是大于其涓流效应，从而不能带动附近的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二种力量随时间而变化的看法上，缪尔达尔认为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而赫希曼则认为这种现象只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地理上的涓流效应将会超过极化效应，从而减少地区差异。美国经济学家J·G·威廉逊通过对24国实际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人均收入增长与地区差异间的"倒V"字型相关规律，从而证实了赫希曼的论点。在上述思想先驱的基础上，区域不平衡增长理论在近年来从研究手段和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文献。

区域专业化系数（Region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Ratio）　区域经济学中的一种分析方法。它主要用来衡量一个区域的经济结构和某些度量问题。例如全国的经济结构，或者某一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结构变化程度。其计算方法现在用一个实例来加以说明（见表）。

前两列数字分别是美国和新英格兰按工业大类排列的1970年制造业增加值的百分比构成，后两列等于全国的百分比与新英格兰的百分比之差。若新英格兰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完全相同，则这些差都会等于零。总之，差之和等于零，因为正数与负数恰好相抵。但若只加总正差（或加总负差，和相同），我们就可以得到衡量在工业结构上新英格兰和全国的不同程度的一个系数。这就是专业化系数。系数为零说明根本没有专业化，亦即是该区工业结构完全等同于全国工业结构或其他某个标准结构；该系数最大值可以接近100%，此时所对应的情况，就是该区完全专业化发展某个产业部门，而该部门在其他任一区域都是不存在的。该系数也有很广泛的应用范围。例如，我们可以用它来确定有哪些地区最接近于具有全国人口年龄结构或种族构成方面的代表性，或某区就业结构与全国就业结构的差异程度是否在衰退时期大于繁荣时期；或两区的相互相似程度是否高于其中任何一区与某个第三区的相似程度。

专业化系数*计算举例：新英格兰与美国工业部门别制成品价值增殖比较，1970年

工业部门	在所有工业部门制成品增加值总值中所占%		新英格兰所占%与美国所占%之差	
	美国	新英格兰	新英格兰＞美国	新英格兰＜美国
食品与相关产品	10.7	5.7		-5.0
烟草制品	0.8	0.0		-0.8
纺织品	3.1	3.0	0.8	
服装与其它纺织品	3.9	3.1		-0.8
木材与木制品	2.0	1.2		-0 8
家具与室内装置	1.6	1.1		-0.5
纸张与相关产品	3.9	5.7	1.8	
印刷与出版	5.8	5.6		-0.2
化学制品与相关产品	9 4	4.9		-4.5
石油与煤制品	1.8	0.3		-1.5
橡胶与塑料制品 n.e.c.**	2.9	4 2	1.3	
皮革与皮革制品	0.9	3.6	2.7	
石料、粘土与玻璃制品	3.3	2.3		-1.0
初级金属工业	7 2	4.4		-2.8
金属加工产品	6.9	7.2	0.3	
机构，不包括电气机械	10.6	13.0	2.4	
电气设备与原材料	9.3	12.6	3.3	
运输设备	9.7	9.2		-0.5
仪器仪表与相关产品	2.7	5 7	3.0	
其它制造业	1.8	4.5	2.7	
军械及附件	1.7	1.8	0.1	
总　计	100.0	100.0	18.4	-18 4

*　新英格兰的专业化系数＝18.4%。

**　n.e.c.：它处未列者。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局，《制造业年度调查，1970－1971年》（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3年），第1章，表2，第11页；第9章，表1，第160—162页。前两列之舍去数后所得百分率已经调整，使之相加正等于100.0%。

区域发展阶段理论(Development Stage Theorg of Region)　这种理论侧重于研究区域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因此它主要是一种部门理论。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E·M胡佛和J·费雪。他们在《区域经济增长研究》（1949年发表）一文中集中阐述了其论点。这种理论强调先进技术的运用对区域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认为任何区域发展都存在着一种"标准阶段次序"，它包括5个发展阶段；1、自给自足经济阶段：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其特征是，区域投资和区际贸易甚少，区域产业几乎全为农业，区域人口绝大部分为农业人口，经济活动分布与农业资源的分布相吻合。2、乡村工业的崛起阶段：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乡村工业及其相关产业开始发展，但乡村工业的原料，市场和劳动

力仍来源于农业区域，其分布也与农业人口的分布相对应。3、农业生活结构转换阶段，随着区际贸易的扩大，区域农业生产开始由粗放型农业转变为集约型专业化的园艺。乳酪和果蔬等产品的生产。4、工业化阶段：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必然出现报酬递减。从而迫使区域的资源向工业转移．经济发展也就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前期的工业化阶段以利用区域的农林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加工业为主，后期的工业化阶段以结合区域自然资源特点，密集使用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炼钢，金属加工制造和化学制造为主。5、服务业输出阶段：也就是成熟阶段。在这个时期是以服务业，如资本，技术以及专业性服务等的输出为主，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胡佛和费雪的研究基本上是对区域发展历史过程的描述和归纳，并无详细的统计资料作验证，因而后来也有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批评。

区域科学协会（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一个国际性的协会。致力于促进地区分析以及有关的空间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其宗旨是促进思想交流，促进那些以地区为对象，并利用专用于区域分析的各种工具、方法和理论体系以及各门社会科学和其它科学的概念，程序和模型的研究工作。为此，该协会促进会员之间以及会员和有关方面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研究，促进研究工作的开展，鼓励出版学术性的研究报告，以及提供各种服务来帮助会员和区域科学不断取得进步。其总部设在美国费城。

区域委员会 根据美国1965年的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法所确定的经济发展区域，每个经济发展区域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州的部分毗连地区组成。各区域都设有一个区域委员会，由有关州每州出一名代表再加上有否决权的一名联邦政府代表组成。其原型是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它根据1965年另一项法案设立，但目的和权限与其他区域委员会相似。设立区域委员会，主要是为了保障州际合作和确保在比经济开发地区大得多的经济发展区域落实发展计划与措施有一个更广阔的前景。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法案要求区域委员会制定协调方案，通过联邦和各州的现行的和建议的计划，解决各自区域内的经济问题。一般来说，它们为得到联邦的援助，互不相让，虽然各委员会由于有两主席之一的联邦代表的干预，全国总体利益可望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各区域委员会都有兴建和协调经济发展地区的咨询功能。其中确定经济发展区域的依据是：

1、高失业；

2、低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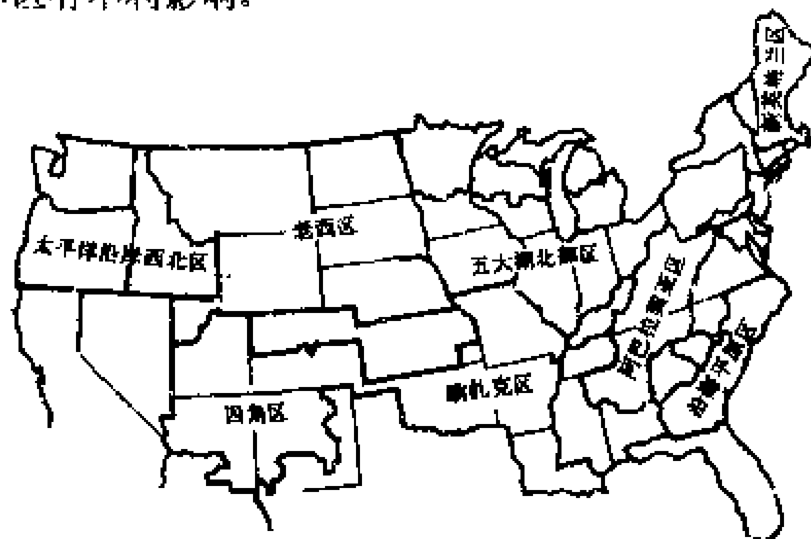
3、住房、卫生和教育设施水平低；

4、区域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仅有一两个处于长期衰落状态的工业部门；

5、劳工，资本或二者大量外流；

6、总产出额增长率低；

7、工业技术变化或国防设施或军工生产变化对本区有不利影响。



美国的经济发展区域，1973年

资料来源：《总统人力报告》（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68年），图23，第139页。图表系美国劳工部根据美国商务部资料准备；著者作了修订，以表明阿巴拉契亚区后来向密西西比的延伸以及欧扎克区的扩大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区与老西区的建立。《联邦注册簿》（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2年6月1日，第10979页；1972年9月1日，第17861页；和1972年9月7日，第18105页。

到1972年底，已经建成了如图所示的经济发展区域，包括阿巴拉契亚在内，它们包括了39个州的部分或全部地区，其中还有波士顿、匹兹堡，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堪萨斯城，西雅图和波特兰等城市。这些区域中，多数都曾一度显示出相对缓慢的增长状况，而且还有未工业化，甚至是落后的地区。

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 区域经济学是关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和经济增长水平空间差距问题研究的经济理论分支。其研究对象可以用“那里有什么，为什么，又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来概括。第一个“什么”指的是各类经济活动，不仅包括狭义的生产企业如工厂、农场和矿山等，还包括其它各类商行，居民户和公共及私立机关的经济活动。第一个“哪里”指的是就各类经济活动而论的区位。它涉及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中的邻近、集中、分散和异同等问题，它可以取大的分析单位如区域或地区进行研究，也可以按微观地理学的尺度，以分区、街道和场所为分析单位进行研究。“为什么和该怎么为”指的是经济学家们的种种解释。如何解释就视其认识和方法而论，因人而异，并颇具弹性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

础主要是一般经济理论的假设与结论，同时又综合了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内容和方法。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它是建立在三个理论基石上的。第一个就是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也就是地区自然资源优势。它是用气候、矿产、土壤和地形等自然条件的不均匀分布，来解释各类经济活动的选址原因。第二个基石就是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用特定产业的规模经济性质来分析空间集中经济的决定因素。第三个基石就是产品和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也就是说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是需要付出代价和费用的，这就对自然资源天赋优势或空间集中经济得以实现的程度形成一定的约束或限制。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区域经济学更多关注的是特定经济活动的区位及其相互作用。研究的是空间和距离对处于某一特定地点经济活动的影响，即研究的是厂址选择的区位决定因素（参见选址论和区位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分析个别生产要素供求之间的均衡关系，分析个别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及其对工业区位趋势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工业区位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就是假定厂商以最低限度成本或最大利润作为确定工厂区位的目标。并且总是把"获得原料的成本"（从原料产地到生产地点的运输成本），"加工原料的成本"（生产地点的劳动成本和其它各种生产成本），"分配产品的成本"（把制成品从生产地点运输到销售市场的成本）这三项内容作为决定工业区位的基本条件。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高低与否并不影响这三个基本条件在决定工业区位过程中的作用。在20世纪前半期，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主要代表人物是韦伯、俄林和廖施等，近年来随着微观经济学自身的完善，其革命性成果如多种成本因素。信息费用和不确定性也被引入了对工业区位的研究。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这部分内容现在已经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二战以来，随着凯恩斯革命对经济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和各国普遍对经济干预和经济计划的重视，许多国家也先后设立了区域开发基金或区域开发银行，展开了一系列的区域开发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学也开始由单纯的微观分析发展到宏观分析，注重从国民经济的总量角度，研究特定区域内的资本形成，劳动就业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区域之间投资，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工业区位形成的影响。同时在批判传统区域经济学单纯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忽视区域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结构分析为主，主张经济综合体布局原则的区域学派。这些内容也就逐步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学的宏观理论部分。区域经济学在二战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随着国际性二元经济格局的日益明显，如何使落后国家和地区迅速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也就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区域发展理论的各种流派也不断出现，并成为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它不仅研究欠发达国家的区域发展问题，而且对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发展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

区域重新开发规划（Area Redevelopment Program）　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萧条地区的工业和就业而制定的一项计划。1961年的"区域重新开发法"使这项计划成了法律。此项法令要求联邦政府向私人企业和公共社团提供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以吸引新的工业项目到萧条地区去投资。它还包括重新训练这些地区的失业人员，并且在他们为新的工作进行训练期间给予津贴等条款。

区域乘数（Regional Multiplier）　区域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的一个分析手段。根据增长极理论，经济体系是一个由相对主动系统和相对被动系统而组成的统一体，它包括产业体系和区域体系二个方面。在这一个统一体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通过投入产出链引起相关环节的变动。因此，在一个区域内无论是引进一个推动型产业，还是引进一个城市中心，都必然会影响产业体系和区域体系的结构性增长，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成倍增长，即出现区域乘数的作用。一般说来，区域市场的规模是很小的，而增长极是大规模的经济单位。因此，如果我们将区域市场和那些通常被称为增长极的产业活动和生产规模相比较来考虑，那么就很容易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引进的新极将是区域经济出口基础或区域专业化部门的一个要素。这样，增长极的区位商应该是大于1的。在这种情况下，区位商可以用来对区域乘数，即就业和生产的乘数进行数量估计：

令 x_{ij} 表示区域j极i的就业，这种就业直接从事区域专业化生产；v_{ij} 是区域j部门i（极归属的部门）的总就业量，那么，可以得到：

$$X_{ij}=(1-1/Q_{ij})V_{ij} \qquad (1)$$

其中：Q_{ij} 为区位商：

$$Q_{ij}=(V_{ij}/\sum_i \cdot V_{ij})/(\sum_j V_{ij}/\sum_i\sum_j V_{ij} \qquad (2)$$

把（2）代入（1）式，则：

$$x_{ij}=\left[1-(1)\frac{V_{ij}/\sum_i V_{ij}}{\sum_j V_{ij}/\sum_i\sum_j V_{ij}}\right] V_{ij} \qquad (3)$$

变换(3)得式：

$$x_{ij}=[(V_{ij}/\sum_i V_{ij}) - (\sum_i V_{ij}/\sum_i\sum_j V_{ij})]\sum_i V_{ij} \qquad (4)$$

加上所有 x_{ij}，包括新注人和先前存在的，便得到区域基础就业或区域专业化部门就业，令 E_b 为区

域基础就业，则：

$$E_b=\sum_i X_{ij}=\sum_i[(V_{ij}/\sum_i V_{ij})-(\sum_j V_{ij}/\sum_i\sum_j V_{ij})] \times\sum_j V_{ij} \quad (5)$$

区域乘数在统计上被定义为总区域就业与区域基础就业之比：

区域乘数

$$=E_T/E_b=\frac{1}{\sum_j[(V_{ij}/\sum_i V_{ij})-(\sum_j V_{ij}/\sum_i\sum_j V_{ij})]} \quad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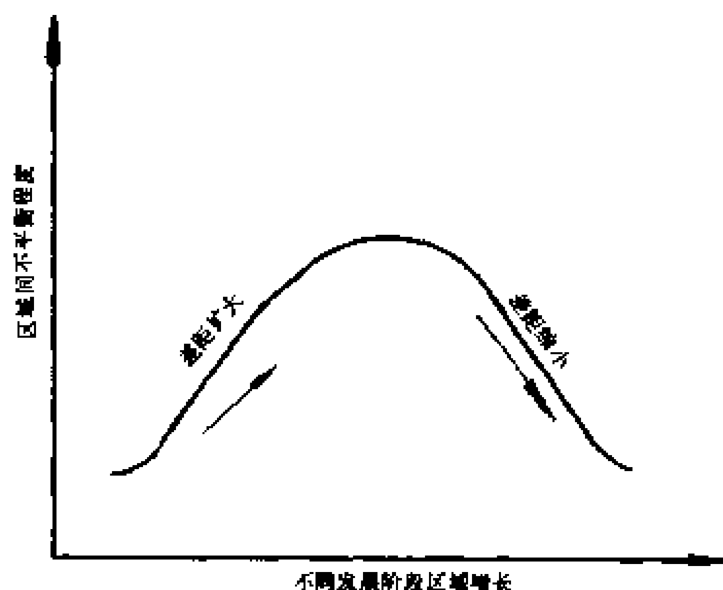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区域乘数等于区域专门化系数的倒数。假如以国民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作为标准模型，那么，一个区域的经济结构与标准模型愈相似，说明多样化程度愈高，因此，引入一个新极的区域乘数作用愈大；反之，如果一个区域的经济结构与标准模型差异愈大，说明其经济结构单一化程度愈高，引入一个新极的区域乘数愈小。

区域假说（The Regional Hypothesis） 区位理论中用结构分析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工业区位问题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假定发展中国家工业区位的形成是某种特定地区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结果。“区域假定”是指一个区域工业增长的动力主要只同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有关，而与各个区域组成的区域体系的整个工业发展没有什么关系。其它各个区域主要被看成是发展中的区域所需要的资本与劳动力的被动的供给者。区域假定主要有两种研究流派：1.大宗商品出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区位的形成，开始于该区域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自然条件特别适应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口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地区，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发展起来，地区工业和地区市场也就随之发展起来；2.外部经济理论。认为各个不同地区在经济结构方面的特点使得它们彼此不可分开，因此，外部经济是某个特定区域发展的重要条件。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某一工业区在发展过程中不致于感到资本和劳动力的不足，因为这一地区的较高利润率和工资率吸引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区位的形成，是一种强调以一个区域为主，其它区域为辅的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分析方法。而大宗商品出口理论则强调一个地区的商品出口对工业区位形成的作用。其共同点就是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区位形成看成是由地区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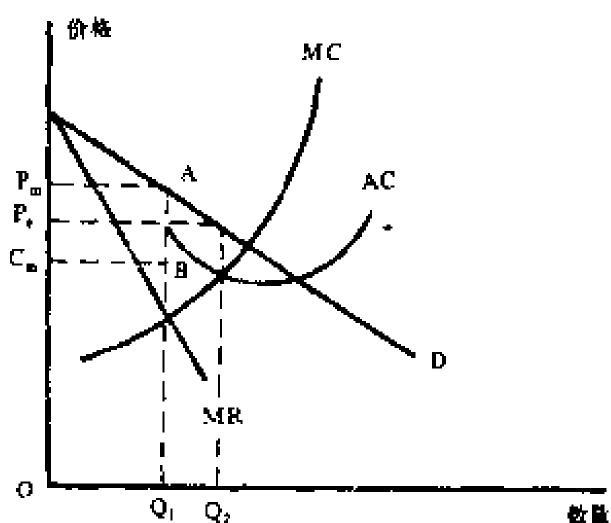
区域集中系数（Regional Agglomeration Coefficient） 区域经济学中的一种分析方法。它是关于衡量一种变量的区位分布（例如人口、收入或某一特定产业中就业等的分布）与另一种变量的区位分布之间一致程度的大小。例如要是美国按县的人口分布与按县的土地面积分布完全一致，我们就应该说人口在县一级是均匀分布的；但若橡胶工业的区位结构完全不同于人口或者总就业的区位结构，我们就可以说橡胶工业的空间分布是集中的。

集中系数的计算方法同专业化系数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我们要排列出两列表示区位结构的数据（也就是说，每一列数字都是一种按地区的百分比分布）。取所有正差或负差，再相加即可得到集中系数（参见“区域专业化”系数）。

区域增长的“倒U形”理伦 区域不平衡增长理论中的一个学派。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J·G威廉逊在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思想的基础上，对世界上不同类型的24个国家的横断面和时间序列的历史资料，对区域增长的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人均收人增长和地区发展差异呈“倒u形”变化的规律。他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随着总体经济增长，区域差异逐渐扩大，然后区域差异保持稳定，但当经济进入成熟增长阶段以后，区域差异将随着总体经济增长而逐步缩小（见图）。威廉逊进一步指出这种“倒V型”的变动是由四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在经济发展初步阶段，由于运输落后，劳动迁移成本是很高的。因此，不发达区域的劳动迁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迁移的往往只是具有一些技能、企业家精神及较高教育程度的青年劳动力。但随着经济发展，运输技术的提高，迁移费用开始下降，从而使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逐步消失，隐蔽性失业的劳动力有能力迁出。与此同时，发达区域劳动力市场也逐渐饱和，熟练劳动力也开始回流到不发达区域；其次，在发展的初期，由于发达区域的外部聚集效益，不发达区域资本市场的不完善，高风险和企业家精神的缺乏等因素，资本由不发达区域流向发达区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开始形成，从而导致发达区域投资利益逐渐降低，甚至消失，故资金将回流到不发达区域；第3，在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在于追求全国经济的最大限度的增长，故国家投资将集中在发展条件优越的发达区域，贸易、关税政策也将偏重于发达区域的产业。但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目标转向福利目标，投资也转向不发达区域，政策制定也将偏向在不发达地区的产业；第4，经济发展起初，由于各个区域之间的关联效应较弱，使得发达区域在技术进步，社会制度变迁，收入乘数等方面的波及效果的传播很困难，从而也无法带动不发达区域的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区域连锁效应提高，发达地区的各种波及效果也就有足够的力量去带动不发达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长期利润最大化假说（Theory of Long–sight Profit Maximization）　是指企业即便牺牲一定程度上的短期最大利润，也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现实的企业如果制定的价格产生高比率的利润，便唤起新企业的进入。所以在某个市场上原来的企业为了防止因定价过高诱入大量的新企业，便制定特殊的目标价格即阻止进入价格。如图所示，opm 为这一市场上企业根据利润极大化目标，按照边际费用（MC）等于边际收入（MR）的原则制定的价格，这时候企业短期利润最大化，为 P_mABC_m。由于这一市场上原来的企业获得高的超额利润，因此要发生新企业的进入。原来的企业为了阻止新企业进入，就将价



格从 opm 降低到某个水平。倘若这一原来的企业知道自己市场上的进入壁垒的高度，将会把价格降低到进入壁垒的水平为止。这时价格水平为 ope。若没有发生新企业进入，原来的企业即可获得长期的超额利润 P_eABC_m，尽管它比短期最大化利润 P_mABC_m 要低，但由于能阻止新企业进入，因此能稳定地确保一定程度的长期超额利润。制定阻止进入价格，归根到底要使长期利润最大化。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在众多的寡头垄断产业中，原来的企业采用阻止进入价格谋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现代企业制定价格行为最有说服力的假说是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

必要资本量（Minimum Capital Amount）　指企业进入某产业时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本量。由于不同产业的生产、技术、销售等基本特点不尽相同，因此进入不同产业的必要资本量差异很大。必要资本量是形成产业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之一。

必需品（Necessaries）　必需品是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必需品是指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必需品不仅包括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存所绝对必需的物品，还包括对于社会低收入层的人用于维持其习惯、风俗所必需的物品。因此，它既包括纯物质的因素，也包括社会的因素。亚当・斯密最初使用必需品概念以区别于奢侈品。奢侈品是指那些对于确保工人象样的生活水平来说并非是必需的物品。必需品的价格对于决定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很重要的，因为维持工人生计的消费品中大部分是必需品。必需品价格的变化将使工人的实际工资发生变化。要使实际工资不受必需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必须使工人货币工资发生变化。这将影响其他工业品价格的变化，因为工人的工资打入这些产品的成本。必需品与奢侈品的区分对于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是重要的。对于必需品征销售税将提高必需品的价格。这将对所有商品市场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必需品价格提高而引起的工人工资的提高会使得所有由工人生产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化。而对于奢侈品征销售税则不会影响所有其他物品的价格。此外，区分必需品与奢侈品有助于理解收入弹性。必需品收入弹性较低，而奢侈品的收入弹性较高。

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　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又称 1959 年劳资报告和揭发法案。1957 年和 1958 年，美国参议院的麦克莱伦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劳工和经理组织的腐化行为，召集了关于工会干部诈骗和滥用职权行为的一系列耸人听闻的听证会。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少数劳工组织中，掠夺已达到一种需要整个国家予以重视的程度。与此同时，这项调查也揭露了资方以及少数劳动关系顾问本人不正当的行为。正是在这些调查结论的基础上，产生了 1959 年的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该法案在"调查结论与政策"部分指出：（1）联邦政府的责任仍然是保护雇员的组织权，而要达到商业自由畅通的目标，需要劳工组织，雇主以及他们的领导人有高度的道德行为标准；（2）参议院的调查发现已经发生过多次失信，贿赂和其他丧失道德准则的事件，这就要求立法来保护雇员和一般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因为他们同劳工组织，雇主，劳动关系顾问以及他们的高级职员和代表的行为有关；（3）因此国会声明，制定

兰德勒姆——格里芬法，以消除或防止有关集团的不正当行为，是必需的。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是过去曾通过的这类法律中最完备的，劳工组织及其领导人，雇主及其高级职员以及劳动关系顾问，都由这项法律的不同条款予以约束。此外，一般公众的权益，以及雇员和雇主的权益，在通过这项法律时，都受到国会的关注。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的几个条款或者缓和或者撤销了瓦格纳法案中经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修正过的条款。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规定，因经济理由而正在罢工的工人，在罢工期间不得在任何代表选举中投票，但他们在复工后可以享有投票权；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作了变更，规定因经济原因罢工的工人在罢工开始后12个月内举行的代表选举中可以投票。该法案强化了瓦格纳法案中禁止间接抵制的规定，但对服装业、建筑业有部分的豁免。瓦格纳法案关于禁止不开放企业的条款，在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中有所缓和，规定在建筑业中，可以要求雇员在他被雇后7天内参加工会。以上是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对塔夫脱——哈特利法案的主要修正。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对工会内部管理，雇员和工会会员的权利，雇主和劳动关系顾问的责任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同时还对工会、雇主和劳动关系顾问的劳动行为进行了一系列限制。由此可见，这项法案远远不只是劳动关系中"竞技规则"的立法，它已深深介入集体谈判各方的内部事务。美国一些研究者认为，瓦格纳法案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分别代表了劳方和资方立法活动的顶峰，而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则更多地代表了由于参议院调查中各种发现而由一般公众作出的行动。它表明一般公众的一种判断，他们认为，集体谈判不加限制的话，并不是经常对整个经济有利的；并且认为，谈判双方都有少数人并不能相信他们会按照高度道德规范行事。由于这项法案所持的立场，有组织的劳工和雇主双方都表示强烈反对。

兰格—勒纳机制（Lange-Lernen Mechanism） 是适用于以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调整机制。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首次提出的。兰格—勒纳机制的第一部分是在1936年兰格在《经济研究评论》中提出的，A·P·勒纳在同一杂志中对兰格的研究进行深刻的评论。其机制的第二部分是兰格给勒纳的答复中完成的。这一词有时表述不是那么严密，但却反映了兰格与勒纳在市场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相似的观点。兰格-勒纳机制的假设条件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的部门被舍弃了；在消费和劳动就业方面是自由选择的；消费者的偏好——消费品的价格是生产和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假设前提下，消费品市场和劳务市场是纯真的市场，但资本货物以及除劳动力之外其他生产资源的价格是由中央计划部门控制的。这些价格用于经济计算之用。所以除了市场价格之外，还存在着计算价格。这两类价格被企业负责人用来作为决策之用。生产管理者负责单个企业或者整个行业的生产情况，例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等。但价格是固定的，企业不能自行定价。虽然利润最大化已不是直接的经营目标，为保证企业取得近似于市场经济的效率，管理者必须遵守两条原则。第一，选择生产要素时使得平均成本最小；第二，决定生产水平时使得边际成本等于生产价格。第一条导致生产成本最小；第二条导致管理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决定单个企业或整个行业的产出水平。这导致了通过试错的方法来调整生产以达到经济的均衡。中央计划部门象一个导演，它选定一个价格水平，而后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再变动原来选定的价格。这种调节主要通过存货的变动。如果在一个价格水平下，某产品太多，库存就增加，那么就应该降低价格。这种调节方法可能使用很多次，直到达到均衡。在兰格——勒纳机制中，中央计划部门实际上是充当了市场的角色。

市场出清假说（Market Clear Hypothesis） 一种关于价格与工资的调节可以使物品市场与劳动市场实现供求平衡的理论。根据这一假说，在物品市场上，价格随供求关系的变动而迅速变动，即供大于求时，价格迅速下降，供小于求时，价格迅速上升，通过价格迅速的调节，物品市场可以经常处于供求平衡的出清状态。同样，劳动市场上，工资随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而迅速变动，即供大于求时，工资迅速下降，供小于求时，价格迅速上升，通过工资迅速的调节，劳动市场可以经常处于供求平衡的出清状态。当物品市场与劳动市场都出清时，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市场出清假说的基本前提是价格与工资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凯恩斯主义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这一假说证明了市场调节的完善性，以及充分就业的必然性。市场出清假说实际上就是萨伊定理的表述形式。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否认了市场出清假说，论证了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调节，经济中必然存在失业与生产过剩的危机，并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70年代初出现于经济学界的理性预期学派又重新接受了市场出清假说，并把它与理性预期假说作为基本前提来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证明市场机制的完善性。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市场（Market） 商品流通的具体领域。是指

实行分工的国民经济的实现条件和购置条件（包括技术和信息）的总体。市场是由于社会分工的结果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同商品生产的其他经济范畴一样，市场的性质取决于通常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商品市场可分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是国民经济范围内部的商品流通领域；国际市场是通过对外贸易而互相联系起来的各个国家市场之间的商品流通领域。国际市场按照古典经济学是由于比较利益机制的存在而产生的，也是由于"剩余产品出路"的作用而产生的。国内市场又分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市场。这五大市场是互相作用，缺一不可的。这样，市场的概念已经扩大了，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市场、而且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市场是商品劳动得以实现的最终场所。因此市场运转状况对一国经济是十分重要的。市场不仅对宏观经济有巨大作用，对微观经济即企业也是至关重要的。西方经济理论对市场研究包括以下四类市场：(1) 完全竞争的市场。每一经济单位的交易量同全社会的同类交易量相比是很小的，众多交易当事人中谁也不能对供求关系发生显著影响。市场价格在竞争中形成，视为不被任何人控制的参数。(2) 制造商部分操纵的市场。少数实力较强的制造商，在交易中占有较大数额，他们的决策对某些产品的影响较大。(3) 制造商完全操纵的市场。少数实力雄厚的制造商在市场交易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位，他们直接左右着某些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市场价格被他们控制，因此被视为受人控制的参数。(4) 完全垄断市场。即国家和个别大垄断组织完全控制市场，排斥任何竞争，价格由垄断者决定。

市场经济（Market-directed Economy）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是由市场调节的，政府干预的因素较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都由供求力量以及由此决定的价格机制调节。价格调节资源的配置和产品产量的决定以及要素的收入分配。在市场经济中，若某种商品产量生产过多，造成供给大于需求，那么超额供给将造成该商品价格下降。价格下降后致使厂商降低产品产量，使供求恢复平衡。而某一种商品若供不应求，超额需求将致使该商品价格上升。上升的产品价格将在降低需求的同时增加厂商的供给，使供求恢复平衡。价格机制还调节要素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是根据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取得报酬的，要素的报酬率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若要素的供给大于要素的需求，将压低要素的报酬率，这将引起要素需求量的扩大，要素需求量的扩大使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量增多，这将降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直至降低的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压低的要素报酬率为止。这时，要素供求重新达到平衡。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都是价格机制在发挥作用。

市场研究与商业经济学（Marketing Research and Business Economics）　市场研究是有系统地收集、记录、计算和分析某些时期内有关商品和劳务的销售和分配的数据；商业经济学则是关于商品和劳务销售的学问。市场研究包括的种类很多，如可能的市场规模、可能达到的销售量、最可能购买某些商品的消费者的选择，某公司或某企业可能拥有的市场份额，以及最有可能刺激消费者购买的广告手段等。商业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于销售实践，它是对销售产品中各种规律和各种关系的研究。规律包括的内容很多，例如产品生命周期规律、消费者消费商品时的心理规律等；关系的研究包括销售量与产品价格的关系，销售量与销售服务的关系、广告与销售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讲，销售活动进而商业经济学的主体是各个经济实体。政府一般不销售商品和劳务，而是提供各个经济实体所不能有效满足的劳务。商业经济学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同时使销售活动更为有利可图。市场研究和商业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帮助管理部门解决其日益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的工具。市场研究可由企业公司、企业公司的顾问或无偏见的机构进行。美国几乎每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和大公司都设有销售调查部门或指定专人负责销售调查。市场研究的结果将成为公司制定生产计划的主要依据。

市场成果（Market Performance）　市场成果就是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由企业市场行为形成的经济效果，反映市场运行的效率。产业组织理论一般从下述几方面直接、间接地说明市场成果的基本情况：

1.产业的企业规模结构是否合理。这就是要了解，在现实的产业的企业规模结构下所达到的生产与流通费用水平，同产业的企业规模结构处于效率最高时即企业处于最佳规模时的水平，有多大差距。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在某产业中规模经济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

2.产业的利润率是否合理。高利润率意味着存在超额利润，有四种超额利润：由不可预期的需求和费用变化形成的预想外的高利润；在危险性大的领域进行冒险投资获得的风险利润；开发和引入新技术成功获得的革新利润；垄断利润。除非产业处于发展阶段初期，从全产业和较长时间看，仅凭前三种利润不可能形成长期的高利润率。某个产业的产业利润率长期居高不下，一般与该产业存在垄断有关。

3.产业生产能力的扩大是否与市场需求的增长相适应。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存在垄断，可能出现两种不良后果：一是由于处在寡头垄断地位的企业筑起较高的进入壁垒，影响资源向供不应求产业的流入，造成资源在这些产业的过少分布。二是在寡头垄断企业的投资超过了市场规模的需要时，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协调行为，阻碍资源从该产业的流出，使之生存于低开工率的情况之下。

4.产业的技术进步是否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进行。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界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富于竞争的市场结构有利于技术进步，因为竞争才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另一种认为，只有大企业才能有资金、人力进行有效的研究与开发，存在着技术开发上的规模经济，且只有大企业才能经得起新技术开发的风险，因此，应该容忍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完全支持或反对其中的一种观点。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得出三条基本结论：(1) 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若没有市场竞争，企业就会丧失技术进步的原动力；(2) 大小企业在发明、革新方面的作用大小，与产业类别，技术进步阶段等都有密切联系，很难一概而论；(3) 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作用往往是互相补充和联系的。

5.是否存在过度的销售费用。销售活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从而具有促进销售，扩大生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过度的销售活动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销售活动的有效性应当是市场成果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考察主要通过销售费用规模（绝对和相对规模）分析进行。考察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分别对应三类基本的销售活动和相应的费用：一是广告宣传费，主要包括广告宣传费总额、广告费相对规模（即广告费密度，通常用广告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表示），及广告宣传费的按规模分级的企业分布特点；二是用于个人的销售活动费，包括推销人员的工资、奖金和活动费，以及有关的管理费，培训教育费等；三是销售流通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费，包括商品供应和服务维修系统，各种运输系统等。一般来说，广告费数据相对较易获得，其它两类费用较难估算。从市场成果分析的角度看，更大的困难是如何估计销售费使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这方面至今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评价方法。

6.产业能否及时向用户提供价格合理的各类产品。市场成果的产品成果方面的中心问题是：用户支付的费用与获得的产品满足是否相适应，或者生产费用与用户获得的满足及支付的相应费用能否均衡、产品成果的具体表现是多侧面的，主要有：在任何情况下产品的一般质量，性能和外观；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变化和改善的程度及类型；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变化和改善的次数；产品的多样性及配套性。对产品成果合理性的评价方法是满足和费用比较法，或者说是收益和费用比较法。当用户因产品变化，改善或为获得一定的产品满足愿意支付的费用高于生产者的生产销售费时，则这种产品及其变化、改善是合理的。

7.是否存在 x 非效率。垄断性大企业由于外部市场竞争压力小，内部的组织层次多等原因，使企业难以形成利润最大化和费用最小化的行为，导致企业利润费用化，企业内部效率状态不佳。产业内企业 x 非效率的实际状况，通常可以根据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单位产出的成本和成本结构的比较反映。

8.是否存在管理价格。管理价格是指企业有较强的控制力，不受或很少受市场需求变化影响的价格。考察是否存在管理价格，有两个主要指标：一是价格变化频度，即一定时期内价格上升和下降的次数；二是价格变化幅度。在进行实际分析时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并注意分析价格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9.自然资源是否得到了合理利用。在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矿业、制材业，自然资源利用的合理性也是市场成果的重要方面。由于较难获得关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系统的数据和给出操作性定义，而且各产业差异很大，一般只能用费用效益分析法概略地分析评价不同资源利用方法的效果。例如斯密斯在 60 年代曾根据油田勘探、开采、生产费用与油田储量及生产能力的关系，石油的需求和需求价格弹性，按油田全部生产期间效益最大的准则，用费用效益模型，研究了合理的油田开采方案：包括油田合理生产周期，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各时期的油井数量，开采强度等。以此为标准，可以评价油田的自然资源利用情况。

市场行为（Market Conduct） 市场行为就是企业在市场上为了赢得极大利润和更高的市场占有率所采取的战略性行动。企业所采取的市场行为是由市场结构的状况和特征制约的，同时，市场行为又反作用于市场结构，影响市场结构的状况和特征。市场行为有卖方市场行为与买方市场行为之分。卖方市场行为主要有三种：1.价格行为。价格竞争和价格协调是最基本的价格行为。价格竞争包括旨在争取市场的降价竞争和旨在限制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阻止进入价格。价格协调主要指卡特尔和价格暗中配合。2.非价格行为。最基本的企业非价格行为，一是产品和技术开发；二是销售活动；三是多角化经营。产品和技术开发是指围绕扩大产品差别实行产品和技术政策；销售活动是指通过广告宣传活动、销售服务活动，流通系列化等扩大产品差别；多角化的基本特征是企业同时开发不同方向的产品、技术、服务以增加利润和减少

风险。3.组织调整行为。主要指企业合并和组建企业集团。较之卖方市场行为，买方市场行为的研究相对薄弱，到目前为止，产业经济学家们主要研究了买方寡占市场上买方行为的某些特点。买方寡占市场有二种，一是卖方分散买方寡占市场；二是双方寡占市场。在卖方分散买方寡占市场，寡占的买方常有下述行为：1.价格行为。主要内容是买方价格卡特尔和暗中价格协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压低卖方售价。2.非价格行为。开发替代卖方产品的新产品；提出更严格的性能、质量和服务标准，严格控制卖方的销售途径，使其无法形成独立的销售体系，建立与卖方产品同类的子公司等强化寡占买方的优势地位，达到压价和控制卖方的目的。在双方寡占市场，买方行为一般有三个特点：1.很少进行集体交易。即多数交易都是买卖双方独立进行的。2.市场结构、地位和供求状况是影响实际交易结果的两个主要因素。相对于小的买主，进行大宗购买的买主较易以较低的买价完成交易。需求不足时，大买主可以获得显著有利的收购价，而当供给不足时，大买主往往也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但与小买主相比，其支付价格的上升幅度一般要小些。3.实际的交易价格是复合的。

市场规模（Market Scale）　即市场容量，市场规模的大小可从两个方面说明：1.一定时期内，市场上所有买方对该市场的产品的需求量。2.在供大于求或供等于求情况下，市场上所有卖方在一定时期内的产品销售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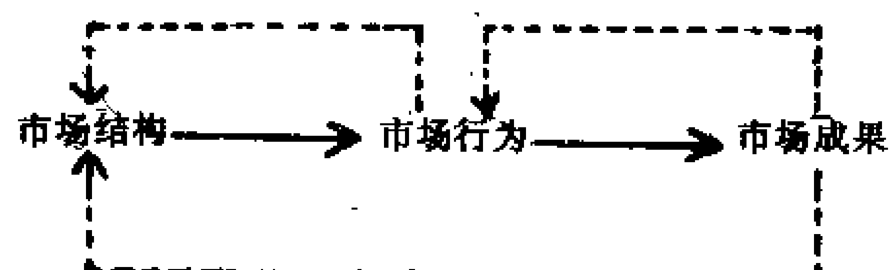
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　市场结构是指特定市场中卖方之间，买方之间以及卖方和买方之间等关系特征。主要包括：1.卖方之间的关系；2.买方之间的关系；3.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4.市场内已有的卖方和买方与正在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卖方、买方之间的关系。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内卖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内已有的卖方和正在或可能进入市场的卖方之间的关系即卖方市场结构，是市场结构的研究重点。典型的卖方市场结构主要有三种：1.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2.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3.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理论一般用集中度、产品差别、进入壁垒等基本概念说明产业的市场结构。其中，集中度是反映市场结构的最基本概念。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主要有4个：1.产业所处的成长阶段。对此，早期的产业经济学家间存在两种对立的说法：(1) 产业的成熟过程就是从垄断走向竞争的发展过程；(2) 产业当其年深日久，就收缩而成为紧密的、勾结性的寡头垄断。后来，产业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实际中，由于各种产业的成长过程不同，再加上其它因素的作用，产业市场结构随产业成长转化的关系相当复杂，需作具体分析。2.产业的技术条件和需求条件。技术、需求条件的不稳定和变化既会使产业内现有企业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又会使本来不想插足进来的新竞争者的进入市场具有实际的可能性。3.市场内外的信息交流通畅情况。在一个产业内部，或在一群企业内部，关于当前或未来的价格、销售、成本、利润等方面，大家都是内行，彼此信息灵通，而外界则相对地无知，这种情况越是显著，处在内部者就越发可能利用这种情况来发展和保持现状。4.政府的政策。有些政府政策包括对研究的支持、各种管制、有利于兼并的税法、国防订货合同、反托拉斯措施等，对市场结构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成果分析结构（The Structure_ Conduct_ Performance Framework）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成果分析结构（简称SCP分析结构）是西方产业经济学主流学派采用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一分析结构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梅森提出。市场结构是指由卖方集中度、产品差别化程度和进入障碍等因素决定的市场形态。市场行为是市场中的企业在价格、设备投资、研究开发、广告推销等方面的活动。市场成果是一个特定产业中市场行为所导致的经济效果。市场成果一般以产业的获利能力，资源配置效率、技术进步等标准衡量，同时也通过此产业对就业、物价稳定、公平分配等宏观经济指标所作的贡献来衡量。SCP分析结构旨在说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成果三者之间存在的联系，早期的产业经济学家如梅森和贝恩，曾假设三者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即一个特定产业的市场结构决定这一产业内企业的市场行为、市场中企业的行为最终决定市场成果。例如，通常认为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会引起合谋行为，并导致产业的高获利能力。但过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也会由于限制了竞争而使产业发展受到抑制。随后，产业经济学家又将企业纵向联合和大企业的多角化经营程度加入市场结构的要素，认为这些要素也在影响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市场成果。他们进一步指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成果分析结构是建立在成本、需求和技术等基本经济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简单的SCP分析结构可以表述为下表：
后来的产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并不是变量之间存在的唯一关系。这些变量之间也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单向因果关系一般只能说明短期内市场结构不变的情况。而在长期中，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成果都在变化。市场结构的变化主要决定于市场行为，有时市场成果也直接使市场结构发生变

简单的SCP分析结构

基本条件	市场行为
成本	经营目标
需求	经营战略
技术	竞争实践
↓	↓
市场结构	市场成果
市场集中	效率
产品差别	获利能力
进入障碍	技术进步
纵向联合	增长
大企业的经营多角化	
↓	

化。例如，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结构，产品差别，进入条件等，最终会引起市场结构变化。再如，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会导致一些企业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从而影响市场结构。因此，有的经济学家以下图表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成



果之间的多种因果关系。图中实线表示短期中的因果关系，虚线表示长期中的反馈效果。

市场势力（Market Power） 市场势力是指市场的一个或一群参与者（自然人、公司、全体合伙人或其他）影响市场上产品的价格，数量和性质的能力。企业运用市场势力，也如进行其他活动一样，其主要目的通常是增进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获利能力。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在短期内或在长期内，或既在短期内又在长期内，它所能够获得的利润，其水平和稳定程度，要比在竞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集中，排斥新竞争者的壁垒、纵向联合等是市场势力的典型表现形式。市场势力为企业所拥有，但在市场中加以运用。市场势力的来源，既可在它所运用的市场之内，又可在之外。因此，它不仅仅是存在于某一种产业内的买方或卖方的一种特点。事实上，许多企业是在有纵向联系的各级市场上进行活动，其中包括买入投入品，在一个或更多的工序上对投入品进行加工或结合，销售产品或劳务。市场势力可以在这些级次中的任何一个级次上取得和运用。市场势力可能是直接为了它所产生的报酬而主动追求和利用的，也可能多少带有偶然地作为技术革新的一种副作用而产生，还可能是现化工艺所要求的条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令它的起点是完全值得称道的，它发展到后来却会成为不可赞许的东西。不管它的起始点是什么，市场势力本身可能会带来限制产量、物价上涨、阻碍技术进步以及分配上的进一步不均等不良后果。

市场范围（Market Scope） 市场范围可以概述为一组产品的集合，集合内产品之间具有密切的替代关系，而与集合外产品没有密切的替代关系。市场范围的确定，是计算集中度等指标的基础。在测定市场范围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产业融合的进展。技术进步可能导致原本属于两个市场上的企业转为具有竞争关系，即它们所提供的产品由替代关系较弱变为密切。2.市场的地理性分布。商品有的在一个国家的所有地区销售，有的只在特定地区销售。同样，市场有的在全国规模上成立，有的只在特定地区成立。因此，确定市场范围时有必要考虑其地理性分布。3.对外贸易。在某个市场上，政府出于保护国内企业的立场，假设完全限制进口，可以把那个市场看作超脱了进口竞争压力的市场。但在关税等进口限制不力或完全不存在限制的场合，该市场上可能发生进口，这时，有必要以既包括国内生产者的销售量，又加上进口企业销售量的总销售量为基准，确定市场范围。当该市场有产品出口时，还需相应扣除出口量。

市场集中（Market Concentration） 市场集中指的是特定市场上卖方、买方各自的企业数以及企业在其市场上的相对规模（市场占有率）的分布。卖方的市场集中称为卖方集中，买方的市场集中称为买方集中。如果其它情况不变，市场上的企业数量越少，或企业之间市场占有率越不均等，则市场集中程度越高。产业组织理论认为，某个产业的市场集中程度特别是卖方集中程度过高，有可能导致竞争受到限制，从而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促进产业市场集中程度提高的主要因素有：1.规模经济。任何企业在竞争压力下，都希望把本企业规模扩展到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最小的水平，即追求规模经济。而市场规模是有限的，有限的市场规模与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动向相碰，势必引起生产集中。2.企业趋向垄断的意向。企业总是力图采取减少竞争对手，提高本企业在产业中的相对地位，限制产业内竞争的行为。3.企业的推销活动。企业为了扩大产品差别化而采取的推销政策，也会促进企业规模的巨型化。4.进入壁垒。如果产业内的少数企业对潜在的竞争对手，长期占有技术垄断、资源垄断以及买者对现有企业产品有很强的偏好等方面的战略优势，有利于阻止其它企业进入该产业。5.金融上的原因。因企业合并而能获得更高利润的金融机构，会推动企业的合并；拥有大量多余资金的企业，可能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去收买其他企业；

大企业利用比中小企业较易获得贷款的便利，加速规模扩张。阻止产业市场集中程度提高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市场的扩大。伴随经济增长的市场扩大，是抵消由于企业合并，大企业内部膨胀等而形成的集中趋势的一个因素。二是维护企业主权。让渡企业经营权，所有权一般是当事人不情愿的事，为此当事人会进行抵抗，这种抵抗也是阻止集中的因素。需要补充指出的是，政府的有关政策，对市场集中程度提高的作用，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市场汇率（Market Rate of exchange） “官方汇率”的对称。在不实行外汇管制或管制较松的国家都存在着自由的外汇市场。在该市场上由外汇供求关系决定的汇率即为市场汇率。市场汇率常和官方汇率并存，但此时官方汇率只起中心汇率的作用，实际交易中使用的是市场汇率。

市场价格（Market Price） 是每股股票在市场上交易时的实际价格，即通常所说的股票价格。其计算公式如下：

$$股票价格=\frac{股息}{利息率}$$

对于投资者来说，股票价格最具有现实意义。它受到公司财务、市场状况以及政治、经济和公众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上下波动。

幼稚工业（Infant Industry） 西方工业分类的名称。指一国中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新兴工业。其特点是：由于缺乏经验，缺乏训练有素的熟练劳动力以及市场不发达，当低于最适度规模，可能经不起外国的竞争；同时，又由于具备潜在的比较利益，未来可以在世界上参与平等竞争。选择建立这种新兴工业，应具有与进口商品课税前的到岸成本相竞争的潜在能力。至于能否在合理的时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与经济效益，通常是可以正确计算的。其方法是，对该部门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加以分析，并将其要素成本与其他国家的成本相比较。如所需成本，产品质量和其他国家相当，就可以说该部门的产品终将在产品成本上具有竞争能力。由于幼稚工业面临海外势力的强大竞争，自身又难以承受试制阶段，市场销售及资金，价格等方面的压力，因而一般需要由政府在贷款，税收，补贴等方面提供保护，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在发展中国家，选择和发展幼稚工业的目标是，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发展民族工业，为实现工业化打基础。幼稚工业的成长和成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生产本国需要的消费品，也有助于扩大幼稚工业的出口创汇，促进外贸增长和经济发展。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各种保护措施来发展幼稚工业。

纠察（Picketing） 指工会为使罢工奏效，防止罢工破坏者进入工厂工作，警戒某一区域，通常是靠近工厂入口或业务地点的区域。纠察人数视工厂规模和纠察目的而定。一般纠察带有标语和旗帜，宣传工会正在进行的罢工的理由。纠察是一种辅助性的工会活动，可以用来加强和壮大罢工，增强联合抵制行动。就其确保停产这点而论，对于一个强大的，纪律良好的工会，它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会员不会穿越纠察线，但如果工会软弱或缺乏纪律，纠察就非常重要。纠察常常导致暴力行为，尤其是在资方雇用罢工破坏者时。在美国，根据联邦法，只要纠察同某些非法的工会活动连在一起，如非法罢工，次级抵制等，纠察就是非法的，腐化工会对雇主的敲榨性纠察也是禁止的。只有当与纠察有关的目的和方式都合法时，纠察才被视为合法。

皮古的范围论 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已故英国经济学家皮古教授广泛论述了通过集体交涉决定短期工资的过程，提出决定短期货币工资的范围论。

皮古认为集体交涉决定工资率的情况不同于自由竞争，工资不再是决定于一个单一的均衡点，工会力争工资率定于均衡点之上，而雇主则要求工资率定在均衡点下方。在工资谈判中，工会和雇主都带着自己的交涉上下限。工会把全上限（图1中的A点）看作工资率，估计上限以外的工资率会使会员就业蒙受不利影响，雇主把全下限（图1中的D点）当成工资率，他估计在此限度以下不可能保持他在生产上必须的劳动数量。全上限和全下限之间的各种工资率就构成了皮古所谓的“未确定范围”，他认为劳资双方不可能在此范围之外达成工资协定。未确定范围的长度与雇主对劳动的需求弹性以及雇工方面对工作的需求弹性均成反方向变动。除以上交涉限度外，劳资双方在思想上有另一个限度。工会把下限作为最低工资率，只要工资率在此点（图1中的B点）以上，工会就宁愿接受而不愿因罢工遭受痛苦，皮古把这点称为工会的“顶住点”，同样，雇主也把某个最高工资率作为顶住点，只要工资率在此点（图1中的C点）以下，他就宁愿接受以免遭到罢工或停产带来的损失。工会和雇主的顶住点水平主要取决于各自对罢工，停产的代价与达成协议可能取得的好处的估量。只要工会的顶住点在雇主顶住点以下，如图1所示，那么B、C两点之间可能的工资范围就构成了实际交涉区。如果双方在交涉期间发现存在这样的实际交涉

区，不经罢工或停产便可达成工资协议。至于确定的工资率是接近于B点还是C点，大体上取决于双方相对的交涉技巧和交涉力量的大小。但即使存在实际交涉范围，如果一方试图威胁对方在此范围内接受某种工资率，也可能导致罢工或停产来对付这种威胁。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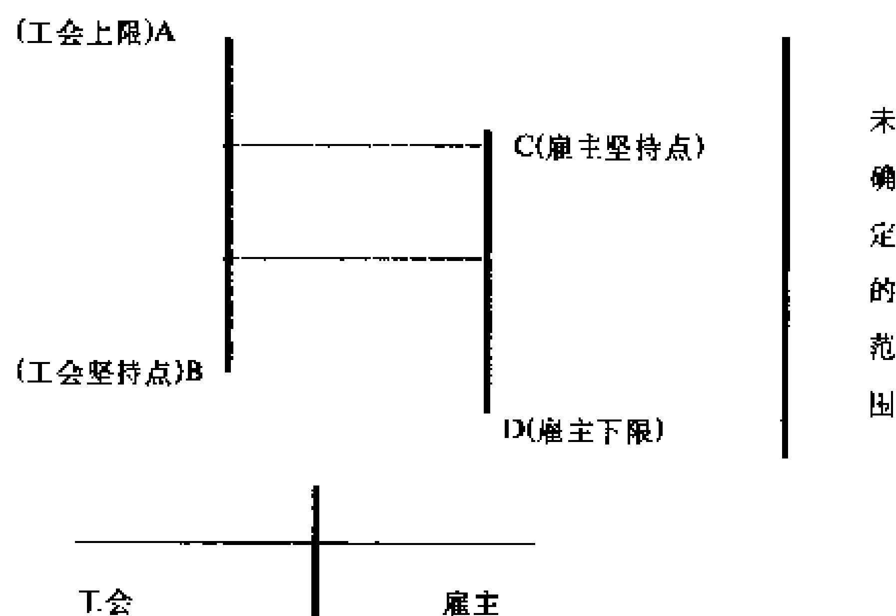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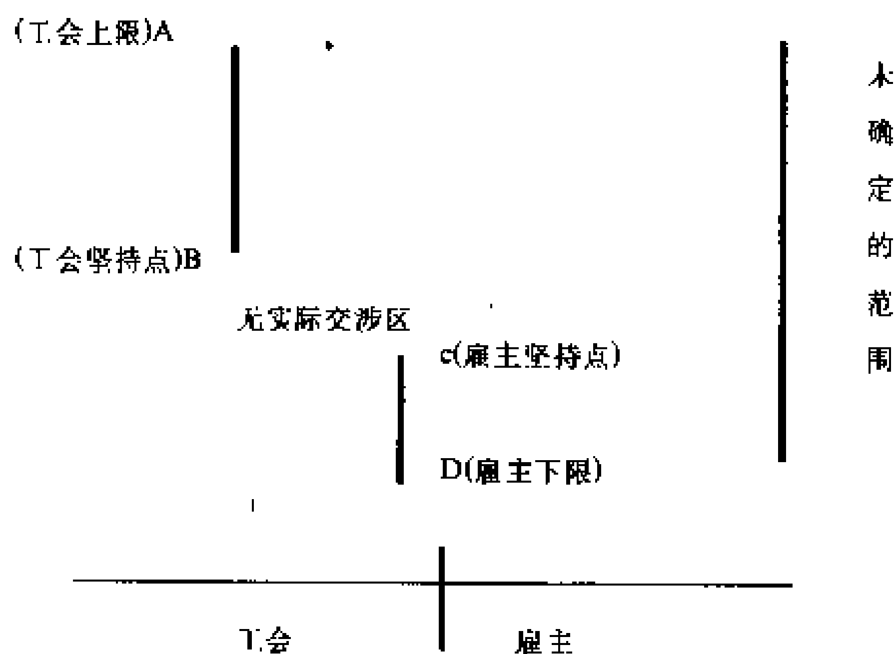


图2与上面讨论的情况相反，工会顶住点B位于雇主顶住点C之上，双方不存在实际交涉区。如果一方或双方坚持不改变原来的顶住点，将导致罢工或停厂。停工期间双方显示的交涉能力是最后决定工资的主要因素，如果工会队伍在罢工或停厂期间保持团结，最后达或的工资协议可能接近工会的顶住点；反之，如果工人在罢工中多数人放弃自已的要求愿意复工，雇主坚持自已的立场，最后工资协议会接近雇主的顶住点；在停工期间双方出现平局，结果会是折中的工资解决办法，近乎两个顶住点之间的中点。

双方顶住点的高度，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经济繁荣时期，劳动市场供不应求，工会交涉能力较强，因而提高它的顶住点。而且工会力量日益增强，也会提高雇主的顶住点，因为工会取得斗争胜利的机会增加了，雇主预见到罢工的代价增大了；经济萧条时期，失业队伍日益扩大，雇主交涉力量增强，顶住点降低，与此同时，工会的顶住点也可能下降，因为工会赢得罢工胜利的机会少，对罢工预期的代价高了。若双方都增强交涉能力，罢工对双方预期的代价都很高，这时雇主的顶住点有向上移动的趋势，工会的顶住点有向下移动的趋势，实际交涉区如果存在就有可能拓宽，如果不存在就可能发展到出现这个范围。总之在实际交涉过程中，实际交涉区越宽，劳资双方越有可能达成工资协议。

民权法案 美国反歧视立法的重要一项是1964年的《民权法》。民权法案的主要内容是规定由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民族出身等方面差别引起的歧视行为为非法。民权法在论及就业时宣称："凡因个人和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原有国籍，而拒绝雇用或解雇任何个人，或者在就业的报酬、期限、条件或优惠方面对任何个人实行歧视，将被认为是非法的雇用行为。"这一条款适用于任何从事州际商业并雇用15人以上的雇主。为执行该法第七篇的上述就业规定，建立了一个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起初，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只有调解申诉和鼓励人们提出私人诉讼的权利，但在1972年，它被授权可以自已提出诉讼。资料表明，在通过民权法以后，黑人工人的相对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在60年代末期，黑人的工资和薪金有了比较显著的增长。尽管70年代中期发生经济衰退，黑人工资在70年代继续上升。那些具有大学程度，从事专业工作，技艺高超的黑人的工资增加得格外显著。在1965年，事实上没有公司到南部的黑人大学去面试并雇用求职者，1970年一些大学去面试并雇用黑人毕业生。到1979年，25岁至29岁的黑人大学生的收人已大致和他们的白人同事一样多了。在职业造诣上，男性黑人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相对数字有了明显的增长。虽然一些年龄较大的非白人的经济地位也有所提高，但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并不能补偿他们过去受到的歧视以及技术的缺乏。美国一些研究者认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工作是积极和卓有成效的。开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重点放在解决有关歧视的个人条件上，对直接相关的集团以外的人影响很小。后来该委员会改变了重点，开始发起广泛的"系统性诉讼"，目标在于整个公司之内的行动。这些行动促使一些大公司拿出相当数额的资金，实施旨在促进雇佣、培训、提升妇女和少数民族雇员的计划。

发盘（Offer） 又在法律上称为要约。与"接受"一起，构成买卖合同成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阶段。所谓发盘，是指交易的一方作为发盘人，向另一方（受盘人）提出买卖某项商品的各项交易条件，

并愿意按照这些条件与之订立买卖合同，是一方当事人以订立合同为目的，向对方所做的意思表示。作为一项有效的发盘，一经受盘人在发盘的有效期内无条件地表示接受，则无需再经发盘人的确认，即可成立对双方均具约束力的合同。

作为一项有效的发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 发盘的目的在于同对方订立买卖合同，发盘人必须清楚地表示愿意按照发盘的内容订立合同的意向。

(2) 发盘的对方原则上应是特定的人，例如某某公司、某某人，而不应仅是泛指一般公众。

(3) 发盘的内容必须明确、肯定，并且包括订立合同的主要条件。依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一项发盘至少具有下列三方面的内容，就可以认为是确定的，可以有效地经过受盘人的接受而订立合同：①明确合同的标的物，即货物的名称；②明示或默示地订明货物的数量，或确定货物数量的方法；③明示或默示地订明货物的价格，或确定货物价格的方法。

(4) 发盘必须送达受盘人方为生效，或者说发盘于送达受盘人时生效。

发盘人在发盘后，此发盘对于发盘人和受盘人两者的约束力是很不相同的。发盘对于受盘人来说基本上是没有约束力的，受盘人收到发盘只是取得了接受发盘的权力，并没有承担必须接受的义务，受盘人对于收到的发盘表示沉默并非等于接受了发盘，受盘人即使对发盘不予接受，也没有必须通知发盘人的义务。这样，发盘的约束力仅是针对发盘人的，这一约束力是指发盘人发盘后，是否有权再行修改其发盘或撤回甚至撤销其发盘。在发盘还未送到受盘人之前，发盘本身还未产生效力，也就无所谓对于发盘人的约束力问题，即使发盘人已经寄出了发盘，他仍可以以更为简洁迅速的通讯方式变更以致撤销发盘。如果受盘人已然接受了有效的发盘，那么买卖合同就已经成立，这时同样发盘的约束力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发盘的约束力问题产生于发盘已经送达了受盘人，但受盘人还未作出接受之前这段时间。对于发盘的约束力问题，各国法律的解释不一。英国法律认为发盘原则上对发盘人无约束力，发盘人在受盘人作出接受之前，可以任意撤销或修改发盘的内容。即使发盘具有明确的有效期限，发盘人也可在期限届满之前撤回发盘。美国法律规定，对于以书面形式签发的关于货物买卖的发盘，在其有效期限内不得撤回，如果发盘没有规定有效期，则在合理的时间内不得撤回，但合理的时间最多不可超过3个月。大陆法国家一般都规定在发盘的有效期内，发盘人不得随意撤销或更改发盘。《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也明确规定了发盘的约束力问题。在发盘已经生效之后，原则上仍然可以撤销，但撤销的通知必须于受盘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受盘人。如果在发盘中已经注明是不可撤销的，或受盘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盘是不可撤销的，并已本着对该项发盘的信赖行事，那么，该项发盘则是不可撤销的。

依照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一项发盘如遇下列情况则为失效，发盘人则不再受该项发盘的约束：

(1) 发盘过期。如果发盘中规定了发盘的有效期限，则在此期限之后发盘自行失效。如果发盘中没有规定具体的有效期限，依据英美法则在“合理的时间”之后发盘失效，而据大陆法则在“依通常情形可期待接受到达的期间”之后发盘失效。

(2) 拒绝：受盘人对发盘明确表示了拒绝，拒绝通知在送达发盘人时生效，而发盘在此失效。

(3) 还盘：如果受盘人在对发盘的接受中对发盘的条件作了扩张，限制或变更，此还盘须经原发盘人的有效接受，方可成立合同。在还盘到达的时候，原发盘失效。

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 世界上比较贫穷国家的统称。发达国家的对称。通常以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划分的标准。但在不同的年份中，划分的标准时有变动。这些国家还可被再度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的石油输出国。在低收入国家中，又把最贫穷落后的划为“最不发达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又将工业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划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我国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殖民地体系迅速瓦解的情况下形成的，分布于亚、非、拉美广大地区。1980年有100多个。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形态基本相似，经济上所显示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烙印大致相同；普遍存在着沉重的人口压力、“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畸型发展而农村异常落后，社会问题严重的情况。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比较完整地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特征：(1) 低下的生活水平。包括国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收入分配不均，大部分人口健康欠佳，营养不良，识字率低，辍学率高，教育不完善或不合需要，婴儿死亡率高；(2) 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水平；(3) 高人口增长率和沉重的抚养负担；(4) 高水平的，不断增长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5) 严重依赖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出口；(6)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广义失业 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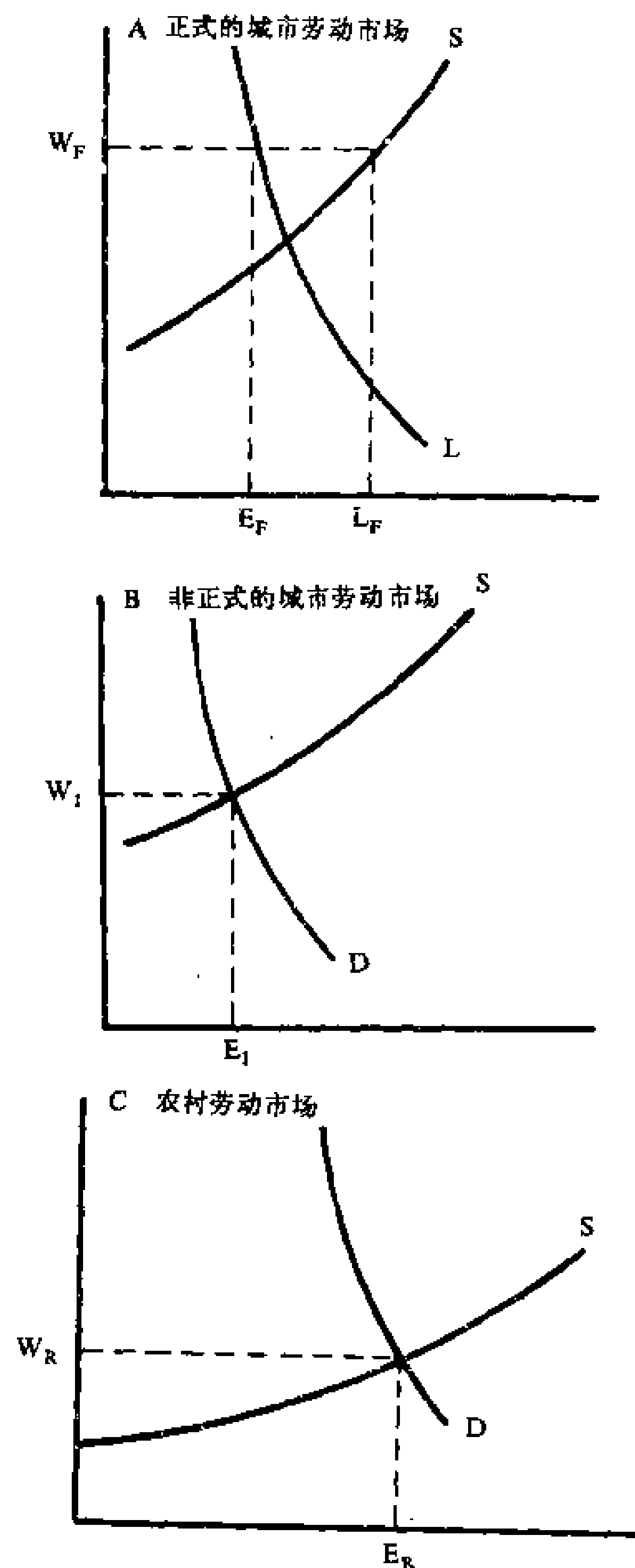
的劳动力不得其用的状况，包括劳动者完全处于闲置状态的公开失业和劳动力利用不足的非公开失业。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广义失业所包括的范围和计量方法作了进一步考察。其中，克里希纳把公开失业定义为零工时零收入；对非公开失业提出了时间、收入、意愿、生产率等4种计量标准，只要符合其中的一条，就可被划归为非公开失业。具体内容为：①时间标准。指劳动者在一年中劳动的天数或时数低于被定义为充分就业的天数或时数；②收入标准。指劳动者在一年中获得的收入低于某种必要的最低额；③意愿标准。指劳动者愿意工作时间大于他目前工作的时间；④生产率标准。指劳动者从目前就业中撤出来而不减少产出。另一位经济学家爱德华兹对广义的失业作了更为具体、全面的划分。分为：(1) 公开的失业。包括能胜任某项工作的人拒绝考虑这种工作而暂时处在闲置状态的自愿失业，和积极寻找但又无工可做的非自愿失业两类；(2) 就业不足。指实际工作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的时间的劳动者；(3) 形式上属于就业而实际上未能做出贡献。包括隐蔽失业，潜在失业和过早的退休；(4) 健康受损。指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可以全日工作的劳动者，因营养不良和卫生保健差而四肢乏力，以致于不能做全日工作；(5) 无生产性。因补充性的物质资源不充分，生产率极低，生产出来的成果甚至还不能补偿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表现较为复杂，其范围相当广泛。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失业要比统计表上所反映的情况严重得多。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函数研究（Production Function Researches in Devoloping Countries）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利用索洛、丹尼森等人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诸因素进行研究，测算了各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是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的实证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麦迪逊、布鲁顿、罗宾逊、哈根、兰普曼、纳迪里。麦迪逊考察了1950—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人力资源、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三大类，列表显示了各类因素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投入的增加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而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1971年纳迪里在《要素投入和全部生产率的国际研究》一书中，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四大类：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全部要素生产率、资源流动对全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同时又进一步将劳动投入分解为就业增长、卫生与营养的改善、教育状况三小类，表明劳动投入包含着人力资本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他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中各类要素的贡献情况。由于要素的分类方法不同，纳迪里的研究结果与麦迪逊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但两人有着共同的结论，即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麦迪逊、纳迪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肯定了“唯资本论”关于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和主要约束的观点。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公开失业（Urban Open Unemple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部分劳动者因找不到工作而处于闲置状态。这是由于城市地区劳动市场供求不平衡，劳动供给超过了劳动需求造成的。与发达国家城市公开失业的特点不同，发展中国家城市公开失业的特点是，失业率较高并且持续上升，即使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失业率也在不断上升。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特殊的供求状况。从供给方面看，城市劳动力的迅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村的迁移者。因为城市人口出生率较低，其自然增长率也比较低，所以劳动力的增长量并不大。而农村的出生率较高，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劳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中隐蔽失业者为了改善自身的贫困境地，大规模地流入城市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从而大大增加了城市就业的压力。从需求方面看，城市的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较低。对此，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曾提出了许多解释，其中有两派观点的争论，一是古典学派的“要素比例固定说”，一是新古典学派的“要素价格扭曲说”。古典学派认为，工业部门使用的是现代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其特点是刚性要素比例，即无论要素价格如何变动，这种比例不发生变化。因此要增加劳动就业，不能靠调整要素价格，只能依靠更大的资本投资。所以，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决定因素是资本积累率或投资率，失业是由于资本投资不足。新古典学派则坚持认为，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着一套均衡价格，这套价格反映了各种要素的真正机会成本，从而能保证所有要素达到充分就业。因此，劳动者失业是由于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扭曲了要素价格。如工会的压力，最低工资法，雇员的各种津贴，跨国公司的高工资政策，等等，都倾向于把工人的实际工资推到市场决定的均衡工资以上，而放宽折旧，低利率贷款，税收减免，汇率定值过高，负有效保护率等等一系列鼓励投资的政策，又导致了资本的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决定的

均衡价格。资本相对于劳动更便宜，结果鼓励了现代工业部门使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从事生产。所以，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比劳动以更快的比例增加，使得城市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不断变小。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结构（Labour Market Struc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就业格局的一种描述，可用于进一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和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特征



是：大多数人在农业和其他初级产业工作，低工资和低生产率；工资差别很大；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长，以及对现有劳动力供给的利用不足。其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种割裂的局面。分别由城市正式部门、城市非正式部门、农村就业部门这三个密切联系着的不同就业部门构成。各自的状况可用图表示。

城市正式部门几乎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工作的部门，由政府和大型企业构成，可对劳动者提供较高的工资和较稳定的就业。由于法律、习惯和其他因素，使工资维持在市场水平以上（图 A 中的 W_F）。因而总是有许多人（图 A 中的 E_F—L_F）在等候着到这一部门工作的机会。城市非正式部门是提供种类繁多的产品和服务的小单位，其工资水平比城市正式部门要低得多。它们有时与大企业竞争，有时填补正式部门忽略了的有利可图的空缺。这一部门很容易进入，因而劳动市场往往处于均衡状态。新进入者一般都能找到某种工作，也许他们的进入会稍微压低一点这个市场参与者的总的工资水平。农村就业部门包括换工、帮工在内的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服务性工作，其工资水平最低。基于人口压力和现行的土地占有格局，还有农业生产季节性的原因，在农村存在着必须依靠工资收入的就业人口。这些农业劳动力构成了最低收入阶层的主要部分。

发展极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 Poles）　强调资源配置在一定时期内应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产业部门聚集的地区，以此带动相邻地区共同发展的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 1955 年提出。佩鲁依据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国民经济不是在每个地方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的，而总是首先从大城市中心那些有创新力的企业开始，然后向周围地区扩展，带动边沿地区的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如果抓住了全国若干个这样的大城市中心，就可以通过它们与全国各地发生纵横交错的联系，把整个国民经济带动起来。发展极就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样的中心具有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运输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等多种功能，能够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极按其对边沿地区发挥作用的形式不同分为两类。一类为吸引中心，其作用是把边沿地区的居民吸引到发展极来，减轻边沿地区的人口压力，以提高边沿地区的人均福利水平；另一类是弥散中心，其作用在于通过增加投资，人材流动来改变边沿地区的经济状况。具体的吸引作用和扩散作用一般表现在四个方面：(1) 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发展极中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可以一方面从其他地区或部门吸引来最新技术和人才，另方面又将自己的新技术推广或扩散出去，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2) 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为了自身发展

的需要，发展极既可以从所在地区和部门或其他地区或部门吸引、集中大量的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也可以向对方输出大量的资本。(3) 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发展极企业和行业集中，生产规模庞大，这不仅可以产生内在的经济效益，而且由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贸易，金融，信息和服务部门的建立，以及人才的互相利用等，可以使各部门、地区共同受益，从而降低社会生产成本，产生外在经济效益。(4) 形成"凝聚经济效果"。发展极的产生，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产生城市化趋向式形成经济区域，可以产生中心城市的作用，并形成技术的，经济的网络，通过吸引或扩散作用，推动周围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佩鲁指出，发展极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必须存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必须创造适当的周围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以便能吸引厂商，投资，人才和技术。发展极理论的政策建议是，如果一个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缺少发展极，就应该创建发展极。因为一个活跃的城市中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对边沿地区产生扩展效应。事实上，发展极理论是把不平衡发展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新古典学派关于人力与资本流动的看法结合起来，转化为地理空间的概念而形成的。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其他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视。一些英美学者对发展极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了增长极或增长点的概念。在实际工作中，发展极理论已对经济计划的指导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工作者把工作重点由以国民经济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转为分解成较小的、较具体的组成部分进行规划。因而，这一理论又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强调区域计划的理论根据。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 或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一门经济学科。又称不发达经济学(Underdeveloped Economics)。其中又有广义、狭义之分：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系起来，考察它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情况的理论研究，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侧重或比较集中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情况的理论研究，是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社会经济条件出发，考察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概括经济发展的经验，找出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并通过多因素的，历史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和大量、细致的实证分析，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其中心任务是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机制，力图建立一种关于经济机制如何运行的知识体系，从而增加人的指导实践，预测政策效果的能力。发展经济学所涉及的范围甚广。由于它是西方经济学中最新的分支之一，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内容也还没有完全定型，大致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积累和外资利用、人口问题，失业和人口迁移，农业改造和乡村发展，工业化问题，工农业发展战略，技术革命和技术引进，国民收入分配，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问题，经济增长速度，财政金融政策，经济结构变化，发展计划和发展方式，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总结和比较，等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很深，可追溯到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尔萨斯、奥国学派、穆勒等。但是作为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一门学科，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形成的。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殖民地体系的瓦解，在世界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着如何谋求发展，找寻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排除限制经济发展的因素的迫切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发生了兴趣，自 50 年代开始相继发表了许多颇有见解的论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伯克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3 年)，阿瑟·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 年）和《经济增长理论》(1955 年)，拉尼斯和约翰·费的《经济增长理论》(1961 年)，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1961 年）和《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研究》(1971 年)，钱纳里的《发展政策的结构理论方法》(1975 年)，迈耶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问题》(1976 年)，以及朱维凯斯的《发展经济学》(1979 年）等。发展经济学的演变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4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有着三种主要看法，分别强调了物质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由于十分强调这三个方面，50 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论点被后人称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理论"。这一时期对一些重要问题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如关于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工业化与农业、进口替代与出口鼓励、计划化与依赖市场价格体系等，这些问题和争论至今仍未解决。60 年代中期以后为第二阶段。由于重视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的发展战略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遭到了失败，60 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转而重视农业、重视收入分配、重视对外贸易、重视微观分析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总括地看，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比较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的特点，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统一体系，提出了不少特殊理论；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则在许多问题的分析中恢复了新古典主义

的观点，扩大了新古典主义的应用。在批评计划化、重估市场的作用、强调农业的重要性、重新认识国际贸易以及社会项目评估的研究等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刻影响，从而被人们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派是新古典主义。虽然还有人从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观点论证经济发展问题，但并未形成主流。发展经济学把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共同点归纳为：生活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人口增长过速，失业率高和就业不充分，缺乏发展经济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对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出口的高度依赖，受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影响等方面。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过速抵销了生产的增长；贫穷阻碍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能力小反过来又限制了生产的发展，造成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普遍缺乏健全的金融制度，缺乏善于管理的经济阶层以及有较高文化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知识不完备，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妨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使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即传统自给经济和现代化经济并存）的境地，存在着大量公开的和隐蔽的失业，失业加剧贫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各个发展中国家政策上的差异引起了发展程度的差异。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些学者提出的政策主张主要有：积累国内资本、合理吸收外资、合理安排国内投资；注意引进科学技术成果；控制人口；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加人力投资，发展教育事业；发挥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等等。由于发展经济学是应如何摆脱持久贫困的政策建议需要而形成的一门实际学科，因而它具有实践性和实用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应首推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增长研究中心（Economic Growth Center)。它成立于1961年，由劳埃德·雷诺兹和西蒙·库兹涅茨等发起建立。发展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刘易斯和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们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理论（Theory of Trade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状况提出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对外贸易理论和策略，目的在于改善贸易条件和平衡国际收支。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相反，为了顺利的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必须实行保护贸易。贸易保护理论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幼年工业论，进口替代论，次优理论，关税结构论，保护政策理论等。

幼年工业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原来依赖进口的产品，如果改由国内自行生产会更经济。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熟练劳动力以及市场不发达，一开始不可能有效地抵制外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因而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加以保护。保护措施主要有：利用关税收入补贴幼年工业，以补偿其损失、增强获利能力，利用出口收入或引进外资支持幼年工业的发展，帮助它形成规模经济并获得外部经济效益，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幼年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其降低成本，以及政府在信贷，税收，原材料供给，产品销售等方面的特殊优惠，使其在开创阶段积累经验，培训人才，在开拓市场时也能赢利。

进口替代论认为，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过程中，国家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扶植进口替代工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应利用关税，进口配额等限制有关的消费品，制造品的进口；另方面利用减免税等手段，增加进口替代工业必需的资本品，原材料的进口，同时，还应实行一些优惠的收入，产品定价等政策。

次优理论的中心是寻求最有效的保护手段。因为各种保护措施之间存在着作用和效应上的矛盾。有些贸易保护措施可以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同时，使一国的外贸和生产发展更经济，而有些措施却会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同时，使生产和外贸的发展变得不经济。例如，利用提高国内产品价格来改善贸易条件，可以解决国内产品价格与国际产品价格的扭曲，但却减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见，任何贸易保护机制都不能产生十全十美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强求最优，而应寻求次优。次优理论详细地分析了保护关税和出口补贴两种机制的作用和后果，以说明选择正确的贸易保护手段的重要性。

关税结构论主要是通过提出适当的衡量关税实际保护效果的数量指标来进行数量分析，以说明关税的结构，作用，区分不同的税率，确定应征的适度税率，并预测其作用的后果。关税是最重要的贸易保护措施之一，它不仅能增加政府的国库收入，而且能起到限制非必需品进口、保护幼年工业、扶植进口替代工业，改善贸易条件，平衡国际收支等作用，关税结构论将关税税率分为两种，一种是名义保护率，一种是有效保护率。名义保护率（np）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从价关税率，表示征收关税后进口商品价格（p'）提高部分与征收关税前进口的商品价格（p）之比的百分率，其计算公式为：

$$np=\frac{p'-p}{p}=\frac{p'}{p}-1$$

有效保护率（cp）是用关税保护下国内商品的增加价值（v'）超过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的进口商品的增加价值（v）的余额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其计算公式为：

$$ep = \frac{V' - V}{V} = \frac{V'}{V} - 1$$

有效保护率与名义保护率的关系，可以通过另一公式体现出来，即名义保护率除以税前商品的增加价值在价格中的比率等于有效保护率。

$$ep = np \div \frac{V}{P_x}$$

其中 p_x 代表税前的 x 商品价格。通过将这两种关税税率用于进出口商品的具体情况的分析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护国内某种商品的生产，对进口最终产品的关税越高越有利，对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关税越低越有利。因此，发达国家总是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征收较低的关税，对进口的最终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从表面上看名义保护率低，但实际上有效保护率很高。这一理论强调，有效保护率是衡量关税对本国的商品生产行业保护程度的一个较恰当的尺度，它能准确地显示采取关税限制进口的政策对国内有关行业发生的净效应，同时可以反映该行业的增加价值变化，从而反映其投入－产出的变化情况以及经济效益如何。这一指标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卡塞尔，卡尔.古斯塔夫（Karl Gustar Cassel，1866—1945） 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先驱者。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曾就读于乌珀萨拉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并获数学博士学位，后又赴德国学习经济学。从 1904 年起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 1933 年退休。卡塞尔作为著名的货币金融专家，曾多次代表瑞典政府出席国际会议，提出了重要的方案和主张，并应邀在英美等国的多所大学和金融机构作过讲学或演讲，甚至还当过苏联国家银行的顾问。其主要著作有《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 年)、《社会经济理论》（1918 年）、《1914 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1922 年）等。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卡塞尔学说是几个对德语国家具有较大影响的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理论》一书的广泛传播而声名更威。卡塞尔的理论体系既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模式为基础，但又摒弃了边际效用理论，似乎颇有点标新立异的意味。但事实上卡塞尔理论体系的学术成就并不突出，只有几个具体的学说在经济学史上较为著名：

1.价值取消论。他认为，以往理论经济学的缺陷在于它以陈腐的价值理论为中心，而价值理论是由那些无用的空洞理论所构成的，因此，应当重新建立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整套的社会经济理论。在他看来，交换经济就是货币经济，即商品交换总同货币使用相联系，倘若在决定商品交换的问题无视货币的存在，就无法作出正确的数字评价。而价值学说对于经济学实在没有必要，就是因为它在研究交换经济时错误的抛弃了货币这个评价尺度，完全缺乏数量上的基础，因而不仅未能具备科学的严密性，并且毫无实际用处。卡塞尔的价值取消论虽则并未赢得许多直接的支持者，但确实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西方学者普遍不再对价值理论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2.购买力平价说。卡塞尔从货币数量说出发，认为在金本位制被各国纷纷取消的情况下，两国单位货币的价值已经无法比较，因而它们的交换比率即汇率也不能依据单位货币直接进行换算。于是他主张，两国单位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根据各自的国内购买力加以计算，即一国货币的汇率取决于该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与另一国货币购买力间的关系，这里的货币购买力是用一般价格水平加以表现，而不是指单位货币究竟能购人多少特定的商品。这种汇率即为"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说"的出现，正好填补了外汇理论因国际金本位制崩溃而出现的研究空白，较圆满地回答了汇率如何确定以及怎样实现均衡的问题，从而使得卡塞尔声名大振。该理论后来经过别人的修正和补充，至今在外汇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3.经济周期理论。在其早期，卡塞尔鼓吹一种"非货币投资过多说"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萧条与危机的出现主要同固定资本的生产而不是个人消费品的生产直接相联系。具体地说，经济高涨时固定资本的生产有着特殊的增加，而萧条与危机的主要特征就表现为固定资本货物生产过多，这种过剩并非是人们的需求不足所带来的，而是资本的供给由于资本家的储蓄增长率下降而大为减少，从而大大落后于固定资本货物的生产。当投资过多论无法解释第一次大战后的现实时，卡塞尔又转用"纯货币现象"的说法来加以说明。他认为，萧条的出现表面看来是购买力不足所致，实际上是由于通货紧缩使得支付工具不足造成的。所以，这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只要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来增加支付工具的供给，便可有效地救治萧条。尽管这种理论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毕竟比较粗糙浮泛，因而同其他许多经济周期理论一样，最终都归于消声匿迹。

卡佛，托马斯.尼克松（Thomas Nixon carrer 1865—1961）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依阿华州，1894 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00—1932 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又赴南

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分配》(1904年)、《农业经济学原理》(1911年)和《美国当前的经济革命》(1925年)等。卡佛一般被看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建立了最重要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学者，其学说体系不仅信奉边际效用说和边际生产力说，而且注重精神因素，伦理道德等对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具有较浓厚的社会学倾向。他主要从事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尽管赞成边际生产力的一般原理，却又批评克拉克学说中的某些内容，还接受了马歇尔和奥国学派的分配思想，据说是美国经济学在20世纪最初25年里最具光辉的学术成就之一。例如，他的利息论分别将节欲论、时差利息论和资本生产力论相融合、又立足在社会伦理基础之上，就颇为特殊。卡佛在农业经济学领域也有所建树，特别强调报酬递减律的普遍性，即该规律适用于分析一切生产要素的报酬所得。不过总的来看，卡佛的分配理论对以后未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1944）　俄国经济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在政治上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撰写的许多经济著作和文章歪曲和阉割马克思主义，散布着大量的反动观点。他否认存在客观的经济规律，否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他疯狂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只是一种"幻影"，唯独价值才是真实的。他歪曲和反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用"产品按比例分配"的观点冒充为马克思的"实现论"，又用"第三者消费"的陈腐看法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实现。他美化资本主义，宣扬它将给全体人民带来利益，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因此，列宁对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圣西门，昂利·克劳德（Henri Claude Saint-Simon,1760—1825）　19世纪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巴黎一个著名的贵族家庭，曾在一些著名学者门下受教。17岁时入伍服役，后随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战争结束回法国不久，便放弃军职，到国外游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度曾接近革命，转而又持怀疑和反对态度。1791—1797年期间与人合伙搞投机生意而成为富翁。以后转向学术研究活动，广结学友，经常设置宴席以切磋学问，终至一贫如洗的境地。40岁以后，圣西门在困苦的生活中开始著述活动。他历经艰难，顽强写作，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终于闻名于世，并为形成一个学派奠定了基础。他本人则最后在贫困中死去。

圣西门的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年)；《人类科学概论》(1813年)；《论实业制度》(1821年)；《实业家问答》(1823—1824年)和《新基督教》(1825年)等。

圣西门是以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为基础来阐述其学说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规律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社会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理性在不断地发展，即哲学以及理智、科学、道德和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从一种体系演变为另一种新的体系，导致现实的社会也相适应地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他由此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并认为"实业制度"就是理性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封建社会而实业制度的过渡时期，并对它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揭露以国王为首的富人集团剥削着广大的劳动者集团，抨击整个社会充满冲突和罪恶。他还初步意识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始终无法认识到私有制度是他所抨击的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现象的真正根源。

圣西门在描绘他的理想社会即"实业制度"时表现出天才的远见。他认为，实业家（包括工人，农民和各类资本家）创造着一切社会财富，又具有管理生产的能力，是该制度的领导力量。实业制度中的领导机构应由实业家（实际上是资本家）和科学家掌握，它将从现在只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国家机构转变成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组织，主要职能是组织发展社会生产。社会生产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就必须将一切科学，艺术和手工业工作加以联合和协调，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实业制度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联合的社会，因此人人都要劳动，不承认任何特权。同样人们的收入也就按照才能和贡献进行分配。这些无疑都是十分宝贵的天才的猜想。

但是圣西门学说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的实业制度有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即它并没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反而主张有必要保持私有制及其剥削收入。他也看不到实行新制度的伟大力量。尽管他同情无产阶级，晚年还自称是其一员，却竭力反对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阶级斗争，而把实现新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国王和资产者身上，幻想说服他们去实施社会改革。这样他的实业制度必然只能流于空想。

圣西门的空想学说在当时曾起过积极和进步的作用。但其门徒后来却形成一个教派，把他的学说神秘化，最后终于解体，从而走到了圣西门本人意愿的反面。

圣·路易斯模型（St.Louis' Model）　又称："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模型"，指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在70年代所提出的一个货币

主义的经济计量模型。该模型证明了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加重要这个货币主义的命题。该模型以货币主义理论为依据，共包括9个方程式。其结论为以下的简化形式方程式:

$$\begin{aligned}\triangle y = 2.28 + (&\underset{(0.62)}{1.54\triangle M_t} + \underset{(0.45)}{1.56\triangle M_{t-1}} + \\ &\underset{(0.45)}{1.44\triangle M_{t-2}} + \underset{(0.65)}{1.29\triangle M_{t-3}}) + \\ (&\underset{(0.27)}{0.40\triangle E_t} + \underset{(0.20)}{0.54\triangle E_{t-1}} - \underset{(0.23)}{0.03\triangle E_{t-2}} \\ &- \underset{(0.26)}{0.74\triangle E_{t-3}})\end{aligned}$$

$$\overline{R}^2 = 0.60, \quad d = 1.78$$

在上式中，$\triangle y$ 代表国民收入变动量，$\triangle M$ 代表货币供给量变动量，$\triangle M_t$，$\triangle M_{t-1}$，$\triangle M_{t-2}$，$\triangle M_{t-3}$ 分别为 t，t-1，t-2，t-3 季度的货币供应量变动量，t 的比率分别为各项下面括号中的数字（0.62，0.45，0.45，0.65），$\triangle E$ 代表政府支出变动量，$\triangle E_t$，$\triangle E_{t-1}$，$\triangle E_{t-2}$，$\triangle E_{t-3}$ 分别为 t，t-1，t-2，t-3 季度的政府支出变动量，t 的比率分别为各项下面括号中的数字（0.27，0.20，0.23，0.26）。$\overline{R}^2$ 是调整了自由度的决定系数，d 是 D.M.统计。在上式中，各个季度的$\triangle M$ 的系数都大于$\triangle E$ 的系数，这说明在解释国民收入从一个季度到另一个季度的变化时，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重要。

布朗，路易（Louis Blanc,1811—1882） 19世纪法国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一个法国中产家庭，早年生活贫困。1830年在巴黎开始写作生涯，逐渐在工人运动中享有很高声望。1848年革命失败后，曾在英国侨居20余年，专心从事著述。后回国担任议员直至去世。其代表作是《劳动组织》（1841年），曾在法国工人中广泛传播。布朗猛烈批判私有制是导致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原因，它使得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他强调自由竞争是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它给社会一切人们带来了祸害。所以他提出了各阶级为反对共同的祸害而联合斗争的主张。为此，他宣扬建立"社会工场"，即同行业工人组成的合作工厂，最后联成全社会的生产组织，人们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他看来，随着"社会工场"竞争力量的不断增强，会迫使所有资本家都愿参加以免于破产，于是新社会秩序就消灭和代替了资本主义秩序。他又强调国家对于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如"社会工场"所需的资本就靠国家用无息贷款予以帮助。1848年革命的现实已经粉碎了布朗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Pierre Le Pesant Sieur De Boisguilbert，1646—1714） 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出生于法国鲁昂，曾长期担任地方法官。在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封建王朝以及重商主义政策带给广大人民的深重苦难，满怀激情地替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辩护。为此，他先后写了《法国详情》（1695年）、《法国的辩护书》（1707年）以及《谷物论》（约1697—1707年）和《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1705年）等经济著作。

作为重商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源泉。他强调，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乳头"，它们的产品不仅养活着国内的其他等级人们，而且能够接济其他国家的需要。从这种重农思想出发，布阿吉尔贝尔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忽视农业和牺牲农民利益的错误政策，并把经济分析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从而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布阿吉尔贝尔还是自由竞争的早期鼓吹者。他认为人们只能按照自然规律行事，而自由竞争就是自然规律的要求，因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违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他主张实行提高粮食价格和许可粮食自由出口等经济自由政策。这种经济自由思想以后也为重农学派所继承和发展。

布阿吉尔贝尔还探求了商品交换中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自由竞争会使得劳动量按正确的比例分配到各个产业部门，因此商品的"真正价值"（即为交换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货币的存在却破坏了按照"真正价值"所进行的商品交换，并成为商人既剥削买者又剥削卖者的工具。所以他把货币看成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源泉，主张保存商品生产而取消金属货币，并用信用货币来发挥商品流通的媒介作用。可见，他已经阐明了劳动价值论的某些基本观点，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他对没有货币的商品生产持颂扬的态度，则是十分片面的，它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愿望和情绪。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Ludwig Brentano，1844—1931） 德国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曾就读于多所大学，并获两个博士学位。在柏林大学时跟随恩格尔学习统计学，并随其赴英国考察工会问题。毕业后一直在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因宣扬和平主义而闻名于世，在192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主要著作有《现代劳动组合》（1881年）和《历史中的伦理与经济》（1901年）等。布伦坦诺对社会改良主义具有强烈的信念，

同希穆勒·瓦格纳一起创建了社会政策协会。但他不主张通过国家强制来推行社会改革，因为有人会出于个人目的而滥用权力，使得直接的国家法制可能同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相反他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改良的成功只有通过私人活动的自由进行才会实现。因此他被看成是新历史学派中的自由主义者。他热烈拥护工会运动和工联主义，认为通过组织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工厂立法和各项改良政策就可以根本改善工人的贫困状况和消灭阶级不平等。由于他擅长演讲，又教过众多外国留学生，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影响颇大，甚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广泛流传。

布雷，约翰.弗朗西斯（John Francis Bray, 1809—1895）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美国华盛顿，曾在英国居住过20余年，当过印刷工人。50年代初回美国后，仍继续热心工人运动。他的著作主要是《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1839年）。他是一个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的欧文主义者。在他看来，劳动与资本之间不等价交换是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根源，这种不等价交换又是私有制引起的。他正确地指出，资本家只不过是用工人以前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来换取工人现在劳动的全部产品，这说明利润完全是剥削的产物。但他并不认识利润的实际生产过程，而看成是贱买贵卖的结果。布雷由此得出结论，救治劳动受害的根本办法在于改变社会制度。其理想社会即“共同所有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欧文的模式。不过他主张用向剥削阶级赎买的和平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他提出建立工人股份公司的方案，主张雇佣工人组成的公司以集体的名义发行银行券来购买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用将来的劳动产品作为偿还的保证。这样，工人与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就可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布雷在欧文主义者中是较激进的，但他犯有其他人同样的错误，试图保存资本主义生产，又用组织信贷和交换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规律。

布登勃洛克动力（Buddenbrooks' Dynamics）　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用来解释各个经济增长阶段依次更替的内在动力所提出的一个词。这个词来源于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著名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小说以19世纪中期德国卢卑克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兴衰史为中心。布登勃洛克家的第一代经营粮食生意，经过拼命奋斗，终于积累了大笔财富，成为当地首富。第二代出生富贵对追求金钱已无兴趣，而追求社会地位，后来终于当了议员。第三代出生于既有钱，又有地位的家庭中，对金钱和地位都不感兴趣，转而追求精神生活，爱好音乐，结果，布登勃洛克家族盛极转衰，最后走向没落。小说的本意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冲突。罗斯托则用“布登勃洛克动力”一词来说明，一家几代人因生活环境不同，从而追求的目标不同，满足欲望的方式也不一样。“布登勃洛克动力”不仅可以说明一个家庭几代人之中的变化过程，而且也可以说明一个社会在几代时间内的变化。罗斯托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若干增长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主导部门，而每一个主导部门的出现又与“新人物”的利益、兴趣和要求联系在一起。增长阶段的转换、主导部门的变动，中心人物的更替是分不开的。正是布登勃洛克动力的作用使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要求不同，这就决定了主导部门的变动，以及经济增长阶段的更替。所以，罗斯托把布登勃洛克动力作为经济增长阶段更替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　1827年苏格兰植物学家R·布朗发现并描述了液体和气体中悬浮微粒的运动，即微粒体在媒质中的无定向无规则的振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微粒将趋向均匀分布于整个媒质中。他在研究一种花的繁殖过程时，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悬浮在水中花粉的“快速振荡运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观察有机物质的颗粒，还是玻璃及花岗岩的碎屑，或是烟尘都能发现这种运动。1877年时人们认为液体分子的热运动是产生布朗运动的原因。后人的研究发现，布朗运动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随机过程（Continuous—time Stochastic Processes）。

布朗运动，也就是连续随机过程，在经济模型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资本理论和金融市场领域中。1905年，爱因斯坦应用统计技术给出了被公认为是最早描述布朗运动过程的数学公式。实际上，在1900年路易·贝奇里尔（Louis Bachelier）在他的股票期权价格理论中就描述了类似的连续随机过程。用抽象的数学公式来表示，布朗运动可表示为$\{B_{(t)}; t \in R_+\}$，R_+为正实数，它具有如下特性：(1) 对于$0<S<t<\infty$，

$$B_{(t)}-B_{(s)}$$

服从于期望值为0、方差为$t-S$的正态分布。(2) 对于$0<t_0<t_1<\cdots\cdots<t_l<\infty$。

$$\{B_{(t_0)}; B_{(t_k)}-B(t_{k-1}) \quad, K=1,2,\cdots\cdots l\}$$

是一组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在这基础上，杜布（Doob）、费勒（Feller）、伊图（Ito）、维纳（Wiener）和其他学者继续发展连续随机过程的一般理论。在该理论发展的半个世纪中，

它在经济中的应用还主要局限在用公式阐述和尝试进行有关经济变量的时序系列特性的假设。直到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连续随机过程理论才找到了同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路子。L·J·萨维奇（L·J·Savage）把贝奇里尔有关期权论述方面的新发现大大推进了一步。1965年萨缪尔森提出了理性付款价格理论。不同于贝奇里尔有关一种股票价格变动过程是布朗运动的假设，萨缪尔森假定一种股票价格的对数遵从布朗运动，因而确保了典型股票价格在有限的不利条件时显示出积极特性。这个被萨缪尔森称为几何图形布朗运动的过程，仍是当今经济学家用来描述股票价格行为的典型过程。虽然对付款和期权价格理论来说它是当今进行这方面分析的标准模型，但是伊图在1944年、1951年在随机积分法上的杰出研究成果直到60年代后期才被引入经济分析。默尔顿（Merton）首次在经济学中使用伊图的随机演算，他分析了一个代理商的最适宜消费和资产价格是伊图过程的一种连续经济活动中的有价证券。伊图对随机过程理论的贡献在于当整个综合是布朗运动时，对期望财产进行积分作了定义。伊图的随机演算中最为有用的成果是所谓的伊图预备定理：一个伊图过程的任何二次连续而又有差别的函数，其本身就是伊图过程。

虽然连续随机过程理论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资本理论和金融市场上，但是该理论在经济领域以外的应用仍可见到。如达费（Duffie，1986b）应用该理论评价安全程度。

六 画

冲击乘数（Impact Multiplier） 又译为"影响乘数"，指外生变量变动对内生变量变动的影响所引起的直接乘数效应，而不是指外生变量变动对整个经济长期、或总的乘数效应。在宏观经济学中，某种外生变量变动所引起的总需求某个组成部分的变动而产生的短期乘数效应被称为冲击乘数。例如，改变某项政策、人口增加，或技术创新所引起的投资增加而带来的国民收入直接增加的倍数称为冲击乘数。但这种政策、人口或技术变化对国民收入的长期影响就不是冲击乘数。在经济计量模型中，冲击乘数是对简化型的外生变量所作出的估计参数。

冲击效应（Shock Effect） 提高工资对改善管理效率的影响。根据这种观点，突然提高工资会消除在大多数企业中所存在的松弛或某种低效率的根源，从而提高管理部门的生产率。管理效率的提高会由于技术上或劳动组织方式上的变革而提高劳动力投入的利用率，使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增加。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对冲击效应的大小表示怀疑。首先，管理低效率更主要地取决于市场支配力，由于市场支配力的作用，会降低提高劳动力投入利用率的刺激。其次，尽管冲击效应会得到工会的支持，但在反复采用这种方法时，要每年改进增加工资的方法才能有效。因此，高工资是否能提高管理效率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以及各种不同的具体环境。

空头（Bears） 在金融市场或期货市场上抛售股票、债券或期货合约的人。这些人预期某种股票、债券或期货合约价格有可能下降，从而就进行抛售，以便在价格更低时买回，达到获利或套期保值的目的。如果一个人持有他正在抛售的股票、债券或期货合约，则被称为"补进的"，或"有保护的空头"。如果一个人并不持有他正出售的股票、债券或期货合约，则被称为"卖空"。在价格下跌时，空头也可以指金融市场或期货市场"看跌"。

决策时滞（Decision Lag） 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从认识到需要采取某种经济政策到实际作出决策之间的时间间隔。决策时滞是内在时滞的一部分，在认识时滞之后，实施时滞之前。决策时滞的长短取决于决策者对有关政策的看法是否一致，以及由制度所决定的决策所要经过的程序的复杂程度。一般说来，采用集中方式作出决策的政策，所需决策时滞就短。例如，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集中作出决策，所需决策时滞就短。采用民主方式作出决策的政策，所需决策时滞就长。例如，财政政策是由政府提出具体政策建议，由议会讨论通过，并由总统批准实施，其间要经过一系列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从而所需要的决策时滞就长。缩短决策时滞有利于适时地采用适当的政策，从而有利于政策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如何缩短决策时滞是经济政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但由于决策时滞主要取决于制度因素，因此，各种政策的决策时滞大体上是固定的。

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 决策指的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各种

条件进行分析研究，制订几种可行的方案，然后再从中选出一个最佳方案或者令人满意的方案。而决策理论正是研究决策问题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决策理论属于运筹学的分支，它涉及到对各种不同层次的组织行动进行决策的方式与原则，其中不仅要研究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产出过程中的物质流动过程，而且还要研究影响这一过程的心理因素，组织因素以及其它人文因素等等，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在企业管理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

1.决策的程序

概括起来，一个决策可以分解成5个步骤，首先，决策人应当确定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例如：使一段时期内的利润最大化等等。然后就着手搜集情况与资料，以便对所处的现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例如，一个企业须了解它的资产情况，且阶段的盈利情况、原材料的供给与价格情况、产品销路与市场竞争情况以及生产效率等等方面的情况。第三步，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情况，拟出几个可行的方案。第四步，根据一定的方法对上述几个可行方案进行比较、筛选，最后选出一个最佳的或者最能令人满意的方案。最后一步，还要对所选定的决策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与控制。这5个步骤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从可行方案中选择最令人满意的方案。因此，决策理论把很大一部分重点放在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上。

2.决策问题的分类与选择方法

根据决策人对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掌握程度的不同，决策问题可以分为3类，即确定型决策，不确定型决策与风险型决策。决策问题的性质不同，选择优化方案所需要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1) 确定型决策

它指的是决策人对未来情况已经完全掌握时所作的决策。它的含义是，每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结果，同时对应着一个确定的值，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人只要选择那个可以使目标值达到最大（例如收益）或者最小（例如成本）的方案就可以了。

确定型决策所用的方法有，市场调查、线性盈亏分析、非线性盈亏分析以及单纯形法等等。

(2) 不确定型决策

它指的是决策人对于未来的情况虽然有所了解，但是对各种可能的情况发生的概率却一无所知时所作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用一定的方法将这类决策化成其它类型的决策（如确定型决策），估计预期收益，然后再进行选择。

不确定型决策所采用的方法包括：

计划评审决策法（PERT决策法）——它对可能采取的每一种方案所得的收益都作三种估计，即最乐观的估计，最可能的估计以及最保守的估计，然后以加权平均的方式算出这种方案下的预期收益。例如，设对第i种方案所得收益的三种估计分别是a_i、b_i和c_i，则预期收益R_i为：

$$R_i=\frac{a_i+4b_i+c_i}{6}$$

估算出各种方案下的预期收益之后，再从中选择那个能使预期收益最大的方案。

沙威吉决策法（最小最大后悔值决策法）——首先估算出在每一自然状态下可能取得的最大收益，然后找出每一自然状态下的最大收益值与这一状态下某一个方案所能得到的收益值之间的差额，这就是这个方案在这一状态下的后悔值。从每个方案中选出一个最大的后悔值，再从所有方案中找出那个（最大的）后悔值最小的那个方案。

赫威茨决策法——首先根据经验估计决策的乐观程度，它以乐观系数表示，系数等于1时表示结果最为乐观；系数等于0时，结果正好相反。用每个方案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最小损益值以及最大损益值与乐观系数及（1−乐观系数）分别相乘，然后相加，得到每个方案的折衷损益值。折衷损益值最小的方案即为决策方案。

瓦尔德决策法（最大最小决策法）——选出每个方案在各种状态下可能实现的最小收益值，然后再从所有方案中选出（最小）收益值最大的那个方案。

不确定型决策的方法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介绍。

(3) 风险型决策

指决策人对未来的各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概率已经掌握，但是对究竟要发生哪一种情况还不能确定时所作的决策。对方案i来说，产生结果j的概率为P_{ij}，它是决策人已知的。如果选择方案i，并且产生了结果j，那么对应的数值为V_{ij}。这时，要分别求出每一个方案在各种情况发生的既定概率下所能得到的期望值：

$$E_i=\sum_{j=1}^{m}P_{ij}V_{ij}$$

（其中m是第i个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的数目）。对各个方案下的期望值进行比较，选择那个使预期值最大（例如收益值）或者最小（例如成本）的方案即可。

风险型决策采用的方法有决策树法、马可夫决策法以及贝叶斯决策法等等。其中的决策树法又叫逐步推进法，它是通过逐层列出方案，先在第一层上进行比较与选择，在选定方案的基础上再列出第二层方案，再进行比较与选择，最后找出优化方案为止。

现代决策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经济学家H·西

蒙，他指出了古典决策原则上的一些不足之处，考虑到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决策方法上引进了非线性关系，同时，还充分注意到，经济分析中的最佳方案在现实中往往很难达到，因此，人们只要找到次优方案、或者满意的方案也就可以了。在这一基础上，西蒙与J·马奇等人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论、运筹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内容，逐渐发展形成了现代决策理论学派。他们认为，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因此可以说，管理就是决策，但组织是由许多个决策者组成的有机体。他们在《组织》以及《管理决策新科学》等著作中对决策的过程、决策的准则、程序化的决策和非程序化的决策以及组织机构的建立与决策过程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这一理论不仅丰富了企业管理思想的内容，而且也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分析与工具。

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Full-employment Budget Surplus） 又称"周期性调整的盈余"（cyclically adjusted surplus），"高就业盈余"（highemployment surplus），"标准化就业盈余"（standardized employment surplus），或者"结构性盈余"（structural surplus）。指不是根据实际国民收入水平，而是根据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或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计算的预算盈余。设 bs * 为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y * 为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g 为政府支出，TR 为转移支付，t 为税率，则有：

$$BS^* = tY^* - G - TR$$

设 BS 为实际预算盈余，y 为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则两者之差额为：

$$BS^* - BS = t(Y^* - Y)$$

这就说明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实际预算盈余为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和实际国民收入的差额与税率之乘积。当充分就业国民收入大于实际国民收入时，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大于实际预算盈余；反之，亦反之。在充分就业国民收入与实际国民收入相等时，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就是实际预算盈余。实际预算盈余的变动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一般把引起财政预算盈余增长的财政政策作为紧缩性的，把引起财政预算盈余减少的财政政策作为扩张性的。但当根据实际的预算盈余时，这一原则并不一定正确。在衰退时期由于私人支出减少引起实际国民收入与税收减少，这时如果政府支出不变，实际预算盈余的减少，并不能说明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同样，在繁荣时期由于私人支出增加引起实际国民收入与税收增加，这时如果政府支出不变，实际预算盈余的增加，并不能说明财政政策是紧缩性的。这种实际预算盈余的变动是自发的，与财政政策的方向无关。但是，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却能准确地反映出财政政策的方向。因为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是固定的，所以，充分就业预算盈余的减少说明了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即降低了税率或增加了支出；充分就业预算盈余的增加说明了财政政策是紧缩性的，即提高了税率或减少了支出。充分就业预算这一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 C.布朗（C.Brown）在 1956 年提出来的，60 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据此提出了以实现潜在国民收入为目标的充分就业预算政策。

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与一定的自然失业率相适应的就业状态。自然失业率即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或长期均衡的失业率。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工作。在充分就业时仍然有一定的失业存在。这是因为，由于一些难以克服的原因（例如，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劳动力的正常流动等）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失业存在。一定失业的存在作为劳动后备军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所必需的，而且失业补助及各种福利支出的存在也使一定失业的存在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凯恩斯把失业分为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把充分就业定义为消灭了非自愿失业的就业状态。现代经济学家一般把失业分为由于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和由于结构性原因而引起的结构性失业，把充分就业定义为消灭了周期性失业的就业状态。自然失业率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对失业的接受程度，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自然失业率是不同的。各国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自然失业率，从而判断经济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以美国为例，50—60 年代的自然失业率是 3.5—4.5%，即 95.5—96.5% 的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70 年代的自然失业率是 4.5—5.5%，即 94.5—95.5% 的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80 年代的自然失业率是 5.5—6.5%，即 93.5—94.5% 的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自然失业率与充分就业的标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充分就业。

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 又称"中周期"指为期 9—10 年一次的经济周期，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 C.朱格拉（C.Juglar）在 1860 年出版的《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发生周期》一书中提出，故名。在朱格拉之前，经济学家们主要研究经济中的危机现象。朱格拉认为，危机或恐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周期性经济波动中的一个阶段。他对法国、英国和美国较长期的工业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根据物价、生产和就业人数等指标，确定了经济中每 9—10 年有一次周期性运动。他又把每个周期分为繁荣、危机、清算三个阶段。他还研究了经济周

期的原因，强调了货币因素，即银行信用的变化是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彼特研究了朱格拉周期与其他周期的关系，指出三个基钦周期（短周期）组成一个朱格拉周期，一个康德拉杰耶夫周期（长周期）包括6个朱格拉周期。熊彼特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朱格拉周期根源于经济生活中的中等创新活动。美国经济学家A.汉森把朱格拉周期称为"主要经济周期"，或称"大周期"，并根据统计资料计算出美国1795—1937年间共有17个这样的周期，其平均长度为8.35年。

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 福利政策的一种形式，由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在1962年提出。其具体作法是，政府规定一个收支相抵的收入标准，低于这一标准的个人或家庭将根据一定的税率和其实际收入水平得到不同的负所得税，即补助。以y_a表示家庭实际收入，y_b表示收支相抵的收入水平，y_m表示最低生活保障的收入，t_n表示负所得税税率，T_n表示负所得税额，则计算负所得税的公式为：

$$T_n=t_n(y_b-Y_a)$$

如果家庭实际收入为零，则：

$$T_n=t_n\cdot Y_b=Y_m$$

上式说明当家庭没有收入时，负所得税额就是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水平。由以上可知，负所得税额取决于实际收入、收支相抵的收入水平、最低生活保障收入，以及负所得税税率。负所得税与其他福利补助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它不是给低收入者以固定的补助，而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收入给予补助，这样就使原收入水平较高人在得到负所得税以后收入仍比较高。设收支相抵的收入y_b为10000元，最低生活保障收入y_m为5000元，负所得税税率为0.5，则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所得到的实际可支配收入y_d为下表：

税前实际收入	负所得税额	税后可支配收入
Y_a	$T_n=t_n(T_b-Y_a)$	$Y_d=Y_a+T_n$
0	0.5(10000—0)=5000	5000
1000	0.5(10000—1000)=4500	5500
2000	0.5(10000—2000)=4000	6000
3000	0.5(10000—3000)=3500	6500
4000	0.5(10000—4000)=3000	7000
5000	0.5(10000—5000)=2500	7500
6000	0.5(10000—6000)=2000	8000
7000	0.5(10000—7000)=1500	8500
8000	0.5(10000—8000)=1000	9000
9000	0.5(10000—9000)=500	9500
10000	0.5(10000—10000)=0	10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采用负所得税制度无收入者可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收入（5000元），达到收支相抵收入水平者（10000元），即得不到负所得税，也不用交纳所得税，在此收入以上者就要交纳所得税。更重要的是，在负所得税制度下，税后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税前实际收入的多少。在表中，随着税前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税收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也在提高。这就说明了，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既保证了低收入者的生活，实现了社会保障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又保证了有一定收入的低收入者实际可支配收入也高，从而鼓励了低收入者参加工作，而不是坐等政府补助。这样，就在不损害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保证了一定的社会平等。而且，由于负所得税的调节，可以使收入较为稳定，从而有利于经济稳定。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负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与刺激工作的效应并不明显，而且实际运用中也较为复杂，因此，这一制度并没有普遍实行，只在美国的几个州进行试验。

负效用说 一种工资学说。由杰文斯创立于19世纪70年代。该学说强调，劳动是一种给人的身心带来某种痛苦的努力，而且随着劳动量的增加，其引起的痛苦程度会递增，因此，工人的劳动时间应决定于最后劳动增量所带来的负效用恰好等于其生产物效用这点。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界限，劳动的负效用就大于生产物的效用，工人就应获得更多的工资报酬。总之，工资的决定必须考虑劳动的负效用因素及其同产品效用的关系。

存量-流量分析（Stock-flow Analysis） 存量-流量的分析方法是对单纯的存量分析和单纯的流量分析的发展。单纯的存量分析是对一定时点上已有的经济总量的数值及其对于其它有关经济变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单纯的流量分析是对一定时期内有关经济的投入、产出等的变动及其对其它有关经济量的影响进行分析。而存量-流量分析则可以看作是上述两种分析的结合。下面我们用一般均衡的事例来说明这种分析法。假定在类似瓦尔拉斯拍卖市场，各个经济人根据市价情况和自己拥有的资产数量，制定自己的交易计划。购买要么是为当期消费之用，要么是留作存量作将来之用，销售的要么是为当期所生产，要么是前期存货，这时每一种交易的商品，在既定的市场交易期都有下列所需函数：

(1) 总存量需求函数：

D=D（p，s） D为交易期末的市场总需求，P为商品价格，s为资产。

(2) 总流量需求函数

d=d（p，s）

(3) 总流量供给函数

S=S (p, s)　　s 为现期生产总量

(4) 总存量供给函数

S=S (p, s)　　S 为交易前全社会拥有商品存货总数。

(5) 持有者的超额需求，或者叫资本帐户(Capital Account) 的计划净购买为:

Z=D−S

(6) 消费者的超额需求，或者叫流动帐户(Current Account) 的计划净购买。

z=d−s

(7) 整个市场超额需求

x=z+Z

这时的市场交易均衡条件为 x=0，而在传统的纯流量分析中和纯存量分析中，均衡的条件则是 D−S=0 和 d−s=0。存量−流量的分析方法目前还主要运用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在传统经济学那里，存量分析与流量分析含混不清，一般均衡模型偏重于研究纯流量或纯存量模型，因而就忽视了当前收人如何转为财富、财富又如何转化为未来收入的问题。马歇尔虽对存量与流量并存问题予以重视，但对存量−流量分析仍残缺不全，直到 1954 年，克劳威尔(R.W.Clower) 才提出了具体处理存量−流量问题的经济模型。此后存量−流量分析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一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存量−流量分析的最大贡献在于处理时际均衡 (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 问题。

存货投资周期 (**Inventory investment Cycle**) 存货投资的变动引起的一种周期性波动。生产的水平不仅取决于销售状况，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增加或减少其存货投资。如果企业增加其存货，则会通过引起生产的扩张而促成经济繁荣；反之，如果企业减少其存货，则会通过引起生产的紧缩而引起经济衰退。这样，存货投资的变动本身会形成繁荣与衰退的轻度而交替出现的经济波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存货投资变动本身并不足以引起经济波动。这是因为，其一，存货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的比例并不大；其二，存货投资的变动取决于经济周期的状况，是经济繁荣引起存货投资增加，经济衰退引起存货投资减少，而不是相反。因此，存货投资的变动并不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原因，只是加重了波动的幅度。一般说来，在衰退发生时，销售减少，企业会减少其存货投资，从而使生产的减少大于销售量的减少，这就加重了衰退的程度。在复苏时期，销售增加，企业会增加其存货投资，从而使生产的扩大大于销售量的增加，这就加快了复苏，使经济更快地进人繁荣阶段。

存货投资 (**Inventory investment**) 以存货形式存在的一种投资，是总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企业的原材料、半成品与未出售的制成品的增加。存货投资分为合意的存货投资（或称计划的存货投资）和非合意的存货投资（或称非计划的存货投资)。为了使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给能保证生产顺利地进行，以及避免制成品脱销，企业要保持一定水平的存货。企业愿意维持的这种存货投资水平就是合意的存货。它的大小可以用存货——销售比率来表示，这一比率指存货投资量在总销售量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说来，存货−销售比率取决于产品生产或原料与半成品定货到来的速度，利率水平，以及销售量和社会需求的不确定性。产品生产或原料与半成品定货到来的越快，利率越高，销售量越少，社会需求的不确定性越小，则这一比率就越低，存货投资就越少；反之，亦反之。如果实际存货投资超过了合意存货投资的水平，那么，超过的部分就是非合意的存货投资。企业要保持合意存货投资水平，在短期中存货投资的调整影响着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如果实际存货投资大于合意存货投资，即存在非合意存货，企业就要通过减少生产来调整存货投资，从而引起均衡国民收入的减少。如果实际存货投资小于合意存货投资，企业就要通过增加生产来调整存货投资，从而引起均衡国民收入的减少。只有在实际存货投资等于合意存货投资，即非合意存货投资为零时，企业才既不增加生产又不减少生产，从而使国民收入处于均衡状态。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存货投资也发生变动。一般说来，在繁荣时期，存货—销售比率上升，存货投资增加，存货投资的增加会促进生产，从而使经济更加繁荣；在萧条时期，存货—销售比率下降，存货投资减少，存货投资的减少又会抑制生产，从而使经济更加萧条。所以说，存货投资的变动会加剧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存货投资尽管在总投资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它的变动对经济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创新 (**Innovation**)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 J·熊彼特在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创新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第一、采用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第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第三、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第四、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

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第五、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把某种新东西引入经济领域中。创新并不等于发明，发明家也并不一定就是创新者。一种发明只有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那些有非凡的眼光，超人的能力，敢于冒风险而又不怕失败、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创新要有资本，银行为创新提供了资本保证。熊彼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创新为中心的。他用创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创新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从而形成创新浪潮，推动了社会前进。社会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创新浪潮中不断发展的。熊彼特还用创新解释经济周期，认为经济中周期性波动正是创新活动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新均衡的形成。创新及以后的模仿引起经济繁荣，创新的普及则引起经济衰退。当另一次创新出现时，就会有新的经济繁荣。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长短则取决于创新的重要程度。熊彼特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会引起创新动力的消失。这时，资本主义将走向灭亡，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由国家进行创新。熊彼特以创新这一概念为中心提出了有关社会发展动力、规律和特点的一整套系统理论。这种理论在经济学独树一帜，而且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当代一些经济学家还在创新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用以解释经济问题。

创新经济周期理论（Innovation Business Cycle Iheory）　一种用创新活动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彼特（J.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和《经济周期》（1939年）两书中提出。创新是熊彼特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结合，包括引进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获得一种原料的新来源，或者采用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经济周期正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社会就是在这种旧均衡破坏和新均衡形成的过程中前进的。因此，经济周期是由创新引起的一种正常现象，这种理论以创新为中心解释了经济周期的原因，阶段，以及不同周期与不同创新之间的关系。

这种理论首先用经济周期的“纯模式”来解释经济周期中两个主要阶段——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原因。创新为创新者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形成引起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大，引起经济高涨，形成繁荣。随着创新的普及，超额利润消失，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引起经济紧缩，形成衰退。直至出现另一次创新，经济再次进入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所构成的周期性运动。经济正是在这种周期性运动中发展着。

但是，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这一理论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这一点。在第一次浪潮中，创新引起了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大和银行信用的扩张。这就促使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扩张，进而促进了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扩张。这些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这就是第二次浪潮。它是第一次浪潮的反应，然而两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即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与创新无关，是由于投机活动所引起的。这样，在第二次浪潮中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所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可能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而现在，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是另一个病态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经济转向复苏。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而存在的，要使复苏进入繁荣，则必须再次出现创新浪潮。

根据前人的研究，经济周期可以分为3年左右的短周期，10年左右的中周期，以及50年左右的长周期三类。创新经济周期理论用创新活动的大小来解释经济周期的长短。经济活动是广泛的，各生产部门是有差别的。因此，不会只存在单一的创新，而是存在着多种创新。由于不同的创新现实所需要的时间长短不同，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大小也不同。这样就会有时间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有些创新现实需要的时间短，对经济的影响也小，从而就引起了短周期。有些创新现实所需要的时间长，对经济的影响也大，从而就引起了长周期。每一种经济周期都与特定的创新活动相联系。具体来说，短周期与存货的积累和发散的持续时间相关，中周期与个人生活相关的消费品创新，诸如，纺织机、发电机，电冰箱等的发明应用相关。长周期则与铁路的修建这类重大的创新活动相关。创新与经济周期长短的这种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创新是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原因。

创新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周期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年代增长模型（Vintage Growth Models）　考虑到资本及其所体现的技术水平随时间推移而老化的

经济增长模型的总称。资本的具体形态（各种设备等）体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由于技术进步，不同年代的等量资本体现了不同的技术水平。这样，如果仅仅把资本作为一个总量的概念来考察，即只考虑资本数量的变动，就无法说明体现了不同技术的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年代增长模型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老化问题。该模型认为，新的技术进步只影响新的投资，即新增加的资本量，因此，就把资本存量分为由不同年代（即体现了不同技术水平）的资本品所构成的一种存量，然后分析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一模型对深入分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用的，但由于体现不同技术的资本在折算一定标准的资本时较为复杂，而且，对不同年代资本所体现的技术水平的标准也难以确定，所以，在实际分析中有一定的困难。

年保证工资（Guaranteed Annual wage） 保证雇员在一年内都能得到最低收入的一种工资支付办法。福特汽车公司和产联的汽车工人联合会于1955年6月签订的合同是最著名的年保证工资计划。该计划规定，公司按每人一小时就业向特种信托基金缴纳一定的金额，直至其数达到所议定的某个最高额为止。如该公司不能提供全年的就业，则工人可得保证（假设他符合一切规定）其正式工资的68%～77%（视其抚养的人口多少而定）为期52周，并将失业补助金计算在内达到所保证之数。一般这类计划都有资历限制，通常是连续受雇1至3年以上的工人才能享有年保证工资。年保证工资计划发展比较缓慢，而且只限于比较大的公司。由于州的失业补助金不能保证与工资和生活费水平同步增长，所以工会把年保证工资称为补充的失业优惠计划（SUB），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就业全年保持稳定，消除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季节性波动。在某种意义上，年保证工资办法表示一种工资的转移，从相对正式任用的人员转向工作不稳定的人员。因此，年龄较大的老工人时常反对年保证工资，因为他们看出是牺牲了自己的工资，以使年轻不甚稳定的工人停工时可以有更多的经济援助。

权力转移论（Power Transfer Theory） 一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已由资本家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手中的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这种理论认为，谁掌握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随着各种生产要素重要程度的变化，权力也在不断转移。这就是说，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有一种是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从而也就是最重要的。谁拥有了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了权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不同的生产要素曾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也就有不同的阶级曾掌过权。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土地的供给者，从而权力就在地主手中。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样，权力就从地主手中转移到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手中。二战以后，一方面，资本供给日益丰富，甚至过剩，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作用日益重要，工业和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重要，专业知识成为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样，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就掌握了权力。这种权力的转移使公司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资本家股东的权力逐渐消失，成为最不关心公司的人，而掌握了权力的技术结构阶层则成为公司的核心，亦使企业经营目标发生了变化。权力转移论在K.加尔布雷斯的二元体系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说明了公司新目标形成与公司成为计划体系的原因。

权利（Entitlement） 在很强的意义上，权利是指一部分人欠另外一部分人的某个事物。所欠的事物可以是某种作为，例如拔牙；也可能是一种不作为，即克制参与权利所有者有关的活动，例如不去侵人别人的土地。权利可以有“强”的和“弱”的区分。强的权利意味着某人的权利的存在对应着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的存在。典型的情况是，被授权的那人需要借助其它的力量才能放弃这个义务或反过来，开始它的实现过程。较此稍弱一级的权利是引起在另外二组人之间存在一个权利—义务关系的受益人，例如一个保险行为的受益人。再弱一级的权利中的人们通常缺少放弃或执行的力量，因为义务的实现要求对他们来说是不严格的。以上讨论的是所谓的“强”的权利的层次区分。

弱的权利是指一个人的这样的活动，即虽然没有被其他人的不干涉义务特别保护着，却也间接地和广泛地由他们的其它克制的义务保护着。当人们可能没有特别的义务允许别人打付费电话时，这些人就可能要有诸如动武、偷窃和破坏财产等方面的不作为义务。相应地要对使用付费电话的那人提供相当的但非彻底的保护。

除了“强”的和“弱”的权利，一个人还可能拥有许多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保护的自由。这是指他没有义务去克制自己不做；相同地，他也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要求不受干涉。规范地讲，一个人的“强”的权利是权利的基本概念，而“弱”的权利和不受保护的自由是一种权利的“残值”。

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 指的是在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区分时间的先后顺序，前阶段的变量的情况将对后面变量的情况产生影响。动态分析是与静态分析相对而言的。

动态的概念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J.克拉克提出。克拉克认为，人口、资本、技术和消费欲望的变化都属于动态的变化，静态会析中加入任一种上述变化就会变为动态分析。此外，他还认为，竞争中弱肉强食的过程也属于动态的变化。

动态分析在以后的经济周期理论中不断得到发展。英国的J.希克斯很注重动态分析，并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首先在引进时间因素的时候，不能将不同时期的事物看成是同质的，应当将它们按历史的进程加以区分，只有这样，动态分析才能接近于现实。其次，存在着灵活价格与固定价格两类市场，不同的市场结构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区分流量与存量，认为在动态分析中，存量与流量的变化一样不可忽视，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存量的变化尤其重要。

尽管动态分析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学者们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静态分析为主，对动态分析只是顺便涉及。英国的R.哈罗德可称是第一位以动态理论研究为主的经济学家，他于1939年发表"论动态理论"一文，1948年又出版了专著《动态经济学》，他认为，动态分析中不仅要引入时间因素，更应当研究经济增长率问题，可见，哈罗德把经济增长问题视为动态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他创立了增长率的模型，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在动态分析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注意将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结合起来，美国的p.萨缪尔森就曾致力于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他认为，旧的均衡受到干扰后，经过一段时间达到新的均衡以后，两个均衡状态往往并不一致，因此，必须将静态与动态联系起来。他提出了"对应原理"，即新的均衡可以恢复旧均衡的某些性质，认为将最大化原则与"对应原理"结合使用，即可将静态与动态，甚至微观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萨缪尔森的观点突破了静态的一般均衡模式，为微观与宏观分析的综合作出了贡献。

动态分析中有比较的与调整的动态分析之分。比较动态分析是研究内生变量不同的值对于均衡或者模型中其它参数的最终影响。如果均衡是静态的，则该分析就降为比较静态分析。而调整动态分析研究的是，在经过某种变化之后，经济是否向均衡状态收敛，收敛的方式如何。可见，比较静态中的静态分析是静止状态中的有限的调整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运用比较广泛，因为象经济周期、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失业对宏观的经济问题本身就具有动态的性质。此外，动态分析也在微观领域中应用，如用于研究某产品的价格与数量如何随税率等参数的长期变化而调整，厂商投资计划以及稀缺资源的使用与定价等等。近年来不断发展完善的微积分以及最优控制理论成为在微观经济领域开展动态理论研究的有利工具。

动态规划与马可夫决策过程（Dynamic Programming and Markov Decision Proceses） 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纳成为给定函数求极值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应的数学方法，而动态规划就是这些决策过程中新需要的数学方法的合称，它是数学规划的一个分支。

1 动态规划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这些基本概念包括："状态、阶段、决策、收益、状态转换与约束以及策略等等。"在一个生产优化问题中，某个企业所拥有的资产数额就是决策过程中的"状态"，状态是可以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各种可能的状态合称"状态空间"。企业需要作出决策的时间将整个过程分成几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要作出相应的"决策"，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应当如何投资、如何生产等等。每一单位资本都将得到相应的"收益"(这里设企业不存在亏损的问题，因而收益非负)。在不同的阶段作为不同的决策，这将导致企业所处状态的变化，这被称为"状态转换"。"约束"指的是企业在作出决策时所要考虑到的某些限制性条件，比如企业现有的资金与资源数量等等。而"策略"则指的是当企业根据所处的不同状态而相应作出的决策的规律。企业的目标是使预期利润的贴现值最大化。

2 最优化原理

这是动态规划的基本原理，是美国的贝尔曼在50年代提出的，它要求在满足无后效性的最优的多阶段决策过程中，从任何一个阶段开始的子过程也是最优的，也就是说，无论在某一个阶段所处的状态与选择的决策是怎样的，由此而形成的转移状态作为下一阶段的初始状态，此后的子过程也应当是最优的过程。

3 动态规划的求解过程

动态规划所要处理的决策过程往往步骤很多，而且序列性强，针对这一特点，人们利用上述最优化原理，将一个具有无后效性的多变量，多步骤的复杂的决策问题转化成多个低维的简单的决策问题，再建立相应的动态规划迭代方程，进而求出最优解。这一方

法可以极大地节省计算时间，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利用动态规划的分析方法去了解决策问题的解的性质。

4 马可夫决策过程

动态规划的方法可以分为确定型与随机型两类，其中随机型的动态规划又被称为马可夫决策过程。

设某个系统在时点 $t=0,1,2,\cdots$ 被观察，第 k 时观察发现系统处在状态 S_k，状态空间为 S，这时的决策为 A_R。这一时点得到相应的收益为 $R_k(S_k,A_k)$。如果 $S_k=i,A_R=a$，那么系统在 k+1 时所处的状态为 j 的可能性为 P_{ij}，可见，对于每一个不同的时刻都可以选择一个相应的决策，这些决策合起来成为一个策略。系统策略的目标是，满足约束条件下，使得预期收益的贴现值之和最大化。而马可夫决策过程正是帮助系统找出使其目标得以实现的优化策略的动态规划方法。

次优（Second Best） 次优是相对于帕累托最优而言的，也就是说相对于一般均衡体系，存在某种附加限制，使得一个帕累托最优条件无法获得而其他条件仍然可以得到满足的状态就是次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要求：任何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所有消费这两种商品的消费者来说都是相等的；任何两种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对于任何使用这种要素的生产者来说都是相等的；任何两种商品在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但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假定并不符合存在某种政策限制的经济现实。所以必须重新构造最优条件。假定经济分析中目标函数是 $F(x_1x_2\cdots\cdots x_n)$，约束条件是 $\Phi(x_1\cdots x_n)=0$，这里 $x_1\cdots x_n$ 是消费者的消费品向量的元素。目标函数在此揭示的是效率中的利益，（即可获的任何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的利益）而不是分配中的利益（某种特殊的帕累托最优）。约束条件来自可获取的技术和最初拥有资源。利用拉格朗日函数方法可得出以下最优的必要条件：

$$F_i/F_n=\varphi_i/\varphi_n \qquad i=1,\ 2,\ \cdots,\ n-1$$

这就是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之一，可以被解释为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但存在某些附加条件，如生产中垄断因素，外部性、市场不完全性等。使：$F_i/F_n=k\varphi_i/\varphi_n \quad 0<k<1$ 这时的拉格朗日函数：

$$L(\cdot)=F-\lambda\varphi-\mu\ (f_i/F_n-k\varphi_i/\varphi_n)$$

这个问题的解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即在 $\varphi(\cdot)=0$ 与 $F_i/F_n=k\varphi_i/\varphi_n$ 两个限制条件下，它不使每个人的效用状况变得更好同时不使另外的人变得更坏。最优解的必要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次优的简单表述。由于次优理论的提出，帕累托最优往往被称为最佳最优（first-best optimal）。次优状况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尽管在早期的福利经济学以及公共财政学，特别是米德（J.Meade）的贸易政策分析中都曾涉及过，但最早明确提出并加以集中论证的则是李普赛（R.G.Lipsey）和兰卡斯特（K.Lancaster）。

次级抵制（Secondary Boycott） 为了向没有卷入劳资争议的雇主施加压力而开展的有组织的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向当事的雇主施加压力。次级抵制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罢工、拒绝生产某种产品、开展运动使消费者不购买某种产品、设置纠察线。次级抵制与初级抵制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反对与之发生争议的雇主，而前者却是把矛头指向与之并无争议的第三者。例如一个制造商的雇员与之发生争端，雇员把反对他的行动扩展到抵制经营该制造商产品的经纪人，这些雇员与经纪商实际并无争议，这就属于次级抵制。为反对第三方如商品的购买者或供应者而举行的罢工等都属于次级抵制。次级抵制还包括工会为争夺管辖范围而进行罢工、工会工人拒绝处理已由非工会工人制成或半制成的材料等情形。次级抵制远比初级抵制有效，但它损害了无辜的第三者的利益，如前面提到的经营制造商产品的经纪人，所以在多数自由企业国家，次级抵制都是非法的。在美国，根据塔夫脱——哈利特法，大多数次级抵制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劳工行动，因而雇主可以对工会提出起诉，要求赔偿所遭受的损失。法律允许的唯一次级抵制是，旨在减少或消除非工会竞争破坏工会旗帜的那种抵制。

米奥匹克决策规则（Myopic Decision Rule） 在一个动态环境中，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t 上，一个决策者都有关于 t 时以及以后一些日子的经济环境的信息。经济环境是外生的、是决策者无法影响的。我们用外生变量 x（t）的向量代表 t 时的环境，未来的外生变量值为（x（t+1），x（t+2），…、x（t+T））。T 是由一些如生命周期、技术和资源限制等因素来决定的。在 t 时点上的决策规则是从与变量 Z 的向量相关的图中选出 d。$d=\psi_t(z)$。$\psi_t(z)$ 就是变量 Z 的向量构成的决策图。米奥匹克决策规则就是这样的决策过程，只是在关于 t 时间的信息中作出选择。即 $d(t)=\psi(x(t))$。这一决策规则不考虑未来经济环境会如何变化。如果决策形式是下面这样的，就是非米奥匹克决策规则。$d(t)=\psi_t(x(t),\ x(t+1),\ \cdots,\ x(t+T))$。例如：一个消费者要实现其效用函数最大化。其效用函数为 $u_t(c(t),\ c(t+1),\ \cdots,\ c(t+T))$，预算限制为基金量与价格水平构成的向量，即基金量为 $(w(t),\ w(t+1),\ \cdots,\ w(t+T))$，价格为 $(p(t),\ p(t+1),\ \cdots,\ p(t+T))$，如果消费函数为 $C(t)=\varphi(w(t),\ p(t))$，

就是米奥匹克决策，而效用函数为 $C(t)=\varphi(w(t), p(t), w(t+1), p(t+1), \cdots, w(t+T), p(t+T))$就是非米奥匹克决策。米奥匹克决策规则忽视了所有不同时间所发生的替代性，而这种替代性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需求发生变化或价格发生变化是会产生的。非米奥匹克决策规则中，决策者将全部阶段内的因素一并考虑，并且在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实现最佳的不同时间的替代。

米塞斯，路德维希·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 奥地利经济学家，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其间服过兵役，担任过商会经济顾问和国际联盟的行政职务。1927年创立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1934年起，先后辗转瑞士、美国和墨西哥，担任一些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职务，最后死于美国。米塞斯的论著很多，最主要的有《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1912年）、《共同经济：社会主义研究》（1922年）、《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1949年）和《经济科学的最后基础》（1962年）等。

在维也纳大学期间，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继承和发展奥地利学派的庸俗经济学传统，形成所谓的新奥地利学派。该学派针对奥国学派主观主义学说招致的种种批评，放弃"苦乐主义"的动机分析，放弃主观价值可以直接衡量的主张，做了许多修补点缀工作。在方法论上，他提出和发挥了人类行为学，特别强调个人选择的重大意义，并把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看成是进行正确经济推理的基础。他认为，主观学派用边际效用论代替劳动价值论的最重大意义，就在于把比较狭窄的经济学转变成更为一般的人的行为科学。他进一步指出，人的行为科学主要分为行为学和历史学两部分，前者适于演绎法，后者需要归纳法，这显然是试图调合当年奥国学派与新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争"。

早在20年代初，米塞斯就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这种经济制度不可能合理地配置生产资源和组织生产活动，他论证说，社会主义经济同市场价格制度水火不相容，而市场价格制度又是进行经济核算和合理决策的必要前提；即使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某种价格制度或竞争制度，它亦无法获得资本主义经济那种高效率，因为公有制和计划化本质上不允许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职能。为此，他后来同兰格等人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战。到了40年代和50年代，他又从人类行为理论的角度继续宣扬社会主义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的陈腐观点。由于米塞斯在诸多经济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顽固坚持极端的资产阶级立场，他被公认为西方经济学家中的"最反动分子"。

米塞斯还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同大多数自由派经济学者多少承认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作些经济调节的立场不一样，他大力宣扬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指责强化国家干预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扩大强制和减少民主。可以说，他和哈耶克是战后仅有的两个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也反映出新奥地利学派的一个理论特征。

从具体的经济理论来看，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较具影响。特别是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产生归咎为货币和信用的紧缩和膨胀，主张适当控制银行所创造出的流通手段的数量来加以平抑，这种用纯货币现象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曾一度为经济学者们所广泛接受。

米契尔，韦斯利·克莱尔（Wiesley Clair Mitchell，1874—1948年） 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生于美国的拉什维尔。189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03年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1913年转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直至1944年退休。其中1919—1922年间曾离开该校，组织"社会研究新学院"，推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创设。主要著作有《经济周期》（1913年）、《经济周期：问题及其解决》（1927年）和《经济周期的计量》（1946年）等。米契尔是制度经济学中经验统计学派的代表。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实际行为与社会制度的科学，这种研究制度的理论必须建立在观察与测量的经验基础上，而统计学就是它的重要工具。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他毕生致力于经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试图发现各种经济制度演进的规律性。尤其是他对经济周期展开了范围广泛且持续数十年的研究工作，硕果累累，被公认为研究经济周期的主要权威。按照他的讲法，经济周期是社会上各种企业有机体运动的必然结果，其中并不存在静态的经济均衡，有的只是一连串动态的累积过程，而它们又是经济制度面对许多不可预测的变化时所产生的一种制度性反应。他进一步强调，经济周期就是运转中的经济过程，从中可以了解经济的结构与功能，同时，无数经济变量的相关变动反映出现行制度下的经济行为，所以这种了解可以通过对经济变量作客观的数量分析来进行。不难看出，米契尔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都充满了制度主义的色彩，这正是这位并未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仍被视为制度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原因。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是指在一个特定事业中使用某种东西的成本是由于没有把它用于其它可供选择的最好用途上所放弃的利益。用某种资源生产某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未把该种资源投

入其他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生产所放弃的利益。

机会成本的概念与企业会计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有区别的。企业会计成本不包括正常利润，而机会成本包括正常利润。会计成本是购买原材料、劳动等的直接成本加上折旧、企业一般管理费等间接成本，不包括自有专利估计费用、自有资金估算报酬等"正常利润"。之所以把自有资金估算报酬列入机会成本，是因为自有资金的使用也存在多种选择，若厂商自己不把它用于生产，他可以贷给别人而取得利息。因此，他至少应取得和贷款利息相等的估算报酬。换一个角度讲，如果厂商不是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生产，而是从银行贷款进行生产，那么到头来他不仅要向银行支付本金，还要支付利息，这笔利息支出当然要算作成本。

同样，厂商自有的专利也应有一笔估算报酬列入机会成本，因为可以设想，如果厂商不是自己拥有专利而是向别人购买专利，他当然要把购买专利费列入成本。

机会成本事实上是一种选择成本，它是因选择行为而产生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很重要，它对分析资源的有效使用具有重要作用。资源的稀缺性是一桩不可否认的事实。任一种资源可有多种用途。把资源用于某种用途就会在同时放弃其他选择。要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就要把它用于生产最能满足社会需要并能使产量达到最大化的商品的生产。

机会成本的概念不仅适用于生产的选择，也适用于消费的选择，不仅适用于经济行为，也适用于非经济行为。只要是有选择的行为，就都存在着机会成本。例如，每个人的时间安排也都存在机会成本，把时间安排于某一项活动，就放弃了把时间用于另一项有价值活动的机会。

成本（Cost） 在经济学中成本是指厂商在从事商品和劳动生产或分配时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对一个厂商来说，他要把他所购买的生产要素用于最利的用途上。因此，经济学理论中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考察成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厂商要使某一生产要素的单位成本等于该要素用于其它用途时所能赚得的最大数额，也可以说，在某一特定事业中使用某种东西的成本是由于没有把它用于其它可供选择的最好用途上所放弃的利益。由于经济学中的成本是指机会成本，所以它与一般的会计成本不同。会计成本只包括购买原材料、劳动等的直接成本以及折旧、一般管理费等间接成本，这些显成本不包括正常利润，经济学中的成本不仅包括上述显成本，还包括属于正常利润的自有资金估算费用，风险费用等隐成本。例如企业主自有资金估算利息不包括在会计成本中，但却包括在经济学的成本之中。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成本–收益分析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在成本分析中区分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加以讨论。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特指对某一经济项目进行系统的、定量的评估，以决定其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值得实施的。这里的经济项目可以是某种投资、新商品的开发或政策的变动等。成本–效益分析不是从企业收益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得失，也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领域（如环境、技术等）它与一般的项目评估的区别在于，它是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得失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以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的，可以看作福利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成本–效益分析一般要涉及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要尽可能准确地估计此特定的经济项目一旦实施，会在哪些方面产生社会影响，如产量、收入分配、价格水平、环境等可能发生变化；其次，要定量地衡量这些变化的具体大小；再次，要将每种变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以货币数量的形式表示出来，加以汇总，得出实施该项目对社会的总效益；最后，将总效益与实施该项目的总成本（机会成本）进行比较。有时，还需要对所运用的模型进行灵敏性分析，说明模型中某些参量的变化对研究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能反映结论的有效性，也便于决策者调控某些参量。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从马歇尔沿袭下来的"剩余分析"方法，另一个是所谓的"规划方法"，通过求解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优化问题，以"影子价格"来评估社会成本与效益。事实上，在实际分析中，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某些项目的实施会产生极其复杂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效果，而这些外部经济与不经济在传统的价格机制中是无法衡量的；在衡量某一项目未来收益的价值时，人们需要确定一个未来和现在价值的折算率，这涉及到个人对未来价值的评价，社会最优增长模式及消费的外部性等问题；有时，为了避免用复杂到无法操作地步的总体模型来进行分析，人们采用分步规划，分散决策的办法来简化模型，这又会引起各个步骤的规划是否相关的问题，同时，大规模生产的不可分性也给分散决策方法造成了新的问题；一个经济项目的实施，还会带来收入分配上的影响，是否应该考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如何评价这种影响，也是成本–效益分析中的难题。经济学家们在试图解决上述问题时发展了不少方法，但显然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有的批评者对"成本–效益分析"所依赖的"存在一个社会福利函数"、"生产可能性集合是凸集"等假定提出怀疑，

有人则认为将所有的福利得失都用货币来表示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认为现行的"成本-效益分析"无法排除个人的主观态度的影响，因而会产生很大的结论上的偏差。尽管如此，"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对于分析社会活动对福利变动的影响问题来说，目前仍是其它方法所不可替代的。

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　成本函数是描述成本与产出和投入物价格之间关系的一种函数。对成本函数的定义有赖于生产函数的构造。以最简单的成本函数推导为例。假定生产者处于完全竞争的地位，这意味着生产者是投入物价格的接受者，而不能左右投入物的价格；生产者的目标函数是求得成本的最小化。生产者用 n 种投入 $x_i(i=1,2,\cdots,n)$生产单一的产品 y（$y>0$）。产出 y 是在给定时期内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投入 x_i（$i=1, 2, \cdots, n$）可以用向量 x 表示。$x=(x_1, x_2, \cdots, x_n)$，投入是非负的，所以 $x>O_n$（O_n 是具有 n 个分量的零向量）。生产函数 F 可以表示为 $y=F(x)$。进一步假定投入物的单价为 $P_i(P_i>0, i=1,2,\cdots,n)$，n 种投入物的价格用价格向量 P 表示，$P=(P_1, P_2, \cdots P_n)$。价格是正的，所以 $P_n>O_n$。

对于 $y>0$，$P>O_n$，生产者成本函数 C 可以定义如下：

$$C(y, p) = \min\{p\cdot x : F(x) > y,\ x>O_n\}$$

其中 $P\cdot x=\sum_{i=1} P_i x_i$。因此，c（y，p）是至少生产出 y 产出水平的最小成本。等式右端 min 表示 F（x）>y 这一生产函数下，选择最小的投入成本 p·x。只要假定生产函数 F 是连续的，便可求得最小成本 C。由生产函数 F 连续的假定，可以得到成本函数的 6 个性质。

性质 1：成本函数 c 是非负函数，即 $c(p, y)>0$。

性质 2：给定产出水平 y，成本函数 c 对于投入价格 p 来说是线性齐次的，即 $c(y,\lambda p)=\lambda c(y,p)$。

性质 3：给定产出水平 y，成本函数 c 对于投入价格 p 而言是非减函数，即对于 $y>0$，$p^1>p^2>O_n$，$c(y,p^1)>c(y,p^2)$。

性质 4：给定产出水平 y，函数对于投入价格 p 是凹的，即：

对于 $y>0$，$0<\lambda<1$，$P^1>>O_n$，$P^2>O_n$，则有 $c[(y,\lambda P^1+(1-\lambda)p^2)]>\lambda c(y,p^1)+(1-\lambda)c(y,p^2)$。

性质 5：给定投入物价格 p，成本函数 c 对于产出 y 为非减函数，即对于 $y^1>y^2>0$ 与 $p>O_n$，$c(y^1,P)>c(y^2,p)$。

性质 6：给定投入物价格 p，成本函数 c 对于产出 y 是下半连续的，即对于每一个 α 以及 $P>O_n$，$\{y: c(y,p)<\alpha\}$是一闭集合。通过对成本函数求导数与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导出成本函数的其它一些性质。通过对生产函数作出若干假定，还可以导出成本函数与生产函数间对偶的特征。

成本函数与支出函数在理论经济学与运用经济学方面具有广泛的用途。成本函数经常运用于计量经济学，用以描述企业或产业的技术状况。支出函数则经常被用于描述消费者的偏好。

成本弹性（Elasticity of Cost）　成本弹性是成本变动率比产量变动率。成本弹性分总成本弹性与平均成本弹性。总成本弹性是总成本变动率比产量变动率。用 TC 表示总成本，△TC 表示总成本增量，q 表示产量，△q 表示产量增量，E_c 表示成本弹性。E_c 表示为：

$$E_c=\frac{\triangle TC}{TC}\Big/\frac{\triangle q}{q}=\frac{\triangle TC}{\triangle Q}\Big/\frac{TC}{Q}=\frac{MC}{AC}$$

MC 为边际成本，AC 为平均成本。由于成本弹性表示产量扩大百分之一时，成本扩大了百分之几，因此可以用成本来衡量扩大产量是否合算。假定产品价格不变，若 $E_c<1$，扩大产量是合算的，若 $E_c=1$，扩大产量时总成本与产量同比例增加。若 $E_c>1$，扩大产量是不合算的。在平均成本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为 U 型曲线情况下，在 $E_c=1$ 时，恰好是平均成本的最低点，因为$\frac{MC}{AC}=1$，即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如在假定市场价格不随产量变化的条件下，$E_C=1$ 时，单位产量的利润为最大。除了总成本弹性外，还有平均成本弹性，它是平均成本变动率比产量变动率。若用$\frac{TC}{Q}$ 表示平均成本，$\triangle\left(\frac{TC}{Q}\right)$ 表示平均成本增量，q 表示产量，△q 表示产量增量、E_{AC} 表示平均成本弹性。

$$E_{AC}=\frac{\triangle\left(\frac{TC}{Q}\right)}{\frac{TC}{Q}}\Big/\frac{\triangle q}{q}=\frac{MC}{AC}-1=E_c-1$$

平均成本弹性等于总成本弹性减去 1，在 U 型平均成本条件下，平均成本达到最低点时，平均成本弹性等于零。　　（朱善利）

成本最小化与效用最大化（Cost Minimization and Utility Maximization）　效用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它们是推导马歇尔需求函数和希克斯需求函数的两种不同方法。在效用最大化时，假设成本预算固定不变，而在进行成本最小化推

导时，则假设消费者保持固定的效用水平。

1.效用最大化

理性的消费者希望购买两种商品 Q_1 和 Q_2 的一种组合，使他能达到最高的满足水平，他所面临的问题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即理性的消费者在他的收入限制条件内，将尽可能使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值，这就是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的收入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y_0=p_1q_1+p_2q_2$　　（公式 1）

其中，y_0 是消费者的固定收入，p_1 和 p_2 分别是 Q_1 和 Q_2 的价格，q_1、q_2 是他所购买两种商品的数量。他在第一种商品上的支付数量（p_1q_1）加上他在第二种商品上的支付数量（p_2q_2），等于他的收入（y_0）。

设消费者的序数效用效数为

$u=f(q_1, q_2)$　　（公式 2）

在公式 1 以预算约束下把效用（公式 2）最大化，列出拉格朗日函数：

$V=f(q_1, q_2)+\lambda(y_0-P_1q_1-p_2q_2)$　（公式 3）

式中，λ 是未定的乘数。一阶条件可以通过对公式 3 分别求关于 q_1q_2 和 λ 的偏导数而得到：

$$\frac{\partial V}{\partial q_1}=f_1-\lambda p_1=0 \quad （公式 4）$$

$$\frac{\partial V}{\partial q_2}=f_2-\lambda p_2=0 \quad （公式 5）$$

$$\frac{\partial V}{\partial \lambda}=y^0-p_1q_1-p_2q_2=0 \quad （公式 6）$$

根据公式 4 和公式 5，我们可以解出

$$\frac{f_1}{f_2}=\frac{P_1}{P_2} \quad （公式 7）$$

因此，为使效用最大化，必须使边际效用的比率等于价格的比率，由于 f_1/f_2 也就是商品替代率，所以一阶条件又可表述为商品替代率与价格比率相等。根据公式 4 和公式 5，我们还可以得到下列等式：

$$\frac{f_1}{p_1}=\frac{f_2}{p_2}=\lambda \quad （公式 8）$$

这表明对于一切商品，边际效用阶以价格均相等，而且这个比率值就等于我们要求的拉格朗日乘数。公式还表明，如果在某一特定商品上增加一个单位货币的花费，满足也应增加相应的比率。如果把新增的单位货币花在 Q_1 上而不花在 Q_2 上，消费者能得到更多的满足，那么这说明消费者没有达到效用最大化，通过把 Q_2 上的某些支出转移到 Q_1 上，他就能增加他的满足。因此拉格朗日乘数 λ 也可认为是收入的边际效用，一般假定 λ 是正的。

效用最大化的二阶条件是：

$$2f_{12}f_1f_2-f_{11}f_2^2-f_{22}f_1^2>0$$

此不等式满足严格正拟凹性的假设。

上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可以推广到 n 种商品，上述的性质和一阶条件也可以扩广，但二阶条件则必须用海赛（Hessian）加边行列式来表示。

2.马歇尔需求函数。

马歇尔需求函数式称普通需求函数，是在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将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数量作为商品价格和其收入的函数。马歇尔需求函数有时也简称为需求函数。

马歇尔需求函数是从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中推导出来的，在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中，公式 4、5、6，由三个未知数 q_1、q_2 和 λ 组成三个方程，通过解这三个方程即可求出需求函数。具体的说，需求函数为：

$q_1=g(p_1, p_2, y_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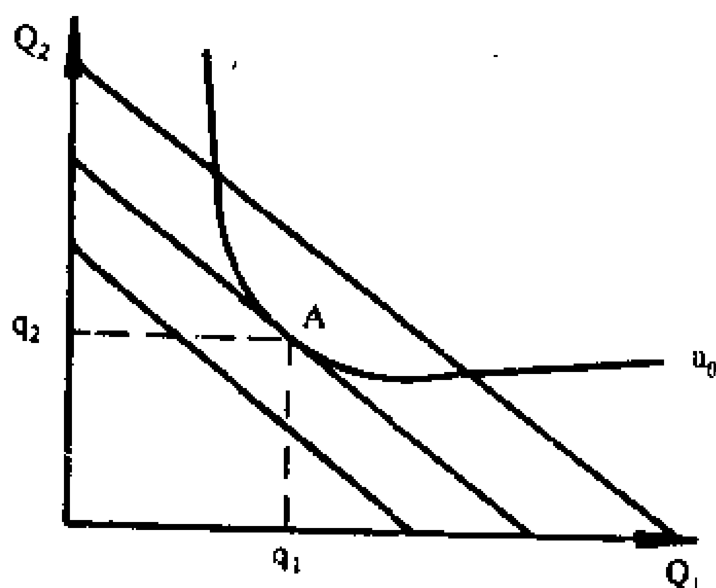
$q_2=g(p_1, p_2, y_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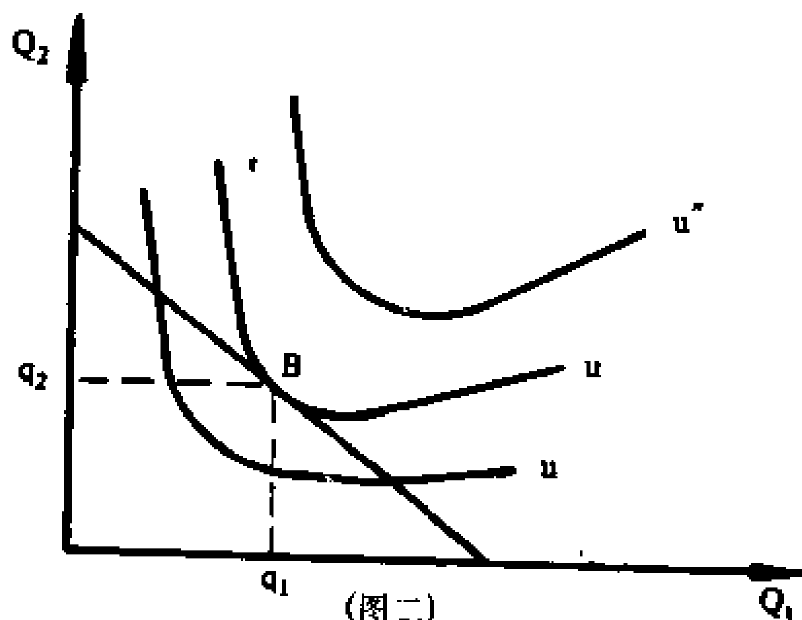
q_1 和 q_2 的解可由参数 P_1、P_2 和 y_0 来表示。

如果设效用函数为 $U=q_1q_2$，则通过解拉格朗日方程的一阶条件，可以求出马歇尔需求函数为：

$$q_1=\frac{y^0}{2p_1}, \quad q_2=\frac{y^0}{2p_2}$$

上述需求函数就是通过效用最大化求出的马歇尔需求函数。　　（图一）





（图二）

3.成本最小化

理性的消费者在保持效用一定的条件下，只是寻求费用成本最小化，即有许多成本组合均可以达到某一效用，但理性的消费者则选择成本最小的商品组合，在效用固定不变的情况下，使购买商品组合达到这一效用的成本最小的过程，称之为成本最小化。

与成本最小化相对应的需求函数称为补偿需求函数或希克斯需求函数，这一需求函数正是通过使成本最小化，推导得出的。假设效用函数 $U=q_1q_2$，效用固定为 U_0

则　$U_0=q_1q_2$

列出成本最小化的拉格朗日方程

$$E=p_1q_1+p_2q_2+\mu\ (U^0-q_1q_2)$$

根据一阶条件：

$$\frac{\alpha E}{\alpha q_1}=p_1-\mu q_2=0$$

$$\frac{\alpha E}{\alpha q_2}=p_2-\mu q_2=0$$

$$\frac{\alpha E}{\alpha \mu}=U^0-q_1q_2=0$$

解 q_1 和 q_2 后，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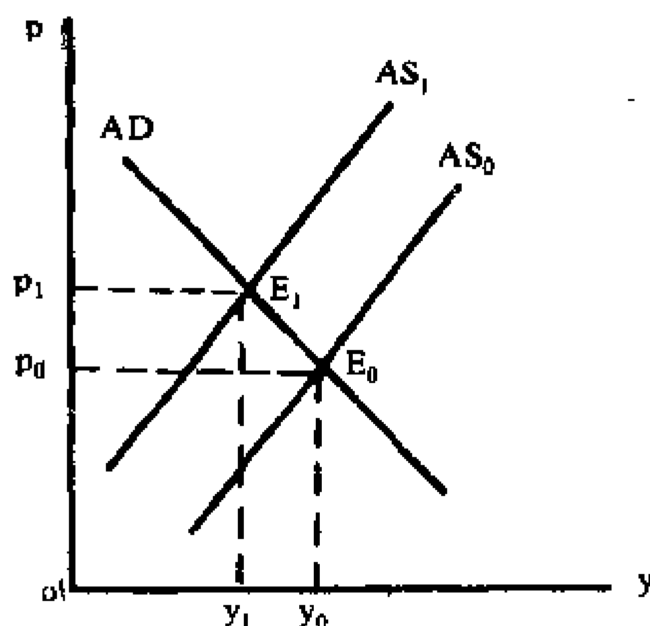
$$q_1=\sqrt{\frac{U^0p_2}{p_1}}\qquad q_2=\sqrt{\frac{U^0p_1}{p_2}}$$

这就是所求的希克斯需求函数，它与成本最小化相联系，q_1 和 q_2 也是关于 U^0、p_1、p_2 的函数，并且函数在价格上是零次齐次的。

成本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成本最小化是在固定的效用水平下使得成本最小，而效用最大化，则是在成本费用一定的情况下使效用最大。

成本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亦可用图来表示，在图一中 U_0 不变，成本约束预算线移动，相切于A点，这就是使成本最小值的商品数量组合。在图二中，成本约束预算线不动，无差异曲线移动，与预算线相切于B点，在这点上效用达到了最大化。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Cost—push Inflation）
又称"供给型通货膨胀"，指由于产品和劳务的供给和成本方面的原因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是从总供给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供给就是生产，产品的价格取决于成本。因此，从总供给的角度来看，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成本的增加。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只有在高于从前的价格时，才能达到与以前同样的产量水平。换言之，成本的增加就是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样，就可以用总供给曲线来解释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如下图所示。在下图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纵轴OP代表价格水平。原来总需求曲线AD与总供给曲线 AS_0 相交于 E_0，决定了国民收入水平为 Y_0，价格水平为 P_0。成本增加，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由 AS_0 移动到 AS_1。这时总需求曲线没变，AS_1 与AD相交于 E_1，决定了国民收入为 Y_1，价格水平为 P_1。价格水平由 P_0 上升到 P_1 是由于成本的增加所引起的。这就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是以生产费用理论为基础的，从50年代起流行于经济学界。根据生产成本总额中各个构成部分在刺激通货膨胀中的作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又可以分为强调工资成本增加的工资推动通货膨胀，强调利润增加的利润推动或价格推动通货膨胀，以及进口成本增加的进口性通货膨胀三大类。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凯恩斯主义者对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补充。货币主义者对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只有在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加，从而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即总需求增加）时，生产成本的增加才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货币供给量不增加，生产成本的增加只会引起通货紧缩。因此，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最终根源仍然在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



成本加运费、保险费价（简称：CIF）（Cost Insurance & Freight…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国际贸易价格术语，属装运港交货系统。又称为"到岸价格"，简称CIF条件，是国际货物买卖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价格术语之一。依据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于成本加运费、保险费价格术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如下：

A.卖方义务：

1.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货物和有关凭证；

2.按照通常的条件和通常的航线，自费订立运输合同，将货物用通常类型可供装运买卖合同货物之用的海船装运至约定目的港，并支付运费及在装运港装运时定期班轮公司所可能收取的卸货港的一切卸货费用；

3.自负风险和费用，领取出口许可证或政府签发的有关货物出口的其它证件；

4.自费在指定日期或指定期限内，在装运港将货物装船，如日期或期限未经指定，则应在合理期限内装船，货物装船后，卖方应当无延迟地通知买方；

5.自费向信誉卓著的保险公司投保有关货物的海洋运输险，并取得可以转让的保险单，上述保险应按平安险条款办理。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保险范围不包括特定行业或买方个别需要的特种险。买卖双方对盗窃，渗漏，破碎，与其它货物相接触而遭受的损坏及其它特定行业的特种险别，应自行考虑并约定是否出需要加保，买方如需投保战争险，卖方应予办理，但费用由买方负担；

6.除下述买方义务（4）条款的规定外，负担货物的风险，直至货物在装运港装船越过船弦；

7.自负费用无延迟地向买方提供载明把货物运至约定目的港的清洁的可转让提单、货物发票和保险单，如在提供单据时不可能取得保险单，则应提供由保险人授权签发的保险凭证，其中应载明保险单内的主要条款，并使其持有人享有相当于取得保险单那样的权利。提单应载明合同规定的货物，其日期应在约定的装运期内，并通过背书或其它方式规定，凭买方或买方同意的代表的指示交货。上项提单必须是已装船提单或已由轮船公司注明货物业已在约定期限内装船的备运提单。提单的内容如涉及租船合同，卖方应提供该项合同副本一份；

8.自费供给货物的惯常包装，但如依行业习惯该货物运输不需包装，则不在此限；

9.负担因装货而需支出的任何检查费用，如核对品质费、过磅费等；

10.负担货物至装船为止的任何捐税，包括因出口而支付的任何税款或费用，以及因办理装船手续而支付的费用；

11.根据买方请求，并由买方负担费用，提供原产地证明书和领事发票；

12.根据买方请求，并在买方负担风险和费用的情况下，给予买方一切协助，使买方获得前条规定以外的由装货地或原产地国家所签发的为买方将货物输入目的地国家或必要时经由第三国过境运输时需要的任何单证。

B.买方义务：

1.受领卖方所提供的符合合同规定的各项单证，并依合同的规定支付价金；

2.在约定的目的港受领货物，负担除运费和海洋运输保险费之外的，货物在海洋运输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直至货物运到目的港为止，其中包括驳船费和码头费用在内的一切卸货费用。但上述各项费用，如已包括在运费内，或在支付运费时已由轮船公司收讫，则不在此限，如需要投保战争险，费用由买方负担；

3.自货物在装运港装船越过船弦时起，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

4.买方对货物装运期或目的港的选择，如曾保留一定期限，却未能在期限内给予卖方以详尽指示时，应自原订装运期限终了时起，负担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和一切风险，但以上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5.支付因领取原产地证明书和领事签证单据而产生的费用；

6.支付因领取上述卖方义务（12）条款所指单据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7.支付一切进口关税和任何其它有关货物进口的捐税；

8.自负风险和费用，领取在目的地进口所需的任何许可证或其它类似证件。

CIF价格术语是国际贸易中最为通行的价格术语之一。卖方自负风险和费用将约定的货物装载于船上，并办理海上保险、获得合格的提单、保险单等货运单据，向买方提交。由此，卖方责任终止，而买方须负担货物越过船舷之后的一切风险，并接受卖方提交的合格的货运单据，支付货款。作为CIF合同，是象征性交货合同，卖方提交的货运单据只要符合买卖合同和信用证的要求，不论货物是否到达目的港或有否损害或灭失，买方均有义务支付货款，而无须卖方实际提交货物。

在CIF条件下，货物价格是货物在装运港的成本加上运至目的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这里的货物成本并非指卖方的购货成本，而应是卖方的出口成本，此成本中除包括了卖方的预期利润之外，还应包括货物运至装运港装船的运输和装船费用，以及卖方备齐货运单据所需的费用等，因此，货物的CIF价格就是货物的FOB价格加上货物从装运港直至目的港的运费和保险费。

成本加运费价（简为：CFR） （Cost and Freight… Name Port of Destination） 又称为运费在内条件。是装运港交货系统的价格术语。成本加运费这一价格术语，除了保险的投保手续和保险费的支付由买方自行负担外，其它各项内容在本质上与成本加运费和保险费价格术语（即CIF）相同。货物的买卖价格即是货物在装运港的成本加上运至目的港的运费。

在成本加运费价格术语下，卖方自负风险和费用，将约定的货物装船，迅速通知买方货物业已装船，并备妥装运单据，至此，卖方责任终止。而买方需自行办理保险，并负担货物自装运港越过船弦之后的一切风险，在买卖合同中，若采用CFR条件，需

要特别注意装船通知的问题，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C&F条件下，货物装船后，卖方须无延迟地将装船通知寄交买方，并注明商品名称、数量、船名、装船和开船日期以及装运港和目的港等，以便买方及时对货物投保，若卖方未及时发出装船通知，致使买方未能及时投保，招致的损失由卖方负责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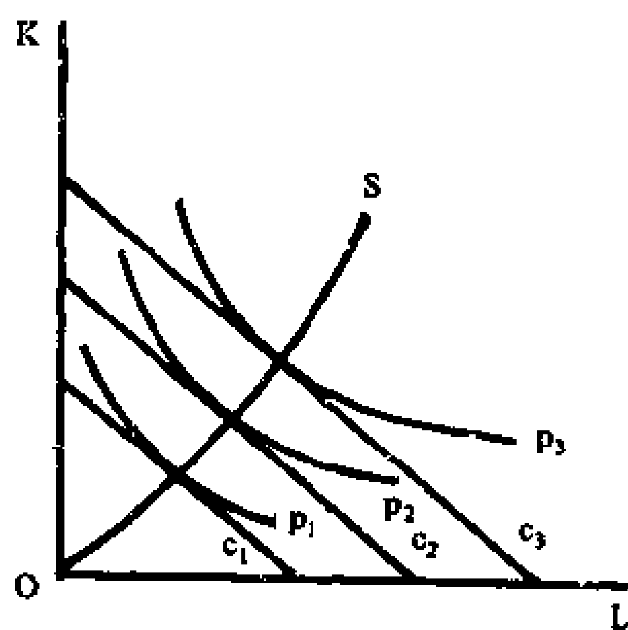
在国际贸易的实际业务中，若买方与保险公司订有预约保险合同（open poliog），往往会要求买方按照C&F价格术语报价。此外，有些国家为了扶植本国保险事业的发展，节省外汇支出，而规定从国外进口货物时，进口商须采用C&F条件，而不采用CIF条件。

吉芬之谜（Giffen's Paradox）　一般说来，需求是与价格成反向关系的，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但有时并非如此，这是一个与常识矛盾的谜。早在1800年，就有人论及此事，1804年已有人对此做出较为清楚全面的陈述。不过，关于这个谜的最著名的表述是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做出的："如同吉芬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贫穷的劳动家庭们来说，面包价格的上涨对他们的财力会造成巨大的损减，并把他们的金钱的边际效用大大提升，这些使得他们被迫减少他们对肉以及较贵的谷物食品的消费。这时，由于面包仍然是他们能够得到并愿意食用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他们对于面包的消费是更多，而不是更少。"关于罗伯特·吉芬，我们知道他是个英国统计学家，和马歇尔同时代。吉芬之谜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曾论述过吉芬之谜。

商品价格的上升会对消费者对该商品的消费数量产生两种效果。首先，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由于他的货币收入没变而商品价格上升了，所以他比以前穷了。结果他只好少购买一些贵重商品，多买一些他所不喜欢，认为是低档货的便宜的商品，在这些便宜的商品中包括更多的价格上涨了的那种商品。这就是说，对该商品的需求量的收入效应是正的。由于收入效应很大，大量的购买力被物价上涨所冲销了。这样，消费者就必须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低档货。其次，由于低档货的价格上涨提高了它对其替代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消费者愿意少买一些这种低档货，多买一些它的替代品，就是说，对于低档货的需求的替代效应是负的。如果正的收入效应足够大，抵消负的替代效应还有余，那么，吉芬之谜现象就发生了：商品的价格上升，对它的需求量反而更大了。这种商品就不仅仅是低档货，而且是吉芬商品了（我们反过来可以说，是吉芬商品则必然是低档货）。如果这种商品在一定的价格范围内，对所有的或许多消费者来说都是吉芬商品，那么，这种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就将是正斜率的了。不过，目前在吉芬商品需求曲线的存在性的经验证实上还缺乏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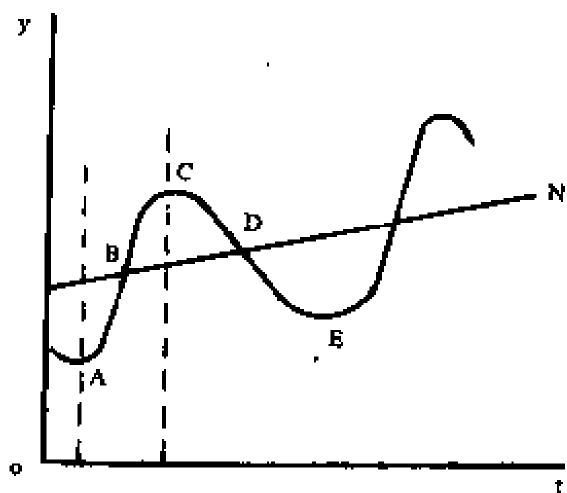
讨价还价（Higgling）　市场的讨价还价是亚当·斯密做为一个过程描述的，通过这个过程，"交换价值"向它的度量"劳动量"调整。斯密写道："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做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来做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讨价还价并不总在前面冠以"市场的"，它甚至可以象杰文斯所用的那样指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两个人之间的议价。马歇尔在一段话里描述了这种情况，在这里，生产是由两家垄断寡头所控制着，这时，决定剩余价值在两个寡头之间的分配的，除了讨价还价以外没有任何别的。

扩张途径（Expansion Path）　在保持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生产者总支出费用的变化而导致等成本曲线平行移动，连接这无数条等成本曲线与无数条等产量曲线的切点的轨迹称为扩张途径。下图由原点出发向右上方延伸的曲线OS便是扩张途径。图中K为资本，L为劳动。P_1，P_2，P_3分别为等产量曲线，C_1、C_2、C_3分别为等成本曲线。



扩张阶段（Expansionary Phase）　经济周期中从谷底到顶峰的这段时期，其中包括复苏和繁荣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经济活动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产量增加，就业增加，价格水平上升。这一时期的复苏阶段，经济活动仍低于正常水平，但经济呈上升趋势。在经济活动超过正常水平之后，就进入繁荣时期。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ot代表时间，纵轴oy代表国民收入，并以国民收入的波动来

代表经济的波动。N代表正常经济活动水平，N向右上方倾斜，表明经济活动呈上升趋势。A点为谷底，A—C为扩张阶段，亦称上升阶段。其中A—B为复苏时期，这时经济活动呈上升趋势，但低于正常水平（在N线之下）。B—C为繁荣时期，这时经济活动大于正常水平（在N以上），而且还在上升。经济中扩张阶段的长短取决于许多实际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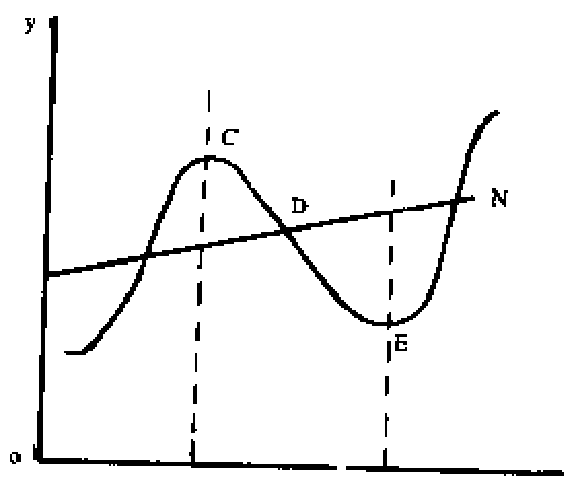


收益债券（Income Bond） 这种债券通常是在公司重整时，因财务困难而发行的一种混合型债券。其债息的支付要根据公司获利的多寡而定。如果盈利只够支付一部分利息，公司就将依该种债券的利率支付一部分；如果没有盈利，则累积到未来盈利时支付。但迟早必须支付利息。

收盘汇率（Closing Rate） 又译为“收盘价”，“开盘汇率”的对称。外汇银行在一个营业日的外汇交易结束前夕报出的汇率。收盘汇率反映了有关外汇市场外汇供求的最新变化。是下一时区外汇市场上外汇银行制订开盘汇率的重要依据。西方国家新闻媒介播发的多是当日的收盘汇率。

收盘价（Closing Rate） 又译为“收盘汇率”，“开盘价”的对称。见“收盘汇率”。

收缩阶段（Contractionary Phase） 经济周期中从顶峰到谷底的这段时期，其中包括衰退和萧条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经济活动一直处于下降时期，产量减少，就业减少，价格水平下降。这一时期的衰退阶段，经济活动仍高于正常水平，但经济呈下降趋势。在经济活动下降到正常水平之下时，就进入萧条时期。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ot代表时间，纵轴oy代表国民收入，并以国民收入的波动来代表经济活动。N代表正常经济活动水平，N向右上方倾斜，表明经济活动呈上升趋势。C为顶峰，C—E为收缩阶段，亦称下降阶段。其中C—D为衰退时期，这时经济活动呈下降趋势，但高于正常水平（在N线之上）。D—E为萧条时期，这时经济活动低于正常水平（在N以下），而且还在下降。经济中收缩阶段的长短取决于许多实际因素。



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Source of Income Tax Jurisdiction） 这是按照属地主义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它不考虑跨国纳税人的国籍和永久性居住地，只要收入发生在该国疆界范围内该国就可以行使税收管辖权。相应地，如果收入不是发生于该国疆界范围内，那么，即使是针对本国公民或居民的所得也不能行使征税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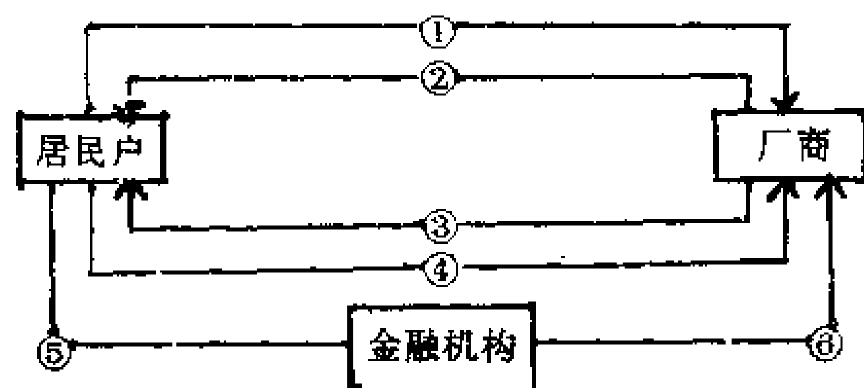
按照这一原则，各国政府只就发生于本国境内的所得行使税收管辖权，如果各国政府都这样做，那么税收权益的分配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但多数国家政府在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之外，往往还同时采纳实施居民税收管辖权，从而使国家间税收权益的分配复杂化。

即使同样实行收入来源税收管辖权，由于国家之间关于收入来源地的判定标准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也使得税收权益在国家内的分配无法简单明了，而是仍有进行国际协调的必要。举例说来，对于来自跨国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所得一般可以选择实际支付者所在国为来源地，也可以选择实际使用地为来源地，对于跨国劳务所得，可以选择劳务服务的实际使用地为收入来源地，也可以选择劳务报酬作为费用扣除的企业所在地为收入来源地，对于跨国营业所得一般以常设机构所在地为收入来源地，但对常设机构的含义又有不同理解。凡此种种都需各国进行协调解决。

收入政策（Income Policy） 又称“收入与价格政策”，指政府通过控制工资与物价来制止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政策，因为控制的重点是工资收入，故一般称“收入政策”。根据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通货膨胀是由于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引起的。因此，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须控制工资增长率。为了成功地控制工资增长率就还必须同时控制其他收入和物价上涨率。收入政策一般采取三种形式。

第一，工资冻结，或工资一物价冻结，即在某一特殊时期内，以法律形式强制性地限制工资与物价（主要是工资）的提高。第二，工资一物价指导线，即政府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确定工资增长率，作为劳资双方工资协议的指南，并相应地确定物价上涨率，以保证工资指导线得以实施。第三，税收刺激计划，即以税收入为手段使企业把工资增长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国在60年代之后大多实施了不同形式的收入政策，特别是工资-物价指导线运用较为广泛。一般认为，这种政策在短期内可以使菲利浦斯曲线向左下方移动，有助于制止通货膨胀。但是，这种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种政策限制了价格的正常作用，会引起资源配置失调。其次，对工资的种种限制会降低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各种工资增长率的限制都是根据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定的，但有些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远远高于社会水平，对工资增长率的限制就不利于这些企业以高工资增长率来刺激生产。最后，收入政策在实施中也有许多困难，例如，对工资增长率的控制较为容易，但对其他收入不易控制；对收入易于控制，而对物价的控制困难。这些使收入政策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收入与支出的循环流（Circular Flow Of Income and Spending）　各经济单位之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附图说明了包括居民户和厂商的最简单的两部门经济中的收入与支出的循环流。



附图中①表示居民户向厂商提供各种生产要素的劳务；②表示厂商向居民户支付生产要素劳务的报酬，即居民户得到收入；③表示厂商向居民户提供各种产品与劳务；④表示居民户购买这些物品与劳务，进行支出；⑤表示居民户的收入中部分作为储蓄存入金融机构；⑥表示厂商从金融机构得到了投资，从居民户与厂商的联系中可以看出，经济正常运行，即经济得以均衡地循环的必要条件是居民户的收入等于支出，或者居民户的储蓄等于厂商的投资。这种收入与支出的循环流反映了经济中各单位之间的关系，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

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Income Velocity Of Money）　又称"货币流通速度"，指货币存量在一年之内为该年收入流量提供资金的次数，即一年内收入流量（即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与货币存量之比。例如，一国某年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4000亿元，该年的货币存量（M_1）为625亿元，则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为6.4，即一元的货币在一年内为6.4元的收入流量提供了资金。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V）的公式是：

$$V=\frac{Y_N}{M}$$

Y_N 为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即实际国民生产总值（Y）与价格水平（P）的乘积：

$$Y_N=P\cdot Y$$

M为货币存量，所以，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公式亦可以写为：

$$V=\frac{P\cdot Y}{M}$$

或者

$$MV=P\cdot Y$$

上式就是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表达式，表明在货币流通速度V和实际国民收入Y不变时，价格水平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动。早期货币数量论者认为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是支付习惯、金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这些因素是稳定的，因此，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或不变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也证明了长期中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现代经济学家还从货币均衡的角度分析了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均衡的公式是货币供给（M／P）等于货币需求（即流动偏好）：

$$M/P=L(i,Y)$$

或者

$$M=P\cdot L(i,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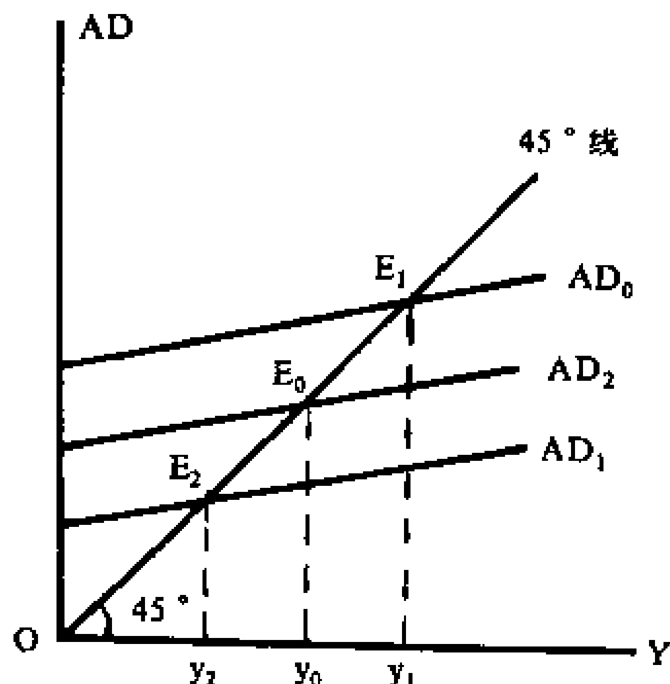
代入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基本公式，则得出

$$V=\frac{Y_N}{M}=\frac{Y_N}{P\cdot L(i,Y)}=\frac{P\cdot Y}{P\cdot L(i,Y)}$$
$$=\frac{Y}{L(i,Y)}$$

上式说明，收入的货币流通取决于实际国民收入（Y）与利率（I），即与货币需求[L(I・Y)]反方向变动。在这两种因素中，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同方向变动，即利率上升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之，亦反是。这是因为利率上升会增加持有货币的成本，从而加快货币流通。实际国民收入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如果这一弹性为一，实际国民收入变动不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但实际上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一，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会随实际国民收入增加而提高。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与利率上升都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在实际中，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不变

的，它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收入一支出模型（Income—Expenditure Model） 又称"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它分析的是在假定总供给可以无限扩大，价格水平、利率为既定的条件下，总需求如何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小及其变动。其基本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非合意的存货增加，由此引起国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合意的存货减少，由此引起国民收入增加，失业减少。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时，非合意的存货为零，从而决定了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所以，这一模型认为总需求的水平决定了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变动，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OY 代表国民收入，纵轴 O，AD 代表总需求，45°线上每一点都表示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即国民收入达到了均衡。当总需求水平为 AD_0 时，AD_0 与 45°线相交于 E_0，决定了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为 Y_0。如果总需求增加，即总需求曲线由 AD_0 向上移动至 AD_1、AD_1 与 45°线相交于 E_1，决定了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为 Y_1，$Y_1>Y_0$，表示由于总需求增加，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增加了。如果总需求减少，即总需求曲线由 AD_0 向下移动至 AD_2，AD_2 与 45°线相交于 E_2，决定了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为 Y_2，$Y_2<Y_0$，表示由于总需求减少，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减少了。总需求的变动引起均衡的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总需求变动所引起均衡国民收入变动的大小则取决于乘数。根据这一模型，政府应该采用需求管理政策，即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扩张性政策，而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取抑制总需求的紧缩性政策。这一模型是对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简单化表述，附图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P·萨缪尔森提出的，故称"萨缪尔森交叉图"(Samuelson Cross)。这一模型概述了凯恩斯关于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基本思想，并说明了总需求不足引起国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的可能性，并为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这一模型过于简单，并不是对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全面表述。首先，它没有考虑到货币和利率对国民收入决定的作用，从而不能全面说明总需求如何决定国民收入。换言之，这一模型只考虑到了物品市场的均衡，而没有考虑到货币市场的均衡。其次，没有考虑到总供给对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的作用，而实际上总供给也并不是既定的，或无限的。最后，这一模型没有说明价格水平的决定。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的"IS—LM 模型"、"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正是为了弥补收入一支出模型的不足而提出的。因此，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收入一支出模型并不能完全代表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收入（Income）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收入最熟悉的看法是，收入是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得到的货币，也就是说，是由于被雇佣而挣的钱。大多数人还会想到，还有其它一些项目也是收入，如由于储蓄而得到的利息，由于持有股票而得到的红利。而且，一般说来自我雇佣的收益也是收入，如医生为自己看病。

经济学家给本期的参加劳动过程而产生的收入赋予特定的含义，不管它们是由于一定时期的劳动而付的工钱或年薪，是由于货币的使用而付的利息，是股利、租金、利润，还是其它什么，都将收入支付以这样的方式定义：即它能增加社会总收入，也就是说，能增加国民收入。这个总量以后按种种自愿的或不自愿的转移支付以及税收形式在全社会成员间重新分配，从而产生一个新的可使用的或可支配的收入的再分配。这样，社会保险支付就是可支配收入的一个重要源泉，但它并不属于与生产相关的国民收入，因为被支付者并不是因为参加本期的生产而被支付的。

（一）概念。在经济学家中，对于与生产过程相联结的收入的广为接受的分析上的定义，是它代表财富产生的收益。这种定义强调了把收入概念与相应的财富概念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借助于通常的金融资产，这个思想的通常意义可以非常容易地建立起来。大家都会同意，1，000 元储蓄的利息收益体现了从这项资产中得到的收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由于储蓄 1，000 元而得到每年 60 元的支付，那么这 60 元就代表了收入。

再看金融资产方面的一个稍为复杂的例子。对于一个售价 100 元，股利每年 5 元的普通股的股东来说，什么是他的收入呢？当然每股 5 元代表了收入并可被认为是股东对公司的部分所有权所得到的股利。在任一个给定的时间区段内，比如说 1 年，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会影响每股股票的收入。比如，在付清所有的费用以后，公司的赢利大于它实际

支付给股东们的股利，就是说，公司很可能获得保留收益。这样，由于种种可能的原因，股票的价格会发生改变。这时经济学家会说，股东的收入明显地不是从价值 100 元的每股股票上得到的 5 元，因为公司的保留收益可能会使公司更有价值，从而以后可能赢利更大，从而以后分红更多，等等。关于股东的收入的通常观点是它是公司总收益的一个比例，而不仅仅是做为股利所支付的收益。这样，每股未分利润就会增加每股的红利，从而更准确地度量出拥有股票的收入。

再看较为复杂的例子。一个自我雇佣的企业经理的收入是什么？假定他每年的总收入是 10 万元，而现金支付的开销是 7 万元。他拥有企业的收入是剩下的那 3 万元吗？如果是，怎样看待这项产生 3 万元收入的资产？经济学家会说，3 万元中的一部分根本就不是收入，这是因为经营一家企业的全部费用并不仅仅是 7 万元的现金花销，还应包括公司财产的折旧。至于说产生 3 万元收入（减去折旧）的资产的性质，多数人会说收入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在企业投资的资本资产的收益，其二是另一种资产——管理企业的人类技能——的收益。前者包括设备、流动资本等，后者近些年来人们已习惯于将其作为拥有并管理企业的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

现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评价在有偿雇佣中的人们所收到的工钱与薪水的支付。这些支付是收入，可以被看做是知识、经验与技能的收益，也就是说，对人力资本财产的收益。这样的分析也有一定的困难，我们来考察一下住院见习医师。在他们训练职业技能的 2 或 3 年内每年的收入为 1 万到 1 万 5 千元。他们往往要用 20 来年的时间在学校接受教育和训练，以后很有希望获得比当住院见习医师期间高出几倍的工资。那么现在这样每年的 1 万多元是否是他们的收入呢？不是。他们在当住院见习医师期间所实际挣得的工资要高于他们在名义上每年 1 万多元的收入，因为这期间他们实际上正在进行很大的投资。至于这种投资的收益如何，大体上可把他们以后的收入与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和训练的人们的收入相比较。

这样，那种认为只有工钱和年薪的支付才是收入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只有当他们的技能水平维持不变（既不提高也不降低）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才能成立。否则，他们所真实挣得的收入就可能高于或低于他们在实际中所得到的收入，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就称为对人力资本技能进行投资所得到的收益。

由雇主代替雇员支付的健康保险显然属于雇员的收入。由雇主为雇员提供的免费或按优惠价进餐也属于雇员的收入。还有许多种类的雇主为雇员提供的权利、收益、方便，都可列入雇员的收入之中。唯一的问题是关于限制的问题。因为雇员在这种种优惠和福利面前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雇主提供哪些他就得接受哪些，雇主不提供的他就得不到，而不管他个人想接受什么，对接受什么不感兴趣。这样，这些优惠和福利对于他的价值，有可能低于雇主为提供这些优惠和福利而花费的价值。不过，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有弹性的，那么雇员就可以找到 1 个雇佣机会，使这家雇主所提供的优惠和福利恰好是他想要的那些。

所有者自己使用的住房以及私人汽车等耐用品，都显然会以给它们的所有者提供使用的方式带来收入。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看一下那些把自己所拥有的住房、汽车租借给别人使用的人，他们可从出借中得到租金，从而获得收入。对于那些不是以出租住房、汽车作为职业的人来说，由于他们自己拥有住房、汽车，从而不必去租房、租汽车，由此而节省下来的钱不也是收入吗？这里存在着 1 个对于从自己拥有的财产中得到的租金收入如何进行度量的问题。对于拥有自己的住房的人来说，美国有关部门是把估测将这样的住房出租能得到的租金作为其收入。现在，美国不把对汽车等耐用品做相应的估测得到的租金作为收入。

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简洁的概念上或经验上的答案。举一个例子，税收支付是否应作为纳税人的收入？美国通常的做法是把收入所得税和所有的社会保险税列入雇员的收入，不管这些税是由雇主缴纳还是由雇员缴纳。但对其它的税，如销售税，则不是这样处理，把税收支付作为收入的一部分需要加以说明：人们交税，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一定的公共服务，如国防、教育。辩论这些公共服务与所交的税是否相称是困难的。一种观点是，税收及由税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反映了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所做出的政治选择，人们一定要从政府那里得到与他们所交的税相等的公共服务，否则，税收一支出体系就必须改变以适应人们的要求。

那么，如何把收入这个概念延伸到各种没有报酬的工作呢？这个问题是重要的。许多由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提供的服务，几十年来是无偿的，而现在这些服务可以在市场上花钱购买。反过来也是这样，一些以前在市场上花钱购买的服务，现在由家庭成员之间无偿提供。前者如照看小孩，照顾老人，后者如做饭、打扫房间等家务劳动。恰当地度量不在市场上进行的活动的收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二）收入与产出。对收入的定义要求能使全社会成员的收入总和恰好等于社会生产的产出的总和。在收入和产出之间这种恒等式的建立，是通过对收入进行一种特定的定义而实现的。按照这种定义，收入是一种剩余，只有当产出已知时，才能确定收入的大

小。举例来说，面包厂的产出价值是由一定时期内面包的产量乘以面包的平均价格而得到的。生产过程的每一个参加者都得到自己的收入：工厂的工人得到工资，原材料（如面粉）的供应者得到的是他们供应的原材料的数量乘以其价格，债券持有者得到债息，股东（主要指优先股的持有者）收到股息，在之上建造工厂的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等等。最后有1个剩余的收入，即工厂所有者（主要指普通股的持有者，当然也包括其它股东）的收入。这个收入可正可负，它是在其它的收入（包括优先股的股息）全部分配完以后得到的，它是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产出的总价值与生产的各要素收入之间的差额。通过这个收入的定义，就可以使产出的总价值等于收入总值这个等式成为恒等式。

上面所列各种支付中，有一种与别的意义不同，对原材料供应者的支付实际上并不是收入。我们看一下原材料的供应者，比如说面粉的供应者磨粉厂。磨粉厂做为一家工厂，也要支付工人的工资、债券持有者的债息、股东的股息等各种支付，而它得到的是面包厂给它的面粉数量乘以面粉价格，记为X。这样，磨粉厂的总产出的价值为X，从而磨粉厂的各种收入的总和为X。在我们计算各个工厂加总后的总收入时，X做为磨粉厂的总收入被计入1次，又做为面包厂的面粉供应者的收入被计人1次，这样，同一个X就被计算进2次，这就产生了重复计算。这样，在计算面包厂所产生的收入时，就要把X减去，也要把其它原材料的价值减去。同样，在计算磨粉厂的总收入时，也要把原材料（如小麦）的价值减去。也就是说，在计算总收入时，我们要把对原材料的支付减去。这些原材料只是为了下一步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本身并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最终产品。与计算总收入时要把做为中间产品提供的原材料的价值减去一样，在计算总产品时，我们也要把中间产品减去，只计入最终产品。这样，国民收入与国民总产品相等仍然是一个恒等式。

（三）真实收入与货币收入。在一个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时期，真实收入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别比较明显。货币收入表示的是票面价值，而真实收入表示的是对货币收入的一种折算。因为在两个不同的时期中，同一个数额的货币量，在前一个时期所能买到的商品与劳务，在后一个时期可能就只能买到其中的一部分。两个时期的平均物价水平发生了变化，若将某个时期的货币收入作为真实收入，而将其它时期的货币收入折算成相当于这个时期的多少收入，这就是用恰当的物价指数加以折算。从另一个角度说，真实收入也就是能购买多少商品和劳务的能力，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将一定量的货币转化为可消费的商品与劳务，比如食品、衣服、理发。

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是指通过税收等政策，对社会各阶层的初次收入再进行调整。公平与效率一直是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公平可以带来稳定，而效率可以促进发展。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政策被认为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有效政策。一般情况，再分配的政策有税收政策、财产转移政策等。其中税收政策是主要政策。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累进税率，如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这一方法使得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以比低收入阶层更高的比例转移到公众那里，被认为是向公平迈进了一步。除税收之外，还有诸如抚恤基金、社会保障基金、财产转移等再分配手段。再分配政策包括事后分配政策和事前分配政策，事后分配政策包括上述全部政策，是对既定的收入分配格局重新调整的政策，而事前政策是保证在未来的收入分配趋于合理化。事前分配政策很多，包括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等，例如教育被认为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良好手段，教育可以保障机会平等，即受到同样层次教育的人得到同等收入水平的机会是相同的，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提高自己在社会职业选择中的机会，并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给别人带来外部经济性，因此教育政策是实现未来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政策。世界各国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评定标准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一般认为，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如果降低了基尼系数就被认为是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公平。

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 什么原则决定了每年物品与劳务的产出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这些原则公平吗？它们能增进效率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在对工会或垄断权力的树立或对不同的政府政策的反应中，这些原则对于不平等程度如何改变意味着什么？将来会有较多还是较少的贫困？在西方国家，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许多人会说，按照李嘉图的观点，这类分配问题是整个经济学的中心问题。

收入分配是由市场和政府共同完成的。政府以各种方式影响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这些方式包括税收（特别是公司所得税、财产税、货物税、资本增值税、遗产税），包括转移支付（对经过选择的工业部门的补助、对教育、对卫生保健等的补助，通过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进行），包括各种调节政策（特别是经过联邦储备体系来进行）。当市场配置好资源，并确定资源价格后，政策税收与转移支付再一次地改变收入分配（特别是通过个人所得税以及对没有可交换资源的人进行的转移支付）。

（一）市场的作用。经过近1个世纪激烈的争

论，分析市场作用的分配理论的主要框架终于形成，这是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9世纪末完成的。现在，这些理论已成为正统理论，它把下列问题做为中心问题：在某个时点上，是什么决定每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企业家、土地—的价格？就是说，是什么决定工资率、利息率、利润率与土地的租金率？李嘉图被这个问题所困惑：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土地的收入份额会怎样？马歇尔和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J.B.克拉克）的主要贡献是把分配问题转化为现在的价格问题，而不是未来的份额问题。这样，就把收入分配问题置于一般的价格理论之下，即研究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的交易比率的决定。只要由供给与需求所决定的价格与均衡数量知道了，计算份额就是很容易的了。

如同正统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最能刻划均衡的要素价格的是，每种要素都按照它们对产出价值的贡献而得到报酬，这个报酬既不应大于也不应小于要素所做的贡献。这种分配方式还带来效率，因为它使每1种要素都被使用在最合适的地方，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

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起，就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但不平等。对此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争论。不过即使是拥护市场经济的人也不认为市场经济尽善尽美，他们指出使得要素市场不完整的一些因素：工会、买方垄断、卖方垄断、种族与性别歧视、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控制，等等。同时，几乎所有拥护市场经济的人都承认存在着计算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困难。

对市场经济持批评和反对态度的有各种类型，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考虑在内的话，在目前的西方社会，最直言无忌的批评也许来自琼·罗宾逊或约翰·罗尔斯的追随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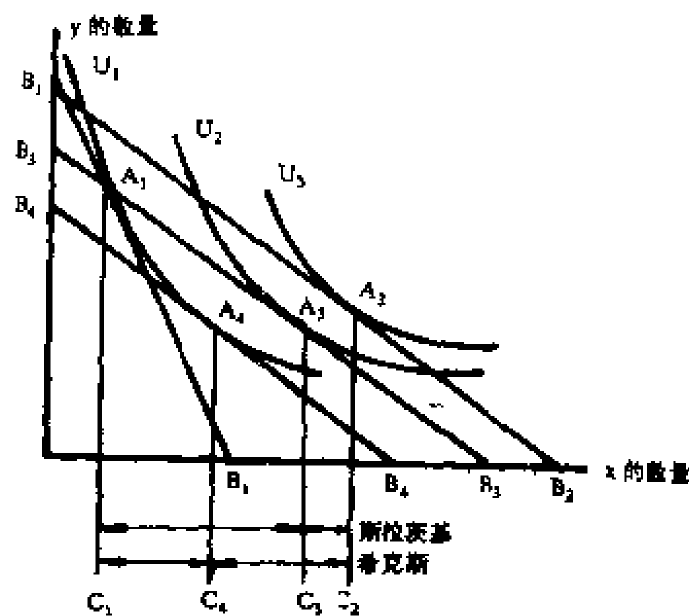
罗宾逊学派（或称为后凯恩斯学派）是从研究计算边际产品的困难开始的。比通常那些对正统理论的批评者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正统理论是矛盾的，它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是错的。他们认为由联合作用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产出，是不能在这些各不相同的要素间分割的，即使是分析上的分割也不行。也就是说，根本就不能假设当增加某种要素时它的生产力会下降。由于进行这种不可能的分割带来模糊不清，结果是强有力的各个集团（地主、劳动者、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力争使自己有利，而最后发生决定作用的是竞争者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政治手腕。在后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分配理论再次成为份额问题，因此毫不奇怪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李嘉图的著作。

罗尔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从另一个方向进攻。罗尔斯批判了正统理论的伦理学基础。他认为，把产出按照每人对产出的贡献来分配是不正义的。他认为，即使有的人生来就比别人聪明能干，他们对产出的贡献比别人大，也不能让他们得到较多的收入，除非这样可使最不具生产能力的人受惠。罗尔斯很怀疑这种受惠能否实现。若不能实现，就需一套另外的制度。创建一套较为公平的制度是收入分配理论的前沿之一。

这些批评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没有哪个政府把收入分配当作只是由市场来做的事。相反，现在所有的政府都积极寻求影响收入分配。

（二）政府的作用。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在争论政府能否改变收入分配。在本世纪之交V·帕累托为他的定律提出经验上的证据。他的定律说，在所有的国家，不平等性是大致相同的。现代研究发现，按照大多数的标准来衡量，在任何一个国家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后，不平等性保持不变。不平等性并不因国家而异，不平等性与经济发展有关系，政府也对不平等性有影响。政府较大地改变收入分配在技术上是困难的，而主要的困难是政治上的。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税收体系趋向于比例制的，而不是累进制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政治原因。同样，转移支付体系趋向于对多数人有利，而不仅仅是对穷人有利。如果税收是累进的，转移支付是以效率为目标的，那么不平等性会减少，但对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来说，一般说来减少不平等并不是最重要的经济目标。

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　我们以两种商品（记为x和y）为例来说明。如图，其中B_1B_1为初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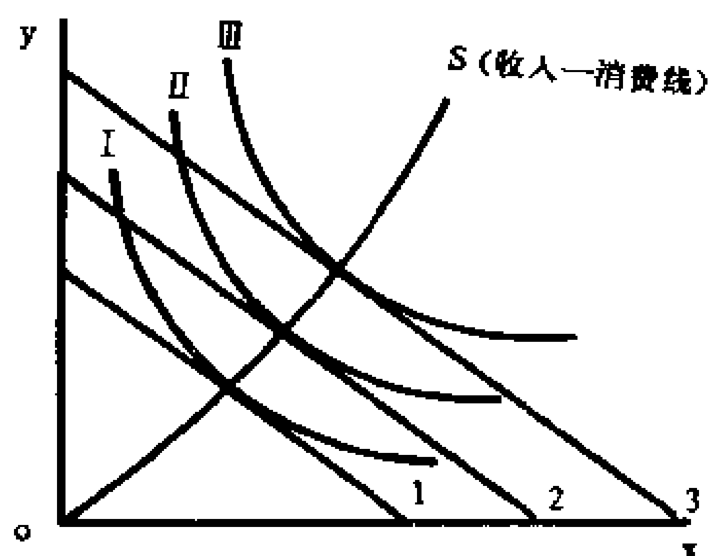


时的预算线，它与某条无差异曲线（记为U_1）相切，记切点为A_1。现在1种商品（设为x）的价格发生了变化（不妨假设x的价格下降），其它条件不变，这会引起x和y的购买量的改变。

如图，预算线B_1B_1沿点B_1转动至B_1B_2，并与一条无差异曲线相切于A_2，这个从A_1到A_2的变化就是价格变化的总效应。它是由2个部分合成的，一为替代效应，一为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假设实际收入

保持不变时，x的价格的变化对x的购买量的影响。收入效应是指由于x的价格变化，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的变化，从而产生的对x的购买量的改变。在几何图示和数学表达上可以把收入效应看做是价格效应减去替代效应以后的结果。对于"实际收入保持不变"有不同的定义，从而收入效应也不相同。斯拉茨基认为，如消费者能购买价格变化前他原来购买的1组商品，则实际收入保持不变。这样得到1条预算线B_3B_3，它经过点A_1，且与B_1B_2平行。它与某条无差异曲线相切，记切点为A_3。我们从各切点A_i做垂线，得到相应的C_i点。我们用C_i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来表示在x的购买量上发生的影响。在斯拉茨基看来，替代效应为C_1C_3，相应的收入效应为C_3C_2。但更常用的定义是希克斯的：消费者的效用不变就是实际收入不变。这样得出1条预算线B_4B_4，它与B_1B_2平行，并与初始的U_1相切，记切点为A_4，并得到相应的C_4。这时替代效应是C_1C_4，收入效应是C_4C_2。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价格变化的总效应都是C_1C_2。

收入—消费线（Income—Consumption Cure） 当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变而消费者的收入发生变化时，消费者的预算线将会平行移动并与代



表不同满足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连接这些切点的轨迹便是收入—消费线。上图中的原点出发向右上方延伸的OS线便是收入—消费线。它是由连接不同水平的预算线（1，2，3，…）分别与不同水平的无差异曲线（Ⅰ，Ⅱ，Ⅲ，…）相切的切点得到。由收入—消费线可以导出恩格尔曲线。图中x表示x商品，y表示y商品。

收入税赋(Taxation of income) 又称为所得税。收入税赋是指个人按照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应纳税收入向政府交纳的一种税。以美国为例，在征收所得税时，将一年内所有收入，包括工资、红利、房租等，合并成为可调整总收入(AGI)，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扣除和减免，如扣除公债的利息收入，得出应纳税收入做为收入税赋的税基。所得税的税率通常是累进的，应纳税收入越高，税率越高，所得税税额越大。如今，所得税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单一税种，以1982年为例，所得税收入占美国和日本政府税收的45%，占加拿大政府税收的44%，占英国政府税收的38%，占德国政府税收的34%。

作为重要的一种直接税，所得税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如何测算应纳税收入，例如很难计算未经市场的收入，这使得人们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将市场活动转为非市场活动，以逃避纳税，这大大地歪曲了所得税税基，又如交纳所得税应按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而不是货币收入水平，这就要求纳税时，将名义收入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而许多国家还没有实行。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制定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要达到最优的累进税率，使每个人真正按照纳税能力交纳所得税，理论上看，应按照帕累托最优法则，使每个人纳税时的边际牺牲相等，但由于收入悬殊，必然会造成高收入级次税率极高，这无疑会抑制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的形成，阻碍经济发展。

收益（Revenue） 西方经济学中，收益一般是指厂商出卖产品得到的收入，即价格与销售量的乘积，这是总收益或毛收益（gross revenue）的概念。总收益包括成本与利润两大部分，包括厂商销售一定产量的全部收入。与总收益相对的是净收益，即从总收益中减去成本后剩余的部分，笼统地讲净收益也就是利润，在企业核算中利润的概念有多种，所以这么说不够准确，但在理论分析文章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表述。净收益也可以继续分解为厂商可支配收益和不可支配收益。后者是以不同方式从净收益取走的部分，余下的就是可支配收益。除总收益与净收益之外，我们经常还见到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之说，平均收益是厂商销售每一单位产品所得到的收入，即为总收益除以产量，边际收益是每增加销售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入。这是我们在微观层次的厂商范围内对收益的讨论。实际上收益完全可以涉及到其他领域。收益一词的含义曾一度与收入相一致，但现在已不同了。按照亚当·斯密的定义，毛收益是一国一年内的劳动与土地的产量，净收益是居民可自由用于购买生计用品、方便品和娱乐品而不侵蚀资本的那部分收入，这种模棱两可的定义引起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争论：是把工资获得者的生存基金看作是循环资本，把它们从净收益中提出来，还是把它看作为最终消费，然后看作为部分最终消费品。这种争论到现在也没有结束。在18世纪亚当·斯密的法国的前辈们就已作过明确定义：净收益为年生产财富减去同样生产规模的生产过程的

垫支部分之后的剩余，作为工资界限的生计工资显然是一种垫支，因而不属于净收益。净收益是归所有者的剩余产品的价值。李嘉图认为净收益包括地租和利润，国家的公共开支来自于净收益。在他看来如果工资超过工人的生计水平，那么就有部分净收益被劳动者所得。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学界长期的上述争论反映了对净收益界定的不同意见，而对总收益的看法则是趋于一致的，这就是社会生产的全部收入。

社会无差异曲线（Community Indifference curves） 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与个人无差异曲线相类似的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了一组商品，它们可以在社会各成员之间分配，以致在社会内产生一种特定的效用分配。经济学家们在商品平面上作出等值的无差异曲线，表示从社会整体上看，社会商品总量的各种组合是无差异的，因此，把这些曲线称为社会无差异曲线。各条社会无差异曲线（不同于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可能相交，一个社会的商品束在社会成员间有多少种分配方法，就会有同样多的无差异曲线穿过商品空间的任何一点。

社会无差异曲线一般通过西托夫斯基等值线（Scitovsky contours）求出，西托夫斯基假定所有的个人享受特定的效用水平，除一种而外其余所有的商品产出都处在特定的水平上，然后决定为了满足上述具体要求，而必须持有的那种例外商品的最小数量。如果个人的无差异曲线是凸的，西托夫斯基等值线将也是凸的，然而这些等值线并不是“社会的”无差异曲线。因为社会无差异曲线只能从它们的斜率中产生。举例来说，在图1中，A点在西托夫斯基等值线 S_1 上，对于 S_1 上的任何点，Q_1 和 Q_2 两种商品的产量，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在两个消费者之间分配，即Ⅰ享受效用水平 U_1^0 和Ⅱ享受效用水平 U_2^0。但是，对于A的数量也可以按不同的方式分配，分配方式之一的结果是Ⅰ享受效用水平 $U_1^{(1)}$，而Ⅱ享受 $U_2^{(1)}$。对于这些新的 U_1 和 U_2 的值，在寻求最大化过程中，将决定一个全新的点集合，它描述对应于分配给个人的不同效用水平的一条新西托夫斯基等值线。这条新的等值线必定在A点与 S_1 有一个共同点，但是，很明显没有任何理由去排除两条等值线是完全重合的。因此 S_1 与 S_2 既可以在A点相交（如图1所示），也可以互为切线，不管哪一种情形，都是与无差异曲线的一般性质一致的。

通过最优化的引入，可以排除那些相交的无差异曲线。令在两个人的社会中，社会福利函数为 $W=W(U_1, U_2)$，对于 $W(U_1, U_2)=W^0$，找出对应于效用 (U_1, U_2) 的所有分配的西托夫斯基等值线，这些等值线如图2所示。对应于 Q_1 的任何值的最小数值的纵坐标，表示保证社会福利水平 W^0 所必要的 Q_2 的最小数量。因此，在图二中，西托夫斯基等值线的包络线就是保证社会福利水平 W^0 所必要的 Q_1 和 Q_2 最低量组合的轨迹，这被称作伯格森等值线（Bergson contour），根据伯格森等值线的斜率，我们便可求出不相交的社会无差异曲线。

利用社会无差异曲线，我们可以找出社会最大的福利点，从而确定使社会总商品分配达到最大福利的值。顺便提一下，西托夫斯基等值线表示的也是商品的帕累托最优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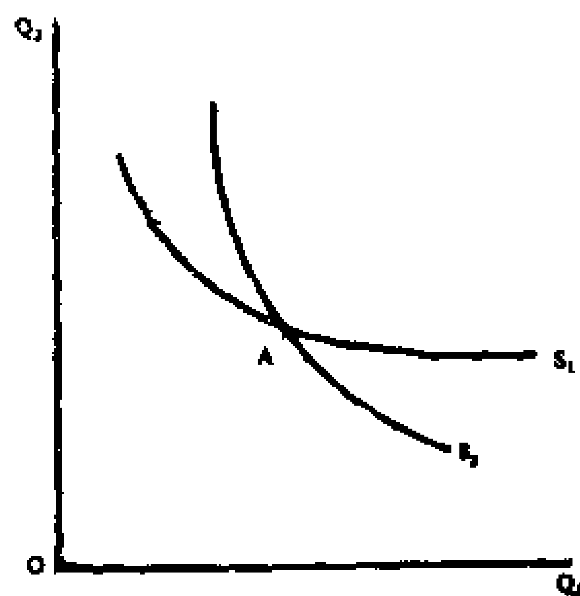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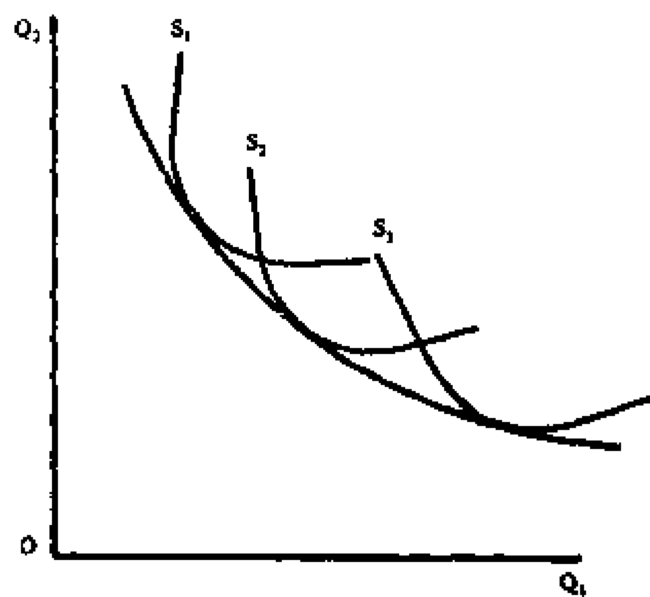


图2

团体理论（Group Theory） 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挪威数学家李（S.Lie）提出了他的转换团体理论（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groups），近来，经济学家们发现李的分析方法可运用于以下的经济学领域：技术变化理论、二元、动态对称理论、经济保护法等等。李的转换团体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分析团体与微分方程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对这种方法的借鉴也涉及到高深的数学知识，如积分、矩阵代

数、集合论、拓扑学、概率论、博弈论以及最优控制理论等。对李的团体理论的运用是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不变”（invariant）关系的有力的最为系统的方法，在这种分析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常常用微分（或差分）方程来表示的。假定生产中技术进步发生的条件是一个因果规律，它有中性的或同一的要素要求有以下关系：

T_t: $\overline{K}=e^{\alpha t}k$, $\overline{L}=e^{\alpha t}L$

其中 K 是指资本，L 是劳动力，T 是技术，α（$\alpha>0$）是技术进步率，$\overline{K}$代表有效资本，$\overline{L}$代表有效劳动，t 是技术变化指数。上述两方程可以分别叫作劳动与资本的技术进步方程。如果技术进步指数从 t_0 到 t_1，则有效资本$\overline{k}$，有效劳动$\overline{L}$就从：

T_{t0}: $\overline{K}_0=e^{\alpha t_0}K$, $\overline{L}_0=e^{\alpha t}L$

转化为：T_{t_1}: $\overline{K}_1=e^{\alpha t_1}k$, $\overline{L}_1=e^{\alpha t_1}L$

这个转化满足以下条件：(1) T_{t_0} 和 T_{t_1} 连续变动的结果与以下单一转换是相同的：

T_{t_2}: $\overline{K}_2=\exp(\alpha(t_1+t_2))K$. $\overline{L}_2=\exp(\alpha(t_0+t_1))L$

(2) 当不考虑技术变化时，即 $t=0$，有$\overline{K}=K$，$\overline{L}=L$，(3) T_t 的反函数同样是属于 T 的函数，用 $-t$ 换 t，有：

$T_t^{-1}=T_{-t}$: $K=e^{-\alpha t}\overline{K}$ $\quad L=e^{-\alpha t}\overline{L}$

那么由于管束着$\overline{L}$与$\overline{K}$的转换满足上面三个条件，技术进步函数$\overline{K}$、$\overline{L}$就形成了李的团体，确切地说，它们构成李的一个参数的连续转换团体。现在李的分析方法得到广泛的运用。这种迅猛的发展是与西方经济学分析的数理化倾向是分不开的。除了在技术进步分析中运用李的方能带来很大的方便以外，比较静态分析、隐性经济函数分析、生产者技术与消费者偏好的二元性分析、指数理论都大大得益于李的团体理论。

价格术语（Terms of Price） 又称为贸易术语、交货术语或价格条件。价格术语在国际贸易中，是用以说明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风险责任和费用的专有词汇。在国际贸易业务中，一般由几个简单的英文缩写字母表示。

价格术语本身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价格术语代表了货物的价格。采用不同的价格术语，买卖双方所应承担的风险、责任和费用就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风险责任和费用是通过不同的价格表示出来的，这是因为买卖双方各应负担的风险责任和费用与所买卖的商品的价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如果卖方所承担的风险大、责任重、支付的费用多，货物的售价也相应地比较高；反之，卖方所承担的风险小，责任轻，支付的费用也少，货物的售价也就较低。这也是将价格术语又称为价格条件的原因。价格术语除承担价格标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代表着全部的合同条件，买卖双方一旦确定了根据某一价格术语进行交易，这一价格术语就会涉及买卖合同中全部条款的签订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 费用的负担问题：商品从装运地直至到达目的地，其间所需支付的装货、运输、卸货、存储、保险、捐税等费用，哪些费用需由卖方负担，哪些需由买方负担；

(2) 责任的承担问题：从商品的启运地直至到达目的地，一切有关租船订仓、装货卸货、投保、申领许可证、报关纳税等事项，哪些需由卖方办理，哪些需由买方办理；

(3) 风险的划分问题：商品从启运地直至到达目的地，这一过程中，货物遭受损坏或灭失的风险由哪方承担；

(4) 货物所有权的转移问题：商品从启运地直至到达过程中，货物的所有权，从何时何地，凭何种单据，才算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这样，根据不同的价格术语而签订的合同，通常就以这些价格术语为其定名。例如：根据 FOB 和 CIF 价格术语签订的合同，就称为 FOB 合同和 CIF 合同。买卖合同一经定名，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就应具有一致性，这些一致性的条款就共同地确定了合同的性质。

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在价格术语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国际贸易惯例。这些贸易惯例包括三方面：

(1) 国际性的商业团体为了贸易的顺利进行而对价格术语制订的一系列规则。其中包括：①《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它主要对内陆交货、装运港交货和目的地交货等 14 种价格术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是现今比较权威的国际贸易惯例，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和采用。②《华沙——牛津规则》主要说明 CIF 合同的性质；③《美国对外贸易修订本 1941》主要说明了美国对外贸易中常用的价格术语，在南北美洲极为流行。

(2) 港口惯例和行业惯例中有关价格术语的解释。一些历史悠久的世界主要港口，如汉堡、鹿特丹、利物浦等都形成了一些港口码头惯例，这些惯例也都涉及双方对货物的风险、责任、费用的划分问题。除了港口、码头的不同惯例外，各个行业，如天然橡胶、谷物、油料等行业，在采用不同的价格术语时，所指的内容、有关的风险责任和费用的负担也都形成了传统性的解释。一般是这些行业中具有垄断地

位的同业工会制订行业标准合同。

(3) 各国司法机关的典型判例和仲裁机构的典型裁决中有关价格术语的解释。法官和仲裁员在审理案件时的记录作为案例长期积累下来，典型性的案例就成为一般性的解释，成为贸易惯例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现行的价格术语共有 14 种，分别是：(1)工厂交货价(EXW);(2)铁路交货敞车交货价(FOR／FOT);(3)船边交货价(FAS); (4)装运港船上交货价(FOB); (5)启运机场交货价(FOA);(6)货交承运人(FRC);(7)成本加运费价(C&F);(8)运费付至目的地价(DCP); (9)成本,运费,保险费价(CIF); (10)运费、保险费付至目的地价(CIP); (11)目的港船上交货价(EXS); (12)边境交货价(DAP); (13)目的地码头交货价(EXQ); (14)完税后交货价(DDP).

在国际贸易中，价格术语通常都是以卖方履行交货义务的地点作为划分买卖双方彼此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界限，根据交货地点的不同，可以将上述贸易术语进行分类。第一类属于出口国内陆交货价格术语。内陆交货的价格术语主要有：工厂交货价、铁路交货价和敞车交货价。按照这类价格术语，卖方在出口国内陆约定地点完成交货义务。第二类属于装运港交货的价格术语，装运港交货价格术语主要有：船边交货价；离岸价；成本加运费价；到岸价；启运机场交货价。在此类价格术语下，卖方在出口国家的装运港口完成交货义务。第三类是目的地交货价格术语，按照目的地交货条件，卖方在进口国的港口或内陆指定地点完成交货义务。属于目的地交货价格术语有，目的港船上交货价；目的港码头交货价；完税后交货价；边境交货价。此外，对于货交承运人价；运费付至目的地价和运费，保险费付至目的地价这三种价格术语，按照交货地点的不同，既可能归为出口国内陆交货价格术语，也可能归于装运港交货价格术语。从货物的售价来看，按照出口国内陆交货条件成交时，由于卖方所承担的责任较小，风险小，而负担的费用少，所以卖方货物的售价也相应较低；相反，按照目的地交货条件成交时，卖方货物售价也相应较高。

由于价格术语既能用来标明货价，又能划分双方当事人的风险责任和费用，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双方订立买卖合同，只要选用双方满意的价格术语，就不必对合同的各项条款逐一进行讨论，从而简化了交易程序、节约了交易费用，缩短了交易时间。

价格水平（Price level）　价格是一种商品或投入物的价格，表现为获得一种商品或劳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对价格以必须付出的某些其他商品的量来表示。因此，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以同样比率上涨，则绝对价格（用货币表示）升高，而相对价格不变。绝对价格水平一般用拉斯佩耶斯物价指数（Laspeyres Price Index）和帕什物价指数（Paasche Price Index）。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分为三大类：涉及确定单个价格的理论与总价格水平有关的理论、以及适用于资源配置的理论。价格决定理论可按它们所属的市场结构分类。在竞争性市场中，厂商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其产品价格由市场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互作用决定的，非竞争性市场中，厂商的需求曲线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该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故所有厂商原则上都可作为价格制定者。在垄断的情况下，利润最大的垄断者面对市场需求曲线，有时实行价格歧视。在双边垄断时，价格和产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在宏观经济学中，价格水平决定于这样三个因素：一是货币存量、二是货币周转速度，三是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即

$$P=\frac{M\cdot V}{Q}$$

其中 M 为货币存量，V 为货币周转速度，Q 是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量，或为基期额，P 为物价水平。因此价格水平与货币发行密切相关。价格水平的上涨，或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价格与数量（Prices and Quantities）　价格与数量是市场用于交换的商品与劳务的两个重要的，可观察的特征。价格与数量都与单位有关，所使用的单位例如重量单位：公斤、磅、吨等；长度单位米、公里、英尺等；容量单位升、加仑、桶等。商品的价格也都是单位价格，例美元／每公斤；美元／每米，美元／每桶等。价格与数量这种商品与劳务所具有的内在特征为商业与经济中对商品进行统计计算提供了基础，也为对经济进行定量分析提供了基础。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等都是建立在商品的价格与数量可以观察和可以测度的基础之上的。价格与数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这种相关的关系既可以从单位商品与价格的关系得到反映，又可以从某种商品的总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得到反映，单位商品与价格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在，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若计量的单位扩大某一倍数，单位价格也将扩大相应的倍数。如果单位由公斤变为吨，那么单价也将扩大一千倍。某种商品的总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如果考察的问题不是均衡价格的决定，而是价格与数量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么，提高价格将会使数量增加，增加数量将会使价格减少，如果考察的问题是均衡价格的决定，假定其他条件既定，只考察某种商品局部均衡的情况，那么需求的增加将提高均衡价格；需求的减少将压低均衡价格。供给的增加将压低均衡价格，供给的减少

将抬高均衡价格。

均衡价格与数量间密切相关关系使得经济学家不仅对价格与数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早就产生兴趣，而且对于设计一种调节价格与数量的经济机制发生兴趣。从斯密开始，直至今天，西方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各种商品数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经济学家如兰格等人则主张用计划的方法来调节数量与价格。折衷主义者则综合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提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

价格—收益率（Price–Earning Ratio） 价格收益率是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与股票收益的比率，即将股票的市场价格除以公司股票每股的年收益。例如，若某公司股票价格每股为 100 美元，而每股每年收益为 10 美元，则股票的价格—收益率为 10；若每股每年收益为 5 美元，则股票的价格—收益率为 20。价格—收益率通过把股票市场价格表示为股票收益的位数为衡量公司的成就提供了较好的尺度。一般而言，若某公司股票的价格—收益率较高，则说明该公司发展较快。但价格—收益比率低的公司为投资者所提供的收入是稳定的，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可以根据各公司股票不同的价格—收益率选择投资机会。

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 价格机制是指价格对于经济调节的机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调节着各个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任何一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供求都由它们的价格支配。劳动的供求由劳动的价格—工资调节，土地的供求由土地的价格—地租调节，资本的供求由资本的价格—利率调节，在局部均衡分析的情况下，每一种商品或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与该种商品或要素的价格呈反方向变动，当价格提高时，商品的供给量增加，需求量减少；在价格降低时，供给量减少，需求量增加，价格将调节商品与要素的供求达到均衡。当一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而出现超额供给时，产品积压迫使生产者降低价格，使价格恢复到市场均衡价格，从而消除超额供给；当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时，超额需求使得消费者竞相争购，迫使价格恢复到市场均衡价格，从而消除超额需求。在一个各种商品、要素的价格相互影响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各种商品、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将调节整个社会商品与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所有商品的供求分别相等时达到整个经济的均衡。价格机制如同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资源的配置与商品的生产。

价格刚性（Price Rigidity） 是指价格确定后的不易变动性，即价格缺乏弹性。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市场竞争为垄断所替代，出现了市场的不完全性，因而，企业生产的物品，其价格是由垄断地位的大公司规定的，物价被其控制、操纵，形成了价格"刚性"，即价格规定后不易降，使物价经常处于较高的指数上。价格刚性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交织并存现象，即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时提出来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价格刚性连同工资刚性的存在，势必引起物价和工资的螺旋式上升。工资刚性是指劳动者的货币工资由于工会对劳动市场的垄断，使其表现为不易下降的状况，工资失去弹性。为了解决物价与工资轮番上涨，西方学者提出了物价—工资管制政策，但因为这一政策是以企业利润为前提，故物价管制是流于纸面而难以实现的。那么，如何利用价格刚性与工资刚性去解释经济中的滞胀现象呢？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是根据技术、工种、地位、年龄、性别等而不同的，而且又分为许多个别市场。市场间不易协调，造成失业与空位并存，即有些工作找不到人干，而社会上又存在失业，二者又不能替代。失业时，工资刚性使工资不易下降，有空位时工资又上升，造成失业与工资上升并存，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价格刚性与工资刚性的观点，是以美国学者托宾等为代表的。

价格测度（Price Measurement） 价格测度问题属于经济统计问题。经济统计中涉及到价格的测度问题。西方工业国家有两种测度价格的方法，一种是类别定价法（specification pricing），另一种是单位价值定价法（Unit–Value pricing）。类别定价法需要精确列出货物品名，并要力求对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同类货物进行定价。类别定价法对于认定产品质量变化以及表示市场上新产品的出现是重要的。但是要精确地列出产品种类可能会产生某些困难、生产者或配售商人也许不会采纳所选择的精确的货物品名，或者他们没有现成精确的货物品名。这使得某些统计机构负责使用不精确的类别定价法公布价格指数，这种不精确的类别定价法使用物品经常采用的价格。这意味着同一类物品在不同的商店将有不同的类别定价。不精确的类别定价法的特征在于收集同样物品在两个相连时期的价格的能力而不必收集相同物品在不同商店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物价指数的目标不是去测度价格水平而是测度价格的变化率。因为它也不需要对每种物品有精确的类别定价。单位价值定价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是用总的发货价值或定货价值除以数量指标。这种方法较多地用于同质产品的情况。例如每吨水泥价格可以通过用水泥总发货价值除以总发货的吨数求出。但是，如果产品是非同质的混合产品，使用单位价值定价测度则比较麻烦。例如，如果

水泥厂生产的水泥有好坏两种等级，同时这两种水泥混合的发货量在不同的时期是变化的，而且每种等级水泥的价格是不同的，结果价格测度就会不同于未发生任何价格变化前的价格测度。此外，在出现产品质量变化，新产品，交易价格与实际价格不一致，契约价格和现价差别问题时，也会使价格测度发生问题。由于这众多问题的存在，使得价格成为经济统计中最难以测度的经济量之一。

价格理论（Price Theory） 价格理论又称微观经济学理论。它是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制度如何调节商品生产与配置资源的理论。价格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中各种商品与劳务的相对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而不研究社会一般物价水平是如何决定的。研究一般物价水平是一种总量分析，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价格理论可以分为五个相互关联的部分：①消费者行为理论；②厂商理论；③市场以及产品定价理论；④分配理论；⑤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理论。这五个部分都与商品价格与产量的决定、资源的配置有关。

消费者行为理论 消费者行为理论假设存在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各种商品 $x_i(i=1,\cdots,n)$，各商品的价格为 $P_i(i=1,\cdots,n)$。消费的效用依赖于他所消费的商品量。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_1,\ \cdots,\ x_n)$$

消费者既是商品的需求者，又是资源的供给者，消费者通过供给资源而取得收入，其收入 y 构成了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在市场各种商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所消费的各种商品价格乘以某数量的加总不能超过其收入 y。假定消费者的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在消费者将全部收入用于消费的情况下，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所支出在各种商品的每一元钱所购买的每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 MU_i $(i=1,2,\cdots,n)$ 是相等的。即

$$\frac{Mu_1}{P_1}=\frac{Mu_2}{P_2}=\cdots=\frac{MU_n}{P_n}$$

从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导出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曲线。由商品对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与边际替代率递减的规律可以导出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市场所有消费者对于某一种商品的需求的加总构成该商品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表明需求量与价格反方向变化。从消费者选择行为到市场需求曲线的形成可以看出消费者的行为与市场价格有着密切关系。市场价格影响个别消费的消费，所有消费者对某一商品需求的总和构成决定价格的两股力量之一——市场需求。

对消费者关于商品需求行为的分析可以推广到消费者的其它选择行为，例如消费者对于闲暇与收入的选择，消费与储蓄的选择，资产组合方式的选择等等。

生产者行为 生产者行为理论主要是厂商理论。在生产者行为理论中，假设厂商投入资源、生产商品，因此，厂商是商品的供给者，资源的需求者。每个厂商产出 q 与投入之间的关系构成厂商的生产函数，假定厂商生产产品需投入劳动 L、资本 K 两种要素，则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示为

$$q=f(K,\ L)$$

具体厂商的具体某一产品生产函数采取特定的形式，例如某些产品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AK^{\alpha}L^{\beta}$$

在可变技术系数条件下，厂商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可以使用不同的要素组合比例，即要素可以相互替代以生产一定的产品量。厂商究竟以多大的比例使用劳动与资本以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取决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以及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既定条件下，价格降低将引起用资本替代劳动，反之用劳动代替资本。

在要素价格既定的条件下，由厂商的生产函数可以导出厂商的成本函数。厂商的成本状况是厂商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厂商对产品的供给由其成本状况决定。由于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从而厂商的边际成本具有递增的特征，这决定了厂商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价格必须随边际成本的递增而增加，厂商才愿意向市场提供产品。厂商提供商品时所得销售收入购成厂商的收益。成本与收益分析决定了所有厂商的行为。假定厂商的目标是求得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只有在厂商的边际成本 MC 与边际收益 MR 相等时，才能保证厂商利润的最大化。此种情况下决定了厂商的供给量。所有个别厂商对于某种产品的供给构成该商品的市场供给。

从生产者的生产函数以及生产者在既定要素价格下的生产行为到市场供给曲线的形成，可以看出生产者行为在价格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市场商品价格与要素价格既决定单个生产者商品产量与要素的需求量，众多个生产者所生产的某种产品的产量又构成了该产品市场供给，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一起决定该产品市场均衡的价格与数量。

市场结构与产品定价 任一产品的均衡价格与均

衡数量由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共同决定，这是价格理论最一般的结论。实际上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决定于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在边际成本为递增的条件下，厂商在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处达到利润最大化，这是生产者行为分析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实际经济中，各种产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各个厂商的行为要复杂得多。产品的定价与厂商的行为与市场结构紧密相关。一般把厂商所处市场的结构分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产品定价与厂商行为是不同的。

完全竞争的市场是具有众多个买者与众多个卖者所形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各个生产者的产品是无差别的，厂商和消费者可以自由进、出该行业，厂商与消费者都具有完全的信息。由于生产者众多，因此单个厂商并不能决定商品的价格，而只能接受现行市价，市场价格由众多个生产者所形成的总供给与众多个消费者形成的总需求决定。单个厂商的需求曲线具有无穷大的弹性。在既定价格下，单个厂商生产多少产品都可以卖掉。完全垄断的市场处于另一极端。一个行业只有一个生产者，没有相近的产品可以替代垄断的产品。完全垄断市场上，垄断者对产品的价格具有决定权。垄断竞争的市场是介于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之间的市场结构。在这一市场结构中，厂商数很多，彼此竞争激烈。厂商的产品相近但不相同，产品间可以相替代但又不能完全替代。产品的差别造成了垄断因素，但产品的相近性又造成竞争。该产品市场上，由于竞争相当激烈，厂商不能完全决定商品价格，但由于产品有差别，厂商对价格决定有一定影响，厂商间除了可以利用广告和提高产品质量进行竞争外，还可以通过降低价格进行竞争，以扩大自己产品的销路。寡头是一个产品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厂商生产大部分该种产品的市场结构。每一家厂商在该种产品生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而在价格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寡头市场厂商数目少，所以每一个寡头的决策都会对其它寡头产生很大的影响。各寡头对于这种影响的反应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寡头的行为模型是不确定的。

对于购买者来说也存在多种市场结构，例如独买（只有一个买者）、买方寡头等。这与产品销售市场结构是对称的。

分配理论　分配理论称为要素定价理论，即研究资本、劳动这类生产要素的价格与收入如何决定的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增加，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最终将递减。厂商对于要素的需求决定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与要素的价格。如果单位厂商是要素价格与产品价格的接受者，并且厂商的目标是求得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厂商达到最大利润的均衡条件是要素的边际收益产量（产品的价格乘以边际产量）等于要素的价格。由于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因此对要素的需求量与要素的价格成反比，即只有降低要素的价格，厂商对于要素的需求量才会增加，因为这种情况下，较多的要素投入所产生的较小的边际生产力与较低的要素价格相适应。单个厂商的要素需求函数就是这样导出的。对所有个别厂商的要素需求函数进行加总便得到对于某种要素的市场需求。要素的市场需求与要素的市场供给共同决定要素的价格。收入分配理论还包括非竞争条件下要素的定价问题，例如要素市场为垄断、政府或其它组织干扰下的要素定价问题。静态条件下的要素定价理论也被扩充到动态的分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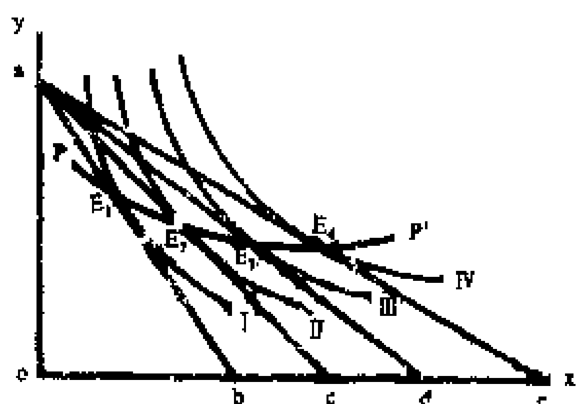
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理论　一般均衡是相对于局部均衡而言的。局部均衡所涉及个体经济行为或单个市场的均衡问题。这种分析方法把其他个体的行为或其他市场看作是既定的，只对所研究的个体行为或个别市场的均衡状况及条件进行分析。上述的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不同市场结构下商品均衡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的均衡大都属于局部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则同时考虑了所有商品市场供求状况及其决定因素，考虑了各个市场间的相互联系，用联立方程对于所有产品的产量与价格，对于所有要素的产量与价格进行分析求解。所有市场的商品与要素的供求同时达到均衡时才能达到一般均衡。

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基础之上的。福利经济学用来分析社会在达到交易与生产的一般均衡状态下，社会所达到的福利状况。福利经济学中常用来判断福利最大化的条件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已达到这样的境界，继续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或收入的再分配只会在提高一个人福利（用效用表示）的同时降低至少另一个人的福利（用效用表示）。福利经济学还涉及到在存在外部性、公共产品条件下的福利改进问题。这些问题是福利经济学中的高深的问题。

价格—消费线（Price-Consumption Curve）
在无差异曲线分析中，当某种商品 x 的价格发生变化时，消费者预算线的斜率将发生变化。这些不同斜率的预算线将与不同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连接这些切点的轨迹便是价格—消费线。下图中的 PP′ 线便是价格消费线，它表示在商品 y 的价格不变，而商品 x 的价格连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预算线的斜率发生变化（预算线分别由 ab 变为 ac、ad、ae，…），这

些不同斜率的预算线分别与代表不同效用的无差异曲线（Ⅰ，Ⅱ，Ⅲ，Ⅳ，…）相切于 E_1，E_2，E_3，E_4，…点，连接这些切点的 PP′ 线便是价格—消费线。由价格—消费线可以导出商品的需求曲线。



价格领先（Price Leadership）　价格领先是寡头行业的厂商定价的一种方式。价格领先是厂商不完全勾结的一种方式。这种定价方式是寡头行业的厂商们暗中决定与该行业的领先制定价格者制定相同的价格。领先制定价格者可能是该寡头行业的低成本厂商或在该行业占支配地位的或大的厂商。在某一厂商为寡头部门占支配地位的厂商时，由它来制定该行业产品价格，并允许该行业其他厂商在这一价格下出售全部想要出售的数量。在寡头行业的产品价格由低成本厂商领先制定的情况下，只有价格领先者通常会生产与出售最佳水平的产量。

价格管制（Price Control）　价格管制是政府为了防止生活费用的不断上涨而对商品和劳务价格实行的管制。它是政府对于市场的直接干预。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平时期较少实行价格管制，价格管制主要在战时使用。但是一些国家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也实行价格管制政策。例如，美国本世纪七十年代初曾实行价格管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用价格管制的办法稳定价格最终是不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国家实行的价格管制与七十年代初美国实行的价格管制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观察这两次价格管制的经历以及历史会发现价格管制一般是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各种价格实施全面管制，能收到一定效果。第二阶段，由于众多不可避免的环境方面的变化，影响冻结的相对物价，需要对变化的价格进行调节。第三阶段，由于上述原因取消对某些物价的控制。第四阶段，由于所有商品的价格相互关联，对某些价格取消控制的结果将会波及到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且波及面越来越大，这样导致政府对越来越多的商品价格取消控制，从而使得控制总价格水平上升的政策的有效性降低。第五阶段，取消大部分商品价格控制的结果最终导致放弃价格管制制度，这时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与在不实行价格控制情况下的价格水平一样高，甚至更高。因此，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不主张实行价格管制。

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　价格歧视是指某种商品的出售者对同样的购买者收取不同的价格或者对所购买的不同数量的商品收取不同的价格的销售手段。价格歧视是在商品的销售者具有某种垄断力量的情况下才可能运用的手段。价格歧视分三级，即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

一级价格歧视是指商品的卖主对所出售的每一单位商品都收取不同的价格。例如，某垄断者商品的需求函数是 $q_d = 18 - P$ 不管垄断者出售多少个单位，他对每一单位商品收取的价格是不同的。对第一单位商品，垄断者收取的价格是 17，对第二个单位收取的价格是 16…等等。如果垄断者共销售 6 个单位，那么他的总收益 TR 是这 6 个单位不同卖价的加总即 $TR = 17+16+15+14+13+12 = 87$。即使对于同一个购买者出售了这 6 个单位，卖主也同样对这个购买者所购买这 6 个单位商品收取不同价格。二级价格歧视的歧视程度低于一级价格歧视。

二级价格歧视是指卖主对所出售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收取同一价格，而对额外多售出的一定数量的该种商品收取较低的同一价格。例如，某垄断者商品价格的需求曲线仍是 $q_d = 18 - P$。垄断者出售 6 个单位商品。垄断者对所出售的前两个单位商品按 $P = 16$ 的单价收，对所售出的第三、四个单位商品都按 $P = 14$ 的价格收取，对所出售的第五、六个单位商品都按 $P = 12$ 的单价收费。这种情况下，垄断者所出售的 6 个单位商品的总收益 $TR = 16 \times 2 + 14 \times 2 + 12 \times 2 = 84$。总收益少于一级价格歧视下的总收益。这是因为一级价格歧视下，卖主剥夺了消费者的全部剩余；二级价格歧视下，买者得到一分消费者剩余。

三级价格歧视是指卖主在不同的市场上对同一商品收取不同的价格，但在不同市场出售的该商品所得的边际收益 MR 相同。实行三级价格歧视的条件是对卖主的产品存在着分隔的市场，而被分隔的各个市场对卖主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价格弹性是不同的。例如一个卖主在本国和其它国家市场上分别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两个市场是分隔的，对于卖主的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曲线，因而卖主可以在不同的国家的市场上对自己的产品收取不同的价格。在三级价格歧视下，卖主也没有夺取全部消费者剩余。

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Price—push Inflation）　又称"操纵价格的通货膨胀"，或"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指垄断厂商为了增加利润而提高价格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厂

商控制了某些产品的供给，从而也控制了价格。它们利用这种垄断地位主动提高价格，由此引起了通货膨胀。特别是当工资和其他成本提高时，垄断厂商往往以此为理由，以更大的幅度来提高价格，从而使物价的上升幅度大于工资和其他成本提高的幅度，其差额是利润的增加。这种利润增加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就称为价格推动的或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源是垄断的存在，以及垄断厂商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消除这种通货膨胀的办法是限制垄断厂商的行为。

价值（Value） “价值”一词的含义和内容，历来是经济学家争论的对象。对于价值的含义，有人称其为“购买它种商品和劳务的能力”，有人称其为“足以交换它种商品和劳务的效用”，也有人称价值为“表示商品满足人类欲望的效用程度”等等，众说不一，解释各异。

同时，对于价值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有人将价值与使用价值等同，认为能够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具有效用，随之具有使用价值，从而决定了物品的价值，这时价值的内容具有了主观随意性。也有人将价值与商品的交换价值等同，认为为了满足人类欲望，个人的物品须与它人的物品相交换，这时，物品作为交换手段的能力，称为交换价值，也就是价值。

作为价值理论，主要有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两者互相对立。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有时将这种劳动视为生产商品时所投入的劳动量，有时又将其视为商品所能交换的劳动量，而且斯密本人有时也将地租、利润等视为价值的源泉。而后，李嘉图澄清了斯密理论的混乱，主张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投入的必要劳动量，但李嘉图认为这时劳动价值是相对价值，而不是绝对价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完整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所包含的抽象劳动，构成价值的实体。劳动价值理论受到边际效用学派的反对，他们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对抗劳动价值论。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于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都予以否定，如瓦尔拉(L.Walras)和帕累托（V.Pareto）等。

价值与分配理论中的剩余方法（Surplus Ap-proach to Value and Distribution） 回顾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分析史，在分配与相对价格理论中有两个一脉相承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古典经济学那里的“社会剩余”方法，它最早出现在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坎蒂隆（R.Cantillon）的著作中，魁奈（F.Quesnay）的《经济表》第一次予以系统表述，并在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家中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方法。马克思也接受了“社会剩余”分析方法并加以发展。

一、剩余方法的前提及其特征

对剩余的概念，魁奈在他的《经济表》里认为如果社会产品（包括所有的农产品）年复一年地生产它自身，即不增加也不减少，产品中有一部分须重新投入到生产，剩余的年产品就构成剩余或净产品，它维持社会基本生存条件。工人们的生计工资是用于再生产产品的一部分这就将再生产分析与社会各阶层的产品分配联系在一起，魁奈就把剩余与社会产品中地主的份额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进而表明剩余不仅产生自农产品，除了地租，利润也是剩余的组成部分。剩余的决定是古典理论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剩余实际上被看作是社会产品中分配给非劳动阶层的那一部分，它是社会产品中被基本消费吸纳后的剩余部分，即

社会产品－基本消费＝剩余（除去工资后的份额）

其中工人的工资旨在生计水平，是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之所以把剩余看作是工资以外的社会产品的份额，其逻辑基础是认为社会产品和真实工资是先于剩余而被决定的，于是剩余就是社会产品减去真实工资的余额，那么社会产品与真实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呢？李嘉图和魁奈认为工资是由生计水平（即维持工人再生产和社会生产过程不断重复进行的水平）所决定，亚当·斯密的平均或自然工资的决定要更复杂一些，他没有直接解释因人口增长超过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吸纳而使工资有接近历史的生计水平的趋势，但他解释了劳资双方在工资问题的谈判中资本家总是处于有利地位。总之古典经济的一致看法并不是工资由生计水平决定，而是由其他条件，如传统的制度的因素决定，这些因素的作用常常反映在生计水平上，它们与影响社会产品和除工资以外其他部分的因素不同，于是经济学家们就把工资的决定分开来研究，正如魁奈和李嘉图将工资解释为传统的生计水平，而斯密和马克思认为决定工资的因素要复杂得多，同样的分割研究方法亦被后来人们用于研究社会产品中其他部分的决定。物质社会产品也被看作是先于其分割之前决定的，总结魁奈、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的观点，社会产品量依赖于（1）决定可雇佣劳动力数量的资本积累所达到的层次，（2）生产技术状况，它决定一定的积累水平与单个劳动力的物质生产量。当社会产品量与工资被确定时，作为余额的非工资部分就是二者之差。

二、古典分析结构与现代分析方法的比较

古典理论中，实际工资与社会产品的分割从而进行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后来的主流理论是很不相同的。剩余分析方法的核心是分割分析，因为工资、社会产品以及生产的技术状况已经被决定，这样剩余的决定需要商品相对价格的决定。于是我们应该找出实际工资、社会产品生产的技术状况（当独立变量看待）与工资以外的份额（构成剩余）、相对价格（二者为非独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把实际工资、社会产品和生产的技术状况作为独立变量来处理就意味着不能对它们之间及与它们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也不能同时考察这三个变量的作用，而只能分割处理。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已经讨论过实际工资，社会产品、生产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在讨论剩余价值的实现时，实际工资对社会产品量的大小的决定起关键作用。社会产品的增长速度对实际工资提高的影响及剩余和相对价格的前述三个变量的及作用被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承认。由此看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结构并不是彻底抛弃上述关系的。它们被留在核心以外进行讨论由于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多样性以及会因条件不同而有不同，分割分析就是很自然的事，且要把各变量的数量关系纳入一体进行一般性的分析是很困难的。但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分析结构与现代理论中的分析方法截然相反，在现代理论中分配被看作是需求与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性是两种选择（企业家的选择与消费者的选择）的结果。考虑消费者选择下的情形、假定有两种商品 A、B，每一种都可用单一的方法生产出来。A 需要有更多单位的劳动和资本，在 A、B 的物质资本中不包括 B，那么任何利息率的下降都会使 A 的价格比 B 的价格下降更多。对消费者偏好的分析会使我们得出：A 商品生产将会雇用更多的劳动，于是 B 商品生产就会有更多的人均资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 古典经济学里实际工资与社会产品在现代理论中已不再是独立变量，而是被同时决定的。(2) 实际工资与社会产品和剩余与相对价格同时被决定的。(3) 由于实际工资不再是先于工资以外的份额而被决定，那么工资的决定中必须考虑进两大新变量，这就是边际主义需求—供给机制中的两个要素，消费者偏好与要素禀赋，在边际主义理论中，分配、产品与商品的相对价值同时被决定，消费者偏好，要素禀赋与生产技术是主要自变量。

三、社会剩余与古典理论的核心

社会剩余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利润和价格的决定都建立在社会剩余这一理论范式基础上。李嘉图直接用社会剩余概念构造了利润率概率，即以用价值表示的社会剩余除以从事生产消费掉的价值。李嘉图这一概念的可取之处在于说明了生产的循环流转性，劳动价值论的大胆假定使得这种概念从逻辑上具有一定的正确含义。但是，李嘉图并没有解决好社会剩余中两部分价值的度量问题。即使按照斯密《国富论》中的度量方法，也不一定会有确定的结论。马克思利用社会剩余概念创立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并且非常完美地解决了价值的度量问题。马克思著名的剩余价值论对资本采取了两分法，一部分为劳动力资本，称其为生产中的可变资本，其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从事正常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另一部分除劳动力资本以外的资本，称为不变资本。这样，一方面，社会剩余中难以度量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马克思运用社会剩余概念充分解释了社会剩余的来源，剖析了雇佣劳动的内在关系。马克思利润平均化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剩余理论，马克思所注意到的是商品交换比率与其内含的劳动量的比率之间的差额，劳动创造的社会剩余会因此而在各部门之间流动，因而必然会导致社会利润或者说社会剩余在行业的平均化。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实践也体现了这一规律。斯拉法 (P.Sraffa) 被新剑桥学派认为是古典理论的继承人，斯拉法运用社会剩余概念对马克思的价格决定公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马克思的价格决定是从他的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论出发来确定的，商品的价格即是由不变成本，加上可变成本，再加上利润来构成的。斯拉法的价格决定公式事实上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价格决定公式，决定商品价格的依然是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和由利润率计算出的利润三者的总和，只不过用来描述这三者的变量都适用生产过程的成本价格。在斯拉法的公式中，社会剩余的范式仍然成为价格决定的基础，价格决定是以剩余的分配为基础的。

四、经济学家对社会剩余范式的认识

由于社会剩余范式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此后为马克思理论所接受和运用，同时又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过历史影响，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一范式的认识并不一致。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剩余这一范式以某种确实存在的原则和现实贯穿到了计划经济中。在相当长时间内，完全的计划经济曾是这些国家的主要特征。马克思的价格决定公式事实上成为计划经济的微观价格依据。在企业中，价格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统一决定的，而决定的方法就是成本加价，这样整个经济中价格、利润的决定就完全以社会剩余的形式表现出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度过份强调了计划性，忽略了市场性。改革以后，许多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商品市场的重要

性。必须注意到，马克思的成本加价定价公式决不仅仅适用于计划经济，也适用于市场经济，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出的。因此，可以说在对马克思社会剩余理论的运用上，社会主义国家曾一度走入了误区，当然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错误。

西方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剩余的概念基本上是作为经济史概念进行评价的。他们认为，在社会剩余的范式中，利润和利润率的决定模糊不清、因而价格的决定也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作为成本的工资是独立决定的，可以认为在这一范式是一种外生变量，事实上工资在价格决定中是内生变量，因而，利润的决定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同时，由于工资等成本是独立决定的，因而反映到由此得出的价格上，各种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法得到反映。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基本是不赞同这一概念的，只有新剑桥学派部分继承了斯拉法的传统。

社会剩余理论自亚当·斯密、李嘉图、配弟、马克思，一直到斯拉法，成为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一直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仍然成为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在西方，自边际学派兴起之后，劳动价值论让位给了边际生产成本价值论，进而又走向了市场均衡价值论，社会剩余理论逐渐不为经济学家所重视。正如斯拉法所言，这一理论是被"淹没和忘记"了。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而言，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市场性，同时也应正确利用这一计划工具，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

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 价值判断是某一事物给出的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而将这些价值判断的标准同一化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因为判断的标准是对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设立的，而即使是对同一个方面设立的，人们所选定的出发点也是不同的。为了保证对某事物作出客观的判断，经济学家曾试图排除价值判断，而只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但是没有成功。这是幸运的，因为如果成功，经济学可能变得十分可怜。在20世纪30、40年代，曾做出了许多重要工作，而这些工作是从经济学与价值判断相结合的角度去开展的。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时代。阿罗的这本书以及其后的研究，不仅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丰富了经济理论，而且在许多其他领域例如竞争均衡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的诞生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件大事，因为这种理论有效地研究了投票、投票体系、政治体制、伦理标准、经济体制等问题。价值判断即使不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却在经济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价值判断影响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也影响经济学家对某一经济制度是好还是坏所作的判断。

价值无用论 一种直接否定价值理论的经济理论主张，又称价值取消论。按照这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经济现象都可通过价格形式加以表述，价值概念及其理论都是不必要的。因此，经济学无需建立和研讨价值学说，而应花大力气去确立价格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出现于20世纪初叶，主要鼓吹者是瑞典的卡塞尔和德国的李夫曼。此外，奥国学派的阿蒙在批评边际效用论无法寻找出统一的尺度来衡量边际效用时，实际上也提出了价值取消论的主张。

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e） 接着，斯密在讨论货币和商品的交换比例时涉及到交换价值问题，提出要寻找决定交换价值的规律，从而论述了他的价值理论。

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前者代表特定物品的效用，后者代表对他种物品的购买力。他正确地认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但错误地主张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会有交换价值。在此基础上，他直接提出要专门而系统地研究价值问题，推动经济学研究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谈到交换价值的决定问题时，他首先认为一切不同商品都是劳动的产物，包含着一定量劳动，所以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在考察商品本身的价值量时又强调，""商品的真实价格"即价值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这样明确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思想，是斯密的主要科学功绩之一。不过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正确地指从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有时又认为是该商品在交换中购买到或能支配的劳动，常常把两者混淆起来。事实上，前者决定着价值，而后者决定着交换价值。这表明他在理论上未能明确地区分价值与交换价值。

在进一步讨论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斯密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转而主张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所构成，实际上是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这是因为，他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工资小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量，劳动所增加的价值的一部分要作为利润和地租，但他无法用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予以解释，于是只得声称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切商品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斯密这个错误的价值论观点，反映了其方法论的两重性，被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发展成庸俗的生产费用论。

必须一提，斯密在探讨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及其

原因时，还考察了价值规律的内容及其作用，阐述了他的市场调节机制理论。其中，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商品价格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的，而且这种波动具有规律性，并对商品生产起着调节作用。

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 指运用行为科学的方法，对个人或者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及其规律进行研究的科学。"行为科学"一词出现在本世纪的50年代，它通过观察与实验等科学方法对个人或者群体的行为特点及规律进行研究。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一样，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中也要大量涉及到人的心理与行为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传统经济学中却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行为经济学的建立正是填补了经济学研究中的这一空白。

1.行为经济学的特点与方法

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最初目的是对某些时期中的市场以及消费者行为进行经验性调查，对这些不同背景下的行为进行对比分析，就可以归纳出一般性的经济行为规律。

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1) 行为经济学重点研究厂商或者消费者的行为特征，而不是经济运行的状况；(2) 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厂商或者消费者在作出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决策之前的心理活动，例如动机、态度、预期等等，而不是对这些决策后的消费、储蓄与投资量进行统计分析；(3) 传统经济学在人类行为规律不变的假设下，通过各种经济分析方法推导出经济理论，而行为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人类行为的变化规律。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个案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实地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样本访问调查法，这种方法始于40年代，它通过选定人口样本，向这些样本询问他们所希望的收入水平、市场价格水平以及经济发展前景等等，可以得到三类数据：(1) 自然方面，如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等；(2) 经济方面，如储蓄量、收入水平等等；(3) 心理方面，如对物价、税收、政府政策等的看法等等。这种直接调查的方法与以前常用的外插法以及埋性预期的假设相比，具有准确度高、有代表性以及解释力强等优点。

2.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1) 消费支出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收入是决定消费支出的唯一因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收入普遍提高，他们要求在决定消费与储蓄方面具有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有能力购买，而且还取决于他是否愿意购买。行为经济学家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将消费支出看成是收入水平与消费意愿二者的函数。

(2) 储蓄倾向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他们愿意多进行储蓄；相反，当他们收入下降时，则要减少储蓄。也就是说，储蓄倾向受储蓄能力的制约，与收入水平同向变化。但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更愿意提取存款去购买房子与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从而导致储蓄的减少；而当其处境不佳的时候，则要尽量存钱，以备生病、失业等情况下的不时之需，这时的储蓄倾向反而上升。

(3) 企业生产计划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当某种消费品被大量售出之后，企业应当开始考虑适当逐步减少这种消费品的生产。但是调查表明，战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收入增加后，不但对各种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增加了，而且由于收入增加造成的心理因素，使得主要消费品大量销售之后对其需求仍然势头不减。这种新情况的出现要求生产厂家制订相应的生产计划，以便在竞争中取胜。

(4) 对通货膨胀的反映方面。一般认为，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则会导致平均需求量的减少。但是行为经济学家认为，涨价对需求量的影响如何，这要看人们对于价格变动的预期是怎样的。如果人们预期涨价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商品的价格不会再上涨，或者还会出现下降的趋势，那么人们就会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现期的需求量就会下降；相反，如果人们预期，这种商品的价格还要上涨，那么人们的反应就是蜂拥抢购，这时，商品的需求量反而上升了。

综上可以看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是，如果人们对于形势的估计与看法不同，那么他们对同一种情况所作出的反应就不会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对人们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此外，由于人们总是寻求较为满意的行为，因此，当形势改变之后，人们就不必总是按照过去的方式行事。传统经济学中的某些前提假设需要加以修改。

行为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的发源地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调查中心，后推广到西欧各国，直到70年代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它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研究也显得不够成熟，不过它的发展前景相当可观。我国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不过也已经开始对人们在消费、储蓄、通货膨胀等方面的心理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

行为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of Activities） 多样化是现代企业把它的活动扩展到超出它通常经营的产品和市场之外。这是现代工业经济结构的决定因

素，并对竞争和效率有着重要的含义。罗宾逊把多样化定义为"企业的多边扩展，既不在他们已有的主要产品方向上，例如水平结合；也不在供给和产出的方向上，即所谓垂直结合，而是在其它不同的、常常是广泛相似的活动上"。多样化的范围可用很多方法来测量，但它被精确定义不同产品、不同市场和不同部门的边界的困难阻碍着。要评价一个企业业务经营多样化的程度并不容易，这些活动的定义下得越窄，多样化就越明显。这些困难问题不仅出现在多样化的度量中，也出现在行业集中的测量中。事实上多样化过程本身在混淆行业界限和引起这些测量难题中起着主要作用。但是，很清楚地，多样化必须涉及企业新的、与它原有产品明显不同的产品，以使企业有新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因此，多样化可能涉及经营方向上的一个小的变化，也可能剧变到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文献中前者被称为"窄"的多样化，而后者则被称为"宽"的多样化。关于多样化对竞争和效率的影响存在着许多争议。乍看起来，大规模的、非专业化的企业会降低竞争和效率，但没有证据表明多样化会加剧市场集中。事实上，"宽"的多样化会成为一支在个别市场上降低集中程度的力量，它们有能力打破各种壁垒并促进竞争。多样化能促进规模经济的实现，而不是在单个市场上变成支配者。

行销渠道（Channels of Marketing） 行销渠道是指为使产品能顺利地销出去，到达消费者手中，从而满足消费的需要，所建立的种种商品销售活动的途径。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商品分配途径，或称之为"分配渠道"（channels of distribution），这种分配渠道的建立是从市场开始的，而不是从制造厂商开始的。企业应该就所决定的市场目标，分析顾客的购买习惯，然后选择最为合适的中间机构和分配方法，如普通日常用品的销售宜采用普遍分配的方法，选购品与特殊商品的销售，应采用选择性的或独家分配的方法。

货物运输途径。商品要从厂商达到消费者手中，中间要经过一些环节和地点上的转移，因此销售渠道本身就包含着商品运输的途径。货物运输现已成为销售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部门。运输方法：存货控制、仓储、订单处理等都是行销工作密切联系的。适当的货物运输途径可以减少行销的成本和商品的出售的价格。

市场信息传递：这对行销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有助于推销工作的进行。在行销观念下，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信息的传递。市场信息现在越来越为更多的企业所重视，成为企业生产何种产品，发展市场先后顺序、生产数量多少、销售地区有哪些，推销策略选择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具体行销渠道主要有以下六种：

1.门市部：一般由工厂自设，使本产品直接与消费者见面。门市部的地址应选在消费者集中的地区，如需要也可在各地和国外设立门市部以推销自己的成品，同时把市场信息反馈回厂。

2.零售商：直接向消费者推销商品的商业组织或个人。制造厂商将产品直接卖给零售商，因为其间没有中间环节，所以，这类零售商出售的商品价格与出厂价格相接近，易于销售。

3.批发商：属于中间商的一种。他们从厂商那里直接成批地购出商品，然后再小批地批发给零售商，而不直接面向消费者，此类商人资金雄厚，商情熟悉，经营地区较广，具有强大的推销能力。

4.代销商：为厂商或批发商代理销售商品的机构和个人。如厂商能找到自己适当的代理商，则厂家将自己一部分或全部产品委托其代为销售。厂家可以专心于产品生产，这是销售职能的进一步分工。

5.特约商：在一定区域内，委托一家经济机构和个人，双方定立契约规定权利和义务，厂方在该区域内不得与别的机构直接交易，特约商也不得经销其它厂商的同类产品。

6.经纪人：是为厂家与购买者联系的媒介，他们介绍消费者或零售商与厂家达成交易，从中提取佣金作为自己牵线的报酬。经纪人由于本身不参与产品的销售，因此无需象批发商、代理商一样出大量的资本，经纪人一般在交易所里从事这种产品的销售工作。

自主关税（National Tariff） 自主关税是指一国有关机构依照关税自主原则单独制定的关税，它又叫国定关税。自主关税不受贸易条约和协定的牵制或约束，本国有权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动情况随时加以调整，使之更好地为本国的贸易政策服务。

"自动"出口配额（"Voluntary"Export Quotas） "自动"出口配额又叫"自动"限制出口，它是指在进口国家或地区的要求和压力下，出口国家或地区自动规定某一时期内（通常为5年）某些商品的出口配额达到配额就自动停止出口。"自动"出口配额形式上表现为出口国自动控制某些商品的出口，而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它是进口国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出口国自愿的。进口国往往以各种理由，要求有关出口国家实行出口的有秩序增长，自动限制商品出口，否则，就要单方面实行进口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出口国家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保护正常的

出口，不得不实行"自动"出口配额。"自动"出口配额有非协定的"自动"出口配额和协定"自动"出口配额两种。前者是指出口国在进口国的压力下，单方面自动限制某些商品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口数量或金额。后者是指由出口国与进口国通过谈判规定"自动"出口的配额。进口国往往通过海关统计资料核查出口国的"自动"出口配额的实行情况，如果发现突破了配额，它就有可能采取单方面的限制措施。两次大战以来，"自动"出口配额运用得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直接的非关税壁垒，它在限制进口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日本在运用"自动"出口配额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原因是日本存在着巨额贸易顺差，在国际贸易领域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矛盾重重，经常发生贸易战。为了避免招致更大的损失，日本通常与其他发达国家通过贸易谈判确定"自动"出口配额。对于进口国家来说，"自动"出口配额的限制范围不象进口配额那么广，因为通常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商品出口国才会与进口国经过磋商或单独决定实行"自动"出口配额。

自由浮动（Freely Floating）　又称"清洁浮动"，"管理浮动"的对称，浮动汇率的形式之一。政府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上汇率的浮动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听任外汇市场上外汇供求自发地决定汇率。这只是纯理论上的划分，在现实中各国货币当局多或明或暗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浮动。

自由兑换货币（Freely Convertible Currency）"不可兑换货币"的对称。(1) 原指金币本位制下因一国货币可在国内自由兑换黄金且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因此货币持有者可以本币兑换成黄金，将其输出后兑换成外币。或者相反，以外币兑换成黄金，将其输入后兑换成本币。故各国货币通过黄金输出入可以相互兑换，其特点是货币对外的可兑换性源于货币在国内的可兑换性。(2) 在现代纸币制度下，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完全自由地随时兑换其它货币即为自由兑换货币。这种可兑换性纯粹是对外的。(3)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规定：当一国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收付不加限制；不采取差别性的多种汇率制；另一会员国要求时，有义务随时换回对方经常项目上所积累的本国货币时该国货币即为自由兑换货币。达到上述要求的国家称为"第八条会员国"。一国的货币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需具备以下条件：(1) 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正常的国际收支；(2) 要有充足的国际储备；(3) 无外汇管制；(4) 发达的金融市场；等等。在外汇市场上交易的都是自由兑换货币。

自由外汇（Free Foreign Exchange）　见"外汇"。

自由贸易政策（Free trade policy）　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既不限制进口，也不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具体地说，它是指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品的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让它们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因此，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不干预外贸或尽量少干预外贸的政策。

一个国家能不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完全是由该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一般来说，经济实力较强，生产技术领先，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可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它所生产的产品同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其结果是，本国产品无需国家的支持和扶植就能大量出口，而外国商品由于缺乏竞争能力难以进入本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无需干预外贸，可以让它自由发展。另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总是要求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政策，以便它的产品进入国外市场。自由贸易政策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产物。英国利用它在世界生产、贸易等领域的领先地位最先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尔后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使自由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发展到了最高峰。两次大战以后到70年代又经历了贸易自由化阶段，对于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社会生产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全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国家总会有自己的优势产品和劣势产品，这也决定了各国不可能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政策。如果说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只是意味着一国的外贸政策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Eone）　自由贸易区是一种经济特区。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区与自由港的区别仅仅在于自由港是指整个港口或城市，包括停泊船只的水域、码头设施和陆上地区等，而自由贸易区则仅指港口或城市中的某一特定地区。由于自由港通常建立在交通要道上，把整个港口或城市辟为自由港，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对自由港所在国来说冒有风险，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些因素制约着自由港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港并不多，如新加坡、香港等。因此，各国建立的多为自由贸易区。有时候，人们仍把建立在港口城市的自由贸易区称为自由港。各国对自由贸易区的管理办法与自由港类似，建立和发展自由贸易区主要也是为了获得一定

的商业利益，即发展转口贸易，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等。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经济特区多为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是指由几个国家或地区组成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地区，也就是指由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成的贸易集团。集团内实行自由贸易，相互减免关税，对外则实行关税壁垒，征收统一的关税。

自由过境区（Free Transit Eone） 自由过境区是指一国为了方便邻国的进出口货物运输而划出的一些沿海港口或边境城市。一国对于通过自由过境区的外国商品，通常给予简化海关手续和免征关税或只征收小额过境费等优惠，另外，过境货物可以在自由过境区内作短期储存或作重新包装，但不得进行加工。

自由边境区（Free Perimeters） 自由边境区是指一国在边境设立的这样一些地区，在这里，外国商品可以在简化海关进口手续的情况下减税或免税进口，进入该地区的外国商品不仅可以用于消费，而且可以在区内进行加工、制造、储存、展览等。如果进入该区的商品想转入国内其他地区销售，则必须办理正常的海关进口手续，缴纳进口税。设立自由边境区不仅可以较好地改善和满足边境地区居民的消费需要，而且还能通过利用外国投资开发边境地区的经济，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自由边境区与出口加工区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后者是以进促出，两头在外，而前者是单向的进口，主要为了支持本地区的建设和发展，而不是为了再出口。设立自由边境区往往是一种临时性的优惠政策，一旦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来了，它所享受的优惠待遇将逐步减少直至完全取消。

自由（Liberty）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断言：世界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人类历史就是教育和自我发现的过程，过程之末，人类将看到自由以及自由的原因就是生活的本质。黑格尔也深知，自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关于自由的论述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亚里斯多德在定义政治一词时，指出，政治就是自由人统治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自由是公民的事情，非自由人则隶属其主人而没有自由。例如波斯人被暴力所统治，没有自由；奴隶听从于主人也没有自由；妇女听从于丈夫也没有政治上的自由。现代社会的自由的概念是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衰败以及现代商业关系的兴旺而建立的。自由只指个人活动和发展的自由，在商业上则指国家很少干预的竞争的自由。自由、平等、博爱则是法国资产阶级在18世纪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这一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以人权反对王权，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类理性反对宗教迷信、以普遍平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的要求。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只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因为财富的悬殊使得劳动的“自由交换”无法实现。列宁认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是欺骗工人，或是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自由企业制度（Free Enterprise System） 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一种以私有制和私人首创精神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对于自由企业制度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私有制即私有财产的概念。因为有私有财产会导致私人企业的建立或私有企业的生产。厂商在以下几个方面拥有权利，即自由雇佣工人、自由生产和自由定价。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只是表现为企业是纳税人，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企业是法人有其行为能力，企业有要求国家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政府对企业的内部事务不予以干涉，当然前提是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和规章。生产不断进行下去以及经济不断发展的原因是存在着私人的首创精神，私人首创精神的动力是企业所有者赚取利润的愿望。由于私有制和私人首创精神，自由企业制度的特征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独立地作出决定。没有人强迫生产者和消费者作出关于生产和购买的决定，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主人。控制经济和协调许多独立决定的职能，是通过运用自由价格制度来实现的。人们主要依靠竞争的力量来确保自由价格制度有效而顺利地发挥作用。竞争迫使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也促使效率高的企业成长壮大。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不论是新企业还是老企业，都要遵循市场规律即优胜劣汰。市场不是人为的，是以自由价格制度和公平竞争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较少。政府的活动只限于少数领域，诸如国防和司法保障等，而在生产和定价方面，政府采取放任主义的立场，较少地或完全不加管制。

自由竞争（Free Competition） 在经济理论中，有各种各样的竞争，其中包括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完全竞争也就是自由竞争。这种竞争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有大量的买主；（2）所售商品和劳务是相同的；（3）更多的卖主可以自由进入市场；（4）买主和卖主对目前市场状况完全了解；（5）生产要素在各行业之间有完全的流动性，使新加入的竞争者能够开展销售业务；厂商将其产品运交买主在费用上彼此间没有差别。经济理论认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保证消费者以尽可能低的价格

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和劳务。主张自由竞争的人认为，政府应尽量不要直接干预物价与贸易，而应该承担以下重任：（1）保持工业中的竞争条件；（2）控制货币供应；（3）担负某些社会福利活动。在美国，从19世纪后期以来，联邦政府在试图保护和鼓励主要工业中某种程度的竞争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象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这样一些法律，就是政府在这方面活动的基石。但是，自由竞争的限制条件几乎是无法达到的，人们所努力达到的，也只能是接近自由竞争。纯粹的自由竞争只是在理论分析时才存在。

自由处置（Free Disposal）　如果我不喜欢一种商品，你可能必须向我进行支付才能让我接受它。但只要某些其他没有厌腻它的消费者认为该商品是需要的，或至少是无害的，那么它在竞争均衡中就不会是负价格。类似地，如果某企业能转卖一种不必使用其它投入，也不产生任何其它有害的产出的商品的任意数量，其价格在竞争均衡中不可能是负的。因此，如果每一种商品对某人或是无害的或是自由处置的，竞争均衡分析就不会出现负价格。

如果一种商品不是自由处置的，并且每个人宁愿少些而不是多些，即它是有害物，这时可能就需要在不存在有害物情况下重新定义商品。这样定义的商品就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物对待而有一个正的价格。一般地讲，选择另一种制度去衡量"商品集"以便于在新的协调的制度中，或者存在自由处置性，或者宁多勿少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人们对一个少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一个高的价格而对一个大量的该种商品支付一个低的价格，那么在竞争均衡中这种商品的价格是正是负是无法事先决定的，均衡价格的符号一般取决于这种商品和其它商品的供给情况以及经济中的具体偏好结构。

有时，如果使用充足的其它资源，产品或消费的有害的副产品可以被转化为有用的产出，那么，这种副产品的均衡价格可正可负，取决于其它投入的价格和它被转化成的那种产出的价格。当商品由位置不同而区分开时这是特别明显的。在市中心的垃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情愿的。把它埋掉或烧掉既花费钱又不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产出。因此，如果用这种方法处理垃圾，它的均衡价格一定是负的。但是垃圾可以运到农村去喂猪。根据这个过程的成本和猪肉的价格，即使垃圾在市中心有一个零的或负的价格，这种把垃圾变成猪食的过程也会是赢利的。垃圾的最终处理方法和它的价格符号的正负二者都必须在竞争过程中自主地决定。

自由银行制度（Free Banking）　签发银行营业执照的自由化。在十九世纪早期以前，美国规定，银行的执照必须根据专门的立法来签发。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通过政治舞弊来获得执照，二是由于银行拥有执照后就具有了相应的垄断权力，而这种垄断权力有时也被滥用。1838年，作为改革这种制度的尝试，纽约州通过了第一部自由银行制度法。它基于这样的原则，即银行业务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象其他行业一样向所有人开放。自由银行法的内容是，任何个人或个人集团只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最低要求，就能获得纽约州的银行执照。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只能用它所贮存的为州政府所认可的、相当于钞票发行价值的债券或抵押品作担保。自由银行制度很快被其他州政府效仿，但产生了如下经济后果：其他州政府实行自由银行制度以后，由于当局授与执照太随便了，为发行钞票所要求的担保也太松了，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信用程度很差的银行。特别是在美国西部，自由银行制度已经蜕变为冒险性的银行制度。很明显，冒险性银行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是不利的，它扩大了金融业和实业界的经营风险。1863年，美国国会仿效纽约州的"自由银行制度法"的一些规定，通过了"国民银行法"。此法对发行钞票的条件的规定比其他州的立法要严格。

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　一种自然条件，它使一个公司的最适度的规模，其大小恰好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公司。自然垄断能否存在的决定性判断标准是，市场的需求必须小得只要有一家在不断降低成本的情况下经营的公司就能满足。第二家公司不可能进入这一行业，因为仅仅一家公司就能生产出两家公司可能生产的产量，而其总成本则比两家公司可能花费的为低。因此，一家正在进入市场的公司必须通过削价的方法设法占领整个市场，这样，两家公司当中便只有一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铁路运输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情况，当客货运输增加时，其成本就降低。这是铁路运输业务生产职能的不可分性的直接结果。一旦运输业机构设立起来并有了必要的铁轨和车站，客货运输的增加就会降低平均成本。如果对这种业务的需求仅限于不断降低成本的某一具体路线，那么就会存在自然垄断，而其他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就会无利可图。在美国，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造成了在平行线路上营业的铁路公司之间的价格战。收入的损失从没有竞争的地方得到补偿。经济的增长能破坏自然垄断，因为需求也在增加，当垄断者不再能在有限的不断降低成本的范围内经营时，自然垄断就破坏了。现在，在自然垄断理论的幌子下，公用事业取得了垄断的地位。

自由放任（Laissey-Faire） 自由放任是一种取消政府对经济干预，让市场本身发挥作用来安排生产、配置资源的学说。"自由放任"一词出自法语。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的工商业受到政府的干预较多，地区间的贸易受到国家关卡的限制。当时法国重商主义主张的支持者、财政大臣柯尔倍尔（Colbert）问一位商人，政府可以帮助工商业界做些什么，该商人回答："对我们自由放任"。此后，自由放任被看作一种取消政府干预的哲学观点与政策。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极其推崇"自由放任"的哲学。他认为，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把政府作用限制在维持国防、秩序、法律方面，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社会生产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19世纪末，自由放任学说最为盛行。1929至1933年西方的经济大危机使自由放任学说失去影响，西方国家对经济干预加强。但近年来西方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新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这一学说的主要鼓吹者。这一学说近些年来已经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自我主义（Egoism） 又叫"利己主义"，指的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道德准则与行为理论。自我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把自身的私利置于他人与社会之上，追求自我的最大利益与最大幸福就是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行事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从历史上看，自我主义原则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古希腊的快乐论认为人们应当去追求各自最大的幸福。文艺复兴时期，自我主义作为一种热爱自身、追求幸福的理论，广为流传。17世纪时的T·霍布斯与B·斯宾诺莎曾宣扬自我保存的理论。自我主义在资本主义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在同封建腐朽势力作斗争的时期，自我主义的广泛宣传有助于反对封建统治与禁欲主义的思想，最大程度地解放了人的个性，把每个人当作独立的个体加以尊重，这些不但帮助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且在资本主义初期，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为自我主义的广泛运用打下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一部完美的机器，经济行为人在其中按自己的意愿去生产、销售与购买、消费，追求最大化利润与最大化效用。其结果，市场总能经过调节，使得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经济迅速发展，经济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可见，经济行为人的利己行为不仅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还增进了全社会的幸福与进步。在亚当·斯密的这种理论的支配下，自我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市场上典型的行为准则。

自利（Self-Interest） 简而言之，自利就是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自利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它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的伦理基础之一。如关于经济人的假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预算约束下，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不了解自利就无法理解经济学的一些最根本的论点。历史上对自利问题的讨论比经济学的年龄要长得多。自从经济学成为一门完善的社会科学以后，自利已不再是哲学、伦理学所讨论的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课题。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把人的自利作为一种不变的前提确定下来。那么什么是自利，自利行为会怎样？这更多地要借助于伦理学的成果。霍布斯（T.Hobbes）就曾指出每个人都有兴趣保持一个和平与协调的社会，伦理准则仅仅是一个大家为获得这样的社会都遵守的规则。我们应该遵守它是因为遵守它可以保障社会的和平与协调。没有和平与协调的社会秩序，任何人都不可能满足他的欲望。如果伦理道德要求我们为他人着想，那么从长远看，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在霍布斯看来，自利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最终驱动力。孟德维尔（B.Mendeville）不同意任何行为都不是有道德的，除非涉及到自我否定（Self-denial）的说法，而走得更为彻底，即使自我否定也不是有道德的，因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某种满足（gradification）。他区分了有道德（virtue）与有好处（goodness），认为道德是一种幻觉，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出自自利。克制自利性的激情是不可能的，而是将它与别人对立。任何一项行为都不是彻底的有道德，但如对别人有益则是有好处的。有人对霍布斯的论调提出批评，认为为他人着想的不自利欲望如同自利一样都是人的天性，而且还有人发现人有一种天生的道德观：当自利与不自利发生冲突时，会更偏好于慈爱而不是自利。休谟（D.Hume）和亚当·斯密（A.Smith）进而分析了人的同情心—对他人欢乐与沮丧的参与趋向。不同于孟德维尔，他们认为同情心是非自利的。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的论述至今仍被大加称颂，在他看来自利心是上帝赋于人类的财富。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会使社会有序地向前发展。就大多数人来说，在交易中都不是想提高公共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个人都在寻求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价格。他的行为受无形的手的引导。这从总体上看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常常超过他有意为社会谋利而带来的利益。而且亚当·斯密认为无形的手会使经济有序地发展，从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这对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功利主义者不愿意将道德建立在自利之上，在边沁（J.Bentham）那里，人类都有追求幸福和避免不幸的天性，人类行为的道德判断标准就为：凡是能带来快乐和增进幸福的就是好

事，否则就是坏事。社会是个人的总和，为求得社会福利就必须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效用主义者的最高目标。他们不再同意自利行为对社会整体有利的说法，而认为一个人的自利行为完全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利益，因而必须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道德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穆勒（J.Mill）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将基本的道德准则看作是做任何可以促使提高大家最大幸福的事，因为个人幸福是与他人乃至社会的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不稳定，个人也是悲惨的。但这并没有解决个人遵守此原则是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问题。实际上穆勒也认为道德品质（virtue）——提高全体人的幸福的愿望，且最初作为提高自己幸福的手段来培养的——趋于冲着个人利益而去。从它作为一种追求幸福的手段来看，它已变成幸福的一部分。这些哲学与经济学前辈们的论述对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自利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个实证问题，也就是说人是不是自利的，而不是社会伦理标准的一部分。当然人的自利心是否就为一种天性，在多大程度上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自然与正常条件（Natural and Normal Conditions） 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对其研究对象作了精确的定义。斯密认为，价值以及分配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价格的决定方式。马歇尔则用正常价格代替了斯密的自然价格。这里的"自然的"和"正常的"不仅是指一般的商品价格，而且也指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以及经济行为的总体水平。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抽象的问题，另一个是对抽象问题的定义。这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讨论的对象要有妥当的定义，另一方面，解释研究对象的理论也必须建立在特殊水平的抽象基础上。在定义研究对象，并且用理论去解释该对象时，一些短暂的、过渡性的因素被抽象掉了，而那些主要的、稳定的、系统的因素被保留下来。在数量经济学中，这些主要因素以代数形式出现，并且成为理论的资料。数学模型也是用来揭示经济中的主要趋势，揭示研究对象的最本质特性。例如，对价值和分配的分析，必须对正常的或长期的经济状况作出分析。正常的或长期的经济状况是指经济中的关键因素的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非正常的、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对价格、分配以及产出水平的内在关系的分析，必须是在自然的或正常的条件下的三者之间的关系。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放弃了对自然的和正常条件的分析，而代之以动态均衡分析。而这标志着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转变。虽然对这一转变人们重视得不够，但这一转变同十九世纪末的理论的转变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 自然界中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种种原料和野生生物，包括矿物、森林、水、鱼类和野禽等。自然资源分为再生资源和非再生资源。再生资源是指虽然已被利用，但通过自然界的生长规律可以重新恢复的资源。如森林资源，虽然森林被砍伐，但经过自然生长或人工培育可以重新生长出森林。属于再生资源的包括绝大多数的动植物资源、淡水资源等。非再生资源是指只能被一次利用，资源总量只会递减的资源，如矿物资源。自然资源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基础。农业国家所赖以发展的土地是非再生资源。各种农业资源和工业用矿物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大多是初级产品，而初级产品就是对自然资源初级加工的产品，发达国家虽然生产出更多的高精尖产品，但其工业乃至国家的基础也是自然资源。第二，自然资源的范围包括很广，既包括可以市场定价的自然资源（narural resources），也包括无法市场定价的自然资源，后者基本上是环境资源，如空气的质量、阳光、水等。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对环境的保护，也就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显然非常重要。第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虽然工业化国家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化学合成物（纤维、橡胶、洗涤剂、油类）和资源的代用品（塑料、胶合板）等，但其生产的原料依然不能缺乏自然资源，如石油资源等。

自然率与市场率（Natural rate and Market rate） 自然率与市场率是指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最初是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所使用的概念。这一概念被当代西方许多流派的经济学家所使用，但是用于不同的分析目的。"市场率"是指真实利率的实际价值，而"自然率"是真实利率的均衡价值。威克塞尔使用"自然率"与"市场率"概念的出发点是货币数量论，即长期内价格水平将与货币存量同比例变化。他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是要解释货币与价格如何从一种均衡水平向另一种均衡水平移动的。这种均衡的移动被称为"累积性过程"。威克塞尔认为利率必须满足三个均衡条件。第一，市场利率必须等于资本物以实物借贷状况下的利率；第二，储蓄与投资协调；第三，价格稳定。利率具有两种作用，一是协调家庭储蓄决策与企业投资决策，二是平衡信贷的供求。如果信贷供给总是与储蓄和对于信贷投资的需求相等，以上两个条件将总是得到满足。但是在储蓄和投资之间、信贷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并不存在这

种必然相等的关系。在威克塞尔的理论体系中，银行创造信贷市场，银行可能超出储蓄中介的范围通过创造货币而筹措额外的投资资金。货币的注入在储蓄与投资之间设置了一种障碍。如果银行所确定的市场利率低于协调不同时点上的实际经济活动所需的自然利率，就会产生这种障碍。只要银行体系维持该种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的情况，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的内在增长就将继续。威克塞尔认为，在一个"纯信用"经济中，这一累积过程将无限地持续下去，而在金本位制下，这一过程得以遏制。

自发罢工（Wildcat Strike） 指没有得到工会的正式支持，也没有履行大多数罢工所必须经过的正当手续而采取的自发性罢工行动。举行自发罢工的目的常常是要引起人们对某一工厂的不稳定局面的注意。例如服装工业曾举行自发罢工，来巩固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实施，因为有迹象表明雇主企图违反协议。自发性罢工许多情况下都未通知工会领导，罢工矛头有时不是针对雇主，而是向工会领导人施加压力，要他们按照工人的意愿行事。

自由雇佣企业（Open Shop） 对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同样开放的企业。在自由雇佣企业中，雇主可以雇用他愿雇用的任何人。雇员受雇以后，对愿否加入工会没有任何契约上的约束或压力。但实际上，许多这类企业的雇主都拒绝雇用工会会员，自由雇佣企业实际成了只雇佣非工会会员的企业。1935年的美国全国劳工关系法使这种企业从事州际贸易的行业为非法。

自动预扣（Checkoff, Automatic） 雇主从工人工资中预先扣除工会会费及其他款项，其目的是向工会保证工人们都能按期迅速缴纳会费。在普遍实行预扣办法以前，工会有时必须在发工资的日子里在工厂大门口布置"会费纠察线"，以强行收取会费。纠察线由工会官员与工会的坚定支持者组成，企图不付会费而穿过纠察线的人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鉴于工会为鼓动工人对工会的热情以便收取会费，有意提出些不很正当的不满要求或攻击雇主，雇主倾向于实行自动预扣，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美国，直到1951年自动预扣的做法才迅速流行起来，从那时起，签订了劳资谈判协议的工人中，一直有略多于3／4的工人的会费被定期预扣。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规定，预扣的做法，只有经工人提出书面许可的情况下才算合法。

自动调整条款（Escalator Clause） 工资协议中关于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名义工资的规定，是工资指数化的一种具体形式。这是工会为了防止工人在通货膨胀中蒙受实际工资下降而与雇主谈判协定的。其基本点是根据消费物价指数定期地调整名义工资，只要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一定比率，名义工资就应无须经过工资协议而自动调整。所以，这是工资决定中一种自发地起作用的机制。最早的自动调整条款出现在1948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工会签订的工资协议中。以后，更多的工资协议中包括了这个条款。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种有代表性的条文规定，当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物价指数变动0.5时，每小时工资相应变动一美分。对工资自动调整的向下变动大都规定了一个最低限度。但是，在现实中自动调整条款并不能完全补偿工人在通货膨胀中实际工资下降的损失。这是因为：第一，除对低工资者外，一般无法使工资调整的幅度与消费物价上升的幅度相等。第二，对工资调整的最高上限要加以限制或封顶。第三，工资的调整一般落后于消费物价的上升，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时滞。第四，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能享受自动调整条款。例如，在美国，1978年自动调整条款仅涉及较大的工资集体协议（1000人以上的工资协议）的960万工人中的5．8%。在其他国家这种自动调整条款也并不普遍。从时间方面看，也只有长期工资协议中有这样的条款，而短期工资协议中一般没有。所以，自动调整条款并不是工资指数化的唯一形式，也不是唯一的工资调整机制。

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亦称"充分就业失业率"或"长期均衡失业率"，指经济中实现了充分就业时的失业水平。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M·friedman）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说："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在该失业水平，实际工资率平均来看趋向于按'正常的'长期率上升，就是说，只要资本形成、技术进步等等维持它们的长期趋势，实际工资率的这种增长率就能够永远维持下去。较低的失业水平是劳动力需求过量的迹象，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上涨，失业水平较高则表示劳动力供给过量，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下跌。换句话说，所谓'自然失业率'是这样一种失业率，它可以根据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方程体系计算出来，只要给与这些方程式以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现实的结构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市场不完全性，需求和供给的随机变化，获得有关工作空位和可利用的劳动力的情报的费用，劳动力的流动的费用，等等。"由此可见自然失业率是一种由劳动力市场结构决定的失业率。弗里德曼根据自然失业率概念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设，证明了凯恩斯

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以及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在长期中并不存在，即长期菲利浦斯曲线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现在一般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各国不同时期都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了自然失业率，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之一。例如，在美国，50—6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3.5—4.5%，70年代为4.5—5.5%，80年代为5.5—6.5%。当经济中的失业率达到这个水平时就实现了充分就业。

自然增长率（Natural Rate of Growth）　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这是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R.Harrod）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提出并运用的一个概念。自然增长率（Gn由人口增长率（即劳动力增长率，n）和技术进步率（即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λ）决定。因此：

$$G_n = n+\lamb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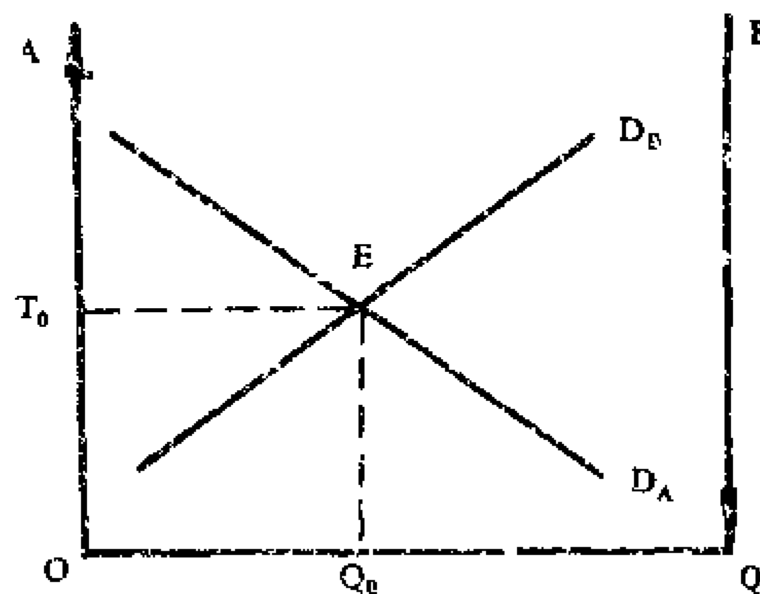
在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中，还指出自然增长率取决于一定制度结构下的最适宜储蓄率（S_0），和长期中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Cr）。所以：

$$G_n = \frac{S_0}{C_r}$$

一定制度下最适宜的储蓄率由人口增长率决定，长期中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由技术进步的程度决定。所以，这两个公式实际是一样的。自然增长率考虑到了长期中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增长的最大限度，因此，又被称为"社会最适宜的增长率"，或"最优增长率"。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许多理论探讨这一问题。

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　由于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引起的失业。英国经济学家A.庇古（Pigou）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如果工资有完全的伸缩性，则愿意就业的工人完全可以就业。但如果工资具有刚性，工人不愿接受现行工资水平，则会出现自愿失业。凯恩斯在《通论》中接受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劳动单位，由于立法或社会的诸实践，或集体议定工资联合，或对变化的反应慢，或不过是人类的顽固性的结果，拒绝接受或不能接受与它的边际劳动生产物的价值相当的报酬"所引起的失业就是自愿失业。自愿失业是由于工会的存在、人性、社会立法等非经济因素引起的。它的存在与充分就业并不矛盾。现代经济学家也接受了这一概念，但更多地认为自愿失业产生于工人为了寻求理想工作的一种等待，或者为了享受闲暇而不愿去工作等工人自身的原因。

自愿交换模型（Voluntrary Exchange Model）　论述公共物品可以根据一致的协议没有强制地提供的条件的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K.威克赛尔提出，又由瑞典经济学家E.林达尔加以发展。威克赛尔认为，要根据一致的协议来提供公共物品其条件是：第一，公共物品的资金应通过公平的税收来筹集。第二，社会成员要对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达成一致的协议。在这些条件下，社会成员了解他所承担的税收份额，并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量。林达尔发展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赋税的份额和公共物品的数量开始时都不是确定的。达到一致协议的条件是各人所交纳的税收份额恰好等于各人从公共物品中所获得的边际效用。可用下图来说明这一条件。下图假设的是一个有两个人的社会，纵轴是A，B两人所承担的税收份额。OA表示从下向上，A所承担的税收份额增加。OB表示从上向下，B所承担的税收份额增加。D_A是A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表明随着A承担的税收份额的减少，他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增加；D_B是B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表明随着B承担的税收份额的减少，他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增加。当D_A与D_B相交于E时，决定了A与B各自承担的税收份额为T_0，公共物品的供给量为Q_0。这时，对A与B而言，他们所愿承担的税收份额与他们从公共物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相等。在这个条件下，就可以通过一致的协议，而不是通过强制来为公共物品筹资，并提供一定量的公共物品。按这个模型，每个人在他承担一定税收份额时消费他的"最优的"公共物品量，这也就是说，可以使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量达到帕累托最优。但许多现代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模型是不现实的，因为事实上难于达成一致的协议。而且，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不承担一定税收份额的人也可以从公共物品中获得效用（即存在"搭便车"现象），所以，公共物品仍然是通过强制征税的方法来筹资的。



自发消费（Autonomous Consumption）　消费支出中不是由于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那部分消费支

出。因此，自发消费不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消费者嗜好、价格水平、社会风尚等因素。在消费函数理论中，一般假定自发消费是既定的外生变量。从对长期消费统计资料的研究来看，自发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的比例很低，可以忽略不计。

自发投资（Autonomous Investment） 总投资中不取决于产量变动的那部分投资。在宏观经济学中，一般把由人口、技术、资源、政府政策等因素变动所引起的投资称为自发投资，并假定自发投资是既定的。在分析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模型中，假定自发投资不受产量变动影响，从而自发投资的变动也就不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原因。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J·Hicks)用"超级乘数"这一概念来说明自发投资与它所引起的产量变动的关系，而由自发投资与超级乘数所决定的产量水平就是经济围绕波动的均衡产量水平。在超级乘数为既定的情况下，这一均衡产量水平就取决于政府公共投资或技术发明所决定的自发投资量。

自发支出（Autonomous Expenditures） 宏观经济学收入——支出模型中不取决于收入水平的那一部分支出。这种支出由该模型之外的某些因素决定。因此，在分析收入——支出模型时一般假设自发支出是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自发支出中包括自发消费，自发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Optimism and Pessimism） 乐观主义是指对事业、前途抱着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积极态度，在思想史上，指对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学说，认为理想必定成为现实，对之应有绝对的信心，如德国莱布尼茨，他强调上帝在创世时已作好安排，使一切趋于尽善，达到和谐；现实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完善的一个"，并从而得出结论：现存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则深信必须解除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的束缚，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王国"，在其中人类幸福将得到充分实现。悲观主义又称"厌世主义"。一般泛指对事业、前途抱着悲观失望和失去信心的消极态度。在思想上，指对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学说。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为小乘佛教、18世纪意大利列奥巴尔迪的诗文和19世纪德国叔本华的哲学。认为世界如幻如梦、人生苦多乐少，因而感到悲观失望，陷入一种精神麻痹状态，甚至认为生不如死，或企图超越现实，以求解脱或获得拯救。在经济学上，根据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19世纪初叶的经济观点认为，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日益减少的农业收入相结合，最后会使人类的生活降低到仅能维持生活的水平。乐观主义者拒不接受这种对经济前景的看法。其中一个美国人亨利·凯里认为，农业的规律是收入日益增长而不是日益减少。他否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正确性。

约束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约束理性指经济主体对问题复杂性在认知和抉择上的局限性。它用于描述考虑到决策者认知上的限制以及知识水平和计算能力的限制的一种理性抉择。作为行为经济学的中心主题，它深刻地揭示了实际决策过程对决策方式的影响。主观效用论一般假定抉择是在给定不变的可供选择的集合中做出的；每个抉择的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抉择的目标是在既定的效用函数下，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事实上这些假定与经济抉择的真实情形并不吻合。约束理性论将上述前提适当放松，将抉择归结为一个寻求方案的过程，通过引进抉择的估计程序，寻求一种令人满意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人的思考和抉择过程是已知的，尤其是在发现可供选择的方案，计算各种方案的结果，以及比较诸方案优劣等方面，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是已知的。从企业决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寻求和评价可能的行动方案上，只有较少的努力花在最终抉择上，一旦选定了某种方案，其结果也就决定了。在大多数情形下，寻求所有可能的方案是不明智的，抉择的产生是一个耗时冗长而又代价昂贵的过程。为了减轻经济主体所面对的复杂性程度，充分利用约束理性，建立合适的规则和机构是必要的。无论是缺乏知识的认知上的局限，还是预测未来的能力的制约，都在方案的评价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局限并不仅仅是特定信息的限制，而且总是能够用于估计相关现象的科学理论的充分性的限制，由于模型内的方程中缺乏对基本经济机制的认识，因此，用计算机模型进行经济预测的精确性就受到严重制约。在方案的评价中，选择的标准是极其重要的。人类选择一致性的假定并不符合实际，效用最大化假设同样使决策人背上了沉重的计算负担。约束理性论试图找到使计算简化的程序，解释人们选择方式中的不一致性。其理论主张既是从经验观察出发的，更加接近于经济现实；又是以心理研究为基础的。在约束理性前提下，模型的推导必须对人类决策行为进行详尽、系统的观察研究。否则既不能彻底领悟约束理性的本质，也不能导出正确的结论，因此，约束理性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买方市场（Buyer's Market） 现行的价格可以弥补具有代表性的生产者的平均成本下仍供过于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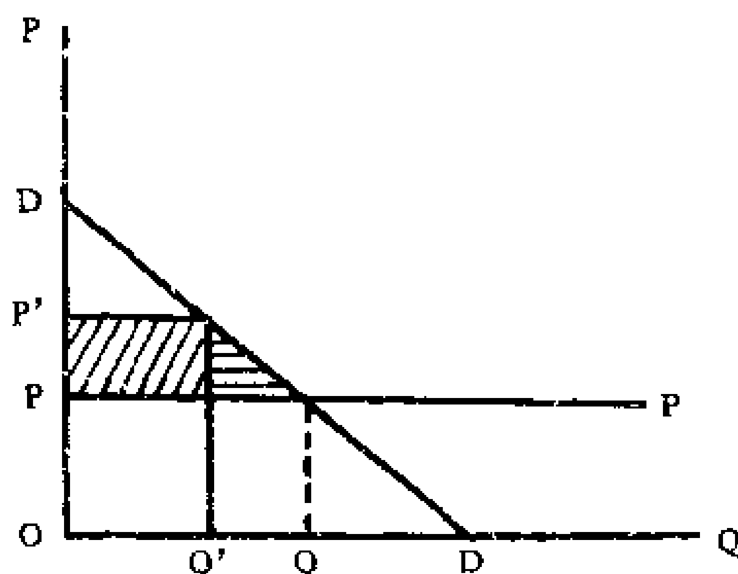
市场状况。由于短期供给的过剩，买方在讨价还价中具有优势，价格被迫降到平均成本以下。卖方为了减少过剩的存货，不得不接受较低的价格，买方市场的存在决定着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趋向，预示着生产或价格的下降，或者预示了两者同时下降。但是，如果买方出价过低，卖方将停止供应，这样，市场就会转变为卖方市场。

买方垄断与买方寡头（Monopsony and Oligopsony） 买方垄断又称独买，它是一种商品、劳务或要素市场上只有一个买主而有众多个卖者的市场结构。买方垄断意味着独买者对于所购买的商品、劳务或要素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出售这些商品、劳务或要素的人找不到其他任何顾主来购买自己的商品、劳务或要素。由于购买者可以控制购买物的价格，因此，其购买价格与购买数量较之竞争的市场要低。买方垄断的市场结构往往产生于商品是同质、无差别、并存在着众多个卖者而买者只有一家的市场，由于产品无差别，任何一个卖者都无法对价格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雄厚的买者就可以决定购买物的价格。独买的情况虽然很少见，但会在一些地区的劳动市场上出现。

买方寡头是指某种商品、劳务或要素市场上只存在少数几个买主而存在大量卖主的市场结构。当市场上只有几家卖主与几家买主时，称这种市场结构为双边寡头。买方寡头情况下，由于买主较少但又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该市场结构下商品、劳务或要素的价格决定就比较复杂。在寡头们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通过暗中勾结来决定购买物的价格。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则由实力较强者制定购买物价格。不管价格采取何种方式来制定，买方垄断市场条件下所制定的购买价格都要低于若该市场处于竞争条件下的购买物价格。买方垄断条件下，买主之所能够通过勾结行为压低购买物价格，除了与该市场买主数目较少有关外，还与该市场供求条件较稳定、购买者利益较一致有关。

寻租（Rent Seeking） "寻租"一词是由克鲁格（A.O.Krueger）于1974年正式引入经济学，但寻租理论却由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早在1967年就已作了细致的阐述。它的基本而又很简单的思想可由图1来说明。横轴表示某种要出卖商品的数量，纵轴表示价格，在竞争条件下，商品的成本应是PP线，这也是它的价格。

需求曲线DD指在各种价格下所出卖的商品的数量。如果形成垄断，那会是在P′价格上出售Q′数量的商品。传统的垄断理论认为社会净损失（三角形表示表现为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它本来可以在购买Q′和Q之间的这部分商品中获得，但现在此部分商品既不可能购买，也不被生产。另外四边形表示的部分在传统理论中只被认为是由消费者转让给垄断者的部分，由于他们都是社会成员，所以这种转



移不是社会净损失。总之传统理论的基本态度是认为垄断的形成本身是无成本的，而寻租理论却认为有一部分实际资源被用来形成垄断。到现在为止，有关寻租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那种由政府培养或保护的垄断上，也许这是垄断最普遍也是最强有力的形式，但值得指出的是，纯粹的个人垄断是可能的，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垄断。寻租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存在一个确定的个人寻租而引起的净社会损失领域。图洛克和克鲁格最初的理论认为寻求利润的商人会致力于运用资源而努力达到垄断，这个过程完全由个人进行或由政府资助，后来进而认为，这样进行投资的最后一美元正好与获得垄断而增加的盈利相等，于是就可以推出从社会角度看整个四边形就被耗费掉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争议，但图洛克等人坚持认为，实际上并没有由消费者向垄断者的转移。社会的损失来自于这样的事实：资源的耗费是用于取得垄断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理论上的这种看法并不完全适合于每一种情况。寻租理论中经常运用的一句格言是"形成垄断的活动也是一种竞争性产业"。由于这样就不难理解有许多人在每时每刻都将至少一部分资源用于促成个人垄断的活动中，而只有其中一部分人取得成功。这种情况很象彩票：许多人购买彩票，而只有极少数人中奖，其余的人无所补偿。损失的大小取决于当初的投入。很明显，几乎对于所有的彩票来说，赌博者们所有的资源投资大大超过他们所得到的补偿。与此不同，寻租理论认为投入于寻租活动的所有资源等于所有的垄断利润——这当然是从社会角度来看的。由于垄断会产生类似租金的垄断利润，追求利润的动机总会使一些人进行争取垄断地位的活动。这样形成垄断的活动既吸引了许多资源投入——特别地，这些资源投入是由于一些聪明的人注意到那些困难但又有

很高报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同时也引起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那些具有很高智商的人们要不就可以从事生产性活动，而且由于垄断的形成而使资源的配置更为扭曲。尽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讨论主要是有关垄断的，但实际上对市场过程的许多可能的干预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简单的最大化或最小化价格就有非常明显的再分配效应，而且受益者为了获得这种益处而可能投入巨大数量的资源。当然存在许多情况：一个游说者竭力促使某种限制的形成，而其它游说者则努力反对和抑制这种限制的形成。后一种行为有时叫做避租（rent avoidance），避租是以寻租活动的存在作为前提的，且要达到此目的代价极为高昂。寻租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简单的直接转让，对A征税是为了支付给B，这就会导致游说活动：对B方征税而不是对A方征税或阻止这种转化的形成。这两种游说活动的耗费会正好等于转移的数量或阻止的被转移的数量，尽管一个或其他的游说者会因其游说活动取得成功而获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寻租中处于同等地位，一些人总是易于在游说活动中取胜，某种利益对这些人来说总是容易形成。如果在政府那儿存在许多这样的利益，且在政府那儿花费时间的人能很快实现此利益，那么社会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从事寻租活动的产业。但实际的社会成本大大超过在政府部门的游说组织的直接成本。特别地，寻租团体常常有必要以明显的无效率的方式从事直接的生产活动，因为将确定的欺骗的成分引入寻租过程还是有必要的。在许多情况下对寻租活动的反对同时也表现为对政治腐败的反对。假定一个有交易控制制度的社会。购买外汇可以通过向官方的外汇控制机构行贿而获得。克鲁格分析了土耳其与印度的状况，最后测算出寻租的社会成本相当于总交易额的7−15%。传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这种行贿行为是人们所愿做的。因为它围绕着人们所厌恶的控制而进行。但实际上它导致寻租。在不发达国家为数众多的人们接受对他们未来生活缺乏实际价值的精心安排的教育计划，且长期从事政治上的策略和技巧，以期被任用。这些年轻人拥有自由的职业选择，假定预期从一种职业获得的收入等于从其他职业获得的收入。所不同的是比如学医的一旦学业完成就能工作并取得收入，而学经济的则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等待期。有时，一个就业机会往往有好几个候选人，他们可能进行寻租活动，寻租的全部社会成本就是不适宜的教育和为同一就业机会而竞争的人们在政治上施展谋略与技巧。总之寻租的全部社会成本就是图中四边形表示的部分。如果组织个人垄断或通过影响政府而得到公共垄断地位是由于规模不经济，那么寻租的全部投资将小于获得租的全部价值，即使在可自由加入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也是这样。在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情况就更不寻常，为获取租金的全部投资会超过租金本身。图洛克指出，寻租理论迫切需要人们去做的是经验研究和对适合于寻租的生产函数进行测度，目前还没有人提出一种较好的方法进行这种测度。需要说明的是寻租理论的倡导者们并不是反对所有的租金，有些租金是以某种特效药、并以专利化的形式产生的，还有的，如演艺家们所得到的租金都不在寻租理论研究的范围内。由此看来，寻租只适合于一部分租金的情形，一般说来这种活动都是对社会有害的。“寻租”的研究是近年来经济学界几个热门的课题之一。寻租理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几乎在每一本初等教科书中关于垄断的社会成本的阐述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对寻租的研究大大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寻租理论的结论是很显然的：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政府干预形成某种垄断，带来租金，就会导致寻租。

过去之现值（Present Value of Past） 过去之现值是人们现在对于过去发生的，但对于现在效用发生影响的过去事件的评价。未来之现值（简称为现值）是投资决策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它通过贴现将投资的未来收益（或对未来事件的评估）折合为现在值。过去之现值则是通过衰减率（decay rate）来评估过去事件对人们现在效用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如沃夫（C.Wolf, Jr）于1970年构造了一个过去之现值的模型，模型包括以下方程变量。(1) 表示现在福利状况的方程，把效用表示为现在收入（或未来收入之现值）y_t 与一组过去之事件的现在值$\overline{V}_t$的函数，$\overline{V}_t$ 通常与名誉、地位、自尊有关。(2) 表示过去事件现值$\overline{V}_t$与原发生的过去事件 V 之间关系的方程，$\overline{V}$与 V 的关系通过衰减率 r^* 而相联系。(3) 衰减方程把 r^* 表示为由于 t 期收入的变化而在 n 种可行选择的策略中选择第 i 种策略 P_{it} 的函数。(4) 与衰减方程有关的收入增长方程，该方程表示收入增量 $\dot{y}_t$ 依赖于策略选择 P_t。(5) 定义现行收入恒等式，定义现行收入等于过去收入 Y_{t-1} 加收入增量$\dot{y}_t$。

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经济中的许多流行的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例如旁置成本（sunk cost），通常认为它是一种在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成本。传统的看法认为由于旁置成本是既定成本非现在决策所能改变因而在决策时可以不予置理。然而按照过去之现值理论，现在决策受到旁置成本的影响，例如人的年龄越大，在过去之现值中所包括的旁置成本就越大，因此衰减的变化对于老人来说比收入的变化要相对重要。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现行收入的变化对于相对于衰减率 r^* 与过去收入之现值 V_t 来说可能很小。如果一个人能够要求将他现在的无能与他过去的聪颖相比，那

么他们往往能够容忍甚至会很高兴地承认他们现在的无能行为。"你们应当在二十年前碰到我。"这句话便反映了这种情况。

衰减率 r^* 不仅影响现在的效用，也受现在决策的影响。例如，一桩现行事件可能会使得所回忆的过去事件更加生动。重返旧地，重逢旧友会产生这种效果。衰减率 r^* 受现在决策影响的事实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时期德陶盖勒（A.deTocquelle）所提出的德陶盖勒之迷（de Tocquelle paradox）。德陶盖勒曾提出，为什么社会公正与福利的改进反而会加强社会的报怨与动乱？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可以用过去之现值理论解释德陶盖勒之迷。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之现值是过去成本或所受屈辱贴现值的加总。对于那些认为他们过去遭受剥削的人来说，这一贴现值加总额占其效用函数影响因素相当大的权数。由于存在旁置成本，为影响现行收入而选择的策略 P_0 会改变衰减率 r^* 而影响过去之现值。如果现行收入的提高降低了衰减率 r^*，对过去不平等的感觉就会更明显，也会使他们感到更痛苦。过去不平等的现在效用是负值。所以并非是现行收入的增量 y_t 越大，效用越大。低的收入增长率 y_t 也许是较可取的，因为它不会降低衰减率 r^*，因而不会降低过去之现值。

过渡性（Transitivity）　是这样一种特质，存在着两种关系，人们可以据之推出另一种关系。在经济学上，过渡性是用以描述一个行为者的选择行为。例如，一个人有两种选择，即在 A 和 B 之中选择 A，而在 B 和 C 中选择 B，那么此人就会在 A 和 C 中选择 A。这一点在逻辑上是明显的，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上面的例子中忽视了个人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关于这种决策过程马伊在 1954 年作过精彩的论述。在一个既定的行为模型之中，过渡性或者是直接假设给出的，或者是行为选择模型所暗含的。经济学中标准的个人行为模型是一个人通过将未来选择用效用函数的方法排序，这实际上是假定了过渡性的存在。但是在建立个人行为选择模型，特别是建立个人效用函数需要对如下两点给以证明，第一，个人消费函数是定义完善的，连续的，满足比较静态的限制条件，第二，如果存在相同类型的人的集体，就应该存在竞争均衡。过渡性是简单的，但与过渡性相关的问题却很复杂。

过渡投资（Over investment）　是西方经济学中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之一。投资过多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料投资过多理论，另一种是货币的投资过多理论。用投资过多，即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多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则相对不足来解释经济周期，最先始于俄国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德国的施皮特霍夫，其后的主要代表者有瑞典的卡塞尔和维克塞尔。英国的庇古和罗伯逊等人也曾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危机。投资过多论者，一般根据如下事实，即固定资本的生产在高涨阶段有很大增加，在萧条阶段减缩很多，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各个阶段变动不大。危机的产生，是由于高涨阶段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或供给太多。货币的投资过多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奥地利学派的现代主要代表，如 F·冯·哈耶克、L·冯·米塞斯和英国伦敦大学的罗宾斯。该理论认为，银行体系的信用膨胀是破坏经济体系均衡，引起经济扩张并导致危机和萧条的根本动因。但并不把危机视为纯货币现象，而同投资过多理论一样，认为发生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因素引起的物质生产领域两大部门之间的组合比例的失调，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相对而言，前者相对生产过多，而后者则相对不足。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对这种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下，银行体系的贷款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就会出现货币供给超过人们自愿的储蓄的信用膨胀。资本家借助信用膨胀而大量投资，使得原来用于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源，转而生产资本货物，从而引起消费品生产和供给的减少。而生产性投资转为货币性收入后，消费者努力恢复其原来的消费水平，从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另外，银行体系受制于法律和经营习惯，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信用。信用紧缩以及储蓄未能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使货币资本供给短缺。从而引起两个后果：或者是繁荣阶段进行的投资半途而废，或者是已生产出的资本货物因货币资本不足而销路不畅，价格下跌，这就是危机。危机是经济高涨阶段信用膨胀的必然结果。

过度储蓄（Nversaving）　是历史上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早期的超额储蓄只是指货币的贮藏手段，而不是指以获取利息为目的而从事金融投资的那种储蓄。因为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储蓄与投资是一致的，决定储蓄也就是决定投资。法国的西斯蒙第于十九世纪提出了储蓄过度而消费不足的理论。他认为，生产由于利润机制而存在着无限扩张的趋向，但日益增多的破产及贫困的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却越来越少。生产过剩则是不可避免的。霍布森则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储蓄倾向过大。他认为，储蓄与投资对利息率的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就会产生总投资小于总储蓄的现象。卡尔多的收入再分配理论认为，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与利润的再分配是储蓄相对于投资而调整的主要机制。由于实际工资太低，而利润水平太高，这就要调整二者之间的分配以提高工资水平。但这种内在的要求由于工人弱小的谈判地位而

不能实现，因此价格的任何降低，都会导致工人工资的相应降低。所以储蓄水平的降低不能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完成，而只能通过生产的收缩来实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计划投资并不依赖于计划储蓄。在成熟的经济中，人们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愿意储蓄的货币之所以超过有利的投放量，是因为投资机会在不断地减少。投资机会的减少是指在既定技术水平下，达到理想盈利水平的投资项目在减少。凯恩斯认为，在成熟的经济中，储蓄过度会造成经济衰退，从而引起失业人口增加。但是政府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储蓄过渡采取防止和补偿措施。补偿是指扩大政府投资使之与储蓄相等。例如，有人主张通过增加税收增加军费开支，可以成功地消化过度储蓄而又不降低消费水平。因此，他们认为，战后过渡储蓄依然存在，但它已被军费支出的增加所抵补了。

过境税（Transit Duty） 过境税又叫通过税，它是指一国对通过其关境或国境转往第三国的外国货物所征收的关税。征收过境税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早期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使得交通运输条件很差，对不少国家来说，可供选择的进出口运输线路很少，因此过境税比较流行。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交通运输事业的不断发展，各国在货运方面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征收过境税会使征税国得不偿失，失掉一大笔运输收入，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征收过境税。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已不再征收过境税，只是在国外货物通过其关境或国境时征收极少量的准许费、签证费、印花费、统计费等。

过境贸易（Transit Trade） 外国的进出口商品在运输过程中通过本国国境，对本国来说这是过境贸易，又叫通过贸易。过境贸易意味着外国商品在通过本国国境时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改制。过境贸易可分为直接过境和间接过境两种。直接过境是指外国商品完全因为运输关系经过本国，无需在本国海关仓库存放就直接运往另一国。间接过境是指外国商品运抵本国国境后，需存入本国海关仓库，在没有进行任何加工改制的情况下又运往另一国，间接过境贸易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商品启运时尚未售出，也可能是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货主不愿立即卖出，或者是由于暂时不能转运，等等。对于采用专门贸易体系的国家来说，间接过境贸易不被列入本国外贸总额统计中。而对于采用总贸易体系的国家来说，间接过境贸易是本国外贸总额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境货物存入海关仓库时，就被计入本国的进口当中，当它从海关仓库提出重新运往国外时，作为再出口被计入本国的出口当中，一般来说，过境商品应按本国海关的有关规定履行过境手续，以前还会对过境商品征收过境税。从目前来看，世界各国已不再对过境商品征收过境税，而且往往还通过简化海关手续等措施来促进过境贸易的发展，因为对一国来说，它可以通过承担过境商品的装卸、储存，转运等任务获取大量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储存费等各种劳务收入。

过期提单（Stale B / l） 过期提单是指出口商在货物装船得到承运人签发的提单之后，延迟很久才凭此提单向银行议付货轮，则提单成为过期提单，对于延迟过期的确定，通常以为如果银行接到货运单据，以正常的邮递寄达目的港时，货物已经运到目的港，则为延迟很久使提单过期。

对于过期提单，由于提单到达收货人之前货物已到目的港，使得卸货后无人提货，常常发生货物损失和额外的费用，因此银行是不接受过期提单议付货款的。

对于一些短程运输，经常会出现货物先于提单到达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应在合同中注明可以接受过期提单；另一方面，货物在装船后，出口商也应立即通知进口商，使进口商可以先凭银行担保提取货物。

迂回生产方法（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 社会生产过程，从原始资源到最终消费品的完成要经过一定的生产期间和生产阶段，其中可以是原始资源与劳动的共同作用而直接成为最终消费品，而迂回生产方法则是在最初阶段，原材料和其他基础材料附之以劳动和类似于土地一类的生产要素制成中间产品，也就是资本品，然后资本品也作为生产手段与上述生产要素一起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与前者直接的生产方法相比，后者则是间接的生产方法。之所以称之为"迂回"的，关键在于一个资本品的制造和生产利用的过程。比如一个渔夫徒手捕鱼，一天只捕五尾，经过若干天的积累，他可以造出一个鱼网和一条小船，这就是他的资本品，用小船和鱼网每天就能得50尾，那么跟他徒手捕鱼，直接用之于消费的生产过程相比，他靠往日的积累制成资本品船和鱼网，再利用船与渔网进行捕鱼的生产方法就是一种迂回生产方法。在现代化生产中，人们所需要的产品花样繁多，资本品已成为复杂的机器设备，但迂回生产的原理没有变。采取迂回生产方法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增大社会生产力。因为自然是永恒的，有无限可以利用的资源，由于受资本和生产手段，也就是受人们的生产技能所限，一部分资源总是不能加以利用，如果能发展技术，增加资本量，延长迂回的路径，那将能把潜在的永恒资源的潜力挖掘出来，创造更多财富。迂回

生产的路径愈长，生产期限就愈长，完成的产量将更大，收益会更多。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表述，迂回生产方法旨在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提高附加值。对最原始资源的挖潜和利用的迂回生产的思想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人物庞巴维克（E.V.BÖhm Bawerk）提出的，迂回生产方法在他的资本理论中担当重要角色，以后威克赛尔（J.G.K.Wicksell）和哈耶克（F.A.V.Hayek）等人将其深化和发展。

地区政策（Reginal Policy）　政府旨在改变某些地区经济类型、经济结构与经济状况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对某些地区理想经济类型与经济结构，以及改变这些地区经济状况的理想方式的看法。最常见的地区政策是为了改变落后地区的经济状况，并缩小各地区之间经济成就的差别。特别是要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减少失业，以提高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这种政策的主要形式有：鼓励企业向落后地区转移，鼓励落后地区的工人外出就业，支持在落后地区建厂，增加政府对落后地区的支出，实行有利于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等。例如，英国为了减少落后地区的失业，曾在1967—1977年间实行地区就业奖励金制度，对向落后地位投资的企业实行补贴，按企业雇用的工人人数为基准，每个工人补贴1.5—3英镑。其他国家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地区性政策。但经济学界对这类政策的有效性仍存在着实质性的争论。

地区就业奖励金（Regional Emplogment Premium）　地区政策的一种，目的在于降低某些地区的失业率，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英国1967—1977年曾采用这种政策。该政策规定，向某些地区的制造业厂商按雇用工人人数支付每个工人1.5—3英镑的补贴。这种政策刺激了这些地区的厂商更多地雇用工人，以降低该地区的失业率。同时，这种政策也有利于降低这些地区厂商的生产成本，鼓励在该地区增加投资和生产。

地区工资税和折扣（Regional Pay-roll Taxes and Rebates）　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提出的一种区域经济政策，其目的在于加速工业区位的移动。一个国家内部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失业率高，有的地区失业率则低。从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政府希望工厂尽可能多地向高失业地区移动，或希望企业家在那里进行新的投资。政府考虑较多的是失业率的减少，而不是财政收入的增加。因此，为了加速工业区位的变动，单靠政府对企业家投资实行优惠是不够的，克拉克建议实行"地区工资税和折扣"方案。其基本内容是地区工资税由在某一地区经营企业的雇主按照本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总额的一定比率向政府缴纳，而地区工资折扣则是由政府给予在某一地区经营企业的雇主的一种补贴，也是按照该雇主所支付的工资总额的一定比率发给企业，这样就会促使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尽可能符合政府的目标。"地区工资税和折扣"的比率要根据3个因素来确定：(1) 地方人口密集因素，这可以用10英里半径的区域内的平均人口密度来表示；(2) 地带人口密集因素，这可以用75英里半径的区域内的平均人口密度来表示；(3) 地方失业因素，这可以用过去5年内的平均地方失业率来表示。根据这3个因素确定的地区工资税率和折扣率，凡是人口密集，劳动力过多的地区，工资税率是较高的；凡是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的地区、雇主不仅不支付工资税，甚至还可得到政府补贴。这样就可以刺激工厂加速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去。而随着工厂的迁移，这又可以促使失业者离开人口密集、劳动力过多的地区，到建立新工厂的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去。为了不致于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可以把工资税和工资补贴的总数规定得大体上相等。

地区帐户（Regional Account）　低于国家一级的收入和产值帐户。由于资料的限制，一般无法编制出和国民收入帐户一样详细、全面的帐户。地区帐户主要提供的是人口、收入、就业和产值方面的数据和资料。

地租（land Rent）　（参看经济租）

地点套汇（Space Abitrage）　又译作"空间套汇"。利用同一时刻不同外汇市场上汇率的差异，在不同外汇市场上调拨资金，贱买贵卖，赚取利润的外汇交易。包括：(1) 直接套汇。又称"两地套汇"或"两角套汇"，"间接套汇"的对称。利用两个外汇市场上汇率的差异，在汇率低的外汇市场上买入，在汇率高的外汇市场上卖出牟取利润的外汇交易。假设同一时刻法兰克福外汇市场和巴黎外汇市场上美元的汇率为：法兰克福1美元＝1.8454／58马克，巴黎1美元＝1.8784／88马克，套汇者可在法兰克福市场上以1美元＝1.8458马克的汇率以马克买入美元，同时在巴黎市场上以1美元＝1.8784马克卖出美元，每1美元可获利0.0326马克。，若交易18，458马克，不计交易费用可获利3260马克；(2) 间接套汇。利用三个或三个以上外汇市场上汇率间的差异，在它们之间贱买贵卖从汇率差异中牟取利润的外汇业务，最常见的是"三角套汇"或称"三地套汇"。例如：

在同一时刻:

纽约外汇市场 1美元=2.5000/20瑞士法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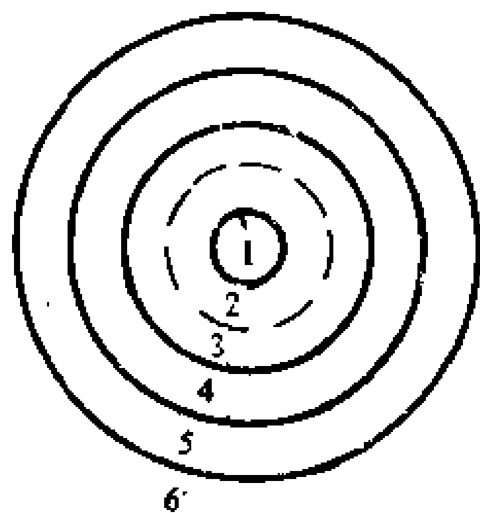
苏黎世外汇市场 1英镑=3.2300/30瑞士法郎

伦敦外汇市场 1英镑=1.3450/70美元

套汇者可在纽约市场上以1美元=2.5000瑞士法郎汇率卖出10万美元，买进25万瑞士法郎，同时在苏黎世市场上以1英镑=3.2330瑞士法郎的汇率卖出25万瑞士法郎，买入(25万/3.2330=)77,328英镑，同时又在伦敦市场上以1英镑=1.3450美元的汇率卖出77,328英镑，可获得(1.3450×77,328=)104,006美元。如果不将交易费用计算在内，套汇者可获利4,006美元。

空间套汇使各外汇市场的汇率趋于一致。

同心型城市 一种根据土地使用的形式而划分出的城市模式。由美国社会学教授伯吉斯(E.W.Burgess)以芝加哥城为样本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这类城市是以不同用途围绕单一核心，由规划地向外扩展形成圆形区为特征。这个核心，美国术语称之为商业中心区(C.B.D)。见图。这六个向心带的依次排列如下：1.商业中心区：这里分布着大银行、保险公司、股票市场、高级专业商店、大百货公司、大型娱乐场和餐馆等，构成了整个城市的中心；2.中心边缘带：这是围绕中心商业区的第一环形带。主要分布有批发商业、运输、铁路客站等；3.过渡带：分布有一般零售商业和轻工业小工厂，是过去高收入居住区，但因城市扩大而迁出。海外移民、少数民族挤入，作为廉价劳动力为此带工商业干活，并在



1.商业中心区

2.中心边缘带

3.过渡带

4.工人家庭带

5.高级住宅带

6.通勤带

此定居。是贫民窟分布区；4.工人家庭带：为了就近上班，租赁或购买房屋在此带居住，往往容纳大量第二代移民、形成中级住宅区；5.高级居住带：由三部分住宅组成：(1)高收入公寓居住建筑，(2)独户房屋，(3)彼此隔离的花园洋房；6.通勤带：即近郊区或卫星城，多为中上层居民沿铁路或快速路居住地段。由于商业中心区扩展和城市增大，这一模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商业中心区的再发展又吞没了贫民的住房，迫使住在那里的低收入居民不得不向远处迁移。因城市增长而发生的持续压力强迫各圆形区域不断向外移动，迫使土地及房屋由高收入居民转给低收入居民。商业中心区本身是各个阶段城市化的遗迹，当时交通运输不发达，为了得到最大的经济收益，不能不在形体上靠在一起。随着20世纪交通运输出现改善，商业中心区之所以继续存在，就可能是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过着充实丰富的城市生活，大部分区域内的一切活动都汇集于此。在现实生活中，若干极高收入的家庭的确从城市外缘迁回到商业中心区来，因为他们为了便于进入商业和社交的核心。

同业工会 见技艺工会条。

同质化产品(Undifferentiated Product) 指不存在产品差别的产品。在一些市场上，不同企业生产的同品种、同规格产品基本上没有差异，即有完全的替代性，这些产品就是同质化产品。比如许多金属原材料、化工原材料产品就属于同质性产品。

因罢工荒废的人日(Man-Days of strike Idleness) 美国用于计量劳动力因罢工而损失的时间的一种单位。损失的人日数，由美国劳工统计局根据国内每次较大的罢工的具体数字进行计算，其中包括卷入的工人数、持续的天数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罢工人数乘以罢工持续天数，就得到了因罢工而荒废的人日数，还可用罢工荒废的人日数在全部工作时间中所占的百分比率表示这一估计数字。有关罢工和因罢工而荒废的人日数资料，每月由劳工统计局公布。

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Zero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Hypothesis)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这一假设。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中，传统的农业部门没有追加资本投入，土地也十分有限。而由于人口迅速增加以及妇女劳动力的解放，劳动力供给十分丰富。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原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必然非常低，有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零，甚至是负数。这部分劳动力是过剩的劳动力。如果把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分离出来，即使其他投入要素并不增加，产出总量并不一定减少，甚至还略有增加。这部分劳动力形式上是就业的，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坚持认为，在大部分发展中国

家，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乡村部门中，存在着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把他们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中去，不会使农业总产量减少。刘易斯还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为零指的是劳动者而不是劳动时间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该假定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和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理论前提。

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假设（Positiv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Hypothesis） 与刘易斯的假设相反，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否认农村有隐蔽失业存在，认为现有生产条件下，若从农村撤出劳动力，农业总产量就会减少。舒尔茨于1964年发表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认为传统农业贫穷但却有效。他把发展中国家完全以世代相传的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称为传统农业。他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状态中，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业生产要素取得收入的偏好和动机长期不变。当农业接近于传统农业的特定的均衡状态时，向农业生产要素进行追加投资的边际生产率不断下降，取得农业收益的成本变得十分昂贵。高成本低收益，削弱了对农业进行新投资的刺激。于是，储蓄和投资，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便处于均衡状态。舒尔茨用经验材料证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以多年积累的经验，对于可用的资源已经做了最优的分配，对于有利的经济刺激也会做出积极的及时的反映，农民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这表现为，如果重新配置那些农民所拥有的要素，也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的增长。舒尔茨还根据1918年发生在印度的一场流行性感冒造成农业人口下降，并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的材料证明，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会引起农业耕地面积的相应缩减和农产品产量的下降，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增减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依存关系。因而，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并不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等于零。舒尔茨观点的政策含意在于，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贫困和落后的主要原因，只有采用技术革新才能增加产出。

农业剩余（Agricultural Surplus） 包括三种形式：农产品剩余、劳动剩余、财政剩余。农产品剩余，指农业的总产量与农民总消费之间的差额。劳动剩余，指农业部门中，在不会减少农业总产出的情况下所能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财政剩余指加入价格因素后，用货币表示的农产品剩余。

农业剩余根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在不同国家中，因土地使用与占有制度的不同，农业剩余的产生与分配亦不相同。农业剩余又是同工业化密切相关的。因为没有农业剩余，就不可能购买工业品以扩大工业需求，不可能为工业扩张提供资本和劳动力，不可能有农产品出口，从而不可能有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农业剩余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非农业部门，通常是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的。价格调整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改变贸易条件，通过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使农业剩余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具体办法有：对专供农民使用的工业品（如化肥、农机）进行征税；国家通过价格控制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得比农产品价格更快；或者允许工业品价格上升而农产品价格固定不变，等。另一种是用价格刺激办法来转移农业剩余。一般说来，随着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就更愿意出售农产品，使市场剩余产品增大。除了价格政策之外，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常常是转移农业剩余的手段。如增加土地税、提高存款利率吸引农民增加储蓄等。就长期而言，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是调动农业剩余的根本性措施。

农业生产力（Agricultural，Productivity） 指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进行农业生产的社会力量。它由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资料、农业劳动对象以及农业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组成。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农业劳动者是农业生产力的主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农业劳动资料包括农具、农业机械以及动力系统、运输系统等等，它是衡量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农业劳动对象一般指土地与庄稼，农业劳动者将劳动加于农业劳动对象上，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是农业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与生产技能，也可以改进或者更新劳动资料。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劳动生产力翻了一番，其原因就在于知识增长与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农业经营管理也相当重要，它包括对农业各生产要素进行充分利用、合理配置，以保证农业生产实现最优经济规模，从而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收益。实际应用中，农业生产力通常以单位土地的谷物产量、每头牲畜的平均谷物产量或者人均谷物产量来衡量。测量农作物产量时要考虑劳动、土地、肥料、机械、经营成本以及时间、气候等因素。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测量时，投入和产出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实际测量困难比较多。从历史上看，农业生产力对农业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当农业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只能用木石工具进行生产时，相对应的只能是落后的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而当生产力发展到可以用大机器进行农业生产时，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运而

生了。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也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农业生产力的状况时，就促进它的发展，相反，若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就会阻碍它的发展。

农业经济学（Agriculture Economics） 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领域中各种经济关系及其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对这些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人们可以找出使农业经济体系合理而有效地运行的方法，从而可以帮助政府和农业企业制订相应的经济政策与决策。

一、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很广，它涉及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以及农产品的分配与消费等各个环节。它既研究一国内部的农业经济问题，而且还在世界经济的范畴中考察各国的农业生产与农业发展情况。

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农业内部所有制结构等等。(2) 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包括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经营与流通销售，把握农业投资的适度规模与速度等等。(3) 农业规划方面，包括建立合理的农业内部生产结构，认真搞好土地规划与农业区划等等。(4) 农业市场方面，包括对农产品合理定价，了解供求关系，以及开发农产品市场等等。(5) 农业现代化方面，包括技术革新与改造，农业生产条件与组织管理的现代化等等。

二、农业经济学的历史演变

有关农业经济的思想古已有之，当时主要是对庄园与农场的经营管理进行研究。一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学发源于18世纪的欧洲，它的标志是英国的阿瑟·扬于1770年发表的《农业经济》一书。在这本著作中，阿瑟·扬阐述了生产要素比例、生产成本以及收益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大规模农业经济的优越性。1809年，德国的A·泰尔出版了《合理的农业原理》一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农业经济学原理。

19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农业在西欧和美国蓬勃发展起来。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这一发展需要，农业经济理论也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德国的冯·屠能在他的《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从理论上研究了农业区位配置与级差地租问题，影响深远。后来，人们注重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与合理的部门结构问题。美国学者重点研究农场主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及农业金融等问题，30年代大危机之后，又把研究的重点转向进行市场预测以及探讨国家干预的程度与方法上。H·泰勒的《农业经济学史话》与T·舒尔茨的《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以及《改造传统农业》等著作对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还有德国的T·布林克曼、F·艾瑞保以及美国的E·诺思、J·布莱克等。

三、农业经济学的新发展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农业经济理论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与进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1.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除了大量使用统计方法外，还广泛采用各种数学手段，设立农业经济模型，研究农业经济问题，计算机的出现使得定量分析迅速发展起来。

2.向新的领域扩展。除了原来已有的研究领域外，目前理论的发展已经扩展到许多新的领域，如水资源分配、大气与水的污染、地区发展规划等等，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相应出现了许多农业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比如农业经营管理学、农业生产力经济学、农业区划与布局经济学、农业生态经济学、土地经济学、农业市场经济学、农业消费经济学等等。

农业经济政策（Agricultural Economic Policy） 农业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础。任何社会中，只要政府对经济不是实行完全的放任自流的话，那么它就必然要制订一系列农业经济政策来保证农业稳定、健康地发展。在经济体制不同的社会中，农业经济政策的目标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政策结果更是迥然有异。

1.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经济政策

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经济政策有4点目标：(1) 保证农业部门的稳定与繁荣；(2) 保持合意的家庭农场结构；(3) 在政府干预程度最小的前提下保持一个有效的农业销售与分配体系；(4) 保证食品供应充足、营养齐全、价格合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农业经济政策要涉及划分土地、控制生产、提供货币信贷、价格支持、关税保护、收入转移以及教育培训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还要不断进行研究与农业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等等。

农业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对农产品价格与农业收入进行调节。这一调节主要采取4种方式：(1) 支持价格政策。许多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因此，在丰收年份，产量增加反而使得价格大幅度下降，造成农场主收入的减少。为了防止谷贱伤农，稳定农场主的收入，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实施支持价格政策，硬性规定小麦、玉米等农产品的最低价格，农产品按这一价格出售，剩余部分由政府收购。这一作法的一个弊端在于，实施支持价格会刺激农产品的大量

生产，但是如果农产品连年丰收，则政府仅对仓储保管一项就要支付大量的费用。（2）减少与控制供给量。通过限制农产品的耕种面积来控制农产品的供给量，使得市场上供给与需求实现平衡。这一作法虽然保证了农场主收入的稳定，但是却造成资源的浪费，在世界粮食匮乏的时期减少粮食供给也不大合乎人道，所以这一作法并不常用。（3）刺激与鼓励需求量。可以采取出口补贴、对国内消费者实行补贴、农产品贷款率高于市场均衡价格以及政府购买后对国外折价销售或实行援助等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刺激需求量的增加，从而保证农产品的供求相当。（4）对农场主实行直接支付。具体作法是，政府提出一个农产品的保证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这个保证价格，那么政府将按照两种价格的差价向农场主实行支付。这种作法既保证了农业收入，又使消费者得到了低价的好处，但是开支相当大。一般来说，上述几种作法经常同时使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经济政策在短期内保证了农业收入的稳定，增加了农业投资，同时，它还使得农场数量下降，规模增大，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近来，由于对食品价格及质量与数量进行保证的需要不断加强，也由于需要提防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因此，农业经济政策更多地倾向于节约粮食，加强对营养的研究与教育，并重视食品监督检查与调节的工作。

2.计划经济下的农业经济政策

计划经济下的农业经济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保证农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也就是经常性地、有计划地保持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农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一定的比例关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就要制订相当严密而具体的农业计划。农业计划按制订计划的单位划分，可分为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按照计划所包括的时间划分，可以分为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其中长期计划一般指3年以上或者更长时间的规划，是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一种战略部署。国家长期计划是从宏观的层次上对农产品的生产与结构以及农业其它许多方面的发展所作的规划；而企业长期计划则要根据国家长期计划的要求、结合自身的各方面条件，制订本企业的发展目标。短期计划主要指年度计划，是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制订短期计划时，要根据长期计划的要求，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计划经济中的农业经济政策所要涉及的内容比市场经济中要广泛得多，除了农产品生产、土地利用、农业基本建设、信贷与投资、成本及销售与分配之外，还要编制农村人口与农业劳动力的计划，把它作为与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

由于农业计划涉及面很广，因此，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必须深入调查，了解实际，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进行综合平衡。

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　从广义上讲，农业革命指的是农业结构以及农业生产技术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发生彻底的转变，这种变革在世界农业的历史中经常出现。但是“农业革命”一词通常用于狭义，特指在农业中采用新的生产技术，使农业的操作方法从中世纪状态向现代状态发生转变，即1750-1850年间英国农业所发生的变革。

农业革命之前，由于缺乏有效的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因此，土地每耕种一年之后都要休耕，以保持土地的肥力，这样显然极大地妨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发展。18世纪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得很快，传统的耕作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改进农耕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势在必行。

在英国，J·图尔首先引进了深耕技术，使土地耕得又深又精，这既控制了杂草的生长，又使得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另外，汤森子爵二世还提倡土地轮作的方法，其中的一轮用于种植饲料农作物，这为谷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肥料。后来，R·贝克韦尔又发明了“雷赛斯特饲羊法”，使牲畜饲养技术得以改进。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与开垦荒地，小块的农场逐渐连接成片，形成了大农场，这使大机器的使用成为可能，从而刺激了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土地和农业机械设备的投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英国农业逐步实现了地区专业化与大规模耕种，这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产量也大幅度上升。农业革命不仅使得大规模进行粮食生产成为可能，而且为19世纪以后英国传统农业向现代科技农业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另一个深刻的后果是，农民逐渐从对土地及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成为农业中的产业工人。

本世纪以来，全世界各国的农业都处在不断进步之中，特别是4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广泛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将生化技术用于土壤改良，因此，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其农业人口却在同一时期大量减少。在60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通过种植高产的杂交粮食作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众多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中国在建国以后，一直强调兴修水利、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同时还通过各种组织的、政策的与经济的措施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能基本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世界各国的农业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全世

界各国所进行的农业变革，除了促进农业效率的提高之外，也必然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企业家（Entrepreneur） 见作为生产要素的企业家才能。

企业分割（Company dissolution） 1947年12月日本制定了《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依据该法规定，有325家公司（其中工矿业方面257家，服务行业方面68家）被指定为"排除过度集中"的对象。这些公司的实缴资本占当时全国公司实缴资本的66%。对这么多的企业采取分割政策，从开始就有反对意见，随后再加上东西方冷战结构的剧烈化和占领政策的转变，形成暂缓实施"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的气氛。1948年5月，美国"集中排除审查委员会"（5人中有3人为实业家）来到日本，决定仅对325家指定企业中的18家进行企业分割。措施包括：1.公司分割；2.营业一部分分割和让渡；3.资产、股份的处分。例如日本钢铁公司分割为八幡制铁所、富士钢铁公司、日铁轮船公司、播磨耐火砖公司；大建工业公司分割为吴羽纺织公司、伊滕忠商事、丸红、尼崎制钉所；三菱重工业公司分割为东日本重工业、中日本重工业、西日本重工业公司；王子造纸公司分割为苫小牧造纸、十条造纸、本州造纸公司。通过企业分割，排除了大企业水平性、多角性的市场支配力。除了依照"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对指定325家企业中的18家进行企业分割外，还有61家，是依"企业再建整备法"进行了企业分割。依"企业再建整备法"进行的企业分割，是为了重建战后面临经营危机的企业，并不一定是作为反独占政策的一环来加以实施。

企业合并（Amalgamation） 企业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成一个新企业，其特点是伴有产权关系的转移。通过合并，合并前的多家企业的财产变成一家企业的财产，多个法人变成一个法人。企业合并是资本集中从而市场集中的基本形式。在日本以及欧美国家，企业合并只要不带来垄断弊端，就被视为合理，甚至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但可能导致垄断的企业合并，会受到反垄断政策的干预。可按不同的标准对企业合并进行分类。最基本的一种是按合并前企业间的市场关系划分的。按照这种划分，有三种基本的企业合并形式：1.水平合并，合并企业的双方或多方原来属于同一个产业，生产同类产品。2.垂直合并。合并企业的双方或多方之间有原料生产、供应和加工及销售的关系，分处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不同阶段。垂直合并是大企业全面控制原料、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建立垂直结合控制体系的基本手段。3.混合合并。同时发生水平合并和垂直合并，或者合并双方或多方是属于没有关联关系产业的企业。后一种合并，常常发生在某个产业的企业试图进入利润率较高的另一个产业时，常与企业的多角化战略相联系。根据合并的方法，可以将企业合并划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吸收合并。合并后一个企业吸收了另一个企业。通常是大企业吸收了小企业，如果小企业掌握特有的技术、势头日好，也可能吸收一些外强中干的大企业；二是新建合并。合并后建立了一个新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合并双方的实力差异较小企业间进行合并的主要动机有：1.加快企业发展，如为了尽快扩大市场占有率；2.经营和生产多角化；3.控制原材料、资源，以获得更大的市场支配力；4.实现规模经济，组织大批量生产；5.获得税收、金融上的好处，这种动机与政府政策和金融企业的政策有关；6.吸收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如为了获得某项技术，购买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7.救济经营不善的企业；8.便于安排人事。19世纪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发生过三次较大的合并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次在本世纪20—30年代；第三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

企业规模（Enterprise Scale） 企业规模包括企业的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两层含义。生产规模指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规模指企业在一定时间的销售量。

企业规模的内部性增长（Internal Expansion of Enterprise Scale） 指企业通过投资活动扩大其规模。其主要形式一是通过生产设备投资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二是通过促销投资促进企业销售量的扩大。

企业规模的外部性增长（External Expansion of Enterprise Scale） 指企业通过相互合并扩大其规模。

企业再组合政策 见"促进集中政策"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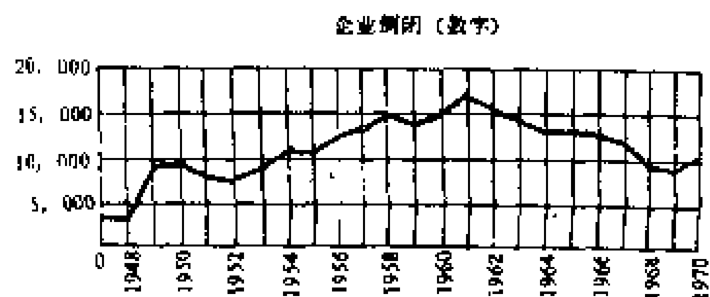
企业间协调（Inter-firm Co-ordination） 以共同利润极大化为目的的限制竞争行为。在卖方集中度较高的寡占产业，卖方独立或竞争的行为会使价格定在竞争水准或降到以下，所以寡占企业们会采取协调行动，追求共同利润的极大。最基本的协调形式有两类四种。第一类是卡特尔，分为两种，一种有明确的文字协定，称为明确协定卡特尔；另一种只有口头而无文字协定，称为秘密协定卡特尔。在商品经济发达

的国家，除非特别批准，卡特尔行为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第二类协调形式，称为默契的合谋。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种称为价格领导制，即随着某企业的价格调整，其它企业也相应调整价格；另一种称为有意识的平行调价。在平行调价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先导和追随的痕迹，但存在一种默契。现代寡占企业进行相互协调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卖方全部参加的，也有部分参加的；有建立在参加者全部完全同意的基础上，也有不完全同意的；有文字和口头协定、卡特尔行为与暗中配合行为相结合的等等。此外，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得默契的合谋得以更多的应用。影响企业间协调的因素很多。一般而言，非差别型寡占市场（即同质产品寡占市场）容易形成和维持价格协调。影响非差别型寡占市场协调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1.企业数。一般而言，企业数越多则越难形成企业间协调。因为企业多，则个别企业往往认为整体协调与自己的直接利益关系较小，价格协调时容易发生调整利益的各种摩擦，各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往往差别较大，目标价格难以协调。2.市场份额。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同时，各企业所偏好的价格也不同，此时则较难形成同一价格的企业间协调。这时有三种情况，当企业的生产费用曲线受产量的影响不大时，企业协调比较容易；当生产的边际费用曲线受产量影响较大时，份额较小的企业可能接受较低水平的价格；当企业的装备水平接近时，市场份额小的企业将力争扩大市场份额，价格协调比较困难。3.成本条件。各企业的成本条件（具体而言是单位平均成本）不同，则较难形成同一价格。即使企业的市场份额完全相同，因企业的成本条件不同，接受协调的价格水平也将不同。实现低成本的企业将会选择较低的价格。4.产品差异性。产品物理性差别越小，则市场价格越会接近同一；产品的物理性差别越大，则越难形成企业间协调。5.需求的价格弹性。若是企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则降低价格来扩大市场占有率越有可能，此时则较难形成企业间协调。6.需求的成长率和变动率。需求的成长率和变动率越大，各企业对未来需求的预测以及价格弹性的大小，会有不同的看法，企业间协调难以成立。7.新技术开发和引入的机会。引入和开发新技术的机会越多，企业的费用条件越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越有可能改变企业的市场地位，企业的价格协调将越困难。在不同的产业，在经济和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述各项因素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将有所不同。

与非差别型寡占市场相比，差别型寡占市场（即产品不同质寡占市场）的价格协调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是：1.当产品由于物理性的差异、主观的差异（由广告等所造成的差异）、卖方的不完全知识等造成较大差别时，寡占企业的独立性较强，难以在价格水准和价格体系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2.如果产品差别与地域差别关系较大，受成本、运输条件、地方政策差别以及区域消费习惯差异的影响，价格协调难度较大。3.产品的性能品质通常会由于企业间竞争而发生变化，企业间这种变化一般都不相同，能接受的价格水平也不相同，价格协调比较困难。4.许多投资品往往是订货生产，订货产品是个别地形成价格，很难进行价格协调。

尽管差别型寡占产业的价格协调比较困难，但不等于不存在价格协调，只是协调程度较低。主要的协调方式有三种：1.企业的产品有差别，但组成产品的零件可能差别不大。各企业对产品零件的价格达成协议，在生产产品或接受订货时，根据产品零件数量、类型确定价格。美国、日本的电机行业就有这种情况。2.制定代表性的标准产品的价格，对变形产品以一定的附加费率制定价格。变形的含义是广义的，既包括产品性能质量的变化，也包括各种服务条件的差异。3.根据基准地的产品价格，加上统一的运输费率，确定包括产品和运输费在内的价格。上述三种方式一般只适用于差别程度中等的产品。如在电机产业，实质性差别较小的一般电机可用上述方式协调价格，而对重型和特殊电机，上述方式较难见效。

企业倒闭（Business Failures）　企业因卷入法院诉讼程序或出于自愿的行动（它将使其债权人遭受损失）而停止营业。由美国邓恩和布雷兹特里特公司编纂的企业倒闭统计数字只包括那些卷入法院诉讼程序（诸如代管、改组和转让等）的公司或那些将使其债权人遭受损失的自愿行动，但不包括那些为避免亏本而清理、合并或出卖的公司。这些统计数字大部分包括商业和工业企业。邓恩和布雷兹特里特公司编入的企业与暂停营业的企业不同，后者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而停止经营的所有企业。企业倒闭数是全部企业的活动的一项重要指标，美国经济研究所将其划为三十项主要指标之一。一般说来，当经济收缩时企业倒闭就增加，而经济扩展就减少。1970 年美国倒闭的企业总数达 10740 家。



资料来源：邓恩和布雷兹特里特公司

企业集中（Business Centralization） 企业通过垂直集中和生产多角化，生产和销售多品种产品并提供服务的行为。企业集中的动机主要是：1.追求范围的经济性。范围的经济性是指在垂直集中和生产多角化工厂由于结合生产而带来的共同费用的节约。如垂直集中生产，可在各生产阶段充分利用用热；可节约原料的搬运时间；可通过合理的工厂布局节约建设投资。又如多角化生产由于零部件、机械、工艺管理等的共同利用，可节约费用。2.充分利用经营资源。它包括，经营者在经营管理上的知识和经验；专利权和专有技术资源；市场交易文法等技术性知识；在销售、购人原料、筹措资金等方面显示出来的市场地位；商标资源以及搜集信息、研究开发的组织等。3.分散风险。企业面临多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经常发生需求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政策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变化等。这些变化既有长期的（如技术变化），也有短期的（如需求变化）。企业若不能成功地适应这些变化，企业经营就会陷于困境。企业实行垂直的集中和多角化的集中，就可分散这些变化带来的风险。企业实行多角化经营，即使某一类产品需求下降，但若有另一类产品需求趋于上升，企业经营也会稳定。而且，如果经营财务稳定，对付其它企业收买的能力也越强。4.信息的经济。企业为了对付风险和不确性，往往支付非常多的信息费用。企业若实行垂直集中和生产多角化，就可以将在一个市场上搜集积累的信息充分利用于其他市场。而且，在几个市场上搜集积累的信息发挥出乘数效应，就可更准确地利用信息。5.节省交易费用。企业为了寻找交易伙伴，交涉和签定合同，监督合同是否圆满地履行，对付不履行合同等，通常要支付大量的交易费用。企业若能通过垂直的，多角化的集中，把原来市场上交易的伙伴，转化为企业内部的交易，将可以大大节约交易费用。企业集中虽有上述的经济性，但不是说企业集中有无限的可能性。第一，因为经营资源有一定的限制，即使是特大的企业也不可能逾越任何产业的进人壁垒。第二，从技术上看，范围的经济性有一定的限制，专业性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第三，内部管理上有限制。组织变得相当大，即使引人事业部制，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仍不能圆满地进行，组织僵化的可能性极大。第四，投入资本的巨额化不仅带来筹措资金上的困难，也使埋没费用巨额化，使企业难以从不景气部门退出，也会使经营露出破绽。

企业准集中（Near Centralization of Business） 企业组织有三种情况：1.各企业是独立的交易主体，可采取独立的行动；2.各企业全部合并成一个组织而行动，即企业集中；3.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企业间不是将几个部门集中在企业内部，而是把它作为外部组织，通过资本、人力和技术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保留各企业的独立性。这种状态就叫企业准集中。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间通过市场交易，交易成本高，并且必须承担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完全采取企业内部交易，交易成本可显著地削减，但企业集中发展到相当程度会发生不经济性，企业必须支付组织上的非效率或因企业规模的不经济性所增加的新成本。相对于此，在企业准集中情况下，各交易主体由于能确保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因此可避免企业集中的非经济性，同时，企业间通过资本、人力和技术等保持密切的关系，又可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企业集中组织的经济性。从兼备两种组织长处的意义上，企业准集中组织也可称为中间组织。由于企业准集中的这种优势，中间组织在现代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类型：1.企业集团。（参见“企业集团”）2.由主要的大企业所属众多子公司组织起来的“系列集团”。3.汽车、电气机器、纤维产品、出版印刷、建筑业等外部订货生产中，在订货的企业和接受订货的承包企业间组织起来的“承包系列”。如汽车产业中零部件厂向组装厂承包，通过活跃地交换有关生产技术的信息，降低费用和提高质量。4.制造厂和批发、零售等流通企业结合的“流通系列”。通过畅通的信息交流，一方面，流通企业可获得制造厂在经营上的指导和支持，降低库存，减少商品流通成本、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另一方面，制造厂可通过流通企业及时把握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以促进商品的改良和开发。5.通过信息交换网结合的“信息网络组织”。如果放宽反垄断政策，企业准集中组织也可能象垂直的、多角化的企业一样，能够行使垄断性市场支配力，所以对企业准集中组织在看到其长处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垄断性行为发生社会性费用。

企业集团（Company Group） 企业集团不是企业的简单聚合，而是指具有特殊结合方式的企业之间的横的联合。企业集团与企业系列不同，企业系列是企业间纵的结合。日本的企业集团是在战前财阀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财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控制日本经济的康采恩，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实行了解散财阀的措施。这样，以三井、三菱、住友为首的财阀，便脱离了财阀家族的控制，财阀势力下的各个企业也分割为各自独立的状况。但自1950年美国侵朝战争后，日本的大企业得到恢复，尤其在战后高速增长过程中，企业追求规模效益，企业集团得到了迅速发展。50年代中期之后，6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逐渐形成了现存的三种企业集团、第一种是“旧财阀系企

业集团"，它们保持着旧财阀的原有特征而以重组的形态出现，它们是三菱、住友、三井这三个集团。第二种是"新兴企业集团"，它们在战前同样都曾是财阀系企业群这一点上与第一类相同，但无中心银行，这种二流财阀在战后与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三和银行等三家银行结合而形成了芙蓉集团、第一劝业集团、三和集团等"新兴企业集团"。第三种是所谓"独立系企业集团"，它们以曾是旧国家托拉斯的新日铁（合并前是八幡、富士两制铁所）为首，加上作为巨大造船重机资本而出现的日立制作所、东芝、石川岛播磨重工，以及战后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汽车制造业的一流企业丰田汽车工业和日产汽车等。

第一类和第二类企业集团是金融资本在现代日本的具体体现，典型的企业集团首先是作为金融集团的这六大集团。这六大集团之所以成为企业集团是因为具有以下几个标志：

第一，相互持股。从股票的所有关系来看，企业集团成员实行相互持股，这种相互持股是有机的、多方面的，如用图表示则是环状。如以三菱集团为例，三菱银行、东京海上火灾、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化工等相互持股。三菱银行的大股东是东京海上火灾等三菱集团的全部企业，而东京海上火灾的大股东又是三菱银行等企业，就是这样的团团转，成为一种不管到哪里也没有最终的大股东的结构。从总体上观察三菱集团20～30%的股票都是在三菱集团内部互相持有。当然也有三菱集团以外的企业或个人股东。但是大股东是由三菱集团的企业占据着的，这样的互相持股既与战前财阀的所有形态不同，也是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看不到的。

第二，由企业集团成员的经理组成经理会。经理会是立足于上述集团内部互相持股之上的，具有事实上的大股东会的性质。即持有股票的虽然是法人企业，但它们行使股东权的是代表董事——经理。因而这些经理集合到一起就形成事实上的大股东会。在经理会上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并不公开公布，但是可以认为那里讨论的是企业集团的重要问题。目前三菱集团用"金曜会"、三井集团用"二木会"、住友集团用"白水会"、芙蓉集团用"芙蓉会"、第一劝银集团用"三金会"、三和集团用"三和会"命名。

第三，设立联合投资公司。根据经理会的决定，各企业集团由集团成员出资设立联合投资公司。这种联合投资公司曾经由三菱、三井等集团在石油化学和原子能等方面设立过。70年代设立了从事住宅建设和城市开发的"开发者集团"以及搞石油开发、海洋开发、情报产业的联合投资公司。由于企业集团成员联合投资，集团成员间建立了同心同德的关系。

第四，以大城市银行为中心。大城市银行成为企业集团的中心，并和本系统其他金融机构（信托银行、生命保险公司、损害保险公司等）合作对集团成员进行系列贷款。系列贷款是指银行进行贷款时，不仅考虑企业经营状态的差别，还考虑别的因素，从而对特定企业予以特别优厚的贷款，因此最初也称为"选择性贷款"。一般把进行系列贷款的银行称为该企业集团的主力银行。当然，企业借款并不是全部依赖系列贷款，也接受系列不同的其它金融机构的协调贷款。各集团成员借款中依赖系列贷款的比重从1960年前后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处于集团中心的银行作为企业成员主力银行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

第五，综合商社做集团内的交易媒介。在日本，一般地说企业间的交易比重很大。作为这种企业间交易媒介的是综合商社。因而成为企业集团中心的是银行和综合商社。综合商社通过承担企业集团成员的购销，为集团企业起媒介作用。就三菱、三井、住友集团的主要成员看，它们的销售额的三成左右是销向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的，企业采购额的20～30%同样也是购自本系统商社的。综合商社的一大职能是商社信贷，它对集团成员实行庞大的商社信贷。此外，综合商社还具有组织者的功能。在海外开展巨大工程项目时，综合商社作为组织者组织集团成员的情况正在增加。

第六，配套的行业组成。从各企业集团成员的组成看，在以重、化学工业领域为中心的同时，成员企业分布在各种产业领域，这被人称为企业集团的配套主义。当然，并不是把各产业领域全部网罗在内，并且也有在相同产业领域中，存在着同一集团的几个成员，并进行相互竞争的状况。

六大集团基本具备上述六大标志，当然也有若干不足的方面。芙蓉、第一劝银、三和三个新兴企业集团因为集团化的时间比较短，在相互持股率和集团内交易等方面还是不完善的。

第三类企业集团即独立系企业集团，与金融系企业集团相比较，则有如下特点：第一，虽然也称为企业集团，但与金融系企业集团的多角环状相比，它们采取的是以特定的重工业资本为顶点的金字塔型的支配形态。第二，与金融集团相比，它又具有以特定的巨大公司为顶点的、在技术上和生产上相互结合的强烈色彩。第三，虽称之为"独立系"，它与金融系集团又并非全无关系。有的独立系企业集团同时是金融集团的成员，如东芝是三井集团成员、丰田汽车工业是三井集团成员、日产汽车是芙蓉会集团成员，日立制作所甚至加入了芙蓉会与三和系两个经理会。

独立系企业集团内部机构一般有几个层次：核心公司，是指企业集团中属于核心地位的母公司。它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子公司，这是集团公司与一般公司

的区别；控股层——子公司，即被核心公司控制，但法律上独立的法人企业；持股层——关联公司，即被核心公司持有股份但未达控制界限的公司；下承包企业，在日本又叫下请企业，是指通过签订承包合同，为集团公司提供零配件的企业，通常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以上。企业集团与托拉斯和卡特尔不同。托拉斯是一个企业，总体法律地位上是法人，企业集团则是许多企业的联合体，总体法律地位上不是法人；卡特尔是企业联合体，但没有资产关系，因而比较松散，企业集团则是具有一定程度资产联系的紧密而稳定的联合体。独立系企业集团中核心公司对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控制，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 资本参与，控制股份。由于核心公司拥有子公司的多数股票，因此可控制子公司的董事会，按照集团的战略意图影响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方针，并让所属公司定期提供财务报表和中长期计划，以供集团公司了解情况。

(2) 在持股基础上向子公司和关联公司派遣干部。对于骨干子公司，往往直接派遣主要职员；对于关联公司，则往往派遣监管人员。

(3) 在产品和生产技术上进行控制。集团公司大都掌握主导产品和技术，这就决定了所属公司服从集团公司的管理。

(4) 投资决策的高度集中。集团公司是投资决策中心。尽管从法律上看，各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完全可以独立进行投资决策，但由于集团公司可控制其董事会，因此事实上所属公司的投资功能已被集团公司"没收"了，它们只是利润中心。子公司要扩大和发展，必须依赖于集团公司的资本投入和集团财务公司的贷款。

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对大型企业集团给予积极扶持。扶持方法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向企业集团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扶持。这在日本独立系企业集团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二是政府直接组建国有企业集团。这在意大利和法国格外引人注目。

日本在二次大战后，政府金融机构广泛向工业系企业集团提供优惠贷款，以扶植其发展。在产业政策的倾斜上，尽管是向产业倾斜而不是向企业倾斜，但由于在这些领域活动的均是那些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因此这些扶植政策自然落到了企业集团头上。例如，日本政府为高速发展其钢铁工业，曾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允许钢铁工业的大部分新设备实行，购入第一年就折旧1/2，折旧费从利润中提取，无需纳税。所以原日铁集团的八幡制铁所和富士制铁所，合计提取的折旧费，仅1968年一年就达954亿日元。以后，在日本政府和财界的大力扶持下，这两家大钢铁公司又组成"新日铁公司"。这就使得新日铁集团从1972年起，稳坐世界钢铁业的第一把交椅。

在国有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发达国家中，政府有时直接组建国有的工业系企业集团。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共有三大国有企业集团，即伊利集团、埃尼集团和埃菲姆集团，伊利集团公司的董事会由12人组成，2名来自财政部，7名来自包括国产局在内的7个政府专业部门，另有3名为国产局局长任命的工业和金融、财务专家。三大集团的经营范围遍及重化工、航空、交通、电力、金融等重要的产业领域。

欧美国家企业集团也分为财团型企业集团和工业系企业集团两类。财团型企业集团如德意志银行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工业系企业集团如西德的工业康采恩和英美等国的混联公司等。两类集团的经济特征和组织构造与日本企业集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重要差异。

企业固定投资（Business fixed investment） 企业用于维持或增加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是总投资中最重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用以维持原有固定资产完整的重置投资（折旧的更新），以及增加固定资产的净投资。重置投资取决于原有固定资产的水平和折旧率。折旧率，即每年的折旧在原有固定资产中所占的比率，取决于原有固定资产使用期限的长短。原有固定资产越多，折旧率越高，即原有固定资产使用期限越短，则重置投资越大；反之，亦反是。净投资取决于新增资本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所增加的净投资要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取决于产量水平。所以，净投资与产量水平同方向变动。净投资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就是加速原理。边际成本主要取决于利率水平，尤其是实际利率水平（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利率与净投资成反方向变动。企业固定投资的变动对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周期性的波动主要根源于企业固定投资的变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产量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影响引起了经济波动。乘数一加速模型正是用于分析这一问题的。在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固定投资要受到政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政府可以运用这些政策来调节企业固定投资，实现经济稳定

全责联运提单（Fult Liabilty Combined Transport B/L） 又称为保险提单。在全责联运提单下，承运人既是提单的签发人，又是货物的保险人。既承担起《海牙规则》下承运人对货物应负义务，又须作为保险人，在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如遇货物损失，以货物保险人的身份，按照提单条款的规定予以

赔偿。

全责联运提单下，货方除交纳货物的运费之外，还需交纳一定的保险费。

全责联运提单大大简化了投保、索赔等程序，方便了出口商。但此种提单目前还仅处于试用阶段.

全产品生产线效益（Full product Line Economy） 又称结合生产的经济性。指企业通过结合生产生产多种产品，比独立生产这些产品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假定企业结合生产 X_1、X_2 两种产品，其生产成本为 $C(X_1, X_2)$，而独立生产 X_1 时成本为 $C(X_1, 0)$，独立生产 X_2 时的成本为 $C(0, X_2)$，这样全产品生产线效益可表示为:

$$C(X_1, 0)+C(0, X_2)>C(X_1, X_2)$$

全国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见瓦格纳法案条。

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 美国制造业上的组织，其宗旨为：(1)增进美国工业的利益；2.促进美国的国内外贸易；3.改善雇主和雇工的关系；4.保护个人自由以及雇主和雇工的各项权利；5.向公众宣传有关个人自由和财产所有权的各项原则；6.支持有利于实行这些原则的法律，反之则加以反对。该协会于1895年1月22日在辛辛那提市由600多名制造商成立，其总部设在纽约。

乔根森两部门模式（Jorgenson two-Sector Model） 从动态角度分析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式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于1961年和1967年分别发表的《二元经济的发展》、《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的发展》两篇论文，创立了他的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模式。乔根森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以工业为代表的先进或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落后或传统部门。其基本假定有：农业中没有资本积累，农业产出只投入劳动和土地，因土地是固定的，所以农业产出仅只是劳动的函数；工业中的土地不作为一个要素，工业产出只是资本与劳动的函数；两个部门的生产随时间而自动增加；这种不增加要素而增加产出的情况被称作技术进步；此种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乔根森建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结构为：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供给，如果粮食供给是充分的，人口增长率将达到生理最大量。当人均粮食供给增长率大于最大人口增长率时，农业剩余就产生了，从此，开始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随之工业部门开始增长。农业剩余越大，劳动力转移规模就越大。其政策含义是：要将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需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加快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这一模式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建立在剩余劳动与不变工资假定之上的；它既不承认农业有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存在，也不认为农业与工业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

该模式从对农业部门的讨论入手。设 P 为总人口，Y 为农业总产品，L 为土地，于是农业生产函数为

$$Y=e^{\alpha t}L^{\beta}P^{1-\beta}$$

式中，α、β 都是参数。α 为技术进步率，$e^{\alpha t}$ 表示 t 年因技术进步引起的产量变化；β 为土地产出弹性或土地在农产品中的相对贡献；1-β 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或劳动在农产品中的相对贡献。由于土地供给被假定是固定的，可以省略。用总人口同除以方程两边，得到人均农业产出 (y)。若对时间 t 求导，然后两边除以人均产出，农业生产函数则变形为

$$\frac{\dot{y}}{y}=a-\beta\frac{\dot{P}}{P}$$

表明人均农产品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他所建立的人口函数为

$$\frac{\dot{P}}{P}=\min\begin{cases} ry-\delta \\ \varepsilon \end{cases}$$

其中，r、δ、ε 都被假定为常数。r 为人口出生增长率；r、y 即为人口出生率；δ 为人口死亡率；ε 为一个社会现实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生理最大人口增长率；min 是两数之中取其小的符号。这个函数表明，在达到最大人口增长率之前，总人口增长率将随人均粮食产出的增长而增长。

在此基础上，乔根森讨论了农业发展的两种情况。第一种为人口增长率低于生理最大量时，可能出现人口与粮食总产出以同一比率增长，而人均粮食产出不变的情况。乔根森称之为“低水平均衡陷井”。并认为，在处于低水平均衡陷井的经济中，所有劳动力都必须从事农业，不可能存在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流动的问题。第二种情况是当人口增长率达到生理最大量时，人口函数变成

$$\frac{\dot{P}}{P}=ry^{+}-\delta=\varepsilon$$

式中，y^{+} 代表人口增长达到生理最大量时的最低人均粮食产出。生产函数变为

$$\frac{\dot{Y}}{y}=\alpha-\beta\varepsilon$$

这一函数是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前提。因为，若 $y<y^{+}$，人口增长率低于生理最大量，粮食产

出的增长就会被人口增长所吞没。只有当 $y = y^{+}$ 时，粮食产出的增长率才有可能超过人口增长率，产生农业剩余。在乔根森看来，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产生与扩张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因此他把 y^{+} 称为临界人均收入水平。农业剩余的产生，使得总人口中有一部分可以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生产工业品。其规模必须与农业剩余的规模相适应。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为：农业剩余（S）在总农业产出中的比例等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M）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即

$$\frac{s}{y} = \frac{M}{P}$$

因乔根森假定，当人均收入超过 y^{+} 时，人们也只消费 y^{+} 量的粮食，其超过的收入部分全部用于工业品的消费，而且所有粮食都被消费掉。

在对工业部门发展的讨论中，乔根森首先分析工业劳动力的增长，然后考察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最后论述工资的变化。工人人口等于总人口减去农业人口之差。在存在农业剩余的条件下，总人口增长快于农业人口增长，从而工业人口的增长快于总人口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工业部门的速度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经数字推导还可得出结论：工业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其极限趋向于最大人口增长率。

为研究资本积累需建立工业生产函数

$$x = e^{\lambda t} k^{\sigma} M^{1-\sigma}$$

其中，x 为总工业产出；k 为资本；λ、σ 都是参数，λ 代表工业技术进步率；σ 代表资本产出弹性和资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1−σ 代表劳动产出弹性和劳动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假定工业部门利润全部用于投资，则有投资方程

$$\overline{K} = \sigma x$$

式中，$\overline{K}$ 代表资本增量；σx 代表利润总额。用工业生产方程和工业劳动力方程替换 x、M，

$$\overline{K} = \sigma K^{\sigma} P(0)^{1-\sigma} e^{\lambda t} \left[e^{\varepsilon t} - e^{\left(\frac{\varepsilon-\alpha}{1-\beta}\right)t} \right]^{-\sigma}$$

乔根森称这个投资方程为二元经济的基本微分方程。从中可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只要存在一个正数且上升的农业剩余，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地进行下去；（2）不存在为达到持续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临界最小资本存量。从投资方程的分析中可知，资本存量始终以正数比率增长；从工业人口方程可知，工业劳动力增长率开始很高，然后逐渐下降到接近最大人口增长率水平。因此，工业产出的增长趋势开始很快，然后逐渐地接近它的长期均衡值。这一事实表明，工业产出的最初迅速增长丝毫不意味着从体系外部注入大量的资本。如果一个正数且上升的农业剩余存在，工业部门就会自行蓬勃发展下去。

关于工资水平，乔根森假定，工业工资率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工业生产函数中的 M 求偏导，便得

$$\frac{\partial x}{\partial M} = (1-\sigma)x = w$$

其中，1−σ 为劳动在产出中的份额，x 为人均产出，w 为工业工资率。乔根森指出，人均产出增长率等于总产出增长率减去工业劳动力增长率之差。可见，工资率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越大，实际工资上升得越高。此外工资率增长还与资本积累率有关。工资率的增长率与劳动份额成反比，与资本积累成正比。所以，乔根森认为，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不断上升的。与此同时，农业工资也不是固定的。为了引诱农业劳动者转移到工业部门，工业工资必须高于农业工资。由于他同时假定这个工资差异在比率上是固定的，因而农业工资也将按同一比例上升。

乔根森的两部门模式更强调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更着重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对于工农业的相互关系及农业剩余对工业增长的促进作用等论述，均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该模式也有一定的缺陷。如在农业生产函数中忽视了资本的作用，特别是有关粮食需求收入弹性的假定，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指责。

乔治·亨利（Henry George，1839—1897 年）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在教会学校度过，曾进中学读书数月，随后即经历长期的颠沛生活。1865 年起开始写作生涯，担任过新闻记者和《旧金山时报》的主笔。70 年代起埋头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发表过大量著述，后来还致力于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良运动。他还两度竞选纽约市长。最后因脑溢血而辞世。亨利·乔治的著述颇丰，《进步与贫困》（1879 年）一书则反映了其基本经济思想。他强调，近代经济的发展使得贫富的差距愈益扩大，这是因为地租吞噬了全部利益，即它攫取了超过最低工资和最低利润那些部分的全部价值，从而导致贫困伴随着进步。可见土地的私人占有是贫困的根源和罪恶与灾祸的渊薮。他认为流行的经济学说并未能圆满地说明这个问题，试图从财富分配的规律着手予以解决。其实他的经济理论同样颇多庸俗色彩，承袭"三位一体"公式，宣扬劳资利益和谐论，且发挥了主观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的思想。亨利·乔治进一步提出，实行"土地单一税"以及没收土地是解决社会贫困的唯一途径，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经济纲领，还掀起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他因此赢得了超越国界的很高声望。

优惠原则（Favourable Principle）　涉外税收负

担原则之一，又称负担从轻原则，主要是给予外国跨国纳税人特殊的优惠待遇，使其享有低于本国国内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根据实行优惠领域的大小，又可将这一原则区分为全面优惠原则和特定优惠原则。前者，是指单独为跨国外国纳税人制定与国内纳税人完全不同的一套税法，全面实行税收优惠；后者则是指在同一套税法下，只对跨国外国纳税人的某些特定应税项目或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实行税收优惠。从而使跨国外国纳税人负担较轻的税负。

有针对性地实行税收优惠的特定优惠原则具有多方面的优点，尤其是它能够满足所在国特殊性的需要，如对贷款利息所得项目和技术转让项目等实行特定优惠可以满足吸引国外贷款和先进技术的目的，等等，与此同时，这一原则还可以使兼收税制简化并降低税务成本的好处。因此，一般而言，特定的优惠原则更为多数国家所乐于接受。

但即使是特定优惠原则，它的实行也不得不考虑多种制约因素，如必须考虑到因实行优惠而产生的税务成本，这一成本决定了实行优惠的边界。此外，实行优惠原则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有必要确定实行税收优惠的重点，有必要使优惠制保持更大的灵活性，等等。

优先股股票（Preferred Stock）　它比普通股优先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股息的优先。尽管优先股的股东一般无权获得红利，但他可以在普通股获得红利之前得到一定的股息；二是清偿要求权的优先。一旦公司由于破产而进行财产清偿，优先股股东对剩余财产就有优先的要求权。其基本特征，除了与普通股一样是用来筹集产权资本的凭证之外，主要不同点有：(1) 面值。多数优先股有票面价值，并有着重要意义，意味着其在最初发行公司中投入的货币数量，也代表同等数量的剩余资产的要求权；(2) 投票权。优先股一般没有投票权，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优先股股息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支付，优先股就具有投票权，而且这种权利延续到股息支付为止。一般地，优先股的投票权受到严格的限制；(3) 股息。优先股的股息通常是固定的，股息高低不与公司盈利挂钩，因此优先股的价格一般地随市场利率升降而波动。通常，优先股的股息比公司债的利息高，比普通股的红利低。优先股的种类包含有：累积优先股票与非累积优先股票；可调换优先股票；可赎回的优先股票；参与分红的优先股票；等等。

优先工会企业（Preferential shop）　在优先工会企业中，雇主在雇佣工人时必须优先雇佣工会推荐的人，有的合同上订明：如在规定期限以内（一般是24小时）没有工会会员可用，雇主就可雇用非工会会员。这种安排往往同工会职业介绍所或工会——经理职业介绍中心相结合，这意味着工会在公司选择雇员方面有相当大的权力。这种制度旨在排除雇主对会员基于自身条件、工作能力等方面的歧视，使会员得到近乎平等的雇佣机会。美国全国劳资委员会认为工会职业介绍所可以继续活动，但它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工会不得只限于推荐工会会员为申请人；雇主必须有权否决工会推荐的申请人。该条件旨在防止工会歧视非工会雇员。优先工会企业从未在工会保障措施中占主要地位。

优先雇用（Preferential shop）　见优先工会企业条。

产品差别（Product Differentiation）　产品差别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的一种特征。所谓产品差别不是指不同种类商品的差别，比如烟与酒的差别，而是同一类产品的商标、牌号、包装、装潢、性能、款式、销售地点等方面的差别。例如香烟中万宝路香烟与骆驼牌香烟的区别。因此确切地讲，产品差别是指产品有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同类产品的差别。由于产品相似，各厂商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就很大，又由于各厂商产品间存在着差别，因此厂商的产品又多少有些垄断因素，即利用消费者对于自己产品的特殊的偏爱而具有调整自己产品价格的权利，不象完全竞争的厂商那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调整自己产品的价格，只能调整自己的产品产量。

之所以会出现产品的差别，是由消费者的需求特征决定的。因为消费者具有多种不同的偏好，这种偏好需要用不同的产品来满足，因此，产品的差别适应了消费者多种偏好的需要。从厂商的角度讲，厂商利用产品差别进行竞争往往比利用价格竞争有利。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商若通过竞相降低价格的办法来进行竞争以扩大自己产品的市场份额，最终会导致自己盈利的减少，甚至亏损。而通过产品的商标、包装、性能、款式方面的变化来吸引消费者，往往会扩大销路，其盈利不仅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

但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表明，由于产品差别造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因此与产品同质的，完全竞争市场相比它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理由是它使得生产者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同时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不象完全竞争的市场那样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意味着消费者对于有差别的产品所付出的价格要比对于若产品是同质情况下所付出的价格要高。但

是不少经济学家也认为，产品差异满足了消费者多方面的要求，它可以丰富市场，促进企业创新。

产品周期（Product Cycle） 产品周期是指产品的生命周期，是指产品从产生，发展变化，到最终消失被另外一些产品而代替的过程。某一种产品或某一类产品从产生到消失，大致经历过这么三个阶段，产生与初期阶段。这一阶段，新产品刚问世，产品在特征上还不够标准化，因为产品生产者生产中的投入不同，生产过程不同，最终产品的设计也不同。因此，这一阶段生产者还不能确定最优的生产场所，最优的生产规模，以及最优的销售价格；这一阶段生产者之间产品的差别也较大。在晚些时候，即产品的中期阶段，产品供给者数目将增加，产品变得比较标准化，产品生产以及生产场所的不确定性大为减少，产品的需求弹性将提高。产品生命的后一阶段，某些生产者会使用商号，广告以及产品的某些变化，试图生产某种程度的差别产品。但是就单个厂商来说，其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仍较高，这一阶段发展的结果是产品差异逐步扩大以致以全新的产品代替原有产品，因而原有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

产品生命周期不仅被企业家或经济学家用来解释微观经济学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用来指导厂商对于产品进行更新换代，还被用于解释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用于解释一国的对外贸易形态与海外直接投资形态。例如产品周期被认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整体运行。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曾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劳动成本较高，资本成本和原材料成本较低的国家。因此，美国式的产品创新主要是生产那些能满足高收入消费水平产品，同时产品中所使用的劳动较少，而资本与原材料较多。美国型的创新影响了与美国贸易关系比较密切的其它国家，其它国家的人均收入随之提高，劳动成本也随之上升。美国在海外投资所生产的产品也都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但是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情况发生变化，到这时日本以及西欧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美国的水平，同时由于工业迅速发展原材料缺乏，原材料与资本成本相对提高这使得节约能源、原材料型的产品得以问世并大大发展，这种节约能源、原材料的日本式、欧洲式的产品创新领导了产品生产的潮流，美国型的产品创新受到挑战，部分产品市场被日本新产品所占领，如钢，铁，电器，汽车等。产品生命周期也同样影响着其它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

产业工会（Zndustrial Union） 指代表某一工厂、某一工业部门或某一部门组内所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一种工会。产业工会的产生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结果。机械化大生产造就了庞大的非熟练工人队伍，在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是混在一起进行劳动的，传统的把非熟练工人排斥在外的技艺工会已不能适应这种状况，于是产业工会应运而生。许多传统的技艺工会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已经变成了产业工会，但在另外一些工业部门中仍是技艺工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国际机械工人协会在航空工业中已经变成了产业工会。产业工会大都在一个以上的工业部门中活动，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工业部门内的纯粹的产业工会很少见。产业工会常常采取一种缩小各行业劳动力之间相对价格差别的政策，其方法主要是通过谈判使工会内所有会员工资都得到增加。

产业民主 指工人参与制定和他们生活有关的政策。西欧国家在贯彻产业民主方面，进行了三项基本试验：通过在董事会增设工人代表，增加工人参加公司全面管理的机会；通过法律上授权的工厂委员会，加强工人对工厂一级决策的影响；通过重新设计工作岗位和工作方法、改善工人劳动生活的质量。在德国，工人参加大公司的董事会始于二战以后。在钢铁工业中，建立了工人与资方共同决策的制度，由工人和资方共同负责董事会的工作。在其他行业中，董事会的一些成员由工人选举产生。在各类公司中，尽管董事会中工人代表占相当比重，但在出现僵局时，资方有决定权，而且董事会主席的产生办法有利于股东，所以董事会的管理权力仍把持在股东手里。在其他几个西欧国家，也实行类似的工人参与董事会的办法，大约有1／3的董事会成员由工人选举产生。有些国家，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通过制定劳资双方的合作计划、实行工人对企业的全面管理。但相对来说，工人管理企业还不普遍。在西德，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似乎对公司没有多大影响，工人代表往往与公司利益不存在冲突，董事会的决议一般能被一致通过或几乎一致通过。有工人参加董事会和没有工人参加董事会的公司在行为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其原因可能是市场需求事实上没有给予公司很多的经营自由。为了在竞争经济中保持一定的实力，公司必须作出一定的决策，不管是谁担任上层董事会会员。工会、工人和经济学家都对实行产业民主存在争议。赞同者认为，工人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把决策的权力下放给工人能够为工人繁重的劳动和工作增添乐趣。如果工人热爱他们的工作，并且更加努力工作，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提高。反对者认为，合理的劳资关系和企业机制是工人依靠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力量坚持他们的利益，资方承担起管理的责任和风险。产业民主试图在决策、承担风险和采取行动过程

中采取"折衷管理"的方法，可能会破坏工会和资方的作用，降低管理效率。

产业伤害 最通行的定义是指在工作过程中造成的伤害，它使受害者损失的劳动时间超过了当人的工作时间。很明显，该定义只包括了较为严重的伤害，而排除了轻微的皮毛破伤。对此定义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一切伤害，不论它多么轻微，都包括在产业伤害之内；另一种观点却认为上述定义已包含了过多的微小伤害。由此可见，对产业伤害的定义涉及到了某种评价问题，但上面定义所划分的界限是目前最普遍采用的。

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 产业经济学是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经济学。在欧美经济学家看来，产业经济学就是产业组织理论。它以个别产业内部的组织形态为研究对象，所谓产业内部的组织形态是指某个特定产业市场中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产业经济学既研究某个产业在特定时间内产业内部的组织形态，也研究在长期中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发展。产业经济学在研究产业组织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时，抓住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某一产业的产业组织性质能否对该产业内的企业保持足够的竞争压力，以迫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改善经营；二是这一产业内的企业是否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使单位成本处于最优水平。如果该产业未能在这两方面处于最优水平，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将提出改善该产业组织状况的方向。与标准的微观经济学不同，产业经济学不将重心放在抽象的完全竞争状况的分析上，而是更注意垄断与竞争并存的现实，往往以不完全竞争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产业经济学在注重分析由市场组织即一个产业内独立企业间的关系导致的资源分配方式的同时，亦十分注意在现实中，由于"市场失败"引起政府对市场分配资源的干预，从而出现"取决于政府干预的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由于企业集中和准集中的发展，企业内部交易部分地取代了市场交易，形成了"取决于企业组织的资源分配方式"。因此，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涉及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和企业联合等领域。在竞争形式方面，产业经济学亦不同于传统理论将竞争简单地概括为价格竞争，而更广泛地分析现实中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等形式。工业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马歇尔的理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一书中，将产业组织概念引入经济学。马歇尔在该书中提出的规模经济和竞争的矛盾成为后来产业组织理论探索的核心论题。到本世纪，随着垄断形式的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了对垄断、寡头垄断等问题的理论分析，其代表作有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1933年发表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1933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为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50年代前后，终于产生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现代西方产业组织主要有三个流派，即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哈佛学派是西方产业经济学中的主流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梅森和贝恩。梅森强调市场结构和其它客观市场条件是识别市场行为的关键因素，首创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成果"分析结构（简称"SCP结构"），建立起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成果这三个产业经济学中的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SCP结构"成为西方主流产业经济学基本理论结构。贝恩同样强调市场结构是产业组织问题的关键因素，并将进入障碍与市场集中、产品差别同样看作是决定市场结构的关键因素。贝恩1959年所著《产业组织论》一书，是对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第一次系统概括。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都是研究产业间关系结构的，但角度不同。产业关联理论就是本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创立的投入产出经济学。产业关联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它是将一个经济体中各产业间题通过一定的经济技术关系所发生的投入与产出状况加以定量化的工具。这个工具的核心是投入产出表。产业结构理论的特点是使用某种粗线条的产业分类，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寻求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间关系较为淡薄，其归纳的规律性结论多为产业发展实践过程的总结。产业结构理论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逐步加强后为制定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日本尤为受到重视。

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 见"产业经济学"。

产业组织政策（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olicy） 是由政府制定的，为了保证资源有效配置和公众的利益，指导和干预企业行为和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企业关系的公共政策（在美国，通常使用公共政策一词，而不称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的实质是政府通过协调竞争与经济规模的关系和矛盾，维持健全市场秩序，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产业组织政策包括互相配套的两方面的政策：一是鼓励竞争、限制垄断的市场秩序政策。由于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集中概括了以上内容，因此这方面的政策又可称作反垄断政策。二是鼓励经济规模、防止过度竞争的政策，即产业合理化政策。这种政策的法律表现就是各种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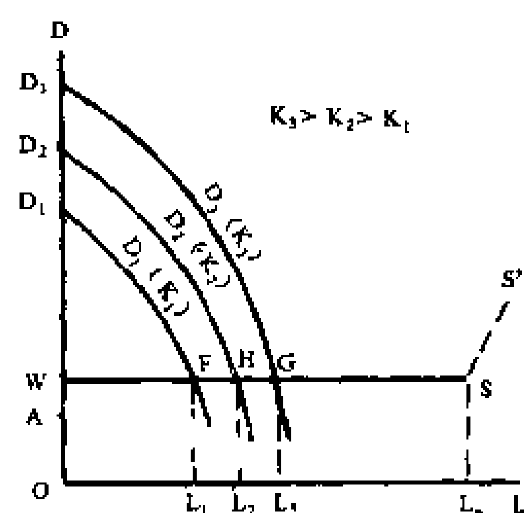
业合理化法，如日本的"机械工业振兴法"。产业组织政策是基本的经济政策，其基本目标与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一致，即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经济公正和经济自由。产业组织政策的一般目标是：(1) 提高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资源的雇佣和利用水平；(2) 有效使用被雇佣和利用的资源；(3) 雇佣比较稳定；(4) 保持较高并且适度的进步率，即必须有效利用资源和提高资源的产出率水平。产业组织政策的具体目标，应包括：(1) 企业应能达到并有效地利用经济规模，市场的供给主要应由达到经济规模的企业承担，企业应有较高的开工率。(2) 资源能较好地流动，从而有效配置、公平分配。不应出现某些产业或企业长期获得超额利润或长期亏损的情况，从较长时间看，产业的资本利润率应是比较均等的。(3) 较快的技术进步。(4) 不存在过多的销售费用。(5) 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较高，并有多样性，以适应提高大众福利和消费水平的要求。(6) 能够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达到产业组织政策目标的手段主要包括三方面：1.市场结构控制。主要包括：(1) 改善市场结构的政策。如为降低卖方集中度，分解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适当降低进入壁垒；减少不合理的产品差别等。结构控制政策的要点是在实现经济规模的条件下，限制过分集中的结构。(2) 预防形成垄断性市场结构的政策，如企业合并审查。(3) 在某些产业，如资源开发产业，为防止过度竞争破坏资源开发，允许适当集中，甚至垄断，但一般要限制同一企业对不同处资源的同时控制和垄断。2.市场行为控制。主要包括：(1) 禁止和限制竞争者的共谋，卡特尔及不当的价格歧视；(2) 政府和公众监督，主要是对卖方价格、质量的监督和交流信息；(3) 对欺骗、行贿、中伤竞争者的各种行为进行控制。3.直接改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实行这类政策往往需要动用财税杠杆，如补助开始赢利不高的新兴产业，对高污染企业进行罚款，禁止滥用稀缺资源，用财政融资进行重大的公共项目建设。实行这类政策的必要性，根本原因是由于存在"市场缺陷"。市场缺陷又叫市场失效，它反映市场调节机制的有证性。因为在某些产业、事业和场合，如基础设施、教育、环境生态治理等，由于个体的、近期的费用和效益，与社会的、长期的费用和效益可能偏差太大，因而不能或很难主要靠市场价格机制确保这类产业的发展。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也不尽相同。如在美国，反垄断政策是产业组织政策的主要部分。而在日本，产业组织政策一直包括产业合理化政策和反垄断政策互相配套两个方面。美国虽然是一个历史较短的国家，但经过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垄断和垄断的弊病很早就有突出的表现。因此，反垄断政策是政府完善市场竞争制度、协调企业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日本则是另一种情况。战后，由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民主化"措施，如"解散财阀"等，这就促成了大量中小型企业从生和大资本、大企业重新组合的局面。这种竞争性较强的市场结构对于以对外贸易，特别是以加工出口型的产业结构为特点的日本经济来说，具有很不利的一面，那就是企业规模小，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从而使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无竞争力。因此，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推进产业合理化政策，鼓励发展专业化和经济规模。直到70年代初期以前，日本的产业组织政策一直注重合理化政策和反垄断政策的有机结合，并且比较突出产业合理化政策的作用。70年代以后，日本才比较突出了反垄断政策的基本政策地位。

产业融合 (Industrial Amalgamation) 产业融合是指本处于不同市场的商品，因技术进步导致由替代关系较弱变为较强，从而使这两个市场上的企业转为处在竞争关系。以邮政与邮电为例，过去前者主要传送文字信息，后者主要传输声音信息，两者被分类在不同的产业和市场。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传真技术的出现，邮电业增强了传输文字信息方面的能力，这就使邮政、邮电业的企业间具有了更大的竞争关系。产业融合及其进展，是确定市场范围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易斯的储蓄理论 (Lewis Saving Theory) 关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来源问题的一种理论。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资本形成率低，储蓄不足。而扩大资本的来源应立足于国内储蓄。他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各阶层经济行为特点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是资本家的利润投资。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地主将地租收入主要用于购买土地和进行奢侈性消费，很少用于储蓄；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不高，不稳定的生活以及对待土地与牲畜的非商业态度，使他们几乎没有储蓄，而工业部门的大部分工人由于工资收入低，仅够养家糊口，基本没有储蓄；工人中少数中产阶级即使有储蓄，也只是作为延期的消费；只有资本家是主要的储蓄者和投资者。他特别强调和重视经济发展中资本家的作用，认为资本家是一个负有使命感的阶级，他们节制消费，尽可能多地生产和愿意从事生产性投资。尤其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生产性投资基本上是资本家阶级的特征，而在以后的阶段里，节约和生产性投资会扩大到全社会各阶级。与此同时，刘易斯还特别强调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对于增加资本主义

“剩余”和资本家的利润的作用，认为它是资本家利润增长的源泉。他所提出的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式是：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是零，他们受工业部门工资收入高于农业收入的吸引，转移到工业部门去。但农业部门的产出和收入保持不变，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也不变。这样，工业部门可以在实际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得到迅速扩大，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可以大幅度增长。若把增加的利润用于再投资，工业生产就会进一步扩大。这个过程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相等，至此也就实现了工业化，刘易斯还进一步指出，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可以创造资本主义剩余，增加资本形成，而且未向城市转移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也能创造资本，如修筑道路、水利工程等，可以在不占用其他资本和稀缺的土地、不减少农产品生产的情况下，创造出农业资本。基于以上分析，刘易斯指出，要增加储蓄，就得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部门，提高资本家的利润，增大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具体地应当通过有利于储蓄阶级的收入分配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来实现。

刘易斯模式（Lewis Model）　著名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于50年代中期建立了分析经济发展的两部门模型。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现代部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使用可再生的资本，有较高的生产率。非资本主义部门以传统农业为代表，也包括城市的传统工业。传统部门使用不能再生的资本，其生产率极低。由于传统农业生产受土地限制，人口增长造成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负数，即传统农业中存在着隐蔽失业的情况。因此，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工资）很低，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传统农业中隐蔽失业的存在，意味着即使减少部分农业劳动力，也不会使农业生产下降。刘易斯认为，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存在，恰恰为现代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且其工资只相当于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这就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可能高于农业工资很多。在这样略高于农业工资的工资水平上，工业劳动力是有充分供给的。这一论点被称为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说，即现代工业部门在某一个现行固定工资水平上能够获得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这一假说是刘易斯两部门模型的基本前提条件。根据这一假定，在经济发展中，可以用剩余劳动力代替稀缺的资本，投入于现代化工业。这样可以不提高工资水平而获得现代部门的发展，同时为农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减轻了土地的人口负担，这种劳动力在两部门的转移对双方都有利益。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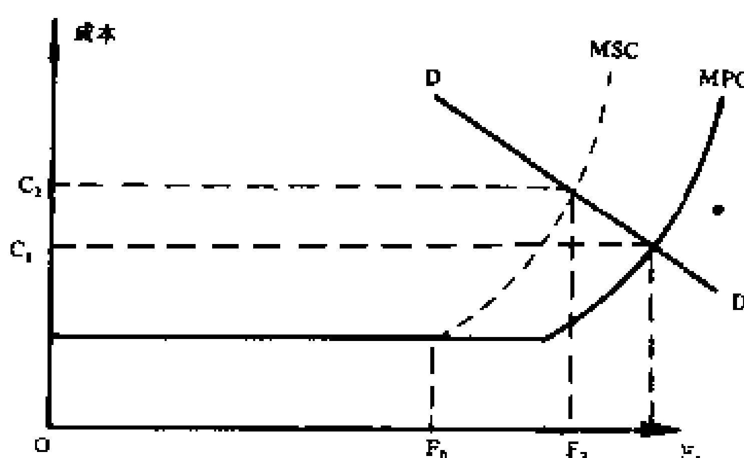
图中，OL轴表示劳动，OD轴表示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表示传统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表示现代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在存在农业过剩劳动力的条件下，劳动供给曲线WS是水平的。当工业部门资本量为K_1时，对应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D_1D_1（K_1），它向右下方倾斜，表示在既定资本量下，随劳动投入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品递减。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边际生产率应等于工资。D_1D_1（K_1）与WS交点F在横轴上对应的L_1点，表示了资本量为K_1时，工业部门雇佣OL_1的劳动力将达到最大利润。这时的劳动总产品为OL_1FD_1，其中OL_1FW为工人的工资，WFD_1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由于工人工资只够维持生存，只有资本利润用于储蓄。当资本量增至K_2时，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上移至D_2D_2（K_2），它与劳动供给曲线WS相交于H，决定资本雇佣的劳动量为OL_2。这时劳动总产品为OL_2HD_2，其中工人工资总量是OL_2HW，资本获得的利润总量为WHD_2。在劳动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利益全部归于资本，利润在总产品中的份额随之增加，增加的利润将被再一次用于投资，并扩大对劳动的吸收。这个劳动力转移过程一直可以进行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

当剩余劳动消失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变为正数，并逐步提高。这时工业部门增加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同农业部门竞争。这种情况在图中表现为，到S点后劳动供给曲线变为向上弯曲的ss'。这时，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阶段，资本积累带来的技术进步利益将不再完全归于利润，而必须相应提高工资。由于工资率的提高，工资在总产品中的份额增加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利润总量下降的情况。刘易斯模型是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第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认为传统农业中过剩劳动的存在给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并强调了资本积累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刘易斯模式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造成极大影响，在他之后，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经过改善的或建立在不同假设基础上的两部门发展模型。二元经济结构分析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

交易内部化 厂商之间通过市场的交换会发生各种费用，包括提出要求的费用，谈判的费用，对合用执行监督的费用，交货检查的费用，等等。这些费用统称为交易费用。存在市场交换关系的企业之间，通过合并、组成集团等企业集中或准集中方式，就可以将市场交换关系变为组织内部的交易，这种过程就称为交易内部化。交易内部化可以大大节省市场交易条件下发生的交易费用。一般来说，内部交易经常可比外部交易更易控制，更可精确地评价绩效，更可有效地解决冲突和实施奖惩。因此，节省交易费用是企业集中、准集中的促进因素之一。当然，实现交易内部化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也会增加监督、协调的费用，当边际协调费用增加到超过了从评价绩效和解决纠纷获得的边际收益时，就构成了限制厂商继续扩大组织的因素。

交通拥挤税（The Traffic Congestion Tax） 西方城市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题的税收政策，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向造成交通拥挤的每个驾车者征税，从而使交通拥挤的外在因素内在化。有的学者也把它称之为"公路使用费"。城市交通中存在的外部因素是一个私人汽车所有者在进行行驶决策时，考虑的仅是个人边际成本（MPC），如汽油费和个人时间等，而不顾及他对现行交通流量造成拥挤时给予其它车主时间成本的影响。驾车者之所以不断地加人车流，是因为他们认为行车所得到的额外私人利益多于其由此带来的边际个人成本。换言之，当一个车主加入车流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边际个人成本是低于边际社会成本（MSC）的。这二个成本之间的差就是，由于车主不断加入车流，加剧了道路拥挤而引起其它车主所增加的时间成本（见图）。在这里，边际社会成本只限于对公路使用者而不是包括对社会总体。图中的横轴表示的是车流量（即每小时行驶在特定道路上的汽车数量），纵轴则表示的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行车成本。这里的成本还包括行车的时间成本。车主所考虑的行车成本用实线 MPC 来表示。此曲线最初呈水平状态，因为在车流量不多时，车辆之间互不干扰，因此也就不存在交通拥挤问题。此时，每增加一辆驶人的汽车，该道路上的行车成本也仍不变。但是，如果车流量达到饱和状态后，拥挤现象就会出现，并使车流减速，这时的行车成本就会增加，此时的行车成本用斜实线 MPC 来表示。该道路上交通需求的任何一点用需求曲线（DD）来表示。这条曲线是反向倾斜，说明沿线行驶成本低，就会有更多的人



愿意从其它线路转道而来，这必然会在该线路上增加额外的车流量。车流量的均衡点是在需求曲线 DD 与边际个人成本线 MPC 的相交点，此时的行车费用就是 OC_1，车主愿意驶入该道路所形成的车流量表示在 OF_1 间，此时所产生的交通拥挤也必然会在 OC_1 间找出相应的行车成本。边际社会成本 MSC 用虚线来表示。当车流量低时，不会产生拥挤现象，故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个人成本相一致。当车流量超过 F_0 时，这时的边际社会成本就会高于边际个人成本。从最大福利经济的观点来看，帕累托最佳的车流量是处于需求曲线 DD 与边际社会成本线 MSC 的相交点，即 F_2 这一点。在这一水平上的车流量的边际社会成本正好等于车主的边际个人成本，因而使适宜的交通量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由于边际个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通常会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即实际使用城市道路的车流量超过最佳的车流量。原因如前所述；车主经常无视由于他们加人已达到饱和的车流而使整个线路上的其它车辆减速，造成行车成本增加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道路上现有的车辆经常会表示在 F_1 这一点上的原因所在。根据以上交通拥挤的经济原理，一些经济学家提倡在行车高峰时，向每个车主征收"交通拥挤税"。其税额相当于图中的 F_1F_2。从而使交通拥挤的外在因素内在化，以改变道路空间市场的价格结构。这项税额使付税后的行车费用等于相应的边际社会成本，使车流量从 F_1 降至 F_2，达到最佳车流量。每辆车应付的税额取决于车辆大小，速度及占用面积。但也有些经济学家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批评意见，有的认为由于交通拥挤税是以价格机制为基础，因此实施这种政策可能使汽车成为有钱人的特权。有的则认为由于政府对这种税收的使用，这部分收入如果在其它方面以减税的形式流回到原来的已被排挤掉的车主那里，则会引起一种所谓的"买回效应"，使这种政策失去作用。

交易所交易商（Floor Trader or Floor Dealer） 与经纪人不同，他们一般不为社会公众的证券交易服务，也不接受其他证券经纪人的委托，在交易所内只为自己买卖证券，通过买卖之间的差价来赚取利润，并自负盈亏。多数交易商不属于任何证券公司，而以发行公司或个人的身份在交易所获得席位。

交易所经纪人（Floor Broker） 又称二元经纪人（Two-dollar Broker），是一种居间经纪人。当佣金经纪人同时接到许多交易委托时，二元经纪人接受佣金经纪人的再委托，代为买卖证券，所以也称他们是经纪人的经纪人（Brokers' Broker）。他们的佣金由佣金经纪人支付。由于过去每次为佣金经纪人买卖100股股票可获得2美元的佣金，所以又称二元经纪人。这种经纪人不属于任何证券公司，而是以个人身份在交易所取得席位，因而也称独立的经纪人。

交易风险（Transaction Exposure） 在结算以外币计价的交易时因汇率变动产生的风险。以外币计价的交易包括：(1) 以外币计价结算的商品、劳务买卖；(2) 以外币表示的公司债券的买卖等资产、负债；(3) 以外币结算的借、贷款。因此交易风险又可以细分为：(1) 外汇买卖风险。由于进行本国货币和外币的交换产生的风险。以买卖外汇为业务的外汇银行及以外币进行借、贷款的企业承受的主要是这种风险。其特点是只有在银行、企业买入或卖出某种外汇后，将来又必须反过来卖出或买进外汇时此种外汇风险才会出现、产生。例如，一日本企业以10%的年利率借入100万美元，期限一年。若借款时1美元＝200日元，则可得本币2亿日元。归还借款时需买入110万美元归还借款本息。若此时日元贬值或美元升值，则以日元计算的借款成本必大于以美元计算的借款成本10%，使该企业蒙受损失。(2) 交易结算风险。伴随着以外币计价的商品、劳务交易产生的外汇风险。例如日本出口企业以美元计价出口商品时，从签订贸易合同到执行合同收到美元货款间有一段时间间隔，在此期间日元和美元间的汇率很可能发生变动，出口货款的日元金额是不确定的。因出口企业的制造成本以日元表示是一定的，故由于汇率变动出口企业便可能出现损失。

交易方程式（Exchange equation） 见"费雪方程式。"

交易（Exchange）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资源配置包括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生产过程是商品的加工过程，交易过程则是商品的所有权的转移过程。对于生产或消费来说，要有效地利用资源，就必须要进行交易，交易可以促进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对于消费，交易可以使具有不同禀赋偏好的经济单位获得最大效用。如果两个单位的边际替代率不相同，那么进行适当的交易就可以使双方都获利。

交易理论，依据市场结构和经济单位的品质（包括单位的禀赋，生产机会，偏好和信息等），试图对交易的项目和所实际发生的交易量进行预测，而这也与可达到的市场，所利用的交易规则以及可供利用的合同有关，即也要依赖于产权、搜索成本或交易成本等。有关交易的价格和数量的记录是许多对经济活动进行经验研究的原始资料，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如何解释这些原始数据。对交易行为也可以从规范经济学方面进行考虑，交易行为的福利分析研究的就是交易过程和合同的分配效果。

假定所有的经济单位在交易时，都追求获得最大的收益，在一个禀赋固定的情况下，就会有许多种有效的配置，任何使所有单位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的配置都是有效配置。显然，这与禀赋在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分配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确定出一个小的有效配置的集合即瓦尔拉配置，而其他一切配置都可以通过它对瓦尔拉配置的偏离来解释。瓦尔拉配置是这样一种配置，它是在现行价格下通过交易所得到的一种配置，任何经济单位要想获得比它更好的配置，就必须花费更多的资源。实现瓦尔拉配置的关键是此时每个经济单位的收益都是最大的（在由价格给定的预算线内），以及在这个价格下，市场必须出清。但是，在市场不完全以及存在货币外部性或合同不充足和存在战略行为时，由交易所提供的所有收益并不能全部实现。如果垄断的生产者有意限制产量以抬高价格，或者实行价格歧视，那么，所实现的配置就不是瓦尔拉配置。

瓦尔拉模型给出了一个在完全竞争情况下有效交易的变化情况表，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决定了交易的条件，而关于具有某种私人信息和市场权力的经济单位的战略性行为的分析则详细地描述了那些阻碍交易效率的不完全市场或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起因。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 交易成本产生于转让所有权，或更一般地说，产生于转让财产权。在集权经济体制下，实行中央决策，交易成本转变为管理成本。在现代经济中，交易成本有日渐增大的趋势，但经济学中讨论交易成本问题却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并且还未建立起完整的理论。在讨论交易成本时，主要涉及的问题有交易成本对交易数量，价格的影响、对经济福利，效率的影响等等。

对交易数量来说，显然，交易成本的存在会减少交易量，因为人们会竭力精简交易，来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越大，交易量越小，甚至出现交易量为零，市场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若交易成本固定，又会产生大规模交易形式，特别是在分析货币需求时，这一效果非常明显。托宾等人用代数方法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在交易成本固定情况下，货币需求只随总资产的平方根上升。托宾的这种方法在货币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对交易价格来说，交易成本象运输成本一样，会阻碍套利行为，从而也阻碍了一价法则（law of one price）的实现，交易成本如果大于商品买卖之间的差价，也就不会发生买卖行为了，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把存在交易成本的市场称为是不完善的，因为有交易成本，就要出现多种价格。此外，交易成本对资产套利套汇行为也有很大影响，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对不同市场进行了研究，例如，弗兰克尔（Frenkel）和里奇（levich）分析了欧洲货币市场上交易成本的影响，菲利浦（Phillips）和史密斯（Smith）则研究了股票期权市场等。

对于社会的福利和效率问题，交易成本的存在显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为社会的一部分资源必须投入于交易行为中，而且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原本对交易者都有利可图的买卖却只有放弃不做。另一方面，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影响社会效率。有的学者就认为交易成本通常会使经济在效率较低的情况下达到均衡，因为交易成本会造成大量的预算限制，从而降低消费的可能性，有了交易成本，也会使经济偏离帕累托最优状况。学者科斯（Coase）就强调交易各方签订多个合同，交易成本会很大，这时实行统一管理反而比分散签订合同效率更高。交易成本对效率的影响也开始被人们应用于政治决策等问题上。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如果进行决策时，达到完全一致的成本很高，就应选择其它决策方式。

交割延期费（Backwardation）　又称现货升水或现货溢价，是伦敦股票交易所中使用的术语。交割延期费是股票或证券的出卖人为延期交割的权利而支付的费用，意指期货价格跌落到现货价格以下。与此相反，交易延期费（或称现货贴水或期货溢价）是由想要延迟支付的买者支付的费用，意指期货价格超过了现货价格，如今，交割延期费和交易延期费已成为国际贸易中常用的术语。在期货交易中，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如果对供给的近期需求高于远期需求，那么，交货越早则现货价格越高。

凯恩斯和希克斯对交割延期费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认为，正常的交割延期费相当于存在一个正的风险报酬，商品的期货价格相当于对现货价格的偏低估计。从生产的技术条件来看，由于生产者可能已经投入生产，而消费者却可能免费获取物品，因此，生产者必须比消费者更有远见。这样，套头交易者作为一个整体往往使用空头，投机商作为一个组织则往往使用多头。为了说服投机商，使他们担当起相当的多头，必须提供一个正的风险报酬，这就是一般的交割延期费产生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释尽管对于典型的商品市场是正确的，然而并不适用于所有市场。一方面，如果变更生产的调整费用较低，而变更消费的调整费用较高，那么模型的技术条件可能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在某些市场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技术区别并不重要，库存可以是负的，这使正常的交割延期费无法得到保证。事实上，正常的交割延期费的产生是否取决于物品的性质，仍是一个全凭观察而得到的未决现象。如果许多市场都必须遵循“有效期货市场假定”，那么，正常交割延期费理论就软弱无力了。

交叉弹性（Cross Elasticity）　交叉弹性是衡量一种商品的价格对另一种商品需求的影响尺度。在消费者的爱好、货币收入和其它商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商品 i 价格的商品 j 的需求的交叉弹性，是商品 i 购买量增减的百分比被除以商品 j 价格涨跌的百分比。

为了避免测量值受所使用计算单位的影响，其量值可以这样来表示：

$$\text{需求的交叉弹性}=\left(\frac{\Delta Q_i}{Q_i}\cdot 100\right)\div\left(\frac{\Delta P_j}{P_j}\times 100\right)=\frac{\Delta Q_i\cdot P_j}{\Delta P_j\cdot Q_i}\qquad\text{（公式 1）}$$

在此，Q_i 是商品 i 的数量，ΔQ_i 是商品 i 数量的变化量；P_j 是商品 j 的价格，ΔP_j 是商品 j 价格的变化量。

交叉弹性可以用来衡量两种商品相互间的关系和程度，商品 i 和商品 j 之间的交叉弹性越高，则它们的相反依赖性就越大；反之，当交叉弹性越小时，则表示两种商品间的依赖程度越小。

交叉弹性可以是正数，负数或零。当商品 j 的价格下跌引起对商品 i 的需求增长时（例如，网球拍的价格下跌引起对网球需求量的增长），则需求的交叉弹性为负数，在公式 1 中，分子和分母一正一负，结果必然为负值，这两种商品（网球和网球拍）便被称为互补的商品。互补商品中的一个如果发生价格下跌，则使价格下跌的这一商品需求量增加，从而提高了互为补充的另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使后者的购买

量随之增加。

但是，如果商品j的价格下降造成了对商品x的需求下降（例如，咖啡价格的下降会引起对茶叶需求的下降），那么这两种商品之间的交叉弹性为正数，因为在公式1中分子分母均为正，这两种商品被称为互相竞争的商品或互相替代的商品。当两种商品之中的一种价格下跌时，促使这种跌价的产品使用量增加，从而降低了另一种替代商品的需求量减少。

若两个商品既没有替代关系也没有互补关系时，则这两种商品的交叉弹性为零。

在上述的研究中，应该注意的是只有在上述商品占总支出的比重非常小，从而其价格变动对收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交叉弹性才是衡量商品间相互补充和可以相互替代的程度的准确尺度。交叉弹性这一概念已被西方经济学用来广泛地进行供求分析，市场均衡分析以及效用分析。

交叉套期保值（Cross Hedging） 套期保值的一种形式。套期保值本应遵循"均等且相对"的原则。但"均等"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期货市场交易的商品（包括有价证券、外汇）和现货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在种类和数量上均可不一致。两个市场上交易商品种类不同的套期保值即是交叉套期保值。例如在利率期货交易中为了避免在公司债券投资上的损失，投资者可以在期货市场上买卖国库券。因为目前还不存在公司债券的期货市场，而公司债券和国库券的价格均受市场利率的影响，和其成反向变动，因此二者间在价格上的变化极为密切。在外汇交易上也有类似情况。

交价格（如CIF价或FOB价） 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出口到同一国家的同类商品的价格；类似商品的价格；以进口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为基础减去有关税金后所得的价格；以制造该类商品所需的原材料费用、生产费用、运输费用和保险费为基础估算的价格。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从价税计征关税。

安第斯条约组织（Andean Pact Organization） 安第斯条约组织又称安第斯集团或安第斯共同体，它是地处南美安第斯山区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于1969年10月建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共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等5个成员国，总部设在秘鲁首都利马。该组织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协调对外政策提高对外谈判能力，更好地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安第斯条约委员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还有安第斯议会，技术委员会，安第斯储备基金会等下属机构。该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促进了成员国间贸易的发展，它还在成员国对外实行统一关税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了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该组织还制定了多种发展计划，对各成员国的钢铁、石化、机器制造等重要经济部门的发展进行指导和协调。此外，该组织还加强了成员国在政治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政治地位。

1990年11月，该组织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举行的成员国首脑会议上作出决定，到1991年底建立商品完全自由流通的安第斯自由贸易区。这一决定使得该组织向一体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也将对拉美一体化进程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税（Customs Duties） 关税是指一国政府设置的海关根据该国的有关法规和章程对经过该国关境的进出口商品征收的一种赋税。关税是一种间接税，进出口商在商品通关时预先垫付了税款，这些税款在出售商品时以加价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关税还是贯彻实施一国贸易政策的重要手段。关税的征收已有很长的历史。一国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个是保护本国市场和生产。如果说一国征收关税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那么这种关税就可以叫作财政关税。如果一国征收关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生产，那么这种关税就可以叫作保护关税。以前，各国征收关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经济联系的密切，财政关税的地位日益下降，而保护关税的重要性却不断加强。事实上，各国目前所征收的关税基本上属于保护关税，而且它主要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一般来说，保护关税的税率越高，保护作用就越突出，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就能起到限制甚至禁止进口的作用。事实上，一国有关机构通过调节关税税率可以使关税发挥广泛的作用。通过降低关税甚至免税，可以鼓励某些原材料、半制成品、先进技术设备、国内供不应求的生活必需品等的进口，这不仅可以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而且还可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并抑制物价的上涨。通过减免关税可以吸引外国投资，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提高关税除了能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外，还能限制本国国内急需的原材料，半成品和先进技术设备的出口，能更好地满足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另外，利用关税调节可以调整与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

关键货币（Key Currency） 在国际收支中使用

最多，在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最大，可以自由兑换且国际上普遍接受的货币。各国制订的本币对关键货币的汇率称为基本汇率，是确定本币与他国货币汇率的基础。政府对外汇市场的间接干预通常采取抛售或收回关键货币的形式。各国以何种货币作为关键货币一般不对外公布。战后多以美元为关键货币。

关键工序分析（Critical Path Analysis） “关键工序”原用来指在某一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或者占用的时间最长的那道工序，后来引伸为任何项目或者经济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程序或者因素。“关键工序分析”指的是在进行各种层次的经济管理中所需要运用的一系列方法的通称。在人们安排旅游日程、厂商制订生产计划以及政府进行大规模基本设施建设的时候，都要面临几个共同的问题：(1) 这些活动必须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进行；(2) 活动中各个程序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各不相同，也难以准确地把握，其中有的程序对于整个活动的影响比较大；(3) 完成活动的方式有多种，例如，要加速建设的进度，就要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要节省开支，工期就要延长。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经济管理，并且能更好地处理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人们开始对经济活动的过程加以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亨利·甘特为了处理好复杂的工业与军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曾经制定出一种安排和控制各种活动的图表方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活动的次序以及每一程序所需占用的时间。帕累托注意到，在每个经济活动中都存在着影响较大的一个或几个因素，后人称之为“关键因素”。如果能有效地控制这些关键因素，就可以有效地把握整个活动的进程。50年代末，杜邦公司制定了一种用于计划和控制的、靠电子计算机操纵的网络方法，这就是“关键工序法”（CPM）。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在管理武器系统的时候设计了计划评审法(PERT)，这种方法运用概率统计工具进行分析，并提供三种时间估计（即最保守的、最可能的以及最乐观的）。这两种技术都是以图示的形式表明活动中各个程序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表明某个程序的起始时间是如何依赖于在它之前的那个程序的进程的。其中能够加快或者延迟整个活动进程的那个程序被称为“关键工序”，找出关键工序之后，若想加快整个活动的进度，就将资源重点配置到关键工序中去；如果要节省开支，就应当从非关键工序中抽出一部分资源，这不会对整个活动的进程造成太大的影响。

后来，人们把“关键工序法”与“计划评审法”这两项技术的优势加以综合，逐渐发展形成“关键工序分析”（CPA）。“关键工序分析”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 对完成某一活动所需要的各个程序进行分析；(2) 用非循环式的网络图表示出活动中各个程序的先后顺序；(3) 确定“关键工序”；(4) 确定整个活动中成本与时间的替代关系。

随着时间的发展，关键工序分析这项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目前，它已经能够以更灵活的方法处理具体问题，并在相当复杂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管理。关键工序分析的方法已被经济组织理论所采用，它的应用必将日益广泛与深入。

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 关税同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签订条约或协定而结成的同盟，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各国原先的关境，建立统一的对外关境，在此基础上不断削减以至取消同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关税，实现同盟内部各国商品的自由流通，对外逐步拉平各成员国的关税税率，实现统一的对外关税。建立关税同盟，不仅有助于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能限制和打击非成员国商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更好地起到保护贸易的作用，关税同盟始于19世纪中后期。两次大战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关税同盟相继建立并有不断发展的趋势，目前最有名的关税同盟就是欧共体的关税同盟，它于1968年7月建立，它在促进欧共体成员国的经济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税合作理事会（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关税合作理事会成立于1952年12月，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政府间国际海关组织。它的宗旨是简化海关手续，完善海关制度，加强海关领域的国际间合作，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它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现有近百个成员国，我国于1983年7月18日加入了该组织。

理事会全体代表大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就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秘书处是常设办事机构。理事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成员国交纳的会费以及各种捐款。理事会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它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但同时以同联合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理事会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它制定了一整套国际海关业务制度，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改革，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各国海关手续的协调与统一。它所制定的《海关合作理事会税则目录》，已为世界上上百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另外，它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讲习班、研讨会等，使各国学到了先进的海关工作经验，提高了各国海关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税税则（Customs Tariff） 关税税则又叫海关税则，它是指一个国家对进出口商品计征关税的规章以及对进出口的应税商品、免税商品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加以系统分类并列明应征税率和免税等具体情况的一览表。因此，关税税则是一国对进出口商品计征关税的直接依据。关税税则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海关计征关税的规章条例及说明，二是关税税率表，它包括税则号列、商品名称、计算单位和税率等项目，在制定关税税率表时，必须首先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合理的分类，它不仅关系到征税工作能否顺利进行，而且还关系到关税的计征能否很好地为本国贸易政策服务。各国关税税则中的商品分类方面不尽相同，有的按加工程度分，有的按商品性质分，有的先按商品的性质分成大类，然后再按加工程度分成小类，等等。尽管各国的关税税则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关税税则中的商品分类极为繁细，税率变动频繁，其目的是使不同商品的关税税率更加具有针对性，以便加强关税的保护作用。第二，关税税则由单式税则向复式税则发展。单式税则又叫一栏税则，这种税则只有一个税率，适用于来自任何国家的商品，没有差别待遇。复式税则又叫多栏税则，这种税则的每一个税目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税率，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商品，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单式税则向复式税则的发展旨在实行差别待遇和贸易歧视。海关税则依据进出口商品的不同流向，又可分为进口税则和出口税则。随着出口税的日益减少，许多国家大大简化甚至取消了出口税则。因此，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关税税则只有进口税则。我国的"海关进出口税则"把我国的进出口商品分成21类、99章、1100多个税目。进口税设普通税率和最低税率两种，对从与我国签订了含有关税互惠条款的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国家进口的商品按最低税率征税，对于其他进口商品则按普通税率征税。

关税壁垒（Tariff Barrier） 关税壁垒是指一国为限制进口而对进口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一国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大大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如果经营进口商品想获利，就必须大幅度提高它在国内市场的售价，这就使得它在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削弱，最终起到了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市场和生产的作用。由于高关税象高墙似的把外国商品拒之门外，故形象地称之为关税壁垒。关税壁垒是传统的保护贸易措施，由于实行关税壁垒很明显容易受到对方的报复，因此这种保护措施已不再流行，只是在特殊时期针对某些特殊的商品采用这种保护措施。

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 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它在1947年10月由美、英、法等23国在日内瓦共同签署，并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关贸总协定最初是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出现并发挥其作用的，由于商议中的国际贸易组织始终未能建立起来，关贸总协定就以临时协定的身份生效至今。因此，从严格意义来说，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但它实际上起着一个国际组织的作用，它同联合国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关贸总协定本身由序言和4个部分组成，共计38个条款。序言阐述了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正文部分则具体规定了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总协定的适用范围、活动方式、参加和退出总协定的手续和程序、总协定的生效、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在贸易和发展方面的特殊规定，等等。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促进成员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保证充分就业，保障稳定的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彼此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取消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主要有5个，即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原则上禁止和取消数量限制，以关税作为唯一的保护手段等。

关贸总协定的总部设在日内瓦，缔约国大会是它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缔约国组成，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它的职责是解释总协定条款，协商解决国际贸易争端，讨论和决定有关重要政策，商讨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制等。代表理事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并监督总协定所属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作。秘书处负责缔约国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为代表理事会以及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作提供服务，另外还要负责组织总协定主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

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复合体，它既是一个调整其成员国之间贸易关系的法律准则，又是一个多边贸易谈判以及对其法律准则进行修改的专门场所，同时还是一个调解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机构。关贸总协定除了每年召开缔约国大会以外，主要活动就是主持开展了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从1947年至今，这种贸易谈判已举行了8轮（其中最新一轮乌拉圭回合还未结束），多边贸易谈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作为传统的保护手段的关税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其次，不断完善和发展了国际贸易规则，为各国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国际贸易争端，缓和了国际贸易中的矛盾和斗争；第四，逐步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等等。所有这些成就为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同时还使该组织本身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目前，总协定成员国的贸易额已占国际贸易总额的近90%。

关贸总协定最初只有23个成员国，此后随着它的作用和影响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该组织，目前它共有近百个正式成员国以及30多个联系国。我国是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但是1949年以后我国在总协定中的席位一直为台湾所占据。1971年总协定取消了台湾的观察员资格，此后我国逐步与总协定建立了联系，1984年11月总协定批准我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1986年7月，我国政府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要求恢复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但这一申请至今还未得到批准。究其原因，除了某些大国的阻挠外，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1991年1月出台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最新方案，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国家对外贸企业的亏损补贴，这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贸体制，另一方面也是为早日恢复我国的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创造条件，相信我国回到总协定中去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许可证贸易（Licensing） 许可证贸易是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它是指技术的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签订许可证协议，通过这种协议，许可人允许被许可人使用其专利、商标以及专有技术等，而被许可人则应向许可人支付技术使用费并承担保守技术秘密等义务。许可证协议是许可证贸易的核心，它包括的内容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下列条款：许可证的名称、范围、专利与商标条款、技术的改进与发展、技术服务与协助、保密条款、支付条款、不可抗力条款、争议处理和法律选择条款、许可证协议的生效、有效期限、终止、满期以及延期条款等。根据许可人授予被许可人的权利范围，许可证协议可以分为以下四种：①独占许可证（Exdusciue Licence）。它是指被许可人在规定的区域和期限内独家使用被许可的专利、商标和专有技术等，许可人和任何第三方都无权使用这种权利。②排他许可证（Sole-Licence）。它是指被许可人在特定的区域和期限内独自享有使用被许可的专利、商标和专有技术和销售相应的产品的权利，任何第三方都不能享有这种权利，但是许可人则可保留这种权利。③普通许可证（Simple Licence）。它是指被许可人有权在规定的地区使用被许可的技术开展生产和销售，许可人保留这种权利，而且许可人有权把这种权利授予第三方。④可转让许可证（Sub Licence）。它是指被许可人在规定的区域与时间内有权将被许可技术的使用权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第三方。不同的许可证由于被许可人的权利和利益各不相同使得它们的价格各不相同。独占许可证由于它的独占性强，可以使被许可人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它的售价最高，而普通许可证对被许可人来说权利和利益最小，因此它的售价也最低。在目前的许可证贸易中，独占许可证贸易和普通许可证贸易开展得最为广泛。

亚洲美元（Asian Dollar） 存放在美国境外亚洲地区银行中的美元。是亚洲货币市场经营的主要货币。60年代，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及西方跨国公司在亚洲地区活动的增加，该地区对美元短期资金的需求，供给增加，需要调剂，1968年新加坡政府取消了对非居民外币存款利息的预扣税及存款准备金制度，批准银行设立"亚洲货币单位"经营美元存放款业务，形成了最初的亚洲美元，目前新加坡仍是亚洲美元的中心。

亚洲债券（Asian Bond） 由亚洲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的国际辛迪加经销的债券。欧洲债券的一种。第一笔亚洲债券是新加坡政府于1971年9月发行的1,000万美元的政府担保债券。大部分亚洲债券的面值货币为美元。

亚洲货币（Asian Currency） 存放在货币发行国境外的亚洲地区银行中有关其交易的结算仍需在货币发行国进行的各种货币。最早出现的是亚洲美元，至今亚洲美元在亚洲货币中仍占统治地位。亚洲美元产生于60年代，晚于欧洲美元，其中心是新加坡。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 1966年11月正式成立，同年12月开始营业，行址在马尼拉。它是由亚洲国家为主成立的包括亚洲以外国家在内的旨在向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贷款和援助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它的宗旨是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

截止1987年底，该行已有47个成员国，其中亚洲国家占32个，非亚洲国家占15个。各成员国总共认缴股金222.7亿美元，份额最大的国家是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份额的多少决定了平等表决权之外表决权的大小，由于平等表决权票数大约只占全部表决权票数的20%，所以，亚行的发言权主要掌握在出资最多的发达国家手中。

除各成员国认缴股金外，亚行资金的来源还包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和成员国的捐款。资金的发放主要分为两部分，即，普通资金贷款和特种基金贷款，前者指按商业标准发放的所谓硬贷款，其利率每半年调整一次，但期限较长，为40年，后者则指通过亚洲开发基金和技术援助特别基金提供的优惠贷

款，即软贷款，这类贷款一般只提供给人均GNP很低的国家，不计利息，每年只收1%手续费，其期限为35—40年。

亚行贷款的主要领域侧重于能源开发、交通通讯、农业与乡村发展、市政设施建设及教育、卫生等。对于一些大型项目，亚行也负责出面融资援助。

除向成员国提供贷款这一业务外，亚行也提供独具特色的技术援助以及多种咨询服务，如应成员国要求派遣专家顾问团，进行多方面的经济考察，设计不同情况下的开发计划等等。

亚行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为各成员国委派的理事和副理事各1名，一般均为各国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理事会每年开会一次，决定新成员的接纳，股金的变动，选举任命董事长（兼行长），并推举12名董事（本地区与非本地区代表比例为8：4），组成董事会，负责制订银行的方针、政策，并就贷款、借款和技术援助等业务作出决策。

亚当·斯密的"有效需求"（"Effectual Demand" in Adam Smith）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巨著中提到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斯密认为，对任何一种商品的有效需求就是在这种商品的自然价格下对它产生的需求。而某种商品的自然价格指的是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相一致的价格，它与由收入决定的价值相一致。如果在自然价格下，商品的供给小于对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么有效需求就不能全部得到满足，有些人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使得市场上表现出来的实际价格高于自然价格。这时，那种获利较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开始上升，逐渐使得它的获利趋于下降，直到市场价格等于自然价格。反之，如果自然价格下，某一商品的供给量大于有效需求量，则供给出现剩余，这使得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这时，亏损的生产要素就退出生产，逐渐使得其收益上升，直到生产价格等于自然价格。如果某价格下，该种商品的供给量与其有效需求量正好相等，那么这个价格就必然是这种商品的自然价格。可见，斯密引入有效需求这个概念，是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自发调节过程。这一调节过程的两个前提是：1.生产要素的收入总量（即地租、工资与利润三者之和）已知，也就是自然价格是已知的；2.收入分配的结构已知。用有效需求的概念，既可以分析微观层次上对某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调节，又可以在宏观层次上分析市场总供给量与需求量的变化。不过有效需求分析不能反映市场价格变化时、市场供求量的变化程度，或者说，亚当·斯密还未能将价格与市场供求量之间的关系上升到函数的高度去研究，他的有效需求只能描述一个点的情况，这个点就是市场供求相等，市场价格等于自然价格的均衡点。斯密还指出，影响需求构成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因素，指的是经济富裕的程度以及收入分配结构；另一个是主观因素，包括社会规则、习俗以及不同层次的收入者对商品偏好的关系等等。综上可见，亚当·斯密"有效需求"的概念将价格与收入分配同市场供求状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对价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与市场供求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也为这几部分理论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桥梁。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　古希腊最著名的思想家，在诸多学科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其丰富的著述实际上是古希腊科学成就的总结。他是马其顿王御医的儿子，曾长期就学于柏拉图，但后来同他的老师发生思想分歧。公元前343年受聘担任马其顿王子的教师。公元前335年回雅典创办学园，进行讲学和著述。作为奴隶主思想家，他力图在政治上巩固古希腊奴隶制的统治。其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两书里。

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说首先研究"家庭管理"。他补充和发展了色诺芬的有关理论，把家庭管理"当作政治学的一部分，并更具体地规定了其研究对象和任务。奴隶主的"家庭管理"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研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二是研究致富的技术。在他看来，适于脑力劳动的人，能运用精神而具有先知，自然是主人，而适于体力劳动的人，只能用体力去实现主人的先知，天生是奴隶。因此，奴隶制是劳动分工的自然结果，是天然合理的。同样所谓的劣等种族也是天生的奴隶。他还论证说，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需要奴隶那类有生命的工具。

在讲到致富技术时，他区分了"经济"和"货殖"。他认为，前者是为了获取真正的财富即具有使用价值的生活必需品，它只局限于家庭的消费，因而是自然的。而后者的目的在于无限制地追求货币财富，它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赚钱愿望的，这种以货币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即"货殖"无疑是反自然的。他又从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过程指明了"货殖"的性质，认为交换从物物交换开始，先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小商业，再进入以货币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即大商业，其中小商业只是要获取使用价值，本质上仍归属"经济"。可见，他实际上已区分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从维护奴隶制的立场出发，他对商业

资本和高利贷这些“货殖”形式给予了完全的否定。

亚里士多德还围绕商品的价值形式问题阐发了极其深刻的见解。他明确指出物品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它是物品固有的属性；一是用于交换，它是物品后有的属性。这里已初步有了区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朦胧思想。他还注意到商品交换是以它们之间的等一性为基础的，而这种等一性又是用货币作为尺度的。如五张床等于一间屋，无异于是说五张床等于若干货币量。尽管由于社会的历史的限制，他不可能发现这种等一性实际上是什么，但能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存在等一性，这就闪烁出天才的光辉。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实际上也已认识到，商品的货币形态不过是简单价值形态的进一步发展，而货币除了充当流通手段和财富积累手段外，还具有用以衡量一个价值实体大小的职能，即价值尺度的职能。这些思想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它们都成了近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起点。

共同海损（General Average） 共同海损是指货物在海上运输过程中，遭遇的海上风险威胁到船、货的共同安全，船方为了维护船，货的共同安全，有意识地，合理地采取一些挽救措施而造成的某种特殊牺牲或支出的某种特殊费用。这种特殊牺牲称为“共同海损牺牲”，支出的特殊费用称为共同海损费用，二者共称为共同海损损失。

共同海损行为在正常航行中不能采用，它是一种非常措施，在正常航行中，船方有义务保证货物的完好状态，保证货物被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船方才有权采取共同海损措施.

构成共同海损的基本因素主要有：

(1) 船、货等方必须面临共同的危险，船方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为了共同的安全；

(2) 遇到的共同危险必须是真实的，不能以推想的危险为基础采取措施，不能凭空臆断；

(3) 共同海损的措施必须合理，必须适时适度，若采取的措施超过合理的限度，或时间上过早过晚，都不应算作共同海损；

(4) 所采取措施而产生的损失和费用必须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这些损失和费用必须是共同海损措施的直接后果造成的；

(5) 共同海损的措施是人为的、故意的，而并非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直接造成。

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是为了使船舶、货物和运费摆脱共同危险，获得共同安全，这些牺牲和费用要按幸存的船舶、货物和运费按其获救后的价值比例地进行分摊。

共同海损理算（General Average Adjustment） 在发生共同海损损失之后，对于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通常是按照获救财产的价值比例地进行分摊，这一比例的分摊过程就称为共同海损理算。在共同海损理算方面，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理算规则是约克—安特卫普共同海损理算规则，同时，共同海损理算也可以根据船舶航行目的地国家法律进行，如我国船舶遭受共同海损，可以按照北京理算规则办理。

共同海损损失的补偿来源是获救的财产，损失的补偿包括船舶的牺牲、货物的牺牲、运费的牺牲以及因共同海损行为而支出的费用。其中船舶的牺牲通常是指共同海损所支出的修理费扣除更换的零部件的折旧费；修理的完好程度应以达到船舶遭遇共同海损之前的状态为准。货物的牺牲若属于全损，则补偿的数额应以船舶到达目的港的最后卸货日货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并且应扣除应付而未付的交费；若货物的牺牲属于分损，共同海损的补偿数额应是船舶到达目的港的最后卸货日，货物完好状态下的市价减去受损货物的残存价值，同样需扣除应付而未付的运费。而运费的牺牲是指承运人因共同海损而损失的运费收入，如果运费属于预付运费，则不存在共同海损的运费牺牲；如果运费是到付运费，则运费的牺牲是指共同海损牺牲的货物应付而未付的运费。

共同海损的分摊应当是共同海损实际遭致的损失，依据公平分摊原则。无论实际受损与否，共同海损措施之后被救的船舶、货物和运费都应按比例进行分摊。船舶方面的分摊应以航行终止时船舶的实际净值为基础，加上该船舶应受到的共同海损补偿的数额；货物方面的分摊应以货物在目的地卸货时的价值为基础，加上货物应受到的共同海损补偿的数额。运费的分摊应以获救货物所应给付的运费为基础，加上运费应受到的共同海损补偿的数额。

如果被保险人对于共同海损进行了投保，被保险人在共同海损中的牺牲和承担的分摊数额，均可要求保险人给予赔偿.

共同海损保证书（General Average Bond） 在发生共同海损以后，即使货物本身并未遭受损失，货方也应分摊共同海损损失，船方为了保证这种分摊不致落空，对获救的货物保有留置权，但是，由于共同海损理算比较复杂，货方又无法等待理算完毕，交纳分摊数额后再行提货，为此，货方通过签署共同海损保证书以便先行提货、共同海损理算书的内容主要有：

(1) 船方具有任意选定共同海损理算人的权利；

(2) 货方愿意受理算人所做决定的约束；

（3）货方保证缴纳所应负担的共同海损分摊额。

共同浮动（Join Floating）　又译作"联合浮动"，见"联合浮动"。

共同决定与利润分享（Codetermination and profit-sharing）　共同决定也叫参与决策，指雇员参与企业决策。他们可以获得有关信息；有权咨询，在工作组织和内部社会问题方面能够介入。他们通过组成工作委员会，监督乃至投票决定成员的配置，代表机构的选举、管理者的任务等，在就业、投资水平和结构方面也拥有颇具影响的决策权力，因此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样对企业决策有很大的发言权。

共同决定具有以下三个作用：1.给工人提供发表自己意见的正常渠道，使成员众多的企业合理控制工人，减少劳动负作用；2.工厂内冲突的数量及强度的减少。当工人得知详尽的和可信的情报，并且参与决策，在企业与个人之间有着某些"认同感"的时候，即使管理者决定的不那么受欢迎的决策，如今也很可能为工人们所接受了。"共同决定"机制的引人，使得企业中的冲突几乎无迹可寻，但以后必然还会出现，并且还会出现这样的冲突，如已受雇佣的人们"共同决定，采取就业保护方针，因此而触怒那些失业者；3.共同决定是工人权力和责任相互联系的纽带，必然使工人分担企业风险。

利润分享是指雇员报酬的一部分随雇主的盈利情况而变动的计划。这些计划可以是真正的利润分享，即将一定百分比的利润分配给职工，或是某种形式的准利润分享。在后一种情况下，雇主将一定数额的利润分享计入成本；不管公司当年盈利多少，都按此数额予以分配。

在劳动收入中，利润分享起着三方面的作用：1.劳动生产力的提高；2.劳动就业的高水平；3.劳动收入的周期伸缩性。利润水平和利润率的高度稳定性，由于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并不自动变化，在一定周期内，通过"利润分享"，由劳动收入伸缩性决定着的就业并不稳定。不喜欢冒风险的工人，宁可接受固定工资，而不愿接受由"利润分享"原则决定着的工资。而喜欢冒险的雇主，或者会、或者不会选择更高度稳定的利润率（这取决于他们对冒险和通过分散投资而减少冒险的机会成本的态度），而不是选择依据"利润分享"付出较高的平均费用，更不是选择对雇主、雇员双方都有利的固定工资形式。因此，"利润分享"主要在冒险的投机中受欢迎，或者为衰退中的企业而欢迎（此时工人不得不接受它，以免永久性的工资削减）；或者为繁荣时期的企业所欢迎（此时企业不得不接受它，以免永久性的工资激增）。

共同决定与利润分享的互相依赖。两者的作用并非是独立的。拥有劳动组织以进行"利润分享"的工人，能够使生产力提高；即使由于工人控制劳动组织会造成的生产力低落，也可以通过"利润分享"而被缓和。收入的变化，在"利润分享"中加强了。"共同决定"导致冲突的频率和强度都减弱了，而由于"利润分享"，就变得更加微弱了，因为对每个工人来说，"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冲突被"共同决定"部分地情感化了——在以前则是外在地被夸大和激化。无论如何，在一个卓有成效的刺激系统中，权力与责任是不能分离的。

威茨曼（Weitzman）有两条建议：1."共同分享"机制下的长期就业平衡，与长期性的非波动性的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有关，这会缓冲收缩性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而且给予劳动以崭新的形象。2.即使在短期内，"分享经济"也能达到并维持充分就业。有人提出如下三点异议，认为：1.充分就业下的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将不堪忍受，这只是一种暂时的非均衡。2.永久的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与缺乏"共同决定"相矛盾。当"共同决定"机制被引入时，出现的抵制性的就业政策会发生作用。3.最重要的，并不必需要达到充分就业。

假设"分享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威茨曼在如下主张的基础上坚持认为在长期均衡中对劳动过度需求出现的可能性和存在的长期性。

劳动支付总额＝充分就业下劳动生产力的边际收入价值①

劳动支付总额＝固定支付+净利润分享②

充分就业下的劳动生产力的边际收入价值＞固定支付＝企业边际劳动成本③

有三种说法对上述推断进行怀疑：1、首先，企业必须清楚，它们的支付公式必须通过不断提高劳动总支付来吸引工人，而且视之为边际劳动成本，结果，就是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的消失。2、其次，如果企业把支付中的固定成分视为劳动的边际成本，它们会发现，固定成分低于劳动生产力的边际收入价值，只要不把总支付提高到劳动生产力之上的话，将无法实现支付参数的有选择的组合。（alternative combinations of pay paraments）不喜欢冒险的工人宁愿选择固定的支付，而不愿要那种虽然等量的但变化多端的潜在收入；喜欢冒险的雇主将通过以牺牲工人的利润分享为代价来增加支付中固定成分的方式，减少劳动成本。即使不考虑对冒险的态度，也可能希望经营者处理支付参数，直至他们使其边际成本与劳动的边际价值相等。即，"充分就业下的劳动生产力的边际收入价值等于固定的支付（3′）。这只能由利

润分享契约的定义②来调整：如果工人对净利润的分享为零，分享作为工资的一个成分，"分享经济"也会消失，并转为"固定工资性的经济"（Fixed wage ecnomy），从而不会存在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3、了解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的工人，很可能减少其努力。

持久失业情况下，工人们很可能被排斥在"共同决定"之外，而在充分就业时，这种排斥是困难的；当存在着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时，这种排斥就更困难了。但是威茨曼所假设的对劳动力过度需求的持久状态，却使排斥"共同决定"成为不可能。

一旦工人在产品、就业、物价以及有关问题（投资、更新改造等）方面有发言权，他们将努力防止对自己的分享的侵夺的极大可能性，一如股东之所为。不管好坏，他们都很可能采取，或者被诱使去采取保护性就业政策，而这种想提高或保持个人收入的企图很可能是错误的，终将导致失败。这不是意图反对"利润分享"，只是不期望那种能达到的过度就业有必要维持下去。

共有权（Common Property Rights） 或叫公共所有权。在一个社会里，为稀缺的资源的竞争而制定的一套规则和标准，这就是所有权。所有权的形式有多种，在私人所有权与公共所有权之间变化。

在私有制中，使用权的分界是按所有物本身的尺度和性质来确定的，对于私人团体来说这些权力是排外的，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且可以从中取得收人。而所谓共有权，在公有制中，对共有权的使用没有什么分界，没有人有权力排除另外的人使用它，在使用上所有的人都可自由竞争。由此没有排外性、不能自由转让。

有理论认为，在公有制下将会发生租金的损耗。由于公有制中使用权缺乏排他性，个体将为公共所有权的使用而竞争，从而使租金价值和纯价值减少到零。

在现实中，由于劳动或另外投人的供给曲线是上升的，竞争使用者有不同的机会成本，或者投人被规则、习惯、信息所限制，租金的竞争损耗很少见。虽然这样，但是伴随着公有制的一些租金的损耗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当公共所有权获得的租金比较于强制排外的花费为低，选择公共所有权的方式。在这方面来说，租金的耗损不为浪费。但是，由于缺乏一些强制力而导致的租金的损耗，又是浪费。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很少出现没有强制力的纯粹的公共所有。

假如稀缺的资源由公共拥有，规则也许能减少租金花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歪曲资源的使用，而且招致腐败与特权的产生。一个没有抑制的共有权，严格地讲，在所有权方面是非所有的。假如它的结构被全面推广，那么就会带来全面的经济危机。

协定关税（Conventional Tariff） 协定关税是指一国与他国通过贸易谈判，以条约或协定方式制定的关税。协定关税通常要比自主关税低，因为它总是缔约国之间通过关税减让谈判达成的。协定关税的适用范围往往要比自主关税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关税减让谈判不可能包括全部进出口商品，一国在条约或协定的有效期内，无权更改或废除协定关税。另外，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协定关税自动适用于与该国互相提供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或地区的有关商品。协定关税分为单边的、双边的或多边的几种。单边协定关税是指缔约国的一方单方面向对方提供关税减让，而没有得到反向优惠。双边或多边的协定关税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签订贸易条约或协定互相提供关税减让。尽管缔约的任何一方不能单独修改协定关税，但它可以通过征收临时性的进口附加税等措施，起到实质上修改协定关税的作用，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利益。

有效保护率（Real or 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 有效保护率是指一国政府对某一行业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后，此行业单位产品附加价值（value added）的变动率。计算公式为：

$$L_j = \frac{V_j' - V_j}{V_j}$$

其中：Lj：j行业的有效保护率；

V_j：自由贸易下，j行业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

Vj：对j行业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后，j行业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

进一步又设：

P_j：自由贸易下，j行业的产品价格；

t_j：对j行业进口产品征收的名义税率；

P_i：自由贸易下，生产j行业的产品所需投人的i行业产品的价格；

t_i：对i行业的产品进口征收的关税；

a_{ij}：生产单位产品j所消耗的产品i的数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后，j行业产品的国内价格为$(1+t_j)$ Pi；而j行业生产所需的投人品i行业的价格为$(1+t_i)P_i$；由于产品的价格是由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生产这一产品所需投人的中间产品价值共同构成，从而在自由贸易下，j行业单位产品的附加值V_j为：

$$V_j = P_j - a_{ij}P_i$$

而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后，j行业单位产品的附加值V_j'为：

$$V_j' = (1+t_j)P_j - a_{ij}(1+t_i)P_i$$

从而：

$$L_j = \frac{V_j' - V_j}{V_j} = \frac{t_jP_j - t_ia_{ij}P_i}{P_j - a_{ij}P_i} = \frac{t_j - t_i(a_{ij}P_i/P_j)}{1 - a_{ij}P_i/P_j}$$

其中$a_{ij}P_i/P_j$为j行业产品的单位产值中所包含的投入品i的价值，设$\theta_{ij} = a_{ij}P_i/P_j$；

则有：

$$l_j = \frac{t_j - t_i\theta_{ij}}{1-\theta_{ij}}$$

由此公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若$t_j = t_i$，则$l_j = t_i = t_i$

它表明，当一国政府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征收的名义税率相等时，则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率与其名义税率一致；

(2) 若$t_j > t_i$，则$l_j > t_i > t_j$

它表明，若对最终产品征收的名义税率大于对中间产品征收的名义税率，那么对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率就高于其名义税率；

(3) 若$t_j < t_i$，则$l_j < l_j < t_i$

它表明，若对最终产品征收的名义税率小于对中间产品征收的名义税率，即么关税对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率就低于其名义税率；

(4) 若$t_i = 0$，则$l_j < 0$

它表明，如果对最终产品的进口不征收关税，那么对中间产品征收任何数额的关税都会导致对最终产品负的有效保护。

实行关税制度，可以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国进口产品的冲击，但是，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而形成的对本国产业的实际保护程度如何就必须进一步研究一国的关税结构，从而计算出对国内竞争性产业的有效保护率，通过有效保护率来显示关税对国内产业的实际保护程度。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一国政府对某一产业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国内竞争性产业所获得的有效保护率随着对这一产业的投入品课征的关税率而定。由此，发达国家常常通过一方面对原料，半成品的进口征收很低关税或免税，另一方而对制成品进口征收较高关税的方法获得比名义税率高得多的对制成品的有效保护率，这种关税结构既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行业，又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盲目地扩大原材料的出口，减少制成品的出口，阻碍了工业制成品行业的扩大，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结构的进步和发展。

准确地计算出某一行业所获得的有效保护率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各种关于关税减让的谈判中，经常需涉及各国名义税率下的实际保护程度，从而，有效保护率的准确计算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形贸易（Visible Trade）　有形贸易又叫有形商品贸易（Visible Goods Trade），它是指具体的物质产品的贸易，它构成了国际贸易的主体。有形贸易包括初级产品贸易和制成品贸易两部分。

有票面金额股票（Par Value Stock）　即在票面上标明金额，表示投资者投入股份公司和作为获得股息的基础资本额。无票面金额股票（又称份额股），则以股份公司财产价值的一定比例为其划分标准。

有效需求原理（Principle of Effective Demand）　凯恩斯主义的中心理论。有效需求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社会总需求量。总供给价格是企业愿意雇用一定量工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需的价格，包括生产成本加预期的利润。总需求价格是企业预期社会为购买全部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凯恩斯在《通论》中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来说明有效需求的决定。总供给函数就是总供给价格和总就业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以Z代表总供给价格，N代表总就业量，则总供给函数可以写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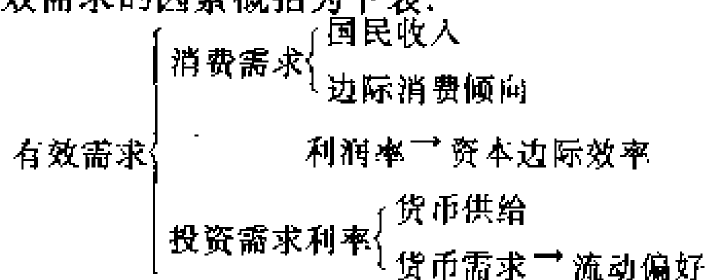
$$Z = \Phi(N)$$

总需求函数是总需求价格和总就业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以D代表总需求价格，则总需求函数可以写为：

$$D = f(N)$$

假定N为某一值时，D>Z，这时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生产有利可图，于是就增雇工人，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扩大，总供给价格上升，直到总就业量N使得Z=D时，企业既不增加工人也不减少工人，这时的需求就是有效需求，所以“D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称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了产量与就业水平。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存在正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凯恩斯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决定消费需求的是国民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在国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就决定了消费需求是不足的。投资需求取决于预期的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预期利润率是递减的。利率取决于货币的供给与

需求，货币供给量由中央银行决定，货币需求为流动偏好，即人们出于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保留一定量货币的喜好。由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的存在，利率的下降有一定的限度。这样，预期的利润率下降而利率不能无限下降，所以，投资需求也就不足了。正是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了有效需求是不足的，从而失业的存在就难以避免。可以把决定有效需求的因素概括为下表：



从以上可以看出：有效需求取决于：国民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这五个因素。在国民收入与货币供给既定时，就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有效需求原理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存在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要消除失业，就需要国家干预经济，以政府支出的增加来弥补私人消费与投资支出的不足。所以说，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中心。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 一种认为垄断组织的加强可以使资本主义变为有组织的，从而可以自行调节生产与流通，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在20世纪初期流行于德国。最初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德国经济学家R·利夫曼（R. Liefmann）和G.舒尔茨——格弗尼茨（G.schulze—Gaevernitz）。他们强调了垄断组织和中央银行调节生产和流通的作用。德国经济学家R.希法亭（R.Lilferding）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流通决定生产，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破坏了货币流通所引起的。在帝国主义阶段，工业企业规模巨大，劳动过程已经发展成为整个工业部门的社会化，而各个社会化了的工业部门又彼此互相联合了起来。同时，由于大银行的发展，信贷范围也大大扩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垄断组织联合成为一个"总卡特尔"，有意识地调整流通和生产，就可以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他还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技术革新，垄断组织在工业中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国际范围内的联合，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被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所代替。这一理论在第二国际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并成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有保证的增长率（Warranted rate of Growth） 又称"合意的增长率"，指长期中能使计划的储蓄与计划的投资保持相等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从而也是使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经济增长率。这是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R.Harrod）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并运用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实际是把凯恩斯关于短期中投资等于储蓄时国民收入均衡的思想扩大到长期，动态的增长问题中。有保证的增长率（G_w）取决于合意的储蓄率（S_d），以及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所以：

$$G_w = \frac{S_d}{C_r}$$

合意的储蓄率（S_d）代表了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之下，人们愿意保持的储蓄率，它决定了计划的储蓄；合意的资本一产量比率（C_r）代表了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之下，资本家愿意保持的资本—产量比率，它决定了计划的投资。合意的储蓄率与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之比就是有保证的增长率。当实际的储蓄率等于合意的储蓄率，即实际的储蓄等于计划的储蓄；而且，实际的资本-产量比率又等于合意的资本一产量比率。即实际的投资等于计划的投资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就是有保证的增长率。这是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

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 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凡勃伦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问世后，有闲阶级一词逐渐流行起来。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产生很早，是与私有制的产生相一致的。社会中有闲阶级作为一个永久性的阶层存在有两个条件，(1) 社会是掠夺性的社会，(2) 生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易得到。这样一部分人就可以脱离日常的劳动。有闲阶级的价值标准与劳动阶层是不一样的。有闲阶级以自己不劳动为荣。有闲阶级实际是财富和权力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占有企业，经营企业、追求商业利润。技术人员则操作机器，管理生产过程，但受制于资本家。应当对现代社会弊病负责的不是技术人员，而是资本家。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成为发展的阻碍。但是由现状过渡到合理社会的方法上，凡勃伦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是不同的，他认为这个过程遵循达尔文的进化论规律，因为技术人员的重要性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日益增大，他们不仅能联合对付资本家，而且也有必要这样做。假如技术人员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只要普遍怠工或总罢工，就足以使整个经济体系瘫痪，从而迫使企业资本家作出让步。虽然凡勃伦的理论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所坚持的也是进化的社会主义，但

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凡勃伦的晚年著作中表现了接近于用激烈的手段结束旧的社会体制的观点。在探讨人的解放问题上，凡勃伦与其他人类学家一样被迫也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对私有制以及对有闲阶级的分析将它向这一方向推动了一大步。

有效市场假设（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充分而又正确地表达出了与决定证券价格有关的全部信息，那么就说这个资本市场是有效的。或者，更正式一点，对于某个信息集合 φ，如果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证券价格并不受影响，那么就说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信息集合 φ 是有效的。更进一步说，对于某个信息集合 φ 是有效的，意味着以这个信息集合 φ 为基础进行交易以获取经济利润是不可能的。根据信息集合的三种不同类型，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程度的市场有效。(1) 有效市场假设的弱形式，这种弱形式宣称：价格充分反映了包含在历史价格序列中的全部信息。这样，投资者就不能在分析过去价格模式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投资策略以获取非正常利润。这种有效市场形式是同"随机走动假设"（Random walk Hypothesis）联系在一起的。(2) 有效市场假设的半强形式，这种形式宣称：现期证券价格不仅反映了历史上的价格信息，而且也反映了同该公司证券相关的全部公开的可利用的信息。此时，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试图通过对资产负债表、收益表、股息变动书或其他任何与公司有关的公开信息的分析来获取非正常的经济利润是不可能的。(3) 有效市场假设的强形式。这种形式宣称：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知道关于公司的全部信息，而这些信息又都是充分反映在市场价格之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那些拥有特许信息的人也不可能凭借这些特许信息来获得更优越的投资成果，在市场价格中，全部私人信息都已经完全揭示出来了。

在有效市场假设的弱形式下，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试图通过对过去的价格模式的分析来预测未来是没有用的，因为从这个分析中所得出的任何信息都已经全部包含在现期价格之中。假定市场参与者确信市场价格在下周将上涨1倍，价格就不会是逐渐地达到它的新的均衡值（即原来的2倍），实际上，除非价格的调整是非常迅速的，否则都将存在套利的机会，而在一个有效市场上，可以预料，这个套利机会马上就会被充分利用。萨缪尔逊曾经严格地证明了在信息流动没有阻碍并且不存在交易成本时，在投机市场上，明天的价格变动将只是反映明天的"消息"，并且不受今天的价格变动的影响。但是，"消息"是无法预测的，因此所引起的价格变动也必然是无法预测的是随机的。

"随机走动"术语通常广泛地用在财务文献之中，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价格序列的特征，在这个价格序列中，所有的后继价格变动都表示为是对先前价格的随机偏离。即价格的变动同前面价格的变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有效配置（Efficient allocation） 对资源配置进行效率分析，一直是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也是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人类的欲望，商品和劳务是通过生产和交换供给的，而这要受到资源的稀缺性和技术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意味着在资源和技术的双重约束下，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的欲望，帕累托最优表述了这种情况，帕累托最优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在给定的约束条件范围内，任何人都不能在不改变其他人的福利状况下使自己变得更好。

由于关于欲望、资源和技术的知识是分散的，效率状态就只能通过经济活动的协调来实现，在协调经济活动过程中，知识或信息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技术和资源的约束，搜集、处理和传播信息也需要付出成本，市场制度和价格就是为了使这些分散在各个经济单位中的信息互相交流，以实现经济行为的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效率不仅要考虑生产时的资源和技术约束，而且，也要考虑信息处理和传播的组织约束，在有效配置的经济分析中，正式考虑的只是对生产和交换的约束。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思想可以通过生产效率和竞争均衡来说明。资源的有效配置既指生产效率也指配置效率，生产效率是指：如果某个经济活动（生产活动）是可能实现的，并且在给定的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任何其他的能够提供更多数量的某种商品而不减少其他商品数量的生产活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就说这个生产活动是有效率的。这也可以用帕累托最优来描述（即视帕累托最优的一个特例）：如果对于在给定资源约束的可能的生产区域内的每一种满意商品，至少存在着一个对该商品不感厌足的消费者，那么增加任何满意商品的数量而不减少其他任何商品的数量，就能使某个非厌足消费者变得更好且不会使其他任何消费者变得更坏。而在考虑同时存在消费和生产决策的经济中，效率就不仅只与生产活动有关，而且，也与分配活动有关。在假定经济单位都是给定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时，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是在给定消费者约束（即禀赋）和生产者约束（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条件下的竞争性均衡。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宣称：在某个给定的环境中（包括生产者、消费者约束和市场条件等因素），该环境下的帕

累托最优集同该环境下的竞争性均衡集二者是同一的。此时资源的配置具有如下性质：(1) 对于每一个消费者 j，他所消费的商品束 X^{*j} 使他在预算集约束下其偏好最大化；(2) 对于每一个厂商 j，他此时所生产出的产品向量 y^{*j} 使他在生产集 Y^j 中达到利润最大化；(3) 对于每一种商品，此时的总消费并未超过全部厂商的净产出与原始禀赋之和即：

$$\sum_i X^{*i}-\sum_j y^{*j} < w=\sum_i w^i。$$

有规则经济 (Regular Economy) 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各个市场的商品之间、商品供给者之间，消费者之间等各种经济变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且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均衡。均衡理论为分析经济领域中各分支问题提供了统一的框架。可以这样认为，均衡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方法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作为均衡，人们自然是要了解其一般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保证均衡的存在，均衡的唯一性，从而为评价产生于不同政策措施的均衡提供依据。另外，均衡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任何个体都无法依据自身的力量去影响整体的状态，那么均衡是否存在理想的特质？例如福利问题，虽然均衡并没有建立在经济个体的福利基础上。但均衡中是否可以有这种特质呢？最后，均衡不仅仅是静态的，它也是个动态的。这一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过去都有过探讨，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存在着保证均衡存在的基本原则的，例如，均衡的福利特质就已被多数人所理解。但是，容易建立的经济例子是该经济存在无穷多个均衡，而建立某些条件以保证均衡的唯一性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均衡不是唯一的，比较静态分析也就失去了其根基，动态理论的发展也遇到严重的障碍。有规则经济的理论就是为解决一般均衡分析缺乏令人满意的唯一性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开创性的工作是由德布鲁完成的。他明确地考虑了均衡的多重性，但他要求每一种均衡在特定范围内 (Lolauy) 是唯一的。这样每一个均衡不会因为参数的微小变化而受到破坏，相反，只是随参数的微小变化而微小变化，均衡相对而言是健全的。有规则经济就是这样的经济，存在着有限数额的均衡，不是有无限多的均衡，所有的均衡都随参数的微小变化而连续地变化。当参数变化的一段时期内，每一种均衡都是可以被寻找到其踪迹，这样，在其特定范围内，比较静态分析就有了基础。如果在某一点，均衡不再是健全的，那么均衡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变化方向和程度都将难以预测。有规则均衡理论的核心更多的是关于健全均衡的连续的行为，较少的是关于其剧烈变化。德布鲁利用数学领域中概念和方法，如微分拓扑学，而将经济分析植入了新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经济学中的许多领域。

有限公司 (Limited Liabilty Company) 即有限责任公司。也称私公司 (Private Company) 或封闭式公司 (Closed Corporation)。有限公司以资本的结合作为基础，公司的全体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责任仅以自己的投资额为限，包括已交和应交但尚未交清的股金。其主要特征是：(1) 公司不公开发行股票；(2) 公司的股权凭证 (称股单) 一般不能任意转让；(3) 公司的财务不公开；(4) 公司的股东人数有最高限额的规定；(5) 公司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可以合二为一。

扣除方法 (Tax Deduction Method) 是国际双重课税的一种免除方法，它指的是居住国 (国籍国) 政府允许本国居民 (公民) 在计算应税所得和应税一般财产价值时将其已向非居住国政府缴纳的税额实行扣除，而只就进行这一扣除后的应税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进行课税，其计算公式为：

跨国纳税人居民应纳税额 = (其来自国内外的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已向非居住国政府缴纳的税额) × 居住国税率。

显然，这一方法所免除的只是纳税人向非居住国政府所缴纳税额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数额等于其国外税额与国内税率的乘积，而其余已向国外纳税的数额在这一方法下不被免除。

这一做法只是有限度地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同时也等于只是有限度地承认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优先地位，这是扣除方法与豁免方法最大的区别。由于这一区别，使得扣除方法更象是居住国政府给予跨国纳税人的一种额外恩惠而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这当然也就不能保证国际双重课税完全得以免除。也因此，扣除方法有时甚至不被看作是免除国际双重课税的方法。如两个范本中就没有列入这一方法。

托收 (Collection) 通常又称为银行托收。它是指债权人委托本地银行向国外债务人收款。在国际贸易中，它是指出口商根据发票金额开立的进口商为付款人的汇票，填写托收申请书，向出口地银行提出托收申请，委托出口地银行通过其在进口地的代理银行或往来银行，向进口商收取货款。在国际结算方式中，托收方式的使用仅次于信用证，已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目前调整国际托收结算方式的法律是国际商会于 1978 年制订的《托收统一规则》(Uniform Rules for Collection，又称 332 小册子)，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托收统一规则》为各国银行所普遍接

受。

依据《托收统一规则》，托收业务主要涉及4个基本当事人：

(1) 委托人（Consignor或principal），即委托银行办理托收业务的债权人，通常是出口商，或票据的收款人。

(2) 托收银行（Remitling bank），即接受托收人委托而代为收款的银行，通常为委托人所在地银行。

(3) 代收银行（Collecting bank），即接受托收银行委托代向付款人收款的付款人所在地银行。

(4) 付款人（Drawee）即代收银行提示单据和汇票的人，通常为进口商或票据主债务人。

托收业务的基本过程是：

(1) 委托人填写托收委托书，托收委托书的主要内容是委托的具体事项以及委托人和托收银行双方的责任范围，并支付托收费用，然后将托收委托书连同请求托收的单据交给托收银行，并取得托收回执作为收据。

(2) 托收银行接受委托收申请，向委托人开立托收回执，并向代收银行开立托收指示书，托收银行开立的托收指示书应与委托人开立的托收委托书内容一致，然后将托收指示书连同需托收的单据交给代收银行。

(3) 代收银行收到托收指示书和托收单据，则依照托收指示书中的指示将托收单据向单据的受票人进行提示，要求付款或付款赎单。

(4) 代收银行收到单据款项后，则将此笔款项拨交托收银行，通常是代收银行贷记托收银行帐户或授权托收银行借记代收银行帐户。

(5) 托收银行签发的委托人为收款人的支票。

在托收过程中，委托人和托收银行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托收委托书则是双方的代理合同，委托的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都需要依据托收委托书。托收银行和代收银行的关系也属于委托代理关系。托收银行与代收银行签发的托收指示书是双方的代理合同，通常它们之间已订有委托代理合同，代收行应按照托收行的指示及时向付款人作付款提示或承兑提示，如果遭到拒付，则应及时通知托收行。如果代收行未按托收行指示办事，则代收行需承担托收行所遭损失。代收银行与付款人之间都不存在合同关系或代理关系，代收银行只是作为委托人的间接代理人向付款人提示票据，进而收款。付款人的付款责任来自于付款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付债人如果拒付，只能由委托人出面对付款人进行追偿。

托收方式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托收的性质属于商业信用，而不是银行信用，无论是托收银行还是代收银行，其责任仅限于依照托收的代理合同及时向付款人进行提示和及时将情况通知委托人，对于付款人是否拒付不承担任何责任。委托人能否收回托收款项完全依靠委托人和付款人之间的信用，与银行无关。因此，使用托收方式，委托人在收取托收款项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托收业务中，托收委托书和托收单据是从债权人流向债务人，而托收款项则是从债务人流向债权人，两者流动方向相反，因此托收方式实属逆汇。

由于托收业务中，托收的单据可以分为资金单据和商业单据，其中资金单据是指支票、本票和汇票以及代表一定货币债权的息票、债券等，商业单据是指发票、提单，保险单等，因而，依据托收单据的不同，托收可以分为光票托收和跟单托收。在跟单托收下，又可分为付款交单和承兑交单，在付款交单下，又可分为即期付款交单和远期付款交单。

托收议付（Negotiation） 托收议付是指在托收结算方式中，托收银行向出口商提供资金融通。它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1) 押汇：押汇是指在跟单托收方式下，出口商以汇票和货运单据做抵押，请求银行给予贷款。银行根据出口商的信誉情况，向出口商垫付全部或部分货款，待进口商支付货款后，扣除货款数和利息数，将余额付给出口商。如果托收遭到拒付，托收银行有权索回贷款，否则，有权处理单据项下的货物。

(2) 买汇或贴现：这是指出口商将汇票和货运单据全部转让给托收银行，此时托收银行成为汇票的执票人，在转让时，如果银行以本币买入外币票据，则称为买汇；如果银行以本币贴进本币票据，内扣利息，则称为贴现。银行作为正当执票人，在汇票遭到拒付时，有权向出口商行使追索权。

出口商为了加速资金周转，扩大贸易业务量，采取跟单托收时，常常要依靠托收银行对其进行议付；而托收银行在对托收票款进行资金融通时，不仅要考虑出口商和进口商的资信情况，还需审查托收条件，商品性质，市场行情，甚至对方国家的外汇管理情况等，由于托收方式仅为商业信用，而非银行信用，银行对出口商议付需承担较大的风险，多数银行不愿承做对出口商的融资；或者在融资的同时，向出口商提出种种要求。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式（The Todaro Migration Model） 说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情况的理论模式。该模式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失业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旨在探讨怎样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就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劳动

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使得城乡生产有了明显的分工，促进了工业化，也促进了城市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以这种历史经验为蓝本，建立起了用以说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过程和经济发展情况的模式。但是，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反而持续增长。这种情况使得以往建立在充分就业假定之上的人口流动模式失去了它们的有效性。为此，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了新的理论。他指出，要建立一个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情况的人口流动理论，必须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这点出发，托达罗阐述了他的人口流动模式。托达罗模式认为，人口移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尽管城市中存在失业，移入城市的人们还是可以作出合理决策的。他们所依据的正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而不是实际收入的差距。其中一个基本前提是，迁移者可以考虑城市和农村各种劳动市场的就业机会，他们通过迁移选择那个能取得最大"预期"收入的工作。潜在的移居者首先要估计在城市找到一个与个人条件相称的职位时可能取得的实际收入；其次对找到这类职位的可能性作出主观判断；而后再把这项预期收入和他在农村地区所能获得的收入作一比较。只要未来的预期城市收入的现值看起来要大于未来的预期乡村收入的现值，人们就会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在托达罗的理论中，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他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始终是正值。对于城市部门，托达罗也将其划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凡是不在现代部门就业的劳动者都被假定在传统部门就业，并把这些在传统部门从事临时性的、低收入工作的以及完全处于闲置状态的劳动者都看作是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因而，托达罗模式中的就业概率仅指在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托达罗以若干数学公式说明劳动力迁移的模式。他依据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分别利用城市预期收入差异公式，就业概率公式等，说明了人口流动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通过设立城市部门劳动需求方程、城市劳动供给增长方程、均衡就业率方程、均衡失业率方程等数学推导，表明城市失业动态均衡的状况。归结起来，托达罗模式具有4点含义：(1) 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收益与成本后的合理经济考虑，其中经济上的因素起决定作用，但也包含心理因素的作用。(2) 劳动力迁移的决策取决于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工资差异，它包括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一是工资水平，二是就业概率。如果城市工资为农村工资的1倍，那么，只要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农村劳动力就会不断向城市流动。(3) 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往往和城市失业率成反比例关系。(4) 人口流动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条件下，情况必然如此。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高失业率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机会不平等的必然结果。托达罗认为，他的模式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还有着政策上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关于人口流动的政策涉及到工资、收入、农村发展和工业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战略，所以需要采取一揽子政策，包括：(1) 尽量减轻城乡经济机会不均等现象。否则，过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不仅引起许多城市中的社会经济问题，还会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2) 在创造城市就业机会的同时，需努力提高农村收入和增进农村就业机会。不然，当政府扶植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使该地区就业机会增加时，在农村居民的心目中就会增大找到城市职业的主观概率，移居人数随之上升，最终导致该地区更高水平的失业。(3) 不宜过分扩大教育事业，特别是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否则，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中的雇佣者必然会选择受教育多的人员就业，这就会加剧知识失业和教育过度。(4) 要适当控制工资补贴和政府的直接雇佣人员的数量。否则会扩大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助长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盲目性。(5) 要摆脱只重城市的偏见，转而注重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规划。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不断缩小，才能最终消除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托达罗模式合理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而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普遍赞扬。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受到一些批评。如有些学者对托达罗模式中关于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的假定，关于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必定在城市里寻找工作，如找不到现代部门的工作就宁愿留在城市传统部门做些临时工作或完全闲置着的假定，分别提出过异议。

托拉斯 (Trust) 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指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为了垄断某些商品的产销，以获取高额利润而组成的大垄断企业。托拉斯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企业组织，参加者在法律上和业务上完全丧失其独立性，而由托拉斯的董事会掌管所属全部企业的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原来的企业主成为托拉斯的股东，按照股权的多少分得利润。托拉斯有各种不同类型，主要是以金融控制为基础的托拉斯和以企业完全合并

为基础的托拉斯。前一种托拉斯的参加者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完全从属于总公司。总公司的权力是以拥有托拉斯的股票额为基础。这种总公司实质上是一种持股公司。托拉斯的大股东通过掌握足以对整个企业组织进行控制的股票额来实行金融控制，并占有利润的主要部分。后一种托拉斯是由同类企业合并组成，或者由强大的企业吞并实力较弱的同类企业而组成。这种类型的托拉斯的总公司是直接掌握产销的业务公司。托拉斯是比卡特尔和辛迪加更为稳定的垄断组织形式。独立企业的所有者或股份公司在加入托拉斯后，即丧失其原有的独立性而成为托拉斯的股东。每一参加者只有通过拥有大量股票来取得对托拉斯的控制权，也只有通过出售股票来退出托拉斯。在托拉斯内部，争夺股票控制权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托拉斯是资本积聚和生产集中高度发展的产物。美国是托拉斯最发达的国家，自从十九世纪末美孚石油公司成为第一个托拉斯组织以后，托拉斯在美国的发展极为迅速，在主要工业部门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据统计，1904 年 1 月，美国全国已有 445 个大型托拉斯，其中 7 个特大的工业托拉斯（包括石油、糖业、烟草、铜、海运和钢铁）并吞或支配了 1528 家企业。1901 年创立的美国钢铁公司吞并或支配了 700 多家企业，垄断了全国钢产量的 65%，当时即拥有 13.7 亿美元的资产，成为美国第一家"十亿美元公司"。美孚石油托拉斯几经改组，兼并或支配了 400 家企业，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控制着国内石油销售量的 84%和石油出口量的 90%。德国、英国和西欧其他一些国家，托拉斯的出现稍晚于美国，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托拉斯组织也有了迅速发展。

划线支票（Crossed Cheque）　划线支票通常是指在支票的左上角划上两道平行线，划线人可能是出票人、付款银行或代收银行。收款人收到划线支票，则这种只能通过银行代为收款人帐，而不能亲自到付款银行提取现款。这样，使用划线支票，是为了保障出票人和持票人的利益，一旦支票遗失或被窃，仍然可以通过银行代收的线索追回票款。

划线支票的平行线中间写明某些情况，如果仅写明不可流通（not negotiable）、入收款人帐户（account payee）等，没有写明某一具体银行，则此种划线支票称为一般划线支票，持票人可以委托任何银行代为收款人帐；如果划线支票的平行线中间注明了某一具体银行的名称，则此种划线支票称为特殊划线支票，持票人只能委托支票上注明的具体银行代为收款。

光票托收（Clean Bill Collection）　光票托收是指仅开立汇票和托收委托书一起交给银行代为收款，而不附带任何装运单据，对于附有非货运单据的债权凭证的托收通常也视为光票托收。因此，光票托收主要应用于单线的金融业务，托收凭证也主要是银行汇票、车票、支票、存单等。在国际贸易中光票托收使用较少，且只用于收取货款尾数和佣金等贸易从属费用的收取，而不用于货款的收付。

依据汇票的付款期限可将光票托收分为即期光票托收和远期光票托收，在即期汇票下，代收银行应在收到汇票后立即向付款人提示，要求付款人付款赎单。如果是远期汇票，则代收行在收到汇票后应先做承兑提示，而后在汇票到期后再作付款提示，要求付款赎单，如果付款人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代收行应在法定期限内作成拒绝证书，并及时请托收银行将拒付情况转递委托人，特别是在委托人仅是持票人，而非出票人时，拒付通知更为重要，如果代收行和托收行未能及时通知委托人，而使得委托人丧失追索权，所造成损失应由代收行和托收行负责。

光票信用证（Clean Credit）　与跟单信用证相对应。指仅凭光票付款的信用证，也包括除汇票外，随附非货运性单据，如发票、垫付清单等的信用证。

在国际贸易货款结算中通常不使用光票信用证，光票信用证主要使用于贸易从属费用和非贸易结算。其中银行同业间的偿付信用证（reembursement credit）和非商业性的旅行信用证属于光票信用证。

光船租赁（Demise Charter；　Bare Charter）　光船租赁是指船方将未配备船员的空船出租给租船人，由出租人经营海上运输业务的租船方式。在光船出租后，租船人对船舶拥有占有权，必须负担船舶一切管理和营运的费用与责任，光船租赁的租船人几乎全是船公司，它们有自有船舶，往往由于航运业务突然增加，而需租赁空船参加自有船队的营运。光船租赁方式不如定期租船或航程租船普遍。

传统农业（Traditional Agriculture）　发展中国家完全以世代相传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为基础的农业。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成为就业的主要部门，但却不一定是产值最大的部门。传统农业主要以小型的家庭农场为标志，其规模狭小；利用的资源量和产出量小；高度的自给自足；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是劳动和土地、很少利用从市场上购买的投入物；农场劳动力主要由家庭成员构成，仅发生某些季节性的雇工。从而，一方面由于家庭成员分担劳动任务与分享收入，使得传统农业中不存在公开失业；另一方面，由于传统部门劳动的机会成本很低，其工资通常低于现代部

门。贫穷是传统农业的最显著特点。贫穷的原因是资源限制与技术停滞。在传统农业中，劳动力通常是充裕的，一般在家庭农场分担工作。由于人口压力和使用权的分配不均，土地是极其稀缺的。此外，由于很低的内部储蓄及资本市场的缺陷，可利用的资本是很有限的。按照西方标准，农业技术与设备是原始的。技术落后与停滞的原因可归纳为：1.缺乏适当的替代技术；2.农民缺乏关于"较好的"技术知识；3.农民不情愿承担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和代价；4.其他市场不利条件给农民采用新技术所造成的障碍。技术停滞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和贫穷。所以，改变传统农业，首要的是把新的技术进步引入到生产体系中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并不是完完全全地显示出传统的特征，典型的情况是，传统的部门与现代的部门共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的比例大，而商品产值占的比例小；在现代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的比例小，商品产值占的比例却大得多。这正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现象。

传统国际金融市场（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经营居民与非居民间金融交易的国际金融市场。包括：(1) 国内投资者和外国筹集者间的交易，表现为资本输出，该交易既可通过银行信贷进行又可通过证券市场进行，为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业务；(2) 国内筹资者和外国投资者间的交易，亦可通过银行、证券市场进行。和新型国际金融市场相比，传统国际金融市场有如下特点：①因其业务以资本输出为主，故以市场所在国必须具有发达的经济和充分的资金供给为前提。所以该种市场多出现于经济发达国家，19世纪初首先产生于伦敦。一次大战后纽约、巴黎等亦成为传统国际金融市场；②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分离。70年代后已有所改变；③经营市场所在国货币；④经营受所在国政府管辖。

仲裁（Arbitration） 在国际贸易中，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调解无效，而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给双方同意的第三者进行裁决，这种还未提起诉讼就先裁决的现象就称为仲裁。

依据国际贸易的习惯作法，凡采用仲裁方式处理争议时，双方当事人必须订有仲裁协议。订立仲裁协议，可以在争议发生前订立，但也可以在争议发生以后订立。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法律依据，如果没有仲裁协议，任何仲裁机构均不受理。对于仲裁协议的内容，通常都包括仲裁机构，仲裁程序，仲裁地点，仲裁费用和仲裁的效力等。

仲裁机构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属于国际性或区域性的仲裁组织，例如国际商会仲裁院；第二类是全国性的仲裁组织，例如我国的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英国伦敦仲裁院，日本国际商事仲裁协会；第三类是专业性的仲裁机构，如伦敦油籽协会。

不同的仲裁机构都有着不同的仲裁程序和规则，但是，仲裁程序一般都是规定进行仲裁的具体做法，如仲裁申请，仲裁员的指定，仲裁的效力和仲裁费用的支付。买卖双方在决定仲裁机构时，也要考虑到不同的仲裁程序和规则对仲裁的结果会有不同影响的问题。

仲裁的裁决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若遇到一方当事人不执行仲裁的裁决，仲裁机构不能强制当事人执行裁决，但是当事人只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仲裁的费用通常是由败诉的一方负担。

伊利，理查德.西奥多（Richard Theodore Ely，1854—1943年）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里普利。187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赴德国留学，受业于历史学派的克尼斯。1881年起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892年转任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直至1922年退休，他还是创办美国经济学会的活跃分子。主要著作有《美国劳工运动》(1886年)、《经济学纲要》(1893年)和《财产和契约同财富分配的关系》(1914年)等。伊利的研究范围很广，对当时的美国经济学界影响相当大，其《经济学纲要》是各大学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对经济概念的定义和分类作了出色论述。他最初十分关注劳工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后来转向产业组织和财产权问题的研究，尤其重视个人分配的重要作用。他在晚年还为土地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他在一般经济理论方面的学术成就并不突出，同其当时所处的显赫的学术地位无疑是不相称的。

伊斯特林假设（Easterlin Hypothesis） 伊斯特林假定又叫集群规模假定，它说的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集群（由在某一年出生的人所组成）的经济与社会财富与它的相对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这个相对规模可由出生率来近似代替。高出生率与较低的经济社会财富效应是由三条主要的途径传导的，即家庭、学校、劳动力市场。这一传导机制可称之为"拥挤机制"。在实证研究上，这一假定的最重要应用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青年人的不同的经历。这一假定还使人们意识到在四、五十年里在当时及以后的美国人的经历中自发波动的可能性。关于伊斯特林的三条传导途径，有大量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列举部分内容。首先关于家庭，在研究精神健康的时候，有证据表明诸如好斗、破坏纪律这些坏行为与

较大的家庭规模（即家庭人口较多，兄弟姐妹较多）有很大的关联。其次关于学校，家庭机制隐含从整体上来说，较大的集群在学校里表现不够好。但是，即使不存在家庭机制的影响，较大的集群也会表现出不良的拥挤现象。事实上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整个学校在人力与财力上的资本存量（教师、校舍、仪器等）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是按一个相当稳定的速度增长。如果在某一年学生人数激增，就会发生每个学生所分配到的教师与设备不足，从而影响教学质量。由于上述两个传导途径，大的集群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就会缺乏良好的培训与准备，但是即使没有上述两个传导途径，大集群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会产生拥挤现象，因为其它生产要素的增长不大可能赶上劳动力的增加。除了上述三条传导途径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使伊斯特林假定成立。比如较大的集群会带来较大的精神上的压力，因为与较多的人竞争总是要更困难一些。需要提醒一下，这里所讨论的集群规模效应与人口学所通常定义的年龄分布效应并不一样。

伊斯兰开发银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t, IDB）　1974年8月12日成立，1975年10月20日正式营业，行址沙特阿拉伯吉达。它是由伊斯兰国家为主组成的旨在向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内的穆斯林社会提供无息贷款的国际金融机构，其目的是促进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截至1986年9月，该行已有44个成员国，法定资本20亿伊斯兰第纳尔（等值于特别提款权），分为20万股，由各成员国认缴，其中，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缴最多，这4国因而得以选派4名代表参加由10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余6名由理事会从其他成员国中选派。执委会负责银行日常业务，任期3年，接受理事会的最高领导，理事会由各国派财政部长作为理事组成，每年举行会议，决定银行重要政策和方针，并选举行长兼董事长，任期5年。

由于信奉古兰经教义，该行反对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这使该行形成了独特的管理经营方式，所提供的资金不收取利息；只靠适当收取管理费用维持运营。其业务主要是为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及其它发展项目以及进口生产物资等提供资金，也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会计平衡（Accounting Equilibrium or Balance）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自主性交易场上的借方总值等于贷方总值。这是一种从事后数字即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借贷双方的数字判断的国际收支平衡。自主性交易是个人或企业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或其它考虑进行的和国际收支调节无关的交易。一般商品、劳务交易和长期直接资本流动均被认定为自主性交易。调节性交易又称补偿性交易，凡基于国际收支的考虑为了弥补自主性交易上的差额而进行的交易皆属此列。官方的黄金、外汇储备公认为调节性交易。

合作均衡（Cooperative Equilibrium）　合作均衡概念是从博弈论中引进的，是指在合作博弈模型上应用合作解方法求解所形成的经济均衡态势。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影响是双向的，许多博弈论概念，如古诺—纳什（Cournot－Nash）均衡解，都是对早已存在的经济学思想规范化和形式化的结果。

试图建立反映某一经济代理人集团（如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如何相互联系的模型，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中合作法的基本特征。其典型的出发点是假设经济代理人中的任何亚群在原则上完全了解联合行动的概率分布图，并且假设其中成员可以在正式博弈开始前自由交流。很明显，抽象掉的因素是相当多的，正如一般建模技术一样，这种极其简单化的技术处理，有助于集中揭示实际或潜在合作的意义。冯・诺伊曼（Von Neuman）和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中强调指出：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是多人博弈区别于双人博弈的关键性特征。

早期取得的研究成果强调博弈前自由交流是合作理论的特征标志。大多数模型中也隐含另一共性假设，也就是假定合作参与者在协议达成后遵守协议的可能性，如果用概率来描述的话，趋近于1。这一假设目前也许不是合作理论的本质性前提条件，但是已成为决定该理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合作理论的研究有支配法和评价法两种基本方法。

1.支配法

假设存在N个经济代理人，每一经济代理人有一策略集S_i，记$S_1 \times \cdots \times S_N = S$，其中$S=(S_1, \cdots, S_N)$是S的一般元素。给定S和一合作$C \subset N$，表达式$S_C$表示对应于C中成员的策略。令$C'$为C的补集，那么表达式$S_C$、$S_{C'}$界定了C。对于每一i，存在一效用函数$U_i(S)$。如果$u=(u_1, u_2, \cdots, u_N)$是一N无效用集，那么象$u_c$或$(u_c, u_{c'})$这样的表达式就有确定的含义。

满足以下条件的策略集S就是均衡解：不存在能够支配效用矢量$u(S)=(u_1(S), \cdots, u_N(S))$的合作C；也就是不存在合作C，对于$u_i$，$i \in C$，使得$u_i > u_i(S)$成立。把C能够使其成员达到的效用水平记作V(c)，那么均衡概念的内涵就依存于V(C)的定义。V(c)通常采取以下几种定义：

〈1〉$V_s(C) = \{u_C | u_C < u_C(s_C', S_{C'}'), S_C' \in S_C\}$相应

的合作解就是古诺——纳什解的强形式；

〈2〉 $V_p(C)=\{u_C|$对于任一$S_{C'}$存在S_C，使得$u_C<u(S_C,S_{C'}')\}$；

(3)$V_2(C)=\{U_C|$存在S_C使得对任一$S_{C'}$，$u_C<u(S_C,S_{C'})$成立$\}$。

2.评价法

关于博弈和冲突的评价研究法目的在于建立每一博弈与考虑到所有相互冲突的要求并且在相互冲突的要求间进行了妥协的一个合理结果的联系。在博弈中，对于有效的C，要求用效用矢量集合$V_{(C)}$来标志，合理性的判定基准也采取合理化形式，因此评价法最好看作是仲裁者的输入而不是一种均衡的描述性理论。博弈的评价依赖于要求，也就是依赖于集合V(C)的构造，其中著名的夏普莱（Shapley）方法中采用的夏普莱值就是把每一博弈(N，V)与计算sh(N，V)相联系的规则，即

$$\sum_{i\in N} sh^i(N,V)=V(N)。$$

夏普莱值理论在经济学中所取得的最有趣的结果，就是证明了一个有很多交易者的经济体系最终将与瓦尔拉均衡状态相吻合。支配法也有类似的结论。

合适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 合适技术是发展经济学中技术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名词，常常与合适产品一词共同使用。意指适合于现有生产要素供给的技术类型。一般而言，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却相对贫乏，因此，劳动—资本比率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最适宜的产业，这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50年代和60年代的技术选择理论认为，古典的市场模型过于迷信静态的资源分配，然而，由于食物和其他消费品有效剩余量的制约，欠发达国家投资于生产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并不是最好的抉择，技术选择应促成更高的人均产出水平，使产品剩余更大。因此，欠发达国家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较为先进的技术，把它们带回国内并付诸实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产量的增长。不料随之而来的却是，欠发达国家中产量增长迅速与就业增长迟缓的并存。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市场扭曲的结果；有人认为在不同的国家，生产相同产品的同类企业的要素比例不同，发展中国家选择增加技术复杂性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极大的错误；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产量和就业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不同要素比例的两种方法或许总成本相同，但是，资本—劳动比率更高的方法或许能使产出水平更高，也可能导致就业增长的迟滞。选择这种方法的决策者们事实上忽略了技术连续性假定；相反，技术决定论者却忽略了经营规模的变化以及消费品之间存在的差别，错误地主张不要任何选择。二者都没有认识到技术的合适性基础问题。那么，"合适"的含义是什么呢？一种观点主张，技术选择的合适与否，关键取决于该技术类型能否有效地服务于欠发达国家的最主要经济目标，但对于该目标到底是最大增长率还是最大产量，抑或是增加就业，却存在明显分歧；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合适"意指竞争性市场作用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合适技术"一词的使用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在考虑到技术选择合适性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来促进生产专业化，这对欠发达国家是不适宜的，因为，跨国公司主要发展那些适合于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同时又倾向于在欠发达国家使用同样的原料。由此而引进的产品和技术对欠发达国家往往是不适用的。以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这种主张忽略了产量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减少市场扭曲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进而使企业自动选择合适技术，这同样忽略了技术和资本品之间相互作用的限制，技术革新的困难以及收入再分配面临的政治经济约束。另一方面，通过举借外债以实现自我发展的决策也有问题。因为债务的使用一般要通过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在市场上又占据着相对有利的位置。欠发达国家既不愿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没有能力保证就业的充分增长，同时还要尽可能增加产出。这样，其技术选择就陷入了两难抉择的境地。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技术合适性的基础显然是不一致的。

合理化卡特尔（Rationalization Cartel） 卡特尔是指有明确的文字协定或口头协定（又称秘密协定），以限制竞争、控制产量、增大利润为目的，独立企业之间的一种协调方式。由于卡特尔限制竞争，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分配不公，因此在发达国家，卡特尔一般被认为是违反公平交易原则及反垄断原则的，是违法的。合理化卡特尔则是一种有特殊目的的合法卡特尔，它以产业合理化为目的，一般经过行政批准而成立。通过合理化卡特尔可以清理显著的过剩生产能力（例如在衰退产业中），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这种卡特尔形态在日本较为盛行。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日本政府就着重在"战略产业"里进行强烈干预，甚至制定有关立法，推动合理化卡特尔的形成，以限制竞争、组织大量生产体制，推进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建立专业化协作体系。这一着棋，是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秘密之一。对合理化卡特尔的成立，反垄断法一般都有"适用除外"的专门规定。批准和指导合理化卡特尔是产业组织政策的重要内容。

合理原则（Resonableness Principle）　是进行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的指导原则之一，也是针对独立竞争原则的不完善而提出的，它要求以"经济合理性"为基础处理国际收入与费用的分配，这种"经济合理性"主要表现为税收中性原则，即要求税法不对任何合法经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包括不干预企业正当的税务筹划。不仅如此，还应维护税收的国际公平，避免国际双重课税对企业行为的歪曲。

合理原则是针对联属企业之间的有些内部交易在独立企业之间永远也不会发生因而也就使得独立竞争原则无法应用这一现象而提出的分配原则。由于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而可以看作是独立竞争原则的补充，但又由于它的标准过于笼统因而难于付诸实际。

合理利润划分安全地原则（Resonable–Profit–Split Safe Haven Principle）　是进行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的指导原则之一，也是针对独立竞争原则的不完善而提出的，它要求有关国家税务当局设立一个"安全地"，即一个允许活动的范围，只要跨国联属企业集团在分配内部利润时没有突破这一安全地就认可其符合独立竞争原则，不要求调整。

这一原则已被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采纳，作为独立竞争原则的有益补充。

合意的资本存量（Desired Capital Stock）　厂商在长期中愿意保持的最适度的资本存量，即在长期中能使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存量。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以资本边际产品的价值代表边际收益，以资本的租金成本（或称资本的使用者成本）代表边际成本，则合意的资本存量就是资本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资本租金成本时的资本存量。资本边际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产量水平（Y），所以，合意资本存量（K^*）、产量（Y）与资本租金成本（rc）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为：

$$K^* = g(rc, Y)$$

上式表明，合意资本存量取决于产量水平与资本租金成本，与产量同方向变动，与资本租金成本反方向变动。换言之，产量越高，资本租金成本越低，合意资本存量就越大；反之，亦反之。因为投资是在未来一定时期生产出产品，所以，决定合意资本存量的产量并不是现期产量，而是预期的未来产量，即预期的未来产量越高，则合意资本存量越大；反之，亦反之。预期的未来产量是现期产量与过去产量的加权平均数，所以，现期产量通过对预期未来产量的影响而影响合意资本存量。现期产量越高，预期的未来产量也越高，从而合意资本存量越大，反之，亦反之。资本的租金成本包括利息与折旧，其中利息最重要，因此，资本的租金成本就主要取决于利率。这里所说的利率指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利率成反方向变动，即实际利率越高，资本租金成本越高，合意资本存量也就越低；反之，亦反之。在影响合意资本存量的因素还有政策因素，即政府对资本所征收的各税收入的变动，税收增加会增加资本租金成本，减少合意资本存量，反之，亦反之。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影响产量的经济政策，影响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来影响合意资本存量。

华沙—牛津规则（Warsa—Oxford Rules）　华沙—牛津规则是国际法协会于 1932 年制订的对 C.I.F.买卖合同进行统一解释的规则。随着国际贸易及与此有关的交通运输和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C.I.F.价格这种贸易术语由于能够较好地划分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各国对 C.I.F.价格的解释存在着各种差异，这就影响了 C.I.F.买卖合同的顺利履行。华沙—牛津规则的制订就是为了对那些愿以 C.I.F.价格条件进行商品买卖但又缺乏标准合同格式或共同交易条件的买卖者提供一套可以在 C.I.F.买卖合同中依照使用的统一规则。该规则共包括 21 条条款，它详细具体地确认了买卖双方在 C.I.F.买卖合同中应履行的各种义务和享受的权利。买卖双方如果在谈判过程中确认采用此规则，那么它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将受此规则的约束，相反如果只是参考了此规则，并在它们签订的 C.I.F.买卖合同中对上述规则的某些条款作出了一定的修改，那么买卖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以合同为依据，不受该规则的约束。尽管该规则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作为国际上对 C.I.F.买卖合同的一般解释，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为各国商人广泛采用。

后定价格　又可称为非固定价格。后定价格是指买卖双方在合同中并不规定商品的具体成交价格，而只是在合同中规定确定商品价格的时间和作价方式，或者仅规定作价时间，不规定作价方式。后定价格是先订约后作价，其方法较为灵活，特别是在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或双方在订约时还未对价格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方便了成交。但是，在后定价格中仅规定作价的方式和时间，这不可避免地给合同带来较大的不稳定性，而影响合同的顺利执行。

名义汇率（Nominal Rate）　"真实汇率"的对称。未剔除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名义汇率不能反映两种货币的实际价值，它实际上就是外汇市场上人们买

卖外汇使用的汇率。

名义收入货币理论（Normal Income Monetary Theory）　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在1971年发表的《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一文中所提出的收入决定理论。这一理论区分了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与早期货币数量论和凯恩斯主义货币论的不同。早期货币数量论以充分就业为前提，假定产量不变，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是由于价格的变化引起的，凯恩斯主义货币论则认为价格水平不变，名义收入的变化是由于产量的变化引起的。名义收入货币理论则要说明货币量变化对价格和产量，即名义收入的影响。这一理论没有对短期中名义收入的变化在价格变化与产量变化之间的区分作出假定。名义收入是一种综合指标，包括了价格与产量，名义收入的变化既可以表现在产量，也可以表现在价格上。名义收入货币理论包括6个方程式。这个模型以封闭经济为前提，也不考虑政府的支出和收入以及随机冲击。这6个方程式是：

$$\frac{C}{P}=f\left(\frac{Y}{P},r\right) \qquad (1)$$

$$\frac{I}{P}=g(r) \qquad (2)$$

$$\frac{Y}{P}=\frac{C}{P}+\frac{I}{P}$$

$$\left(\text{或者：}\frac{S}{P}=\frac{Y}{P}-\frac{C}{P}=\frac{I}{P}\right) \qquad (3)$$

$$M^D=P\cdot l\left(\frac{Y}{P},r\right) \qquad (4)$$

$$M^s=h(r) \qquad (5)$$

$$M^D=M^s \qquad (6)$$

(1)—(3)式描述了储蓄与投资流量的调整，即实物经济均衡的条件。(4)—(6)式描述了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存量的调整，即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1)式是消费函数，说明实际消费$\left(C\text{为消费支出，}P\text{为价格水平，}\frac{C}{P}\text{为实际消费}\right)$取决于实际收入（Y为名义收入，$\frac{Y}{P}$为实际收入）和利率r。(2)式是投资函数，说明实际投资$\left(\frac{I}{P}\right)$取决于利率。(3)式是物品市场均衡的条件、实际收入等于实际消费加实际投资，或者实际储蓄$\left(\frac{S}{P}\right)$等于实际投资，即储蓄等于投资。(4)式是货币需求函数，也可写作$M_D/P=l\left(\frac{Y}{P},r\right)$,即实际货币需求取决于实际收入$\left(\frac{Y}{P}\right)$与利率。(5)式是货币供给函数，把利率作为一个变量，但可以把这一函数作为货币当局决定的外生变量。(6)式是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即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以上6个方程式中共有7个未知数，即C、I、Y、r、P、M^D、M^s，缺少一个方程式。因此，在这些未知数中有一个是在方程式之外决定的。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未知数是Y，Y是持久收入，故有：

$$\frac{Y}{P}=Y_0 \qquad (7)$$

将(1)，(2)和(7)代入(3)式可以得出：

$$Y_0-f(Y_0,r)=g(r) \qquad (8)$$

(8)式决定利率r，将r之值作为r_0代入(5)式，而得出

$$M^s=h(r_0) \qquad (9)$$

(9)决定货币供给量M^s，将M^s值作为M_0代入(4)式与(6)式，则得出：

$$P\cdot l\left(\frac{Y}{P},r\right)=M^s \qquad (10)$$

将已求出的Y_0、r_0及M_0代入(10)式，得出：

$$P\cdot l(Y_0,r_0)=M_0 \qquad (11)$$

以Y_0除(11)式，得出

$$P\cdot\frac{l(Y_0,r_0)}{Y_0}=\frac{M_0}{Y_0} \qquad (12)$$

由于

$$\frac{l(Y_0,r_0)}{Y_0}=\frac{1}{V} \qquad (13)$$

所以，

$$P\cdot\frac{1}{V}=\frac{M_0}{Y_0} \qquad (14)$$

或者

$$P=V\cdot\frac{M_0}{Y_0} \qquad (15)$$

也可以写为：

$$P=\frac{MV}{Y}. \qquad (16)$$

在(16)式中，如果y和v是既定的，p与M则成同比例变动，弗里德曼通过对美国货币史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货币流通速度在长期中是十分稳定的，持久收入也是稳定的，所以，货币数量论的结论在长期中是正确的。但在短期中货币量的变动既影响价格又影响产量，即影响名义收入。货币量的变动对名义收入的影响不是通过利率，而是通过相对价格。资产采取了货币，债券，股票，住宅，耐用消费品等多种形式。所以货币数量的增加，人们要更多地支出于其他资产形式，这就引起债券、股票等资产价格上升，利率下降，这就刺激了消费与投资，引起了产量增加与

物价上升，即名义收入增加。而在长期中，产量取决于实际因素，货币数量的增加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变化，这样，名义收入货币理论就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解释了货币量变动对产量和价格的影响，说明了货币量变动所引起的短期与长期变动及其调整过程。这一理论是货币主义学派其他理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

多部门增长模型（Multisector Grouth Model）　包括多个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这种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经济生产多种产品，每种产品与一个经济部门相关。这种模型则要探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稳定均衡增长问题，包括是否存在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途径（即是否存在稳定均衡增长的可能性），这种稳定均衡增长的途径是否是唯一的（即稳定均衡增长的唯一性），如何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增长率，等等。这种模型涉及到更复杂的因素，包括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产品与要素的相对价格等。这种模型是以一般均衡理论和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的，要运用数学模型来表达。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冯·纽曼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大道定理都是多部门增长模型。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Domar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一种关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需条件的模型，在本世纪4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E·Domar）所提出，这一模型与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一般把这两个模型合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第一、社会只生产一种既可用于消费又可用于投资的产品，即这种模型是一部门增长模型。第二、只有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而且，资本-劳动比率是固定不变的。第三、规模收益不变。第四，不存在技术进步。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G=\sigma \cdot S$$

在上式中，G为经济增长率，即国民收入增长率；S为储蓄率；σ为资本生产率，即投资效率，指每单位资本或投资的产出，以K代表资本，Y代表产量，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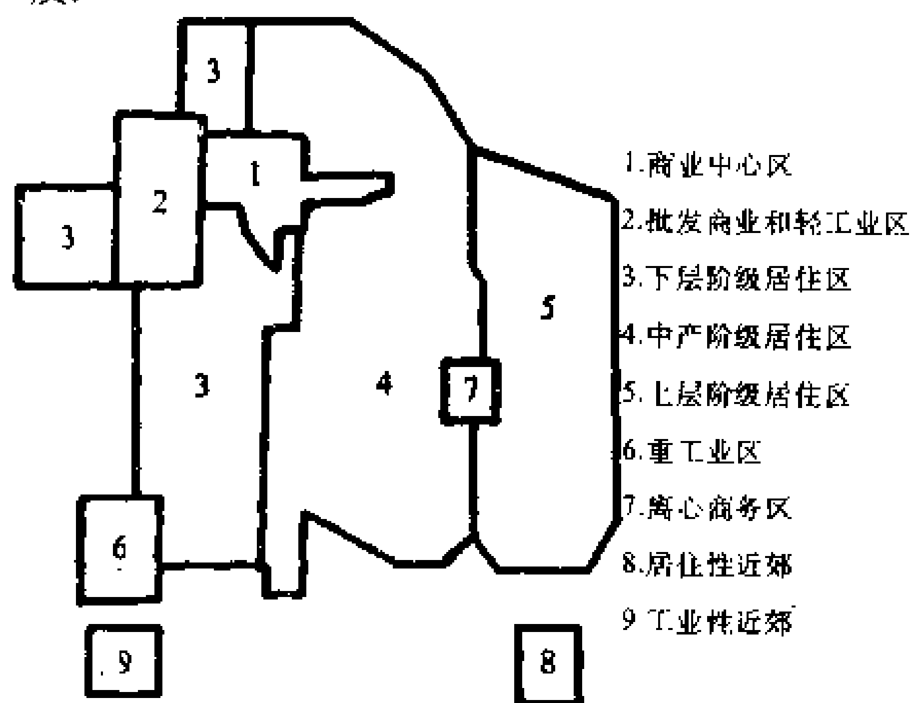
$$\sigma=\frac{Y}{K}$$

由此可见，σ就是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产量比率C的倒数。正因为如此，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与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与含义是相同的。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与哈罗德模型的差别在于，哈罗德模型强调了上一期收入水平变化对本期投资的影响，而多马模型强调了，当本期的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时，本期投资对下一期生产能力的影响。多马认为，投资具有两重性。投资通过乘数作用，扩大了收入和就业，这是投资增加总需求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投资又增加了新生产能力、扩大了总供给，从而还具有增加总供给的作用。凯恩斯强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多马指出，投资所增加的生产能力只有在下一时期中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资本家才愿意进一步投资。因此，下一期的总需求必须等于包括了新生产能力在内的总供给，经济才能实现长期稳定均衡发展。多马模型正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多头（Bulls）　在金融市场或期货市场上购进股票、债券或期货合约的人。这些人预期某种股票、债券或期货合约的价格会上涨，从而就进行购买，并希望在价格更高时卖出，以达到获利或套期保值的目的。在价格普遍上升时，多头也可以指金融市场或期货市场"看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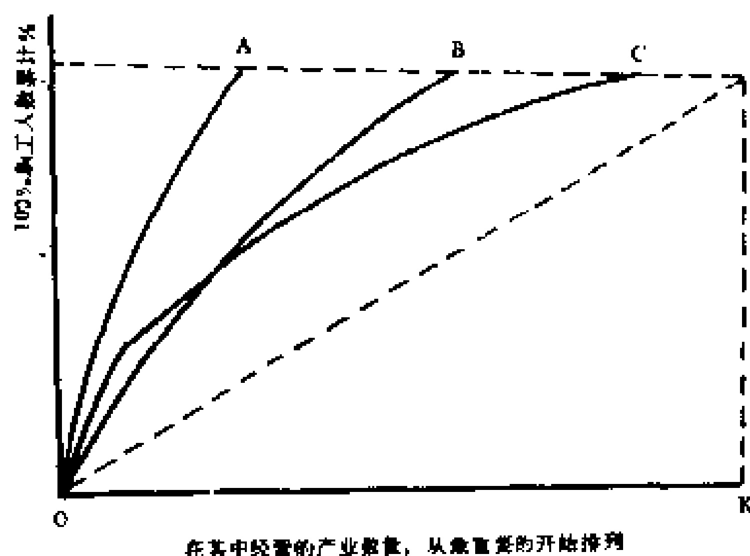
多中心城市　根据城市土地使用形式而划分的一种城市模式。由芝加哥大学地理学家哈里斯（C.D.Harris）和乌尔曼（E.L.Vilman）于1945年提出。他们认为以往的城市模式均有缺陷，其主要问题是整个城市被看成具有单一中心的整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城市有时具有两个以上的中心，或主中心外有副中心（被河流、铁路分割的城市，或城市扩大后新区的形成等），尤其是那些由几个小市镇扩展合并而成长起来的城市。其具体格局如图。多中心的概念并不排斥土地使用扇形模式或同心型城市的存在，城市内每个次中心都可以具有扇形或同心的性质。



多中心城市是在西方国家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城市地域结构进一步复杂化背景下提出的，比较准确地反映

了西方四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发展趋势。

多角化曲线（Diversification Curve） 多角化曲线是度量企业经营多角化程度的工具之一，它表示企业分布于所经营产业中的职工数量（或衡量企业规模的其它指标）的累计百分比与企业所经营的产业的累计数量之间的关系，产业按其重要性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排列，下图列出了A、B、C三个企业的多角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多角化曲线具有3个特征。首先曲线是下凹的，它反映了企业分配于各产业中的经营活动的相对不均等性，当企业把经营活动均等地分配于各产业中时，曲线取其极限状态，即为直线。其次，处于较高位置的曲线表明该企业的产业活动具有较高的集中程度或专业化程度。曲线越低，说明与之对应的企业的经营多角化程度越高。在图中，企业B、C的经营多角化程度高于A，因为对在其中经营的任何数量的产业，企业B、C在这些产业中从事其经营活动的比例较小。最后，当两条多角化曲线相交时，企业之间的多角化程度不存在一个确切的排列顺序。如图中，B、C两企业多角化程度的比较，不能仅依赖多角化曲线，还需通过其它指标进行。



多头套期保值（Long Hedging） 套期保值的一种。"空头套期保值"的对称。见"套期保值"。

多种汇率（Multiple Exchange Rate） "复汇率"的一种形式。一国货币对同种外国货币同时并存两种以上的汇率。外汇管制手段之一。一种汇率适用于某一类交易或仅适用于某种商品的交易。复杂的复汇率，汇率可多达几十种，高低相差数倍。例如，1981年罗马尼亚将汇率分为官方汇率、非贸易汇率、贸易汇率。其中又将进出口商品分类，每一类适用不同的汇率。多种汇率在制订、实施、管理中都有许多困难。

多边反避（逃）税措施（Multilateral Measure Against Tax Avoidence and Evasion） 指多个国家联合采取的防范跨国纳税人从事国际避（逃）税行为的措施。必须承认，这种多边合作进行国际避（逃）税的斗争远不如双边合作普遍，值得一提的只有欧共体内部的努力及北欧五国的公约。

欧共体于1975年2月10日通过了"关于共同体反对国际逃税和避税应采取的措施"的理事会决议，提出了加强成员国之间税务合作的迫切性。认为这种合作应包括：（1）无论有无请求都应交换有用的情报；（2）协调税收管理的立法和行政手段；（3）由一国代表另一国进行调查；（4）为一国税务官员在另一国的工作提供便利等。以此为基础，1975年7月提出了"欧共体税收行动方案"，进而1977年12月19日颁布了"关于成员国主管当局在直接税领域中提供相互援助的指令"，并要求各成员国在1979年1月1日以前将其国内立法进行调整以和这一指令的精神趋于一致。虽然这一指令没能如期实现，但其多边合作的思想和设计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能忽视。

在多边合作方面至今最为成功的要属北欧五国，这一点表现在他们（瑞典、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于1972年底签署并于1973年开始实行一项多边的有关在税收事务中进行相互援助的详细公约，又称"北欧公约"或"北欧协定"。这是目前仅有的对签字国有约束力的多边文件。它要求签字国按公约条款的详细规定进行多边反避（逃）税合作，比如要求进行交流的税收情报包括：法律文件，税务调查，提供纳税申报单及其它报表，税收的征课以及有关居民所得的大量情报（如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工资、薪金、养老金、终身年金等等）。另外，又比如，北欧公约还要求，一个国家在应属于另一个国家的税款的征收上应对后者的征收工作给予援助，即使这种税只在后者国内征收，而据前者国内税法并不开征，前者也应提供援助，等等。显然，北欧公约的内容已超出了单单进行税收情报交换的范围而进入了更广阔的税务多边合作领域。

多边贸易（Multifateral Trade） 多边贸易有两种理解。（1）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为求相互之间的贸易收支在整体上获得平衡，通过有关协议在相互结算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贸易，又叫多角贸易。多边贸易以多边支付为条件，通过相互调节，实现贸易的基本平衡。（2）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追求平衡的大前提下开展的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往来，它不是追求个别平衡，而是追求整体平衡，它要求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外汇管制，减少贸易壁垒，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买入汇率（Buying Rate）　又称"买入价"，"卖出汇率"的对称。外汇银行从同业或客户买入外汇时使用的汇率。买入是从外汇银行的角度说的。采用直接标价时，外币折合本币数较少的汇率为买入价；采用间接标价时，本国折合外币较多的汇率为买入价。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一般为1—5‰，为外汇银行的利润。银行同业间买卖外汇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又称同业买卖汇率，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同业买卖外汇的差价比银行同客户的买卖差价小。

买方集中度（Buyer Concentration Degree）　买方集中指的是特定市场上买方企业数以及企业的相对规模分布，反映买方集中程度的指标称为买方集中度。买方集中度测量的是商品购进额集中度。由于同一产品的买方往往分属于不同的产业，而不同产业的差别很大，所以买方集中度的实际测量具有很大的难度。例如，买方分属4个产业，当4个产业都是高度垄断的，买方集中度必然较高；当4个产业都是分散的，买方集中度必然较低，当4个产业中有些产业是高度垄断的，有些产业是分散的，买方集中度就既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尽管美国产业经济学家贝恩早在50年代就已指出分析买方集中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直到70年代以前，关于买方集中度的测量方法的研究一直进展甚微。直到美国经济学家布鲁克斯和鲁斯特卡特分别在1973年和1975年完成了他们有关买方集中度的开创性工作后，买方集中度的测量问题才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现有的关于买方集中度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投资品和中间品产业。这些产业的买方，购买一般是为了加工，生产后再销售。因此，根据投入产出表和已知的卖方集中度就可以计算产业的买方集中度。假定BC_i为i产业产品买方集中度，W_{ij}为j产业购买的i产业产品占i产业产品总销售量的比重，BC_{ij}为i产业购买i产业产品的买方集中度，C_{ij}为j产业购买j产业产品的企业的卖方集中度。由于C_{ij}容易测量，因此，根据C_{ij}以及由技术函数决定的j产业购买i产业产品的各企业使用i产业产品后的投入产出比，可以计算出BC_{ij}。这样，BC_i可通过下式测定：

$$BC_i=\sum BC_{ij}\cdot W_{ij}$$

如果简单地假定i产业内各企业的投入产出比相同，则有：

$$BC_{ij}=C_{ij}$$

在此条件下：

$$BC_i=\sum_j BC_{ij}\cdot W_{ij}=\sum_j C_{ij}\cdot W_{ij}$$

伦敦学派（The London School）　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一个竭力维护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流派，因其主要人物均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而得名。它的领袖人物为爱德·坎南，其他有罗宾斯、哈耶克等人。面对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危机，他们继续鼓吹资本主义经济能自行调节的陈腐信条，坚决否认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并先后用工会不合理地坚持高工资要求，资本短缺或投资过多等原因来解释严重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出现。伦敦学派独树一帜，完全是为了反对迅速发展着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充当着西方经济学界的"保守派"角色，其本身并无完整的学说体系和许多独特的理论内容，因而在凯恩斯革命发生之后，它已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不过，伦敦学派早在30年代初就意识到国家的调节措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更趋深刻复杂，并认定这种干预必然无效，这却是已为以后现实所证实的较正确的看法。

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个倡导"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的学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弗·奈特、亨利·西蒙斯和雅·瓦伊纳等，因他们均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而得此名。该学派十分注重因袭19世纪传统经济学庸俗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宣扬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均衡的自然趋势。因此，他们反对那些旨在干预市场机制的政策措施，认为这不仅有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可能加剧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局面。芝加哥学派上述基本思想通过奈特等人的授课、讲演和个别指导，形成一种所谓的"口头传统"，始终对芝加哥大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二次大战后，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施蒂格勒为代表的、出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些著名学者，承袭上述的传统思想，并结合战后的新情况、新特点提出了理论学说，形成一个现代的芝加哥学派。可见，在凯恩斯主义煊赫盛行的年代，首先敢于提出挑战并逐渐形成一个与之相抗衡的货币学派都来自芝加哥大学，决不是偶然的。

西尼尔，纳骚·威廉（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年）　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英国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181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并在1825到1830年期间任该校首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亦是英国第一个经济学教授。此后担任过各种英国皇家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制定《济贫法修正案》，还反对工会和工厂立法，1847年又重返牛津大学担任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年）、《论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政治经济学的四次导论性讲演》（1852年）

等。

作为李嘉图与约·穆勒之间最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对纯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被认为是"纯粹经济学"或称"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之一。他坚持政治经济学是"财富科学"，强调研究范围"应当以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为限"，反对掺入制度、人类福利、道德等因素的研究内容，主张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与方策严加区别，宣扬经济学家只发挥纯学术的科学作用，不应涉足社会经济方案和有关对策的制定和讨论。为此，他进一步概括出纯粹经济学的四个基本命题或称四原则：(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2)由于人类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者各阶级担心财富不足以适应其需求，都会限制人口的增殖。(3)劳动能力借助于资本可以无限制地增加。(4)在农业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对土地投入追加的劳动，一般会产生比例递减的报酬。西尼尔认为它们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纯粹经济理论就是从中演绎出来的。这里已初步区分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并将前者看作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标志。

西尼尔还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论。他认为一项财富要具有价值，必须具备"效用、可转移性和供给有定限"这三个特质或要素。这里的"效用"只是人们的主观感觉和评价，商品的供给减少，就会使其效用成比例地增加，因而他认为商品的供给有定限(即后来叫做"稀缺性")是价值形成的基础。这种用主观心理来说明价值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做法，被后人看作开了主观价值论的先河。西尼尔又进一步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需求和供给，而前者由效用所决定，后者是稀缺性的原因。他又分析了限制商品供给在于生产成本的高低，即生产所必要的劳动和节欲为多少。可见他的价值论实际上综合了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并具有一定的边际效用论成分。这就大致形成了马歇尔均衡价格论的雏形。

西尼尔最著名的理论是庸俗的节欲论。他认为，节欲是人类的一种自我节制行为，它代替资本成为生产三要素之一，因为资本常常是所有三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产物，而使用"节欲"一词可以同其他两种要素严格区分开。他把节欲和劳动都看作是一种牺牲，劳动是工人放弃自己的安逸和休息所作的牺牲，其报酬即为工资，节欲是资本家对个人消费及其所体现的眼前享受和满足的牺牲，因而相应地取得了利润这种报酬。西尼尔尽力赞美资本家的节欲行为，推崇这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并吹嘘它给社会带来了分工和使用生产工具的重大利益，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这种理论完全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为剥削行为大唱赞歌，是十分典型的辩护论调。

此外，在反对工人阶级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时，西尼尔又提出"最后一小时"的说法，声称工人在11小时半的工作日中，只是在10小时以后的劳动才开始创造"毛利润"，最后一小时生产出"纯利润"。因此，推行10小时工作日将使资本家无利可图，工厂必然会倒闭。显然，"最后一小时"论同他的"节欲论"相悖逆，即仍然承认利润来自劳动，从而直接反对着利润来源于节欲的著名论点。

西蒙斯，亨利·卡尔弗特（Henry Calvert Simons，1899—1946年） 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其学术生涯基本上同芝加哥大学相联系，曾长期在该校执教。主要著作有《个人所得税制》(1938年)和《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1948年)等。西蒙斯大力宣扬和坚决维护芝加哥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鼓吹通过"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即发挥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来实现经济均衡和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他又指出，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要辅以适当的政府干预来维持。具体地说，政府干预要依靠法制而不是行政力量，旨在维持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竞争环境，但不应干预相对价格水平、工资以及生产与投资的决策。同时，应当重视平等问题，并把它作为社会目标加以实现。为此，他强调税制(首先是所得税)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推行累进税有助于减少社会的不平等。他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税收理论，如界说"关税收入"的含义，用消费总额加上净资产价值之变动来计算课税收入，强调短期的收入分配常导致不公平和无效率等，对战后的财政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意义。西蒙斯还对工会力量持敌视的态度，认为它是自由竞争社会的主要威胁，主张政府对这股"垄断"力量的增长要加以限制。由于西蒙斯的重要学术观点散见于他的一些论文和未经发表的遗稿，据说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在其死后才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尔（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de de sismondi，1773—1842年）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始人。出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生长在瑞士的法语民族住区。曾在巴黎上大学，因父亲破产而中途辍学，到里昂一家银行当职员。法国大革命后，回到日内瓦，后又举家迁居英国和意大利。1800年重返日内瓦后，除一度从事政治活动外，一直潜心研究和著述，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西斯蒙第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此外还有《论商业财富》(1803

年）和《政治经济学研究》（1837—1838年）。

西斯蒙第在经济学史上是个一身而二任的人物。他有力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害，指明其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进而怀疑政治经济学自身和要求作进一步的分析，来结束法国古典经济学的。这是他最重要的科学功绩，但是，他用伤感的批判代替科学的分析，试图将小生产理想化的经济模式来代替资本主义现实，这种经济浪漫主义完全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既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又要消灭其弊害的幻想。他的《新原理》一书就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来阐述一切经济问题的。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追求财富的增加和积累，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财富的享受，而资本主义不公平分配是一切贫困和弊害的根源；因此收入的分配问题应成为研究的中心问题。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他把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分解为工资与利润两个相对立的部分。他指出，由于机器的使用，资本的集中和资本家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工资已日益低于工人应得的份额，而利润是对工人阶级的掠夺，因为它是他们创造的额外价值。他进一步认为，这种掠夺导致了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而自由竞争又加速了这个过程。所以他对经济自由主义持反对的态度，公开同古典经济学这个传统决裂。

经济危机理论是其经济学说的归结。他较充分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如机器排挤工人，无产阶级贫困化，小生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生产无政府状态等。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工人只能靠工资进行消费，而资本家和地主却不会消费掉全部剩余价值，何况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必然扩大生产和尽量降低工资，于是消费势必日益落后于生产，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指明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是西斯蒙第的重大功绩，但用消费不足论却说明不了其产生的真正原因。

西斯蒙第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矛盾和弊端，主要是当权者遵循错误的理论和政策所造成的。所以他寄希望于立法者，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用一整套法律行政措施来普遍提高人们的物质利益，如限制竞争，限制劳动日，实行劳动保险等。工农业中的小生产是他向往的理想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应当仿效宗法和行会的原则，并用来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如把资本家的企业和农场分解为众多的小作坊和小农场，使社会各阶级都当"私有者"。这种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规范所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说明西斯蒙第的学说体系必然是反动而又空想的。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年）古希腊著名的奴隶主阶级思想家。出生于雅典富人家庭，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拥护斯巴达贵族寡头政治，反对雅典民主政治，因而曾长期流亡国外。他的著述很多，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前书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经济著作，并最先使用"经济"一词来概括对于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经济"在古希腊的原意是家政管理，因为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的。后者主要涉及国家财政问题，其中提出了较深刻的货币思想。

色诺芬拥护奴隶主自然经济，认为奴隶主的经济任务就在于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促使其财富增加。他已知道物品有使用与交换的两种功能，例如，笛子对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不会吹它的人来说，只有在卖掉它时才成为财富。所以，奴隶主是为了得到更多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他重视农业而鄙视手工业，认为"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手工业则是外邦人或奴隶从事的"粗俗的技艺"。他还对社会分工问题作出了有意义的论述，认为劳动分工是必要的，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还认识到分工的规模依赖于市场范围，如小市镇的分工就不及大城市发达。色诺芬对商品交换和货币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意识到商品的供求变动会影响价格发生波动，而商品价格波动又会导致社会劳动重新分配。他对白银作为货币的职能有着较深刻的认识，认为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拥有的白银越多越好，因为它随时可以购买有用物品，一旦太多还可储藏起来。可以看出，色诺芬的经济思想都是立足在维护奴隶主自然经济这个基础上的。

达文波特，赫伯特·约瑟夫（Herbert Joseph Davenport，1861—1931年）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的佛蒙特州。189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教授过经济学。1908—1916年任密苏里大学教授，1916年又转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直至1929年退休。主要著作有《经济理论概要》（1896年），《价值与分配》（1908年），《企业经济家》（1913年）等。达文波特的学术探讨主要集中于企业家行为及其同总体经济利益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上，认为个人追逐私利的经济活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但超越该范围则会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他力图建立一个以价格为基础而排除心理因素的经济理论，反对边际效用论那些立足于心理分析的流行概念，主张应用货币直接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关于"机会成本"概念的明确阐发，则是达文波特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他看来，生产一种商品的真正成本并不是用于生产该商品的各种绝对的费用，而是这些生产资源因此无法用于其他用途所产生的牺牲。这种牺牲就叫"机会成本"。所以，按企业家的眼光，商品的生产成

本实际上与把他的学识、能力和资本用于第二个最有利用途所得的收入没有区别。达文波特强调，这种把边际效用归结为相对的边际牺牲的做法，同传统的生产费用说毫无共同之处，却是一种真正解决价值问题的全新方法。

休谟，大卫（David Hume，1711—1776年） 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生于英格兰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734年开始研究哲学，并出版多部著作。1763—1769年曾任英国外交官和副国务大臣。此后回爱丁堡隐居。休谟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代表人物，其经济学说主要见之于《政治论从》（1752年）一书中的7篇经济论文。从人性论出发，他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私有制都归结为人类"自私""贪欲"本性的结果，主张对不妨碍公益的追逐私利活动不必加以限制。他第一个对货币数量说作了系统完整的论述，明确指出一国的物价水平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货币量过多会抬高商品的价格，并导致对外贸易逆差。他还赞同马西关于利息与利润相互促进的观点，论证了利息率与利润率大体上同方向变化。但他又反对马西关于利润决定利息的观点，断言两者没有因果关系，低利润和低利率都是一国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应当说，休谟认识到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并对利润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在经济学史上是个功绩。

考茨基，卡尔（Karl Kautsky，1854—1938年）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83年起长期任党的机关刊物的主编。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过一定作用。后还担负起编辑出版马克思遗稿《剩余价值理论》的任务。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逆流出现后，一直持妥协的"中派"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成为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凶恶敌人。191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参与了镇压德国无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1924年后主要从事著述活动，"超帝国主义"论是考茨基的著名学说，集中反映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在论述帝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他对帝国主义下了错误的定义，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政策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是一个特殊阶段，从而将它同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因此，他主张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能够实行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即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互相斗争。这种"超帝国主义论"完全歪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起着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斗志，挽救资本主义的反动作用。考茨基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已无必要，而应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民主制，因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其他条件的成熟，资本主义可以自然过渡到社会主义。据此，他进一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诋毁苏联十月革命，鼓吹用"议会共和国"取而代之，直接堕落成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公开敌人。

场外交易市场（Over-the-Counter Market） 又称柜台交易或店头交易市场。它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进行证券买卖的市场。在场外交易的证券，主要是一些未上市的证券，其价格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直接磋商决定。

汤普逊，威廉（William Thompson，1785-1833）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出生于爱尔兰富裕地主家庭，曾在都柏林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一生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是最重要的欧文主义者。主要著作是《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他建立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它是边沁功利主义、李嘉图经济学和欧文主义的混合物。分配理论是其学说的核心。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他尖锐地强调和谴责了工资和利润的根本对立，认为利润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但他又用伦理观点来看待分配的公平问题，主张用他的"保障"制度确保全部劳动产品能归劳动者所有，恢复"正义"的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由此汤普逊进一步宣扬欧文合作社形式的空想共产主义，认为该理想社会是人们自愿参加的，而成员个人间则完全实行平均分配，从而是使其保障制度得以实施的保证。

汤因比，阿诺德（Arnold Toynbee，1952—1883） 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英国伦敦。187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并开始在该校任教，31岁时便早逝。汤因比是有名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积极从事鼓动宣传和实际改革工作。他能在经济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则在于他对英国产业革命史有杰出的研究，并使"产业革命"一词得以广泛流传。他的研究信奉历史归纳法，直接反对演绎法，故有"英国历史学派学者"的说法。

廷伯根—帕恩斯方法（Tinbergen—Parnes Method） 见"人力计划理论"。

七　画

赤字财政政策（Deficit Financing Policy）　通过财政赤字来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这样，就必然引起财政赤字。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政策不仅仅是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而更重要的是为实现充分就业服务。在萧条时期，只有通过赤字支出才能刺激经济，因此，应该放弃财政收支平衡的旧信条，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这种赤字财政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为，第一，债务人是国家，债权人是公众。国家与公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国家欠公众的债务，也就是自己欠自己的债务。第二，政府的政权是稳定的，这就保证了债务的偿还是有保证的，不会引起信用危机。第三，债务用于刺激经济，增加国民收入，这样，最终会增加政府税收，使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弥补赤字。这就是所谓的“公债哲学”。赤字财政政策通常的作法是由财政部把公债出售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把款项转入财政部帐户，财政部即可用于各种支出。中央银行所购买的政府债券既可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金，也可到金融市场上出售。各国赤字财政政策的采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以美国为例，在30年代是严重萧条的局面迫使政府不得不采用赤字财政政策。50年代奉行“补偿性财政政策”，以求得长期财政预算平衡，并没有长期依靠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60年代后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打破了害怕赤字的框框，开始用长期大规模的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这种作的结果一方面的确促进了经济的较迅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使财政赤字大大增加，通货膨胀加剧，以致导致了70年代初的“滞胀”。许多经济学家对这种赤字财政政策也表示怀疑，甚至反对，里根政府与布什政府也曾想实现预算平衡，但由于多年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实际上任何一届政府也无法实现预算平衡。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宏观是希腊文“uakpo”的意译，原意是“宏大”。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它所涉及的都是整体经济的问题，故又称“总量经济学”或“总体经济学”。

形成与发展　自从经济学产生起，经济学家就把整体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等人都研究了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等宏观问题，并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受重视的观点。本世纪初以来，各国经济学家又对经济周期、国民收入统计、利率等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前，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于30年代，其产生的标志是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了《通论》。从那时以来，宏观经济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40年代，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形成时期。凯恩斯的《通论》是宏观经济学的“大宪章”，它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1) 把国民收入的决定作为中心；(2) 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国民收入的决定；(3) 以总需求分析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4) 通过利率把货币与实物经济联系在一起；(5) 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第二阶段是50—60年代，这是宏观经济学发展、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完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全面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使之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理论严谨的经济学分支，并在经济政策实践中得到了运用。第三阶段是70年代之后，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各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并存、争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仍然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但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传播，并足以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相抗衡。货币主义把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作为影响经济的中心变量，建立了以现代货币数量论和名义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理性预期学派以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这两个假设为前提来重新建立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新凯恩斯主义则运用非均衡分析方法力图从微观经济分析出发来建立宏观经济学。这些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还不足以取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对经济理论和政策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后各种宏观经济学将会继续并存、发展，并争论下去。

基本内容　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第一，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这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中

心。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包括三个模型：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以及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第二，消费函数理论。包括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相对收入假说、以及持久收入假说。第三，投资理论。包括分析决定投资的各种因素的理论。第四，货币理论。包括各流派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以及对货币需求与供给的经验分析研究。第五，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包括各派对失业与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以及各种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第六，经济周期理论。包括各派对经济周期原因与规律的分析。第七，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定量分析。第八，开放经济理论。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交往对一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国际收支调节。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第一，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均衡的确定与协调。第二、经济政策工具。包括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供给管理的人力政策、收入政策以及其他政策。第三，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第四，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包括各种政策的作用分析，以及协调地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规律。各学派有不同的政策主张，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包括它们对经济政策的不同解释与争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包括根据各派理论所建立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理论验证、经济预测、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应检验。以上三部分共同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运用与影响　现代宏观经济学是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服务的。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引起了各种问题，这正是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70年代之后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政策自由化"的原因所在。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Objective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宏观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变量。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变量包括四项。第一，充分就业，即存在自然失业而消除了需求不足失业时的就业状态。第二，物价稳定，即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如存在爬行的通货膨胀。第三，经济增长，即一个社会资源与技术进步所允许的适度增长率。第四，国际收支平衡，即既无国际收支赤字，又无国际收支盈余。这四个目标变量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之间，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采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而引起通货膨胀；要实现物价稳定必须采用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难免出现失业。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有一致的一面，即迅速增长的经济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充分就业，但也存在不一致的一面，即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会引起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产生技术性失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也有矛盾，因为充分就业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会引起进口增加，不利于国际收支均衡。在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也都有矛盾。这样，决策者就面临着如何确定适当的政策目标变量问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确定政策目标变量时，是要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这一目标可以表述为：

$$L = a_1(U-U^*)^2 + a_2(P-P^*)^2 + a_3(Y-Y^*)^2$$

上式仅考虑国内的三个目标变量。U、P、Y分别为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变量；U^*、P^*、Y^*分别为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目标水平。a_1、a_2、a_3分别是不同目标的加权数，即在社会福利中的重要程度，L为目标变量与目标水平背离所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变量时就是要使社会福利损失达到最小。在实际确定目标变量时一般要兼顾各个目标，使之都达到较为理想的水平，以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但各经济学派对不同政策变量重要性的看法并不相同（即对a_1、a_2、a_3加权数大小的估计不同），例如，凯恩斯主义较为重视实现充分就业，而货币主义则较为重视物价稳定。在实际上，各国也要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在兼顾各个目标的情况下，确定政策目标重点。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正确选择目标变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这一基础上才能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并采用一定的经济政策。

附加险（Additional Risk）　附加险是投保人不能单独投保的保险险别，它的承保范围是外来风险和损失，需要在投保主险的基础上另付加保，是主险范围的扩大和补充。投保人可以根据需要，加保一种或几种附加险。由于外来原因的风险和损失分为一般外来原因和特殊外来原因的风险和损失，附加险通常分为一般附加险和特殊附加险两类。

一般附加险的种类基本包括：偷窃、提货不着险(theft，pilferage and non—deliveuy)；淡水雨淋险(fresh water demage)，（淡水雨淋险着意于扩展平安险和水渍险仅对海水损失负赔偿责任的范围）；短量险（risk of shortage）；混杂、沾污险（rish of inemixture and contanination）；渗漏险（risk of

leakage)；碰损破碎险（risk of clash and breakage)；串味险（risk of odowr)；受潮受热险(damage cansed by sweating and heating)；钩损险(hook damage)和锈损险（risk of rust)。

特殊附加险的种类基本包括：

(1) 交货不到险（failure to delivevy)，交货不到险是指由于政治、军事等因素造成被保险货物从装上船开始，满6个月仍不能运到原定目的地交货，通常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办理委付手续，则保险人按全损赔偿。

(2) 进口关税险（impoit duty risk)，这是针对某些国家不论货物是否完好，均按完好价值予以征税的情况设置的特别附加险。

(3) 舱面险（on deck risk)，舱面险是针对某些具有体积特大、易燃易爆等特点，而需装载于船舱舱面上的货物设置的附加险别，通常是在投保平安险基础上加保舱面险。

(4) 拒收险（rejection risk)，主要承保货物在进口港由于各种原因被进口国有关部门拒绝进口或没收产生的损失。

(5) 海运战争险（ocean marine cargo war risk)，战争险是承保直接由于战争或类似战争的行为引起的被保险货物的损失。海运战争险的责任起讫以货物装上海轮或驳船开始，直到卸离海轮或驳船为止，即以水上危险为限，由战争险所引起的附加费用，亦由保险人负责。

(6) 罢工险（strike risk)，罢工险主要承保由于罢工、暴动等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

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Expectations—Augmented Phillips Curve)　在原有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上增加预期的概念来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和P·费尔普斯用适应性预期来解释短期与长期菲利浦斯曲线。他们认为，在短期中人们的预期来不及调整，这样，当实际通货膨胀率大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时，实际工资下降，就业与国民收入增加。所以，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交替关系　在长期中，人们可以根据过去预期的失误来调整预期，从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必然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不会使实际工资下降，也不能增加就业与国民收入。所以，长期中不存在菲利浦斯曲线所表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理性预期学派所采用的理性预期的概念。由于人们能对未来作出合乎理性的，正确的预期，所以，在短期中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也不会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

附加技术进步的生产要素（Factor Augmenting Technical Progress)　包括了技术进步的生产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生产要素的量并没有发生变化，也会由于包含在其中的技术进步而使产量增加，例如，当资本量不变，但同样的资本量代表着体现了新技术的机器数量，或者劳动量不变，但这些劳动采用了新技术时，资本和劳动就成为附加技术进步的生产要素，从而即使资本量和劳动量不变，产量也会增加。这就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E·登尼森等人则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说明了包含在生产要素之中的技术进步的作用的具体大小，从而就把这种附加技术进步的生产要素分为生产要素与技术进步两个部分，可以分别分析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

纯货币理论（Pure Monetary Theory)　一种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其主要倡导者是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R·霍特里（R·Hawtrey)。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周期是一种纯货币现象，经济中周期性的波动完全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大和紧缩信用所造成的，经济周期不过是显著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一个较为缩小了的翻版而已。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银行信用是主要的支付工具，银行体系创造并调节着信用量。经济周期的高涨是由信用扩张所引起的。具体来说，在经济中商人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商人运用的资本主要来自于银行信用。当银行体系降低利率扩大信用时，商人就会更多地增加向银行借款，用以增加存货，这样，商人就增加了向生产者的订货。生产的增加引起了消费者收入与支出的增加，这又使商人增加向生产者的订货。其结果是社会对商品的需求普遍增加和物价上升，经济活动高涨，这种经济活动的累积性扩张使经济进入繁荣阶段，当这种扩张过程开始之后就可以靠自身的动力持续与发展下去，而无需银行的促进。但是，银行扩大信用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在金本位制度下，银行信用的扩大要受到黄金储备量的限制，在不兑换纸币的条件下，为了稳定外汇或防止国际收支逆差的过度扩大，信用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当银行体系迟早被迫停止信用扩张并转而紧缩信用时，繁荣也就到了尽头。利率上升，商人得不到信用，这就使商人不得不减少订货，从而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又进一步使商人减少存货，减少甚至完全停止向生产者订货。生产减少，消费者收入与支出减少，经济进入累积性紧缩阶段，直至进入萧条阶段。霍特里认为，要是银行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信用，繁荣就可以持续下去。但实际上银行不可能无限扩大信用，因此，萧条的出现就是难以避免的。在萧条时期，资金逐渐回到

银行，银行又可以通过贴现政策或公开市场业务使信用扩大，这就使经济由萧条转入复苏，再开始又一次周期性波动。这种理论所强调的是，其他非货币因素也可能引起局部性萧条，但只有货币因素才能引起普遍的萧条。这种理论对经济扩张和紧缩过程的具体分析与其他经济周期理论基本是一致的，差别在于它强调引起这一过程的是货币因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理论把经济中周期性波动完全归因于银行信用，甚至提出只要银行信用能无限扩张、繁荣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它对货币与银行信用在经济周期中作用的分析至今仍然受到重视，当代的一些经济学家，诸如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仍然重视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

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 市场上形成的足以与垄断者对抗，并抵消其垄断力量的一种力量。美国经济学家 J·加尔布雷斯（J·Galbraith）在 1952 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其基本观点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少数大公司成为市场上的垄断者，并以其垄断地位取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随着垄断力量的出现，作为商品市场上买主的消费者和作为劳动市场上卖者的工资劳动者相应发展成为一种削弱或抵消垄断权力的抗衡力量。这种抗衡力量在劳动市场上就是工人所组成的工会，在商品市场上则是零售商店联号。前者作为垄断性大公司劳动力的供给者影响着垄断性大公司对工资的决定。后者作为垄断性大公司产品的购买者影响着垄断性大公司对产品价格的决定。抗衡力量的形成有助于扼制垄断组织力量的发展，实现社会平等。但它在与垄断组织相对立时，也可能成为一种垄断力量有损于非工会工人与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应对抗衡力量加以限制。

体现出来的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 一种只能体现在新机器设备或其他物质因素上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如果不体现在资本增加、设备更新上就不可能发生。例如，电子技术的进步要求更新设备，如果没有相应的设备，这种技术就无法存在。而新设备的运用又要以资本积累和其他物质或制度条件为前提。

求职性失业（Search Unemployment） 工人为了寻找更理想的工作所引起的失业。劳动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由于信息是不充分的，即使是同样的工作也存在着工作条件与收入的差别。如果工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而花费的收集信息与寻职的代价小于从更好工作中所得到的好处，那么，为了寻职而失业就是值得的。寻职的代价为失业前的收入减去失业期间的失业补助，这种代价是一种投资，它的收益是获得较高工资的收入增加。在寻职的代价大于所得到的收入增加时，寻职过程才会结束，只要寻职的代价小于所得到的收入增加，求职性失业就会存在。所以，求职性失业存在的根源是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充分性，以及失业补助的存在。这种失业属于自愿失业，在青年人的失业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减少这种失业的办法是完善劳动市场，提供充分的劳动市场信息，并对青年人的就业进行指导。

均质区 （见"区域"）

均等利润率（Equal Rate of Profit） 平等与不平等是比较而言的，这种比较要考虑不同类型的人口，所以根据对此人口的不同定义，平等与不平等就有不同的含义。这个一般性的考察同样适用于对利润率的讨论。我们将利润率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1) 以固定货币计值的，在某段确定时间内获得的、来自不同投资活动的利润率，这就是利润率的部门间均等问题；(2) 同一确定时间内获得的以不同货币计值的利润率。我们将之称之为自利润率的均等；(3) 以同一货币计值的，同一投资活动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利润率，这就是利润率的长期趋势，称之为利润率的时际（temporal）均等，对均等利润率的讨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适用什么样的利息理论。下面对部门间均等和自利润率均衡的讨论与一般的利润率决定理论无关。

1.利润率的部门间均等，套利的力量及其局限性在部门间的利润率比较中得到再好不过的显示。由于投资者们都希望获得可能的最高利息率，所以很自然，可以假定不同债券的收益率是相等的（均衡状态）。同样的原理能不能用于讨论不同产业的利润率的均衡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比较两种收益率，它们相等的原理是什么？其次，套利可能会遇到障碍。显然，收益率应该是包括所允许获得的资本收益等的真实经济比率，而且两种明显不同的收益率如果它们代表不同的风险，不同纳税义务，或者如果二者之间的差异过小而不足以克服交易成本，那么就不能刺激套利行为。关于套利的结构性障碍，经济学家们在假定部门间利润率均等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产业结构的问题，例如他们认为资本可以以任意小的数量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如果递增的规模报酬意味着小规模经营会付出相对更大成本，假想的加入者定会没法选择走向寡头垄断市场的产业。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产业内的生产者的利润率不会超过更小规模生产单位的竞争部门的利润率。在斯拉法

(P.Sraffa) 的价格决定模型中就暗含着利润率的部门间均衡的假定。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利润率均等须有不变规模报酬，但要有利润率的部门间均等，必须有一些关于环境特别是市场环境的假定，在这个企业活动的市场环境中，不变规模报酬和自由加入是利润率的部门间均等的充分条件。

自利润率的均等，假定一个价格矩阵

P_{11}　$P_{12}\cdots\cdots P_{1t}\cdots\cdots P_{1T}$

P_{21}　$P_{22}\cdots\cdots P_{2t}\cdots\cdots P_{iT}$

2.……

P_{N1}　$P_{N2}\cdots\cdots P_{Nt}\cdots\cdots P_{NT}$

p_{NT} 是第 n 种商品 T 时期的价格。这是最远只考虑到 T 时期的价格 $p_{iT}(i=1\cdots\cdots N)$。再假定第 1 种商品是货币。第 1 期借给第 t 期的货币的利息率可作如下计算：一单位现时货币购买成本为 P_{11}、一单位现时购买但为 t 时期提供的货币成本为 P_{1t}，这样一单位的现时货币可购买 P_{11}/P_{1t} 单位 t 时期的货币，利息率就为 $P_{11}/P_{1t}-1$ 或 $(P_{11}-P_{1t})/P_{1t}$。这也就是 t 时借贷事例中的货币的自利息率问题，货币的利息率量度可通过延期支付（延期支付一个比例）而获得的超额货币。这个观点可以推广到任何商品。现在我们转而考察前面矩阵的列——同一商品不同时期的价格，如果这些价格彼此比例相等，也就是说在所有时期内的相对价格是一样的，那么给定时段的借贷的自利息率对所有商品来说都是相同的。如商品 1 以第 1 期延迟到第 t 期的自利息率是 r_{1t} 那么：

$$r_{1t}=P_{11}-R_t/P_{1t}$$

如果：　$P_{11}/P_{1t}=P_{11}/P_{1t}$

有：　$(P_n-P_{1t})/P_{1t}=(P_{11}-P_{1t})/P_{1t}$　或 $r_{1t}=r_{1t}$

这里，不变相对价格就意味着自收益率均等。相反，相对价格不同，自收益率就有差异。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整个时间内的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作出经济静态的假定。例如随着森林的减少或需求的增加，木材越来越稀缺，相对价格会上升，相似地：技术进步——除非它是简单的劳动增加型的——将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静态是在每个时期技术上与其他时期是相同的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如果经济在每时每刻都是相同的，那么相对价格就是不变的。实际经济的静态性是支撑生产活动的价格体系的静态性的充分条件，但它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价格体系也是静态的，此价格体系既非唯一也非静态，而是双重再转换（double—reswitching）。当两个均衡价格体系的平均也是均衡价格时，我们就说存在均衡的非静态价格体系。但是两种价格体系的平均是基于不同的利息率，它们改变相对价格，因为价格体系不仅支撑着生产（供给），而且支撑着消费（需求），所以上述立论可能是很成问题的，这就使得对非单一价格的考察，特别是对包括双重转换过程的考察比仅仅考虑生产一方时要困难得多。我们可以想象，就象许多财产积累那样，进一步积累的货币的收益率不得不下降，且积累的最后数量是各种资产边际收益率和等的那一点。

3.利润率的时际均等，在经济理论家中有解释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的相当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的下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这里我们仅仅考察对此问题的最新的一些观点。关于利润率的现代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很大不同。这种差异的主要渊源是现代理论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具有成规律的连续的作用，而古典经济学则不是这样，可以看出下降利润率的古典观点之特点是一种停滞主义（stagnationist），利润率的下降是使进步经济止步的摩擦的一部分。相反现代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认为技术进步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

假定产出 Y 依赖于劳动投入 L，同质的资本存量 K，根据不变规模报酬生产函数：

$$Y=F(K,L,t)\qquad(1)$$

资本的边际产品用 F_k（k,l,t）表示，那么利润率 $r=F_k(K,L,t)$，最后可以得出等式：

$$\sigma_k\cdot K+\sigma_2\cdot L+\gamma=0\qquad(2)$$

其中 σ_k，σ_l 分别为对于资本 K 和劳动 L 的资本的边际产品弹性。k,l 分别为 K 与 L 总投入比重，y 是资本的边际产品在时间数轴上的变动比率。由于 F_k(K,L,t) 在 K 与 L 上是零次齐次的，所以有：

$$\sigma_k+\sigma_l=0\qquad(3)$$

（2）式可转化为：

$$\sigma_k(k-1)+\gamma=0\qquad(4)$$

对于资本的边际产品弹性是负的，即 $\sigma_k<0$，(K−1) 是每单位劳动的资本增长率，在正常的经济增长中，$6_k(k-1)$是正的，它用来量度利润率，在此利润率中，由于资本对劳动在不变技术下的替代，资本积累会促使利润率的降低。第二项表示这样的利润率，在此比率下，技术进步又会提高利润率（在要素投入比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技术进步是有益的，那它就为正，总之（4）式表明对于不变规模报酬的利润率，上述两种作用正好相互抵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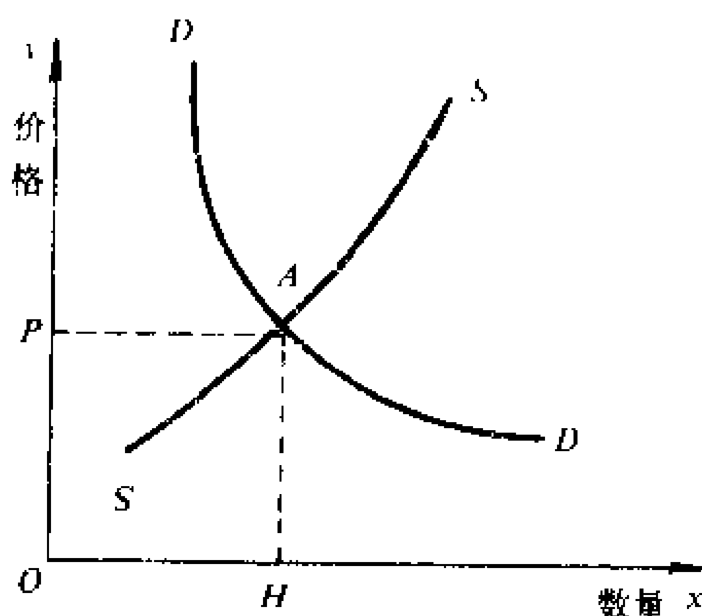
均衡（Equilibrium）　均衡是指经济体系中变动着的各种力量处于均衡因而变动的最后倾向等于零的那种状态。当经济中各种重要的变量在一段时间里未出现变动时，这个经济体系即可视为处于均衡状态。象任何其他经济学术语一样，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定义均衡，一种较常见的定义是，“均衡是一组被选择的相互关联的变量在它们所构成的模型中相互间调

整到不存在内在变动趋势的状态。"该定义中有几个关键的词值得特别注意。首先，"被选择"一词强调这样种事实，即由于分析者的选择，确实还存在一些变量没有被包括在模型之中。因此，局限在特定的一组被选择的变量范围内才有均衡可言。如果将模型扩大到包括额外的变量，原来在较小的模型中适用的均衡状态将不再适用。第二，"相互关联"一词表明，为了达到均衡，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必须同时处于一种静止状态；此外，每一变量的这种静止状态必须与每一其他变量的静止状态是一致的，否则某些变量将发生变化，通过连锁反应，又会造成其他变量发生变化，这样将不存在均衡可言。第三，"内在变动"一词表明，在定义均衡时，所包含的静止状态仅仅是建立在模型的内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假定外部力量是固定的。这意味着参数与外生变量被作为常量看待。当外部力量的确发生变化时，可能会导致一种定义在新的参数值基础上的新的均衡；但是，在定义新的均衡时，新的参数值将再次被假定为常数而保持不变。从本质来讲，某一特定模型的均衡是以缺乏变动趋势为特征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均衡分析（即对均衡状态的描述）是一种静态学。

均衡有稳定的均衡与非稳定的均衡之分。稳定的均衡是指任何脱离均衡状态的运动都会自动地产生使各变量恢复到均衡的力量。不稳定的均衡是指，一旦脱离均衡点，变量不会恢复到均衡状态，而会离开均衡点越来越远。

均衡分析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运用，例如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的均衡价格与产量，在投资、消费既定条件下的均衡国民收入等都是均衡分析的结果。

均衡价格论 一种价值理论，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它将价值与价格相混淆，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由该商品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从而用它的均衡价格来说明它的价值。均衡价格是指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需求价格（即消费者对一定商品量所愿支付的价格）取决于商品量的边际效用，供给价格（即生产者为提供一定商品量所愿接受的价格）取决于商品量的边际成本。由于同一种商品的不同数量会有不同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于是分别形成需求表和供给表，并各自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加以表示。这样，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点（如图所示）即两条曲线 DD 与 SS 的相交点 A，恰好使需求量与供给量相一致（都等于 OH），使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一致（都等于 AH）。在这里，OH 叫做均衡量，而 AH 即为均衡价格。这个均衡价格即决定着该商品的价值，既代表这一数量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又代表它的边际成本。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进一步引进时间因素来分析均衡价格的决定，按时期的长短把它分为三种（或四种）均衡状态，并认为需求和供给对这些均衡状态的影响会有所不同。不过总的来说，马歇尔的价值论强调价值由需求价格（以边际效用为基础）和供给价格（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共同决定，如同剪刀的两刃一起裁剪下东西，故素有"剪刀式价值论"之称。这种价值论用市场价格的决定代替价值实体和价值决定的分析，又吸收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多种庸俗价值理论，其理论谬误是十分明显的。必须指出，均衡价格论长期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普遍信奉和推崇，至今尚未出现新的西方价值理论能与之相抗衡。



均衡产量（Equilibrium Output） 又称"均衡的国民收入"，指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时的产量或国民收入。在简单的两部门经济中，总需求分为居民户的消费需求与厂商的投资需求，所以，总需求（AD）为消费（C）与投资（I）之和：

$$AD = C + I$$

总供给是全部产品与劳务供给的总和，产品与劳务是由各种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所以总供给也是各种生产要素供给的总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总和可以用各种生产要素相应地得到的收入的总和来表示，这种收入最终又分为消费与储蓄两部分。所以，总供给（AS）为消费（C）与储蓄（S）之和：

$$AS = C + S$$

当产量或国民收入处于均衡状态时：

$$AD = AS$$

即

$$C + I = C + S$$

或者

$$I = S$$

所以，均衡产量也就是投资等于储蓄时的产量。凯恩斯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因此，均衡产量也就是充分就业产

量，两者是一致的。凯恩斯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总是充分就业的。因此，均衡产量与充分就业产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均衡产量可以小于充分就业产量，也可以等于充分就业产量。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是存在失业，所以，均衡产量一般小于充分就业产量，只有在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特殊情况下，均衡产量才会等于充分就业产量。宏观经济学正是要研究均衡产量为什么不等于充分就业产量，以及如何使均衡产量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均衡通货膨胀率（Equilibrium Rate of Inflation）　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时的通货膨胀率，亦即完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完全可以准确地预期到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因此，这时通货膨胀的影响，一是减少人们的现金持有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二是改变名义变量（例如，价格水平与名义利率），但并不影响经济中的实际变量（例如，实际国民收入与实际利率），从而也就不会对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但在现实经济中，一旦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这种均衡通货膨胀率的情况就并不常见。

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一种系统分析方法，用于极其详尽地分析某一部门或某一经济的商品和劳务的产量与完成某一生产量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创始人是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通常借助于一种棋盘形的平衡表来详细说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钢铁工业为了增加钢锭的产量，就需要额外增加煤炭、铁矿石、平板货车，电力和许多别的项目。为了满足钢铁工业的额外需要，煤矿、铁矿、铁路设备公司以及发电站同样也需要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来生产出额外的最终产品。如此类推，国民经济有多少部门，投入—产出分析就会牵涉到多少个部门。这是一项极其详尽而复杂的工作。一般情况下，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大大帮助于分析以往的经济活动。一种要素的增加会对其他要素的增减产生什么影响，一个部门的增长对其他部门增长的依赖有多大等等，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中都可以揭示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投入—产出分析既是对经济活动的描述，也是对经济活动的一种缩写，它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经济生活，使本来难以捉摸的复杂的经济可以系统化，可以数量化。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预测各部门间的相互需要方面到底有多大用处产生怀疑。其怀疑的不是方法本身，而是投入—产出分析必须使用的各种参数，这些参数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分析的结论，而且参数每时都在变化，用以前的参数去预测后来的经济关系，必然产生较大的误差。

投机（Specuation）　在商业或金融交易中，甘冒特殊风险以期望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为。投机通常适用于期望价格变化而获利的交易。在证券交易、商品和外汇买卖活动中最为常见。一般情况，在日常业务活动中需要外汇、货币或商品的人所采取交易不是投机行为，但除此之外的所有交易都是投机性的，因为这些交易都不支付股息、利息，只有依靠市场上的价格变化才能产生利润。在证券市场上，投机与投资并不明确，只是根据行为人的动机。如果他关心的是本金的安全，希望本金有所增值或从其行为中得到虽不大但却稳定的收入，这种行为就是投资。如果行为人不是过多地考虑本金的安全，而是一心想通过冒风险来马上获得大笔收入，这种行为就是投机。对于投机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结果人们争论不休，也没有定论。有的人认为投机的作用是利大于弊，其作用表现在：（1）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要想投机成功，就得有资金，就得了解所要投资的市场行情，并对市场运行趋势作出判断，头脑要冷静，能够对重大损失泰然处之。（2）由于价格变化是经常性，因而投机是必然的，投机一般不会扭曲价格机制，反而使价格趋向合理。但反对投机的人也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投机对社会经济的危害很大，例如投机会造成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虽然是暂时性的、投机利润会促使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而这样会败坏政府形象。

投机性失业（Speculative Unemployment）　又称"投机性就业不足"，指由于实际工资暂时下降而引起的工人劳动时间的减少。工人根据实际工资的变动来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当实际工资暂时减少时，闲暇的机会成本也减少了，从而工人就会以闲暇来代替部分劳动时间，即减少现在的劳动时间，以便在未来实际工资增加时增加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的减少就是投机性失业。这种失业实际上是工人在维持长期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短期实际工资的变动来调整劳动时间，是工人在其一生中为对付暂时的实际工资下降而对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所进行的临时重新安排。这也是引起摩擦性失业的一个因素。由于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与人们对闲暇的偏好，这种失业形式日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投资与积累（Investment and Accumulation）　投资是指为增加或保持实际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费用流动。实际上更为确切的定义是：投资是用于生产而非

立即消费的商品项目的费用流动。这些资本项目既可以是增加存货的形式，也可以是增加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投资是一种流量，其大小决定于一切产生正净增值或大于利息率的内部收益率的项目。积累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指累积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存量。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更重视投资。认为投资与储蓄的关系是经济均衡增长的先决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积累是指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其来源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积累包括三个部分：(1) 扩大再生产基金，主要用于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基本建设和流动资金。(2) 非生产性建设基金，主要用于文、教、科、卫等部门的基本建设和国家行政机构、国防部门的基本建设和其他非生产性基本建设部门。(3) 社会储备基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积累和消费比例对国家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里，储蓄率将影响积累，但更为长的时期里，影响积累的只有两个因素，一是人口增长，二是技术变化。

投资计划 (Inrestment Planning) 某一工商企业对新厂房设备进行投资的设想。大多数工商企业都有一个打算在短期或长期内实行的投资计划。短期的投资计划一般是为了适应短期内市场需求的变化，如果市场需求增加，企业就要增加厂房设备的投资，扩大生产能力；长期的投资计划一般是为了适应长期的市场需求，如要增加对产品更新换代的研究设计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长期内企业的其他设想的落实。因为投资计划方面的情报对预测经济情况很有价值，所以公司计划人员和政府计划人员都密切注意有关投资计划的调查。如美国商务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季度调查以及麦格劳一希尔公司经济部的年度调查等。对于某一特定时期来说，投资计划中的美元价值和同期实际投资的美元价值往往不一样，主要原因是由计划的增加、推迟和取消造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个具体计划的实施与原来的打算总是有出入。在公司一级，计划投资额和实际投资额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但当把各个公司的投资合为部门投资总额，然后再汇总为所有企业的投资总额时，各个公司的差额便趋于抵消，结果投资总额与实际投资额十分接近。正是因为如此，投资计划就成为预测未来经济的重要依据。当投资者对未来充满信心，投资计划雄心勃勃，未来的经济也必将快速发展；反之，如果投资者对未来心灰意冷，投资计划可有可无，未来的经济也必将趋于萧条。

投资决策标准 (Investment Decision Critiria) 投资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牺牲的现时的消费。投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每个投资主体都将决定是否投资，以及在可供选择的投资方案中如何决策。个人、企业、政府所决策的内容是不同的。例如企业将决定是否购买机器设备，而政府决定的是是否修筑水库。对于投资决策标准，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如何找到一种权衡方法。在投资决策标准中有一种期间选择的经济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是使得某种形式的消费在一段时间内达到最大。这需要如下三个方面的数据资料：(1) 投入，即在一段时间内，个人的投入流；(2) 偏好函数，即在各种形式的消费当中有轻重之分；(3) 转换性，即规定了将其前面投入转换为后来的消费组合的可能性。期间选择理论导致一种新的投资决策方法即现值法。这种方法可分为两类：第一，在可供选择的机会当中，选择使得总收益最大的那一个；第二，单个投资的被选择的必要条件是现值为正，所谓现值，就是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所有的投入与支出都折算到投资起点上。

现金的流入为正，现金的流出为负，每一笔收入就是现金的流入，每一笔投资都是现金的流出，因此，在一个计算期内，现金流入大于现金流出，说明投入可以达到预期的收益水平。除了现值法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投资决策标准，如偿还期最短法，投资回收期最短法、内部收益率法等。

投资的风险溢价 (Risk Premium on Investment) 经济生活中风险性是广泛存在的，几乎任何的投资活动都存在风险性，投资的风险溢价是对投资者在投资项目的实验过程中因不确定性的后果而对此给予弥补的增量收益 (incremented return)，也就是向特定项目所要求的收益率（已经考虑进风险因素）与特定的收益的无风险贴现率之间的差额，反过来讲，投资收益的按风险定的贴现率等于无风险的贴现率加上风险溢价。这是一个纯理论上的抽象定义，我们也可以将投资的风险溢价理解为，因不确定性存在有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损失而给投资者以弥补性收益。对于一项现实的投资项目对其风险溢价如何进行估价，这不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难题。但企业官员和经济学家们需要一个简单和比较精确的风险溢价的估量技术，因为风险溢价的量度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特别是对在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世界里的投资决策的评估。在美国60年代对证券价格的研究导致了夏波—林特纳—摩辛 (Sharpe-Lintner-Mossin) 的资本资产的收益模型。这个理论运用投资的预期收益的变化来度量风险，所以它也就是一种风险溢价的估值方法。假定投资者希望从高风险投资项目中获得更多的

收益，投资者们确定的风险溢价间的均衡是与给定的风险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证券市场上对资本资产所要求的价格就反映这种均衡。如果收益的风险贴现率与风险的市场价格可以某种价值形式表示，那么风险溢价就可以表示为预期收益率的市场指数的一个比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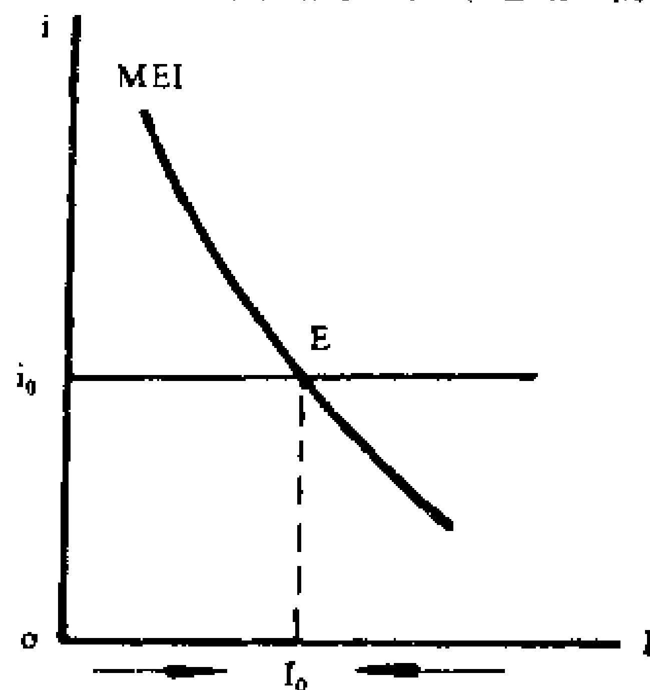
$$E(R_i)-R_f=\beta_i[E(R_m)-R_f]$$

$E(R_i)$、$E(R_m)$是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的市场指数，R_f为投资的无风险贴现率，β_i由项目的相对风险决定，在实际工作中$\beta_i E(R_m)-R_f$常用证券价格的历史资料来估值。$E(R_i)-R_f$就是投资的风险大小程度。风险溢价的思想使经济学家们更深地理解均衡投资的决定，它提供了投资决策的新的方法和对各产业不同收益率的新的解释，总之风险溢价在经济学与经济工作中已得到广泛运用。

投资收益（Return on investment）　是投资资本收益或产出（yield）的衡量尺度，或是现存企业或预期投资的企业的期望收益，或为拟议中的预备购置工厂和设备的产出率。投资收益有时也称为股本收益（return on equity），它常常是衡量不同企业或产业相对盈利性的标准，具体地，投资收益有两种标准。(1)、净资产的资本收益率，它是净利润（税后利润）与资产的比率。用百分比表示，表明资本自有（equity capital）的收益，是股票持有者积累投资的净产出。(2) 总资产的资本收益率，即为税后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它揭示企业所有资本存量的盈利能力。一般地，大型企业可通过慢周转高销售边际（sale margin），即每销售1美元的盈利来获得高投资收益率，而小企业常通过快周转和低销售边际来取得高投资收益率。运用投资收益率来衡量相对盈利性有三种方法，(1) 资金偿还期法，它表示为弥补投资而取得净可获收益的年份。这种方法易计算也易被理解，但它是间接的投资收益，不能告诉人们在取得弥补投资的净收益所需年份之外的收益和收入的获取方法。(2) 平均收益率方法，如果说投资回收期方法忽视了每个项目的相对盈利性，那么平均收益率方法正是比较不同投资项目的盈利状况的。(3) 贴现的现金流量法，它不仅考虑在整个工程的生命周期内的资本基金成本，而且比较不同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收入。

投票（Voting）　有很多经济活动是由政府完成的，如提供公共设施等。政府决定经济活动的规模通常是通过政治的渠道而不是市场渠道来完成的。投票也就是政府决策，虽然从总体上讲是政治科学的一部分，但与经济理论也密切相关。历史上，经济学家起码与政治学家投入同样的力量去研究投票理论。投票理论最早出现在启蒙哲学家和数学家的作品中，然而投票理论的进展缓慢。1948年经济学家D·布莱克就委员会组成及选举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在1958年编辑成书。从布莱克重新提出投票这个问题之后，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已经作出很重要的贡献。投票问题分为很多种，最简单的是两个候选人中选一个，在这里简单多数原理是适用的。如果是有三个以上的候选人，问题就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种选举程序，但所有的程序都要服从简单多数的原则。但存在一些不足，就是选举结果不是那么公平和合理，原因是选举人都在心中将候选人分类或排序了。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人们发明了总和选举法。就是，如果有M个候选人，每个候选人的每张选票的点数不同，居于选举人心中第一位的得分是M点，居第二位的是M−1点，以此类推，得点数最多的候选人则当选。还有消除法，就是将比较弱的候选人经过选举消除，剩下的候选人再进行新的一轮选举。最后是顺序二择一程序。就是每两个候选人排成一组，让选举者选出一个，当选者再与第三个组成一组进行二择人选举，以此类推，直到每一位候选人都参加了选举，最后的胜利者就是当选人。选举的方法很多，远远不止上面几种，各种方法各有利弊。

投资边际效率表（Marginal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Schedule）　投资的需求曲线，表明了投资的边际效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内，投资要一直进行到其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之点，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OI代表投资量，纵轴oi代表利率，MEI代表投资边际效率，由于投资的边际生产力递减，MEI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当现行利率为i_0时，投资要一直进行到I_0，因为在I_0时投资的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在I_0之左，投资的边际



效率大于利率，投资仍要增加（如向右方的箭头所示）。而在I_0之右，投资的边际效率小于利率，投资

要减少（如向左方的箭头所示）。投资边际效率表描述的是流量关系，即投资量是流量。而资本边际效率表描述的是存量关系，即资本存量是存量。在长期中，合意的资本存量，即资本存量的均衡值是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之点。

投资过度理论（Over—Investment Theory） 一种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或投资过度来解释经济周期原因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相对于消费品的生产而言，资本品（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度发展，以致于经济失衡而引起生产过剩。这是因为，资本品工业所受到的经济周期的影响远比消费品工业大得多，即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资本品工业的扩张，以及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资本品工业的收缩，都远远大于消费品工业。由于某种原因所引起的投资增加表现为对资本品需求的增加，以及资本品价格的上升，这就刺激了资本品工业的迅速扩张，使经济进入繁荣阶段。这种繁荣进一步刺激了对资本品的需求，使对资本品工业的投资进一步增加。繁荣时期资本品生产的过度发展引起了消费品生产的相对减少，从而引起经济结构失衡。当这种失衡为社会所无法忍耐时，就会由于投资不足而使资本品生产过剩，价格下降。随着资本品生产的急剧减少，经济进入萧条时期。只有在萧条时期，经济通过强制性生产过剩及价格下跌的调节而恢复平衡后，经济才能走向复苏，并借助于投资增加再次走向繁荣，开始另一个周期。投资过度理论又可以分为三个派别：以奥地利经济学家L·米塞斯（L·Mises）、F·哈耶克（F·Hayek）、英国经济学家L·罗宾斯（L·Robbins）等为代表的货币投资过度论，他们强调引起投资过度的原因是货币，偏重于用货币因素来解释整个周期中投资的变动。以德国经济学家A·斯皮托夫(A·Spiethoff)、瑞典经济学家G·卡塞尔(G·Cassel)、K·魏克赛尔（K·Wicksell）等为代表的非货币投资过度论，他们强调引起投资过度的原因是新发明、新发现、新市场开辟这类非货币因素，偏重于用这些实际因素来解释整个周期中投资的变动。以法国经济学家A·阿夫塔利昂（A·Aftalion）、美国经济学家J·克拉克（J·Clark）、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R·Harrod）等为代表的加速原理论，他们强调制成品需求的变动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而引起了投资过度及经济周期。

投资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又称"内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指一种贴现率，这一贴现率使对一项资本资产（投资）的预期净收益贴现的现值恰好等于该资产的供给价格。这一概念与资本边际效率相似，但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即投资边际效率考虑到了在短期内，当所有厂商同时增加其资本存量时，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会上升，即资本品的短期供给价格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上升，而资本边际效率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投资边际效率对厂商作出短期投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

投资的利率弹性(Interest Elasticity of Investment) 投资变动对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投资变动的百分比与引起这种变动的利率变动的百分比。以 $\Delta I/I$ 代表投资变动的百分比，$\Delta i/i$ 代表利率变动百分比，则投资的利率弹性 E_I 可以写为：

$$E_I = \frac{\Delta I}{I} \Delta i / i。$$

根据投资理论，投资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动，即利率上升，投资减少，利率下降，投资增加。所以，投资的利率弹性小于零，为负数。投资的利率弹性反应了投资变动与利率变动之间量的关系，从而就可以根据实现充分就业所需要增加（或减少）的投资量来估算应有的利率变动。投资的利率弹性大小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大小与挤出效应的大小有重要的影响。当投资的利率弹性大时，一定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投资较大的变动，同时，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挤出效应也大，反之，亦反之。因此，估算实际的投资的利率弹性是十分有用的。

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y） 外国基地公司的一种形式，它不象控股公司那样对其它公司拥有控制权，而只是专门从事股票、公司债券或其它证券的投资，这些有价证券通常是在证券交易所标价出售，投资公司据此选择最有可能赢得利润的方式进行投资，并不刻意追求决策投票权，而专注于利用避税地国家对上述活动所得（如股息、利息等）的税收优惠措施减轻或免除纳税义务，或者利用居住国与避税地国家的税收条约或协定对已就上述活动所得缴纳的预提税要求退税或减税。

投资公司可由公司集团或私人按股份公司形式组建，此外，还可以"离岸基金"形式出现。列支敦士登、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等被认为是组建私人投资公司颇为理想的地点。特别是列支敦士登所独创的避税形式"安斯塔尔特"（Anstalt）尤其具有吸引力。

投标（Tender） 新证券发行的一种方式。它由发行公司拟定说明书，说明新证券的内容和销售条件等，由投资银行在投标的申请书上标明该证券的投标

价格，待到发行者规定的日期，当众开标，出价最高的投资银行便可获得证券经销的权利。一般地，采用公开投标方式发行的证券，大多数是畅销的证券，如政府公债、公用事业的公司债以及信誉卓著的公司债等。

财产税（Property Taxation） 从最广泛的形式上看，财产税应包括对所有财产例如土地、土地上的建筑、生产者与消费者耐用品、企业存货、持有政府债券或现金等的征税，它应该是对资本或非人力形式下的财富征税。但是，财产税比真正的财富税范围要窄。实际上，财产税主要是对不动产即对土地以及附属在土地上的建筑物征税。财产税在许多国家是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实行财产税的国家里，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种，对于财产税的税收负担以及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意见分歧很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财产税具有累退性质。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财产税很大一部分是对住房与商业财产征税，而对于住房征税的负担与年住房支出成比例，对于商业财产征税的负担与消费成比例。由于作为可测度年收入一部分的年住房支出与消费随收入水平而下降，因此，财产税具有累退性质。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财产税具有累进性，因为财产税负担大部分是落在资本所有者身上。关于财产税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学家也是众说纷纭。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土地供给固定，因此对于土地征税不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即对土地征税的效应是中性的，但对于土地上建筑物的征税会影响对于土地的改进，造成资本的不当配置。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得多寡有赖于财产税征收的多寡，征收财产税类似于收取地方公共产品费，因此财产税会导致住房与地方公共产品有效的消费形态。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财产税是一项不完善的费用，这会导致人们减少住房消费以降低他们对于地方公共产品的赋税。因此财产税扭曲了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财务报表（Financial Statements） 财务报表是交流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要手段，最常见的财务报表有资产负债表或财务状况表、收益表以及财务状况变动表或资金来源以及使用表。财务报表通常要由独立的审计局审计以保证它的可靠性。

资产负债表描述的是公司在某个给定的日期所拥有或所控制的资产情况和公司在这个给定日期的负债和证券发行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一般都列有四种主要资产项目：现金、应收帐款、存货和厂房设备，其中前三种又统为流动资产。现金是公司的现金登记册上和公司的银行帐户上所拥有的现金量；应收帐款是公司对它的顾客的债权。它表示为公司预计从它的顾客那里所能收取的现金量，这两个项目都是货币性资产，而流动资产的第三个项目存货则是一种非货币性资产，它是表示公司将要卖出或在生产中将要自身消费的那些实物项目。这三个项目之所以称为流动资产是因为它们在一个正常的商业循环中或一年内一般都能转化为现金或卖出或在自身的生产中消费掉，它们在资产负债表中按其转化为现金的可能性由大至小排列。第四个项目厂房设备也是一种非货币性资产，并且也是非流动资产，因为它不仅要在下一年而且要在随后许多年内创造收益。此外，在资产负债表中，还包括有无形资产（如信誉）、短期和长期投资以及预付费用等。在这些资产中，有的（比如现金和应收帐款）按它们对公司价值的大小来确定其数额，有的（比如存货和厂房设备）则是按其成本确定其数额。这四种资产的总和既不代表公司资产的成本也不代表公司资产的价值。

负债是一种义务，是机构在未来必须将其经济资源转移给其他实体的义务。在负债项目中，应付款项计量的是公司拖欠其他实体的款项，这些实体在公司决算日之前曾经供给公司商品和劳务，但公司没有支付给他们相应的款项，应付款项列在流动负债项目内，因为它们在下一年内必须偿付；应付债券是长期负债，它是公司借入的期限相对较长的金额；股东的股份是公司的股东投资的数额，他们获取公司在偿付法定的固定债务后所剩下的剩余，因此，他们要承担企业经营中风险。

收益表描述的是公司在某个特定时期内所创造出的收益的情况。帐面收益定义为总收益和总开支的差额，一个时期内的收益是企业在向他人提供商品和劳务后从他人那里所得到资源，而开支是企业在这个时期内为创造这些收益所消费的资源，收益表反映了企业将货物交付给顾客所换来的货币性资产（现金和顾客答应在未来支付的现金）的收益。收益可由企业所收到的资源的价值来计算，不过，在这些资源未收到以前，其收益就不能算在内。相比之下，企业在创造收益时所消费的资源的价值计算起来就要困难得多，会计师们一般是用这些资源的成本来计算开支，这些开支一般有四种：A.所购买的商品的成本，B.工资和薪金开支，C.其他业务开支，D.所支付的利息。

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是在会计记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记录一般都同时记载了交易行为对至少两种资产、负债和股票的影响。对于每一种交易，资产变动量必须等于其负债和股票的变动量，这个规则体现在复式帐户系统中，这种复式记帐法使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上某个时期的净收益总是等于其净资产的增加额。

财富（Wealth） 财富概念在经济学中既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至今，在经济学中，对于财富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虽然它不象"价值"一词那样是争论的焦点，但是对其含义和衡量的问题，学者们之间看法几乎是势不两立的，总的来看，对于财富的概念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富就是有形财产，这种观点是早期经济学家提出的，而且至今仍普遍使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财富是快乐或效用，它来自于有形商品，但并不是有形商品本身。由此，财富一词就有了"客观"和"主观"两种含义。

对于财富的客观概念，即财富是有形财产，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对各种各样的物品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计算其价值。在早期经济学中，这种计算有双重标准，一种是以货币为标准，一种是以土地和劳动的数量为标准，直到斯密时期，斯密放弃了易变、不稳定的货币标准，而将劳动作为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但是，财富的客观概念从其一开始提出就遇到许多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劳务"，劳务不是有形商品，而且是流量，无法计入作为有形存量的财富之中，但是，劳务的生产又消耗了劳动；再有的问题就是劳动是各种各样的、难以确定一个共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并进行加总。此外，另一重要的问题是财富作为客观概念，未能表明财富对财富所有者或受益人带来的快乐或效用，李嘉图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开始注意区分财富的主观和客观概念，最终，财富的主观概念在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中确立了。

对边际主义者来说，财富是有形财产所带来的快乐或效用，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不是计算财富的数量，而是如何在给定的资源状况下，使效用最大化。强调财富的心理方面以及稀缺性，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澄清了许多原来的疑难问题，如水—钻石悖论（water-diamond paradox）。但是，仍需指出经济学家并没有放弃使用财富概念，也没有放弃寻求其衡量的方法，事实上，计算财富数量已是现代各国重要的事务。既包括了财富存量的计算，也包括了财富流量的计算，成为显示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财富约束（Wealth Constraint） 财富约束在消费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中是指各经济单位的交易行为，其购买价值不得超过其售卖价值。新古典学派最先使用财富约束，特别是瓦尔拉则经常在其著作中使用财富约束，但严格意义上，财富约束一词的使用则是由希克斯在1946年确立的。

设在物物交换经济中，有N种商品。某一经济单位其偏好在商品空间R^N_+中预先排定，其财富拥有量由点e表示。在任何给定的价格体系p下，此经济单位在商品空间R^N_+中选择其最大偏好点X（p），此时要求其最大偏好点价值不得大于其财富拥有量价值，即：

$$P\cdot x(p)\leqslant P\cdot e \qquad (1)$$

设超额需求为：

$$g(p)=x(p)-e \qquad (2)$$

从而有：

$$P\cdot g(p)\leqslant 0 \qquad (3)$$

（3）式即为此人的财富约束。如果某一正向量乘以价格，此财富约束不受影响。如果对所有商品都有需求，（3）式仍然具有约束力。如果允许经济单位发生借贷行为，那么引入时间因素就可以保证财富约束仍然有效，即使经济单位未来的财富拥有量不确定，其财富约束却仍然是确定的，但是，这种确定要依赖于相应的市场的存在，如果相应的市场不存在，其财富约束也就变得不确定了。

在货币经济中，计划需求只有以货币为后盾，才能成为有效需求，也就是说，经济单位除非有足够的储存货币，否则就只有卖掉小麦，得到货币，才能购买面包。这将在出现对所有商品的有效过度需求为零的同时，却存在大量的计划过度需求，产生经常性的过度需求或过度供给。但是，如果允许借贷行为自由发生，那么就会消除这种经常性的过度需求或供给。而这时财富约束又成为对个人偏好的唯一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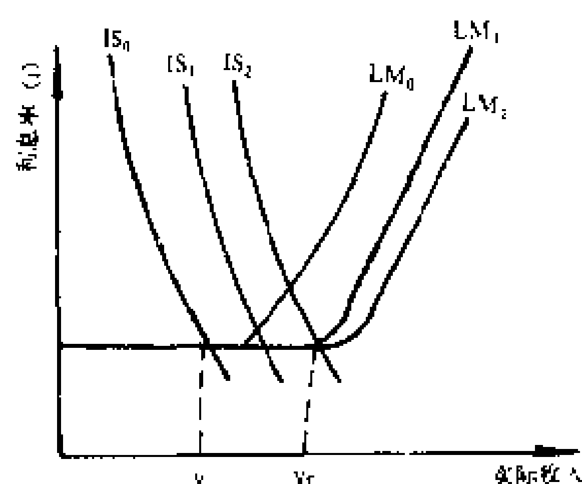
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 许多经济学家使用财富效应一词，但所指含义往往互不相同，我们这里所说的财富效应特指从总消费角度而言的财富效应，事实上，即使局限于这一特殊角度，财富效应也有些不同的用法。

哈伯勒（Haberler）、庇古（Pigou）和帕廷金（Patinkin）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余额的变化将引起总消费支出的变化，这一财富效应经常被人们称为庇古效应（Pigou effect）或称为实际余额效应（real balance effect），如果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之间存在这种正向关系，就会对凯恩斯未充分就业均衡分析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IS-LM分析中看出。在下页图中，IS曲线与LM曲线相交于流动性陷阱区域，这时经济中实际收入Y低于充分就业的实际收入Y_F，初始的LM曲线为LM_0。若价格下降，这将增加实际货币余额，使LM曲线由LM_0变为LM_1、LM_2……，而同时，利息率仍然维持在最低水平不变，虽然价格降低，但并未使经济走出衰退。现在设实际余额效应开始发生作用，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将提高消费支出，IS曲线由IS_0逐步变为IS_1、IS_2……，直至IS_2与LM_1相交，这时，市场力量使实际收入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

另一方面，财富效应的来源则更具争论性。现代消费函数理论将财富视为总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由

于货币余额是财富的一部分，实际货币余额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应当与资本存量增加等对消费的影响一致。但是，如果考虑何种形式货币是财富的问题，那么财富效应的来源也就具有不确定性了。

此外，在阐明实际余额效应时，实际货币余额增加与通过资产调整两者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增加相比，前者大大地高于后者，由于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品被视为储蓄和投资，那么增加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也就成为降低现金余额的简便方法，反之亦然。



财富赋税（Taxation of Wealth）　财富赋税是政府获取收益的最古老方法之一，至少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使用。财富税的主要形式有四种：(1) 财产税。这是最古老的财富税形式，定期对某些私人财产进行征收，最常见的对象是土地。财产税不实行累进税率。随着纳税能力标准的变化，财产税的地位已逐渐下降。以美国为例，现今美国财产税仍然是比较重要的税种，但财产税占政府收入的份额已从一次大战前的50%降至15%以下。(2) 遗产税。遗产税是对赠予和继承财产进行课税，而且只是在发生赠予或继承行为后一次性课征。但是遗产税无论是从获取收益或从财富再分配的效果看都不理想，人们常常采取各种方法逃避交纳遗产税。因此，人们也经常将遗产税视为自主税。(3) 净值税。净值税是政府每年向个人财产净值进行课税，通常税率很低，带有累进性，课税效果与资本收入税很相似。(4) 资本税。为了获得战争经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捷克、奥地利等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匈牙利设立了资本税。课税对象是现存资产，税率很高，但只是一次性的。

财富税基本是中性的，不针对某一特殊形式的资产，也有些学者反对财富税形式，认为它刺激消费，而减小了人们储蓄和投资的欲望。但是，需要指出，不同形式的财富税，其经济效果是不同的。以财产税为例，在美国，财产税是地方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各个地方的财产税赋不同，当地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也不同。人们就会按照税赋大小和公共服务水平选择居住地，最终会实现帕累托最优分配。这实际上也就是蒂布特假说的思想。再如，考虑到预期因素，未预期到的资本税对经济产生的歪曲程度比较小。

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　通过改变政府支出与税收来调节总需求与经济活动总水平的经济政策，是需求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为政府的各项开支筹资，以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它的影响主要是收入分配，以及资源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配置。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财政政策被广泛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工具，以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这时财政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选择开支政策，即政府财政开支的规模有多大，以及用于哪些方面，政府开支中包括公共工程支出、政府对产品与劳务的购买，以及转移支付。第二，选择税收政策，即确定征收多少税收，以及用何种方式征税。政府所征收的税可以分为纳税人可以把税收负担转嫁出去的间接税，以及纳税人无法转嫁税收负担的直接税。在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中最重要的是直接税中的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第三，赤字财政，即确定赤字的规模和分配。财政政策的运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内在稳定器，即由于制度上的特点可以自动地调节经济的某些财政政策措施。例如，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有固定的征收标准与税率，各种转移支付有固定的发放标准。这些财政政策工具无须有意识地调节就可以起到自动调节经济、使经济稳定的作用。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第二，补偿性财政政策，亦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法是，在萧条时期采用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减少失业。在繁荣时期采用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抑制总需求，制止通货膨胀。这种财政政策的基调是"逆经济风向行事"。同时，以繁荣时期紧缩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财政盈余来弥补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财政赤字，以求得长期中、或整个经济周期内的财政预算平衡。第三，赤字财政政策，其作法是增加政府的赤字支出，以便刺激总需求，实现高经济增长率与充分就业。具体方法则是通过发行货币或发行政府债券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为政府支出筹资、增加财政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挤出效应，即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而挤出了私人支出。这是因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发行货币或发行债券为支出筹资就会提高利率，从而抑制私人投资。尽管挤出效应一般不会为一、但也不会为

零，所以，挤出效应会使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作用有所减弱。不同经济学流派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作用的看法很不一致，凯恩斯本人非常强调财政政策，尤其是赤字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所以，被称为"财政主义者"。当代凯恩斯主义者，如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则同时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主张两者并用。货币主义者则认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甚大，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十分有限。从战后各国的情况看，财政政策，尤其是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同时也引起财政赤字严重、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

财政幻觉（Fiscal Illusion） 某项财政支出给人们造成的收益大于成本的错觉。当某项财政支出所带来的好处直接又显而易见，而这种支出的成本由于分散在一定时期和全社会纳税人身上而不明显时，这项财政支出就会引起财政幻觉。例如，政府进行公共工程支出建设一个机场，这项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包括在兴建机场时对有关行业投资与支出的刺激，以及在建成后对经济的刺激，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建设该机场的支出要由全体纳税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以纳税的形式支付，人们并无法直接看出是为新建机场而纳税。这样，人们就会错误地认为新建机场的收益大于成本，这时就产生了财政幻觉。财政幻觉的产生与财政支出和税收制度的特点相关。支出是一次性的，但这种支出却由一定时期的税收支付，这种支出的成本往往隐蔽在其他许多财政支出计划之中，某种支出与为这种支出所征收的税收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就造成某项财政支出的效益明显，而成本较为隐蔽。财政幻觉的存在使政府的支出计划不会受到纳税人的反对，从而就刺激了决策者用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但这样做最终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或造成财政赤字。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正是财政幻觉的存在引起了战后各国财政支出剧增与财政赤字严重。

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 一种税收和财政支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级政府都有权征收赋税并决定支出。大部分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这种制度，但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是不同的，例如，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比其他国家大一些。一般认为，这种制度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诸如国防这类支出与相关的税收由中央政府控制，因为这类支出是全国收益的，统一征收与使用效率更高。诸如教育这类公共服务支出是地区性受益的，则由地方政府进行支出并征收税收。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需要决定财政支出与收入，可以为当地提供最优公共服务和最优税收的组合。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在不同地区的支出与税收之间进行选择，则可以促使各地提高效率，以最低的税收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有关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和数量，各级政府之间税收和支出权力的划分，并把俱乐部理论运用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

财政部观点（Treasury View） 20世纪初英国财政部所提出的一种看法，认为政府开支增加会被私人支出的等量减少所抵消。20世纪英国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失业人数增加，当时英国经济界J·凯恩斯、A·庇古等人提出增加政府支出以解决失业问题。但财政部认为，无论是用发行货币为政府支出筹资，还是用增加税收为政府开支筹资，政府支出的增加都会减少等量的私人支出。因此，增加政府支出只是以公共支出取代私人支出，并没有增加生产减少失业的作用。经济学界对这一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反对财政部的这种观点。

财政-货币政策混合（Fiscal-Monetary Mix） 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起来使用，以便更有效地达到既定的目标。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配合，以便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由于引起利率上升而产生挤出效应，同时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则可以抵消这种挤出效应。第二，紧缩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配合，以便更有效地抑制总需求，制止通货膨胀，实现物价稳定。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配合。第四，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两种配合更多地运用于使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实现。这是因为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对国内的影响大于对外的影响，而货币政策对外的影响大于对内的影响。当国内存在失业而对外国际收支又有赤字时，仅仅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减少国内失业，但却由于国民收入增加，进口增加又加剧了国际收支赤字。仅仅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提高利率引起资本流入，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均衡，但紧缩性货币政策又会抑制总需求，加剧失业。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配合就可以既通过刺激总需求增加了就业，又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引起资本流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因为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增加就业的作用大于引起进口增加的收入，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吸引资本流入的作用大于抑制国内总需求的作用。同样，在国内存在通货膨胀而国际收支又有盈余时，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配合的作法，既抑制了国

内总需求，消除了通货膨胀，又降低了利率使资本流出实现了国际收支平衡。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以及所要达到的不同政策目标，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运用是宏观经济政策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做有助于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同时实现多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更好地稳定经济。

财政红利（Fiscal Devend） 财政收入减少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实行累进税制时，随着国民收入的减少，税收的减少会快于政府支出的减少。这样，税收减少所增加的私人支出就大于政府支出的增加，从而对经济活动产生刺激作用。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实际收入没有变而名义收入减少了。由于赋税是按名义收入征收，这样，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税收减少。税收减少有利于增加个人收入与支出，从而刺激经济活动。但是由于通货紧缩的情况并不常见，所以，这样作用只是一种理论分析，现实中很少存在。

财政拖累（Fiscal Drag） 财政收入增加对经济所产生的紧缩性影响。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实行累进税制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税收入的增加会快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这样，税收增加所减少的私人支出就大于政府支出的增加，从而对国民收入增加产生抑制作用。为了抵消这种作用，政府就应该采用减税政策。此外，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际收入没有变而名义收入增加了。由于赋税是按名义收入征收的，这样，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税收增加，这种税收的增加称为"通货膨胀税"。通货膨胀税增加了个人的税收负担，减少了个人的实际收入，也会对经济活动起到抑制作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实行税收指数化。

补偿贸易（Compensation Trade） 补偿贸易是指贸易双方通过一定的安排，进口方在没有足够外汇的情况下，借助于出口方的信贷从出口方那里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或劳务，在一定时期内，用进口货物或劳务生产出来的产品或其他产品和劳务去偿付进口货款。补偿贸易通常包括三种方式：

（1）产品返销（Product Buyback）。又叫直接补偿。它是指进口方用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叫直接产品）去偿付货款。这种方式比较简单易行，因此在国际上使用比较广泛。但是以直接产品进行补偿，意味着要等进口的设备和货物投产后才能进行清偿，因此，直接补偿的交易期限比较长，最长的可达10年以上，而且交易金额往往也比较大。

（2）商品互购（Commodities Parallel Deal）。又叫换购或间接补偿。它是指进口方不是以直接产品而是用其他商品或劳务（又叫间接产品）偿付货款。由于间接补偿与进口商品的安装投产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无须等到进口的设备投产后再进行补偿，这就使得偿还时间比较短，一般在一年左右。间接补偿贸易多适用于非生产性的设备交易以及直接产品不符合设备出口方需要的场合。由于间接补偿贸易的补偿产品有较大的选择余地，能更好地适应出口方的需要，加上补偿时间比较短，这就使得这种贸易方式有比较广泛的适用性。

（3）多边补偿（Multilateral Compensation）。它是指第三国替进口国向出口国提供补偿产品，属于间接补偿。这种方式适用于进口国与第三国签有支付清算协定而进口国对第三国拥有贸易顺差的场合。

补偿贸易是一种新兴的国际贸易方式，它是在易货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补偿贸易使得贸易与信贷、贸易与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各国生产、贸易、金融业的发展。尽管在这种贸易方式中引入了信贷，但是贸易双方建立起来的还是买卖关系，双方都需要通过货币计价和支付。如果使用了银行信贷，补偿贸易中的某一方还要与银行签订贷款协定。

开展补偿贸易，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从进口方来说，通过补偿贸易可以克服外汇不足所造成的困难，及时利用外国的资金和设备，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增强出口生产能力。通过产品返销，可以促使更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促进外贸的发展。从出口方来说，补偿贸易可以克服进口国外汇支付能力的限制，扩大商品出口。另外，还可以通过产品返销取得国内建设急需的原材料和其他商品。当然，补偿贸易开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对进口方来说，引进的设备往往不是最先进的，而且作价较高。另外，返销产品，尤其是制成品，往往由于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被对方拒收，上述问题都会影响补偿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60年代以来，国际间的补偿贸易发展很快。补偿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在这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进口方，而发达国家则是出口方。国际补偿贸易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有较大的需求，而外汇短缺现象普遍存在，它们就要想方设法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必要的进口。从发达国家来说，各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国内经济状况不妙，甚至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实现经济的正常运行，就要想方设法推销自己的产品。另外，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盛行，如想通过正常的贸易方式扩大出口困难重重，必须为扩大出口另找出路等

等。总之，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的影响和补偿贸易自身所具有的优点，使得补偿贸易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补贴（Subsidies） 通常意义上的补贴可以看作是一种赋税制，就是政府为某种目的而对特定的经济单位或符合特定条件的经济单位给予一定的财政资助。这里我们将要进行讨论的是庇古的补贴或校正的（corrective）补贴，在庇古那里补贴与税收的作用是相互对称的。说它们是校正的，这是因为这种税收与补贴是由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引起的。由于外部性（经济的和不经济的）的存在，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与收益产生某种程度的偏离，征收税收或给予补贴在理论上就可以校正这种偏离。庇古的名字常常与此思想连在一起，尽管他本人的阐述是非常小心的。外部性问题后来在科斯（R · H · Coase）和布坎南（J · M · Buchanam）等人那里得到了更为精细的论述。外部性可能存在于厂商之间，它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之间技术上的相互依赖性引起，甲厂商生产函数中的投入与产出适于成为乙厂商的投入或产出，或者直接地说甲厂商的生产对乙厂商的生产有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非市场的技术性途径传递的。外部性也可能出现在消费者之间。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适于成为另一个人的效用函数的变量。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外部性可能存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厂商的最优行为意指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如果考虑进社会成本与收益，它们也应是相等的。如果不相等、那就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市场失灵是指共同的利润边际并没有被削减完，就是说还可能使更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变得更好而同时又不会使其他人变得更坏。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市场经济中所有这样的机会将消失殆尽。校正税收或补贴的目的在于在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由外部性引起的它与社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裂缝上建起一座桥梁，并使二者达到一致。当然做到这一点在理论上要比在实践中容易得多。上述思想将外部性纳入考虑之中而不是剔除它，正如通过合并而将外部性内部化时必须予以考虑一样。如果外部性不能得以校正，就会带来市场无效率，尽管表面看来是有效率的。校正的方法是通过财政的干预，对外部性受益的一方征税和对受损的一方实行补贴，这一过程也完全可以通过外部性所涉及的双方的直接谈判而进行，当然如果交易费用过高，谈判也会受阻。例如、处在河流上游的工厂A向河流倾倒废弃物，污染了河流。这就增加了处在河流下游的工厂B的净化用水的成本。假定B的净化成本依赖于其选用的方法并随着产品组合和产出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与A的产量与A对其废弃物的净化处理之开支多少密切相关。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设计一种对A征收的税收、使得此税收正好等于A的生产加给B的成本并随着此成本大小的变化而变化。同样也需要模拟一种市场过程。使得A与B进行直接谈判，税收从A转移给B，而不是转向国库。相比于前一种庇古的观点，以科斯为首的交易费用学派更倾向于不直接进行政府干预，所以让A、B直接谈判解决外部性问题。补贴不仅应给予遭受外部不经济的一方，还应给予带来外部经济的一方、从联合的观点来看，最有效率的废品处理系统结构可以是A自行减少其废物排放量或改进净化系统、使得这样减少的收入正好等于原来的征税额度。要不A就得通过分担操作（Operating）成本和建立B的净化工厂的成本来寻求限制损害的办法。这样做会有效率得多。对A、B双方都有益。因为交易费用会大大减少，其结果可以通过鼓励双方谈判或允许它们合并而获得，但靠单向的征税是不行的，通过合并使外部性内部化仅在厂商之间才是有可能的，但谈判适用的范围要广得多，只要所涉及的经济当事人数量不是非常大。但问题在于当事人的数量有时却很大。摩托车手们使得公共交通拥挤不堪，但要以谈判的方式来减少每个车手加给其他车手的外部成本显然是不可行的。其交易费用极其庞大。于是有人提出一些次优的解决方案：对燃料征税，发行执照收费以及制订高速公路规则等。它们至少可以缓解交通拥挤和减少事故、校正税收（或补贴）就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一种次优方案，尽管在实现帕累托最优上还没有实际的途径。相对于其他方法，校正税收最为人们所看重。在河流污染的例子中，如果众多的使用河水或向河流排放污物的厂家进行谈判是可能的、或者制定法则，禁止污染河流，或者干脆禁止为工业目的而使用河水，这些无疑都能消减外部性、但却不能带来事务的有效率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校正税收是另一种重要的选择。另外，考虑各种征税标准也许是合适的。烟草税总是从收益、烟草产品需求无弹性的角度来设计的，但其可接受性还要看对抽烟者带给不抽烟者的外部成本的广泛承认。衡量这种成本的难度使得设计和征收校正税收几乎不可能。这样以禁烟区域部分地禁止成为通常的形式。于是，在我们最初的例子中，如果A和B被带到谈判桌前，但当河边的所有者在法律、风俗和社会传统意义上拥有污染河流的权利或清理流水的权利时，很难有一个结果。这两种制度（Regime）会带来潜在收益的截然不同的分配结果，但在每种制度下可能会产生一个有效率的结果——所有的利润边际被削减完毕。校正税收或补贴是关于后者的，而不是关于交易分益的分配，很简单地说是涉及效率问题而不是平等。

补偿原则（Compensation principle）　新福利经济学的一种关于福利标准检验的理论。补偿原则的实质在于说明，如果一部分人经济境况的改善不会同时造成一部分人经济境况的恶化，或者一部分人境况的改善补偿了另一部分人境况的恶化而有余，就意味有社会福利的增大。补偿原则承认任何一种变革都难免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但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使受损者部分得以补偿。如果补偿后还有剩余，即益大于损，就是社会福利的增大。

按"帕累托最优化"原则，任何社会变革如果只能使一部分人福利增长，而另一部分人福利下降，那就不是社会福利的增大。但事实上在任何变革中总难免有些人会受到损失，如果必需按最优化条件才能进行变革，那就无异于完全否定变革。英国经济学家J·R希克斯（Hicks, John Richard, 1904—）首先发现这个矛盾。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Hotelling Harold, 1895—1973）和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 Roy Forbes, 1900—1978），最早提出补偿原则和福利标准检验问题。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Kaldor Nicholas, 1908—）提出了社会福利增加的"客观检验方法"、"虚拟补偿原则"。卡尔多的补偿原则并非直接使变革的受损者得到补偿，而是说通过税收政策、财政支出政策或价格政策进行调节后，只要受益者的所得大于受损者的所失，就是增大了社会福利，这可叫做虚拟补偿。同年，希克斯进一步发挥了卡尔多的观点，认为只要某种变革提高了生产效率，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受损者就都会自然地得到补偿。政策的改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或然性。在长时间内的一系列政策改变中，这次使这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下次则可能使这部分人受损而另一部分人受益；相互抵消后益大于损，社会福利便增大了。这就是补偿原则中最著名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Karldor—Hicks Criterion）或"卡尔多—希克斯检验"（Karldor—Hicks Test）。不久，美国经济学家席托夫斯基（Scytovsky, Tibor, 1910—）对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作了补充，提出"双重标准"：一方面要看变革后是否可能通过收入再分配使每一个人的境况都比变革前好；另一方面要看变革前是否没有可能通过收入再分配使每一个人都比变革后好。席托夫斯基标准实际上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检验，以真正判定境况是否改善。1949年，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Little, Lan Malcom David, 1918—）重提被卡多尔、希克斯等排除出福利经济学之外的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必须在虚拟补偿上再加上实际补偿（收入再分配）才能成为补充标准，因此提出李特尔三重标准。

补偿需求（Comporsated Demand）　在一个被给定的名义收益下，消费者面临价格变化时，他的效用（或实际收益）水平和他的需求向量一样变化。这种方式被当作对价格变化的补偿，我们称这个需求向量为新价格的"补偿需求"。

补偿需求是价格向量和效用水平的函数，可以这样表示：$x=h(p,\mu)$　(1)，

其中，x、p分别是消费和价格向量，μ是效用水平，h为补偿需求函数或希克斯需求函数，或表示为：$\min p'x$ 条件 $u(x)=\mu$　(2)

这里u是效用函数。

补偿需求函数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性。

(a)希克斯需求规则：补偿表示为h_p的关于p的h的雅可比（Jacobian）矩阵，是希克斯置换矩阵，众所周知，它有如下特征：

$$p'h_p(p,\mu)=0 \quad (3)$$

$$yh_p(p,\mu)y\leqslant 0,\ y\ \text{取任意值} \quad (4)$$

$$h_p(p,\mu)=h'p(p,\mu) \quad (5)$$

条件(3)是同类条件，因为它表示关于p的函数h同o相等。条件(4)和(5)分别是负半定条件和对称条件。上述三条我们称之为希克斯需求规则。

(b)谢菲尔德—萨缪尔森预备定理。(2)式中最小的支出值是p和U的函数，这个函数叫支出函数，说明如下：

$$e(p,\mu)=\min\{p'x|u(x)=\mu\}$$

明显可得：

$$e(p,\mu)=p'h(p,\mu) \quad (6)$$

补偿需求和支出函数间的联系为：

$$e_p(p,\mu)=h(P,\mu) \quad (7)$$

当谢菲尔德—萨缪尔森预备定理被希克斯、萨缪尔森和谢菲尔德发现时，这个恒等式经常被提及。

为证明此定理，可设x^*是一个支出最小向量，它在价格p^*的条件下有μ，如：

$$x^*=h(p^*,\mu) \quad (8)$$

用下式说明收益函数g：

$$g(p)=e(p,\mu)-px^* \quad (9)$$

这和e的说明暗含有$g(p)\leqslant 0$，并且从(6)和(8)可得出$g(p^*)=0$。因此，当$p=p^*$，函数g取最小值为0，所以第一和第二个顺序最小值条件产生为：

$$g_p(p^*)=0 \quad (10)$$

并且得：

$$y'g_{pp}(p^*)y\geqslant 0\ \text{其中}\ y\neq 0 \quad (11)$$

运用方程式(10)可推出(7)。

证明了谢菲尔德—萨缪尔森预备定理，就可以从

中得出希克斯需求规则，从（7）中可得：

$$e_{pp}(p,\mu)\equiv h_p(p,\mu)$$

从此式可推出（5），联系（9）和（11），可证明（4），另外，（6）、（9）和（10）结合可得：

$$h(p^*,\mu)+p^{*\prime}h_p(p^*,\mu)-x^*=0$$

由此，从（8）可推得（3）。

补偿需求的概念在分析普通需求函数中是最重要的，考虑最大值等式：

$$M_{ax}u(x)\text{条件 } y=p'x \quad (12)$$

其中 y 是收入水平，它的解函数 m（p，y）为普通需求函数。用下面恒等式说明间接效用函数：

$$V(p,y)\equiv u\,[m(p,y)] \quad (13)$$

解题（2）是与（12）有联系的支出最小值解题，冯·诺意曼称之为最大值解题的反映或镜像。假如在解题（2）中设 $\mu=v$（p，y），得出的最小支出一定等于 y，并且补偿需求一定同（12）中的 m（p，y）相等，这样，可得：

$$Y\equiv e\,[p,v(p,y)] \quad (14)$$

$$\text{和 } m(p,y)\equiv h\,[p,v(p,y)] \quad (15)$$

由上述恒等式可推出罗伊恒等式：

$$v_p(p,y)\equiv -v_y(p,y)m(p,y) \quad (16)$$

对（14）式中 p 和 y 求导数得：

$$e_\mu\,[p,v(p,y)]\;v_p(p,y)\equiv -e_p\,[p,v(p,y)] \quad (17)$$

$$\text{和 } I\equiv e_\mu\,[p,v(p,y)]\;v_y(p,y) \quad (18)$$

在（17）式两边同乘以 $v_y(p,y)$，然后用（18）、（7）和（15），可得（16）。

根据恒等式（14）和（15）可推出斯拉茨基—希克斯分析，

$$m_p(p,y)\equiv h_p\,[p,v(p,y)]-m_y(p,y)m(p,y) \quad (19)$$

这样，普通需求函数的斜率同适应于收入影响的补偿需求函数的斜率相等。

为证明(19),可对(15)式中 p 和 y 求导数，分别得：

$$m_p(p,y)\equiv h_p[p,v(p,y)]+h_\mu[p,v(p,y)]v_p(p,y) \quad (20)$$

$$\text{和 } m_y(p,y)\equiv h_\mu[p,v(p,y)]v_y(p,y) \quad (21)$$

（19）和（20）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的收入条件不同。把（16）和（21）代到（20），可得（19）式。

在价格变化以后，"希克斯补偿"将消费者保持在价格变化前的效用水平上。莫萨卡（Mosak）指出斯拉茨基有一个不同的补偿实际工资损失的概念。斯拉茨基认为所谓补偿就是"使对曾买过的一样的全部大批的货物的购置成为可能"。当价格变化时，希克斯补偿需求和斯拉茨基补偿需求的影响一般来说不同。当价格变化极小时，它们相等，这个等式叫做莫萨克(Mosak's) 等式。

莫萨克等式在指数理论中起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广泛采用的拉斯佩耶斯（Laspeyres）指数是以斯拉茨基补偿为基础的，它指出了收入的变化，为了去买在基年买过的商品组，本年度必须取得这个收入。在斯拉茨基置换影响下，个体经济境况不坏并且有可能较好，因为他在价格变化前至少还能购买商品组，这样，就会出现"过度补偿"情况，真正反映效用变化的价格指数应该以希克斯补偿为基础。因为效用水平难以观察得到，因此价格指数难以计算。莫萨克等式揭示出价格变化极小时，拉斯佩耶斯指数近似等于"理想的"指数：

$$s(p,x)\equiv m(p,p'x) \quad (22)$$

S 是关于固定资金束 x 的需求函数，s_p〔p,m(p,y)〕为斯拉茨基置换矩阵。当价格变化伴随有收入补偿—它将原始消费束 m（p，y）保持在预算水平上的时候，它表示需求的变化，莫萨卡等式现在可表示为：

$$S_p\,[p,m(p,y)]\equiv h_p\,[p,v(p,y)] \quad (23)$$

为证明这，首先说明函数 W：

$$w(p,x)\equiv v(p,p'x) \quad (24)$$

w（p，y）表示当资金束 x 给定时的最大效用水平，将其求导再代入罗伊恒等式，可得：

$$w_p\,[p,m(p,y)]=0 \quad (25)$$

这样，假如在一定价格水平下的效用最大束碰巧等于资金束，那么效用水平几乎不随着轻微的价格变化而变化，由等式（15）、（22）和（24）得：

$$s(p,x)=h\,[p,w(p,x)]$$

求 P 的导数，联系（24），可以得到（23）。

补偿性财政政策（Compensatory Fiscal Policy）

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 A·汉森、P·萨缪尔森等人在40年代提出的一种财政政策。其基本含义是：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即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税收，以赤字财政来刺激总需求，消灭失业。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税收，抑制总需求，制止通货膨胀。这种政策的基调是"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萧条时进行刺激，而在经济繁荣时又进行抑制，以实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稳定增长。其补偿的含义在于，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财政赤字可以由繁荣时期紧缩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财政盈余来弥补，从而使财政预算在长期中或在整个周期中实现收支均衡。所以，这种政策又被称为"长期预算平衡论"，或"周期预算平衡论"。这种政策的核心是把财政政策作为稳定经济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刺激经济的工具。它虽然不反对财政预算的短期赤字，但仍坚持在长期中或整个经济周期中要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对长期大量的财政赤字仍持反对态度。补偿性财政政策被认为是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发展，它坚持了凯

恩斯重视财政政策的传统，但又主张财政政策不以扩张为基调，而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相机抉择。美国政府在战后到60年代之前基本执行了这种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美国经济在50年代没有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使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因此，6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放弃了这种财政政策，而采取以扩张为基调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赤字财政政策。

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　由工作的非货币特征而产生的工资差别就称作补偿性的或均等化的工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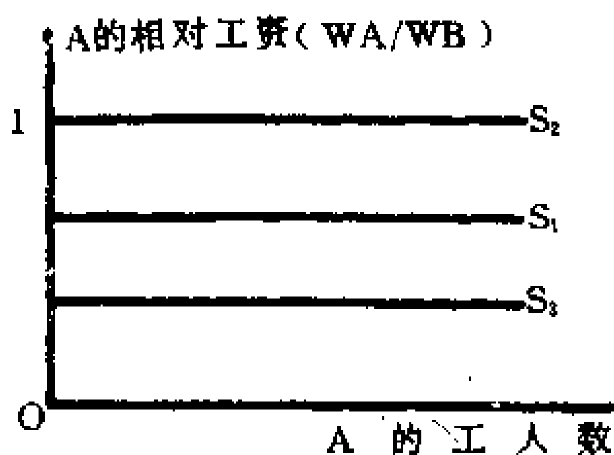


图1

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当非货币特征不均等时，通过工资差别使就业的总体条件均等。究竟哪一种工作将引起补偿性工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将是多大，这最终是由工人的主观偏好所决定的。亚当·斯密是最早研究这类工资决定的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有一整章题为《劳动和股本不同使用中的资本和利润》来叙述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几种有关工人偏好的不同假定来探讨其对补偿性工资差别决定的影响：1.所有工人偏好相同，他们都同等程度地喜欢或厌恶一种工作的特征。假定有A和B两种工作，二者恰好要求等量的人力资本。假如工作特征上不存在相应的差别，A和B的工资就必然相等（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一种长期均衡的情况）。这种情况如图1所示，它表明对A种工作的工人的供给，是A与B相对工资（W_A/W_B）的函数。供给曲线S_1代表偏好相同而且没有工作特征差别的情况，因为在所需技能或工作特征上没有相应的差别，S_1曲线位于相对工资为1（$W_A=W_B$）的地方，又因为偏好同一，S_1是水平的。如果大家都认为工作A不满意，供给曲线就较高（但仍旧是水平的）如S_2所示。提高的那部分工资是吸引人们承受不愉快工作条件所需的差别补偿。如果A工作更令人适意，则结果正好相反，此时A的供给曲线S_3位置较低，而补偿性工资差别则由B工作中的工人获得。2.所有工人都讨厌A工作的某一方面，但讨厌的强度彼此不同。这时工人对A工作的供给曲线将向上倾斜（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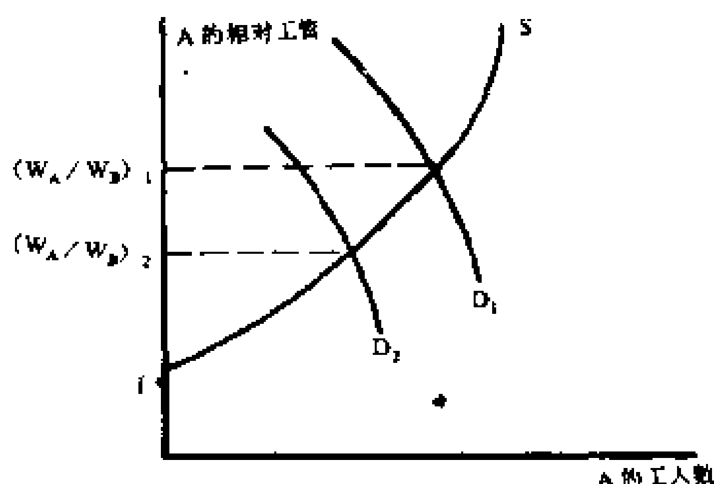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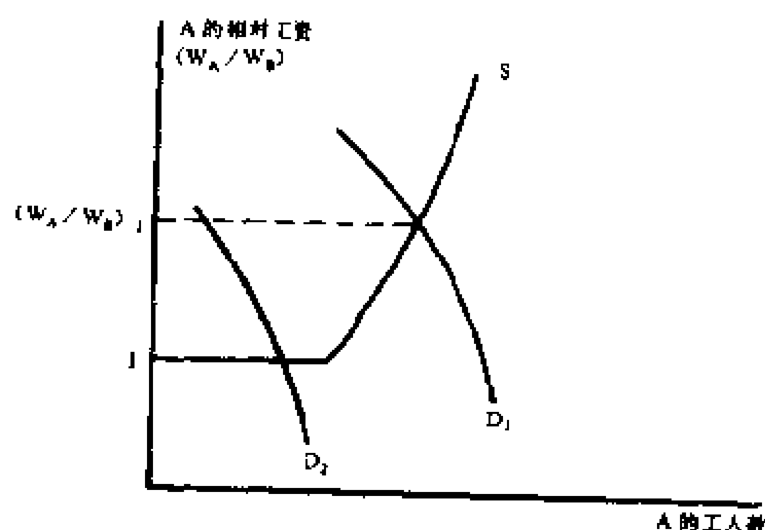


图3

曲线开始处相对工资大于1，其幅度刚好达到足以满足那些对A工作讨厌程度最低的工人。同理，其他的每个工人都包括在这条供给曲线中，在最低工资处，他愿意在A中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劳动力需求曲线肯定会影响均衡工资率，因为要吸引更多的工人，必须有较高的相对工资。起作用的是边际工人的偏好而不是偏好较弱工人的偏好。图2包括两条可能的需求曲线，它对均衡相对工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3.所有工人偏好不同，但有些工人不讨厌工作A，现在供给曲线在相对工资为1的地方是水平的，这说明工人不讨厌A工作；然而对此后的另一些工人来说，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为D_1，那么如图3所示，包括那些不必给予额外补偿的工人在内，所有工人都获得了补偿性工资差额。但是，如果需求小得多，比如在D_2，则显然可以不存在补偿性差额。假如工人对夜班工作、经常出差或各种危险毫不在乎，对带有这些特征的职业就不必支付补偿性工资差额。在这些情况的分析中包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见：如果一种工作

的有关特征发生了变化，补偿性工资差别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其基本机制是供给曲线的移动（如图 4 所示）。假定在工作 A 的现有特征和工人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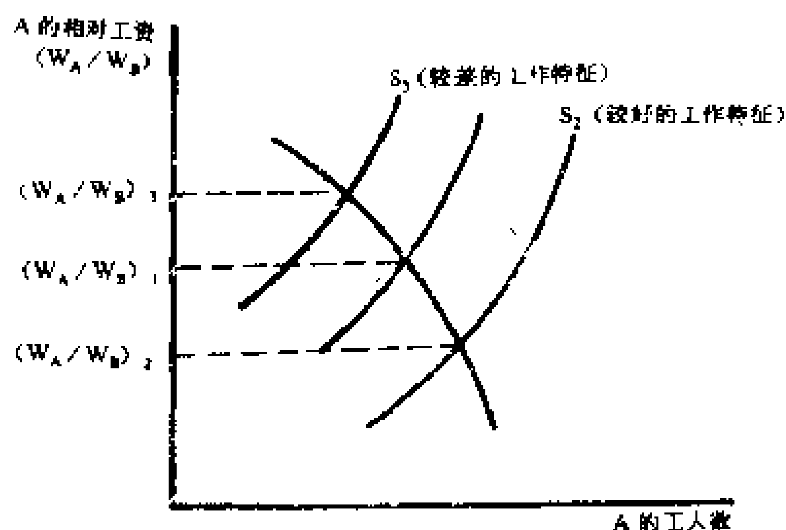


图 4

好给定时，相应的供给曲线为 S_1，相对工资为 $(W_A/W_B)_1$。如果不合意的工作特征有所减少，曲线将外移到 S_2。在每一相对工资水平上，现在在 A 寻找就业的工人比以前多了，相应的均衡工资也降到 $(W_A/W_B)_2$。如果 A 的不利特征日趋严重，则会发生相反的情况。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是由社会提供的对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的保障。无疑这种保障的实践是在一定的原则下进行的。社会保险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及家庭免遭因失业、年老或死亡而在收入上造成的损失，并通过社会公益服务（如教育、医疗保健）和提高家庭经济资助来提高社会居民的福利。在出现社会保障以前，经济收入的保障原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即使经常也由当地的社会或教会提供支助。后来一些救助组织逐渐发展起来，最高的规章是由工匠协会、共济会以及工会所制定的，后来则是根据法律建立的，社会保障可包括社会保险计划、社会保健等与其他的福利事业以及各种维护收入的计划。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有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项目。虽然不同的国家，其社会保障项目不同，但总括起来有以下主要特点：（1）社会保障项目依据法律制定；（2）对于因年老、残废疾病、死亡、孕育、因工受伤或失业而收入减少的个人或家庭提供某些形式的资金支助，以补偿其部分损失。（3）通过诸如社会保险和社会资助等手段向个人提供救济金和其他福利性服务。社会保险项目的资金全部或大部分都由工人或工厂主交纳，而并非来自政府正常的财政收入，但有时政府部门也提供部分金额。所有这些款项通常以专门的基金加以管理，全部救济金即由基金来支付，救济金的额度是根据法律规章而不是个人需要。享用的资格来自个人交纳或是此人工作于该保险项所包括的部门。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大部分社会保障计划都采用社会保险的方式。社会资助项目是社会保障的另一主要手段，它的救济金的发放仅限于那些低收入者或有急需的人，因而需对个人作调查。此项救济金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

社会保障方案（Social Security Programme） 是一种保障公民免于经济危难和生活困苦的经济计划。最普通的形式是对老年人，退休者，病人，伤残人，靠别人供养的人，老年妇女，失业者，工伤者和困难家庭提供救济金。在不同国家中，此种计划的资金来源和行政管理方式以及救济的范围、救济金的额度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近代最早的社会福利法律是由德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颁布的，当其他国家制定类似的计划时，一般都对救济的条件，保障危难的界定两方面向更广泛的范围发展。社会保障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应保障的各种危难、应保障的人口、合格者的标准、救济金的水平、财务形式以及行政管理程序等等。所有这些在实践中常常大相径庭，特别是合格者的标准经常包括一个时限，它规定了参与或适用计划的特定时限。项目资金的来源通常是参与人员或企业主或二者按规定的数额提供，或由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支付部分或全部份额。社会保障方案最常见的各种形式可以归纳如下：（1）年老、残废及家庭方案，救济金的发放对象是无能力或不适于从事有收益的工作者、永久性残废而不是工伤者且未受到其他医疗计划保障的人，以及死亡工人的家属。这个计划一般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普通保障，资金额度为基本工资的 30—60%。（2）失业救济金方案，这在工业化国家是普及的，在发展中国家较差。对于正常受雇佣的工人不是由于个人过失而失业，且愿意而能继续工作而又无工作者通常提供限于基本工资 50—75%的救济金，发放有一定的期限。典型的方式是由雇主或工人或者二者缴纳的强制保险金项目支付。（3）医疗方案，此项目最有争议，适用范围包括全体人员，救济金可包括医疗以外的工资损失补偿。（4）家庭补助救济金，由政府向养育超过一定数额的孩子的家庭提供。（5）工伤补偿包括医疗支出、工资补偿，肢体永久性损伤的特别赔偿和死亡救济金，它的历史最悠久，适用范围最广。（6）旨在帮助其他项目未包括的穷人、盲人、老人、多子家庭等的公共救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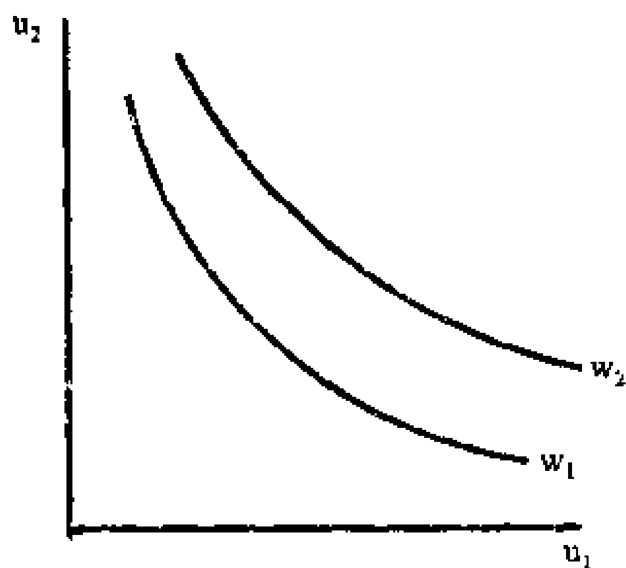
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 是表达社会福利水平及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式。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社会的福利状况是由个人的

福利推演而来。在福利经济学里，福利与效用是同义词，这是基于以下假定：(1) 每个经济行为人都是福利的最佳判断者；(2) 状态甲和状态乙中，如果A人偏好甲，则甲给A的福利就超过了乙给A的福利；(3) 每一个经济行为人都按其偏好决定其经济行为。这样社会福利函数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福利与个人效用的一个函数关系式。由于福利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所以社会福利函数本身就代表一种社会整体的评判标准。而社会的偏好是由个人的偏好而来，如何从个人的效用或个人偏好得出社会福利水平或社会选择，在福利经济学里有不同的意见。

1、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社会福利函数的分析方法最早是由伯格森（A Bergson）于1938年提出，又经萨缪尔森（P.Samuelson）1940年加以完善和发展而成为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假定社会有几个成员。U_1、$U_2\cdots\cdots U_n$ 分别代表这几个成员的效用水平，那么社会福利函数就是几个社会成员效用的函数，即：

$$W = W(u_1 u_2 \cdots\cdots u_n)$$

W是社会福利，被认为是实际价值函数。它可以根据社会大多数人的偏好导出，这就是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一般形式。这个函数是反映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即在社会福利最大时，两种消费品的任何组合都使个人满足程度没有差异，或两种生产要素的任何差异都使生产效率没有改变。且通常被认为是严格拟凹的（如图）。图中表示两个人，其效用为U_1、U_2时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图示。在图中W2代表的福利状态优于W1代表的福利状态。W1和W2线都是效用无差异曲线。伯格森和萨缪尔森都采用序数效用，效用是无法量度和不可比的，而只是有序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福利函数就是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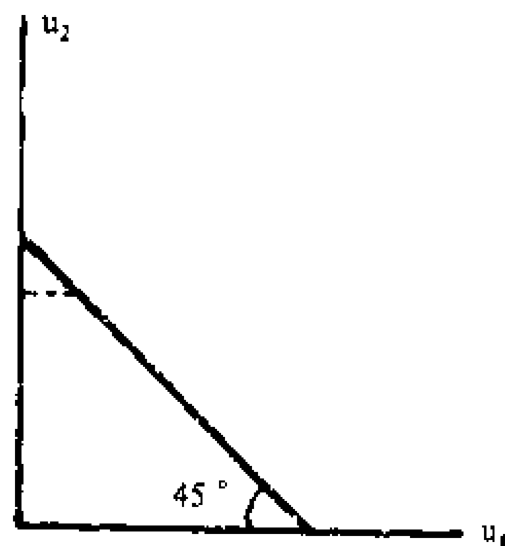


2.古典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边沁就曾提出过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目标，直到庇古（A.C.Pigou）那里，个人的效用还是基数的，即效用是可以测度也是可以比较的，这样，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就是个人效用的总和，即可表示为：

$$W\,[u^1(x_1)\cdots\cdots u^n(x_n)] = \sum_{i=1}^{n} u^i(x_i),$$

其中，$i=1\cdots\cdots n$。

这是后人根据庇古的论述总结出来的，$u^i(x_i)$表示第i人的效用水平，x_i是一组商品组合。显然，古典主义的效用函数是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的特例。其图示是一条直线（假定只有两个社会成员的情形）。



3.罗尔斯（J.Rawls）的社会福利函数。罗尔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公平问题。他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是社会各成员不知道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每个人都尽力避免对自己最不利的状态，但又无法消除这种不利状态发生的可能性。他认为最好的社会状态是在各种社会状态下、个别福利最小者的福利达到最大的那个社会。根据这种观点：某一社会状态下的社会福利依赖于社会中最为不利的人的福利和效用水准。这样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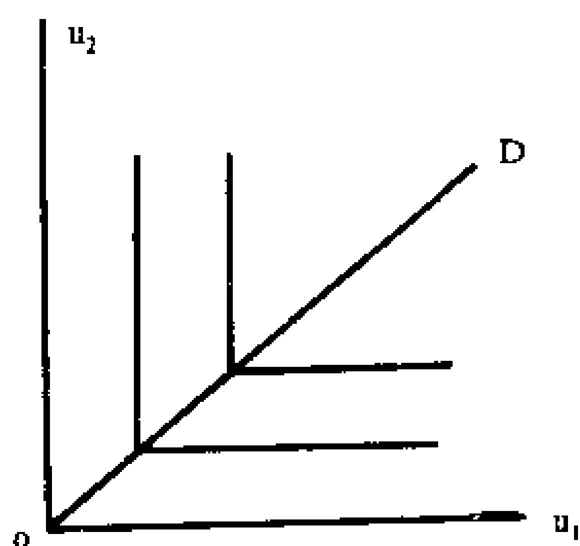
$$w\,[u_1(x_1),u_2(x_2)\cdots\cdots u_n(x_n)] = \min\,[u_1(x_1),u_2(x_2)\cdots\cdots,u_m(x_m)]$$

若 $w\,[u_1(x_1),u_2(x_1),\cdots\cdots u_n(x_1)] \geqslant \min\,[u_1(x_2),u_1(x_2),\cdots\cdots,u_n(x_2)]$

则前种社会状态比后种社会状态更为社会所偏爱。在这里效用也是可以测度和进行人际间的比较的。在假定只有两个人的社会里、OP为社会福利曲线（见图）。实际上一个社会有可能出现效用最差者的效用相等的情形，塞思（A.Ksen）认为这时按效用第二差者的效用来衡量，如第二差者的也相等，就补充第三差者，如此等等。福利经济学家们证明，罗尔斯的效用函数不符合帕累托条件，以此来判断：假定一经济政策使除了原福利最差者外，其他人的福利都有很大改善，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

4.个人偏好与社会选择。从个人偏好如何得出社会的最优选择，这同样是社会福利函数所必须解决的

问题，从社会各成员的偏好到最终的社会偏好有多



社会福利曲线

种方式，如可由独裁者决定，或由社会成员大多数选票决定等，但所有可能的方式都不一定是合理的，可接受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就是为解决这样一个社会选择问题而提出的。人们通常将满足阿罗关于社会偏好应满足的五个公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称为社会泛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al），而柏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这种社会泛福利函数的一个特例。

5.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是指在可能的社会状态集合中找出一个最佳状态；在资源与技术的限制下使社会福利最大的收入分配状态，

目标函数为：
$$\max \quad w\left[u_1(x_1),u_2(x_2)\cdots u_n(x_n)\right]$$

约束条件 $\sum_{j=1}^{n} x_i^j = \overline{x_i} \quad j=1,2,\cdots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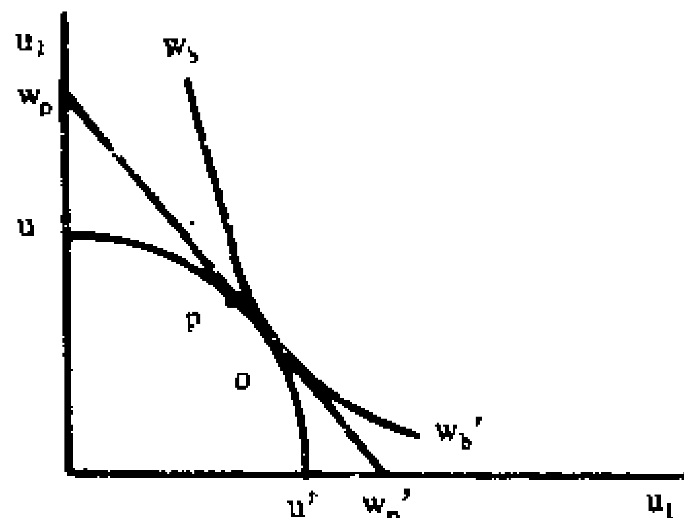
其中，$\overline{x_i}$ 是第 i 种资源总数量，x_x^j 是 x_i 资源的第 j 用途。

假定社会福利函数和个别效用函数都是可微的，且有内部解，我们用拉格朗日函数方法
$$L\ (x_1x_2\cdots x_n,\lambda_1,\cdots\lambda_n)=w\left[u_1(x_1)\cdots u_n(x_n)\right]+\Sigma\lambda_i(\overline{x}_i-\sum_{j=1}^{n}x_i^j)$$

可以根据极大化的一阶条件导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为：
$$\frac{u_i^j(x_j)}{u_h^j(x_i)}=\frac{\lambda_i}{\lambda_h} \quad h,j=1,2,\cdots k \quad k<n$$

和：
$$w_j(\cdot)\cdot u_i^j(x_j)=w_j(\cdot)\cdot u_{i(x_i)}^j j,\ \overline{j}=1,2\cdots\cdots n$$

λ_i，λ_h 为拉格朗日指数，$W_j(\cdot)$为社会福利．上面两式中第一式是帕累托最优化条件，第二式表示消费者对第 i 种消费而产生的边际社会福利都相等。这就是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的条件，用图表示就是效用可能线与社会福利曲线的切点（下图），UU' 是效用可能线，表示社会福利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与福利曲线 W_bW_b' 切点 O 为社会最大福利点。P 点为古典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福利点。



社会性费用（Social Cost） 由于企业垄断性行为或企业间过度的、不适当的竞争造成从社会角度看资源的浪费。垄断性行为的危害主要是破坏了价格在合理分配资源上所起的作用，阻碍了资源随供求关系的变动而移动。可能出现两种情况：（1）某产业部门存在过剩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存在供过于求状况。比如说，这个产业的市场规模只需存在 5 个处于最佳规模的生产线，这些生产线又分布于若干企业。但实际上这个产业在这若干企业中存在着 5 个以上的生产线，比如说 6 个或 7 个。生产线的数目超过了市场的相对规模（市场容量／最佳规模）。如果这些企业都无法控制价格，在市场上竞争，则必然使这个产业的价格下跌，利润减少，这种情况本应使一部分资源从这个产业退出去。但是，由于该产业是一个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的产业，有可能公开或暗地里达成价格协议，限制产量，避免竞争，使这些企业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不出现资源移动的状况。但各企业的开工率都要下降，使设备、资金、人力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显然是一种社会的浪费。（2）反过来，当某个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不足，也就是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生产线数目小于市场的相对规模。如果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资源应向这个产业部门移动，增加生产线的数目，但由于种种进入壁垒的存在，新企业难以出现，原有企业又可安享超额利润，而缺乏增加生产线的动力。前者是资源分配过多，而不流出；后者是资源分配不足而不流入。这些都是对价格机制的阻断造成的不良后果．显然，垄断也阻碍了价格机制将资源向高效率的企业分配的作用。更为甚者，一旦垄断价格形成，企业间的价格竞争就不存在了，寡头企业在产业中的地位就相对稳定下来。竞争的压力会大大减小，改善经营管理和推动技术革新的动力亦相应

减弱。这些都是从社会角度看不希望发生的状况。以产品质量、设计和推销为内容的过度的、不适当的非价格竞争也会造成社会的浪费。就产品质量和设计的竞争而言，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有意缩短商品寿命周期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过频的产品改型，使许多有用的社会财富成了垃圾，造成很大的社会浪费。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企业用于广告、宣传的费用之大也令人瞠目。据1968年统计，西德全国企业的广告费累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87%，瑞士、美国占2%，日本占1.04%。这种过多的推销费用，尽管从某企业的利益上看或许是迫不得已的，但从宏观经济效益上看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社会项目评估（Social Project Appraisal）　以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为对象，进行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和比较，目的在于使社会净收益最大化。社会净收益＝收益－成本。所以，社会项目评估也称"成本—收益分析"。它是一国政府指导和评价资源配置的方法。政府可以通过估量一系列可能项目的可预见结果，来支持那些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投资。社会项目评估于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于50年代获得了较大发展，进入60年代以后，其他国家才开始采用，60年代后期又被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此后，项目评估技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理论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社会项目评估是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其基本思想是：任何一个项目的实施通常都会改变初始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福利水平。如果一个项目实施的结果可以改善经济状态，增进社会福利，则该项目就值得实施，否则就不值得实施。由于外部条件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影响，企业利润和社会收益之间，当前的收益和成本与未来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着差别，因而，在进行项目评估时，首先要选择可恰当地衡量社会净收益的影子价格，社会的贴现率或整个社会的资本机会成本。社会项目评估的一般情况是：通过全面系统地分析项目的"投入"和"产出"来估计其成本和收益，从而求出净收益；然后对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人的净收益用"贴现因子"和"分配权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加总，求出项目的"净社会现值"；最后根据净社会现值大小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项目。计算项目社会价值的公式包含4项基本要素：①项目所增加的产出和投入，即$\triangle X_{jt}$、$\triangle Y_{jt}$；②评估产出和投入的价格，即PX、PY；③从时间方面调整收益的贴现因子b_t；④从收入分配方面调整收益的加权因子a_j。其具体计算过程是：将项目的净收益定义为项目在所有时期对所有个人的收益减去它在所有时期对所有个人的成本。

$$V=\sum_j\sum_t(B_{jt}-C_{jt})$$

式中B_{jt}、C_{jt}分别代表在t时期对j个人的收益和成本。进一步假定，项目的规模相对于整个市场很小，其实施不会影响现存的价格体系；项目发挥作用的期限相对短暂，在该期限中现存价格体系不会发生变化。则第j个人在t时期得到的收益，就等于他在该时期得到的项目产出增量（$\triangle X_{jt}$）与产出价格（PX）的乘积；其损失的成本，等于他在该时期对项目的投入增量（$\triangle Y_t$）与投入价格（PY）的乘积。于是，净收益公式可具体地写成：

$$V=\sum_j\sum_t(P_x\cdot\triangle X_{jt}-P_y\cdot\triangle Y_{jt})$$

但是，这种对个人净收益简单的加总还不能真实地反映项目的社会价值。因为从社会角度看，一方面，同一笔收益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价值；另一方面，同一笔收入在不同个人的手中也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需要分别对不同时期的净收益和不同个人的净收益进行调整。即通过贴现因子b对每一时期净收益进行"贴现"，使其转化为以当前时期收益计算的净现值；通过加权因子a对每一个人的净收益进行"加权"，使其转化为以社会价值水平计算的净社会收益。从而得到准确反映社会福利变化的，反映项目全部社会价值的项目评估的一般公式：

$$项目社会价值=\sum_j\sum_t a_j b_t(P_x\cdot\triangle X_{jt}-P_y\cdot\triangle Y_{jt})$$

式中，j个人的分配权数$a_j=\frac{\bar{Y}}{Y_j}$，其中$\bar{Y}$是社会平均收入，Y_j是第j个人的收入；t时间的贴现因子$b_t=\frac{1}{(1+r)^t}$，其中r为社会贴现率，表示社会对不同时期的净收益所赋予的不同重要性。因而，也可将项目评估的一般公式写成：

$$项目社会价值=\sum_j\sum_t\left(\frac{\bar{Y}}{Y_j}\right)\frac{P_x\cdot\triangle X_{jt}-P_y\cdot\triangle Y_{jt}}{(1+r)^t}$$

如果它大于零，则项目值得实施，否则便不值得。如果多个大于零的项目是互相排斥的，则应选择能够获得最高社会价值的那个项目。

社会必要技术（Socially Necessary）　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试图对原有的技术的选择和技术创新过程进行透彻分析时所用到的，所谓社会必要技术是指这样的技术，它被这样的生产者使用，它们的经济活动决定正常的生产费用，从而决定正常的价格。这些生产者以及它们所使用的社会必要技术可能会因为市场结构的不同而不同。而市场结构本身会受到技术、新加入者以及竞争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影响，由于社会必要技术通过被生产者的使用而决

定正常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因而也叫做支配性(dominant)技术。在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部门，新加入者的参与并获得技术就比较容易，那么大部分生产者就使用社会必要技术，且它们付出同样的生产成本，获得同样的产品价格。而在集中程度比较高的部门，新的加入就受到很大的制约，对技术的获取困难重重，甚至彻底被限制，这时起支配作用的一小撮厂商成为价格的领导者，那么社会必要技术就是被这些厂商所使用的。马克思用社会必要技术来分析正常的价格决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决定价格的支配性技术并不必须是技术上具有决定性的，一项更好的技术也许被很有限的生产者使用，使它们成为超额利润的获得者，但并不足以影响现行的价格决定，因而也就不构成社会必要技术，相反一些老朽、过时的技术仍然被使用，由于处在其供给价格之上的收益率低于一般利润，因而它们已不再被开发生产，但它们仍产生正的准租，且只要对它们的需求存在正的准租就值得获取，这样有时也会成为社会必要技术。显然社会必要技术是一个抽象的经济学概念，而不是技术概念。

社会成本 (Social Cost)　社会成本的基本观念是非常简单的，这就是一个人的经济行为并不是他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或取得他带来的所有的收益。他自己承担的部分叫私人成本，他自己所无法承担的部分叫外部成本。这两部分的总和就叫做社会成本。私人成本是指实现一项计划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私人(或厂商)被看作是进行最优化选择的，而每一种选择都会有牺牲，私人成本就是这种最佳选择的必要的放弃。但一个人的活动常常超过自己的财产权力界限，这就是外部性问题。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个人实际承担的成本即私人成本并不等于他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全部成本，他常常给他人造成某种损失，这部分损失并不计在自己的成本里面。构成外部成本。所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是由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所造成的。比如一家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的私人成本为 50 万元，但与此同时它给周围的其他工厂和居民造成各种污染，给它们带来 5 万元的经济损失，这一部分损失并不计在化工厂的生产成本里面，而是作为外部成本存在，那么化工厂生产的社会成本就是 50 万元+5 万元＝55 万元。所以社会成本也可以理解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经济行为人的一项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全部成本。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一部分由他自己承担，另一部分则由他的经济活动影响到的其他人承担。社会成本问题的分析由来已久，在早期的福利经济学里，庇古 (A · C · pigou) 就曾分析行进的火车给路旁庄稼造成损失，且按他的福利标准，铁路公司应赔偿庄稼主人的损失，也就是承担它的外部成本，这个过程由国家对铁路公司征税和对庄稼主人进行补贴来完成。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就存在着市场失灵，因为市场只能解决私人成本的决定问题，而对外部成本从而对社会成本无能为力。这是交易费用学派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按照他们的主张，社会成本的决定可以由当事人之间谈判或明确产权等手段来解决，这就克服了早期福利经济学中关于社会成本的数量界定上的困难，克服了国家对私人经济的不正当干预。

社会选择 (Social choice)　现代社会选择理论最早是由阿罗 (K.Arrow) 提出的。它主要是研究个人兴趣、判断、幸福 (well—beings) 的总体如何形成总体的社会福利、社会判断、社会选择的观念。很显然，不同人的个人兴趣、伦理、政治判断与社会福利标准、社会决策（什么应去做，怎么样的结果可以接受）截然不同。而后者必须来自于前者，那么后者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正是社会选择理论所要探讨的。

1.福利经济学与社会选择，阿罗对社会选择的分析借用了福利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伯格森 (A, Bergson) 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简写作 SWF)，SWF 可以理解为定义在不同社会状态集合上的真实价值函数。此后萨缪尔森 (P.Samuelson) 对 SWF 作了重要发展，他利用 SWF 应满足的几个条件（包括帕累托条件），要求个人对不同社会状态的一致的偏好会产生相应的不同社会状态的社会偏好。如果 n 之集合个人偏好序叫做一个面我们将萨缪尔森.伯格森的研究看作是单面的，他们没有进一步研究社会偏好与个人偏好这两面相互一致性问题。阿罗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阿罗将社会福利函数定义为表示任一给定的个人偏好序与由此而来的社会偏好序二者的关系式，并进而提出他的福利函数应满足的条件：①条件 I，独立于无关选择性，假定 A、B、C 都是适用的选择，社会选择 A，拒绝 B、C，如果 C 不再是适用的选择，社会从而选择 B，拒绝 A，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正确的。②条件 P 为帕累托原理的弱条件，要求个人对两种社会状态一致的严格的偏好序必定反映在同样严格的社会偏好序之中。③条件 U 为非限制定义域条件，即福利函数的定义域包括所有逻辑上可能的个人偏好序。也就是说，不管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个人偏好序，福利函数都有确定的社会偏好序。④条件 D，非独裁性，如果当且仅当只有一名成员选择 A 拒绝 B，社会就选择 A 拒绝 B，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正确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说明如果个人集合是有限集合且存在至少三个以上的不同的社会状态，那么得出一个具有完全有序性且能同时满足条件 U、I、P、D 的社会选择是不可能的。阿罗不可能性

定理是现代社会选择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这里有必要解释清楚社会偏好与个人偏好，社会选择行为有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对严格社会偏好的 Xpy（x 比 y 更比社会所偏好）就有不同解释；如 xpy 可表示社会对状态 x 的判断好于 y 状态，这个判断可以看作是个人判断通过某种社会机制而转化成的总和判断，xpy 也可以表示为对于一对状态（x、y），只有 x 必须被选择，还有的解释是在任何包括 x 的集合中，y 肯定不会被选择，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包括了所有的解释。个人偏好序代表个人幸福程度（well—being）的排列，如果是这样，社会选择就可以看作是个人幸福的某种总和；方式有集体商议、投票、独断等。阿罗的工作是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福利函数理论的发展，如果将个人偏好序视为个人效用排列，那么社会偏好就是对社会福利的判断。但不可能性定理说明，个人效用序列无法达到满足前述四条件的社会福利判断。个人偏好序可以看作是代表个人幸福（well—being）序列，如果是这样，社会选择就是对个人幸福的总和，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使得福利经济结构的存在缺乏它必要的基础。

2.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发展，从阿罗 50 年代的探讨之后，经济学界对不可能性定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重点在对阿罗所提出的几个条件进行重新考察。有一些人的研究表明：给定非限制的定义域和非独立性。所有允许的社会福利函数即会有一个强加的不考虑个人偏好的社会选择序列，也会有一个独裁者。还有的人通过弱化集体理性的要求来研究社会选择，即社会选择必须建立在具有完全性、反身性、传递性的社会偏好序的条件被弱化的基础上。如果仅考虑严格社会偏好的传递性，阿罗的条件就可以同时被满足，社会选择的不可能性就不存在。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另外一个拓展途径是弱化社会选择必须是双数的（binary）的要求，即社会选择不一定严格要求是代表双数关系的。

3.社会选择中的多数投票问题。假定有三个人，每个人都面临同样三种选择 X、Y、Z，每个人的偏好序或效用序为：

$u_1(x)>u_1(y)>u_1(z)$

$u_2(y)>u_2(z)>u_2(x)$

$u_3(z)>u_3(x)>u_3(y)$

如果每人都按自己的偏好进行投票，最终不可能产生由多数票决定的社会选择。因为有 xpy（x 偏好于 y）、ypz、zpx。这就是投票悖论。要解决多数投票的传递性（既有 xpy、ypz 则必有 xpz）问题，就要求偏好序须是单峰型的。即在平面座标图上标出的偏好序只有一个峰。也就是说是单调增或单调减的，并且在投票者是偶数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个具有传递性的社会偏好。上面讨论的是二维空间的情形，那么在多维空间会怎么样呢？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单峰型与多数投票的传递性或准传递性联系主要是在一维（unidimensiond）选择集合的情况下存在。如果选择可以排列，效用函数具有给出这种排列的单一峰，多数投票在逻辑上是可接受的。但如果选择表现在一个平面上，效用函数在此平面上具有单峰，多数投票在逻辑上基本是不可接受的，存在一个社会选择的循环问题。

4.可操作性与执行问题。投票过程的各种问题产生于投票者非诚实投票的决策机制之操作的可能性。当投票过程是投票者不按自己的真实偏好进行时，就存在一种对投票过程的操作行为。理论界对无处不在的操作的可能性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形成了 70 年代由吉伯德（A. Gibbard）和萨特斯怀特（M.A.Satterthwaite）提出的“操作定理”。这个定理说明：每一个至少有三种结果的投票方案肯定是可操作的。吉伯德将他的定理建立在另一个说明一般博弈形式（game form）的定理之上。博弈形式并不限制个人对社会状态顺序（也就是选票）的选择，每个人的策略集可是任何一个信号集。吉伯德认为不存在至少有三种可能结果的非独裁的博弈形式，这种博弈形式是坦直的（straightforward）。在这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有一种主导策略，它就是关于他的针对各种结果的偏好序的策略。而与其他人的策略无关。这样就每一个非独裁的这样的博弈形式，至少有一个人没有针对结果的偏好序的主导策略。于是就有他的定理：如果投票方案是非操作的；那么每个人都应有主导策略；即是根据他们的真实偏好的，而与他人的所做所为无关。由于主导策略的存在是不能建立的，诚实的主导策略的存在也是这样。萨特斯怀特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此后人们对上述定理作过许多其他表述，对诚实地显示偏好的集中讨论逐渐让位于对均衡及其执行的讨论。如果社会选择的目标是在达到适宜结果意义上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所讨论的就应是有效机制是否存在而不是策略检验机制。

5.效用，补偿与公正问题。在阿罗那里个人间的效用不存在可比性，尽管在福利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对效用的个人间比较进行过探讨，但这一点并没有被正式的社会选择理论所继承。早期福利经济学关于个人效用损失的补偿在于人间不存在同一效用标准时就受到限制。另一个关于效用的个人间比较的是对公正的研究。这里个人所享受的益处由他拥有的商品组合与别人的进行比较来进行判断。如果没有任何人对他人所享有的商品更偏好时，公平就算实现了。但这种“非羡慕”的公平标准是存在局限的，个人益处不仅来自于商品，而且来自于非商品因素，如健康、美貌

等。而后者无法在个人间转移，公平就难以实现。上面所述的是传统福利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的重要区别。

6.社会福利泛函数，阿罗所用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和相关的集体选择法则形式都不能提供一个比不可比的个人效用序列更好的效用信息，社会福利泛函数的提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福利泛函数可以写为 $R=F[(u_i)]$，对于每一个效用函数集 $U_1\cdots\cdots U_n$（n 个人的效用函数）社会福利泛函数 f 决定一种社会偏好序 R，但由于社会福利函数可以作名义上的变动（各种形式没有实际的不同），任何一种社会福利泛函数必须满足不变性要求。如果两个 n 维效用 (Ui)，(Ui＊）在信息上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则有 $F\{(u_i)\}=F\{(u_i^*)\}$。效用的度量与比较的假定形式可以通过对这种不变性要求特定化而形成。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福利泛函数的特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可以重新表述成社会福利泛函数的形式，效用基数不可比性。

7.自由与权力，社会选择理论自从阿罗加以系统化分析之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的研究领域不止前面所表述的那些。在社会选择中自由与权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由于早期社会选择理论在效用信息上的局限性，近年来的一些文章采用非效用的分析方法，对自由问题的研究就是这样。自由被认为是在确定的纯粹的个人问题中，个人有根据其所好行为的权力，在确定个人自由的区域问题上正形成个人定义域、保护圈等许多观点。在这个领域的一项研究成果已引起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帕累托原理与加在非限制定义域上社会选择的关于自由的确定、最小化条件的冲突。

8.总结：社会选择理论发展到今天，其内容十分丰富，对社会选择理论的总结会有不同的方法，前面的分析中，是将社会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提出来加以说明，各个问题之间存在交叉的内容。实际上对社会选择理论可作两种看法：首先它是一个研究领域，在此领域中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个人偏好的总和方法，以更广泛意义上讲，社会选择理论就是研究这种总和方法的领域。其次社会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但不仅为经济学研究，而且为政治学研究带来很大方便。社会选择理论长期以来一致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完全与不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 and Im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市场是两种不同的市场结构。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具有以下特征，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差别并具有无限可分的性质；有众多的买者与卖者，任一个买者与卖者对于商品的购买量或出售量都只占整个市场商品数量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任何一个买者与卖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他们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单个购买者或出售者所面临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具有无限大的弹性，表明在既定价格下，买者可以购买任意数量的商品，卖者可以出售任意数量的商品；众多购买者所形成的市场需求与众多个卖者所形成的市场供给决定商品的均衡价格；商品的价格等于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生产要素的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收益产量；常数的规模报酬；不存在外部性；经济活动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厂商和消费者可以自由进出市场；买者或卖者都不存在勾结行为。只有具备以上条件的市场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市场结构，以上条件只要有一条不具备便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例如，一旦卖者与买者数目很少，就可能形成垄断，单个人对于商品的价格就会产生影响。若商品有了差别，即使是同种产品的商标牌号差别，也会使消费者对某种商品产生特殊的偏好，从而使该种产品产生垄断力量。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比完全竞争的市场复杂得多。就卖方来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是某种商品市场存在一个卖者的垄断；也可以是几个卖者的寡头，还可能是许多卖者的垄断竞争。就买方而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是只有一个买者的独买，也可以是只有几个买者的寡头买者，还可以是有许多买者的垄断竞争。

经济学家把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是要探讨不同市场结构下资源配置的效率。完全竞争的市场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描述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也被认为是理论上比较完善的模型。这一模型存在着满足各个生产者最大利润与满足各个消费者最大效用目标的均衡解。完全竞争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但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是不完全竞争状态。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包括多种复杂的情况，因此描述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资源配置状况的模型就具有很多种。

古诺模型、斯威齐模型、张伯仑模型等都是描述不完全竞争市场状态的模型。由于这些模型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探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状况，因此模型的假定与结论都是不同的，不象完全竞争模型那样有一个统一而完美的形式。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一般均衡理论来分析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假设的合理性以及解的存在性都存在问题。近年来经济学中发展了博奕论来分析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状况，这种理论的重大优点是它的理论结构既能解释完全竞争的状况，又能解释不完全竞争的状况。从而为

市场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基础性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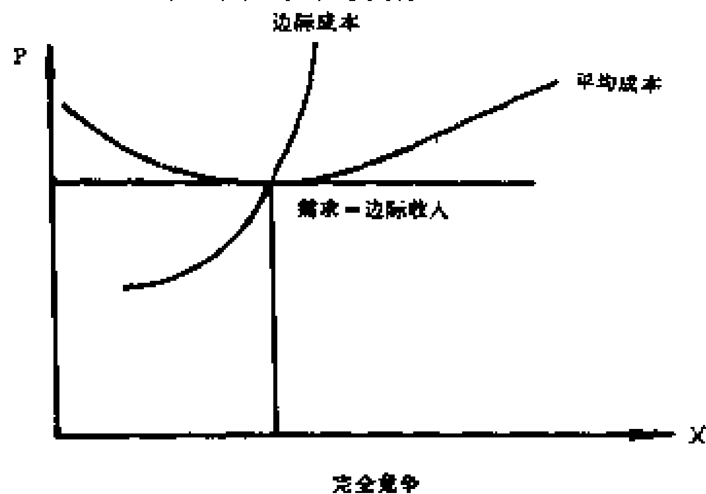
完全成本定价（Full Cosr Pricing）　参阅平均成本定价（Average Cosr Pricing）。

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　在经济学中，完全信息是指对一个人的经济环境具有完全的知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对经济的各方面具有完全的知识。一个人不可能对经济的各方面具备完全信息的限制条件并没有妨碍经济学家运用完全信息这一概念来构造经济模型。事实上，完全信息的概念是服从于经济学家所构造模型的结构、模型的解的要求的。对于某些模型来说是完全的信息，对于另一些模型来说不一定是完全的信息。例如，对于一个静态的确定性的交易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说，完全的信息是指交易中的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已的偏好，以及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每一个人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没有任何人能够操纵价格因此可以了解市场价格，只要具备这些信息条件便具备了交易均衡所需的完全信息，因为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构造超额需求函数，借助于价格机制便可以求得均衡解。这种静态的确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具备的完全信息对于不确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说就不是完全的信息，对于不确定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说，还要具备额外的信息，例如对于不确定性情况下、各种情况变化的概率要了解。用不同的方法构造经济模型所要求的完全信息也是不同的，例如，在用博奕论来描述经济行为时所要求具备的信息不同于通常的一般均衡模型所要求的信息，在博奕论中不仅要求每一个博奕论者了解自已的策略，了解对手的策略，还要了解一旦自已的策略发生变化后对手对于自己策略变化所作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对自已的影响，它所要求的信息量是较大的。市场结构不同，模型构造不同，信息要求不同，模型分析所产生的结果就会有差别。对于分析资源有效配置的模型来说，信息要求的差别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别，这些已被许多经济学家的分析所证明。

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　一个市场结构如果具备以下条件，就是完全竞争的：(1) 存在大量厂商，每个厂商掌握该市场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份额，为数众多的买者和卖者都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决定者；(2) 所有卖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对买者来说没有任何差别；(3) 所有资源都可以自由流动，进入或退出市场；(4) 对于现行价格和现时出价，厂商和消费者都掌握完全的信息，他们都利用每个有利机会，分别增加其利润和效用。

条件 (1) 保证了在买者和卖者大量存在时，单个厂商可以在不明显改变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扩大或降低其产出水平；单个买者可以在对价格没有任何有感影响的情况下，增加或减少对商品的需求。条件 (2) 表明，就厂商而言，一个厂商的产品与另一个厂商的产品是无差别的，因而消费者没有任何理由偏爱某一厂商的产品；就买者而言，消费者的相同性保证厂商将以最高出价出售商品。条件 (3) 保证，在长时期里，资源在各种可选择的占用之间，无限制地流动，并且总是流向产生最大利益的占用。条件 (4) 坚持市场和双方都掌握完全的信息。由于产品是同质的，因而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唯一价格，必定是现行价格。以上条件表明，如果单个卖主对市场价格和其它卖主的行动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则卖主之间就存在完全竞争，每个卖主象对外界毫无影响地行动。买主之间的完全竞争，必须坚持同样的条件。如果市场上的卖主和购买者双方都存在完全竞争，则这个市场就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新厂商能够并愿意加入能赚取高于正常利润的行业。这种自由加入的作用是使每一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下降，直到每个厂商都只能赚取正常利润，到达这一点时，就不能再刺激新的加入者了。此外，由于每个厂商生产同质的产品，那就不可能抬高价格而把市场丢给其竞争对手。这样，每一厂商面临的长期需求曲线将成为水平状态，并与该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相切，如图所示。这意味着边际收入和平均收入两者都与价格相等。这样，厂商就是价格接受者，并能以现行市场价格出售它可能生产的商品。如果成本曲线呈 U 型，则存在着一个唯一的短期利润极大化的产出水平。在该产出水平上，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且在此点上边际成本不断递增。由于每一厂商的需求曲线都是水平的，这种情况暗示边际成本等于价格。



完全竞争

在短期内，可满足利润最大化条件的产出水平的平均成本可以是高于、等于或低于平均收入，从而出现亏损，正常利润或超正常利润。自由加入或退出保

证了长期平均的产出水平为每个生存着的厂商赚到正常利润，其价格等于生产的最低平均成本。

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非常严峻，使完全竞争市场很难在现实中存在，只有证券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因而，西方学者把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当作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把它当作一个理想情况以便和现实相比较。

完全预见（Perfect Foresight） 完全预见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即一个人对未来事件的预见是绝对正确的。完全预见缺乏现实性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完全预见需要两个要素：第一，人们对变量的未来变化有肯定性的预期，不准有不确定性。第二，这些预期是正确的。完全预见一词最先由希克斯提出。希克斯在研究动态平衡时，认为决定平衡的因素中价格因素最为重要，而价格是预期的价格。完全预见的价格是实现动态平衡的关键。希克斯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但却认为预见可以是经过概率分布调整后的风险。希克斯将时间按周来划分，交易是按周来发生的。供给和需求数量取决于上一周的决定，而上一周的决定是根据对价格的预期作出的。但由于价格预期可能是错的，价格也会根据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因此，静态的均衡是不够的。应该采取动态分析，把它同时作为一个时间过程来考虑。不过这不意味着可以舍弃静态分析方法，因为一个不断发生变动的动态过程中可以包括一系列的暂时均衡，只是新的均衡不同于前一个暂时均衡，所以在动态均衡中仍然使用均衡分析方法。在希克斯的动态均衡中，价格预期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个人都有完全预见的能力。如果人们的预期不准确，而生产和投资是根据预期作出，因此以错误的价格预期基础的经济行为会使未来的经济均衡打破。完全预见的概念虽然是重要的，但与现实的距离差距太大、为此许多经济学家对动态的均衡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这包括阿罗——德布鲁模型等。

完全成本理论（Total Cost Theory） 指牛津大学的霍尔和希契以30年代英国的主要企业价格行为的调查结果为基础所发表的假说。他们认为，英国的主要企业是在每单位直接费用（称为变动费用，用PC表示）和每单位间接费用（称为固定费用，用OC表示）上，加一定的提高标价率（r）计算价格的。也就是说，价格P为：

$$PC=(PC+OC)(1+r)$$

据霍尔和希契的调查表明，当时英国的主要企业按惯例决定r为10%，并加以维持。若费用没有变化，价格则在长期恒定不变。现代企业的制定价格行为也证明了霍尔和希契的完全成本理论。理论上，企业应根据利润极大化目标，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原则制定价格，决定产量，这就是所谓的边际原理定价方法。但是各国进行的大量实际调查表明，大多数企业并不是按边际原理方法定价，而是按完全成本方法定价。如现代主要的流通企业是在购入价格（直接费用）上加劳务费用（固定费用），并把一定的提高标价率合在一起计算制定价格的。企业定价时，为什么主要考虑完全成本原则，而较少考虑与利润最大化联系更为紧密的边际原则呢？研究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信息不充分。一般企业难以掌握整个市场的需求和费用变动情况，很难确定真实的边际费用和收入曲线，因而无法按边际原则定价。相比之下，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利润率（即提高标价率r）收益加成本的定价方法更为实用；第二，企业目标多元化。所有者关心的是与股息、投资回收期相联系的利润最大化，而经营者更关心的是稳定的利润，企业的增长和个人的工资；第三，一般的寡占产业，在根据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市场地位定价时，主要考虑的原则是价格要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协调（协调寡占企业的价格水平）并与增加的支出（如原材料和工资的上升）相适应。因此，完全成本定价方法更方便，灵活，好掌握，也更为合理。最后，企业的实际定价原则是混合的，先按预期的利润率和完全成本原则定价，而后考虑相关者的价格态势进行调整，实际交易时还要灵活升降价格。

完税价格（Dutiable Value） 完税价格是指货物在输入一国国境的时候，此国海关依照该国法律的规定，用以计算该项货物所应征收的关税数额的商品价格。确定商品的定税价格，各国所依据的标准是不同的。一般较为通用的确定商品定税价格的货价标准有四种：（1）装运港船上交货价（FOB）；（2）成本、运费、保险费价（CLP）；（3）进口国主要市场的批发价格（wholesale market value）；（4）官方价格（lffical lisfed proe），作为官方价格，是政府参考商品的国际和国内市场价格因素确定的。

完全预期的通货膨胀（Perfectly Anticipated Inflation） 可以准确地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亦即长期稳定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是爬行的或温和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工资合同、长期货款合同。银行可以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定期存款利率，并向活期存款支付相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利率。这种通货膨胀会提高持有现金的成本，从而减少现金持有量，加快现金周转，加快货币流通速度。除此而外，对经济不会有

什么不利的影响。但是，要使人们能准确地预期到未来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相当稳定。而这一点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

灾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　利用参数来处理问题的方法，是由普安卡普（poincare）首先提出的，他称这种方法为"连续的方法"，此方法不仅在经济学中被应用，同时也被大量运用于工程技术方面，以解决实际工作中有关参数方程的问题。后来汤姆（Tem）把普安卡普的连续方法和单一化理论加以综合，称之为"灾变理论"。其内容如下：当我们对均衡条件下以 P 为未知量的方程 E（P，W）＝0 求解时（其中 P 为价格，W 为参数，E 为函数符号），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开多次方根特别是偶数次方根，必然对应了一些不确定的两可的情况，这些情况与方程解个数的变化，在开偶数次方时解是否成对地出现等是相互联系的。结果是，虽然原来模型的其他向量是连续、甚至平滑的，而求出的均衡方程的解却可能是不连续的。灾变理论过分地强调了这种不连续性。

在一个有 L 种商品，M 个消费者纯交换的经济体系里，参数空间为 Ω，即初始财产的集合，可以确定为$(R^{e})_{m}$，这时价格则可以普通化，例如，经过数学交换，价格空间可确定为 $S=R^{l-1}$，于是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描述 Z（P，W）的解的集合 E，即 $E=\{(p,w\in S\times\Omega / Z(p,w)=0\}$（总体目标）和当 W 变化时解的集合（P，W）∈E（局部目标）。总的结果如下：

（1）假定偏好是平滑的条件下，E 是 Ω 的变形 SXΩ 的一个平滑簇。由式子（p，w）→w 定义的自然映射 π：E→Ω 是恰当的（和平滑的）。

（2）集合∑由 w∈Ω 构成，其平衡方程有一个多次方根，这个集合接近零测度的勒贝克积分。

（3）使 P 为帕累托最优集合，这个集合不与∑相交，而且，当 w 描述了帕累托最优集合 P 与 Ω 中的集合∑的并集时，均衡式有唯一的解。

这后面的结果表明，在交易向量一定程度上保持很小的经济体系中，均衡点是唯一的，其平滑性也取决于这一经济体系的参数。另一方面，当交易向量很大时，这个经济体系很可能存在多个均衡点，当参数向量 w 变化时，均衡价格及分配则"灾难性地"发生变化，即不再具有平滑性和连续性。

这种均衡点性质和数目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均衡模型的更一般特性的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使 N（w）为均衡方程或 Z（p，w）＝0，P∈S 的均衡点的个数，假设 N 是已知的（即均衡方程的解的个数对每一个 W∈Ω 都是已知的）另外，假设存在有至少两个均衡点（即 N（w）≥2）的经济体系，这样就有足够的信息决定每一经济体系 W∈Ω 的均衡价格。换句话来说，这个经济模型具有这样的特点：已知均衡点数目，再决定这些均衡点所体现的价格水平（假定存在一个具有多个均衡点的经济体系）。但在均衡点是唯一的情况下，上面的说法则不正确了，此时，这唯一的均衡价格向量是连续的，即不依赖于经济体系 W∈Ω。

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　间接成本是相对于直接成本而言的，所谓直接成本就是与特定产出单位永远保持一致变动的成本，在短期内与可变成本比较接近，间接成本则是指那些不与特定生产单位保持一致变动的成本。固定成本具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包括在间接成本里，间接成本是由于其自然特性而计入成本，它只能大致按照一定比例分摊在每个产品单位。由此看来间接成本与产品数量间接相联。作为一个整体，间接成本也常常叫做制造费用（burden）。间接费用（overhead）或间接制造开支。包括监督人工资、娱乐开支和税收等等。

间接效用函数（Indirect Utility Function）　间接效用函数是相对于直接效用函数而言的，直接效用函数是商品的效用函数，而间接效用函数则是表示收入与商品价格的函数。假定存在几种商品 X_1、$X_2\cdots X_n$，直接效用函数可以写作

$$U=U\ (X_1,\ X_2\cdots X_n)$$

间接效用函数由直接效用函数而来。现有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条件

$$Y=P_1X_1+P_2X_2+\cdots+P_nX_n$$

其中 Y 为消费者收入，P_i 为第 i 商品的价格。求效用最大化时的最优解，可以得出各种商品的普通需求函数：

$$x_i=x_i(p_1p_2\cdots p_n,y)\quad i=1\cdots n$$

它也表示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所选择的消费量。将此式代入直接效用函数就得到间接效用函数

$$u^*(p_1p_2\cdots p_n,y)=u\ (x_1(p_1\cdots p_n,y),x_2(p_1\cdots p_ny)\cdots x_n(p_1\cdots p_n,y))$$

或者一般地写为：

$$u^*=u^*(p_1\cdots p_n,y)$$

间接效用函数与直接效用函数存在对偶性关系。因此，一般假定直接效用函数是严格正则拟凹的增函数，那么对应的间接效用函数就为严格正则拟凸的减函数。即反映在无差异曲线上，离原点越远，效用水平越高，虽然其平面图上的无差异曲线是凸的原点，但这并不碍于它是严格拟凸的函数。效用函数即决定

于直接效用函数，也决定于间接效用函数。间接效用函数与直接效用函数相互对应，且可相互推导。

间接税（Indirect Taxes） 间接税是相对于直接税而言的。传统意义上，间接税的含义是指对商品和劳务所课征的税收，税收的支付是间接的。以后人们就进而以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将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是指法律意义上的付税人最终也是税收的负担者这样的税收，纳税人直接承担纳税而造成收入或福利的减少。相反间接税就是可将纳税的责任通过某种方式转嫁给他人的税收。纳税人至少不完全承担纳税而来的收入或福利的减少。纳税人与负税人不是同为一人。这类分法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税负转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某种税究竟能否转嫁，事先很难确定。一般说来所有的税收都有转嫁的可能，只是有些税收，如所得税、遗产税比较不容易转嫁，而有些税如消费税比较容易转嫁而已。通常的用法中，间接税指由零售商、批发商，生产厂家所支付但可以最终向后转嫁给消费者的税收。间接税在一些文章中常常用商品税(commoditytax)一词来代替。间接税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征对特种商品的营业税，这种商品历来被课以重税，如烟草，酒精。此类税收按一定的产品单位征收，也可能是从价税，总之都可依据零售价格的一定比例而估量。具有更广泛基础的间接税是从价税，它又包括两类间接税，即我们所要归纳的第二类：单一阶段税收，仅在批发或零售环节一次性征收；以及第三类多阶段税收，在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都进行课征。流转税和汇积增值税（cascade tax）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最为常见的多阶段税收则是增值税。它现在已被40多个工业化国家所采用。增值税是与商品税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相一致的。这就是商品税应仅加于购买商品的最终消费者身上，而不应加在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交易上。

间接标价（Indirect Quolation） 又称“应收标价”，“直接标价”的对称。以外国货币表示本国货币价格的标价方法。按该标价本国货币的数额固定不变、外国货币的数额是一可变量，无论本币还是外币的币值发生变动，改变的都是外币数额。若一定单位本币折合外币的数额增加，说明本币汇率上涨，即本币币值上升，外币币值下跌。若一定单位本币折合外币的数额减少，则反之。英国一直采取间接标价法。美国1978年9月1日前采用直接标价，此后为了与国际外汇市场的标价一致，除对英镑仍使用直接标价法外，对其它货币一律改用间接标价。

间接抵免（Indirect Credit） 它是相对于直接抵免而言的一种对跨国纳税人居民的非直接向来源国缴纳的税额予以抵免的方法，只适用于跨国母子公司之间由于股息转移而发生的税收抵免。它与直接抵免不同，只允许跨国母公司就其于公司转移过来的在其居住国已缴纳的股息所得税税额进行抵免，而不允许对子公司在其居住国已缴纳的全部股息所得税税额进行抵免，因为其中包括了针对不属于母公司的股息所得的课税。

间接抵免的出现离不开跨国母子公司的发展，与跨国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不同，跨国母子公司都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母公司只是拥有子公司的一定股权从而控制子公司而与子公司并非同一经济实体。因此，子公司在其居住国所缴纳的税收并不等同于母公司在当地的缴纳。但母公司与子公司显然又不是完全没有经济联系，这种经济联系之一就是子公司在利润发生后一定会按母公司股权向其转移应得的股息，由于这一部分股息在子公司所在地已缴纳税收，如果母公司所在国再行课税势必造成国际双重课税，所以有必要对此加以免除。由于这一免除并非母公司在自己的非居住国直接缴纳的，故而又称之为间接抵免。间接抵免的计算在基本原理方面与直接抵免相同，在方法上略微复杂一些，其公式为：

$$\text{间接抵免额}=\frac{\text{母公司股息所得}}{\text{子公司已税股息所得}}\times\text{子公司在其所在地缴纳的股息所得税额}$$

母公司在居住国应纳税额＝其世界范围内的应税所得×居住国税率－允许的间接抵免额

所谓“允许的间接抵免额”，并不一定等于间接抵免额，而是还要与其子公司实际缴纳的税额比较取其低者。

应该指出，这种间接抵免并不局限于母公司与子公司双层之间，而是可以通过控股活动在横向和纵向的多重发展而产生进行多层间接抵免的必要。

无论是双层间接抵免还是多层间接抵免都对适用抵免的范围作出了某些限制性规定以防范间接抵免外延的无限扩大，损害母公司所在国的财权利益，这些限制性规定主要要求：母公司必须是直接投资者而不是证券投资者，同时它还必须积极参与下属子公司的业务经营，拥有具有表决权的股票应达到一定最低比例，等等。

间接贸易（Indirect Trade） 间接贸易是指通过第三国而不是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直接进行的商品买卖活动。间接贸易对商品生产国来说是间接出口，它把商品卖给第三国而不是直接卖给消费国。间接贸易对商品消费国来说是间接进口，它不是直接从商品生产国那里购得所需货物而是从第三国购得。即

使贸易商品直接由生产国运往消费国，只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交易关系，这种贸易仍属于间接贸易。间接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很不正常，无法开展直接贸易，因此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力量间接发展贸易往来。某些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也有可能使得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无法开展直接贸易而只能开展间接贸易。此外，某些国家为了避免有关贸易法规的限制，也有可能开展间接贸易。

闲暇（Leisure）　闲暇不仅仅是不工作，它是个人或家庭消费以工作所取得的收入而购买的物品与劳务而需要的时间。闲暇与工作一样是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用不是直接产生于物品与劳务，而是产生于消费物品与劳务。消费者通过自已具体的时间与购买的物品与劳务的结合而产生的消费来生产效用。时间与物品都是创造效用所不可缺少的。一杯茶如果没有时间去喝它，它产生的效用很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际工资率不断提高，物品日益丰富。由于一个人可以利用的时间是固定的，而物品与劳务相对便宜，时间相对而言变得更有价值，闲暇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序列经济（Sequence Economy）　序列经济是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时间组合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要求，通过合理安排生产力中各个因素的时间序顺而取得经济收益。序列经济的基本依据是生产力因素形成周期的差异性，同生产力系统结合时点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一般情况下，解决序列矛盾有两种方法，一是"时序法"，二是"贮存法"。时序法是以生产力系统的结合时点为基础，根据各因素形成周期的长短，仅求出各因素形成过程的始点，从而排出各因素的形成过程依次开始的顺序，周期长的因素，先开始其形成过程；周期短的因素，后开始其形成过程，最终求得在统一的时间点上开始生产力系统的结合过程。贮存法则不管生产力各因素形成过程应有的时序如何，各自生产出生产力因素，并把它们贮存起来，等待生产力系统结合时点提出需求。两相比较，时序法更符合生产力因素组合规律的要求，后贮存法易引起自然损耗和生产费用增加。序列经济是分层次的，国家有国家的序列经济，企业有企业的序列经济，地区发展也存在中观序列经济。时序与空间的结合，构成了生产力的布局，因此，时序与空间分布是经济学中两个重要因素。

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　运用某种数学方法分析一些特殊活动，以便能够比较科学地选择某一目标的方法。运筹学的名字最早于 1938 年出现于英国。美国从 1942 年从事这项工作。美国运筹学的早期的著名工作之一就是深水炸弹的起爆深度。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反潜水艇战，所使用的武器是飞机侦察到潜水艇后，投掷深水炸弹，以便击沉之。这样，除了研究搜索方法，还需要探讨深水炸弹的有效使用。当时的深水炸弹原为海军所使用，企图炸沉已潜入水中的潜艇，所以起爆深度为 100 米。现在形式改变了：由空军空投。运筹工作者在对一些统计数字进行分析后，作出以下决策：1.仅当潜艇浮在水面或开始下潜时，方投弹攻击，2.起爆点为 25 米，这是当时炸弹所允许的最浅起爆点。这项决策执行后，被击沉的潜艇成倍增长，从而为运筹学赢得了声誉。以后运筹学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所需的知识也越来越复杂。为实行某一运筹方案，要组织一个专家小组，其中每一个成员要精通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一般地说，要精通高等数学。电子计算机的引进使得运筹学解决问题成为可能。近年来，运筹学作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更受到极大的注意。目前，应用运筹学所解决的企业问题包括生产控制，编目控制，运输计划以及厂址选择。运筹学的主要分支有规划论、对策论、排队论、质量控制等。

医疗保障方案（Medicare Programe）　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强制性的健康保险计划。1965 年以社会保障修正案第 18 篇的形式正式通过，1966 年 7 月 1 日开始生效。内容适用于大多数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包括为他们支付门诊费，住院费，特别护理费及其他一些医疗费用。这些费用由社会保险费中支付。在美国，1967 年前的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及印第安人可享受由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从某种观点看来，实行任何形式的社会化的医疗制度都是向福利国家迈进了一步。医疗保障方案遭到广泛而有效的反对，保守派议员及选民认为，应尽可能限制联邦政府的职权，反对建立一套官僚机构来从事医疗事务，而这种事务由私营企业经营会更有效，更经济。美国医学学会认为，这种方法会使政府过多地插手医疗事务，对医疗费用发号施令，便决定阻止其通过。甚至在方案通过后，一些分会也拒不执行。但比重日益上升的老年人却认为，医疗费用上升，社会保险津贴已经不敷需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是联邦政府的事情，因此支持老年人的意见。1965 年通过的医疗保障方案是个妥协的产物。

报复关税（Retaliatory Tariff）　报复关税是指一国在它的出口商品或国外投资等在他国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为实行报复而对从该国进口的商品所征收的

进口附加税。报复关税是一种临时性的关税，而且具有针对性，一旦对方取消对本国的歧视待遇，本国的这种关税也将随之取消。

报价（Bid） 是由买方提出的价格或数量，在此价格或数量上他愿意购买。报价也常是对卖方的还价（offer）作出的反应，在此意义上它要比还价更低或数量上比还价所对应数量更多。卖者对报价的反应有三种：接受，反还价，退出。退出是买卖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对买方的报价卖方觉得没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所致。反还价是议价的过程，一般地，任何一项交易都要经过报价—还价—再报价—再还价……这样一个过程，一旦报价与还价取得一致，报价和还价就为买卖双方所接受，交易在此价格上得到实现。报价与还价适用在许多场会，如在拍卖市场上，证券交易所，也常指一个公司要购买另一个公司的全部股份而提出的价格。报价可以是实际发生的，在理论研究中，也常常是一个假想的环节，是走向市场出清的必需的一步，因此如何进行报价不仅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而且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出一系列有关研究成果。

抚恤基金（Pension Fund） 也称养老基金。抚恤基金制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准备金制，涉及个人的终生再分配，其基础是通过工人储蓄，以积累在退休时消费的资金。当然，储蓄时间越长，每年可得的抚恤基金数额也就越大。另一种制度是费用发生拨款制，涉及在工人之间的随时再分配，因此由仍在工作的工人供养退休者。随着抚恤基金制度主要指第一种的准备金制度在许多国家迅速发展，较大的公营和私营部门的雇主的抚恤基金已成立主要的金融机构。大笔基金资产都是可上市的金融资产，约半数是公司债券和股票。由于抚恤基金的责任是长期的，所以抚恤基金会特别偏爱长期资产。抚恤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也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所有部门经营，也从事新证券发行的包销工作。

技术（Technology） 经济学中所指技术，其含义非常广泛，凡是一切与生产行为有关的知识、方法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因素都可涵盖于技术范围之中。简单地说，技术是指有系统地应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进行生产活动的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技术既可以表现为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如人力，设备，原料等的品质水平，也可表现为生产过程中组织管理的科学程度，还可表现为最终产品的样式、质量状况等众多形式。

在生产过程中，生产技术表现为三种形态，即规模报酬形态，要素替代关系以及技术进步形态。作为规模报酬形态，表现为生产阶段出现的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以及规模报酬递减，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应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而在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则出现规模不经济，应当缩小生产规模。对于要素投入的替代关系，这种关系的强弱，反映了生产技术的伸缩性，若某种要素与其它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很强，则在此种要素价格上升时，减少该种要素投入量，而代之比其它可替代要素，达到降低单位成本的目的。对于技术进步形态，可分为中性技术进步（neutral technical progress）和有偏技术进步（biased—nonneutral techical progress）。中性技术进步是指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要素投入的边际替代率不发生变化，而是出现在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出水平增加，或在产出水平与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下降。而偏技术进步是指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要素投入的边际替代率发生变化，某种特定要素的生产效率增加了。

技术传播（Diffusion of Technology） 指的是技术革新与发明创造从产生开始直到被多数企业所普遍使用的过程。

从古以来，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技术革新与发明创造，它们被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之后，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可见，技术传播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世纪以来，新知识与新技术大量涌现，各种发明创造更是层出不穷，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迅速提高。在这种形势下，本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理论界开始对有关技术传播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或者发明创造从产生到被半数以上的大企业所采纳，这中间需要5–10年的时间。从某个企业开始使用一项革新或者发明直到它在整个企业内部被普遍采用，这中间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内，新技术要逐渐取代旧技术，直到它在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是什么决定着一项新技术的传播速度呢？曼斯菲尔德认为，决定一项新技术传播速度的因素有3个：(1) 这项技术的盈利性。如果新技术的盈利性比其它投资项目的盈利性都高，那么很快就会有企业纷纷采纳之，这项技术传播的速度就快。如果一项新技术的盈利性比较低，那么它的传播速度就慢。(2) 同行业中已经采用这项新技术的企业在所有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这一比重越高，说明采用这项新技术所要承担的风险越小，盈利性也可能越高，尚未采用它的企业就会更快地采用它。相反，如果只有少数几家企业采用这项新技术，那么其它企业就很可

能采取观望的态度，这时的传播速度就会慢下来。(3) 革新费用在企业平均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它与技术传播速度呈反相关关系。一般来说，一项新技术的采用者数量的增加可以用一条对数曲线来近似地表示出来。

从企业内部的角度来看，如果企业的规模越大，它就越容易采用一项新技术，如果企业管理人员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们的平均年龄越轻，这个企业接受一项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至于新技术在一个企业内部传播的速度，一般地说，那些较晚采用这项技术的企业反而可能要快一些。从新技术本身的条件看，如果它需要使用者掌握相应的新知识、新技能以及采用新的行为方式，甚至要求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调努力，那么这项技术的传播速度就必然要慢一些；相反，如果一项新技术简便易学，容易操作，那么它的传播速度就会快一些。此外，技术发明者的广告与宣传、技术传播阶段的经济形势、革新中所遇到的资源问题以及经济政策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一项新技术传播的速度。

技术选择和利润率（Choice of Technology and Rate of Profit）　技术选择和利润率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

在经济发展战略中，采用什么样的技术类型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利润获得的大小。技术选择具有内在的灵活性，它比劳动力的选择有更大的灵活性。来自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技术转让，一般来说不适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大多具有资本集约和劳动集约的特点，而发展中国家可获得的生产要素往往完全相反。在这些国家中，资本缺乏故很昂贵，但却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直接运用资本集约型的技术，往往不仅会造成就业水平的下降，同时也会使实际收入减少。因此发展中国家只能借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并把这些技术经过适当的改造，以适合于自已的特点，且在技术的使用上结合自已的实情有目的、分步骤地采纳。

对技术的选择，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方针，首先，要避免不同部门中每个工人的资本集约程度过于悬殊。这是工业生产同步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使工人在一个部门内生产不致于首尾不连接，防止造成生产上的产品堆积和窝工等现象，从而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其次，技术应该适合经济和社会环境，必须与社会所处的实际工业化阶段相一致，技术进步过慢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采用过于超前的新技术，也会由于缺乏种种配套措施或由于与社会实际经济条件不符，造成技术的无效率使用。同时，一些技术的采用还应当适当地考虑文化，民族和传统习惯等方面的社会因素。再次，所采用的技术应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新技术应刺激当地工业的产量并且能在当地进行再生产。第四，所利用的资本水平的生产率应达到最大程度，而社会成本则要减少到最低程度，即达到利润的最大化。这也就是说技术选择应与利润率联系起来考虑。

先进的技术有以下来源：它们可以是专门设计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也可以是对现代技术加以改造或是对长期沿用的设计加以改造，还可以是借用比自已先进的国家、部门或企业所采用的现有技术。

至于实施先进技术的方法，则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可以同其他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但有互补资源的国家结成关税联盟。这有利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国际间的分工协作。为了说明企业家多利用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可以对资本索取高利率，可以制定各种训练和教育计划，包括各类技术的信息中心，学校一级的教育；训练计划人员和经理人员，使他们具备进行项目评估应有的技能；进行工作研究，以提高原有技术的效率。建立奖励计划，对当地的劳动集约的项目或适用的发明给予金融资助，鼓励对这些技术的改进和应用。可以组织合作社以辅助当地手工业，同时对这些技术进行广泛的宣传，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了解到当地技术的价值。

对那些在技术转让上现在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并较为广泛地采用了适用技术的国家和地区，技术选择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这是向贫困进行挑战的一个有利武器，因为技术选择不仅能更好地利用当地现有的各类资源，同时也为生产发展，取得较高的利润率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和工具。所以，技术选择是为全部人口而不是为少数特权阶层提供增长和繁荣。

技术选择同利润率有着紧密的关系。利润是从产品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与生产这种产品时用去的生产要素的全部机会成本的差额。成本中包括承担风险所付出的保险费以及使用所有者资本的成本。利润又可分为正常利润和超正常利润。正常利润是指维护商品继续经营所必须获得的最低利润额，在此情况下，所有机会成本正好被总收益所抵偿，因此利润水平相当于0。超正常利润是指某一行业中的各厂商创造的收益，若超过所有机会成本时，通常称之为取得超正常利润。

利润率则是指以资本资产的帐面价值的百分比表示的利润。利润率同技术选择之间存在十分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

在第i部门使单位成本最小的资本家可采用以下技术：

$$a_{21}, a_{i2}, \cdots\cdots a_{in}\ \ Ti$$

劳动者的单位劳动力可以得到以下商品组合:

$$b_1, b_2, \cdots\cdots b_n$$

那么n个部门之间的等利润率r是由下列公式决定的:

$$P_i = (1+r)(\sum_{j=1}^{n} a_{ij} P_i + Ti \quad w) \quad (i=1,2,\cdots\cdots n)$$

$$w = \sum_{i=1}^{n} b_i P_i$$

其中,P_i 是第i种商品的价格,w是劳动力的价格。

上述公式表明利润率r取决于技术(a_{ij},Ti)和实际工资(用商品组合表示的 b_i)。为了进一步研究技术选择与利润率的关系,不作证明,我们给出以下条件:

$$\sum_{j=1}^{m} a'_{kj} P_j + T'_k w < \sum_{j=1}^{m} a_{kj} P_j + \bar{E}_k w$$

这一条件我们称之为"利润率评价标准"。

其中,a_{kj} 和 $\bar{e}/k$ 是另一种新的技术选择。如果这一条件能满足,那么我们就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并且这还表明在采用新技术之后,一定伴随着利润率的普遍提高。

技术变化(Technical Change) 技术变化含义是非常广泛的,简单地说,技术变化就是技术进步,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发明,创造新产品;创新,将发明应用于商业领域,以及创新的普及。在现今世界,技术变化早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研究技术变化一直处于次要位置。在早期的古典经济理论中,通常将技术变化视为经济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是经济系统中的外生变量,虽然斯密也强调劳动分工是技术变化的一种形式,但并没有对技术变化本身做更多的分析。直到本世纪30—40年代,随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经济学家在研究投资和资本累积行为时,才逐步将技术变化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通过对个体厂商行为和市场、产业等结构的变迁的研究建立有关技术进步的经济理论,其中熊彼特(J.A.Schumpeter)在40年代初提出的创新理论影响最为深远。熊彼特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经济系统本身,是经济系统中各个生产单位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结果,技术创新活动一般分为研究发展,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普及三个阶段创新活动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在于技术普及阶段。在技术普及阶段,原有的创新技术不断进行改进,而最终引发再次的创新,在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创新活动推动了技术的变化。这样,要寻求技术变化的原因和效果,需要了解经济体系中各个生产单位各个阶段的技术创新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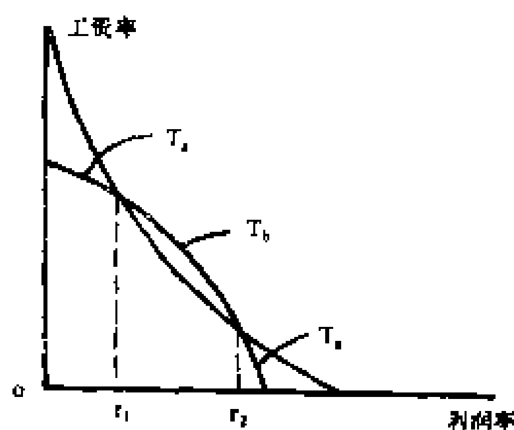
技术转让(Transfer of Technology) 技术转让问题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渠道的技术转让行为。

在本世纪60–70年代,分析技术转让问题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弗农(Vernon)在1966年提出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中,美国是技术创新国家,在技术创新的初期阶段,美国享有对产品和技术的垄断权,出口新产品,完全占领了国内和国外市场。在技术成熟以后,由于垄断利润很高,一方面刺激了美国公司扩大生产,在国外建厂,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它国公司努力仿制新产品,以挤进国内市场。由于通常来看外国的工人工资和原料价格等低于美国,使在国外生产的新产品更有竞争力,美国在这一产品的生产上逐渐优势丧失,最终成为这一产品的完全进口国。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60—70年代影响很大,许多学者运用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不同产业的技术、市场等的变化过程。

但是,80年代以来,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已不能很好地解释技术转让中出现的新问题。现今来看,技术转让的渠道已基本上不再采取出口形式,产品周期的出口阶段消失了。特别是对于新产品,其生产常常在美国本土和国外同时开始,有时国外生产甚至早于美国本土。大跨国公司的生产已经国际化,它们往往也在国外的公司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用,技术创新的出现,以及新技术的首次应用可能在美国的母公司,也可能在其国外的子公司,技术创新已不再在一个国家内单独进行,技术优势也已不再象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保持相当一个阶段,这样,对于技术的国际转让问题,经济学家逐渐转向将生产函数方法应用于对研究开发效果的研究上,1984年,曼斯菲尔德(Mansfiecd)就建立生产函数,来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向海外投入的研究开发费用对提高总要素生产力的效果问题。

在现实中,技术转让的成本是很高的。平均来看,在国外建厂,技术转让成本要占总成本的20%,而且技术转让成本往往随具体情况有较大的差异。此外,在技术转让问题,模仿成本也很重要,如果模仿成本大大低于技术创新成本,技术创新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动力,根据相关资料,平均来看,模仿成本与技术创新成本之比为0.65,模仿时间与创新时间之比为0.70。另一方面,对专利的保护也会提高模仿成本。

技术的再转换（Reswitching of Technique） 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本大争论中由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提出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生产任何特定产品都假定存在多种生产技术，所以生产者可以根据如同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次序从使用一种技术到使用另一种技术，这个次序依赖于资本密集度（以人均资本量表示）。这样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生产技术会依次更替，较低的利息率（等于均衡利润率）与较高资本密集程度条件下的技术采用联系在一起。随着50年代线性生产模型的发展，人们发现，这种关系技术采用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D·钱伯诺恩（David champernowne）和琼·罗宾逊指出利息率按一特定方向变动可能会导致对过去已摒弃技术的重新利用，这种情况就叫技术的再转换。起初被人们认为技术的再转换只是一种逻辑的推理，实际中不可能发生。但皮罗·斯拉法（P·Sraffa）对此作出了非常有创建性的分析他认为各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或"过去劳动"（指现时生产中不需要，而在中间产品上所用的劳动）的比例会有不同，技术再转换也就是这种现象的正常的结果。这是由非同质的资本引起的，当各种技术的资本-产出比率不相等时，每种技术的要素价格边界（factor—price frontier）显示出的曲率不同，我们用斯拉法所用的图式加以说明（下图）。这里Ta、T_b分别表示两种技术的要素价格边界。对A技术与B技术的采用取决于它们的赢利性（profitability），对于小于r_1的利润率区间A技术的利润高，或叫A技术比B技术廉价，当利润率在r_1与r_2之间时，B技术的赢利性强，人们就采用B技术，当利润率高于r_2时，情况与利润率低于r_1时相同，这时人们又转而采用A技术。这就是技术的再转换。技术再转换的存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对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Technical Innovation Theory） 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发展的一个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E·曼斯菲尔德（E·Mansfield）、英国经济学家特列比尔科克等人。他们主要研究了四个问题。第一，同一部门内影响技术推广的速度和影响技术推广的各种因素，尤其是模仿率的决定。模仿率是一个行业中其他企业向首先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模仿的速度，它决定了一个行业内技术推广的快慢。影响模仿率的因素主要是：模仿比例，这一比例的增大意味着人们对新技术了解多，从而模仿率高；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相对盈利率，主要指新技术相对于其他投资机会的盈利率，这一盈利率越高，模仿率越高；采用新技术所要求的投资额。此外，旧设备被置换之前已使用的年数，该工业部门的销售量年增加率；新技术被首次使用的时间，新技术在初次采用时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等因素也影响模仿率。第二，部门间技术扩散问题。这是指一部门的技术创新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一个时代的先进技术往往集中于军事部门，所以，技术扩散的中心是研究军事工业部门新技术扩散到民用工业各部门的过程。这种过程一方面是军事部门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部门，另一方面是军事工业部门的技术工人转到民用部门。因此，军用部门的技术创新对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这种研究说明了不同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这方面影响创新的因素是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对技术创新最有利的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因为竞争鼓励创新的动力，一定的垄断又可以保护创新企业的动力。第四，国际间技术转移问题。国际间技术转移分为一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用于另一国的"垂直转移"和一国已运用的技术转移到另一国的"水平转移"。这种国际技术转移又有简单技术转移和技术吸收两类。阻碍国际间技术转移的因素包括技术输出国的技术保密、专利权以及政策考虑，还包括技术输入国的需求障碍、资本障碍、自然资源障碍、劳动成本障碍、技术障碍、规模障碍、基础结构障碍、文化传统障碍等。国际间技术转移的成本是专利和特许费用、技术转移的资源成本、效率损失，以及为这些所付出的研究与发展费用。国际间技术转移的途径有销售新产品、出卖专利、传授知识、投资建厂等等。技术创新理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相当的影响。

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由于技术进步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而产生的失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般的规律是愈来愈广泛地采用了资本密集型技术，这样就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从而引起失业增加。但是，生产中采用的资本—劳动比率还取决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如果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劳动的相对价格可以相应地下降，那

么，就会减少，甚至不存在技术性失业。所以，技术性失业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即工资能升不能降。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而劳动的相对价格却不能下降，这样，就加剧了技术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的增加是长期经济增长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属于自然失业的范围之内。由于这种技术性失业的增加，长期中自然失业率有上升的趋势。在经济中，那些文化技术水平低，无法适应新技术发展要求的工人，技术性失业严重，这些人往往成为难以消除的"失业硬核"。

技术贸易（Technology Trade） 技术贸易作为技术转让的主要方式，它是指交易双方按照约定的条件，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把某项技术从一方转让给另一方。技术贸易的结果是使一方（被转让方）获得了使用该项技术的权利，同时它必须为此而支付一笔使用费。

技术贸易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专利、商标和专有技术。专利（Patent）是指政府有关机构根据申请人就某项技术发明提出的申请，认为该项技术发明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给予申请人的在一定期限内独占该项发明的权利。专利具有三个特点，即时效性、地域性和排他性。时效性是指国家只在特定的时间内保护该发明的独占权；地域性是指在没有有关国际公约的情况下，只在某一国家内享有独占权；排他性则表示只有申请人（一般也是发明人）才是它的合法和单独的占有人，其他人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不得使用它，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商标（Trade mavk）是一个单词、字母、数字或图案等，它是生产者或销售者把它附在自己的商品上用来与其他商品相区别的一种标志。商标经过注册登记后可获得专用权，任何其他企业和个人未经商标拥有人的同意使用该商标属于侵权行为。专有技术（Know-how）又叫技术决窍，它是一种可以传授和转让的、公众所不知道的，没有申请专利权的技术知识。专有技术包括某一特定产品的工艺流程、产品设计、技术资料、配方等秘密的技术知识。由于它未申请专利权，因此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另外，由于它的保密性，只要公众不知道这项技术，专有技术的拥有者可以无限期地独占该项技术。

技术贸易作为一种无形商品贸易，它有许多特点。首先，技术贸易是技术使用权的转让而不是所有权的转让，这是与有形商品贸易的最大区别。其次，技术贸易的作价方法很独特。一般商品价格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价格，而技术贸易的价格是可变的，它以技术引进方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作为价格的计算基础，并随经济效益的变动而不断变动。第三，由于某项技术有时可以多次转让，因此技术转让方的收益要比出售一般商品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国际技术贸易起源于本世纪初。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国际技术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发展最快的项目之一，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而不断提高。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与战后新的科技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技术贸易的迅猛发展是科技革命的产物。在当代国际技术贸易中，专有技术的贸易居领先地位，其次是专利和商标权的贸易。究其原因，是由于专有技术有较好的保密性，专有技术的被转让者可以充分利用专有技术为它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专利由于对社会公开，被非法占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影响了被转让者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得它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技术贸易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一般商品贸易的影响大得多。它不仅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且还能对当代国际分工的改变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影响和制约着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目前，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开展，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技术的输入者。发达国家通过控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技术以及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时附加种种苛刻的条件，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依赖性，这就难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也不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技艺工会（Craft Union） 在劳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为同雇主集体谈判而成立的工会，大都是技艺工会。早期技艺工会是指成员仅限于需要某种特定技能的行业或拥有熟练技能的行业的工会，它排斥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随着工业机械化的发展，技术工人在工业中不再居于显要地位，而半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地位日益提高，所以大部分现代技艺工会已经把它们的范围扩大到了与其最初限定的行业关系并不怎么密切的职业和技艺。例如，名为技艺工会的国际机械工人协会，由于吸收了航空工业的生产工人，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产业工会。多数技艺工会中，其地方分会都有一个地域管辖范围，即管辖某一城市的一个行业的成员。地方分会往往比全国工会的行业专一性更强，所以属于同一全国工会的成员，如砌砖工、泥瓦工和抹灰工，在美国大多数城市都有各自的地方分会。当一个技艺工会代表几个行业时，工资最高的行业往往在决定工会内部政策上居于统治地位。

计提折旧（Depreciation Allowance） 参见"折旧"（Depreciation）。

折旧（Depreciation） 有时又称作"贬值"。意

指资产由于耗损造成的价值减少。这种资本的消耗被认为是一种生产成本，因而在计算净利润时允许把它从总利润中扣除掉。常规的记账方法是把这种资产价值的下降分摊到该资产预期的经济生命期内。美国注册公众会计师协会会计术语委员会对折旧所下的定义是："折旧会计是一种会计方法，其目的在于按照一种系统和合理的方法，把有形资本资产减去残值（如果有的话）后的成本或其他基础价值，在各资产项目（或资产类别）的估计有效寿命期间进行摊配"。西方国家的企业常用的折旧方法有四种，即直线法、产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定率一递减余额法。其中后二种方法是加速折旧法。直线法的年折旧额计算公式为：（固定资产原始成本一估计残值）／估计有效使用年限。产量法的计算公式是：每单位产量上的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始成本一估计残值）／估计总产量。年数总和法的计算公式为：每年折旧额＝（资产原始成本一估计残值）×尚可使用年数／年数总和。定率一递减余额法的计算公式是：每年折旧额＝逐年递减的固定资产帐面余额×固定折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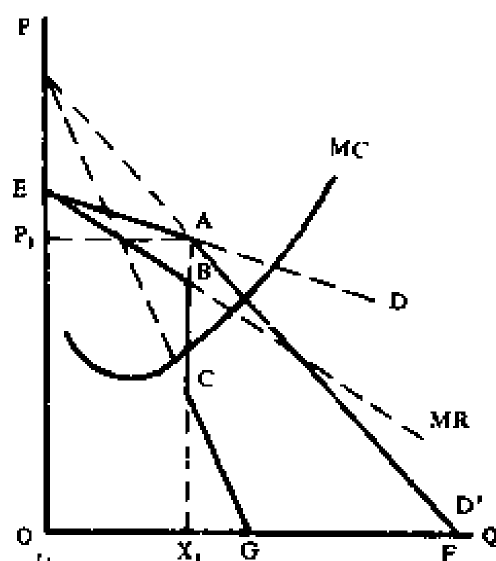
折算风险（Translation Exposure）　又称"会计风险"。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对企业以各种货币进行的经营活动用同一货币进行统一的财务报告时因汇率变动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出现在跨国公司和有外币经营项目的本国公司中。跨国公司在国外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反映在其财务报表中，这些报表须遵循东道国的会计原则并以东道国货币计价。为了让总公司的管理人员、股东等了解整个公司的状况需将以各种货币表示的报表加以合并，用总公司所在国的货币表示，因而产生了外币换算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因汇率变动跨国公司便可能蒙受损失。根据在不同情况下使用的汇率不同，折算的方法有：（1）现行／非现行法。将资产负债表中的项目划分为一年以下的当期项目及一年以上的长期项目。，对当期项目以结算日（编制报表日）的汇率折算。对长期项目以资产负债产生时的汇率折算；（2）现行汇率法。所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均以总公司汇总报表日的汇率折算；（3）货币／非货币法。将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划分为货币性的和非货币性的。对货币性项目以汇总回汇率折算，对非货币性项目以产生日的汇率折算。国际上目前通行现行汇率法。

和交易风险相比，交易风险涉及现金的流动，造成真实的损益。而折算风险主要影响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动无关，由该种风险造成的损益是不真实的，仅存在于帐面上。

折耗计提（Depletion Allowance）　又称"备抵耗竭"或"耗竭准备"或"（资源）耗损减免"。是一种税收优惠。它允许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从总收入中扣除非再生性资产（如矿产品，石油或天然气）价值的耗损部分。扣除的金额应以补偿成本或与总收入相关的一组百分率为基础。这可以鼓励开发和采掘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的资源。它还可以促进一体化的生产者在采掘阶段确立高昂的价格，同时采取一些措施，以便把申报的收入转向这个阶段从而得到税收优惠的好处。

折弯需求曲线（Kinked Demand curve）　折弯需求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威齐（p · sweezy）所构造的用于解释寡头定价行为的一种需求曲线。它又称为斯威齐模型。斯威齐认为，寡头市场经常观察到的价格刚性的情况可以用折弯的需求曲线加以说明。斯威齐推测到，如果某一寡头厂商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本行业其他厂商将不会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以便夺得降价者的市场，降价者将失去自己产品的顾客。不过，寡头厂商也不可能通过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来扩大自己市场的份额，因为若某厂商降价，该行业其他厂商将如法炮制。因此，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强制力去阻止寡头改变现行价格。寡头厂商一般通过产品造型、质量、广告、服务等手段而不是通过价格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这一推测下所建立的需求曲线便是折弯的需求曲线。

下图是某寡头厂商的折弯需求曲线。该寡头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 EAF 是一条折弯的曲线，在 A 点是折弯点。由于假定寡头厂商不会随别的寡头提价而提价，而是随别的寡头降价而降价，因此折弯需求曲线折弯点右上方一段 EA 富有弹性。因为若该寡头稍作提价，对其产品的需求量将大幅度减少，在图中折弯点 A 的右下方 AF 一段，需求曲线缺乏弹性，表明厂商大幅度降价也只能引起人们对其产品需求量很小幅度增加。因此，寡头倾向于不改变现行价格 P_1



与折弯需求曲线相应的边际收益线是 EBCG，

EB（MR）段对应于需求曲线 D，CG（MR'）段对应于需求曲线 D'，需求曲线上的折弯点 A 造成边际收益线上的 BC 段是不连续的。该寡头的边际成本曲线可以在边际收益线的不连续段 BC 间任意变动（例如从 MC_1 变到 MC_2）而不必改变销售水平与价格。

折耗（Depletion） 是指所消耗的资产，如矿山、油井、森林等天然资源，由于开掘或采伐，导致其储量逐渐下降，以至于耗竭，因而这种资源的效用，在生产过程中也必随之消失。根据会计上成本与收益相配合的原则，把其采掘或采伐的消失的价值，分摊到存货或销货当中的成本就是折耗。换言之，折耗指开采天然资源所应分摊的业务成本。也是对于所耗资源所采用的一种成本定期分配的手段。

走私（Smuggling） 走私也常常叫非法贸易。按照各国的法律规定国际贸易或进出口货物必须在海关登记，在海关的监督之下进行，其中许多货物需要交纳关税。走私就是秘密运送商品进口或出口以逃避海关的监督检查。一般说来，引起走私的主要有两类情况，一是国家对某些商品的进出口征收重税，于是就有人逃避关税以取得非法收人。二是国家限制某些商品的进出口，占领这类商品的市场往往有巨额的收入。由此看来，走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地下交易或黑市经济。走私者的活动幅度与其所承担的风险与走私所带来的收人有关。18 世纪是走私者的黄金时代，通过走私运进英国的茶叶、烟草、香料、丝绸和酒类的数量超过合法运人的数量。1920—1933 年间，美国禁止售酒，有成群的船队从欧洲和西印度洋群岛运送到大西洋沿岸。走私的方式有直接运输，进出境人员携带和邮寄等。走私的商品种类随各国法律的规定而有所不同，可用于走私既有货物、金银还可能有各种票据（只要这些票据被限制成禁止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和为走私者带来利益）。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走私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走私还没有被纳人正式的理论模型分析。60 年代对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研究中，一大批理论家对走私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人们注重于走私的两种途径：(1) 在货物清单上做手脚，伪造货物的特征与价值，通过正常的进出口案进行走私。(2) 在官方管制不到或管制较松的地方进行非法贩运。最早对走私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是帕哥瓦蒂（J. N. Bhagwati）和汉森（B.Hansen），他们扩展了马歇尔—埃奇沃思贸易理论模型而将非法贸易纳人进一般均衡理论之中。与正常贸易相比，非法贸易具有更高的贮藏成本，运输损失以及秘密进出的高昂开支，但从私人角度来看，走私能够获利是因为它逃避了关税。尽管走私具有很高代价，但有助于改进人们的福利，因为通过走私消费者和生产者更接近世界"真实"价格。而且如果非法贸易与合法贸易同时存在，国内价格比率保持在无走私时的状态，这样无限的非法贸易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因为走私会不断抵消生产和消费收益。此后皮特（M.Pitt）等人还建立了其他的模型分析走私问题。不过在这一方面，帕哥瓦蒂所做的工作最多，他还将走私的规范理论纳人到直接非生产性寻利（profit—seeking）活动的一般理论中。

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 欧洲启蒙运动中最具特色的分支之一。期间为 1740 年至 1790 年。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两个杰出代表。在两个伟人周围会聚了大批仁人智士，其中包括弗朗西斯·休策森、洛德·凯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威廉·罗伯逊、约翰·米拉等。这些启蒙者的思想范围极广，几乎包括从玄学到自然科学的一切。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最突出成就在于与社会进步问题相关的以下思想领域：历史、伦理及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在欧洲，18 世纪中后期，同时存在多个启蒙运动，如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等。但苏格兰启蒙与其他启蒙相比，则更被人们所理解。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观点、以及对伦理、政治状况和与之相应的各种后果的认识，在很广的范围内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就被拿破仑的哲学家、改革者所吸取。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与苏格兰的社会中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首先，经济上取得增长。这给苏格兰的思想家们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直观印象，而且影响力由弱到强。其次，政治发生明显的变化。苏格兰于 1707 年与英格兰实现联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经济增长，但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立法权力，无法与英格兰等地的自由贸易作出独立的选择，而这使得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问题突出了。17 世纪的残暴的盟约性的长老制土崩瓦解，而温和的僧侣集团逐渐掌握了教会的权力。最后，大学制度的改变。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圣安德鲁斯四所大学通过改革允许教授专业化。与此同时，这些大学的非正规的自愿组合的俱乐部发展迅速，最著名的是"爱丁堡选择社会俱乐部"。这些背景的存在使思想家们得到思想的自由和广泛的社会支持，同时，这些背景本身也为思想家提供可以分析的对象。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三大领域是历史、伦理和制度，这些领域都离开他们所重视的经济问题。亚当·斯密作为该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对这些领域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亚当·斯密于 1790 年逝世，这标志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结束。虽然法国革命改变了那些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条件，但

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后来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思想家不断地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去研究新的政治经济。这些思想家中包括斯图亚特、李嘉图等。正如黑格尔（他从斯图亚特那里受益颇多）、马克思以及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伦理以及制度方面的前提是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建立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说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使得经济学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时间的价值（Value of Time）　时间是个短缺的资源，所以才有“时间就是金钱”的俗语。时间的价值取决于对时间的利用以及与时间相关的其他资源。公司根据工人的价值或者他的边际产出支付工资。一个家庭在市场销售产品时是要赚钱的，所以在家里消遣的时候就存在时间的价值。时间的价值是由某人所从事的行为的最优组合来决定的。这个最优组合影响劳动供给和商品需求。人们对时间价值的认识已有很长时间，例如对与市场相关或无关的经济行为的认识时，就有对时间认识的问题。时间价值的综合模型是贝克尔1965年在家庭生产理论中完成的。贝克尔将分析的重点转移到对行为分析上，而不是传统经济学对商品的分析。贝克尔认为，家庭福利的来源是行为，行为是商品和时间的组合，福利最大化是家庭活动的目标，限制条件是预算和时间。一般情况下，福利函数取决于活动水平（Z_i）：

$$u=u(z_1,\cdots,z_r)$$

这里每一个活动都是商品（X_i）和时间（Ti）的组合

$$z_i=d_i(Xi,T_i)$$

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限制条件是预算约束：

$$\sum P_iXi=W(Z_n)+v$$

时间约束：

$$\sum T_i=T$$

这里 P_i 为价格，W（Z_n）是劳动者收人，V 是非劳动收人，T 是可利用的总时间。福利最大化的条件为最佳行为分配：

$$\partial u/\partial Z_i=\lambda\hat{\Pi}_i$$

和生产各种行为的最佳投人组合：

$$(\partial Z_i/\partial T_i)(\partial Z_i/\partial Xi)=\hat{w}/p_i$$

这里 λ 为边际收人，$\hat{\Pi}_i$ 为行为 i 的影子价格，$\hat{w}$ 是时间的影子价格。行为的影子价格等于生产的边际费用

$$\hat{\Pi}_i=P_i(\partial Xi/\partial Zi)+\hat{w}(\partial Ti/\partial Zi)$$

所以时间的影子价格上升会引起用商品替代时间，而产生从时间密集型向商品密集型转变。如果没有其他外生条件限制，人们对时间的价值给与为边际工资率

$$\hat{w}=w+(u_n/\lambda)$$

这里 w 是边际工资率，Un 是劳动的边际效用。除此之外，关于时间与储蓄理论，以及节省时间与交通项目投资的关系等问题，也都是关于时间的价值的重要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也都有相当程度的突破。

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　时间偏好是指一个人选择将来消费还是现在消费时的倾向。时间偏好的程度通常可以用时间偏好比率表明，例如，某人认为现在一块钱的消费与其将来某一时间一块钱的消费完全没有差别，那么此人的时间偏好比率为零，而此人若认为将来某一时间1.20元钱的消费才能获得现在一块钱的消费得到的满足，则此人的时间偏好比率为20%。时间偏好比率是一种主观的利息率，主要决定于个人自身的爱好和特点。进一步看，与其年龄和社会地位有密切关系，也取决于人们现时收入与未来预期收人间的关系，通常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某人的现时收人越高，则其时间偏好比率越低，而现时收人越低，其时间偏好比率则越高。

时间偏好概念是资本理论，储蓄理论以及利率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可以用下面的定理表明时间偏好概念的作用：只要资本市场上的利率水平高于某人的时间偏好率，那么此人就会放弃现时消费而投资于资本市场，随着资金借出数量的增加，此人的时间偏好率也在上升，直至时间偏好率等于利率，此点也就决定了此人的总储蓄数量，若某厂商投资，直至投资收益率等于利率，那么此时其时间偏好比率也等于其投资收益率。

时差利息说　一种利息（利润）学说，强调从人的主观评价和时间因素来解释利息。它把物品分为直接满足当前需要的“现在财货”和满足将来需要的“未来财货”，认为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人们对前者的评价一般会大于对后者的评价，因此，现在财货比未来财货具有更大的价值。这种对两个不同时间的主观评价产生差异而导致价值上的差异，叫做时差。所以，未来财货所有者在交换时须向现在财货所有者支付一笔相当于时差价值的贴水，这种贴水就是利息。按照时差利息说的讲法，上述观点同样适用于企业利润和包括地租在内的各种租金的分析。该学说是奥国学派的庞巴维克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其目的在于用心理感觉和时间差异来掩盖利息产生的真实原因，以对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时差利息说在西方经济学中至今还是一种有较大影响的利息学说。

低息资金（Cheap Money）　指的是利息率比较低，且供给量比较大时的资金，这是货币管理当局所实施的一种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息率，

增加信贷供给量，可以鼓励个人与企业多进行消费与投资活动，进而导致经济的增长与繁荣。要实行低息资金的政策，货币当局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措施，即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证券；降低贴现率，向商业银行提供自由储备金；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业银行的信用储备量增加了，这又导致市场上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得不到贷款的人也能够得到各自所需要的贷款，这必然使得投资量与消费量都有所上升，从而刺激产量的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走向繁荣，而这正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所要追求的目标。判断某个时期的资金是否属于低息资金，这要根据各国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世纪末的英国，货币市场受英格兰银行的再贴现率（银行率）的影响很大，银行率通常比市场利率要高，而且变动相当频繁。为此，英国货币当局规定，只有3%以下的银行率的情况才算是低息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银行率的变动不那么频繁了，但是它比战前的水平要高一些。30年代以后，低息资金不仅意味着以低的短期利息率来增加流动资金，而且还加入了降低长期利息率的内容，以此来帮助增加就业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复苏。英国货币当局在这一时期颁布政策，维持大约2%的银行率。到了50年代以后，只要实际利率比前一阶段下降了，那么就可以说存在着低息资金。但是后来，在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中，实施低息资金政策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大量失业，这使人们对低息资金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不过出于种种原因，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当局仍然坚持这一政策。到了7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控制货币供给量就越发显得重要了，因此，货币当局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上，逐渐放弃了低息资金的货币政策。

低档货（Inferior Good） 我们可以分两个阶段去理解经济学中的“低档货”的概念。在恩格尔需求函数 $D_i=f_i(y)$ 中，（Y表示收入，D_i 表示对第i商品的需求）如果收入的需求弹性小于0，即需求的变动率与收入的变动率之比小于0，则该商品就为低档货。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的为正常的奢侈品，在0与1之间的为正常必需品。显然，对低档货而言，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它的需求则减少，相反，收入的减少会引起对它需求的增加。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低档货的含义，我们引入斯拉茨基方程。在两种消费品的情况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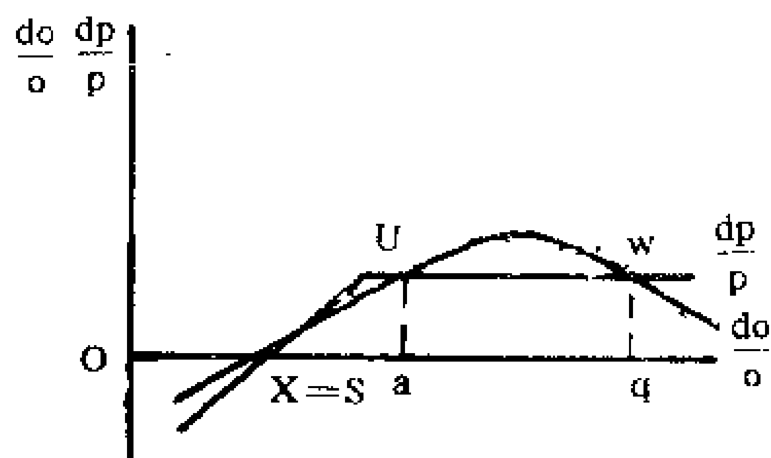
$$\frac{\partial q_1}{\partial p_1}=\frac{\partial q_1}{\partial p_1}\bigg|u^{\cdot}-q_1\frac{\partial q_1}{\partial y}\bigg|p^{\cdot}$$

即一种商品的价格如 P_1 的变化的总效应为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之和。对于所有的商品而言，替代效应总是负的，可以解释为价格变动在假定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对其需求呈反向变动，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但收入效应则不一定了。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正常品的收入效应为正，亦即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收入与需求同方向变动。而劣等品或低档货正好相反，收入效应总是负的，也就是说，收入与需求反方向变动。劣等品中还有一种特殊商品叫吉芬商品（Giffen good），它的收入效应是如此之大，足以替代负的替代效应，使价格变动的总效应为正，意思是价格上升，对其需求增加，价格下降，对其需求减少。在价格收入座标图上，吉芬品的需求曲线是上升的。而正常品与一般劣等品的价格变动的总效应都为负。即价格与其需求反方向变动。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Theory of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中，解释人口与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其结论与“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相一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思想是利本斯坦1954年提出的，但当时的模式存在着数学上的矛盾。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又重新系统论证和表述了这一理论。他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增长、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速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量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状态，可用附图描述。

图中，横轴表示人均收入，纵轴表示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frac{do}{o}$ 为国民收入增长曲线，$\frac{dp}{p}$ 为人口增长曲线。在低于Oa而高于X=S点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人均收入将减少，直到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等于国民收入增长率为止，如图中的X=S点上，人口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都为零。纳尔逊把这种状态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其意义是，只要人均收入处在很低的水平上（如小于Oa），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销，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当人均收入大于 O_a 时，国民收入的增长将超过人口的增长，使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等于人口增长时（如等于qw），人均收入达到Oq。这一新的均

衡是高水平的均衡。如果其他条件都不变，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从多方面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分析了资本稀缺，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增长的障碍，强调了资本形成对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决定作用，提出了全面地大规模地投资，以大幅度提高资本形成率，实现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而成为"平衡增长"战略和"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重要依据。同时，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说明人均收入水平过低与资本形成不足的因果关系，过于强调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受到了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



谷物法（Corn Laws） 指英国历史上对粮食贸易进行管理的法案。早在12世纪，英国就开始实施谷物法，14世纪时出现了鼓励粮食出口的条款，到了17世纪则开始限制或者禁止粮食进口，以保护本国农业。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于英国人口增加，再加上1791年以后持续多年的战争所造成的粮食短缺，英国的粮食价格一度飞涨，地租也相应提高了，这种局面给英国大地主阶级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大地主阶级就千方百计阻止粮食的进口。1773年，他们以保护本国农业为名，让国会通过了一项谷物法，规定了进口小麦价格的下限，如果进口的小麦价格低于这个下限，就要被课以高额关税。后来通过的谷物法又将进口小麦的价格下限不断提高，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中干脆规定进口的小麦每夸特不得低于80先令，否则绝对禁止进口。以后又把限制与禁止进口的对象扩大到所有粮食作物。谷物法的有关规定使得大地主阶级可以在国内人为地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地租，从而维持高额收入，这一方面造成粮食价格上下波动，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另一方面，由于地租太高，使得工业资本家几乎无利可图。百姓与工业资本家终于联合起来与大地主阶级进行抗争，1839年创立的反谷物同盟就曾经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斗争。爱尔兰一直是英国的主要产粮区，但是1845年爱尔兰发生歉收，粮食供给更加紧张，反谷物法的斗争也就日益激烈。1846年，工业资本家占了优势的英国议会终于宣布废除谷物法，到1847年，英国所有的谷物法全部废除。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最终取得了胜利，它使得粮食贸易与黄金外流的波动逐渐减少，农业资本化程度提高，农业利润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可以从国外大量进口廉价的粮食和原材料，这为英国工业的发展也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谷物模型（Corn Model） 谷物模型是用来表述斯拉法（P.Sraffa）对李嘉图1815年《利润论》一文中所阐述的利润理论的解释。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假定在谷物生产中资本与产品在物质上是同质的，因为资本（李嘉图倾向于将之等同于年付工资）被认为完全是谷物，这样农业中的利润率仅仅依赖于生产谷物的条件，形成工资率的谷物的数量，且决定了独立的价格。其他部门的利润率会以它们相对于谷物的产品之价格变动的方式随着农业利润率而作调整，如果r表示农业部门的利润率，W表示工资率，L_i表示i产品生产所雇佣的工人，那么以谷物形式表示的价格就是：

$$P_i = wL_i(1+r)$$

只有P_i是未知的。谷物生产在这个构想中与在斯拉法的商品生产的标准体系（standowd system）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参阅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在这个生产体系中，基本的商品谷物也就相当于斯拉法的标准商品（只是它不为复合商品时）。"谷物模型"一词容易将人导入歧途，人们自然想到在李嘉图的文章中，只是一个部门的模型，但在谷物模型中有与李嘉图原理中同样多的部门。更适合的表述应是斯拉法所说的利润的谷物比率理论（corn-ratio theory）。正如斯拉法在他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农业中资本与产品同质性的观点从未在李嘉图的信件和文章中得以表述，斯拉法对李嘉图理论进行了重建和扩展。这一工作也引起一些人的疑问，特别是霍兰德尔（S.Hollander）。但应该说，霍兰德尔并没有否定李嘉图谷物模型的存在，而仅否认李嘉图理论构造中的中肯性（relevance）。值得指出的是，利润的谷物比率理论在李嘉图的同时代人中也有相近的表述。

谷底（Trough） 经济周期中经济活动的最低点。萧条阶段终结时期和转入复苏阶段的转折点。一般只有1—2个月。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产量和就业人数达到本经济周期内的最低水平，股票和商品价格开始下跌，存货低于正常水平，企业界的悲观情绪正在转变为乐观。

佃农制（Share Cropping） 佃农制是一种土地

租赁形式，地主允许佃农使用土地，条件是规定产出的一部分要交给地主。佃农制在世界许多地方盛行。现代社会中，在不发达国家中，佃农制是最普通的土地使用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也同样存在着。佃农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地主在生产成本中可能负担一部分，可能负担全部，也可能一点不负担。对生产费用负担与否与负担大小直接关系到佃农支付给地主的"地租"。地主也可能对佃农规定一些限制条件，例如种植什么作物、多大部分的非劳动投入等。20世纪70年代，对佃农制讨论又热烈起来，原因有两个，一是佃农制看上去是一个无效的制度，因为工人的所得低于其边际产出。二是人们认为佃农制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的经济关系。例如，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工作，使用资本家的资本，工人得到工资收入，而资本家得到利润；佃农制中，佃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地主得到土地收益的一部分。关于佃农制，有人认为是有效的，原因是佃农与地主共同承担各种风险，如气候、市场等风险。佃农制的合同比其他土地租赁合同给地主带来更大的风险。也有人认为佃农制为地主带来的风险远远小于佃农自己承担的风险，因为二者的贫富状况差别极大。有人认为，佃农制不仅使地主和佃农共同承担风险，而且为他们提供动力。佃农制除了为地主提供部分土地收益外，可以使佃农的福利极大化。例如，地主鼓励佃农使用其他非劳动投入，从而提高佃农的边际产出；这种制度还可以在土地市场与信贷市场之间产生外在的经济性。佃农制有长久的历史，并被许多地区所接受，人们不断地对这一制度作出新的评价。

住房经济学（Housing Economics） 是住房供给与需求以及建筑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的一门学问，在美国，建筑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占固定投资的30%，该产业是美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建筑业的增长直接影响到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住房这一商品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商品，住房是固定不动的，而且购买住房通常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最大一笔支出。除了支付购买费之外，家庭还必须支付额外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财产税、保险费、维修费等。由于住房不同于其他商品。住房的价值通常是上升的，而不是下跌的，因此，住房在存在通货膨胀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在5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率低于2.5%，所以人们购买住房就为获得居住空间，但是，如果出现双位数的物价上涨，购买住房就成为一项投资。人们拥有住房，便可以申请抵押贷款，而这种贷款利率是优惠的。住房价格的上涨使得所有者可以从免缴税赋形式上得到好处。住房产业是最地方化的产业之一，而且是最不具垄断性的行业。美国400家大的建筑企业仅占建筑市场的25%，根据美国房屋建筑者协会的调查，单身住房建造商的2／3年建造量不足25套，只有8%的建造商的建造量每年超过100套。即使这样，在住房市场上也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状态。影响住房需求量的因素有：居民可支配收入、住房的价格、其他商品价格、抵押市场状况、政府补贴等。住房供给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生产成本、住房售价、空房率、存货、利润率等。影响住房建造成本的因素主要有：抵押信贷、地价、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住房质量等。

住房问题（The Housing Problem） 所谓"住房问题"在西方城市经济学中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从狭义上讲，它主要指住房存量的供求不平衡与住房服务质量的低劣；从广义上讲，它还包括量不足、质不佳的住房及居住区不合理的分布给整个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城市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由此，西方国家的住房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住房供应总量的不足。造成住房供应总量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种：(1) 由于人口突然向城市集中，使住房存量跟不上急速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及西欧各国，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产业与人口也向本国的大城市集中，造成了这些大城市的住房紧张。(2) 原有的大量住房毁于战火。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2万套，加上海外人员被遣回国的因素，它当时住房短缺约为420万套，约占当时人口1／4的人无房可住。第二，住房资源分配上的浪费现象。这类住房问题主要指：各种不同质量的住房在供求上出现突出的不均衡状态，从而造成了房源分配上的浪费。如联邦德国在1970年至1979年的9年时间内共建造了500万套住房，但仍然在1980年出现了"新的房荒"。在这一"房荒"中，一方面，高级住宅供过于求，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闲置房屋；另一方面，廉价住房（特别是低租金的"社会住房"）则供不应求，使得许多低收入阶层，多子女家庭和孤独的老人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经济情况的住房。第三，住房消费水平大大落后于其他消费水平。这类住房问题是指，相对一定时期城市居民的经济而言，住房服务水平明显跟不上城市居民的需要，而成为"问题"。如现在的日本，由于其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已接近或超过西欧国家。但在日本的大城市中，由于用地的极度紧张和由此造成的昂贵的地价、房价、房租、使许多城市居民至今仍然居住在被他们称之为"兔窟"的狭小房屋中。第四，大城市中的住房在空间布局上的不合理现象。这类现象在不同的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如在

美国的大城市中，它主要表现为不同收入阶层在居住上的"空间分离"和市中心的"贫民区"问题；而在日本的大城市中，它则表现为市中心的"空洞化"。(1) 空间分离。指城市中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及不同人种的居民，由于经济上的差别和文化、习俗，兴趣上的不同需要，倾向于同自己相同或相近类别的居民接近，从而形成各自的社区，并在住房的选址上与异类居民相隔。如在美国及一些发达的西欧国家中，高收入阶层往往居住在效外舒适的别墅区，而低收入阶层则被迫集中在市中心拥挤的贫民区。而且在美国。至今还存在着"唐人街"、"黑人区"等不同人种的集中居住区。(2) 贫民区问题。所谓"贫民区"是指贫困阶层居住的劣质过密的住房地域。它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A) 这一区域中的许多居民收入不稳定，生活贫困；B) 住房劣质，老朽，生活设施不完备，环境卫生恶劣；C) 居民中从事不定期的简单劳动的工人占有很大比例；D) 人口移动频繁，居民间缺乏正常的交往与了解。由于"贫民区"具有以上特征，因此它常被一些西方城市经济学家认为是城市中各种犯罪及吸毒的温床。形成贫民区的主要原因是：A) 随着高收入阶层不断向郊外迁移，市中心的旧房地区就成为向较低收入阶层"过滤"的场所。这时，市中心的居住环境也随之下降。B) 当市中心的居住环境质量下降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产生出一种消极的"外部效应"，从而使房产所有者取消原来想进行的住房维修投资。这样，随着这一区域住房质量的进一步下降，就会产生更为消极的"外部效应"，并导致"贫民区"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如不加以必要的经济干预（如清除贫民区住房，并在此基础上建造公房），"贫民区"就有向周围扩散的倾向，从而给整个城市的经济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带来不良的影响。3) 市中心的"空洞化"现象。

住房政策（Housing Policy）　在城市经济中，凡由政府（主要指地方政府）通过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以解决各种住房问题的手段、方法，一般被统称为住房政策。住房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注重收入的公平分配。这类政策旨在使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能获得由本国政府规定的住房服务水准。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对低收入阶层的经济补助，促进这一收入阶层的住房服务有效需求，以缩小他们同其它阶层在居住条件上的差距。其二是注重住房存量的分配效益，其具体内容是，纠正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市场中出现的供求不平衡现象以及由外部因素所带来的偏差，有效促进整个住房存量的供给。也就是说，住房政策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主要措施如下：1.房租统管政策。政府通过立法对住房服务市场中各类租房（主要是低质租房）的最高房租进行限定，防止由于租房不足而引起的房租暴涨。一般地说，为了能使低收入阶层得到廉价的住房服务，统管下的房租总要比住房服务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定得低，从而使得一部分低收入阶层的居民能够住进廉价的租房。2.公共住房政策。公共住房政策是指由政府出资建造，并且有一定住房质量（指符合本国政府规定的最低住房水准）的廉价住房（主要指租房）。由于公共住房的服务价格要低于住房市场上同等质量的住房服务价格，因此政府通过大量提供公共住房，就可以扩大住房市场上的总供给，从而使住房市场上同等质量的住房服务价格有所降低。在西方城市经济学中，公共住房政策被认为是对住房资源的分配最合适和最有效的。3.自用住房政策。即通过扩大自用住房的供给，降低租房率，以尽可能减少房屋租借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降低房租，自用住房政策的重点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自用住房率。它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措施。需求方面的内容是：(1) 免收由自用住房所产生的归属所得；(2) 向低收入阶层提供自用住房的购房贷款补贴和贷款利息补贴。供给方面的措施有：1) 由政府负责建设并低价出售自用住房，以扩大自用住房的供给；(2) 缓征售房人的售房资本所得税，以鼓励住房存量市场上的售房交易等。在城市经济学中，人们一般认为上述需求措施和供给措施都会对住房价格产生影响，所以对上述两类措施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住房存量市场中的价格弹性。当供给价格弹性大于需求价格弹性时，如政府采取供给政策，那么许多私有售房者就会因价格的下降而停止向住房存量市场提供住房，而私有售房供给的大量减少就有可能抵销大部分公有售房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与此相反，这时如果采取需求措施，那就有可能通过有意供提高少量住房价格的办法来刺激更多的私有售房的供给。当供给价格弹性小于需求价格弹性时，由于市场上价格的下降不会对私有售房的供给有多大触动，所以，这时政府通过供给措施，就能使公有售房为大多数低收入阶层所利用。(4) 所得转移政策与房贴政策。所得转移政策是指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家庭总开支，间接地促进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房贴政策则是政府先规定出一个低收入阶层所应得到的住房服务水准，然后再规定出为达到这一水准所需付出的房租占家庭总开支的比率，当上述房租超出这一规定的比率时，政府就对超出的额数给予补贴。

住房存量（Housing Stock）　住房存量是指住房在其有效使用期内的有形构造（即住房的建筑单位，如栋、套、间等），因为有形的建筑物在其有效使用期内是相对固定的，故称"存量"。此外，在西方

的城市经济学中，住房还常被看作是一种资本，因此，"住房存量"也就被称为是一种"为保护人类（生存）之需而积累的固定资本存量"。在住房存量市场上，市场交易的对象是一次性买卖的住房。由于房屋建筑有新旧之分，因此，这类市场又可以分为"新建住房市场"与"陈旧住房市场"。

住房流量（Housing Flow） 住房流量是指由住房建筑的各种属性及住房周围的环境因素构成的，一定质量的住房所能给住房消费者带来的一种"服务量"。由于"住房服务"是从一定选址上的住房存量中"流出"的，而且"住房服务量"是随着单位住房存量的维修、更新改造过程而变化的，因此它相对住房存量而言，是一种流动的变量，故称"住房流量"。在住房流量市场上，市场交易的对象是以租房形式出现的，并由住房存量在一定期限内给住房消费者所提供的住房服务。在这里，虽然住房消费者通过支付房租买到的不是有形的建筑物，而是规定的期限内的住房使用权，但这种住房使用权却给其消费者提供了一定量的效用。因此，这种市场构成了城市经济学分析住房经济活动的基础和重点。

住房投资（Residential Investment） 私人用于建造新住房的那部分投资，是总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住房是一种使用期很长的资产，因此，住房投资在现有住房存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少，在许多国家仅为3%左右。住房投资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原有住房的价格、人口增长率、财产水平、利率，以及其他资产的收益率。一般来说，原有住房的价格水平越高，人口增长率越高，财产水平越高，利率越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越低，则住房投资越多，反之，亦反之。住房投资一般都要依靠长期贷款来进行，因此，利率大小对住房投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调整利率的货币政策来调节住房投资，即降低利率可以增加住房投资，提高利率可以减少住房投资。但是，如果政府仅仅限制进行长期贷款的储蓄利率（例如，美国政府曾经实行过的第Q条规则），则会使这些机构吸收不到存款，由此导致住房贷款和住房投资的减少。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金融机构中介作用减弱对住房投资的不利作用。此外，通货膨胀对住房投资也有重要的影响。在通货膨胀加剧时期住房投资有增加的趋势，其原因一是在名义利率不随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情况下实际利率下降会引起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的影响，使人们愿意借款进行住房投资；二是通货膨胀使住房作为一种资产的价值增加，住房投资成为一种保值或增值的手段。但是，如果通货膨胀加剧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也会引起贷款减少，不利于住房投资。因此，对长期抵押贷款的利率要进行调整。从总体上看，住房投资在投资中是较为稳定的，对经济周期影响不大。

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Cand，a Factor of Production） 经济学中，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被定义为不可变换的、以地租作为其要素收入的自然生产力。根据这一定义，只有以自然状态存在的土地从经济的角度讲才被称之为土地。这种土地的数量及其地租由土地的地理位置、地形、土地肥力等因素决定。如果某块土地已被开发过，那么它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土地，因为它代表资本与土地的结合。使用这种土地时对于要素的支付也不仅只有地租，还包括利息。因此，将土地定义为自然资源较为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煤、石油这类自然资源处于自然状态，它们也是土地；但当它们被开采并被用于其他生产过程时，它们不仅含有资本要素，而且还带有资本的特征。它们符合资本的定义，即被生产出来用于生产其他商品与劳务的商品。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与土地之间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如果从生产要素提供的服务来考察资本与土地，二者的区别就更加模糊。因为土地和资本一样，都是以存量的形式获得的，生产在生产者过程中所实际使用的是运用这些存量所提供的服务流量。例如农业中土地可以用来种植多种农作物，而且可以反复使用，因此农用土地几乎和资本没有区别。

然而，和资本不同的是土地是可耗尽资源。这对于那些供开采矿业的土地资源来说更是这样。这种土地与农用土地不同，随着开采量的增加，开采矿业用土地的数量逐渐减少，尽管随技术的发展可以不断发现新的矿物储量，但矿物储量不是无限的。因此，在采矿用土地中，任一时期的开采率都会影响未来的开采率。现在对于这种拥有既定数量的资源的过度开采会影响今后开采的成本。这与资本是有明显区别的。

作为生产要素的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 Factor of Production） 在生产要素中，企业家才能（或能力）是最不容易加以定性和定量的，在以公司形式出现的企业中，它作为一个特定的要素又是最难以辨认的。企业家可被视为企业中某个特殊的个人，他不与企业签订契约、合同，他向企业提供劳务并获取剩余。因此，也可以说，企业家就是把人力资本同其他雇佣来的投入联合起来，生产产品并取得剩余作为自己的收入的人。虽然很明确地定义出这个生产要素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列举企业家所完成的某些独特的职能还是可以把它从一般的劳动要素中区分出来，这些职能是：（1）集中和组织雇佣

投入进入生产过程，(2) 在生产过程中创新，(3) 管理企业的日常运作，(4) 作为剩余的要求者，承担企业的风险。

企业家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与所有与经营合一的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现代的公司中，雇佣来的经理和高级官员事实上完成了某些企业家的职能，这个投入既包括劳动又包括企业家才能，对其补偿中，有一部分必须视为利润而不是工资（实际上，包含持股和利润分成的官员补偿计划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个人持股者由于要承担风险（承担风险是企业家的职能之一），其所得的报酬也应包括利润。这样，现代公司组织的运作将企业家职能扩大到几个投入要素上，因此，几乎不可能把企业家才能作为一个特定的要素——譬如像劳动要素：劳动者——明确地辨别出来。

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Labor, A Factor of Production）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通常被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由人力投入的服务，这种服务又以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基础，以工资的形式得到补偿。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观点产生于新古典（边际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和J.B、克拉克用边际的观点讨论了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边际生产力理论被用于评价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这种分析一直是讨论劳动供求以及工资决定的基础。

近年来，西方发展了一种被称之为人力资本的理论用于解释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这种理论认为，劳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资本。例如，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取决于资本存量，劳动供给数量本身也由个人所获得的各种能力的存量所决定。因此，把劳动作为由给定的人力资本存量产生的服务流更为合适。人力资本存量的功效由教育、训练、健康状况以及人力投入的流动性决定，与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也包含建立在预期报酬基础上的人力资本存量产生的服务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又有重要的区别，其中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物质资本可以让渡（出售），而劳动则不能。

生产过程中实际使用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由劳动供给者个人和厂商二者最大化决策行为所决定，劳动供给者个人首先以其整个一生的报酬的最大化为基础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作出决定，然后在收入与闲暇间效用最大化选择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存量中所要提供给市场的服务流作出决定。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对所要雇佣的劳动量作出决定。厂商的需求与个人的供给共同决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使用量。

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Capital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资本是否应当是一个生产要素？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是有生产力的？资本较密集的生产方法是否比资本欠密集方法更有生产力？对于资本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的。由于"资本"一词的定义和用法不同，各派经济理论对上述问题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般而言，生产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投入是以同样的生产方法，为获得更多产出而需要增加的东西；生产方法则指投入以什么比例生产一单位产出；由于可能不只有一种方法生产同样单位的产出，生产过程就被定义为生产某种特定单位产出的特定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总是以固定的比例使用投入，比例的变动代表了不同的生产过程。如果存在生产同样单位产出的各种不同的生产过程，那么它们在各种投入要素的比例上必定存在差别，不可能通过纯技术手段互相比较。不同的生产过程只有在它们的成本可以计算出来和相关的产出价值可以获得的时候才能进行比较。由于不同的生产过程可能产生同样的单位成本，这就导致了不同生产过程间的选择问题，然而它们并不影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生产作为迂回曲折的过程，一种生产过程的产出可以用作其他生产过程的投入。如果所有中间产品的具体性都不予考虑，那么，所有生产过程都可以串成一系列将初级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出的生产过程链条，这样组成的生产系统包含了经济运行中的所有生产过程。无视生产系统和生产过程的内在结构，人们可以直接将原始投入和最终产出联结起来，从而将生产过程归结为一个"黑箱"。在这里，原始投入是指那些不在生产过程链条内生产的东西，最终产出则指那些不在生产链内使用的东西。通过上述定义，产出的增长只能通过以固定比例增加投入来获得，因此可以推断存在非负的边际生产过程，所有必要投入都是生产性的。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定义直到自然力和人力被关注时合理地、精确地给出，土地和劳动至少从配第起就被看作生产要素，后来生产工具也被当作一种生产要素，称为资本。在现代用法中，所有初级投入都可以称为生产要素，如果它们是自然力或人力的贡献，则可以称为原始生产要素。因此生产要素可以定义为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原始投入的东西。如果它们的贡献是生产性的，有非负的边际产品，那么生产要素就是生产性的。从术语上讲，资本品是生产中需要的产物，只要生产中需要，即使它们不在市场上交易也是有价值的。资本价值是可以变动的资本品价值的总和，在同样的意义上货币资本强调购买某种资本品所需要的货币量。在经济学中，资本被定义为用来生产其他商品和劳务的物品，从它代表现期消费以获取未来生产和未来消费的意义

上说，它又是一种储蓄，从其物质形态来看，它不同于金融市场中使用的资本。事实上，资本总是由不同成分的资本品组成的，而且资本品一般总是异质的和具体的。古典经济理论把进步（advance）作为一个总量概念使用，并关注资本的异质性；奥地利新古典经济理论试图使这个概念更准确，然而却没有取得成功；非奥地利学派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将资本品的异质性和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因素结合起来，在资本价值或货币资本概念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生产理论。然而，在承认资本品的异质性，允许它们用于不同用途的框架之内，显然可以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其作用。迄今为止，这种分析主要归结为静态分析。而且资本品某些必不可少的特征，仅仅在非静态中才是重要的。因此，在资本和资本品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能够完全解释清楚之前，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为预期概念的均衡（Equilibrium: An expectational concept） 至少在传统的用法上，经济均衡总是意味着某种与经济的参与者预期相吻合的结果，也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均衡还需要有一个更进步的条件：即任何经济参与者相对于他们的正确预期，总是追求最优。正确的预期，是均衡的基本特征，因此，经济学上定义的均衡与物理学上定义的均衡并不相同，单摆的静止或减幅振荡并不是经济均衡，也不是经济非均衡，其原因就在于单摆没有预期。

均衡概念，最早确实是指某种静止的位置或静止状态，它意味着在这个静止状态下，拉力和推力之间的平衡，但是，也可能存在一种位置序列，在这个位置序列中，对应于每一个新的位置，都有一种新的力量平衡，这样，就没有理由认为均衡只存在于静止状态或平衡增长的路径之中。因此，一旦把经济理论扩展到动态均衡路径上，均衡的预期意义就变得明晰起来。

缪尔达尔（Myrdal）曾经宣称：在经济的动态分析中，存在着两种相互依赖性，即现期的扰动会影响未来的价格，而对未来扰动的预期又会影响现期的价格。凯恩斯论述了在低于充分就业时，存在着某种均衡，他争辩说：对正在下降的工资和价格的预期，会加剧经济的恶化程度，显然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一个预期的均衡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出这预期的均衡概念意味着什么，因此，他的预期均衡概念的本质和基础是什么并不清楚。希克斯清楚地描述了这个问题：未来的内生变量（如下次的价格）依赖于厂商和居民的现期行动，而厂商和居民的现期行动又依赖于对他们对未来的这些内生变量的预期，什么样的预期会产生与这些预期相符的现实结果？例如，如果实际价格 P 是预期价格 P^e 的一个函数，确定 P^e，使得 $P^e=F\ (P^e)$。于是依据数学上的定点而来的均衡的不动点特征在这里就具有现实的意义。在博奕论中，均衡被用来指一种政策或游戏上的理论上的解，在这个政策或游戏中，存在着两个或多个对手，并且这些对手之间的策略互相影响。如果假定追求最优化，或预期效用最大化，均衡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单独行动使自己变得更好，不过，在这种情况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基本前提：每一方都能正确地预计出其他各方的策略，并在这种正确的预计下追求最优。对动态均衡和空间均衡亦可作出相类似的分析和说明。在动态均衡中，预期均衡的意思是未来的价格，即是预期的未来价格（即正确预期）；在空间均衡中，则是反映了对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的正确预期。

估算收入（Imputed Income） 估算收入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性收入，它不是以货币形式取得的，因而估算收入的大小难以直接反映在收入帐户上，只能通过估算来获得，诸如免费食品或替别人服务换得的无偿食宿，在同一个农场生产并消费的食物以及房主住自己的房屋所提供的服务。估算收入要么是以实物形式取得，要么以劳务的形式取得，它应是广义收入的一部分。美国商务部估计了估算收入的市场价值，并将其包括进国民收入帐目里。估算收入在一些国家还包括其他项目，如家庭主妇如果在外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还有一些形式的收入——如居住在某特别舒适的地方或做一件虽然报酬较低但称心如意的工作所获的心理上的收益——一直未被计量化，即使它也应算在估算收入里。总之，估算收入是指收入帐目上无法反映的收入，它包括那些具体项目以及如果就此项目进行估值还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估算利息（Imputed interest） 此利息被看作是一种成本，即使并没有实际的现金付出，它从未出现在企业的财务记录上。企业的资本投资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到底考虑不考虑此类资本的利息，并将其算作为制造过程中间接费用的一部分。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人们认为投资于本企业的资本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估算利息的机会择一成本（opportunity alternative cost）。也就是说，假如这笔资本没有投入本企业，那么它会使公司得到另外一些收入，如存入银行或购买公债可以获得利息。这部分收入产生机会成本，结果形成估算利息。尽管几乎没有一家企业将估算利息计入它们的会计帐目中，但许多企业把它作为投资选择的重要参考指标。作为机会成本，企业自我投资估算利息的高低取决于这笔投资用于他处的收

益。如果估算利益高于投资的收益，那么投资就是不合算的。如果A投资项目的估算利息高于B投资项目的估算利息，B投资项目就应被优先考虑。

估价比率（Valuation Ratio） 企业的股票市场估价与该资产的帐面价值之比。在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股票市场估价（V）等于预期的股息支付额的净现值乘以企业当时的股票发行额。以n代表企业的股票发行额，D代表每股按固定年率g增长的股息，i代表折现率，则可以把企业股票市场估价写为以下公式：

$$V=\frac{nD}{i-g}$$

如果以r代表企业股票留存比率，π代表利润率，K代表资产的帐面价值，则可把上式写为：

$$V=\frac{(1-r)\pi K}{i-g}$$

由以上两式可以得出估价比率为：

$$\frac{V}{K}=\frac{(1-r)\pi}{i-g}$$

上式说明估价比率取决于企业的股票发行额(1-r)、利润率、股息的年增长率以及折现率。

改良自由主义（Reform Liberalism） 自由主义是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一种政治思潮。以法国的孔斯坦、英国的边沁和穆勒为代表。自由主义这一名词提出于19世纪初，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以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提倡个人权利，实现毫无拘束的企业主的竞争。改良自由主义又称20世纪自由主义，认为纯粹的自由主义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有害的，因此，他们信奉这样的经济哲学，即：人力对某些市场的干预将促进经济福利。改良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使资源的分配不当，并使得某些工人收人的明显不公平成为可能。不象古典自由主义那样认为当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时，在经济体系中就存在一种自然的和谐，对大家都有利。改良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被认为是新政、公平政治、福利国家，或最通常地被简称为自由主义。"自由"一词的含义已变得与20世纪初几乎完全相反了。改良自由主义者认为，巨额的垄断利润，对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掠夺、河流污染、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反复、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些都是政府方面采取放任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改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实用主义的。他们视市场情况而决定对策。如果市场符合于他们一般认为是最好的状况，那就对市场采取放任态度；但如果发现市场不符合理想状况，甚至于背离一些大的原则而发展，就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在某些场合下，解决的办法可能是以反对托拉斯来促进竞争；在另一些场合下，解决的办法是政府经营。改良自由主义者对于克服经济周期波动方面，更关心由于失业而造成的人间悲剧，而不是那么担心政府债务负担。凯恩斯认为美国经济由于长期需求不足而受到损害时，许多改良自由主义者便抓住这一看法作为需要政府起更大作用的进一步证明。

局部均衡理论（Partial-Equilibrium Theory） 局部均衡理论是用孤立的观点研究个体决策行为、个别市场运行情况的理论。该理论是在"假定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展开对特定问题的研究。局部均衡价格理论是局部均衡理论最典型的例子。在局部均衡价格理论中，只研究某种商品例如小麦市场价格的决定，而不涉及其他商品或要素价格。在研究小麦价格决定时，只假定小麦的需求量与供给量发生变化，而假定其余条件不变。在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的地方决定了小麦的均衡价格。除了局部均衡价格理论外，研究个别消费者均衡的理论，研究个别生产均衡的理论以及各种市场结构下，各种类型厂商的均衡都属于局部均衡理论。由于局部均衡理论集中于所要研究的个别变量并对影响变量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因此它简化了问题的分析，使得所分析的问题易于理解。但是，由于它把那些变化的因素视为既定，因而忽视了所研究变量与其他变量被假定为常量或参数而实际为变量之间的联系。对于各变量相互影响从而同时达到均衡的理论分析是一般均衡理论所要解决的任务。

状态偏好方法（State Preference Approach） 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方法。正如一个苹果在今天吃和在明天吃不一样，冰淇淋在炎热的夏天和在寒冷的冬季带给人们不同的效用，在时际间(intertemporal)问题中，同样的物质产品在不同的时间进行消费被看作是不同产品。在不确定情况下，同一物品在不同状态下就是不同物品。状态偏好方法以此为起点将效用定义为状态随机(state-contingent)商品的函数。状态随机商品指只有在某特定状态下才能消费的商品。假定只有两种可能的状态。w_1,w_2分别表示状态1和状态2之上的商品的数量，π_1、π_2表示状态1和状态2出现的概率。w_1·w_2用列向量表示两组商品，$\pi_1+\pi_2=1$。那么消费者的偏好可以用一个效用函数来表示：

$$u(w_1,w_2;\ \pi_1,\ \pi_2)$$

这里效用是被定义在偶然性的消费计划(w_1,w_2)之上。π_1,π_2是效用函数的参数，因为状态随机商品的价值依赖于状态出现的概率的大小。特殊

地，如果在一个完全市场上，人们可以外在的价格购买状态随机商品，消费者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分析与确定情况下的相同，即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对 w_1,w_2 进行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但状态偏好方法是非常一般的，状态随机商品的完全市场要求几乎不能被满足。如果有 n 种不同的商品，s 种可能状态，那么就有 n×s 种不同的市场。阿罗（k.J Arrow）曾说明：状态随机债权（claim）（即在不同状态下可产生不同货币数量的金融契约）的交换可以用状态随机商品的交换来代替，那么一个完整的市场集合仅要求 n 个商品市场加上 s 个证券市场。这个例子表明组织随机市场的代价极为高昂，因为对状态的确定和衡量十分困难。由于状态随机商品在市场不可能被交换，可见状态偏好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有很大的局限性。

纳西均衡（Nash Equilibrium） 纳西均衡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在一个由有限个人进行的博弈中，如果每个博弈者在相互博弈中选定了最佳策略，而且包括所有个博弈者的策略组合已定，那么任一个博弈者都不可能在其他博弈者都不改变其策略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得到较高的效用。

纳西均衡的定义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定有 I 个人参加博弈，即 $i=1,2,\cdots,I$,有 N 种纯粹的而不是混合的策略，假定第 i 个博弈者从可供他选择的 N_i 种纯粹的策略中选择若干种策略。用 S_i 表示他所选择的策略集合，s_i 是 S_i 中的一个具体策略。汇集所有 i 个博弈者所分别采取某一具体策略构成策略组合，表示为 $s=(s_1,s_2,\cdots s_I)$,这是一个策略向量。全部的策略组合为$\pi_{i=1}^{I}S_i$，用 S 代表$\Pi_{i=1}^{I}S_i$。每一个策略组合 $s=(s_1,s_2,\cdots,s_I)$都属于 S，表示为 $s=(s_1,s_2,\cdots,s_I)\in S$。第 i 个博弈者某一具体策略 s_i 当然也属于 S，即 $s_i\in S$.如果第 i 个博弈者将其策略 s_i 变为 s_i'，而其他所有博弈者的策略都保持不变，则出现一种新的策略组合（$s_1,s_2,\cdots,s_{i-1},s_i',s_{i+1},\cdots,s_I$）。用 s/s_i' 表示这一新的策略组合。对于每个博弈者 i 与每一种策略组合 S 而言，每个博弈者都会得到一个既定的效用，用 $U_i(s)$表示在所有博弈者采取 S 策略组合时第 i 个博弈者所得到的期望效用。在这些假定下，可以对纳西均衡定义如下：在博弈者的策略为纯粹策略的情况下，纳西均衡是一种策略组合 S，在这一策略下，对于每个博弈者 i 而言，$u_i(s)\geqslant U_i(s/s_i')$，$s_i'\in S$，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博弈者在策略组合 S 中其余博弈者的策略不改变的情况下想通过改变 S 策略组合中自己的策略而提高自己的效用都是不可能的。

纳西均衡表明，带有自我强制的、由博弈者达成的协议是达到纳西均衡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某一特定的经济活动中，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尤如参加一项博弈。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就如何从事经济活动达成一致协议，尽管协议没有明文规定而只是一种默契。每一个人都明确自己所要采取的策略，并且意识到其他每一个人所采取的策略，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其他人都不改变策略的情况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即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带有自我强制力。这是达到纳西均衡所必需的。若个人在其他人不改变其策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得到更多的好处，他的行为就不具有自我强制性，也达不到纳西均衡。

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IADB）

1959 年 12 月 30 日正式成立，并于 1960 年 10 月 1 日开始营业，行址华盛顿。它是由美洲国家为主成立的包括美洲以外国家在内的旨在向拉美国家提供信贷资金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它试图集中美洲内外的资金资助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促进拉美成员国的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以及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

泛美开发银行成立之初，有 21 个成员国，除美国外都是拉美国家，其法定资本为 10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 45%。此后，该行业务及成员不断扩展，到 1983 年 2 月，已有 44 个成员国，其中，美洲国家占 27 个，非美洲国家占 17 个，其法定资本已增至 296.38 亿美元，其中美国约占 41%。除美国外，认缴资本最多的国家为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

由于非美洲成员国的大量增加，泛美开发银行的法定资本不但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形式上也由原来的普通资本和特种业务基金两种形式发展为三种主要形式，增加了区际资本，供非美洲成员国与美洲成员国共同认缴。除认缴资本外，该行还通过向成员国借款和发行债券等形式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筹款，截至 1979 年 6 月底，借款金额达 24.28 亿美元，此外，该行还受托管理有关国家交付的一些资金，截至 1983 年底，这类资金达 11.76 亿美元。

该行主要业务是向拉美成员国内符合该行宗旨的项目提供贷款，这些贷款包括普通业务贷款和特种业务基金贷款。其中，普通业务贷款主要用于政府和公私机构的有关项目，年息 8%左右，期限 10--25 年，还款时须用借款时的货币。特种业务基金贷款则主要用于拉美国家的公共工程，年息较低，期限较长（30 年）。除贷款外，该行还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组织培训和学术会议以及帮助成员国制订发展计

划等。

该行日常业务工作由执行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由 12 名执行理事组成，其中，拉美国家 8 名，美、加各 1 名，美洲以外 2 名。该行大政方针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由各成员国派出副董事组成。各国均掌握基本投票权 135 票，此外，按认缴资本额每增加一股多一票表决权，美国认缴股金最多，因此表决权也最大，占 35%，其次为阿根廷和巴西。

应付标价（Giving Quotation） 即"直接标价"、"应收标价"的对称。见"直接标价"。

应收标价（Receiving Quotation） 又称"间接标价"，"应付标价"的对称。见"间接标价"。

证券交易所（Securities Exchange） 一种有形的，有组织地进行证券交易的场所，是二级市场的主体，各类证券，如普通股、优先股、公司债券、政府债券等均可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凡在交易所交易的证券，必须达到交易所规定的有关条件。凡符合条件，经过登记并在交易所交易的证券，称为上市证券。证券交易所的主要职能有：(1) 提供连续不断的交易市场；(2) 通过买卖双方的竞价过程，形成较为合理的证券价格；(3) 通过公开发行公司的财务状况，引导投资资金的合理流动；(4) 通过证券价格的升降，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状况。

证券公司（Securities Company） 指经营或投资于政府公债、公司或企业的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从而获取收益的公司。其最重要的职能是为投资者（即证券公司的客户）买卖证券，此外还有：(1) 为客户保存证券，并还代理客户收取债券的利息或股票的分红等；(2) 为客户融资和融券。如客户采用信用交易方式时，证券公司给予贷款，如客户采用卖空方式交易时，证券公司可以贷给证券，待客户以后购买证券再归还；(3) 提供证券投资的有关信息。

来料加工（Processing With Customer's Material） 来料加工是指本国企业接受外商提供的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辅助材料、零部件和包装材料等，按照外商提出的质量标准、规格、款式等要求进行加工，并把制成品运交外商，自己收取加工费。有时候，外商还提供一部分机器设备，机器设备的价款往往在加工费中扣除，加工结束后，机器设备归加工方。如果加工方在加工过程中提供了部分原材料、辅助材料和零部件等，那么它就可以向外商收取这部分货物的货款。

来料加工是国际间生产合作的一种初级形式。在这种交易中，加工方对进口的原材料等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由于绝大多数原材料由外商提供而成品又由外商销售，因此，对加工方来说，开展来料加工成本低，风险小。来料加工中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和零部件可享受免税进口，制成品则可以免税出口，而且这种进出口往往不收缴外汇，而只须在海关作一登记。由于来料加工不是一般的商品买卖，因此来料加工合同中规定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于一般的货物买卖合同。在这里，外商（委托方）承担的主要义务是按时、按质、按量地将原材料等运至指定地点交给加工方，按时在指定地点接收制成品并按合同规定的方式和条件向加工方支付加工费。加工方的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的原材料消耗定额，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加工任务并把制成品及时在约定地点交给委托方。我国的来料加工贸易发展很快，目前发展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产品，由于可供开发的行业和产品还很多，因此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来样加工（Processing on Giving Sample） 来样加工是指加工方根据外商（委托方）提出的样品及有关要求，用自己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进行加工生产，然后把制成品交给外商，自己收取加工费和材料费，在这里，加工方采用的原材料通常是本国生产的，有时候根据需要也从国外进口一些，不过这一工作完全由加工方自行解决。在来样加工贸易中，加工方对原材料和其他辅助材料等拥有所有权，这是同来料加工的一个很大区别。另外，由于来样加工通常是采用本国原料进行加工生产，因此，加工方可以取得更多的外汇收入。但是，相对于来料加工来说，开展来样加工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是外商对加工方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心，不会轻易开展来样加工。因此，发展来样加工的关键是要让外商了解自己，同时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赢得外商的信任。

来件装配（Assemblkiying With Customer's Parts） 来件装配是指本国企业利用外商提供的元器件、零部件以及装配所需的设备、技术等组装成品，并把成品交给外商，从中获取装配费。来件装配是一种最简单的加工形式，开展来件装配的主要原因是外商希望通过利用装配国低廉的劳动力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逃避进口关税，更好地打入国外商场。来件装配同来料加工的差别，一方面在于加工产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来件装配偏重于电子、机械产品。另一方面，来

料加工的加工方得以较好地掌握生产技术，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而来件装配的加工方则在加工过程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关键技术都由外商掌握，对于提高加工方的生产技术水平作用不大。

进入市场自由（Free of Entry） 指新厂商进入行业和市场的能力。一般来说，只有在完全不存在进入行业的障碍时，进入市场才是自由的。进入行业的障碍有很多种，有的在于难于获得某种特定的自然资源，有的在于某种重大专利的存在，以及产品市场相对于最佳企业规模的大小，某些产业一开始就需要巨额投资，需要巨大的、复杂昂贵的工厂设备，此外，还有可能在于已经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联合行动如制订和实施限制性价格等。进入市场自由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应该是拆除行业和市场壁垒，保证进入市场自由。

进入诱发因素（Inducing Entry Factor） 指诱使潜在竞争者实际进入某产业的因素。一般认为，进入诱发因素主要有两个：1.产业具有长期性的高利润率；2.存在长期性的持续的需求增长率。

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 进入壁垒是市场内已有企业对准备进入的新企业据有的优势。换言之，进入壁垒就是准备进入某产业的企业，相对产业内现有企业，可能遇到的不利因素和障碍。一般来说，进入壁垒高的产业，卖方集中度较高，而进入壁垒低的产业，卖方集中度较低。形成进入壁垒的因素主要有：1.规模经济壁垒。就规模经济很大的产业而言，现有企业一般都已经采取大规模生产，因此，新企业如果采取最佳生产规模以下的小规模生产，在成本上是无法和现有企业对抗的，所以新企业必须在进入时或进入后短期内就达到最小最佳生产规模。问题是，新企业在进入初期难以获得与较大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市场份额，所以可能发生开工率不足从而亏损等现象，就是说，在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内，无论新企业组织何种规模的生产，都不易站稳脚跟。2.必要资本量壁垒。在不同产业，进入市场所必需的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投资量即必要资本量因生产、技术、销售的基本特点不同，而差异很大，必要资本量越大，因筹资困难进入的难度也就越大。3.产品差别壁垒。消费者对现有企业产品有强烈偏好的产业，新企业为了获得消费者对自己产品的偏好，必须作出巨大努力如支出巨额的促销费用，由此造成企业进入的困难。4.资源占有壁垒。相对新企业、产业内现企业一般具有资源占有优势，如：（1）现有企业排他性地拥有、支配原材料供应渠道；（2）现有企业排他性地拥有专利技术或技术诀窍；（3）现有企业排他性地拥有，支配销售渠道；（4）现有企业拥有不易得到的生产许可证等。由此给新企业的加入带来了难度。

进口替代战略（Import Substitution Strategy） 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之一。又称内向发展战略。指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优先发展本国消费品或制造品生产，来取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同类商品，以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发展中国家在殖民地时期大都形成了单一的经济结构，本国经济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所需制造品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为了摆脱对发达国家制造品的依赖和改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制定和推行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便防止外国商品对本国制造业的冲击，保护和促进对民族工业的投资，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进口替代战略于本世纪30—40年代由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率先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推行。到60年代，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进口替代，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是，为此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进口一定数量的设备与原材料，这样就迫使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用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因此，出口替代又往往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前提的。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生产资本、技术要求不高的简易消费品；生产资本、技术、设备要求较高的耐用消费品；生产机械设备和中间产品。就目前状况而言，很少有全面进入第三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可采取多种形式。如国家出资建厂、引进外资建厂，国家与外资、私人企业与外资合作办厂，利用外资和国外资助办企业，建立经济特区，利用跨国公司在国内建立生产和销售基地，等等。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形式。为了确保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在进口替代工业建立的初期，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保护措施予以扶植。主要包括：（1）实行关税保护，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以限制其进口；同时对国内生产必需的资本品、中间产品等投入品的进口征收低关税或减、免关税，以降低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成本。（2）实行进口配额，以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增加必需品进口，并通过限制国内对进口商品的非生产性消费，来防止“示范效应”产生的消费早熟，为工业积累资本。（3）实行外汇升值，以减轻必需品进口造成的外汇压力。（4）国家在资本、劳动力、技术、价格、收益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保护进口替代工业不被外国产品和国内其他行业的竞

争所排挤。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对于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广泛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进口替代的深入，其消极的面也日益暴露。诸如国内两极分化加强，市场难以扩大；对农业、电力、能源、基础设施重视不够，尤其是粮食自给程度显著下降，转而依赖进口；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原材料进口增大，国际收支难以平衡等。由此导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不同见解。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进口替代长期实行保护政策，会使国内工业效率低，成本高，竞争力差，不利于出口，而且，为了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需进口机器设备，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更加恶化。有人对进口替代战略持赞成态度，认为只要这些国家注意节约外汇，尽可能利用本国资源和劳动成本低的优势，进口替代就有助于实现本国工业化。更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主张，进口替代不可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在实行了较低级的产品替代之后，转向以出口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的发展更为有利。

进料加工（Processing With Importing Material）　进料加工就是指国内企业进口原料，用自己的机器设备和劳动力把它加工成制成品后再用于出口，又叫"以进养出"。进料加工是一种传统的贸易方式，由于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各国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又使得有些国家在某些领域生产能力有余而原料不足，这时就可以发展进料加工，以充分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要开展进料加工，前提是生产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外汇得以进口原料，而要使进料加工具有现实可行性，还必须使制成品出口收入大于原料进口成本。因此，在开展进料加工贸易前，企业必须认真分析核算外汇增值情况，同时还必须考虑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问题。因为即使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售价较高，但如果销路不畅，同样不能取得理想的外汇收入。

进口汇率（Import Exchange Rate）　"出口汇率"的对称。实行外汇管制国家的外汇管理机构规定的进口商品购买外汇时所使用的汇率。进口汇率可以是一种汇率，适用于所有进口品，也可以数种并存，不同种类商品适用不同的进口汇率。进口汇率的制订往往和一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对于本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原材料进口所需外汇，外国货币汇率常订得较低，对于重点保护工业产品的进口所需外汇，外汇汇率一般订得较高。

进口商品拨交价格（Allocating Prices of Importers）　进口商品拨交价格是指我国的外贸公司在向国内的企业和机构出售进口商品时所使用的价格。进口商品拨交价格有两种作价办法。一种办法是按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作价。如有全国统一价就以全国统一价为准，如无全国统一价则以到货口岸地区价格为准。如果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质量、规格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则可按按质论价的原则适当加以调整。另一种办法是代理作价，就是将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按规定汇率折成人民币，加上包括进口税在内的各种费用，以此确定进口拨交价。从这两种拨交价来看，前一种价格与国际价格相脱节，对国内企业和机构形成不了压力，后一种价格则以国际价格为标准确定，国内企业要对进口商品实行自负盈亏，这就有利于促使国内企业更好地利用进口商品，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同时，代理作价还将减轻国内的负担。进口商品拨交价格是在我国特有的经济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对国内生产企业无法形成强大的压力，影响了进口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就有必要对这种进口拨交价格进行改革，应逐步减少以至取消以国内价格为基准的作价方法，逐步向代理作价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一改革需要时间，也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套。

进口许可证制（Impert Licence System）　进口许可证制是一种直接的非关税壁垒，它是指一国为了加强进口管制，规定进口商必须领取本国有关当局发放的进口许可证方能进口，没有进口许可证一律不准进口。一国如果要实行进口许可证制，首先必须公布有关商品的目录。如果进口商要进口一种商品目录所列的商品，就必须向有关当局提出申请，在得到同意、取得许可证后，就可以办理通关进口手续。进口许可证上通常要注明有效期限、进口商品的名称、来源、数量和金额等。一般来说，一国在实行进口许可证时，总是严格控制许可证的发放，使之更好地为本国的贸易政策服务。进口许可证制可以直接控制进口，它不仅可以控制进口的总额，而且还可以控制国别来源，因而可以在实现限制进口的总目标的同时实行差别待遇和贸易歧视。另外，一国有关当局在发放许可证时，往往要收取一定的捐税和手续费，这些费用相当于变相征收的进口附加税，有时候这些费用甚至会大大超过正常的进口税，从而能够更好地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进口许可证从它与进口配额的关系看，可以分为定额进口许可证与无定额进口许可证。定额进口许可证是国家在公布进口配额的基础上，在配额的范围内，根据进口商的申请发给的含有一定数量或金额的许可证。一旦进口配额分配完毕，国家就

不再发放进口许可证，因此，定额进口许可证与进口配额直接挂钩。无定额进口许可证是指国家并不公布进口配额，在考虑进口商的申请和国家内部掌握的政策界限和进口额度的基础上，逐一发给进口商的没有进口数量和金额限制的进口许可证。从表面上看，无定额进口许可证限制较松，但是事实上它在限制进口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定额进口许可证更大。因为既然发放进口许可证，那肯定是不会随意发放的，总会有一定的政策界限与标准。如果说公众不了解这方面的标准，那么政府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作出发还是不发的决定。而如果公众了解有关标准和配额，那么在配额用完之前，政府无法强制停发进口信用证，这不仅会引起进口商的不满，而且还会引起出口国的不满，影响贸易的进一步开展。进口许可证根据进口管制的程度来看，又可分为公开一般许可证、特种进口许可证和公开个别许可证。公开一般许可证只规定进口商品的种类，既不限制进口数量和金额，也不限制来源地。这种进口许可证对进口的管制最松，进口商在填写该许可证后，即可办理进口。特种进口许可证既规定进口商品种类，又规定进口国别和地区，这种进口许可证对进口的管制最严。在办理这种许可证时，进口商必须向政府有关当局提出申请，经逐笔审批后才能进口。公开个别许可证对进口的管制程度介于上述两种许可证之间。为了区分不同许可证所进口的商品，有些国家通常会定期公布商品目录。由于不同时期政府对不同进口商品的管制程度会有所变化，因此政府公布的商品目录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进口商及时申请和办理相应的进口许可证，完成进口。两次大战以前，进口许可证制曾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较少采用进口许可证制，只是对一些市场竞争激烈的商品仍实行进口许可证制。目前，实行进口许可证制的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通过实行进口许可证制来保护民族工业，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发展体系服务。

进口最低限价（Minimum Price of Import） 进口最低限价是一国政府为某种商品规定的最低进口价格。如果某种商品的进口价格低于最低限价，就必须对之征收进口附加税或禁止进口。规定进口最低限价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削弱它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制定的进口最低限价总是接近于国内市场价格，而在少数情况下，进口最低限价会大大高于国内市场价格，其原因是某种进口商品具有极强的竞争能力，如果不大幅度拉开它与国内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售价，那么它仍有很强的竞争能力。有时候，政府制定的大大高于国内价格的进口最低限价实际上起到了禁止进口的作用。进口最低限价是一种间接的非关税壁垒。

进口配额（Import Quotas） 进口配额又叫进口限额，它是指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对于某些进口商品设置的数量限制。在规定的期限内，配额以内的商品可以按正常途径进口，但超过配额，就不准进口，或者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至罚款。进口配额是一种直接的非关税壁垒。进口配额同进口关税尤其是高额进口关税一样，都能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不过它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通常要比进口关税大。因为有时候国内对某种商品有很大的需求，单靠高关税难以阻止商品的进口，而进口配额却可以做到这一点。由于进口配额效果显著且简便易行，因此它成了许多国家限制进口的有力武器。进口配额限制进口作用的大小，与配额数量关系密切。配额大，它所发挥的限制进口作用就小，配额小，限制进口的作用就大，两者呈反比。

进口配额主要有绝对配额和关税配额两种。（1）绝对配额（Absolute Quotas）。这是指一国对某些商品在某一时期内的进口规定一个数量或金额的最高额，达到这个限额后就禁止进口，绝对配额又分为全球配额和国别配额两种。全球配额（Global Quotas 是指一国政府对某种商品规定一个世界范围的绝对进口配额，按照进口商的申请批给一定的进口额度，直到总配额发完为止。在批发额度时，不考虑这些进口商品来自哪个国家。国别配额（Countny Quotas）是指一国在制定绝对进口配额的基础上，分别确定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配额，超过规定的配额便不准进口，与总配额是否用完没有关系。有关国家可以通过推行国别配额实行区别对待和贸易歧视。在推行国别配额时，为了区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进口国一般要求进口商提交原产地证明书，从而限制其他国家的商品通过转口方式进入该国。国别配额又可分为单方面配额和协议配额。单方面配额是指由进口国单方面强制规定在某一时期内从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口某些商品的配额，协议配额则是指由进口国与出口国通过谈判规定某一时期内某些商品的国别配额。由于单方面配额容易引起贸易双方不必要的摩擦，因此国别配额多为协议配额。（2）关税配额（Tariff Quotas）。这是指一国对某一时期内某种商品的绝对进口数量或金额不加限制，而是对关税配额内外的进口商品分别给予不同的关税待遇。具体讲，对关税配额以内的进口商品，分别给予低税、减免或免税待遇，而对关税配额外的进口商品，则征收较高的关税或罚款。关税配额按进口商品的来源，可以分为全球关税配额和国别关税配额，按征收关税

的差别，又可分为优惠性关税配额和非优惠性关税配额两种。优惠性关税配额（Preferential Quotas）是指在关税配额以内的进口商品，可以享受较大幅度的关税减让甚至免税，超过配额则征收正常关税；非优惠性关税配额（Non-preferential Quotas）是指对关税配额内的进口商品征收正常关税，而对超过关税配额的进口商品则征收高额进口税甚至罚款。除了绝对配额和关税配额外，还有一种季节性配额，它是指一国针对国内某商品在不同时期的生产和供应情况临时确定的进口配额。

进口押金制（Advanced Deposit System）　进口押金制又叫进口存款制，这种制度规定，如果进口商要进口一批货物，那么它必须预先将一笔相当于进口货款一定比例的资金在指定的银行无息存放一段时间。实行进口押金制，不仅使进口商直接蒙受了利息损失，变相提高了进口商的进口成本，而且使进口商可能会缺乏必要的流动资金用于进口，因而不得不减少进口。总之，进口押金制将会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信贷紧张的情况下尤为明显。进口押金制是一种间接的非关税壁垒。

进口税（Import Duties）　进口税是指进口国家的海关在外国商品输入时，根据有关法规对本国进口商所征收的关税。进口税可以在外国商品直接运入关境或国境时征收，也可以在外国货物由本国设立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或保税仓库提出运入关境时征收。进口税的种类很多，如正常进口税、进口附加税、优惠进口税、差价税等等。进口税在增加一国财政收入和保护国内市场及生产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战后国际贸易自由化倾向使得进口税的作用有所下降，主要表现为进口关税的不断减让。尽管如此，进口税在限制进口、实行贸易的国别和地区歧视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进口性通货膨胀（Imported Inflation）　又称"进口成本推动性通货膨胀"。指由于进口的投入品价格上升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从开放经济的角度看，一国经济中一些重要的进口产品价格上升，会引起用这些产品作为投入品的本国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导致该国国内物价水平普遍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尤其是某些重要的、无法替代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上升，更会对国内通货膨胀有重要的影响。这种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类型。在开放经济中，一国的通货膨胀会通过其出口品价格的上升而传递到另一国，出口与进口是国际间通货膨胀的重要渠道。开放程度高，特别是对进口投入品依赖程度大的国家，进口性通货膨胀就相当重要。而且，进口性通货膨胀极容易演变为经济的停滞膨胀。70 年代初期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和石油价格的猛烈上升，使许多石油输入国发生了严重的进口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不但无助于扩大生产消除失业，反而使一些与石油有关的生产部门因生产成本上升过快产品销路锐减，结果在物价水平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国内生产停滞，失业增加。许多经济学家正根据这一点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 70 年代初出现的滞胀。

远期信用证（Usance Credit）　远期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授权信用证的受益人开立远期汇票收款的信用证。由于受益人开立的是远期汇票，在受益人提交符合信用证规定的汇票和单据时，银行并不立即付款，而是先由汇票的付款人先行承兑。远期信用证下，汇票的付款人既可能是开证银行或其指定银行，也可能是进口商，这样，远期信用证可以分为银行承兑信用证和商业承兑信用证。

所谓银行承兑信用证（banker's acceptance credit 是指授权受益人开立的开证银行或其指定行为汇票受票人的远期信用证。出口商开立远期汇票后，将汇票、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的货运单据以及信用证交当地议付银行，议付银行既可以一方面立即对汇票进行议付，进行出口押汇，一方面将汇票与单据寄交开证银行或其指定行进行承兑提示；也可以审单后仅将汇票与单据提交开证行进行承兑提示，而后将银行承兑汇票交还受益人，由受益人自行保存，到期取款或自行到当地贴现市场进行贴现。议付银行向开证银行的交单条件是承兑交单，而开证银行承兑后取得货运单据，在汇票到期日则要求进口商付款交单，与托收业务类似，若出现货物抵达目的港的日期早于信用证下远期证票的到期日，则开证银行在进口商资信较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开展信托收据业务，允许进口商凭信托收据先行借单提货，在汇票到期日再行付款。

所谓商业承兑信用证（trader's acceptance credit）是指授权受益人开立以开证人为汇票受票人的信用证。在商业承兑信用证下，需将汇票及有关单据提交信用证的开证人进行承兑提示。同时，开证银行仍需对汇票的承兑及到期付款承担责任，在开证人拒付时，可转向开证行要求提示或付款。但是，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条件终究低于银行承兑汇票，因而，商业承兑信用证较银行承兑信用证相对较少。

远期汇率（Forward Exchange Rate）　远期外汇交易中所使用的汇率。（1）可以直接标出；（2）在即期汇率的基础上以远期差额，即升水、贴水或平价标出。若即期汇率采取的是直接标价法或美元标价

法，则远期汇率＝即期汇率升水；若即期汇率采取的是间接标价法，则远期汇率＝即期汇率贴水。

远期外汇（Forward Exchange） 见"远期外汇交易"。

远期外汇交易（Forward Exchange Transaction） 又称"期汇交易"。即期外汇交易的对称。买卖外汇的双方先签订合同，规定买卖外汇的种类、数量，汇率及将来的交割日期，至所定交割日双方再按合同规定卖方交汇，买方付款的一种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中买卖的外汇称为远期外汇或期汇；所使用的汇率称为远期汇率；双方签订的合同称远期合约。交易期限通常为1、2、3、6、12个月，少数的在一年以上，多数为3个月。从事远期外汇交易的主要是：(1) 进出口商。进口商购买和其已订贸易合同相应的远期外汇，出口商出售和其已订贸易合同相应的远期外汇，不仅可以避免签订贸易合同到执行合同进行外汇收付中因汇率变动可能造成的损失，还有利于成本核算；(2) 外汇银行。利用远期外汇交易可以调整其外汇持有额和外汇资金的结构，可以达到避免外汇风险及其它目的；(3) 外汇投机商。远期外汇交易分为固定交割日的远期外汇交易和择期远期外汇交易。前者在远期合约中规定了明确的交割日期；后者的远期合约则规定和外汇银行交易的顾客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中的任何一天进行交割。因交割日对顾客有利，故所使用的汇率须是从择定期开始和结束时较不利于顾客的那一远期汇率。在国际经济交易特别是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商往往不可能知道收付款的具体日期，固定日期的远期外汇交易很难满足需要，择期远期外汇交易便应运而生。例，一美国出口商向英国出售价值100万英镑的商品，他不知道收款的确切日期，但认为肯定能在签订合同后的第三个月收到英镑货款。于是为了避免外汇风险和某外汇银行进行了一笔择期远期外汇交易，卖出远期英镑100万，择期在第三个月。该行报出的买入汇率为：

即期　£1＝＄1.8750

1月期　£1＝＄1.8760

2月期　£1＝＄1.8765

3月期　£1＝＄1.8770

据此，该出口商可在第三个月中的任何一天向外汇银行交割100万英镑取得美元，适用汇率在1.8765美元和1.8770美元间选择，因1.8765对出口商较为不利，故入选。

运输包装（Shipping Package） 又称为大包装或外包装。运输包装是为了便于商品的运输、装卸和储存而对货物进行的包装。运输包装的种类很多，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形式为单件运输包装，这是指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作为一个计件单位的包装，从造型上分可以分为箱、桶、袋等，它们的制成材料可以不同，容量也可不同。另一种形式称为集合运输包装，又称为组化运输包装。它是在单件运输包装的基础上，为了适应运输，装卸过程的现代化要求，将若干件单件运输包装组合为一件大包装。目前常见的集合运输包装有：集装箱、集装袋、托盘等，集合运输包装极大地提高了装卸效率，更好地保护了商品，但是，采用集合运输包装，需要有专门码头和相应的装卸设备与之配套，因而，集合运输包装还处于推广阶段。

运输包装的费用一般是包含在货价之内，由卖方负担的，由于包装费用影响成本，包装尺码和重量大小也影响运费，这样，买方只能够在不影响包装费用和运费的原则下提出包装要求；若买方提出包装特殊要求，其费用应由买方负担。

运输指向（Transport Orientierung） 区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按运输成本所决定的区位趋向。韦伯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他认为，单就运输而言，假定没有其它因素影响工业的区位，那么工业自然会选择原料与成品二者的总运费为最小的地方。这样看来，决定运输费用大小的基本因素就是距离和货物的重量了。当然韦伯也承认其它因素也会对运费的大小产生影响。例如，运输制度和运输工具的利用程度、地形的差异、待运货物的质量等。但韦伯认为这些因素都可以用货物重量和运输距离的差异来表示或者进行换算。可以看出韦伯把运输费用作了进一步的引伸：1.运输机构和地段不同而形成的运价差异。在计算中，可将运费高的线段按比例拉长实际距离，运费低的线段则按比例缩短实际距离；2.地形不同造成的运费差异，也可按比例拉长或缩短相应的上坡或下坡的运输费用；3.运量小，运距短的货物运费率高、运量大，运距长的货物运费率低，也可以相应拉长或缩短其运距；4.特殊货物的运输如超高、超大、轻泡、易燃和易爆等，则可按运价换算成更大的重量划一办理。在这里韦伯排除了经济制度对运费的影响，认为重量和运距是运费的本质内容。这样区位的基本图形就只是原料、燃料和消费地的分布，用区位三角形就可以找到一个吨公里最小的运费最小点。后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韦伯的假定是存在着一个"均一运输面"，并没有揭示下列实际情况：1.各种不同的投入和产出是以不同成本转移的，而重量又往往不能作为衡量投入或产出数量的合适尺度；2.运输通常必须沿着已有的服务始、终点之间的线路，而不是按

照直线来进行；3.当运输沿一线路进行时，成本是与距离成正比的，但运输中所需要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信息成本等因素之间是不相同的；4.运输公司的成本与运输服务用户之间的成本，不同运输技术或方式在成本和服务能力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情况都会对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但这些经济学家仍然和韦伯一样，认为在根据运输费用来确定最优区位时，如果用"理论重量"来取代投入和产出各自的实物重量，那么就可以用不同货物运价的差别来反映其对区位优劣的影响。从而形成决定产出产位的因素。

运输工具交货　FOB（USA Definition）　根据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修订本（Kevise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Definition，1941），美国的FOB贸易条件并不仅限于海上运输的FOB条件，除了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所指的"装运港船上交货"价格术语之外，FOB条件还可应用于内陆运输的卡车、火车、驳船、飞机等各种运输方式，由此，美国的FOB贸易条件可分为下述几项：

1.在国内指定的发货地点，送到指定的内陆运输工具上交货；

2.在国内指定的发货地点，送到指定的内地运输工具上交货，运费预付至指定的出口地点；

3.在国内指定的发货地点，送到指定的内地运输工具上交货，扣除到指定地点的运费；

4.运至指定的出口地点，在指定的内地运输工具上交货；

5.装运港船上交货；

6.进口国家内地指定地点交货。

因此，美国通行的FOB条件只有"装运港船上交货"与一般国际贸易中通用的FOB条件含义相同，而其它的FOB条件事实上是国内贸易价格术语。在对美贸易中，若采用FOB条件、必须在FOB后面加缀船舶（vessel）字样，以及装运港名称，如FOB Vessel New York。

运费到付提单（Freight at Destination BIC）
运费到付提单是指收货人在目的港收取货物时，才向承运人支付运费的提单。

运费到付提单一般都在提单上列明"运费待付"字样。

运费付至目的地价（简写：DCP）（Freight or Carriage Paid to…Named Point of Destination）　国际贸易价格术语，按照卖方交货地点的不同，可分属于出口国内陆交货系统价格术语或装运港交货系统价格术语。依照《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规定，在运费付至目的地价格术语下，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如下：

A.卖方义务：

1.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货物和有关凭证；

2.自费在指定日期或指定期限内，发货至双方约定的目的地交货地点。如交货地点未曾约定，卖方须在目的地选择最适地点作为交货点；

3.除依照下述买方义务（3）条款规定的情况外，应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直至依照合同的规定时间，将货物交与第一承运人保管为止；

4.卖方在将货物送交第一承运人保管后，应当立即无延迟地通知买方；

5.自费供给货物的惯常包装，但依行业习惯，若对此货物的运送无须包装，则不在此限；

6.负担因装货、或将货物送交第一承运人保管而需支出的任何检查费用，如核对品质费；

7.自负风险和费用，领取出口许可证或政府所签发的有关出口的其它证件，并支付在启运地国家所应负担的任何捐税；

8.根据买方请求，并在买方负担费用和风险的情况下，给予买方一切协助，使其获得装运地或原产地国家所签发的、为买方所需的、货物在目的地国家进口或必要时经由第三国过境运输的任何凭证。

B.买方义务：

1.按照合同规定，在目的地交货地点，受领货物并支付合同规定的价金；

2.自货物送交第一承运人保管时起，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3.对发送货物或选择目的地，如曾保留了一定期限，却未能届期给予指示，则自该期限终了时起，负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但以该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4.支付因领取上述卖方义务8条款所指凭证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原产地证明书和领事签证费用在内；

5.支付海关捐税及其它在货物进口时和由于进口而征收的一切其它捐税。

运费付至目的地价格术语主要是规定在运费的负担上，卖方负担货物到达目的地以前的一切费用，但在卖方将货物送交第一承运人保管并通知买方后，风险则由卖方移至买方负担。卖方负担的费用一般包括领取出口许可证费用，出口捐税、托运检验费、装货费以及到达目的地的运费，但对于领事签证费及其它买方为办理进口和转口手续所需的单证费用以及进口捐税，都应由买方负担。

对于货物是否须在合同规定的日期和期限内到达目的地，或卖方仅须在规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将货物付

运，在运费付至目的地下，各个国家还是有不同的惯例的，这需在买卖合同中予以明确。但对于买方的付款时间，则通常是在货物到达目的地之后。

运费预付提单（Freight prepaid BIL） 运费预付提单是指托运人在装运港交付货物时，就向承运人支付运费，而承运人则在提单上载明"运费已付"字样的提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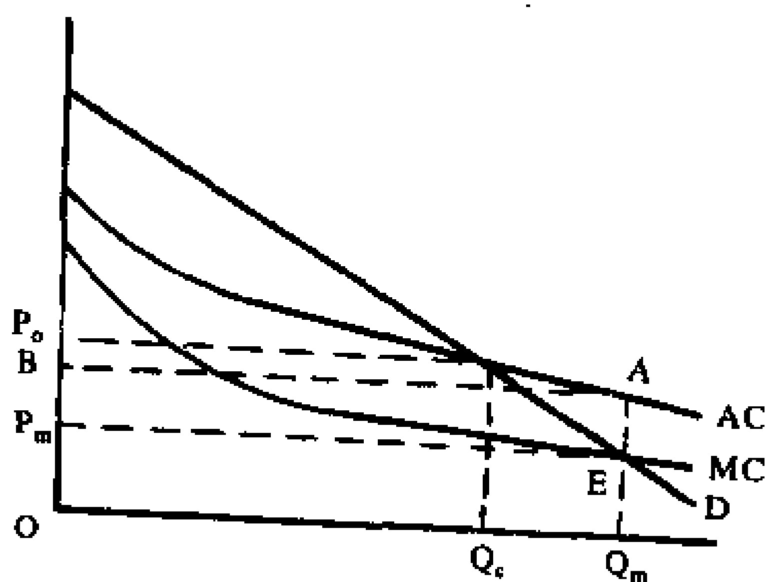
运费已付提单通常是在CIF或C&F合同中使用的。

两地套汇（Arbitrage in Two Places） 即"直接套汇"，又称"两角套汇"。见"地点套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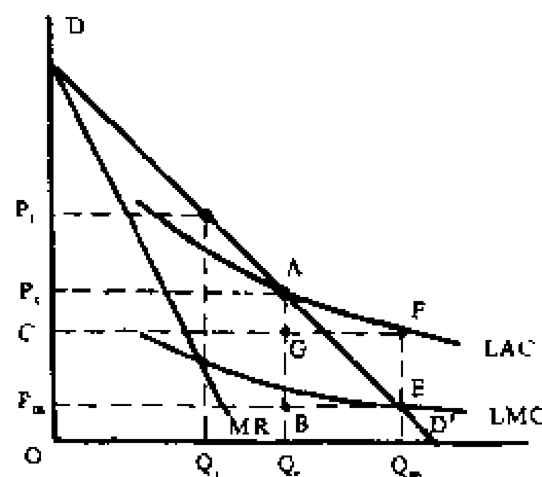
两角套汇（Two-Point Arbitrage） 即"直接套汇"，又称"两地套汇"。见"地点套汇"。

两合公司（Limited Partnership） 是无限责任股东与有限责任股东混合组成的公司。这种公司的股东至少必须有一个人负无限责任。作为无限责任的股东，对于公司的债务负有连带无限的责任，如同无限公司的股东一样。同时，两合公司的股东也至少必须有一个负有限责任，象有限公司的股东一样，仅以其投资额对公司负责。其主要特征是：(1) 两合公司是无限公司和有限公司的混合，因而它同时具有无限公司以个人信用为基础和有限公司以股东的资本为基础的双重性质；(2) 两合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由合伙契约规定；(3) 两合公司中负不同责任的股东，其权利与义务不同；(4) 两合公司筹集资本较之无限公司容易。

两部分费用（Dual Charge） 确定公益事业价格的一种方法，它综合了平均费用价格形成和边际费用价格形成。边际费用价格形成是使社会性剩余（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总和）最大，资源分配处于最佳状态时的价格，此时价格等于边际费用水平。用图解释边际费用价格形成，那么，因为在公益事业领域中有规模的经济性。因此，边际费用曲线为自左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如图所示）。这就是和需求曲线相交，交点为E点的曲线，此时价格为OP_m。OP_m为满足资源分配效率的目标的价格，它比每单位平均费用AQ_m低，所以发生每单位亏损AE，总亏损额为p_mEAB。这一亏损如果通过税收补贴，便能够使企业提供服务，但向众多的公益事业支付的补贴需要巨额的税金收入，实际上难以实行。而且向企业提供税收补贴又会招来企业经营松散化。因此，在大部分国家公益事业未能实施边际费用价格。平均费用价格形成就是需求曲线和平均费用曲线的交点上的价格OP_c（如图所示）。



边际费用价格和平均费用价格



两部分费用

这时价格在平均费用水平之上，不发生亏损，企业能够取得正常利润。平均费用价格形成虽然不能实现最佳的资源分配效率所要达到的目标，但企业能够获得正常利润，为稳定企业经营作出贡献。因此在公益事业中采用的较多。两部分费用则是综合了边际费用价格形成和平均费用价格形成，公益事业中同一种类的服务价格体系有基本费用和度数（用量）费用形成的两部分费用。两部分费用指，在边际费用水平上确定租金，由于那时的亏损部分相当于不能通过租金（=边际费用=变动费用）回收的固定费用部分，将固定费用均等地分配给全体利用者，企图以此作为基本费用按月回收的费用。若用图说明，租金决定于边际费用水平OP_m，如同边际费用价格形成一样供应OQ_m。

若假定固定费用和平均费用价格形成有同样的水平为P_cABP_m，那么把它分配给利用者数（N），以此作为每月必收的基本费用。两部分费用的消费者剩余DAP_c+AEB比边际费用价格形成时的消费者剩余DEP_m只是少P_cABP_m，比平均费用价格形成时消费者剩余DAP_c，只是多AEB。因此从经济性福利的

观点看，两部分费用虽然不如边际费用价格形成，但比平均费用价格形成要好。经济学上边际费用价格形成为最佳方针，两部分费用称为次佳方针，平均费用价格形成称为现实的方针，垄断价格（图中 OP_1）称为最差方针。两部分费用能够避免发生象边际费用价格形成的亏损，而且不管利用量多少，能够从利用者那里征收一定月额的基本费用，用来资助于企业经营的稳定。但是，如果基本费用变得高，便有少量的低收人的需求者难以接受所提供的服务的危险性。因此，政府当局制定两部分费用时以确定基本费用水平的方法为重要的政策课题。

两缺口模式（Two—Gap Model）　关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外资源解决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矛盾的一种模式。1966 年由美国经济学家 H · 钱纳里和 A · 斯特劳特在《外援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并主要受到三种形式的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即出口收人小于进口支出，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等进口，阻碍了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的约束。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企业家和管理人才，无法更多地吸收外资和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影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会遇到这些约束，并依次出现 3 个经济发展阶段：吸收能力限制的发展阶段、储蓄限制的发展阶段、外汇限制的发展阶段。钱纳里和斯特劳特重点考察的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利用均衡方法分析，宏观经济的总量公式为：总产出或国民收入＝总支出。如果 Y 代表总收人；C 代表总消费，I 为总投资；X 和 M 各代表出口和进口；S 为总储蓄；则有：

$$Y=C+I+(X-M)$$

移项　$Y-C+M=I+X$

而　$Y-C=S$

于是　$I-S=M-X$

如果 I 大于 S，则国内储蓄出现缺口；如果 M 大于 X，则国内外汇出现缺口。假设在给定的时点上，储蓄和外汇这两个缺口不仅大小不等，而且没有互补性和替代性，从而每一个缺口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约束性。调整这两个缺口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从修补缺口本身考虑，不用外资条件下消极的调整。又分两种情况：当 $(I-S)>(M-X)$ 即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时，可以通过削减国内投资或增加储蓄来实现两端的平衡；当 $(M-X)>(I-S)$ 即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时，可以通过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来实现两缺口的平衡。但是，削减投资或减少进口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增加储蓄和出口又都是难以实现的。另一种是着眼于经济增长的方法，利用外资条件下积极的调整。即引进外资，使两个缺口在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情况下实现平衡。通过引进外资来平衡两缺口，具有双重的效应。若一笔外资以机器设备的形式引进发展中国家，从供给看，既是从国外进口了资源，又不需要用增加出口来支付，这就减轻了外汇不足的压力；从需求看，这笔进口既是投资品，又不需要用国内储蓄来提供，这就减轻了国内储蓄不足的压力。两缺口模式指出，当经济发展受到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限制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成功地利用外国资源。因为利用外资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表现为：(1) 可以增加出口能力。外资若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项目，可以直接增加出口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量；若用于降低出口成本的项目，可使出口产品成本降低，增加竞争能力，间接地促进出口。(2)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投资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收入水平。若将外资用于投资，可促进国民收入增长，从而一方面提高国内储蓄率，增加资本形成；另方面使政府获得较多的财政收入，可再度用于投资。(3) 可以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产出增加了，资源使用的效率提高了，本国的总收人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量增大。两缺口模式强调，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必须做到有计划性。应根据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事先计算好需要进口的资源量，使进口的资源量恰好等于国内需要的追加资源量，以使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相等，国内经济结构达到平衡。相反，盲目地引进外资，则会造成因进口过少而使储蓄缺口不能填补，或因进口过多而使储蓄过多发生浪费。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不能长期依赖引进外资来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应有效地利用外资来发展国内生产，增加出口，提高国内储蓄能力，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以使两个缺口自然而然地实现平衡，消除它们对经济发展的约束，逐步地减少直至取消国外的援助，最终依靠本国经济内部的力量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为了有效地利用外资，两缺口模式还强调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本世纪 60 年代，两缺口模式的影响相当广泛，曾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制订利用外资政策的理论依据。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也指出了两缺口模式本身存在的不足。这包括：(1) 它使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缺乏对国外资源结构的具体分析，无法说明国内需要的特殊的资源量；(2) 忽视了挖掘国内资源来填补两个缺口的潜在力量；(3) 没有说明一个国家的借债能力和偿债能力，容易产生对外资的依赖性，以及产生借债过多、债务负担过重、债务

偿还困难等一系列问题；(4) 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导致人们忽视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与体制的改善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5) 忽视了外资、外援、跨国公司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6) 认为技术、储蓄、外汇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阶段性、继起性的，但事实表明这些缺口常常是同时并存的。两缺口模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有人根据对它的一些批评意见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有人提出了包括技术、管理、企业家方面内容的"三缺口"模式，以及再加上税收的"四缺口"模式。

两阶级模型 (Model of Two Classes) 指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模式。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以收入分配问题为核心，研究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所占份额的决定及其变化，相应地就把凯恩斯主义中收入、储蓄、消费这些总量概念分为工资领取者和利润领取者这两个阶段的收入、储蓄和消费，并以这种区分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这种两个阶级的划分是新剑桥学派理论上的重要特征，故有两阶级模型之称。在收入分配理论中，新剑桥学派研究工资与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决定与变动，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在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工资所占份额越大，则利润所占份额越小，反之，亦反之。第二，工资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利润率"，而利润率又取决于客观的物质的生产技术条件。第三，收入分配还取决于客观的物质基础，以及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关系与劳动市场状况。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剑桥学派把储蓄分为工资领取者的储蓄与利润领取者的储蓄。前者取决于工资领取者的储蓄倾向与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后者取决于利润领取者的储蓄倾向与利润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于利润领取者的储蓄倾向大于工资领取者的储蓄倾向，所以，利润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提高会提高社会的储蓄倾向。经济增长以资本积累，即社会储蓄倾向的提高为条件，因此经济增长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即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为条件。经济增长的结果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新剑桥学派根据这种两阶级模型把收入分配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收入分配平等化的政策主张。

两个剑桥之争 (Dispute of Two Cambridge，或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以J·罗宾逊为首的英国新剑桥学派和以P·萨缪尔森为首的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之间的学术争论。这两个学派分别以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其学术中心，这两所大学所在地都称剑桥 (Cambridge)，所以，一般把这两个学派的争论称为两个剑桥之争。早在50年代初，这两个学派曾就若干纯资本理论问题，诸如，资本的性质与测定，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在技术不变或变化下的特点，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作出投资决策时生产技术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中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剑桥学派认为，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中心的新古典学派价值论与分配论以及均衡分析法都是错误的。而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在通过国家干预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完全是适用的，这场争论就决定了它们在如何解释与发展凯恩斯主义这一问题上的争论。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尽管凯恩斯本人还没有与新古典经济学彻底决裂，但发展凯恩斯主义则应该进一步割断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只是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的假设，并没全面否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通过国家干预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中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是适用的。因此发展凯恩斯主义则应该把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在对凯恩斯主义的解释与发展方面，这两派之间的分歧体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是什么？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中心是收入分配理论。发展凯恩斯主义就要以客观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建立分配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则认为，凯恩斯主义的中心是收入—支出模型（即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发展凯恩斯主义就是要把这一模型与边际生产力理论及相关的分配理论结合在一起。第二，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在方法上的变革在于用历史观代替了均衡观。而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继承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第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中心是什么？新剑桥学派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仅仅是凯恩斯用以对付30年代大危机的权宜之计，凯恩斯主义政策中心应该是收入分配平等化。新古典综合派则认为，凯恩斯主义是要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充分就业，因此，经济政策的中心是调节总需求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70年代后由于"滞胀"的出现，这两派的争论更为激烈，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歪曲了凯恩斯主义，是冒牌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也给予了回击。这两派都以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它们之间的争论，则使凯恩斯主义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学派。新剑桥学派被称为凯恩斯左派，新古典综

合派被称为凯恩斯右派。

两部门增长模型（Two Sector Growth Model） 包括两种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这种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中生产两种产品：消费品与资本品，这两种产品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与此相应，经济分为两个部门，每个部门生产一种产品。在探讨这种两部门经济中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时，要涉及到这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每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与劳动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两个部门的比例等多种因素。因此，两部门增长模型要比一部门增长模型复杂得多。但是，由于这种模型的假设条件接近于现实，所以，对指导经济增长更具有实际意义。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J·Meade）和H·尤扎瓦（H·Uzawa）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两部门增长模型。这种模型在更多限制条件的前提下，也得出了存在稳定的均衡增长率的结论。

还盘（Counter—Offer） 又称为反要约或还价。还盘是指受盘人在接到对方的发盘后，对发盘的内容向发盘人提出修改意见。还盘并非仅指针对商品价格，而对于商品的品质、数量、装运期等交易条件、提出的不同意见，也属于还盘。还盘可以以书面表示，也可以以口头表示。

还盘阶段并非对于每笔交易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国际贸易中，为了节省时间，在交易双方对发盘无重大分歧时，往往省略还盘阶段，直接表示接受，从而成立合同。

抛补套利（Covered Arbitrage） 套利方式之一。"非抛补套利"的对称。与远期外汇交易相结合的套利。见"套利"。

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 又称为里昂惕夫反论。里昂惕夫之谜在本世纪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V·Ceontief）提出，起源于对赫克歇尔—欧林要素禀赋理论的统计验证结果。

根据赫克歇尔—欧林要素禀赋理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状况不同，形成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不同。而不同商品的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密集度是不同的，这样，为了获得国际贸易利益，各国必然会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较密集地使用其相对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进口那些需要较密集地使用其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商品。这一结论提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在经验统计上对其进行证实。但是，里易惕夫在运用其创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以美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验证赫克歇尔—欧林要素禀赋理论的时候，却得出了与此理论相反的结论。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极大震动。

50年代初，里昂惕夫根据美国1947年和1951年200个产业部门的出口产品与进口替代产品的统计资料编制了美国投入—产出表，用以比较美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与进口替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里昂惕夫得出下表结果：

美国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品
对国内资本和劳动的需求数量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出口品	进口替代品
1947年	资本(1947年美元价格)	2,550,780	3,091,339
	劳动（人／年）	181	170
	资本／劳动	14，015	18，184
1951年	资本（1947年美元价格）	2,256,800	2,303,400
	劳动（人／年）	174	168
	资本／劳动	12,977	13,726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47年，美国每出口100万美元的商品，需要资本约255万美元，劳动为181人／年，从而资本／劳动比率为14，015，而美国每生产100万美元的进口替代品，需要资本约309万美元，劳动为170人／年，从而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为18，184，这样，美国在1947年出口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劳动比率，1951年的计算结果也与其一致，这表明，美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在50年代，出口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商品。这一结果与人们通常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通常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丰裕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根据赫克歇尔—欧林理论，美国的外贸商品结构应当是：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这样，理论的结论与经验统计的结果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就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又采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法对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了验证，其中日本经济学家对日本的进出口结构验证的情况表明：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日本却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印度的结果也表明，在40年代，印度向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印度劳动力资源的庞大优势相矛盾，存在着里昂惕夫之谜，但在验证印度与它国贸易格局时，结论又是印度的状况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之谜又消失了。总之，里昂惕夫本人在验证赫—欧原理时，提出了里昂

惕夫之谜，而进一步以它国贸易格局进行统计验证则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此时有，彼时无的现象，同时也表明里昂惕夫之谜有一定的普遍性。

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试图解开这一难解之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点包括：

1.里昂惕夫本人认为，由于美国工人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都高于其它国家，因此，美国工人的劳动效率也高于其它国家，可以认为是其它国家水平的三倍，这样，真正的美国劳动力数量就应当是实际工人人数乘以3，而美国也就成为一个劳动力较为丰富，而资本较为稀缺的国家了。从而美国的贸易格局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并没有违背赫—欧原理。

进一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应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资本应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美国的出口商品表面上资本密集度较低，而实际上却是较高的，而进口商品则相反，其实际资本密集度是较低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出口品中包含了大量的熟练劳动，而熟练劳动是人力资本的具体体现，进口品则包含了大量的非熟练劳动。但是，这种将生产要素进一步细分的方法是与赫—欧原理中劳动同一性的假定相矛盾的。

2.不同的国家，同一种商品是可以以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来生产的，由于劳动要素在美国价格较高，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美国企业家愿意以资本要素代替劳动要素，从而在别的国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在美国则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形成了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而里昂惕夫检验时是采用进口替代品资料，而不是进口品资料，也就过高地估计了美国进口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但是，要素密集度逆转现象在现实中并不普遍。

3.里昂惕夫的研究并未考虑自然资源，而局限于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美国既出口又进口自然资源产品，其中出口的自然资源产品通常也是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品，而进口的自然资源产品则相反，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自然资源的论点解开了美国与加拿大等国贸易结构中的里昂惕夫之谜。

4.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壁垒的存在，也是产生里昂惕夫之谜的重要原因。40年代末50年代初，正是保护主义盛行时期，而美国的关税体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保护水平就更高，因此，阻碍了美国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提高了进口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产生了里昂惕夫之谜。如果实行自由贸易，美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会有所提高。

里昂惕夫之谜的提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试图解开里昂惕夫之谜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赫—欧理论进行一系列的修正，也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如人类技能理论、技术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偏好相似理论等，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繁荣，而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品分析方法也开创了利用统计资料验证国际贸易理论的先河。

帐面价值（Book Value） 指普通股每股所含实际资产的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text{普通股每股帐面价值} = \frac{\text{公司的资本净值} - \text{优先股股东的产权}}{\text{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有时，由于公司的资本公积和保留盈余的数量较大，公司的资本净值也较大，因而，普通股的票面价值可能较小，但其每股的帐面价值可能较大。

钉住汇率（Pegged Exchange Rate） "固定汇率"的一种形式。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保持固定联系的汇率。若A国货币与B国货币间实行钉住汇率，则B国货币对C国货币的汇率发生变动时，A国货币对C国货币的汇率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动。实行钉住汇率的国家可将本国货币钉住某一国货币，主要是和本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发达国家的货币；也可以选择若干种货币组成篮子货币，钉住该货币篮子。目前实行钉住汇率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利他主义（Altruism） 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个指的是以他人利益作为道德行为目标的原则，另一个指的是通过利他的手段来达到利己的目的的行为准则。两种利他主义虽然在行为上都主张为他人谋利益，但是目的却不一样，前者认为，有道德的人有责任为他人增添幸福与快乐，帮助他人分忧解难，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如此自我修行与完善，那么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和谐与美好。而后一种利他主义的最终目的与行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可见，这种利他主义在本质上还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行为理论是19世纪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的。后来，许多学科都对这一理论产生了兴趣，经济学则利用这一准则考察它对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意义。

在经济学中常设立下面的模型来描述利他偏好与效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设有n个人，每人消费一种可以转移的商品w。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不变。收入分配向量$y=\{y_1,y_2,\cdots y_n\}$，其中y_i表示第i个人的收入，它们是非负的。如果i是利己的个人，那么当且仅当$y_i>y_i'$的时候，Y才优于Y'。但是利他偏好允许即使在$y_i<y_i'$的时候，Y也优于Y'，只要他人的收入足

以弥补（y_i-y_i'）的损失。

当每个人的利他效用函数取决于 Y，即所有人的收入时，存在的外部因素就会导致其帕累托效率不复存在。不过人们也可以将利他主义变为行为的准则，将收入施舍给某些人，一般来说，在这种收入再分配中，如果施舍人只有一个人，而且是富有的人，那么帕累托效率存在；否则，只要施舍人在两个以上，那么帕累托非效率就不可避免。

在论及慈善事业的时候，理论研究认为，有的时候，慈善不过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还是自己受益。慈善不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它是一种私人品。

利益（Interest）　在经济学中，"利益"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引起颇大争议的概念。它是代表一种促使自我保护、自我扩张的基本力量，这种力量驱动着个人或拥有相似社会地位的个人团体进行的行为。当此概念与个人相联系考虑时它就包括极为广泛的含义，有对荣誉、荣耀、自尊的追求，甚至考虑到后世。但有时仅限于指对经济上的好处的追求。人们对利益驱动的行为是否应予以尊重的看法大相径庭，利益一词最初（至少在中世纪后期）的含义中就有使人们对自利行为的尊重的内容，而在此以前，对借贷收取利息被认为是对神授权力的违抗和高利贷的产物。此后利益逐渐获得了显赫的地位，被看作是发挥作用的(workable)、和平的社会秩序的关键。而另一方面利益也被抨击为社会基础的腐朽和人类精神的低下。在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利益仍然是一个中心概念之一，对自利的解释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形成利益驱动行为特点的有两大必要因素、一是自我中心（self-centredness），即行为者对其反复琢磨的行为后果的高度重视，二是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即对预期的成本、收益、满意等的系统估算。计算可以看作是支配性因素：一旦行为被假定是对成本与收益精心估算以后进行，它就会由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满意与失望有充分的知识而趋于变为自我参考的（self-referential）。利益已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应该说过去在哲学领域中对利益远比在经济学的探讨多。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里提到的利益是指个人取得某种收益的权力或是免受侵害的权力，而与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中利益的含义不同。有关对利益的一些古老的讨论可参阅"自利"（self-interest）词条。

利息率（Interest Rates）　利息是一段时间内为货币的使用所付的价格，它通常被表达为每个时期所获得收益的比率，即利息率。利息率通常是以借入或贷出的本金的百分率来表示：

$$S=P\ (1+it)$$

对于每个时期 t 来说，若利息率为 i，本金为 P，则利息为 Pit，本利总和为 S。

对于利率计算有各样的公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复利（对利息的利息）计算公式：

$$S=P\ (1+i)^n$$

若每个时期利率为 i，共 n 个时期，本金为 P，则本利总和为 S。一般说来，对于给定的本金和利率，分别按照上面两个公式计算本利总和 S，则越是频繁地，越是长期地计算，按照复利计算所得到的 S 就越是比较大。这个复利公式是所有有关金融方面的数学计算的基础。它的最重要的应用之一是为财产估定价格，这是一种现值计算：

$$PV=\frac{D}{(1+i)^n}$$

其中 PV 是现值，D 为以后的货币收益总和再加上本金。假定某种证券，每年货币收益（利息）为 4 元，而这时的市场利率为 4%，它的票面价值为 100 元，则这时它恰好可以按票面价值出售。若利率上升，则 PV 变小，即证券的价格下跌，人们可以用较少的钱购买到从前需 100 元才能买到的证券。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是因为数学上定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供给与需求力量的作用。如果有 A，B 两种证券，按同样的价格出售，A 的年收益率比较高（比如说 10%），B 的年收益率比较低（比如说 5%），这时人们当然会抢着买证券 A，证券 B 则无人问津。由于供不应求，A 的价格上升，从而年收益率下降。由于无人问津，B 只好降价出售，从而年收益率上升。这种运动一直到 A 与 B 的收益率大致相等的时候才会停止。这就是证券调整过程。一般说来各种证券的收益率是大致相等的，但不一定完全相等，因为决定收益率大小的还有各种证券各自不同的偿还期、风险等因素。

在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上，任何时候都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利率（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证券）。从这些证券各自的收益角度看，它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其相对流动性和风险。流动性指的是证券市场的宽广性，粗略地说，相对于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每期交易量越大，证券越具有流动性。由供给与需求的边际变动而引起的价格的变化是又一个有关流动性的度量。风险指的是不确定性的程度。一般说来，期限越长，风险越大，流动性与风险同债券的到期日密切相关、短期证券（通常不到 1 年），中期证券（通常 1-5 年，但也常可长达 10 年），长期证券（不超过 25 年，不过也可以更长），在金融市场上很不相同。

当到期日越长时，证券的利率通常是沿着收益曲

线递增的，这反映出当到期日较长时，流动性较小，风险较大。这样，期限越短，利息越低。不过有时也有例外发生，这就需要在流动性与风险因素以外去找原因了。70年代曾发生过这种例外，对此的一个解释是它是由于联邦储备当局对位于繁荣期高峰的短期信贷的利用所采取的突然而严厉的措施。对短期信贷的需求与对长期信贷的需求相比，是远为缺乏弹性的，长期信贷可以比较容易地推迟。由于联邦储备当局的措施，造成对短期信贷的供不应求。此外，人们预期短期利率会再度下跌到长期利率以下，从而在信贷危机的情况下一连串的短期借入最终的平均成本会低于长期借入的成本，于是人们不仅在客观上不得不借入短期贷款，在主观上也比较愿意借入短期贷款。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是较有影响的利率当中期限最短的，期限只有一天。它对联邦储备当局旨在降低或提高短期利率总水平的操作非常敏感。国库券等证券的利率对联邦基金的利率比较敏感。在美国短期利率与外国货币中心的利率间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欧洲美元的利率。在长期利率中，AA级新效用债券利率是重要的一种。抵押利率现在主要有两种用途：住房与商业。在美国政府给予抵押贷款较大流动性的努力下，抵押贷款利率在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已经与公司债券利率基本接近，而在之前的几十年里，前者是一直高于公司债券利率的。利息期货是7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那时芝加哥开始允许对国库券进行期货交易，然后是对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进行期货交易，影响较大的期货交易大约是在80年代出现的。

把影响利率水平与变化的理论基础做为一个学术课题来研究，大概是在两个世纪前。随着大规模的计算机经济模型的发展，以及多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计量学检验方法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可能对利率做预测的尝试。

对利率的推断首先选择某个特定的利率或利率总水平，将之放在方程或方程组的左边作为因变量，然后寻找一些解释变量放在方程的右边，这些解释变量要能在满足可接受的统计标准的前提下较好地解释因变量。

如同在所有的经济分析论证中一样，在利率理论的学者们当中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既考虑到利率，又考虑到它们的解释变量。这就是正确地认为每件事物都有赖于别的事物，它可引导人们走向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全部利率都是内生的，说一个变量是内生的，也就是说这个变量既可被别的变量解释，又可以解释别的变量。另一个倾向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利率或一个利率集合上，将解释变量简单地假定为独立于利率（即不可以被利率解释）。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学者们由于无法解释货币与资本市场上的一些特殊现象而受到打击，或者只是因为局部均衡方法更容易一些。

长期利率的"真实利率加通货膨胀率"理论是由欧文·费雪于20世纪早期创建的。采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方法。费雪把观察到的债券利率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作为对放弃消费进行储蓄的奖励的真实利率分量，另一个是通货膨胀分量，由于可以预见到，在债券到期时本金与利息的购买力会下降，因此要对之进行补偿，故需在真实利率的基础上，加上通货膨胀率。费雪认为真实利率是相当稳定的。它依赖于资本存量的组合（在需求方）和储蓄习惯（在供给方）。而通货膨胀分量是很大的，依赖于实际的通货膨胀经验。

从6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高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利率，费雪的理论再次受到注意。在广泛的经验检验面前，这个理论被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并且这个理论有着直观上令人信服的逻辑基础。不过它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不容易直接被测量出来（费雪对此是采用分布滞后或较为简单的对过去实际数据加权平均的方法，来作为真实的预期）。不过对于70年代晚期的那种强有力的上升的利率趋势来说，费雪的理论是最令人满意的，并且现在已很清楚，短期利率也象长期利率一样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不过短期利率更加难以预测。

利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是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立的，其注意力主要在于短期利率。为了获得普遍适用的通用性，凯恩斯加上了长期利率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理论，不过除了探索与强调投资动机外，这一关于长期利率的理论与费雪以及其他早期经济学家的理论没有太大的不同。凯恩斯认为，在任何一定的时间，公众的流动性偏好（是愿意持有货币还是持有近似货币的等价物）将随着利率而成反方向变化，但是流动性偏好会随着一般的经济条件而改变。在短期利率的决定因素的供给方面，凯恩斯喜欢采用银行政策（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就是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政策）。

经过30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对利息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假说—"流动性陷阱"说。在流动性陷阱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无法使利率下降到足以刺激投资增加的程度（这里所说的流动性，指的是一般经济的情况，而不是前面所说的某种证券的流动性）。这样，凯恩斯就降低了经济周期中利率与货币的重要性。

利率的可贷资金理论的创建是和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赛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理论是不辨自明的，它通过对信贷的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来探索利率变化的过程。维克赛尔是在寻找一种自然利率（这个概念与费雪的真实利率很相近），而场利率将

根据同期性的需求与供给的变化而围绕自然利率上下流动。这个理论在现代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资金流量分析。资金流量分析是由联邦储备局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使用的。当时人们认为，各种金融流量应该并且能够作为国民收入与国民产品帐户的补充，纳入到一个内容丰富、内在谐调的框架中去。就其本身来说，资金流量分析几乎算不上是一种理论，但在实践上人们正积极努力用它作为对未来经济情况进行预测的基础。

近期的利率理论研究，借助于现代制度环境与提高了的测量手段，把注意力放在把以前的种种思想综合起来。根据马丁·费尔德斯坦和奥托·艾克斯坦所做的出色研究，长期公司债券利率的基本的决定因素是流动性、债务、通货膨胀与预期。

值得一说的是，以前的各种理论（凯恩斯的、费雪的资金流量分析）的相对解释能力，现在可以予以检验了。费尔德斯坦—艾克斯坦公式对1954年到1969年经济的研究认为，在那段期间长期利率的上升中，流动性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但是，在那段期间越往后，利率就越迅速地获得相对重要性。

尽管统计科学很发达，但利率预测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主要的问题在于，在任何一个前面很短的期间发生的外生因素的变化就可以推翻过去各种关系，而后者正是所有预测方程的基础。此外，在前面的长时期里，随着经济实际情况的改变，独立变量的系数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就是说，利率预测的精确性依赖于对决定因变量的结果的独立变量的正确预测。例如，对短期利率的预测与同期货币政策关系重大，而后者是无法用数学方法事先预测的。不过，货币政策一般是在已知的参数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这样，想要预测利率就必须再回到以前那样，把利率和一个成熟的经济模型整合为一整体，而这又使统计工作复杂化，并成倍地增大了误差。

利润与利润理论（Profit and Profit Theory）

利润与利润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论最大的问题。关于利润的定义，利润的存在性、利润的来源等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于利润最通常的定义是利润是超过成本的余额。这种定义看上去似乎很直观，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它是不严格的，因为成本的定义就是不严格的，是会计成本还是机会成本？对于成本的定义不同，所计算利润也不同，在完全竞争长期均衡的条件下，按会计成本算，厂商存在着利润，而按机会成本算，厂商没有任何经济利润。进一步说，如果说利润是超过成本的余额，那么是否超过成本的余额都是利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租、利息又如何解释？因为它们也是超过成本的余额。租、利息、利润三者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它们就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定义。对于利润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利润理论。例如新古典的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新的古典利润理论（New dassical theories of profit）、非均衡的利润理论、凯恩斯主义利润理论、行为主义利润理论等。

新古典理论是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主流。在新古典理论中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每个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竞争的厂商通过调整产出与投入水平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长期均衡的条件下，厂商的利润为零，价格等于平均成本。零利润是长期均衡的条件，标志着资源达到了最有效的配置。之所以产生零利润，是因为成本被定义为机会成本，机会成本中包括了正常利润，因此零利润并不排除正常利润。如果长期内有非零利润存在，则表示市场是失衡的或者是非完全竞争的，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进出该行业出现障碍，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所出现的正常的非零利润可以用马歇尔（A.Marshall）的准租来解释。在新古典理论中，利润的起源是用克拉克（J.B.Clark）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的，即利润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一些经济学家如阿罗（K.J.Arrow）与德布鲁（G.Debreu）等人则把资本品看作是一种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只是资本品的价格，而并不存在利润，因此阿罗—德布鲁均衡条件下的利润为零。

古典学派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基本上都区分了利润和地租，利润和地租共同构成经济剩余。关于利润的来源问题，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土地外，资本与劳动也是其来源之一。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利润量的确定是模糊的，因为并没有明确的规则来区分地租与利润，斯密只是预计利润率将下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是一国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受到限制，商人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利润率下降。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利润率将呈下降趋势，但是关于利润率下降的原因的解释不同于斯密，李嘉图认为利润的下降是由于土地的收益递减所致。李嘉图区别了利润与地租，并且分析了二者对立的关系，即二者此消彼长。李嘉图也对利息进行了说明，认为它规定了利润的最低限度。

新的古典的利润理论主要是由斯拉法、冯·诺意曼（Von Neunmann）等人所提出。他们是对李嘉图理论的扩展，斯拉法放弃了李嘉图单一商品的假设，而定义了一种标准商品，用这种标准商品表示的利润率相对于商品价格的变化而言是不变的。他不再把工资看作是成本的一部分，而看作是商品增加值的一部分，工资与利润一起构成剩余，工资与利润之间此消彼长，二者存在着冲突。冯·诺意曼则提出了联合生

产的线性模型。在这一体系中，生产一种商品存在许多可供选择的生产过程，但是只有那些能生产最小利润率的生产过程才被选择。在冯·诺意曼体系中，利润份额的规模是不确定的，而利润率是确定的。在均衡的情况下，利润率等于产出增长率（或投入的增长率），其利润来源是对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技术。

非均衡利润理论有两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熊彼特（J.A.Schumpeter）另一个是凯恩斯。熊彼特认为，利润是一种不均衡的现象。熊彼特的利润理论只涉及利润量与利润的来源，并不涉及利润份额或利润率。熊彼特认为，利润来源是创新。创新的含义很广泛，引进一种新产品，引进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种新市场，发现一种新的原材料供给，或实施一种新的产业组织都属于创新。假定社会处于均衡状态时没有利润，那么创新活动将打破这种均衡。给创新者带来垄断利润。任一项创新活动都会伴随着众多人的模仿，模仿活动使创新利润消失，但新的一项创新活动又会产生新的利润。由于创新是企业家所进行的，因此利润应该归企业家所得。

凯恩斯也认为利润为非均衡的现象。凯恩斯认为，利润产生于投资与储蓄的差额。按照凯恩斯理论

$$P = W + T$$

$$\pi = \frac{(I - S)}{y}$$

P为总物价水平，W为单位产品的工资，π为单位产品的利润，I为投资，S为储蓄，y为收入，当I等于S时，经济处于均衡之中，无利润存在，只有当投资大于储蓄时，才有利润存在。

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利润理论由卡莱茨基（M.Kallecki）等人创造。对卡莱茨基的理论的研究会发现他所谈的利润产生于生产定价行为，利润所得者的支出行为决定利润是否能够维持。这一理论被卡尔多（N.kaldor）、帕西内蒂（L.Pasinetti）等人所发展。

行为主义的利润理论大多是从决策的角度来谈利润的。无论是企业主的个人决策，还是合作企业的多人决策，决策者要在若干种方案中进行选择，决策者视自己可以控制的变量、其他决策者的策略、市场条件以及宏观经济条件来选择自己应采取的策略。决策者可能不是选择最大利润作为目标，而是选择满意的利润作为目标，也可能使利润的增长适应于整个企业增长的需要。由于不同的理论家对于企业决策行为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因此行为主义利润理论所包括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例如沙克尔（G.L.C.Sharkle）的理论，西蒙（H. A. Siman）的理论，伍德（A.J.B.Wood）的理论等，他们的理论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利润的测度（Profit Measure） 利润的简单定义是，它是收益超过费用部分。但是利润的测度要复杂得多。对利润的准确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测度的为何种利润与测度利润的目的。有多种测度利润的方法。例如，在美国主要有四种测度利润的方法：帐面利润（book profit）、纳税申报利润（tax-return profit）、国民收入利润（national income profit）与所谓的真实利润（real profit）。如果所选择的概念不同，就会造成所测度的利润量与变化方向的很大差异。

帐面利润是各个公司向其股东报告的数字。帐面利润代表管理者对于公司运营情况的评价，并且是决定红利政策与投资方案的重要决定因素。帐面利润也是财务分析家进行财务评价的原始材料和决定价格——收益率与其他股票市场标准的基础。

在美国纳税申报利润是由公司向财政部国内收入署所报告的净收入。纳税申报利润的资料是最广泛的，并且是最近乎一律的。但是纳税申报利润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同于向股东们报告的帐面利润。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厂房与设备的折旧率不同，处理投资税的减免不同，以及公司在海外附属机构的收益并入公司总收入的方式不同。一个公司可以合理合法地向国内收入署隐瞒利润额以尽可能减少纳税额，而与此同时向股东报告的帐面利润与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认为真正代表公司财务状况的利润相一致。由于这种原因，帐面利润一般要高于纳税申报利润。

国民收入利润所测度的是如果公司使自己的帐目与商业部公布的国民收入帐户一致，公司将赚取的利润数。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将财政部国内收入署的数字调整为国民收入与产品的概念，某些项目，例如资本利得与损失以及公司间的红利去除了，而另一项目，例如折耗计提、坏帐，州与地方所得税等被加进税前利润。公司海外机构与分部的收益不列入国民收入利润，得自联帮银行与互助储蓄机构的收益也被包括在公司利润加总额之类，所有这些构成了通常使用的税前估计利润。为得到国民收入利润总数，经济分析局还进行进一步调整以便排除存货利润并利用现行重置成本而不是历史成本计算折旧。

"真实"利润是在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进行折扣之后所得到的利润。对于因通货膨胀而对国民收入利润造成的影响有两种调整方法调整为真实利润。一种是存货评价调整 IVA（inventory valuation adjustment），另一种是资本消耗调整 CCA（capital consumption adjustment）。存货评价调整是将应作为国民产品一部分的存货实物量的变化与不应计入国民产品的因价格变化而造成的帐面价值的变化分离出来。存货评价调整不仅受价格影响，还受企业存量构

成，周转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资本消耗调整实际是以下两种调整的净结果：一种是将所有的公司折旧调整为统一的直线折旧；另一种是将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折旧转换为重置成本为基础的折旧。实际上，资本消耗调整假定现行产出的测度应该反映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资本物的现行成本。存货评价调整与资本消耗调整都趋向于减少上述税前国民收入利润的数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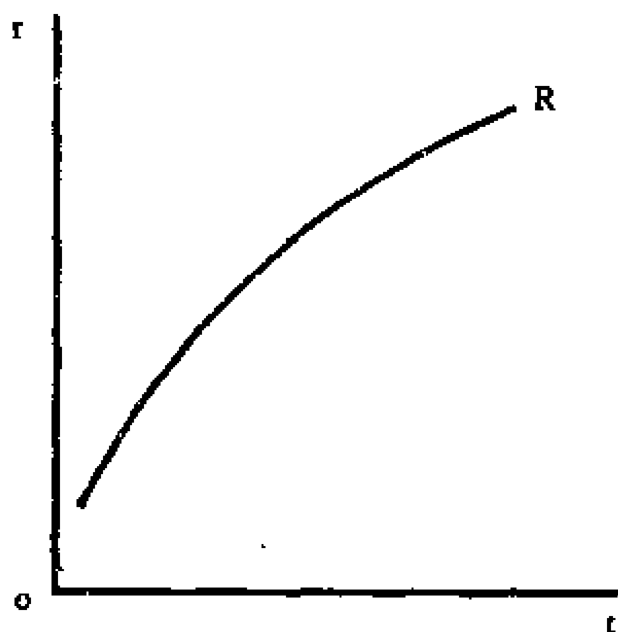
利率互换（Interest Swap） 借入本金金额相同、币种相同贷款的两方通过中介银行其中一方以固定利率换取另一方浮动利率的交易。交易中不发生本金的实际转移。交易的目的在于降低双方的资金成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同借款人因资信不同，借款成本有差异，如资信较差的借款人在固定利率借款市场上通常要比在浮动利率借款市场上付出更多的利息。通过利率互换交易，双方可先进入各自最有优势的借款市场筹资，然后以固定利率转换成浮动利率，或将浮动利率转换成固定利率。

利率置换（Interest Rates Swap） 是调换的双方（通常为公司企业）通过银行就某项资产或负债的利率作出互换的安排。这种安排不涉及借贷本金，也与原有的借贷关系完全无关。利率调换可将浮动利率的资产或负债换成固定利率的资产或负债，反之亦然。如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与固定利率的互换；也可将一种浮动利率的资产或负债换成另一种浮动利率的资产或负债，如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换成优惠利率。导致利率置换的主要原因有：（1）信贷市场上各种借款人的资信不一，因而借款成本（借入利率）有差异。为了降低借款成本，需要进行利率置换；（2）各种借款人的信用关系不同。有的只限于与某一间或几间金融机构的往来，信用形式固定。为了灵活地筹借资金，亦需进行利率调换；（3）利率的频繁变动，产生巨大的利率风险。为了消除利率风险，使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在利率种类上得到吻合，也需要进行利率置换。它具有降低借款成本，扩大借款途径，消除利率风险的优点。

利率上限（Interest Rate Ceilings） 又称"第Q条规定"，指对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利率的最高上限，适用于商业银行和其他储蓄机构。由于储蓄贷款协会等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是长期贷款，其资产主要是房产抵押贷款。这是一种长期的非流动资产，其票据流通较为缓慢，因此在吸收资金方面，它们竞争不过那些掌握大量期限短、种类多的资产的商业银行。规定银行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使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目的是为了保护储蓄贷款协会这类金融机构，以及房屋抵押市场，使之免受商业银行的激烈竞争，从而稳定长期投资，主要是住房建设投资，进而稳定经济。因此，利率上限属于中央银行进行选择性信用控制的货币政策工具。美国在1933年提出这一政策，但并未认真执行，60年代之后普遍实施，并对利率上限作出分级规定。这种政策尽管限制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但也损害了客户的利益，使储蓄贷款协会这类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大量存款，从而减少了住房建设投资。因此，美国1980年的新银行法规定，从1980年起6年内逐步提高各种存款利率，到1986年4月，中央银行已全部取消对存款利率的限制。

利率的期限结构（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不同偿还期限的证券及其利率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不同偿还期限的证券及其收益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短期证券的风险小，利率或收益也低，长期证券的风险大，利率或收益也高。证券的偿还期限与其利率或收益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平滑曲线，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t 代表证券的偿还期限，纵轴 r 代表利率或收益，向右上方倾斜的 R 即为表示不同偿还期限的证券及其利率或收益关系的收益曲线。人们持有债券是为了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同时，作为风险的回避者人们还要使其风险最小化。这样，人们就要持有具有不同偿还期限的证券，以达到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目的。不同的学派对利率的期限结构有着不同的解释。古典学派和预期理论着眼于解释不同偿还期限的证券与纯利率之间的关系。纯利率是指不包括风险收益在内的利率。所以，他们所考虑的就是无风险的政府债券的利率结构，而没有考虑有风险的私人债券的利率结构。他们的出发点是，如果有人要买进债券，那么，总是买一系列的短期债券，即各种偿还期不同的短期债券，而不会在整个投资期内持有一种期限的长期债券。同样，如果一个人想在短期内持有债券（例如，在两年内持有债券），他总是会先买进而后卖出，把两种在这一期间都不到期的长期债券依次各持有一年。这样，如果所有人对短期债券的未来收益和在同期内持有的较长期限的债券（在该期内未到期的债券）的未来价格都具有同样的预期，则所有债券在一定时期内的总收益相等。持有长期债券可能会有资本损失，因此，这类债券利率较高。这样，就可以根据对这些债券未来价格的不同预期来对不同偿还期限的债券确定不同的利率。这就如附图所表示的，当偿还期限增加时，风险增加，利率逐渐上升。这就是古典学派对债券偿还期限与利率之间关系的解释。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解释则与此不同。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用流动溢价理论来

解释这一问题。这种理论认为，证券的供给和需求在市场的长短两个端上处于不同的平衡状态。证券的供给者（债务人）希望偿还期限长，从而就提供了过量的长期证券。这样，压低了长期证券的价格，提高了其利率。证券的需求者（债权人）偏爱短期证券，从而就使短期证券供给不足。这样，提高了短期证券的价格，降低了其利率。换言之，由于证券的需求者流动偏好的存在，宁愿付出溢价，接受较低的利率，这样，就出现了相当可观的溢价，套利者以现行低价大量买进即将到期的证券，作为资产持有，同时又以较高的价格售出相应的短期证券，仍然有利可图。这样，套利活动逐步使不同偿还期的证券有着相同的收益。美国经济学家 F · 莫迪格利安尼进一步发展了希克斯的理论，认为固然证券的需求者有流动性偏好，但也仍然有人愿意购买期限较长的证券。而证券的供给者也要获得与自己的负债相应的证券。这样，各有其偏好的范围，能使收益相等。如有溢价出现，套利活动就会使各处收益平衡。这种理论认为市场是可以分割的。套利活动使各种偿还期限的证券收益相等。



利率敏感资产负债表（Rate Sensitive Balance Sheet） 就是把银行的资产负债对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进行划分对照的一种资产负债余额表。这种表上的资产和负债，从总余额来说，是平衡的，但是从表上划定的各个时期来说，一般都是不平衡的，即资产和负债之间出现了差额。各期的资产总额减去负债的总额，就是该期的利率敏感资产、负债差额。各期资产大于负债，为正差；资产小于负债，为负差。由于市场利率可能急剧上升，也可能急剧下跌，对银行来说，不管是正差还是负差，差额越大，利率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如在某个时期出现了较大的差额，银行就要采取措施，缩小差距，以避免利率风险。通常地，稳健的银行一般都尽量把这种差额保持在资产总额的 5%或 10%以下。

利特尔—米尔里斯项目评估方法（Littie_Mirrlees Method of project Appraisal）

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项目评估方法。利特尔和米尔里斯于 1969 年发表了他们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准备的《工业项目分析指南》，针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扭曲的特殊性，提出了一个与社会项目评估的一般方法不同的新方法。

在发展中国家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很难对社会净收益进行现实的估计。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控制由于供给缺乏弹性的通货膨胀，政府往往采用价格控制的方式进行干预、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的是关税、限额制、外汇管制等保护主义政策，从而使得经济中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社会净收益。在劳动市场不完善和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不能反映出真正的社会劳动成本；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人为地保持着低利息率，使得资本对社会的成本过低，等等。为此，利特尔和米尔里斯提出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社会项目评估方法。其特点在于，一方面它采用外汇而不是国内价格来衡量所生产商品的真正成本和收益；另一方面，它改变了通常根据本国资源来重新估价外国资源的传统做法，而把所有国内成本转变为世界价格进行计算；并以影子工资率来衡量劳动成本；设立了“帐面利息率”这一特殊的贴现率，以便把所有收益和成本转变为政府收入的指数进行计算。

私募（Private Placement） 又称“私下发行”或“非公开发行”。新发行的债券不在任何证券交易所登记上市，而是通过投资中介售与特定的对象，一般是数量有限的专业投资机构，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会等。以该方式发行的债券不需承购辛迪加承购；不允许公开买卖或转让，投资者购买的目的不是转卖而是赚取利息。因购买私募债券的投资者都拥有经验丰富的市场分析专家，故无需发行人逐年提供财务报告。采取私募方式发行债券，手续简单、所需时间短、手续费较低，但因债券流动性差，发行人需向投资者付较高的利息。若借款人希望在短期内迅速筹措资金又不愿公开自己的财务资料或缺乏发行债券的经验可以采取私募。

私募发行（Public Private Placement） 指发行者以某些有限的特定投资者为对象发行证券，即通过私人接洽直接售给为数不多的个人投资者或团体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各类基金组织）。它的流动性较低。近几年来，这种私募证券也开始由专门从事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银行或其它金融组织中介发行。

私人外汇（Private Foreign Exchange）　亦称“个人外汇”，“官方外汇”的对称。居民或非居民作为自然人所持有的外汇。在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政府对私人外汇的持有、汇入、汇出、使用实行种种管制。严格的禁止私人持有外汇或规定私人持有的外汇必须存入政府指定的银行。在无外汇管制的国家，人们可以自主地支配私人外汇。

佣金经纪人（Commission Broker）　通常简称经纪人，即指接受客户委托，在交易所代理投资者买卖证券，并按规定收取佣金的经纪人。他们是交易所的主要成员，人数最高，交易量最大。经纪人属于各个证券公司，并以公司的名义在交易所内取得席位。大的证券公司在交易所都有几个席位。

条件承兑（Qualified Acceptance）　条件承兑是指承兑人在对远期汇票进行承兑时，对其行为附加一些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1) 部分承兑：即付款人在对汇票进行承兑时，仅对汇票金额的一部分保证到期付款。

(2) 当地承兑：即付款人在承兑汇票时，表明付款的具体地点，并强调只在此地点付款。

(3) 付款时间限制承兑：即付款人在进行汇票承兑时，改变汇票原有的付款时间，而将自己订立的付款时间加于汇票之上。

(4) 一般条件承兑：即付款人在进行承兑时，提出某些条件，并表明承兑人是否到期付款，取决于持票人是否履行这些指定的条件。

对于条件承兑的效力问题，各国法律是有不同规定的。通常认为，如果持票人未得到明示或默示的授权，就接受条件承兑，则可以自动解除出票人和背书人对于汇票的责任。但是，在合理时间内，出票人或背书人对条件承兑这知未表示意见，则可以认定已接受条件承兑。

狄龙回合（Dillon Round）　狄龙回合是指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第五轮多边贸易谈判，由于这轮以互减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发起人为美国副国务卿狄龙，故得名。狄龙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始于1960年9月，一直持续到1962年3月，该回合的谈判主要是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开展。这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起因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之间逐步建立起关税同盟，对内不断削减以至完全取消全部关税，对外则实行统一的共同关税，这就严重阻碍了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进入这些市场，为此，美国就提出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相互减让关税的谈判。狄龙回合为期18个月谈判的结果是，美国和欧共体将各自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降低20%，而在农产品的关税减让问题上则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狄龙回合对于推动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的贸易往来起了积极的作用。

即期外汇（Spot Foreign Exchange）　见“即期外汇交易”。

即期信用证（Sight Credit）　与远期信用证相对应。即期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授权受益人开立即期汇票收款的信用证。在即期信用证下，只要受益人提交的即期汇票和各项单据符合信用证的条款规定，就可以立即取得票款；而进口商作为开证申请人在开证银行向其提示时，也需立即付款赎单。

在即期信用证条件下，从出口商交单收款到进口商付款赎单，其间仅仅相差一个寄递单据的邮程。如果采取电报或电传方式寄单，则此过程更为缩短。因此，即期信用证方式大大加快了出口商的资金周转。

即期外汇交易（Spot Exchange Transaction）　又称“现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的对称。买卖双方成交后在两个营业日之内进行交割的外汇交易。外汇交易中买汇者付款，售汇者交汇的实际收付行为即为交割。即期外汇交易中买卖的外汇称为即期外汇或现汇，所使用的汇率称着即期汇率或现汇汇率，是其它外汇交易的基础。在从事即期外汇交易时，外汇银行对自己所报出的汇率必须遵守，勿须签订合同。若询价者同意按所报汇率进行交易，外汇银行必须按所报汇率买进或卖出外汇至一定数额。报价时不必申报全价，仅需报出最后两位数。随着外汇银行所持头寸的变化，所报出的即期汇率是不断变化的。如在法兰克福外汇市场上，A行急于买进美元现汇以弥补其头寸不足，当时市场汇率为1美元＝1.6529—1.6539马克，A行为了买进美元现汇报出的汇率为1美元＝1.6532—1.6542马克。因其买入价、卖出价均高于市场汇率3点，买入的美元现汇增加，卖出的减少，可弥补美元现汇之不足。但若维持该报价不变，该行必出现美元多头，因而又需调整报价。即期外汇交易的手段为电话、电报和电传。

即期汇率（Spot Exchange Rate）　又称“现汇汇率”。见“即期外汇交易”。

迟付信用证（Deferred Payment Credit）　迟付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在信用证上受益人交单后若干天或货物装船后若干天开证行保证付款的信用证。一般认为，迟付信用证也可以归为远期信用证类。但是，

在迟付信用证下，受益人无须开立并提交汇票，而只须完成装船获得提单或交单行为后，在规定的日期要求付款。对开证银行来说，也无须在一般意义的远期信用证下，对汇票进行承兑，因此，迟付信用证较银行承兑信用证更为灵活。

在迟付信用证方式下，由于不使用远期汇票，出口商也就无法利用贴现市场的资金，而只能自行垫款或向往来银行借款；同样，受益人交单后，无法得到付款人承兑的汇票，增加了迟付信用证的风险。

迟付信用证主要用于大型的承包工程或投标，采用这类交易方式，其付款期限通常超过了各国法定的汇票有效期限，从而无法使用远期汇票，而只能采用迟付信用证。

陆运冷藏货物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Frozen Products"） 陆运冷藏货物险是陆运货物保险中的一种专门保险。它的承保责任范围除了陆运险所包括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引起的部分或全部损失之外，保险公司还特别承保冷藏机器或隔温设备在运输途中的损坏所造成的被保险货物的解冻融化所造成的损坏。但是，对于被保险的冷藏货物在保险责任开始时未能保持良好状态，例如包扎不妥、冷冻不合格等原因造成的损失以及由于战争、罢工或运输延迟所造成的货物损失，保险公司是不给予赔偿的。

陆运冷藏货物保险的承保期限从被保险的冷藏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地点的冷藏仓库开始，包括正常陆运和与其有关的水上驳运在内，直至货物到达目的地收货人仓库为止。

陆运冷藏货物险的索赔时效从冷藏货物在最后目的地全部卸离车辆以后开始计算，最多不超过两年。

陆运货物附加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Cargo Additional Risks） 陆运货物附加险包括陆运货物战争险和陆运货物罢工险两种。

陆运货物附加险必须在已经投保了陆运险或陆运一切险的基础上经过保险人和投保人协议后方可另行加保。陆运货物附加险通常仅限于火车运输。

陆运货物战争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cargowar risks）的承保责任范围是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战争、敌对行为等所致的损失，但限于常规武器如炸弹、地雷等所致损失，不包括使用原子弹等核武器所致的损失。

陆运货物附加险的责任起讫从被保险货物装上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的火车开始至卸离所载明的目的地卸离后为止。

加保陆运战争险须另行计算保险费。在加保战争险的前提下，加保罢工险不另行增收保险费。但若仅要求加保罢工险，则按战争险费率加收保险费。

陆运货物运输保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Cargo Insurance） 陆上货物运输保险始于19世纪末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速发展。在国际保险业务中，保险公司一般仅对采用火车和汽车运输方式所发生的风险予以承保，对于采取人力车牲畜驮伏等落后工具运输货物的风险则不予承保。不论采取火车运输方式或是汽车运输方式，险别和责任范围都是相同的。

根据1981年1月1日修订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陆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陆上货运保险的基本险别分为陆运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risks）和陆运一切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all risks），此外，还特别包括适用于陆运冷藏货物的专门保险——陆上运输冷藏货物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insarance frosen prodacts）和陆上运输货物战争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cargo war risks）。

陆运货物基本险（Overland Cargo Basic Risk） 陆运货物基本险是陆运货物保险的主要险别，可以分为陆运险和陆运一切险两类。

陆运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risks）的承保责任范围类似于海洋货运保险中的水渍险。对于陆运险，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遇到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全部和部分损失。其中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暴风、雷电、洪水等。意外事故包括：运输工具遭受碰撞、倾覆、出轨、驳运工具遭受搁浅、触礁、沉没、碰撞等；此外，被保险人对于遭受承保责任范围内风险的货物采取的合理的救助措施而支付的合理费用，保险公司也给予赔偿。

陆运一切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all risks） 承保的责任范围类似于海洋货运保险中的一切险。保险公司对于陆运一切险，除了陆运险的责任范围外，还包括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造成的全部和部分损失。这些外来原因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外来原因，如货物的渗漏、短量、破损、偷窃等，不包括战争，罢工等特殊意义上的外来原因。

陆运货物基本险的责任起止采用"仓至仓"原则，保险人负责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陆上以及与陆上有关的水上驳运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

陆运货物基本险的索赔时效从被保险货物在最后目的地车站全部卸离车辆后开始计算，但最多不超过

两年。

阿拉伯共同市场（Arab Common Market）　阿拉伯共同市场作为阿拉伯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它是根据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的决议于196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它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逐步走向经济一体化。部分阿盟成员国加入了该市场，目前共有埃及、苏丹、利比亚、毛里塔尼亚、伊拉克、约旦、叙利亚等7个成员国。共同市场在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它本身不设独立的机构。共同市场成立以来，在推动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早在70年代初就实现了各成员国间逐步削减以至完全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捐税；不断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其他贸易壁垒；协调各成员国的对外关税，力争早日实现统一对外关税等。

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它是亚、非阿拉伯国家于1945年3月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它的宗旨是全面协调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该组织现有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埃及、苏丹、摩洛哥等20多个成员国，它的总部一开始设在开罗，后移至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目前又回到了开罗。理事会是阿盟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由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它负责作出各项主要决策，并通过下设的16个委员会和秘书处执行有关决议，开展各项工作。阿盟作为阿拉伯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合作组织，在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提高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联盟内各成员国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不仅使得该联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而且甚至演变成成员国之间的尖锐对抗和冲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侵占科威特，包括沙特、埃及在内的许多阿盟成员国部队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同伊拉克部队作战，并把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对阿盟来说，它能否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各成员国间能否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各成员国长期艰苦的努力。

阿拉伯合作委员会（Arab Council of Cooperation）　阿拉伯合作委员会于1989年2月15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成立，其成员国有伊拉克、埃及、约旦和也门。作为阿拉伯国家区域经济组织之一，由于它包括伊拉克和埃及两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该组织应能在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抵御外来侵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危机已使该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rab Maghrib Union）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于1989年2月17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成立，其成员国有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该联盟的宗旨是减少成员国间的贸易和非贸易限制，发展自由贸易，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更好地迎接外部世界的挑战。该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成员国首脑组成的主席委员会，其他机构还有外长理事会、常设委员会、秘书处、咨询委员会和仲裁法庭等。1990年7月，该联盟召开了第二届首脑会议，会上达成了五项协议，以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五项协议是：农产品交换以及建立马格里布农业市场指导方针的协议、植物卫生防护特别协议、鼓励和保护投资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议、陆地游客和物资运输过境协议。会议决定在1992年底建成马格里布自由贸易区，在1995年前建成马格里布关税同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

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Council of Arab Economic Unity）　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是阿盟为促进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于1964年5月建立的常设机构。它的宗旨是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推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它的总部最初设在开罗，后移至约旦首都安曼。该组织的委员会作出各项决策，通过下设的秘书处贯彻执行。

阿奎那，T.（Saint 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　13世纪欧洲著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亦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的典型代表。出生于意大利一个伯爵家庭，早年曾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并加入多米尼克教团。后赴巴黎从师著名神学家阿尔贝图·马格努研究神学。从1252年起，曾在巴黎等地讲学，又长期担任罗马教廷的重要职务。他不仅在当时被奉为"神学的泰斗"，而且对以后有着很大的影响。其代表作《神学大全》集中世纪经院哲学之大成，但里面也涉及到若干经济思想。

阿奎那竭力宣扬等级制观念，为私有制和阶级压迫辩护。按他的讲法，上帝创造万物原有贵贱之分，因此"上等人"统治"下等人"是永恒的，农奴受剥削符合上帝的意志。同样，私有制是人的理性创造的，归根到底仍来自于自然法的观念即上帝意志。他声称，人们对获取自己的东西比对获取共同的东西更为关心；如果人们有自己的事情需关心时，人类的事务处理得会更有条理；而大家满意自己处境的话，则人类社会就比较太平；所以，私有制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

的制度。必须指出，当时社会的传统看法一直认为私有财产与人类罪恶相联系，唯独亚里士多德为私有制作过辩护。阿奎那适应封建主阶级的需要，首先全面论述了私有制和封建农奴压迫的必要性，并使之逐渐成为基督教会的主导思想，从而根本扭转了上述传统观念。

公平价格理论是阿奎那学说中最重要的内容。他接受了其老师马格努的看法，把生产物品所作的"劳动耗费和货币支出"都相等的价格称为"公平价格"，并主张物品应当依此来交换。他们已模糊地意识到价格与劳动耗费的关系，却给他披上一件宗教伦理的外衣，同时目的在于反对商人的贱买贵卖活动。然而，阿奎那又将价格同等级制相联系，宣称公平价格必须是那种能使卖主获得"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的价格。换言之，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也应是公平的。据此，他进一步把公平价格看成是一种主观评价，认为它取决于人们从物品中所得利益的大小，取决于物品的用处（即效用）的大小，指出："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例如，如果一个人急需某种物品而它的卖主因此带来损失时，卖主就可将它的价格卖得高于其价值，这并未违背公平价格。显然，这种说法旨在替封建主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物品进行辩解，实际上是对公平价格的否定。

阿奎那对商业活动和高利贷调和折衷的态度也反映了中世纪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他仍然同意获取商业利润和借贷取息是罪恶的传统观点，但又认为有些情况不属此列。例如，贱买贵卖所得的收入，如果用于必需的或正当的用途（维持家庭生活、帮助穷人等），抑或是来自对物品作了改进，改变时间地点而使价格变化、转运物品而担负风险等原因的，都可以免受道义的谴责。因为这样赚的利润是劳动报酬，其数量须保证商人符合自己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同样，如果出借的物品属于所有权和使用权能够分离的类型(如房屋)，那么，出借者除收回它的所有权外，还可收取转让其使用权的报酬，即利息。此外，他虽把货币视为那种不应获取利息的物品，但声称出借货币若蒙受损失或承担风险，仍可索取一部分利息。正是阿奎那的这些论述，使得后来的教会作家们对商业利润和放债收息采取了认可或宽容的态度，从而逐渐改变了以往一概否定的传统观念。

阿什利，威廉·詹姆斯（Willian James Ashley，1860—1927 年） 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出生于英国伦敦。1881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后赴德留学。1888 年起，先后担任多伦多、哈佛、伯明翰等大学的教授。阿什利是全世界最早一位经济史教授，他的经济史著作相当多且有名，其中《英国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导论》（1888 年，1893 年）为代表作。由于他曾直接受教于德国历史学派，其学说又具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色彩，主张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基础，因而被看成是所谓英国历史学派的后期主要代表。

阿蒙·阿尔弗里德（Alfred Amonn，1883—1962 年） 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生于奥地利，自 1910 年起先后在奥地利、捷克、日本和瑞士等国多所大学任教。阿蒙在经济学史上令人瞩目之处在于，他虽为奥地利学派一员，却对边际效用论作出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他指出，边际效用只是个人的心理现象，尽管能用以说明许多个别的经济现象，却因为一个国家绝对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边际效用，而无法以它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经济学体系。由此出发，他在其代表作《国民福利学原理》（1926 年）里对许多经济问题作了有别于边际效用学派的解释。特别是他的价值论，试图通过区分效用与价值，强调人的主观欲望与财货的客观数量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坚持市场的供求平衡条件等论证环节，把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论融合在一起。这种徒劳的折衷主义自然不可能引起经济学界任何积极的反应。

阿罗定理（Arrow's Theorem） 社会选择的基本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数理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7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于本世纪 50 年代初提出。此后，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大都是围绕阿罗定理展开的。

一、社会选择的困境

由于经济政策或其它社会政策主要对众多而又千差万别的社会成员产生影响，所以从亚当·斯密（A·Smith）以来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社会政策的选择标准应以个人对政策的判断作为出发点已是一种共识。那么，如何由个人判断准则推导产生社会判断准则就成为社会选择的根本问题。社会选择的一个最纯粹的例子就是投票表决行为。这里，社会决策依赖于全部可得的备选方案（候选人或法律议案）以及每一个投票者对可选择方案的偏好排序。投票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只有与问题有关的备选方案的个人偏好才构成对选择的影响，可得方案的范围以外的偏好则不起作用，这是社会选择机制的基本要求。社会选择理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研究根据个人偏好来推导出能够满足某些既定条件的社会偏好。由于个体的千差万别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个体判断标准，而且按照个人的直接消费标准或按照个人的公平标准对社会状态所进行的排序其结果是不相同的。这样社会选择理

论面临两方面的难题：(1) 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判断两种社会状态孰优的评判标准；(2) 如果能够给定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社会机制（制度）来执行这些价值判断标准。阿罗以前的经济学家在这两方面作了很多的探索。边沁（Bentham 提出以个人效用加总来得出社会效用作为社会选择的标准，艾奇渥斯（Edgeworth）则认为可以用征税的标准或判断作为社会选择的准则；为避免效用的基数性质的人际比较，1939 年卡尔多（Kaldor）和希克斯（Hicks）提出了补偿原则，然而，补偿原则无以定义社会偏好排序；被认为社会选择典例的大多数投票行为如作为一种社会决策程序会出现非连通性，也即孔多塞（Condorcet）1785 年指出的"投票悖论"；既可避免效用的人际比较，又可避免以基数效用来定义社会福利函数的提出者是柏格森(Bergson，他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构成是这样的：首先选择一个代表个人的偏好排序的效用函数，然后将社会福利函数定义为由 n 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所规定的函数 $W(U_1,\cdots U_n)$。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核心是要确定最大值的社会帕累托最优状态。欲达此目的，就需要社会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求出社会无差异曲线就需根据各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偏好顺序，来确定统一的社会偏好顺序，这也是社会选择的基本含义。社会选择是相对个人选择而言，个人选择的中心是确定个人偏好，而社会选择的中心是确定社会偏好。

阿罗研究了社会状态的排序问题。他认为：如果把社会福利函数作为社会选择的准则，那么前述的社会选择的两个难题可以归结为选择与产生最适度的社会福利函数的问题。阿罗进一步论证，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它能够作出有助于社会选择的明确的社会排序，那么这个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同时满足五个相应的独立条件：广泛性；一致性；独立性；非强加性；非独裁性。阿罗证明了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五个条件，才能保证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达成谐调一致。阿罗定理，又称"不可能性定理"的基本内容就是：一般情况下，从已知的各种个人偏好排序基础上推导出同时完全符合这五条件的社会偏好顺序亦即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可能的。阿罗利用集合论的工具，严格地证明了这一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阿罗常举用的"投票悖论"就是不可能性定理的一个例证。阿罗从中得出了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结论：没有任何的表决办法能够摆脱"悖论"的阴影。即使是以货币为选票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导致一个合理的社会选择。阿罗定理否定了通常认为所谓民主社会达至社会选择的两种办法：投票表决与市场机制。阿罗断言："在从个人偏好过渡到社会偏好时，能使社会偏好得到满足，又能代表广泛的个人偏好，这样一个排序方法，只有强制和独裁。"表明了导致这种不可能性的原因在于上述五个条件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如此，寻找合理的社会选择机制的努力就陷入了困境。构造社会福利函数的困难正是来源于其出发点即个人主义的假设所带来的差异的社会态度，因而，社会福利判断的可能性，依赖于各个个体对备选社会方案的态度之间的差异程度。既然个体判别准则如此千差万别，社会福利的判断与选择的难于统一实为不可避免。

二、阿罗五条件与阿罗定理

阿罗有关社会选择的常用术语有：备选方案(alternatives)、机会集（opportunity set)、偏好序(preference ordering）以及偏好序组合（profile of preference Orderings)。在任一社会决策中，都存在大量的备选方案，在给定的决策状态下，这些备选方案集合的一些子集是可得的或可行的。这些子集称为机会集。进入决策的每一个人都能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基于个人对所有备选方案有一个偏好序，对于每一对选择方案（x，y），个人都有 x>y 或 x 无异于 y 的评价。如果 $x\succ y, y\succ E$，那么 $x\succ E$，则说选择具有一致性。偏好序组合是对所有个人偏好序的描述。对于给定的偏好序组合，社会选择机制将确定从给定的机会集中选出一个方案。因此，社会选择必然是这样一种行为：备选方案的社会排序是存在的，从任何机会集中作出的选择将是位于社会偏好序中最高位置的元素。这样社会选择机制或制度就是关于每一个社会偏好序组合的函数。在了解阿罗选择术语含义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叙述阿罗五条件。

条件Ⅰ.社会选择制度由全部逻辑可能的备选集合的偏好组合来定义（广泛性或完备性）。

条件Ⅱ.假定对于给定的偏好序组合，社会选择为 x>y；再假设一个新的偏好序组合，其中，有一些个人的排序中对 x 的偏好程度提高，而在其他人的排序中，x 的偏好位置并未下降，那么，与新的偏好序组合相关的社会排序中必定有 x>y（单调性或一致性）。

条件Ⅲ.设 S 为备选方案的集合。存在两个偏好序组合，其中，每个人对 S 中的方案有同样的排序，那么这两个偏好序组合决定了来自 S 的同样的选择（独立性）。

条件Ⅳ.社会选择制度是非强加的。所谓强加，表现为社会选择制度关于某对选择方案，对于全部的偏好序组合，社会选择结果是相同的（非强加性）。

条件Ⅴ.社会选择制度是非独裁的。所谓独裁制度就是规定某个人的一种严格的偏好作为社会偏好制度（非独裁性）。

在上述五条件的基础上得出了社会选择（理论）

的阿罗定理。

定理Ⅰ：不存在一种社会选择制度同时满足条件Ⅰ、Ⅱ、Ⅲ、Ⅳ和Ⅴ。

条件Ⅲ可由投票方式的重要特点来说明。两个备选方案的偏好选择仅仅依存于个人对于这两个方案的偏好，与其它方案的偏好无关。至于社会选择制度需由全部偏好序组合来定义的条件Ⅰ，可以有一种替代的弱性的描述：

条件Ⅰ'，社会选择制度由一个偏好序组合的集合来定义。那么，对于某个有三个备选方案的集合，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任意方式对这个集合进行排序。

条件Ⅰ'中之所以要特别指明"三个"方案的集合，是因为存在三个备选方案就可能产生类似"投票悖论"的结果。即使这样，条件Ⅰ'仍是不充分的，因为条件Ⅱ须对所有的备选方案都成立，而不仅仅对类似三种方案的特定的子集成立。所以条件Ⅰ比条件Ⅰ'优越。假如要以条件Ⅰ'代替条件Ⅰ，那么就必须对条件Ⅱ进行适当强调，才能保证定理Ⅰ成立。

条件Ⅴ'、不存在任何个人在任意三种方案的选择中是独裁者。

如果对于可能的个人排序范围有一种合理的限制，比如偏好序为单峰型，那么条件Ⅰ和条件Ⅰ'可以被相应的范围条件所取代。但在研究多维问题时，类似的限制条件鲜有说服力。条件Ⅱ和条件Ⅳ体现了一种社会价值判断的不同方面，该价值判断认为社会决策的制度应代表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且应随价值的变化以相应的方式变动。条件Ⅴ表达了最低限度的民主。无论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还是其它的社会选择理论，条件Ⅲ都是相应的社会选择机制的关键性条件。

社会选择的目的是寻找适度的社会福利函数从而确定最优的社会状态。在前面的条件中，有些包含了帕累托条件，尤其是条件Ⅱ、Ⅲ、Ⅳ。如果明确给出帕累托原则则有：

条件P，如果每个人的排序都是X＞Y，那么在社会选择排序中X＞Y（最优性）。

条件P对于条件Ⅱ和条件Ⅳ具有完全的替代性。由此可得出定理Ⅱ。

定理Ⅱ：不存在同时满足条件Ⅰ、P、Ⅲ和Ⅴ的社会选择制度。

定理Ⅰ和定理Ⅱ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两种表述形式。阿罗定理以集合论为推理论证工具，在严格的公理化体系的基础上，第一次宣布了由个人选择推导社会选择的不可能性，打破了一些由来已久被认为是真理的观点。阿罗定理非直接地表明了民主并不足以保证达至"公共意志"，它最大的好处是防止了"最坏"情况的发生。此外，"不可能性定理"还表明以货币为选票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作出符合社会公意的合理选择。因此，它的天然合理性是有限度的。

虽然"不可能性定理"已被证明，但是如果个体之间判别的基础毫无可比性，那么社会选择问题亦无从谈起。实际上，人们在许多方面持有相同的社会态度，比如向往和平、权力、平等、长寿等等。因此，后来，阿罗又证明了"类似性是确实存在的"。布莱克（Black）的单峰偏好研究也表明如果事先把个人的趣味限制在某一类似的范围内，那么至少可以从数学形式上找到一个合适的社会福利函数。阿罗据此修正了他的假设：各个个体对某些选择存在一致性，但对另一些选择却不一定一致。这种"部分一致性"的假设，有助于把"一致性"研究引上数学的形式化、公理化的方向上来。

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Feneral Equilibrium） 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始人瓦尔拉斯（Walras）那里，市场网络向均衡的调整过程乃是一个反复探索（talonnement）的过程。他对于均衡存在的论证更多的带有直觉的色彩，而非严格的数学证明。解决一般均衡解的存在需要借助于拓朴学中的不动点定理（fixed point theorem），而这一定理本世纪30年代才由数学家布劳威尔（Brorwer）和冯·诺伊曼（Von·Neumann）所开创。1954年数理经济学家阿罗（K·Arrow）和德布鲁（G·Debreu）合作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竞争经济均衡的存在性》，揭开了一般均衡理论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阿罗和德布鲁在其所构造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论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命题——均衡的存在与均衡的效率。用凸集理论与集合论的方法证明了竞争均衡的存在性及其在资源配置上的最优性质。模型的分析前提完全忠实于新古典方法的传统，即个人理性、市场出清以及理性预期等。模型所使用的两个分析手段凸性分析及不动点理论至今仍是数理经济学的最重要的数学工具。阿罗—德布鲁模型代表了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模型优异的抽象性及一般性为此后的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Ⅰ模型——基本概念及假设

模型所用的基本数学工具有：元素的集合、实数概念、商品空间 R^L、函数和对应的连续概念以及不动点概念等。构筑模型的最基本的对偶概念是商品和价格这两个经济学的中心概念。这里，商品有其特有的严格的规定性：商品由其物质属性、可供的时间和地点来加以描述。而每一种商品对应于一个实数即价格P。通常的商品价格是指为获得某些商品而付出的货币量，而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没有涉及货币。商品

和价格这两个抽象概念包括了许多具体形式。一旦选定了测度单位，这两个概念就具唯一的数量形式。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数学基础是：考虑一个具有有限商品的经济，一个经济主体（agent）的行为可以通过列举其对各种商品的投入产出来描述。一旦采用了正负号来区别投入和产出，经济主体人的行为就可以用商品空间中的一个点来表示：一个消费者的行为可以用 L 维向量 $X=((x_1,\cdots,x_L)'$ 来表示，其中，x_i 表示他该消费的第 i 种商品的数量，$i=1,\cdots L$；一个生产者的行为以 J 维向量 $Y=(y_1\cdots,y_J)$ 来表示，其中，当分量 $y_i>0$ 时，表示第 i 种商品的产出量，$y_i<0$ 时，表示生产要求的第 i 种商品的投入量。同样地，一个经济中的各种商品价格可用价格空间的一个点来表示。商品空间和价格空间的丰富的数学结构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阿罗—德布鲁模型主要是建立在商品和价格这二个基本概念的定义以及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基础上的。下面用〔A·i〕表示模型的假设。其中 $i=1,\cdots,13$。模型的最基本的假设是关于商品的假设。（A·i 现象）商品和阿罗—德布鲁商品。

假设有 L 种商品，用 l 表示，$l=1,\cdots,L$。每种商品的数量以实数表示。所有商品的数量列用商品向量空间 R^L 表示。商品是模型中最重要的概念，生产和消费的定义就是按照它们各自引起的商品的转换内容而设定的。而商品集合是对生产和交换进行描述所必须的最小的物品集。阿罗—德布鲁模型研究的是通过商品交换在瞬间达成的资源配置。

阿罗—德布鲁商品是这样定义的：当物品被描述得如此精细入微以至于进一步的改进不可能产生可想象的配置使经济主体的满足程度有所提高，那么这些物品就称为阿罗—德布鲁商品。对物品的描述越精微入里，交易范围就越广，从而可想象的配置的集合就越大。阿罗—德布鲁模型中商品概念的极为丰富的内涵为现实经济现象，如金融资产、公共物品、外部性、风险等等都可以通过合理的途径纳入模型分析框架。比如，按照商品的最后消费主体可以系统地将外部性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阿罗—德布鲁商品市场。因为商品的描述越精细，商品市场拥有大量买者和卖者（竞争的）的可能性越小，通常的情形是许多阿罗—德布鲁商品族不可分割成丛地一起交易。在许多瞬间达到的这种交易是"次优"交易。理想化地将各个阿罗—德布鲁商品市场描述为同时结清的阿罗—德布鲁模型是与现实经济的可度量观念相抗衡的基点。

有关消费者的假设实际上形成了模型的消费者理论。模型中假设消费者的数目是给定的正整数 H。每个消费者由指标 $h=1,\cdots,H$ 来表示（A·1）有关消费者的假设还有：

（A·2）每个消费者 h 的可能的消费计划 $x\in R^L$，这些消费计划存在于某个消费集合 X^h。即第 h 个消费者在商品空间 R^L 的非空子集 X^h 中选择一点，即选择其消费或需求 X。消费集 X^h 的有关假设是连续性、封闭性、下界性、连通性以及凸性。在这些假设基础上讨论了消费可能性计划中的偏好的概念：

（A·3）每个消费者 h 的偏好次序关系是消费集 X^h 上一定的完全次序关系。对于每对消费计划 $(x,y)\in X^h\times X^h$ 都有一定排序 $\succeq h$。$x\succeq y$ 意味着 X 至少和 Y 一样令人满意。假设偏好次序 $\succeq$ 是一种完全的、连通的和连续的次序。

可见，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消费是在整个消费计划而不是在单个商品之间作选择。单个的商品仅当其与消费者已经消费的或计划消费的商品有关时才有意义。偏好次序的完全性和连通性假设折射出新古典精神的理想的理性选择。理性选择假设与传统的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中效用最大化假设相对应。传统场合下效用是瞬时消费产生的。在模型中一旦以效用作为整个消费计划而非瞬时消费的函数，那么理性选择就等同于效用最大化假设。德布鲁 1951 年证明了当且仅当存在一个效用函数 $u^h:X^h\to R$（u^h 为 X^h 对 R 的映射）并且当 $u^h(x)\geq u^h(y)$ 时，有 $x\succeq y$，那么定义在 $X^h\times X^h$ 上的任意偏好次序 $\succeq h$ 满足（A·1）—（A·3）。在这里，效用具有避开人际比较的序数性质，它是理性选择的逻辑结果。从中可见从帕累托（Pareto）到希克斯（Hicks）以至萨缪尔逊（Samuelson）的影响所造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将理性作为基本行为假设，效用最大化作为其逻辑结果的革命性转变。这一转变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罗—德布鲁模型对偏好作了进一步的假设：

（A·4）对于每一个 $x\in X^h$，都有 $y\in X^h$，而 $y>_h x$。那么 $y\succeq hX$，而非 $x\succeq_h y$。这一假设符合人类的不餍足的本性。

（A·5）X^h 是一个凸集，$\succeq_h$ 是凸性的。即如果 $y>hX$，并且 $0<t\leq 1$，那么 $[ty+(1-t)x]>_h x$。这一假设暗示了商品是无限可分的，混合状态至少与极端单一状态一样好。如果商品按照生产日期来区分，这样它们必被视为流量，从而凸性的假设就无法成立。只要每个经济主体与市场关系极小（市场上有许许多多的主体），偏好的非凸性就相对地是不重要的。

（A·6）每个经济主体 h 拥有初始资源，用向量表示：$e^h\in X^hCR^L,h=1,\cdots$，h。向量 e^h 代表消费者物质上要求拥有所有商品而不仅仅是必需品。$e^h\in X^h$ 说明即使经济主体丧失了所有的交易机会也可维持生

存。

(A·7) 对于全部 $h=1,\cdots,H, j=1,\cdots,J, d_{hj}\geq 0$,对于所有 $j=1,\cdots,J$, $\sum_{h=1}^{H}d_{hj}=1$。即每个个人都拥有每家企业的一部分股份，每家企业的股份全部分散为消费者拥有。

以上 (A·1) — (A·7) 假设构成了模型的消费理论。下面是构成模型的生产理论的有关生产者—企业的假设，它们准确地给出生产者（企业)、生产计划以及生产可能性集合的概念：

(A·8) 假设模型中有 J 个企业，J 是给定正整数，$j=1,\cdots,J$。

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的企业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企业的原始股权是分散的；企业的生产活动表现为对商品的转形，生产可能性集合 $Y_j \subset R^L$,Y_j 是商品空间 R^L 的一个给定的非空子空。在 Y_j 上第 J 个企业选择一点，即他的生产计划和供给 Y，$y \in Y_j$（则称 y 组成的集合是总生产集合。即 $y=\sum_{j=1}^{J}y_j$ 是总生产或总供给)。$y\in R^L$，$y<0$ 时表明投入，$y>0$ 时表明产出。关于集合 Y_j 的假设包括：连续性、活动的不可能性、免费生产的不可能性、不可逆性、可加性、凸性，规模效益不变以及自由支配等等。

(A·9) 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惯常假设是自由支配：如果 $l=1,\cdots,L$ 表示任意商品，V_L 是商品空间 R^L 的单位向量，这一向量的第 l 座标值为 1，其余各处为零。那么，对于所有 $l=1,\cdots,L, K>0$，以及某些 $j=1,\cdots,J$，有 $-KV_l \subset Y_j$。当引进负的价格时，这一假设条件将得以放宽。

(A·10) 对于每个企业 j，生产集合 Y_j 是闭的和凸的。凸性的假设排除了生产的不可分性、规模收益递增以及分工获益等。和前面的消费场合一样，如果生产的不可分性与整个经济规模几无相关，那么对结论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一旦相关系数增大或者存在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那么阿罗—德布鲁竞争均衡模型就失去应用意义。凸性假设与传统的规模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场合是一致的。所以 (A·10) 是模型中对于经验检验最脆弱而对模型的逻辑确立至关重要的假设条件。

(A·11) 设 $e=\sum_{h=1}^{H}e^h$,

$F=\{y\in R^L|_y=\sum_{j=1}^{J}y_j, y_j \subset Y^j, j=1,\cdots J\}$,

$\overline{F}=\{y\in F|_y+e\geq 0\}$,

以及,$K=\{(y_1,\cdots,y_J)\in Y_1 \times\cdots\times Y_J|\equiv y\sum_{j=1}^{J}y^j\in\overline{F}\}$则有 $F\bigcap R_+^L\neq\varphi$，并且 K 是紧集。

此假设要求即使生产部门运用了全部的消费部门的资源，可能达到的生产活动的水平仍然是有界的（也是闭的)。这一假设与拥有初始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是一致的，在最初的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企业不被允许拥有初始资源。

(A·12) 经济是不可缩减的。对于任意两个经济主体 h 和 h'，h 的初始资源 e^h 是某种商品 L，同时，h'可以通过使用该 e^h 来改善处境。

(A·13) 商品不按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来区分。这一假设的设立是为了释义的目的，将之与竞争均衡的定义相结合，就排除了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由于 (A·13) 没有数学内容，所以如果抛弃这一假设，阿罗—德布鲁竞争均衡的概念仍是有意义的；并且仍不失其最优的性质，不过，那将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诠释。林达尔 (Lindahl) 均衡就是建立在 (A·1) — (A·12) 的阿罗—德布鲁模型的特例。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商品空间有优异的延展性和很好的诠释能力。(A·13) 严格限制了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规范结论的产生。然而，从描述的角度来看，阿罗—德布鲁均衡所暗示的理性和价格接受行为的假设使 (A·13) 不可或缺。

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最后一个基本概念是价格。它和商品一样是定量分析和直接度量的。德布鲁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所起的根本作用部分地归因于商品和价格这二个基本概念的可度量的性质以及自由地区分为价格的价值集合和商品的数量集合的二重向量空间的丰富的数学关系。准确地说，价格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仅当表现为两种商品之间的关系时可是可感觉（和可衡量）的，即是一种相对价格。因此，阿罗—德布鲁模型中共有 L^2-L 个相对价格。按照阿罗—德布鲁均衡定义，模型直接给出 L−1 个相对价格，其余 $(L-1)^2$ 个相对价格由此而得出，为表述方便起见，价格被指定为每种商品每单位数量。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来自这些商品的阿罗—德布鲁价格比率。

在以上所有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来定义阿罗—德布鲁经济 E.$E=\{L,H,J(X^h,e^h,\succsim_h),(Y^j),(d^{hj}),h=1,\cdots H,j=1,\cdots J\}$满足 (A·1) — (A·13)，一个经济社会是由所有经济单位的特征组成的。微观经济学中的阿罗—德布鲁经济环境或经济 E 是由经济社会中所有成员，所有商品，成员的消费集，偏好关系，生产可能性集以及初始资源组成的。

阿罗—德布鲁均衡就表示为一组均衡解：

$[(\overline{P_l}),(\overline{x}_l^h),(\overline{y}_l^j),l=1,\cdots,L,h=1,\cdots H,$
$j=1,\cdots,J]$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对于所有 $j=1,\cdots,j$

$$\overline{j}\in argmax\{\sum_{l=1}^{L}\overline{p_l y_l}|(y=y_1,\cdots,y_l)\in Y^j\} \quad (1)$$

对于所有 $h=1,\cdots,H,\overline{x}^h\in B^h(\overline{p})$

这里，$B^h(\overline{p})\equiv\{x\in X^h|\sum_{l=1}^{L}\overline{p}_l x_l\leq\sum_{l=1}^{l}p_l e_l^h$

$$+\sum_{i=1}^{l}d^{hj}\sum_{l=1}^{l}\bar{p}_l\overline{y_l^j}\}\qquad(2)$$

对于所有 l=1,…,L,

$$\sum_{h=1}^{H}X_l^h=\sum_{h=1}^{H}e_l^h+\sum_{i=1}^{J}\bar{y}_l^j\qquad(3)$$

其中 (1) 对均衡时的企业行为进行了说明。对于一定的价格系统每个生产者使其利润最大化; (2) 是对均衡的消费者行为的刻画。消费者拥有初始资源并控制生产者的私有经济，生产者的利润要分给消费者——股东。这样就确定了消费者的财富，消费计划的支出不能超过其财富。消费计划必须满足给定的约束; (3) 揭示了均衡的总生产集与总需求集的关系。阿罗—德布鲁经济实际上是以 h 个消费者、j 个企业以及总资源来定义的，一个经济状态就是对每个经济主体行动的一种说明。阿罗—德布鲁均衡表明了均衡的价格系统$\bar{P}$致使每个经济主体选择的行为必然与总资源相容。

将阿罗—德布鲁模型与以前所有的一般均衡模型相比较，除了体现出一般均衡的基本特征如目标与资源的谐调，经济主体行为的对称性，经济主体的价格接受行为等等之外，另有其卓而不群之处。比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工具迥异于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 阿罗—德布鲁模型以更具一般性的生产可能性计划代替了固定系数的生产; 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不存在一贯的利润率。模型中引入的 d^{hj} 是消费者对企业拥有的股份，以便股份拥有者不必从事生产活动而能获得利润。d^{hj}; 同时也构成了消费者的财富; 阿罗—德布鲁模型依据于"理性预期"，每个经济主体必须知晓每一个企业的价格，$q_j=\sum_{l=1}^{L}\bar{p}_l\overline{y_l^j}$。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其严格的公理化体系的方法。这一方法对经济理论分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被作为范本用以对其他的经济分析模型进行比照鉴定。

构成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最伟大成就的一般均衡的公理化体系表达形式〔(A·1)—(A·13)〕的意义在于: 基于这些假设条件，有可能宣称一个适当选择的价格系统是必然存在的，它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目标多样同时又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作出彼此相容的选择。所有的假设条件都被用以说明模型是坚实的和一贯的，均衡解是必然存在的。

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对于一般均衡分析中三个基本问题即"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都有完全的讨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三个关键性的数学结论就是均衡的存在性、最优性和唯一性。这里，我们只讨论前两个结论，它们回答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古老的命题即均衡的存在及均衡的效率。首先讨论均衡的最优性，其次讨论均衡解的存在性。

Ⅱ、阿罗—德布鲁均衡的效率及均衡解的存在性

一、阿罗—德布鲁均衡是帕累托最优境界

本世纪 50 年代早期，阿罗—德布鲁模型的第一个成果就是阿罗、德布鲁 1951 年同时明确地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和第二定理。定理的证明非常简单而清楚，这两个定理一直被奉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圭臬。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任何阿罗—德布鲁均衡配置$\bar{x}=(\bar{x}^h)$,h=1,…,H 都是帕累托最优。定理的成立是基于以下情形: 即: 〔(x^h),(y^j)〕满足$y^j\in Y^j$,$\sum_{h=1}^{H}x^h=\sum_{j=1}^{J}y_h^j+e$,对于全部 h，都不存在$x^h>_h\bar{x}^h$。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 为第一定理的逆定理即阿罗—德布鲁经济 E 的任何帕累托最优配置都是通过对 E 的初始商品资源以及所有权份额进行重新安排而达到的阿罗—德布鲁经济的一个竞争均衡的配置 $\hat{E}$。

第一定理表达了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的效率——帕累托最优。它对初始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无所主张。第二定理意味着在任何收入重新分配上一次性的收入转移优于通过操纵市场引起的收入变化。阿罗—德布鲁之前关于帕累托最优的证明用的是微分法，要求可微的生产函数和严格的正的配置$\bar{x}$，而阿罗—德布鲁的证明所用的则是偏好及生产集合的凸性。虽然一阶条件加上偏好与生产集合的凸性假设之后可以成为更具一般意义的条件，但对于阿罗—德布鲁均衡的存在或者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来说，偏好和生产集合既可微又是严格凸的假设是不必要的。阿罗—德布鲁关于竞争均衡为帕累托最优的证明，在整体变化下，无须可微性，亦不要求所有经济主体对每一种物品的严格的正的消费数量。事实上，第一定理的证明甚而没有用到凸集的条件。唯一需要的是局部非充分满足条件，即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均衡中花掉了他(她) 的全部收入。证明用的是反证法: 如果 (x, y) 为帕累托最优配置，假设它优于竞争均衡配置$(\bar{x},\bar{y})$。那么，对于所有 h，有$\bar{p}\cdot x_h<\bar{p}\cdot x^h$。又由于利润最大化意味着对于全部 j，有$\bar{p}\cdot y^j\geqslant\bar{p}\cdot y^j$，所以，$p\cdot(\sum_h x^h-\sum_j y^j)>\bar{p}(\sum_h\bar{x}^h-\sum_j\overline{y^j})$。这显然是矛盾的。第二定理的证明需要偏好及生产集合的凸性假设。证明主要应用了明考斯基 (Minkowski's) 定理，断言在商品空间 R^L 中，任意两个支离的凸集之间，必存在一个独立的超平面。

二、均衡的存在性证明

假设经济主体的偏好集合以及企业的生产集合是严格凸的，经济主体对于拥有商品是严格的多多益善(严格的单调性)，而且拥有严格为正的资源。设：

(1) △为L维价格向量的集合，所有的价格向量都是非负的，其和为1。

(2) $f^h(p)$是在给定的严格正的价格 p∈△$_{++}$F 经济主体h最为偏好的商品丛。

(3) $g^j(p)$是在给定价格 p∈△$_{++}$F 企业j的利润最大化选择。

(4) $f(P) = \sum_{h=1}^{H} f^h(p) - \sum_{j=1}^{J} g^j(p) - e$ 。

(4) 将经济中的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与企业利润最大化选择以及经济的总资源联系起来。f(p)是超额需求。在以上四个假设条件基础上说明f(p)是在所有的 p∈△$_{++}$上的连续函数。当且仅当 $f(\bar{p})=0$时，价格$\bar{p}$∈△$_{++}$是一个阿罗—德布鲁均衡价格。阿罗—德布鲁证明了 f(p)必定满足瓦尔拉斯法则（Walras' Law，对于所有P，P·f(p)=0。因此，f不是任意设定的。

阿罗—德布鲁对存在性的证明应用了布劳维尔定理即点对点的映射。布氏定理认为对于任何一个连续的函数g，定义在I度几何空间的一个封闭的、凸的且有界的子集合S，必然存在一点 x∈S，使得 g(x)=x。阿罗—德布鲁在证明中引进△$_\epsilon$作为价格P的凸的紧集，p∈△，且对于全部l，有 $P_l \geq \epsilon > 0$。还引进连续函数 φ:>$_\epsilon$→△$_\epsilon$定义了P对△$_\epsilon$中的最近点$\hat{p}$的映射，表示为f(p)+p。那么，根据布氏不动点定理，φ 至少有一个不动点$\bar{p}$使得 $\varphi(\bar{p})=\bar{p}$。又由于严格的单调性条件，可得出如果ϵ被选择为足够小，那么$\bar{p}$就不可能在△$_\epsilon$的边界上，即$\bar{P}$是 φ 的一个非在△$_\epsilon$边界的定点。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可推知p是△$_\epsilon$的内点，从而 $f(\bar{p})=0$，$\bar{p}$是一个均衡的价格向量。这就是证明阿罗—德布鲁经济均衡存在的逻辑过程。在上面的证明逻辑中凸性和单调性的假设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关于经济主体的凸性假设，保证了他们的最大化行为的连续性；凸的△$_\epsilon$则保证了这一向量空间具有定点的性质。

70年代以来，面对现实经济中非完全市场及其价格空间的非凸性，经济学家们开创了一些新的不要求价格空间凸性条件的一般均衡的证明方法，比如"轨迹跟踪法"(path—following)。一旦弱化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严格的凸性假设，那么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将采用卡库坦尼定理（Kakutani's theorem）采取代布劳维尔不动点定理。总而言之，只要偏好集和生产集都不具非凸性，而且所有的经济主体与市场不相关，那么经济中必定存在使市场出清的价格。这种场合下大规模的规模收益递增必定与均衡不相容。至于单调性在证明中的作用，可以断言，只要负的价格不容存在，那么单调性和生产集自由处置条件作为假设条件就不能剔除。如果抛弃了严格单调性的假设，生产集合就不具自由处置性质，这样，为了求得均衡的存在解，均衡存在的证明逻辑必须修正：或者要求$f_l(\bar{p})=0$，或者要求$f_l(\bar{p})<0$，且$\bar{p}_l=0$。这种场合下，就可能存在自由物品（如空气）的超额供给。

四、模型的限制及其发展

5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借助于数学家引进的集合论与拓朴学方法，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使得微观经济的数学结构十分漂亮，然而却和实际观察缺少联系。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纷纷开始致力于解决阿罗—德布鲁模型在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时遇到的困难，由此来发展和完善一般均衡的理论分析。主要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是保持原有的新古典的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根本法则，诸如经济主体行为的最优化假设，市场出清，理性预期等等。与此同时引入新的机制或引入在阿罗—德布鲁模型背景下忽略的变量，从而使一般均衡的框架对新的现象具有解释能力。这方面的理论发展主要有：(1) 对于非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2) 代际模型（ou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3) 市场博弈模型（game theory model）；(4) 理性预期的均衡模型。其次，引入新的科学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规范。这方面的发展的标志是7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创立。

阿莱之谜（Allais Paradox） 所谓"阿莱之谜"是指对策论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阿莱（M·Allais）的名字而命名。在对以往的对策论公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阿莱发现，随机选择的独立性原则和每个主体显示的对邻近确定性区域的债券的偏好是互相矛盾的，并据此构造了一个由两个问题组成的反例：

(1) 你选择情形A抑或情形B?

情形A

肯定能获取100万美元。

情形B

10%的机会赢得500万美元，

89%的机会赢得100万美元，

1%的机会一无所获。

(2) 你选择情形C抑或情形D?

情形C

11%的机会赢得100万美元，

89%的机会一无所获。

情形 D

10%的机会赢得 500 万美元。

90%的机会一无所获。

按照以往的观点，偏好 A＞B 应该限定了偏好 C＞D，反之亦然。然而，观察的结果表明，对于每个谨慎地考虑概率计算的人来讲，其资本与收益相比相对较低，偏好 A＞B 往往和偏好 C＜D 平行对应。这样，二者之间似乎出现了矛盾，这个结果被看成一个谜。这就是阿莱之谜的由来。它被广泛传播的同时，其真正含义却一般被误解了。事实上，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行为，总是和传统的对策论公式相矛盾，这绝不仅仅只是"异例"和"谬误"等，而是大量观察实验的结果。对于阿莱之谜的真正含义，阿莱在其随机选择通论中给出了一个简明的解释。阿莱之谜给传统的对策论公式加上了限定条件，即以风险倾向为特征的，考虑基数效用整体的分布。它并不是一个不可理解之谜，而是对应于基本的心理实在，即货币价值和心理价值的非同一性以及基数效用分布对其平均价值的重要性。许多人在研究阿莱之谜时，都没有提到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随机选择通论，它基本上说明，不仅要考虑基数效用的数学期望，而且要考虑平均的、基本的风险因素的整体分布。

阿鲁沙协定 (Arusha Convention) 阿鲁沙协定是指欧洲经济共同体于 1968 年 7 月 26 日与东部非洲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三国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订的经济贸易协定。该协定确认坦、肯、乌三国为欧共体的联系国，该协定关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雅温得协定有所类似，只是范围要窄一点。阿鲁沙协定于 1969 年 9 月续订，其内容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它的有效期从 1971 年 1 月 1 日到 1975 年 1 月 31 日，此后未再续订，而是为洛美协定所取代。

阻止进入价格 (Spatial Price) 产业内现有企业通常情况下都以利润最大化为准则制定产品价格、但如果据此制定的价格产生的利润率较高，便可能诱使潜在竞争者进入该产业参加竞争。此时，产业内现有企业有可能制定一种特殊的目标价格即阻止进入价格，在此价格条件下，产业利润率相对较低，从而使潜在竞争者不愿进入该产业、产业组织理论对阻止进入价格的研究，主要按两个基本方向进行：一是构造理论模型，分析市场结构等因素对阻止进入价格的影响；二是着重进行实证研究，用实证材料证明影响阻止进入价格的实际因素。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相符。这些结论主要是：1.阻止进入价格与市场进入壁垒高低关系密切。壁垒高，阻止进入价格高；壁垒中等，阻止进入价格较低；壁垒很低，阻止进入价格可能低至使产业内现有企业的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2.根据不同的情况，产业内现有企业可按不同的原则制定阻止进入价格。例如在规模经济是进入壁垒的主要因素的产业中，企业的定价原则是：使在非经济规模条件下生产的新企业无利可图，被迫退出市场。3.与一般竞争价格不同，阻止进入价格通常由占优势地位的寡占企业首先实施。

劳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部。负责增进雇佣劳动者的福利，改善其工作条件，增加其就业机会。该部在促进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人力和使更多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获得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负责训练年青人和成年人，向他们介绍工作经验以及提供与职业有关的其他各种服务。其中包括实施根据人力发展和训练条例制订的各项社会事业计划和职业训练计划；实施社会保障条例中的工作刺激条款，以使靠救济为生的人参加永久性工作；实施集中就业计划，把居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以资助穷人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并且和企业家全国同盟一道实施工商企业就业机会计划。该部还负责实施根据经济机会条例制定的某些计划。其中包括"行动主流计划"、以及"街道青年团计划"。该部负责实施的其他计划有："职业团"，这是一项为辍学和失业的男女青年提供住宿的计划；退伍军人就业服务；徒工训练；以及为移民开具证明以便在美国寻找工作。该部还管理全国的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系统。除了开展有关人力的立法的活动外，它还负责实施有关工人的其他法律，其中包括公平劳动标准条例，该条例规定了最低工资额和最低加班费，并规定必须实行同工同酬；公共合同条例；劳资关系报道和揭露条例；以及其他几项有关工伤事故赔偿的法令。该部还收集和发表有关失业与就业工资与工作时间、物价与生活费用、工伤事故以及劳资关系等方面的资料。另外，该部还制定政策和计划以增进 3100 多万劳动妇女的福利，提出政府在国际劳工方面的对外政策目标，并负责使人们在政府合同和政府资助的建设项目中得到平等的就业机会。该部所属的机构包括人力管理署的美国训练和就业局、失业保险局、徒工和训练局、职业团；劳资关系署的劳资关系和福利——养老金报告局、劳资政策局、劳资关系局、退伍军人重新就业权利局；工资和劳工标准署的妇女管理局、工资和工作时间处、劳工标准局、雇工补偿局、联邦合同服从局；以及劳工统计局。

劳工骑士团 1869 年由尤里安·S·司提劳思创建的劳工骑士团是一个容纳各种类型、各种级别劳工的组织。1881 年以前，为了避开雇主和政府的抵

制，劳工骑士团一直是作为一个秘密的团体，以精巧的形式从事活动。这一组织的长远目标是以合作的社会取代竞争的社会。为实现其目标，他们准备采用以下手段：一般公众的教育、劝说雇主以及通过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进行劳工阶层内部的合作等。劳工骑士团领导人不重视罢工，联合抵制和其他一些暴力类型的工会活动，它认为政治方法胜过集体交涉方法。劳工骑士团并不是一个革命性实体，它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它主张的重要改良方案有如下几种：采用全民动议和投票方式的直接立法、建议劳工局促进民众福利、制定健康与安全法、工伤事故的保障、以货币支付的周工资、禁止雇佣15岁以下的童工、强制性公共教育与免费的教科书、累进所得税以及铁道、电话和电报的国有化等。这些改良措施中有许多在今天已被视为当然，但在劳工骑士团提倡它们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这些作法是极其激进的。从1869年到19世纪80年代，劳工骑士团会员增长非常缓慢，但在1885年反对强大的古尔德铁道业的大罢工出奇制胜之后，它的会员激增，1886年会员总数达到最高纪录，据不精确统计为70万。然而，其会员人数在以后突然开始下降，以至于到1892年这一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劳工骑士团的迅速衰败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可能有若干因素促成了这种情况，其中包括：全国领导机关与所属地方组织之间在罢工问题上意见分歧，地方组织更倾向于进行罢工活动；1885年以后，雇主方面日益增加其进攻性抵制活动，使得1886年以后骑士团遭受了接二连三的罢工失败；这种面向产业、甚至面向一般社会、而不是面向技艺的工人组织实验，也许早了半个世纪，其会员过于杂异，利益纷呈，使这一组织无法采取更为积极的政治立场；此外，一个强大的竞争者——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86年出现，联合会顺应了当时技艺工会主义的需求，对劳工骑士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劳工骑士团这一迅速发展并一度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组织，由于上述因素以及其他无法证实的原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亡了，并为后起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取代。

劳动力市场区（Labor —Market Area） 由一个中心城市或若干城市及其周围的合理往返距离内的地区构成的一个地理单位。它是一个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形成整体而以城市为主的单位，在这个地区内，工人无须变更住处就可以容易地调换工作。在多数情况下，大的劳动力市场区的边界是与标准大都市的边界相一致的，如纽约大都市区和芝加哥大都市区，美国劳工部就业保障局根据劳动力供应的充足程度，评定了150个大劳动力市场区和一些小劳动力市场区。

劳动市场歧视（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劳动市场歧视是指具有相同生产力的工人所得到的报酬不同，或者所从事的职业存在着贵贱之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劳动市场上存在着种族与性别歧视。例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美国，妇女与黑人付出与白人男劳力同样的劳动，但得到的报酬却是不同的。具有同等劳动能力的妇女与黑人所从事的职业也可能劣于白人成年男子。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在描述或定义劳动市场歧视时，存在三个重要的问题，即受歧视者的选择、歧视的动因、同等生产力或相同价值的含义。如果考虑到受歧视者的理性选择，给同等价值工人的不同报酬并不必然属于歧视，因为不同等报酬反映了其它方面的报酬。如果不同的报酬产生于人们自愿选择某一特定工作则不属于劳动市场歧视。例如，妇女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特点的工作而得到不同于男子的报酬则不属于歧视。关于歧视的动因问题涉及到歧视是经济的原因还是非经济的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产生于市场过程而不是产生于歧视性决策的非同等报酬不属于经济学上歧视的范畴。同等生产力或相同价值对于定义歧视问题更为重要。主要是要弄清"同等生产力"与"同等价值的工作"的决定因素。只有人们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下做完全相等的工作才能说是做"同等价值的工作"。因此，定义歧视或非歧视的问题变成为对同一环境下做同等工作的能力的差别进行识别和测度的问题。

劳动密集型技术（Laboar— Intensive Techniques） 在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比例中，使用的劳动相对较多的生产技术。这种生产技术的特点是使用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少，从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低，劳动生产率也低。使用这种生产技术的行业被称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农业、服务业等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采用劳动密集性技术主要是由其本身的生产特点所决定的。使用这种生产技术为主的经济称为劳动密集型经济。例如，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这些国家采用劳动密集型经济是由于它们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缺乏而劳动丰富，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要使一国经济达到发达水平，必须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转为资本密集型经济。

劳动力参加率（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劳动力人数在总人口数或某一集团人数中所占的比率。以LF代表劳动力人数，NLF代表非劳动力人数，U代表失业人数，E代表就业人数，则劳动力参加率为：

$$\frac{LF}{LF+NLF}=\frac{U+E}{U+E+NLF}.$$

在实际统计中，既可以按总人口数计算劳动力参加率，也可以按不同的集团（各年龄集团、性别集团、种族集团、各文化程度集团等）来计算不同的劳动力参加率。劳动力参加率反映了经济中劳动力储备的大小，在失业统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劳动力（Labor Force）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定义，凡年龄在16岁以上有收益的雇佣人员（包括武装部队人员）和虽然没有工作但在劳动力调查期间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员都是劳动力。后一类算作失业者，而那些没有工作也不想工作的成年人，包括家庭妇女，学生等等都不属于劳动力范畴。刑罚机构，精神病机构及养老员的管制人员也不计算在列。但个体劳动者，在农场或店铺中不领工资的家庭工人是属于劳动力的。劳动力人数由普查局每月为劳工部测算一次，每次调查都在每月第12天的那个星期内进行，由人口调查采访人员在449个地区，向50,000个家庭提问，了解该周内有哪些人可列入劳动力。全体劳动力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典型说来，它在每年夏天达到顶峰，因为这个时候学校放假了，许多学生长期地，或者在暑假期间暂时地投入劳动力行列。每年年底开学以后，全体劳动力就开始缩减，通常到一个典型年的一月或二月降到最低点，因为这个时候随着年节的大肆花销以后会出现工商业活动的萧条。此外，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全体劳动力的平均人数也会逐年有所增长。

劳动力市场歧视　指在所有经济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人有相等的生产能力，只是在一些非经济的个人特征上有所不同，如种族、性别、原有国籍，宗教或性偏好等，从而引起了待遇上的差别。不同性别和种族平均报酬的不同本身并不是歧视的充分证明，男女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事实上不会在各个有关的经济方面都相等的。歧视是任何两部分人平均报酬中不能由技能或其他有关特征差别来解释的那部分差距。

劳务（Service）　经济学中所讲的“劳务”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它们比较接近于汉语中所说的“劳务”与“服务业”（二者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service）。传统意义上，人们习惯于把社会产品分为物品(goods)与劳务(service)。虽然都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但前者是有形的，如食品、衣物；后者则是无形的，如生活服务中的理发、旅馆、音乐、文学、文化娱乐等，生产服务中的金融、保险等，但是，在传统的经济学中，物品与劳务的含义并不非常明确。现在，经济分析中所讲的劳务主要指服务业，它通常指诸如零售、金融、保险、运输、电讯以及与公共和私人决策相联系的非市场活动，对劳务概念的这种界定与费雪(G.B.Fisher）和柯林·克拉克（C·Clark）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它源于由费雪1939年提出的又被克拉克加以完善和发展的经济学中三次产业的划分。克拉克在1940年把社会生产分为三次大产业，第一次产业就是广义上的农业、第二次产业就是广义的工业，它们都是提供有形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第三次产业就是广义的服务业，所以服务业又经常与“第三次产业”混在一起。它被认为是繁衍于物质财富生产活动之上的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此后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被广泛地采用。现在世界上对三次产业的划分大致都信守上述原则，但具体的方法则不尽相同。因而，服务业本身的内容也有差异。服务业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有批发、零售、饮食业、金融、保险、不动产业，还有运输、通讯电力、煤气以及自来水、医疗、教育等，有的甚至把国家公务也包括在内。随着经济的发展，“情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信息业从第三次产业中提出来作为第四产业，可见“服务业”包含的内容也是不稳定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中往往把劳务（service）的相对发展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劳动交换（Labour Exchange）　劳动交换有时是指就业交换，也就是劳动登记机构。但从历史上讲，劳动交换是指罗伯特·欧文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一种理想制度。欧文认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是要求改变不合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据。欧文认为，私有制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在设想新的社会制度时，欧文主张公有制，消灭私有制。主张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使人得到解放，使人的理想得到全面发展。在经济理论上，欧文主张劳动价值论，认为资本、土地等不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唯有劳动创造价值。欧文幻想用载明生产产品所耗的劳动时数的“劳动券”来取代货币，用所谓的“国民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取代资本主义市场。在1832—1834年，英国出现了许多劳动交换所、市场和银行机构。在这里，人们根据生产时所投入的劳动来交换产品，产品的价值也是按生产劳动的投入量来计算的，机械的使用以及磨损的费用均不考虑。劳动交换制度是为了反抗那种由于货币的使用、垄断等而被扭曲了的社会。这种制度确实迎合了公众的需要，因而也曾受到人民的欢迎。但由于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因而很

快就失败了的。原因是欧文所主张的每小时六便士的劳动价值标准的实行，使得机械加工，特别是需要较多资本的产品价格变得相当便宜，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却变得相当贵，因此一些奸商囤积可以获利的产品。由于价值标准脱离现实，最后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劳动券，劳动券自然贬值，工人也最后放弃了劳动券而选择了市场所必需的货币。

劳动力剩余经济（Labour Surplus Economies） 劳动力剩余经济的显著特点是社会中存在二元经济，不同的经济部门存在不同的特色。重农主义者最先强调农业的特殊作用，并且在一个宏观体系下来分析两个相互关联的部门。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建立了劳动力剩余经济的第一模型。李嘉图的土地资源的固定性，马尔萨斯的人口几何级数增长，产生了这样的结论：农业实际工资趋于下降。其缺点有两个，一是缺乏对关联部门的分析，二是缺乏动态分析，没有考虑到农业中的技术变化。劳动力剩余经济在后凯恩斯经济学中得到复苏，并且有许多模型建立起来。经济学家用这些模型去分析第三世界战后经济的发展。现代劳动力剩余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中，某些部门的不对称发展就会产生劳动力剩余经济。劳动过剩可能出现在农业部门，也可能出现于其他部门，例如服务领域或生产规模小的工业部门。这些劳动过剩部门的显著特点是无法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率，即工资水平等于边际产出率。原因是过多的劳动资源与相对短缺资本以及土地资源的结合，使得劳动边际产出水平低于实际可以接受的收入标准。新古典经济部门与非新古典经济部门的并存以及相互作用是劳动过剩模型分析的核心。经济的进步依赖于结束劳动过剩状况。结束劳动过剩是指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渐地把非新古典经济部门的人口转移到新古典经济部门中去，也就是实现工资水平等于劳动边际产出这一条件。

劳资关系（Labour—Managed Relations） 美国劳动者与资方的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工会的力量相对较弱，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资方的力量比较强大，二是政府对资方的偏护。1947年，美国制定了劳资关系法即塔夫脱—哈特利法。该法的目的是在1936年的瓦格纳法通过以后建立集体谈判过程中的新的均势。瓦格纳法是美国主要的劳资关系法，除了航空系统和铁路系统适用"铁路劳工法"外，它适用于所有州际商业。瓦格纳法保证工人在组织工会和选择集体谈判代表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权；禁止雇主或工会采取某些不正当的劳工行动。由于瓦格纳法解除了对工会的许多限制，使它们得以在没有为资方和非工会会员提供足够的保护的情况下自由发展。政府对瓦格纳法的修订而形成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政府在劳资争议中的作用是保护公众的利益，既不袒护劳方也不袒护资方。为此，该法改组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建立了联邦仲裁与调节局。该法还开列了劳方和资方所采取的可能是针对对方或针对非工会会员的种种不公平的劳工行为，对于确定工会的代表权以及在集体谈判过程中的程序做了详尽而广泛的规定。该法规定，法院必须复审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诉讼，就劳工组织提出的诉讼或控告劳工组织的诉讼也作了规定。1959年，兰德勒姆一格里芬法即劳资管理报告和揭露法对1947年劳资关系法进行了修正。

劳动管理经济（Labour—Managed Economies） 劳动管理是指企业由参加工作的人们自己管理。有些人认为，实行劳动管理的企业和经济与资方管理和国家管理的企业和经济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劳动管理的组织形式和自我管理程度大不一样。最古老的劳动管理企业是生产者的合作企业。这种形式的企业在中世纪就曾经有过。现代的非宗教色彩的劳动管理经济是以色列的集体农场。19世纪欧洲出现的公社化运动也是劳动管理经济的形式。目前在发达国家的小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乡村公社也属于劳动管理经济。二战后，各种各样的劳动管理经济大量出现。南斯拉夫是第一个整个国民经济由工人自治管理的国家。劳动管理经济的组织形式有三种：(1) 合伙制。参加者既是合作社的缔造者，也是管理者，他们之间权利平等。他们可以雇佣工人，当然受雇佣的工人没有所有权和管理权，在西方社会中，法律以及医疗性公司属于这一类。(2) 完全合作制。企业所有的人都是所有者，每一个人在企业管理中有平等的一票权。(3) 工人自治企业。资本由社会所有，即属于社会每一个人。所有的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并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组织是建立在专业权威与政治权威两个基础上的。政策由所有的人来制定，或者由工人的代表机构—工人议会来制定。一旦政策已经决定，技术人员就共同作出技术方面的决策。这种组织是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建立的。最民主与最有效的结合。(1) 与 (2) 基本上属集体所有制，第 (3) 种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在劳动管理经济中，工人的参与程度以及效率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劳动力成本指数（Index of Labor Costs） 韦伯工业区位理论中用来分析工业的技术性质对工业区位决定影响因素的一种方法。其具体内容是指每个单位重量产品的平均工资成本。如果这一指数大，表示单位重量的产品中工资成本高，则该种产品的生产就越

容易被工资低廉地区所吸引。反之，如果这一指数小，表示单位重量产品中的工资成本低，则该种产品的生产就越不容易被工资低廉地区所吸引。

劳动力系数（Labor Coefficient）　指伯工业区位理论中的一种分析方法。韦伯为了分析工业区位决定过程中，究竟是以工资成本来决定区位还是以运输成本来决定区位，提出应考虑工业自身的技术性质因素的影响。而工业技术性质包括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是该种工业生产所需运输的原料和成品的总重量；其二是每个单位产品的平均工资成本，即劳动力成本指数。所谓劳动力系数就是指劳动力成本指数与所需运输的总重量之比。一般来说，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劳动力系数越大，工业越容易被工资低廉地区所吸引。也就是说劳动力系数越大，将厂址迁至工资较低廉的地区越有利；反之劳动力系数越小，将厂址迁至工资较低的地区就不一定有利。韦伯还认为，假定在运输成本最低地区和工资成本最低地区之外，还有另一个地区，那里的运输成本虽不是最低的，但属于比较低的；那里的工资成本虽不是最低的，但属于比较低的。这样，这个新地区的总成本有可能是最低的，因为它兼有运输成本较低和工资成本较低的综合利益。所以用"劳动力系数"这个综合指标来决定工业区位，符合于实际情况，因为它综合反映了运输条件和工资条件。

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atics）　美国劳工部的一个局，是联邦政府进行劳工经济调查的主要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如下问题提供统计资料和分析：就业、失业、人力、生产率与技术的发展、工资、劳资关系、工伤事故、价格动向、生活费用与生活水平、外国工人状况和经济增长等。资料来源是工人、实业家和其他政府机构，这些个人和机构提供资料完全是出于自愿，因为他们关心而且需要这方面的分析和结论。因此，该局的研究计划也是为了满足这些个人和机构以及国会、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劳工部的需要。其研究工作侧重于实现劳工部的如下目标：增加工资劳动者的福利，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以及增加有利可图的就业机会。劳工统计局局长由总统任命非政界人士担任。该局还实施一项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统计人员和其他劳工官员进行训练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由国务院通过国际开发署发起的。该局通过实地调查等方法收集到的资料一律以专门公报和报告的形式发表在若干种期刊和新闻稿上。

劳动无限供给假定（Hypothesis for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假定。这一假定是刘易斯建立其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的重要前提条件。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两个主要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且农业生产率低下，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零，甚至是负数。即使减少这部分剩余劳动力，也不会减少农业总产品，甚至会增加农业总产品。这种情况被称之为隐蔽失业。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极低，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劳动力无限供给假定是指现代工业部门发展中，可以在一个现行的固定工资水平上得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根据刘易斯的解释，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过剩，而且农业劳动力只能维持最低限度工资，这就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从农村吸收劳动力不需要付给很高的工资，只要工业工资略高于农业工资，就足以吸引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充分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如果提高工业工资水平，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就会超过工业需要，从而迫使工业工资下降。刘易斯认为，工业工资必须适当高于农村工资，才可能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是因为城市生产费用会比农村高，工资必须弥补这一维持生存的费用；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应有一部分工资弥补这种心理成本；还应有一部分额外的增加收入作为对农村劳动力转入工业的刺激。刘易斯估计，工业工资大体应高于农村工资30%左右。当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非熟练劳动力，而工业需要的是熟练劳动力并非"无限供给"。但劳动无限供给假定对此并不做过多讨论，是因为它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在劳动剩余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适量的资本，就可以通过培训和教育培养出充足的熟练劳动力。根据劳动无限供给假定，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部门可以在固定工资水平上不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但一旦所有的剩余劳动被吸引尽，农业生产率会因劳动减少而逐步提高，农民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工业部门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以同农业竞争劳动力，这时，劳动供给就不再是无限的了。经济发展就走出了初期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　劳动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门分科，主要研究同劳动和劳动市场有关的经济问题，以及就业不稳定和制度发展等问题。随着工业化和机械化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变化，劳动关系问题已成为典型的工业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因而，劳动经济学尤为重视研究和说明人力资源的有效安排以及劳动者中收入分配这样的重大

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个与许多成熟社会有很大关系的问题，即社会对于货币收入的水平和分配可能施加的控制问题。近25年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制度，尤其是工会、集体谈判过程、政府作用等问题。这种制度学派的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的或预测的。较多的是从法律、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大量地吸收材料，而实际上很少依据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比如很少见到对劳动力的供求分析。今天，在劳动经济学中，这种主要是描述性的制度分析仍有一定地位，但其作用和影响正在下降。劳动经济学已经比较完整地被归入了经济分析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基本工具已被用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行为与结果。在总体上看，劳动经济学目前有以下几种分析的方法：第一，最大化行为和市场分析。最大化行为的经济理论研究个人和企业如何用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去分配时间和金钱，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个人被假设在工资、价格和其他收入有限的条件下，选择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商品及服务。市场经济理论用表示各类工人或各组企业对经济刺激所作反应的供求曲线来分析工资和就业数量的决定。第二，宏观经济分析。主要研究失业、货币工资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变动趋势有关的广泛的经济总量问题。它集中分析整个经济体系中各个主要市场之间的联系，如货币市场、投资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宏观经济学已经广泛地研究了总失业的决定因素，并寻求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第三，劳资关系的制度分析。主要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它主要对工人（通常指加入工会的工人）、雇主协会和政府机构的集体行为，以及对工作规则和解决争议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劳动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这既因为它所考虑的课题极为重要，又因为它所处理的理论问题极为复杂。因此，劳动经济学在基本概念、体系结构和分析方法上也许比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更需关注。但也须看到，劳动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或核心理论已有了很大发展。它不但被迅速地修订和补充，而且也正在运用更成熟的方法改进数据来源，产生新经验结果，新的发现不断出现并为经济学家所重视。

劳动指向（Labor Orientierung） 区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根据劳动力成本来决定的区位趋向。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韦伯提出的。按照韦伯的分析，决定工业区位的因素除了运输成本外，还有劳动力成本或工资成本的因素。并且认为劳动力成本是导致运输成本所确定的工业区位发生第一次变形的因素。也就是说，假定一个工厂，从运输成本的角度出发，选择某一区位作为理想的设厂地址以后，却发现别处的工资较低，那么应不应该重新选择，迁移厂址呢？韦伯认为作为区位因素的劳动力成本，可以用单位产品的工资来表示，即工资率。工资率的差异既可以由劳动的效率引起，也可以由生产的组织引起。前者是属于主观方面的原因，它同地理差异有关，后者则是属于客观因素，它与地理差异无关。所以在分析中可以排除后者，而只考虑前者。韦伯同时又假定在一定的工资率之下，劳动力是充分供给的，这就排除了迁厂后因新区位中劳动力供给不足，工资率上升而引起的新问题。但迁厂后需要把节省的工资成本与增加的运输成本进行对比。从纯理论的角度可以认为，与旧址即根据运输成本所确定的地区相比，如果迁到新址即工资率较低的地区，每吨成品所增加的运输成本大于所节省的工资成本，则不应该把厂址迁至工资较低地区；反之，如果每吨成品所增加的运输成本小于所节省的工资成本，则应当迁移。为此，韦伯使用了等差费用曲线的方法，研究了劳动力成本差别与运输成本差别之间的替代关系。韦伯进一步指出，究竟一种工业应当以工资成本来决定工业区位，还是以运输成本来决定区位，仅有纯理论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考虑工业的自身性质和工厂所处的社会环境。工业的性质主要包括两个因素：(1) 该种工业生产所需运输的原料和成品的总重量。如果生产中所需运输的原料和成品的总重量越大，则越不容易被工资低廉地区所吸引；反之亦然。(2) 劳工成本指数即每个单位重量产品的平均工资成本。如果这一指数大，表示单位重量的产品中工资成本高，则该种产品的生产就越容易被工资低廉地区所吸引。反之，如果这一指数小，表示单位重量的产品中工资成本低，则该种产品的生产就越不容易被工资低廉地区所吸引。工厂所处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3个因素：(1) 根据运输成本这一单项因素所决定的区位与根据工资成本这一单项因素所决定的区位相距的远近。如果相隔的距离较近，工业区位迁移的机会较多；如果相隔的距离较远，则迁移的机会较少。(2) 运费率。如果运费率是下降的，工资成本的影响将增大；反之，如果运费率是上升的，运输成本的影响将增大。(3) 人口密度。如果人口稀疏，各地工人劳动生产率的相差不会很大，工资率的相差也不会很大，因此，工资成本对区位迁移的影响较小；反之，如果人口稠密，各地工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差距增大，工资成本对区位迁移的影响也会增大。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在考虑工资成本对区位迁移的影响时，更多地考虑了工厂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因素，如不同区域的工会势力差异，不同企业的企业制度，以及不同

区域的政府税收政策和聚集经济差异等。但其基本框架依然是继承了韦伯的思想。

劳资协议（Labor Agreement）　雇主同工人或者工人代表之间签订的用以阐明雇佣条件的书面合同。工人如果单独与其雇主打交道，就处于比较软弱的地位，雇工们为了使自己也能处于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常结成一些强有力的工会，通过工会代表去同雇主谈判达成协议，协议经工人同意后，便签字生效。协议都规定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如果劳资双方达不成协议，工人便会运用他们的主要武器——罢工，迫使雇主同意工会的条件。

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Labor—Management Policy）　美国的一个委员会，其目的是提出各种政策建议，以"促进自由和负责的集体谈判、劳资和平、工资与物价政策的合理性以及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该委员会是根据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2月16日的行政命令创立的，由21名委员组成，其中7名代表资方，7名代表劳方，还有7名（包括两名内阁成员）代表公众。在委员会会议上，工会领袖和雇主可以讨论他们的各种问题，讨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而不致产生谈判桌上的那种激烈争吵。它研究各种一般性的问题，而避免卷入具体的劳资谈判。该委员会成立以来，已经发表了许多有关失业和自动化问题的报告。

劳联——产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Congress of Zndustrial Organization）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在1955年以前一直是两个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是1881年在匹兹堡由6个著名的技艺工会发起的，当时名为：美国及加拿大职业和劳工协会组织的联合会。1886年它以较简短的名称——美国劳工联合会而获得承认。1881年负责发起这一组织的技艺工会的成分是印刷工人、钢铁工人、制模工人、木工和玻璃工。制烟工会的赛缪尔·甘博斯和阿道夫·斯特拉瑟尔是这一联合会的首要组织者和早期领导人。前者从1886年至1924年一直是劳联主席。当时，大多数欧洲劳工运动转向社会主义方向，劳联却奉行经济工联主义，代表了美国劳工组织发展的主流。劳联初期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建立了一套牢固的组织结构。在这套结构中，地方工会附属于全国工会，全国工会附属于联合会。第二、会员交纳较高的会费，用以维持财政上强有力的工会主义。第三，强调技术工人的联合，排斥异杂的劳工种类，推行所谓技艺工会主义。第四，坚持单一代表制原则。即在劳资关系体系中，一个工人或其他谈判单位的雇员选举单一的工会代表他们。第五，接受乌托邦式的劳工骑士团失败的教训，强调经济活动，赞成无党派政治，反对直接的（第三党的）政治活动。赛缪尔·甘博斯认为工会应避免成为一个工人党派，它应该"奖励他们的朋友，惩罚他们的敌人"，而不论其所属的党派如何。第六，接受自由企业制度。对工资的要求是激进的，但对私人企业的经济制度态度却是保守的，决心在现行制度的框架下工作，以便改善劳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些原则，如经济工联主义、单一代表制原则、无党派政治、承认自由企业制度等。劳联一直奉行至今。而有些原则却在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劳联逐步抛弃了技艺工会主义，并由于政府在劳资关系中不再一味偏袒资方，劳联开始更多地参与政治领域谈判，对政府立法和党派竞选施加影响。劳联开始一直强调技艺工会主义。随着工业机械化的发展，技术工人在工业中的显要地位逐渐下降；相反，半技术工人的地位日益提高。从19世纪末开始在劳联内部就蕴酿着产业工会主义对技艺工会主义的斗争。1935年，由约翰·L·路易斯和他的矿工协会发起在劳联内部成立了产业组织委员会，得到其他几个产业工会的赞成。劳联领导人谴责这些产业组织犯了双重工会主义错误，于1936年把它们开除出劳联。同年，这些被开除的产业工会组成了一个对抗性的联合会，即以约翰·L·路易斯为主要领导人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他们决定按产业原则组织工人的团体。

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成立了劳联——产联。但这一合并未彻底解决技艺工会主义同产业工会主义之间的分歧。劳联——产联是各个独立工会的联盟，由120个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工会以及大约18%的直属地方工会组成，会员总数达1360万。它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个下属全国工会按其交费会员比例向大会派出代表，大会期间讨论通过劳联——产联制定的法规和政策，同时选出2名执行官员，1名主席和1名司库，由两名执行官员和27名副主席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贯彻大会确定的政策，并解决大会期间出现的一切事宜。执行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3次全会。总理事会是劳联——产联的另一个行政机构，它由执行委员会成员、各下属全国工会的主要官员及每个职业和产业部门的官员组成。总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大会，商讨由执行官员提出的重大政策问题。劳联——产联下属有6个职业部门：建筑部、金属业部、海运职员部、铁路职员部、工会标签部和产业工会部。产业工会部是产联的继续，其职能和活动与以前的产联相似。除此之外，劳联——产联还包括50个州一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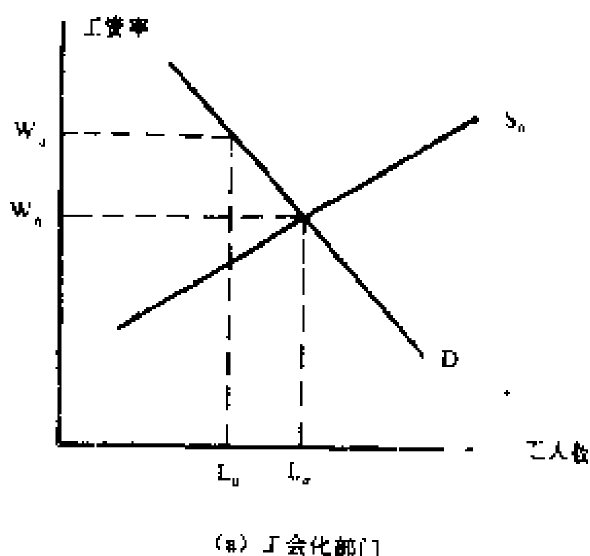
的中心机构和750多个地方一级的中心机构。

美国是个劳资关系分散的国家，地方一级的工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劳资协议大都是由单个工厂、企业或地区雇员与其雇主单独签定的。劳联——产联作为工会联盟，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许多全国性工会联合会，它不负有直接从事集体谈判、达成劳资协议的职能，也不为集体谈判制定目标。其主要职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劳工组织更加团结，更有威望是劳联——产联的基本职能。联合会有责任协助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防止或解决对立的下属组织之间的权益争执。第二，代表劳工组织，积极参与政治、立法活动。在竞选活动中，劳联——产联捐赠党派竞选基金，通过下属的政治教育委员会指导会员投票，用以支持劳工组织的"朋友"人选。劳联——产联及下属工会的代表经常在讨论与劳工利益有关的法案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向国会申诉工人运动的立场，设法说服议员们支持劳工组织的观点。对于重要法案则可能花费大量的款项以期获得全国的支持，力争在州和联邦级别上通过有利于劳工的劳动立法。第三，代表整个工人运动向国会和政府提出有关全国经济情况的分析报告。第四，为工会收集和汇编一般的经济资料，起情报交换作用。第五，对于全国和各州的工人运动来说，劳联——产联具有政治机构和立法机构的作用。但其下属工会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制订与联合会平行或补充的行动计划。为整顿下属工会，避免政府剧烈干涉，劳联——产联还制定了伦理行为法，所属工会均受此法约束，曾有三个工会由于违反了该组织的道德标准而被开除，如1957年开除的卡车司机工会和纺织工人联合会。第六，在全国和国际场合，劳联——产联是大多数有组织的劳工的正式发言人，它力图通过新闻媒介搞好公众关系，其主要出版物有《劳联——产联新闻》周刊以及《美国联合主义者》月刊，后者经常刊登关于经济、集体谈判和教育等方面的报告。除以上职能外，劳联——产联还拥有多个常设委员会，用以监督和指导劳联——产联的各种具体活动，这些委员会包括：公民权利、社会服务、政治教育、经济政策、教育、伦理行为、住房、国际事务、立法、公众关系、调查研究、安全与职业健康、社会保障以及退休事务等。正如劳联——产联章程指出的，它的目的是一般地促进工人的利益，为国家的最大利益服务。

劳埃德，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rster Lloyd，1795—1852） 英国经济学家。1818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曾被聘为该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劳埃德是第一个明确用边际效用来阐释价值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价值可以恰当地定义为对所占有物品的估价"，即归结为人对效用的主观估价，由于物品本身的效用并未发生变动，可人的估价会变，故须将价值与效用加以区分。他进一步指出，某人拥有许多某种商品（如上衣）时，若再给他增加一单位，尽管该增加的商品有绝对效用，但就特殊效用而言对该人已无用处。这样，他就分析了效用递减现象，并把价值同特殊效用（即边际效用）联系了起来，从而为明确阐述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学说铺平了道路。可见，他是边际效用论当之无愧的先驱者。然而，直到本世纪初有人重新发现了劳埃德的有关著述后，其学术地位才逐渐得到公正的评价。

严重失业地区（Substantial-Unemployment Area） 根据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分类，严重失业地区的失业率通常要占该地区劳动力总额的6%以上。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等级，是由就业保障局根据所属的州一级的就业保障局提供的情报指定的，州一级的就业保障局又是根据地方政府职业介绍所提供的情报整理出来的。失业率的高低并不是劳动力市场分类的唯一标准，还要根据雇主对未来劳动力需要与发展所作的估计，考虑各地区的就业前景。凡是按照就业保障局的分类属于"D类"（失业率为6—8.9%以上）的地区，"E类"（9—11.9%）和"F类"（12%以上）的地区，都被认为是严重失业或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地区，凡是处于这个地区内的企业，均具有向政府的采购定货合同优先投标的权利，从而提高该地区的就业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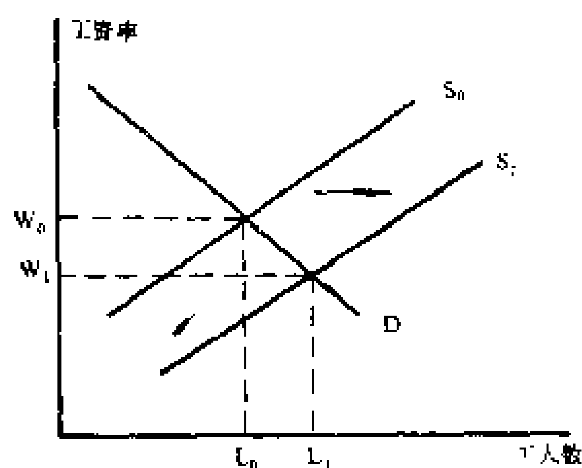
伴随效应 工会化可能影响到非工会工人工资的一种效应，指工会化部门提高工资可能会压低非工会部门的工资。图（a）代表工会化部门，图（b）代表非工会部门。用作比较的工人除了工会化这点外是



(a) 工会化部门

完全相同的，在没有工会效应时二者有着同一均衡工资（W_0）。假设工人有充分的工作流动性以便消除任何不均衡工资差别。初始工资均为 W_0（没有工

会)。当工会出现后，工会部门工资上升到 Wu，就业降至 Lu。现在工会部门提供的就业减少。有些未能成功找到工作的工人转向非工会部门寻找工作，使非工会部门的供给曲线外移至 S_1，均衡工资降至 W_1。这时以百分比表示的工会与非工会工资差别将是 $(Wu-W_1)/W_1$，而工会对自己会员工资的实际影响却没有那么大，仅仅只是 $(Wu-Wo)/Wo$。



(b) 非工会化部门

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　周期长度为15—20年的一种长期经济周期波动，由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在1930年出版的《生产和价格中的长期运动》一书中所提出，故名。库兹涅茨广泛研究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历史经济统计资料，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存在着一种长期波动。这种产量的波动上升或下降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1.6年，因此，一个周期为22年左右，价格的波动上升或下降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1.7年，因此一个周期为23年左右。这样，产量和价格长期波动的持续时间约20年左右一个周期。他确定了一战前，顶峰为1873年、1892年和1913年，谷底为1878年和1896年。他除了研究建筑业的波动情况外还分析了产量变动、资本形成、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因素。他根据对统计资料的研究得出，长期变动是一种持续的、不可逆转的变动，是一种长期变化趋势，周期性变动正是围绕这一趋势发生的。这种长期波动是增长率的周期性变动，而不是经济活动绝对水平的扩张或收缩。他还进一步根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资料分析了1866—1925年53种产品产量和价格变动之前的关系，证明了这两种变动的相关关系大体上是价格的变动领先于产量的变动，由此推断出价格变动是产量变动的原因。具体来说，在价格上升时，货币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的增加落后于价格上升，这就使生产总成本的上升落后于价格的上升，从而提高了利润率，刺激了生产，促成了繁荣。而在价格下降时，货币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的减少也落后于价格下降，这就使生产总成本的下降落后于价格的下降，从而降低了利润率，抑制了生产，导致了萧条。其中建筑业的波动又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到其他经济活动的波动。他还用货币供给量，尤其是黄金产量的变动来解释价格的变动。美国经济学家P·欧拉瑞(P·OLeary)和A·刘易斯(A·Lewis)肯定了这种周期的存在，并将这种周期命名为"库兹涅茨周期"。他们认为，在美国、德国和法国，一战前存在三个这样的周期，而战后英国有第四个这种周期。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对这种经济周期的研究，不仅从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中证实了这种周期的存在，而且从广泛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周期的原因。

库兹涅茨，西蒙（Simon Kuznets，1901—　）

美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经济统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出生于俄国的乌克兰，1922年移居美国，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他老师米契尔领导的全国经济研究所工作，1930—1954年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54—1960年被聘为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1960—1971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还担任过美国战时的统计局官员和旧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库兹涅茨是个高产的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1930年)、《国民收入及其构成》(1941年)、《现代经济增长》(1966年)和《各国的经济增长》(1971年)等。

库兹涅茨继承和发展了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米契尔的理论和方法，注重经验归纳对经济学研究的作用，强调经济统计的重要性，主张经济学应经由缜密的数学分析而成为一门可以具体计量的科学。由于库兹涅茨等人始终坚持对历史统计资料加以整理分析，善于比较和计量各种经济现象的变化及其相互联系，逐渐在米契尔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史称经济统计学派。

库兹涅茨曾从事过多个领域的经济研究，并都取得杰出的成绩或形成独立的见解。在经济周期方面，他考察了不少国家的多个经济变量的时间数列，用人口增长率、铁路建筑业和住宅建筑业这三者的变动及其相互联系来加以说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存在的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二十年左右"，可以称为"长波"或"长期消长"。这种"库兹涅茨周期"在当时曾引起一些争议，但在二次大战后日益受到重视。

在国民收入核算领域，他解决了许多有关国民收入及其构成的性质、含义和衡量方法的理论问题和实

际操作问题，并建立起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基本框架。故有人赞誉他是 GNP 之父。他还发现了人均国民收入与用基尼系数量度的收入分配不均程度之间存在着反 U 关系，即：在贫穷国家，分配不均程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富裕国家，不均程度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由此出发，他进一步错误地宣称，美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出现了他称之为“收入革命”的收入平均化趋势。他又对 GNP 的估算方法作了批评，认为它不能停留在社会帐目的实际演算上，还应力图反映社会福利的变化。应该说，库兹涅茨的最大影响就在国民收入核算领域。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他视野宽广地描述和分析了 100 多年来各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和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动及其相互联系，还就经济增长的因素和途径阐述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其中突出的论点有：科学技术进步是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人均产值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源投入量在质量上的改善，而资源数量增加所带来的产值增加部分则越来越小；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趋于上升，第三产业趋于不稳定地上升，同时，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趋于上升，而财产收入的比重趋于下降；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制度与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的缺陷等。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是其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总之，他的不少研究成果包括比较符合实际的见地，推动着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作出了显著的学术贡献。

库尔诺理论（Cournot Theory）库尔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 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数理经济学的奠基者。其代表作是 1838 年出版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该书第一次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对厂商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推理论证了在垄断、双头垄断、寡头垄断以及无限竞争（即完全竞争）等市场条件下实现最大利润的价格决定问题，并给出数学解答。指出在垄断市场上使边际产量等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水平就是获最大利润的价格；在双头垄断市场上，其均衡价格低于垄断市场均衡价格，其均衡产量高于垄断市场的均衡产量。随着销售者个数的增加，均衡价格水平随之降低，均衡产量则随之增加。直至达到完全竞争状态为止。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库尔诺关于纯粹寡头垄断价格决定的理论。纯粹寡头垄断指某一行业中销售者为数甚少，它们的产品品质相同的市场情况。由于产品的同质性，对购买者而言各厂商的产品是无差别的，众多的购买者相互竞争导致统一的市场价格，各厂商面临一条共同的市场需求曲线。任何厂商产量的变动都将影响产品市场供给量和市场价格，从而影响其他厂商的利润。如该市场上只有两家厂商，它们面临的共同市场需求曲线为：

$$p=F(q_1+q_2)$$

式中，p 为产品的市场价格，q_i 为第 i 家厂商产量，i＝1,2。它们的利润等式为：

$$\pi i=p\cdot q_i-C_i(q_i)$$
$$=F(q_1+q_2)\cdot q_i-C_i(q_i)\quad i=1,\ 2$$

式中，π_i、c_i（q_i）分别为第 i 家厂商的利润、成本函数，i＝1、2。同质寡头垄断者均衡指某一厂商在对其他厂商行为作一定假设的条件下确定产品产量水平，以达到利润的极大化。对其它厂商行为的不同假设，将导致不同的解答。库尔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每个寡头垄断者认为对手的产量水平不受自己产量决策的影响。第 i 家厂商在其竞争对手的产量不变的条件下决定其产量 q_i 使其 πi 极大化。由利润极大化一阶条件：

$$\frac{\partial\pi i}{\partial q_i}=\frac{\partial Ri}{\partial qi}-\frac{\partial Ci}{\partial qi}=0$$

$$i=1,\ 2$$

导出其反应函数：

$$q_i=\varphi_i(q_j)\quad i\neq j$$

式中 φ_i 为总收益。当已知竞争对手的产量时，由反应函数可求出其产量。库尔诺在寡头垄断理论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功绩卓著，成为所有寡头垄断理论的基础。

初级抵制（Primary Boycott） 一种由工会进行的直接对雇主施加压力迫使他接受条件的运动，雇员们有组织地拒绝购买和他们发生争议的雇主的产品，并力图劝阻顾客购买其产品，以达到妨碍雇主最终产品出售、限制雇主市场的目的。初级抵制在西方国家普遍被认作合法的工会活动。但它实际不是一个反对资方的有力武器，因为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本企业雇员购买的东西极为有限，当雇主是制造商时，初级抵制就更无能为力，因为产品是卖给批发商而不是消费者。

初级与二级劳动市场（Primary and Second Labour markets） 头等劳动市场与二等劳动市场是按等级而划分的劳动市场。对劳动市场按等级划分起因于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性。最初主要是以工作的特征来区别劳动市场的二元性，以此划分头等与二等劳动市场。头等工作的报酬，工作条件、工作的安全性、培训的机会，事业的前途等都比较高，而二等工作这些方面的待遇都比较低。两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受到

限制。穷苦劳动者被限制在二等工作中。工人也如同工作一样被分成两等。二等工人从事的都是一些无需什么技能的工作，他们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都较低。对劳动市场二元性的这种说明很快被多种解释所代替。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劳动市场的二元性。有的人从就业的稳定性探讨劳动市场的二元性；有的是从收入水平探讨劳动市场的二元性；有的人认为二元劳动市场的划分是局部的，有的则用二元性来划分所有的工作与所有工人。

劳动市场二元性的解释有两个来源。一是美国本世纪60年代所实行的试图强化个人的职业技术以便使城市内大量的居民找到稳定的、高收入工作这一人力政策的失败。解释这一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工作二元性特征而不是劳动的二元性特征。另一个起源于涉及到激进经济学家所认为劳工间政治上的不团结。劳工间政治分裂的关键在于二元劳动市场上工作经历的差别。

二元劳动市场的划分不同于传统的劳动理论。传统的劳动理论认为劳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是同质的、不存在差别。工人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就业。而按照二元劳动的市场理论，存在头等与二等劳动市场的区别，就业并不能仅仅通过工资率调节达到稳定，就业的不稳定是工人态度与工作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妇女与青年所从事的二等工作不应理解为他们根据自发的偏好选择的结果，而应理解为家庭与国家内的权力关系。劳工市场上二等劳动者较低的报酬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劳动质量低，边际生产力小，而是为为歧视性所致。劳工市场的歧视使得从事二等工作的人不能进入头等工作的劳动市场、劳动市场上工资的变动、人事的变动不能仅靠劳动市场的工资率来解释，而同时也应该由产品市场的特征、雇主的权力以及生产技术加以解释。

防止延迟支付下包企业垫金法 日本于1956年制定的一项反垄断措施。日本政府于1953年对反垄断法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明显放松了反垄断控制后，一些大企业利用其有利的市场地位和政府支持，采取拖延支付代垫资金等办法，不公正地对待为其配套的下包中小企业。于是，公正交易委员会根据反垄断法中控制“不当滥用优越地位”的条款，制定了防止迟付垫金法。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了发包企业不得延迟支付垫金等禁止行为，发包企业和下包企业的交易必须有书面契约，强化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和中小企业厅的调查监督权，使中小企业交易规范化，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抑制大企业的买方垄断力。同时由于合理地协调了经济关系，促进以下包制为基本特点的专业化生产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

纵向公平（Vertical Equity） 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原则。指对不同情况下的人都实现了公正。在税收方面，这一原则就要求按纳税能力支付税收，即税收负担应与收入水平相关。累进所得税就是这种原则的体现。这是因为高收入者的边际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要小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从而就要对高收入者的边际收入征收较高的税收。此外，免费教育也是纵向公平的体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收入与社会地位的人都能得到相同的教育。纵向公平是各种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的政策的基本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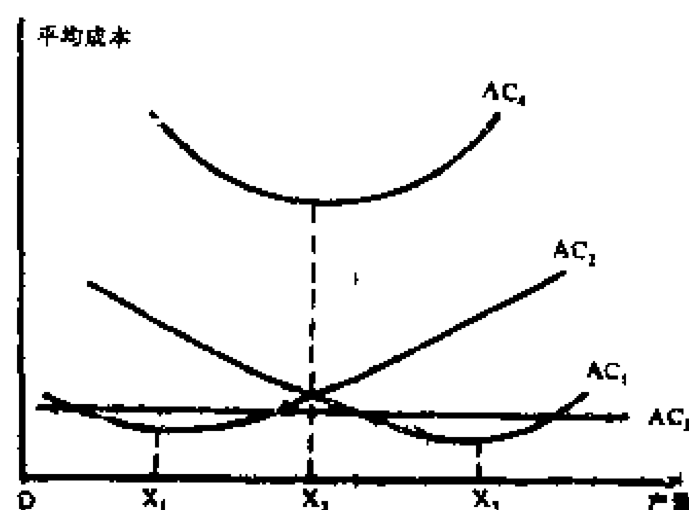
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纵向一体化有两方面的含义：1.指企业的现存状态，即指单个企业向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各阶段的延伸程度。2.指行为，即指企业通过垂直合并或建立新的生产或销售组织进入另一加工或销售阶段的行为。当纵向一体化沿供给方向发生时，即为后向一体化。当纵向一体化可获得销售、装配或精加工等便利时，即为前向一体化。

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的动因很多。例如，出于纳税原因，企业纵向一体化可以用内部交易代替需纳税的市场交易，以免缴部分销售税；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提高实行价格歧视的能力和筑高进入壁垒的能力；纵向一体化能够使企业达到保证投入要素的供给或产出品的市场，消除在生产和销售相继阶段上不必要的成本加成，排除替代产品的竞争等，从而增强企业的垄断力量。产业组织理论主要从市场机制失灵角度、技术的相互依赖性和不确定性角度、产业生命周期角度以及企业的垄断动机等方面分析纵向一体化的成因。

1.市场机制失灵观点。从市场机制失灵角度分析纵向一体化成因的理论是由科斯首创的。为了节省费用，减少不确定性，形成垄断等，都会促使企业间实行纵向合作。获得这种协作的方式，既可以是独立企业之间的协作，也可以是在单个企业控制之下的纵向一体化。上述两种纵向合作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运行状况。当市场交易成本很高时，企业就趋于抛弃以市场协作为特征的企业间纵向合作，追求可使交易内部化于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威廉森发展了科斯的研究。在市场交易成本导致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假设下，他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和纵向一体化的因素。他的研究侧重于人为因素，并把它与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他认为人类的某些基本品质可能十分重要，其中他特别指出了机会主

义，即伺机利用获利机会的倾向；有限理性，即不能处理大规模的决策问题。人的因素与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从而内部组织机制代替市场机制。具体来说，企业之间的纵向合作主要有签订长期合同和短期合同两种方式。长期合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加之人们的有限理性，难以确定未来的各种异常情况。签定一个包罗万象的合同，把所有意外事件都考虑进去是不可能的。因此长期合同必然是不完备的，只能为未来可能的讨价还价留有余地。短期合同优于长期合同之处，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充分利用有限理性，作出一系列决策。但是，短期合同难以满足稳定合作双方经营的要求。正因为这样，在减少不确定性和减少讨价还价的前提下，纵向一体化是可取的。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具有复杂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组织中，个人主义的、追求私利的行为得到控制；组织内部的争议通过命令可以轻易解决，因此避免了企业之间出现的那种代价昂贵的讨价还价；具有较强的合作意识，内部控制、决策机制比较有效。这就使得纵向一体化比市场协调更为有效。

2.技术的相互依存性和不确定性。(1) 技术的相互依存性。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相互依存性会促进纵向一体化。典型的例子是钢铁生产。炼钢生产包括几个阶段，即炼焦、熔结、制铁、制钢和初轧。这些生产过程相互衔接，尽可能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会降低处理和加热成本。(2) 不确定性。实行纵向一体化可以获得较确定的投入要素供给，或较确定的产品市场。根据传统理论，在不存在节省费用问题的竞争市场中，似乎没有必要实行纵向一体化，因为所有投入品和产出品都可以按市场决定的价格公开购买和销售。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竞争市场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而正是这个问题，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纵向一体化。阿罗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当前一生产阶段的企业和后一生产阶段的企业获得的信息不同时，纵向一体化可以改进这两个生产阶段的资源配置。在阿罗的分析中，后一生产阶段上的企业不能获得充分的有关原材料价格的信息，这限制了他们作出有效的有关生产中投入要素比例的决策。他认为前序产业中的原材料生产企业，比后序产业中的企业获得更多信息。后序企业显然愿意实行后向一体化，合并前续企业，以便更好预测原材料价格。卡尔顿提出了第二种可能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和竞争市场中的刚性，共同促进了纵向一体化。他的模型明确指出后续企业应该后向一体化，以保证受不确定性影响的投入要素的供给。假设后续企业生产的产出品是 X，用的投入要素是 A，这些投入要素最初由前续企业生产。由于市场对 X 的需求是不确定的，由此产生的对投入要素 A 的需求也不确定。这样，A 的生产企业最初要承担过量生产 A 的风险，因此 A 的价格高于单位生产成本，即 P>C，乍一看，后续企业对投入要素 A 的生产实行后向一体化，虽然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的生产成本 C 生产投入要素 A，但也要承担过量生产 A 的风险，所以不会有后向一体化动机。卡尔顿指出，至少对部分企业来说，后向一体化动机是存在的。因为 X 的生产企业在决定后向一体化时，是从边际角度，而不是从平均角度作出决策。特别是，企业最初考虑的是对应于一个单位产出的投入要素 A 的生产成本和预期费用节省，因为它把这种投入要素首先供给它的第一个产出品。由于生产至少一个产品 X 的概率很大，企业自己生产投入要素 A 供给第一个单位的产出品，几乎肯定会获益。同样，对一系列的产出品作出边际决策，直到预期节省的费用与供给最后一个单位的投入要素 A 的成本相等，后向一体化才暂停。这个模型的一个有趣特征是：后续企业自己生产投入要素 A 满足他们的"高概率"需求，而希望从其它独立企业购买额外的投入要素满足其"低概率"需求。



3.产业的生命周期。斯蒂格勒认为，一个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随这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而变化，新兴产业中存在大量的纵向一体化，随着产业增长纵向一体化趋于解体，而产业处于下降阶段时会重新出现纵向一体化。斯蒂格勒的观点集中在特定产业中存在成本——规模关系的差异上。假设，产业的产出品用两种中间投入要素 A 和 B 生产，投入一产出比例是固定的，每种生产要素的生产成本是独立的，并且投入要素 A 的生产具有大规模经济，而投入要素 B 的生产具有适中规模经济。如图所示，AC_1 和 AC_2 分别表示生产 A 和 B 的单位成本曲线，它们是产出 X 的函数。假设，企业在固定成本为 AC_3 的基础上用投入要素 A 和 B 生产 X。如果企业承担所有这三项活动，即如果企业是纵向一体化的，那么这些曲线的垂直加总 AC_4 是企业的单位成本。根据斯蒂格勒的理

论，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企业倾向于从事上述所有经济活动，而在中间阶段当市场很大时，企业趋于分解它的经济活动。这是因为，当市场规模足够大时，A的专业化生产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比纵向一体化有优势。B的生产也有可能实现专业化，但其倾向弱于A。斯蒂格勒指出，在一个产业的发展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市场规模可能很小，难以支撑A和B的独立生产，所以纵向一体化是合理的。

4.垄断动机。纵向一体化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垄断势力。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排挤。在一些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纵向一体化企业能把未纵向一体化的企业排挤出去。例如，假设一个纵向一体化企业在一种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前序阶段具有垄断力，这个企业便可提高前序阶段产品的价格，使未纵向一体化企业购买投入时支付高价。它还可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低最终产品的价格，这样，未纵向一体化企业就不得不高价购进投入，低价出售产出，从而被赶出市场。(2) 进入壁垒。纵向一体化可被用于筑高进入壁垒。如铝产品的生产者可以通过买尽一种或更多的生产铝的关键资源（如铝土矿），阻止潜在竞争对手进入该产业。(3) 价格歧视。纵向一体化可增强垄断企业实行价格歧视的能力。

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度量主要有下述尺度。(1) 附加价值与销售收入的比率。当纵向一体化程度越大、在连续的生产过程中企业所要完成的阶段越多，从而这一比率的值也就越大。反之则反是。(2) 存货与销售收入的比率。这一指标隐含地假定，一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阶段越多，即纵向一体化程度越大，这一企业的存货水平也就越高。(3) 某生产阶段企业对投入的购买量与该阶段所用投入总量之比。这一指标专门用于测量后向一体化的程度，企业在任何生产阶段上依赖市场为其提供投入的程度越小，即后向一体化程度越高，该比率的值越小。(4) 某生产阶段企业产出的转移量与该生产阶段产出总量之比。这一指标显示出企业在任一生产阶段上依赖市场来处理产出的程度。该比率越小，表示企业的前向一体化程度越大。

沃尔克·弗朗西斯·阿马萨（Francis Amasa Walker，1840—1897年）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商人和经济学教师家庭。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统计局局长和人口普查负责人。1872—1881年被聘为耶鲁大学教授。1881—1897年则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他还是美国经济协会第一任会长。其主要著作有：《工资问题》（1876年）、《货币》（1878年）和《政治经济学》（1883年）等。在南北战争结束到19世纪终结这段时期里，他是美国老一代经济学者中的主要人物，重视基本经济理论研究，致力于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而不再是实用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他在许多领域内作过研究工作，尤以纯理论研究的成绩而在经济学史上闻名。他发展了自己的分配理论，特别对庸俗的工资基金理论作了尖锐深入的著名批评，并试图用自己创立的剩余学说取而代之。他还十分强调并考察了利息与利润的区别，又指明了利润和地租在性质上的类似。他在统计方面做出不少成绩，曾担任过14年的美国统计协会会长。在货币问题上则忠实拥护货币数量说。在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盛行的环境里，沃尔克的态度却倾向于自由贸易。据说他在沟通新老两代经济学家的联系和引导新一代注重基本理论研究上，都发挥过显著的作用。

克拉克·J.B.（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学派的创始人。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工商业者家庭。1872年毕业于安默尔斯特大学，随后留学德国，成为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克尼斯的学生。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制度学派创始人托斯丹·本·凡勃仑就曾受教于他。他还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一度担任其会长（1893—1895）。自1895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近30年之久。

克拉克是美国理论学派的开创者。19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只局限于论述和研究具体经济问题；而对基本理论的探讨甚为忽略。早期的克拉克也表现出历史学派的若干特征和观点。但他后来率先重视价值论和分配论等基本理论的研究，又接受和发挥边际效用分析，成为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和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克拉克的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哲学》（1886年）、《财富的分配》（1899年）和《经济理论要义》（1907年），另外还出版过五部论述竞争、垄断以及社会公平的著作和发表过二百余篇论文。其中《财富的分配》是他的代表作

克拉克经济学说的中心内容是阐述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他承袭萨伊关于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庸俗思想，同时又把报酬递减律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到一切产业部门，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各自决定工资和利息的分配理论。这种理论抹煞阶级剥削，明显地为资本主义辩护。同时他最先明确区分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此外，他所创立的社会效用

论，试图修正和补充奥国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当时也为不少著名美国学者所信奉。

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　克拉克反对传统的经济学"三分法"或"四分法"，而把经济学划成三个自然分部加以论述。第一分部包括财富的一般现象，第二分部是静态的社会经济，第三分部涉及动态的社会经济。按他的说法，第一分部实际上是没有商品交换的原始经济，起作用的是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经济规律，并不须依赖经济组织。后面两个分部则是存在交换的社会经济，反映着人与人的关系。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假设的"静态"社会，另一个是现实的动态社会。必须看到，一般经济规律在三个分部都起作用，而"静态"社会的经济规律又适用于现实经济生活，是动态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因此，只有研究和把握静态经济学，才谈得上分析现实的经济社会。

按照克拉克的定义，"静态"是指一个社会虽有生命但无生长和变化的状态。具体地说，在静态社会中，人口、资本、生产方法、产业组织形式和消费者欲望这五种状况都不会变动。以人口为例，若一个社会不断有新婴诞生和有人衰老病死，这便是活生生的社会；而只要该社会每时每刻的人口总数不变，就表明没有生长和变动。这就是静态社会。静态经济学的任务，就只在于发现任一时期中这样的社会自然状态。

但是，经济社会总在不断生长，上述五大因素的变动还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都表现出动态经济的特征。因此，经济学的下一步工作应当研究动态经济规律，以使理论符合实际。克拉克认为，动态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确定动态变化的两个影响：社会在任一时间的实际状态与它在那一时间的静态不同；社会在一个时间的静态与它在另一个时间的静态不同。他本人为此还作过一些阐发。不过他的动态学实际上只是研究一些经济因素或条件变化时，一种均衡状态怎样向另一种均衡状态过渡。显然，这仅仅是现在称为的比较静态学，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动态经济学。

边际生产力论——工资论和利息论　克拉克学说的中心是阐述静态模式下的分配问题。在他看来，地租只是利息的一种特殊形式，企业家管理和组织生产活动所得的"薪金"又归入工资范畴，而利润则来自暂时的技术进步，具有动态的性质，因而不存在于静态社会中。这样，工资论和利息论就成为其静态分配理论的全部内容。换言之，只有劳动和资本是静态经济中的基本生产要素。

克拉克是用边际生产力论来说明工资和利息的来源和标准的。按他的说法，在静态经济中，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分别增加都会提高生产物的总量，但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生产物增量的比例是递减的。此即所谓"生产率递减律"。这样，若资本量不变而继续增加劳动，则每一追加的劳动单位的生产率就会递减。同样，若劳动量不变而继续增加资本，则每一追加的资本单位的生产率就会递减。最后追加的劳动单位（即边际工人）的生产率称为"劳动边际生产力"，它决定着边际工人和所有同等条件工人的工资。最后追加的资本单位（即边际资本）的生产率叫做"资本边际生产力"，它决定着边际资本和所有资本的利息。可见，在共同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本分别由"劳动生产率递减律"和"资本生产率递减律"所支配，并各自根据其自身的边际生产力获取其相应的报酬份额。克拉克由此得出结论：这两大要素的收入各有其源，公平合理，因而不存在剥削他人的问题。很清楚，边际生产力论实际上旨在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一个公平、合理、和谐的理想制度。

社会效用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出现后，由于边际效用作为主观评价有个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异的问题，无法对商品的价值决定给出统一的共同标准，因而经常遭到指责。为此，克拉克提出了所谓的社会效用论。他强调：消费品的边际单位即决定价值的单位难以包括整体商品；大多数商品都有多种用途，应看成是各种效用的结合，即一个具体物品实际上是"效用束"：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其中只有一个效用是其消费品边际单位的一部分，其他效用则在边际之内，即对该消费品的价值决定没有影响。据此，他主张最后（边际）效用原则要能说明实际市场上的商品价值，必须将该原则分别应用到商品的各个效用或各个服务能力上面。

具体地说，一件商品作为"效用束"就好似一捆商品，它从整体来说不可能成为某一个消费者的财富的边际单位。但就这捆商品的每一个因素而言，总会是社会上某个等级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从而由他们来估定该效用的价值。然后将该捆商品的各个效用的价值加总，便可求出该件商品的价值。他明确指出，价值是一个社会现象。商品确实是按其边际效用出售的，不过这是指对社会的边际效用。换言之，在整个社会里，一件商品的每个效用对社会某一部分来说，都是边际效用，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不可能都是边际效用。这样，按社会的边际效用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的思想，在克拉克的倡导和宣扬下，当时成了美国经济学界中的流行价值理论。这种理论是对边际效用论的一种修正和补充，但究其实质，依然未能摆脱价值决定依赖于主观心理的窠臼，因而也就无法真正克服边际效用论的理论缺陷。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

禁止商务经营中不公平竞争方式的联邦法律。这项法律于 1914 年通过，修正并加强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克莱顿法所着眼的是设法防止垄断力量的积聚而不是解散已经形成的垄断集团。它的主要目标是：把导致削弱竞争或者建立垄断的不正当做法，例如价格歧视、排它性或限制性交易的契约、公司之间相互持有股票以及兼任理事等，宣布为非法，来防止企业变成垄断企业。这项法律基本上是试图防止大公司能借以消灭其弱小对手的那种残酷竞争。该法规定："在价格歧视的影响可能严重地削弱竞争或在任何商务行业中倾向于形成垄断的地方，在商品的不同买主之间实行价格歧视……"是非法的。但克莱顿法允许真正是为了对付竞争而采取的价格歧视措施。这就造成了有关价格歧视条款法律解释上的困难。这项法律从谢尔曼法的条款中删除了劳工一项，指出人的劳动不是商品，因此不能把工会视为限制贸易的谋划者。

克纳普，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Georg Friedrich Knapp，1842－1926 年）　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早期出任莱比锡市统计局长，1867 年起先后在莱比锡和施特拉斯堡两所大学执教，直至 1919 年退休。克纳普最初研究统计学，继而又关注经济史，后来又对货币理论发生浓厚的兴趣，而使其闻名于世的还是《货币国定说》（1905 年）一书所宣扬的货币学说。他从所谓历史的法律的观点出发，认为货币不过是法律制度的创造物，即它的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完全是由国家赋予的，至于货币是否由有价值的材料所构成，则无关紧要。他进而指出，货币本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现象，若离开国家的法律，就无法了解货币的本质。他还把其他一切货币理论统称为金属主义，批评它们过分着重货币金属的币材价值而带来了货币流通量不足的困难。可以说，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说"是一种表述得最完整的典型的货币名目论。

克尼斯，卡尔（Karl Knies，1821－1898）　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生于德国马尔堡，早期因政治活动被迫流亡瑞士。1855 年起先后担任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教授达数十年之久，其间曾任巴登国会议员和教育局局长。他的主要著作是《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1853 年）。在历史学派诸学者中间，克尼斯对方法论的阐述最为系统完整，还提出了著名的"相对性原理"。按他的说法，经济学研究的是属于历史领域或人的感觉世界的种种现象，它们时时都在变动或发展之中，因而并无真正的规律性可循，规律性只存在于自然界。因此，"经济学的概括，仅仅是历史的说明和真理的逐步显现。……没有一个公式也没有一批这样的公式能够称作是终极性的。"换言之，它们只具有相对的暂时的性质。从上述思想出发，他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只是简单记述经济现象的科学，并把统计学和历史学中的归纳法视作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完全取消了作为理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李嘉图等价理论（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等价理论。即政府为筹集资金而采取的增税方法和发行债券方法并不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也不影响资本形成。其推论是这样的：假如每个人的税赋减少 100 美元，为了保持一定水平的财政支出，政府通过出售债券的办法来弥补税收的减少，每个人平均购买债券 100 美元。假定债券是一年到期利率为 5%，人口规模不变。第二年，政府为支出债券的本息，就必须在这一年里每人税赋提高 105 美元。家庭由于每人增加了 100 美元的储蓄，可以维持现在和未来的消费。这 100 美元的储蓄是以持有政府债券形式出现的。在第二年,政府提高了税赋，每人增加 105 美元，以便偿还债券本金。家庭由于债券本金和利息也可以支付税赋。这样，原来的消费路线可以维持不变。另外，既然原计划的消费路线是在税赋变动前由消费者作出的，由于所有相对价格都没有变动，因此消费者将维持其原计划。所以，家庭行为不会因为政府是采取税赋增加，还是出售债券的不同措施而有所改变。李嘉图的等价理论被后来经济学家所重视，很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验证这个理论。例如有的经济学家从消费函数的角度去验证。在消费函数中，两个决定因素是收入和财富。关键的是家庭所持有的政府债券是不是它的财富。如果是，消费函数不发生变化，李嘉图的理论就是正确的，如果不是，消费函数就要改变，李嘉图的理论是有问题的。目前，对这一理论的争论还是相当激烈。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The Ricardian Socialists）　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在英国出现的一批主张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因他们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来展开理论阐述的，故名。他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利润、利息和地租都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却被不劳动者无偿占有，但又错误地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看成是这种剥削的实质和根源。其中有些人在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上以及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性质及其对立的问题上，都比李嘉图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为了反对一切剥削，他们提出劳动者应有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尽管这个空想社会主义主张在理论上有明显的缺

陷，他们对如何加以实施又无统一的看法，但它在历史上确实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应该看到，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一批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主要代表有：《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的匿名作者、霍吉斯金、汤普逊、格雷和布雷等。

李嘉图学派（The Ricardian School） 19世纪2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因它的形成直接同维护李嘉图学说的努力相联系，故名。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由于李嘉图体系中存在着两个重大矛盾，成为反对者们推翻劳动价值论的主要理由，该学派主要围绕它们来进行辩护。在解决资本与劳动间的交换同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时，他们或者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剥削关系歪曲成普通商品买卖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把利润看成是交换不平等而"让渡"来的。在解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同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时，他们或者鼓吹积累劳动会继续创造价值，或者把动物和自然力的一切行为和作用都看成是能创造价值的"劳动"。这样，他们非但未能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重大矛盾，反而把它庸俗化，结果只是导致了李嘉图学派自身的解体。

李夫曼·罗伯特（Robert Liefmann，1874—1941年） 德国经济学家。出生于德国汉堡。曾就读于弗赖堡、柏林等大学，1896年起在多所大学任教。20世纪初，李夫曼主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提供过不少关于垄断资本的有价值的材料。但在经济学史上值得一提的，是其《国民经济学原理》（1924年）一书所体现的纯粹主观主义的理论体系。在李夫曼看来，一国的全部经济现象都可在价格形式中表现出来，因而价值概念及其有关理论毫无必要。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取消论"。他的价格论建立在纯粹心理的基础上，试图运用所谓边际收益均等法则来说明价格的形成。在这里，收益是指效用（即个人欲望的满足程度）与费用（即为满足欲望所花费的心理代价）的差额，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判断；而该规律是指，人们在其各种欲望上的最后收益彼此相等时，才能获得最大的欲望满足。他由此分别分析了消费经济和交换经济中的价格决定问题。总的说，李夫曼的价格论依然不脱奥国学派的窠臼，却又更彻底地诉诸纯粹心理评判，因而被人称作"纯粹主观的价格论"。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List，1789—1864年） 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创始人。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符腾堡的雷特林根一个制革匠家庭，就学于图宾根。1817年曾被聘为图宾根大学教授，还曾当选符腾堡议会议员。由于他积极主张实行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屡遭封建势力的迫害，1825年被迫移居美国。在美国期间，他创办一德文报纸并不断发表文章，极力宣扬保护主义贸易理论。1832年作为美国驻莱比锡领事回到德国，参加了1834年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活动。在最后10年里，他完成和出版了数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为他赢得了国际声望。最后因久病厌世而自杀身亡。

李斯特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其他重要经济著作有《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年）、《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年）、《德国政治经济的民族统一》（1846年）。

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从民族利益出发，主要探究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和繁荣富强，旨在为德国加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服务。为此，他指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推行"世界主义"，只关注适用于全世界的"普遍规律"而不研究各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道路，批评它只重视"价值理论"而完全忽略生产力概念。于是他提出了作为其学说核心内容的生产力理论。

在他看来，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而不是决定于它蓄积的财富的多少，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他系统论述"生产力"的内容及其发展的源泉，特别批评了把单纯的体力劳动当作唯一的生产力的狭隘观点。按他的说法，一切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因素统统囊括其中，还包括着"精神资本"以及国家、宗教和社会道德等社会状况。在这里，李斯特十分重视各种社会因素（如思想观念、习俗等）对于生产力的重大影响，并强调精神资本（如司法制度、个人智力等）在推动生产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进一步论述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即精神资本）的相互联系，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他又就物质生产力内部的相互联系提出有见地的观点，主张国民经济各部门要平衡和协调发展，如搞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协作，重视交通运输和商业的进展等。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尽管混淆使用价值（财富）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又对"生产力"概念作了不精确的表述，但仍不乏丰富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他重视精神和社会的因素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他主张生产力是财富的原因，并强调财富的生产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他关于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之间以及物质生产力内部的相互联系的论述，至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为了充分论证他的经济学说，突出各个国家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应采取相应政策的重要思想，李斯特又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他指出，各国的经济发展都须依次经过五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则是依据国民经济中哪些经济部门占主导地位加以确定。他认为，既然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就应当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特点的理论和政策。例如，当一个国家由未开化阶段转入畜牧、转入农业以及转入工业与海运事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时，或者已经进入经济的理想状态既农工商业时期，都宜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在农工业时期则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从具体情况来看，英国已经进入第五阶段，而德国和美国这些年轻国家尚处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倘若国家不采用保护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和阻止先进工业国冲击民族经济，这类年轻国家就无法实现进入第五阶段的经济理想。显然，该理论完全撇开了生产关系分析。

保护贸易理论　李斯特在经济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完整的保护贸易理论。在论述其保护理论时，他首先尖锐批评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单纯追求当前的财富交换，根本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其实落后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虽然暂时须付出较高的代价，但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增长以及对外竞争能力和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他指出，片面强调自由竞争，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也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来说，如果不推行保护贸易制度，非但不能促进国内工业和经济发展，反而会危及自己的独立地位。

李斯特进一步提出一些有关的原则和主张，深入阐述他的保护贸易理论。它们主要是：1.保护贸易的目的在于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农产品和有些技术与机器并不限制进口。2.关税是建立和保护国内工业即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手段，对国外工业品要根据情况征收高额关税。3.重点是保护那些对国家独立自主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幼稚工业。4.保护的对象只适于那些经济发展处于第四阶段（即农工时期）的国家的有关工业，保护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多为30年。换言之，保护贸易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5.保护的程度视具体情况而定，国外工业品属于国内急需发展的产品，应用高税率禁止或限制进口，其他的外国工业品则可征收较低的税率。至于高贵奢侈品一类进口货只实施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关税的提高要同工业发展水平相适应，事先作出规定，变动也不宜过急过频。可见，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对经济落后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嘉图—巴罗假说（Ricardo—Barro Hypothesis）　又称“巴罗—李嘉图假说”，一种关于减税只会使储蓄增加，而不会使消费增加的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D·李嘉图(D·Ricardo)在19世纪提出，70年代又由美国经济学家R·巴罗（R·Barro）进行了修正与发展。其基本观点是，一时性税收减少只会引起储蓄增加，而不会增加消费。假定最初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减税就会引起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就要发行债券。所发行的债券要在以后的年份偿还本金与利息。这样，政府为了偿还债务就会在以后提高税率。现在减税意味着未来的增税。税收的变化并不影响持久收入，从而也就不影响消费。在政府减税时，人们要把减税所引起的收入增加储蓄起来，以便支付未来更高的税收。这样，一时性的税收减少就并不是增加消费，而是增加了储蓄。但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假说表示怀疑，实际统计资料也并不完全支持这一假说。在有些时期，税收减少，储蓄增加，但在另一些时期，也往往是税收减少，储蓄并不增加，甚至还减少。反对这种假说的经济学家认为，李嘉图—巴罗假说所分析的理性人，即能合乎理性地分析政府减税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并以此作为行为准则。只有在这一假设之下，人们才会把减税所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但实际上，人并不具有这样的理性，他们会把减税看作自己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把政府增税偿还债务看作以后几代人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会把减税所增加的收入用于增加消费了。一般认为，减税既会影响储蓄，也会影响消费，但对哪一方面影响大则难于作出一般性结论，要取决于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伊万诺维奇（Mikhail Ivanovich Tugan—Baranovsky，1865—1919年）　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895~1917年任彼得堡大学和基辅大学教授。最初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公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反动势力的一分子。主要著作有：《周期性工业危机》（1894年）和《政治经济学基础》（1909年）等。他对俄国国民经济史研究颇深，但其经济思想则呈现折中主义的特点，既表示要拥护一点马克思主义，又混杂了民粹主义和“边际效用论”的货色。他详尽研究了19世纪英国工业的发展及其危机的表现，指明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和“垂死象征”，失业现象也是它的重要特点。但是，他用借贷资本的变动来说明危机产生的原因，被视作经济周期理论中“非货币投资过度论”的先驱。他反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实际上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可以脱离广大人民的需要和消费而无限地发展扩大。

杜尔哥，安纳·洛贝尔·雅克（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 18世纪后半叶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贵族家庭，当过修道院修士和名誉副院长。1751年放弃神职，先后在巴黎市议院历任公职。1761—1774年担任利摩日地方行政长官，曾进行整理赋税和废除徭役的政策，赢得声誉。路易十六即位后，杜尔哥一度出任海军大臣，不久调任财政大臣。在近两年的任期内，他试图进行多方面的财政改革，如取消徭役制度和许多苛捐杂税、废除行会、规定特权阶级纳税等。但这些触动特权阶级利益的措施遭到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激烈反对，他本人终于被免职。在脱离政界后的最后五年里，杜尔哥一心从事学术研究。其主要经济著作是1766年写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该书是为两位受托在回国后作出中国情况报告的中国留学生所写的一篇分析性引言。在别人的劝说下，杜尔哥于1770年将它公开发表。

杜尔哥是一位独特的重农主义者。他并不属于该学派领袖魁奈圈子内的人，却几乎完全赞同魁奈创立的所有基本理论。同时，他的学说体系也不再具有重农学派原先的封建外观，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了更深入的阐述，从而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

杜尔哥在魁奈的社会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内部再各自划分为资本家与工人，并正确地认为前者靠资本雇佣别人劳动而赚取利润，后者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来养家糊口。他又用自由竞争原则来分析劳动的供求关系，指出：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劳动市场总是供大于求，因而工人的工资只限于维持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杜尔哥对“纯产品”学说也作了补充和发展。他虽然仍认为“纯产品”来自农业，是自然的恩赐，但同时强调是土地对农业劳动者的赐予。在他看来，农业劳动者是唯一那种劳动产品超过其工资的人，“纯产品”是由他们生产出来的；土地所有者由于拥有土地的私有权，所以能不劳动而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里实际上已指明土地所有者阶级剥削了农业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

杜尔哥还系统地考察了资本的类别和作用，把它分为买进田产、租用土地、从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和放债等五种使用方式，并相应地划出土地所有者，租地的农业企业家、工业企业家、商人和放债者等阶级。在此基础上，他完备地划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收入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按他的说法，除工资只等于维持生存的必需生活资料外，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应最少，放债者因承担风险而须获得较多收入，而企业主不但要获取资本的利息，并且应得到利润，用作其管理劳动和承担风险的报酬。不过他并不懂得这些收入的本质，即它们都是来自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也无法解释作为物质产品总和的社会产品是怎样分解为上述各项基本收入的。总的说，杜尔哥的上述学说内容都是颇为宝贵的理论财富。

杜皮特，朱尔（Jules Dupuit，1804—1866年） 法国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出生于意大利。毕业于工艺学院与桥梁公路工程学院，长期担任职业工程师，并当过法国桥梁公路总监。他在经济学方面发表过多篇论文，还出版过《贸易自由》（1861年）一书。杜皮特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则反映在两篇主要论文《论通行费和运输费》（1842年）和《公共工程效用的测量》（1844年）里。他在阐述公共工程的效用及其衡量问题时，提出了相对效用理论，并用于分析公共事业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按他的说法，相对效用“表现为购买者为得到它而愿作出的牺牲，同他在交换中所须支付的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这实际上就是后来马歇尔所提出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他指出，这个差额会随市场价格的提高而下降，或随价格的降低而上升。于是相对效用也就是最终在变动中导致实际购买的最后效用（即边际效用）。最后他得出了相对效用是衡量一切物品的效用尺度的结论，并认为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包括了相对效用和生产成本所构成的绝对效用两部分。杜皮特依据上述思想，进一步论述了有关通行税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那种所支付的通行税额同人们得自这种通行的效用成比例的税率才是最适当的税率。他还应用相对效用原理深入分析了公共工程的效益问题，从而被看成是研究公共工程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先驱。

伯努里·丹尼尔（Daniel Bernorlli，1700—1782年） 瑞士数学家。出生于瑞士一著名数学家家庭。从1725年起，先后担任过数学、医学与生物学、物理学等方面教授。在《测定风险新理论之解说》（1738年）一文中，伯努里最早提出了边际效用以及边际效用的思想。他认为，一物的价值决定是以其带来的效用（而不是价格）为基础的，效用则取决于估价该物的人的特殊情况。他又指出，一物的效用会随情况而变动，并且这种变动量可以确定。具体地说，财富的任何增加总会使效用增加，而且来自财富的任何微小增加量的效用将同先前占有的物品量成反比例。他还强调，上述命题无论对个人或个人之间的比较都是适用的。可见，伯努里是边际效用这一概念和边际效用递减这一规律的最初发现者。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John Ramsay Mc Culloch，1789—1864年） 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

苏格兰的威格顿郡，最初在爱丁堡大学学法律，不久改学政治经济学。1818年他为《爱丁堡评论》撰写一篇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书评开始，在该杂志发表了为时20年的著述。1820年到伦敦讲政治经济学。1828—1832年间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1838年起出任英国皇家印刷所的主计官，直至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在经济理论方面，麦克库洛赫并没有多大成绩，他是作为李嘉图学说的坚决捍卫者而著名的。在1820—1830年间关于李嘉图学说的大论战中，他为了弥补李嘉图体系的两大矛盾，对劳动的性质和利润的来源作了非常庸俗化的解释。他区分了"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前者决定于消耗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后者决定于一定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在所谓自然市场里，商品与商品（包括资本与劳动）实行等价交换，即"实际价值"等于"相对价值"；而在现实市场上，商品购买到的劳动常常高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即"相对价值"常高于"实际价值"；而两者之间的差额便构成利润。这样，利润就被归结为从流通中产生的让渡利润。麦克库洛赫在回答葡萄酒窖藏后会增值这个问题时，认为自然力也会劳动并创造价值，而葡萄酒增值就是自然力劳动的结果。这种将"劳动"如此庸俗化的做法，实际上完全站到了李嘉图的批判者的立场。正是在李嘉图体系的两大矛盾上，麦克库洛赫以及詹·穆勒的庸俗化的"捍卫"，最终招致了李嘉图学派的彻底解体。还值得一提，麦克库洛赫对经济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主编过亚当·斯密的经济著作和《李嘉图著作集》。

坎南，埃德温（Edwin Cannan，1861—1935年） 英国经济学家，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拉群岛。1887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895年伦敦经济学院成立，担任该校经济学讲师，1907年升任教授，1926年退休时聘为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1776—1848年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898年）和《经济理论评论》(1929年)。在经济学史上，坎南因编辑出版亚当·斯密《国富论》成绩卓著而闻名。他自称信奉斯密学说，实际上受约·穆勒经济思想的影响较大。当时英国正值所谓的"马歇尔时代"，坎南却能超然于马歇尔的影响之外，保持着独特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后来还反对后期剑桥学派的理论主张，形成独树一帜的伦敦学派。从他的经济理论来看，其人道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对分配理论共为关注。他主张，理想的分配应是一种依据各人需要而加以修正的平等分配，收入可分为来自劳动或财产的两种，而来自财产的收入（如遗产）则是不平等分配的原因。他还同大多数学者不探究现存社会制度的传统做法相对立，深入研究了社会制度本身及其经济基础的问题，并认为要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必须使社会制度得以逐渐改良，以适合于人类进步所需的社会环境。此外，坎南所撰写的经济学说史著作至今被视为第一流作品。

纽曼，约翰·冯（John Von Neumann，1903-1957） 美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生于匈牙利，1926年获布达佩斯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该校高级研究所教授。他因同奥斯卡·摩根斯坦合著《博奕理论与经济行为》(1944年）一书而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他还分析过均匀扩展型的封闭经济在某些条件下的稳定均衡性质。其研究结果在1945年以后才广为人知，被有些人称誉为开创了当代增长理论的新纪元。

纽曼增长模型（Neumann Growth Model） 由美国经济学家J·冯·纽曼（J·Von Neumann）在1937年提出的一个一般均衡增长模型。这一模型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探讨均衡增长途径的存在性、最适状态和稳定性，运用的分析方法是活动分析。它的假设条件是：第一，根据投入—产出关系，每一行业或部门的投入与产出都是多种的，因此，行业的生产活动应以有联合产品的生产技术来表示。同时，生产要素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替代性。因此，定义一种生产活动为一种（或多种）投入与一种（或多种）产出的关系，每一行业可能有多种生产活动。第二，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时滞存在，即投入之后并不会马上有产出，各行业之间的这种时滞并不同。第三，资本有折旧。旧资本设备在本质上不同于新资本设备。可以把不同时期的资本作为不同种类的物品，生产后剩余的旧资本设备作为生产的副产品。这样，生产中的资本为投入，生产后剩余的资本作为产出。第四，生产函数为固定规模收益，即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第五，劳动供给是无限的。第六，工资固定不变，取决于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水平。第七，全部利润收入全部用于投资。纽曼增长模型是一套相当复杂的数学推导。它所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存在着各部门共同的均衡增长率，在这一增长率时不存在超额利润，而且现期的中间产品投入不超过上期的产出。第二，这一均衡增长率等于市场利率。这时，产出的增加率恰好弥补投资的利息成本，这也是不存在超额利润的条件。第三，在这一均衡增长率时有些生产活动是无效率的，这些活动不会被使用。这是因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参与生产的活动仅有正常利润，而无超额利润。根据活动分析原理，完全效率的生产活动的数量不会超过所有物品（投入品与产出）的种类。

第五，在经济增长中，某些产品的增长率可能会高于利率水平。但在一个均衡增长的经济中，这就会造成下期的投入品供给过剩。因而，这类产品成为免费的物品，价格为零。第六，在长期中，维持一个经济均衡增长的增长率是唯一的。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道雄，美国经济学家 D · 乔根森（D · Jorgenson）等人认为纽曼增长模型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因此，在 50 年代对这一模型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主要是考虑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修正的假设是：第一，资本家并没有把全部利润用于投资，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品支出。第二，劳动者全部支出其收入。第三，消费者对消费物品的购买取决于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且，需求的收入弹性为一。第四，劳动的供给不是无限的，劳动供给量取决于实际工资水平。对纽曼经济增长模型结论的修正主要是认为，存在均衡的增长率，但这种增长率并不是唯一的。但各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也不同。森岛道雄认为，均衡的增长率取决于支付劳动收入的时间。如果支付劳动收入的时间是每期期末，均衡增长率等于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和固定资本利润率的乘积。如果支付劳动收入的时间是每期期初。均衡增长率等于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和总资本（固定资本与工资基金之和）利润率的乘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更实际的多部门模型里，均衡的增长途径是不存在的，因为产出的稳定暗含着价格的不稳定，而价格的稳定又暗含着产出的不稳定。

张伯仑，爱德华 · 黑斯廷斯（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1899—1967）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的华盛顿州。1920 年毕业于依阿华大学，1922 年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1924 年和 1927 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一直担任该校的副教授和教授（1934 年起），1937 年起还出任经济系主任职务。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始终同哈佛大学联系在一起。其主要代表作是《垄断竞争理论》（1933 年）和《走向更加一般的价值理论》（1957 年）。

张伯仑是个对经济学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理论功绩在于提出了完整的垄断竞争理论，填补了经济学研究的一大块空白。因此，有些学者称誉其为 20 世纪五、六十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还有些人欢呼他曾经在凯恩斯之前也发动过一场经济学革命。从推动经济科学进步这个角度来看，张伯仑学说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1、主张研究垄断竞争市场。他指出，整个市场体系由纯粹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等类型共同组成。纯粹竞争是指市场上的产品和销售者完全一样，且每个销售者只占市场一个极小份额，因而对价格基本不产生影响，纯粹垄断是指个人或厂商完全控制着某种产品的供给。事实上，纯粹竞争和纯粹垄断都是罕见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竞争与垄断的“混合”，即垄断竞争。因此，垄断竞争应当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市场类型。

2、提出无差别产品学说。张伯仑进一步认为，之所以“垄断竞争”成为普遍的经济现象，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产品既有一定的差别又具相当的替代性。产品的差别性可以区分为两类，一是产品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带来的（如品质、式样、包装等），二是产品的销售条件造成的（如销售的地点、信誉、服务态度等）。在他看来，有差别的产品是垄断竞争体系的基础，即产品的替代性一面必然产生竞争，而其差别性一面又导致垄断的存在。

3、建立厂商理论。传统经济学研究生产者行为一般都以个人为对象，后来马歇尔又把行业扩充为分析对象。而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第一次把厂商（即能独立作出经济决策的生产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先分析个别厂商的经济均衡，再探讨相互联系的各个厂商如何实现集团均衡，从而建立起完整的厂商理论。厂商理论的建立，既完善着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又丰富了它的生产与供给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4、创立垄断竞争价值论。张伯仑承袭马歇尔的思路和做法，把垄断竞争条件下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冒充为它的价值论。在具体阐述时，他认为价格、产品和销售成本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着商品价值，并强调引进销售成本（即推销商品所引起的开支，主要是广告费用）是垄断竞争价值论特有的产物。同时，他又使用或倡制了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四个概念以及相应的曲线，深入考察了各种情况的价值决定问题。例如，按张伯仑的分析，厂商的生产和销售要实现长期均衡，其条件是：既使平均收益等于平均成本，又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样，厂商就可取得利润最大化。可见，垄断竞争价值论只不过是均衡价格论的补充和发展。但张伯仑首次详细研究了销售成本，又倡制和使用诸如边际收益一类的分析工具来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意义和实际作用都十分显著。

庇古，阿瑟 · 塞西尔（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 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

生平和著作 庇古出生于英国一退职军官家庭。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因受马歇尔的鼓励而研究经济学。1901 年开始讲授马歇尔经济学。1908 年，仅 31 岁就继任马歇尔的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一直担

任到1943年退休。此后继续在剑桥从事研究著述工作。作为马歇尔的大弟子以及其后的新古典学派领袖，庇古一生都致力于维护和阐发以"剑桥传统"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革命发生后，他曾在不少重要问题上展开过反批评，也在部分观点上有所修正，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

庇古的著述众多，最主要有《福利经济学》（1920年）、《失业理论》（1933年）、《静止状态经济学》（1935年）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年）。

福利经济学　庇古因袭他老师马歇尔的福利思想，第一个系统阐发了福利经济理论体系，故获"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名声。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那些直接或间接能与货币这一尺度相联系的社会福利即经济福利，而福利经济学的目的就在于探索现代社会中影响经济福利的各种重要因素。庇古进一步认为，由于一个人的经济福利是由效用构成的，同时效用可以通过单纯商品的价格进行计量，所以个人以及全社会（即个人的总和）的经济福利都可以计量。这样，他就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

庇古把一国经济福利的总和看成可用国民收入总量加以表示，并进而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命题：在收入分配状况不发生变动的条件下，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它的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据此，他具体探讨了如何获取福利的主要途径。

按照第一个基本命题，由于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得实现生产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其实现条件是边际私人纯产品（指厂商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纯产品）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指社会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纯产品）。但事实上这两者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往往相背离，这就需要进行政府干预，对前者大于后者的生产部门征税，对前者小于后者的生产部门实行补贴。在论述过程中，他还引申发挥了关于收益递减、不变和递增的三条规律以及外部性理论。可见，这是从生产角度来论证经济福利。

按照第二个基本命题，要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必须从分配角度实现收入均等化。这是因为，只有当社会上一切成员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都趋于相等时，社会总满足量才达到最大化。为此，庇古提出一些把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手里的具体措施，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为穷人举办社会福利或服务设施、对公共产品实行补贴等。这就给"福利国家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存有许多理论缺陷（如鼓吹效用基数论等），又宣扬掩盖阶级矛盾的社会改良主义，其庸俗性不言自明。不过他重视社会福利方面的经济学分析，又提出若干令人启迪的理论命题，还创制了不少有益于经济科学进步的新概念，这些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失业理论　30年代初期，庇古为了解释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失业问题，提出了他的新古典主义失业理论。在他看来，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价格机制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即价格和工资会随供求的变化而自行调整。因此，产品市场倘若发生商品过剩，也只是局部的现象；而劳动市场出现失业，只是由于工人不愿接受现行工资率而造成的（即自愿失业）和改变工种或就业单位的困难所带来的（即摩擦失业）。总之，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会使产量和就业量都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庇古又指出，产量的多少决定于就业量的大小，而就业量则决定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劳动的供给和需求都决定于实际工资，供给与实际工资同方向变化，需求则与实际工资反方向变化，劳动供给量和劳动需求量相等的一点决定着均衡的实际工资和就业量。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其就业量一定为充分就业水平。

庇古还分析了失业的产生原因，认为它们相互影响和共同发生作用。这些因素主要有：各种职业和各个地区的雇主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劳动者所希求的实际工资率即劳动供给函数、劳动者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以及自由流动状况等。他集中分析了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实行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即降低工人的货币工资，来刺激劳动需求的提高，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手段。很显然，庇古的失业理论粉饰资本主义现实，主张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反映出鲜明的辩护性质。同时它无法经受事实的检验，很快在"大萧条"中陷于破产，因而遭到凯恩斯的批判和否定是很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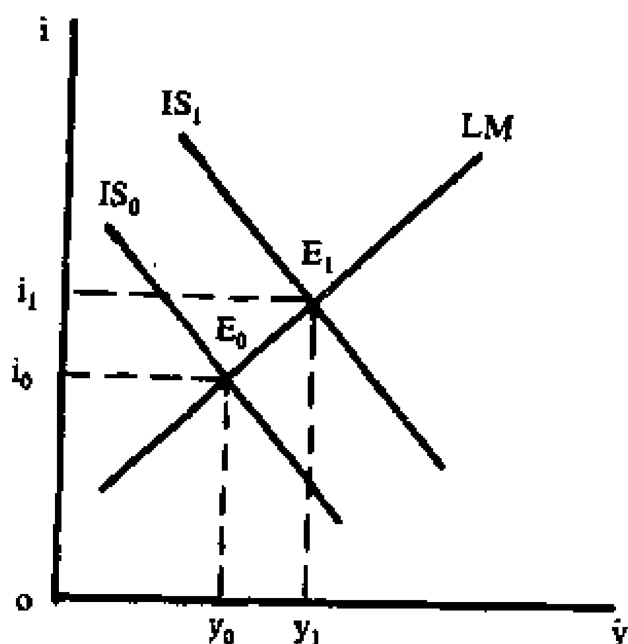
比较经济体制论　"大萧条"之后，庇古从理论角度比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之处，承认社会主义在若干方面比资本主义优越，从而成为研究比较经济制度最早的西方学者之一。

庇古批评了资本主义的缺点。他承认资本主义生产以攫取利润为目的，大部分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安全保障和个人自由都得服从少数资本家的意志。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所有权的极端不平等，造成全社会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带来生产资源配置上的浪费和低效率。同时周期性的严重失业现象亦是它的严重弊端。不过他强调，资本主义刺激生产活动的动因较多，因而生产效率较高。

讲到社会主义时，他认为这是一个为了整个社会利益的特种计划经济，不能同一般经济计划相提并论。按他的说法，社会主义不存在市场机制，各类消费品或货币收入实行强制分配，因此，要使得资源的配置达到理想状态，只有经过不断调整才能实现。总的说来，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主义上述的缺点。

从庇古的论述来看，他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经济乌托邦，并认为资本主义采取渐进的道路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如对重要工业实行国有化、通过议会道路推行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制等。

庇古效应（Pigou Effect） 实际货币量变动对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A·庇古在1943年提出，故名。60年代以色列经济学家D·帕廷金（D·Patinkin）在其《货币、利息和价格》中对此作出了重大的发展。其基本观点是：由名义货币量或价格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实际货币量（即实际余额）的变动会导致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变动。名义货币量的增加或价格水平的下降都会使实际货币量增加。这样，人们所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了。货币是财富的形式之一。货币量的增加使人们财富的构成，即各种财富形式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动。为了恢复原有的财富构成，人们就会增加对商品与劳务的支出，从而增加了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庇古效应强调了实际余额变动对总需求的直接影响，即实际余额效应引起了IS曲线的移动，如附图所示。原来IS_0与LM相交于E_0，决定了国民收入为y_0，利率为i_0。实际余额的增加使IS曲线由IS_0向右上方移动至IS_1，IS_1与LM相交于E_1，使国民收入增加至y_1，



利率上升为i_1。庇古效应和凯恩斯效应都被称为实际余额效应，但前者强调了实际余额变动的直接作用，而后者强调了实际余额变动通过利率而影响国民收入的间接作用。

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Hicks Neutral Technical Progress） 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所提出的一种技术进步的类型。如果把技术进步以前和技术进步以后两个生产函数中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K／L的两个点进行比较，与之相应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比率（即工资率与利润率的比率）也相等，则这种技术进步就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OK代表资本量，纵轴YL代表资本－劳动比率，OF代表技术进步以前的生产函数曲线，OE代表按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所作出的生产函数曲线。OF线上任意一点A代表每个劳动力平均使用资本（即资本－劳动比率K／L）为OC时的平均产出量为AC，过A作OF的切线与OC的延长线相交于R，OW_0为工资率，$AC-OW_0$为利润量。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比例为OW_0：$(AC-OW_0)$。又因为，

$$\frac{OR}{RC}=\frac{OW_0}{AC-OW_0},$$

所以，

$$\frac{OR}{RC-OR}=\frac{OW_0}{AC-OW_0}$$

即：

$$\frac{OR}{OC}=\frac{OW_0}{AC-OW_0},\frac{AC-OW_0}{OC}=\frac{OW_0}{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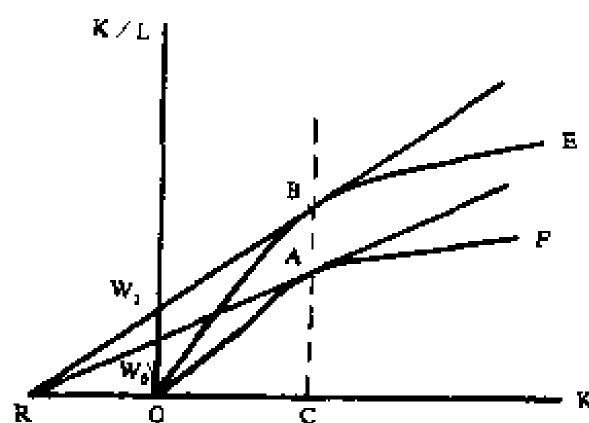
这也就是：

$$\frac{利润}{K}=\frac{工资率}{OR}$$

或者，

$$利润率=\frac{工资率}{OR},\ OR=\frac{工资率}{利润率}。$$

RB是过B点的OE的切线，技术进步后的工资率为OW_1利润量为$BC-OW_1$，利润率$=\frac{利润量}{OC}=\frac{CB-OW_1}{K},\frac{工资率}{利润率}=OR$。这表明在技术进步前后两个生产函数曲线OF与OE上，如果每个劳动力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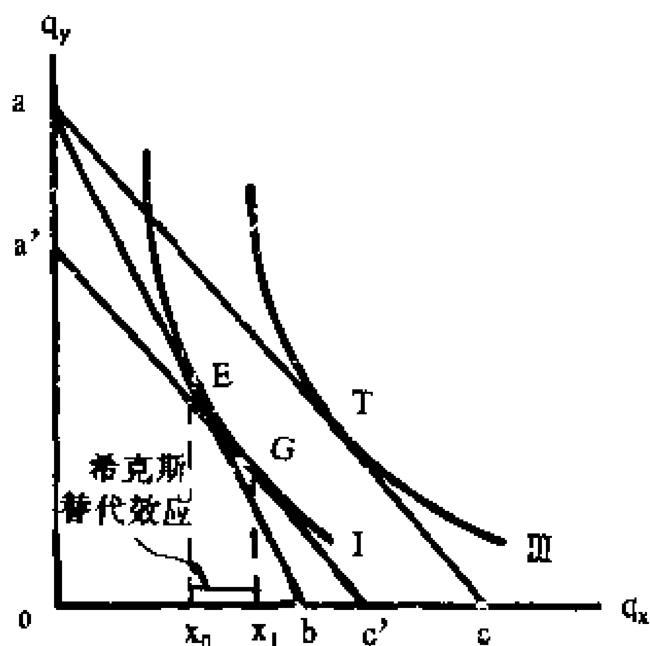


备的资本都同样为OC，即资本－劳动比率

(K／L) 都相同的 A　B 两点上，相应的工资率与利润率的比率也一样（为 OR），从而这种技术就是希克斯技术进步。希克斯技术进步的特点是：第一，资本一劳动比率（K／L）在技术进步前后不变。第二，技术进步增加了与每一个 K／L 相应的产出量。第三，工资率与利润率的比率不变，从而工资与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不变，即这种技术进步不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这种技术进步概念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

希尔德布兰德，布鲁诺（Bruno Hildebrand，1821—1878）　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德国瑙姆堡一文职人员家庭。自 1839 年起先后担任过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创办并长期编纂著名杂志《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还出任过图林根联邦统计局局长。代表作是《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学》（1848 年）。同罗雪尔相比，希尔德布兰德对英国古典学派的反对更具根本性和彻底性。他攻击古典学派的自然规律学说和抽象演绎法忽视了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以个人经济利益和利己主义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学说抹煞了精神、道德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的作用。据此，他声称要用历史方法把政治经济学改变成一门研究民族经济发展的理论，从而否认存在一般的共同的经济规律。他还从交换形式的变化为标准，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个时期，并认为信用经济势必成为未来文明社会的普遍状况。他认为私有制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带来了个性的多样化和蓬勃发展，而对私有制的任何侵犯，就是无视历史教训和破坏历史规律。他在统计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颇多建树，在当时的经济实务方面亦有令人瞩目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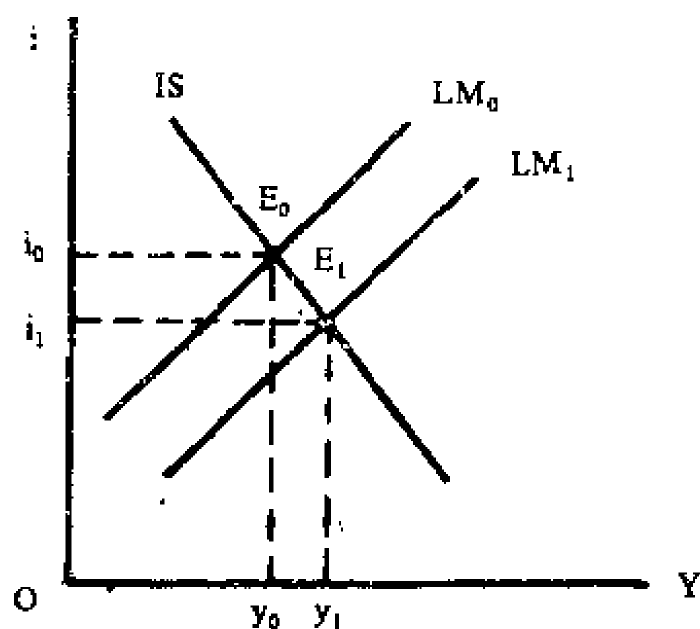
希克斯替代效应（Hisksian Substitution Effect）　在某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后，消费者的购买量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消费者实际收入发生变化。但可以设想维持消费者实际收入不变来考察因商品价格变化而产生的替代效应。希克斯替代效应是在设想产品价格变动后按照新的价格比率将消费者维持在与价格变动前相同的无差异曲线上，从而保持消费实际收入不变（效用满足程度不变）情况下，纯粹因为商品价格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化。下图反映了希克斯替代效应。该图是某消费者消费 X 与 Y 两种商品的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图。图中预算线 ab 是 X 商品价格降低前某消费者的预算线，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 I 相切的均衡点为 E 点。X 商品价格降低后，形成新的预算线 ac，它与较高的无差异曲线Ⅲ相切构成了新的均衡点 T 点。X 商品价格降低后所引起的总的效应（收入效应加替代效应）为 E 点到 T 点，而从 E 点到 G 点（横坐标上 x_0 到 x_1）为希克斯替代效应。



希法亭，鲁道夫（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 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商家庭，在维也纳大学学医。1907 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编辑。战后他加入德国籍，并于 1922 年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923—1928 年间两度出任资产阶级政府部长。十月革命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敌人。1933 年因法西斯势力猖獗而逃亡法国。1940 年被德国警察逮捕，后在狱中自杀。他的主要著作是《金融资本论》（1910 年）以及《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评》（1904 年）。希法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有机会主义倾向。他虽然看到金融资本统治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却认为它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从而完全忽视了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按他的说法，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这样，金融资本不再是银行垄断组织与工业垄断组织的融合，而成了统治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他还忽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由于上述理论观点，他无视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瓜分，看不到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内在联系。他还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系统阐发者，鼓吹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国家干预经济可以使得资本主义转变成有组织的、可自行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宣扬工人能够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即“经济民主”来直接管理国家。这些都是粉饰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论调。希法亭还主张错误的货币理论，断言纸币与黄金价值没有联系，纸币进入流通时没有价值，因而完全允许发行数量不确定的纸币。这实际上在为资产阶级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进行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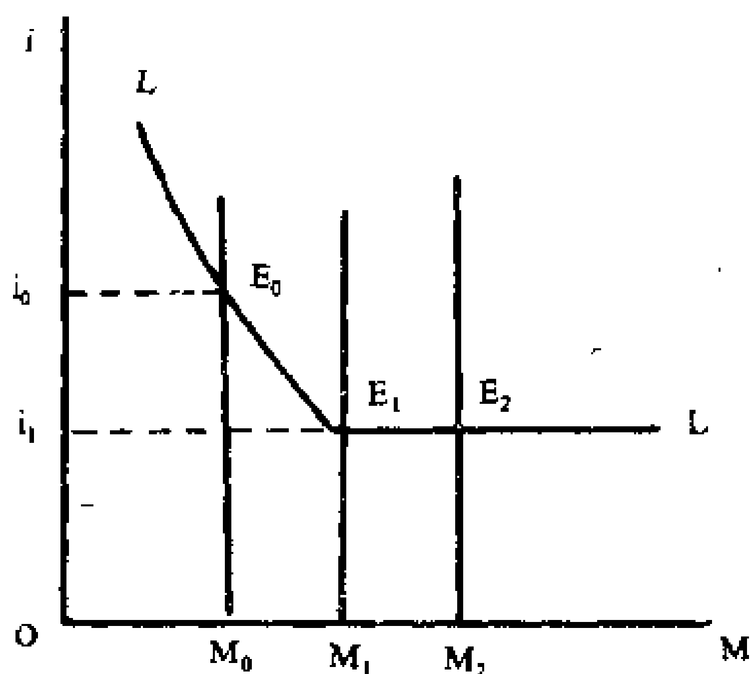
八　画

凯恩斯效应（Keynes Effect）　凯恩斯关于价格水平变动通过对实际余额的变动而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理论。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利率与投资成反方向变动，当利率下降量，投资增加，当利率上升时，投资减少。利率又取决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货币的供给量指实际货币量，即实际余额．实际余额取决于名义货币量和价格水平。当名义货币量不变、而价格水平变动时，实际货币量与价格水平同比例变动，即价格水平上升，实际货币量减少，价格下降实际货币量减少。这样，价格水平的变动就会通过对实际货币量（实际余额）的变动而影响投资与总需求水平。当名义货币量不变而价格水平下降时，实际货币量就增加了。在货币需求，即流动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货币量的增加会引起利率水平下降，利率的下降就刺激了投资与总需求。反之，亦反之。价格水平下降会使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增加，价格水平上升会使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减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实际余额效应。英国经济学家A·庇古对这种关系的论述被称为"庇古效应"。凯恩斯效应与庇古效应的差别在于：凯恩斯效应强调了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余额的变动要通过利率而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因此，这种效应是间接的。庇古效应强调了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余额变动直接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因此，这种效应是直接的．可用附图来说明凯恩斯效应。在附图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由总需求决定），纵轴Oi代表利率。IS曲线与LM_0曲线相交于E_0，决定了利率为i_0，国民收入为Y_0。当价格下降时，实际货币量增加，LM曲线从LM_0向右下方移动到LM_1、LM_1与IS相交于E_1，决定了利率为i_0．国民收入为Y_1。凯恩斯效应所强调的就是，价格下降引起的实际货币量增加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这种变动首先使利率从i_0下降为i_1，利率的下降引起投资与总需求增加，从而国民收入从Y_0增加为Y_1。正因为凯恩斯效应强调了价格水平的变动所引起的实际余额变动要通过利率来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所以，凯恩斯效应，即价格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也就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根据流动偏好理论，利率的下降是有一定限度的。在附图中横轴om代表货币量，纵轴oi代表利率，D为货币需求曲线，s_1、s_2、s_3分别为不同货币量时的供给曲线．当货币供给量为m_1时，D与s_1相交于E_1，决定了利率为oi_1，当货币供给量为m_2时，与s_2相交于E_2，决定了利率为oi_2，说明由于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下降，但当货币量增加至m_3时，D与s_3相交于E_3，利率仍为oi_2，说明利率只能下降到oi_2．



凯恩斯陷井（Keynesian Trap）　又称"流动性陷井"（Liquidity Trap）。由于流动偏好的存在，利率的下降有一个最低限度，当利率降低这一点时，无论货币供给量如何增加，利率也不会再下降了。由流动偏好所引起的这个利率下降的最低点就是流动性陷井。因为这种陷井是根据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流动偏好理论——所提出的，故称为"凯恩斯陷井"，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OM代表货币供给量，纵轴Oi代表利率，LL为流动偏好线，即货币需求曲线。M_0、M_1、M_2，为三条货币供给线。当货币供给量为OM_0时，M_0与LL线相交于E_0，决定了利率水平为Oi。当货币供给量增至OM_2时，M_1与LL线相交于E_1，决定了利率水平为i_1。由于流动偏好的存在，i_1是最低利率水平。即使货币供给量增加到OM_2，利率也不会下降，仍为i_1，所以，在流

动偏好线与 E_1 以后就是凯恩斯陷井，无论货币供给量如何增加，利率水平都不会低于 i_1 了。换言之，当利率达到 i_1 时，利率的货币供给弹性为零。这时货币政策就不起作用了，财政政策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凯恩斯陷井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包括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对凯恩斯陷井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除极其个别的特殊时期，现实中并不存在凯恩斯陷井。由此得出，货币政策还是有用的，即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 由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提出，并由其追随者发展与运用的一套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与政策。

产生的背景与形成　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坚信，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中可以实现充分就业。30年代的大危机否定了这种观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于是，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建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当今的宏观经济学。

基本内容　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失业的必然性，凯恩斯主义正是要在理论上解释这种失业存在的原因，在政策上提出消灭失业的具体办法。这种理论与政策就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要说明什么力量决定就业量。具体来说，就业量取决于产量，产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因此，他的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平衡时的总需求。这种总需求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们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所决定。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是决定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规律和决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指消费取决于收入水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的增加，这就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指随着投资的增加，预期的利润率，即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投资取决于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额大小。如果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利息率也下降，则投资还可以增加。但由于心理上流动偏好的存在，即人们出于交易、预防和投机动机总想持有一部分现金。这样，利率的下降就有一定的限度。这两条规律的共同作用造成投资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的不足正是失业的原因所在。凯恩斯认为，如果经济由市场自发地调节，有效需求不足与失业存在就是必然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因此，在政策上，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就是用国家干预来代替自由放任，其中包括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刺激消费的收入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和扩大支出不足的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的货币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的是整体经济的运行，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就用总量分析代替了个量分析。这些内容就构成了当代的宏观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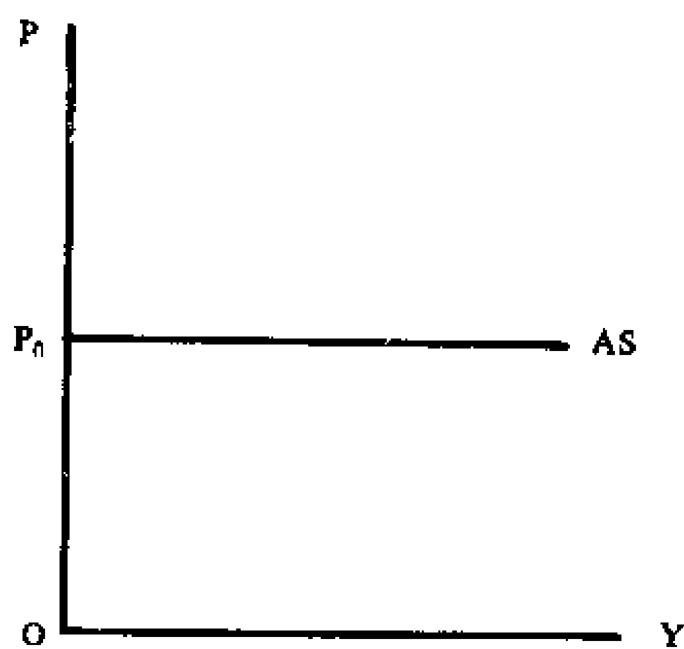
发展　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的思想进行了解释与发展。这种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0年代。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有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提出IS—LM模型，这一模型被作为对凯恩斯思想的标准解释。英国经济学家K·哈罗德在把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动态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也提出了类此的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第二阶段是50年代之后，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分化为两个大的流派：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他们对凯恩斯的解释不同，发展的方向也不同。新剑桥学派把收入分配作为凯恩斯主义的中心。由此形成了一套以收入分配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派把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作为中心，并力图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第三阶段是60年代末期以后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这个学派用非均衡理论来解释凯恩斯主义，又从另一角度解释与发展凯恩斯主义。

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看，这些年来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第一、用IS—LM模型来解释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第二、用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来补充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第三、把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与加速原理结合起来，形成解释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模型。第四、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长期化与动态化。第五、用多种因素来解释投资的投资理论。第六、对凯恩斯货币需

求理论的重新解释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金偏好理论与资产选择理论。第七、用总供给理论补充总需求理论，建立了国民收入决定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第八、各种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运用。第九、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扩大到开放经济中，建立了开放的宏观经济学。第十、经济政策的具体化与发展。

政策运用与影响　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政策对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也引起了各种问题，以致于70年代西方各国出现了滞胀，滞胀的出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这样，各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思潮，包括主张自由放任的各经济学流派和主张制度变革的新制度学派、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以国家干预为宗旨的凯恩斯主义仍将是经济学的主流。

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Keynesian Aggregate Supply Curve）　总供给曲线的一种特例。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如附图所示。图中横轴OY代表产量，纵轴OP代表价格水平，AS为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该曲线表明，在既定的价格水平（P_0）时，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将引起产量的相应增加，供给弹性为无穷大。这种总供给曲线



是根据凯恩斯对30年代大萧条时期情况的分析提出来的，故名。凯恩斯认为，在存在大量失业和设备闲置的情况下，厂商可以不提高工资和增加设备来增加产量从而在产量增加的同时成本不会提高，价格也不会上升，这就是所谓总供给无限的假设。凯恩斯正是根据这一假设把总需求作为决定国民收入与就业量的关键，集中进行了总需求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需求管理政策。总供给曲线的这种特例仅存在于资源严重闲置的时期，并没有普遍意义。

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　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通论》中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所进行的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政策主张上。在理论上，凯恩斯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承认如果只依靠市场调节经济，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的存在就是必然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遵循的是萨伊定理，相信市场调节可以使经济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均衡。这时所存在的失业仅仅是由于局部或偶然的原因引起的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凯恩斯面对30年代大危机中严重失业的事实，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并说明了这种失业根源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心理的流动偏好存在这三大心理规律所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凯恩斯用总量分析法代替了个量分析法。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资源充分利用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从单个经济单位和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因此，所采用的个量分析法，凯恩斯要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说明资源如何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他所研究的不是单个经济单位，，而是整个经济，所涉及的不是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而是总量。这样，就用总量分析代替了个量分析。在政策主张方面，凯恩斯用国家干预取代了自由放任，新古典经济学政策主张的基调是自由放任，即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来自发地调节经济，政府对经济不加干预。凯恩斯以其有效需求理论否定了市场调节经济的完善性，认为要消灭失业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这就是由国家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凯恩斯革命在经济学上有着重大的影响。从理论上看，这次革命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从政策上看，西方各国经济进入了国家干预的时代。战后宏观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与各国通过各种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正是经济学上凯恩斯革命的后果。但是，由于国家干预经济对经济所带来的副作用，特别是由于70年代初西方各国出现了“滞胀”，凯恩斯革命也受到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抨击，其中货币主义对凯恩斯革命的批评则被称为“对抗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Keynesian Distribution Theories）　收入水平决定是凯恩斯的主要概念。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在今天的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占据着不可争辩的地位。在后凯恩斯分配理论中，通过在各社会阶层之间进行的工资和利润的收入分

配，储蓄只是消极地去调整外在的、既定的充分就业投资。而前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主义框架中，投资由储蓄决定，生产能力和边际生产力学说在收入分配决定中充当着重要角色。而在静态凯恩斯主义框架中，是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不是收入分配来使储蓄和投资相等。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社会阶层依然是重要的，其特征反映在他们的储蓄与消费行为上。一般的意义上，在后凯恩斯理论中，不同的储蓄率与不同的经济或社会阶层相联系。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应产生一个总储蓄以使之和充分就业投资的理想水平相等。

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最初源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引起的困境。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得到发展，收入分配理论则陷入僵局。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均衡条件是S＝g（K／Y）。其中，S是总储蓄率，g是自然增长率，K／Y是资本与产出比率。如果这三个变量都是既定的，那么哈罗德——多马条件不大可能满足。因此，为了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被保证，有必要放松其中一个假定。S和g（K／Y）之间的相等可以这样获得：ⓐK／Y灵活变动（也指技术假定）；ⓑS的灵活变动（储蓄假定）；ⓒg的灵活性（劳动市场或劳动供给假定）。解决哈罗德——多马困境有二种方法，一种是如新古典或边际主义者们那样，采用一个提供连续变动的技术的生产函数，每一种技术水平对应着不同的资本和劳动比率，使K／Y是可变动的，从而使条件满足。另一种方法是假定总储蓄率是变动的，最初是由后凯恩斯主义者或剑桥学派所采用的。这里，可以假定社会由工人和资本家或消费者和企业家二个阶层组成，各自有着不同的储蓄倾向，这样，总会在二个阶层之间找到这样一种收入分配格局使得储蓄率S和g（K／Y）恰好相等，从而满足哈罗德——多马均衡条件。

在剑桥或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卡尔多的理论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他最初的分析出现在1956年的《经济研究概览》（Review of Essays Studies）和1960年《经济价值与分配论文集》（Essays on Value and Distribution）里，卡尔多考察了一个单部门经济，其中有二个阶级，一个是资本家，其收入完全从资本取得；另一个是工人，其收入唯一地来自工资。对每一阶级，卡尔多各自确定一个固定的储蓄倾向，即S_c和S_w，S_c较高，而S_w较低。卡尔多模型，连同其它后凯恩斯主义模型，都是建立在长期、充分就业均衡前提下的。假定国民收入Y被分割成工资和利润P，还有一个稳定增长条件，即所有变量以同样的速度g增长，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所有比率是不变的。卡尔多导出了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和利润率的清晰公式。另外，通过利用"古典"假设即Sw（即工人的储蓄倾向）是0，他得出下列二个简单的关系：$P/K=g/S_c$和$P/Y=g\bar{K}/S_c$。第一个关系说明均衡利润率唯一地依赖于外生的既定增长率g和资本家阶级的不变的储蓄倾向，第二个关系说明国民收入中长期利润份额由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率（$\bar{K}$）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均是外生的）决定。

当假定储蓄倾向不是根据收入阶层而是根据个人变化时，帕西内蒂作了分析，其结果与卡尔多的相似。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帕西内蒂没有作任何工人储蓄倾向的假设，他的方程是$P/K=g/S_c$，说明国民收入中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都与S_c反方向变化。因此，在所有其它变量不变时，资本家储蓄越少，他们的资本收益就越多。

总之，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介于古典的和边际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之间。因为一方面，他们排斥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分配的社会阶层理论，即各种收入份额与相应投入要素的财产权相联系。而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更灵活的阶层概念，用既定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来分类。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又和竞争经济学模型不同，他们允许垄断因素，保留剩余收入概念以及生产过程的周期。他们包容储蓄和消费行为的某些生命周期理论的成分作他们的某些微观基础。

凯恩斯，约翰·内维尔（John Nerille Keynes，1852—1949）　英国经济学家。曾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自1884年起，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其间还担任过该校教务管理职务。他是大名鼎鼎约·梅·凯恩斯的父亲，但本人因《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年）一书同样在经济学史上享有声誉。该书是第一本系统论述经济学对象与方法问题的专著，素有"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著作"之说。他以调和主义的态度总结了19世纪种种经济方法论观点，特别全面评论了奥国学派与新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争"。在他看来，经济学方法应当兼容并仓，演绎与归纳都不可偏废。为此，他深入探究了这两种方法的具体内容和相互作用问题，提出不少颇具启迪意义的见解，这使他赢得了著名经济方法论家的称誉。他还针对西尼尔等人把经济学分为实证科学与规范艺术的做法，独特地将经济学划分为三部分，即实证经济科学、规范经济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即为实现一定目的所须遵循的规则体系），不过这种"三分法"并未能被人们普遍接受。

凯里，亨利·查尔斯（Henry Charles Carey，1793—1879）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费城的

一个出版商家庭，从未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他继承父业，成为一个富有的大企业主。42岁退出实业界，专心从事著述。他出版过许多著作，最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原理》（共3卷，1837—1840年）和《社会科学原理》（共3卷，1858—1859年）。凯里是19世纪中期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但对经济学的长期影响一直很微小，在经济学史上则以宣扬“阶级利益调和论”而著名。他是以所谓的再生产费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来阐述这种理论的。按他的说法，商品的价值是由再生产费用（包括工资和利润）决定的，而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再次生产同样东西所需的费用会不断减少。这样，工人劳动能力增加，工资随之提高，而资本家的资本价值降低，利润随之减少。总之，工人在社会产品中所得份额会提高，资本家的所得份额会减少，但其利润量仍在增加。于是凯里声称：“这就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因为由它而建立了人类各阶级之间一个真实利益的完满的调和。”这完全抹煞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事实，是一种典型的辩护论调。他还企图证明资本家和地主间的利益同样是调和的，为此反驳了李嘉图旨在表明地主阶级利益同社会其他阶级利益相对立的地租论。由于凯里鼓吹庸俗的阶级利益调和论，他和巴斯夏一起在经济学史上被称为“乐观主义”的主要代表。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 Cairnes，1823—1875） 爱尔兰经济学家。1848年毕业于都柏林大学。1856年被聘为该校惠特利经济学讲座教授。1859年起又担任盖尔韦大学教授，1866年转而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72年因病辞职，三年后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逻辑方法》（1857年）和《政治经济学新论》（1874年）。凯尔恩斯第一个明确地论述了古典学派的经济方法论，认为经济学原理只是一些关于事实的法则，而决不是关于行为的标准，因而研究它的恰当方法应该是“演绎法”。在大力推崇演绎法的同时，他还贬抑了归纳法的作用。他还肯定经济学既是实证科学又是假设科学。从其阐述的经济学说来看，西方学者通常称之为“古典学派的最后一位学者”，有些人还认为他是约·穆勒的主要继承者。但事实上凯尔恩斯并未全盘接受约·穆勒的学说，相反重新拾起了后者最终宣布放弃的“工资基金说”来反对他。凯尔恩斯提出的“非竞争性集团”概念，是对经济学的一个贡献。他认为竞争只在两个条件完全相同的个人（或集团）之间起作用。换句话说，竞争只在小范围发挥作用，而在两个不同的范围之间不起作用。由此可将社会各阶层划分为若干个非竞争性集团加以考察。应该看到，这个理论有助于说明工资与利润之间存在永久的不平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 又称“需求不足的失业”，指由于经济中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业。总需求的变动是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关的。在萧条阶段，总需求下降，从而就产生了失业；在繁荣阶段，总需求增加，失业消除。这种失业反映了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故称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的原因可以用紧缩性缺口来解释。这种失业的存在表明经济中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正是要消除这种失业。

货币主义（Monetarism） 又称“芝加哥学派”，是6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一个与凯恩斯主义相对抗的宏观经济学流派，因强调货币供给量变动在经济中的第一重要作用而得名。

历史渊源 战后凯恩斯主义的运用一方面促进了西方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引起了许多问题，导致了70年代初的“滞胀”。“滞胀”的出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地位，经济学中出现了许多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流派，货币主义即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货币主义的理论核心是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来源于早期货币数量论，尤其是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论。此外，货币主义师承了美国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是这一学派的直接继承，故又称为“芝加哥学派”。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货币主义的首领是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M.Friedman），其主要著作有：《现代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消费函数理论》，《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资本主义与自由》，《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与J·施瓦茨合著），《货币最优量和其他论文》、《通货膨胀与失业》等。此外，属于这一派的还有：美国经济学家K·布朗纳（K.Brunner）、A·梅尔泽（A.Meltzer），英国经济学家A·沃尔特斯（A.Walters），D·莱德勒（D.Laidler），M·帕金（M.Parkin）等。

基本理论 货币主义这个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布朗纳创造的，他认为货币主义的中心命题是：（1）货币最重要，货币的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2）货币存量（或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货币推力的最可靠测量标准。（3）货币当局的行为支配着经济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经济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唯一地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

节。英国经济学家把货币主义概括为四个主要特点：(1) 货币数量论对宏观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表明，无论货币需求还是货币存量变动，都是货币收入变动的最重要原因。(2) 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3) 国际收支的货币研究方法。(4) 反对积极的稳定政策，支持长期的货币供应规则或目标。根据以上的概括，货币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第一、现代货币数量论。这是货币主义的核心理论。它不同早期货币数量论只研究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而是把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水平作为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货币供给的是法律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而货币需求函数正是现代货币数量论所要研究的。货币需求函数为：

$$M^d = f(Y, w; r_m, r_b, r_e, \frac{1}{p} \cdot \frac{dp}{dt}; u)$$

这说明货币需求取决于实际收入（Y），非人力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W）、预期的货币名义报酬率（r_m），预期的价值固定的债券的名义报酬率（r_b），预期的股票名义报酬率（r_e）、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frac{1}{p} \cdot \frac{dp}{dt}$），以及其他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U）。在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作为总资产代表的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所以，货币需求也是稳定的。这样，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就是物价水平与名义收入变动的最主要原因。第二、名义收入货币理论。名义收入是价格与实际国民收入的乘积。M·弗里德曼这一理论用数学模型分析了货币数量变动对名义收入的影响。其结论是"在货币量增长率和名义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致的、虽然不那么精确的关系"，"如果货币量增长迅速，名义收入增长也迅速，反之，亦反之。这一理论还解释了货币量变动影响名义收入的机制在于货币量变动对各种资产形式的相对价格影响。第三、通货膨胀理论。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通货膨胀始终是，而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则是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而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大于产量的增长率。第四、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及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这一理论分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说明了在短期中存在着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关系，但在长期中并不存在这一关系。

政策主张与运用　第一、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这是货币主义的政策基调。货币主义坚信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是滞胀产生的根源。第二、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不是通过对利率的影响来控制经济，而是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中心，具体作法是根据经济增长率按一不变的比率来增加货币供给量。第三、浮动汇率制度。弗里德曼一直反对固定汇率制，主张在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以防止国际收支严重失调。第四、收入指数化，这就是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收入，以消除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五、负所得税制度。按不同的收入给低收入者以不同的补助，以在保证一定程度平等的同时，能提高经济效率。80年代之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尤其是自由放任，控制货币量，实行浮动汇率这些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运用。

评价　货币主义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上"对抗凯恩斯革命"的一次革命，对当代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政策有重大的影响。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货币主义在理论上的不完善性，它还不足以取代凯恩斯主义。

货币创造（Money Creation）　又称"信用创造"（Credit Creation），指商业银行体系由于其制度特点而产生的由存款与贷款活动创造货币的机制。这一机制与准备金制度、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就是货币可以用支票流通，以及银行贷款转化为客户活期存款相关。商业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存款，为了应付现金支付需要，在所吸收的存款中要留一定的准备金，准备金与存款的比例称为准备金——存款比率，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所规定的法定准备率。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就是货币，它可以用支票在市场上流通，所以，活期存款的增加就是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而且，客户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以后，一般并不取出现金，而是把所得到的贷款作为活期存款存入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商业银行，以便用支票进行支付，在这样的制度之下，银行贷款的增加就意味着活期存款的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这样，商业银行的存款与贷款活动就会创造货币，使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增加。设准备金——存款比率为20%，货币创造的过程就是：A银行吸收存款为100万元，留准备金20万，80万作为贷款放出，得到80万贷款的客户把这笔钱存入B银行。B银行增加了80万存款，留准备金16万，64万作为贷款放出。得到64万贷款的客户把这笔钱存入C银行，C银行在留出12.8万元准备金以后，又可以放出贷款51.2万元，如此这样继续下去，整个商业银行体系最后创造出了500万元的货币。如果以R代表最初存款，D代表存款总额，即创造出的货币，r代表准备金——存款比率（0<r<1），则商业银行体系所能创造的货币的公式是：

$$D = \frac{R}{r}$$

由上式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体系所能创造出来的货币

量与准备金——存款比率成反比，与最初存款成正比。应该强调的是，不仅仅存款增加可以具有创造货币的作用，任何使商业银行资产增加，从而可以增加贷款的方法，都可以通过上述机制而创造出货币。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贴现率，法定准备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贷款量，从而影响货币供给量。在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系统的货币创造机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货币可贷资金理论（Monetary Loanable Funds Theory）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利率决定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I·费雪、瑞典经济学家K·威克赛尔、B·俄林、英国经济学家D·罗伯逊为代表。这一理论在实际可贷资金理论的基础之上考虑到了个人对未来消费的不同时间偏好，并把货币流量作为资产的一部分包含在该理论体系中。时间偏好指人们认为现期一元消费的效用大于未来一元消费的效用。设一年的时间偏好率为 ρ，一元的现期效用为 PV_t，第二年一元的效用为 Y_{t+1}，则有：

$$PV_t = \frac{Y_{t+1}}{(1+\rho)}$$

当 $Y_{t+1} = (1+\rho)\ PV_t$ 时，个人在第二年所得到的一元的效用与现期相等。新古典派认为，在市场利率为既定的情况下，个人根据时间偏好率决定储蓄还是消费。当利率高于时间偏好率时放弃现期消费而进行储蓄；当利率低于时间偏好率时放弃储蓄而进行消费。这样，储蓄就与时间偏好相关。当时间偏好为既定时，储蓄才与利率同方向变动。就厂商而言，如果投资的边际效率低于利率，则不愿投资；如果投资的边际效率高于利率，则愿意投资。当投资的边际效率为既定时，投资才与利率反方向变动。就整个社会而言，投资大于储蓄会使利率上升，投资小于储蓄则会使利率下降。利率的调节使投资等于储蓄。货币可贷资金理论正要说明这种利率的决定过程。在这一理论中，可贷资金的供给，即债券流量需求包括计划的储蓄与名义货币存量的增加量 ΔM^s，即：

$$\Delta B^d = s + \Delta M^s$$

可贷资金的需求，即债券流量供给包括投资I与厂商和居民户增加货币持有量的需求 ΔM^d 即：

$$\Delta B^s = I + \Delta M^D$$

当债券流量供求相等时决定了利率，所以，利率的决定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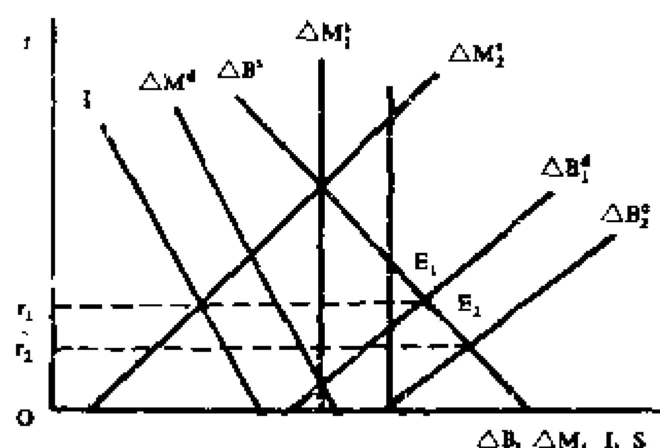
$$S + \Delta M^s = I + \Delta M^D$$

上式说明影响债券流量供给与需求的因素。就影响债券流量需求的因素而言，利率高，则投资与货币需求量都减少，反之亦反之。就影响债券流量供给的因素而言，货币供给增加量为外生变量，不受利率影响，而储蓄则与利率同方向变动。所以，债券供求均衡时则有：

$$\Delta B^s(r) = \Delta B^d(r)$$

$$\text{或者}\ I(r) + \Delta M^d(r) = S(r) + \Delta \overline{M}^s$$

可用附图进一步说明利率的决定。在附图中，横轴代表债券流量（ΔB）货币流量（ΔM）、投资（I）以及储蓄（S），纵轴代表利率r。ΔB^s 线与I与 ΔM^d 线水平距离之和，ΔB_1^d 线为s线与 ΔM_1^s 水平距离之和，债券流量供求均衡（即 ΔB^s 与 ΔB_1^d 相交时）决定了利率为 r_1。如果货币供给由 ΔM_1^s 增加为 ΔM_2^s、债券流量需求由 ΔB_1^d 移动为 ΔB_1^d 时，利率水平使下降为 r_2。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这里指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以影响利率，再通过利率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经济政策，是需求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是利率，即货币量的变动影响利率，利率又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货币政策的这种机制是以人们的财富只有货币与债券这两种形式的假设为前提的。在这一假设之下，债券是货币的唯一替代物，人们在保存财富时只能在货币与债券之间作出选择。持有货币无风险，但也没有收益；持有债券有收益，但也有风险。人们在保存财富时总要使货币与债券之间保持一定比例。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人们所持有的货币增加，原有的货币与债券的比例就被破坏。为了恢复原有的比例，人们就要以货币购买债券，从而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如果货币供给量减少，人们就要抛出债券以换取货币，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债券价格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可表述为下式：

$$\text{债券价格} = \frac{\text{债券收益}}{\text{利率}}$$

这就是说，债券价格与债券收益成正比，与利率成反比。因此，货币供给量增加，债券价格上升，利率下降；反之，货币供给量减少，债券价格下降，利率上升。利率的变动又会影响投资，进而

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即利率下降、投资增加，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增加；利率上升，投资减少，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减少。因此，以货币供给量增加为例，货币政策的机制是：

货币供量↑→债券价格↑→利率↓→投资↑→总需求与国民收入↑

货币政策的工具，即中央银行控制与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即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政府债券；贴现政策，即中央银行调整贴现率；准备率政策，即中央银行调整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此外还有：道义上的劝告，即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指导；垫头规定，即中央银行调整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比例；利率上限，又称第Q条规定，即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率上限；以及中央银行调整分期付款与抵押贷款的条件。中央银行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券，降低贴现率和准备率，以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即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政府债券，提高贴现率和准备率，以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抑制总需求。各国在不同的时期对货币政策有不同的侧重。以美国为例，50年代侧重于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货币政策的重点在于稳定物价。60年代之后则偏重于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70年代初膨胀的出现使这种货币政策受到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70年代后期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则主要采用了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

货币乘数（Money Multiplier） 货币存量与高能货币存量之间的比率，即高能货币存量变动所引起的货币存量变动的倍数。其公式为

$$mm = \frac{1 + cu}{re + cu}$$

在上式中，mm为货币乘数，cu为通货-存款比率，即人们的全部货币收入中现金与存款之间的比率，re为准备-存款比率，即商业银行所吸收的存款中准备金与存款的比率。由上式可以看出，货币乘数的大小取决于通货-存款比率与准备金-存款比率。而且，这两个比率越小，即全部收入中以现金形式保留于手中的货币量越小，以及银行所吸收的全部存款中留作准备金的比率越小，则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多，既定的高能货币存量所能创造的货币存量也就越多，从而货币乘数就越大。由于通货-存款比率和准备金-存款比率都小于一，所以，货币乘数必定大于一。这就说明，中央银行增加一单位高能货币时，由于银行体系创造货币的机制，所增加的货币存量一定大于高能货币。在实际中，通货-存款比率是相当稳定的，这样，当不考虑这一比率时，货币乘数也可以写为：

$$mm = \frac{1}{re}$$

这就说明，货币乘数是准备金-存款比率，即法定准备率的倒数。所以，在高能货币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改变法定准备率来改变货币存量。货币乘数对于货币政策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

货币投资过度理论（Over-Monetary-Investment Theory） 用货币因素所引起的投资过度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由奥地利经济学家L·密塞斯(L.Mises)、F·哈耶克(F.Hayek)，英国经济学家L罗宾斯(L.Robbins)等人所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引起经济中繁荣与萧条交替的是投资过度及其所导致的投资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失衡。引起投资过度的因素则是货币，即银行信用的扩张或收缩。银行信用的扩大引起投资增加。这种投资增加首先表现在对投资品需求的增加，以及投资品价格上升。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信用扩张和投资增加，使经济进入累积性扩张的阶段。这种投资的增加和资本品生产的增加必然使一部分生产消费品的资源转而用于资本品的生产。消费品的缺乏引起了消费者的强迫储蓄。要使经济扩张持续下去就必然不断增加投资，采用更加复杂的迂回生产方式。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无法持续下去。当经济繁荣，人们的收入增加之后，就要把消费恢复到正常水平。这样，强迫储蓄减少，银行被迫紧缩信用，投资无法增加，生产过剩（资本品生产过剩）性危机就会爆发。这种危机或者表现为繁荣阶段利用银行信用正在进行的投资由于资金缺乏不得不半途而废，或者表现为已经生产出来的资本品由于资金缺乏而销路疲滞，价格爆跌。经济进行累积性收缩阶段，只有在萧条达到一定程度，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银行信用的再次扩张才能使经济进入下一次扩张。这种理论与纯货币理论的差别在于，它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是信用的扩张与收缩，但周期本身并不是纯货币现象，周期的关键因素是投资问题.这种理论在经济周期理论中还是有相当大影响的。

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 又译为"货币错觉"，指人们只看到名义货币量的变动而没有看到实际货币量的变动，即只看到货币名义价值的变动，而没有看到货币实际价值的变动。例如，在通

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只看到货币工资量的变动，而没看到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的变动，就是货币幻觉的表现。当人们不是对货币实际价值的变动，而是对货币名义价值的变动作出反应时，就是产生了货币幻觉。由于人们的经济知识是有限的，货币幻觉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货币幻觉对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在通货膨胀时期，当货币工资有所上升，但低于通货膨胀率时，实际工资下降。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工人无法认识到实际工资的下降，这样，就会引起利润增加，并刺激生产。所以说，通货膨胀对投资与生产刺激作用正是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凯恩斯也正基于这一点反对用削减货币工资的方法来刺激经济，而主张用在不削减，甚至增加货币工资的情况下，提高价格的办法来刺激经济。货币幻觉还会影响消费支出。在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收入增加了，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人们把货币收入的增加中看成是实际收入的增加。这样，就会在实际收入不变，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增加消费支出。根据适应性预期假说，货币幻觉只能在短期中存在，在长期中人们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调整自己的预期，从而货币幻觉就不存在了。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人们能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期，从而即使在短期中，也不可能有货币幻觉。

货币中性（Neutrality Of MOney） 新古典经济学家否认货币对经济具有实质性影响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完全的、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在这样一个每人都知道需要放弃多少某种商品去交换其他某种商品的确定性社会里，把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是没有必要的。货币的作用仅仅在于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只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起着转瞬即逝的作用，对实际经济活动并不产生影响。所以说，货币只是"一块遮挡实际经济力量活动的面纱"。货币量的变动不会影响产量、实际价格、实际利率这些实际变量，只会影响绝对价格、名义利率这些名义变量。所以，货币在经济中对实际变量既没有积极作用，也没有不利作用，它是中性的。古典的二分法正是以货币中性为基础提出来的。凯恩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说明了货币供求变动如何通过利率而影响经济中的实际变量，从而就否认了货币中性，以及由此得出的古典二分法。货币主义者承认，在短期中，货币不是中性的，货币量的变化会通过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而影响产量等实际变量。他们认为，在长期中货币仍然是中性的，即对实际变量没有影响，而仅仅影响名义价格这样的名义变量。

货币政策乘数（Monetary Policy Multiplier） 在财政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变动，即实际货币量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的倍数，或者说是国民收入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实际货币供给量变动量之间的比率。可写为下式：

$$\frac{\Delta Y}{\Delta(M/P)}=\frac{b\cdot c}{h+b\cdot k\cdot c}$$

在上式中，ΔY 为国民收入变动量，Δ(M／P)为实际货币供给量（M 为名义货币供给量，P 为价格水平），ΔY／Δ(M／P)即为货币政策乘数。因为实际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下降，投资增加，总需求与国民收入都增加；反之，亦反之，所以，货币政策乘数为正数。b 为投资的利率弹性，c 为边际消费倾向，h 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k 为货币需求的的收入弹性。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给量对利率的影响，以及利率对投资的影响，而影响总需求，总需求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又取决于乘数。所以货币政策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这两者决定实际货币供给量变动所引起的利率变动的大小），投资的利率弹性（决定利率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即总需求变动的大小），以及乘数（决定总需求变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的大小）。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小，投资的利率弹性和乘数越大，货币政策乘数就越大；反之，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大，投资的利率弹性和乘数越小，货币政策乘数就越小。在现实中，正确估算货币政策乘数对于货币政策的操作是十分重要的

货币的职能（Functions of Money） 货币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一般认为货币的职能有四种：(1) 交换媒介，即作为商品交换中的媒介，或者流通手段，这是货币最基本的职能，它决定了货币的其他职能。(2) 支付手段，即在延期支付时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是交换媒介这一职能的延伸。(3) 计价单位，即用它的单位来表示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这是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必要条件。(3) 贮藏手段，即作为保存财富的一种方式，或者说资产的一种形式，货币只有能作为交换媒介，才能作为贮藏手段，因为这种职能也是交换媒介职能的延伸。在以上四种职能中交换媒介是最基本的，其他三种职能都由此而来，并由交换媒介这一职能决定。这就说明了，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东西。

货币的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　奥地利经济学家F·哈耶克在70年代所提出的一种货币政策主张。其基本内容是：取消政府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废除国家货币制度，用私营银行发行的竞争性货币来作为国家货币替代物。哈耶克从货币因素入手来分析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货币的发行是一国政府借以增加国库收入和扩大政府权力的手段，政府一旦需要钱用，就可以利用这种垄断的货币发行权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货币。这样，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就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失业与通货膨胀都是由此所引起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经济，只要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资源就会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的利用。但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作用是以健全的货币制度为前提的。如果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是由私人经济提供的，那么，私人经济就会按交易的实际需要而提供货币，这样的货币制度就是健全的。但由于国家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剥夺了私人经济自行提供交换媒的可能性，私人经济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家货币发行政策的限制。这样，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失业和通货膨胀就难免会发生。具体来说，私人经济活动受到限制，投资积极性被挫伤，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失业必然产生。为了消除这种失业，政府就凭借货币发行的垄断权，根据刺激经济的财政支出的需要发行货币，这就又导致了通货膨胀。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使财政赤字日益加剧，而这种财政赤字无助于恢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就无法消除失业，反而造成滞胀局面。哈耶克强调，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原因中，关键并不是货币数量本身，而是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只要政府依然垄断着货币发行权，就不可能指望政府自己控制货币数量。因此，所应采取的政策不是控制货币数量，而是实行"货币的非国家化"，即废除国家货币制度，用私营银行发行的竞争性货币来代替国家发行的货币。私营银行会谨慎从事，自行限制货币发行量，维护通货的价值，取得公众的信任，并承担过度发行货币的后果。私营银行发行竞争性的货币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哈耶克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之下，要国家放弃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并以私营银行竞争性的货币来取代国家的货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实现货币的非国家化首先在于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这就是今天所需要的"自由货币运动"和19世纪的"自由贸易运动"同样，目的在于使公众了解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危险性，并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去争取"货币的非国家化"的实现。

货币面纱（Veil Of Money）　货币中性论的另一种表述，指经济中的交易是物品与物品的交易，货币仅仅是在瞬间作为交换媒介，对交换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因此，货币在经济中仅仅是蒙在表面的一层面纱，掩盖了物物交易的本质。早期货币数量论和古典的二分法are以这种货币面纱论为基础的。

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Interest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Money）　货币需求变动对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货币需求变动的百分比与引起这种变动的利率变动百分比之间的比率。以 $\Delta M/M$ 代表货币需求变动的百分比，$\Delta i/i$ 代表利率变动百分比，则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 E_i 可以写为：

$$E_i = \frac{\Delta M/m}{\Delta i/i}$$

根据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动，所以，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小于零，为负数。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反应了货币需求变动与利率变动之间的量的关系，从而就可以根据利率变动情况来预测货币需求的变动情况。所以，对货币利率弹性的估算有助于宏观货币管理的操作。

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 Of Doemand For Money）　货币需求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货币需求变动的百分比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收入变动百分比之间的比率。以 $\Delta M/M$ 代表货币需求变动的百分比，$\Delta Y/Y$ 代表收入变动的百分比，则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EY，可以写为：

$$EY = \frac{\Delta M/M}{\Delta Y/M}$$

根据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与国民收入成同方向变动，所以，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零。随着收入的增加，货币的使用更加经济，即产生了货币的规模经济，所以货币需求的增加要小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一。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反应了货币需求变动与国民收入变动之间的量的关系，从而就可以根据国民收入变动情况来预测货币需求的变动情况，所以，对货币需求收入弹性的估算有助于宏观货币管理的操作。

货币的投机需求（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　又称"货币需求的投机动机"，指出于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所需而产生的货币需求。这种需求体现了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即

表现了货币是资产的一种形式。凯恩斯认为，在货币需求动机中，这种动机最重要，因为正是由于这种动机的存在，货币量的变动可以通过利率而影响经济。人们出于投机的目的而持有货币是为了通过在金融市场上的债券买卖而获得收益。债券价格，债券收益和利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

$$\text{债券价格}=\frac{\text{债券收益}}{\text{利率}}$$

这就是说，债券价格与债券收益同方向变动，与利率反方向变动。当债券价格上升，即利率下降时，债券收益增加，这样，人们就要持有较多的用于投机活动的货币。当债券价格下降，即利率上升时，债券收益减少，这样，人们就要减少用于投机活动的货币。所以，货币的机制需求取决于利率，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动，即利率上升，货币的投机需求减少，利率下降，货币的投机需求增加。正如凯恩斯所说："经验告诉我们，货币需求之用以满足投机动机者，则常随利率之改变而改变，二者之变动方式，可以用一条连续曲线表示之。而利率之改变，则又可用长短期债券之价格变动代表之。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J·Tobin）用"风险"来解释货币的投机需求。持有债券有收益，亦有风险，持有货币无风险，亦无收益。随着利率的上升，即持有债券所获得的收益将增加，这使人们愿意冒更大的风险，所持有的货币量（即货币需求）减少，反之，随着利率的下降，即持有债券所获得的收益将减少，这就使人们不愿意冒更大的风险，所持有的货币量（即货币需求）增加。这种解释所得出的结论也是货币需求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动，但所依据的理论不同。

货币的交易需求（Transactions Demand For Money） 又称"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指出于应付日常支出所需而产生的货币需求。这种需求体现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中，又把这种需求分为收入动机与业务动机。收入动机是指"保持现金之理由之一，乃在渡过从所得之收入到支出这一段时期。这个动机之强度，主要须视收入之大小，以及收入支出期间之经常长度而定。"业务动机是指持有现金，可以是为渡过业务上从支出成本到收入售价这一段时间：商人持有之货币，用以渡过从进货到售货这一段时间者，即包括在此动机之下。这个需求之强度，主要定于两个因素：当前产量——即当前收入——之值，以及这个产量须经过几道手才达到消费者。"所以，货币的交易需求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并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即国民收入增加，货币的交易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减少，货币的交易需求减少。这样，货币交易需求函数就可以写为：

$$M^D=f(Y)$$

在上式中，M^D代表货币的交易需求，Y代表国民收入。在5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W·Baumol）和J·托宾（J·Tobin）等人利用存货理论法研究货币的交易需求，说明了利率对货币交易需求的影响。根据这一研究，持有用于交易需求的货币可以节省每次提取现金的费用，即经纪人费用，但也会损失把这些货币存入银行时所能得到的利息。把节省的经纪人费用作为持有交易动机货币的收益，放弃的利息作为持有交易动机货币的成本，则所持有的用于交易的货币量应该使持有这一货币量的成本与收益相等。这样，就可以把货币的交易需求写为下列公式：

$$M^D=\sqrt{\frac{tc\times Y_n}{2i}}$$

上述公式称为"货币需求的平方根公式"。在这一公式中，M^D代表货币的交易需求，tc代表每次提取现金的经纪人费用，Y_n代表国民收入，i代表利率。从上式中可以看出，货币的交易需求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而且，取决于利率水平，与利率反方向变动。这就说明了，国民收入越高，利率水平越低，则货币的交易需求越大，为应付日常支出所持有的货币量就越多；反之，亦反之。

货币的预防需求（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Money） 又称"货币需求的预防动机"，指出于应付某些无法预测的偶然事件而产生的货币需求。这种需求也体现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中认为"由此动机持有之货币，仍在提防有不虞之支出，或有未能逆料之有利进货时机。"未来偶然事件的多少取决于支出量的多少，而支出量又取决于国民收入，所以，凯恩斯认为，这种货币需求取决于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即国民收入增加，货币的预防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减少，货币的预防需求减少。60年代，美国经济学J·托宾（J·Tobin）和E·瓦伦（E·whalen等人把不确定性引入货币预防需求的分析，指出，货币的预防需求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而且还要取决于为持有这种货币所不得不放弃的利息收入、以及在没有持有这种货币时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即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如果以M^D代表货币的预防需求，i代表利率，σ代表不确定所带来的损失，则货币的预防需求函数是：

$$M^D = f(Y,i,\sigma)$$

这就是说，货币的预防需求与国民收入和不确定所带来的损失同方向变动，与利率反方向变动。如果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是正态分布的概率，则货币的预防需求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与利率反方向变动。但在实际中，不确定是影响货币预防需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托宾等人的贡献正在于把不确定性引入了货币预防动机的分析。

货币需求的平方根公式（Square—root Formula for Money Demand） 见“货币的交易需求”。

货币需求（Demand For Money） 公众出于各种目的而愿意持有的货币量。公众需要货币是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交换媒介和价值贮藏的职能。因此，人们并不是需要货币本身，而是需要货币本身的购买力，即货币所代表的商品与劳务。从而，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不是对名义货币量的需求，而是对实际货币量，即实际余额的需求。早期货币数量论强调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在费雪方程式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货币需求的决定。剑桥方程式则强调了货币需求，给出了货币需求方程式：

$$M^d = KPY$$

在上式中，M^D 为货币需求，P 为价格水平，Y 为实际国民收入，PY 为名义国民收入，K 为公众所持有的货币量与全部国民收入之比。这一方程式强调了人们货币需求的动机是为了日常交易和预防意外。所以，货币需求实际上取决于国民收入，以及由支付习惯等制度因素决定的 K。价格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体现在预期价格上，即货币需求与预期价格水平同方向变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中分析了人们货币需求的动机。凯恩斯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货币是出于三种动机：满足日常交易所需的交易动机，满足应付临时意外支出的预防动机，以及作为财产的一种形式从事获得的金融投机活动的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利率，与利率反方向变动。以 L_1 代表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与预防动机，L_2 代表货币需求的投机动机，MD 或 L 代表货币需求，Y 代表国民收入，i 代表利率，则可写出货币需求函数为：

$$M^D = L = L_1(Y)+L_2(i)$$

在这一货币需求函数中，凯恩斯以利率为中心，把货币量与国民收入联系在一起，说明了货币量的变动影响利率，而利率的变动又影响国民收入。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J · 托宾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证明了满足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都取决于国民收入与利率，即全部货币需求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与利率反方向变动，所以，货币需求函数为：

$$M^D = f(Y,i)$$

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的中心则是货币需求理论。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 M · 弗里德曼给出的货币需求函数为：

$$M^D = f(Y,W;r_m,r_b,r_e,\frac{1}{p}\cdot\frac{dp}{dt};u)$$

在上式中，Y 为实际收入，W 为非人力资本（财产）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例；r_m 为预期的货币名义报酬率，r_b 为预期的价值固定债券的名义报酬率，r_b 为预期的股票名义报酬率；$\frac{1}{p}\cdot\frac{dp}{dt}$ 为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u 为影响货币效用的其他非收入变量。这一货币需求函数说明货币需求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持久收入。由于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所以，货币需求函数也是相当稳定的。此外，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还研究了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利率弹性，形成了对货币需求的经济计量与经验研究，解释了现实中货币需求的变动。有关货币需求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货物税（Excise Duties） 见消费税和间接税。

货币与一般均衡理论（Money And General Eqmlibrium Theory） 一般均衡的体系是由瓦尔拉斯建立的。一般均衡论企图论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情况。该社会具有 n 种资源，生产 m 种商品。在既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前提下，个人从事着社会经济活动，消费者力图在收入限制的前提下取得最大效用，企业家力图从经营中得到最大利润，资源所有者力图用其资源取得最多的报酬。对于这样的社会，瓦尔拉斯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在包括产品和资源的各种市场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能使每个消费者，企业家和资源所有者都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价格和数量即为均衡价格。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存在这些均衡数量，这种均衡是否稳定。如果上述两个问题都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社会可以和谐而稳定地存在下去。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价格是一种拍卖价格，也就是由拍卖者喊出一系列的价格，然后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根据喊价而作出反应，这种拍卖价格直到使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时结束。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非货币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将货币作为衡

量价格的标准融进一般均衡分析却进展缓慢。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有很多人认为，微观均衡分析适用于瓦尔拉斯均衡，但货币问题是宏观经济学问题；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货币因素融进瓦尔拉斯均衡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瓦尔拉斯不是将货币视为交换机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是在他完成了其交换理论之后，将货币现象额外加进体系中去的。在那里货币不是为了完善系统中其他部分的行为而存在，货币自身也有待于定价。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建立选择货币这一商品的机制，可以改善货币经济中的交换机制。弗里德曼和托宾等人在价值理论框架当中融进货币，并将之视为货币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弗里德曼认为，如果存在合适的货币机制，市场就是稳定的，市场的波动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周期只不过是货币供给量的波动引起的。弗里德曼将完全竞争的市场作为理解经济活动的最理想的方法。在个人选择以及个体行为最大化的假设前提下，弗里德曼认为竞争性价格理论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货币供给量以及价格水平是实现最佳配置、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

货币市场（Money Market） 是指办理一年以下短期资金借贷业务的场所。包括融通资金主要是短期信用票据的买卖和转让的各种金融机构和融通短期资金的全部手段。货币市场主要照顾小企业对流动资本的需要，个人的借贷和政府短期债务。货币市场不同于长期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长期金融市场主要进行期限一年以上的债券、公司股票和抵押借款的买卖。货币市场不是单一的市场，而是由很多不同市场所组成，每一个市场从事不同类型的信用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有：商业票据市场，经营企业的短期期票；抵押贷款市场，它发放的贷款要以债券或其他财产作担保，也叫经纪人放款；承兑市场，买卖银行承兑汇票；国库券市场，经营短期政府证券。货币市场的机构以及商人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买卖政府债券的商人、买卖商业票据的商人、金融公司以及代理商。货币市场可以分为客户市场和有组织市场。大多数私人的短期借款，特别是工商企业的短期借款，都在客户市场上进行。客户市场上最起作用的是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有组织的短期货币市场，包括那些经营政府债券、商业票据、承兑汇票和联邦资金的市场。大多数有组织的市场，如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和抵押市场，主要从事长期资金的融通活动。纽约的货币市场是美国最大和最重要的融通短期资金的中心，吸收全国的剩余资金，它在满足联邦政府的短期资金需要和整个经济的资金需要方面，都发挥主要作用。货币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明显的，但要形成货币市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程度；第二、多种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的流通；第三、充裕的资金；第四、比较充分的市场机制。

货币非均衡与市场结清（Monetary Disequilibrium And Market Clearing） 货币非均衡是指货币供求关系的非均衡。影响货币非均衡的原因主要有：(1) 生产者不一定是目标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2) 即使是属于追求目标利润最大化的行列，即属于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生产者的假定，但面对不可预见的货币扰动，生产者也无法作出关于工资和价格方面的预期；(3) 即使可以作出这方面的预期，生产者也需要较长时间；(4) 生产者的关于价格方面预期并不是关于货币总量的信息，因而与货币非均衡的分析关系不大。市场结清则是表明在一定价格水平下，供给与需求达到相等，市场中没有多余的商品，也没有多余的货币。一般情况下，即使存在关于市场的充分的信息，但个体的策略性思考也将偏离于货币均衡中所要求的集体合理性，因为个体之间千差万别，很难与货币均衡的要求相一致。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将产生影响。例如1982年美国所实行的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年的经济衰退。货币量如何影响经济总量，经济学家之间还存在分歧。一些经济学家通过研究技术、资源、货币流通速度的扰动来间接地研究货币量与经济总量的关系，但是很难找到与货币量无关的、而只是单方面影响经济总量的因素。一般情况下，货币量或货币非均衡要对以下两方面给以说明：经济总量及通货膨胀。这种说明要符合以下普遍的特征：(1) 货币量的实现既与经济总量也与通货膨胀相关；(2) 货币量与经济总量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关系，但在长期内具有较弱的关系，而与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有较弱的关系，而在长期内却具有较强的关系；(3) 如果货币量的实现是无法预期的，那么货币量与经济总量的关系是强的；如果货币总量的实现是可以预期的，则货币量与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关系。货币非均衡的理论被经济学家所采用，是为了说明非市场结清或凯恩斯的方法。该理论所解释的对象是货币政策在现代社会中对经济总量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当然解释经济总量及通货膨胀还有自然利率假定、合理预期假定等理论，但货币非均衡理论则更接近于数据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特点。

货币供给（Money Supply）　货币供给是社会上现存的货币量。货币量与通货范围相关，通货范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货币的具体内容，即哪些货币可以称为通货。在美国，货币流通层次为：

M_1＝硬币＋纸币＋银行活期存款

M_2＝M_1＋商业银行的定期储蓄和定期存款

M_3＝M_2＋其他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和定期储蓄。

从狭义上说，货币供应量就是M_1，由通货和银行活期存款构成。货币当局贮存一定量的货币，只有流通中的货币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中。银行的活期存款也被看作货币供应量的一部分；事实上，活期存款占美国全部货币供应量的四分之三。有些经济学家还把准货币即流动资产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中，如在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在储蓄及放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中的存款。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公众。如果个人需要较多的现款，他们可以从银行户头中提取。如果他们只需持有较少的现款，他们可以把多余的现款存入其户头。活期存款的数量取决于商业银行。通过增加其放款和活期存款，银行可在中央银行规定的存款准备要求的额度内扩大货币供应量。然而只有当企业家、消费者和政府愿意借款的时候，商业银行才能扩大放款。因此，货币供应量决定于银行、联邦储备系统、企业家、政府和消费者。货币供应量一般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因为经济增长引起货币需求增加，而货币供给要和货币需求相适应，否则就产生问题，当货币供应量低于货币需求量，经济趋于萧条，而当货币供应量大于货币需求时，物价趋于上升。

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　指由银行持有的货币、公众持有的货币以及会员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中的存款组成的货币合计数。货币基数也叫做基础货币，可以看作是联邦储备的债权加上国库帐户，黄金储备和其他联邦储备帐户。联邦储备的债权则包括中央银行所拥有的证券，对会员银行的放款和应收票据。因为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之间有一个乘数关系，即基础货币可以成倍地创造货币供应量。从理论上说，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虽然货币基数或基础货币是高能货币，但由于中央银行提供新贷款的途径不同，形成货币量的结构不同，不是所有的基础货币都能产生货币乘数。如流通中现金是中央银行对公众的负债，不能产生货币乘数，财政资金由于不同的管理办法，对货币乘数的作用也不相同。属于商业银行存款范围的，因为可以反复贷放，可以产生货币乘数。但这一部分存款还受如下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法定存款准备率，其次是超额准备率，再次是信贷计划对专业银行贷款的限制。

货运单据（Shipping Do Cuments）　货运单据是指出口商在货物装运后，依照买卖合同或信用证的规定，在完成交货义务和收取货款的过程中所应提交的一系列证明。常用的货运单据可分为基本单据和特殊单据两大类。其中基本单据（basic documents）包括买卖单据，即指商业发票；运输单据，依运输方式的不同，分为空运提单、铁路运单、海运提单、联运提单、邮包收据等；以及保险单据，指保险单或保险凭证。而特殊单据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国家政府机关要求提供的单证，其中包括海关发票、领事发票、产地证明书、卫生证明书等；另一类是进口商所需单证，其中包括包装单、品质证明书，重量证明书、检验证明书、公证报告等。

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特别是对于象征性交货的买卖合同，货运单据就代表着货物的所有权，单据的合法转让就是货物的合法转让，只要出口商提交了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合格单据，开证银行和进口商就有义务接受货运单据并向出口商支付货款，同时，合格的货运单据也有效地保障了进口商和授信机构的权益。

货币互换（Currency Swap）　交易双方通过中介银行以议定的汇率交换需支付债务本息的货币种类，以后根据事先确定的、体现还本付息状况的规定作相反的交换。该交易通常用来防止汇率变动的风险。例如，某美国公司因英镑利率较低，发行了一笔3年期英镑债券，还本需支付英镑，扩大了该公司的风险头寸，为了避免美元对英镑汇率变动的风险，通过中介银行与另一客户进行货币互换交易，期限相同，3年后作相反的交易。经过互换交易，实际上相当于该公司借入美元，3年后到期时仍用美元偿还。

货币置换（Currency Swap）　是将资产或负债从以一种货币表示变换为用另一种货币来表示的安排。货币置换涉及不同货币资金的本金和利息两部分。导致货币置换的主要原因有：（1）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商有时可从出口商国家的银行获得优惠条件的资金融通（如出口买方信贷），但资金不一定是进口商想要得到的货币；（2）在金融市场上，各种货币之间的借贷利率不同，借款人可以先借进利率低的货币，然后调换成所需要的货币；（3）在对外投资中，投资者有时用本币调换外币的金融资

产比直接购买那种金融资产更合算；(4) 汇率风险的存在。可见，货币置换具有降低借款成本，增加资产收益，拓宽借款渠道，消除汇率风险的作用。

货币金属论 一种同货币名目论相对立的货币理论。它主张货币必须有实质价值，其价值由其金属价值所决定，进而把货币同充作货币的足值的金银相等同。重商主义是货币金属论的典型代表，它认为：货币必须是足值的金银，而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的真正财富；铸币的价值在于含金量，而不是它的名称或者国家印记。因此，它反对货币名目论者用降低铸币的重量或成色的办法人为地提高铸币的名义价值。以后，洛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或肯定过货币金属论。这种货币理论的缺陷在于，它看不到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性质，看不到其他辅币或纸币也能完成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货币名目论 一种同货币金属论相对立的货币理论。它否认货币必须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认为货币只是用以计量商品价值的一种符号，只是存在于名目上的一种票券，它所起的职能与本身的价值并无关系。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货币名目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巴尔本、休谟和斯图亚特等人。他们或者认为货币是国家创造的，铸币因为国家的权威而具有价值，或者认为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取得一种虚构的价值，其价值决定于自己的数量和商品数量之间的比例，或者认为货币只是用来计算、记载和监督价值比例的记号或符号，而它用什么材料做成则无关紧要。现代货币名目论的著名代表有克纳普等。他鼓吹"国定货币论"，认为货币是法制的创造物，货币的本质就是支付手段，它的购买力和支付能力完全是国家赋予的。各种形式的货币名目论共同错误是，货币要完成价值尺度的职能，其自身必须具有内在价值，单靠法定的名目是无济于事的。

货币数量论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关于货币流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的价值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变化，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例变化。所以，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愈多，商品价格水平愈高，而货币的价值愈小；反之，亦反之。因此可以说，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关于物价水平决定的理论。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货币数量论的是16世纪法国重商主义者J·波丹 (J.Bodin)，他曾用货币流通量的变动来解释16世纪西欧的物价波动，认为"价格革命"是金银大量流入，货币流通量增加的结果。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J·洛克 (L. Locke) 和D·休谟 (D.Hume) 进一步发展了货币数量论。洛克认为，在产量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数量的增加必定使货币的价值减少。休谟认为，金银作为货币，完全靠它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职能，才具有自己的价值。一国流通中的货币，不过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多，商品价格就会同比例提高。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是货币数量论者，他根据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银行券兑现以后许多商品价格上升的事实，得出了这一结论：商品进入流通之前没有价格，货币没有价值，商品价格与货币价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I·费雪 (I.Fisher) 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费雪方程式，即：

$$MV = PT$$

或者

$$P = \frac{MV}{T}$$

在这一方程式中，M为货币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T为经济中的交易总量，P为价格水平。在长期中，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当稳定的，根据充分就业的假设，经济中商品与劳务的交易总量也是既定的，这样，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同比例变动，即"货币数量增加的正常影响之一，是一般物价水平确切地按比例增长。"费雪方程式强调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明货币量与价格水平的关系，所以又被称为交易方程式。以后，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和A·庇古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剑桥方程式，即：

$$M = KPy$$

或者：

$$P = \frac{M}{KY}$$

在这个公式中，M代表货币量，Y代表国民收入，K代表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P代表价格水平。当K与Y不变时，价格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动。由于$K = \frac{1}{V}$，所以，这两个公式在解释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的关系上是一致的。但剑桥方程式强调了货币需求，所以，又被称为现金余额方程式。费雪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从分析货币需求函数入手，说明了货币供给量在经济中的决定作用。

受抑制的通货膨胀（Suppressed Inflation） 经济中存在着通货膨胀压力或通货膨胀缺口，但由于价格被政府管制而无法上涨，因而在现行价格及相应的购买力条件下出现商品普遍短缺和居民的实际储蓄大于自愿储蓄（即存在强迫储蓄）的现象。一旦解除价格管制，经济中马上就会发生实际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存在的基本原因是价格受到严格控制。无论任何经济，只要有价格控制，就可能出现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中战争期间对价格的管制会引起这种现象。在计划经济中，当经济中存在着高于产量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而价格又受到严格管制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受抑制的通货膨胀的后果一是必须实行配给制，以防止物品短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二是经济中存在强迫储蓄，即居民不得不把无法实现的货币购买力储蓄起来，受抑制的通货膨胀对经济有潜在的危害，一旦通货膨胀无法抑制，经济中就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受益原则（Benefit Principle） 受益原则又称服务费原则，是公共财政学中重要的赋税原则之一，由艾瑞克·林达尔（Erik Lindahl）提出。按照这个原则，税负和政府的其他费用应当按照纳税人从公共物品供给中受益的多少，在他们之间公平地进行分配（政府救济穷人的计划例外）。这一原则可以应用于公共支出的许多领域，可以据之设计出种种方案，使消费者按照从公共品供给中得到的利益，为公共品付款。林达尔把税收看作是与对公共服务的个别偏好相对应的对公共服务的支付，因而税收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价格。在这里，居民总和的拟需求曲线同供给曲线一起，共同决定未来生产的公共品总量，单个人的拟需求曲线决定税负在纳税人之间的分配。在此之前，税制的公共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分离的理论问题而存在，税收的主导理论以支付能力原则为基础。

将公共品引入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建立了公共部门均衡模型，并利用受益原则阐明了政府支出，负税人税率和税收总量最佳水平的决定。在均衡状态下，由于均衡税率反映了获得的边际利益，而边际获益也可以说反映了边际支付能力。边际获益越大，边际支付能力越大，而税负也就越高。因此，这样产生的税收应当看作是公平的。受益原则从而也体现了支付能力原则。这一原则尽管有很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却又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支付能力原则意在解决初始的，不公平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问题在林达尔模型中却是预先给定的，它事实上被抽掉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考虑到收入再分配的影响，那么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均衡水平就会不同。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它能否真正起作用，取决于纳税人是否愿意显示他们对公共品的偏好；其作用大小也取决于这种偏好显示的接近真实的准确程度。由于排他原则不适用于公共物品，单个的消费者并不充分显示其真实偏好。结果，尽管对公共品需求的变化的影响难以察觉。然而，如此偏好水平却会使政府生产公共品的选择误入歧途，偏离最优产出水平。从而使最优水平的决定很难与真实情形相吻合。只要需求显示问题得不到解决，应用受益原则的局限性就客观存在。这一原则仅仅非常有限地适用于财政的分配职能。

受益征税理论（Benefit Theory Of Taxation） 指的是在征税时所遵循的一种原则，这项原则认为，不同的个人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中的受益程度不同，因此，应当按照各个人受益程度的大小来征收不同数量的税额。按照这个理论，政府应当把它所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的开支按照不同的个人的受益的程度在他们中间进行分摊。实行受益征税理论体现出一种公平的原则。在某些公共服务中，可以相当便易而且准确地判断出各人从中所享受的好处的多少，这样就可以按照比例来收取服务费用，例如在公共能源与邮电等项服务中。但是，对于许多公共服务来说，很难精确地判断各人受益程度的大小，例如，无法计算与分摊维持交通安全这项公共服务的费用。还有，某些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转移支付的性质，例如对穷人与失业者的救济，兴办免费教育与医疗等等，如果对这些服务项目实行受益征税原则，那么主要受益人将负担不起这些费用。由此可见，受益征税理论只适用于某些公共服务项目中，但是不能用于多数公共项目中。到目前为止，受益征税理论的主要应用领域有：邮电、公共能源（电力、煤气等等）以及公路通行等等。

受控保险公司（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指受某企业或公司集团控制的保险公司，它往往由企业或公司集团自己建立，为其自身和集团成员提供费用低廉或非受控保险公司不愿提供的保险。显然，建立受控保险公司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避税，但是，在国际避税地建立受控保险公司，可以使企业或公司集团获得包括避税在内的多重好处。

位于国际避税地的受控保险公司接受高税国母公司以保险费支付形式转移其利润，利用避税地保险费收入可免缴或少缴所得税的规定使这部分利润

得以避税。因为受控于母公司，所以对于母公司就其任何特定资产提出的保险要求，受控保险公司都会接受，从而为避税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若干国家对母公司利用避税地受控保险公司实施了限制，但效果有限，原因在于所做的限制仅仅针对母公司与其避税地保险子公司之间的活动，而母公司通过其国内受控保险公司在避税地受控保险公司进行再保险则不受限制。

顶峰（Peak） 经济周期中经济活动的最高点。繁荣或高涨阶段终结时期和转入衰退阶段的转折点。一般只有1–2个月。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产量和就业人数达到本经济周期内的最高水平，股票和商品价格开始下跌，存货高于一般水平，企业界的乐观情绪正在转变为悲观。

爬行的通货膨胀（Creeping Inflation） 又可译为“潜行的通货膨胀”，指持续，但较低的物价水平上升。一般认为，如果一国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物价水平年平均上涨率在1–3%（最多不超过5%）之内，而且，这种较缓慢的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并不会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通货膨胀预期，那么，这种物价水平上升就可以称为爬行的通货膨胀。在50年代，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货膨胀都属于这一种类型。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通货膨胀不会给经济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相反，还会作为一种“润滑剂”，起着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实际上，在长期中持续的爬行的通货膨胀往往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很难有一个国家长期维持爬行的通货膨胀。

季节性失业（Seasonal Unemployment） 由于某些行业生产的季节性变动所引起的失业。某些行业的生产具有季节性，生产繁忙的季节所需要的工人多，生产淡季所需要的工人少。这样就引起这些行业具有季节性变动特点的失业。这些行业生产的季节性变动往往是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很难改变。所以，季节性失业是正常的、难于消灭的。季节性失业属于自然失业或结构性失业的一种。在农业、建筑业、旅游业中，这种季节性失业是最严重的。

季节变动（Seasenal variation） 由于周期气候变化和特殊节假日而发生的，多少具有一定规律性的、逐月或逐季的经济因素的波动。如，盐业生产在日光充足而又少雨的季节就较多，而雨季或冬季冰期的生产量则很少。又由于节假日的影响，使得电视机的销售量在不同月份就不一样，如大型节假日前的那个月的销售量较多，而其后的销售量较少，原因是大型节假日的电视节目精彩。为了消除季节变动对经济序列的影响，可以进行季节调整。季节调整是逐月或逐季进行补偿。可以有各种方法，例如环比法，月平均数法以及平均数相比法。季节调整数字可以是稳定的，即各个月份的季节指数每年都不变，也可以是变动的，即各个月份的季节指数每年稍有不同。季节指数用百分数表示，每个月数字均为年平均数之比。经济季节调整的数据的优点是，周期性的变动不会因纯季节性的变动而看不清楚。因此，在探讨经济周期时，季节调整是必要的。

季德，夏尔（Charles Gide，1847—1932） 法国经济学家。自1874年至1919年退休，先后在多所大学执教。此后又主持法兰西学院的合作经济讲座，直至1930年，季德曾被普遍看作是法国的历史学派学者，其实他的经济学说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力图把历史观点与理论观点、古典学说与现代学说、客观主义方法与主观主义方法相融合。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84年）一书，因其体系完整、概念清晰，文字优美而蜚声国内外，成为半个世纪里影响最大的法国经济学著作。他与夏尔·里斯特合著的《经济学说史》（1909年）则是公认的关于经济学史的世界名著，该书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了颇为详尽的述评。季德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合作经济理论方面。他所撰的《消费合作社论》（1904年）长期被奉为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圣典”，而他本人还是消费合作运动的热情而富于成效的倡导者，在整个欧洲都被视作该运动的权威。

刺激经济的政府支出（Pump—Priming） 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而进行的支出。其形式有：公共工程支出，对地方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的补助，以及对农场主的补助等。一般认为，这种支出不仅本身可以直接刺激投资、消费，从而刺激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它具有一种“唧筒效应”，即增加了私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刺激了私人投资的增加，又进一步间接地刺激了总需求。正因为如此，在衰退期间采用这种政策比采用减税等政策有更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种支出的作用有多大存在争论，这主要取决于所增加支出的性质，以及政府在决定这种支出时的时滞。

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诸如帕累托最优配置，对争议的公平解决等，常常设计各种各样的制度，如配置机制、

组织 (organi zation)、投票过程等等。在许多情况下，对这样的可行过程的构想相对比较容易。如果所有的参与者都遵循特定的原则并有能力处理信息上的要求，构想的过程就可以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样的机制的例子很多，如边际成本定价，设计它是为了获取效率和公平分配。当然，一旦可行机制被建立，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变为：这样的机制在信息上是可行的，并与参与者的"自然"刺激相协调。由赫尔维兹 (L · Hurwicz) 提出的激励相容就是揭示上述机制的特点：在此机制中参与者会发现如果他违背机制的规则对他是不会有好处的。正如格罗伍斯 (T · Groves) 和莱迪亚德 (J · Ledyard) 所指出的：刺激共存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在那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吻合。同样的问题在对投票过程的设计中也会出现。激励相容即是会意的又难以捉摸。在公共产品中激励相容的合意性表现得很明确，一个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妨碍其他人同时进行同样的消费。对同样公共产品的集体消费构成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市场没有能力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在格罗伍斯和莱迪亚德以前，人们普遍相信在公共产品经济中不可能设计一种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非集中化过程。因为经济行为人为减少自己对公共品的提供份额而有对他人提供份额上的白搭车的刺激。林达尔 (E · Lindahl) 曾经提出对每一个公共品的消费者制定他自己的价格。但这个设计的过程或机制不现实，消费者并没有把此价格当作对其需求来说是固定不变的。林达尔价格是可行的，但并不是成功的。因为这样的机制并不是激励相容的。如果购买者不遵守规则，有效配置就不可能实现，机制设计的目标也就无法达到。激励相容的不可捉摸性在仅考虑私人品的情况下可得到最为简单的显示。经济学家们常常构造这样的模型：在其中买卖者都遵守规则，并视价格为给定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人们可以通过虚假行为或以别人无法探视的方式行事仍然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行为人的数量是有限的。首先如果交易者的数量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会有完全弹性的供给曲线，那么某个交易者可能会通过控制价格来达到目的。当然如果其他人知道购买者的需求曲线，他们也就知道购买者并不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并对此作业反应而采用对购买者的相适的惩罚性行为。其次，即使可对垄断行为者的价格制定行为进行监视和阻止，追求利益的垄断者也会阻遏这种监视。他可以计算出一种虚假的需求曲线，与其他人的供给需线相对照产生一个均衡价格，它等于如果垄断者对价格有直接控制权时本来应该制定的价格。然后他计算出一个偏好集，从而产生一个需求曲线和一个好象的确有此偏好的机制过程的参与者。由于偏好不能被其他人观察到，他可以进行好象是价格制定的行为，从而取得个人好处。隐藏虚假行为的上述含义使机制的运行并不象人们意愿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受到人为的限制，几乎不存在可以获取效率的交易。上述思想是由赫尔维兹于1972年提出。他对激励相容进行过系统的精深的阐述。激励相容阐述了作为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及其运用基础的自利行为的实证观点。它已被证明是一种庞大范围 (scope) 和权力 (power) 的组织原理。它与现代机制设计理论一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诸如拍卖、中央计划、垄断管理，转移定价，资本预算，公营企业管理这些完全不同的问题进行分析的框架。激励相容也对实证分析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基本限制。

单一规则货币政策 (Single Rule Money Policy) 又译为"简单规则货币政策"，是货币主义学派所主张的货币政策，由美国货币主义学派领袖 M · 弗里德曼所提出，故又称"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中心是按一定固定比率的货币增长率控制货币供给量。货币主义者认为，影响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不是利率而是货币量。这就因为，人们的财富具有多种形式：货币、债券、股票、不动产、珠宝、耐用消费品等。这样，人们保存财富时就要在这多种形式中作出选择。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主要不是影响利率，而是影响各种形式资产的相对价格。在货币供给量变动后，各种资产的相对价格变动，从而影响产量。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会在短期内通过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而影响产量。在长期内，则只影响价格水平。货币主义者反对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因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但长期中的主要影响还是提高利率。这就因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国民收入增加了货币需求量，总需求的增加提高了价格水平，减少了实际货币供给量，这两种作用的结果是提高了利率。此外，利率还要受人们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提高了通期的通货膨胀率，从而也就提高了名义利率。因此，货币政策无法限定利率，利率是一个易于把人们引人歧途的指示器。货币政策不应该是一项调节总需求的政策，而应该作为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失调的根源的政策，为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并抵消其他因素所引起的波动。货币政策不应该是多变的，应该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中心，即根据经济增长率，按一固定比率增加货币供给量。这就是要排除利率、信贷流量、自由准

备金等因素，以一定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因素来确定货币政策。例如，弗里德曼根据美国每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人口增加而引起的收入增加需要每年增加1—2%的货币供给量，因此，每年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应为4—5%。这种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给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经济就可以依靠市场机制的内在调节作用实现稳定与增长。货币主义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制止通货膨胀，手段是控制货币供给量。70年代末期以后西方各国为了制止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大多采取了这种货币政策。

单一代表制 在劳资关系体系中，一个工厂或其他谈判单位的雇员选举单一的工会代表他们。美国的劳工运动，一直是奉行单一代表制原则。工人在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监督下，遵循多数票表决的原则，由工人选举他们喜欢的工会或是表达他们不需要工会的意愿。单一代表制原则因循了多数票表决选举单一代表这种美国政治传统，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工会担心"双重工会主义"（或竞争的工联主义）会削弱工人运动的力量。那些由于政治或宗教原因使工人在历史上一直分裂的国家，如法国、比利时等，实行了与美国不同的代表制度，由竞争的工会在同一工作场所或同一职业中代表不同的工人团体。

单一税（Singal Tax） 指政府只课征一种税来作为自己唯一的收入来源的税收制度。早在17世纪英国人霍布斯就曾利用税收利益说理论提出单一税的设想，力图削弱封建贵族、王室成员，僧侣阶层享有的不纳税特权。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也提出过单一土地税的主张，认为农业才是制造纯产品的唯一的生产部门，国家应只对土地征税。但今天所讲的单一税的真正的倡导者是英国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他和当时的一些人都极力主张对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经济租金征收百分之百或接近百分之百的税款。这就是所谓的土地价值特税制。(Land value taxation) 主张实行单一税的人认为土地是一种固定资源，经济租金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剩余，因此国家应征以重税，用之于国家开支使之社会化。采取单一税制，使得其他的税收成为不必要，由于对劳动资本税收的免除，单一税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平等。并且他们认为单一税可以大大简化行政管理工作。乔治时代，虽然单值税没有得到很完善的描述，但单一税却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正如批评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实际经济生活中很难把土地与资本区分开来，土地的所有权与财富与收益之间并无关系，因而很难把土地的经济租金与因改良土地而获得的商业租金区分开来，对土地收益征收百分之百的税就没有道理。并且由于单一税制显而易见的缺陷，各国均未彻底实行，但土地价值税(land value taxation) 在今天仍得到更多利用，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把它作为一种限制性税收（Limited tax)

单独海损（particalar Average） 单独海损是指在海上运输过程中，由承保范围内的风险直接导致的保险标的的部分损失。是共同海损以外的部分损失。单独海损只涉及受损害一方的单独利益，损失由受损害方承担，若受损害方已经投保，可以向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索赔。单独海损损失赔偿的计算，可以按损失情况分为两类。

如果单独海损的损失是部分货物灭失，则以下面公式计算损失赔偿。

$$\text{赔偿额}=\frac{\text{保险金额}\times\text{损失数量}}{\text{保险货物总量}}$$

如果单独海损损失是部分货物受损，但受损货物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则应当首先计算出受损货物的残存价值，以下面公式计算损失赔偿：

$$\text{损失赔偿额}=\text{保险金额}\times\text{贬值率}=\frac{\text{货物完好时价值}-\text{受损后价值}}{\text{货物完好时价值}}\times\text{保险金额}$$

由于货物受损前的价值往往难以确定，在实际计算中常常以发票价值代替：

$$\text{损失赔偿额}=\text{保险金额}\times\frac{\text{按发票价值计算的损失款}}{\text{发票金额}}$$

单独费用（particalar charges） 单独费用是在被保险货物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时，为了解除或减轻货物的损失而支出的各项费用。这些是费用基本上可分为施救费用和救助费用。施救费用是由被保险人自身为避免或减轻损失而采取的抢救措施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保险人应对施救费用给予赔偿，但是赔偿的金额以不超过该批被救货物的保险金额为限。所谓救助费用是指保险人、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者采取救助措施而应得到的救助报酬。海上救助行为也应在救助人和被救助人之间订立救助合同。通常这种合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雇佣性救助合同，无论救助是否有效果，在这种合同下，被救助人都应付给救助费用；另一种合同是无效果、

无报酬救助合同，在这种合同下，如果救助未产生效果，则不必付给报酬；如果救助后有效果，则按获救财产价值，救助时间和费用等计算救助费用。保险人通常对救助费用也给予赔偿。救助费用一般也是共同海损费用的一种。

单边反避（逃）税措施　(Unilateral Measure Against International Tax Avoidence And Evasion)　针对跨国纳税人的种种国际避税行为，有关国家可以单方面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矫正，这些单边反避（逃）税措施可以粗略地从对跨国纳税人的要求和对税务行政当局的要求两方面加以考察。

从对跨国纳税人的要求看，主要是要求跨国纳税人必须承担若干义务，包括：①就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政府同意的义务，这是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对避（逃）税行为的有效控制，凡未尽这一义务者不但必须取消该交易行为，而且还要受到惩罚；②就其世界范围内的应税项目有如实申报的义务，必须按期向税务当局申报各类报表，有时还要附有注册会计师的审核报告；③就所受到的从事国际逃税的指控有事后举证的义务，即有义务提供充足证据以证实或否定对其逃税的指控。

从对税务行政当局的要求看，主要是要求从税务管理上采取措施，防范和处分国际避（逃）税的发生。具体措施包括：①经常性地进行税务调查和审计，选取最有可能从事避税逃税活动并从中获得极大好处的跨国纳税人作为重点进行调查，从而既打击避（逃）税者气焰又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这方面的丰富实践已形成不少成功的调查方法，如美国的"净值法"（networth wethod）和"银行存款法"（bankdeposit wethod）；②有效地贯彻执行有关反避（逃）税的各项条款。这些条款包括一般反避（逃）税条款，具体的反避（逃）税条款，一般结合具体的反避（逃）税条款以及全面的反避（逃）税条款等。税务行政当局必须对税法条款和跨国纳税人可能的避（逃）税手段都尽可能地熟悉，以有效地发现和制止各种避（逃）税行为；③争取有关国家及银行的合作支持，共同针对国际避（逃）税行为采取行动。这已多少涉及了双边的措施。

单纯债券（Straight Bond）　国际债券的主要种类之一。即政府、特别法人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发行并流通，具有相应债务责任的有价证券。同一般国内债券相同，这种单纯债券并不是一对一的债权债务关系，一个债务人通常要对另一个国家或复数个国家的债权者负有债务责任。它具有如下特色：(1) 只有达到一定财务水准，有一定信用度，获得国际债券发行评级机构评级或其它信用度较高的发行体担保的发行单位才能发行；(2) 债务者对所有债权者负有一般相同债务责任；(3) 债务者有偿还债务本金、利息的义务和责任，并要接受债权者及其代表机构的监督；(4) 债券发行者既使是公司，债券也无权转换成公司股份等等。

油灰—油灰（Putty—Putty）　"油灰"指易变性。这个词用来比喻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可变性。这就是说，无论在投资之前，还是在投资之后，资本—劳动比率都是可以变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用的生产函数就是"油灰—油灰"。这一模型认为，可以通过劳动的价格（工资）与资本的价格（利息）之间相对比率的变化来调整资本—劳动比率，从而使资本与劳动都得到充分利用，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油灰—陶土（Putty—Clay）　"油灰"指易变性，"陶土"指不易变性。这个词用来比喻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比率在投资前可以变，而在投资后不能变的特性。这就是说，资本—劳动比率的可变性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即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可以用劳动力代替资本，或用资本代替劳动力，但一旦投资完成，机器设备已经固定，则劳动力不能代替资本，资本也无法代替劳动力。这种特性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在经济增长模型难以运用，因为在一个增长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是否可变应预先作出假设。一个前后不一致的假设会给经济分析带来困难。因此，在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没有采用这种生产函数特性的。

制度创新理论（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ory）　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发展的一个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L·戴维斯（L·Davis）、D·诺斯（D·North）、R·汤姆斯（R·Thomas）等人。制度创新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这里所说的制度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工会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等，而不是指社会制度。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有相似之处，是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方面新发明的结果，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才会实现。促成制度创新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制度创新更加迅速；生产技术发展，加速了制度创新；一定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预期的改变。制度创新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五个步骤：形成第一行动集团，即预见到潜在利益并认识到制度创新可以得到这种潜在利益的决策者；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第一行

动集团根据最大利益原则对可供选择的制度创新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即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集团；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被延缓的原因主要是：现存法律制度的限制；新旧制度交替过渡需要一定时间；制度上的发明也是一个过程。制度创新可以由个人、团体或政府进行。在私人市场发展不充分，制度创新受到私人财产权的阻碍，潜在利益由社会所获得，或者创新涉及到强制性收入再分配时，制度创新往往由政府所进行，即政府作为第一行动集团行事。戴维斯等人认为，制度创新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历史上制度创新的原因和过程，而且，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他们用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近代欧美经济史上的重大变革与发展过程，所以，也被称为"新经济史学派"。他们的理论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 School）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并无共同的理论体系，他们的主要特点是着重从经济结构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因素来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同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迥然不同，故统称制度学派。该学派常被看作是历史学派的变种。

凡勃仑是该学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把制度定义为范围广泛的所谓思想习惯，并强调制度研究是经济学的对象。他把生产技术制度与私有财产制度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根源，因而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改良。他指责财产私有制度所形成的"有闲阶级"、"既得利益者"和"不在所有者"损害了社会利益，主张依靠"技术人员委员会"来改革资本主义的弊端。凡勃仑的学说被普遍看成是经济学中的"异端"。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康芒斯和米契尔，前者特别重视国家和法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后者着重于经验统计资料的制度分析。进人30和40年代，贝利、米恩斯和艾尔斯等人继承了制度主义传统，又从公司结构和社会结构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趋势。二次大战后，以加尔布雷恩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点、新情况，又进一步加强制度—结构分析，用制度结构的不协调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弊端及其发展趋势，故又有"新制度经济学"之称。

范围经济（Scope Economy） 指企业通过垂直集中、实行结合生产等方式扩大规模，而非单纯地扩大规模，所带来的利益。范围内的经济性主要可分为两类：1、全产品生产线效益；2、垂直集中的利益。

卖方集中度（Seller Concentration Degree） 卖方集中度是反映卖方集中程度的指标，卖方集中是指特定市场上卖方企业数以及企业的相对规模分布；假设j市场的卖方集中度为SCR_j，其企业数为N，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分布为I，那么可表示为：

$$SCR_j = f(N,I)$$

卖方集中度指标有许多种，常用的有集中率、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等。测量卖方集中度一般应遵循下述程序：1、明确市场的定义，即明确有密切替代关系的商品群或行业。2、确定市场的范围，是全国的，还是地区的，是否要考虑进出口。3、确定具体的测量对象，是产量，还是销售额，抑或是资产额等。4、确定统计对象，是按公司统计，还是按工厂统计，存在专业化协作关系的工厂如何处理等。在50年代以前，产业经济学家能获得数据的行业往往包含很多类产品。这样，由于产品群和行业的分类很不协调，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偏差过大。为此，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再分类研究，力图把握真实情况。随着统计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行业分类的细化，一般认为按联合国建议的现行产业分类标准，行业和实际的市场范围大体接近。因为，制定这个分类标准时，已经考虑到：1、社会产品和服务的种类；2、生产和工艺的相似性；3、统计上的需要和方便。因此，按联合国建议的产业分类标准计算是大致可行的。联合国制定的产业分类标准一般分为四级。先将产业分为门类或部类，分类代码是一位数，如制造业是一个门类，代码是3；再将门类分为大类，代码是二位数，如代码38的金属、机械和工业设备是属于制造业的一个大类产业；再将大类分为中类，代码三位数，如代码384的运输设备就是属于工业设备的中类产业；最后将中类分为小类，代码四位数，如代码3843的汽车就是属于运输设备的小类产业。基本集中度的计算必须以细分类的产业为基础。但要综合反映产业集中的情况，则必须根据低级产业集中度计算高一级产业的平均集中度，如根据汽车、船舶、飞机业的集中度计算运输设备的集中度。由此上推，还可以计算更高一级产业的平均集中度。具体的计算方法有二种：

$$\text{单纯平均集中度} = (\sum_{j=1}^{m} c_{nj}) / m,$$

式中：m为计算的产业数，C_{nj}为第j个产业的前n位集中率；

$$\text{加权平均集中度} = (\sum_{j=1}^{m} X_j c_{nj}) / \sum_{j=1}^{m} X_j,$$

式中：X_j为第j个产业的权重，通常是产值、附加价

值等。单纯平均集中度的主要缺点是当不同产业规模差别较大时，偏差较大。加权平均集中度弥补了单纯平均集中度的上述缺点，但当集中率是实物指标（如产量）时，无法加权平均。

卖空交易（Short Sales）　指投机者卖出他本身并不拥有的股票。其交易方式与一般交易方式相反，即一般交易中是先买后卖，而卖空交易是先卖后买。其过程是：投机者认为某种证券的未来价格将会下跌，他先从证券公司那里借入该种证券来出售，希望在一定的时间后，能以较低的价格再买进证券来归还给证券公司，从而在卖出和买进的两次价格差额中获取利润。进行这种卖空行为的人称为卖空者（Short Seller），所处的地位称为卖空地位（Short Position）。

卖出汇率（Selling Rate）　又称"卖出价"。"买入汇率"的对称。外汇银行向同业或客户卖出外汇时所使用的汇率。卖出是从外汇银行而不是客户的角度说的。采用直接标价法时，外币折合本币数较多的那个汇率是卖出汇率。采用间接标价法时，本币折合外币数较少的那个汇率是卖出汇率。买入价和卖出价间的差额一般为1—5‰，为外汇银行的利润。

极化与扩散效应（Pole and Spreacl Effects）
极化与扩散效应是关于增长极与区域基本作用机制的分析概念。在一个区域的现实经济中，一方面推动型产业的迅速增长，将引起其它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这种经济上的极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地理上的极化，从而产生各种聚集经济。而聚集经济又将进一步增强极的极化效应。从而加速其增长速度和扩大其吸引范围。另一方面，增长级的推动力将通过一系列的联动机制而不断向周围地区发散，这种发散最终将以收入增加的形式对周围地区产生较大的区域乘数作用。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均随距离而衰减。扩散效应可用以下公式来度量：

$$s_r = s_0 e^{ar}$$

其中 S_r 为离极 r 远的扩散强度，S_0 为极的扩散强度；a 为距离衰减系数；r 为距离。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综合结果就是溢出效应。如果极化强于扩散，净溢出效应为负值，这对落后地区不利，反之为正值，对落后地区（或腹地）有利。在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化和扩散效应还存在着一定的交替关系。在城市增长的最终阶段，极化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因此极的成长对受影响的周围地区的扩散作用相对较小，因而也对城市扩张的乘数作用较小。但是，当增长极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极化效应会相对或者绝对地减弱，扩散效应会相对或绝对地增强。最终，扩散效应终于替代极化效应而成为主导作用过程。然而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城市的扩散效应可以分为区内和区际两个部分。因此并不是任何城市都可以称为区域的增长极的。对此加拿大经济学家本金明、赫根斯提出了城市和区域的相互作用阶段理论。他把城市和区域的相互作用分为三个阶段：第1阶段：也就是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地，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导致城市增长的乡村地区的初级部门扩张，城市和其边缘区域被统一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劳动力都从事农业。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化和结构变化，大部分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到城市工业和服务活动上来；，由于这个阶段的工业主要是以原料加工为基础，工业区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矿产、森林、动力资源以及农产品的分布所决定。运输成本是决定城市工业区位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城市在接近自然资源的地点成长，城市的扩散效应主要集中在区域范围内。因此，城市是它所在区域的增长极。第3阶段：随着结构继续转换，城市经济中的主导部门转变为以人力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如电子、光学、仪器和计算机技术等。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城市吸引范围的重要因素，而且城市增长与自然资源的联系断裂；城市经济扩张对周围边缘区域部分的收入和就业增长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的确，大都市中心是创新的源地，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它是"增长极"，大都市中心在对其所在的区域产生扩散效应的意义已经不再是区域的增长极，而再次成为"中心地"。但与每一阶段不同，它不是与所在区域的初级部门的扩张结合在一起的，而是与整个城市体系增长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当一个城市经济处于第二阶段时，由于其产业主要是以所在区域的资源为基础的，其扩散效应主要是区域性的，因此，它才能成为区域的增长极。

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现代公司结构的一种现象，即公司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所有者以外的人手里。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这种分离，主要是由于公司所有权分散在众多的小股东手里。例如，1970年，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的股东有二百七十万人，没有一个人持有股票总额的百分之一。在一般巨型公司里，所有管理人员（高级职员和董事）通常仅仅持有已出售普通股总额的百分之三左右。因为各个股东的态度冷淡，也就是说他们既不行使投票权也不委托管理部门代替他们行使这种权利，所以在许多大公司里管理部门的控制权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在控制集团（即管理部门）根据所有权集团（即股东）的意愿行事的情况下，控制

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是无关紧要的。可是，管理部门也可能不关心如何为公司牟取最大利润，而是想方设法通过采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动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增加自己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就可能导致控制集团的滥用职权。

所有权（Property Right） 关于所有权并没有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定义。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们常引用法国民法法典对于所有权的定义。该定义为"所有权是以法律允许的最绝对的方式处理事情的权利。"从经济上讲，所有权是一种选择某一经济物品的使用的社会强制性权利。这种权利是社会规定的，因而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物品的权利。

所有权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一种社会工具，它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在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形成自己特有的合理的期望，这些期望体现在法律、习惯或其它社会习俗中。例如，法律规定不能偷窃别人的物品，那么要想取得某一物品的所有权，只能通过自愿的交换手段。

所有权可以分为私有、公有、政府（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团体共有）四种主要形式。

1、私有权。私人所有权是指为特定个人所持有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可以让渡以交换具有相同个人所有权的其它物品。个人对其所拥有的物品具有占用、使用、处置权。个人可以自由地转让私人财产，可以利用自己对于财产的所有权取得收入。个人所有权具有严格的排他性。一个人绝不能不经另一个人的同意去使用为后者所拥有的资源。在个人所有权下，任何个人间相互协议而达成的契约性条款都是允许的，尽管并非所有经相互协议的契约性条款都受到政府的支持。个人所有权是有限度的，有些以个人所有权为基础而达成的契约性条款受到禁止。例如，许多国家规定不能搞毒品买卖，尽管交易的双方分别持有毒品与货币的所有权。有些国家对于雇员的周工作时间也有严格规定，不允许超过某一限度，尽管雇员和雇主可以分别依据自己对于劳动与资本的所有权在较高的工资率或较低的工资率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这些限制类似于契约双方交换所有权时的成本，它降低了私人所有权的强度。

2、公有权。如果说私有权是所有权的一极，那么，公有权为另一极。按照西方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公有权是指某一社会全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权力。任何人都无权排斥其他人使用公有物。与私有权不同，个人对于公有权不存在排他性使用权与自由转让的权力。这里的公有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实际生活中，属于这种公有权定义的物品很少。历史上，世界上很多地方存在过土地公有的情况，它类似于这里所定义的公有权。现实生活中空气可以看作是公有的，江河的水、公海的渔力资源可以看作是公有的。公用海滩也可以看作是公有的。有些物品的某种使用可以看作是公有的。例如，在公路边散步的权力，尽管这条公路可能为国家所有。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也把这种公有权定义为"不存在所有权"（non—existing property right），因为不顾在特定的组织或个人对于该公共物品的所有权。因此，不仅上面列举的一些公共资源这类"公益"的东西为"不存在所有权"，一些"公害"例如噪音、污染也属于不存在所有权之物。

3、团体共有权（Mutual Property Right）这是一种为小社团团体共有的一种所有权形式。该种所有权是为了维持该社团平均每个成员的最大价值，或者对于现有的社团成员来说，该种所有权是要通过更多的成员保留更大的团体价值。与个人所有权相同的是，团体共有权的使用具有排他性，即排斥不是该团体成员对于其权力的运用。这一点与公有权不一样。但是和个人所有权不一样的是该种权力不能私自自由转让，除非得到该社会团体其他成员或代理人的许可。属于这种所有权形式的社团有兄弟会，社会或国家的俱乐部。

有一种不属于团体共有却类似于团体共有权的所有权形式是合作所有权（Corporate Property Right），例如合作社、某些厂商、或其它合作性生产组织。这种合作所有权的定义是不严格的，界限也是不明的。它是从组织形式上来定义所有权类型。形式上它与团体共有权相类似，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这些合作企业是个人根据具有约束力的契约组织起来的。这些被组织起来的个人拥有自己所有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资源，一种是企业特定性（Firm—specific，即一旦这种资源用于某一特定厂商，它的可供选择的其他用途就很小，因而其价值就很小。这些资源可以是人力资源，也可以是非人力资源。在现代化分工和专业化的情况下，许多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不能单独运用，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发挥群体生产力。尤其是企业特定性质的资源，只有用于某一类型的企业才有很大的价值。例如一些医学、法学、建筑学组织都是由一些在这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组成的。离开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些人在其他方面就没有多大用处，非人力资源，如某些设备象手术用装置也是企业特定性的，其它方面的用途很小。

这种资源属个人所有，但为适应专业化分工需要而组织起来。合作团体在形式上采取了合作所有权的形式。个人要受团体订立的契约所约束，不能象对个

人所有权那样对合作所有权任意行使使用权、转让权和处置权。但一般来说，这种合作所有权都是以股份形式组织的，对持股人规定了有限的责任，且股票大都可以出售、转让，因此，与个人所有权一样具有可让渡的特征。

4、国有权（政府所有权）（sfare ownership government property right）。西方经济学家对于国有权的定义是不统一的。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国家颁布公认的用于决定谁不能使用国有财产的政治程度，国家就可以排斥任何个人使用国有财产。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把国有权等同于政府所有权，并认为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所有权与股份合作形式所有权类似，并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一国的选民能够持有一份与该国财产中他应分享的那份相等的选票，则国有权更加与合作所有权相似。由于各国的政体不一样，因此，国有权的性质依赖于政府的类型。

经济学中研究所有权的意义在于所有权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存在的前提；所有权有助于说明各种经济组织的相对效率以及解决经济活动的外部性。

垂直合并（Vertical Amalgation） 是分处于生产和销售的连续性阶段中不同阶段的企业间的合并。其中，合并后继续存在的企业合并处在最终需求方向的企业，称为前向垂直合并；合并后继续存在的企业合并处于原料生产阶段方向的企业，称为后向垂直合并。

垂直集中的利益（Vertical Concentration Economy） 垂直集中指将相继的生产阶段集中起来，实行连续生产。如钢铁企业将焦炭生产、炼铁、炼钢、轧钢等工艺集中在一起不间断地进行，垂直集中的利益顾名思义就是由垂直集中带来的利益或费用节约。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如上所述的钢铁企业的垂直集中，由于各生产工艺均需热能，因此连续加工有利于减少热损失。2、有利于节省运输时间和费用。3、有利于合理布局工厂从而节省投资费用。4、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管理。

垂直贸易（Vertical Trade） 垂直贸易是指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意味着这两类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各不相同，这就使得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大不一样，其结果就是它们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的差异。具体地讲，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出口的多为工业制成品，而进口当中初级产品据主要地位。相反，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出口的多为初级产品，而进口的多为工业制成品。由于进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贸易中的不平等问题有可能产生。实际上，垂直贸易是在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最初表现为帝国主义宗主国与它们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今天，垂直贸易表现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主要分别处于南、北半球，因此，当代垂直贸易又被称作"南北贸易"。

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 指发展中国家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不能就业的现象。其原因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另一方面社会吸纳知识劳动者的能力有限。教育需求主要由收入和成本决定。一个人受的教育越多，他未来挣得的收入就越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大、中学免费或近似于免费就学的政策，个人教育费用的相当部分是由社会来负担的，因而个人受教育年限越多，他所予期的私人收入将比所支付的教育成本增长更快，由此造成公众对教育的无限需求。由于政治压力，政府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不得不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机会。结果，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发展异常迅速，实际提供的各方面专业技术人员远远大于人力计划的预测数。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相关，传统部门因收入太低无力接纳知识劳动者，知识劳动者都愿意挤在现代部门寻找职业。但现代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于是，随着教育的迅猛发展，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劳动者人数就越来越大于现代部门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的数目，使得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必定找不到工作。知识失业反过来又助长了教育的进一步扩张。因为现代部门面对各级知识劳动者求职，自然会首先招聘文化程度更高的人。为了防止失业，那些读完小学的学生不得不进入中学继续学习，待到中学毕业难于找到工作时，对大学教育的需求就增加了。政府只得扩张大学教育，但必须同时扩张中、小学教育。可见，就业状况的每一次恶化就会产生一次扩张正规教育的要求。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Theory Of Vicious of Circle Of Poverty） 分析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一种理论，是1953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的。他在该书中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他所得出的一个著名命题是："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阻碍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能力小反之又限制了生产的发展，结果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均收入

水平低、生活贫困。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若干个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持续的贫困封闭圈中，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在这个恶性循环系列中，主要是贫困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看，资本形成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从需求方面看，资本形成也存在一个恶性循环：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其中，投资引诱的大小取决于商品市场的容量。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人均收入低，社会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低，形成市场容量狭小、商品不易销售，从而企业不愿贸然进行大量投资。因此，从供需两方面看，既使有投资引诱，却缺乏储蓄用于投资；既使有储蓄，却又缺乏投资引诱来消化储蓄。由此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圈，使发展中国家必然处于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贫穷的困境之中。所以说，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地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用结构主义方法来探讨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发展经济学家中引起了许多争论，同时也因过于强调储蓄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贫困（Poverty） 收入不能满足维持生活需要的一种情况。生活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生活需要。生活需要标准是指个人或家庭认为生活所必需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如食物、衣服、家具）和劳务（住房供给、运输、医疗等）的总和。因为生活需要通常可以用货币来表示，所以贫困线也可以量化。贫困者的生活水平可能比那些被认为有适当生活标准的人要低得多。在美国，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公平，特别是某些地区，还存在贫民窟。贫困中所提到的收入，是指全部收入，包括货币性收入，也包括非货币性收入。在某些场合，特别是对某些较老的家庭和个人研究贫困问题，也应该把他们的资产考虑在内。贫困的概念不是静止不动的，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贫困的内涵及其要素的量也在变化。一个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生活标准，从而有不同含义的贫困。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贫困的标准也不一样，发达国家的贫困线可能比不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要高。因此除了生活标准这一因素是衡量贫困与否的标准外，社会标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发达国家的居民需求的内含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居民，例如，小汽车在发达国家被视为必需品，而在不发达国家被视为奢侈品。正是由于不同的生活标准和社会标准，要准确衡量贫困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徒制（Apprentice System） 是在职培训和正规课堂培训相结合的一种培训方式，它是培训某些行业技术工人的一种主要方法，例如电工、管工、管道安装工、板金工以及印刷业的工人。学徒在3—5年的期间里，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各种工作，同时还在课堂里学习有关课程。许多计划规定要进行1200—1600小时的有关课堂教学—和大学四年学习的课时一样多。学徒工的工资每6个月或1年增加一次，直到达到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学徒计划是在工人雇主联合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没有工会组织的部门，学徒计划由雇主单独管理，由他们制定学徒标准，规定培训内容，安排培训资金的使用。学徒制涉及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培训计划所包括的课程范围。开设的课程范围越窄，适应性就越小，培训计划的时间就越短，费用就越少。然而，用这种方法培训的工人可能在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上遇到技术过时和失业的麻烦。所以，工人和工会常常宁愿选择范围较广的培训，这样的培训既有助于不受技术更新的影响，又避免反复地接受培训。然而，企业主却喜欢专业化程度高的培训计划，以减少培训费用，并喜欢把全面的技术工作划得更细更专业化，这样他们对每种工作就能支付较低的工资。解决这些分歧是集体谈判的任务之一。谈判迫使双方考虑其长远利益并且使双方认识到，培训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就业的稳定性。学徒培训计划还牵涉到让谁参加培训以获得技术工种的问题。多年来，大多数工会组织的学徒培训主要吸收白人参加，常常是那些在工会中有亲戚朋友的人得到培训机会。70年代以来，培训计划开始大量接纳少数民族工人，但并非所有的培训计划都愿意吸收少数民族，此外还有许多计划反对大规模招收女学徒。

泄愤效应（Spite Effect） 人们因对政府的某项经济措施不满产生了愤怒情绪，进而设法反击，使政府遭受到损失的现象。例如，当贸易条件对农民不利时，农民可能会减少销售额，在极端的情况下，农民可能拒绝出售任何东西。再如，开征所得税可能引起纳税者的极大不满。他们以减少工作劲头相对抗，使得税基及所得税支付随之缩减。纳税者以报复得到的满足心理补偿着自己的损失，甚至希望政府会惧怕他们的行动而重新改变政策。

变动价格模型（Flewprice Model） 见固定价格模型。

变动成本（Variable Cost）　又称为直接成本（direct cost）可变成本是指企业中随着生产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成本，例如劳动力费用，原材料费用等。企业未开工时，应当只有固定成本，而无可变成本；从短期看，企业的成本分为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从长期看，所有成本都是可变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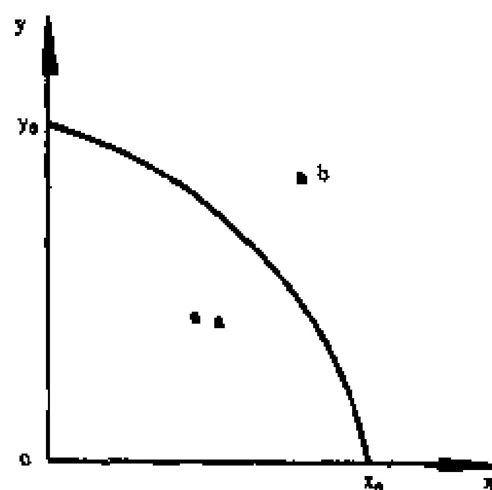
变动投入（Variable Input）　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其投入量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投入称为变动投入。变动投入是相对于固定投入而言的。那种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投入被称为固定投入。把投入分为固定投入与变动投入是一种短期分析的方法。人们在谈论变动投入概念时一般是指短期内那些因产量增加的需要而变动的要素投入，例如劳动的投入、原材料的投入等。在进行长期分析时，由于所有的投入都可以变动，因此没有必要区分变动投入与固定投入。

变换和不变性（Transformations And Invariance）　变换与不变性与量度理论（Theory of Measurement）有关，用来阐明不变原理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不变原理的内容是：只有在量度事物的尺度发生变化，而用来量度事物的数字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的时候，这种关系才对我们具有意义，可以认为，这时这种关系是以数字语言表述了现实世界。在经济学中，人们很少讨论不变原理，但可以说在许多定理中都含有不变原理。例如，我们在分析需求函数的时候，经常比较弹性，而不是比较斜率，原因就在于当价格和商品的度量尺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弹性之间的顺序关系不发生变化，而斜率之间的顺序关系却会发生变化。

对于不变原理，应当区分经验法则（Empirical laws）和数字法则（Numerical laws），经验法则是对世界的真实描述，而数字法则是对度量世界事物的数字进行描述，经验法则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度劳制之间的关系。例如，对于现实世界的需求函数，我们是指商品与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而不是量得的数目之间的关系。

变换曲线（Transformation Curve）　变换曲线又称为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它表明在总资源水平固定的情况下，某一总体经济所能生产的两种商品数量组合的轨迹。通常的变换曲线的形状如图所示，曲线上任一点都代表了在充分就业经济下，所能生产的 x 与 y 商品的某种数量组合，其中 x_0 与 y_0 分别表示在充分就业经济上，所有社会资源全部用于生产 x 或 y 商品所可能的最大产出水平。变换曲线内部的点，如 a 点，代表着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情况下 x 与 y 商品生产的数量组合，而变换曲线以外的点，如 b 点，代表着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水平下无法达到的 x 与 y 商品生产的数量组合。变换曲线的形状是由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决定的，曲线斜率为负并凹向原点，表明随着 x 商品单位产量的增加，所需放弃的 y 商品生产的数量逐渐递增。

变换曲线在许多经济学领域中都是重要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在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理论中应用很广。



放款人（Maney Lender）　放款人不同金融中介，而是指无组织的信贷提供者。一般情况下，有组织的金融中介如银行必须有一定水平的存款准备，这是防止提款减少风险所必须的，也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一种方法。但由于放款人不是有组织的，因此现金储备量没有或者很少，因此，一般情况下，放款人比金融机构具有更高的“货币乘数”。放款人的放款对象主要是信誉相对较高，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亲戚朋友等。其所签订的放款合同就是私人的债权债务合同。这种债权债务合同是极为严格的，原因有三：（1）由于放款人没有法律所规定的现金储备，也没有“最好的贷款人”的支持，放款人的业务必须依靠自己；（2）放款人的放款对象是限定地域的，这样不同地区的放款人是不同的，放款人之间的关系是支离破碎的；（3）放款人不同于金融中介，一般情况下，他们贷放的货币只是自己的储蓄，他们并不吸收存款，而这种现象在落后国家的贫穷的农业地区更为明显。放款人的放款利息率较高，这一原因的解释是多方面的。一种解释是，在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是一个整体，无组织的放款者与有组织的金融机构竞争并有相同的收益率。但由于放款者的风险较大，因为其相对较高的利息包含风险收入。设 q 是总放款中无法收回的部分，放款利率为 i，银行贷款利率为 r，则

$$(1-q)(1+i)=1+r$$

$$i=r+q/1-q$$

如果 $1>q>o$，则 $i>r$。有人认为，在落后的国

家金融市场不是一个整体，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并不为贫穷的农业地区提供贷款，而从放款人那里得到贷款就是农民唯一的选择，而放款人具有垄断性，农民不得不承担高利率。农民借贷有时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借一些消费性贷款，因此，这种贷款实际上是高利贷。

官房主义（Cameralism） 指的是18世纪中期在德国和奥地利流行的一种重商主义形式的经济理论体系。1618—1648年，德国的许多领邦经历了长达30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为了重建国家的财政，创建了一个综合性的治国理论体系，其中的经济学部分就被称为"官房主义"。官房主义涉及的范围很广，它包括政府经济政策、立法、公共财政、行政管理以及技术等等。由于它的重点在于对各个领邦进行有效的统治与经济管理，因此，它非常重视政府采取的集中性的财政政策，并将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看成是国民财富的最重要的标志，这一点在德国与奥地利的专制主义盛行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英法等国的重商主义所强调的是发展商业与国际贸易，并拓展在海外的领地，以便使国家的财富不断增长。而官房主义者却相反，他们把着眼点放在国内，强调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工业的集中，从而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他们还主张，政府应当控制农业，抓紧建设基础设施，并采取积极的人口政策鼓励人口的增长，以此作为增加生产与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在贸易政策方面，官房主义者认为，政府一方面应当废除中世纪的行会组织，通过立法来消除本国内部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护国内生产与贸易，设立高额关税来限制不必要的进口，为培养出口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外，官房主义还提倡通过贸易盈余与货币政策来增加国民收入。官房主义体系中所包含的财政思想、统计学与货币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它的奠基人有毕彻、V·贾斯第以及V·索南菲尔斯等人，贾斯第与索南菲尔斯合著的《官房主义》一书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官房主义与传入德、奥的重农主义与古典学派合流，其中的有些内容成为德国旧历史学派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尽管官房主义独立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它提倡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中心作用的核心思想一直在给予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官僚（Bureaucracy） 官僚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的分析对象，主要是由非正统经济学派别的专家们系统地进行研究的，它和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官僚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理论模型假定，国家机关追求的行为目标是预算最大化，较大的预算使官僚们能够满足他们对薪俸、升迁、职务保障以及权力、声望、分配合同的机会等非货币收益的偏好。在这一模型中，一个政府机关面对的需求函数，是一项服务的边际价值和该项服务的水平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机关以服务交换总预算，而不是交换每单位价格。同样，边际成本函数也不是供给函数，因为一个政府机关并不是按其边际单位成本供给服务的。政府机关的均衡产出，是由使预算最大化的点决定的，该点受到包括提供相应服务水平的费用预算的制约。政府机关的经营可以有"油水"，也可以没有"油水"。因此，在对政府机关的行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不需要揭露任何低效率，并且产量始终是超过最优水平的。

官僚经济理论的动力，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社会中，私人官僚和政府官僚迅速增加，作用显著增长。尤其在发达国家中，资源总量的很大部分都被官僚控制，这种现象出现在如此众多的国家，以至于官僚的产生不能完全归因于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必须归因于社会选择。一般而言，没有什么比人们的选择更自然地受热情的影响，然而狂热并不适用于解释官僚；同样，存在许多不喜欢官僚的例子，也不足以构成否定官僚的理由。在官僚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对官僚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尽管指出了官僚机构的优点，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存在于官僚中的能够导致资源有效配置和高水平创新的强有力动因；对官僚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的看法同样是不充分的，他们没有解释现代社会选择或接受不断增长的官僚的原因。这些都是理论研究有待回答的关键性难点。非正统经济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把官僚产生的动因、必要性等归结为以下几个要点：（1）市场失灵论。一般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在合适条件下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既然如此，那么，个人和所有者为什么不利用价格信号协调其相互作用，而是选择了企业组织？科思在《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firm）一文中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他把建立企业的动力归结为由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一方面，企业组织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可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进而减少交易费用，因而有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企业组织又不能完全取代市场机制，那样管理费用将会大幅度增长。这可以用来解释企业官僚和市场并存的原因。同样，由于内在状况导致的市场失灵也在政府中产生，因而政府官僚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病。同时，由于政府行为的呆板僵硬和无效率，又使它不能完全取代市场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解释并不完满，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构都不完善，一方面，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介入并不一定适宜，有时政府失灵往往比

市场失灵更糟糕；另一方面，市场失灵又构成政府介入的必要理由。那种政府介入总是最优点或者政府只有在最优时才介入的假定都是毫无根据的。（2）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非凡进步，它可能使官僚的扩大成为现实。因为通讯和运输费用的减少，使企业可以在更大的区域内协调其经营活动。表面上看起来，大企业的出现暗含了竞争的下降和垄断的增长，实际上，通讯和运输费用的减少增加了远距离市场交易的机会，市场的规模和企业的数目都增加了。企业官僚的增长和竞争性市场的扩张并不必定是互相排斥的，而通常是一起发生的。此外，创新因素的出现，使市场更大和企业可以得到更便利的技术，往往导致控制大规模企业组织的更好方法的出现，使更大的企业可以将由市场机制执行的某些功能，转移到企业内部来完成。在这种意义上，企业官僚可以用相当大的使用市场的费用来解释。（3）信息市场的一个重要限制，即是信息的非对称性分布。由于信息往往仅被那些没有或缺少该信息的人们理性地购买，这样，信息的流向会突破某些界限。同样，超越国界的跨国公司的建立也可以用资本的非对称分布来解释。（4）一个政府官僚生产公共产品的社会生产函数会受到"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不可分性导致的信息缺乏，才使竞争性市场不可能存在，才允许某些官僚产生和存在。假定只有政府官僚知道生产一定的公共产品需要多少资源，这些官僚的所得（来自官僚本身的增长、权力、升迁机会、其他额外收入等）是官僚管理者预算的增函数。那么，政府官僚总是追求预算最大化，这使官僚远远大于最优水平。在政府产出的社会需求曲线上，官僚会受到政客的压力，事实上不可能拿走所有盈余，这样，其预算最大化行为又是受到制约的。尽管官僚总是远离最优水平，而且总是受到人们的非难，社会仍然选择使用更多的私人官僚和公共官僚，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官方外汇（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私人外汇的对称。国家货币金融机构（如财政部、中央银行或其它政府机构）及国际金融机构所持外汇。各国货币金融机构所持外汇是一国国际储备的主要部分，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本国货币的汇率等。国际金融机构所持外汇主要用于对成员国贷款。

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　空间经济学是关于资源的空间配置以及经济活动配置的理论。空间经济学有较长的历史，并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空间经济学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空间这一概念，不比时间，还没有成功地融进经济学领域。其主要原因在于，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关于运输成本和变动的规模收益被舍弃了。运输成本和变动的规模收益是十分重要的。在没有运输成本以及规模收益稳定的条件下，经济行为的规模和位置是无法决定的；在规模收益稳定，而存在运输成本的条件下，或者在规模收益下降的情况下，人们只会在自己家中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在规模收益增加，而不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将随便地在任何一地点出现；在变动的规模收益，也不存在运输成本的条件下，经济行为在稳定的规模收益中来完成，但不会有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只有在变动的规模收益，同时存在着运输成本的前提下，才存在空间均衡的可能性。空间位置的不同以及经济的外部性，使得问题复杂化，但是，在经济集中地区的企业既存在着运输成本提高，又存在着生产成本下降两种相反趋势。这两种趋势也就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分散力与凝聚力达到均衡时，空间均衡也就实现了。选址论有两种，一是非策略选址理论，这里包括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韦伯的费用最小理论。韦伯的费用包括生产费用、投入物和产出物的运输费用。线性规划理论，在选址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二是策略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把自己的生产、销售，而且把竞争对手对自己位置选择的反应也考虑进去，这一理论也称为"游戏理论"。

空间竞争（Spatial Competition）　空间竞争是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在一般均衡分析当中，不存在着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只存在着生产成本。为了完善一般均衡分析，特别是纠正其一些不现实的因素，人们提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早期的不完全竞争模型，主要是古诺的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一个企业根据对其他企业产出的预期来调整自己的产量，市场结清是在大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上。但有人认为，企业市场活动不仅需要调整产量，更主要的是调整价格。1929 年，霍特林建立了不完全竞争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买主在一条线段上连续分布，而企业则是线段上的某一点。至于在哪一点，是根据规模经济决定的，在交易过程中，企业承担生产费用，消费者承担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因此，离企业越远，消费者所付的价格越高。虽然一个企业可以通过降低价格的办法来争取市场，但也只能部分地争取买主，不能独占市场，原因是运输费用高的买主。因为别的企业产品的运输费用低，因此他会权衡之后而选择近的企业产品。这样，空间和运输成本就决定市场位置与成本间的连续关系。霍特林的思想在现代被发展成为内容更为广泛的模型。空间模型揭示了如下重要概念：（1）完全竞争模型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在那里运输成本为零，需求的密度是无限的。在空间竞

争则意味着在某一位置上，经常有垄断的存在，所以不能通过自由竞争来决定企业的经济行为；(2) 过多的企业或过多的商品进入市场，会导致过剩生产能力，不是象一般均衡那里，总供给与总需求永远是平衡的；(3) 进入市场的自由，并不能保证不存在超额利润，因为不动资本是存在的，而不动资本却可以产生大量的超额利润。

空白背书（Blanle Ender Sement） 又称为无记名背书。它是指持票人仅在票据的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而不指明被背书人。而后对票据进行交付。经过空白背书的票据和来人抬头票据一样，可以仅凭交付而再度转让。

空白背书票据的持票人可以在票据的背书人的签名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空白背书就转变成为特别背书。

各国票据法通常都视空白背书为有效背书。即使如此，空白背书票据的受让人虽不承担背书人的责任，但并非可以免除一切责任，如果空白背书票据的执票人在交付票据时曾经获得其直接后手受让人的对价，则此持票人必须对其直接后手担保票据并非伪造，而且其本人对此票据有充分的权利。

空头（Short Position） 见“外汇头寸”。

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 资本主义生产和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时期产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最早出现在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书中。康帕内拉、摩莱里和马布里都是其早期的主要代表。空想社会主义在19世纪初叶发展到其最高阶段，并涌现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预言它将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天才猜测和具体描绘，包含着许多积极的或正确的思想见解，如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消灭三大差别、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等。但是，他们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和平改造社会，不可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和社会力量。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消灭阶级对立的主张具有纯粹空想的性质。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空想社会主义也就逐渐丧失其积极意义，甚至蜕变为形形色色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

实际与名义数量（Real And Nominal Quantities）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区别了实际与名义数量。实际数量是指一个商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这是商品交换价值在不同社会中共同的外在尺度，也就是一个商品的购买力。名义数量是指商品用白银或黄金所表示价格。商品的真实价格即实际数量，在不同社会中由不同要素组成。在初期社会，它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所构成，所以商品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也就等于生产这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在进步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即实际数量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于是斯密的价值理论出现了二重观点，一是一个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另一个是三种收入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这种观点给理论带来了混乱，并且陷入了循环论证。斯密的价值尺度是用以衡量变动的价格的，因此，斯密想找到一个不变的尺度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个尺度就是劳动。用劳动量与名义价格即货币数去比较，从而反映货币量所包含的劳动量，但不幸的是斯密没有考虑劳动量在不同生产率条件下意味着不同的量。而斯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又把三种收入即名义数量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经济学家奥布利恩（O'Brien）曾说过：“这一章是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笔下最混乱的一章。”

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Wage Real and Money Wage） 货币工资是劳动者获得的以货币表现的劳动力的价值。劳动者获得货币工资后，将货币工资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如果货币购买力发生变化，那么货币工资所能购得生活资料的数量也会随之变化，因此，货币工资的数量仅具有名义上的意义，又称为名义工资。实际工资是指用货币工资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是劳动者实际得到的工资。实际工资中消除了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当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时，名义工资上升，而实际工资却有可能下降；反之，当经济中出现通货紧缩时，名义工资会下降，但实际工资却会有所上升。因此，在衡量工资水平时，必须考虑到物价变动因素，应以实际工资为标准，而不是以货币工资为标准。

早在12世纪，人们就发现实际工资与人口数量有密切关系。人口数量上升，会出现实际工资下降，而人口数量下降，又会出现实际工资的上升。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才对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决定有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称为工资基金说。工资基金说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工资的资本总额，即工资基金是一定的，同时，劳动力人数也是固定的，两者相除，即得到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工资，若实际工资低于这一水平，社会人口就会出现下降倾向，使实际工资回升，反之，若实际工资高出这一水平，又会出现实际人口上升倾向，使实际工资回落。许多学者反对工资基金说，他们认为社会一定的工资基金并不存在，而后，1869年，穆勒（J·mill）本人也

放弃了工资基金说。

19 世纪末，克拉克（J·clark）和马歇尔（A·Marshall）又将边际生产力理论用于工资决定领域，提出了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下，各生产要素的价格应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实际工资水平就应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果实际工资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厂商必然会解雇一部分工人，或直接降低工资水平，最终使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如果实际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此时厂商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原有的厂商会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也会有新厂商加入竞争，从而提高实际工资水平，直至又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有片面性的，它仅从劳动的需求方面讨论了工资决定问题，而忽视了劳动的供给面；同时，它仅是静态理论，从动态来看，由于工资具有稳定性，工资的变化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并非经常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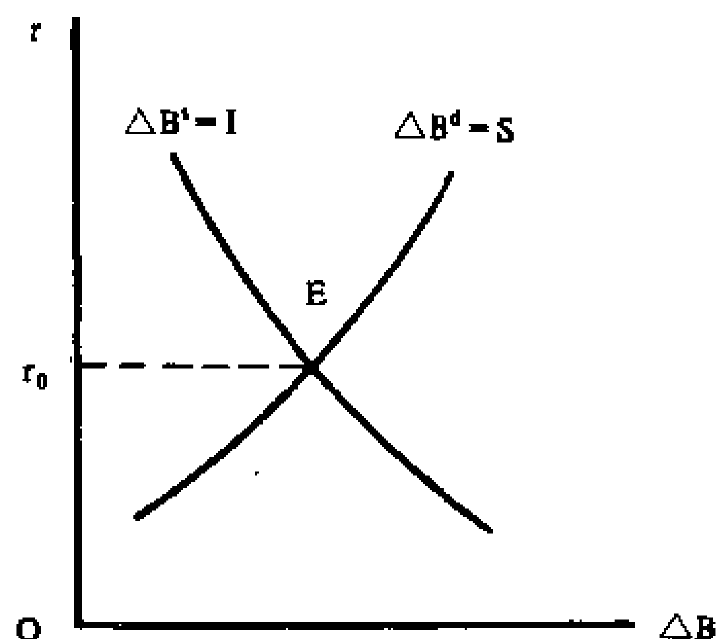
实际可贷资金理论（Real Loanable Funds Theory）　古典经济学派的利率决定理论，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奥国经济家 E·庞巴维克所完成。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实际储蓄与投资决定了利率水平。这就是说，投资者以投资的收益来支付利息，储蓄者由利息来补偿牺牲现期消费的损失，当实际储蓄与实际投资相等时决定了利率水平。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ΔB 代表增加的债券量，纵轴 r 代表利率，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Delta B^s=I$，代表对增加的债券的需求量，即储蓄，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Delta B^d=s$ 代表对增加的债券的供给量，即投资。这两者相等决定了利率水平为 r_0。按这种理论的解释，厂商的投资所需的资金以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筹集。厂商所发行的债券，即债券的供给（投资）ΔB^s 与利率反方向变动，利率高则投资少，反之亦反之。居民户的储蓄以购买债券的方式进行。居民户所购买的债券，即债券的需求（储蓄）ΔB^d 与利率同反方变动，利率高则储蓄多，反之亦反之。而且，由于投资与储蓄均为流量，所以，债券的供给与需求也为流量，即这里指的债券的供给与需求都是指现期的变动量(ΔB。这样，利率决定的条件就是：

$$\Delta B^d=\Delta B^s$$

或者

$$S=I$$

这一理论说明了利率决定的基本原理。但它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对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汉有考虑到居民户还要持有货币，以及厂商的投资还可以来源于自有资金，并且把债券的发行与购买作为投资与储蓄的唯一形式。这样，该理论就过于简单化了。



实际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　衡量一国居民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由 M·D·莫里斯于 1977 年提出。其中包括识字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三项内容，并以瑞典水平为基准计算出综合指数。目的是为了克服 GNP 这类指标本身的局限性，更好地比较和反映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由于人均收入增长的指标不能充分反映居民生活的质量，因而需要用其他的指标来补充。而识字率是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发展的程度的反映；预期寿命指数由营养、公共卫生、收入和一般环境等指数综合而来；婴儿死亡率则反映饮用水的净化程度、居住的环境条件、母亲的健康状况等。实际生活质量指数直接简单、明了、着重于产出而不是投入，从而可作为 GNP 的补充以衡量经济发展。但也有人指出了它的缺点。如指数内涵过于狭窄，没有包括就业、住房等指标；指数概念不够清楚，识字率似乎与物质生活质量没有直接联系，而与健康有关的发病率却未得到反映；3 个指标含义的轻重不同，却未得到适当加权；指数不能表现各个阶层的卫生健康的实际状况等。

实际余额效应（Real Balance Effect）　实际货币量变动对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影响。实际货币量由名义货币量与价格水平决定。因此，名义货币量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货币量变动及由此产生的对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影响都称为实际余额效应。名义货币量的增加或价格水平的下降都会使实际货币量增加。这样，人们所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了。人们以货币、债券、股票、不动产等多种形式持有自己的财富，并使各种财富的形式保持一定的比例。当货币量增加之后，人们为了使财富的各种形式仍保持原有的比例；就要增加各种支出，从而增加了对商品和劳务

的需求，增加了国民收入。对实际余额效应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实际货币量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总需求，这种解释由英国经济学家A·庇古提出，并由以色列经济学家D·帕廷金（D.Patinkin）加以发展，被称为庇古效应。用IS—LM模型来解释，庇古效应强调了实际余额变动对IS曲线的影响，如附图1所示。在附图1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由总需求决定），纵轴oi代表利率水平。IS曲线IS_0与LM相交于E_0，决定了国民收入为Y_0，利率水平为i_0。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加或价格水平下降，使实际货币量增加，个人实际余额量增加所引起的资产比例调整会导致对商品与劳务需求的增加。从而实际余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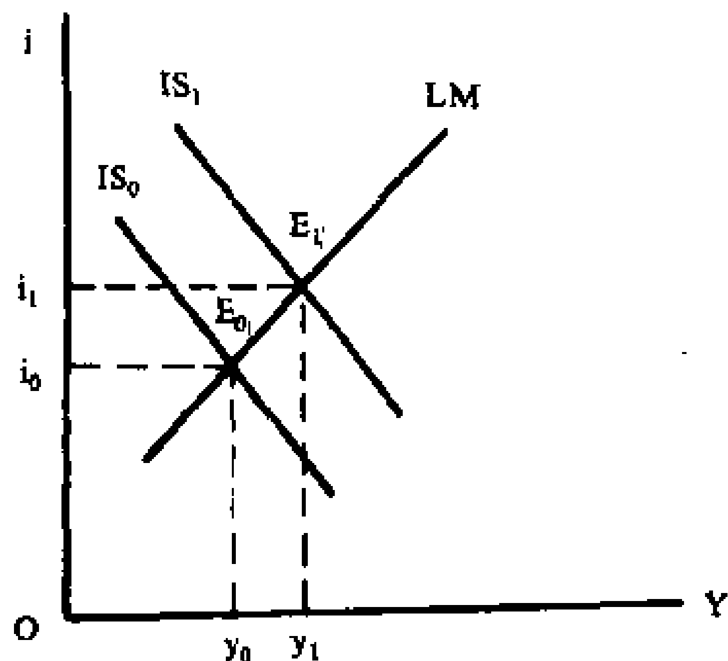


图1

的增加直接使总需求增加，IS曲线从IS_0向右上方移动至IS_1，IS_1与LM相交于E_1，使国民收入增加为Y_1，利率上升为i_1。另一种解释是认为实际货币量的增加首先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这时实际余额效应是间接的，这种解释由凯恩斯提出，故称凯恩斯效应。用IS—LM模型来解释，凯恩斯效应强调了实际余额变动对LM曲线的影响，如附图2所示。在附图2中，实际余额的增加使LM曲线从LM_0向右下方移动到LM_1，LM_1与IS相交于E_1，首先使利率从i_0下降至i_1，然后通过利率的作用使总需求与国民收入从Y_0增加到Y_1。实际余额效应被认为解决了货币理论和经济理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说明了货币量变动与国民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这就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货币与经济分割开来的古典二分法。第二、说明了名义货币量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这就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古典二分法中得出的货币中性论，即名义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价格水平这类名义变量，而不影响产量这类实际变量。第三、由于实际余额效应，货币需求的变动小于价格水平的变动，而不象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货币需求与价格水平同比例变动（即货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一）。第四、根据凯恩斯的解释，即使价格有完全伸缩性，也不能保证实现充分就业。因为价格变动要通过对实际余额和利率的影响间接地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但由于流动偏好的存在，利率的下降是有一定限度的。实际余额效应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重视，但对于实际余额效应发生作用的过程仍有不同的解释，对实际余额效应大小的估计也并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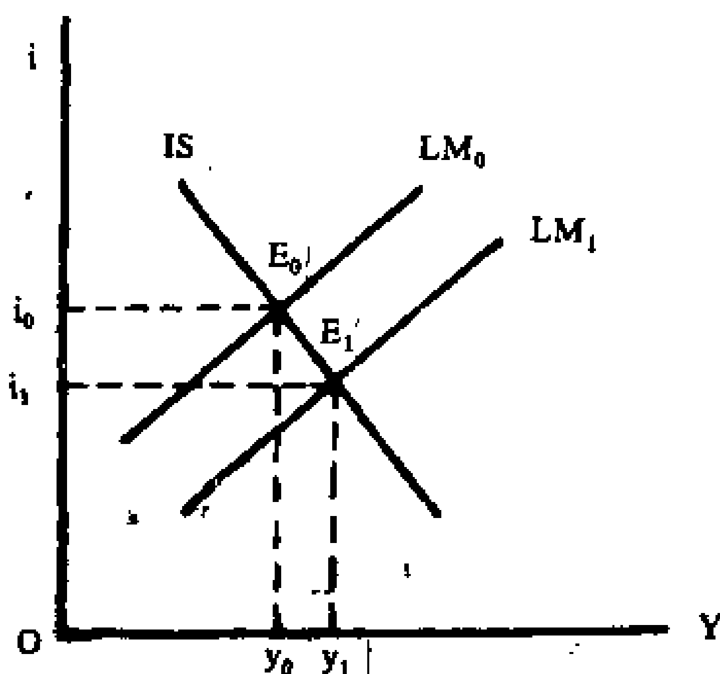


图2

实施时滞（Administration Lag）　又称"行动时滞"（action Lag），是从作出某种政策决定到付诸实施之前的时间间隔。实施时滞属于内在时滞的一部分，在决策时滞之后。不同的经济政策所需要的实施时滞是不同的，它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决定与实施，所以，实施时滞很短，几乎为零，即在作出某种政策决定后马上可以付诸实施。财政政策由议会通过，总统批准后，由有关政府部门实施，从而实施时滞也较长。但总体上看，实施时滞是较短的，从作出某项政策决策到付诸实施之间所需要的时间间隔并不长。因此，实施时滞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并不大。

实盘（Offer With Engagement）　实盘是发盘的一种，与虚盘相对应。鉴于世界各国法律对发盘的解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我国进出口公司根据对外贸易的实践经验，将发盘分为实盘和虚盘两种。这里实盘与虚盘的区分主要看发盘人在受盘人接受其发盘后是否承担订立合同的法律责任。实盘是指对发盘人有约束力的发盘，作为一项实盘，它的措词须具有明确性、完整性，并且没有保留条件。一般都规定由实盘的有效期以及其它表示不可撤销的词句。实盘一经受盘人在有效期内无条件地表示接受，即成立对双方均具约束力的合同。

实际全损（Actual Total Loss; Absolate Total Loss） 又称为绝对全损。被保险货物的实际全损通常是指下面四种情况:

(1) 被保险货物的完全灭失，例如，由于火灾、货物被完全烧毁;

(2) 被保险货物由于损害而丧失其原有的用途和价值，例如，茶叶由于水浸而无商业价值，水泥由于水浸而成为硬块;

(3) 被保险人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被保险货物的所有权，如发生战争，货物被敌国所捕获或没收;

(4) 受载货物的船舶失踪，经过一段合理时间之后仍无消息。

实际全损的四种情况是英国海上货物保险法确定的实际全损的范围。

在海运货物保险中，并非整张保险单所列全部货物的全部损失才构成全损，以分组计算的整组货物的全部灭失，或货物整件灭失，整条驳船货物的灭失都可以作为全损处理。

实证经济学（Porsitive Economics） 西方经济学中与"规范经济学"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类别。它企图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首先对所研究的变量的含义作出明确的规定，然后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提出假说，并据此对未来作出预测，最后用经验事实来验证。如果预测是对的，那么假说就成为正确的理论;反之，就要作出修改，甚至提出新的假说。例如，关于货币量的计算。根据费雪方程 $M \cdot V = P \cdot Q$，其中 M 为货币量或货币存量，V 为流通速度，P 为价格指数，Q 为不变价格的生产量。费雪方程用来判定现在或过去的货币存量或货币流通速度，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物价上涨。这种理论已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实证经济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回答的是"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例如，现在市场的货币量是多还是少，物价的趋势是升还是降等。(2) 它所研究的内容具有客观性，其结论也可以验证。例如，物价的走势在不远之后就成为现实，事实可以说明所用的判断是真还是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很快，要快于规范经济学的发展。

法人经济（Corporate Economy） 本世纪以来，在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的一些国家中，大型工业企业不断出现，把持着很大一部分产品生产与销售权利，成为经济生活中一支不可轻视的新生力量。人们就把具有这种经济特征的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称为"法人经济"。在法人经济中，由于大型企业的特有的与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企业的行为与发展及其对整个经济所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就显得必要而且迫切。

1.微观理论基础

对法人经济中的企业组织进行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首先是 A·马歇尔的有关分析。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均衡价格论"，通过使市场上供求相等时的均衡价格将供求理论、边际效用论以及生产费用论溶为一体，形成一个局部均衡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马歇尔对个别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有成效的探索研究，在供给方面，他研究了生产成本与供给规律，其中包括成本与收益、收益递增与递减规律、替代原则以及供给曲线和供给弹性等等。马歇尔十分重视企业的成本与效益分析，认为企业应当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水平，从而增加利润，保证企业的发展壮大。另外值得重视的一点是，马歇尔第一个明确地将"组织"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成为继土地、劳动与资本之后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他的理由是:"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私人所有，而其它部分则不是私人所有。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组织则有助于知识，它有许多形式……"。马歇尔还专门以一章的篇幅探讨工业组织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他的上述研究对于后来企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起着不可轻视的影响作用。

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前提假设基础上的。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有无数个企业与消费者，他们只能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都不能对价格施加影响。但是，在经济现实中，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企业规模日益庞大，少数最大的企业已经控制了某个行业或者某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从而演化为寡头或者垄断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关于企业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显然无法很好地对现实情况作出解释。1933 年，美国的张伯仑和英国的罗宾逊等人分别同时发表了《垄断竞争理论》与《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改变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的有关分析，设立了垄断竞争理论（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完全竞争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在它的另一极是完全垄断的情况，在这两极之间的垄断竞争才是本世纪以来更为常见的情况。在这一前提之下建立起来的企业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及市场价格理论更接近现实，也为研究法人经济中大企业的行为与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2.管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

有关企业行为与管理的思想兴起于 19 世纪末期，到今天已将近一个世纪。它的发展演变大约经历了 3 个阶段。

(1) 管理思想的确立阶段

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中，大机器生产飞速发展，可是对企业的管理还是凭以往的经验办事，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改进管理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泰罗曾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他首先对当时普遍的做法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改进的意见，他还试图通过减少疲劳、科学的选择以及使工人的能力适合工作的需要以及刺激性的奖励计划等等来实现最大限度的个人发展与收益。泰罗所设计的目标只有在劳资双方的利益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才能顺利实现，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泰罗终于创立了"科学管理制度"，从而取代了落后的经验管理，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的专著《计件工资制》、《车间管理》与《科学管理原理》中。泰罗本人也成为"科学管理之父"。

美国的弗兰克·吉尔布雷恩与莉莲·吉尔布雷恩夫妇发展了泰罗的工时研究，扩大了疲劳因素研究的范围，并且对科学管理中的心理学给予了必要的强调。他们所著的《疲劳研究》、《时间研究》以及《管理心理学》等著作也成为科学管理的奠基之作。

法国的亨利·法约尔以大企业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经营活动与管理活动，还强调了管理教育的重要性。他的研究成果同样对现代企业管理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学者或实际部门的有关人员对企业走向科学管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实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企业经营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2) 管理思想的成熟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经济危机频繁，法人经济中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缓和矛盾，提高工人的劳动织极性，西方学者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有关内容引入企业管理思想中，提出要研究工人在生产中的行为以及造成这些行为的原因，来改善管理，调节人际关系。人们将此称为"行为科学研究"。

最先对行为科学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的培尔顿·梅奥与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他们曾参与了著名的"霍桑实验"，并得出以下结论：传统的企业管理将人看成只追求金钱的"经济人"，而"霍桑实验"则把人看成"社会人"，除了金钱之外，他们更需要感情、安全感与归属感。另外，这个实验还告诉人们，士气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企业中存在的"非正式团体"的作用不可轻视，企业领导应当通过提高工人的满足度来激发他们的士气，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后来对企业职工行为进行的研究相当广泛而深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及威廉·大内的"Z理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行为与人际关系进行了独到的研究，这对于改善企业中的人际关系、创造一个和谐而团结的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也间接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效率。

(3) 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管理思想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派别，如"社会系统"派、"决策理论"派、"经验主义"派以及"管理科学"派等等。它们的侧重与分析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调整与实验，加以分析归纳而成。其中"社会系统"派以美国的切斯特·巴纳德最为著名，他集中对"组织"进行了分析，并从合作的意义上给了组织以透彻的定义。赫伯特·西蒙继承并发展了巴纳德的有关思想，创立了"决策理论"，认为决策是管理的中心，它贯穿管理的整个过程。另外，西蒙还指出，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最优状态，企业也很难实现最大化利润，现实中作为"决策人"的企业往往追求一个"满意"的目标就可以了。

在这一阶段，企业管理思想大量借助于数量分析方法与工具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线性规划、博奕论、项目评估技术等等，极大地便利了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管理。

3.法人经济中的企业

在法人经济中，大型企业的股份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买卖，而企业越大，持股人就越难对经理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大大分开。

在这种情况下，经理如果只重视追求利润，而不致力于企业本身未来的发展的活，那么虽然在短期内会快速增长，但是持股人看不到企业的发展前景，就会转向其它企业。所以，企业的发展与增长同样重要。

一个管理较好的企业应当能使得雇员与股东的利益达到平衡，使得双方在博奕的谈判中，效用收益与预期的产出之比相等。企业的收益将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雇员、股东以及留存的增长基金。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人或者股东的谈判力下降、或者竞争能力（反映在需求弹性上）降低，那么企业可能会增长得更快。

企业为自身发展奋斗的同时，也为经济创造了增长，这是法人经济发展的源泉，也是它所应当追求的目标。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应当引导企业与整个经济同时发展起来。

法币 (Numeraire) 是指根据政府法令发行，规定在一切公私债务的支付中必须接受的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都同黄金脱钩，普遍由中央银行发行的兑换的纸币作为流通手段。这种纸币即法币不能兑换黄金。在西方经济学

中，一般均衡理论下的某种商品的价格是指用另一种商品来计量时的数量，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也可以用这一种商品的数量来表示。所以法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是不必要的。但由于法币是其他商品价值衡量的标准，所以将法币引进一般均衡理论是有助于分析的。

法律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　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包括三种不同的，但却又互关联的方面：第一，用经济学去说明法律规则的效果；第二，用经济学来决定哪些法律规则在经济上是有效的，目的在于强调法律规则应该怎么样；第三，用经济学去揭示法律规则将是怎么样。第一个方面主要是价格理论的应用，第二个是福利经济学的原则，第三是公共选择的原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去揭示法律效果，一般人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分析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不同于一个非经济学家所期望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考虑法律规则对市场价格的作用；原因之二是经济学家认为法律规则会改变人的行为。在对法律规则应该怎么样和将是怎么样的经济分析时，有两种不同的形式。首先，根据理查德·波斯内的观点，在经济上，一般的法律是有效的。因此，人们就开始探讨到底哪些法律在经济上是有效的，有效的程度如何。其次，根据公共选择的理论，法律的和行政性的规则都是政治大市场的结果，在这个市场上，利益集团通过政府来实现各自的目标。由于利益集团为得到它所欢迎的法律而投入的费用不仅依赖于法律的自身价值，而且依赖于该利益集团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所以花费本身不能准确地代表了该利益集团所欢迎的法律的价值。所以有时无效的法律会被通过。经济学家对法律的分析与法学家等对法律的分析有不同的出发点。经济学将各自不同的法学领域作为一整体来分析，而正是这种整体的分析是过去法学分析所缺少的。

房地产市场（Housing Market）　简而言之，房地产市场就是房地产交换的市场，但这种市场与普通商品的市场很不相同，因为房地产同其他商品相比具有自己明确的特点。第一，房地产的供给成本相对较高，这是由于房地产的生产费用大，生产周期长等因素所引起的。第二，房地产具有耐用性，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消费者提供同样的效用，而不需要经常地更替。第三，房地产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同属于房地产商品，但作为消费品，它们之间是很不相同的。第四，位置的固定性，房地产商品不能随意搬动，在位置上是固定的。此外房地产在供给与需求上不符合普通商品的连续性假定，而且往往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溢价。所有这些都使得房地产市场也具有自己独到的特点。耐同性、异质性和位置的固定性表明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松散相关的但分割的市场，这些分割的次级市场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各个次级市场上的价格不同，理论上认为，在临近定位中，不同次级市场的价格差异不能超过在此处建造一住房单位移到彼处的成本。在不同的地方，次级市场间的价格差异不能超过边际消费者运输成本的微分。但实际上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机制要复杂得多。由于房地产相对较高的供给成本，这就大大限制了供给者的范围，同时对需求一方的购买力要求就比较高。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及供给与需求数量的决定的理论研究显得十分艰难。要在长期以动态角度看，房地产投资常常具有投机性，也就是说投资的收益不仅有利润和利息的成分。而且还有一个时间溢价。这也许是由于房地产的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还可能是由于地产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在数量上具有固定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房地市场的认识还不十分深刻和完善。

规模报酬（Return To Scale）　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生产规模的变动即所有投入要素同比例变动所引起的产出的变动称为规模报酬。生产规模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种情况：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规模报酬递增是指所有投入扩大某同一比例后，产出扩大的比例大于投入扩大的比例。规模报酬递减是指所有投入扩大某同一比例后，产出扩大的比例小于投入扩大的比例。规模报酬不变又称常数规模报酬，它是指所有的投入扩大某同一比例后，产出扩大的比例与投入扩大的比例相同。例如，用资本与劳动两种投入生产某种产品，假定资本与劳动的投入是原来的2倍，若产出也是原产出的2倍，则称为规模报酬不变；若产出大于原产出的2倍，则称为规模报酬递增；若产出不到原产出的2倍出称为规模报酬递减。

对规模报酬递增、递减、不变三种情况可以用数学形式严格定义。设生产函数的形式为：$q=f(K,L)$

若两种投入的要素K，L都增加一个倍数$\lambda(\lambda>1)$，这表示规模的扩大。在规模扩大了八倍以后，产出q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1)、若$f(\lambda K,\lambda L)>\lambda f(K,L)$,则称该函数为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

(2)、若$f(\lambda K,\lambda L)<\lambda f(K,L)$，则称该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

(3)、若$f(\lambda K,\lambda L)=\lambda f(K,L)$，则称该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

常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简单形式为：

$$q=AL^{\alpha}K^{1-\alpha}\qquad(0<\alpha<1)$$

不难证明它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

规模经济学（Economics Of Buscaleate）　规模经济指的是经济实体中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对于同一个经济实体，其规模的变化往往会伴随着生产效益的变化，如果合理地安排各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相对比例，就可以达到一个适度的经济规模，从而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规模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实体的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

规模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影响经济规模的因素、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经济规模结构、衡量经济规模的方法与体系，经济规模的发展变化规律等等。

根据经济实体的不同层次，规模经济学的研究也分为不同的层次。设备规模与企业规模等属于微观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规模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是企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并据此确定一个适当的经济规模，以便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处于最优状态。在宏观层次上，如产业规模、部门规模等等，规模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则是在一个更大的领域范畴内，如何安排生产资源，以实现最优经济规模；实现这一最优经济规模的制约因素有哪些，经济结构规模的发展规律怎样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帮助经济决策人找出实现最佳经济规模的方法及其相应的政策，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率。在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中，规模经济学要重点研究的层次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主要研究微观层次上的经济规模问题，而计划经济则主要探讨宏观层次上经济规模的发展趋势。

规模经济还可分为内部规模与外部规模。内部规模指的是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应性关系，而外部规模则指的是经济实体所处的外部环境中存在的各种规模，如资源规模、市场规模以及能源规模等等。外部经济规模对于经济实体的效率的影响不可轻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外部规模则指的是国际经济中与之相关的各种规模。在考察一个经济实体的速度经济规模的时候，必须将它的内部规模与外部规模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偏废哪一方面，都会导致决策上的失误。

规模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生产的初始阶段，当实体规模扩大时，成本随之下降，从而收益增加，但是到了某一限度之后，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降低成本，反而会导致成本的上升，使经济效益降低。可见，经济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不合适，关键在于把握合理经济规模的“度”，而这又要求在进行研究时，考虑到时间、地点以及经济实体的具体条件等因素，不能不顾具体情况，搞一刀切。

规模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通过制针业的例子说明了大规模生产对于促进专业分工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后来，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大生产也作了许多探讨，认为它不但促进了劳动分工协作，而且还保证了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并进而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界对规模经济问题一直很重视，其中的投入—产出分析理论以及规模收益变化规律的理论就是对规模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规模经济理论除了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结构进行分析，并提供决策的依据以外，还可以用于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范围以及垄断程度进行分析。

在我国，对规模经济进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规模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实践的需要使得尽快研究与发展规模经济学成为当务之急。

规模经济与不经济（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考虑在给定技术的条件下生产某种产出时的单位成本，如果在某个产出阶段，其平均成本是下降的（或上升的），那么就说在该产出阶段，存在着规模经济（或不经济），这个定义着眼于技术特征的经济和不经济，有时候也可以扩充到非生产性的其他经济活动（比如：市场、融资和培训等）。与规模经济与不经济有着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概念是规模报酬：产出和投入比例均保持不变，比较由给定的投入向量 X 所生产出的产量 f(x)和由投入向量 $\lambda x(\lambda>1)$所生产出的产量 $f(\lambda x)$，如果 $f(\lambda x)$大于（或小于、等于）$\lambda f_{(x)}$，那么就说规模递增（或递减、不变）。在某些条件下，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等同于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如果 f 是一个严格的凹函数，并且 $f_{(0)}\geqslant 0$，或者 f 是一个小于 1 次的齐次函数，那么就会有递减的规模收益，相反，如果 f 是大于 1 次的齐次函数，则是规模收益递增。有时候也可以不从单个厂商而从总体角度考虑规模经济与不经济，即内部经济（或不经济）和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例如：有两个厂商，其成本函数为 $C_j(y_j)=K_jy_j$　$j=1,2$，K_i 为厂商 i 的参数，这是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现假定 K_i 事实上依赖于另外一个厂商的产出水平，如 $K_i=[y_j]^{\beta}$，此时两个厂商的总成本为：

$$[y_2]^{\beta}y_1+[y_1]^{\beta}y_2$$

如果 $\beta<0$ 则为外部经济，如果 $\beta>0$ 则为外部不经济。

规模报酬递减意味着所有的投入增加 1 倍时，所

生产出的产出小于原来产出的两倍，但是一个详尽地列出了所有的生产要素的生产过程，应能生产出两倍的产出，因此，产出未能增加一倍，只能意味着存在着某个额外的投入，这个投入未能出现在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中，当其它投入都增加1倍时，它并未也相应地增加1倍。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这个地租理论的根据就是不可能将给定的农业土地增加1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额外投入应被理解为管理技能。这种解释也可以运用到外部不经济和外部经济情况，如果这个额外投入是公用的但数量有限时，就是外部不经济情况，相反，如果这个额外投入在产业活动中可以增加，那么就是外部经济情况。

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　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提出某些标准作为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规范和确立经济理论的前提，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据。规范经济学有两个特点，（1）它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应该是怎样的。而与之区别的实证经济学要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即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怎样解决。（2）它所研究的内容没有客观性、研究出的结论也无法通过经验事实来直接验证，而实证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具有客观性，它的结论是否正确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验证。在西方，最早对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作出区分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和大卫·休谟。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主要是规范经济学，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短缺经济学等则主要是实证经济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规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研究受到很大限制，而要使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抛开价值判断问题，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规范经济学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中，规范分析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环境经济学（Enviromental Economics）　一门植根于外部经济和不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以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科。

经济学界在早期一般认为如果一种有价值的资源的财产权不能被明确的话，那么一个使用者的行为除非通过市场上的交换不会对其它的使用者发生影响，但是无限制的私人交换将产生外部不经济，从而带来经济的无效率。而财产的确定的所有权则被认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石。60年代，柯斯、布坎南等人在使概念系统化和对政策进行解释方面又向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在60年代末，至少发现了一种与现代生活和生产行为带来的残余物的处置有关的外部不经济，其行为方式与上述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现代福利经济学认为如果（1）消费者的偏好顺序和生产者的生产方程无关而且它们的形状被适当地限定，（2）消费者根据给定的收入和价格使效用最大化，（3）生产者根据价格的限制使利润最大化，那么将存在这样一组价格，在这组价格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不使别人的经济状况恶化的前提下使自己的状况改善，帕累托最优就可以通过一种价格机制和自愿的非集中的交换达到。

但是对于上述的与残余物有关的外部不经济问题来说，如果环境吸收这些残余物的能力达到饱和的话，自愿的非集中的交换将不可能不带来技术性的外生不经济，除非（1）所有的投入品都充分地转化为产品，而所有的最终产品在消费过程中都被彻底地消耗掉，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残余物，或者（2）所有有关的环境资源都被赋予明确的财产权，而这种财产权又可以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进行交换，但是任何一个条件在现实经济中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许多福利经济学的结论是无效的。

水和空气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免费商品。但在经济发展中，它们变得越来越珍贵，而且给社会带来了重要而又困难的配置问题，这个问题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而加剧。

环境经济学今后会向很多方面发展，其中主要的有：（1）怎样对环境质量做出判断？（2）怎样衡量改变环境质量的成本和收益？（3）怎样实施有关改变或保持环境质量的决定？（4）有关环境质量的决定将怎样影响整个经济？

环境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早期，环境经济学从工程学、进化论中吸取了许多理论，现在它必须加强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联系，以求得不断的进步。

拍卖人（Auctioneer）　一般意义上的拍卖人是指在拍卖市场上促使买卖双方之间确定一个可以相互接受的价格的代理人，因此可以说是拍卖市场的交易的组织者，组织的方式是通过叫出一系列的拍卖价格，直到买卖双方都愿接受此价格，且使得过度需求与过度供给都不存在，交易就算完成。瓦尔拉斯就把拍卖人的这种作用引入他的一般均衡模型，在他那里的市场上是有一个虚构拍卖人，有时称之为瓦尔拉斯拍卖人，他的作用是在市场上高声叫出一组不同的价格，使得市场按照类似于交易所的方式进行交易，最后买卖双方接受的价格正好使市场供求达到平衡。这个拍卖人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七个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

拍卖（Auction） 拍卖是指专门从事拍卖的机构（拍卖行），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公开竞购的办法，把拍卖的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作为一种古老的贸易方式，拍卖是一种现货交易。这种交易并不是在买卖双方之间直接开展的，而是由拍卖行依照一定的法律和规则组织进行的。按照拍卖规则，凡参加拍卖的货物都必须预先存人拍卖行仓库，以便进行拣选和分类，然后由拍卖行根据货物情况编印拍卖目录向社会公布。拍卖行贴出的拍卖通知应包括货物的品种、存放地点、拍卖的时间和地点等内容。有意购买者可在拍卖前到仓库看货，以便制定竞购计划。一般来说，拍卖方式买卖时间短、成交数量大。一些大型的国际拍卖，集中了各个不同来源的不同品质的各种商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买主，因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贸易中心。某些商品的拍卖价格对同类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属于拍卖的商品大多是一些品质不易标准化或不能长期保存的大宗商品，以及历史上有拍卖习惯的商品。由于是现场交易，品质不易标准化的商品采用拍卖方式，通过现场看货，有利于促成交易。不能长期保存的商品通过拍卖能尽快把商品送到买主手中，避免商品腐烂或失效造成的损失。具体地讲，拍卖的商品主要有茶叶、烟草、香料、羊毛、水果、蔬菜、鲜活品以及古玩、艺术品等。另外，有些商人采用拍卖方式来推销新产品，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打开日后的销路。

拍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增价拍卖、减价拍卖和投标式拍卖。增价拍卖是最主要的拍卖方式，它又可分为买方增价拍卖和卖方增价拍卖两种。前者是指由拍卖人在拍卖某商品时首先宣布最低价格，然后由买方根据拍卖规则规定的加价额度竞相加价，直至无人继续加价时，拍卖人即敲打木槌，表示拍板成交，把该商品卖给加价最高的买主。后者是指由拍卖人喊出逐渐增高的价格，买主不叫价，而是用各种约定的手势表示愿意购买。最后，拍卖人把该商品卖给最后做手势的买者，也就是愿以最高价购买该商品的买者。卖方增价拍卖又叫无声拍卖。减价拍卖又叫荷兰式拍卖，这是指先由拍卖人喊出最高价格，如无买主愿意购买，拍卖人便逐渐降低售价，直至有人愿意购买时即拍板成交。投标式拍卖又叫"密封递价"拍卖。采用这种拍卖方式，事先由拍卖人公布专家对该商品的估价，然后由买者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自己的出价放在密封信件内寄给拍卖人。经拍卖人比较后，把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并向社会公布买主的姓名。从拍卖行来说，拍卖成交后，它可以从买主那里得到一笔相当于商品售价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报酬。

直接投资（Direct Investment） 指的是购买设备、建立厂房以进行生产或者设店进行经营的活动。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国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直接投资。国外直接投资指的是某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政府在其它国家以自己的名义设厂生产产品或者设店提供服务，他们对所投资的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具有全权。这种外资的流入必然伴随着管理技巧与技术工艺的输入。至于国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一般说来，私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他们看到其它国家比本国的税率低、生产要素质好价廉以及政局稳定等等，或者由于汇率变动将带来的好处，于是决定在这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获得高额利润。对于政府来说，进行国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则多是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以及长期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需要。对于投资国来说，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并实现盈利以外的某些目的。但是如果流到国外的资本太多，也会导致投资国出现赤字。对于被投资国来说，国外的直接投资可以补充国内投资的不足部分，通过乘数作用加快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使出口量增大，贸易繁荣；此外，被投资国还可以从中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与科学技术，提高本国企业人员的素质。但是另一方面，国外直接投资也可能使被投资国处于被控制、被剥削甚至被奴役的地位。因此，是否接受一次国外直接投资，要根据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投资所附带的条件，认真研究之后再作出决定。另一类直接投资即是国内直接投资，它指的是企业或者政府在本国直接建厂或设店进行生产或者提供服务。它的目的在于不断发展生产与服务，以跟上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变化速度，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使经济走向繁荣。进行国内直接投资的目的还包括对领土上的开发等等。在西方国家，国内直接投资基本上是由私有企业按本身的计划进行的，它的原则是寻求最大利润，政府只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内直接投资几乎全部由政府进行统筹安排，企业要服从整体的需要。

直接税（Direct Taxes） 直接税原意是由课征对象实际支付的税款，它与间接税相对立。二者的区分传统上或习惯上是依靠这二种税的不用效应。税收的效应是指谁承受由于这种税的征收而产生的收入和福利上的损失。如果付税者有能力把部分或全部税赋责任转嫁到某些其他单位上去，付税者就不是最后的承担者。转嫁税收负担的可能性大小依赖于课税的要素或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直接税是那些支付

的法律责任和最终影响都可识别的税收。间接税是那些税收被转嫁，主要由最后消费者承担的税。所得税一般被认为是直接税，商品税是间接税。这是假设要素供给是完全无弹性而商品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从实证的角度，这是极端的情况而不是普遍真理。实际上，一切税收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不是完全地被转嫁，直接税主要包括对个人和公司征收的所得税。在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出现之前，专门的财产税是税收的一个主要来源。但这只有在财产形式主要是不动产和税收要求相对不大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很多国家还保留着财产税，但没有一个国家的财产税是税收的主要贡献。对资本转移、遗产或有时大额的赠予也要征税。这些都是直接税。

直达提单（Direct Blc）　又称直运提单。直达提单表明货物运输过程中，不发生转船现象，由装运港直接运到目的港。直达提单上只写明装运港和目的港的名称，没有'中途转船'之类的批注。

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买方一般都愿意采用直达提单。这是因为如果货物需中途转船，常常要增加装卸费用，还要冒货物残损等风险，若出现无法及时转船运输的情况，货物也就无法准时到达目的港。这样，只是在必须转船的条件下，才会不得以为之。

直接标价（Direct Quotation）　又称"应付标价"，"间接标价"的对称。以本国货币表示外国货币价格的标价方法。按照该标价方法，外国货币的数量固定不变，一般是1单位或100单位外币，少数的也用1万或10万外币单位，外币的数额是一可变量，无论是本币还是外币币值发生变动，改变的都是本币的量。若一定单位外币折合的本币增加，说明外币的汇率上升，即外币币值上升或本币币值下跌。若一定单位外币折合的本币数减少，则相反。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直接标价，我国亦然。。参见"间接标价"。

直接套汇（Direct Arbitrage）　又称"两角套汇"或"两地套汇"。见"地点套汇"。

直接抵免（Direct Credit）　它是相对于间接抵免而言的对同一跨国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直接向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缴纳的税额实行的抵免方法。它所适用的人的范围包括同一跨国自然人与同一跨国法人的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直接抵免方法强调只对直接向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缴纳的税额给予抵免，对于非直接缴纳的税款则不予抵免，这就排除了对母公司来自子公司的收入给予直接抵免的可能，因为母公司和子公司是不同的跨国法人，母公司并未直接向子公司所在国纳税。从跨国法人言，直接抵免只适用于同一跨国法人的总分支机构之间的收入转移。

一般而言，直接抵免的数额可以包括跨国纳税人在国外缴纳的全部税额，但前提是，这一数额不得超过跨国纳税人国外应税所得按国内税率所应承担的纳税义务，亦即存在一个抵免限额，如果跨国纳税人在国外已缴纳的税额未超过这个抵免限额，当然可以全额抵免；而如果超过了抵免限额则对超额部分不予抵免。（参见"抵免限额"）

直接抵免的计算公式是：

跨国纳税人在居住国应纳税额＝其国内外全部应税额×居住国税率－允许的直接抵免额

所谓允许的直接抵免额就是指将跨国纳税人国外已纳税额与直接抵免限额比较后所选取的较小的数额。因此，直接抵免还具有以下特点：①它虽然保证了收入来源地管辖权的优先行使，但由于要补征一部分国外收入的所得税，因而就使得非居住国对跨国纳税人实行的税收优惠措施变得毫无优惠可言，有鉴于此，税民饶让抵免方法已日益引起各国重视；②它虽然保证了居住国居民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但由于存在跨国纳税人国外纳税额小于或等于抵免限额的情形，因此也就可能没有任何税收收益。有鉴于此，各国都对抵免限额的计算进行了符合自己利益的设计。

直接贸易（Direct Trade）　直接贸易是指没有第三国介入的、在商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直接进行的商品买卖活动。直接贸易从商品生产国来说是直接出口，这是指它把自己生产的商品直接出口到消费国。直接贸易从消费国来说则是直接进口，这是指它直接进口生产国的商品。由于直接贸易最为简便，中间费用较少，贸易者获利较大，因此国际贸易中一般都采用直接贸易的方式。

垄断（Monopoly）　垄断是某种商品或劳务市场上只存在一个卖主而有众多个买主的市场结构。在垄断市场上，卖主对于所出售的商品的数量与价格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按照垄断的特征划分，分自然垄断与非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该行业必须实行垄断的情况。象铁路、城市供水、供电、供暖等行业实行垄断性的经营更符合经济的原则。除此之外的垄断为非自然垄断。按照垄断的组织形式划分可以把垄断分为政府垄断与私人垄断。政府垄断是指由政府垄断经营的业务例如邮政系统的业务。私人垄断是指由个人或私营企业组织控制的业务。私人垄断大致有三个来源：垄断者拥有雄厚的资本、垄断者具

有其他组织或个人所不具有的技艺或才能. 政府特许的垄断. 垄断者，尤其是私人垄断者与其他形式的市场结构的厂商一样目标都在于求得利润的最大化。由于垄断市场上不存在任何竞争者，垄断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与销售量来维持较高的价格、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如果一个行业实行垄断要比该行业实行竞争提供的产量要低。对于资源配置来说，垄断的市场结构比起竞争的市场结构要缺乏效率。正因如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反垄断法与反垄断措施，以限制垄断（自然垄断除外）。

垄断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在古典经济学里，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完全竞争的特点是有许多厂商，进出产业完全自由，产品具有同质性。而完全垄断是指有单个生产者，且产品没有相近的替代品。但理论上的这种假定与现实的市场结构相距甚远。至少有这样一个不成文传统：垄断竞争的理论源于斯拉法（P.Sraffa）。在琼.罗宾逊（J.Robinson）那里也许是真的，但在张伯仑（E.chamberlin）那里就不能这么说。因为正如张伯仑本人所说的那样，在斯拉法1926年的文章发表之前，他的关于垄断竞争的博士论文已基本写成。斯拉法认为竞争均衡所必需的递增边际成本条件并不适合于许多企业，它们也不能被描述为马歇尔的完全垄断。这样就不存在关于企业的一般组织的适宜模型。张伯仑和琼·罗宾逊的工作就是填补极端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空白的。在此之前已有寡头垄断模型，但此模型无法填补上述空白。

1、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既包括垄断的成分，也包含竞争的成分。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也有许多独立的卖者，进出入产业不受限制，厂商生产同类产品，但各自的产品具有差异，即彼此的产品是相近的替代品。除此之外，张伯仑还指出如果每个厂商都面对相近替代品的竞争，所有这些相似品能组成"产品组合"（Product group）。进而假定：（1）存在许多生产相异产品的厂商，（2）产品有相进的替代品；（3）产品组合中的厂商数量足够大以使每个厂商都觉得它的行为会被其竞争者所忽略。（4）所有厂商的成本与需求条件是一致的。

2、垄断竞争的均衡，垄断竞争时厂商生产相异产品，所以要出售更多，价格就要下降，所以需求曲线是下降的。而完全竞争时，需求曲线是水平的。垄断竞争的厂商一方面有一定的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有相似替代品，所以需求的价格弹性很高，控制价格的能力仍然有限。现在我们看看垄断竞争的均衡，假定最初所有厂商定价为 P_1（图 1），代表性厂商此时出售 Q_1。由于此厂商必须接受无法控制其他厂商的定价 P_1，其他厂商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线分别为 d 和 mr。在 OQ_1 的产量水平上，由于此行业内厂商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表明在更大产量上含有更多利润。这样厂商将扩大生产使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产量。此时产量为 Q_2，价格为 P_2。但所有的厂商面对同样的成本与需求条件，所有厂商定价 P_2。其结果是代表性企业将出售 OQ_3 的产量，而不是 OQ_2，即图中 A 点所表示的情况，A 点在代表性厂商的需求曲线 D 上。所有的厂商扩大产量和降低价格．单个厂商的需求曲线向下平移至 d'，与 D 相交于 A 点，此时行业价格为 P_2，新的边际收益线 mr'。这样的调整过程持续下去，直至利润最大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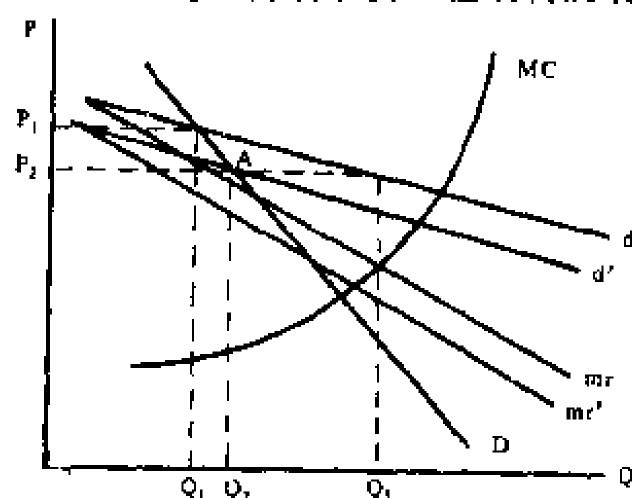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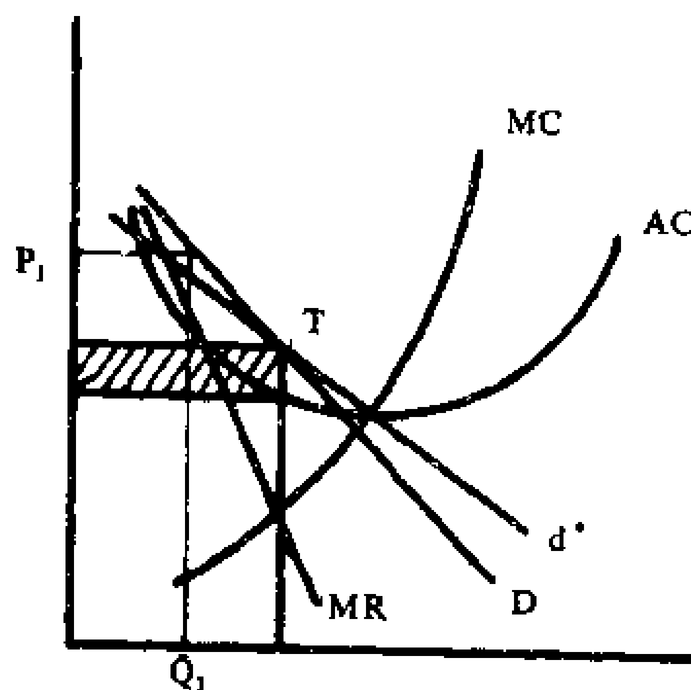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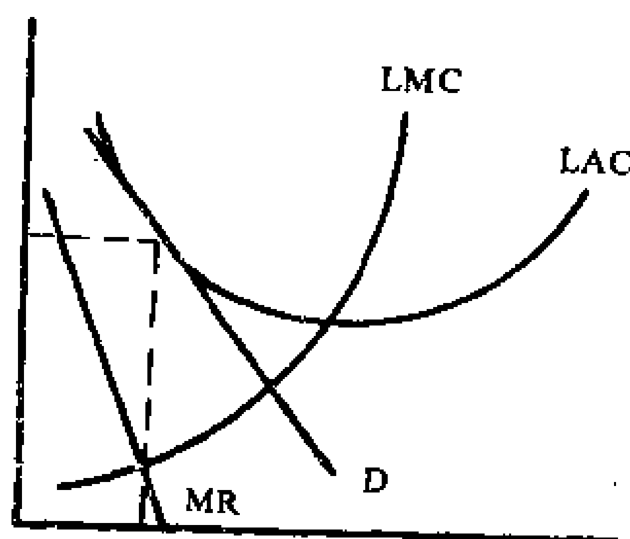


图 3

条件 mr＝mc 得到满足。D 线与 d 线的交点正好是代表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点 T（图 2）。于是在短期内企业没有改变产出与价格的刺激。因此达到短期均衡。很明显，短期均衡时还存在经济利润（图中的阴影部分），因此从长期看，会有更多的厂家加入该行业以剥减经济利润因为它们有寻求高于正常利润的利润的动机，结果使每个厂商用比以前更低的价格出售产品，D 线和 d 线都向原点移动，这意味着更多厂商分享市场，最后使每个厂商的经济利润为零，只获得正常利润。长期均衡如图 3 所示，这时不仅有 MR＝LMC，且 LAC＝P。

3、垄断竞争的特点与完全竞争相比，垄断竞争的长期均衡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 具有剩余生产能力；(2) 经济效率显得更低，这是因为在长期垄断竞争的均衡点，虽然长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但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表明增加一单位的产出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要大于生产者所付出的成本完全竞争时的情形正好与此相反，因为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均衡条件。垄断竞争均衡造成的效率损失与需求曲线的弹性密切相关，弹性越大，价格越接近边际成本，产量限制更小。(3) 非价格竞争。厂商之间的竞争除了价格竞争以外，还有许多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如改变产品质量，销售点的设置，各种售前售后服务，商品包装，等等。这些非价格竞争同样可能出现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但在垄断竞争中则更为普遍。它们可以改变购买者心目中的产品的特征，因此会对生产者带来利益刺激。可以认为厂家改变产品质量和各种服务安排是依从于消费者偏好的，但经济理论上还没有对非价格手段的作用机制作出很明确的论述。广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价格竞争手段，厂商支出广告费用是因为在它们看来因此而带来的收益会大于成本，从而能增加总利润。评估广告的最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广告是否能增加厂商的利润，而在于广告会不会使市场更有效率或相反。这在理论上尚未定论。人们常常把广告分为信息性广告和说服性广告。前者向消费者提供许多有关产品的信息，以帮助消费者作出更佳选择，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因而能使市场功能更有效地起作用。而说服性广告的此种作用则受到很大的怀疑。

垄断竞争理论在 30 年代提出以后时兴一时，此后就被人们所淡忘，直到 70 年代才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兴趣，经济学界对垄断竞争的分析存在各种批评，这也推动着垄断竞争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现在人们对垄断竞争问题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运用传统的瓦尔拉斯均衡和希克斯均衡方法，将社会商品作为它的分析对象，试图把垄断竞争也纳入均衡理论之中。另一类是所谓特征（characteristics）方法。即分析商品的特征而不是商品本身，因为商品特征与垄断力量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但是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分析不同，人们对垄断竞争的研究还存在很大争议。

垄断程度（Degree Of Monopoly）　垄断分为公共垄断与私人垄断两类。公共垄断指的是由一国政府直接经营或者严格监督某些企业或者行业，例如邮电、交通、通讯以及其它公共设施等等，公共垄断的部门多是私人部门不愿投资或者无力进行如此巨额投资的领域，政府兴办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项目，可以极大地便利经济的运行，为其它部门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类垄断是私人垄断，指的是一家或者少数几家企业控制了某种产品或劳务的大部分生产与销售量。它包括独占性垄断、双头垄断与寡头垄断几种类型。这里就说的垄断指的就是这种私人垄断。

19 世纪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起初，人们对它抱着支持的态度，认为通过规模经济可以提高产量、降低价格。但是到了本世纪初，出现了托拉斯、卡特尔等等相当大型的生产联盟，有的已经形成了跨国公司。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如何判断垄断新产生的经济效果，如何判断某个企业或者行业是否处于垄断的状态，这些问题日益为理论界与实业界所关注。人们著书立说，议论纷纷。英国经济学家 J·罗宾逊与美国经济学家 E·张伯仑于 1933 年同时出版了两部论述垄断经济的专著。他们都认为，垄断与竞争不是彼此对立的两极，它们彼此相互融合，不存在没有市场竞争压力的垄断，另一方面，由一些产品以及其它方面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市场分区也可能使某个企业具有定价方面的类似垄断的权力。垄断会导致控制了产品生产与销售的企业通过制订垄断价格、降低产量而牟取高额垄断利润，此外垄断还使得资源不能按照消费者的需要进行配置，它保护落后、不鼓励技术革新甚至阻止新技术的扩散，这必然极大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基于这一考虑，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制订法令，严格限制垄断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对垄断程度的研究成为必要。

为了衡量垄断程度，人们设计了许多指标，这些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垄断的程度，其中比较常用的是"集中率"这个指标，它指的是某个行业中最大的 3—8 家企业在总产量、销售量、就业量或者资产存量中所占的比重。使用"集中率"来衡量垄断程度，测量方便、数据容易找到，也可以大致反映所测行业的垄断情况，但是它没有涉及到最大企业以外的企业的数量与规模。

勒纳与卡莱斯基的某企业产品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来反映垄断程度。此外，还有以企业实际产量与该企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量的比率、企业利润率与该企业"正常"情况下的竞争利润率之比率作为衡量垄断程度的指标，但是在具体测量时会遇到困难。另有利用张伯仑的两条需求曲线斜率之比以及需求交叉弹性思想作为设定指标的基础，不一而足，但是在估计与测量时都会存在精确度的问题。

这些指标各有长处，可以相互补充，它们对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垄断以及掌握各行业中垄断的程度都有所帮助，这些指标在制订反托拉斯法以及公平竞争法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帕西价格指数（Paasche Price Index） 帕西价格指数P是用相对于基期价格 P^0 的现期价格来衡量现期购买数量的成本的一种价格指数。它表示为

$P=\frac{\sum P^1q^1}{\sum p^0q^1}$，其中P为价格，q为数量，上标"1"与"0"分别表示现期与基期，$\sum$ 为求和号。通过比较帕西价格指数与支出指数，可以判断从基期到现期消费者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帕累托定律（Pareto Law） 帕累托定律是说明收入分配格局不变性的一条定律，它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而得名。帕累托对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广泛的统计研究后发现，不管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低如何，收入分配的格局总是一样的。假如用X表示某一收入水平，Y表示收入大于X水平的人数。将X与Y的对数值分别表示在横坐标与纵坐标上，那么，不管考察哪一国家，所形成的曲线总是与Y轴形成56°角，通常相差不会超过3°到4°。这一定律的政策含意是，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变性，要想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态是困难的，只有通过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才能使一国贫困阶层的收入提高。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帕累托最优所描述的是商品生产收入分配达到最优的状况。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是，如果不通过减少至少一种商品的产量或减少至少一个人的效用就不可能使任一种商品的产量或一个人的效用提高。即商品生产与收入分配已经达到不能加以再改进的最佳状况，达到这种最佳状状态后，若继续对资源重新配置或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只会在使一种商品增加的同时使至少一种其它商品产量减少，或在使一个人的效用增加的同时，使其它至少一个人的效用受损。帕累托最优一词由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cfredo pareto）而得名，帕累托最先对商品生产与收入分配的最佳条件给予了精确的定义。

可以用埃奇沃思盒状图分别讨论消费中帕累托最优与生产中的帕累托最优。消费中的帕累托最优是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每个消费这两种商品的消费者来说都是相等的。如果用埃奇沃思盒状图来表示，就是在由埃奇沃思盒状图中消费的契约曲线上的所有点都是帕累托最优点，凡不在契约曲线上的点都不是帕累托最优点。

生产中的帕累托最优是任意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对于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生产来说都是相同的。如果用埃奇沃思盒状图来表示，就是凡是在埃奇沃思盒状图中代表生产的契约曲线上的点都是帕累托最优点，凡是不在契约曲线上的点都不是帕累托最优点。

消费和生产同时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是任意两种资源在任意两种商品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对于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与此同时，任意两种资源在任意两种商品生产中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帕累托最优被广泛地用于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的讨论中。

帕累托，维尔弗雷多（Vilfredo Pareto，1848—1923） 意大利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生于法国巴黎，10岁时随父返意大利。1869年毕业于都灵工艺学院后任工程师。后对经济学发生浓厚兴趣，十分推崇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从1876年起发表了许多经济学论文。1893年继瓦尔拉之后担任洛桑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1906年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义》（1896—1897年）、《社会主义制度》（1902年）、《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年）等。

帕累托作为瓦尔拉的继承者，发展了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他把理论分析同经济资料和数学工具密切结合，扩大了瓦尔拉的分析范围，分别论证了自由竞争、垄断、寡头垄断以及"集体主义"类型的经济状况。他创制了指数函数理论，坚持经济问题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思想，认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具体区别，从而丰富了一般均衡条件的内容。他还主要论述了在既定资源存在稀缺和现存知识有限的条件下，个人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需要，进一步深化着瓦尔拉学说。可以说，帕累托大大精致了一般均衡理论，在这样做时，他作出了一些在经济学史上有独创性的贡献。

他明确地提出序数效用论。他第一个明确地区分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两个概念，前者是指效用的绝对

数值的大小，后者是指效用的相对水平的高低。他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应当从未经证明的关于效用可以测量的假定中推演出来，而须从可观察的经验事实中加以归纳总结，并且应采用偏好的尺度即序数效用来考察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样，帕累托就回避了"主观感觉无法测量和比较"这个难题，为主观价值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他系统地应用无差异曲线工具。在具体论述序数效用论时，帕累托主要使用了无差异曲线分析。他对埃吉渥斯首先倡制的这个分析工具加以改造，摒弃其基数效用论的含意，又运用立体几何图形重新绘制，真正创制出至今广泛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按照无差异曲线的性质，同一条曲线上的任一点所代表的商品组合对经济行为主体没有任何满足上的差异；它都凸向原点，且离原点越远的曲线代表越大的效用；各条无差异曲线彼此不相交。此外，帕累托把无差异曲线分析不仅首先引进其消费者行为理论，而且运用于生产理论，试图用供求均衡模式来取代单纯用边际生产力论解释生产问题的做法。显然，无差异曲线工具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并直接推动着一些微观分析工具的产生。

他独创地论证用于测定经济福利极大化的"最优状态"。他在考察所谓"集合体效用"的极大化问题时明确指出，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的任何重新变动已不可能使有些人的处境更好而又不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坏，其生产资源的配置已处于"最优状态"，意味着集合体的效用和社会经济福利达于极大化。这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它是现代新福利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甚至成为许多计量经济模式的必要基础。

歧视（Discrimination）　又称差别待遇或歧视。在种族和性别等主要方面存在着三种主要类型的差别待遇或不平等待遇。第一种类型甚至发生在被歧视的对象进入市场之前。这种歧视最明显地表现在提供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的教育和正规训练的公共设施质量低劣。第二种类型是就业歧视，意指即使已经把妇女和黑人普遍较低的人力资本禀赋作为符合标准对待，妇女和黑人的工作职位也是吸引力较低的。第三种类型发生在劳动市场中，被称为工资歧视。在这里，少数民族在给定的工作种类中得到的工资低于同种职业的其他工人得到的工资。

对劳动市场中的歧视或差别待遇有三种主要解释："权力"和"偏好"的因素加上信息的外部经济效果。"权力"解释的重点是阐明一个集团以损害另一集团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更为流行的解释是偏好解释，它要求阐明一个集团的成员的活动似乎并不愿意与另一个集团的成员发生联系。无论对雇主一方还是对雇员一方来说，要满足这种偏好就得付出代价。第三种解释与雇员的陈规桓框有关，有时又称为统计上的差别待遇。

歧视经济学（Disoriminating Economics）　歧视通常指的是由于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各个人口群体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歧视经济学就是对造成歧视的原因以及歧视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的系统学科，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歧视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造成歧视的原因、歧视程度的衡量、歧视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等等。

1、造成歧视的原因。

对造成歧视的原因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认为企业与白人工人对于企业内工人的性别、种族等有一定的偏好，这就使得有些工人（如黑人、女性等）被迫以最低工资从事最差的工作。企业若进行歧视，它就提高给白种男性的报酬，以减少企业中的黑人、妇女等工人；白种男性工人若进行歧视，企业就得多给他们报酬，以便使得他们能够与被歧视者共事。无论是企业歧视还是白种男性工人歧视，它们都导致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是要给白种男性工人增加报酬，这就会降低企业的利润。从长期来看，不进行歧视的企业就占了上风，并会逐渐将歧视企业挤出竞争行列，最终存在的企业中，要么完全由白种男性工人组成，要么完全由黑人、妇女以及其他工人组成。但这一推论与事实不符，可见，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造成歧视的原因不十分恰当。

从供给角度分析造成歧视原因的人们认为，歧视出自历史。奴役黑人的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了对黑人的根除蒂固的歧视，即使在废除奴隶制之后，黑人所能得到的权利也远远少于白人，他们也只能从事那些低贱的工作，报酬微薄，直到1954年，美国黑人才在教育与就业方面基本上与白人享受同等待遇。对妇女的歧视也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至少是在妇女足不出户、养尊处优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技术性强的职业都被男性占据了，这一传统沿续至今，妇女虽然已成为劳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仍难以大批挤进诸如工程师、律师、医生等职业，而只能从事如中小学教员、护士等工作。可见，歧视的原因不在于企业，它更多地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在一个人进入劳动市场以前就开始出现了。

2、歧视的经济后果与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是社会内部的制度，如

婚姻、教育以及家庭中的劳动分工等因素在劳动市场及生产力方面产生了群体差别。黑人由于所接受的教育相对较低，所以只能从事又脏又累、报酬微薄的工作。妇女即便与男子的教育、能力背景完全相同，其它日制工作的工资也常是男性同事的60%左右，许多妇女长年处于失业状态，这使得妇女在学校读书时选择非市场导向的专业。此外，婚姻对妇女的就业状况也影响很大，特别当做了母亲之后，许多妇女史是放弃了好工作，而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家庭之中，以支持丈夫更好地工作，并培育下一代。

这种歧视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了黑人、妇女等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埋没了许多人才。如果摒弃歧视，让黑人有同等的受教育与就业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那么肯定会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劳动生产率也会大有提高，许多各方面的新人才也会脱颖而出，这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歧视经济学家指出，政府制订的《均等就业机会法》是针对企业而言的，这对于减少歧视现象是一个必要的措施。但是，企业中的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只是歧视的一种表现，其真正原因多在于歧视首先导致了劳动力素质及生产力的差别，然后才表现为就业中的不平等。要治本，政府就得从社会入手，改变现存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让所有公民真正享有同等的受教育与就业等等权利。

3、歧视程度的衡量

通常由歧视系数表达歧视的程度。歧视系数是当生产力的差距被排除之后，由种族、性别向分的各群体的工资差别中无法解释的因素所占的比重。由于有些数据无法直接观察，且在估差中也存在一定的误差，所以歧视系数不能精确地衡量歧视程度，但是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人口群体之间歧视存在的情况。

歧视经济学的历史比较短，它是在70年代由G.贝克尔创立的，R.弗里曼对它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歧视垄断（Discriminating Monopoly）　指的是私有企业或者政府利用所掌握的垄断优势，对不同的市场或者不同的消费者实行价格歧视的政策。价格歧视指的是，面对不同类型的市场或者消费者，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同，却有不同的价格；或者生产成本不同，但是价格相同。歧视垄断包括下面三种情况：

1、在国内市场上，垄断性生产企业为了获取垄断利润而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实行价格区别对待的政策。之所以能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于产品有着不同的需求曲线，企业按照不同的曲线来收取不同的价格，就会使得利润总额最大。设 π 为企业总利润，Q_i（P_i）为在 P_i 下销售的产品数量，C 为总成本，则企业的目标是：

使 $\pi = P_1Q_1(P_1)+p_2Q_2(p_2)-c(Q_1+Q_2)$ 最大

此时，$MC = P_i \cdot \frac{1+\varepsilon_i}{\varepsilon_i}$

$$\varepsilon i = \frac{dQi}{dP_i} \cdot \frac{P_i}{Q_i} < -1 \qquad (i=1,2)$$

如果垄断性企业实行单一定价，那么只有当 $MC = P(1+\frac{Q}{Q_1q_1+Q_2q_2})$ 时，π 才能达到最大，这制约了企业追求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2、政府在对公共设施进行收费时所实行的价格歧视政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就提到过这种情况，即在制订公路税的时候，对于同等重量的车辆中的豪华车应当收取较高的费用，通过这种办法来"劫富济贫"，实行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服务或产品的边际成本收费的话，那么收入将远远少于建设公共设施与服务所花费的费用。但是，人们为此所愿付出的价格远远高于边际成本，所以，可以按照个人最大的支付意愿收费。这一费用标准与成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却能反映出产品所具有的效用。

设 W 为社会福利水平，B_1（P）与 B_2（P）为在不同需求线下的领域，则政府的目标为：

使 $W = B_1(P_1)+B_2(P_2)-C(Q_1+Q_2)$ 最大

同时满足　$Z = P_1Q_1+P_2Q_2-C(Q_1+Q_2)$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阶条件为：

$$\frac{\triangle Q_1}{Q_1} = \frac{\triangle Q_2}{Q_2} = \lambda$$

它意味着，对每个使用者收取的费用超过该产品边际成本的部分与这个人的需求弹性成比例。

3、对外贸易中，有些企业对外销产品实行低价，而对在国内销售的同类产品则维持较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市场本来就是分割的，产品各有不同之处，所以这种情况使得外销企业很容易维持种垄断性质的地位，通过向国外倾销，企业获取最大利润。不过世界许多国家都对本国生产采取保护性政策，通过实施"反倾销法"来阻止这种歧视垄断的扩展。

在歧视垄断中，第二种情况是公开的、正当的，而另外两种情况则有时是暗中进行的。如果它妨碍了自由竞争、旨在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话，有些国家就要通过"反托拉斯法"来限制它，要求其实施单一定价。

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Discriminatory G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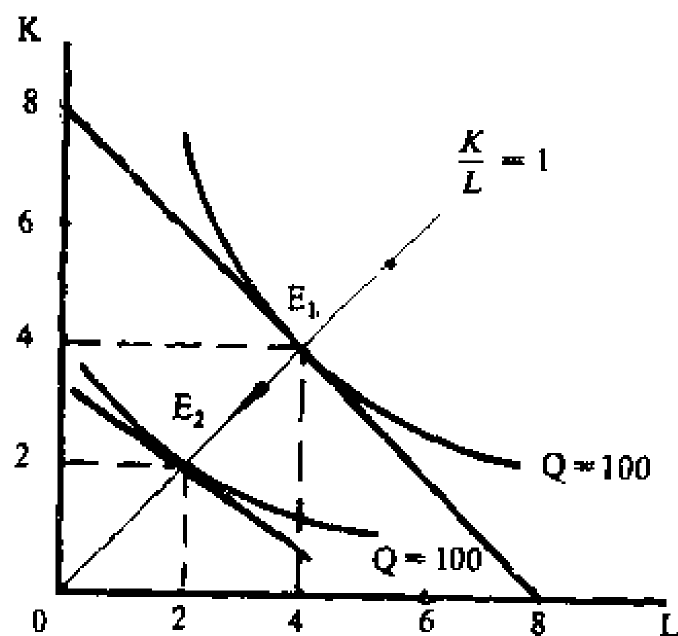
ernment Procurement Policy) 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是指一国通过有关法令，规定政府机构在采购商品时，必须优先购买本国商品，而对外国商品采取歧视和限制政策。由于在不少国家政府机构是某些产品如农产品、高技术产品等的主要购买者，而且它们的购买量又很大，如果让国内外产品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大量外国商品的进口。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使得国外产品无法与国内产品开展正常的竞争，其结果必然会限制国外商品的进口。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有时候表现为不买或少买外国产品，这里所说的外国产品不仅是指完全由国外进口的产品，而且可能还包括那些有一定的成份来自国外的本国加工产品。另外，采购上的歧视还表现在政府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本国产品。所有这些歧视性的采购政策，不仅在此时限制了外国商品的进口，而且还是对国内生产的扶植和支持，这就为将来进一步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创造了条件。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作为一种有效的间接的非关税壁垒被许多国家所采用，但由于它所具有的明显的歧视性，受到了不少国家的反对。为此，在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东京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了一项初步的旨在扩大政府采购市场上的国际竞争的协议，以降低政府采购中的歧视性。尽管如此，政府采购中的歧视性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制约着外国商品的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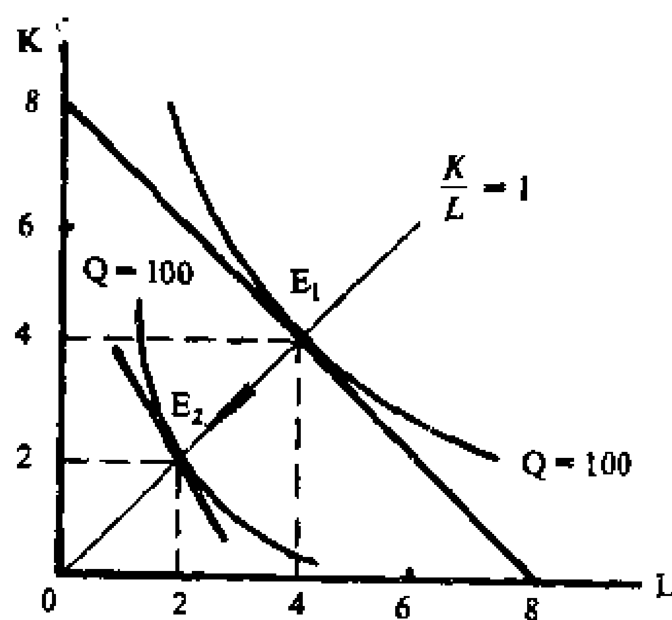
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一个货币单位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购买力是物价指数的倒数。因此，如果五年间物价上涨一倍，五年前所发行的货币的购买力也就下降一半。由于有用来衡量初级市场价格，零售物价和整个经济的各种指标，因而计算衡量购买力的尺度也不同。由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购买力，主要指居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或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因此，购买力指数应按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来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text{货币购买力指数} = \frac{100}{\text{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 \times 100\%$$

一种汇率理论即购买力平价理论，就是根据两国货币的购买力比率关系来确定两国货币的汇率的。按照购力平价理论，如果有代表性的一组货物在美国值两美元，而在法国值十法郎，汇率就应该是一美元等于五法郎。因此，该理论认为：一个平衡的汇率就是使比较的两种通货各自国内购买力相等的汇率。虽然购买力平价理论有它的缺点，即该理论没有说明两种通货间的全面关系，但购买力平价理论所揭示的道理是正确的，一个国家国内的物价指数是其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如果物价上升，货币贬值，即货币购买力下降，必然的结果是本国对外汇率的贬值。

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Capital Us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所划分的三种技术进步即中性技术进步，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中的一种技术进步类型。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是指若用资本与劳动生产某种产品时资本与劳动的组合比例不变，则资本的边际生产提高的幅度大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提高的幅度。因此这种技术进步下在导致等产量曲线向原点移动的同时，也导致等产量曲线斜率（绝对值）降低。下图反映的是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的情况。K 为资本，L 为劳动，Q 为产量，从 E_1 点到 E_2 点便反映了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在发生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情况下，由于生产同样的产量（Q＝100）资本的边际产量大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因此，应该增加资本的投入。所以此种技术进步称为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又称为资本深化或者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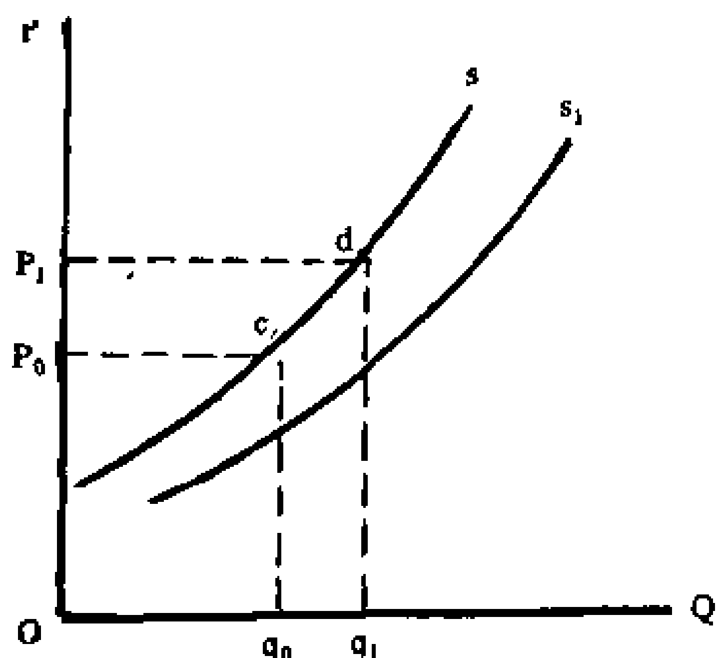




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Labor-us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英国经济学家布克斯所划分的三种技术进步，即中性技术进步，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中的一种技术进步类型。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是指若用资本与劳动两种要素生产某种产品

时资本与劳动的组合比例不变，则资本的边际产量提高的幅度小于劳动的边际产量提高的幅度，因此，这种技术进步下在导致等产量曲线向原点移动的同时，也导致等产量曲线斜率（绝对值）提高。下图反映的是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的情况。K 为资本，L 为劳动，Q 为产量，从 E_1 点到 E_2 点便反映了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在发生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由于生产同样的产量（Q=100）劳动的边际产量大于资本的边际产量，因此应该增加劳动的投入，所以此种技术进步称为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又称为劳动深化或节约的资本型技术进步。

供给（Supply） 供给是微观经济学中与需求概念相对称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分析的目的不同，供给的概念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它可以是指对于某个别商品或劳务的供给，也可以是指对于社会所有商品与劳务的供给。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对于各个别商品或劳务的供给。对于社会所有商品与劳务的供给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与这里所谈的供给不同。



供给概念所包含的是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与影响商品供给价格、成本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供给分单个人供给与市场供给。二者的关系是市场供给与个人供给的加总。供给是一个产品流量的概念，它是与特定的时期相联系的，例如一年的玉米供给量，一个月的大米供给量等。市场上这种特定时期的商品供给流量受到商品现行价格、预期价格、相关商品价格、生产要素的成本等因素影响。如果假定除某商品自身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不变，只考察商品自身价格变化与供给量变化之间的关系便得到供给表列，供给表列描述了各种不同价格下商品或劳务供给数量。在分析中，严格地区分开供给量与供给。供给是指整个表列，是所有可能的价格与供给量之间的关系。而供给量则是指某一特定价格下所供给的数量。若用供给曲线来描述供给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用纵坐标表示商品的价格（P）用横坐标表示商品的数量（Q），那么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供给曲线的一般情况是向右上方倾斜（如图所示）。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表明，随某种商品价格的提高，该商品的供给量将增加。

区分了供给量与供给的概念以后，很容易区分供给量的变化与供给的变化。由于供给是指整个供给表列，或者说是整条供给曲线，而供给量是指某种特定价格下的供给量，或者说是供给曲线上的一个点，因此，供给量的变化是同一条供给曲线上不同点的变化。例如，供给曲线 s 上由点 c 到 d 的变化是同一条供给曲线上点的变化，它表示供给量的变化。而供给的变化是整条供给曲线的变化。例如，由供给曲线 s 到 S_1 的变化是供给的变化。供给量的变化（P_0 变化到 q_1）是由于商品自身价格变化（P_0 变到 p_1）引起的，而供给的变化则是除商品自身价格以外的其它因素引起的。例如，生产成本的变化、技术状况的变化、相关商品价格的变化等都会导致供给曲线的变化。

供给曲线的形状取决于成本结构。由于短期与长期成本结构不同，因此，短期与长期的供给曲线形状是有区别的。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生产任何商品都必须使得商品的价格能够弥补成本开支，并尽可能求得利润的最大化。就短期而言，生产者的厂房设备等固定投入不能调整，生产者只能通过调整劳动、原材料等变动投入来调整产量，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因此，要使价格能够弥补生产者的成本，随生产者供给量不断增加，价格也必须不断提高。所以短期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长期的供给曲线呈何种状况则是不确定的。由于长期内各种投入要素都可以变动，因此厂商可以通过变动生产规模来调整产量。规模变动时会产生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若规模扩大时产生规模经济，使得成本下降，则长期供给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若规模扩大时产生规模不经济，使得成本上升，则长期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如果规模扩大时既没有产生规模经济，又没有产生规模不经济，则长期的供给曲线是水平的。

除了某些产品长期的供给曲线因规模经济而发生向右下方倾斜的状况外，某些要素的供给曲线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折弯的供给曲线部分地描绘了这种情况。这种折弯的供给曲线被用来分析个人的劳动供给、当劳动的价格一工资较低时，劳动供给曲线是通常的形状，向右上方倾斜。当工资上升到一定高的水平再继续提高时，个人的劳动供给反而减少，而选择较多的闲暇，这时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工资提高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较高的工资率和较少的劳动时间再加上较多的闲暇可以给个人带来较大的效

用。

供给价格（Supply Price） 供给价格是供给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与劳务所愿意接受的价格。供给价格依赖于生产成本。一种物品的供给价格等于生产该种物品所花费的所有成本总额，这些成本包括折旧、原材料、燃料、动力、工资、保险费、利息、地租、正常利润等。这里所谈的成本是机会成本，因为正常利润被包括在总成本之中。

供给函数（Supply Function） 表示商品或要素的供给量以及决定这一供给量的因素之间关系的函数。由于存在着要素的供给与商品的供给的区别，因此，也就存在着要素供给函数与商品供给函数的区别。

从要素的供给函数来讲，假定消费者拥有原始的生产要素。消费者是要素的供给者，消费者通过供给要素取得收入。他们又用取得的收入来购买商品。假定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任意一个消费者都只能接受市场确定的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假定每个消费者都有一个效用函数，表示其效用是其购买的商品与持有的要素的函数，消费者的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其效用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是他消费商品的支出不能超出他出售要素的所得。从每一个消费者在其有约束的条件下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便可以得到他的要素的供给函数：

$$S_{jk}=S^{jk}(p,r)\quad j=1,2,\cdots,m \tag{1}$$

S_{jk} 表示第 K（K 是任意的）个消费者供给的第 j 种要素，P 是商品的价格，r 是要素的价格。等式（1）表明每个消费者要素的供给都是商品价格与要素价格的函数。假定有 n 个消费者，即 K＝1，2，…，n，则市场上对于第 j 种要素的供给函数是

$$S_j=S(p,r) \tag{2}$$

其中，$S_j=\sum_{K=1}^{n}S_{jK}$，$S(p,r)=\sum_{K=1}^{n}S^{jK}(p,r)$

从商品的供给函数来讲，假定厂商是商品的供给者，每个厂商都生产单一的商品。每个厂商都有一个表示产出与投入之间关系的生产函数，厂商购买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下，厂商是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接受者。假定厂商的目标是追求最大利润或最小成本，在既定的产出下，从厂商选择一种能使成本达到最小化的投入行为可以导出厂商的供给函数：$S_{il}=S^{il}(p,r)\quad i=1,2,\cdots m$ （3）

S_{il} 表示第 l（l 是任意的）个厂商对于第 i（i＝1，2，…，M）种商品的供给。p，r 分别表示商品与要素的价格。（3）式表明每个厂商的商品供给都是商品价格与要素价格的函数。假定有 N 个厂商，则第 i 种商品的市场供给函数为

$$S_i=S(p,r) \tag{4}$$

其中 $S_i=\sum_{l=1}^{N}s_{il}$，$S^i(p,r)=\sum_{l=1}^{N}s^{il}(p,r)$

对于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导出的供给函数可以加以修正以用于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使得这一理论与实际更接近。

供给弹性（Elasticity Of Supply） 供给弹性是供给的价格弹性的简称。供给弹性是商品的供给量变动率比上其价格变动率。用 q 表示商品的供给量，Δq 表示该商品供给量增量，P 表示该商品价格，Δp 表示该商品价格增量，E_s 表示供给弹性，则

$$E_s=\frac{\triangle q}{q}\Big/\frac{\triangle p}{p}=\frac{\triangle q}{\triangle p}\cdot\frac{p}{q}$$

供给弹性用来测度在其它条件既定下，只有某商品价格发生变化时，该商品需求量变动对于其价格变动作出反应的敏感程度。

对于一般商品而言，其供给量与价格同方向变化，因此，一般商品的供给弹性是非负的值。在理论上，可以将供给弹性的值分为五种情况：完全无弹性（$E_s=0$），弹性为无穷大（E_s 趋于无穷大），单位弹性（$E_s=1$），缺乏弹性（$E_s<1$），富有弹性 $E_s>1$）。供给无弹性表示不管价格如何变动，供给量始终不变，供给曲线是一条与代表数量的横坐标相垂直的线（图①）。供给完全无弹性的情况很少见，那些无法复制的珍稀物品其供给弹性近似等于零。供给弹性为无穷大的情况表示某种商品一旦供给稍有增加，便会有无限的供给。供给曲线是一条与代表数量的横坐标相平行的线（图②），供给弹性为穷大的情况也少见。劳动力严重过剩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接近于这种情况，在一定的工资率下就可以源源不断得到劳动力的供给。供给为单位弹性情况下，供给量的变动率等于价格的变动率。若 $E_s=1$，则供给曲线是一条由原点出发的象第一象限延伸的射线。供给弹性等于1的情况，日常生活中也较为少见。供给缺乏弹性表示商品供给量的变化对于其价格的变化反应不灵敏，供给曲线是一条与横坐标相截的线（图④）。供给富有弹性表示商品供给量的变动率大于价格的变动率，供给曲线是一条与纵坐标相截的直线（图⑤）。日常生活中大量见到的商品是缺乏弹性或富有弹性这两种情况。

有关供给弹性的五种情况都是就整个供给曲线而言的，只有当供给曲线的形状如上述五种情况那样都是直线的情况下，才能讨论整条曲线是缺乏弹性还是富有弹性或其他三种情况。如果供给曲线的形状是曲

线，而不是直线，就不能说该供给曲线的弹性只是上述五种情况中的一种，因为这种情况下，曲线上各点的弹性是不一样的，任一点的弹性都可能是上述五种情况中的任一种，要看该点切线是上述五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切线是哪一种情况，该点的弹性便是哪一种弹性。这时弹性用$E_s=\frac{dq}{dp}\cdot\frac{p}{q}$表示更为精确，其中$\frac{dq}{dp}$是供给量对于价格的一阶导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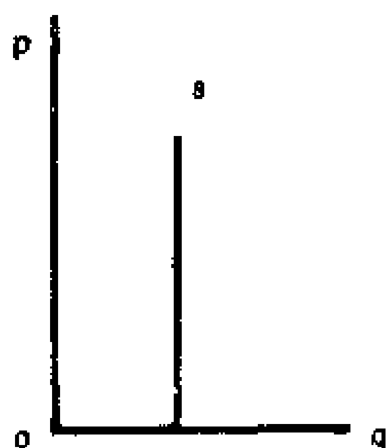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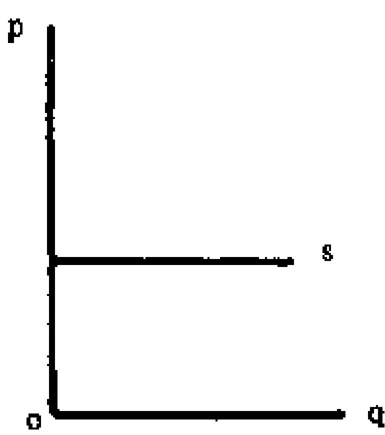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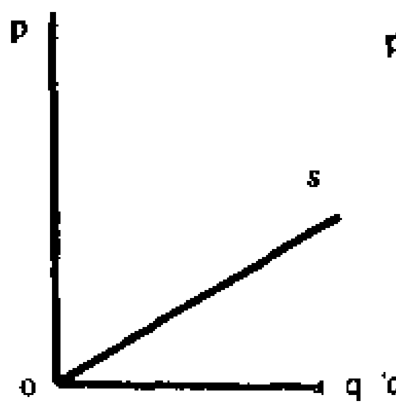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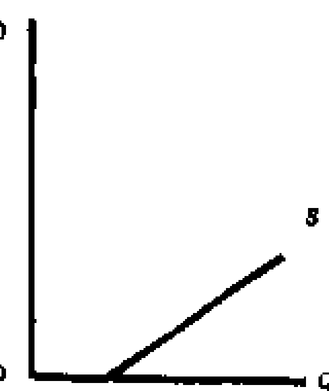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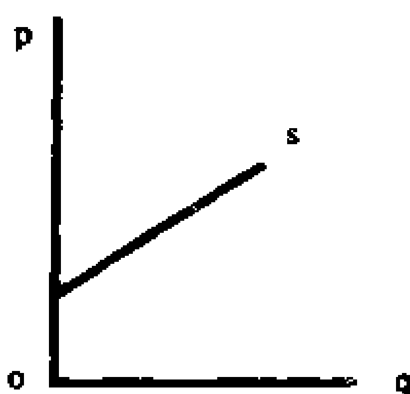


图5

供给弹性的大小受产品的生产成本、生产周期长短，生产规模变动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某种产品随产量增加，成本会迅速增加，那么该种产品的供给弹性就小。如果随产量大幅度增加，成本增加的幅度较小或不增加，该种产品的供给弹性较大。生产周期长的产品供给弹性较小，生产周期短的产品供给弹性较大。因为生产周期长的产品不容易随价格变动而调整产量。例如，许多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其供给弹性较小。许多工业品，例如一些电子产品生产周期短，其供给弹性较大。对于同一种产品而言，时间越短，供给弹性越小，时间越长，供给弹性越大，因为短期内生产者受生产能力限制，即使价格提高也难以大量增加生产。长期内，生产者则可以随产品价格提高大幅度增加产量。生产规模不易变动的产品其供给弹性较小，因为不容易随价格变化调整产量；生产规模容易变动的产品其供给弹性较大，因为容易随价格变动调整产量。

供给的变化与供给量的变化 (Change In Supply And Change In The Quantity Supplied)

供求定律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供求定律是微观经济学中讨论局部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变动的问题所涉及的一个概念。根据局部均衡分析，某种商品或劳务的均衡价格由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在需求曲线D_0与供给曲线S_0的交点E_0决定了均衡的价格P_0与均衡的数量q_0。E_0点为均衡点。这一均衡点是在假定除了所讨论的商品价格以外，所有其它影响供给与需求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由商品自身价格的变化而引起的需求量与供给量的变化而得到的。除商品自身的价格以外，其它影响需求的因素有消费者偏好、消费者收入、替代品的价格、消费对于未来的预期等；其它影响供给的因素有生产要素的成本、生产者的技术状况、生产者的目标、生产者对于利润的预期等。假定所有这些其它因素不变，只有商品自身价格发生变化，那么均衡点不会发生变化。商品自身价格的提高或降低而导致的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将造成一种市场压力，迫使价格重新回到均衡点。例如，当商品自身价格提高时（由P_0提高到P_1），将出现超额供给。供大于求的状况将迫使生产者争相压价出售其产品，最终导致价格降低到均衡价格E_0。相反，如果商品自身价格降低时（由P_0降低到P_2）将导致超额需求。供不应求的状况将迫使消费者争相以高价购买商品，最终导致价格提高到均衡价格E_0点（见图1）。

当除了商品自身价格以外的其他影响需求与供给的因素发生变化则会影响均衡点发生变化。供求定理所涉及的就是因除商品自身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变化而导致的供给或需求的变化所引起的均衡点（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况。除了商品自身价格变化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变化所造成的需求的变或供给的变化可以分为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是需求的增加（需求曲线右移），需求的减少（需求曲线左移），供给的增加（供给曲线右移），供给的减少（供给曲线左移）。这四种变化都可能造成均衡点的变化。例

如，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例如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消费者收入的减少等）使得需求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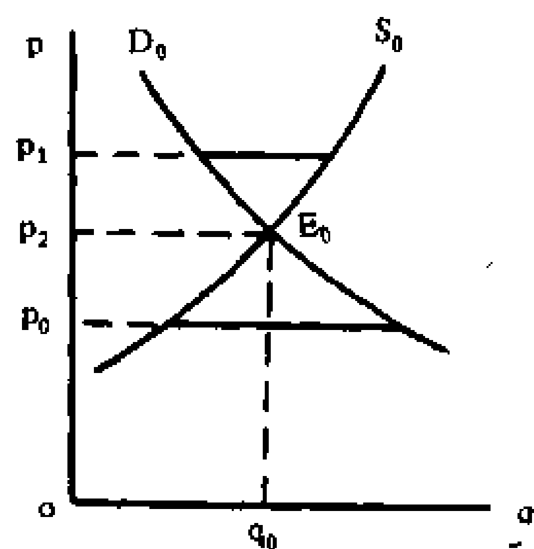


图 1

少，相对于原需求曲线 D_0 而言，现在的需求曲线是 D_1。D_1 与不变的供给曲线 S 交于 E_1，达到了新的均衡。新的均衡价格为 P_1，新的均衡数量为 q_1。与原来的均衡价格 p_0 与均衡数量 q_0 相比，$OP_1 < OP_0$，$Oq_1 < OP_0$ 这表明在供给不变的条件下，需求的减少既降低了均衡价格，又降低了均衡数量（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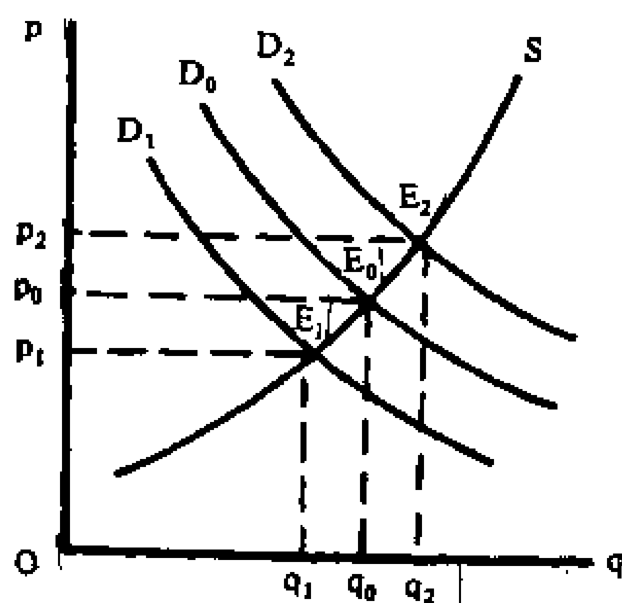


图 2　需求的变化

相反，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若由于某种原因（如消费者收入增加、消费者预期商品价格将提高）使得需求增加，需求曲线由 D_0 提高到 D_2，均衡点由 E_0 移到 E_2。新的均衡价格 P_2 与均衡数量 q_2 都要大于旧的均衡价格 P_0 与均衡数量 q_0（见图 2）

同样，可以在假定需求 D 为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供给变化所造成的均衡点的变化。例如，由于某种原因（生产要素成本降低、技术水平提高等）而使得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右移，由 S_0 移到了 S_1。在需求 D 不变的条件下，均衡点由 E_0 移到了 E_1。新的均衡价格为 P_1，新的均衡数量为 q_1。与旧的均衡价格 P_0 和旧的均衡数量 q_0 相比，$P_1 < P_0, q_1 > q_1$。这表明供给的增加降低了均衡价格，提高了均衡数量（见图 3）。相反，若因某种原因（例如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等）而使供给减少，供给曲线左移，供给曲线由 S_0 移到 S_2，均衡点由 E_0 移到了 E_2。新的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分别为 P_2 与 q_2。与旧的均衡价格 P_0 和均衡数量 q_0 相比，$P_2 > P_0, q_2 < q_1$。这表明，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供给的减少提高了均衡价格，降低了均衡数量（见图 3）。

由需求与供给的变动而引起的均衡点的变动概括出四条供求定律。(1)、需求的增加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提高。(2)、需求的减少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降低。(3)、供给的增加引起均衡数量的提高，均衡价格的降低。(4)、供给的减少引起均衡数量的减少，均衡价格的提高，需求的变动与均衡价格、均衡数量同方向变动；供给的变动与均衡数量同方向变动，与均衡价格反方向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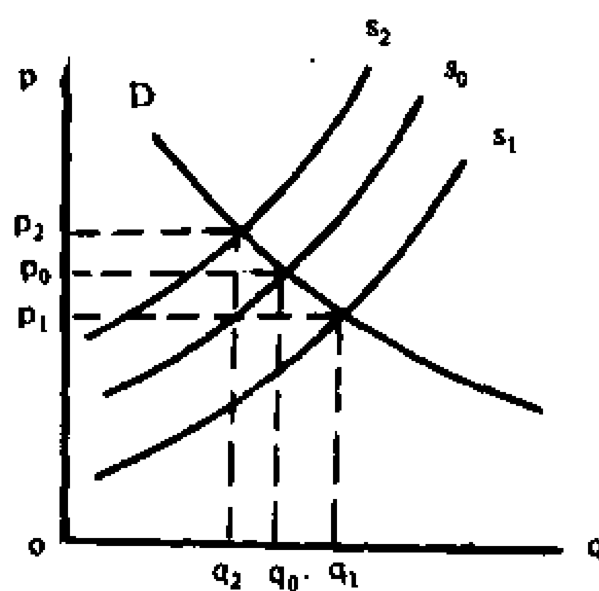


图 3　供给的变化

供给管理（Supply Management）　通过调节总供给来稳定或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凯恩斯主义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强调了总需求的决定作用，由此则主张用需求管理来调节经济。但是，实际上总供给对国民经济也有重要的影响，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分析了总供给对物价的影响，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了总需求与总供给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样，就相应地提出了通过调节总供给来调节经济的供给管理政策。供给即生产，根据总生产函数，在短期内影响供给的是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在长期内影响供给的是生产能力，即经济潜力的增长。这样，供给管理政策主要包括：第一、收入政策。通过对工资的控制来消除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第二、人力政策，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与改善劳动市场结构来降低失业率。第三、经济增长政策。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提高经济潜力、，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在现实中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同样重要，只有把这两种政策配合使用，才能达到规定的宏

观经济政策目标。

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　又称"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是7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

历史渊源　战后西方各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这使西方国家在战后实现了经济繁荣。但是，凯恩斯主义也给西方经济带来了许多问题，这集中表现为70年初出现的"滞胀"局面。"滞胀"的出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地位，经济学中出现了许多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流派，供给学派即是其中之一。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经济停滞的原因，并主张通过刺激总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供给学派则强调了供给，把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归咎于供给不足。这种对供给的重视实际上是萨伊定律的复活，因此，供给学派是在现代条件下对萨伊定律的继承与发展。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供给学派分为"正统的供给学派"与"中间的供给学派"。"正统的供给学派"又称"极端的"供给学派，包括美国经济学家R·蒙德尔（R.Mundell）、A·拉弗（A.laffer）、J·温尼斯基（W.Wanniski）、P·罗伯茨（P.Roberts）、G·吉尔德（G.Gilder）等人。代表作有A·拉弗等的《供给经济学基础》（论文集），J·温尼斯基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P·罗伯茨的《供给学派革命》，G·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等。"中间的供给学派"又称温和的"供给学派、主要是美国经济学家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代表作有《资本税》，《通货膨胀、税收规则与资本形成》，《税收政策分析中的行为模拟方法》等。

基本理论　正统的供给学派是供给学派的主流，这里主要介绍他们的理论观点。第一、重视供给，恢复萨伊定律。美国70年代的问题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这表现为：投资率减少，技术进步放慢，生产率下降；产品缺乏竞争力；以及供不应求的存在。在经济中，供给是关键，因此，萨伊定律的"供给创造需求"是正确的。这就是说"从整个经济来看，购买力和生产力总是能够平衡的。在经济中总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它的产品，不会因总需求不足而使商品供给过剩。生产者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对他们产品的需求。这些看法在许多方面显然是简单化了些，但是它具有许多重要的，从未受到过凯恩斯或任何其他人反驳的经济学真理和含义。这些真理是当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第二、通过加强对个人的刺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出萨伊定律的重要性并不是一般地重视供给，而是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要通过加强对个人的刺激来增加储蓄和投资，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供给学派正是要研究经济活动的刺激因素及其作用，以及如何进行刺激以取得最大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说，供给经济学也是一种"新的关于个人刺激的经济学"。第三、减税是刺激经济活动最有效的手段。个人与企业经济活动的动力是收入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税率的高低对收入或利润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减税是各种刺激手段中最有效的手段。减税理论是供给学派的核心理论。他们运用拉弗曲线说明了税率与税收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减税可以刺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税收，并指出税率过高，尤其是边际税率过高，是当前美国经济问题之所在。第四、减少国家干预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供给学派属于自由放任思潮，他们认为，国家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企业的过多干预严重阻碍了企业家投资与经营的积极性。只有减少国家干预，使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才能提高生产率，并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实现稳定增长。第五、减少政府支出实现预算平衡。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恶果之一是财政赤字严重。政府支出增加不仅加剧了财政赤字，而且降低了经济效率，因此，在减税的同时，应该减少政府支出，尤其是福利支出，以实现财政平衡。第六、恢复金本位与控制货币供给量。供给学派都主张实现物价稳定。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看法并不相同。A·拉弗等人主张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使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是不现实的，主张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制止通货膨胀。

政策主张与运用　供给学派的理论受到1981年上台的里根政府的重视。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为依据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这一计划反映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减税政策。全面降至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税率，三年内减税30%。第二、削减预算支出。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第三、撤消或放宽限制企业自由经营的法令与规章。第四、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

评论　供给学派曾在80年代由于受里根政府的重视而风行一时。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流派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学中难以产生长期影响。英国经济学家J·伊特维尔（J.Eatwell）指出：供给学派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一场"没有任何明确理想核心的，一个经济思想大杂烩的运动。"

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　指的是生产资料归公众所有，所有经济活动都由中央政府计划与控制的经济体制。它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概

念。

“命令经济”一词由德文 Befehlswirtschaft 发展而来，原用于指德国所一度实行的纳粹经济，后来多用来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

在命令经济中，政府对经济中的各项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它用一套极其详细的计划指标体系将物资与资金分配给各个企业，指定每个企业生产产品的数量、质量与种类。为了保证计划的合理性，政府不得不建立庞大的机构体系来搜集信息以及有关资料，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指标的依据，但是尽管如此，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往往表现出信息的不足，因为要制订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指标体系，它所需要的信息量是惊人的。政府所制定的计划分两类，一类是中长期发展规划，一般在 5—10 年之间，它反映了计划当局在经济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长远构想；另一类是短期协调性计划，一般以一年为单位，它把计划当局的长远构想落实为具体的行动，对这一阶段中全国的资源进行配置，并对企业与个人作出具体的指导。但是，由于信息的不足以及计划的不可改变性，因此，如果形势出现了变化，它就会变得束手无策。此外，中央政府还制订所有产品的价格、工资与外汇汇率等，长期不变，因此，这些已不再是市场信号，而是计划当局实现其规划的手段。

在命令经济中，企业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从上级计划部门得到政府分配的资金，物资与编制，按照计划所规定的规模生产固定数量与种类的产品。这些产品也不能由企业自己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而是要经过上级部门进行分配，也没有留存的利润，盈利全部上交。如果企业出现了亏损，那么由国家给予补贴，决无破产之虞。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追求经济效益，不关心经营的效果如何，也不必搞革新以降低生产成本，它们所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以便更受计划当局的重视（更确切地说，是企业的领导人能够更受到重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各个企业都尽可能地去争投资、争物资、争项目，甚至争编制，导致了所谓的“投资冲动”与“囤积行为”。

对于个人来说，作为生产者，他是固定工资的接受者；作为消费者，他是固定的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个人与企业一样，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前面提到，由于由计划当局制订如此详细的计划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必然会产生有产品没有市场需求，而与此同时，消费者的某些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现象。但是，由于所有市场信号都被中央所固定，它们无法反映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状况。因此，企业得不到来自消费者的信息，盲目生产，造成积压而消费者的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只能进行产品的强制替代或者强迫储蓄，他们的排队、等待以及抱怨等反应也同样要垂直地上达到计划当局，而无法水平地通过市场传递给企业。计划当局如果接收到来自消费者的反应，并能够对这一反应加以考虑的话，它就会修改下一阶段的计划，并且下达到企业，才完成了这一信息的反馈。根据需求变化所作出的这一调整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很难做到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的短缺与滞存同时存在，微观层次上不均衡的现象随处可见。

由于企业具有强大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它们常常以夸张的形式申报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与原材料，这势必有产生投资膨胀与资源短缺的倾向，如果政府在总量上给以控制，那就会制止这种倾向的发展。但是，政府本身也急于尽快发展经济，于是往往鼓励企业去扩大生产规模，而通过向银行透支的办法，增发货币量，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对企业则实行预算软约束。在命令经济中，货币成了计划当局用来体现自己的意志的工具，它在市场经济中的某些职能已经大大弱化了。

在命令经济中，为了保证经济的高度公有化，计划当局还严厉抑制私有经济的发展。尽管如此，在公有经济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地方，就会出现“地下的”私人经济，它对公有经济是一个支持与补充。

实行命令经济的好处在于（1）在必要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动资源，去完成国家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例如，迅速实现工业化、参加战争等等；（2）宏观层次上的计划性比较强，计划当局可以根据本国的物力、财力、人力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平衡；（3）可以通过权威的力量去消除失业，压制通货膨胀。

但是，中央当局毕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一手包揽，它所下达的计划往往不切实际。它还扼制市场的作用，使得企业没有任何竞争的意识，生产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由于供求双方无法直接传递彼此的信息，因此，势必造成短缺与积压并存，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人民生活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这种结构性的失调再加上企业的扩张冲动，问题就更加严重。

许多实行命令经济的国家逐渐意识到了这一体制中存在的弊端，纷纷下决心进行改革。其核心在于引进市场机制，放开价格与工资，使它们真正反映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同时，将权力部分下放，使企业具有独立经营的权力，并自负盈亏；此外，还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人经济自由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搞活了市场。

金融（Finance）　在人们的心目中，金融与货

币流通存在某种关系，而实际上经济中货币流通的对象主要有三个：（1）财物的流通，即支付商品和劳务的货币的流通。（2）财政的流通，支付国家和公共团体的租税的流通。（3）信用的流通，在一定的时间内或不限期、货币使用权的有偿转让等的货币自身的流通，如借贷、票据贴现、直接投资于有价证券或企业，存款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等。金融就是信用的流通。它不同于随着物物交换的货币流通，也不象租税那样强制性的单方面流通，而是专门以信用为对象的货币流通。正如物品市场一样，金融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或者说是经济机制。它由信用的卖方、买方和金融中界机构组成。信用的卖方转移自己的货币，拥有对这种货币的所有权及其溢价人索取权。信用的买方有责任偿付本息，金融中介机构则起组织买卖双方的交易活动。由于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买卖双方都直接跟它打交道。所以金融可以看成是现在货币与未来货币的交易，借贷的交易。现代经济中，信用交易的媒介已不限于货币，还有各种证券，交易的方式也复杂得多。本息的收取与偿付也不象货币信用那么简单。但金融作为一种信用制度的本质内容却没有发生改变。说金融是一种经济机制，这不仅是因为在金融领域内部，有如资本市场的运行，资本资产的供给与定价、以及个人或企业的金融资产组合等存在特定的机制。而且金融的发展与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产业如果没有金融的存在，工厂的建立与企业的扩张是难以想象的。金融直接影响产业界的行为和整个产业发展，而且反过来产业的发展又会促使金融的发展。

金融机构作用削减（Disintermediation） 金融机构指的是作为那些将大部分可以利用的投资资金投放到信贷市场中的非金融机构的中介人。它包括银行、储蓄与贷款协会以及人寿保险公司等等。金融机构作用削减指的是，非金融机构为了获得较高的利息而从金融机构中提取资金，转向去购买市场证券，从而导致经过金融机构的资金流量的下降。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国库券、商业债券等公开市场利率大大高于金融机构能够支付的利息率。在美国，各州都对其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利率规定一个上限，不得随意变动。当市场上的资金非常紧缺的时候，有些公司就愿意以高得多的利息率来吸引资金，两个利息率之间的差额一般要高达1.5—2个百分点。这种情况显然对金融机构十分不利，它们无法在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将抵押贷款顺利的转化成现金，因此，它们被迫用光所有手头的现金来支付提款，同时还要向政府机构借债；当市场利息率与金融机构的利息率之间的差额超出正常水平的时候，金融机构被迫提高它们的利息率，来保持竞争能力。美国在1965—1980年间曾经经历过四次金融机构作用削减（1966年、1969—1970年、1973—1974年以及1979—1980年）每一次都提高了短期利率，以控制金融机构作用的削减以及通货膨胀，但是由于长期利率没有改变，而且政府的政策无论从作出反应还是到发生效用都有一个时滞，因此，提高短期利率的措施没有有效地阻止金融机构作用削减的强大势头。在不发生金融机构作用削减的时期，美国国内每年向信贷市场投入的资金的约95%要经过金融机构；而在发生了金融机构作用削减的时期，这个比例降到80—85%。

金融机构作用削减对于建筑行业打击严重。由于建筑业抵押贷款的唯一来源是储蓄与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以及人寿保险公司，因此，金融机构作用削减通常会造成抵押贷款的净减，建筑资金额大大下降，从而导致对住房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金融机构作用削减的另一个影响是，它将信用在不同的借款人之间重新分配，其中得到好处的是短期借款人，他们从中得到一笔安全可靠、流动性强的资金，还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金融机构作用削减还可能不利于信用的增长，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把金融机构作用削减对信用的影响与货币紧缩对信用的影响区分开来，因为这二者总是相伴发生的。二是金融机构作用削减这个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70年代末期以来，大量资金流出传统的储蓄机构，成为货币市场基金。在这种新情况下，金融机构作用削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总信用量，这一方面要分析货币市场基金对于信用流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金融机构作用削减这个词是否也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的资金转移。

当市场上资金供给增加、或者那些提高利率以争夺资金的公司的资金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市场利率会逐渐下降。这时，把钱存入金融机构又变得比较有利，在同样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存款总是更为安全的。这个时候，金融机构的作用便又回升了。

金融机构（Financial Institntions） 从事资金筹集并提供给资金需求者的私立或官方组织。金融机构在实现资金从供给者流向需求者的活动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经济增长以及公众福利方面，金融机构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资金从供给者流入需求者，一般有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金融市场实现直接融通，二是通过金融机构实现间接融通。即使是在金融市场上，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的购买者也不是面对面地与需求者谈判，其投资行为也受到某些中介的影响，如证券交易所中的交易商。在美国，储蓄者与资金购买者直接谈判而完成的金融行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这种

行为多发生于某个家庭成员从其亲友那里借款。而在互不相关的团体间的融资行为大多是借助于金融机构作为媒介。原因是：第一、资金供给者即投资者对所从事的投资行为不甚了解，风险大小，收益如何都不很了解，而金融机构却可以为之提供稳定的收益；第二、小额的资金要实现投资并不容易，但通过金融机构却可以实现聚小为大、积沙成塔的功能，所以储蓄业务受到公众的欢迎；第三、金融机构对于资金需求者而言就成为供给者，为了降低投资风险，金融机构对资金需求者可以进行深入了解，并可以参与投资项目的评估。在美国，金融机构可以划分为七类，它们是：从事储蓄的银行、从事储蓄的非银行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投资机构、个人和企业性的金融公司、政府和准政府的金融机构、混和贷款者。

金融危机（Financial Erisis） 是指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暂但却剧烈地恶化，商业信用出现危机从而金融机构也不能完成其职责。金融指标包括短期资本价格以及股票、土地以及真实资产的价格等。一种情况下，如果出现经济高涨，资金会涌入真实资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原因是存在着资产价格将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如果出现金融危机，资金会从真实资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涌出，原因是存在着资产价格将进一步下降的预期。在经济高涨和金融危机之间也许存在着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们对价格的预期虽然不那么高，但还没有达到要下降的地步。这一阶段也可能带来金融危机，但取决于如下因素：信贷的刚性、心理预期的变换速度、金融事件对人们自信心的干扰程度等。金融危机的治理措施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贷款者—中央银行的作用。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表明，它有足够的货币用于贷放，这样可以阻止资金由真实资产或长期资产的涌出；其他方法包括：政府购买企业或公司的证券；政府对处于困境的商业或金融机构保证其支付能力；大量的公开市场行为等。在国际上，有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是指外国的资产所有者尽力放弃某一国家债券或货币以避免该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货币掉期的运用使得国际间货币比率趋于稳定。二十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实际上也是国际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 由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溶为一体而形成的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形成垄断以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从两方面来溶合的：一方面是业务上的相互渗透。银行通过购买工商企业的股票或直接开办新企业，加入产业资本的经营活动；而工业资本则通过购买银行的股票或直接开办银行跻身于金融领域；另一方面是人事参与。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互渗透到一定程度后，双方互派人员充当对方各自的领导职务，这样，工业垄断资本家也是银行垄断资本家、银行垄断资本家也是工业垄断资本家。金融资本的主要组织形式是金融资本集团，即财团。财团操纵着国家全部经济和政治生活。最初的财团大多带有比较浓厚的行业色彩和部门分工。例如，美国的摩根财团主要占据着钢铁工业和其他基础工业，故有"钢铁大王"之称。洛克菲勒财团则以"石油大王"闻名于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生产的跨部门集中和混合联合企业的发展，各大财团的行业色彩日益淡薄。又由于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渗透，财团原有的家族色彩更趋淡薄。金融资本对国民经济实行统治的主要手段是参与制。通过参与制，各大财团控制了比自有资本大几倍、几十倍的他人资本，业务范围也扩大到经济中各个领域。不仅是经济领域，金融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国家政治方面的渗透与控制也很明显。金融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全面统治，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进了它的最高阶段，这就是帝国主义。

金钱的与非金钱的经济（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Economics） 金钱经济来源于瓦伊纳，他用金钱经济一词来区别于技术经济。技术经济也就是非金钱经济。一个公司的内部经济很容易区分为金钱经济与非金钱经济。这两种经济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公司的单位产品成本。金钱经济的产生是由于公司可以与卖者达成较低的价格，因为购买规模的扩大会使卖者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非金钱的经济则来源于对所有投入物，包括厂房、机器设备以及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总之，对于企业内部而言，金钱经济与要素价格有关；非金钱经济则与要素的不可分性有关。一个公司的外部经济也可以区分为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非金钱的经济来源于公司之间在技术上的相互依赖性。也就是说，不知道其他公司的投人或产出就无法确定本公司的生产函数。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例如，在同一油田的两眼油井，其中一眼井的产量依赖于另一眼井。又例如，一个果园的水果产量与邻近的蜜蜂场的经营有关。一个公司的外部经济中的金钱经济虽然不同人有不同表述，但本质只有一个，就是马歇尔的"一个公司的经营水平依赖于整个产业的总体进步。"例如，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则与技术工人的供给以及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外部的金钱经济不是在静态均衡中产生而是在动态均衡中才产生的。

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见“金融深化”。

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状况的一种概括。指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采取人为地压低利率和汇率的金融政策，从而出现了银行储蓄这类金融资产的实际利率为很大负值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1973年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提出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问题。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割裂的，大量的经济单位互相隔绝，各自面临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不同，所处的技术条件不同，所得到的资产报酬率也不相等，没有一种市场机制来使之趋于一致。在这种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民、小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他们若要进行投资只能靠自身的内部融资。所以，一定时期的货币积累，就成为他们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要使货币实现积累，就需要确保货币的收益。其收益率等于存款的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这一收益率越高，人们越乐于持有货币，从而储蓄和投资就越高。反之亦然。因而，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和投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就在于货币的收益率太低，以至成为负数。其原因在于政府的限制政策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具体地包括：（1）对商业银行规定了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麦金农认为，适当的准备金，可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稳定价格水平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在发展中国家，为弥补严重的预算赤字，政府以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比例来实现向商业银行借款，可以不必支付利息。在贷款利率不能上升的条件下，扣除银行的各种费用，存款利率必然很低，抑制了金融的发展。（2）普遍实施非价格信贷配给。即可贷资金被分配到给银行所熟悉的、贷款管理成本低、拖欠概率小的大中型企业或有特权的企业，而大量的农业和其他非国家特权部门的融资，只能从有组织的银行之外获得，使得高利率和投机风盛行，金融制度受到抑制。（3）规定贷款利率限额。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低，必须将长期存款利率保持在相当的水平才能刺激金融储蓄的大量增加。但是长期以来，政府对于银行系统的贷款利率直接或间接地确定了一个最高限额。这一限额一般较低，相应地银行不得不对存款支付较低的利率，从而储蓄水平下降，金融发展受到抑制。（4）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变为负值。有的国家利息收入还要纳税，使得实际利率更低了。从而储蓄者的流动资产大幅度贬值，流动资产的需求自然会减少，银行可贷资金不断萎缩。就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并不是故意地或自觉地制造金融抑制现象的。更准确地说，是某些旨在刺激和鼓励投资而不是妨碍投资的政策，导致了对金融系统施加的限制。如决策者通常认为，名义利率低下对扩大投资十分重要，加上相信低利率对帮助企业特别重要，各国政府往往对各类贷款的名义利率规定很低的上限。但在实际上，负实际利率降低投资的边际收益，将产生较高的资本产出比率。结果，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及与之相关的储蓄增长，都将比实际利率为正值时要低，只能使失业和收入分配恶化。因此，要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必要的措施就是解除金融抑制，即通过资金市场自由化来使利率高到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并消除通货膨胀，从而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

金融浅化（Financial Shallow） 见“金融深化”。

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以形成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形成初级证券市场，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银行系统的存款形式。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深化也就是指银行流动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扩大。相反的情况，即银行流动资产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则称为“金融浅化”。实现金融深化，需要解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使其自由发展。因而关于金融深化的货币理论也被冠以“金融自由化”的理论。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先后出版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两书，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著名理论，对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中国家所应采取的金融体制及其改革，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一理论认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比财政政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长期未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是因为政府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所致。为此，应解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限制，实行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金融自由化可以促成金融深化；而金融深化的政策涵义就在于采取适当措施消除金融抑制现象。实现金融深化的目的在于：（1）从国内经济中动员较大数量的储蓄；（2）使所有的国内投资者更易获取储蓄所提供的资金；（3）确保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更有效地分配投资；（4）使金融方法能动员及分配储蓄，以减少对财政方法、外国援助和通货膨胀的依赖。金融深化政策的实质是朝着正实际利率接近的持久运动，或至少避免巨大的负实际利率的运动。因此，深化金融战略的第一步，一般是提高对存款和贷款的名义利率的上限。随着实际利率向正值水平转移，储户强烈希望提

高其流动资产的占有量，这样就使投资者能得到的信贷供应量出现了实际的增长。在实际运行中，金融深化的政策可能涉及到许多其他政策，包括：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利息支付，以及避免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过高，其焦点在于存贷款的实际利率。而实际利率将使银行业的实际规模增长，从而会大大地扩大短期信贷的实际流量和商业银行的待销存货。由于吸收的存款基本上是短期的，商业银行不适于提供大量的长期融资。可是，随着经济转向较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投资方式也将趋于更长期的横向发展，对此，需要建立专门从事长期融资的机构、保险公司、投资银行、证券股票市场等，因而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金融自由化的理论认为，金融深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能积极地促进经济的发展。首先，银行系统规模的扩大可以增强国民储蓄与投资的能力。在没有银行系统作为媒介的情况下，富有的储蓄者可以采用非生产性的储蓄形式，如贮藏黄金和珠宝、购置房地产等；另一方面企业家因资金不足只好放弃获利性大的投资机会。而在银行系统相当发达的条件下，私人储蓄者将有可能把不生息的物质资产转向生息的金融资产，同时私人投资者也将通过外部资金的利用增加有利可图的投资。其次，银行流动资产规模的增长能促进储蓄配置效率的提高。在金融发达的条件下，银行中介作用增强，储蓄大部分成为银行存款形式，借款者必须负担利息成本，往往使得最具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借款者在竞争资金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既使投资由企业内部储蓄融资，发达的银行系统也能为决策者考虑资金的选择使用提供各种机会，刺激他们把再投资基金用于最有生产性的项目上，至少用于其利润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投资项目上。再者，流动资产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上升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稳定，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利率较高，资本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劳动的机会成本就较高，从而生产者被引导到劳动密集型生产方法上来，这就提高了就业机会，从而缓和了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另外，高利率也有利于缓和及消除通货膨胀。一方面高利率能抑制一部分投资活动，使投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它又能吸引更多的储蓄资金，可促进抑制消费需求，总需求的减少无疑对通货膨胀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自1973年麦金农和肖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论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问题已受到广泛的重视，金融深化战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金融自由化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试图按深化思路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但在实践中金融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原因可能是金融抑制论的某些假设有问题，也可能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金融自由化或深化气候。在理论上，也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批评这种理论具有片面性。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货币化比例很低，金融市场高度分割，从而金融自由化并不一定能促进金融深化；即使能促进金融深化，这种政策将以收入分配更加不均为代价；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的公共储蓄和公共投资具有重要作用，不应低估这种作用而过分强调刺激私人储蓄和投资的必要性。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 70年代以来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上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变化，其中主要包括新金融工具的出现、金融业务的更新，以及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各种与传统相异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主要是由于60年代中期以后通货膨胀严重，利率水平上升，以前的一些金融管理法规（诸如法定准备率、利率上限等）严重限制了金融活动，而使这些变化成为可能的则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以及在金融业务中的广泛运用。金融创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第一、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以美国为例，70年代以来的新型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货币市场存单（MMC）、小户存单（SSC）、可转让提款单账户（NOWA／C）、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 A／C）、超能NOW帐户、自动转帐存款（ATS A／C）、SWEEP帐户、现金管理帐户等。第二、各金融机构广泛采用负债管理。第三、浮动利率的贷款比例增加，贷款期缩短。第四、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大大提高，金融机构的资金媒介功能已部分转移到金融市场上。而且在金融市场上，非价格因素的重要性增加。第五、金融期货市场，即利率期货市场与外汇期货市场出现。第六、银行服务中自动付款机的运用使银行成本降低。第七、金融机构间、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间的区别缩小、非银行机构提供的银行服务增加、银行机构也向非银行机构的业务发展。这些创新使货币政策的运用困难，银行难以控制信用，货币的定义扩大，M_1与M_2的区别缩小。而且，金融体系内竞争加剧，利率波动频繁。这些向传统的货币定义与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

金融汇率（Financial Rate） 即"非贸易汇率"，见"非贸易汇率"。

金融公司（Financing Company） 外国基地公司的一种形式，它的建立旨在充当企业或公司集团内部借贷的中间机构，也可以对外提供资金。公司集团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贷款和公司集团购置不动产及进行证券投资等活动所暂时需要的大量款项往往都通过公司集团设在避税地的金融公司进行，利用避税地国

家对利息所得的优惠政策以及有关税收条约或协定，金融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可得以避税。这里，居住国与避税地是否签订有税收协定至关重要，以至美国公司（1963 年前）常在荷属安的列斯建立国外金融子公司，德国人常利用列支敦士登。当然，除此而外，一般而言，凡低税或不征直接税的国家（地区）都是建立国外金融子公司的可供选择的地点。

委托人与代理人（Principal And Agent） 委托人与代理人是一对孪生概念。若一个人（A）受雇于或受托于另一个人（B）而代表 B 行动，则称 A 为代理人，B 为委托人。雇主与雇员、老板与仆人、股东与经理等之间的关系都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

由于代理人代表当事方的委托人行动，但他又不是当事方本人，因此其行动方式并不总是与当事者本人所设想的行动方式一致，由于两者往往存在利益上分割的关系，因而往往会使得代理人不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图行事，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委托人一代理人的问题，委托人一代理人问题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委托人往往不知道代理人要采取什么行动或者即使知道代理人采取某种行动，也不观察和测度代理人从事这一行动时的努力程度，例如银行无法完全监视向其借款者的行动。一个雇主无法跟踪其雇佣的推销员以监视他的销售活动。保险公司的老板无法完全监视投保人的行动。所有这些情况下，代理人的行为将影响委托人。在当代理人的行动不可观察的情况下，委托人就不能根据代理人的行动来对代理人进行补偿。有些情况下，委托人虽然能够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但委托人往往并不知道代理人的各种行动是否恰当，因为委托者本人从来未从事过这样的行动。

虽然代理人的报酬是由委托人支付的，但代理人的报酬不同于委托者本人的报酬，因此代理人并不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图去行事。例如雇员并不一定按照雇主所要求的那样去努力工作。因此委托人一代理人问题是经济中动力或积极性的中心问题。

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会对其它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就会产生委托人一代理人问题。只要经济活动的参加者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就难以避免委托人一代理人问题。例如，在保险业中，如果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财产进行了完全保险。投保人定期向保险公司交一笔保险费，一旦投保人财产发生损失，就完全由保险公司负责。但保险公司无法监督投保人的行为，一旦投保者财产完全保了险，他就会对财产的保管漫不经心，从而使财产损失的风险增加。保险理论中的这一道德公害问题是典型的委托人一代理人问题。

经济学中研究委托人一代理人问题的核心就是探讨如何设立一种补偿制度使代理人能按委托人的利益行动。经济学家们构造了一系列委托人一代理人模型以解决这一问题。在标准的委托人一代理人问题中，模型的基本要点是，寻求一种能使委托人的期望效用达到最大化的契约；给定的条件是，在适当的补偿方案下，代理人将愿意接受这一契约并采取能使本身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各种模型还就契约的定立与实施问题进行了探讨。

委付（Abandonment） 所谓委付，是保险标的物在发生推定全损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物的一切权利转让给保险人，以此求得保险人按照标的的全损对被保险人给予补偿。委付一经成立，保险人就有权获得对保险标的物残余部分的利害关系，并由此而取得对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

委付的成立，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首先，被保险人在发生推定全损的时候，必须向保险人发出委付通知，而后经过保险人明示或默示地承诺，委付方能生效，对于被保险人发出的委付通知，保险人经过分析委付行为是否有利可图，享有接受和拒绝委付的选择权。另一方面，委付行为必须是对保险标的物的全部，而不能仅仅委付其中的一部分；保险人对于委付的接受，也是对保险标的物的全部利益和义务的接受，这表明，委付和委付的接受是不应附带任何保留条件的。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的委付后，则有权以保险标的物所有人的身份处理保险标的物，若保险人由此所得金额超过了已赔偿的保险金额，超出部分亦归保险人所有。委付的接受，并不以保险人先行支付被保险人的全损赔款为先决条件，保险人可以在处理保险标的物之后再行赔偿被保险人。

在实际保险业务中，保险标的物的委付可以分为船舶的委付，货物的委付以及运费或租金的委付。按照保险业务的实际情况。船舶的保险通常是由几个保险人按不同的百分比共同承保全部保险金额，如果船舶发生了推定全损，船方发出委付通知时，要由各个保险人按其各自承保的百分比负责赔偿；如果货物作为保险标的发生了推定全损，保险人接受委付时，应当按照货物的保险金额予以赔偿，在处理受损货物时，可以将货物公开拍卖，也可以与货方协商，由货方自行处理货物，待收到货物款项后，由保险人补足至货物的保险金额；至于运费或租金的委付，由于运费或租金的支付方法多种多样，难以具体说明推定全损的情况，因而，是否进行委付也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物物交换（Bar Ter） 物物交换或称易货交易，是一种商品、劳务以及洽谈同时发生而又没有货

币参与的一种初级交易方式。在物物交换中，信用不存在或比较虚弱，交换比率（价格）不确定，并且在交易或支付中缺少一个抽象的价值尺度。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物物交易是作为中心的基础问题而存在的，因而在现代经济思想中也占有突出地位。在亚当·斯密那里，物物交易作为人类自然趋向的表述，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的先兆。人类利用地理和技能的差别，通过物物交易建立相互依赖关系。物物交换的内在困难导致某些商品成为一般的交易手段，最终货币出现了。边际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同样将货币的起源追溯到物物交易的无效率。有人则把历史的顺序颠倒为：从以地理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出发，行政代理人进行远距离交易，在使支付手段逐步常规化的过程中，最终导致了货币的产生。事实上，物物交易在经济序列中总是带有各种交易制度的标记，只有将政治学和市场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其本质。例如，礼仪性交易和一般的物物交易就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合乎礼仪的，以慷慨大方和报酬的延迟为特征，后者则是不拘礼仪的，以议价的争斗和报酬的即付为特征。在实践中，礼仪性交易是以血亲为基础的社团领袖之间建立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一般的物物交易却只有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被接受；礼仪性交易是对市场的直接政治介入，而一般的物物交易却是一种相对自由的商品交易。一个缺少威严和货币的社会必须将二者功利地结合起来，决不能单纯依赖任何一种形式。在货币供给水平较低的情形下，货币本身往往会变成交易的一个项目，这种暂时的现象和当地政治秩序的瓦解有关联。因此，物物交易的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进程常常是相互作用的。假定市场扩大不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效用从来不是完全匀称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等不能仅仅通过货币中介使估价等价化。其次，在物物交易中，明显存在低量一高值项目和高量—低值项目之间的转化问题；第三，从技术意义上看，对交易的主要限制力量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一般的物物交易的缺点主要在于：(1) 在交易和估价中，没有独立的价值尺度，交易的完成有时需要知道无穷个交换比率。货币充当价值尺度可以解决这一麻烦。(2) 交易双方必须具备"需要的双重偶合"（double—coincident of wants)，即交易双方必须碰巧同时需要对方的产品。货币充当交换媒介可以克服这一障碍。(3) 交换货物的品质有时不易保持，货币充当储存手段可以解决这一问题。(4) 交易的货物在工艺上存在不可分割性，以货币单位表示其价值可以克服这一障碍。然而，缺少货币本身并不表明对有效交易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只有政治秩序的形式，才是物物交易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事实上，物物交易是一个极为广泛的现象，作为交易问题的部分的、暂时的办法，在许多时候和地点都在不断地发生。它不仅不能被货币取消，而且有时将货币本身变成物物交易的一个项目。

物物交易尽管存在许多缺点，但却不是一钱不值，尤其在现代社会中，物物交易的复活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1) 当货币体系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逐日倍增，物物交易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货币极不合算，物物交易更为有效。(2) 在价格不能自动调整到均衡时(如存在价格控制或法定最低价格时)，也可能采用物物交易的方式。(3) 在正常情况下，为了某些特定目的，物物交易也会在有限程度内出现。如美国的"物物交易俱乐部"即是为逃税而设立的。(4) 在许多边远地区，物物交易和种种原始贸易及货币交易一起，共同扮演重要角色。(5) 物物交易是许多现代公司不可缺少的经营手段。(6) 物物交易是国际贸易的一个主要部分，尤其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东方国家缺少硬通货，第三世界国家缺少现金，跨国公司经常选择物物交易方式，交换他们不能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产品。此外，有许多国际贸易协定是以物物交易为基础的，但这种情形一般存在一个初步的估价，货币是隐含在内的。

物物交换与交易（Barter And Exchange）　物物交换与交易的不同在于，它没有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货币。在没有价值尺度的情况下，交易者们之间的复杂交易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物物交换一般以不存在竞争为特征。正如在完善的市场中一样，在缺少竞争的情况下，议价是无法确定下来的。议价的结果极大地依赖每个人相对的信息量和当事者们在交易过程中拥有的或试图获得的需要量。除非人们具有超人的洞察力，否则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而且，除非有严格的经济上的理由，人们才必须选择物物交换的方式。然而，在交易情形下，即使在理论上仍然不能估计议价的条款，然而却可能估计当事人的分布，他们的需求曲线是已知的，而且不必强调交易品的不可分割性。除非有严格的经济上的理由，才可以考虑选择物物交换的方式。为了和现代社会中的垄断与联合的交易相类比，在不过多地考虑条件受到适当限制的基础交易下，研究物物交易是重要的。

非工业化（Disindustrialization）　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产量与就业量的相对份额或者绝对数量出现下降的现象。

对许多国家进行时间序列与横断面分析都表明，

当经济境况改善以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结构关系都表现出相类似的变化，即当人均收入增加时，农业部门的产量与就业量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份额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制造业的份额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不断上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开始下降，而服务业的份额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不断上升，到目前还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70年代都经历了制造业份额的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不断加快，而许多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与产量份额在50至60年代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石油国家大幅度提高原油生产价格，导致制造业成本的猛增，提价的效应通过反复渗透，对经济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导致西方国家出现非工业化的真正原因是，生产率提高的相对比例在制造业及农业中比在服务业中高得多，而需求的相对收入弹性在服务业中比在制造业与农业中要高，其中农业的需求收入弹性最低。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增加的时候 服务业的份额随之上升，首先出现下降的是农业，然后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下降对经济的影响相当重大，它会削弱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使资本投资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此外，制造业贸易还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的下降将导致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在世界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还有，制造业的下降还会使许多技术改造与新技术的应用失去了原有的动力，从而造成劳动效率的下降。

由此可见，非工业化对经济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要遏制非工业化的势头，就得进行一场再工业化，从而保持制造业的增长势头。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货币以及收入等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提高投资率，增加供给，维持工业生产的流动，同时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增进出口，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这是一项大工程，它的最终目标是扭转非工业化的趋势，使制造业重新振兴，从而实现经济在平衡的结构关系中稳步增长，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 非对称信息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名词，70年代由阿克勒夫（Akerlaf）在其《赝品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中首先提出。在古典的福利经济学模型中，一个竞争性的均衡配置或瓦尔拉斯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其中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所有的经济人对于各种经济变量都有同样的信息。然而，信息实际上总是呈非对称状态分布的，这样，原有模型的有关结论就必须相应进行修正。

在以非对称信息为基础的模型中，假定信息结构是共知的常识，即一个人可能不知道他人拥有的某些信息，然而却知道信息分布的概率。按照非对称信息理论，市场上买卖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是有差异的，通常卖方有较完全的信息而买方只有不完全的信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即使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也不会恢复均衡状态，因为价格已经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信号工具。以产品市场为例，在某种产品的市场上，只有卖主才知道每个商品的品质，而买主只知道售出品的平均品质，并且以平均品质为基础理性地出价。那么，某些高品质产品的价格将被低估，结果使一些卖主不愿意在以平均品质为基础的价格水平上出卖它们，随着这部分产品退出市场，市场上该种商品的平均品质会下降，买主也会理智地削减他们情愿支付的价格。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某些产品退出市场，买主进一步压低支付价格，直至最终市场清算价趋于零。这一过程的均衡使任何交易都不会发生。当信息呈对称状态分布时，人们可以通过使用同样的概率分布获得的预期效用，对不同的资源配置进行比较，这是肯定无疑的，也是十分简单的；当信息呈非对称状态分布时，某些人可能知道某个事件不会发生，而其他人却可能不知道。较少信息的一方往往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得信息，而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则通过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使自己获利，这样，信息分布的不对称导致经济人行为分布的不对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将非对称信息引入各种经济问题中，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解决了许多在古典的福利经济学模型中模棱两可的困境。从理论上来讲，非对称信息论的发展是和动态模型、博奕论以及激励机制经济学密切相联的。它不仅重新解释了买卖双方价格与交易量的决定问题；而且阐明了劳动管理模型中，非对称信息对最佳劳动契约的干扰方式；同时，它也成功地被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之中。在实际生活中，非对称信息论的运用非常广泛，只要在一个环境里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方面并相互对立，非对称信息就会存在。例如，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的信息掌握，即是典型的非对称信息分布。因此，非对称信息是比充分信息更为现实的假定。

非价格竞争（Non—Price Compitition） 非价格竞争是厂商竞争的一种手段。厂商不是通过改变产品的价格进行竞争，而是通过其他形式进行竞争。非价格竞争的主要手段有产品差异、广告、售后服务等。厂商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变产品的包装、设计、更新产品的品种、提高产品的性能等手段与对手

进行竞争。产品质量、品种等方面的改进使得一个厂商将自己的产品区别于其他厂商的产品，使消费者对自己的产品产生特殊的偏爱，从而扩大自己产品的销路。厂商还利用各种广告形式来宣传自己产品的长处以扩大自己产品的销路。通过对消费者提供售后服务也能吸引众多的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扩大产品销路。非价格竞争，特别是产品质量、款式的竞争可以促进技术进步。

非耐用品（Nondurable Goods）　也称软货物，是只能使用一个短时间的消费品，例如衣服、鞋和药物。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规定，非耐用品是指使用期不足三年的商品。但这一标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例如，衣服虽然被列为非耐用品，但属于衣服中的高档品如裘皮服装显然使用期不只三年。非耐用品是与耐用品相对应的。耐用品是指供消费者和生产者使用的，在正常情况下大概能用三年以上的设备。消费性耐用品包括汽车、家俱、珠宝和书籍等。生产性耐用品包括各种各样的机器和设备，但不包括建筑物、道路、飞机场等。一般情况下，非耐用品是在需要时购买，它属于生活必须品之类，因此其开支几乎与人口数量的增长相一致。而耐用品则不然，其购买基本上是可以延期的，在收益下降时期，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趋向于推迟购买新的耐用品，而继续使用现在的设备。结果是，用于非耐用品的开支波动小，而用于耐用品的开支则波动大。例如，1960—1961年的经济衰退时期，美国耐用品开支从740亿美元下降到630亿美元。

非标准分析（Non—Standard Analysis）　微积分理论的一种现代的重新阐述，它提供了用无穷大和无穷小量做计算的逻辑上严格的工具。非标准分析也称为无穷小计算，是20世纪60年代中耶鲁大学逻辑学家罗宾逊发明的，当初是回答微积分基础中的主要理论问题：怎样去定义无穷小这种不可思议的数。象导数（dy／dx）和积分（Sydx）中的dx和dy等无穷小的数到处都碰到。但这种无穷小无法出现在数轴上。在非标准分析中，实数轴以两种方法增加了内容：加进了无穷小和无穷大数。非标准数轴与普遍数轴相比就象宇宙与我们的银河系相比。另一种方法是，在普遍数轴的端点之外，非标准数轴包含无穷多个所谓"普遍数轴的副本"。用非标准分析的术语，就是有无穷多个银河系。非标准分析的实质就是模型论，是当代数理逻辑的主要组成部分。罗宾逊构造这个非标准模型的办法是在普通实数系的公理（例如x+y＝y+x）中加进无穷小数和无穷大数所必须满足的某些性质，然后运用数理逻辑中一条强有力的定理来证明确定存在这样一个模型，它对于普通数和无穷数来说都满足扩大了的公理系统。这个定理被称为紧性定理或转移定理。在非标准分析中，许多方面不同于标准分析，但标准分析中正确的每一个命题，在非标准分析中也是正确的，反之亦然。所以，与其说非标准分析是新的真理的源泉，不如说它是用新的方式来表达已有的真理。非标准分析在经济学中可以成功地运用。例如，它提供了建立有许多小商人的经济市场模型，每个小商人只对市场产生无穷小的影响。经济学应用非标准分析建立的经济模型已经很多，如拉施蒂模型、斯特劳安模型等。

非均衡分析（Disequilibrium Analysis）　非均衡是与均衡的概念相对而言的。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均衡包含二重意思，一是市场中各个有关变量势均力敌，经济结构处于相对静止的稳定状态，不再有发生变化的趋势。二是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相等。非均衡分析是在与均衡的第2种含义相对的情况下，即在市场非出清状态下研究价格与数量的决定。

1、非均衡分析产生的背景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无形的手"原理就一直贯穿在所有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中。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利已为动机，在市场上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其结果却总能使得市场达到均衡、资源合理配置、经济稳步发展。其中市场的均衡基本上都是通过价格调整获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也只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但是，均衡经济理论必须求助于一系列相当抽象的、在现实中很难达到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假设，而对于象非自愿失业、通货膨胀以及资源非充分利用等现实情况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呼唤着新的理论出现，以对现实问题给予恰当的解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世纪60、70年代，非均衡分析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引人瞩目的经济理论。

2、非均衡分析的理论内容

首先，非均衡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前提之一是经济行为人对有关市场的情况掌握着充分的信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获得信息要花费成本，要获得一定数量的信息，成本就已经相当高，而要获得充分而完备的信息，无论从人们的精力上还是从所需耗费的成本上来看，都是不可能的。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是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包括垄断竞争的情况，因此，应将不完全竞争作为研究的重点。

其次，非均衡分析区分了计划数量与实现数量，指出，市场出清达到均衡时只表明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等，但是有效数量与计划数量不一定相等。当市场上供大于求时，按照市场的短边原则（即均衡数量等于计划供给与需求量的小者），有效供给小于计划

供给，后者不能完全实现，而计划需求都全部转化为有效需求。反之，当求大于供时，计划需求不能全部实现，而计划供给则可按短边原则全部转化为有效供给。这时达到的均衡是一种配额均衡。

第三，均衡论者认为，市场在实现均衡价格之前，不会有任何交易发生，市场的唯一调节工具是价格。但是非均衡分析认为，在均衡价格实现之前，也会存在非均衡的自愿交易，调节市场交易水平的不仅有价格信号，也有数量信号。短期内，数量调整过程往往要快于价格调整过程。因此，数量信号在非均衡分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但影响与调整着所在市场的供求状况，而且通过"溢出效应"，也将这一影响波及到其它市场。

第四，非均衡分析将存量水平视为一个重要的数量信号。当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厂商总是要确定一个正常的存量水平，一旦存量过多，厂商就要减少产量并裁员，这时存量水平的调节作用超过了价格信号的作用。

此外，非均衡分析还引入了预期的概念，强调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的有关分析方法，而且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备的，搜集信息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交易不可能完全是均衡的交易，非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3、非均衡分析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非均衡分析打破了几百年来统治着经济学界的均衡观。它指出，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不确定性，时间序列中的经济运行总是相互发生作用的，行为人搜集信息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在均衡价格达成之前，交易也是可以实现的。而均衡理论却将上述现实情况通过大量的假定抽象掉，或者说，均衡理论正是凭借着舍弃上述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才得以存在的。非均衡分析正是要将这些复杂性考虑在内，立意创建一套更加逼近现实生活的理论，而这套理论不可能建立在优美但却空洞的均衡观上，它的思想基础是更具有说服力的非均衡观。

从实践意义上看，非均衡分析对于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切合实际的微观分析基础。同时，对于那些更具有典型的非均衡特征的计划经济来说，非均衡的分析方法为它们开辟了一条发展和完善经济学体系的新思路。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以往的均衡理论所采用的多是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研究的是一个个彼此孤立的均衡状态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非均衡分析采用动态分析方法所研究的是实现某个均衡的过程以及均衡变动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一个个连续的非均衡状态。

4、非均衡分析的演变与发展的过程

非均衡思想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它最早出现在均衡理论的有关分析中。例如，蛛网理论中的"不稳定条件"就描述了一种非均衡状态。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也提到了非均衡情况的存在。

非均衡思想在凯恩斯经济学体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凯恩斯不仅强调了劳动市场上的非自愿失业的状况，而且将收入的变动与价格的变动一同视为市场调节手段。

本世纪60年代以来，帕廷金、克劳沃、莱荣霍夫德以及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将非均衡分析系统地引进经济理论中，从而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其中，帕廷金对劳动市场进行了局部非均衡分析，克劳沃提出了"二元决策假说"，莱荣霍夫德对非均衡状态下价格经常呈刚性的原因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阐述，而巴罗和格罗斯曼则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局部非均衡分析扩展为一般非均衡分析。

后来，贝纳西、马林沃德以及卡丁顿等人将非均衡理论用于研究失业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以及开放经济中经济的运行。波兹、缪尔鲍尔等人更是将有关分析方法用于对集中性计划经济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非均衡理论与分析方法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但是非营利组织却带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厂商的某些特征，它带有政府的某些特征。因此，也可以说非营利组织是结合营利性厂商与政府两方面特征的一种混合的组织形式。一些国家的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组织、学校等都属于非营利组织。这种组织的组织与控制通过私人的主动性而不是通过政治过程来实施。这种组织不能通过以税收的形式取得财政资助。这种组织象政府一样不能在其拥有者与管理人员中分配利润或剩余，称为"非分配约束"。这种组织常常享受多种税收补贴，例如，可减免税收的捐赠、免征收入与财产税等。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非营利组织产生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失灵，二是政府失灵，即政府与市场都不能有效地提供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产品。例如，在只有市场起作用的条件下，消费者对商品的信息知之甚少。市场的营利性组织往往利用消费者的无知欺骗消费者，使消费者在购买时上当。消费者借助于非营利组织，例如消费者协会可以了解商品的信息，实现购买意愿。

在政府失灵时，非营利组织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政府一般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通过征税，或

者通过对公用事业收费的形式来筹集生产公共产品的资金。但是政府并不完全了解公众对于公共产品需求的信息，因此很难使公共产品的生产满足公众的需要。有些公共产品不是生产得太多了，就是生产得太少了。对于那些政府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公众要求，但又不盈利的产品往往由非营利性组织来生产，以弥补政府生产的不足。

但是，象市场与政府会失灵一样，非营利组织也会失灵。许多非营利组织由于资金来源问题而无法生存下去。由于非营利组织不能象政府那样以征税来筹集资金，也不能象营利厂商那样通过盈利来发展，因此，非营利组织资金的来源只有通过私人或官方的捐赠、政府给予税收优惠等方法筹集，或通过私人提供义务劳动来进行实际操作。一些非营利组织也通过对用户收费或在二级市场上出售产品而取得资金。例如，一些学校在市场上出售计算机软件而筹集办公经费等。即便如此，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还是有严格区别的，这种区别的标志就是上述非营利组织的"非分配限制"，而营利组织则可以在所有者和经理人员中分配利润和剩余。

非替代定理（Non--Substitution Theorems） 非替代定理是描述产品生产特征的一种定理。非替代定理表述为：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对应于可接受的利润率，一个经济将只有一种特定的价格结构，而不管最终需求形态如何。该定理有两种形式。一种适用于单一生产而没有固定资本的经济；另一种适用于考虑了固定资本的特定的联合生产。

以单一生产为例。非替代定理认为，假定：(1) 只有一种原始投入，该原始投入为劳动；(2) 所有生产过程是完全可分的，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并且具有同样的生产期间；(3) 每一生产过程利用有限数量的商品与完全可分的原始投入劳动只生产一种完全可分的商品；(4) 对于每一种商品而言，至少存在一种生产过程去生产这一商品；(5) 劳动对商品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6) 商品交换在每一生产期间结束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即利润率、工资率、商品的价格是统一的；(7) 只有在现行价格下运用一种生产过程能降低成本时，生产者才会运用这一生产过程。只要具备以上七个条件，某一经济中对应于每一可接受的利润率只会有一种相对的价格组合（包括工资），因此，相对价格是独立于需求的。

对该定理可以进一步进行描述。当利润率等于 r，净产出向量等于 d 时，用向量 p 表示均衡的价格向量，数 w 表示均衡的工资率。因此，没有任一生产过程可以在价格 p 下支付额外利润。对于每种商品，至少存在一种可行的生产过程生产它，所谓可行的生产过程是指使用这一过程的生产成本（包括正常利润）不会超过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可行的生产过程可以用来生产净产出 d。在以上条件下，可以将非替代定理表示为：(1) 如果净产出为$\bar{d}$而$\bar{d} \neq d$，那么 p 与 w 仍旧是均衡的价格向量与均衡的工资率。(2) 如果存在一种以上的解，那么解的特征是价格向量的分量将等于工资率。

通过放宽以上的假定 (3)，可以将单一生产中运用的非替代定理运用于联合生产。在联合生产的条件 P 下，假定将商品分为"最终产品"与"使用的机器"，每一生产过程只生产一种最终产品，但由于使用的机器与最终产品一道被生产出来，因此允许联产品存在。使用的机器是不能转换的，即它只能固定地使用于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此种情况下也将导出非替代定理。

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imy） 非正规经济在七十年代逐渐流行起来，这一词是描述在公共或私营的正规部门之外而存在的经济行为。这一词同"暗藏的"、"地下的"、"黑色经济"等词一样，用以形容非工业化。这一词最早是用来形容第三世界中自我就业以及非规律就业的，但后来也用来描述发达国家中一些社区的自发组织。在发展经济学中，特别是二元经济论中，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是相对的。正规经济的特点是大规模的，高效率的经济，企业是有形的，可数的，劳动者的收入形式是工资。而非正规经济与之相反，是小规模的，低效率的经济，经济是无形的，单位也是不可数的，劳动者是自我就业的。正规经济中的工资等于边际产出，而非正规经济的工资低于等边产出。因此，在二元经济理论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依赖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的转向，因为这样，劳动者在非正规经济中的收入的降低，而转移到正规经济中后收入增加了。但这需要资本积累。这是二元经济转化的最大障碍。由于正规经济是规则的，可以预测的、因此正规经济一直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非正规经济是无法预测的，无法再认识的，因此经济学家在过去很少研究。但事实上，这种非正规经济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然而很少有经济学家能正确地认识它。目前，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官员们已将非正规经济视为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了。

非货币投资过度理论（Over-Non-Monetary-Investment Theory） 用非货币因素所引起的投资过度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由德国经济学家 A·斯皮托夫（A.Spiethoff）、瑞典经济学家 G·卡塞尔

(G Cassel) 等人所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引起经济中繁荣与萧条交替的是投资过度及其所导致的投资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失衡。但是，引起投资过度的基本原因并不是银行信用的扩张，即不是货币因素，而是新发明、新市场开辟、新产品的发明等非货币因素。经济周期中的主要特点是资本品生产，特别是固定资本设备生产的变动。而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正在于上述非货币因素。当出现了新发明、新产品、开辟了新市场时，资本品生产增加、资本品生产增加又引起资本品需求增加、价格上升，资本品生产进一步增加，投资增加、经济进入繁荣状态。在这种累积性扩张的过程中，信用扩张是必不可少的，但引起这一过程的还是新发明等因素。投资的增加，资本品生产增加，必然引起消费品生产的减少。这就形成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失衡。这种失衡必然导致资本品生产过剩，于是，经济就进入萧条时期。这一累积性收缩的过程中，也会有信用紧缩，但信用紧缩仅仅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在于新发明等实际因素引起的对资本品生产的需求迟早会得到满足。一旦资本品生产过剩，萧条就无法避免了。只有再出现新产品、新发明，开辟了又一个新市场时，经济才会重新进入下一次高涨。正是新发明，新产品、新市场开辟等的周期性引起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种理论对经济周期过程的解释与货币投资过度理论基本相同。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引起投资过度的原因不同。货币投资过度理论强调了货币因素，而非货币投资理论强调了非货币的实际因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非货币投资理论过份强调了外部因素的作用，难于解释经济体系内的周期性波动。

非自愿失业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工人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但仍然得不到工作而引起的失业。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他对这种失业的解释是："当着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价格，比起货币工资来，发生轻微的上涨时，如果愿意按照现行的货币工资作工的劳动的供给和按照现行的货币工资对于劳动的需求都可能比现在实际的就业量更大的话，那么，人们就是非自愿地失业了。"这种失业是真正的失业，它的存在表明经济中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所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这种失业存在的原因。所以这种失业也被解释为可以由总需求的提高所消除的那种失业。现代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了这一概念，把这种失业称为"需求不足的失业"，又因为这种失业随经济周期的阶段性而变化，所以，又称为周期性失业。

非公开失业 (Non-Open Unemployment) 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失业形式，指除了与发达国家统计口径一致的公开失业外，还大规模地存在着的劳动力利用不足的情况。非公开失业的范围和计量方法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实际存在着的几种劳动力利用不足的情况很难于用任何单一的尺度来完全概括。从而这一研究成为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详细考察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有两种研究较有影响。一是克里希纳提出的計算非公开失业的4种标准。包括时间标准、收入标准、意愿标准和生产率标准。凡符合这4条标准之一的，即可被划归为非公开失业的范围。具体内容是，时间标准：劳动者在一年中劳动的天数或时数低于被定义为充分就业的天数或时数；收入标准：劳动者在一年中获得的收入低于某种必要的最低额；意愿标准：劳动者愿意工作的时间大于他目前工作的时间；生产率标准。劳动者从目前就业中撤出来而不减少产出。另一项研究是爱德华兹对发展中国家广义失业的各种形式所进行的具体、详细的划分，其中可归于非公开失业的形式有4种：(1) 就业不足。指那些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的时间的劳动者。例如，一个劳动者一天能够并愿意工作7个小时，但由于工作机会缺乏，实际上只工作6小时。(2) 形式上属于就业而实际上未能做出贡献。指既不属于公开失业又不属于就业不足的劳动者。本应划在就业范围之内，但他们的劳动却未能创造应有的效益。具体包括3种情况。一是隐蔽失业。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就业；二是潜在失业。如有些劳动者本已受过一定教育想参加工作，但因就业机会缺乏而被迫继续留校学习，有些妇女由于找不到参加工作的机会而做家务劳动，结果教育和家务成了最后的雇主。这种情况实质上无异于失业，但在统计中却反映不出来；三是过早的退休。不少国家中尽管人口的寿命在延长，但退休年龄却在逐渐下降。这主要是为了给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就业和提升的机会，而过早地让一些有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退休。(3) 健康受损。指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做全日工作的劳动者，但因营养不良和卫生保健差而无力做全日工作。(4) 无生产性。指本来能够做生产性劳动的人，由于缺少其他投入要素的配合，生产率极低，相当大部分的劳动几乎不创造成果而收益微薄，其生产成果甚至还不能补偿自己的生活必需品。

非洲开发银行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 1964年9月正式成立，1966年7月开始营业，行址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1979年以前，是只有非洲国家参加的互助性质的国际金融机构。

1979年5月，该行理事会年会以后，对非洲以外的国家开放，截止88年底，该行已成为包括75个成员国（非洲50个，非洲以外25个）在内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旨在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和担保，促进公共和私人资本在非洲的投资，加强成员国之内的合作，协调各国的发展计划，促进对外贸易以及更好地利用本国资源等等。

由于对非洲以外国家开放，非洲开发银行的法定资本不断增加，从成立之初的2.5亿非洲开发银行记帐单位，增加到1987年的162亿非洲开发银行记帐单位。同时，该行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能力也不断加强，为该行保证了稳定而充分的资金来源。

该行发放的贷款分为两部分，普通业务贷款和特别业务贷款。前者是利用该行的普通资本基金按照一般商业标准提供的贷款。后者是利用该行的特别基金按照优惠的原则提供的贷款。其贷款主要用于公用事业开发，农业发展以及交通运输业等方面。

为解决资金不足以满足非洲国家建设需要的问题，非洲开发银行先后建立了非洲开发基金和尼日利亚信托基金等附属机构，重点对非洲最穷的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其中，非洲开发基金尤为重要，它可以提供期限长达50年的无息贷款，从1974年基金成立起到1988年底，该基金总计发放贷款和赠款金额约45亿非洲开发银行记帐单位。

该行虽对非洲以外国家开放，但规定，必须由非洲人担任行长，非洲国家至少控制银行资本的66%，行址永远设在非洲等措施以保证该行不背离成立的宗旨。行长由董事会选举，兼任董事会主席。董事会由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推举的董事组成，并作为理事会的执行机构，负责处理该行日常业务。

非洲贸易促进组织协会（Assocation Of African Trade Promotion Organization） 非洲贸易促进组织协会成立于1974年1月，共有20多个成员国，总部设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它的宗旨是加强非洲国家间在贸易方面的联系，协调各国的贸易政策，进而促进各国间贸易的发展。该组织通过两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为推动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发展而努力。

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组织，它成立于1963年5月25日，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目前共有50多个成员国。它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加强它们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防务等领域的合作，改善各国人民的生活，根除殖民主义，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成员国首脑会议是非统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就目前和未来的各项有关问题作出决策。部长理事会负责筹备首脑会议，秘书处是常设机构。另外，1963年5月成立的解放委员会和1964年成立的调解、和解与仲裁委员会也在非统组织的领导之下。长期以来，非洲各国受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和掠夺，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非统组织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殖民主义的剥削，维护了非洲各国人民的利益，对于缓和和解决非洲各国面临的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 非关税壁垒是指除关税以外的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限制商品进口的措施。非关税壁垒产生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战后曾受到一定的削弱，但是从六、七十年代起不断发展，目前已成为贸易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非关税壁垒的种类繁多，到七十年代末已达到900多种，发展到今天，这个数字已在3000种以上。非关税壁垒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之分。如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等属于直接的非关税壁垒，而进口押金制、最低进口限价、复杂苛刻的进口检验标准等属于间接的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同关税壁垒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了限制进口的主要手段。第一，它比关税壁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第二，它比关税壁垒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歧视性。有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往往不公开，即使出口商了解到其名称，但很难了解到它的运用程度，使出口商难以适应。由于非关税壁垒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这就可以对不同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得限制进口取得不同的成效，实现区别对待的目的。第三，它比关税壁垒更能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关税壁垒是通过提高进口商品成本来间接地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而某些非关税壁垒措施预先规定进口的数量和金额，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能起到直接限制进口的作用。

非抛补套利（Mucouered Arbitrage） 套利方式之一。"抛补套利"的对称。见"套利"。

非累积优先股票（Non—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 其规定如果本年公司营业欠佳，当年无法分配给优先股股东的股息时，该股息不能累积，只有当公司有盈利时，优先股股东才能优先分配股息。

非贸易汇率（Invisible Trade Rate） 又称"金融汇率"，"贸易汇率"的对称。适用于与非贸易往来有关的外汇买卖的汇率，包括资本输出输入、旅游、侨

汇、海陆空客运费、邮电、银行、保险业务等外汇收付适用的汇率。一般由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的外汇管理机构制订，可以是一种汇率，也可以是多种汇率。

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本身及其周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由于人与经济密不可分，因此，人类学也就必然与人类的经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经济问题都离不开对人类自身的体态与体型特征进行研究，可见，要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就有必要借助于人类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经济人类学正是运用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人类经济生活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

经济人类学主要研究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人类的起源、发展与变化同经济生活的相互关系；（2）人类如何在物质生产中实现最高的效率等等既定目标；（3）对经济体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比较分析。

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观察法，这一方法是1922年由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首创的，它通过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实地观察，特别是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进而归纳出相应的社会关系并上升到人类学理论。另外一种方法是由法国学者所倡导的图书资料法。他们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前人通过实地调查得来的宝贵资料，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这两种方法经常综合起来使用。

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比较短，属于新兴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经济起飞与发展的问题，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经济人类学应运而生了。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M·赫斯科维茨所著的《经济人类学：对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一书的问世为经济人类学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K·波兰依也是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1971年，"经济人类学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经济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历史虽然比较短，但是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其中以对农业社会的土地、技术等问题所作的分析最为深入。例如，他们认为，农业社会中的土地以及其它财产是按照血缘关系在部落或者家族内部转移的，这种转移的规模与构成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威望、品质等因素，这使得土地权力不可剥夺，当然，土地所有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时间的推移，土地所有者的结构也会出现变化，但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转移的情况截然不同。1877年摩根所著的《古代社会》一书首先将非洲与大洋洲农业社会的财产所有制与欧洲的财产所有制进行对比，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人类学家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对经济人类学的创建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启迪作用。

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 指的是在现有的人力，财力与物力的条件下，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制约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制订的经济发展方案，它使得经济有意识、分步骤地向所追求的目标靠近。

1、计划的制订

经济计划可以是微观层次的，比如一个企业的发展计划，可以是中观层次的，比如部门发展计划，也可以是宏观层次的，比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它可以排除对外贸易，在封闭的体系下进行，但是多数国家的经济计划都必须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制订。经济计划的具体制订过程要因国、因时而异，但是大多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首先要明确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所追求的目标一般是利润最大化，以及使企业最大程度地发展等等。对于一个部门来说，它所追求的目标通常是维持本部门内部各种结构合理、关系顺畅，以保证部门经济迅速、健康地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所追求的目标则是实现经济迅速而稳定地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等。

（2）收集信息。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了解实际情况，不应当只注意那些与生产计划直接相关的因素，而忽视了那些可能间接地影响着经济目标实现的力量。例如，对于生产汽车的厂家来说，它不仅要注意了解钢材、合金等等原材料的供给与价格情况，还要考虑汽车发展的趋势、世界上其它汽车生产厂家的经营状况及发展动向、新的制造技术的应用，新材料的出现，甚至其他运输工具的发展情况等等。轻工业部门的计划制订者不仅要了解本部门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能源以及劳动力的供给情况以及本部门产品的销售情况等等，还要考虑到本部门与重工业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以及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与应起的作用、它在世界工业市场上的竞争等等，因为这些都将间接地影响到轻工业部门的产品销路与价格水平，从而影响到这个部门的发展，对于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负责人来说，更应当考虑所有有关本国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技术状况，了解计划期间资源的可用数量、各种结构关系以及来自制度的以及社会的制约条件等等，所有这些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所追求

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各种信息的可用性、处理以及存储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便利了信息的收集与使用。

(3) 编制具体计划。这是制订经济计划的关键一步，计划制订者将所掌握的信息分门别类整理出来以后，从中归纳出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交织组成的结构等等。把所有有关因素以及这些关系、结构都纳入一个一致的、完整的框架中，就形成了具体的经济计划。它可以用文字表述，阐明其中各因素与变量的逻辑关系以及层次性、阶段性等等；也可以纳入经济模型之中，用数学方式进行有关的表述，模型表达的优点在于使各种结构看上去一目了然，并且易于操作，但是有时偏于简单化，不够全面。如果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效果更佳。

(4) 计划的核定。将计划编制完毕以后，还应当交给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有具体工作经验的工人等等进行研究、讨论、反复论证，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才能敲定。

2、编制计划的方法

常用的计划编制方法有两种，即经济计量模型与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模型是由J·丁伯根、R·弗里希以及L·克莱因等人创建与发展起来的。通过回归分析、假计检验等方法可以估计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经济计量模型主要研究的是宏观经济问题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作用。该模型的发展已经相当完善，任何经济政策对任何市场的各种影响都能通过它被估算出来。

投入产出分析法是在本世纪30年代内里昂惕夫所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它把经济中各部门、甚至各个生产环节都纳入一个庞大的体系中，从中可以找出各部门与行业在生产中的连锁关系，可以计算出某个部门或者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的直接或者间接生产这种原材料所需要增加的其它产品的产量。

目前，许多国家在制订经济计划中都把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这样既可以为中长期发展作出规划，又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作出协调与管理。

3、各国的经济计划

在计划经济的国家中，各个层次的经济计划都由中央计划当局来制订，并进行管理，各部门与企业只需要按照中央所指派的计划去生产，一切服从整体的利益。这种计划方式可以迅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经济可以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消灭失业与通货膨胀。但是实践表明，在计划经济中，如此具体入微的计划都由中央制订，这是不切实际的，它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往往束手无策，而且短缺与积压同时存在的现象到处可见，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者之间缺乏竞争，消费者在市场上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这种局面，计划经济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改革，中央计划当局不再负责为企业编制计划，企业可以自主经营。这一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不过，中央当局仍然掌握着很大一部分计划的权力。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计划通常由企业自己制订，本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加强了政府的作用，从宏观上对经济的发展作出指导与引导，以便保护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协调不同部门的经济利益以及保证各部门、各地区发展结构的合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制订计划，它们的目标主要是经济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早日提高等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们在经济计划中设立了一些子目标，比如完善市场体系、建立健全立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建立一套社会经济统计学等等，这些子目标的实现是完成上述长期目标的必要前提。

经济活动中的货币（Money In Economic Activity）　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马克思对货币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关于货币的起源，有人认为货币是人们协商的结果、有人认为货币是人们有意识地发明的，有人认为货币是金银天然的属性、有的则认为货币纯粹是一种符号。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虽然作过一些论述，他们已经认识到货币是商品，货币是从商品界分离出来的，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自发产生的，但是他们不能从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来阐明货币的产生，而是用"有思虑的人"的自发活动来解释货币的起源。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商品交换发展历史的考察，分析了价值形式怎样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成为货币形式。揭示了货币是商品交换矛盾发展的产物，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稳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特殊商品。货币既有使用价值，同时在经济行为中的货币也具有价值。在经济关系上，货币体现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一切商品只有通过与货币相交换，才能证明它们是社会劳动产品，是价值物。货币体现社会劳动，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交换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货币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不同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货币是奴隶主，封建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占有他人劳动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因此，货币又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特别是货币以及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不少经济学家重新认识货币。这些经济学家中

包括I·费雪，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等人。他们用多种方法在静态下分析经济行为与货币的关系。但是静态下对货币与经济行为的分析是不够的，这种关系还必须在动态下去研究。

经济活动的控制与协调（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它是经济控制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意指一个经济控制系统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方法起源于50年代的西蒙（Simon），70年代广为传播，并在两个方向上得以发展。第一个方向是众所周知的，即将理论的控制模型应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在这种情形下，控制因子的结构被看作是给定的，问题是根据某种判断标准，找出使经济系统的作用可以接受的控制变量的价值（通常是最稳定的或最优的）。第二个方向是经济制度理论的发展，是在选择中有用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经济机制理论，意在控制因子的改变或重新构造。

1、经济控制系统。在任何时点上，一个抽象的经济体系由下列成分构成：（1）经济人的集合A，它们是经济活动的主体；（2）经济人活动的对象的集合B，（3）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环境C，它们不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却和它发生相互作用；（4）将集合A、B、C的元素连结起来并改变其状态的过程的集合D。在控制论方法中，经济过程分为以下两种：（1）真实过程（$D_r \subset D$），它改变物质对象的状态。真实过程的集合由经济人的真实活动和环境的外部作用组成，连结真实过程的规则是自然规律。最重要的真实过程是生产、抵押以及物质对象在经济人之间的让渡、消费、真实过程的对象形成商品集合（$B_r \subset B$），（2）控制过程（$D_c \subset D$），它改变经济人的认知状况并调节其行为。这些过程的对象（$B_c \subset B$）称作信号。最重要的控制过程是对真实过程的观测，经济人之间信号的产生和转移，以及有关真实活动的决策。由于每一个经济人$a \in A$都进行真实活动和控制活动，因此可以方便地把经济活动及其对象的集合分为两个副集，把每一个经济人看成由真实部分和控制部分组成，它们分别进行真实活动和控制活动。最后，为使经济系统的两分法更为完善，我们可以将经济人的集合A分为两个子集：真实经济人（或真实机构）$A_r \subset A$，其主要活动属于真实过程；控制经济人（或控制机构）$A_c \subset A$，其主要活动是信息处理和决策制订。对这种经济人的分类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首先，或许会存在边界经济人（如中学），其归类意义模棱两可并取决于它们在给定序列中所起的作用；其次，控制机构的真实部分在理论研究中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在上述两分法中，有关信托商品、货币过程和金融机构的一些词汇是规则的。

经济控制系统也可以用数学控制论的语言来解释，它由下列三个方程组成：

受控子系统：$x=\Phi(t, x, u, z)$ (1)

评估子系统：$y=\psi(x)$ (2)

控制因子子系统：$u=\theta(t, y-y^*)$ (3)

其中，$t \geq 0$表明变量决定的时点，$x(t)$是状态向量，$u(t)$是控制向量，$y^*(t)$是命令向量，$z(t)$是状态的外部作用向量，Φ、ψ和θ是相应的函数。公式（1）—（3）当然不仅仅是表示控制系统的数学形式，而且是以覆盖许多重要情形和特殊形式，从上述方程中可以看出，该系统主要包括下列内容：（1）间歇运行系统，即状态的评估不是连续的而是在间断的时点上进行。在这种情形下，控制变量的价值保持不变。（2）随机系统，如果x、y、u代表随机过程，相应地某些操作者Φ、ψ、θ有随机价值，那么，随机系统就会产生。在Φ随机的情形下，控制系统不规则地运行，随机的ψ表示度量的错误，随机的θ表明不确定的控制行为。（3）最优控制，方程（3）没有给出控制规则，但利润最大化问题的解决却可以归结为一个给定函数，即$I=\int_0^T u(t,x,u)dt$，它以方程（1）为条件，要求控制变量u属于一个给定的集合，u是自变量的标量函数。（4）高级系统采取下列不同形式：A.自制（或目标修正）系统产生命令信号y^*；B.认知系统改善控制因子，修正度量尺度价值；C.自组系统能改变控制结构、组织机构以及它们在受控子系统和控制因子之间的内部关系。尽管大多数经济系统都执行高级作用，但其数学分析却是极其困难的。

2、控制因子的结构。在实际经济系统中，控制因子的结构相当复杂，它由许多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的不同元素组成。这些元素的一部分被用来进行简单的观测。常规计算和薄记等，另一些则被用于搜集、产生、传播重要信息或者根据已经拥有的大量信息做出重大的决策和计划，他们有些在不同的数据集合上平行运行，有些则形成有规则的组织机构。控制因子的构成要素是转换因子，转换因子是一个不能再分的复杂的控制因子的基本成分，其作用包括三个继起的行为：（1）信号接收—转换因子通过对真实过程的观测、环境或其他转换因子接收信号，这些是要素投入信号。（2）信号变换或信号发生—转换因子转换、储存与合并接收到的信号并产生新信号，这些信号产生的规律构成转换因子的转换函数。（3）信号发出（或发射）—转换因子将发生的信号（产出信号）转换成一个或更多的转换因子，或者直接作用于真实过程中的经济人。

在基本控制过程的分类中，涉及了两类参与该过

程的经济人，即产生信号的经济人和信号在他们之间传递的经济人。对于信号的发生，我们可以分为三种过程：（1）非协调过程—信号由一个单一的真实机构组成的控制因子发生；（2）相互作用过程—信号由多个真实机构构成的控制单位共同产生；（3）集中（或统一）过程—信号由一个控制机构或多个控制机构共同产生。同样，信号的传递也可以分为三个过程：（1）隐讳过程—信号没有离开它所由发生的机构；（2）交易（或处理）过程—信号用于两个真实机构间的真实交易，发送人和接收人是两种不同的真实机构；（3）非隐讳过程—在两个以上真实机构之间进行的其他信号传递，不管何时一个真实机构都是发送者或接收者，或者既是发送人又是接收人。在复杂的控制过程中，多个转换因子的结合随着其信号产生和传递的模式而有所不同，大多数实际存在的经济控制系统都可以称作部分协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大部分决策由真实机构单独进行，另外的部分则由它们的相互作用或不同的控制机构进行。上述经济控制系统结构概念没有从外部把问题限于'经济活动的控制与协调'，而是包括了在真实机构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内运转的控制功能。可以看出，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之间的区别是不充分的，必须由一个更精确的分类方法所取代。

3、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控制结构模型，这种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1）它不仅研究均衡的存在及其有效性，而且研究导致均衡状态的运动轨迹。真实过程和控制过程平行运行，不存在无限的均衡过程；（2）经济人的非最优化行为是假定的，向某些产出变量的外生常态价值的调整是行为规则，在使用'标准控制'原理（control by norm'princiole）时，假定标准在长期过程中由个人经验或社会认可形成，而且在短期和中期调整过程中保持不变；（3）信息和决策并不集中于少数经济人手中，整个控制过程以一种非协调的然而直接的方法，由真实机构中的控制单位来执行；（4）模型只使用可以观察到的变量，因而可以进行经验研究。模型假定经济由几个生产者组成，每个生产者生产一种产品。环境通过最终使用作用于真实过程，通过以往的经验作用于控制过程。那么，真实过程和控制过程都可以用由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构成的方程来表示。根据控制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与控制过程相对应的转换因子产生的所有信号都不存在任何协调；另一方面，通过选择一个适当的控制尺度，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邻近均衡状态的位置。这就是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控制结构模型的基本结论。

经济史与理论（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经济史就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经济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经济史也就开始了。每个人、每个部落、每个社会都要考虑穿衣吃饭这类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问题，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人们通过改进生产工具、发展劳动分工等等方法来提高劳动效率，以便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后来还通过将剩余进行投资，扩大再生产、增加积累的办法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另有近代的进行各种层次的管理与组织，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富裕，更满足、因而也更幸福。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人们进行过种种如上所述的探究，这就是经济思想的由来。经济思想的片段逐渐积累起来，人们就能够对经济中存在着的各种关系、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因素及其发展变化作出系统的阐述，这就形成了经济理论。

经济理论是人类经济历史的必然产物，它紧紧伴随着经济史的发展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会出现相应的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例如，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奴隶社会，人们所注重的是如何通过社会分工，加强控制与管理来发展农业，促进奴隶主经济的发展，而对工商手工业则持轻视的态度。到了封建社会，人们立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重点仍然是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高利贷现象在封建社会广泛出现，对它的争论也随着展开，一方面，它是放贷者盘剥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起到了融通资金的作用，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人们对此看法不一，不过多数人对它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人们不再扬农抑工商，而是把工商业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与当时商品生产不断发展，交换日益频繁的现象分不开的。资本主义初期产生的重商主义就认为，财富与货币是同一个概念，一个国家拥有的金银越多，它也就越富，因此，应当到流通领域去寻找财富的源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发达起来，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人们在市场上传递着供求信息，以协调彼此的生产与消费。在这种形势下，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从重农学派到西斯蒙第，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研究价值问题、生产增长问题、分工、交换以及货币问题等等，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一些经济规律，并提出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19世纪末，当大企业不断涌现，自由竞争被垄断竞争所取代时，对垄断现象的研究日益增强，1933年，美国的张伯仑和英国的罗宾逊夫人分别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与不完全竞争理论，修改了完全竞争这个基本前提，使理论更接近于现实情况。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随之发展完

善起来，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它要研究如何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如何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在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短期经济计划时所应考虑的方方面面。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经济理论服务的对象是各不相同的。在奴隶社会，经济学者与思想家们所研究的是如何加强对奴隶的剥削，以使增加奴隶主阶级的收入，从而加强奴隶制经济；另一方面，他们还要考虑剥削的方式与程度，以防奴隶起来反抗，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奴隶制度。封建时代的经济理论涉及到庄园的经营管理问题，以便更有效地剥削农奴，确保封建地主阶级的权益与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中奉行的是每个人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这已成为有关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经济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起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例如，18世纪下半叶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借助一系列发明创造，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使得生产走向机器大工业时代，这从技术上与社会结构上都保证了资本主义势力的日益强大，从而最终战胜了封建势力，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斯密的《国富论》开始，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工业革命，那么以后的经济理论就要改写。再如，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经济萧条，失业人数剧增。这一事实打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奉行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会自动达到均衡状态"的神话，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出现了第一次危机。在这一形势下，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应运而生，从而揭开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传统的放任自由的经济主张一度被取代，直到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沿用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却导致了停滞膨胀之后，自由主义思潮才又重新抬头。可见，不同时期盛行的经济理论总是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经济形势紧密配合的，这也正是经济理论实用性的体现。

另一方面，某些经济理论的产生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经济历史的进程。例如，马克思在19世纪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与矛盾之后，写就了《资本论》这一巨著，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各种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趋势。当时各国的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点下，认清了自身所处的悲惨地位以及历史使命，联合起来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世界上不少地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经济史的连续性（Continuity In Economic History） 在描述经济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的时候，经常要涉及到连续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当出现了某些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时，历史会出现转折或者较大的变化，从而使得经济历史变得不连续，对于这类事件，人们可以找到它发生的具体日期，并分析此前与此后的不同之处，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通常认为发生在18世纪的下半叶，以瓦特发明蒸汽发动机为重要标志。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这一变化对以后的历史起到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大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前面的无数小事件演变、积累而成的，它的变化总是渐进的、缓慢的，对以后历史的影响也是逐步的，因此，很难为这种事件确定一个具体的日子，也不能说在这个日子之后就出现多么大的转折。例如，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有许许多多技术上的发明、创新，经过长时期的日积月累，当大的发明创造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与完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影响也是逐渐蔓延开来的，因此，应当把它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应当以一个具体的日期来间断此前与此后的历史。经济史学家A·格森克朗（Gerschenkron）对于帮助人们理解经济史中的连续性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时候，不应当将变化之间的相互连贯性视为不存在变化。在一条曲线上，任何经济变化都是连续的，但是不能因此就推断说实际中根本没有变化，应当将严格的数学意义上的连续性与讲述事件时所指的连续性区别开来。讲述事件时所用的连续性或者不连续性只是历史学家设计的工具，以便使讲述更为方便与清楚。总之，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它的前因后果的，大事件也是如此，为这些事件指定一个具体的日期只是为了表达的方便，但是不能因此将它们同有关的小事件割断开来。有的时候，当影响深远的大事件真正到来时，那些作为其最初动因的小事件早已结束了，尽管如此，在考察历史的时候也不应忽视它们。

经济学（Economics） 是对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科学。它是研究如何用稀缺的资源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科学。

"经济"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来指的是对家庭事务进行管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家作用的加强，在17世纪初出现了"政治经济学"一词，用来指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管理。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政治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不单纯研究国家的经济

政策问题，而是对整个经济社会作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学者逐渐用“经济学”一词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样不但更显得名符其实，而且可以囊括对有关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各个学科。西方经济学说在19世纪传入中国，按照中国古语中的“经世济民”之意被译为“经济学”。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进行考察的时候，受当时习惯的影响，也经常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被冠以“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以此与西方经济学说相区别。

1、经济学分类

当代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 理论部分

经济学的理论部分主要是表述基本概念、原理等等反映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变化规律的理论性概括。它是经济学中提纲挈领的部分，可以用来对经济学的应用学科提供理论性的指导，也为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按照研究的层次不同，这一部分又可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等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分析这些经济个体在市场上追求各自最优化目标的同时，如何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微观经济学要研究市场的调节机制、价格的决定、资源的配置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总量的变化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供求量、就业量、价格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等总量指标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核心是国民收入与就业理论。宏观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

按照研究的目的不同，经济理论还可以分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研究经济中“是什么”的问题，不涉及价值判断。而规范经济学则要说明“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表达研究者的主观意见。

按照研究的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学的理论部分又可分为西方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

(2) 应用部分

经济学的应用部分就是运用基本经济理论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实际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以便从不同的领域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从地区来看，有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等等；从部门来看，有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从国际经济关系来看，有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等等；从企业经济关系来看，有企业管理学、市场学等等。此外，还有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生物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许多分支，其中许多学科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建立与发展起来的。

(3) 历史部分

包括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及相互关系的特点与规律。按地理范围可以分为国别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以及世界经济史。按研究的时期划分，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与现代经济史。

经济思想史是研究历史上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说的发生和发展、产生的背景以及在整个经济学框架中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对一些代表人物与流派的研究。按国别划分，经济思想史可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英国经济思想史等等；按照所研究的时期划分，就有古代经济思想史、近代经济思想史等等。

(4) 方法部分

这里主要指的是对经济现象进行数量分析与计量的方法部分。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统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等等。数理经济学是用数学方法对经济问题加以研究的学科；经济统计学重在统计方面的分析与研究；而计量经济学则是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实际经验数据进行研究，通过设立模型求解，又以参数估计的方法来对模型进行检验，从而达到验证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关系并对经济变量进行预测的目的。这些方法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精确，也更为科学。

2、经济学的方法论

经济学的方法论就是了解和研究经济问题所需要运用的各种方法的统称。这些方法主要包括演绎法、归纳法、以及各种数学计量的方法，其中最为常用的与重要的方法是演绎法与归纳法。

演绎法是从前提假设或者从已经成立的法则推论出结论的研究方法。它首先要根据需要作出某些假设，或者是选定一个有关的、已经得到公认的法则，然后从假设或者法则出发，推出结论，最后还要对结论进行检验，看它是否与实际的观察相符合。其中假设不应太脱离现实情况，它也制约着结论的适用范围。

归纳法是从许多个别的事实总结出普遍性原则的研究方法。它的第一步是进行实地观察、搜集有关数据资料，将这些分散的资料进行总结之后，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最后进行检验。

3、经济学的演变

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就曾出现过有关管理、买卖与税赋方面的经济思想，西欧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出现的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等从不同的侧面对前人

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完善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

1776年，英国的亚当·斯密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对价值、财富的分配、国际贸易以及货币等方面的经济问题都作了论述。他重视生产领域，把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视为财富的创造者，他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认为利润和地租是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的扣除。此外，亚当·斯密还提出了著名的"无形的手"原理，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会自行调节，并总是处于理想的均衡状态，从中自然导出的政策结论就是主张放任自由，政府尽可能少干预经济生活。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此建立起来。

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他还提出了财富分配理论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从而建立起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1870年以后在西欧出现了边际效用学派，其中代表人物有奥地利学派的C·门格尔，F·维塞尔和E·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的杰文斯、L·瓦尔拉斯与V·帕累托以及美国的J·克拉克。他们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以此取代古典政治学中的劳动价值论。

英国的A·马歇尔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均衡价值论，并以此为核心，采用一系列数学的与动态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将供求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与边际生产力理论融为一体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他所创导的新古典学派在西方影响极广，并一直延续到本世纪30年代。

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企业规模日渐庞大，从而形成了垄断势力，这冲击了传统经济学所赖以存在的自由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本世纪以来危机的频仍更是使传统经济学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E·张伯仑与英国的J·罗宾逊于1933年分别发表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从而使理论的分析更接近现实，也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1936年，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他在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并不是总能经过自行调节而达到均衡状态，"萨伊定律"所描述的只是现实中的一个特例，更经常的情况是市场无力自行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对小于充分就业条件下均衡的研究才是"通论"。凯恩斯从国民收入与就业量等宏观变量入手，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失业与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增加有效需求，就需要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通过系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从而实现充分就业，使经济重新走向繁荣。凯恩斯的这套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于在30年代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异于一付灵丹妙药，这些国家纷纷采纳了上述政策建议，逐渐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这被西方称为"凯恩斯革命"。

后来的学者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充实和完善，形成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方面都影响颇深的凯恩斯学派。凯恩斯学派内部有两大分支，一是以美国的P·萨缪尔森和J·托宾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又叫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另一个是以英国的J·罗宾逊和P·斯拉法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派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大不相同，曾经进行过长达20年之久的论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的日益广泛，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逐渐形成。将动态的方法与观点用于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形成了动态经济学。此外，为了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又兴起了发展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与方法日益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各种地区性、部门性经济学以及交叉学科也应运而生，蓬勃发展。

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使凯恩斯学派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其中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等，它们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恢复经济自由的原则。

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它的创始人是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代表作是1867—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共三卷)。《反杜林论》与《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性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他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概念，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等环节进行了辩证的剖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同时，他们还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了预见性的描述。

此后，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建立起一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涌现出了如苏联的H·布哈林、波兰的O·兰格、M·卡莱斯基与W·布鲁斯、匈牙利的J·科尔奈等出色的经济学家。

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这要求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经济杠杆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经济学体系也必将作出相应的变革。

经济学中的计算机（Computors In Economics） 由于经济学研究中要大量涉及数据的计算与处理、分析以及对经济形势进行评估与预测等等，因此，计算的任务相当繁重。在本世纪20—30年代以前，由于没有得力的计算工具，许多计算与分析工作无法进行，这严重地妨碍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研究成果的运用。

40—50年代，电子计算机开始用于为经济学研究服务，这极大地减轻了经济学研究者的负担，使得许多大型的调查，实验以及理论研究得以较容易地进行，首先，电子计算机可以帮助人们对经过普查或者抽样调查得来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与此同时，计算机还可以将这些数据存入大型数据库中供以后的分析之用，数据库中还存有数以千计的经济变量的长期统计序列，存入之后还可以对这些数据与变量序列进行修改与调整。如果将世界各国的计算机终端联系，那么世界上的几百万用户就可以共享彼此的研究成果，他们只要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从中找出所需要的数据，立即用于研究。有时为研究之用，人们可以同时从数据文件中取出几十个统计序列，这样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分析出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经济中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往往是非线性的，在进行检验与应用的时候，计算机依据历史数据，通过拟态技术进行求解、分析，同时为经济变量开出时间通道。进行拟态检验之后，计算机还可以将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制成图表的形式，并对其经济意义给出解释。从调出所需数据到对计算结果进行总结，借助软件包可将上述任务连续完成。

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大量使用，这对于经济学，尤其是对于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等分支来说，无异于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它可以迅速而精确地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分析与预测，为各国政府与企业制订经济政策与生产决策服务。目前，计算机的应用已经日益广泛，经济领域中到处有用武之地，也成为教学的普及工具。

计算机技术还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之中，未来，它的使用会更加广泛而深入。一方面，大功率计算机可以处理具有完全解释功能的软件包，从而可以对经济中相当复杂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国际性的调查统计也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价格低、体积小的微型计算机将进入千家万户，使计算机的普及化大大加强。

经济学中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Economics）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是一个难题，这种困境源于经济学缺乏一整套共同的认识。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怎样才能认识一个因果规律？第二，研究工作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为寻求某种因果规律。我们以假设—演绎的方法出发进行分析。标准的观点认为，当经济理论假说与经验事实相互对应时经济理论才能获得发展。此看法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自然世界是一个有序的王国，它独立于人们的概念、信仰、假说与猜想之外，当科学通过对猜想的检验，从而获得了因果规律——各种各样的最初条件会在下一步引起什么结果——的时候，科学也就掌握了这种秩序。科学的方法或是以一种已知模式中推断出一种情况，或是从特定情况中推演出一般的模式，前者就是预测，后者是解释，二者构成知识的两个方面。经济世界和经济知识就是在这种自然的科学模式上进行分析的。这个基本的经验主义还需从两个方面加以补充。一方面要赋予理论一个更为明确的作用，弗里德曼（M.Friedman）的见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经济理论与"一种语言"和"一种独立的假说体"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一种同义反复（a set of tautologies），其作用是扮演一个档案系统（filing system），后者指以复杂的现实将必要的本质特征抽象出来，经济现实的真实特征有没有被抽象出来并包括在档案系统中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最终预测成功与否。这种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关于分析性命题与综合性命题的区分中得到响应。弗里德曼的独立假设使纯粹的理论与世界联系起来，并让经验事实支配理论，第二点补充是波普（K.popper）的证伪（猜想与反驳）学说，他削弱了将经验实证作为真理检验的论断。他认为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才真正区分科学与伪科学。如果假设H隐含了观察O，那么O并不能证明H，但非O则能排除H，因此一个明智科学理论必须陈明它会被驳倒的可能的经验事实。但波普的看法并不碍于经验事实的检验仍是方法论中的一张王牌。之后的科学哲学对这种判断理论的经验主义方法提出了很大的疑问。奎恩—杜海姆（Quine—Duhem）的假定认为科学理论就象一个蛛网，它包括的观察判断只能作为一个整体而理解，不是单个假设H隐含一个非加修饰的O，而是一系列的假设与一串观察相联系。经济学中充满了奎恩—杜海姆假设的例子，比如"货币供应量"与"总价格水平"，对它们有许多不同的定义，选择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反映了理论上的不同考虑。经济学家们所用的描述性资料本身就包含了建立它们的理论，而且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经济预测总是在"假定其他情况均相同"的前提下作出的，一旦预测是错误的，经济学者就会说这是因

为"其他情况均相同"的前提被违背，特别在消费理论中，诸如偏好序和效用这些变量是不可观测的，上述方法经常被运用。于是我们发现经济学中的经验检验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尽管人们一般都尊重波普，但似乎经济学中充满那些从其倡导者的经验眼光看来，总能得到证实的迂回理论。这个结论并不会使库恩（T.S.Kuhn）感到惊讶，他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也没有进化到经验主义方法论所期待的地步。而他们的历史最确切地可以理解为一系列不连续的范式。他所说的范式是指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群体通行的实践活动，有时也指一系列公认的前提或世界观。范式随很多情况而变化，但经验检验却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当相反的经验论据逐渐积累时，范式只是有了越来越多的反例，只有当包含这些反例的新范式出现时，范式的转换才会发生。拉卡多斯（I.Lakatos）试图通过接受所研究的单位应是整个系统而不是单个假设，来证实波普理论的核心，这种研究纲领的核心常常通过对辅助假说或"保护带"进行适应性调整，以免遭证伪。一个研究纲领可以按这些对保护带的修正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来加以判断。退步的仅包括那些促成修正的反例。而进步的则提供了新的理论应用领域。这种进步与退步的区分听上去似乎是重新将经验标准引入理论评价的一种有希望的途径，但实际上此思想象其先前证伪学说一样，容易随不同持有者的观察而有不同。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思相不同，韦伯（M. Weber）提出解释（erklaren）与理解（uerstehen）之间有趣而模糊的区分。自然科学寻找因果规律来解释世界，而人文科学则从内部重造行为者来理解世界。此观点的关键在于行为主体（agent）本身的观点对社会来说是重要的，而对自然科学则不然。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它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们的概念、信仰、假设和猜想的有序王国，人们的信仰影响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经验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结果。而自然界中的亚原子微粒则不会受信念的影响，这就给试图寻求统治独立王国的因果规律的经验主义方法论提出了难题。韦伯运用"理解"方法进行研究。他通过强调行为者行为的合理性，想赋予"理解"更加确切的含义。他从新古典经济学中借用了理性行为的概念。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人的实际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甚至从内部反观也是这样。韦伯探讨了什么样世界才是完全理性的，从而人们把对理想形态的偏离归结为待解释的事。但是"理解"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它与其说是"解释"的一种替代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经验工具。尽管如此，它已经开辟了一个有趣的新领域。韦伯的方法在经济学中也能找到共鸣。冯·米塞斯（Von Mises）就把经济学看作是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把经济理论看成是一种反映资源合理配置这一理想模式的因果关系构架的。类似地，哈耶克（F.A.Hayek）和新奥地利学派在构筑根植于自由选择这一先决条件下的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时，也求助于康德的因果论，尽管向纯推理性的康德认识论的转变产生的问题可能比它解决的还要多，但这种方法仍有意义。以阿罗一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为例，似乎它即没有被看成是一套经验假设，也没有被看成仅是一个档案系统（filing system）它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型"被用来判断经济运行和提出政策建议。如果它是经济运行协调与否的标志，那么对它应该作何评价？康德主义者的回答是：在什么是整个经济中完全合理的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这一意义上，它是真理。就象在数学中一样由因及果的真理很难得到，但它仍不失为理论上的目标。同样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也只有在这点上才有意义。甚至就纯数学来讲，这也是一种有争议的方法。在经济学中由于理性在"理想模式"中的作用，使得这种争议尤为激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承认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现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状况。在确保经济分析的实证规范明确的区分和防止对经济理论的基本部分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下一个最为实证性的定义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为了实现某一既定目标所采取的最有效率的手段。尽管如此，这仍不能使其他方法论的支持者，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者们满意。他们声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定理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康德主义者关于"理想模型"的合理性势必即要包括手段的合理性，又要包括目标的合理性。而一个理想的合理目标的选择最终是一种道德选择。向康德主义认识论的转变将会打破实证—规范的区分，而使经济学回到道德科学的地步。对实证—规范区分的挑战引起了深刻的认识论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在罗尔斯（J.Rawls）的鼓励和启发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合理的资源配置状态应该是理性行为者在知道他们将从中得到什么的情况下，事先一致同意的。于是他就把经济合理性与道德选择联系起来，这样就可能提出一些具体明确的问题，如偏好的合理性以及在发生冲突时应满足哪种偏好等等。其目的在于确立一门具有效率和道德进步性双重意义的因果性规范科学。罗尔斯方法论上的新鲜之处在于它运用了一种思想—实验方法，它引导读者将自己看成一个具有完全理性、自利的行为者，他不知道在拟议中的方案会使他受损还是受益。他们关于什么为理性的知识来自于事实验证，即在具有相同的基本权力的情况下各自能做得最好，以及商品分配的最优化。这种验证是有争议的，但罗尔斯确实给经济学家注入了新的思想，特别是在福利经济学那里。同进他也为对付那些认为关于自身均衡的纯粹理论仅仅是一种危险的

游戏的指责提供了新的防线。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中，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观念的变化能改变经济事件的过程，引起过程的不连续性。从而使理性行为的理想模式不同于没有时间性的因果规律模型，理性的信念是理性概念本身的一部分，所以理性概念中的实证成分对经济学而言仍然十分重要，即使仅仅为经济预测。

经济学中的分布滞后（Distributed Lag In Economics） 在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在某一些函数关系中，当自变量发生变化的时候，因变量会立即产生相应的反应。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自变量发生变化与因变量发生变化之间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例如，某商品的价格上涨，消费者不会立即减少对这种商品的需求量，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逐渐减少购买量。又如，计划拨一笔款建一个新厂，从拨款到厂房的建立与设备的配备齐全，其中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自变量（原因）的变化与因变量（结果）的变化之间的这段时间间隔被称为时滞。如果消费者在某商品涨价后的第二个月才开始减少对该商品的购买，就称为时滞是不连续的。但是由于消费总量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人们将这种情况称为时滞被分布了。时滞的长短以及时滞分布情况因函数关系而异，但是对它们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研究的方法之一是，设 X 为对自变量（原因）进行观察的时间序列，设 Y 是对因变量（结果）进行观察的时间序列，则：

$$Y_t = \sum_{i=0}^{n} w_i X_{t-i} + Z_t$$

其中 n 为滞后扩展的时期数，Z_t 为 X 以外影响 Y 的因素，W_i 为第 i 期 X 所占比例。一般集中研究如何估算 W_i，即如何描述对某商品的消费量逐渐减少的状况及速度，或者如何将一笔投资逐渐用来建厂房、购置设备。估算 W_i 的方法有两种，主要取决于 N 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般常用有限滞后的方法。

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 In Economics） 所谓实验是指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将某种事件的发生过程置于人们的控制之下，试图得到人们所需要的有关信息。实验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事件发生过程的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经济学不象化学、物理学那样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经济学家凭助于对各种发生的经济现象的观察来理解经济功能的，天文学的方法有些与此类似，但天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存在两点差异，这比较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实验方法的理解、第一、天文学的基本原理来自古典机械物理学与离子物理学，它们可以从实验中得到，经济学家却没有相似的来自可控制的实验过程的现成原理，这些原理与微观行为不存在明显的误差，而微观行为支撑着可观察的经济运行。这就给人们一种启示，象物理学跟天文学关系那样，在经济学与实验心理学之间找到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对微观经济行为进行实验研究，为经济学提供最基本的原理，而现在这种基本原理由前提假定的方法来处理。但这样的工作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第二、天文学的资料是天文观测者为科学研究目的而辛勤收集的，天文物理学家和宇宙学者对此资料极为重视；宇宙专家们直接对他收集的材料的科学性、可靠性负责，而经济学的资料则是由政府或私人机构为非科学研究目的而收集的，当实际经济现象与资料及由此而来的抽象推理不符时，资料和推理就被人怀疑。如果真能运用实验的方法就能克服这种缺点。大约在 20 世纪中叶，经济学家开始试图把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们开始直接设计并进行实验，以检验市场经济理论中所用的基本命题。这种实验方法将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的理解引入到实验示范之中，并使它们对在可控制和可重复进行的实验过程中取得的科学性负责。实验方法会推倒原有的原理而带来新的原理，任何一种未经检验的理论都只能是一种假说。要把经济学理论变为真正的知识，实验方法也许是一条很有效的途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它成立于 1961 年 9 月 30 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间的经济协调机构。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巴黎，目前共有 24 个成员国，即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瑞典、荷兰、丹麦、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卢森堡、土耳其、挪威、冰岛、芬兰、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该组织的宗旨是在维持成员国财政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并日益提高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平；协助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世界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

理事会是经合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每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它的任务是负责制定该组织的总政策并就各项有关问题作出决策，设立附属机构并监督其工作、批准预算等。执行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执行机构。由理事会每年选派 14 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它执行理事会的各项决策并向理事会报告执行结果。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经合组织虽然只是一个经济协调和咨询机构，但

由于它包括了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总值都占世界总值的一半以上，因此它在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事实上，经合组织开展的活动已经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主要涉及经济政策，能源、国际金融事务、科技和工业、社会事务、国际贸易以及南北关系等问题，它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不少积极有效的建议和设想，这对于缓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贸易领域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规律（Economic Laws）　指的是对各种经济现象中存在着的必然性联系所作的概括性表述，例如，供求法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的时候，对这种商品的供给增加，对它的需求却要减少。又如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连续追加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就会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的。18 世纪时代，古典学派用自然科学的机械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看待社会现象，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一部完美的机器，人们以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为推动力在市场上活动，其结果却使得经济均衡、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繁荣。这一强调经济的和谐秩序的法则不仅是对经济生活中的联系所作的表述，同时，它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准则。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规律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一样，不受时空以及具体情况的制约。当然，为了保证规律的正确性，有时要加上一些前提。新奥国学派认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只是客观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对经济生活的实质进行必要的剖析，因此，不必对经验进行概括，不必提出任何一般性的经济规律。但是大多数经济学者们认为，经济规律除了是对客观世界的概括性解释之外，提出它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人们可以进行预测，而预测又反过来使人们有可能对经济现象进行控制。经济规律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关于某种经济现象的认识本身会随着具体情况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对经济规律的研究要考虑到历史的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它涉及到价值判断，与动机、预期等心理因素有关。而自然规律却不必如此，对后者的研究要相对单纯一些。另外，当某一经济规律具体运用到某种情况时，还要将这种情况对规律的作用可能产生的“扰动”考虑在内，由上可见，经济规律虽然与自然规律一样，兼有解释和预测的功能，但是经济规律是通过历史和经验的方法归纳总结出来的，它要受到时间，空间以及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的限制。

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　经济自由是以亚当·斯密与约翰·穆勒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一种经济观点。他们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自由，其中生产者追求最大化利润，消费者追求最大化效用。在这一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不但每个人的福利都有所增加，而且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总的结果也是趋向于资源充分地与有效率地利用，充分就业以及经济不断增长。由此可见，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使得个人与社会的经济福利同时得到增进。经济自由主张的一个必然结论是，政府不必干预经济，应当让市场机制这个“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使之达到均衡。当然，为了保证市场体系有效地运转，需要由政府出面来制订有关的法规，维护经济秩序，保护竞争，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政府还要兴办公共项目，建设公共工程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为竞争与市场体系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保证了竞争的顺利进行。经济自由的观点被后来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一代经济自由主义者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他们认为，用经济自由的观点来考察收入与财产分配领域，只要那些无法在市场内部得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的人都能在市场的外部得到它，那么收入分配机制就是公平的，就不应当限制这种经济自由。反过来，如果贫富悬殊过大，财富长期集中，那么必然导致对穷人的不公平，经济自由因此受到损害。要保证公平的收入分配，有时需要政府出面调节，但是应当通过税收等经济转移支付手段，而少用增加政府支出的办法来改善人们的经济条件。总之，经济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一方面促进私人部门的资本积累，保证市场机制有效率地运转，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手段的调节改善贫困阶层的生活条件，使得平等与效率并存。

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　见免费物品

经济统计学（Economic Statistics）　指的是对国民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与各种经济活动给出数学上的测量，并对此进行分析、研究，进而作出预测的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经济统计学是统计学的一个分支。

经济统计学一般要完成以下四个方面的步骤：（1）搜集各种有关的数据与资料；（2）将搜集上来的数据与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从中计算出有关的经济统计指标；（3）利用这些指标，通过一定的统计方法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与研究，找出其变化的规律性以及对这些活动的变化产生影响的因素；（4）对未来的经济活动变化趋势作出预测。

1、经济统计学中的基本统计指标

(1)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反映一个国家某时期内经济发展境况的最全面的指标，它是以货币量表示的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内（通常是一年内）所生产的所有商品与劳务价值的总和。它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估算，一个是从支出的角度，包括消费支出、净国外与国内投资以及政府购买；另一个是从收入的角度，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生产要素的收益之和。国民生产总值有名义的与实际的之分，名义的国民生产总值指的是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这其中可能包含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指的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它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个国家一年内实际生产的情况。

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各部门的总产值增长率来反映一段时期内生产的进展情况。例如，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是以价值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总量，它按各企业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来计算，是反映某一时期内工业总产值变动程度的相对指标。

(2) 就业方面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失业率，它指的是失业人数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其中的失业人数指的是那些积极寻找工作却未所找到的人们。

(3) 价格方面，一个重要的统计指标是物价指数，它指的是同一种（或者同一组）商品在不同时期的价格的比率，经常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来描述一个国家全部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但是物价总指数的范围太广，于是常以消费价格指数与生产价格指数来补充它。其中消费价格指数指的是消费品价格变动的比率，它反映了生活费用的变化，是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外还可用于指导政策与企业的决策，作用相当广泛。

(4) 货币方面的指标有货币的供给量、流通速度、利息率、信贷流量等等。

(5) 对外贸易方面的指标有进口量、出口量、汇率及收支平衡情况等等。

2、统计分析与预测

通过所搜集的数据资料计算出上述各方面的有关指标之后，就可以对经济活动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了。

例如，要看经济在某一时期内资源的利用情况，有几种方法，一是将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潜在的(即充分就业水平下的) 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如果差额很大，说明资源闲置比较严重，也说明经济发展的潜力比较大。第二种方法是从失业率的角度考察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情况。第三种方法是将部门实际的生产情况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相比较。

再如，要考察某一时期内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有几种方法，一个是将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名义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如果二者相差很远，就说明名义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包含的"水分"很大，也就是说，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价格的上涨而致的。第二种办法是考察价格指数以及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等指标的变动。第三种办法是将经济中流通的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以及信贷量进行综合考察。

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统计指标对经济效率以及对外贸易情况等等进行经济统计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政策制订者与理论工作者就可以得到关于这一时期中经济活动各方面发展情况的总体印象，进一步归纳出各类经济活动的变化规律以及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结构与比例，这不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经济统计学的理论，而且对于制订相应的政策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人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统计分析的结论对各种经济变量进行预测，并且考察不同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对产量，就业、物价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3、经济统计学的演变

经济统计学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17世纪，德国的大学里就出现了讲授关于对土地、人口、产业以及社会财富进行统计的课程。18世纪，丹麦的安彻森用统计表将各国的面积、人口、财政等经济情况用数字列出来，德国的克罗米又相继创造了统计图。

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威廉·配第在所著的《政治算术》等书中把英国与荷兰与法国的经济实力相比较，其中估算了各国的人口、每年的消耗量、劳动者的收入等指标，用统计的方法阐述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论证，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反映经济活动情况的统计方法。这是经济统计学的开端。

随着生产的发展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日益精细与复杂，经济统计学也不断发展起来，并且日臻完善。现在它可以设立大规模的经济计量模型，通过回归与相关分析对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与测算。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的存储、处理与使用极为迅速与方便，这对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经济科学与经济学（Economic Science And Economics）　在希腊文中，"经济"一词原用于指对家庭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对家庭财政收支的管理。由于一个国家中的事务管理与家庭的相似，因此，人们用"政治经济"一词表示某国政府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所进行的管理。在重商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管理比较严，且把重点放在流通领域。到了重农学派与古典学派时期，管理的重点转向生产领域，研究国民

财富增长的源泉与经济发展的途径。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从政治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此后，它不仅限于为政府管理提出各种政策建议，而且更一般性地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及其性质进行深入的研究，理论性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已经显得有些狭窄，19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用“经济学”或者“经济科学”的概念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与“经济科学”这两个概念一般可以通用，它们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配置到各种不同的生产中去，以及如何将所生产的产品进行合理分配，使得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增进。经济学的方法论可以是演绎的、归纳的，也可以是历史统计的。

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ransection Costs） 科斯指出：如果所有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生产和交易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将是相似的。这意味着交易成本不存在，可选择的惯例的或有组织的安排将失去选择的基础，因此不能被经济理论解释。不仅经济组织将被随机地决定，确实不存在任何组织可言，生产和交易活动将简单地由市场这无形的手来指导。但各种组织或各种习惯性的安排客观存在着。为解释它们存在和变化，必须把它们当作在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结果来对待。

在最广的含义中，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能想象存在的成本。那里财产权、交易和经济组织种类都不存在。定义的这种宽度是必要的，因为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成本经常是不可能的。这样定义后，交易成本就可以被视作通常成本的一个系列：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订合同和执行合同成本、保证财产和监督实现成本以及变化中的惯例安排。总之，它们包括所有那些不直接包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顾名思义，一个组织需要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的意义上，不是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指导的一切生产和交易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用到经理、管理者、监督者、职员、执行者、律师、法官、代理商甚至中间人的一切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这些职业在克鲁索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对他们工作的支付就是交易成本。

当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包括在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所有成本时，经济组织被同样广泛地定义为含有需要一个看得见的手的服务的任何安排，结果必然是所有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有交易成本就必有组织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中经济学家一直努力根据各种交易成本去解释组织活动的各种形式的原因。

例如工厂是一个组织，工人的工资可以用计件工资率或计时工资率计算支付，测量和控制执行的成本就是一种交易成本。如果这两种成本为零，那么无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会得到同样结果。但是如果这些成本是正的，且测量产出的成本相对低些，就很可能采取计件工资合同；如果测量时间和管理执行的成本相对于测量产出量成本低些，则很可能选择计时工资合同。如果交易成本完全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工厂，因为消费者将直接从生产商品和劳务的投入品所有者那里购买。

早在1937年，科斯根据确定市场价格成本（交易成本）解释企业的出现。当这些成本由于测量工人单独贡献或谈判一个产品各零件的价格的困难很大时，一个工人会选择在工厂工作，他通过合同放弃使用他劳动的权力，自愿遵从有形的手的指挥，而不是通过市场上无形的手，私自把自己的服务或贡献卖给顾客。于是这个企业代替了市场。随着这种替代进步，市场价格成本即交易成本的节约将被企业监督和管理成本的上升所抵销。当前者节约的边际成本等于后者上升的边际成本时，达到均衡。

企业对市场的取代可以被认为是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如果所有交易成本是零，两个市场将是不可分的，顾客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支付会与对产品销售者的支付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共存性是一个谬误。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区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个前提。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某些计件工资率的使用，区分这两个市场是不可能的，因此，不是把企业看作市场的替代或把要素市场视作产品市场的替代，而是将组织选择视为一种类型的交易替代另一种类型的交易，更合适些。从这些意义上讲，组织安排的选择实际上是交易安排的选择。

当组织选择被视作交易选择时，显然，把一个组织从另一个组织中明确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用一个企业作例子，通常情况是，掌管雇工合同（而企业到底是业主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业主是不很明显的），可以和其他企业签合同，而一个合同方又可转让合同，一个被转让合同方又可再转让，结果，一个工人可以和大量“雇主”或“企业”签合同。如果交易链可以延续，这个企业可以包括整个经济。从这角度看，企业规模变得不可决定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合同的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的交易成本。

传统经济分析局限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上，而作为一个考察的层次的交易安排在这种传统中被轻视了。在由交易成本复杂化了的世界里，这种忽视不仅留下了无数有趣的未被解释的问题，而且事实上阻碍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理解。因此，组织或制度经济学，或各种经济系统的运作，在传统研究中从没有

得到正确的研究。

引进新的和更正确的思想的成本是巨大的，直至今日，教材上依然讨论边际生产率只与固定工资和租金率有关，而经济学家已知道对于劳动，支付可以在外表上采取计件工资、奖金、小费或各种分配安排，而且即使计时工资率也可采用多种形式。一种形式的合同暗含着一种不同的监督、测量和协商成本，也是一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每当选择了一种不同的交易安排，有形的手的功能就变化。

交易安排的选择当然不局限在要素市场上，产品市场上，例如搭配，俱乐部的资格费等定价安排可以类似地根据交易成本来综合。而且企业组织的合并以及综合的各种形式现在正被视为交易成本现象。事实上，对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间商和零售商以及零售商之间的定价和交易安排都不能由教材上的经济学来解释。

交易成本经常难以测量，如前所述，还难以划分类型，但是，只要我们能在不同的考察条件下区别这些成本怎样变化，测量难题就可以避免；只要根据边际变化来考察，它们各种类型就是可分的。

私有权有一个独有的优点。即允许私有者不加入某一个组织。这一选择对有着较高交易成本的组织的应用是一个有效的限制。私有权在竞争条件下可进一步减少交易成本。一个企业主或中间商，如他想招募其他资源所有者去参加他的组织，在竞争的条件下，他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而这只有在他的组织能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情况下才能达到。另一方面，资源所有者争着参加一个组织会更加积极表现，以免失业。

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指的是对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各种规律性的关系所作的系统的，概括性的表述。

1、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

按照所研究的层次不同，经济理论可以分为微观与宏观两类。微观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即说明单个消费者与单个生产者如何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活动，市场如何实现均衡等等。因此，微观经济理论要研究供给与需求、市场调节机制、消费者行为与生产者行为、资源配置以及收入分配等等，其核心为价格理论。西方微观经济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原理，即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如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人去促进公众的福利，从而实现市场均衡、资源合理配置、经济稳步发展。微观理论采用个量分析的研究方法。

宏观经济理论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总量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它分析的是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水平、就业水平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其核心为国民收入与就业理论。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思想基础是"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宏观经济理论采用总量分析的研究方法。

2、实证经济理论学与规范经济理论

从研究的目的不同，经济理论又可分为实证的与规范的两类。前者是对经济活动中存在的相互关系与变化规律进行客观的表述，并据此进行分析和预测的理论。它研究在某种具体情况下，如果作出某种决定，则会产生何种结果。也就是说，它要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经济理论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前提假设的，分析与预测的结果都要依赖于所设的前提假设才能成立。

规范经济理论则要对经济活动的状况与结果作出价值判断，说明其是好是坏。它研究的是、究竟哪一种选择为最优，也就是说，它要说明"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其中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所选择的标准的主观评价。

3、经济理论的流派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的来源，它还可分成许多流派，如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包括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等等，此外还有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等等。各个学派产生的背景不同，其研究的重点、思路与结论也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对经济现象作出相应的解释，并从规范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

4、西方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

按照经济理论研究的经济制度划分，它还可分为西方的与社会主义的。其中前者所处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其本质经济特征是以充分发达的市场机制调节为主、辅之以适当的经济政策调节。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这种社会曾经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著称，后来经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向计划性商品经济过渡，试图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吸收二者的长处，克服计划的无效率与市场的无政府主义的弊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的有关论述。

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设（Economic Theory And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ity）　许多经济学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认为经济理论必须要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离开了理性原则，就不会有经济理论。这个见解甚至被某些认为经济行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学家

所坚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曾经争辩说：在经济领域中，很大一部份是由习惯而不是由竞争统治着。但是，他又补充说，那唯一可能的理论必须要以竞争为基础（在他的理论中，竞争包含有某些理性元素）："只有通过竞争原则，政治经济才能成为科学"。然而，事实上，经济学中，并不以理性假设为基础而是以理性之外的其他假设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在不断生长，今天，不仅以其他假设为基础设计出经济的完全模型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宏观经济学的所有实际理论都是部份地以其他假设为基础。凯恩斯理论的价格和工资刚性就很难与理性框架相适应，尽管曾经有过一些勇敢的尝试。在原始形式上，乘数是从仅仅由现期收入决定的消费函数中推导出来的，而更接近于以理性假设为基础的理论认为消费是依赖于生命周期或持久收入，这种理论降低了乘数的规模以及由乘数所决定的凯恩斯模型的解释能力。有些人可能认为凯恩斯模型本来就是无限理性拥护者们的攻击目标，但是，货币主义情况也并未见得好些，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并不是从理性最优化中严格推导出来的，一些代替严格推导的松散的论据，弗里德曼的鞋面的节约或托宾的以买卖证券成本为基础的交易需求，都引入了一些与不存在市场成本（这在其它地方被假定）不相容的假设，在这些论据中，只是在形式上使用了理性，而且，这些用到的论据并没有提出一个非常稳定的联系，它所提出的联系往往随着金融结构和金融技术上的变化而迅速改变，而对于任何形式的货币主义，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则是必须的。在应用经济学中，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理性假设仅只是假设中的一部份，并且经常（即使不是总是）为其他的各种不同的假设所补充。理性原则对于经济的理论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直接应用的理论通常都使用了不同的假设。

理性并不只是单个人所单独拥有的东西，尽管通常都是这样表达的。理性还从社会背景中聚集它的力量和它的意义，它在非常理想化的条件下，是很合理的，但一旦这些条件不再满足，理性假设就变得牵强附会甚至自相矛盾，理性假设的有用的并且有力的运用是从个人理性的联合和新古典理论的其它的基本概念（均衡、竞争和市场的完全性）中推导出来的，一旦这些假设不成立，理性概念就受到了威胁，因为此时其他人的感觉尤其是理性变成了某个人自己的理性的一部分。而即使这些所有的对于完全竞争所必须的结构假设（知识，生产函数的凹性，不存在产生市场势力的足够的规模）都满足，问题仍然存在，如均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均衡是从不均衡的过程中得到的，在不均衡时，理性行为又意味着什么？在均衡的过程中，个人投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不均衡是否可以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更高阶的均衡过程？等等，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理性这个概念在解释多元世界时，存在着许多困难。

经济量的量纲（Dimensions Of Economic Quantities） 量纲是针对"单位"与"派生单位"而定的概念。一个"单位"是用来进行衡量的量，以便同类的量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例如长度单位（有米、公里等等），时间单位（有秒、小时等等），又叫"基本单位"。一个"派生单位"指的是参照基本单位而确定的单位，例如面积的单位，它是从长度单位中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平方，如平方米、平方公里等等；而速度的单位则是从长度单位与时间单位中派生出来的，是二者的比，如米／秒，公里／小时等等。对基本单位和派生单位引入量纲的概念，规定一个基本单位只有一个量纲，如一个长度单位有量纲 L，一个时间单位具有一个量纲 T。而派生单位因是从基本单位而来，所以具有两个以上的量纲，如面积单位有量纲 LL，或写成 L^2，这是长度单位两次进入面积单位的结果。速度单位的量纲为 LT^{-1}，它表明，长度单位与时间单位各一次进入速度单位，但是前者从正的方向进入，而后者则以负的形式进入，包含负进入量纲的单位通常表示一种比率关系。此外，由于长度单位三次进入体积单位，因此，体积单位的量纲为 LLL，或写成 L^3

量纲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当基本单位发生变化时，派生单位变化的规律。例如，如果长度单位由米变为公里（1000∶1）时，面积单位就要以同样的比例连续变动两次（1000^2∶1）。可见，面积单位的变动是长度单位变动的平方。对于速度单位来说，增加长度单位可以使它增加，但增加时间单位却会使它减少。如果给定了具体的量，则量纲正向进入的单位越大，数值越小，而量纲负向进入的单位越大，数值越大。例如，某物体速度为 1000 米／秒，若将米变为公里，则该速度为 1 公里／秒，数值由 1000 减少为 1；若将秒变为分钟，则速度为 6000 米／分钟，数值由 1000 增加为 60000。

角度、百分比以及三角函数等等，它们没有单位，数值不会受单位变化的影响，它们的量纲为 LL^{-1}，或称没有量纲。

将量纲理论运用到经济领域，可以非常简便而明了地反映各个经济变量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设基本单位为效用单位、商品单位与时间单位，它们的量纲分别为 U、Q 与 T，则每消费一单位商品所得到的效用的量纲为 UQ^{-1}；单位时间内的效用之量纲为 UT^{-1}。价格与商品的效用程度相等，即其量纲为 UQ^{-1}；佣金是单位时间的商品价格，量纲为

PT^{-1}，即 $UQ^{-1}T^{-1}$ 等等。将各个变量单位在坐标系中表示出来，则它们量纲之间的关系与变化规律更是一览无遗。

19世纪末，J·福瑞尔（Fourier）首先提出了量纲理论，后经不断发展与充实，其中P. 威克斯蒂德作出了比较重要的贡献。

经济租（Economic Rent）　经济租是对一种生产要素给付的报酬超过该要素为执行其功能所必须获取的报酬的差额。这是由于要素的需求者相互竞争，以致于抬高了要素的价格，并产生了经济租。经济租概念源于地租理论。衡量地租的方法之一是以一块未经改良的优等地与另一块未经改良的次等地之间的产出差额来估计。由于如果没有多余的优等地可供利用，农民就必须耕种次一等的土地，所以当所有可利用的优等地都已利用完时，地主就开始向农民收取地租。如果地主计算错误而索要过高的地租，那么农民将宁愿转移到次等地耕种，虽然其生产力较低，但却不用付地租。当次等地也已被利用完，农民便必须利用三等土地，这时二等土地的地主就会开始索要地租，而优等地的地主可以提高他们的地租了。经济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的。

地租是因社会对土地有高需求并产生高价格所致的结果，而其本身并不能抬高土地和农产品的价格。如李嘉图所说，谷物并不因付了地租而价格高，而是因谷物价格高而必须付地租。即地租决定于谷物价格而不是相反。即使地主放弃所有的地租，谷物价格也不会下降。这些在A·斯密时代还是没有被解释清楚的。如果农民要在边际土地较好些的优良地上耕作，则必须支付地租成本，因为如果不支付地租，那么他人会出价承租这块土地。但就整个农民整体而言，地租并不是一种生产成本，地租只有在所有农民对某一等级的土地的需求超过该土地供给时才会上涨。

经济租原理也适用非农业方面，例如，当电影厂或球队聘用著名影星或球星时，因为他们的出现会卖出更多的门票，影星和球星会索取很高的薪水。这是由于具备这种特殊才能的人物供给非常有限，且不能增加。原先的薪水应属于生产成本，因为这是使他们离开原来的职业所必须负担的成本。只有支付给他们的报酬超过原来薪水的部分，才是经济租。

在存在自然资源限制、行政限制或独占因素的地方，供给的扩张受到阻碍，便很有可能产生经济租。

经济模型（Economic Models）　经济模型是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关系进行抽象的、简化的表达。表达的方式可以是一个图、一个统计表，也可以是数学方程式，其中后者最为常用。由于经济模型所采用的基本上是数学方法，因此，它又可以被称为"经济数学模型"。

要建立一个经济模型，首先需要对经济现实有充分的正确的认识，从理论上以及资料上都作好准备。建立模型就是设立有关的变量与参数，然后按照它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关系组成一个或者若干个方程组。方程中所反映的关系既要符合现实，又要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过于具体就难以归纳与计算，过于简单又会失真，所以，建立数学方程式的过程需要较强的分析能力与概括能力。建立了经济模型之后，就可以进行求解，并通过检验对方程中的各项进行估计，以便求出各个参数。最后，将经济模型的解与经济现实进行对比，考察模型与现实的吻合程度，并找出相应的经济含义与政策含义。

经济模型的种类很多，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如下分类

（1）理论经济模型与应用经济模型。理论经济模型所表达的是抽象的、比较精确的经济关系，例如：

产量＝f（要素投入）

消费量＝k（收入，消费倾向）

理论模型可以反映技术关系、行为关系、概念关系以及法规关系。

如果函数f与k以特定的数学形式出现的话，它就可以求解，并与现实情况进行比较，这时，该模型就成为应用经济模型。

（2）微观经济模型与宏观经济模型。反映个别企业或者个别市场中的经济关系的模型称为微观经济模型，对微观层次上的数据进行加总、归纳，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或者国家中各个经济部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一经济就称为宏观经济模型，近来，宏观经济模型中还出现了国际性模型，它将若干个国家或者地区集团的经济模型加以综合，从而反映出国际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关系。

（3）计理经济模型，投入—产业模型与最优规划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反映的是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性关系，投入—产出模型表达的是经济各部门、地区以及生产中存在的各种平衡关系，而最优规划模型则是经济生活中各种条件极值问题的概括，可以用于找出最优方案。

（4）静态经济模型与动态经济模型。不涉及时间变化因素的模型叫做静态经济模型，而反映经济关系随时间发展变化过程的模型叫做动态经济模型。典型的静态模型是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它表明，经济中的最终需求如何通过技术函数矩阵的操作向各个生产环节传达它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其中不涉及时间的

变动。典型的动态模型是经济增长模型，它反映了国民经济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从而提出政策建议，并进行预测。

(5) 随机经济模型与确定性经济模型。随机经济模型指的是方程所反映的关系是不准确的，其中含有随机误差。确定性经济模型中所反映的关系则是精确的，其中不包含误差，例如反映概念关系的恒等式。

经济模型是经济数量分析中的重要工具，它可以用来指明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含义、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方案进行检验、进行经济预测、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模拟某一时期的经济形势等等。对模型的解进行检验与分析，可以帮助分析有关的经济理论。而要进行经济预测，就可以在模型的运行中加入设想的变量调整，借助计算机求解、分析，最后得出政策结论。

经济模型出现的历史不是很长，它的正式建立与发展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经济计量学的发展使得以模型的方式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数量关系成为可能，经济模型在检验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以及预测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也日渐重要，并在不断加强。

经济模型中的因果关系（Causality In Economic Models） 在经济模型中，经常要涉及到内部结构极为复杂的经济系统，要很好地对这些系统进行研究，就需要把它们分解成为一系列简单的子系统，对子系统中的结构加以分析，然后再归纳起来，就可以对复杂的原系统有了比较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例如，要分析市场上彩电的价格与供求情况，就要考虑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市场价格与供求数量，对于每一种机制都可以用方程式的形式表示出来：

$$\begin{cases} O=\delta\ (C,\ T) & (1) \\ N=g\ (P) & (2) \\ Q=O\times N & (3) \\ P=f\ (Q) & (4) \end{cases}$$

其中，O 为每个工厂生产彩电的数量，C 为生产成本，T 为当前的生产技术水平，N 为生产彩电的厂家的数目，P 为彩电的市场价格，Q 为彩电的市场交易量，每一个方程都被视为一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分别是这个子系统中的原因与结果，而各个子系统共同形成的联立方程组就表现了市场上彩电的价格与供求状况这个系统的框架与机制。应当注意，方程 (1)、(2)、(4) 都是彼此独立的子系统，而方程 (3) 中的自变量 O、N 已在前面的方程中决定，所以，方程 (3) 不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等式关系。在整个系统中，生产成本 C 与技术水平 T 是外生变量，即在该系统之外决定的，而方程 (2) 中的价格 P 实际是上一期的彩电价格，因为现期产量只能由上一期的价格决定，后者可记为 P_{-1}。将整个系统中存在的因果顺序表达如下：

$C > \longrightarrow O$

$P_{-1} \longrightarrow N \qquad > \longrightarrow Q \longrightarrow P$

采用这种方法，经济系统中的各种因果关系便可一览无余。

可是，有些经济系统相当复杂，通过经验观察往往难以清楚地找出因果顺序，这就需要通过计量经济的方法进行辨别。在线性结构方程组中，如果某个方程的某些子集可以独立地解出，则它为独立子集，看一个系统中的最小独立子集，对于每一个子集来说，都有可能从中独立解出的变量，称之为零序列变量。然后将系统中其它方程中上述变量的值代入，重复整个过程，则可以得到一序列变量以及最小独立子集。如果某一级序列变量在高一级子集中的方程中系数不为零，则该变量是后一子集中内生变量的自变量，经济系统中的因果顺序取决于哪些变量在哪些方程中的系数不为零。

对于结构复杂、变量众多的经济系统，需要找出足够的前提假设来保证方程结构的唯一性，其中每一个方程代表一个子系统，前提假设必须符合实际情况，不能图方便，或者想当然，否则就会将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导入歧途。

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 经济效率指通过投入要素的最有效的组合生产出最适度的或最优的产品组合，它包括两个方面：(1) 最合适的产品组合，保证不存在浪费；(2) 最优的要素投入组合，这种组合保证在生产任何给定数量的产品时成本总是最低的，这种组合有时候也被看成是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最合适的产品组合可以有多种组合方式。但在福利经济学中，最合适的产品组合被认为是完全由消费者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价格选择决定的组合。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经济单位并不总是绝对追求达到经济效率，往往还要兼顾其他目标，这样一般都会损失经济效率。

经济剩余和等边际原理（Economic Surplus And The Equimarginal Principle） 边际分析实际上只是一个更普遍的理论—剩余和市场经济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

在保持所有的偏好指数不变时，经济发生一个可实现的变动所产生的相对于某个商品的经济剩余，定义为由于这个变动所释放出的该种商品的数量。假定一个经济中存在 U、V……W 等多种商品，$I_i=f_i(u_i,V_i,\cdots\cdots W_i)$为第 i 个消费者的偏好指数，

$f_j(u,V_j\cdots\cdots W_j)=0$ 为第 j 个生产者的生产函数。现假定经济的初始状态为 ε_1，此时可利用的资源分别为 $u_0,V_0\cdots\cdots W_0$，则有：

$$\sum_i U_i + \sum_j U_j = u_0$$

$$\sum_i V_i + \sum_j v_j = V_0$$

$$\vdots$$

$$\sum_i W_i + \sum_j W_j = W_0$$

现假定 $\delta\varepsilon_1$ 为经济的一个可能的变动，ε_2 为变动后的新状态，则有

$$(\varepsilon_2)=(\varepsilon_1)+\delta(\varepsilon_1)$$

于是由第一组方程式，又有：

$$\sum_i \delta V_i + \sum_j \delta V_j = 0$$

对于所有的 $V_1V_1\cdots\cdots W$ 均成立

$$f_j(v_j+\delta v_j,v_j+\delta v_j,\cdots\cdots W_j+\delta w_j)=0$$

$$I_i+\delta I_i=f_i(u_i+\delta v_i,v_i+\delta w_0\cdots\cdots,W_i+\delta w_i)$$

现再假定只变动 $u_i+\delta V_i$，变动量为 $-\delta\sqrt{\delta_{ui}}$，而使经济回复到全部偏好指数与 ε_1 相同的状态 ε_3，即：$f_i(u_i+\delta u_i-\delta\sigma_{ui},V_iV_i+\delta V_i\cdots\cdots w_i+\delta w_i=f_i(u_iv_i,\cdots\cdots w_i)$ 在从 ε_1 变到 ε_3 以后，就有

$$\delta\zeta_u = \sum_i \delta\zeta_{ni}$$

的 U 商品被释放出来，这个 $\delta\sigma_u$ 就是经济从 ε_1 变到 δ_3 时的经济剩余。这个剩余在 ε_1 时处于一种潜在状态，即可实现和可分配的，而在 ε_3 时则被现实地分配了。一个包括生产的交易体系如果能够实现并分配潜在的经济剩余，从而使偏好指数增大，那么这个交易体系就是有益的。如果一个交易和生产体系是有益的，那么至少存在着一种保证这个体系存在的价格体系，实现的经济剩余在各个单位之间的分配，就是由这个价格体系决定的。

一切经济运行的本质都寻找、实现和分配经济剩余。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实际就是不存在可实现的剩余，即对于所有可能的经济变动 $\delta\sigma_u<0$，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同经济结构相容的可能的变动，其可分配的剩余均为零或负的。此时，也不可能找到一种使对所有的单位都是有益的双边或多边交易成为现实的价格体系。经济的最大效率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要增进某些人的福利而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是不可能。即不可能在不减少某些人的偏好指数时增大另一些人的偏好指数。最大效率状态集合代表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边界。从上述最大经济状态和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的定义。显然，这二者是等价的，任何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必定是某种最大经济状态，而任何最大效率状态也必定是某种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既然在存在着经济剩余时，就必定不会是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那么任何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就一定是最大效率状态。反之，是最大效率状态，就不会有可实现的经济剩余。任何最大效率状态就一定是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

既然任何经济运行的实质都是为了寻求、实现和配置经济剩余，那么市场经济的演化、发展过程就可以用条件：

$$\delta I_i<0$$

来描述。由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剩余不断地实现、分配，偏好指数就会不断增大，而不会下降，这意味着对于给定的结构，即给定偏好，资源和技术，市场经济的运行趋向于越来越接近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和最大效率状态。

等边际原理是上述经济剩余和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特例，即在剩余和市场经济这个一般的理论中，引入一些特定的假设（如可导性和凸性等）后，所推导出的一个特殊的规则。在引入这些特定的假设后，经济剩余可表示为：

$$d\zeta_u = \sum_{i}^{n} \sum_{\substack{K,r \\ KC_1}} (\in^K_{vu} - \in^l_{vu}) dv_{KL}$$

或

$$d\delta_u = \sum_{i}^{n} \sum_{\substack{K,l \\ KC_1}} (v_K - v_2) dv_{Kl}$$

其中 $\delta\sigma_u$ 为总的可分配剩余 $\delta\sigma_u$ 的一阶微分，$\in^k_{vu}$ 和 $\in^l_{vu}$ 分别为单位 K 和单位 L 的商品 U 对 V 的边际替代率，u_k 和 v_l 分别为商品 V 对单位 K 和 L 的边际价值。dv_{kl} 为商品 V 从单位 L 转移到单位 K 的数量。在这里，只要 $\in^k_{vu}\neq\in^l_{uv}$ 或 $u_k\neq u_l$，则还存在着可分配的潜在的经济剩余。而只有在 $\in^k_{vu}=\in^l_{vu}$ 或 $u_k=v_l$ 时，即等边际原理，经济剩余才不存在，或者全部都被实现、分配，经济达到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和最大效率状态。因此，等边际原理实质上不过是在经济满足一些特定的假设时，使经济中的剩余全部实现、分配，即使经济达到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和最大效率状态的条件。即要使经济中不存在经济剩余，经济达到稳定的一般经济均衡和最大效率状态，经济中的所有的边际价值必须相等。经典的等边际原理理论，对于理解一切经济现象的本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更一般的、更普遍的经济剩余理论则把边际分析的一些结论推广到最普遍的，离散的和不可分的情况。

经院经济思想（Scholastic Economic Thought）

经院学派是中世纪西欧教会哲学家所组成的思想流派。其中所包含的经济思想，有时被称为经院经济学。经院学派维护私有制，认为财产公有制是一种空

想、仅仅在修道院小范围内或者极端匮乏时才能实现。提倡节俭、禁欲。个人可以拥有符合本人社会身份的财产，多余的财富用于赈济穷人。托马斯·阿奎那力求说明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及其优越性。经院经济学赞誉农业，认为农业可以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对于商业起初是坚决反对，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态度逐渐缓和，但仍然劝导传教士不要经商。经院经济学集中讨论的两大问题是"公平价格"和"高利贷"。他们不了解价格决定的内在因素，几乎一致认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圣贝纳迪诺是对价值作过最完整论述的经院学派哲学家。他认为价值的源泉是使用价值、稀缺程度，欲求程度。15世纪以后，经院经济学仍然流行了很长一般时间。17世纪的两位红衣主教胡安和鲁巴蒂斯塔曾经将经院学派的经济学说系统地综合成书。经院经济学要求经济关系适合于教义教规，束缚了自由思想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但在对待古希腊罗马的理论遗产方面起过翻译和继承作用；对价值、价格、利息等基本经济范畴进行了初步探讨。

经济增长阶段论（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Stages） 又译为"经济成长阶段论"，是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W.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及以后一些著作中对经济增长历史过程的解释。罗斯托首先研究了人类的动机。他认为，人类的动机有六种：发展基础科学（自然的和社会的）的倾向，把科学应用于经济目的的倾向，接受创新的倾向，寻求物质进步的倾向，消费倾向，生儿育女的倾向。人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个体，他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还追求权力、安逸、事业、安全、还关心自己的家庭，关心他所熟悉的民族文化的价值，乃至关心本地的一些有趣事情。在此基础上，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指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以前的社会，实际包括了一般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一社会的特点是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缓慢，农业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家族和氏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起决定性作用，政治力量的重心在各个地区。第二阶段是"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指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的过渡时期，相当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这个阶段中，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必须改造成为以工业、交通、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必须提高农业与采掘业的生产率，并发展商业，以积累资本。政治上则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一阶段的特点则是世界市场的扩大反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工农业中发挥作用。第三阶段是"起飞阶段"，这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大分水岭，由此开始经济增长成为正常情况。所以说，起飞阶段是一种产业革命，直接关系到生产方法的剧烈变革，在比较短的一段时期内产生带有决定意义的后果，相当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时期。实现起飞的条件是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占10%以上，建立起主导部门，并实现适应经济增长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资本迅速积累，新技术在经济中得到广泛运用，生产力迅速发展。第四阶段是"向成熟推进阶段"，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虽有波动但仍持续前进的时期，相当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阶段，处于正常成长条件下的经济力量把现代技术推广到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中去，"成熟"实际上是技术上的成熟。所以，这个阶段突出的特点是，不但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最先进的成果，而且要将之推广到整个经济领域。工业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际贸易有了巨大的增长。一个社会从起飞到成熟大约需要60年左右。第五阶段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时主要注意力从供给方面转到需求方面，即从生产转向消费，主导部门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方面，相当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时期。美国首先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已使大多数群众享受到基本的衣、食、住及其他消费品，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生产耐用消费品，并使服务业大为普及。第六阶段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相当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时期。这时群众已不满足于高消费，而要使生活质量更好。这样，一方面主导部门已不是以汽车为主导的耐用消费品工业，而且与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的部门，这些部门主要提供劳务。另一方面，要消除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种种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社会的不稳定等。美国在50年代中期首先进入这一阶段。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经济增长阶段论在经济学与史学中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 经济活动中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就业人数、物价水平、利率等综合性经济指标的变动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W·米契尔（w·Mitchell）和A·伯恩斯（A·Burns）在30年代曾给经济周期下了这样一个经典性的定义："经济周期是以商业为主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包括同一时间内许多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扩张，继之以同样普遍的衰退、收缩，以及引起转入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这种变化的顺序重复出现但没有周期性；经济周期的时间从一年多到十年或十二年不等；这些周期不能再分为与它们本身的特点相似的更短的周期。"在有关经济周期的

定义中，一般强调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经济周期是以国民收入为中心的整体经济波动。第二、经济周期是现代经济（即商业经济）中不可避免的波动。第三、经济周期的基本点是每个周期都包括了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一般把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阶段，经济活动高于正常水平的的上升阶段，其最高点称为顶峰；萧条阶段，经济活动低于正常水平的下降阶段，其最低点称为谷底。在这两个主要阶段间还有两个过渡性阶段：由繁荣过渡到萧条的衰退阶段；由萧条过渡到繁荣的复苏阶段。顶峰是上升时期的最高点，此后就转向下降阶段了，被称为上转折点；谷底是下降时期的最低点，此后就转向上升阶段了，被称为下转折点。

自从 1825 年英国出现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学家就开始注意这种现象。但早期的研究者只注意到了生产过剩这种现象，称之为"危机"或"恐慌"。19 世纪后期的法国经济学家 C · 朱格拉（C.Juglar）最早把危机现象作为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阶段，开始探讨这种周期性动的特点及其原因。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大量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中心问题：第一、整理长期的经济统计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分析经济周期的特征。不同的经济学家依据不同的标准把经济周期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包括 9－10 年的中周期（朱格拉周期）、3－4 年的短周期（基钦周期），50－60 年的长周期（康德拉杰耶夫周期），以及 20－30 年的长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 J · 熊彼特（J.Schumpeter）则把前三种周期的划分加以统一，即一个长周期（康德拉杰耶夫周期）包括 6 个中周期，一个中周期包括 3 个短周期。第二、对经济周期原因的探讨。这个问题一直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至今为止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不下几十种，大致分为两大类：用经济体系内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原因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用经济体系外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原因的外生经济周期理论。前者把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为货币、投资、消费等因素，后者把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为气候、战争、新发明、新市开辟等因素。当然，这两类理论也很难严格划分，因为，经济内因素的变动有时会由外部因素引起，而外部因素也只有通过内在因素才能引起经济周期。在凯斯主义出现之前，主要的经济周期理论有：纯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投资过度论、心理经济周期理论、创新经济周期理论、太阳黑子经济周期理论、消费不足论等。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许多经济学家用经济体系内产量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经济周期。这就是由英国经济学家 R · 哈罗德开始，经美国经济学家 A · 汉森和 P · 萨缪尔森发展，最终由英国经济学家 J · 希克斯完成的乘数一加速模型。这一模型在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中至今仍受重视，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令人完全满意的经济周期理论。这一问题仍然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在经济政策方面，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许多反周期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对稳定经济，减少经济周期波动程度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完全消灭经济周期。经济中周期性波动仍然是现代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指一个经济生产能力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一般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或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 S · 库兹涅茨（S.Kuznets）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求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这个定义说明了：第一经济增长就是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进步，第三、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是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这个定义是对各国经济增长的高度概括，已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S · 库兹涅茨还从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中总结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第一，按人口计算的产量的高增长率和人口的高增长率，第二、生产率本身的增长也是迅速的，这反映了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三、经济结构的变革速度是高的，其中包括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由工业转移到服务业，以及消费结构、进出口结构的改变，等等。第四、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迅速改变。包括城市化、教育与宗教的分离，等等。第五、增长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大。运输和通讯的发展促进了这种扩大。第六、世界增长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当大。这些特征中，前两个属于数量特征，中间两个是结构特征，后两个是经济增长的国际扩散特征。根据总生产函数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增加、资本增加，与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最重要。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Economic Growth Theory） 研究经济增长中各种问题的理论的总称。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 斯密。斯密把国民财富的增长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论述了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

本积累所带来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研究了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趋势。从19世纪中期至本世纪40年代之前的这一时期中，经济增长问题被忽视了。在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和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彼特·马歇尔强调了资本积累和企业家的组织管理活动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尽管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作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有些结论现在仍然有意义，但在本世纪40年代之前，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科学本身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时的经济增长理论以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为对象，不同于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的经济发展理论。从战后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各个时期分别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在50年代，主要是建立各种经济模型，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探索经济稳定增长的途径。从理论上说，这些模型根据了凯恩斯主义理论，是对短期中国民收入均衡公式；投资等于储蓄，长期化、动态化的结果。这些模型主要有：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分别建立而含义又基本相同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英国经济学家J·罗宾逊和H·卡尔多等人建立的新剑桥增长模型，这些模型都是一部门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之上，美国经济学家冯·纽曼等人建立的冯·纽曼经济增长模型及其他模型用数学公式探讨了多部门经济中最优均衡增长途径的问题。在60年代，经济学家们根据实际统计资料并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以确定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种研究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首要作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实际经济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对各国增长因素作用的比较分析也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这一时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有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J·肯德里克、E·丹尼森等人。70年代之后，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研究了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力图说明经济增长的限度，并提出了“零经济增长”的主张。他们强调了经济增长中引起的人口爆炸、粮食缺乏、资源耗尽、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被称为“世界末日模型”。这种模型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许多学者反对这种增长悲观论。这种悲观论并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流。此外，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研究经济增长历史过程的增长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在对经济增长长期统计资料整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关于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会有更多的发展。从现在来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有这样一些发展趋势：第一、建立更复杂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各种增长因素之间的复杂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各种增长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经济稳定增长的最优途径。第二、定量分析的加强，尤其是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进行精确的计算，并进行预期。第三，重视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展跨学科的经济增长研究。第四、重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诸如、环境污染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道德问题等，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第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预测。第六、国际间经济增长问题，例如，缩小各国之间经济增长差距与国际合作等问题。

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又称“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是要求自由地发展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总称，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潮。其基本观点是：第一、以利己的个人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即认为人是利己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只有通过个人追求私利的活动来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第二、经济自由是经济活动的最高原则，也是其他自由（政治自由或思想自由）的基础。经济自由包括个人可以自由地拥有资源（私有制），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资源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例如，生产者利用自己的资源进行生产的自由，消费者利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的自由，以及工人就业的自由，等等，第三、市场机制的调节能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进行活动，价格则象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经济。价格的调节把个人追求私利的活动引向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使资源配置到最优，同时，市场中的竞争可以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因此，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竞争是通向繁荣的唯一途径。第四、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国家的作用仅仅是维护国防、维护社会公正，并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险，即国家仅仅起到“守夜人”的作用。经济活动应由私人进行，国家不能进行任何干预。第五、在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各国之间的自由经济交往与竞争会使全世界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并实现全世界的最大福利。

经济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与重商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哲学家J·洛克等人就提出了"天赋人权"的主张，论述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强调社会经济按自己本身的内在规律发展，国家不应干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自由放任思想的完成者。他从利己的人性出发，论述了市场如何把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引向社会利益，并确定了市场调节、完全竞争和自由贸易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都继承了这一传统，自由放任成为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条，并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一直统治着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之后，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放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仍有一些经济学家,例如,以英国经济学家L·罗宾斯为首的伦敦学派、以德国经济学家E·欧根为首的弗莱堡学派、以奥国经济学家F·米塞斯和F·哈耶克为首的新奥国家派、以美国经济学家F·奈特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仍然坚持了自由主义的传统。70年代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所引起的"滞胀"，经济自由主义又得以复兴高涨，在理论上可以与凯恩斯主义抗衡，在政策上则引起了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经济政策的自由化。这一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包括以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以德国经济学家E·艾哈德为首的弗莱堡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R·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L·拉伐为首的供给学派，以及以美国经济学家B·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R·科恩为首的"产权学派"，以及奥国经济学家F·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G·斯蒂格勒等一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基本坚持了18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当代。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与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思潮对资本主义过去与今后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经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　关于经济权力已由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的理论，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所建立。早在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凡勃伦就提出了由工程技术人员取代企业家掌管企业的理论。3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A·贝利和G·米音斯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分析了公司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现实，认为由于股权分散，资本家已逐渐丧失了对自己企业的管理权力，产生了一个专门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经理阶层。40年代初，美国制度学家J·伯恩汉在《经理革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经理革命"这个词。由此以后，经理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谓经理革命就是指随着股权分散，社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由受过各种专业训练的经理阶层来管理，从而这个经理阶层成为企业的实际的掌权者。50年代以后，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和K·博尔丁等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并根据经理革命的现象来研究企业内部制度上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在管理理论中，经理革命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下的刺激机制、企业目标，管理特点等问题。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Factors）　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并根据实际经济统计资料，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小所进行的定量分析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但这些因素各在经济增长中起多大的作用？从50年代后期起，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R·solos)、J·肯德里克（J·Kendrick)、E·丹尼森（E·Denison）等人根据美国等国的长期经济统计资料，运用经济计量学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R·索洛根据美国1909—1940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在这一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为2.9%，其中劳动力增加所作的贡献为1.09%、资本增加所作出的贡献为0.32%，技术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为1.49%。J·肯德里克根据美国1889—1957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在这一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为3.5%。其中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即劳动力与资本增加）所作出的贡献为1.8%，技术进步所作的贡献是1.7%。他所用的技术进步的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即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E·丹尼森根据美国1929—1969年的统计资料进一步分析了各种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用每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来表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的结论可以用下表概述：

增长因素	所引起的增长率（%）
总生产要素投入	1.82
劳动	1.32
资本	0.50
每单位投入产出量	1.59
知识进展	0.92
资源配置	0.30
规模经济	0.36
其他	0.01
国民收入增长率	3.41

E·丹尼森还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了分解，更详

细地分析了各种因素的作用，并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各种增长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具体说明了各种因素的不同作用，尤其是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的研究都表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个比例在加大）。这样，不仅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还可以指导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关政策。

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 美国激进经济学家P·巴兰（p·Baran）和P·斯威齐（P·sweezy）在1968年出版的《垄断资本》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经济剩余指"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其中不仅包括利润、利息、地租等全部财产收入，而且还包括买卖过程中的浪费、某些其他广告费用、金融与法律等服务部门从事人员的报酬，以及由政府所吸收的剩余（教育、卫生、文化、福利与军备)支出。巴兰和斯威齐运用经济剩余这一概念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首先，由于居垄断地位的少数大公司实际能够压抑价格竞争和制止减价，同时革新技术以降低成本的竞争有增无减，结果使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利润总额趋于增加。因此，经济剩余无论就其绝对量，还是就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都趋于增长，这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的"剩余增长趋势规律"。这一规律的存在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基本特征。然后，作者探讨了经济剩余的出路问题。经济剩余增加使得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增加了，但垄断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利用经济剩余的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和具有破坏性。本来解决经济剩余的途径之一是降低价格，增加工人和其他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并引起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变。但大公司对价格的垄断却阻止了这种作法。垄断资本主义没有为经济剩余提供适当的消费和投资出路。结果，一方面，经济剩余的吸收成为日益困难的问题而使经济停滞；另一方面，把经济剩余用于无用的、浪费的或有害的方向，例如，进行花费高昂的推销活动，大量生产军用品，或生产一些无用的物品等等。这正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只能在"世界革命"中被推翻。

经济学中的六次革命（Six Revolutions In Economics） 经济学发展史上六次有重大影响的变革。第一次指18世纪中期"斯密的革命"，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对重商主义进行了革命，这次革命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第二次指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即以奥国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和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与边际分析法的建立。这次革命在理论上把对生产的研究转向了对消费与需求的研究，以资源配置为中心建立了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方法上则是引进了增量分析的边际分析法，从而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第三次革命指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以在理论上有效需求原理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论断；在方法上用总量分析代替了个量分析，在政策上用国家干预代替了自由放任。这次革命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并开始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时代。第四次革命被称为"斯拉法革命"，指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P·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完成了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第五次革命是60年代以来由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发动的"对抗凯恩斯革命的革命"。货币主义者批评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对经济的恶果，主张在控制货币量稳定物价的条件下利用市场机制来稳定经济。这次革命使得货币主义足以同凯恩斯主义抗衡，并使经济政策从80年代初开始向自由化转变。第六次革命是美国经济学家R·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革命。"这次革命在理论上以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为前提重建宏观经济学，在政策上则用自由放任来代替国家干预。理性预期革命对宏观经济理论、模型与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经济学的这六次革命被称为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六块里程碑。

经济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 指那些主要关心改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工会的一个专门名词。这样的工会也可能对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感兴趣，但这只是次要的考虑。与经济工联主义形成对照的是"激进"的工联主义，它以争取新的立法，改变或推翻现存的经济、社会制度为其主要目标。欧洲的劳工运动一度曾盛行革命的工会主义，但美国，经济工联主义一直是工会运动的主流。

经济支配力（Economic Power） 指随着一般集中程度的提高，少数巨大企业在大产业部门甚至全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具有经济影响力。

经济开发署（EDA） 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它根据1965年的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法而设置的。其主要职能是帮助美国一些失业和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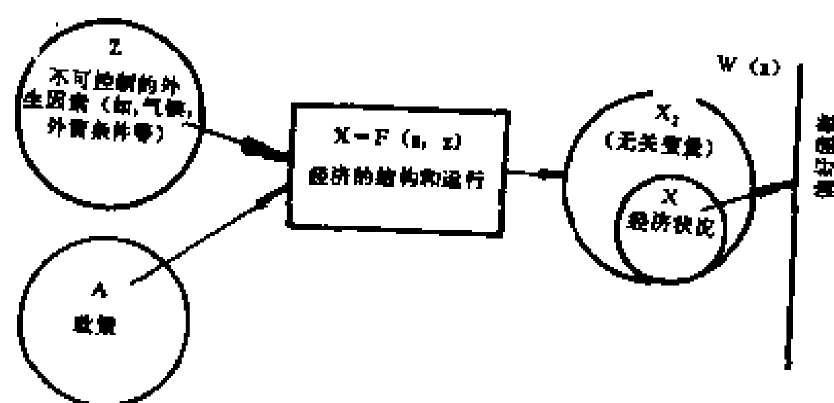
工资问题严重的地区创造新的永久性的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发展，为地方上的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提供贷款和赠款，并为建立和发展私人企业提供商业贷款、并且通过实物技术援助或专用贷款，帮助这些地区进行开发分析和规划工作。经济开发署按照3个不同的规模层次，确定合格的受援区。援助项目仅具有地方意义时，受援单位被称为“重新开发地区”，它可以小到一个县、一个城市、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有时甚至更小。受援条件是否具备，可以根据若干标准中的任何一条确定，到1973年6月30日为止，按照各种标准，合格的受援地区有1729个。这些标准主要包括：(1) 持久失业；(2) 大量失业；(3) 家庭收入中位数低；(4) 人口减少；(5) 按人口平均的就业量；(6) 印第安人保留；(7) 失业率骤升；(8) 法定每个州至少必须有一个合格受援区；(9) 受特殊影响的地区。

经济民主化（Economic Democratization） 指美军占领日本时期（1945年到1952年），推行了一系列以反垄断政策为中心的经济民主化措施，促进了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市场化，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根据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原则，占领当局实施的排除经济力集中、禁止垄断的政策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解散财阀。（见解散财阀词条）；第二、企业分割（见企业分割词条）；第三、解散统制性的经济团体。行业性的经济团体是二次大战期间统制经济的重要基础。从1945年9月到1949年5月，解散了几乎涉及所有产业的1022个经济团体和67个国策研究公司及外国银行。为了实施上述措施，在美军占领当局指导下，日本政府制定了《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等反垄断法规。最有历史意义的是1947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法》，即反垄断法。这个法律标志着日本有了系统的反垄断原则、政策及实施办法。根据这个法律，同年7月，成立了公正交易委员会。至此，日本确立了反垄断法治体制和基本政策，这对日本以后产业组织政策的内容和实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关于经济民主化措施的评价，日本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积极意义是显著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反垄断法的制定为建立市场秩序和发展市场竞争确立了基本的法律规则；第二、处分旧财阀和大企业的高级职员，为大批熟悉处理劳资关系、懂技术和管理的新型经营者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从根本上提高了经营者的素质；第三、与农地改革（土地改革）和工会合法化一起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中心环节，促进了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

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结构，以及一般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过程。是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经济进步。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应达到三个目标：(1) 增加了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生活必需品的分配；(2) 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3) 扩大了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相比之下，经济发展的内容更为广泛。它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既包括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改变社会结构、公众观念和国家制度等多方面内容的过程。一般而言，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但有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有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计划（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做出的安排。按计划的时间长度，有长期计划、中期计划、短期计划之分。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体上可简化图示如下：图中，Z是不可控制的外生因素，如气候、外贸条件等；A表示一组政策；a表示具体的政策；经济变量函数X＝F（a，z）。有了外生因素（z）和政策（a）值以后，就可以得出经济运行的一组联立方程，求出X的值。在X函数的各种变量中，有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可以不去注意，用x_t表示。W（x）表示各种经济因素相互关系作用的结果，称做“偏好函数”。一般说来，对于外在因素无能为力，只能使预测尽可能准确。计划工作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建议改变政策，找到具体政策a的一个值，使偏好函数的值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在指标体系、内容范围、详尽程度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什么类型国家的发展计划，都具备三方面的要素，即公共机构规定的社会目标、调节机制、调节手段选择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大多利用数学模型制订发展计划。因为数学模型能提供一个系统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可以充分利用给定经济体系中有关结构关系的现成资料，以此为基础解决具体计划问题，保证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经济发展计划模型按照结构复杂程度和具体用途，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 总量增长模型。它利用一组有限的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生产、投资、储蓄、进出口等来研究整个国民经济，这种模型常常用来确定在简化了的假设前提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可能增长速度。它只能提供一种粗略的初步的近似值，因此还不能算做真正的发展计划。(2) 部门投入一产出模型，又有三种类型：一是单独部门模型。在缺乏总量或完整的主要

部门模型所需要的统计资料、只有一个或少数单个部门的详细资料的情况下经常使用。其主要缺点在于，发展计划内部不协调，缺乏整体的合理安排。二是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两个或更多的主要部门，以便在主要经济部门互相配合的基础上，制定一个较完整的发展计划。三是部门间平衡方法。通过一组表示各个部门的特定生产过程的联立线性方程，将国民经济所有生产部门的活动相互联系起来，可用于计算中间产品、进口、劳动力和资本的需要量。给定某一部门的计划产出指标，可以制定出各部门相互协调的全面发展计划。这种模型包括从简单的投人产出模型到更为复杂的线性活动分析模型，(3) 项目鉴定与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属于微观分析，用于大量日常的投资基金分配得失的权衡。项目鉴定的方法是建立在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之上的。为了评定涉及财政支出的计划的价值，必须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收益和成本的比较。社会收益和成本之差，就是社会利益。这三种类型的模型是相互联系的。总量增长模型建立了主要的战略；投人产出分析保证部门间的协调一致，项目鉴定则能保证每个部门的项目有效可行。这三种方法的衔接程度，将决定大范围内计划执行的成败。



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三种基本思路之一。这一思路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着重于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社会结构去分析经济发展问题。该思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诸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低供求弹性等等结构上的特点。这种结构上的特殊性使得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可能实现，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利益不易普及，导致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因此，应当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要发挥国家干予的作用，进行结构的改革，有计划地对资本积累和工业建设作出安排。

这一思路的思想，在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时被广泛采用，对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属于这种思路的经济学家，主要是50—60年代中较有影响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们。刘易斯、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普雷维什、辛格、缪尔达尔等人。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普雷维什的"中心与外围"理论等，都属于此种思路。归纳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指出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均衡状态；发展结构分析的方法论；提出结构主义观点的政策建设等几个方面。

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当时在经济论坛上兴盛着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均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并把经济变动看成是边际的、增量的调节。而在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普遍不发达，市场是不完全的，价格体系仅处于萌芽状态，人们不可能在经济行为中作出合乎逻辑精明选择，要使整个经济变化就需要进行重大的经济结构的改进。凯恩斯经济学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出发考察和解释就业和储蓄的。而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表现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原因是储蓄不足、资本短缺，所以凯恩斯提出的增加有效需求的对策是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奏效的。

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刚性，指出在缺乏弹性的条件下，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向均衡交叉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形成了持续的不均衡状态。他们还强调部门间的结构上的差异，认为尽管各个部门都会谋求利润和效用的最大化，但是各个部门对于刺激的反应存在差异。因此，应把整个经济分解为几个构成部分，以便更好地剖析经济发展进程的真实情况。他们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的。

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已从一套直觉的假设发展为具有经验效力和分析严密性的多种模式。可归纳为三个阶段：(1) 提出假设；(2) 经验测试；(3) 建立较完整的模式。有两种结构主义概念可以说明这种演进过程，一是二元经济的概念，一是作为平衡增长理论基础的需求互补性的概念。刘易斯对前一概念提出了3个基本假设，纳克斯和罗森斯坦—罗丹对需求互补和平衡增长提出了一套结构假设，后来都分别经受了经验测试，被证实假设是站得住脚的。于是二元经济概念和平衡增长概念都在第三阶段中进一步完善了理论，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模式。由于根据的是个别国家的统计资料，模式有转向国别化的趋势。

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所

应采取的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认为，在国内应据收入结构的特点制定重视分配的政策，但并不主张对现有财产的重新分配，仅主张对收入增量的重新分配；就国外而言，由于结构刚性，对外经济政策要受到国内资源配置的限制，体现这种思想的有两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等。

经济发展的新古典主义思路（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3种基本思路之一。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用新古典学派的方法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形成的理论观点，是当前发展经济学中的主流派。这一思路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主张完全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确认发展过程中社会团体之间、穷国和富国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有：鲍尔、怀纳、哈伯勒、舒尔茨、明特、巴拉沙等人。

新古典经济学关心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重视产出与就业量的波动和收入的分配。他们假设经济体系是具有韧性的，可以按照价格变化而作出灵活反映，经济发展过程可以通过边际调节和市场修补达到经济均衡。持新古典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注意到50—60年代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情况：尽管有快速的增长，但广大人民并未摆脱贫困；尽管采用了教育、人口流动、工业化等等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但二元结构、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其他种种失衡现象并未减轻。他们认为，这些情况从反面说明了新古典主义的思路是正确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内容集中反映在对发展过程的看法、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看法、资本积累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方面。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和谐的、累积的过程，经济的继续不断发展是可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渐地分润到社会全体。因而，经济体系有一种自然走向充分就业的强有力的趋势。由于货币因素、战争以及新生产技术的引进，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失业，但不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失业。经济发展会提高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工资；技术进步又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总生产，从而总收入也得到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纵向的"涓流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会自然而然地促使经济发展的利益普及，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

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从渐进的、连续的发展观出发来解释整个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他们认为，经济的进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因此用静态的局部均衡方法足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把经济发展分解为价格导向的、竞争性的基本经济活动，认为不受干涉的市场体系必将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因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必须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限于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在经济体系内限定产权以减少外在影响、宣传和传播关于现有经济机会的信息等方面。同时对于私人垄断应有强制性的规章规定，要求随着产量增加、规模经济的出现而必须降低价格。

在资本积累理论中，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十分关心长期问题。他们从替代关系中去观察人口的变量变动、资本存量、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对发展的影响，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当资本存量对比人口有所增长时，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都会增长，但是，在既定的技术状况下，随着积累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将逐渐下降。他们还认为，利息率和收入水平决定储蓄率。技术水平和人口水平既定，利息率决定投资流量，而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将刺激投资需求。由于技术进步的发生被认为是颇有规律的，储蓄率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比较成本学说作出了演绎，提出了资源赋有理论，并赞许自由贸易政策。他们指出，如果对外贸易自由化，穷国和富国都会得益；富国向穷国投资，借方和贷方同样有利；富国向穷国传授管理和技术，双方都会有好处。所以，在国际关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南北冲突，而是维持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双方都分享利益。

经济发展的激进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思路（The Radical Or Neomax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Developmentt）　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3种基本思路之一。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演绎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研究上而形成的理论观点。这一思路强调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利益冲突，主张打破支配—依附的旧格局，倡导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和地区的一体化。属于这一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有巴兰、阿明、弗兰克、卡尔多索、桑克尔、桑托斯、伊曼纽尔等人。

持激进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一方面尖锐地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脱离历史、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由于回避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方面，其理论体系不过是空中楼阁；另方面又超越了结构主义者单纯从不平等力量去观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主张进一步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历史联系与现实状况去认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依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思想和理论的影响，因此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立论较为简单，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的内容只是散见于各个经济学家关于支配—依附关系的理论分析之中。他们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程度不同，分析和论证也各有侧重，但是对于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问题有着比较一致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把不发达单纯看成为一种落后状态或一种自然现象，实际上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其根源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关系和不平等交换的关系。处于外围的受支配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依附于处于中心的、支配地位的发达国家，不能独立地决定自身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在不平等交换关系中，中心国家从外围国家取得了大量的剩余，从而得到不断的发展；而外围国家由于剩余的不断流出而不能跳出持久贫困的陷阱。

激进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各自对支配—依附关系的理论分析得出了一些不尽相同的政策推论，大体上有这样几种：(1) 要使依附状况彻底改变必须改变内部生产结构，改变制度和秩序。(2) 只有整个世界改造成为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外围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所以革命和社会主义是发展的必要条件。(3) 外围通过坚定的政策措施，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订立国际商品协定，发展本国技术，就可以把中心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4) 发展中国家应实行一种与国际体系"脱钩"的政策，走向"集体的自力更生"，包括选择依赖本国资源原则为基础的自力更生发展道路；优先考虑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以提高原料的价格、控制自然资源外流，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并加速技术转让。

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Weignted Inde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不能仅以某种指标作为尺度，而是要用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衡量。在这方面，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做出过大量的努力，分别提出了含有不同变量的指标体系。一般认为，发展的中心意义是增进社会和个人的福利，从而设计发展的衡量指标至少应包括与之相关的5个方面的内容。即：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就业状况。从统计学角度看，这5方面的统计数字不能简单、随意地相加成某一种统一的指标，但却可以采用加权的办法把它们合成为一种具有综合意义的指标。对此，哈根（E·E·Hagen）、尼维阿罗斯基（N·H·Niewiaroski）、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曾分别提出过大同小异的指标体系（对比列于下表）。此外，还有阿德尔曼（I·Adelman）和莫里斯（C·T·Morris）设计的41个变量体系，其中不少项目具有社会的或政治的性质；哈比逊（F·H·Harbison）、玛鲁尼克（J·Maruhunic）和雷斯尼克（J·R·Resnick）提出的41个变量体系，其中较强调人力资本的发展。

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

项　目	哈根	尼维阿罗斯基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耐用品—服装—住房：			
人均机动车数	×	×	
人均收音机数	×	×	
人均纤维消费量		×	
每个房间人数			×
交通—设施：			
人均电话机数	×	×	
人均报纸发行量	×	×	×
人均能源消费量	×	×	x^a
基本工业产品：			
人均钢消费量		×	×
人均水泥消费量		×	
卫生与营养：			
人均医生数	×	×	
预期寿命			×
蛋白消费量		×	x^b
教育：			
识字率	×	×	
小学入学率	×		x^c
高小入学率		×	x^c
职业学校入学率			×
就业：			
农业和服务部门以外的劳动力百分比	×		
农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口百分比		×	x^d
公用事业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口百分比			×
进行经济活动中工资和薪水收入者百分比			×
其他：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份额			×
男性农业劳动者的人均农产量			×
人均出口量		×	x^e
城市人口百分比	x^f		x^g

资料来源：小朱维卡斯：《经济发展导论》，1979年英文版，第22-23页。

a—电力及其他能源分列　　b—动物蛋白

c—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合并计算　　d—成年男子

e—对外贸易　　f—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g—2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经济规模　见"最佳规模"。

经营多角化（Diversification）　经营多角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末以后，最引

人注目的企业非价格行为，并且日益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的基本经常战略，就词义来说，任何企业只要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多于一种，都可以说成是经常多角化。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将生产若干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如各种商标的洗衣粉）的企业称为横向一体化企业；将生产具有显著投入产出关系的不同产品的企业称为纵向一体化企业。经营多角化企业中不包括这二类企业。经营多角化可以区别为不同类型，例如，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将经营多角化分为三种类型：1、产品扩展型。企业所生产的不同产品间虽不直接竞争，但在生产或销售方面存在某种技术联系。2、市场扩展型。其典型形式是上述企业的合并，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虽然相同，但销售的市场却在地理上各不相同。3、联合多样化。企业生产的不同产品在生产市场方面几乎互不相关。经营多角化的衡量方法、指标主要有多角化曲线、企业经营的产业数量、专业化率、贝里指数、熵指数、厄顿指数等。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解释企业经营多角化的成因，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资产利用理论，二是降低资本风险理论。资产利用理论把企业看成是能够从事一些独立经营活动的有形资产、人和无形资产的集合。某些资产相对来说是产品专用资产，只能用于生产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另一些资产则可以通用于生产一定数量的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如果后一类资产在企业目前经营活动中得不到充分利用，就值得把它们用于其它方面。首先，如果在企业现有的生产线上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企业就有可能通过多样化其生产活动来提高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其次，对企业来说，经营技能显然也是一种重要资产，一些企业拥有具有特别组织才能和企业家才能的经理或经理队伍。经营技能，至少在高管理层次上，不是局限于某种产品的，因此企业通过扩展经营范围，可以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它的这种资产。再次，研究与开发的基本特点，是由它产生的知识和创新的应用可以超出企业现有经营活动的范围。企业既可以通过出售专利权从这种成果中获利，也可以通过使经营活动多样化，来更广泛地利用这种成果。如果企业对进入新产业的自身能力具有足够的信心，就趋于后一种选择。2、降低资本风险理论。认为，一组经营活动要比它的单一组成部分具有较少的风险，因为，一种经营活动的坏运气会被其它经营活动的好运气所抵消。多角化经营企业从事着几种不同的经营活动，它期望这种补偿性影响能起作用，从而得到平稳的收益率。在两种经营活动的总收益率具有完全负相关关系的情况下，这组经营活动的总收益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是完全平稳的。在不是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多角化经营的收益率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变异性，但这种变化要大大低于非多角化经营的收益率的变化。

企业经营多角化会对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营多角化企业较易进入垄断性产业，从而可能降低这些产业的垄断程度。多角化企业在打入新的市场时比专业化企业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这不仅因为它通过内部和资本市场筹措资金的能力较强，而且因为它有能力在进入新市场初期承受亏损，就一些垄断性产业而言，非经营多角化企业一般很难进入，只有经营多角化企业有进入的可能。假如这种进入是建立新的厂家，并且它本身不提高产业的垄断化，就有助于增强产业的竞争。2、掠夺性定价。多角化经营企业如果在市场上具有市场势力，有可能导致掠夺性定价和其它过分的经营行为。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为了达到在较长时期内把价格提到垄断水平的目的，都有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大幅度削价即掠夺性定价的方法排挤其它企业，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市场势力。问题是，经营多角化企业实行掠夺性定价的能力高于其它企业，这是因为它可以用其它市场的赢利弥补某一市场因大幅度降价造成的临时性亏损。3、相互克制。当几家经营多角化企业在一些市场相互对立，它们有时会采取避免竞争的克制态度。这是因为，多角化企业担心在任何一个市场采取竞争行动，会导致多角化竞争企业在其它市场采取报复行动。

经理会议（Manager Meeting）　日本企业集团成员的经理组成的经理会议。最早的经理会是在财阀解体的同时开始设立的，如三菱系的“金曜午餐会”、三井系的“恳谈会”、住友系的“泉友会”等。1951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经理会逐渐成为常设机构。目前三菱集团用“金曜会”、三井集团用“二木会”、住友集团用“白水会”、芙蓉集团用“芙蓉会”、第一劝银集团用“三金会”、三和集团用“三和会”命名。1982年日本六大企业集团中加入“经理会”的成员企业数为157家（金融、保险业除外），其资产额和营业额分别占产业界总数的15.1%和15.7%。这只是就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而言，如果加上它们的全部子公司和关系公司，则几乎控制着日本经济的一半以上。关于经理会的性质有多种议论，尽管当事者们尽量把其意义轻描淡写，说它是“亲善团体”，“杂谈场所”，但是经理会是立足于企业集团内部相互持股之上的，具有事实上的大股东会的性质，即持有股票的虽然是法人企业，但他们行使股东权的是代表董事—经理。因而这些经理集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大股东会。在经理会上讨论协商些什么，因为不公开公布，从外部一无所知，但是可以认为那里讨论的是企业集团的重要问题，并通过经理会采取了许多共同行动。如1975

年，购买三井矿山股票时，二木会（三井集团的经理会）通过向本会成员分配该矿山的股票而谋求股东的稳定化。"经理会"的事务所一般设在本集团的某一机构内，如二木会（三井系）的事务局是三井不动产的秘书课，芙蓉会（富士银行系）的事务局是富士银行的企划部。经理会的建立和充实六大企业集团的体制完成开辟了道路。

经理制度下工业区位的决定　这是区位理论中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后的一个流派。基本假定是在所有权与管理权广泛分配后，企业的决策权已从股东、所有者手中转移到非所有者的经理阶层手中。这种经理制度下的企业目标和企业行为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的由所有者经营的企业，从而也会影响到工业区位的决定过程和目标。古典式的工业区位理论一般都要强调按最大利润进行区位选择，基本不考虑其它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在经理制度下，企业目标已不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而要附加另外的要求或约束，经营者的个人偏好往往在厂址选择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变化的另外一个历史背景就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运输业的发展，使得地理差异对生产成本的影响逐步下降，地区间生产成本的差距也在缩小。这就使得工业区位形成过程中，非成本一价格因素或者说非经济因素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被经理人员所看重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如社交、文化生活等。公司经理如果根据这个角度来考虑工厂搬迁或者区位选择，就会选择成本虽高，但社交、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的城市和市郊作为厂址，而成本虽然较低，但位置偏远的乡村却不被企业的经理人员所看中；政府的地区经济政策；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工会力量的强弱及劳资关系的状况；种族矛盾的情况等。

经济平衡（Economic Equilibrium 或 Balance）分为：(1) 市场平衡。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等于外汇需求的状况。若外汇需求大于供给，则一国国际收支逆差，反之则为顺差。该概念多用于纯经济理论的分析；(2) 计划平衡。能同时实现政府当局所期望的经济目标的国际收支平衡。若实现经济目标所需外汇恰等于计划性外汇供给（包括国外融资）则国际收支达到了计划平衡。若为了实现所定目标，计划所需外汇大于计划性外汇供给，则国际收支发生逆差，反之则发生顺差。会计平衡为事后平衡，而经济平衡却是事前平衡，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市场平衡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

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emce）　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它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封锁与禁运而于 1949 年 4 月成立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该组织成立时共有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 7 个成员国，以后东德、蒙古、古巴、越南先后加入该组织。由于阿尔巴尼亚的退出和东德作为一个国家的消失，目前该组织共有 9 个成员国。经互会的宗旨是通过联合和协调各成员国的力量，有计划地发展各成员国的国民经济，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工业不很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和人民的福利，使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推动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体化。

经互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经互会会议，由各成员国的政府总理率团参加。它负责审议各成员国间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基本问题，确定其活动的主要方针，研究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建立有关机构，接受新成员国，修改章程，等等。执行委员会是该组织的主要执行机构，由各成员国的一名副总理组成，它领导开展各项主要工作，监督各成员国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的情况，提出各种方案供经互会会议审议，领导下设的各合作委员会、常设委员会以及秘书处的工作并为它们制定主要的活动方针。除此之外，经互会还设有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投资银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分支机构。

经互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体化，因此从成立之日起它就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时间的推延不断得到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协调是合作的主要形式，具体内容包括协调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长远规划，共同制定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规划，对重要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发展作出联合预测，完善和发展五年计划的协调工作，交流各成员国完善计划管理的经验等。在生产的专业化与协作方面，经互会成员国通过签订数以百计的双边与多边生产专业化与协作协定大大推进了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的发展。各成员国集中力量来生产一种或数种自己的优势产品满足各成员国的需要，这有利于提高各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推动各国以至于整个经互会组织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互会各成员国通过协调各自的科技政策和科研工作来加强它们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为了实现一体化经济的目标，经互会还组织各成员国共同投资建设联合项目，建成了大量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各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总之，经互会组织在成立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在推动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一体

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在发展一体化经济过程中的某些不合理的决策，使得某些成员国的经济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缩小与其他成员国的差距，反而使差距有所扩大，影响了一体化的进程。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各成员国的经济形势普遍恶化，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许多成员国要求改革经互会的合作和一体化机制，建立平等合理的金融体系和经互会共同市场。由于各国忙于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使得经互会的共同目标难以得到贯彻实施，经互会的作用不断下降。1989年以来，东欧各国的政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导致了这些国家政治社会体制的根本变化，而苏联也由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无力顾及经互会的问题，因此，经互会组织目前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前途未卜。

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Eone）　经济特区是指一国境内一些特定的地区，在那里采取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特别灵活、优惠、开放的经济政策，如放松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控制，让其自由发展，减免所得税和进出口关税等等，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引进更多更好的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本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促进本地区的对外贸易，进而以此为龙头，带动更多的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发展经济特区，不仅需要国家采取优惠的经济政策，作为特区本身还需具备一些客观的有利条件，如良好的自然条件、较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较齐全的经济基础设施、较高的教育水平等等，另外，一国还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局。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全面良好的投资环境，才能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本国的经济特区时采取的优惠政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区的种类和名称也很复杂，如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对外贸易区、自由加工区、出口加工区、自由关税区、关税仓库区、自由边境区、促进投资区、科学工业园区、过境区，等等。

经济特区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它的发展与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上第一个经济特区是意大利的里窝那，它在1547年被定名为自由港。两次大战以后，经济特区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开辟了经济特区，其中美国开辟的经济特区超过了100个。我国于1979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了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除此之外，大批沿海的城市和地区成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的建立和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它不仅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经济发展，使得我国的对外开放、对外贸易不断走上新的台阶。

经济风险（Economic Exposure）　由于汇率变动对销售量、价格、成本的影响，使企业在将来特定时期的收益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与经济风险和交易风险、折算风险不同，它是汇率变动对未来收益的影响，而后二者涉及的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以外币计价的交易。

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　国际收支中的重要项目。分为：（1）贸易收支，即有形贸易收支；（2）劳务收支，又称无形贸易收支。反映该国在一定时期内对外国居民提供劳务或接受外国居民劳务而发生的全部收入或支出。包括：海陆空客货运费收支；银行及保险费收支；旅游收支；国际旅游的膳宿、交通等服务性收支；政府往来，如使领馆经费支出；其它劳务收支，如专利权使用费、广告宣传费等；投资收益收支，如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收益（股利、利润收支等），对外间接投资（如证券投资）。（3）单方面转移。

经常项目差额（Balounce of Current Items）　一定时期中一国居民在商品、劳务及单方面转移项目上借方总值与贷方总值之差。贷方总值大于借方总值称为经常项目顺差，反之则称为经常项目逆差。

经合组织范本与联合国范本（OECD Model and UN Model）　它们指的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分别通过的指导各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国际税收协定的示范性样本。一般而言，经合组织范本指的是1977年通过的"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范本"（Model Convention for the Avoidence of Double Taxat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qn Income and Capital），而联合国范本指的是1979年通过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Model Conventr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目前，这是影响最为广泛、深远并被广为采用的两个国际税收协定范本。

这两个范本不是随便提出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较充分的酝酿。关于税收协定范本的最早模式可以追溯到国际联盟所做的卓越努力及其墨西哥草案和伦敦草案。二战以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即开始草拟协定范本的工作，OECD成立后，其财政事务委

员会继续了这项工作并于1963年提出了协定草案，在各成员国及非成员国之间试用效果良好，于是1977年通过了修改完善后的OECD范本。

OECD范本虽然内容全面，行文严谨，但被认为有意无意地偏向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随着进入税收协定领域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多，对OECD范本的不满之声也多起来。为此，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成立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代表在内的专家小组制订为更多国家所乐于接受的协定范本。这个小组于1968年正式开始工作，在多次会议之后于1979年通过了前述联合国范本。

联合国范本出于更具普遍性的目的，只对与OECD范本存在原则性差别的地方另立文字，而其它方面则几乎完全沿用了已被广为接受的OECD范本。因此，对比两个范本可以发现，二者不但在行文结构方面完全相同，其主要内容甚至遣词用句也大都相同。

从结构方面来看，两个范本都由七章组成。第一章给出协定所适用的人的范围和税种范围；第二章对协定的基本用语加以定义，包括一般定义，对居民的定义和对常设机构的定义；第三章确定对所得征税权的划分，列举了十六类所得；第四章确定对财产征税权的划分；第五章规定了双重征税的解除办法，包括免税方法和抵免方法；第六章给出有关特别规定，包括反对税收歧视的无差别待遇条款，相互协商程序条款、情报交换条款以及外交代表与领事官员税收优惠条款等；最后，第七章，对协定的生效和终止作了规定。

但相似之处再多仍然掩盖不了两范本的许多明显差异，从其名称就可发现，联合国范本要比OECD范本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一特点当然也体现在协定内容中，举例说来：1.OECD范本更偏重维护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而联合国范本则更偏重维护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尽管二者都承认收入来源税收管辖权优先；2.OECD范本倾向于将常设机构定得窄一些，联合国范本则倾向于进行更宽的定义，比如联合国范本将建筑工地等成为常设机构的条件由OECD范本的12个月缩短为6个月；又比如联合国范本主张对常设机构的应税所得实行引力原则，而发达国家难以接受；3.OECD范本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预提税税率的限定明显偏低，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因此，联合国范本规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济人（Economic Man） 指古典学派所创造的，只受经济动机驱使的人的概念。在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中，市场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是有理性的人，他们通晓一切、精于计算，将市场上的有关情况进行周密分析之后，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动，其中生产者追求最大化利润，而消费者追求最大化效用。政府中的官员也在经济人之列，他们结成联盟、制订政策，名义上是为民众着想，实际上也是在追求自己的私利。经济人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经济人的概念后来被新古典学派所继承与发展，他们把这个对个人的假设进行推广，希望能使得经济理论构造得更加严密。现在，经济人的概念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分析中相当重要的行为模型，它还是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典型特征之一。另外，经济学家们还试图利用它对其它社会领域的交易行为以及这些领域中运行的机制等作出分析。尽管经济人的概念如此有用，它还是遭到了来自经济学界内外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人不能只受金钱的驱使，他们还需要安全、独立与闲暇，还要考虑道德因素，不可能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都去犯罪。还有，经济人不可能通晓一切，因为要搜集到所有有关的信息，需要的时间与花费的成本将是惊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掌握的信息必然是不完备的，有些信息还可能是错误的。在不完备的与错误的信息的指导下所采取的行动就很可能偏离其最大化目标。再者，即使经济人的假设对于某一部分人来说是近似的，也不能以演绎法推广到全体，它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合。西蒙提出一个“次优”模式，认为人们只是去寻求一个好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最优的。其他经济学家也正逐步开始研究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人所实际作出的决策，以此来补充经济人概念中的某些不切实际之处。

《经济表》（Tableau Economique） 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主要经济著作。它第一次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作了系统的分析，反映着重农学派的基本经济理论和政策纲领。

《经济表》基本上有两个模式。1758年魁奈发表时采取的是一个曲折连接线的模式，人们很难看懂。后来在与别人合著的《农业哲学》（1763年）中，他使用了一个提要的模式。当1766年正式发表《经济表的分析》时，魁奈进一步提出了《经济表算学范式分析》。从此它就成为经济表的基本模式（见附表）。

魁奈分析《经济表》时有着以下一些前提：（1）社会上普遍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主经营的大农业；（2）流通只在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与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进行；（3）假定价格固定和进行简单再生产；（4）抽象掉对外贸易和阶级

内部的流通，只考虑阶级之间的流通。

《经济表》分析的出发点是生产阶级一年所生产出的总产品，假定为50亿利弗尔。再假定在生产上投下100亿利弗尔的“原预付”（即固定资本），可用10年，因此每年折旧10亿；又投下“年预付”（即流动资本）20亿利弗尔，每年一次收回。在流通开始时，三个阶级的经济情况是：1.生产阶级拥有50亿利弗尔农产品，其中40亿为粮食，10亿为工业原料。其进入流通的只有20亿粮食和10亿原料，其余20亿粮食要补偿“年预付”。2.不生产阶级投入10亿利弗尔“预付”，生产出来的20亿工业品全部投入流通，其中10亿为该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土地所有者阶级拥有20亿货币，是上年度生产阶级交纳的地租。

全部商品和货币是按五项行为进行的：1.土地所有者用20亿地租的一半向生产阶级购买粮食作为生活资料；2.土地所有者用其余的10亿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3.不生产阶级用所得10亿货币向生产阶级购买粮食作为生活资料；4.生产阶级用这10亿货币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以补偿“原预付”每年损耗的物质设备；5.不生产阶级又用这10亿货币向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原料。

这样，交换的结果是：1.土地所有者得到10亿粮食和10亿工业生活用品，可以满足一年生活需要；2.不生产阶级得到10亿粮食和10亿工业原料；3.生产阶级得到10亿用作生产资料的工业品（用作“原预付”物质损耗的补偿）和20亿货币（用作下一年的地租）。至于原已扣除的20亿农产品则当作下一年农业生产的“年预付”。于是，工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魁奈的《经济表》把社会资本的运动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包括了社会各阶级收入的来源、资本和收入的交换关系、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关系，并且把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间的流通看作是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这些思想都极富独创性，对后来科学地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颇具借鉴作用。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把《经济表》看成是最早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有的人甚至称之为原始的投入产出表。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如没有正确的价值理论作基础，没有把工业当作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没有从价值增殖观点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没有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等。这样它就不可能在理论上最终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因此，《经济表》尽管对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作了极有天才的尝试，但毕竟还不是科学的再生产理论。

魁奈《经济表算示范式分析》

总的再生产:50亿　利弗尔

生产阶级预付	土地所有者收入	不生产阶级预付
20亿	10　亿	10　亿
10亿		10　亿
10亿		
10亿		10　亿
年预计		
支出	20　亿	
总计	50　亿	总计20亿

经济方法论争　19世纪80年代发生在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一场关于方法论的大论战，主要围绕历史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何者重要这个问题而展开的。1883年，门格尔发表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一书，在论证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时攻击了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于是历史学派首领希穆勒在同年发表《政治社会科学方法》一文予以反驳。翌年，门格尔在一本名为《德国历史主义的错误》小册子里作出答辩，重申了先前的思想。这样，这场论战逐渐趋于高潮。此后，庞巴维克追随门格尔，于1890年发表文章加入争论，而历史学派学者也不甘示弱，纷纷反击门格尔等人的论调，致使这场争论延续了二十余年。进入20世纪后，一些历史学派学者主动采取妥协态度，意在平息这场持久战，甚至希穆勒本人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原理和方法》（1911年）这篇著名论文里，都申明演绎法和归纳法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而奥国学派学者也开始承认演绎法不是万能的，维舍尔后来还转向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接受了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特点。在这种情势下，持续多年的激烈争论终于在和解的气氛中悄悄地结束。从实际结果来看，这场论争显然削弱了历史学派的影响，而抬高了奥国学派的声望。其实，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片面维护某种研究方法，又抹煞了经济方法论的本质特点和科学性质，并不存在真正正确的胜利者。所以连熊彼特都称之为一场“索然无味”的争论。

经济和谐论　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凯里和法国的巴斯夏。19世纪20年代以来，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者以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矛盾，或者尖锐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和种种弊害。同时西欧和美国的劳资斗争日益尖锐，威胁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地位。正当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鼓吹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思想武器时，“经济和谐

论"便应运而生。

凯里十分仇视强调社会各阶级利益对立的李嘉图学说，攻击它是一个"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制造纷争"理论体系。他宣扬经济分配规律具有和谐性，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和谐的最重要因素。只要资本积累比人口增加来得迅速，可供社会分配的产品总额必然更为充裕。这样，利润将得到绝对的增加，而工资则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增加。换言之，劳资利益不仅和谐一致，而且生产进步给工人带来更大的好处。凯里又杜撰出所谓"再生产费用论"并进一步推论资本家、劳动者与地主的关系同样具有和谐性。

此后，巴斯夏对经济和谐论作了更系统的阐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永恒存在的自然和谐的社会秩序，受到其内部自然规律的支配，而这种经济和谐规律同样决定着社会的利益分配。巴斯夏以交换为出发点，提出了他的服务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交换实际上是各自"服务"的交换，它必须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即实行等价交换，而价值正是进行交换的两种"服务"的比例关系。据此，他进一步论证了地租、利息和工资分别是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各自提供的"服务"的报酬或代价，彼此并无对立和矛盾，并且还宣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工人和资本家的所得同时都在增加，工人所得的份额甚至比资本家所得的份额还要增加得快。可见，这种理论的主旨就在于彻底抹煞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对立。

由于凯里和巴斯夏把资本主义制度描绘得无限美好协调，似乎它是万古长青的理想社会，因而同李嘉图一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其内部各阶级利益对立与冲突的所谓"悲观主义"学说形成鲜明对照，故史称他们为"经济学的乐观派"。这两人的经济理论尽管喧嚣一时，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毕竟因毫无科学的理论价值而很快归于沉寂。不过，他们所鼓吹的劳资利益和谐一致的思想始终没有消声匿迹，经常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个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学说中，并且至今还对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起着严重的毒害作用。

经济浪漫主义（The Economic Romanticism）　一种把小生产当成理想模式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潮。它的最初鼓吹者是西斯蒙第。19世纪初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向法国和瑞士延伸，致使广大小生产者陷于破产和苦难的境地，于是这种思潮得以产生和传播。经济浪漫主义虽则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但不能科学地说明它们的产生原因，只是作些伤感主义的批评，并指望立法者通过国家干预来加以解决。在经济浪漫主义者看来，宗法式农业和行会制工业是最理想最美好的经济模式，小生产应当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据此，他们主张把资本主义经济重新改造成社会各阶级都是小生产私有者的经济社会，以消除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对立。显然，这种保存小生产和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企图，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相悖逆，只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这种经济浪漫主义以后在小生产者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以各种形式出现过，不过它们的影响都十分微弱，不可与西斯蒙第学说同日而语。

线性规划（Linear Programming）　在满足用线性不等式表示的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使线性目标函数最优化的一种数学方法。一般情况下，为达成一理想目标有多种行动方案，但多种行动方案中会有一种是最佳的。例如，一块田地必须种植几种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每一种农作物的总产量都有一些限制，如粮食作物的产量不得低于一定量，由于每种农作物的生产成本不一样，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不一样，如对水的需求不一样，而水资源是有限的。又由于每种农作物的收益水平不一样，原因是市场需求而导致的价格水平不一样。因此就产生多种组合，在这些组合下都能满足约束条件。但目标函数的最优值可能只有一种组合。例如，目标函数是总收益水平最大化。达到目标收益函数最大化可能只有一种，则该种组合就是我们的选择。作为管理的决策工具，线性规划已被广泛应用于解决各种问题。例如，选择什么工艺来生产某种产品会使成本最低；确定厂址，而使得运输费用最低。线性规划还被用来确定某种产品的影子价格。其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线性模型（Linear Mqdel）　冯·诺意曼的线性经济模型于1938年在德国首次出版。于1945年译成英文。从那时起线性模型不断得到完善。最开始的冯·诺意曼模型不承认生产要素，也不承认最终消费，后来的模型逐渐允许从一个生产要素到一个生产要素的向量。实际上里昂惕夫—斯拉法的线性模型只是一特例。假设生产几种商品有m种方法，这里mZN。j种生产方法要有a_{oj}的劳动投入和一个向量的商品投入(a_{1j},a_{2j}…,a_{nj})，这种生产方法生产出商品为（b_{1j},b_{2j},…,b_{nj})。生产过程需要t时间，所以投入时间为t，而产出时间为$t+1$。规模收益是稳定的，亦即线性化的。如果投入为λa_{oj}和（λa_{1j},λa_{2j},…λa_{nj}）就有产出(λb_{1j},λb_{2j},…,λb_{nj}),$\lambda \geq 0$，m种生产行为对劳动的需求为$A_0=(a_{01},a_{02},\cdots,a_{0m})$。则总投入矩阵为

$$\left[-\frac{A_0}{A} - \right] = \begin{bmatrix} a_{01} & - & - & a_{0m} \\ a_{11} & & & a_{1m} \\ \vdots & & & \\ a_{n1} & & & a_{nm} \end{bmatrix}$$

产出矩阵为

$$B = \begin{bmatrix} b_{11} & \cdots & b_{1m} \\ \vdots & & \\ b_{n1} & \cdots & b_{nm} \end{bmatrix}$$

每种生产行为的密度以向量表示

$$x = \begin{bmatrix} x_1 \\ \vdots \\ x_m \end{bmatrix}$$

虽然在 a_{oj}, a_{ij}, a_{2j} 中的某些因素可能为零，但这里假设其均为正数。假设劳动增长率为 $g>0$，充分就业就表示为

$L(t)=A_0(t)\cdot x(t)$

资源限制为

$Ax<Bx-C$

这里 C 是对商品的消费

$$C = \begin{bmatrix} C_1 \\ \vdots \\ C_m \end{bmatrix}$$

满足下面不等式，就能生产出正的最终消费，并且其增长率为 g

(Hg) $A\cdot x<Bx-c \quad c>0 \quad c\neq0$

$X>0 \quad X\neq0$

单位劳动价格和几种商品的价格为 $P_0=w, p=(p_1,p_2 \cdots p_n)$

这里

$$\sum_{i=0}^{n} P_i = 1$$

均衡利息率为 r。如果冯·诺意曼的价格体系满足下列不等式，经济社会实现在利率（利润率）为 r 的前提下的均衡

$w\cdot A_0+(1+r)p.A>PB \quad w>0 \quad w\neq0$

$p>0 \quad p\neq0$

冯·诺意曼的线性模型将处理不同生产技术的不同方法综合起来，但这是一个静态的均衡，而要实现动态均衡，就更加复杂。

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Theory）　组织理论是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中所涉及的问题，例如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中都涉及到组织理论。这里所谈的组织理论是经济学中的组织理论。经济学中所谈的组织理论所涉及的问题是经济、市场、企业等类型的组织。经济学家要对这些实际组织加以理论化分析。由于经济学家大都已习惯于用模型来表述经济学理论，因此，经济学中较为流行的假设、检验、计量方法也被用于组织理论。例如，对有关的组织作出若干假设，然后利用可以系统收集的资料对假设加以检验。这是组织理论中实证的或者说描述性的分析。但是经济学中的组织理论不仅有实证的分析，也有规范的分析。这种理论不仅涉及到是什么的问题，也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已经求得共识，他们认为，任何一种组织理论都采取了组织设计者的观点。经济学中组织理论大都涉及组织的目标（例如，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成员福利最大化）、组织的运行机制（例如计划或市场）、组织运行的结果（例如，资源配置是有效还是无效）、组织运行的成本（例如，是否信息成本较大）等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无不涉及到设计者的观点。当亚当·斯密及其以后的追随者用他那"无形的手"的思想来描述市场机制能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达到福利最大化目标时，他们事实上是持市场价格机制优于中央计划机制的观点。现在，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仍然用许多实证的方法证明价格机制在达成资源有效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降低信息成本方面优于中央计划机制。而兰格、勒纳等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央计划机制这种组织形式能够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此外，也有不少制度经济学家从经济制度的安排，例如所有权的确立、交易成本的降低角度来研究经济组织。这些经济学家也都通过组织理论的研究来探讨促进经济效率与收入平等等问题。

限价（Limit Pricing）　限价被定义为"在不导致其他厂商进入的情况下，定价的厂商认为他可以收取的最高共同价格。"限价的关键特征不仅仅是它阻止其他厂商进入，而是它在阻止其他厂商进入的同时能够让定价厂商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利润。限价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济学家们不断用新的方法研究限价理论。目前限价理论的研究中所流行的方法是博奕论。

最简单的限价理论包括两个假定。第一，存在规模经济，一旦达到某种产量水平以后，规模经济便消失。假定实行限价的厂商完全达到这种规模经济，因而能够产生最小成本。试图进入该行业的潜在加入者的平均生产成本依赖于他加入该行业后生产产量是多少。第二，潜在的加入者认为在他进入该行业后，制定限价的该行业原厂商将保持其现有的产量水平，或者说原厂商将与新加入者的价格保持一致。如果新加

入者遵循上述两个假定，他是否进入该行业的决策将建立在他进入该行业后他的盈利情况的基础上。在制定限价的原厂商可以预见潜在加入者决策过程的情况下，他可以把自己的产量确定在新加入者进入该行业后不能盈利的水平上。因此，相对于潜在加入者而言，制定限价的原厂商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他的目标是要通过产量与价格的制定权阻止潜在加入者进入该行业，以便取得超额利润。他所制定的产量水平当然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最低水平；而他所制定的价格水平当然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最高价格水平，因此称为"限价"。面临着由制定限价的原厂商需求函数而导出的剩余需求函数的潜在加入者相信，若他进入该行业，产量增加将导致价格降低到其平均成本水平以下，这将导致亏损。因此，他将不进入该行业。

制定限价的厂商只有在能够通过阻止别的厂商进入而获利的情况下，他才会用限价的办法阻止别的厂商进入。如果制定限价的垄断者留给潜在进入者的需求函数使后者不能盈利，则制定限价者能成功地阻止别的厂商加入。这也可以认为制定限价者具有"自然"垄断的地位。但是，如果不存在规模经济，或者规模经济在很低的产量水平就可以达到，则原厂商只能通过制定竞争性产量与竞争性价格才能阻止新的加入者加入该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原厂商制定垄断价格而让其他厂商进入该行业对自己来说是有利的。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但原厂商通过限价措施阻止新加入者加入该行业不能盈利，则限价措施是无效的；若原厂商通过限价措施阻止新厂商加入可以盈利，则限价措施的有效的。

选址论（Location Theory） 一种关于影响厂址的诸因素的经济理论。根据选址论的分析，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全部运输成本最小的地方就是应选的厂址。工厂的运输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原料的采购成本，二是产成品的销售成本。一般情况下采购成本的高低与原料供应地的远近正相关；销售成本则与产品销售市场的远近正相关。采购成本与销售成本可能是矛盾的，生产者在决定其厂址时必须权衡每一成本因素的相对利益；有些情况下，厂址选择很简单，甚至无需做什么判断。例如，农业方面的工厂或矿业方面的工厂其位置被相关资源的位置所决定。同样销售业和其他服务业必须靠近买主，即靠近产品销售市场，采购成本虽然也很重要，但不能考虑这个因素，否则即使采购成本和销售成本总和最低，但销售业工作内容的重要方面——销售额将严重下降。有些行业如制造业的选址就相当复杂。如果制造过程或其他过程会大大降低产品的重量，从而降低销售成本，则工厂设在原料产地附近较为合算。如轧棉工厂就应设置在棉花生产地附近。如果产成品容易变质或运输成本较高，则生产者应将工厂设在市场附近。如面包加工厂。选址论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采购成本与销售成本最小，而且还强调工厂选址后的效率性，即努力争取市场使总收入最大。不同类别的产品，由于其生产、加工、销售不一样，厂址选择的限制条件不同。开放经济中，由于产品的原料采购以及产品销售市场可能都不在国内，但厂址设在本国，本国的作用就是加工增值，也可能有较高的效率。但为了避免运输费用过大，在市场销售地或原料生产地设厂也更为普遍。大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遍布世界各地。

定期租船合同（Time Charter） 又称为期租船合同。定期租船合同是承租人支付约定的运费，船舶所有人按照约定的用途在约定的期限内将船舶出租的租船合同，是以时间计算的租船合同。在船舶的出租期间里，船方保留对于船舶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但由承租人负责船舶的经营管理。

定期租船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

（1）提供约定的船舶，载明船舶的名称、国籍、船级、载重量、航速以及燃油消耗量，船舶营运所需的燃料由租船方负责；

（2）船舶的使用范围；这一使用范围是特指船舶的航行区域，船舶须在规定的航行区域内行驶，如果船舶驶离约定的航行区域，船方有权向租船方索赔由此造成的损失；

（3）订明船舶的租期以及交船和还船的时间、地点；船方有义务在约定的时间将船舶在约定的交船港口交付租方使用，从交付船舶的日期开始计算租期，租期届满，租船方应在约定的时间在约定的还船港口交还船舶。除自然损耗之外，租船方还船时，船舶的状态应与船方交船时一样良好。

（4）租金的支付与订租；定期租船合同的租船费用称为租金，租金的数量是以时间长短计算的，通常以月为单位，租船方按月预付租金，在合同规定的租期内，不论是否使用了船舶，租船方都应按期照付租金，否则，船方有撤船权利，并可以对货物行驶留置权；但是，如果船舶发生故障超过24小时，则租船方有权停租，即停止支付租金，直到船舶恢复有效工作状态；

（5）使用和赔偿责任；它主要要表明当船长由于执行租船方的指示而引起了后果损失时，租船方应向船方予以赔偿。

定期租船合同的标准格式称为波尔太姆(Boltime)
期租租船合同格式。

定期保单（Time Policy）　定期保单是保险人承保一定时期内保险标的物遭受风险损失的保险单。保险人的责任期限以约定的时间为限，约定时期届满，保险责任即告终止，这一期限通常为一年。

定期保单多用于船舶保险和运费保险，在货运保险中较少使用。

定值保险单（Valued Policy）　定值保单是在保险单内载明保险标的物的约定价值的保险单。对于保险标的物的约定价值，通常要包括货价、运费、保险费和预期利润，如果发生标的物的损坏或灭失，约定的保险价值就成为保险标的物的最终保险价值，不论保险标的物的实际价值如何变动，保险人均按约定的保险价值进行赔偿。

定值保险单由于事先已经约定了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一方面避免了标的物受损后再行确定保险价值的困难，也保证了被保险人在标的物受损后获得完全的补偿。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一般都采用定值保险单。

定性经济学（Qualitative Economics）　定性经济学是指对经济系统的性质分析，所使用的信息资料只是关于经济系统变化方向的资料，如对经济系统起正性作用，起负性作用，还是起中性作用。经济学中的定性分析从正规经济学的早期开始就存在了。但只是从1939年希克斯的对竞争经济一般均衡分析开始，对定性的信息资料的规范化分析才逐渐完善。萨谬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将定性分析，最大化假设和均衡稳定假设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中比较静态分析的三个基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经济分析的两个基本方法，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定性分析是分析某一经济指标对经济活动作用的方向，例如，消费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作用的方向分为正性的，中性和负性的。有时分析经济指标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并不容易，因为经济学所要揭示的是作用的长期趋势，例如，收入增长，消费也应随之增长，因此存在着消费倾向问题，但有时收入增加，反而引起消费下降，这就不是定性分析的对象，因为不是经济本质联系，而是其他偶然因素造成的。定量分析是分析影响作用的大小。现代经济学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定性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它揭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揭示经济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定量经济学则是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使经济学的科学性进一步提高。

净出口与净进口（Net Export And Net Import）　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商品往往既有出口又有进口。如果该商品的出口数量大于进口数量，则为净出口。反之，如果该商品的进口数量大于出口数量，则为净进口。净出口与净进口反映一国在某种商品贸易上所处的地位。

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　一项投资的预期收益的折现值减去该项投资的预期成本的折现值的差额。设折现率为r，第一年的预期收益为R_1，预期成本为C_1，第二年的预期收益为R_2，预期成本为C_2，第几年的预期收益为R_n预期成本为C_n，则净现值NPV的公式为：

$$NPV=\left[\frac{R_1}{1+r}+\frac{R_2}{(1+r)^2}+\cdots+\frac{R_n}{(1+r)^n}\right]-\left[\frac{C_1}{1+r}+\frac{C_2}{(1+r)^2}+\cdots+\frac{C_t}{(1+r)^n}\right]$$

或者也可以写为：

$$NPV=\sum_{n=0}^{n=7}\frac{R_n-C_n}{(1+r)^n}$$

如果净现值是正的，该项投资就是有利的，反之，如果净现值是负的，该项投资就是不利的。这是在作出投资决策时所常采用的方法。

询盘（Inquiry）　又称为询价或探价。询盘是指当交易的一方希望出售或购买某项商品时，向交易的另一方询问买卖该项商品的各项交易条件。询盘并非单纯指询问货价，同时还会包括询问商品规格、品质、数量各方面的问题。询盘既可以以书面表示，也可以以口头表示。通常通过航空书信方式传递。

现汇贸易（Trade Cash Payment）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进口商以货币作为清偿工具，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出相应的贷款，完成国际结算，这就叫现汇贸易。这是一种“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古老的贸易方式。对贸易双方来说，这种贸易方式既简单，又安全，当代国际贸易绝大多数都属于现汇贸易。

现货交易（Cash Transaction）　指股票的出售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股票交付给购买者，一般这个交割期为五个营业日，而购买者在交割时必须以现款交付。采用现货交易方式的投资者一般是为了较长期的投资而不是为了投机，他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内能够获得较稳定的分红或利息收入。

现汇（Spot Exchange）　见“即期外汇交易”。

现状条件（tale quale）　卖方对所交货物只保证装船时品质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而对货物到达目

的地的品质状况不负责任，货物在到达目的地时，买方应按照到达时货物的现状情况接受货物。以现状条件买卖，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的损害由买方自身负责。

现汇交易（Spot Exchange Transaction） 见"即期外汇交易"。

现金股利（Cash Dividends） 是以现金作为股利支付给投资者。红股，则是股份公司再分配给股东的新股票。一个公司是以现金还是以股票作为股利支付给投资者，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主要的因素有企业的资金状况、建立时间的长短、收益的能力和稳定性、等等。通常的情况是，建立时间长的公司倾向于支付较多的现金股利，而较年轻的公司则倾向于支付少量的现金股利，把收益用来进行再投资，以求得进一步的发展。

现钞价（Bank Votes Rate） 即"外币钞票价"，见"外币钞票价"。

现代货币数量论（Modern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在1956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一文中所提出的一种新的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是影响经济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并不象早期货币数量论那样把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作为固定的，把货币流通速度作为不变的，研究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而是认为，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货币供给的是货币制度，即法律和货币当局（中央银行）的政策。所以，货币数量论首先是货币需求理论。现化货币数量论的货币需求函数是：

$$\frac{M}{P}=f(Y,w;r_m,r_b,r_e,\frac{1}{p}\cdot\frac{dp}{dt};u)$$

在上式中，M为个人财富持有者所保留的货币量，P为价格水平，M／P为货币需求（即实际余额需求）。Y为实际收入，W为非人力资本（财产）得到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例；r_m为预期的货币名义报酬率；r_b为预期的价值固定债券的名义报酬率，r_e为预期的股票名义报酬率；$\frac{1}{p}\frac{dp}{dt}$为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U为影响货币效用的其他非收入变量。货币需求函数说明了货币需求取决于多种因素，诸如财产总额，财产的构成（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比例），以及各种财产所得到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人们持有货币及其他形式资产时所预期的收益率及其他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但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各种形式资产总和的总财产。但总财产很难衡量，所以可以用总收入来代替总财产。这里所说的总收入不是持现期收入，而是指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一个人在相当长时期内从拥有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中经常能够获得的稳定的收入流量，大致相当于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平均量或正常收入。从长期来看，持久收入是稳定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强调了持久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计算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仅为0.15，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1.8。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所以货币需求也是稳的，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这个货币需求函数是对个人财产持有者而言的，但略作变动亦适用于企业和整个社会。弗里德曼证明了，在长期中，持久收入是稳定增长的，货币需求也是稳定增长的，货币流通速度在长期里缓慢下降的。这样，货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虽然不是一个常数，但与有关经济变量，特别是与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持久收入之间有着稳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必须从货币供给的变动来研究货币对产量与物价的影响，这样，弗里德曼就在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说明货币量决定产量与价格的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沿着剑桥方程式的传统来表述货币数量论，而且也吸收了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中关于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的观点。现代货币数量论是货币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与基础。

现金偏好理论（Cash Preference Thory） 一种货币需求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J.Tobin）在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的基础之上所提出来的。其结论仍然是货币需求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动，但对此所作的解释却不同于凯恩斯。凯恩期认为，由于投机性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动，其原因在于：财产持有者一般对未来利率的高低具有一个"安全水平"（safe level）的概念，如果现行利率高于预期的安全水平，则财富持有者认为未来的利率将朝着安全水平下跌，债券的价格将上升，于是他们便少持有货币，多买债券，以期从未来的债券涨价中获利，从而出于投机动机所需要的货币在利率高时就少。反之，如果现行利率低于预期的安全水平，则出于投机动机所需要的货币就多。这里强调了利率水平的预期。托宾认为，利率的安全水平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因为当经济均衡，从而现行的利率等于安全的水平时，就无法解释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了。托宾的现金偏好理论正是对货币需求与利率之间反方向变动关系的另一种解释。

托宾假设，财产只有两种形式：货币和债券。持

有货币无利息，但也没有风险，持有债券有利息，但也有风险。全部财产分为货币与债券，以 A_1 代表货币在财产中所占的比例，A_2 代表债券在财产中所占的比例，则有：

$A_1+A_2=1$，$0<A_1<1$，$0<A_2<1$

用 E 表示预期未来一年内财产总值的增值百分数，则有：

$E=A_2 \cdot i$ —— (1)

上式表示财产的增值是由债券所引起的，取决于利率 i。但持有债券亦有风险，即财产受损失的可能性，以 R 表示风险，则有：

$R=A_2 \cdot S$ —— (2)

上式中风险仍用百分数表示，S 是风险系数（$0<S<1$），由财产持有者主观上的估算断定，S 越大，则风险越大，S 越少，则风险越小。由于利息收入与风险的同时存在，则产持有者就要决定财产中货币与债券各占的比例，即 A_1 与 A_2 的大小，假设财产总值给财产持有者带来总效用为 u，财产所有者在决定 A_1 与 A_2 时目的是实现财产总效用的最大化。可以通过效用函数来确定这一点：

$$u=u(E, R) \quad \frac{\alpha U}{\alpha E}>0, \quad \frac{\alpha U}{\alpha R}<0$$

当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时，u 达到最大值：

$$d_u=(\alpha_u / \alpha E)dE+(\alpha_u / \alpha R)dR=0,$$

或者

$$\frac{dE}{dR}=-\frac{\alpha_u / \alpha_R}{\alpha_u / \alpha E} \quad \text{——(3)}$$

从（1）式和（2）式得出：

$$E=\frac{i}{s} \cdot R$$

$$\frac{dE}{dR}=\frac{i}{s} \quad \text{——(4)}$$

代入（3）式得出：

$$\frac{i}{s}=-\frac{\alpha u / \alpha R}{\alpha u / \alpha E} \quad \text{——(5)}$$

（5）式是财产持有者可以得到最大预期效用的必要条件。为了进一步说明效用最大化时 A_1 与 A_2 与利率的关系，托宾假设预期的财富增值 E 所带来的效用 u（E）用一个二次方程式来表示：

$$u(E=(1+b)E+bE^2$$

当利率之发生变动时，uE 最大值的条件是：

$$\frac{dA_2}{di}=\frac{A_2}{i}\left(\frac{s^2-i^2}{s^2+i^2}\right)$$

如前所述，$0<S1$，即 S 最高可达 100%，而利率 i 一般是远远小于 100%的。只要 $i<S$，则上式 $\frac{dA_2}{i}$ 为正数；即债券的比例 A_2 与利率同方向变动，又因为 A_2 与 A_1 反方向变动（债券的比例增加即货币的比例减少，反之，亦反之），所以 A_1 与利率反方向变动，即货币需求与利率反方向变动。

托宾进一步解释了利率变化与货币需求变化成反方向的原因。利率提高，表示预期的财富增值将增加，这将鼓励财产所有者冒更大的风险，即多持有债券而少持有货币，这是利率提高的“替代效应”。利率下降则是用货币替代债券的“替代效应”，但利率的变化还会引起“收入效应”，即利率提高意味着财产持有者收入增加，这会使他既多持有货币又多持有债券，反之，利率下降，“收入效应”就是使财产所有者少持有货币与债券。这样，收入效应使货币需求与利率同方向变动，而替代效应使货币需求与利率反方向变动。一般而言，对货币需求而言是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所以，货币需求与利率反方向变动，托宾从风险的角度论述了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这一理论是对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重大发展，在当代货币理论中有深远的影响。

现金流量贴现分析（Discounted Cash flow Analysis） 一种根据把成本与收益贴现为现值的思想来评估投资计划的方法。由于利率或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现金流量的值一般小于现值。这样，只有根据利率或通货膨胀率对现在成本与收益现值进行贴现，才能得出准确的净收益率，并用以评估某项投资计划，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而不进行贴现分析则会作出错误的评估与决策，可用下表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现期贴现值
成本或收益	−100	+50	+80	
一元的现值	1	1/1.5 =0.87	$(1/1.15)^2$ =0.756	
成本或收益的现值	−100	50×0.87 =43.5	80×0.756 =60.48	−100+43.5 +60.48=3.98

（单位：100 万元负号表示成本，正号表示收益）。

上表的例子中假设第 1 年投资 100 万元，第 2 年与第 3 年收益为分别为 50 万元和 80 万元，利率为 15%。如不根据利率进行贴现，这 100 万元的投资在第 2 年和第 3 年可以得到收益共 130 万元，减去成本 100 万元，纯收益 30 万元，净收益率为 30%。但如果根据 15%的利率把第 2 年与第 3 年的未来收益贴现为现值。则第 2 年和第 3 年的收益分别为 43.5 万元和 60.48 万元，共计 103.98 万元，减去 100 万元成本，净收益仅为 3.98 万元，净收益率为

3.98%。，由此看出，如果不对未来的收益进行贴现就会高估投资的净收益率，从而作出错误的投资计划评估与决策。这种评估投资计划的方法在经济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然。在实际应用中具体的计算方法要复杂得多，贴现的标准也不是一个，但这一原理是普遍适用的。

现代农业（Modem Agriculture） 经济发达国家以现代的科学技术、生产资料和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社会化农业。现代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全面发展相联系，广泛应用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生产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对人工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获得最高产量为生产活动的目的，实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大幅度提高。其主要特征是：在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植物保护等各个生产环节上，形成和推广了一整套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术；形成了现代农业机器体系并广泛用于生产；开始将电子、原子能、激光、遥感技术以及人造卫星等现代科技成果运用于农业生产，逐步形成了良好的高效能的生态系统；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扩大了企业规模；实现了生产分工、专业化、以及农工商一体化；管理方法显著改进，并将经济数学方法、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技手段越来越广泛地用于企业管理。现代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把传统的、维持生存的农业纳入了大工业发展的轨道，使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货（Spots） 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我们可以按其交割的时间、地点、方式（是否交货付款）把它们分为现货和期货。所谓现货就是在市场上供现时现地出售的商品，一般是交货付款。而期货则是现在成交，远期交货的票据。商品经济的早期阶段，市场交易主要是现货交易，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风险日益增大，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期货交易量越来越大，期货交易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经济理论分析的主要对象是现货交易，通常所说的市场交易中的商品就是指现货。对于期货交易应遵循什么样的市场法则，经济学的研究还只能说仅是个开头。但对现货交易的研究则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就绝大部分现货来说，其供给数量会随着市场价格的升高而增加，随市场价格的下降而减少，而需求数量正好有相反的情形，供需相等点即为市场均衡点。只要价格是有充分弹性，市场总是可以出清。这是在经济学中已早已为人熟知的原理。但一旦考虑到期货交易、则要作为一番更为复杂的表述。对现货的分析可以不考虑时间和预期的因素，而期货则不然。总之，现货在概念上是相对于期货而言的，即是在市场上随时可以交货付款的商品。而期货则是一个远期交货字据。

现货与期货市场。（Spot And Forward Market） 所谓现货市场最通俗的说法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市场。即为出售商品，收取现金并马上交货的市场。现货市场又称作现金市场或有形市场。它由拥有现货并准备马上交割的卖者和有现金并想立即得到商品的买者组成。现货市场上的交割时间和地点都是确定的，即是此时此地。现货市场主要分两个等级，初级市场即地方市场和中央市场。地方市场是在各个斗一地区发展起来的，一般集中在各地方的运输集汇点上，商品从这里运入规模很大的中央市场，在中央市场上，交易基本上都是由商人进行，他们在生产者和需要它们产品的制造者之间充当中间人，承担交易风险，并从中获利。当然在地方市场和中央市场上也有直接进行交割的。期货市场是相对于现货市场而言的。如果说现货市场是"现货、现款、现时、现地"交割的，期货市场则正与此相反。它是指买卖商品或外汇的远期交货合同的一种市场，是一种并无实际商品进行交易的市场，即商品本身并不需要带到期货市场上，而进行交易的只是通常称之为期货的远期交货字据，某种商品的期货市场常常同一个有组织的商品交易所合在一起，由这个商品交易所提供一个可以从事期货买卖的持续的和稳定的市场。期货市场的基本作用在于避免商品从生产到最后利用这段时间可能发生的不利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损失。这种保险职能是通过套头交易（hedging）即在期货市场上采取与现货市场相反的立场来实现的。一个商品市场如果不同期货市场相结合，通常便不会有足够的愿意冒险的商人及足够数量的投机资本来很好地执行这种套期保值的职能。并且一个稳定而灵活的期货市场的持续存在，还从形式上大大便利了人们获得购买商品所需要的资金。

现值（Plesent Value） 现值是指一笔资本或金融资产预期在未来取得的收益按照某种贴现率折合为现值。资本品（或金融资产）未来收益的现值是进行购买资本品（或金融资产）决策时的重要参数。一个人购买一笔资本或一种金融资产所支付的价格不能低于这笔资本或金融资产预期未来收益的现值。在无不确定性存在的情况下，资金或金融资产的价格应该与其在未来产生的收益的贴现值相等。用来将某一时期未来收益贴现为现值的贴现因子 B，由同一时期的利率决定。在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下，如果没有不确定因素存在，那么在均衡时，一笔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率应该等于利息率，否则将存在套利行为，而这与完善

的资本市场的假设以及均衡的条件相矛盾。对于贴现率的数学表达式可以推导如下：在存在确定性的情况下，先假定一笔资本品或金融资产只延续一个时期（t 到 t+1）t 到 t+1 期市场利率为 r_t，P_t 为除去红利后的资本品或资产的价格，d_t 为红利，根据上述讨论，必然存在下述关系：

$$r_t = \frac{d_{t+1} + p_{t+1}}{p_t - 1} \qquad (1)$$

（1）式的右端为资本（或资产）收益率。由（1）式可以解出资本（或资产）价格 P_t。

$$P = \frac{d_{t+1} + P_{t+1}}{1 + r_t} \qquad (2)$$

用 t+1 代替（2）式的 t，得 p_{t+1} 的表达式

$$P_{t+1} = \frac{d_{t+2} + P_{t+2}}{1 + r_{t+1}} \qquad (3)$$

用 t+2 代替（3）式中的 t+1 得到 P_{t+2} 的表达式。这样不断替代下去，得到包括几个时期资本（或资产）收益的贴现值。

$$P_t = \frac{\sum_{i=1}^{n} d_{t+i}}{\pi_{j=0}^{n-1} (1 - r_{t+j})} + \frac{P_{t+n}}{\pi_{j=0}^{n-1} (1 + r_{t+j})} \qquad (4)$$

（4）式为现值的表达式。Pt+n 是第 n 期资本品（或资产）的残存值。当 n 趋向无穷大时，（4）式最右端项为零。如果再假定各期利率相等，等于常数 δ 即 $r_t = \delta$，则现值的表达式为

$$P_t = \sum_{i=1}^{\infty} \frac{d_{t+2}}{(1 + \delta)^2} \qquad (5)$$

若 d+1 是一常数 d，则现值关系表示为

$$P_t = \frac{d}{\delta} \qquad (6)$$

若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则现值表示为

$$P_t = \sum_{i=1}^{\infty} \frac{E_t(d_t + i)}{(1 + P_t)^2} \qquad (7)$$

$E_t(d_t + i)$为资本品（或资产）在第七期收益的期望值。Pt 为不同于利率的贴现因子。

现值关系式可以用于投资方案的决策，任何一项投资方案，只要其现值是正的值，该项投资方案都是可取的。

注入（Injections） 在国民收入流量的收入支出循环中，从流通之外而来用于现期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支出的任何收入。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厂商的投资、政府的支出，以及向国外的出口都属于注入。根据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注入增加了现期支出，从而增加了总需求，对国民收入具有扩张作用。这种扩张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乘数的大小。

转运（Transhipment） 转运是指货物在运输途中无法直接抵达目的地，而需改用其它运输工具再行运往目的地。如果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仅需要改变运输工具，而且需要改变运输方式，如将海洋运输转为铁路运输，则此种运输方式又称为联运。在海洋运输中，若货物的运输需要改变运输船舶，则此种转运称为转船。

由于货物转运增加了运输时间和运输损耗，进口商只是货物不得不转运的情况下才会接受转运。货物是否转运，必须在买卖合同中予以明确表示，若承运人擅自允许货物转运，其后果由承运人自行负责。

转让定价（Transfer Pricing） 指联属企业之间在相互交易过程中人为确定的价格，而不是按独立竞争原则（arm's length Principle）形成的正常市场价格。通过这一人为确定的价格，联属企业可以将利润进行有利于整个跨国联属企业集团的转移。一般而言，这种转移是通过人为抬高低税国或无税国联属企业向高税国联属企业转移项目的价格，以及人为压低高税国联属企业向低税国联属企业转移项目的价格而实现的，这些可资转移的项目包括货物销售、贷款取得、服务和租赁的提供以及无形资产的转让等等（参见"课税客体流动避税）。通过这种人为的定价使大部分利润转移到低税国，而费用则大部分转移到高税国，从而达到减轻纳税义务的目的。

由于这种转移定价伴随着可税所得的大量流失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反对，并针对性地采取了相应的防范和矫正措施，主要是规定联属企业之间的交易也必须遵循独立竞争原则来确定正常市场价格，并且还进一步具体设计了计算这一正常市场价格的种种标准和方法，主要包括市场标准、比照市场标准、组成市场标准、成本标准等等。

显然，这些标准虽然具体但也难于完全达到形成正常市场价格的要求。原因主要在于不少情况下可能并不存在可比的市场交易数据，也可能存在不止一个市场价格，还有可能存在许多特殊情况。所有这些都使得一个绝对的"正常市场价格"难以找到。另外，即使可以找到，也不可能对数以万计的跨国联属企业的每一笔交易都逐一审核，所有这些都为通过转让定价进行国际避税留下了不小的活动空间。当然，这一空间已大大减小了，而且在限制转移价格作用的发挥方面还有许多因素值得一提。

从跨国联属企业外部来说，如果各国有关税收法规没有差异或相差不大，则转移定价不起作用或作用极小；而如果各国有关税收规定差异很大，那么实行转让定价可能会因其中一国采取调整到正常交易价格

的措施而另一国并不给予相应的补偿性调整而陷入国际双重课税的重负之中。

从跨国联属企业集团内部来说，一般认为，也需要考虑个别联属企业的特殊利益，包括其管理人员和股东的利益，也包括要维护该联属企业长远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外部形象和内部士气等等。因此，人为确定转让定价索取了公司利润的做法并不总是明智的。

转口贸易（Entrepot Trade）　在间接贸易中，商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并不直接开展交易活动，而是分别同第三国打交道，通过第三国转手最终使商品从生产国流向第三国。对于第三国来说，这种贸易就是转口贸易。对于开展转口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它分别同生产国和消费国开展商品买卖，分别扮演买者和卖者的角色。贸易商品有时候需从生产国运到转口国的自由港或海关仓库，然后再转运消费国，有时候则直接从生产国运往消费国。转口贸易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某些国家拥有特别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贸易传统，适合于成为货物买卖和中转的中心，通过开展转口贸易获得大量的转口利润。目前世界上有名的转口贸易中心有新加破、香港、鹿特丹等等。

转移收入（Transfer Income）　不是由于提供了生产要素的劳务而获得的收入，即不是作为生产要素提供的劳务的报酬的收入，从而也就是一种不能计人国民收入的收入。属于这种收入的有：政府的各种转移支付、养老金、和人赠予等。

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　政府给予个人的、不以换取产品与劳务为目的的支出，属于政府支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给予失业者的失业救济金、给予贫困者的各种福利补助，以及其他赠予或养老金、医疗补助这类社会保险支出。转移支付在政府支出中占有一个日益增长的比例。它既是进行收人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福利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政府调节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工具之一。在各种福利支出标准不变时，转移支付可以作为自动稳定器而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当改变福利支出时，它又可以刺激或抑制消费，从而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

转让（Assignment）　指某人或某公司以让与证书的形式将其财产或权利转让给另一人或另一家公司。这一术语通常专门用于指以下两种转让，即合同的转让和为债权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转让。要求用货币支付的合同可以在未与付款人协商或征得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进行转让。为债权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转让是一种清偿债务的方法，即债务人将其财产转让给一位受托人，由他来管理和清算这笔财产，以便用尽可能好的方式清偿债务人的债务。这种方法现已废而不用了，因为美国联邦破产法把这种转让看作是一种破产行为，任何不同意这种转让的债权人，都可以通过提出破产诉讼而使其无效。

转让问题（Transfer Problem）　转让问题的提出起因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德国作为战败国向战胜国赔款问题。在讨论德国的支付能力时，基本上是以国际价格水平固定为基础，并且假定各国政府通过购买国内外贸易商品自动改变着价格水平。由此，1929年，凯恩斯（J.Keynes）提出了所谓的"转让问题"。凯恩斯认为要求一个国家以不变的购买力水平向它国转让，在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时，会使购买力水平下降，使这个国家背上又一个包。而且这个负担会大得使进行转让的国家其贸易品的价值低于所需转让的数量。进一步，俄林认为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也会发生，这给进行转让的国家带来利益。

1932年，庇古又用国际贸易2×2模型来说明转让问题。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按照瓦尔拉定律（Walras'Law)、只需考虑两市场中的一个，设分析本国的出口品，以X表示。在X商品市场上，X的供给少于需求则有：

$$s + s^{*} = D(y,p) + D^{*}(y^{*},p)$$

式中S与S^*分别代表x商品的国内、国外供给量，D与D^*分别代表X商品的国内、国外需求量，其中需求量是实际收入Y与相对价格P的函数。现假定某一购买力T由本国转让到外国，这使得本国对X商品的需求下降，而外国对X商品的需求上升，数量分别为$D_Y T$和$D^*_{y^*}$·T，其中D_Y和$D^*_{y^*}$分别为本国和外国对X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使X商品市场在原来的价格水平下达到均衡，须使得$(D_y + D^*_{y^*})T = T$，也就是需要$D_y + D^*_{y^*} = 1$，如果出现$D_y + D^*_{y^*} < 1$，对X商品来说，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过小，就无法在原来的相对价格水平下产生所需剩余来出清X商品市场，这就会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形成凯恩斯提出的又一负担问题。而反之，如果$D_y + D^*_{y^*} > 1$，又会产生转让国家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

对于转让问题，许多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如米德（J. Meade）、约翰逊（Tohoson）、萨缪尔森（P.Samuelson）等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而且也将转让问题应用于其它问题的讨论，如石油价格上涨问题、外债问题等。

转让定价（Transfer Pricing）　转让定价是指大公司内部的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交易时所采用的订价方法，在这时，商品价格不由市场因素决定，而是使用公司内部会计价格，以便使公司的内部市场有效地出清。对于转让定价问题，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这些子公司之间通过转让定价，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表明其收益，从而将所应交纳的税款减小到最低限度，也可以将税前利润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使总公司的税后利润最大化。这的确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和政府的收入。事实上，跨国公司内部的转让价格与纳税、审计时的价格并不需一致，而且在有利可图并简便易行时，两者的差距是很大的。对公司来说，按照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订价系统几乎没有什么内部限制条件。这使得转让定价方法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工业国的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也大量使用了转让定价方法。

在不同国家通过转让订价方法改变收益水平的动机是不同的，在发达国家主要出于税率和关税不同的考虑，而在发展中国家，限制特权和股息，汇率不稳定，工会力量等则更是重要因素。

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来说，在跨国公司内部实行转移定价是使其效率最大化的一种方法，任何对其管理的企图都会造成效率降低和资源分配不当，而刺激利润在国家之间转移，形成实际转移价格偏离最优价格。从而，最优的政策就是让跨国公司自由制定最有效率的转让价格。古典经济学也认为，政策歪曲降低了经济福利，转让定价方法实际上使得跨国公司绕开了政府干予而减少了福利损失。但是，采用多种计账方式打断了影子价格与申报的价格之间的联系，也就很难弄清楚跨国公司是否将边际成本作为其转移价格，从而使效率最大化。

转折点（Turning Point）　经济周期中经济活动的方向发生转折的一点。每一个经济周期有两个显著的转折点。一个是经济扩张停止时的上转折点。这时经济达到本周期内繁荣的最高水平，开始向衰退转折。上转折点的标志是产量和就业人数达到最高水平，股票和商品价格开始下跌，存货高于正常水平，企业界的乐观情绪正在变为悲观。这种上转折点又称"顶峰"（peak），或向下转折点。另一个是经济收缩停止时的下转折点。这时经济退到本周期内萧条的最低水平，开始向复苏转折。下转折点的标志是产量和就业人数达到最低水平，股票和商品价格开始回升，存货低于正常水平，企业界的悲观情绪正在变为乐观。这种下转折点又称"谷底"（reough），或向上转折点。转折点一般持续1—2个月的时间，所以，有时也把转折点称为"转折带"。（turning zone）。

拉美里约集团（Rio Group of Latin America）
拉美里约集团于1986年12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成立，最初有8个成员国，即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秘鲁、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因此该组织始称拉美八国集团。1990年10月，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成了该组织的成员国。

拉美里约集团的宗旨是协调各成员国的内外政策，推动拉美经济的一体化，力求通过加强南北对话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从1987年起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首脑会议，就本地区和世界局势展开讨论并制定对策。1990年10月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召开的首脑会议发表了《加拉加斯声明》以及《最后文件》和关于反毒品斗争的联合公报，这些文件将有助于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某些共同问题。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Association）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成立于1981年3月，它是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共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乌拉圭、巴拉圭、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11个成员国，总部设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它的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的协调、稳定的发展，加强与其他拉美国家和一体化组织的联系与合作，不断向拉丁美洲共同市场的最终目标迈进。部长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它负责作出主要决策，不过这些决策只能在全体成员国代表出席的会议上才能作出。该组织的其他机构还有作为协调和决策机构的估价与协调会议、作为常设机构的代表委员会以及负责日常事宜的秘书处。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成立以来在减少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障碍，发展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此外，它还加强了与包括其他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内的许多国际经济组织的联系，这对于这些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发展经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Latin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是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合作与协调的常设机构，它成立于1975年10月，总部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目前共有20多个成员国。它的宗旨是协商制定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优先照顾本地区较不发达小国的利益并在特别情况下向成员国提供援助，推动拉丁美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拉丁美洲理事会是该组织的

最高权力机构，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一名全权代表组成，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它负责制订该组织的总体行动方针并协调各成员国对第三国的立场。常设秘书处作为技术行政机构负责执行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草拟预算，并为各种会议提供服务，行动委员会作为一种特别的组织形式负责具体项目和特别计划的调研、制订和协调。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成立以来，在提高该地区的集体谈判能力、维护该地区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利益、协调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利于推动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拉尼斯——费模型（Ranis—Fei Model）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Fei）是刘易斯两部门发展模式的继承者。刘易斯模式只描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略了工业扩张过程中农业部门的发展。拉尼斯和费景汉于1961年发表题为《经济发展理论》的论文，在刘易斯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发展中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问题，两部门平衡增长问题，人口增长对劳动力转移条件的影响问题等，大大推进了刘易斯的两部门分析。拉尼斯—费模型的基本结构如图所示。

图（a）即刘易斯模式，横轴OW为工业劳动力，纵轴OD为工资，DF为工业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由于投资增加会提高边际生产率，边际生产率曲线随资本增加会不断向右移动。劳动供给曲线SS'分为水平的SP'与向上弯曲的P'S'两部分，P'为转折点。在工业就业达到D'以前，表示不必提高工资就可扩大就业的劳动无限供给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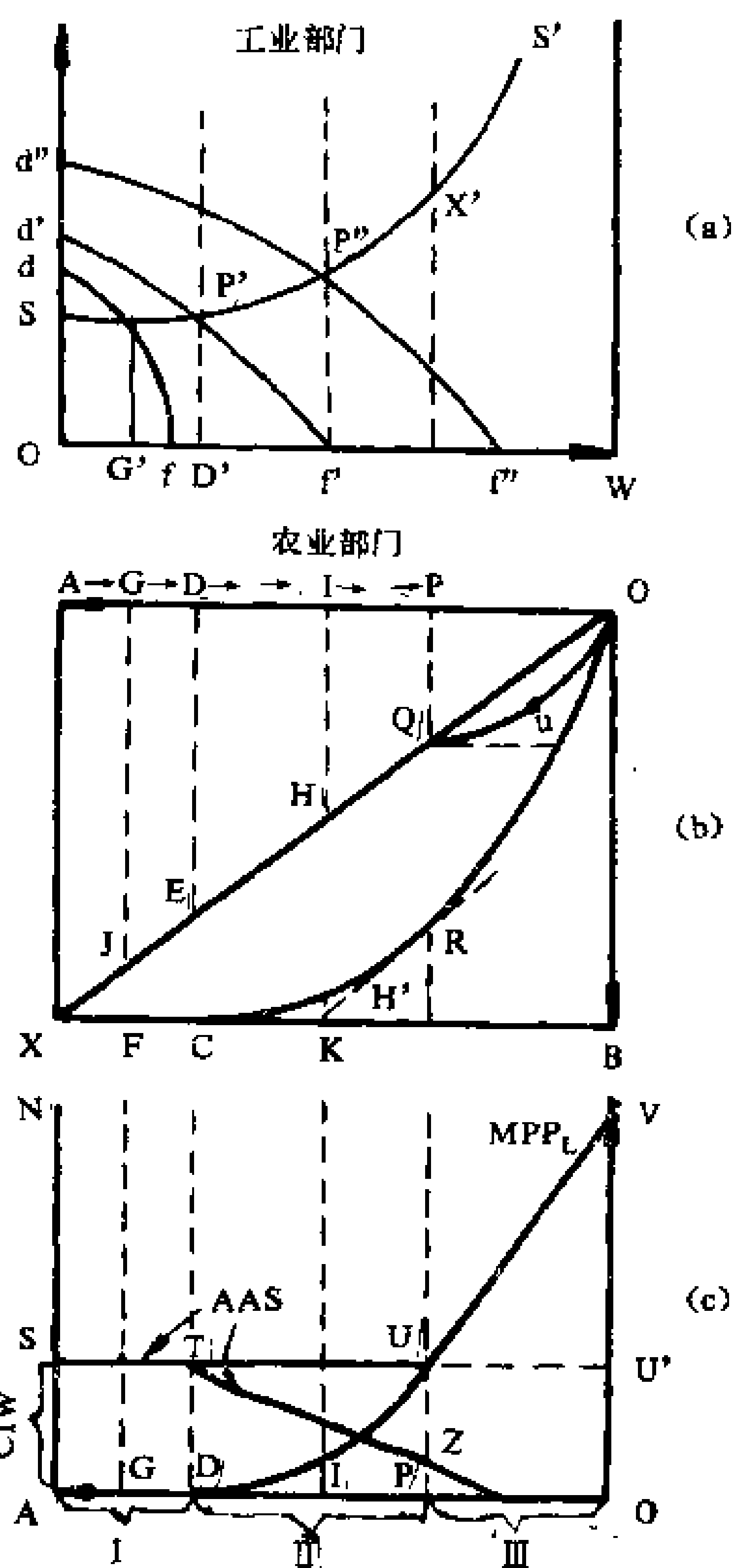
图（b）和图（c）表示农业部门。

图（b）中，原点位于右上角。横轴OA从右向左度量农业劳动，纵轴OB从上至下度量农业总产出，ORCX曲线代表农业部门总物质生产率或总产出曲线。这条曲线上凹的ORC部分表示随农业劳动力的增加，边际生产率递减；水平的XC部分表示劳动边际产品为O。从（b）图中可看出，AD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是多余劳动力。

假设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总人口为OA，假设初期没有工业部门，全部人口都在农业就业，并假设全部农产品都由农业人口消费。这样，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等于AX／OA，即OX线的斜率。在存在农业剩余劳动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由习惯、道德等制度因素决定的，只够维持生存水平，叫做“不变制度工资”。

总产品曲线上总有一点R，其切线与OX平行，在这一点上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不变制度工资，在这一点以后的农业劳动力AP是伪装的失业者。这又分为两部分，其中AD部分是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而DP部分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且小于制度工资的。拉尼斯与费景汉认为剩余劳动是一个技术现象，决定于生产函数，而伪装失业是一个经济概念，决定于工资水平。

图（c）原点在右下方，横轴OA从右至左度量农业劳动，纵轴AN从下至上度量农业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VUDA曲线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图（b）中的总生产率曲线一致。图（c）中，SU'为不变制度工资线，它与横轴的距离等于图（b）中OX的斜率，即农业平均产品。



拉尼斯和费景汉用图（c）表示农业劳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转移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即AD部分，这时农业边际生产率不发生变化，农业工资仍为不变制度工资。第二阶段转移DP部分，即伪装的失业部分。这时农业部门随劳动力转移而使边际生产率上升，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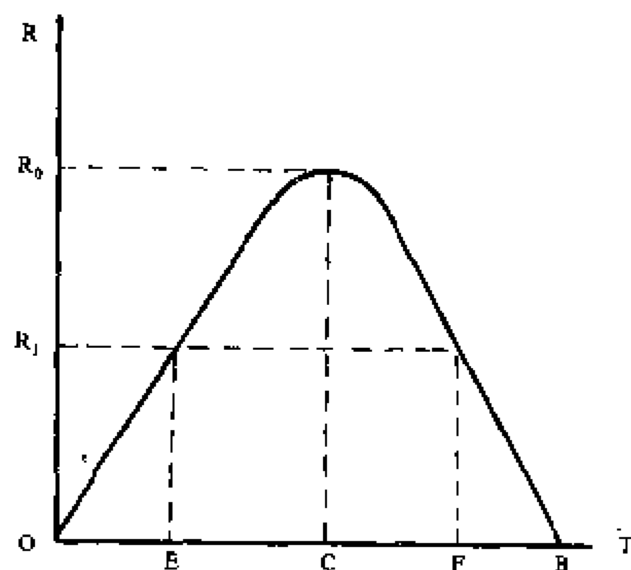
P点，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到等于制度工资(VUDA曲线与SU线相交于U点)。这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农业部门工资仍保持在制度工资水平，仍不提高。而在P点之后，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三阶段，此后，农业劳动力转入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上升将使农业工资超过不变制度工资水平。这意味着，进入第三阶段之后，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了，工资水平已不再由制度决定，而由市场力量决定。这样，图(c)中的SUV曲线就成了农业劳动对工业部门的供给价格曲线，它表明每一工资水平从农业部门可以释放的劳动数量。

拉尼斯——费模式中还定义了总农业剩余和平均农业剩余概念。随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农业总产品因农业人口的减少而出现剩余，就是总农业剩余。总农业剩余除以转移的农业人口总数就是平均农业剩余。拉尼斯——费模式中说明了平均农业剩余在转移过程中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进而影响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和劳动力转移速度。图(c)中曲线STO是平均农业剩余曲线。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减少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品，因此平均农业剩余等于制度工资，表现为平均农业剩余曲线同不变制度工资曲线在ST段重合。而到第二阶段，由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劳动力转出农业将使平均农业剩余减少，图(c)中表示为平均农业剩余曲线STO从T点起开始位于不变工资曲线SU之下。拉尼斯和费景汉将图(c)中的D点称为短缺点。到劳动转移的第三阶段，农民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已开始高于不变制度工资，平均农业剩余将下降的更快。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图(c)中的P点称为商业化点，这是第三阶段的起点。

这一有关平均农业剩余变化的分析表明，从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起，农业总产出将会减少，引起粮价和工业工资上涨，因此会影响工业扩张。这一分析的意义在于指出，在经济发展第二阶段起，就必须在工业扩张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发展，否则会在伪装失业消除之前就限制工业扩张。

以上是拉尼斯——费模式的基本结构。其中最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对刘易斯模式中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的问题作了纠正。此外，拉尼斯——费模式在进一步分析中涉及了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问题和人口增长问题。刘易斯把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问题包含在资本积累之中，但实际中有些技术进步在增加资本同时也需增加劳动，甚至有些技术进步只需增加劳动，不需增加资本。拉尼斯和费景汉把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看作是提高生产率的两个途径，强调了技术进步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由于刘易斯认为利润都归于资本家，因此在分析人口流动时认为人口增长赶不上资本积累的增长。拉尼斯和费景汉则指出经济发展中人口增长可能快于工业劳动力的增长，并提出工业扩张必须有一个“临界最少努力”，以保证工业发展快于人口增长。以上几方面内容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对刘易斯两部门发展模式的重要发展。

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说明政府税收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曲线，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A·拉弗（A.Laffer）提出，故名。可以用附图来说明拉弗曲线的含义。图中横轴OT代表税率，纵轴OR代表由收入与税率共同决定的税收。向上凸出的OB即为拉弗曲线。原点O表示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也为零，B点表示当税率为100%时，税收也为零。因为这时人们要把全部收入用来纳税，则无人再愿意工作或投资，从而政府税也为零。拉弗曲线即是以这两个极端为极限，税率为OC时开始转折的一条曲线。随着税率从零开始逐渐提高，政府税收逐渐增加，当税率提高至C点时，政府税收达到最大（OR_0），这时拉弗曲线是上升的。这一阶段税率的提高会增加政府税收，而不会对产生与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税率再提高，由于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生产与投资的积极性，收入减少，政府的税收也减少了。这时拉弗曲线是下降的。这一阶段税率的提高会对生产与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政府税收减少。C点时为最优税率，大于C点的税率会使收入与税收减少，是税率禁区。经济学家就应该确定最优税率C点应该是多少。从拉弗曲线中还可以看出，同样的税收可以通过一个低税率和一个高税率来征得。图中的税收OR_1，就可以通过低税率E点和高税率F点征得。但通过低税率征得时有利于人们生产和投资的积极



性，使国民收入增加，而通过高税率征得时却压抑了人们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使国民收入减少。所以，通过低税率来刺激生产与投资，在国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税收是有利的，而靠高税率来增加税收

是不明智的，因为高税率所引起的生产与投资减少，最终会不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拉弗认为，当时美国的税率已进入税率禁区，对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所以，应该进行大幅度减税。拉弗曲线正是供给学派和里根政府减税政策的理论依据。

拉斯佩耶斯价格指数（Laspeyres Price Index） 拉斯佩耶斯价格指数 L 是用相对于基期价格 P^0 的现期价格 P' 来测度其购买数量的成本的一种指数，它表示为

$$L=\frac{\sum p' q^0}{\sum p^0 q^0}$$

其中 P 为价格，Q 为数量，上标“1”与“0”分别表示现期与基期，$\sum$ 为求和号，通过将拉斯佩耶斯指数与支出指数 E 比较，可以判断从基期到现期消费者生活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了。

拉姆西价格（Ramsey Price） 简单地说，拉姆西价格是指个人供给者或一组供给者的总的利润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价格。特别地，因为厂商的活动存在规模经济，如果要按照边际成本来制定产品价格就会发生损失，厂商的拉姆西价格就是：在厂商的利润不能为负这样一个财政可行条件要求下的帕累托最优价格。同样拉姆西价格也可以以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的条件中得出。这一思想由弗兰克.拉姆西（Frank Ramsey）提出，并由庇古（A.C Pigou）萨缪尔森（P.Samuelson）的发现和发展，但直到 70 年代以后，拉姆西价格才真正在理论界和实业界确立了它的地位。拉姆西价格是运用纯粹经济理论方法对一个实际经济中非常困难的问题得出一个可行解。它早于次优理论的正式诞生，但与现代次优理论的讨论同样的确切。它从一个很简单的假设出发，即帕累托最优条件所要求的价格需是它诱使出的产出和购买数量既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在不伤及他人时的效用增加，也不可能使它减少。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在次优理论中，同样对帕累托最优条件有更进一步的限制。拉姆西价格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出来。假定生产者提供几种商品，那么在利润非常条件的限制下的帕累托最优要求这些商品的价格满足：

$$\frac{p_j-mc_j}{p_n-mc_n}=\frac{mr_j-mc_j}{mr_n-mc_n}\quad(j=1,2,\cdots n-1)$$

$$\sum_{j=1}^{n}P_jY_j=c(Y_1\cdots Y_n)+K \tag{1}$$

其中 mc、mr 分列为产出 j 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c（$Y_1\cdots Y_n$）为供给者的总成本函数，y_i 为 j 商品的供给量，k 被视为不变值。在特殊的情况下，即供给者的商品中没有任何一个既是其他商品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上述关系就变成以下特殊形式，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反弹性公式

$$\frac{(P_j-mc_j)/P_j}{(P_n-mc_n)/P_n}=\frac{E_n}{E_j}\quad(j=1,2,\cdots n-1)$$

$$\sum_{j=1}^{n}P_jY_j=c(Y_1Y_2\cdots Y_n)+K \tag{2}$$

E_i 是 j 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此种情况下的最优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要求，这时按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确定产品价格正好使利润为零，条件（1）和条件（2）就成为边际成本定价条件，即

$$P_j=mc_i\quad(j=1,\cdots n)$$

与帕累托最优条件一致。很容易证明，在利润条件限制下，除非满足条件（1），任何一个价格都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反过来，条件（1）与受限制的帕累托最优价格条件一致。为什么受利润条件限制的帕累托最优价格必须满足条件（1）和条件（2）？$P_i=mc_i$ 是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但规模报酬在 $P_i=mc_i$ 时购买向量上不是不变的，那么 $\sum P_iY_i=(Y_1\cdots\cdots Y_n)$ 的条件就被这些边际成本价格违背，结果价格就以满足利润要求的方式与边际成本出现偏差，每一种这样的偏差都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以至生产量，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边际成本定价时的最优数量。当 Pi 与 mci 在利润条件限制下出现偏离时，为使消费者购买量与最优水平出现尽可能小的扭曲，最终就得出条件（1）和条件（2）。

拉姆西模型（Ramsey Model） 拉姆西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由拉姆西在他的一篇题为《储蓄的数理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拉姆西从一国应把多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储蓄的问题入手，得出一个非常有名的简单法则，这就是为后人所总结的凯恩斯—拉姆西法则。此法则说明由消费的边际效用乘以储蓄率应永远等于效用净享用率（total net rate of enjoyment of utility）低于最大可能享用率的差额。拉姆西这种分析的中心思想成为后来关于均衡经济增长分析的一个模型。他假想的一种商品的世界，劳动与资本存量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产品来，部分用于消费、剩余部分用于储蓄，从而增加资本存量。他的目标或者说标准就是从整个时期考虑获得最高限度的享受水平。这里，效用就是消费的效用。用 U（c）表示，工作的效用损失为 V（L）。拉姆西还提出三个假定：不考虑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和效用折现(discount)，进一步假定存在一个最大可获取的享用率，用 B 表示，由于没有人口增长，未来效用并不折值，那么足够多的

储蓄就会使人达到最大可获得的享用率，或无限接近这种境地。最大可享用率（拉姆西又叫幸福境地bliss)与实际享受程度的差在无限的时间数轴上达到最小，即

$$\min\int_0^{\infty}(B-[U(c)-V(L)])\,dt\cdots\cdots(1)$$

限制条件：$\frac{dk}{dt}+c=f(k\ L)\cdots\cdots(2)$

其中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

拉姆西从经济学和数学两个途径来解释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上他首先通过使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产品与消费的边际负效用之和，然后使现在消费一单位产品的效用等于紧接着下一时期消费一单位产品的效用，这个关系表明，消费的边际效用一定会降到利息率水平，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frac{\partial F}{\partial K}$。拉姆西从这个法则出发得出，均衡储蓄率会大大高于人们正常所能想象的水平，并指出最优储蓄率为收入的60%。拉姆西用动态均衡技术分析时际间的福利最大化，从而研究储蓄率水平问题，他的结论很明确，储蓄率应明显处于较高的水平。并且还作了拓展，认为个人在对不变要素价格时的储蓄率的选择是希望在他一生中使自己的消费模式达到最优。

拉姆赛，乔治（Georgr Ramsay，1800—1871）　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之一。出生于苏格兰的班夫，1826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主要著作是《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拉姆赛的经济学说旨在补充和发展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实际上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提出了新的理解。他把社会划分为工人、雇主、资本家和地主四个阶级，认为它们由于各自在生产中作出贡献而分享生产的成果，因此，分配问题就是决定它们各自应得多大的份额，即如何将国民产品分割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四部分。他强调，雇主在生产和分配中起着主导作用，与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不同，直接从事着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这个思想为以后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从生产过程来界说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前者是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即除了垫付工资之外的一切用于生产的资本，而后者仅由工资所组成。这就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实际区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并确切地规定了它们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姆赛进一步看到资本家总是用较少的物化劳动向工人换取较多的活劳动，从而接近于正确理解剩余价值。这是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他同情工人阶级，具体考察了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认为利润的迅速增长必然损害工人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他又独特地把总收入分为必要收入和净收入，认为地租和利息是那种对维护社会财富毫无必要的"净收入"，从而直接将借贷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多余的形式。但是，拉姆赛的分配理论仍然有着错误和缺陷，如把资本视作利润的次要源泉等，而且缺乏正确的价值论基础。由于其经济理论同当时流行的庸俗学说大相径庭，起不了替剥削阶级辩护的作用，因而拉姆赛及其理论学说长期被贬抑和湮没。

拥挤（Congestion）　如果产权没有明确界定，或者交易和契约行为被排斥，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就会出现拥挤。可以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如果只有一台最大载客量10人的电梯，现在有15人需要搭乘，那么其中至少5人要承受等待下一次搭乘的成本。现代社会并没有关于第一次搭乘权利的内在授权制度，然而社会行为有时承认某种根据便利或地位来授权的规则，如老年人、残疾人、首长或女士优先。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样的规则本来会相当复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大多数社会都认同简单的排队规则：先来者优先。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发展排队规则普遍存在，而且非常不同的社会都认为排队虽然浪费资源，但是它体现了公平，而且为追求公平这样的成本是值得承受的。

即使在排队规则下，也有可能进行互利交易。排在第11位的人可能会出价购买排在前10位中一人的空间，而且其中也会有人为了交换第11位的报价而卖出他的空间，等着坐下一辆电梯。交易也许可以定约，使得那些对尽快上梯作价较高的人购买那些作价相对低的人的空间。既然合同可以自由谈判，那么人们的福利状况必然不会恶化，所以会导致帕累托改进。但是，排队仍然不是一种有效的配给工具。很清楚，如果搭乘电梯的不超过10个人，而且他们是当时所有人中对电梯服务作价最高的，情况就会好得多。排队中包含有等待的浪费。设计一种替代的产权分配制度并且不会产生排队中的时间和资源的浪费现象，原则上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容易的。例如电梯中的空间可以用抽签来分配。实际上，伦敦经济学院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教师中分配停车位置的。

假设选择电梯服务质量的产权属于电梯的所有者，进而假设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抽象掉交易成本和随机偏差因素条件下，他会发现把电梯搭乘权直接卖给公众是有利可图的，从而也就不会发生排队和拥挤。明确界定的产权，为零的交易成本，利润最大化和自由订立合同，是消除拥挤的充分条件；但是很清楚，并非必要条件。由用户自己装备的电梯，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持久的或结构性的拥挤的。

持久的或结构性拥挤、不同于偶然的或随机性的拥挤，一般是由于缺乏产权明确界定而常常发生在公共部门。例如、人们一致认为许多鱼区是非常拥挤的，那里捕鱼的人太多而鱼太少。鱼的数量是有限的，对于一特定的渔船，捕鱼的边际成本应该反映多捕鱼会提高其它渔船捕鱼成本这一事实。关键在于鱼不是由一个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实体所有，也就不会向捕到的鱼收取使用费。稀缺的鱼没有标价，而是被当作可以自由取用的物品，因此就出现了拥挤和过度捕捞现象。

抵押信贷（Morgage Credit） 抵押信贷是不动产信贷投资的核心。这种信贷手段用契约形式建立信贷者之间的关系。所定的契约内容包括为取得贷款而指定的作为担保的财产、贷款支付的期限与利率、借款者归还贷款的期限条件、要求提前支付贷款的罚金、借款者不能满足抵押信贷契约因而需要损失财产的条件等。

抵押贷款的种类主要有住宅抵押与收人财产抵押。筹资购买住宅占抵押信贷绝大部分比例。住宅抵押的主要形式是水平支付，固定利率手段，即利率是不变的，同一的。在整个贷款期间定期支付。每笔抵押支付在利息与未清债务的削减之间分配。在整个信贷期间，当归于本金的份额上升时，抵押支付的利率下降。利息比例的变动率决定于利息率与抵押的期限。

除了为购买住宅提供资金外，大量的抵押信贷运用于建筑公寓以及商业与农业设施。用于建筑公寓与企业财产方面的抵押贷款不同于为自己所有并居住的房屋提供资金。为建筑公寓与企业财产提供抵押信贷在资金安排上更为复杂多变，其主要原因有：需要计划与建筑的时期要长；参加抵押信贷筹资谈判的厂商与个人数目较多；缺乏高度发展的收入财产抵押的二级市场等。

抵押信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以下机构提供的资金：互惠储蓄银行、储蓄与信贷协会、人寿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抵押公司以及一大批房地产投资信用机构等。

抵押债券（Mortgage Bond） 即公司以现有的或包括日后添置的财产作为担保而发行的一种债券。其持有者比一般债权人享有更大的保障。

抵免方法（Tax Credit Merhod） 是国际双重课税的一种免除方法。它指的是居住国（国籍国）政府允许本国居民（公民）在计算应纳税额时以其已向非居住国（非国籍国）政府缴纳的税额加以抵免。目前，在国际双重课税诸免除方法中这一方法应用最广。这是因为，与豁免法和扣除法相比，抵免方法具有兼顾各方面利益的突出优点，表现在：①从收入来源国看，由于允许进行抵免，使这一方法较好地维护了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优先的原则；②从居住国看，由于计算应税税额额时是以纳税人居民得自世界范围的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作为计税基础的，所以又较好地维护了居住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③从跨国纳税人来看，与扣除法不同，它也较好地免除了国际双重课税。

无疑，上述特点一方面使抵免方法得以推广，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在计算和执行方面的难度。

一般而言，抵免方法可以被分为两类：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前者指对同一跨国纳税人（包括自然人与法人）直接向来源国缴纳的税额予以抵免；后者则是指对跨国纳税人非直接向来源国缴纳的税额予以抵免。（参见"直接抵免"、"间接抵免"）

无论直接抵免、间接抵免，通用的计算公式是：

跨国纳税人居民的应纳税额＝其来自国内外的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居住国税率－允许抵免的其已向非居住国缴纳的税额

对于公式中"允许抵免的已向非居住国政府缴纳的税额"一项的计算体现了前述抵免方法相对于其它方法的复杂性，有许多具体情况和规定，但其基本原则是，并非已向国外缴纳的税额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全部抵免，而是存在抵免限额，一般要求抵免数额不能超过纳税人国外应税项目按国内有关税率应纳税额的大小，对在国外缴纳的超过这一限额的税额不予抵免。

抵免限额（Credif Limit） 指居住国（国籍国）允许的本国居民（公民）用以冲抵其纳税义务的已向非居住国（非国籍国）政府缴纳的税收数额的上限。它等于居民（公民）在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的应税所得和应税一般财产价值在按国内相应税率计算时所应缴纳的税收数额，超过这一限额的已向国外纳税部分不予抵免。对抵免方法实行限额的规定，体现了同时尊重来源国和居住国的财权利益的精神、也体现了对跨国纳税人的公平对待。在抵免限额的规定下，首先是来源国优先课税得以保障；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居住国仍保留了征税权，从而也就保证了其应得税收收益不致丧失；第三，从跨国纳税人来说，等于保证了对每一应税客体都应只课并且必须课一次税的原则。

抵免限额对于确定实际的抵免额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确定实际抵免额时，首先要按有关规定计算出抵免限额，然后将这一限额与实际发生的已向非居住

国（非国籍国）政府缴纳的税额比较，按孰小原则确定实际的抵免数额。

抵免限额的计算比较复杂，至少需要考虑以下情况：

1、是否实行累进抵免；如果实行，是选择"不合并累进抵免"还是"合并累进抵免"；

2、是实行"综合限额"还是"分国限额"，是否也同时实行"专项限额"作为补充；

3、是否允许超限额结转抵免和亏损结转抵免。

等等。

择期远期外汇交易（Option Date Forward Trqnsaction） 见"远期外汇交易"。

招标与投标（Invitation for Tender and Tender） 国际贸易中的招标是指招标人（进口人）为购买一定的商品发出招标通告、单方面公布准备购买的商品的品种、数量、交货期、投标人的条件、投标日期等各种交易内容和条件，公开邀请愿意参加交易的人（投标人）参加竞争，以便从中选定最佳的交易者。在国际市场上，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和某些大企业，特别是一些公用事业机构，经常采用招标方式采购商品。通过招标购买的商品范围很广，如机器设备、建筑材料、交通及通讯设备、电气器材、纸张等等。

国际贸易中的投标是指投标人（出口人）根据招标人在招标通告中公布的具体条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招标人递标，提出自己8的交易条件，试图通过竞争，为招标人选中（中标）。在投标时，投标人一方面要使自己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因为有投标人之间的竞争往往很激烈，如果不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那么投标人提出的交易价格及其他条件可能缺乏竞争力，在竞争中遭到失败。

招标和投标构成了一种贸易方式的主要内容，也是交易过程的前两个环节，交易的达成还需经历第三个阶段，即开标阶段。开标是指招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启各投标人递交的投标信件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最理想的交易者。开标有公开开标和不公开开标两种形式。公开开标的中标人一般是索价最低者，而不公开开标则不一定。开标后，招标人先向中标人发出采购意图通知书、随后签订买卖合同。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招标人始终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投标人之间的竞争，招标人通常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而投标人如能结合自身情况提出恰当的交易条件，就有可能中标，获取一定的利润。

欧洲美元（Euro—Dollar） （1）存放在美国境外的欧洲地区银行的美元；（2）存放在美国境外任何地区银行中的美元。因为最早出现于欧洲得名。欧洲美元是最早出现的欧洲货币，至今仍是其主体。60年代末活动范围从欧洲扩展到拉美、亚洲及加勒比地区。亚洲美元就（1）而言与欧洲美元相对应，就（2）而言是欧洲美元的组成部分。

欧洲计算单位（Eleropean Unit Of Account） 亦称"欧洲计帐单位"。1979年3月13日欧洲货币体系正式生效前，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进行内部记帐和结算的记帐单位。1971年前同美元等值，含金量0.888671克纯金。1973年美元贬值后1欧洲计算单位等于1.2064美元。1975年为了减少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稳定共同体的货币、便利相互间记帐结算，欧共体9国财政部长会议决定取消含金量，改由9个成员国货币价值加权定值。权数由各国在1969—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在共同体内部商品、劳务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决定，当时计算的权数为：西德马克27.3%、法国法郎19.5%、英镑17.5%、意大利里拉14.0%、荷兰盾9.0%、比利时法郎7.9%、丹麦克朗3.0%、爱尔兰镑1.5%、卢森堡法郎0.3%。1978年1月1日正式使用。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成立后为欧洲货币单位代替，最初二者是等值的。

欧洲型期权（European Option） 外币期权的一种，与美国型期权相对。只能在期权到期日行使的期权。

欧洲中长期信贷市场（European Meclium And Long Term Crecllt Market） 欧洲货币市场上提供期限在一年以上资金的信贷市场，贷款期限一般为1—3年、5年、7年、10年或更长。办理中、长期信贷须签订合同，有时还需借款国官方的担保。利率一般以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为基础，根据金额大小、时间长短以及借款人资信不同附加利息，一般为0.25—2.5%。该市场是同欧洲短期信贷市场同时发展起来的，但直到70年代它才得以迅速发展。当时因石油危机等原因欧洲中长期信贷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均增加，而新的贷款方式（辛迪加贷款）新的信用工具（如浮动利率本票）、新贷款技术（转期信贷）的出现又分散了贷款风险、维护了借贷双方的利益。该市场的资金来自：（1）短期欧洲货币存款；（2）发行短期、中长期欧洲票据、欧洲债券筹集的资金；（3）发行欧洲货币存单。资金的使用者主要是跨国公司、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其它工商企业等。参看"欧洲货币市场"、"欧洲短期信贷市场"。

欧洲债券（Euro—Bond） 发行人以外国货币为面值并在面值货币发行国以外国家的金融市场上通过国际辛迪加发行的债券。国际辛迪加又称承购辛迪加，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若干金融机构组成的负责欧洲债券发行和担保工作的集团。例如，加拿大某公司发行的以美元为面值的债券，不在美国而在英国、卢森堡出售，发行工作由英国、法国、荷兰、卢森堡的若干家银行组成的国际辛迪加承担。根据面值货币不同有欧洲美元债券、欧洲日元债券等。欧洲债券可按不同的标准加以划分：(1) 按发行期限可分为：(A) 短期债券，一般为3年；(B) 中期债券，一般5—7年；(C) 长期债券，8年以上；(2) 按利率规定分为 (A) 固定利率债券，发行时利率既已固定不再变动；(B) 浮动利率债券，每隔一般时间利率根据伦敦银行同业利率调整一次；(3) 按清偿要求分为：(A) 到期清偿本息的普通债券；(B) 可兑换债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兑换成股票；(4) 按销售方式可分为：(A) 公开发行的债券；(B) 私下或不公开发行的债券。(5) 按面值货币划分：(A) 单一货币债券，如欧洲美元债券；(B) 双重货币债券，在发行、付息时采用一种货币，还本时采用另一种货币，两种货币间的汇率在发行债券时就已确定；(C) 篮子货币债券，如以欧洲货币单位为面值的债券。第一笔欧洲债券是1961年2月在卢森堡发行的。

欧洲债券市场（Euro—Boncl Market） 由欧洲债券的发行人和投资人及经销机构组成的金融市场。中心在卢森堡。分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前者组织欧洲债券的发行和认购；后者安排上市和买卖。是欧洲货币市场的组成部分之一。至今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 1963—1968年是萌芽时期。第一笔欧洲债券于1961年2月出现在卢森堡，1963年正式形成欧洲债券市场，直到1968年次级市场还很不发达，发行额不大，最高年份亦没有超过20亿美元；(2) 整个70年代欧洲债券市场大起大落。78年前增长很快，此后急转直下；(3) 8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在欧洲债券市场上发行债券，不受任何法令的干预和限制。

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uestment Bank、EIB） 欧洲共同体设立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成立于1958年1月1日，旨在为共同体内部的落后地区以及与共同体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长期贷款和担保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原则来自《罗马条约》(即《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的有关规定，因此，该行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致力于共同体内部经济发展的平衡与稳定。为此，该行结合不同地区的特点将资金主要投入能源开发，公共设施建设及老企业更新改造等方面。成员国内部，接受优惠贷款最多的国家是意大利、英国、法国、爱尔兰、丹麦以及希腊。在成员国外部，接受优惠贷款的国家分布很广，主要是地中海沿岸，但也包括非洲、太平洋地区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有关国家。

该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①成员国对法定资本的分摊；②向成员国政府筹借；③在共同体外资本市场上筹借。最初，该行法定资本10亿美元，有6个成员国，到1987年底成员国增加到12个，认缴资本已达288亿欧洲货币单位。

该行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负责制定银行大政方针，并任命董事和候补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由22名董事和12名候补董事组成，负责制定银行日常经营方针并监督银行的经营活动。下设管理委员会作为常设执行机构主持日常银行业务。

欧洲货币（Euro—iurrency 或 Euro—Money） (1) 在货币发行国国境外的国家存放，最后仍回到货币发行国清算转帐的各种货币的统称。这是目前普遍使用的概念。它既包括了在欧洲地区，主要是伦敦存放的美元、瑞士法郎、西德马克、法国法郎、日元，又包括了活动在亚洲、北美、拉丁美洲的美元、英镑、日元等货币。在此"欧洲货币"这一名称中，"欧洲"已失去了地理上的意义，而有了经济上的含义，它等同于"非国内的"、"境外的"或"化外的"意思；(2) 在货币发行国之外欧洲地区银行存放、最后仍需回到货币发行国清算转帐的各种货币。欧洲货币出现之初使用的便是该概念。亚洲货币就 (1) 而言是欧洲货币的一部分，就 (2) 来说则是与之相对应的另一概念。各种欧洲货币和其发行国国内流通的货币是相同的，具有同样的价值。最早出现的欧洲货币是欧洲美元。当一美国企业将其在纽约银行的美元存款转存到伦敦的A行时，一笔欧洲美元便诞生了。A行可以将该笔美元存款转存到其它银行亦可贷放给客户，假设贷放给日本的B企业。整个交易在清算时，应将美国企业在其银行中的美元存款划拨到伦敦A行在美国的联行或代理行的美元帐户中，同时从A行在美的美元帐户中划出一笔款项，划入日本B企业在美国的往来银行的美元帐户中。参见"亚洲货币"、"欧洲货币市场"。

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 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创立的篮子货币。为各成员国货币的合成货币，各成员国货币为其组成货

币。在初创时由9个成员国的货币构成：西德马克占33%、法国法郎19.8%、英镑13.3%、荷兰盾10.5%、意大利里拉9.5%、比利时法郎9.2%、卢森堡法郎0.4%、丹麦克郎3.1%、爱尔兰镑1.1%。根据9国货币比重，一欧洲货币单位含0.828西德马克、1.15法国法郎、0.286荷兰盾、0.0885英镑、109意大利里拉、3.66比利时法郎、0.217丹麦克朗、0.00759爱尔兰镑、0.14卢森堡法郎。根据协议，对于各货币所占比重，在欧洲货币生效后的6个月内进行第一次调整，此后每5年审查调整一次。1984年9月调整后，加入了希腊德拉克马。调整后各国货币所占比重变为：西德32%、法国法郎19%、英镑15%、意大利里拉10.2%、荷兰盾10.1%、比利时法郎和卢森堡法郎8.5%、丹麦克朗2.7%、希腊德拉克马1.3%、爱尔兰镑1.2%。欧洲货币单位是在共同体原有的欧洲计算单位的基础上创设的，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核心，作用主要是：(1)作为确定参加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中心汇率的标准。首先确定成员国货币与欧洲货币单位的中心汇率，据再确定相互间的双边中心汇率。在中心汇率的基础实行稳定汇率机制；(2)作为清算成员国业务往来的结算手段；(3)可作为成员国的外汇储备；(4)作为成员国内部进行信贷业务的计算单位。此外，由于欧洲货币单位由多种货币构成，具有相对的内在稳定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使用日益广泛，如80年代出现的以欧洲货币单位计值的欧洲债券。

欧洲货币市场（Euro—Currency Market）　经营欧洲货币借贷、存放业务的市场。初期曾称"欧洲美元市场。"1957年伦敦银行开始系统地吸收、贷放美元，此后经营的币种扩大到西德马克、瑞士法郎、法国法郎、英镑、日元等，经营欧洲货币业务的金融中心，从欧洲的伦敦等城市发展到中东、远东、加勒比地区、加拿大和美国，被人们称"境外金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历史因素都起了推动促进作用：(1)美国政府实行的一系列金融政策。联邦银行法中的"Q条例"，在60年代市场利率提高时阻止了商业银行提高存款利率、使国内资金流动西欧。"M条例"规定美国商业银行必须交纳存款准备金，但该条例对欧洲美元存款无约束力，降低了欧洲货币市场经营欧洲美元业务的成本。此外60年代实行的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如"利息平衡税"，使美元资金的需求者转向欧洲货币市场筹资。(2)5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一方面使美元大量外流，另一方面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3)美元地位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削弱下降，使欧洲货币市场经营的欧洲货币多样化。(4)1958年底西欧各国基本上取消了外汇管制，实行货币的自由兑换。(5)欧洲银行（经营欧洲货币业务的银行）经营的自由化，不受市场所在国及所经营货币发行国金融当局规章、法令的管制。欧洲货币市场是一种新型的国际金融市场，与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有很大区别：(1)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主要经营居民存款或投资、非居民借款或筹资的业务，故其存在和发展以市场所在国经济发达，资金供应充分为前提。欧洲货币市场经营非居民间的存放款、投资筹资业务，如英国银行接受美国居民的美元存款后贷放给一日本企业，所以勿需该前提。这正是7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开曼、巴拿马等亦成为欧洲货币市场分支的重要原因；(2)传统国际金融市场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分离的，由不同的金融机构经营，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则合二为一；(3)传统市场经营市场所在国货币、欧洲货币市场经营欧洲货币即境外货币业务；(4)传统市场的经营受市场所在国法律的制约、金融当局的管理。欧洲货币市场既不受市场所国也不受所经营货币发行国的管制。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故从60年代起有关国家及经济学家便提出了管制欧洲货币市场的问题。

欧洲短期信贷市场（European Short— term Credit Market）　欧洲货币市场的组成部分之一。接受短期（一年以内）外币存款并提供一年期以下短期贷款的市场。和欧洲中长期信贷市场、欧洲债券市场相比，欧洲短期信贷市场产生得最早，规模最大，是欧洲货币市场的基础。在欧洲货币市场上，欧洲银行的负债90%，资产的80%左右期限均在一年以下。欧洲短期信贷业务主要凭信用，勿须签订合同，亦无需提供担保品。大部分交易在银行间进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银行间拆借市场，交易具有批发性。交易单位最小通常是100万美元，利率由交易双方依据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具体商定。贷款期限多数为1—7天或1—3个月，少数为半年或一年。其资金主要来自：(1)银行存款；(2)非银行存款，包括跨国公司、其它工商企业、个人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3)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和其它官方机构的存款。该市场资金使用人主要有：(1)商业银行，它们是最大的借款人；(2)跨国公司及其它工商企业，它们是该市场资金的最终使用者；(3)西方国家地方和市政当局、国有企业。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wi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1960年1月4日，葡萄牙、英国、瑞士、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等欧洲7国在斯德哥尔摩

正式签署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约》，该公约于同年5月3日生效，意味着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宣告正式成立。该联盟的总部设在日内瓦。目前该联盟共有瑞士、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冰岛等6个成员国。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是西欧两大经济集团之一，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它的宗旨是实现成员国间工业品的自由贸易和扩大农产品贸易，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早在1966年，联盟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国间的关税及进口限额均被取消，实现了工业品的自由贸易。该联盟在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同时，还不断加强与欧共体的合作。1972年7月，该联盟的成员国与欧共体成员签署了"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协定"，规定到1977年7月1日完全取消所有这些国家间的工业品关税。到1984年初，两大经济集团间最终取消了全部工业品贸易的关税和数量限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这就为进一步加强两大集团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欧洲经济区的建设阶段。由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无论在成员国的经济实力还是在联盟本身的凝聚力方面远远不如欧共体，因此它跟欧共体的联合的结果将可能是它的成员国逐步加入欧共体或者它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共体，这种情况在欧共体不断走向统一大市场的现实下变得越来越可能。总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将随着西欧经济的一体化而逐步走向消亡。

欧洲统一大市场 欧洲统一大市场是欧共体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并准备在九十年代初实现的欧共体一体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其主要内容是：在1993年1月1日前，在欧共体12国内建成一个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没有国界的大市场。

1985年3月，欧共体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完善内部市场的白皮书》，对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内容和实现时间作出了具体的规定。1985年12月，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卢森堡会议拟订了"欧洲一体化文件"，这个文件在由各成员国首脑签署后于198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与此同时，欧共体主席德洛尔于1987年初针对1992年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提出了一份全面改革欧共体财政体制、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一揽子工作计划（德洛尔计划）。正是在"欧洲一体化文件"和"德洛尔计划"的基础上，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工作得以迅速开展，并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进展。《关于完善内部市场的白皮书》提出的近300条关于欧洲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具体措施中的绝大多数已由理事会通过而变成立法，并且在许多国家开始实施，这些重要的立法包括统一商品标准、消除技术性贸易障碍、相互承认文凭、交通运输自由化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等内容，这些立法对实现商品、劳务、人员、资本的自由流通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另外，在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消除财政障碍、统一增值税、取消税务边界、统一农业和财政政策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将在1992年底基本实现，但是，由于存在着一些近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一目标又不可能完全实现。首先，欧共体还没有实现货币的一体化，既没有发行统一的货币，又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其次，税制改革进展缓慢，缺乏必要的财力，难以对共同市场进行有力的干预和协调；第三，统一法制困难重重；第四，各国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难以采取统一的经济、社会政策；等等。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统一大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却是事实。欧共体为建立统一大市场而采取的各项措施至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主要表现为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提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内部市场不断扩大等。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1992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才能适应这种挑战。

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1957年3月25日，西欧意大利、法国、西德、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6国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通称《罗马条约》）。1958年1月1日该条约生效，宣告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1967年7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主要机构合并，通称"欧洲共同体"，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欧共体，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共体。因此，欧共体目前共有12个成员国。

欧共体的宗旨是协调成员国的内外经济政策，在共同体内部逐步实现商品、劳务、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的均衡、稳定发展，以逐步实现共同体内部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

欧洲理事会是欧共体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它就是欧共体成员国的首脑会议，这种会议每年举行三次，它主要讨论与欧共体有关的重大问题并制定大致方针。部长理事会是欧共体的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部长级代表组成。部长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具体的政策，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并监督各成员国执行共同体条约的进展情况。执行委员会是欧共体常设

执行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实施共同体条约以及共同体作出的各项有关决议，向决策机构提出建议和意见，为决策机构的活动作出安排等。欧洲议会起初是咨询机构，它监督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并有权解散执行委员会，（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已逐步拥有了立法权。）欧洲议会的议员名额按国家大小分摊，由各国经过选举产生。除上述主要机构外，欧共体还没有欧洲法院、审计院、经济政策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等70多个专门机构和附属机构。

欧共体成立三十多年来，经过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第一，成员国之间已全部取消工业品贸易关税，对外则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建立起了工业品关税同盟。第二，通过制订实施统一的商品过境管理方案和统一的商品分类目录，简化海关手续，制订实施统一的安全、卫生、检疫条例以及统一的产品标准和技术标准，建立税务清算手续并逐步统一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措施来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并在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第三，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欧共体建立了数额巨大的农业基金，主要用于收购过剩农产品和向成员国的出口农产品提供补贴，在共同体内逐步实现了农产品的统一价格，对内取消了农产品贸易关税，对外则征收统一的进口税。第四，建立并实施了欧洲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创立欧洲货币单位（ECU），并把它当作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结算工具或外汇储备，以欧洲货币单位为中心在欧共体成员国间建立起稳定的汇率制度并对外部国家的货币实行联合浮动。此外，欧共体在政治一体化以及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实体发展对外关系上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欧共体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并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国际经济贸易集团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欧共体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欧洲统一大市场以及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经济上甚至政治上日益统一的欧洲将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欧共体各成员国必须克服它们所面临的种种严峻的困难，但不管怎么说，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将不可逆转。

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Space） “欧洲经济区”又叫“西欧经济区”或“西欧统一市场”，它是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全体成员国于1984年4月9日在卢森堡举行的首次部长联席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发表的《卢森堡宣言》阐述了欧洲经济区的轮廓，主要内容有：拆除两个集团间的非关税壁垒，协调产品标准，消除技术障碍，简化边境手续和产地条例；加强在运输、农业、渔业、能源以及研究领域的合作；在工作条件、社会保障、文化、保护消费者、环境、旅游和专利权等方面进行协商与交流；协调经济政策与对外关系，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等等。《卢森堡宣言》标志着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开始了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内扩大和加强合作的新阶段，有利于推动西欧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由于欧共体在八十年代中期忙于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欧洲经济区的建设进展缓慢。从1989年起，欧洲经济区的建设步伐才大大加快，欧洲经济区的内容也不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1990年6月下旬，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就建立欧洲经济区问题开始了正式谈判，谈判的具体目标是：在1992年底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建成之时，在西欧18国间建立尽可能完善的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通的欧洲经济区，同时将两大集团的合作领域扩大到研究与发展、教育、环境、交通、社会等领域，建立欧洲经济区的共同决策和管理机构，包括一个代表双方最高水平的委员会和一个由双方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等等。在欧洲经济区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影响了谈判的进程，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决策机制以及法律的适用性问题。欧共体一方面希望通过加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合作推动西欧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优先性和主导性，因此它反对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参与欧共体的决策，反对欧共体与联盟实行共管，并要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全面实行欧共体通过的立法；而欧洲自由贸易领域的成员国一方面希望参与欧共体的决策并从统一市场中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针对欧洲体的立法提出许多例外条款以保护它们原有的利益。尽管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1992年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压力以及西欧统一市场的诱惑力将推动欧洲经济区的谈判进程，并有可能使欧洲经济区的建设目标在1992年底初步实现。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uropean Union Of Economics And Currency） 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是欧共体经济一体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建立共同的货币储备，为最终实现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奠定基础。

早在1969年，欧共体海牙首脑会议就提出要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并计划从1971年起分三阶段至1980年实现。但由于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代之以建立起了欧洲货币体系。

1988年6月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再次提出要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随后德洛尔提出了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具体设想。根据德洛尔的设想，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建设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各国要完成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使所有成员国的货币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第二阶段，在签订新的欧共体条约后，欧共体成员国逐步过渡到集体决策并着手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第三阶段，实现成员国货币固定汇率，并最终建成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实现欧洲货币的一体化。1989年6月的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90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第一阶段。由于欧洲货币一体化将损害各国的主权，因此这一计划遭到了某些成员国特别是英国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1990年10月的欧共体罗马特别首脑会议还是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第二阶段，不过第二阶段所要实现的目标比德洛尔的设想稍有后退。欧共体还初步计划迟至1997年开始实施第三阶段并争取在2000年之前发行欧洲统一货币。总之，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将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历程，但由于它关系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因此它的最终建立将是不可避免的。

欧亚债券（Euro—Asian Bond） 欧洲债券的一种。是发行人以外国货币为面值并在货币发行国以外国家的金融市场上，通过由欧洲和亚洲地区的金融机构组成的国际辛迪加经销的债券。其发行多限于港台。

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 关于齐次函数的欧拉定理，在多重微分数学中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但在经济学理论的证明中非常重要。我们先来建立起所需要的概念和术语，然后再陈述定理。

给定任意实数K，F为定义在向量$X \in R^n$的某个非空子集S上的实值函数，如果对于所有$x \in S$和一切实数t，等式

$$F_{(tx)}=t^K F_{(x)} \qquad (1)$$

均成立，那么就说F为K次齐次函数（h. d. k）。定义f为非空开子集$G \subset R^n$上的可微函数，记f在X处的梯度即f在x处的n维偏导数向量为$\triangle f_{(x)}$，任意两个向量a、b的内积记为<a、b>。

欧拉定理：可微函数f为k次齐次函数，而且仅当下面的欧拉关系式对于任何$x \in G$均成立。

$$<X, \nabla f(X)> = Kf(x) \qquad (2)$$

这个定理描述了齐次函数的特征，即任何函数对于所有X如果满足（2）式，那么也必定满足（1）式，该函数必定为K次齐次函数。该定理的一个简单的但经常应用的推论是：如果f是r阶可微且m<r，那么它的每个m阶偏导数为K−m次齐次函数，即f_i为K−1次齐次函数，f_{ij}为k−2次齐次函数等等。

在分配理论中，关于加总问题（adding-up problem）的论战使欧拉定理开始名声大振，其基本要点如下：假定一家只生产一种产出的厂商想使其成本最小化，其使用的投入要素为$x_1x_2\cdots\cdots x_n=X$，要素的竞争价格为，$p_1p_2\cdots\cdots p_n=p$，在标准假设情况下，这个最小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P_i=\lambda f_{i(x)} \qquad (3)$$

$i=1,2,\cdots\cdots n$ λ为拉格朗日（Lagrange）乘数，这个乘数也是产出的边际成本。现假定生产函数f为k次齐次函数$\eta=Kf_{(x)}$。将（3）式代入（2）式，有

$$\lambda^{-1}<x,p>=kf_{(x)} \qquad (4)$$

如果产品市场上竞争是完全的，则在长期均衡中，边际成本应等于产品的价格q，于是（4）式又变为

$$<x,p>=kqf_{(x)} \qquad (5)$$

（5）式的左边是所有要素支付的总和。如果是规模报酬不变，则f为1次齐次函数，即K=1，由于（5）式右边是总收益，于是总的要素支付就等于总收益；如果K<1，规模报酬递减，（5）式表明：在支付了全部投入要素后，还有剩余；如果K>1，规模报酬递增，（5）式意味着收益不足以应付要素的支付，不过，在规模报酬递增时，产品市场上完全竞争假设不适用，必须放弃。

欧文，罗伯特（Robert Owen，1771—1858） 19世纪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贫困，只读过四年书，10岁时便出外谋生，当过商店学徒和雇员等。1791年起，先后被聘为大纺织厂和著名公司的经理。1800年，欧文担任新拉纳克纺织厂的经理，以慈善的目的进行改革，因成绩卓著而声誉日隆。1824年他和信徒们到美国进行"新协和公社"试验。此举失败后，他又投入英国工人运动，并继续宣传和推行他的各种试验方案。1833年他领导成立了英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1834年该组织被迫解散后，他又继续进行小型试验，并出版过宣传其思想的几种小册子。不过都未取得瞩目的效果。

欧文的代表作是《新道德世界书》（1842—1844年），另外还有《致拉纳克郡的报告》（1820年）和《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等。

欧文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他明确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是阻挡资本主义制度改造的三大障碍中的祸首。

因此他主张要取得人类的幸福，必须实行公有制。他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者创造了全部财富，而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只是劳动所创造

的价值的一部分，剥削了工人。他进一步指出，大机器的使用加剧了劳动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他还把经济危机的产生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但他未能由此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反而主张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并把希望寄托在剥削阶级身上。

欧文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其基层组织是"合作公社"。它实行财产公有制，公社全体成员集体进行生产劳动和消费。劳动是自愿的愉快的事情，每个成员都应被分配适当的工作，同时需从事多种工农业劳动，既各尽所能，又得到全面发展。由于产品十分丰富，分配则可根据需要进行。他还十分重视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来促进劳动者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使得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他又主张公社应当把城市和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显然，欧文的这些设想包含着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天才猜测，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不过他并不真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总的说来，其"合作公社"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欧文对货币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它破坏等价交换的原则，不仅使资本家有可能剥削工人，而且限制了财富的生产。他主张：既然劳动创造价值，就应直接以劳动为价值尺度，而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价值尺度。为此，他建立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实行劳动券制度，即劳动者将自己的产品交给市场，获得相应的劳动券，然后凭券向市场领取等价的其他劳动产品。这种试图在维护私有制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有组织的交换，同样是一种空想，所以他的交换市场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

欧文是个杰出的社会实践家，他的思想学说的形成始终同其改造社会的实践紧密相联系。他先后进行过以慈善为目的的"新拉纳克"管理、公平交换市场和空想共产主义即"新协和公社"的又是全国性工会组织形式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还创办过幼儿园、工人学校和公共食堂。他一生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积极推行其改造社会的试验方案，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总之，英国当时一切有利于工人的社会运动和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这个名字联在一起的。

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国民待遇原则也是不同的国家签订贸易条约和协定时依据的重要法律原则。国民待遇是指缔约国一方给予另一方的公民、企业和船舶等在本国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公民、企业和船舶等的同等待遇。外国公民、企业与船舶享受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享受本国公民、企业和船舶享受的一切权利，而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一般来说，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外国公民的私人经济权利、外国产品应缴纳的本国国内税、运输和转口过境的条件，船舶在港口的待遇、商标注册、发明权、专利权、著作权、民事诉讼权等等。国民待遇原则以不损害一方经济主权为前提，诸如领海捕鱼权、购买土地权、零售贸易权等都在国民待遇范围之外，如果一国要给予外国这些权利，往往要经过特别的批准。

国民待遇可以说是最惠国待遇的一种补充。最惠国待遇使得外国公民和企业在本国享受同等待遇，而国民待遇使得外国公民和企业在某些方面和本国公民和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进一步体现了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中的平等性。一国给予别国的公民、企业和船舶等国民待遇，主要是为了使本国的公民、企业和船舶等在国外取得同样的待遇，以便开展公平竞争，扩大出口贸易。由于国民待遇原则使得本国的经济独立性受到某种损害，因此不少国家尤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签订贸易条约和协定时较少给予对方国民待遇，或者对国民待遇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和管辖。

国际储备（International Reserve） 各国政府持有的用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稳定汇率、偿付对外债务的流动资产。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应具备以下条件：(1) 具有流动性，可在国际间自由调拨而不受任何限制；(2) 为国际上普遍接受，可以充作国际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70 年代以来国际储备资产包括：(1) 黄金。其价值大体积小，易于保存不变质，是最理想的保值和储备手段。黄金作为国际储备历史较长。在金本位时代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战后其地位不断下降；(2) 外汇。为战后国际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使用最广泛的是英镑和美元，战前英镑居统治地位，战后美元为主。70 年代以来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西德马克、日元、瑞士法郎等也先后被当作储备货币，成为各国的外汇储备；(3)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包括会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交份额的外汇部分（相当于份额的 2.5%）、基金组织用去会员国货币持有量的部分（1976 年前称为超黄金部分）；(4) 特别提款权。国际储备规模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影响极大。一国国际储备不足常引发支付危机，提高对外借款成本；过多，不仅造成巨额资金闲置，影响经济发展、引发国内通货膨胀，而且还要承担储备货币币值或汇率变动的风险。一般说国际储备规模受以下因素制约：(1) 经济开放及对外依赖程度；(2) 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效率；(3) 外汇管理的松紧程度；(4) 外汇政策；(5) 向外筹资的能力；(6) 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从经验上看，一国国际储备应以满足该国 3 个月进口的支付为最低限。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是指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也可以说，国际贸易是买主和卖主分属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买卖活动，它是各国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超出国界的那一部分。由于国际贸易是立足于全球来看商品和劳务的流动，因此，它又被称作世界贸易（World Trade）。

国际贸易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腐朽的社会制度，都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都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器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不仅使得社会产品大大增加，而且还推动了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的迅速发展，这就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从此，国际贸易的发展走上了新的轨道，并且开始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爆发，新兴的科学技术不断涌现并且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生产领域中去，国际分工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其结果是生产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间产品的差异化、多样化不断发展，零部件生产的专业化越来越深入，这使得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最终表现为国际贸易持续、稳定、巨大的发展，并且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调剂余缺，促进各国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还能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从而能节约各国的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国际贸易还有助于各国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各国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这就能够扩大各国的国内生产能力，增强各国的经济实力，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国际贸易额（International Trade Value） 国际贸易额又叫国际贸易值，它是指按现价计算的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国际贸易总额。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贸易额只是世界各国和地区一定时期内出口贸易额的总和，而非各国和地区进出口贸易额的总和。因为从世界范围来说，一国的出口可能就是另一国的进口，同样道理，一国的进口可能就是另一国的出口，如果把各国进出口总额相加，必然会产生重复计算，不能正确反映国际贸易的实际规模。

国际贸易量（Quantu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量是指按基期价格（不变价格）计算的各个时期国际贸易总额。计算国际贸易量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办法是用世界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_1/P_0，其中 P_0 表示基期的世界出口商品价格水平，P_1 表示报告期世界出口商品价格水平）去除国际贸易额（$\sum Q_1P_1$，其中 Q_1 为报告期世界出口商品数量），得出国际贸易量 $=\sum Q_1P_1 \div \frac{p_1}{p_0}$。另一种办法是用基期世界出口商品价格乘以报告期世界出口商品数量，得出国际贸易量 $=\sum Q_1P_0$。

计算国际贸易量的意义在于，只有国际贸易量才能真实反映国际贸易的实际规模和水平，才能真实反映国际贸易的实际变动情况。因为当代国际市场是动荡不安的，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也经常发生变化，这就使得按即期价格计算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额缺乏可比性，这就有必要计算国际贸易量。事实上，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多变性，使得同一时期的国际贸易额同国际贸易量大不相同。例如，1970 年的国际贸易总额为 2800 亿美元，1978 年的国际贸易总额为 11736 亿美元。两者相比，得出的结论是 1978 年的国际贸易额相当于 1970 年的 4.2 倍，但你不能说，1978 年的国际贸易规模比 1970 年扩大了 3.2 倍，因为这里有一个价格上涨因素未排除。已知 1978 年的世界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 1970 年的 2.65 倍，那么，按 1970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 1978 年的国际贸易量 $=11736 \div 2.65=4429$ 亿美元，同 1970 年的 2800 亿美元相比，得出 1978 年的国际贸易量为 1970 年的 1.6 倍，也就是说，1978 年的国际贸易规模比 1970 年扩大了 0.6 倍，而不是根据国际贸易额对比得出的 3.2 倍。

国际贸易的地区结构（International Trade By Regions） 国际贸易的地区结构是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地位的高低通常用它们的出口总额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反映。国际贸易的地区结构不仅能够反映各大洲、各国和地区参与国际流通的水平，反映各国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且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在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贸易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目前来说，立足于各大洲，欧洲居首位，其次是美洲和亚洲，从国别来看，德国、美国、日本居领先地位。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亚洲将超过美洲和欧洲居首位，德、美、日三强领先地位不容易改变，但是亚洲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会不断提高。

国际贸易商品结构（International Trade By Commodities） 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是指各类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它既可以反映各种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个

时期国际贸易的发展特点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

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有各种不同的划分标准，其中运用得最普遍的就是按产品的加工程度来对所有贸易商品进行分类。据此，所有商品可以划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所谓初级产品，就是指没有经过加工或者加工程度很低的产品，它主要包括农、林、牧、渔和矿产品等。工业制成品则是指经过机器完全加工的产品。由于各国对两大类商品的划分标准定得很不一致，这给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综合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联合国秘书处制订出版了"联合国国际贸易分类标准"，这个标准把国际贸易商品分为十大类，具体是：⑴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⑵饮料及烟类；⑶燃料以外的非食用粗原料；⑷矿物燃料、润滑油以及有关原料；⑸动植物油脂及蜡；⑹未列各化学品及有关产品；⑺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⑻机械及运输设备；⑼杂项制品；⑽没有分类的其他商品。在联合国的贸易统计中，一般把⑴—⑸项商品列为初级产品，而把⑹—⑼项商品列为制成品。目前，这个分类标准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

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同世界科技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长期以来，初级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二次大战以来，这种历史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开始超过初级产品贸易。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制成品贸易的比重在不断扩大，初级产品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趋势还将不断持续下去。另外，制成品贸易的重心，正逐步由消费用品向生产用品转移。

国际贸易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国际贸易理论着重于研究国际间的经济交换关系，这种经济交换关系包括（1）商品和劳务的国际流动；（2）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3）技术，信息的国际流动；（4）企业的国际流动。

对于国际贸易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通常认为十六—十八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理论对国际贸易的讨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自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国际贸易理论可以分为两大体系。一种理论体系是保护贸易理论；另一种理论体系是自由贸易理论。两者相较，以自由贸易理论为国际贸易的主体理论。

保护贸易的理论起源于重商主义时代。在重商主义时代，通常认为金银的积累就代表着一国财富的积累。为了促使一国金银积累的增加，必须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造成贸易出超，使金银从国外流入。减少进口的方法便是对进口产品课征关税，提高其进口价格，或利用其它政策禁止进口。虽然重商主义者提出课征关税的本意仅在于减少进口，以防止进口引起的金银的外流，而目的并非在于保护国内具有比较利益的产业，但是课征关税的结果却使国内进口替代产业受到保护，因此，通常认为重商主义者是最早提出保护贸易主张的。自重商主义贸易思想之后的保护贸易理论还包括：幼稚产业说；价格扭曲说；国际收支说；廉价外国劳力说等等。

自由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作为主体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论证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国家都应当参加国际贸易，通过自由贸易，使得世界上的资源达到最佳配置，具体产品的要素投入达到最佳比例，产出水平、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水平达到最优化。在自由贸易理论的前提下，国际贸易理论又分为国际贸易实证理论和国际贸易规范理论。国际贸易实证理论是国际贸易基础理论，它是在一般的经济假定前提下，抽象地分析贸易开展的基础、条件和得失。这一贸易基础理论又称为国际贸易纯理论。国际贸易规范理论则着重于评价国家实行的各种贸易政策。围绕国际贸易理论的中心论题，国际贸易的规范和实证理论主要涉及：（1）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2）贸易形态如何决定，即国际间商品输入和输出的方向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3）在国际市场上，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贸易数量如何决定；（4）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利益、产业结构、消费形态有何影响；（5）在生产要素、技术水平发生改变时，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利益、产业结构、消费形成的影响有何改变；（6）贸易政策对于国内价格、贸易条件、福利水平和影响如何

从西方十六世纪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开始，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又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亚当·斯密（A·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第二阶段是以马歇尔（A·Marshall）、埃奇渥思（F·Edgeworth）、米德（J·Meade）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之后，出现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以赫克歇尔—欧林要素禀赋理论为开端，而后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围绕着里昂惕夫之谜，当代经济学家又从更新更广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出现了人类技能理论、技术贸易理论、收入贸易理论等新的思想，但通常认为这些理论仍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组成部分。

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在充

分就业的前提基础下，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将国际贸易作为世界资源获得最佳配置的媒介，但是，由于新古典学派在古典学派的基础上，建立了自身完整的体系，即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部分；同时，又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即均衡分析方法，这样，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说是对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刻的修改基础上形成的，特别需要一提的这一修改是新古典学派分析国际贸易的出发点是比较各个国家之间产品的机会成本，而古典学派分析国际贸易则是将劳动成本差异作为出发点，由于新古典学派修正了成本的含义，建立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依据这一概念，产生了生产可能性线，配合社会无差异曲线，在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问题时，就可以抛弃古典学派采用的低级的算术推导，代之以现代数学分析工具，进行较为严密的论证。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与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则是从完全崭新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这一角度就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故而，现代贸易理论又称为要素禀赋理论。现代贸易理论认为不论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有缺陷，新古典学派贸易理论亦需要重大改进，改进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学派没有真正阐明不同国家之间商品的机会成本不同的原因所在，而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机会成本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客观存在着各国资源禀赋状况的不同，各国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总观这一发展过程，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学派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商品劳动成本的差异分析贸易问题，而新古典学派则是以机会成本的差异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转变了分析角度，着重于各国资源禀赋的差异。虽然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分析贸易问题的角度和层次是不同的，但是，这些阶段都是以同一思想为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比较利益的思想，比较利益的思想是自由贸易的最根本依据。

国际承包工程（International Contract Project） 国际承包工程是国际劳务合作的一种，它是指一国的承包企业或企业集团按国外业主提出的条件，承担某项工程的建设任务，从中取得一定的报酬。承包国际建设工程，一般都是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进行的。招标人大多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只有少数招标人可能会根据工程项目的特殊情况，有选择地、不公开地邀请一些承包商参加投标。由于国际建设工程往往投资巨大，因此对投标人提出很高的要求。有投标意愿的人通常要经过严格的预审，才能取得参加投标的资格。国际承包工程根据中标的承包公司所承担的责任不同，又可分为分项承包、半统包和统包等几种。其中统包工程又叫作"交钥匙工程"。它是指承包的工程项目从方案的设计和选择、可行性研究到建筑施工、安装调试以及人员培训、操作指导等一系列的工作全都由承包公司负责完成。工程完成以后，承包公司交给业主的是一个完整的工程，只要启动开关，即可开工生产，投入正常的运行，故称"交钥匙工程"。我国对外承包的工程不少就是"交钥匙工程"。国际承包工程战后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在七十年代达到了最高峰，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尤以中东地区最为突出。从承包工程的内容看，从先前的"劳动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项目，逐步转向了"技术密集型"的成套工程项目。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经济情况不景气，影响了国际承包工程的发展。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逐渐走上新的发展轨道，逐步向现代化迈进，国际承包工程将会得到新的发展。

国际商品协定（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f Commodities） 国际商品协定是指某种商品的主要出口国和主要进口国之间就该商品的供求、价格等问题经过协商所达成的政府间的多边贸易协定。

国际商品协定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由于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频繁而且波幅很大，这就给这些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和损害，并且影响这些商品贸易的正常开展。为了维护这些商品的合理价格和正常的市场供应，保障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这些国家往往就某种商品签订国际商品协定。目前已签订的国际商品协定主要有七个，分别如下：1949 年 3 月签订的国际小麦协定，以后又续订几次；1953 年签订的国际糖协定；1956 年 7 月开始生效的国际锡协定；1958 年 4 月签订的国际橄榄油协定；1962 年 9 月签订的国际咖啡协定、1973 年 10 月签订的国际可可协定；1979 年 10 月签订的国际天然橡胶协定等。

国际商品协定的最主要内容是经济条款，它是确定各缔约国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依据，而经济条款的最主要内容则是如何保持价格的稳定。不同的国际商品协定中规定的保持价格稳定的办法各不相同，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四种，即：①出口配额的规定。它规定一个基本的出口配额，适用于该协定的整个有效期，然后再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确定每年的出口配额，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控制商品的供给使之与需求保持平衡来保持价格稳定的办法，采用这种规定的有国际糖协定和国际咖啡协定。②缓冲存货的规定，它规定设立一个执行机构，建立包括实物和现金在内的缓冲存货，并为该商品规定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干预市场。当市场价格突破最高限价时，向市场抛售缓冲存货中的

实物；当市场价格跌破最低限价时，则动用缓冲存货中的现金在市场上收购该商品，通过调节市场供求来稳定价格。这一措施在维护生产国和消费国，尤其是在维护生产国的利益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市场状况不景气的情况下，缓冲存货阻止了某些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采用这一规定的有国际锡协定和国际天然橡胶协定。3 多边合同的规定。它规定某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和主要出口国签订多边合同，该合同要求进口国保证，在协定规定的价格幅度和特定期限内，向各出口国购买一定数量的有关商品。与此同时，该合同还要求出口国保证，在协定规定的价格幅度和期限内，向各进口国出售一定数量的商品。采用这种规定的有国际小麦协定。4、其他规定。有的协定规定同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维持商品的价格，如国际可可协定规定通过出口配额和缓冲存货来控制市场和价格。

由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它的消费和进口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因此，国际商品协定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从国际商品协定的执行情况看，它们在稳定初级产品的价格，维护这些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的顺利进行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受益非浅。但是，由于处于进口国与出口国地位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在维护初级产品的价格等方面必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国际商品协定往往受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操纵与控制，使得它们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这主要反映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的价格一跌再跌上，这就使得作为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生产和贸易以至整个经济的发展。

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Agreement Regon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aes） 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又称多种纤维协定，它是在关贸总协定的主持下，由主要纺织品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签署的一项有关纺织品贸易的多边协定。该协定于1974年1月1日正式生效，1978年、1982年、1986年三次延期，目前运行的是第四个协定，预期该协定于1991年7月到期。

多种纤维协定标榜的宗旨是逐步实现世界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保证纺织品贸易有秩序地发展，避免对某一市场或某种产品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保证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出口收入的不断增加，并在世界纺织品贸易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但是事实上，多种纤维协定严重背离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它是发达国家利用它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签订的具有明显保护色彩的多边贸易协定，旨在保护发达国家的纺织工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的大量出口。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纺织品贸易上缺乏竞争力，因此纺织品贸易一直被排除在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范围之外。多种纤维协定签订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发达国家重新发展纺织工业提供一次机会，以便最终实现纺织品贸易的自由化。为此，该协定给予了作为纺织品进口国的发达国家采取数量限制和关税限制等措施的权利。但是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纺织品，并没有因为它采取保护贸易措施而提高了在国际纺织品贸易中的竞争地位，相反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处于越来越明显的劣势，因此发达国家长期依赖多种纤维协定采取保护贸易政策，而且保护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不仅违背了该协定的宗旨，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作为纺织品主要出口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它们强烈要求实现纺织品贸易的自由化。为此，乌拉圭回合首次把纺织品贸易列入了谈判范围，并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进行讨论，而且为纺织品谈判规定了如下目标："根据强化了的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和纪律，制定能使这一部门最终纳入关贸总协定的方式，以有助于实现进一步自由化的目标"。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纺织品贸易中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因此谈判本身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发展中国家要求取消多种纤维协定，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关贸总协定的原则范畴内，实现纺织品贸易的自由化，而发达国家则希望逐步取消限制和保护措施并要求发展中国家不断取消其他限制措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由于双方立场相距甚远，至今仍未就纺织品贸易达成一个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可以预料，由于多种纤维协定存在的明显的不合理性，不断削弱该协定的限制措施进而取消该协定将是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方向并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但要把纺织品贸易完全纳入关贸总协定的轨道还需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多种纤维协定共有四十多个成员国，（成员国的纺织品贸易额占世界纺织品贸易总额的80%以上。）我国于1984年1月18日正式加入了该协定。作为纺织品出口大国，加入该协定有助于加强我国在与纺织品进口国谈判时的地位，可以避免进口国对我国实行更为严厉的单方面限制，并有利于我国较好地解决纺织品贸易中的争端，保证纺织品出口的稳步发展。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简称农发基金，它成立于1977年11月，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总部设在罗马。农发基金成立的宗旨是筹集更多的资金，以便向严重缺粮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农业生

产和提高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农发基金由三类国家组成，这三类国家是发达国家、石油输出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它的资金主要由前二类国家提供。农发基金的主要活动就是向第三类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发放贷款，其中以贷款为主，它又可以分为特别贷款、中等期限贷款和普通期限贷款三种，这三种贷款的期限和利率各不相同，以特别贷款最为优惠，事实上农发基金提供的贷款正是以特别贷款为主。农发基金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是日常办事机构，它全面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活动，批准对各个项目的援助和贷款。我国于 1980 年 1 月以第三类成员国的身份加入该组织，并得到了该组织提供的数笔贷款用于发展畜牧业和治理盐碱地等。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Roil）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是 1893 年欧洲各国在瑞士的伯尔尼签订的，此后该公约经过了多次的修改。该公约的主要内容包括铁路与发货人之间、各参加国铁路相互之间在货物运输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国际铁路运单的统一格式和使用方法、运输契约的签订、修改与履行、运输费用的计算与支付方法、铁路对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的赔偿以及诉讼和仲裁方法等等。东、西欧的 20 多个国家参加了该公约，从而沟通了欧洲地区铁路货物运输，这对于推动该地区铁路货物运输的不断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起了积极的作用。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Interuational Cargo Railway Transportation）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是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的一种重要形式。铁路运输的运输速度仅次于航空运输，运载量仅次于海洋运输，特别是对于那些内陆国家，铁路运输是这些国家之间极为方便的货物运输形式。

目前，在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方面存在着两个国际公约。一个是由奥地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于 1961 年在伯尔尼签订的《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简称为国际货约；另一个是由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八个国家于 1951 年签订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简称为国际货协，我国是国际货协的成员国。

铁路的货运单证称为运单。发货人在托运货物的同时，应对每批货物按规定的格式填写运单和运单付本，由发货人签字后向发货站提出，在发货人提交全部货物和付清发货人需负担的费用后，发货站在运单和运单付本上加盖戳记，证明货物业已承运。运单的戳记就成为运输合同的凭证。发货人应对他在运单中填报的关于货物情况的正确性负责，铁路也有权检查发货人在运单中记载的事项是否正确。运单属于铁路承运货物的凭证，但并非物权凭证，不具流通性，铁路方面在终点站将运单交给收货人，并据运单在终点向收货人核收运费并交付货物。

发货人在始发站按发货国家的国内运价支付发货国家铁路的运费，而收货人则在终点站按到达国家的国内运价支付到达国家铁路的运费；如货物需经第三国过境运输，过境国家铁路的运费，可由始发站向发货人核收，也可由到达站由收货人核收。

货物运抵到达站，在收货人付清应付运费和其它费用后，收货人应领取货物和运单。收货人只有在货物因毁损或腐坏、部分或全部货物不具使用价值时，才可以拒收货物。货物的全部灭失，应由发货人或收货人提出，并提交运单或运单付本；货物的部分灭失，除了提交运单，还须提交铁路方面在到达站的劳务记录。有关当事人依据运单向铁路方面提出的赔偿请求和诉讼，以及铁路方面对于收货人或发货人关于支付运费，赔偿损失的请求和诉讼，都应在 9 个月内提出。收货人或发货人无故不交运费或其它费用，铁路对货物则拥有留置权，可以通过扣留货物确保运费的核收。

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国际海事组织简称海事组织，它的前身是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成立于 1958 年 3 月，并于 1959 年 1 月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国际海运技术和海上安全等问题。1975 年 11 月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改用现名，该决定在得到各成员国政府的批准后于 1982 年 5 月正式生效。海事组织的宗旨是制订和推广有关国际海运的统一标准，提高海运技术，保障海运安全，防止和减少海运污染，加强各国在海运领域的合作等。海事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两年一次的代表大会，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执行机构，它通过下设的法律、便利运输和技术合作三个委员会开展工作。理事会主持下开展的工作包括制定有关海运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协定，处理与海运有关的法律问题，限制和消除国际海运过程中的歧视性措施，交流各国海运方面的情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海运领域的技术援助等。海事组织的总部设在伦敦，到 1984 年 3 月已有成员国 125 个。我国从 1973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参加该组织，并于 1983 年当选为该组织理事会成员国。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International Cargo Sea Carriage） 海上货物运输，是指使用船舶经海道或其它与海相通的水域，将货物从一个港口运输到另一

个港口的行为，海洋运输具有运输量大，运输成本低，无道路限制等方面的优点，目前的国际货物运输总量中，有三分之二的货物采取海洋运输方式，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主要是从航海贸易发展起来的，许多有关国际贸易的法律和惯例都是在总结长期航海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是最重要的国际货物运输方式。

在海洋运输中，专门从事海上货物运输的船方称为海运承运人，海运承运人向货方提供船舶，运输货物，并以此收取货方运费。船、货双方通过签订海上运输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保证运输过程的顺利完成。按照船舶的经营方式，海上货物运输分为班轮运输和租船运输，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就相应地分为'提单'和'租船合同'两种形式，凡是租用船舶的全部、部分或指定舱位进行运输，通常需租船运输方式并签订租船合同；在货物数量较少而按照货物的数量进行托运时，通常采用班轮运输方式并采用提单形式。

海洋货物运输的船舶，按其运载货物的种类，分为干货船（dry cargo carrier）和油槽船两大类，其中干货船又可分为散装船、杂货船、矿砂船、木材船、冷藏船、集装箱船、子母船等，油槽船又分为油轮、液化气船等。

由于海洋货物运输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而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作为货方，通常需指示其运输代理人（shipping agent）具体办理租船订船业务，同样，船公司作为承运人，也需使用装货经纪人（shipping broker），代船方招揽货方，实际上，运输代理人和装货经纪人常常就是一个人，既办理租船订舱业务，同时也招揽货载。我国外贸企业的运输代理人是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China Foreign Trade Transportation Corporation），而处于装货经纪人地位的是中国外轮代理公司（China Ocean Shipping Agency）。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虽然有多种优点，但是海洋运输易受各种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季节性的限制，航行速度较慢，运输风险较大，涉及的当事人也较多，这样，调查海洋运输的法律是比较复杂的，除各国的法律规定外，在班轮运输方式下，最重要的国际公约是海牙规则，其全称是：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lation of Certain Rules of Law Relating to Bills of Lading），于1924年8月在布鲁塞尔签订，1925年1月1日起生效。其它的还有1977年生效的'维斯比规则'和1978年制订的'汉堡规则'。与班轮运输方式相反，租船运输方式下还没有什么国际公约，租船合同的订立可以完全听凭当事人的意愿，但是，对于租船合同项下的提单，却仍需受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的约束。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成立于1945年4月，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航空联合组织，其成员都是各国的航空公司，总部分别设在蒙特利尔和日内瓦。该协会的宗旨是促进安全的、正轨的、经济的航空运输，加强各航空公司间的合作，加强同包括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的联系和合作。该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的会员大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开展各项活动，它所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协商制订国际航空客货运价，统一国际航空运输规则制度，进行各航空公司间的运费的国际结算，等等。该协会有100多个会员和准会员，它们分别来自近百个国家。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International Cargo Air Carriage）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是一种现代化的国际货物运输方式。航空货运的最大优点在于速度快，对于那些价值高、重量轻，体积又小的贵重物品以及那些时令性的鲜活商品，航空运输是最为方便的运输方式。特别是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飞机速度大大提高，而运载能力也越发增强，航空运输在国际货物运输中的地位越趋重要，成为不可忽视的国际货物运输方式。

在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中，承运人一般是航空公司或航空揽货公司，托运人和收货人分别是出口商和进口商，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订立的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称为空运单（air waybill）空运单通常包括正反两面。正面主要记载托运人、收货人及承运人的基本情况和所运货物的基本情况，背面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声明条款，用以表明此空运单受何种有关航空运输的国际公约制约，另一部分称为运输条款，表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若这一权利义务关系违反了制约空运单的国际公约，则有关条款是无效的。

空运单具有不可转让性，收货人抬头栏内是特定的人；空运单也不是货物所有权的凭证，不能用空运单向承运人提货。同时，由于航空运输的速度较快，通常是收货人还未收到空运单，货物就已经到达目的地，因此，收货人提货是凭承运人发出的到货通知，空运单的作用也就相应地变小了。

空运单自航空公司做为承运人签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收货人提领货物之日。如果收货人在提货时或提货以后发现货物受损，应在规定期间内提出索赔。索赔若由托运人提出，则索赔对象应为第一承运人，若由收货人提出，则索赔对象是最后承运人。索

赔时应提出的单证包括：(1) 索赔通知单；(2) 空运单付本；(3) 公证检验报告；(4) 装箱单；(5) 发票。

在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中，目前主要有三个国际公约。(1)《统一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n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Air Carriage)，简称《华沙公约》，由德国、比利时、丹麦、法国、波兰等 23 个国家签署，1933 年生效，我国在 1958 年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华沙公约是国际航空货物运输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国际公约。(2)《修改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简称《海牙议定书》，该议定书于 1963 年生效，我国于 1975 年成为该议定书的成员国。(3)《瓜达拉哈拉公约》(Guadalajara Convention)，这一公约于 1964 年生效，我国尚未加入。在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中，这三个公约是相互独立的，但是这三个公约的内容又是相互关联的，《海牙议定书》和《瓜达拉哈拉公约》均是以《华沙公约》为前提和基础，其中《海牙议定书》在航行的责任限制、索赔期限等问题上对《华沙公约》进行了修改，而《瓜达拉哈拉公约》又在承运人的含义等方面对《华沙公约》进行了补充。这样，这三个公约的适用范围是一致的，使用时也往往是交错的。

国际能源机构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国际能源机构又叫国际能源署，它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立的有关石油消费的国际机构，它成立于 1974 年 11 月，总部设在巴黎。该机构的宗旨是制订和实行一项有关石油消费的全面计划，即拟订石油消费计划尤其是在石油供应不足时分配石油的计划，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促进与石油生产国以及其他石油消费国的合作关系。该机构现有 21 个成员国，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组成，秘书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国际能源机构作为发达国家的能源组织它在控制石油消费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较好地维护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

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w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 1919 年 6 月，它于 1946 年 9 月成为联合国的第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该组织的宗旨是建立和完善国际劳工立法，推动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和保护工人健康，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的国际劳工大会，它负责讨论和通过国际劳工立法，在通过后供成员国批准实施。各成员国参加劳工大会的代表团有 4 名代表，其中政府代表 2 人，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各为 1 人。理事会是该组织的管理机构，由 56 名理事组成，其中政府代表 28 名，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各为 14 名。理事会每年举行数次会议，它负责制订计划草案和预算，选举该组织的领导人，监督下属机构的工作等。国际劳工局是该组织的常设办事机构，它为大会、理事会以及其他有关机构提供秘书服务，协助该组织制定的有关法规的贯彻执行。国际劳工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除了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制定国际公约和建议书以外，还包括向众多的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劳工问题的专家咨询和技术援助以及培训成员国的有关人才和出版有关劳工问题的一系列报告、著作、年鉴等。目前，国际劳工组织有 150 多个成员国，我国是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并从 1983 年起恢复参加该组织的活动。

国际专利合作联盟 (International Patent Cooperation Union) 国际专利合作联盟成立于 1970 年 6 月，该联盟于 1978 年 1 月生效并从同年 6 月 1 日起开始正式接受国际专利申请，总部设在日内瓦。该联盟的宗旨是为专利的申请、审查及公布出版等方面制定国际统一的标准和程序，以便简化专利的申请登记工作，加强对专利的国际性保护，提高专利的利用效率。该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盟大会，联盟的具体工作由执行委员会以及下设的其他委员会负责开展，主要内容是受理专利的国际申请并进行审查核实。目前该同盟共有 20 几个成员国。

国际广告协会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国际广告协会成立于 1938 年，原名为出口广告协会，从 1954 年起改用现名。该协会的宗旨是加强世界各国在广告思想、经验和信息方面的交流，加强与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全世界的广告水平、推动市场营销的发展。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数年一度的成员国大会。目前该协会有 70 多个成员国，我国于 1987 年加入该协会。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简称民航组织，它成立于 1947 年 4 月，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总部设在蒙特利尔。民航组织的宗旨是发展国际航运设备，完善国际航运规则，提高国际航运的安全性，保障各国开展国际航运的权利，推动国际航运的不断发展。民航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三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它负责审查理事会的报告，批准该组织的预算和决算，确定成员国的捐款数额等。理事会是民航组

织的执行机构，它由33个成员国代表组成，负责制订具体的行动规划。我国是民航组织的最初成员国之一，后于1974年恢复参加该组织的活动并连续当选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国际铝土协会（International Bauxite Association） 国际铝土协会是世界主要铝土生产国组成的铝土生产和出口的国际性组织，它成立于1975年7月，共有11个成员国，即牙买加、圭亚那、几内亚、塞拉里昂、苏里南、南斯拉夫、澳大利亚、加纳、海地、多米尼亚和印度尼西亚，总部设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该协会的宗旨是协调成员国的有关政策，促进各成员国铝土工业的合理发展，确保各成员国从铝土生产和销售中获取公平合理的收益，推动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适当考虑铝土消费国公认的利益。该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部长理事会，它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负责批准政策和预算等。常务理事会负责采取各项措施，检查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协会成立以来开展的具体活动主要包括维护和提高各成员国在铝土生产和销售中的经济权益进而逐步掌握本国铝土资源的开发和生产权。这些活动打破了跨国公司对各成员国铝土工业的垄断，维护了各国的经济主权，大大增加了各国的收入。另外，成员国之间不断加强生产技术的合作，通过合办炼铝厂等进一步推动了铝土工业的发展。

国际金融市场（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市场所在国非居民参与的从事金融资产交易的一切金融机构的总和。国际金融市场可按不同的标准加以划分：（1）在该市场上的交易有两大类。一类为居民和非居民间的交易，表现为资本输出或输入，经营该类交易的为传统国际金融市场。另一类为非居民间的交易，经营该类交易的为新型的国际金融市场即欧洲货币市场；（2）按所融通资金的期限长短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或分别称为短期资金市场和长期资金市场。狭义的国际金融市场仅指货币市场；（3）按所经营货币的性质可分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严格地说金融市场与外汇、黄金市场不同。后二者交易双方是买卖关系，市场上发生的是外国货币及黄金所有权的转让。在金融市场上双方是一种借贷关系，所发生的是货币使用权的转让。但因在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新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业务往往和外汇、黄金交易交织在一起，因而一般亦将它们纳入国际金融市场；（4）按地区可划分为欧洲市场、北美市场、亚洲市场、拉美市场等。一个地区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分支，即国际金融中心需具备以下条件：（1）经济较发达；（2）外汇交易、资金流动不受限制；（3）政治、经济较稳定；（4）具有现代化的通讯设施、良好的地理位置及其它支持性的服务业。

国际债券（International Bond） 发行人在国外金融市场上发行的、以外国货币为面额并主要由外国居民购买的债券。分为：（1）欧洲债券；（2）外国债券。在欧洲货币市场产生前国际债券等同外国债券。

国际小麦理事会（International Wheat Council） 国际小麦理事会成立于1949年7月，总部设在伦敦，它是由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组成的有关小麦贸易的国际性组织，其宗旨是平衡国际市场小麦供求，稳定小麦的国际市场价格，扩大小麦及面粉的国际贸易。该理事会通过制定、贯彻、修改"国际小麦协定"来监督成员国的活动，以实现共同的政策目标，1986年3月又通过了新的国际小麦协定。目前，该理事会共有50多个成员国，其中多数是小麦进口国。我国于1974年国加入该理事会。

国际茶叶委员会（International Tea Committee） 国际茶叶委员会成立于1933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原料生产和输出国组织，最初只有3个成员国，以后不断增加，1979年6月以后成了由主要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组成的国际性组织。它的宗旨是稳定国际市场茶叶供求及价格，保障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推动茶叶国际贸易的发展。目前，茶叶委员会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很有限，它主要负责收集和公布世界范围内有关茶叶生产、贸易、价格、库存等情报，而无力干预国际市场。属于该委员会的茶叶生产国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肯尼亚、马拉维及莫桑比克等，这些国家的茶叶生产和出口总量都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该组织的总部设在伦敦。

国际咖啡组织（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 国际咖啡组织作为国际咖啡协定的监督机构成立于1963年8月，它是由咖啡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组成的国际性组织，其宗旨是确定关于咖啡贸易的共同原则，制定维护咖啡价格的共同政策。它的具体任务是商定各生产国每年的咖啡出口定额和价格，使出口定额与价格互相制约，实现供求平衡。这种做法不利于生产国同时实现较大的出口量和较高的价格，而对作为咖啡主要消费国的发达国家有利。为此，作为咖啡生产国的发展中国家作了不少的努力，力求改变自己在咖啡的生产和贸易中的不利地位。目

前，国际咖啡组织有70多个成员国，其中大多数为咖啡生产国。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执行局负责具体的工作。该组织的总部设在伦敦。

国际可可组织（International Cocoa Organization） 国际可可组织是可可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组成的国际商品组织，它成立于1973年，主要任务是检查"国际可可协定"的履行情况，收集世界可可生产、贸易的最新情报并提供给各成员国。国际可可组织现有40多个成员国，它的总部设在伦敦。

国际锡理事会（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国际锡理事会作为世界锡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组成的国际商品组织成立于1956年，它的宗旨是维护锡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防止锡价的过度波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该理事会设立了锡的缓冲存货，根据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进行抛售或收购，必要时还控制生产和出口，以稳定锡的国际市场价格。该理事会现有30多个成员国，其中消费国占多数，总部设在伦敦。

国际避税（International Tax Avoidence） 指跨国纳税人通过种种合法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回避或减轻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这里所说的跨国纳税人包括跨国自然人和跨国法人；这里所说的"种种合法方式"包括税法许可的任何跨国纳税人及其资金、财产的跨越税境的流动与非流动；通过这种流动与非流动，跨国纳税人得以利用世界各国（地）税法上的差异谋取到最大的税收利益。

国际避税的出现和日益扩大首先是由于跨国纳税人总是具有试图减轻其税负的主观动机；其次是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税法上的差异，特别是国际避税地的出现从客观上为跨国纳税人减轻其税负提供了可能。

对跨国纳税人试图减轻其税负的行为不能仅仅用其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观动机加以解释，从客观上说，战后各国税制及税务管理的不断完善使税收负担日益加重以及国际双重课税之不易避免等多种因素都是促使跨国纳税人寻求避税的重要原因。

对各国（地）税法上的差异也可以从多方面考察，税基，税率，税种，税务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所实行的避免国际双重课税的方法等等各方面的差异都会对不同的跨国纳税人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目前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出于各种目的都纷纷采取税收优惠措施，更是为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地税法上的差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对于各国（地）税法差异的利用，亦即国际避税的方式，可以说多种多样，无奇不有。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如下三大类：（1）通过课税主体跨越税境的流动与非流动进行避税；（2）通过课税客体跨越税境的流动与非流动进行避税；（3）通过各种流动与非流动的结合进行避税。

应该指出，对避税方式进行简单化的分类虽然有助于认识和了解避税问题但却忽略了现实中避税方式的复杂性，现实中的避税方式为适应日益增多的反避税措施往往发生种种变形，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

有关国际反避税措施，可分为单边措施，双边措施和多边措施三类，目前，多边合作开展有限，双边合作主要限于税收情报交换，只单边措施相对较为发达，个别国家的单边反避税措施更是如同纳税人的避税措施一样复杂而面面俱到。

但仅靠单边和双边的反避税措施还远不能完全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避税行为，而且由于有些国家（地区）可能会从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行为中获得好处，因此他们可能对于进行国际反避税合作兴趣不大，加上若干反避税条款在设计初衷与实际效果间可能存在较大差距等等都使国际避税与反避税的斗争将持续地开展下去。

国际逃税（International Tax Evasion） 又称国际偷漏税，指跨国纳税人通过种种非法方式，如隐匿各项应税收入，虚报成本费用和虚报投资额等种种欺诈手段逃脱其应承担的世界范围的纳税义务。

应该承认，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相比，无论是它们产生的原因还是它们给各国税收当局造成的后果都非常相似，差异只在于二者非法与合法的区别。

国际避税是合法地利用各国（地）税法上的差异来安排其全球范围的税收负担以使其最小化，而国际逃税则是用欺诈的手段拒不申报或虚报其应税项目，以求非法地不缴或少缴税收。对前者可求助于不断修改和完善税收法规、加强国际间的税务合作以堵塞漏洞；而对后者则需要依法惩处。当然对后者的确认也需要加强国际内的税务合作。

理论上对国际避税与国际逃税进行严格而清晰的区分是容易的，但实践中对合法与非法的判定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因而这一点经常为国际纳税人利用进行逃税。

国际收支（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狭义的概念。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也可以是一个季度或一个月）内所有外汇收支的总和。在此居民可以是：（1）自然人。身在国外并代表本国政府的个人，包括军队，属本国居民；身在国外但不代表本国政府的个人属哪国居民，依其"利益

中心"（即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所在国确定。在"利益中心"不易判定时，以工作地点或长期居住地为判断标准。(2) 政府机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在国外时间是长是短，皆为本国居民。(3) 法人。在哪国注册、成立就是哪国居民。

广义的概念。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的全部国际经济交易的总和。它将不涉及外汇收支，因而不包括在狭义概念中的易货贸易、补偿贸易、无偿的经济、军事援助等项目也包括在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统一各成员国对国际收支的统计，对国际收支作了如下定义：国际收支是一定时期内反映如下内容的统计表："(1) 一经济实体与世界上其它经济实体间的商品、劳务和收益交易；(2) 该经济实体的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的所有权变动与其它变动，以及与世界上其它经济实体间的债权、债务；(3) 无偿转移及对应分录。这些分录是会计上需要用来平衡上述未能相互抵消的交易和变动的任何分录。"17世纪初，重商主义主张贸易顺差，将国际收支等同为贸易收支，此后相当时期一直通行这种概念。本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交易范围的扩大，国际收支扩展为外汇收支。二次大战后形成了含义更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了一国一定时期内的全部国际经济交易。目前各国普遍采用广义的国际收支概念，但在经济学家的纯理论分析中多使用狭义的概念。

国际收支失衡（Balance Of Payment Disequilibrium） 又称"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的对称。国际收支逆差和顺差的统称。通常是指国际收支中自主性交易项下的借贷总值不等。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有：(1)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一般在经济繁荣阶段因国内总需求增加，进口上升会出现逆差。如果经济繁荣是由出口增加推动的，也可能出现顺差；在经济衰退萧条的时期，社会总需求下降，进口减少会出现顺差。(2) 季节或天灾人祸的影响。以农作物为主要出口品的国家，因农作物生产从而出口的季节性，便可能在收获季节国际收支顺差，其它季节逆差；(3) 货币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价格、成本、利率、汇率等。高估本币币值，会抬高出口品外币价格，降低进口品本币价格，可能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反之则可能导致顺差。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也可以引起逆差；(4)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若是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则会导致国际收支顺差；(5) 经济结构的影响。其中由经济结构及经济持续增长造成的失衡具有长期性。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失衡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以纠正：(1) 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不平衡时可以采取紧缩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出现顺差不平衡则反之；(2) 调整汇率。国际收支逆差则调低本币的对外价值，即对本币进行贬值；(3) 直接管制：包括外汇和外贸管制；(4) 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收支逆差（International Payment Deficit） "国际收支顺差"的对称。国际收支中线上交易项下的借方余额。通常在大多数国家将经常项目、长期资本项目列为线上交易。国际收支逆差标志着一国对外债务增加或外汇储备下降，是其经济实力下降或支付能力降低的表现，因此各国对其国际收支逆差都很重视，常采取措施纠正。

国际收支顺差（International Payment Surplus） "国际收支逆差"的对称。国际收支中线上交易项下出现的贷方余额。商品、劳务交易及长期直接投资是公认的线上交易，对长期证券投资、短期资本流动的处理则各国不同。绝大多数国家只将前者划为线上交易，美国不同。60年代美国设计了三种衡量顺差或逆差的方法：(1) 官方结算差额。和其它各国一样，将经常项目、资本项目（无论长期、短期）置于线上，线下项目包括：黄金持有量的变化、中央银行外汇持有量的变化、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美方货币数量的变化；在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变化；(2) 总清偿差额，其线下项目除官方结算差额下的线下项目外再加上国外私人持有美方货币数量的变化；(3) 净清偿差额。其线下项目除总清偿差额下的线下项目外再加上美方居民外币持有量的变化。国际收支顺差是一国对外债权增加，外汇储备增加的标志，说明一国经济实力及对外支付能力增强。但一国若出现长期巨额顺差，则会面临本币对外升值及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还要承担储备货币汇率变动造成其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受损的风险。故对于长期巨额顺差也应该调整。

国际收支危机（International Payment Crisis） 国际收支出现长期持续的逆差而又难以在短期内使之根本改善。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诸多原因中，结构性变化是其主要原因。当一国经济结构、特别是进出口结构不合理时，出现的逆差性失衡需通过重新配置生产资源才能改善，故短期内难以消除。国际收支危机最终会导致外汇储备枯竭，引发国际支付危机。

国际收支平衡表（Statement Of the Batanei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按照复式记帐或簿记原理，系统计录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国际经济交易及金额的统计表。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所有国际经济交易可以划分为如下项目：(1) 经常项目；(2) 资本项目；(3) 平衡项目。全部项目可以划归

借方或贷方。凡是涉及外国居民向本国居民支付的项目属于贷方称贷方项目或正号"（+）"项目；凡是涉及本国居民向外国居民支付的项目属于借方，称为借方项目或负号"（-）"项目。

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的原则和标准（Allocate Principle And Standerd Of Inter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se） 为了防止跨国联属企业集团利用内部交易的便利，通过转让定价等手段以最有利于集团内部利益的方式安排其世界范围的收入与费用的分配，从而给有关国家造成财权利益的严重损失，国际间日益认识到迫切需要形成公认的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原则以规范国际收入与费用的分配。国际间先后提出的分配原则主要有①独立竞争原则；②总利润原则；③合理原则；④合理利润划分安全地原则；等等；其中独立竞争原则已成为指导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的最重要的原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其它几项原则还只是独立竞争原则的补充。

为使独立竞争原则这一一般原则得以有效贯彻，还必须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可以指导税务人员在处理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问题时可以引用的具体标准，以防止随意对独立竞争原则进行解释，引起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配争端。

有关国际收入与费用的分配标准目前虽然没有整齐划一的为各国所接受的规范，但各国还是有一些共同认可的一般性标准，包括：①市场标准，这是最符合独立竞争原则本意的标准，它要求联属企业之间的各种交易都必须以非联属企业之间的类似交易的市场价格为标准；②比照市场标准，这是按照市场标准，在不存在无关联企业之间类似交易的市场价格时，用转入产品的联属企业销售该产品的价格减去合理的销售毛利，倒算出市场价格，用于联属企业之间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分配；③组成市场标准，这是按照市场标准，在没有市场标准和组成市场标准的情况下，用成本加利润的方法组成一种市场价格，作为联属企业之间在进行某些工业产品销售和某些无形资产转让时收入分配的标准，这是在缺乏可比对象市场价格情况下的选择，但它要求不能缺少按正常会计制度记录的有关成本费用等资料；④成本标准，与上述①—③标准不同，成本标准要求联属企业之间的某些交易活动只以其发生的成本费用作为分配的标准，而不考虑包括利润的市场价格。这种交易主要指联属企业之间非主要业务的费用分配和某些非商品收入的分配如贷款、劳务提供和财产租赁等。

应该承认，①—④所列举的标准也还只是一些一般性标准，据此，各国在实践中还考虑各自国情规定了各有特点的分配标准。如美国规定应顺序选择"可比的不受控制价格标准"、"转售价格标准"和"成本加利润标准"。又如德国在接受美国的三种标准外还以"间接不受控制价格标准"和"假设不受控制价格标准"作为补充。另外，还有的国家如瑞士不对分配标准作出具体的规定，等等。

正由于各国选择的分配标准或多或少存在差异，使得国际收入和费用的分配中存在着出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显然，对此极有必要通过各方公认的相互协商程序加以解决，这一协商程序一般体现在国家间缔结的税收协定之中，联合国专家小组还为此专门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规范性相互协商程序条款。

国际双重课税（International Double Taxation） 国际双重课税问题是随着跨国界经济活动的广泛发展以及所得税制的普遍推行而出现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广泛发展必然伴随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价值的日益增多，从而也必然将拥有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价值的跨国纳税人置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税收管辖权之下，由此就产生了实行不同税收管辖权的不同课税权主体对于同一课税主体的同一课税客体同时征课税收的国际双重征税问题。

这类国际双重课税问题的发生首先要求存在跨国纳税人（即跨国课税主体）和跨国课税对象（即跨国课税客体）；其次要求不同国家（即不同的课税权主体）分别采取不同的课税权力原则即税收管辖权；再次还要求上述国家对于同一跨国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实行课税。

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双重课税问题又被称为法律性国际双重课税，以区别于经济性国际双重课税。狭义的国际双重课税仅指法律性双重课税，而广义的国际双重课税则同时还包括经济性双重课税。

所谓经济性国际双重课税是指不同国家对于经济渊源相同的不同纳税人同时课税所引起的国际双重课税，例如对股份公司资本收益课税后还要对股东个人股息所得课税。这类国际双重课税不要求具备"同一课税主体"这一条件，但要求不同课税主体具有相同的经济渊源，这就完善了国际双重课税的概念。

无论属于哪类国际双重课税，一旦发生，都会不恰当地加重跨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不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其进行事先的防止和事后的免除，这两点构成了国际税收协定的主要内容，当然并不是全部内容。

所谓国际双重课税的事先防止主要是指对税收的地域管辖权加以有效约束，也就是对收入来源地的判定作出统一的国际规范，以期在各国对跨国经济活动实施课税之前就使双重课税问题得以防止。但这种事

先防止并不能完全消除因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税收管辖权而带来的国际双重课税，这时就需要对国际双重课税加以事后免除。

所谓国际双重课税的事后免除主要是指国际双重课税发生后通过采取豁免法、扣除法、抵免法等措施来取消或减轻国际双重课税。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性国际双重课税与法律性国际双重课税的区分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承认，有些学者倾向于把经济性国际双重课税作为与国际双重课税不同的概念提出，称之为"国际双层课税"或"国际重叠课税"。其事先防止与事后免除的方法包括母子公司合并申报，股息减免以及间接抵免等。

当然，这里的"双重""双层"都并不一定仅指两次课税而是泛指多于一次而言。

国际双重课税免除的范围（Elimination Range Of International Double Taxation） 国际双重课税的免除是基于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优先的原则由居住国（国籍国）对国际双重课税采取的事后措施。但必须指出，承认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优先并不等于全面承认它的独占，亦即，一方面，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优先并不是无条件的；另一方面，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优先也并不意味着不承认居民税收管辖权。

从前者来说，要考虑以下限制条件，①免除的主体必须是居住国（国籍国）的居民（公民），非本国居民（公民）不能享受免除的待遇；②免除的客体必须是来自非居住国（非国籍国）并且是在来源国已完税的跨国所得或跨国一般财产价值。如果来自非居住国（非国籍国）的应税课税客体尚未在来源国纳税，则居住国不应予以免除；③免除的必须是非居住国（非国籍国）所征课的税而不是费；④免除的税种必须是所得税和一般财产税，而其他税种如流转税和个别财产税都不在免除之列；⑤免除的所得税除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预提所得税可按毛所得征课外，其它应按净所得作税基征课。

从后者来说，在收入来源国优先征课之后，居住国仍可以在不造成双重课税的前提下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以维护自己的财权利益。

总之，国际双重课税的免除是有限制范围的，基本的原则是：所免除的只应是双重课税部分而不是全部税收。

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ation） 国际税收泛指国际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切税收关系。

国际税收是经济活动国际化的产物。随着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日益加深而不断表现出新的特点。

经济生活国际化对税收的最初影响是各国关税的协调，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之间在生产中的相互依赖取代了过去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这导致了跨越国境的商品流通成百倍地增加，从而使得关税的作用也有所发展，由所谓"财政关税"（Revenue Duty）发展成为"保护关税"（Protective Duty），各国从此不得不面临协商双方的税收关系以维护各自经济利益的局面，税收也由此从各国的涉外税收发展成为国际税收。

这一含义上的国际税收主要是指对商品课税的国际协调，而随着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商品税的国际协调已经不只局限在关税领域，而是日益向其它种类的税收延伸，突出的例子是在欧共体内部展开的增值税的协调进程。增值税自54年在法国首次实施起已逐渐为欧共体各成员国所接受。在关税一体化完成后，如果不对增值税加以协调，那么各国针对商品的不同的课税标准将会象已被废除的关税壁垒那样继续影响商品的自由流通。因此，对增值税加以协调是商品税国际协调的新课题。

经济生活国际化还带来了对税收的另一点重要影响，即由于跨国纳税人的大量增加而导致的有关国家之间税收管辖权的交叠（overlapping），这种税收管辖权的交叠从法律上引出了所得税的国际协调问题。

由于国际间人员、资本、商品、技术等等的交往在最近几十年间迅速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以及在各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导致了各类跨国所得的大为增加，这一客观形势使得在各国普遍推行所得税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对它进行国际协调的必要。即对同一课税主体的同一课税客体同时拥有税收管辖权的国家之间究竟应该以何种准则和程序来建立一种各方均可接受的税收分配关系，成为国际税收所要研究的重要领域——而按照狭义的国际税收概念则是唯一的领域。

狭义来看，国际税收被认为研究的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与税收分配关系，其中，前者是指拥有税收管辖权的国家与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税与纳税的关系，后者则是指由于这种征纳关系的发生而形成的税收在有关国家之间的分配。

这一定义排除了对商品课税的国际协调，原因主要在于从历史上看，对于关税的国际协调已构成国际贸易理论的一部分；同时，另一方面，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又恰恰具有相当丰富并且是以独立的内容，所以，国际税收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就集中于对国际间所得课税所形成的税收关系的研究。但毫无疑问，特别是以增值税国际协调为代表的不同种类税收的国际协调的新发展使得拓宽国际税收概念变得日益重

要。

即使是仅以所得课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税收，也有必要随着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断补充新的内容，比如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比重的上升，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以及所谓"象征"经济的壮大等等，就需要对于跨国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跨国利息所得、跨国股息所得等给以更多的研究和关注。又比如80年代中期席卷全球的税制改革中调低所得税税率、减轻所得税负的措施无疑也对国际间所得课税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由上可知，国际税收的内容事实上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研究国际税收也就需要历史地、发展地，动态地作出分析，需要不断地发现和补充新内容，以适应现实提出的新要求。当然，这并不否认从狭义上理解国际税收的意义。

按照狭义的国际税收概念，可以把国际税收的研究范围简要概括如下：

它首先要研究税收管辖权问题；其次，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由税收管辖权引出的两类不同的国际税收问题，一类是由于税收管辖权的交叠而引起的国际双重征税及其免除的问题；另一类是由于税收管辖权的脱节（underlapping）而引起的国际避（逃）税及其防范的问题；这两类问题自然地又引出了对国际税收协调及其结果，即对国际税收协定进行研究的必要；而作为协调过程必不可少的考虑，还需要对国际间进行收入和费用分配的原则和标准以及涉外税收的负担原则等进行讨论。

必须指出，国际税收的研究内容即使从狭义来看也不止上述所及，而是要丰富得多。当然这种丰富不是没有界限，虽然目前还没有形成对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统一认识，但是在明确界定国际税收与国家税收、涉外税收，外国税收以及国际税法等学科之间研究范围的区别与联系方面国内学者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

另外，虽如前述，目前对国际税收这门学科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并不完善，但仅现有研究所涵盖的内容之丰富以及它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多方面契合关系也已使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日益为世人所认识。国际税收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会计等学科的密切联系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国际税收的研究内容。

国际税收筹划（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指跨国纳税人为实现纳税总额最小化的目的而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合法手段对其纳税行为进行的统筹安排。由于国际反避税斗争的开展和国际避税方法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跨国纳税人日益感到选择适当的避税方式面临信息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困难，因此，为跨国纳税人提供国际税收筹划咨询服务的业务应运而生并且日益兴旺起来。

进行国际税收筹划需要全面了解世界各国（地），包括避税地所实行的涉外税收规定和有关国际税收条约，还要了解各种避税方式的特点及其为跨国纳税人所利用的可能性，它要为跨国纳税人选择最有利的经营方式，安排最有利的与联属企业之间的收入与费用的分配方式，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的有关免税，扣除、抵免等优惠办法和国际税收协定所规定的各种优惠待遇，等等。

国际税收筹划已日益为更多的人所重视，也因此而使其内容变得越来越详细和实用。

国际税收协定（International Tax Convention） 国际税收所具有的超越一国税收管辖权的特点使得国家之间的税收关系不能完全靠单边措施加以妥善处理，而必须进行双边以至多边的协调与合作。这种协调与合作所最终形成的用以约束有关国家课税管辖权行使的书面协议即为国际税收协定。

最早的国际税收协定出现在19世纪中期，此后100多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税收协定从内容到形式到数量都获得了突出的发展，表现在：①全面税收协定（general tax convention）逐渐取代特别税收协定（specific tax convention）而占主导地位；②双边税收协定日益转向多边税收协定；③规范化的税收协定范本已被广为接受和采纳，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是OECD范本和UN范本；④国际税收协定的数目迅速增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签订国际税收协定的势头方兴未艾；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正在更加独立和广泛、深入地加入国际经济生活。

国际税收协定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国际双重课税与国际避（逃）税收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免除作出具体的规定。〔参见"国际双重课税"，"国际避税"，"反避（逃）税措施"等〕

除主要内容外，国际税收协定往往特别列出无差别待遇条款，以反对任何形式的税收歧视。要求缔约国双方相互保证将对方居民与本国居民在税收上同等对待，做到在国籍、常设机构、支付扣除、企业资本等各方面都不实行差别待遇。

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协定还要对本身的签订、生效与废止作出规定。一般而言，一项双边或多边国际税收协定只有在有关国家政府之间谈判、签订，由各自国家立法机关正式批准并经由外交途径互换批准文件后方才正式生效。

国际税收协定不仅体现了国际间致力于税收公平的努力，解决了国际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协调问题，而且也体现了各国所遵循的涉外税收负担原则，促进了

缔约国各方的经济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联合国经济方面的专门机构之一，旨在通过这一永久机构的设置起到如下的作用：①便于各国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研讨与合作；②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进而促进和保证成员国的就业与实际收入等基本经济目标的实现；③维持外汇的稳定，避免成员国之间实行以邻为壑的竞争性外汇贬值；④消除妨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在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⑤提供急需的贷款帮助成员国摆脱国际收支失衡的困扰；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以成立的背景使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看作布雷顿森林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具体体现。它是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所形成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而于1945年12月27日正式宣告成立的，发起国29个，认缴法定资本的80%。当时并未列入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只是在47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之后不久才于同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诸专门机构之一，并被视为实现布雷顿森林制度诸原则的有力中介。在其成立后的最初20多年内，该组织通过维护金汇兑平价制度和规定国际间涉及货币关系的行为规范以及从事附有严格条件的信贷业务等方式，在维持统一的汇率体系的稳定，加强国际间货币合作以及促进世界经济的复兴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了维护平价制度的努力，允许成员国自行选择各自的汇率政策，但其宗旨并未改变，仍致力于汇率制度的稳定和创造有秩序的基本经济与金融条件以避免反常的货币混乱，并且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IMF规定了严格的磋商程序和有关权利义务条款，这些严格的规定因其过分关心国际收支调节同时又过分忽视调节的对称性原则而受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非议，为此，IMF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如60年代先后为初级产品出口国设立了出口波动补偿贷款和缓冲库存贷款，以帮助初级产品出口国摆脱暂时的国际收支困难和稳定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又如70年代，利用按市价出卖黄金所得到的超官价部分的收入为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设立了信托基金贷款等等。但应该说所采取的措施极为有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份额的确定方法，投票权的分配，获得贷款的条件等方面仍存在严重倾斜，仍然是过多地考虑发达国家的利益。

IMF的经常性业务是应成员国申请提供普通贷款，又被称为成员国的普通提款权，旨在解决成员国短期的国际收支逆差。该项贷款的数额最多不能超过成员国份额的125%，其中又分储备部分贷款和信用部分贷款两类。前者原称黄金份额贷款，占25%，可无条件动用，不需特别批准。但后者则依贷款数额的多少而附加渐趋严格的条件，在贷款数额达到份额的25—50%时，称第一档信用部分贷款，申请国需向IMF提交克服其国际收支失衡的计划，即可在规定期限内根据需要随时支取贷款；但如果贷款数额达到份额的50—75%时，又称高档信用部分贷款，就需要向IMF提交详尽的财政稳定计划，并要附以必要的国内经济资料，还要陈述具体的理由，贷款的使用也受到严格监督，只有完成了申报计划中所规定的政策指标才准予提用。除这一普通提款权外，如果成员国仍无力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可再申请不超过其份额140%的中期贷款，又称扩展贷款，期限较长，但条件更加严格。此外，IMF还针对上述贷款的不足而向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的国家发放条件优惠的补充贷款和其后的扩大贷款，其条件之严格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IMF的日常业务由执行董事会及其下设的业务机构负责。执行董事会由22名执行董事组成，其中5人分别来自份额最多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沙特阿拉伯和中国也可以分别单独推举1名，另外15人由其它成员国分组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会接受理事会的最高领导。理事会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理事组成，每年例会决定接纳新会员，决定份额，分配特别提款权等重大事项。决议投票作出，一般要求赞成票应达到80—85%。投票权的分配除250票基本投票权外，随成员国认缴份额的增加，每10万美元增加1票，美国因拥有最大的份额而具有最大的表决权和否决权。

截止86年底，IMF已有成员国150多个，其法定资本在1983年第8次普遍增资后达900亿特别提款权。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　1930年5月成立，是最早的国际金融机构，主要由欧洲国家中央银行组成，创始成员包括英、法、意、比、德、日六国的中央银行和美国的三家大银行（摩根银行，纽约花旗银行和芝加哥花旗银行）组成的银团，行址设在瑞士巴塞尔。创立该行的最初的动机是在战胜国之间分配一战后德国的赔款，但成立后该行的业务活动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断调整和扩大，其成员也不断增加，截止80年代中期已达到30个。成员的组成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欧洲国家占绝大多数；二是除美国外，其它成员均是各国中央银行。这后一特点成为国

际清算银行的突出特色并使它有机会经常性地为各国中央银行的总裁提供进行磋商的场所，从而使该行本身也经常性地卷入国际货币与金融的管理业务之中。由于该行的上述特点及其重要性，它甚至被称为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的业务范围在二战前即已不只局限于负责德国赔款的分配，而是逐渐转向为成员国之间资金往来提供清算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该行因为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清算代理机构而得以留存，并相继还成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支付同盟和欧洲煤钢联营等组织的代理银行。同时，该行与IMF和世界银行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业务范围也超出了接受委托进行国际结算的领域，扩大到从事更广泛的银行业务，特别是与各国中央银行保持密切的往来、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存款和黄金存款，代理各国中央银行从事黄金、外汇和证券的买卖，为成员国之间筹措资金以及为缓和国际货币危机而提供支持弱势货币的贷款等多项国际金融业务。此外，该行还向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及时提供内容丰富、系统的经济统计资料和预测报告，被认为是研究和掌握国际金融市场动向不可或缺的情报。该行进行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债务信用等方面的调查也卓有成效，引起广泛重视。

国际投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发行股票，在其成立之初，法定资本为5亿金法郎，1969年12月法定资本增加到15亿金法郎，共分60万股，绝大部分由各国中央银行认购，也允许私人银行和个人持有股份，但不得参加股东大会，也没有投票权。股东大会由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派代表参加，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批准该行年度决算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利润的分配。该行的日常决策和领导机构是董事会，由13人组成，其中8人为以下8国中央银行的总裁或董事长，它们是：英、法、意、比、西德、瑞士、荷兰、瑞典。另外5人由上述8国代表提名指派。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每年召开10次会议，制定银行主要政策。下设银行部、货币经济部、秘书处和法律处等机构。

国有化（Nationalization） 政府把私人企业变为国营企业的作法。二战后西欧和北欧一些国家进行了国有化。国有化的背景是，二战中这些国家受到严重破坏，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实现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并改造一些濒临破产的技术落后的私人企业，国家对某些行业私人企业实现了国有化。当然，这些国家中政治上举足轻重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主张也加速了国有化的进程。国有化的方法是，国家购买私人企业，国家对私人企业实行参股控制、或者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战后的国有化在50年代初和70年代初出现过两次高潮，这使得国有化企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并控制了运输、邮电、化工、钢铁、电子等基础工业与新兴工业部门。经济学界对国有化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国有化的拥护者认为，国有化加速了经济恢复与发展，实现了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并有利于社会安定。国有化的反对者认为，国有化降低了经济效率，造成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且，由于国有化企业的亏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80年代初期，反对国有化的观点占了上风，从而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非国有化"的浪潮。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一个世界性的工会组织。它成立于1949年，其目的是使工会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该联合会成立时，包括53个国家的70个工会，会员约5000万。到1961年，它包括107个国家和地区的135个会员工会，会员达5650万。所有会员工会享有自主权。代表美国加入该组织的是劳联—产联和矿工联合会。其主要职能是开展教育活动，侧重在不发达国家开展教育。它的另一活动是管理国际团结基金，向罢工、矿井事故、地震等不幸事件的受害者发放工会会员的捐款。其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在纽约、日内瓦以及拉美、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的城市里设有办事处。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处理劳工事务。它是根据凡尔赛和约作为国际联盟的一个附属机构于1919年成立的。其最初目的只限于制订劳工标准供各国应用，现在活动范围已扩展为包括有关就业和劳工标准的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具有独特的三位一体结构，即每个国家的代表团由政府代表2人、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各1人组成。美国自1934年加入该组织以来，工人代表一直由劳联—产联指派，雇主代表由美国商会指派。苏联于1934年加入该组织，1939年退出，1954年又加入。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下列3个机构发挥作用：国际劳工大会，由所有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是最高立法和决策机构；理事院，由政府和大会的工人及雇主代表推选48人组成，处理年会休会期间的各种问题；以及行政管理机构国际劳工局。自成立以来，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文件有：各种公约，这些公约是多边条约草案，必须得到成员国的批准才有约束力；对各成员国在制订劳工标准方面起指导作用的各种建议；以及对成员国没有约束力的其他不太正式的文件，例如各种

决议、备忘录和声明等。此外，国际劳工组织还进行直接的技术援助，主要是提供经济发展方面的咨询意见和训练，为现代方法的研究提供研究员薪金或奖学金，以及开设区域性讲习班和研究班。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煤钢联营来说，国际劳工组织已经成为联合国在劳工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执行机构。国际劳工组织于1964年起在财政上独立，其资金由各成员国捐赠，主要捐赠国有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其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

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IEO） 在各个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旧秩序相对立。国际经济旧秩序指发达国家操纵世界经济命脉，利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通过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面临进一步从经济上破除历史遗留并一直延续着的受剥削、被控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问题。最早提出废除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是普雷维什。后来，他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发展经济学家和积极响应和支持。其实际行动始于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高潮。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召开和"七十七国集团"的组成，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步骤。1974年5月联合国代表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主题是纠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平衡现象，促进发展中国家在集体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加速发展。前一个文件规定了涉及关键领域的一些基本原则;后一个文件提出了广泛的改革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切国家都享有平等地参加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各国对其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直至实行国有化；改革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国际金融制度和贸易条件等。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进一步强调了国际经济关系应受主权平等、公正互利、国际合作以谋求发展等原则的指导。这些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表明了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胜利。1982年夏召开的第6届国际贸发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长远目标，也涉及了国际经济关系中最为紧迫的一些问题。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决议，同时又因一些发达国家缺乏应有的政治意愿和僵硬态度而搁置了一些有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问题。由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涉及国际经济关系根本变革的事业，自然会遇到业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负责实施美国主要的一项劳动关系法，即瓦格纳法。该法广泛适用于除铁路公司和航空公司以外的所有州际商业活动。铁路公司和航空公司受铁路劳工法的约束。按瓦格纳法规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有下列两项主要职责：(1) 防止和纠正工会或雇主对待劳工的不正当作用；(2) 举行无记名投票，让雇主们自己决定是否由工会代表他们进行集体谈判。无论按哪一种职责，该委员会只有在得到正式要求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行动。不论个人、雇主或雇工都可以对在劳工问题上的不正当作风提出控诉，或者要求进行雇工代表选举。该委员会有5名成员和1名总法律顾问，均经参议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自1935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共处理了25万宗关于对待劳工的不正当作风的案件，在有关的工人当中举行了16万多次反映雇工自决权的无记名投票选举。该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

国家调解委员会（National MediationBoard） 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调解有关工资率、规章条例或工作条件的纠纷，确定参加集体谈判的雇工代表。此外，它还为仲裁委员会等审理机构指定中立人，并在某种情况下解释经过调解而达成的协议的含义。国家调解委员会是根据铁路劳工法1934年修正案成立的。该修正案确立了和平解决铁路和航空业劳资纠纷的法律程序。该委员会由3名成员组成，他们经参议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其行政事务由执行秘书处理。协助该委员会工作的是一个由调解人组成的工作班子，这些调解人的任命需遵守美国文官条例的规定。

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美国的一个民间的、非盈利性的法人组织。该组织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某一大学的附属单位，更不是为了赚钱而设立的研究机构。按照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组织章程，其建立的目的是"对经济、社会和工业等科学领域进行精确而公正的调查或资助这方面的调查活动，并为了这一目的而同政府，高等院校、学术团体以及个人进行合作"。由于成立国民经济研究局是为了揭示那些与重大经济问题有关的事实真相，所以该组织所采用的方法是客观的。该组织关注的是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问题，并选出那些容易

引起科学讨论的问题进行研究。国民经济研究局的人员组成十分广泛，成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代表各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观点。例如，会员既来自资方又来自劳方；来自银行、保险等金融界。会员包括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会计师、统计学家、企业家、金融专家。各个咨询委员会负责帮助制订具体计划并检查各项计划的执行情况。高等院校 —— 国民经济研究局执行委员会以及收入和财富研究会议负责计划和组织专题报告会。研究成果通过发表研究报告提供给所有人。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项目包括经济增长、国民收入、资本构成、消费、商业周期、金融制度和程序以及国际经济关系。该组织帮助发展了许多目前广泛使用的基本经济衡量法和指标，例如对国民收入和资方构成的估计方法。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开展的国民收入以及资本构成方面的研究工作，导致了美国商务部确立了定期提出有关国民生产总值及其组成情况的报告的制度。国民经济研究局每年都有重要成果面世。在历史上，该组织可以说是成绩突出，战绩辉煌。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总部设在纽约，其管理机构是理事会。

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iee of Congress） 同美国政府中经济顾问委员会相对应的一个国会机构，根据1940年就业法设立。建立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总统收集经济动向方面的权威性情报，根据就业法宣布的政策对各项计划进行估计，并提出在自由竞争制度的体制内避免经济波动和减少其影响的国家经济政策。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是不断地研究经济发展动向和国家经济政策，以协调诸如就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国际收支政策等各项政策。其职能实现的渠道是对特定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报告。在每届国会开会之初，该委员会就总统的各主要计划向国会提出一份包括研究结果和建议的报告，以指导各个处理立法问题的委员会的工作。在就业法中，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原名叫做两院联合经济报告委员会，它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各十名议员组成，十人中多数党代表六人，少数党代表四人。《经济指标》月刊由该委员会出版，由经济顾问委员会编，每个议员一份，也提供给美国各地想及时得到权威性经济动向资料的订户，提交国会的年度经济报告，主要是回顾总统提交国会的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回顾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意见听取会报告，意见听取会报告主要研究以下问题：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政府统计资料的精确程度、经济增长问题、外国经济政策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公共支出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Conomics）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研究各国之间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分支学科，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人力流动、技术转移、南北关系等。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资本与人力流动、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的国际传递、国际贸易的政策分析、国际收支、国内均衡与国际均衡的调节、国际金融理论、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体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跨国公司理论等。国际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从国内向国外的延伸，虽然至今并未定型，但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轮廓。它以比较利益为主轴，认为比较利益学说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在结构上，是以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综合为主；其方法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理论与政策的结合，规范与实证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由于国际间的合作关系日益加强，国际经济学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其主要原理亦为许多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时的重要理论依据。

国际清偿能力（Ability To International Liguidation） 政府为了支持本国货币汇率、平衡国际收支、偿还到期对外债务所能动用的外汇资源的总和。包括：(1)国际储备。为官方掌握的黄金外汇储备等。是一国金融实力的标志，其多少集中体现了一国国际清偿能力的强弱；(2)官方向外的贷款，主要是一国政府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或他国中央银行间达成临时性的筹措资金协议取得的外汇资金。国际清偿能力不仅反映了一国的金融实力，还在相当程度上综合反映了一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金融资信。

国际债务（International Debtedness） 又称"外债"，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以及私有部门向国外所借的债务总和。发生这种债务一般都是用于国内的资金周转、进行经济建设、弥补国际收支差额以及替换已经到期的旧债等等。

1、国际债务的种类

(1)按照国际债务期限的长短，可以分为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一般来说，长期债务的金额比较大、多由政府借入以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等等。由于到期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可以从容地把这笔资金安排到建设所需要的方面去，例如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产业。而短期债务则主要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其它临时性的需要，它的特点是，灵活性强、不容易统一控制，往往比较集中，所以，在安排国际债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债务的平均到期率以

及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的相对比重。一般来说，短期债务的比重不要过多，最好在1／4以下。

（2）按照国际债务债权人来分，可以分为外国政府债务、国际金融组织债务以及外国私人机构债务等。外国政府债务又叫双边贷款，它包括外国政府为了支持本国进口而对进口商品所给予的优惠性贷款，还有外国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性贷款。这类债务一般属于长期债务，利率比较低。但是它常常伴随着债权国政府附加的其它条件，其中包括政治、军事以及外交等方面的条件，因此，在决定是否接受这类债务之前，必须慎重考虑，以免受债权国的摆布，甚至沦为它的附庸。

国际金融组织债务又叫多边贷款，它包括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等等提供的贷款，它主要用于帮助有关成员国及发展中国家解决在长期经济发展、国际收支出现暂时逆差以及偿还债务等问题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多边贷款也属于优惠性贷款，但是它的条件不如双边贷款优越。

外国私人机构债务包括某国向国外的企业、银行等等私人机构所借的债务，它包括外国私人金融机构的贷款，债务国向国外私人机构发行的债券以及国际金融租赁等等。这类债务一般属于短期债务，比较灵活，但是利息率比较高，因此，这类债务在债务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宜过大。

2、国际债务的控制与管理

借入多少外债，这首先要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与重要产业的建设，而国内又一时筹措不到这大笔的开支，那么就可以考虑对外借债。其次，要注意有效地使用国际债务，保证把这笔资金用到生产性建设以及最能发挥其经济效益的地方，这样才能有利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保证国际债务的收益大于还本付息的金额总数。第三，还要考虑到债务国的还债能力。

确定国际债务规模与构成的原则是一按需借债、成本低廉、安全可靠、便于管理。为实现这些原则，借债方不但要注意贷款的来源、期限与使用，而且要注意利息率与汇率的变化对债务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此，债务人应多借以固定利率计算的债务，少借以浮动利率计算的债务，并注意借债来源的多样化，分散化，以避免利率与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衡量国际债务规模有两个常用的指标，一个是偿债率，即某一时期内某国国际债务还本付息数额占与这一时期内该国商品与劳务出口收益之间的比率。一般认为，偿债率在20—25%之间比较适宜。另一个指标是负债率，它有几种不同的测量方法，或者是债务（或支付的利息）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或者是总债务额与出口额之间的比率等等，反映某国在某一时期内的负债程度。

3、国际债务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开始借入外债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开始时，债务的来源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贷款，60年代中期以后转向从外国私人机构取得贷款。这虽然可以不受双边贷款中一些附加条件的牵制，但是加大了借债的成本，也不利于债务国进行统一管理。

70年代，由于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原油价格，许多国家的生产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它们只好高筑债台，接受了许多条件苛刻的短期债务，再加上管理不善，致使1982年发生了债务危机。借入外债不但没能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反而成了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这是应当吸取的一个沉痛教训。

国家之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The State） 指的是研究各个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程度、进行调节的方式及其经济意义的理论。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会相差很大，这里仅以一般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为例来进行说明。

1、国家的经济特征

两种制度下的国家所具备的性质显然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表现在为不同人的利益服务上。但是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经济特征

（1）掌握着有效的强制力量，以便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随时准备惩罚那些破坏经济秩序的人。

（2）国家的收入来源通常是百姓缴纳的税金，国家可以使用这笔收入来购买所需要的资源。

（3）国家的活动也要在它自己所制订的法律规范之内进行。

2、国家的经济职能及其演度

一般来说，国家的经济职能就是帮助经济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经济目标。但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具体作用不尽相同，这是与当时当地的生产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以及其它经济、社会、政治甚至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的。

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建立初期，主要作用是运用国家权力建立资本关系、发展市场、并制订有关的经济

法规。它的专制保证了原始积累的顺利完成。到18世纪中叶，开始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只负责维护国防、兴办公共设施以及保证正常的经济秩序。在这一时期，国家的干预程度降到最低点。这一状况深受亚当·斯密等人自由放任主张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各个经济行为人按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最大利益，结果也使得整个经济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运行。因此，政府只要充当"守夜人"就可以了，不必插手经济。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垄断组织，从而标志着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竞争阶段。这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开始加强，在对生产资源与生产过程进行调节与管理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有些国家还积极向外进行扩张活动。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多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对外贸易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与引导，福利事业的发展成为对劳动力资源等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多国与跨国的国家组织在管理世界经济中作用重大。

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与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通过没收或和平改造等方式将封建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资产收归国有、逐步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纯度。同时，还要制订有关的法律规章，规划发展的战略目标，并着手组建自己的经济理论。随着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它通常制订一个中期发展规划，再按照这个规划编制每年的具体计划。国家负责安排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活动，包括企业计划在内，主要对各种比例关系与结构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此外，国家在这一阶段的任务还有，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维护国家安全与兴办公共服务与保证正常的经济秩序。这一段时期被称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在这一时期中逐渐将一部分经营权力移交给企业，以便它们充分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国家仍然负责编制总体规划，并对国民经济中许多领域的发展作出决策性指导。不过这一时期的国家更重视为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完善立法体系与市场系统等等，它还通过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来鼓励经济的发展。总之，国家更注意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了。

3、国家干预经济的利与弊

除行政命令手段外，国家通常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外贸政策等方式来干预与调节经济，其具体手段有价格、利息率、信贷量、税率以及汇率等等。

国家干预经济通常可以使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更有计划性，从而避免资源的浪费，保证经济有效率地运行。此外，国家还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兴办公共设施（道路、能源、通讯等等），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保健等等），还负责维护经济秩序，保证国防力量等等。

但是国家干预经济也有不利的一面，干预程度过高会导致经济缺乏活力，计划中的失误往往反而导致更大的浪费，用于公共部门的支出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资本的形成等等。

另外，国家的经济作用经常受其它因素的影响，经济政策经常被纳入到政治战略之中，经济需要往往要服从政治需要。因此，国家的经济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力量对比以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左右，这使得经济政策有时不连贯，也难以制订长期不变的计划。

国债（National Debt）　又叫"政府公债"。指的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所借的债务的总和。当政府收不抵支的时候，它就得靠借债来维持运转。发行债券所要支付的利息通过税收落在纳税人头上。当国债中的某些债券到期的时候，政府还得发行新的债券，因此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债务总额。债券分短期债券与长期债券，短期债券有的只有90天的成熟期，而长期债券就可能要20年之后才到期。负责管理国债的政府机构要注意把握债券的平均成熟期，这样才能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维持一定的债务总额。国债管理中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在决定借债的数量与构成的时候，要考虑到它对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私有企业借债时所唯一要考虑的是使债务成本最小。这样，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的时候，它就大量发行短期债券，因为这时的利息率比较高；当经济处于低谷时，利息率很低，企业就大量发行长期债券。但是，如果一个政府这样做的话，那么将会导致经济更加波动。国债的债权人一般是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以及个人。

现代意义上的国债于15世纪出现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共和国中，后来逐渐被欧洲的许多国家所采纳。18世纪末期，美国联邦政府也着手设立举债的有关条款。一般来说，出现战争的时候，由于财政紧张，政府通常要大规模举债。此外，国债还可以用来建设公共工程以及扩张领土等等。

政府是否应当维持大规模的国债？这个问题一直为经济理论界所关注。几乎所有的英国古典学家都反对政府大规模举债，认为它破坏了价格均衡，使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斯密甚至认为，大规模的国债在长期内将可能毁灭所有欧洲国家。后来的反对者也认为，将资本集中于公共部门是一种浪费，如果这部分资本由私人企业投入到生产领域，那么就会使就业机会增加，工资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降低国债还可以由于利息支出降低，从而减轻税收负担，提高工资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此外，减少国债还可以提

高政府的威信。可是支持政府借债的人们认为，只有大规模的外债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而国债不过造成国内收人的重新分配，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政府可以增加税收或者货币供给量，以避免破产的可能性。再者，政府可以将举债筹集的资本用于建设基础设施，这是私有部门无法做也不愿去做的，但它也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30年代，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政府大规模举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认为将国债用于公共支出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刺激私人部门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走向繁荣。此后的几十年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纳了凯恩斯的赤字财政主张，国债规模扶摇直上。到了60年代，由于自由放任学派重新抬头，再加上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对治理经济问题的效力不如从前，因此，经济理论界又开始对国债的规模等问题进行探讨。

国家干预主义　一种反对自由放任、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经济学思潮和政策观点。早在16至17世纪，盛行于西欧主要国家的重商主义为了保证对外贸易顺差和金银进口，主张国家应当大力干预经济生活，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奖励、监督工业生产。这是最早的国家干预主义。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各个国家或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宣扬国家对经济发展具有特殊作用，因而主张国家必须干预经济活动，用以保护和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0世纪美国制度学派出于改良资本主义的目的，同样主张国家采用"集体控制"、"经济计划"一类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加以干涉。但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都没有能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造成有力的冲击。在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消长的长期较量中，真正使前者在最近半个世纪里占据优势还是约·梅·凯恩斯所发动的那场经济学革命。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确实会产生严重失业和经济危机，这是自由竞争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国家实行直接干预，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有效需求，才可能诊治资本主义的病症。由于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因而其政策思想又有"新重商主义"之称。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积极鼓吹下，又因为美国"新政"的示范效应，凯恩斯那套国家采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被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接受和采用，战后长期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最近这些年来，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大大消弱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力，但即便是新自由主义者一般都不否定国家适度干预的作用。应当看到，国家干预主义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国家发挥经济职能的需要。

肮脏浮动(Dirty Floating)　又称"管理浮动"，"清洁浮动"的对称。浮动汇率的形式之一。

易货贸易(Barter Frade)　易货贸易又叫换货贸易，这是一种买卖双方互换货物的贸易方式。在国际贸易中，易货贸易是指在换货的基础上把两国或多国的同等价值的出口与进口连成一体的贸易方式。也就是说，一国以一种或多种商品按一定的计价方式与别国等值的商品相交换。易货贸易的特点是双方互有进出，互换货物，且进出基本平衡，一般不用货币（外汇）支付。易货贸易通常有两种方式，即直接易货和一揽子易货。直接易货是一种传统的易货方式，也是一种狭义的易货。在这里，交易双方以等值的货物同时进行交换，根本不动用外汇。交易双方只需确定某种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清算单位，作为银行帐户上的结算符号，而不存在该货币在交易者之间的实际转移。要实现直接易货，交易双方必须拥有适当的商品，这些商品不仅在品种和数量上能够满足对方的需要，而且在价值上也必须相当，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很困难。因此，直接易货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在国际贸易中运用这种贸易方式有较大的困难。一揽子易货是一种广义的贸易方式，它是指贸易双方根据易货协议的规定，分别承担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购买对方等值货物的义务，交易货款一般通过记帐方式进行平衡，有时虽需运用外汇结算，但由于货款基本相等，因此没有太多的外汇流出入。一揽子易货比较灵活，它不象直接易货那样，要实现每一笔易货的平衡，它只需在一定的期限内，用几种出口货物去换回几种进口货物，货款分别结算，最后进行综合平衡。由于一揽子易货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它比直接易货更容易成交。事实上，目前国际上开展的易货贸易，主要采用一揽子易货方式。易货贸易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开展易货贸易的原因主要是交易双方缺乏足够的外汇，如果不采用易货方式，可能会影响这些国家贸易往来的经常开展。本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感到外汇短缺，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开展易货贸易。战后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它们纷纷放弃易货贸易转而开展现汇贸易。从目前来说，开展易货贸易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外汇短缺现象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开展易货贸易可以及时进口国家建设和消费急需的商品，有助于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

固定交割日远期外汇交易(Fix Maturity Date Forward Exchange Transaction)　见"远期外汇交

易"。

固定价格(fired price)(set price) 固定价格是指买卖双方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就明确规定商品的具体成交价格，同时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更改。固定价格的优点是价格明确、肯定，且便于核算。但是，在现今浮动汇率体制下，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变动频繁，采用固定价格，就意味着买卖双方要承担从订约到交货付款以至转售的整个过程中价格变动的风险，因此，固定价格的方法并不适应现代国际贸易的要求。依据固定价格的特点，多使用于立即交货或短期交货的合同。对于长期交货合同，为了避免价格波动的影响，即使采用固定价格成交，往往也需增订黄金或外汇保值条款，或明确规定如果计价货币币值发生波动，货价可做相应调整。

固定价格模型（Fixprice Models） 固定价格理论是研究在非瓦尔拉价格时多个经济单位和多个商品的交换和生产情况。希克斯（Hicks）曾经定义过两种分析方法：第1种是变动价格方法，它假定每个时期内的价格调整是迅速的，以至该期的交易量总是等于该期内的需求量和供给量，第2种是固定价格方法，它则假定价格在每个时期的开始就被给定，该期的交易量并不一定等于该期的供给量或该期的需求量。在变动价格模型中，交易行为只是在使超额需求等于零的价格下才会发生，它认为：价格调整对于超额需求是非常迅速的，在市场均衡达到之前，交易行为不会出现，这个思想的一个严格表述是瓦尔拉—萨缪尔逊反应调整过程。考虑某个交换经济情况，这个经济中存在着两种商品和两个经济单位，第i个单位开始拥有的第j种商品为Wij个（i，j=1、2），记瓦尔拉总超额需求函数为$Z^i(P_1,P_2/W)$，只要$Z^i(P_1,P_2/W)\neq 0$，交易行为就不会出现，价格将根据下述微分方程进行调整。

$$(dp_i/dt)=Z^i(P_1(t),P_2(t)/W)\quad i=1,2.$$

在这里，瓦尔拉超额需求为价格调整提供了市场信号。但是在50年代后期，人们发现：在一般的条件下，瓦尔拉——萨缪尔逊反应调整过程并不收敛，于是，就出现了非反应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两种运动：由在非瓦尔拉价格时发生的交易所导致的禀赋的分配运动和在现行的禀赋下对应于瓦尔拉的超额需求的价格调整运动。

现代的固定价格分析是以直接的货币交换为基础的，在每一个市场上，商品都是同货币相交换，这即是说在几个市场上，存在着n+1种商品（从0到n），其中第0种商品就是货币。固定价格分析提出了两个问题：（1）给定一个价格向量P（用货币进行标准化了的），什么样的配置与之相容？（2）给定价格向量P与之相容的配置，存在着那种类型的不平衡？（问题（2）是研究价格调整的市场信号的先决条件）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根据三个基本的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反映了市场制度的运行：（i）买卖自由；（ii）无市场摩擦；（iii）有效需求。最后一个原则反映了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前两个原则给出了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条件，即在现行的价格下i）没有任何交易者能够通过减少交易获得什么；ii）任何一对买者和卖者也不能通过增加交易获得什么。固定价格模型为价格指导型的资源配置机制提供了一个一般的分析框架。它可以用于i）短期分析；ii）垄断竞争；iii）价格（或工资、租金）控制；iv）价格（或工资）谈判。

固定成本（Fixed Cost） 固定成本是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固定成本是经济学中进行短期分析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短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这段时间，某些支出的成本不能改变。例如，在短期内投入在厂房、固定设备、固定管理人员的工资方面的成本是固定成本。即使不生产，这笔成本也照样要支付。在长期内，由于投入的成本可以变化，因此不存在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问题。例如厂商可以通过扩建厂房、购买设备，或卖掉厂房、设备、减少成本来改变各种成本支出。

固定投入（Fixed Input） 在产出与投入关系中，其投入是不随产出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生产要素投入称为固定投入。例如，在只利用资本K与劳动L生产某种产品q的生产函数

$$q=f(L,K_0)$$

中，产出量q发生变化，而资本投入K不变，保持为k_0，产出量的变化是由于劳动投入的变化而引起的。资本投入就是固定投入。固定投入是短期分析的一个概念。在短期内，厂商的某些投入如厂房、机器等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市场对于该厂商产品的需求突然扩大，而且预期这种需求的扩大是短期的，那么厂商不可能在短期内变动这些固定投入物，而只能通过增加变动投入物来增加产量。若进行长期分析，则不存在固定投入问题，因为所有的投入都可以变动。若市场对于某厂商的产品需求量增大，而且预期这种增大是长期的，那么厂商可以变动所有的投入，包括扩建厂房和增加设备来增加产量，以适应需求的持久扩大。因此，长期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固定投入。

固定要素（Fixed Factors） 固定要素是在一定

时期内其使用率不变的厂商的某些生产要素。在从某一市场均衡状态向另一市场均衡状态移动的情况下，厂商可能会保持一些生产要素的使用率不变。厂商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是出于厂商维持生产与盈利的目的。固定要素以及与此相关的固定成本会影响厂商对于市场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

在短期内厂商不可能随市场需求变化调整所有要素投入，因为总有一些要素是固定的。厂商的总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短期内需求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厂商价格变化。但只要价格高于市场变动成本，而低于平均成本，从而使得一部分固定成本难以弥补，厂商也不能停产，因为固定要素已经投下去，不能在短期内变动，只要开工生产，并使价格稍高于平均变动成本，就总可以使一部分固定成本得到弥补。因此，固定要素解释了短期内厂商价格易于波动的情况。

固定要素这一概念被加以发展并被广泛用于解释劳动市场失业变化的情况，劳动投入一般被看作是准固定要素（quasi-fixed factor）因为现代化生产下，由于专业化的发展，大多数行业内工人都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每一企业的技术工人都具有从事该企业工作的特定的技术，一旦解雇这些工人，对于雇主与雇员来说都受损失。雇主遭受训练费用的损失，工人遭受失业的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雇主与技术工人之间大都定立长期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厂商付给工人的工资并不与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价值相等，而是小于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差额部分为偿付固定的就业成本的租金。劳动的固定性程度越大，这一差额越大。这种理论解释了萧条时期大企业技术工人不易失业而小企业的非技术工人常常遭受失业之苦的情况。专业化分工较为突出的大企业的技术工人在一定时期对于厂商来说是一种固定的要素。大企业在雇用他们期间等于为他们花了一笔固定训练费。工人与雇主双方都愿意订立一种长期的雇佣关系，以避免解雇给双方造成的损失。而小企业的工作专业化并不强，雇用非技术的工人即可，非技术的工人对于雇主来说只是一种变动要素，一旦经济衰退导致其产品需求下降，小企业便解雇非技术工人。

固定汇率(Fixed Exchange Rate) 受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幅度之内波动的汇率。狭义的固定汇率仅指金本位制下的汇率。在金本位制下汇率的法定平价由两国货币的含金量决定，始终不变，市场汇率在由黄金输出和输入点决定的上下界限间波动、幅度很小。本世纪初，1 英镑的含金量为 113.0016 格令，1 美元的含金量为 23.22 格令，法定平价即铸币平价为：1 英镑 = 113.0016 / 23.22 = 4.8665 美元。黄金输出（入）点 = 铸币平价 +（-）运送黄金的费用，当时在英美间运送 1 英镑黄金所需费用约 0.03 美元，故美国的黄金输出点为 4.8965 美元，黄金输入点为 4.8365 美元。英镑和美元间的汇率因此只能在 1 英镑 = 4.8365—4.8965 美元间波动。广义的固定汇率还应包括可调整钉住汇率。如战后布雷顿森林制度下的汇率，各国规定一个本国货币和美元间的法定平价，轻易不得改变，市场汇率只能在法定平价的上下 1%（1973 年前）波动。

股票分割(stock splits) 也称析股。即股份公司有时会对其发行在外的股票进行分割，也就是把 1 股面值较大的股票分割为数股面值较小的股票。如把 1 股面值 100 元的股票分割为 2 股面值 50 元的股票。析股减少了股票面值而增加了发行的股数。对股票分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为了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一般地说，高的股价会降低股票的市场性，使交易困难，通过析股，使股票的买卖比较容易进行；（2）一些新发展起来的公司通过析股、分散股权来获得在交易所上市的资格、此外，析股还有利于吸收小额资本。

股价平均数(Stock Price Averages) 是用来反映多种股票价格变动的一般水平的综合数，通常用算术平均数来表示。人们通过对不同时期股价平均数的比较，可以认识多种股票价格的变动水平。股价平均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有：（1）简单算术股价平均数，即在选择股票样本的基础上，以采样股票每日的收盘价格计算，公式是，股价平均数 $=\frac{1}{n}(p_1+p_2+\cdots p_n)$ $=\frac{1}{n}\sum_{i=1}^{n}P_i$，其中，n 为采样的股票数，$P_i(i=1、2、\cdots n)$为各采样股票的收盘价；（2）调整算术平均数，它是为了克服在析股时简单算术股价平均数发生不合理下降的现象而采取的调整方法，其一是调整股价，就是将析股后的股价还原为析股前的股价进行计算，其二是调整除数，也就是通过调整除数来纠正股票发生析股后股价平均数发生的误差，从而达到具有代表性和敏感性的特征以客观地反映股票价格变动的情况。

股价指数(Stock Price Index) 是用来反映不同时期股价变动情况的相对指标，也就是将某一时期的股价平均数化为以另一时期股价平均数为基准的百分数。通过股价指数，人们可以了解计算期的股价比基期的股价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率。由于股价指数是一个相对指标，因此就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说，股价指数

比股价平均数更能精确地衡量股票价格的变动。其计算方法有：(1) 简单算术股价指数。即确定某一个交易日（或者某一时期）的股票价格为基期价格，再以报告期的股价与之比较，公式是：

股价指数$=\frac{1}{n}\sum_{i=1}^{n}\frac{P_{1i}}{P_{0i}}$,式中，$P_{0i}$为基期第i种股票价格，$P_{1i}(i=1,2,\cdots n)$为报告期第i种股票价格，n为股票的采样数目。(2) 加权股价指数。即把股票发行量作为权数（有时也把股票交易量作为权数）来计算的股价指数，它是为克服简单算术股价指数没有考虑各种采样股票的发行量或交易量不一样对整个股票市场的股价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因素而进行的，如果以基期发行量为权数，其公式为：加权股价指数$=\frac{\sum P_1Q_0}{\sum P_0Q_0}$，如果以报告期发行量为权数，则公式为：加权股价指数$=\frac{\sum P_1Q_1}{\sum P_0Q_1}$,式中，$Q_0$为基期发行量，$P_0$为基期股价，$Q_1$为报告期发行量，$P_1$为报告期股价。它们比简单算术股价指数更能准确地反映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情况。

股份有限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简称股份公司。它是把确定的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由一定人数的有限责任股东组成的公司。在各国的公司中，股份公司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特征有：(1) 股份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只负有限责任，即以其投入公司的股金为限对公司的债务负责。其全部资本划分为若干等额的股份，以股票的形式在社会上公开发行出售；(2) 股份公司是典型的财产或资本的组合公司，股东只有在持有股票时，才是公司财产的所有者之一；(3) 股票可以在市场上随意转让买卖，公司对此不加以限制，股票的价格随行就市；(4) 股份公司的股东有法定最低人数的限制；(5) 公司财务必须公开；(6) 多数股份公司的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的所有者与经营者通常是相分离的；(7) 股份公司的股东人数众多，资本筹集较容易，竞争能力较强。

股份固定的投资公司（Closed— End Investment） 股份固定的投资公司是指不能随时或者不断地赎回股票的投资公司，也称之为限额基金。它不同于单位信托投资公司：单位信托一端是"封闭"的在外股票不能增加，但另一端却是"开放"的当有人决定赎回股票时，股票的数量可以减少。

大多数（不是全部）这样的投资公司有无限的生命期。从证券组合中得到的红利和利息付给股东们，实现资本收益，减少资本损失。并且大多数公司允许（并鼓励）用这种支付进行重新投资。公司保留这些货币并送给投资者额外的股票。这些股票是以单位股票所取得的净资产价值为基础的，通过计算出所有资产的市场价值，减去所有负债，并用在外股票的数量去除而得到的。

股份固定的投资公司也是把资产投在其它证券上的公司，和其它公司一样，大多数这样的公司可以通过提供股票方式发行新股，但这并不是经常地和不断地，公司的资本构成在大多数时间内是"闭锁"的。

大多数的股份固定投资公司能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自己的股票，只要市场价格低于净资产价值，重新购买回股票就将增加基金每股的净资产价值。例如，假定每股净资产价值是20美元，但股票用16美元就可以买到，则经理可从基金的证券组合中卖掉20美元的证券，然后买回一张基金在外的股票，这样就多出了4美元。如把这4美元销毁，遗留的股票的净资产价值仍然是4美元；但如把这4美元加到基金里，则每股的净资产价值将增加。

股份固定投资公司的经理很少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或许因为他们的费用是所管理资产总价值的函数。然而，当价格下降到比净资产价值低时，一些希望重新投资的股东却在公开市场上用得到的红利去购买股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股份固定的投资公司在美国是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活动。它通过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优先股及认股证书还有卖出普通股来获取货币。这使公司中不同所有股的价值发生有趣运动，并提供其它方式所不可能具有的投资机会。1940年《投资公司法》所收编的限制条款是对这种活动的抑制因素，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投资者在管理股份固定投资公司中所采用不同形式金融工具的兴趣似乎有所减弱。如果说除那些普通股持有者外还有一些在外股权，那么现在大多数的股份固定投资公司则只有很少的这种在外股权。

股份固定的投资公司的股票是按所涉及团体共同达成的价格在经纪人之间进行交易的，一些股票被列在国家级交易所里，并且是十分有效的交易。其它方式的交易很少，这种股票的价格和其净资产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一个公司不能随时准备赎回股票或以净资产价值在公开市场上买回这些股票，那么股票就不会有明确的最低价格；如不能以净资产价值从基金赎回新股票，那么股票就没有明确的最高价格。

股息政策（Dividend Policy） 一个企业把收入分配给它的普通股，有两种主要方式。它可以召集它

的普通股东去宣布一个现金分配方法，也可以重新购买股票。股票的重新购买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形式：(1) 注册投标方式，即宣布要从股票持有者手中以一定价格收购股票；(2) 公开市场购买；(3) 协议重新购买。到目前为止，最流行的向股东分配收入的方法是支付现金股息。绝大多数企业按季度支付现金股息。股息由企业的董事会在被称作"宣布日"的那天宣布。董事会的宣布指出要对那些在册的股东在一个确定"记录日"进行现金支付。股息支票通常大约在晚于记录日两周的"支付日"寄给股东。股票交易规则一般规定在记录日前几个商业日的"前股息日"之前买卖股票的要带股息，在前股息日之后买卖股票就不带股息。股息可作上标记也可不作标记。绝大多数股息是不由管理部门作标记的。不作标记的股息通常指"普通股息"。有时，管理者给股息一个特殊的标记，最普通的标记是"特殊"（extra）这个词。企业每年支付给股东大量的金钱，并且这种支付的绝大部分采取通常的现金股息。有时，企业也进行有特殊标记的现金股息支付和大规模的股票重新购买。我们也知道股票价格在普通股息增长时，或宣布特殊股息以及股票重新购买时持续上升，而在普通股息下降时股票价格也下降。一个正在增强的观点是由于股息变动反映着由管理者掌握而不为外界投资者所知道的信息的情况，所以发生了股票价格变动。

股票价格的平均与指数（Stock Price Average And Index） 又称股票价格指数（stock price index）它是一种为衡量股票行市变化情况而制定的股票价格的平均数。其计算方法通常是以某年某月为基期，并把基期的股票价格视为100，以后各期的股票价格同基期相比计算出的百分数即为该期股票价格指数，然后再用一组有代表性的股票的价格指数平均（通常是加权平均）数来衡量整个市场的股票价格。这种方法的奠基人就是查理斯·H·道（Charles H.Dow），他在1884年就根据10家铁路公司的11种有代表性的股票编算了股票价格指数,以后对所选股票屡作调整和增减。现在股市已成为市场趋向的集中反映，股票价格指数不仅是证券经纪人进行买卖中介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许多国家政府用来掌握与调节经济的重要指标和手段。目前世界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的平均与指数有许多种，主要的有：(1) 道—琼斯平均数（Dow —Jones Average）它是美国道—琼斯公司编制的表明大工业垄断公司股票价格平均数。它的历史最悠久，而且一直处于最有影响的地位。1897年道—琼斯把原来的11种股票改为20种铁路公司股票，且又另外提出了12家工业公司的股票指数，这就是道—琼斯工业股票股票平均指数（Dow—Jones Industric Aveange），(DJIA)。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65家美国公司股票共有四组指数：①30家工业公司股票指数；②20家铁路公司股票指数；③15家公用事业公司股票指数；④前三组合计的65家公司股票指数。报刊上经常引用的道—琼斯平均数通常指第一组平均数。(2) 斯坦达德和普尔指数（Standard &Poor's Index）它是美国斯坦达德—普尔公司编制的加权平均综合股票价格指数。包括各个工业部门的130余种股票价格，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大约90%的普通股票价格计算出来的，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3) NYSE普通股票指数（Common—Stock Index）这是美国股票交易所1966年开始编制的股票价格指数，包括所有上市股票，根据各种股票的市场价值加权平均。(4) 恒生股票价格指数，它是由香港恒生银行编制的用来反映香港股票市场波动的一种股票价格平均数，以银行和地产股票价格指数作为主要计算根据。

贬值(Deppxecuition) "升值"的对称。(1) 由外汇市场上外汇供求状况变化造成的一国货币对外价值即汇率的下降；(2) 一国货币对外价值下降，包括由政府货币当局明文规定的法定贬值及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升值。

侨汇（Foreign Exchange Of Overaeas Chinese） 侨汇汇款的简称。国外侨胞、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汇入国内的款项，属非贸易外汇。按照不同用途分为：(1) 赡家侨汇。用于赡养、接济国内亲属；(2) 建筑侨汇。用于为自己或国内亲属修理、兴建或购置房屋；(3) 捐赠侨汇。为建设家乡或资助某项事业捐赠的款项；(4) 投资侨汇。用于国内投资的款项。侨汇可采取信汇、电汇、票汇和约期汇款形式，大部分是信汇。

凭规格买卖（Sale By Specification） 所谓商品的规格是指一些用来反映商品品质的主要指标，例如：化学成分、纯度、含量、性能、长短、粗细等。买卖双方通过提交商品规格来说明商品的基本品质状况，以此为依据，进行交易，称为凭规格买卖。

凭规格买卖的方法明确具体、方便准确，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较广。

对于同一类商品，按其规格上的差异，还可分为品质各不相同的若干等级，依照这些等级进行交易时，又称为凭等级买卖。

凭样品买卖（sales by sample） 又称为看样成交。这里样品是指从一批商品中抽取出来的或由生产

或使用部门加工设计出来的用以代表整批商品品质的少量实物。凭样品买卖则是指买卖双方约定以样品作为出口商交货时商品品质的唯一依据。

凭样品买卖方式，一般由卖方提供标准样品，而后经买方确认后成交，称为质量以卖方样品为准；也可以由买方主动提出样品，向卖方订货，此种作法称为质量以买方样品为准。为慎重起见，对于买方的来样，卖方可以制造与来样类似的样品，交买方确认，这种样品称为对等样品。

在凭样品买卖的方式下，依照国际贸易惯例，除非合同中另有约定，否则卖方应保证所交货物的品质与样品完全一致，如果货物品质与样品不符，买方有权拒收货物并请求损害赔偿。在实际业务中，为了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通常在合同中加注"品质与货样大致相同"字眼，以减轻卖方责任，消除不必要的纠纷。

凭标准买卖（Sale By Standard） 所谓标准，是指由政府机关或商业团体颁布的统一化的商品规格、等级及其检验方法。目前，对于某些商品，在国际上已经形成通行的标准，这些商品的进出口，只需列明商品标准的名称和等级，极大地方便了交易的进行。但是，对一些初级产品的贸易还尚未形成产品品质标准化，或这些商品的品质规格难以订出统一标准，例如农副土特产品，这时通常以"良好平均品质"来说明商品品质。所谓"良好平均品质"（fair average quality）一般是指装运地在一定时期内出口该项商品的平均品质水平，也可以说是指合同约定的生产年份的中等货。

商品品质标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而变动的，在以标准成交时，必须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以那国标准为依据，并须注明该项标准的出版年代和版本，以免因所据版本不同而发生合同纠纷。

备运提单（Peceived For Shipment BLC） 备运提单又称为"收货待运提单"，它是指承运人已经收到货物但货物还未装船之前，向托运人签发的提单。备运提单只是表明承运人承认货物已收、准备装船。但在这种提单下，无法确定准确的装船日期和明确的船舶名称，这就有可能造成收货人由于无法预计货物到达日期、收货不及时而出现损失，也使得在出现承运人违约时，提单持有人无法请求扣押船只。因此，备运提单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较少。

备运提单是可以改变为已装船提单的，在货物已经装船之后，承运人就可以在备运提单的正面上加注"已装船"，写明装船日期和船名，并由其签字。这样，备运提单就成为已装船提单。

但是，随着集装箱运输方式的迅速发展，备运提单的使用也日益增多。这是由于采用集装箱运输，收货是在内陆，无法确定装船名称和装船日期，只能签发备运提单。在这种条件下，签发备运提单是必然的，可以接受的。

备用信用证（Stand By Credit） 又称为担保信用证（Guarantee Credit）。备用信用证是开证银行代表开证人对受益人承担义务的凭证，如果开证人未履行合同，开证银行保证为其向受益人付款。备用信用证是新近发展的一种支付方式，国际商会于1983年已明确注明备用信用证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信用证，适用于《银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在备用信用证下，如果开证人违约，受益人可在信用证的有效期和金额范围内，可凭汇票和一份开证人未能履约情况声明书向开证银行要求付款，以补偿开证人违约造成的损失；但是，如开证人并未出现违约情况，也就无须使用备用信用证。由此从表面上看，各国信用证与银行保证书（banker's letter of guarantee）相似，但两者是有实质区别的，备用信用证作为信用证，受益人只要履行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则开证银行保证付款，而且信用证上对开证行的权利义务有明确规定，因而开证行面临的风险仅限于信用证规定的范围。

备用信用证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信用证，不仅可以起到传统意义的信用证结算货款的作用，而且多用于借款保证、投标保证，履约保证、赊购保证等情况。特别是世界上有些国家法律不允许开立银行保函，这些国家的银行更是采取备用信用证的形式来代替开立银行保函。

居民税收管辖权（Resident Tax Jurisoliction） 这是按照属人主义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它不考虑跨国纳税人所得来源地或财产所在地，而只根据居民身份的认定行使税收管辖权，只要按照有关标准确定了跨国纳税人作为居民的法律身份，居住国就有权对其得自任何来源的收入或存在于任何地点的财产行使课税权。

显然，居民税收管辖权行使的关键是居民身份的判定。所谓居民，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法人，二者的判定标准不同，同时，无论是自然人居民的判定标准，还是法人居民的判定标准，不同国家也都不尽相同，所以需要国家之间分别地进行协调

就自然人而言，一般以居住或滞留于某国的时间超过某一期限为判定标准，超过这一期限则成为该国居民、对该国拥有纳税义务。需要指出，这一判定标准有时还要考虑个人意愿，即，跨国纳税人是否愿意

成为本国居民。

就法人而言，一般以登记注册地为准，但也有其他标准，如以总机构所在地为标准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标准等等，还有的国家并无一定之规，主张通过协商解决。

建设费用的经济性（Constmction Economy） 指在一定限度内，工厂的建设规模较大，单位生产能力的投资额较小。

承兑（Acceptance） 承兑是指汇票的指定付款人表示接受出票人的付款指示，同意承担付款义务，在汇票到期时进行付款，而将此项意思表示以书面记载于汇票之上的行为。承兑行为仅与票据中的汇票有关，并且只用于远期汇票，承兑的方式通常是汇票的受票人在汇票上写上承兑字样，注明承兑日期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由于汇票的受票人是由出票人单方面指定的，在受票人对汇票承兑之前，是无法确定付款人是否愿意承担付款义务、只有付款人对汇票进行了承兑，付款人才承担了对汇票进行付款的义务，并成为此汇票的主债务人。这样，承兑行为的作用就在于确定付款人对汇票的付款义务。

如果远期汇票的付款人拒绝承兑汇票，由于此时此付款人并未成为汇票的债务人，因而持票人只能对汇票的所有前手背书人包括出票进行追索，要求偿还汇票金额。如果付款人对远期汇票进行了承兑，但在汇票的到期日却拒绝付款，则持票人可直接对汇票的承兑人进行起诉，同时向汇票的任何前手背书人，包括出票人进行追索。

承兑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普通承兑（general acceptance），这是指承兑人未对汇票出票人的指示附加任何条件的承兑；另一类是条件承兑，即是指付款人在进行承兑时，对出票人的付款指示添加了某些限制性条件。

承兑交单（Document Against Acceptance，简称D / A） 承兑交单属于跟单托收。它是指出口商发货后，取得货运单据，向进口商开立远期汇票，将汇票和货运单据交托收银行代为托收货款的同时，指示银行：进口商承兑汇票后，银行即可向进口商交出货运单据而使其自行提货。这样，在承兑交单方式下，出口商交单仅以进口商承兑为条件，汇票到期日进口商方才支付货款。从而在承兑交单下，进口商甚至可以完全利用出口商的资金与出口商进行交易，承兑汇票，取得货运单据后，将货物转手出售而取得货款，而后在汇票到期日将此笔款项转交出口商即可。因此，进口商多愿意采用承兑交单的结算方式，而由于出口商在承兑交单下，面临进口商拒绝承兑和拒绝付款的双重风险，而不为出口商所愿意接受。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ial Awards） 国际贸易过程中的争端和纠纷通常是用仲裁的办法来解决的，但由于各国的仲裁法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就使得各国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影响了国际贸易纠纷的顺利解决。为此，国际社会缔结了几项有关仲裁的国际公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联合国主持下于1958年缔约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它又被称作"纽约公约"，该公约于1959年6月7日生效，至今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国于1986年12月加入了该公约。纽约公约共包括16个条款，它具体规定了各缔约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义务及条件。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互相承认对方国家作出的仲裁裁决，并根据公约的规定结合被申请执行国的程序，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该公约还规定，被申请国可以在下述情况下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这些情况是：第一，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第二，被要求执行裁决的当事人没有得到有关指定仲裁员或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未能获得申诉的机会；第三，仲裁的内容超出了仲裁协议规定的范围；第四，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与仲裁协议不符；第五，仲裁裁决尚未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或者该裁决被仲裁地国家的有关机构撤消或停止执行。公约允许缔约国在加入时，声明对公约的适用范围。因此，如果被申请执行裁决的国家认为争议的事项不宜用仲裁方式处理或认为该裁决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那么该国就可以拒绝执行该裁决。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作了两点保留，一是只承认和执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上作出的仲裁裁决，二是只承认和执行属于商事范畴的仲裁裁决。

承销（Underwriting） 证券发行的一种常用方式，它保证发行者通过证券的销售而获得所需要的货币。其进行步骤是：（1）投资银行与发行者协商，达成协议条款，由投资银行负责调查发行者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并对新证券的销售进行分析预测。投资银行应取得发行公司的股东的合法授权；（2）由于承销新证券的风险大，一般发起的投资银行要组织一个承销集团（Underwriting Syudicate）共同承担证券发行中的风险。这个承销集团由几家投资银行组成，而由发起的投资银行任集团经理。如果承销的数额少，也可以不组织承销集团；（3）为有效地推销证

券，一般还组织由众多金融机构如各种证券公司等组成的推销集团（Selling Group），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证券销售给各种投资者；（4）双方正式签订合约，规定承销给投资银行应支付的款项和日期，以及筹资费用等。

承诺调解（Consent Settlement）　当着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面调解案件的一种方法。在接受承诺调解办法时，被指控违法的企业组织只要同意签署一份停止违法竞争或劳动规章制度书就可免受审讯。由委员会过问的案件，大约70%是通过承诺调解办法解决的。

承兑提示（Presentation for Acceptance）　是指持票人出示远期票据，要求付款人进行承兑。在进行承兑提示的时候，执票人须亲自或委托代表，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付款人进行承兑提示。依照惯例，承兑提示的地点是指票据上指定的付款人所在地址。如果票据上未载明付款人地址，而持票人经过合理的努力仍未能与付款人取得联系，则持票人可免于进行承兑提示。但是，如果持票人认为有理由相信在承兑提示时，付款人会拒绝承兑，而未做承兑提示，责任由持票人承担。通常只有远期票据才需持票人进行承兑提示，而即期票据则只需付款提示。对于见票后确定付款日期的远期票据，需特别注意及时向付款人进行承兑提示。

参与分红的优先股票（Participating Preferred stock）　指除了按规定的股息率获得股息外，还可以分享公司剩余的盈利。例如，公司按规定支付给优先股的股息，普通股也获得与优先股同样数量的分红，如果公司尚有盈余，那就可以在普通股与优先股之间平均分配。

林达尔，埃里克·罗伯特（Erik Robert Lindahl，1891—1960）　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1919年获隆德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起先后在隆德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任教，1932年担任哥德堡大学教授，1939年又转任隆德大学教授，直到1958年退休。主要代表作有《货币政策的范围及手段》（1929年）和《货币和资本理论研究》（1939年）。作为瑞典学派的一员，林达尔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试图建立一个一般的动态理论体系，以取代传统的静态均衡分析。为此，他提出了"期间分析"的方法，即分别分析相连续的各时期的经济变动过程，具体地说，建立一个动态的序列模型，把该经济变动过程划分为若干个短的时期，分时期地考察有关经济变量（如生产、消费、价格等）在这些转折点上的相应变化及其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同时，他又强调了"预期"因素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决策者的心理预期（即对未来的价格、成本、需求以及一般经济前景的主观估计），对经济动态过程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在这里，他进一步提出"经济计划"的概念，认为它具有普遍性，即各种经济主体都有某种形式的既定计划，代表着他们对将来的预期。他紧密结合经济动态过程，详尽地阐述了其计划理论，区分了经济计划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表现形态，并论证了动态经济理论特别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另外，他深入考察了利息率是如何通过影响诸多经济因素的变动进而影响物价水平的，指明魏克塞尔单纯强调利率对投资的影响的做法有失偏颇，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累积过程理论，这同样是有积极意义的。

林达尔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　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分析中所使用的一个概念。林达尔均衡是指在公共产品达到供求均衡时，均衡的数量是符合每一个消费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的需求愿望的公共产品总量，均衡的价格是所有消费者愿意为该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也称为为公共产品支出的税收）的加总，这一加总的税收额等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主要特征是消费的不可分割性与排他性。一个人消费某种公共产品的同时不能排斥另一个人对于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而且每个人所消费的公共产品量都等于公共产品总量（产品不可分割）。例如，城市的护城堤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它是不可分割消费的；每一个人所消费的该种公共产品量等于该公共产品总量。

由于公共产品不可分割，不能分割出售，因此不存在着象私人产品那样的公共产品市场。但是，公共产品的消费与私人产品的消费一样是居民消费不可缺少的部分。如何有效地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上配置资源，生产出符合人们需要的公共产品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项重要课题。林达尔均衡给出了公共产品有效生产的均衡条件。由于公共产品不可分割，每个消费者消费公共产品的数量等于公共产品总量。但每个人对于公共产品的评价不同，或者说公共产品对于每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不同，因此，消费公共产品的各个消费者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也是不同的。只有按照消费者对于公共产品的支出意愿来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征收费用，才能符合公共产品生产的效率条件。

在私人产品的场合，个人为产品支付的价格等于所消费的私人产品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用；或者说消费者根据商品边际替代率来支付商品的价格，使两商品

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价格的比率，并且在均衡时使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边际成本）。这样便达到了私人产品生产的效率、达到了均衡。在公共产品的场合，消费者也根据公共产品给他带来的边际效有而对公共产品付费。或者说消费者根据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间的边际替代率对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付费。在均衡时，所有人消费公共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加总等于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这符合公共产品的效率条件，达到了公共产品的均衡。如果用征税方法来解决公共产品生产的费用问题，应该使每个人的税收额等于他消费公共产品的边际替代率。所有人税收加总恰好等于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这便是林达尔均衡。这表明，公共产品的均衡条件不同于私人产品。在私人产品场合，各个人支付同样的价格，但所消费的私人产品数量不同，在公共产品场合，各个人支付不同的价格，但消费同样数量的公共产品。

英格拉姆，约翰·凯尔斯（John Kells Ingram，1823—1907）　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生于爱尔兰，1843年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自1852年起一直担任该校的教授，1898—1899年还当过副院长。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史》（1888年）是19世纪少有的经济学史名著，曾对世界各国有过很大的影响。英格拉姆是所谓英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该书里，他对古典学派特别是它的方法论及其结论作了严厉的批评，也攻击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学派，而用赞赏的态度详介了德国和英国的历史学派学说。该书的体系安排和叙述方法也充满历史学派的色彩。但是，由于浓厚的辩护色彩和易走极端的态度，英格拉姆的著作及其学说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已没有什么影响。

孟，托马斯（Thomas Mun，1571—1641）　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英国伦敦商人家庭，本人亦为著名商人，曾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他的主要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是对《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21年）一书的彻底改写，死后由其子于1664年印行。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早期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日趋过时，但仍有人依此来攻击东印度公司为经营转运贸易而大量输出货币的做法。正是为了反驳这种攻击，孟阐发了著名的"贸易差额论"。他指出，对外贸易是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但不能采用早期重商主义者那种限制货币输出来获取财富的做法，因为输出货币用以换回商品是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贮存货币并不能增加货币，只有将货币不断用于有利可图的流通活动中，获取贸易顺差，才能最终换回更多的货币。因此，看待"少买多卖"原则应当着眼于全年贸易的最后总结果即最终的贸易顺差上，而不该强求短期里的每笔具体贸易都须这样办理。这种贸易差额论的主张，把重商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见重商主义条）从上述根本思想出发，托马斯·孟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获取贸易顺差的措施：大力发展本国工业、手工业和农业，增加商品出口；提倡节约，尤其不要使用外国消费品，减少外国货进口；重视航运业和转口贸易，增加航运、贸易、关税等收入；实行保护关税，但对用于再出口的外国货物应给予照顾；鼓励人口繁衍，为发展本国工业而提供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等等。显然，托马斯·孟的理论主张代表着当时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杰文斯，威廉·斯坦莱（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　英国经济学家，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数理经济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的一个商人家庭。曾两度入伦敦大学学院深造，186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866年担任曼彻斯特欧文学院的教授，讲授逻辑学、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876年改任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46岁时因溺水而丧生。

杰文斯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年）、其他经济著作有《煤炭问题》（1865年）、《政治经济学入门》（1878年）和《货币和金融研究》（1884年）等。他还出版过一些关于逻辑学和科学哲学的有名著作。

边际效用价值论　杰文斯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出发，又强调经济学的诸规律须用数学加以表述，故称"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他完全从主观感觉来解释价值，认为商品的价值纯然取决于它的效用，而其效用就在于使人产生"快乐"和避免"痛苦"。他进而又区分了总效用和效用程度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物品所能满足的欲望总量，后者是指物品某一单位所满足的欲望强度。他指出，由于物品的效用直接同消费者的欲望与需求相联系，所以，随着物品量的增加，欲望随之降低，其效用也就相应减少。这实际上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律。据此，他特别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的概念，把它说成是现有物品量中最后增加一个极小单位时所带来的效用程度，因为物品最后增量的效用最小，故称为最后效用。杰文斯强调，物品的价值量就是由它的最后效用程度所决定。可见，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即为边际效用价值论。他还用效用理论分析了如何按照各种用途合理使用物品的问题，指出当一种物品有多种用途时，要取得最大效用，就应当使分配在每一种用途上商品量所得的最后效用程度

相等。

交换理论　在杰文斯的心目中，交换可以增加效用和节约劳动，是经济学研究相当重要的课题，事实上交换理论成了其经济学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认为，价值实际指的是交换比例或由该比例所表示的最后效用程度，即只是一个数量关系。他进一步指出，交换总要经由市场才能进行，但市场无论广狭，它的交换原理总是相同的，即在同一市场上，同一种商品的各个部分在同一时候必须按相同比率（即同一价格）进行交换。此即著名的无差别法则。在讨论两个人进行交换的经济行为时，他根据无差别法则又得出交换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即：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是交换后可供消费的诸商品量的最后效用程度之比率的倒数。换言之，交换后这两种商品对双方的边际效用与两者的价格成比例，这样交换就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如再继续交换，双方都不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杰文斯对上述交换理论还用交换方程式加以表述：

$$\frac{\varphi_1(a-x)}{\psi_1(y)}=\frac{y}{x}=\frac{\varphi_2(x)}{\psi_2(b-y)}$$

其中 a 与 b 分别代表两种商品的总量，x 与 y 分别代表这两种商品的交换量，而 y／x 代表它们的交换比率（价格）。至于交换后这两种商品对 A 交换者的最后效用程度分别为 Φ_1（a−x）和 Φ_1（y），对 B 交换者的最后效用程度分别为 Φ_2（x）和 Ψ_2（b−y）。杰文斯申言，该方程式体现的交换原理是全部交换理论和经济学主要问题的基石。其实这不过是其效用论在交换理论中的运用。

劳动理论　杰文斯依据其主观价值论，研究了劳动本身的性质及其数量问题，构成了他的劳动理论。他认为，经济学上的劳动是指人们心理或身体所忍受的任何含有痛苦的努力，它以未来利益为目的。可见，他不仅完全从主观感觉意义上来理解劳动，而且特别强调劳动与痛苦的联系。他指出，劳动生产物或劳动报酬会带来效用（即带来快乐），而劳动本身又经历痛苦，因此，考察劳动的法则必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一并研究。具体地说，人们在劳动时，先有一段不适应引起痛苦的经历，再是短暂的一阵快乐，并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而下落，到一定时点，快乐转化为痛苦，这种痛苦并随继续劳动而按递增速度加剧。换言之，劳动本身带来的痛苦随劳动量的增加而递增。同时，劳动者从劳动产品中得到的效用又随产品量的增加而递减，即其效用的变化服从于效用递减规律。这样，对劳动者来说，其支付的劳动量即劳动时间应该决定于劳动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恰好等于劳动本身引起的边际痛苦的那一时点，因为此时得到的总效用量最大。如果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超过这一时点，就会带来更多的负效用。倘若劳动时间既定时，要生产两种或多种产品的劳动量分配，则应使得最后劳动增量在各种产品生产上所带来的效用增量均相等，因为这种均衡状况能给劳动者以最大的总效用量即最大的满足。这即为劳动分配法则。可见，杰文斯的劳动理论仍然依赖主观因素，并提出劳动进行到一定点后会带来痛苦，即成为一种"负效用"，故它后来被称作劳动负效用说，而且影响到英国的边际效用学派一般都把劳动的"负效用"当成是决定劳动供给量的因素之一。

其他经济理论　由于杰文斯始终使用微积分的语言来阐述和展开他的各项理论，其学说显得精致深入，从而结束了以往那种数学仅是表述而不是研究经济理论的表面"结合"的状况，这对数理经济学的最终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的"太阳黑子"经济周期论，根据太阳出现黑子运动的周期来说明农业收成的好坏，进而证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具有周期性的规律，也是一种独特而又荒谬的经济周期理论。其实它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失业和经济危机归咎为自然因素所致，从而抹煞了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和社会性质。此外，他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在当时亦有声誉，特别是对大量经济资料的整理编制工作颇具成绩，还引申发展了物价指数理论。总的说来，杰文斯因其纯理论研究而闻名于世，而且其学说始终以主观评价为基础，当时对一贯强调客观的供给（成本）因素的英国传统经济学造成巨大的冲击，故经济学史上将他称为"主观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罗宾斯，莱昂内尔（Lionel Robbins，1898－1984）　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923 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1929—1961 年任该校教授，1962—1967 年为兼职教授。此外，他还担任过政府官员和《金融时报》社社长。罗宾斯是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同其老师坎南一起坚决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使得伦敦经济学院长期成为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心。他强调价格制度和市场机制能够最合理地配置生产资源。他抨击集体主义经济降低工作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妨碍个人自由。他指责工会组织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使得企业难以盈利从而不能维持充分就业，于是造成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总之，他是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罗宾斯在经济学史上的声名首先来自他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 年）一书。在该书里，他对经济学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把人类行为作为可替代使用的给定目的与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按照这种解释，经济学最终变成了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分支，不必再研究实际的经济现象和进行经验验证，它只是保证最大

限度地实现人们所抉择的活动目标。这对以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发生重大转换起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罗宾斯后来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经济思想史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理论》(1952年)和《罗伯特·托伦斯与古典经济学的演变》(1958年)这两部著作使其名声大增,确立了他作为世界一流经济学史家的学术地位。然而,罗宾斯身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并未作出过显著的理论发现,也没有形成其独特的一套学术思想,因而他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起的实际影响并不大。

罗雪尔,威廉(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 1817—1894) 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汉诺威一个高级法官家庭,早年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学和政治学。1840年任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和国家科学的讲师。1841年开始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1843年升为副教授,1844年又任教授。1848年转任莱比锡大学教授,任职达46年之久。其主要代表作是《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843年),该书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其他主要著作有《国民经济学体系》(共5卷,1854—1894年)、《16和17世纪英国经济学说史》(1851—1852年)、《德国经济学说史》(1874年)等。

罗雪尔是历史学派研究方法的奠基者。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当论述一国经济生活的发展规律和进程,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生活,其各方面现象相互之间有着最紧密的联结,因此,政治经济学要作出这种描述,特别须密切地结合法律、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历史来进行。据此,他把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并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叫做"历史的方法"或"历史的生理学"的方法。

"历史的方法",是指尽量忠实地记述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即按照时代的顺序,对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历史归纳的研究。根据罗雪尔的解释,历史方法可归结为四个基本原理:1、目的在于记述各国国民在经济方面的想法,要求,以及所作的努力,所获的成就及其有关原因,即个别考察法。2、对历史上各个文化阶段的研究同考察现代经济关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即历史考察法。3、近代的各国国民在各方面都紧密相联系,考察本国的或一国的国民必须综合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整体的比较的研究,即综合考察法。4、决不轻率地赞赏或非难某一特定的制度,因为它不可能对一切国民或在所有文化阶段上都会是有效或有害的,即相对考察法。这些新的方法论原则虽然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视野和研究范围,但却严重贬抑着科学的抽象法的重要意义,从而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事实上,罗雪尔的经济研究只不过罗列堆积着大量的经济史料,进行纯经验主义的观察和描述,并未能推进经济理论。而历史学派的其他学者更把罗雪尔的错误倾向推向极端,致使"历史方法"成为对经济规律乃至经济学本身的否定。

罗雪尔还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他承袭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认为生产的进行需要劳动、自然和资本三者合作,并根据某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优势地位,把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他又主张国民经济的生活和动植物界一样,要经历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四个时期。在他看来,其幼年时期"自然"占最重要的地位,"劳动"在成年时期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而到了老年时期则是"资本"占优势地位,此时国民进入最幸福的时代。不过他承认这种好景不会长久,需要国家采用"人工治疗"法加以干预,使之继续保持平静状态。应该说,这种阶段论已经着眼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它未能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本质特点和阶级内容,反而起了美化资本主义的作用,因而仍然是不正确的。

罗伯逊,丹尼斯·霍姆(Dennis Holme Robertson, 1890—1963) 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英国剑桥,早年习古典文学,后在庇古和凯恩斯指导下钻研马歇尔经济学。自1914年被选为剑桥三一学院研究员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几乎都在剑桥大学度过。1947年他还接替庇古担任剑桥经济学讲座教授,直至1957年退休。他曾多次被国内外大学授予名誉学位,并被加封为爵士。罗伯逊的主要著作有《产业波动研究》(1915年)、《货币》(1922年)、《银行政策与物价水平》(1926年)和《经济原理讲义》(1957—1959年)等。对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是罗伯逊的主要理论贡献。他不仅写出英国学者第一本论述经济波动的专著,而且提出了独特的理论见解。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货币利润水平、就业水平和价格水平发生周期性的波动,这种产业波动也是长期经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农产品产量变动、资本品和消费品边际效用的变动、技术发明、利息率、投资水平以及需求变化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或范围不同地影响着产业波动。他还指出,由心理因素和货币力量引发的经济波动则是不适当和不必要的,于是他作为剑桥学派的后期代表之一,却对庇古和霍特里分别用投资决策错误和纯货币力量干扰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加以反对。后来他又深入探讨利息率同经济周期的关系,提出了后来由庇古等人阐发的"实际货币余额效应"的初步思想。在经济分析方法上,罗伯逊不仅强调动态经济分析的

重要性，而且运用时期分析法全面考察储蓄与投资间的关系，这为以后学者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时普遍所因袭。因此，罗伯逊又被看成是时期分析的创始人和英国宏观动态经济学研究之父。

罗宾逊—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美国政府继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之后，制定的又一项关于规定某种价格歧视行为非法的法令。该法制定于1936年，以加强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它宣布在一地区比在另一地区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售货物（地理上的价格歧视）或者为损害和消灭竞争者的目的以不合理的低价出卖货物（对人的价格歧视）都是违法的。该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卖主为了有利于某些有很大议价能力的买主而实行不公平的价格歧视，从而保护独立的零售商和批发商。该法具有的一个效果是制止大的连锁商店从供应者那里通过不正当的高额折扣取得特惠待遇。制定该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价格差异应该仅仅反映成本的差异；高额折扣只有在是成本节约的结果时才是正当的，而运用市场力量得到的就不是正当的。只有在确是为了对付竞争者同等的低价时，降价才是正当的。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说在"新政"的前期，政府有意削弱反托拉斯令，用限制不受拘束的竞争来帮助大工商企业的话，那么以该法为标志，限制不受拘束的竞争，已经转向试图去协助小工商企业。

罗，约翰（John Law，1671—1729） 18世纪初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富家。1705年出版《对货币和贸易的思考》一书。同年根据该书所拟定的方案，向苏格兰议会提出创办国民银行，未获采纳。1708年起，他奔波于欧洲大陆各国，宣扬他的建议方案，主张发行不能兑现的银行券来增加国内财富。1716年获准在法国设立他所倡议的中央银行，从事发行纸币、贴现票据以及存款等业务，信誉渐高。后来，罗担任总经理的法国皇家银行同许多企业相联合，不仅控制着法国的大部分对外贸易，还得到了造币权以及偿还公债与征收租税的大权。罗对法国经济的重大影响在1720年担任财政部长时臻于顶峰。但是，由于该银行滥发纸币和抬高股票的地位，引发投机狂潮和通货膨胀，人们纷纷要求兑现纸币。而该银行被迫宣布银行券贬值后，更造成社会恐慌，最后终于使得该银行破产，罗本人亦被解职，并逃出法国。因此，约翰·罗成了历史上迷信和滥用信用货币的著名例子。经济学史上有些人还把他看成是重商主义的新的变种。

奈特·弗兰克·海尼曼（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972） 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出生于美国的伊利诺伊州。1916年获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1928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教授，退休后又被聘为名誉教授。代表作为《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奈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利润研究方面。他把风险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计量的风险，因而能采用保险的方式予以避免，另一种是无法计量的风险，即为不确定性，这样预期的情况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就会发生差异，从而取得利润或造成损失。换言之，他同熊彼特等人一样，把利润视作企业家作出贡献的报酬，但又认为它是"不确定性"的结果。奈特作为开创芝加哥学派的关键人物，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推崇市场机制作用，并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于生产和物价水平起着决定作用。但他主要是通过讲坛和个别接触向学生们宣扬上述基本思想的，这就是经济学史上有名的芝加哥"口头传统"的由来。这种"口头传统"对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现代芝加哥学派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庞巴维克·欧根·冯（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 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奥地利的布伦省，1872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法律系。1881—1889年任英斯布鲁克大学经济学教授。1889年任职于奥国财政部，并三次出任财政部长。1904年起担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逝世。另外他还当过维也纳科学院院长。

庞巴维克的主要著作有：《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资本与利息》的第一卷，1884年）、《资本实证论》（《资本与利息》的第二卷，1888年）和《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1896年）等。

边际效用价值论 庞巴维克对奥国学派的主观价值理论作了最系统最完整的阐述。他以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为出发点，认为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既具有用性，又有稀缺性。有用性即物品的效用是指欲望的满足，它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评价，而这种主观评价又是以物品的数量（即供给量）为转移的。所以，效用是价值的源泉，稀缺性则为价值存在的条件。

庞巴维克明确指出物品的价值具有主观性质，其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但是，人们对物品所估的价值同欲望种类的分级毫不相干，只同欲望强度的分级相联系。前者是按欲望的重要性进行分级，后者则根据人对同种欲望的迫切程度加以分级。具体地说，由于欲望递减规律的作用，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人们对它的欲望强度下降，从而

主观评价亦随之跌落，即效用出现递减现象，而一件物品的价值就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所谓边际效用就是指用来满足人们边际欲望（即一定量物品可能满足的一系列欲望中最不迫切的最后欲望）的最后单位物品所具有的最小效用。物品的边际效用越大，其价值量也越大，反之亦然。同时边际效用量又依赖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这即为消费品的价值决定。

庞巴维克又论述了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问题，同样主张它们由边际效用所决定。不过由于生产资料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也谈不上什么边际效用，他采用倒因为果的方法予以阐述，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借助它所生产出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因此，他把各种物品按照生产程序的先后分为不同的等级，第一级是消费品，第二级是生产该消费品的资本品，第三级又是生产该资本品的资本品，依次类推。由于没有后几级资本品就不能生产出消费品，或者资本品减少必然导致消费品减少，所以消费品的边际效用也须依赖于资本品。这样，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就成为以后各级资本品（即生产资料）的价值标准。例如，一个人购买用于制作水桶的木料，该木料的价值应以桶板的价值为标准，而桶板的价值又是由水桶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

可见，庞巴维克混同价值和使用价值，且将使用价值曲解为一种基于心理评价的主观效用，从而完全抹煞了价值理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在价值量的决定问题上，他只是侈谈欲望递减律和效用递减律的作用，却无法把这一系列递减的数量表述为可测定的具体量值。事实上，物品的边际效用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异，其价值决定必然是难于捉摸的。至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他的论述不仅颠倒因果关系，而且完全否认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问题，显然同现实的经济生活相悖逆。总之，边际效用论是一种荒谬的庸俗的价值理论。

时差利息论　庞巴维克所谓开辟新领域的学说内容是他的独特的利息理论。这种利息论建立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主要着眼于时间偏好分析，对利息的源泉、形式以及利率给予了新的理论解释，故称时差利息论。该理论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利息学说，并对以后西方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发展起着较深广的影响。

庞巴维克认为，利息包括利润、纯利息和地租等不同形态的剥削收入，其产生在于"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类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的物品更有价值"。现在物品是指现在就能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物品，而未来物品则是目前无法消费而只能满足将来消费需要的物品。这样，人们对同类同量的现在物品的主观评价总要高于未来物品，即由于时间的差异，前者的价值总要高于后者，这个价值差额即为利息。当这两种物品交换时，后者的主人就须向前者的主人付出一笔相当于这个价值差额的"贴水"，贴水的形式就表现为各种利息形态。庞巴维克强调，这个命题是其利息理论的要点和中心。

他进一步分析了现在物品的主观评价总高于未来物品的原因所在。第一，"需要和需要供应的差别"，即有些人因为当前经济境况不佳而急需现金或消费品，其将来的境况则会明显好转，从而必然高估现在。第二，"低估未来"，这是由于人们对未来需要考虑欠周、因意志上的缺陷而只顾眼前快乐，认为人生短促无常等原因造成的。第三，"现在物品技术上的优越性"，这是指占有一定量的现在物品便可进行"迂回生产"，即先制造出高效率的生产资料，从而以后可获得远为丰富的消费品和价值量。

庞巴维克考察了利息的三种具体形式：企业利润、借贷利息和耐久物品的租金（包括地租），并把它们说成是超历史的永恒范畴。他把决定利率水平的基本因素归结为三个，即国家用于维持生活的基金总量、依靠该基金供应的生产者人数和资本的生产力因素。

时差利息论的根本要害在于掩盖利息来源的剥削性质，借以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它从心理角度和时间偏好来解释利息的产生，完全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在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它把利息、利润和地租混为一谈，归根结底还是要抹煞它们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割断同生产劳动的本质联系。因此，该理论的庸俗性质显而易见。

对马克思学说的攻击　庞巴维克除了用上述理论对抗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外，还直接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他混同价值与生产价格，指责商品价值决定于其所含的劳动量这一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对很大一部分物品完全不适用。他歪曲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先将其归纳为所谓的三步论证，尔后胡诌马克思的价值论只是用纯粹的逻辑推理方法演绎出来的。他还公然声称《资本论》的第三卷否定了其第一卷，认为生产价格论同价值论是无法调和的，甚至叫嚷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已经"崩溃"和"终结"。很清楚，庞巴维克是马克思主义凶恶的敌人，并且他所起的反动影响至今犹在。

此外，就对经济科学作出的贡献这点而言，现今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他并无太高的评价。不过他对某些具体理论的深入探究，如提出替代原理、迂回生产概念，边际计算方法以及重视时间因素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要作用等，仍然应给予积极的肯定。

肯尼迪回合（Kennedy Round） 肯尼迪回合是关贸总协定主持下的第六轮多边贸易谈判，由于该轮谈判由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故得名，参加肯尼迪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但是谈判主要仍在美国和欧共体之间开展。由于美国和欧共体成员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谈判空前激烈，持续的时间也较长，1964年5月谈判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1967年6月30日，历时3年多。肯尼迪回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大幅度降低各自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关税降幅达35%，为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之最，有3万多种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的下降幅度超过了50%。工业制成品的关税减让从1968年1月1日开始，分五期进行，直至1972年1月1日全部完成。在农产品关税问题上，由于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能力，而且它的农产品主要输往欧共体成员国，因此，它在该轮谈判中要求欧共体六国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并取消进口数量限制，欧共体六国则出于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拒绝了美国的上述要求，结果只对少数农产品进行了一定的关税减让。总之，该轮谈判在农产品问题上的收获仍不大。该轮谈判还首先涉及了非关税壁垒问题，但在如何限制和取消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上并未取得突出的成就，因此在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在该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但通过该轮谈判也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一定的好处，这种好处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发达国家作出的关税减让而无须作出相应的减让，但由于实行关税减让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出口产品多为初级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从该轮谈判中取得的好处并不大。肯尼迪回合对于战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它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九　画

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美洲国家组织成立于1890年4月，最初称为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1948年改用现名。该组织现有成员国30多个，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它的宗旨是加强美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组织共同行动以对付外来侵略，解决成员国之间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纠纷，促进美洲国家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事实上，该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美国控制和剥削拉美其他国家的一种工具。随着拉美其他国家的崛起，该组织已成了它们同美国“对话”的重要讲坛，并在加强该组织成员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和合作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各成员国部长级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常设理事会为执行机构，下设经济与社会、科教与文化、法律等理事会。秘书处为常设机构，负责日常事务。

相机抉择（Discretionary Approaches） 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政策根据经济状况和各项政策的特点机动地决定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相机抉择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运用来直接干预经济，实现经济稳定，它不同于依靠内在稳定器来自发地稳定经济，政府不采取任何政策措施的作法。通过相机抉择所实现的经济稳定方法又称“相机抉择的稳定”。所以，相机抉择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政策行为。各种经济形势的趋势与严重程度不同，各种政策本身的时滞与效应不同，因此，相机抉择的关键就是要正确地决定所选用的政策手段。例如，同样的萧条状况，当情况不十分严重时，尽管要采用某些政策，而不能依靠内在稳定器，但这种政策也应该是时滞较长而作用较平缓的政策，例如，货币政策中的公开市场活动（收购政府债券，逐渐增加货币供给量）。但当萧条严重时，就要采用时滞短，作用快而有力的政策，例如，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支出量）。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之下，如何选用不同的政策，或者政策的配合，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因此，相机抉择体现了政策运用的艺术，是一个实际，而又相当困难的问题。

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nothesis） 美国经济学家J·S·杜森贝利（J·S·Duexenberry）在1949年出版的《收入、储蓄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一种消费函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个人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关系，即消费者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其二是个人现期收入与过去收入的关系，即消费者过去曾有过的最高收入水平。

杜森贝利认为，个人的消费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因此，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本人的消费支出，而且也取决于相关的其他人的消费支出。这样，效用函数就是：

$$U_i = U_i(\frac{C_i}{\sum Z_j C_j}) \quad (i,j=1、2\cdots n)$$

在上式中，U_i 为第 i 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C_i 为第 i 个消费者的消费支出，$\sum Z_j C_j$ 为相关的其他人的消费支出的加权平均数。如果第 i 个消费者的收入增加，消费支出也增加。但如果其他消费者的收入同比例增加，其消费也增加。这样，就使 $\frac{C_i}{\sum Z_j C_j}$ 不变，第 i 个消费者的总效用也不变，从而他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变。这就说明，如果个人的绝对收入尽管变动了，但只要他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没有变，即他的相对收入没有变，那么，他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不会变。在长期中，尽管消费者的收入在增加，但只要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变，消费也只是随收入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长期中收入分配的格局，即相对收入的稳定性正是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当稳定的基本原因。消费者消费之间的相互影响被称为消费的"示范效应"。

相对收入假说的另一个观点是，人们的消费行为是不可逆的，因此，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而且还取决于过去的最高收入，以及在最高收入时所形成的消费习惯。如果过去的收入水平比现在高，则过去的收入对现期消费就有影响，人们不会减少其消费，而是要减少储蓄来维持过去所形成的消费习惯。这种过去所形成的消费习惯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过去最高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要逐渐减少。这种消费行为的不可逆性所引起的消费易于增加难于减少的作用被称为消费的"棘轮效应"。这种棘轮效应也是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当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短期中如果现期收入低于过去的最高收入，则边际消费倾向会提高，这就解释了长期消费函数稳定，而短期消费函数不稳定，长期消费函数与短期消费函数不一致的现象。

相对收入假说的公式可以写为：

$$s_t = f(Y_t, \frac{Y_t}{Y_0})$$

或者写为：

$$C_t = 1 - s_t = 1 - (Y_t, \frac{Y_t}{Y_0})$$

在上式中，Y_0 为过去收入的最高水平，S_t、C_t、Y_t 分别为现期储蓄，消费与收入，利用这一函数对 1890—1930 年长期储蓄率和 1947 年短期储蓄率进行估算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相对效率工资 区域不平衡增长理论中的一种分析方法。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 N · 卡尔多提出，以借此具体描述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发展过程，所谓相对效率工资是指工资（W）与生产率增长率（U）的比例（W / U），它可以决定一区域在全国市场中所占的相对份额，W / U 的值越低，产出增长率越高。由于制度原因一个国家内部各个区域的货币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是相对的。因此，在发达区域，由于聚集经济而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故产出增长率高。生产率增长率也随之提高，进而相对效率工资下降，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产出增长率提高，使高速增长区域更高速增长。这样区域不平衡增长可以表示为：

$$U_i = f_1(y_i) \qquad f'_1 > 0$$

$$W_i / U_i = f_2(U_i) \qquad f'_2 < 0$$

$$Y_i = f_3(W_i / U_i) \qquad f'_3 < 0$$

$$W_i = \overline{W}$$

其中，U_i 表示 y_i 区域生产力增长率，y_i 为 i 区的货币工资，W_i / U_i 为 i 区的效率工资、$\overline{W}$ 为货币工资水平。

相互需求理论（Reciprocal Demane Theovy） 相互需求理论是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约翰 · 穆勒（Joan Mill）在其 184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相互需求理论的提示既是以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大卫 · 李嘉图（David · Ricardo）的比较成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又是以需求角度的分析弥补了比较成本理论的不足。约翰 · 穆勒本人将相互需求理论称为"国际需求方程"或"国际价值法则"。

约翰 · 穆勒首先提出了"国际价值"的概念：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这两种产品进行交换时就产生了交换价值，随着两国居民对商品的需求程度的变化，交换价值会自行调整，而形成同一的国际交换比价，这一交换比价就是国际价值，而国际价值也即是国际贸易条件。相互需求理论的第一个论点是国际贸易条件的范围介于两国产品的国内交换比率之间。如下表所示：

国家 \ 商品	麻布	棉布
英国	15 码	10 码
德国	20 码	10 码

上表说明了英国和德国有关麻布和棉布的生产状

况。对十单位劳动投入量，英国和德国都可生产出10码棉布；而在麻布生产上，英国能生产15码，而德国却能生产出20码。因此，两国在棉布生产上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而在麻布的生产上，德国高于英国。进一步，德国在麻布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英国在棉布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在两国贸易中，德国专门生产和出口麻布，而英国专门生产和出口棉布。从两国的国内市场来看，英国市场上麻布和棉布的交换比例是15：10，德国市场上麻布和棉布的交换比例是20：10，在国际市场上，10码棉布若换不到15码麻布，英国则不会参加国际贸易；而20码麻布若换得的棉布少于10码，德国则不会参加贸易，只有棉布和麻布的交换比率介于10：15和10：20之间，贸易才具有互利性，因此，实际的国际贸易条件必定介于贸易国商品的国内交换比率之间。

相互需求理论认为，实际的国际贸易条件的确定，由贸易参加国的消费者对对方国家商品的需求决定，当双方对对方商品的需求恰好吸收双方对对方商品的供给时，此时的国际贸易条件即是实际的国际贸易条件，也是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在这一均衡贸易条件下，国际贸易处于平衡状态，贸易差额为零。再看上表中的情况，假设国际市场上，棉布与麻布的交换比率是1：1.8，如果在这一交换比率下，德国消费者对英国棉布的需求量是1000码、愿意以1，800码麻布换取其所需1，000码棉布，而此时恰好英国在这一交换比率下，愿意出口1，000码棉布，换取德国的1，800码麻布，那么1：1.8的交换比率就使英、德两国贸易达到了平衡状态，这一交换比率即是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如果此时英国居民的消费偏好发生了改变，对于1：1.8的交换比率，英国居民对德国麻布的需求量低于1，800码，若此时德国居民对英国棉布需求量没有发生改变，仍是1，000码，这样，德国必须通过降低麻布价格的方法刺激英国居民对麻布消费偏好的提高，从而使得英国对德国的棉布出口值正好等于德国向英国的麻布出口值，两国贸易重至平衡，但此时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已发生了变动，棉布的相对价格有所提高，而麻布的相对价格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如果在1：1.8的交换比率下，英国对德国的麻布需求量低于1，800码，而恰好此时德国对英国的棉布需求量也有所减低，两者的降低水平相等，从而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仍是1：1.8，但是国际贸易量却发生了变化，而低于原来的贸易量。因此，贸易参加国对对方商品的相对需求强度不仅决定了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和贸易数量，而且决定了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和贸易数量的变动方向。

进一步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于商品的相对需求强度还决定了贸易利益在贸易参加国之间的分配。按着上面的分析，若国际市场上均衡的交换比率是1：1.8，此时英国对于德国麻布的需求有所降低，德国为了保持原来的棉布进口量，则必须降低麻布的价格，刺激英国对麻布的需求，以更多的麻布出口换取原来同等数量的棉布进口，此时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是趋向于德国国内市场上棉布与麻布的交换比率，因而德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利益有所减少，同理，德国对英国棉布的需求强度越大，均衡的贸易条件就越加趋近于德国国内棉布与麻布的交换比率，德国的贸易利益就越发减少。因此，相对需求理论认为，外国对本国的商品需求强度愈是大于本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强度，均衡的贸易条件越是接近于外国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交换比率，则本国来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就越大，反之亦然。

由此，可以得出，相互需求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按照比较利益进行专业化生产，但国际市场上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和贸易数量及其变动决定于各国消费者对对方国家商品的相对需求强度，随着一国对它国商品相对需求强度的提高，均衡的贸易条件越趋接近此国国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比率，而贸易利益则向相反方向变动。

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 政府支出对减少私人支出，尤其是减少私人投资支出的影响。在以下五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第一，政府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债券来为其支出筹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货币供给量没有增加，政府债券出售使债券价格下降，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减少了私人投资，引起了挤出效应。而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大，则挤出效应大，反之，亦反之。第二，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为其支出筹资。在这种情况下，增税减少了私人收入，使私人消费与投资减少，引起了挤出效应。而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大，则税收增加引起的私人消费减少多，从而挤出效应大；反之，亦反之。第三，在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增加引起了价格水平的上升，这种价格水平的上升也会减少私人消费与投资，引起挤出效应。第四，政府支出的增加，尤其是赤字支出增加对私人预期产生不利的影响，即私人对未来投资的收益率抱悲观态度，从而减少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五，在开放经济中当实行固定汇率时，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价格上升削弱了本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出口减少，私人投资减少，也会产生挤出效应。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家对挤出效应大小的看法并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挤出效应的作用并不大，尤其在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时，投资的利率弹性很小，

政府支出也不会引起价格上升，挤出效应几乎为零，所以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货币主义者认为，挤出效应的作用很大，因此，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会刺激经济，只会引起财政赤字增加和通货膨胀。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短期中，当经济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小于一而大于零。但在长期中实现了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则为一。由此得出，在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时，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在长期中这种政策只会引起通货膨胀。此外，在短期中，还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来抵消挤出效应，即在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使利率下降，从而使挤出效应降至最小，甚至为零。这样，就可以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最充分地发挥其刺激经济的作用。

怠工（Labor Slowdoun） 劳动力既不离开工作岗位，也不进行就地罢工，只是暂时放慢工作进度，减少产量，以要求资方答应某些具体条件。怠工同留厂罢工非常相似，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施加压力的策略。根据美国联邦法和全国劳资委员会裁决，怠工是非法的联合行动。

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 一种关于预期形成方式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经济变量数值的预期是根据经济变量的现期数值和过去数值而形成的，并要根据自已的预期误差（即实际值与预期值的误差）来修正对未来经济变量数值的预期。按这种预期的形成方式，经济变量的未来预期值等于现在与过去一系列时期实际值的加权平均数，离现在越近的时期加权数越大。以通货膨胀为例，设 πt 为 t 期的实际通货膨胀率，π_t^e 为 t 期的预通货膨胀率。根据适应性预期理论，t+1 期与 t 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为：

$$\pi_{t+1}^e-\pi_t^e=\alpha(\pi_t-\pi_t^e) \qquad (0<\alpha<1)$$

上式说明，在现期通货膨胀率预期值小于实际值$(\pi_t-\pi_t^e>0)$时，下一期（t+1 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向上调整；反之，在现期通化膨胀率预期值大于实际值$(\pi_t-\pi_t^e<0)$时，下一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向下调整。调整的比例数决于加权数（α）。可以把上式写为：

$$\pi_{t+1}^e=\alpha\pi_t+(1-\alpha)\pi_t^e$$

上式说明，下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π_{t+1}^e)是本期实际通货膨胀率（πt）与对本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π_t^e)的加权平均数。由此推理可得出：

$$\pi_t^e=\alpha\pi_{t-1}+(1-\alpha)\pi_{t-1}^e$$

因此，

$$\pi_{t+1}^e=\alpha\pi_t+\alpha(1-\alpha)\pi_{t-1}+(1-\alpha)^2\pi_{t-1}^e$$

以此类推可以得出

$$\pi_{t+1}^e=\alpha\pi_t+\alpha(1-\alpha)\pi_{t-1}+\alpha(1-\alpha)^2\pi_{t-2}+\cdots+\alpha(1-\alpha)^n\pi_{t-n}+\cdots$$

由于

$$\alpha+\alpha(1-\alpha)+\alpha(1-\alpha)^2+\cdots+\alpha(1-\alpha)^n+\cdots=\frac{\alpha}{1-(1-\alpha)}=1$$

所以，上式说明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是现期与过去一系列时期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加权平均数。而且，加权数 α，α（1-α），α（1-α）^{3}……为递减数列，即越近时期的实际值对预期值的影响越大。现代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主要根据适应性预期来分析经济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例如，短期菲利浦斯曲线等，都是以适应性预期假说为前提的。

适应性货币政策（Accommodating Monetary Policy） 在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为了防止利率上升而相应地采取的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当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国民收入的增加引起货币需求增加，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就会引起利率上升，产生挤出效应。为了消除挤出效应，就在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采用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以防止利率的上升。这时增加货币供给量的作用并不在于它本身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而在于配合财政政策，故称适应性货币政策。此外，适应性货币政策还可以指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使政府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购买政府用来支付其赤字的债券。这时的适应性货币政策是适应了政府弥补赤子的需要，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影响经济的作用。另一种情况是指中央银行按通货膨胀率来增加货币供给量，以使通货膨胀得以持续。这时适应性货币政策是适应了通货膨胀的需要。总之，适应性货币政策所强调的是货币政策本身对经济并不产生直接影响，它只是被动地适应其他政策的需要，以消除其他政策的不利影响。

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发展中国家引进的、适合本国国情、能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技术。由于这种技术的水平往往介于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和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技术之间，因此也被称作“中间技术”。

适宜技术着眼于技术引进时的具体条件，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先进与落后。在发明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

里，劳动价格相对昂贵，因而最先进的技术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劳动的相对价格较低、使用劳动密集程度高的技术更为经济。同时，最先进的技术总是需要更多的资金、大批熟练工人、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在发展中国家往往资金不足、能源紧张、人才缺乏、劳动过剩，在引进技术时就需要照顾到这些实际情况，选择那些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适用技术。

持久性消费（Permanent Consumption） 居民户在相当时期内维持的正常消费支出。这种消费取决于持久性收入。以 C_p 代表持久性消费，Y_p 代表持久性收入，C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有：

$$C_p = C \cdot (Y_t)$$

美国经济学家 M.弗里德曼（M.Friedman）在其持久收入假说中解释了持久性消费的稳定性。他认为，持久性消费是持久性收入中的一个比例，这一比例（即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利率、财富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影响消费者现期消费或财富积累偏好的其他因素，诸如，消费者的社会地位，社会风尚等。这些因素在长期中都是稳定的，或者可以互相抵销。所以，持久性消费也是稳定的。

持久性收入（Permanent Income） 又称正常收入或平均预期收入，指居民户在相当长时期内预期可以得到的收入。美国经济学家 M.弗里德曼（M.Friedman）在持久收入假说中论述了持久性收入的估算方法。他认为，持久性收入是与过去与现期收入相关的。因为人们总是根据过去与现期的收入来预期未来的持久性收入。因此，持久性收入就是过去收入与现期收入的加权平均数，时期越近，加权数越大，时期越远，加权数越小。以 Y_p 代表持久性收入，Y_t 代表现期收入，Y_{t-1}、$Y_{t-2}\cdots\cdots Y_{t-n}$ 代表过去一系列时期的收入，Q 代表加权数，则持久性收入的公式可写为：

$$Y_p = QY_t + (1-Q)Y_{t-1} + (1-Q)^2Y_{t-2} + \cdots + (1-Q)^n \cdot Y_{t-n} \quad (0<Q<1)$$

在长期中，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

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sis） 美国经济学家 M·弗里德曼提出来的一种消费函数理论。其基本观点是：消费是消费者享受物品所提供的服务的一种行为，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取决于持久收入。这也就是说，影响人们收入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暂时因素，另一种影响持续一个较长时期（三年以上）的因素。反映暂时因素的收入是暂时收入，即一时的、非连续性的偶然收入；反映长期因素的收入是持久收入，即长久的、有规律性的稳定收入。同样，消费也有暂时消费与持久消费之分。可以用以下四个方程式来概述持久收入假说的基本内容：

$$C_p = K(i,w,u)Y_p \quad (1)$$

$$Y = Y_p + Y_t \quad (2)$$

$$C = C_p + C_t \quad (3)$$

$$P_{YP}Y_t = P_{Ytct} = P_Y tct = 0 \quad (4)$$

(1) 式表示，持久消费（C_p）是持久收入（Y_p）的一个比例，这两者的比例（K，即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利率（i）、财富占收入的比例（W），以及影响消费者现期消费或财富积累的偏好的其他因素（U）。(2) 式表示，现期收入（Y）为持久收入（Y_p）和暂时收入（Y_t）之和。(3) 式表示，现期消费（C）为持久消费（C_p）和暂时消费(C_t)之和。(4) 式表示持久收入（Y_p）与暂时收入（Y_t）之间，持久消费（C_p）与暂时消费（C_t）之间，暂时收入（Y_t）与暂时消费（C_t）之间都不存在相关关系，所以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为零。弗里德曼运用统计资料证明了，在长期中影响边际消费倾向（K）的其他因素（i、w、u）都是稳定，或者其变化可以互相抵消，所以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

弗里德曼还解释了持久收入的估算方法。持久收入是与过去和现期收入相关的，因为人们总是根据过去与现期的收入来预期未来的持久收入。这样，持久收入就是过去收入与现期收入的加权平均数，时期越近，加权数越大，时期越远，加权数越小。以 Y_{-1} 代表过去的收入，以 Y 代表现期收入，以 Q 代表加权数，则持久收入可以表述为：

$$Y_P = \theta Y + (1-\theta)Y_{-1} \quad (0<\theta<1)$$

持久收入假说不仅解释了长期中消费函数的稳定性，而且对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经济波动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本积累。过去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取决于收入水平高低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即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资本积累越高。持久收入假说驳斥了这种观点，证明了资本积累的决定因素储蓄率与收入水平高低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无关，而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相关。在经济波动方面，这一理论认为，现期收入并不决定现期消费，而决定消费的持久收入又是较为稳定的。因此，经济周期与消费关系并不大。此外，持久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该理论中，弗里德曼用持久收入的稳定性证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从而说明了货币供给量变动对经济有着决定的作用。

垫头规定（Margin Requirements） 又称"保证

金规定"或"保证金比率"，指购买证券时应交纳的保证金的比率。这一比率同时也决定了购买证券时所能得到的借款数额。例如，保证金比率为25%，就是在购买证券时首先必须交出所购证券价值的25%，其余的75%可以向金融机构贷款。这样，保证金比率的高低不仅会影响证券交易，而且会影响货币供给量。当降低保证金比率时，银行的贷款就会增加，并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货币供给量增加。同样，提高保证金比率也会使货币供给量减少。所以，在最初垫头规定是为了保证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但以后就被中央银行作为较次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加以使用。在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所管理条例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确定垫头规定，联邦储备委员会用这一权力来防止证券投机过度的风潮，并借以调节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但现在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已经很小了。

贴现政策（Discount Policy）　中央银行调整贴现率与贴现条件，以影响货币供给量和利率，进而影响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政策，是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中央银行是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者"，当商业银行准备金不足时可以以政府债券或其他中央银行认可的"合格证券"向中央银行贷款，或用客户借款时抵押的票据向中央银行再贴现。这两种方式一般都称为"贴现"。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贴现规定有一定的条件，并收取一定的利息，这种贴现的利率称为贴现率。贴现条件和贴现率可以影响货币供给量和利率。当中央银行放松贴现条件并降低贴现率时，商业银行可以得到更多的贷款，从而就可以增加放款。这样，通过货币乘数，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下降。此外，贴现率作为官方的利率，也会影响一般利率，贴现率的下降会带动一般利率的下降。这样，放松贴现条件和降低贴现率就会作为一种扩张性货币政策工具起到刺激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作用。同样，提高贴现条件并提高贴现率也会减少货币量和提高利率，从而作为一种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起到抑制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作用。因此，贴现政策就是中央银行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其中主要是调整贴现率。但是，贴现政策本身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银行对该政策的反应。如果商业银行的反应不积极，或不能进行密切配合，则贴现政策的作用就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贴现政策在目前作为日常调整信用的工具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已降为一个次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贴现率（Discount Rate）　一般有两种用法。第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时所支付的利率。当商业银行准备金不足时可以用客户借款时提供的票据到中央银行再贴现，或以政府债券或中央银行同意接受的其他"合格的证券"进行抵押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贷款通称"贴现"。商业银行进行贴现时所支付的利率就称为"贴现率"，以有别于一般利率。第二，把未来收入折算为现值时所用的利率。由于时间偏好或利率的存在，未来所获得的一定收入小于现期所得到的同样的收入。为了用现值表示未来的收入，就要根据利率对未来的收入进行贴现，即按这一利率把未来的收入折算为该收入的现值。在进行这种贴现时所使用的利率就称为贴现率。以 Y^e_{t+1} 代表 t+1 年的预期收入，Y_t 代表未来 t+1 年收入在 t 年的现值，i 为利率，则贴现的公式为：

$$Y_t=\frac{Y^e_{t+1}}{1+i}$$

在这一公式中，i 即为贴现率。在经济学中第二种含义的贴现率用得更普遍。

贴现（Discount）　通常指的是持票人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的做法。其具体过程是，银行先根据当时市场上的利息率以及距票据到期的日期计算贴现利息，然后从票据的面值中扣除这一利息，将剩余的金额付给持票人。当票据到期的时候，银行可以凭这张票据向最初出票的债务人（或者付款人）或者背书人按照票据的面值取得现金。贴现对于持票人来说，是提前收回预支资本、融通资金的方式；对于银行来说，这是它贷款的形式之一。贴现率等于银行扣除的贴现利息与票据面值之间的比率，它与当时市场上的利息率大致相当，但是要比银行的贷款年利息率稍高一些。贴现还广泛用于计算将在未来某个时间内收到或者支付的资金的现值，它的计算公式是

$$S'=\left|\frac{S}{(1+r)^n}\right|$$

其中 S'为未来的金额 S 在当前的价值，r 为贴现率，n 为年数。这种方法经常用于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投资项目的支出与收入都是分散在许多年中的，运用贴现的方法可以使得工程时间不同的项目相互进行比较。

贴水（Discount）　"升水"的对称。外汇市场上某种货币的远期价值低于其即期价值。在计算远期汇率时：（1）若即期汇率采取直接标价，则远期汇率＝即期汇率－贴水；（2）若即期汇率采取间接标价，则远期汇率＝即期汇率+贴水；（3）若外汇银行所标出的远期差额并没有说明远期差额的性质，则当远期差额形如低／高，即线前点数低于线后点数，远期汇率＝即期汇率+远期差额，说明标价货币贴水；当远期差额形如高／低，即线前点数高于线后点数，远期

差额＝即期汇率－远期差额，说明基础货币贴水。例如，在纽约外汇市场上：

即期汇率　　1英镑＝1.4230／40美元

一月期期汇　　　　20／10

一月期英镑的汇率为（1.4230－0.02）／(1.4240—0.02)

即1英镑＝1.4210／30美元．又如，若：

即期汇率　　1美元＝2.2060／70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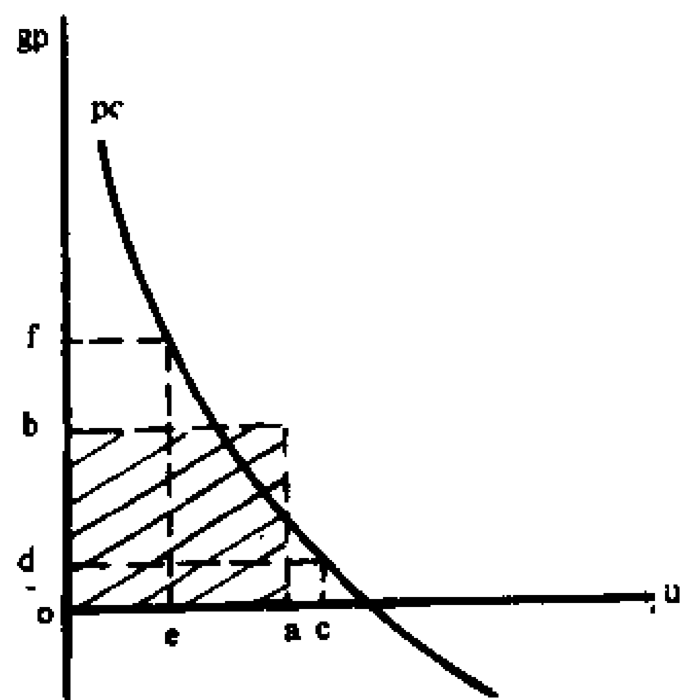
一月期期汇　　　　50／60

一月期汇率为（2.2060+0.05）／(2.2070+0.06)

即1美元＝2.2110／30马克，参看“远期汇率”、远期差额、“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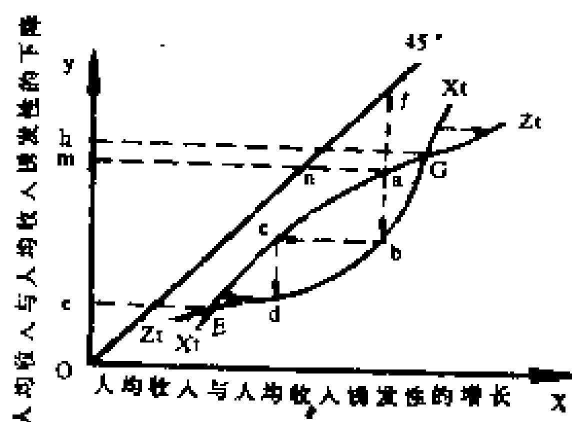
临时就业（Causual Employment）　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与工资合同的一种特殊就业状态。在发达国家这属于一种例外的情况，而不是常规。但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状况则较为普遍。在商贩，服务等独立经营的行业中，这种情况更多，因此，这些行业被称为非正规行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就业机会不足、劳动力大量过剩，以及劳动市场和劳动法规的不完善，工会力量太小等等。

临界点（Critical Point）　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政府对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的社会可接受程度的理解，也就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在临界点之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是社会可以接受的，政府不用采取任何政策措施，在临界点之外，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为社会无法接受，政府就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在根据菲利浦斯曲线进行相机



抉择时，临界点是十分重要的。附图中，横轴OU代表失业率，纵轴O、gP代表通货膨胀率，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PC为菲利浦斯曲线。假设社会可接受的失业率为oa，通货膨胀率为ob，则图上的阴影部分为临界点范围。如果失业率为oc，则通货膨胀率为od，这时，通货膨胀率在临界点之内，而失业率在临界点之外，这样，就要采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以提高通货膨胀率为代价，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在临界点之内。反之，如果失业率为oe，在临界点之内，而通货膨胀率为of在临界点之外，则要采用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以提高失业率为代价，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在临界点之内。这样，临界点就为政府进行决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临界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各个社会的历史、经济与政治等因素。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Theory of Critical Minimum Efforts）　关于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一种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哈维·利本斯坦于1957年提出。这一理论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强调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了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途径。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人均收入过低、资本形成不足，从而陷于“低水平均衡陷井”或“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要打破这种困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行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大到足以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水平，形成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均衡陷井，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利本斯坦在论证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之所以需要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时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提高收入的力量和压低收入的力量两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努力。提高收入的力量是由上一期的收入水平及投资水平决定的；压低收入的力量是由上一期投资的规模及人口增长的速度决定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压低收入的力量大于提高收入的力量时，人均收入的增长被人口的过



快增长等负力所抵销，并退回到原来的低水平均衡陷

井中去；只有当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时，人均收入才会大幅度提高，并打破低收入的稳定均衡、实现高收入的稳定均衡。

图中横轴代表可提高收入增长的力量，纵轴代表可压低收入增长的力量。Z_t 为提高收入力量的增长曲线；X_t 为压低收入力量的增长曲线；45°线用来测定人均收入的诱发性增长或下降。假定经济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为 oe，这时，Z_t 与 X_t 交于 E 点，达到了两种力量的稳定均衡，是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 om，由此形成的提高收入的力量相应提高到 ma 水平，但由于 $X_t > Z_t$，结果使人均收入趋于下降。在两组对立力量的作用下，若再提高人均收入，会因反向力量过大而再次使人均收入下降，并且产生一条人均收入沿 abcd 线路运动的轨道，最终将收入拉回到 E 点的低水平均衡陷井之中。相反，如果初期的投资能大到产生足够的提高收入的刺激力量、把人均收入猛然提高到 oh 水平之上，这时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会使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从而脱离低水平均衡陷井。同时由于提高收入的力量和压低收入的力量在高水平上达到了稳定均衡（G 点），因而经济可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利本斯坦指出，要实现使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的临界最小努力，必须创造一定的条件。诸如，激发居民的经济增长的动机，改变传统观念以鼓励人们敢冒风险，善于追求利润；创造适宜的投资盈利环境；培育经济增长的气氛，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群体；大力开发和运用新技术；等等。利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的突破口、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具有很大启发作用。同时，也在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临界最小努力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必要程度等问题上，受到了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质疑。

追加工人假说（Additional Worker Hypothesis）　关于经济周期下降阶段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人会增加的理论。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工人的工资水平会下降，家庭为了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就会有追加的工人进入劳动市场，从而劳动供给增加。因此，劳动力参加率与经济周期成反方向变动，即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工资高，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人会减少；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工资低，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人会增加。但是，对实际统计资料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参加率总的来说是与周期变化同方向变动的。这是因为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工资高，工人闲暇的代价高，从而就用工作来代替闲暇，劳动参加率提高；相反，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工资低，工人闲暇的代价低，从而就用闲暇来代替工作，劳动参加率下降。追加工人假说所反映的情况只存在于低收入工人集团中，对于这些低收入工人来说，维持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不得不增加劳动，以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

参看"失望工人假说"。

追索权（Right of Recourse）　追索权是指当票据遭到付款人拒付时，正当持票人有权要求票据的出票人及所有前手背书人偿还票据上载明的金额。追索权的行使是可以不依票据的背书次序的。持票人可以向任何一位前手背书人提出追索，若被追索者并非真正的主债务人，则向持票人付清票款之后，转而再向其前手进行追索，直至出票人。

票据一旦遭到付款人的拒绝付款或拒绝承兑，持票人可立即向其所有的前手行使追索权，但是，如果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付款人进行票据提示，即使遇到拒付，也无权对前手进行追索。

持票人在票据遭到拒付，从而拥有追索权之后，还需采取必要行动保留追索权。一方面持票人须立即在法定期限内请付款地的公证人开立拒绝证书，证明付款人拒付票款，另一方面持票人须及时向出票人和所有前手背书人发出拒付通知，只有这样，才能保留追索权。

如果付款人拒绝承兑票据，由于此时付款人并非汇票的债务人，因而持票人无权进行追索。但在付款人已对远期汇票进行承兑，却又拒绝付款的情况下，不论有无拒绝证书，持票人都有权向付款人立即追索。

持票人在遭到拒付，获得追索权后，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此项权利。不同的国家对追索权的法定期限的规定有所不同。如果持票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追索权，此项权利自行消失。

绝对收入假说（Abxolute Income Hypothesis）　英国经济学家 J·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一种消费函数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实际消费支出是现期实际收入水平的稳定函数。凯恩斯认为，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很多，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在这些因素中除收入外，其他因素在短期中都相当稳定，因此，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这里所说的收入是指现期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以 C 代表消费，Y 代表收入，则绝对收入假说的基本公式是：

$$C = C\ (Y)$$

第二，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在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

小于一。以△C代表增加的消费，△Y代表增加的收入，则有：

$0<\triangle c/\triangle Y<1$

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以公式来表示则是：

$$\triangle c/\triangle Y<C/Y$$

第四、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率为负数。这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本身是递减的，即消费函数的斜率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绝对收入假说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凯恩斯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解释了消费不足的原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成为支持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之一。在乘数理论中，凯恩斯又用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说明了乘数数值的决定，即乘数数值为一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同比例变化。

凯恩斯最早明确地把消费作为收入的稳定函数，并用以解释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因此"凯恩斯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消费函数"（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A.汉森语）。根据许多经济学家对消费统计资料的研究，绝对收入假说与短期消费行为相符合，但与长期消费行为并不一致。长期消费统计资料表明，在长期中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是相等的，而且，无论是平均消费倾向还是边际消费倾向，都相当稳定，并不存在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消费统计资料研究的结论与绝对收入假说的不一致被称为"消费函数之谜"。这就引起了对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以及其他消费函数理论的产生。

孤岛比喻（Island Perable） 一种解释寻找性失业的假说，由美国经济学家E·弗尔普斯在1971年提出。这一假说的两个基本前提是：第一、理智的工人处于寻找性失业时，宁可失业也不会接受低于他的保留工资的工作。第二、寻求工作的工人不可能区分局部的需求变动和总需求的变动。假定经济是由许多孤岛所组成的，这些孤岛之间的信息交流是要支出费用的。一个工人只有通过到其他孤岛上收集信息才能得到其他岛上关于工资率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工人想了解其他岛上的工资率情况，就必须牺牲在本岛的工作时间，从而要付出代价。在每个岛上，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工作是同质的。每天早晨，劳动力的拍卖在每个孤岛上开始，决定劳动市场出清的工资率和就业水平。这个孤岛对其他岛上工资率的情况并不了解，只能按一种常规方法去进行估算。假定总需求的下降打破了这种均衡。这时，经济的运行将取决于工人如何理解总需求的减少（即这种总需求的减少是局部的、还是普遍的），以及这种总需求减少对生产要素的影响。如果他们认为需求的下降是普遍的，并会影响到所有各岛，那么，所有各岛上的工资和价格水平都会下降，而就业将保持不变。但是，如果工人认为总需求的下降是局部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岛上的货币工资下降，那么，工人将会拒绝接受新的使劳动市场出清的工资率（即较低的工资率），而宁愿花时间去寻找其他地方更高工资率的工作。这就引起了寻找性失业，使产量和就业水平下降。因此，实际货币工资率和工人对其他岛上的预期工资率之间的差额越大，则寻找性失业的规模也越大。孤岛比喻就是指，劳动市场上需求下降引起了货币工资非预期性的下降，预期和实际货币工资的差异使寻找性失业增加。而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各孤岛间的信息交换并不是无偿的、迅速的。同样，总需求的增加也会使寻找性失业减少。孤岛比喻对寻找性失业原因的解释说明了在短期中货币工资和失业率之间存在非利浦斯曲线所表示的交替关系。

封闭经济（Closed Economy） 国际化程度或开放程度低的经济。封闭经济有以下特征：第一、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的比率低，即对外经济部门在经济中无足轻重。第二、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着较严重的障碍，即基本实行保护性政策。第三、国内货币体系基本不受外汇储备与国外金融市场的影响，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由国内各种因素与货币政策决定。第四、国内物价水平基本不受汇率变动与国外物价水平的影响。这种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较少，世界经济的变动对这种经济影响不大，因此，在研究这种经济时主要不是考虑国际因素，而是它的国内因素。

封闭企业（Closed Shop） 见排外性雇佣制企业条。

各个社会的历史、经济与政治等因素。

指派问题（Assignment Problem） 有关开放经济中是否可以给一个政策变量指派完成一种政策目标的问题。结论是不可能作到这一点。例如，是否可以指派货币政策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呢？当国际收支有赤字时，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可以吸引外资流入，有助于消除国际收支赤字。但这种政策的另一个作用是刺激了总需求，增加了国民收入，从而又增加了进口，加剧了国际收支赤字。可见仅仅指派货币政策并不能完成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目标。这时因为，一种政策变量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主要作用于某一方面时，必然也会对其他方面带来某些影响。正因为如此，不能采用一

种政策变量去实现一种政策目标，而应该配合使用各种政策变量来实现一种或多种政策目标。这就是说，各种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是经济政策实际运用中的重要问题。

指数化（Indexation）　一种定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契约的名义价值，以使其实际价值保持不变的处理方法。一般作为对付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使用。通货膨胀会产生一种收入效应，即使收入分配发生有利于某些集团而不利于另一些集团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对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或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就要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契约中所规定的名义变量。指数化包括调整工资契约中货币工资增长率的工资指数化，调整税收标准与税率等级的税收指数化，以及调整借贷契约中名义利率的利率指数化等形式。

指标（Indicators）　指标有两种含义。(1) 指标是反映总体现象数量表现的概念和数值。这种完整的指标包括五个构成要素：指标名称、计量单位、时间限制、空间限制和指标数值。五个构成要素可以归结为两个组成部分。指标概念和指标数值。(2) 指标是总体现象数量表现的概念。例如、人口数量、工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货物周转量、货币存量等。这种指标不包括具体数值。这是数理统计和统计调查方案设计上使用的统计指标含义。指标有四个特点：(1) 它是可以用数值表现的量；(2) 是说明总体现象的综合的量；(3) 具体的总体现象的量，不是抽象的数字；(4) 它不是客观事物的数量本身，而是客观实际数量的反映。指标分为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前者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规模或总量的指标，可以是实物计量也可以是货币计量；后者是用分式形式把两个有联系的指标加以比较而得出的指标。相对指标又分为计划完成相对指标，结构相对指标，强度相对指标、比较相对指标、动态相对指标。指标可以反映总体经济波动，但也可以分为三类：(1) 超前指标，如新的订货和利润，通常是在总的经济活动发生转折之前上升或下降；(2) 重合指标，如失业率是与整体经济活动发生的变化同时上升或下降；(3) 滞后指标，如资本开支通常是在总的经济活动趋势已经改变之后上升或下降。虽然指标是预测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但并非是准确无误的，而且各种指标同总体经济活动的联系也不总是密切的。

指数（Index Number）　是同类经济现象的对比数。从广义上讲，指数就是相对数；狭义的指数是由多因素构成并且不能直接相加的经济现象总体的对比数。例如，我们有一组价格的数据 $P^i=(p_1^i,\cdots,p_N^i)$ 和产量数据 $X^i=(X_1^i,\cdots,X_N^i)$。这两组数据说明在一个社会中属于某一集团的某一历史时期的 N 种商品的数额。指数问题就是确定下式中 P^i 中的 I 值以及 x^i 中的 I 值。

$$P^iX^i=p^ix^i=\sum_{n=1}^{N}p_n^ix_n^i \quad 其中\ i=1,\cdots,I。\quad (1)$$

P^i 是 i 时期的价格指数，X^i 是 i 时期的数量指数。在某种程度上 P^i 是所有 p_n^i 价格的代表，而 X^i 则是 x_n^i 数量值的代表。p_n^i 与 x_n^i 都是一组数列，其中 $n=1,\cdots,N$。但是 P^i 与 X^i 分别代表各种价格、各种数量的精确度是不清楚的。正是要弄清精确度问题才产生了指数理论。我们令价格与数量指数的乘积 P^iX^i 等于在 i 期人们对 N 商品的实际支出 p^ix^i。这样如果 P^i 已经决定了。根据 (1) 中的等式 X^i 也可以得到。相反，亦然。每一个人在一年中消费了成千上万种商品和劳务，每一个厂商也都利用或生产了成千上万种商品和劳务。指数就是用来减少或综合过多的微观信息。在经济学中，指数是在实际的经验调查中被引进的。指数理论分为两种。如果 $I=2$，则就有两段时期或两个集团的数据资料，因此，这种指数理论被称为双边指数理论；如果 $I>2$，则被称为多边指数理论。指数理论有四种方法，即统计方法，新统计方法、微观经济方法和检验方法。

指示提单（order B / c）　指示提单分为二种。如果托运人在提单的收货人一栏内填有凭某人"指示"字样，此种提单称为"记名指示提单"，根据发言指示的有所不同，可以分为"托运人指示"，"收货人指示"或"进口方银行指示"三种。如果托运人在提单收货人栏内填有"凭指示"字样，此种提单称为"不记名指示提单"。"记名指示提单"和"不记名指示提单"合称为"指示提单"。

指示提单是一种可以流通的有价证券。提单持有人可以以背书方式将提单转让，而无须取得承运人的同意。记名指示提单需先行特定的指示人背书转让，才可再行转让，而不记名指示提单，托运人就可背书转让。

在指示提单下，虽然提单并未确定收货人，但是可以通过提单的背书转让确定收凭人。

由于指示提单可以转让流通，风险又较小，买卖双方都乐于接受，银行也愿意以指示提单作为议付货款的单据，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指示提单的使用是比较普遍的。

剑桥方程式（Cambridge Equation）　又称"现金余额方程式"（Cash Balance Eqration），是货币数

量论的一种表述，由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和A.庇古所提出，故名。其基本公式为：

$$M^d = K \cdot PY \quad (1)$$
$$M^s = \bar{M} \quad (2)$$
$$M^d = M^s \quad (3)$$

(1) 式是货币需求函数，M^d 货币需求。K 表示人们持有的货币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P 为价格水平，Y 为实际国民收入水平，所以，DY 为名义国民收入水平。(2) 式为货币供给函数，M^s 为货币供给，M 代表不变的货币量，该式说明货币供给量是不变的。(3) 式为货币均衡条件，即当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时，货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剑桥方程式的简化式则是：

$$\bar{M} = K \cdot PY \quad (4)$$

在 (4) 式中，实际国民收入 Y 取决于资源、技术等实际因素，在充分就业实现的假设之下，Y 是不变的，K 也就是弗雪方程式中货币流通速度 V 的倒数，即$K = \frac{1}{V}$，K 取决于持有货币所得到的便利与安全，以及金融机构是否发达等制度因素。在短期内这些因素也是不变的，所以 K 也是一个常数。这样，(4) 式就表明货币数量 M 与价格水平 P 同比例变动，即价格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这一结论与弗雪方程式的基本结论相同，所以，也是货币数量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但是，剑桥方程式与弗雪方程式研究货币作用的角度不同。弗雪方程式从商品的交易过程入手，强调了货币的交换媒介作用，从而得出了交易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则从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即货币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在假定货币供给为既定的条件下，货币需求就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剑桥方程式实际是货币需求方程式，研究的是决定货币需求函数的因素。剑桥方程式把货币需求量与人们持有的货币量和国民收入的比率，以及国民收入水平联系起来，而费雪方程式把货币量与交易总量联系起来。正因为剑桥方程式强调了货币需求，并且把货币需求与国民收入联系起来，所以，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 M.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正是从剑桥方程式发展而来的

剑桥学派 (The Cambridge School) 又称新古典学派，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因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故名。其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阿·马歇尔。他广泛地吸收和综合各种各样的学说内容，又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体系的核心。它以价格代替价值，并分别用边际效用规律和生产成本规律来说明需求和供给，进而从某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实现均衡来解释价格的决定。其分配论同样贯串供求均衡分析，即仅仅把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看成是决定该要素需求的因素，而生产要素的价格则取决于其需求与供给的均衡，这同一般的边际生产力论是不同的。马歇尔学说仍然宣扬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得和谐美好，明显地暴露出其辩护实质。同时他还声称，解救贫困和增进福利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宗旨。上述思想观点构成了所谓的"剑桥传统"。马歇尔的大弟子庇古继承和发展着这种传统，进一步创立福利经济学，提出系统的新古典主义失业理论。以后，剑桥出身的罗伯逊、霍屈里和凯恩斯从货币理论方面补充和发展着传统的剑桥经济学。此外，斯拉法、琼·罗宾逊尤其是张伯仑，以剑桥传统为基础，建立起新的垄断竞争理论来修改和补充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学说，这也可视作剑桥学派的发展。总之，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里，剑桥学派不仅在英国经济学界占据着霸主地位，而且对美国和欧洲大陆也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故有人将该时期称作"马歇尔专政"的时代。自至 1936 年、凯恩斯向他老师的经济学说发动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才丧失其独步一时的学术地位，不过它对现代经济学依然发生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顽固性失业 (Chronic Unemployment) 某一行业季节性萧条或正常流动之外的其他原因所造成的至少长达 6 个月的失业。一般用长期失业统计资料来衡量这种失业。造成顽固性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使某些行业或技术衰落；该行业工人所受的教育不足以适应其他行业的工作；机械化取代了手工劳动，对劳动的需求减少；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对某些行业工人所提供劳务的需求减少，劳动力由于各种原因而缺乏流动性；等等。这种失业一般在一些衰落行业或低技术工人集团中较为常见。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 (Harrod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一种说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需条件的模型，由英国经济学家 R.哈罗德 (R.Harrod) 在 1948 年出版的《动态经济学导论》中提出，并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一理论是对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长期化与动态化。凯恩斯把投资等于储蓄作为短期中国民收入均衡的条件。早在 1939 年的《论动态理论》一文中，哈罗德就曾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长期化，动态化。而这一模型的建立则是这种长期化、动态化的结果，即把短期中国民收入均衡的条件投资等于储蓄作为长期中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第一，社会只生产一种既可用于消费又可用于投资的产品，即这种模型是一部门增长模型。第二，只有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而且，资本-劳动的比率是固定不变的。第三，规模收益不变。第四，不存在技术进步。

以 G 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国民收入增长率，S 代表储蓄率；C 代表资本-产量比率，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亦即增量的资本-产量比率或加速系数；则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G=\frac{S}{C}$$

这就说明了，在技术不变，从而资本-产量比率（C）不变的条件下，要经济增长维持一个固定的比率，这一经济增长率所要求的投资率一定要等于储蓄率，即长期稳定的增长率要保证储蓄等于投资。例如，当资本--产量比率为了，储蓄率为 15% 的情况下，使投资等于储蓄的增长率应该是 5%。而且，在投资与储蓄相等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就取决于储蓄率。在上面的例子中，要使经济增长率为 6%，储蓄率就应该是 18%，可见这一模型既分析了长期中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又分析了资本增加（即储蓄率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基本公式的基础之上，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经济中短期与长期波动的原因。在进行这种分析时，哈罗德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G）是指实际上所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S）和实际资本一产量比率（C）决定。所以：

$$G=\frac{S}{C}$$

有保证的增长率（Gw）指长期中能使计划的储蓄与计划的投资保持相等的经济增长率，它由合意的储蓄率（Sd），即长期中计划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一产量比率（Cr），即资本家感到满意，并愿意保持下去的计划的资本一产量比率，所决定。所以：

$$G_w=\frac{S_d}{C_r}$$

自然增长率（Gn）指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它由最适宜的储蓄率（So）和合意的资本一产量比率所决定。所以：

$$G_n=\frac{S_0}{C_r}$$

长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相一致，即：

$$G=G_w=G_n$$

如果这三种增长率不一致，则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或长期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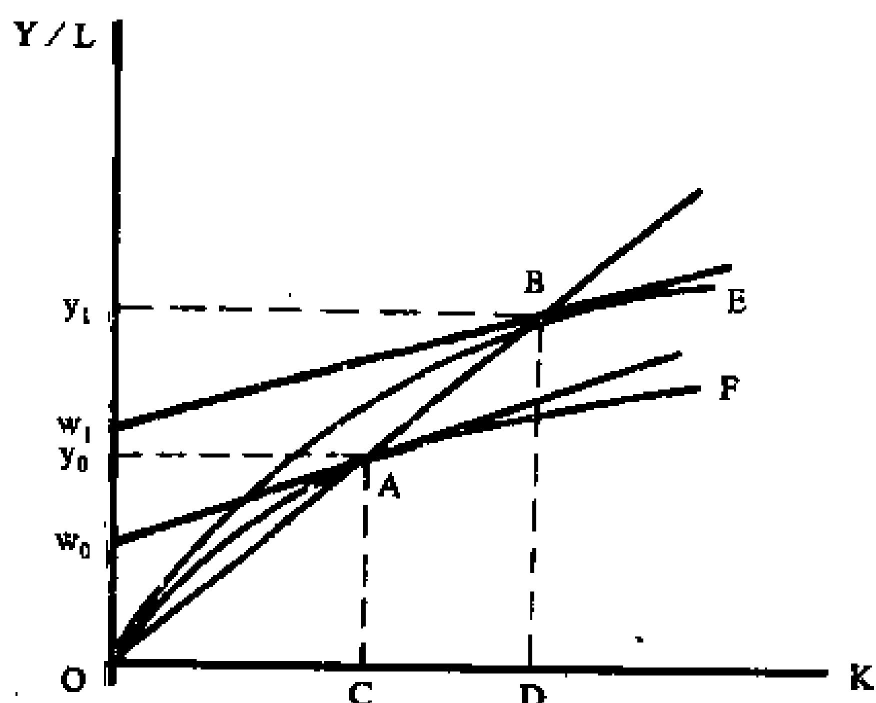
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不一致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波动。当实际增长率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G_w$）时，会引起经济中累积性的扩张。因为这时实际的资本-产量比率小于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C<C_r$），资本家会增加投资，使这两个比率一致，从而就刺激了经济的扩张。相反，当实际增长率小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G_w$）时，会引起经济中累积性的收缩。因为这时实际的资本-产量比率大于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C>C_r$），资本家会减少投资，使这两个比率一致，从而就引起了经济收缩。

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一致会引起经济中的长期波动。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G_w>G_n$）时，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经济将会出现长期停滞。或者说合意储蓄率大于最适宜的储蓄率（$S_d>S_o$），储蓄的不足导致经济停滞。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G_w<G_n$）时，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没有达到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经济将会出现长期繁荣。或者说合意储蓄率小于最适宜的储蓄率（$S_d<S_o$），储蓄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与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 40 年代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基本相同，因此，一般把这两个模型合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这个模型是最早建立的增长模型，对以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影响。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最大的缺点是，它所提出的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G=G_w=G_n$）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个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被称为"刃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其他经济增长模型都是要解决这个"刃锋"问题而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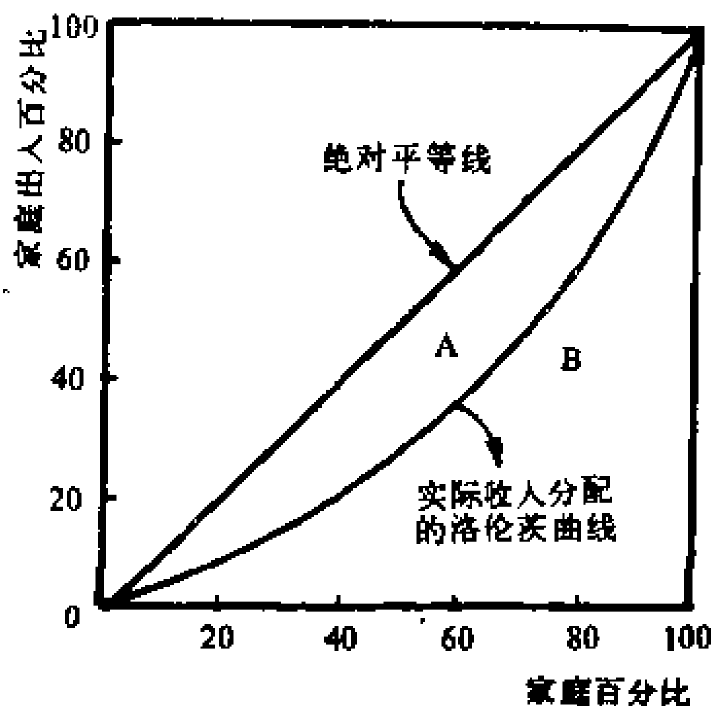
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Harrod Neutral Technical Progress）　英国经济学家 R.哈罗德所提出的一种技术进步的类型。如果把技术进步以前和技术进步发生以后两个生产函数中具有相同利润率的两个点进行比较，发生技术进步以后使利润率保持不变的资本-劳动比率（K／L）相应的资本-产量比率（K／Y）不变，换言之，技术进步之前和技术进步发生以后两个生产函数中利润率相等的点上与之相应的资本-产量比率相同，则这种技术进步就是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OK 代表资本量，纵轴 Y／L 代表资本-劳动比率，OF 代表技术进步以前的生产函数曲线，OE 代表按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所作出的生产函数曲线。自原点 O 作一直线与 OF 相交于 A，与 OE 相交于 B，因为 A 与 B 在

同一直线上，所以 A 点$\frac{AC}{DC}=\frac{Y}{K}$，B 点$\frac{BD}{OD}=\frac{AC}{OC}=\frac{Y}{K}$。再过 A 点作 OF 的切线，过 B 点作 OE 的切线，这两条切线是平行的。过 A 点所作的 OF 的切线 W_0A 的斜率$\frac{W_0Y_0}{AY_0}=\frac{W_0Y_0}{oc}$代表每个劳动力所配备 OC 资本时的边际生产力，即利润率。过 B 点所作的 OE 的切线 W_1B 的斜率$\frac{W_1Y_1}{OD}$代表有了技术进步，每个劳动力所配备 OD 资本时的边际生产力，即利润率。这两条切线平行，它的斜率相等，从而技术进步前后的利润率也就相等，这样，在两个生产函数曲线上利润率相等之点，各与之对应的资本—产量比率（K／Y）也就相等。这种技术进步就是哈罗德技术进步。由此可见，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特点是：第一、资本-产量比率在利润不变时不变。第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即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函数的资本-劳动比率（K／L）大于技术进步之前生产函数的资本-劳动比率。第三、由于利润率，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工资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不变，即这种技术进步不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这种技术进步的概念会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



哈伯勒，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Haberler，1900— ）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奥地利，1925 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1927—1929 曾赴英美游学，1928—1936 年在维也纳大学执教。1936—1971 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哈伯勒在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显赫地位。在《国际贸易》（1933 年）和《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在商业政策中的运用》（1936 年）两书里，他根据现代一般均衡理论详细阐述了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比较成本说，应用新的分析工具（如机会成本分析）更精确地表述了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优劣之处，并从比较成本说中引伸出福利含义。这就使得他的上述著作被人视作国际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的《繁荣与萧条》（1937 年）一书，全面总结和评介了本世纪来流行的众多经济周期理论，进而阐述自己旨在制止这类争论的综合性说明，并提出了相关的经济检验方法，影响十分广泛。战后他致力于通货膨胀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及汇率体系的改革的研究，但成就和影响均不及以前那样显著。

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 用以描述收入分配性质的一种曲线。洛伦茨曲线是通过测定社会中各阶层人民（从最贫困者开始排列）的累积部分对他们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所得的累积份额而得出来。一般情况下，各阶层累积人口比例越大，所对应的财富分配比例也应该越大。例如，1967 年美国占人口总数 20% 的最贫困者的所得，只有全部国民收入的 5.4%、占人口总数 80%的贫困者的收入占全部国收收入的 59%，也就是说，占人口 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41%。如果收入分配完全相等，即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得到同等的数额的收入，则洛伦茨曲线将是一条成 45° 角的直线。如果收入是完全的不平等，即很少一部分人甚至是一个人得到全部的国民收入，则洛伦茨曲线将构成正方形的底边和右边，一般情况下，收入分配都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因此洛伦茨曲线表现为一条向下弯的曲线。洛伦茨曲线向下弯曲得越大，收入分配就越不平均，相反，洛伦茨曲线向下弯曲得越小，收入分配就越平均。因此用对角线以下的总面积（图中的 A 加 B）去除洛伦茨曲线与对角线之间的面积（图中的 A），就可以表现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这一比值，即对角



线和洛伦茨曲线之间的面积与三角形面积的比率，称

为洛伦茨系数或基尼系数。

洛美协定（Lome Convention） 洛美协定是指欧洲经济共同体9国与来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46个发展中国家于1975年2月28日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的经济贸易协定。该协定于1976年4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该协定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欧共体单方面向来自上述46理事会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工业产品和96%的农产品提供免税和不限量的优惠，允许它们自由进入欧共体市场。第二，欧共体出资设置一个基金，用以补偿上述46个国家的一些主要农产品因价格下跌或减产所遭受的损失，以保证这些国家获得稳定的出口收入。第三，欧共体在财政、技术和工业合作等方面向46个国提供援助。洛美协定与以往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协定相比，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该协定做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定，这不仅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促进这些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打破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它是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第二个洛美协定于1979年10月31日签订，参加签约的发展中国家增加到57个。它的有效期仍为5年，该协定从1980年4月起开始生效。与第一个洛美协定相比，该协定的内容进一步出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如欧共体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和补偿、降低享受补偿的条件、进一步加强在工业、农业、能源、运输等方面的使用等。第三个洛美协定于1983年12月签订，参加签约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增加到63个，该协定到1990年2月28日期满。第四个洛美协定于1989年12月15日在洛美签订，参加签约的发展中国家达到了69个，该协定从1990年3月1日起生效，它的有效期长达10年。考虑到该协定只有在得到各签约国政府的批准之后才能全面实施，因此欧共体部长理事会最初决定第四个洛美协定从1991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为了避免在第三、四个洛美协定之间出现法律空白，欧共体采取了一些过渡性措施，主要内容就是延长第三个洛美协定的部分条款的实施期并提前实施第四个洛美协定的部分条款。由于第四个洛美协定在各国的批准程序进展缓慢，使得它无法按原定计划全面实施，为此，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后又决定第四个洛美协定的全面正式的实施期从1991年7月1日开始，在此之前继续采用一系列过渡性措施。第四个洛美协定不仅包括欧共体向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进一步的贸易优惠和财政援助等内容，而且还加入了欧共体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解决债务危机等条款，因此，新的洛美协定的实施将有助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克服面临的经济困难，更好地发展经济和贸易。

洛桑学派（The Lausanne School）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瑞士洛桑大学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里昂．瓦尔拉和意大利的帕累托。洛桑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是热衷于数理分析和创建了一般均衡理论。它强调数理方法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推崇抽象逻辑推理的重大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纯粹经济理论的结构体系。它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石，广泛利用函数概念和联立方程组，全面考察了一切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问题，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洛桑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对现代数理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例如，线性规划方法、投入-产出分析和经济计量学都同其存在某些渊源关系，而现代经济学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更同一般均衡分析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在边际效用学派中间，实际上还是要算洛桑学派产生的影响最为久远。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Johann Katrl Rodbertus，1805—1875） 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司法官兼法律教授的家庭。先后就读于戈丁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毕业后任司法官。1830年左右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度曾活跃于政坛。后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其主要代表作是《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表面看来，洛贝尔图斯是依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建立起其经济学体系的，实际上却陷入了经济学的庸俗立场，用以论证维护君主制政权的社会改良主义。他把基本经济概念看成是"逻辑"范畴，抽掉了经济学的历史性质和阶级特征。他宣扬"价值构成论"，主张用劳动票券代替货币，试图在保持私有制度和封建国家的基础上改革资本主义流通。虽然他十分强调剩余价值及其分配问题，但又认为利润和地租仍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履行社会有用职能的报酬。洛贝尔图斯还用农业原料不列入生产费用的论点来说明地租的来源。洛贝尔图斯曾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作了许多攻击和曲解。他的学说还是德国后来出现的"讲坛社会主义"和反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发点。

洛克，约翰（John Locke，1632—1704） 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出生于英格兰一律师家庭，曾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长期担任莎夫茨利伯爵的私人职务，曾随其流亡国外数年。1689年后担任过政府大臣要职，1691年隐居直

至逝世。其经济著作主要有《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2 年）、《再论提高货币价值》（1695 年）和《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1690 年）。洛克在经济思想上是配第的追随者，但也作了若干补充和发展。他同样从地租引申出利息，但从"自然权利"的观点加以阐发，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成果理应归自己所有，但一旦社会产生货币占有的不均等，出借货币者就能从债务人的劳动收入中获得利息。这里他实际上已把利息看成是一种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收入，不过还未能区分货币与资本。他认为利息率的变动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不能用法律加以限制，人为降低利息率会妨碍生产发展和对外贸易，使国家财富遭受损失。这个观点显然是有损于地主贵族维护高额地租的。通过探讨利息的本质，洛克还发表了关于价值、价格和货币的见解。他认为，劳动是价值的主要源泉，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后来有人称之为价格的供求理论。但他又指出货币流通数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价值和价值，同时又把货币看作只是一种交换媒介。这里已具货币数量说的雏型。另外为了维护金融贵族的利益，他对国家铸造份量不足的铸币来偿还债务的做法作了坚决的斥责。总之，洛克的经济学说同其哲学政治思想一样，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济贫法（Poor Law） 16—17 世纪英国贵族通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剥夺农民土地，使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沦为流浪者，国王为制止行乞盗窃，防止社会动荡而颁布的救济贫民的法令。1536 年，国王颁布法令，让教会承担救助贫民的义务。1572 年，开征济贫税，命令保安审判官任命负责救济事宜的管理人员和监督员。1576 年和 1597 年又颁布两项法令，推广伦敦首先实施的感化院制度。1601 年汇集以上一些规定加以补充，成为正式的济贫法。18 世纪圈地运动继续扩大，贫民数量增加。1723 年，为减轻教区救济金负担，颁布法令要各地设立习艺所。1782 年，为防止社会动乱，议会通过《吉尔伯特法》，准许教区救济健壮的贫民不强迫进入习艺所，济贫税管理人应为贫民在农场找工作，如工资不够维持生计，可从济贫税中提供补贴。以后又废除了 1723 年的法令，准许在一切教区内发放习艺所以外的救济。19 世纪初，随着产业革命的深人，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不断壮大，他们终于在 1832 年通过《改革法案》，使自己占据下院的多数席位，掌握国家政权。工业资产阶级议员们信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反对济贫法、认为济贫法是鼓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增长。1834 年，议会通过了《新济贫法》，取消对无业贫民的一切金钱和实施救济，只允许一种救济方法，即把他们收容到习艺所中去。新济贫法的实施，激化了社会矛盾。

活动分析（Activity Analysis） 见线性规划（Linear Programing）词条。

派生需求（Derived Demand） 派生需求是指由于对于最终产品的需求而派生出来的对于用以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需求。尽管马歇尔（A·Marshall）之前的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的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分析，并导出派生需求曲线的是马歇尔。

马歇尔在他 1890 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分析了用多种投入生产一种商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所有投入物的联合需求都是由于对于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而派生出来的。在马歇尔的分析中，他假定所有投入都是按照固定比例组合的。由此他导出了派生需求曲线。

马歇尔分析了多种投入物中每一种投入物派生需求曲线的情况。他假定除了要加以分析的投入物可以变化外，其余投入物的供给都是固定的，对产出的需求曲线也是固定的，并且对于产出和其它投入物的竞争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的状态。令需要导出其派生需求曲线的投入物的价格为 r，投入物的数量用 X 表示。在以上假定下，可以导出随着对于最终产品需求变化而变化的投入物的派生需求曲线：$r = f(x)$；投入物的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反方向变化。要素的这条派生的需求曲线与其供给曲线一起决定要素的均衡价格。

继马歇尔之后，希克斯（J·R·Hicks）放宽了马歇尔关于投入按固定比例组合的假定，而假定投入物可以相互替代。他借助于替代弹性的概念导出了对于投入物的派生需求曲线。罗宾逊夫人（J·Robinson）则分析了最终产品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对投入物的派生需求曲线。他们拓宽了马歇尔分析的范围。今天，派生需求的概念对于劳动市场的分析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要素价格边界（Factor Price Fronfier） 要素价格边界概念是由萨缪尔逊提出来的，用来描述分配变量之间存在的那种强制性的反比关系。亚当·斯密曾经认为价格是工资和利润的总和，但工资和利润率是各自独立地决定的。李嘉图研究了实际工资率（w）和利润率（r）之间的关系后，则认为："劳动成果中给予劳动者的部份越大，利润率就越小，反之亦然"。在经典分析的框架中，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是由斯拉法提出来的。

假定各个产业都只生产一种产品，并且只存在一种原始投入（劳动）和一种生产体系，则有：

$$p=(1+r)ap+wa. \quad (1)$$

p 为标准价格列向量，a 为一个物质投入方阵，a_0 为直接劳动投入的列向量。现用一篮子消费品 d 代表通货的价值，即：

$$dp=1 \quad (2)$$

由（1）和（2）就可以推导出在生产体系（a,a_0）时的 w−r 之间的关系：

$$w=\{d[1-(1+r)a]^{-1}a_0\}^{-1} \quad (3)$$

这个关系也可以用图 1 来说明，在 r=0 时，用 d 表示的实际工资率达到它的最大值 W，然后随着 r 的增大，单调下降，在 r 达到最大值 R 时为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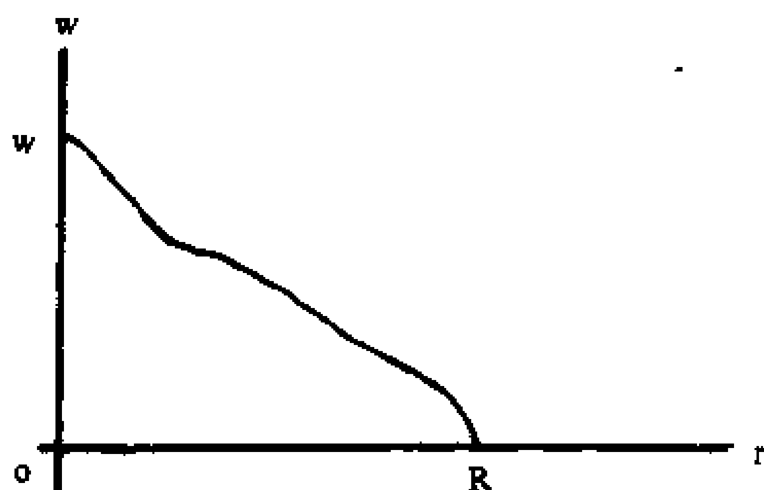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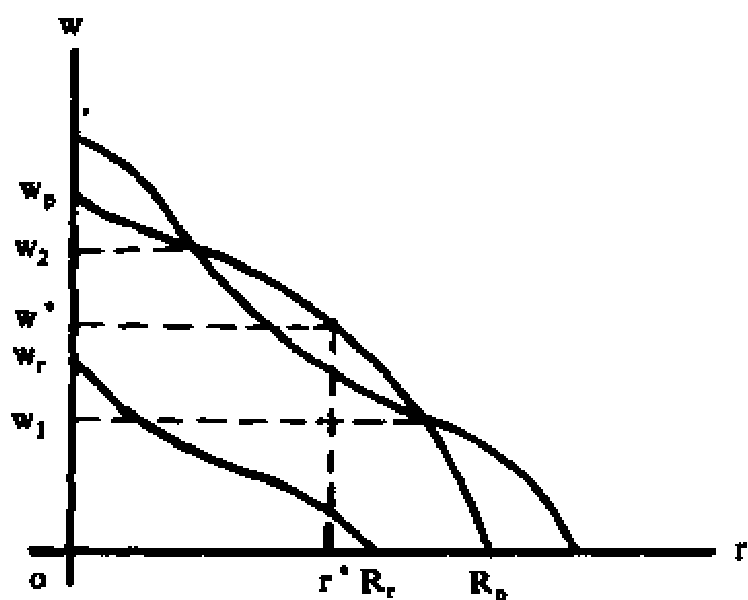


图 2

现在再假定存在着几种生产体系可用于生产不同的商品，并且，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所有的这些供选择的生产方法（或过程）的集合即是经济体系的技术。从这个集合中，一个供选择的技术系列可以通过这些生产方法的组合获得，因此，存在一个技术选择问题，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这个选择的标准是成本最小化，在现存的价格下选择最便宜的技术的企业间的竞争趋势倾向于在给定 w（或 r）时选择能产生最高的 r（w）（或 w（r））。如图 2，假定只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技术 α、β 和 γ，它们中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种 w−r 关系，显然 γ 是不会被采用的，在 $0<w<w_1$ 和 $w_2<w<w_2$ 时将采用 α，而在 $w_1<w<w_2$ 时，则采用 β，$w=w_1$ 和 $w=w_2$ 是两个转换点，在这两点处，α 和 β 是等同的，图 2 中的粗黑线就代表了经济的 w−s 边界（或要素价格边界）。

要素边际产品价值（Value if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a factot）　要素边际产品价值是要素所生产的最后一单位产品的价格乘以要素的边际产品，对于用生产要素 A 生产商品 X 而言，要素边际产品价值 VMP_A 表示为 $VMP_A=MP_A\cdot P_x$。其中 MP_A 为要素 A 的边际产品，p_x 为 X 商品的价格。

要素成本（Factor Cost）　要素成本是一种用来测算产出和收入值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以生产要素而不是以通常所见的市场价格为依据。要素成本通常都是与国民生产净值和（或）国民收入一起使用。对于国民生产净值，要素成本用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的给付测算国民生产值；对于国民收入，要素成本测算生产要素在提供服务时所获得的收入。要素成本法与市场价格法不同，后者是用市场上支付给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来测算产出和（或）收入的。用市场价格测量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民收入反映的是国民总产出在市场上出卖后所获得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在生产者所应支付的全部费用中的分配，这些费用不仅包括要素成本，而且也包括非要素成本，比如资本折旧、付给政府的间接税（如销售税和货物税）。

要素成本法提供一种对被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测算方法，因而它也代表着一种资源使用程度的测算方法。要素成本法在测算国民收入和分析经济中资源配置情况时非常重要。在考察各个具体的生产部门时，要素成本法能够指出在生产出给定的产出时，使用了多少资源。一个支付了大量的货物税的产业，其生产要素成本就会明显地低于其产品的市场价值。例如，烟草制品的市场价格就比它们的要素成本高得多，其原因就在于对它们征收了很重的货物税。由于这个原因，要素成本被认为比市场价格更适于显示经济中生产性资源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的配置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要素成本法作为资源利用情况的一种测算方法，也常常被误用。要素成本法只有在完全竞争即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备充分的知识、资源具有完全的流动性的条件下，才会真实地反映出资源的利用情况。在统计项目中，要素成本是用对生产要素的支付来测算的，但是这些支付只有在竞争性均衡的条件下才会等于要素成本。某个产业具有较低的要素支付，可能是来源于 1.使用了较少的竞争性资

源，2.需求不旺导致报酬降低，或者3.该行业过度供给导致报酬降低。而假定要素成本法反映要素的利用程度，也就是等于假定资源实际上被正确配置，由于这个原因，要素成本法不能推广运用到资源错误配置的场合。

尽管用要素成本法测算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净值这两个概念在许多国家中仍被广泛使用，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收入帐户中；其基本的结构主要是由用市场价格测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收入组成，这种情况部份地是出于对市场价格测算的最终产品的支出分类的兴趣和它包括了总资本构成而不是净资本构成，另外也是出于对帐户中收入一方显示了对总产出的全部课税情况（既包括资本消耗的补偿，又包括对生产者征收的间接税的兴趣）。

要素秉赋说 一种重要的资产阶级国际贸易学说，又称赫克歇尔-俄林学说，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要素秉赋说指出，各国商品价格存在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但只有在交易双方商品的国内价格比例不同时，即各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才会真正发生。它进一步指出，这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来自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换言之，商品价格的国际差异是由各国生产成本的差异所决定的。而一国生产要素价格的高低又是由其生产要素秉赋的不同所引起的。这就是说，一国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比较充足，该要素的国内价格就相对便宜，从而该国的优势产品就是那些含有较大比例该要素的出口品，反之，一国某种生产要素比较稀缺，其国内价格相对昂贵，从而该国就需进口那些该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该学说从要素秉赋即它的供给状况的角度出发，阐明了比较成本为何能以及如何来决定一国的相对优势问题，补充和发展了李嘉图学说，因而成了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又一块基石。

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Political Economy and Psychoaqgy）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它探讨如何努力提高产出水平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种种欲望。在这里，努力、欲望，满足都是心理现象。因此心理学是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和终点，既是政治经济学的动机，也是它实现动机的途径。但是经济学家并没有尽力去建立心理学方面的最高原则。例如，经济学家没有探究一个概念的本质，也没有决定意志与原因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只是接受心理上的原则作为其研究的资料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结论。只有经济学家手中没有现成的心理前提，这才涉足心理学领域去寻找那些前提。但是，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从来没有降低到物理因素的水平上。例如经济学家在研究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时，不研究为什么人的自私动机是第一位，但更不研究决定土地收益水平的土地的性质。虽然经济学家只是应用现成的心理因素和物理因素，但如果某些事物具有部分的心理特性，又具有部分的物理特性，经济学家将之视为心理因素，这是他最后的出路。因此，政治经济学的规律，都是人类行为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是心理性的，而不是物理性的。因此，政治经济学基本上，甚至于绝对地是应用心理学。在这门学科里，经济学家必须十分清楚他自始至终在处理心理现象，采用的方法也是心理分析方法。有人认为，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紧密关系如同数学与机械学的关系，虽然二者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相似的。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Pq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s）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前身，虽然经济学的内含与政治经济学已大不相同。"政治经济学"一词首见于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于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175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条目，区分了家庭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是1767年斯图亚特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脱离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而形成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因此，这一名词不具有政治活动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含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但不是反映在这个名称上，而是表现在其内容上。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有所转变，即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不侧重研究国家经济政策。有些学者把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加以改变。英国的杰文斯在1879年再版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一词代替"政治经济学"一词。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以后，经济学这一名词逐渐代替了政治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倡导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的思潮。有的经济学家主张恢复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把它与经济学区分开来使用：经济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是实施性质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则包含价值判断，是规范性质的科学。有的经济学者则主张赋予政治经济学中政治一词以实质性意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中的相对性原理（Relativity，Principle of，in Pqlitical Econqmy） 经济学的原则是针对一定时代的特殊环境的，因此，经济学原则不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是正确的，不能把它视为无论

什么条件下都是正确的教条。经济学是历史性的科学，其基本原则来自于经济活动，而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是不同的，因此经济原则是存在相对性的，而不是绝对无误的。琼斯和李斯特被认为是指出政治经济学中相对性原理的先驱。琼斯认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适用性存在着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这一地租理论是建立在个人所有制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因此就不适用于原始社会，因为那里是公有制社会，也不适用于中世纪，因为在中世纪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拥有，所有者与耕种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自由竞争的关系。李斯特认为，温带的文明社会经历了三个连续的经济阶段，即纯农业阶段；农业与幼小工业并存的阶段；；农业、工业和商业都高度发达的阶段。纯农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是落后国家进步的条件。但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需要合理的保护措施。因此，自由贸易与保护措施，对不同民族具有相对性、对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具有相对性。政治经济学的相对性原理，说明了经济学之所以丰富的原因。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就会有不同的经济学原理诞生。应用经济学原理，关键是所处的环境，所具备的条件是否与经济学原理一致。

政治学与经济学（Politics and Economics）　政治学与经济学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就说过："一届政府在选民中的地位以及在大选中取胜的信心是依赖于其经济政策的成功的。"如果在政治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经济运行的状况，那么，政府将尽力调整其经济政策而在大选之前产生最好的结果、而将那些不利的后果留给选举胜利之后。但事实上，政治学与经济学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理由有以下三个：第一，政治上是否受欢迎与经济运行的关系不是整齐划一的。评价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的标准是变化的、特别是评价两届不同政府的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是不同的，原因是不同的政府总是把不同的问题视为最重要的，而公众也总是按照政府自己规定的最重要问题解决得好坏去评价该届政府。第二，不同人是具有不同的利益的，因此评价政府时也总是从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第三，具有不同利益的人组成了利益集团，而越是在不好的时期、集团的凝聚力也越强。所以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政府。关于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是否考虑到选民的态度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从结果上看，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政府政策的执行会给整个国家经济带来一定后果，也会对社会中某些集团的利益产生影响，这都会产生政治上的后果。马克思和卡莱茨基都基于社会冲突与矛盾提出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马克思认为，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产生的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矛盾将给资本主义带来繁荣与萧条。马克思与卡莱茨基均认为国家代表着某个阶级的利益，但二人的观点是不相同的，卡莱茨基认为，资本家之所以不喜欢长久的充分就业，是因为这会增加工人的自我保障能力从而削弱资本家的社会地位。而马克思则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三种领域：第一，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在形成经济政策方面的作用；第二，对制定以及执行经济政策的机构的研究；第三，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扩大到国际经济领域。

宪制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又被称为宪制政治经济学，指的是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有关理论。

1.宪制经济学的特点与内容。

传统的经济学在对经济活动的过程进行研究、作出解释的时候，往往是在现存的宪制—法律结构中进行，分析结果可以供决策人参考。但是宪制经济学不同，它要分析不同的宪制—法律结构的运行特征，研究不同结构下经济行为人进行选择时的不同表现与后果，从而对所研究的宪制—法律结构加以评判。可见，宪制经济学不是用来为在既定的宪制准则下行事的政治决策人提供政策依据的理论，而是为那些讨论研究宪制—法律结构变革的人们提供选择的依据。宪制经济学研究的是对限制的选择，而不是在限制内部的选择，它比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层次要高。

宪制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个人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个人才能够进行选择、采取行动，个人是所有价值的源泉。

在宪制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概念仍然相当重要，可以利用它来设立关于个人追求最优化目标的经济模型，用来进行比较分析。模型中假定，个人在市场上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时与他们在政治过程中作为投票人、纳税人、受益人以及政治家时的行为特征不会改变。为了保证不同结构的可比性，则应设在不同的宪制—法律结构中，人们的行为都是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这样，通过模型得出的结果不同可以分析不同结构下的差别，从而为选择宪制结构提供指导。

2.理论渊源。

宪制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联系比较密切，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复兴。亚当·斯密就曾经提到过两个不同的模式，一个是非政治化的经济体制，另一个是高度政治化的重商主义经济体制，并就这两种不同的宪制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

19世纪末以来，垄断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理论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危机的频频发生更是打破了资本

主义市场自行调节的神话。有些人认为，之所以出现市场失灵，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在一套未经评价的宪制—法律结构下运行。要扭转这一局面，需要对几套不同的体制加以比较分析，然后从中进行选择。这一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并不现实。只有当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后，对体制进行比较分析才具有了现实意义。

宪制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是瑞典的J·威克塞尔，他强调对不同宪制结构进行选择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改革的方向所在。威克塞尔创造了著名的"一致性原则"作为对不同体制进行评判和选择的标准，在有效性标准的基础上对方法论框架进行建立与使用，并进而进行制度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宪制经济学在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中发展起来。在欧洲，它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很多，包括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史等等，其中每个领域都涉及宪制—法律结构问题，都试图越出新古典学派相对狭隘的研究框架。

3.宪制经济学的应用。

宪制经济学的应用非常广泛，它可以用于对税收、政府预算、收入分配机制以及企业组织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改革性建议，但是与正统经济学不同的是，它所研究的是不同的宪制—法律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税收机制与收入分配机制等等、在不同的体制下应当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在这方面，以布坎南为代表的现代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较大的成就，而这些研究正是当代经济学所迫切需要的。

政府支出乘数(Government Spending Multiplier) 又称"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或者说是国民收入增加量与引起这种增加量的政府支出增加量之比率。根据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政府支出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国民收入增加，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应该等于政府支出的增加量。以△G代表政府支出增加量，△Y代表国民收入增加量，C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有下式:

$$\triangle Y=\triangle G+C\cdot\triangle Y$$

$$\triangle Y=\frac{1}{1-c}\cdot\triangle G$$

上式中$\frac{1}{1-c}$就是政府支出乘数。从上式可以看出，政府支出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同比例变动，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政府支出乘数越大；反之，亦反之。而且，政府支出乘数也有双重作用，即政府支出的增加或减少都会使国民收入按这一乘数的大小增加或减少。在有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就会有政府税收，在考虑到税收的情况下，政府支出乘数的公式会略有不同。因为在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收入增加中只有纳税后收入可用于支出。因此，以t代表税率，这时的边际消费倾向就是$c\cdot(1-t)$。这样，上述公式就是:

$$\triangle Y=\triangle G+c\cdot(1-t)\triangle Y$$

$$\triangle Y=\frac{1}{1-c\cdot(1-t)}\cdot\triangle G$$

这时，$\frac{1}{1-c\cdot(1-t)}$是政府支出乘数。因为$0<t<1$，所以，$c\cdot(1-t)<c$，从而:

$$\frac{1}{1-c\cdot(1-t)}<\frac{1}{1-c}$$

这就说明，如果考虑到税收，这时政府支出乘数小于没有税收时的情况，即小于一般的乘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乘数还取决于税率与税率反方向变动，即税率较低，政府支出乘数越大；反之，亦反之。政府支出乘数可以说明政府支出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在实际制定政策时十分有用。

政治性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西方国家政府为了有利于赢得选票而制定的经济政策所引起的经济波动。政府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往往在大选前从政治需要出发来制定经济政策，以迎合选民的心理，而在选举后又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以稳定政局。这些政策往往并不是根据经济形势制定的，但会引起或加剧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一般就把这种由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经济波动称为政治性经济周期。一般说来，在选举之前经济形势改善，尤其是失业的减少，有利于现任政府连举连任，所以，现任政府就往往在选举前采用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这类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这就引起或加剧了选举前的经济繁荣。在选举之后，为了制止这种繁荣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或弥补财政赤字，往往又要采取增税或减少政府支出这类紧缩性财政政策，从而又会引起或加剧经济衰退。这种经济周期往往是随选举时间而变的短期波动。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尽管选举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这种影响还不足以引起较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从长期统计资料看，经济周期与选举也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政治性经济周期在经济中并不重要。

政策时滞(Policy Time Lag) 一项经济政策从作出决策到完全发挥作用的时间间隔。其中包括作出决策的内在时滞与政策发生作用的外在时滞。内在时

滞又可以分为确定是否需要采取某项政策的认识时滞，作出决定的决策时滞和付诸实施的实施时滞。各种经济政策的时滞长短并不一样。政策时滞中各种时滞的长短也不一样。为了使经济政策起到有效地稳定经济或刺激经济的目的，应该缩短政策时滞，尤其是内在时滞。政策时滞的长期取决于不同政策本身的特点，以及经济体制，决策方式等制度特征。在确定某种政策，以及预测政策效应时，要考虑到不同政策的政策时滞。因此，在运用相机抉择的政策规则时，应该考虑政策时滞这一重要因素。

政策困境（Policy Dilemmas）　开放经济中内在均衡与外在均衡之间的矛盾。内在均衡指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外在均衡指国际收支平衡。经济政策目标应该是同时实现内在均衡与外在均衡。但在实际上这些目标是有矛盾的。在开放经济中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均衡之间有九种组合方式：第一、国内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赤字；第二、国内经济衰退（失业）与国际收支盈余；第三、国内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盈余；第四、国内经济衰退与国际收支赤字；第五、国内经济均衡与国际收支赤字；第六、国内经济均衡与国际收支盈余；第七、国内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均衡；第八，国内经济衰退与国际收支均衡；第九、国内经济均衡与国际收支平衡。在上述九种组合中，第九种同时实现了内在均衡与外在均衡。在第一处情况下，采用紧缩性政策既可以消除通货膨胀，又可以消除国际收支赤字（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国民收入，减少进口；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入）。在第二种情况下，采用扩张性政策既可以消除国内失业又可以消除国际收支盈余（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国民收入，增加进口；紧缩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使资本流出）。从第三种到第八种情况则属于政策困境。在第三种情况下，采用紧缩性政策可以消除国内失业，但紧缩性政策引起的国民收入减少与利率上升又会减少进口，吸引资本流入，加剧国际收支盈余。而采取扩张性政策减少了国际收支盈余又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第四种情况与第三种情况相反，采取紧缩性政策可以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却加剧了国内经济衰退，采取扩张性政策可以消除国内经济衰退却又加剧了国际收支赤字。第五种与第六种情况是实现了国内均衡，但国际收支不均衡。在第五种情况下，采取紧缩性政策可以消除国际收支赤字，但却引起失业，破坏了国内均衡。在第六种情况下，采取扩张性政策可以消除国际收支盈余，但却引起通货膨胀，破坏了国内均衡。第七种与第八种情况是实现了国际收支均衡，但国内不均衡。在第七种情况下，采取紧缩性政策可以消除通货膨胀，但却引起国际收支盈余，破坏了国际收支的均衡。在第八种情况下，采取扩张性政策可以消除失业，但却引起国际收支赤字，破坏了国际收支的均衡。第三到第八种情况使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难，用任何政策都无法同时达到国内均衡与国际收支均衡。摆脱这种困境就要把各种政策配合使用，这正是最优市场配合所要解决的问题。

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　政府为了影响政策变量，达到既定政策目标而使用的经济和社会变量，即政府用于达到某种目标的政策手段。其中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收入政策。此外，政府还通过社会和制度改革来影响政策变量，例如，政府试图改革工资谈判制度、以控制工资增长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不同的政策工具可以达到同样的政策目标，同样的政策工具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如何适当地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是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是指企业、政府以及非盈利组织所进行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和工程，以及样机与工序的设计和发展。不包括质量管理、日常产品检验、市场调查、推销活动、销售服务以及地质或地球物理勘察。研究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以及非盈利性机构。其中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政府所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及技术的研究在全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也包括社会的基础情况研究，具有投资大，时间长，而又风险大的特点，企业和非盈利性机构无力或不愿从事这项研究。但由于基础研究的成果具有深远意义，某一项基础研究的突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对之十分重视。企业特别是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大的企业近年也不断地参与基础研究。当然，应用研究一直是企业研究与发展的主题。由于技术变革速度加快，技术创新对一个企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企业对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的投入不断增加。非盈利性机构主要是指民间性的研究机构。如大学中的研究所、其在技术变革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与技术进步分不开的；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研究与发展是经济成长的关键。

既定事实（Stylizde Fact）　既定事实这一概念是尼古拉·卡尔多于1958年在关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论述中提出的。卡尔多认为，每个人都清楚建立模型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模型可以解释经济运行过程的基本特点，而这个特点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见到

的。如果理论模型的结论与所见事实相矛盾，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呢？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是简单地认为，模型中的假设条件中没有包括认识方面的变化，或者把矛盾归结于技术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卡尔多认为，这种矛盾的解释没有太多的价值。对于卡尔多来讲，虽然一个人选择符合实际经济运行的假设是很困难的，但选择理论方法时，出发点必须是与所探讨问题相关的既定事实。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事实为什么是既定的？当既定事实不只一个，而是多个时，人们是从多个既定事实中选择合适的，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经济学家们目前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威克塞尔与新古典经济学（Wick Sell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的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问世。它集19世纪经济学之大成，用折衷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庞杂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运用连续原理和局部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变化，用主观心理动机去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均衡价格，马歇尔以均衡价格为基础建立分配论，提出了生产四要素学说，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生产要素共同协作创造的，而各要素的所占份额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充分就业的自动均衡趋势。马歇尔的这一经济理论区别于"古典经济学"，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百余年间，西方经济学界还出现了与传统流派不同的其他学派。包括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和瑞典学派。其中瑞典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它的主要创始人就是威克塞尔。威克塞尔把货币分析引入经济分析，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中率先反对萨伊定律，破除自动均衡教条、主张国家干预的第一个人。威克塞尔率先对马歇尔的传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先驱。

威胁效应（Threat Effect） 有工会部门或企业的工资标准对没有工会的部门或企业工资决定的影响。在没有工会的部门或企业中，雇主为了防止本部门或本企业工人建立或加入工会，向工人支付与有工会部门或企业的工资相同或接近的工资。这是工会的存在对没有工会的部门或企业雇主的威胁所引起的。根据这种理论，工资上升的动向是由有工会的部门或企业向没有工会的部门或企业移动，即先由有工会的部门或企业提高工资，而后没有工会的部门或企业不得不追随。威胁效应对解释工资攀比行为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依据。但现实中威胁效应的大小还要取决于没有工会的部门或企业中劳资力量的对比、以及整个社会中工会的强大程度等因素

耐用消费品（Consumer Durables） 关于耐用品需求的研究通常分析两类数据。第一类是购买的时间序列数据。第二类是各种消费品占有的横截面数据。经济理论中有专门的分支研究第一类数据，但是研究中抽象掉第二类数据中所强调的所有权离散问题，而集中考察投资、预期和调整成本的动态。在家计单位水平上研究离散性选择的理论却不涉及这些因素。对耐用消费品的研究一般也在这样的框架中进行。

耐用品需求的分析必须首先考虑到商品存量与商品流量的区别、考虑到购买和占有耐用品决策影响的跨时性，在这两条基本性质上克瑞默（Cramor）建立了耐用消费品需求模型，这一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费雪（Fisher）的投资需求模型。

假设消费者追求在时间维度上的效用极大化，而且他们可以在同一利率下借款和购买，可以在同一价格下买进和卖出耐用品。不存在调整成本或其它与购买和占有耐用品相联系的惯例限制，服务流在时间维度上按几何级数缩减。如果转换为有效单位，新旧耐用品满足消费的能力是相同的。耐用品完全可分并且不存在离散问题，因此没必要以整数单位占有。虽然耐用品可以在旧货市场上转手，但是不存在报废问题。在以上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下，消费者在以下形式跨时预算约束下

$A_t = A_{t-1}(1+r_t)+y_t-q_t-(p_t^D / pt)(s_t-(1-\delta)s_{t-1})$追求效用极大化

$$\max u_t = V(q_t,\ s_t,\ \cdots,\ q_t, s_t, A_T)$$

其中，q是非耐用品的消费流量，S是耐用品存量，A是用耐用品价格指数p_t调整后得到的实际金融资产，r是实际利率，y是实际非资产收入，p_t^D是耐用品的价格指数，δ是耐用品的折旧率。

通过消去金融资产项并进行贴现处理，可以得到消费者生命周期财富W。

$$W_t = \sum_{j=t}^{T} P_j q_j + \sum_{j=1}^{T} P_j \pi_j S_j$$

其中，π_t代表使用者成本，而且存在

$$p_t = 1$$

$$\rho_j = \pi_{i=t+1}^{j} (1+ri)^{-1}, \qquad t+1 \leqslant j \leqslant T$$

$$\pi_t = (p_t^D / p_t)[\delta - \triangle \ln(p_{t+1}^D / p_{t+1}) + r_{t+1}]$$

由极值问题

$$\max \quad u_t = V(q_g, s_t, \cdots, q_t, S_t, A_t)$$

$$s\cdot t\cdot W_t=\sum_{i=1}^{t}P_i q_i+\sum_{i=1}^{t}\rho_i\pi_i s_i$$

得到需求函数

$q_t=g(\rho,\rho\pi,W_t)$

$S_t=g^D(\rho,\rho\pi,W_t)$

在横截面数据中必须正视占有的离散性，法雷尔（Farell）首先分析了耐用消费品这方面的因素影响，以下是法雷尔模型的简化形式。

令 p^D 是耐用品的出租价格，用 x 近似表示消费者收入，那么预算约束就是

$pq+P^DS=x$

如果占有耐用品，则 S=1；否则 S=0

令单一时期效用函数为

$u=v(q,S,b,\in)$

其中 b 是标志家计单位可观察特征的矢量，其不可观察特征用 ∈ 概括，如果 S=0，可解得 q=x／p。如果 S=1，可解得 $q=(x-q^D)/P$。如果

$v((s-p^D)/P,1,b,\in)>v(x/P,0,b,\in)$

那么家计单位就应该占有而不是租用耐用品。如果该耐用品在体积、功能或豪华等其它方面的变量可用一质量参数表示，那么以上占有基准仍然是正确的，此时 S=1 就指可利用的最低质量，而 S>1 相应表示可利用质量的提高。由极值问题

$\max v(q,S,b,\in)$

$s\cdot t\quad pq+p^DS=x$

得出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

$Q=g(x,p,p^D,b,\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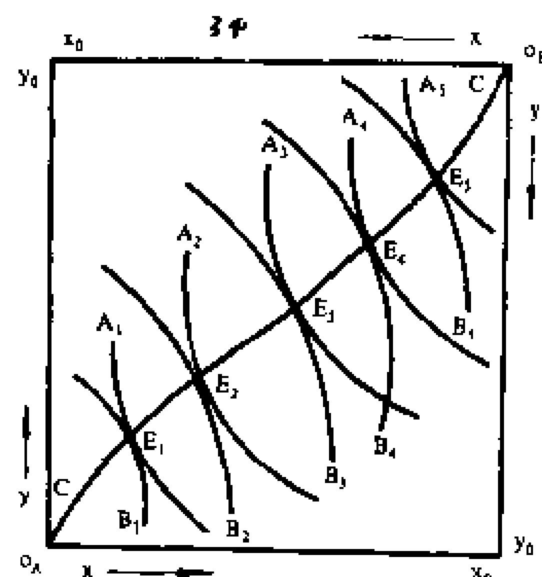
$S=g^D(x,p,p^D,b,\in)$

其中，p^D 成为经质量修正的价格参数，和 P 一样，在单时期横截面数据中对所有消费者都是相同的。同时 S＞1。

在 $g^D(x,p,p^D,b,\in)>1$ 时，耐用品就全被占有而不是被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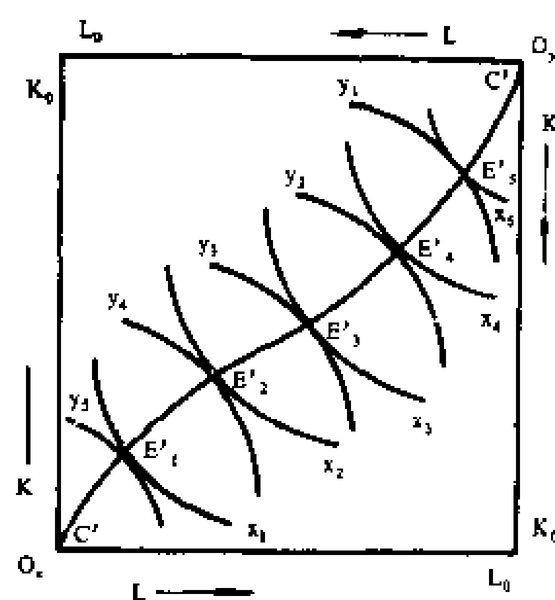
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　是描述消费者或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处于最佳状态的一条曲线。契约曲线是借助于英国经济学家 F·Y·埃奇沃思提出的埃奇沃思盒状图构造出来的。分为消费契约曲线与生产契约曲线两种类型。

消费契约曲线是一个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与另一个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点轨迹。假定一社会只有两个消费者 A、B，只消费两种商品 X、Y，社会所拥有的 X 总量为 X_0，Y 总量为 Y_0。可以分别画出 A、B 两个消费者消费 X、Y 两种商品的无差异曲线。A 的无差异曲线用通常的方式给出，B 的无差异曲线图旋转 180° 与 A 的无差异曲线图一起构成埃奇沃思盒状图。在 A 的无差异原点 O_a 上，A 所消费的 X，Y 两种商品均为零，而 B 消费了全部的 X 与 Y 两种商品，A 的无差异曲线处于最低水平，B 的无



差异曲线处于最高水平；在 B 的无差异曲线原点 O_B 上，B 所消费的 X 与 Y 两种商品量均为零，全部商品 X，Y 都由 A 消费了，B 的无差异曲线处于最低水平，A 的无差异曲线处于最高水平。埃奇沃思盒状图中，A 的无数条无差异曲线 $A_1,A_2\cdots$，与 B 的无数条无差异曲线 $B_1,B_2\cdots$，相切，得到无数个切点 $E_1,E_2,\cdots$，连接这无数个切点，便得到一条消费契约曲线 C—C 曲线。在契约曲线上的点都是消费者交易的最优点，因为在这条契约曲线上，两个消费者边际替代率是相等的。

生产的契约曲线是一个生产者等产量曲线与另一个生产者的等产量曲线相切的点的轨迹。



假定社会只有两个生产者 A、B，只有两种要素资本 K 与劳动 L，两种商品 X、Y。社会拥有的两种资源总量为 K_0,L_0，可以分别画出 X 产品与 Y 产品的等产量曲线。X 产品的等产量曲线图按通常的方式给出，Y 产品的等产量曲线图旋转 180° 与 X 产品的等产量曲线图构成埃奇沃思盒状图。在 X 产品等产量曲线图的原点 O_x 生产 X 产品所使用的 L 与 K 两

种生产要素都为零，而全部生产要素都被用于Y产品的生产，X产品的等产量曲线处于最低水平，Y产品的等产量曲线处于最高水平；在Y产品等产量曲线图的原点O_Y，生产Y产品所使用的L与K两种生产要素都为零，而全部生产要素被用于X产品的生产，Y产品的等产量曲线处于最低水平，X产品的等产量曲线处于最高水平，在埃奇沃思盒状图中，生产X产品的无数条等产量曲线$X_1,X_2\cdots$与生产Y产品的无数条等产量曲线$Y_1,Y_2\cdots$相切得到无数个切点E_1,E_2，…，连接这无数个切点，便得到一条生产契约曲线C−C'。在契约曲线上的点都是资源配置的最优点，因为在这条契约曲线上两个生产者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等的。

项目评估（Project Evaluation） 项目评估从广义上讲是根据某种标准对一个项目进行评价。例如对某一投资项目进行评估。狭义地讲它只是指对一国政府所从事的项目进行评估。

在一个由价格机制调节经济的社会中，私营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选择是不成问题的。项目评估并不复杂。投资者根据自己的目标选择投资方案。如果投资者的目标是使得该项投资取得最大利润，那么他只需要根据这一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选择可行投资方案即可。他通过比较购买资本的价格、资本预期可以给他带来的收益，贴现率、投资的风险等因素，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方案中选择一种能给他带来最大预期利润的投资。

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要从事某一项目就不象私人投资项目选择那么简单，政府所从事的项目是一种公共决策，而不是私人决策，私人经济决策时，市场价格是一重要的信息。私人往往根据投入物与产出物的价格来评价项目的盈利性，但是政府决策的场合，市场价格信息的重要程度就不象在私人决策场合那么大，在许多场合，政府所从事的项目，例如政府所生产的公共产品并不存在着象私人产品那样的市场，也就不存在着这些项产品的市场价格。政府的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并不象私人决策那样通过投资使得利润达到最大化，其决策的目标往往是复杂的，多样的，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因素，又要考虑到政治的、社会的因素。因此项目评估对于政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项目平估"一词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就是指一国的计划者如何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一种符合计划者目标的方案。

评价政府的项目属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支，所使用的是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分析方法。进行项目评估时，首先设计一社会福利函数，在考虑到消费，公共部门与私营生产约束的条件下选择一种投资项目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由于政府的计划项目并不存在着象私人产品市场那样的市场价格，因此在进行项目评估时，使用一系列理论价格（notional prices）以对商品和劳务定价，理论价格并不一定与市场价格一致，理论价格也叫会计价格或影子价格。在理论价格的基础上，估计理论利润（notional Profit）对于计划投资项目所产生的预期收益，用社会贴现率进行贴现。根据各种方案所产生的理论利润的大小，选择一种能带来最大理论利润的项目。

显示偏好理论（Revealed Pveference Theory） 是最早由萨缪尔森提出的一种需求理论。它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对商品价格和收入的反映方式的观察的基础上。偏好无法被观察，但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来推知其偏好，那么需求行为是否而且如何产生于显示偏好关系？显示偏好理论正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显然，它与存在显效用函数的情况下，对效用最大化的分析理论不同。

一、显示偏好。在显示偏好理论看来，不能观察的偏好产生于可观察的消费者选择行为。假定存在几种商品，用向量表示$X=(x_1x_2\cdots x_n)$，$P=(p_1,p_2\cdots p_n)$为其价格向量。$q=(q_1q_2\cdots q_n)$为其数量向量集合。消费者拥有一定的收入，且凭他个人无法影响价格P_0。消费者的总支出$P^0Q^0=\sum_{i=1}^{n}P_iQ_i$，在预定约束$P^0\cdot Q^0=M^0$（$M^0$为消费者的总收入）条件下，考虑一种可供选择的商品组合，q^1，它应该被消费者购买，但实际上没有购买，当价格为P^0时，q^0的总成本必定不能大于q^0的总成本，即

$$p^0q^0<p^0q^0$$

由于q^0是一组至少与q^1同样昂贵的商品组合，而消费者选择q^0而拒绝选择q^1，那么我们就说q^0显示偏好于q^1。亦即x^0显示偏好于X^1只是意味着消费者面对两种可以购置的消费品组合x^0,x^1,x^0被选中而x^1未被选中，尽管x^1并不一定比x^0更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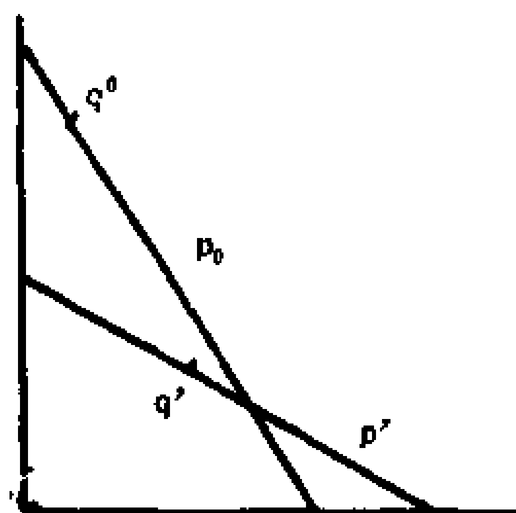
二、显示偏好弱公理。假定x^0显示偏好于x^1，这就是说在价格向量p^0上，x^0被选中，且$p^0x^0>p^0x^1$，这样x^1本可以被选中，但实际未被选中，那么x^1永远不会显示偏好于x^0。只有在某些价格情况下，当消费者也可能能够买q^0时而实际购买了q^1，q^1才显得比q^0更可取。换言之，q^1显示偏好于q^0，如果：

$$p^1g^0<p^1q^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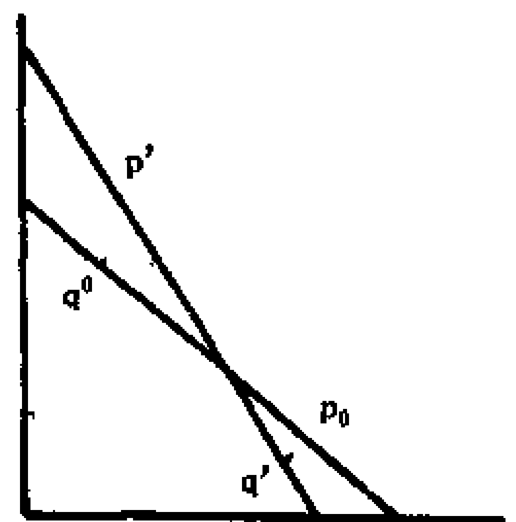
显示偏好的弱公理表明，$p^1q^0<p^1q^1$时，x^1更可取与$p^0q^1<p^0q^0$时，x^0更可取二者不可能同时成立，也就是说：

$$p^0q^1<p^0q^0 \text{ 暗含 } p^1q^0>p^1q^1$$

三、显示偏好的强公理。不难看出显示偏好弱公理存在很大局限性。我们用两个商品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上图中假定价格由 P^0 表示的线给定的，消费者购买商品组合 q^0，而当价格由 P'线给定时，购买 q^1。由于 P'线低于 P^0 线，消费者可能以 P^0 价格购买 q'。给定这样选择，弱公理表明，当她购买 q^1 时，q^0 必定时无法取得的。也就是，q^0 必定在线 P'上方。图（a）表示的行为是满足弱公理的。但如果出现（b 图的情况就违背了弱公理。我们注意到图 a 中 P'价格上，x^0 比 x'贵，即 $P'x^0>P'X_1$，那么 X^1 不显示偏好于 X^0 只是由于 X^0 被选中，X'在 P'下只不过比 X^0 更便宜，用代数方法单以 $P'x^0>P^1X'$ 本身推判不出任何关于 x^0、X'的合意性的情况来。对于两种商品组合如 X^0.X',我们不能说 X^0 而不是 X'被选择、是因为 X'不可取，也不能说 X'而不是 X^0 被选择是因为 X^0 不可取。X^0 与 X'无法简单相比。在图（b）



(a)



(b)

中，要找出一条在 q^0 与 P^0 相切，另一条在 q^1 与 P^1 相切的凸的无差异曲线是不可能的。如果考虑两种以上的消费品组合，如三种组合 x^0,x^1x^2，弱公理允许偏好具有不传递性。将偏好与通常的消费者偏好相联系来考虑，x^0 偏好于 x'x'偏好于 x^2，x^2 偏好于 x^0，这种情况不成立。而效用的不传递性在通常的效用分析中被假定为不出现。针对上述问题，霍萨克（H · S · Houthakker）于 1950 年又提出最显示偏好的强公理，即如果 X^0 显示偏好于 x'，x^1 显示偏好于 $x^2\cdots$ X^{m-1} 显示偏好于 X^m，则 X^m 必定不再显示偏好于 X^0。由此看来，强公理保证了显示偏好的可传统递性。但比一般的可传递条件更强些。在显示偏好的弱公理基础上，无法得出一个需求函数。有了强公理，就能以一定限制的效用最大化中求出与其一致的个人需求函数。实质上，强公理与效用最大化的分析相一致，一个可以表明另外一个。它是弱公理的更一般的情形，只不过是将弱公理的观点以两个消费不组合的情形推广到两个以上消费品组合的情形。

四、显示偏好理论的运用。显示偏好理论在萨缪尔森、霍萨克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发展。对显示偏好理论的许多运用支持了萨缪尔森最初的观点：显示偏好能够提供作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基础的偏好理论。显示偏好的分析技术被用于证明竞争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证明希克斯复合商品定理。分析是超额需求函数的性质等等。显示偏好理论为传统的效用分析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显成本（Explicit Cost） 显成本是指厂商购买投入物品的实际支出。例如，厂商购买原材料、燃料的支出，厂商雇用劳动力的工资发出，固定资产折旧、管理费用支出等都属于显成本。

按指数偿付的证券（Indexed Securities） 通常的证券利率是固定的，这个利率包括经济的期望的收益率、市场的期望利率等内容。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由于人们的预期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一致的可能性的存在，在固定证券利率下，人们可能遭受物价大幅度上涨所带来的未预料到的损失。为防止这种情况，有人提出发行按指数偿付的证券，以取代固定的利率的证券，也就是说，将证券的利率与物价水平上涨结合起来，物价上涨越大，证券利率越高，证券的利率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按指数偿付的证券对人们的保护是通过两种方法之一进行的。其一，证券按照特定的利率发行，等到期满时，根据从发行到期满这段时间里物价水平的变化，对证券的本金和利息进行调整。这种方法与目前英国发行按指数偿付的证券的方法很相似。第二种办法是在从发行到期满的整个期间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到期满后偿付本金。需要指出，每种方法都不能保证投资者完全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关于发行按指数偿付的证券的利弊有许多讨论，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是否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有人认为，由于按指数偿付的证券可以很大程度地保护人们，减少了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于是，通货膨胀对人们的压力就很小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就不大关心，听其发展、恶化，从而通货膨胀状况将会越来越糟。另一种看法认为按指数偿付的利率有

助于对通货膨胀的斗争。因为它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可鼓励投资，增加储蓄，这些可以改善经济状况。而且，以托宾为代表的学者们还认为，通货膨胀可减少政府公债的实际负担，这样，发行按指数偿付的证券，就可消除政府鼓励通货膨胀的主要动机。

信用（Credit） 指的是一种交易活动，其中的贷款人将一笔资金转让给借款人使用，借款人承诺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将这笔资金归还给贷款人，并支付利息作为对贷款人放弃这笔资金的当前使用权的报偿。

信用发生的时候，借贷双方通常要制订一个书面协议，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偿还能力与承诺。在借贷款时，贷方通常要根据借方的经济实力以及信誉度确定这个借方的信用等级。对于信用等级不高的借方，一般要求通过财产抵押或者签名等方式来支持其偿还贷款的承诺，这是有保障的信用，当借方一旦不愿或者无法还债时，贷方还可以索取一部分价值。对于信用等级很高的借方，有时只作出口头上的偿还承诺就可以了，这是没有保障的信用。（2）偿还时间。从十几个小时到几十年不等，一般根据需要，由借贷双方协商进行，但主动权在贷方一边。（3）利息。以前的信用利息是固定的，在协议中明确写出。7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利息率波动幅度大，因此现在常用的办法是借债期间每隔一段时间支付一次，每次支付的利息按当时利息率的变动情况决定。另外一个办法是在信用到期时，将债券的面值与其最初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利息。（4）可转让性。债务工具分为可以转让与不可以转让两种。对于前一种情况，它可以在贷方之间转让，也可以通过债券市场进行。如果某一债券的利息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它的面值就会随着市场利息率变动，这使得债券成为投机买卖的工具。

信用出现的历史相当长久，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出现了私有财产与贫富分化，产生了高利贷信用。这一信用形式沿用了许多年，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由于它有利于寄生阶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受到严厉的禁止。当代社会中，信用主要由三个渠道提供：（1）工业企业。主要通过分期付款或者延期付款的方式向购买其产品的用户提供信用，其主要信用工具是期票、汇票等等。（2）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工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将吸收的存款贷出以及贴现等方式提供信用，其主要信用工具包括期票、信用证以及商业承兑票据等等。（3）政府。通过发行公债以及短期国库券提供信用。它提供信用的主要领域是那些偿还上有一定风险、私有机构不愿提供信贷的地方，比如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具体的信用之外，政府还应当从宏观层次上对信用的规模以及银行的储蓄存款进行严格控制，因为它们都将影响到货币的供给总量，并进而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

信用可以为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公共工程融通资金，极大地便利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的需要，从而促进了经济的运转与发展。此外，它还以某些信用工具代替货币在经济中流通，这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流通费用。可见，信用是现代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之一。

信用发行（Fiduciary issne） 信用发行是指银行发行的一部分银行券没有相应的黄金或其它被广泛接受的支付手段与之对应。信用发行最早起源于英格兰银行1844年的银行章程法案。1844年的法案将英格兰银行划分为发行和资金两个部分，而发行的部分银行券是以一个固定数量的政府债券为准备的，这部分银行券就被称为信用发行。信用发行在初期执行得较严格，发行量受到限制，结果引起了货币的不足。为了满足商业需求，政府便鼓励银行增大信用发行部分。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后，信用发行大幅度增加。现在在世界各国货币发行中，信用发行已成为主流。

信用周期（Credit Cycle） 指的是信用不断收缩与扩张的过程，是商业周期波动的本质特征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商业周期理论是与当时的价格理论相互独立而发展的，因此，人们总是无法对经济总量重复波动的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后来，学者们重新考察了图克的货币数量论的收入法，认为应当强调货币收入总量在货币价格分析中的地位，而以前都过于重视货币数量。这一研究重点的转移成为信用周期理论发展的关键一步。随着货币理论的发展以及一战之后经济背景的变化，信用周期理论在二、三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

信用周期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是：（1）投资量与利率之间是反相关的关系；（2）一般地说，利率对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额足够敏感。

第一个用货币信用来解释商业周期波动的学者是英国的R·霍特里(Hawtrey)。他于1913年在《商业兴败》一书中就对货币与信用在商业周期中的运行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论述，1928年，他在《贸易与信用》一书中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充实完善，认为，当代的周期波动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当以货币表示的商品需要增加的时候，则生产量增加，价格上升，商业就处于繁荣阶段；反之，如果以货币表示的商品需要减少，则产量减少，价格下跌，商业处于萧条阶段。但是，商品对货币的需要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变

化，如果货币量增加，就会导致消费需求增加。生产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相反，如果货币量减少，则市场需求下降，产品积压，产品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可见，货币信用的扩张与收缩是造成商业周期波动的原因，对信用进行控制就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尽管霍特里的理论并不完善，也忽略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不过它们不失为具有启迪意义的早期信用周期理论。

L·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继承了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的观点，即认为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不一致引起信用膨胀，造成投资增长，经济繁荣。但是经济周期波动是由不适当的信用政策造成的。罗伯逊持类似的看法，即认为信用周期的原因是投资过度，而这又是平均经济中的典型特征。因此，要重新研究储蓄的概念以及它在周期中所起的作用。

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中对信用周期作出了某种程度上非货币的解释，认为银行利率的影响涉及很广，不仅限于某一种投资，累积过程包括传统的收入动机以外的货币需求理论，在短期内，货币信用量与价格水平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哈耶克继承了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论等观点，将它与奥地利学派的商品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创造新货币或者货币以外的力量将造成自然利率（均衡利率）与实际利率的背离，引致信用资本增加，使得投资大于自愿储蓄，形成累积扩张。过多的投资又多用于资本品，而不是消费品，造成二者之间的失衡。这时只有通过信用控制从而提高实际利率，才能使产品结构逐渐恢复正常。可见，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背离以及强迫储蓄是造成周期波动的原因，哈耶克的理论很重视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也强调银行创造信用品倍数作用，更重要的是，他采用了"瞬时均衡"的分析方法，认为在瞬时均衡中，不仅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不同时刻上会各不相同，而且资本存量也不会在它的供给价格上得出统一的自然利率。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都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

研究信用周期理论的其他学者还有卡塞尔、庇古、费雪以及米契尔等人。

信贷与储蓄（Finance and Saving） 信贷是指用货币流量余额保证支付功能的货币交易或对资产的投资。对信贷的分析在性质上是微观的。储蓄是未被消费的收入，与信贷不同，储蓄既是个人的行为又是整个经济运行的结果。储蓄是资本存量增长的唯一源泉。

在从个人储蓄中形成并构成了信贷的潜在来源的微观货币流量和宏观水平的实际储蓄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距，可贷资金理论据此得出自然利息率的观点：当存贷相等时流行的利率为自然利息率。当自然利息率大于货币利息率时，将形成通货膨胀；当自然利息率小于货币利息率时，将形成通货紧缩，当自然利息率等于货币利息率时，价格将保持稳定。

储蓄是信贷的重要来源，但并不是唯一的来源；此外，银行的信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投机需求理论认为利息率是由现存的证券交易决定的，所以如果新的证券发行不能充分吸收储蓄流量的话，储蓄并不能完全转变为信贷。这样，储蓄理论和信贷理论第一次分离了。

直到凯恩斯之前，经济学界一直认为投资取决于作为信贷来源的储蓄；凯恩斯改变了这一因果关系，认为投资是独立于储蓄的，并且创造出额外的收入，而额外的收入最终又将转化为等量的储蓄。

在目前，储蓄理论还没有超过利率和收入决定的水平，而信贷理论，在研究合理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选择和企业合理的投资来源选择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仍有着无限的生命力。

信贷控制（Credit Control） 指货币当局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或者信贷政策对信贷流量所进行的调节以及合理配置，它的目的是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控制通货膨胀，进而保证经济稳定而健康地发展。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信贷控制都是由中央银行来完成的，在美国则是由联邦储蓄系统通过12家联邦储蓄银行来实施。进行信贷控制可以从两个角度着手，一个是从总量的角度，对信贷的数量与可用性进行全面的控制，这一方法在18世纪就已被英格兰银行所采用；另一个是从结构的角度，对某种信贷的数量与使用方向施加影响，使它向既定的目标倾斜，这种方法在二次大战以后才被采用。进行信贷控制的具体措施有：(1) 货币当局从事公开市场业务。这是控制信贷最为重要的措施。货币当局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或者出卖政府债券，就可以提高或者降低商业银行的储备，从而影响它们的贷款能力。(2) 改变贴现率。贴现率指的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钱时所要支付的利息率，提高或者降低贴现率可以影响商业银行的借款能力，从而间接地影响着它们放贷的能力。(3) 改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同样影响着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存款准备金比率越高，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就越低；反之，这个比率越低，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就越高。(4) 对购买证券的贷款、抵押贷款以及消费信贷等的借贷条件作出一定的限制。(5) 货币当局直接进行调节与说明工作。除了上述货币与信贷的手段之外，有时还采用财政政策来帮助缓和资本

市场的紧张程度。

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 指的是在借贷市场上，贷方对资金的供给少于在合同条款下借方对资金的需求，从而借方的需求无法全部得到满足的情况。在出现了信贷配给的情况下，贷方与受到限制的借方都愿意提高贷款价格（即利息率以及其它附加条件），当贷款价格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借贷市场就会处于出清的状态，信贷配给随之消失。可见，如果信贷配给在借贷市场上持续存在，那么必然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对高利贷的限制使得利息率保持在市场出清的水平之下，这就会维持信贷配给的局面。从借贷双方的行为来看，债务拖欠是造成信贷配给的另一个原因，不过它的一个前提是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从借方来看，还债是最佳选择，但从贷方来看，却预期注定要发生拖欠，这时如果存在对贷款过度需求，那就会导致信贷配给。贷方所决定的利息率与贷款的规模将影响到借方的还债行为以及对贷款的选择。如果贷款规模增大，借方拖欠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这时，贷方可以提高利率以弥补其减少了的收益。利率提高以后贷方预期的收益会有所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借方也希望选择那些风险更大的项目，以期多获利，这又增加了拖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些借方的风险较小的投资在提高了的利率下无法盈利，这些都会影响到贷方的收益水平。所以，贷方的最优选择是将贷款利率保持在市场的水平之下，将信贷实行配给。实行配给的时候，贷方可以对借方进行选择，同时规定一些附加条件，并对每一种债务风险都掌握一个额外的控制的手段，以便消除拖欠等不利因素。

在实践中，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对高利贷进行控制，因而信贷配给普遍存在。在法定利率上限较低的领域里，贷款的供给趋于减少。80年代以后，有些国家对金融市场实行放宽管理，债务市场与资本市场正迅速溶为一体，防止债务拖欠的措施不断加强。信贷配给量尽管会随着金融平均的变革而有所减少，但它还会由于借贷双方信息的不对称而继续存在下去。

信汇汇率（Mail Transfer Rate,简称M / T Rote） 外汇银行以信汇汇款方式卖出外汇时使用的汇率。外汇交易中的信汇是指外汇银行卖出外汇时开具一份付款委托书，以信函的方式邮寄给其国外分支行或代理行由它们向收款人付款的汇款方式。因信函邮寄需要的时间较电汇要长得多，银行在付款前可以利用客户的资金，故信汇汇率低于电汇汇率，一般其差额相当于邮程时间内的利息。

信托收据（Trust Receipt，简称TR） 信托收据是指在远期付款交单托收方式下，进口商向代收银行开立的表示愿意以代收银行受托人的身份代为提货、报关、存包、保险和出售货物，同时承认货物的所有权仍属代收银行，货物出售所得款项应交付银行的书面担保文件。

代收银行凭信托收据给予进口商以提供便利，这是银行向进口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又可以称为收进口押汇或称为付款交单凭信托收据借货。它主要用于解决在远期付款交单方式下，汇票的到期日晚于货物抵达目的地日期的情况。进口商通过付款交单凭信托收据借货，可以在承兑远期汇票后，开立信托收据，在汇票到期付清货款之前，借出货运单据而自行处置货物，取得货款，而在汇票到期的时候再行付清货款。它减少了进口商的资金占用并加快了资金周转。

代收银行开展信托收据业务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只有在严格审查进口商的资信情况下，代收银行才会向资信较好的进口商提供信托收据业务。如果代收银行未经出口商或托收银行的同意，擅自决定接受进口商的信托收据而向其借出货运单据，则代收银行就承担了汇票到期日必然付款的义务，因此这种融通行为事实上对出口商和托收银行有利。出口商也可以主动在托收委托书中指示银行允许其凭信托收据向进口商借出货运单据，但此时若汇票遭到拒付，风险由出口商自己承担，与银行无关。因为代收银行在这时仅仅是出口商的间接代理人，依据出口商的指示行事。

在信托收据业务中，出具信托收据的出口商其身份为银行的被信托人、代保管人和代理人。出口商须履行以下义务：（1）凭信托收据借出货运单据而自行提货后，应将这些货物分开保管；（2）将货物出售后所得货款应交付银行；或者代银行暂为保管，但应将此货款与自有资金分开。（3）无权将单据项下的货物予以抵押。代收银行对于出借的商品则拥有以下权利：（1）对于出借的商品；可以随时取消信托而收回商品；（2）在商品已出售后，有权随时收回货款。（3）若开立信托收据的出口商破产倒闭，代收银行出借的货物或货款有优先债权。

出口商以开立信托收据而借单提货的作法，主要用于远期付款交单方式下。但在即期付款交单方式下，也有可能进行信托收据业务。依照国际惯例，在即期付款交单方式下，进口商赎取单据的时间通常为24小时。如果进口商一时难以付款，可以与代收银行商定以交具信托收据的方法先行借单提货。但是在即期付款交单条件下，若代收银行允许进口商开立信托收据而延期付款，则代收银行需按即期付款交单的条件如期垫付托收金额。

信托收据不仅使用于托收方式下，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其中主要是在远期信用的方式下，也可能出现银行允许进口商凭信托收据借单提货，而在汇票到期付款购还信托收据的情形。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简称 L / C）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国际结算方式。又称为银行信用证。它是进口商所在地银行根据进口商的请求，向出口商开立的授权出口商依照信用证内规定的条件，签发以开证银行或其指定银行为付款人的汇票，并保证在出口商提交符合规定的汇票和单据的条件下，银行保证支付的书面凭证。简单地讲，信用证就是银行开立的有条件的银行付款承诺凭证，而付款承诺的条件则是进口商提交符合要求的货运单据。

信用证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和结算工具，十九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首次出现，很快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结算方式。本世纪以来，各国的银行公会和商业团体均致力于制订国际通用的银行信用证统一规则，以推助国际贸易的发展。迄今来看，在信用证领域得到世界各国银行普遍采用信用证规则是国际商会于 1983 年制订的《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niform Customs and Pradtice for Commurcial Documentary Credits）简称为《400 统一惯例》。

信用证并无统一的固定格式，国际商会曾制订了《跟单信用证标准格式》供银行界参考。一般来说，信用证必然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1）对于信用证本身的说明；大致包括：信用证的编号、开证日期，有效期限，信用证当事人名称和地址、信用证种类、信用证金额、出口商揭示日期和交单日期等。

（2）汇票条款；大致包括：出票人、付款人、汇票金额、种类和份数等。

（3）商品条款；大致包括：货物名称、品质、数量、包装，单价等。

（4）运输条款；大致包括：装运地、目的地、装运期限、运输方式、运费支付方法等。

（5）货运单据条款；大致包括单据的种类和份数。货运单据条款是信用证的最主要条款，信用证要求出口商所提交的单据主要有商业发票，提单和保险单，还可能包括；商检证、原产地证明书、装箱单、海关发票等。

（6）开证行责任条款；主要包括开证银行对受益人和汇票的善意持有人保证付款的责任文句。

信用证所涉及的当事人较多，其基本当事人主要有：

（1）开证申请人（opener；applicant），申请开立信用证的一方，通常为进口商。

（2）开证银行（opening bank，issuing bank），指接受开证申请人委托而开立信用证的银行，通常为进口商所在地银行。

（3）受益人（beneficiary），指有权享用信用证权益的人，通常为出口商。

除了这三个基本当事人，信用证在使用过程中还可能涉及：

（4）通知银行（advising bank，notifying bank），指接受开证银行委托，开立通知书，将信用证通知受益人的银行。

（5）转递银行（transmitting bank），指接受开证银行委托，向受益人转交信用证的银行。

（6）议付银行（negetiating bank），指愿意买入或贴现受益人提交的帐单汇票的银行，议付行按信用证规定的条件议付帐单汇票后，则成为银单汇票的正当持票人。

（7）保兑银行（confirming bank），指应开证银行的请求，保证对依照信用证的要求所签发的跟单汇票予以付款的银行；保兑银行对信用证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

（8）付款银行（paying bank；drawee bank），指信用证上指定的付款银行，通常即为开证银行。

在国际贸易中，采用信用证结算，其主要程序包括：

（1）进口商和出口商在其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明确规定采用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

（2）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进口商按时向其所在地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填写开证申请书，交纳开证押金，支付银行手续费。

（3）开证银行根据开证申请书的内容，开立以出口商为受益人的信用证，并通过开设银行在出口商所在地的分行或代理行通知或转递受益人，或由开证银行直接将信用证寄给出口商。

（4）出口商收到信用证以后，装运货物并取得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各项单据，同时签发跟单汇票，向议付银行议付货款。

（5）议付银行审查单据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后，将汇票金额中扣除议付日到实际收款日的利息和手续费，将余额付给出口商，并将全套单据、汇票和索汇通知单寄交开证银行。

（6）开证银行审查单据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后，即将票款偿付议付银行。

（7）开证银行通知开证人付款赎单。

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信用证可以按不同的性质分为不同的种类。依据信用证订下的汇票是否随附货运单据，信用证可以分为无票信用证和跟单信用证；从开证银行对信用证负责程度来看，可以分为可撤销信

用证和不可撤销信用证；依信用证是否加具保兑来看，可以分为保兑信用证和不保兑信用证等等（详见下面有关辞条）。

使用信用证结算方式，信用证条款以买卖合同为基础，理应与买卖合同一致，但信用证一经开出，即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与买卖合同完全无关，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因此，开证银行只对信用证负责，与信用证相关的银行也只凭信用证条款的指示行事。因此，信用证可以看作独立于有关合同之外的合同。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开证银行以自己的信用作出付款保证，且承担信用证的第一付款责任，因此，信用证方式属于银行信用、而非商业信用，开证银行的付款责任是一项独立的责任，与一般的银行担保责任有实质区别。

信用证业务纯粹是一种单据买卖，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对于受益人提交的各种单据，采取严格符合的原则，不仅要求单据与信用证的规定一致，而且要求单据之间的一致。只要受益人提交的各项单据表面上严格符合信用证规定，则银行就有义务对其进行支付并接受单据，反之，即使货物符合合同规定，而单据与信用证规定不符，银行也可以拒收单据，拒绝付款。因此，在信用证业务下，有所谓银行四不管的说法：一不管合同，二不管商品，三不管单据真假，四不管出口商是否履约交货。

由于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出现，使平时没有业务往来的进出口商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国际交易，银行作为万能的中介人参与国际贸易的进行，大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信用债券（Debenture Bond） 即无特定财产作抵押而发放的一种债券。它以发行公司的一般信用为担保。经营好、信誉佳的大型企业或公共事业机构常以此为筹资工具。

信箱公司（Letter—Box Company） 亦称招牌公司或文件公司，它是外国基地公司最主要的形式。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在所在国仅仅履行了注册登记等法律手续而并不从事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公司。这类公司往往设在国际避税地，虽然可能只拥有一只信箱和一名常务董事，或者只具有纸面上的组织形式，即所谓"文件公司"或"招牌公司"，但是它却能够通过形成"积累中心"，将在高税国的经营收入在避税地积累起来，达到避税目的。

信箱公司有多种具体形式，如控股公司、金融公司、受控保险公司、贸易公司等。

信箱公司也并不是只能设在国际避税地，如果有关税收协定提供了某项特殊利益，那么，在高税国设立信箱公司也不无可能。

保险经济学（Economics of Insurance） 保险是为应付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采用的一种社会互助性质的经济补偿方法。保险经济学则是金融学的一个分支。保险经济学随着保险业的发展而发展。一般情况下，保险对经济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1) 通过对遭受意外事故的投保人的经济补偿，保证社会再生产的稳定。(2) 有助于防灾减灾，事故发生后又尽可能缩小其造成的后果。(3) 保险业与银行机构一样，均是金融机构，在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中与银行发挥同样的作用。保险公司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这如同银行经营货币的目的一样。为此，保险公司就要在收入与支出方面、安全与风险方面作出选择。目前，保险业务范围已非常广泛。从保险对象上分，包括财产保险、人身保险；按保险范围可分为，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按保险实施形式分，主要有强制保险、自愿保险。保险公司接受保险业务后，如果认为自己承包的金额过高或风险太大，通过契约规定，将所保险业务的一部分或全部转由其他保险公司承包。这样可以避免危险集中，保持保险业务的稳定扩大，并形成联合保险基金，解决一家或几家公司无力承担的巨额危险单位的风险问题。

保持资本完整（Maintaining Capital Intact） 是指为了维持收入的稳定而不致于骤然下降，用相当一部分收入去弥补经济中已经消耗掉的部分。在静态经济中，保持资本完整是指维持资本存量的规模及结构不变，在没有技术变化的情况下，意味着资本存量结构不变但却有相应的总量增加；在其他情况下，意味着资本存量的结构与总量都将发生变化，而不再是维持原有的状况。经济活动的目的通常是创造产品剩余，而剩余以收入的形式进行分配。只有用于分配的那部分总产出才是剩余。而其他部分则用于维持经济的同等水平运行。这就如同生产谷物，谷物不能全部用来吃掉，必须有一部分用来作种子，目的是使明年有同样多的谷物生产出来。经济中也包含着那些存量，这些存量被视为资本，资本的使用消耗了资本自身，要维持资本的生产能力，必须不断地补充资本。在微观经济中，保持资本完整，是一个企业对其股东以及债权人的义务的表现，因此，国家也都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企业的收入中必须有一部分用于保持资本完整。这部分可能是以折旧等形式出现，也可能以利润再投资等形式出现。在宏观经济中，保持资本完整也意味着，在任何时间点上，都要有相当规模的资本存量。可以设想任何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的期初与期

末总是存在着不同组合的资本存量。一些资本存量在期初是存在的，但在期末却不见了，这些资本必须由其他资本所替代，替代可能是同质同量的替代，也可能是同质不同量的替代，也可能是不同质也不同量的替代。但无论如何，保持资本完整就意味着期末资本存量必须大于或等于期初资本存量。

保留比率（Retention Ratio）　保留比率是企业的保留收益（retained earning）与保留收益与股息之和的比率，即

$$保留比率=\frac{保留收益}{保留收益+股息}$$

与此相关的变量，即股息支出比率是股息支出与保留收益与股息之和的比率。保留比率与股息支出比率之和为1。保留比率是企业最佳投资规模决策以及投资的融资方式的影响因素之一，对保留比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企业的债务与资产比率的选择。保留比率对企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作用，长期来，理论界对企业的市场评价（market valuation）是否依赖于它的保留比率的问题进行争论，至今仍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保留比例本身反映了企业税后利润在股票持有者所获股息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之间的分割，它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税后利润与这种利润的分配。

保留价格与保留需求（Resrvation Price and Reservation Demand）　保留价格与保留需求可以说是反映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保留价格是指这样的价格，在此价格上拥有一定存货的所有者会选择保留一部存货而不是提供更多。那么这个保留的数量就是存货所有者在保留价格上的保留需求。显然保留价格是一种"界限价格"，在此之上商品拥有者会将其全部出卖，在此之下则会选择保留部分商品，商品拥有者是否会作出这种选择取决于保留价格与市场价格（即预期价格），如果未来价格上涨，则他的保留需求就大，也就是说保留价格就高，相反保留需求就小，保留价格就低。保留价格也受到商品的易损性及保存费用（包括利息和仓储成本等）以及人们流动性更强的现金的需要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种不能即刻毁坏的商品的保留价格都存在投机因素，即希冀在未来交易中取得更大利益。保留需求一般有两种目的，一是供个人使用或消费，二是供将来出售。由于供给加保留需求等于市场供给，我们可将商品供给曲线看作是保留需求曲线，市场供给曲线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看一本书第一版的价格决定，现在没有这本书的人的需求曲线可以画出，考虑到每个拥有者的保留价格，我们也可以画出供给曲线，供需曲线的对立产生市场出清价格。同样我们可画出拥有者的保留需求曲线，将它与不拥有者的需求曲线相加，然后与市场总供给曲线相比，这个图书显示出同样的市场出清价格，但并不显示图书市场交易量这个价格与所显示的数量显然是要高于保留价格与保留数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保留价格与保留数量与市场均衡数量的关系。现在保留价格经常被用到要素供给分析和私有资源的利用的分析上。魏克斯蒂斯（P.H Wick-steed）对保留价格与保留需求的分析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保留收益(未分配利润)（Retained Earning Undistributed Profit）　公司的税后收入减去分配给股票持有者的红利收入之后剩余的部分称为保留收益。下面举例具体说明，不考虑公司的年初存货，一家公司的收入帐目如下（单位：万美元）

总销售收入	24000
减去销售产品成本（原料工资、折旧其他经营成本）	−17500
总利润	6500
减去：销售和管理成本	−1000
净经营利润	5500
减去：各种税收	−2000
税后利润	3500
减去：优先股股息	−500
普通股票的净利润	3000
减去：普通股股息	−1000
保留收益	2000

在这个例子里。该家公司税后利润为3500万美元，各种股票红利为1500万美元，未分配利润剩2000万美元。保留收益是最后留给企业作为企业自由处理的利润，它是企业发展的内部基金的重要来源，许多企业更倾向于运用内部基金作为融资的重要手段来发展自己。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股本和一定的利息责任对企业收益的"侵蚀"。保留收益的大小即取决于总的销售收入的多少，还取决于帐目中所列的销售产品的成本，销售和管理成本、各种税收和股息。通常，股息和税收负担是一定的，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各种成本来增加保留收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用"所获剩余"（earned surplus）一词，但现在的会计帐目里多采用不易引起误解的"保留收益"。

保兑信用证（Confirmed Credit）　保兑信用证是指一家银行开立的信用证由另一家银行保证兑付。加保的银行则称为保兑银行。保兑的手续通常是由保兑银行在信用证上加列保兑文句。保兑行通常是信用证的通知行。

只有不可撤销信用证才可另行加保，构成保兑的不可撤销信用证。银行是不会对可撤销信用证进行保

兑的，对可撤销信用证加保，如果遇开证银行撤销信用证，则保兑行此时既不能对受益人推卸保兑责任，又无法要求开证银行予以偿付。

不可撤销信用证经过保兑后，保兑银行对受益人承担第一付款责任，而且此种责任具有独立性，不论开证银行发生何种变化，保兑银行不得片面撤销其保兑责任。因此，银行是否同意对某一信用证进行保兑，首先需考虑开证银行的资信情况，即使同意保兑，也需要求开证银行交纳保兑费，或进一步交纳保证金。

通常信用证的保兑是出口商向进口商提出，而开证银行应进口商的要求向通知行提出。只有在开证银行资信能力较差的情况才有必要对信用证加保，另一方面，保兑银行要求开证银行支付的保证金和保兑费，最终都会转嫁到进口商身上，增加其进口成本、影响产品的竞销能力。

保证金购买（Margin Buying） 信用交易的一种方式，又称为垫头购买或押金购买。此方式只需证券购买者支付一部分保证金（比如55%），其余部分(45%）的证券价款由经纪人垫付。即投资者交一定的保证金后，可以向证券公司融通资金，从而超过他所拥有的货币来购买证券。保证金又分为初始保证金(Initial Margin）和维持保证金（Maintenance Margin)，前者指投资者采用保证金购买证券，必须先在证券公司开立保证金帐户，并存入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后者指由于保证金购买方式风险较大，因而在证券价格急剧下跌时，证券公司为了保障其贷款安全，要求投资者增加的保证金。

保护贸易政策（Protectine Trade Policy） 保护贸易政策是一种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它是指国家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冲击，从而保护本国的生产。与此同时，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各种优惠和补贴，提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促进本国的出口。可以说，"奖出限入"是保护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般来说，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主要原因是本国生产技术水平较差，经济实力较弱，它所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如果此时放任外贸自由发展，其结果是本国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逐渐为外国商品所占领，这就会影响本国生产的稳定发展和增长。保护贸易政策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史，各个不同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保护贸易政策始于十五一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这时候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货币（金银）流入国内，以促进资本原始积累，加速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新兴的民族工业，抵制先进的英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推动本国商品的出口。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各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获取垄断利润。这时，各国的保护贸易政策不再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防御性，而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和侵略性。这一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又被称作"超保护贸易"政策，它不是保护国内相对落后的产业以增强其竞争能力，而是保护高度发展的工业以加强其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这不是消极地防御国外商品侵入国内市场，而是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外市场进行侵略性的扩张。这一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具体措施种类越来越多，"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保护贸易政策在战后曾有减弱的趋势，但从70年代起掀起了新一轮的保护主义浪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生产不断扩大与市场变得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对国际市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各国如果不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不仅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且会失掉越来越多的国内市场。目前保护贸易政策的重点已从"限入"转向"奖出"，保护措施更加复杂，内容繁多。由于国际生产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国际贸易领域保护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将长期维护下去，当然不排除某一时期保护程度稍有下降的情况出现。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ry）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它是指1883年3月在法国巴黎签订的有11个国家参加的保护工业产权的国际公约。该公约自最初签订以来已经过了七次修改，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公约，任何国家可以参加，无限期有效，它是目前世界上保护工业产权方面成员国最多、影响最大的开放性的多边国际公约。巴黎公约的保护范围很广，包括商标、专利、新型工业品式样、商号名称、产地标记或原产地名称等。巴黎公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成员国之间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第二，成员国之间互相给予优先权；第三，对成员国的参加国际展览会的展品中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和商标等实行临时性的保护；第四，关于工业产权保护时效的规定。它要求某项工业产权的所有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使用该项工业产权以造福于大众，如果在一定的期限内所有人并没有这样做，一国法律就不再对该项工业产权实行保护，其他人可以使

用该项工业产权。总之，巴黎公约为现行国际工业产权法奠定了基础。只有参加了巴黎公约，才能进一步加入马德里协定，更好地对本国商标实行国际保护。我国于1980年3月参加了该公约。

保税仓库区（Bonded Warehouse Eone）　保税仓库区又叫保税区，它是指一国海关设置的或经过海关批准设置的特定地区和仓库，外国商品进入该地区不办理进口手续，不缴纳进口税，如再出口也不缴纳出口税。进入区内的商品可以进行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展览、加工和制造等。保税仓库区形式多样，主要有保税仓库和保税工厂等，它们的职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保税仓库是指经海关批准而设立的特定仓库，在这里，外国货物可以不办理进口手续而连续长时间存放。存放在保税仓库的商品可以随时用于再出口而无须缴纳出口税。一般来说，存放在保税仓库的商品主要有三类，一是暂时存放随时准备再出口的商品，二是那些用于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的复出口商品，三是那些经海关批准缓办进口纳税手续的进口商品，一般的进口商品不允许进入保税仓库。进入保税仓库的商品通常不允许加工制造，如要进行改装、分类等也须在海关监督下进行。在海关仓库储存货物的期限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1个月到3年不等，我国一般为1年。储存期满后仍未运出保税仓库的商品，将由海关负责作出处理。保税工厂是指经海关批准成立的、可以对外国货物进行加工、制造等保税业务活动的场所。同保税仓库相比，保税工厂不仅可以储存外国商品，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外国商品进行加工制造。经过保税工厂加工制造的外国商品一般用于复出口。保税工厂的设立将有助于一国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推动该国外贸的发展。总之，保税仓库区起到了类似自由贸易区甚至出口加工区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在发展一国的转口贸易上产生明显的作用，而且还将对一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外贸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保付支票（Certified Cheque）　保付支票是指支票的付款银行在支票上加盖保付戳记，用以表明当支票的收款人或持票人对支票进行提示时银行保证付款。这是支票的收款人或持票人为了避免支票出票人开立空头支票，从而遭遇银行拒不付款情形而向付款银行提出对支票进行保付。支票一经付款银行保付，则付款银行即成为支票的主债务人，出票人和背书人都因此而免除责任。

保函（Letter of indermnity）　保函是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订立的协议，托运人向承运人出具保函，托运人向承运人保证，如果发生由于承运人应托运人的请求而做出的某种行为，使得承运人遭到损失，由托运人负责赔偿。

保函通常使用在由于货物表面状况有缺陷承运人有意签发不清洁提单的情况下。在这一情况下，如果承运人签发了不清洁提单，而银行是拒绝以不清洁提单作为议付货款的单据的，从而出口商就无法向银行交单议付货款，为解决这一困难，托运人向承运人出具保函，保证如果承运人由于签发清洁提单而受到损失，这一损失由托运人负责赔偿。通过出具保函，以换取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另外，托运人若想取得承运人的倒签提单，也会向承运人出具保函。

但是，依据某些国家的法律，如果保函构成了对善意的收货人或提单受让人的诈欺，则保函是非法的，无效的。而且，即使是对有效的合法的保函，承运人也不得凭保函对抗提单的受让人，承运人须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方可凭保函向托运人追偿损失。

保险单（Insurance Policy）　又称为大保单。保险单是由保险人书立的，载明保险合同的内容，证明保险合同成立的书面文件。保险单应载明如下事项：（1）被保险人名称；（2）保险标的；（3）承保险别；（4）保险期间或航次；（5）保险人名称；（6）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

保险单是可以转让的，保险单的转让是转让保险单上所载明的权利和义务。一般采取空白背书的方式。按照国际货运保险惯例，保险单的转让既可以在货物发生损失之前进行，也可以在货物发生损失之后进行。这一点对于象征性交货合同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但是，保险单的转让与被保险货物所有权的转让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保险单并不随同保险货物的转让而当然转让，必须通过被保险人在保险单上背书才产生转让的效力。

海上保险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按照保险价值是否确定，可以分为定值保险单和不定值保险单。按照保险期限的不同，可以分为航程保险单，定期保险单和混合保险单。按照船名是否确定划分，可以分为船名已定保险单和船名未定保险单，属于船名未定保险单一类的又可分为流动保险单，预约保险单和兑换保险单；按照保险单的形式划分，又可分为正式保险单，保险凭证和暂保单。

保险利益（Insurable Interest）　又称为可保权益。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所拥有的某种合法的经济利益。各国法律都规定，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才有权同保险人订立有

效的保险合同。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则其与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是无效的。

保险利益必须是一种确定的利益，可以是现有的利益，也可以是预期的利益，无论是现有的或预期的利益，都必须是客观上可以实现的利益。但保险利益并非仅指诸如货物，船舶本身等保险标的，它特别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在海上保险中具体体现为被保险人对于船舶、货物、运费、预期利润上享有所有权，担保物权，或承担经济风险和责任，被保险人会由于这些保险标的保全而获益，或由于这些保险标的受损。

与国际贸易的特点相适应，国际海上保险并不要求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仅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物发生损失的时候对此标的物具有保险利益．但是，如果在保险标的受到损失的时候，被保险人不能证明对其具有保险利益，他就无权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对于已经支付的保险费也无权要求偿还。

作为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利益．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并不具有合法的保险利益．即使保险人予以承保，但保险人得知情况之后，仍然可以撤销保险合同，或者在被保险人受到风险损失的时候，拒绝赔款。

保险凭证（Insurance Certificate） 俗称‘小保单’。是一种简化的保险契约。它包括了正式保险单的基本内容，其中载明了保险标的名称、数量；被保险人名称；投保险别；保险期限；保险金额；以及保险责任生效的起讫地点等，但省略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等方面的条款。保险凭证与正式保险单具有同等效力。但是，保险凭证本身缺乏独立效力，在信用证规定提交保险单时，不能以保险凭证代替，相反，信用证规定需提交保险凭证时，却可以以保险单代替。而且，保险凭证不仅需要发货人在填写时签字，还需保险人签字，才具法律效力。

保险金额（Sum Insured） 保险双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物的实际投保金额即为保险金额。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标的物的保险价值当作为保险金额投保，当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相等时称为足额保险；保险金额也可以多于保险标的物的保险价值，这时的保险称为超额保险，在不定值保险下，超额部分保险人是不予赔偿的，当保险金额少于保险价值时，称为不足额保险，当发生损害赔偿时，保险人应按照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的差额按百分比给予补偿。

在保险标的发生承保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人以保险金额作为赔偿时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的计算通常是以发票价值为基础确定的，即以C·L·F货价为基础确定保险金额，其间包括运费，保险费和适当加成的预期利润，保险金额的计算公式是：

保险金额＝C·L·F货价+C·L·F货价×加成率

保险金额也是保险人计收保险费的基础，保险金额与保险费之间的关系是：

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 前身叫"英国经济协会"，1902年开始称为皇家经济学会。英国经济协会的建立参照了美国经济协会，但在很多方面与之不同。例如美国经济协会的著名学者经常参与公开的论争，就方法问题，政策问题发表见解，但英国经济协会却有严格的、谨慎的纪律，其目的是避免公开协会成员之间的不同观点，因此英国经济协会不允许召开正规会议讨论理论或政策问题。皇家经济学会的刊物是《经济学杂志》，该刊物被认为，是英国经济学第一刊物。凯恩斯、哈罗德、罗宾逊等人均作过《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刚建立的英国经济协会的另一主要目的是复制古典经济学。战后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伦敦经济学派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势力得以削弱。皇家经济学会也组织正规学术会议，并进行学术辩论。皇家经济学会的成员大多都长期或短期地就业于政府部门或国际机构。70年代，皇家经济学会有过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正是从那时起，该组织放弃了传统的作法。从1975年开始，皇家经济学会会员的任命已经公开化。目前的皇家经济学会与美国经济学会很相似。该学会资助出版了大批优秀著作。其中包括埃奇沃思、杰久斯、凯恩斯、马歇尔、奥弗斯通、李嘉图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

种植郁金香狂(Fulipmania) 这一词用来形容价格变动趋势似乎无法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释的情况。凯恩斯曾经对这种现象作过探讨。现代经济学理论极为重视均衡，而均衡就类似于种植郁金香狂，但实际上，在完全预见或合理预期的假设前提下，均衡理论以及种植郁金香狂是与标准的供求分析相一致的。例如，设 q_t 为土地的价格；R是单位土地单位时间的净地租，R>0；r是市场利率；R、r都是稳定不变的。不考虑不确定性问题，土地的收益率在均衡的前提下一定等于市场利率，即

$$(R+q_{t+1})/q_t=1+r \qquad (1)$$

设t=0，如果 q_0 是给定的，那么（1）式就决定了土地价格q在所有时间段上的数值。但另一方面，如果 q_0 必须由均衡条件所决定、那么(1)式很明显是不充

]分的。如果均衡没有为q的变化提供进一步的限制条件，不同起点的q_0，就会有不同的q的变动线。如果将式（1）变化为

$$q_{t+1}=(1+r)q_t-R \qquad (2)$$

如果$q_0>R/r$，土地的价格将无限地上升。但是，由于地租与利率是稳定的，所以这种变动线似乎也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相容。但是，如果（2）式是土地价格的唯一的均衡条件，那么，这种明显的种植郁金香狂与标准的增衡分析是一致的。问题的核心就是是否存在着其他限制条件。在迭代模式中，如果土地价格无限地上涨就与均衡本身是矛盾的，因为未来的那一代无力支付这么高的地价。当然地价也不可无限地下降。为了使分析更接近于现实，人们不断地提出新方法、新的限制条件以解决种植郁金狂这一问题。

种族与经济学（Race And Economics）　种族这一概念进入经济学理论的途径是很广泛的，特别是在劳动经济学中。这些途径包括种族歧视、不平等、人力资本、劳动市场竞争与分割、阶级关系。1957年，加里·贝克尔从种族歧视这一角度去探讨种族与经济的关系，这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种族与经济学的第一次留意。加里·贝克尔的著作对了解种族在经济中的角色提供了许多理论方法。这一著作里探讨了如下问题：（1）雇主或雇员的歧视；（2）劳动供给；（3）资本竞争以及劳动与资本的竞争。在分析雇主或雇员歧视时，贝克尔将社会分为两大集团，即劳动密集社会和资本密集社会。得出结论：由于歧视的存在，资本密集社会中的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增加，而资本净收益降低，原因是该社会的资本输出的减少。在雇主歧视模型中，由不同种族的雇佣成本、训练成本不同，生产率不同，因此歧视是存在，不可改变的。结果是劳动密集社会中的成员就业机会少，就业的工资低．在雇员歧视模型中，资本密集社会形成一个卡特尔，并使得劳动密集社会的成员被排挤在低收入职业中，而低收入职业因为劳动供给过多，边际产出更少，工资将进一步下降。在不平等分析中，人力资本是第一位的，但由于劳动密集的社会，由于教育水平低，因此人力资本少于资本密集社会，因此在职业分布上对劳动密集社会的成员也是不利的。对种族与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在过去三十年得到很大发展。研究方法或者集中于市场不完善上或者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矛盾上。大多数结构分析都把种族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最早的结构分析是马克思对美国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科斯定理是一条表述所有权与资源有效配置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定理。科斯（R.H.Coase）本人并没有明确地表述过科斯定理。他本人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列举事例表述所有权对于资源配量的决定作用。所谓科斯定理是科斯的追随者与反对者从他论文所列举的例子中归纳出的定理。科斯定理有多种表述方式，最典型的一种表述方式体现在科斯对效率的定义上。该定义如下：从效率的角度看，只要法定权利是可以自由交换的，那么这些法定权利的最初配置状态就是无关紧要的。科斯所谈的法定权利就是指所有权。它不仅包括人对物的所有权，也包括定立与实施契约权、要求对事故进行赔偿权、依某种方式使用某物权等。作为科斯定理一种表述方式的上述定义是说，只要所有权（法定权利）是明确的，不管所有权的最初配置状态如何，都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要使法定权利可以自由交换，就必须不存在法定权利自由交换的障碍，这是以明确的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的。

表述所有权与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科斯定理可以用科斯所举的例子加以描述。假定有两个经营者分别经营铁路和农业，农业经营者在铁路两侧种庄稼，铁路经营者利用燃烧木材与煤炭作为动力来趋动铁路机车；但木材或煤炭燃烧时所喷出的火花往往会引起铁路两侧农作物起火燃烧。经营者双方都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因火灾而造成损失。例如，农业经营者可以避免沿铁路两侧种植农作物；铁路经营者可以在铁路机车上安装控制火花的装置或者减少运行机车的数量。

初看起来似乎是法律控制当事人采取预防措施，因而法律规定了由火灾造成的损失的数量以及铁路运输量和农作物产量。例如，在财产法中，禁令对于损害行为是惯常性措施。如果农业经营者有权禁止经营铁路并可以关闭铁路，那么除非铁路经营者能停止机车火花喷出，否则就不让他经营铁路，这样就会很少或不会因机车喷射火花而造成对农作物的破坏。反之，如果经营铁路者有权经营铁路并可以任意决定运行机车的数量而不必考虑机车火花喷发造成的后果，结果就会对农作物造成很大的破坏，减少农作物产量，按照传统的观点，作为资源配置结果的机车的数量，农作物的产量（或者其损失量）由法律所决定。科斯认为，这种表象会将人引入歧途。他指出，法律只决定法定权利的最初配置状态，而市场才决定最终配置结果。举例来说，如果农业经营者有权禁止经营铁路，那么他可以出售这一权利。铁路经营者可以支付一笔钱给农业经营者，用以交换农业经营者所作出的带有法律约束的、不禁止经营铁路的承诺。相反，如果铁路经营者有让机车喷射火花的权利而不受任何约束，他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农业经营者可以支付给铁路经营者一笔钱，用以交换铁路经营者所作出的带

有法律约束的、减少火花喷射的承诺。不管权利最初的配置状态如何，只要通过交换可以带来潜在的利益，农业经营者和铁路经营者就会有继续交换法定权利的积极性。例如，如果农业经营者有权免除机车的火花，而且如果机车喷射火花这一法定权利对于铁路经营者的价值高于免除机车火花这一法定权利对于农业经营者的价值，交易双方都会通过农业经营者向铁路经营者出售法定权利而受益。当法定权利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时，来自法定权利交换的障碍将完全消除。因此，只要所有权是明确的，只要市场发挥作用，法定权利配置将是有效的。

科斯认为，铁路经营者与农业经营者的例子带有普遍意义。在社会中，任何一项交易，只要明确交易物的所有权，就可以达到资源配置或法定权利配置的效率。

科斯定理往往也以另外两种方式表述，一种是建立在市场竞争状态基础之上。一种是建立在交易成本概念基础之上。从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出发，科斯定理被表述为：从效率的角度看，只要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法定权利的最初配置状态就是无关紧要的。从市场竞争角度出发，科斯定理被表示为：从效率的角度看，只要法定权利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交换，这些法定所有权的最初配置状态就是无关紧要的。科斯定理的这两种表述方式表明，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只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就可以通过交换法定权利的最终配置状态达到最优。科斯定理所表述的已经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是法定权利交换的效率，也就是法的效率。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主要针对的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这种方法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内存在，如批评主义，文学，美学等。结构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将研究的客体当作一个系统，系统的各个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关联的。结构主义认为，存在着一系列社会经济结构，这些结构是看不到的，但却产生了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哲学上，结构主义有几个派别，有的是相互对立的。在经济学上，结构主义主要与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思想派别相联系，特别与是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劳尔·普利彼奇相关。这种经济学上的结构主义认为，世界经济存在两极，一个是中心极，另一个是边缘极，该两极的生产结构完全的不同。中心极的生产结构是相似的，丰富的，而边缘极的生产结构是不相似的，专业化的。不相似是因为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之间存在着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别，特别是出口部门有相对高的生产率，而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却极低。专业化是指出口部门的出口产品只是为数较少的几种初级产品，生产也就集中在这些产品上。这些产品是远离中心的，它们对前面或后面的产品联系有限。正是由于两种经济结构上的差异造成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而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又扩大了两种经济的结构差异。这两极的经济结构是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所以两极的结构差异不能在静态下去定义，去理解，两极之间的相互转化只能以两极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条件。中心极和边缘极构成了一个动态系统。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并不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两极之间相互关系上进行的，国际贸易有利中心极，而不利于边缘极。边缘极的发展存在三个问题，它们是，劳动失业，外在不均衡；贸易条件恶化。

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 是指在宏观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相对权数的变化。例如出口与进口，收入与支出，人口与劳动力。结构变化是一个综合指标，它反映了社会价值变化、各阶层福利水平的变化等。影响结构变化的原因很多，从组织变化和制度变化去分析结构变化是两个基本方法。用组织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关系的经济学家很多，如弗雪、克拉克、库兹涅兹、钱纳里等。钱纳里—希尔魁恩的工作成功地描述了大约100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所共同经历的多种形式的结构变化，被认为是建立结构变化的一般理论。钱纳里—希尔魁恩还试图说明不同条件下，不同发展政策的国家所可能经历的不同形式的结构变化。用制度变化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关系，是历史的分析方法。该方法集中探讨具有相同初始条件、相同制度国家所经历的结构变化。这种研究包括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理论；米林特的剩余产品出路理论等。虽然上述的理论仅仅是描述性，不很正规，但却为我们对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结构变化提供可以利用的参考。第二种理论，对于政策制定者更为有用。组织变化以及制度变化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已成为新的边缘性学科，正引起众多经济学家的重视。目前的经济中，存在着集中管理的经济向分散化、市场化经济过渡的趋势，同时也存在着用合适的合作经济制度去弥补市场经济不足的趋向。这两种趋向都是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同时又会产生组织和机构方面的变化，从而引起经济结构乃至政治结构的变化。

结构经济动态学（Structural Economic Dynamics）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经济活动表明这样一种规律，一些宏观指标绝对量的变动，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密切相关。但是在一个短期内，人们无法区别真正的结构变化与暂时性结构波动。但是，如

果考察的时期延长，短期的结构波动就可以消除，而经济的长期趋势就会变得清楚，这样人们就可以分析宏观总量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结构经济动态学。关于经济动态学中的中短期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都作过分析。但是长期的结构经济动态学却很少有人探讨。只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表现过对这一方面问题的兴趣。亚当·斯密在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时，指出在就业结构中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将上升。李嘉图认为，由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生产总量不可能超过一定的水平，除非经济部门之间的相对结构发生变化。自从1870年边际主义理论的出现，人们对现存资源的合理配置日趋关心。二十世纪20年代经济周期理论更加重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关系。这一时期出现了里昂惕夫、丁伯根等一批经济学家来探讨关于经济结构变动的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特别是比罗克斯，他给经济结构的定义已成为标准，该定义是，在一定空间和时间经济体系中的各种比率以及相互联系。现代经济学家试图建立结构经济动态学的理论。他们强调两种联系，一是结构变化与技术领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联系，二是结构变化与个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以上所有的理论被人们归纳为结构经济动态学。这一学科主要探讨如下经济关系：(1) 人口，生产率和消费需求、(2) 生产，价格与就业。人们在研究这一理论的同时，对该理论的应用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结节区（见"区域"）

结合生产（Combining Production）　指企业通过共同的生产过程或设备生产多种产品。典型的如精炼石油产业中，企业同时生产汽油、重油、轻油等多种产品；再如汽车制造企业在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多种汽车。

结合生产的经济性（Combining Production Economy）　见"全产品生产线效益"。

结构性不景气产业（Structural Depressed Industry）　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动造成某些产业不景气。这些产业不景气，主要是因为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取代了这些产业的原有产品的地位，从而使这些产业的企业变得非常脆弱，使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停滞。所谓"夕阳产业"就是这种产业。由于化纤工业的急速发展，曾使棉纺工业受到过很大冲击；由于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石油取代了煤炭的地位，使煤炭工业一时一蹶不振。这种产业的盛衰荣辱史在经济发展中是常有的事，面对这类问题如果放任不管，甚至可能酿成社会问题。这就需要国家的干预，通过特定产业政策，有组织，有步骤地转移这些产业部门的资源，或者强有力地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彻底改变这个产业的面貌。

结构性通货膨胀（Structural Inflation）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学家50年代后期在研究美国物价水平的变动时发现，在许多经济部门，当需求增加时，工资和价格具有向上的伸缩性，但当需求下降时，工资和物价却呈现出向下的刚性，由此造成的物价水平上升。他认为，工资和价格缺乏向下的伸缩性，资源缺乏流动性和短期中各部门之间需求的大规模转移，是引起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以后，一些经济学家从各生产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工市场的结构特征和各生产部门之间收入水平的赶超过程等角度发展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这也就是说，各部门之间生产率差异的存在和工资攀比机制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认为，经济可以分为正在兴旺发达的扩展部和日益衰退的非扩展部门。在扩展部门中，繁荣时期由于劳动力缺乏，货币工资上升，但由于工资刚性，衰退时期货币工资并不下降。非扩展部门的工人由于工资攀比效应也要求工资相应提高。由于非扩展部门工会的压力，这些部门的货币工资也上升到扩展部门的水平。这样，工资的普遍上升就引起了通货膨胀。此外，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的工资攀比也会引起这种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还从劳动力市场结构分析了这种通货膨胀。他认为，劳动市场上失衡的特点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性别结构或地区结构而造成"失业与空位"并存。有空位存在货币工资就上升，而有失业存在工资并不下降。由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障碍，劳动力不能迅速从失业部门转向空位部门，从而就导致整个工资水平上升，造成结构性通货膨胀。此外，瑞典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也从结构特点出发解释了国际间通货膨胀的传递的过程。尽管对结构性通货膨胀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其基本观点是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这种理论在通货膨胀理论中还是有相当影响的。

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　由于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而引起的失业。这种失业的特点往往是"失业与空位并存"，即尽管总体上劳动市场的供求是平衡的，但现实中有一些行业有人无活干（失业），而另一些行业却是有活无人干（空位）。造成

这种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包括技术结构、地区结构，与性别结构，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力流动的不完全性。例如，失业的是纺织工人，而空位是在电子行业，纺织工人由于技术所限无法流向电子行业。这种失业也是摩擦性失业的一种形式。扩大总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无助于消除这种失业。减少这种失业的办法是实行人力政策，如对失业工人进行培训的人力投资，完善劳动市场，协助工人流动等。

结算货币（Currency of Settlement） 亦称"清算货币"。见"清算货币"。

战时经济（War Economy） 战争期间，许多市场都关闭了，政府决定哪些产品是优先生产的，并且有权分配资源。战时的分配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管理和政治问题，时间的优先原则说明了经济投入物的约束。领导人根据敌方的情况对许多方面作出安排，例如，人力资本与技术和物资、进口与自制、防守与进攻等。在战争破坏上，效率同样是重要的，如同在和平时代的生产效率一样。企业、技术和动机显得比平时更有决定意义。如果战略选择受到要素投入物的约束，那么，相反，战略选择也决定了经济问题的实质。二十世纪的战争很大程度是经济性的战争，目的有经济的因素，手段也是经济性的。为了破坏敌方的经济实力，削弱其战斗力，经济上的轰炸——战略轰炸经常地被采用。美国的空军轰炸的目标是敌方的瓶颈部门，而英国空军夜间轰炸则把整个工业城市作为轰炸对象。但经济中的要素存在很高的替代性和伸缩性，因此，导致战争失败的经济性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人们莫衷一是。在战时，国家掌握了相当大部分的国民财富，企业经营也与平时完全不同，政府通过法令直接引导生产、分配和交换。由于动用了闲置资源，生产规模扩大了，而民用消费，特别是耐用货品的消费减少了。企业则由于开工率十足而价格是有保证的，因此利润增加，新的投资也增加了。但战时经济结构转变为和平时期的经济结构是困难的。由于食品等重要物资消耗极大，战时食品、纤维等物资短缺。又由于农业中的劳力很多被调出该领域，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又加剧了食品等短缺。战争期间会改变国际贸易的形式，改变金融机构的行为，引起税赋增加。战争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作用是双重的，有时对一个国家的有利方面是主要的。例如美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开拓了新的市场，取缔了过去的债务。而二战的胜利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萧条的困境。战争中的技术革新为美国战争胜利后的经济发展也作了很大贡献。

食利者（Rentier） 是指这样的人，他们拥有对资本的借贷权力，从而能依赖货币资本的利息收入为生。因此它不同于依靠地租为生的地主，也不同于从生产或从投资的投机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资本家。食利者，一般是债权所有者，不论是公共单位，还是个人，他们定期地由于资金的债权而获得利息收入。食利者是伴随着货币形式的经济剩余的积累和国家长期金融放债支出而出现的。按照食利者的收入来源和性质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类：(1) 靠继承财产的终身食利者；(2) 靠年金度过晚年的退休业务人员、寡妇等依赖性食利者；(3) 公共团体食利者。这主要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包括基金增款，团体社团等。它们从国家投资中获得收入且不依靠持续进行的生产活动，而是依靠现存财产关系的稳定。经济学界对食利者的看法主要反映在利息理论中。有人把食利者的消费看作是过去消费的延期，是过去节省的结果。它们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从而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取得利息收入。但更多的人认为食利者是一个消极的收入获得者，它们的收入既不是来自劳动，也不是来自生产性资本，因而被认为是社会寄生虫。食利者由于对劳动和资本收益的无用，从而抑制了经济的扩张，是资本积累的一大障碍。食利者由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往往构成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阻碍因素。食利者的个人利益一般集中在币值的稳定上，经济停滞时、物价稳定，它们比较兴旺，而在经济高涨，物价上涨，会受到打击。食利者主张政府平衡预算，稳定币值，甚至不惜付出经济低增长的代价，因为食利者的幸福是靠固定的财产关系，神圣的债权和稳定的币值。

盈方临界点（Break—Even Point） 企业进行产品的生产或销售时，其总成本与总销售收益相等的点为盈方临界点。当企业将其生产的产品产量推进到总成本等于总销售收入这一点时，企业收支相抵，不赔也不赚。究竟是产量小于这一临界点还是大于这一临界点才会盈利，既要看收益的变化情况，又要看成本的变化情况。若边际收益既定，则观察边际成本的变化情况就可以判断在达到临界点后是增加还是减少产量会使企业盈利。若产量水平推到临界点时边际成本递减，则增加产量将会盈利；若产量水平推进到临界点时边际成本递增，则继续增加产量将会亏损。

盈利能力测度（Profitability Meaures） 盈利能力测度是将利润水平与销售额或资本相联系，以便测度公司或行业的效率或投资的潜力。有两种方法测度公司盈利能力。一种是利润幅度。利润幅度是单位销售收入所实现的税后利润额。另一种是报酬率

(rates of return)。报酬率通常是将税后利润与股东股本净价值联系。

城市（Urban）　在一般经济学意义上，城市是一个座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和各种服务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从政府管理或官方统计的角度来看，城市往往用诸如最低限的人口水平等管理上或可度量的标准来定义。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就是各种活动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大规模集中。城市最早产生在公元前6000多年以前，但是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却是在最近100多年来，通过城市化的过程不断发展起来的。截止目前，这个城市化过程还在继续。

城市土地学会（Urban Land Institute）　美国一个独立的非赢利性研究组织。研究对象和活动范围包括有关城市规划、增长与发展的整个领域。该学会于1936年根据伊利诺斯州的法律正式成立，并成为法人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和阐明在美国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各种需要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房地产的发展动向，研究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城市土地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促进专门调查报告、专著和技术杂志的交换和发行。该学会还根据合同承担某些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与之合作的单位有联邦住房署、全国住房营造商协会以及国际性市郊商店区委员会。这些研究工作都有直接的实际应用价值，是适合住房营造业和市郊商店区的需要的。该学会的大部分工作由下列三个委员会负责：社区营造商委员会、工业委员会以及中心城市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特别重视城市土地利用的几个主要方面：住宅、工业和商业。它们为一些城市、民间组织以及私营公司提供一种非常独特的服务，即把一些学识渊博而经验丰富的人组成许多专门小组，调查研究商业区，工业和郊区的各种具体问题。这些专门小组检查和评价各种计划和建议，并就将采取的手续和行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城市土地学会还在实施一项基本研究计划，以揭示赋税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种种根本性关系。

城市公共事业（Urban Public Service）　城市当局承办并供应的货物和服务，这些活动对在城市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全国性公共事业（包括国营工业）是个补充。这些公共事业主要包括防护、公用事业、人力资源开发和一般服务。市政当局之所以需要如此广泛地加入地方经济并主动干预城市市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理由：1.有些货物和服务会产生消极的外在因素，市政当局的干预可以把由于生产和消费这些货物而落到城市公众头上的社会成本减到最低程度。这种干预有些情况下是提供服务去排除损害，例如垃圾的收集和处理。有些情况下当局所提供的服务则是把消费者从产生外在的影响的方面吸引过来，如办好公共交通以便鼓励减少或不使用私人小汽车。2.有些货物和服务最好由专营机构供应，为了免使消费者受剥削，应由地方当局承担供应者的任务。有些类型的城市服务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例如很少有理由重叠设立污水厂或让许多公共汽车公司为同一条线路服务。如果发生这种垄断，市政当局或者对它们经营上所从属的经济体制加以管理，以免它们剥削用户，或者是由地方自己来经营。3.有些货物和服务被认为是公共货物，如果由私人承办，将难以供应。公共货物的特点是一个人的消费不影响对其它人的供应，即具有共同性或共同消费的特性。因此这也就很难排除那些"免费"的消费者，使私人企业不愿意进入市场担当供应者。4.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福利的理由，有必要对贫困的那部分人按非经济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以此来补偿这些人的低收入水平。5.城市社会中一些个人的决策往往是在忽视其它人的行为与意图的情况下做出的，因之常常不能符合居民整体的最大利益。当发生这种互相关联的情况时，要求一定程度的地方政府的规划，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福利。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地方当局有个大规模公共事业部门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城市，从而调节平衡城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当本地失业水平上升时，地方当局就能增加开支，例如用在建造市有房屋和平整土地等工程，并通过地方增殖率来创造更多的本地区就业。当然这种作用也是有限的，由于当地经济的开放性，城市增殖率会变得很少，而公用事业增加活动的影响也不可能很大。再者由于城市的开放性，一个地方当局的活动很可能影响甚至破坏其它城市的经济稳定，形成所谓"空间溢流效果"。并且，中央政府支援地方政府部分财力，可能不同意地方政府在次于国家一级的水平施行稳定措施。

城市化（Urbanization）　城市化是指国内人口由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人口由农村地区迁往城市地区，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2.城市状态发生变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它既包括老城区范围扩大，使周围农村地区并入城区，也包括某一农村地区由于工业、商业、交通等活动的发展，引起人口聚集和地区性质的转变，成为新兴城镇或城市；3.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农村逐步实现城市生活方式，农民生活水平按城镇模式发展变化。城市化一般是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主要指标来加以衡

量的，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城市化的主要标志。

城市化过程开始的原因。正统的学说认为城市化最初是从农村生活慢慢地演变而来的。农业的兴起取代了新石器时代的那种狩猎游牧生活方式，不能不要求建立更为永久和固定的居民点。继续下去，就出现了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和公社经济事业的扩大——这种趋势由于乡村规模的增大与专业分工的更大经济性成为可能而愈益加速。一旦城市化进程开始，市场力量势必把更多的人口与工业吸引到城市里来。工业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城市能够以大规模占有本地市场，提供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便于利用辅助工业等各种形式显示出聚集经济的优越性。对个人而言，城市可以提供广泛的服务事业，安全保障和待遇较高的工作。从各个方面来说，一旦城市化过程开始，它就形成自行增长的市场力量，这些力量促使各种要素和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因此，如果起初没有能养活城市居民的农业剩余产品，城市生活是不可能出现的。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这种解释，认为城市和城市生活先于农村的发展，并且是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从人类历史的现实发展过程来看，城市的产生与城市化并不是同步的。城市的产生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城市作为对农村具有支配和领导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以至出现城市化潮流，则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而是经历了许多不连续的步骤与阶段。

城市化的过程根据一些学者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时期：1.前工业化城市。这个时期的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居住和从事各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而且城市数目在不断增加，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也在相应增多。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率水平低下，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仍不发达。城市的发生和发展极为缓慢，整个经济结构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体，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多数也是与农村相关的职业。城市居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并不比农村居民优越多少，因而城市对农村产生的吸引力不大，还未形成现在所谓的城市化现象。2.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城市化。18世纪6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全面动摇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一方面，这场工业革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因而城市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发生的工业革命又极大地刺激了城市的发展，于是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作用的新兴城市代替了旧的自然形成的城市，像闪电般迅速的出现，并在后来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因为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新能源的利用和蒸汽机的发明，使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首先是商业，然后是工艺专业化的扩大，工厂同新机器相结合，产生了规模经济效益，这又反过来导致了工厂规模的扩大。原料的分布不均衡（特别是煤和铁矿）、地方气候的特点（对纺织厂来说尤为重要）、高昂的运输费用促使工业集中在一些有利的地区。扩大工业劳动力需要有住房和其它的服务事业，这些只有在城市环境中才能提供。结果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把农村人口通过拉力和推力吸引到城市。这也就使得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退居第二位；使和乡村并无多大差别的城市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定地区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城市化过程的开始。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二种社会化过程是互为因果的，两者都可以引起对方发生螺旋式的上升发展。3.世界范围的城市化。20世纪以来至今的城市发展被称为现代世界的城市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变化，也引起了现代世界城市化程度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不仅表现在世界各地区城市的共同发展及其空前的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城市的类型上，其总的趋势是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这个阶段世界范围的城市化特点是：(1)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2)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20世纪，特别是在二战后，城市化已形成全球性状况，不仅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城市及其城市人口剧增，而且发展中地区和国家的城市数量及其城市人口也在剧增。增长速度后者往往超过前者。截止目前，这种状况仍在继续。

城市劳动力运动的重力模型 关于城市劳动力迁移的一种理论模型，新古典经济理论假定任何行业的工资率决定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相互作用。工资率越高，愿意参加就业的人越多，但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则越少。就业人数继续增长直到那个边际劳动力的收入刚能补偿工作对他的不利为止。雇主则愿意录取更多的人直到最后增加的人的边际产品正好等于那个人的工资为止，从而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按照这个理论，城市之间的工资率只能在短期中有差别，在长期内工资率则趋于相等，从而使劳动力达到最佳的地理分布。在实际中，由于工资率并不随时间而趋于均等，经济力量的大小也并不仅决定于工资率还要决定于实际迁移中的困难。如果搬家、重行定居和其它迁移费用微不足道的话，繁荣城市的相对吸引力可能大一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把原有邻居关系破坏而建立新的联系这种社会损失计算进去的话，这种迁移成本是相当高的。由此，著名经济学家赖利

(Reilly) 在1929年采用牛顿物理学的重力模型，试图用各城市之间相对吸引力和移动阻力来解释城市间的劳动力移动。这一模型假定收入差别大致相当于不同城市间的相对引力。而城市间地理距离相当于运动的阻力。重力模型最基本的公式说明，从X城移居到Y城与两城市相对收入水平成正比，与两者之间距离远近成反比。我们可以将两城市之间移居表达为:

$$M_{xy} = \frac{KAg_{a}}{q_{xy}^{\beta}}$$

其中，M_{xy} 为一个工人从X城移居Y城的或然率，A_y 为Y城的引力，d_{xy} 为两城之间地理距离（式中K，。α为β实验数据中估算的参数）。

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 一门关于研究和解决各种城市问题的应用经济学科。从比较狭义的角度可以把城市经济学看作是集中研究城市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空间分析，这就容易忽视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众多问题的相互关系，从比较广义的角度又可以把城市经济学看作为任何系统地运用经济学原理去解释城市问题的企图。它既研究城市内部的问题，又把城市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点。城市经济学是经济学王国中最新和发展最快的专门学科之一。虽然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可以追溯到20年代人们对城市土地，经济的研究，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语系国家对城市问题所开展的研究，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学却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从中分支出来的区域经济学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主要侧重于发展中美国城市内部结构，城市地区的区位决策和城市土地使用模式等问题的研究。但较高水平层次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应该是60年代以来才开始的。城市经济学被列为大学研究生的学位主课，大量专业性的学术中心的出现，并创办了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除了专业经济学家在城市问题方面表现了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外，城市经济学已成为许多学科诸如社会学和地理学专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城市经济学的出现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劳动力以极高的速度向城市流入，使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这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工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人口拥挤，犯罪率上升、污染加剧，教育和公用设施的超负荷运转等问题。这种状况使得城市规划和管理城市活动的传统手段、制度乃至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再也无法仅被看作是一块乱七八糟散布着许多工厂、商店、剧院、住宅、公园和道路的土地，而被当作居民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一个有生命和内在组织的机体。对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单元的认识和了解导致一整套新的研究工作的发展，包括城市社会学、城市心理学等，其中城市经济学最为引人注目。必须指出的是，上述随着城市化而出现的问题对于所有发达国家而不发达国家都是存在的，但特点和程度却是不同的。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人口十分稳定，农村进一步向城市移民的势头已经微不足道，城市问题也就主要是考虑满足现有居民的需要以及城市公用设施、住宅等的更新。而对不发达国家来讲，乡村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仍然非常高，换言之传统的城市化过程仍然在进行。因而所面临的城市问题也就主要是筹集足够的资本去满足迅速增加的城市新移民的需要，在原来什么也不存在的地方建设新的住宅和公共设施。所以在发达国家中，城市问题可以看作是现有资源的管理配置，而不发达国家则是资源的创造问题。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正规的经济学之所以忽视或者没有兴趣去关注城市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以及政府最低限度的干预之上。而这些假设引入城市系统是难以成立的，城市研究包括地理空间研究，而古典经济学只考虑了时间空间，并未引入地理空间的维数。他们基本上是在某个已定的空间位置上来讨论价格与产量的决定因素。2.传统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资源最优配置规律，换句话说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城市经济学则格外接近于政治经济学，要较多地涉及到住房、污染、种族和贫困的问题，而这一切却无法用纯客观的方法来解释或分析。它要求经济学家更多地了解更为广泛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3.历史传统的影响。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着一种留恋农业和乡村生活的情绪，对城市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这就必然影响对城市问题的关心和对城市理论的探索。4.早期的城镇规划工作者不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规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规划还是自然科学活动，城市规划还是一张如何绘制土地利用的图纸而已。这种状况直接妨碍了经济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积极参加城市政策的制定，而对从事城市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更少鼓励。

随着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日益发展和完善，为人们认识城市经济问题也就提供了更多角度的认识和分析框架，使城市经济学自身的逻辑和方法也有较为明显的特点：1.聚集经济性或规模经济性。城市中居民居住地和工作地点是相对密集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城市的资源投入往往是大批量的，从而显示出值

得重视的规模经济性，这就使传统的边际分析很难适用。因为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方法是建立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之上。2 外部经济性。城市经济以具有广泛分布的外在因素为特点。外在因素的影响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当一个经济活动的决策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而直接影响其它经济活动者的效用或生产函数时，或者说其实际的成本和效益不能在其商品的价格上反映出来时，外部经济就必然出现，这就使得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难以实现。由于城市经济系统的这些特点，这就要求人们进一步发展空间经济理论，对城市经济活动能在一种更为完善的认识框架内得到展示。如有的经济学提出的局部处理的研究方法，就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城市经济的认识水平。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宏观理论，它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和城市与区域经济及国民经济其它部分关系的问题。它主要是以凯恩斯的总量经济分析方法为基础，探讨城市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通货膨涨和失业之类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主要是在价格理论的基础之上研究城市经济的内部问题。即研究个人、家庭和企业在选址、土地利用和流动等方面的决策。它特别注意探讨影响各类决策的距离因素以及那种来自高度垄断势力的影响，并承认地方政府在区位选择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

城市病（Uban Problem） 一般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城市规模增大而出现的负效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往往把它称为"城市病"或者城市问题。

大多数人所指的"城市病"主要是指住宅紧张、交通拥挤、公共设施老化、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治安混乱，自杀率与离婚率上升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城市经济本身的特点来看就是广泛外部经济的存在，其中大量的负的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得现有的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在很大程度上失效或者作用不力；从城市的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就是人口从各方的涌入所形成的不同语言，宗教、种族和道德的冲突，使得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都远离传统和现有社会规模的约束，继而形成比较集中的社会问题在城市出现。

城市重建（Urban Renewal） 对美国城市地区的重新开发和改造。这就需要政府和私营企业采取协调行动来改变美国城市的结构，以适应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要。城市重建计划所力图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是防止许多大城市内贫民窟的发展。城市重建的内容包括消除和改造贫民窟，防止城市区的衰落，重新安排居住的地方，建造低成本公共住宅，以及解决一般城市的住房问题。城市重建工作是1949年住房法一通过就开始的，该法规定联邦政府应帮助城市改善住房条件。1954年的修正案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而全面的解决贫民窟问题和城市重建发展问题的方法。某些州已经实施了城市重建计划，向自己管辖的城市提供城市规划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据某一权威人士估计，近20年来用于城市重建的款项共约21500亿美元。

城市增长的棘轮（The Urban Growth Ratchet） 关于城市增长稳定性的一种理论，是由经济学家威尔伯·汤普森（Thempson.Wilbur）所提出。他认为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稳定性除了城市经济对国家经济周期的依赖关系；城市经济专业化程度；城市本地经济的灵活适应性，以及对技术革新和对需求模式变化所能作的反应程度之三种一般因素外，还有一种更特别的综合力量，这就是有关城市规模大小问题。大城市比小城市更能支承经济增长的延续。汤普森认为城市应当有一个最小的规模（约为250000居民），在这个规模以上时能出现增长，而经济衰退则不可能发生，从而形成一种增长的棘轮效应。只允许经济随着时间逐级增长，而不会有停滞作用。这种棘轮作用是大城市的固有特征。这主要是以下几种因素形成的：1.工业方面的广泛的多样性；2.当地对全国有较大的政治影响；3.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设施，足以维持本地区的基础工业；4.具有随着城市增长而越来越扩大的服务部门；5.单纯由于规模增大就能更加增进技术革新和发展新工业的机会。但有的经济学家后来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达到这个临界规模。他们也不希望为了经营管理和生产上的效率以及社会福利上的原因而一定要城市达到这个规模。此外，在人口数量较大和收人数量较高时，也有一些力量会使发展速度慢下来。这种情况很容易使增长阶梯的每进一步都比前面一步小些。以经济基础模型来表达。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高而降低，如果要使经济仍按均匀的速度增长，就必需有越来越大的刺激。

城市聚集经济效益（Urban Aggregative Returns） 在城市经济学中一种用来解释经济活动集中于一个特定城市或地区的分析方法。其含义是当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相对集中，能够为企业或工厂产生外部经济时，这就出现聚集经济效益。这些外部经济因素是指一些家庭、公共机关或企业的活动对其他一些家庭、公共机关或企业的活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市场发挥作用，或者说，它们的影响关系不属于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聚集经济效益都是外部因素所致。当某一单个企业在某一特定地区发展

而享有利益时，如那些由于扩大规模而增加利润的经济，应该是属于内部的。虽然属于集合在某个特定城市同一工业部门许多独立企业的聚集经济利益，对每个个别企业来说是外部的，但对这一工业部门整体来说又是内部的。聚集经济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本地市场的潜在规模。居民和工业的大量集中产生市场经济，当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时，它促使这个城市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反过来又为当地的工商业增加了潜在市场。因为扩大本地市场比发展外地市场更为可取。一方面这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降低实际销售费用。2.大规模的本地市场也能减少实际生产费用。因为它能促进较高程度的专业化，并使大规模生产获致的经济效益成为可能。处于大城市地区，生产者确信自己的商品有足够的市场，使他能采用较大的、效率更高的机器，并将生产效益与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技术引入自己的工厂。如果当地市场狭小，则这种经济效益只能从向其他城市地区的市场大量输出才能取得，而这往往只有支付高额运输费用才能办到。3.与规模经济效益有关的是，在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事业之前，需要有个人口限度标准，交通运输业更是如此。只有最大城市地区才适宜设置机场设施，而配置铁路干线也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城市规模。4.某种工业在地理上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地区，有助于促进一些辅助性工业的建立，以满足其进口的需要，也为成品的推销与运输提供方便。5.与同类企业在地理上集中特别相关联的更进一步的聚集经济效益，是熟练劳动力的不断汇聚适应当地工业发展的需要。6.正如熟练劳动力的汇聚一样，有才能的经营家与企业家的聚集也发展起来。这不仅包括同工业直接有关的人员，还包括那些聘任人员，如会计、工效研究专家等等。7.在大城市，金融与商业机构条件更为优越，它们更加适应当地工业专家的需要，因此在筹措资金与管理投资方面能提供很大的帮助。8.与小的中心相比，城市的集中能经常提供范围更为广泛的设施，如娱乐、社会、教育，以及其他等等设施，面这些设施对于良好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一个地区舒适的生活水平，经常和高薪一样能够吸引高级管理人员。9.工商业者更乐于集中，因为他们可面对面的打交道。他认为这样可以更为有效地进行经营管理，增进信任，并且使思想得以自由交流。10.聚集经济效益的一种相当有力的象征就是，处于地理上的集中时，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一大批生产同样商品的企业集中在一个大城市里，必然引起竞争，这样反过来就促进了革新。同时地理上的集中本身就有助于商品制造者、供销商与顾客之间产生一种更为方便的信息交流。另外，通讯工具一般来说在大的集中地区是比较优越的，这意味着革新的消息相对来说传播得比较迅速，这样就能使该地区所有企业很快采用这种革新。

南北对话（South and North Dialogue）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国际经济问题所举行的国际会议，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在南半球，被称为南方国家；发达国家大多在北半球，被称为北方国家。他们共同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就被称为“南北对话”。南北对话最早是前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的。1975 年 12 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是第一次全球性南北对话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19 个发展中国家和 8 个发达国家或集团，但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1977 年 5 月，国际合作的会议继续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曾就建立稳定原料价格基金和给最贫穷国家 10 亿美元的特别援助基金两项内容达成了协议。但在执行时，前一项没能兑现；后一项也发生多次波折。以后，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反对，全球性南北对话陷入僵局。1981 年 10 月在墨西哥坎昆城举行了有 22 国参加的南北最高级会谈，其中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3 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发展中国家要求就原料、贸易、货币、金融、能源等领域的问题进行商讨，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调整现有的国际关系，并力争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由于美国的抵制态度，未能举行正式的全球性南北对话。南北对话的出现，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在提高。尽管全球性的南北对话未能正式展开，但区域性的南北对话已取得进展，如 3 个洛美协定的签署就是成功的例子。至今，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仍在不断地为加强南北经济合作和对话，进行着多方面的努力。

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 发展中国家为求得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发展而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互助与合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协调彼此立场，提高他们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如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优惠地发展贸易、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以及以原料为武器的联合斗争，建立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在南半球，常被称作“南方国家”、所以，它们之间的合作便被称为“南南合作”。南南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4 年的万隆会议。进入 60 年代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61 年不结盟国家第一次首脑会议呼吁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此后，发展中国家举行了若干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文件，逐步确立了南南合作的行动纲领。主要有：按照集体自力更生的原则，

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密切有效的经济合作、加强政治、经济独立和集体经济力量，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1979年七十七国集团第四次部长会议通过的《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提出，南南合作的内容涉及贸易、工业化、粮食与农业、货币与金融、原料、运输、保险和通讯等领域，并确定要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贸易普惠制、国家贸易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创办第三世界跨国公司。1981年七十七国集团加拉加斯会议又通过《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行动纲领》，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技术、农业、能源和财政等七个方面加强合作。1982年44个发展中国家在新德里举行南南会议，就保证粮食自给与合作，增进能源、科技合作以及建立南方银行等问题，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1983年不结盟国家第七次首脑会议通过《经济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提出必须把南南合作的主张付诸行动，并提出一系列加强合作的具体措施，强调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合作的重要性。实施结果使南南合作获得很大发展。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有了较快发展；石油输出国，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积累了大量资金，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贷款，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60年代，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特点是成立同类原料的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如石油输出国组织、拉丁美洲石油互助协会、铜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中美洲共同市场、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等。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展开，成立了新的经济共同体，还建立了跨地区的经济集团。使南南合作成为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力量，也是摆脱对发达国家经济依附的重要措施。

南部非洲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Regional Elonomic Cooperation of aouth Africa） 南部非洲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1980年4月，共有安哥拉、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赞比亚、坦桑尼亚等9个成员国，总部设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它的宗旨是减少各成员国在经济上对南非的依赖，通过国际社会的支持建立公平有效的区域性经济社会秩序，推动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的成员国首脑会议，此外还有部长理事会和官员常设委员会等机构负责执行该组织的有关决议和开展日常工作。该组织的成立增强了南部非洲发展中国家同南非开展斗争的实力，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各国的主权，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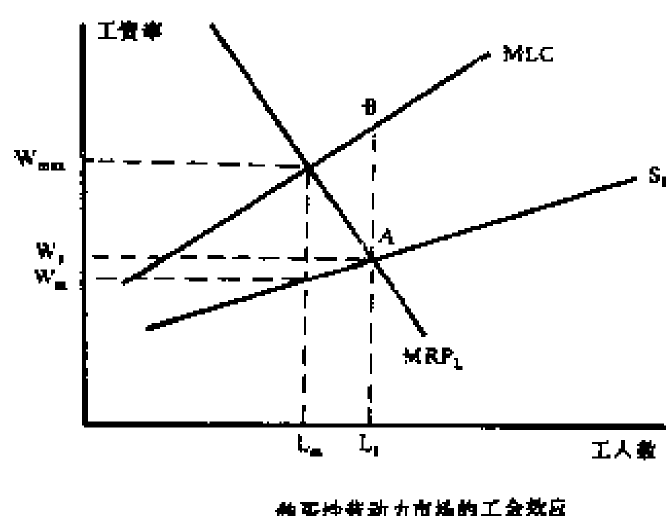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于1985年12月8日，它是南亚地区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共有7个成员国，即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马尔代夫。它的宗旨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的福利，促进成员国间经济、社会、福利、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互助协作以加强集体自力更生，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和合作。该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的成员国首脑会议，它总结回顾前一年的工作成果并为今后的工作制定计划。由各成员国外交部长组成的部长理事会和各成员国外交秘书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负责开展各项工作。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以来力求以一个统一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以提高本地区的国际地位，维护本地位的整体利益。由于该联盟的绝大多数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因此它很注意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农业、科技、灌溉、文教、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以提高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力求早日摆脱贫困，走上经济正常发展的轨道。另外，该联盟还在诸如打击恐怖活动、禁毒等社会问题上加强合作，对于维护本地区的社会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由于南亚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由于各种客观的原因存在着许多重大的矛盾，影响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积极作用的发挥。随着这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这个组织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逃亡工厂（Runaway Shop） 一个为了逃避工会的各种要求而迁移到另一个州或地区的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关于某个企业是否属于这类问题，常常引起争论。工会领袖可能坚持认为某个企业是逃亡工厂，而资方则坚持说，搬迁是为了取得税收方面的某种特许，更易于取得原材料或更靠近市场。在企业迅速地在国内迁来迁去的竞争性产业部门中，美国工会要使自己站稳脚跟，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很大困难。固定资产比重较小的行业如服装行业，特别易于发生这种情况。有些行业中，工会为防止逃亡工厂专门维持了一个有效的组织。

促进集中政策 日本在本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初期实行的产业组织合理化政策。战后日本由于财阀被削弱，大量存在的是中小企业，企业素质很弱。而日本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面对的是欧美的强大竞争对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日本确立了促进企业集中，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打入国际竞争市场的基本政策。产业振兴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就是执行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是“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

法"（1956年公布）。"机械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建立产业水平上的大量生产体制，改变机械工业品种多、批量小和生产过于分散的状况，不仅在企业水平上而且要在产业水平上利用规模经济。本世纪50年代初，日本机械工业的经营规模（即企业规模）要比欧美小得多，生产率很低，日本1953年的机械工业经营规模同1952年的美国和西德相比，1000人以上的企业美国占62.1%，西德占45.4%，而日本仅占26.9%；反之，100人以下的小企业，美国只占9.9%，西德占7.3%，日本则占42.1%。日本机械工业按附加价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只抵美国的10.9%。与此相联系，当时日本机械工业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是基础部门（指工作母机部门和通用件部门）脆弱，而且分布于基础部门的多为中小企业。这就需要在提高中小企业素质的同时把中小企业引导到品种少、批量大和集中生产的方向上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机械法"所采取的措施是对企业实行"四限制"：（1）限制生产的品种；（2）限制各品种的生产数量；（3）限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技术；（4）限制零件和原材料的采购方法。通过这"四个限制"达到了"四个效果"：（1）挤掉落后企业；（2）挤掉企业中的落后产品；（3）促成企业生产的专业化；（4）促成企业大批量生产，这又为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为使用大型、高效、高精度的专用设备和生产线创造了前提。上述这种插手调整整个产业的产业组织状况的作法，是西方诸国中很少见的。当今在国际市场上，日本工业产品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不能不说与当初的促进集中政策有关。

独买性劳动力市场的工会效应　在独买性劳动力市场中，工会的处境完全不同于竞争性市场，至少在某个工资率范围内，工会既能提高工资又能增加就业，这就是独买性劳动力市场的工会效应。下图表示了基础的独买形式。



独买性劳动力市场的工会效应

其中MLC是边际劳动成本曲线，S_L是劳动力供给曲线，MTP_L是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没有工会的独买市场均衡是W_m和L_m。行业工会化有两种作用，其一，它必然把工资提高到W_m之上；其次，它给企业提供了一条在大部分范围内有充分弹性的新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如果工资确定在W_1，那么企业新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在W_1是水平的，一直到与原来供给曲线的交点为止，此后则开始上倾。相应的MLC曲线也将变化，在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上，每增雇一个工人的成本都不变，等于W_1，所以MLC也将是水平的，与过A点的供给曲线重合；但在供给曲线的上倾部分，MLC曲线将从A点跃升到B点，然后再沿初始的MLC曲线变化。（MLC从A突然跃升到B反映出增雇一个工人的工资成本大于W，从而也必须增加以前所雇用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工会化取消了标志独买的上倾供给曲线的很大部分，而代之以水平的供给曲线，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消除了工资与MLC之间的差别。图一说明了劳动力市场工会化以及通过谈判增加工资时的情况。如果工资是W_1，企业就不仅仅愿意雇用开始的L_m个工人，而需要更大的数量，因为对于L_m和L_1之间的工人来说，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超过了雇用他们的成本。由此得出结论，对于介于独买工资（W_m）和竞争工资（W_1）之间的任何工资而言，工资增加都将导致就业增加。对大于W_1的工资而言，工资和就业之间传统的负相关重新成立，不过工会仍可把工资尽量上推到W_{max}而又不使就业削减到初始水平L_m之下。但目前，独买性劳动力市场已变得越来越不普遍。

独立竞争原则（Arm's Lenth Principle）　又称正常交易原则，独立核算原则等，是进行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的主要指导原则。它要求联属企业之间的交易也必须象无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那样进行，相互以独立企业的身份出现，避免人为地确定转让价格，而以竞争市场的标准分配交易活动的收入与费用。

由于这一原则与不少国家所崇尚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相一致，也由于经合组织与联合国在各自的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中对这一原则的推崇，使接受和采纳该原则的国家越来越多。

在这一原则下，对跨国联属企业的国际收入和费用有两种具体的分配办法：1.在可以准确计算成本和费用的按独立竞争原则进行的业务往来中应将其业务往来的所有各项收入与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登记入帐并以此为据进行国际收入与费用的分配；2.在不能准确计算成本与费用的业务往来中，联属企业应对有关联属企业所应得的公平利润进行估算以分配各联属企业的利润。估算的方法很多，如按销售净额的一定

比率确定利润归属，或按承包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确定利润归属，等等。

更具体地，在联属企业之间的各类业务往来中究竟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费用，有关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已接受许多公认的标准如市场标准、比照市场标准、组成市场标准、成本标准等等。将其具体化，各国又有不同，并且还针对不同交易项目作了很多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比如有些规定要求：1.在通过贷款利息进行收入或费用分配时，应以债权国市场利率作为依据，同时允许在上下20%的幅度内浮动；2.在通过劳务活动进行收入或费用分配时，要求其高限不能超过市场价格标准，而其低限不能低于成本费用标准；3.在通过有形财产租赁进行收入或费用分配时要求租金最高不能超过合理利润的市场标准，最低不能低于按最低成本费用率计算出的价格；4.在通过无形资产转让进行收入或费用分配时，要求参照市场同类交易的标准，或者按含利润的价格计取收入或者按出让人的成本费用收取费用；5.在通过销售进行收入分配时则要求按独立竞争标准确定转让价格，其具体标准包括（1）可比价格标准；（2）转售价格标准（又称倒扣价格标准）；（3）成本加合理利润标准（又称组成价格标准）；等等。

必须指出，上面所列举的规定仅仅是不同国际机构和国家有关独立竞争原则的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不是绝对的，针对上面每一类交易行为都还有不少特殊情况需要单独处理，按独立竞争原则要求作出符合实际的规定，这些规定各国也不尽一致。

如何及时发现跨国联属集团内部的笔笔交易是否违反了独立竞争原则，从理论上讲要求对每一笔交易逐一进行审核，然而这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行的。因此就要求采用分析法与抽样法作为补充。分析法指并不逐笔审核其交易项目而是应用分析法进行一步步的分析，第一步，对利润总额进行比较分析；第二步，如果第一步分析表明营利分布不很正常可进一步进行收支分类比较分析，按有形资产销售及租赁、无形资产转让、贷款利息、劳务等大类分别审核有关定价是否在独立竞争原则允许的合理幅度内；第三步、如果第二步分析表明超出了合理幅度，还要对重点收支项目进行比较分析。所谓重点收支项目指那些金额巨大的项目或定价特别高或特别低的项目以及其它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项目等。与分析法相配合还可采取在应审核的众多的收支项目中进行抽样的办法既保证工作的可靠性又减少工作强度。

前工业化城市（Preindustrialized City） 指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存在着的城市。这个时期的城市虽然已经成为人们居住和从事各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但它在各个方面都和工业革命以后出现或形成的工业化城市有本质的区别。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前工业化城市具有如下的特点：1.自然特征。一般面积小，封闭型，城市人口占社会人口的小部分，社会成员中等级森严，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宗教集团的身份区别明显，街道狭窄，以步行为主，信息传播速度慢。2.城市功能与社会结构。城市为政府首脑，商品交易市场和宗教活动的中心。阶级结构比较僵化，上层社会由高级官吏、地主阶段和少数商人组成，中间阶层居少数，社会底层由大多数居民构成，整个社会对手工劳动采取轻视态度。3.经济结构。农业在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社会财富主要来自土地。商业活动地位低下，市场范围小，日常存货少。行会制度比较普遍，生产经营采取个体的形式，服务区域小，价格不一，不讲究时间效率。工作规则缺乏，不存在标准化。4.宗教组织。政教合一，宗教组织统治其他组织，宗教权力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并为其阶级统治进行辩护和宣传。5.政治结构。政府建立在传统观念和绝对权威的官僚制度上，其功能主要是管理社会和征税。6.教育和传播。教育为少数人服务，传播宗教观念。重视口头宣传，不重视文字记载，全国语言不统一，文体为一种时兴艺术，书刊是宗教艺术的表现物。

逆城市化 主要是指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不同于城市化趋势的现象，即人口和城市的职能部分由城市中心向外移动和扩散，从而使中心城人口增长缓慢以致减少，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布让那·J·L·伯瑞（Brain·J·L·Berry）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这个概念。他认为"在美国的城市经历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逆城市化代替了城市化而成为塑造国家居民点型式的主导力量，其他西方国家也可以找到与此相似的趋势。"西方其他一些学者也提出"离心型城市化"、"市郊化"等概念，指出了这种趋势。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逆城市化的出现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城市规模的扩大超出了其自身的极限，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急剧减少，多余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用以满足工业扩大生产的需要。完成工业化以后，城市容量逐渐饱和，由于城市过于庞大，破坏了生态平衡，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失调和社会混乱，第二，现代技术尤其是汽车和公路技术水平的进步，使空间距离相对缩小，从而引起了人们居住观念的变化，开始纷纷从市内移居郊外；第三，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税收政策对人们选择生活空间提供了追求郊区的信号和鼓励，第四，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发达国

家产业调整中，新兴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也促使人们离开城市中心和旧的工业地带，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机会。逆城市化的趋势可能使现有的城市性质再次发生变化，新的分散型城市正在形成，其特征是地方性的，适宜于个别企业和互不关联的不同类型的工业设置。而不象过去的城市，把相互有协作关系的企业集中在一起。

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　考虑这样一个市场。假定参与交易的某种商品的质量各不相同，只有卖主知道每个产品的品质，买主至多仅知道先前售出品的品质分布，并且没有办法辨别产品的好坏，劣质品总是与优质品一起出售。在这个市场上，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那么效率原则要求所有的该类产品都参与交易。然而，对于买主来讲，由于他们仅能知道商品的平均品质，不具备完全的充分信息，因而在购买产品时，平均产品价值等于价格；对于卖主而言，由于他们提供用于交易的任何商品，其价值都低于价格，因而平均产品价值一般低于价格。这样，在任何瓦尔拉斯均衡中，产品的边际价值在买主和卖主之间出现了不一致。如果某些买主愿意为更高品质的产品支付更多，资源的无效性就会产生，反之，当市场结算价格为零时，任何交易都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配置几乎总是无效。这就是逆选择问题最极端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买主们有不同的偏好时，可以存在复合的瓦尔拉斯均衡。如果出卖品的平均品质完全随价格增长，那么一些买主实际上可能宁愿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购买，即使没有收入效应，需求曲线也将上移超过所有价格，供给曲线也必定相应上移，二者在更高的均衡价格上相交，复合的瓦尔拉斯均衡就产生了。如果在该种商品的品质和其他消费品之间，买主的边际替代率恒定不变，那么，每一个买主都明显地偏好较高的均衡价格，同样，卖主也总是喜欢在较高的的价格水平上出售。这样，较高的均衡价格优于较低的均衡价格。但是，在存在逆选择问题时，市场力量可能不会导致单一的价格。因为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所有商品都以使市场明晰化的单一价格进行交易，逆选择问题会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转，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假定每一个买主都必须公布一个价格，然后等待供给。如果任何买主都倾向于比瓦尔拉斯价格更高的价格，那么，随着过度供给最终必定受到限制，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将会出现。为了增加产品的平均品质，卖主可能倾向于这样一个价格，它高得使供给超过了需求，使一些供给商无法出卖其产品，被迫退出市场。此外，价格水平和出售可能性是交替的，卖主的保有价值越大，他愿意接受的为增加买主的降价幅度就越小。这就有可能维持一种存在多种价格的均衡状态，品质不同的产品的卖主公布不同的价格，以吸引数量不等的买主，因为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比在较高价格水平上买主更多。同样，既然产品品质随着价格升降而正向变动，买主也愿意在各种不同的价格水平上购买。

在对逆选择问题的研究中，"市场信号"的含义是指，高品质品的卖主通过进行某些活动来显示它们，这种活动的费用对他们来讲，低于低品质品的卖主。一般来讲，在产品市场上，企业利用担保人显示其产品的可靠性；在信贷市场上，贷款人利用抵押品来显示其信贷价值。

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计划模式（Feldman—Mahalanobis Planning Model）　经济发展的部门计划模型之一。费尔德曼曾于1928年为苏联计划委员会制订了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计划，主张应优先投资和发展资本品工业，实行工业内部的不平衡增长。被称为费尔德曼模式。这一模式在苏联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1947年印度政府任命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为印度计划委员会主任，为解决当时资本品缺乏的问题，他运用了费尔德曼模式的原理，于1953年制订出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成为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计划模式。简称为FM模型。与哈曼德一多马模型不同，FM模型采用的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它假设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真正的瓶颈，而能够消除这种抑制因素的唯一方法是改变经济结构，使之允许经济体系产生更多的资本货物，以保持较高的投资率。FM模型通常假设：(1) 经济被分成两个部门；生产消费品的部门C和生产资本品的部门K；(2) 资本是不可能转移的，即一台机器一旦被安装在一个部门，就不能转移到另一部门了；(3) 两个部门的技术系数是固定的；(4) 资本是唯一的稀缺要素；(5) 不考虑实际资本的折旧，因此实际资本的增量等于全部投资。(6) 对外贸易不存在，因而资本品不能从国外进口；(7) 资本品的生产独立于消费品的生产。给定这些假设后，设 λ_K 为在资本品上的投资比例，λ_c 为在消费品上的投资比例，β 为产出-资本比率，β_K 为资本品部门的产出-资本比率，β_c 为消费品部门的产出-资本比率。FM模型可用下列方程表示。Y_t 为t期的收入。

$$1=\lambda_k+\lambda_c \qquad 故\ \beta=\lambda_k\beta_k+\lambda_c\beta_c$$

设 K_t = 在时间t的资本存量，则有：

$$K_{t+1}-K_t=\lambda_K\beta_K K_t$$

$$C_{t+1}-c_t=\lambda_c\beta_c K_t$$

$$K_t=(1+\lambda_k\beta_k)^t K_0$$

则　$$Y_t = [1 + a_0 \frac{\lambda_i\beta_i + \lambda_c\beta_K}{\lambda_K\beta_K}][(1 + \lambda_k\beta_K)^t - 1]$$

式中　$a_0 = \frac{I_0}{Y_0}$即最初的投资—收入比率。需注意：给定a_0、β_k和β_c，λ_k是起作用的变量，因渐近的增长率由$\lambda_k\beta_k$给定，选择一个较高的值的λ_k将产生较高的增长率，最终将产生较高水平的消费。这是因为通过把更多可供投资的资源分配到资本品的生产上去，将得到一个较高的边际储蓄率和较高的产出或消费增长率。据此，在苏联早期和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工业化而极为重视资本品的生产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资本品生产中的准确的投资量尚未得到说明，最优的选择将依赖于国内和国外的变换限制因素。尽管FM模型具有独创性，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批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该模型没有重视外贸的作用、农业的作用和失业问题等方面。实践中，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得很不成功，实际投资与计划大相径庭。其间资本品工业和农业的过慢增长，而国内人口过快增长，产生了食物和消费品稀缺，于是政府不得不增加食物和资本品的进口，引起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60年代起，印度政府放弃了马哈诺比斯的计划理论。

费边经济学（Fabian Economics）　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流派，最早由"费边社"成员提出，故得此名。

"费边社"的早期成员如肖伯纳等在研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对社会化大生产进行社会性的有计划的管理的思想，但他们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提出"交换价值"的概念，认为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他们还认为剩余价值并不只由劳动创造，而由全部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主张租金应由目前享有租金的阶级转移到全体人民手中，还主张对财产的共同所有，用有组织的生产代替竞争。

"费边社"成员承认资本主义是贫穷、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不认为资本主义会走向崩溃。因为资本主义长期的增长趋势和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技术创新等原因，"费边社"成员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持相信态度，但他们明确表示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结果。

"费边社"成员对股份公司的出现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更脱离了企业管理，使资本主义更偏离公共利益和民主。但他们对于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运行的看法是相当模糊的，只是主张建立社会议会来决定经济政策和管理公共企业。

"费边社"的的第二代成员提出继承和教育机会不平等是不平等的保证的观点，为推动累进税和教育改革的实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大萧条"时期，部分"费边社"成员修正了他们原来的看法，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然而这并不是"费边社"的主流。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出现，"混合经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费边社"成员对此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他们仍希望以他们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扩大经济中的公共部分。他们认为市场不能给公共产品定价，也不能反映外生效应的社会价值，认为一个计划当局可以解决生产无效率的问题并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费边社"成员对混合经济并不满意，他们希望建立非马克思主义又非新古典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主张建立更平等，更具有计划性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费边经济学从实质上看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

费特，弗兰克·艾伯特（Frank Albert Fetter 1863—1949）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894年获德国哈雷大学博士学位。1895—1933年间，先后担任印第安纳、斯坦福、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原理及其对实际问题的应用》（1904年）、《经济学原理》（1915年）和《现代经济问题》（1917年）等。费特学说的主要特点在于试图在一种改良的心理学基础上，构筑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为此，他首先集中研究价值理论，并得出价值是由边际效用递减律和稀少性原则而产生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欧文·费雪所采用的"心理收入"概念，就是费特在论证中提出的。但他真正关心的是福利经济学，福利观念成为其学说的中心，而价值论在他看来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他甚至声称，边际效用论的历史任务只在于克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点，要用来说明福利问题是远为不够的。可见，他同真正的边际效用论者又有显著的区别，从而在美国经济学史上占据着一个较独特的地位。

费雪，欧文（Irving Fisher，1867—1947）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纽约。1883年进耶鲁大学攻读数学，后来还在该校担任过数学讲师。1895年转任该校经济学副教授，1898年升任教授，直至1935年为止。其后期还当过实业家，并在著名大公

司任过职。费雪的研究范围广泛、著述颇丰，代表作有《资本和收入的性质》(1906年)、《货币的购买力》(1911年) 和《利息理论》(1930年)。

费雪是个对经济科学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他作为美国其时最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把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恰当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取得瞩目的成绩，并成为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关于物价指数的编制以及发现各项变量的时滞关联，是对统计学的重要功绩。他的理论研究始终紧密结合客观的经验资料来进行，既避免了当时许多经济学说常有的浓厚的主观色彩，又使其论述十分明确透彻，从而推进了经验方法在经济科学中的重要作用。从一般经济理论方面来看，费雪主要提出如下的新学说：

1.重新界说"资本"和"收入"。为了能使资本与收入学说真正成为应用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便于进行具体有效的研究和计算，他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定义。按他的阐释，收入是资本物提供的未来服务，由劳务的流量所构成；资本由物品的存量所构成，其价值是未来各年收入流量按利率折成的现值；因此，利率具有重要意义，是联系收入与资本的桥梁。这里他已明确区分了"存量"与"流量"的概念。

2.提出"交易方程式"。费雪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重新加以表述，主张货币购买力的确定可按这样的"交易方程式"进行分析：

$$MV+M'V'=PQ$$

这样，一般物价水平P（即表示货币的购买力）完全决定于五个已经确定的因素：货币流通量M、货币流通速度V、支票存款量M'、支票存款流通速度V'和商品流通总量Q。他力图证明，在正常情况下，M与M'之间有固定的比例，M的变动对V、V'和Q都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于是他得出结论："货币数量增加的正常影响之一，是一般物价水平确切地按比例增涨。"在这里，他把支票存款（即活期存款）定义为货币供给的一个部分，明确解释了它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作用，还探讨了该方程式其他参数的意义和统计方法，这些都对货币理论的今后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3.阐述新的利息理论。费雪综合了19世纪末期的各种庸俗利息理论，强调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解释利息的产生。他认为，利率取决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前者由储蓄者的心理即"不耐心等待"所决定，人们总是偏好现在就可提供收入的资本财富，后者由投资的可行性及其前景所决定，即人们要看有否"投资机会"和其"收益超过成本率"来决定对资本的需求。这意味着，在资本市场上，人们的时间偏好率和资本的收益超过成本率共同决定着利息率。很显然，这种利息理论主要是对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的一种综合和发挥，并没有能作出新的解释。不过他对储蓄与投资的分析、以及有关利率与经济体系内其他相关因素之间依存关系的论述，却为以后的学者们提供了具有启迪作用的分析思路和研究途径。

弗雪方程式 (Fisher Equation)　又称"交易方程式"(Exchange Equation)，是表述货币数量论的一个重要公式，由美国经济学家I·弗雪(I Fisher)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故名。其基本形式是：

$$MV=PT$$

或者

$$P=\frac{MV}{T}$$

在上式中，M为货币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T为交易总量。上式说明，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总量。它与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同方向变动，与交易总量反方向变动。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是稳定的，交易总量在实际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固定的量。这样，价格水平就与货币量同方向、同比例变动。这就是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内容。如果考虑到货币分为现金与银行存款，是可以把上式写为：

$$MV+M'V'=PT$$

或者

$$P=\frac{MV+M'V'}{T}$$

在上式中，M指现金、V指现金的流通速度，M'指存款货币，V'指存款货币的流通速度。该式同样说明了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的关系，但强调了货币数量不仅包括现金，而且还包括存款货币。这一公式在货币数量中十分重要，被认为是对原始货币数量论的标准表述。

退出壁垒 (Barriers to Retreat)　指企业从特定市场上退出的难度。所谓退出是指企业停止作为卖方的行为、从特定市场上撤退。退出有破产的状态，也有在经营绩效不良的情况下向其它产业转移的状态。形成退出壁垒的因素主要有4个：1.埋没费用。企业退出某个市场时的埋没费用较大，该市场中的企业便不易退出。2.劳动者的解雇或培训费用的额度。当企业以破产状态退出时，必须解雇雇佣劳动者，为此需支付退职金、解雇工资等。当企业以向其它产业转移的状态退出时，需重新培训劳动力，并为此支付费用。这些费用的多少，也影响企业退出的难易程度。3.结合生产，对结合生产企业来说，即使它所生产的多种产品中的一种产品销售不畅，停止该种产品生产

的可能性极小。事实上，在结合生产条件下，企业削减所生产的多种产品中的一种产品的产量的限度也是有限的。4.法律和行政上的制约。在某些产业，企业退出受法律制约，或会受到行政当局的干预。

洗售（Wash Sale） 它不是指实际上全部销售证券的意思，而是指一种虚抛证券的行为，即投机者若立即重新买回他所出售的证券，他可以把自己所拥有的证券出售给自己，或者在同一天以相同的价格或不同的价格购买和出售同样数量的某种证券。投机者通过洗售可以达到创造某种证券的市场价格的记录，使其他投资者误认为该种证券的价格变化而采取行动，投机者则从中获得利益。一般地，证券交易中把洗售当作一种违法的投机行为。

差别汇率（Different Rate） 即"复汇率"。见"复汇率"。

差价税（Valiable Levy） 差价税又叫差额税，它是指当某种本国生产的产品价格高于进口的同类商品价格时，对进口商品按国内价格与进口价格之间的差额征收的关税。差价税的征收，拉平了国内价格与进口价格水平，削弱了进口商品的竞争优势，从而保护国内市场和生产。各国在征收差价税时，有的规定按价格差额征收，有的规定在征收正常关税以后另行征收。从本质上说，差价税也是一种进口附加税。由于国内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都会发生变动，它们两者的差额也经常变动，因此，差价税是一种多变关税，它的税额随着价格差额的变动而变动。

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 指美国哲学家J·罗尔斯在其1972年出版的《正义论》一书中所提到的原则。罗尔斯在这本书中认为，如果建立一套公正的社会制度，保证它不受少数个人私利的左右，那么可能会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并且共同遵守有关规定。其中，每个人都不了解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但是仍然能合作得很好。这样的社会制度有以下两个特点：(1)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权享受与维护各自最大程度的自由，但是不能影响别人的自由。(2) 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只能是为了充分发挥个人的长处，或者由于完全竞争条件下每个人的地位不同所致，否则就被视为是不合理的。其中的第二个特点被称为"差别原则"，由于它有助于分析经济社会的收入分配与福利问题，因此受到了经济学界的重视。按照差别原则，如果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并且有利于改善贫困阶层的状况，使得社会福利有所增进，那么这一现象就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在这里，罗尔斯引进了基本商品的概念，它包括权利、自由、自尊、机会以及收入等等。他主要研究的是基本商品指数的分配问题，将社会上每个人的基本商品指数进行逐个比较，通过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境况的变化来判断整个社会形势的好坏，以人们境况的变化来考察社会的富裕程度以及不平等程度，而不是从效用的角度去衡量。社会上的个人虽然不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采用差别原则来行事，就可以免于成为最贫困阶层中的一员。

总头寸（Overall Position） 见"外汇头寸"。

总差额（Totle Balance） 又称"官方结算差额"。一定时期内一国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包括长资本项目、短期资本项目）上贷方总值与借方总值之差。贷方总值大于借方总值称为官方结算顺差。反之则为官方结算逆差。

总括保单（Dlanket Policy; Closed Policy） 又称为闭口保险单。总括保单是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期限内按约定的保险总条件对整批货物进行承保的保单。它适用于整批成交分船运输货物，特别适于每批运输种类和价值相近的货物。

总括保单中需载明总的保险金额，承保的险别，保险费总额，装运港的名称等，这样，投保人无需在每批货物装运时逐次通知保险人只是当出现承保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将损失的数量从总保险金额中予以扣除，直至总保险金额扣净为止，保险人的责任也随之终止。

如果投保人与保险人愿意在保险总金额被扣除的时候，保险单仍然有效，可以在总括保单中附加恢复条款，当保险人对风险损失的赔偿从总保险金额中扣净之时，被保险人可以通过加付保险费，使保险总金额恢复到原来水平。

总利润原则（Gross--Profit Principle） 是进行国际收入与费用分配的指导原则之一，它不要求逐笔考察跨国联属企业的内部交易是否符合独立竞争原则，而只要求按照某种合理的标准对整个联属企业集团世界范围内的总利润进行分配。具体的分配标准可以根据跨国联属企业集团的不同情形从下列标准中选择：

①以各联属企业营业额或手续费收入占联属企业营业总额或手续费收入总额的比例为分配标准；

②以各联属企业人员工资额占联属企业全部人员工资总额的比例为分配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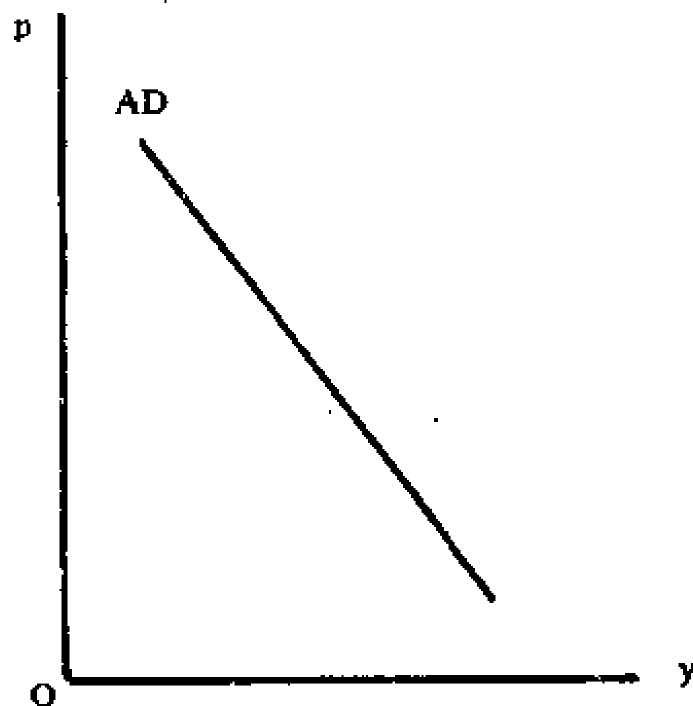
③以各联属企业流动资金额占联属企业流动资金

总额的比例为分配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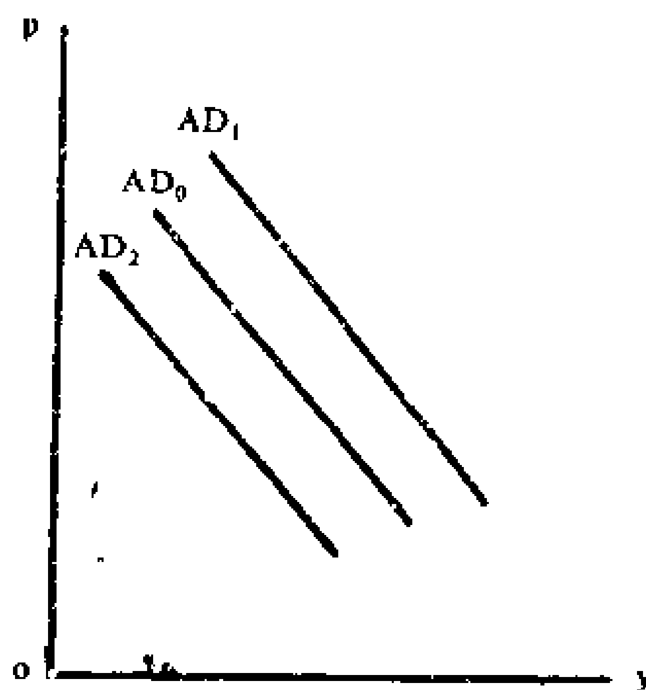
利用总利润原则分配跨国联属企业集团的总利润显然可以既简化税务管理，又间接地纠正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国际收入与费用的分配失当，还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对各联属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优劣不同加以平衡。但也显然，按总利润原则计算出来的利润可能与现实情况差距较大，特别是如果集团整体有盈利，那么亏损严重的联属企业也有盈利；如果集团整体有亏损，那么盈利再多的联属企业也是亏损。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此外，由于确定总利润分配标准时难以达成令各方满意的一致，所以也使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补充手段。

总贸易（General Trade）　总贸易包括总进口和总出口，它是一切进出入本国国境的所有商品的总和。总进口不仅包括已办理海关进口手续、供本国生产和消费使用的商品，而且还包括进入国境后存放在海关仓库并由海关监督管理的商品，这部分商品有可能办理进口手续，输入国内市场，也有可能用于再出口。总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本国生产的出口商品，另一部分是已办理进口手续，进入国内市场，而未经过任何加工改制又输出国外的复出口商品，还有一部分是进口时由海关监管，既未办理进口手续，又未进行任何加工改制的复出口商品。

总需求曲线（Aggregate Demand Curve）　表明物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价格水平与国民收入之间关系的曲线，如附图1所示。在附图1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纵轴OP代表价格水平，AD即为总需求曲线。总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说明，在物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价格水平与国民收入是反方向变动的，即价格水平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反之，亦反之。这是因为，根据IS--LM模型，在名义货币存量为既定时，价格水平的上升会使实际货币供给量减少。在货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要使货币市场均衡，实际货币供给量减少，必然使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使物品市场上投资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并使国民收入按乘数原理成倍减少，反之，价格水平下降则会使实际货币供给量增加，从而利率下降，总需求和国民收入都增加。总需求曲线的倾斜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与乘数的大小。投资的利率弹性越大，乘数越大，则总需求曲线的斜率越小，或者说总需求曲线越平坦，在这种情况下，既定价格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就大。反之，投资的利率弹性越小，乘数越小，则总需求曲线的斜率越大，或者说总需求曲线越陡峭。在这种情况下，既定的价格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就小。自发总需求的变动会引起总需求曲线位置的移动，如附图2所示。在附图2中，AD_0为最初总需求曲线的位置。当自发总需求增加（例如政府支出增加）时，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即从AD_0移动到AD_1，表明在价格水平既定时，国民收入由于自发总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了。当自发总需求减少（例如政府支出减少）时，总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即从AD_0移动到AD_2，表明在价格水平既定时，国民收入由于自发总需求的减少而减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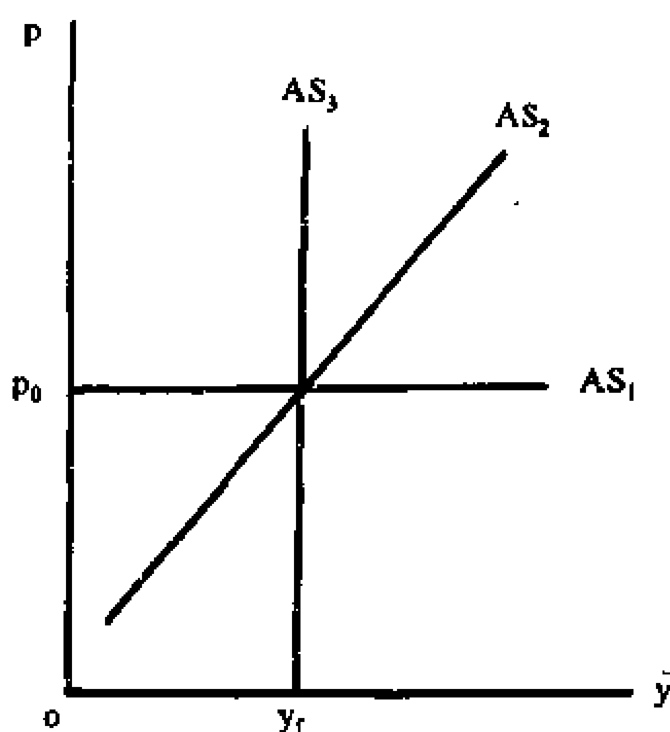
附图1



附图2

总供给曲线（Aggregate Supply Curve）　表明一个经济的价格水平与总产量（国民收入）之间关系的曲线，它描述了与每一既定的价格相对应，所有厂商愿意供给的产量的总和。总供给取决于资源利用的状况，在不同的资源利用情况下，总供给曲线的形状，即总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附图说明了三种不同的总供给曲线。附图中，横轴OY代表总产量（国民收入），纵轴OP代表价格水平，

AS_1，AS_2，AS_3分别为三种不同的总供给曲线。AS_1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这条水平的总供给曲线表明，在价格为既定（P_0）的情况下，总供给可以适应总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供给弹性无穷大，因为这时资源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产量的增加不会使价格水平上升。AS_2为短期总供给曲线，这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表明，总供给与价格水平同方向变动，即价格上升，总供给增加，价格下降，总供给减少，因为工人对价格变动的预期一般落后于实际情况，这样，当价格水平上升时，实际工资的增加赶不上价格的上升，从而厂商会增雇工人，增加产量。AS_3为古典总供给曲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这条从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Y_f）向上垂直的总供给曲线表明，由于经济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所以，无论价格水平如何上升，产量都无法增加，在长期中经济总会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这是长期总供给曲线。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分析正是根据不同的总供给曲线来分别分析总供给对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影响。



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 又称“总支出”。指经济中对商品和劳务需求的总和，或者用于商品和劳务支出的总和。总需求包括四个组成部分：(1) 消费，包括私人用于商品和劳务的支出；(2) 投资，包括企业的固定投资、存货投资与私人住房投资；(3) 政府支出，包括各级政府用于商品和劳务的支出；(4) 净出口，即出口与进口之差额。以AD代表总需求，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NX代表净出口，则有：

$$AD=C+I+G+NX$$

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时的国民收入称为均衡的国民收入。这一模型假设总供给是既定的，因此，决定均衡国民收入水平的就是总需求。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经济中存在失业；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经济中存在通货膨胀。这样，总需求分析就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与此相应，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是需求管理。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总供给（Aggregate Supply） 经济中能用于满足总需求的产品与劳务的总供给量。总供给中包括国内生产的产品与劳务，以及进口的产品与劳务。总供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资源（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与技术水平。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假设，在短期内，资源和技术水平是既定的，因此，总供给也是既定的。凯恩斯正是根据这一假设分析总需求如何决定国民收入。但是，实际上总供给并不是不变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分析正是要分析总供给的变动及其对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影响，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中就有供给管理政策。与总需求一样，总供给也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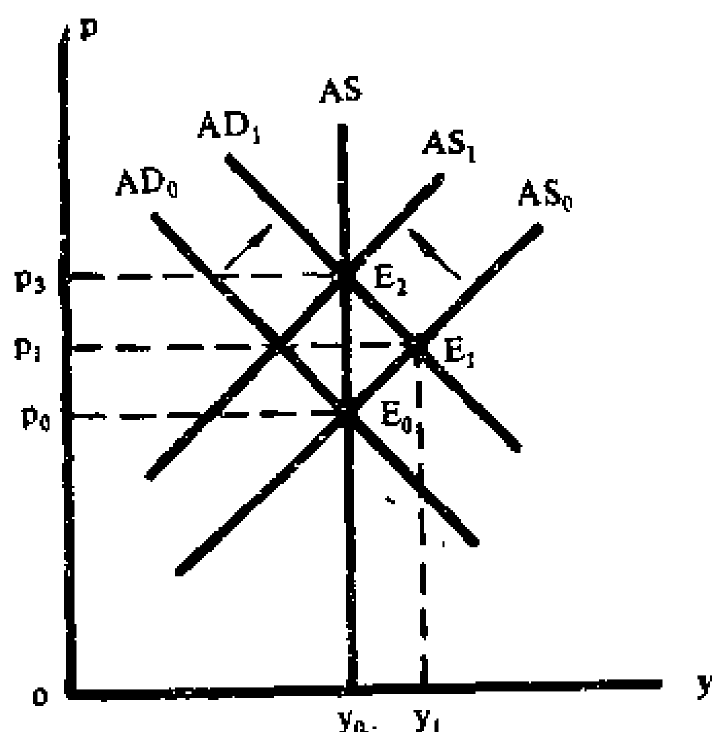
总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实际用于生产的总劳动量和总资本量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的产出流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以L代表总劳动量，K代表总资本量，Y代表产出流量，则总生产函数记为：

$$Y=F(L,K)$$

总生产函数还可以扩展到包括作为投入品的土地、技术等因素，这时总生产函数就是实际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流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总生产函数与微观经济学中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有某些共同之处。它们具有两种形式：第一、固定系数生产函数。在这种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是固定的，两者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因此，就可能存在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本或劳动。当产量增加时资本与劳动应按固定的比率增加。第二、可变系数生产函数，又称连续生产函数。在这种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是可以变动的，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从而资本和劳动可以充分得到利用。总生产函数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5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经济学家J·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围绕总生产函数的连续性与边际生产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资本与劳动至少在总量是可以替代的，即总生产函数具有连续性，由此就用边际生产力来解释分配的决定。后者反对这一观点，特别是反对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根据这一理论而得出的分配理论。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ggregate Demand__Aggregate Supply Model） 把总需求与总供给结合在一起分析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决定及其变动的国民收

入决定模型，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OY 代表国民收入，纵轴 OP 代表价格水平。AD_0 代表原来的总需求曲线，AS_0 代表短期总供给曲线。AS 为长期总供给曲线。AD_0 与 AS_0 相交于 E_0，决定了国民收入为 Y_0，价格水平为 P_0，这时，E_0 点又在长期总供给曲线 AS 上，所以，Y_0 代表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当总需求增加（例如，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总需求曲线从 AD_0 向右上方移动到 AD_1，AD_1 与 AS_0 相交于 E_1，决定了国民收入为 Y_1，价格水平为 P_1。这说明在短期内总需求增加会使国民收入增加（从 Y_0 增加至 Y_1），价格水平上升（从 P_0 上升至 P_1），如果是总需求减少，则国民收入减少，价格水平下降。这就是说，总需求变动引起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同方向变动。但是，价格的上升必然引起工资增加，工资增加使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从而国民收入减少，价格水平上升。这说明总供给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价格水平反方向变动。当总供给曲线移动到 AS_1 时，AD_1 与 AS_1 相交于 E_2，这时 E_2 点又在长期总供给曲线 AS 上，国民收入仍为充分就业时的 Y_0，但价格水平上升为 P_3。总需求变动及其所引起的总供给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均衡的途经是 $E_0 \to E_1 \to E_2$。这一模型在理论上说明了总需求变动与总供给变动对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共同作用，从而使国民收入决定模型能分析更为现实的情况。因此，这一模型在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是十分重要的。



总成本（Total Cost） 总成本是某特定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成本总额。根据时期的长短可以进一步对总成本进行划分。这里，时期的长短是根据生产要素能否进行调整而言的。短期是指在这段时间内不能调整全部生产要素。长期是指这段时间内全部生产要素都可以调整。短期内由于某些生产要素为既定而不能调整，因此总成本可以分为总固定成本与总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是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例如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支出，生产工人的工资等。固定成本是在一定限度内不随产量而变动的成本，例如厂房费用、机器折旧费用、一般管理费、厂部管理人员工资等。只要建立了生产单位，不管是否进行生产，都要支出固定成本。长期内由于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调整，因此，所有的成本都是变动成本。

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为 TFP。所谓生产力是指生产要素在其投入和产出过程中所表现的生产效率。生产力提高则表示以同量的要素投入可获得更大的产出，或表示以较少的要素投入获得同量的产出。相应地，总要素生产力是指每单位总要素投入而获得的平均产出，它表明生产要素（资本劳动）等对于产量增长的贡献，是衡量一国产业部门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

设 Q 为一国或一产业部门的总产出水平，K、L 分别为相应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那么，总要素生产力的几何平均指数 A 就有等式：

$$A = Q/(K^{w_1}L^{w_2})$$

其中 w_1 和 w_2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权数，通常以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分别在总产出中所获份额为其数值，设 P 和 W 分别为利润和工资，则数值分别为 P/Q 和 W/Q，而 P/Q+W/Q=1。进一步，在计算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时，也可让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表示，即：

$$A' = Q' - w_1K' - w_2L'$$

此式是将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视为总产出水平增长率中扣除总要素投入增长率之后的剩余部分。

衡量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计算方法（growth accounting）是二次大战以后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发展，它的中心内容是测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于产出水平增长所起的作用。这种增长计算方法至少会引起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将每一要素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作为每一要素对总要素生产力的贡献的权数，这大大减低了资本要素对产量增长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以[(P/Q)·Q']/Q'表示，若经济中资本增长与产量增长的比率基本相同，那么，资本增长对产量增长所起的作用就可简单地表示为 P/Q，若按这种方法，则 50 和 60 年代的统计资料则表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仅在 10%—15%之间，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很小的。另一方面，这种增长计算方法也不能清楚地解释以资本、劳动增长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增长情况，它仅考虑了资本、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而其它的对总要素生产力增长起积极作用的因素还包括，规模经济、研究与开发支出，技

术进步等等。以规模经济为例，若引入规模经济，那么在进行加权时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就是不正确的。同时，规模经济因素还表明了总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总要素生产力增长率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会提高资本和总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替代（Gross Substitution） 我们可以将斯拉茨基方程：价格变动的总效应等于收入效应加上替代效应，用数学方法表达为：

$$\frac{\alpha xi}{\alpha pi}=\frac{\alpha x_i}{\alpha p_i}|u=u^0-x_i\frac{\alpha xi}{\alpha y}|p=p^0$$

推广到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的另一种商品的需求的变动的情形：

$$\frac{\alpha xi}{\alpha pj}=\frac{\alpha xi}{\alpha pj}|u=u^0-x_j\frac{\alpha xi}{\alpha y}|p=p^0$$

$$i,j=1,2,$$

$\frac{\alpha xi}{\alpha pj}$可以视为交变效应，即j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x_i$需求量的变动。如果$\frac{\alpha xi}{\alpha}pj>0$，则说商品i与商品j是总替代的，这是由于j商品价格变动的对i商品的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相反，如果$\frac{\alpha xi}{\alpha p_j}<0$，则商品i与商品j是互补的。需要强调的是总替代与替代的含义是不同的。替代是指在效用不变的情况下，j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i商品需求量不同方向变动，即$\frac{\alpha xi}{\alpha pj}|u=u^0>0$。总替代或总互补里已经包括了替代效应。在两种物品情形下，一对物品可能在$\frac{\alpha xi}{\alpha pj}|u=u^0$形式上是替代的，同时又是总互补的。扩展到几种物品的情形下，它们也可能在$\frac{\alpha xi}{\alpha pj}|u=u^0$形式上是互补的，同时又是总替代的。总替代也常常利用超额需求函数来定义。假定超额需求函数集$e_i(p_1\cdots p_n)$中p_i为第i商品的价格，莫萨克（J·L Mosak）于1944年最早提出总替代的概念，他们定义要求$\alpha e_i/\alpha p_j$的符号是正的，即与前面第二个斯拉茨基方程的符号一致，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被更为广泛运用的定义是由摩里西玛（M·Morishima）提出，他认为第j商品对第i商品是总替代的，如果$e_i(p)<e_i(p^0)$，只要$P^1<P$，$p_j^1<p_j$　$p_k^1=p_k$，　$K\neq j$。也就是说，如果$e_{(p)}$可微，对于所有p和p'，p<p'　p≠p'　$p_i=p_i'$，有$ei(p)<ei(p')$，则第j商品对第i商品是总替代的。这个假定表明，nxn阶矩阵〔$e_{ij}(p)$〕对于$e_{(p)}$定义域上的所有P，非对角线元素都是正的。如果$e_i(p)<e_i(p')$，则可称之为弱总替代的。

总罢工（General Strike） 指在某一地区所有主要行业的大多数工人停止工作。总罢工不同于个别行业的普遍罢工，不论其涉及范围的大小，总罢工的特点都是使该地区经济生活几乎完全瘫痪，以此对政府施加压力，达到预期目的。总罢工的目的一般是纠正劳资关系中的特殊不合理现象或是为工人争取新的民主权利。美国总罢工在工人中缺少支持，因而不太盛行，而在欧洲总罢工支持率很高，罢工者往往能成功地把整个经济停顿下来。

品质公差（Tolerance Franchise） 品质公差是指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对于一些特定的工业品或农副产品已经形成了公认的交货品质合理差异。对于这类商品的交易，必须在买卖合同中明确规定出口商在交货时商品品质的公差幅度，既防止出口商以品质公差为由以次充好，也保证出口商在合理的品质公差限度内完成交货义务。依据国际贸易惯例，商品品质公差部分是不计价的。

钞票价（Currency Rate） 即"外币钞票价"，见"外币钞票价"。

看涨期权（Call Option） 又称"买进期权"。该期权的购买者支付保险费并取得固定价格（在外币期权交易中即为汇率）购买特定数量的股票、外汇等的权利，其出售者取得保险费并有义务应看涨期权购买者的要求交投股票或外汇。看涨期权可给其购买者带来两方面的好处：（1）在期权有效期内，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购买者行使期权可以获利。价格上升越多，获利越多，即使价格上升幅度不够大，甚至不上升或下跌，其损失也很有限。据此进口商或其它持有外汇债务的人，可以利用外币期权交易中的看涨期权避免外汇风险。例如，美一企业进口了价值24亿日元的商品，三个月后付款。对于由此产生的外汇风险以购买看涨期权的方式避免，协议价格定为1美元=240日元，保险费20万美元。三个月后付款时，若日元升值，设汇率为1美元=220日元，则该美国企业行使期权，以1美元=240日元的汇率买入24亿日元，支付1，000万美元，加上保险费共付1，020万美元。此时若在现汇市场购买24亿日元，则需支付1090万美元。若日元贬值，设汇率为1美元=260日元，放弃期权，在现汇市场购买24亿日元，支付约920万美元，加上已付的购买看涨期权的保险费，成本共计940万美元。若付款时汇率为1美元=240日元，则行使与不行使期权无差别，损失仅限于保险费20万美元。由此可见持有外汇债务的人以看涨期权避免外汇风险不仅可以避免汇率不利变

动可能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利用汇率有利变动获得好处。(2) 在期权有效期内，如果期权的保险费上涨，转让期权不仅可以赚取一定的利润，而且转嫁了风险。看涨期权的出售者从其交易中亦可取得好处：(1) 收取保险费；(2) 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看涨期权进行保值。例如：某人拥有1，000英镑需售出，当时1英镑＝1.50美元。由于某种原因他不想立即卖出，但对该汇率很满意担心汇率下跌。此时他可卖1，000英镑的看涨期权，协议价格定为1英镑＝1.50美元，保险费每英镑0.03美元。则若汇率下跌，购买者不行使期权，只要下跌不超过0.03美元，其损失由保险费弥补而有余。即使超过0.03美元也可部分由保险费弥补。若汇率上升仍以1英镑＝1.50美元的汇率卖给买主，汇率维持在了他满意的水平且得到了一笔保险费收入。

看跌期权（Put Option）　又称"卖出期权"。该期权的购买者支付保险费并取得以固定价格（在外币期权交易中即为汇率）出售一定数量股票、外汇等的权利；其出售者取得保险费并有义务应看跌期权购买者的要求购入其出售的股票、外汇等。看跌期权可为购买者带来两方面的好处：(1) 在期权有效期内，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购买者行使期权可获利。价格下跌越多，获利越多。且即使价格下跌幅度不够大，或不下跌甚至上升，损失也仅限于已支付的保险费。在外币交易中，出口商或其它持有外汇债权的人，据此便可购买看跌期权以避免外汇风险。若汇率下跌则行使期权，可以免遭汇率不利变动带来的损失；若汇率上升则放弃期权，进入现汇市场卖出外汇又可获得汇率有利变动的好处；(2) 在期权有效期内，如果看跌期权的保险费上涨，转让该期权既可赚取一定利润，又可以转嫁价格下跌幅度不够大，或不下跌甚至上升的风险。看跌期权的出售者从其交易中亦可取得两个好处：(1) 收取保险费；(2)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看跌期权进行保值。

选择税（Alternative Duties）　选择税是指对同一种进口商品同时规定从价税和从量税两种征税税率，在实际征税时，根据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征税。相比之下，选择税比较灵活，它能够更好地执行政府的贸易政策。如果要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限制商品进口，那不就可以选择税额较高的征税方法计征关税。相反，如果要鼓励某种商品的进口，则可选择税额较低的征税方法计征关税。在实践中，采用选择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进口，因而总是选择税额较高的那一种征税方法。

选址论（Location Theory）　一种关于影响工厂厂址选择的理论。它是属于区域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根据选址论的分析，在其它区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最合理的企业厂址应该选在其全部运输成本最小的地方。一个工厂的运输成本包括原料的采购成本和产品的销售成本。采购成本可以通过把工厂搬到（原料）供应地附近来减少，而销售成本则可通过把工厂搬到产品销售市场附近来降低。这二种原则经常可能是冲突的。生产者在决定其企业厂址时，必须权衡每一成本因素的相对利益，特别是对不同产业来说情况差距更大。例如农业领域的工厂和矿业方面的厂址位置决定了其生产资料分布的位置。同样对销售业和其它服务行业来说，厂址则必须尽可能靠近买主。但对制造业来说，其厂址的最优决定因素就非常复杂，如果制造或加工过程能使产品重量大大减少，从而降低销售成本，则可把工厂设在原料产地较为经济，另一方面，如果制成品容易变质或其运输成本较高，则厂商应把其工厂设在市场附近较为合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加快。影响工厂厂址选择的因素也日益增多，选址论的理论体系也趋于不断完善。

复汇率（Multiple Exchange Rate）　又称作"差别汇率"，"单一汇率"的对称。一国货币的对外汇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有三种具体形式：(1) 法定的"差别汇率"。如区别不同情况对进口买汇及非贸易结汇、出口售汇实行不同的汇率，以鼓励本国出口。对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支实行不同的汇率。智利在70年代曾制订了多达9种的汇率，适用于不同的外汇收支。(2) "混合汇率"。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混合使用；(3) 外汇转移证制度。出口商按官方汇率向外汇银行结汇时，除取得本币，还取得中央银行签发的外汇转移证，可在市场上出售，实际上提高了出口商的收入。进口商买汇时，除了按官方汇率支付本币外，还需出示外汇转移证。为此需在市场上购买外汇转移证，实际上提高了外汇成本。因外汇转移证的买卖，进出口商的实际汇率便有了一定的差异，形成一种特殊的复汇率。实行复汇率是进行外汇管制的手段之一。

复进口（Re—import）　本国输往国外的商品，未经加工又输入国内，就叫作复进口，又叫再进口。复进口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说，本国出口商品由于质量不合格被退货，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没有销路，或者该商品国内短缺、价格上涨，而国际市场价格回跌，这也使得一部出口商品再进口到国内销售。一般来说，一国政府应想方设法避免复进口，因为不管怎么说，复进口总是意味着一种浪费。

复出口（Re—export） 外国商品进口以后未经加工制造又出口，就叫作复出口，又叫再出口。复出口的产品有时候办了海关进口手续，进入了本国市场，而有时候则没有办理进口手续，只是存放在本国海关仓库，这往往与转口贸易有关。任何从外国进口的产品，如果在国内经过了加工，即使加工的水平非常低，也不再被列入复出口。

复合置换（Dual Swap） 它是在利率和货币置换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资金融通方式，原理和利率置换、货币置换一样，只是操作过程较为复杂，有关文件繁复一点。复合置换兼有降低筹资成本、拓宽借款渠道、消除利率和汇率风险的多种作用。

复式记帐法（Double entry—Bookkeeping） 所有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保存他们与其它企业和个人的交易、他们欠别人和别人欠他们的债务以及他们的资产的记录。为这个目的而保存的记录就构成了他们的会计记录。传统上，会计记录由各种各样的帐薄所组成，但它们也可以采用磁带等方式来记录。如果记录建立在系统的基础上，人们就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会计制度。根据会计记录人们可以作出各种会计表格，在这些表格中详细的会计信息可以被重新安排、归类并用概括的形式表达出来。平衡表和损益表就是这些会计表格中的重要实例。

复式记帐法是会计信息安排和分类的一个制度或方法。它最初出现在十三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尔后逐渐通过商业交往、教育和发表论文等方式向欧洲的其它地方传播。虽然不可能证实复式记帐制度在十八世纪就已被商人和其他人广泛地应用了，但到十九世纪，它确实已经成为会计记录的标准制度。今天，它实际上被所有公司组织和其它企业以及非盈利性组织使用着。它已被证明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国民收入及其有关帐户建立的有用的支架。

复式记帐法仅是一个安排和组织会计信息的一种制度，它本身并不定义那些信息的范围和细节。复式记帐法要求每一笔交易（或其它变化）在会计制度中必须被记两次，就是说对同一笔资金数额，要在借方和贷方各记一次。在双帐户中，借、贷两个帐户是在原始记录中信息基础上在分类中作出的。分类帐还可以为方便起见再细分为一系列专门的分类帐。分类帐是由大量的，例如有关某一借款者或贷款者、某一笔资金或某一笔支出等类别的分类帐户所构成的。习惯上，借方帐户被列在适当的分类帐户的左侧，即借方；而相应补偿的贷方帐户则列在右侧，即贷方。

每笔交易的帐户二重性把分类帐户联络在一起构成一个信息记录的连锁体制。而且每笔交易都涉及两个相等但相对立的帐户，所以帐户系统一直是平衡或均衡的，借方帐户总额一定等于贷方帐户总额。相应地，在所有分类帐户上有余额的，其借方余额的余额总额和贷方余额的余额总额也必定相等。借贷相等是平衡目标的基础。

复式记帐法是组织会计数据的一个有用且多用途的方法，它的价值随着有组织的数据的规模和复杂性的增长而增长。反过来，数据的有效组织有助于在各种水平上对各个方面的管理，在大规模的组织中这一点尤其明显。

贸易汇率（Trade Rate） "非贸易汇率"的对称。适用于由对外贸易及其从属费用收支所产生的外汇买卖的汇率。一国可以只制订一种贸易汇率，也可以对外汇银行买入出口外汇、卖出进口所需外汇及对外贸易从属费用规定不同的汇率，因而同时并存数种贸易汇率。贸易汇率的制订、实施是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进行外汇管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贸易差额（Trade Balance） 又称"商品差额"。一定时期内一国居民的商品出口总值与进口总值之差。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称贸易顺差，反之称为贸易逆差。与经常项目差额、基本差额、总差额相比，该差额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使用得最频繁。该数字因海关可以迅速收集并汇总上报商品进出口资料比较容易得到。经常项目差额等因其中有关劳务收支的数字既分散又纷繁，收集汇总比较困难，费时亦多，不能及时获得。故新闻报道中经常使该差额而非其它差额。它是国际经济交易者，特别是外汇交易者密切注视的经济指标之一。贸易顺差说明本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均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为各国政府所追求。

贸易术语解释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 贸易术语解释国际规则是国际商会对国际贸易中采用的用来划分买卖双方在贸易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贸易术语所作出的统一解释。这个国际规则最初于1936年制订，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作出了多次的补充和修改，从1953年起改用现名。目前，该规则共对14种国际贸易术语作出了统一解释，这些贸易术语是工厂交货、铁路交货或火车上交货、装运港船边交货、装运港船上交货、成本加运费一指定目的港、成本加保险费、运费一指定目的港、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目的港船上交货、目的港码头交货、边境指定点交货、目的港完税后交货、启运机场交货、承运人的指定地点交

货、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等。该国际规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它被当作一般的国际贸易惯例，成了买卖双方签订交易合同的基础，这一规则大大减少了国际贸易过程中的争议和纠纷，有利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

贸易议定书（Trade Protocal）　贸易议定书也是一种关于两个国家间经济贸易关系的书面协议，它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只是这种书面协议往往只涉及缔约国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一些较次要的问题，而且大多是用来说明、补充、修改或限制原先已签订的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因此它是一种辅助性的贸易协议，通常附在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后面，但也有一些贸易议定书作为单独文件保存。有时候，在两国未签订贸易条约或协定之前，可以先签订贸易议定书，将它暂时用作两国开展贸易的依据，另外，如果两国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那么关于年度贸易的具体事项，通常也用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加以保证，以确保两国贸易的顺利开展。

贸易协定（Trade Agreement）　贸易协定是指以"协定"为名称的关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书面协议，贸易协定的签订和生效比较简单，它通常是由缔约国的某个行政机关的首脑或其代表签订，协定无需批准，在签订之日或规定的日期生效。贸易协定也有双边和多边之分，它的有效期比较短。贸易协定除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外，通常还有民间贸易协定。贸易协定涉及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是针对相互间贸易关系的某个具体方面。根据涉及的内容，贸易协定可以分为专门贸易协定和一般贸易协定。专门贸易协定是指就贸易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而签订的协定，主要有关税协定，它规定关税的征收、优惠、减免等。一般贸易协定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贸易额、双方出口货单、作价办法、使用的结算货币、支付方式、关税待遇等。缔约各方以此为发展贸易关系的依据，不过有的内容如贸易额、出口货单等规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调整。

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in Trade）　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是指一国政府对各种进口商品规定的一系列标准要求。如果外国商品不符合这些标准，就不准进口。它包括的内容非常复杂，具体地说主要有三部分，即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商品包装和标签的规定。技术标准（Technical Standards）　包括产品的质地、纯度、营养价值、尺寸、用途、设计等等。技术标准主要适用于限制制成品的进口，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一些制成品规定极为严格的技术标准，外国商品必须符合这些标准才能进口，即使商品的具体情况与技术标准只存在细小的差异，而且也不会对国内消费者造成什么损害，本国仍有权禁止该商品的进口。目前，技术标准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电力设备、家用电器、汽车、飞机、卫生设备、药品和食品等部门。卫生检疫规定（Health and Sanitary—Regulation）　主要适用于农副产品和其他一些日常消费品，各国对于要求实行卫生检疫的具体商品越来越多，规定的内容也越来越严格。如果外国商品经检验不符合卫生检疫规定，该国海关将予以扣留，并有权作出进一步的处置（如销毁或装运再出口等）。商品包装和标签的规定（Commodity's Packing and Lebelling Regulation）内容十分繁杂，而且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外国商品必须符合这些规定才能进口，否则不准进口或禁止在国内市场上销售，有些外国商品为了符合进口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得不重新包装和改换商品标签，这不仅增加了商品的成本，而且也耗费了不少时间，其结果是该商品的竞争能力下降，还有可能错过在某市场的销售良机，最终起到了限制进口的作用。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不仅内容复杂多样，而且经常发生变化，使外国商品难以适应，从而提高了限制进口的作用。另外，外国商品即使符合进口国所制定的上述标准和规定，但它必须在通过了进口国海关漫长的检验过程之后才能进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进口的作用。总之，上述标准和规定实质上是一种间接的非关税壁垒，由于它有较好的隐蔽性，制定这些标准和规定又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保护本国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保护环境等），加上它在限制进口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些都使得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成了当前非关税壁垒的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国家往往针对某些主要的进口商品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定，使之在某些方面不能适应进口国的要求，以便更好地限制进口。

贸易公司（Trading Company）　外国基地公司的一种形式，它以从事货物和劳务贸易的形式出现，通过在有关购买销售及其它交易（如租赁）活动中开具发票这一行为达到国际避税的目的。设在避税地的贸易公司在母公司控制下从其联属公司低价购进货物或从非联属公司平价购进货物，然后高价转售给另一家联属公司，从而完成利润向避税地贸易公司的转移。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交易对象完全可以不必经过贸易公司所在地而直接到买者手中，贸易公司所要做的只是入帐和开具发票。由于实行高税管辖权的国家

可能对贸易公司不从事买卖性经营活动进行干预，所以，贸易公司往往尽力避免与高税国母公司联系过密；特别是避免成为高税国母公司的常设机构；同时，贸易公司还往往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一些实质性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从事租赁业务，一举两得，既是实质性经营活动，又是一种日益流行的国际避税的新手段。

不仅一些设有税收协定的避税地易于成为贸易公司理想的立脚点（如巴哈马，百慕大、巴拿马等），而且不断发展的自由贸易区因其对货物的进口、加工、装配、再包装等免除关税和减免所得税等措施而也为贸易公司展开活动提供了便利。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 贸易条件又叫进出口商品比价，它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之间的对比关系，这种关系是用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对比来反映。如用公式表示；则为：

$$T\cdot O\cdot T=\frac{P_x^t}{P_x^0}\Big/\frac{P_m^t}{P_m^0}$$ 其中：

T·O·T 代表贸易条件，P_x^0、P_x^t 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的出口商品价格水平，P_x^0、P_x^t 分别代表基期和（报告）期的进口商品价格水平，P_x^t/P_x^0、P_m^t/P_m^0 分别代表出、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

如果贸易条件大于 1、意味着自从基期以来，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幅度或者出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低于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幅度或者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而进口商品价格下跌了。总之，贸易条件大于 1 说明对进口价格来说，出口价格相对地上升了，这意味着出口相同数量的商品能够换回比以前更多的进口商品，这表示贸易条件改善了，对本国很有利。相反，如果贸易条件小于 1，说明对进口价格来说，出口价格相对地下跌了，这意味着出口相同数量的商品换回的进口商品比以前减少了，或者说要换回同样多的进口商品需要出口更多的商品，这表示贸易条件恶化了，对本国不利。如果贸易条件等于 1，说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发生了同幅度、同方向的变化，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出口相同数量的商品换回的进口商品与原先一样多，因此，贸易条件没有发生变化。

以当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同的国家它们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大不一样，而不同的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又有很大的差异，这就使得各国的贸易条件各不相同。具体地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为主，由于初级产品价格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制成品价格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相反，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则不断得到改善。这生动地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不仅长期存在，而且有日益扩大的迹象，不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无从谈起。

贸易条约（Commercial Treatics） 贸易条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贸易条约是指不同的国家为确定相互间在经济贸易关系上的权利和义务而缔结的各种书面协议。它包括贸易协定、支付协定、贸易议定书以及狭义的贸易条约等等。它们的名称虽然不同，内容也都有差别，但它们都是各方经过正式的协商和谈判，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缔结的，因此对缔约各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狭义的贸易条约是指以“条约”两字为名称的关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书面协议，它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政治首脑派出全权代表，以国家或政府首脑的名义签订的。贸易条约需要按照缔约国的法律程序完成批准手续并互换批准书之后方可生效。贸易条约一般都规定有效期，且有效期比较长。期满后如不延长有效期或续签新约、该条约就告失效。贸易条约按照参加国的多少，可以分为双边贸易条约和多边贸易条约。两国之间通过协商和谈判签订的贸易条约就是双边贸易条约。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经过协商和谈判签订的贸易条约则称多边贸易条约。贸易条约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经常涉及缔约国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关税的征收、海关手续、船舶航行、双方公民和企业在对方国家所享受的待遇、工业产权的保护、进口商品应征收的国内税、进出口商品运输以及转口问题，等等。缔结贸易条约反映了缔约国要更好发展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愿望，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贸易条约的签订对于促进和推动缔约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将起直接的推动作用。从表面上看，贸易条约的缔约各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它们之间政治经济实力的不同，不同的缔约国从它们所签订的贸易条约中得到的好处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是国际贸易领域不平等的一种反映，它对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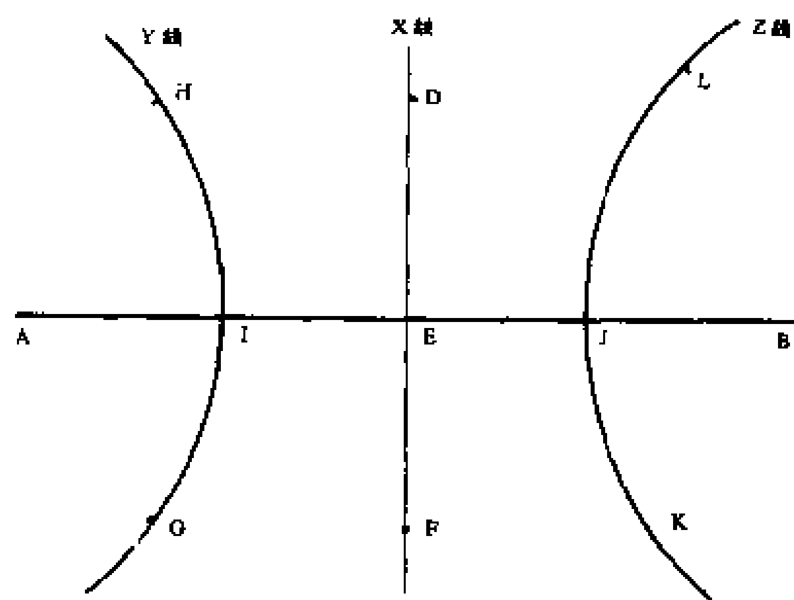
贸易壁垒（Trade Barrier） 贸易壁垒是保护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国采取的限制进口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总称。也就是说，贸易壁垒的目标是“限入”。贸易壁垒由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部分组成。长期以来，贸易壁垒的主要内容一直是关税壁垒、但是两次大战以来，它的重心已逐渐转向了非关税壁垒。

贸易收支（Trade Account） 又称"有形贸易收支"。商品进出口收支。出口记在贷方，为贷方项目；进口记在借方，为借方项目。该收支不仅是经常项目而且也是整个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重要的项目。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商品的进出口都应以离岸价格计算。许多国家，出口商品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商品按到岸价格计算，其中包含保险费、运费，因此按基金组织的规定，应将进口总值中的运费、保险费剔除，记人劳务收支。

贸易差额说 一种最早国际贸易学说。它是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由晚期重商主义者在17世纪提出。货币差额说反对早期重商主义者单纯把金银货币禁锢在国内的狭隘做法，认为对外贸易活动不应强调少买或不买，关键在要着力于多卖，因为只要出口大于进口，金银货币总会流进本国，国家增加财富的目的便可实现。为此，它主张采取一系列旨在推动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除了扶植工场手工业等，还应允许大量进口原料以及半制成品来扩大出口品生产，允许金银出口以发展转运贸易。总之，一切为了最终能够获取对外贸易顺差，促使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应该看到，贸易差额说的思想和政策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单纯强调贸易顺差的做法是片面的，也同现代国际贸易活动的准则和趋势相背离。

贸易补贴（Trade Subsides） 贸易补贴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保护民族工业的一种手段。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把贸易补贴视为减轻失业的一种手段。补贴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贸易的直接补贴是负税。间接补贴包括多种，如免税、信贷优惠、低价或免费使用基础设施等。补贴数量可能与贸易数量有关，也可能足与贸易额有关。补贴的政策的制定基于很多种考虑，例如稳定经济、平抑价格等。对贸易补贴的经济分析主要集中于直接补贴。很多的分析都是基于假定的简化的情况、如仅有两个生产者、有两种贸易货品、提出的结论有以下三种：（1）出口补贴的从价比率与进口补贴的从价比率对世界和本国经济的影响是相同的；（2）进口或出口补贴通常使国际贸易条件不利于实际该政策的国家；（3）进口或出口补贴通常在国内价格的作用是不利被补贴的产口，所以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是不利于在某一受补贴行业中受补贴程度高的生产者。近年来，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与此相关的政策问题上。经济学家用数量模型去研究税率以及补贴对经济的影响，并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小的国家由于从量税的降低或者贸易补贴的实行，使得该国经济得到益处。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些贸易补贴量或关税降低量最大的国家将比该量较小的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贸易区世界区位理论 The Theorg of Location of Traele Arca Boundaries 美国经济学家费兰克·费特尔（Frank · A · Fetter）提出的一种区位理论。其代表作是1924年发表的《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一文，在这里他主要研究了商业区位的决定问题。费特尔首先假定有A和B两个贸易中心，工厂设在该地，产品由该地销往别处。其中A和B是一种竞争关系。对这种区位选择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讨论。1、假定A和B两处的生产成本是相同的，运输费用也是一样，并且运输成本按距离的远近同比例增加。那么以A为中心的贸易区和以B为中心的贸易区之间将有一条直线（X）作为分界线。这条分界线（X）上的D、E、F点与A之间的运输成本等于它们与B之间的运输成本。∠AED和∠BED都是直角（见图）。



在这里，X线上各点与A、B之间等距离，可以看出，两个贸易区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2、假定A和B两处通往外地的单位距离的单位运输成本是一样的，并且运输成本按距离的远近而呈同比增加。假定A和B两处生产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不一样，A处的生产成本较高。那么这时的分界线就不是X而是Y。Y将表现为一条曲线，它靠近A，并向A点弯曲。这时，由A运往Y线上的各点（H · I · G）的单位产品的总成本（生产成本加运输成本）与由B运往Y线上的相应各点（H · I · G）的总成本相等。这是因为A处的生产成本比B处高，所以要使单位产品总成本相等，H · I · G同A的距离就要比相应各点同B的距离近一点。从A处往外销货，只要越出了Y线，其总成本就会高于从B处外销的产品，其竞争力就较差。3、假定A和B两处的生产成本一样，但运输成本不一样。假定B处向外运输的

成本比由A处向外运输的成本高，那么分界线既不是X，也不是Y，而是Z，Z将表现为一条曲线，它靠近B，并向B弯曲。这时，由A运往Z线上的各点（L·J·K）的单位产品的总成本（生产成本加运输成本）与由B运往Z线上相应各点（L·J·K）的总成本相等。这时因为B处的运输成本比A处高，所以要使单位产品总成本相等，L，J，K距离B要近一点。由B处往外销货，如果越出了Z线，其总成本就会大于从A处往外销货的总成本。费特尔的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城市区位问题，因为既可以把A，B两点视为同行业的两个工厂的所在地或同行业的两个工业中心，又可以把A，B两点视为与工业生产无关的两个消费中心或两个纯粹商品集散中心、农产品集市点、零售公司所在地。因此，费特尔的理论对以后的城市经济等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贸易条件恶化论（Theory of Terms of Trade Worsen） 分析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原因及后果的一种理论。1950年普雷维什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心-外围学说，并集中论述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问题。同年5月经济学家辛格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投资国和借贷国之间的收益分配》一文，提出了与普雷维什大致相同的理论。因而，贸易条件恶化论也被合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贸易条件的概念，如不另作限定，一般是指商品贸易条件，即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p_x/p_m）。比值大于1，出口国贸易条件改善；比值小于1，贸易条件恶化。普雷维什和辛格在具体地考察、分析了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制造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情况和长期数据的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是一种历史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其原因可以从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状况、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以及生产的垄断性等方面进行分析。贸易条件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状况决定的。由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初级产品产业的技术进步，制造品价格的下降速度本应快于初级产品价格下降速度。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不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却表现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垄断企业吸收了生产率提高而得来的利益，增加了工资和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缺少组织，企业的垄断性较低，工人之间的竞争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使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化为价格的下降。所以，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率提高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都是价格的下降。另方面，发展中国家如果从发达国家引进新技术，自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增加其要素投入的收入。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人口压力大，劳动力过剩，会使要素收入的提高慢于生产率的提高，这样，技术进步的利益就会被人口所抵销。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工资率、产品价格都低于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可避免。贸易条件还与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有关。根据恩格尔定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随着一国收入的增长，总收入中分配给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部分将下降，分配给工业品生产部门的部分将上升。由于各国对工业品的需求相对较大，因而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这样，资源就不能顺利地从初级产品部门转到工业品生产部门。如按既定资源进行生产，就会出现初级产品的供给过剩，从而价格下跌；工业品的需求过度，从而价格上升的局面。再有，初级产品的生产是竞争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引起价格下降，而工业品的生产相对来说是垄断性的，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起价格上升。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不利，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这一理论指出，贸易条件恶化，使大量的经济剩余流向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更多的资源配置于满足国内消费的工业生产方面，来扩大本国的现代化工业，而把较少的资源用于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具体主张一方面实行进口替代政策，限制工业品的进口，设法在本国建厂制造；另方面面向出口，要求发达国家减少贸易壁垒。此外，50年代末，普雷维什还提出创立拉美的共同市场，统一投资来促进拉美各国工业化的主张。以后，他的政策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但始终与改善拉美各国的贸易条件紧密相关。

贸易限制（Restraint of Trade） 在两个或更多人或企业之间的具有妨害自由竞争影响的任何协议、共谋或行动。限制贸易的共谋协议可以是水平式的（由处于生产的相同阶段的企业作出）或者是垂直式的（由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的企业作出）。常见的水平式的贸易限制的例子有：卖主们将价格或产量固定在某一水平上的协议、追随最大企业在价格上的领导的协议，和瓜分市场的协议等。独占性供应或采购的协议是垂直式贸易限制的几种形式。贸易限制可以通过有关企业的公开明确的协议而显现出来，如在规定价格方面往往有这种情形；它也可以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非书面的协议的结果，如在价格领导方面可能有这种情况。在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最先禁止在竞争者之间达成的限制或取消相互竞争的共谋协议。谢尔曼法适用于每一个限制贸易的合同或组

合，不论它如何不重要。这一条款被美国最高法院在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的案件中所提出的"合理原则"所修正，这些裁决认为，只有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才算违反谢尔曼法。然而，法院并没有提供确定不合理限制的具体标准，因而从此以后决定合理或不合理限制的界线就成了法院的事。通常法院把所有限制竞争的协议都视为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即使它可能带来有益的结果。

统一托收规则（Uniform Rules for Collection） 统一托收规则是国际商会为了统一各国在开展托收业务中所采用的不同规则和做法而于 1978 年制定的，它是国际商会的第 322 号出版物。统一托收规则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该规则包括总则和定义、义务和责任、提示、付款、承兑、期票、收据和其他类似的支付凭证拒绝证书、需要时的代理和货物的保护、托收结果的通知及其他、利息、手续费和费用等 10 部分共 23 条。虽然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它为各国开展托收业务提供了一个统一明了的样板，因此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在国际托收业务开展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利于国际托收业务的不断发展。

柯尔贝尔，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Colber 1619—1683） 法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1661 年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后，推行了一系列重商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故 17 世纪下半期的法国重商主义又称柯尔贝尔主义。同其他晚期重商主义者一样，他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财富。他还强调流通在欧洲货币的总额是一定的，只有减少邻国的白银，法国才能相应增加财富。其推行的经济财政政策大致与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的理论主张相同，如实行保护关税、创办海外贸易公司、发展航运业和海军舰队、推行殖民扩张等。柯尔贝尔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大力鼓励和扶植工场手工业发展，旨在为扩大出口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他利用国家财力创办许多皇家工场手工业，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如发放大量补助金和贷款、给予产销特惠权、减免租税、拨给土地等）和颁布各种法令规章（如禁止劳动者流往国外、吸引外国熟练工匠移居法国、赠予工场主贵族称号等）来刺激私人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样，法国工业出口产量激增，带来了一时的繁荣景象。但是，柯尔贝尔虽则对农业也采取过一些奖励措施，但所下的力量并不大。相反，由于片面促进工商业发展和争夺国际市场，他却又采取了不少严重损害法国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导致农业凋敝衰落，最终使得法国的财政经济状况陷入严重危机。于是，在路易十四死后，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便完全崩溃。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即重农学派就是在彻底批判柯尔贝尔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 见柯尔贝尔条。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函数，它在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与应用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1928 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柯布（Charles W · Cobb）和数学家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合作，根据历史统计资料，研究 1899 年到 1922 年的美国制造行业中，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对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指数型函数 $Q=AL^{\alpha}K^{1-\alpha}$ 比其它数学函数更适合于描述生产过程。它反映了产出物与各种投入物之间的一种实物关系。

柯布—首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是：

$$Q=AL^{\alpha}K^{\beta}$$

其中，Q 代表产量，L 为劳动投入量，K 代表资本投入量，A 代表一定的技术水平，α、β 为正的参数。这一公式表明，在总产量中，工资的相对份额是 α，资本收益的相对份额是 β。柯布—首格拉斯生产函数还具有以下性质：(1) 如果一种投入为零，产出也为零。(2) α 和 β 分别是产出对于劳动和资本的偏弹性。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产出对于劳动 L 的偏弹性 α 代表在资本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投入变化 1%时产出变化的百分比；产出对于资本的偏弹性 β 则代表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投本投入变化 1%时产出变化的百分比。(3) 柯布—首格拉斯生产函数 $Q=AL^{\alpha}K^{\beta}$ 的规模报酬取决于 $\alpha+\beta$ 的值。分别将原投入量 L、K 扩大 λ 倍并代入生产函数得

$$A(\lambda L)^{\alpha}\cdot(\lambda K)^{\beta}=A\lambda^{\alpha}L^{\alpha}\cdot\lambda^{\beta}K^{\beta}=\lambda^{\alpha+\beta}(AL^{\alpha}\cdot K^{\beta})=\lambda^{\alpha+\beta}Q$$

因此，当 $\alpha+\beta=1$ 时，$\lambda^{\alpha+\beta}=\lambda$，则规模收益不变；当 $\alpha+\beta<1$ 时，$\lambda^{\alpha+\beta}<\lambda$，则规模收益递减；当 $\alpha+\beta>1$ 时，$\lambda^{\alpha+\beta}>\lambda$，则规模收益递增。(4)与柯布—首格拉斯生产函数相联系的等产量曲线显示出人们熟悉的凸向原点的形状并且是条光滑的曲线。(5)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为 1。

柯布—首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应用非常广泛，既可应用于小范围，如一个工厂或一个部门生产预测，也可应用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简单描述。其估计方法如下：取函数两边对数并化为

$$\log Q=\log A+\alpha\log L+\beta \mathrm{Log} K$$

这样，如果有若干组的产量、劳动投入量（可以工资总额代替）、资本投入量（一般以资本存量代替）等数据，就可用最小二乘法估计 α、β、$\log A$，并进一

步算出 A，即可得出某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

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实际应用中，经济学者常用它的变换形式来分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的关系。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时间 t 求导，并加以整理，得到

$$Q=a+\alpha l+\beta k$$

其中 $Q=\frac{\frac{dq}{dt}}{Q}$，$\alpha=\frac{\frac{dA}{dt}}{A}$，$l=\frac{\frac{dl}{dt}}{L}$，

$$k=\frac{\frac{dK}{dE}}{K}.$$

此式的意思为，在知道资本、劳动产出偏弹性 β、α 和劳动、资本投入增长率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后，即可求得技术进步增长率，或知道其中 q、l、k 一组样本，即可用最小二乘法求得 a、α、β。还可利用上式计算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frac{a}{q}$，劳动投入增长率的贡献份额是$\frac{\alpha l}{q}$，资本投入增长率的贡献份额是$\frac{\beta k}{q}$。

道格拉斯在研究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制造业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后，发现各种估计结果的 α+β 值都很靠近 1，因而他认为生产过程体现了规模收益基本不变的特点。但是对不同国家来说，劳动的产出弹性 α 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β 都存在着较大差别，这表明，α 和 β 的值取决于各个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不同的生产部门，α 和 β 值也有差别。因此在利用生产函数研究具体问题时必须考虑这一点。

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而言，它是游离于资本、劳动量之外单独存在；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始终和资本诸如设备等、劳动力本身的素质联系在一起。另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只包括了劳动力和资本两个投入，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其它投入也是同样重要，而且该函数假定市场完全竞争也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由于该函数具有若干使研究人员感到方便的特点，并且可用它估计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而其魅力犹在。

俄林，贝蒂尔·戈特哈德（Bertil Gottard Ohlin，1899—1979） 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早年就读于隆德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后又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1925 年任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教授，1930 年转任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教授，到 1965 年止。其间，他当选国会议员、担任过政府部长，甚至长期领导瑞典自由党。其代表作为《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1933 年）。在经济学史上，俄林作出了两方面的理论贡献，即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稳定政策理论，但前者是他的主要研究论题，且影响要深广得多。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在阐述发挥其老师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史称赫克歇尔—俄林学说。该学说认为，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价格存在差异，而这种相对价格不同是由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所决定的。一般而言，生产要素的价格会受其供求双方的影响，但要素的供给是主要的。这样，一国生产要素价格的高低是由其生产要素禀赋即供给状况的不同所决定的。这个理论称为生产要素禀赋说，它弥补了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不足之处，从而成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俄林又进一步提出，由于各国都出口从本国优裕的要素为密集型的产品和进口从本国稀缺的要素为密集型的产品商品的流动实际上代替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会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出现均等化的趋势。这个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学说实际上在颂扬自由贸易能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俄林还在"凯恩斯革命"之前就采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的基本模式，以阐发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他正是因为作出了上述理论成就而荣获 1977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奖。

俄林的区位理论（Ohlin's Theory of The Location） 伯尔蒂尔·俄林（Bertil Ohlin）是瑞典的经济学家。他在区位理论史上首次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研究区域分工，其研究不象以往人们所关心的单个工厂的厂址选择问题，而是一般工业区位的决定，以及一种工业的布局将如何受到其他工业的布局的影响问题。其区位理论的代表作是《贸易理论》（1924 年）和《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 年）。俄林认为区位理论首先是贸易理论，并且贸易理论必然以区位理论为基础。从一国范围来看，国内各个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有差别，这导致各个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因此，国内贸易理论就是国内的区位理论；从国际范围来看，可以把国家看成特殊的地区，各国的生产要素价格有差别，这导致各国之间进行贸易，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就是国际区位理论。这也就是说，区际比较成本或比较利益，既导致区际贸易的展开，又决定国内工业区位的形成；国际比较或比较利益，既导致国际贸易的开展，又决定国际范围内工业区位的形成。具体来说，俄林的区位理论包含着如下两个组成部分：首先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情况下工业区位的决定。在这里，俄林基本接受了韦伯关于商品

的运输状况，以及关于原料产地与市场远近距离的论点，也就是承认商品的区际流动或区域内流动情况要取决于运输成本。但他又进一步指出由于消费者既是生产者，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因而在原料产地、工业区位、销售市场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原料产地与工业区位是互为因果的，销售市场和工业区位是互为影响的。在运输成本对工业区位的作用方面，俄林又指出运输便利程度的差异对工业区位也存在着影响，这就补充或修正了韦伯关于"等距离收同一运费率"的假定。其次是假定资本和劳动力不可能自由流动情况下工业区位的决定。这是俄林区位理论富有特色的内容。他运用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考察一般工业区位以及各个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在俄林看来，利息率和工资水平的区域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工业区位确定的前提，又是工业区位确定的结果。利息率的地区差异、工资水平的地区差异是与资本和劳动力在各个地区的配置状况不同，以及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相联系的，要使得这种差异的配置状况发生变化，应依赖以下这些因素的作用：1.人口增长率；2.储蓄率；3.各地区的价格比率。因此，工业区位的移动应被看成是生产要素在各个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的结果、均衡关系变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区位理论实际就成为一种价格理论。除此之外，俄林还在他的区位理论中加人了历史因素的分析。由于工业区位的决定与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或重新配置有关，而资本和劳动的配置又同已形成的资本和劳动配置的历史格局有关。

重置政策（Replacement Policy）　重置是指随着技术进步，人们的观念，兴趣爱好的变化而导致的资产的更新。这个资产既包括物质方面的资本，也包括人力方面的资本。重置政策就是关于资产重置的政策，相应地，它也包括物质资本的重置政策与人力资本的重置政策。重置是产业革命的趋动力，它始终是现代经济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家厂商与一个产业的兴亡，一个工作机会在新兴企业中的产业或在衰退企业或破产企业中的消失，诸如此类的重置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它是保证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效率的关键。因而重置政策在工业化国家普遍大受重视。残旧资本的重置，随机损坏资本的重置，重置的方法，一项资本的重置时间等都是重置政策的重要内容。重置政策既有可能来自微观方面，如企业的资产更新政策，也有可能来自宏观方面，如有关折旧率的法律。目前重置政策更多的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包含在诸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分配政策，就业政策等里面。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一种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流行于16和17世纪的一部分欧洲国家。按重商主义的说法，金银货币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和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唯一标准，而对外贸易是获取财富和国家致富的主要源泉，因此，国家应当积极干预经济，严格管制对外贸易。重商主义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又称重金主义，晚期重商主义又叫重工主义，以托马斯·孟为主要代表。前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或不买，并严禁金银出口，同时鼓励商品多出口。后者则着力于在对外贸易中多卖，主张积极发展本国工商业，鼓励进口那些用于生产出口品的国外原料，旨在通过大量扩大商品出口来赚取国外的金银，同时用高关税限制和禁止国外消费品进口。因而，晚期重商主义一般又称为"贸易差额论"，早期重商主义则相应地叫做"货币差额论"。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理论上只考察了流通领域。于是，随着工业资本的迅速发展，它在17世纪中叶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其逐步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重农学派（Physiocrats）　18世纪中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者所形成的一个学派，因崇尚"重农主义"而得名。它是经济学史上的第一个学派，曾对法国产生重大影响。18世纪初，布阿吉尔贝尔、达让逊、沃邦等人都积极提倡重视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经济思想，成为重农主义的先驱。后来，弗·魁奈及其追随者逐渐形成较完整的经济理论和纲领，并大加宣扬，遂建立以他为领袖的学派，其他代表人物有老米拉波、里维埃尔和杜邦·奈穆尔等。其后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杜尔阁。

自然秩序思想是该学派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它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自然秩序"即合乎理性的秩序，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在于阐明"自然规律"，使得"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这样明确承认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内在的客观规律性，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功绩。重农主义者还由此引伸出"自由放任"原则，认为实现"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是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把农业看作唯一的生产部门，认为农产品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是重农学派的又一特点。这样它就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从而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这种"重农"观点出发，它又最早对社会阶级结构作了经济分析，并天才地探讨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纲领实际上维护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但其外观却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如重农学者多数具有贵族头衔，政治上拥护君主

制等，甚至他们本人都未认识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伟大功绩在于，它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探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并基本建立起一个较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它所鼓吹的经济自由思想在历史上也起过促进作用。但是，它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理解和论述，毕竟未能提供一个科学而完整的答案。

重迭需求理论（Theory of Overlapping Demand） 重迭需求理论于1961年由瑞典经济学家斯蒂芬·林德（Staffan Linder）提出，林德首次将赫—欧贸易模型中引入了需求因素，从需求的角度解释了当代国际贸易形态，说明了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占世界总贸易量绝大部分的原因，发展了赫克歇尔—欧林国际贸易理论。

依照赫—欧要素禀赋理论，由于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状况不同，同时，生产不同商品所需要的要素比例不同，从而，各国生产不同商品必然会产生比较成本差异，这一差异就构成贸易产生的基础和原因。进而，要素禀赋状况差别越大的国家，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贸易量也越大。因此，国际贸易应当主要产生于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属于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贸易，这是因为工业化国家所拥有的要素主要是资本和技术，而非工业化国家所拥有的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但是，实际情况正好与其相反，国际贸易量中的绝大部分是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国际贸易总量中的一小部分。林德认为造成理论与实际不符的原因之一就是赫—欧贸易理论中忽视了国际贸易中需求因素所起的作用，却假定了消费偏好在不同国家之间是具有同一性，从而不同国家的相对生产价格不受需求因素的影响，而仅源于生产成本的差别，供给因素成为国际贸易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也就无法解释要素禀赋状况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为何进行如此庞大的国际贸易。

林德在其重叠需求理论中的论点主要有：

1.初级产品的贸易形态主要由各国要素禀赋状况决定，赫—欧贸易理论是关于初级产品贸易形态的理论，而不适于工业制成品贸易；工业制成品贸易形态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各国的需求结构。

2.一国的需求结构是此国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函数，平均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一个国家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状况主要取决于此国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倾向于高质量产品，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消费者偏好品质较低的产品。

3.企业生产的目的最先是满足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上的旺盛需求是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的原动力，一种新产品是否有旺盛的需求，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反复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交流信息，如果企业生产的目的最先是为满足国外市场，那么，信息交流的成本过高将使得产品不具相对优势，商品出口则无利可图。

4.商品出口是本国市场延伸的结果，只有在本国市场上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已经饱和、市场过于狭小、利润减少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目标才会转向发展商品出口，满足国外市场需求。

5.由于市场的需求结构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则收入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结构也是相似的，一种商品在一国国内市场上有旺盛的需求，则在与其人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也会有较为旺盛的需求，从而，形成重叠的需求，因此，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主要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进行，进行贸易的商品也往往是经过各种变化后的同一种商品。

由于当今贸易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主要集中于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这些国家都有着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绝大部分的工业制成品贸易集中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而且经常出现一个发达国家既大量生产某种商品，同时又大量进口此种商品的情况。

重叠需求理论从商品的需求角度，进而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阐明了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形态，从理论上解释了工业制成品贸易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这一实际现象。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出生于雅典贵族家庭，年轻时师从苏格拉底。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刑后，他出走国外游历各地，继续反对雅典民主政治。公元前388年回到雅典，创办学园，从事讲学。他的著作颇多，其经济思想主要见于《理想国》和《法律篇》。

在《理想国》一书里，柏拉图第一个提出理想社会的方案，力图缓和当时奴隶与奴隶主、穷人与富人间的尖锐斗争，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他用所谓“正义原则”来论证国家组织问题，实际上阐明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认为，个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才能却是有限的，所以人们必须分工和互助。这是产生国家的唯一原因。从使用价值方面看，社会分工还可使人们专心于某个行业，从而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至于每人适于担任何种行业的职务，则由先天的秉性所决定。这样，奴隶主贵族充当脑力劳动者和统治者，平民和奴隶只能当体力劳动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天经地义的。

他描绘了理想国家的组织和构造，认为按照分工原则由三个阶层所组成。第一个阶层包括有理性和知识的哲学家们，他们是治理国家的执政者。第二个阶层是充当保卫者的武士们，专门进行作战和护卫国土。最低的阶层则由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所构成，他们必须服从统治者、并负责生产和供应整个国家的生活资料。而奴隶作为会讲话的工具，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没有列入社会阶层的资格。柏拉图特别强调，哲学家和战士两个阶层都应消灭私有财产和家庭，实行共产共妻共子，以免引发他们的利己和贪婪之心，从而可以消除社会争端、确保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柏拉图所谓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试图用消灭奴隶主阶级之间的财产私有制来消除内部的矛盾冲突，它仍然是以剥削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这是一种消费性的、倒退反动的"财产共有"，同科学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柏拉图还十分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它应该成为"理想国"的经济基础，充当社会收入的主要源泉。从社会分工的原则出发，他认为商人阶级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不过他又十分鄙视商业，抨击商人唯利是图，不赞成雅典人从事这种不体面的行业，他还特别反对高利贷，主张禁止放款取息和抵押放债。这是因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对奴隶制自然经济起着破坏作用。此外，他已看到货币可以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但反对货币可以作为贮藏手段。柏拉图的经济学说完全是为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效劳而建立的。

施托尔茨曼，鲁道夫（Rudolf Stolimann，1852—1930） 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把新历史学派注重精神力量的做法进一步极端化，认为无论在经济理论抑或经济政策的各种问题上，始终应将社会伦理观念放在决定经济的首位，并把它同所谓的"自然范畴"密切相结合。他声称，工人和资本家都执行由高级社会伦理原则所决定的社会职能，所以，一部分产品应归功于资本家的活动，而劳资的对抗只是具有不同才能的执行者与组织者之间的矛盾。他把劳动看成是一种受道德因素调节的自然范畴，反映出他企图尽量把社会伦理观念与表述因果关系的"自然"理论相融合，因此，他具有强烈社会学化倾向的经济分析，居然充满边际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的应用，从而显露出一种当时德国学者少有的折衷主义特征。

施穆勒，古斯塔夫（Gustar Schmoller，1838—1917） 德国经济学家，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一公务员家庭，1860年毕业于图宾根大学。一度曾在符腾堡担任公职，后决心终生从事学问研究。1864年进哈莱大学任教，1872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82年又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直至1912年退休。他还曾被任命为普鲁士枢密院顾问和上院议员，1907年受封为贵族。他的主要代表作是《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1900年、1904年）。

施穆勒作为不同于旧历史学派的德国新学派领袖，首先在方法论上有其自己的特点。他比克尼斯更彻底地否认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规律性，认为国民经济的构成既包括自然的技术的因素，还有精神的道德的因素，它们在不断变动且相互发生错综复杂的作用，因此不可能从中找出一个最终的统一的经济规律。其实，人们所认识的"经验规律"不过是经常重演的经济现象和史实，这些规律是依靠收集资料并加以分类归纳而得出的。在这里，充分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学方法至关重要。于是施穆勒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的统计方法"，以取代旧历史学派的"历史的生理方法"。尽管他一般并不反对演绎法，但方法论的上述特点实际上否定了理论经济学的存在。

就理论内容而言，施穆勒的学说把精神因素放在优先于物质生产的首要地位，强调心理、伦理道德和法律等因素对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他声称，应该从一切成熟的心理学命题出发去归纳地找出自己所需的有关国民经济学的结论。他主张，经济问题必须联系伦理道德加以说明，如工资问题同工人性格的稳定程度即道德水平密切相关，而劳资的对立则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之间的隔阂。于是他把生产、劳动、工资等经济范畴看作既是自然技术的又是伦理心理的范畴，却抹煞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

因此，施穆勒公开反对科学社会主义，鼓吹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并在1873年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完全站在德国容克地主和资本家一边，直接反对工人运动。由于施穆勒等人利用教授地位和大学讲坛来宣扬他们自诩的"特种社会主义"，故又有"讲坛社会主义"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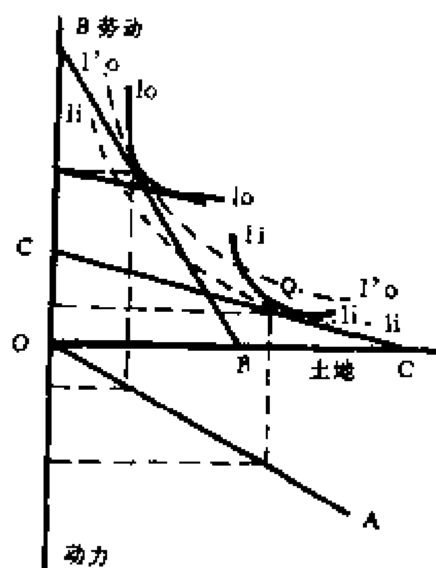
施穆勒还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他以社会集团为标准，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1、种族或马克公社经济，2、村落经济，3、庄园经济，4、都市经济，5、领域经济，6、国民经济。但他并未能说明这些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亦没有揭示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客观依据。施穆勒的这个理论主要是为政策目的服务的。

施穆勒学说的庸俗性质和反动实质十分明显。当时，德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国内劳动阶级所受的压迫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已广为传播，他的学说起了大力维护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的作用。这正是其学说在当时的德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原

因。然而，施穆勒企图依据“历史的统计方法”来构筑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却同时严重损害着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既使得德国经济理论在半个世纪里几成空白，又导致20世纪德国学术界极端排斥经济史，同时更给德国经济发展造成重重障碍。因此，有些人认为施穆勒对德国社会科学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实在是一件相当不幸的事。

诱导的技术变革理论（Theory Of Induced Technical And Institrtional innovation）　关于资源配置的模式的一种理论。全称为“诱导的技术与体制变革理论”，是由日本农业经济学家速水佑次朗和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拉坦于本世纪70年代共同提出的，曾在农业发展经济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科学研究和投资先于导致技术进步的科学发现，而科学研究和投资是由市场力引导的。他们认为，在农业中，要素供给的相对稀缺，导致要素价格变化；要素价格的变化吸引着研究资源的投入；最终导致技术进步的变化。从而促进相对不太稀缺的比较廉价的资源替代更稀缺、更昂贵的资源，改变资源特别是土地与劳动的相对稀缺性。例如，在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中，劳动价格相对昂贵将会引起机器代替劳动的技术变革趋势出现。在土地稀缺的经济中，土地价格相对昂贵会引诱用更多劳动、化肥、良种等投入代替土地的技术变革倾向的发生。诱导的技术变革模式需用图来说明。

下图表示机械技术发展过程。I_0^*代表零期的变革可能性曲线，它是一系列较无弹性的单位等产量曲线的包络线，每条曲线对应着一种机械技术，越是往右的曲线机械化程度越高。假设零期的土地—劳动价格比率由BB线表示。于是，一种机械技术被发明出来，由图中的单位等产量曲线I_0表示。I_0与BB相切于P点，在这一点上，生产——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和土地以及非人力动力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即成本最小。土地和动力之间有互补关系，如图中下半部的OA线所示。与劳动和土地最优配置相一致的动力投入由横轴和OA线的垂直距离来表示。这样，当劳动价格相对于土地和动力价格提高时，土地和动力一起被假定代替劳动。在图中，I_1^*代表第1期的变革可能性曲线。它位于零期变革可能性曲线I_0^*下方，意味着第1期与零期相比，农业生产率提高了，生产一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源减少了。假设农业发展从零期进行到第1期，劳动相对于土地变革更稀缺了，这可能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的速度大于人口增长率。结果、地租相对于工资率下降了，还假设动力价格相对于劳动工资率下降了，这可能是由于工业的发展使动力源的供给更加丰富和便宜。于是土地一劳动价格比率从BB下降到CC、导致一种新的机械技术的发现和应用。这一新技术用单位等产量曲线I_1来表示。它与CC相切于Q点，决定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与零期相比，生产一单位产出的劳动减少了，土地和动力增加了。这是劳动稀缺诱导的技术变化的结果。技术变革与体制改革是互补的。在速水佑次郎和拉坦模式中，体制变革也相当重要。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诱导的技术变革受体制的阻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缺乏适当的农业研究机构来促进技术变革的发生。因此，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来冲破这个瓶颈。他们认为，组织和资助科学研究的主要责任必须由政府承担。诱导的技术变革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它的行为假设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都想使自己利润最大化，认为他们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具有严格的市场倾向，具有要素替代率与要素价格比例的全部信息，从而遭到结构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实际上，由于文化的、社会的原因及经济的不确定性、反风险性、缺乏知识等，自给农业技术变革的障碍在短期内难以克服，因此，这一理论不适合那些农业落后的地方。美国经济学家贝克福指出，这个模式是在传统厂商理论的一般框架里建立起来的资源配置模式。而当今的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是极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要素供给人为的刚性和资源使用形式的不灵活性。再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外部的影响，破坏了要素秉赋和要素价格之间以及要素价格与技术变化之间的纯粹的联系。实际上，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



十 画

浮动利率抵押贷款（Floating Rate Mortgage） 一种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名义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长期贷款（例如，期限为25—30年的住房抵押贷款）要受到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当名义利率不变时，实际利率会下降，从而发生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的影响，使长期抵押贷款减少，不利于经济。因此，就必须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这种贷款的利率。具体作法是，定期地（例如，每三年一次）按现行的短期利率来调整长期抵押贷款的名义利率，以保持实际利率不变。因为短期利率一般较准确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情况。这种作法在实际中较为广泛。

浮动汇率（Floating Exchange Rate） 一国对本国货币不再规定法定平价，不再规定汇率波动的上下限，中央银行亦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义务时的汇率。浮动汇率有很长的历史。早在金本位制时期，一些殖民地、附属国，特别是其中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货币汇率长期不稳定，实际上是最早的浮动汇率。1919年至1926年法国曾实行过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英国美国在30年代也曾试行过浮动汇率。二次大战后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在某些时期都实行浮动汇率。70年代后世界主要国家均实行浮动汇率。浮动汇率以政府是否干预可以区分为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按浮动方式可以分为：单独浮动、钉住单一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联合浮动。

浮动利率债券（Floating Rate Notes） 是一种中长期债券，利率通常同短期银行同业折放利率（Libor）相联系，以浮动利率付息。70年代初，欧洲货币的浮动利率债券虽已出现，但是直到银行在流动资金管理上使用浮动利率债券，作为增加资本的手段时，这种融资工具的交易数量才有幅度较大的上升。同时，浮动利率债券品种也有增加，出现了"固定上限浮动债券"（Copped Floating Rate Notes）、"固定上下限浮动利率债券"（Mini / Max Floating Rate Notes）、"错搭浮动利率债券"（Mismatch Floating Rate Notes、即计算和付款不一致的债券）、"部分付款浮动利率债券"（Partly paid Floating Rate Notes）。浮动利率债券能满足借贷双方的某些要求，能够改变借贷双方在利率变动上的风险组合。发行浮动利率债券的借款者，必须承担较多的利率成本，但可以获得比通常典型的固定利率债券期限更长的资金。对于投资者而言，浮动利率债券的最大吸引力，在于这种融资方式比其他贷款有更大的机动性。

逐步调整假说（Gradual Adjustment Hypothesis） 又称"资本存量调整原理"（Capital Stock Adjustment Principle），说明了厂商调整其资本存量的速度，即投资率的决定。当厂商合意的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不一致时，就要进行调整，即进行投资，以使实际资本存量达到合意的水平。但厂商并不是进行一次性调整，使这两者一致，而是在一段时期内逐渐进行调整，逐步缩小它们之间的差额。厂商在每一时期中所进行的投资是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之间差额的一个比例。设这一比例为 λ，合意资本存量为 K^* 现有实际资本存量为 K，投资为 I，则逐步调整假说的公式为：

$$I=\lambda(K^*-K)$$

由上式可以看出，投资率取决于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之间的差额，以及厂商把实际资本存量调整到合意资本存量的速度。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之间的差额越大，厂商使这两者一致的速度越快，则投资越多，投资率越高。反之，亦反之。根据加速原理，任何增加合意资本存量的因素都会提高投资率。因此，预期产量的增加，实际利率的下降、以及提高投资赋税优惠都会提高投资率。在决定合意资本存量、从而决定投资率的因素中，预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合意资本存量主要取决于厂商对未来或长期产量的预期。而另一个决定投资率的因素，即调整速度 λ 则取决于调整的时滞，即厂商想在多长的时期中完成这种调整。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政策来影响合意资本存量与调整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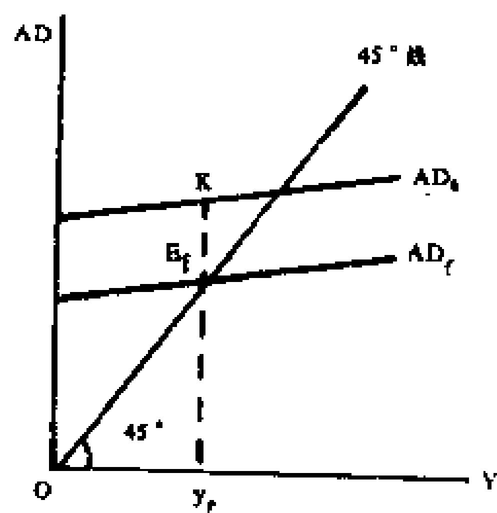
格莱欣定律（Gresham's law） 又称"劣币驱逐良币定律"，由英国商人、银行家 T.格莱欣（T·Gresham）在1559年给英国女皇伊利莎白一世的上书中提出，故名。该定律的基本内容是：如果有两种金属货币在市场上同时流通，它们实际内在价值不同而具有同等法偿能力，即外在价值相同时，实际内在价值高的货币必然退出流通，被收藏、溶化或输出，

而实际内在价值低的货币必然充斥市场，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格莱欣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建议女王下令收回成色不足的铸币加以重铸，以阻止银币外流。以后经济学家用这一定律来说明金属货币流通情况下的货币规律，并作为反对实行复本位制的依据。一般而言，这一规律适用于金属货币。但在纸币流通情况下，当有两种货币流通，这两种货币票面价值相同，而实际价值（即购买力）不同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都只有一种货币流通。

格雷、约翰（John Cray，1799—1883） 19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出生于英国苏格兰一中产家庭。在其活动的初期，曾积极宣传过欧文的学说，后来是转向以改革交换组织为主要手段的社会改良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是《人类幸福论》（1825年）、《社会制度》（1831年）和《货币的本质和用途》（1848年）。格雷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把社会划分为生产阶级、非生产的有益阶级（如医生、教师）和无益阶级，认为大部分资本家就属于既不创造物质财富又不提供服务的无益阶级，主张应该对它进行斗争。但是他仍然坚持私有制，只是主张进行以建立劳动货币制度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改革。他幻想用劳动货币代替金属货币，实现把商品直接当作社会劳动产品进行相互交换的改革方案。具体做法是，国家银行确定生产各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付给商品生产者一定的价值凭证，生产者凭它再可领取其他等量价值的商品。同欧文不同，格雷把这种孤立改革组织交换市场的方案当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方法，从而更反映出其小资产阶级的偏狭性。

格罗伍斯—莱迪亚德机制（Groves—Ladyard Mechanism） 参阅刺激共存（incentive compat ibilit）词条。

紧缩性缺口（Deflationary Gap） 当实际总需求低于充分就业总需求时，实际总需求与充分就业总需求之间的差额，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纵轴O，AD代表总需求，45°线上任何一点表示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即国民收入的均衡。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为OY_f。实现这一国民收入水平时所要求的总需求，即充分就业总需求是AD_f。实际总需求为AD_0，它所决定的国民收入为OY_0。这时，实际的国民收入小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其原因是实际总需求小于充分就业总需求。充分就业总需求与实际总需求之间的差额，即图上的E_fK，就是紧缩性缺口。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需求不足引起了失业。紧缩性缺口反映了总需求不足的存在及程度。因此，当经济中存在紧缩性缺口时，就必然存在着失业。由此得出，要消灭失业就必须消除紧缩性缺口。而消除紧缩性缺口的政策就是以刺激总需求为中心的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紧急关税（Emergency Tariff） 紧急关税是指当外国某种商品的大量进口对本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造成重大威胁或重大损害时，本国为了制止这种商品的大量进口而对该进口商品紧急征收的高额进口附加税。紧急关税的税率很高，有时甚至可以超过商品本身价格。因此它在限制进口上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是这种关税不常征收，原因在于非常容易受到对方的报复，引起一场关税战，结果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振幅（Amplitude） 一个经济周期中经济活动的最高点（顶峰）与最低点（谷底）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差额来衡量。振幅的大小反映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程度，振幅越大，则波动程度大；反之，亦反之。连续发生的各个周期的振幅变动趋势，反映出经济周期的趋势。如果各个周期的振幅是逐渐减小的，则经济周期趋于平缓，这种周期被称为减幅周期，或收敛型周期。如果各个周期的振幅是不断加大的，则经济周期加剧，这种周期被称为增幅周期，或发散型周期。如果各个周期的振幅相同，则经济周期是稳定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证明了，周期的振幅取决于乘数、加速数的大小，以及其他因素。反周期的政策正是要减小周期的振幅，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候补工人（Secondary Workers） 不属于正常劳动力队伍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例如，已婚妇女、青少年，以及年老退休者。这

些人已退出劳动力队伍，不包括在正式的劳动力统计中，他们不从事工作也不列为失业。但他们仍有劳动能力，当劳动力缺乏，工资高到一定程度时，他们还可以参加工作。这些人不如基本劳动力那样牢固，对他们来说，不从事工作比获得一定工资更重要。例如，已婚妇女更重视家庭生活与抚育子女，青少年更重视学习，老年人更重视闲暇。因此，当需要他们工作时，所支付的工资就要更高。这些人可以作为基本劳动力的补充，作为劳动力的来源之一，这部分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取决于人口结构，以及有关制度（如退休年龄的规定），社会服务水平的高低等因素。

通货膨胀税（Inflation Tax）　政府以通货膨胀政策来代替增税以支付其开支的作法。纳税人交纳的税收取决于他们的货币收入与税率。当经济中发生了通货膨胀时名义收入会有所增加。在税收起征点与税率没有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更多的人的名义收入达到了起征点，或进入了更高的税率级别，从而就要交纳更多的税收，政府的税收增加了。当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为其支出筹资时就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其作用与增加税收相同，故称为通货膨胀税。这种通货膨胀税引起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人民的收入再分配，成为政府掠夺人民的一种手段。同时，因为通过发行货币引起通货膨胀来增加税收为支出筹资比直接征税所引起的反对要小得多，所以，有些政府更愿意采用这种方法。制止政府采用通货膨胀税的有效方法是实行税收指数化。

通货复胀（Reflation）　在由萧条向复苏过渡期间由政府运用货币政策有意地促成的一种通货膨胀。意指在这一期间，政府为了使物价恢复到期望的水平，起到刺激经济恢复的作用，采取降低货币购买力的货币政策而引起的物价上涨。这是人为地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物价上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萧条时期物价水平相当低，不利于刺激生产，而靠经济自身的力量调节，物价水平的恢复又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采用通货复胀有利于经济复苏。但当经济复苏后通货复胀也会导致真正的通货膨胀。而要确切区分通货复胀结束的时间和通货膨胀开始的时间，不使通货复胀导致通货膨胀则是十分困难的。在美国历史上，1917年—1920年和1933年—1934年曾运用过通货复胀的政策，而战后就很少采用这种政策了。

通货紧缩（Deflation）　减少货币发行量以提高货币购买力或减轻货币贬值，并引起物价普遍下降的过程。一般来说，通货紧缩与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相关。当经济进入萧条阶段时，银行收紧银根，减少信贷，这就引起了通货紧缩，进而引起物价水平下跌与生产衰退。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会引起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Inflation）　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一般接受的观点是，通货膨胀是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或者说是由货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实际需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说："通货膨胀的意思是：物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普遍上升的时期"。M·弗里德曼说："物价普遍的上涨就叫做通货膨胀。"D·莱德勒（D.Laidler）和M·帕金（M.Parkin）则说："通货膨胀是一个价格持续上升的过程，也等于说，是一个货币价值持续贬值的过程"。这些定义主要从价格变动的角度来说明通货膨胀，它们强调了：第一、通货膨胀不是一次性或短期的物价水平上升，而是指持续一定时期的物价上升。第二，所谓物价水平不是指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物价水平上升，而是指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即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在一般的研究中所根据的大多是这种通货膨胀定义。在根据这种定义时，通货膨胀可以用消费物价指数（又称零售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批发物价指数，以及国民生产总值折算数来进行衡量。而且，根据物价上涨水平的程度可以把通货膨胀分为潜行的（或爬行的）通货膨胀、温和的通货膨胀，飞奔的（或奔驰的、加速的）通货膨胀、恶性（或超速的）通货膨胀这四种类型。还有一种观点是从货币的角度来给通货膨胀下定义，强调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量的过度发行。物价上升与货币贬值都是货币量过度发行的结果，但物价上升本身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定义，因为，物价上升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而这种物价上升与货币量过度发行无关，不是通货膨胀。例如，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F·哈耶克说："通货膨胀一词的原意和真意是指货币数量的过度增长，这种增长会合乎规律地导致物价的上涨。"美国经济学家H·赫兹里特说："通货膨胀这个词原来只用于货币量，意思是指货币量膨胀、扩大、过度增长。"《美国大学词典》也把通货膨胀解释为："国家通货的过度膨胀或增长，尤指因发行不能兑换的纸币而引起的过度膨胀。"此外，美国经济学家M·布朗芬布伦纳（MBronfenbrenner）把通货膨胀的定义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通货膨胀是一种普遍的过度需求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过多量的货币追逐过少量的商品。第二、通货膨胀是无论以计总量计算还是以人均计算的货币存量和货币收入的过度增长。第三、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附加特征或条件的价格总水平上升。

这些条件是：非完全预期性，导致价格再上升，不增加就业和实际产量，具有不可逆性，等等。第四、通货膨胀是货币对外价值的下跌，是以汇率，以黄金价格来衡量，或者指在官方价格下，对黄金和外汇的过度需求。各经济学流派对通货膨胀的原因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通货膨胀理论。

通货—存款比率（Currency Deposit Ratio） 人们手中所持有的现金与银行存款之间的比率。这一比率反映了公众的货币需求，在货币决定中代表着公众的行为。这一比率的大小主要由支付习惯所决定，并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例如，在圣诞节时，公众的支出增加，从而通货—存款比率就高。随着收入中消费比例的提高，这一比率也会提高。一般来说，收入中消费的比例，即平均消费倾向是较为稳定的，因此，通货—存款比率也是较为稳定的。

通货膨胀补贴（Inflation Subsidy） 通货膨胀给债务人所带来的好处。在一般情况下，贷款利率是按名义利率确定的。由于制度上的不灵活性，借贷合同一旦确定，利率就很少变动。当经济中发生了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下，债务人仍按原来规定的利率水平支付利息，并按原来的货币量偿还本金。这样，实际利率会下降，有时甚至于降为零，甚至负数，所偿还本金的实际价值也会减少。因此，通货膨胀就会引起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的收入再分配。通货膨胀实际上是给债务人以补贴。这种由于通货膨胀而产生的补贴就是通货膨胀补贴。对债权人来说则等于征收了同等数量的税收。在长期贷款（例如，25—30年的住房抵押贷款）中，这种情况十分重要，会引起这类贷款的大幅度减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实行定期地按接近于通货膨胀率的短期利率来调整长期利率，或采用浮动利率的贷款制度。

准备金—存款比率（Reserve—Deposit Ratio） 商业银行所保留的准备金与所吸收的存款之间的比率。这一比率反映了商业银行的货币需求，在货币决定中代表着商业银行的行为。这一比率的大小取决于两种因素。第一、中央银行规定的最低准备金要求。这种最低准备金要求随存款类型和商业银行的规模与地理位置而不同。一般而言定期存款的准备金要求低于活期存款，对大银行的准备金要求低于小银行。第二、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大小。商业银行超过法定准备金要求的那部分准备金称为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和个人持有预防动机的货币一样，是为了应付临时的支付之需。因此，超额准备金的大小取决于从这种准备金中所得到的好处，以及为持有这种准备金所付出的成本。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成本是贴现率，即商业银行在需要现金时向中央银行借款所支付的利率，以及持有超额准备金所放弃的利息收入。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好处就是当有了临时的支付需要时可以避免的损失。综上所述，准备金—存款比率 re 取决于四个因素：最低准备金要求 r_R、现金支付的不确定性 σ，贴现率 i_D，以及利率 i。这样就可以写出：

$$re = r(i, i_D, r_R, \sigma)$$

上式说明了，准备金—存款比率与利率、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动，与最低准备金要求和现金支付的不确定性成同方向变动。准备金—存款比率是决定货币乘数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比率越大，一定量高能货币所创造出来的货币量就小，从而货币乘数就小；反之，这一比率越小，一定量高能货币所创造出来的货币量就多，从而货币乘数就大。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最低准备金要求来影响准备金—存款比率，从而影响货币乘数与货币供给量。

准备率（Reserve Ratio） 又称"法定准备率"或"准备规定"，是中央银行所规定的、商业银行所必须保留的存款准备金与存款的比率。存款准备金或作为无息存款存于中央银行，或作为库存现金保留，一般不能随便动用。最初这一制度是为了保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加强银行的清偿力，防止银行倒闭和金融体系混乱。但现在已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当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降低准备率，从而就使商业银行产生超额储备，可以更多地贷款，并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因此，降低准备率就是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同样，在经济繁荣时期，中央银行提高贴现率，可以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这就是紧缩性货币政策。由于存款总额一般而言数额都相当大，因此，变动准备率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也就相当大。正因为这样，中央银行对这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般不常使用。此外，由于各种银行吸收存款的多少不同，受准备率变动的影响也不同。一般来说，这种政策对大银行的影响大，而对小银行的影响小。最后，这种政策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的配合情况。所以，这种政策工具在实际中运用得也不多。

准租（Quasi—Rent） 亦称"类地租"或"准租金"。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分配理论的一个术语，指短期内使用非土地生产要素时在弥补各项可变费用之后

所形成的收益。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第一人。他认为，从短期看，象土地一样，其它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供给也是固定的，其供给弹性几乎相当于零。如果厂商使用较好的厂房、设备、在进行生产时所支付的费用就较少，成本条件较差的厂商要低，因此，总收益和总支出之间便会形成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在性质上类似于地租、归厂商所有。由于从长期看，一个厂商的生产设备的技术上优势，同技术进步而消失，因此，准租在长期内是不存在的。存在不存在准租、关键是看固定资本的供给弹性是否为零，如果供给弹性不为零，会消除总收益和总支出之间的差额，则不存在准租。在西方经济学中，除了土地有租金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可以产生类似的租金，除了固定资本之外，还有具有特殊劳动技能的人等。由于这类因素的供给弹性在短期内可以视为零，因此，其工资的绝大部分是经济地租。例如，一个大学教授去做工人，它的收入是1万美元，但他是大学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年薪是4万美元，那么其中的3万美元是经济租。

准契约（Quasi－Contract）　准契约可以定义为某种交易或事实状态（state of facts），在个人意志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法律附加某种义务或责任表现于它们之上，这种义务或责任类似于从契约中产生的义务或责任。罗马法案（Roman Law）就是一个比较相似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准契约与隐含契约（implied contract）不同，它实际上并没有法律上的契约关系存在，而隐含契约则不然，后者包含两部分人的责任关系。如一人到商店买东西，对于价格他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存在一种隐含契约要求他支付，因为卖与买是买卖双方的意图。但是在不存在任何协议的前提下，保障每一个人在他们的行为中追求自己权力的这种原则上的责任就是准契约的例子；这个原则当然是指法律。是法律对发生关系的双方附加了某种责任，准契约由而产生。

起飞（Take—off）　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在其经济增长阶段论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罗斯托给起飞所下的定义是"起飞阶段是一种产业革命，直接关系到生产方法的剧烈变革，在比较短的一段时期内产生带有决定意义的后果"。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妨碍经济增长的阻力已被最后克服，传统经济的停滞状态被突破了，经济可以迅速地发展了。这就象飞机起飞一样，一旦升空就可以顺利航行了。起飞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产业革命时期。因此，这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大分水岭"，是"一个社会的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间歇，即增长成为正常情况的时期。"在这一阶段"近代工业化开始了，并且迅猛地发展。"经济实现起飞，进入起飞阶段，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提高生产性投资率，使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5%或5%以下增加到10%以上。第二、建立并发展一种或多种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即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生产率高的"主导部门"。起飞的本质正是这些主导部门的迅速发展。第三、建立起适应经济起飞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社会制度结构。第一个条件通过国内积累与资本输入来实现。第二个条件非常关键，但各国情况不同，例如，英国以棉纺织部门为主导部门，而美国等国以铁路建设为主导部门。第三个条件在各国的情况也不同，但一般都有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把各主要国家的起飞时期列表如下：

国别	起飞时期	国别	起飞时期
英国	1783—1802年	俄国	1890—1914年
法国	1830—1860年	加拿大	1896—1914年
比利时	1833—1860年	阿根廷	1935年
美国	1843—1860年	土耳其	1937年
德国	1850—1873年	印度	1952年
瑞典	1868—1890年	中国	1952年
日本	1878—1900年	墨西哥	1940年

在现代经济中，起飞这一概念得到广泛运用，用以解释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开始。

莫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　又称"公司财务理论"或"资本成本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F·莫迪格利安尼和M·米勒在50年代共同提出，故名。这一定理是要分析不确定条件下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企业投资决策理论。它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企业的成本是什么？第二、资本结构的变化对资本成本有什么影响？第三、企业如何根据资本成本理论来作出投资决策？对三个问题的回答分别形成莫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Ⅰ、Ⅱ、Ⅲ　他们指出，在不存在不确性的世界里，资本的利润是未来一系列年的收益流，并且根据这种收益流可以求出确定的资本收益率。如果资本收益率大于利率，投资就是有利的，反之，资本收益率小于利率，投资就要受损失。这样，就可以把利率作为资本的成本。但是，在存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资本的收益是一个具有一定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收益的高低无法预先确定，从而不能与利率相比较，利率就不是衡量资本成本的尺度了。这时就

要用数学方法求出资本的预期收入流，资本预期收益与资本市场价值之比，即资本预期收益率就成为资本成本的尺度。全部资本分为由出售股票而来的股权资本和由出售债券（即借款）而来的借入资本，所以，资本成本的尺度就是股权资本与借入资本的预期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资本的结构指股权资本与借入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传统的观点认为，资本成本会随着借入资本的增加而下降，因为借入资本通常比股权资本便宜。这样，随着借入资本的增加，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就会下降。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认为，在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借入资本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金融风险，即一方面使股权资本的收益率更加不确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无力偿付债务的可能性。为了抵销借入资本带来的金融风险，投资者会要求一个更高的股权资本收益率，即提高了股权资本的成本。所以，借入资本增加所引起的资本成本的减少被由此而引起的股权资本成本的增加所抵销，从而，资本结构变化对资本成本没有影响。根据以上论述，得出了莫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Ⅰ：对风险相同的企业而言，企业的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即借入资本和股权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无关。莫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Ⅱ：股权资本的成本随着借入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的增加而增加。根据这两个定理，如果有两个企业除资本结构不同之外，其他方面都一样，则这两个企业的资本成本将相等，如果资本成本不相等，市场的套利活动将使它们恢复相等。假定有两个资本结构不同而预期收益相等的企业A与B。A企业没有借入资本，B企业有借入资本。如果B企业的资本的市场价值高于A企业，则处于边际上的投资者就会把它拥有的定格高的B企业的股票卖掉，而购买A企业的股票，这样投资者可以通过较小的投资而获得同样的预期收益。这种套利活动的结果是降低了B企业的股票价格及其资本的市场价值，而提高了A企业的股票价格及其资本的市场价值，最终使这两个企业的资本成本相等。反之，如果A企业的资本市场价值大于B企业，也会发生出售A企业股票而购买B企业股票的过程，结果仍然是恢复均衡。在这两个定理的基础上，又得出莫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Ⅲ，即企业最优投资决策的定理：为了股东的最大利益，企业只有在投资的收益率大于或等于资本成本时才会进行投资。决定投资与否的分界点不是利率水平，而是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这种资本成本不受筹资方式的影响，无论是发行股票，发行债券，还是增加留存利润，资本成本，从而投资决策都将同样。莫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对金融市场和企业投资的分析受到广泛重视，并被运用于公司财务的实践。

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汉森—萨缪尔森模型（Multiplier— Accelerator Interaction: Hasen—Samuelson Model）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与萨缪尔森对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的一种解释。根据他们的解释，投资或总需求其他组成部分（如政府支出）的变动会通过乘数作用影响国民收入，而国民收入的变动又会通过加速数来影响投资支出。正是这种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使经济中形成了周期性波动。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述这一模型。设 Y_t、C_t、I_t、G_t 分别为现期收入、现期消费、现期投资与现期政府支出。根据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有：

$$Y_t = C_t + I_t + G_t \tag{1}$$

现期消费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α）和前期收入（Y_{t-1}），则有：

$$C_t = \alpha \cdot Y_{t-1} \tag{2}$$

现期投资取决于加速系数（β）和消费的变动（$C_t - C_{t-1}$），则有

$$I_t = \beta(C_t - C_{t-1}) = \alpha\beta(Y_{t-1} - Y_{t-2}) \tag{3}$$

把（2）式与（3）式代入（1）式，则有

$$Y_t = \alpha Y_{t-1} + \alpha\beta(Y_{t-1} - Y_{t-2}) + G_t \tag{4}$$

（4）式即为汉森—萨缪尔森模型。设 $\alpha = 0.5$，$\beta = 1$，$G_t = 1$，则可作出下表：

t	G_t	C_t	I_t	Y_t
1	1	0	0	1
2	1	0.5	0.5	2
3	1	1.0	0.5	2.5
4	1	1.25	0.25	2.5
5	1	1.25	0	2.25
6	1	1.125	−0.125	2
7	1	1.0	−0.125	1.875
8	1	0.9375	−0.0625	1.875
9	1	0.9375	0	1.9375
10	1	0.96875	0.03125	2
11	1	1.0	0.03125	2.03125
12	1	1.0151625	0.015625	2.03125
13	1	1.0151625	0	2.015625
14	1	1.0078125	−0.0078125	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即使乘数和加速数不变，经济中也存在一种有规则的上下波动。在第3—4期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值2.5，在第7—8期下降为最小值1.875，第11—12期又上升为最大值2.03125。如此循环下去，表现了国民收入一种有规则的周期运动过程，汉森—萨缪尔森模型说明了两点：第一，即使乘数与加速数保持不变，由于这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引起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第二、经济周期表现为经

济体系本身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说，经济中周期性波动完全是由乘数和加速数的特征决定的，而不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汉森—萨缪尔森模型还有另外两个特点。其一、引入了时滞的概念。从公式中可以看出，t 期的国民收入，由 t-1 期、t-2 期的国民收入以及乘数与加速数决定。前期收入决定现期收入，这就考虑到了时滞。其二、分析了乘数与加速数大小对经济周期类型的影响。这就是说，乘数与加速数的数值大小取决了经济周期是收敛型的，还是扩散型的。这进一步说明了乘数与加速数对经济周期的决定作用。汉森—萨缪尔森模型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对哈罗德模型的发展。这一模型也被作为典型的乘数—加速数模型。

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哈罗德模型 (Multiplier Accelerator Interaction: Harrod Model)

英国经济学家 R·哈罗德对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的一种解释，在其 1936 年所出版的《经济周期》一书中提出，也是用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结合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一种最早尝试。哈罗德认为，决定经济运动过程的主要是储蓄倾向、利润的转移和资本对收入的比例这三种动态决定因素。储蓄倾向决定了乘数，而资本对收入的比例就是加速数。如果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不变，那么收入的稳定增长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这两个数并不能保持不变，从而就会引起经济中发生由繁荣转向危机的过程。具体来说，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消费增长率会放慢。其原因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二是在繁荣时期利润率上升，而利润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储蓄，从而减少了消费。一旦消费增长率出现下降，它必然对乘数和加速数发生影响。这就在于消费倾向降低使乘数数值减少，投资增加对国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减少、国民收入增加的减少又会影响投资，使投资减少，投资减少进一步使国民收入减少。这样，乘数与加速数的共同作用就会由消费—投资—国民收入之间的连锁反应而引起经济危机。当经济下降到谷底之后，由于资本更新数量的增加要求产量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这样会引起净投资的增加，为三种动态决定因素提供了机会去促进一种稳定的或累积的上升。哈罗德模最早把乘数与加速数结合起来解释经济周期对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哈罗德模型还很不完善，没有对经济周期过程中的复杂阶段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以后的汉森—萨缪尔森模型和希克斯模型是对哈罗德模型的发展与完成。

乘数—加速模型 (Multiplier– Accelerator Model)　用乘数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了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是由乘数与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是经济本身的一种内在机制。这种理论对经济周期的原因与周期性运动过程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数学模型。最早提出这一模型的是英国经济学家 R·哈罗德。以后美国经济学家 A·汉森和萨缪尔森对这一模型作出了重要发展，建立了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与数学表述式。英国经济学家 J·希克斯是这一模型最后的完成者。乘数—加速模型是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动态化、长期化的结果，被称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周期理论。

乘数—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希克斯模型 (Multiplier–Accelerator Interaction:Hicks Model)

英国经济学家 J·希克斯对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的一种解释，在其 1950 年所出版的《经济周期论》一书中提出，也是乘数—加速数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后完成。这一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第一、实际消费支出 C_n 是过去几个时期的收入的函数，即

$$C_n=C_1Y_{n-1}+C_2Y_{n-2}+\cdots+C_nY_0$$

第二、投资分为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自发投资指不受产量变动影响的投资，它按一种不变的百分率增长。引致投资由产量变动所引起。第三、引致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即加速数具有相当高的数值，这就决定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也大。第四、产量的上限为充分就业时的产量水平。第五、加速数的数值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小，而在上升阶段大。在以上的假设之下，希克斯模型用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解释了经济周期的累积过程和经济周期过程中各个不同阶段转变的必然性。希克斯模型首先分别说明了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仅仅是乘数原理并不能说明经济周期的运动过程。因为动态的分析表明，由于消费时滞的存在，乘数会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经济最终会达到投资和储蓄相等的均衡上。这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产量的波动对投资的影响，即加速原理的作用。产量波动对投资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对产品需求的增加，投资无法马上增加，这就引起存货减少。第二阶段，出现大量的引致投资，其中包括存货投资与固定资本投资。第三阶段，由于固定资本更新过程中折旧额的上升或下降引起的投资波动会对整个经济发生影响，产量下降时，由于现有资本量的调整，投资会减少，甚至停滞。然后，希克斯模型讨论了经济体系均衡的可能性和稳定性，即是否存在一种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以及经济体系脱离均衡后是否会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按这一模型，经济体系均衡增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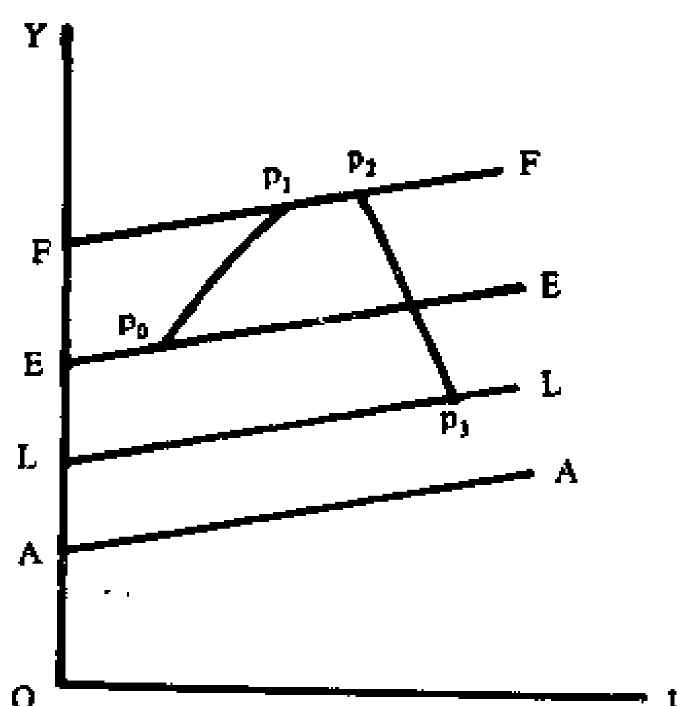
条件是:

自发投资十引致投资=储蓄

那么，经济体系脱离这个均衡的途径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假定在第零期，投资=A，消费=（1−S）A，引致投资=VA。在第一期，产量水平为（1−S）A+VA，或（1−S+V）A。第二期的产量为$[(1-s+V)^2-V]A$。以此类推，设Y_n表达超过均衡产量水平的产量，超过均衡水平的消费量为$(1-S)Y_{n-1}$，同期的引致投资为$V(Y_{n-1}-Y_{n-2})$，从而得出下式:

$$Y_n=(1-S-V)Y_{n-1}+VY_{n-2}$$

希克斯根据上式分析了储蓄倾向（S）和加速数（V）的大小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波动的强弱完全取决于S和V的大小，其中V又是主要因素。根据V值的大小可以分为低点、中点和高点。当V低于低点时，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产量离开均衡水平后，会很快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下，不再发生波动。当V高于低点，低于中点时，产量离开均衡水平后，不会立刻趋向均衡。当V介于中点和高点之间时，产量会产生一种围绕均衡的波动，但这种波动是逐渐加强的，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大，离均衡水平越来越远。当V高于高点，那么经济波动一开始就表现为很大的幅度，以致于发生不会转折的可能。希克斯认为，第一和第二种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第三种情况则最为可能，即经济一旦离开均衡之后，就会发生一种扩散的循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希克斯模型完整地描述了经济周期的运动过程，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Ot代表时间，纵轴OY代表产量，AA线为自发投资增长线，假定它处于一种稳定增长状态，EE线为自发投资与超级乘数（自发投资所引起的产量增加的倍数）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均衡增长线，FF线为经济增长的最高上限，亦称充分就业线，LL线为只有自发投资存在而无引致投资时，自发投资与乘数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假定经济开始时处于均衡增长线EE上的P_0点。由于某些外部因素（如新发明，新技术等），引起自发投资增长。在乘数与加速数的共同作用之下，经济发生脱离均衡水平的向上运动，直至P_1点为止。这时经济中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的运动只能沿充分就业线FF进行，从P_1到P_2。但经济不可能长期处于充分就业水平，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放慢，引致投资下降。在乘数与加速数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向下的运动，朝着均衡增长线EE的方向移动。但产量并不能停在EE线上，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还要继续下降到LL线的水平上，即P_3点。这时经济萧条，引致投资不存在了，加速原理不起作用了。但由于自发投资存在，在乘数作用之下，LL线成为产量的下限。但产量也不会长久停留在LL线上。由于自发投资的增加，又引起乘数与加速数的作用，产量又发生向上的运动。这时经济开始复苏，产量向EE线靠近，并又开始下一次高潮。经济活动水平就这样处于不断的循环之中。希克斯模型被认为相当令人满意地解释了经济周期，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乘数原理（Multiplier Principle） 乘数又译为“倍数”，指自发总支出（总需求）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如果自发总支出是投资，则乘数是投资乘数，如果自发总支出是政府支出，则乘数是政府支出乘数，等等。乘数原理说明了各种支出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某一部门支出（需求）的增加不仅会使该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相应增加，而且还会引起其他部门的生产、收入和支出增加，从而使国民收入的增加量数倍于最初增加的支出。这就是说，经济中任何一笔支出的增加都会在各部门引起连锁反应，从而最终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会数倍于最初支出的增加量。

设第一部门最初增加的支出为△A，这种支出增加引起本部门收入的增加亦为△A。再设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为C，则第一部门收入增加△A就会使该部门支出增加C·△A。这笔支出用于购买第二部门的物品，就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C·△A。第二部门增加的收入中又会增加支出C^2·△A。这笔支出用于购买第三部门的物品，就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C^2·△A。第三部门增加的支出C^3·△A又使第四部门收入增加C^3·△A。这种由收入增加引起的支出增加会逐轮连续下去，当整个经济再次达到均衡时，增加的总支出（△AE）与增加的国民收入（△Y）相等，则有:

$$\triangle AE=\triangle Y$$

$$=\triangle A+C\cdot\triangle A+C^2\cdot\triangle A+C^3\cdot\triangle A+\cdots+C^n\cdot\triangle A$$

$$=\lim_{n\to\infty}\left(\frac{1-C^n}{1-C}\right)\cdot\triangle A$$

$$=\frac{1}{1-C}\cdot\triangle A\quad(0<c<1)$$

在上式中，$\frac{1}{1-C}$就是乘数。它表示由于最初自发支出增加了$\triangle A$，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再次达到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增加量（$\triangle Y$）为自发支出增加量$\triangle A$的$\frac{1}{1-C}$倍。由于$0<C<1$，所以$\frac{1}{1-C}>1$。而且，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C）。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即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支出的比例越大，则乘数越大，即最初自发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加越大。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即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支出的比例越小，则乘数越小，即最初自发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加越小。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之和为一，所以，乘数也可以写为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乘数与边际储蓄倾向成反比例变动，即边际储蓄倾向越大，乘数越小，反之，边际储蓄倾向越小，乘数越大。乘数原理说明了自发支出增加使国民收入倍增的作用，但实际上乘数的作用要受到两种情况的限制。其一，只有当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时，乘数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资源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或者存在着某些资源的"瓶颈状态"，则乘数的作用不是使国民收入增加，而是由于需求过大而引起通货膨胀。其二，在由自发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过程中，由于货币的交易动机需求随国民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样，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就使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了投资，使支出减少，从而乘数的作用受到限制。

乘数的概念最初由瑞典经济学家K·威克赛尔（K·Wicksell）和俄国经济学家图干—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i）分别提出。1931年英国经济学家R·卡恩（R·Kahn）在一篇文章中用乘数的概念来解释投资增加与就业增加之间的关系，并计算了乘数效应的极限值，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凯恩斯在《通论》中把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联系起来，并用乘数来说明总支出变动与国民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使乘数原理成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后，美国经济学家A·汉森和P·萨缪尔森把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结合起来，建立了"乘数—加速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周期。

高利贷（usury）　在中世纪，高利贷是指债务人们还贷款的数量高于债权人的本金，而在当时，通过借贷而获利的行为是违法的，特别是在基督教作为正统宗教的时期，官方更是引据《圣经》将借贷获利行为视为犯罪，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平民都不例外。到中世纪晚期，商业活动非常繁荣，债权人通过各种办法获得借贷利息，同时又不违反法律，使借贷获利行为有禁无止。随着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时期的到来，按照《土地法》，出租土地，教徒有权获利，罗马教会对此也不予追究。而1917年，更是通过法律，允许债权人获得法定利息，从而，将借贷获利视为犯罪的法律也就废止了。

按照现代用语，高利贷一词仅指放债利率过高，至于何为过高并无定论。以美国为例，美国借款利率最高限由各州法律自定，各州之间法定利率最高限相差较大，而对于违反高利贷法的行为，各州之间惩罚也并不相同，有的是没收超额利息，有的是没收全部贷款。

经济学家认为，中世纪禁止借贷获利的制度促使人们将资金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放债，有利于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建立，又反过来推翻了禁止借贷获利的思想。

高息资金（dear mony）　指的是利息率比较高并且信贷供给量比较少的情况，这是货币管理当局所实行的一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息率，减少信贷供给量，可以消除由于货币及信贷需求过多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有些时候，货币当局看到这种通货膨胀的趋势，就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抽紧银根，它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证券，或者提高贴现率以及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可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储备量，从而减少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得到贷款的人，由于信贷供给量的降低，也可能得不到贷款，这就减少了投资量与消费量，从而实现了给经济"降温"的目的。有些时候，紧缩货币是在出现了意外情况的时候被迫采取的一种手段，例如，当对信贷的需求量增加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不足，这时，如果商业银行系统内部没有额外的资金，那么就必须向货币当局再借一部分准备金，或者减少贷款，甚至出售证券等等。不过商业银行在计划中会自动提前作出一些限制性的规定的，比如，贷款数额少于某些申请人的要求，缩短某些定期贷款的偿还期限等等，受到限制的一般多是那些与商业银行的联系比较少，资信标准又不太高的借款人。货币当局向商业银行提供的自由储备金的净额头寸是衡量经济是否处于高息资金时期的重要指标，如果它降到零以下，那就说明在实施相当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了。自从19世纪以来英美等西方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时候，都迅速地提高短期利息率，以缓和经济的波动。

这种措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又以高息资金的政策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70 年代以来，通货膨胀成为困扰着人们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这时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率取代了高息资金，成为货币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高能货币（High Powered Money） 又译为"高效货币"或"强力货币"，是指银行体系借以创造货币的基础，并限制着引起创造货币的银行贷款活动的储备资产。包括中央银行的两种负债：通货与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高能货币的变动可以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而影响货币供给量。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获得资产，并创造负债为这种资产进行支付来调节高能货币，进而调节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中央银行调节高能货币的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即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出卖有价证券，减少了中央银行资产和负债，也减少了高能货币，购买有价证券，增加了中央银行资产和负债，增加了高能货币；外汇与黄金市场的干预，即在市场上买卖外汇与黄金，出卖黄金与外汇，减少了中央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也减少了高能货币，购买黄金与外汇，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也增加了高能货币；变动贴现率，即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的变动来改变高能货币，降低贴现率，向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增加了高能货币，提高贴现率，向商业银行提供较少的资金，减少了中央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减少了高能货币。此外，当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把政府债券出售给中央银行），并用于支付时，也会增加高能货币。

高级卡特尔（Senior Cartel） 由于一般卡特尔不管何种形态，都是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和成本条件有差异的企业间的联合，内部常常存在着企业对立。所以为了防止发生内部对立，避免协调失败，卡特尔演变成高级形态，称为高级卡特尔。主要有下面几种形式：1.销售卡特尔。这主要指为了解决有关生产量或销售量分配的企业间的对立，按不同企业分割销售地或顾客的卡特尔。有关分割销售地区的卡特尔称为市场分配卡特尔或领土制。即最终按每个企业分割销售地区，发展到各企业得到地区垄断权的形态。按每个企业分割顾客的称为交易对象卡特尔。2.利润分配卡特尔或统筹利润。这种形态的卡特尔，是参加者将价格决定权和按不同企业分配生产量的权利转让给卡特尔组织。由卡特尔组织决定出可以使共同利润极大的总供给量，再分配给每个企业生产量。并且，卡特尔组织将所获得的利润暂时统筹起来，再分配给各企业。在此种情况下，无效率的企业即使停止生产，也可以参加利润分配。这种利润统筹形态的卡特尔，由于卡特尔组织拥有总供给量和价格的完全决定权，使得容易实现极大的共同利润。再者对不遵守协定的企业，可以采取停止利润分配等措施，使得参加者比较会遵守协定。3.辛迪加，这是一种极特殊的统一销售的卡特尔。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参加辛迪加的企业有共同出资成立的销售公司，参加企业的产品由销售公司统一销售。另一种情况是辛迪加将所有参加企业的产品都买下，而后统一销售（可以委托销售），这种辛迪加临时性的较多。辛迪加与托拉斯的区别是，共同出资的范围一般只限于销售领域，因此辛迪加又可视为卡特尔和托拉斯的中间形态。

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s） 离散是与连续相对而言的。在经济学模型中，如果因变量能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连续变化时，这个模型就被作为是连续模型。连续模型经常用于对宏观层次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比如，当市场上彩色电视机的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对彩电的购买量会出现连续下降的情况。但是，如果仅对经济总量进行研究，而不考虑每个经济个量的情况时，就不能精确地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也难以很好地对有关经济变量作出预测。而要研究经济个量，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个别经济行为人面对市场进行选择的时候，往往采取一种不连续的形式，例如，市场上彩电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单个消费者所要作出的选择是，是否购买与购买几台彩电，我们将这种选择称为离散选择。如果想设立模型来研究经济个量的行为特征的时候，这种模型就被称为离散选择模型。

1.一变量二项模型

这是离散选择模型中最为简单的情况，即模型中只有一个变量，选择上有两项。这时的离散选择模型为

$$P(y_i=1)=F(x_i'\beta)\quad i=1,2,\cdots\cdots n$$

其中 P 为概率；F 为一个特殊的分布函数，它可以是自变量的线性函数，也可以是非线性函数，F 采用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整个模型的特征，其中最为常用的有标准正态分布函数与对数分布函数；β 为未知参数向量；x_i 与 y_i 分别表示对自变量向量与二次制因变量的第 i 个观察值。在前面的例子中，$y_i=1$ 表明第 i 个消费者购买了一台彩电，而 x_i 则包括第 i 个消费者决定购买时彩电的市场价格、此人的收入水平、与彩电有关的商品的价格、该消费者对彩电的偏好以及他对彩电价格变化的预期等等。

购买彩电可以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如果不买也可以省掉一笔开支，究竟哪一种选择能使消费者的效用实现最大化呢？这就需要将两种选择下某个消费者所

得到的效用进行对比，则

$U_{i1}=x_{i1}'\beta_1+\sum_{i1}$

$U_{i0}=x_{i0}'\beta_0+\sum_{i0}$

其中 U_{i1} 与 U_{i0} 分别表示第 i 个消费者购买与不购买彩电时所得到的效用，$\sum$ 是所有不可观察的自变量的总和。这时，

$$P\ (y_i=1)\ =P\ (U_{i1}>U_{i0})$$
$$=F\ (X_{i1}'\beta_1-X_{i0}'\beta_0)$$

其中 F 是 $\sum_{i1}-\sum_{i0}$ 的分布函数。

2. 一变量多项模型

如果经济个体可以选择的方案在两种以上，所设的模型就为多项模型。对于不同的经济个体，可以选择方案的数目也可能各不相同，设第 i 个人可以选择 m_i+1 个整数值，即 0，1，……m_i

$$P\ (y_i=j)\ =F_{ij}\ (x,\ \beta)$$
$$i=1,\ 2,\ \cdots\cdots n$$
$$j=1,\ 2,\ \cdots\cdots m_i$$

多项模型中分有序模型与无序模型两类。如果对于第 i 个人对彩电的需要强度 $\bar{y}_i$ 来说，当且仅当

$\alpha_j<\bar{y}_i<\alpha_{j+1}$ 时，有

$y_i=j$

其中 j=0，1、……m

$\alpha_0=-\infty$，$\alpha_{m+1}=\infty$

这时确定的模型就是有序多项模型。在上面的例子中，对于所有的 $k\neq j$，如果 $U_{ij}>U_{ik}$，则第 i 个消费者购买 j 台彩电，U_{ij} 为此人拥有 j 台彩电所得效用的总和。连续变量 $U_{ij}-U_{ij+1}$（j=0，1，……m）决定了离散变量的结果。

无序多项模型包括多数对数模型、网状对数模型与多项概率模型。

3、多变量模型

这类模型用来研究两个以上离散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比较复杂。主要类型有线性对数模型，多变量网状对数模型以及多变量概率模型。

离散选择模型的出现只有 20 多年的历史。在此之前，人们一直着重对宏观经济总量进行研究，而忽视了对经济个量特征的分析。而且建立离散选择模型所需要的数据量很大，模型处理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离散选择模型的建立。直到五、六十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通过数据库可以大量存储有关经济个量的具体资料，同时也使得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成为可能。在这一背景下，离散选择模型才迅速地建立与发展起来。

竞争（competition）　竞争是个人（集团或国家）之间的对立和争斗，只要双方或多方都为获取不能各方都得到的东西而努力，竞争就会产生。因此，竞争至少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从经济理论来看，竞争在其中占有举足经重的地位，在理论发展序列中，随着各种经济学流派的产生，竞争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而且，不同的竞争概念和各种不同的价值论之间的区别是互相对应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竞争实质上是自由竞争，他们把垄断看成竞争的一个异例，认为竞争者寻求超额利润的能力是竞争不断渗透的基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竞争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亚当·斯密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不同市场或行业的资源竞争。他认为，一种商品的供给的减少之所以会导致价格上升，原因在于买者之间的竞争会抬高价格；类似地，如果一种商品的供给增加，那么，加强的卖者之间的竞争会使价格下降。竞争者的数量增加会增强竞争的密度，长期的竞争过程会导致同一的“自然价格”和一般利润率。他提出了私人企业经济的主要命题：资源配置。即每个生产性资源的所有者都试图在资源能产生最大报酬的地方使用它。结果，在竞争条件下，每项资源都如此分布，以致于它在各种用途中产生同样的报酬率。如果一项资源的不同使用会获得不同的报酬，那就会导致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最终同一资源在同一市场上不可能有两种价格。N·S·西尼尔（Nassau·W·Senior）则指出，在自由竞争下，生产成本是价格的调节者，只有假定不存在干扰因素，资本和劳动可以迅速地无代价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每个生产者都可以从生产方式中获取充分信息，那么竞争机制的运行才能假定是完善的。然而，这种假定显然完全脱离了经济现实。他暗示了完全竞争概念，却没有明确表述出来。奥古斯汀·古诺（Augustin Cournot）对广义的竞争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对于一种资源来讲，竞争或许不会导致同样的报酬，他把竞争更精确地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形，即价格不随产量变化，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当部分生产相对于总生产微不足道时，竞争的作用就达到了极限，部分生产可以从总生产中提取出来。在这个定义下，当竞争者数量趋向无穷时，企业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别趋近于零。每个竞争者都相信，其产量决策不影响其竞争对手的产量决策。W·S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ens）提出了交易者拥有的信息的作用问题。他认为一个完善的市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只有当所有交易者都完全知道供求状况、交换率等信息时，市场从理论上说才有可能是完善的。（2）必须存在完全的自由竞争，不存在导致非自然交换率的图谋。这样，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上，同一种商品不可能有两个价格，这就是他所称的“无差异法则”。如果商品是明确具体的，交易者拥有充分信息，那么市场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但是，把竞争概念和市场结合起来却增加了问题的难度。艾奇沃思（Edgeworth）第一个严格而系统地探讨了完全竞争的定义。他认为，在完全条件下，假定每个交易物是无限可分的，那么市场上交易双方有无限多独立的当事人；每个交易者都能无代价地与其他任何人以非限定数量进行交易；只要有更为有利的生意可做，他们就可以通过变更这些交易进行再交易。市场交易双方交易者无限多是必要的，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如果每一次的交易者都联合起来，就可能会出现双边垄断的情形，从而不存在竞争。为什么这种交易者的合并没有产生呢？艾奇沃思并没有给予说明。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J·B·克拉克（John·Bates·Clark）强调了资源流动性的必要性，然而在经济现实中，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很少能够或很难达到的。F·H·奈特（F·H·knight）对于完全竞争的条件提出了最有影响的表述，"在所有单个的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完善的、不间断的、无代价的相互联络"，这些条件足以达成竞争性均衡。总之，随着竞争概念的发展。它已成为价格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的一个标准部分，也日益重要地成为判断实际市场效率的标准。竞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过于重要，以至于当经济学家改变其兴趣或分析方法时，它不能不受任何影响。斯密提出了竞争性的私人企业经济中的产量最大化命题，即如果每个资源所有者都使其资源报酬最大化，那么总产量将会最大；克拉克则认为完全竞争只有在静态经济中才能达到；熊彼特更认为，产品和生产方法的不断变化是资本竞争的本质，一种产品和生产方法由另一种取代，是一种"创造的毁坏"。事实上，任何完全竞争概念都不能满足行业内的实际竞争状况。竞争概念的重要地位今天在经济理论中和以往一样大，同时，竞争的本质也将在经济学中继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竞争：奥地利学派的概念（competition:Ausfrian conceptions） 和新古典理论的均衡分析相反，奥地利学派着重强调正在进行的经济过程，其竞争概念就反映了这一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对新古典模型的挑战和对完全竞争概念的摒弃。就此而言，某些从著作上看并不属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强调了实际的市场活动及其过程。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的竞争定义，通常意指企业进入有利可图的行业（或退出无利可图行业）以及企业根据市场状况提高或降低价格。他们不承认，实际上也没有分析竞争中反映的企业精神，然而却承认在大多数情形下，企业确实可以对市场价格施行某些控制，控制程度和该行业中企业数量的多少成反向变动。这些基本思想经过扩充，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并不矛盾。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反对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概念，以为它旨在阐明竞争过程达到极限后竞争的合理作用，它尽管描述了一种均衡状态，却没有言及导致均衡的竞争性过程，实际上剥夺了所有和"竞争"一词有关的企业经营活动。结果，在完全竞争模型中，企业不是区别其产品，广告提高或降低价格，而是试图改变其成本结构。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就是在对新古典模型的批评中建立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J·熊彼特（J·Schumpeter）和I·科尔茨纳（I·Kirzner）。熊彼特坚持认为，完全竞争概念和理解资本主义过程无关，对竞争的任何真实的分析，都要求理论分析的焦点从经济怎样有效地分配资源转向如何创造和毁坏资源。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企业家，在熊彼特的分析框架中是重要人物，它在影响经济生活运转的市场过程中，通过引人创新起着不断打破均衡的作用。以成本和质量优势为前提的竞争结果，远比传统理论的价格竞争更为重要，它在企业中导致了一种内在的效率机制，这种效率对于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分配效率。大企业是来自于新企业，新管理或新观念的竞争威胁而导致的不断变化的结果，因此大规模企业组织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企业精神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规模。科尔茨纳主要的观注点是市场过程的分析和"人类行为"概念。他认为，经济生活的关联是不确定的，它要受到创造性的人类行为的约束，这种创造性作用即是"企业精神"，即发现人类新需求以及满足它们的新资源，技术及其他方法的能力。他的企业家是这样的人：他能看到和探明别人没有注意的东西，即要素投人价格低于最终产品价格情形中内含的利润机会。应当明确，上述二人的企业精神理论是存在差异的，熊彼特的企业家在经济体系中着眼于经济变动，是一种不断打破均衡的力量；科尔茨纳的企业家则扮演一种均衡化的角色，他带来的变动与他在市场上查明错误决策和遗漏机会是互相对应的。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一个导致变动，另一个对这种变动做出反应，二者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奥地利学派对完全竞争模型的批评也扩展到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竞争理论的发展。

竞争：古典学派的概念（competition: classical conceptions） 仅仅通过竞争原则，政治经济学就可以自诩为一门有特征的科学，租金、利润、工资、价格都是由竞争决定的。在经济理论各分支中，竞争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竞争的不同定义和不同价值理论间的区别是互相对应的。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必须弄清古典学派的竞争概念的含义。一般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机制由一般化的交易过程来完

成，其运行构成一个有规律的体系。正是通过对这种规律的描述、列举、分析、提炼，古典的竞争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首先，斯密解释了价格的形成，即竞争力量导致价格的变动和自然价格的产生，并建立了将价格和利润率的形成与整个经济组织连结起来的概念性结构。他认为，如果市场上的供给量低于需求，那么，其中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就会高于其自然价格，从而促使供给商提供更多的商品，以足以满足需求。这样，所有价格都迅速回落到自然价格水平。因此，在竞争性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种趋向：如果商品以自然价格出售，当市场供给量低于需求时，实际价格相对较高，反之则较低。这种竞争作用即是所谓的'供求法则'。市场价格之所以会偏离自然价格，原因在于隐含的额外需求，秘密技术优势，个人或公司保有的垄断以及独有的特权地位等。土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在竞争过程中不是被动的适应者，而是能动的经济人。其次，坎蒂隆和塔尔格特（Cantillon and Turgot）在讨论货币循环时，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思想。塔尔格特把生产过程看成货币循环的一部分，认为土地的开垦，商品的生产及商业的进行都取决于大量的资本或不断积累的财富。它首先由各阶层的企业家们预付，每年回报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利润，这种资本的不断预付与回归，构成所谓的"货币循环"。在此过程中，投资结构往往产生一个同一的利润率，并且来自于各行业投资资本的产品是互相制约的。每个社会都有一般的和平均的工资率和利润率，当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正好是以按照自然率支付租金、工资和利润时，商品就以"自然价格"出售，自然价格是一个中心价格，是所有商品价格不断互相作用的自然趋向。它来自于无所不在的竞争力，是自由竞争的价格。一般利润率由不同投资之间资本的竞争位置决定。李嘉图则着眼于资本的不同作用，他认为，资本家总是将资金不断地从不利行业转向有利行业，这是市场价格不能长期偏离自然价格的原因。物品价值是由物品的稀缺性决定的，因此有些商品需要"臆想的价值"，如古画，其价格不必与其自然价格连结在一起。在马克思那里，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般化的同义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地位的增长相关联。自由竞争消除了以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障碍，资本的积聚尤其是集中破坏或再造了竞争。作为资本集中最有利的杠杆之一，竞争的发展和一般利润率的建立密切相关，单一部门的竞争导致单一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多部门的资本竞争使各部门的生产价格趋向于其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资本无一例外地追求最大报酬，利润是由生产过程中人格化的资本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具有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特征，资本运动仅仅取消了那些限制资本积累的障碍。综上所述，竞争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仅仅认识到竞争力量的重要性是不充分的，这些力量必定通过一个建立其支配地位的过程和制度性基础来发挥作用，该过程即是实施和表明单个资本利润最大化企图的竞争。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行为的重要方面，不捕捉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提出任何一般的经济理论。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表明，可以从逻辑上对一般利润率和自然价格给出内在的解释，这种逻辑线条主要包括社会产出的规模与构成、使用中的技术以及实际工资三个要素。总之，古典学派的成就由两个独立的方面组成，一个是价值理论对象的特定化，另一个是分工理论对于那种对象的决定。支持前者的是竞争强加给的引力概念，支持后者的是理论抽象中内含的引力概念。古典学派对流动性的强调必须由存在于单个经济人之间的关系的定义来补充。完全竞争概念暗含了这样的观念，即经济体系中有无限多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表述事实上已经远离了古典的竞争概念。

竞争：马克思的概念（competition: marxian conceptions）　在古典经济学文献中，竞争是经济理论的中心概念，自由竞争被看作一个交易社会中组织化和均衡化的力量。马克思的竞争概念来自于他的资本主义企业行为理论，他把竞争定义为导致企业重组和技术变革的企业内部动力，并对竞争过程中固定不变的所有权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变动及其增长的驱动力是资本主义企业成长和扩充的目标。从企业内部动力来看，经济发展，积累和增长，老企业的衰落及资本的集中，都是竞争加剧的结果，竞争是资本集中最有力的杠杆之一，资本集中破坏或重构了竞争，竞争又促使更加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企业并不是根据既定的技术、价格和数量进行被动调整的虚弱的经济人，而是在可能的竞争链中，积极寻求生产重组和市场活动的能动者。企业也不仅仅是价格执行者，而且是根据竞争作用导致的市场占有情况的价格（或数量）的制定者。同类产品价格的差别在非均衡状态下存在，垄断企业被看成在某一时期，需求超过供给时"暂时垄断"的特例，或者是对土地和自然资源拥有所有权的"自然垄断"，在生产活动中，企业的重组和技术变革被看成是竞争的主要武器，企业的目标是捕获一个短暂的盈余利润，并把它变成长期增长的潜力。这一过程通过技术变革和创新导致，以继时性而不是以阶段性形式发生的失衡，而且，通过技术变化而来的竞争并不导致一种最优技术的存在，而是多种技术的并存。另一方面，马克思不仅把竞争看作通过企业内部动力导致不平衡的力量，同时也把它看成一种平衡性力量，其作用机制是：在不存在人为的或自

然的对于扩充投资领域，进出市场的障碍，劳动力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下，资本通过不断流动寻求最大报酬。在马克思那里，动态过程是资金离开报酬率较低的行业流入报酬率较高的行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业中相对的产出比例将会变动，导致供求失衡，顺次地使相对市场价格和利润率变动，进而导致作为吸引市场价格的引力中心的长期生产价格的确定。行业利润率和企业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存在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打破均衡的力量的大小，以及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调整的速度和难易程度。马克思在其竞争概念中，预见了由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带来的制度变迁或结构变动，竞争促进了资本积累的加速进行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育。在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垄断成为主要的理论问题。由于行业集中，不断增强的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联合三个因素的作用，导致了垄断价格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间利润率差别的持久性。在这里，大企业被看成是有自由定价权的经济单位，建立在局部均衡观上的成本加定价格取代了古典的和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应当明确，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垄断的原因，成本加成价格和报酬率的决定以及垄断对经济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等问题上，都存在很大分歧。如今，古典的和马克思的竞争概念有复活的趋势，它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问题上：(1) 在动态竞争理论和长期生产价格序列中，详尽描述成本加成定价理论，以解释竞争对于行业与公司价格及利润决定的作用。在这里，大公司的经济行为更多地以生产过程和企业组织的变动来说明，而很少以市场结构的变动去解释。(2) 竞争对于技术变革和创新的作用。由于他们忽略了竞争的反作用，当企业选择或通过竞争被迫选择一项技术时，有关未来技术和市场的确定性是无法预期的。结果，这种技术选择不仅难以模型化，而且很难给出更精确的结果。(3) 竞争对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作用。许多学者开始将马克思的竞争概念公式化，竞争的动态过程被描述为：资本根据利润率差别在行业间的流动。可以证明，价格、产量和利润率都是有界浮动或摆动的。然而，大多数人在分析行业内部竞争过程时，仅仅提到资本循环模型，却很少注意包含了固定资本，规模报酬或多种技术因素的行业内竞争模型。

竞争与效率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经济效率和竞争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的分析；在竞争模型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斯蒂格勒 (Stigler) 和奈特 (Knight) 都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不必仅仅在一个特定的市场之内存在，企业和资源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在行业内流动。市场由大量企业构成，每个企业都能达到一个有效的运行规模，这样通过市场的进出可以确保报酬的均等化。它使政策制定者们相信，即使没有经济调节的愚蠢作用，也可以达成令人满意的经济成就。问题在于尽管大多数市场都是自然垄断的，估计也没有人会支持完全竞争模型所需要的大量企业。在古典学派的文献中，德姆塞茨 (Demsetz) 指出，市场内部竞争的不合理性并不一定会妨碍市场的有效竞争。“处理技术自然垄断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公共企业或经济调节”的传统论点是片面的。例如，在投标系统序列中，特许不是回报给提供最大劳务的企业，而是回报给以最低价格服务于市场的企业。这种解释在市场和企业之间引进了一个新的机构——特许拍卖人，却隔断了市场竞争分析和确保有效行业竞争的进出市场作用的早期竞争概念之间的联系。由于没有考虑成本下降和不完全契约等因素，它作为一个对策建议，也受到了后人的批评。鲍莫尔、帕赞和威林 (Baumol、Panzar and Willig) 等人在其可竞争市场 (contestable market) 理论中，通过把新古典的（部分均衡）长期均衡理论扩展到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形，提出了一种市场均衡过程的模型，该模型由四个定义和两个基本命题组成。

定义 1、合理的行业轮廓 (FIC) 是 i 个企业的集合，$i=1, \cdots, m$，每个企业的产量向量为 $y^1, \cdots, y^m$，市场价格向量 P。每个企业赢得非负利润，总供给量等于总需求量，即对于所有的 $i=1, \cdots, m$，有 $py^i-c(y)^i \geq 0$，$\sum y^i = D(p)$，c 是最低成本函数，D 是市场需求函数。

定义 2、长期均衡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对于所有的 y，FIC 具有 $py-c(y) \leq 0$ 的特征。它意味着企业行为似乎是由准备进入市场，以市场现价计算利润机会的潜在的进入者控制的。

定义 3、可以生存在行业轮廓 (SIC) 是满足如下条件的 FIC，即对于所有的 $p^e \leq p$ 和 $y^e < D(p^e)$，有 $p^e y^e - c(y^e) \leq 0$。这意味着市场是由潜在的进入者控制的。

定义 4、完全竞争市场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出市场，以确保长期均衡是 SIC。

从上述四个基本定义，可以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 1、任何长期的竞争性均衡都是 SIC，而不是相反。这样，完全竞争性的市场是完全可以竞争的，而不是所有完全可以竞争的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根据这一命题，可竞争市场的概念可以在完全竞争情形之外使用。对于和可竞争市场中的均衡有关的效率特征，在单一产品情形下，SIC 可以解决次优问题，即企业在盈得非负利润的约束下实现福利最大化，当规模报酬增加到使边际成本定价无利可图时，最好的办法是根据平均成本定价。然而在多产品情况

下却不同。一个生产两种或多种产品的垄断者，一般能够发现无限多的价格组合，它们产生零利润。如果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可以有效地作用，那么存在一个唯一的福利最大化价格向量 p^*，可望的效率结果将是由单一元素 p^* 组成的集合 p。十分不幸的是，只有在 p 不包含 p^* 或 p 是空集时，实例才容易找到。

命题 2、在任何 SIC 中，行业的产出以使行业总成本最低的方式在企业间分配。根据这一命题，在多产品序列中，可竞争市场的效率结果是：市场均衡没有给潜在的进入者提供任何利润机会。这意味着多产品企业不能产生超过其成本的收益。这样，企业和资源的流动性即使不存在市场竞争，也能保证生产效率。总之，无论何种竞争理论，都无法回避竞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否则它就不可能阐明竞争在经济现实中的作用机制，理论就脱离了现实经济基础。

竞争与选择（competition and selection）　在竞争条件下，企业要想生存必须使其利润极大化。这种类似于生物自然选择的命题不仅在经济思想中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且可以明确地以经济选择过程模型来表示。在这个模型中，首先，企业合理行为的范围明显地必须扩展到利润最大化区域之外，同时结论却又必须包括适宜的利润极大化行为。一般而言，该模型具有一个特定的动态过程，有利可图的企业往往存在和生长，而无利可图的企业却往往衰落和失败。这个动态过程的均衡位置是一种“选择均衡”。其次，竞争的概念不必仅在完全竞争均衡序列中考虑，在更广的意义上，任何有价值的选择模型都是一个竞争性过程的模型。这一过程不一定拥有静态均衡或任何均衡，因为它可以很容易地导致非竞争性的结果。再次，在作为选择结果的竞争性均衡模型，“均衡”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前者是“没有改变行为的动力”，后者则指“动态过程的静止位置”，模型则试图以一种特定的方法把两种含义的均衡概念连结起来。模型的主要假定有四个：（1）恒常的规模报酬在特定的意义上意指，在任何特定时间，单个企业的供求函数可以表述为由取决于价格而不是直接取决于规模或时间的函数倍乘的企业规模（或能力）。这样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的情形就被排除了。（2）有利可图时企业必定扩大规模，而无利可图时企业必定减少规模或完全退出该行业。或者说，某个特定企业的有利可图性会导致对该企业行为的完全模仿者的进入。如果企业在对应于正的有利可图性的长期扩张意义上不追求利润，那么静止位置可能包含正利润。这种静态的均衡位置没有模拟竞争性均衡，然而却引入了如下可能性：生存企业的短期行为反应可能使在选择均衡规模上潜在可以获得的某些正利润消失了。标准的经济理论把对应于有利可图性的扩张看成企业寻求利润的一个方面，价格不受能力决策的影响。（3）在当时价格水平上产量为正的盈亏平衡企业不一定会改变其行为；一个在当时价格水平上仅仅盈亏平衡的潜在进入者不一定会进入市场。这一假定要求确保：竞争性均衡位置实际上是选择过程的静止位置。（4）最终的规定可以简明而不充分地表述为：“某些企业实际上必定是利润最大化者。”在这里，有两点值得特殊强调，首先是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规则和利润最大化行动的关系。一般而言，模拟一个特定的竞争性均衡的选择均衡必定是这样的情形，即企业在该竞争性均衡中采取利润最大化行动，企业是利润最大化者，然而这并不暗指选择均衡中的幸存者支配利润最大化规则。其次，利润最大化行为规则的概念本身取决于一个给定的生产集合或函数的概念性基础。这类模型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而非中心的位置，它们提出了如下事实，即标准的竞争性理论的均衡可以由选择均衡模型模拟，也提供了一种使有益的模型发展进入更广阔领域的途径，是对标准竞争理论赖以依靠的支撑点进行评价的基础。模型的弱点在于：选择为标准竞争理论提供的支撑点仅仅和均衡行动有关，却和行为规则无关。一个被模拟均衡尺度变化搅乱的选择系统，不管它与最初均衡显示的信息是否一致，都不一定走向新的模拟均衡。更基础地，选择研究并没有弥补由于生产可能性是系统的既定数据的假设而产生的标准理论的不充分性。要弄清竞争和选择的关系，有必要进一步理解熊彼特的竞争。在创新或模仿创新的竞争过程中，选择在两个相关的水平上进行，每个企业中支配现有产品和过程使用的组织路径通过市场位置相互作用，同时市场将报酬和惩罚分配给各个竞争者。在长期过程中，选择力的作用有利于这样的企业：它能获得连续创新带来的租金与产生这些创新的研究与发展努力的成本之间的有利差额。沿着这种途径构建的模型是一种静态均衡，它描述了不易以理论方法探明的复杂的随机过程。然而在极端情形下，足够高的创新成本和足够低的模仿成本却往往会导致对企业继续创新的抑制。熊彼特的动态竞争模型的一个基本成分是技术机会（或称潜在生产力），如果创新活动归结为一个不变的生产可能性集合，那么，技术机会可以说是不变的，技术机会的增加意味着创新扩大可能性的增加。当技术机会恒定不变时，创新努力的报酬是递减的，在邻近固定的可能性的边界处，这种报酬趋近于零。建立这种动态模型却是十分困难的。首先，技术机会模型化的实验性基础难以找到，而且创新的实际和努力都很难予以评估；其次，似乎并不存在可以由选择力表示的模型；再次，动态最优化的未来决定的特征与选择和适应过程反映过去经验的事实是直

接冲突的。如果企业看不到未来技术机会的路径，如果他们的决策仅仅反映过去的经验和推论，那么，一般而言他们不能最优地决定他们的未来位置。与静态均衡模型相比，熊彼特的竞争模型简要地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描述，然而有关选择的支架的力度的全面结论却明显更为消极。经济学应当更多地考虑经济现实，同样，选择模型也应更多地关注选择、适应及认知的机制，离开了大量的观察，这种研究就会失去了价值。

竞争政策（competition policy） 竞争政策的内容与作用方面，决定于竞争政策具体应用国家经济体系的国内结构和国际关系。

1、经济效率

战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产业结构和产业成就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某些国家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下降，在许多产业里生产集中加剧，而且由于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发展，新承受的国际竞争能力日益强大，出现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和生产能力过剩，出口联系不稳定，国外厂家逐渐占领国内市场。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各国竞争政策具体内容就反映了以客观需求管理政策为一方和以合作性与竞争性的干预主义供给战略为一方的二者相互作用。因此，关于竞争政策的考察，必须分析产业政策目标和形式的特定形成背景，分析整个经济战略与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贸易政策的联系。

在开放经济中，作为竞争政策基本内容的产业政策，其作用可以根据为维持有效率的生产过程来确定。所谓有效率，实质上是指国民经济必须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产品和劳务的需要，能够出口足以支付国家进口需要的产品和劳务，而且这些目标必须在社会可接受的产出水平、就业水平和汇率水平上实现。

在这样的框架中，可以认为竞争政策的角色就是调节经济行为以实现经济效率目标。如果从其操作性含义进一步解释，这就意味着通过调节竞争行为，以保证当前和未来所生产贸易商品的高质量和低成本，能够与国内和国外的同类产品供应有效竞争；意味着以最小成本生产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的非贸易商品；意味着竞争过程必然把充足的投入配置到配置政策目标所必要的产出部门。某些竞争行为有碍于整体效率目标的实现，所以竞争政策必须能够允许某些必要的非竞争行为。

2、竞争与竞争政策

在某些限制条件下，完全竞争将导致传统的帕累托最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但是完全竞争与相应的帕累托效率基准都过分严格而不能作为竞争政策分析的有用基础。隐含在完全竞争中的假设，几乎排除了与竞争政策相联系的商业行为的各个方面，忽视了通过改进国内产业组织来提高国家福利水平的可能性。甚至在其自身的严格假设的范围内，也没有提供非完全竞争经济应该采取的决策规则。因为如果完全竞争条件在某一市场遭到破坏，那么难以作为有关其它市场的一般性结论，产生了所谓的次优问题。帕累托效率基准不涉及包含有收入分配变动的经济变化，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应该采纳和我们在前面所建立的效率基准相对应的另一竞争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竞争的方法，把竞争看作是联系结构变化和市场行为的动态过程，认为竞争是以其它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的生产性行为，也就意谓着商业意义上的生产者相互较量的过程。竞争过程既可以采取生产者之间相互较量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进入那些预期收入富有吸引力的新领域的形式，而且采取价格竞争、生产技术改进和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等方法，所以最终影响到生产技术水平和改进速度，影响到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影响到市场结构的演化。

在任何市场上，具有最低成本的企业在既定市场价格下能够获取最大利润，从而拥有扩张的资金能力。因此相对低的成本是与相对快的增长相联系的，市场份额由低效率生产者向高效率生产者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机制对效率有反馈作用从而有可能引起创新。转移和创新机制对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竞争过程后果依存于过去与未来效率的关系、产业规模和成就。规模经济的利用或创新能力的增强，有可能使特定市场被数量越来越少而规模越来越大的厂家占领，最终市场由在过去竞争中其效率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的厂家所独占。然而，在达到这样的阶段之前，由现有厂家相互勾结而取得私人利润的机会就已显现出来。勾结可以在低生产成本基础上索取高价，竞争过程看来将以优势厂家的纯粹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形成而告终，从而最终消灭了竞争过程自身。这种状况会减轻不断提高效率或效率扩散的压力，市场价格较高而产出低于可能达到的水平。有进入壁垒限制的市场结构下的竞争，效率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会由于竞争过程的中止而恶化。

根据以上分析，竞争政策目标就在于辨认和管理阻碍转移和创新机制作用的市场结构、进入壁垒限制，阻碍竞争过程和产生以上效率损失的经济行为。在政策具体操作中，会产生建立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联系的困难。在开放经济中，市场与效率的标准是有国际性的，所以应该认识到，由于国际竞争的重要影响，不能仅仅根据本国生产厂家的集中程度来判断转移和创新机制的实际状态。

竞争性市场过程（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 根据风险承担的公平分配标准，由激烈竞争所产生的竞争性价格证明了自由放任道德观的正当性，但是在考虑到最优经济效率时，这一结论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观察到的商品价格降低是有效市场竞争途径中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最有力例证。从完全竞争的理论标准出发，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中出现的非价格竞争被认为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结果。依据资源配置无效率而实施干预，一直是以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利润的存在为转移的。到了七十年代，由于有关经验事实的总结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由完全和不完全竞争理论所衍生的市场集中度基准，其可信程度逐渐降低而最终被放弃。十多年的解除市场管制和支持自由的市场联合的历史，也积累了产业的静态和动态效率缺乏的经验证据。市场竞争过分激烈，即使在收入最可能趋向平等的条件下，也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经验事实也表明，复杂并且不连续的竞争仍然是解释企业间和产业间收入不断趋于一致的一种系统而且普遍的力量。

这种动态趋势在大企业间比在小企业间、在现在比在过去更为突出，但是它不能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解释，因为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是以承认在追求极大化行为的静态经济中代理人相互独立的原子主义为前提的；它也不能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理论来解释，因为某种意义的垄断力量的稳定位置越来越不明确，而且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情况不同，这种动态趋势并不与任何最优或唯一的产业效率状态相联系；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不能用新古典的市场上厂家数量标准来度量，因为它一开始就处在集中的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

应用博弈论重新建立竞争价值的一般理论，以解释当代市场条件下的价格行为，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已经出现了把博弈论引入完全竞争而把完全竞争对应于非合作均衡的研究成果。这样，关于相互依存并且动态的竞争将导致经济体系中收入趋于一致的古典经济学思想，又被重新引入。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并非所有的博弈都有正和的结果，从而竞争和经济效率问题就是开放性的而不象完全竞争的新古典基准那样自我封闭。

是否应该抛弃完全和不完全竞争理论所产生的思想包袱而使用古典价格理论从头开始来检验和解释收入一致的经验趋向？产业中固定资本流动的制度性条件在过去经济发展的二百年历史中是逐渐发展和进步的，而且一开始就不是在原子主义式企业而是在那些多角化经营的当代代表性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竞争策略的演变中发现的。在这些企业中，产业的最高管理集团在日常性事务中逐渐取代了银行家的传统角色，把资本从低收入领域向高收入领域转移。

如果资本束缚在产业中的固定资本上，在它的生命周期内一般是不具有流动性的。美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单一工厂企业所面对的资本流动壁垒也许是最坚硬的，由铁道企业首创的多工厂组织随后增强了资本的流动性，而后出现的联合制造公司、联锁分销制、康采恩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流动

除了以上影响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因素外，由巨型组织经济所决定的企业所使用竞争策略的数量，由大规模预算和大量雇员所产生的追求竞争利益的迫切性，都在不断增加。由永久性研究与开发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创新、促销活动、接管和剥夺、以及价格和信用竞争，使企业对市场条件变化做出反应和主动影响市场条件方面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是，原子式的企业或个人代理人在经济体系中自由流动并不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同义语，而是类似于乌托邦的空想。这里重要的是，保证资本自由流动的组织制度、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理论构造，但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是满足资本自由流动的假象。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大型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资本流动的壁垒在不断增加，整个经济体系的竞争程度是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这一观点也得到许多非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拥护。

即使不考虑企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的影响，资本自由流动在当代市场条件下也比在以前历史上任何时期内更加充分。世界经济进一步集聚，产品与劳务的创新加速，那些在市场上享有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拥有巨大的无所不包的信息网，如果说在长期缺乏理性预期的话，那么在短期内是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完全信息假设的。在满足人类基本需要之外开拓巨大市场领域的市场进程，是资本自由流动强化的另一背景。汽车工业的规模经济并不构成儿童保健业的进入壁垒。另外随着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企业资本越来越多地采用商业资本的形式，而这种人力资本比固定资本更富有流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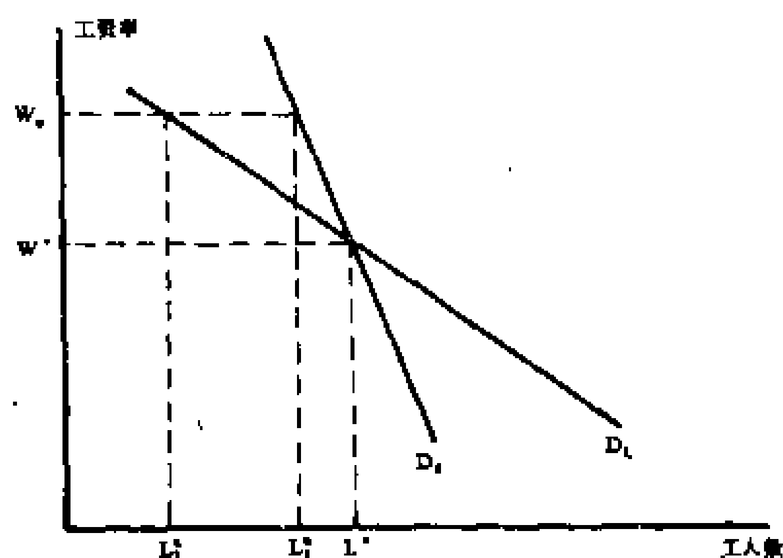
除了资本自由流动外，解释收入一致趋向的理论还有另外一些，如依据寡头垄断企业决策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来说明这一动态趋势。这些理论，不管是否与博弈论相结合，都超出了完全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范围。

各种事实证明，最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竞争日益激烈，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复杂性是持久地增加的。自由企业制度继续沿着促进资本流动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特别是近年来的美国，竞争的过分激烈已经影响到产业效率。这种变化完全是由变化自

身所形成的，而不是从属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竞争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是推动我们前进的繁荣发动机，看来现在有可能拖我们前进的后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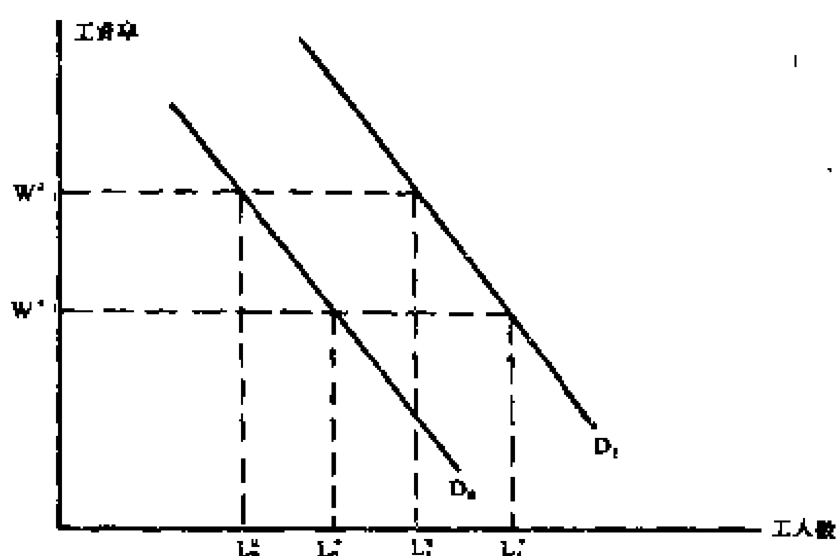
因此，经济思想和公共政策必须采取不同于或者是自由放任或者是垄断管制的二者必居其一选择的新内容，也就意味着，为减少某些竞争的激烈程度和范围对市场予以干预并不一定导致保护垄断或与垄断相联系的缺乏效率，而极有可能在促进经济增长或资源配置改善的同时，在收入平等方向继承风险承担分配的公平性质。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工会效应 当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时，劳动力需求曲线是下倾的，所以如果工会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成员的工资，同时就必然对就业造成相反的作用，简单地说，这就是所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工会效应。在不同情况下，工会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性质和幅度变化很大，其中最普遍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一个企业工会化，另一个是整个行业都工会化。只有一个企业工会化的情况如图一所示。在这里，我们假定劳动力市场最初是竞争性的，产品市场也是竞争性的。而企业是产品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如果它企图单独地提高价格，其销售（从而其就业）将降低到零。假设企业工会化以后，工资相应地从初始的均衡工资 W^* 上升至 W^u。工会合同一般具体规定工资率，也许还有些工作规则和工作条件，但并不指明雇用谁，也不指明雇用多少工人。（例外的情况将在超员雇用中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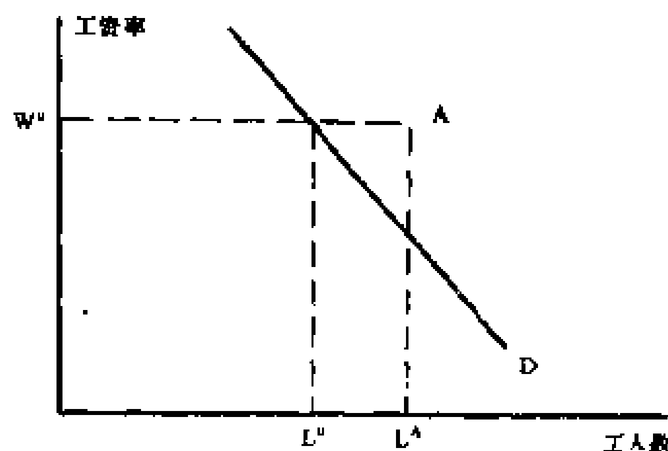
图一 通过工会增加协议工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

这样一来，企业就有两种选择：它可以提高其雇用标准，只雇用均衡工资等于 W^u 的那些工人；或者，它可以继续雇用同等技能水平的工人，但把雇用人数减少到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正好等于 W^u 的那一点。后一选择在图一中作了说明，它包括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劳动力需求曲线，分别以 D_s 和 D_l 表示。* 在短期中，企业将把雇用人数沿 D_s 从 L^* 减少到 L_1^u，对所有介于 L_1^u 和 L^* 之间的工人而言，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低于 W^u，因而雇用他们无利可图了。长期效应往往更大，雇用人数进一步减少到 L_2^u。这时工会效应影响就业的幅度取决于 W^u 和 W^* 的差别以及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弹性。除非需求曲线是无弹性的（垂直的），否则通过谈判增加工资总会减少就业。一般说来，需求曲线越有弹性，工资增加的负就业效应就越大；劳动力需求曲线弹性越小，工会的力量往往就越大。需求曲线很大时，工资增加引起的严重就业后果，将有助于抑制工会的工资目标。由于影响就业的其他因素也伴随着工资变动，上述效应在现实劳动力市场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情况如图二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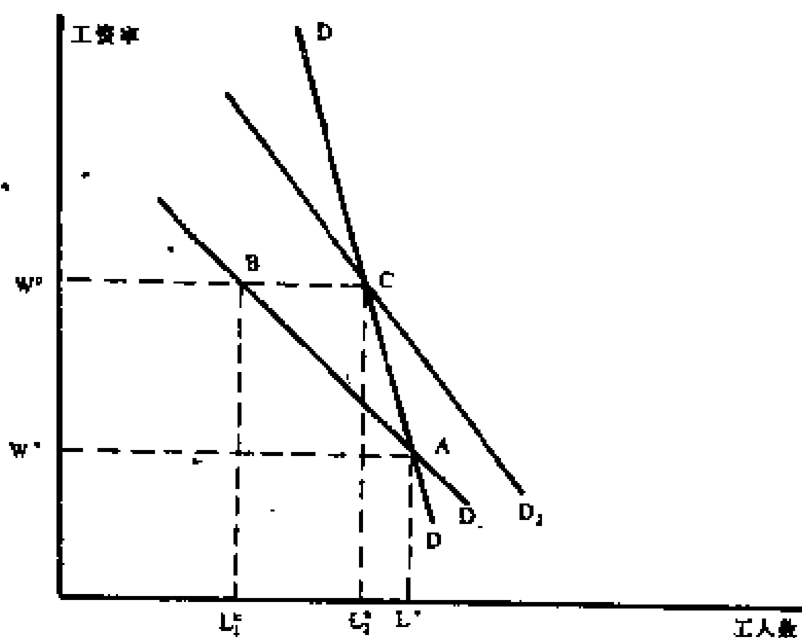
图二 劳动力需求增加时工会的就业效应

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由于产品需求增加或生产率的增长，每年以固定比率提高（外移）。图中，D_0 是本年需求曲线，D_1 是下一年需求曲线，W^* 和 W^u 仍然代表初始工资和工会工资。如果工资增加而需求不增加，就业便从 L_0^* 下降到 L_0^u；如果需求增加而工资不增加，就业便提高到 L_1^*。反映两种变化的实际结果是 L_1^u，即工资和就业都增加。对就业影响的正确度量是 L_1^*（它是不可观测的）和 L_1^u 之差。这种情形对工会来说比较理想，它对就业造成的不利影响牵涉到的是那些从未受雇的工人，而不是被解雇的现有工人。有时工会合同既指明工资率又确定雇用人数，工会力图把企业劳动力需求曲线外推以增加就



图三 超员雇用，使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外移

业，即所谓超员雇用的情况。典型的超员雇用情况如图三所示。在合同工资 W^u 处，如果允许的话，企业将雇用 L^u 个工人，一个超员雇用的合同将确定在 A 点，即需求曲线的右边，而 L^u 和 L^F 之间的距离说明了超员雇用的程度。在竞争性产品市场上，进入和退出行业生产不受限制，行业长期均衡价格就是各企业所获经济利润为零的价格。倘若工会化企业在未工会化之间获得的是零经济利润，那么工资成本的任何增加，都会造成其经济利润为负。除非企业受到震动而发挥出潜在的效率，或者因需求增加或其他降低成本的技术变革而得到援救，否则它最终会退出行业而转到其他行业以追逐有利可图的机会。所以，如果工会果真要提高工资，企业中的长期就业将下降到零。现在我们转向整个行业都工会化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变化多半会引起价格的变化，因为所有的企业现在都有着较高的生产成本，并且在任何价格下都只愿意供给较少的产品。新的长期均衡价格将高到使企业再度获得零经济利润。这种情况对工会来说显然更好一些。首先，不再有企业因经济利润为负而退出行业的问题，价格提高也允许企业安然生存下去。其次，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始终比只有一个工会化企业而它又不能提高价格时更缺乏弹性，这可以从图四的分析中看到。



图四　当一行业中所有企业都工会化时工资增加对就业的影响

初始情况由 A 点代表。如果工资提高到 W^u 而产出价格又不变，就业将沿需求曲线 D_1 跌落到 L_1^u（点 B），正如分析单个企业时那样。然而随着价格的上升，需求曲线也上移到 D_2，就业上升到 L_2^u（点 C）。尽管如此，甚至在价格上升以后就业也总会下降，因为更高的价格减弱了需要的产出数量，也因为现在每一单位的产出要求比过去较多的资本但较少的劳动力。企业的最终劳动力需求曲线是 A、C 的连线 DD，它比两条基本的需求曲线缺少弹性。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就是从 DD 这样的需求曲线推导出来的。这意味着行业范围内工会化的劳动力的需求曲线要比单个工会化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缺乏弹性。由此可见，对工会来说，建立全行业的组织显然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如何保持那种程度的工会化，因为工会化行业里无论是工资还是价格都已提高，这就为新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市场提供了潜在的机会，后者可以以较低的工资雇用生产率相同的非工会工人，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而压低工会化企业的产出价格。这种进入可能通过两种途径发生：第一，新的非工会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经营；第二，国际贸易为在国外生产的非工会化企业提供了一种进入国内市场的机制。这两种进入都将使工会化企业难以成功地维持其较高的价格，劳动力需求曲线会变得更有弹性，工会化企业不再能够获得经济利润。在现有工会影响范围之外的进入，对工会的力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工会有三种途径去力争维持其地位：第一，它可以劝说消费者购买工会制造的产品而不去购买同样的非工会制造的产品，这种战略的效力尚不明了。第二，工会可以尽量在新企业中把工人组织起来，从而把同样的工资成本加到新企业身上。然而这样做即使能够成功，它对外国厂商支付的工资也没有什么影响。第三，用进口管制来限制通过国际贸易的进人。这不是一个工会所能办到的，需要联邦政府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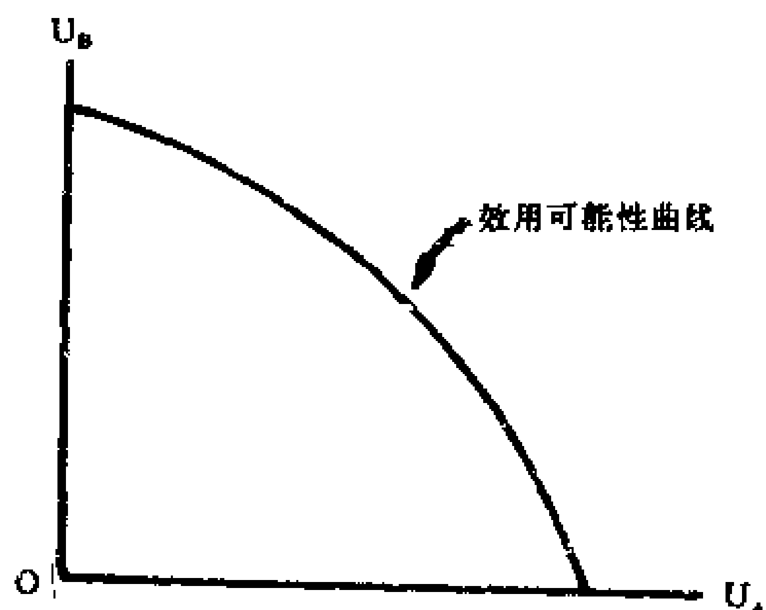
效用（utility）　边际效用学派的学者认为，所谓物品的效用，是指物品对人们的有用性，但这种有用性并不取决于物品本身所具有的满足人们欲望的性能，即物品的客观性能，而是取决于人们对于物品性能的心理感觉，因此，效用并不是物品的内在性能，而是人们欲望的反映，是一个主观观念，只有能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才可称为有效用，有效用的物品，又称为财富。

18—19 世纪，许多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A · Smith）、李嘉图（D · Ricardo）、穆勒（J · Mill）就经常使用“效用”一词，但当时并不注重区分效用是指使用者的心理感觉还是指所使用物品本身的性质，也不注重说明效用需求与商品市场价格三者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中，商品的效用是商品有价值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到 19 世纪中期，一些欧洲学者开始寻找效用与需求和市场价格的关系，英国人劳俟德（W · F · Lloyd）和西尼尔（N · Senior）认识了总效用和效用增量的区别，以及随着消费商品的递增，人们从每单位商品获得的效用递减，法国人杜比特（J · Dupuit）明确解释了边际效用的概念以及边际效用与需求曲线的关系；德国人戈森(H · Gossen）不仅指出边际效用递减，而且提出了边际效用均等法则。但是，这些观点中经济学界并未引起

什么震动，直到19世纪80年代，效用分析方法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美国人杰文斯（Jevons）奥地利人门格尔（Menger）和法国人瓦尔拉（Walras）几乎在同时发表了各自独立的论著讨论价值理论，其中大部分内容分析了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从而引起了著名的边际革命。虽然他们所采用的术语和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其核心内容都是一致的。此后，马歇尔（Marshall），埃奇渥斯（Edgeworth）等人又解决了个人效用函数与个人需求函数之间的关系，市场需求函数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到19世纪末，在马歇尔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边际分析已经溶入供求分析之中。至今，边际分析已不仅是消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广泛应用于生产理论，分配理论等方面。

对于效用分析方法，争论的最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效用究竟是基数的还是序数的，另一个问题是效用能否具有可比性。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都没有给出确切的讨论，但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将效用视为可以以基数量度的，而且具有可比性。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接受了效用可以基数量度和具有可比性的观点，基数效用成为马歇尔需求理论的基础。但是，埃奇渥斯、帕累托（perato）等人则反对基数效用的概念而认为效用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消费者仅能根据其对物品的喜好程度表明其偏好的次序，效用也无法进行基数比较，而只能进行序数比较。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分别演变成为基数效用分析法和序数效用分析法，其中序数效用分析法经希克斯（Hicks）、艾伦（Allen）等人广泛使用之后，已成为一般均衡的基础。

效用可能性曲线（utility-possibility curve） 效用可能性曲线是在交易的一般均衡条件下个人所获得的各种效用水平的组合点的轨迹。将产品空间的消费契约曲线转换到效用空间便得到相应的效用可能性曲线。下图表示的是简单的两人经济中A、B两个人的效用可能性曲线。横坐标为A的效用U_A，纵坐标为B的效用U_B。效用可能性曲线表明，要提高A的效用只能以降低B的效用为代价。在消费契约线上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的点是效用可能性曲线上生产与消费的帕累托最优点。在生产可能曲线上选择任一点都会得到一条新的消费契约曲线，进而得到一条新的效用可能性曲线。在每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上都存在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相等的点即效用可能性曲线上生产与消费同时达到最优的帕累托最优点，连接所有这些生产与消费同时达到帕累托最优点可以得一条总效用可能性曲线（grand uttility-possibility curve）。这条总效用可能性曲线概括了社会既定资源与消费者偏好下全部消费与生产的最优点。



效用理论和决策（utility theory and decision-making） 在效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是从二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的，这就是假设消费者面临的经济情况是确定的，以及假设消费者面临的经济情况具有风险性和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将效用理论与决策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在确定性的经济情况下，消费者每一决策的结果都是预先已知的，那么，设有集合x，其中的元素为商品束或决策的结果等，以符号>代表偏好次序，u为消费者对x集合的效用函数，对于x集合中的任意元素x和y，有关系式：

$$x>y<=>u(x)>u(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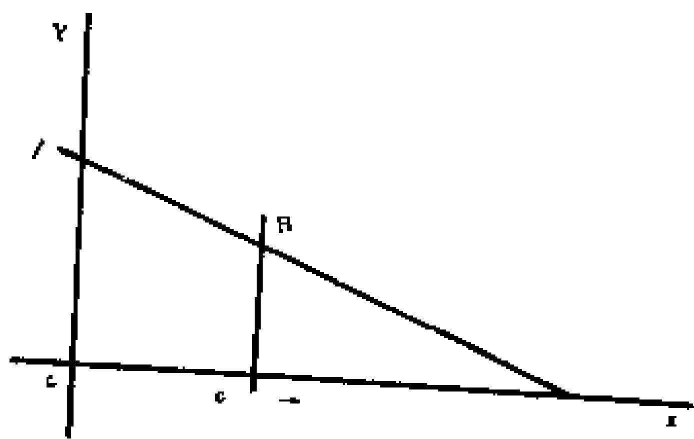
此式就是消费者在确定性下进行决策的效用表示方式，u为序数效用函数，作为偏好次序>，它具有不对称性，即：若x>y，那么就不会出现y>x；以及负转移性，即：若x>z，则有x>y或y>z；同时，若X是无限不可数的，在x中就会有一个可数的子集C_0，只要x>y，在C_0中就会有一个z，使得x≥z≥y，其中x≥z就意味着不存在z>x。

上述讨论是基于消费者已知其主观的效用，而通过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除此之外，萨缪尔森（P·A·Samuelson）和胡萨克（H·S·Houthakker）还分别提出了弱显示性偏好理论和强显示性偏好理论，萨缪尔森认为效用是抽象的、主观的概念，以这一概念为基础而建立消费者行为理论是不适当的，萨缪尔森认为应当改用所观察到的消费者实际购买行为，根据物价水平和实际购买量，分辨出消费者的偏好组合，萨缪尔森在需求理论中提出显示性偏好的方法后，人们将其与确定性情况下的决策理论相结合，得出了更为一般化的选择函数理论。设C为一个选择函数，对于每一个可行的Y，C(Y)为Y的非空子集；C(Y)为Y中最佳的，如果Y≤

Z，同时，Y⋂C（Z）是非空的，那么则有C（Y）=Y⋂C（Z）。

除上述在确定性情况下进行效用和决策分析之外，纽曼（J·Neumann）等人提出了不确定情况下的预期效用理论，以此为基础，经济学家对风险性和不确立性情况下的效用、决策进行了分析。

效用度（degree of ugility）　最早见于杰文斯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理论》（Theory of politicd Economy）。它的精确含义可由一个比喻准确地表达："效用度"与"总效用"的关系恰似"速度"与"空间位移"。假设我们把一个物体垂直上抛，在一定的速度下，我们可以先问抛出后的某一时点物体在什么高度，再问在这一过程中的任一时点上它移动的速度是多少。当然，其移动速度是指它的高度在上升时的速度，这个速度在每一时点上都是变动的。这里，"效用度"对应着"速度"，而"总效用"对应"空间位移"。为了更清楚说明这一概念，现在考察抛物体的经济类比。假如我们向一个饥饿的人提供面包，那么我们可以问这个人从给定数量的面包的消费中得到多少满足。这时我们是在测定这些面包对这个人的"总效用"。我们还可以问在这个吃的过程中的每一点上，面包的消费以什么程度给这个人以满足。这时，我们是在测定面包的"效用度"。这个"效用度"在每一点上都是不同的。当这个人最饿时，每盎斯面包的消费给他相对大的满足。到他吃完了，几乎饱了的时候，每盎斯给他的满足就相对小了。显然，"效用度"是"总效用"增加的比率，如同一个上升或下降的物体的速度是它的空间位移或高度变化的比率一样。



速度对空间位移和效用度对总效用的精确关系在数学上是前者可以通过对后者的求导数来取得。在几何上，如果后者用空间范围来表示，前者可以用线段来表示。如图，如果假设CD线从O点沿箭头方向运动，以固定的速度代表时间间隔。假设AOCD区域就代表OC方向上抛物体的空间位移，截距CD是AOCD的微分，代表抛物体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即C点向右运动，CD的长度就表示AOCD空间增加的速度。现在让CD直线从O向右的运动代表面包的消费，那么OC代表这一餐的任何给定时点上消费的数量，AOCD就代表达到这一点的消费所得到的总满足。CD代表每盎斯面包的消费使消费者总满足程度增加的速率。换言之，CO代表已消费的数量，而CD是在C点上面包的效用度。应该指出，图中的AD线实际很难是一条直线，最经常的是一条曲线，因此也就难以确定它的精确形式。

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　一种关于雇主为了提高效率会支付高工资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雇主要把工资作为刺激雇员努力工作的手段。雇员努力程度决定了经济效率，而雇员的努力程度又与工资状况高低有关。如果雇主所支付的工资高于其他企业从事同种工作的雇员的工资水平，雇员就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好工作"，并为了保持这种好工作而努力工作，这就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由此推出，雇主不愿意降低工资，因为这不利于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根据这种理论，工资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由于高工资刺激了高效率，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失业的存在就是必然的。

调查研究（Survey Regearch）　广义地讲，是人类自觉地能动地了解实际情况、分析研究问题、认识客观事物的活动。是人类借助于五官和仪器设备，通过思考认识客观事物的活动。包括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的认识活动，如物理、化学实验，天文观测、生物考察、经济调查，社会调查等。包括定性认识活动，也包括定量认识活动；包括对个体现象的认识活动，也包括对总体现象的认识活动；包括直接的认识活动，也包括利用现成材料的间接的认识活动。调查研究在客观实际与主观认识之间起桥梁作用，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狭义地讲，调查研究是调查者深入实际直接接触客观事物掌握第一手材料的认识活动，是研究和认识问题的重要方法。调查的方法很多，有普查、抽样调查、小组调查、动机调查等方法。普查是对调查对象全部地加以考虑，而抽样调查是对调查对象选出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并据此推断全部对象的特征的方法，这些资料通常具有数量性，或者属于可以用数量加以概括的类型。这种抽样调查方法是最先进的市场调查方法之一。但自从有了小组调查和动机调查方法以后，抽样调查作为市场调查方法来说，就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

调查理论（Search Theory）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基础上的：生产者只有生产成本，其交易商品，既没有运输成本，又没有交

易成本；市场遵循一价定律。事实上，生产者并不是按这些假定条件而行为的。也就是说，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是极为一般的情况。调查理论就关于搜集信息以及处理信息的理论，是根据一定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系统地对市场商品供求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的理论。调查理论分为两种，一是关于市场需求的调查理论，一是为市场供给能力的调查理论。生产者在决策之前首先要清楚的是市场需求有多大，而既定的市场需求情况下，竞争对手的供给能力有多大，其供给条件如何，供给条件包括产品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信赖程度等。资料收集过程就是对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的了解过程。而后的过程是分析过程，最后才是生产者的决策过程。调查理论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作用：(1) 正确认清市场供求状况，为进行市场预测和决策提供前提条件；(2) 有利于产品创新，消费者的需求是变化的，如果调查能够把握需求变化的趋势，就可以在生产决策中关注这一趋势，投入资本，而创造新的产品；(3) 调查理论为生产者提供科学准确的信息，使生产者避免了盲目行动，从而降低了生产费用。

调整与反调整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在西方国家中，调整是由政府所从事的旨在维护公众利益的活动。在美国，1887 年就建立了国家管理机构（州际管理委员会）来控制铁路货运和客运的价格。到现在，美国有 14 个联邦机构和 100 多个州机构来管理公司的经济活动。国家管理机构对铁路、公路、航空、电话等规定了最高收费标准，甚至对电力，天然气等行业的销售条件和价格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对私人经济实体进行管理以及政策调整的原因有：(1) 垄断势力的出现；(2) 避免过度竞争；(3) 外部的经济问题；(4) 提供充足的信息来源。通常的调整方法有：(1) 价格标准的确定；(2) 最高价的限定；(3) 罚款以及命令停产；(4) 制定各种经济行为标准，如污染物排放量标准等。调整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调整起到良好的作用，避免了垄断的存在，避免公司之间的过度竞争，提高了环境质量水平，促进了信息交流，提高了技术发展水平。但另一方面，调整存在着消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调整政策制定得不合适，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有时保护了落后。正是因为调整产生了不良后果，经济学家对产生不良作用的调整政策进行批评。反调整作为调整的对立面出现在西方社会。美国取消对航空领域的调整措施，是反调整的先例。此后，许多反调整的方法接踵而至。反调整取得成效最大的领域一是从未被调整措施所干扰的领域，另一个是调整措施造成后果最严重的领域。

调整成本 (Adjustment Costs) 它指的是，当决策变量改变时，经济行为人所要付出的成本。在经济行为人的最优化模型中，调整成本可以用来帮助确定决策变量的最优变化率。

调整成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调整成本，另一类是外部调整成本。内部调整成本指的是，当厂商将生产要素从生产领域转向投资活动时所要付出的成本。在生产要素的这一调整过程中，由于要进行规划，设计与重新组合，这些活动都会造成产量的下降，从而形成内部调整成本。生产要素向投资领域转移得越多，这一成本也就越高。

当某个厂商对某一资本品的需求占整个市场对这一资本品总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时，该厂商就处于对这一资本品的买方垄断状态。这时，如果该资本品的供给价格出现了上涨，那么这个厂商就面临着外部调整成本，对该资本品的需求越大，所要付出的外部调整成本也就越高。

从前面的定义可以看出，调整成本的概念总是与投资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有必要对经济行为人的投资行为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调整成本的实质，掌握它对投资理论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在厂商最优化模型中，假定厂商是生产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在满足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使企业资产达到最大，从而可以得到一系列优化条件：(1) 假设劳动是完全可变的生产要素，它的改变不会导致调整成本的产生，因此，最优化模型要求劳动的边际生产价值等于工资率。(2) 设资本为半流动要素，它的改变会导致调整成本的产生，因此，这就要求厂商一额外单位资本的影子价格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3) 厂商一额外单位资本的影子价格等于预期的资本未来边际产量的当前价值，而后者实际上是投资的边际收益。(4) 投资决策的动态性质决定了，它的优化行为要求当前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由这一投资所引致的边际收益的当前价值与未来价值之和。

在上述对厂商最优化模型的分析中，一直假定存在着调整成本。如果不考虑调整成本对模型的影响，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资本的边际产量的价值等于资本的出租率。这一结论的一个必然前提是，资本是完全可变的生产要素。可见，如果不考虑调整成本的影响，那么上述模型就回到了静态的新古典厂商理论中，在那里，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可变的。

在静态的新古典厂商理论中，对资本的需求只被视为一种存量，而不是对投资的不断需求。因此，它就无法正确地预测：实际利率的上升（下降）会导致

个别厂商对厂房与设备的投资出现下降（上升）。将调整成本的概念引入新古典的厂商理论中，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个别厂商对投资的有限需求，同时，也为个别企业的投资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持。

调整成本的引入还有利于合理地解释投资行为的可变加速数模型。假设生产收益递减，预期是静态的，将厂商的长期均衡的最优化条件进行线性近似，那么投资就可以表示成可变加速数模型或者存量调整模型：

$$\dot{K}(t)=b[K^{*}-K(t)] \quad 0<b<\infty$$

其中，K（t）为资本存量函数

K^{*}为长期中最优的资本价值

b为反应系数

"·"为时间导数

它表明，厂商最优的资本存量与实际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差别只是一个时滞问题。其中的b不固定，它取决于实际利率等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

此外，调整成本概念的引入还为托宾的投资行为的"q理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托宾在他的"q理论"中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边际q"，即一额外单位资本的市场价值与该资本的替代成本之比，另一个概念是"平均q"，即现存资本的市场价值与该资本的替代成本之比。托宾认为，投资与边际q成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二者之间的确切关系。此外，边际q不容易被观察，能否将边际q与平均q建立某种联系，从而使该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呢？引入了调整成本概念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这个模型通过设立一些假定，推出边际q与投资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使平均q能够替代边际q，从而使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

在前面的分析中，一直假定劳动是完全可变的生产要素，它的改变不会导致调整成本的出现。实际上，雇佣工人，对他们进行培训，这都需要花费成本。因此，更符合实际的情况应当是把劳动也看成是半流动生产要素，它的变化也会产生调整成本。

此外，调整成本不仅限于影响半流动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它还影响到流量与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见，对调整成本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可以广泛应用到许多不同的领域。

家户（Household） 通常也称为居民户。经济学中讲的居民户与社会学中家庭（home）的概念是不同的。它是最基本的消费者单位。微观经济学里所讲的消费者通常就是指居民户，生产者是指厂商。居民户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劳动力），取得收入。传统理论中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不作考虑，而假定各个成员的偏好是一致的，家庭的效用函数就是每个成员的效用函数。居民户就是个人消费者。此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居民户是一个统一的决策单位，社会分工与社会化大生产使生产与生活消费分离开来。居民户提供劳动力，取得收入只是一种手段，其主要经济职能还是消费，在一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实现其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居民户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的选择行为是体现理论化原则的，它是按照个人偏好，根据市场条件做出各种消费决策。传统理论还把消费者视作最后决定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主要依消费者的需求而定。在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的家庭经济分析里，又赋以居民户以生产者的含义，贝克尔认为家庭不仅是消费者，而且还是生产者，生产获得满足所需要的物品或直接生产某种满足。在家庭中，以每个成员的技术、知识、时间以及市场来生产食品，健康、孩子、技艺、尊严、声望等等。而消费行为只是一种中间手段，消费者用这种手段来生产最终满足。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在偏好上是存在分歧的。在这种分析里居民户的内容要丰富好多，而不仅是一个消费单位。

家庭生产（Household Production） 家庭经济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加里·贝克尔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有人把他对家庭经济的论述称为新家庭经济学。贝克尔把古典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到家庭经济分析中。传统理论认为，家庭提供生产要素，取得收入，通过消费活动实现效用最大化。贝克尔的看法与此有所不同。他认为家庭作为消费者不仅仅是单纯消费的人，它同时还是进行"生产"的经济人，"生产"就是指生产人们获得满足的所需品或者直接生产满足，而家庭自己是这种满足的消费者。家庭作为一个生产者，为生产自己所追求的最大满足，也就是最大效用，它使用的投入品有两大类，一是市场上购买的商品与劳务，另一种就是时间。时间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在贝克尔看来，家庭的消费行为只不过是一种中间的经济行为，消费者以这种行为来生产最终满足，通过这种行为实现效用最大化。例如人们购买汽车，并不是为了汽车本身，而是为了以汽车作为物质基础来生产服务和满足，以获取效用或使效用最大化。因此，人们买的不是一部汽车，而是一种使人们能方便地行走的手段，或者是一种在邻居和熟人面前出风头的手段。由此看来，消费者象任何一个有理性的经济人一样，进行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每天都要根据各种信息做大量的有关资源配置的个人决策，设法对各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家庭生产要考虑不同投人品的相对价格，尤其是时间和机会成年。任

何一种个人行为都可视为受个人货币收入和个人时间这两个因素限制的行为，这种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又称为称为最大化。贝克尔进而把家庭视为一个小工厂——由多人或一个人组成的单位。在此单位内，以每个成员的知识技术、时间和物品购进来生产食物、健康、孩子、技艺、尊严、声望等。最终还是为了效用最大化。上述观点受家庭社会学的直接影响，家庭社会学习惯于用家务劳动的概念将使用工具的活动 (instrumenfal activities) 置于市场中，而将表达性活动 (expressive activities) 置于家庭中。这就使大部分社会学家将家庭看作是一个生产者，或者将家庭活动看作是生产功能的具体显示。经济学中对家庭经济和家庭生产的上述分析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进展，但上述观点也同时招来了各方面的强烈批评。

家庭预算 (Household Budgets) 最早对家庭预算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伊登 (F·M·Eden) 于1797年出版的《贫困的状况》(The state of poor) 一书。为了度量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伊登试图弄清楚一个劳动者家庭一年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以及他们的消费品品的价格与数量，他从英格兰的50多个教区中得到了家庭收支的有关资料。伊登指出这些家庭所得 (earning) 的主要形式是收人 (income)(主要是工资收入)，花费 (expenses) 的主要形式是开支，(expendifure) 包括食品、租金、燃料、衣物等。也指出了家庭收入的获得者。虽然没有给出家庭消费品的价格与数量，但对家庭的组合与家长的职业 (occupation) 进行了准确分析。另一个分析家庭预算的早期人物就是恩格尔 (E.Engel) 他对家庭支出进行了统一的分类，大大便利了家庭间消费模式的比较。他提供的有关劳动者阶层的详细的统计资料以及其结论被后人总结为恩格尔定律。总之19世纪，对家庭预算的调查主要由一些私人来进行，直到近来官方机构才组织一些统一的调查。现在人们所说的家庭预算是指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如一月或一日）如何将其开支分配给已被定义好的各个项目或项目组上。通常项目是根据所调查家庭的统一的阶层体系而进行分组，现在的调查与分析注重于家庭开支，不同于早期的分析，其重点在家庭所得。所得的资料比支出的资料更具有敏感性，调查家庭所报数据就可能更不够准确。家庭预算的资料目前还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来取得，所考虑的家庭类型依赖于调查的目的。随着各种分析目的的出现，调查越来越细致，调查资料的分析价值也越来越大。家庭预算分析是了解家庭消费结构的一种非常直接明了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家庭预算类似于国家财政预算，但实际上财政预算通常以计划的形式出现，而家庭在决定将其收入用于各种类型的开支项目时，随意性很大。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不存在一个系统的详细的实际预算，然而家庭的支出结构却存在着稳定性，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家庭预算调查与分析的基础。

家务劳动 (Housework) 家务劳动就是在家庭范围内所进行的"生产性"劳动，这个"生产性"可以理解为有助于维护家庭的存在与发展，能为家庭成员提供某种效用。家务劳动包括孩子养育，提供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衣服、食品、住宿以及保持家庭的舒适环境等等。家庭经济的功能是确保人口再生产，并使成年人能在家庭以外从事取得收益的工作。家务劳动是社会与经济系统必要的组成部分。对家务劳动所要求的数量，家务劳动进行的形式及由谁来从事家务劳动，这些都随着时间、文化的不同以及在同一文化中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不同。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对劳动力按性别进行了分类。一般认为，男性从事户外生产活动并取得收入，妇女从事家务劳动且分享这种收入。尽管所有的成年男人都或多或少地分担一部分家务劳动，但妻子们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美国家务劳动的工作时间平均在30至50小时，工作时间随子女的多少及其年龄的大小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当然妻子在确保社会所需的家务劳动量完成之后，也可以从事可取得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妇女所完成的这种工作量十分有限，她们主要进行的是家务劳动—为其丈夫和孩子服务一而不是商品生产，这就使得她们在市场中处于次要地位。家务劳动在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里和在制度分析中存在很大差异。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家庭就是一个小企业，在一定的时间内和市场投入下生产某种商品。通过在不同的消费品组合间进行选择和对生产过程的改变，实现时间与市场物品的替代。妇女的工作决策是在效率基础上作出的，这样妇女的边际家务劳动或不取得收入的劳动等于边际市场劳动，即户外的可取得收入的劳动。特别地，妻子在将其时间与生产衣服、食品、舒适的家庭及健康成长的孩子时所用的市场商品的结合存在着伸缩性。但对美国的家庭操持和家庭预算的特有调查表明家庭操持者的时间与家务劳动所用的市场物品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关系。实际上母亲很少用可料理孩子的市场物品替代自己的时间，替代的倒是市场劳动与闲暇，因此，在制度分析方面的观点看来是由社会标准统治着家务劳动，由家庭提供的劳务与在外购买的商品与劳务不可比。家庭经济的特点是生产母性，对家庭成员的护理，和在提供衣、食、住中的人为照顾。市场提供更为精细的医疗服务、高等教育、交通、通讯、城区住房、社会保险；大宗生产的消费品。在历史上，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开始将一些家庭生产过程

(如织布、缝纫)从家庭转向市场，相对而言，市场生产更有效益。从20世纪早期开始，市场生产一些家庭从未生产的物品与劳务，如电力、汽车、高等教育、为了取得这些商品与劳务，家庭必须从事更多的市场劳动以取得收入。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家务劳动还应包括类似于市场劳动的内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就显得十分清楚。尽管对家务劳动的市场价值受到人们很大的重视，但由于家务劳动与市场替代品之间具有不可比性，使得这种估计成了问题，妇女运动中妇女对经济独立性和性别平等的要求使她们更明确地认为，家务劳动与市场劳动是相互冲突的。

家庭生活周期分析（Family Life Cycle Analysis） 根据家庭存在的各个不同阶段，确定每一阶段家庭生活特征，并以此来分析消费过程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这种分析主要是在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E·杜瓦尔（E·Duvall）和W·威尔斯（W·wells）等人所进行的。这种分析一般把家庭生命周期分为6个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消费特征。第一阶段是单身阶段，年龄在34岁以下，消费特点是收入较低，消费也较低，主要的消费是满足个人的需要。第二阶段是新婚阶段，指没有孩子的年轻夫妇时期。这时收入仍不高，但需求大大增加，增加了各种消费品，尤其是各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第三阶段是满巢（Fullnest）阶段Ⅰ。这时，孩子年幼，夫妇较年轻。家庭消费支出进一步增加，尤其是用于孩子的抚养、医疗与教育支出。第四阶段为满巢阶段Ⅱ。夫妇年龄在34—54之间，孩子较大。这时家庭收入达到顶峰，消费支出稳定。第五阶段是空巢阶段。夫妇在54岁以上，子女已独立生活。第六阶段是丧偶独居阶段，家庭成员为54岁以上的单身。这两个阶段家庭收入减少，消费支出减少。但医疗支出增加。各个家庭的消费结构变动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收入与消费间的关系，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动大体上是相似的。尤其是不同阶段家庭在耐用消费品、医疗、教育、住宅、休假等方面的支出，更能反映出这一特点。这种分析受到有关调查资料的支持，对消费者行为和市场预测有很大帮助。

资本主义（Capitalism） 又称"资本主义制度"，它指的是继封建主义制度之后，在西方国家中盛行的经济形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生产，交换与分配等活动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因此，资本主义又被称为"自由市场制度"。

一、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最早出现在14与15世纪欧洲南部的某些城市，在当时的罗马与希腊境内就已经出现了生产工厂。后来，资本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原始积累，以便尽早使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过渡，其中的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著名。在生产技术方面，18世纪30年代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使得大机器生产开始取代手工工具的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到了19世纪，英、美、法、德、俄、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建立了大机器工业与工厂制度。产业革命的完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制度，从此迅速发展起来。

二、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

在典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都对资本主义作如下描述：可以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一个大市场体系，其中由无数个厂商与家庭组成。这些厂商和家庭数目众多，分散决策，因此，谁也无法对市场价格施加影响。价格作为一种市场信号，可以为市场上的经济行为人提供完备的信息，调节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从而使经济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行为人在市场信号的指导下进行生产、交换与分配，厂商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家庭则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资本主义的这一特征最先由亚当·斯密系统地提出。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发展了重农学派放任自由的经济主张，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追求各自的利益，那么"无形的手"就自然会协调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决策，使得在均衡的价格下达成交易，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源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实现最大化。基于这种认识，斯密主张将政府的干预降到最低程度，只让它从事国防与建立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活动。这种自由放任的思想统治了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年，后来的不少学者都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形成一系列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流。

但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者的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与研究，对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进行了剖析，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庸，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是为了继续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他们的生活水平将走向绝对贫困；资本家通过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牟取利益，为了竞争的需要，他们拼命地扩大再生产。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购买力不断缩小的矛盾将会日益激化，最终爆发动摇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危机，苦难深重的劳动者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

三、资本主义的演变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多数西方国家奉行放任

自由的原则，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只为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保障竞争的须利进行。结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成为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

到了本世纪的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人数剧增，生产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经济学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西方经济理论也面临着危机。正在这时，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他指出，市场是不能完全自行调节的，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出面进行干预，通过税收与公共支出等政策来刺激经济，从而增加就业与私人投资，进而使经济尽快走出低谷。此后的40年中，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微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持续增长。二次大战以来，各国普遍推行公共教育，医疗、福利以及失业救济等计划，这标志着福利国家的兴起。

上个世纪末以来，寡头与垄断竞争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虽然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抑制垄断保护竞争，但是它们还是与自由竞争并存，一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三大竞争形式。此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得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这也是资本主义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

到了7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奏效。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不少经济学流派，它们各执一端，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佳方案。

目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

资本化（Capitalization） 资本化是指资本由于时间的延续和不同时间内利率的变化而在不同时间内只能获得不同的收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可以是土地、劳力、机器设备、一种思路乃至于金钱等等，它们都可以给资本持有者或拥有者带来一定偿付，但资本持有者担忧的不是能不能获得偿付，而是如何获得最大价值的偿付同时又不使自已的资本受到掠夺性的使用，即要便自己资本化的价值最大。他们雇佣一些代理商为他们代理资本的出租及其他业务，以便能获得满意的资本使用费。

现值是资本化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现值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资本货物或金融资产的价值等同于由资产产生的收益流量的总折扣价值。折扣因素取决于恰当时间内的利率。现值之所以存在，是基于（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必须获得一个等同于利率的收益这一事实，否则就会给套利者以机会，而这是平等原则所不允许的。因此，如 r_t 代表t时间内的利率，P'_t 代表资产的价格（不包括下期红利）而 d_t 代表其股息（或红利）则下式一定成立：

$$r_t = (d_{t+1} + p'_{t+1}) / p'_{t-1} \qquad (1)$$

因为等式右端等于资产所获得的利益，从（1）中解出 p'_t：$p_t = (d_{t+1} + p'_{t+1}) / (1 + r_t)$ (2)

用 t+1 代替 t，（2）式变为一个以 r+1，d_{t+2} 和 p'_{t-2} 表示的 p'_{t+1} 的方程，将它代入（2）式，并进行n次同样代换，变为下式：

$$p'_t = \sum_{i=1}^{\infty} d_{t+i} / \prod_{j=0}^{i-1}(1 + r_{t+j}) + p'_{t+n} \prod_{j=1}^{n-1}(1 + r_{t+j}) \qquad (3)$$

假设投机价格不会出现，上式最右端部分当n趋于无穷时趋于零，于是现值方程变为：

$$P_t = \sum_{i=1}^{\infty} d_{t+i} / \prod_{j=0}^{i-1}(1 + r_{t+j}) \qquad (4)$$

如另外还有一条件：利率 r_t 永远等于 p，那么，现值关系式可以写成：$p'_t = \sum_{i=1}^{\infty}(1 + p')^{-i} d_{t+i}$ (5)

在特殊情况下，即 d_{t+1} 永远等于d或是以g的比率从 d_t 增长，（5）式简化为：$= p'_t = d / p'$ (6)

或 $P'_t = (1 + g)d_t / (p' - g) \cdots$ (7)

一般说来企业总是选择现值最大的项目以取得最大化的财富。这个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决策原则即是现值最大化原则，它是一个不以代理商好恶为转移的正确的原则，它产生的消费结构决定了其他任何资本预算准则产生的消费结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准则。例如，接受偿付期最短的项目，或接受内部收益率最高的项目，都与现值最大化原则等同，在不定情况下，若假设为完全市场，资本预算的现值最大化原则可不带任何限制（除了折扣因素不必再解释为利率）。自从阿罗和德布鲁证明了这个问题以后，它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了。完全市场情况下，不定性可用简单的确定的新商品价值来表示不同国家的给定商品价值的手段来驾驭，所以不定情况下的分析也与完全情况下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有更多商品参与进来。如市场是不完全的，就会在这些商品和债券的交易中出现很多意外的与平等原则相抵触的出价。因此，即使所有代理商认为所有项目偿付的可能性等概率出现，但一致性已被打破，一些代理商可能签定一项肯定现值的项目而其他代理商却签定了否定现值的同样的项目。

在非确定情况下，现值关系可以写成：

$$p'_t = \sum_{i=1}^{\infty}(1 + p'_t)^{i} E_t(d_{t+i}) \qquad (8)$$

（8）式与（4）式不同之处仅在于将左端的未来股息

换成了它们的期望值，而 p'_t 并不限定等于利率，但 (8) 式近乎于没有价值，它只是说存在着折扣因素 P'_t 的一定顺序，使得未来的期望股息与现在资产价格相一致。一个自然的特例是假设折扣因素的永久不变性：

$$p_t = \sum_{i=1}^{\infty}(1+p')^{-2}E_t(d_{t+i}) \qquad (9)$$

这种关于现值关系的说法已得到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些早期金融财政著作中。很明显它的意思是说：

$$E_t(r_t) = p' \qquad (10)$$

即资产的条件期望偿付利率等同于一个永恒不变的，不依条件变化的规模。这个强硬的限制给大多数被称为资本市场效率的经验检验提供了基础。如 (10) 式正确，没有任何可公开取得的有关 t 时期的信息与 t 到 t+1 期的资产偿付利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公开信息。

现值关系还可从它的冒险却能获利的含义角度解释。如 (9) 式那样，定价为包括资产和再投资的所有股息在内的共有基金的价值 X_t，则此基金会导致一个以 P' 递增的再投资，即

$$E_t(X_{t+1}) = (1+P')t \qquad (11)$$

在此式中，假设共有基金包括 h_t 股资产，则有：$X_t = h_t p'_t$ 和 $X_{t+1} = h_{t+1} \cdot p'_{t+1}$ 当股息收入被再投入时，h_{t+1} 由 F 式得出：

$$h_{t+1} \cdot P'_{t+1} = h_t(P'_{t+1}+d_{t+1}) \text{ 即}$$

$$E_t(X_{t+1}) = E_t(h_{t+1} \cdot p'_{t+1})$$

$$= h_t E_t(d_{t+1}+p'_{t+1}) = X_t(1+p') \qquad (12)$$

从 (1) 式与 (10) 式，可看出股息付出需修正。从 (10) 式推出：

$$p' = E_t(d_{t+1})/P_t + E_t(P'_{t-1})/p'_t - 1 \qquad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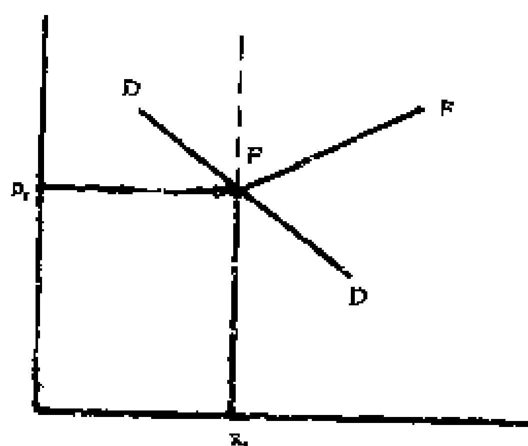
因此，期望股息收益的变化总是一对一地被资本期望收益率所补偿。如 p'_t 自身是一个再投资额，那么资本期望率将说明 p'_t 永远是一个期望股息的倍数。但这并不说明现值关系（例如把股息看作是由一次自回归过程所给出的）。因此，p'_t 自身不会随再投资的出现而出现。如未来价格被假定等于恰当时期现价的条件期望值，那么未来价格会随再投资的出现而出现。如利率偿付期结构随期望假设变化，那么由偿付期结构所显示的未来利率会随再投资变化。如一个有限资源的拥有者们用最适当的速度来开采资源，那么某种程度上，储量价格将以等同于利率的速度向再投资额趋近。

期望现值关系有资产价格活性方面的含义。通俗地说，期望现值关系表明股票价格象一个持有股息流量所有权凭证的变动均值，因为一个变动均值比其组成部分更平滑，它导致股价应该表现出比股息小的特性。

由于资本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分开的，资本使用权的转让要求有一个租金作为使用的偿付，这就涉及一个如何根据资本的内在使用潜力确定租金的问题。

租金是使用资源而付出的酬金，无论这个资源是土地、劳动力、设备、思想乃至金钱，典型的劳动力酬金称为"工资"。而为使用土地或设备付出的酬金称为"租金"，使用思想的酬金称为"专利使用费"，使用金钱而付出的酬金称为"利息"，对早期经济学家来说，租金意味着使用土地的酬金。后来由于认识到了土地这种有特色的东西：特殊之处在于它预先假定的取之不竭性（其价格总是不确定），对于那些取之不竭（无费用支出而永久存在）和毫无争议的资源来说，其价格是不变的，在经济学术语中，现在和未来可得到的资源数量对价格来说是完全无弹性的。

在经济学理论中，为使用可得的、对所付酬金多少反应不敏感的资源而付出的酬金称为"经济租金"或"准租金"。这种租金依赖于其价格的不敏感性是永久



（图一）

的还是暂时的，此外，它也可用图一中在 X_r 点的垂直供应线来说明。对于所有价格，供应是连续不变的。全部资源偿付是"经济租金"，如这些资源的合计量在未来随着更多取之不竭的资源的发现和价格的升高而增长（但在某时间可得的资源数量一定，无论其服务价格是多少），现时刻的供应曲线都是垂直的，未来的供应数量将从现时刻数量倾斜向上。正如图一中 FF 曲线所示，长期租金将为 P_r 而股票平衡数将为 X_r，在这种股票平衡数下，"市场供应"将为一垂直线，因此，取之不竭的资源的供应将依赖于对现价起作用的过去价格，而现在供应量与现价或现在的租金是无多少关系的，偿付可被称为"经济租金"，除了没有任何常规形成与这种取之不竭而扩大的资源有关的术语。

准租金与"经济租金"关系密切，是一个先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运用的术语。至少在很短的时间内，现存的资源对价格的变化没有反应，偿付近似于"经济租金"，供应数量将因产量或现在的替代品而改变，但可供数量不是对趋近于"准基金"的价格马上起反应

的，这意味着偿付变量对现在提供给需求者的数量不起作用而对将来的供应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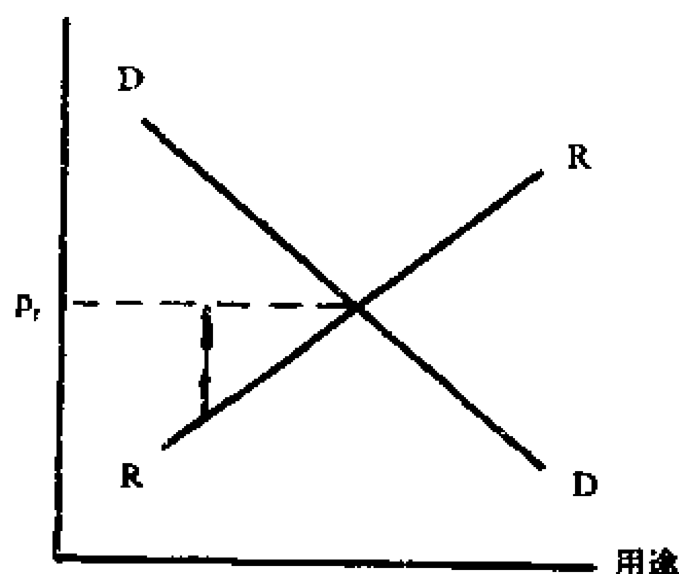
如一个资源的租金流量超过其生产的成本，那么现存资源的承受力将继续提供资源，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即使租金没有补偿生产成本，而能补偿包括利息在内的使用成本，则它在一定时间内仍提供资源，任何超过现在成本的部分称为"准租金"，在供过于求时，"准租金"与"经济租金"相同，尽管是暂时的，除非不能补偿所有的"准租金"，租金流量将在未来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保持不变，直到资源价值减少到不足抵偿清偿价值，如资源能获得超过所有以前参予的或已实现的生产和操作成本的报酬，那它就能获利，即比资源纯投资成本利息要多，关键在于"准租金"是否只超过了剩余资产操作成本的最低价值。

如两个不同持有者的资源之间差别很大以至于其联合利率高于他们单独使用时的利率之和，则此联合利率就被称为"混合准租金"，不过有一假定，即这两资源是由于特殊的内部相关的投资而造成其差别之大的。这一概念是马歇尔创造的，易为人们所忽视，但实际上，其作用却很重要，原因很明显：如出现资源之间互相以它资源的存在为条件而存在，则"混合准租金"间的联合就会成为一个持有者集团吞并另一个持有者集团，特别是当一个持有者集团持有高可变作用的可控流量时。

一些独生资源的租金可能不同于并将导致与最高价值利用所不同的利率，这些不同点就称为"李嘉图租金"，这出现在所有单个资源如此利用和用作其他被认为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情况，对一些问题来说，"共生"这个不精确的词可能是一个简略的概括，但如用来解释各个单位的租金，则会引起迷惑与误解，资源价值乃至租金，因其用途的原因在这里可能是不同的，尽管在其他地方可能与所期望的相同。不论其独特作用是天生的还是由于偶然事件造成的，其在用途上的特性会反映在偿付值上，这一偿付值经常被称为"李嘉图租金"以区别于那些依靠垄断或人为的限定潜在竞争对手而获得的租金——垄断租金（对受保护的资源来说）。

区别租金是从反面但是同质的不同角度来说明租金的。各个资源单位在这里被认为是与期望的价值都相等的，而在其他地方可能其利用价值是不同的。如图二所示，连续单位的区别租金可从价格线与 RR 曲线的不同来说明：这两条曲线是将单位从最低利用价值向最高利用价值排列，这些被排列的曲线的价值与其他情况下的价值是不同质的。因此尽管此处用处相同，但称之为相同商品的连续单位将会导致错误，他们不是完全同质的，否则，就会有与其他单位相同的利用价值和租金，象 RR 这样的曲线与马歇尔的特殊消费曲线是等价的。马歇尔曲线是按各单位的生产成本和其他场合的利用价值把单位由最低向最高排列的，这里的价格和租金的区别和 RR 曲线上的价值就被称为"生产者剩余"或"区别租金"。总的说来，"区别租金"指出了最佳选择用途价值不同而在此处租金价值相同的各单位之间的差别。

资本的拥有者们要求资本在利用中能获得所期望的价值偿付，这也可说是一种对资本使用偿付的"偏好"，且他们对应得的偿付有着不可侵犯的权利，不愿让任何人分享他们的资本收益。蒂博特假想反映出



（图二）

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层对资本收益的不同要求。

蒂博特假想指的是存在一种揭示把提供的公共商品当作消费者意愿，可以根据"偏好"选择的一种途径，明显的应用是许多自治区域提供地方政府以公共商品，例如初等、中等教育、警察、救火队、上下水管道设施等。蒂博特最初的思想可见于他 1956 年著名的论文中。他为消费者们提供了一种偏好选择机制——机动性。即到他喜好商品所在区域去，使能不断发现自己喜爱的商品而完成他的需求曲线。

蒂博特的观点自出版后被闲置了 10 多年，当奥茨出版社注意到税收和学校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产价值这一反应时，开始把兴趣投向蒂博特的观点，结论很简单——消费者们在选择住处时考虑了学校和税收上的问题，蒂博特关于消费者行为的论述看起来是正确的，而资本化在对蒂博特假想的现代看法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奥茨 1967 年出版的书中得出了有关资本化的结论，在书中，发现了有高中消费支出的区域的财产价值。从反映来看，很明显这个资本化作用是人们享受高质量学校特权的一部分，它表明需求价格对边际消费者来说超过了生产成本。反过来这也可能被解释为对高质量学校需求过旺的证明，在上述可变社会集团模型中，可能导致高消费社会集团的形成，而这反过来会抑制资本化作用。根据这种解释，奥茨关于资本化作用的观点与蒂博特在竞争模型

中的短期利润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资本化价值（Capitalied Value） 在经济学中，资本是指被用来生产产品和劳务的资源。古典经济学把它与劳动和土地并列，称为生产三要素。资本可以广泛地定义为所有可能的实物，非实物形态的投入和生产过程中人的投入，然而更有用地，或者说更有实际意义地，应把资本定义为厂商所拥有的实物资产，即厂商为从事生产而投入的要素，厂房，机器、工具等物品。从企业角度看，资本是厂商的总财富，有两种形态。首先是货币，也称为金融资产，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无形资产，一般被用来投资，第二种是资本品，也称为实际资本，实物资本，它是有形的实物，诸如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被用来生产其他产品和劳务，还包括原材料，材料和燃料以及工人的货币工资。

资本化价值是指赋予资本的价值，无论是有形资本，还是无形资本。这种资本要按现行市场利率获得该资本现有的收益。例如，一种资产，假设为企业的机器设备，可以产生 10 英镑的收益，现行利率为 10%，那么这台机器设备的资本化价值是 100 英镑。

这个问题有时会引起争论，用这种方法估价资产值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尤其在强行购买情况下。这是因为资产所有者对自己的资产价值可能估价较高，从而准备以较高代价保住它。

资本生产力（Productivity Of Captlal Stock） 每单位投入资本的产值。资本生产力是物质生产能力与现存资本设施和设备的实际价值的比率，物质生产能力是产品生产能力或产量。但这些产品的产量是指可以被社会认可，即可以被购买被使用的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很多，但有效产品可能不多，原因是大量产品成为过时的积压的产品，资本设施和设备则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资本设施和设备包括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从狭义上，资本设施和设备就是生产产品时的直接发生的资本投入。根据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有的经济学不仅将企业的主要生产对象视为产品，而且将形成环境污染的因素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也视为产品，这些是有害物，其价格的大小应该等于其对环境的边际破坏力。资本生产率决定于技术水平、资本大小和性质、组织与管理水平，等等。资本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来源有如下方面：投入资本的质的变化；资本货物使用中效率的变化，提高对资本设施的现有的生产能力的技术进步。生产力的增加有两个原因，一是资本生产力的变化，二是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表面上看起来是资本生产力的增加，但实际上可能是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因此，提高生产力除了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量以外，更重要的是提高资本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而这又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合适的教育政策、就业政策等。

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 指的是为了避免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资本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进行大规模转移的现象。造成资本外逃的原因有通货膨胀、没收性税收、货币贬值、政局动荡以及战争等等。资本在国际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使得国际资本流通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出现大规模的货币投机，给资本外逃的国家造成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该国的官方外汇储备枯竭，并且无从获得国外的贷款。还有，在资本外逃期间降至低谷的利息率，在形势缓和之后仍无法提高，否则就更加剧了动荡的形势。为了避免破产，也为了使经济走出低谷，资本外逃国家的政府有时被迫冻结外资，实行汇率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向出现资本外逃的国家发放短期贷款，以此来帮助该国缓和局势，也控制货币投机的进行。二战以前，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资本外逃，首先是普法战争期间，法国资本大量涌向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从轴心国逃出，涌向瑞士、瑞典、荷兰等中立国家。这些中立国的投机商大量低价购买交战国的货币，以图战后牟取暴利。一次大战结束后，资本又从战败国中大规模逃出。在这期间，瑞士等中立国成了资本外逃的主要去向。70 年代，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与美国也出现了资本外逃，但都不是象以前那样出于政治的动荡，而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税负太重所致。

资本利用（Capital Urilization） 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对资本利用有多种解释。如果我们使用一台机器，使用一天，那么通过改变操作期限，这一天内就可对机器有不同水平的利用；即使使用一天的期限是固定的，仍然可通过改变机器的运转速度而改变机器的利用率。这两种情况虽然都是对资本不同水平的利用，但在物理特性和经济特性方面二者差别却很大。另外，即使这台机器的操作期限和速度保持一致，也有些学者从与最佳日产量相联系的某一机器日投入量的变化上来定义资本利用，其含义是资本能力的利用，总之，资本利用是指对资本的使用期限，使用效率进行选择，以便使资本达到最好的利用效果，取得较高产量水平。

对操作期限的探讨可追溯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体系蓬勃发展时期。早期的著作强调关系到工人的社会后果和资本家的经济后果的劳动时间长短适度的问题。这些观点是在对英国各种各样的工厂行为讨

论争辩中提出的，这些争论通常假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是相同的。

理论的现状

当代有关资本利用理论的贡献在于把期限选择与关于企业方面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其方法是通过利用以二元论为理论基础的模型，来推导出结果。

企业的最优配置问题被认为是一个两阶段的过程。在第一阶段，决策者设计不同期限水平的成本函数，在第二阶段上则从这些成本函数中选择费用最少的一个。资本和劳动力两种投入的结果为:

$$C^* = DC(W^*, r^*, x^*) \qquad (1)$$

在某一已知的参考单位期限下，W^*代表平均工资率，r^*代表资本劳务的价格，x^*代表产出的水平，而 d 是代表操作期限的一个指标，c 是一个古典成本函数，c^*代表在最优期限水平的总操作成本。

公式(1)对几乎所有有关资本利用或轮班作业问题作了分析。由温斯顿、麦考尔、贝利、贝坦考特和克莱格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结论：(1)高轮班差异或加班率由于增加 W^*，因而有害于资本利用，(2)规模报酬程度高的技术由于在低水平产出（X^*）时增加了操作成本，也会有害于资本利用；(3)高资本密度的技术会鼓励资本利用，因为它导致相应的资本成本（r^*）的下降，从而产生一个比较高的成本百分比；(4)具有充分事前替代可能的技术鼓励资本利用，因为也可以通过建立一资本密度更高的工厂来降低资本成本（r^*）

这四点是费用方面最优极限的长期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还有资本利用决策的两个特点也值得一提。第一，在高资本利用水平下工作的工厂应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第二，投入成本的外生变化如何影响期限，在规模报酬保持稳定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前替代弹性。

对(1)加以逻辑推广；在获得最大收益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对日产出量进行外延上的选择，在上面讨论结果成立的同时，我们还可获得另外的结果：当规模报酬的程度依赖于产出水平（x^*）时，正如标准 u 型成本曲线所描绘的：日产出水平越高，在需求情况良好条件下，高资本利用的体系越可能有最大的收益。

在作短期考察时，高资本利用在反映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因为在作短期分析时，资本利用加倍意味着就业和产出的成倍增加。

速度和能力是与资本利用期限有关但又有区别的问题。我们先考虑成本函数（1）的一个二元情况。即:

$$x = df(k, l) \qquad (2)$$

这里 x 是日产出的水平，即 $x = dx^* = df$；F 是定义在考虑期限内的新古典生产函数；k 代表使用的资本存量水平和资本劳务率水平。函数中操作速度(v)是稳定的并且有统一的规定，l 代表单位参考期限时间内劳动力提供的劳务。但如果要通过选择速度来分析资本利用的变动情况，那么还得以下面的式子来反映生产过程:

$$x = f(vk, l) \qquad (3)$$

这里所有的变量前面都已定义过了，在（3）里对期限有统一的规定。

使用（3）式的学者假设资本价格是速度或可利用递增函数，因为成本被定义为 $C = r(v)k + wl$，$r'(w)$ 0，那么通过增加速度而得到的单位资本劳务的成本是关于 v 的一个增函数。在二元模型里，资本存量价格 $r(d)$是期限的一个增函数 $r'(d) > 0$，而且通过延长期限得到的单位资本劳务的成本则是期限的一个减函数，即 $R^* = r(d)/d$，$r^{*\prime}(d) < 0$。这里的不同在于：在只有一个资本利用变量的模型里，如果这个变量既代表期限又代表速度，用这个模型来反映生产过程只会导致毫无意义的经济结果，因为计算成本结果只能反映这两者中的一种。

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中，我们得到"速度"模型的另一个有趣的特性，如果 V,K,L 都作为选择变量，在最优情况下，$r(u) = r'(v)v$。当期限和速度是外生时，根据这个特性可推知 $r(v,d) = r_v(v,d)v$ 以及最优速度取决于最优期限的结果。

有块把资本利用认为是资本能力的利用。他们的主要论点如下：假设生产函数:

$$x = F(k, L) \qquad (4)$$

这里所有变量定义如前所述，对速度期限也都有统一的规定，利用（4），潘策尔(panzar)（1976）对能力的定义则变为:

$$h(k) = M_{ax}F(k, L) \qquad (5)$$

这里 h(k)是 k 的增函数，这个定义推出了产出基础上对短期能力利用的定义。即:

$$CV = x / xM_{ax} \qquad (6)$$

在此 XM_{ax} 由(5)式给出。

以产出量来衡量资本设备的利用。如衡量发电机的能力时，我们可以同时直接测量出(6)式的分母和短期资本利用与能力利用情况。但一般说来，对（6）式的分母并没有很好的定义。

总之，资本利用与能力利用是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我们不能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资本品（Capital Goods） 资本品亦称"实际资本"是指从事物质生产的各种固定资产。一般它是作为一种实际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的，资本品包括

生产用的厂房、机器设备，运输车辆，辅助设备等，但不包括土地和货币。一个国家的资本品则包括了它所拥有的铁路、公路、港口、设备、发电站、水坝、工农业机器设备、工具及各种原材料等。资本品的作用是生产，但不同于劳动力和土地。它既作为一种产出，同时也作为一种投入。因为实际资本不是生产的一种"原始"因素，而是某种过程的结果，它作为决定因素之一参与该经济过程。实际资本的形成或投资在生产中起决定的作用。

资本品一般区分为固定资本品和流动资本品。有时也把耐用资本品同固定资本品区别开来。这二者的区分关键在于前者不只包括厂房机器，还包括建筑和其它工业基础设施的必要部分。固定资本品在一年中只是部分地被消耗；而流动资本品则由原材料的存货和半成品等组成。在生产阶段用完的资本必须全部得到补偿。资本至少有两种不同属性：作为实物的资本和作为价值的资本，从技术经济的观点来看，生产是一种任意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马克思强调，当生产的手段和劳动者被区分开来且生产手段属于资本家时，在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作用下，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工具便成为资本。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手段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资本品被理解为异质商品和在生产中有特殊用途设备的总和；另一方面，它又被看作异质价值基础和利润形式下的"未付"工资的源泉。由于资本品具有非同质的特性，因此，如何衡量资本数量的问题成为经济理论中争议颇多的问题。

资本品存量的数量主要由过去投资消耗的积累总额决定，也可以由预期的在参照利润率下折算成现价的未来资本净回收值决定，对应于某一生产系统的资本品价值，虽然有相一致的技术，但无论用哪种单位来计量，还是会随着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当利润率或实际工资率变化时，现行的相关价格也会随之变化，以致于相同的物质资本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而不同的资本品存货可以有相同的价值。

计量资本品存货的另一种方法是按照直接或间接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在给定的利润率下，对劳动量进行时间化。在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分析中，她称之为"实际资本"。而斯拉法（P.Sraffa）认为，独立于分配和价格之外的任何可测量数量的资本概念是不可能存在的。

只要个人关心他作为财富收藏和收入来源的资本品的拥有程度，整个社会就不会面临为钱和信用而买卖资本品的问题。较大的产出显然需要较大数量的资本品，在给定的生产力利用程度和技术条件下，额外的资本品只能通过积累或净投资过程来提供。

关于资本部类的划分问题在对国内经济研究中，弗里德曼（Feldman，1928）和洛（lowe，1955，1976）均强调资本品在生产中的全局意义，两个作者都以马克思著名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结构为出发点，并用更恰当的方法加以修改，认为在第一部类中应包括所有使生产产品的经济能力增长的活动。

机器工具部类的全局作用和强行扩大在资本品工业中设备的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家讨论不发达国家的增长和计划问题时，也曾提到过。象印度这样机器设备不能自足的国家，只能通过外贸来加速工业化过程。如国内生产机器设备不足的部分不能用进口来补充的话，将出现资本品紧缺，从而影响工业化过程。

在具有全局意义的固定资本品存在的前提条件下，象农业生产中的玉米种子，我们可以推出洛的结论，他将马克思再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部类进一步分解为两大子部类，在他的垂直一体化三部类的三分结构中，第一部类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品或"机器工具"，它们直接用于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的生产。第二部类生产次要的机器设备品，它们只用于生产消费品，即只用于第三部类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后者的资本存货是不可转换的。所以第一部类是唯一不仅能为其他部类而且可以为自己生产机器的部类，因而它是唯一的"自我再生产部类"。在斯拉法的术语学中，第一部类代表着"基础系统"。

资本品部类的再划分同稳定增长的结构条件相关联，甚至也同"转化分析"的问题相关联。当经济发展面临结构变化的问题时，陈旧资本品存货的不合理性就成为经济上可能面临的偏离稳定增长道路的决定性问题。从一条稳定增长的道路到另一条道路的动力转换，必须包括整个数量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资本存货的重置。经济学无法改变产出，除非它首先改变投入，这就是说资本品部类必须提供适合投入变化的资本品，来生产新的产出模型。机器工具的生产是任何经济快速增长过程所必须克服的"瓶颈"。提高增长速度的关键在于提高第一部类的比重，同样，逻辑上要求系统作为一个总体在它能改变产出之前首先能改变投入，生产的增长依赖于这个部类的资本存货的优先增长。在两部类的弗里德曼模型中，采取在机器工具生产中采用更大比重的新机器工具政策是十分可能的。而在洛的模型中，一个附加的从第二部类到第一部类的事后转换是可能的，且缩短了调整的时间。两个模型得出同样结论，即为了提高长期总产出和消费品产出的总增长速度，在一开始，消费品产出暂时下降是必然的。

资本品部类的研究还有其它两个方面的内容：它的生产力利用程度和它的耐用性。成本最小化技术的

选择包括资本利用“计划”程度的选择和固定资本品经济寿命的选择，后者可在纽曼（Neuman）、斯拉法对固定资本品处理的基础上把固定资本当作总产出的共有部分来处理，因此可以将不同年龄的机器区分为不同的商品。

资本、信用与货币市场（Capital，Credit And Money Markets） 货币、信用和资本市场描绘了经济活动的基本范围。在这个范围里很多现代金融市场的可变函数完全影响并促进了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化。货币市场、信用市场和资本市场统称为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利于主要经济活动的发展，如生产和贸易，赚钱和花费，储蓄和投资，积累和退休，转让和遗赠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是经济发展程度的表征。

资本市场也称为长期借贷市场。它主要进行债券，公司股票和抵押借贷的买卖。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资本市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阶段的性质。资本市场的首要作用是建立起资本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在市场导向经济下，这种条件能刺激资本的长期积累。从长远来看，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持久性，也就是说，生产中的资本不会经常不消费掉。正是因为这种持久性，厂商对未来的市场需求有正确的预期，因此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总之，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之供给地，其组成部分包括各种金融机构，私人储蓄资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之定期及储蓄存款部门、储蓄放款协会、投资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

信用市场是借款和贷款的场所。它通过资金债务的流入和流出促进购买力的转移。信用市场在指导经济资源的分配方面具有跟资本市场一样的功能。如果市场的参与者是同质的，这样的市场能够建立在代理机构能够组织自愿借贷（但实际的借贷是不会发生的）的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市场起着很小的经济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参与者是异质的，个人不同于商业企业，私人部门不同于政府部门。甚至个体中也有新的和老的、富的和穷的、强的和弱的差别。信用市场通过安排各个经济实体的近期需要和远期需要而重新分配资金的分配比例。这些经济实体主要有个人和厂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等。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国际信用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很多国家政府已经撤消了妨碍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一个国家的对外借贷款额不一定都要求每时每刻与它们的进出口保持一致。而且一个国家一旦处于债权地位，它就能够使它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从整个世界经济的远景来看，国际间借贷活动更加类似于封闭式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国际间借贷活动使资源在国际间分配更有效益。总之，信用市场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重新分配近期需要和远期需要获得额外资源而促进经济发展。

货币市场是指那些办理短期信用票据的买卖和转让的各种金融机构。货币市场包括融通短期资金的全部手段。它主要照顾小企业对流动资本的需要、个人的借贷和政府的短期债务。货币市场不是一个单一的市场，而是由很多不同的市场所组成，每个市场从事不同类型的信用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有：商业票据市场、经营企业的短期期票；抵押贷款市场，它发放的贷款要以债券或其它财产作担保（也叫经纪人放款）；承兑市场，买卖银行承兑汇票；国库券市场、经营短期政府证券。活动于金融市场的主要机构和商人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买卖政府债券的商人、买卖商业票据的商人，金融公司以及代理商。货币市场也可分为客户市场和有组织市场。大多数私人的短期借款，特别是工商企业的短期借款都在客户市场上进行。客户市场上最起作用的是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有组织的短期货币市场，包括那些经营政府债券、商业票据、承兑汇票和联邦基金的市场。大多数有组织的市场，如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和抵押市场，主要从事长期资金的融通活动，属于资本市场。国际贸易中需要多种通货作为支付手段，因此必须有国际货币市场，以便商人卖出某种多余的通货，买进另一种所需要的通货。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国的货币换取另一国货币的比例称为汇价。汇价行情因外汇的供求而变化，其变化的幅度以国家规定的比例为基准。国家规定的比例称为法定汇价或平价。各国中央银行为了支付国际结算和稳定市场汇价的需要，经保持某种形式的国际货币储备，主要是黄金或者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同黄金有固定平价的某些国家的通货，如英镑、美元等。美国国内货币市场之大居全世界第一。参加者有各种各样的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它允许多种货币代替物作为交易手段。虽然在纽约，货币市场的活动相对集中，并且是国际货币市场的一个中心；但比起别国来，美国国内货币市场在地理上不是很集中的。英国货币市场由集中于伦敦并互有联系的若干市场构成，其中包括贴现市场、地方当局贷款市场，银行往来市场，政府债券市场、欧洲美元市场等。交易对象有商业票据、政府债券、地方当局短期债券和欧洲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少数高收入的国家才有相当发达的货币市场。一般可以说，各国包括货币市场在内的金融体系，其发展程度是同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持续的通货膨胀一直是阻碍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从个别资产分析到资产选择理论所探讨的都是个别投资者的市场决策过程，其中隐含的假设是：单个投资者是价格决定者，不能凭借其自身投资多少而改变资产的预期报酬或变动数量。如果将所有投资者的决策加总，而探讨资产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那就成为资产价格决定（或称资产定价）理论。在不确定下资产估价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以套利为基础，从以 MM 定理为基础的套利理由到作为选择定价模型基础的动态定价决策，都是这种方法的实例，套利模型仅仅产生了一种资产相对于其它资产的价格；在第二种方法下，均衡资产价格通过使外在决定的资产需求等于资产供给可以得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尽管通常作为一个相对的定价模型出现，却是将资产价格与外生数据，投资者的兴趣和赋有量联系起来的均衡模型的一个实例。在实际使用中，每个经济人的资产需求向量可以表示成作为资产组合或互助基金的基础向量集合的线性组合。在资产定价模型中，基本的资产组合可以解释为某个限定资产组合方差最小化问题的求解。未来资产报酬的不确定性可以用概率分布描述的假定源于 I.费雪（Lrving Fisher）；希克斯（Hicks）则最早指出，投资偏好可以解释为对投资报酬有利可图性的分布时机的偏好，偏好可以用中间差区域的无差异曲线表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创始人马克维茨（Markowitz）则明确假定，投资者偏好可以在总合的资产组合报酬的中间差区域上定义，由于首次将边际分析原理用于最优资产组合的选择，从而将资产组合与债券报酬的联合分布联系起来；马克维茨和托宾（Tobin）指出：如果效用函数是报酬或财富的二次方程，那么中间差偏好可以与诺意曼—摩根斯坦定理协调一致，这个假定暗含了在高财富水平上的负的边际效用；莫顿和萨缪尔森（Merton and Samuelson）也指出，如果交易间隔极其微小，那么中间差分析对于广义的连续资产价格过程是适宜的；托宾分析的主要是单个风险资产和现金之间的选择，而6年以后，夏普和林特纳（Sharpe and Lintner）则探明了托宾命题的均衡含义。夏普的 CAPM 由 EV 模型延伸而来，它除了全盘接受 EV 资产选择模型的假设外，又进一步加上了如下假定：（1）所有投资者对债券报酬的联合分布持有同样的信条，对各种资产的预期完全相同，即存在理想化的不确定性（Idealized Uncertainty）；（2）所有投资者都可以在风险利率水平上无限地借入和贷出；（3）资本市场充分有效运行，没有交易成本或其他障碍，如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和非上市性（non—marketability）等。那么，结论是：所有投资者都保持同样的风险资产组合。70年代上半期，随着假定的进一步放松和经验研究的深入，模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影响到实际投资管理和公司财政。70年代后半期，CAPM 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罗尔（Rull）认为，包括所有资产的市场资产组合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明，CAPM 认定的资产组合的效率特征从来没有被经验研究检验。这一论据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将注意力从 CAPM 转向罗斯的套利定价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 CAPM 不幸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均衡报酬率而不是作为基础的利益变量的价格，但是，资产定价模型却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最早的不确定性下的资产定价均衡模型，而且阐明了资产组合分离对于容易驾驶的均衡模型的重要性。更重要地，它揭示出必要的分离资产可以通过对偏好或分布的限定得到。以偏好为基础的和以分布为基础的资本市场均衡模型都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直接发展。

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 经济学家们分析资本积累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最普通的是把资本积累看成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一国生产潜力的扩张，技术在扩张过程可以不断改进。这种分析方法以包括技术进步导引因素的稳定增长观念为基础，资本概念作为生产品或者作为一种可以支配生产品的基金而存在，这尽管不错但却是不够的。另一种是把资本看成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方式。资本积累就是这种组织形式向由其他规则支配的生产消费、交换诸领域的延伸，是一国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完全转形（outright transformation）。这样一种理解强调了组织的重要性，技术和工艺作为组织生产的方法有了制度性的维度，因此，资本积累即指生产和制度的转形，稳定增长是不适用的。经济学家们考察资本积累方式的另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一种把资本积累看作利润盈余的再投资部分，即利润的资本化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研究积累需要解释盈余的有效性和再投资的动力。古典学派的创始人把积累看成经济的转形。斯密强调了制度性变迁尤其是市场的发展以及国家关卡的取消，但其分析却是不完备的甚至部分是错误的。李嘉图在其"工资铁律"中对盈余仅仅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解释，然而却把资本积累看成资本家的自然活动，尽管随着边际土地开垦的延伸，导致食物价格上涨，资本积累会受到限制。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来源归结为对劳动力的剥削，发现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在于竞争和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边际土地的压力。现代的研究却大多在稳定增长序列中研究资本积累，最初是增长的"人道理论"研究，后来是利用模型分析持续扩张的均衡途径的决定。在这两种情形下，资本积累都是作为盈余的再投资而存在的。另一种方法是把资本积累看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一种稀缺资

源（生产要素）向它的均衡水平的调整过程。在这里，要素均衡被定义为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资本供给要么视为是给定的，要么看作是由对应于利息率的储蓄行为所支配的、资本需求由边际生产力决定。在某个特定部门中，当对其供给等于其需求时，均衡就产生了。按照这种看法，只有当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时，积累才能发生，它是一种沿着均衡之路的运动过程，是一个相对次要的现象，中心经济问题是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尽管资本积累似乎是无限的，但再分配过程在均衡点上却有一个自然的终结，因此，这种方法不可能解决主要的问题。

在各种时兴的模型中，稳定增长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对于新古典学派，它是均衡概念向全期扩张的延伸；对于新凯恩斯主义者，它代表了一个引力中心，一个制度移向并围绕它摆动的目标点；对于其他人，它仅是一个考虑制度运行状况的参照点。事实上，稳定增长似乎是最好的供给学派的概念，但却是不完善的增长概念。因为它只在一个时点上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却没有平衡供给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由于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增长并不是同比例进行的，因此，稳定增长不可能发生，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积累的黄金法则"（Gold Rule of Accumulation）也只是一种观念的产物。并不能产生惊人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繁荣和萧条的历史。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技术变革确实导致了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的出现，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这可以反映在经济主要部门重要性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模式和性质的变化上。理论分析之所以忽视了这些要点，部分原因就在于太专注于以资本作为生产品的简单化概念为基础的平衡增长。当我们把资本也理解为一种组织形式时，积累就和制度转换联系起来了。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至少有三个理由。首先，土地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成本将会不断上升；其次，消费模式是不断变动的，消费者的商品需求往往上升更慢；第三；不同社会阶层的储蓄倾向不同，相对财富的不断变化导致需求构成的变化。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变革，经济将会陷入长期停滞。这不仅仅指现今使用的生产过程的生产能力的增长，而且意指新产品的出现和新生产过程的发展，这将从根本上导致转换性增长"（transformational growth）。

在不发达国家中，通过正的净投资来增加资本存量，进行资本积累，固然是一种好的理论设想。但是，由于不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极低，来自于现有收入的储蓄或投资非常之少，以至于积累十分困难。外来投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供就业机会，产生附加收入，但对不发达国家来讲，并没有国内资本的积累。当外援是用来提供通过经济起飞实现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资本时，它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由于国内的储蓄和投资能力常常总是太低，以至于无法为经济起飞融通资金，因此，资本援助是必要的。

资本消耗扣除（Capital Consumption Allowance） 反映折旧的一笔帐目。在不同的帐户中，资本消耗扣除的具体含义不同。在国民收入帐户中，它相当于私人企业帐户中的折旧，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私人企业生产设备与厂房的磨损，陈旧与损坏的价值、由于意外事故而遭到破坏的厂房与设备的价值以及开发某些资源所要花费的费用（例如开采煤炭中的开支等等）。在国民收入与生产帐户中，资本消耗扣除包括所有机构的折旧（不论它是否以盈利为目的）、自有房屋的折旧以及企业的厂房与生产设备由于意外事故而遭到破坏的那部分价值。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这些被消耗掉了的资本的价值就得到国民生产净值。这些扣除有时与固定资产的有形损耗不完全一致，进行这些扣除主要是以折旧的税收报表为依据。

资本数量（Quantity Of Capital） 参见"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Capital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词条。

资本赋税（Taxation Of Capital） 就是对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进行征税。资本收益税是个人收入税的一种，一般地，可以把个人收入分为正常收入与资本收益，资本收益就是个人投资品或资本品在出卖或交换中取得的收益，它的大小取决于投资风险的大小，资本收益的形式有利息，红利、租金，使用费用。来自对资本利用的利润等。个人收入税已有相当一段的历史，但对资本收益征税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看法。由于资本收益来自于企业的税后利润，对资本收益征税就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资本收益在许多国家全部免于征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将全部资本收益作为可税收入，如美国常常将长期资本收益的一半算作可税收入，在许多年份税率为25%。理论界对资本收益税的激烈争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平与平等的冲突在资本收益税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尖锐，是否对资本收益征税、如何征收。征收的程度都既关系到公平，又关系到效率。

资产与负债（Assets And Liabilities） 资产和负债是一对密切相关的概念，负债可以看作是负的资产。资产一词来自法语'assez'，意指"充足的"。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它指破产的资产能否足以弥补全部负债。一般而言，资产是具有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的

一种实体，是其所有者的财富或财产的构成部分，区分为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负债则指对某一个人或机构拥有的任何实在的或潜在的债权。二者在经济学尤其是会计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会计学中，资产和负债是与复式记帐法和资产平衡表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在资产平衡表中，资产列在一方，负债和业主权益列在另一方，业主权益是资产减去负债后的净资产。随着会计实践的发展，资产一般区分为流动资产、递延资产和固定资产三个组成部分。流动资产主要是现金、银行存款、短期票据、预计可售出的存货等；递延资产主要指在服务还没有施行之前，预先支付的保险费、广告支出等；固定资产则主要指机器和厂房等永久性资产。此外，信誉、才能的价值等无形资产在会计实践中，也往往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负债的分类与此相似，流动负债是那些预计在会计期内可以还清的部分，如工资，短期贷款，应付帐款等，同固定资产相对应的是长期信贷负债。经常资产减去经常负债即是周转资本，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即是业主权益或净值，后者又可分为实收股本和未分配利润。在复式记帐法下，某项经济活动的发生会直接导致资产平衡表中的项目发生变化，正是由于成本核算方法的出现，才使交换和生产可以代表等量价值的让渡，才使经济人仍能够了解他们活动的盈亏状况。由于某些资产在销售前以成本估价，在销售时以市场价重新估价，二者之间的差额即是利润。正的利润额是净值的增加，负的利润额是净值的减少。当利润被分配时，流动资产和净值同时等量减少，资产平衡表始终保持平衡。问题在于通货膨胀和通货贬值不好处理，而且容易误入歧途。一方面，资产和负债必须以货币单位来表示。由于折旧不能准确计算。固定资产的价值往往在估价上存在偏差，这样，通货膨胀（或贬值）往往会影响利润额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利润的产生同购进某物而后再卖出的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的时间间隔中，所有价格都发生了变化。结果，通货膨胀产生了虚幻的高利润，通货贬值则产生了虚幻的低利润，这种虚假的会计利润常常将企业的预期和决策导人歧途。更进一步地，资产和负债也可用于理解经济系统的形式和动力。一般而言，由于每笔债务对债权人是一笔资产，而对债务人却是一笔负债，因此，每项负债都是或者都应该是其他资产平衡表中的一项资产，当我们将社会中所有资产平衡表汇总起来时，就可以得到一张总的资产平衡表。在这样一张表上，由净资产增加而导致的利润增加，可能会被其他情形所抵消。结果，投资下降与利润下降互相作用，循环往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1929—1933 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爆发。此外，资产和负债对收人，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从资产和负债的意义上说，家庭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很大比重，不应被排斥在经济系统之外，人力资本的价值也应当包含在总资产当中。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人力资本能够保持完整，知识和技能不受损害，那么，资本即使遭到灾难性的破坏，也将会相当快地恢复过来。

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是分项载列某家企业（或某个人）的全部资产和全部负债的一种报表，它表明企业在某一个具体日期（一般是是每年的最后一天）拥有的财富存量的"静止不动的情况"。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复式记帐法密切相关。后者起源于 13 世纪后半期的意大利，19 世纪成为一种会计记录的标准制度。它要求记录在会计体系中的每笔交易，必须以借、贷的形式，用同样的货币数量分别记载两次。在复式帐簿中，所有分类帐设置的帐目必须是双重的，而且必须遵循借方总金额等于贷方总金额的资金平衡原理。即：所有分类帐借方金额总和一定等于贷方金额总和，如果借方金额被看作正的，贷方金额被看作负的，那么，所有分类帐金额的代数和为零。这是试算平衡的基础。在交易分析中，复式记帐法采用的最普通的规则或方法，来自于所谓的平衡表等式（balance—sheet equation），这个公式也是资产负债表的基本恒等式，

资产＝负债+业主权益或企业净值（即净资产）

或者，用股本的定义来表示：

股本（业主的股本）＝资产—负债

从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来看，过去习惯上将它分成两半部分，一边是资产项目，另一边是负债和股本项目；出在较常见的形式是单独一栏表示资产净额状况，接着是为这种状况筹资的方法。从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内容来看，一般根据资产能否在一年或正常的会计期内把它转换为现金，而区分为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两部分。流动资产包括手头现金，政府股投资，应收帐款，存货及其它短期投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建筑和设备。负债根据偿还的期限是否在一年以内，区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流动负债由应付帐款。短期信贷、利息和应计税款组成；长期负债则包括长期银行信贷、债券和抵押。从资产中扣除负债以后的净额即是股本，又称净值，净资产或业主权益，它是以面值或发行价格表示的所有现有股票再加上盈余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债主对于企业资产具有一定数额的讨还欠债的权利，而股东对于剩下来的部分具有讨还股本的权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资产负债表中，尽管每一项目的具体数字并不正好等于在另一方的一个项目的数字、便资产负债表却总是两方平衡的。因

为股本（或净值）总是会自行调整，以便使两方保持平衡，资产的损失（或增值）相当于负债不变而股本减少（或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报告书不同，前者说明在某一时间的财政状况，后者则说明销售量，成本和收入在一年中的变动情况．不可将二者混同。资产负债表和复式记帐法无论在会计学上还是在经济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精神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西方学者们给它仍以高度评价，认为它远远超过了"组织安排会计信息的一种制度"的作用，提供了使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动力。没有复式记帐法，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见表中所列××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公司资产负债表(1987年12月31日)

资　产		负债和股本	
		负　债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现　金	$ 20,000	应付帐款	$ 20,000
存　货	100,000	应付票据	35,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	
设备	130,000	SBA 票据	60,000
房屋	170,000	应付债券	50,000
		股本	
		优先股票	55,000
		普通股票	………
总计	$ 420,000	总计	$ 420,000

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　资产选择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期希克斯（J·R·Hicks）的分析。资产选择理论的产生则缘由于马克维茨（Markowitz）发表于1952年的经典之作《资产选择》。马克维茨第一次将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作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研究。资产选择的意义乃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将可供投资的资金分配于众多种类的资产，以构成最适当、最满意的资产组合。以资产组合为基础，配合投资者对待风险的态度而进行的资产选择的分析引发了金融理论的一场革命，导致了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产生。由于马克维兹、托宾（J·Tobin）、夏普（W·Sharpe）、特瑞诺（J·Treynor）、法马（E·Fama）等人在这一领域中的辛勤工作和卓著的成就促使该理论至今仍呈蓬勃之势。

资产选择模型中最负盛名的是夏普1970年提出的平均值与方差模型（Mean Variance Approach），简称EV.Eo模型，近代金融理论的四个主要领域——个别资产分析、资产组合分析、资产选择理论及资本市场均衡理论几乎完全以EV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资产选择理论所探讨的是个别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决策过程，其中隐含的假设为个别的投资者是价格的接受者，他（她）的投资的多少不能改变资产的预期收益或方差。资产价格决定理论所研究的则是将所有投资者的决策加总，以得出资产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长久以来，(实质上是)夏普的EV模型的一种延伸的CAPM（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唯一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假设为：(1) 所有个人都是全部相关的价格的接受者；(2) 所有的证券都是完全可分的，无论长期还是短期证券的出售无须保证金要求或契约要求；(3) 不存在交易成本或税收；(4) 不存在套利的机会；(5) 投资者对各种资产的评估完全一致（homogeneous expectations）；(6) 投资者可在同一利率下无限制地购入或售出无风险资产。在模型中个人被假设为风险的回避者，期望达至效用最大。资产价格决定模型的基本类型有资本市场线（Capital Market Line）CML和证券市场线（Security Market Line）SML，其中后者是探讨资本市场均衡时个别资产的预期收益与资产风险之间的关系。夏普、林特纳（J·Lintner）、杰森（M·Jensen）、法马及鲁宾斯坦（M·Rubinstein）曾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当市场均衡时，个别资产（i）的预期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利率（R_F）加上资产与市场组合的协方差 Cov（R_i，R_m）的某一个比例：

$$E(R_i) = R_F + \left[\frac{E(R_M) - R_F}{O_m^2}\right] Cov(R_i, R_m) \quad (1)$$

其中 $Cov(r_i,R_M) / O_M^2$ 记为B值，B值是对个别资产或证券的风险的衡量。对此模型的批评造成较大影响者为罗尔（Roll）。他的主要论点是对CAMP的检验必须是与市场效率相联系的联合检验，模型的使用必须十分审慎。

资产定价有三种基本模型：其中最简单的一种称为市场模型（market model），它表明了证券 i 的收益与"市场"资产组合的收益是线性相关的，也即：

$$R_i = ai + biR_{Mt} + \varepsilon_{it} \quad (2)$$

这里，ε_{it} 是平均值的零古典常态分布误差项。市场模型的强有力的假设是在模型与可得的经验数据相符的时期内截矩项和斜率项是常数。第二个模型称作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表达式为：

$$R_{it} - R_{Ft} = [R_{Mt} - R_{Ft}]\bet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模型要求截矩项等于无风险的收益率或最小方差零 β 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二者都随时间而变化。β_{it} 称为系统风险，通常被假定为在估计区间内保持不变。第

三个模型实际上是对 CAPM 的一个经验的补充称为经验市场线（empirical market line），数学表达式为：

$$R_{it} = \overrightarrow{\gamma_{0t}} + \overrightarrow{\gamma_{1t}}\beta_{it} + E_{it} \qquad (4)$$

与第二种模型不同的是在上述表达式中，截矩项并不等于无风险的收益率，没有规定在时间上不变的参数。与市场模型不同的是，它是一个时间序列表达式。截矩$\overrightarrow{\gamma_{0t}}$和斜率$\overline{\gamma_{1t}} = (R_{Mt} - R_{ft})$，都是从每一个时期的估计值。式中的 β 值是从市场模型中计算而得的。资产定价模型在实际中的运用非常广泛。其中有些应用研究的是利用市场模型来衡量误差项或残差，一般的做法是首先由市场线（方程 2）中计算出 β 值，按 β 值来排序的资产组合提供了可使衡量方差问题中误差极小的编组。这些资产组合的 β 值被用以产生方程（4）中的参数，而方程（4）是经验的市场线用来对方程（3）进行的估计。有了 γ 项的估计值，经验市场线就可用于从预期的证券收益中计算出"非常态"的收益或残差。

对 CAPM 的经验检验工作始于 70 年代，这一工作的主要开展者有米勒（Miller）、法马以及雷恩格姆（Reingonum）等。绝大多数的研究数据选自上市的普通股的每月的总收益。典型的检验是以超量收益的形式进行的。这一形式的方程的截矩与近乎于零，而斜率则等于超量市场资产组合的收益率。经验检验的结果发现了一个高居零之上的截距以及比预期低得多的斜率。因此经验的证券收益，呈顺时针变化，它意味着 β 值低的证券的投资收益高于 CAPM 的预期值，而 β 值高的证券的投资收益则低于 CAPM 的预期值。

随着仅仅依靠市场收益不能解释一种资产或一种资产组合收益的所有变动这一共识的达成，多因素分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应运而生。罗斯（S · Ross）1976 年提出的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 就是其中的代表。模型的基本假定为个人是风险的规避者。CAPM 被视为 APT 的一个特例。CAPM 和 APT 为企业财务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CAPM 虽然远未被经验检验断定为完全有效，但它的一些基本的内容是无懈可击的：系统风险（β）不失为对资产风险的有效衡量；模型是具 β 值的线性模型；收益和风险之间呈正的替换关系。

资产组合分析（Portfolio Lnalysis）　资产组合分析是一种重要的金融投资理论。该理论是要证明什么样的资产组合方式才可以给人们带来最大的效用或最大的收益。有两种基本的资产组合分析方法。一种是期望效用方法；一种是均值一方差法。期望效用方法是假定投资者在开始时拥有一笔固定的资产 W_0，资产所有者一生中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机会，每一种投资机会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收益，他一生的财富 W 将由最初财富状况以及投资机会所产生的收益所决定，他的效用状况取决于这些财富状况。该投资者的最大化问题就是要在各种限制下求得期望效用的最大化，期望效用是拥有的财富的函数。而其拥有的的财富状况除了与他初期拥有的财富 W_0 有关外，也与投资机会与投资收益有关。因此他应在各种约束条件下选择一种合适的资产组合方式以增加财富，获得最大的期望效用。均值一方差方法是对用统计学方法来分析资产收益从而决定资产组合方式、以使得投资者所持资产的组合方式能给投资者带来最大收益。一般来说收益的期望值(均值)，越大越好，收益的方差越小越好。投资者应该选择均值大，方差小的资产组合方式。均值一方差方法优于期望效用方法，因为均值一方差方法有实际的统计资料可资利用。更适用于进行实际分析。

资产组合管理理论（Portfolio Management Theories）　资产组合管理理论是研究人们如何选择资产的持有方式以便在对各种资产的风险作出预期的情况下，求得资产报酬的最大化。

资产组合形式及其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市场发展而变化。早期在金融市场不存在或者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不用于即期消费的财富也采取可供选择的方式将它们保存起来或者通过贵金属的方式持有财富，以房地产方式持有资产、通过购买家庭耐用品的方式持有财富，或者是通过财富的投资性运用使财富增加。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工业国家，人们持有资产的方式是一样的。人们除了能够以上述方式持有资产外，还以各种现金、债券、股票等方式持有资产。在市场日益扩大，市场条件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持有不同形式的资产会取得不同程度的赢利，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风险。赢利大的资产往往风险大，赢利小的资产往往风险小。现金与流动性较大的政府的短期债券的风险性较小，但是其赢利性也较小。一些新的高科技产品的开发风险性较大，但一旦产品开发出来后，赢利也会很大。资产组合管理理论涉及到各种资产风险与赢利之间的权衡。

对于短期赢利性资产的投资者来说，其所谓风险主要是本金损失的风险，例如对于从事于可出售股票投资的人来说，其所谓风险是主要因股票跌价而产生的本金损失风险。对于长期赢利性资产投资的长期投资者来说，在投资期间结束前不能抽回投资基金和取得任何投资收益的情况下，还存在再投资的风险。再投资的风险是指除了存在损失的本金外，还存在着损失掉把本金所取得的报酬进行再投资而取得的收益的

风险，这些用于再投资的盈利是按复利计算的。

不同的投资者对于风险具有不同的偏好。可以用一条效用曲线来表示投资者在某项投资中所面临的风险与预期得到的赢利之间进行的选择。这一效用曲线可以与市场上风险与赢利之间的组合情况进行比较以确定自己对于资产组合的选择。

资产组合管理的核心就是随环境变化改变人们对于风险的欲望并在不同的时点上控制风险的后果，减少风险最直接的方法是在既定的赢利下使风险分散化。直观观察与数学计算都表明，通过把资产分散在多种投资中可以减少与资产方式相联系的风险的总水平。

资产投资者在选择不同的资产组合时要考虑多种风险。例如经济周期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政治风险、气候与地理条件风险等。例如，经济衰退对于许多公司的股票起消极影响，在衰退的初期阶段其股票价格下跌。若某种资产组合中主要是这些公司的股票，它将主要受经济周期风险的影响。但是若经济处于上涨时期，这种组合方式却会大大赢利。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资产组合中大部分方式是以固定的名义货币收入形式构成的资产所冒的通货膨胀的风险较大，随通货膨胀而升值的资产如房地产、普通股票等则会因通货膨胀而赢利。一国的政策不稳定会使其资产的投资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投资者为了减少投资政治风险应该把资产投资于不同的国家。对于农业的投资者来说所冒的气候风险较大。

投资者通过评价各种资产的风险与赢利情况并将自己的评价与市场上混合的资产风险与赢利的评价情况进行比较决定资产组合的选择，以便求得给定风险条件下赢利的最大化。

资金流量（Flow Of Funds） 资金流量是描述经济中引起货币在部门间转移的交易行为的会计制度，它是社会会计的集合，它显示了社会上由交易行为所引起的货币流入和货币流出的情况。既然一个经济单位的支出即是其他单位的收人，一个单位的金融负债即是其他单位的资产，那么资金流量这种会计制度就给出经济中不同部门之间金融关系的总体图景，同时它也揭示了经济的扩张和收缩的全过程。全部交易行为是在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表中描述的，从概念上说，一个完整的资金流量体系不仅应包括金融业务而且也应包括本期收入和本期支出的非金融项目。资金的使用，即本期支出，本期投资及金融资产的减少总列在表的一边，而资金的来源，即本期收人、本期储蓄及负债的增加则总列在表的另一边，并且，资金的使用的总和和资金来源的总和二者必须保持相等，下面是一个完整的资金流量体系的一般化的基本的帐户框架。

但是，这种资金流量体系从来也没有完全实现过，一般都主要是关注储蓄和投资、资金的借入和借出几个方面。

资金使用	资金来源
本期支出 财富净值的变化(储蓄)	本期收人
实物资产的变化(投资) 金融资产的变化(借出) 货币的变化(储备)	财富净值的变化(储蓄) 负债的变化(借入)
总和＝总和	

在资金流量帐户体系中，资金流量一览表是从各个部门的资金来源和使用表中建立起来的。各个部门的资金来源和使用表中的具体项目都是从资产负债表中引伸出来的，它通常包括各种不同的信用手段，如抵押、公司证券、市政证券、政府证券和贷款。单个部门的资金使用既包括现金持有量、房地产、其他实物资产以及杂项资产的变化，也包括通过信用手段所发放的贷款，而单个部门的资金来源也不仅既包括所收到的存款，抵押和储备、其他负债以及本期盈余的变化，还包括通过信用手段所获得的借款。

资产选择理论（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 有关在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各种资产形式的最优组合，以使总资产的收益最大化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原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总财产可以采取货币、债券、股票、不动产等多种形式，不同的资产形式有其不同的收益与风险，如何使各种资产形式的比例达到最优正是资产选择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早在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J·Hicks）就研究了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报酬的不确定性与资产组合问题。5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学家H·马克维兹（H·Markowitz）、J·托宾（J·Tobin）、W·夏普（W·Sharpe）等人都研究了资产选择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资产选择数学模型。H·马克维兹在50年代论述了资产多样化的经济逻辑，并为选择一种最优资产组合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法。他认为，可以根据收益和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背离的概率来对各种资产进行分类，并决定如何持有各种资产，以使收益达到最大。马克维兹的资产选择理论说明了如何衡量与不同资产相关的风险，以及用什么方法来选择各种资产，以便在风险尽可能小的情况下达到整体最大收益。他用数学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并经过以后许多

人的努力，可以运用计算机来进行计算。以后，托宾也在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资产选择理论”。他假设所涉及的资产形式包括：货币、政府的各种债券、银行存款、私人公司发行的债券和股票等证券。相应于这些资产形式存在着各种收益率。如短期利率、长期利率、股息率等。资产选择所运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法。基本原则是，财产所有者调整各种资产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直至使各种资产形式的边际收益率相等时为止。这时的资产构成就是最优构成，可以使财产所有者从中获得最大的效用。假设某一种资产形式增加了（例如，货币供给量增加）、原来已存在的最优资产构成便要进行调整，即人们发现手头货币量多了，就要用多余的货币购买其他形式的资产，其他资产的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其他资产的价格上升就会刺激这些资产的供给增加，供给增加又会使其价格下降，收益率回升。直至各种资产形式的边际收益率又相等时，又形成新的最优资产构成。这种资产选择理论是一种一般均衡理论。在其数学模型中，被决定的是各种资产形式的供给量、需求量和价格（即相应的收益率）。每一种资产形式都有一个平衡方程式（即供求处于均衡状态的方程式）。从这些均衡方程式可以解出各个被决定

年份	获奖者姓名	国别	主要贡献
1969	R·费瑞希 (R·Frisch) J·丁伯根（J·Tinbergen）	挪威 荷兰	经济计量学的建立
1970	P·萨缪尔森 (P·Samuelson)	美国	经济理论分析
1971	S·库兹涅茨 (S·Kuznets)	美国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与经济增长理论
1972	J·希克斯 (J·Hicks) K·阿罗 (K·Arrow)	英国 美国	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理论
1973	W·列昂惕夫 (W·leontief)	美国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建立
1974	G·缪尔达尔 (G·Myrdal) F·哈耶克 (F·Hayek)	瑞典 奥地利	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
1975	L·康托洛维奇 (L·Kantorovich) T·库普曼 (T·Koopmans)	苏联 荷兰	资源最优配置理论与方法
1976	M·弗里德曼 (M·Friedman)	美国	货币数量论与消费函数理论，以及对稳定经济的政策的复杂性的分析
1977	B·俄林 (B·Ohlin) J·米德 (J·Meade)	瑞典 英国	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1978	H·西蒙 (H·Simon)	美国	管理科学中的决策理论
1979	A·刘易斯 (A·Lewis) T·舒尔茨 (T·Schultz)	美国 美国	发展经济学
1980	L·克莱因 (L·Klein)	美国	经济计量学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运用
1981	J·托宾 (J·Tobin)	美国	资产选择理论与金融市场分析
1982	G·斯蒂格勒 (G·Stigler)	美国	市场竞争理论
1983	G·迪布鲁 (G·Debreu)	美国	一般均衡理论
1984	J·斯通 (J·Stone)	英国	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
1985	F·莫迪利安尼 (F·Modigliani)	美国	消费函数中的生命周期假说与公司财务理论
1986	J·布坎南 (J·Buchanan)	美国	公共选择理论
1987	R·索洛 (R·Solow)	美国	经济增长理论
1988	M·阿莱 (M·Allais)	法国	一般均衡理论与市场分析
1989		挪威	概率论在经济计量学中的运用
1990	H·马科维兹 (H·Narkowitz) M·米勒 (M·Miller) W·夏普 (W·Sarpe)	美国 美国 美国	资产选择理论 资本成本理论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1991	R·科思 (R·coase)	美国	交易成本与产权理论

因素的值。货币作为资产的形式之一，其供给、需求及利率也是在这整个模型中被决定的。托宾的这种理论认为，连接货币和生产的并不是利率，而是股息率（又称资本的供给价格）。如果股息率低于生产领域中的资本边际生产率，那就意味着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股票所代表的实际资本价格，从而将会扩大投资。反之，如果股息率高于资本边际生产率，投资就会减少。资产选择理论对货币理论、金融市场理论、投资理论等都有重大的影响。

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 使未来收益折算成现值时恰好等于新增资本设备的重置成本的贴现率，或者说，使投资等于折成现值的预期收益的预期利润率。这个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来的。他所下的定义是"资本之边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以 Q_1、Q_2、……Q_n 代表一笔投资未来一系列年的预期收益，以 R 代表重置成本，或投资量，r 代表资本边际效率，则计算资本边际效率的公式为：

$$R=\frac{Q_1}{1+r}+\frac{Q_2}{(1+r)^2}+\cdots+\frac{Q_n}{(1+r)^n}$$

应该强调的是，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这一概念不同于现实的利润率，它包含了两个因素：第一、心理因素。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资本家对投资未来收益所作的心理上的估计。凯恩斯强调了预期，并把长期预期的心理状态作为资本家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他认为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高度心理现象。第二、时间因素。凯恩斯认为，一项资本设备可以用若干年，取得未来一系列收益。收益是在将来，而投资决策要现在作出。因此，就要运用贴现的方法，把未来的收益折成现值，作为当前投资的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资本边际效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决定了投资的诱因，从而对投资有重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凯恩斯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解释了投资不足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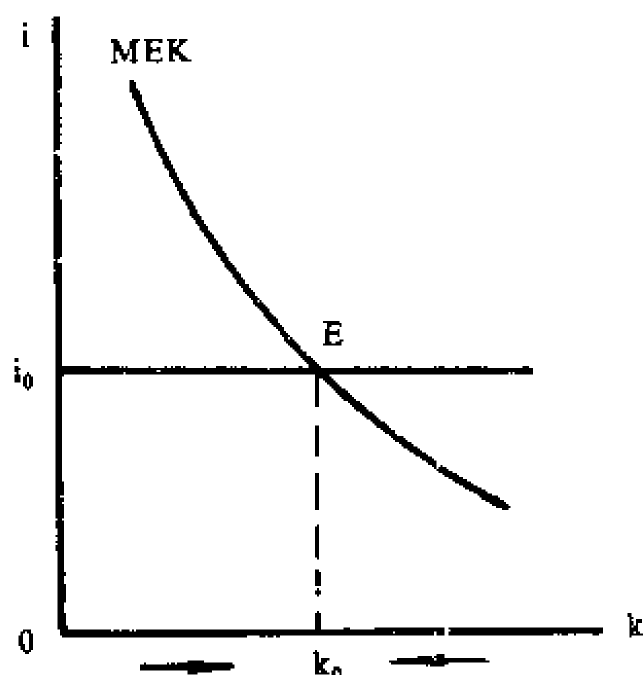
资本增值（Capital Gain） 又译为"资本收益"或"资本利得"，指资产由于价格上升而引起的资产本身实际价值增加。当某种资产的购买价格与以后某一时间再出售的价格之间有差额，而且再出售的价格高于原购买价格时就产生了资本增值。即使该资产并没有实际出售，但只要该资产的现期价格大于原购买价格，也产生了资本增值。例如，某一房屋购买时价格为 1 万元，但现在价格已上升为 1.5 万元，那么，无论是否实际出售，该房屋都有了资本增值 5 千元。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该资产价格水平的上升而引起的，因此，在通货膨胀时期，价格上升的资产具有保值或升值的功能。资本增值表现为经济租的形式，它往往成为特种形式税收（资本增值税）课征的对象。

资本减值（Capital Loss） 又释为"资本亏损"或"资本损失"，指资产由于价格下降而引起的资本本身实际价值减少。当某种资产的购买价格与以后某一时间再出售的价格之间有差额，而且购买时的价格高于再出售的价格时就产生了资本减值。即使该资产并没有实际出售，但只要该资产的现期价格小于原购买价格，也就产生了资本减值。例如，某一汽车购买时价格为 2 万元，但现在价格已下降为 1.5 万元，那么，无论是否实际出售，该汽车都有资本减值 5 千元。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该资产价格水平的下降而引起的。引起价格下降的原因可能是技术进步，生产成本下降等原因。避免资本减值的最好办法就是对价格有下降趋势的资产进行加速折旧。

资本密集型技术（Capital-Intensive Techniques） 在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比例中，使用的资本相对较多的生产技术。这种生产技术的特点是使用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多、从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高，劳动生产率也高。使用这种生产技术的行业被称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例如，汽车制造、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行业，以及计算机、无线电电子等高技术行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采用资本密集性技术是由其本身的生产特点所决定的。使用这种生产技术为主的经济称为资本密集型经济。例如，发达国家都属于资本密集型经济。这些国家采用资本密集型经济是由于它们经济发展水平高，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少，而且，资本密集型行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所采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会越来越多。

资本边际效率表（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 Schedule） 资本的需求曲线，表明了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在长期内，合意的资本存量为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之点，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OK 代表资本存量，纵轴 OI 代表利率，MEK 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MEK 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当利率为 i_0 时，合意的资本存量为 Ko，因为在 Ko 时，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在 Ko 之左，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合意资本存量仍要增加（如向右方的箭头所

示)。而在 Ko 之右，资本边际效率小于利率，合意资本存量要减少（如向左方的箭头所示)。资本边际效率表与投资边际效率表的差别在于：前者所描述的是存量关系，即资本存量与利率的关系；后者所描述的是流量关系，即投资量与利率的关系。与此相关，前者涉及到长期问题，后者涉及到短期问题。



资本争论（Capital Controversy） 以 J·罗宾逊（J·Robinson)、N·卡尔多（N·Kaldor）和 P·斯拉伐（P·Sraffa）为代表的英国新剑桥学派和以 P·萨缪尔森、J·托宾和 R·索洛为代表的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在本世纪 50 年代围绕纯资本理论所展开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否正确。争论的问题涉及资本的性质与测定，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在技术不变或变化下的特点，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作出投资决策时生产技术的选择等属于纯资本理论范围的问题，故称"资本争论"。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中心的新古典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在实际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他们坚持认为：第一、较低的利润率和每个人所使用的资本的较高价值联系在一起。第二、较低的利润率和较高的资本一产量比率联系在一起。第三、较低的利润率和（通过投资于更"机械化"和更"迂回的"生产方法）每个人更高的稳定的消费状况联系在一起。第四、在竞争条件下劳资之间的收入分配可以根据边际产品和生产要素供给来说明。这些关于边际生产力理论和资本积累及生产方法选择上的基本观点的前提是：资本有同质性，可以随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增减，从而资本一劳动比率和资本一产量比率都是可以随时调节的。由此得出的推论则是，在依靠国家干预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边际主义原理的适用性可以保证生产的稳定增长和公平分配的实现。正是以这些观点为基础，新古典综合派实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新古典学派的生产函数理论以技术不变为前提，这样，在研究经济增长时就没有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以及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第二、生产函数以资本的同质性为前提，回避了资本衡量的问题。实际上资本由各种不同物品组成，是不同质的，也难以找出种衡量的尺度。第三、新古典学派在解释分配问题时只注重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比例，而忽视了社会和制度因素。因此，用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分配问题是错误的，分配论应以客观价值论为基础。第四、新古典学派的均衡观是有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继承了新古典学派的错误观点，因此，关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的论述是错误的。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工资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段之间在分配问题上冲突的加剧，因此，必须以收入分配平等化为主中心进行改革。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在资本问题上的争论成为他们其他争论的出发点。

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 以超过劳动力增长的速度积累资本的过程。在资本深化中，资本一劳动比率在提高，即每一个劳动平均使用了更多的资本。因此，资本深化一般意味着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技术进步。现代经济增长是以技术进步为前提的，所以，资本深化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一个经济只有通过资本深化才能提高技术装备程度，提高资本密集程度。实现资本深化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而这又主要依靠储蓄的增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增加储蓄，增加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资本一劳动比率（Capital-Laboar Ratio） 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相结合的比率，一般用单位时间内资本与劳动的流量来计量。以 R 代表资本一劳动比率，K 代表单位时间内的资本流量，L 代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流量，则其公式为：

$$R=\frac{K}{L}$$

资本一劳动比率反映了一个经济技术装备水平的高低。这一比率高属于资本密集型经济，技术装备水平较高，反之，这一比率低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技术装备水平也低。资本一劳动比率与资本一产量比率、增量的资本一产量比率、加速系数都是同方向变动的。资本一劳动比率高、即一单位劳动所使用的资本量多，则资本一产量比率也高，即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资本量也多。对一个社会来说，在技术不变的短期条件下，资本一劳动比率一般是固定的。

资本—产量比率（Capital－Output Ratio） 资本量与该资本量所生产的产量的比率，即生产一单位产量所需要的资本量。以C代表资本—产量比率，Y代表产量，K代表资本量，则资本—产量比率为：

$$C=\frac{K}{Y}$$

资本—产量比率反映了一个经济的技术装备程度。一般来说，经济技术水平越高，生产中所用的资本设备越多，资本—产量比率也就越高；反之，经济技术水平越低，生产中所用的资本设备越少，资本—产量比率也就越低。在一个经济中，资本—产量比率高的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资本—产量比率低的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资本—产量比率就是增量的资本—产量比率或加速系数。固定不变的资本—产量比率是加速原理的基础。

资本广化（Capital Widening） 又译为"资本扩大"，是以与劳动力增长相同的速度积累资本的过程。在资本广化中，资本—劳动比率仍保持不变。因此，资本广化一般意味着经济增长中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广化的原因在于资本的积累没有超过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积累来源于储蓄，所以，这也反映了储蓄增长缓慢。

资本的使用者成本（User Cost of Capital） 又称"资本的租金成本"（Rental Cost of Capital），指使用资本进行投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资本的使用者成本包括为资本筹资所必须付出的（或使用自有资本时所放弃的）利息，以及资本每年的折旧。因此，资本的使用者成本包括利率与折旧率。但这里所说的利率是指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以rc代表资本的使用者成本，r代表名义利率，gp代表通货膨胀率，d代表折旧率，则有

$$rc=r-gp+d$$

由上式可以看出，资本的使用者成本与名义利率和折旧率同方向变动，与通货膨胀率反方向变动。资本的使用者成员决定合意资本存量，从而决定投资率的重要因素。资本的使用者成本减少可以增加合意资本存量，增加投资率。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政策来影响资本的使用者成本，以达到影响投资的目的。货币政策对利率的调节和投资税收政策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 又称"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中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之一，用以解释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资本边际效率是指新增加一笔投资时预期的利润率，是资本家进行投资的投资引诱，它不同于现实的利润率，包含了心理因素，即资本家对投资未来收益的心理估计，以及时间因素，即指未来的收益。以Q_1，Q_2，Q_3，……Q_n代表资本一系列未来年的收益，C_R代表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即重置成本），r代表资本边际效率，则有

$$C_R=\frac{Q_1}{1+r}+\frac{Q_2}{(1+r)^2}+\frac{Q_3}{(1+r)^3}+\cdots\cdots+\frac{Q_n}{(1+r)^n}$$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资本的供给价格与预期收益。它与资本的供给价格成反方向变动，即在预期收益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供给价格越高，资本边际效率越低；反之，亦反之。它与预期收益成同方向变动，即在资本供给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预期收入越高，资本边际效率越高；反之，亦反之。凯恩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含义是，任何一类资本的边际效率都是递减的。这是因为，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家预期资本的供给价格是增加的，同时，随着投资增加，产品增加，产品的价格，从而投资的未来收益则是减少的。预期资本供给价格的上升与未来收益的减少就引起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资本边际效率是投资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流动偏好）。在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三个原因中，凯恩斯最重视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并把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作为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再转轨（Capital Reversing） 又译为"资本反转"，指同一种生产方法可能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润率相适应。英国经济学家J·罗宾逊在50年代初在与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争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J.罗宾逊指出，生产装备的价值和成本取决于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工资单位）和使用期间应付的利息。利息的多少又与各种装备的使用期间等因素相关，另一方面，各种物质资本在生产期间、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差别，即具有非同质性。所以，利润率和生产方法的选择之间并不存在新古典学派所确信的那种同一性。在均衡条件下，采用不同生产要素的生产方法可以获得相同的利润率，即相同的利润率可以与各种生产方法相适应。另一名英国经济学家P·斯拉伐（P.sraffa）在《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这一问题。他把商品价值（即价格）归结为劳动时间，并进而归结为生产价格（在一般利润率条件下），又把生产资料（资本）价值归结为过去的劳动时间，从而把具有不同要素比例的生产

方法的差别归结为过去劳动时间和现在劳动时间之间在比例上的差别。在这种价值论的基础上，斯拉伐研究了资本再转轨问题。他指出，工资或利润的变动对于用不同生产方法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因为这些生产方法所使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不等。在各生产部门中劳动与资本的比例不等时，两种可以互用的生产方法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成本）就会随分配关系（利润率或工资率）的改变而改变。选择哪一种方法要取决于哪种方法的成本最低。这就是说，由于各种生产方法的要素比例不同，资本的物质构成各异（归结为生产这些资本品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不同），使它们的产品价格在利润率（和工资率）变动时发生不同的变动。结果是，随着利润率的上升，时而某种生产方法最优，时而另一种生产方法最优。或者说，随着利润率的下降，既可以采用资本密集型方法，也可以采用劳动密集型方法。并不存在新古典学派所认为的，随着利润率下降，将采用资本密集型方法这种单向的变化。新剑桥学派通过对资本再转轨问题的论述，进一步否定了资本的同质性，否认了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所得出的种种结论。新古典综合派回避了这一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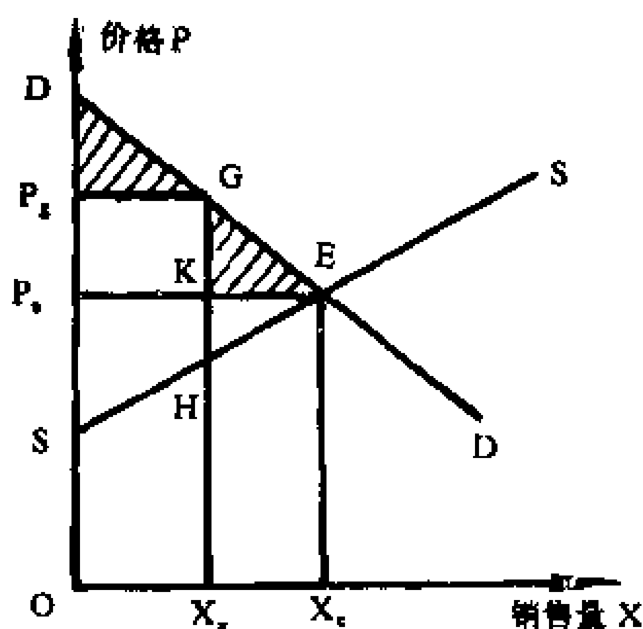
资本项目（Capital Accoant）　记录一国与它国间资本流出、流入的项目，二次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各国间资本输出和输入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项目在国际收支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分为：（1）长期资本项目。期限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资本输出入。又可分为：（A）政府长期资本流动。包括：政府间贷款，政府投资，如购买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等；其它，如向国际金融的借款，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各成员国之间贷款不属于资本项目，而是储备；（B）私人长期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如私人企业在国外办企业；证券投资：中长期出口信贷；（2）短期资本项目。期限在一年以下的资本。又可分为：（A）政府短期资本流动。（B）私人短期资本流动。

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　国内资金为了保全其价值而转移到国外。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从而政府对于资金外流有着许多限制。但是，在利率受到限制的国家，国内利率水平通常低于国际平均利率水平，于是国内储蓄者千方百计地把资本存入国外银行或贷给外国投资者，并不打算在国内使用。特别是在那些国内经历严重政治动乱或汇率不稳的发展中国家，更经常可见其资本外逃到发达国家的情况。

资历规定（Seniority Rule）　劳工合同中的一项条款，是最广泛使用的，用来决定工人工作权利的规则，它要求给予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人以优待。资历规定主要体现在解雇，重新雇用、提升以及调换工作方面。在有工会的部门，80%的劳工合同把资历定为暂时解雇和重新雇用的决定因素，即在雇用中遵循"后入先出"原则，在衰退时期，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人最后被解雇，恢复时期到来时又首先被重新雇用。资历区的范围在决定给资历长的工人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使其免遭解雇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当资历在全厂范围内规定时，在完成工作的能力相同的条件下，资历长的工人可以在全公司范围内"排挤掉"资历较短的工人；当资历规定范围较窄时，比方说在车间范围内规定，资历较长的人只能在车间内部而不是外部排挤掉那些资历较短的人。在资方与工会订立的合同中，有60%把资历规定为升级的决定因素。由于不是所有工人都要求得到特殊的提升，也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具有从事特殊工作的技能，所以资历在提升方面的规定就更为复杂。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空缺一般是按照正式的职位投标制度让谋求这一职位的工人进行投标，然后从中录用。在把职位分配给申请人名单中的候选人过程中，规定资历和其他因素作用的合同条款可大致分为两类：（1）如果资历长的工人能力符合空缺职位的最低标准或平均标准，保证资历长的工人得到提升。（2）只有当其他质量因素基本相同的时候，才给资历长的工人提供职位空缺。在实际工作中，即使在对资历条件限制较少的企业中，资历较短的工人通常也必须比资历较长的工人能干得多才能得到提升，一般在调换更合意的工作时，也是首先考虑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人。资历规定的广泛使用是有许多原因的。与能力，身体健康状况和技能等标准相比，它是一个客观的尺度，在工作调动、挑选雇员时，它减少了个人偏好程度。同时工作经历是对在职培训付出投资和具有应付意外事故的能力的很重要的说明。但管理部门常常仅对严格的资历规定，认为它妨碍了管理部门按贡献大小给予报酬的原则，从而降低效率。工会方面则争辩说，资历规定可以使工人免受专横和歧视做法的损害。这一规定也遭到民权团体的反对，他们认为这项原则阻碍了以前遭受歧视的人改善其地位，如新雇用的妇女和有色人种工人。

资源分配非效率（Inefficiem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是指拥有市场支配力的寡占产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力，抑制生产量，将价格提高到竞争水准以上，而获取了较竞争产业为高的利润，造成资源分配效率下降的事实。就一国的经济而言，对可能利用的有限经济资源，必须有效率地分配到各产业间。假

设在任何一个产业资本都可以自由地加入、退出，则对某个产业投入必要以上的资本会引起产业利润率的下降，此时会促使该产业内的资本移往其它利润率较高产业，通过这种产业间资本不断地流入流出，各个产业的利润率会逐渐达到均等，此时社会总效用或社会总剩余最大，社会福利也最大，资源分配将会是最适状态。然而，在卖方集中度和加入障碍高的产业，较容易采取限制部门内和部门外竞争的协调行动，形成和维持有效协调的寡占制谋求长期利润的极大化，使实际利润率高于正常利润率，造成资源分配非效率。资源分配非效率可以用下述方式来估计，如图所示，DD和SS分别是需求和供给曲线，E点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供求平衡点，X_c是此时的销售量，P_c为均衡价格。此时，消费者的货币购买支出等于生产者的货币收入，数额为P_cEX_cO的面积。消费者得到的总满足，数额为DEX_cO面积，故消费者剩余额为DEP_c的面积。与之相应，生产者的支出额为SEX_cO的面积，剩余额为P_cES的面积。社会总剩余为两个剩余之和DES。当市场是垄断的，垄断者可以控制价格和产量时，剩余分配将不合理并且总剩余会减少。如图所示，垄断者控制市场时，垄断价格为P_g，相应的销量为X_g。此时，生产者剩余为P_gGHXS，消费者剩余为DGP_g，社会总剩余为DGHS。与无垄断时相比，生产者剩余率(P_gGHS/SHX_gO)显著上升，消费者剩余率($CDGP_g/P_gGX_gO$)显著下降，社会总剩余减少GEH，这个GEH的大小就是资源分配非效率的大小。由于这种高度卖方集中度和加入障碍，主要取决于规模的经济性、必要的资本量等技术因素，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通常不会发生变化，所以由于独占的市场支配力所引起的超额利润，通常在短期内不会消减。资源分配非效率现象也将长期存在。



"剩余"的示意图

消费（Consumption） 广义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生产消费指的是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各种原材料、能源以及生产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消耗以及劳动者脑力与体力的消耗。生产消费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的必要条件。狭义的消费只包括生活消费，即购买和使用产品与劳务来满足人们当前需要的活动。人们的需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如衣、食、住、行等；另一部分是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如读书、娱乐等等。商品与劳务的购买者，使用者叫做消费者，消费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个机构。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商品与劳务叫做消费品。消费量的大小要受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量一般也随着增加。现期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后，余下的部分用于储蓄，不过可以将储蓄看成是推迟到将来的消费。消费的构成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产品与服务的性能以及价格等等因素。一般来说，无论是消费的规模还是消费的构成，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而消费又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是生产的动力与最终目的。

消费支出（Consumer Expenditure） 对于个人来说，消费支出指的是在某一时期中用于购买商品、劳务以及闲暇的支出。将某一时期中社会上所有人的消费支出进行加总，就得到整个社会的总消费支出。由于消费是整个经济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环节，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所在，所以，对消费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分析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以及消费支出的发展变化规律，就成为经济学中长盛不衰的课题。在古典学派时期，经济学家就曾对消费问题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如应当节制消费、发展生产，政府应当对消费加以引导，应当对消费税进行合理的调节等等。但是他们的论述都上限于一般性的评价，对消费支出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对于分析消费问题提供了较为简便适用的工具，此后的马歇尔在其局部均衡体系中，结合需求理论论述了消费问题，但也并不十分深入与具体。对消费支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系统而专门的论证，则是从凯恩斯开始，后人不断地补充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消费经济学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

1、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消费函数即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而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称为消费倾向。收入对于消费与投资之和，未用于消费的部分就是储蓄，储蓄是资本形成的源泉与基础，从而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换个角度说，消费支出影响着未来收入水平，可见，对它进行研究相当重要。

凯恩斯认为，影响消费支出与消费倾向的因素有

两类，即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其中主观因素包括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与奢侈等等，这些因素比较稳定，因此在消费函数中一般不进入变量。影响消费的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单位的变化、收入和净收入之间差额的变化、财产的货币价值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利率的变化、财政政策的变化及个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的变化。这6项客观因素中，只有第1项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就将消费支出视为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收入的函数，这一函数在短期内是比较稳定的。

凯恩斯还指出，消费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不那么快，也就是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

凯恩斯将消费支出看成绝对收入水平的出数，因此他的理论又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

2、其它有关理论

美国的J·杜森贝利提出"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某个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本人的收入水平，而且受到别人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影响。在他人的示范作用影响下，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就未必递减。另外，某个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此人目前的收入水平，而且受到其过去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影响，尤其是过去最高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影响。由于消费习惯的作用，消费支出的变化要比收入的变化平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并不减少消费支出，而是宁愿用一部分储蓄用于维持已有的消费支出。而当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并不立即增加消费支出，而是将之用来储蓄。可见，收入的变化往往首先反映在储蓄的变动上，消费支出并不因此有较大的波动。

美国的M·弗里德曼指出"持久收入假说"。他认为，持久收入指的是消费者预期之内的长期性收入，持久消费指的是在消费者计划内的正常的消费支出，这二者之间存在固定的比率关系。这一理论揭示了未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由于消费者可以对持久收入进行安排，所以，他在某一段时间中的消费支出可以大大超过他的收入，如购置汽车、房子等等。

美国的F·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假说"。他将人的一生分为少年、壮年与老年三个阶段，在壮年阶段，收入大于消费支出；在另两个阶段，则收入小于消费支出。壮年时期多年的收入用来补偿另两个时期的开销。这个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与他的财产情况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如果实际财产达到理想中要维持的财产额，则收入余下的部分就可以用于消费；否则收入就要转为财产。此外，消费者即使没有收入，但是只要存有一笔财产，那么消费支出就不会太低。

除上述理论外，还有的将消费决策与消费品存量调整等因素作为影响消费支出的指标，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以及消费支出的变化规律。

3、研究的最新进展

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局面，标准消费函数在那一时期过低估计了总储蓄量，从而削弱了有关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这使人们认识到，储蓄与通货膨胀（至少是预料之外的通货膨胀）成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在通货膨胀时期，储蓄量要比正常时期为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消费支出要低一些。

此外，学者们在对收入与消费支出的联合检验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对生命周期理论也作了修改与补充。

消费主义（Consumerism）　指的是对商品及其生产企业进行监督与控制，从而保证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害的一种社会现象。关心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古代，那时就提倡在商业活动中应当讲求信誉，出售的商品要货真价实、价格公道等等，对于那些以缺斤短两或者出售假冒商品的行为则予以禁止。资本主义建立之后，自由企业制度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消费者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但是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垄断因素，某些大企业把持了某种商品生产的绝大部分份额，这使得它们可以自行制订这种商品的价格以及质量标准，维持高额垄断利润。而由于缺乏竞争，消费者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之。此外，形形色色的广告与销信活动对消费者进行劝说，诱导，使他们无法理智地选购自己满意的商品。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害，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发起了一场消费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通过了一些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其影响比较深远。本世纪60年代，消费主义再度兴起。1960年成立了消费者同盟国际组织，它对世界各国出现的消费者权益问题进行探讨，并研究合作与协调的方案。1962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向国会发布消费者咨文，咨文指出，一个国家富有程度的提高不一定保证消费品质量及其有关服务质量的提高，许多企业对产品提供的信息或者不够充分，或者是错误的，有些产品还会对消费者产生危害。对此，消费者有权要求自身的利益得到保护。自此之后，美国的消费者组织蓬勃发展，为消费者权益进行辩护的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此外，欧洲经济共同体也于60年代建立了区域性的消费者组织，其它许多国家也制订了相应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政策，其中以

北欧国家做得最为出色。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许多国家都对产品的生产、标签、检验以及广告、推销等各个环节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有的采取不成文法的形式，有的则以立法的形式出现。无论采用哪一种形式，所有消费品都必须达到有关产品标准管理部门所规定的最低标准才能允许出售。对于食品和药品，则必须严格按照有关部门所规定的成分剂量去生产，不得随意增减关键性的成分。这些规定尽管已经相当详细与具体，但是执行起来仍有漏洞，因此还需要不断地补充与修改。

在消费者运动的初期，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参与对消费者权益等有关问题的研究，但是近年来，他们对消费问题日益重视，许多人参加了消费者组织中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日臻成熟，消费经济学也已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

消费税（Consumption Taxation） 消费税可以作为直接税或间接税课征，间接消费包括本国消费税、批发或零售税、增值税或有关中间交易的其他税收。间接消费税可以按照商品类型分类，而直接消费税却以购买者的总消费量为基础，按照以总支出为基础的累进税率课征。长期以来的传统主张以消费而不是以收入作为主要的计税基准，直接消费税的征收不应按照居民总开支，而应通过对于来自就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净收益的间接监督来进行，由于这个原因，它被一些人描述为“现金流量收入税”。支持消费税的一个理由是：对个人的评估应根据其消费而不是收入来进行，否则付税者的负担就会被颠倒。例如，一个拥有黄金的印度王子和一个宫门外的乞丐，由于都没有收入，事实上他们都将不支付任何税收。然而更详细地审查，这些论据却缺少说服力。在个人生命周期内，一个人的消费量必定等于其收入量，实际上，对于每个具有相同的终生消费现值的人来讲，消费税加给他们的负担是相同的。而收入税则有利于那些加速消费者，不利于那些在生存期内迟延消费的人。米勒主要关心的是收入税中隐含的对储蓄的双重课税，即不仅对储蓄而且对来自于储蓄的报酬课征，这是消费税力求避免的一种双重课税形式。收入税的课征对于延迟消费比对现行消费要重，这会导致消费选择的变形。任何合理的税制都必定会包含选择的某些畸变，问题在于，相对于它所产生的收益而言，这种特定的畸变是否比税制的其它作用更有害？有人认为消费税之所以优于收入税，是因为消费税很少使劳动力供给决策扭曲。收入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它要求必须区分投资收入和资本收益的真实部分与名义部分，这样在任何地方都会带来大量的政治的和实践的困难，这也是支持消费税的一个理由。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传统的消费税通常作为那些名义价值不随通货膨胀增长的特税课征，因而大多数国家对其信任逐渐在减少。相反，增值税作为一种基本的消费税被更广地采用。在增值税下，计算纳税义务时，支付在投入上的税被扣除了，课税在每个生产环节对增加的净值进行征收，在最终环节对给予最终消费者的销售征收，销售总值和课税相对应。增值税通常根据以商品类型区分的复合税率来施行，它既可以适于劳务，也可以适于物质商品，甚至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消费支出。由于这些特点，在整个西方世界，增值税现在已经成为主导的消费税种。

消费集（Consumption Sets） 假设有 m 个消费者，这里的每个消费者用指标 $i=1, \cdots\cdots, m$ 表示，其中 m 是一个正整数。第 i 个消费者的投入用正数表示，其产出用负数表示。在这个约定下，第 i 个消费者的消费计划，或简言之为第 i 个消费者的消费，就用商品空间 R^L 中一点 X_i 表示。给出某一消费 X_i，对第 i 个消费者而言，这种消费或许是可能的，或许是不可能的；其全部可能性消费的集合 X_i，称作他的消费集，集合 $X=\sum_{i=1}^{m} X_i$ 称为总消费集。

一般说来，许多商品不能直接用于消费，这反映这样一个事实：X_i 包含在商品空间 R^L 中维数相对较少的某一坐标子空间里。典型地说，消费投入是各种各样的物品或劳务（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有关的物品和劳务）；消费者的产出只能是他承担的各类劳动（在某一时间或某一地点）。这些投入的非负性与这些产出的非正性，更进一步限制了集合 X_i。最后，投入与产出的对称性关系完全确定了 X_i。

对个人消费者而言，用两个例子说明这个概念。首先考虑有一个时期和一个地点的情况；某一种类的劳动定义为第一种商品；某一种食物（假设可以自由支配）定义为第二种商品。消费集 X_i 可由图 a 阴影区域表示。

其次，考虑一个地点，两个时期的情况。在第一时期的某一食物定义为第一种商品；在第二时期的同一食物定义为第二种商品。设区间[o,o']的长度（图 b）是第一种商品的最小数量，这一数量是直到第一基本时间区间末端，为了生存下去，消费者必须持有的数量。如果第一种商品的投入小于或等于这一数量，马上就可以看出，他的第二种商品的投入必须是零。因此集合 X1 应当由闭线段[o,o']和闭象限 1, 0',2'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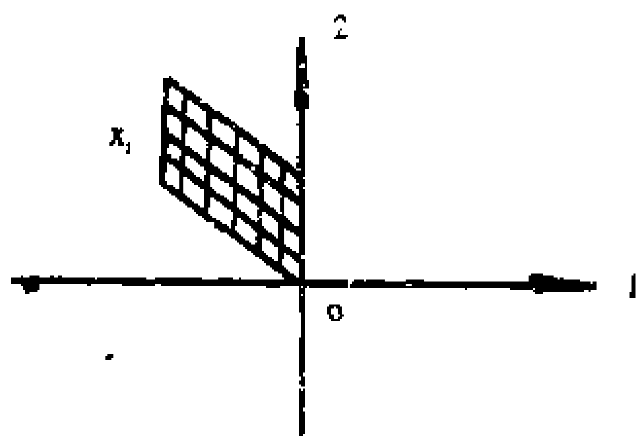
消费集的假设有如下一些：(a)X_i 是闭的（连续

性)。就是说，设(X_i^q)是消费的无限序列；对第i个消费者而言，如果全部消费X_i^q都是可能的，且$X_i^q \to X_i^0$，则X_i^0对第i个消费者也是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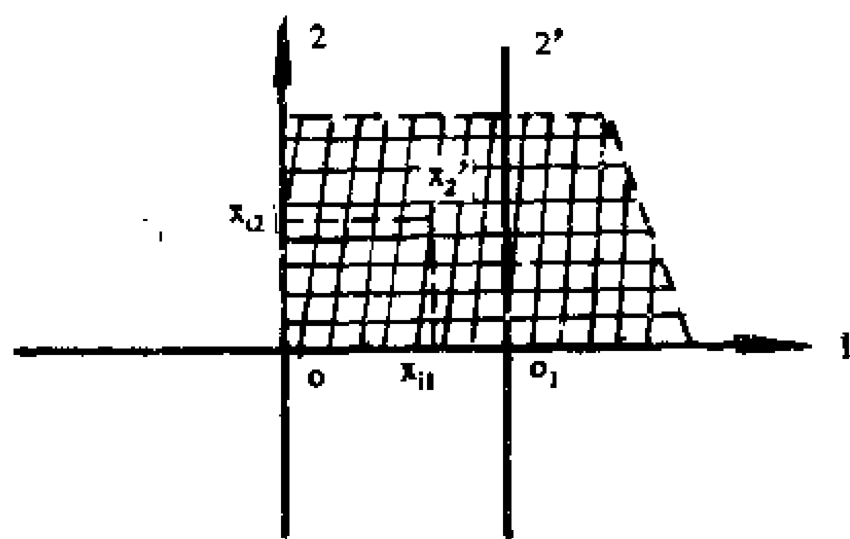
(b) 消费集X_i关于次序关系≤有下界（下有界性)，就是说，在商品空间R^2中存在点X_i，对Xi中全部X_i有$x_i \leq x_i$。

(c) X_i是连通的（连通性)。从直观和不甚准确的说法而言，这意谓着Xi是由一块构成的。

(d) X_i是凸的（凸性)。就是说，如果X_i^1和X_i^2对第i个消费者是可能的，则关于任意正权数的加权平均$tx_i^1+(1-t)x_i^2$也是可能的。



(a)



(b)

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　指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偏好与意向支配着经济活动的现象。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上的供求双方都要通过市场机制来传递信息；实现各自的目标。生产者为了实现最大的利润额，就必须掌握市场的需求状况，迎合消费者的需要，生产销路好的产品，这样，生产者才能从中获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成了经济活动中的支配者，生产者必须按照消费者的需求与偏好去组织生产，并决定生产产品的种类、数量与质量。"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是由亚当·斯密首先提出来的，以后主张放任自由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极力推崇这一原则，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他们认为，消费者主权的原则可以使市场供求双方都实现各自最大的利益。消费者为了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效用)，就按照自己的意志到市场上选购商品，他们的每一次选购都相当于对所买的商品以及这种商品的生产厂家投了一张"选票"，作为生产者，要实现最高的利润额，就要迎合消费者的需要，尽可能多地赢得选票，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如果不顾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盲目生产，其结果只能是失尽选票，为市场所淘汰。另外，由于生产者按照消费者的意愿组织生产、及时调整，使生产要素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因此，这可以保证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合理配置，避免了资源闲置以及由于积压所造成的浪费，由此可见，按照消费者主权的原则，经济会自行实现其合理配置、顺利发展的最优目标，这一结论暗示着，政府干预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消费者的知识与信息都是有限的，垄断势力与寡头把持着产品的价格与质量，再加上宏观经济形势的制约，消费者对于产品的生产与价格只能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而决不是象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起支配的作用。消费者主权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原则。

消费者理论（Consumer Theory）　又叫"消费理论"，是研究消费者行为与消费活动变化规律的经济理论。它是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消费问题的重视以及研究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早在18世纪初，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就指出，消费与收入是同一件事物，由于苛捐杂税而造成的消费不足必然导致国民收入的锐减与经济衰落。可见消费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后来，法国的西斯蒙第发展了这一观点，用它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矛盾。对消费问题以及消费者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则是在19世纪以后的事，消费者理论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1.需求的基本理论的创立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A·马歇尔在对需求进行分析研究时，首先提到了"效用"的概念。效用指的是商品或者劳务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边际效用"则指最后购买的一单位商品或者劳务所带来的效用。边际效用具有递减的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需求变化规律，即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消费品价格上升，则需求量下降；消费品价格下降，则需求量增加。这一反相关的关系可以由需求表和需求曲线来表示。价格以外的因素变化将导致需求曲线本身移动。

马歇尔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需求价格弹性"的概念，它被用来考察某一商品的需求量对于这一商品价格的变动所作的反应程度，这一反应程度的强弱

由需求弹性系数来表示，后者等于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之间的比率的相反数。如果需求弹性系数大于1，就说明对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大；系数小于1，说明需求弹性小；系数为1，说明需求量与价格同幅度变动。

此外，马歇尔还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消费者剩余指的是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所愿意付出的最高价格同实际付出的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一概念表明，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可以得到一种福利。因此，消费者剩余成为后来的社会福利分析中的重要概念。

2.需求理论的发展

马歇尔认为效用是可加的，也就是说，他主张的是基数效用论。但是在实践中，效用很难测量，更难以将边际效用价值转换成可以计算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J·R·希克斯引进并发展了帕累托的序数效用论，对需求理论作了发展。

希克斯首先引进了"无差异曲线"等概念，它表示消费者偏好程度相同的各种不同商品的组合的连线，对于第一既定的偏好，都对应着一条无差异曲线。"预算线"反映了在不同的收入与价格情况下，消费者所能购买的最大数量，收入变化会导致预算线的移动。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的切点反映了消费者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点，这一点也决定了在收入与价格已定的情况下，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数量。

希克斯还认为，其它条件不变时，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将产生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例如，如果洗衣粉的价格上涨，而其它商品价格不变，那么人们可能要更多地转向购买相对便宜的肥皂等替代品，从而对洗衣粉的需求下降，这是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洗衣粉价格的上涨也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这会造成预算线的左移，从而对需求量产生影响。两种效应的综合效应是，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的变动成反向变化。可见，虽然效用是序数的，不能相加、不能定量，但是通过它也同样得出了有关需求的变化规律。

除此以外，希克斯还以边际替代率递减代替了边际效用递减，他还修改了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的概念，从而避开了测量效用的难题，使需求理论更精确、更科学，也更加完善。

应当一提的是，费雪、帕累托与斯拉斯基对于效用论以及需求理论的发展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3.消费函数理论

本世纪以来，在需求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又创立与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

(1) 绝对收入假说

消费函数的概念是由凯恩斯首先提出的，它指的是消费量与收入量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消费量与收入量同方向变化，但是变化的幅度往往不如收入变动得快，也就是说，边际消费倾向是大于零而小于1的数。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按照这一理论，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

(2) 相对收入假说

由美国的J·杜森贝利提出。假说认为，某人的消费量不仅取决于他本人的收入水平，而且还受到周围人们的消费量与收入水平的影响，这被称为消费的示范效应。由于存在这一示范效应，因此，当某人的收入不断增加时，其边际消费倾向就不一定递减。

另外，人们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本人现阶段的收入水平，而且还受本人过去的消费与收入水平的影响，可以把这看成是消费习惯的作用。一般来说，消费的变动比收入的变动要缓和得多，当人们收入增加时，将把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当收入减少的时候，就宁愿动用储蓄来维持已有的消费水平。

(3) 持久收入假说

由美国货币学派代表人物M·弗里德曼提出。他将消费分为暂时消费与持久消费，前者指计划之外的消费开支，而后者则指计划之内的、正常的消费开支。收入也分为暂时收入与持久收入，前者指的是暂时的、计划外的收入，而后者指在长期内比较固定的收入。其中只有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比例关系（这一关系要随利息率、偏好以及消费者的财富总量而变化），可见，消费决策成了持久收入水平的函数。

(4) 生命周期假说

由美国的莫迪利安尼、安多与布朗博格等人指出。该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即少年、壮年与老年。其中在少年与老年时期，消费大于收入，属于负储蓄；而在壮年时期，收入大于消费，将积蓄用于弥补少年与老年时期所需要的资金。

可见，在这个假说中，财产对于消费决策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在某一时期的消费不必受那个时期收入的限制，只有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财产总量大于消费总额就可以进行消费。如果在某个时期，由于意外情况导致财产突然减少，人们往往会减少消费去实现既定的财产目标。这个目标实现之后，再将收入用于消费。

除了上述提及的几种消费函数理论外，J·摩根、H·霍萨克、L·泰勒以及G·卡托纳等人还从短期的角度以及消费品存量、消费决策对收入的影响等方面对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作了独到的分析。

4.消费者理论的新发展

在前面提到的消费者理论中，都将消费者看成是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与市场状况下的最终决策人，也就

是说，消费者是纯粹名义上的需求者。但是80年代以来，出现了对消费者理论的新解释，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G·贝虎尔。他认为，消费者不仅仅是需求者，他们还是生产者，其"产品"就是最大的满足。消费者及其家庭如同一个个微型企业，人们向市场提供劳动，再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商品与劳务，这些商品与劳务就是他们生产"产品"的"生产要素"，另一种"生产要素"是时间，它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存在一个有效配置的问题，在多人口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可以相互提供服务以便实现最大化的满足。消费者如何分配其时间，这取决于各种活动的效率与收益、市场品的价格以及将时间用于市场与家庭劳动的相对价值等等。

消费者前景调查（Antilipation Surveys，Consumer） 外推历史趋势是最常用的预测方法，所以当历史趋势确定继续时，预测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方法在预测商业周期的转折点时就发生了困难，此时必需搜集预测变化的趋势所需要的信息，而其中主要的信息是各种心理数据。在本世纪40年代，以概率抽样技术为代表的各种调查技术迅速发展，有可能利用相对较小的样本（1，500到3，000个家计单位）来无偏差地预测全部家计单位或全部消费者的行为，而且边际误差能够控制在事前确定的范围内，也使消费者心态和金融状况的调查成为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农业部项目调查处在样本访问调查中开始包括有关居民购买住房、汽车和家用设施意向的问题。1946—1947年间，密执安（Michigan）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把它的调查数据范围扩展到包括消费者心态和预期方面。从那时起，这样的数据一直在定期收集，而且现在已成为普遍接受的预测技术。

消费者前景调查的理论基础，可以用以下四个命题来概括：

(1)在象美国和西欧这样的富裕社会里，消费者在生活必需品购买之外进行相机抉择的支出。这些支出不仅是收入或购买力的函数，其规模和在时间上的分配要依赖于人们的购买意愿，而且购买意愿比收入的波动性更大。

(2)消费者的最重要的随机抉择支出类似于厂家的投资支出。消费者购买可以服役多年的住房、汽车和其它耐用品，通常是依靠信贷而不是收入。他们因为被新的和更好的产品所吸引而购买，而不是出于当时的需要，所以他们的购买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而且对国民经济运动的趋向（特别在衰退期或复苏期)有重大的影响。

(3)心态和预期代表了干预环境变化（刺激）与支出——消费决策（反应）相互作用关系的变量，而且对后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们代表了对实际变动的预防性反应，而且常常超前实际支出的变化而变化。

(4)大众或一国居民的心态和预期的重大变化是可度量的。在访问调查代表性样本中得到的关于个人金融状况、经济形势、市场条件或价格水平等的回答，就提供了消费者意向。通过反复调查，就可以确定心理状况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是对未来充满信心还是怀疑不定，这些心态和预期的变化就能够反映人们在主要支出决策上的意愿。

消费者意向指数的构造是消费者前景调查的重要内容。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所构造的消费者意向指数，是由对以下问题的回答组成的：个人金融状况（在过去几年和在未来几年）的变化，个人对经济形势的展望（在下一年和今后五年），耐用品市场条件估计（是购买耐用品的有利时机还是不利时机）。度量到的消费者的乐观情绪是与随后时期耐用消费品购买增加和消费信贷扩大相联系的，消费信贷进而对经济发展趋向有重大影响。对消费者心态和预期预测最严格的检验，就是比较消费者意向指数与商业周期转折点二者的动态。每次转折中，指数下降都超前于实际衰退。在经济回升前，指数值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在心态指数与实际支出或储蓄变化的时间间隔要比经济下降时短。在实际经济发生微弱变化时，心态指数很少发生波动，所以此时不如外推预测结果准确。

消费者心态调查，不仅有助于回答有可能发生什么而且有助于回答为什么发生。政策制定者、商业团体和公众为了评估预测和增进知识，需要关于未来可能发展趋向形成原因的信息。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每季或每周调查，包括大约30个问题，并且利用其中5个问题来构造指数，其余问题反映消费者对国民经济不同方面（如通货膨胀、失业、利率和政府政策）的感受。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影响现行经济趋向的因素。

消费者前景调查虽然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但是还存在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取样应该包括哪些人？使用全样本？包括一国所有居民；包括高收入阶层?社会的主要购买是由他们进行的；还是包括低收入阶层？他们大多数在经济衰退中处境悲惨。经验告诉我们，使用全样本最为可靠，但是这样的概况在未来也许就不真实了。

购买力（经通货膨胀调整的收入）与购买意愿的关系是消费者前景调查中的又一问题。总结过去的经验，二者的相对解释能力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从70年代起，后瞻心态与前瞻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分离。在1974年以后，乐观情绪的扩散不是与信心和确定性相联系的，更可能是与信心丧失和

不确定性相伴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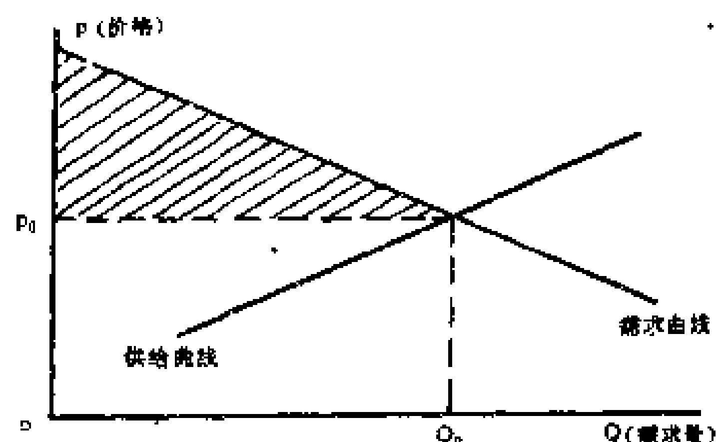
时代的变化也许需要消费者前景调查相应变化，要求在调查方法和调查结果解释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消费者剩余（Consumer's Surplus） 消费者为得到商品或劳务实际支付的价格与其愿意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一概念最早的正式提出者是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all）。但它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以前。对于这一概念的应用与评价至今仍有争议。约翰·希克斯（J·Hicks）视其为福利经济学演进中的里程碑，而保罗·萨缪尔逊（P·A Samelson）则坚信抛弃这一概念与经济分析无妨。

消费者剩余的分析基础是局部均衡理论。可以用需求和需求曲线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来导出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的实质是对消费者从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中获得的收益的一种衡量。设想一个家庭对一特定商品A的需求量是该商品单位价格的函数。如果影响商品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变，则商品A的价格与对A的需求量之间呈反向变化。由此可得出一个需求表。当价格为0.4元时，该家庭购买6单位的A共花费2.4元。事实上，这个家庭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得到这6单位的A。从需求表中可知：该家庭愿意以0.9元的价格购买1单位A，以0.8元的价格购买2单位的A，……。由此可以推知，对于6单位的A，该家庭最多愿意支付3.9元，比实际的支出额高1.5元。实际支出额与愿意支付的最大额之间的差额即是马尔尔所谓的"消费者剩余"。（下表即为该家庭对A的需求表）。

A的价格(元)	对A的需求量(个)
100	0
0.90	1
0.80	2
0.70	3
0.60	4
0.50	5
0.40	6
0.30	7
0.20	8
0.10	9
0	10

从需求曲线的角度，消费剩余可以得到几何图形的描述（如下图）：消费者在一定价格下购买的商品或劳动所得的收益表表示为由纵轴、价格线与需求曲线所围成的三角区域面积（假定该面积为正值）。这样，收益的变化反映在图形上则是价格变动而引致的该三角区域面积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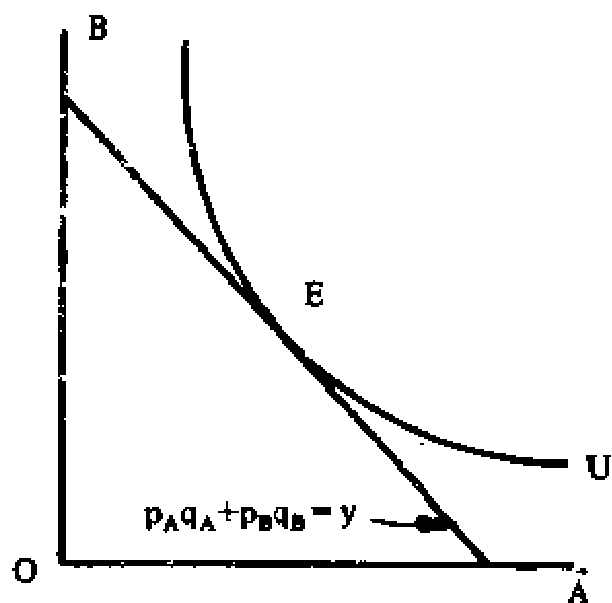


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常常被用来分析产品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收益的变动。因为所有个别的需求曲线相加可以得到某种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同样，我们可以将所有消费者对某一产品或劳务的消费者剩余相加从而得到一项发明或技术革新引起的产品价格下降而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益。消费者剩余还被用来分析垄断和征税产生的效应的福利后果。例如，在先前为竞争的行业中设置垄断，结果会导致该行业产品供给量减少，产品价格上升从而消费者剩余下降。消费者剩余被认为是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常常用于营建公共工程的决策。比如，政府部门打算在一条河上架设一座桥梁供公众免费使用。那么该桥能带来的效益就表现为消费者从该桥的使用中得到的收益，这一收益对单个消费者而言即为其需求曲线以下的三角区域的面积。

尽管消费者剩余常常被用作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有些经济学家对这一概念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仍深表怀疑。主要的疑问是：一旦马歇尔当初赖以衡量消费者剩余的假设条件放宽，那么需求曲线下方的三角区域很可能不再成为收益的一种精确衡量。怀疑的根据是对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的深入考察：其一，产品价格的变化会引起实际收入的变动，这一变动的程度大小依赖于对这种产品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实际收入的变动将会导致需求曲线发生移动。从而违反了衡量消费者剩余的最初的假设条件之一。而用把价格变动产生的效应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方法，所得到的几种不同的消费者剩余的衡量仅仅在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下才恰好一致；其二，考虑到不同商品需求之间的相互影响。假如商品X价格下跌，引起对X的支出的增加，这额外的购买将导致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然而，由于对其他商品的购买的减少使得消费者从这些商品购买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减少了，从而最终引起净效益的下降。所以，如果将价格变化效应作进一步分析或以一般均衡的观点来衡量，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远非尽善尽美。

消费者均衡（Consumer Equilibrium）　消费者均衡是消费者在既定收入下达到最大效用或得到最大满足的点。也就是消费者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的切点。在只考虑消费者现期消费的情况下，假定消费者花光全部现行收入，没有任何储蓄，并且假定消费者只购买A、B两种商品，那么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是花在A、B两种商品上的每一元钱所购买的边际效用是相等的，即$\frac{MU_A}{P}=\frac{MU_B}{P_B}$，这恰好是无差异曲线U与预算线$P_Aq_A+P_Bq_B=Y$的切点E，因为这一点无差异曲线的斜率$-\frac{MU_A}{MU_B}$与预算线斜率相等。$P_A$、$P_b$分别为A、B商品的价格，$MU_A$、$MU_B$分别为A、B两商品的边际效用。$q_A$、$q_B$分别为A、B两商品的购买量，Y为收入。

如果分析的情况不仅仅是消费者消的现期消费，而是包括多个时期的情况，例如工作时期与退休时期两个时期的情况。那么，消费者的均衡就是由两个时期的消费所构成的无差异曲线与两个时期收入以及利率所构成的预算线的切点。消费者的均衡还可以用于分析消费者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选择。这时消费者均衡是指消费者的闲暇与收入（工作）的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由工资以及每24小时总时间在闲暇与工作间的分配确定）的切点。



消遣（Recreation）　是用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来度过空闲时间。对消费者来说，消费品与闲暇都能带来效用，工作时间与闲暇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工作收入在一定范围内有被闲暇替代的趋势，即人们宁愿放弃部分工作收入而拥有闲暇，但闲暇能否真正给人们带来效用，以及多大程度上增加效用，还须看闲暇的利用，即消遣，解决人们的消遣问题靠市场是不行的，而须依靠公共部门，例如靠公共部门修造公园和旅游设施，组织文化娱乐活动，这些都有助于增加国民福利。因此，消遣也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领域。

消费品存量调整假说（Consumer Goods Stock Adjustment Hypothesis）　一种分析消费品存量对现期消费支出影响的理论，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H·贺塔克（H·Houthakker）和L·泰勒（L·Tayloy）提出。根据这种理论，现期消费取决于现期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已有的消费品存量。通过对1929—1970年美国消费者需求的分析和预测，他们得出了两点重要的结论，第一、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取决于现有的耐用消费品存量与合意耐用消费品存量之间的差额。这一差额越大，则耐用消费品支出越大，反之，亦反之。由此得出，现有耐用消费品的存量越多，则用于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越少。这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收入、价格、以及社会风尚之下，合意耐用消费品存量是既定的，消费者总企图调整现有耐用消费品存量，以达到合意的水平。这样，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就取决于现有耐用消费品的存量，两者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耐用消费品存量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一个消极因素。如果耐用消费品存量已达到了合意的水平，除非由于更新或折旧，否则收入的增加也并不会增加耐用消费品的支出。第二、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取决于过去消费者所形成的消费习惯，而不是已有的非耐用消费品的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过去在非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越大，其非耐用消费品的现期支出也越大。在分析这些问题时，贺塔克和泰勒提出了"情况变量"（state variables的概念。情况变量指过去消费支出所留下的已经贬值（由于折旧等原因）的余量或存量。在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上，情况变量是负数，即过去消费支出所留下的存量对耐用消费品支出有消极影响。非耐用消费品由于其性质一般不存在存量，情况变量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数量"或"习惯积累力量"，即过去所形成的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对非耐用消费品支出有积极作用，即消费习惯高，则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多。在全部消费中，非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大于耐用消费品的比率，所以，综合不同的情况变量，这一变量是正数，对消费有积极作用。这一理论把分析生产中资本存量调整的理论与方法用于分析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并把消费品存量与消费习惯结合在一起。这对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更正确地进行需求预测。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理论尚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支持，并没有广泛适用性。

消费不足理论（Under Consumption Theory）　一种用消费需求不足来解释萧条或危机产生根源的经济周期理论。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理论。其早期代表

人物有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J·劳德戴尔（J·Lauderdale）、马尔萨斯，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近代的代表人物是19世纪末的英国经济学家J·霍布森（J·Hobson），在当代还有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坚持这一观点。这种理论并不是解释整个经济周期的过程，而只是解释经济周期中危机或萧条阶段的形成。其基本观点是，萧条或危机的产生在于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赶不上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或者是社会的储蓄大于投资需求。但对消费不足的根源又各有不同的解释。马尔萨斯强调，消费不足根源于地主阶级的储蓄过度或购买力不足。西斯蒙第认为，消费不足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生产的增长。霍布森则提出，消费不足根源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致于引起富人储蓄过度，而穷人消费不足。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消费不足与投资过度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认为在繁荣时期投资过多的情况下，消费的有限性和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压制了利润的增长，并阻碍了经济流通，从而产生了危机。还有的经济学家强调，繁荣时期工资增长缓慢是消费不足，引起萧条的原因。这种理论由于过分强调消费问题，而又难于对整个经济周期的运动作出解释受到非难。但它的某些观点已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接受，例如，凯恩斯就继承了马尔萨斯的部分观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实际上就是消费不足论。此外，繁荣时期工资增长缓慢的观点也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消费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 消费与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以C代表消费，Y代表收入，则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是：

$$C=C\ (Y)$$

消费函数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提出来的，被认为是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强调了现期消费支出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战后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一假说可以解释短期消费函数，但无法解释长期消费函数。因此，以后在消费函数的研究中又先后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以及生命周期假说，并对收入之外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许多经济学家还对消费统计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与横断面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消费函数之谜（Consumption Function Puzzle）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与消费统计资料实证研究结论之间的矛盾。根据绝对收入假说，消费支出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而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4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等人研究了消费统计的时间序列资料。根据对美国1929—1941年间每年消费统计资料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消费函数是：

$$C=47.6+0.73Y_d$$

上式表示，自发消费为476亿美元，Y_d为个人可支配收入，0.73是可支配收入中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对1869年—1898年、1884年—1913年和1904—1933年的长期消费统计资料的研究，这三个三十年间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是0.867、0.867和0.879。这两种研究得出了这样三个重要结论：第一、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并不一致。第二、在长期中，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是相等的。第三、在长期中，边际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并不存在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这些结论显然与绝对收入假说并不一致。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无法解释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的不一致性，也无法解释长期中边际消费倾向的稳定性。这种消费函数之谜推动了50年代经济学界对消费函数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并形成了解释这种谜的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以及生命周期假说。这些理论从理论和实际上令人满意地解决了消费函数之谜。

消费信贷（Consumer Credit） 对消费者提供的、用于购买某种特定商品的一种短期贷款。这种信贷可以分期偿还，也可以一次性偿还。但不包括赊购帐户和分期付款购货，因为这类信贷并不限于购买特定的商品；也不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因为这种信贷是长期贷款。消费信贷一般用于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由银行或消费信贷公司发放。消费信贷有助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繁荣。战后的消费信贷对经济的刺激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提前使用了消费能力，因而会抑制以后的消费，引起以后的经济衰退。

消费的探索因素（Probe Factor of Comsumption）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时，一般不仅要预先了解价格，而且会事先调查质量，保修服务等情况，这便是消费的探索因素。由于存在消费的探索因素，因此，顾客服务就成为形成产品差别的重要因素。

消费不足危机论 一种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它强调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消费相对不足，即消费品的生产超过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这种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有西斯蒙第、马尔萨斯和霍布森等人，但他们对消费不足的根源又有不同解释。他们有的认为人民群众的收入远落后于生产的增长，有的认为贵族、地主一类"第三者"阶级过度储蓄而未能充分消费，有

的认为国民收入分配不当导致穷人消费不起而富人却过度储蓄。相对来说，消费不足论是一种影响较大的经济危机理论。

配置职能（Allocation Function） 政府通过税收和支出政策来影响资源配置，从而影响商品与劳务供给的职能。美国经济学家R·马斯格拉夫（R·Musgrave）认为，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个经济职能之一。这种职能的产生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两大缺点：不能提供公共物品，以及生产的外部效应。公共物品指基础设施、国防、立法这类物品与劳务，它的特点是当它提供给某个人或某些人时，其他人也可以利用而无须花费额外成本，即这种物品在消费中无竞争，且不具有排他性，因此，这种物品不能由私人来提供，必须由集体来提供，并由全体公民免费享受。生产的外部效应指生产活动对社会所带来的损失（例如，生产中的环境污染）。政府的配置职能就是政府征收税收来为提供公共物品筹资，以及用各种政策来限制生产的外部效应。政府的这种政策会改变资源在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的配置，并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配第，威廉（William Petty1623—1687）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织布手工业者家庭。14岁开始独立谋生，在英、法、荷兰等国从事过多种职业。1649年获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医学教授。1651年任爱尔兰英国驻军总司令的随从医生。1652年任爱尔兰总督的私人秘书，后又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并掠夺占有约五万英亩土地。1658年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他转而投靠英王查理二世，被封为男爵，并担任爱尔兰土地测量总监。晚年已占有27万多英亩土地，还先后创办和经营过铁厂、渔场、木材场等行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

配第的著述很多，涉及多方面学科。他的经济著作主要有：《赋税论》（1662年），《政治算术》（1690年），《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爱尔兰政治剖视》（1691年），《货币略论》（1695年）。其中《赋税论》的问世可看作是英国古典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配第的主要贡献是最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他首先区分了市场的价格和价值，把前者称为政治价格，把后者称为自然价格，并认为自然价格是其他经济现象的基础。他举例说，如果有人把一盎司白银从秘鲁银矿中运来，所用的时间同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相等，这一盎司白银就是一蒲式耳谷物的自然价格。可见他已认识到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所决定。此外他还指出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不过用谷物交换到的金银货币量当作谷物的价值，完全混淆了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配第又正确地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命题。但有时却将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主张一切物品都是劳动和自然共同创造的，这同他的劳动价值论相矛盾。

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和货币等经济范畴。他认为，自然工资由工人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决定，而地租则是农产品价值扣除种子和工资以后的余额，它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他不知道利润这个经济范畴，但其论述中地租包括了利润，还引申出利息。在他看来，既然货币所有者可用货币购买土地并出租收取地租，他贷放货币同样应收取利息，并有一个自然标准，所以国家用法律来限制利息率就徒劳无功。他还说明土地价格相当于购买一定年份的地租总额。他认为货币的价值也是由劳动决定的。配第对上述经济范畴的考察仍有不少缺陷，如未能区分地租和利润，也不能从利润引出利息等。

总的看，配第的经济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主要经济问题而写的，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他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并注重从具体的经济统计资料中去探究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他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他的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观点也对后来英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配给（Rationing） 消费者行为的一般理论认为，消费者在一定的市场价格和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可以购买到他所希望买到数量的商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消费者所实际能得到的商品的数量或多于或少于他所需要的数量。配给一般指对市场稀缺的商品，即供给小于需求的商品，不借助于市场机制在消费者之间进行配置的作法。这是实际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配给也在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实行。比如摊派购买，失业（被认为是对闲暇的强制消费）。在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情况下，价格是会使市场出清，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被认为是价格被人为地维持在低于或高于均衡状态所致。一旦前一种情况发生，往往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配给，特别是对商品中的生活必需品。一般是由政府按照某种标准规定消费者所能购买的数量，具体实际的办法因时因地会有不同，比较常见的是由政府分发给消费者（这里既包括生活消费者也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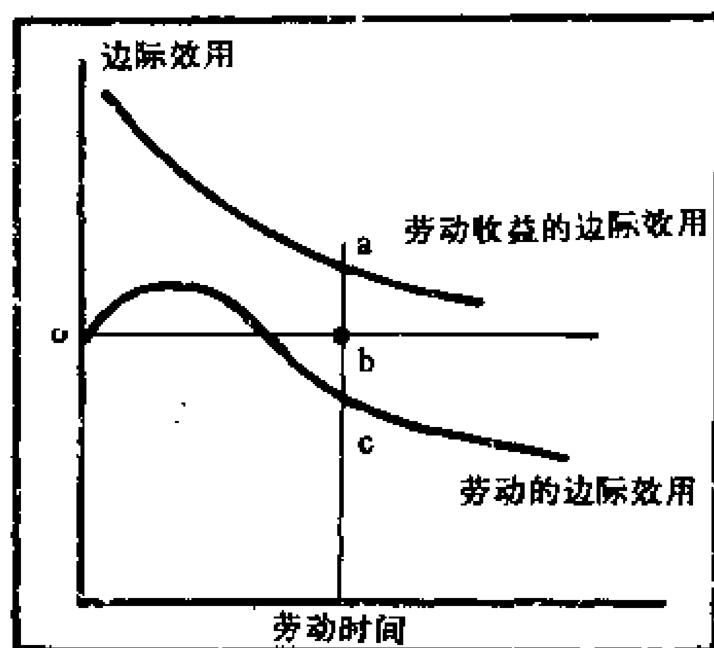
括生产消费者）配给券。作为“第二货币”，消费者凭这种配给券和货币才能买到规定数量的商品。在西方国家这种配给多在战争等特殊时期实行、范围也很有限。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配给则是经常的和大范围的。供过于求时的配给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这是因为这种配给与前一种配给相比要少见得多，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时期，供过于求的配给往往有利于许多社会准则。如强制购买多于某种社会强权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家们认为，长期的配给会引起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最终会影响整个经济效率，同时配给也是对消费者偏好的违背，必然会损害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

配额均衡（Rationed Equilibria）　又叫非瓦尔拉斯均衡，它不象瓦尔拉斯均衡那样要求市场必须是出清的，而是在市场存在短缺和配给情况下的均衡。在瓦尔拉斯均衡中，每种商品的供求总是相等的，因为价格具有完全的弹性，每个人都能在瓦尔拉斯均衡价格下交换到他所需物品的所需数量，这是由每个人的理性化行为所决定的。非瓦尔拉斯放弃了市场出清这一假定，允许价格可以受市场外因素的影响和决定，经济中存在供需不等的配给现象，这样，除了价格信号以外，还有数量信号，价格调节与数量调节同时进行使经济达到均衡。由此看出，配额均衡是对均衡概念适用范围的推广，使一般均衡更具有一般性。瓦尔拉斯均衡可以看作是配额均衡的一种特例。于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我们可以将配额均衡作如下概括：（1）存在一个更为一般的价格机制，即存在完全弹性价格、完全刚性价格以及处于中间的非完全竞争价格，每个市场都有各自的价格决定方式。（2）除了价格信号以外，经济生活中还存在数量信号，它在供给、需求以及价格决定中发生作用。（3）短期均衡是价格与数量信号同时调整的结果。（4）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不仅影响价格信号，而且影响数量信号。在凯恩斯以前的主流经济学总是假定市场是出清的，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就存在一个完全弹性的价格、使市场最终供求达到均衡。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提出政府应同时利用价格信号与数量信号调节经济的思想，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希克斯（J·M Hicks）、阿罗（K·J Arrow）、德布鲁（G·Debreu）等人的努力下日臻完善。直到60年代，克劳维尔（R·W　Clower）和莱荣霍夫德（A·Leijonhufvud）继承了凯恩斯劳动市场配给与数量调节的思想，并对市场非均衡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从此配额均衡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七十年代以后，微观方面的配额均衡理论得到很大发展。

真实收入（Real Income）　个人或国家收入的购买力。真实收入是将货币收入按日用品价格的变化调整后计算出来的。如果物价指数与货币收入按同样数额上涨，真实收入就保持不变，因为消费者用他们的货币收入既不能多买一些商品和劳务，也不能少买一些。当物价上涨得比货币收入快时，真实收入就减少；反之，当物价上涨得比货币收入慢时，真实收入就增加。货币收入是名义收入，名义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有欺骗性。例如，统计年鉴的人均货币收入的增长率是年10%，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就无法断定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甚至不清楚真实收入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如果物价上升8%，则人均真实收入上升2%；但如果物价上升20%，则人均真实收入下降10%在进行国家与国家经济实力对比时，也要使用真实收入的概念。而这时，不仅要考虑本国的物价水平，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汇率这一平衡可以使用。一国按本国物价水平计算的真实收入可能上升，但如果用汇率因素去衡量该国真实收入时，就不一定表现为收入上升，这种现象在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的物价上升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则用其他国家货币表示的该国真实收入低于按该国物价水平折算的真实收入；反之，实行固定汇率国家的物价上升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则用别国货币表示的该国真实收入高于按该国物价水平计算的真实收入。

真实成本学说（Real Cost Doctrine）　这是由19世纪后半期英国的主观效用论者所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供给价格要超过或至少不低于因生产而给人们造成的效用损失，也就是说工人们生产产品直到这一点，在此点上他的递减的收入的边际效用等于他递增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而这里的效用完全是人们的主观判断。这一学说的主要创始者之一的杰文斯（W　S·Jevons）认为人们从劳动中获得的边际效用先是递增的，然后递减（见图），而他从劳动收益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他劳动的边际效用损失等于劳动收益的效用时，劳动者的个人净效用达到最大，即如图中所示，劳动进行到b点时ab＝bc个人净效用最大。在杰文斯之后，马歇尔（A·Marshall）也是这一学说的赞成者，马歇尔的价格决定理论与杰文斯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成本与效用是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而马歇尔的成本最终还是可归结为杰文斯的主观效用，他还认为资本主义乃至工人在生产中都遵循真实成本原则。在杰文斯的同时代，还有另外一种成本学说与真实成本说分庭抗礼，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奥地利的庞巴维克和维赛尔（Wieser）和英国的威克

斯蒂德（P·H·Wicksteed），他们认为资源的供给价格等于其用于下一个仅次于现时之用生产力的用途的潜在收益，而不是由主观效用决定的所谓真实成本。这个争论在英格与奥地利之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真实票据学说（Real Bill Doctrine） 是银行学派所主张的一种理论。在银行学派看来银行券应等于真实票据，也就是说它的数量应以生产和流通中产品的价值为依据，能够自动清降。它的发行应为短期的，不能过量，由于非银行公众的需求是给定的和有限的，因此任何过量发行的银行券最终必将流回到发行者的手中，至少从长期看是如此。按照这样的看法，自然会理所当然地推出，银行券的过量发行，也就是说发行量超过交易中的真实票据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所讲的真实票据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是指经济生活中，为维持生产与交换的正常进行所需要的交换媒介。对它的数量如何进行确定，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但他们相信，如果按照真实票据学说的主张去做，国民经济中的支付手段会随着产品数量而扩大或缩小。真实票据学说源起于17、18世纪银行业的发展。第一次对其进行权威性阐述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在此之前，有一项约翰法案（John Law）就曾对此作过论述，此法案中认为银行发行的证券应是有良好保障的。亚当·斯密在当时的研究基础上，对此理论作了比较全面深刻地论述。此后真实票据说在李嘉图与桑顿（H·Thornton）的著名的硬币论者（bullionist）的争论中被抛弃，而又在后来19世纪中页的图克（T·Tooke）与富拉顿（J·Fullarton）的“通货银行”（currency--banking）争论中恢复了其地位，我们也可以从现代的货币理论中找到其实票据思想的遗迹。真实票据学说在18世纪一度被英格兰银行总裁接受并作为货币管理的指导方针，它也被认为是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的基础。

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 “名义汇率”的对称。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根据两国间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进行调整后的汇率。此种汇率和外汇的实际交易无关，主要用于进行各种经济分析。实际交易中使用的是官方汇率（外汇管制严格的国家）或市场汇率（外汇管制较松或无管制的国家）。

夏普列值（Shapley Value） 最开始的夏普列值是关于有限竞争者参加的游戏中，每一个参加者的效用值的大小。后来被推广到无限竞争者参加的场合中。每一个参加者的夏普列值是他对某个竞争团体的边际贡献的期望值。他参加那个竞争团体都是随机的。夏普值已被应用在许多领域，如政治中的选举理论。在经济中，夏普列值也得到了应用。例如，经济学家集中讨论的交换经济模型中，最基本的概念就是竞争均衡，也就是价格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每一个经济团体都是自由地交换商品。这种交换经济也可以称为市场游戏。在交易者无穷多，因而每一个交易者的都是无足轻重的情况下，每个竞争者的夏普列值都是经过竞争实现的。各个竞争者的总和构成总供给和总需求，这决定了竞争价格，每个交易者的夏普列值就是对这一竞争价格的边际贡献。夏普列值的分析与普通的一般均衡分析不同。后者不考虑个别竞争者的作用，而前者则考虑到每个竞争者的边际贡献，在非标准分析中，夏普列值也得到了利用。

套头交易（Hedging） 指买方或卖方为了保护其收入免遭今后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而协助于期货市场的操作行为。对中间商其方法是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中大约同时买进和卖出等量同样的或类似的商品，以期在一个市场中远期价格的变动能从另一个市场中价格的相反变动来抵消。如果某生产者所用的某种原料的未来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该生产者为避免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可以按照所需原料的数量购买一份期货合同。如果购买原料时，原料的价格确实上涨了，那么与当初直接购买原材料相比，就有一个损失。但这时生产者的那份期货合同却已增值，增值的幅度正好弥补上述损失，也就是说，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正好为出售期货合同的获利所全部，或至少是部分地得到弥补。如果原材料的价格下跌，则可在市场上直接购买原材料并从中获益，它可以至少是部分地弥补那份期货合同的现值低于当初买价的损失。就卖方而言，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套头交易还被普遍地用于对预期价格至少和通货膨胀一样的速度上涨的一项资产的购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用套头交易来

对付通货膨胀”的做法。在外汇市场上，套头交易极为常见，它被用来对付汇率的波动，具体地又分远期套头保值和即期套头保值（spot hedging）。套头交易是由市场不确定性而引起，它的操作以期货市场的存在为首要条件。通过套头交易可以消除或至少是减少因市场不确定性给经营者所带来的损失。

套利（Arbitrage） 套利是指在某一市场买进而在另一市场卖出的行为。套利能够把这些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商品价格保持在由从某一市场买进而在另一市场卖出的交易成本所决定的范围内，建立起既定市场上既定商品价格的浮动界限。商品价格脱离由交易成本所决定的浮动界限会引起套利，从而迫使商品价格重新回到其活动范围内。

套利可能出现在外汇市场上。任何一对货币间都存在一定的汇率，如果从某一货币开始，与其它一些货币相继进行一系列交易，套利就保证最终得到的起始货币数量，等于该货币开始时数量减去交易成本花费。例如，首先用美元购买法国法郎，再用法国法郎购买日元，最后用日元购买美元，作为套利行为存在的结果，最后得到的美元数量等于开始时支出的美元数量减去交易成本。

交易同一商品的市场间也可能出现套利，如果(1)个人能够在所有这些市场上订立合同，或者(2)其中任意两个市场能够被同一个人的交易行为联结起来。例如，纽约与芝加哥银行的差价，不能超过从其中一市场运输银子到另一市场的运输成本。脱离这一价格浮动界限的趋向会引起套利活动，套利会使银子输出市场的银价不断上升，同时银子输入市场的银价不断下降，直到从这样的交易中不能再获取净利为止。

套利的主要作用是依据把商品从某一市场转移到另一市场的交易成本而建立起同一商品在不同市场上的价格的联系，但是套利的后果是不确定的。例如，在股票市场上，出现了两家公司（如公司甲和公司乙）要合并的预测，而且预期到公司甲将以某一比率，如公司乙每一股股票换取公司甲两股股票，全部买进公司乙的股票。如果合并确实发生了，那么由于套利的作用，公司乙股票价格就会是公司甲股票价格的两倍。但是，除非合并是明确无疑的，否则由于不合并的风险存在，这两家公司股票价格的比率并非必然是2比1，由于当前股票价格比率偏离合并确实发生时的价格比率而采取的买进一家公司的股票并且卖出另一家公司的股票的交易行为，也可以叫做套利，即使其中包含有风险因素。

以即期价格构进一定量商品并且以远期价格卖出相同数量商品，也是套利的一种形式。由于这样的和其它类似的交易行为，把远期价格与即期价格联系起来，使远期价格超过即期价格的差额，不能大于从现在到依据期货交易合同的交易日这段时期内商品的存贮成本；而且商品较晚交割的价格超过较早交割的价格差额，也不能大于该时期内商品的边际存贮成本。所以套利也建立起不同时期交割商品价格的联系。

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由罗斯（Rose）所建立的套利定价理论（APT）是一个单时期模型。模型假设，每一投资者相信资产收益的随机特征是与一种因子结构相一致的。所以，如果均衡价格没有提供套利的机会，那么这些资产的收益将近似地与因子载荷量线性相关，其中因子载荷量是和收入与因子的协方差成比例的。

APT模型是建立在排除套利的基础上的，所推导出来的资产定价关系是由某种类型追求效用极大化代理人所构成市场的均衡的必要条件。APT模型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替代理论，它们都认为，资产预期收入和它们与其它随机因素的协方差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只是CAPM所考察的是资产预期收入与市场证券收入的协方差。这些协方差被解释成投资者不能通过资产分散化来加以避免的风险的度量标志，而且预期收入与协方差线性关系的斜率参数被解释成风险贴水。

1.APT模型的正式表述

假设投资者相信表示单时期资产随机收入的NX1阶矢量r满足

$$r = E + Bf + e \qquad (1)$$

其中r和e都是Nxl阶随机变量矢量，f是Kxl阶随机变量（因子）矢量，E是Nxl阶矢量，B是Nxk阶矩阵。在不影响分析结论的普遍意义前提下，标准化式（1）。令 $E\{f\}=E\{e\}=0$，其中 $E\{\}$表示预期值，那么 $E\{r\}=E$。

APT的证明需要对协方差矩阵 $E\{ee'\}$，协方差矩阵 $E\{ee'\}$的特征根与矩阵 BB'的特征根间的关系附加一定的限制性条件。通常假定 $E\{e|f=0\}$。假定资产数量比因子数量即N比K大得多。在某些模型里，N趋近于无穷。因此，式（1）适用于一系列资本市场；在第(N+1)个市场上的前N种资产与第N个市场上的资产是相同的，第(N+1)个市场的矩阵B的前N行可以替代第N个市场的B矩阵。

APT认为，存在一（K+1）×1阶风险贴水矢量、一N×N正定矩阵I和一常数a，使得

$$(E-CU)I^{-1}(E-CU) < a \qquad (2)$$

成立，其中N×（K+1）阶矩阵C=（i，B），而i是以1为元素的N×1阶列矢量。如果所考察的投资场所存在某种无风险资产，那么风险贴水矢量u的

第一个元素就等于无风险资产的收入。

如果（2）由

$$E-Cu=0 \qquad (2')$$

代替，就取得准确的套汇定价公式。（2）的含义是，E矢量的每一元素近似地线性依存于矩阵B的对应行。资产间的这种线性关系是相同的。常数a越小，这样的近似越准确；如果a=0，线性相关就是完全的从而得到式（2'）。

一种有价证券v是一$N\times1$矢量。有价证券的成本是$v'i$，它的收入量是$v'r$。如果它的成本不为零，它的收益率就是$v'r/v'i$。

有关经验检验也证明了APT模型比其它一些替代模型性能优越，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套期保值（Heclging）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多译为"扶盘"、"护盘"、"顶险"、在我国也译为"对冲"、"套头交易"或音译为"海琴"。（1）在现货（包括商品、有价证券、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外汇的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或买进金额大致相同的期货合约，因价格（包括汇率）变动造成的现货交易上的盈亏由期货交易上的亏盈抵消，以避免价格风险（包括外汇风险）的交易方式；（2）任何一种可以避免外汇风险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外汇市场避免外汇风险的方法。

套期保值分为：（1）空头套期保值。进行套期保值时在期货市场上先卖出后买人。例如：美一跨国公司在英国有一分公司急需10万英镑半年后可归还。总公司便购买10万英镑汇去，为了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情形如下：

现汇市场	期货市场
6月1日 买入10万英镑	
汇率1英镑=1.8000美元	6月1日 卖出4份12月英镑期货合约
支付18万美元	每份25,000英镑共10,000英镑
	汇率1英镑=1.79美元
	价值17.9万美元
12月1日卖出10万英镑	12月1日买入4份12月英镑期货合约共10万英镑
汇率1英镑=1.700美元	汇率1项=1.71美元
收入17万美元	价值17.1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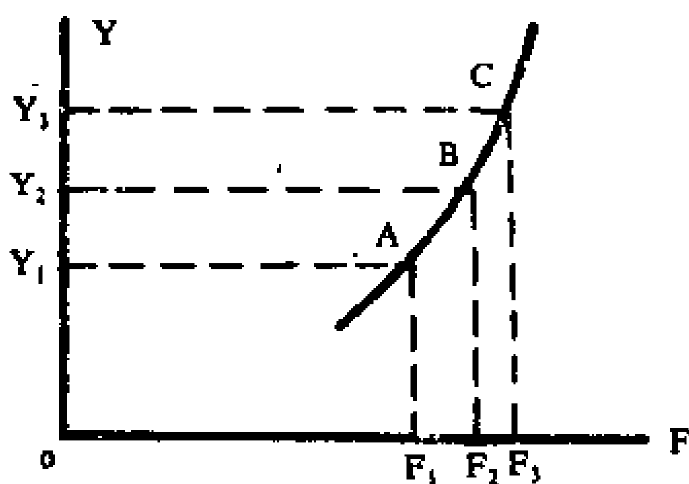
在现汇市场上亏损1万美元、在期货市场上盈利0.8万美元，使现汇市场上的损失减少到0.2万美元。（2）多头套期保值。进行套期保值时在期货市场上先买入后卖出。套期保值须遵循"均等且相对"的原则。"均等"即进行期货交易的商品（包括有价证券、外汇）应和现货市场上将要交易的商品在种类和数量上一致。"相对"即在两个市场上采取相反的买卖行为。

套算汇率（Cross Rate）　（1）从两种汇率套算出的汇率。如通过A国货币与B国货币的汇率以及B国货币与C国货币的汇率，计算出的A国货币与C国货币的汇率；（2）因世界主要外汇市场只公布以美元标价法计算的汇率，故不能直接反映非美元货币的汇率。从两种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中计算出的这两种货币间的汇率即为套算汇率。如从美元对马克的汇率及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汇率计算马克对瑞士法郎的汇率。（3）以基本汇率为基础计算出的本国货币和其它货币间的汇率。假若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基本汇率、其汇率为：1美元=5.2人民币、外汇市场上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2马克，据此便可计算出人民币对马克的汇率：1马克=2.6元人民币。

哲学与经济学（Philosophy And Ecqnamics）　哲学与经济学是相互关联的，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来源20世纪的科学哲学的某些观点已经在某些程度上不健康地主宰了经济学。关于这一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对经济学产生不良影响的仅仅是科学哲学某些特点，而且不是经常地影响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理论有亲缘关系的某些哲学分支对经济学将不起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起破坏作用。政治经济学是人文学科学族的一个成员。在这个古老的人文学科学族中，各学科保持着既紧密而又充满活力的联系。一个经济学家可能被来自科学哲学的某些思想观点深深地影响着，但不会丧失对某些特殊问题重要性的正确的感觉。本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思考所产生的某些思想观点，其对经济学的破坏性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文科学在本世纪经历了一次信任危机，人们灵魂是一片黑暗，"否定一切"成为一种思潮。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却充满活力，并为自己的成功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因此，自然科学吸引了20世纪的注意力。第二、自然哲学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完全是单向的。人们找不到马尔萨斯对达尔文影响丝毫痕迹。但是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明显的、健康的，充满了给与与接受的相互关系。第三、某些不适当的概念被移到经济学中而产生了广泛的破坏作用、这些概念即使在自然科学那里也是有害的，但却被很多科学哲学家所广泛地接受了。我们不能作这样的假设，对自然科学的正确的哲学分析也将对经济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产生破坏作用。

恩格尔，E.（Ernst · Engel 1821—1896） 德国社会统计学家。就读于巴黎煤矿学院，最初主攻采矿冶金，后来改修统计。先后担任过萨克逊统计局局长（1850—1858 年）和普鲁士统计局局长（1861—1882）。曾发表过多篇重要的社会统计研究论文，如《萨克逊王国的生产和消费状况》（1857 年）和《比利时工人家庭的生活费用》（1895 年）等。他的研究结果明确指出：每个家庭的食物以及其他必需品支出在其收入或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会随着收入或消费支出的增减而有所不同；而收入越低的家庭，其食物以及必需品支出在收入或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它可以说是第一个依据经验资料得出的经济数量规律，即众所周知的"恩格尔定律"。此外，他还就劳动、工业、税收，保险及银行等经济问题发表过论著。

恩格尔曲线（Engel Curve） 全称为恩格尔食物支出曲线，系根据恩格尔定律（见"恩格尔定律"条目）得出的表现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总收入的关系的一条曲线。



图中，Y 代表收入，F 表示食物支出，当收入由 Y_1 上升到 Y_2 时，食物支出由 F_1 上升到 F_2。当收入由 Y_2 上升到 Y_3 时，食物支出由 F_2 上升到 F_3。把图中的 A、B、C……点联结起来，便得到恩格尔食物支出曲线。恩格尔食物支出曲线的斜率始终大于 1，这表现出了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总收入之间的反比例关系。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 由德国 19 世纪的统计学家恩格尔（E · Engel）提出。他在长期对无产者家庭的预算构成的研究中发现，食物支出占整个家庭全部收入的比重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也由此得出，即为家庭各项支出是家庭全部收入的比例。由于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支出存在对应关系，所以现在人们所用的恩格尔系数还有的指家庭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根据恩格尔定律，人们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乃至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如有人把食物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在 20% 以下者划为富裕家庭，50% 以上者为不富裕家庭 20%—50% 之间者划为中等家庭。恩格尔本人也认为，食物是农业的主要产品，这样食物在总消费中比重的下降就表明农业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份额下降。经济发展就是一个结构演化的过程，恩格尔系数也成为人们进行经济结构研究的重要工具。当然对恩格尔系数的利用常常需要一些假定条件，如相对价格不变等。

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 19 世纪德国的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经验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提出的一种观点，其内容如下：一个家庭食物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是与该家庭的总收入成反比例的。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恩格尔定律隐含着食物的收入弹性是小于 1 的，这一观点已被许多经验统计资料所证明。一般认为，恩格尔定律在以下两个前提之下是普遍适用的：（1）假定其它一切变量都是常数；（2）"食物支出"有统一的含义，即指维持生活所需要的食物支出，在各种收入水平之下，都应按照这种含义所要求的来衡量。经验统计资料证明：恩格尔定律不仅适用于食物支出，也同样适用于作为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衣服、住房等生活必需品支出。

健全货币（Sound Money） 指货币的稳定性。一是指货币发行与商品价格总额挂钩，以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二是指商品间的相对价格的稳定。保持货币的稳定性的理论认为，应该阻止中央银行这一货币发行机构行为，因为这一行为造成了或扩大了经济中的不稳定。关于货币的稳定性的第一种看法，即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本币与外币或与贵重金属兑换比率的稳定，二是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前者被称为货币的外在稳定性，后者被称为货币的内在稳定性。健全货币一词的来源是由于有人认为，为避免经济中清偿危机，就需要通货本身的弹性的存在，也就是需要有货币供给的弹性，但货币供给的增加，势必引起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又会产生一系列经济问题，因此，有人提出健全货币这一主张。凯恩斯经济学却为健全货币应该让位于健全的经济，即经济的稳定高于货币稳定，经济稳定意味着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健全货币是期望存在着这样一种货币供应量，其刚好满足交易需要。健全货币的前身是一个世纪以前的"真实票据说"意思是银行保证为那些真

止的商品交易所发生的汇票进行贴现，而不是建立发行基金从而被投机性金融交易所利用。为了建立这种健全货币许多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都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后来，健全货币说被货币数量论所取代。

健康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 健康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领域，在这里主要从事经验性的研究。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来源有四个领域，它们是：金融与保险业、产业组织、劳动力、公共财政。虽然健康经济学只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但其主要研究资料却来源于保健技术和医疗机构。有政策导向的研究在健康经济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与政策相关的重要的文章的读者通常是医生以及其他参与医疗保健工作的人。将经济学的概念及研究方法系统地应用于保健领域的历史很短。一本全面论述健康经济学的书所依据的资料是1977年以前的，其中只有10%的资料是1963年以前的，1963年以前，人们只是以文学的形式来看待医学与经济学。对健康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文献主要是对美国医疗机构的论述、对精神病与公共健康的论述、对英国全国医疗水平的论述。美国第一届健康经济学大会是1962年举行的，世界第一届健康经济学大会是1973年举行的。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是1979年出版的。健康经济学的发展依赖于主要健康问题的变化以及医学的发展。由于人口年龄的变化，慢性病和长期的医疗保健将日益受到重视。在非老龄化医学问题中，起因于滥用药物的问题将日益重要。有些问题在医学上是可行的、而在经济学上是不可行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将加深。所以关于效率与健康政策的公平性的矛盾也将更加突出。为此，医学要与经济学紧密地结合。

俱乐部（Club） 俱乐部是对于其成员分享公共产品的一种组织，并为其成员交付产品的成本和费用（一般是以人头税的方式交纳的）。每个成员取得产品的质量或数量不取决于成员的身份或是成员的组成成份。提供作为俱乐部产品的资源水平越富，每个特定的成员所能取得的公共产品的质量或数量也越提高。

俱乐部产品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中间类型产品，这种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即与公共产品相对照，它可以排斥某些居民对它的消费。但其最优规模一般大于单个消费者的最优规模。因为在俱乐部内部成员可以共同消费某种产品，而使俱乐部内部成员的最优规模提高。例如，放映电影，电影入场券可索取一定的价格（排他性可以付诸实施），一定数目的人可以分享这种产品而不会相互影响各人对它的消费。最优的分享人数是使分享人的共同效用达到最大的人数。如果俱乐部成员是同一的，那么这种状态还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

俱乐部理论是非纯粹公共产品理论的组成部分。上面已谈到俱乐部产品的排他性。除此之外，还有非竞争性。因为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并不妨碍俱乐部内别的成员对它的消费。例如游泳池、公园、美术馆、风景点、海滩等都是俱乐部产品。很明显，当出现拥挤，即俱乐部成员已超过达到最优状态的最多人数时，该产品的非竞争性就不再存在。当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俱乐部后，每个成员的效用将出现递减趋势。人增加越多，个人效用递减越快，这一理论就称之为俱乐部理论。

俱乐部的效用、成本和俱乐部规模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C = f(X, N); 或 X = \varphi(C, N)$$

在这，C 表示总成本或费用，X 表示产品总数量，N 表示俱乐部的规模。并且假设俱乐部内所有成员 N 消费同一数量或质量的商品。在成本 C 固定的条件下，如成员 N 增加，则产品数量 X 减少。而在成员 N 固定的情况下，产品数量 X 则随从成本中取得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俱乐部理论在交通、通讯中是十分有用的。其目的在于确定俱乐部产品的最优规模，以及这类产品供应量的最优值。

债券（Bonds） 金融市场上发行和流通的有价证券之一。它是债务人承诺按固定利率和在规定时期内分期支付利息，并在特定的到期日偿还本金的书面债务合同。最早的公开债券出现于12世纪中期。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债券已成为政府和公司向债券购买者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债券上的条款主要包括发行者的名称、利率以及偿还期等。如有担保，还须写明担保品的名称。条款的设立旨在保护债权人的权利。条款的诠释及其法律效力随着立法及司法的变更而有所不同。

任何证券都具有偿还期、流动性或变现性、安全性以及收益率这四种特征。债券的偿还期较长。极端的例子是英国1751年发行的统一公债。在规定的偿还期到期日发行人有权收兑债券。由于债券持有人通常不参与公司的分红，所以有些公司的债券包含了一个附加条款，允许持有人以规定的换算值将债券转换成公司的普通股股份。债券一般是可流通的，通常是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其流动性由于期限较长而较其它短期的债券差。所谓资产的安全即资产免遭风险的程度。债券投资的风险有两类：一是爽约的风险，主要指债券发行人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和按期还本；二是市

场风险，即债券持有期内市场利率的波动对债券投资收益的影响。由于债券持有人无权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短期内的资产负债变动也无法过问，所以一旦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持有人就面临爽约的风险。爽约情形下债券持有人的权利由合同的有关条款及政府司法部门来确定。债券按获取收益的不同方式可分为附息票债券和不附息票的债券即贴现债券。前者的收益表现为在不爽约的情况下，按息票所示在指定日期按固定数目的利息支付；后者的收益则不表现为间歇的现金流量。债券持有人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购得此种债券并在到期日兑取相当于面值的现金。这种债券投资的收益即是贴现债券发行价格与收兑价格之间的差额。债券的息票有助于人们选择一个适当的资产组合来实现其投资行为的收益最大和风险最小即效用最大化。投资资产的多样化可以免除减少市场利率波动造成的风险。持有债券的名义收益包括二部分：一是持有期的利息收入；一是持有期债券价格的变动。例如，持有一种长期债券两年的收益在不存在交易成本和税收的条件下可表示为：$y_1+y_2-P_p+P_s$。其中，P_p 和 P_s 分别表示债券的购买价和出售价；y_1 和 y_2 则表示两年各自的年利息收入。如果利息是在年底支付，那么两年期投资的名义年收益率 r 可通过对以下多项式求解获得：$P_P=y_1/(1+r)+(y_2+P_s)/(1+r)^2$。如果 P_P 和 P_s 分别为债券的实际购买价和出售价，那么，当 $P_P<P_s$ 时，债券持有人就实现了资本利得；当 $P_P>P_s$ 时，则称资本损失。债券市场均衡的条件是对期限不同债券的投资在相同时期内获得的收益率应相同。如果这一条件没有满足，那么债券的交易者就会卖掉收益率低的债券买进收益率高的债券直到交易成本超过了二者收益率的差额。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则债券具有完全的可逆性。当预期市场收益率上升时，上市的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现有的债券持有人投资人的收益率就会下降，从而会遭受资本损失。债券持有人总是抢在市场收益率下降之前买进债券以便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实现资本利得。债券的未来价格是不确定的，价格和收益率呈反向变动。

按债务主体，债券可分为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和国际债券。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是为弥补赤字和获取资产。公司可以通过向银行短期贷款或者发行长期债券来为长期资产融资。依靠银行贷款的办法为企业长期资产融资使企业面临银行单方面更改贷款条件或拒绝续贷的风险。企业发行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的债券，要视获得的长期资产的收益率与短期利息率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有发行法币或外部货币、短期国库券、钞票以及债券。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对外部货币与付息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加以控制。国际债券是各国借款人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各种面值的债券。债券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被中央银行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之一。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债券来控制市场利率以影响投资环境。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在市场上卖出债券引起债券利率的上升、利率的上升加大了企业添置新的资本设备的成本，以致于使投资无利可图。控制债券利率和其它市场利率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以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如果债券较之国库券对投资者的资本组合中物质形态的资本有更好的替代性，那么出售债券购进等量国库券的债券管理政策会阻碍私人部门资本的形成。

70 年代以来，债券市场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上的变革和创新，对经济产生了虽然目前无法准确估计但肯定将是持久的影响。债券的期货市场的建立加强了债券在投资者资产组合中的地位，套期保值交易和投机行为在期货市场上如鱼得水且成本极小；息票和债券分离，各自作为独立的有价证券形式进入市场。除去息票的债券本体成为贴现债券；债券交易在技术上的改进表现为操作的自动化程度的提高。高度的自动化降低了债券交易成本并使债券持有更加便利。大部分美国的政府债券不再以书面证明形式发行，而只是在输入计算机进行登记。自动化的应用还提高了债券的可逆性，从而淡化了债券和外部货币之间的区别，因而增加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奏效的难度。大规模的离岸的欧洲债券市场的建立减弱了一国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时使得对潜在债券发行人的信用评估日益复杂化。最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的半官方机构发行了大量无异于政府债券的债券或附属性有价证券这一现象同样值得重视。

债务 (Debt) 指的是借贷双方之间的一种自愿的交易行为，其中的贷方将一笔资金转让给借方使用，而借方则承诺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将这笔资金归还，并支付一笔利息，作为对贷方放弃这笔资金的当前使用权的报酬。其中的借方叫做“债务人”，贷方叫做“债权人”。债务发生的时候，借贷双方一般要签定一个正式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债务人要通过签字或者财产抵押等方式来证明其承诺归还债务的有效性，此外还规定债务归还的时间、应支付的利息等等，这通常由借贷双方经过协商制订。

债务人可以是个人、企业、也可以是政府机构以及金融机构。他们借债的动机、数量、种类以及对此产生影响的因素都各不相同。

(1) 个人借债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例如，当某个人或者某个家庭由于失

业、退休、生病等等原因造成收入状况下降，为了使原有的生活水准不致降低，他们就只有借债。另外一个动机是超前享受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例如，某个中等收入的家庭本来没有力量购买房子，但是他们希望能尽快拥有自己的住房，于是就借款或者分期付款购房。个人借债的意愿与数量要取决于有关贷款人所定的利息率水平，如果得不到低利率的贷款，那么个人只有在前一种情况下被迫借债，而后一个动机就可能要推迟实现。如果贷款量很多，利息率也低的话，就会刺激个人与家庭进行后一种消费。不过一般来说，个人借债的数额一般不会很大。

(2) 企业借债一般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维持正常的生产水平，例如，某个企业目前的销售额降低，资金周转不灵，这时，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水平，企业只好暂时借债，一旦境况改善，就可以还掉这笔债务。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建厂初期，或者要引进大规模先进设备的时候，企业手头一时筹集不到如此巨额的资金，就先借债，等到生产运转起来，或者先进设备将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之后，所赚得的利润除去还债与支付利息，还有剩余。企业要筹措资金，除了借钱以外，还可以发行股票，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要取决于贷款的利息率水平以及风险程度等等。如果贷款的利息率太高，企业就会选择发行股票；相反，如果发行股票的风险比较大，企业就可能去借债。当然，企业也可以将两种办法结合使用。

(3) 政府借债同个人与企业一样，或者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维持原有的支出水平，或者是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需要筹措大笔资金。

政府借债或者来自国外，或者来自本国。政府借入外债时，国内可用的资源数量增加了。但是外债的偿还与支付利息都必须是国内有形的物质资源，这对国内经济是一个负担。此外，有些外债要附带一些政治的、军事的以及外交方面的要求，接受这类债务，就有可能逐渐为别国所牵制，甚至被剥削。所以，借外债需要权衡利弊、慎重考虑。政府向国内的企业与个人所借的债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生产资源的数量，政府的债券被国内的个人或者企业以资产的形式持有，只是支付利息的负担落在所有纳税人的身上。

政府借债也要考虑利息率的问题，一般来说，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利息率比较低，有较多的信贷可供使用，这时政府借债，并把它用于增加投资等项目，那么就可以刺激所有部门的投资，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使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经济逐渐走出低谷。但是，如果政府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借债，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影响私人资本的形成。

另外，如果政府将借债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兴办公共事业，例如教育、医疗等等，那么它们在未来的收益将远远超过债务的本息之和以及对私人投资的任何不利影响。

(4) 在金融机构中，如果把存款看成是一种贷款形式的话，那么银行等机构也可以算成是债务人。不过，更准确地说，它们只是借贷交易的中间人，银行的存款还要向最终借方发放。此外，当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不足的时候，它们也可以向货币当局借债，以应付信贷需求的扩张等等。

债务管理（Debt Management）　指政府对于国债的性质以及国债的构成方面所进行的控制活动。债务管理包括发行新的债券，也包括以所发行的债券去偿还或者更换已经到期的旧债券。搞好债务管理的三个重要因素是，掌握好利息率水平、债务所有权类型以及债务的到期时间表。债务管理的目的是把债务利息支出降到最低额度，稳定经济周期，促进经济的发展。5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很重视尽量降低债务利息，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对政府债券的持有量，从而提高银行储备，刺激银行贷款以及货币余额持有量的增加。。50年代，管理的重点转向私有企业以及国民经济的稳定。政府通常靠把握债务的到期时间来对经济进行调控，并达到稳定经济周期的目的。一般来说，债券到期的时间越短，它的流动性就越大，因为它更容易换成现金；而债务到期的时间越长，它的流动性也就越小。在经济扩张的时候，可以增加长期债券在国债中所占的比重，使债务的平均到期时间延长，以防止经济过热；相反，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的时候，则应当减少长期债券的比例，增加短期债券的数量，以使经济更具有流动性，从而逐渐走向繁荣。采取前一种措施时，国库存款会暂时增加，但是由于个人与企业能够明智地预测到政府的政策以及经济的前景，因此，增加的存款至少会被部分地抵销。在经济繁荣即将到来的时候，如果人们预期短期债券利率将要上升，那么只有使得长期利率高于短期利率，给经济降温的政策才能奏效；反之，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如果人们预期短期利率将要下降，那么只有使短期利率维持在高于长期利率的水平上，才能使经济逐渐复苏。近年来，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政策制订者开始将重点转向对货币增长率等问题的研究，债务管理已不再象从前那样受到重视了。

债券评级（Boncl Rating）　由专门的评级机构对发行人的偿还能力作出估价并进而对其所发行债券的信誉评定级别，作为投资者购买债券的参考，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多在公募时采用。评级机构对投资者只有道义上义务而无法律责任。评级亦不是发行新债

券必须履行的手续。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评级机构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cl &Poor）和穆迪公司。前者将债券分为 10 个级别：AAA、AA、A、BBB、BB、B、CCC、CC、C、D；后者分为 9 个级别：AAA、AA、A、BAA、BA、B、CAA、CA、C。A 级以上者信誉较好，投资安全；BBB 或(BAA)，级尚可，但所在国政治、经济有突变的可能；BB（或 BA）以下级属于有风险的借款人。

爱好的变化（Change In Taste） 爱好有时也称偏好，是人们对于生活中的商品、服务、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等诸方面事物的喜恶程度、爱好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爱好的变化则是指人们对上述诸方面事物的态度、评价标准和认识程度的改变。

利用爱好的变化现象来解释或评价经济现象在分析上往往是很方便的。例如，由马歇尔提出的既定需要的假设，虽然很粗糙，但仍不失为发展效用理论的有效出发点。马歇尔在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写道：研究消费者爱好的变化，在经济的发展、调控中是很重要的。对商品和劳务的爱好不是生理上既定的，斯蒂格勒（Stigler）和贝克(Beeker）赞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有某种深藏在内的需要，比如对营养和自尊的需要是既定的，这些内在的偏好与价格和收入相互作用，解释了对某种商品和劳务爱好的变化。

影响爱好变化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生因素，即外部经济力量，时间、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另一类是内生因素，即人自身的内部因素的影响，有时也称之为偏好。

外生因素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首先，爱好可能随经济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广告宣传对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市场产品深入到传统社会的广泛程度影响到与公共“空闲”活动相关的对物质产品消费的爱好。当这些相互作用在实践中越来越重要时，正确的经济模型应该把这些作用也考虑进去。其次，当不同时间消费者的爱好有所不同时，偏好会发生暂时的不连续，人自身内部的矛盾也会随之产生。期望将来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面临着一个计划现在自我与将来自我的问题，这类似于在两个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之间分配资源的情况。我们应考虑对理性的时间选择理论加以扩充，包括研究消费者计划及其实施等。如果偏好有节奏地或周期往复地变化，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一个周期性地大量花钱或过量饮食冲动的消费者，可能预先采取措施控制这些冲动，如烧掉信用卡或锁上冰箱，汤马斯·谢林（Thomes Scheuing）把关于缓和人自身内部偏好矛盾冲突的策略性行为的学科称为自我经济学。

上面所讨论的这些爱好的变化，也许并不是消费者自觉的行为，甚至他们对此毫无觉察，而是偶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在消费者对自己的爱好加以选择的情况下，问题复杂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例如一个消费者认为他应该消除对吸烟的爱好转而培养对慢跑的兴趣，一个正确的消费者决择理论应包括这种第二次偏好，或称为偏好。这种扩充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解释在发达社会里消费者利用各种方法，比如上音乐欣赏课以接受减肥治疗和参加戒烟协会来帮助戒烟等。这种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的爱好而引起的消费支出。

另外，更广泛地说，消费者日常消费支出与其对自己生活（不仅仅是偏好、而要其“价值”）的想法之间的矛盾关系，一定程度上解释消费者的矛盾心理、意识形态以及自我约束。自我批评能力等问题。这些虽不总是经济学家接触的问题，但有时也会碰到。储蓄行为，人与工作的关系就是这方面应用最好的例子。在人与工作的关系中，组织的目标是否明确是很重要的。如组织的目标透明度高，工作者则会产生一种被信任、被重视的主人感和归宿感，他在这个组织工作的时间就会较长；相反，工作者对组织的目标不清楚，没有参与意识或不强，就会经常地变动自己的工作地。艾伯特·希施曼（Albort·Hirschman）认为对政治参与“爱好”的波动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的构成与不断完善。

偏好是可以变化的。这一事实展示了经济学实证性及解释性的一面。这种研究体现了社会政策在解决偏好的个人矛盾冲突问题中所起的作用。社会可以提供支持自我控制的机制。例如允许人们签订约束其将来行为的契约以防止个人将来需要的实际发生等。但人们很难决定应从哪个角度来评价一个决策的效果，无论是在个人福利还是自由权利方面。政府投票显示出，社会政策也可以破坏个人的自我控制。

如经济制度或政策可改变偏好，那么重重的困难也会随之而来，或是在事前或是在事后（除非两者恰好一致），评价这样的政策或制度似乎有些武断，但对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来说，决定哪些偏好更具“目标性”，更好些，不但是对自由的威胁，且也是非常武断的。进一步的探讨则立足于评判人们本身欲望引起的“偏偏好”的问题。但是，偏偏好本身也可能依赖、受制于经济制度和政策，因此，这种方法实际也无法更深入。

从实证性角度来说，两种问题，即关于偏好矛盾和内生偏好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摆脱大部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严格的“只考虑需要”的道德系统是必要

的。这种被A·K·森称为"福利主义"的道德系统，除了个人偏好满足程度外，排除了与道德无关的但反映一个社会现实的所有信息，认为只有当影响到偏好满足程度时，其他信息才能被加以分析。功利主义和帕累托（Paretian）福利经济学是福利主义道德系统的最好例证。

在放宽福利主义的严格控制后，人们可搜集到许多有助于解决"偏好变化"问题的信息。首先，关于偏好形式程序性问题被认为在道德上是很重要的，而建立在歪曲事实，控制个人情绪基础上的偏好的形式或变化，则被认为是重要性降低，而不管对那种偏好的结果的价值是如何评判的。其次，对个人福利状况的衡量不（或不仅仅）考虑偏好的满足，而应着重分析个人可以获得的资源或个人可以运用的"才能"。这将使对事件的评价从依赖现存的偏好中部分解脱出来。最后，一个社会可以利用其公众活动对提倡某种偏好或共同价值在好坏评价标准方面达成一致。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这些偏好在其他时代或其他社会里同样有用。

上面所述问题，即偏好对制度和政策的独立性；个人本身内部欲望矛盾冲突的存在；人类评价自身偏好的能力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认为是社会理论中的中心问题。这些问题25个世纪以来仍处于中心地位且一直未得到解决。这种状况无疑会使一些经济学家对它置之度外，但其他经济学家则对爱好变化探讨的重新兴起持欢迎态度，把它视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政治哲学重新建立联系的有利机会。

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　预算约束是消费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一种约束条件，即进行交易的当事人要以财富约束为前提条件，其购买品的价值不超过出售品的价值。在简单交易的场合，如果价格被任何数量倍乘，约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需求函数是齐次的。如果所有物品都是必需的，约束将总是有约束力的，需求函数遵循瓦尔拉斯法则。预算约束的解释说明，人们的开支不能超过其财富量，否则就会有借（或贷）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商品物质属性的基础上，根据可获得的时间先后将它们分类，在引入时间因素的场合，物品可以根据其有用的属性形态区分。一个人的未来财富数量尽管是不确定的，但其财富约束却是确定的。这取决于一个适宜的应急性市场的存在，由于差别信息和事实上的交易费用，这类市场不可能存在。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内部暂时的财富约束是不确定的，他们面临一连串收入约束而不是一个财富约束。在现代货币经济中，没有货币，交易可能极其麻烦，因为它必须同时满足"需要的双重偶合"，货币的出现使这种困难得到了解决。当预算约束转变为对人们偏好的限制时，如果借入和贷出可以自由发生，那么，长期的过度需求或过度供给就不可能出现。在给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受到约束的，即他只能选择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以下的组合。只有在切点上，消费者的有限收入才能实现最大效用，消费者均衡才能达到。此时，商品X和Y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它们的价格比率，即 $MRS_{XY}=P_x/P_y$。

预期（Expectations）　经济单位所必须作出的决策中，绝大多数都包含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样，任何意在刻画人类行为的经济模型都可能包含有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经济变量的预期。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里都包含有预期，如跨时期的消费或劳动供给决策理论、厂商的定价、销售、投资、存货决策理论、金融市场和货币理论以及保险理论等都包含有预期。

预期有经济预期、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预期、专家预期以及理性预期和与之相对的机械预期，此外还有数学预期（即数学期望）。经济预期的实际意义通常是难以讲清楚的，不同的人对于未来变量的结果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通常问及人们对某个经济变量的预期时，他们可能会回答说他们没有预期，经济模型中的经济变量的预期，实际上都是用某些人的预期的某种平均或同一些人在不同的时期所作出的好的或坏的预测的平均来推测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预期一般都是对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在下一时期变动的方向作出某种猜测，而不愿意对这种变动的范围作出某种数量估计。一项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在前一时期失业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利润或零售额是增加还是减少，并且也知道利息率是升高还是降低，但对这些变量增大或减少的程度，都不了解。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据以作出他们预期的信息也是很零碎的。专家预期也可以称为是专家预测，经济预测早就变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一些人定期公布他们对宏观经济变量变动预测的结果。专家预测一般都有某种经济计量模型作为基础，专家预期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预期二者的区别在实际中可能并不重要，专家所拥有的那些优势可以获得许多资料、数据、熟悉经济理论和可以利用统计方法，在经济结构改变时，可能变得毫无用处，这些数据、统计方法对专家预期没有什么帮助，此时专家也可能象普通的个人一样采用适应预期或其他的预期方法。理性预期是指把理性的最大化行为原理用于信息的取得和处理，以形成对未来问题的一种看法。它假定个人不致出现系统的预测错误，他们有关未来的猜测一般说来都是正确的，理性预期认为，

当人们对未来形成一种看法时，个人获得一切可以取得的有关信息，并使用信息达到使取得和处理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由此活动取得的边际效益的程度。在信息完备且无不确定因素的极端情况下，这一假设就成为一种完全的预见。数学期望一般用于概率理论之中，经济学中的预期与数学上的预期（即期望）二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对应关系，实际上，也经常用其他一些测度中心趋势的量（如中值和众数）来代表经济模型中的经济变量的预期。

预期效用假设（Expected Utility Hypothesis）

关于风险行为的预期效用假设，实质上是假定单个决策者拥有定义在某个事件集合上的"冯·诺依曼——摩尔根斯特恩效用函数 U（·）或冯·诺依曼——摩尔根斯特恩效用指数$\{U_i\}$，单个决策者总是在这个集合中进行选择，使其 U（·）或$\{U_i\}$的预期值最大，由于这些事件可以用来代表选择的财富水平、多维商品束、消费的时间流，或甚至非数值结果，因此，这种预期效用方法可以用在非常广泛的场合，不确定性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是在预期效用的框架中进行的。

预期效用模型是现代消费者理论的一个分支，它首先限定一个选择目标准合，并且假定个人对这些选择目标拥有一个偏好序，这个偏好序可以用偏好函数 V（·）表示，越为人们所偏好的目标，偏好函数所赋予的值就越大。不过，预期效用模型与非随机商品束的选择理论在两个重要方面并不相同，首先，既然它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下的选择理论，其选择的目标就不是确定的，而是这些事件概率分布；其次，与非随机情形不同，预期效用模型对于偏好函数 V（·）的函数形式进行了非常特殊的限制。

选择目标的正式表示，从而预期效用偏好函数，依赖于这个可能的事件集合的结构。在这个集合为有限集$\{X_1, \cdots X_n\}$时，通过其概率向量 $P=\{P_1\cdots,P_n\}$（P_i 为$\tilde{X}=X_i$ 处的概率），就可以表示出这个集合的任何概率分布，其偏好函数就可以表示为:

$$V(P)=V(P_1,\cdots\cdots P_n)\equiv\sum V_iP_i。$$

当这个事件集合是由实数轴或实数轴的某个子集所组成时，其概率分布就由它们的累积分布函数 F（·）表示，即 $F(X)=P\{\tilde{x}<X\}$，此时，预期效用偏好函数的形式为:

$$V(F)=\int V(X)dF(x).$$

当事件为多维商品束（$E_1, \cdots\cdots E_n$）时，

$$V(.)=\int\cdots\cdots\int U(E_1\cdots\cdots E_n)dF(E_1,\cdots\cdots E_n).$$

$F(\cdot,\cdots\cdots\cdot)$为累积分布函数，在每一种情形中，偏好函数 V（·）都是由冯·诺依曼一摩尔根斯特恩效用函数 U（·）；V（·……，·）或效用指数$\{V_i\}$关于其概率分布 F（·），F（·，……，·）或 P 的数学期望所组成，预期效用模型正是因此而得名的。

区分预期效用最大化者的偏好函数 V（·）和他的冯·诺依曼一摩尔根斯特恩效用函数 U(·)或指数$\{U_i\}$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种认为预期效用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是"基数的"的流行的但却是错误的观点来说，更是如此。对于一个偏好序的任何实值表示，预期效用偏好函数 V（·）是"序数的"，因为它要受任何不影响表示的有效性的增长变换的限制，例如，如果 $V(F)=\int V(X)dF(x)$代表了某个预期效用最大化者的偏好，那么，偏好函数（非线性的）$Y(F)=[\int V_{(x)}\,dF_{(x)}]^3$ 也代表了这个预期效用最大化者的偏好。另一方面，冯·诺依曼一摩尔根斯特恩效用函数要在函数 $U^{※}$（·）将产生出一个序数相等的线性偏好函数 $U^{※}(F)=\int V^{※}(X)dF_{(x)}$ 的意义上产生出"基数的"偏好函数，就必须满足基数关系 $U^{※}(x)\equiv a\cdot V_{(x)}+b$，$a>0$，（此时 $V^{※}(\cdot)=av(\cdot)+b$)不过，这种情形在非随机商品束的偏好理论中也出现过，科布一道格拉斯偏好函数 $\alpha\cdot\ln(X)+\beta\ln(y)+\gamma nl(E)$这里是它的加法形式）也受任意增长变换的限制，并且，显然是序数的，假如一个参数向量$(\alpha^{※},\beta^{※},\gamma^{※})$要产生出一个序数相等的加法形式$\alpha^{※}\ln(x)+\beta^{※}\ln(y)+\gamma^{※}\ln(E)$,它就必须满足基数关系$(\alpha^{※},\beta^{※},\gamma^{※})=\lambda(\alpha,\beta,\gamma),\lambda>0$。

目前，一些研究者正在致力于发展显示风险偏好（如一阶随机显性偏好）和风险厌恶的非线性预期效用模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特定的偏好函数的非线性函数形式，这些函数形式有 $\sum V_{(x_i)}\pi_{(p_i)}$'$\{[\int u_{(x)}dF_{(x)}]/[\int W_{(x)}dF_{(x)}]\}$以及$\{\int U_{(x)}dG[F_{(x)}]\}$等。

预防性失业（Precautionary Unemployment）

又称"等待性失业"（Wait unemployment），指工人为了获得更有利的工作而放弃工作机会所引起的失业。当工种任务的性质或劳资合同的形式阻止从事某一项工作的雇员利用以后会出现的工资率较高的另种工作时，雇员就会拒绝现在可以得到的第一种工作，而等待工资率较高的另一种工作。例如，某项工作工资率较低，而合同期又长，阻止了雇员以后向更好工作的流动，而以后又会有这种机会时，就会产生预防性失业。这种失业的原因仍在于制度上的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因此，这种失业也属于摩擦性失业。

预期的通货膨胀（Expectational Inflation） 一种用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来解释通货膨胀得以持续的

原因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最初的通货膨胀，即使这种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消失了，通货膨胀也会由于人们的预期而持续下去，甚至加剧。预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而预期又往往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形成并调整的。在产生了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要根据过去的和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来预期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并把这种预期作为指导未来经济行为的依据。工会要根据自己的通货膨胀来确定下一期工资谈判中工资提高的幅度，厂商也要根据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来确定未来的物价上涨幅度。这样，预期的存在就会使通货膨胀持续，甚至加剧。当通货膨胀一旦形成之后，即使引起这种通货膨胀的原因消失了，通货膨胀也会由于预期而存在下去，这时的通货膨胀就成为预期的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者根据适应性预期的假设提出了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了现在的通货膨胀对未来的影响。

预支信用证（Anticipatacy credit）　预支信用证是指出口商作为受益人，可在货物装运之前向开证银行或其指定银行收款的信用证。与远期信用证相反，预支信用证下，进口商付款在先，而出口商交货交单在后。它是进口商或开证银行向出口商提供的资金融通。出口商预支的货款既可以由出口商在申请开证时即予以拨交，或在出口商支款后立即予以拨交，也可以由开证行或代付行先行垫付，此时利息由垫付银行收入。

预支信用证可分为全部预支和部分预支两种。全部预支信用证实质上属于光票信用证，出口商仅凭光票要求付款，在性质上与一般的预付货款相同，但某些全部预支信用证也要求出口商在提交光票时，附第一份保证补交信用证规定单据的证明。但是，开证行对出口商是否补交单据不承担责任。部分预支信用证又称为红条款信用证（red clause crdeit），出口商凭光票在货物装运前预支部分货款，货物装运后则凭货运单据收取货款余额，同时需扣除预支款项的利息。同样，出口商若不补交单据或预支的款项未按合同采购商品，开证行及代行不予负责。红条款信用证的由来仅是以往部分预支信用证的预支条款习惯上为红色，而今对此条款的颜色并无要求。

预支信用证通常是去市场缺货情况下，出口商利用进口商急于进货的心理，以预付货款为条件而采用的。也可能是进口商主动采用预付部分货款作为自己压价的手段。

预付货款（Payment in advance）　又称为'先结后出'。预付货款是指出口商在向进口商发货之前就已收到货款。预付货款对卖方来说，就意味着'预收货款'。

预付货款可以分为预付全部货款和预付部分货款。通常使用预付货款都是指预付全部货款；预付部分货款则主要是使用于进出口大型的生产资料商品，如大型机械、成套设备飞机、轮船等，在这类商品交易中，进口商在生产开始时就需预付一部分货款作为定金（down payment），而出口商则为这笔定金提供担保，开立保函，保证定金的安全。

在国际贸易中，预付货款中货款的结算方式是使用汇款方式，可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汇款的时间，以及对信汇、电汇和票汇进行选择。由于预付货款方式需要货款汇到的时间与发货时间相衔接，因而在使用票汇时，还必须考虑汇票的托收时间问题。

采用预付货款方式对出口商最为有利，而进口商则承担较大风险。因为进口商在对货物付款之前并未得到出口商一定发货的担保。一旦出口商违反合同，拒绝发货，或延迟发货或所发货物与合同不符，进口商都会面临损失。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商预付了货款，事实上是进口商对出口商提供了信贷。由于这些原因，预付货款的方法在国际贸易中实行使用较少。通常只是用于进口商对出口商的出口商品有特殊要求的时候；或是某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抢手等情形下。

预约保单（Open pdicy; open cover）　又称为开口保单。类似于流动保单和总括保单，都是经常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为了简化投保手续而采用的方法。

预约保单是一种长期性的保险单，保险人在一定时期内对约定的货物予以统一承保，但预约保单一般不规定总的保险金额，因而也就不存在保尽的问题。由于不存在保险单保尽的问题，预约保单需订立保单终止条款，明确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若要终止合同，须于终止日若干天前通告对方。

预约保单中通常要载明保险货物的类别，投保险别、保险费率、每批货物的最高金额，当每批货物起运，投保人应立即将船名、货名投保金额，航程等情况通告保险人，保险人则按约定自动予以承保，并签发保险凭证，以便投保人凭其交货并议付货款。

能源成本（Energy Costs）　能源是一种用于生产其它商品和劳务的中间产品，能源成本是指在生产这些其它商品和劳务时，用于支付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能源那部份成本。例如，消费者购买电、天然气和石油产品，但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能源本身，而是这些能源所生产出来的热量、光、冷气和交通运输等。能源成本正是指用于支付生产这些热量、光、冷气和交通运输时所需要购买的电、天然气和石

油产品的那部份成本。另外，能源除了直接用于生产其他（非能源类）的商品和服务外，还有很大一部份被用于能源本身的生产、转换和输送上。例如，美国在1978年所消费的能源中，有22%（用热力学单位衡量）用在发电上。所以，能源成本出现在一切场合，从采矿、种植等初级产业到家庭生产等服务性行业都存在着能源成本。

能源经济学（Energy Elonomils） 源起于石油危机的一门以能源（尤其是石油）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的经济学科。

石油危机为研究市场对一种重要的投入的价格波动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很理想的天然实验室。石油危机前，对能源的研究主要限于对石油市场的结构或其它具体燃料市场的结构的研究；石油危机后，对能源的研究扩展到了以下三个方面：能源需求及对价格的反应；能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的关系；经济对投入价格剧烈波动的反应。此外，还涉及到对卡特尔行为的分析。

对能源需求绝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对能源的需求一般在长期中都倾向于缺乏价格弹性，而最终使用需求的价格弹性高于批发的价格弹性，而各种工业燃料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也略高于一般的对石油的需求的价格弹性，这是因为在各种工业燃料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替代关系。能源作为一种由居民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而引发出的需求，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能源的需求对价格的反应是不同的。在短期中，当事人可以根据价格、收入以及天气的变化等因素改变能源的利用数量；而在长期中，对能源的需求将取决于对使用能源的资本的需求。

对能源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在很大程度上与能源和非能源投入间的替代弹性紧密相关。如果对非能源投入的供给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那么对能源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就将决定在长期中能源和经济的关系。较高的价格弹性一般意味着较少的经济损失，这是由于减少对能源的依赖和进口能源的费用造成的。在能源与其它投入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最大的争论在于能源和资本之间到底是一种替代的关系还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这个问题至今尚无定论。

能源的成本的持续增长将对一个国家的实际国民收入带来直接的和持久的影响，这或者源于对国内能源资源更大的损耗，或者源于能源进口价格的上升。当国民收入的减少是由于进口价格的上升造成的时，这种国民收入的减少也被称为贸易条件效应，西方工业发达国家7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石油价格的突然飞涨造成的；而石油价格的飞涨又会最终带来物价总体水平的上升。这是一个供给方面的问题，所以单纯的需求政策是无法奏效的。

递减成本产业（Decreasing cost industry） 一个产业若在其产量扩张时要素价格下降，其产品的长期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该产业称为递减成本产业。以完全竞争的厂商与产业为例，若由于对该产业产品需求增加，均衡价格提高而使得该产业原有的厂商有经济利润可赚，长期内会有更多的厂商进入该产业。如果在更多的厂商进入该产业，该产业产量扩张的同时要素的价格却下降了，则该产业面临成本递减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该产业的长期供给向右下方倾斜，表明该产业产品在较低的价格下也会有较大的产量。

递减报酬率（Diminishing Returns Law） 见“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

递增规模报酬（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递增的规模报酬指的是一种经济技术。它的定义如下：投入比例扩大后引起产出比例的扩大。如果产出比例扩大的幅度大于投入比例扩大的幅度，则称该种技术为规模报酬递增。在用若干种投入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况下，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平均成本递减。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递增的规模报酬是扩大劳动分工的结果。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的扩大、工业的集中引起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市场相矛盾。由于经济学的瓦尔拉体系中一般均衡解的存在都是假定了完全竞争常数规模报酬的存在，因此，为了保证递增规模报酬下均衡解的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对瓦尔拉均衡的概念进行修正，根据不同的假定得出多种递增规模报酬下的均衡解。

递增成本产业（Increasing Cost—Industry） 一个产业若由于其产量的扩张，要素价格上升，则长期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该产业被称为递增成本产业。以完全竞争的厂商与产业为例。若由于对该产业产品需求增加，均衡价格提高而使得该产业原有厂商有经济利润可赚，长期内将会有更多的厂商涌入该产业。如果随着更多的厂商进入该产业要素的价格在该产业扩张的同时较以前提高了，那么该产业面临着成本递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该产业产品的长期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这表明在长期条件下，该产业产品只有在较高的价格下才会有较大的产量。

贿赂（Bribery） 研究贿赂行为对于对政治和官僚体制作经济分析有一定参考意义。在理想的官僚

行为模式下，他的决策是依客观的精英原则进行的，是非人格化的，不受有关人员的种族、性别、魅力等个人因素影响。而贿赂行为则既可能使受贿者以非人格化的纯粹金钱推动原则进行公共决策，也可能改变他与行贿者的关系，从而使他所作出的公共决策受到个人关系的影响。贿赂行为既可能是某些社会中旧的传统的延伸，也可能是对传统态度的反抗。贿赂行为的这种复杂性，使得对它的评价变得非常困难。事实上，迄今为止对贿赂行为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大都是描述性的或分类性的，在背后左右贿赂行为的经济力量则常常只被用来褒贬这种行为本身。对贿赂问题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 立法方面的腐败问题。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加以描述。假定一个政治家想连任议员职位，同时也想获得尽可能多的个人收入。如果公众仅仅由他在一系列立法活动中投票的行为来决定下次选举中是否投他的票，则这位政治家的一个对于连任来说最优的投票行为。接受暗中的贿赂而使他改变自己的投票行为，意味着对他的连任期望不利，但个人收入得到了改善。在不考虑道德因素的影响下，这位政治家对贿赂的态度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大小。如果放宽假设，公众对政治家的投票可能受到竞选活动的影响，而政治家又可以用受贿的钱进行竞选，研究表明，这将使腐败的可能性大为增加。(2) 采购人员的贿赂行为。在市场不完善情况下，如完成某笔交易可以使一方获得较大利益时，他便有动力从预期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行贿以促成交易。这种情况看起来有助于资源的更有效的配置，因为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以较大的数额行贿，从而获得资源。但它产生了其它问题，比如行贿行为使守法者反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秘密交易使市场由于信息不足而增加了运行困难，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监督成本。为了防止此情形下的贿赂行为，研究者指出，对贿赂行为的处罚必须使个人预期受到的处罚大于其可能得到的收益。(3) 有些低级官员在分配福利或摊派负担方面拥有实际权力，如他在公共住房分配、促成某人与重要人物的接触以及对某些违章行为的处置方面有很大的自决权，这会造成贿赂行为。研究表明，在这一领域内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可能使进行某类正当活动更为方便，从而不需要行贿或需要行贿的数量很小，从而使有关官员受贿得到的好处不足以抵偿可能由此带来的损失，达到防止其受贿的目的。

流动保单（Floating Policy） 流动保单是指保险人在一定时期内对约定价值的货物所遇风险和损失予以承保，在流动保险单内，一般只是载明货物总价值、货物类别，投保险别、保险费率，航行区域等，而对运载货物的船名则不进行具体确定。这样，流动保单就成为可以连续使用的保险单，在每批货物装运后，投保人立即将船名和货物的投保金额向保险人申报，保险人则按流动保单中载明的保险总条件予以承保，货物的投保价值逐次从货物的总价值中予以扣除，直至总价值扣尽为止，流动保单效力即告终止。

流动保单的保险费一般由投保人去签定流动保单时预先按平均保险费率进行支付，待全部投保货物运输完毕，则按实际保险费率多退少补。

采用流动保单，投保人在每批货物装运后，均采用启运通知书形式向保险人申报，保险人则出具保险凭证，投保人凭保险凭证交货和议付货款。

在流动保单下，保险人通常在其中加列一定的限制性条款，以分散风险，这些限制性条款主要有每船限额条款（per bottom clause）和地点条款。（location clause）。在每船限额条款下，规定了每批货物保险的最高限额，超出限额部分则不予承保；地点条款则是规定存放在某装运地点的货物保险的最高限额，超出限额部分亦不予以承保。

流动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 又译"灵活偏好"，或称"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中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之一，用以解释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流动偏好指人们想以货币形式保持其一部分财富的愿望，即货币需求。这种流动偏好或是出于交易的动机（用于应付日常支出）、预防的动机（用于应付意外的支出），或投机的动机（用于进行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利息就是对人们在一特定时期内放弃这种流动偏好的报酬。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货币的供求，流动偏好代表货币需求，货币数量代表货币供给。货币数量由中央银行的政策决定。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以降低利率，但由于流动偏好的存在，利率有一个最低限度。无论货币量如何增加，利率也不会下降到这一最低限度之下。换言之，由于心理上流动偏好的存在，利率的下降有一定的限度。投资取决于利润率与利率，两者的差额越大，则纯利润越大，投资越多。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预期的利率是下降的，又由于流动偏好的存在，利率不能无限制地下降，这样，利润率与利率的差额缩小，投资需求也就不足了。流动偏好实际是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也正由这种理论出发，凯恩斯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只有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财政政策才能有力地刺激经济。所以，凯恩斯被称为"财政主义者"。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不重视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作用。在60年代，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才重视货币政策，主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重要。

流量社会化论（Theory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Flow） 又称"剩余社会化"，是一种二战后主张资本主义从收入分配入手进行改良的理论，其主要创立者为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代表作是都留重人1961年所主编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了吗?》一书。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剩余形式的不同，以及剩余占有方式的不同。在封建社会中，剩余以地租的形式表现出来，并由地主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表现为利润，由资本家占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剩余采取社会基金的形式，由社会所占有。既然剩余形式及其占有分式是区分各社会制度的标准，因此，可以从改变剩余的形式及其占有形式来改变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理论并不否认生产资料占有制的重要性，也把所有制作为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但它认为，生产资料是一种存量，剩余是一种流量。改变流量比改变已经历史地形成的存量要容易得多。因此，要改变一种社会制度，采取改变剩余这种流量的方法要比改变生产资料这种存量的占有方法容易得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剩余采取利润的形式并归资本家所占有。如果消弱资本家对剩余的占有，使剩余逐渐成为社会占有的基金，比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遇到的阻力要小。因此，剩余社会化，即流量社会化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较灵活而易于实行的方法。剩余社会化的作法主要有：第一、政府管理产品价格，压缩价格中的剩余部分。第二、改进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制度，使公众享有一部分剩余。第三、实行有更大的累进率的赋税制度，使剩余转化为社会基金。第四、实行最低工资法，提高最低工资率，使工人分享一部分剩余。这种理论的实质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前提下，从改变分配方式人手，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其部分理论与政策被福利国家理论所吸收，并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付诸实施。

流通系列化 流通系列化是指制造厂商或自己成立销售企业，或选定批发商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受本公司的控制，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推进零售商店的组织化。流通系列化使得制造厂商易于维持基层零售价格，并可能从市场上挤走竞争者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尚未做到流通系列化的厂家的产品。流通系列化的形式大致可以分类如下：1.制造厂商通过全额出资、吸收合并等方式，建立完全从属于本公司的销售企业，以形成自己的流通渠道。2.制造厂商通过资本参与对既有销售企业控股或参股，同时派遣职员至这些销售企业，以形成可支配的流通渠道。3.专卖店制。制造厂商只透过销售自己公司产品的专卖店进行商品的流通，要求专卖店不经营经其它公司的产品，也不将自己公司的产品转售给销售其它公司产品的商店。与此同时，制造厂商在特定的地区内给予专卖店独家销售权。4.领土制。制造厂商限制销售商的营业地区，限制销售商的营业地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一个地区内只允许存在一家专卖店，即实行封闭领土制；另种则是在一个地区内允许存在几家专卖店，即实行开放领土制。5.一店一帐制。限定零售店的进货对象为一个特定的批发商，若要变更进货对象，必须要取得制造厂商的允许。6.店会制。制造厂商把销售自己产品的销售商，其营业额达一定规模以上者，按地区组织成以促销和协调为目的的团体。7.折扣差别。制造厂商通过占有率折扣和累进折扣，来和销售商进行差别性交易，以确立、维持流通系列化。占有率折扣方式，是当完全专卖店化有困难时，为使销售商能优先销售自己的产品，故采取以销售比率来决定折扣比率。累进折扣方式则是以销售商的进货金额的大小将折扣率分等级，金额越高者折扣率越大。8.委托销售制。制造厂商为使需要特别售后服务的产品，在自己的指导和监督下销售，为使销售商遵守规定的销售价格和转售限制，在销售商将产品出售给消费者之前，始终保留产品的所有权。9.拨存制。制造厂商为了维持销售各阶段的价格，在收回销售货款时，将销售商应得的利润全部或部分加以缴收，将此保管一段时间后，再拨付给各销售商。制造厂商实行流通系列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形成，加强其产品差别。流通系列化是达成由"地理差异"引起的产品差别化的手段，例如在某地有个家电销售企业，和某制造厂商缔结了排他性契约，只销售该厂商生产的产品，由于在该地区的居民购买这个销售企业商品的可能性很大（其程度视该地区的大小及交通的发达情形而定），因此形成产品差别。流通系列化也是加强由"售后服务"引起的产品差别化的手段，这是因为流通系列化使制造厂商更有可能指导销售商的售后服务，制造厂商实行流通系列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持自己产品的销售价格。制造厂商对于销售自己商标产品的系列销售商，一般会要求回避品牌内价格竞争，而且系列销售商间也会暗中限制同一品牌的竞争行为，而维持指定的价格。因而，流通系列化是限制品牌内竞争从而维持销售价格的重要手段。但是光凭流通系列化并不能避免不同品牌之间的竞争，当制造厂商间没有勾结共谋行为时，品牌间竞争仍然会存在。然而，流通系列化一般而言在高位集中寡占中较易形成，如果寡占企业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则流通系列化所引起的限制品牌内竞争行为，将会促使品牌间竞争的限制更加容易。从社会角度看，流通系列化使消费者能获得更多的售后服务；能通过合理组织流通环节，减少商品流通成本；能使制造厂商更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及时开

发、改良产品。同时，流通系列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零售领域的竞争；阻止了那些虽然资本较少，却能开发，生产优质产品的中小制造厂商的发展，从而缩小了消费者选择的幅度；流通系列化使得制造厂商在决定利润时必须考虑到使参加这个系列的效率最差的销售商得以存在下去，从而会抬高零售价格。

涉外税收负担原则（Principle Of Tax Burden In Taxation Concerning Foreign Countries）　指各国税务当局所遵循的对该国涉外经济活动进行课税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根据本国的经济和财政利益对跨国纳税人和跨国课税对象采用负担从轻，负担从重和负担相等的不同原则进行课税。

负担从轻原则又称优惠原则，它准许跨国纳税人或跨国课税对象享有低于国内纳相应税收负担的优惠待遇，其目的在于鼓励有关涉外经济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吸引外国投资和先进技术。

负担从重原则又称最大负担原则，它规定跨国纳税人或跨国课税对象必须承担高于国内相应税收负担的义务，其目的在于限制有关涉外经济活动，特别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

负担相等原则又称平等原则，它要求对跨国纳税与国内纳税一视同仁，承担相同的税收负担，其主要意义在于维护税收中性原则并避免税收歧视。

显然，这里所说的税收负担的高低是相对于国内纳税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外国税制下的情况。另外，这里所说的税负不仅包括跨国纳税人，而且也包括跨国课税对象；不仅包括本国的跨国纳税人，而且还包括外国的跨国纳税人，这显然是相当宽泛的解释。较狭义地理解，涉外税收负担则专指本国税收给外国跨国纳税人造成的负担。

涉外税收负担的不同原则为各国针对不同经济目的制订适当的政策提供了备选的思路，但应该说，各国的选择往往不是简单化和单一的，而是结合运用。另外，各国在不同情况下选用的不同的涉外税收负担原则也在它与其它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的有关条款中体现了出来。

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etion Council）　海湾合作委员会是波斯湾沿岸的6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81年5月26日，成员国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阿曼。该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间在一切领域内的联系与协调，并向一体化方向迈进。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成员国首脑参加的最高委员会，它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制定各项基本政策，部长委员会由各国外交大臣组成，每年举行六次会议，它负责制订各项具体的政策措施并向最高委员会提出建议，为首脑会议作准备。该组织的总部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不仅在促进各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协调石油政策，统一油价，互免关税等，而且在维护成员国的团结和本地区的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海运冷藏货物保险（Ocean Marine Insurance Frogen Products）　海运冷藏货物保险是属于海洋货物运输专门保险的一种。它主要承保需要冷藏运输的鲜货在海运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海上风险和外来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海运冷藏货物保险的险别分为冷藏险和冷藏一切险两种。冷藏险的承保责任除水渍险的责任范围外，还包括冷藏机器停止工作24小时以上所致货物的损失。冷藏一切险的承保责任除冷藏险范围之外，还包括冷藏货物由于外来原因所造成的损失。

但是，如果冷藏货物的损失是由于在保险责任开始之前，冷藏货物自身未能保持良好状态，或冷藏货物在合格的冷藏装置中仍未能保持良好状态，则保险人免除责任。

冷藏货物保险的责任起讫亦采用"仓至仓"原则。

海运和空运公司（Shipping And Aircraft Company）　是国际避税者用以避税的一条途径，也是外国基地公司的一种形式，主要以海运公司为主，它以船舶避税地为基地，通过建立国际海运公司并且将船舶在这些避税地进行注册及悬挂"方便旗帜"（flag of convenience）来逃避高税国税收管辖权，少缴或不缴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

海关（The Customs）　海关是指设立在关境上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它的任务是对进出口货物实行监督管理、征收关税、查禁走私、临时保管通关货物以及统计进出口货物等等。可以说，海关是贯彻执行本国贸易政策以及有关法律、法令和规章的专门机构。关境是海关所管辖的用以执行各项海关法令和规章的领域。笼统地说，关境是征收关税的领域。在一般情况下，关境与国境是一致的。但是，目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国家在国境内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这就使得该国国境大于关境。而有的国家由于和邻国建立了关税同盟，对内互减并逐步取消关税、对外征收统一的关税，使其领土成为统一的关境，这些国家的关境就大于国境。

海关是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的。由于受到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各国的

对外通商口岸最初大多建在沿海各港口，为了便于工作，各国就在这些港口设立专门机构管理以商品进出口为主的对外经济交往，因而把这些专门机构称之为海关。尽管今天各国相应的职能机构并不仅仅设在沿海港口，而且还设在内陆城市和其他边境地区，但从习惯起见，一律叫作海关。海关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它在维护一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在保护一国的独立和主权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海关估价制（Customs Valuation System） 海关估价制的本意是指一国海关根据有关章程对进出口商品进行估价，以确定完税价格，便于征收进出口关税。海关估价制作为一种间接的非关税壁垒则是指海关人员在对进口商品进行估价时，故意提高完税价格，从而提高关税税额，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不少国家曾通过海关估价制来限制外国商品进口，而尤以美国为甚。

海关发票（Customs Lnvoice） 海关发票是美国、加拿大以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进口贸易中出口商开立并提供进口商通关时使用的海关规定格式发票。海关发票的内容主要包括价值部分和产地部分。填写项目较商业发票复杂，发票上有关货物的内容须与商业发票完全一致，还须经出口商品个人名义签字。根据海关发票的内容，进口国家海关不仅可以将其作为估价定税和海关统计的依据，而且还可通过货物产地证明，实行差别税率政策，或根据货物在出口国市场的销售价格，确定是否需征收反倾销税。

海牙规则（Hague Rules） 海牙规则的全称是"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这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海牙规则于1924年8月2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由26个海运国家签订，并于1926年6月2日正式生效。由于该规则于1921年首次在荷兰的海牙起草，故得名。海牙规则规定了海上运输的承运人在货物运输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享有的免责范围以及对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遭受损失的赔偿限额等。根据海牙规则的规定，承运人的最低责任包括：第一，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时履行相应的职责，使船舶适于航行；第二，适当而谨慎地装载、搬运、收受、配载、承运、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第三，及时向托运人发出提单。规则规定承运人的责任期从货物装上船时起，直到货物卸下船时结束。规则中规定的承运人的免责条款有17项，主要有不可抗力，海上风险、船员违约、货物固有缺陷、包装不当或标志不清等等。规则规定一旦在运输过程中出现货物损失，诉讼时效为一年，从货物交付之日或应付之日算起。海牙规则以公约形式规定了承运人的权利与义务，这对于保障托运人在货物运输过程中的利益，缓和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有利于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海牙规则的最初签约国是运输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该规则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承运人而不利于托运人，这就引起了航运业不够发达需要依靠国外承运人的许多国家的不满。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海牙规则也在各方的压力下多次作出了有利于托运人的修改。

海上损失（Sea Damage） 海上损失是指被保险标的在海洋运输途中由于海上风险所引起的损失，又称为海损，当保险标的物发生了承保范围内的海上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时，保险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在海运货物保险业务中，海上损失按货物损失的程度划分，可以分为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两类。

全部损失又称为全损。按损失的情况不同，全部损失又分为实际损失和推定全损两类。实际全损和推定全损虽然都称为全损，但两者在保险公司予以损失赔偿的处理方法上有所不同。实际全损下，货物已无挽回地发生了全部损失，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按货物的全部价值予以补偿；而在推定全摘下，货物并未完全灭失，被保险必须办理委付手续，才可获全损赔偿。

部分损失又称为分损。它是指被保险货物的损失还未达到全部损失的程度。部分损失又可分为共同海损和单独海损两大类。区分共同海损和单独海损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造成海损的原因不同，它们虽然都是部分损失，但单独海损的损失完全是由于意外原因造成的，是承保风险直接造成的船、货损失，共同海损不是承保风险所直接导致的船、货损失，而是船舶或货物面临共同危险，或者已遭受单独海损之后，为了解除或减轻这些风险损失而人为地采取措施造成的部分损失。另一方面，单独海损与共同海损所造成的损失补偿方法有所不同。单独海损的损失由受损方或过失方自己负担，而共同海损的损失要由受益各方按照受益的大小比例地进行分摊。

海上风险（Sea Risk） 海上风险是指船舶、货物在海上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伴随海上运输过程所发生的风险。其中伴随海上运输所发生的风险是指货物在运输过程中，虽然基本上是以海洋运输的形式，但在此其间，经常会需要经过陆地或河流等再进入海洋，这些过程所发生的风险也属于海上风险。海上风险的范围是特定的，它并非包括海上所发生的一切风险，又不局限于海上发生的风险。从性质上分，海上

风险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保险公司一般对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是予以承保的。

自然灾害是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由于自然界的力量所引起的灾害。但针对保险业务，自然灾害并非泛指一切自然力量造成的灾害。保险人予以承保的属于自然灾害性质的风险为：雷电；地震；火山爆发、浪击落海（指船面货物由于海浪的冲击掉入海中而造成的损失）；海水、湖水、河水等进入船舶、驳船、运输工具、集装箱或大型海运箱。

海上保险合同（Marine Insurance Contract）
海上保险合同是被保险人通过支付保险费，当保险标的在海运过程中遇到风险而受到损失时，保险人保证对被保险人的损失给予补偿的协议。海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有关的当事人还有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物或可能有三种：在船舶保险单中，保险的标的物是船舶；在运费保险单中，保险的标的物是运费；在货物保险单中，保险的标的物则为货物。但是，需要指明的是，在海上运输中，船舶上消费所用的食品、储藏物和设备，以及政府规定的禁运物资，走私品等，是无权作为保险标的而进行投保的。

在海上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物是被保险人的可保权益的具体体现，可保权益的货币价值称为保险价值，在海上保险中，一般都将保险价值在保险合同中予以列明，若没有列明保险价值，则应列明保险价值的计算方法。投保人对保险标的进行投保时，实际投保金额称为保险金额，通常投保人是按照保险价值投保，保险金额则以保险价值为最高限度。

海上保险合同的成立必须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投保人向保险人要约，也就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投保申请，通常是填写投保单或投保申请书，主要内容包括：投保人名称，被保险人名称，保险标的名称，运输工具名称，投保险别，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起止等，保险人的承诺则是保险人签署保险单，若保险从对投保单提出修改意见，则构成新的要约，只有投保人接受后，保险合同才告成立。

保险合同的签订，是以双方当事人的最大诚信为基础的，在海上保险中，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情况一无所知，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按什么条件承保，是以投保人的申报为依据，这就要求投保人按商业常规将与保险标的相关的重要事实进行真实陈述，如果投保人以欺骗手段诱使保险人与其签订海上保险合同，保险人一旦查明，则有权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

投保人填写投保单，保险人签字后，海上保险合同成立，但是投保单是不能作为海上保险合同，保险人还需出立保险单，将保险合同的内容在保险单上予以载明，此时保险单成为海上保险合同的证明文件。

不同种类的海上保险合同的流通能力是不同的，海上货运保险单无须经保险人同意，就可通过投保人的背书而流通转让，但是船舶保险单和运费保险单须先经保险人的同意，投保人方可背书转让。

在保险单上订明的保险期限届满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即告终止，通常船舶和运费保险单中的保险期限是一年，而货物保险单的保险期限是按'仓至仓'原则，即从装运港出口商仓库开始直到货物运至目的港进口商仓库为止。

课税主体流动避税（Migrating Subject Of Taxation For Tax Avoidence） 指课税主体即跨国纳税人（自然人和法人）通过居所的跨越税境的变动与不变动达到国际避税的目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诸方式：

1.通过真实流动避税；

主要指跨国纳税人真正迁出高税国，主要又有以下几种形式：

(1)成为低税国居民，使原有纳税义务得以减轻，但这一方法目前已受到税法限制，如规定居民在迁出之前须纳清已查定的税款等等；

(2)成为另一国家的非居民临时纳税人，因各国对临时工作的人常有所得税优惠待遇而受益；

(3)成为无国籍人，利用各国对居民身份判定标准的差异通过避免成为任一国家的居民而避免税收，这类人又称"税收难民"（tax refugees）

(4)与(3)相应，就法人而言，利用各国对常设机构的不同解释通过避免成为常设机构而实现避税；（参见"常设机构"）

2.通过虚假流动避税；

主要指跨国纳税人只是名义上迁出高税国，而实际上仍在高税国拥有住所、工作、银行帐户等社会的或经济的联系或仍然从事经营活动等等，所做的迁出行为仅仅是为了避税，这种虚假流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临时移居：指自然人为获得国外税收的某些优惠而进行的短期移居，例如高税国居民可通过移居到对资本利得不征税的国家去出售其股票以使其资本利得免交原居住国所得税。目前往往通过规定移居年限必须满若干年来限制这种避免居民税收管辖权的避税行为；

(2)部分移居：指自然人并未完全摆脱与原居住国的社会与经济的联系，从而使有关国家对居民身份的判定遇到难题，利用这一点实行避税；

(3)管理机构的虚假迁出：在以管理机构所在地为法人居民判定标准的国家可通过将管理机构虚假迁

出的办法避免纳税义务，办法是消除使所在国成为行使实际管理权地点的所有实际的象征；

3.通过不流动避税；

指跨国纳税人不通过真实流动与虚假流动而是留在高税国里不流动却仍可实现避税，这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1)信托：指纳税人安排别人在另一国（一般是国际避税地），以信托的形式为其创造一个中介来转移一部分所得和财产，从而使这部分所得和财产得以避免居住国的纳税义务。这一信托形式可以以个人持股信托公司形式出现，一般仍受信托人的控制，故又称"虚设信托财产"；

(2)其它受托协议：例如纳税人可以与避税地银行建立某种信托关系，由银行代为向第三方收取利息，如果银行所在地与第三方所在地有减免利息所得预提税的税收协定，而信托方所在地与第三方所在地没有这种协定，那么信托人可藉此使第三方所付利息得以避税；

(3)信箱公司，跨国纳税人还可以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形式的信箱公司以转移所得和财产，收到不流动而避税的目的。

课税客体流动避税（Moving Object Of Taxation For Tax Avoidence） 国际避税地也往往通过课税客体跨越税境的流动与非流动实现，突出地表现为货物、资金和劳务的流动，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诸方式：

1.通过常设机构进行流动，具体地指：

(1)利用总机构与常设机构所在地之间税收协定中对于常设机构某些活动的优惠免税条款进行货物、资金与劳务的流动以减免纳税义务。比如经合组织范本规定，常设机构如属从事货物仓储，存货管理、货物购买，广告宣传、信息提供以及其它辅助性活动都可予以免税，这就提供了通过建立从事免税活动的常设机构转移货物、资金和劳务以避免税收的可能。

(2)利用总机构与常设机构之间利润与费用的分配进行避税。总机构与常设机构身处同一经济实体，因此，在将利润与费用按有利的方式进行分配以避免税收方面有很多便利。比如，总机构可以利用常设机构转移管理费用、转移特许权使用费及其类似费用，还可以利用常设机构出现的亏损冲抵总机构营业利润以减少税负等等；

(3)利用总机构与常设机构所在地之间税负的差异进行避税活动，比如进行虚构财产租赁，人为转移租凭费用到设在避税地的常设机构可达避税目的。利用常设机构转让营业财产也可利用两地税负差异谋得好处；

(4)利用常设机构之间的汇率差异，人为地制造亏损和盈利以达到有效避税的目的。

2.通过跨国联属企业进行流动。

这主要是指在联属公司之间实行转让定价的情况下转移货物、资金和劳务以利用各国（地）税法规定上的差异实现避税，包括：

(1)对货物与劳务的定价，通过这种转让定价将高税国公司的利润转移给避税地公司；

(2)对贷款利息率的确定，由于利息支付可作为费用扣除故可被联属公司利用通过由低税国联属企业向高税国联属业提供贷款进行避税；

(3)对专利或专有技术的定价，由于这类价格不具可比性，很难按正常交易原则处理，难以避免联属公司通过这一手段减轻税负；

(4)对租用（hire），租赁（leasing）和租购（hire--purchase）的定价，由于国内税法及国际税收协定都还很少触及这一领域，故而成为很有潜力的避税手段。

虽然各国税法与国际税收协定都对转让定价作了某些限制性规定，如确定正常交易原则及各种价格标准，但实施起来由于各种规定均有缺陷所以总有许多办法可以达到的避税的目的。（参见转让定价，独立竞争原则等等）

3.通过基地公司进行流动。

指在避税地建立多种形式的基地公司从事转移、积累以及第三国经营等活动以实现避税目的。必须指出，基地公司的活动包括转让定价的做法但并不止于此，它的活动方式更多样和灵活。（参见"外国基地公司"）

4.通过非流动。

课税客体不流动也可以实现避税的目的，这主要有两种情形：

(1)延期纳税。

指实行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的国家对外国子公司于非居住国（非国籍国）取得的收入在没有汇回居住国（国籍国）之前不予征税。这一延期纳税的规定有可能被跨国纳税人加以滥用，从而在外国子公司所在地积累大量利润。

(2)变更所得的项目或性质。

指利用税法对不同所得项目和不同性质企业在税收待遇方面的不同规定，通过改变所得所属的项目或所属企业的性质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前者主要指针对该国不同所提项目的不同税收待遇所进行的税收筹划，如若该国对利息所得更优待，则可不对子公司进行证券投资而改为对其实行贷款；后者主要指针对该国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不同税收待遇而在子公司与分公司之间进行抉择，如改子公司为分公司或改分公司为

了公司。

班轮运费（Liner's Freight） 在班轮运输方式下，运费是以班轮运价表的规定计算的，班轮运价表可分为四种：

（1）航运公会运价表：由区域性的班轮航运垄断组织——航运公会代表船方的利益制订运价表，供参加公会的班轮公司使用。

（2）班轮公司运价表：由未参加公会的班轮公司自行制订调整，货方虽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解释权和决定权却在船方。

（3）货方运价表：在货方势力强大时，由货方自行制订的运价表。

（4）双方运价表：由船货双方共同制订，运价的调整需由双方协商决定。

依据班轮运价表，班轮运费的计算标准主要有：

（1）按货物重量计算，亦称"重量吨"，以每吨或每长吨作为计算运费的单位，以'M'表示。

（2）按货物的体积计算，亦称'尺码吨'，在运价表内以'M'表示。

（3）按货物的价格计算，即从价运费，运价表内以'A.V.'或'Ad.Val'表示，通常按商品在装运地的 FOB 货价收取百分之零点几到 5%的运费，适用于贵重商品。

（4）按货物的件数计收。

在班轮运价表中，常有这样的标志：M／W or A.V；或 M／W plas A.V，前者表示按从重、从体、从价三者中最高的一种运费计收，后者表示先按从重或从体中最高的运者计收，而后另加一定百分比的从价运费。当然，运费计算也可由货主与船公司临时议定，临时议定的运费通常适用于承运粮食、矿石等运量大、货价低、易于装卸的农矿产品。

以上述方式计算的运费称为基本运费，它是指班轮航线上固定或直接可以挂靠的基本港口间，货物运输所必须收取的基本费用。除基本运费外，班轮运输往往还包括许多附加费，它是船方根据不同情况，为抵补运输过程中额外增加的开支而收取的运费。这些班轮附加费主要包括：

（1）超重附加费（heavey—left additional），在一件货物的毛重达到或超过规定的重量时予以计收。

（2）超长附加费（long longth additional），在一件货物的长度达到或超过规定的长度时予以计收超长附加费。

（3）直航附加费（direct additional），当货物需运往班轮航线上非固定港口时，船公司向托运人收取直航附加费。

（4）绕航附加费（devlation sarcharge），当船舶必须离开正常航道而绕道航行时予以计收。

（5）港口拥挤附加费（port congestion surcharge），当港口拥挤，使得船舶无法立即进港而耽误船期时予以计收。

（6）变更卸货港附加费（additional for alterction of destintnin），在货方要求变更原卸货港时予以计收。

班轮附加费名目繁多，在采用班轮运输时需予以特别注意。

速遣费（Despatch Fee） 在采用航程租船运输时，程租租船合同中通常规定了租船方的装卸时间，如果租航方提前完成了装卸作业，而加速了船舶的周转，船方应向租船方支付奖金，此项奖金就称为速遣费。速遣费的金额可以由双方在租船合同中予以规定，若在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航运惯例，速遣费通常为每天航舶维持费的一半。

换汇成本（Costs Of Foreign Excharge Eainings） 换汇成本是指我国外贸企业在完成商品出口时，每换取一个单位的外币所付出的人民币成本。用公式表示：

$$换汇成本 = \frac{出口成本}{出口外汇净收入}$$

在这里，出口成本是指人民币成本，它主要包括出口商品收购价款以及其他一系列用人民币表示的经营管理费用。出口外汇净收入是指外贸企业所获的用外币表示的出口货款减去在出口过程中支出的外汇，后者可能包括一定的运费，保险费和佣金等。

在我国，换汇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它反映的是出口商品换取外汇的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外贸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水平。换汇成本越高，意味着某种商品创汇能力较差，其结果是出口某种商品获利较小、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相反，换汇成本越低意味着某种商品创汇能力强，可以带来较多的利润。在我国，换汇成本总是用每换取一个美元所付出的人民币数量来表示。换汇成本对决策者来说还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它可以帮助决策者确定应该优先发展哪些商品的出口、以及出口数量和地区等。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我国外贸出口换汇成本比较高，很多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高于官方汇率，这就意味着外贸企业亏本经营，而这亏本的部分总是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因此，从直观的经济效益来看，我国的很多出口贸易是赔本买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出口商品竞争能力不强，人民币汇价不合理等。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力求扭转出口亏本经营的状况，这些措施包括

调低人民币汇价，改革外贸体制、狠抓出口商品生产等。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它扭转了绝大多数出口商品换汇成本过高的现象，减少了国家补贴，为外贸企业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奠定了基础。最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取消了外贸出口补贴，它将进一步刺激外贸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迫使出口生产企业进一步改善生产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出口换汇成本，使我国的出口贸易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状态，这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换货协定（Barter Agreement） 换货协定又叫易货协定，它是指两国为开展易货贸易而签订的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互换商品的种类、价格以及结算办法等。换货协定的特点是将进出口直接联系起来，贸易在双边基础上进行。签订换货协定的多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原因是这些国家缺少外汇，不得不开展易货贸易，以前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通过签订换货协定开展易货贸易，目前由于这些国家发生的巨变，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已逐步由易货贸易改为现汇贸易，因而也无需再签订换货协定。

留成外汇（Retained Foreign Exchange） 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中，有外汇收入的厂商，按国家有关管汇机构规定的比例，将部分外汇收入交售给指定的外汇银行，归国家所有，另一部分即作为留成外汇归自己支配使用。一般对留成外汇的用途管汇机构还要作若干规定以防滥用，留成外汇分为（1)贸易留成外汇。来自商品出口的留成外汇；（2）非贸易留成外汇。来自非商品输出，如运输、保险、旅游、利息、股息等收入的留成外汇。

留厂罢工 工人不离开工作地点，而是就地停止工作。留厂罢工中，罢工工人占据着工厂，这就免去了设置纠察线，且雇主无法用罢工破坏者代替罢工工人，但它却使所有工人在一段不定的时间里不得不留在工厂里。1936—1937年，产联成功地用这一方法组织了通用汽车公司和克里尔斯公司的罢工。此后，最高法院判这种罢工为不合法的联合行动，因为它未经适当的法律程序而查封了雇主的财产，不让其使用这些财产。

铁路交货价／敞车交货价（Free on Kail / Free On Truck，FOR / FOT） 国际贸易价格术语，属于内陆交货价格系统，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下，对铁路交货价和敞车交货价合并进行了统一的解释，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如下：

1.卖方义务：

(1)依照合同规定，提交货物和有关凭证；

(2)若货物重量足够整车装运，卖方应妥定车皮，在指定的日期或期限内，自负费用，履行装车；若重量不足整车装运，卖方应在指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将货物送交起运站铁路保管。

(3)自负货物的一切费用和风险，直至已装货的车皮移交铁路局保管为止；

(4)自费供给货物的惯常包装，但按行业习惯，如对该项货物的运送无需包装者不在此限；

(5)负担因装车，或将货物送交铁路局保管所需支出的任何检查费用；

(6)无延迟地通知买方，货已装车或已移交铁路局保管；

(7)根据买方请求，在买方负担风险和费用的前提下，给予买方协助，使其获得原产地国家签发的，为买方所需的出口，进口或必要时经由第三国过境运输的凭证。

2.买方义务：

(1)在卖方将货物移交铁路而保管时起，受领货物，并依照合同的规定支付价金；

(2)在卖方将货物移交铁路局或货已装车移交铁路局时，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3)负担因货物出口而征收的一切海关捐税；

(4)对给予卖方发货指示或选择装货地点，如曾保留一定期限，而未能届期给予指示、则应自期限终了时起，负担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和货物的一切风险，但以上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5)支付因领取卖方义务（7）条款所指凭证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原产地证明书和领事签证费用在内；

铁路交货与敞车交货价格术语和工厂交货等价格术语相同，出口商无需过问货物的实际出口情况，也不需负担海上风险，但卖方需将货物交与铁路而保管之下，在此之后，货物的风险和所需费用均由买方负担，这时，卖方须立即通告买方，以便当货物发生错运事故或在中途灭失的时候，买方可根据卖方的通知，在铁路而规章规定的期限内向铁路而提出索赔。采用铁路交货与敞车交货价格术语时，卖方只需及时向买方提供发票或通知单，就算完成了交货义务。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虽然《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于铁路交货和敞车交货价格术语作了统一的解释，不同的国家在采用这两个价格术语时，也有一些不同的惯例和规定，关于风险责任和费用的负担也可能会有所区别。

铁路交货和敞车交货价格术语主要用于大陆国家之间贸易，适用于铁路，汽车运输。

铁路劳工法案 1926年通过的铁路劳工法案是30年代以后开始的全面系统的劳动关系立法的先导，其它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避免州际商业的任何中断，2）禁止对雇员组织自由的任何限制；3）规定雇主和雇员为实施法律条款可以成立完全独立的组织；4）规定有关工资、就业规则和劳动条件等争议的及时解决；5）规定因对法律的解释而产生的申诉的及时解决。该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国会制定的劳动关系条例有宪法的州际商业条款作为依据；工人和雇主双方都有权自行组织起来，不仅由法律承认，而且受法律保护。铁路劳工法的主要条款，是赋予劳工和资方集团达成维护劳工协议的责任。它主张双方之间的一切争议，力求通过会议方法解决。此外，还有两种法律解决办法：一，调解。法律规定了两个机构：铁路调停委员会，由36人组成，一半来自资方，一半来自劳方，按现有的契约调停有关工资标准、就业规则和劳动条件的争议；全国调解委员会，由总统和参议院挑选三人组成，调解有关工资标准和其他劳动条件的变动的争议。二，自愿仲裁。这一程序只有当双方同意交付仲裁时才能使用，法律并未规定强迫交付仲裁。最后，如果一个争议不能用会议方法，调解方法或自愿仲裁方法解决时，法律规定可由总统任命一个紧急委员会在30天内进行调查，在此期间以及随后的30天内，不能举行罢工或停厂，然后，由委员会向总统提出报告，再由总统向国会提出报告。在和平时期，由国会决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在战争时期，则可由总统没收受到争议影响的铁路并使它们运行。从1926年到二战期间，铁路劳工法案常被引为劳动关系法的范例，二战以后，铁路劳动争议有激化的趋势，国会于1963年通过了暂时性的铁路仲裁法案，到1964年2月宣布终止。作为全国劳工关系法的例外，铁路劳工法案适用于铁路系统和航空系统。

租赁贸易（Leasing Trade） 租赁就是指出租人根据租赁合同将有关商品出租给承租人，出租人定期收取一定的租金并保持对租赁商品的所有权，而承租人则通过定期支付租金取得该商品的使用权，在租赁贸易中，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的是商品使用服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租赁关系而非买卖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租赁贸易是一种服务贸易。

租赁贸易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即服务性租赁和融资性租赁。服务性租赁是指承租人根据租赁合同取得设备的使用权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出租人负责设备使用期间的维修保养甚至操作，并收取租金。租期结束后，设备即退还出租人。融资性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要求，购进承租人所需的设备，然后租给承租人使用，设备的所有权属出租人，承租人按合同规定分期支付租金，并负责设备的装修，保养和管理。承租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足以弥补设备的总值并使出租人获得一定的利润。这样，在租期结束时，承租人可以用象征性的价格购进租赁设备，取得设备的所有权。从承租人来说，通过开展融资性租赁贸易实现了融通资金的目的。如果承租人是进口人，那么融资性租赁将是它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实现进口的一种有效手段，因为融资性租赁使得进口人得以延期付款或分期付款，这就使得它即使一时缺乏足够的外汇也能及时取得急需的机器设备。事实上，融资性租赁是一种最重要的租赁贸易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因为发展中家往往处于承租人的地位。

融资性租赁贸易涉及四方当事人，即承租人、出租人、金融机构以及设备生产企业。从我国开展国际融资性租赁贸易的情况来看，承租人是我国的生产企业，出租人大多为国内的租赁公司，而金融机构及设备生产企业都在国外，交易过程大致如下：如有一家企业急需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但手中没有足够的外汇，这时，它就可以向租赁公司提出租赁该设备的要求。国内租赁公司在了解该企业的具体情况（如它的创汇能力等）后，如果觉得具有可行性，就可以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一方面，它应从国外金融机构如大的商业银行寻找必要的贷款以购买相应的机器设备，另一方面它又要与国外的有关生产企业联系购买设备事宜。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就可以用所获贷款支付给国外生产企业，同时让国外生产企业将有关设备直接运给国内生产企业。国内生产企业在获得该设备以后，就应根据它同租赁公司事先签订的租赁合同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每笔租金都包括一定的设备货款。在规定的期限内（一般为三到五年），生产企业应向租赁公司支付包括设备贷款和租赁公司利润在内的租金。然后，该企业再同租赁公司签订一个买卖合同，以象征性的价格买下该设备，使该设备的所有权正式转到企业手中，交易过程到此结束。从作为承租人的国内生产企业来说，通过融资性租赁解决了急需获得国外先进设备与自身缺少足够的资金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进口先进设备，增强了生产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出口能力，这对于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国的国际租赁贸易发展时间还不长，规模也比较小，但是发展潜力却是很大的，事实上我国的国际租赁业正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租船运输（Carriage By Charter） 又可称为不定期船运输或非班轮运输、租船运输方式下的船期、航线、港口及航行时间并不固定，而是根据货物运输

的需要进行随时安排，主要用于承运临时成交的大宗货物。如矿砂、石油、煤炭等，或承运季节性货物。租船运输方式下的运费或租金并不固定，而是随市场行情波动。

采用租船运输，船舶租赁的方式有三种：

(1) 定期租船，又称为期租船。定期租船是指租船人在一定时间内租用整条船舶。在租凭期间内，租船人负责船舶的日常营运，航运区域固定，租金按月预付。船东需保证船的适航性、并负责船员薪金，给养，伙食等。

(2) 航程租船，又称为程租船。它是指承租人支付运费，按约定的航次运输货物。航程租船既可以租用整船，也可以租用部分舱位。船方负责船舶的日常营运的经营费用。

(3) 空船租航，又称为光船租赁。它是航方仅保留船舶所有权，由租船人享有船舶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租船方式。租船人自行雇佣航长、船员管理船舶。在海运业务中，光船租赁形式较少采用。

采用租船运输，租船方式不同，租船合同也有所不同，依据不同的方式，分别有定期租船合同、航次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船合同。船方与租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划分依据是租船合同，租船合同仅具有运输合同的作用，而非货物所有权凭证，租船合同不受与提单有关的国际公约的制约，由双方协商订立。

租船提单 (Blc Under A Charter Party)　租船提单是指船舶的有人和租船人已订有租船合同的条件下，托运人托运货物时收到的提单。这时租船提单的性质是否与班轮提单性质一样，则要看提单是由船舶的有人还是由租船人签发的。

如果租船人的承运人身份接受托运人托运货物，并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则这种提单的性质与班轮提单性质一样。船舶所有人与租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划分以租船合同为依据，而租船提单则是作为承运人的租船人与托运人和提单受让人之间权利义务划分的依据。

如果租船人是作为托运人运输自己的货物，由船舶所有人签发提单，则此种提单仅起收据的作用，船舶所有人与作为托运人的租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划分，应以租船合同为准，提单失去了独立性，受租船合同的约束，提单中与租航合同相反的条款则不具效力。但是，如果租船人将这种受租船合同约束的提单背书转让，则此种租船提单就成为作为承运人的船舶所有与提单受让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对于要受租船合同约束的提单，银行是不愿作为出口商付货款的单据的。

租 (Rent)　是对生产要素的使用所付的报酬，这里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土地、资金、劳动、而且还包括设备、人的智力、思想等。这是一广义的定义。特殊地，劳动的租就是工资、对人的思想的使用支付叫"使用费"(royalty)，对资本的使用支付叫利息，而对土地和设备的使用支付也称租，这是狭义上的租。可以说，一切关于租的概念都来自地租 (land rent)，按照李嘉图的定义，地租是"对土地原有的不可毁减的地力使用的支付。"但土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产要素，这就是它的数量是一定的，供给缺乏价格弹性。其他生产要素在这一点上与土地不同，而且土地一般被假定为只能用于耕作，这也是它的特殊之处，于是以后的经济学家们就运用"经济租"(economic rent)、准租 (quasi—rent)"差异租"(differential rent) 的概念来讨论租的问题。

经济租：一种定义是某种生产要素总的收益与其供给价格（为获得对该生产要素的使用而必须支付的最低额金）之间的差额。假定一个人担任现在工作的收入是一万英镑，要诱使它受雇就必须出资不少于3000英镑，否则他就不会提供他的劳动，那么他的经济租就为10000英镑—3000英镑＝7000英镑。这个定义显然是来自于李嘉图的地租的概念。在李嘉图那里，只要耕种最劣等的土地，其产品的价值足以弥补其成本，对农产品需求就会促使扩大耕种肥力越来越好的土地，因为这肯定是有利可图的。这样肥力较高土地的单位产品的种植成本会低于单位产品价格，（此价格由肥力较低的土地产品决定），这个差额就被土地所有者凭借其所有权而占有。后来这一看法延伸到其他生产要素。约翰·穆勒 (J·Mill) 和马歇尔 (A·Marshell) 持同样的观点。还有一种看法是经济租为付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超过目前继续使用该要素所必须付给的报酬，就上例而言，此人下一个最好的可供选择的工作的收入为9000英镑，如付给他同样的工资就能让他继续工作，那么他应有的经济租金就为1000英镑。这种对租金的定义出自于帕累托。实际上上述两种定义的区别是细微的。由于土地被假定为只用于耕种，对上使用的报酬就全部为租。其他生产要素其用途越广就越接近于帕累托定义的状况前一种定义可以看作为后一种定义的特例。由于经济租是由生产要素的供给者获得，所以又被称为生产者剩余。

准租指除土地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在短期内其供给也可以租为不变、对这种生产要素使用的报酬就叫准租。因此准租类似于地租。它只有短期才存在。从长期看，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其供给弹性不为零，这就使资源总收益与生产支出之间的差额不再存在，于是准地租也就不存在。从长期

看，要素供给者取得超过他所要求的收入就成了经济租。准租的概念是由马歇尔提出的。此外马歇尔还提出合成准租（composite quasi—rent）的概念，它是指：两种资源彼此存在很特殊的关系，当它们合在一起使用时获得的租要比单独使用时获得的要多，这个合成使用所获的租就叫合成准租。如水力和磨面机就是这样的例子。

差异租实际上就是前面解释的经济租的后一种情况。

租金控制（Rent Control） 是指政府部门对地主的租金率规定一个最高的限额。这个地主已不仅仅是指土地的所有者，它也可以拥有其他的生产要素。只要有租赁关系的存在，就有一个租金交纳问题。许多国家或地方政府都有关于租金控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保护租佃者的利益。那么会不会如愿以偿呢？经济分析家们认为除了租金控制的法律，还得有其他的附加的法律规定。假定政府对某一佃主的租金规定一个最高限额，在没有附之以其他的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如果佃主不希望法律在未来凝固化(tighteniny)，限额的效果会很短暂，未到期的佃户享受到低租的利益到租赁期满，这时佃主会以什么样的条件重新租赁或作其他决策，将取决于法律上的其他规定，如规定所有的租赁关系，不论是已有的或将要有的，所有的租金都应在控制之中，这样才能防止佃主的对策对法律限制的抵消作用。实际中最为明显最经常的办法是在对最高租金率实行控制的同时，又对租佃关系进行法律保障，如保障佃户在其租佃范围内的权力保持到法律生效期满。这种保障既对已有的租赁关系实施，也对新的租赁关系实施。如英国1965年颁布租金法律。这样看来租金控制不仅是一种存在的限制，而且也是一种对私人租佃经济部门的政策。有效的租金控制实际上是一种隐性配给。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长期看，租金控制有以下作用：现有佃户不愿退出租佃关系，潜在的佃户没有租佃的和该佃主也会把租佃物转作他用，租金控制的基础消失，潜在佃户是受损而不是受益。这就涉及到租金控制导致的收入再分配应有一个什么样的合理标准的问题。他们还认为租金控制难以使租金率达到出清水平，它会损及到整个经济的效率，乃至人们的福利。

倒签提单（B／L） 倒签提单是承运人在填写装船日期时，不填写实际的装船日期，而填写买卖合同或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日期的提单。

采用倒签提单常常是由于出口商无法在买卖合同或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期限内完成装船义务，货物实际的装船日期超过了规定的日期，为了通过银行单证一致的审查，顺利获得货款，出口商请求承运人在提单中按照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日期填写装船日期，出口商向承运人出具保函，保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倒签提单是属于违法的提单。承运人倒签提单日期的行为是一诈欺行为；侵犯了提单持有人的正当利益。对于倒签提单，银行和收货人有权拒收，并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航空货运保险（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insurance） 国际贸易中航空运输始于二十世纪初，这样，相应的航空货运保险的发展历史也较短，尚示形成独立体系。直至一九六五年，英国伦敦保险协会才针对实际业务中最为常用的航空运输货物一切险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协会航空运输货物一切险条款》(institate Air Cargo Clauses—All Risks)，现条款改称为《协会航空运输货物险条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 —Air)，在此基础上,伦敦保险协会还制定了《协会航空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institate War Clauses—Air Cargo) 和《协会航空运输货物罢工险条款》(institate Steiee Clauses— Air Cargo)。现行世界上许多国家保险公司均接受伦敦保险协会制定的航空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用于实际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制定了自己的航空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它的基本险别包括航空运输险和航空运输一切险，附加险为航空运输货物战争险。

航空运输险（air teansportation Risks）和航空运输一切险（air transportation all Risks）要承保由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引起的航空运输货物的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这与海洋运输货物保险险别中的水渍险范围大致相同，航空运输一切险除承保航空运输险的全部责任外，还对于一般外来原因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予以承保，航空运输货物基本险的承保责任起讫采用'仓至仓,原则，自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载明的起运地仓库开始运输时生效，直至货物运达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为止。但是，如果货物运抵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却未运抵收货人的仓库或储存处所，但以被保险货物最后卸离飞机后30天为止。

航空货物运输战争险（air trans portation cargo war Risks）作为航运货物附加险必须在投保航运货物基本险的基础上另行加保，加保时另行加付保险费，航空运输战争险承保航运货物由于战争，敌对行为等造成的损失，包括常规武器造成的货物灭失，但不包括原子武器造成的损失。航空运输货物战争险的承保责任起讫自被保险货物装上保险单所载明的启运地飞机开始，直到卸离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飞机时为止。

航空运输货物附加险还可包括罢工险，在投保战争险前提下，投保罢工险则不另收保险费，而仅要求加保罢工险，则按战争保险费率收取保险费。

航程租船合同（voynge chartar） 又称为程租船合同。航程租船合同是指船舶所有人按照航次出租船舶，而承租人支付约定的运费的租船合同。在航程租船合同下，船舶所有人保留对了船舶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且直接参与船舶的经营管理。

航程租船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船方提供约定的船舶，载明船舶的名称、国藉、船级、载重量、航速等，使船舶特定化。

(2) 装运港名称以及船舶到达装运港的日期，船舶到达日期的最后一天称为"解约日"，若船舶迟于解约日到达装运港，租方有权解除合同。

(3) 运费支付；运费的支付方法通常有预付运费和到付运费两种：预付运费一般是在船方接管货物或签发提单时，由租方向船方支付，采取预付运费，在运输过程中，不论船舶和货物损失与否，概不退还运费，到付运费则应在船舶抵达目的港交货之前，由租方付清。采取到付运费，只要货物运抵目的港，不论货物损失与否，租方或收货方都需支付运费，但是，若货物中途灭失，租方便不须支付运费。

(4) 装卸时间和滞期费；所谓滞期费是指租方在装卸货物的时候，超过了合同规定的装卸时间而需向船方支付的费用；若租方提前完成了装卸作业，则有权向船方索取速遣费。

(5) 货物损害责任和留置权；货物损害责任是指船方应对接管货物之后，货物的灭失、残损和延迟交货负赔偿责任。置留权是指租方在未付清合同所规定的运费，滞期费等费用之前，船方有权扣留货物作为抵押。

承租人选择航程租船方式，通常是因为承租人手中有较多的货物需要来船运输，一般并非以航运事业为目的，这样，航程租船合同通常就是货物运输合同。

航程租船合同的标准格式称为金康（Gencon）程租租船合同格式。

航程保单（Voyage policy） 航程保单是保险人承保一定航程内保险标的物的风险损失的保险单，一旦所承保的航程结束，保险责任也就相即终止。航程保单多用于海上货物运输，通常在航程保单中都订明航程的装运港和目的港。

为了防止货物所有人由于难以控制船方的行为而遭致损失，在航程保单中，通常订有运输条款(transit clause) 和更改航程条款（change of voyage clause)。在运输条款下，如果发生被保险人所不能控制的延迟、转船、重装、绕航等情况，保险合同并不因这些情况而失效。在更改航程条款下，如果发生更改航程，在增收保险费的条件下，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发生的风险损失仍予赔偿。但是，如果航程保单中没有运输条款和更改航程条款，若发生不正当的绕航或更改航程，从这些行为发生时起，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即告终止。

展卖（Fair） 展卖是指通过参加或举办商品博览会或展览会展览和销售商品。展卖的特点是展销结合，以展促销、以销为主。展卖方式比较灵活，对货主（往往就是出口人）来说，它既可以参加各种形式的博览会或展览会，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举办展览会，以便宣传和推销自己的产品。

国际贸易中展卖的主要场合是国际博览会。国际博览会又叫国际集市，它是由区域性的集市发展而来的，具有悠久的历史。国际博览会在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国际博览会不仅是一个直接交易的场所，而且越来越成为介绍产品，广告宣传和打开销路的重要场所。各国商人除参加直接交易外，还通过样品展览及各种宣传，同其他国家的有关机构建立更广泛的商业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博览会有综合性国际博览会与专业性国际博览会之分。前者各类商品均可参加展出与交易，后者只限于某类商品。目前，世界上著名的博览会有巴黎、汉诺威、莱比锡、米兰、布鲁塞尔、蒙特利尔、悉尼等国际博览会。

我国的外贸企业广泛通过展卖方式来推动我国的出口贸易。目前，我国在国外开展的展卖业务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把货物卖给国外客户，由客户自己在国外参加或举办展览，货款在展览会后结算，我方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另一种方式是由我方和外国客户合作，共同组织展卖。在展卖时货物所有权仍归我方，价格由我方决定，但货物的运输、保险、劳务等费用由外国客户承担。在货物售出后，我方给予一定的手续费作为补偿。展览结束后，未售出的货物折价处理或转为寄售。我国在国内的展卖业务主要是在广交会和小交会上开展的，广交会的全称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Chinese Export Commoditves Fair—CECF)，它由我国各进出口公司联合举办，每年的春、秋季在广州各举行一次。越来越多的我国出口产品在广交会上展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客户参加广交会，与国内企业洽谈交易。其结果是，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越来越大，我国相当大一部分商品的出口，是在广交会上成交的。总之，广交会在推动我国商品出口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小交会主要是指国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的小型出口交易会，有时也指单类出口商品的交易会。目前，国内各省市尤其是沿海开放地区通过举办小交会带动了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

原料指数（Material index）　韦伯区位理论中用来分析运输成本和区位决定关系的一种分析方法。首先，韦伯对原料进行了分类。从原料的空间分布来看可以分为"地方性"原料和"遍布性"原料，从原料运输性质来看可以分为"纯原料和粗原料"或"损重性"原料。所谓"地方性"原料就是该种原料只产自少数固定的地方，"遍布性"原料是指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的原料；所谓"纯"原料是指经过加工后，其重量全部转移到产成品之上的原料，"损重"原料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损失部分重量，剩余重量转移到成品之上的原料。在对原料进行了这样的分类以后，韦伯就提出了"原料指数"的概念，所谓"原料指数"是指需要运输的地方性原料的重量对于产成品重量的比例。如果使用的是"地方性原料"中的"纯原料"，那么所有原料的重量全部转移到成品之上，原料与成品的重量相等。这时"原料指数"等于 1。如果使用的是"地方性原料"中的"粗原料"或者"损重原料"，这时，由于原料重量不可能完全转移到成品之上，所以需要运输的原料重量必定大于成品重量，"原料指数"大于 1。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参用了部分的""遍布性原料"（这些原料是无需运输的），需运输的原料重量有可能小于成品重量，即"原料指数"小于 1。

根据对"原料指数"大小的比较和分析，韦伯认为运输因素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就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 从运输成本的角度来看，决定"原料指数"大小的两个因素即"地方性原料"的损重程度。以及"遍布性原料"的参用程度，对工业的区位趋势有决定性的影响。"地方性原料"损重程度越大，则"原料指数"越大。"遍布性"原料的参用程度越大，则"原料指数"越小。一种工业，如果"原料指数"大于 1，厂址应当设在原料产地附近，以便减少原料的运费。反之如果"原料指数"小于 1，厂址则可以靠近产品销售市场，以便减少成品的运费。2 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工业应尽可能采用"遍布性原料"。如果工业采用"遍布性原料"，厂址应设在产品销售市场。3 由于"地方性"原料中的纯原料全部转移到成品之上，其"原料指数"等于 1，因此这种"纯原料"产地不能吸引工业在那里设厂。可以看出，韦伯通过"原料指数"概念的提出和分析，对龙哈德使用过的区位三角形的论证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破产（Bankruptcy）　即企业无力偿付其债务的处境。破产这个词在使用时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真正的破产，即公司的负债超过资产；另一种法律上的破产，即公司无力偿付其到期的债务。在后一种情况下，资产可能大于负债，但不能马上变换成现金来偿还债务。美国联邦破产法对破产的定义是第一种意义，而衡平法院对破产的定义则是第二种意义。当破产似乎迫在眉睫时，公司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来避免拖欠债款：通过交涉延期偿还债务；从股东、职员等人那里获得紧急贷款；人为地加速存货周转（例如通过抛售存货）；向银行或金融公司出售应收票据；降低或延期支付经理薪金和工人工资。一旦无效，就只能宣布倒闭。由法庭依法宣布的个人，合伙组织或公司破产即处于无力偿还债务的状况，其目的在于把债务人从其债务中解放出来，并且通过提供一种有条不紊的债务清偿程序以保护其债权人。破产的债务人将其全部财产让与一个由法庭指定的管理人，然后由他将财产转交给一个选定的受托保管人，让他按债权人的利益来处置这些资产。破产诉讼有两种形式：(10 自愿的，即由债务人向法院提交一份申请，要求宣布他破产；(2) 非自愿的、即由债权人采取主动，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布债务人破产。根据破产法，个人、合作组织或公司（铁路、市政和金融业公司除外）都可以自愿破产；任何人（农民和工资收入者除外）和任何公司（铁路、市政和金融业公司除外）都可以被宣布为非自愿的破产。

谈判单位（Bargaining Unit）　具有完全相似利益的雇员集体（如同一行业或同一产业的成员），可以归为旨在与资主商订劳工合同的一个谈判单位。在一个极端，单个雇主可以同单个技术行业和代表进行协商。在另一个极端，雇主协会也可以同代表全国本行业全体雇员的一个产业工会进行谈判。在劳资关系集中的西欧国家，谈判单位除企业一级的工会外，还有地方工会，同业工会和中央工会联合会等；而在劳资关系分散的美国，大多数谈判单位只包括一个公司的雇员。

热处理经济（Heatreatment Economy）　指垂直集中若干都需热能的连续生产阶段，可减少热损耗，从而节约热能。比如钢铁工业中将炼焦、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集中在一个企业中连续进行，就会获得这种热处理经济。

埋没费用（Sunkcost）　主要指企业在某产业中因经营绩效不佳试图退出时，由投资形成的设备中，不能通过变卖等办法回收的部分、例如，其个企业为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购置了 10 万美元的设备，当

年开始生产、销售，计划每年折旧1万美元，企业经营3年后陷人不景气，便决定退出，此时若仍有7万美元未折旧的设备无法转卖变现，则企业由退出引起的埋没费用为7万美元。设备越具有技术上的专用谢景气，便决定退出，此时，若仍有7万美元未折旧的设备无法通过转卖变现，则企业由退出引起的埋没费用为7万美元。设备越具有技术上的专用性，在企业退出一个产业时就越可能不易变卖。埋没费用不仅发生在固定资本上，也发生在流动资本和无形资本上，如果企业退出后，库存物资不能按购入价转卖，由此造成的损失也构成埋没费用。企业退出时，一些专用于企业原所在产业的技术，管理知识随之损失，这种损失也是一种埋没费用。埋没费用是形成产业的退出壁垒的重要因素之一。

接办（Acquisition） 一家企业接收另一家企业。接办一家公司通常通过购买其普通股份中能起支配作用的部分来实现，兼并式的接办与合并不同，合并是几个企业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联合公司，通过接办兼并一些小的企业比较容易，因为接办所需的资金就在接办企业的资源之内，联合形式在合并一些大企业时采用得比较普遍；特别是在将这些企业合并成为一家资本更为雄厚的公司因而往往需要新的资金来源时是这样。如果法律或其他限制使许多企业不能在一个时候联合起来，那么一家公司进行一系列的接办，便可能是它争取市场控制权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

罢工（Strike） 工人为实现或反对工作条件的某种改变而集体停止工作。罢工并不意味着工人放弃工作，而只是暂时离开工作，可以是简单的离开工作，也可以包括设置纠察线，有时甚至发生暴力行为。在集体谈判不能达成协议，达到预期效果时，罢工是工会最壮观，最有效的次级方法，工会以此对雇主施加经济压力，希望这种压力能迫使雇主答应其要求。引致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工资纠纷，要求组织工会，工会保障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工作资历，操作规章等工作条件方面的问题，也常常引起罢工。罢工因时期和行业的不同有很大差异。罢工在失业率低的经济繁荣时期比在失业率高的时候更为频繁，部分原因可能是工人很容易找到额外工作，使损失减轻。在象煤炭这样的工业部门中，罢工特别普遍而且持续时期也长，这些产业中的工人往往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工人相融绝。近来，在公共事业部门，罢工也逐渐频繁起来。此外，罢工次数的多少和时间长短还取决于工会财政状况好坏、工人运动战斗力的强弱，管理部门态度冷淡与否，以及是否有调解劳资纠纷的机构。在西方国家，罢工权利一直被工会认为是一种基础的或根本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丧失则被工会描述为强迫劳动或"奴隶"劳动的同义词。但在这些国家，并不因为一般工会认为罢工权是基础的权利，它就被归入不可让渡的权利之列，所有民主国家都用大量的方法限定罢工权利，采用法律否定某些类型的罢工行动。在集权国家，罢工是完全禁止的。

罢工破坏者（Strikebreaker） 指在因罢工而关闭的工厂里接受工作的人。雇用罢工破坏者是雇主们对付工会罢工的传统方法之一。罢工破坏者既可以是从外面召来的替代者，也可以是本厂不参加罢工的工人，雇主希望利用他们使工会显得软弱无力，破坏罢工并迫使工人复工。劳工暴力行为的发生，多半是针对罢工破坏者而不是针对主管部门的。在美国有专门机构为雇主提供罢工破坏者。1936年以来，联邦拜那法案禁止在各州之间输送罢工破坏者，但并不禁止使用州内的罢工破坏者。1947年的塔夫脱——哈利特法保障罢工破坏者继续工作的权利，并使工会会员阻止罢工破坏者越过纠察线成为非法行为。

特定产业政策 指主要管理制造业的政府部门（在日本大部分制造业归通产省管辖）应付有关特定产业问题的政策。具体包括以下二类：第一类是关于保护、扶植幼小产业、朝阳产业，调整夕阳产业的固定资产、劳资关系的政策。其目的主要是在幼小产业和朝阳产业中限制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保护国内企业，向那些企业集中分配资源，促进其成长，并通过处理夕阳产业的设备等，促进资源向其他产业转移，第二类是为应付个别产业组织内部发生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循环性不景气，过渡竞争问题）的有关调整价格、设备、生产、投资的政策。在日本，主要在50年代后半期，通产省挑选朝阳产业，着手制定保护、扶植的政策。作为这样的战略性目标产业，选择了合成纤维、塑料橡胶、精炼石油、石油化学、汽车、电子机器、工作机械，实施了政府资金的低利息融资、减免税收措施。在引进技术方面，实施特殊分配外资、政府资助等。到60年代，日本政府的特定产业政策着重在第二类，即解决过渡竞争问题。通产省曾于1963年提出"振兴特定产业临时措施法案"，基本思想是试图通过促进企业合并、实业合作、企业间协调投资，协调制定价格等，来解决过渡竞争问题，增强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由于这一法案可能导致政府部门过于强烈地介入、管制产业界的危险，终究被废弃了。以这一废案为契机，由于经济环境变化，日本的产业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总之，从经济复兴过程开始到高速增长的中期（大约1965年左右）为止，日本的产业政策以保护和扶持特定产业

为中心课题，运用多种多样的政策手段，为主要产生的现代化，合理化，增强国际竞争力作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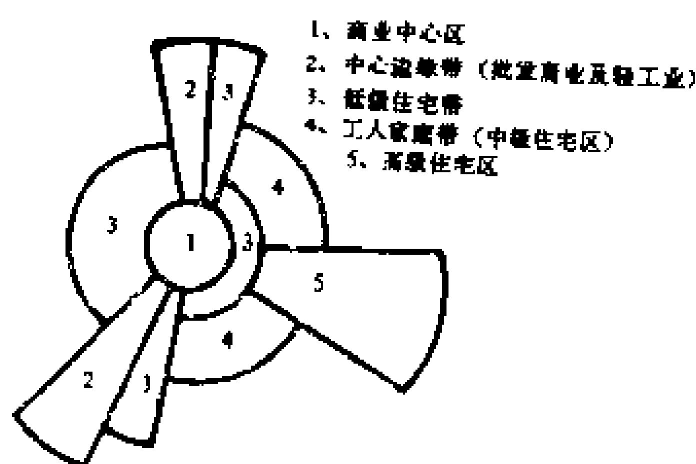
特惠税（Preferen Tial Duty）　特惠关税是指对来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部分或全部地给予低关税或免税待遇的一种优惠关税。（特惠税的税率比最惠国税还低。）特惠税的优惠对象不受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制约，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得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享受这种优惠待遇。特惠税有互惠和非互惠两种。互惠是指缔约双方互相提供优惠关税待遇，而非互惠则是指一方单方面地提供这种优惠关税待遇而对方不必提供反向优惠。特惠税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最初实行的是非互惠的特惠税，即宗主国输往殖民地的产品享受特惠关税，而殖民地产品输往宗主国则无此优惠待遇，以后逐渐出现了互惠特惠税。当代特惠税的著名例子是欧洲共同体给予部分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非互惠的特惠关税。

特别背书（Special Andorsemeat）　又称为记名背书，它是指持票人除了在票据的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写上被背书人的名字，或在被背书人名字之后加上或其指定人的字样，然后将票据进行交付的行为，经过特别背书的票据，被背书人可以进一步将票据背书而再度转让票据。

特别背书的被背书人，可以将票据的空白背书的方式再度转让，从而票据成为空白背书票据，仅凭交付即可再度转让。

特大城市　这一概念是指多个大城市地区连接成一个巨型的、一体的居住和经济活动的群集地带。它最早是由法国著名地理学家简·戈特曼1961年在其出版的《特大城市》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这种更大型的城市（或称为城市群）是由大都市区的扩展而形成的，或是由两个甚至更多的大城市合并所致，方圆达数百公里。他主要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在战后的分布特点来进行分析的。特大城市主要是在二战以后至70年代期间形成的。在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大城市人口点状聚集形态逐步被散状形态的城市区域所替代。如美国东北海岸的城市地带，从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延伸到弗吉尼亚州，包括了纽约、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华盛顿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德国的鲁尔区，包括有19个大城市。还有荷兰的港口城市带，包括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海牙和乌特勒支为中心的港口城市群体。这些城市群一般都集中了本国主要的经济和人口高密度的城市。特大城市的出现是战后西方国家城市化潮流的新格局，它标志着一个国家一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熟水平。

扇形城市　根据城市土地使用形式而划分出的一种城市模式。这是美国学者赫爱特（H.Hoyt）在1939年正式提出的，他对142个北美城市在三十年代的内部土地使用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市中心之外向心园模式并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城市实际状况。而自市中心向外延伸的扇面的土地利用，更为常见。从形态而言，城市是被交通线撑起来的扇面组合。赫爱特通过大量对居民区的租金研究对比，认为扇形城市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商业中心区；2.中心边缘带；3.低级住宅带；4.工人家庭带；



5.高级住宅区；见图。其中他还根据租金水平对城市土地利用进行了划分：1.高租区位于一个或多个城市一方的扇面上，处于城市周边位置，呈楔状自市中心向市郊延伸；2.中租区趋向于高租区的两侧，在高租区和低租区之间，或低租区之外；3.低租区常处于高租区对方，且处于市中心位置。扇形城市的提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当时正是西方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贫富分化尖锐、社会矛盾开始突出，市中心出现衰退，郊区开始兴起。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扇形城市的存在：城市交通日趋重要。高收入阶层广泛利用小汽车，以克服住宅和工作场所的距离；低收入阶层更趋于市中心的工作场所以节省交通费用，中高收入阶层向外避开；民族矛盾加剧，除了黑人，西班牙人聚居外，犹太人、中国人、意大利人等各组成社区，各占一方地盘，向外延伸，呈扇面向市外扩展。

兼职（Moonlighting）　一个人从事一个以上的职业。在一个职业上工作了一整天以后，被称为兼职者的工人在晚上便转到第二个职业上，兼职受到了劳资双方的抨击，劳方认为这是造成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论点已基本上被劳工统计局所作的调查驳倒了）。资方则担心兼职会降低生产率。

兼并（Mergers） 一家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所接办，这种情况下，一家公司保存下来，另一家公司则丧失了其法人实体。一般情况下，有以下三种兼并方法：（1）甲公司可以买进乙公司的资产或付以现款或付以它所发行的证券。（2）收买股权的甲公司可以买进乙公司的股票，从而变成乙的控股公司，但乙仍作为一个单独的公司继续营业。（3）甲公司的股票可以发行给乙公司的所有者，而不是给乙公司本身，从而甲公司取得乙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乙公司丧失其实体；这种兼并方法称为法定兼并。兼并不同于合并，合并是组成一个新的公司，新公司成立后，原来的各公司便不存在。兼并作为一种经济的和法律的行为，必然产生双重作用。一般情况下，兼并会产生规模效益。由于被兼并的企业大多是效益低下的企业，兼并则会将比较先进的管理方法带给被兼并的企业，同时资产的增加以及业务规模的扩大，必然带来较高的效益。从历史上看，兼并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但兼并也会带来一些负作用。一是有些被兼并的企业不一定是效率低下的企业；二是兼并必然给股东和工人带来心理上和生活上的波动，如果是大公司被兼并，则社会影响是巨大的。

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 1932年通过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国会通过的3个有利于工会主义和集体谈判的法案之一，它也是第一个适用于一般劳工的劳动关系法。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阐明了美国有关劳动关系争议和其他劳动关系的公共政策。这个法律宣布政府的政策是要保证未组织起来的工人，（1）有结社、组织和选择谈判代表的自由；（2）对雇用条件有集体谈判的权利；（3）工人们的组织和谈判权利不受雇主干扰，遏制或强迫。该法案还专门对劳动争议下了非常广泛的定义，劳动争议被解释为包括雇主或其团体同雇员或其团体之间的争议；雇主或其团体同其他雇主或其团体之间的争议；以及雇员之间或雇员团体之间的争议。实际上，劳资内部发生的任何争吵，都被称为劳动争议。最后，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限制在劳动中使用“私人的”禁令，但并非阻止使用禁令去遏制非法行为或欺诈行为。法律开列了雇主不得采取的禁令，包括(1) 阻止进行罢工、支付罢工津贴以及散发有关罢工的宣传品；（2）遏制工人参加工会或和平集会；（3）阻止个人合法地支援因劳动争议而正被控制的其他人；（4）阻止工人告诉别人他有意图去从事上述行为，或阻止一个工人建议或鼓励其他人参加上述活动。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以及后来通过的瓦格纳法案等，废除了雇主的大多数反工会技术，正式确立了工会主义和集体谈判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诺思，达德利（Dudley North，1641—1691） 17世纪英国经济学。出生于商人家庭，二十几岁即成为著名商人。1680年回英国从政，曾被英皇授予爵位。《贸易论》是他的代表作，1691年匿名出版。诺思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他竭力主张经济自由，坚决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国内外贸易的政策。诺思最先把利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联系，明确指出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量，从而纠正了配第和洛克在论述利息率问题时将资本与货币混为一谈的错误。因此，他是第一个正确理解利息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时利息将下降，而借者多于贷者时利息将上升，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由于出借资本要冒较大的风险，资本利息要多于土地的地租。诺思批评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和致富主张，明确指出：货币不过是一种商品，用作买卖的衡量尺度；把它储藏起来并不能增加个人或国家的财富，而只有把它不断投入交易即将货币当作资本来运用，个人和国家才会富裕起来；一个富裕民族不可能缺乏货币，因为流通的货币量不能超过商品交换的需要，其在国内外来去会自行调节，根本用不着政治家操心。这些论述都有合理可取之处，对后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者，产生了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又称“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1968年在瑞典中央银行建行300周年时为纪念诺贝尔奖金提供者、瑞典化学家A.诺贝尔而设立的，不同于1901年设立的诺贝尔和平、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组成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选，每年10月与其他诺贝尔奖金同时公布，并获得数额相同的奖金。从1969年第一届发奖以来到1991年为止共有31名经济学家获奖。获奖经济学家的情况如表（见本书631页）。

桑巴特.威尔纳（Werner Sombart，1863—1941） 德国经济学家，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德国埃姆斯勒本的一富裕家庭。1882年起在比萨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曾受教于希穆勒和瓦格纳。1888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890年继布伦坦诺任布莱斯劳大学副教授和教授。1906年柏林商业学院创立，被聘为教授。1917年接替瓦格纳，转任柏林大学教授，1931年退休后被聘为名誉教授。其间，曾参与社会政策协会和社会学会的创立工作，还担任过主席。1904年还同马克斯·韦伯联合主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杂志。他的代表作是《现代资本主义》（1902年、1916年）。

桑巴特是个思想复杂而多变的人物。早期曾表示同情和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成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猛烈攻击社会主义理论，最后竟堕落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不过总观其主要理论主张，他一方面承袭历史学派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力图克服历史学派缺乏理论体系的致命伤，努力追求理论与历史的完美统一，从而明显推进了新历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统一的基础就是他提出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时代"两个中心概念。

所谓的"经济体制"，是指具有一定性质的经济方式，由经济意识、技术与组织三个要素所构成。所谓的"经济时代"，是指历史上受一定经济方式所支配的时期。桑巴特进而用"理想型"作为工具来观察经济现象，并测定各种具体的历史现实与这种纯粹"理想型"之间的距离。具体地说，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一种特定的经济体制能使全部经济生活具有其纯粹"理想型"的特征，则称为该经济体制的"全盛时期"。在此之前，称作"初期"或"早期"，其后则叫"后期"或"晚期"。就9世纪以来的欧洲而言，其间曾经历自给自足经济、手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三种经济体系，相应地也有三个经济时代。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亦有早期、全盛期和晚期的区分。

桑巴特作为新历史学派的一员，还应用"历史方法"阐述了有关的理论观点。他主张研究经济现象应当同社会整体相联系，经济学应该是"经济社会学"。他提出"三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伸发挥希穆勒的思想，坚决反对"规范经济学"和"因果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强调精神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声称"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从迅速发展的"策动力量"，并把它解释成由企业学精神（集中表现为征服和营利）和市民精神（表现为遵守契约，计算正确、目的确切等）组成的一种统一的整体的心情。他宣扬国家政权在社会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并是实行保护与统制政策和干预经济的根本力量。

德国法西斯政权出现以后，桑巴特修正了他的上述许多思想，转而颂扬独裁政体，鼓吹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拥护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堕落成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辩护士。或许由于他思想多变的缘故，尽管桑巴特的著作广泛流传到世界各地，他的追随者却寥寥无几，学术界对其理论也十分冷淡，从而同新历史学派领袖希穆勒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照。

埃吉渥斯，弗朗西斯·伊西德罗（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　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爱尔兰的埃吉渥斯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1877年后，先后担任伦敦大学逻辑学讲师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891年转任牛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1922年退休时又被聘为名誉教授。他还长期担任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编委。主要著作有《伦理学的新旧方法》（1877年）《数学心理学》（1881年）和《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集》（1925年）等。埃吉渥斯在当时的英国是个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从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阐述来看，他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大名鼎鼎的马歇尔，而就数学方法的娴熟运用而言，他是杰文斯之后最重要的英国数理经济学家。不过在经济学史上为其博得声誉的，主要还是他所提出的"契约曲线"。按他的解释，在两个人交换各自手中的商品时，这两种被交换的商品可以有一系列不同比例的组合，其带来的总效用对交换双方是无差异的，连接这些组合点的几何曲线叫做无差异曲线。交换者的成交各点即契约点的轨迹，其分别同他们的无差异曲线相交的那部分，则叫契约曲线。这样，契约曲线上的任一点都能满足交换的均衡条件，即两种被交换的商品的总效用与各自的边际效用之比相等。换言之，实际的交易量总是表现为契约曲线上的某一点。埃吉渥斯的契约曲线稍后经帕累托等人的修改补充，成为建立序数效用论和阐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此外，埃吉渥斯对指数、垄断、国际贸易等理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陶西格，弗兰克·威廉（Frank William Taussig 1859—1940）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城一个捷克移民家庭。1883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该校经济学讲师和副教授，并于1892年升任教授，直至1935年退休。此外还担任著名的《经济学季刊》主编达40年之久。陶西格还是美国关税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和总统经济顾问。主要著作有《美国关税史》（1888年）、《经济学原理》（1911年）和《国际交易》（1927年）等。陶西格作为美国最坚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尽管在理论创造方面似乎赶不上约·贝·克拉克，却对经济理论的应用和发挥起着杰出的作用。他编著了一部体系完整、论证缜密且影响十分深广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哈佛培养出众多出色的经济学者，长期担任著名经济学杂志主编，推动着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因此，陶西格对美国经济学界以及实际经济工作所具有巨大影响力，是同时代美国学者根本无法比拟的。就其学术研究领域而言，他主要探究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及其实务问题，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用多个国家与多种商品的假定和生产成本递增的假定修正了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某些前提条件，使之更符合实际，从而对传播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又企图抹去

"比较成本说"中注重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主张用货币价格来计量由利息和工资所构成的生产成本，并把成本的比较归结为三种不同的差别。这充分反映出其国际交易理论的新古典主义性质。他还对关税的理论与历史作过深入的阐述，至今具有重要的权威性。

陶土一陶土（clay—clay） "陶土"指不易变性。这个词用来比喻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劳动比率的不可变性。这就是说，无论在投资之前，还是在投资之后，资本-劳动比率都是不可以变动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所用的生产函数就是"陶土一陶土"。这一模型假设，资本-产量比率是既定的，从而资本-劳动比率也是既定的，并在这一前提之下探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途径。

朗菲尔德，塞缪尔·蒙蒂福特（Samuel Mountifort Longfield，1802—1884） 英国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出生于爱尔兰，曾担任过政治经济学教授，但主要职业是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朗菲尔德作为经济学家曾长期被人忽视，其实他的价值论和分配论预示了以后边际效用学派的学说，他认为，价值由供给与需求两者决定，商品的供给通过"最不利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花费的最大量的劳动"和"最低的资本效率"这两个因素即边际成本加以调节，而商品的需求则由消费者的"最低限度需求"即边际需求来调节。这实际上已勾勒出马歇尔均衡价格论的基本轮廓。朗菲尔德还是边际生产力论的先驱者。他指出，资本利润的水平和高度必定由效率最低的那部分资本的利润所决定，而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一定等于因社会需要而投入耕作的最差土地上所种植的成本，于是其他较优的土地或投资就能获得超过一般利润收入，其超额部分即为地租。显然，这里包含着资本和土地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润和地租的原理。他还反对工资基金说，也不赞成维持生存说的传统观点，主张工资必定出自劳动者的劳动产品或它们的价格，其中包括着劳动生产力的要素。他又把资本报酬看作是比较现在收益与未来收益的产物，即劳动者因资本家眼前支付工资而付出的一种"折扣"。这无疑反映出"时差利息论"的基本思想。不过，他在谈到资本利率的决定时，又强调供求双方的交互作用，并认为资本的供给取决于储蓄者愿为将来而牺牲现在的程度，其需求则由资本边际生产力所决定。不难看出，这恰恰又是马歇尔从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分配学说的分析框架。鉴于上述的理论思想，朗菲尔德在边际分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十一画

阈效应（Threshold Effect） 一次性税收增加对以后政府税收增加的影响。在某种战争或其他特殊时期中，社会会愿意接受税收的增加。在这种特殊时期，即"阈"，结束之后，社会仍愿意按新的税收标准纳税。这种一次性税收增加变为持久性税收标准的阈效应使政府税收有上升的趋势。这一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A·析柯克（A·Peacock）和J·威斯曼（J·wiseman）提出，并用来解释战后英国政府税收与支出增加的原因。

惯性通货膨胀（Inertial Inflation） 一种用通货膨胀本身的惯性来解释通货膨胀得以持续的原因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最初的通货膨胀，即使这种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消失了，通货膨胀也会由于其本身的惯性而持续下去。这是因为，工人与企业家所关心的是相对工资与相对价格。他们在决定自己的工资与价格时，要参照其他人的工资和价格水平。如果其他人的工资与价格水平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上升了10%，那么，他们在决定自己的工资与价格时，也要以这10%的通货膨胀率为基础。所有工人与企业的工资与价格的决定都要互相参照。这样，谁也不会首先降低自己的工资与物价水平。已经形成的通货膨胀就会作为一种惯性而存在下去。只有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才会由于工资与物价的被迫下降而使通货膨胀中止。这种理论由美国凯恩斯主义者J·托宾（J·Tobin）等人提出，它强调了过去行为对现在的影响，根据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

康芒斯，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 Commons，1862—1945） 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荷兰斯堡，父母都是解放黑奴运动的热情支持者。1882年起先后进奥柏林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分别受业于著名经济学者凯里和伊利。1890—1899年间，先后在四所大学执教，多次因思想激进而被迫离职。1904年开始担任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其学术生涯亦在该校任职期间臻于巅峰。康芒斯的著述极多，其制度经济理论的代表作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制度经济

学》(1934年)和《集体行动经济学》(1950年)。在制度经济学者中间，康芒斯特别重视法律制度的作用，认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就是法律制度，故被有些人称为"制度经济学的法律学派"。他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制度"下了独特的定义："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并认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人们之间普遍存在利益冲突，而且还在于经济资源的稀少性，不加管理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他详细分析了被他视为基本经济范畴的"交易，认为它是指所有权的转移，包含着利益冲突、相互依赖和社会秩序（即协调关系）这三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社会关系。他进一步提出，现代社会的利益协调方式有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三种，但其中法律制度的作用最重要。在他看来，通过国家首先是法院的"公正调节"，既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从冲突中建立秩序"，实现一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又能从社会利益出发来确定所谓的"合理价值"，为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可见他的理论同传统的庸俗学说不一样，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康芒斯还十分关心劳工运动，参加过许多有关的社会活动，是全国闻名的劳工问题专家，因此，他成功的实际改良工作比起其表述得十分繁杂混乱的经济理论来，似乎当时更受人瞩目和称赞。

康替龙·理查德（Richard Cantillon 1680～1734）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赴巴黎创办银行，后来成为巨富。曾到美洲和东亚等地旅游，对其经济理论的形成颇有影响。他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是在他死后于1755年出版的。该书是建立起经济学完整体系的第一部著作，系统论述了范围广泛的经济问题。他还第一个使用了"企业家"的概念。他极其强调土地及其土地产物在各阶级之间的流通对于一国居民的重要性，认为土地是财富的源泉而劳动是生产财富的形式，从而被看成是重农学派的先驱。他的价值理论虽然接受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却又转向生产费用说，并且包含着供求说，因此缺乏一致性。他的工资理论预示了亚·斯密关于不同职业中的工资差别思想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观点。总的来看，康替龙的经济学说较多是对配第、洛克以及其他人的理论的阐述和发挥，尽管独创性的成分较少，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仍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康德拉杰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 又称"长周期"，指为期50—60年一次的经济周期，最早由苏联经济学家N·康德拉杰耶夫（N·Kondratieff）在1925年发表的《论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提出，故名。康德拉杰耶夫研究了法国、英国、美国、德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长时期的时间序列资料，根据这些国家的价格、利率、工资、对外贸易，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资料，认为存在着平均长度为54年左右一次的长周期，或称长波。他把从18世纪末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三个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从18周期80年代末到1844—1851年、其中从18世纪80年代末到1810—1817年是上升时期，从1810—1817到1844—1851年是下降时期。第二个长周期从1844—1851年到1890—1896年，其中从1844—1851年到1870—1875年是上升时期，从1870—1875到1890—1896年是下降时期。第三个周期从1890—1896年开始，从1890—1896年到1915—1920年是上升时期，以后就开始进入下降时期。康德拉杰耶夫认为，这种长波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中所固有的一些原因。他根据对统计资料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关于长周期的特点：第一、长波属于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每一个长周期又有较短的波动，但长周期的上升期繁荣年份多，而下降期以萧条年份为主。第二、在衰退期间，农业通常出现特别显著而长期的萧条。第三，在长周期的衰退期间，生产和交通运输中有特别多的重要发现和发明完成，但一般只是在下一个长周期的开始时才得到大规模运用。第四、在长周期开始时，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世界市场有所扩大。第五、在长周期的上升时期，即在经济力量的扩展高度紧张时期，一般会发生灾难性的和广泛的战争和革命，应该说，这些特点仅仅是经验性描述，还不是理论解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彼特认为长周期与经济生活中重大的创新活动相关。他把从1780年到195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三个长周期：从1780年到1840年为第一个长周期，其特征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心的一系列重大创新；从1840年到1890年是第二个长周期，其特征是以钢铁和蒸汽机为中心的创新；从1890年到1950年是第三个长周期，其特征是以电力、化学和汽车为中心的创新。康德拉杰耶夫提出长周期后不少经济学家曾持否定或怀疑态度。70年代之后，对长周期的研究活跃起来，不仅承认这一周期的存在，而且从技术创新、重型设备更新、利润率变动、初级产品与世界工艺品相对价格变动等因素来解释长周期的原因。但对长周期的分期、代表性指标、及其认识上仍存在分歧。

理想指数（Ideal Indexes） 是美国经济学家I·费雷为消除两种不同指数偏倚现象而提出的一种指数，它将两种指数相乘、再求出其平方根，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指数。这是利用几何平均数受极值影响较

小的特点，得出更具普遍性的数值。例如，两个著名的指数，拉斯佩尔斯指数 $p_{st}^{L}=\sum p_t \cdot q_s / p_s \cdot q_s$ $Q_{st}^{L}=p_s \cdot q_t / p_s \cdot q_s$。其中 p_{st}^{L} 与 Q_{st}^{L} 分别是价格指数与产量指数。s 代表基期，t 为计算的现期。另一种指数为帕西指数 $p_{st}^{P}=p_t \cdot q_t / p_s \cdot q_t$，$Q_{st}^{P}=p_t q_t / p_t \cdot q_s$。由于拉斯佩尔斯指数中每种变量的权数按基期使用的价值不变，因此用这种方法编出指数常偏高。而帕西指数却是用当前数据来加权的，因此常常偏低。将这两种指数按理想指数重新计算就能够消除偏倚。其公式为

$$P_{st}^{F}=\sqrt{P_{st}^{L} \cdot P_{st}^{P}} \qquad Q_{st}^{F}=\sqrt{Q_{st}^{L} \cdot Q_{st}^{P}}$$

式中 P_{st}^{F} 与 Q_{st}^{F} 是理想价格指数与理想产量指数。费雪比较了 134 个指数，认为上式中的指数是最佳的，也是最理想的。除了费雪之外，还有许多人曾为消除指数偏倚现象做出过努力。有的人通过对数形式来完成这一工作。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 又译为"合理预期"，指对未来经济变量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的预期。这一假说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作出经济决策的经济主体是具有理性的。他们的行为目标是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作出正确的预期。第二、经济主体在作出预期时可以得到有关的一切信息，包括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系统的了解，以及可以利用一切有关的资料与数据。第三、经济主体在预期时不会犯系统的错误，即从总整上看，经济变量的预期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设 I_t 为经济主体所得到的第 t 期及 t 期之前与未来经济变量预期有关的信息，则对 t+1 期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π_{t+1}^{e} 可以表示为：

$$\pi_{t+1}^{e}=E(\pi_{t+1} / It)$$

上式中，E 为预期值。该式说明，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取决于现在所得到的有关信息(I_t)。由于信息是完全的，所以

$$\pi_{t+1}^{e}=\pi_{t+1}$$

现实中，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之误差产生于随机冲而 ε_{t+1}，所以

$$\pi_{t+1}-\pi_{t+1}^{e}=\pi_{t+1}-E(\pi_{t+1} / I_t)=\varepsilon_{t+1}$$

在长期中，$\varepsilon_{t+1}=0$，所以：

$$\pi_{t+1}-\pi_{t+1}^{e}=0$$

这说明了理性预期是长期中的正常状态。理性预期是 6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 J·穆斯(J·Math)在分析金融市场时提出的，70 年代被美国经济学家 R·卢卡斯(R·Lucas)、T·萨金特(T·Sargent)等人用于分析宏观经济问题，而形成当前在经济学界影响颇大的理性预期学派。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概念的提出是经济学上的一次重要"革命"。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理性预期这一概念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经济学界围绕理性预期及由这一概念所得出的理论与政策分析展开了激烈争论，目前仍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 又译为"合理预期学派"，或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是 70 年代之后在美国形成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学流派，被称为"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

历史渊源 70 年代初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滞胀。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恶果。于是，各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流派纷纷形成并得到发展，理性预期学派正是在这时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理性预期的概念来源于 6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 J·马思（J·Muth）的一篇论文。二是市场出清的概念与对市场调节完善性的承认来自于新古典学派。三是在理论上直接继承了货币主义，自然失业率假说就是由货币主义的有关论述而来的，因此也被称为"货币主义Ⅱ。"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这一派公认的首领是美国经济学家 R·卢卡斯（R·Lucas），其代表作有：《经济周期理论研究》（1981），T·萨金特（T·Sargent），其代表作为《宏观经济理论》（1979）、以及 N·华莱士（N·Wallace）等。代表这一派观点的还有卢卡斯与萨金特合编的论文集《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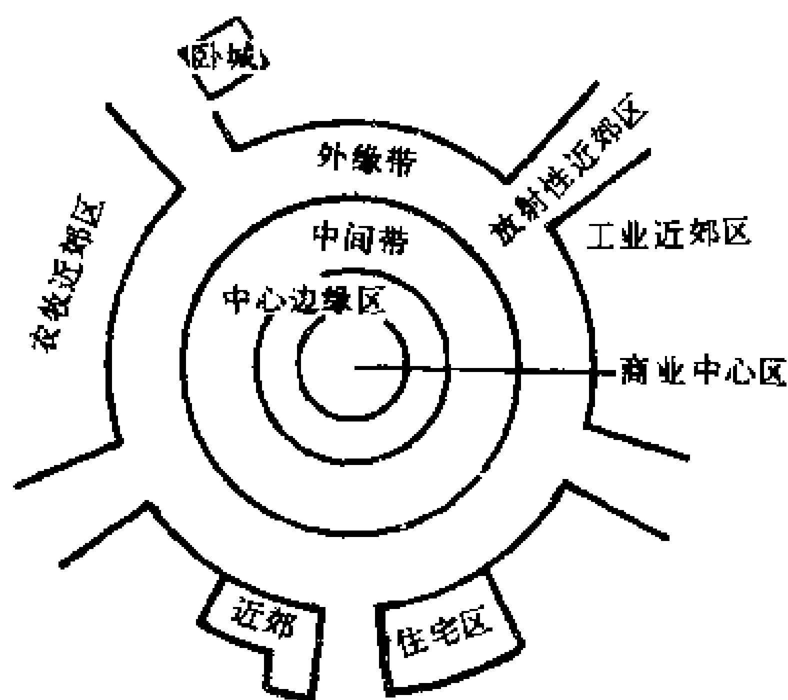
基本理论 这一派的理论是要以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来表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调节能保证充分就业的观点，并证明国家干预经济的无用性。市场出清假说是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完全的伸缩性，当劳动市场和物品市场失衡时，工资和价格的调节可以使这两个市场迅速恢复供求相等的均衡状态，即市场出清状态。理性预期是指"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所以它们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经济主体是有理性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所能得到的有关信息对未来作出符合理性的预期，从整体上看，人们在预期未来时不会犯系统的错误。从这两个前提出发，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不变性假说。这一假说认为，货币供给（或其他政策变量）中可预测的变动对产量、就业量和其他实际变量不发生影响，因为经济主体能对这种变动作出合乎理性的，从而也是正确的预期，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有随机性的，即无法作出预期的货币供给（或其他政策变量）的变动才会通过对经济主体的欺骗影响产量、就业量和其他实际变量。但这种欺骗只是暂时的，在长期中，由于经济主体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不会犯系统的错误，所以，这种政策变动就是无效

的。由这一假说出发，他们又得出了三点重要的结论。第一、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中都不存在菲利浦斯曲线所表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关系。第二、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对于可预期的政策变动，经济主体会作出正确的预期，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不可预期的变动尽管在短期中有作用，但它仅仅是依靠欺骗，这种欺骗在长期中不仅无用，反而还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第三、宏观经济是以微观经济为基础的。整个经济的运行取决于每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每个经济主体都按理性预期行事，通过市场调节，经济自然会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因此，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只有去消国家的干预，不用随机变动的政策去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经济就会正常发展，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从以上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理性预期学派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政策主张与运用　理性预期学派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他们的政策主张包括：第一、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设法消除货币供给量、政策支出这类它所控制的变量的不规则变动。第二、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不应该是同时解决失业与通货膨胀，更不是实现充分就业，而应该是防止通货膨胀，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第三、政府应该取信于民，预先告诉经济主体政策的变动，以防止政策变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在这些政策之下，则要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完全受到重视并实施。但是，自从 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受到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

评价　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的一场革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学派至少从三个主要方面改变了经济学的前景。第一、它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第二、它迫使经济计量模型的编制者提供更好的技术方法把预期引人模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改变了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式。正因为如此，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政策制定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经济学界对理性预期学派也有不同看法。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经济主体的预期能否是合乎理性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获得信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以及经济主体理性的有限性，理性预期的假设实际上是不现实的。第二、市场机制是否是完善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尤其是 30 年代大危机都证明了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对于这些问题理性预期学派还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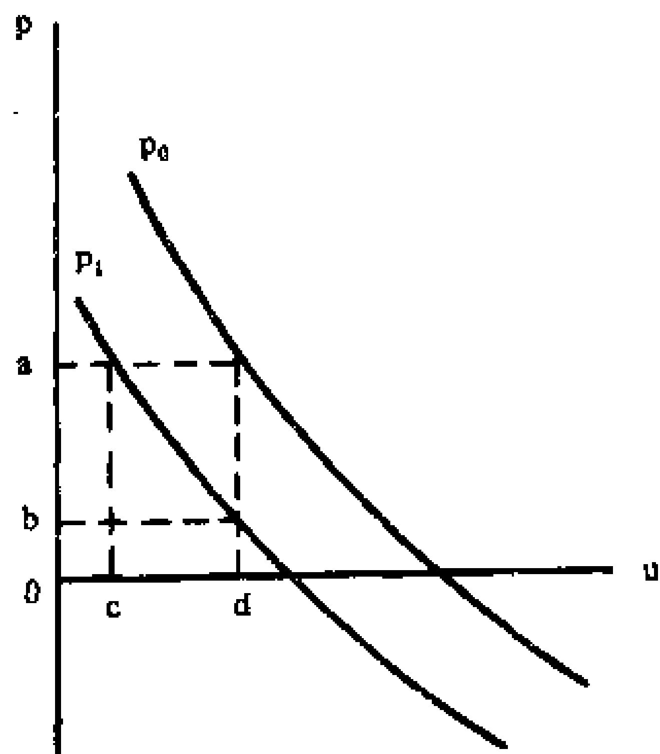
理想城市模式　西方城市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理论。由于现代城市地域结构日益复杂，已有的各种城市土地使用模式均无法准确反映这种格局。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对现代西方城市进行描述的一般理想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托夫（E·J·Taaffe）、格耐尔



（B·J·Garaer）和耶提斯（M·H·ycates）的模式（见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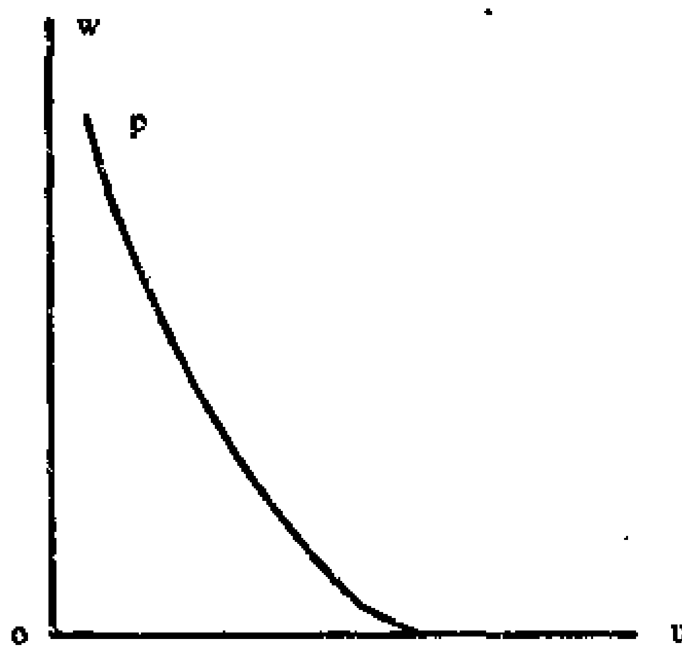
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如下：1.商业中心区：以具有集中的摩天大楼为其特殊物质外貌，除银行、保险公司的总办事机构和股票交易市场外，尚有城市内最大的百货商店，大量的文化娱乐场所；2.中心边缘区：由商业中心区向四周蔓延，往往由若干扇面组合而成，有批发商业地段和工业小区分布其间，并有住宅漫溢其内；3.中间带：占市区用地较大部分，具有混合型经济社会活动。有集中的高级单元住宅区，同上一区工业扇面连在一起的低级单元住宅区，以及一幢两户的中级住宅。高密度住宅区距商业中心区近，而低密度住宅区在其外缘；4.向心外缘带，处于市区周边地区，中等收入者多在此拥有独户住宅，形成早期的卧城，此带为城市新区，轻工业，特别是耗用大量电力和需要大量空间的食品、服装、纺织、日用化工逐渐发展。因联结市内交通线和对外公路，交通方便。中级旅馆、大面积停车厂均有分布。此带还建了许多大购物中心，如大超级市场，为本市、中间带和近郊区服务。最后此带成为市区的扩展部分；5.放射近郊区：由市区向外辐射，其蔓延方向系沿城市对外的高速路和快速道路、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同市区取得方便联系，高、中级住宅群形成的卧城位于交通干线邻近，自成体系。在放射区中间，出现了间隙带，有需卡车运出产品的农耕和乳牛饲养部，以及一些不断扩大的居住小区。小区有高、中、低之别，决定于服务业的阵容。

移动效应假说（Shift Effect Hypothesis） 一种关于收入政策具有使菲利浦斯曲线向左下方移动的影响的理论。菲利浦斯曲线表明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即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低；反之，亦反之。菲利浦斯曲线向左下方移动表明与既定的失业率相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了、或者说，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之下，失业率较前减少，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ou 代表失业率，纵轴 op 代表通货膨胀率。P_0 为原来的菲利浦斯曲线，这种菲利浦斯曲线表明与通货膨胀率 oa 相对应的失业率为 od。当菲利浦斯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即由 P_0 移动为 P_1 时，与通货膨胀率 oa 相对应的失业率为 oc，oc＜od，表明既定的通货膨胀率时，失业率降低了。与失业率 od 相对应的通货膨胀率为 ob，ob＜oa，，表明既定的失业率时，通货膨胀率降低了。收入政策之所以具有这种效应是因为收入政策的作用在于控制货币工资增长率。根据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工资增加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控制了货币工资增长率就控制了通货膨胀率。这种制止通货膨胀的方法不以抑制总需求增加失业为代价，从而就在不增加失业率的情况下控制了通货膨胀，使菲利浦斯曲线向左下方移动。由此得出，运用收入政策可以在不提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制止通货膨胀，是一项有利的政策。但由于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并不能仅靠收入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



萧条（Depression） 经济周期中经济活动低于正常水平的一个阶段，属于收缩阶段的后期。当经济从顶峰开始向下的衰退，并且低于正常经济活动时，就进入了萧条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生产急剧缩减，投资减少，信用紧缩，价格下跌，失业严重，企业倒闭率高，开工率低，企业家与消费者情绪悲观。这一阶段的最低点称为"谷底"。但从谷底开始，经济就开始缓慢地复苏，从而摆脱了萧条。萧条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多种因素。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缩短、甚至消除这种萧条。

菲利浦斯曲线（Phillips Curve） 最初是一条表示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后用于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1958 年新西兰经济学家 A·菲利浦斯（A·phillips）根据英国 1861—1957 年间的资料研究了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即失业率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低；失业率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高。并把这种关系用一条曲线来表示，如附图所示。附图中，横轴 ou 代表失业率，纵轴 ow 代表货币工资率，向右



下方倾斜的曲线 P 就是菲利浦斯曲线。以 w 代表货币工资率变动率，u 代表实际失业率，u^* 代表自然失业率，ϵ 代表货币工资率变动率对失业率变动的反应程度，即可以把菲利浦斯曲线的公式写为：

$$w=-\epsilon(u-u^*)$$

在上式中右方的负号表示货币工资率变动率与失业率成反方向变动，即菲利浦斯曲线所表示的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后来加拿大经济学家 R·利普赛（R·Lipsey）证明了货币工资率变动率是劳动力市场过度需求程度的函数。美国经济学家 P·萨缪尔森和 R·索洛在此基础之上证明了，由于价格是以成本加成的方法（即在成本之上加一个平均利润）决定的，而工资又是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因此，货币工资率的变动率就决定了价格水平的变动。这样，就用菲利浦斯曲线来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以 gp 代表通货膨胀率，就可以把菲利浦斯曲线的公式写为：

$$gp=-\epsilon(u-u^*)$$

萨缪尔森和索洛还主张使菲利浦斯曲线成为一种有用

的决策工具，运用这个工具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进行选择。当失业率高时，就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承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当通货膨胀率高时，就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承受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通过这种选择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处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60年代末滞胀的出现否定了菲利浦斯曲线所表示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这种交替关系。许多经济学家则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条件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短期菲利浦斯曲线、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和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

商业与经济中的截面分析（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简称"截面分析"。它与"时间序列分析"相对应，二者皆广泛运用于经济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截面分析"研究二个或二个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变量的共同特征都是对不同的经济分析单位在同一时点上的状况的衡量。例如，对某一特定产品的需求的分析首先要对消费者的收入进行分组，依此将消费者分成不同的层次，然后来考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每一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行为。"时间序列分析"考察的是经济单位在连续的时间点上的状况的变动情况。

"截面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这一方法的运用包含了这样几方面问题：选择适当的函数形式，估计自变量的误差的倾斜效应以及考虑被排除变量可能产生的效应。这些与"时间序列分析"中运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所包含的问题完全相同。实际上，在经济分析和计量经济学中这二种分析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和"时间序列分析"一样，"截面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定衡量的对象。例如，在给定年份里不同农场的总产量很大程度上受到天气的影响，如果用总产量对总投入进行回归，得出的正的离差并不一定表明一种上乘的管理水平。只有运用每个农场连续几年的统计资料通过建立每个农场几年来变量的平均值的回归方程才有可能消除天气的因素，从而这种回归方程的残差可以清楚地表明不同农场之间的效率的差异。当观测值是某种有序的规则排列时，在"时间序列分析"中用来检验自相关的"德宾—沃森（Durbin—Watson）统计"也可用于"截面分析"。回归系数是"截面分析"中的重要分析值。简单最小二乘法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的随机误差使"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回归系数都趋向于零。弗里德曼（Friedman）曾创立了一种复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截面分析"中基于家庭收入的家庭支出回归系数低于"时间序列分析"中基于国民收入的消费支出的回归系数。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统计数据具有相当的离中趋势的分析场合（如人均收入），单独使用时间序列分析很难达到分析目的。不过，"截面分析"的分析数据搜集不易且成本不菲。

"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都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截面分析"最早的分析类型是研究居民户对于不同种类产品的支出。分析的结果即是1857年提出的著名的"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越贫穷的家庭对食物的支出与其总支出的份额越大。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居民户支出的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1916年威廉·F·奥格本（William F · Ogburn）建立的多重的回归方程，把每一种类的支出表示为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的函数。斯蒂格勒（Stigler）1954年由奥格本的方程计算出了支出的收入弹性。本世纪50年代初，曾有几位经济学家试图将"截面分析"对于收入弹性的测量移植到"时间序列分析"对于人均食物支出对食物价格和人均收入的回归分析之中，这一做法受到另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批评者强调这二种分析的回归方法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类型不同。在经济分析中将"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结合运用获得的第一个主要的研究成果是1959年由库（Kuh）宣布的。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以17年为分析期的73个企业每年的统计数据，将每个年份73个企业的变量取平均值就得到17个时间序列的观测值；再将每个企业连续17年的变量取平均值就得到73个截面分析的观测值。用同样形式的方程来处理这些观测值从而得到不同的回归系数。库还以1241（73×17）个观测值的方差和协方差为基础提出了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G·S·玛德拉（G · S · Maddala）1971年在《计量经济学》第138卷上撰文专门讨论了方差和协方差在"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广阔的使用前景。

商业中的决策：一种行为方法（Decision Makig In Business: A Behavioral Approach）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经常需要作出决策。例如，从宏观上，人们要考虑如何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去；从微观上，人们要研究如何有效地使用与管理所得到的资源，而在这些问题中都需要作出决策。人们每作出的一个决定都代表了一种选择，而决策就是选择不断积累的过程。对经济中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就逐渐形成了决策理论。

I.古典决策理论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经济学界一直假设经济行为人是具有理性的、追求最优化目标的"经济人"。例如，作为生产者，必然追求最大利润与最大的市场份额等等；作为消费者，必然追求最大效用。

根据这一理论，经济行为人在进行决策时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按照增量的变化来寻找最优化目标值。

2.现代决策理论

后来的有些学者认为，古典决策理论没有将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考虑在内，认为未来也是完全可知的，这是不正确的，也必然会影响到决策人进行预测的结果。另外，古典决策理论中所追求的最优化目标在现实中往往很难实现，这些目标所需具备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决策人掌握完备的信息，只这一条就是不现实的。还有，古典决策理论忽视了决策人认识上的制约、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目标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等等因素。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古典决策理论既无法解释现实中的企业决策，也不能有效地对企业决策加以预测，应当引入"行为"的方法，研究在企业组织决策中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一研究的发展形成了现代决策理论，又称行为决策理论。

对企业中人的行为进行研究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管理学者们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有关原理用于对企业管理方式进行的研究之中，试图通过改善企业间的人际关系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埃尔顿·梅奥与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及其所从事的"霍桑实验"、瓦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以及威廉·大内的"Z理论"等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行为对于企业生产与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人际关系、提高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措施，从而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后来，切斯特·巴纳德将人的行为引入他的理论框架中，用来解释"组织"出现的必要性以及组织决策问题。

真正从行为的角度对企业决策进行系统的分析与阐述的，当推赫伯特·西蒙。他继承了巴纳德的某些观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他在1947年出版的《管理行为》、1958年与詹姆斯·马奇合著的《组织》以及1977年出版的《管理决策新科学》等著作中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概念框架，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规划"，它是由一系列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的活动组成的，活动来自于外界的刺激。安排周密的规划可以以同一形式重复出现，从而使顺序固定不变；如果规划安排得不严格，这种规划就不会重复出现，活动的顺序也不会一成不变。假设决策人多会按照安排严密的规划行事，那么根据企业所用的规划就可以为企业决策设立模型并进行预测了。

西蒙认为，要对企业组织进行研究，首先要了解它的决策过程与结构，研究它是如何影响企业中人的行为的。企业管理的过程就是先确定目标；然后找出可以实现目标的各种方案，对这些方案进行筛选，定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最后在实施这一方案的过程中进行检验与控制。管理的这一全过程也就是决策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决策就是管理。在对决策的过程与准则、程序化的决策与非程序化的决策、组织机构的建立以及决策过程的联系等方面作了深人的论述之后，西蒙还指出了"集体决策"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具有高度的客观合理性，只有组织内部的成员来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合理有效的决策。

此外，西蒙还提出了"管理人"的概念，"管理人"与"经济人"不同，他不是完全理性世界的人，不以追求最优化目标作为标准，而是非常现实，讲求实际，追求令人满意的目标。西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决策人很难实现其最优化目标，生产者的"最大利润"目标往往难以实现，所以他们追求的往往是"满意"的方案，即使生产者感到满意的利润、市场份额与价格等等。

在西蒙之后，R·希耶特（Cyert）与J·马奇等人对现代决策理论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引入了冲突的事解决、避免不确定性以及组织知识等重要概念。马奇等人还于1976年著文指出，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的选择行为多样化，它也使得实际情况与期望的情况之间的不一致无法确定，最终导致这一不一致的消失。

现代行为决策理论的应用相当广泛，人们利用计算机来对企业决策进行模拟，包括企业预算、生产计划、产品价格以及市场需求等等。除了解释与预测的功能之外，行为决策理论还试图改进选择行为的有效性，重点放在非结构性形势下企业战略的制定，包括对决策时的形势的认识、设计或者找出可能的方案以及对这些方案进行选择等等。

商业存货（Business Inventory） 商业存货是由商业企业保有的各种物品的供给，它用于迅速满足产生的需求，以保证企业运营不致中断。商业存货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1) 对应于周转资本的存货周转额。存货分析中的最大难点是所谓生产期，如果将数字转变成存货周转额统计，那么问题就至少可以解决。最终销售下降可能由于实际利息率上升，也可能由于财政约束预计将减少最终需求。在周转资本开支中，由于重置需求如此之大，加速原理在存货支出中并不重要。如果在整个模型中，企业存货周转额是即定的，那么在稳态的均衡中，一个经济的成员将有

效地预测销售额和其他变量。存货水平适应于财政的或货币的冲击，这种冲击可能强烈地影响经济过程。(2) 企业存货行为的微观基础。首先，从分配者的存货原则来看，他将考虑置存与维持成本和再订货成本。如果一个零售商估计有信心在下一年内销售 Q 单位（在预先确定的价格水平上，需求在全年内均匀分布），他手头应保有多少存货呢？他可以在一月的开始将整个数量存入仓库，也可以分期存入仓库。第一种方法可以避免再订货成本，却要负担大量的置存与维持成本；第二种方法减少了置存与维持成本，却要负担更多的再订货成本。当然，置存成本可以是负的，即存货在保有期内由于价格上涨或者老化的增值而增值。在任何情形下，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归结为最优量的计算：

$$D=\sqrt{\frac{2aQ}{k}}$$

D—最佳再订货量

Q—销售量

K—单位置存成本

a—固定的再订货成本

这一公式给出了最优的平均存货水平 $\frac{D}{2}$，它是通常进货量的一半，据此，存货增长应当仅仅和销售额的平方根成比例。其次，从生产者的存货原则来看，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前提下，他将考虑两种不确定性，一种是任何既定时期内需求量的不确定性，另一种是采购前置时间的不确定性。如果需求的概率分布随时间变化，那么成本分析就会极其复杂。相对于价格和利息率的既定预期、存货可能是销售额的无弹性函数。(3) 货币—财政政策和存货积累之间的传递。由实际利息率和总需求传递的货币—财政政策对存货的影响可能是相当微弱的。对存货的需求和对货币的需求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大不同。因此，用古典的货币需求理论分析存货需求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商业信贷（Business Credit）　信贷就是延期的交换，也就是交换的一方直到未来某个时候提供交换品，商业信贷与消费者信贷不同，它是指对企业经济活动的信贷，后者则是对消费的信贷。讨论商业信贷的一种方法是刻画一个包括所有商业企业（business firm），单个业主，合资者以及公司的联合资产平衡表，在这个假想的资产平衡表中，所有的资产的净值包括最初发售的股票和新近发售的股票，再加企业支付税金和红利之后的收益三大部分。所有资产的总和减去企业资产净值后剩余的部分就是商业信贷的数量。下面我们用另一种类似的方法来探讨商业信贷。所有的企业的资产由股份和债务组成。企业的债务就是借贷者给予企业的商业信贷的数额。所有的企业的融资需求是下列资产增加的结果：(1) 短期资产的增加，包括存货，净商业信用（trade credit），消费者信贷，净杂项金融资产。(2) 长期资产的增加；包括厂房与设备、住宅建设、直接对外投资。(3) 流动金融资产。这三项的总和就是所有的融资需求。存货投资的变动对整个融资需求的周期性变动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商业信贷或商业债务记在企业的应付帐户时，是短期债务的最大的一项。作为一种规律，大型公司要扩充（extend）相当数量的商业信用，特别是向更小的公司。单个业主、合资者扩充信用。企业也向它的零售顾客以消费者信贷的形式扩充信用。在商业和消费者信用的提供者这种作用中，非金融性的公司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金融机构的功能。从总体上看，新厂房设备的投资是企业最大的融资需求。对新的生产能力的开支主要依赖于市场需求的流动比率（current rate）和企业对这种需求增长的预期。企业惯于增加或减少流动资产、这个流动资产在周转过程中起缓冲器的作用。当经济活动减弱时，融资需求下降，流动资产累积，接着在经济周期的下一个阶段，融资需求加速，流动资产减少、因此这时流动资产就是一种资金源泉。企业的一部分融资需求可以在自己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cash flow）中得到满足。这样筹集的基金叫内部基金或内部现金流。内部现金流等于扣去税收和折旧之后的利润。另外，流动资产的下降会增加内部融资来源。如果所有的融资需求超过内部基金、企业就必须在自身以外寻找新的来源。向外应筹集的数额就是总的需求减去内部基金后剩余的部分。那么对外筹集基金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最为常见的便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行金融证券（长期的和短期的债务）。短期债务的主要来源是商业银行系统，长期债务的主要来源是人寿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公司债券是公司一般的长期债务义务。它是制造性和公共事业公司的主要长期债务来源。抵押一直是诸如办公建筑，销售中心和房屋建筑等的不动产筹资的重要的基金来源。另外商业银行也常常给予企业一定数额的借贷，这种借贷常被看作是中期债务，期限长于一年，但短于长期债务的 15—30 年。整个外部融资及其组成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具有周期性。在经济周期的早期阶段，长期基金来源特别是长期债务是新基金的主要来源。到经济周期的中期，总的新的基金加速增加，而长期债务却下降。此阶段短期债务成为在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主要来源，到最大的经济衰退期，长期债务又逐渐恢复了主要融资来源的地位。这种周期性的变动从一定意义上讲有利于企业的融资决策。通货膨胀会使得现时各种投资的名义量成年上升，从而促使融资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使产品成本上升，有降低企业利润的作用。内部融资来源变小。在企业从各种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时，短期债务在所有的外部融资来源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银行借款是短期商业债务的主要来源。金融公司是补充借贷的重要来源，通常是对那些较小的流动资本需要它们支助的小企业借贷。另外，美国的政策部门也向企业发放短期信贷，大公司也在公开市场上发售商业票据、短期非保险的承诺证券（Short—term unsecured Promissory notes）来满足短期融资需求。公司债券是长期企业债务的主要形式，其他形式只起一些补充作用。如商业抵押对不动产企业在办公用房、销售中心和其他商业目标的建设筹资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银行定期借贷是许多公司中期融资的重要补充形式。为了某些产业发展计划和污染控制设备投资，还有一些免税的融资办法。此外租赁常被作为长期融资的替代形式。长期的公司债券市场上，资金供给者来自许多方面。有人寿保险公司，私人的和公共的养老基金，其余的还有公共储蓄银行、有财保险公司、公共基金、经纪人、外国投资者等。公司债务本身也有许多类，公司债券市场分别为不同的部分。私人发行的债券与公共发行的债券在市场上的待遇差异很大。前面是在美国的经济背景下对商业信贷作了概谈。西方国家企业管理制度上的差异会带来商业信贷的不同，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还具有一致性和相似性。

商业前景调查（**Anticipation Surveys，Business**）　商业前景调查是关于样本企业计划的或预期的未来活动的调查，一般包括销售、价格和投资等内容，有时也调查企业过去的某些活动。这种调查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消费者前景调查，而且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但是二者有着重大差别。消费者调查使用概率抽样方法，把关于一个相对小的消费者样本（一般在3，000至4，000人）的结论外推到全体消费者这一非常大的整体。商业调查更象一种修正的普查而不是随机抽样，不超过0.1%的企业，占有美国所有企业资产总额的60.8%和收入总额的40%。1972年，203，200家交纳所得税的制造业企业中，360家企业占有制造业资产的2／3和营业收入的56.2%。商业调查尽可能地包括了这些企业，而且从中小企业中随机抽样，以消除系统性的大企业偏斜。

1.商业前景调查的可靠性

商业调查的可能性是回答调查问题的大公司数量的函数。在预测销售和投资的预期变化量方面，商业调查比消费者调查更为可靠（消费者调查主要用于预测消费者行为改变的转折点），因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比消费者更为注重计划支出和未来年度的活动。

由于同样的原因，投资计划调查要比销售调查可靠。资本投资过程本身就要求计划，要求考虑到各种可行方案的预期收益率。一旦方案落实下来，投资基金就由董事会拨付，这种决策过程本身就相当地固定了未来投资。只要项目仍然按计划进行，投资支出就可以准确地预测。当然，资本品支出的上限也是会发生波动的，如在经济衰退期，企业可能削减计划支出或延长建设周期。在正常条件下，企业的支出不会与其在给定财政年度的计划有显著的差别的。因而调查企业计划就很好地指示了未来投资活动。

企业也制定销售计划。在很多情况下，销售计划只能看作是一种目标而不是即期预测。超额完成销售计划。管理者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的，这是与投资成本超计划有着根本区别的。许多企业也易于受外在不可控因素的冲击，如非预期的紧缩政策的实施就会使销售计划流于形式。由于销售计划只有这样的性质，预期销售调查较好地指示了商业信心而不是指示了未来商业活动。当然，商业信心对投资计划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预计到销售不畅，投资计划就会自然削减。

商业前景调查主要是针对未来的，不过其中也经常包括一些有关商业过去活动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经常地系统地收集起来，会有助于修正前景调查结果中可能的误差。

2几种类型的商业前景调查

美国商业部的"新建工厂和设备购置调查"、麦克格劳·希尔（Mcgraw Hill）"新建工厂和设备购量计划"春季调查和秋季调查，分别开始于1945年、1947年和1953年。

商业部主持的前景调查，其样本量从它产生以来一直在增加，所提供的某些产业的数据越来越全面。它不仅报告了企业投资计划，而且还包括了企业过去的实际投资支出和未完工建设项目的状况。它调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水平、实际的和意愿的开工率。

从过去的调查结果来看，某些产业的反馈中，不论是年度数据还是季度数据，都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偏斜。商业部一直在使用偏斜调整技术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企业在全年度支出上比在季度性支出上的预测准确，是该调查存在的另一问题。十月份商业调查对下一年支出的估计一般要比对本年度十一月份的估计准确，也比下一年的季度性估计准确。

麦克格劳·希尔春季调查一般包括长期计划、生产能力计划增加量和前一年的开工率等内容，还附加一些经常变换的调查内容。由于所取得的这些附加信息，该调查比商业部调查用处更大。麦克格劳·希尔秋季调查偶尔要求被调查企业报告下一年度的投资和

设备计划支出、预期销售、预期价格水平等。该调查结果一直受到许多批评，但是不象商业部调查那样，从未进行过系统偏斜调整。由于目前还不清楚的原因，春季调查相对于秋季调查，常常高估支出水平。各调查间缺乏系统的和一致的联系，是该调查所存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所调查的企业数量也少于商业部调查，因而调查结果中大企业偏斜也就严重得多。

商业经济学（Business Economics）　指的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各种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

商业指的是在国民经济中进行商品流通的部门，负责进行商品的收购、销售、运输与管理。商业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必然结果，对商业部门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可以有助于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也必将促进整个经济的运转与发展。而这正是商业经济学的任务。

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有以下几点：（1）商业的产生与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与所处的地位；（2）商业中的所有制形式与多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情况；（3）市场的变化规律与价格理论；（4）商业部门的管理体制的变化；与商业的发展趋势等等；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中，商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会各有侧重。

商业经济学的演变与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早在久远的古时候，人们就对市场上供求与价格变化规律作过研究与探讨，对于经商的方式与原则也有过一定的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商品交换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商品的买卖等流通领域的问题作了不少精辟的分析，虽然很少单独对商业经济进行论述，但是，这些分析为商业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紧实的基础。

19世纪末，在西方国家，由于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种商业组织不断涌现，商品流通系统日益精密与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经济学应运而生。其建立的一个标志是美国的N·布里斯克于1922年出版的《商业经济学》一书，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商业的经济基础、商业组织、管理原则、市场活动、广告、商标、商业劳动效率以及财务分析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其他代表人物有C·格斯坦伯格、L.汉尼以及我国的孔士谔、罗京善等人。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涉及到资金、管理、银行、保险、统计调查以及国际贸易等各个有关方面。

目前，商业经济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与广泛，在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分支学科，例如：市场学、商业企业管理学、商业统计学、商业贸易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发展标志着商业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深化，也必然为商业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　指的是充当交换媒介的商品。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有了发展。最初的商品交换只是物物交换，在交换过程中，有一些商品可以更快地被交换出去，这些商品就逐渐从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商品，也就是最初的货币。在历史上的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期中，许多商品都扮演过这种“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如牲畜、兽皮、贝壳、布帛、钻石、烟草以及金属，还有的将奴隶与妻妾也当作了货币。一般来说，充当货币的商品要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它的供给量却要相对地小，同时还要具备质地均匀、便于分割等等特点。虽然，上面提到的有些商品就不具备这些特点，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却有着质地均匀、便于分割、体积小、价值大、经久不坏，便于携带等优点，为其它商品所不能及，因此，人们逐渐把金银当成固定的货币。

商品货币与一般的商品一样，也具有价值与交换价值。但是作为特殊的商品，它还具备以下5个职能：

（1）价值尺度。重商主义者曾经把金银看成是国家财富的唯一载体。但是古典学派认为，商品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它同其它所有商品一样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它们共同构成国家的财富。商品货币不过是可以充当所有商品价值的唯一尺度以及它们的价格标准。

（2）流通媒介。古典学派认为，商品货币与其它商品一样，都以其不变的价格进入流通，这时，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数量取决于其价值的大小。因此，古典学派认为，可以用某种代用品替换流通中的金银，只要二者的数量相等，那么它们的价值也就相等。

但是，主张货币数量论的经济学家却不将商品货币看成是一种商品，而是将它看成一种符号，一种购买商品时的票证。认为它不具有价值，只是在进入流通之后，由市场的供求数量决定了它的“价值”与数量。可见，不是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它的价值，而是它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相对数量。

（3）贮藏手段。由于黄金、白银具有久藏不坏、便于携带等优点，因此，人们将它们视为理想的贮藏对象。特别是在当代，金银已经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领域，用作政府的集中储备基金。其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

（4）支付手段。由于在商品交换中，信用的出

现使得买和卖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分离了，这就使货币又具备了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当代，许多国家都发行纸币或信用货币来代替金银进入流通，使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现代信用系统的发展，使得多种信用工具进入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货币。

(5) 世界货币。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周转。当世界各国的商品货币不一致，或者发行纸币或信用货币来代替商品货币的时候，各国货币的比价不同，无法直接流通。在这个时候，商品货币——黄金等贵重金属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就显得日益重要了。作为世界货币，它在各国经济交流中起着支付手段、流通媒介与贮藏手段等作用。

由此可见，商品货币是货币形态发展的一个阶段。它的5个职能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不一定同时存在。

商品储备通货（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 国际经济社会放弃金本位以来，由于缺少一个国际货币本位，因此产生许多不便。有些人提出恢复金本位，但是近年来，黄金价格很不稳定，而且它对于商品社会来说也显得比较抽象，这就需要建立另一种商品本位。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储备通货便应运而生了，它的含义是将许多被广泛使用的商品按照不同的比重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商品"篮子"，其中商品的比重反映它们在世界的生产或者贸易中的重要性。将那些商品纳人这个"篮子"中，这取决于以下几个标准：(1) 纳人的商品将出现在未来的商品交换市场上。(2) 至少在一、二年之内可贮存，贮存期间不多花费成本，质量也不会降低。(3) 政府或者厂商无法对主要商品的价格进行操纵。基于这个原因，石油不能纳人"篮子"中去。(4) 为了减少成本，可以将纳人的某种商品换成合同，以备未来或者现期交货之需。一篮子中组成固定的主要商品的价值叫做一个商品储备通货单位("班克")，通常价值几百万美元，其原因在于，为了有效地进行交易，每一种商品的价值必须是批发份额的倍数，这样，商品储备通货才能有力地支持某一国家的货币储备。

商品储备通货可以由一个多国机构（IMA）来进行管理。与金本位管理者一样，IMA以一个宣布的价格进行交易，这个价格是多数货币商品可能出现的价格，但成固定的"篮子"是商品价格指数，它由所纳人商品的价格加权平均来决定。一般来说，每一纳人商品的价格波动要大于"篮子"价格的波动，可见，商品储备通货是一项稳定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的计划，它具有反周期的作用，可以将世界上大宗商品的出口商与生产商的收人波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也就控制了影响生活费用的主要因素的波动程度。IMA的交易由不同贸易地点的代理人经办。为了判断在某一时刻是买进还是卖出，IMA要对各个代理人报告的定单或者叫价进行加总，一旦对"篮子"中各种商品的叫价之和达到"篮子"的标价时，IMA就会做出决定，并指示代理人进行交易。

对商品储备通货的争论意见主要在于：实施这一计划的困难、使IMA卖价有效的储备规模以及对不同纳人商品的持股的成本等等，其成本-收益问题也比较复杂。不过，商品储备通货通过一揽子计划来减少大宗商品的周期性波动，而不必去一个个商品地操作，而且不必通过限制商品生产来实现这一操作，而且鼓励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实施商品储备通货会减缓衰退的进程，但在经济扩张时期却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早提出商品储备通货的想法的是J.过德瑞恩与B·格拉海姆。1964年，A·哈特、N·卡尔多与J·丁伯根曾向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提交有关最新建议。不过还没有机构或者政府对此进行实施。

商标注册条约（Trade Mark Registration Treaty） 商标注册条约于1973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工业产权外交会议上签订，1980年8月7日起开始生效。该条约与马德里协定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在商标国际注册的手续方面更加简便。缔结商标注册条约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英等国未参加马德里协定，该条约的签订有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促进商标的国际注册和保护。参加该条约的国家必须首先加入巴黎公约。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Madrid Agreement for Internationa Registration of Trade Marks）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简称马德里协定，这是一个简化一国商标在他国办理注册手续的国际协定，旨在更好地保护商标这种工业产权。由于商标是产品的标志，名牌商标更是一种高质量的象征，是一种无形财富，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冒用他人的商标尤其是名牌商标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就损害了该商标的声誉，影响了采用该商标的商品的销售，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能使得一国商标在他国得到及时的注册，就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对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是很有利的。马德里协定最初于1891年4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签订，以后曾经过了6次修改。该协定的内容包括商标国际注册的申请、效力、续展、收费等。马德里协定规定，缔约国的任何公民，以及在该国内有住所或营业所的人，必须首先在本国有关机构取得商标注册，然后就可以向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提出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国际局在核准后就予以公布并通知其他缔约国，其他国家在接到通知的一年内如不提出拒绝保护该商标的声明，则该商标就算在该国注册，享受该国的法律保护。商标国际注册的有效期为20年、期满后可以申请续展，续展期为20年，续展次数不限，但要求续展的商标图象要与原先的一致。马德里协定大大简化了一国商标在他国的注册手续，但该商标有他国能够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还取决于各国的有关国内法。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它的国内商标保护法很不完善，因此国外商标即便在该国注册了仍难以得到较好的保护，而在发达国家这种情况就要好得多。我国于1980年3月3日加入了马德里协定。

商业汇票（Commercial Draft） 商业汇票是由工商企业或个人开出的汇票。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出口商在向国外进口商收取货款时通常采用签发汇票的形式。利用银行托收或信用证支付方式。这种汇票即是商业汇票、商业汇票通常附有货运单据，此时又称汇票为商业跟单汇票。

商业发票（Commercial Invoice） 又简称为发票。商业发票是出口商开立的向进口商索取货款的价目清单。它不仅是进口商收货、记帐、付款的依据，也是进口商报关纳税的依据，是国际贸易结算中，出口商必须提出的主要单据之一。

商业发票本身并无统一固定的格式，但是通常商业发票需要包含下列内容：1、首部，其中包括：发票号码；发票制作的地点和日期、货物装船地点、船名、船期及目的地；收货人名称；合同号码和信用证号码。2.本文，其中包括：商品名称及规格；数量，净重及毛重、唛头、单价；发票总金额。3.结文，其中包括：是否保险，是否押汇，以及出票人名称及签字。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使用信用证结算，则商业发票的内容必须与信用证内容严格相符，商业发票上有关货物的说明必须与信用证的描述一致，发票总金额不得超过信用证金额，否则银行有权拒收此类商业发票。

商品交易所（Commodity Exchange） 商品交易所是一个固定的、特殊的市场，在这里，交易者在固定的时间内、通过专门的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的办法，从事和开展某些大宗商品的买卖。商品交易所的交易有两种，即现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大多开展期货交易，现货交易越来越少。期货交易是以交易所的标准合同作为中介的延期交货的交易，实际上只是期货合同的买卖。根据交易者的不同动机和目的，期货交易可以分为套期保值交易和投机交易。套期保值交易是交易者为了避免实际商品买卖活动因价格变动可能遭受的风险而进行的期货交易。具体做法是，如果交易者在实物市场买进一种商品，那么它就在交易所卖出一份同质、同量的期货。相反，如果它在实物市场卖出一种商品，那么它就在交易所买进一份同质、同量的期货。投机交易是指交易者通过自身对价格变化趋势的预测，单纯希望从价格的变动中获取投机利润的一种交易。投机者本身并不拥有货物，而且也不需要实际货物。它所从事的是"买空"和"卖空"交易。如果它预测未来一个时期内某商品价格要上升，那么它就买入一份期货合同，这就是"买空"交易，又称多头。如果它预测未来一个时期内某商品价格要下跌，那么它就卖出一份期货合同，这就是"卖空"交易，又叫空头。由于国际市场上某些商品的价格波动频繁，这就直接推动了商品交易所交易的发展。商品交易所经营的商品绝大部分是初级产品，如粮食、棉花、糖类、橡胶、咖啡等等，这些商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这些商品市场供应量大，而且行情变化快，因而吸引了众多的交易者；其次，这些商品不易腐坏、具有耐久保存性；第三，可以分级分类有公认的品质标准，而且大多是"可替代"商品。对于进出口商人来说，参加商品交易所交易，可以避免价格的频繁波动可能给它带来的损失，保证通过进出口贸易获得稳定的收人，大大减少了贸易的不稳定性，从长远的和总体的角度来看，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

商品倾销（Dumping） 商品倾销是指本国出口商在国外市场以低价大量销售商品，倾销价格可能低于国际市场平均价格，也可能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甚至低于商品的生产成本。开展商品倾销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打击或摧毁竞争对手，以扩大和垄断某产品的销路、维持其在国外市场的垄断地位，有的是为了在国外建立新的销售市场，有的是为了推销新产品，有的是为了阻碍当地类似产品的生产与发展，以便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对其实行一定的控制，有的是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推销"过剩"产品，等等。开展商品倾销就要大大压低商品售价，因而对倾销者来说短期内利润会减少，甚至会出现亏损，不过这种损失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得到补偿：第一，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倾销者（多为垄断组织）保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以垄断高价在国内市场出售商品，弥补出口倾销亏损；第二，国家提供出口补贴补偿出口倾销亏损；第三，倾销者在国外市场倾销的基础上打跨国外竞争对手，然后就可以抬高价格，获取高额垄

断利润，弥补过失的损失。商品倾销有三种形式，即临时性倾销、间歇性倾销和长期倾销。临时性倾销往往与季节因素或经济周期有关，间歇性倾销往往与倾销者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地位有关，如果竞争激烈，就开展倾销，一旦打跨竞争对手，就提高价格，如此反复。它对国外竞争对手的打击特别大，因此又称侵略性倾销。长期倾销一般建立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另外，如果能得到政府有力的财政支持，也可实施长期倾销。以前，商品倾销总是由私人垄断组织开展的，但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设立了专门机构直接开展商品倾销或支持本国企业开展商品倾销。商品倾销对扩大本国出口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但它容易引起对方的报复，导致贸易战，因此目前运用得较少。

商品综合方案（Integrated Programme For Commodities） 商品综合方案是一项旨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增加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综合性计划，它于1976年5月在第4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获得通过。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各种客观原因决定了它们出口的多为初级产品而进口的多为制成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和控制国际市场的结果又使得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甚至表现为初级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对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商品综合方案的建立和通过，正是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经过不断的努力而实现的一个初步目标，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建立一项初级产品共同基金，以维护初级产品的供求和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改善生产条件和进行技术改造。第二，初步拟定要签订18种初级产品的国际协定。这18种商品包括：香蕉、铝矾土、可可、咖啡、铜、棉花及棉纱、硬纤维及其产品、铁矿石、黄麻及其产品、锰、肉类、磷酸盐、天然橡胶、糖、茶叶、热带木材、锡、植物油及油籽等。目前只有少数上述商品已达成国际协定，还有一些商品就协定的签订开展了协商和筹备。除了这二项内容外，综合商品方案还提出改进和扩大对初级产品出口收入不足的补偿设施，使发展中国家在出口收入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能得到优惠贷款和补贴。它还提出要采取国际措施，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参与初级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出口多样化，使之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等等。商品综合方案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要求维护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的一项综合计划，它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彻底改变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阻挠，它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为了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制约，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某些初级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组成了该产品的输出国组织同发达国家抗衡。这些组织在某些产品的国际生产和贸易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商人汇率（Merchant Rate） 外汇银行与非银行客户间进行外汇买卖时所使用的汇率。一般高于银行同业间买卖外汇的汇率。

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qnly） 卡尔马克思用"庸俗经济学"一词来说明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立场。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辉煌成就在于揭示了生产中剩余价值的来源，肯定了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相反，庸俗政治经济学接受关于地租、利润、工资等来源的荒谬原则，认为土地是地租的源泉、资本是利润的源泉、劳动是工资的源泉。马克思认为，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政治的需要，资产阶级经济学担负起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任务，庸俗化的具体方法是，抓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成份和错误观点，阉割它的科学成份，抹煞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本质联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是英国的马尔萨斯和法国的萨伊。庸俗经济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级是近代庸俗经济学，时间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这时期中，庸俗经济学有了重大发展，其中主要以两次经济理论的大综合，大调和为标志。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穆勒的经济学说；第二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庸俗经济学的第二阶段是当代庸俗经济学，时间是起于20世纪30年代。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投资和储蓄不可能自动地形成均衡，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对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的观点进行攻击，形成凯恩斯主义。该书的问世，成为近代庸俗经济学与当代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

营业成本（Overhead Cost） 营业成本是一种间接成本，它是对厂商行为进行短期分析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短期情况下，总是存在一部分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不能变动的，例如，厂房、机器设备等。它们不可能随产量变化而在短期内增减。只要厂商一建起厂房、设备，不管是否生产，都存在营业成本。在短期内，厂商只能根据产品售价与可变成本（直接成

本)，例如购买劳动、原材料的成本来决定是否生产。如果单位产品售价高于可变成本，那么短期内可以继续生产。这时收益能够弥补可变成本，并可以使一部分营业成本得到弥补。如果厂商停产，连这部分营业成本也难以弥补。如果单位产品售价低于平均变动成本，则厂商应该停止生产。在对企业行为进行长期分析的情况下，不存在营业成本这一概念，因为所有的营业成本都是可变成本。

副产品（By—Puoduct） 副产品是指在多产品生产企业进行的联合生产过程中，伴随着主要产品的生产制造而取得的次要产品，也叫联产品（joint product）。只要企业的生产过程不只进行单一产品的生产，就总会有连带产品产生。一般而言，多产品企业的成本关系网络比产品单一企业的成本关系网络更加复杂，因而这种关系的本质和企业规模与结构，产业组织与调节，以及资源利用的方式和密度等都有密切相关。一般新古典的多产品——多投入决策模型预先假定，企业进行多产品生产，然而中心问题在于，企业进行多产品生产的原因何在？答案可能从成本函数的特征和企业面对的需求的本质之中找到。

联合生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多种产品在分离的生产过程下进行生产，生产函数是非联合的；另一种是多种产品出自于单一的生产过程。前者是加总的问题，后者是内在联合的工艺现象。联合生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是可分摊投入的节约化的考虑。由于某些固定投入（如物质和人力资本）是不完全可分的、不能容易地从一种生产转向另一种生产。因此，在某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某些投入具有准公用特性，购买它用于一种生产过程时，至少可以部分地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其次是产品内部关系中的相互作用，两种或多种产品联合生产，即使生产过程中没有能力过剩和共同投入，也比单独进行生产成本更低；再次是需求状况的不确定性，它对企业产品结构影响甚大。企业通过生产新产品可以避免由于市场饱和造成的收益的减少，同时，企业选择产品多样化可以作为减少风险的一个策略。假定企业来自每种产品的利润是随机的，投入和产出的价格是随机变量；在这些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给定的情况下，企业追求总和利润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在这些假设之下，即使没有工艺上的理由，企业也将生产多种产品。此外，多产品工艺和产业组织与调节有重大关系，潜在的成本关系的特征可以决定在产业中占一席地位的企业的最佳数量。在许多复合品产业中，可竞争性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复合的成本函数的本质。联合生产理论可以解释产业内部，受管制部分和不受管制部分之间的比重，这实际上涉及了产业结构问题。

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 掠夺性定价是一种通过降价方法把竞争对手挤出竞争行列的定价方法。例如，某一地区市场上的某厂商可能把其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不仅使别的厂商不可能盈利，连他自己也不能盈利，待把竞争者挤出这一市场后，他再重新提高价格以便获得超额利润。早期，约在上一世纪末本世纪初，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掠夺性定价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因为实行掠夺性定价的厂商大幅度压低价格而把某竞争者挤出竞争行列的行为使得其竞争者的资源闲置，而制定掠夺性价格的厂商最终会制定垄断高价，生产较少的数量，这样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认为掠夺性定价行为会损失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在本世纪中叶受到了挑战。经济学家麦克齐（J · Mcgee）五十年代中期对于掠夺性定价行为进行实际研究后，从理论上证明，掠夺性定价行为是一种无利可图的行为，并不象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总会给进行掠夺性定价的厂商最终带来垄断利润。他认为，禁止掠夺性定价行为的政府调节措施将阻碍竞争，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也都追随麦克齐的观点。这些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某个厂商有能力大幅度压低产品的价格把其它竞争者挤出这一行业，那么当这一厂商在挤出其它竞争者后又重新制定垄断高价时，被挤出的原竞争者又会重新进入这一行业，使被挤出该行业后闲置的资源又重新得利用。即使被挤出的厂商不愿再重新加入该行业的竞争行列，但它原有的厂房设备仍然存在，一些觉得这一行业有利可图的厂商会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被挤出该行业的厂商的厂房设备，进入该行业与曾制定掠夺性价格的厂商竞争。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政府或立法机构不应对制定掠夺性价格的厂商制定行政或法律方面限制措施，因为掠夺性定价所造成的较低的产品价格将对消费者有利，同时低价还将促使生产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技术进步，把那些无法降低成本，无法扭转亏损局面的厂商赶出竞争行列。然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认为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掠夺性定价，把竞争者挤出某一行业从而造成该行业垄断的状况从而导致效率损失。关于掠夺性定价的优劣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 是一种旨在稳定农业价格的计划。《圣经》中就曾讲过七年丰产七年欠收的例子，它也是常平仓的历史源渊。这种计划最通俗的理解就是调剂丰欠七年的粮食储存，来稳定市场供给。丰收之年将生产粮食的剩余储存起来，而在欠收年份又将储藏的粮食投放市场，在市场粮食

价格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弥补市场供给的不足。实际上只要是市场上粮食供给出现相对剩余与相对不足的情况，不论这种情况是否发生在年份之间或是否由于粮食收成造成，就有必要进行调剂——通过调整供给来稳定市场价格。这就是常平仓概念的中心内容。常平仓实际起一种平衡市场供需调剂余缺的大仓库的作用。常平仓是国际间商品协议的基础。也是美国粮食支持计划的基础，从长期看，常平仓计划的成功实施要求有可调配的剩余，具体地，由政府购买粮食供给丰裕时的剩余供给，而在相对稀缺时出售储藏粮食。但是常平仓计划在实际实施中的情况并不象前面讲过的那样简单。比如在美国，由于农场主在国会里的影响变化用粮食降价而受益的消费者的影响要强，这就促使政府不断增加粮食购买和储存量以保护农场主的利益，其结果使常平仓成为常增仓（ever growing granany）。

常设机构（Permanent Establishment） 指跨国法人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场所，它首先是一个从事营业活动的场所，所以要求有一定的设施，如场地及有关设备等，其次这个场所必须是相对固定的或永久性的，亦即是常设的而不是临时性的；第三，在该固定的营业场所还必须从事部分或全部营业活动，而不是仅从事非营业性的准备活动和辅助活动。

根据这一概念，两个国际税收协定范本中都开列了常设机构的常见具体形式，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和车间；矿场；油井或汽井，采石场或任何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建筑工地，建筑装配安装工程或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等等。

但上述列举并不是穷尽，而且现实中还会遇到一些不尽明确的情况需要特殊处理，比如①对建筑工地及安装工程等成为常设机构施以时间的限制，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的范本规定 12 个月以上，联合国的范本规定 6 个月以上，不足规定月份不算常设机构；②准备性或辅助性场所不应列为常设机构，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的范本列出：专为储存、陈列或交付本企业货物或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场所，专为储存、陈列或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商品的库存；专为通过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商品的库存；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或者收集情报的目的而设立的固定营业场所；专为本企业进行任何其他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的活动的目的而设立的固定场所等等。③对于在非居住国（国籍国）设有的具有独立地位的代理人一般不视为常设机构，但如果其全部活动均代表另一方企业则应视同失去独立地位，对于这类代理人应视同非独立代理人，考虑其签约权和其职责活动等情况制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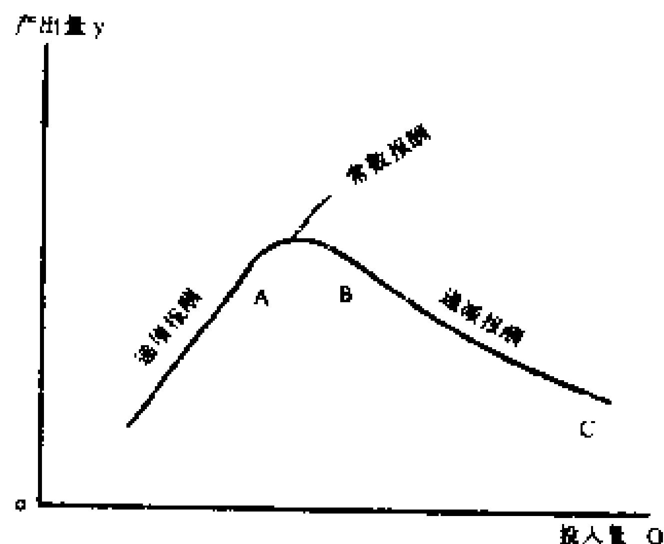
常设机构的认定对于收入国和居住国之间进行税收收益的分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通行的课税原则要求，除非跨国法人在该国有常设机构存在，否则该国不能对其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标准的宽窄会直接影响到收入来源地的确定，进而影响到税收权益，因此，发达国家倾向于窄定常设机构，而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宽定常设机构以维护各自利益。这两种不同倾向突出地表现于上述两种范本对常设机构的定义之中。

常设机构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它是衡量应否实施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标准，而且它也可以用来进行多种避税活动，主要是通过常设机构的避免和课税客体向某些常设机构流动等方式实现。

常数报酬（Consatnt Return） 常数报酬又称作规模报酬不变，要了解常数报酬首先应知道什么是规模报酬的概念，规模报酬是指在使用同样技术的情况下，所有各种生产投入物的增长与产出的变化之间的相等的比例关系。规模报酬描述了产出对所有投入的一定比例增加的反应。当产出以同样的比例随投入的增加而增加时，则在所考虑的投入范围内，我们认为规模报酬是不变的，因此称之为常数报酬。

与常数报酬相联系的另外两个概念是递增报酬或称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和递减报酬或称规模报酬递减（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前者是指产出以一种比投入更大的比例增加，后者则是指产出以一种比投入更小的比例递加，一些经济学家假定，当投入量较小时，生产函数展示出递增的报酬，然后经过一个报酬不变的阶段，最后当投入数量越来越大时，显示出递减的报酬，如图一所示，在开始时 OA 线上，报酬递增，在 AB 段则报酬不变即为常数报酬，而 BC 段则报酬递减。



（图一）

1.性质：

规模报酬很容易用齐次函数来定义。设：

$f(tx_1,tx_2)=t^k f(x_1,x_2)$　　(公式一)

其中，k是一个常数，t是任何实数,则这个生产函数是k次齐次的。当两种要素投人随因子t增加时，产出随因子t_k增加。在公式一中，当k=1时，则称之为常数报酬，此时公式变为:

$f(tx_1,tx_2)=tf(x_1,x_2)$　　(公式二)

当k>1时，规模报酬递增；当0<k<1时，规模报酬递减。

在公式二中，常假设t=1。我们知道，一个k次项齐次函数的偏导数，是k-1次齐次函数。在常数报酬条件下，生产函数是一个一次齐次函数，因此，两种投人要素x_1和x_2的边际产量是零次齐次的，即两种投人要素成比例变动时，边际产量保持不变。对公式二求偏导数:

$f_1(tx_1,tx_2)=f_1(x_1,x_2)$

$f_2(tx_1,tx_2)=f_2(x_1,x_2)$　　(公式三)

其中f_1,f_2分别表示对第一种投人x_1和第二种投人x_2的偏导数。令$t=1/x_2$，则公式(三)变为:

$f_1(x_1,x_2)=f_1(\frac{x_2}{x_2},1)$

$f_2(x_1,x_2)=f_2(\frac{x_2}{x_2},1)$　　(公式四)

边际产品只取决于两种投人x_1和x_2的比例。

科布—道格拉斯函数(Cobb—Douglas function)是最常用的常数报酬函数。

$q=Ax_1^a x_2^{1-a}$　其中　$0<a<1$　　(公式五)

如果两种投人均提高七倍，则

$f(tx_1,tx_2)=A(tx_1)^a(tx_2)^{1-a}$

$=tAx_1^a x_2^{1-a}=tf(x_1,x_2)$

两种投人的边际产量也是零次齐次的。

规模报酬的另一性质是扩张线，亦即技术替代率等于固定投人价格比率的点的轨迹，是一条直线。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有约束条件的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frac{r_1}{r_2}=\frac{f_1}{f^{\sqrt{2}}}=\frac{aAX_1^{a-1}x_2^{1-a}}{(1-a)Ax_1^a x_2^{-a}}=\frac{ax_2}{(1-a)x_1}$$

其中r_1，r_2是两种要素投人的价格，因此，扩张线由隐函数。

$(1-a)r_1x_1-ar_2r_2=0$

所决定，它是一条在等产量线平面上从原点发出的一条直线。

2.欧拉定理(Enler's law)

根据公式一，欧拉推导出了下列公式:

$x_1f_1+x_2f_2=kf(x_1,x_2)$　　(公式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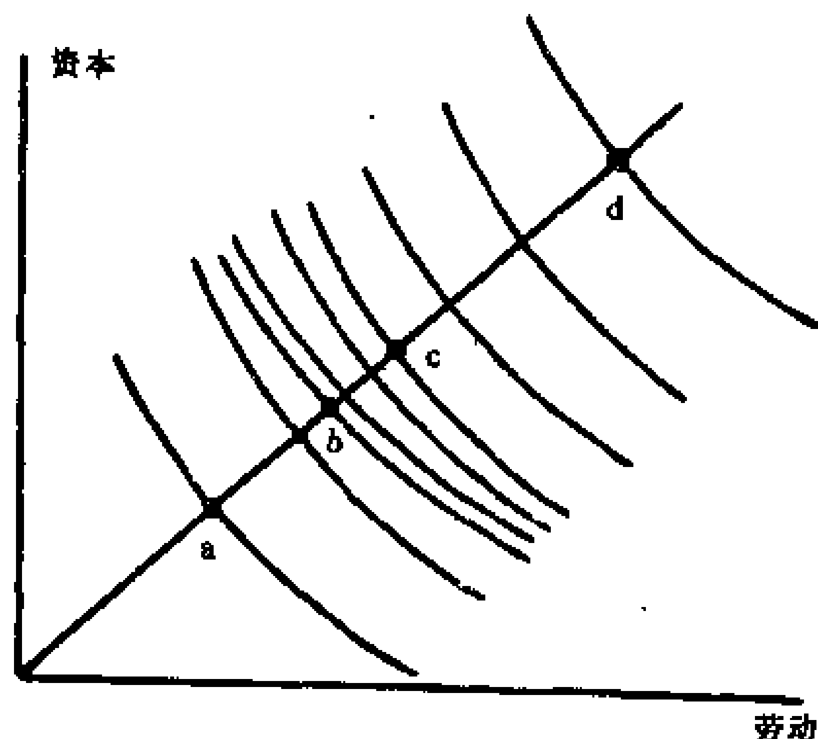
在常数报酬下，k=1，则公式六变为

$x_1f_1+x_2f_2=f(x_1,x_2)$

生产函数可以用$q=f(x_1,x_2)$来表示，所以

$x_1f_1+x_2f_2=q$　　(公式七)

在公式七中，总产出q等于x_1的边际产量乘以它的数量与x_2的边际产量乘以它的数量这两个乘积的和。如果厂商付给每种投人供给者以它的边际实物产量，则总产出应正好耗竭。如果是在递增报酬条件下，则总支出大于总产出，而在递减报酬条件下，则总支出小于总产出。



(图二)

3.长期成本函数

对于有凸性无差异曲线的齐次生产函数，可以建立包括所有投人变量的长期成本函数，设(x_2^0,x_2^0)为生产一单位Q的最优投入组合，对应的生产成本是$a=r_1x_1^0+r_2x_2^0$。由于齐次生产函数的扩张线是线性的，所以，全部投入组合可以写成(tx_1^0,tx_2^0)。因此，生产函数和成本方程可以写成:

$q=f(tx_1^0,tx_2^0)=t^r$　　①

$c=(r_1x_1^0+r_2x_2^0)t=at$　　②

根据①求t的解代人②式，则总成本函数为:

$$c=aq^{1/t}$$

且有$\frac{dc}{dq}=\frac{a}{k}q^{(1-k)/k}$　$\frac{d^2c}{dq^2}=\frac{a(1-k)}{k^2}$ g(1-2k)/k

在常数报酬条件下，k=1，这说明它有不变的总成本、边际成本和线性长期总成本函数，即

$$c=aq$$

$$\frac{dc}{cq}=a\qquad\frac{d^2c}{dq^2}=0$$

规模报酬亦可用图来表示，图二显示了几条等产量曲线，并且说明了所有三种规模报酬类型。每条等

产量曲线代表了一个相等的生产增量。ab 部分表示递增报酬；bc 部分表示常数报酬；cd 部分表示递减报酬。

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 Produition Function） “常数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生产函数。简称 CES 生产函数。在厂商理论中，要素 x_1 和 x_2 的替代弹性定义为 $\sigma=-\frac{d\log(x_2/x_1)}{d\log(f_1/f_2)}$，其中 f_1、f_2 分别表示 x_1 与 x_2 的边际产出。从广义上说，凡是要素替代弹性为一常数的生产函数都称为 CES 生产函数。CES 生产函数的最简单形式为 $Y=T[\alpha x_1^{-p}+(1-\alpha)x_2^{-p}]^{-1}/p$，其中 Y 表示产量，参数 T、$\alpha$ 和 ρ 分别满足条件 $T>0$，$0<\alpha<1$ 和 $\rho>-1$。这是一个一次齐次函数，代表规模报酬不变。要素 x_1 与 x_2 的替代弹性为 $\frac{1}{1+\rho}$，仅仅取决于 ρ，因此，参数 ρ 常被称为“替代参数”；参数 α 表示两个要素在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它影响两要素收入的分配，因而常被称作“分配参数”；参数 T 则被称为“效率参数”或“技术进步参数”。这个函数看起来很复杂，也难以处理，但它“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表达式却十分简单，这是它能得以广泛应用的一个原因。另外，当 ρ 趋近于零时，此函数转化为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Y=Tx_1^{\alpha}x_2^{1-\alpha}$。除了上述的最简单形式的 CES 生产函数外，任何这个函数的单调复合函数也满足常数替代弹性的条件，这一类函数统称为“位次 CES 生产函数”（Homothetic CES Production Function），可表示为 $Y=F(f),F'>0$，其中 $f=T[\alpha x_1^{-\rho}-(1-\alpha)x_2^{-\rho}]^{-1/\rho}/\rho$。最一般的 CES 生产函数则由满足“替代弹性固定”条件的微分方程解出，萨托（Sato）证明，一般的 CES 生产函数可表示为隐函数形式 $C_1(Y)x_1^{-\rho}+c_2(Y)x_2^{-\rho}=1$，$\rho=\frac{1-\sigma}{\sigma}$，$\sigma\neq1$。而位次 CES 生产函数则是此式的特例。CES 生产函数在现代经济学中应用十分广泛。在厂商理论中，人们既把 CES 生产函数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工具，也把它用于经验研究之中。事实上，由于消费者行为理论与厂商理论具有相似性，因此，在效用函数中，CES 类型的函数也有重要的应用。

累退税（Degressive Tax） 又称“递减税”或“累退税”。与“累进税”对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累退税，指随着高税额增加税率逐渐累退降低，同累进税恰好相反。广义的累退税泛指负担水平随课税对象数额增加而呈递减趋势的税收。如西方一些国家对某些商品征收的消费税，以及按比例税率征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由于这些税种不考虑纳税人的收入状况和负担能力，对数量不等的同一类课税对象都按同一比例征收，结果是收入越高者，负担越相对地轻；收入愈低者，负担愈相对地重，税收负担和负担能力呈反方向变化。

累进与累退税（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Tax） 累进税与累退税是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税。累进与累退税的划分是根据税收的负担是落在富者头上还是落在穷者头上的相对比重来谈的。累进税的税收负担落在穷人头上的比重相对要大。具有累进性的税有所得税、支出税、遗产税、净值税等。这类税对于富者征收的比率高于对穷者征收的比率，例如就所得税而言，对于 5000 美元征百分之五的税，对 10000 美元征收百分之十的税。收入越高，征收的比率越大。对于实行累进所得税的国家而言，所得税一般是最大的累进所得税，例如，美国的联邦所得税是最大的累进所得税。

累退税的确切含义是课税基数增大时税率降低的一种税。按照这一定义，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这种税。但是人们一般谈论的累退税并不是将税收结构与实际课税基础比较，而是和纳税人的净收入进行比较，因此累退率往往是指对低收入者纳税的比例大于对于高收入者纳税的比例。常见的累退税例子是营业税、消费税，统一率的工薪税等。累退税的结果是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差距，使得穷者的负担更重。而累进税具有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差距的作用。但是较高的累进税制尤其较高的累进所得税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

累进抵免（Progessive Credit） 指在居住国实行累进税制下抵免限额的一种计算方法。关于累进抵免限额的计算又有两种不同主张，一种主张实行合并累进抵免；另一种主张实行不合并累进抵免。

合并累进抵免要求把居民（公民）国内外的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合并计入应税基础，按累进税率征课税收，同时，就国外部分所占的比例予以抵免，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text{跨国纳税人居民的抵免限额}=\text{其国内外应税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之和}\times\text{居住国累进税税率}\times\frac{\text{其国外应税所得与一般财产价值}}{\text{其国内外应税所得与一般财产价值}}$$

不合并累进抵免不主张合并考虑纳税人国内外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而只要求对纳税人国外的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按国内累进税率实行课税，具体计算公式为：

跨国纳税人居民的抵免限额＝其国外应税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居住国累进税率

按合并与不合并方法计算出的抵免限额在数额上是不同的，前者总是要高于后者，这是因为，在累进税率下，由于合并国内外所得提高了纳税人的收入级别从而使得适用的税率累进提高，造成抵免限额的扩大。这不利于居住国有效行使其居民税收管辖权，因而一般认为不合并累进抵免更符合居住国的财权利益。另外由于合并累进抵免具有国外所得越高，抵免限额也越高的特点，事实上已失去了累进税的性质，这也是不被居住国采纳的原因之一。

累积优先股票（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 即如果公司盈利不足以发放股利，则可以累积于次年或以后某一年有盈利时，在普通股的红利发放前，连同该年优先股的股息一并发放。

累积过程（Cumulative Processes） 指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于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在这本书中，维克塞尔基于信用制度的新变化，重建了货币数量论。他首先明确区分了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这两个概念，并指出，这两种利率都可能发生变化，自然利率的变化原因可能是生产率以及人口数量的变化等等，它的变化比较缓慢，具有递进性。而货币利率的变化则可能取决于价格与经济形势的波动等等，它的变化不一定连续，有时会出现大的跳跃式波动。不过，货币利率是从属于自然利率的，它的水平最终还要取决于自然利率的水平。

在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经常不一致的前提假设下，维克塞尔提出了"累积过程"。他认为，当自然利率大于货币利率时，预期的投资收益较高，企业会竞相扩大生产，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导致各阶层人们的收入增加，这使得消费也与生产一道增加，商品价格上升，经济处于扩张状态。与此同时，由较低的货币利率导致的储蓄减少，将使得资本供给紧缺，货币利率随之上升，直到与自然利率相等。当自然利率小于货币利率时，企业生产可能会蒙受损失，这使得生产规模减小，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随之减少，由此导致收入以及消费降低，商品价格下降；经济处于紧缩状态。与此同时，较高的货币利率吸引了较多的储蓄，导致资本供过于求，货币利率因之逐渐下降，直到与自然利率相等。在这一过程中，假定了自然利率不变的情形，也可以设货币利率由银行固定，自然利率变动所产生的影响，不过结论都是一样的。

维克塞尔从利率的变动出发，考察了它对投资与储蓄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扩张与收缩所起的作用，累积过程首先是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分析，其着眼点不在于产量与就业的变化，其中呈现出经济波动的规律，即当自然利率高于货币利率时，经济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直到二率相等为止；当自然利率低于货币利率时，经济处于收缩状态，直到二率相等才开始回转。维克塞尔认为，有时货币利率的变动比较迟缓，使得市场价格持续上升，这就要求货币当局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对货币利率施加影响，以减缓周期波动，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

累积过程理论对后来学者的影响很大。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就通过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背离引出投资与储蓄的变化以及经济活动的变化，其中反映了非均衡过程的动态规律。非均衡学派将累积过程用于对非均衡的、没有重新约定的经济进行分析，他们强调收入制约的总需求函数以及非市场出清状态下的价格对于经济所产生的动态性影响。

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宏观动态分析中更重视价格与产量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动态函数中均衡的存在与稳定，产量与就业量对于均衡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受到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累积过程的影响。尽管如此，累积过程仍不失为一种富于启迪的经济分析理论。

假分配（Pseudo-Distribution） 假分配是指在收入中人均工资、每元利润、每亩地租等相对性指标，与真分配即总收入中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绝对额相对。这一词是由埃德文·卡南于1893年所创。卡南认为，在等式生产＝工资+利润+地租中，应该找到三者相对权数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只有当考虑到三者的绝对额，并且绝对额与过去不成比例变化时才显得有意义。卡南实际所探讨的是要素价格。卡南认为，将工资率、利润率、地租率的决定与供求规律结合在一起，并不能完全回答分配问题，因此这种方法无法解答收入份额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李嘉图的分配定义是指全部产品在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并特别强调了利润率的决定而不是强调利润份额的决定。十九世纪末，分配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各种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原因是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但后来，相对收入份额的问题逐渐消失，分配问题则更主要的是收益比率的问题。

假设其它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 原是一个拉丁文术语，意为"如果其它所有条件保持不变"。经济学家在其理论表述中之所以经常使用这一术语，其基本原因是，经济现象总是受到无数的因素影响，完整地模拟经济现象本身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一术语的意图和内容往往是不同

的。概括起来说，这一术语在理论表述中大致有三种用法：①提醒人们该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某种稳定而连续的背景条件之上的。在经济计量模型中，它保证模型的结构不变。②在运用该理论进行预测时，提醒人们这一预测只在某些特定的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有效。在经济计量模型中表现为某些外生变量被假定为不变。③在某一理论体系中，当考虑一些变量的变动时，假定其它可能相关的变化的变量保持不变。在经济计量模型中表现为，在考察某些内生变量变动时，要求其它内生变量保持不变，尽管模型本身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性质。前两种用法是容易理解的，它表明理论模型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比如可以通过引入新的变量使模型更加精细，或在预测过程中考虑尽可能多的外生变量的影响。虽然人们也需要模型不能过于复杂以便于应用，从而要求在模型的准确性和复杂性方面加以权衡取舍，但这并没有破坏理论模型本身的逻辑一致性。然而对于第三种用法，情况则大有不同，因为在某一理论体系中，相关的一些内生变量的一部分发生改变而另一部分保持不变是与该理论本身相矛盾的。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仍可能采用“假定其它条件不变”这一术语，其原因是：1.在某些情况下，采用这一术语能够进行近似的分析。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所有市场上的价格都是内生变量，而且互相关联，但在分析某类问题时，假定某些市场中的价格不变（或将其视为外生变量）而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能够提供足够好的近似结果。2.由于人的分析能力是有限的，在一定时刻只能分析逻辑链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一系列假定某些条件不变的步骤就成为分析一般理论的必要过渡。这样，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可以从简单的局部均衡开始，逐渐放松条件限制，直至达到一般均衡。3.使用“假定其它条件不变”的方法，对于理解一般性理论还具有重要的启发思考的作用。在一般均衡理论中，运用这种概念实验”的方法，可以建立瓦尔拉斯市场中的超额需求函数，虽然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所有市场的剩余需求必然为零。“假定其它条件不变”这一术语的上述三种功能可以概括为近似作用、过渡作用和启发作用。

假远期信用证（Usance Credit Payable at Sight） 假远期信用证是指对于即期付款的买卖合同，开证银行应进口商的请求授权受益人开立远期汇票的信用证。在假远期信用证下，远期汇票经过付款人的承兑，就能在进口国贴现市场贴现，因而，受益人虽开立的是远期汇票，却能够即期收款。而且假远期信用证往往是进口商出于自身考虑而要求采用的结算方式，这样，进口商还需负担远期汇票的承兑手续费以及汇票的贴现息。

假远期信用证对开证人来说，相当于远期信用证，进口商可在汇票到期时方予付款；对于受益人而言，又相当于即期信用证，受益人能够即期收汇。所以说，假远期信用证其形式上是远期信用证，而实质上是即期信用证。

在假远期信用证方式下，受益人在远期汇票未到期前已经收取现汇，但是受益人对已贴现的汇票仍负有法律责任，在汇票到期时开证银行如果拒付，持票人仍有权向受益人行使追索权。

偏好（Preference） 偏好是微观经济学价值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它是一个人对于客观事物按照其偏爱的程度进行的评价。例如某个人认为A优于B。偏好是主观的，也是相对的概念。说它是主观的，因为它是个人对于事物的评价，只表示某个人认为一物优于另一物。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一个人的主观偏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偏好关系具有两个重要的性质，即非对称与传递性。所谓非对称性是指，若某人认为物品A优于物品B，他不能同时又认为B优于A。所谓传递性是指若某人认为物品A优于物品B，而物品B优于物品C，那么物品A优于物品C。个人对于物品的这种偏好关系不同于物品的无差别关系。无差异关系所描述的是个人所认为的物品间的等同关系，即某种物品X与另一物品Y对于某个人来说是无差别的，对于具有无差异关系的物品来说，它们不具备有偏好关系物品那种不对称性特征。事物对于个人所产生的偏好关系具有许多实体。这种偏好关系可能是商品、达到目标的手段或一种事态。例如，一个人认为彩电优于黑白电视机。这是人对商品所产生的偏好关系。一个人认为乘飞机到达某地优于乘车去该地。这是该人对于达到目标的手段所产生的偏好关系。一个人认为反抗或战斗优于继续受压迫与做奴隶，这是个人对事态产生的偏好。严格地讲，偏好关系只适用于个人，而不适用于团体，一个团体内很难形成一致的偏好，阿曼的不可能性定理证明了这一点。

铸币税（Seigniorage） 政府对铸造金银币抽取的利润。铸币费这一词的原意是“领主”所占有股份额、他们用这个份额来弥补铸造费用并取得利润。因此，对于中世纪的贵族来说，铸造货币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在历史上，有自由铸币制。它是指个人有权利无限制地把金银块送到铸币厂去铸币。但自由铸币制中的自由不是说对铸币不收费用，而是说每个人有把金银块送交造币厂请求代铸货币的自由。对实际铸造征收的费用叫铸币费，而政府有时对铸币征

收包括铸币利润在内的额外费用则叫铸币税。政府对个人铸币不收任何费用的制度，称为免费铸币制。美国从 1792—1873 年实行白银的自由铸币制，并从 1792—1933 年实行黄金的自由铸币制。

欲望（Want）　从广义来说，欲望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通过消费满足人类的各种欲望，才能使人类维持生命，继续发展，因此，研究经济也必须分析人类欲望，但是，经济学所研究的欲望，并不加入伦理价值判断，与愿望或希望的含义也不相同，而是指通过付出劳力或费用能够实现的欲望，单独观察某一欲望，因人因时而异，种类程度上也有不同。但是，总体来看，欲望也有一些共同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

（1）欲望的种类具有无限性。某种欲望得到了满足，又会产生各种新的欲望。

（2）欲望的强度具有有限性，某种欲望在满足过程中，强度逐渐下降，直至欲望完全实现，欲望强度消失。

（3）欲望的满足具有替代性。例如，感到饥饿，产生对食物的欲望，既可以用米也可以用面来满足。一般来说，对于生活必需品，替代品的范围较小，而对于奢侈品，替代品的范围则较大。（4）欲望的满足具有不可逆性。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突然降低生活水平，许多欲望因而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痛苦。

（5）欲望的满足具有连带性。满足旅行欲望的同时，也满足了对旅行用品的欲望。

对于欲望理论，颇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计算欲望，如何不带政治偏见地比较不同人的欲望，阿罗定理证明了不同人的偏好进行的排列不能简单地进行加总，除非这些人的偏好恰好相同。因此，在公共政策中应用欲望理论，一涉及公共福利，欲望理论就有些一筹莫展。

弹性（elasticity）　弹性通常是指因变量的相对变动对于自变量相对变动之间的比率。假定 X 为自变量，△X 为自变量增量，Y 为因变量，△Y 为因变量增量，E 为弹性，则

$$E=\frac{\frac{\triangle Y}{Y}}{\frac{\triangle x}{x}}=\frac{\triangle y}{\triangle x}\cdot\frac{x}{y}$$

弹性是分析需求、供给、产出等问题的重要工具。由于弹性是因变量相对变动与自变量相对变动之间的比率，因此弹性是无量纲的，不象成本、价格产出那样带有量纲，因此弹性概念的运用为不同量纲的变量之间变化的比较提供了方便。经济学中，弹性是结合具体的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的，例如需求中的需求弹性、供给中的供给弹性、生产中的产出弹性等。对各种具体问题中弹性的掌握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弹性的概念。

隐蔽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　非公开失业中的一种主要的形式。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就业，即有些人虽参加生产，但对产业并不起任何作用，若从总就业中撤出这部分劳动者，也不会使总产量减少。隐蔽失业这一术语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首先提出的。当时她把发达国家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大批熟练工人不得不从事非熟练工作，其生产率远低于潜在的生产率，因而存在隐蔽的劳动潜力这一现象称为隐蔽失业。尔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在《东南欧工业化问题》一书中把这一术语引入到发展经济学之中。从此，这一概念又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含义。对于隐蔽失业的定义表述和内容范围，在发展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看法。纳克斯认为，隐蔽失业是指在既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资源条件下，在人口稠密的欠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为零。因此，可以把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产量。A·K 森则认为，隐蔽失业通常采取每人工作较短时间的形成，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为零，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边际上也许恰好等于零。假定某一农场每个工作日需要 35 个小时，第 35 个小时的边际产品下降为零。有 7 个人在农场劳动，每天只须劳动 5 小时。在既定的技术和生产过程下，若其中两个劳动力撤出，剩下的 5 个每天劳动 7 个小时就能保证原有的产量水平，这样就是有两个隐蔽失业的劳动力。还有人认为，隐蔽失业是季节性失业，因为在农忙季节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把隐蔽失业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特有的现象。但刘易斯则提出，隐蔽失业绝不仅限于农村，它在城市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一方面是指自营职业的过度发展，另一方面是指国内服务行业中工资劳动者的严重过剩。后一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就业是第一位的目标，否则将有很多人会失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是由于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人口的迅速增长不相适应造成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着的劳动力供给过量和资本稀缺的情况，使得隐蔽失业带有持久性的特征。

隐成本（Implicit cost）　隐成本是厂商自己拥有而又为厂商在生产过程中自己使用的投入物的价

值。这些厂商自己所拥有的投入物的价值应该通过这些投入物在可供选择的最佳用途中所能取得收入来估算。例如小业主应该把自己的薪水计入隐成本，否则他为别的厂商干活所需的工资支出会计入雇佣他工作的厂商的成本。小业主生产中所使用的自有有资金的本金与利息也应计算进隐成本。因为，若小业主没有自有资金可供使用他要开业需向银行贷款，所贷款项目及利息也都计入他的生产成本之中。

隐蔽的通货膨胀（Hidden Inflation） 物价水平的上涨并没有完全在官方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中表现出来的通货膨胀。在这种通货膨胀中，经济生活中的物价水平实际上已经上涨了，但在官方的物价指数中并没有得到准确或充分的反映，即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低于实际物价的上涨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也可能是由于价格指数编制方法的失误，还可能是由于价格资料的不完整、不准确。一般经济学家认为，在计划经济中往往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隐蔽行为、道德公害与契约理论（Hidden AcLions Morcd Haiard Cmd Contract Theory） 道德公害的字面上的意义是指逆效应（ddverse effect）厂。经济学中对道德公害一词的广泛运用起于阿罗（k · Arrow）的《风险承担理论论文集》阿罗之后，现代经济学中所用的道德公害一词是指对偶然事件的不可观测性，在其中，为达到最佳效率的交易，需有必要的信息。考虑契约的一般形式。常常是与契约相关的信息可以通过对行为和结果的观察获得。结果本身依赖于自然状态（指随机事件，它的出现反映外在的自然选择）。假定后果总是可以观察的，道德公害就仅限于指一个人或契约几方的更多人的行为对所有契约各方是不可观测的。这样道德公害就与契约关系中的隐蔽行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对这种定义需要作三点说明：（1）"道德公害"一词本身有伦理的含义、经济学讨论中它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假定契约各方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用隐蔽行为一词看来是可取的。（2）在近来有关契约的文章中对行为的可观测性和可检验性作了区分。行为对契约各方是可观测的，但对契约以外的人来说又是不可观测的，因而就难以被检验。这样行为可以叫不可检验的行为。（3）组织一种契约关系的困难不仅出自契约各方可以隐蔽的行为，也可以出自他们行为以前在取得信息上所受的限制，这样的困难不仅导致了隐蔽行为，还导致了隐蔽知识（hidden knowledge）。隐蔽知识会产生机会主义。隐蔽知识与隐蔽行为的区分看来要比道德公害与逆选择（adverse select）（即不同人选择不同风险的契约）的区分更有助于人们理解问题。

我们考察一种抽象的隐蔽行为模型，它是双边关系的基础隐蔽行为模型。在此模型中，有一个行为者，一个主体人（principal）行为者在不同行为者之间选择一样，这种行为与随机事件或自然状态一起决定可测度的结果，此结果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主体人的货币支付。主体人不仅对上述结果感兴趣，也对应向行为者的支付感兴趣。行为者有一个依赖于其所进行的行为和主体人转移支付的货币的效用函数。每个效用函数都是分开的。风险中性的契约双方收入获得的，收入上的效用残性关系。假定行为者的行为是不可观测但是可检验的，行为者与主体之间的契约包括一个反映货币支付与可能结果相联系的报偿表（reward scheclme）。对主体者来说最优契约是在对行为者与个人理性的限制下，报偿表最大化的计划。契约论者还研究了更为复杂的隐蔽行为之下最优非残性次优契约的产生。最优非线性性次优契约可以作如下表述。对于一个给定的报偿表，行为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不是拟凹的。这样，当报偿表参数被更改时，行为者最优反应就可能上升（jump），尽管这种上升仅仅出现在参数的预期值上，但仍然是最优契约系统地选择这样的预期值。隐敝行为模型中契约的决定的细节远比这里描述的要复杂，近年来，对隐敝行为模型又作了各种拓展与发展。总之隐敝行为与道德公害不仅是影响形成契约的重要因素，而且它本身也是契约理论的重要的研究领域。相比之下，隐敝行为契约模型是更接近于现实的模型，因为对契约各方而言，他们的行为可完全观测的假定显然是一种抽象和简单化。考虑到他们行为不可观测性是对现实的靠近。

随机走动假说（Randqm Walk Hypothesis） 随机走动是以下述问题为基础的一种随机过程：如何确定随机运动的点的可能位置，其沿着某个方向移动的某个距离的概念是可以确定的。醉汉走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一个点从欧几里得平面的原点开始，在每个单位时刻中移动单位距离以及运动的方向在每一步都是随机的。这个问题是要找出在某个固定时间之后这一个点离开原点的距离的概率分布。在时间序列模型中，根据随机走动的假设，模型中一个变量的现值等于其最近值加上一个随机因素。这个变量的现行值与其最近值和随机误差相联系的过程也叫马尔可夫过程（Marko Process）简单的例子是一阶马尔可夫过程，它可定义为

$$X_t = aX_{t-1} + e_t$$

这里，x_t 为有关变量，e_t 是误差项。随机走动假设或一阶马尔可无过程在数量经济模型中很常见。

屠能，约翰·海因里希·冯（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n，1783—1850） 德国经济学家。生于奥尔登堡的卡纳林豪森田庄。14岁入中学，特别爱好数学。1799年开始在田庄学农，曾受一些农业专家的热情指导。1803年入哥丁根大学，后肄业。1810年移居梅克伦堡经营田庄，并从事农业经济研究，逐渐获得巨大声誉。1830年获罗斯托克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848年当选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其代表作是《孤立国》（第一卷1826年，第二卷（上）1850年，第二卷（下）1863年，第三卷1865年）。在经济学史上，屠能同戈森一起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最早运用了边际分析方法，而且他首先将边际原理广泛应用于包括地租、利润和工资理论在内的全部分配理论，成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主要先驱者。他的经济理论是从假设存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即孤立国引伸发挥的，因此，他详尽考察了孤立国的生产布局。在这样做时，屠能确立成本（包括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为基本原则，并制定了生产布局应遵循的若干条具体规则，如生产布局须临近消费地点和原料产地、各城市应有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供应基地等。这些杰出的理论分析，又使屠能成为现代西方生产区位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的直接先驱者。接着在阐述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时，他发挥了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的核心思想。他主要研究了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特别集中在土地位置即离城市远近这一因素的作用上，认为最边远（即边际）的位置最差的土地所生产以及运输谷物的费用决定着农产品的价格，该类土地得不到纯收益即地租。他强调地租不是劳动和投资的产物，而是土地的位置和性质的偶然优势带来的，因而提出剥夺地租的进步主张。他看到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后投入资本带来的效益比前投入的要小，换言之，资本的生产力会随之递减。他进一步指出，全部资本所得的利息都是由最后投入的那部分资本的效益决定的。这就是后来的资本边际生产力论。同样，他认为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主张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数量界限是最后一名雇佣工人的增产量等于其工资，而全部工人的工资则以该工人的增产量为标准。屠能在方法论上亦不同于德国其时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学派，十分推崇抽象法对经济理论分析的重大作用，并且将它同包括微积分在内的数学方法密切相结合，故他又被视为数理经济学的前驱。同戈森一样，屠能的学说在其生前并不受人青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得到马歇尔、熊彼特等大经济学家的高度赞誉。马克思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认为他作为一个独立的客观的研究者在其时德国经济学者当中十分少见。

屠能的农业区位论（Thünen's Theory of Location of Agriculture） 屠能（Jonana Heinrish Von Thunen）是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经济活动空间模式的创始人。他于1810年在门克伦堡东南的泰罗购置了146公顷土地，亲自经营多年，并在积累管理经验基础上，对农业区位论进行深入研究。他的名著《孤立国》（孤立国对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于1826年完成，成为第一个区位理论的古典名著。屠能在这本著作里，通过对合理主义农业论的批判，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农业区位理论体系。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理论研究的基本假定。屠能为了导出基本模式，首先把非主导地域现象舍弃，构成均一的世界条件。其基本假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假设在一个大平原中央有一个城市，它与其周围农业带组成一个孤立的地区。该区位于中纬，具有同样适于作物生成的气候和土壤。(2)孤立国中，既无河川，亦无运河，马车是产品唯一的运输手段。(3)农村除了同中心城市外，与其它任何市场无联系。即中心城市是唯一农产品贩卖中心，也是工矿品唯一供应者。(4)农业的经营目标是获得区位地租即纯收益。因此他们是根据市场来调节生产的。(5)市场上的产品、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均假定固定不变。(6)运费的费用同运输的重量成正比，运输费用由农业生产者负担。2.分析指标体系的内容及定义。屠能根据上述假定逐步建立了农业区位的向心圈理论模型。为了推导和贸易分析的方便，他选用了一组供计算用的经济指标，其经济上的内容主要有二点：(1)市场上农产品销售价格决定于经营的产品种类和经营的方式，以及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2)农产品的销售成本为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之和。如果以π代表利润即纯收入，P代表产品的销售价格，d为生产成本，T为运输费用，则有：

$$\pi = P - (C+T)$$

屠能对此公式用自己亲自实验观测到的数据，以木材和粮食为例进行了解释和分析。3.区位地租理论。屠能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地租主要取决于空间（自然区）和配置（对城市接近程度）这二个因素。由于屠能已经假定了孤立国自然条件是单一的，因此其地租理论主要是指距离城市远近的地租差异，即所谓的区位或经济地租。具体来说，其地租理论有3个方面的内容：(1)同一集约的程度单一产品的区位地租。在这种条件下，屠能假定单一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不依距城市距离远近而异。于是，产品的纯收入，即总收入除去生产和运输耗费就完全取决于距离城市的远近。屠能把这一纯收入定义为区位地租。如果以k代表单位面积的区位地租，Q代表单位面积的产量，P代表单位产品的销售价格，d代表单位产

品的生产成本，t 代表单位产品每英里的运费（即运费率），k 代表距离市场的英里数，于是区位地租可由下式得出：

$$R=Q\ (P-C)\ -Qt=Q\ (P-C-t_k)$$

(2) 不同集约程度、单一产品的区位地租。在古典经济学中，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取决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屠能从这一前提出发，将运输费用引入，进一步讨论了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决定法则。由于利润不仅取决于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差额，还取决于运费的大小，于是增加资本和劳动力而需要的边际成本，必须恰好弥补增加的产量运至市场的运费，再增加产量就不经济，运输费愈低，边际追加量本身需偿付愈少。这样，生产地距市场愈近，农民就更愿追加投资和劳力，使其耕作集约化。在这里，屠能还探讨了不同农作制度的差别对农业分布影响。(3) 土地管理利用的经营品类选择。在多种农业生产品类之间，由于其各类所能偿付的区位地租的差异，以致其空间的分布呈一以市场为中心的向心圈。这种农业多品种的空间组织是屠能农业区位理论的精华。屠能认为，如果土地利用的可能在空间上是连续的，农业的部门或作物的合理分布区，是其能偿付区位地租的地段。因为距离市场较近的农地，其纯收益也需较大，较远的农地、其纯收益必定较小。4."屠能环"理论。根据区位地租理论，屠能分析了 6 种农作物制度，每种制度构成一个区域。这些农作区系围绕城市中心按顺序向外排列，呈向心环带状分布，被人称为"屠能环"。屠能的 6 个农作区依次为：(1) 第 1 区：自由农作区：本区距市场最近，主要生产易腐难运的产品。其范围的大小则依据城市的需求而定，在这里农民可以对土地实行更集约的经营，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所以自由农业区是进行牲畜饲养和园田种植的地带。(2) 第 2 区：即林业区。主要生产木材，以解决该时期城市居民所需之燃料问题。(3) 第 3、4 和 5 区，此 3 个区是作物轮作区。3 区为谷物轮作带，4 区为谷草轮作带，第 5 区是三圃轮作区。这 3 个区的区别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愈来愈低，即随距城市距离的增大而递减。(4) 第 6 区，即放牧区，与第 1 区的饲养区在集约化高低上有显著差别。在这里，粮食自给，生产牧草养畜，主要产品是活畜和黄油、奶酪，这些产品事实上是质高易运的。屠能的农业区位论不仅对后来区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还对农业科学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of Education） 评价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的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会。对于个人来说，可作为个人教育选择的指导；对于社会来说，可表示当前教育投资格局的生产率状况，为教育规划提供参考。作为分析对象的教育，仅指学校的正规教育。对个人或对社会的分析，在方法上是一致的。一个人通过教育提高了生产技能，从而增加的产出和收入，即为他的教育收益；而为此付出的支出及放弃的收入，为他的教育成本。测定某项教育投资是否值得进行，可比较收益流量和成本流量贴现后的现值。用有关利率对这两个流量进行贴现，若收益超过成本，就值得投资；若成本超过收益，该项投资就不值得进行。收益方面的计算公式为：

$$V_0=\frac{E_t}{(1+r)^t}$$

式中，v_0 为 t 年收入的贴现值；E_t 为 t 年内的教育收入；r 为利率，即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通过运用利率 r，教育的收入被贴现为现值。如果要计算某级教育 n 年的全部预期收入贴现值，只要把 n 年内的所有预期收入贴现值相加起来即可。其公式为：

$$V=\sum_{t=1}^{n}\left(\frac{E_t}{(1+r)^t}\right)$$

在成本方面，家庭负担的私人成本包括两个部分：①显性成本，也叫做直接成本，包括一个家庭对子女完成最终教育的全部实际货币支出。如学费、书本费、交通、衣食宿等用途的现金开支；②隐性成本，也叫做机会成本，指学生在上学期间放弃的收入，学生若不上学，可以工作来获得收入。一般说来，一个学生年令越大，受教育越多，放弃的收入就越大，隐性成本越高，但在农村年幼儿童已经开始为家庭干活的环境中，即使上小学也有机会成本。计算成本的公式为：

$$G=\sum_{t=1}^{n}\left(\frac{c_{et}+c_{it}}{(1+r)^t}\right)=\sum_{t=1}^{n}\frac{C_t}{(1+r)^t}$$

式中，C_{et} 为 t 年的显性成本；C_{it} 为 t 年的隐性成本；C_t 为 t 年内付出的全部成本，包括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G 为 n 年的全部成本的贴现值。比较教育投资决算是否最优化的一个常用方法，是计算内在收益率。可用下列方程求出：

$$\sum_{t=1}^{n}\frac{E^t}{(1+i)^t}=\sum_{t=1}^{n}\frac{C_t}{(1+i)^t}$$

$$\text{或}\sum_{t=1}^{n}\frac{E_t-C_t}{(1+i)^t}=0$$

这里，i 为内在收益率，它是指贴现成本之和与贴现收益之和相等时的贴现率。通过计算内在收益率，一个家庭可以把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其他投资收益率进行比较。如果教育投资内在收益率在所有各种投资中是最高的，这个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就是最优的，否则对教育的投资就不合算。教育的收益，在私人和社会

方面的内容都一样，但社会成本的内容要比私人成本的内容包括更多的项目，如包括私人成本之外的各种政府补贴及公共部门的支出。所以，私人收益率一般要高于社会收益率。西方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包括私人的和社会的收益率——都进行了大量的估算和经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的3个主要结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一般都很高，不仅高于发达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也高于实物资本投资收益率。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看来，教育投资是合算的；第二，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最高社会收益率是从初等教育中获得的，尤其是在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学要高得多；而中学教育投资收益率又比大学高。与此相反，在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顺序是大学、中学、小学。因此，发展中国家把重点放在初级教育普及上是最有利的教育战略。第三，由于政府承担了许多教育成本，私人教育投资收益率总是大于社会的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发展中国家，两者的差距更大。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大、中学教育实行免费或近似于免费就学，使得私人教育收益率大大高于社会教育收益率。因而公众对教育的需求强烈，表现为无限需求。

教育过度（Overeducation）　指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发展超过了国民经济对人力的需要的情况。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像其他产品和劳务一样，个人所受到的教育年限主要由供求决定。其中教育需求由收入和成本的比较状况决定；教育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政府的财力决定。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私人收益率大大高于社会收益率。由于国家对大、中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行免费或近似于免费就学，使得个人的教育支出并不随教育年限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但教育年限增加所带来的报酬却是成比例增长的。所以当一个学生完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年限时，他的予期收入将比他所支付的教育成本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样，对于个人来说，尽可能多地受教育是最优决策。由此产生了公众对教育的无限需求。教育的供给一般说来总是被动地适应教育需求的。面对无限的教育需求，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不得不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机会，使得教育发展异常迅速，实际培养的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的一般容量，最终导致知识失业。教育过度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配置不当，教育投资效益低下。这包括：一方面，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属于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教育过度发展耗费了国家的大量物质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用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可能会产生大得多的经济效益。

职业病（Occupational Disease）　道蒂和帕利士教授对受职业病危害的工种划分了九大类别：粉尘行业、有毒行业、产生细菌病的职业、产生皮肤感染的行业、需要在极低气温下工作的职业、需要在稀薄或高压大气中工作的职业、光线不适条件下的工作、需要连续使用身体某一部分的职业，需要人为屈尊的工作过程。由于以上工作条件造成的雇员疾病，就定义为职业病。它是工作社会中工人个人无法控制的一种经济无保障形式，有赖于大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加以关注和解决。

职业群（Job Cluster）　劳动市场上稳定的职业集团或工作分类。每一个职业群内联系十分紧密，而且具有共同决定工资的特点。职业群的形成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第一、工作场所的技术因素，即工作的技术相似性。第二、生产管理的组织因素，即由共同的生产行政组织所管理。第三、社会的习惯因素，即某种共同社会习俗的存在。职业群的最重要特点是共同决定工资。每一个职业群都有一项或数项"基准工资率"，该职业群中的每一项工作都与其中一项基准工资率相联系，并决定其工资率与基准工资率之间的差别。职业群的概念有助于解释工资水平的决定。

职位空额率（Job Vacancy Rate）　职位空额与就业额加空额之和的比率。职位空额指有待补充的以及为此企业正积极设法从外界寻找或招募工人来填补的空缺职位。企业一般通过以下方法填补职位空额：向公立的或私营的职业介绍所和学校安置办事处提出需用人员定单、向工会和各种专业团体发出通知书、刊登招工广告和人员补充计划，最后是通过对申请者进行口试来挑选人员。职位空额的资料由州就业保障机构通过有代表性的雇主样本，每月收集一次。这种资料在制定训练方案和确定供求失调情况方面，有助于使人力计划更有效地反映求职者和雇主双方的现时需要。美国由劳工部负责公布职位空额资料。

排队性失业（Queue Unemplogment）　由于工作岗位不足，工人排队等待就业时的失业，美国经济学家E·费尔普斯（E·phelps）所提出的失业类型。这种失业产生于两种情况：第一、工作岗位不足，或者说是劳动供给过剩；第二、工人相信，即使他们降低自己的工资要求，也不会改变排队等候就业的状况。在总需求减少时，那些不适于工作（或"欠合格的"）工人将被解雇，他们要等待经济形势好转时再被雇用。这种失业不同于寻找性失业或预防性失

业。寻找性失业是工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而引起的失业，如果他愿意接受任何条件从事工作，则不用排队等待。预防性失业是工人选择最优的闲暇与工作交替而产生的失业。这两种失业都属于自愿失业。而排队性失业不是工人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总需求不足造成的，排队时间的长短并不取决于本人，即失业时间是外生变量，不由工人控制。因此，排队性失业属于非自愿失业。

排外雇佣制企业（Closed Shop） 只有已经成为工会会员的人才可以被雇用的工厂或企业。1947年的集体谈判协议所包括的美国工人中，约有1/3受雇于这类企业，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规定从事州际贸易的企业实行排外性雇佣制为非法。因而到1959年，为集体谈判所包括的工人中受雇于这类企业的已不到4%。1969年，美国19个州的法律也规定排外性雇佣制企业为非法，但在其余31个州，营业范围限于州内的排外性雇佣制企业仍是合法的。据估计，在一些行业中，特别在运输、印刷与建筑业中，排外性雇佣制即使在合同中没有规定，实际上却是存在的。

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为分割大企业，使之不拥有过份集中的经济力量而制订的法规。根据占领军当局的指令制订，1947年12月由日本国会通过施行。是美国占领军当局解散财阀的措施之一。执行该法的机构是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四十年代后半期，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冷战"开始，并逐渐加剧，1948年4月起美国放宽分割要求，陆续削减分割企业的数目。指定须加以分割的大企业最初为325家，后来减为18家，实际被分割的仅三菱重工业公司等11家。1951年7月美国等国即将和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前夕，日本政府宣告解散财阀的措施结束，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解散，该法遂告终止。

黄色劳工协议（Sweetheart Agreement） 它是指不诚实的工会领袖同经理集团和个人密切勾结，订立的不合法定标准的劳工合同。比如工会官员受到经理官员收买，订立"善心"合同，其中的工资和其它雇用条件低于一般标准，工会并不是代表其会员的真正利益，而实际上是受到收买而出卖了会员。劳工协议的签订者既可以是全国性工会所属的腐败的地方工会，也可以是专门为签订这种协议而成立的工会。有些雇主已被指责帮助建立专门签订黄色劳工协议的工会，以阻止合法工会的成立。黄色劳工协议违反了劳联——产联的伦理实践法，从事这种勾当的工会，一经发现，就要予以开除。同时它也触犯了美国联邦劳工关系法律，对签订黄色劳工协议的工会将取消其集体谈判资格。

黄狗合同 劳资协议的一种。在该劳资协议中，企业把受雇人不参加工会当作雇用条件。1932年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宣布黄狗合同为非法。

黄金时代增长（Golden Age Growth） 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描述的一种理想的增长状态，指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充分就业时的自然增长率。这时一个经济按一种实现了充分就业的不变增长率均衡而持续地增长。这个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J·罗宾逊所提出。如果技术进步是中性的，生产的时间类型没有任何改变，人口以稳定的速度增长，企业对未来充满信心，按一固定速度增加投资，资本积累的速度足以为所有的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这时，经济持续地保持充分就业，每年的总产量和资本量按一固定速度增加，利率保持不变，实际工资随人均产量的增加而同比例地增加，这就是黄金时代增长。但这种情况正如传说中远古的黄金时代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换言之，在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中，这只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状态。因此，J·罗宾逊称之为"黄金时代"增长。

辅助失业津贴（Suplemental Unemployment Benefit） 美国被解雇的工人除州失业保险计划提供的津贴以外从私人失业保险计划中得到的款项。辅助失业津贴产生于1955年，是产联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福特汽车公司之间达成的谈判协议。这项协议使工人在失业期间的收入从纳税后基本工资的40%—45%（这种幅度大都由州失业保险计划规定）提高到60%——65%。此外，辅助失业计划还向不能够再领取州失业保险津贴的工人，支付60%——65%的基本实得工资。它使领取失业津贴的期限从26周延长到52周。实行辅助失业津贴只限于比较大的公司，如汽车行业"三巨头"、钢铁行业、橡胶行业的部分企业。津贴是由雇主捐给集团或个人信托基金的捐款支付，当基金不足时，或者只向高级雇员提供津贴，或为保住一部分人的津贴而大幅度削减另一部分人的津贴。辅助失业津贴计划的实施，使雇主不愿意雇用新的人员，而失业者也不象从前那样急于找到新的工作。

曼德尔模型（Mundell Model） 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型。曼德尔认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容许适度的通货膨胀。他于

1965年提出了这一模型。说明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机制。该模型是用一系列数学公式表述的。

曼德尔从基本的货币数量理论方程入手进行分析，以表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MV=PQ \tag{1}$$

式中，M为货币供应；v为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Q为总产出。

通过对时间（t）求微分，即得：

$$\frac{1}{v}\frac{dv}{dt}=p+g-m \tag{2}$$

式中，P为价格增长率（即$\frac{1}{p}\frac{dp}{dt}$）；g为产出量增长率（即$\frac{1}{Q}\frac{dQ}{dt}$）；m为货币供应增长率（即$\frac{1}{m}\frac{dM}{dt}$）。

假设：

$$Q=\beta K \tag{3}$$

式中，β为产出一资本比率或资本的生产率；K为资本总存量。因为产出（Q）直接取决于资本（K），这就隐含地假定劳动处于"剩余"之中。对时间（t）求微分，可得

$$\frac{dQ}{dt}=\beta\frac{dK}{dt} \tag{4}$$

假设全部公共投资由银行提供，而且公共投资的真实价值是

$$\frac{G}{P}=\frac{1}{P}\frac{dB}{dt}=\frac{dK}{dt} \tag{5}$$

式中，G为公共投资；B为银行储蓄。

B和M之间的联系有：

$$B=rM(6)$$

式中，r为分级储蓄率。对时间求微分，有：

$$\frac{dB}{dt}=r\frac{dM}{dt} \tag{7}$$

代入（5），有：

$$\frac{dK}{dt}=r\frac{1}{P}\frac{dM}{dt} \tag{8}$$

在（8）和（4）之间做必要的代换，得到

$$\frac{dQ}{dt}=r\beta\frac{1}{p}\frac{dM}{dt} \tag{9}$$

将（9）式除以Q，有

$$\frac{1}{Q}\frac{dQ}{dt}=r\beta\frac{1}{PQ}\frac{dM}{tt}$$

$$=r\beta(\frac{1}{M}\frac{dM}{dt})\frac{M}{PQ} \tag{10}$$

（10）式表明产出增长率和货币供应增长之间的关系。由此，（2）式可以写成：

$$g=\frac{r\beta}{V}m \tag{11}$$

如果V不变，（2）式可再写成

$$P=m-g \tag{12}$$

代入（11）式，有

$$p=(1-\frac{r\beta}{v})m \tag{13}$$

$$或P=(\frac{v}{r\beta}-1)g \tag{14}$$

（13）（14）表示出p、m和可能被赤字财政推动的g之间的关系。

这里，$\frac{1}{v}$是有计划的货币一收入比率。如果政府决定对投资品支出r单位，且价格稳定，那么，这种支出就会把产出提高到$r\beta$。但是，只要产出提高一个单位而且货币需求提高$\frac{1}{v}$，则货币供应增加一个单位时，产出提高$r\beta$单位将会使货币需求提高到$\frac{r\beta}{v}$单位。因而，赤字财政是通货膨胀的还是通货紧缩的将取决于：

$$v \gtrless r\rho$$

因为一般说来r和$\beta<1$而$v>1$，所以，赤字财政可能是通货膨胀的。

为了解模型的实际作用，假定$V=4$，$\beta=0.33$，$r=0.4$。解方程（14）：

$$P=29.303g$$

这样，把增长率仅仅提高1%，就需要29%的通货膨胀。需要注意的是，给定资本一产值比率即$1/\beta$，或3.03，则把储蓄提高1%，就需要价格提高大约10%（即29.303／3.03）。

也许有人指出，如果通货膨胀趋向于过度，v就不会保持不变；毋宁说它应当随通货膨胀而提高，用公式表示就是

$$V=V(p) \qquad 和\frac{dv}{dp}>0 \tag{15}$$

假定v和p的关系是线性的。因而

$$V=v_0+ap(16)$$

式中，V_0为没有通货膨胀时的流通速度。将此式与等式（14）合并，得到

$$P=\frac{v_0-r\beta}{r\beta-ag}g \tag{17}$$

可见，$\frac{p}{g}$随着g的提高而提高。在极限情况下，通货膨胀将是无穷大的，增长率不会再被通货膨胀所推动。于是，最优的信贷集资增长率(g^*)为

$$g^*=\frac{r\beta}{a} \tag{18}$$

利用方程（14），并采用曼德尔假定，$v_0=3,\beta=0.5,r=0.3,p=\frac{57}{3-20ag}g$,如果 $a=0$，则$p=19g$，或者为了使经济增长率每年提高1%，价格

应当每年提高19%。如果a＝10,那么,

$$P=\frac{57g}{3-200g}$$

或每年增长1.5%将与无穷大的通货膨胀相联系。特别是，为了使增长率g每年提高1%，价格提高的必要速度将达到每年57%。

曼德尔模型具有某些局限性，被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主要有：(1)关于产出一资本比率或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假定不科学。事实上，如果信贷集资能够提高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这一比率将会提高。(2)只要信贷筹集的公共投资取代了私人投资而不是消费，增长速度就可能受到不利影响。(3)曼德尔的模型是封闭的，如果包括外资的作用，产出一资本比率就可能提高；(4)假若通货膨胀是高的，货币流通速度多半会变化。从制定政策的角度看，为了使增长率每年提高1%，政府将允许价格每年提高57%，这种假定近乎荒谬。(5)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受需求不足的制约，从而由信贷筹集的投资可能对增长产生有利的影响，并不严重干扰价格的稳定性。(6)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表明，通货膨胀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较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更为重要。超过一定比率("最优比率")的通货膨胀不仅肯定对投资有害，而且肯定会对外汇率、国际收支和失业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综合性的外贸战略（Integrated Foreign Trade Strategy） 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之一。指同时发展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出口替代工业，使之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以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进口替代战略比较适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大国；出口替代战略比较适用于经济较发达的中、小国家；而一些经济发展落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初级产品的出口仍不失为上策。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应片面地、单一地实施某一种外贸战略，而应实行综合性的外贸战略，特别是应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地选择实行现有的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出口替代这三种战略。

综合限额（Comprehensive Limit） 抵免限额的一种计算方法，它指的是居住国（国籍国）政府允许本国居民（公民）将其在非居住国（非国籍国）同一纳税年度内发生的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汇总合并，综合计算出抵免限额。

综合限额的提出与跨国纳税人居民的经济活动不只限于两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这一特点密不可分，由于各国之间税率存在差异，在多国直接抵免方法下，很可能出现跨国纳税人居民在一些国家已缴税额超过限额，而在另一些国家又不足限额的情形，这时，综合限额计算方法允许跨国纳税人将其在某些国家的超限额与在另一些国家的不足限额合并计算得出总的抵免限额。

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text{综合限额}=\text{跨国纳税人居民国内外全部应税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times\text{居住国税率}\times\frac{\text{各非居住国应税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之和}}{\text{国内外全部应税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

无疑，这一计算方法对于跨国纳税人减轻税负是有利的，原因在于相互充抵使本来超限额不应被抵免的国外已缴税额也得到了抵免。

当然，实行综合抵免也有条件，一方面它要求跨国纳税人在有些非居住国（非国籍国）存在不足抵免限额的情形，即，有可能进行冲抵；另一方面也要求跨国纳税人在某些非居住国（非国籍）存在超限额的情形，即，有进行冲抵的需要。缺少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应用综合抵免法。

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 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以培育和引进高产稻麦新品种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技术改革活动。20世纪40年代，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和福特财团派遣农业专家到亚、非、拉国家，设立各种农业研究中心，选育推广稻麦高产品种。60年代后期，在墨西哥、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大面积地推广和种植了新型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并研制了一整套新的种植方法，使粮食产量比过去大幅度提高，大规模地提高了土地生产率。绿色革命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是随着高产良种的大面积推广，化肥的施用量也迅速增加；其次是绿色革命技术是规模中性的，即无论大农场还是小农场，新型高产品种的效率都是相等的。绿色革命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和农业停滞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大大缓和了粮食价格上升幅度，缓解了劳动力盲目流动和失业问题。绿色革命也产生了一些负作用。最重要的负作用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恶化了，也导致了地区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此外，由于高产品种要求优良的水利、化肥等条件，提高了生产费用，往往只能在富裕农民中推广。尽管如此，绿色革命仍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增长的根本出路。近年来，绿色革命已由原来的推广高产品种为主，逐步转向综合性的农业技术改革。

减量经营 1974年以来日本企业通过压缩经营

费用、提高生产效率以应付经济不景气和阻止利润率下降的经营手法。具体做法有（1）抑制工资水平的上升，减少新就业人员，通过转业或退休的方法削减企业在职人员；（2）压缩新的借款，并通过归还借款减少金融费用；（3）关闭不盈利的部门，出卖闲置的不动产；（4）提高操作技术和单位投入的产出率，降低生产成本；（5）压缩产品及原料的库存，节省一般经费。

清洁浮动（Clean Floating） 又称"自由浮动"，"肮脏浮动"的对称。浮动汇率的一种形式。见"自由浮动"。

清洁提单（Clean Bil） 清洁提单是指承运人没有对货物的表面情况填加任何瑕疵批注的提单。承运人在接受货物装船时，不可能详细检查货物的内部情况，只能检查货物的外表或货物包装状况，因此，承运人只对货物的表面状况负责，如果货物的表面状况良好，承支人就签发清洁提单，同时也受清洁提单的约束。如果货物在目的港卸货时发现货物表面有残损现象，承运人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由于清洁提单能够保障买方的利益，使买方能够收到完好货物，因此，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一般都要求卖方提供已装船的清洁提单。银行也只接受已装船清洁提单作为议付货款的单据。

清偿能力（Liquidity） 清偿能力是指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清偿其债务的能力。衡量清偿能力的方法不止一种，但通常的方法是看资产负债表，看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根据历史经验，人们对某种企业或团体确定一个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比率。实践中，比率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合适的，若企业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比率太低，有可能出现企业偿付不起债务的危险；若比率太高，则又会使企业失去潜在的盈利机会。例如，衡量一个商业银行的清偿能力是看其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之比率，即看其存款与贷款之比率。若存款与贷款比率太低，银行有可能发生清偿危机；若这一比率太高，银行又会失去贷款盈利的机会。但清偿能力并不是衡量企业、个人或团体偿付债务能力的唯一标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偿付债务能力的高低要看其实际经营得好坏，而不能仅看其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比率。一个企业老是亏本，即使其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比率再高，也只能在短期内维持其清偿能力。此外，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比率也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相同行业的厂商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其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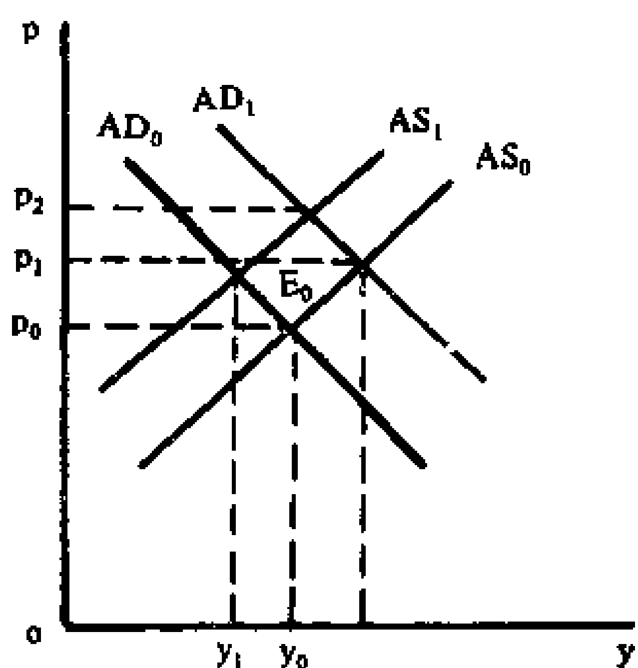
清偿价值（Liquidating VaLue） 指公司破产清算时，每一普通股所含的实际价值。由于公司在财务清算拍卖时，需要支付清算费用等，因而其清算价值一般与当时的帐面价值相背离。

清算汇率（Clearing Rate） 签有支付协定的国家进行双边结算时使用的汇率。通常有四种：（1）其中一国在外汇管制下的官定汇率；（2）两国间货币的法定平价；（3）市场汇率；（4）在支付协定中规定一种专用汇率。具体使用那种汇率须在协定中加以规定。

清算货币（Clearing Currency） 或称"结算货币"。根据政府间或民间签订的贸易或支付协定，双方外汇的收付以某种货币记在双方银行帐户上，定期通过一定的转帐进行结算，该货币即清算货币。可作清算货币的币种有（1）本国货币；（2）对方货币；（3）第三国货币。究竟使用哪种由贸易或支付协定中订明，多是第三国货币。

混合型通货膨胀（Mixed Inflation） 又称"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指需求推动与成本推动共同作用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把总需求因素与总供给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根据这种理论，通货膨胀的根源不是单一的总需求或总供给，而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通货膨胀是由过度需求的存在引起的，即过度需求引起物价水平上升，而这种物价上升又会使工资增加，产生工资一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样，就不能排除成本推动力量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在工会的压力之下，工资增长幅度超过物价上涨率时，成本推动的作用更为明显。如果通货膨胀是由成本推动开始的，即成本增长引起物价水平上升。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总需求的相应增加，工资上升最终会使生产减少，失业增加，从而以经济萧条而结束通货膨胀。只有在成本推动的同时，又有总需求的增加，才会使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持续下去。可用附图来说明混合型通货膨胀中，总需求因素与总供给因素的共同作用。在附图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水平，纵轴op代表价格水平。原来的总需求曲线AD_0与总供给曲线AS_0相交于E_0，决定了国民收入水平为Y_0，价格水平为P_0。当总需求增加，即总需求曲线从AD_0移动到AD_1时，由于过度需求的存在，价格水平由p_0上升到p_1，即发生了由总需求因素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但物价上升必然引起工资成本增加，即总供给曲线由AS_0向上移动至AS_1，当工资的增加幅度大于物价上涨率时，价格就又由p_1上升为p_2，这就是总供给因素引起的通货膨

胀。同样，如果是总供给曲线由 AS_0 移动到 AS_1，即由于成本推动使物价从 p_0 上升为 p_2 时，如果没有总需求的相应增加，即总需求曲线由 AD_0 移动到 AD_1，则成本推动最终会使国民收入减少至 Y_1，从而总供给曲线最终回到 AS_0，物价水平又回到 p_0，通货膨胀结束。经济学家们认为，当进行静态分析，即单独分析一次性物价上升时，可以区别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引起的，还是由总供给引起的。但是，当进行动态分析，即分析通货膨胀的全部过程时，就必须把总需求与总供给结合在一起，分析总需求变动以后货币工资的反应，以及工资增加后，总需求的反应。把总需求与总供给完全分开是无法解释现实中持续的、甚至加速的通货膨胀的。



混合经济（Mxed Economy） 把竞争性的私人市场经济与某种程度集中控制的国家干预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体制。一般是指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的思想。这是混合经济的思想来源。美国经济学家 A·汉森发挥了凯恩斯的这一思想，提出了"双重经济"（dual economy）的概念。他认为，19 世纪末期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已不是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双重经济"。双重经济包括双重生产经济，即生产领域中同时有私人活动与政府活动，以及双重消费经济，即消费领域中同时有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战后，美国经济学家 P·萨缪尔森把美国经济称为"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控制"的混合经济。这种经济的特点在于，资源配置仍然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由私人的行动决定，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经济问题仍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什么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如何生产取决于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谁生产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但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就表现在：第一、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来控制总产量及其他重要的经济总量。第二、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来干预收入分配，谋求社会平等。第三、政府通过强制性法令对私人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还有些混合经济中，政府对部分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制定经济计划来指导经济发展。所以说，混合经济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又有国家干预的一种经济制度。

混合汇率（Mixed Rate） "复汇率"的一种形式。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混合使用。亦可作为外汇管制的手段之一。如有的国家规定某些业务必须按官方汇率结汇或买汇，凡不属此列者即可到自由外汇市场按市场汇率结汇或买汇。因市场汇率通常高于官方汇率。故允许外汇收入者到自由外汇市场出售外汇实际上是对其的优惠。按规定必须以官方汇率购买外汇者实际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即使对同一项外汇买卖也可以按不同比例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混合使用，以达到奖罚的目的。

混合合并（Mixed Amalgation） 指水平、垂直以外的所有企业合并。其基本类型有二：一是同时发生水平和垂直合并；二是合并企业双方或多方分属于没有产业关联关系的产业。

混合税（Mixed Duties） 混合税又称复合税，它是指对同一种商品按从价税和从量税征收办法同时征收的关税。在实践中，混合关税的征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征收从价税为主，同时加征从量税；另一种是以征收从量税为主，同时征收从价税。混合税的计征比较复杂，但它能较好地起到保护关税的作用，尤其是在商品价格波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下。

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 亦称"境外金融市场"、"欧洲货币市场"。经营境外银行业务而不受所在地政府法令管辖的金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的地域分布，以伦敦及其它西欧城市为中心，在亚洲则集中在新加坡、香港、巴林、贝鲁特、东京等地，加勒比海的开曼、拿骚等海岛城市，以及巴拿马等地是为美国和拉美国家服务的境外金融市场。

寄售（Consignmet Sale） 国际贸易中的寄售是指寄售人（出口人）根据事先与国外代销人或专营寄售的经纪人签订的寄售协议，把货物运交国外代销人，由它根据寄售协议约定的条件和办法，以自己的名义代寄售人在当地市场出售货物，收取货款。所得货款在扣除代销人的佣金和其他费用以后，按约定办法寄交寄售人。

在寄售方式下，寄售人与被寄售人的关系是委托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寄售的典型特点是先出口、后销售。在货物售出之前，货物的所有权仍属寄售人。作为代销人，除了受寄售人的委托照管货物和根据寄售人的指示处理货物以外，不承担货物在寄售过程中的任何费用和风险。如果寄售期满后货物仍不能售出，代销人就可以把它退还寄售人，有关费用由寄售人负责。

对于寄售人来说，寄售有很大的优点。寄售具有现货买卖的性质，国外买主可以看货成交，并且可以立即取货，因此，对买主来说，既方便又安全，便于成交。对于新产品和那些规格复杂、等级不易严格划分以及难以凭样品成交的商品来说，寄售方式特别能起到扩大销售的作用。对于寄售人来说，寄售方式意味着直接与国外中间商尤其是批发商和零售商打交道，这就有利于建立和扩大贸易渠道，促进对外销售。另外，寄售还有利于寄售人抓住时机抢先成交，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当然，寄售方式也有缺点。对寄售人来说，采用寄售方式冒有很大风险，它不仅要承担寄售过程中的全部风险，而且还有周转期长、收汇不安全等缺点。周转期长意味着资金的积压严重，这对于寄售人开展正常的贸易经营和获取更多的利润都会产生消极影响。收汇不安全的风险不仅来自代销人的可靠程度，而且也来自目标市场实行的严厉的外汇管制等。

为了使得寄售贸易取得成功，寄售人在选择寄售方式时必须解决下列问题：第一，选准寄售市场和代销人，为此，必须对可供选择的寄售市场和代销人的情况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第二，选择适宜的寄售商品；第三，安排好寄售商品的存放地点，寄售商品除了直接运交代销人外，还可以存放在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或者存入海关仓库，随售随取。如果存入海关仓库，就必须注意存放期限，因为超过一定期限就将被海关变卖。第四，订好寄售协议。通过签订有关协议，对货物所有权、代销人的责任和费用负担、货款的结算以及商品售价等问题作出合理明确的规定，这就有利于贸易的顺利开展，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利润。

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　又称“短周期”，指为期3—4年一次的经济周期，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J·基钦（J·Kitchin）在1923年出版的《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趋势》一文中提出，故名。基钦研究了1890—1922年间英国与美国的物价、银行结算、利率等指标，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大周期与小周期。大周期就是朱格拉周期，小周期是为期3—4年，平均长度为40个月一次的周期。基钦是个统计学家，他着重对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并据以划分周期，但没有对这种周期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他只指出，短周期是一种由心理原因所引起的有节奏的变动，而影响人们心理的主要是农业产量与价格的波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彼特把基钦周期与朱格拉周期联系起来，认为三个基钦周期组成了一个朱格拉周期。他还用存货的积累与发散来解释短周期。美国经济学家A·汉森把基钦周期称为“次要周期”，或“小周期”，并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计算出1807—1937年间共有37个这样的周期，其平均长度为3.51年。一些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基钦周期并不重要。例如，英国经济学家A·刘易斯（A·Lewis）认为，这种周期仅仅反映在工业统计上，对经济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

基尼比率（Gini ratio）　衡量收入分配接近于绝对平等或绝对不平等程度的一种尺度。是以科拉多·基尼而命名的。基尼比率是一条四十五度线和洛伦茨曲线之间的面积与整个三角形面积之比。洛伦茨曲线上的每一点表示累计的人口百分比所占据的收入的百分比。因此，洛伦茨曲线越是靠近四十五度线，说明收入越是平等，因为此时说明人口的百分比与所拥有的财富收入的百分比接近。相反，洛伦茨曲线越是偏离四十五度线，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因为人口的百分比与所拥有的财富收入的百分比相去甚远，很少一部人拥有财富收入的大部分。所谓绝对平等就是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社会财富中的平均的一份，彼此是平等的，没有收入差别；所谓绝对不平等，就是几乎全部的社会公众没有一点的财富收入，全部的财富收入由近似于零的人全部占有。这两种情况都是极端的情况，现实经济生活中是没有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基尼比率来说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当系数接近于零的时候，收入分配便接近于绝对平等；反之，当系数接近于一时，收入分配就接近于绝对不平等。基尼比率可以用来对两个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对比，也可以用来确定税收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例如，如果某一税收变化能够减低基尼比率的话，那么这种税的总的效果就是累进的，因为它会导致收入分配更接近于绝对平等。

基本汇率（Babic Rate）　一国货币与某种关键货币间的汇率。战后美元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关键货币因此各国一般将本国货币和美元间的汇率作为基本汇率。因外国货币的种类很多，不可能一一制订本国货币和它们的汇率。以基本汇率为基础，确定与其他各种货币的汇率不仅省时、省力，还可以避免汇率制订不当造成的套汇。一个国家以哪种货币作为制订基本

汇率的关键货币一般是不公开的。

基本差额（Bajic Balance） 一定时期一国居民在经常项目及长期资本项目上借方总值与贷方总值之差。贷方总值大于借方总值称为基本顺差，反之则为基本逆差。该差额反映了一国基本的经济地位。因为商品、劳务的国际流动产生于成本、价格即生产率的国际差异；长期资本流动源于预期资本利润率的国际差别，而短期资本流动源于利率的国际差别及汇率的变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故基本顺差说明该国经济实力强，基本逆差则反之。

基本价格（Baje Price） 简称基价。商品的基本价格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含义。(1) 基价是指计算商品销售的基本价格。若出口商是制造商，则商品的工厂交货价或仓库交货价即为商品基价；若出口商是专业出口商，则计算出口价格的基价就是专业出口商的购货成本。(2) 基价指据以计算各级品质商品价格的基本品质商品价格。有些商品如棉花、生丝等在国际市场上都有基本价格，不同档次又有公认的与基价之间的差价，市价的涨落则仅表现在基价之上。(3) 基价指在买卖合同中，依照特定条件可予以调整的基本价格。

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 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主旨在于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的原因。他所讲的国民财富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总量，并第一次指出它是由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所创造的。在他看来，增加国民财富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主要靠加强劳动分工，一是增加在业工人的人数，这主要靠增加资本积累。按照这个思路，他把《国富论》共分为五篇。第一篇从分工开始，进而分析了货币、交换价值和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它们都被看成是分工的前提或后果。第二篇考察了资本问题，着重研究资本的构成、资本积累的条件和资本的用途。这两篇基本上包括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内容。后三篇分别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财政学的角度，探究了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这样他就建立起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斯密的学说涉及到经济学的所有主要研究范围，故又有"经济学百科全书"之称。《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经济科学正式诞生。

斯密学说的中心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他从"人性论"出发，强调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都受"利已心"的支配，而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却又自然地会给全社会带来普遍的利益。以这个思想为理论基础，他进一步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理想制度，它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地调节着生产活动，卓有成效地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国家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反而会对国民财富的增长起阻碍作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充分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迫切愿望，旨在冲破封建制度残余和重商主义政策的种种束缚，其积极的历史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同时它还对以后的经济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宣扬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主要理论武器，并成为同国家干预主义互为消长的两大经济学思潮之一。

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另一方面他又仅仅描述经济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外部联系，并为它们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其实，这种两重性是同斯密的两重研究任务相适应的。他对不少重要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本质的科学分析，取得了辉煌的理论成就，同时又热衷于对经济现象作细致的描述和简单的概括。本来这两项任务都具积极意义，但由于斯密未能将它们辩证地统一起来，经常使之处于交错和矛盾之中，从而导致不少理论观点的混乱和非科学性。

检验证明书（Insperfion Certiricate） 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商品经过商品检验机构的检查，鉴定后，由这些检验机构出具一定的证明文件，称为检验证书。商品检验证明书不仅是区分货物的品质，数量是否符合合同规定的依据，而且在卖方要求凭单付款时，常常也要出具检验证书作为议付货款所必须的单据之一，如果检验证书中的所列项目或检验结果与信用证中的规定不符，付款银行可以拒绝议付货款。

目前在国际贸易中较为常见的检验证书有品质检验证书（Quality certificate）；重量检验证书(Werght Certificate)；数量检验证书（quantity Certificate)；卫生检验证书（sanitary，Certifiarte)；产地检验证书（origin certrficate)；兽医检验证书（verterinary Certificate），价值检验证书（value Certificate）残损货物检验证书（inspecfion Certificate on damaged Cargo）等。

检验机构：（Inspection Organization） 在国际贸易中，检验机构是指与出口商和进口商场无直接利害关系，以公正的态度和与有技术提供商品检验服务的机构。

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商品检验的机构主要有两类：

(1) 法定检验机构，它是各国政府为了防止违法商品或有害的、劣质的商品进出口，为保护产品的

信誉和消费者的利益，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强制性的检验。这些法定检验机构是法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例如我国的法定检验机构是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美国有海关事务局，美国动植物卫生检疫处等，（2）公证检验机构：公证检验机构是指在法律上具有公证人资格，能够接受委托进行商品检验并作出公证鉴定的法人，它主要是指由私人或同业公会，协会等开设的公证行或检验行。如：英国劳氏公证行（Llogd's Saroeyor）瑞士的日内瓦通用鉴定公司（General Snperintendence Generva）。

检验权（Inspection Right）　检验权是指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商品检验时，由什么人来决定商品的品质，数量，包装等状况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确定商品的检验权实际上就是确定检验商品的时间和地点。一般来说，在买卖合同中，对商品检验权有三种确定方法：

（1）以商品的离岸状况为基准：采用这种检验方法，货物在装船前就应进行品质、数量、重量方面的检验，并由双方同意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证明书。采用这种以货物的离岸状况为准的检验方法，货物在到达目的港后，买方虽然可以再进行检验，却无权对检验证明书提出异议，如果货物在长距离的运输过程中发生了品质、数量等方面的变化，除非买方提出确实证据证明货物的品质、数量等的缺陷，是货物在装运时就存在的，否则卖方可以拒绝承担责任。显然，以商品的离岸状况作为检验的基准对卖方比较有利。

（2）以商品的到岸状况为基准：这种检验方法与前一种检验方法是相对的，双方在买卖合同中规定，货物的品质，数量等方面以列举状况为准，货物到达目的港卸货后进行检验，由目的港所在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证明书，以目的港的检验结果为标准和买卖合同进行对照，若出现品质，数量等方面与合同要求不符，卖方需对此承担责任。显然，这样对买方有利。

（3）以装运港所在地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明书作为卖方议付贷款的依据，但是货物到达的目的港后允许买方有复验权。通常对买方复验商品都要规定一个明确的复验期限，这一期限也就成为买方向卖方提出索赔的期限。如果合同中规定买方必须在货物到达目的港后若干天内进行检验，那么买方只有在这一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检验，并且取得检验证明书，检验的结果才可以作为买方提出索赔的有效依据，否则，超过了规定的检验期限，买方就失去了商品的复验权，这时，也可以视为商品复验合格。

票汇汇率（Demancl Draft Rate，简称 D / D Rate）　外汇银行买卖外币汇票、支票或其它票据时使用的汇率。可以分为即期票汇汇率、远期票汇汇率和外币现钞价。多数情况下从卖出外汇到支付外汇有一段时间间隔，银行在此期间可以占用客户的资金，故票汇汇率一般较电汇汇率低，其中远期票汇汇率又低于即期票汇汇率。

票面价值（Par Value）　普通股股票的面值金额。最初，普通股股票的票面价值是为了保证股东将来转让或公司结束经营时，投资者可以收回投入的资本或取得价值相等的财产，它的作用在于保护持有人的利益。但由于持有人无论在交易或取得公司的财产中都与面值相背离，因而面值的现在的作用仅在于它代表一定所有权及表决权，同时也代表一定的红利的要求权。

票据（Bills）　所谓票据，是用来抵消债权债务关系的使用工具，从广义上看，股票、提单、保险单等权利凭证都可以归为票据一类。但是，在国际贸易业务中，票据是指其狭义的概念，即是指那些可以代替现金流通的有价证券，具体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类。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主要是采用票据结算，现金结算很少使用。

各国法律对票据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内容规定并不一致。西德和法国的法律认为，票据只包括汇票和本票两种，不包括支票，有关支票的法律问题，另有单行法规予以规定，不包括在票据法之内。英国汇票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却认为，汇票和本票均为票据，而把支票视为以银行为付款人的汇票。日本商法典则明确规定，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即使这样，通常可以认为，票据即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

汇票（bill of cxchange）是由出票人向受票人开出的，要求该受票人于见票时或在一定时间内，向收款人或执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凭证。

本票（promissory note）是出票人约定于见票时或在一定时期内，向受款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凭证。

支票（cheque）是出票人要求银行无条件即期支付一定金额的凭证。

将汇票、本票和支票总括起来看，通常可以认为票据涉及三方面的当事人。即出票人、受票人和收款人。出票人是开立票据并指示受票人付款的债权人，又是收款人的债务人。受票人是根据出票人的命令支付票款的人，即付款人。出票人和受票人相比较，受票人是主债务人，出票人是从属债务人。收款人是接受票款的人，是票据的主债权人。当票据上没有写明收款人时，持有票据的人就有权接受票面金额，称为

持票人（bearer）上述三方面票据的当事人可以称为票据的基本当事人，除了这些当事人之外，在票据转让流通时，还可能需要涉及背书人和被背书人，背书人是票据的让与人，即转让票据的人；被背书人是票据的受让人，是接受转让的票据的人。

票据作为代替现金流通的有价证券，既是流通证券，也是债权证券，票据上的债权债务，是由于票据行为而产生的。票据行为是指的负担票据上债务为目的所做的要式法律行动。票据行为可分为主票据行为和从票据行为，主票据行为是指出票行为，从票据行为则是指票据的背书，保证、承兑和参加承兑。不同的债权人，根据票据行为的不同，有不同的的票据权利，这种票据权利基本上有两种：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票据权利可以经交付或经背书、交付而转让，不需通知原债务人，受让人取得票据则取得了票据的全部权利，从而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票据的出票人、承兑人或前手背书人起诉。票据经转让后，善意而又支付了对价的受让人可以取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不因其前手对票据的权利有缺陷而受到出票人或承兑人、付款人的对抗。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自行制订了本国的票据法，这些票据法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异，极大地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此，国际联盟理事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积极致力于制定并推行国际统一票据规则，现票据方面已有国际公约《统一汇票本票法》，《国际统一支票法》等，这些公约多为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采用，但是，由于这些公约是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制定的，英美等国一直拒绝参加。我国虽尚未参加上述国际公约，但在对外贸易结算中，，也适当予以参照和应用。

票据背书（Bill's Endorsement） 所谓背书是指持票人在票据背面写上指示性文句，鉴上自己的名字，并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此时，签名人称为背书人，而票据受让人称为被背书人。对于可以流通的票据来说，背书行为是票据转让时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背书行为的完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持票人在票据上进行背书，另一方面是持票人将票据交给被背书人。

票据背书有三方面的作用：（1）持票人通过背书转让其对票据的权利；（2）持票人通过背书委托银行代收票据，这时，持票人所做的背书称为委托背书（endorsement for collectcin）；（3）持票人通过背书将票据向银行进行抵押以便获得银行贷款，这时，持票人所做的背书称为质押背书（endorsement for hypothecation）。但是，背书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转让票据的权利，这种转让票据权利的背书，其作用主要是：（1）背书人对票据的权利，包括所有权转让于被背书人；（2）背书人对票据的所有后手担保票据必然会被付款或承兑；（3）背收人证明票据的前手背书人签字的真实性；并且以背书的连续性证明背书本人具有背书权利。

根据票据法的一般原则，凡是善意地并支付了对价方获得票据的人，包括被背书人，都是正当的执票人。正当执票人可以取得优于其前手让与人的权利，不因前手背书人对票据的权利有缺陷而受到影响，无论是票据的出票人或该被背书人的任何前手得以对抗该被背书人的抗辩事由，原则上都不能用以对抗正当执票人，这样，被背书人若是汇票的正当执票人，就有权取得背书人拥有的票据的一切权利，被背书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要求付款人承兑、付款；也可以将票据再度背书转让。在票据遭到付款人拒付时，被背书人有权向票据的一切前手背书人，包括出票人进行追索。

背书行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主要的背书方式包括空白背书，特别背书和限制性背书。

接受（Acceptance） 又在法律上称为承诺，接受是指发盘人按照发盘所规定的方式，对发盘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一种意思表示。发盘一经接受，合同即告成立的。在合同的成立阶段，接受是成立合同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受盘人对发盘表示接受是一种法律行为。作为一次有效的接受，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接受行为必须由受盘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作出，任何无关的第三者表示接受，不能据此而成立有效合同；

（2）接受必须在发盘的有效期限内作出。对于没有规定有效期限的发盘，在英美法国家，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表示接受，而在大陆法国家，则必须在依通常情形可期待得到接受的期间内接受。对于一项已过有效期限的接受是否有效，取决于发盘人。如果发盘人在收到迟到的接受后，毫不延迟地通知受盘人其接受有效，则迟到的接受仍具效力。另一方面，如果接受迟到的过错不在受盘人，那么除非发盘人毫不延迟地通知受盘人接受失效，则原来的接受仍有效。

（3）接受的内容必须与发盘的内容严格一致，反之，如果对发盘的内容进行了扩充、限制或变更，则不应算做接受，而仅是还盘。但是，在国际贸易的具体业务中，接受与发盘的内容完全一致的情况是较少的，通常受盘人作出接受的同时，往往不能完全同意发盘的内容。为了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如果受盘人在接受

发盘的同时，对发盘提出了添加或不同的条件，但是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并没有对发盘提出实质性的变更，那么除非发盘人在不过分延迟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提出异议，否则仍然视为有效承诺。根据公约的规定，凡是对发盘中提出的有关价格、支付、品质、数量、交货的地点或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者解决争端的方法等所做的修改，均应视为在实质上变更了发盘的条件，对于载有以上修改内容的接受，均不可构成接受，而仅视为还盘。

(4) 接受的传递方式必须符合发盘中提出的要求。如果发盘中规定了接受的传递方式，则必须依此方式进行接受。若没有规定传递方式，通常应按发盘本身的传递方式进行接受，也可采用比发盘更为迅速的传递方式。

接受生效的时间，各国法律的规定是不同的，尤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分歧较大。

(1) 英美法国家的投邮生效原则（Mail—box Rule），投邮生效是指接受通知一经投邮，即告生效，合同在此时随之成立。投邮以后，函件即使发生失误，合同仍然有效。投邮生效的原则，其前提是认为发盘人通过邮局发出发盘时，已经默示了将邮局作为其接受通知的代理人，一旦接受通知交到邮局，如同交给发盘人一样。投邮生效的原则人为地缩短了发盘人能够撤回发盘的时间，事实上保护了受盘人的利益。

(2) 大陆法国家的到达生效原则（Receined of the Letter of Acaptance Rnle），在到达生效原则下，接受通知在送达发盘人时生效，合同也在此时成立。这种送达是指送达要约人的营业所或惯常的住所，不指亲自到发盘人手中。如果接受通知在传递过程中遗失，则接受通知是不产生效力的，合同也就无法成立；但是，如果接受已送达了发盘人，发盘人却由于没有及时拆阅而延误，接受仍然成立，合同也依然有效。

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　信箱公司的一种形式，主要是指出于进行国际避税目的而在国际避税地建立的控制其它公司相当数量股票或证券的公司。被它所控股的公司以股息或资本利得的形式向控股公司转移收入，控股公司则利用所处避税地对某些特殊所得（如股息等）的税收优惠措施进行避税。进而，控股公司还可以利用再投资的方式控制新的公司以获取更多的免税收入。而建立该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则可以通过其居住国实行的延期纳税等政策避免就其避税地控股公司所得所应承担的纳税义务。

需要指出，有些避税地国家对于某些特殊所得（如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并不一律免税或减税而是统一规定从源征课预提税，然后对与其有税收协定国家的公司实行退税或减税。

掉期交易（Swap Transation）　买进或卖出一种期限某种货币的同时，卖出或买进另一种期限的同种货币。掉期交易可划分为：(1)"纯粹掉期交易"和"分散掉期交易"。前者为两笔交易同时和同一对手进行。现实中绝大部分掉期交易均属此类。后者是从一个交易对手处购买再向另一对手出售的掉期交易。(2)"即期—远期掉期交易"和"远期—远期掉期交易"。最典型的掉期交易是在作一笔即期交易的同时另作一笔远期交易的即期—远期的掉期交易。大银行间有时也作不同期限的"远期—远期"交易。掉期交易通常被外汇市场上的投资者或借贷者采用。例如：一日本投资公司需1万美元现汇用于投资，一个月后收回，于是买入1万美元现汇，为了避免外汇风险在买入美元现汇的同时卖出1万美元一月期期汇。此外，外汇银行为解决外汇头寸问题也要进行掉期交易。如A行的美元现汇出现多头而一月期美元出现空头，该行卖出美元现汇而进一月期美元，进出口商为了避免外汇风险，采用的都是独立的远期交易。

授权资本制（Authorized Capital System）　即股份公司采用资本总额在公司章程中标明，但在公司设立时不必全部认足，公司的股东只认足其中一部分，这一部分称为已发行股本（Issued stock）其余部分的资本可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逐渐增加的一种方法。采取这种方法，公司的设立较容易，增加资本也不需要变更公司章程。

推测均衡（Conjectural Equilibrium）　在一个由非常多经济代理人构成的经济体系中，每一代理人的经济环境是独立于它所采取的经济行为的。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如果某一代理人从经济体系中退出，其它代理人的福利状况在它退出之前与之后是无差异的，那么这一经济体系就是完全竞争性的。这样的经济体系被认为满足"无剩余"条件。当经济体系是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经济代理人在决策时必然要考虑他的行为对市场环境的影响，如对他可以卖出产品价格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后果是未知的或不能完全确定的，因而需要进行必要的推测。推测不同于由于某种随机过程存在而进行的有关未来市场环境的预期，它所关注的是市场环境对经济代理人行为的反应。

推测均衡首先研究不满足无剩余条件而竞争不完全的经济体系，但是某一经济体系即使不满足无剩余条件，也有可能是完全竞争的。

经济系统的均衡，通常是指作为动态体系驻点的经济状态。例如，常常假设在现行价格下，如果代理人意愿购买的数量与他们意愿卖出的数量不相等时，价格就发生变化。也就意谓着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代理人改变价格的某种动机，这就蕴含了代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经济环境的矛盾。这也是引入虚构的拍买商解释价格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不完全竞争经济中，这样的矛盾是可以避免的。当某一代理人推测到价格变化对他有利时，价格就会发生改变，因而作为合理的推论，推测均衡必然是这样一种状态：它被每一代理人推测到，而且某一代理人采取个人可控的偏离它的行动，将损害这一代理人的利益。

推测来源是推测均衡所需注意的重要问题。如果假定推测来源是外生的，某些推测就可能存在于很多推测均衡状态中，类似于传统的均衡分析过程。在传统的均衡分析中，代理人偏好被假定为外生的，从而某些偏好状态可以存在于许多均衡状态中。但是，当推测最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和需要偶尔改变推测时，使内在机制认识到偏好状态的变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推测均衡要求推测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或理性的。

推测均衡思想的意义在于，现实经济体系本质上不是完全竞争的，而推测均衡允许在拍买商不存在的情况下研究价格形成。推测研究方法有这样的优点：它考虑到代理人对经济环境的认识。经济理论常常忽视了实际结果决定于经济代理人对实际结果的推测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早已认识并且研究了信念与事件的相互联系，但是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推测研究方法一定会进入我们关于经济代理人理论。推测理论试图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引人不完全竞争，而且已经证明了完全竞争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古诺（Couvnot）推测均衡解的极限状态。

推定全损（**Constructive Total Loss**） 推定全损是指被保险货物在海上运输过程中遭遇承保范围内的风险损失并未达到完全灭失的程度，但是对货物修复的费用加上将货物续运到原定目的地的费用估计要超过货物运到目的地后的价格。

在被保险货物发生推定全损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于损失的索赔可以有两种选择。如果被保险人希望获得全部损失的赔偿，就必须及时地办理委付手续，将被保险货物的一切权利，包括所有权在内全部转让给保险人，同时要求保险人按照实际全损给予赔偿；除此之外，被保险人也可以将这种推定全损作为部分损失处理，保要被保险人不办理委付手续，保险公司通常会以部分损失予以赔偿。

虚盘（**Offer Without Engagement**） 虚盘与实盘相对应，也属于发盘的一种。虚盘是发盘人有保留地愿意按照一定的交易条件达成交易的一种意思表示。虚盘的措词通常是不肯定的，不明确的，交易条件也可能是不完备的，在发盘中常常会有一些保留条件。

虚盘对于发盘人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即使受盘人对虚盘表示接受，仍然必须经过发盘人的最后确认，方能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均具约束力的合同。同时，发盘人对于虚盘的内容是有权随时进行撤销或修改的。

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 今天已经很少有经济学家使用虚拟资本这个概念。在以前那些人数很少，但各不相同的使用者那里，虚拟资本是指运用信用手段为生产活动融资。尽管这些人的用法多么不同，但他们全部拿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相对照，后者通常是指生产中的生产工具，但也可能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的货币资本。这些人中，有的拿虚拟资本融资与生产手段的自愿储蓄相对照，如哈耶克（Hayek），有的（如马克思（marx）和希法亭（Hilferding））从借贷资本的不同形式和金融项目的市场价值的意义及其同劳动价值的关系方面分析了虚拟资本这个概念。哈耶克争辩说：虚拟资本是使资本市场发生畸变的银行信贷增长的结果。当消费者计划和生产者计划相吻合时，前者提供给后者的信用等于储蓄，此时资本市场是稳定的；但是当银行信用增长，鼓励企业投资，而储蓄没有对应增长，就会导致哈耶克所说的"过度消费"危机，此时，资本市场上资本短缺而不能用的资本品过度供给。在这里，虚拟资本这个概念具有贬义特征，它不仅是提供了虚幻的刺激，而且也导致了危机。虚拟资本破坏了货币的中立性，它通过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关系，代替了银行的中间者角色，这种虚幻的或有害的关系的解释是同货币供应的数量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他的货币和信用理论中，讨论了完全不同的虚拟资本概念，按照他的观点，由劳动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本具有不同的形式，第1种即是货币资本形式，它用来支付工资和购买资本品。这个被某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可能通过金融机构借贷给企业，企业支付利息给这个资本家，但利息仅仅是一种从利润中分割出来的金融收益，它并不具有"自然的"特征。按照他的 A—A'公式（表示了借贷资本循环），"资本就象梨树结梨一样增殖货币"，货币资本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并且剥削劳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为什么生息资本在资

本中最具有拜物教形式。虚拟资本概念是从借贷资本中引伸出来的，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一种与劳动价值原则相对的价值原则，"虚拟资本"的形成被称为资本化，资本化考虑资本总量，它在平均利息率水平上，将固定地产生出各种给定的收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金融收益制约着所有其他收益。把工资作为人力资本的收益是完全荒谬的，它同没有相应的生产性投资的公债的利息一样都是一种幻觉。不过证券的发行提供了对未来剩余的部份收益权。希法亭坚持马克思的观点，他宣称："在股票交易中，资本家所有权表现出它的纯粹形式……在生产过程之外"。不过，尽管虚拟资本在A—A'循环中以及金融市场上，具有确定的拜物教形式，但它也有某些现实的根源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功能性的一种表示，必然要求这些货币资金、信用以及金融流通手段的存在。虚拟资本的这些用法都带有贬义，但是它却是主要经济问题的核心——尽管很少提及——它反映了流通和生产之间、银行和企业之间以及更基本的收人分配之间的关系。

第三市场（Third Market）　指原来在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在场外进行交易而形成的市场。从事这种交易的是一些非交易所会员的经纪人和交易商，他们在交易所外买卖那些在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第三市场实际上是场外市场的一部分，但由于原来场外市场指的是未上市的证券在交易所以外的交易，而第三市场的交易对象则是在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所以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场外市场。

第四市场（Fourth Market）　指一些投资机构或个人，绕过经纪服务，彼此之间直接进行证券买卖。有时，尽管也有第三者协助安排证券交易，但此时的经纪人不向政府有关当局注册，也不公开其交易情况，其佣金比其他市场都低，因而它对投资者较有吸引力。

铜出口国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hmental Council of Copper Expoiting Countiies）　铜出口国政府间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5月，它是由世界主要产铜国组成的原料生产与输出国组织，其宗旨是协调成员国关于铜的生产和出口等方面的政策，促进铜的生产的扩大和出口收人的增加，为各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该组织有赞比亚、扎伊尔、智利、秘鲁和印度尼西亚等五个成员国及南斯拉夫、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毛里塔尼亚四个联系国。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的成员国部长级会议。理事会是执行机构，由成员国各派两名代表组成，铜情报局则负责收集和提供关于铜的生产、销售等情报供各成员国参考。该组织成立以来为维护各生产国的利益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它所采取的措施包括限价、限制生产和出口等。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巴黎。我国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该组织的部长级会议。

银行汇票（Banker's Draft）　银行汇票是指由银行开立的汇票。通常银行汇票的付款人也是银行，用在票汇业务中。由银行签发汇票后，交给汇款人，由汇款人寄交国外收款人向付款银行要求付款。办理票汇业务的银行在签发汇票以后，须将付款通知书（advice of drawing）寄给国外付款行，以便付款银行在收款人持汇票取款时进行核对，核对无误方会付款。银行汇票多为光票，不附带单据。

银行同业汇率（Inter Bank Rate）　外汇银行同业间买卖外汇时使用的汇率。外汇市场上报出的汇率实际上是银行同业汇率。一般银行同业汇率买入价和卖出价间的差价较商人汇率买入、卖出价间的差价小。

银根紧缩（Tight Money）　指货币管理当局执行的旨在减少信贷供应量，提高利率，从而消除因需求过大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的一种货币紧缩政策。从货币管理当局的角度来看，有三种可以采取的主动性措施：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提高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例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债券，美国商业银行系统的资金便会减少，从而被迫调整其金融资产。如果商业银行系统内没有多余的资金，它们必须向联邦储备系统借人追加的准备金，或压缩放款，或出售债券，或二者兼用，来限制其生息资产。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商业银行在用完其流动资产和较长期的投资以前，就会采取措施来限制其放款额的增长。他们会对贷款申请人进行排队选择，优先选择那些同它们建立了长期关系并且资信较好的贷款申请人。而对其他贷款申请人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如缩短定期贷款的偿还期限、严格贷款申请人的资信标准，以及不按申请人所要求的足额提供贷款等。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银行的自由准备金的净额头寸，每周由联邦储备系统报导并刊登在星期五报纸上，这是当前货币政策的晴雨表。一般情况下，自由准备金少于一亿五千万美元，这就表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货币紧缩；而如果自由准备金的净额头寸是个负数，那就是在执行非常严厉的紧缩银根政策了。

停租 停租是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租船方有权在租船期限内停止继续支付租金。在租船合同中，通常都列有停租条款，租船方在依据停租条款停止支付租金时，有义务说明停租的原因。停租的最常见的原因是船舶发生了意外故障，使得租船人无法继续正常地使用船舶，从而造成了租船人的时间损失。

停厂（Lockout） 雇主不让工人进厂的一种手段。它是与罢工相对的，主要用来防止可能爆发的罢工。雇主往往把停厂安排在工会正在权衡一场罢工的时候，起到先发制人的作用，这时工会就面临选择，是举行罢工，还是与雇主达成协议，或是在谈判达成协议之前先行工作。但雇主很少采用停厂的办法。在协议期满时，雇主通常会单方面宣布他的条件，让工会在罢工和谈判达成协议之间作出选择。最容易导致闭厂行动的场合，是在工会为反对雇主协会的某一成员而号召举行罢工的时候，这时其他雇主为声援这个受罢工影响的雇主便可能关闭他们的工厂，停厂更有利于雇主协会采用而不是单个雇主采用。根据联邦法，雇主在受到工会罢工或经济损害的威胁时，为迫使工会接受他的合法交涉立场，采用停厂是合法的；如果工会正在采用“串通”伎俩，雇主协会成员进行同情性停厂也是合法的。但若雇主在并未受到罢工威胁时，把停厂作为一种不公正地压制工会的方法，则是非法的。

停工点（Shut－Down Point） 停工点是对厂商生产行为进行短期分析的一个概念。在厂商的产量曲线中，产品的价格等于平均变动成本而厂商的损失等于总固定成本的点为停工点。在短期内，商品的价格若高于停工点则可以继续生产，若低于这一点，则应停工。因为继续生产不仅不能弥补固定成本，连变动成本也不能弥补。

船边交货价（Free Alongside Ship；F·A·S） 国际贸易价格术语，属装运港交货系统。依照《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船边交货价格术语下，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如下：

1.卖方义务

(1)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货物及有关凭证；

(2)在规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在约定的装运港买方所指定的装货码头，按照该港惯常方法履行船边交货，并无延迟地通知买方，已在船边完成交货；

(3)根据买方请求，并在买方负担风险和费用的情况下，给予买方协助，使买方获得出口许可证或政府所签发的有关货物出口的其它证件；

(4)除依照上述买方义务（3）（4）条款规定外，负担货物的一切费用和风险，直至在指定装运港船边交货为止，其中包括因办理船边交货的任何手续而产生的费用在内；

(5)自费供给货物的惯常包装，但依行业习惯，如对该项货物的运送无需包装，则不在此限；

(6)负担因办理船边交货而需支出的任何检查费用，如核对品质皆、过磅费等；

(7)自费供给通常的清洁单据，证明已履行船边交货义务；

(8)根据买方请求，并在买方负担风险和费用的情况下，给予买方一切协助，使买方获得装运地或原产地国家签发的、为买方所需的货物在目的地进口或必要时经由第三国过境运输的任何凭证，但提单或领事签证单据除外。

2.买方义务

(1)及时将船名，装货码头及船边交货日期通知卖方；

(2)自卖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或期限，在指定装运港船边有效地交货时起，负担货物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并依照合同的规定支付价金；

(3)如买方指定的船只不能及时抵达，或未能装载上述货物，或在规定的日期前截止载货，买方应负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并自卖方将货币置于买方控制下起，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但以该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4)如买方不能及时指定船只，或对受领货物、选择装运港曾保留一定期限却未能及时给予卖方详尽指示者，应自原订期限终了时起，负担由此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和风险，但以该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5)支付应买方请求，卖方领取的各项凭证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从以上解释通则的规定可以看出，买卖双方风险，责任转移的分界点是船边码头吊钩所及之处，具体地说，卖方负责将货物运至海船船边，以便买方得以使用船上或码头上的吊钩将货物吊至船上。当载货船只停泊在码头旁时，卖方应将货物安放在该船吊钩所及之处；如果载货船只无法进港停泊，则卖方须支付雇佣驳船运货的费用。但是，卖方不负担装船的责任，也无须负担装船费用，对于装船所需的手续，卖方可协助买方办理，但风险和费用则由买方自行承担。

领事发票（Consular Invoice） 领事发票是国际贸易中，进口国家驻出口国家领事馆制订的商品进口发票，由出口商填写，进口国领事签字盖章，若采用信用证方式结算、领事发票的内容不得与信用证内容

相抵触。领事发票的主要作用是供进口国海关核对货物原产地及进口货价，以便确定有关倾销。同时，由于领事发票的签发需交纳签证费用，这笔费用也就成为领事馆经费的来源。

维斯比规则（Visby Rules） 维斯比规则的全称是"修改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它是对海牙规则的修改和补充。维斯比规则于1968年2月在布鲁塞尔签订，并从1977年6月起生效。由于该议定书的起草工作最初在瑞典的维斯比完成，故得名。维斯比规则为承运人的赔偿限额规定了双重标准，并规定以金额较多者为准，这实际上提高了承运人的赔偿限额。该规则还增加了一项集装箱条款，以便确定货物的计量单位。总的来说，维斯比规则对海牙规则作了少量肤浅的修改，它未对承运人的许多不合理的免责条款作修改，因而不足以显著改变托运人在货物运输过程中的不利地位。

维克塞尔，克努特（Knut Wicksell，1851—1926） 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创始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先驱者。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小商人家庭。1885年获乌普萨拉大学数学硕士学位。此后五年周游西欧各国，专门研究经济学。1895年又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00年转入隆德大学任教，1904年升任该校教授，至1916年退休。晚年过着隐居生活，并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激进的改良主义者，曾因触犯当局而被监禁过。维克塞尔在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既维护和发展着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又开创了现代客观经济学的重要学说，从而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维克塞尔的主要著作有：《价值、资本和地租》（1893年）、《利息与价格》（1898年）和《国民经济学讲义》（1901年、1906年）等。

累积过程学说 维克塞尔在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学说，为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累积过程学说上面。他首先区分了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前者是指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利率，后者主要是指假定在实物经济条件下借贷资本应有的利率，它同货币利率相比占据着主要地位。货币利率取决于货币当局，因为它能运用政策手段调整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自然利率则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以及工资和租金所决定，即资本参与的生产过程越迂回，其生产率越高，而在其他情况（包括资本生产力）为既定时，工资和租金水平的高低又直接决定自然利率。当这两种利率恰好相等时，投资（即资本的需求）就等于储蓄（即资本的供给），价格水平稳定不变，经济体系保持着均衡状态，而货币亦不起任何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两种利率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变动的，且变动的方向不尽一致，这就导致价格水平发生变动。若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资本预期收益的折现值就会提高，从而刺激资本需求增加，进而又导致信用膨胀、货币收入上升和物价上涨等累积的经济扩张过程。若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则出现相反的累积的经济紧缩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下，价格水平将会累积性地下跌或上升，故称之为累积过程。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学说至少有如下方面的贡献。

(1)开创性地区分了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传统经济学对利率的理解比较狭隘，把实物资本利率与货币利率混为一谈。维克塞尔指明它们间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而且当它们不相等时还会发生价格水平的累积过程。这就为价格水平的决定和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开拓出一种极富启迪意义的新思路。

(2)首次将一般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传统经济学历来推行所谓"两分法"的做法，认为一般经济理论是相对价格形成的学说，货币理论则研究绝对价格水平问题，两者并无直接的关联。但维克塞尔强调，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的条件下，货币确实只起着流通媒介和衡量尺度的"中性"作用，而当这两种利率相背离时，货币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动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价格，从而使之成为决定商品相对价格和供给量的因素之一。这样，他就第一次把阐述价值论和分配论的一般经济理论与论述绝对价格水平的货币理论融合进同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

(3)建立起第一个现代宏观经济均衡体系。传统经济学一向信奉"萨伊定律"，坚持总供给永远等于总需求的基本思想，根本谈不上建立宏观经济的均衡体系。而维克塞尔在论述累积过程理论时，明确认为总需求不一定等于总供给，并且分析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背离对经济的影响时，总是着眼于投资与储蓄和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可见，他比凯恩斯早30年就提出了宏观经济均衡的理论体系。

不过，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学说仍有严重的缺陷，如"自然利率"的定义较为混乱、论述有矛盾之处等，因而以后又由瑞典学派其他学者作了许多修正、补充和发展。

其他学术贡献 如果说累积过程学说主要是对货币利息理论的开创性贡献的话，那么，维克塞尔对一般经济理论也有突出的成绩。它们主要有：

(1)系统阐述一般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维克塞尔早在维克斯蒂德和克拉克之前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并用边际生产力解释了工资、地租和利息的决定，使之具有普遍意义。他还第一个用完整的数学公式来表述这种一般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但是他本人对此缺乏认识。

(2)严密分析国民收入的相对份额和绝对份额。按他的说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的增加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绝对量随之上升，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相对份额则随该社会所达到的资本密度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下降速度而定。他还对此作了具体分析。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社会总产量自然随技术发明而增加，但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有时还包括绝对量）却会下降。维克塞尔这个独特而新颖的思想对后来的学者有较大的影响。

(3)指明生产系数的可变性。维克塞尔的学说吸收了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但对后者关于技术系数不变的假定作了修正。他明确认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断地为另一种所替代，此即生产系数可变性的思想。它对以后的生产理论发展起着有益的推动作用。

维克赛尔效应（Wicksell Effects）　一种关于经济中的实际利率可以与资本的总边际产品不一致的观点，由瑞典经济学家K·维克赛尔（K·Wicksell）提出，故名。维克赛尔认为，资本供给（即投资）的增加，不仅影响新资本品的价格，而且还会改变受到估价的现有资本存量的单位。工资增加和利率下降的净效应是提高现有资本的价值。这就意味着，在两个经济中虽然实际资本存量相同，所用的技术也一样，但资本的价值可以由以工资和利率的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这种效应被称为价格维克赛尔效应（Price Wicksell Effect）。实际维克赛尔效应指技术变化所引起的利率变化。负实际维克赛尔效应实际上就是剑桥学派所说的“资本反转”（capital—reversing）。维克赛尔效应与新古典学派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理论相反。根据资本边际生产率理论，当资本价格（即利率）下降时，将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但根据维克赛尔效应，当利率下降时，可以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

维克赛尔累积过程（Wicksellian Cumulative Process）　瑞典经济学家K·维克赛尔对经济变动过程的一种解释。维克赛尔把利率区分为市场利率和自然利率。市场利率又称货币利率，指金融市场的借贷利率，自然利率指假定资本借贷不使用货币而使用实物情况下所应有的利率，实际上就是“预期利润率”。资本投资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差额，只要这种差额存在，经济就会发生累积过程。如果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资本的预期收益按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资本的预期收益按市场利率计算的折现值就会提高。这样，就会使资本品的需求增加，信用膨胀、投资超过储蓄、货币收入增加，价格水平上升。这种经济扩大的过程是一个累积过程，即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使经济不断扩张，所以，称为累积性扩张过程。反之，如果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也会发生相反的累积性收缩过程。只有在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投资等于储蓄，从而物价水平不变时，经济体系才会处于均衡状态。维克赛尔对累积过程的分析使经济学从静态分析进入动态分析，对以后有相当大的影响。

维持生存说　一种早期的工资学说，认为工人的工资由维持其最低限度生活水准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量所决定。重农学派的魁奈和杜尔阁、英国古典经济学者李嘉图都明确阐述过这种学说，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维持生存说是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的一种流行的工资理论。

维持生存工资理论　18世纪初由法国重农主义者杜尔阁和魁奈提出的一种工资理论，后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学者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修正。该理论认为，就长期则言，产业社会中工人的工资与最低生活费用相等，即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这既包括维持工人本人的生存，又包括维持其家属的生存，为社会未来的扩大再生产准备足够数量的补充劳动力。如果工资低于这一水平，工人阶层、人口死亡率上升，劳动力供给相应减少，工资就会提高；如果工资高于这一水平，就会有更多的孩子出世，因为父母养得起他们，劳动力供应随之增加，工资就会减少，跌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亚当·斯密认为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随着工人人口的自然增长，工资会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而在最繁荣，或者说走向富足最快的国家，劳动工资是最高的。国民财富增加是决定工资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当时英国处于上升状态，所以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要比重农学派的理论乐观得多。而且斯密承认维持生存的水平不仅取决于生物学上的需要，也部分取决于一国的风俗习惯，因而其水平的严格性有所削弱。李嘉图认为劳动同时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自然价格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使劳动者大体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即所谓维持生存水平的工资。市场价格指根据劳动力供求比例实际付给劳动者的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可能与其自然价格相偏离，但由于工人阶级人口增长率的变化，

二者将会趋于平衡。李嘉图对这一理论的突破在于，他认为工资是由劳动力供求比例决定的，由于一国资本的增加，例如在新殖民地，资本可能比工人阶级的人口增长更快，劳动力需求比供给相对增长，从而将促使工资提高。此外，"社会进步"也会在某个时期使劳动力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他极力主张通过各种方法降低工人阶级人口增长率，从而保障其成员的长远福利。坚持维持生存工资理论的大都是早期经济学家，其理论前提大都类似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物质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人口数量终将达到使人只能维持最低生活的水平，他们都对生活标准是否会提高到超过仅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物质需要不抱乐观态度，这既反映了早期工资理论的幼稚，不成熟，也反映出当时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处境给早期理论家造成的深刻影响。维持生存工资理论不能解释当时的许多工资现象，如各类工人之间当时已存在的工资差别等问题，人们在19世纪中叶就基本放弃了这种理论，转而赞同工资基金论，而工资基金论后来又被边际生产率工资论所代替。

维色尔，弗里德里希·冯（Freridich von Wieser，1851—1926）　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富裕家庭，成年后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及历史。1872年在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影响下，对经济学发生浓厚兴趣。毕业后曾赴德国多所大学进修，在历史学派诸代表人物的分别指导下攻读经济学。1883年担任维也纳大学的讲师，以后又被聘为布拉格大学教授。1903年继任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讲座教授。1917年任上议院终身议员，同年还入阁任商务部长。1919—1922年再返维也纳大学任教，并于1923年被聘为该校名誉教授，直至逝世。

维色尔的经济学著作主要有：《经济价值的来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自然价值》（1889年）和《社会经济学》（1914年）。

边际效用论　在经济学史上维色尔被看成是首先创立"边际效用"一词的学者。此前，戈森、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都提出过有关的思想或名称，但"边际效用"一词因其准确贴切而为大家所普遍接受。作为门格尔的追随者，他不仅承袭了其老师的边际效用论，并且加以发挥补充，提出了"边际效用定律是价值的一般定律"这个命题。按他的阐述，边际效用既决定着某一具体物品的价值，也适用于对整批物品的评价。具体地说，在一批同类物品中，任一件都具有边际效用的价值。若需求不变，供给量越大，价值就越小，反之则越大；若供给量不变，需求越大，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而且，这许多件物品中的每一件都具有同样的边际效用的价值，因此，一批同类物品的价值就等于边际效用乘以件数之积。维色尔的这个理论观点同奥国学派另一著名代表庞巴维克的边际计量公式，有着明显的歧异。

归属论　维舍尔把边际效用分析应用于成本和分配理论，被视作对经济学的又一贡献，其中用以决定生产资料价值量的"归属理论"十分著名。他认为，生产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产品的价值或生产收益的价值决定的。具体地说，各个生产要素相结合来生产收益，意味着每一种要素都对生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也就须在总收益中得到一份"归属"于自己的份额。而生产总收益中归属于各别生产要素的份额，就是这些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的收益。这样，生产总收益的价值等于全部生产贡献的总和。维色尔还强调，边际效用定律同样适用于生产贡献的归属问题，即每一单位生产物品也都从归属于它的边际贡献获得它的价值。在他看来，这就弥补了门格尔原先考察生产物品的价值时忽视生产要素总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缺陷。

维色尔的成本分析亦有其独特之处，在他看来，某生产要素生产一种物品，意味着原可用该要素生产的另一种物品的牺牲，换言之，后一种物品的效用即为前一种物品的成本。这实际上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由于他没有采用真实成本概念，其所阐述的成本规律实际上同客观的真实成本分析毫不相干，因此他一再申言成本与效用并无根本对立。这表明，维色尔的成本理论依然未脱主观学派的窠臼。

维克斯蒂德，菲利普·亨利（Phili Henry Wicksteed，1844—1927）　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英国利兹的一牧师家庭。获伦敦大学硕士学位后，曾担任牧师一职达30年之久，并成为伦敦宗教界的领导人物。中年转向经济学研究后，一直致力于宣扬边际效用学说，后来还辞去牧师职位，专心从事著述。他的主要著作是《经济科学入门》（1888年）、《论分配规律的协调》（1894年）和《政治经济学常识》（1910年）。维克斯蒂德作为边际效用理论宣传家在当时颇负威名，他善于应用深入浅出的非数学语言，结合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讲解那种以数学为中心的纯粹经济学原理。他十分强调分配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协调"，极力主张必须从边际效用论直接引伸出边际主义的分配论，并且批评某些人的分配论同其边际效用理论的不一致性。在此基础上，他较好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还发挥了全部产品被各种生产要素完全分光的重要思想。他在达文波特之前已论及"机会成本"理论，只不过还不够深入完整。应该说，维

克斯蒂德在边际理论分析方面自有其特点和贡献。但由于克拉克很快就提出了系统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维克斯蒂德的学术成就和普及宣传的成功反而被人忽略和埋没了。

萨伊，让·巴蒂斯特（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 法国经济学家。

生平和著作 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从事商业活动，后赴英国一商业学校学习。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正在一保险公司任经理秘书，曾一度积极支持革命，投身军队，后又跟随大资产阶级一道反对革命。1794年到1799年期间，担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杂志主编，并发表过许多经济学文章。1799年被任命为参议员。1803年完成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概论》。因为同拿破仑的思想不合，他不久即被解职并离开巴黎，其著作也被禁止发行。拿破仑下台后，萨伊的学术研究活动得到波旁王朝复辟政府的支持。1816年，他在法国阿森尼大学讲授经济学，这是法国第一个经济学讲座。两年后又在国立矿业专科学校开设工业经济学讲座。1830年担任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

萨伊的经济学著作主要有《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政治经济学问答》（1817年）、《政治经济学教程》（1828年—1829年）。后两本书主要是对第一本书所建立的经济学体系加以阐释和扩充。

经济学三分法 萨伊自认为对亚当·斯密的学说作了通俗化和条理性的阐述，资产阶级学者也常常称誉他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早一位分类学家，把政治经济学整理成一个严整、清晰的学说体系，这主要就在于他倡导了所谓的“经济学三分法”。按他的说法，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因而理论体系可以由此分成三部分。这种“三分法”表明，生产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而分配作为它们之间的媒介，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至于经济活动四个环节中的交换则在生产部分加以考察，因为按照他的销售理论需求是由供给自行创造的，商品交换中的矛盾和困难实际上就是生产问题。

这个形成萨伊学说总体结构的“三分法”，将生产、分配和消费相提并论，抹煞了生产的决定作用，而且只强调它们的一般特征，完全回避了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下的特定性质。所以“三分法”实质上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接着，詹姆斯·穆勒又进一步将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部分。“经济学三分法”和“四分法”大致规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成为以后各种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生产三要素论 萨伊对生产作了独特的解释，认为它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同时又主张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效用的大小。在创造效用的过程中，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各自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因而它们全都是创造商品价值的要素。他进一步指出，工资、利息和地租就是对劳动、资本和土地自身耗费的一种补偿，是为取得它们的生产性服务所付的代价。这一种收入组成了创造商品效用的生产费用，直接决定着商品的价值。可见，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是一种以效用论为基础的生产费用论，即庸俗的价值理论。它实际上利用和发展了亚当·斯密价值理论中的庸俗成分。

在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萨伊又用“三位一体”公式来阐述其分配理论。按他的说法，生产三要素都是创造价值的源泉，那么它们的所有者就可以根据各自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分别获取各自应得的收入：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在这里，利润这种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则被萨伊说成是企业主阶级进行劳动所得的报酬，是一个同资本并无关系的经济范畴。这样，本来都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上述三种收入，却被解释成都来自独立的源泉，从而掩盖了利息和地租的剥削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马克思把萨伊这种分配理论称之为“三位一体公式”，并揭露其实质在于“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

销售理论 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剩问题，萨伊详细论述了商品的购买力源泉和销售问题，形成了著名的销售理论。这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产品实现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所需要的只是货物而不是货币，出售一种商品必然会购买其他的商品，因而货币不过只是“转移价值的手段”即交换的媒介。在这样把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归结为物物相交换的行为后，买与卖无疑成为同一个过程，即出售就同时在购买。于是，萨伊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换言之，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他进一步指出，既然供给同时就是需求，自然就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至于局部的生产过剩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因为一种过剩的产品必然会价格下跌，并逐渐导致其供给减少，而另一种不足的产品则将价格上涨，并推动其供给增加，这样各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就趋于平衡，使得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过剩的现象不可能长久存在。他甚至断言，倘若真有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则是政府当局对生产横加干涉的严重后果。这种以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为中心思想的销售理论，史称“萨伊定律”。

从“萨伊定律”出发，他又进一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第二，一个企业获得成功，可以

帮助其它企业也达到成功；同样，一个民族的农业与工商业之间也会互相促进。第三，购买和输入外国货物不会损害国内的生产。第四，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

萨伊的销售论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它把资本主义流通混同于物物交换，抹煞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目的在于追逐剩余价值，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完全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是，它顺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对封建障碍，主张经济自由，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同时其中包含的有些思想还有着一定的科学成分，如生产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创造需求，国家应当按照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外贸活动会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等。"萨伊定律"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信奉的经典，在遭到凯恩斯经济学的致命批判之后，其学术影响已大为削弱，不过在当今的西方经济学界仍有不少信奉者，如美国的供给学派学者等。

其他经济思想　萨伊的有些思想尽管本身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和错误，但对经济分析还起着较明显的积极作用，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的消费理论。他把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加以区分，认为后者的结果是产品效用即价值的真正消灭，它仅在于满足人的欲望和享受。因此他提出了非生产性消费的一般原则，坚决反对奢侈消费。他又对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作了区分，认为前者应实行节约的原则，后者须以产生的社会利益大于由此而牺牲的价值为基本准绳。例如，教育费用有利于财富增长，应建立和发展学术机构和最高学府，并提高劳工阶级的知识水准；建筑费用要用来修筑道路、桥梁等，而不该装修宫殿、纪念柱一类没有效用的建筑物；国家行政、司法、军事等费用则需控制在最低限度。他还阐明了赋税原则，主张国家财政尽量少花费，而征税应当税率适度、课税公平、租税额小。

萨伊充分论述了"企业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并未明确提到过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而萨伊已使之成为经济分析中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企业家是生产组织的创办人，执行着真正的创造功能，管理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利润则是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在英国经济学中，拉姆赛曾于1836年提出了"雇主"在生产的分配中起着主导作用及其报酬为利润的思想，但"企业家"的概念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在杰文斯的著作里。此后，马歇尔和奥国的熊彼特都对企业家的地位和功能有过杰出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萨伊有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萨伊还十分强调人才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才比物质财富和生产资源更为宝贵，并且痛惜战争破坏最严重的是造成了无可补偿的人才损失。为了使人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他主张应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们的智能，从而推动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萨伊能在19世纪初已注意到人才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萨伊定律　参见萨伊条

萨伊定理（Say · Law）　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所提出的供给本身创造需求的理论。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第一篇第十五章"产品的出卖或需求"中详细论述了这一理论。其基本观点是：第一、一种产品的生产给另一种产品创造了需求。第二、货币交易的实质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换，货币只是在交换的瞬间充当交换媒介。第三、某种产品过剩是因为另一种产品不足。这就是说，造成生产过剩的原因是供给不足。第四、局部的产品供求失衡可以通过价格来调节。这就是说，在短期中可能出现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的情况，但通过市场上价格机制自发的调节作用，在长期中必然是供求平衡的。由这四个基本观点出发，萨伊又引出了四个重要的推论：第一、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到的利润也越大，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加。这就是说，供给决定了需求。第二、每一个人都和全体的共同繁荣有利害关系。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就可以帮助别的企业也达到成功。这就是说，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可以实现社会的公益。第三、购买和输入外国物品决不至损害国内或本国产业和生产。因为购买国外的物品要用本国的产品或本国产品所购买的现金来支付。无论用现金还是本国产品偿付外国物品价款，对外贸易都同样给本国产业的产品开辟了销路。所以，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第四、鼓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因为鼓励消费仅仅是刺激消费的欲望，而无助于刺激供给消费的手段。发展经济的困难而不在消费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只有刺激生产才能刺激供给消费的手段。萨伊定理对以后经济学的发展影响甚大。30年代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把萨伊定理作为基本出发点。这就表现在：第一、重视总供给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重视生产的作用。第二、相信通过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经济中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否认了失业与生产过剩性危机产生的可能性。第三、由相信价格机制调节作用出发得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

政策。第四，经济学研究实物经济，忽视了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凯恩斯批判了萨伊定理，强调了需求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70年代之后，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又重新提出了萨伊定理的正确性，强调了供给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主张通过减税刺激个人与企业的积极性来增加供给。

十二画

锁住效应（Locking—in Effect） 资产价格下降而使资产所有者不能出售其资产的效应，由美国经济学家R·鲁萨（R.Roosa）最早提出并论述，所以又称"鲁萨效应"。典型的情况是，在利率显著上升而证券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证券持有者被阻止出售其证券的影响。因为证券价格的下跌必将使出售证券者蒙受损失。这样，证券价格的下跌就会影响证券交易。

滞胀（Stagflation） "停滞膨胀"的简称。"滞"指经济停滞，失业率高；"胀"指通货膨胀严重。滞胀就是低经济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交织并存的状态。这种状态70年代初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

根据凯恩斯主义，失业与通货膨胀是不会并存的。存在失业时，总需求的扩大只会增加就业，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只有在实现了充分就业时，总需求的扩大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种观点反映了30年代的情况。根据50年代的情况而提出的菲利浦斯曲线修改了这一观点，承认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存，但又强调了这两者之间的交替关系，即通货膨胀率时失业率低，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低。70年代滞胀的出现否定了以上的理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争论。各派对滞胀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主要观点如下。

"失业紧跟通货膨胀"论。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F·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滞胀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失业并不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由于背离了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均衡价格和工资水平使劳动力供求失衡。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来换取充分就业。结果，通货膨胀改变了各部门和生产过程各阶段的货币流量分配，引起对物价进一步上升的预期。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就使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这样，不仅失业没有解决，而且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致于造成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

"通货膨胀和失业相互加强"论。这是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菲利浦斯曲线所表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关系只在短期中存在，从长期来看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这种自然失业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原因引起的。企图把失业率降到自然率之下就要借助于菲利浦斯曲线的短期效应，即在短期中由于人们的通货膨胀率预期低于实际水平，引起实际工资暂时下降和失业减少。一旦人们的预期调整到实际通货膨胀的水平，实际工资就要回到原有的水平，从而失业率又回到原有的水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以通货膨胀来换取充分就业。结果，从长期来看，充分就业没有实现，而通货膨胀加剧了，这样，就形成了滞胀。

"劳工市场的均衡和失衡论"，又称"失业与空位并存"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劳工市场上失衡的特点是既有人失业，又有工作无人作，即失业与空位并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劳工市场的结构特点,例如，技术结构、性别结构或地区结构。这就是说，劳工市场上的失业者并不是有空位的部门所需要的。这种失业是结构性失业。但是，工资决定的特点是有空位则工资增加，有失业工资并不下降。工资的不断上升引起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货膨胀并不能解决结构性失业。于是，就出现了失业与货膨胀的并存。

"市场操纵"论。这是英国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J·罗宾逊和N·卡尔多的观点。这种观点从不同类型产品市场价格决定的特点来分析滞胀问题。这就是说，在初级产品市场上，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在工业品市场上价格由垄断厂商自己决定，是一种操纵价格。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都会对工业生产起到抑制作用。当初级产品价格下降时，会减少对工业品的需求而不利于工业；当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时，会增加工业品的成本而不利于工业。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引起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货膨胀又不利于工业发展，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产生失业。70年代初的滞胀正是由于石油价格上升所引起的。

"两种价格体系"论。这是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

斯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两种市场：大部分工业品是由生产者定价的固定价格体系；另一种则是由供求定价的“弹性价格”体系。弹性价格体系中的工资与物价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这一体系中的通货膨胀会影响固定价格体系。一旦固定体系中发生了通货膨胀后就不会下降，而这种通货膨胀不会减少失业，从而就引起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

除上述观点外，对滞胀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把滞胀归咎于引起美国战后繁荣的因素的消失，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用福利支出增加引起的自愿失业者增加、经济效率下降和财政赤字严重来解释滞胀，等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滞胀作出了解释，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被认为是最令人满意的解释。

暂时性消费（Transitory Consumption）　消费中没有预见到的增加或减少。这种消费变动取决于暂时性收入的变动。以 C_t 代表暂时性消费，Y_t 代表暂时性收入，C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有：

$$C_t = C \cdot (Y_t)$$

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M.Friedman）在其持久收入假说中强调了暂时性消费与持久消费之间的区别，认为暂时性消费仅仅取决于收入中一时的，偶然的变动，与持久收入无关，也与持久消费无关。一般说，暂时性消费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中收入的一时性变动相关，取决于某些外生变量的影响。暂时性消费的变动从长期来看可以相互抵消，从而不影响长期中消费倾向的稳定性。

暂时性收入（Transitory Income）　收入中没有预见到的增加或减少。这种收入变动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所引起的，诸如经济周期的阶段性，或其外生变量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M.Friedman）把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认为暂时性收入通过对现期收入的影响而影响持久性收入，但从长期来看，暂时性收入的变动是可以互相抵销的，从而对持久性收入的影响就很小。暂时性收入决定暂时性消费，即暂时性收入的变动引起消费一时的增加或减少，但并不影响持久性消费。因此，暂时性收入仅与暂时性消费相关，而与持久性收入与持久性消费无关。

暂时贸易（Temporary Trade）　暂时贸易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的本国物品暂时输出国外和外国物品暂时输入国内的活动，因此，暂时贸易由暂时出口和暂时进口构成。暂时出口的物品在经海关许可暂时输出国外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输入国内。暂时出口的物品种类很多，如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本国展品、本国文艺团体出国演出用的服装道具等等。根据海关规定，对暂时进口的物品可以免征关税，不过有时要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以保证该物品在规定期限内再输出。当物品再输出时，只要经海关验明确系原物时，即可发还保证金，并予以免税放行。同暂时出口一样，暂时进口的物品种类也很多，而且两者较类似。由于暂时贸易不涉及买卖活动，只是物品的暂时流动，因此，暂时贸易的物品不属于对外贸易的对象，因而也就不把它们归入对外贸易统计中。

暂时解雇（Temporary Layoffs）　失业的一种形式，指被解雇者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复职。这种失业在两种情况下产生，一是由于短期总需求不足，企业暂时减产或停产，但一旦生产恢复后，企业就会马上召回自己企业被解雇的工人。这种情况反映了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尽管不得不解雇工人，但仍会优先录用这些工人。二是由于季节性失业，季节性失业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生产有季节性的行业处于淡季时要解雇工人。但当生产旺季到来时，则会优先雇用原来属于自己企业的工人。暂时解雇属于一种临时性失业，对工人的威胁并不大。由于经济中这种失业占了一定的比例，所以，失业队伍的流动性就大，即尽管失业率不变，但总有一部分人失业，而另一部分人就业。这样，就减少了失业对社会的威胁，可以使自然失业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而又不引起社会动荡。

暂时均衡(Temporary Equilibrium)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运行过程是经济单位预期和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单位对未来的预期决定着现时的经济变量，而这种预期又决定于经济单位所掌握的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各种信息。这样，要研究动态经济体系，就必须了解经济因素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由此，希克斯（J·R·Hicks）等经济学家提出了暂时均衡方法，在动态经济模型中考虑到预期因素与经济变量的实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使用了均衡和博奕理论的内容。

设经济系统中，时间因素是无限的、不连续的，又设商品交易在一个日期，如日期O进行，商品交付日期为t（t>0），从而就可以得到在开始日期t=0关于未来市场的一个完整的集合。这种结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若日期O处达到均衡，生产和交易又会按着先后顺序进行；在另一个日期达成均衡。这种均衡状态决定于经济单位的预期，其间关系可表示为：

$$X_t = f(x^e_{1,t+1} \cdots x^e_i, t+1, \cdots, x^e_{mt+1})$$

$$X^e_{i,t+1} = u_i(x_t, x_{t-1}, \cdots\cdots)$$

其中 x_t 为 t 日期的经济状况，$X^e_{i,t+1}$ 为 t 日期经济单位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这样，经济单位基于过去和现时的信息对未来经济状况进行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得到不断的调整，暂时均衡不断地得以实现。

暂时均衡方法的提出大大推进了对于货币理论，凯恩斯失业模型，更广泛地说，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的理解。在暂时均衡方法下，经济的演进就表现为暂时均衡的连续实现，同时，现实的均衡状态又决定于过去的均衡。对于暂时均衡理论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在何种条件下，暂时均衡得以存在；动态经济体系是否有长期均衡状态，如果存在长期均衡状态，连续的暂时均衡是否会向这一长期均衡收敛等等。暂时均衡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在确定的经济情况下有效，而且在不确定的、多维世界中依然有效。

税收 (Taxation) 是国家向具有纳税义务的个人，组织和企业无偿征收的货币与实物，具体的职能一般是由国家税务机关的定期强制征收而完成。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它连同国家的财政体系对国民收入具有分配和再分配的作用。一般认为税收是为了纳税人的整体利益而征收。它不同于个人为了取得某种权利而缴纳给政府的款项。当然特别是早期的某些赋税往往与纳税者的利益相关不大，而是维持官僚阶层的生活。税收伴随着国家公共权力的产生而产生，是国家的一种经济职能。从历史上考察，税收前后采取了劳股、货物与货币三种形式。现代社会的税收主要是以货币形式收缴的。税收包括税收对象(货物、交易或金额)、税收基础，即征税所适用的一定的物资单位或货币基础 以及征收的标准，时间期限等、税收可以按不同的方法划分为不同种类，比如按税收负担能否转嫁将其分为直接税、间接税、前者指纳税人不能将税负转嫁给别人的税收，如遗产税，而后者则能。此外还有从量税、从价格，累进税、累退税等分法。税收具有三大特点：(1) 强制性，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通过颁布法律法令进行强制课征。(2) 无偿性，税收被征收以后，该部分财产的所有权便从纳税人转向国家，而纳税人不能得到任何抵偿。(3) 税收的征收必须具有一定限度。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纷纷被许多西方国家采纳，税收就进而成为调节经济的手段。除了筹集财政资金、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外，税收对配置资源、稳定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关于税收的概念经济学家们有过种种表述，如孟德斯鸠认为"税收是市民欲求财富安全，或欲求财产得到安乐，分割一部分给国家"，李嘉图定义为"租税是一国土地与劳务的生产物中，交由政府处理的一部分"。这些定义都有其片面性。现在经济学仍然基本赞同李嘉图提出的税收的四大原则：(1) 平等原则，国民纳税应具有平等性；(2) 确切原则，各人应纳的税收应是确定的，不能随意变更。(3) 便利原则，各种税缴纳的方法和日期，须给纳税人最大的便利。(4) 节约原则，即最少征收费用原则。现代的税收理论强调税收的效率原则，不仅要求管理与执行费用少，而且在竞争的市场机制下，税收要尽可能保持中性。

税收与补贴(Taxes And Subsidies) 税收与补贴是指理论上将边际个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更为紧密结合的矫正方法，只要经济社会出现外部性偏差，就需要使用这种矫正方法，以保证边际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的结合。这种外部性可能产生于厂商之间，他们的技术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厂家的投入或产出会受到另一个厂家的影响；这种外部性还可能受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所包含的某一变量也正是另一个消费者效用函数中所包含的变量。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厂商的最优行为都意味着此时边际个人成本等于其边际个人利益，如果这一数值与个人最优行为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也相等，此时即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否则，就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产生外部性问题，这时通过征税这种财政干予手段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例如，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太多会使公路显得非常拥挤，但是，由于交易成本过大，通过谈判的方法降低这种外部成本是不可行的，从而需选择次佳方案，如可以征收汽油税、执照费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路的拥挤状况，在各种可选择的次佳方案中，征税方法是比较好的一种。当然，在其它情况下，也可能会选择其它方法，例如，对烟草征税的确减少了抽烟人对不抽烟人形成的外部成本，但是在实际中测算这一外部成本是很困难的，这样，在某些地方就可以明令禁止抽烟，这种办法比对抽烟者一给他人造成不便就征税更为可行，总之，税收与补贴方法可以解决谈判桌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但这种解决是就社会效率的角度，而不是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的。

税收漏洞 (Tax Loophole) 狭义的税收漏洞指一项税收法案或章程的非故意的和事先未曾预料到的避税收益 (revenue of tax avoidance)，这个收益由某些纳税人获得。税收的漏洞由税法起草中的疏忽所造成。广义上的税收漏洞指一项税收带给某些个人或团体的某种好处，漏洞的造成既可能是无意的，也有可能是有意的。实际上管理当局常常利用税收漏洞提

供税收刺激来促进某些领域的经济活动．税收漏洞也常常反映压力集团或游说集团对法律制定的影响上。通常人们所说的税收漏洞的含义是指广义上的税收漏洞。

税收饶让抵免　(Tax Sparing Credit)　指居住国（国籍国）政府对于本国居民（公民）获得的非居住国（非国籍国）减免税款的优惠待遇视同已在该非居住国（非国籍国）实际缴纳税收而准予饶让抵免。

这一措施是抵免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它解决了抵免方法带来的对非居住国的歧视。所谓歧视指的是非居住国出于各种目的而给予跨国纳税人的税收优惠在抵免方法下等于让居住国政府享受而未落实到跨国纳税人。（参见"抵免方法"）这样，不仅非居住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失去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居住国侵犯了非居住国的税收权益。因此，对于非居住国出让给跨国纳税人的税收优惠，居住国应视同已在国外缴纳税款，不应进行税款补征。

应该指出，居住国所饶让抵免的税额本来就不在该国居民税收管辖权之下，而是属于非居住国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范围，所以，这一措施对于居住国而言既毫发无损又成人之美，应是何乐不为？

一般而言，税收饶让抵免大多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大多数发达国家对于这一措施的确是乐于配合，当然也附加有关条件。只有少数国家不予合作，所持理由主要是税收中性原则等。

税收管辖权　(Tax Jurisdiction)　指各主权国家政府所拥有的征课税收的权力，这一权力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它允许主权国家在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前提下，选择最符合本国国情和利益的原则来对某政治权力范围内的人员和经济活动行使征课税收的权力，亦即行使其税收管辖权。

各国的税收实践显示，税收管辖权的选择有两大原则可以遵循，一是依地域概念确定的属地主义原则；二是依人员概念确定的属人主义原则。由这两大原则又可以具体化为三大税收管辖权，它们是：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公民税收管辖权。

一般而言，多数国家都同时实行双重税收管辖权，这主要是出于保证税收收入的考虑，比如，如果发达国家只采取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那么就会失去其资本输出的所得这一税源，而如果发展中国家只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那么它就会失去外国自然人和法人取自本国的所得这一税源，这两种情况都会给有关国家带来较大税收损失，所以有关国家只有同时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实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同时也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这主要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多米尼加等等；同地，也只有极少数国家不只实行双重税收管辖权而是实行多重税收管辖权，如美国、墨西哥等国，它们在行使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税收管辖权之外还要行使公民税收管辖权。

由于税收管辖权的复杂情况，引起了许多国际税收问题，比如由于税收管辖权交叠而引起的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由于税收管辖权脱节而引起的国际避（逃）税问题等等。但须说明，税收管辖权的交叠与脱节只能算是国际双重征税和国际避（逃）税现象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税收指数化（Indexation of Tax）　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征税起征点与税率等级，以保证实际纳税额不变的一种作法。当经济中发生了通货膨胀时，人们的实际收入不变，但名义收入增加了。税收是根据名义收入征收的。这样，如果纳税的起征点不变，就会有更多的人符合纳税标准。如果税率等级不变，就会有更多的人进入更高的纳税等级。从而，通货膨胀使实际交纳的税收增加，引起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的收入再分配。这种收入再分配还会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就应该根据通货膨胀率来定期地调整税收标准。其中包括调整起征点，即使免税部分的实际标准不变，以及调整税率等级，以使税率等级不变。还有一些税是特别规定的、在通货膨胀时实际税率还会有所下降，例如某些商品的消费税（英国的酒类、香烟、石油制品国内消费税）就是这样。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税收指数化也应该包括这些特殊固定的税收。税收指数化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运用。

税收的抑制作用（Tax Disincentive）　所得税对人们工作和投资积极性的不利影响。所得税的征收对工作会产生两种影响：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收个人所得税，闲暇比工作更有吸引力，因为闲暇没有收入，也不用交纳所得税，这样，所得税就会引起人们用闲暇替代工作。替代效应对人们工作有不利的影响。收入效应是指由于征收个人所得税，人们的收入减少，为了维持纳税后的收入与纳税前的同样多，人们就要更多地工作。收入效应对人们工作有有利的影响。是否存在税收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有多大，则取决于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哪种更大。一般认为，边际税率愈高则替代效应愈大，而在高平均税率时收入效应较为明显。根据大量的经验研究，税收的抑制作用对大多数人并不明显，但对已婚妇女和处于最高纳税等级上的高收入者则较为明显。

关于所得税对投资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所得税会减少投资的收益，从而抑制个人与公司投资的积极性，引起抑制作用。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了。因为投资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大多数所得税税制都具有弥补损失的条款，这样，实施所得税时政府就成为投资亏损与收益的分享者，由于分担了风险，投资还可能由于所得税而增加。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税收的抑制作用就还要取决于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以及投资者可以使用的资产类型。应该指出的是，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非常强调税收的抑制作用，认为美国的高税率大大挫伤了人们从事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都以减税为中心。

税收刺激计划（Tax Incentive Plans，TIP）　收入政策的一种形式，以税收手段来控制工资增长率，以便制止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具体作法是，政府根据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规定出货币工资增长率（即工资指导线）。如果企业的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这一规定，就课以重税；如果企业的货币工资增长率低于这一规定，就给予减税或免税。美国卡特政府在1978年曾提出过这一政策，但遭到议会否决而未付诸实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作法实行起来较为困难，而且作用不大，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缺乏约束力，因此，在各国的实施也并不普遍。

税收推进的通货膨胀（Tax—Push Inflation）　在没有实行税收指数化的情况下由于税收增加所引起或加速的通货膨胀。人们所关心的是纳税后的实际收入水平。这样，名义收入的增加不仅要能抵销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实际收入减少，而且还要考虑到税收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在通货膨胀时期，如果不实行税收指数化，即不按通货膨胀率调整纳税起征点和税率等级，当通货膨胀引起名义收入增加时，所交纳的税收也会增加，从而使实际收入减少。这样，为了维持纳税后的实际收入水平不变，工人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其他人也会要求提高收入。工资或其他的收入的提高又会加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税收制度相关，可以通过税收指数化来消除。这种理论的前提是人们对通货膨胀时期实际收入状况有确切的了解，但实际上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这是困难的。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并不存在，或者并不重要。

温和的通货膨胀（Mild Inflation）　一般物价水平的年平均上涨率为3—6%或3—10%的通货膨胀。温和的通货膨胀介于爬行的通货膨胀与飞奔的通货膨胀之间。当物价上涨率处于温和的通货膨胀的下限，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相当稳定，不致引起通货膨胀预期时，它相当于爬行的通货膨胀。但是，当物价上涨率处于温和的通货膨胀的上限，即虽未达到两位数但已接近10%时，就成为飞奔的通货膨胀，因为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出现通货膨胀预期，并很快使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和爬行的通货膨胀一样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温和的物价上升会鼓励支出，刺激需求和投资。但更多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已接近飞奔的通货膨胀，如不加以控制，反而以其来刺激经济，结果必然会使通货膨胀加剧，从而破坏经济，甚至使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最终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受阻的事实证明了，利用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也许开始会有一些成果，但最终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　也可译为"制轮效应"，指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对短期消费减少的抑制作用。美国经济学家J·杜森贝利（J.Duesenberry）在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了这一概念。根据相对收入假说，人们的消费行为是不可逆的，即消费易于增加，而难于减少。因此，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而且还取决于他在过去最高收入水平时所形成的消费习惯，或者说取决于过去的高峰收入。这样，即使在短期中人们的收入暂时减少了，他们仍要维持过去所形成的消费习惯，用过去的储蓄，甚至借债，来进行消费，从而使消费的减少小于收入的减少。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尽管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但消费并不会同比例减少。这样就减轻了经济衰退的程度，使上一次繁荣时期由于收入增加而引起的消费增加不会完全减少。棘轮效应在经济衰退、萧条和复苏时期一直发生作用，直至经济达到繁荣，经济活动超过前一次繁荣时，它的作用才消失。棘轮效应抑制了消费的减少，减轻了经济的衰退程度，起到了自动稳定经济的作用。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实际上棘轮效应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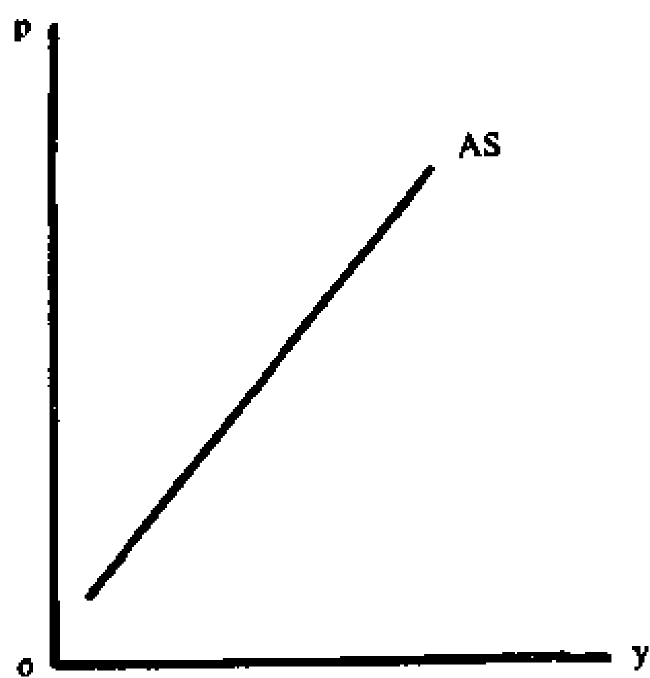
就业增长率（Accession Rate）　又称"雇用率"(Hiring Rate)。某一时期内增雇的职工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率。所以：

$$\text{就业增长率}=\frac{\text{本期增雇人数}}{\text{本期就业总数}}$$

增雇的人数包括各类职工，即包括新雇用和再次雇用的固定职工或临时工。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把就业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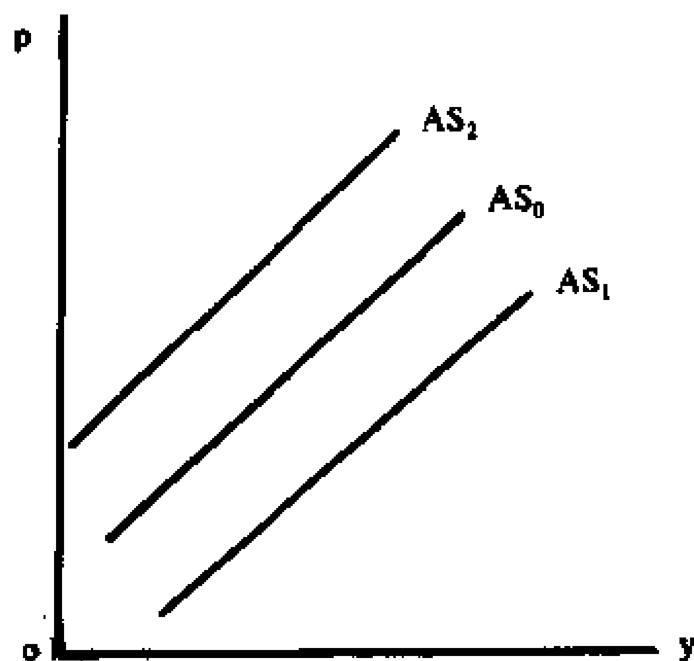
长率作为主要经济指标之一，它的上升或下降反映了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因此，可以作为判定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指标之一。

短期总供给曲线（Short—Run Aggregate Supply Gurve） 表明预期价格不变的短期中价格水平与总产量（国民收入）之间关系的曲线。该曲线如附图1所示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表明短期中，当预期价格不变时价格水平与总产量同方向变动，即价格水平上升总产量增加，价格水平下降，总产量减少。这是因为，在短期中，产量主要取决于就业量，就业量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劳动市场的供求取决于实际工资率，在名义工资率不变时，实际工资率取决于价格水平。工人根据现期价格的情况来预期未来的价格变动，并根据这种价格预期来确定他们所要求的工资水平。在短期中，工人的价格预期往往来不



（图1）

及调整，从而预期的价格就与实际价格不一致，当实际价格提高时，预期价格就会低于实际价格。这样，在价格上升时，实际工资率就会下降。具体来说，当价格水平上升时，工人对价格的预期来不及调整，所要求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从而实际工资就下降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增加了企业对劳动的需求，这样，产量就增加了。所以，总供给与价格水平成同方向变动。在不同的短期中，短期总供给曲线也是可以变动的。附图2表明了这一点，在附图2中，AS_0是原来的总供给曲线。当价格上升时，工人在短期中来不及调整预期，当在下一个短期中工人会调整价格预期，意识到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从而要求提高名义工资，以保持实际工资率不变。这样，企业就会减少劳动需求，使产量减少，上一期价格水平提高后，即使在下一期价格水平不变，产量也会由于工人价格预期的调整而减少，因此，总供给曲线就由AS_0向下移动到AS_1。同样，在上期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下期即使价格水平不变，也会使总供给增加，总供给曲线由AS_0向上移动到AS_2。短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是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总产量的增加。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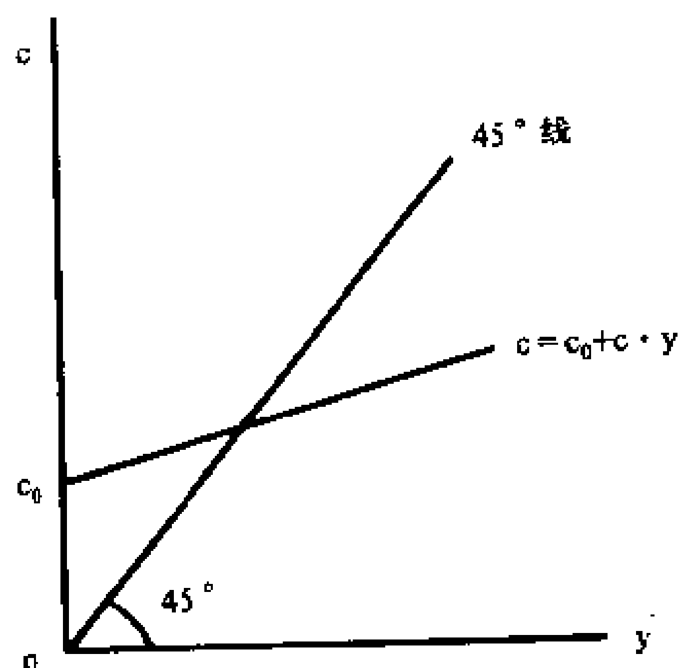
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表明价格不变下总产量的增加，总供给曲线向下移动表明价格不变下总产量的减少。在短期中，引起总供给曲线移动的原因尽管可能有多种，但最重要的是不同短期中价格预期的调整。

短期消费函数（Short—Run Consumption Function） 短时期内消费与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以C代表短期的消费，Y代表短期的收入，C_0代表短期的自发消费，即不取决于收入的那部分消费，用C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短期消费函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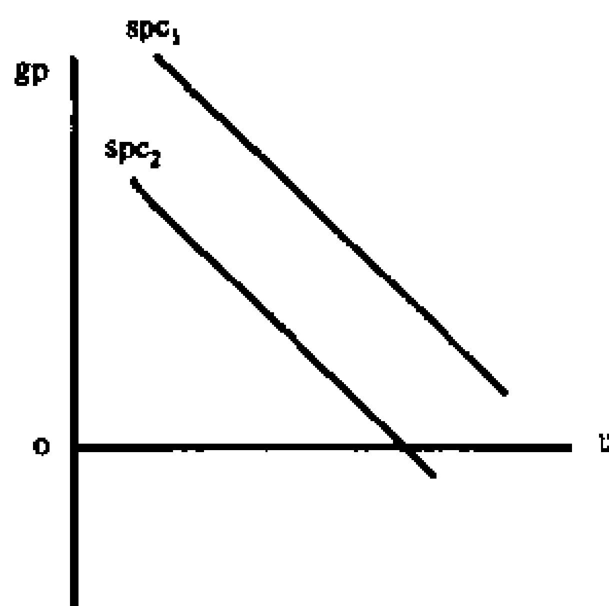
$$C=C_0+C\cdot Y$$

上式表明，短期中的消费可以分为与收入无关的自发消费（由人最低的生理需求决定）以及由收入所引起的引致消费这两部分。自发消费是既定的，引致消费取决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附图说明了短期消费函数。图中横轴OY代表收入，纵轴OC代表消费，45°线是收支相抵线，线上的每一点都表示收入等于支出。$C=C_0+C\cdot Y$为短期消费函数线，其截距为C_0，斜率为边际消费倾向C。短期消费函数线从C_0出发，表示自发消费C_0不取决于收入Y，是固定的OC_0。该线向右上方倾斜表明引致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根据经济学家对短期消费统计资料的研究，短期消费函数的特点是：第一，在短期中消费支出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收入。当消费大于收入时，有负储蓄（使用以前的储蓄或借债）；当消费小于收入时，有储蓄。第二、在一般情况下，短期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仍然小于一，但边际消费

倾向并不等于平均消费倾向。更常见的情况是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对短期消费函数的解释。



短期菲利浦斯曲线（Short— Run Phillips Curve） 表明短期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存在交替关系的菲利浦斯曲线。这是美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M.Friedman）和E·费尔普斯（E.phelps）对菲利浦斯曲线的重要发展，他们认为，菲利浦斯曲线最主要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预期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他们根据适应性预期来解释短期菲利浦斯曲线。适应性预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调整对未来经济变量的预期。在短期中，人们来不及调整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因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人们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提出货币工资增长率，由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所以货币工资增长率就会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从而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使利润增加，这就会刺激厂商扩大生产，增加雇用量，从而失业率下降。正因为在短期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会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所以，提高通货膨胀率会降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由此得出，在短期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以提高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但是，根据适应性预期，人们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调整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一致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这种交替关系就不存在了。在下一个短期中只有再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率才会再出现这种交替关系，所以，短期菲利浦斯曲线会由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向右上方移动，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ou 为失业率，纵轴 o，gp 为通货膨胀率，spc_1 为某一预期通货膨胀率时的短期菲利浦斯曲线。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在下一时期中短期菲利浦斯曲线就由 spc_1 向右上方移动至 spc_2，短期菲利浦斯曲线的移动说明只有以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才能换取一定的失业率，这样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引起了通货膨胀加剧。



循环积累因果原理（Principle Of Circulata Accumulation Cause And Effect） 瑞典经济学家G·缪尔达尔（G.Myrdal）在维克赛尔"累积过程理论"基础之上在40年代所提出的一种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理论。其基本内容是，经济制度是发展着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社会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是一个因果关系。而发生变动的因素反过来又加强了最初作为原因的因素的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因果发展关系可能是上升的运动，也可能是下降的运动。但这种运动不是简单的循环流转，而是有着积累效果的，所以是"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缪尔达尔用一理论来解释美国的黑人问题。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黑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是两个互为因果的因素。白人的偏见与歧视，使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而黑人低生活水平与文化修养，反过来更加增加了白人的偏见。白人的歧视和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这两个因素是互为因果，并不断互相加强的。这两个因素不会都处于一个相互平衡的状态。无论其中哪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必定会引起另一个因素的变化，于是，一个因素的变化，就会由另一个因素的反应而不断加强。这样又开始上述的循环积累过程。白人偏见与黑人文化水平的低下互相加强，则是一种向下的运动，如果白人改善对黑人的态度，黑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这就会开始向上的运动。缪尔达尔强调了，之所以存在这种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是因为，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当一种变化发生

的时候，并不是引起另一种变化来抵消这种变化，而是由一种变化引起的另一种变动，会反过来加强最初的那种变化。所以，事物的常态是动态变化的积累倾向，而不是像传统经济学所说的那样、经济因素之间总是由均衡到不均衡再恢复到均衡的变化。可以说，这一理论是由瑞典学派的动态均衡理论发展而来的。缪尔达尔不仅用这一原理来分析各种具体问题，而且，还作为进行社会改良的指导。他把这种特环过程分为向上的循环与向下的循环。上升的循环是良性循环，即两种因素相互作用，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变动；下降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即两种因素相互作用，使事情向坏的方向变动。社会改良正是要选定能促进向上运动的因素加以推动。例如，通过提高黑人物质文化水平的措施来改变白人对黑人的歧视，通过向上的累积性过程解决黑人问题。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体现了制度经济学的演进的、整体的研究方法，它是缪尔达尔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中有重大的影响。

循环信用证 (Revolving credit) 循环信用证是指规定受益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金额限度内，可反复使用的信用证。对于那些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分批完成的国际生物买卖合同，往往采用循环信用证，以节省开证费用和开证押金，充分利用银行的授信额度。

循环信用证的特点是每当出口商全部或部分地使用后，信用证仍可恢复原金额，再行使用，多次循环，直至达到信用证规定的使用次数或规定的总金额。

循环信用证可分为按时间循环和按金额循环两类。按时间循环的信用证又可分为积累循环信用证(cumulative revolving credit) 和非积累循环信用证(non—cumulative revolving credit) 前者是指受益人对于在一定时间内有权支取的金额中未用完的部分可移至一次一并使用；而后则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受益人未完成交货，此次信用证金额即被取消。

对于按金额循环的信用证，有三种恢复原金额的方法：

(1) 自动式循环：出口商按规定时期装运货物交单议付一定金额后，不需等待开证行的通知，信用证自动恢复到原金额，而再次使用。

(2) 非自动循环：出口商按规定时期装运货物交单议付一定金额后，必须等待开证行的通知，信用证方可恢复到原金额，再行使用。

(3) 半自动式循环：出口商按规定时期装运货物交单议付一定金额后，若开证行在一定时间内未提出中止循环，则信用证自动恢复至原金额，而可再度使用。

蒂布特假设(Tiebout Hypothesis) 经济学家蒂布特（C · M · Tiebout）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地方政府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分析时建立模型，其基本含义是只要消费者有权进行选择，那么对于公共物品就存在着偏好显示机制，这一偏好显示机制就是流动性，通过在不同地区进行流动，消费者表明了其偏好，不断接近并最终达到其消费曲线。这就是蒂布特假设。

蒂布特的思想是针对萨缪尔森的观点而提出的。萨缪尔森认为由消费者表示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会使公共物品的生产达不到最优水平。但蒂布特选择流动性作为消费者的偏好显示机制，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选择范围，所有消费者都会达到其消费曲线，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达到最优水平。

1969年，奥特（Oate）对各地方税收和教育支出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消费者在决定居住地点时，要考虑学校和税收，这表明蒂布特关于消费者行为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结论促使学者们开始深入研究蒂布特模型，对蒂布特模型进行各种实证检验。

蒂博特模型（Tiebout Model) 分析个人对公共物品服选择原则的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C · 蒂博特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政府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该模型认为，如果公共物品服务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个人则可以表示他们对这种服务的挑选，并通过在不同政府区域间的迁移来取得一种公共物品服务与税制的最优组合。这个模型对解释人口流动亦有意义，说明了人口将向税率低而公共物品服务好的地方流动，因此，公共物品服务与税制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之一。

蒂博特假设（The Tiebout Hypothesis） 一个关于在美国地方政府制度的背景中政府和私人决策相互作用的著名理论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查理士 · 蒂博特（Tiebout charles）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地方支出的纯理论》的论文中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居民向地方政府纳税，用来"购买"公共教育及其它服务，非常类似他在市场上购买其它货物。因而在地方公共部门中，也象在私人市场中一样，通过竞争也会产生效率。他认为，由于在美国存在着众多的地方政府，而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税收与公共支出的组合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每个家庭就会根据自己的情况，为寻求最接近自己偏好的税收——公共支出组合而从一社区迁至另一社区。在这里搬迁者对搬迁费用的考虑，就像市场交易中的交易成本作用一样。这就是所谓的"用脚投票"。即人们用搬迁的行为来代替市场的选择。因此，如果存在着

足够数量的地方政府，每个居民就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一个税收—地方公共服务最优组合的社区。那些同质的，即家庭收入和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相似的地区，尤其是市郊的这类地区，就是人们"用脚投票"所达到均衡状态的地区。蒂博特假设的前提是，在一个都市地区存在着大量数目的市郊政府，每一市郊政府都对税收和公共服务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并对土地使用实行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市郊的实际情况。在美国市郊，每个社区的住房造价显然是不同的，但同一社区的住房造价显然是不同的，但同一社区的住房质量相当整齐，市郊区内居民的收入和房价要比市中心附近更加同质。一些城市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支出高的社区内的房地产价格要比公共服务支出低的社区内的房地产价格高一些，而房产税率低的社区内的房地产价格则要比房产税率高的社区高一些。这表明，在美国存在着额外公共服务支出和租税节约额有其资本化价值的情况。这就证明了"用脚投票"行为在起着作用，即有理智的消费者常从地方公共服务的受益与纳税的负担之间进行衡量来选择他们的居住地点。因为房地产市场价格之所以受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是由于人们从低公共服务支出（相对房地产税）地区向高公共服务支出（相对房地产税）地区迁移的结果。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蒂伯特的模型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首先对迁移费用估计不足，在实践中往往由于迁移费用的过高，人们宁可依旧住在地方当局干预水平不理想的老地区而不愿付出迁往其它城市的费用；其次，对居住在大城市郊区或主城外面的卧城居民说得不多，而这些人能够享受到城市当局所提供的便利却因住在市外而不须负担费用；最后，事实上，各个地方当局所提供的服务并无较大差别，使人们找不到特别好的公共事业组合可以迁移过去。同时同一社区内，每一住房价格和每一居民的收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童工法（Child Labor Laws） 旨在保护童工使其避开有害于健康的环境和不在有危险的地方劳动，并保证他们受到最低限度教育的立法。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是美国最早拥有童工立法的州，它们于1842年立法禁止雇用12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现在各州对雇用童工都已规定了一些限制措施。各州法律的一般条款中都规定了就业的最低年龄，特别在制造业和危险职业中，要求青年工人必须取得就业证书或工作许可证，还对工作日或工作周长度以及夜班工作量作了限制。联邦政府的童工立法中，最重要的是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有关使用童工的限制。这项法令禁止在州际贸易商品的生产中，雇用一定年龄以下的童工（大多数工作的标准为16岁，危险职业为18岁），并对在校学生参加工作的时间作了详细而严格的限制，把不符合该法令要求的童工列为"受压迫的童工"。1949年的一项修正案对使用童工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限制。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制裁对象是"受压迫的童工"生产的"非法"商品，而不是采取这种做法的雇主，而修正案则是直接禁止在商业中或为商业而生产的货物中雇用或使用"受压迫的童工"，劳工组织一直致力于支持童工立法，其目的有两点：首先，他们极端关心提高工人阶级儿童的教育水平，以尽可能地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而"逃出"工人阶级的范围。第二，工会在传统上把儿童看成劳动市场上对工会会员工资和劳动条件标准的一种牵制，并认为他们是萧条时期已经很稀少的工作岗位的竞争者。而雇主，特别是在充分就业的年份，为了获得"廉价"而驯顺的劳动力，往往反对童工立法。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美国的一项联邦法令，1890年通过，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法律形式的反垄断法。它禁止签订限制贸易活动的合同，禁止实行垄断的一切企图。该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垄断集团发挥力量和发展，恢复自由经营和价格竞争的制度。谢尔曼法规定，"凡是限制几个州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活动的合同，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进行的兼并或暗中策划"都是非法的，还宣布，"凡要垄断或企图垄断……某几个州之间的一部分贸易或商业的人……都以违法论罪。"因此，不仅限制贸易的所有策划都是非法的，而且所有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垄断，不论限制贸易与否，也都被认为是违反该法的。联邦政府被授权执行该法，违者以刑事罪论处。谢尔曼法确定了市场竞争秩序政策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得限制竞争和公平交易原则；二是禁止垄断原则。但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条文过简，内容很泛，不易执行。如谢尔曼法没有对"限制贸易"和"垄断"这两个词作精确的定义，解释权留给了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在早期的判决中裁定，谢尔曼法适用于限制贸易的所有协议，但是在处理1911年的标准石油公司案件时却制订了"理性原则"。根据这项原则，美国最高法院不是见到对贸易有限制作用的协议就加以禁止，要禁止的只是那些对贸易实施无理限制的协议。在以后的判例中，虽然合谋定价的行为本身被判为违法，但却没有把对贸易的其他限制和实行垄断化的企图本身判为违法，除非被判决有意进行垄断或滥用权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除解散了美国1882年成立的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外，以后五年没有再援引此法分割托拉斯。近年来，最高法院的解释发生了某些变化，仅仅掌握垄断权和在少数人控

制的市场上采取有意识的协调行动（即在不签订正式协议情况下带头制订价格），就常常被认为是违反了谢尔曼法。虽然该法最初只适用于从事州际商业活动的工商企业，但其适用范围已屡经扩大，目前反托拉斯法适用于几乎所有从事州际或州内商业活动的厂商。

强制价格（Forced Price） 是为了排挤和控制交易对方或者竞争对手，采取的价格竞争手段。主要有二种：1.垂直的多角化集中的企业抬高投入要素的价格，从而将后续阶段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排除、驱逐出市场，或让其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继续存在，表现为一种非垄断的态势，以免受反垄断政策的约束。如40年代以前的美国铝公司，几乎是国内唯一的粗铝供应者，它利用这种办法，压低大多数铝材加工厂的利润，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二次大战后日本垄断性的大钢铁企业也是使用这种办法控制了一批小的钢铁制品厂。2.差别价格竞争。指大企业为摧跨较小的竞争者而进行的歧视性的降低价格。大企业常常可能只在与它相竞争的公司营业的地区内降低价格，而在别的地区则保持正常的价格，从而排除、驱逐前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从1870到1890年间，美国许多行业，如石油、糖、盐、铜、铅、烟草和钢铁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公司,使用这种手段把与之竞争的公司从营业范围内驱逐出去，并扩大了他们的私人垄断权。又如1980年，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在旧金山到芝加哥和旧金山到弗雷斯诺两条航线上实行差别运价竞争，前一条线竞争激烈，票价降到99美元，而后一条线公司垄断，票价仍为133美元。通过这种办法挤垮许多地区性的航空公司。

强制性动员储蓄（The Forced Mobilizing Saving） 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来获得国内储蓄的资金来源，各国政府都相信，通货膨胀是保证国家收入来源的一种可以采用的手段。只要是货币流通量的增长速度快到足以提高一般价格水平，通货膨胀就成为对持有货币者的一种税收而发挥作用，并且其税率会比任何国家设法成功地对任何实物资产，如房子、汽车、设备等征收的税率还要高。在通货膨胀率无限高的情况下，如在1922～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各个家庭都试图将货币余额的实际持有量缩减为零。但是，由于货币是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计量单位而存在的，人们的手中总要掌握某些货币余额，从而必须付出相当重的通货膨胀税。这种通货膨胀税实际上就是从货币余额持有者手中强行动员的储蓄，移交给政府补充十分短缺的投资。实施这种强制性储蓄战略，显然会缩减一些私人投资。因为某些通货膨胀税来源于准备用于投资的货币余额。但是，那些主张通过通货膨胀使税率最大化的经济学家已明确地假设，政府得到的储蓄也将投资于实际资产，不过是对私人投资的替代，因而决不会缩减社会的总投资。他们认为，强制性动员储蓄战略有利于增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财富。理由是，一方面，通货膨胀税的效率损失比其他能够增加政府收入的常规税收的效率损失要低；另一方面，常规税的征收同通货膨胀的增加关系很密切，即与名义收入增长相关的常规税收系统的收入弹性大于1。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来动员资金储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因为他们认为支持这一战略的人所提出的种种假设和理由都非常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并且，通货膨胀对政府总收入（常规税加上通货膨胀税）影响的最后结果，可能会降低政府扩大总投资的实际能力。

强制储蓄（Forced Saving） 由于消费品缺乏而使消费者不得不进行的储蓄。在货币投资过度理论中，这一概念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当银行信用扩大引起投资增加时，首先是资本品需求增加，价格上升，这就引起投资集中于生产资本品的部门，资本品的生产增加。资本品生产的增加使原来生产消费品的资源流动到资本品生产部门，从而消费品减少。消费品的减少就引起了消费者的强制储蓄。这种强制储蓄又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信用扩大、投资增加、资本品生产增加。如果强制储蓄能一直维持下去，则银行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用于扩大信用的资金，投资也就可以一直增加下去。但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强制储蓄是无法一直持续下去的。当经济繁荣，人们的收入增加后，他们就要增加支出。由于消费品价格提高，支出增加，必然是储蓄减少。这样，银行无法不断扩大信用，投资无法继续增加，必然出现资本品过剩的情况。这时，经济就由繁荣进入了生产过剩的萧条时期。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强制储蓄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中，当强制储蓄出现时，必然由于消费品短缺而使消费品价格上升，这就刺激了消费品生产，使强制储蓄消失。因此，强制储蓄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在计划经济中，价格起不到这种调节作用，计划者往往考虑不到消费品的短缺，从而强制储蓄就会成为一种长期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政府也为了增加积累而实行强制储蓄。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 1935年瓦格纳法案通过以后，雇主及其集团加强了政治和立法活动，以遏制劳工组织日益增长的权利

和影响，1947年通过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的目的就是要重新确立集体谈判过程中的均势。为此，该法案对瓦格纳法案作了多方面的修正。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在开宗明义的"调查结论和政策"这一条中，除瓦格纳法案中那些调查结论之外增加了一项陈述，即一些劳工组织、工会领袖及工会会员的某些做法，被发现是压抑或堵塞商业的，其办法是用罢工或其他类型的工业骚动，以及容易损害自由畅通的商业中公众利益的某些活动，来阻止商业中货物的流通。并指出，要保证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中规定的，由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修正的权利，消除这类做法是必要的条件。美国一些研究者认为，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并没有触动瓦格纳法案原有的调查结论和政策，表明国会仍致力于保护劳工组织起来和集体谈判的基本权利。但与瓦格纳法案不同之处在于，该法案虽然主要是针对劳工组织而不是雇主及其组织的，它着重指出，正如雇主的某些行为可能干扰商业的自由畅通一样，劳工组织的某些行为也可能产生同样效果，并暗示工会、工会领袖及工会会员也可能因不正当的劳动实践担负罪责。

瓦格纳法案第7条题为"雇员的权利"，该条宣布，雇员享有组织或参加劳工组织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在这项陈述之外还宣布，雇员有权退出有关组织或集体谈判的任何或全部活动，强调了保护工人不参加这些活动的自由。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保留了瓦格纳法案列举的雇主五项被禁止的不正当劳动实践，但与此同时开列了劳工组织及其代理人的六项不正当劳动实践：第一，遏制或强迫雇员们行使其组织权利或雇主选择其谈判代表的权利；第二，歧视因不交会费而被否定或终止其会员资格的雇员，或使雇主歧视这类雇员；第三，拒绝集体谈判；第四，实行非法的罢工或抵制；第五，按照工厂工会契约收取过多的或歧视性的会费或费用；第六，对未履行的服务或那些将不履行的服务强迫要求补偿。

塔夫脱——哈特利修正案改组了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委员由原来的3人增加到5人，并设立了一名法律总顾问，把该委员会的司法职能与起诉职责分离开来，规定由法律总顾问对不正当的劳工行为向该委员会提起上诉，法律总顾问由总统任命。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规定雇主或工会必须在终止或修改一个契约之前60天通知对方，即所谓"缓冲期"，在缓冲期内罢工的雇员将失掉其雇员身份。该法律还包括一项全国性紧急状态条款，总统根据其判断，如果认为罢工有危害全国的健康和安全的威胁，他可以要求检察长发出一项禁令，暂停罢工不超过80天。此间前60天由总统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试图排解这一争议。如果这些努力不成功，委员会在60天期满后向总统提出报告，在禁令期间的最后15天内，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被授权在雇员中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民意测验，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雇主的最后许诺。当80天期满后，即使争议未获解决，禁令也将撤销，罢工可以继续举行，这时由总统向国会提出报告，可能由国会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还建立了一个名为联邦仲裁和调解局的独立联邦机构，负责促进劳资和平。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规定雇主有对工会和集体谈判发表意见的自由。任何一方都可以讲话反对另一方，只要这种发言不是伴随着以报复或暴力相威胁，或答应给予某种报酬。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对于确定工会的代表权以及集体谈判的程序做了广泛而详尽的规定，规定法院必须复审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诉讼，而且对劳工组织提出的诉讼或控告劳工组织的诉讼也作了规定。该法确认排外性雇用制企业，优先会员企业以及工会举办的职业介绍所为非法，禁止工会参与次级抵制和封闭工厂，禁止司法人员罢工和政府雇员罢工。允许各州制定工作权利法，以便对集体谈判协议中工会保障条款的应用加以限制。

正如瓦格纳法案代表了工会立法活动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不妨说塔夫脱——哈特利法标志着雇主及其集团立法活动的重大胜利。劳工组织对这一法案反应激烈，称它为"奴隶劳工法"，认为它不仅是单方性的，而且是歧视性的，它的实施使劳工们回到了依靠禁令的政府的时代。但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项法案的许多条款是确实需要且基本合理的，例如对待工会方面大多数不正当的劳动实践，1946年盛行一时的罢工活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它的有些条款是软弱的，如关于缓冲期和全国性紧急状态等条款。这项法案的实施，无疑给没有工会的地方建立工会造成了困难，但它并没有导致工会主义的大量消亡，它也没有起到时钟倒转的作用，使集体谈判重新有利于雇主。劳资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把一切劳资争议交付法庭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法院诉讼在劳资双方导致的敌意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超出实施法院诉讼行为的任何收获。

美国一些研究者认为，瓦格纳法解除了对工会的许多限制，使它们得以在没有为资方和非工会会员提供足够保护的情况下自由发展。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改变了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政府既不偏袒资方也不偏袒劳方，其作用是处理劳资关系中保护公众利益。政府从鼓励工会的发展转变为限制工会的权力，这本身就充分反映了工人运动在30和40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功。1959年的兰德勒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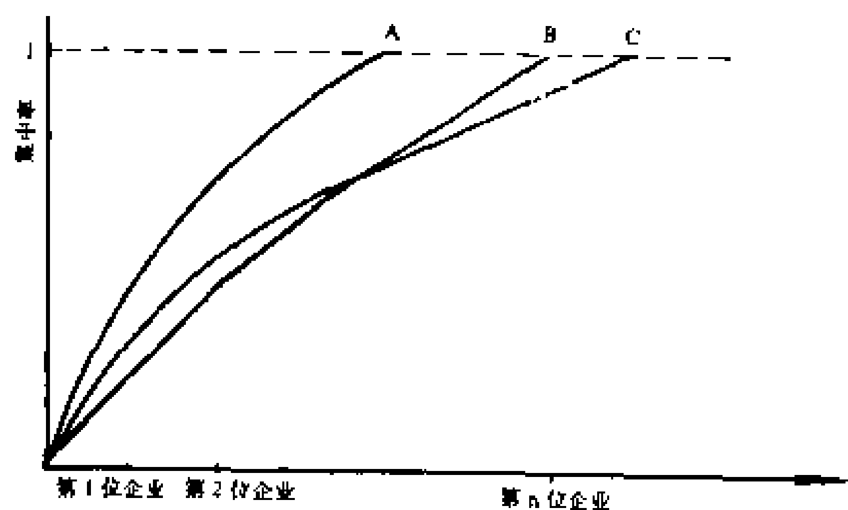
格里芬法案对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作了修正，进一步限制了工会的活动。

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s）　指的是在某个特定的行业中，少数几家最大的企业所控制的业务量在全部业务量中所占的比率，它反映的是这个行业的集中程度。衡量集中率有两种指标，一是某行业中3—8家最大的企业在自有资产、产品产量、销售额、利润额或者职工人数等方面在全行业的相应范围中所占的百分比。比率越高，集中率就越高，这个行业的集中程度也就越强。第二种指标是控制着某行业中一定份额（比如70%）的产量、资产、利润额、销售额或者就业人数的大企业的数目。数目越小，集中率就越高，这个行业的集中程度也就越高。无论以哪种指标进行衡量，如果集中率越高，该行业内的几家大型企业就越容易联合起来，共同制订产品价格，从而形成寡头统治市场的局面；相反，如果集中率越低，这种有力的同盟就不容易实现。一般来说，如果某个行业中的4家大企业占有60%以上的份额，那么这个行业的集中率比较高，称为紧密的寡头控制；如果4家大企业所占的份额低于40%，那么这个行业的集中率就比较低，可以称为松散的寡头控制。紧密的寡头控制与松散的寡头控制的区别还在于：(1) 在结合紧密的同盟中，一旦某个企业背叛，那么整个联合体受到的打击将非常之大。当然，由于同盟内企业数目少，因此，很容易查出背叛者，并给予严厉的惩罚。不过在这种同盟中，由于寡头们从联合中所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他们相互欺骗所得到的好处，所以，紧密的寡头控制中很少出现背叛的情况，而是联合共谋。而在结合松散的寡头同盟中，由于企业数目多、每个企业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较少，通过联合所得到的利益不大，因此，经常出现的是竞相削价、彼此欺骗。某个企业出现背叛时，对整个同盟的利益影响不大，也不易被查出。因此，在这类同盟中，寡头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2) 对于结合紧密的寡头同盟来说，外来的企业要加入这个同盟是相当困难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寡头数目的增多会减少每一家企业所得到的利益，而且还会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在结合松散的寡头同盟中，外来企业的加入相对容易一些，但也要从同盟的外围开始，逐渐缓慢地进入。

对行业集中率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开始只进行一些统计方面的分析研究，后来，人们把集中率用于计量分析，用它来分析行业结构，用于个案研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考虑集中率与价格制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集中对技术革新和财富分配所造成的影响，它还在制订反托拉斯政策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集中率这个指标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不能反映寡头同盟内部几个大企业之间的相对力量的状况，同时，它也不能说明寡头控制的份额以外的那部分市场中，企业规模的分布状况。例如，如果两个行业中，都分别由4家大企业控制了70%的份额，那么按照集中率的概念，这两个行业的集中程度相等。但是，如果前一个行业中余下的30%由另外4家大企业控制，而后一个行业中余下的30%由另外40家企业占有，那么前一个行业的集中程度显然要高于后一个行业，这在集中率中不能体现出来。为了弥补这一不足，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个别市场份额进行研究，集中率在回归分析中的使用已不再象从前那样广泛，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描述性统计工具。

集中率曲线（Concentration Ratio Curve）　集中率曲线是描述集中率与按产业中企业规模从大到小排列的企业的累计个数之间关系的曲线，是分析市场集中的工具之一。下图所示为三条假设的A、B、C三个产业的集中率曲线。横座标为从最大企业开始累计的企业数量，纵座标为集中率。集中率曲线一般是下凹的，曲线的凹度反映了企业规模的不均等性，凹度越大，企业规模越不均等，反之亦然。当产业中所有企业的规模相等时，曲线达到它的极限，即成为一条直线。根据市场集中的定义，有理由认为如果一个产业的集中率曲线处处高于其他产业的集中率曲线，则这个产业的集中程度较高，如图，A产业的集中程度高于B、C两产业。然而，如果集中率曲线出现



交叉，如图中B和C那样，就不能简单地作出判断，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集体交涉的工资理论　直到1890年以前，理论家们都一直没有把集体交涉看作决定工资的一个因素，是英国的韦布和美国的约翰·贝特斯、克拉克·道最早把集体交涉同工资决定联系起来，并设想这一办法会在现代产业劳动市场上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手

段。此后，英国经济学家A·C·皮古和莫里斯·多布在研究中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使人们对决定工资的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二战以后，在该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有：凯丁顿、邓洛普、麦克阿赛、俩罗、罗斯和沃尔顿等。

集体交涉工资理论的拥护者们认为，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工资是由雇员和雇主谈判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在工会势力强大的行业或企业，由于劳方力量相对强大，工资便会提高；而在工会力量弱小的行业或企业，或是雇主扩大企业规模，雇主力量相对增强，工资就会被压到可能得到的水平之下。集体交涉理论是一个短期货币工资决定理论，劳动市场上劳资双方之间的经济实力经过较量，从劳动力的生产贡献而言，并不保证获得所谓"公正"或"公平"的工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如果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经济蓬勃发展，工会集体交涉力量就会大为增强，雇主抵抗力削弱，工资将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增加得更快；相反若经济萧条；劳动力供过于求，工会集体交涉力量削弱，雇主力量增强，工资将定得低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该理论的拥戴者认为上述情况并不说明集体交涉理论与边际生产率理论相矛盾。如果通过集体交涉办法使工资在短期之内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那么，雇主会力图恢复工资与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平衡；如果在某个短暂时期内工资低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劳动者、雇主或劳资双方，就会采取行动使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一起最终向着平衡发生变动。在这一上下波动过程中，工会和雇主集团是劳动市场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经济力量才能发挥作用，工资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才有可能在一个长时期里建立相当密切的关系。

目前在西方国家，劳工领袖，企业经理和公众有一个自然的趋向，认为应把工资增加归因于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力量。但研究表明，集体谈判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象人们常说的那么大。芝加哥大学的H·G·刘易斯教授对统计资料进行最全面的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说：最强大的工会（象建筑技工工会、联合矿工工会，以及其他工会等等）使其会员的工资，比技术水平相同但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高15%至25%。而那些尚未完全确定其权限范围，或是受到无组织的雇主或产品的实际及潜在竞争的威胁，力量弱小的工会，对工资只能起到幅度由0至5%的影响。对这些工人需求的弹性太大，工会无法使其会员工资大幅度提高。工会提高工人工资的程度，主要由有关行业或地区组织起来的程度决定，行业或地区组织程度越高，工会越有能力在工资谈判中与雇主抗衡。但总的说来，工会对工资的影响比人们预想的要有限。另一项历史统计资料也表明了这一点，尽管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30年间，劳资双方组织程度有了巨大发展，但若略去1929、1933、1958、1966年这几个衰退年份，从1899年到1966年，制造业工资总额占新创造价值的百分比一直在40.7%（1899年）到38.8%（1925年）之间上下波动，后30年相对于前30年并无上升的迹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一个长时期内对工资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集体谈判而是生产率。此外，刘易斯教授的另一个结论也与一般看法相同。研究表明，工会会员与非会员平均工资的最大差异曾达到25%，但却是发生在工会阻止了削减工资的大萧条时期，工会会员与非会员的工资差距在通货膨胀时期似乎戏剧性地下降了。刘易斯估计，在1945年—1949年间，平均影响只不过5%。在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中，大量的未组织工会的农业、服务业、零售商业的工资，比高度组织起来的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工资增长大得多，在制造业内部，那些尚未很好组织起工会的行业，其工资增长的百分比反而更大。由此看来，认为工会在经济高涨时期谈判能力更强，是工会迫使工资过度增长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看法难以完满解释工资现状。

尽管集体交涉理论遭到多种非难，但就工业社会中短期工资的确定途径而言，它仍是迄今为止较好的一种解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虽然工会在集体交涉以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方面作用有限，但它在改变工人工资构成，缩小工资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却是明显的。我们不能否认，在现代工资决定过程中，集体交涉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

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也叫集体协议，是雇员和雇主之间为了确立有关劳动条件和工资率的秩序和规则而进行的谈判。集体谈判的内容包括一些明显的重要项目、例如工资标准、工时、工作强度、雇佣和解雇手续等，也包括一些看起来很一般的项目如休息时间或假日等。最后达成的条款都列入集体谈判协议或合同中，对雇员和雇主都有约束力。

保罗A萨缪尔森对美国的集体协议的过程作了以下描述：假设一个劳动者在一家工厂的流水作业线上工作，该厂的工会刚刚成立。那个属于劳联—产联的工会向全国劳工关系局（NLRB）提出申请，要求投票决定该工厂的唯一合法的协议代理机构。工人们用秘密谈判的方式把该工会推选出来，它比原有的独立存在而为管理部门愿意与之打交道的所谓"公司工会"得到更多的票数。于是，全国劳工关系局把新成立的工会鉴定为该厂的集体谈判或协议的代理机构，限制任何其他工会直接与该厂的管理部门进行协商。

新工会的代表与该厂管理部门的代表在一个规定

的日期开会。谈判的一方很可能是该厂专管劳资关系的副总经理以及专管劳工事务的法律事务所的律师们。另一方是当地的工会业务管理员和少数工会领导人所组成的委员会，而在协议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来自全国工会的一位专家。工会的经济研究人员帮助这位专家准备一份该范围的材料，以便支持工会所提出的要求。

劳资双方经过争论和彼此迁就容让，终于签订了契约。契约的有效期限通常为一年或数年，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重新协商签订新的条约。

美国政府到三十年代开始支持工会集体协议，1935 年通过了被认为是偏袒劳工一方的瓦格纳法，1947 年又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对于工会和雇主都规定了行动的准则。

集体谈判有的涉及到一个企业，有的适用于整个行业，有的甚至是全国性的谈判。根据谈判的双方及涉及的范围，集体谈判可分为以下三种：

全国性谈判。为确定全国的一个行业或一个工业集团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在雇员代表和雇主代表之间进行的集体谈判。通常这类谈判包括许多不同的雇主和工会，但偶尔也只有一个雇主或雇主代表参加。

公司谈判。在全国拥有一家或多家工厂的某一公司的代表与雇员代表之间的集体谈判，讨论确立整个公司的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

工厂谈判。单独一个工厂的雇主和雇员代表之间为确立该工厂的工资率和工资条件而举行的劳资集体谈判。

上述三种类型的集体谈判的划分是相对的，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全国性谈判，在只有一个雇主或雇主代表时，这种谈判形式可以视同公司谈判；公司谈判中，如果这家公司是垄断者，在全国拥有许多工厂，则这种谈判就相当于全国性谈判；另外，公司谈判、工厂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既可作为全国性谈判的补充，也可取而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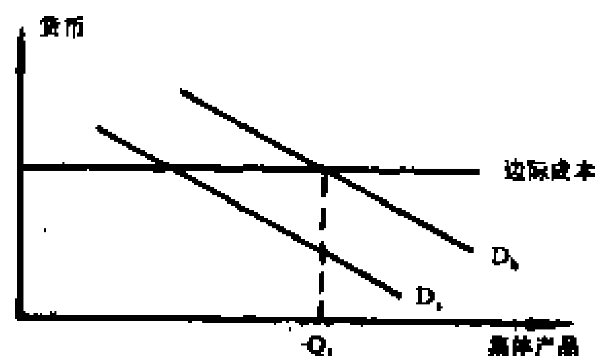
集体辞职　即全体或几乎全体雇员同时辞职。它是罢工的一种变相形式。在西方国家，法律禁止公共事业雇员罢工，于是这些雇员造出了集体辞职这种代替罢工的方法。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是很危险的，雇主可能把职位让给失业工人。

集体行为　(Collective Action)　在早期美国劳动联盟中，在政治学的"多元主义"群体理论中，在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理论中以及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中，集体行为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个体假如认识到他们能从特殊种类的政治行动中获利，则组成群体以扩大共同权益，一般称之为集体行为。如一群工人组织行业工会参与集体谈判，一些工业企业加强联合垄断市场价格，乃至中产阶级或其他阶级团结起来取得对政府的控制权，都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某些组织永远不会为其公共权益而集体行动，有一些组织如果有灵活的领袖，能克服集体行为的困难，就有能力组织起来集体行动。具体而言，在两种情况下能实现集体行为：一是有着共同权益的组成集体行为组织的个体数目足够少；另一种是组织有"选择性刺激"机制。人数少的组织中的个体简单划一，比如，有两个大型工业企业，它们同样地能从政府的某个让步或税制中获利，或者从产品的垄断价格中获利，显然，每个工业企业将获取一半的利益，这种结果刺激着单方面的企业行为。其中每个企业的行为都对它者的利益有明显的影响，这刺激着双方施展策略，互相干扰和竞争，直到"联合效益最大化"或"集体最满意"为止。当团体中的数目增加时，这种刺激必然减弱，如组织中成员增至 10 个的话，每个将从集体行动中获取 1/10 的收益，增至 100 个，获取 1/100 的利益，如此类推。在团体中数目较多的情况下，即使有刺激的话，刺激也会在"集体最满意"远未到来之前就消失了，互相之间的施展策略、干扰和讨价还价就不会发生了。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足够小的团体能够集体行动，但这种刺激会随着团体中个体的逐渐增加而逐渐减小，直至接近消失。

当从集体行为中获利的个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有很大不同时，有最强烈的绝对需求的个体将被刺激去加入集体行动，这导致一种矛盾的"少数利用多数"。如果忽略收入影响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确实并显而易见的。如同下面图示的有关集体产品的需求曲线。当对集体产品有最大需求的团体 (D_h) 获得集体产品(Q_1)时，不可避免地，只有最低需求愿望的(D_l)也将获得同样的满足，即使他根本没有任何愿望去获得它。当把收入因素考虑进去时，结果则不会如此极端，但是不利于那个具有最强需求的团体的不均衡负担分配是存在的，这种不均衡在如下例子中很明显，如在各种军事联盟、国际组织、同业联盟和大城市地区（全市范围的集体产品由不同规模的独立市政来提供）。



在另一种情况下，能使集体行为成为可能的是“有选择的刺激”，那些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体经常想出一些方法对成员进行有选择的刺激，促使他们积极参加集体行为，为共同权益的实现作出贡献，这类方法中最明显的是劳动联盟安排的“排外性雇佣制企业”和监督性组织，劳联经常为其联盟成员提供雇佣环境并且在罢工期间保证劳动力的提供。一些为集体行为服务的大的组织同劳联有些相似，往往也有选择性刺激，虽然不太明显，但发挥同样的作用。

对于潜在的入伙者来说，组织好的团体与低水平的团体相比，后者更需要多样性的刺激。事实证明，有着较好教育与技术的人，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刺激，受过职业训练的职业人员，如物理学家，常在劳动联盟出现之前就组织起来了，熟练的工人的组织一般也较之熟练工人的组织出现很早。

对集体行为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经济学开端时期，但是以后逐渐被奇怪地忽略了。亚当·斯密认为集体行动是经济缺乏效益和不平等的表现，甚至认为穷人或平均主义者绝对不可能从集体行为中受益。他认为，城市居民通过集体行为以牺牲农民利益而获利，农民由于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分散很难联合起来对政治经济形势施加影响来保持价格。这种情况是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和通讯造成的。

斯密称这种公共政策为垄断联合，他所攻击的观点是“重商主义”，认为它的最大罪恶就是商人的集体行动，尤其是他们组织起来从事指挥或合并。他在《欧洲政策导致的不平等》和《地租》中强调，无论什么时候立法机关想调和雇主与工人的矛盾，律师总是雇主。在一个城市的联合贸易中，一个富商总比一个贫穷的工匠有贸易优先权。虽然劳动者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有着严密的联系，但社会对他们的声音总是充耳不闻。农民的利益同贸易业和制造业相比，由于地域性的分散造成不易联合，因而总是处于劣势。

上面转达了斯密对集体行为提出的警告，在当今发展中国家，虽然穷人为集体行为而组织所面临的阻碍远远少于斯密时代，但斯密所讨论的一部分仍在这些国家中发生。在那里的贫困地区，交通和通讯设备缺乏，广大农民不受重视，农产品价格一般都很低。

斯密对集体行为有见地的解释，一直被忽视，一个原因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主要对自由竞争市场理论感兴趣，相反，集体行为总是被当作市场失败的一般状态来描述。认为除非没付钱或任何代价而从公共产品中受益和由此获得利益的方式被排除，否则自由市场机制就不会运行直到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公平税收新原理”（New Principle of Just Taxation）1896年在德国出版时，一些经济学家才对公共产品的性质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且随着萨缪尔森的论文在本世纪50年代的问世，这种理论渐渐成为英语世界的一般常识了。

最近，对集体行动有着不同的解释。假如一个集体行动中的个体确定能共享一种共同权益，那么无论他是否为集体行为付出代价，他都能从由于集体行为而扩大的共同权益中受益；据此共同权益的存在不必靠给为集体行动的个体提供激励来获得。如一个种植限额粮食的农场主因某种限制粮食进口的税赋而受益，他不必为此而给那些争取该税的组织报酬，因为无论他掏不掏钱，他都会受益。农场主的感激与金钱并不能左右税赋的推行。这种现象说明个体在决定团体损益方面的极端不现实性，因此，一个个体倘是理智的自利的话，他将不会积极投身于为着共同权益而奋斗的集体行为。

集体产品(Collective Goods) 也叫公共物品，和私有物品相对。它是一种本身具有非排斥性特征的货物或劳务，为人们集体消费，并且牵涉到政府支出。这种货物或劳务，如研究、法律维护、水土保持、天气预报服务等。其中突出而极端的例子是国防，当它们提供给某一个人，也能为其他人所利用而无需花费更多的成本，并且某人消费它并不减少对其它任何人的可用性。在这种场合，虽然在技术上有可能排斥人们消费这种货物或劳务，但这样做使收入小于收集的费用，因而是不经济的。

保罗·A·萨缪尔森曾给“纯粹”的公共物品在极端情况下作了这样一个定义：这是一种，(1) 在消费中无竞争，(2) 具有非排他性特点的货物——在生产者提供这种货物时，不能阻止任何人来消费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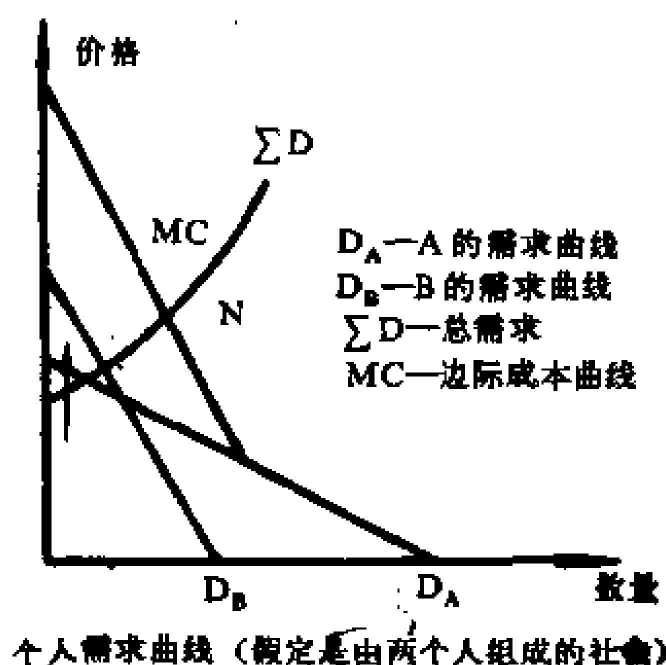
后一特点决定公有物品不可能在私人市场上进行买卖。因为这种货物，即使有卖主，卖主也不能保证只有付款购买这种货物的人才能获得它。实际上，这种货物不需付款就能获得，没有人愿意付款去买它。但要注意的是，有一种非纯粹性公共产品，也称混合产品，可能具有排他性或者消费具有某种程度的竞争性，可以在私人市场上出售，，如一些科学研究、公共设施等，一般仍称为公共货物。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在没有竞争的场合，市场完全不能起作用，所以公共产品的计价是无效率的。当公共产品的消费增加时，给消费者提供了效益，但并不对消费者征收任何费用，所以没有必要实行计价；并且计价会妨害某些消费发生，从而使消费者减少满意，使公共产品的效用不能充分发挥，其结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最佳产生量不能被生产出来。

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完全是集体的事情，没有任何私人厂商为了赢利而提供它，把他珍贵的金钱都投

资在使整个集体得到最大利益的事业上。因为要向这种公共产品的每个使用者、受益者收费会引起很大困难。因此，一般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强制性的征税来付款。

公共产品的另一种提供办法是全社会的所有成员达成自愿的协议来为它付款，其困难是个人可能会隐瞒对该物品的真实消费以逃避付款。我们可以用自愿交换模型（见下图），



个人需求曲线（假定是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

来分析这种通过协议而不是通过强制性征税来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一种公共货物的总需求可通过把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的需求相加来估计。就私人货物而言，市场总需求曲线通过个人需求曲线水平相加获得；但对公共货物，需求曲线是垂直相加的。因为每一单位的商品对 A、B 两人都是可得到的，问题是找出社会对每一单位该商品愿意付出的总价格，这就是把 A 愿付出的与 B 愿付出的相加。在总需求曲线∑D 与边际成本曲线 MC 相交处，就是该公共物品的最佳产出水平。在该交点，增加一个单位商品社会需付出的成本正好等于社会愿付出的数额。这里要注意的是，需求曲线是根据非现实的假设前提，（即每个人通过其政治过程表现他对公有物品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它实际上并不存在。

集中与分散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集中与分散问题主要是针对经济系统的决策机制而言。如果某一个经济系统的决策权掌握在中央机构手中，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被称为是完全集中的。相反，如果某个经济系统的决策权是由各个经济个体把握的，那么这个系统就被称为是完全分散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根据决策机制的不同特点，还可以举出程度不同的集中或者分散的经济系统的例子。

任何社会都要遇到公平与效率的取舍问题。一个完全集中的经济系统可能会由于缺乏适当的动力以及中央决策机构信息的不灵通而变得无效率、不公平，而一个高度分散化的市场经济也可能因为存在着外部性、无政府而导致不公平、低效率。那么究竟应当选择何种集中或者分散程度的经济系统？经济系统怎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这正是资源配置理论或者经济组织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关理论首先设计出经济活动条件的模型，它假设存在一个最优解，至少是一组最优解，然后研究不同形式的经济系统如何发现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或者至少是向这个目标迈进。

1.理论框架

经济环境（E）：由一组商品极其可能的用途、一系列行为人及其特征（技术水平、禀赋、偏好等等）以及初始的信息结构组成。实际中的一组经济环境被称为"经济"（A）。

可分解程度：是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最高的可分解程度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其中的生产与消费及其决策权全是经济个体所掌握的，信息结构也是私人性质的。而完全集中的计划经济则具有最低的可分解程度，信息结构具有公共性质。

优化对应（P：E→A）：包括当经济环境为 e 时，不同的行为人所采取的行动中的优化向量。在这里，优化的含义是使社会效用函数最大化，或者满足消费者的某一"收入分配"原则。

资源配置机制（f：E→A）：对每一个经济环境 e 选择一个行动 a＝f（e）。其中可以分为两个步骤：（1）信息对应 g：E→M，表明已经搜集到的关于 e 的情况。（2）结果函数 h：M→A，指的是按照所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例如，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中，中央决策者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搜集到有关的情况，然后按照这些掌握的信息来指导具体的生产与消费。又如，在完全分散的市场经济中，有一个通晓一切的拍卖者，他了解不同价格下的供求量，并努力寻求实现均衡状态。这一状态一旦实现，结果函数 h 就能给出均衡交易量，从而得出生产与消费的具体数量。

无论集中或分散的程度如何，各个经济系统都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所有的 e，结果 f（e）是否属于优化对应 P（e），如果不属于 P（e），那么 f（e）离 P（e）有多远。

2.应用

（1）计划问题　本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系统的集中或分散问题争论不休，其原因在于，无论哪一种经济系统都不尽如人意。60 年代，欧洲开始探讨实行有效率的计划的可能性，对计划的许多步骤进行严密的研究，其中反映了中央决策者、厂商与消费者代表之间反复交换信息的情况。在研究中，将价格导向与其它（如数量）导向区分开来，还强调了

经济环境对于不同导向对应的行为的决定性作用。

(2) 公共品问题　这是有关理论应用最恰当的领域。对于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品以及有关开支作出的决策不可能完全分散化，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对集中的，但是决策所需要的知识与信息是分散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将它们搜集起来。在决定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时，要看每个人的边际效用是否大于或等于另外提供服务的成本。如果说，对于私人品是价格导向的话，那么对于公共品则是数量导向。

(3) 动机的一致性问题　对集中与分散问题进行研究还要考虑到经济系统的目标与个人动机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一般来说，二者很难完全一致，个人一旦了解经济组织的规则与决策，他们就可以通过报假情况或者不明显的偏离行为而获益，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系统最终目标的最优性。另外，有些人并未从系统所要实现的目标中获益，因此，他们缺乏积极性。公共品理论中的"免费搭车问题"也是动机一致性问题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对集中与分散问题的研究不仅限于整个经济系统，它也广泛存在于企业或者社团组织中。无论研究的范围如何，该问题都是要了解不同的行为人所掌握信息的实质以及使他们按照集体的要求行事的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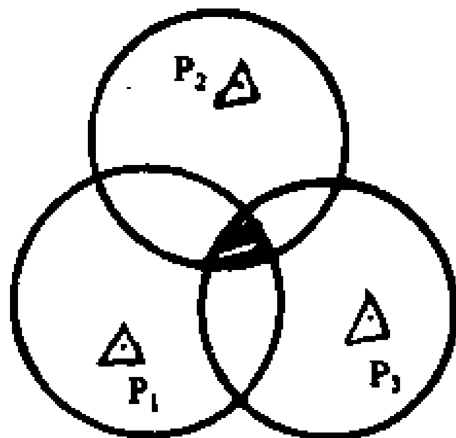
集聚指向（Agglomeration Orientierung）　区位理论中的一种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指按集聚因素决定的区位趋向。韦伯在研究工业区位时首次较全面地对集聚因素进行了分析。韦伯认为集聚指向是对根据运输指向和劳动指向所确定工业区位的第二次形变。集聚因素既包括集中因素，也包括分散因素。二者对工业区位的吸引力相反，但性质相同，即将由运输成本和工资所确定的区位再次引向集中或分散，使工业活动的配置发生大范围的形变。集中因素是指促使工业活动集中到一定地区的因素，它包括特殊的集中因素和通常的集中因素。特殊的集中因素也叫社会集聚或意外集聚，这是由于集聚的外部原因引起的。一个工厂因选择了与其它工厂相邻的位置而得到额外的利益。如共同使用专门设备和社会公用设施和交通设施，共同利用劳动力市场，以及在已有的当地市场销售产品等。这一切都可使成本降低。韦伯认为在讨论工业区位时，可以不去注意特殊的集中因素，只注意通常的集中因素。因为只有后者才是集聚的固定和内在的因素。

通常的集中因素也称为生产或技术集聚，它是指由于工业集聚内部原因引起的工业集中因素。它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发生：

1.一个工厂规模的扩大给工厂带来的利益或能节省的成本。由于企业内部技术流程和经营管理系列化的要求，规模扩大会带来经济上的效益。

2.企业间协作的加强，或若干个工厂集中于一个地点能给各工厂带来的利益或能节省的成本。即把企业生产在地域上集中而分工系列化，各企业的产品可以互为原料，就近取得，零部件生产亦可就近分工。从而使企业的成本降低。

分散因素则是指与集中因素相反的力量，即不利于工业集中于一定地区的因素。例如若干个工厂集中于一个地点会使各工厂的租金支出增加，因为地租、房租都因需求扩大而上涨。这样，一些企业宁肯远离工业集中的地点，迁往企业较少的地方去，或者新工厂宁愿在工厂较少的地方设厂。总的来说，集中因素和分散因素是相互影响的。一般而言，一个地区，集中程度越高，"分散因素"的影响也就越大。一个地点的工业集中程度正是集中因素和分散因素这两方面的力量正负相消的结果。由于集中因素有促使工厂节省成本的好处，但工厂迁往工业集中地点之后，也有可能要多付运费。这样，仍以工厂原来的区位为中心，找出到达此地所需运费相等的各个地点，把它们连接起来，形成等高运费曲线。其中必定有一条曲线是决定性等差费用曲线，这条曲线表示所增加的运费与集中所节省的成本恰好互相抵销。因此，集聚引起的工业区位转移，必须使由于工业集中所节省的成本大于由此而增加的运费。假定 P_1、P_2 和 P_3 是已有的工业区位，那里的工厂都愿意迁移到能够取得集聚收益的地方去，那么新的工业集中点将在这三个工业区位的决定性等差费用曲线相交后所形成的公共地段（见下图 S 点）。在这三条等差费用曲线以外的任何地点都不适宜工业集中，因为集聚收益小于由此所增加的运费。只有在这块公共地段之内，才能使每一个工业区位都能得到集中的好处（即集中所节省的成本大于由此所增付的运费）。从理论上讲，这块公共地段的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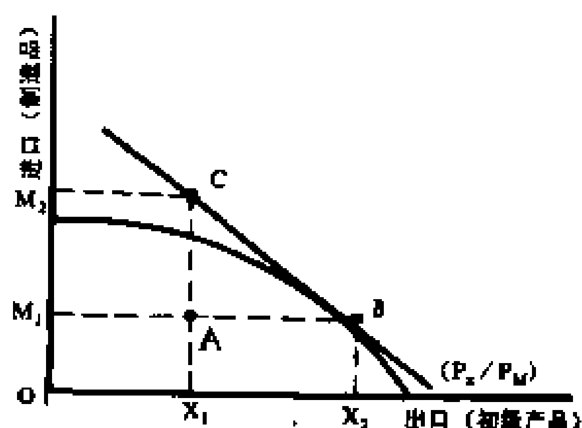


何一个地点都可以成为工业集中点。一般来说，集聚因素都会造成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异现象，韦伯认为集聚地域经济类型有如下几种：1.地方性经济，指的是有限地区内，由一系列相同的生产单位组成的整体。它基本上是通常集中因素作用的结果，如煤矿区、陶

瓷区、轻纺区等。2.城市性经济，这是特殊集中因素的产物。城市形成后对企业成本降低带来收益，包括发达的对外交通网络和市政设施、劳动力资源多而且技艺多样化等因素。3.中心区工业。指大城市和大工业区企业集中程度最高的地域。它是全部集中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通常的和特殊的集中因素全部发挥作用的产物。

剩余的出路理论（Theory Of Vent—For—Surplus）　从发展中国家资源利用不足的现象出发，论述对外贸易的一种理论。由缅甸经济学家明特 1954 年在《经济落后的一种解释》一文中提出。明特认为，西方传统的贸易理论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历史和现实。古典的比较成本理论的假定之一是，贸易国的现有资源都已得到充分利用，因而不可能再增加出口量；其结论之一是，国际贸易应按比较成本的原则实行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即应按照国内资源的供给优势或比较成本来安排出口产品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现有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存在着闲置甚至浪费。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可行的办法在于，通过扩大外贸出口来扩大生产量。充分利用剩余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进行出口，换回更多的进口产品，提高该国的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这种动态的外贸收益可以不花费多少实际成本就获得。明特对这一观点进一步作了详细论证，可用图来说明。

图中曲线为某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曲线，直线表示贸易条件。在未进行贸易之前，生产配合点



假定为 A，此时，生产 Ox_1 初级产品和 OM_1 制造品，消费同量的两种产品。A 点的位置在生产可能性边缘曲线之下，表明未实现充分就业，资源利用不足。如果进行贸易，就可以利用闲置的资源，把生产扩大到生产可能性边缘上的 B 点。在既定的贸易条件下，生产 OX_2 量的初级产品，以 $x_1x_2(=AB)$部分出口，换回 $M_1M_2(=AC)$量的制造品，制造品的消费水平由 OM_1 提高到 OM_2。这样，闲置的“剩余”的资源找到了“出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同时得到了提高。明特指出，剩余出路的理论比比较成本学说更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生产的迅速发展。首先，它以大量剩余资源存在的现实为出发点来讨论外贸，如果没有剩余资源，外贸就不可能产生并扩大；其次，这一理论可以用资源的优势、人口压力等原因来解释两个国家条件相近时，各自如何选择发展的主要出口部门，例如一国的劳动力富足，就应该优先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工业；此外，这一理论也能较为可信地说明一国在没有剩余产品、但存在剩余资源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

剩余产品的出路（Vent for surplus）　亚当·斯密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时，有两种分析路线，一是生产率理论，强调劳动和技术的分工，二是剩余产品出路理论，强调国际贸易在解决过剩生产力问题上的作用。这一理论主要是对不发达国家的产品过剩问题进行讨论，但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扩大世界市场以适应其相对过剩的生产力的需要。对不发达国家的剩余产品出路问题的分析是这样的：在没有短期生产波动的条件下，在一国往往存在实际生产水平与理论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别。理论生产能力是在资源和技术约束下的生产能力的极大值。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是过剩的，不成为约束条件。不发达国家要比发达国家有更大程度的实际水平与理论能力之间的差别，原因是不发达国家的交通、通信系统的落后、市场不完善特别是要素市场不完善，行政与财政政策的效力差，等等。正因为如此，不发达国家都有相当数额“过剩”资源的储备。这种情况下，国家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就可以起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给该国带来直接利益，而且会产生间接好处。直接利益是指通过比较成本而给该国带来福利。间接利益是指通过经济交换的扩大和发展，通过交通、通信设施的改进、以及通过政府部门的良好服务而改变传统经济中的组织。剩余产品的出路理论认为，贸易的直接利益也大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所体现的利益。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直接利益仅仅是比较优势带来的，而剩余产品的出路理论认为，没必要将产出限制在国内需求水平上，而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出口，这样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出来。由于进口很少有甚至没有资源成本，所以收益就增加了。由于未利用的土地不是给定的，而是依赖于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完善，依赖于市场体系的进步，所以土地资源最大程度地得到利用。不发达国家中有很多国家正是获得了剩余产品出路理论的启示、经济迅速发展，如泰国等。由于非洲等落后国家的农产品价格没有比较优势，自然，国家贸易的直接利益无法得到。对于发达国家，剩余产品出路理论依然有效，只是存在的基点不同罢了。

游击罢工 工会只让它的一部分会员罢工，这部分工人人数不多，但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罢工一个时期后，再换一批工人，这种方法可以使大多数工人得到工资，减少了工会为罢工付出的代价，同时又能对雇主施加经济压力。美国全国劳资委员会判游击罢工为不受法律保护的联合行动，因为它既不构成工作，又不构成罢工。

游资（Hat Mqney） 是指出于投机目的而离开本国逃往国外的资本。资本通常会转移到既安全，收益率又高的产业和地区。但由于产业资本中固定资本的比重大，因而产业资本的流动性缓慢，而商业资本特别是商业投机资本的流动性却很强。当然产业资本由于与虚拟的货币资本脱离，因此，当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货币资本也会大规模流动。一般情况下，影响本国资本逃往国外的因素有很多，如政治不稳定、利率下降、汇率变化、战争危险、税收制度、资本税的计征、国内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由于游资会削弱一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因此游资的增加，特别是游资因为某些因素的变化而真的逃往国外，对该国的经济稳定是不利的。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游资少，并且可以吸收国外的游资，但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因本国货币的汇率趋于下跌，游资会因而增加，这样就使得本来就薄弱的该国的国际支付能力更加降低了。

智力外流（Brain Drain） 高等文化程度的人力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亦称"人才外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高质量的移民人境，是国际间人力资本转移的一种重要形式。这对于移人国来说，是不花人力投资的人力资本净增加。因为这些人才的教育费用、保健费用是由外国政府负担的。移人国人力资本净增加越多，移人国的人力资本收益越大，对经济增长越有利。1962年—1980年间，世界上共有50万科技人员迁移到美国。智力外流的流向主要是从穷国流向富国、由发展中国家流人发达国家。那些具有高等文化的专门人才，在本国教育机构中，以非常高的社会成本受到专门的训练。但由于他们只想取得私利，则为那些富裕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力。这种情况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结构和速度发生影响，而且也会对发展中国家教育体制的特点和发展前途发生影响。因为，人才外流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专业技术人员减少，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把本国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的注意力从民族发展的目标和重要的国内问题上转移开来，落到国际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成就上。从而使他们将自己专业的行为准则建立在国际社会的赞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为本国发展做贡献的基础之上。在追求本专业的国际先进水平的思想支配下，一些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专家，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成为国际性人才外流中的移民，但实际上却以他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等学术活动进行了"智力"移民。托达罗在分析智力外流时，把身在国外的专门人才称为外在的智力外流；把那些身体留在国内、头脑受国外学术潮流左右、进行了"智力移民"的专家学者，称为内在的智力外流。他认为，内在的智力外流倾向，已经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的教育和理论研究机构。人才外流和眼睛向外选择科研方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难以从经济发展速度和贫困程度方面进行度量的。但实质上，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状况的延续，已经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雇主交涉协会 雇主交涉协会是雇主们在劳资关系中为抗衡劳工组织而结成的联盟。工业化进程引起了劳工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而组织起来的劳工的经济压力又刺激了雇主交涉协会的产生，因此从时间上说，雇主交涉协会在组织的产生、演变和完善上往往落后于劳工组织。最早的雇主交涉协会产生于18世纪后半期。早期雇主协会都是地方性的技艺协会，其主要活动是联合阻挠工会提高工资的要求，以及在司法界的协助下，利用法律手段压制工会活动。1836年，在费城创立了第一个雇主协会联合会，这是雇主协会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南北战争之后，雇主协会表现出一种越来越具有总体性质的趋势，摆脱了以前的职业或技艺的限制。当时的总体雇主协会并不是一种集体交涉团体，它的主要职能在于排斥有组织的劳工，阻止劳工实现其目标。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总体雇主协会往往是以摧毁或挫败劳工骑士团为已任。70年代以前，雇主协会的反工会活动主要有：进行开放行业运动，其实质是在行业中排斥工会会员；开列工会"活跃分子"黑名单；1864年促使通过了关于移民劳工的劳工合同法，以利于输入外籍劳工充当罢工破坏者。70年代以后，雇主协会的结构和管理变得高度正规化，增加了反工会的方式，诸如黄狗合同。公司工会、公司福利规划等都列人了雇主协会的活动日程之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反工会活动一直是大多数雇主协会的首要职能，尽管其间有些协会已开始执行某些交涉职能，但往往是雇主协会与工会之间，以牺牲消费者和雇员为代价的密谋交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的需要，政府普遍鼓励集体交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雇主协会的反工会活动。直到本世纪30年代末，雇主协会性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一系列自由劳工立法的颁布，雇主协会的大多数反工会手

段已属非法，同时各工业国家政府对集体交涉活动作为一种工业生活方式予以保护并鼓励，雇主协会被迫公开放弃消除工会主义的企图，而力求在同其有关的工会交涉过程中争取签署尽量有利的合同。这时，集体交涉才开始成为雇主协会的主要职能。现代社会中，雇主交涉协会作为与工会具有同等能量的资方团体，除参加集体交涉外，还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领域。雇主协会一直致力于促成限制劳工组织经济权力的立法，如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和1959年的兰德罗姆——格雷芬法案等等。全国制造业主协会代表着13，000家主要的无工会组织的公司，它经常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并散发有利于雇主利益的资料。1978年，它发动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主，开展了一场大规模运动反对劳动改革法提案。由美国最大的200家公司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提供了一个传达大公司观点的重要工具。各行业协会在联邦政府和州议会里，也都有代理人宣传他们的观点。雇主协会按照职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第一，战斗性协会。它以消除工会主义和集体谈判为首要职能，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曾占压倒多数。由于它们采用的技艺大都被30年代的劳工关系立法宣布为非法，这类协会实际已被法律所取消。第二，交涉性协会。其首要职能在于联合雇主的努力，确保同某个或某些工会达成最有利的合同。它的次要职能在于防止工会的"欺诈"策略。这类协会30年代以后才开始迅猛增长，现在已成为最通行的一种职能类型。这类协会为汇集会员的财政捐款，用以雇用精通集体交涉的专门人员。在协会合力对付工会的同时，对其会员没有约束。会员可以脱离协会行列而同工会单方面解决问题，且协会在合同签定后，并不协助会员企业实施合同，而是从事下一轮交涉的研究工作。第三，实施性协会。该类协会保持全日制的由专家和职业交涉人员组成的班子，交涉人员一般都被会员企业授予委托代理交涉的法律权力，所以他们达成的劳动合同对会员企业有约束力。除交涉合同外，这类协会还负责配合会员企业的申诉以求阻止工会的"欺诈"策略（指工会以过去从某个雇主所获得的让步为根据而向其竞争雇主索取让步）。此外，协会办事人员还不断地进行研究工作，以便加强下一个交涉阶段中的交涉地位，同时向会员企业提供法律咨询，使它们熟悉有关立法和司法领域的新动向，以及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决议。这类协会是雇主协会中最正规、最牢固的一种，在美国西海岸城市中，这类型协会较多，那里雇主比较小型却面临强大而好战的工会。一般来说，由于雇主不甘愿把委托代理的法律权力交给职业交涉人员，实施性协会至今还不太普遍。第四，磋商性协会。它的首要职能仅在于提供一个集会地点，供会员探讨在未来交涉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为最不正规的一种协会，磋商性协会既不交涉，也不实施劳动合同，而且也不保持大量的或全日制的办事人员。通常在面临大多数会员企业同各自工会开始交涉时，召开由会员企业代表出席的会议，讨论工会提案及雇主可能作的反提案，但会员并不受此提案约束，每个企业回去仍独立地同某个或某些工会进行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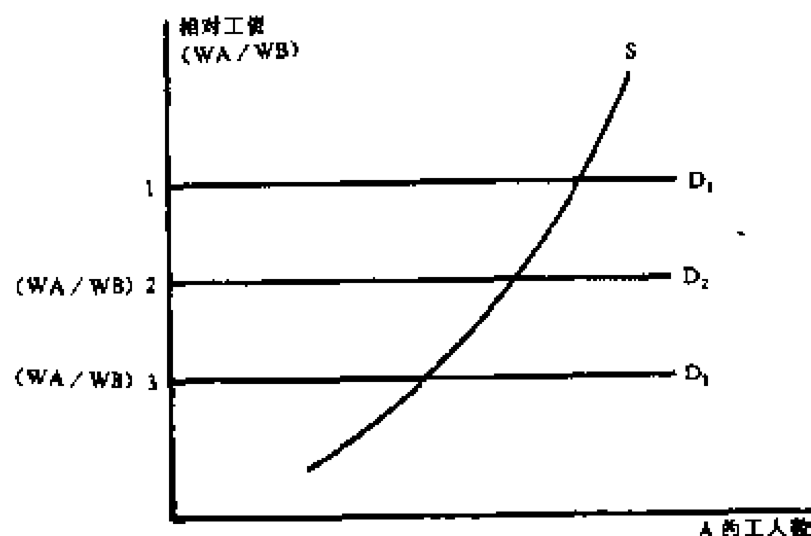
雇主协会在结构上同劳工组织非常相似，因为面对特殊的工会结构，雇主发现以同样结构的协会抵抗工会对自己有利。从结构上，雇主协会可划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技艺协会。这是最早的雇主协会类型，类似于技艺工会，其会员仅限于某种职业或技艺的雇主。第二，产业协会。这种协会力求接纳某个产业中的一切雇主为其会员，而不管雇用工人的种类和多少。这种协会是产业工会的伴生物，并随产业工会的增长而日益普及。第三，总体协会。这种协会可以是地方性的，也可以是全国性的，其会员为某个区域内雇用集体劳工的所有雇主，这种组织本身并不投身于集体交涉，而是用于同大型总体工会进行一些协调工作。从地理上划分，雇主协会主要有：与地方工会对等的地方协会；类似于工会城市中心机构的城市雇主协会；与劳工方面同级组织相似的州和地区协会；以及与全国工会对应的全国雇主协会。在美国，雇主协会没有象劳工的劳联——产联那样的全国联合会，但大多数工业国家都有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全国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业主协会和美国商会，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着普通联合会的职能。在有些工业国家，雇主协会同全国工会或者工会联合会之间的集体交涉已变成一种法则，这些国家中劳资关系比较集中，工资首先由全国范围、行业范围和地区范围的谈判来决定，然后经理或地方谈判代表加以补充修正以便反映当地的情况。例如在瑞典，先是由中央工会联合会同中央资方协会举行国家级谈判，随后进行具体行业和工厂的谈判。在英国，行业范围的谈判最为流行；在法国，则流行地区谈判。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工厂级的谈判都是紧随其后的。而在美国，劳资关系是分散的，15万个以上单独的劳资协议管辖着美国工人，其中绝大部分协议涉及的是在单个工厂、企业或地区的雇员，但美国通过协会交涉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劳动市场双方都存在推动这个国家采用协会交涉的力量。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协会交涉有得有失。一方面，协会交涉这种较大范围的交涉意味着较负责的交涉，因为它可以使主要交涉者更进一步摆脱其成员的特殊意见；另一方面，较大范围的交涉也意味着更有可能引致较大范围的罢工，迫使政府进一步干预劳资关系，甚至达到强行裁决的程度。经验表明协会交涉

确实提高了政府对劳资关系的介入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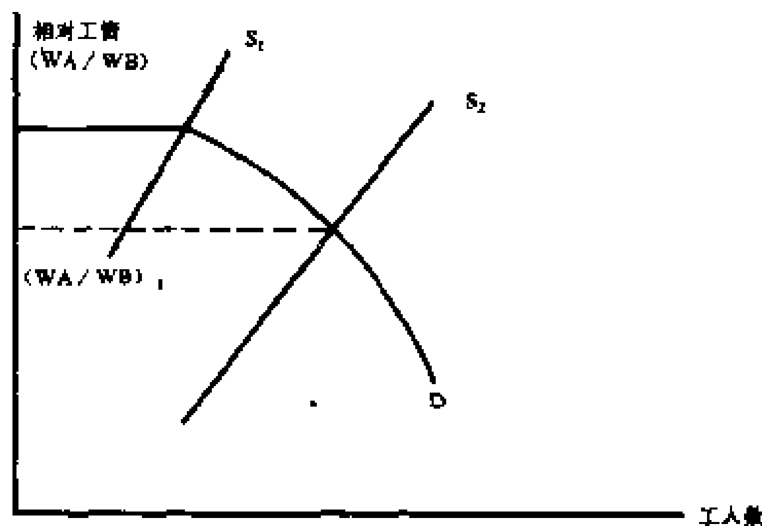
雇主的次级内部活动 雇主用于加强其基本内部活动一集体交涉而采取的一些辅助性活动。雇主的次级活动主要包括停厂、雇用罢工破坏者、复工运动、转让因罢工停止的工作、摩霍克峡谷方案、宣传、公司工会、黄狗合同等等。雇主的次级活动与工会的次级活动的明显区别在于，雇主的大多数次级活动实际是用于"破坏"工会或阻挠它组织公司里的工人，而不是仅仅为加强自己的交涉力量。雇主的许多次级活动如黄狗合同、公司工会等已被联邦劳资关系法判为非法。

雇主歧视理论 雇主歧视是指雇主对一部分工人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有嫌恶情绪，而这种偏爱或嫌恶与工人的技能无关。假设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竞争性产品市场中有两类工人 A 和 B，除了雇主不喜欢 A 类工人这点外，两类工人在各个经济方面，包括生产率方面，都是相同的假设目前还没有反歧视立法，因而雇主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毫无偏见，A 和 B 的工资就会始终相等，否则企业只会雇用较便宜的工人。同理，如果所有雇主都一致不喜欢 A 类工人，A 的均衡工资必然较低：工资相同就无



图一 偏好一致时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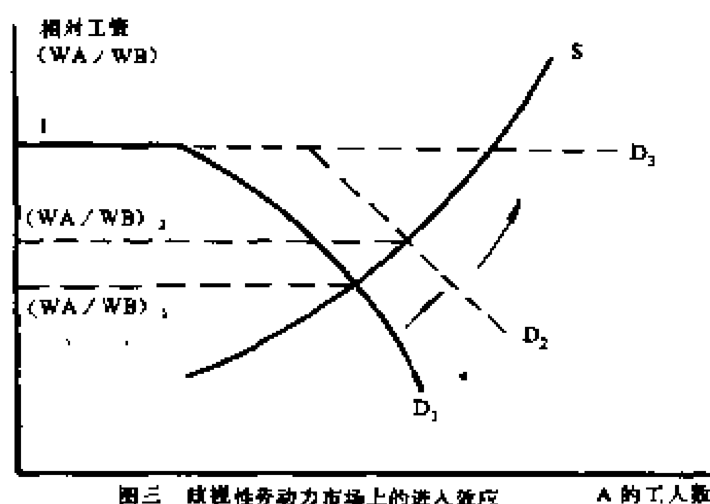
人愿意雇用他们。不过除非对 A 类工人不喜欢的程度无限大，否则就必然会有相当大的工资差别，足以使雇主重新对 A 和 B 一视同仁。图一中，如果没有歧视，对 A 的需求曲线如 D_1 水平于相对工资为 1（WA＝WB）之处。（A 与 B 生产率相同）如果相反，所有企业都不喜欢 A 类工人，需求曲线则为 D_2，其相对工资（WA／WB）较低。相对工资若高于这点，雇主根本不愿意雇用他们。但在给定偏好强度下，（WA／WB）$_2$ 处的工资差别足以诱使他们雇用 A 类工人。对 A 类工人厌恶越深，需求曲线便越低，如 D_3 所示



图二 企业歧视偏好不同时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如果一些雇主的歧视情感比另一些更强，情况将更为复杂。如有些雇主对 A、B 两类工人并无偏爱，其需求曲线如图一中的 D_1；另一些雇主的需求曲线则为 D_2、D_3，这样对 A 类工人总的市场需求曲线便如图二所示，在相对工资恰好使企业雇用 A 时，把每个企业的需求加总起来就得到了 D。相对工资为 1 时的一小段水平部分代表对 A 类工人无偏见的那些企业的总合需求；下倾部分则包括了有歧视偏好的企业，在上部的偏好最弱，在下部偏好最强。所以，曲线给出了每个相对工资下对 A 类工人的需求总数。如果供给曲线为 S_1，均衡相对工资将是(WA／WB)$_1$，A 类工人就会遭受歧视。这个模型表明：第一，劳动力供给现在对 A 类工人工资的决定起作用，倘若供给曲线象 S_2 那样一直很小，A 类工人便可以在没有偏见或偏好的企业范围内就业，这时不存在工资歧视，即使多数雇主都是潜在的歧视者；第二，在市场均衡点所有雇主对 A、B 一视同仁的观点已不再正确了。现在，位于均衡点之上的需求曲线所代表的雇主只雇用 A 类工人，因为他们愿意按高于均衡工资的相对工资进行雇用；同理，均衡点之下需求曲线所代表的那些雇主只雇用 B 类工人，对他们来说，均衡中 A 与 B 之间的工资差别并未达到足以抵消对 A 类工人厌恶强度的地步；唯有正好想在点（WA／WB）$_1$ 雇用 A 类工人的企业才既雇用 A 又雇用 B。假设行业中有些企业只雇用 A 类工人，另一些只雇用 B 类工人，根据我们最初的假定，A、B 两类工人有同样的生产率，既然 W_A 少于 W_B，因而不愿雇用 A 类工人的企业比雇用 A 的企业成本要高，但产品市场是竞争的，各个企业必须按同一价格出售产品，所以这个模型表明，那些不愿按均衡工资雇用 A 类工人的企业将付出减少利润的代价。最终结论是，歧视是与利润最大化行为不一致的。行业中企业结构可能因为歧视而发生变化，那些歧视偏好弱从而利润大的企业将向外扩张，另一些企业将进入这个行业进行生产，利润少歧视强的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将缩小，如果高成本使它们遭受损失，那么，随着时

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从这个行业中被排除出去。这一调整过程由图三予以说明，图中包括图二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初始相对工资是（WA／WB）$_1$。随着新企业的进入和老企业的扩张，对A类工人的需求曲线将外移。假如竞争压力足够强大，它会上升到D_2，最终达到D_3。关键性的结论是：在自由进入的竞争市场上，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消除歧视。因为歧视减少了利润，在长期中它就不能持久。所以雇主歧视模型不仅解释了歧视现象，更重要的是它预示了这一现象最终将会消失。



图三　歧视性劳动力市场上的进入效应

雇主基本的内部活动　雇主在劳工—经理范围内进行的活动称为内部活动，其中包括基本的内部活动和次级的内部活动。基本内部活动作为雇主内部活动的主要方面，通常意义上它指的就是集体谈判。对于雇主而言，显然没有什么理由促使他们自发要求集体谈判，因为在一对一的交涉中，他们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工会的成立，，以及政府立法保护工会主义和集体交涉，逼使雇主必须承认工会，并把集体交涉这种现代工业生活方式作为其基本的内部活动。

趋同假说(Convergence Hypothesis)　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差距逐渐缩小，相同点不断增多，最终可能走向同一种社会形态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人们按自己的意愿去从事各种活动，以便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个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不但不损害社会与集体的利益，反而恰恰使得经济体系总是处于均衡的状态，生产不断发展，社会福利得到提高、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政府无需对经济施加干预，它只要保证经济系统能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下运行、保证竞争的充分进行就可以了。但是在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停滞、失业剧增、整个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而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再不能象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通过"无形的手"使经济恢复均衡，在那场危机面前，平均体系本身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了，要走出危机，只有求助于政府的力量。罗斯福的"新政"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分别从实践上和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从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的作用来调节经济以及各集团利益之间存在的矛盾，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计划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通过制订中长期发展计划来达到实现经济起飞的目标。公有部门不断扩大，公共支出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另一方面，19世纪末出现的垄断组织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的优势受到很大冲击，虽然各国纷纷制订反托拉斯法以阻止垄断的形成与发展、保护竞争，但是各种类型的垄断组织正方兴未艾，规模继续扩大。这些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私有化、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以及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公有部门的扩大、垄断竞争以及计划性加强的冲击与取代。

再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府负责制订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再分阶段制订每一年的短期计划。短期计划相当详细，甚至为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安排了生产计划，然后下达交各经济单位去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意义上的市场在这里几乎不存在，价格、工资、利率等等市场信号被长期固定，成了统计与计划平衡的工具。企业无权无责，没有竞争压力，生产效率低下。而社会主义政府为确保公有制的绝对优势地位，严厉禁止私有经济的存在。这种经济类型适合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可以通过国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动人力、财力与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中性计划经济的弊端也日益突出，并严重妨碍了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让企业具有经营的自主权，自负盈亏，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与经济效益，企业之间开展了竞争。开放市场，使价格、工资、利率等指标真正成为市场信号，反映供给与需求的变化情况。市场体系正在不断健全。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在市场上直接传递信息，而不必象以前那样要纵向地间接沟通了。政府只从宏观层次上、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中进行控制与指导，计划的集中性下降了。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以作为对公有经济的补充。股票、债券交易正蓬勃开展，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完善之中。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彼此对立的两极，而且相互借鉴有用的经验，相似点不断增强。支持这种现象的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趋同的现象，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比一切体系都好的最优化体系，它是吸收综合了所有其它体系的优点而得

的，它通过计划避免市场中的无政府状态，又以市场竞争来保证经济有效地运转、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所有经济都是混合经济，只是不同体制的国家中，公有成分的比例与私有成分的比例不尽相同而已。他们认为，实现这一趋同的途径是通过国际间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方面的交流，使得各国都能够向最先进的技术水平、管理方法以及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方式学习。

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趋同假说。有些人认为，近年来，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已经难以奏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思潮再度兴起，这预示着政府干预程度的下降。再说，不存在一个优于一切现存体系的最佳体系，经济体系都会有利有弊，人们的看法不同，选择自然也不会一样。

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水火不相容，永远不会趋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府干预以缓和经济与政治发展中的矛盾，但是这无法根除其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可见，如果趋同假说指的是全世界各国在技术水平、管理方式、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共同点在增多的话，那么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各国交流不断加强的结果。但是，如果趋同假说指的是社会制度的融合，那么就是空想的、错误的。

确定性下的存货政策(Inventory Policies Under Certainty) 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在工业和商业行业中，存货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美国1982年非农行业的存货额为5000多亿美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维持这些存货的成本包括资金占用、场地占用、管理费，税收和保险费等，其成本总额约占存货总额的25%。正是因为存货的成本巨大，才产生了关于存货的理论。确定性下的存货政策是指厂商可以预期供给和需求条件下，尽量减少存货成本、努力实现最佳或次佳的存货量的政策。存货理论的研究既受其分析工具的影响，也影响分析工具的进步。最早关于确定性下存货政策的研究是1915年W·哈里斯的存货的经济规模模型。后来存货理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15—1950年，主要是用微积分的方法解决单一品存货的问题；1950—1965年，数学工具发展成为动态规则，线性与非线性规划等，主要解决的是单一品存货在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最佳策略问题；六十年代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多物品存货的策略问题。数学方法包括动态非线性网络分析、列昂惕夫替代模型等，这些工具使得存货控制理论得以建立。计算机的运用和完善化，促进了存货政策研究的复杂化。人们开始利用连续的动态的时空模型来研究多物品存货相调和的存货问题。

确定等值(Certainty Equivalent) 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策，理论上必须建立一个模型，明确每一种可能状态下的情况。在实际应用中，常常建立一个使不确定状态转变为可以简单处理的确定状态的模型。这种明确把不确定状态下的最佳决策转变为相应的确定状态下的最佳决策的条件，就称为确定等值。

萧（Theil，1954）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并设想了一个具体的有关确定等值的模型。

萧提出了以下两个假设（1）自变量X和因变量y通过一个简单的等式联系起来。

$$y=g(x)+s \tag{1}$$

这里S是一个随机变量，不失一般性，我们取其期望值为零。（2）决策者的目标函数是一个二次方程，可以写成：

$$m(x,y)=A(x)+\sum_{i=1}^{m}A_i(x)y_i+\frac{1}{z}\sum_{i=1}^{m}\sum_{j=1}^{m}A_{ij}y_iy_j \tag{2}$$

利用这个模型，当在（1）条件下求最大期望效用的最佳解存在时，这个解决方案与确定情况下的最佳方案是一样的，即是等值的：

$$\begin{cases}M_{ax}\,u(x,y)\\ y=g(x)\end{cases}$$

这一结果不但可以用于解决多时期问题，而且可推广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决策者可以逐渐获得更多信息的情况，这时结果随机性有所加大，但可通过利用编制动态序列的方法简单地解决，在时间t内的最佳解决方案是前时期标志η_{t-k}的函数：

$$X_t^*=X_t^*(\eta_1,\eta_2\cdots\eta_{t-1})$$

第一个时期，把对问题的解决方案转变为等值确定状况下的方案所要求的条件是很严格的。如前所述，必须要求目标函数为二次方程，另外还要求对自变量的限制为下面这种类型：

$$y=Rx+S$$

这里R是具有一些所需性质的矩阵（即某一时期的自变量对下一时期的因变量不发生影响。）

由于保证不确定状态与确定状态等值的条件非常苛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进行变换的可行性。去掉对模型参数的限制，转而对不确定状态本身进行限制，即考虑一组可以按其不确定性排序的问题，并使用参数ε来衡量他们的效果，而且对这些参数的限制条件是确定的。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在什么条件下，对于与一个确定状态等值的那些随机问题的解决方案同ε之间在一阶条件下是相互独立的。因此：

$$\frac{dE[x_1^*(\eta_1,\cdots\cdots\eta_t)\varepsilon]}{d\varepsilon}=0,\qquad \text{for}\quad \varepsilon=0$$

这种不同的设想称为"一阶确定等值"，是由萧(1957) 和马林沃德 (Malinvaud, 1969) 提出并加以探讨的。

马林沃德认为一阶确定等值的一般条件是 (1) 目标函数是二次型的；(2) 最佳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是连续的。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则在时间上，自变量的最佳值在作第一阶近似时是与不确定性相互独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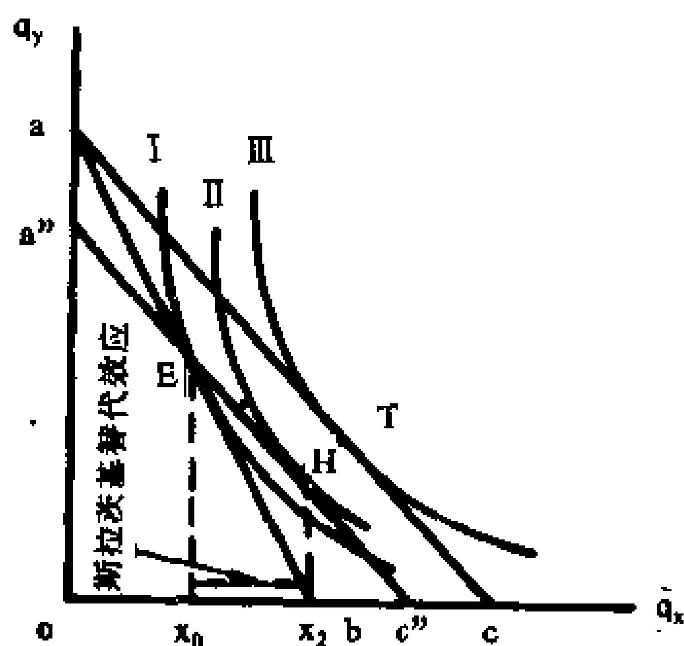
很清楚，如果对将来的自变量加以限制，这个条件是不能得到满足的，因为这会给将来带来影响。举一个具体而又有普遍性的例子，在决策一旦作出就不能撤回的情况下，一阶确定等值是不适用的。亨利(Henry, 1894) 指出，这种情况就是第一次决策的数值影响到以后时期的决策，利用确定等值，则会产生系统问题。

斯拉法经济学(Sraffian Economics) 斯拉法(Piero Sraffa) 是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1960 年，他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一书。斯拉法探究的问题是没有生产规模的变动或生产要素中的比例变动的经济体系的特征，认为国民纯产品就是超过补偿生产资料所需要的产品的"剩余"，把生产看作是同样的商品既表现为生产资料、又表现为最终产品的一种"循环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正是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他时常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者"。斯拉法证明了如何有可能解决李嘉图终生困惑而未找出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他规定一种"标准合成商品"，或简称"标准商品"，即经济体系中所生产的合成商品本身配合的比例，必须等于参加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总量的比例。当收入分配发生变动时，用标准商品来计量的相对价格就未变动，除非有了技术变革。斯拉法还论证了实际工资为已知和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就被决定。如果实际工资是用标准商品来测定，那么整个经济体系的实际工资和利润率之间的一种线性关系就能确立：

$$r=R\ (1-W)$$

式中 R 为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即最大利润率；r 为利润率；W 为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比率部分。斯拉法的理论结构中，生产价格的决定所根据的均衡条件仅仅在于每个部门的利润率均等，这个假说同为获得一定量的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一起考察，就足以决定分配量 (利率和工资) 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是基于客观材料，与建立在消费者偏好基础上的边际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斯拉法的理论对流动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促使 60—70 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就资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斯拉法以一种必需的分析工具装备了劳动价值论。斯拉法的经济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理论被称为斯拉法经济学。

斯拉茨基替代效应(Swtsky Substitution Effect) 斯拉茨基替代效应是区别于希克斯替代效应的一种替代效应。在某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后，消费者的支出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消费者实际收入发生变化。但是可以设想维持消费者实际收入不变来考察商品价格变化而产生的替代效应。斯拉茨基替代效应是在设想商品价格变动后按照新的价格比率将消费者维持在与价格变动前相同的预算线上，从而保持消费者实际收入 (实际支出) 不变情况下，由于商品价格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替代效应。图反映了希克斯替代效应。该图是某消费者消费 x 与 y 两种商品的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图。图中预算线 ab 线是 x 商品价格降低之前某消费者的预算线，预算线 ab 与无差异曲线 Ⅰ 相切的均衡点为 E 点。x 商品价格降低后，形成新的预算线



AC，它与较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构成了新的均衡点 T。x 商品价格降低后所引起的总的效应 (收入效应加替代效应) 是从 E 点到 T 点。其中 E 点到 H 点 (横坐标 X_0 到 X_2 点) 为斯拉茨基替代效应。它是在 X 商品价格变化，从而预算线由 ab 变化为 ac 后，在新的价格比率下将消费者维持在原来支出水平上 (与新的预算线 ac 平行的预算线 a″c″ 过原均衡点 E 点，它与新的高于 Ⅰ 但低于 Ⅲ 的无差异曲线 Ⅱ 相切)。

斯堪的纳维亚模型 (Scandinavian Model) 又称"北欧模型"，或"小国开放经济模型"，由挪威经济

学家 W·奥克鲁斯特（W.Aukrust）提出，并由瑞典经济学家 G·埃德格兰（G.Edgren）、K·法克森（K.Faxen）、C·奥德纳（C.Ohdner）等人进一步发展。这一模型说明了开放型小国经济中通货膨胀的机制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过程。这一模型把一国经济分为两部分：开放部门，即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易，其价格是世界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并且经济效率高；封闭部门，即其产品在国内市场进行交易，其价格由国内市场决定，并且经济效率低。这一模型认为，在这种开放型小国中，国内通货膨胀是国外传递而产生的。其基本观点是：第一、世界市场价格决定了该国开放部门产品的价格，这种价格通过汇率转化为本国货币表示的价格后，又与该部门的技术条件和生产率共同决定了该部门利润率。第二、开放部门的利润率决定了该部门的工资率，一般来说，工资率将调整至该部门能维持正常的利润率为止，否则该部门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第三、通过全国性的工资集体谈判，开放部门任何工资增长都将导致封闭部门工资率的相应增长，由于封闭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般低于开放部门，在工资同比例增长的条件下，势必引起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第四，一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是由两个部门工资上涨率的加权平均数决定的，因而必定受到经济中两个部门结构比例的影响。设开放部门（E）的通货膨胀率为 π_e，它与国际市场的通货膨胀率 π_w 保持相同水平，即 $\pi_e=\pi_w$；封闭部门（S 的通货膨胀率为 π_s；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为 π；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 λ_e，封闭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 λ_s，根据假设条件 $\lambda_e>\lambda_s$；开放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 a_e，封闭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 a_s，且 $a_e+a_s=1$。国内通货膨胀率是两个部门通货膨胀率的加权平均数，则有：

$$\pi=a_e\pi_e+a_s\pi_s=a_e\pi_w+a_s\pi_s \qquad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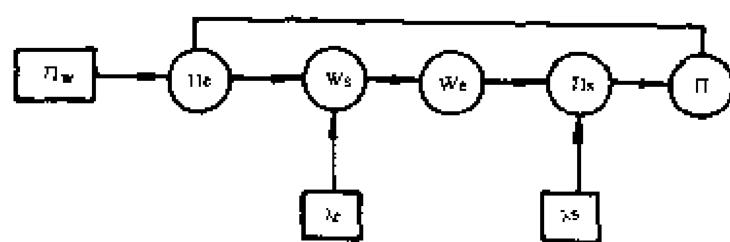
由于封闭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开放部门保持一致，而其劳动生产率又低于开放部门，所以，封闭部门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开放部门，高出的幅度为这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额，这样，封闭部门的通货膨胀率为：

$$\pi_s=\pi_e+(\lambda_e-\lambda_s)=\pi_w+(\lambda_e-\lambda_s) \qquad —(2)$$

将（2）式代入（1）式则得出：

$$\begin{aligned}\pi&=a_e\pi_w+a_s[\pi_w+(\lambda_e-\lambda_s)]\\&=(a_e+a_s)\pi_w+a_s(\lambda_e-\lambda_s)\\&=\pi_w+a_s(\lambda_e-\lambda_s)\end{aligned}$$

上式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其含义是：国内通货膨胀率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国际市场的通货膨胀率。第二，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在经济中各自所占的比重。第三、两个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额。还可用附图说明国际间通货膨胀传递的过程：



在附图中，方框中为外生变量，圆圈中为模型所要解释的内生变量。从附图的左方开始，世界通货膨胀率 π_w 作为外生变量影响到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率 π_e。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 π_e 与其劳动生产率 λ_e 共同决定该部门的货币工资率（W_e）。由于工资的攀比效应，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率决定封闭部门的货币工资率（W_s）。封闭部门的货币工资率（W_s）与其劳动生产率（λ_s）决定该部门的通货膨胀率（π_s）。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率（π_e）与封闭部门的通货膨胀率（π_s）及这两个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了国内通货膨胀率（π）。这就是世界通货膨胀通过开放部门而传递到国内，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过程。这一模型把国际通货膨胀，国内经济结构（开放部门与封闭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以及工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三者结合起来，解释小国开放经济中通货膨胀发生的机制。这一模型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

斯蒂格勒生存法（J·Stigler's Way Of Subsistence） 一种判断规模经济存在与否的方法，涉及到对厂商（或工厂）在全部时间内规模分布的检验。这被斯蒂格勒称为"生存法则"。他提出，穆勒在 19 世纪已经提出过这一点。生存法包括一个比较简单的计算，即在整个时期内按规模把厂商划分成各种等级，计算它们的产出在行业中的份额。可以推测，如果等级给定的厂商产出所占份额下降，其对应的厂商规模就是相对缺乏效率的。等级给定的厂商产出所占份额下降越快，相应的规模就越缺乏效率。斯蒂格勒指出生存法并不能决定一个厂商的社会最优规模。相反，该方法只是从厂商的角度来看待效率，它力图弄清楚哪一种等级的厂商规模对付政府的管制、动荡的国外市场、快速的创新、紧张的劳工关系，以及更普遍的市场力量最成功。斯蒂格勒认为，生存法将取代任何成本或利润率的技术分析。例如，如果技术分析表明厂商最优规模是每家日产量为 1000 单位，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生产规模比这个标准大三倍的厂商却在扩大其市场份额，那么日产出 1000 单位就不可能是最优规模。生存下来的厂商的经验将是检验规模经济存在与否的最终标准。根据斯蒂格勒生存法的原理，进行

实际的测算表明，不同产业的最佳企业规模有很大差别。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对具体产业作具体分析。

斯密分工论　参见斯密条

斯盘，奥特马　(Othmar Spann,1878—1950)　德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史家。生于维也纳，长期担任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经济学史》(1910 年）一书是流传十分广泛的经济思想史名著，共出了 19 版。在经济理论方面，他因提出所谓的全体主义经济学而闻名。按他的解释，"全体"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它对上而言时只能成为局部，而对下而言时自身即为全体；同时，只有在全体存在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局部方可能存在。从其论述来看，最高层次的全体实际上是指国家这个有机体，可见这是一种鼓吹国家至上的论调。他又宣称，只有在中世纪的基尔特和合作社这样的经济形态下，全体主义的理想才能实现。作出这种反动的空想在经济学史上屡有先例，他由此获得了 20 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经济学家的名声。全体主义经济学曾经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起过反动的作用，二次大战后对德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已没有什么影响。

斯图亚特，詹姆斯（James Steuart ,1712—1780)　18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生于英国爱丁堡，1729 年入爱丁堡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获律师资格。1746 年政治流亡在外，开始研究经济学。1763 年回国后更是埋头著述，致使众多著作相继问世。他的主要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原理》(1767 年)。该书第一次将"政治经济学"一词用于书名，试图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许多方面看他的理论体系仍立足于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如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宣扬利润来自商品的让渡等，同英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要求相悖逆，故马克思称之为"迟到的重商主义者"。他主张商品的价值由三个因素决定，即单位时间平均完成的劳动量、购置生存资料和必要生产工具的价值、材料的价值这三者构成"实际价值"，产品的价格不能低于"实际价值"，超过部分则成为厂主的利润。这种混乱的价值论同其不懂得把资本家的预付费用还原为劳动来进行补偿密切相关。不过，他发展了配第关于创造商品的劳动与创造金银的劳动有区别的思想，强调劳动是增加生活必需品供应的唯一源泉，认为那些促进社会财富扩大或增加的利润"是劳动、勤勉或技能的增进产生的。"他还接受诺思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应同商品交换的需要相适应的说法，认为多余的货币将被贮藏或铸成金银条块。他又纠正了洛克和休谟在货币分析中的一些错误。因此，斯图亚特依然可以跻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行列之中。

欺诈(Fraud)　当一个代理人不据实报告有关信息以诱使他的委托人作出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在委托人知道真实情况时是不会作出的，此时，就说这个代理人有欺诈行为。欺诈这种现象一般是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这两个个体通过共同合作可以获得某种好处，但这两个个体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并且这两个个体各自所掌握的信息也有差别。更具体一点，是否具有欺诈行为，关键在于这个代理人是否既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又具有可以通过这种拥有信息上的优越去影响委托人的行为以增加自己在总收益中的份额的地位。欺诈是很广泛的经济代理关系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欺诈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在生产者（即代理人）和顾客（即委托人）之间，只要在实际购买商品和劳务之前，证实生产者关于这些商品和劳务所声称的事实的成本是很高的，那么，一般就会出现欺诈。如果生产者关于这些商品和劳务所作的保证很容易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进入该市场的主顾是固定的，那么，这些厂商的欺诈行为就会受到他们出于保持他们的信誉的考虑的限制，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短期的生产者仍然会继续欺诈这些顾客。欺诈行为最多的可能是发生在服务行业，因为服务行业所提供的服务在未享用之前，更难于对它作出鉴定，对它的质量更不易估计。

欺诈行为有时候可以通过双方的自愿约定来防止，这些自愿的约定如正式的保修单和售后服务合同一般会削弱供给方欺诈顾客的动机，因为这些保修和售后服务都需要增加供给方的维修费用。因此，在不能直接证实生产者所作的保证的场合，这些保修单和售后服务可以看成是对生产者所作的保证的一种证实工具。还有一种不那么正式的约定是"主顾关系"，这种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隐蔽的约定：只要顾客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诈，他就会一直光顾这家商店。

由于欺诈行为可以获得利润，这些利润又往往要引起资源的流动，在进入障碍不存在时，这些超额利润最终会消失，但在这些超额利润消失之前，资源配置已经被扭曲：一些稀缺资源被错误地引导到并不是必须的地方。

成功地查明和告发欺诈行为可以防止欺诈的发生，这需社会的干预，让欺诈者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种政策可以提高人们对欺诈的警惕性，它通过对欺诈者课以罚金可以将社会上的欺诈行为降低到适度水平。这需要通过政府部门或法律机构来强制实现。

既然不真实的信息既有可能来自有意的欺骗，也有可能纯粹来自产品不合格，因此，成功的抑制欺诈政策也会提高供给的质量水平。不过，与消除有意谎报信息不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需要供给者进行投资。因此，在确定减少欺诈的政策的目标时，就必须要考虑使由于质量的提高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与所使用的资源的成本相对应，这样就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最佳欺诈水平不为0。

期权(Option) 期权是财政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一种用于交易的契约权。期权有两种最普通的形式，即购买权（call）与出售权（put）。购买权是购买期权（call option）；出售权是出售期权（put option）。购买权与出售权是两个投资者之间的契约。期权的购买者是契约给予他某种权利或"选择权"的一方。购买权的所有者被认为具有长余期货（long position）。期权的创造者被认为具有短缺期货（short position）。如果购买权的所有者选择去运用购买期权，则这一购买期权的创造者将具有一定的金融义务。购买权的所有者有权利（而不是义务）在一给定的日期或这一日期前按照设定费用购买某一固定数量的特定资产；这一给定日期被称为到期日（maturity date）或截止日（expiration date）；这种所设定的费用被称为行使价格（exercise price）、或定约价（Striking price）、或契约价（contract price）。购买权所有者只有行使购买期权才能得到普通股带来的红利或者产生于所有权的其他权利。出售权的所有者有权在相同的条款下出售其出售期权。

期权分"欧洲型期权"与"美洲型期权"两种。欧洲型购买（或出售）期权是一种给期权所有者在特定的价格（行使价格）、特定的日期（截止日）购买某一定数量金融资产或实物资产的权利。美洲型期权允许期权所有者在截止日或截止日之前都可以行使其期权。

期权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与市场价值（market value）之分。以美洲型期权为例，当购买期权时，持有长余期货的一方付给持有短缺期货一方的数额被称为溢价。如果股票价格高于定约价格，二者的差额被称为购买权的内在价值。对于一个市场价格为S的股票来说，若其购买权的定约价为X，则内在价值是max（s−x，0），即s−x与0二者中的最大值者。对出售权来说，当行使价大于股票价格时，其内在价值是行使价格减去股票价格，即max（x−s，0）。期权内在价值有时又称为行使时价值（when—exercised value）。一种期权的内在价值并不能测度其市场价值，典型的情况是所有期权出售的价格都要高于其内在价值。

期权定价理论(Option Pricing Theory) 期权是特定的金融证券。研究期权价格决定的理论称为期权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是财政经济学中近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理论。尽管该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本世初法国数学家路易·巴歇利埃（Louis Bachelier）。他在1900的所写的"投机理论"一文中试图利用数学方法描述期权定价的均衡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系统的阐述与运用开始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布莱克（F·Black）与斯古尔斯（M·Scholes）1973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期权定价与公司责任"一文奠定了现代期权定价理论的基础。布莱克与斯古尔斯假定构成期权基础的资产的定价动态学可以通过带有连续样本轨迹的扩张过程加以描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可以用基础性资产与无背信债券中动态的交易策略为期权中长余状况和短缺状况的风险设置障碍。在导出这样一种动态交易策略的基础上，布莱克与斯古尔斯认为，无风险资产组合必须与无背信债券其有同样的收益这一均衡条件决定了期权价格。布莱克与斯古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为许多财政经济学家接受、发展和运用。

期权定价理论已经成为财政经济学的基石，这一理论虽然创立的时间较短，但却得到长足的发展。该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涉及到期权定价问题本身，还被推广到其它金融问题的研究之中。例如，该理论被用于对实施了财政杠杆措施的股本进行定价。之所以能对这样的股本定价，是因为通过部分债务筹资的厂商的股份具有与厂商资产的期权相等同的支付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定约价是厂商债务的面值，截止日是厂商债务的到期日。期权定价理论被用于资历、提前兑回条款、关于债务的偿债基金安排、可兑换股票的债券、商品，各种不同的通货、利率的最高与最低价格安排、股票与债务栈单、权利与备用信贷协定等模型中的定价问题。

期权定价理论被用于评价非公司金融安排，例如，用于政府贷款担保、养恤金保险、存款保险的评价。期权定价理论还被用于评价研究与发展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期权定价理论是把研究与发展方案看作是进入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减少生产成本的期权。

期货市场，套头交易与投机(futures markets, hedging and speculation) 对货物的期货市场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芝加哥，并很快传播于各地，应用于许多商品。远期契约（forward contract）是两个交易者对一笔交易交割的日期、价格等内容所达成的协议，它的历史要追溯到商业本身开始的时期。期货市场区别于大多数远期契约的显著特征在于，期货市场

的契约是标准化的，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流动性很高，可以被买卖许多次。对期货市场所起作用的标准的解释是它们能够分散风险，从而减少风险，并且推动了对有关信息的收集与传播。远期市场（forward markets）提供了同样的分担风险的机会，但是较大的透明度与较大的流动性使得期货市场在制度上更有利于价格补偿。关于期货市场如何很好地完成收集、汇总、传播信息的工作，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假定具有理性预期并且拥有共同的信息，那么期货市场的价格补偿的作用就可以忽略不予考虑了，风险分担的研究也没必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期货市场与远期市场也没多少概念上的区别了。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些市场的两个典型：套头交易与投机。

投机是对一种商品先买（卖）后卖（买），目的不是为了使用这种商品，而是希望从价格变动中获得收益。一般说来，任何耐用品都可被用于投机性购买，但是，如果置存成本比较高，或者说缺乏流动性，这样，买与卖之间的差价比较大，对于这种商品的投机通常也就不吸引人了。这里所说的流动性是指存在一个完整的或接近完整的市场，在其中，商品在确定的价格上可以立即被卖掉，而这样的要求就对能用于大规模投机的财产的范围做了严格的限定。一般说来，金融财产（债券、股票）的性质使它们特别适合于投机。我们再看一下套头交易，它指的是在期货市场上为减少风险而进行的交易。例如，一个怕冒风险的果农可能在1月份就按商定的价格与数量把他的果子卖出去，而这些果子要在半年以后才能成熟。而一家怕冒风险的水果罐头厂为预防届时水果价格上涨，可能现在就把半年以后的果子买下来。对于罐头厂商来说，如果半年后果子成熟时价格比合同的要高，则由于涨价他要付更多的钱买果子。但是，由于他已经以较低的价格订了一个期货合同，则在合同的数量范围内，他可安较低的价格买进果子。这样，至少可部分补偿他因果子涨价而造成的收益上的损失。当然，半年后也可能发生价格比合同上的价格要低的情况，他将因按合同购买高价果子而受损失。但是，这时市场上的价格比较低，所以在他对果子的全部需求中，除去合同规定的以外的部分可在市场上以低价购得，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当初签订高价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这样，不论半年后果子价格是上升还是下降，罐头厂商都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对果农的分析也是同样。

期汇交易　(Forward Exchange Transaction)　见“远期外汇交易”。

期权交易　（参见“期权”）。

替代与互补(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　对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两种消费品或投入品如果能单独满足消费者的同一种欲望或生产者的同一生产目的，那么这两种消费品或投入品就是互为替代关系。如果必须同时是二者的结合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一种欲望或达到生产者的某一目的那么它们就是互补关系。商品的替代与互补通常是对消费者行为理论予以分析，但在生产投入品之间也存在替代与互补的关系。消费品中互为替代关系的例子很容易就能找到，比如啤酒与汽水，二者都能解渴，但要达到解渴的目的，所需要的啤酒与汽水的数量是不相同的，一般看来对啤酒消费量的增加而能替代的汽水数量，或者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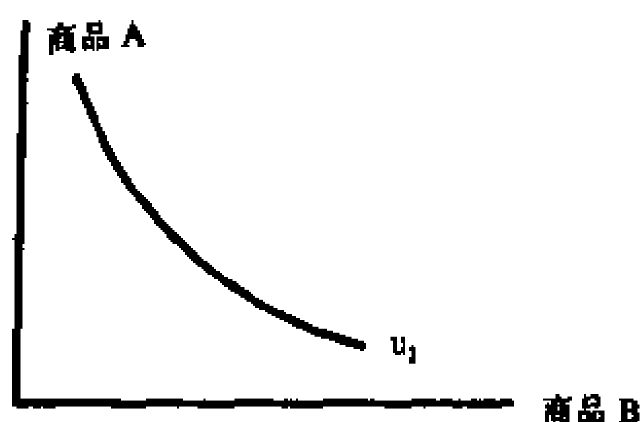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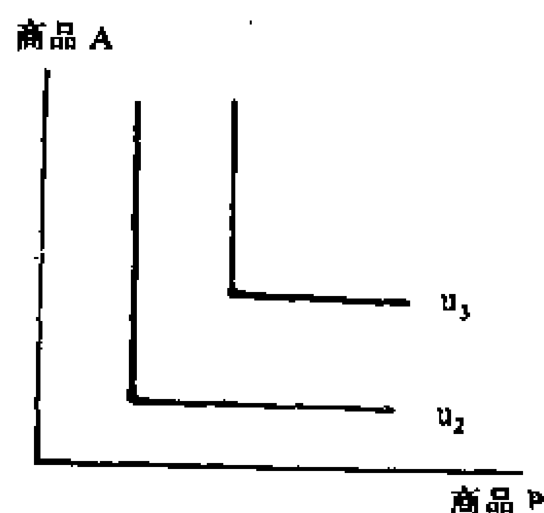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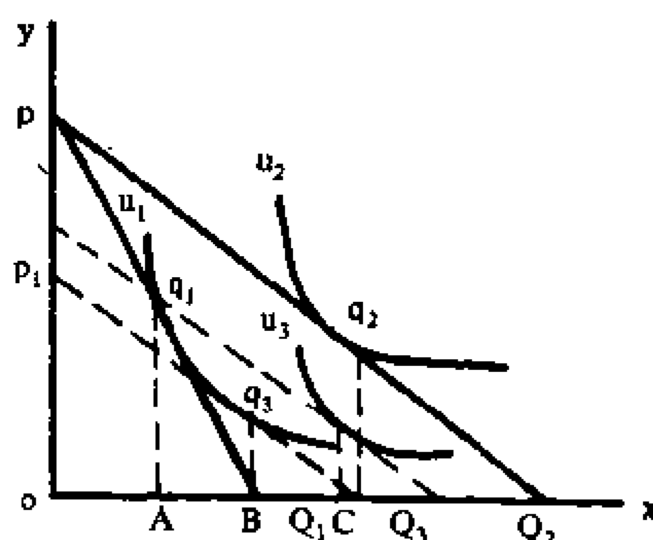
图 2

过来对汽水消费量的增加而可以替代的啤酒的数量在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不变的前提下是递减的，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一般都假定存在替代的可能性，这样无差异曲线或等产量曲线是光滑的。在互补的情况下，一单位的X商品须有一定单位的Y商品作为补充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磁带和录音机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互补关系，有录音机无磁带或有磁带无录音机都不能达到所要求的消费效果。上图1表明而商品具有替代关系，上图2表示两商品具有完全互补关系，U_1、U_2、U_3为消费者无差异曲线。对于替代与互补品还可以从两商品需求的交叉弹性来定义。如果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为负即一商品价格上涨会使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减少，则这两商品是互补的，若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为

正，则互为替代品。

替代定律 (Law Of Substitution) 替代定律由马歇尔所创立。它是指经济中低效率的生产方法总是被高效率的生产方法所替代，费用高的技术总是要被费用低的技术所替代。替代定律既适用于一个企业，也适用于整个社会。就一个企业而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总是要用生产效率比较高的方法代替生产效率比较低的方法。例如，如果一单位劳动与一单位资本的费用相同，资本与劳动间可以相互替代，而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大于一单位劳动所生产的产出，那么厂商将用资本替代劳动。厂商也总是用费用较低的生产技术替代费用较高的生产技术。例如，若一单位资本与一单位劳动所生产的产出相等，但劳动的价格是资本的一半，那么厂商将用劳动代替资本。就整个社会而言，在竞争中，费用较高、效率较低的企业将被费用较低、效率较高的企业所替代，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替代定律还可以被用于消费方面。若 A、B 两商品的价格相同，但 B 物品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效用，那么，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将总是用 B 商品替代 A 商品，以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

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假定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保持不变，一种商品价格发生变化，消费者在原有的效用水平上，但会改变对价格变动商品的消费量，这个变动量就叫价格变动的替代效应，或者如斯拉茨基方程所说的，这个变动量与价格变动量的比率是替代效应。下面我们举价格下降这一情形具体加以说明。如下图所示，假定 X、Y 两种商品，消费者的收入为 $Y=P_x \cdot X+P_Y \cdot Y$，$P_x$，$P_Y$ 分别为 XY 商品的价格，又假定 P_X 下降，这时消费者的预算线由 PQ_1 变为 PQ_2，其效用水平将由 u_1 提高到 u_2，在 u_1 水平时对 x 商品的消费量是 OA，在 u_2 水平时为 OC，那么以 OA 到 OC 不变化是价格变动的总效应，也就是因为 P_x 的下降，对 X 的需求量总的变化为 OC−OA 。对此，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分解，画出与 PQ_2 平行的 u_1 的切线 P_1Q_3，P_1Q_3 所表示的 X 与 Y 的比价关系与 PQ_2 所表示的相同，新的切点 Q_3 所对应的对 X 的需求量为 OB，那么 AB 就为替代效应，这是因为 AB 是剔除了 P_X 的变动所引起的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变化，单考虑因 P_x 变动而引起的 x 对 y 的替代，其数量 AB 就是替代效应。而 BC 则是由于 PX 的变化而使消费者收入增加从而对 X 需求的增加，因而叫收入效应，AC 为价格变动的总效应，从图中看显然有总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一般说来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斯拉茨基方程用代数学方法表明了上述关系。希克斯最早对替代效应作了论述，此后替代效应就日益成为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替代弹性(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替代弹性是生产函数的一个性质，假定某一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q＝(k，l)，q 为产品产量，K 为资本投入，L 为劳动投入。当劳动与资本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将产生生产过程中劳动与资本间的替代。例如资本价格(P_K)不变，劳动价格(P_L)降低时，将在生产过程中用劳动代替资本，要素相对使用量的变动率 $\triangle\left(\frac{K}{L}\right)/\left(\frac{K}{L}\right)$ 比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率 $\triangle\left(\frac{P_L}{P_K}\right)/\left(\frac{P_L}{P_K}\right)$ 为替代弹性，即用劳动 L 替代资本 K 的替代弹性为

$$E_{LK}=\frac{\triangle\left(\frac{K}{L}\right)/\left(\frac{K}{L}\right)}{\triangle\left(\frac{P_L}{P_K}\right)/\left(\frac{P_L}{P_K}\right)}$$

。由于在等产量曲线与等成本曲线切点 $\frac{P_1}{P_K}=\frac{MP_L}{MP_K}=MRTS_{LK}$，($MP_L$ 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MP_K 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MRTS_{LK}$ 为用劳动代替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所以

$$E_{lk}=\frac{\triangle\left(\frac{K}{L}\right)/\left(\frac{K}{L}\right)}{\triangle\left(\frac{P_L}{P_K}\right)/\left(\frac{P_L}{P_K}\right)}=\frac{\triangle\left(\frac{K}{L}\right)/\left(\frac{K}{L}\right)}{\triangle(MRTS_{LK})/MRTS_{LK}}$$

替代弹性用来测度在资本与劳动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用劳动替代资本（或者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容易或困难程度。若替代弹性等于零，说明无论要素相对价格如何变化，都不会发生要素之间的替代，要素之间是

按固定比例组合的。若替代弹性为无穷大，说明要素之间可以完全替代。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较少见，若替代弹性等于 1，说明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率与要素相对使用量的变动率按同一比例变化，若某生产函数中要素替代弹性不变，则称该函数为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称简 CES 函数。弹性等于 1 的生产函数是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中的一种。

赔偿（Reparation） 民法中所讨论的赔偿是指一个人未履行法律义务或在正常情况下违反合同或进行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伤害、损失或损害而向他人支付的实物或金钱补偿。这种补偿金分为普通损害赔偿金和特殊损害赔偿金。前者指因违反合同或侵权行为的推定损失而引起的赔偿。后者是在特定场合事实上发生的而不是推定的具体损失而引起的赔偿金。经济学中对类似于民法中的赔偿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外部性问题的研究中，在庇古(A · C · Pigou)的福利经济学里就探讨了一个人的经济行为给他人带来福利损失的经济补偿问题。此后在以科斯(R · Coase)为先导的交易费用经济学里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赔偿行为也有可能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国家由于战争失败或对他国的部分人造成损害而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向战胜国或受害者进行支付，领土的割让一般不算作赔偿之列。这种赔偿一般是由于某种错误，但无法找到某种标准在错误行为与赔偿支付之间建立平衡，赔偿额与实际损害并不是一致的，常常无法取得这种一致，因而对赔偿的"正确"数量的确定经常发生一些无休止的争执。国与国之间的赔偿支付往往伴随着某种强权行为。中国清朝末年对帝国主义的赔偿就属于这种类型。

赋税归宿(Tax Incidence) 指税收负担的最后承担者。在不存在税收负担转嫁的前提下，税收归宿就是纳税人。但实际上税收负担往往存在一个转嫁问题。这种转嫁既有顺转，指纳税人将其税负在交易时转嫁给交易的另一方，其方法是售价中已加有税款，也有逆转，指纳税人零售商将税负转嫁给批发者的厂商。在前一种情况下，税收归宿就为消费者，如酒税就包含在售价中，税收负担由酒厂纳税之后，经批发商和零售商辗转到消费者。后一种情况下，税收归宿在纳税者的前面的流转阶段，如由零售商转给批发者和厂商。直接税的税收归宿为纳税人，间接税的税收归宿则不为纳税者。据美国的一些学者研究，美国 1981 年的个人所得税约占联邦税收收入的一半，其中 80%以上由年收入在 30000 美元以下的劳动者负担。公司所得税即可向前通过提价转给消费者，也可通过降低工资向后转给雇佣劳动者，这样其税收归宿就为消费者和雇佣劳动者。至于一般的销售税，税收归宿多为广大消费者。要了解税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就必须分析税收归宿问题。经济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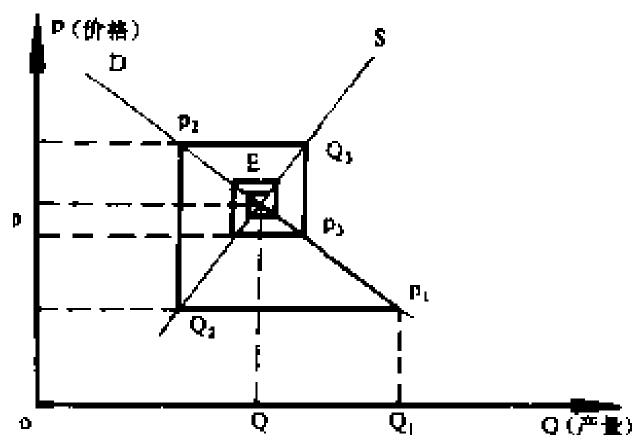
蛛网理论(Cobweb—Theory) 一种最简单的动态模型。它试图说明市场上某些商品所表现出的价格与产量的波动现象。这些商品的共同特征是都有一定的生产期，当期的产量决定于预期的产品售价，而实际的市场交易量则决定实际的市场售价。所以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农产品如毛猪、砂糖、橡胶等。这些农产品有较长的生长期，因此市场供给量是前一期价格的函数，而市场需求则是当期价格的函数。理论上有均衡价格及交易量的存在。但当实际价格与均衡价格不一致时，实际价格并不一定表现为迅速趋近均衡价格，而很可能在均衡价格上下波动，实际交易量也表现为在均衡的交易量上下波动。这种波动依照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与供给弹性之间的不同关系而表现为三种型态：一是递减振幅的波动，波动的结果必然趋向均衡；二是固定振幅的波动，表现为循环往复，波动不已；三为递增振幅的波动、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偏离均衡点越来越远。蛛网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理论上的开先河者分别是美国的舒尔茨（H · Schultxe），荷兰的丁伯根（J · Tinbergen）以及意大利的里西（U · Ricci）。蛛网定理的名称则是由英国的卡尔多于 1934 年首先提出的。"蛛网"乃是对该理论所研究的价格波动的轨迹的名状。

蛛网理论获得迅速发展的二个时期分别是本世纪 30 年代和 50—70 年代。30 年代的研究致力于探索预期的形成过程以及价格预期机制对均衡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研究的是稳定的价格预期，也即预期价格等于上期的市场价格。在这一预期机制下，当产品的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时，市场价格在长期中将长期中将趋近于均衡价格，反之反是。这一稳定性条件由后来采用的更为精确的预期模型进行了修正。30 年代对蛛网理论研究贡献最大者当推伊思基尔(Ezekiel)，他在发表于 1938 年的论文中详尽而清晰地讨论了发散、收敛以及持续振动的条件并且说明了不同周期的循环在稳定的预期下是如何形成的。奠定了蛛网模型的基本内容。30 年代大量的研究成果昭示了蛛网理论是解释价格循环的有用的分析工具。这一时期对理论演进产生较大影响的批评主要来自科斯（Coase）、福勒（Fowler）以及布坎南(Buchanan)。高斯和福勒对英国的肉猪生产的循环作了实际的考察，发现了经验证据与稳定性价格预期假设的矛盾，他的研究结果暗示了预期价格不是以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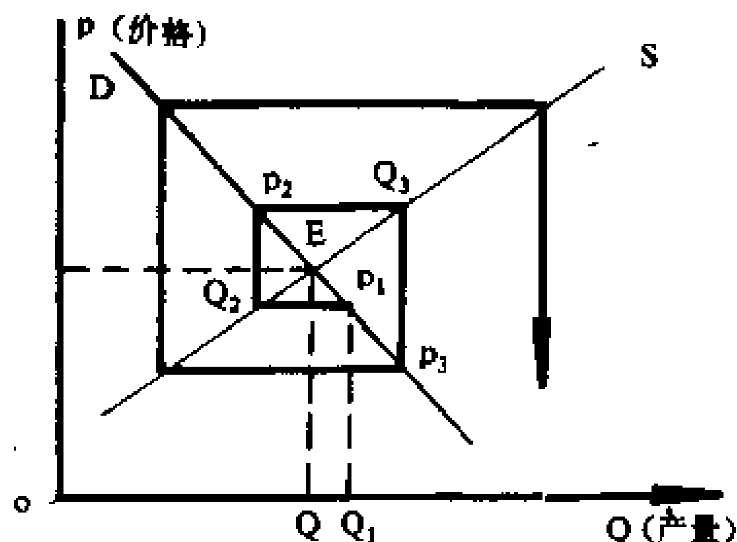
种机械方式形成的，生产者对未来利润的变化会作出迅速的反应。预测的误差源于对需求和国外供给变化进行预测的困难。他们甚至以模糊的形式提出了7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的假设。布坎南1939年的论文从另一个角度对蛛网定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认为蛛网理论意味着当产量由长期供给曲线决定时，生产者在整个价格循环期间将承担全部损失，持续不断地供给的生产者准备耗尽其全部资本，这与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毫无共同之处。50年代理论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对价格预期机制的革新。1958年纳洛夫（Nerlove）受经济计量学研究成果的启发提出以适应性预期来解释价格行为。并说明了在适应性预期和扩大的条件集合下，蛛网收敛的可能性。虽然纳洛夫的提议纠正了蛛网理论的基本假设，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关键性的问题即为什么生产者要依赖某一种特殊的预期机制。米尔斯（Mills）60年代初对适应性预期进行了批评。穆思（Muth）则对预期的本质赋予新的解释。他认为预期是对市场经济结构的一种预测，它综合了全部所得获得的信息。在此穆思在蛛网理论中发掘了理性预期的含义。理性预期的提出对蛛网理论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适应性预期仅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才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价格预测结合了全部可得信息，那么预测的误差将不具有连续的相关性，从而过去际观察到的周期短得多的价格循环。近年来，对于蛛网理论的研究趋于衰落。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应用理性预期的更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即使在应用蛛网模型的市场上，对理性预期所作的经济计量的检验也很鲜见。从而蛛网理论对现实的价格行为的解释能力仍是个待解的问题。

传统蛛网模型的三种图示如下：

（1）从绝对上比较，供给曲线斜率大于需求曲线斜率，价格和产量的波动越来越小，最后恢复均衡。此模型称作“蛛网收敛”。



图中，D、S分别表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E为均衡点，OP为均衡价格，OQ为均衡产量。第一时期产量为Q_1,$Q_1>Q$,于是供大于求，买主为Q_1付出的价格是P_1,$P_1<P$。第二时期，买主以P_1来决定产量故而产量为Q_2，$Q_2<Q$，出现供小于求，这时市场价格上升至P_2.$P_2>p$。第三时期，卖主以P_3决定产量Q_3，$Q_3>Q$，则价格跌至P_3,$P_3<P$。这样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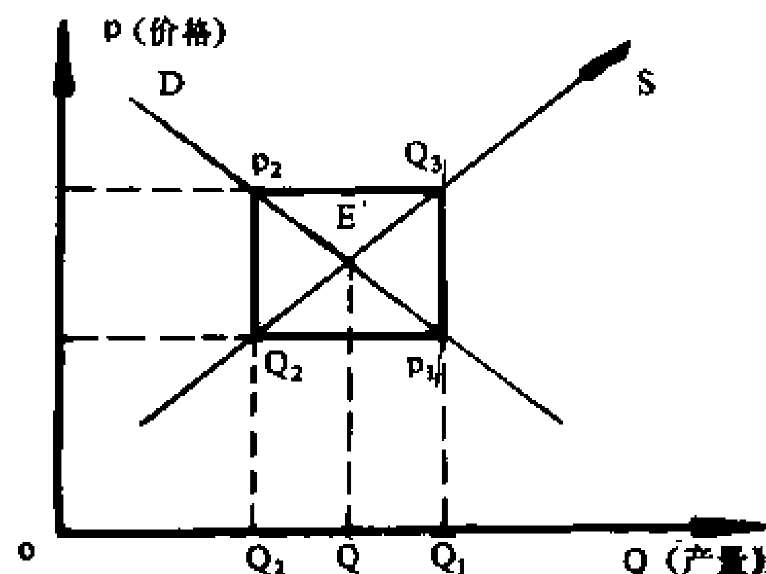


一直延续下去直至回到均衡点。所以，在绝对值上，供给曲线的斜率大于需求曲线的斜率又称“蛛网稳定条件”。

（2）从绝对值上比较，供给曲线斜率小于需求曲线斜率，价格和产量的波动越来越小，离均衡点越来越远，又称“蛛网发散”。

在这一场合下，价格与产量的变动方式与（1）同。在绝对值上，供给曲线斜率小于需求曲线斜率又称为“蛛网不稳定条件”。

（3）从绝对值上比较供给曲线的斜率与需求曲线的斜率相等，价格和产量始终按同一幅度变动，形成首尾相连的蛛网。



在绝对值上供给曲线的斜率等于需求曲线的斜率称为“蛛网中立条件”。

以上三种模型图式都是基于稳定价格预期的传统的蛛网理论模型表达。

最低工资（Minimum Wages）　一些工业化国家为了消除极低工资的情况而用法律形式规定的最低工资率。例如，在美国，联邦和州都制定了最低工资率。州的最低工资率不得低于联邦最低工资率，一般都高于联邦最低工资率。最低工资率是在不断变化的。1938年，联邦一级的最低工资率是每小时25美分。但80年末，联邦一级的最低工资已达每小时3

美元以上。最低工资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一些行业的劳动成本，而在没有最低工资规定的情况下，这些行业的工资率是低于最低工资率的。由于工资差别难以缩小，因此，最低工资率的实施使各行业在职人员的工资普遍提高。

最优人口(Optimum Population) 马尔萨斯曾论述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使人口规模逐渐增加，人口增加又会使工资收入降低到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很多经济学家去探讨最优人口问题。最早的最优人口概念是假定如资本存量不变，在某个时间点上，平均每一个人的产出最大化。这种概念的假设前提是在给定的资源和技术水平情况下，收益是先增加，后降低的。后来，最优人口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概念。米德的人口最优是指总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效用和最大化，而不是平均每一个人的产出或消费的最大化。总效用最大化的影响因素包括军事的、宗教的以及文化的因素。罗尔斯的标准是使得社会中最低层人口的效用最大化。不同的最优人口的定义，都包含着许多困难的哲学问题，例如，未来人口成员的基本权利问题。这个定义中的假定的生产条件不一样，从稳定的收益水平到变动的收益水平，从资本和劳动两因素到包含自然资源的多因素，自然资源有的假定是不变的，有的假定是趋于枯竭的。最优人口理论还牵涉到公共货物的分配理论。由于在某地区额外工人的加入会降低人均税赋的负担，但同时又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这就产生了最适人口规模的问题。这种理论不仅有一个总规模问题，而且由于各地区情况不同，因此各地有各地的最优规模。最优人口理论在经验上都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甚至很多只是停留在理论分析上。无法进行实际检验去计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数据来源的困难，二是对于什么因素在未来是决定性的并不清楚，例如，未来的技术水平是什么样的，无人知晓。未来会产生什么新的重要因素，更是无人了解。

最优化与效率 (Optimality And Efficiency) 最优化与效率是描述人们进行商品与交易所达到的状态时使用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有联系的。一般来说，交易达到最优状态时，一系列效率条件也将满足，但二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最优化问题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变成为效率问题中约束条件与目标函数。可以说最优问题与效率问题是对偶的。按结构性内容划分，最优可以分为三种：(1) 埃奇沃思与帕累托意义上的最优，即 EP 最优；(2) 核解 (core solution)，这是博弈论中所求的最优解；(3) 竞争的均衡。这三个解虽然是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导出的，但是在假定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追求最大的满足，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求得的。如果把 (1)、(2)、(3) 三种最优问题中的约束条件与目标函数互换位子，便得到与 (1)、(2)、(3) 三个最优条件相对应的三个效率条件：(1)'.与 EP 最优相对应的阿莱 (M·Allais) 与席托夫斯基 (T·Silovsky) 效率，即 AS 效率；(2)'.与核解相对应的补偿核解 (compensated core)；(3)'.与竞争均衡相对应的补偿均衡。

描述最优化的竞争性均衡与描述效率的补偿性均衡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直观地从市场行为观察到，例如成本的最小化与效用的最大化可以直观地从市场行为观察到。但是与竞争的均衡与补偿性均衡之间关系相类似的 EB 最优与 AS 效率之间以及核与补偿核之间的关系却不能直观地从市场行为观察到。

在最优条件 (1) 与 (2) 以及效率条件 (1)'与 (2)'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称性，但也存在一些不对称特征。在 (1) 与 (2) 中隐含地给定了社会每一成员一个正的权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计算某种事物。因此，很容易证明，分配是强 EP 最优分配，而且仅当在给定除第 i 个人 (i 是随机任意选择的) 以外其余所有人的总的要素禀赋与满足水平情况下，这种分配使第 i 个人的满足达到了最大化。对于 AS 效率来说，相应的表述并不如此明显。假定除第 j 种商品 (j 商品是随机任意选择的) 以外的所有其它商品价格数量既定，且每一个人的满足程度既定，那么"某种分配是 AS 效率的分配，而且仅当它是使 j 的使用达到最小"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所选择的 j 商品可能是没有任何人需要的物品，它不是稀缺物品，其影子价格是零，不存在使它达到最经济使用的问题。与上述最优问题中所随机选择的人不同，随机选择的商品并不一定含有正的权数。所以，最优问题的表述与效率问题的表述是有区别的。

最优控制与经济动态学(Optimal Control And Economic Dynamics) 最优控制是对一个因果关系链偶合系统的运行过程施加控制以获得最优的运行效果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50 年代以来，以控制理论为基础的自动控制技术和自动化科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出现了现代控制理论，即最优控制理论。它在空间计划中的成就启发了经济学家采用现代控制理论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最优控制理论在经济上的应用，始于 60 年代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即研究产量随时间在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最优分配问题，研究各部门之间的投资分配问题。在经济领域内，最优控制方法不仅适用于解决宏观经济范围内的最优计划和管理问题，而且也适用于解决微观经济范围内的最优计划和管理问题。在经济政策的制订中应用最优控制

方法，其基本结构与内容与最优分析相类似。首先要确定控制的目标，建立与之相应的优化指标，即使其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的目标函数，它通常表现为福利函数或损失函数、费用函数等形式，以代表政策目标。其次要建立反映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过程的经济模型，来描述受控系统的运行过程。另外，还要建立对控制函数的约束。以上这些构成了最优控制的约束条件。最优控制方法的目的就是找出上述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的最优值。在经济政策的制订中，最优控制方法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模型的质量及模型所适用的时间的长短。在经济政策制订中一般采用两种方法来运用最优控制，一种是静态优化，另一种是动态优化过程。在经济领域内，动态过程的优化问题，主要是在时间过程中的各种分配问题。这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连续过程的最优控制，另一种是离散过程的最优控制问题。前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通常是苏联数学家C·庞特里亚金在1959年创造的"最大值原理"方法，而后一种即离散过程的最优控制问题，通常采用的是R·贝尔曼在1957年创造的以最优性原则为核心的动态规划方法。

最优货币数量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这一概念形成于20世纪50和60年代，是货币经济学家将最佳的边际条件应用于货币时提出的。由于货币的作用可以用纸币来完成，而纸币的生产成本与其交换价值无关，增加货币数量的边际成本实际是零。如果一个人需要增加5%的货币，那么通过降低所有的商品价格5%，他的这个目的就可以实现。最优货币数量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数量。对于个人来讲，在竞争均衡当中拥有货币的边际成本是此人卖掉的那种资产的收益率。如果名义利率是正的，个人就会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因为边际收益是正的。为了促使人们持有最优货币数量，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支付竞争性利息，目的在于拥有货币不再承担个人的机会成本；二是使得价格水平保持下降，下降幅度等于真实利率，这样就会迫使名义利率从而拥有货币的个人成本降低为零。第二种方法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9年提出。乔治·托利提出了第一种方法。最优货币数量对现实的货币政策没有影响，支付竞争利息也是无法操作的。如果中央银行为消除拥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从而按实际利率为零去制定名义利率，将促使人们不去储蓄，而这也是弗里德曼自己一直告诫的。最优货币数量学说也受到不少经济学家的批评，也有人想方设法去论证它。到目前为止，争论依然不休。

最优储蓄(Optimal Savings) 是指一个国家应该有多大部分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换句话说，最适增长率是多大。庞巴维克和费雪等人曾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就是个人有将消费提前化的偏好，他们把这种事实融进了他们的关于利息的理论中。庇古曾认识到个人将属于他自己的未来消费折扣化，并认为这会造成未来经济的不和谐。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最优储蓄率成为庇古极为关心的问题。剑桥大学哲学家、数学家拉姆齐以期间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创建了决定最优储蓄率的原则。拉姆齐的论述，得到了凯恩斯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数量经济学的最辉煌的成就之一"。但由于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关心的是过度储蓄，拉姆齐的论述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些经济学极为关注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问题，而这又使最优储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拉姆塞的方法也得到相应的关注。从那时起，最优储蓄的论述方法不断丰富，也不断完善。这些方法包括生产函数法、效用最大化法。研究也从单部门扩大到多部门，从静态人口到动态人口，从技术稳定到技术变化。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并且形成最优储蓄总模型。

最优赋税 (Optimal Taxation) 最优赋税所研究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才能达到最优。所谓最优既是一个实证的问题，也是一个规范的问题。如果在既定的收入分配下来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实证的问题。如果最优化问题既涉及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又涉及收入分配问题，那么最优化问题就是一个规范的问题。由于最优化问题本身就涉及规范与实证两方面的问题，因此，最优赋税当然也就涉及到实证与规范两方面的问题。它既涉及到平等，又涉及到效率。所谓最优赋税所涉及的是平等与效率之间权衡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赋税才算最优赋税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它取决于人们主观设计的社会福利函数。除了一次总付税（Lump sum tax）对于资源的配置与收入分配状况不发生影响外，其它税种都会对资源的配置与收入分配发生影响。因此，谈最优赋税时，要先确定社会收入分配更平等一些是最优状态，还是更多的效率是最优状态。若认为社会收入分配很不平等，那么最优赋税就是采取一种能促进收入分配达到平等的税收，例如，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累进所得税。若认为资源使用的效率很低，那么最优赋税就是要采取一种能促进资源配置使用效率的税收。例如，在较高的累进所得税降低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促进工人工作的积极性。

最终效用(Final Utility) 最终效用这个概念在心理学派手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最早是由杰文斯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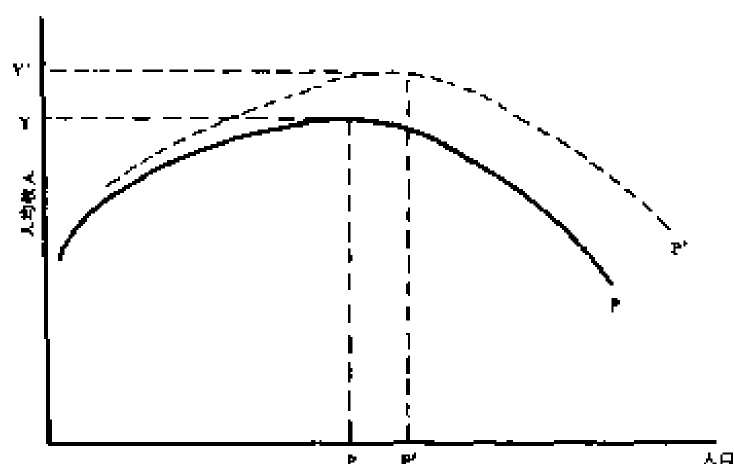
门格尔在1871年按现在的形式加以阐明的。它并不是用来指通常所谓有益的东西的意思，而是指满足人们某种愿望的能力，不管这种愿望是合理的，可笑的还是该谴责的。同时，它并不是指一般东西的效用，而是指某个人所需求某种特定商品的特定单位的效用，不管这个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面包问题，而是一个关于面包数量的问题。要明了最终效用这个概念，最好是不去考虑甲物的价值，而考虑能代替甲物的乙物的价值。如果甲物可完全被乙物代替，那么甲物的价值就不能高于乙物。最终效用这个概念在当时解答了许多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难题，譬如为什么水的价值低于钻石的价值，而水和钻石相比，显然水对人类要重要得多。它解答了从重农学派以来难住了许多经济学家的一个隐谜，即按照定义，交换行为意味着交换对象的等值，而它怎样能使双方都获得利益呢？应用最终效用这个概念可以知道，在交换行为中不应该注意总的效用，而应该注意最终的效用。就交换双方来说，均等是在于购入的最后部分和卖出的最后部分之间的平衡。最终效用这个概念不仅可成功地应用于交换领域，还可应用于生产、消费、分配诸领域。

最终效用度（Final Degree Of Utility）“效用度”概念与“最终效用度”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数学方法的核心，它的历史几乎和数理经济学一样长，并且不断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杰文斯用它来表示任何一种商品的最后1个增量或下1个增量的效用程度（效用度）。这个增量被看为无穷小，最后1个增量和下1个增量的效用度被认为是不变的。这就很显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各种商品的最终效用度，而不是别的，譬如平均效用度。我们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设有2种商品A和B，它们各有1个很小的单位a和b，这是A和B的最后1个增量。如果消费者甲认为a的效用程度是b的2倍，则近似上可以说，他愿用2b倍的B来换取a倍的A，或者说用2b换a。现在假设有消费者乙，他也许认为a的效用度是b的3倍。在这种情况下，二人之间就会发生交换。设$2<\delta<3$，甲给乙a，乙给甲δb，这样，甲获解为$(\delta-2)$ b，乙获解为$(3-\delta)$ b。这种交换一直继续下去。当然，δ并不是保持不变的常数。由于这种交换，使两个消费者持有的A和B的数量发生改变，从而对每个消费者都造成对A和B的最终效用度的改变。一直到两个消费者对A和B的最终效用度的评价相等时，交换停止。这就产生了杰文斯的基本的定理：当交换完成后，任何两种商品交换的比例将与它们的最后效用度成倒数关系。

最大最佳规模（Maximum Optimum Scale）见“最佳规模”。

最小最佳规模（Minimum Optimum Scale）见“最佳规模”。

最优人口理论（Theory Of Optimum Population）关于一国中人均国民收入与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处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国家，只要非劳动资源的供应是固定的，与人均国民收入最大化相适应的只有一种人口规模，这时的资本净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劳动的平均生产率相等。人口低于这一规模的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就会比应该达到的低，因为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有效地利用现有的非劳动资源。如果人口高于这一规模的水平，人均国民收入也比应达到的低，因为劳动力太多，产生了报酬递减。这种关系用图中的曲线表示，适度人口是OP。与此相应，人均国民收入的最大化水平为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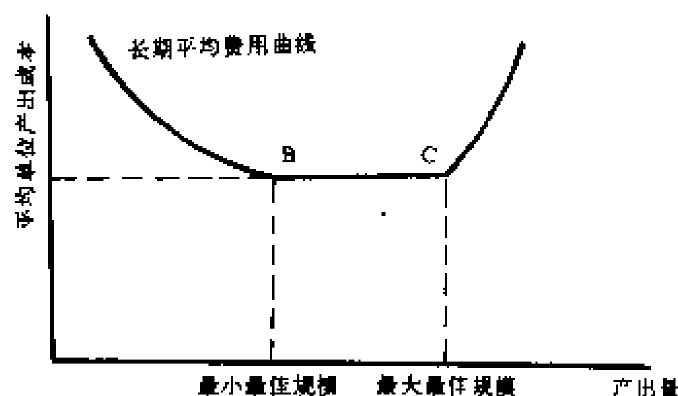


直观地看，这一理论与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多国家中的情况是相符的。但它所采用的是一种静态的方法，只能考虑到很少的动态因素。随着资本积累，技术变革和自然资源的发现，有可能使人均国民收入和适度人口同步提高。图中虚线描述了因上述原因可能产生的某种状态。两条人口曲线的形状是相似的，但新虚线的位置全部高于旧曲线，所以经济学家称图中的例子为“比较静态方法”。这种“或前或后”的方法，不是以反映不同人口增长率的经济增长的动态效果。

最低工资立法（Minimum Wage Legislation）在工人运动早期，工会对制定最低工资立法并不感兴趣，因为当时的工会大都是技艺工会，其成员以工资较高的熟练工人为主。随着产业工会在一战以后开始占据优势，有组织的劳工不断努力争取有一个作为工资最低额的立法条款。在美国，关于最低工资的立法州政府往往先于联邦政府，现在州和联邦政府都拥有这方面的法律。联邦政府最早涉及最低工资的法律是

1931年通过的戴维斯——培根法案。该法案授权劳工部长确定某些地区某些劳动的通行的小时工资标准。订有联邦公共工程契约的公司，不论是新建还是修建，都必须至少按照劳工部宣布的标准支付工资。为确定工资标准，劳工部长必须进行调查并定期举行公众听证会，因此，确定的最低标准是可以变动的。1936年，国会制定沃尔什——希利法案，它授权劳工部长对与政府订有超过10，000美元供应和装备契约的任何公司确定其必须支付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了确定特定地区的通行工资标准，劳工部长要在宣布这种最低标准以前进行调查并举行公众听证会，与政府订有供应契约的公司必须执行这种最低标准。这项法案是对戴维斯——培根法案的补充。1938年，国会才制定了一项真正全面适用的最低工资法——“公平劳动标准法”（一般称为工资与工时法）。该法规定，参与州际贸易的行业（除农业和少数其他行业外）的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5美分，并要求雇主对工人每周40小时以外的劳动支付1.5倍的工资。1938年以来，最低工资多次提高，从1938年的25美分提高到了1981年的3.35美元，而且适用范围也有所扩大（主要增加了零售和服务行业）。到1970年，已有38个州（包括主要的工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把最低工资法应用于州内的各行业中，它们一般低于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虽然最低工资的绝对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但它的变动相对于平均工资而言并不大。最低工资一直为平均工资的50%左右，当国会通过立法提高最低工资时，它同平均工资的比例就会急剧上升，而在最低工资稳定期间，比例又会下降。规定最低工资率是为了在不严重影响一国经济和一般工资物价水平的情况下，消灭极低的工资。因为最低工资的规定使某些技术水平低的工人工资高于应有的水平，所以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公平劳动标准法使这些工人在适用该法的部门中就业机会减少。事实表明，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南方低工资行业工厂中工作的工人和青少年。对于最低工资法的影响程度，经济学家中却存有争议。有些经济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青少年的就业和失业有相当大的影响，认为最低工资法起不到鼓励雇主雇用和培训缺乏技术且经验不足的年轻人的作用。其例证是，60年代，最低工资法适用范围扩大到了以往未包括在内的行业（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使青年的失业率大大超过了成年人，而在许多欧洲国家，最低工资法不适用于年轻人，这样他们的失业率就可望接近成年人。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青年失业率在60年代迅速增长是由于青年人口增长造成的，当时正值生育高峰的一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欧洲不存在这样的人口突变。由此可见，当最低工资在其他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的时期内变动时（例如当最低工资以及青年人口的相对规模和商业周期都在发生巨大变动时），人们难以确定最低工资的独立影响。尽管对最低工资法影响程度的看法有分歧，但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确实减少了低技术水平人员的就业机会，且工资最低的工人由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获取的工资收益在时间上是暂时的，劳工组织往往以此为理由提高整个工资等级表，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以前就存在的工资差别常常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又重新恢复了。所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削弱最低工资法的作用，而主张用其他政策来提高非熟练工人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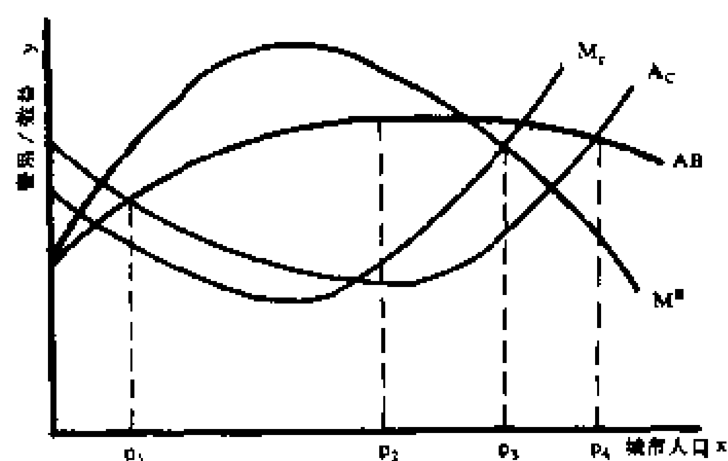
最佳规模（Optimum Scale） 在存在工厂规模经济的产业中，在长期内，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平均单位产出成本趋于下降（见图）。但这种下降不是无止境的，下降到一定程度长期平均费用曲线逐渐变平，此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平均单位产出成本不变。不仅如此，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到一定限度，平均单位产出成本转而逐渐上升，即长期平均费用曲线由平转升。对应于长期平均费用曲线开始由降变平缓时的生产规模称为最小最佳规模，最小最佳规模也叫经济规模。对应于长期平均费用曲线开始由平转升时的生产规模称为最大最佳规模。大于等于最小最佳规模，又小于等于最大最佳规模区间内的任何生产规模均为最佳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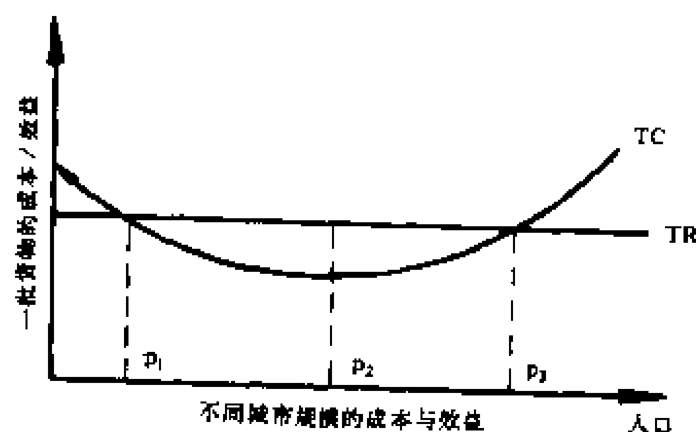
最佳城市规模（The Optimum Size Of Cities） 根据城市体系各项参数所确定的理想的城市规模。由于城市化过程仍在进行，因而对于什么是理想的城市规模，其概念也在发展和修正。最有影响的城市规模最佳选择理论主要有三种：1.行政管理上的最佳选择。它关心的是组织上的效能，特别是要求减低市政服务的每人平均费用。这些服务的费用在城市扩展之初是下降的，但在达到某种最低水平之后就开始上升，这是一种典型的“U形成本曲线”。确定最低成本也就是行政管理上的城市最佳规模，在理论上，只要找到成本曲线上最低的一点即可。但在实际上，由于地方政府类型的不同，所推算的最有效的人口规模

也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最佳城市规模的个人观点。即根据私人成本与收益来确定的城市最优规模。由于城市存在着聚集经济效果，不论对个人、私人企业，还是公用事业来说，都存在着生产效率（每人平均产量）随着城市规模而增加。但随着城市达到一定规模，聚集经济效果也会由于拥挤与其它费用的增加而大部分抵销、因而一个合理的生产效率（也是个人收入曲线）曲线具有反 V 形。但个人并不是单从其货币收入得益，也要从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广泛设施便利得益。各种便利如公共交通、商店、剧院、体育设施等常随城市集中的规模而增长。但增长率是递



（图 1）

减的。当达到一定城市规模极限、虽说不一定发生每人收益的实际下降，但社会福利曲线很可能是平缓的。将城市生活中货币收入与社会收益合并起来，有可能做出个人总收益如何随所住城市规模而变化的曲线(见图 1)。合并平均收益曲线 AB 表示由于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加的平均每人收益从开头的迅速增长，后来开始逐渐减弱，最后有所下降。边际曲线 MB 表示城市社会每一增加成员应有的收益。同理也可以得出个人的生活费用曲线。从该图中可以得出几种城市规模的选择：（1）P_1 点就是城市最小的规模，即人口在平均效益曲线自下方与平均费用曲线的交点，城市规模低于此值不能提供超出生活费用的收益；（2）P_2 点就是现有城市居民所希望的城市规模，这一点是平均费用与平均效益相距最远地方的人口。即在这一点现有居民城市生活每人的净收益最高；（3）P_3 点是城市议员所希望的城市规模，这一点是边际收益与边际费用的平衡点。在这里城市化所获得的总纯收益达到最高；（4）P_4 点是将要迁入城市的移民所希望的城市规模，这一点是居住市区的平均收益与平均费用相等或平衡之处。虽然 P_3 点是符合每一现有居民的最大纯收益，但在这一点迁入该市的边际收益仍有相当的数量超过迁入所花费用，因而仍然有吸引迁入该城市的趋势。即使超过 P_3 点的规模、MC 曲线高于 MB 曲线，但人们通常考虑的不是城市生活的边际收益，也不是他们迁入本城所造成的增加费用，而是考虑的平均收益，因此他们还会继续迁来城区，一直到 AC 和 AB 两线的交点。3.最佳城市工业人口规模。这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考虑的城市规模。企业对待城市规模取决于其生产目标和产品种类。我们假定货物价格是不随人口规模而变的（这一点虽然并非不现实，但放弃也不影响论点的正确），这样总收入 TR 不论城市大小，其数量不变，其曲线保持水平状态。其货物生产成本随着人口增加而趋于下降，取得了聚集经济的效果，但随着城市问题的出现，原来的效果被抵销，因此总成本曲线呈 V 型状（见图$_2$）



（图 2）

如果一企业要求取得最高利润，那么将取 P_1 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点既是企业的最低成本点，也是其最大收益点；对要求取得最高收入的企业来讲，其城市规模选在 P_2—P_3 之间均可；对于追求最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来说，其对城市规模的看法就无法在此图上看出。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的个人或企业群体来说，最佳城市规模这一概念存在着多种选择。每一类人都有自己的决定最佳城市人口规模的观点。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规定出 4 种不同的最佳选择类型，即城市规模符合下面 4 个可以替代的标准：（1）地方当局开支减至最小；（2）现有居民享受纯效益增至最大；（3）对潜在迁入居民的纯收益尽量考虑；（4）对各种私人企业的目标予以满足。

最惠国待遇 (Most— Favoured— Nation Treatment)　不同的国家之间在签订贸易条约和协定时，总是要以一定的法律原则或条款为依据，以便保障缔约国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一个运用得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法律原则。最惠国待遇是指缔约国一方在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各方面现在

和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和豁免，必须同样给予对方。贸易双方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目的是为了取消贸易中的不平等性和歧视性，保证各方在贸易中的平等地位，使国际贸易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缔约国通常将最惠国待遇以条款的形式固定在贸易条约或协定里，使它具有法律约束力。

最惠国待遇原则早就产生，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事项随着时间的推延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说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就目前来说，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事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有关进口、出口及过境商品的关税和其他各种捐税；第二，在商品进口、出口、过境、仓储、转船等方面的有关海关规则、程序、手续和费用等；第三，进出口许可证的发放以及其他数量限制措施；第四，船舶驶入、驶出和停泊时的各种税收、费用和手续；第五，关于移民、投资、外汇管制等规定；第六，关于工业产权的保护；第七，关于铁路、公路运输等；第八，关于法人和自然人的法律地位的保护。在上述各适用事项中，进出口商品的关税待遇是最重要的内容。

最惠国待遇原则上应该是平等的，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被分成了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两种。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指缔约国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和豁免，都无条件地、立即地、自动地给予对方。由于欧洲国家（荷兰与葡萄牙）最先采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因此它又被称作欧洲式的最惠国待遇。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指如果缔约国一方给予第三国的优惠和豁免是有条件的，那么对方必须提供同样的补偿，才能享受这种优惠和豁免。由于美国最早采用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因此它又被称作美洲式的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的不平等性，更主要的体现在缔约国在签订贸易条约或协定时对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和事项的规定上。缔约国一方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限制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从而对对方实行差别待遇。事实上这已经成了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避免承担给予最惠国待遇的义务、对其他国家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的一种手段，使得最惠国待遇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大大削弱。需要指出的是，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事项，国际上有公认的例外。也就是说，一国给予第三国的某些优惠和豁免，并不属于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事项、一国在贸易条约或协定中给予对方的最惠国待遇并不包括这些内容。这主要是指边境贸易中的特惠待遇、关税同盟的特惠待遇，特定国家之间的特惠待遇以及内河航行、沿海贸易等方面的优惠。

最大负担原则 (the Highest Burden Principle) 涉外税收负担原则之一，又称负担从重原则，主要是规定外国跨国纳税人必须承担高于国内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与优惠原则类似，也可将这一原则区分为全面最大负担原则与特定最大负担原则两类。前者是指单独为外国跨国纳税人制定与国内纳税人完全不同的一套税法，使外国跨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全面高于国内纳税人；而后者则是指在同一套税法下，只对外国跨国纳税人的某些特定应税项目或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以较高的税率课税，从而使外国跨国纳税人负担较重的税负。

实行最大负担原则并不完全出于财政动机，甚至更重要地，是要实现多重经济与政治的目标，包括，保护民族工业，保护本国资源，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及防止外国跨国公司操纵经济命脉等。

与优惠原则类似，相比之下，特定的最大负担原则要比全面的最大负担原则更易为各国所接受，因为一项全面的最大负担原则无异于对各国实行税收歧视，肯定会招致其它国家的指责和报复。

储蓄 (Saving) 不用于现时消费而是用于未来花费的那部分当前的收入。从根本上说，决定储蓄就是决定不用光全部收入，而是将一部分收入保留起来，把这部分收入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购买股票、公司债券、国家债券等有价证券，或者手持现金以便随时购买。一个人进行储蓄而不是用于现时消费，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 为不测事件建立储备金，如失业后没有稳定收入；(2) 为自己的老年积累基金以防止年老无能后自己的生活没有依靠；(3)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属，如子女的生活及社会化教育等；(4) 为了自己日后一项较大数额的货币性支出，如购买小汽车或一所住宅等。不仅居民个人成为储蓄者，企业和公司也可以进行储蓄。公司或企业进行储蓄的通常作法是把一部分收益不发给股票持有者，而是将这部分收益再投入企业。影响个人储蓄水平的因素很多，大体上有以下这些方面：(1) 家庭收入的大小。一般来说，居民个人在储蓄和收入之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收入增加，储蓄也就增加。(2) 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一个人预期他未来有稳定的收入，而收入额比较大，就会扩大现时的消费支出，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较大规模的储蓄。如果一个预期其未来的收入不稳定，则不论这一不稳定的数额有多大，他都会增加储蓄。(3) 个人对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认识。由于利息是舍弃现时消费而取得未来消费的贴水，因此，一个人对现时消费极为重视，他就不会过多地储蓄，例如现代青年人的消费倾向就很高。(4) 社会及个人的习惯。有些国家

如日本就有储蓄的习惯，即使是战后日本平均收入不高时也是如此。（5）利息率的高低。利息率越高，储蓄的诱惑性就越大。因为储蓄可以保证未来消费量远远大于现时消费量。个人在进行储蓄和为自己提供保障的过程中，也为资本投资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来源。因此，储蓄的多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因为如此，利率这一经济杠杆被大多数国家所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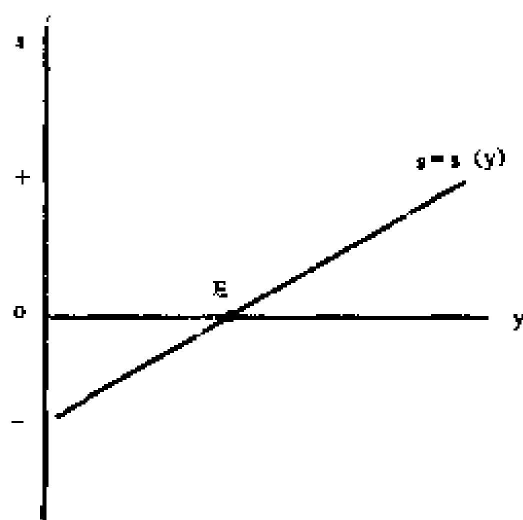
储蓄机构(Thrift Institutions)　储蓄机构包括两个主要类型：储蓄与贷款协会与互助储蓄银行。储蓄机构在全国的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吸收的消费类储蓄与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总额的四分之三。储蓄机构的主要目标就是吸收个人的闲散资金为生产性投资；特别为抵押贷款投资的提供资金来源。目前金融事业在美国非常发达，在1979年底，个人就可以在十四类储蓄类型中进行选择。储蓄机构除了办理普通的存折储蓄之外，主要办理期限三一八年以上的定期储蓄业务。定期储蓄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三个：（1）利率差异；（2）未到期而提前支取的惩罚条件；（3）期满后重新续约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储蓄与存款的周转相对较慢，因此，对储蓄机构来讲，从事长期的投资或贷款是有利可图的。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在金融市场上从事长期投资会比短期投资有更高的收益。而房产投资或抵押贷款是储蓄机构所从事的最主要的经营活动。美国私人金融机构所从事的房产抵押贷款的70%是由储蓄机构完成的。储蓄机构也是商业、工业以及其他非房产类抵押信贷的重要来源。储蓄与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的抵押资产拥有额与其资产的比率分别为7：1和2：1。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互助储蓄银行一般是重点搞永久性的抵押贷款，而储蓄与贷款协会是将其大部分抵押基金投向建筑业贷款。互助储蓄银行也是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抵押贷款提供者。而储蓄协会则是在金融市场上的普通住宅贷款的提供者。由于其投资力量的变化，当不动产信贷需求低于其信贷能力时，或者是为了资产的流动性，互助储蓄银行也拥有非抵押性资产，但储蓄协会却很少有这类资产。近年来，储蓄机构的资产负债中的负债业务并不景气，原因是在消费类储蓄市场上，储蓄机构有些不利因素：（1）低的储蓄利率使资金流入其他有较高收益的投资中去；（2）商业银行的激烈竞争；（3）新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出现；（4）利率过高情况下，缺乏有效的金融手段；（5）通货膨胀时期，消费者储蓄愿望降低。

储蓄与投资相等　(Saving Eqnals Investment)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说过，储蓄与投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必然相等。这一命题引起后来的争论。霍特里认为，投资与储蓄不相等。因为投资包含流动资本。罗宾逊从时间分析的立场，说明现期的储蓄，等于前期所得中除去现期的消费；现期收入，等于现期的消费加现期的投资，所以只有现期收入与前期收入相等，才有现期的投资与现期的储蓄相等。斯德哥尔摩学派说明储蓄与投资，事后是相等的，而事前是不相等的，如此各个观点来否定凯恩斯的命题。但是凯恩斯的体系有脱离萨伊法则的特色。按照萨伊法则，储蓄与投资，无论均衡成立与否，两者都相等。按照克莱因的解释，此种误解的原因，是批评者没有区别凯恩斯投资及储蓄函数关系和可测值。按照凯恩斯观点，投资与储蓄分别是以各种函数关系表示的收入曲线。这与萨伊法则相反，投资与储蓄在所有水平上都不相等，而在两函数交叉点决定了收入水平。这一均衡点的投资与储蓄是可测值。投资与储蓄的可测值在均衡点才相等。在凯恩斯那里，商品市场的均衡有两种定义方法，一是在两部门经济体系中收入水平Y所产生的C+I的总额恰好等于Y；另一方法是储蓄等于投资。在储蓄等于投资的收入水平上，以收入流转移到储蓄流的量恰好等于抵补投资。如果投资是自发地进行，则存在投资等于储蓄的均衡；假定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则此均衡是稳定的，即投资与储蓄通过收入变动而存在一致的倾向。对凯恩斯储蓄等于投资的批评都有其特点，但都没有对其假设条件完全了解。

储蓄函数（Saving Function）　储蓄量与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以S代表储蓄量，Y代表收入，则储蓄函数为：

$$S=S(Y)$$

这里的收入是指国民收入或个人可支配收入。储蓄函数表明，储蓄取决于收入，与收入同方向变动，正如附图所示。附图中，横轴OY代表收入，纵轴OS代表储蓄，S＝S（Y）为储蓄函数曲线。该曲线向右上



方倾斜，表明储蓄随收入的变动而同方向变动。在E点时，收支相抵，储蓄为零，E为收支相抵点。在E

点之左，收入小于支出有负储蓄，在E点之右，收入大于支出，有正储蓄。在全部收入中，除去消费支出以外的余额就是储蓄，因此，储蓄与消费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用来解释消费函数的因素也可以用来解释储蓄函数。凯恩斯在《通论》中正是通过对影响储蓄的主观动机的分析说明了消费的决定。

储备货币 (Reserve Currency) 政府用作外汇储备的可兑换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 必须是自由兑换货币，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受限制地兑换；(2) 国际上普遍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镑是主要的储备货币。此后，随着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元取而代之。70年以来储备货币多样化，除美元、英镑外西德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日元、欧洲货币单位亦占有一席之地。

稀缺性 (Scarcity) 通常所说的稀缺性是相对稀缺，也就是说相对于人们的无限欲望，某些资源与物品总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说这些资源与物品是稀缺的。所有的物品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随意得到任意数量的物品，如空气是自由品；另一类是稀缺的，叫经济物品，得到经济物品总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稀缺性的概念在整个经济理论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些经济学认为稀缺性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所以往往用稀缺性来定义经济学。由于稀缺性的存在，就决定了人们在使用经济物品中不断作出选择，利用有限资源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在稀缺的消费品中如何进行取舍及如何用来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而这些正被认为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对稀缺性的论述很早就见诸经济学文章中。瓦尔拉斯定义的社会财富即经济物品是一方面它对我们有用，即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另一方面我们所能获得的数量是有限的。而稀缺性正来自这两个方面。稀缺性的概念被那时的经济学家广泛接受，并被罗宾斯(L·Robbins)采用。他否定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就是研究物质源泉的科学的观点，认为这种物质主义(materialist)远不能包括经济的全部内容，有些劳动，如音乐与文学方面的劳动就不生产任何物质。在他看来每个经济问题都存在着目的的多样性与手段(means)的稀缺性这样的特点，经济学就是研究反映在目的与稀缺的手段之间关系上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配置的科学。这一定义至今仍流行在西方经济学界，虽然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界也开始研究绝对稀缺这一概念。所谓绝对稀缺就是指资源的绝对数量是确定的，一旦用去，通常无法重新加以再利用，如矿物燃料便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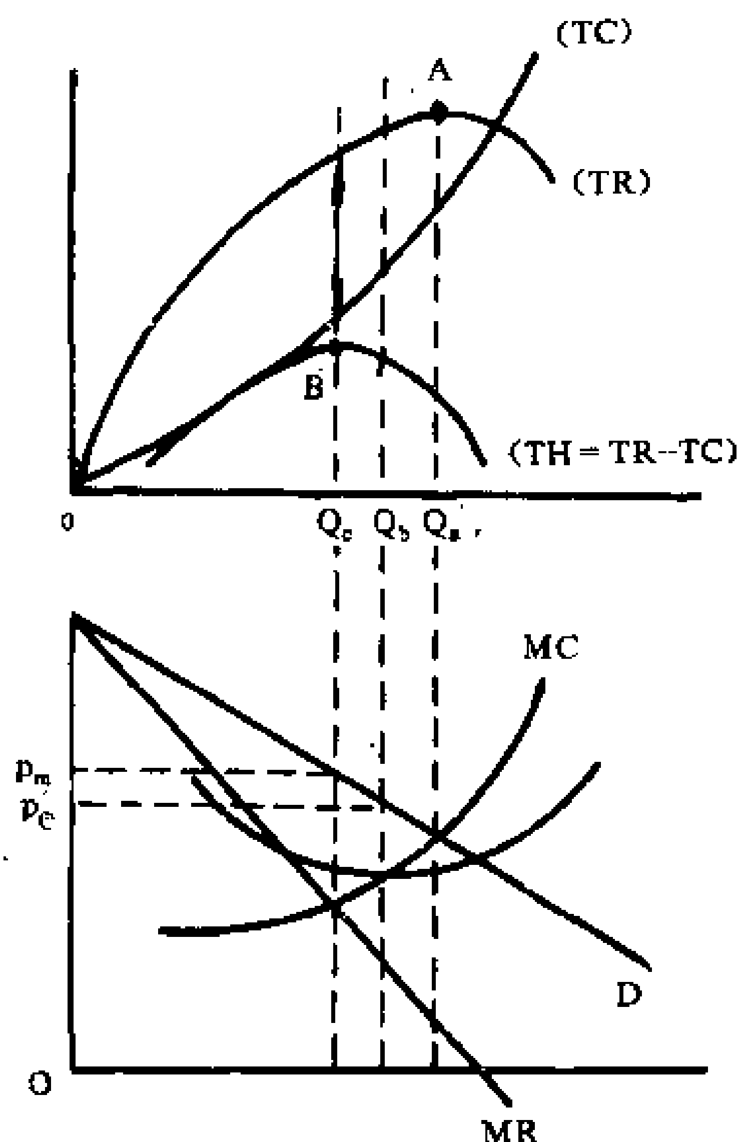
馈赠经济学 (Grants Economy) 馈赠是指某些机构或个人提供给另一些机构或个人的款项，这种款项的提供并非某项交易的构成部分，而是单向的转移支付。馈赠可由某一些政府付给另一级政府，由政府机构付给私人团体或个人，或者由私人团体或个人付给其他私人团体或个人。一项馈赠可能属于可用于任何一种支出的"一般性拨款"，或者是限定用途的"选择性馈赠"。馈赠也可能属于"配合性赠款"，其金额按受款者总支出的某种比例计算，也可能属于"非配合性赠款"，其金额不取决于受款者的支出。馈赠经济学则是研究馈赠这一经济行为的经济后果。在美国，馈赠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馈赠，也包括不同级政府之间馈赠以及政府与私人间、私人相互间的馈赠。其中一种形式是基金馈赠，其目的是平均各地区提供最低水平的公用事业的成本(根据它必须规定的税率衡量)。计算所需的馈赠，是从提供服务所需要的货币总额中，减去地方政府通过规定税率征税所得收入的总额。如果收入小于公用事业的成本，则由上级政府通过馈赠来解决。

销售成本 (Selling Cost) 是企业将一批产品销售出去而付出的代价，包括广告费、包装费、推销员奖金，各种赠费、降价时的降价总额等等。销售成本可以看作交易费用的一部分，这种费用由卖方产生。销售成本的大小在不同的交易中变化很大。一般认为这样的销售成本是适中的，它能使中间人将标准商品(standard good)的买方与卖方组织在日常交易中。销售成本的一部分构成交易中介人的部分收入，如果销售成本太高，卖方会退出交易，销售成本太低，必要的促销手段会被停用、广告支出减少、交易中介入缺乏利益刺激等，所有这些都会减少市场交易量，销售量也就减少。销售成本除了为销售而付出的直接成本以外，还包括间接成本，如保险费、贮存费、技术咨询等。销售成本中，各种费用所占比例的大小常随市场结构、销费管理以及产品本身因素等而有很大的不同。

销售税(Sale Tax) 销售税又叫营业税，一般地一个企业只要有营业行为发生，就要交纳营业税，所以也叫营业行为税。营业税是对商品课征，以企业单位的销售额作为课征标准，按比例税率征收，销售税因此得名。销售额包括销售的货物和提供劳务等的收入而并不扣除成本，或者是向外购买物品或劳务支出。按照营业税征收的环节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应征税商品流转过程的多种阶段就其销售额层层征

收，如周转税、税额一般暗含在售价之内，这种类型的营业税负也就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存在着所谓的重复征收的问题。对于哪些需经过多次交易阶段才能成为最终消费品的产品的生产来说就非常不利，有促使产品生产与销售垂直合并的作用，不利于商品生产的专业化，所以现代各发达工业国家都已经取消这种周转税。第二种是在应征税商品的零售、批发或产制的单一阶段就其销售额按一定比例税率一次性征收。如美国的零售销售税，在零售阶段课征，加拿大的产品营业税，在产品出厂时征收。现代各国对营业税的征收，普遍地主张就一个环节而且只应在零售环节课征，零售销售税已成为营业税的主要形式。销售税可以适用于范围很广的营业项目，如增值税、零售税、周转税、综合支出税属普通营业税；也可以适用于某种特殊商品和劳务的销售，如关税、消费税是对特殊货物所征收的营业税。

销售额最大化行为（Maximum Total Sales Action Maximization）　是美国经济学家 W·J·博莫尔提出的现代企业的行为目标假说。博莫尔曾向美国大企业的经营者调查"什么是企业行为目标"？结果表明，比起利润来企业更追求销售额最大化。这是因为，实现销售额最大化有利于取得股东的信赖，金融机构的信用，商人的信用，消费者的评价，从业人员的信赖，提高社会性威信。博莫尔所说的销售额最大化是指对企业来说若能确保必要的红利和用于投资基金的内部提留，确保尽可能的"最低利润"，那么，企业将尽可能使销售额最大化。用图说明，销售额最大指相应于销售额曲线 TR 的 A 点的 OQ_a。但在这时，由于存在不能确保最低利润的可能性，将销售额定为 OQ_b，这时比短期利润最大化的销售额 OQ_c（相当于利润曲线 Tπ 的 B 点）销售额大。博莫尔的销售额最大化象这样不是指销售额曲线的最大点的销售额最大化，而是指比短期利润最大化时的销售额大的"销售额最大化"。这一观点相近于稍微降低短期利润最大化时的价格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价格图（下段）中，短期利润最大化的价格为 OP_m，博莫尔的销售额最大化的价格为 OP_c。若考虑 OP_c 为阻止进入价格，那么博莫尔的销售额最大化和长期利润最大化如出一辙。因此，长期利润最大化是考察现代企业行为极为重要的行为假说。但在现代企业中，由于力图尽可能扩大销售额，用博莫尔的销售额最大化行为假说来说明产生的行为，事实上也比较容易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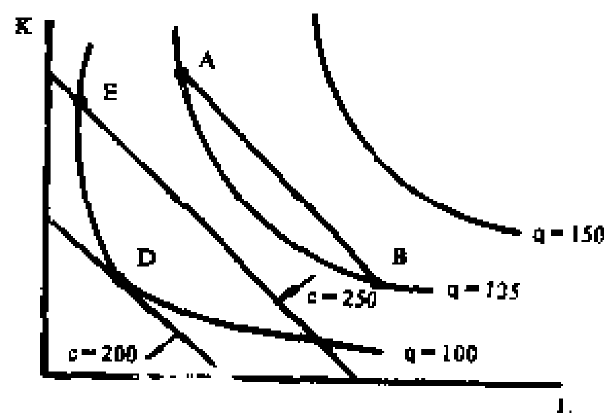
图中：TC：总支出曲线；
TR：销售额曲线；
TH：利润曲线。

等产量（Isoquant）　等产量是产生某一特定产出水平的劳动—资本组合的轨迹。设生产函数为：

$$q=f(L, K)$$

其中，q 是产量，L 和 K 分别是劳动与资本的投入的数量。假定函数是连续的，并有连续的一阶与二阶偏导数。令 q=100，则相应的等产量的隐函数形式为 f（L，K）=100。

（一）等产量族。下图中画了三条等产量线（横轴为劳动投入量，纵轴为资本投入量），每条等产量线对应着一个特定的产出水平。由于劳动—资本座标图中的每一点对应着一定的产出。所以任一点都在某个等产量曲线上。因为劳动与资本的增加通常会带来产出的增加，所以离原点越远的等产量线，对应着越高的产出水平。等产量线的斜率通常为负，如图中所画的那样。因为在产出不变的前提下，对于一种投入的增加通常意味着另外一种投入的减少。而无数的互不相交的等产量线就构成等产量族。



（二）技术替代率。等产量的斜率表示的是，在产出不变的前提下，一种投入替代另一种投入的比率。这种技术替代率（简写做 RTS）有时也叫边际技术替代率。对生产函数全微分：

$$dq=f_L dL+f_K dK$$

其中 f_L 和 f_K 是生产函数的偏微分，分别被称为劳动与资本的边际产品。dq、dL 与 dK 是产出与投入的微分。令 dq＝0，这样来表示沿着一条等产量线上的不变的产出，这时，

$$KTS=-\frac{dK}{dL}=\frac{f_L}{f_K}$$

根据这个定义，RTS 是等产量线斜率的负值，其大小还可用投入的边际产品的比率来度量。任何一点上的 RTS，不管沿曲线向哪个方向移动，都是一样的。只要投入的边际产品是正的，那么 RTS 就是一个正数值，而等产量线的斜率是负的。但当某种投入足够大时，那么它的边际产品有可能是负的，从而 RTS 是负数。

通常假定 RTS 是递减的，即 $\frac{d(RTS)}{dL}=-\frac{d^2k}{dL^2}<0$，亦即 $\frac{d^2K}{dL^2}>0$，这也就是说，假定等产量线是凸的，如图中所示的那样。我们看一下等产量线 q＝125 及其上的任意两点 A 和 B，说等量线 q－125 是凸的，就是说在等产量线 q＝125 上任意找出两点 A 和 B，连接 A 和 B 成为线段 AB，那么 AB 上的任意一点所代表的产量都大于 125。

（三）成本最小化。用 C 代表生产成本，它与劳动—资本座标图上的点相对应。C＝WL+rK，这里 w 和 r 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固定的单位价格。图中标出了 C＝200 和 C＝250 这两条等成本线。由于 w 和 r 是固定的，所以各条等成本线是相互平行的直线。如果厂商想生产 100 个单位的产出，则他可在等产量线 q＝100 的任何一点上生产，比如 E 点。但是 E 点缺乏效率，成本比较高，C＝250。而在 D 点，达到最高效率，此时成本最小，C＝200。在 q＝100 的任何一点上都不能获得比 C＝200 更小的成本。

在通常的假定下，在一定产出下的最小成本点，是这条等产量线与某条等成本线相切的切点，如图中的点 D。

（四）齐次生产函数。对于 1 个生产函数，如果

$$qt^k=f(tL,tK),$$

那么就称其为 k 次齐次的。

k 次齐次函数的 1 阶偏微分是 k－1 次齐次的，所以

$$RTS=\frac{f_L(L,K)}{f_K(L,K)}=\frac{t^{k-1}\cdot f_L(L,K)}{t^{k-1}\cdot f_K(L,K)}=\frac{f_L(tL,tK)}{f_K(tL,tK)}$$

因此，若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关系不变，则 RTS 保持不变。这意味着一条等产量线就可以代表整个等产量线族，因为知道了斜率，等产量线族中的其它曲线可用积分的方法求出。

（五）替代弹性。当沿着一条凸的等产量线从左向右移动时，RTS 与资本—劳动比率都在降低。用 σ 代表替代弹性，

$$\sigma=\frac{de_n(K/L)}{de_n(f_L/f_K)}=\frac{d(K/L)}{d(f_L/f_K)}\cdot\frac{f_L/f_K}{K/L}$$

其中 e_n 是自然对数。若满足严格拟凹性假设（而这条假设一般是容易满足的），则 σ 大于零。如果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得比 RTS 大，则 σ 大于 1，反之亦是。如果它们按同一个比例下降，则 σ 等于 1。当 σ 增加时，两种投入间的替代程度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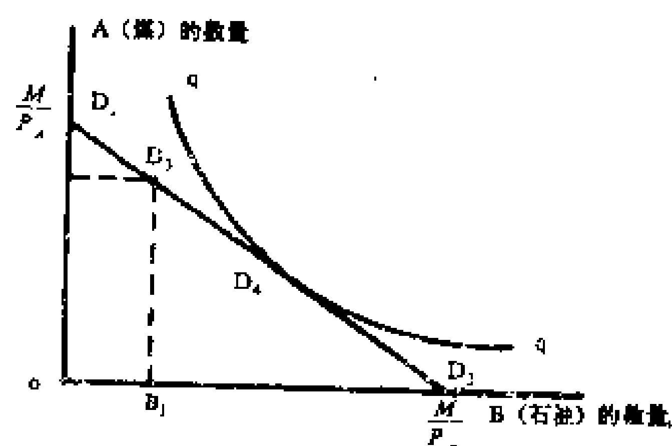
一般说来，当沿着等产量线移动时，替代弹性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存在着不变的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CES），

$$q=A[\alpha L^{-\rho}+(1-\alpha)K^{-\rho}]^{-k/\rho}$$

$$A>0,0<\alpha<1,$$

可以算出 $\rho=\frac{1}{1+\rho}$，它表示了不随 L 和 K 而改变的替代弹性。CES 生产函数是齐次的，次数为 k。当 σ 接近零时，几乎不存在替代的可能。当 σ 接近无穷大时，等产量线变得竖直，这时，几乎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了。

等成本（Isocost） 等成本表示的是一定数量的货币所能买到的资源，这些资源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我们以两种商品为例来说明。不妨令这两种商品分别是煤和石油，其价格分别是 P_A 和 P_B。并设货币数量为 M，煤和石油的数量分别是 A 和 B，我们有等成本线 $AP_A+BP_B=M$。用图来表示。我们可看出，可以把 M 全部用于买煤，可买的 $\frac{M}{PA}$（用点 D_1 表示），也可全部用于买石油，可买到 $\frac{M}{PB}$（点 D_2），也可



以用一部分买煤，剩下的买石油，可分别买 A_1 和 B_1 数量，设这点为 D_3。连接点 D_1 和 D_2 组成 1 条线

段，则 D_3 位于线段 D_1D_2 上。等成本线的斜率表明了煤和石油的价格的比率。等成本线可用来决定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的最小成本，或在一定成本下的最大产出，这通过使等成本线与等产量线（图中曲线 qq 相切即可得到），图中的 D_4 表明了这样的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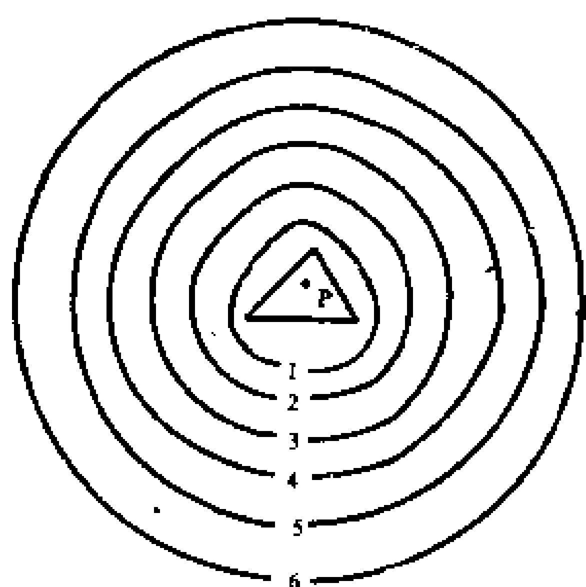
等级制度（Hierarchy） 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在某一组织内，按照公认的有关价值标准和权力、权威或声望的高低来排列成员的等级、次序或地位的制度。等级的经济学理论是用于解释典型的公司组织形式的，这种公司是按照从上到下的命令式的形式管理的。现代的方法可以使得某些公司的工资水平上升的幅度限制在合理的幅度之内。而有些时候，工资的上升可以超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而这对公司是有害的。关于等级理论的探讨方法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梅那为代表其将等级制度视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因为通过生产要素的结合，有较高天赋的人将知识转移到其他人那里。这种理论与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没有多大差异。该理论揭示了这样两个原理：（1）在一个均衡体系中不同规模的公司可以共存；（2）最有本领的人如果不与其他较没本领的人共事，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现代分配制度是趋于根据权利和公平而不是根据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另一种理论则与上述不同，其前提假设是，为保证经营的正常进行，监督是必要的。一个人之所以到公司去就业，是因为公司的工资水平比他上个体要高。但同时也说明公司的劳动效率要比个体高。但为了使工人的效率提高，就必须有较好的设备等，同时保证工人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否则公司就要受损，而这样做，就必须有监督人员。监督人员作为一个阶层的出现说明，监督带来的收益必须大于监督成本。经济学中的等级制度说明了该制度的合理性。

等待（Waiting） ‘等待’一词是从节制（abstinence）一词演变而来的。早期经济学家，如：穆勒（J · S · Mill），杰文斯（Jevons）等用节制一词指储蓄和投资这种需要获得报酬的经济行为。克拉克（J · B · Clark）写道："节制就是放弃某种消费的乐趣而获得全新的资本增殖"。但是，人们日渐对"节制"一词感到不满意，马克维恩（MacVane）提出以"等待"一词代替"节制"，随后，马歇尔（A · Marshall）、卡塞尔（Cassel）等人也开始使用"等待"，"等待"的使用变得普遍起来。但实际上，"等待"与"节制"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马歇尔将"等待"视为推迟享受或储蓄，认为储蓄需要牺牲现时消费以便日后投资，而利润就是这种经济行为的报酬；卡弗（Carver）也认为利息率是由递减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递增的边际节制力共同决定的。马歇尔和卡弗都区分了储蓄和投资，而将等待（或节制）视为储蓄，马歇尔还接受西尼尔的观点，认为节制与消耗时间的生产相联系，而且进一步认为与消费也一样有联系，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时间长，其中也含有等待，马歇尔将等待所包含的牺牲计入了使用过程中人们获得的实际利益。

此外，卡塞尔所使用的"等待"一词的含义与其它学者的含义不同。卡塞尔在其价格理论中将"等待的供给"视为储蓄，从强调经济行为的形式转而强调经济行为的结果。同时，卡塞尔又象西尼尔那样，将储蓄与投资联系在一起，将节制与生产要素也联系在一起，而将"对等待的需求"视为投入资本的全部货币价值。

等差费用曲线（Isodapanes） 韦伯工业区位理论中，用来分析区位决定过程中工资成本与运输成本之间替代关系的一种方法，在根据运输成本选择或形成了工业区位以后，如果又出现了工资费用较低的区位。那么如何再对工业区位进行选择？韦伯假定在一定的工资率之下，劳动力供给是充分的，也就是说把工资率差距纯粹归结为地理差异以后，韦伯使用了等差费用曲线对地区间工资成本差距和运输成本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以确定最佳的工业区位点。这是一种纯理论的分析，并不考虑工厂的技术性质和它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所谓等差费用曲线就是指单位原料或产品相等运输成本点的连线。在其它条件（如自然，交通线等因素）相同而且均匀连续的情况下，由以运输点为中心的同心圆圈组成，由于运输成本的高低不同，所以可以有若干条不同的等高运费曲线。任何一个工资成本较低的地区，总是处在某一条以该地为中心的等高运费曲线之上。从曲线的位置，可以看出放弃原来运费最低区位，迁至工资较低区位，从而需要增付的运费大小的情况。在这些曲线中，有一条曲线是最重要的，韦伯称之为决定性等差费用曲线。在这条曲线上，所增付的每吨成品的运费与所节省的每吨成品的工资成本恰好相等。因此，如果迁厂后的新地点在这条曲线之内，则表示所节省的工资成本大于所增付的运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迁厂是适宜的，反之，如果迁厂后的新地点在这条曲线之外，则表示所增付的运输费用大于所节省的工资成本，这时就不宜迁厂。等差费用曲线的形状，在距离原来的区位图不远之处，与区位图同样不规则，但离区位图渐远时，便渐呈圆形，距离越远则愈呈圆形。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等差费用曲线图看出（1，2，3，4，5，6，表示不同的等高运费曲线）。



策略行为与市场结构 (Strategic behaviour and market structure) 自从贝恩 (J · Bain) 对产业组织的开拓性的分析研究之后，结构—行为—运行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的分析方法一直流行在产业组织的分析中，这种方法认为市场结构由产业的基本因素如技术、需求弹性等决定，市场结构反过来影响企业的行为，企业行为决定经济运行。而且这种分析将市场结构看作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从而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与经济运行的作用。近年来在产业组织研究中又出现了一个新领域，它们试图探究一种逆向的关系——从企业行为到市场结构，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企业对价格、广告、生产能力和其他可以影响未来市场结构的工具的策略性运用。一些人认为这种工作是对结构—行为—运行分析向动态方向的扩展。企业采取可以影响市场结构的策略行为的动力来自于追求贴现利润 (discounted profit) 最大化，此目的可以通过提高自己在市场结构中的地位来达到。其手段通常是对新加入者进行策略性的威慑或促使竞争对手退出从而减少竞争企业的数量。那么什么是策略性行为呢？它是指一个企业在考虑到别的企业行为会依赖于自己的行为的前提下而选择的行为方式。假定两个企业，一个是国有的企业 A，另一个是潜在的加入者 B，B 的加入决策依赖于 A 的先前加入行为，如果 A 已看到这种情况，它就采取策略行为来影响 B 的决策。企业的策略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经济学家们用博弈论等方法进行分析。他们认为企业实施策略行为有三种工具：价格（或产出），耐用资本 (durable capital) 和大宗投资的时间选择 (timign of Lumpy investment) 传统的微观理论都假定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对市场无能为力，除非有垄断的出现。企业策略行为的研究突破了这一前提假定。

策略—检验配置机制 (Strategy—proof allocation mechanism) 抽象地讲，配置机制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揭述以个人偏好到最终配置过程的一个方程，例如竞争的配置机制通过市场出清价格的作用得到一个可行的、帕累托最优的最终配置，这种配置随着个人偏好的不同而不同。但在上述配置过程中，每个人实际上在追求其效用最大化时都要受到信息与技术方面的限制。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个人的偏好只是他自己的，且除了通过环境的相互作用，否则就无法得到检验，于是竞争机制实际上依赖于每个人对其个人偏好的表示，但表示的并不一定是个人的真实偏好、也就是说个人可以就其偏好说谎。假定经济中个人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谎示其偏好，从而影响市场出清价格。如果一个人知道别人可能如何显示其偏好，然后谎示其偏好，影响市场价格，从而确保自己可以获得一个与他真实显示其偏好时所能得到配置相比更好的或更为偏好的配置，这是比策略—检验配置机制更进一步的情形。考虑到上述情况，在一定数量的个人的经济中，竞争机制就是描述个人偏好及个人对他人偏好和信息的信息的。对策略—检验配置机制的研究就是对策略性谎报个人偏好的复杂情况予以全面分析，简单地说，每个人为其效用最大化在选择他的偏好显示时，仅仅依赖于他自己的偏好，而不依赖于他对别人可能显示他们预期的预期，这个配置机制就是策略—检验型的。也就是说，策略—检验配置机制并不考虑个人对他人偏好以信息的预测，但这时他同样可以策略性地谎示其偏好，从而使个人效用最大。这样在策略—检验机制里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受他人影响的主导性的显示个人偏好策略，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但并不是诚实的人。但是策略—检验机制是不是存在始终是策略—检验配置机制研究的中心问题，由于牵涉到个人偏好的显示问题，所以社会选择理论是很有用的分析工具。

编制资本预算 (Capticl budgeting) 编制资本预算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一个分支。它是指为投资项目分配可供投资的资金过程，其目的是达到这些资金的最佳用途。这一分支的主要流派分别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提出研究以下两个问题：(1) 公司或企业怎样去衡量某个投资项目是值得投资的；(2) 公司或企业怎样对所使用的资本确定出一个最低的收益率。

为了上述目的，人们曾提出过许多方法。例如，投资资本的回收期和收益率、这些方法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也建议采用以折现的现金流量分析为基础的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等方法。传统的会计方法现已不被广泛采用了。因为这种方法在投资项目中没有突出现金流量的时间因素，而这一因素直接影响，

到资本的收益和对投资项目的评价。一般说来，所有的企业或公司（或其它经济机构）都要编制资本预算，只不过各人所采用的方法不同罢了。这些方法归纳如下：

（1）回收期法：这是一种传统的会计师评价项目的方法。它是指一项投资产生的现金增量足以补偿最初的资本支出所需的时间。因此它要考虑一个新项目的资本支出，并将它与该项目的净现金流量联系起来。根据回收期的长短对项目排列等级，优先考虑回收期最短的项目。这种方法存在一个最严重的缺陷，即它不考虑回收期后所产生的现金流量（cash flow），也不考虑回收期内现金流量的类型。

（2）平均利润率法：最早采用的项目预期利润率法，是指根据项目每年的利润流量与项目的年平均投资额的比率，来对项目作出评价。上述这两个数据在传统会计中均有现成的值，因而比较方便和适用。但由于这种预期利润率一是没考虑预期收益的时效性，二是无论分子或分母，其数据大小都受到难以预测变化的折旧率的影响，因此与实际利润率相差较大，故现已不常采用了。

（3）贴现的现金流量收益率法（The DCF rate of return）：有时也称内部收益率法。它是根据公式

$$C=\sum_{i=1}^{n}\frac{v_i}{(1+r)^i}$$

计算得出。其中 C 为初始阶段的创业资本支出，v 为该项目整个寿命期间任一年份的净现金流量。若 r 为 a%，则表示资本支出可以回收，在整个寿命期间未清偿的资本余额可有 1%的收益，把内部收益率与公司的资本成本相比，就可以确定和评价项目是否合算，这种评价方法的优点在于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但也存在缺陷，它无法提出由此项目产生的财富总额，另外，多数情况下，会得出多重收益率的值。

（4）净现值法（NPV）：它是把一项投资的预期成本的折现值从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中扣除，所得到的现值总额。计算公式如下：

$$NPv=\sum_{t=0}^{t=1}\frac{R_A-G}{(Hr)^t}$$

其中，NPv 为净现值，R_a 为现期收益，G 为现期成本。如果计算出的净现值是正的，这个项目就潜在地值得去承担，可是拒绝还是接受的准确法则，必须取决于把具有正现值的一切可用的选择排列起来。这还需要运用线性规划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具有同内部收益率法相类似的优点和缺陷。

道—琼斯平均指数（Dow—Jones averages）

简称道·琼平均数。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出版者道·琼公司编制的四种股票价格平均数。它们是：①道·琼 30 种工业股票平均数；②20 种运输业股票平均数；③15 种公用事业股票平均数；④这 65 种股票的综合平均数。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中的全部股票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报刊上经常引用的道·琼斯平均数，通常指道·琼 30 种工业股票价格的平均数，它是美国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大工业垄断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数。

道·琼斯公司的创始人是查尔斯·道。1844 年，他根据 11 种有代表性的股票（大多是铁路公司的股票）编制出股票价格平均指数，并每次在该公司出版的《每日通讯》上刊登。1889 年，该刊改为《华尔街杂志》仍继续刊登。最初，道·琼斯平均数的编制方法是求上市股票每一股的简单算术平均数，如 1897 年工业公司上市股票 12 种，就这 12 种股票的每一股市场价格除以 12。以后，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选用的股票逐渐增加，且各股份公司经常有增资和拆股行为，而在增资或拆股以后，股票总股数突然增加，单位股价相应会降低（如 1 股股票原为 40 美元，化为 4 股，各成为 10 美元的股票），这样再用简单算术平均值，就无法反映股票价格的真实变化，因此，编制方法就改为平均数修正法。修正后的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的计算公式为：

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

$$=\frac{\text{增资或拆股后各种股票每一股市价总和}}{\dfrac{\text{增资或拆股后各种股票理论价格总和}}{\text{增资或拆股后各种股票市价总和}}\times\text{前一天的旧除数}}$$

理论价格即增资或拆股企业每一股股票面值与前一天市价的平均数。如成倍增资则理论价格为：（前一天的市价+面值）÷2。

以道·琼斯 30 种工业股票价格平均值为例。假定在起用修正后计算公式的那一天有一家企业按股票面值成倍增资，其面值为 10 元，前一天收盘市价为 30 美元，则其理论价格为（10+30）÷2＝20 美元。其余企业没有增资或拆股行为，则其前一天的市价即为理论价格。设前一天 30 种工业股票每股市价总额为 900 美元，旧除数是 30，则新除数为

$$\frac{900-30+20}{900}\times 30=29.67$$

再假设这一天收盘时 30 种股票每股市价总和为 898 美元，则这一天收盘时的道·琼股票价格平均数变为　　898／29.67＝30.217 美元。

如果不做修正计算，变化后的简单平均值为 29.93 美元，低于前一天的 900÷30＝30 美元。

假如第二天又有企业增资或拆股，那么以这一天

的除数（29.67）和市价总和（898）为基础重新计算新的除数，再算出新的价格平均数。如果没有企业增资或拆股，则用新的市场股票价格除以 29.67 即可。

从计算公式看，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的计量单位应该是美元，但由于其具有夸大平均股票价格的问题，所以国际上对其计量单位有的用"美元"，有的用"点"。

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虽然不再反映上述股票的实际平均价格，但它在美国的各种股票平均数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著名，而且自编制以来从未间断，可以用来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情况，能很好反映各类股票价格的水平及变化。道·琼平均指数按每小时计算，并在每期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是反映美国行情变化的最敏感的股票价格平均数之一。

道德公害 (Moral hazard) 道德公害是指经济活动者在追求自己效用最大化时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的行动。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不确定性与不完全的契约或限制性的契约的障碍而使得对其行为后果负有责任的经济活动者未能承担全部活动的利益或全部损失。道德公害是一种特定形式的不完全性契约所造成的结果，它使得经济活动者的效用与其他人的效用发生冲突。这种不完全性的契约产生于经济活动主体间不对等的信息、躲避风险或联合生产、定立契约的成本与法律障碍以及强制实施契约的成本等一系列原因。

在保险理论中经常涉及到道德公害问题。以个人向保险公司进行财产或其他保险为例。当投保者个人对于财产损失的概率与绝对量具有某种控制能力，而保险公司并不能观察到这些控制能力的变化，因此即使投保者改变其控制能力也不影响他交纳的保险费的数量时，将产生道德公害问题。道德公害使得投保者在有财产保险与无财产保险情况下财产损失的概率不一样。以个人向保险公司投保自行车险为例，假定投保者自行车被偷的概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他的细心程度、依赖于自行车上锁的保险程度等。保险公司并不能观察到每个投保者保管自行车的细心程度，更不能观察到投保者保管自行车的责任心的变化。保险公司只能根据历史经验来确定投保者应交的保险金数额。假定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实行全额保险，而向投保人定期收取既定的保险费，一旦投保人自行车被偷，保险公司赔偿全部损失。一旦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实行全部保险，问题便发生。此种情况下，既然当投保者自行车丢失后保险公司会赔偿全部损失，他为什么还要细心保管自行车呢？因此，投保人投保前后看管自行车的责任心发生了变化，自行车丢失的概率也发生了变化，这便是一个很具体的道德公害问题的例子。

道格拉斯，保尔·霍华德 (Paul Howard Douglas,1892—1976)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1921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执教，其中 1920—1948 年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席，1925 年升为教授。他还当选过三任参议员。作为约·贝·克拉克的学生，道格拉斯在其代表作《工资理论》（1934 年）里，既精彩概述工资学说史，又系统阐述边际生产力论的有关内容，还用早期的实证资料从统计学方面加以验证，从而为边际生产力理论作了大量的辩护。道格拉斯闻名于经济学界，则是他同科布一起发现了"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生产函数表明，制造业的产出分别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份额。据说该生产函数已被经验资料所证实，能够广泛地适用于各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有人认为这是"真正的生产规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具体数学形式为：

$$P'(L,C) = bL^{K}C^{1-K}$$

其中 P'为产出量，L 为劳动投入，C 为资本投入，K 为参数($0 < K < 1$)，而 b 代表既定的技术水平。

道义上劝告 (Moral Suasion)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建议性指导。这种指导作为一种选择性信用控制也是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这种指导一般用于信用市场的某个特定部分，例如，针对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或某类贷款。其作法是中央银行的领导发表谈话，表示对某种存款或贷款的关注，或由中央银行颁布一些指导原则。这种道义上的劝告对商业银行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它往往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不听劝告的商业银行会在进行贴现时受到惩罚。第二，银行持股公司扩充业务要经中央银行批准，因此，与持股公司有关的银行也不得不听中央银行的劝告。所以，中央银行也常常把道义上的劝告作为一种较次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

滞期费 (Demurrage) 在采用航程租船运输时，程租租船合同中通常规定租船方一定的装卸时间，如果租船方在规定的装卸时间内，无法完成货物的装卸，延误了船期，租船方应向船方支付一定的罚金，此项罚金称为滞期费。租船合同通常规定滞期最多十天，超过十天，租船方要赔偿船方的实际损失。滞期费的数额可以由双方在租船合同中予以规定；若未有明确规定，依据航运惯例，通常以船舶每天的维持费计算滞期费。

滑动关税 (Sliding Tariff) 滑动关税又叫伸缩关税，它是指根据进口商品价格的涨落，分别以不同的部率征收的关税。征收滑动关税应事先确定某种商

品价格的上、下限。当进口商品价格高于规定的上限时就降低进口税率，而当进口商品价格低于规定的下限时则提高进口税率。如果进口商品价格界于规定的上下限之间，则按原定的税率征税。总之，税率的高低与进口价格的涨落成反比。滑动关税与差价税有一定的类似性，它在制定价格的上下限时总是以国内价格为依据。征收滑动关税的目的，就是要抵消进口价格变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保护国内的市场和生产，维护国内价格的稳定。

滑动价格 (Slieing—scale price) 滑动价格是指买卖双方在合同中对商品仅规定一个基本价格，这一商品的基本价格中应包括价格构成的主要指标，例如固定支出，原材料费用，工资支出等项目在基本价格中所占的百分比，同时规定如果在合同执行期间上述生产费用发生变化，可以对合同中的基本价格作相应的调整。滑动价格也是一种较为灵活的作价方式，它多用于生产周期较长的商品的买卖合同，例如大型机器设备的进出口合同。

装运港船上交货价 (Free on Board… named poot of shipment; FOB) 国际贸易价格术语、属装运港交货系统。简称"离岸价格"，是国际贸易中最为经常使用的价格术语之一。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于装运港船上交货价格术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如下：

A、卖方义务：

1.依照合同的规定，提交货物及有关凭证；

2.在规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在约定的装运港按照港口的惯常办法，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的船只，并无延迟地通知买方，货物已经装船；

3.自负风险和费用，领取出口许可证或政府签发的有关货物出口的其它证件；

4.除依照下述买方义务（3）（4）条款规定外，负担货物的一切费用和风险，直至货物在指定装运港越过船弦时为止，所付费用中，包括出口所需的任何捐税及办理装船手续的费用；

5.自费供给货物的惯常包装，但依行业习惯，如该项货物的运送无需包装，则不在此限；

6.负担因交货而需支出的任何检查费用，如核对只质费、过磅费等；

7.自费提供通常的清洁单据，证明货物已经装上指定船只；

8.根据买方请求，并由买方负担费用，提供原产地证明书；

9.根据买方请求，并在买方负担风险和费用的情况下，给予买方一切协助，使买方获得装船提单和原产地证明书以外的装货地或原产地国家所鉴发的，为买方所需的货物在目的地国家进口或必要时经由第三国过境运输的凭证。

B、买方义务：

1.自费租赁船只或预订必要吨位，并及时将船名，停泊地点和装货日期通知卖方；

2.自货物在装运港装船越过船弦时起，负担货物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并依照买卖合同的规定支付价金；

3.如买方指定的船只，未能在指定日期或指定期间内到达，或未能装载上述货物，或在规定日期或规定期限终了前截止装货，买方应负担由此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并自规定期限终了时起，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但以该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4.如买方未能及时指定船只或对受领货物，或选择装运港，曾保留一定期限而未能及时给予卖方详尽指示，应自原订交货期限终了时起，负担由此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及货物的一切风险。但以该项货物已清楚地划归为本合同项下为限；

5.在卖方义务（9）条款规定的情况下，支付因领取提单而产生的任何费用；

6.支付因领取卖方义务（8）（9）条款所指凭证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原产地证明书和领事签证单据费用在内。

以上是解释通则下的 FOB 价格术语的含义。它代表了对于 FOB 价格术语的一般解释，对于买卖双方在装运港船上交货价格术语下的风险责任和费用的划分问题，我们从上述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1）风险转移：采用装运港船上交货价格术语，货物风险转移以货物越过船弦为界。货物被吊车吊离地面，越过船弦之前的风险由卖方负担，而越过船弦之后的风险则由买方负担；

（2）责任的承担：对于买卖双方责任承担的划分，也是以货物越过船弦为界。在货物越过船弦之前，卖方有义务按照合同规定的品质、数量备齐货物；申领出口许可证，交纳出口捐税而后，卖方应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在装运港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的船只。货物装船完毕，卖方就应立即通知买方货物已装船，以便买方及时投买保险并准备接受货物。同时，卖方需取得清洁的装运单据，以掌握货物的所有权，便于向银行办理押汇或议付货款。对于买方来说，货物越过船弦，买方则应对货物投买海上运输险，而后等待接货并办理货物进口手续，交纳进口捐税。对于 FOB 价格术语，买方还有一重要的责任，即租船订舱，在运输大批量货物时，买方需采用租船方法，与船公司订立租船合同；若只有少量货物，则可采用托

运的方法，与船公司订立运输合同，受订舱位。由买方租船订舱，买方就应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选择装运港，并及时通知卖方，以便卖方安排货物装运。但是，在实际业务中，通常是买方委托卖方代为租船订舱，这时卖方有权选择装运港，且费用由买方负担；

(3) 费用的负担：买卖双方在费用负担的划分上，也是以货物越过船弦为界。货物在越过船弦之前的费用，包括装船之前的费用和装船费，但不包括理舱费和平舱费，由卖方负担。其中装船之前的费用包括：货物出口捐税、装运港货物检验费、领取原产地证明书费用、货物习惯包装费用；装船费则是指货物搬运费、港口捐税等。货物越过船弦之后的费用，则要由买方负担，其中主要包括：运费、保险费、平舱费、理舱费以及货物到达目的港的卸货费等。这样，FOB价格术语下的货物价格就包含了货物成本加上货物越过船弦之前的各项费用，其中也就包括了各种国内捐税、出口捐税、单证费用和装船费等。

上述内容均是在一般意义下对于FOB价格术语的解释。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对与FOB价格术语有关的买卖双方的费用和负担，风险的划分，许可证的申请、租船订舱的责任等，不同的国家和港口都有不同的规定和解释，为了防止产生纠纷，常常在签订买卖合同之时，要求卖方向买方提供一些附加的服务，这引起了FOB价格术语的变形，其中包括：FOB班轮条件（FOB Liner terms）；FOB卖方理舱（FOB stowed）；FOB卖方平舱（FOB trimmed）FOB吊钩下交货（FOB under tackle）等。此外，还需注意美国对于FOB的解释与国际商会的解释通则下FOB的含义差别较大。美国对FOB的解释中，其中只有装运港船上交货条件与国际通用的FOB含义大致相同。而美国对FOB的解释在南北美洲为人们广泛接受，需引起特别注意。

装运通知 (Shipping advice) 装运通知是指货物已装船或即将装船的时候，出口商向进口商发出的货物装运情况的通知，装运通知常以电报发送，有时随有货运单据正本或副本。在国际货物买卖中，采用不同的价格术语，对于装运通知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若买卖双方采用FOB条件成交，由于此时由买方租船订舱，卖方只需在装船日期到来之前电告买方货物备妥准备装船的通知即可；若采取C&F条件成交，卖方需要在货物装船后，将货物的品名、规格、件数、重量、发票金额以及船名、装船日期通知买方，以便买方提货、进口报关和转售；若采取C&F条件成交，在货物装船后，卖方须无延迟地将货物情况，船名及装船日期等电告买方，以便买方及时投保，在C&F条件下，若由于卖方未能及时电告买方装运通知，使得买方未能及时投保，卖方应承担买方由此遭受的损失。

普惠税 (Generalized Perceferentied Duty) 普惠税是指发达国家对于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入的商品，特别是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普遍给予的优惠的关税待遇。普惠税有两大特点，一是普遍的、非歧视的，它是指发达国家应使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受歧视地、毫无例外地共同享受它所提供的优惠关税待遇；另一是非互惠的，它是指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优惠关税待遇，而不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反向优惠。普惠税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领域同发达国家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取得的，其标志是在1968年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通过了由发达国家建立普惠制的决议。目前，实施普惠制的国家已有二十多个，而享受普惠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多达一百七十多个。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的普惠税，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无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其作用却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实施普惠制的过程中，规定了种种带有歧视色彩的限制性措施，从而使得普惠税既未很好地体现出普遍性，也没有体现出公平性，普惠税的原意受到了很大的歪曲，影响了它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具体说，发达国家实施的普惠制方案中包括的限制性条款主要有以下几条：①受惠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发达国家从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并不履行应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歧视地、普遍地提供优惠关税待遇的义务，限制受惠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美国把我国排除在受惠国范围之外。②受惠商品范围的规定。普惠制要求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入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普遍给予优惠关税待遇，但实际上，许多敏感性的商品，如纺织品、鞋类、石油制品等常被排除在受惠商品范围之外，有的即使列入受惠商品范围，但也受到一定的限额限制。③减税幅度的规定。不少受惠商品的减税幅度比较小，对农产品来说尤为如此。④给惠国的保护措施和规定。这是指发达国家有权在特殊的情况下完全或部分地取消履行提供优惠关税待遇的义务。⑤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品能否享受优惠关税待遇产生直接的影响，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严格原产地的规定条件来控制和减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商品范围。一般来说，对于受惠商品的原产地规定有两种，一种是产品必须全部产自受惠国家或地区，另一种是产品中包含的进口原料或零件，经过高度加工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要享受普惠制优惠关税待遇，意味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出

口企业必须向给惠国提供由受惠国官方机构签发的普惠制原产地证明书，经给惠国有关机构审核签发机构印鉴、证书签署人姓名、手签字样相符以及货证相符后才能实现。事实上，给惠国有关机构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故意刁难受惠国或者人为拖长检验时间等来达到削弱或减少提供优惠关税待遇的目的，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正常出口产生消极的影响。总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际享受的普惠税优惠待遇要比理论上的普惠制给予的优惠少得多。

普通股股票（Common stock） 是指在优先股要求权得到满足后，在公司的利润和资产方面给予持股人以无限权利的一种凭证。它是股份公司筹集资本的基本工具。其主要特征有：（1）投票权。普通股股票是一种所有权证书，持有者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具有投票权（或称表决权）；（2）收益性。即普通股股东有获得公司盈利分红的要求权；（3）风险性。它说明普通股获得公司利润分红的数量，取决于公司盈利的多少和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具有一定风险；（4）流动性。普通股股票没有到期日，它可以在任何时候被购买和出售，这种因出售而变为现金的能力，使普通股股票和投资者投入的资本可以流动。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 见"贸易条件恶化论"。

普利斯效应 发展中国家税收与储蓄之间的一种相关状况，即增加税收却收到减少国内储蓄的效果。世界银行的斯坦利·普利斯于1967年发表的《通过税收进行储蓄：现实还是幻想》一文，首先指出了这一经济现象，并提醒人们引起广泛注意，后来这一现象就被称之为"普利斯效应。"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私人储蓄一向受人均收入低、储蓄能力最强的家庭私人消费倾向高等因素的限制，外国储蓄的获得也很有限，因而有必要制订动员政府储蓄的计划，而增加政府储蓄的方式，就是尽可能通过对税收结构的重要改革，或通过提高现行税率，来提高税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一度流行的观点是，在每增加的一单位收入中，国营部门的消费倾向要比私营部门小得多。所以，通过增加税收而多交给政府的收入会增加国家的储蓄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税率的增长会成功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后来，有些分析家发现，政府储蓄与私人储蓄之间的相互替代性很高。因而，只有在政府新增税收的边际消费倾向比私营部门支付新增税收后的边际收入消费倾向低的时候，增加税收才能同时增加国内储蓄。其中政府新增税收的边际消费倾向，指政府每单位新增收入的消费量。如果某国政府每增加100美元收入就花掉其中的80美元，那么它的边际消费倾向就是0.80。从6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间，大多数政府的消费倾向相当高，发展中国家的税率通常在这一时期增长甚微，但其公共消费开支在同期内却迅速增长，一般都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事实说明，发展中国家政府新增税收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高到增加税收却减少国内储蓄的程度。

超员雇佣（Featherbedding） 指工会人为增加雇员人数，使其超过企业满意的雇用水平，以增加就业。尽管遭到广泛批评，今天超员雇用的做法仍旧存在。

超买（Overbaught） 即"多头"，见"外汇头寸"。

超卖（Oversold） 即"空头"，见"外汇头寸"。

超限额结转抵免（Carry—Over Credit of Above Limitation） 计算抵免限额的一种方法。它指的是在计算跨国纳税人抵免限额时，允许跨国纳税人将其发生在某些纳税年度的超抵免限额部分与发生在另一些纳税年度的不足限额部分相互冲抵，亦即将超限额加以结转，计算抵免限额。

这一结转计算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往往规定一定年限，只在一定年限内准予结转，如美国规定，可前转2年，后转5年。

与综合限额允许横向用不同国家间的不足额与超限额合并计算抵免限额比较，超限额结转则是允许纵向用不同时期间的不足额与超限额合并计算抵免限额。二者对于跨国纳税人而言都是一种特殊的优惠，而对于居住国（国籍国）而言则都会带来一定税收收益的损失，因此除非意在鼓励各种对外经济活动，否则不宜实行。

超级乘数（Super Multiplier） 自发投资及其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量之间的关系，即自发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这个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在1950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根据希克斯的解释，在消费取决于过去和现期收入，引致投资取决于过去和现在收入变化的情况下，不同的自发投资水平和不同自发投资增长水平上可能存在均衡。这样，在既定的增长率时，自发投资与均衡国民收入的比率就称为超级乘数。在超级乘数既定的条件下，自发投资水平越高，均衡的国民收入也越高。希克斯用这一概念说明了自发投资

与其所引起的国民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而由自发投资与自发投资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则是国民收入均衡增长的水平。在希克斯的经济周期理论中，这一概念是十分重要的。

超速通货膨胀（Hyherinflation）　又称"恶性通货膨胀"，指流通中的货币量异常迅速地增长，以致了货币购买力急剧地下降，物价水平以加速度增长，达到货币当局无法控制的地步。美国经济学家P·卡甘（P.Cagan）把物价水平以每月超过50%的速度大幅度的持续上升定义为恶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的后果是，货币急剧地大幅度贬值，正常的经济关系遭到破坏，以致于最后整个金融货币体系和经济完全崩溃。因为在超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对本国货币完全失去了信心，货币完全丧失了作为价值贮藏的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经济几乎倒退回以物易物的状态，经济完全停滞或濒于崩溃。这种通货膨胀较为少见，它往往是战争或革命之后，社会与经济遭受极大破坏的结果。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了超速通货膨胀，1919年12月至1923年12月，零售物价指数由80%，上升为1200.4×10^{19}，马克贬值为$1/10\times10^{12}$。这使德国经济完全崩溃，政府跨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匈牙利、旧中国都发生过类似的通货膨胀。在旧中国，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上海市的批发物价上涨了62719倍。对付超速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国家实行币制改革，用新货币来代替旧货币。战后，有些国家尽管也曾出现过相当高的通货膨胀率，但由于货币当局仍没有失去控制，通货膨胀仍可以控制，所以，还称不上超速通货膨胀。

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试图解释经济运行的经济模型最为常见的是表示有关经济变量的方程式，联立方程模型指由彼此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程组成的方程组模型，这些方程式描述的是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在假定的技术上和在实际经济中的表现之间的关系。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市场供给与需求模型就是典型的例子。

1.模型的构选。在建立模型时，首先是考虑到所要分析的经济变量以及相关变量，通常将这些变量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内生变量是指由所要分析的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变量，外生变量由分析的体系以外因素决定，它被认为是引起内生变量变动的、自动的、无法解释的因素。简化地，内生变量都可以表示成外生变量的函数。其次是建立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模型的建立要研究多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由单个方程式来表示，但单一方程式通常无法满足全面揭示某一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要求，例如不仅要研究A变量与其他变量一起来影响B变量的变动，还要研究B变量同其他变量一起来影响A变量的变动。这就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程式来描述这种复杂的经济关系，从而构成经济计量分析中的联立方程模型。模型本身就是一种模拟，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同，方程式的形式就不同，而且模型的建立需要作许多必要的简化。在联立方程模型中，经济计量方程的个数必定与内生变量的个数相同，每一个变量即可以在一个方程中作解释变量和为其他的变量所解释；又可以在另外的方程中作为解释变量去解释其他被解释变量。一个变量不仅由它所在的一个方程所决定，也由它所在的其他方程共同决定，所以联立方程中的内生变量必须通过联立求解才能得到解值。我们举一个宏观模型的例子，在一个封闭经济中，经济总收入为Y，总消费为C，总投资为I；联立方程模型为：

$$C_t=\alpha_0+\alpha_1Y_t+\varepsilon_1$$
$$I_t=\beta_0+\beta_1Y_t+\beta_2Y_{t-1}+\varepsilon_2$$
$$Y_t=C_t+Z_t+G_t+\varepsilon_3$$

其中G_t为政府支出，Y_{t-1}是前期收入，C、I、Y是内生变量，其值通过方程组求解得到。ε_1、ε_2、ε_3为随机误差项。

2.联立方程模型的求解：经济计量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联立方程分析体系中的参数进行特定化，检验及估值。联立方程模型中的所有内生变量都是随机变量，任何误差项的变动都会引起内生变量发生变动。因此，如果对每个方程的随机参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将是有偏的，即使在大样本条件下联立方程的随机方程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量也不具有一致性。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必须采取其他的能够使估计量具有较好性质的参数估计方法，它们包括两大类，一类是（1）间接最小二乘法；（2）工具变量法；（3）两阶段最小二乘法；（4）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这类方法能够利用联立方程模型给出全部变量的信息，得到随数变量参数估计是有偏的，但具有一致性。单一方程估计法每次只能估计一个方程的参数。另一类方法是方程系统估计法。包括：（1）阶段二乘估计法；（2）充分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这类方法不仅能利用联立方程模型给出全部前定变量信息，随机变量参数的估计是有偏的。但具有一致性。方程系统估计方法能够一次得到模型中所有的随机误差项的相关信息。一般情况下后一类办法比前一类办法更为有效。

3.联立方程模型的应用。联立方程模型是根据实际的社会经济问题建立起来的，因此它首先是一个结构型模型，即内生变量表现为其它内生变量、前定变

量以及随机误差项的函数，或者是由内生变量，前定变量组成的恒等式，模型中每个方程的经济意义都十分明确。它能表示每一个解释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联立方程模型是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简化和数学化，它的解释往往与实际经济生活存在很大差距，但仍然在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

联运提单 (Through B / C) 联运提单是在船舶运送货物时，由于货物的目的港不在船舶航行的航线范围之内，而须借助它种方式转运到达目的地时，承运人签发给托运人的提单。联运提单的运输方式包括船舶与船舶联运，船舶与火车联运，船舶与飞机联运，以及船舶与汽车联运。当船舶承运再经由陆路或飞机继续运至目的港时，托运人通常都选择船方签发的联运提单作为托运的文件，而不采取陆运或空运方面的单据。这是因为海运提单是同时贸易中公认的文件，是可以流通的物权凭证，而且在出现纠纷时有统一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作为依据。

联运提单的签发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承运人作为第一承运人，在提单上注明只负第一航程责任，对于其它联运过程以及在转运港换装期间发生的货物损害概不负责。另一种形式是第一承运人签发所有承运人承担把货物运至目的地责任的联运提单，这种形式是第一承运人作为其它承运人的代理人对所运货物负全程责任。为了避免各国法律分歧情况，可以在联运提单上加注不论是水运，陆运或空运，均以《海牙规则》作为衡量责任的依据。

签发联运提单，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无法确知，中途停滞的费用也无法估计，承运人在收取联运运费时，总要酌情多收，补偿货物停留在中途转运地无法估计的费用。

在联运提单的签发上，通常是由承运人签发联运提单交给货方，而签发普通提单交给第二承运人，在中途转运地由第二承运人凭普通提单提货，而货物到达目的地则由收货人持联运提单提货。

联合浮动 (Joint Floating) 又称“共同浮动”或“集体浮动”，“单独浮动”的对称。若干国家组成货币集团，集团成员国货币间实行固定汇率的同时对非成员国的货币则实行同升同降的浮动汇率。为浮动汇率的一种形式。1973 年 3 月欧共体六个成员国（法、卢、荷、比、西德、丹麦）决定，在它们的货币间保持固定比价，汇率波动幅度为固定比价的上下各 1.125%，其中卢、荷、比结成更紧密的联盟，汇率波动幅度为固定比价的上下各 0.75%，对非成员国货币，主要是美元则实行同升同降的联合浮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它成立于 1945 年 10 月，并于 1946 年 12 月成了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它的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作为各国政府讨论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国际组织，它的宗旨是提高各成员国人民的营养和生活水平，改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效率，改善农村人口状况并确保人类免于饥饿，为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粮农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理事会是大会的执行机构，由 49 个理事国和一个独立的主席组成，大会休会期间由它行使大会赋予的权力。理事会下设 8 个职司委员会，协助理事会研究和审查各种专门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秘书处作为该组织的常设办事机构，它负责日常工作，并通过它设在世界各地的区域办事处和专门委员会从事具体的活动。该组织开展的具体活动主要包括从成员国搜集有关世界粮食和农、林、渔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情报并向成员国提出相应的建议；就世界粮农领域的重要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并提交大会、理事会讨论；通过多种渠道寻求贷款和援助并组织实施各种援助项目；协助发展中国家制订农业发展的具体规划；在市场的分析和预测基础上组织政府间的协商，促进农产品的国际贸易；通过提供各种资料、召开各种专业会议、举办培训班、提供专家咨询等办法推广农业生产和管理新技术，协助发展中国家在防治农作物和牲畜的流行病、控制水土流失、更新森林、发展灌溉工程以及控制仓储粮食虫害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效。

粮农组织的预算资金由成员国按人口平均收入分别捐献，捐献的标准由粮农组织大会制定。粮农组织的成员国有 150 多个。我国是该组织的创始国，但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所占据。1973 年 4 月我国正式恢复了在该组织的活动，并于当年 11 月当选为该组织的理事国。从 1978 年起我国开始接受该组织的援助，引进了不少有关技术设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agramm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立于 1966 年 1 月 1 日，它是联合国系统多边技术援助的计划管理机构，简称开发署，它的总部设在纽约，联合国成员国都是开发署成员国。

开发署的宗旨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经济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科技水平，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推动这些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开发署的决策和领导机构是管理理事会，它主要

负责制订方针政策、筹措资金、分配援款、批准受援国的国别计划等。该理事会有 48 个成员，从联合国会员国中选举产生，任期 3 年，每年改选$\frac{1}{3}$，可以连选连任。我国曾多次当选为该理事会的成员。开发署的具体活动是在它的职能机构——秘书处领导下开展的，主要内容是提供无偿技术援助，主要用来开展技术合作和项目的投资前活动。开发署的援助项目涉及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主要项目为考察和评估各种自然资源如农田、森林、河流、矿藏等的开发潜力、考察和评估制造业、商业和出口的发展潜力、推动国内外的投资、培训各种专业人才、转让和应用先进技术、完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规划，等等。开发署援助的项目，大多数由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有关组织和专门机构来执行，少数项目由受援国政府自己执行。开发署援助项目的主要方式是派遣专家和顾问提供技术服务、资助受援国专业技术人员到国外考察和进修、援建试验或示范性项目等。

开发署提供无偿技术援助的资金来源是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的自愿捐款。我国一方面不断对开发署捐款，同时也接受开发署的技术援助。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简称工发组织，它成立于 1967 年 1 月 1 日，是联合国大会下属的一个多边工业技术合作机构，它的宗旨是通过动员国际、国内的资源，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工业发展方面的活动。工发组织的总部设在维也纳，凡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都可以加入该组织。

理事会是工发组织的领导机构，它由 53 个理事国组成，理事国任期 3 年，每年改选$\frac{1}{3}$，可以连选连任，我国从 1972 年起一直是该组织的理事国。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原则和政策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讨论并审批工发组织的活动方案并审查联合国系统内工业发展活动的协调情况；通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年度报告，等等。作为工发组织的执行机构，秘书处全面负责实施工发组织的工业发展与合作计划，它主要从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讨论并设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困难、组织各种专业会议及专家小组会议等。

工发组织自成立以来已召开了多次大会，通过这些会议不断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战略，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工发组织的主要活动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其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等。工发组织开展的技术援助，大多数属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国别计划确定的项目，主要是在农产品加工、冶金、机械、化工、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工发组织还建立了工业协商制度，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协商和谈判的场所，帮助发展中国家确定工业投资项目并将有关资料提供给发达国家以促使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向这些工业项目投资。该组织还有一个庞大的工业发展现场高级顾问网与实施这些计划的有关国家政府进行合作，以使各项工业发展和合作计划取得最大的成效。工发组织有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它的行政与研究经费由联合国预算拨付，开展技术合作与援助的经费主要来自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此外，联合国的有关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会员国的捐款也是它的资金来源。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于 1980 年 4 月由 62 个国家的代表在维也纳签署并通过的，已于 198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它为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订立规定了一个统一的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订立该公约的宗旨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平等互利，在充分考虑不同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的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统一规则，以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除序言外，公约分为四部分共 101 条。第一部分规定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公约的要求。它规定，该公约仅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国际性货物销售合同，而不适用于其他形式的货物销售合同。第二部分规定了合同成立的有关规则，对于要约、承诺的生效、撤回的条件和效力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该公约的最主要部分，它规定了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风险转移、免责事项、货物保全等具体处理规则。第四部分规定了公约的签字、加入、批准、生效、退出、允许保留的事项、公约正本的保管等一般规则。总的来说，该公约对国际货物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处理等作出了合理、统一的规定，由于它是在综合考虑世界各国的不同情况和要求的前提下制订出来的，因此较好的维护了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它的推广使用必将大大减少国际货物买卖领域的摩擦和争端，有助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我国是该公约的签字国，并于 1986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入该公约。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强调该公约仅适用于我国与其他缔约国之间签订的书面合同，而不适用于我国与缔约国以外的国家签订的有关合同。

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Multimodel Transport of Goods) 多式联运是指借助各种运输工具把海、陆、空运输联系起来的运输方式。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是关于利用两种以上交通运输工具进行货物跨国运输的国际协定，该协定于1980年5月24日在日内瓦签订，参加签约的国家有68个，我国是其中之一。该公约分序言、总则等9部分，由40个条文和一个有关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海关事项条款的附件构成。该公约详细规定了承运人和发货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和诉讼期限等。由于该公约是在汉堡规则之后签订的，因此在内容上同汉堡规则有不少相似之处，如承运人在从接管货物到交付货物的责任期内，对货物的损失或延迟交付承担赔偿责任，诉讼期为二年等等。另外，该公约还规定由于发货人的过失所造成的货物运输过程中的损失由发货人赔偿，发货人应按有关规定在托运的危险货物上加印危险标志并向承运人说明货物的危险性和应采取的预防措施等。由于多式联运的发展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因此公约的有关条款还规定本公约不得影响各国在国家一级管理多式联运业务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权利，以维护各国的经济利益。由于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是在国际多式联运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单式运输公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有很广的适用性和很大的实用性，它作为国际货物运输的一个准则将推动国际货物运输的不断发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易法委员会，它成立于1966年12月17日，是促进国际贸易法律不断协调和统一的国际机构，其宗旨是不断减少或消除国际贸易往来中的法律障碍。贸易法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包括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现有的国际贸易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完善原有国际条约、草拟新的国际条约并促使其获得通过；促使国际条约和公约等在世界各国得到统一的解释和运用；协调国际贸易法律领域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之间的活动和工作并促使其加强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机构和人员的国际贸易法律知识的培训。贸易法委员会在统一各国在国际贸易往来中的具体做法、在减少国际贸易往来中的摩擦、在妥善处理国际贸易往来中的纠纷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

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一个常设委员会，它成立于1974年。作为负责研究和协调有关跨国公司问题的专门机构，跨国公司委员会的宗旨是全面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跨国公司的性质和活动，进而研究跨国公司的活动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法律领域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产生的影响；制定有关国际法规，规定跨国公司的行为守则，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控制进而消除它的消极影响；增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同跨国公司打交道的能力，并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国际协作。跨国公司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并通过下设的跨国公司中心开展具体的业务活动。它所开展的活动包括制订"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建立有关跨国公司的情报体系，搜集了大量的有关跨国公司的资料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供发展中国家参考，举办有关跨国公司问题的培训班培训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同跨国公司打交道的人员并向各国政府提供有关咨询服务。跨国公司委员会有49个成员国，它们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选举产生，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我国于1980年当选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国。跨国公司委员会的建立同战后以来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并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紧密相关。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它是联合国的机构之一，负责审议国际贸易和发展问题。1964年3—6月召开了第一届贸易会议，同年12月，它被确定为联合国的常设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是该会议的成员国，贸发会议的宗旨是促进国际贸易，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以及不同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国家间的贸易发展，制定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发展问题的原则和政策并提出实施计划；审议、推进、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各项活动；协调各国和各区域性经济集团的有关贸易和发展政策，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谈判等。贸发会议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由各成员国参加的大会，通常每四年举行一次，至今已举行了七次，最近的一次是1987年7—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理事会是贸发会议的常设机构，下设初级产品、制成品、航运、无形贸易和贸易资金、技术转让、优惠特别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等七个委员会。贸发会议的召开，对于改善南北关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最近一次也就是第七次贸发会议上，各国就发展资

源商品、国际贸易、最不发达国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发展中国家克服面临的困境、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国于1972年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了该会议。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于1945年10月，总部设在纽约，它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专门负责协调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它的具体职能是：研究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问题，并向联合国大会和会员国提出有关报告和建议；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召开有关国际会议，并起草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公约草案；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订立协定，确定它们与联合国的关系，并协调它们之间的活动；就其负责的各项事项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经联合国大会许可，为联合国成员国服务，等等。理事会下设会期委员会、常设委员会、联司委员会、区域(经济)委员会等四个委员会，它们又包括许多更加具体的委员会。理事会会议通常每年举行两次，分别就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理事会的具体活动大多是通过各区域经济委员会开展的，这些区域经济委员会是亚太经济委员会、西亚经济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理事会成立至今它所包括的理事国数量不断增加，最初为18个，到1973年已扩大为54个。理事国任期3年，每年由联合国大会改选$\frac{1}{3}$，可以连选连任。我国从1971年11月23日起一直是该理事会的理事国。

联合（Combination） 联合用于表示各种类型的组织形式，旧的用法同作为企业联合体—现在被当作垄断组织、卡特尔、工业联盟或跨国联盟—的商业企业有联系。在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被理解为要求提高工资和抗议工作环境恶化的工人的联合。"工会"这个概念直到1830年以后才被普遍运用。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它逐渐取代了"联合"一词。

18世纪，劳动者联合行动很广泛，但它决不可能由正式组织来指挥或引导。韦伯曾错误地坚持，只有那些正式组织领导的持续存在的联合组织才能被承认。对某些地区织布工人的研究表明，十八世纪联盟主义的基本信条就是坚持在限定的范围内拥有施加集体压力的权力，但纺织工人的组织行动通常超出其职业范围之外。一个定居的团体会鼓励居民的联合以及一致行动，技术在其中常常是一个群体性的因素，但在欠熟练工人和移民团体中也存在较多的活动。

伦敦的行旅裁缝18世纪是最有影响的联合组织，这种组织当时约有1，700个，最后形成五个盒式"box"俱乐部，这种俱乐部的理想是友善的社会。为正常工作，俱乐部长期存在，其规定和章程为后来的英国工会提供了原则基础。

在紧接的一百年间，在一些行业中反对联合的立法是非常普遍的。1799年，政府通过一项总法案(后被废止)。这个法案宣布那些意图获得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的全部组织成为非法。1824年，所有从前的有关联合的法律被废止了。但次年的法案又规定在严格的条件下允许联合，并且严令惩戒行动中将会出现的威胁、干扰和暴力。

立法限定联合的完全结束，是现实的发展及人们抗议的结果，其中最有份量的是J·R·麦克尔霍克，一个正统的政治经济学家，他认为《联合法》不公正，因为它没有把雇主和工人放在同一水平上。这类立法很危险，它们将导致人们对立法的蔑视，而且激化阶级对抗。他支持温和的联合，认为工人们有理由决定其适宜的劳动价格。但是他反对罢工，认为这只有利于未涉入罢工的雇主，会削弱民族工业与外国工业的竞争能力，并且容易产生暴力。

由于欧文主义及霍奇斯尔辛·格雷和汤姆森等理论家的影响，19世纪末，英国工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合作生产的联合组织明显增长，有人支持欧文的共产主义思想，注意力集中于所谓的平等交换，集中于19世纪30年代的"劳动公平交换"，集中于货币银行系统。欧文主义的一个中心设计就是"全国生产大同盟"，这一切都偏激地影响了英国工会以后的观念。

在雇主阶层中总的说来对工人联合是充满仇恨，这种敌意如同害怕，已经成为英国自由传统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影响到政治、管理和司法方面。

联合生产（Joint Production） 联合生产是指厂商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一种以上产品的生产。联合生产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生产结束时产出多种产品，但每一种产品都可以用独立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即生产函数是非联合（Nonjoint）的生产函数。第二种情况是多种产品是用单一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联合生产"是一个加总的问题；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联合生产"是一种具有"内在联合性"的技术现象。

导致联合生产的原因有三种。一、是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或者说节约某些共用的投入而需要采取联合生产；二是由于产出间的关联而导致联合生产；三是为适应需求方面的不确定性而产生联

合生产。

范围经济定义如下：若产品联合生产，其联合生产的成本小于将联合生产的产品进行分割生产的情况下每一种分割生产产品的成本加总额。在许多产品是用同一种固定的要素，例如固定的资本、固定的技术劳动生产，而同时生产这多种不同的产品又不会超出既定生产力的情况下将产生范围经济。这种情况下之所以产生范围经济，可能是由于固定的投入不能完全分割，并且不容易从一种生产转入另一种生产，因此，只生产多种产品中的一部分产品可能导致生产的某些阶段生产力闲置。另外，生产中某些投入物带有准公共投入的特征，在购买这种准公共投入物用于某种生产过程时，至少可以部分地用这种投入物生产其它商品。

范围经济也可能产生于产出品之间的相互关联。有些生产过程带有这样的特征，只要生产X产品，就必然产生Y产品。农业中与化学工业中会常见到这种情况。炼焦过程中会产生多种煤化工产品。生产出牛肉的同时也生产出牛皮。

需求方面的不确定性往往会使得只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面临产品销售的风险。一旦该种产品滞销，而厂商又无别种产品可以销售，就会使厂商蒙受重大损失。象消费者愿意持有多样化的资产以避免因持有单一化资产而容易产生风险一样，厂商也愿意生产多样化产品，以分散产品销售的风险。

联合生产问题对于研究工业的组织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产品的联合生产及其有关的成本问题可以用来确定一个行业厂商的最优数目，可以用来确定一个行业究竟是实行垄断、寡头，还是竞争性生产。

联合冒险经营(Joint Venture)　商业中的冒险行为是一种其结果带有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行为。联合冒险经营是两个或多个合伙者共同分担风险的经营。合伙者可以是个人，公司或者政府。联合冒险经营一般来说都是规模较大的经营，并且要冒较大的风险。例如两家大的石油公司组成一个附属公司开发某一地区的石油，而在该地发现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的机会是不确定的。合伙经营者往往有互补的能力。例如，某一企业在国内市场拥有政府的特权，但不具有开发的技术，而另一企业拥有技术，但又没有得到政府特许的开发权。这两个企业可以联合经营，利用对方的专长（前者利用后者的技术，后者利用前者的垄断权），共同获利。几乎所有的联合冒险经营都有不完全竞争的因素。

联产品（Joint Products）　指出自同一生产过程或用同一原料生产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不生产出另一种或几种产品，这种产品就不能生产出来。这类商品是在联合成本和联合供应的条件下生产的。从石油中提炼出汽油、煤油和其他产品，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出自同一生产过程的一例。

联系效应理论（Theory Of Linkage Effects）　赫尔希曼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内容之一，用以解决产业部门发展优先次序选择的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各产业部门之间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依存。所谓联系，即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联系效应，则是指某一经济部门的发展诱发了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作用。赫尔希曼将产业部门间的联系分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那些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投入物的产业，具有前向联系作用。如石油工业为化学工业提供原料，化学工业是石油工业的前向联系部门，石油工业的发展会推动化学工业的发展。那些从其他工业部门获得投入品的产业，具有后向联系作用。如纺织工业需要从农业中获得原棉，农业是纺织工业的后向联系部门，纺织工业的发展要求棉产量的增加。当然，也有些产业既是前向联系部门又是后向联系部门。如钢铁工业，既是煤炭、采矿等部门的前向联系部门，又是机械工业的后向联系部门。在投入——产出表中，能够明确地看到各产业间的这种联系。但投入——产出表却不能直接用来度量联系效应。赫尔希曼认为，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来说，投入——产出表并不能揭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哪一个追加的产业应当被建立，它也不适用于说明后向联系对一个产业的真正影响。只有当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投资主要用于扩大产业而不是“创造新产业”时，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的统计方法才具有度量联系效应的实际意义。为此，赫尔希曼提出，一个产业的联系效应，应该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测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大，表明该产业联系效应大；反之，则表明该产业的联系效应小。同样地，也可以用价格与收入弹性的大小来测定一个产业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的大小。凡是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不论是后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都能通过这个产业的扩张而促进相关部门的发展，反过来还可以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有关产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据此，赫尔希曼指出，一个国家在选择适当的投资项目优先发展时，首先应当选择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在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中，又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而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正是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最大的产业。这就是产业部门发

展优先次序选择的技术标准，也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据赫尔希曼观察，发展中国家经济部门的联系效应比较微弱。农业是缺少联系效应的。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尤其是加工业还是具有较大联系效应的。因此，即使是在各经济部门联系效应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某些联系效应相对较大的部门优先发展。

联邦反禁令法案 见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条

联邦仲裁与调解局（Federal 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Service） 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负责促进劳资和平。该局致力于防止和解决雇主和雇工组织之间的集体谈判争议。联邦法律规定，如果在一项劳工合同期满或延期30天以前还未达成协议，应向该局提交纠纷通知书。该局接获通知后，为避免发生劳资纠纷，派出特派员调查是否需要帮助。他的任务不在于表态赞助其中的一方，而是通过听取双方意见，进行调查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向争议双方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该局还积极从事预防性和创造性的调解活动，这包括在劳工合同协定有效期间同劳资双方进行磋商，以帮助改善关系，为合同的最后顺利延期做好准备工作。该局由总统任命的局长领导。有大约265名经验丰富的负责调解的特派员，他们在7个地区处和分设在主要工业中心的75个以上的地方办事处工作。这些特派员中劳工组织、资方以及专业和政府工作等三种经历的人员各占1／3。他们全都宣誓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坚持完全中立的态度。

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美国联邦政府独立机构。1914年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建立。是一个准司法性和准立法性的管理机构。其任务是调查与反托拉斯法有关的经济活动，规定禁止不公正竞争和禁止垄断的具体条例，防止不公平的竞争方法以及商业方面的不公平的、欺骗性的行为或做法。该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他们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任期七年。根据组织法，其中同一政党的党员不得超过三人。其中一人由总统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负责该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址在华盛顿。建立该委员会是因为国会担心，单靠向联邦法院检举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合并是不足以保持自由经济的。该委员会负责把那些可能影响或妨碍竞争的商业作风消灭在萌芽状况，负责检举违反克莱顿法的歧视做法，并同司法部一起检举非法的兼并和接办行为。近来，越来越重要的是，该委员会承担了保护美国消费者的任务，使其不受包括广告宣传在内的各种欺骗性行为的损害。该委员会还负责禁止在各州之间运销易燃纺织品，使赊销人公布真实的赊销——利息帐，并管理消费品的包装和贴标，以防止消费者受骗，便于他们进行价值比较。该委员会根据它所执行的各项法律、通过规章制度和合作的传统做法，向工商企业提供有关合法经营的权威性指导。在其经济报告工作方面，负责收集和分析有关营业的竞争情况的真实资料，并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国会、总统和公众。该委员会近年来经济方面的出版物举例如下：《在食品和汽油零售中利用各种机会的策略》（1968年）、《汽车保单》（1968年）、《共同合并》（1969年）。该委员会还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共同出版《制造业公司财务报告季刊》，该杂志根据行业和资产情况提供包括所有企业的美国制造业公司的损益计算书和资产负债表。它的《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汇报它在前一财政年度所取得的成绩，略述它所依据的各项法令，应该履行的职责，登载有关该委员会的法律原文或有关部分，详细介绍该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并列举自1915年以来它所作的各种调查和提出的各项报告。

提示（Presentation） 提示是指票据持票人向付款人出示票据，请求付款人进行承兑或付款的行为。即提示是指持票人向付款人收取到期票据的款项或要求付款人承兑远期票据而向付款人提交票据的行为。因此，提示可以分为付款提示和承兑提示两种。

提单（Bill of Lading） 所谓提单，是货物承运人在接管货物或把货物装上船舶之后签发给托运人，证明双方已然订立运输合同，并保证在目的港按照提单所载明的条款交付货物的一种书面凭证。

提单在内容上并无统一格式，它是由各个轮船公司自己制订的，通常是采用班轮运输方式时，班轮运输合同签订后承运人签发提单，作为运输合同的证明，无论是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还是提单受让人和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划分，均应以提单为准。虽然提单并无统一格式，但提单通常是一页纸，包括正反两面，提单的正面主要记载下列内容：（1）托运人名称；（2）收货人名称；（3）承运人名称；（4）船名和船舶的国籍；（5）装运港、目的港的名称及运输航线；（6）货物名称、件数，重量、包装，标志等等情况；（7）运费和应付给承运人的其它费用；（8）提单签发的日期、地点和份数；（9）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的签字。在上述项目中，前六项应由托运人自行填写，这就要求托运人对其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果由于托运人填写不清或故意隐瞒事实，以致引起损害或灭失要由托运人自己负责。提单的背面主要包括一系列的运输条款，具体规定了托运人和

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划分。目前多数国家的航运公司制定的提单，在确定托运人和承运人在提单运款项下所应承担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问题上，均依据1924年国际法协会制定的《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海牙规则是国际海运方面最为重要的国际公约。依据海牙规则，承运人的责任期限是从货物装上船之时开始直至货物卸离船舶之时为止。这一责任期限在《海牙规则》之后的《汉堡规则》里扩展为自收到货物时开始直至交付货物时为止，包括货物在装货港、运输途中和目的港由承运人照管之下的全部时间。在承运人的责任限期期间内，承运人对货物负有装货管理堆放、承运、保管和卸货的责任。装货责任是指承运人的货物由吊车吊起时开始，对货物的安全负责。一旦货物吊起后发生事故损失，责任由承运人承担。管理责任是指货物在运入仓内之后，承运人应当按照货物的种类、性质等进行管理，以便预防货物在航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坏或变质。堆放责任是指货物在装上船之后必须进行适当的堆放，货物的性质不同，堆放的方法也就不同，如果由于堆放不当而引起的货物损失责任由船方承担。运送责任是指在货物堆放妥当之后，海上航行开始，船方承担起运送货物的责任。在正常航行的情况下，船方应当尽快地安全地把货物开往目的港完成交货义务，相应地也就不应当发生延迟开航或绕道航行的情况，若无故发生延迟开航，绕道航行等行为，货物受到损失，不管这种损失是否是由于上述行为造成的，船方都要负赔偿责任，除非船方能够证明即使不绕航货物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船方才可以免除责任。另一方面，承运人运送货物的责任还包括在船行途中，如遇意外情况，船方还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船方所采取的措施没有针对所面临的情况，由此造成的船货损失，应由船方负责。承运人的卸货责任是指船舶到达目的港卸货，承运人的责任自货物离开吊钩时为止。这就要求承运人谨慎卸货，若发生卸货不当引起货物受损，承运人负赔偿责任。《海牙规则》除规定了承运人的基本义务，还规定了承运人的负责权利，在下述情况下，承运人对于货物的损失有权免除责任。（1）海上或其它通航水域属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货物损失；（2）由于承运人无法控制或无法合理预见的意外事故，如战争，公敌行为，罢工，停工，暴动、骚乱，港口的检疫限制力；（3）非由承运人过失或实际参预的船舶、货物发生火灾现象，如果火灾是由于船舶不适航引起的，承运人也不能免责，除非承运人已尽到填谨处理的责任使船舶适航。（4）由于船长、船员、领航员或其它人员在驾驶和管理船舶中的行为疏忽或过失。（5）属于托运人或货主的行为过失造成的损失；（6）由于货物的自然特性或潜在缺陷引起的货物损害或灭失；（7）属于船方克尽职责仍不能发现的潜在缺陷，一般是指船舶的潜在缺陷而言。

上面我们涉及的是提单的基本内容，依据《海牙规则》，承运人可以放弃各项免费条款的权利，或加重自己对货物所负义务，但承运人所签发的提单却不能任意地扩大托运人的责任或减轻其根据《海牙规则》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在国际贸易中，提单作为装运单据，所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可以从两方面看出。

（1）提单是海上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据。在货物装船之前，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就已经订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这一运输合同是在托运人采用班轮形式运货，与承运人洽订舱位的时候成立的；而在货物装船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才向托运人签发提单，详细重申运输合同的各项条款，并由承运人单方面签署，因此，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据，而不是运输合同本身。因此，当提单条款与运输合同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运输合同为准来改变提单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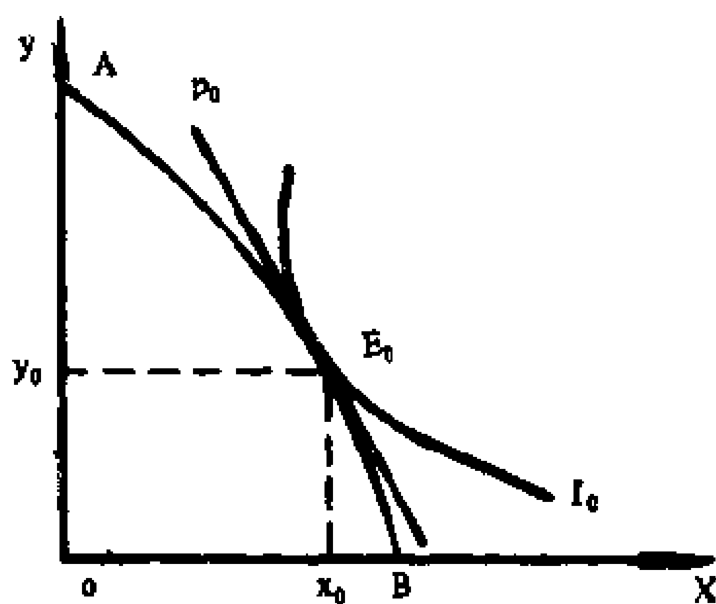
（2）提单是承运人与提单受让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托运人收到提单后，将提单通过背书转给收货人或其它受让人，提单的受让人则取得了提单所代表的权利和义务，提单成为承运人与提单受让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承运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应以提单的规定为依据。

（3）提单是承运人对货物的收据。提单具有收据的作用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提单对于托运人来说是承运人已按提单所记载的内容收到货物的初步证据；另一方面提单对于提单受让人来说是承运人收到货物的终结性证据，对于提单上所记载的有关货物的情况，承运人对受让人不得否认其正确，承运人有责任按照提单所载明的货物状况向收货人交货。

（4）提单是货物所有权的凭证。提单是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凭证，是货物的象征，占有提单，也就意味着占有货物，通过背书转让提单，也就意味着转让货物。由于提单具有物权凭证的性质，使得卖方不同实际提交货物，就可以通过背书转让提单而转让货物所有权而得到货款，也使得买方作为提单受让人，通过处分提单而处分提单项下的货物，而不得等到货物实际到达目的地。另一方面，提单作为物权凭证，还使得提单持有人有权要求承运人交付提单项下的货物，而不问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来源是否正当。

提供曲线 （Offer curve） 又可以称为供应条件曲线，或相互需求曲线（reciprocal demand curve），或贸易曲线（trading curve）。提供曲线是英国经济

学家马歇尔（A·Marshall）在其《对外贸易纯理论》（Pure Theovy of Foreign Trade）一文中最早提出的，而其思想渊源来自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nh Mill），穆勒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认为供给和需求是相互需求的同义语，价值自身调整以达到供求平衡无异于说价值自身调整使一方需求与对方需求相平衡。穆勒自己提出了相互需求理论，并用低级的算术工具分析了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的确立问题，而马歇尔则沿着这一思路和基础，以供求论和几何分析工具提出了提供曲线的概念，以后又经过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Leontieff）、勒纳（A·Lerner）、米德（J·Meade）等人的发展和改进，最终确立了提供曲线的分析方法，现今，提供曲线已广泛用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问题，也成为新古典学派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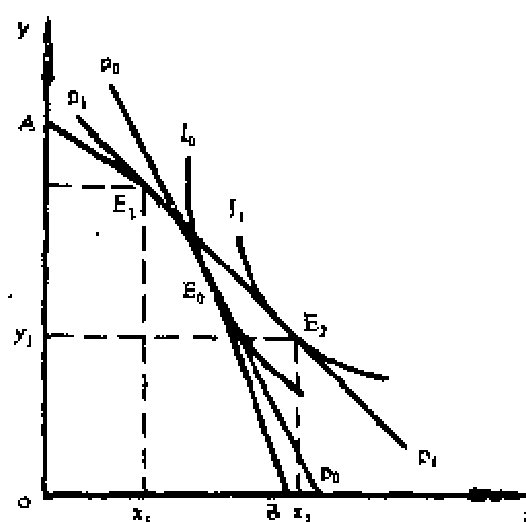
图(1)

1.提供曲线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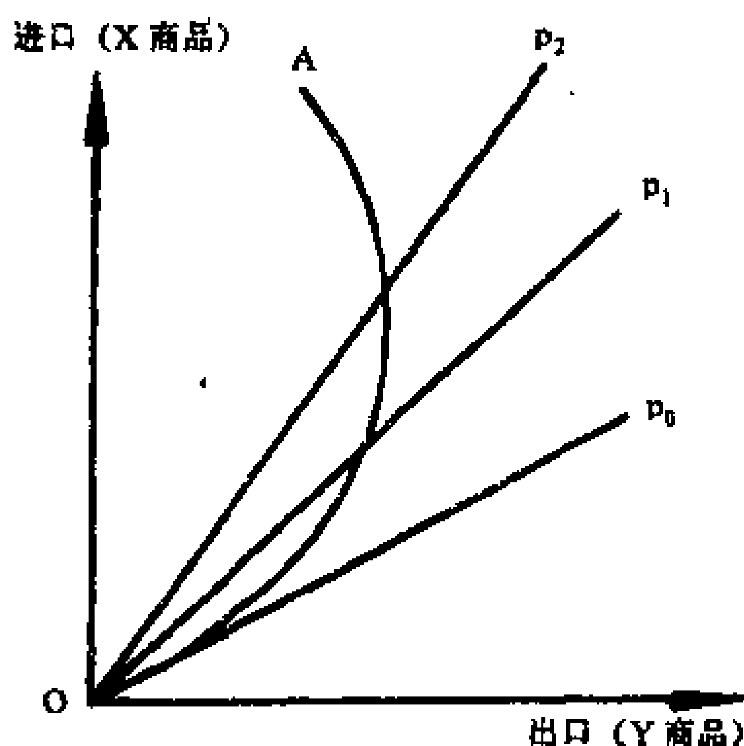
以简单的物物交换模型为例。

（1）设有甲、乙两国，同时生产两种商品X和Y，在国际贸易开始之前，甲国国内生产和消费状况如图（1）所示：图（1）中横轴与纵轴分别代表甲国X及Y商品的产量和消费量。AB曲线为甲国的生产可能性线；I_0为甲国国民的无差异曲线，其中生产可能性线AB与无差异曲线I_0相切于E_0点，形成了在现有资源水平下，甲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P_0线为与均衡点E_0相适应的甲国国内市场上商品X与Y均衡的交换比率线。

（2）设现今甲国进入国际市场，开始与它国进行贸易。从图（1）中可能看出，甲国在Y商品的生产上劳动生产率高于X商品生产，因此，依照比较利益的原则，甲国贸易形态为：以在甲国较为便宜的Y商品的出口换取较为昂贵的X商品的进口。而甲国进出口量的多少则取决于国际市场上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甲国将随着国际市场上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其进出口数量，这一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与图（1）相对应，图（2）中AB线为甲国的生产可能性线，I_0线为与AB线相切的甲国国民消费无差异曲线，切点为E_0，代表了均衡的生产和消费状况，P_0线为与E_0相适应的甲国国内市场上X与Y商品均衡的交换比率线，其斜率为$dy/dx=P_x/P_y$，（P_x、P_y分别为X与Y商品的价格）。



图(3)

在国际市场上，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若低于甲国国内两种商品的均衡交换比率，甲国就不会参加国际贸易，以甲国国内均衡交换比率为基本比率，在国际市场上，随着Y商品价格的提高，甲国将愿以更多的Y商品的出口换取等值的X商品的进口，这一过程在图（2）表现为在P_1线所代表的新的均衡交换比率下，甲国的最佳生产点为E_1，而其最佳消费点却为E_2，其中甲国愿意以y_1y_2数量的Y商品出口换取x_1x_2数量的X商品的进口，满足其国内需求。

（3）在国际市场上，不同的均衡贸易条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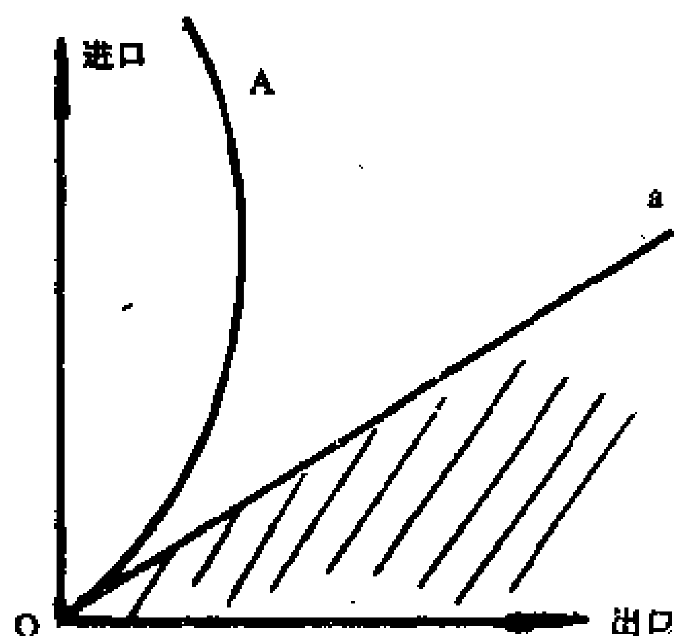
甲国所意愿出口的 Y 商品和意愿进口的 X 商品的数量结合起来所形成的轨迹就构成了甲国的提供曲线，如图（3）所示：在图（3）中，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甲国的出口量和进口量，而曲线 OA 即为甲国的提供曲线。

因此，所谓提供曲线，就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曲线，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各种可能的贸易条件下，所愿意出口的商品与所愿意进口的商品的数量组合轨迹。曲线上任一点与原点相联所形成的射线的斜率，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

2.提供曲线的性质：

（1）提供曲线是供求合一曲线，曲线上的任一点既代表了此国在一定的贸易条件下，所愿意提供的出口产品的数量，即供给曲线，也代表了在这一贸易条件下，此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量，即需求曲线。作为供给曲线，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与出口量成正向变动，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出口量也随这增加；作为需求曲线，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与进口量成反向变动，随着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进口量随之减少。

（2）作为一国提供曲线，以本国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交换比率为其所有可能的贸易条件的最下限，如图(4)



图（4）

OA 为一国的提供曲线，oa 为此国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交换比率线，提供曲线 OA 必然位于 oa 线以上，而 oa 线与横轴所夹的面积则是此国无意参加国际贸易的区域。进一步，从原点 O 沿着提供曲线移动，则表明了一国每多出口一单位商品，所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逐渐增多。这意味着一圖提供曲线上的点离原点越远，国际贸易条件对此国愈加有利，此情形一直持续到作为出口商品，由于大量出口，在本国已处于十分稀缺的地位，既使贸易条件对此国非常有利，此国也不愿再增加出口，而相反，却愿意减少出口，这在此国的提供曲线上表现为在某一贸易条件之上，提供曲线向后弯曲。

（3）一国的提供曲线可以有不同的形状。透过提供曲线的弹性，进口需求弹性和出口供给弹性，可以表明一国提供曲线的形状。

设一国出口商品为 X，进口商品为 Y，则其提供曲线的弹性：

$$\pi=\frac{进口变动百分比}{出口变动百分比}=\frac{dY/Y}{dX/X}=\frac{dy}{dx}\cdot\frac{X}{Y}$$

则其进口需求弹性 α 和出口供给弹性 β 分别为：

$$\alpha=\frac{进口变动百分比}{进口相对价格变动百分比}$$

$$\frac{P_y/P_x=\frac{x}{y}}{dy/y}\,d(x/y)/(x/y)$$

$$\beta=\frac{出口变动百分比}{出口相对价格变动百分比}$$

$$\frac{P_x/P_y=\frac{y}{x}}{dx/x}\,d(y/x)/(y/x)$$

其间关系可由表(1)表示：

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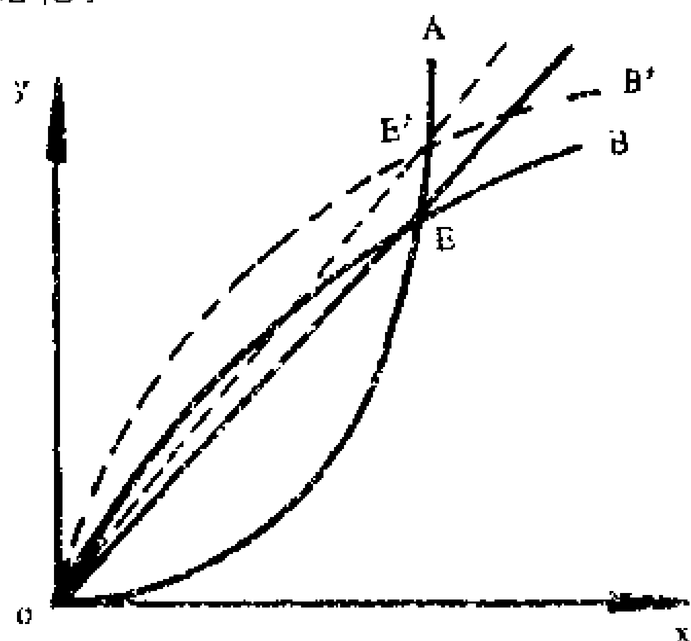
提供曲线弹性	进口需求弹性	出口供给弹性	提供曲线形状
$\lambda=1$	$\lvert\alpha\rvert\to\infty$	$\beta\to\infty$	通过原点的任意射线
$\lambda>1$	$\lvert\alpha\rvert>1$	$\beta>0$	曲线向上倾斜
$\lambda\to\infty$	$\lvert\alpha\rvert=1$	$\beta=0$	垂直线
$\lambda<0$	$1>\lvert\alpha\rvert>0$	$\beta<0$	曲线向后变曲

3.均衡贸易条件的决定和变动：

提供曲线的分析方法可以广泛地用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府问题。这里特别指出以提供曲线说明国际市场上，均衡贸易条件的决定和变动。如图（5）所示：设世界上只有 A、B 两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A 国出口 X 商品，而进口 Y 商品；B 国出口 Y 商品，而进口 X 商品，则可以得出两国的提供曲线，其中 A 国为 OA 线，B 国为 OB 线，那么，OA、OB 两线的交点 E 则为贸易均衡点，连接 O、E 两点所形成的直线 OE 的斜率即为均衡的国际贸易条件，在这一贸易条件下，A 国所愿意出口的 X 商品的数量正好等于 B 国所愿意进口的 X 商品的数量，而 A 国所愿意进口的 Y 商品的数量正好等于 B 国所愿意出口的 Y 商品的数量，另一方面，A 国所愿意出口的 X 商品量正好换回其愿意进口的 Y 商品量、B 国所愿意出口的 Y 商品量正好换回其愿意进口的 X 商品量。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如相互要求的变化，使得提供曲线发生了位移，如 B 国提供曲线由 OB 移至 OB'，则 B 国新的提供曲线 OB'与 OA 交于 E'，E'点

即为新的贸易均衡点，而OE'线的斜率则为新的国际贸易均衡条件。均衡的贸易条件由OE变为OE'，在这一过程中，A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而B国贸易条件恶化了。



图（5）

雅温得协定 (Yaounde Convention) 雅温得协定又称雅温得联系国协定，它是指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63年7月20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与18个非洲国家和7个海外领地签订的经济贸易协定。这18个非洲国家是：喀麦隆、多哥、贝宁、尼日尔、马达加斯加、布基纳米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马里、毛里塔尼亚、扎伊尔、卢旺达、刚果、加蓬、塞内加尔、索马里、布隆迪。该协定规定这些非洲国家作为欧共体的联系国，它们可以享受欧共体提供的贸易优惠待遇和经济援助，同时必须分期削减以至完全取消从欧共体进口商品的关税和数量限制，并保证欧共体成员国在联系国投资的安全和利润自由汇回本国。该协定从1964年6月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1969年5月底到期后，同年7月又续订了第二个雅温得协定，其内容和第一个雅温得协定基本相同，它的有效期也是5年，从1971年1月1日到1975年1月31日。第二个雅温得协定到期后未再续订，而是被一个包括的范围更广的新协定——洛美协定所取代。总的来说，雅温得协定有助于这些非洲国家发展出口贸易，尤其是推动咖啡、可可、香蕉、热带木材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但是由于该协定带有互惠性质。事实上欧共体成员国是该协定的主要受惠国，该协定有助于欧共体成员国保持和加强对这些非洲国家的控制。

黑市汇率 (Black Market Rate) 在外汇黑市上买卖外汇的汇率。外汇短缺的国家多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外汇收入者绝大多数需将外汇交售国家指定机构，外汇需求者须向指定机构购买外汇，一切外汇交易由国家垄断并一律按官方汇率进行。由于外汇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受高额利润引诱，某些外汇持有者便以远远高于官方汇率的汇率在外汇黑市上卖出，某些外汇需求者在不能按官定汇率获得足够外汇时便在黑市上买进，形成了买卖外汇的黑市汇率。

黑市 (Black Market) 黑市是指在通常由政府确定价格最高水平或最低水平的地方所建立的任何非法市场。黑市有时又称地下市场。在黑市上的交易是政府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黑市交易所得的收入通常是逃避政府税收的，黑市的成交价格一般高于已确定的最高价格，有时这一成交价格高出正常的已确定价格的幅度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达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黑市通常产生于实行配给或发生象战争这种全国危机的时候，因为在实行配给的经济中，某些商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供求缺口较大，在正常的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由国家制定，低于供求平衡的价格，因此出现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地下市场，在这种市场上，人们可以买到公开市场上短缺的商品，但是在黑市上，商品的价格高于国家公开市场上的价格。在战争期间，也会由于经济不稳定，生产停滞而造成某些生活必需品的紧缺，从而产生黑市交易。

黑市这一词也常常同走私品联系在一起，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当国内某些商品出现严重短缺后，从国外走私便宜的商品在国内黑市上出售，变得十分有利可图。因此在黑市上，走私品的价格反而会比公开市场上同种商品的价格便宜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走私品偷漏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走私品在国外比国内公开市场上的价格低得多。近些年走私品交易在不发达国家中也渐趋严重。

在黑市中也出售法律所不允许出售的商品或称非法商品（如大麻、海洛因等），这类商品有社会危害性，是国家强行禁止出售的。因此这类商品只能在黑市上秘密的进行交易。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淫污物品、卖淫等活动。

黑市交易中取得的收入称为黑色收入或地下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黑色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由于黑色收入逃避税收部门的检查，因此偷漏税的数额是十分巨大的，每年国家财政在这方面的损失也是不可低估的。各国一般都有自己的一些措施和系统来打击黑市交易。

属地主义原则 (Territorialism Principle) 又称领土原则、地域原则等，是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的一项基本原则。从税收角度而言，它要求一国政府以地域作为行使其税收管辖权的范围，即只对其领土疆域内发生的经济活动及其收入行使课税权力而不管从事

经济活动的纳税人是否为本国居民或公民。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对外国居民或公民在本国从事的经济活动及其收入与财产可以行使税收管辖权；另一方面，对本国居民或公民在税境外从事的经济活动及其取得的收入与财产不能行使税收管辖权。

属地原则是广为各主权国家采纳的一项原则，甚至因其合理相方便而被认为是一条最好、最合适的原则。但它却并不是唯一被广为采纳的原则，各国同时还广为采纳另一原则：属人主义原则。

属人主义原则（Personalism Principle） 这也是主权国家行使其管辖权的一项基本原则。从税收角度而言，它要求一国政府对其管辖权下的任何人员行使课税的权力，而不管这些人员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收入与财产是发生在境内还是境外。

这一原则也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属人主义原则可以被理解为国籍原则，即，国家有权拥有本国国籍的公民的来自全世界范围的所得和财产均有课税权。另一方面，属人主义原则也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永久住所或营业地原则。这是由于一国政府管辖下的人员往往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是包括很多非公民但在本国拥有习惯性居所或永久性居所并且从事经济活动及获取收入与财产。对这类人员在境内取得的收入和财产，该国政府拥有税收管辖权。

一国公民或居民对国家克尽纳税义务符合有关纳税的古老的受益原则，因而也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实施。

富兰克林，本杰明（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波士顿。早年当过工人和新闻记者，后长期担任公职，还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曾写过一些经济学著作，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9年）所表述的劳动价值论观点。他明确指出，一切东西的价值可以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而贸易不过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这样，他在美国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尽管他讲的劳动实际上只是具体劳动。不过，富兰克林上述包含科学因素的分析，并未对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

傅立叶，沙利（Charles Fourier，1772—1837） 19世纪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在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因父母的安排开始学习经商。1792年他接受父亲的一部分遗产，准备在里昂独立经商。1793年，由于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发生战斗，致使傅立叶几次被捕，差点丧失性命，并损失了全部财产。此后他担任过会计、出纳、推销员和经纪人等许多商业职务直至晚年退休，对资本主义商人的黑暗内幕有着极深切的体会。他的学说主要是利用了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创立的。

傅立叶的主要著作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论家务农业协作》（1822年）、《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927年）和《伪实业》（1835—1836年）等。

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把以情欲论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作为出发点的。他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上帝为人类社会所制定的各种规律；要发现这种规律性，就必须研究人的情欲，即人的自然本性。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一切对情欲的压抑，而将来的理想社会则在于能够使人们的情欲得到充分满足和全体人民团结协调。正是这种唯心主义的人性论，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和宣扬理想社会的理论根据。据此，他坚持人类社会具有规律性的思想，将它划分为若干阶段和时期，并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上升时期与下降时期。同时他在划分历史时期时，也考虑到经济发展和一定生产特征的作用。这些都是具有辩证法或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的。

傅立叶的突出优点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而精彩的批判。他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产生一切灾祸的主要原因，造成全社会人与人处于对立和斗争的状态，商业活动充满着欺骗和罪恶，同时该社会有2/3的人从事非生产劳动，他们都是靠少数生产劳动者供养的寄生虫。他还批判资产阶级鼓吹天赋人权，却对最主要的天赋人权—劳动权无法予以保障，指出雇佣工人的体力和精神受到企业家严重的摧残，并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境遇日益贫困恶化。他还指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又愤怒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压迫妇女，认为妇女只有在新社会才能得到解放和占据应有的社会地位。傅立叶虽然尖锐抨击了资本主义，但并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无法揭露这些弊端的根源。

傅立叶所设想的"和谐社会"的基层组织，是一种叫"法郎吉"的生产—消费协作社。其资金采取招股办法加以募集，向投资者支付优厚的利息便可实现这个目标。作为集体的生产组织和生活组织，法郎吉应保证人人都参加劳动，且将劳动与个人爱好相结合，使得大家获得全面发展。而分配则以各人的劳动、资本和才能按比例进行，有利于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和建立成员间的友谊。法郎吉的生产以农业为主，兼营工业，实现工农业和城乡的结合。法郎吉还十分重视妇女的解放和儿童教育，并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步骤。总之，在傅立叶看来，这是一个和谐协调、充满幸福的

社会。傅立叶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有着不少可取之处，但是他仍然主张保留私有制和剥削收入，允许存在阶级差别，甚至幻想通过宣扬和说服工作，让统治者和资本家支持新社会制度的实施。这明显反映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和最根本的缺陷。

博弈论、在经济中的运用(Game Theory,Economic Application) 博弈论是对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存在利益冲突的人这样的环境中的决策原理进行的数学分析。它的中心问题正如由冯·诺意曼（von Neumann）在1928年提出的那样：存在几个博弈者$s_1,s_2\cdots s_n$，他们进行给定的策略博弈，那么每一个参与者在获得最大好处，他如何进行这样博弈？冯·诺意曼认为策略博弈包括一系列事件，每个事件具有有限数量的不同结果，一些事件的结果由机会来决定，而另外事件的结果则由博弈者的自由决策决定。对每一个事件，博弈者将要进行决策，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决策之前的早期事件的结果，这些都是已知的；当所有事件的结果已知时，各个博弈者之间必然发生的支付可以根据一种固定法则计算出来。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博弈，它涉及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绝对的自私如何在给定的外部环境之下表现出来。冯·诺意曼1928年的论述得到摩根斯特恩（O·Morgenstern）的赞同，二人合作于1944年发表了经典性的论文：《博弈与经济行为理论》，对经济中的博弈行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直到50年代后半期，对博弈论的发展与拓展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由数学家做出的。6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博弈论中对市场结构和竞争的论述产生兴趣，70年代晚期，博弈论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为活跃和最受亲昧的领域之一。但要把博弈论用于实际生活中存在很大困难，一些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探讨。约翰森（L·Johamsen）在1977年建立了他的经济模型，包括他所称的中心权力和许多更大的非中心的决策者，他们的偏好之间以及与中心权力之间存在冲突。这些更大的非中心的决策者深知他们的相互依存性，从而可以看成是从事精细的策略博弈。经济学中对博弈论的一重要的运用领域就是核理论（core theory），泰塞（L·G·Telser）在这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工作。他在1978年的著作中，运用核理论分析外部性，公共产品和白搭车问题以及对自然垄断充分条件的特定化，对存货和价格分析的研究等。他还表明核是空的、也就是说没有竞争均衡存在。在他早期的文章中，他运用核理论于古诺—纳什(Cournot Nash)的双头垄断模型中并澄清了主导竞争的共谋的条件。哈萨尼（J·c·Harsanyi）指出博弈论直到那时还不能广泛地运用于社会行为科学，主要是因为冯·诺意曼和摩根斯特恩的方法不能产生两人，非零和博弈或几个人博弈中的确定解，并提出博弈状况中的理性行为的一般理论，解决了上述问题。哈萨尼对许多博弈论模型进行重新阐述，大大方便了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几个人博弈的核理论中，随着几变得相当大的时候，就导致了一种对一般均衡理论的重新表述，奥曼（V·Aumann）、德布鲁（G·Debreu）、维思德（K·Vind）、希尔顿布兰德（W·Hildenbrand）是这一发现的主要贡献者。纯粹交易经济的核是所有资源的配置的集合，这些配置不能超过家户最初拥有的资源禀赋，且不能由任何家户间的结合来加以改进。核中的任何配置都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一种办法能使任何一个家户变得更好。

奥地利学派 (The Austrian School) 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在奥地利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流派。由于其代表人物先后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又称维也纳学派。它的创始人是门格尔，其他代表人物有庞巴维克和维舍尔等。该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即主张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量，所谓边际效用就是满足消费者最后的即最小的欲望那一单位商品的效用。它的分配理论主要是维舍尔所系统阐发的归算论，而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则是该学派特有的利润论。奥地利学派推崇抽象演绎法，为此曾同历史学派开展“方法论争”，但其方法论最显著的特点还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完全仰赖心理分析方法，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只是归结为欲望及其满足，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这类心理规律。特别是，它提倡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研究的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罗宾逊式消费者的心理状态。这些都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纯然成为一种关于反历史反社会的主观心理评估的分析研究。在经济学史上，奥地利学派还是公开反对和敌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者之一，这充分反映出它的阶级实质和某些代表人物的反动面目。

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米塞斯、哈伯勒和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承袭和发展了这种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他们绝对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进一步把经济学解释为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通论即人类行为学，还对研究宏观经济总量问题表示怀疑，他们积极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并进而攻击和诋毁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据此，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新奥地利学派”。

总的看来，奥地利学派作为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流派，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所宣扬的诸如

边际效用原理、心理分析法一类理论和方法，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必须指出，该学派的理论体系并不完整全面，主要涉及消费者行为和市场价格决定等问题，很少有真正阐明供给和成本问题的理论内容，且因过于仰赖心理分析而有颇多的理论谬误或缺陷。因此，过份看重奥地利学派对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和所谓贡献，也是不恰当的。

奥国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 即奥地利学派（参见奥地利学派条）。

奥肯定理（Okun's Law） 说明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经验统计规律，由美国经济学家A·奥肯（A.Okun）提出，故名。奥肯根据1947年第2季度到1960年第4季度共55个季度的资料来估算失业给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所带来的损失，其公式为：

$$G = -a(u - \overline{u})$$

在上式中，G为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U为实际失业率，u为自然失业率，a为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不一致时所引起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的系数。据奥肯估算a为3。这就是说，当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时，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失业率成反方向变动（a前负号的含义），实际失业率每增加百分之一，则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百分之一，反之，亦反之。奥肯定理是一个根据统计资料而得出的经验规律，它主要是要说明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是反方向变动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1∶3是60年代以前的情况，在70年代这一比率是1∶2.5—2.7之间，在80年代这一比率是1∶2.5—2.9之间。此外，奥肯定理主要适用于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在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自然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这一关系就要弱得多，一般估算为1∶076左右。

琼斯，理查德（R:chard Jcnes ,1790—1855） 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之一。出生于英格兰滕布里奇韦尔斯的一个著名律师家庭，1819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833年起担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经济学教授，1835年转任东印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其逝世。主要著作有：《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源泉》（1831年）、《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大纲》（1833年）和《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等。琼斯对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最主要在于他对各个经济范畴的考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注重不同经济关系的对比研究。他十分重视经济结构分析，并着重考察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及其产品分配方式，认为土地所有权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向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其变动原因即在于所有制形式及其分配方式的改变。同样，他对劳动和资本的阐述也突出了它们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把劳动的本质还原为资本主义劳动和非资本主义劳动，强调资本的根本特征是积蓄起来的用于获取利润的财富。按照他的历史观，琼斯明确否定那种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的自然关系的传统看法，并直接声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由于上述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琼斯被有些西方学者称誉为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先驱者。作为李嘉图的追随者，他也把分配问题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论题，还对地租和劳动基金作了颇具特色的阐发。他认为，地租的最初源泉是投于土地的劳动的剩余产品，资本主义地租则是剩余劳动扣除资本家所得的平均利润之后的余额。他又论述了级差地租增长的三个规律，还反驳了农业生产率递减理论。这些都推进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把劳动基金解释为“劳动者所消费的收入总量”，认为它们的不同形式是分析各种经济结构的关键环节，从他将劳动基金分为三类及其阐述来看，实际上区分了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生产方式以及分配形式。换言之，琼斯的分配理论同样贯串着他的历史观和经济结构分析。

舒尔茨，亨利（Henry Schultz,1893—1938） 美国经济计量学家。出生于波兰，曾到英国留学，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旋即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1938年因车祸而丧生。舒尔茨因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函数进行统计测定而闻名。他在《需求的理论与测定》（1938年）一书里，曾对砂糖、玉米、棉花等许多种消费品的需求进行测定，并对多种相对应的商品（如牛肉、猪肉与羊肉等）进行需求相关性的计量。其对经济计量学的重大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往测定需求只考察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其需求量相关的马歇尔式做法，而从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同时探讨关于多种商品需求函数的经济计量方法，并进而作具体的统计测定。后来，约·斯通就是受到这种方法论及其实际计量技术的深刻启示，大大推进了经济计量学的发展。

十 三 画

魁奈，弗朗斯瓦（Francois Quesnay，1694～1774） 18世纪后半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巴黎附近的一个地方家庭。16岁开始学医，后来发表过有关医学和生物学的著述，并成为名医。1749年被聘为路易十五的御医，1752年因治愈王子疾病而被封为贵族。在凡尔赛宫生活期间，他经常同社会名流、著名学者集会交往，从而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具有广博的见识。鉴于当时法国社会陷于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人们普遍关注经济问题，魁奈也在60岁左右时开始研究经济学。1756—1757年，他先后为《百科全书》撰写过论述租地农场主、谷物、人口和赋税问题的四篇文章，175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终于创立了重农主义的各项基本理论。魁奈以后发表的不少经济著作都只是对《经济表》的阐释、补充和应用。由于魁奈的不少追随者拥护和赞同他的学说，经常聚会研讨，并出版著作和刊物加以宣扬，遂形成一个学派，魁奈自然成为该学派（即重农学派）的领袖。

"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其他重要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所谓"纯产品"是指农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耗费后的余额。在他看来，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它才能增加物质财富，而工业只是改变农产品原料的物质形式，并没有生产出新的物质财富。所以纯产品完全是由农业部分生产的。魁奈能够完全从生产领域来考察纯产品的源泉问题，这无疑作出了科学的功绩。但他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工业也创造纯产品即剩余价值，则是其缺乏劳动价值理论因而只从使用价值角度研究纯产品的必然结果。它是魁奈学说体系的一个突出缺陷。

魁奈以纯产品为衡量尺度，论述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把当时的法国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生产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是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仆从，还有国王、官吏和教会等，这是以地租形态占有纯产品的阶级；不生产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他们是不结果实即不生产纯产品的阶级。魁奈最早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作了经济分析，且有其一定的理论根据和社会背景，但因为未能正确地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结果就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矛盾。

魁奈从再生产的角度出发，还把农业资本划分为两部分：一叫"年预付"，即年经营的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农业工人的工资；一叫"原预付"，即耕畜、农具和房屋一类的长期投资。他指出，前者全部算入生产费用，由每年生产物给予补偿，后者只部分地算入生产费用，其补偿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这里实际上是作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

在上述诸种理论的基础上，魁奈用《经济表》深入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及其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流通和分配。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了系统深刻的分析，闪烁出天才的思想光辉，是个极其卓越的理论贡献。

必须指出，魁奈的经济学说具有浓烈的封建外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存在着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前者是上帝为人类幸福而安排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者是各国统治者制定和推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它是根据人们意志制定的。当后者与前者协调一致时，社会就健康发展，否则社会就处于生病状态，还要产生种种弊端。这种自然秩序实际上是保障私有制和实现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秩序，却偏偏要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而且还需"开明君主"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使人为秩序适应自然秩序。这样，反映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魁奈学说，就披上了一件封建的外衣。

基于他的基本经济理论，魁奈还阐述了其资产阶级性质鲜明的经济纲领，如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实行地租单一税（即一切赋税均由土地所有者负担），提倡自由贸易和极力维护私有制等。总之，魁奈的理论和纲领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和要求，也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经济纲领的不少内容在杜尔哥执掌行政大权时，甚至还被直接推行过。

新工业国（New Industrial Country） 美国经济学家J·加尔布雷斯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一书中所提出的一概念，包括了对美国当代社会特征的分析。加尔布雷斯认为，当今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同于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新工业国。其特征首先在于权力的转移。权力归于哪个阶级，取决于哪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封建社会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权力在地主阶级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

要素，所以权力在资本家阶级手中。现在由于技术发展，技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权力就转移到了拥有技术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 手中，这些人包括在大公司中掌权的高级经理与技术人员。随着权力转移，新工业国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公司目标的变化，即公司新目标的形成。这就是说，掌权的技术结构阶层不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他们追求适度的利润，但主要的目标是稳定、增长与技术兴趣。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技术结构阶层就要增加积累，以摆脱银行对工业的控制。而且，随着权力的转移，公司内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最忠于公司的是技术结构阶层，其次是工人，股东（即资本家）是最不关心公司的。由于技术结构阶层追求稳定与增长，生产者主权就取代了消费者主权。消费者主权是生产者生产什么由市场上消费者的货币投票决定。生产者主权则是生产者根据自己的需要生产产品，并通过广告宣传等方法强迫消费者接受。这样，在大公司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市场调节就让位于大公司的计划原则。在公司内，工人的地位得到改善，工会的作用削弱了，在社会上由于技术结构阶层的超党派性，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司在专门技术人材供给、总需求的调节、工资和价格的稳定、重大技术的投资和产品的销售方面更加依靠国家。在这样的新工业国中，社会的冲突不再是穷人和富人的冲突，而是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的冲突。此外，由技术结构阶层掌权的"成熟的公司"所组成的新工业国也会产生官僚主义，形成对个人自由、独立和幸福的威胁。公司的目标被冒充为公共目标，一切为了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弊病。因此，还必须对新工业国进行"社会革新"，而这种革新的力量则是培养技术结构阶层的科学教育界。与此相应，经济学也应该变革，不要把"经济增长第一"作为一种信念，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社会革新"上。新工业国体现了加尔布雷斯作为一名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的特点，在加尔布雷斯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Neoclassical Regional Growth Models） 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是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增长理论来研究区域增长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早期的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纯以供给为出发点，把区域看作是一个总生产单元。认为通过要素市场的正常作用，可以实现收入和就业均衡。而不平衡仅是对均衡的短期背离，反映了市场对均衡调整的滞后和自身的不完善。实际上这只是把国家增长理论简单地移植到区域里面。60年代以后，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开始把需求、规模报酬递增、新技术、聚集经济以及支持投资的公共部门的影响等因素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使其解释力和预测力大大提高。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的早期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不变，市场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区域长期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个要素的区内供给率差异和区际流动的结果。由于假定随着区域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也提高，而边际资本生产率则降低。因此，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呈相反趋势，即劳动力由低工资区流向高工资区，而资本则由高工资区流向低工资区。这样低工资区因资本生产率增长最快，工人人均产出率也提高。其结果，区际差异将缩小，也就是说区域将趋于均衡增长。随着现代经济理论的日益完善，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也不断吸收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分析手段。对早期理论中忽视需求因素，规模报酬递增、聚集经济等的缺陷，也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H·W·理查森提出的一个融合空间维的区域增长理论模型，用数学方法表示就是：

$$Y=[ak+(1-a)l]^{z}+t$$

其中α表示规模报酬，资本增长率（K）为聚集经济（A）。区域收入增长率（Y）。区域资本存量（K。该区Z个城市中心每一单位面积资本存量之变异系数（CV_z），该区资本报酬率（R）与全国资本报酬率($\overline{R}$)之差等变数的函数，即

$$K=b_1A+b_2Y-b_3K-b_4CV_z+b_5(R-\overline{R})$$

劳动供给增长率（l）为人口自然增长率（n）聚集经济（A）。区位偏好（F）、该区工资率（W）与全国工资率（W)之差等变量的函数，即

$$l=b_6n+b_7A+b_8F+b_9(W-\overline{w})$$

区位偏好（F）则设为聚集经济（A），该区首位城市(N_1)，人口潜力之倒数($1/V_{N_1}$)，居民居住于该区的平均时间长度（H）、工资率差异($W-\overline{w}$)。该区至最接近的高收入区的迁移成本（PC）等变量的函数即，

$$F=b_{10}A-b_{11}(1/VN_1)+b_{12}H+b_{13}(W-\overline{w})+b\cdot 4TC$$

技术进步率（t）为聚集经济（A）、资本增长率（R）。该区首位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位次(GN_1)，该区和其它地区联系的程度（q）与全国技术进步率（$\overline{t}$）之积等变量的函数，即

$$t=b_{15}A+b_{16}K+b_{17}GN_1+b_1pq\overline{t}$$

理查森的区域增长模型明显地综合了不平衡增长与经由区际要素流动所导致的平衡增长过程。聚集经济及各种聚集变数决定了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空间上的聚集，从而导致区际的不平衡发展和区内的增长，而各种地区差异变数与资本存量的大小，则可能导致区域间平衡发展。因而，区域的增长过程取决于集中与分散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新古典学派（The Neo—Classical School） 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广义来讲，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的一些经济学流派，包括杰文斯、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和美国学派等，统称为新古典学派。一般而言，它仅限指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参见剑桥学派条）

新奥地利学派（The Neo—Austrian School） 参见奥地利学派条、米塞斯条和哈伯勒条。

新历史学派（The Neo—Historical School）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旧历史学派演变而成的一个德国经济学流派。其创建人为希穆勒，其他代表人物有瓦格纳、布伦坦诺、韦伯和桑巴特等人。所谓的新历史学派，一方面承袭了旧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将旧历史学派的原先观点和做法进一步推向极端。他们采用所谓的"历史统计方法"，搜集、罗列和描述琐碎的历史统计资料，比起旧历史学派还研究整个经济发展史的基础的做法，更加热衷于史料的堆砌。新历史学派干脆把政治经济学看成一门伦理和心理的科学，主张从伦理道德和心理出发去研究历史资料，并由此归纳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民族特点。故又有"社会伦理学派"之称。该学派又推崇国家力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离不开国家这个中心，甚至将国家通过法律进行的社会改良活动冒充为"社会主义"。由此出发，有的新历史学派学者最终堕落为国家社会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总之，新历史学派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试图跻身世界列强的愿望和要求，起着不好的历史作用。

新制度学派（Ne—institutional School） 5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强调对经济问题的制度分析，故名。

历史渊源　新制度学派是由制度学派发展而来的。制度学派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T·凡勃伦、J·康芒斯和W·米契尔。这个学派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为特征，强调对经济制度演变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A·贝利、G·米音斯、C·艾尔斯和J·伯恩汉继承了这一传统，研究了企业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等制度问题。5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J·加尔布雷斯等人则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新制度学派。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美国经济学家J·加尔布雷斯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等。另外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K·博尔丁，代表作有《组织革命》（1953）、《赠予经济学》（1981）等，瑞典经济学家G·缪尔达尔，代表作有：《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亚洲的困境》（1968）、《反潮流：经济学评论集》（1973）等。此外，属于这一派的还有美国经济学家A·格鲁奇（A·Gruchy）、G·科姆（G·Colm、R·海尔布罗纳（R·Heilbroner）、B·沃德（B·Ward），英国经济学家A·甘布尔（A·Gamble）、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F·Perroux）等。这一派在1958年成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演进经济学协会"，并出版了代表这一派观点的《经济问题杂志》。

基本理论　新制度学派的各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他们在基本理论观点上是有某些共同之处的。首先是把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制度。他们反对正统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作为研究对象。他们主张从制度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所说的制度包括公司、工会、国家这类有形的制度，也包括集团行为、社会习俗这类无形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包括这些制度，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以，经济学就应该是包括各学科的一门跨学科的科学。其次，用演进的、整体的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演进的方法就是研究变化，研究过程。整体的方法就是以整体观念来研究社会。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行了一定的揭露与批评，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端"。在这一派中代表着这些特点的有加尔布雷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前者用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这两种构成美国社会的制度特点分析了当前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根源。后者从美国社会的黑人问题入手分析了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关系，以及社会制度演进的过程。此外，博尔丁的"赠予经济学"等理论在新制度学派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政策主张与运用　新制度学派不满于当前资本主义现实，并认为资本主义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因此主张进行制度改革，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对某些具体的制度进行改革。但在如何改革以及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加尔布雷斯主张通过制度改革实现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的平等化。缪尔达尔则强调选定并推动能使社会发展向上运动的因素，以便改变现状。还有些经济学家分析了企业结构等问题，主张从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入手。他们这些政策主张被作为"激进的"或"异端的"，因此，很少受到重视并付诸实施。

评价　新制度学派是作为正统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的“异端”而出现的，他们的发展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一般而言，当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时，这一派发展迅速，力量壮大。反之，当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一派就处于低潮。但他们在经济学中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把这一派称为“对主流经济学的第三种挑战”，认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人们非常需要的东西，即对流行的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　美国60年代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总称。由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J·托宾、W·海勒（W·Heller）等人提出，并由当时的美国政府付诸实施。5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托宾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学，并成为当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这种思想的基本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持乐观态度，坚信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克服经济周期，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保证充分就业，并给大多数人带来不断增长的经济福利。因此，高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目标。在确定充分就业的具体指标时，托宾等人把4%的失业率作为充分就业，把这种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作为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并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确定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为3.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政策方面必须作一些重大的改变，首先，改变补偿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法，经济政策不能逆经济风向行事，而要顺经济风向行事，即只要没有实现既定的充分就业目标，无论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还是衰退阶段，都应该采用扩张性政策进行刺激。其次，要打破害怕财政赤字的框框，运用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赤字有益论”，强调赤字支出对实现经济充分就业的重要作用。最后，对经济的刺激仍然是刺激总需求，因为要使实际的产量增加到潜在的水平，关键仍然是总需求问题。在刺激经济的政策方面，他们强调了，克服过去凯恩斯主义只重财政政策而忽视货币政策的作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重，双管齐下。具体的政策主要包括：减税，尤其是减免投资税，甚至是对投资进行补贴的投资赋税优惠；增加政府支出，尤其是赤字支出；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使各国短期利率接近，等等；新经济学被认为是真正体现了凯恩斯理论的实质，即以扩张性政策刺激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之所以称为“新”经济学，就是在反对补偿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主张实现充分就业、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重视货币政策等方面不同于传统上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与作法。60年代上半期，美国政府执行这一政策曾使美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的增长，一度实现了充分就业、高增长率与稳定的物价。但这种政策也引起财政赤字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并导致70年代初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

新剑桥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　又称“英国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形成。这个流派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经济学家集团，以解释和发展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为己任。其学术中心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其成员大都为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但又有别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以马歇尔为首的剑桥学派，故称“新剑桥学派”。

历史渊源　新剑桥学派的早期成员曾参与过凯恩斯思想的形成，其学术思想亦受凯恩斯的影响。但在解释与发展凯恩斯思想时，他们力求建立客观价值论的基础，这样又继承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传统，并加以重新解释与发展。自从50年代初以来，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就纯资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其核心是如何对待新古典经济学。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与均衡分析法是错误的，而新古典综合派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内容，由此而分化为凯恩斯主义的两大流派。也正是在这种争论的过程中，新剑桥学派形成并发展起来了。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这一派的第一代经济学家有英国经济学家J·罗宾逊（J·Robinson）、R·哈罗德（R·Harrod）、N·卡尔多（N·Kaldor）、P·斯拉伐（P·Sraffa）、P·帕西内蒂（P·Pasineti）以及波兰经济学家M·卡莱茨基（M·Kalecki）。第二代经济学家有英国经济学家P·戴维逊（P·Davidson）、G·哈尔科特（G·Harcourt）、H·明斯基（H·Minsky）、S·威特拉布（S·Weintraub）、J·伊特韦尔（J·Eatwell），以及美国经济学家A·埃斯纳（A·Eichner）等。代表这一派的著作是J·罗宾逊与J·伊特韦尔合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反映这一派观点的还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

基本理论　新剑桥学派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争论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争论的中心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解释与发展。新剑桥学派指责新古典综合派背叛了凯恩斯主义。这就在于：在理论上，凯恩斯理论的中心是收入分配理论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新古典综合派却把收入一支出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作为中心，这样就把凯恩斯所批判过的充分就业假设、储蓄支配投资、货币数量决定价格等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都恢复了；在方法上，凯恩斯强调了历史观与时间观，而新古典综合派则用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

的均衡法；在政策上，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用于对付30年代大危机的权宜之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长期政策，引起了70年代初的“滞胀”。新剑桥学派以凯恩斯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他们要围绕收入分配问题来发展凯恩斯主义，因此，收入分配理论就是其理论中心。这种分配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第一、收入分配理论要说明利润与工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相对份额的决定与变动。其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由于物质条件与历史上的财产分配格局所决定的分配状态是不合理的。第二、收入分配理论要以价值理论为基础，而不能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第三、价值论应该是客观的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而不能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新剑桥学派所根据的价值论是由P·斯拉伐60年代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所建立的价值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是这种收入分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运用。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称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说明了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由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增加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减少，即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引起的储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结果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形成与加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在微观经济学方面，这一派把具有垄断因素的不完全竞争作为出发点，并用垄断所引起的价格上升解释了通货膨胀和滞胀的原因。

政策主张与运用　新剑桥学派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需求管理的政策，又反对货币主义等学派自由放任的政策。他们政策的中心是收入分配政策。因为他们把收入分配不平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所以，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具体的政策主张主要有：第一、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第二、征收高额财产税和遗产税。第三、通过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支出来对低收入者提供补助。第四、提高低收入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五、实现适度经济增长，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较高的收入。这些政策在英国等国的收入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与运用。但从总体上看，新剑桥学派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并不大。

评价　新剑桥学派对价值理论、资本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有过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这一派在经济学中属于“激进”派，并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且，由于经济政策中“改良”的内容相当多，也不为政界所采纳。目前这一派的影响正在缩小。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战后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思潮。这种经济思潮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对自由的解释完全继承了18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这就是说，生产者与消费者所拥有的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而实现人类的自由是最高原则。第二、市场机制与自由竞争是保证人类自由与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说，价格对经济的调节是其他手段所不能取代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第三、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既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属于新自由主义的有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与经济学家，他们之间在具体理论与政策主张方面并不完全一样。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有：以奥地利经济学家F·米塞斯（F·Mises）和F·哈耶克（F·Hayek）为代表的新奥国学派，这一派主张最彻底的自由放任，即国家完全不干预经济。以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这一派主张国家仅限于控制货币量，经济由市场调节。以联邦德国经济学家L·艾哈德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这一派主张国家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国家不介入经济活动。以美国经济学家R·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这一派以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假说重建宏观经济学，主张国家完全不干预经济。以美国经济学家L·拉法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这一派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个人与企业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并由市场调节经济。以美国经济学家J·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这一学派深入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弊病。以美国经济学家R·科恩为代表的“产权学派”，这一派分析了自由经济的基础—私有制的形成及其作用。此外，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还有美国经济学家G·迪布鲁、G·斯蒂格勒、G·贝克尔等人，这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完善性。自由主义是经济学中历史悠久的思潮之一，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一直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自由主义处于低潮。但仍有一些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流派坚持自由主义。战后的自由主义则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引起了西方经济的“停滞”，所以，新自由主义得以高涨。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可以与凯恩斯主义抗衡，而且，在政策方面，许多政策主张也被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在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Neo—Classical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一种说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需条件的模型，50年代由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

R·索洛（R·solow）、英国经济学家T·斯旺(T·Swan)、J·米德(J·Mead)等人分别提出，并进行了系统论述。它是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发展。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资本——产量比率是不变的，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情况下，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在长期中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一致。但由于这三种增长率分别取决于不同的因素，所以，这三种增长率实际上很难一致。R·索洛把这种难以实现的稳定增长途径称为增长的"刃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正是通过改变资本——产量比率来解决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刃锋"问题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是：第一、社会只生产一种既可用于消费又可用于投资的产品，即这种模型是一部门增长模型。第二、只有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但资本—劳动比率和相关的资本—产量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改变。第三、规模收益不变，但资本（或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第四、存在着完全竞争，这意味着工资率和利润率分别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第五、不存在技术进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G=a\cdot\frac{\triangle L}{L}+(1-a)\cdot\frac{\triangle K}{K}$$

在上式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国民收入增长率，$\frac{\triangle L}{L}$代表劳动增长率，$\frac{\triangle K}{K}$代表资本增长率，a代表劳动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的比率，(1-a)则是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的比率；(1-a):a，即为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模型的基本含义是：第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比率。第二、资本—劳动比率是可变的，从而资本—产量比率也就是可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资本—劳动比率来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增长"刃锋"问题，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第三、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是通过价格的调节来进行的。如果资本量大于劳动量，则资本的相对价格下降，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就使生产中更多地利用资本，更少地利用劳动，提高资本—劳动比率，通过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来实现经济增长。反之，如果资本量小于劳动量，则资本的相对价格上升，劳动的相对价格下降，从而就使生产中更多地利用劳动，更少地利用资本，降低资本—劳动比率，通过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实现经济增长。可见通过价格的调节，改变资本—劳动比率，即改变资本—产量比率，就可以使资本与劳动都得到充分利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第四、可以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工资率与利润率取决于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随着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或资本量）的增加，劳动（或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般的趋势是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大于劳动量的增加，因此，相对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言，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这就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发生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资本的收入分配变化，即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加，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种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劳动比率中的作用，并用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市场机制与边际生产力理论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而这一经济增长模型正体现了这些观点，故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许多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了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稳定增长的最优途径等问题。但也有些经济学家对这一模型持有不同看法，例如，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J·罗宾逊等人就反对这一模型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解释及其结论。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Neo -Cambridg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一种说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需条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模型。本世纪50年代由英国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J·罗宾逊（J·Robison）、N·卡尔多（N·Kaldor）和L·帕西内蒂（L·Pasinetli）等人提出。它是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发展。这一模型的特点在于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把收入分配中利润与工资相对份额的变动所引起的储蓄率变动作为解释哈罗德模型中增长"刃锋"问题，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并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与工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这一模型主要由N·卡尔多论述，并以强调收入分配为特征，因此，又被称为"卡尔多分配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第一、社会成员分为利润收入者和工资收入者两大阶级。第二、这两个阶级的储蓄都占各自收入中一个固定的比例，即各自的储蓄倾向是不变的。第三、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大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G=\frac{s}{c}=\frac{\frac{P}{Y}\cdot S_{p}+\frac{W}{Y}\cdot W_{w}}{C}$$

在上式中，G为经济增长率，即国民收入增长率；S

为储蓄率，即整个社会的储蓄倾向；C 为资本—产量比率，或加速系数；$\frac{P}{Y}$和$\frac{W}{Y}$分别为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frac{P}{Y}+\frac{P}{W}=1$；$S_P$ 和 S_W 分别为利润收入者和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而且，根据假设，$S_P>S_W$。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可以通过改变储蓄率（S）来解决哈罗德模型中的增长"刃锋"问题。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储蓄率取决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P／Y)，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W／Y)，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S_P)和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S_W)这四个因素。由于假定 S_P 与 S_W 是不变的，所以，储蓄率就取决于 P／Y 和 W／Y。而且，由于 $S_p>S_w$，所以 P／Y 越大，即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储蓄率也就越高，反之，亦反之。要使经济有较快的增长，储蓄率就要较高，而要储蓄率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P／Y）就要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比例的提高，意味着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要下降。因此，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这是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这一点可用下述公式来说明：

$$\frac{P}{Y}=\frac{1}{s_p-s_w}\cdot\frac{I}{Y}-\frac{s_w}{s_p-s_w}$$

根据假设，在上式中，$s_p>s_w$，$s_p-s_w>0$，所以 P／Y 与 I／Y 按同方向变动。P／Y 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I／y 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即投资率。经济增长引起投资率提高，而随着投资率的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增加，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增长必然引起有利于利润收入者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的收入分配变动。这一结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关于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变动的趋势是有利于工资收入者而不利于利润收入者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新剑桥学派通过收入分配理论进一步论证了他们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经济增长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剑桥学派被称为凯恩斯"左派"。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则是这种"左派"思想的发展与运用。

新古典综合派（Neo— Classical Synthesis School） 又称"美国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右派"或"主流派经济学"。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二战以后在美国形成，是美国和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

历史渊源 其中心思想是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综合为一个新体系。它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在当代美国的运用与发展，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由于这一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适应了美国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正统学派。1948 年萨缪尔森《经济学》第一版的出版标志着这一派的形成。1961 年的《经济学》第 6 版中正式提出"新古典综合"这个名称。从 1970 年《经济学》的第 8 版起改称"主流派经济学"，在 1985 年《经济学》第 12 版中又改称"现代经济学"。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这一学派的奠基人是美国经济学家 A · 汉森，其代表作有：《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49)、《凯恩斯学说指南》等。主要代表人物是：P · 萨缪尔森，代表作有《经济学》(1948 年第 1 版，最新为 1989 年第 13 版)、《经济分析的基础》。此外属于这一派的经济学家还有：J · 托宾、F · 莫迪格里安尼、R · 索洛、A · 奥肯、W · 海勒等。

基本理论 这一派的理论主要包括：第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综合。这种结合体现在理论上用微观经济学来补充宏观经济学，在方法上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法来解释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在政策上则把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第二、理论核心是 IS—LM 模型。IS 曲线表明物品市场上均衡，即 I＝S 时，利率与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关系。；LM 曲线表明货币市场上均衡，即 L＝M 时，利率与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的关系。这个模型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方法概括了凯恩斯理论中决定国民收入的四种因素：投资（I)、储蓄（S)、货币需求（L)、货币供给（M)，说明了物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关系。因此，这一模型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基础。第三、消费函数理论。属于这一派的 F · 莫迪格里安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发展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证明了长期中消费函数的稳定性。第四、经济增长理论。属于这一派的 R · 索洛等人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论述了如何通过市场调节改变资本—劳动比率及资本—产量比例，以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并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解释了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变化。索洛等人还运用这一模型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第五、货币理论。J · 托宾对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作出了发展，进一步论证了货币需求的决定，并提出了影响颇大的现金偏好理论与资产选择理论。第五、滞胀理论。用微观经济理论补充宏观经济理论来解释通货膨

胀、失业，以及两者并存的滞胀现象。在这方面提出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结构性失业，以及"失业与空位"并存等有影响的理论。第六、新经济学。60年代J·托宾、W·海勒等人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提出了包括理论与政策在内的新经济学，被认为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重大发展。新经济学的中心是坚信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并主张通过刺激总需求来实现这一目标。除上述问题外，这一派在福利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数理经济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政策主张与运用　新古典综合派的许多经济学家曾参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的政策主张主要是：第一、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他们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价格机制的调节是基本的。但他们强调，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国家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能够调节经济，只有把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第二、国家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在如何运用政策来干预经济方面，这一派的主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这一时期A·汉森和P·萨缪尔森等人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总的企图是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来实现经济稳定。第二阶段是60年代，这一时期J·托宾和W·海勒等人提出用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第三阶段是70年代之后，面对着严重的滞胀，他们主张采用多种政策。其中包括调节总需求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包括用于制止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收入政策，消除结构性失业的人力政策，以及其他各种政策。

评价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适应了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因此，在经济学中始终处于正统地位，在美国和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学界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评价则众说不同。英国的新剑桥学派指责新古典综合派背叛、歪曲了凯恩斯主义；自由主义各经济学流派则反对新古典综合派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各派之间的这种争论则会长期存在下去。

新通货膨胀（New Infla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把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称为"新"通货膨胀是因为战后的通货膨胀在性质与原因上都不同于战前的通货膨胀。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战前的通货膨胀主要与货币供给量增长率过高相关，而战后的通货膨胀更主要的原因是工会的推动，即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引起了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因此，制止战后通货膨胀的办法就应该是供给管理。

新左派（New Left）　见"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新古典生产理论（Production: neoclassical theories）　新古典生产理论是一种保留了古典学派关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的生产理论。新古典学派的生产理论假定商品与要素的价格由竞争的市场决定；而厂商是在生产函数限制下选择要素的投入与产品的产量达到利润的最大化。新古典学派的生产理论可以用生产函数表示。一个抽象而又简单的形式是用几种投入$x(x=x_1,x_2\cdots, x_n)$生产单一的产品Y。生产函数表示为：

$$Y=\ (x,\ t)$$

x为投入向量，y为产出，t是技术变化指数。

新古典学派生产函数具有如下特征：齐次生产函数，可加性，可分性，生产函数的这些性质对于导出投入需求与产品供给函数是十分必要的。其中可分性的特征对于不同投入与产出的加总，对于推导增值函数以及对于估计生产函数是极其重要的。由生产函数可以导出许多反映出生产过程中关于经济与技术特征的结果，例如规模报酬、要素分配的份额，自价格弹性、替代弹性、技术进步率，边际产品变化率等。通过对这些结果施加某些特定的限制，可以得到不同函数形式的生产函数，例如常见的生产函数是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AL^{\alpha}K^{1-\alpha}$，替代弹性为1，里昂惕夫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是零；而常数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CES production function）的替代弹性是一任意的常数。

与古典的生产理论不同，新古典理论中还探讨了技术进步问题，技术进步是指由于新技术的采用而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技术进步对于生产过程的影响可能是中性的，即不改变投入一产出的关系的变化，在中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一产出比率；产出一劳动比率与资本一劳动比率都不发生变化，而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可能是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

新古典学派的生产理论揭示了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转换关系的转换函数与成本函数之间的对偶特征，例如，如果转换函数对于产出来说是递增函数，那么对应的成本函数对于产出来说就是递减函数。

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Distribution theories: neoclassical）　当一个理论变得有争议时，那么究竟是什么构成这个理论本身就值得讨论了。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就是这样。人们已看到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新

古典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另一些人则认为资本总量或总生产函数是基本的。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被很多人视作一般均衡理论，而弗里德曼则把它称作"马歇尔主义"的局部均衡方法。由于任何学说长期而普遍的流行都需要她能够吐故纳新，而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在西方主要国家过去10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这一理论中包含"矛盾"是不奇怪的。

新古典主义分配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认为生产要素与其它商品一样，其价格都是由最大化某个目标的各个主体所发出的供求力量决定的。新古典分配理论强调租金、工资、利率和利润率的支付水平的形成，相应地，生产要素概念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除古典学派称为生产要素"三位一体"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外，新古典主义者又附加上"企业家才能"。生产要素概念的使用也受到了批评：有人提出劳动显然不象其它投入要素那样遵从供求定律。各种要素及其市场的不同特点的引入使得纯理论的简单对称性受到了破坏。

新厂房和设备的商业投资（Business investment in new plants and equipment） 新厂房和设备的经营投资是国内私人投资总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商业部所属经济分析局使用的一个分析指标。它包括公司为维持折旧帐户完整在新建筑和新机器设备上的开支。新建筑及其追加包括可记入固定资产帐户的所有非住宅建筑及主要改建、土地改良、勘探和开发性开支等；新机器设备包括所有汽车、卡车、拖拉机，器具和装置物、办公用计算机，以及其他新设备等。在那些机动车辆或其他资本被购进为个人或企业使用的场合，只有分配给企业的部分包括在内。所有归为日常运营费用的项目开支，包括维修费用，由联邦政府拥有而又在私人公司合同下运营的新设备，以及由社团或组织供给的厂房和设备等，都被排除在外。开支一般在支付发生时，以各种经营投资调查的形式来公布，这种调查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不是以利用为基础。例如，在航空和铁路中存在广泛的设备租借，然而，只有在已被租出的时候，设备的总价值才被看成开支。新厂房和设备的经营投资以及未来投资预期，每年由经济分析局调查四次，每个季度一次。其中一个问题是以前开始仍未完成的遗留项目和扩张支出与重置支出的比重；另一个问题包括前一季关于新建筑、现有厂房添加和新机器设备的信息，以及那些开支发生以后三个季度的预期。全年的预期支出要求在第一季度内，根据前一年的实际支出进行估计。尽管新厂房和设备的经营投资是一个滞后的指示器，然而，它却常常被看作导致生产能力增加和费用减少的技术变革的化身。由于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新厂房和设备的经营投资作为一种特别重要的和敏感的周期性指标，受到经济学者和预言家们的密切关注。在短期内，它受到流动性考虑，内部基金可靠性和外源融资的影响；在长期内，则受到资本和其他生产投入的相对成本的影响。经营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一般包括旧资本的现代化，即旧资本的折旧。对新厂房和设备经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总体经济状况，尤其是需求对现有生产能力的压力和产量增长率。很明显，大量的有关扩张的经营投资取决于需求和产量的现行增长率及预期增长率。通货膨胀并不一定对它产生负作用。事实上有理由认为，在价格上升时期，为了使其购进在费用变得更高以前进行，企业往往试图购买更多的厂房和设备。

禀赋（Endowments） 见一般均衡。

禀赋构成的策略重新配置（Strategic reallocation of endowments） 在纯粹交换的经济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行为人会发现改变他们的禀赋拥有将会是有好处的，且因此可以增加效用。这个效用的增加是通过拥有新的禀赋这样的竞争性行为和将新的均衡分配与如果没有禀赋的改变所应有的均衡分配相比较而获得的。我们将如同上述这样的经济行为叫做禀赋构成的策略重新配置。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农场主为了提高他们的销售价格有时会毁坏部分庄稼，石油公司出于同样的理由而蒙骗新闻界，谎报自己的储备量。单个人的这种战略行为与纯粹交换经济中个人不能影响价格这样的假定相冲突，所以个人的策略行为与有限经济严格地联系在一起，但个人的组织的策略行为在连续统一的经济中却是非常有效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虽然禀赋构成的策略重新配置最有可能在有限经济中发生，但它肯定不仅仅限于有限经济。禀赋的策略重新配置有时也叫借助禀赋的操纵行为（manipulation via endowment）它与偏好的操纵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偏好主导着策略行为，所以在理论分析中又置于经济行为人的偏好（通常以效用函数表示）这样的经济变量，借助禀赋的操纵行为就可以看作是对偏好的操纵。也就是说，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经济行为人并不总是按照偏好行事，而是对他人进行一些"欺骗性"行为或者"欺骗"自己。但最终目的还是为增加自己的利益。

摊销（Amortization） 摊销是一个会计名词，意指将费用在若干期内进行分配，具体有以下两种含义：(1) 一种用法指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某种资产的折旧费用。假定某企业投资生产某种新产品，伴随

着生产过程的进行，初始资产的价值被逐年侵蚀，到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初始资产的价值变成零。这种资产的逐年损失费用称为摊销。在考虑每年获利多少时，投资价值的损失必须从收益额中扣除，以保证初始投资的价值完整无损；类似地，在计算投资期内的利润总额时，也必须将各年摊销的费用总额从总收益额中扣除，否则就会错误地将总收益额看成总利润额。值得注意的是，摊销一词尽管类似于折旧，甚至有时用来代替折旧使用，然而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折旧一般针对机器、厂房等有形资产，而摊销却主要指无形资产；折旧一般比较直观地和物质退化及最终退役联系在一起，而摊销是看不见的和难以准确估价的，常常和无形资产价值的逐步消亡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摊销规则带有武断性和随意性的色彩。(2) 另一种用法指债务帐面价值的逐步削减。由于摊销一词最初来自拉丁语，意指债务的清偿，因此，逐期支付的债务也称为摊销。在这里，如果债务是不动产，一般通过分期付给足够偿还当期利息和到期债务的办法来逐步减少债务，包括足够付给税金和房产保险费的金额；在财政金融上，摊销指通过对资本帐户付费或增加还帐现金的办法来逐步减少未来债务的一种安排。它通过分期付款来偿还债务，直到全部债务（包括利息）都已清偿为止；如果摊销的是一笔贷款，那么在整个贷款期内，逐期支付的本金总和等于该笔贷款的原值。总的来看，在概念上，一笔债务的摊销和无形资产的摊销相似，两种情形都涉及了费用的逐期分摊。

摆阔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摆阔性消费是指为了给他人造成印象而不是为了满足正常的消费需要，炫耀式地使用消费品的消费方式，通常是为了夸示个人之富有，是由凡勃伦（Veblen）在分析作为上层社会地位标志和作为提高个人地位方式的摆阔性消费和摆阔性浪费时引入经济理论的。

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主要对消费的模式感兴趣，在其它阶级中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有闲阶级最有机会进行这样的消费。判定某一特定支出是否属于摆阔性消费的标准，除了从已形成的爱好、消费惯例和通用的礼仪来考察外，主要看这笔支出最终是否增进了舒适或充实了生活。

摆阔性消费这一概念实际出现要早得多。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就谈到，人们喜欢拥有那些能表明他们富有而且只有他们才能享受的标志物品，在这些人看来，一件有用或者漂亮的物品，其稀缺性或者需要大量劳动才能累积到一定数量的特征会增加这件物品的价值，因为其他人是支付不起所需要的劳动的。斯密认为，这一领域是由时尚支配的。萨伊（Say）和麦克库洛赫（Mcculloch）也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以同样方式讨论了这一问题。首次使用摆阔性消费概念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雷（Rae）。雷依据人类生活中虚荣心的含义来解释豪华的性质和影响。他认为，虚荣心就是超越他人而又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欲望，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拥有他人所没有的东西。不过，是凡勃伦把摆阔性消费作为理解社会整体消费的重要现象介绍给我们的，他根本没有参考雷的有关论述。

所谓凡勃伦效应，就是凡勃伦对这种现象形成机制所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解释。它是指：当某种消费品价格下降时，某些消费者就认为这种消费品的质量或它的独立性下降而不再购买。

微观分析体系的模拟（Simulation of microanalytic system）　这是由奥卡特（G·Orcutt）于1957年提出的一种经济模型方法。它是一种反映微观体（microentity）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模型。模型中的微观体可以理解为家庭或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人，公司、产业或地区中的工厂等等。按照奥卡特的说法，所有的经济模型可以归为四类：(1) 宏观计量模型；(2) 产业间模型；(3) 组频数转变矩阵模型（cell frequency—tremsistional matrix）；(4) 微观分析模型。前三种模型只限于宏观层次，有一些涉及到微观领域，但不足以揭示微观体之间的关系。许多经济关系被作为宏观层次的联立方程来对待，如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而不是微观层次的联立，个人开支对其收入的影响就被忽略。反映部门间相互关系的模型，不能进行许多重要的预测。总之，以往的模型对微观层次重视很不够，微观分析体系中的模拟方法就是为弥补这种空白和不足而提出的。由于它将微观决策单位，如个人、家庭企业、地方政治团体等纳入考虑之中，构造它们的行为和相互作用的模型。这是微观分析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的优点，同时也正是它的困难所在。由于微观体的信息特别宠杂，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信息的获取，以对微观体特征的把握，二是信息的处理。从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应用上得到重大突破，微观体的资料也越来越容易获取，这使得微观分析体系的模拟方法逐渐走向实用阶段，成为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微观体系中的模拟方法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是以个体经济单位的决策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微观经济学理论又称为价格理论，因为微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商品与资源的价格决定的。在商品与资源的

价格决定的同时，决定了资源的配置与产品产量。由于微观经济学研究范围涉及个体经济行为、价格决定以及资源配置状况，因此，它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等。

微观经济学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假定消费者具有一个效用函数。该效用函数建立在以消费者所消费的各种商品、闲暇等基础上。效用函数代表了消费者消费意愿。消费者的购买能力由他所取得的收入所决定。消费者面对既定的商品价格在既定的收入的限制下求得效用的最大化。当消费者的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时，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

生产者行为也称为厂商行为。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假定生产者具有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描述了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在给定投入品价格的情况下，由生产函数可以导出生产者的成本函数。生产者成本等于投入品的价格乘以生产中投入品的数量。生产者的目标是求得利润的最大化。生产者可以通过比较出售产品的收益与生产产品的成本来求得利润的最大化，也可以通过比较生产要素的收益与生产要素的成本求得利润的最大化。就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而言，假定生产者能够出售全部产量，则当生产者额外增加单位产量的成本（边际成本）等于增加这额外一单位产量的销售收益（边际收益）时，厂商达到了利润的最大化（假定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就要素的成本与要素的收益比较而言，当额外增加一单位要素的成本（要素和价格）等于增加这一额外单位要素所生产的边际产品的收益（边际收益产量）相等时，厂商达到利润的最大化。

局部均衡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都是建立在消费者行为与生产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之上。局部均衡理论研究的是个别商品价格的决定而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单个商品的市场价格由对于这一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决定。所有购买这一商品的消费者的购买量构成对于该商品的需求；所有出售这一商品的生产者的出售量构成该商品的供给。在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点决定均衡的价格与均衡的数量。

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所有商品与要素价格同时决定的情况。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任一种商品的需求不仅受该商品本身价格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他所有商品价格与要素价格的影响。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相互影响，改变任一商品与要素的价格都会影响到其他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均衡。因此，各个商品与要素的均衡价格是同时决定的。假定一种商品为法定商品，令其价格为1，那么，所有商品价格都可以表示为与这种商品价格的比率。在包括了每一种商品与要素（资源）供给与需求的方程式体系中，在既定资源量下，所有商品的价格与产量、所有资源的价格同时决定，整个经济达到均衡。

研究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所涉及的是实证的分析。它所分析的是均衡的状态与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什么，而并不对均衡的结果进行价值判断。但是经济学中对资源配置的结果进行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资源配置的结果是否达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应该如何重新配置资源使其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价值判断。福利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福利经济学假定存在着一个社会福利函数，社会要使资源配置符合这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在福利经济学中还涉及到外部性、公共产品定价等问题。

微调（Fine Tuning）　根据经济中经常发生的较小波动而对政策变量进行小幅度的调整。当经济中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时，无疑需要采用有较大变动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但经济中经常发生的是较小的波动，如果对这些较小的波动不及时作出反应，采取相应的政策，又会引起较大的经济波动。这样，决策者就需要经常而及时地小幅度地调整政策来消除经济中小的波动。这种小幅度的政策调整就被称为微调。微调可以是财政政策，也可以是货币政策。但一般而言，诸如公开市场业务这种货币政策更适用于进行微调。在进行微调时要尽量缩短政策的内在时滞与外在时滞，以便使微调更迅速、更有效。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微调引起政策多变，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不如利用经济本身的自发调节机制或者内在稳定器。

解线性规划中的单纯形法（Simplex method for solving linear programe）　如果线性规划存在着最优解，就可以在它的所有基本可行解中去寻找最优解，单纯形法就是如何在诸多的可行解中迅速地求出最优解的方法。如果该线性规划问题不存在最优解，单纯形法对此也可以作出明确的回答。单纯形法是B·旦特兹格于1947年发现并于1951年公开发表的。其基本步骤如下：

(1) 化一般的线性规划问题为标准形式。标准形式为

求 $X = (X_1, X_2, \cdots, X_n)^T$，满足

$$\begin{cases} X_1 + a_{1,m+1}X_{m+1} + \cdots + a_{1n}X_n = b_1 \\ \quad x_2 + a_{2,m+1}X_{m+1} + \cdots + a_{2n}X_n = b_2 \\ \quad\quad \vdots \quad \cdots \quad \cdots \quad \vdots \quad \vdots \\ \quad\quad x_m = + a_{m,m+1}X_{m+1} + \cdots + a_{mn}X_n = b_m \end{cases} \quad (1)$$

使得 $\min f(X) = \sum_{i=1}^{n} C_i x_i$

(2) 建立初始单纯形表格。对应于 (1) 的初始单纯形表格为

基变量	X_1	…	X_m	X_{m+1}	…	X_n	
X_1	1	…	0	$a_{1,m+1}$	…	a_{1n}	b_1
⋮	⋮		⋮	⋮		⋮	⋮
X_m	0	…	1	$a_{m,m+1}$	…	$a_{m,n}$	b_m
f	0	…	0	λ_{m+1}	…	λ_n	f^0

表中 f 行中的 $\lambda_j(j=m+1,\cdots,n)$是用非基变量表示目标函数时，表达式中非基变量 X_j 系数的相反数，称为检验数。f^0 是该初始基本可行解所对应的目标函数的值。

(3) 检查所有的检验数 λ_j 中有无正数。如果所有的检验数中没有正数，则该表格中的基本可行解，就是一个最优解。

(4) 在所有的正检验数中选取最大的一个，如果最大的正检验数不只一个，则选取最左边的一个。当此数值所对应的非基变量由零变至某一负值时，目标函数值有可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5) 检查最大的正检验数所在的列中，除此检验数外，还有无数。如果再无正数，则表明该线性规划问题无解。

(6) 求出最大正检验数所在列的其余正数与其相应的 bı 的比值。即对所有 $a_ik>0$,分别计算比值 bl／aik。

(7) 选出 (6) 中各比值中最小的。即选出

min(bi／aikjaik＞0)＝bi／alk

(8) 以 aLK 为主元，施行高斯消去法，得到新的基本可行解，转到步骤 (3)。即用初等变换，化主元 aLK 为 1，再消主列中其余元素为 0。这样非基变量 X_K 将进入基变量位置。

单纯形法就是从一个初始基本可行解开始，通过高斯消去法来获得新的基本可行解，并使目标函数得到改善的一个迭代过程。

解雇 (Layoffs)　解雇是指雇主停止雇用职工的合同。对解雇一词本身有较大的争论。该词可以是指一种暂时的雇主主动辞退工人的行为，也可以是指任何一种雇主主动辞退工人而无损工人法定利益的辞退工人的行为。如果雇主只是暂时辞退工人，那么被辞退者不久后会被重新聘用。如果不是暂时性辞退，则被辞退者不会在短时期内被重新聘用。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解雇行为的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产生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解雇失业理论是建立在总体劳动市场粘性工资假定基础之上的，这种总体的劳动市场被认为是一种"拍卖性"市场。但是这种粘性工资拍卖市场的观点不能解释暂时的解雇，即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厂商在经济不景气时解雇工人，而在需求恢复时又重新聘回被解雇者。近年来，西方发展了一种新的劳动市场行为的观点，即劳动契约观点。这种理论可以解释劳动市场的暂时解雇行为。劳动契约理论强调长期归属。长期归属的动因建立在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工人与企业间风险的转移、以及它造成工人与企业不流动的因素的基础上。劳动契约理论被用于改变劳动市场出清的概念，并且对于分析解雇行为提供理论基础。传统的市场出清概念是就业问题。根据这一观点，在充分就业时市场是出清的。而契约理论认为，市场出清概念是归属。归属于但并未受雇于一个企业的工人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市场没有出清。按照这种观点，暂时解雇可以被视为工人与企业间内在契约关系的一部分。这就是，工人与厂商都认识到将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工人工作时边际产品价值低于机会成本，而继续这种归属关系的贴现值是正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暂时解雇"工人是最优策略。在预计出现上属情况的条件下，工人与厂商将在归属关系开始时考虑暂时解雇的可能性。这将依赖于归属关系赖以存在的市场结构，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参加者所掌握的信息是否是对称的等。

解散财阀 (Disband financial Magnate)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强烈要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要求解散日本的财阀。当时，美国占领当局在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同时也为了打击日本财阀、削弱世界贸易中日本这一长期竞争对手，根据美国政府在《美国对日投降后初期方针》，实行解散财阀（实际是改组）的措施。这项工作于 1946 年开始，1947 年末基本结束。解散财阀的措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 解散作为财阀总公司的控股公司。被指定为控股公司的有三井总公司、三菱总公司等 83 家，其中包括一些兼营企业的控股公司，但在这些公司中只有三井、三菱等 28 家公司被指定为控股公司后，根据占领军的特别命令立即被解散，其余 55 家在令其出售股份以消除控股公司的性质后，企业部门都被保留下来。(2) 消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三井、岩崎、住友、安田、中岛、野村、浅野、大仓、古河、鲇川等十大财阀的 56 个家族被指定为财阀家族，与这些财阀有关的 625 家公司被指定为"限制公司"。这些控股公司、财阀家族和"限制公司"持有的全部股票交给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公开拍卖，同时勒令财阀家族和财阀所属主要公司领导人一律辞去公司领导职务，并禁止他们在 10 年内重新任职。此外，日本政府还勒令 2500 家战时主要公司

和银行的领导人、大股东辞去职务，属于战前财阀的大公司和大企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交出了领导权。(3) 分散股份。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有偿地接收被定为控股公司的83家公司和被定为财阀家族的56个家族的股份，并通过证券处理调整协议会拍卖给这些公司的职员和社会的一般居民。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接收的股份共达181亿日元，相当于1946年底日本全国股份公司资本总额的42%。除部分无法处理的股票外，可处理的股票几乎全部在1947—1951年拍卖。(4) 分割大企业。1947年12月公布《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并指定应解散的公司325家。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转变，指令解散的公司陆续减少，最后减至18家，实际被解散的仅11家。(5) 制定禁止私人垄断法。为防止被解散的财阀复活，1947年4月制定《禁止私人垄断和保护公平交易法》。法律规定：全面禁止卡特尔的共同行动；限制企业间的结合；不得设立以支配国内公司企业活动为主要事业的公司；原则上禁止事业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持股率不得超过对方公司股份的5%，等等。但后来几经修改，许多规定并未见诸实行。通过解散财阀总公司和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封建家族式统治，但财阀所属企业并未被解散，财阀康采恩的基础亦未被破坏，这些企业后来又通过横的联合重新集结为大垄断企业集团或财团。

满意解决法（Satistice） 在已知各种可供选择的条件下，尽可能满意地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法。例如，假使某人一天内生产某种产品一千个单位，但是他的生产设备只允许生产八百个单位。为了生产出那另外二百个单位的产品，他就不得不扩大其生产能力，使工人加班加点，或者把这些额外的单位产品承包给其他公司去生产。于是他便对上述可供选择的方法及其费用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作出决定，决策的标准是获利最高。在已知条件的限制下，所作的决定从供求一览表上看正是生产最后一个产品而刚好能获利之点，这种方法是使生产和利润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和完善的方法。满意解决法适用的问题的范围很广。当已知约束条件下，可能有多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各有利弊得失。当你从中选择时，必须有选择的标准，也就是必须存在使你满意的条件。当这些条件明确时，你就可以从多个选择中挑选出一个。例如，使你的目标利润达到极大。或者，如果一个比较保守的决策者不仅关心利润的大小，他更关心实现利润的风险性，这时他的满意的条件是风险极小。而这种方法很多，如概率法，最小后悔值法等。

满足人类基本需要战略（The Basic Needs Strategy） 解决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案之一。主张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诸如教育、健康和卫生这样的公共服务事业，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以利于社会中的穷人能切实地享受到这些服务。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尚不能在短期内根变改善国内大多数穷人的生活条件，所以应通过发展公共性服务来保障穷人生活中的基本权益，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穷人。这一战略提出要向穷人提供几种基本商品和服务：基本食物、水与卫生设备、健康服务、初级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住房。其具体办法，一是让政府拿出足够的财力，使这些商品与服务以穷人能出得起的价格提供给他们；二是在设立提供这些服务的网点上，要尽量对穷人有利，应有适宜的服务项目扩展到乡村以及城市的贫民区，并保证有学校、诊所、教师和基本的保健人员在乡村和穷人生活区工作。迄今为止，有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服务网点还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溢出效应 是极化和扩散效应。

溢出假说（Spitlover Hypothesis） 又译“外溢假说”，是关于某些重要的工资协议会影响以后的工资协议，或某一部门的工资协议会影响其他部门工资协议的理论。这一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前提：第一、任何一个协议集团工资争端的解决必然与其他协议集团工资争端的解决密切相关。这就是说，在工资谈判中攀比效应有着重要的作用。各个集团和各个部门都要向其他部门，尤其是高工资部门的工资标准看齐，并以此作为自己进行工资谈判的依据。一次重要的工资协议对以后的工资协议和其他集团的工资协议都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称为“溢出效应”。第二、这种工资攀比及溢出效应存在的根源在于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特征，很难根据正统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溢出假说可以解释现代社会存在的“工资—工资螺旋式上升”。这就在于，一个协议集团或部门所确定的较高工资带动了其他协议集团或部门工资的上升，而受溢出效应影响的协议集团或部门的工资又会影响其他部门或协议集团，从而使整个社会工资水平上升。这种“工资—工资螺旋式上升”又会带动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溢短装条款（More or less clause）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数量条款是合同中的重要条款之一，对卖方来说，有义务按照合同规定的商品数量交货，但是，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由于商品本身的特性，或由于生产条件，运载能力等原因，卖方往往不

可能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数量交货，为了避免纠纷，卖方通常要求在买卖合同中规定卖方交货数量允许有一定范围的机动幅度，这种条款就称为溢短装条款。

溢短装条款中规定的机动幅度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有两种方法较为常用。一种方法是在合同中具体规定卖方的交货数量可以多交或少交若干，但以不超过成交数量的百分之几为限；另一种方法是对合同中交货的数量冠以约、近似、左右等具有伸缩性的词汇，来表明卖方交货数量有一定范围的灵活性。两种方法相比较，以前者明确规定溢短装的幅度这一方法为好，后者由于国际上对近似的含义缺乏统一理解，极易引起纠纷，应当避免使用。

对于买卖合同中溢短装条款所规定的货物溢短装部分的计价方法，较为常见的是溢装或短装的部分均按合同价格计算。但是，为了防止享受溢短装权利的一方利用市场价格的波动，故意多装或少装而获得额外的利益，也有的合同对于溢短装部分不按合同价格计价，而是按装船日的行市或货到日的市场价格计算。

零股交易商（Odd—lot Dealer）　零股交易是在1—99股以内的股票交易，通常是以10股作为零股交易的一个单位。从事零股交易的称为零股交易商（整数交易则在100股或100股以上倍数的股票交易），其交易对象是佣金经纪人，即佣金经纪人接到客户不足一个整数成交单位的委托，就向零股交易商购买。零股交易商一般是整数购买，零数出售，未出售的部分则自己存货。他们在为小额资金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机会和使证券发行公司在更大范围的筹集社会闲散资金、调节证券供求等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零增长理论（Zero—Growth Theory）　又称“增长极限论”（Limits of Growth Theory）或“末日模型”（Doomsday Model），是70年代初美国学者D·麦多斯（D·Meadows）等人所提出的一种经济增长悲观论，其代表作是麦多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五种因素是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不能再生的资源的消耗。这五种因素的特点在于都是以指数形式增长，即按一定的百分比递增。衡量指数增长的最恰当方式是倍增时间，即某种因素增加一倍所需要的时间。这种指数增长的特点在于开始时增长速度并不引人注意，但递增很快。麦多斯等人运用结构体系原理中的反馈环路概念，分析这五种因素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并编制数学模型，运用计算机进行详细的计算分析。其结论是：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人口增长迅速，按目前的年增长率2.1%计算，倍增时间为33年，即每过33年，世界人口数目翻一番。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为7%，人均增长率约为5%。这样，每隔14年左右物质生活水平将提高一倍。但这种状况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粮食供给、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情况。粮食供给的情况取决于土地、淡水与农业资本投资。土地与淡水是有限的，农业资本投资则取决于不能再生的资源，除农业资本投资外，工业资本投资也取决于不能再生的资源。这种不能再生的资源的消耗也是以指数形式增长的。以铁矿石为例，按世界目前的消耗量，只能使用240年，如果每年的消耗量增加1.8%，93年就用完了。工业投资增加中环境污染也以指数形式增长。例如，目前95%的能源是化石燃料（煤、石油），使用这些燃料会产生二氧化碳。现在每年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达200亿吨，并且还在以0.2%的年增长率增加。污染物质的增加将严重破坏人类的生态环境。把这五个因素放在反馈环路中进行综合考察，并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以后，人口和工业仍维持着指数增长，但迅速减少的资源和环境污染将限制着这种增长。工业化达到最高点后，由于自然时滞，人口和环境污染还会继续增长。但由于人口过剩、食物缺乏、环境污染、不能再生的资源耗尽，最后人口增长停止，工业增长停止，人类社会将在2100年之前崩溃。解决这一困境，实现全球均衡增长的措施主要是：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在1980年停止工业资本投资增长；每一单位工业品的物质消耗降到1970年的四分之一；经济重点从物质生产转到服务业方面；污染降低到1970年数值的四分之一；把资本投入到粮食生产上；农业投资重点用于增加土地肥力与水土保持，等等。这一理论对人类经济增长的前途抱悲观态度，它的出现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许多学者对其基本观点持否定态度，对其计算、分析方法也提出了批评，但认为这一理论所提出的人口增长过快、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是值得全世界注意的，所提出的许多建议中也有可取之处。

零利润条件（Zero—profit conditions）　设P为产出价格，W为投入价格，产出函数为$y=f(x)$，那么，对于竞争性厂商其利润函数为：$\pi(p,w)=\max P\cdot f(x)-w\cdot x$

设在既定产出下，最佳投入所获利润严格为正，即：$P\cdot f(x^*)-w\cdot x^*=\pi>0$ 那么，扩大生产规模t，只要在$t^s y=f(tx)$中$S>1$，则利润会以更大规模增加，即：

$P\cdot f(tx^*)-W\cdot tx^*>tP\cdot f(x^*)-W\cdot tx^*=t\pi>\pi$ 这

时，对竞争性厂商来说，就不存在最大利润的均衡，利润是无限的。因此，有意义的竞争性均衡要求生产技术为规模收益不变，利润在零点最大。这就是零利润条件，它是竞争性均衡的必要条件。

零利润条件中的利润经常与资本品收益的利润相混淆，事实上，零利润条件并不是用于要素收益，而是用于短期超额利润。这种混淆实际上仅是一个词汇问题，1890年，马歇尔特意将这些超额利润归为准租（quasi—rents）一类而认为准租不象利润那样直接计人产品供给价格。但是，用词混淆也引起了分析时的混淆。马歇尔很清楚地区分了资本收益和零超额利润的均衡条件，同时却将超额利润视为企业家报酬，认为在均衡状态下，企业家收益为零。

跨国联属企业（Transnational Associated Enterprise） 这是区别于跨国独立企业而提出的概念，当不同国家的两个企业之间的商务或财务联系不同于两个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具有以下特点时，称有前述关系的两个企业为跨国联属企业。这些特点包括：

①一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两国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②同一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两国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一旦形成跨国联属企业集团，它就会受到所在国税务当局的格外关注，因为跨国联属企业集团往往利用其内部相互之间的特殊关系对收入与费用进行各种合法转移，以利用世界各国（地）的税负差异规避纳税义务，从而给有关国家造成税收收益的流失。

因此，各国对跨国联属企业的业务活动都做出了种种限制规定以约束其收人与费用的不当转移。

跟单托收（Documentary bill collection） 跟单托收是国际贸易中货款结算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指出口商将汇票连同提单、保险单、发票等装运单据一起交给银行，委托银行向进口商收取货款。在跟单托收中，出口商也可以不开汇票，而仅开立发票，随附货运单据交银行托收。跟单托收的基础是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根据买卖合同，出口商得以在备货装船，取得各种必要单据后，开立汇票交银行托收，进口商则依合同规定条件付款。

出口商委托银行收取跟单汇票，对于随附品货运单据，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交单条件。既可以在进口商承兑汇票后立即取得货运单据，在约定的期限到达后才行付款；也可以先要求进口商承兑汇票，同时扣住货运单据，在汇票到期日再单款两讫。依据交单条件的不同，托收可以分为承兑交单（document against acceptance，简称D／A）和付款交单（document against payment，简称D／P）两种。而付款交单方式中，依据汇票的付款日期，又可以分为即期付款交单（D／P at sight）和远期付款交单（D／P after sight）。在各国的跟单托收业务中，出口商所开立的汇票通常为远期汇票，这使得进口商可以不必自备资金，而以转售货物而得的货款支付出口商。一般来说，出口商主要是根据进口商的资信能力采取不同的交单条件。如果进口商资信能力较强，出口商就可能以远期汇票对其进行放帐，甚至采用承兑交单的付款方式。此外，采取何种交单条件，还需考虑交易商品的性质，不同国家、地区所采取的贸易政策和贸易习惯等情况。

依照国际惯例，在跟单托收业务中，出口商与托收银行之间只是委托代理关系，银行只需负责审核托收委托书中所列单据与出口商交来的单据是否一致，而对于出口商所交单据是否符合合同规定则不负审核责任。另一方面，出口商通常在跟单托收中，应进口商的要求而指定进口商的往来银行作为代收银行。以便于代收银行为进口商提供融资便利。如果出口商没有指定代收银行，托收银行可以自行选定代收银行，通常这时托收银行会将其在付款国家的分支机构或代理行作为代收银行。

在跟单托收业务中，代收银行向进口商提交汇票后，进口商有权对单据进行审查，检验单据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进口商审查单据后，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代收银行和托收银行有义务及时将具体情况通知出口商，并提交公证人作成拒绝证书，以备出口商行使追索权。

采取跟单托收方式，由于其属于商业信用，而非银行信用，此方式无论对出口商还是进口商都存在较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采用跟单托收，托收费用少，没有信用证方式下的银行授信额度限制，进口商可以仅凭少量资金而开展较大量的业务，因此，进口商通常较偏向于使用跟单托收，出口商为了推销商品，保持竞争地位，也常常愿意对进口商进行融资，而采取跟单托收结算方式。

跟单信用证：（Documentacy credit） 与光票信用证相对应，它是指需凭跟单汇票或仅凭单据付款的信用证。这里所指的单据是代表货物所有权或证明货物已经发运的单据。前者包括海运提单、全单等，后者包括铁路运单，航空运单、邮包收据等。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信用证结算方式，多采用跟单信用证。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国际商会的第400号出版物，它是国际商会

在原有的"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最新做法于1983年修订的，并于1984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该惯例包括总则和定义，信用证的形式和通知、义务和责任、单据、其他规定以及转让等6部分共55条，它对跟单信用证这种在国际贸易领域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结算方式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尽管它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仍然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各国银行采用跟单信用证方式完成国际结算的主要准则和依据。

数理经济学派　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崇尚数理方法是经济学中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数学符号和数理方法来表述、研究和论证经济现象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数理经济学者研究和阐述经济学原理，总是要借助函数概念表述经济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如需求函数），借助微积分表明经济规律（如边际效用递减律），借助联立方程组构筑整个经济体系（如一般均衡理论）。数理经济学派最重要的先驱者是古尔诺。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洛桑学派的瓦尔拉和帕累托、英国的杰文斯和埃吉渥斯等。他们所创立的数理经济学在二次大战后有了迅速发展。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数据库（Data banks）　指的是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一组彼此相关的数据。数据库分为两类，文字的数据库包括文章摘要、索引等参考资料，而统计意义上的数据库则可以涉及企业内部的统计数据，微型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等等。数据库的特点是：(1) 数据库中收集的数据相当精确而完整，重复程度最小，可以为多种不同的应用程序提供满意的服务；(2) 数据的存储系统与数据的应用系统一般是彼此独立的；(3) 用统一的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增减、修改与维护。

DBMS是操纵与管理数据库的工具，它对数据库进行管理的过程叫做数据库的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确定数据模型，常用的数据模型包括关系模型、层次模型与网络模型。根据不同的数据模型可以设计出三种相对应的数据库，也就是关系数据库、层次数据库与网络数据库。在确立了数据模型之后，再根据所制订的系统目标以及数据传递程序进行数据库的设计，具体的设计任务是由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系统完成的。通过设计数据库，并将经过检验的数据进行存贮，可以使数据结构化，实现对数据的集中控制，从而大大提高了数据的使用效率。DBMS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控制下运行的，它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数据库，并修改与利用它。

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常见的有微型数据库与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库。

微型数据指的是关于个人、家庭、企业以及机构等的数据，这些数据通常以横断面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可以提供某个单位在时间某一点上的大量信息。将这些横断面的数据组织起来，就形成了纵向的微型数据库，它可以提供有关某个单位在不同时点上的情况。

微型数据的来源多半是普查与典型调整所得到的数据，将这些数据进行检验之后，输入计算机存贮系统，就形成了微型数据库。人们利用微型数据库中存储的有关数据，可以研究个别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与市场变量之间的关系。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大规模利用微型数据库供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之用成为可能。

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指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加总的时间序列。人们将收集上来的数据首先化成机器可读的形式，然后进行检验，在确认这些数据是精确的与连贯的之后，再把它们输入有关的数据库，供宏观经济学研究之用。这种时间序列数据库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但是直到本世纪50年代才出现了计算机可读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库。它为用户搜集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有关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演化过程，并且可以同时为多种应用程序服务，这极大地方便了用户，为他们节省了大量时间。

数据库的概念的出现只是20多年以前的事，但是到目前，全世界已经拥有上万个大型的数据库系统，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经济统计、人口规划、企业管理、资源配置等等，对经济规划与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70年代大量使用的是集中式数据库系统，而80年代大量使用的则是分布式的数据库系统。目前，数据库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是，用户只能得到由数据库提供的第二手数据，而对数据的准确程度无法作出直接控制；另外，数据库要占用大量的存贮空间与通道；它进行数据处理的速度也比较慢。值得庆幸的是，人们正在对数据库的有关理论及其应用作深入的发展与研究，随着将更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数据库的研究之中，数据库必将以更优的性质为用户提供服务，它所存在的不足也将会逐步被克服。

瑞典学派（The Swedish School）　又叫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因其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都是瑞典人，故称此名。该学派吸收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的边际分析法和一般均衡理

论，同时创制出新的分析方法来建立动态的总量的理论体系，从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学说内容。在经济学史上，瑞典学派被看成对现代经济学作出了很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它强调预期因素的重大作用，创立动态的过程分析法，区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试图建立起一个一般动态理论体系以替代传统的静态均衡分析。第二，它突出货币对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又作出关于储蓄与投资的现代分析，从而不仅将传统的一般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并且建立起第一个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应该看到，在西方经济学者普遍关注微观经济问题之际，瑞典学派学者却能系统地阐述宏观理论，且早于凯恩斯之前就建立起类似于有效需求原理的宏观经济体系，是难能可贵的。第三，瑞典学派学者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上风的情况下，主张应该采用国家干预主义来稳定或调节经济，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程，并阐明了这种干预手段的财政政策机制和货币政策机制，这也是颇具创见的。第四，他们还积极鼓吹"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瑞典学派的学说体系总的讲是庸俗的，带有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共同的谬误和缺陷。瑞典学派的奠基者是魏克塞尔和卡塞尔，它的主要代表有缪尔达尔、林达尔、俄林和伦德堡等人。由于以后的瑞典经济学家（如林德伯克等）承袭和发展了上述的传统和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继续以一个独立的学派跻身于西方经济学界，因而为了同现代瑞典学派相区别，它又常常被称作早期瑞典学派。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19世纪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生于法国边省贝桑松的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少年时干过田间农活，当过雇工，后来还当过排字工人。由于自学成才，1837年获贝桑松大学助学金，迁居巴黎后成为职业作家，出版过多部著作。1848年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后因抨击政府和反对天主教曾两度被判监禁。于是脱离政治，继续从事写作直至去世。但其思想曾对法国工人运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反映蒲鲁东经济学说的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财产》（1840年）、《经济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和《十九世纪革命的总概念》（1851年）。

蒲鲁东应用唯心主义和庸俗化了的辩证法阐述了经济范畴自身的发展，由此构成他的所谓"经济矛盾体系"即政治经济学体系。他认为，每个经济范畴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它们互相矛盾和斗争，经过综合后形成一个新的范畴，新范畴的好与坏经过斗争和综合再形成一个新范畴。这样，经过不断的运动，整个社会经济就划分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或税收、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和人口等经济范畴构成的十个阶段。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保留它们好的方面和消灭坏的方面。据此他自以为超过了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实，他不认识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错误地把它们当作是人们头脑中纯理性运动的产物。

蒲鲁东的经济学说是以"构成价值论"为基础的。按他的说法，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在交换时得到社会承认，被列入社会财富，它就成为"构成价值"。要实现这点，就需取消货币，使所有商品都成为货币那样的等价物，能随时随地依据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直接进行交换，达到供求一致。他的进一步结论是，只要建立一种新的交换制度，确保一切商品都按其"构成价值"进行交换，商品生产的矛盾便可消灭。他的社会改革方案是，设立"交换银行"，组织生产者直接进行等价的商品交换，取消交易中间人；发放无息贷款，帮助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从而拥有取得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这样，不必剥夺剥夺者就能消灭一切非劳动收入。

显然，蒲鲁东的理论和改良方案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力图巩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用改良主义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这是一条空想的反动的道路，把消灭阶级的愿望寄托在全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化上。因此马克思对他的经济观点作了深刻尖锐的批判。

输出基础理论（Export Base Theory） 输出基础理论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D·C诺思在研究美国历史时期的区域经济增长时提出，后来经过蒂博特、罗曼斯和博尔顿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其理论基础是静态比较分析中的外贸乘数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一个区域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内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因而，增加区域的输出即增加区域所有的输出产业和服务，将启动一个乘数过程，其乘数值等于区域输出与非输出活动收入或就业量之比。

诺思在其著名的论文《区位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中，首次提出了输出基础这个概念。他把区域输出基础定义为"一个区域所生产的可供输出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和"。其中"可供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指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单项输出商品。按照这样的逻辑，输出产业兴办的成败是影响区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区域增长或者是由于相对竞争区域来说其输出品的地位提高了，或者是由于开发了新的输出品。因为，输出产业的发展既决定着区域绝对收入和人均收

人的水平，也决定着区域将要发展的地方性产业的规模和数量。因此，一个区域只有当它的输出基础如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品和最终生产制成品组成的条件下，这个区域就实现了工业化。

博尔顿根据诺思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关于输出基础理论方面的具体的短期增长模型：

$y_p = y_x \cdot y_x / (a + y_x)$

$y_n = y_x \cdot byx(a + by_x)$

其中，y_p 为个人总收入增长率；y_x 为外生收入（输出产业收入）增长率；y_n 为内生收入增长率；y_x 为外生收入（包括外生需求产业的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之和，工资、薪金及业主收入）。

如果 $a=0$,则有 $y_p = y_n = y_x$

如果 $a>0$,则有 Y_p 或 $y_n < y_x$

如果 $a<0$,则有 y_p 或 $y_n > y_x$

特尔顿在研究了美国的区域发展情况以后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a<0$。其原因在于，地方产业（如建筑）的投资增长要快于当地政府在增加收入或输出替代等方面的支出增长。因而，区域总产出增长率和内生收入增长率一般都要大于输出的增长率。因而，唯一例外的情况是，在边际支出倾向大于1的条件下，增加的输出可能被较高的输入所抵消。那么，增加输出并非能较大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实际上，输出基础理论包含着下述假设前提，即所有非输出经济活动（特别是区域的贸易和服务活动）由输出产业的扩大或缩小所诱致。而且，它也没有考虑资源容量的限制和供给因素的影响。因而，把它运用到短期分析时，就明确假定存在着未利用的资源和剩余容量。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即存在供给短缺的情况，那么输出的扩张不是增加总收入，而是提高价格或者促使短缺资源从地方产业转移到输出产业。同时，输出基础理论还具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它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开放经济中的应用，不同的是，输出被单独提到作为影响总需求的唯一外生变量的关键地位，而其它的可能影响均被考虑为不重要。其次，它把输出基础看成是同质的，因而忽略了输出需求增长的区域来源。在输出基础理论中，世界经济仅仅被划分为"区域"和"世界其余部分"两个部分，这种高度的简化，掩盖了区域间的功能联系，继而忽视了区域增长的区际传递过程。第三，在分析区域增长时，输出基础理论十分重视国家需求类型的变化。它特别强调，为了弄清区域增长过程，一个区域不能孤立地研究。即是说，一个区域的增长快慢不能在其边界内决定，国家经济（某些情况下是国际经济）扩展的速度是决定区域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置换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　一次性政府支出增加对以后政府支出持续增加的影响。在战争或经济萧条时期政府支出有了明显增加，但在战争或经济萧条结束以后，政府支出并不会回到战争或经济萧条之前的水平。这种一次性政府支出增加引起了政府支出持续增加的趋势。许多经济学家用这种置换效应来解释政府支出不断增加的原因。例如，英国经济学家 A·帕柯克（A·Peacock）和 J·威斯曼（J·Wiseman）曾在60年代用这种效应来解释战后英国政府支出不断增加的原因。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置换效应仅仅是一种现象，并不是政府支出增加的原因。

意外事故　是指由于偶然的非意料中的原因所造成的事故。针对海上保险业务，意外事故也并非泛指海上一切意外事故。保险人承保的属于意外事故性质的风险为：搁浅；触礁；沉没；倾覆；碰撞；火灾；爆炸；陆上运输工具倾覆或出轨；抛货；海盗行为；船长或船员的不法行为。

十四画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政府采取大规模行动来强调并努力实现社会福利。一般情况下，国家的经济目标有如下四个：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稳定的物价上升幅度、国际收支的平衡。但福利国家却不同于上述目标。福利国家的目标包括：维持全体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生产社会商品和提供劳务，控制经济周期、以及在计算社会成本和收入的条件下来调整总产量。政府公益服务的增加意味着从个体化经济向公私混合经济的过渡。福利国家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福利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确切地讲，福利国家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整总需求。当生产能力很大、而消费需求无法适应产品供给时，就增加政府财政支出。虽然政府支出很大，但生产的主体还是私营企业。现代福利国家的政策工具有：累进税制、社会保障系统、失业保险、农产品价格补贴、政府资助的住房计划等。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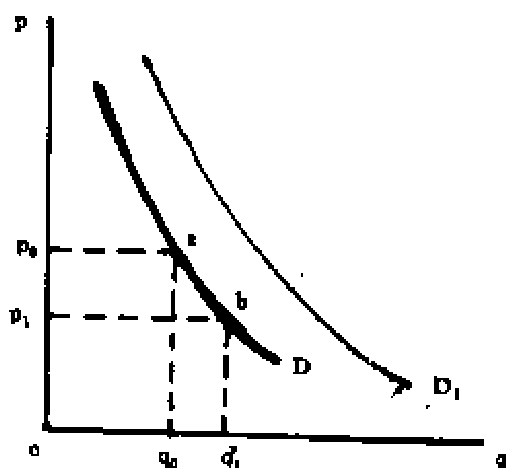
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比较典型的福利国家。美国自从实行"新政"以来，福利国家的性质也在不断增加。典型的福利措施很多，例如，英国政府实施的统管一生的福利资助计划。由于福利国家过分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因此经济发展的动力就略显不足。英国的经济增长迟缓虽然有很多其他因素，福利国家的巨大负担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使公众福利最大化的一种经济理论。在福利经济学中道德标准如公平原则是重要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实际的社会经济目标是假设的，而不是由经济分析所决定的。从公众福利的观点评价一种经济制度的作用时，首要的社会目标不是经济增长方面的，而是公众福利方面的，如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即机会均等；收入分配方面公平的原则是第一位的，虽然效率因素也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能达到最适宜的生活水平，而这种生活水平决定于人们的爱好和抉择并只受资源和技术因素方面的制约。福利经济学通常的原则是，最大多数的人的福利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而不是让某个人或个人集团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福利经济学的先驱庇古对极大经济福利的定义主要根据国民红利的平均数额、分配情况及变动为核心。庇古认为，增加经济福利的过程是指在不受任何强迫之下增加国民红利的效率与数额而言，或者是指增加贫穷者获取的红利的分配比率。福利经济学认为，在收入分配既定的任何条件下，只有竞争性的边际成本定价才会使资源的分配使用达到最优状态。垄断及垄断条件下的竞争是达不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的，因此垄断是应该消除的，而在消除垄断方面，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福利经济学还认为，只有在所消费的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与这两种商品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相等时，才有可能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对生产进行最优调整。

寡头（Oligopoly） 寡头是几种市场结构中的其中一种，其特征是在某一行业的商品市场上买者很多，而只有少数几家厂商供应该行业的绝大部分商品。由于一个行业的商品仅被几家厂商所分割，因此，每一家厂商在该产品市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一个寡头的行为都会对该行业其他寡头的行为产生影响。鉴于这种原因，每一个寡头在进行价格与销售决策时都要考虑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对策。由于寡头的决策不仅要考虑到市场需求条件的变化，还要考虑自己决策行为对于对手的影响，以及对手可能作出的反应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对寡头进行经济理论分析要比对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完全垄断几种市场结构分析复杂得多。在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市场上，厂商数目很多，每一个厂商都不会对市场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厂商不必考虑自己行为引起对手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对自己决策的影响。在垄断市场上，只有一个经营者经营该行业的全部产品，他根本不存在竞争的对手，所以谈不上考虑对手的反应。由于寡头市场上一个寡头作出决策后其它寡头的反应是多种的，因此，寡头的决策行为是不确定的。有多种理论用于分析寡头行为，例如古诺模型、斯威齐模型、张伯仑模型等，这些模型只就寡头行为的某些特征进行分析，而不是概括了寡头的全部特征。近年来又发展了一种博奕论用于分析寡头行为，使得对寡头行为的分析进一步深入。

需求（Demand） 需求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分析的目的不同，需求的概念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它可以是指对于某个别商品或劳务的需求，也可以是指对于社会所有商品与劳务的需求。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都是指对于某个别商品或劳务的需求。对于社会所有商品与劳务的需求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与这里所谈的需求不同。这里所谈的需求，不管是对某个别商品或劳务的需求，还是对于社会所有商品或劳务的需求，都是指市场需求，而不是指单个人需求，市场需求是所有单个人需求的加总。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所分析的是对所有商品与劳务的需求。对于任一商品的需求被看作是受购买者的偏好，购买者的收入，以及其它所有商品价格的影响。在局部均衡理论中，分析的是对个别商品与劳务的需求，需求被看作是购买者的偏好与收入、商品自身价格以及替代品与互补品价格等因素的函数。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关需求的概念建立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分析的需求概念的基础之上。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需求概念时都沿用了马歇尔的传统，把重点放在分析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上，而把影响需求的其它因素看作是常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某种商品或劳务的需求函数所描述的是各种不同价格下对于该商品或劳务所需求的数量。在分析中，严格地区分开需求量与需求。需求是指整个表列，是所有可能的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而需求量是指某一特定价格下所需求的数量。若用需求曲线来描述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用纵坐标表示商品的价格（P），用横坐标表示商品的数量（q），那么除了特殊商品（例如吉芬商品）外，一般商品的需求曲线D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如图所示）。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表明，随某种商品价格的降低，该商品的需求量将增加；随着该商品价格的提高，其需求量将减少。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比关系。



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建立在两种理论基础之上。一种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另一种是经验的研究。按照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对于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由消费者从购买的商品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决定。因为边际效用随所购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因此，随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价格必须降低，这样才能和消费者降低的边际效用相适应。因此需求量和价格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化关系。大量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在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正因为一般商品都存在着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反比关系，因此，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反方向变化关系被称为需求法则。

在区分了需求量与需求的概念以后，很容易区分需求量的变化与需求的变化。由于需求是指整个需求表列，或者说是整条需求曲线，而需求量是指某种特定价格下的需求量，或者说是需求曲线上的一个点，因此，需求量的变化是同一条需求曲线上不同点的变化。例如，需求曲线 D 上由点 a 到点 b 的变化是同一条需求曲线上点的变化，它表示需求量的变化。而需求的变化是整条需求曲线的变化，例如由需求曲线 D 到 D_1 的变化是需求的变化。需求量的变化（q_0 变到 q_1）是由于商品自身价格变化（P_0 变动 P_1）引起的，而需求曲线的变化则是除商品自身价格以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例如，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消费者收入的变化，替代品或互补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导致需求的变化。

根据需求者的不同身份可以将需求分为消费者需求与生产者需求。消费者需求是对消费品的需求。生产者需求是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例如对于机器设备、劳工、原材料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又可以称为最终需求、直接需求，它是直接用于消费的。生产者的需求称为中间需求、派生需求，它是由对于最终的消费需求而派生的需求。无论是对于消费品的直接需求，还是对于生产要素的间接需求，其需求量与价格之间都存在反方向变化的关系（特殊商品除外）。

还可以从销售者的角度来看待需求，称为销售者需求。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需求，每个销售者所面临的需求曲线与通常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不同的。对于那些有众多个销售者销售同质的、无差别产品的销售者来说，每个销售者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即需求曲线的价格弹性为无穷大，表示销售者在既定价格下可以出售任意多的产品。若销售者提高价格，对于其产品的需求量为零。对于只有独家销售的垄断者或销售者人数较多、所售产品存在差别的每一个销售者而言，其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表示销售者若降低价格，对于其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若提高价格，对于其产品的需求量将减少。与垄断者相比，产品存在差别的竞争者的需求曲线的价格弹性要大些。对于只具有少数几个销售者而每个销售者的销售份额都占该产品市场整个销售量相当大比例的寡头销售者而言，其需求曲线的形状是不确定的。

需求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licity of demand）

需求的价格弹性是商品需求量变动率比该商品价格变动率。它用来衡量商品需求量变动对于自身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用 Ed 表示需求的价格弹性，P 表示商品自身价格，△P 表示价格变动量，q 表示商品需求量，△q 表示需求量的变动量，需求的价格弹性表示为：

$$E_d=\frac{\triangle q}{q}\Big/\frac{\triangle p}{p}=-\frac{\triangle q}{\triangle p}\cdot\frac{p}{q}$$

需求法则表明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之间总是呈反方向变化，因此，在需求的价格弹性公式右端加上负号，以使需求价格弹性成为一正的数值，由于需求的价格弹性 Ed 是无量纲的，因此可以对不同商品或劳务的需求的价格弹性进行比较。

对需求的价格弹性取绝对值，为人们对需求价格弹性进行分类提供了方便。需求的价格弹性可以分为五类：完全无弹性、缺乏弹性、单位弹性、富有弹性、弹性为无穷大。当弹性等于零时，此种情况为需求完全无弹性，需求曲线为一条与横坐标相垂直的直线（见图①），它表示无论价格如何变化，购买者购买商品的数量不变。需求完全无弹性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在极少数情况下，需求的价格弹性接近于零。当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零，小于1时，此种情况为缺乏需求弹性。它表示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大于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其价格下降一定的比例后，购买量增加的比例较小。经验的研究表明农产品是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产品。当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于1时，称此种情况为单位需求价格弹性。它表示价格变动某一百分比，需求量变动相同的百分比。需求的价格弹性为单位弹性的商品也较少见。当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时，称为需求有弹性，它表示需求量变动的比例大于价格变动的比例。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弹性无穷大。对于拥有千万个卖者的整

个某一商品市场来说是不存在需求的价格弹性为无穷大的情况的。但是对于单位卖者来说却存在在某一价格下对于其产品具有无穷大的需求的情况，即在某一价格下对于其产品的需求曲线具有无穷大的弹性。完全竞争市场上的某个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就是这种情况，此种情况下需求曲线是与横坐标相平行的一条直线（见图②）。除了图①整个需求曲线是完全无弹性与图②整条需求曲线弹性为无穷大的特殊情况外，一般的同一条需求曲线上并不是只有一种弹性。一条需求曲线的不同点上是有不同的弹性的。图③的需求曲线 D 上；只有在 B 点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于 1，A 点到 B 点之间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 1，B 点到 C 点之间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 1。从几何上可以证明需求曲线 AC 上任意一点 F 的价格弹性等于线段 AF 比线段 FC 即$\frac{AF}{F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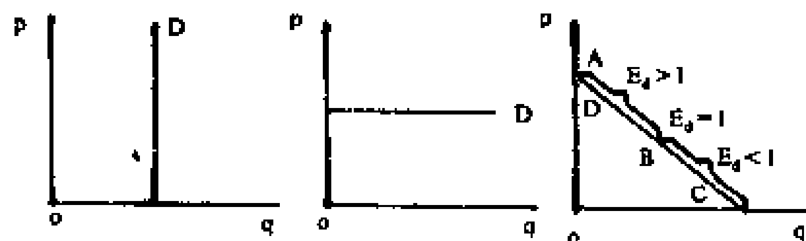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图 3

需求的价格弹性有点弹性与弧弹性之分。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需求的价格弹性称为弧弹性。需求曲线上任一点需求的价格弹性称为需求的点弹性。由于需求曲线上各点的弹性并不一样，因此，弧弹性只是一种近似值。$\frac{\triangle q}{\triangle P}\cdot\frac{P}{q}$表示的弹性是弧弹性，$\triangle P$ 值越大，用$\frac{\triangle q}{\triangle p}\cdot\frac{P}{q}$表示的弹性值的近似程度越低，$\triangle P$ 值越小。用$\frac{\triangle q}{\triangle p}\cdot\frac{P}{q}$所表示的弹性值的近似程度越高，当$\triangle P$ 趋向于零时，$\frac{\triangle q}{\triangle p}\cdot\frac{P}{q}$表示的就是点弹性。点弹性用$\frac{dq}{dp}\cdot\frac{P}{q}$表示，$\frac{dq}{dp}$为需求量对价格的导数值。

需求的价格弹性与厂商的收益具有很大的关系。富有需求价格弹性的商品，降低价格可以增加总收益，因为需求量增加的比例大于价格下降的比例。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商品提高价格会增加收益，降低价格会减少收益，因为提价时需求量下降比例小于价格提高的比例。

一种商品是富有弹性还是缺乏弹性取决于替代品的数量及其相近程度，商品在消费者预算中的比例以及商品用途的多寡。商品的替代品数目越多、相近程度越大，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大，反之，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小。商品在消费者预算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其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大，否则，其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小。商品的用途越多，其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大，反之，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小。

需求的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 If demand）

需求的收入弹性是需求的变动率比购买者的收入变动率，用 Y 表示购买者收入，$\triangle Y$ 表示收入增量，q 表示需求量，$\triangle q$ 表示需求增量，E_Y 表示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收入弹性可以表示为$E_Y=\frac{\triangle q}{q}/\frac{\triangle Y}{y}=\frac{\triangle q}{\triangle Y}\cdot\frac{Y}{q}$。购买者对于商品的需求不仅受商品的价格的影响，也受自己收入变动的影响。需求的收入弹性是用来测度当其它条件不变而只有购买者收入发生变化时，需求量变动对于收入变动作出反应的敏感程度，可以把需求的收入弹性分为弹性较低，弹性较高，负的弹性几种类型。当 $0<E_Y<1$ 时，称为低收入弹性，当 $E_Y>1$ 时，称为高收入弹性，当 $E_Y<0$ 时，称为负收入弹性。一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高还是低要看该商品在消费者预算中的比例是大还是小。若某商品占消费者的预算比例较大，则一般而言该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若某种商品占消费者预算的比例较小，则一般而言该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奢侈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但不管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大于零，因此都属正常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负值的产品称为非正常品，也称为低档货，这类商品随消费者收入增加，购买量反而减少。

需求价格（Demand price） 需求价格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 · Marshall）最先创立的一个概念。需求价格是消费者为额外增加一单位商品的购买而愿意支付的价格。例如，在购买量为整数的情况下，第 X 个单位商品的需求价格是在假定消费者已经得到第 x-1 个单位的商品后，为得到第 X 个单位商品而愿意支付的价格。随着消费者购买量的增多，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是递减的，即购买量 x 越大，第 x 单位商品的需求量越小。消费者对于所购买商品中每增加一单位购买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构成整个需求表列。在购买量可以无限分割的情况下，由需求量与需求价格构成的需求表列绘在坐标图上便得到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其中，横坐标表示需求量，纵坐标表示价格，表明需求价格是需求量的函数。对所有消费者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的加总便得到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马歇尔对于需求价格的分析是建立在对于消费者行为的两个一般假定基础之上：其一是消费某种商品所得到的效用只依赖于所消费的该商品的数量；其二是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由于消费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商品的购买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是递减的，所以，需求价格随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

马歇尔还构造了供给价格的概念，供给价格是供给者每供给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市场上某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是该商品供给总量的函数。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相等时的价格为市场均衡价格。

马歇尔的需求价格的概念是建立在单商品的效用以及商品的需求的分析基础上的。今天，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已经发展到对多商品效用与需求的分析。而且，当代经济学对于商品数量与价格之间关系的二元分析方法已经揭示了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在进行理论和计量分析时，不仅可以象马歇尔那样把价格看作是数量的函数，也可以把数量看作是价格的函数。这种二元的分析方法在微观经济学中经常使用。

需求的变化与需求量的变化（Change in demand and change in the quantity demanded）　参看需求。

需求法则（Law of demand）　需求法则是微观经济学中关于需求的一个重要法则。其内容是，除极少数商品与劳务外，一般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量与价格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某种商品或劳务的价格提高，对于它的需求量将减少；而若该商品或劳务的价格降低，对于它的需求量将提高。一般认为，具有吉芬效应和具有凡勃仑效应的商品其需求量与价格之间不存在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具有吉芬效应的商品，或者说吉芬商品，是指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的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因此，该种商品价格较高时需求量较大；而价格降低后，因价格降低而导致人们实际收入的提高（收入效应）使得人们反而减少对于该商品的需求。具有凡勃仑效应的商品所指的是那些象征社会地位的摆阔性商品。该商品价格越高，人们的需求量越大。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具有吉芬效应的商品与具有凡勃仑效应的商品其需求量与价格之间同方向变化的关系是因需求的变化（除商品自身价格以外的其它影响需求因素的变化导致需求的变化）引起的，例如价格下降后引起人们实际收入变化，人们的偏好变化而导致需求变化，因此，这并不违反需求法则。

需求转换的通货膨胀（Demand-shift Inflation）　一种用总需求结构变化来解释通货用品膨胀的理论。这种理论是把需求推动与成本推动两者结合在一起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根据这种理论，总需求构成的变动引起经济中某些部门得到扩张，而另一些部门不得不收缩。但由于社会经济中存在着结构刚性，资源不能迅速适应总需求构成的变动而在各部门迅速地流动。这样，扩张中的部门资源缺乏，特别是劳动力缺乏，而收缩中的部门资源过剩，特别是劳动力过剩。扩张中的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收缩中部门的工人也根据公平的原则要求工资与扩张中的部门同比率增加。这样，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产生了。这种理论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过程是：总需求结构变动→工资上升→物价上升。而其关键原因则是结构刚性。因此，紧缩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对制止这种通货膨胀无效，单纯的工资控制作用也不明显，唯一的办法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均衡增长。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Demand—Pull Inflation）　又称"需求型通货膨胀"，指由于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从而出现膨胀性缺口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超过了在现行价格条件下可能的供给"。这种通货膨胀是由英国经济学家J·凯恩斯所提出的。他认为，当经济中实现了充分就业时，表明资源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这时，如果总需求仍然增加，就会由于过度总需求的存在而引起通货膨胀，如附图1所示。在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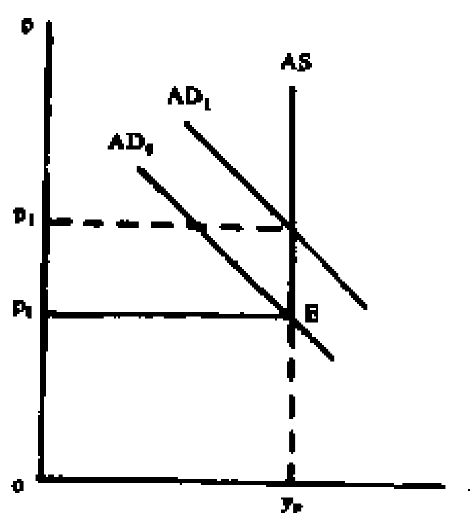


图1

中，横轴OY代表国民收入，纵轴OP代表价格水平。当总需求水平为AD_0时实现了充分就业，AD_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于E，决定了国民收入为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Y_f，价格水平为p_0。当总需求继续增加到AD_1时，由于国民收入无法增加，价格水平上升到P_1，这样，就产生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强调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不会并存，通货膨胀是在充分就业实现以后产生的。但实际上，在经济中未实现充分就业时，也可能由于总需求增加而引起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仍然属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在附图2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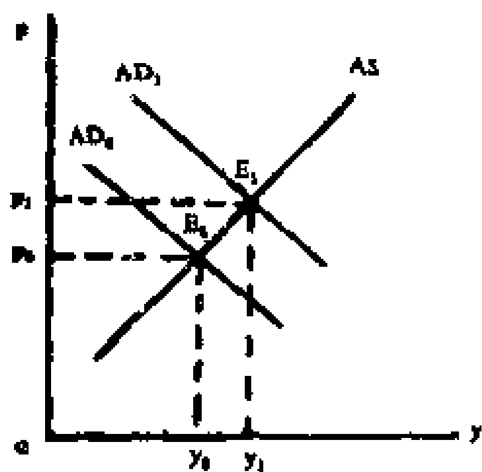


图2

当总需求为 AD_0 时，AD_0 与总供给曲线 AS 相交于 E_0，决定了国民收入为 Y_0，价格水平为 P_0，这时还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总需求增加到 AD_1 时，AD_1 与总供给曲线 AS 相交于 E_1，这时，国民收入增加至 Y_1，价格水平上升为 P_1。因为总需求增加首先引起了价格水平上升，所以，当总供给没有满足总需求时，仍然存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即价格水平由 P_0 上升为 P_1。货币主义者对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解释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强调了货币因素对增加总需求的作用，因此，造成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还是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这就是说，没有货币供给量的相应增加，是不会引起持久的总需求过度，也不会产生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他们把通货膨胀的过程概括为：货币量增加→总需求增加→通货膨胀。总之，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都认为需求过度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对引起总需求过度的原因解释并不相同，前者强调实际因素（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后者强调货币供给量。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一种出现最早，而且影响又相当大的通货膨胀理论。

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 通过调节总需求来稳定或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认为，决定经济状况的关键是总需求，当总需求小于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时，经济中存在着失业，当总需求大于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时，经济中存在着通货膨胀。在短期中，总供给是既定的，因此，就应该通过需求管理来稳定或刺激经济，达到预定的经济政策目标。由此得出，需求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当总需求小于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时，应该采用扩张性政策，以便刺激经济，消除失业；当总需求大于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时，应该采用紧缩性政策，以便抑制经济制止通货膨胀。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使总需求等于充分就业的总供给，从而实现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需求管理的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者重视需求管理政策，但从70年代之后也认识到，仅有需求政策是不够的，还要采用供给政策与其他政策与需求政策相配合，才能有效地稳定经济。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需求管理政策。货币主义者认为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而在长期内不仅无用，还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需求管理政策不仅在长期中无用，即使在短期中也无用。他们都主张借助于经济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稳定。

静态分析（Static analysis） 静态分析的方法一般认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 Clark）在《财富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eth）一书中明确提出的。克拉克把经济学分为研究不同规律的三个部分：(1) 研究经济的"普遍规律"；(2) 研究"静态经济规律"；(3) 研究"动态经济规律"。所谓静态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资本数量、人口、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需求状态等被假定为固定不变这一静态社会里所起作用的规律。现在人们所说的静态分析就是不考虑时间变量的分析方法，它假定生产要素等为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所达到的均衡状态以及为确保这种均衡所要求的条件。传统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就是一种典型的静态分析，它分析各种经济变量达到均衡点的状况以及为确保均衡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而并不分析达到均衡状态所经历的过程。例如已知商品的需求状况和供给状况，就由此可得供需均衡点，并可求出此种均衡条件下的价格和产量。对于经济"静态"本身，西方经济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克拉克以资本、人口、技术、生产组织和需求处于固定的经济循环为静态，而熊彼特（J·A·Schurnpeter）所谓的经济静态是指一定经济时期内重复进行的，与前一时期同样内容的经济活动。A·马歇尔则认为动态与静态并不是对立的概念，静态是动态的一个阶段。与静态分析相对的还有比较静态分析（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和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前者分析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变化，而不涉及变化过程，后者正是要分析这个过程（参见"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静态分析往往是纯流量或纯存量的分析，一旦涉及到流量与存量的转化，那就是动态分析。

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l index） 是一种衡量

工业市场集中程度的方法。希茨曼—赫芬达尔指数（HHI）的来源是这样的。先求出每个厂家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再将其自乘，然后将全部厂商所占份额的平方和相加，便得到该指数。其式为

$$HHI=\sum_{i}^{n} si^{2}$$

式中 si 代表第 i 家厂商所占市场份额，n 为厂商数量。如果 si 是从 0 到 1.0 来估算的，那么 HHI 就是从 0 到 1.0。如果 si 是按百分比来估算的，即从 0 到 100，那么 HHI 值是从 0 到 10，000。这个指数最先使用的是能源经济学家赫芬达尔，而希茨曼较早地用这一指数来评价对外贸易状况，因此是用两个人的名字来称呼这一指数。这个指数是综合的，但是标准的集中比率仅仅包括居于前列的公司。这个比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到很大重视，但并不是没有取代标准集中比率而成为主要的指标。赫芬达尔指数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作为一个纯数字比率，它缺乏内容。使用者必须将之转换为真实的集中比率，否则就不能表达其意义。例如，HHI 的指数为 1500，并不能说明什么。第二、HHI 指数的数据要求十分巨大。如果是关于个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那么全部的数据都是要利用的、不能合并或综合。最后，在这个系数中找不到关于主要市场占有者的痕迹。例如，一个厂商占据市场的 70%，HHI 为 4900，但是 4900 这个数不能表明有一家厂商的市场占有率为 70%。

赫克歇尔，伊莱·菲利普（Eli Filip Heckscher，1879—1952）　瑞典经济学家，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1909—1929 年任斯德哥尔摩商学院经济统计学教授，1929 年起改任该校经济史教授和经济史研究所所长，1949 年退休时被聘为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欧洲大陆体制的经济观》（1922 年）《重商主义论》（1931 年）和《瑞典经济史》（1954 年）。赫克歇尔是瑞典学者中最著名的经济史家。他对经济史的研究兼有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长处，显得尤为全面深刻。他曾用巨幅鸿篇探讨了西欧主要国家的重商主义演变史，内容涉及经济理论、社会思想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更迭嬗变，被推崇为这方面迄今最系统完整的著作。赫克歇尔对经济理论的实际贡献则是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命题，即应当用两国的生产要素秉赋不同和生产不同商品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比例不一样，来解释李嘉图关于两国之间比较成本存在差异的问题。后来他的学生俄林接受和系统发挥了这种思想，形成影响深远的生产要素秉赋理论，史称赫克歇尔—俄林学说。

赫克歇尔—欧林定理（Hecksher—ohlin theorem）　赫克歇尔—欧林定理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组成部分，与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定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雷布登斯基定理共同组成要素禀赋理论，即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主体。赫克歇尔—欧林定理的基本思想最早由瑞典学派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 · F · Hecksher）提出，而后赫克歇尔的学生欧林（E · Ohlin）在其代表作《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加以总结和发扬，故而合称为赫克歇尔—欧林定理，又称为赫—欧模型。

赫克歇尔—欧林定理的成立以下列条件为假设前提：

（1）2×2×2 模型，即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

（2）生产要素在一国国内不同部门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上不能自由流动。

（3）各种商品生产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处于自由竞争的状态，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没有关税和运输成本的障碍。

（4）商品的生产函数为齐次线性函数，即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5）同一商品的生产函数在各国均相同，即各国生产的技术水平相同。

（6）各国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即各国间的社会无差异曲线相同。

（7）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存在生产要素密集度在国际间逆转现象，所谓生产要素密集度，是指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比例，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可逆转则表明原为劳动密集型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始终保持这一劳动密集型的性质，而不会由于生产要素价格等方面的变化，转变为资本或其它要素密集型商品。

在以上前提条件的限制下，可以进行如下推理：在国际贸易发生之前，两国商品价格比率的差异决定于两国各自所拥有的生产可比性线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由于前面已有假定条件：各国的居民消费偏好相同，从而各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形状相同，这样、在国际贸易发生前的两国商品价格比率的差异就决定于两国生产可能性线的差异，而一国生产可能性线的形状取决于各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以及该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同样，依据前面的假定条件：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函数相同，但均为线性齐次生产函数，这样，两国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差异取决于两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的差异，从而可以得出：两国商品价格比率的差异乃是因为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存在着差异。

通过以上的推理，有以下赫克歇尔—欧林定理：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状况不同，形成了各国生产要

素的相对丰裕程度不同，而不同商品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密集性不同，因此，各国集中生产那些能够较密集地使用其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产生比较利益，即各国必然会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较密集地使用其相对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进口那些需要较密集地使用其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商品。

赫克歇尔——欧林定理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赫——欧定理也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围绕着赫——欧定理，国际经济学家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一方面对赫——欧定理进行了积极的统计验证，产生了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c）（见辞条）另一方面，在验证的同时，又在多方面进行修正，引发出一系列新的国际贸易思想和理论。这些修正主要表现在对于赫克歇尔——欧林定理的前提假设条件的讨论上。

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一样，赫——欧定理的假设条件大多与现实相距甚远，例如：生产要素在一国国内具有完全流动性，而在国际上不具流动性的假设；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国际贸易没有运费、关税等障碍的假设，这些假设使赫——欧定理的成立基础带有一定的脆弱性。

对于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度不存在逆转现象的假定，至今在现实中还没有得出经验性的证明，但是，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两国间有一种商品发生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度逆转的现象，将不妨碍赫——欧定理的有效性。

对于各国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的假定，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假设不同国家的每一生产要素所有人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都有相同但具齐次扩张性的消费偏好，虽然在总体水平上不必有相同的消费偏好，赫克歇尔——欧林定理仍然有效。

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Hirschman—Herfindanl Index）　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简称 HI）是测度卖方集中度的常用指标。这一指标因由赫希曼和赫佛因德先后提出而得名。HI 定义为特定产业各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平方和。假定 X 为某产业总销售量，Xi 为 i 企业销售量，Si 为 i 企业市场占有率，n 为产业内的企业数，则 HI 可表示为：

$$HI=\sum_{i=1}^{n}S_i^2=\sum_{i=1}^{n}\left(\frac{X_i}{X}\right)^2$$

为便于分析 HI 的性质，设$\overline{X}$为产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并对上式作下列变换：

$$HI=\sum_{i=1}^{n}\left(\frac{X_i}{X}\right)^2=\frac{\sum_{i=1}^{n}X_i^2}{\sum_{i=1}^{n}X^2}=\frac{\sum_{i=1}^{n}X_i^2}{(n\overline{X})^2}$$

$$=\frac{\frac{\sum_{i=1}^{n}X_i^2}{n}-\overline{X}^2+\overline{X}^2}{n\overline{X}^2}=\frac{\frac{1}{n}\sum_{i=1}^{n}\frac{X_i^2}{\overline{X}^2}-1+1}{n}$$

$$=\frac{C^2+1}{n}$$

由于 C 为数理统计中的变动系数，可见 HI 值取决于描述企业规模不均等程度的变动系数和企业数量 n。对于垄断市场，n=1，c=0，HI 取最大值 1；对完全竞争市场，可以认为企业数目非常多 n→∞，企业规模间的差别非常小 c→0。HI 取最小值 0。HI 反映了产业内企业数以及企业的规模分布，这比起集中率有优越性。但 HI 值对上位企业，即规模较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反应特别敏感，而对较小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小幅度变化和小企业数量的变化，反应不敏感。

模拟模型（Simulation models）　模拟是用电子计算机对真实系统在一定环境下各要素的相互作用进行有条件的模仿试验，并求得数值解的一种数量分析方法。它不同于一般求解确定性的、静态线性问题的数学解析法，它能比较真实地描述和近似地求解复杂系统的问题。在经济学中，对模拟模型有三种不同的认识：（1）模拟模型是描述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行为，研究该系统某方面变化如何影响其他方面或整个系统；（2）模拟模型是对动态方程组按期求，以实现预测的目的；（3）模拟模型是对所有可替换的结合方式进行有控制的试验，观察其后果，从中选择较好的特定结合方式。模拟的步骤包括确定问题、收集资料、制订模型、建立模型的计算程序、鉴定和证实模型、设计模型试验、进行模拟操作和分析模拟结果。一般认为，模型有如下几个作用：（1）能对高度复杂的内部相互作用的系统进行研究和实验；（2）能设想各种不同方案，观察这些方案对系统的结构和行为的影响；（3）能反映变量间的相互关系；（4）能研究不同时间相互间的动态联系，反映系统行为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5）能检验模型的假设，改进模型的结构。但模型也有局限性，主要有：（1）它选择的方案可能遗漏了最优方案；（2）它的运用范围只限于能考察的情况，一旦出现不能模拟的情况时，就会发生困难；（3）成本高、费时间、工作复杂。

模型与理论（Mqdelsand theory）　经济现象十分复杂，仅以直接的观察和分析，难以把握千变万化的事实。借助于理论和统计资料，即从复杂和变动现象之中，抽取其某种经济量的关系和函数关系，编成

方程式，构成模型。所谓模型分析，是用来分析过去和现在，预测将来的经济定理。理论是编制模型的根据，而模型又可以使理论具体化、现实化。经济模型被许多经济学家用来作为经济分析的武器。如魁奈的经济表、马克思的再生产表式、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凯恩斯的收入分析、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是最有名的经济模型。经济模型的重要性在于说明现实经济什么是未知的，什么是已知的、未知的与已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经济模型的建立不是轻而易举的，对现实经济及经济理论必须有一个彻底的理解。要有精细的分析技术，从最复杂的事实中得出最简单的公式。就是说，简单的数学模型，包罗了复杂的经济事实，如果模型本身脱离了现实，那就没有意义了。模型的建立要经受两方面的检验。一种是数理统计的检验，主要检验模型的稳定性，误差大小等；另一种是经济检验。而这又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理论检验、二是事实检验。一个好的经济模型，可以为分析现在和过去提供很好工具，也为对未来的预测提供了较为可信的标准。

缪勒，亚当（Adam Muller，1779—1829）　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最早先驱者。生于柏林，当过王子的家庭教师，从1813年起先后担任奥地利政府的文职人员和外交官员。主要著作有《政治学原理》（1809年）、《国家财政管理》（1812年）和《新货币理论检验》（1816年）等。缪勒作为“浪漫主义派”的领袖，最先提倡所谓的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国家是代表民族和国民生活的总体，亦是协调经济生活与更高社会目标的最适当机构，因此，国家的统一和国家政权的作用至关重要，同时应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国家经济学体系”。他十分强调国家的有机性，并认为作为人民的每一分子既属于自己又属于社会。他极其注重“精神资本”对生产的作用，认为由前代传下的知识、经验、思想以及道德等构成的“精神资本”是国民的真正储蓄，它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增加。他还宣扬推行保护贸易政策，这样做既可保护民族工业，又能激发人民对于国家的情感。缪勒的这些论述都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有关思想时展开的，它们反映了后起的德国资产阶级迫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缪勒的学说曾给予李斯特以甚多的启迪，更对历史学派发生很大的影响，故历史学派学者都对他十分推崇和赞赏。

廖施的区位理论（Losch's Location Theory）
廖施（A · LOsch）是德国经济学家，其1940年出版的《区位经济学》被认为是20世纪前半期西方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区位理论著作。其理论特点是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即利润原则来说明工业区位的决定趋势，他不但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研究了整个工业的区位问题，也从局部均衡的角度研究了一个工厂的区位问题，其理论核心是将中心地学说应用于工业区位和工业市场区的形成研究。廖施假定一个工业中心地的周围是农业区域，农业区域的居民是工业品的购买者；假定这些居民的偏好是相同的，从而他们有相同的个人需求曲线，工人决定其生产品的价格，消费者承担产品的运输费用，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个工业中心地会出现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只要这些居民的需求是有价格弹性的，那么距离中心地越远的居民需求就越少；第二，以工业所在地为中心的半径越大，到中心地来购买工业品的消费者就越多。一般来说上述两种情况往往是并存的，假定没有新的企业加入到这个中心地，那么工业区位则主要由其产品的销售范围的大小而决定，也就是说，工业区位主要由对其产品的需求量来决定。这样，一个工业如果设于它能吸引足够数量的消费者的地点，它就能够获得利润，否则，它就不能获利，而这样的地点也就不适宜成为工业所在地。其中影响产品需求的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价格的高低；（2）需求的强度；（3）市场的半径，这是指消费者所处的地点与消费地点之间的距离的大小；（4）每单位距离的单位产品的运输成本，即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所需要支出的运输费用。对单个工厂来说，决定厂址后选择的约束变量也基本相同。因为工人所需要得到的不是产品的总销售量，而是通过销售所能得到的总利润量，总利润量等于总销售量的总收入减去总成本。而总销售量又取决于销售出去产品的数量与平均价格。工厂要使自己所得到的总利润量增加，在平均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必须使总成本减少，使销售出去的产品数量增大。工厂能销售出去的产品数量与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有关。在价格一定、单位距离的单位产品的运输成为一定的前提下，工厂能销售出去的产品的数量受需求强度和市场半径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产品的需求强一些，那么市场半径就可以小一些；反之，如果对产品的需求强度小，则需要有较大的市场半径，才能使工业品有足够的消费者。根据对历史的考察，廖施认为近代西欧的工业区位正是按产品需求量的大小而逐步形成的，每一个新出现的工业点都无法离开它周围的消费者。

境外金融市场（External Financial Market）
亦称“离岸金融市场”。见“离岸金融市场”。

管理浮动（Managed Floating）　又称“肮脏浮

动"，"自由浮动"的对称。浮动汇率的形式之一。政府有关部门对外汇市场进行或明或暗的干预，使本国货币的汇率不至于过份地上浮或下浮。因汇率变化对一国国际收支及国内经济的各方面皆有深刻的影响，为了保护本国利益使汇率朝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变动，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均采取管理浮动。管理浮动和固定汇率不同，既无需要长期维持的法定比价亦无需长期维持的波动界限。

管理价格通货膨胀（Administered Inflation） 管理价格是指企业有较强的控制力，不受或很少受市场需求变化影响的价格。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米斯。他研究了20—30年代美国高集中度产业，发现这类产业的价格刚性特点十分明显，当市场不景气时，价格也不下降或者下降幅度很小。随后，在美国陆续发展出几派有关管理价格通货膨胀理论。管理价格通货膨胀理论在说明美国于1953—1958年间产生的滞胀现象的同时，也指出高集中产业在不景气下，会将工资、原料成本转嫁到价格以维持高利润率的事实。由于此种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是以市场支配力为前提，因此把此种通货膨胀称为管理价格通货膨胀。管理价格通货膨胀主要有威易斯模型来加以说明。其它分析模型都是以威易斯模型为基础或稍加修正。在威易斯模型中，是以需求变化率Q、每单位生产量中成本平均变化率M、每单位生产量中工资平均变化率W、卖方集中度CR等因素，来说明各产业的价格上升率P。他以1951—1959年的81个产业，得到下列分析结果。

$$P=23.8-0.013Q+0.442M+0.369W+0.076CR$$

$$(0.43)\quad(8.67)\quad(5.12)\quad(2.30)$$

$R^2=0.72$ （括号内为t值）。

上述结果显示Q的系数不具显著性，亦即需求的增大不是引起价格上升的原因。M和W的系数均是正数且具有显著性，亦即是成本推动因素引起价格的上涨，再者CR的系数是正的而且具显著性，显示了卖方集中度越高产业的价格上涨率越高。另外，M、W和CR之间存在高度相关，表示了原料成本、工资上涨可以透过市场支配力来转嫁到价格上，亦即管理价格通货膨胀。美国、日本等地的实证分析大都发现了下述共同事实：一、一般而言，卖方集中度越高的产业其价格的变动坡度和变动幅度越小，即属于管理价格的产品越多。二是工资对价格上升的推动作用是与集中度有关的。在高集中度产业，一般工资上升率也高，可以通过提价转移较高的工资支出。三是在经济不景气时，管理价格现象表现明显。卖方集中高度的产业在不景气时特别容易出现价格向下刚性。

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 18世纪初英国作家B·孟迪维尔（B·Mandeville）所作，又为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引用的一首寓言诗。内容是描述了一群蜜蜂的兴衰史。有一个由一群蜜蜂所组成的社会，最初蜜蜂们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大肆挥霍浪费，结果整个社会兴旺发达，百业昌盛。后来，它们改变了原有的习惯，放弃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朴素，国家也削减军备，大家都致力储蓄，结果社会凋蔽，到处是一团糟。因为大家都崇尚节俭，于是奢侈品无人过问，原有之奢侈品，如衣饰、车马、宫室之类，或变卖偿债，或任其荒芜。结果是土地宫室等之价格大跌，依靠供给奢侈品为生者无法谋生，又因各行业皆有人满之患，亦无法改行。于是，经济衰落，终于被敌手打败而逃散。作者所得出的教训是："仅仅是美德，不能使国家兴盛；彼欲恢复古之黄金时代者，于致力于俭朴时，也要顾到平民生计。""因为在私人家庭中，处处节俭打算，从事储蓄，的确是致富之道，于是有人想，不论国家得天之厚薄，假使每个人都实行以上这个方法，则国家也可以致富。例如有人认为，假使每个英国人都择其邻居之节俭者而从之，则英国人比现在还要富。我认为这是错的"。"使国家兴盛快乐之道，厥惟给予每个人以就业机会。为实现以上目标，政府应当第一，提倡各种制造、技艺、手工业，凡人类才智所能及者，皆予提倡；第二、奖励农渔二业，普及各部分，使土地也像人一样出力。要靠这种政策，国家才能伟大幸福；用一些琐碎规章，来限制奢侈，提倡节约，是于事无补的"。这首诗所宣扬的思想在当时受到指责，1923年英国中爱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的成员曾宣判该书为败类作品。在《通论》中，凯恩斯引用了这个故事说明了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个故事所说明的个人美德与社会繁荣之间的矛盾正是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所引出的"节约的悖论"。

漏出（Withdrawals） 在国民收入流量的收支出循环中，从流通中撤出，从而不支出于现期生产的商品和劳务上的任何收入。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居民户不用于现期消费支出的储蓄、政府的税收，以及国外的进口都属于漏出。根据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漏出减少了现期支出，从而减少了总需求，对国民收入具有收缩作用。这种收缩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乘数的大小。

稳定职能（Stabilization Function） 政府维持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使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能。美国经济学家R·马斯格拉夫（R·Musgrave）认为，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个经济职能之一。但对政府

如何行使这一职能，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要主动积极地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来稳定经济，发挥其稳定职能。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有其内在稳定性，政府的稳定职能不是采用这些干预经济的政策，而是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稳定政策（Stab: lization Policy） 又称"反周期政策"（Countercyclial Policy），是政府为减少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而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的总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周期性波动。经济繁荣时期，国民收入与就业水平高，但通货膨胀严重；在经济衰退时期，国民收入与就业水平低，失业严重。而且，如果由经济本身进行自发调节，则繁荣与衰退会交替地出现。为了熨平这种周期性波动，使经济维持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稳定增长，政府就必须运用各种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这些政策统称稳定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对外经济管理等多种政策工具，但其中运用最广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特点在于"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繁荣时期任何紧缩性政策都具有反周期的含义，而在衰退时期任何扩张性政策也都具有反周期的含义。换言之，稳定政策的反周期含义在于在经济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上，政策都使经济向相反的方向变动。战后西方国家广泛运用了稳定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起到了某种稳定作用，但也引起了不同的问题。经济学界对稳定政策的作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由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不稳定的，因此，这种经济需要加以稳定，也可以加以稳定，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来干预经济是经济稳定与繁荣的唯一途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强调经济本身具有内在稳定性，资本主义经济依靠市场调节完全可以实现稳定与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稳定政策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其结果不是稳定了经济，而是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但它们之间仍有分歧，这就在于，货币主义者承认稳定政策在短期中有一定作用，而在长期中无用，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稳定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都无用。无论各派经济学家的看法如何，现在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稳定政策。尽管在某些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所减少，但国家干预经济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稳定状态增长（Steady--state Growth） 人均资本量不变，即资本一劳动比率不变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稳定状态的含义是，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人均资本量不变，资本一劳动比率不变，从而人均产量也不变。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长，为了使人均资本量不变，资本存量必须和人口按同一比率增长。所以，稳定状态增长也就是产量、人口和资本按同一比率增长，经济处于按一固定比率增长的均衡状态。以△Y／Y代表经济增长率，△K／K代表资本增长率，△N／N代表人口增长率，则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是：

$$\triangle Y/Y=\triangle K/K=\triangle N/N$$

当经济中按人均计算的经济变量都按同一比率增长时，就实现了稳定状态增长。经济学家们研究这一均衡状态是否可能存在，如果存在的话，经济是否会按这种状态增长。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状态是可以存在的，并探讨稳定状态增长的途径，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由于现实中存在的复杂因素，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稳定（Stability） 经济活动达到高水平而且不存在严重周期波动的一种状态。从本质上讲，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活动中与衡量是否稳定有关的量有：生产、就业和物价。如果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经济稳定，就必须有一个增长的标准。经济增长一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二是要适应人口增长的压力。因此，从实物方面看，经济稳定的标准必然表现为与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相等，而不稳定，则表现为与可能达到的生产水平相背离。与这种对稳定的实物经济活动（即就业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所下定义不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物价稳定，通常是指物价水平的固定不变。如果人口和生产率决定了稳定的实物经济活动是长期趋势，那么物价稳定就是可取的。因此，没有严重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稳定的主要标准。物价稳定只是经济稳定的一个方面，如果生产下降，就业水平下降而带来的物价稳定，就不是经济稳定，而是经济萧条。现代经济不是实物经济，货币供给与需求在经济生活中起重大作用。货币政策在整个金融政策以至于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情况是货币供给增加，经济增长加快，就业量增加，但会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因此，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政策是达到经济稳定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

稳定人口理论（Stable population theory） 在1911年，A·J·罗特卡就证明了稳定人口的存在。稳定人口是指人口的年龄分布、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均不变的人口状态。当然，稳定人口的条件是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的稳定，以及移民是稳定的，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如果稳定的人口被死亡率或出生率的暂时变动所打破，那么人口经过一段时间后又

会回到均衡状态，即不变的出生率、不变的死亡率和不变的年龄结构。罗特卡对人口稳定性的证明说明，在一个封闭的人口环境中，不论什么样的年龄分布和人口数量，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固定，就会在后来形成固定不变的年龄结构。也就是说，固定的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的初始状态无关。在1957年，可亚利作出了人口独立于其过去的假定。很明显，当生育率与死亡率变动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变动，但年龄结构的变动却与很久以前的人口状况无关。例如，法国的人口构成不再受拿破伦战争时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影响，希腊的人口年龄分布不再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任何一个人口状况，不论稳定与否，都与其遥远的过去无关，而稳定的人口，不仅与遥远的过去无关，而且有一个固定结构。固定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稳定人口理论有精密的数学证明，这种理论在某些方面也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十 五 画

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 由于劳动市场上出现的暂时的、或偶然的供求失调而造成的失业。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A·庇古(A·pigou)所提出，而为凯恩斯所采用。凯恩斯对摩擦性失业的解释是："或由于估计错误，或由于需求之时断时续，以致各种专业化的资源之相对数量，暂时失调；或由于若干变化之未曾逆，以致产生时间间隔，或由于从一业改就他业，中间须隔若干时日，故在此非静态的社会中，总有一部分资源，在改业过程中暂时无业；凡此种种都可引起失业。"摩擦性失业的存在与充分就业并不矛盾。现代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中由于正常的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的失业称为摩擦性失业。这种劳动力流动包括已从业工人在各行业、各企业、各地区之间的正常流动，也包括第一次参加工作或再次加人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工人在寻找工作期间的失业。正常的劳动力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摩擦性失业也属于正常的自然失业。

摩霍克峡谷方案 作为雇主破坏罢工方法的集大成者，"摩霍克峡谷方案"内容包括：在报纸上公开宣传，把工会说成是个暴虐机构，这个暴虐机构把少数人意志强加到反对罢工的大多数工人头上；利用公民委员会和国民警卫队；由雇主挑起暴力行动；鼓吹复工运动；用乐队、演说者等等在复工那一天大张旗鼓地宣扬复工。"摩霍克峡谷方案"是雷明顿制鞋公司在1936年发明的，该公司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方案。摩霍克峡谷方案主要是利用舆论压力和工人恐惧失去工作的心理，在集体交涉中增强雇主的交涉力量，削弱工会的力量。

摩根斯坦，奥斯卡（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 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德国，1925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1929—1938年在维也纳大学执教。1938—1970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其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同约·冯·纽曼一起将博奕论引进了经济理论。在两人合著的《博奕理论与经济行为》(1944年)一书里，他们运用拓朴学深人分析了利益不同的两人之间的竞赛战略如何决定和组织，并强调一切经济行为都可从博奕论原理为前提来展开分析。这就为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摩根斯坦还对经济政策理论和国防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潜在产量（Potential Output） 又称"充分就业产量"(Full—employment Output)，指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时所达到的产量水平，即一个经济的潜力。有两种估算潜在产量的方法。一种是根据总生产函数，估算出各种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然后据此估算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时的总产量水平、另一种是先估算出充分就业时的总劳动时数和每小时的人均产量（即劳动生产率），然后把这两个数字相乘，得出潜在总产量水平。这两种方法都涉及到许多难以准确估算的因素，在实际计算中也颇为复杂。因此，一般所估算出的潜在产量并不一定准确。在凯恩斯主义国民收人决定理论中，所进行的是短期分析，通常假定潜在产量是不变的，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实际产量水平如何达到潜在水平．总需求分析正适用于这种分析，需求管理政策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所进行的是长期分析，这时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提高潜在产量水平。根据这种分析，增加潜在产量的途径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人（即劳动力与资本的增加），以及实现技术进步（即提高生产率）。

潜在契约（Implicit contract） 这是一个理论中的用语。"潜在"一词意指此类契约不同于法律意义上

的契约，它存在于雇主与雇员之间，得到双方默认的，或者也有可能是写在纸上的。由于对各种类型的对特种工作的投资阻碍着劳动力的流动，分散风险的机会也受到限制，潜在契约统治着劳动的交换过程。潜在契约的存在是由于雇主与雇员对风险的态度不同。相对说来，雇员比雇主更反对风险，其原因一方面是雇员作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无法像实物资本的所有者那样使风险得到分散，另一方面是在雇员看来，雇主具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他们比较不在乎风险，或者说是风险爱好者。因此，雇主为雇员提供由就业机会和防备收入的不稳定所构成的混合物，便成为一种最适的措施（长期成本最小化）。潜在契约的存在，使企业主和工人都按照契约所含的模式行事，使他们感到好象是在法律上受到某种约束。契约规定了雇员的收入，或者至少规定了雇员的工资率；同时将风险转嫁给了雇主。在这种契约之下，工资并未能使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达到平衡，以适应劳动力总需求的变化。市场均衡需借助于减少工作时间，或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暂时解雇等形式来解决。因此人们常用潜在契约理论来解释刚性工资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潜在契约不同于新古典的强调劳动交换的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契约，常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于两个特定的经济单位（如工人与企业，工会与企业管理方等），而不是在个人之间。且潜在契约反映的是一个即时（instantaneous）的市场过程，在其中劳动供给者与需求者的行为分散化并相互配合。而劳动交换的契约则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字据。

横截面消费函数（Cross—section Consumption Function）　在某个时间上，不同收入集团的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一函数的形式为：

$$C=c_0+c\cdot y$$

上式中，C 为消费，c_0 为自发消费，c 为边际消费倾向，Y 为收入。对这一函数的研究得出两条重要的结论：第一、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但小于一。第二、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种消费函数实际是一种短期消费函数，因此，它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一致的。

横向公平（Horizontal Equity）　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原则，指对处于相同条件下的人都实现了公正。一般说来，这是指在有关经济事务的安排中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同样的个人的原则。例如，在税收中收入相同的人承担了相同的税收负担。在公共开支中收入或需求相同的人获得了相同的利益也是实现了横向公平。横向公平强调了相同条件。一般认为，这里的相同条件是指收人相同，但也可以反相同条件解释为其他条件，诸如相同的教育程度、相同的健康状况等等。横向公平是反对岐视，同工同酬等原则的基本依据。

影子汇率（Shadaw Rate）　能够体现货币真实价值，不受官方汇率限制或政府经济政策干预影响的汇率。在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汇率由官方制订，通常不是高估就是低估了本币价值，不能体现外汇的实际价值。即使是无外汇管制的国家，因政府有关部门对外汇市场或明或暗的干预，阻碍了外汇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汇率亦可能与外汇的实际价值不符。为了分析、预测经济形势，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等目的，许多国家的有关部门都有根据外汇及本币的实际购买力，或单位外币及本币的实际价值确定的影子汇率。

影子价格（Shadow price）　有时也叫“预测价格”或“计算价格”。它以运筹学中的线性规划中的对偶问题的知识为基础，对某个投资方案或项目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以及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分析时所用的一种计算价格。假定有几项经济活动，每项经济活动消费 m 种资源，这些经济活动可以用下列向量表示

$$P_1=\begin{bmatrix} a_{1} \\ a_{21} \\ \vdots \\ a_{m1} \end{bmatrix}\quad P_2=\begin{bmatrix} a_{21} \\ a_{22} \\ \vdots \\ a_{m2} \end{bmatrix}\quad \cdots\cdots P_n=\begin{bmatrix} a_{1n} \\ a_{2n} \\ \vdots \\ a_{mn} \end{bmatrix}$$

这里 aji 表示第 j 项经济活动进行一个单位，所需要的第 i 种资源的效量。aij>0 表示对 i 种资源有消耗量，aij<0 表示第 i 种经济活动进行一个单位所生产的第 i 种资源的数量，我们再用 X_j 表示第 j 种经济活动所进行的强度，b_i 表示该经济部门所拥有的资源数量，C_j 表示第 j 种经济活动进行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收入，那么这个线性规划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有限的资源拥有量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各项经济活动的强度，使从事这些活动的总收入达到最大，用拉格朗日函数方法有：

在满足 $P_1X_1+P_2X_2+\cdots P_nX_n<b$　$X_j>0$　$C_j=1\cdots\cdots n$)的条件下，求 $\sum_{j=1}^{n}C_jX_j$ 的最大化值。

如果把这个经济问题看作是线性规划的原始问题，那么它的对偶问题的经济含义就是：为了使各种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我们应对其规定一个合理使用的经济估价，它们用以下要求来确定。

1.资源的用价是非负的，这样才具有经济意义：

$W_i>0$　　W_i 是用第 i 种资源的用价。

2.每项经济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的用价之和应当大

于或等于该项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收入，即

$$\sum_{i=1}^{m} aij \cdot W_j \geq C_j$$

对于资源用价只所以作这样的要求，只因为使得只有一部分经济活动的收入能弥补其所消耗的资源用价之和，从而这些经济活动可以列入最优计划，如果是不能弥补所消耗的资源的用价之和的经济活动就不能列入最优计划。在上两项约束条件下，求给定资源的用价之和达到最小值，即使：

$$wb \to min$$

根据线性规划的定理可知，如果原始问题有最优解 x^0，那么对偶问题也有最优解 W^0，这个表示资源最低用价的解值 w^0 就是影子价格。对于供大于求的资源，其影子价格就为零，而供不应求的资源的影子价格往往很大。对于原始问题中列入最优方案的经济活动，其收入就应等于它所耗用的资源数量与相应的影子价格乘积之和，也就是说收入可以弥补按影子价格计算的支出，如果收入不能弥补这种支出，那么这项经济活动一定不能列入原始问题的最优解。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人们运用市场价格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现实生活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市场实际价格与市场出清价格总是有差异，政府也往往采取补贴或征税等办法来支持或限制价格，因此影子价格的存在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增值税（Value—added tax） 简称 VAT。增值税是指从最初生产到最终交换过程中，商品和劳务在每次交易时所征收的税。增值税是对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成本与其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征税，也就是对商品和劳务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额征税，这里的投入包括了所有的费用，其中也包括除增值税之外的所有税种。

增值税的支付和征收是这样的：每一个交易者都按增值税的一定百分比加价出售其产品，那么他就应当把从顾客处获得的税款交给政府，同时可以要求退还在购买投入品时的发票中所付增值税，每一个交易者都是如此，直到最终的消费者。在每笔交易中，都以较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税收，事实上交易链中每个交易者都不负担增值税，而最终消费者将负担所有税款。课税当局也只是征收了交易链中所付税款和所收税款相抵后的余额。

增值税概念最早在 20 世纪初由美国人提出，美国一些州也间或实行了增值税，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认为增值税无助于推行适当的国内财政政策以及改进国际经济状况，不赞成将增值税作为主要的联邦税种。另一方面，增值税在欧洲许多国家却是主要税种，欧洲共同体就要求其成员国实行单一的增值税体制。

增业活动（Make—Work Activities） 某一工厂或工业部门为了使更多的工人被雇用而采取各种方法来减少或限制每一人时的平均产量。其中包括：(1) 限制每一工人每日或每周的产量；(2) 通过控制工作质量和采用费时的生产方法来限制产量；(3) 要求做不必要的工作或同一工作做一次以上；(4) 规定一起工作的人的数目超过必需的水平；(5) 规定必须由某一行业的成员来干某种工作。这些增业条例都是由于工人害怕失业而强烈要求实施的。如果仅作为高失业率时期的权宜之计，也许是正当的，但一旦实施了这些条例，即使在充分就业时期也很难废弃。显然，增业活动实际上不会给工人带来好处，它一般会使劳动成本提高，最终导致工资下降或雇工减少。

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of Grouth） 对于国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一种比喻。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在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中发现，国际贸易曾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将国际贸易誉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叶推动现代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的“增长的发动机”。当时，一方面迅速膨胀的出口市场为这些国家国内增长着的需求提供了一种附加的刺激，引起制造业的大规模建立。另方面，这些出口收益使 19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能以很低的利率在国际资本市场借到现款。这一资本积累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使增加进口成为可能，并导致更加多样化的产业结构。19 世纪，欧洲和北美洲国家都是由于相对的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非技术剩余劳动力无拘束的国际转移，而有可能分享由国际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已不能直接运用于发展中国家了，国际贸易这一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已经减弱。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仍然具有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扩大国内外市场，开辟储蓄源泉，增加资本形式，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为工业化创造条件；除开辟了产品出口新市场、产生了对外贸产业的刺激外，还可通过进口高效率的机器设备、提高外贸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大一国的总产出和总供给能力；可提高技术水平、改进生产方法；可以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可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文化、新知识、科学技术、竞争意识等等现代化的东西；可以为政府创造收入来源，增加政府的储蓄；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刘易斯在他的大量著作中也进一步论述了对外贸易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

外贸易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发展外贸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但外贸的扩大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二是贸易条件。发达国家的外贸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外贸与发达国家的进口和经济增长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于工业化国家的繁荣。他还根据资料计算出，发达国家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与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速度的相关系数是0.87，即发达国家工业增长100%时，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值增长87%。因而，刘易斯在《增长动力的减弱》一文中提出，如果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发达国家是工业生产，在发展中国家是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发达国家的发动机就要比发展中国家的发动机转动得略快一些；而当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时，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的下降程度也会更大些。他因此而主张，在世界经济经历了50—60年代高速增长、对外贸易这个增长的动力已经减弱的情况下，应当鼓励发达国家提高经济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团结起来，通过发展彼此间的贸易、建立关税同盟、成立发展中国家的外贸跨国公司、依靠政府干预等等途径，来扩大对外贸易，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增长不足型失业（Growth—gap Unemployment）　又称"增长缺口型失业"，指经济中长期需求不足而引起的失业。这种需求不足是指对劳动力的需求下足。造成这种失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长期中经济增长低于劳动力增长，从而引起劳动力过剩。第二、采用了资本密集型技术，相对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两种情况都与长期中的经济增长相关。前一种原因与长期停滞相关，是一种长期的需求不足型失业，后一种因素与技术进步相关，是技术性失业的一种形式。

增量的资本一产量比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　又译为边际资本—产出率，是增加的资本量与所增加的产量的比率，亦即增加一单位产量所需要增加的资本量。以△K代表增加的资本量，△Y代表增加的产量，则有：

$$ICOR=\frac{\triangle K}{\triangle Y}$$

这一比率就是加速系数。它反映了社会经济的技术装备程度。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增量的资本—产量比率也就是资本—产量比率。一般把这一比率作为投资效益的一种衡量。在技术既定的条件下，这一比率低就反映了资本利用状况好，投资效益高。各国间这一比率的差别很大，即金额相等的资本所实现的产量水平在各国差距相当大，这就反映出各国投资效益的差异。但是，由于对资本存量的变化的度量存在问题，要对各国的增量的资本—产量比率进行比较又是相当困难的。

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　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50年代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起初，佩鲁提出增长极概念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能够保证经济活动趋于均衡的思想而言的。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他吸收了现代数学的思想，把抽象的经济的结构关系定义为经济空间。他认为，经济空间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存在于极化过程之中的，即任何一般意义上的空间都是一个由于中心及传输各种力的场所组成。因此，在经济空间中之所以存在着类似"磁极"作用的现象，是因为在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和不可逆的支配效应。在他看来，现实中经济单位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是在一种非帕累托关系中进行的。在这种关系中，少数经济单位通过不对称的和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的影响控制其他经济单位的现象就是支配。支配效应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创新能力在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异。由于经济单位的规模、交易能力和经营性质不同，特别是规模的差异，它们的创新能力是不同的。佩鲁认为大的经济单位是最富于创新的。它们"由一些代理人成功地采用创新可以对其他代理人作出示范，并促使相互仿效。一个成功的创新，由于引起熟悉彼此活动及其结果的各种机构间利益不平等，从而加剧了他们对相互盈利和相对实力追逐的决心。"因此，富于创新的大规模经济单位处于支配地位，而其他经济单位则处于受支配地位。佩鲁认为，支配性经济单位具有"推动效应"。推动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支配性经济单位产生外部经济的能力。支配性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经济体系总产出的作用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贡献，即其产品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二是间接贡献，即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其在环境中增加的追加产品。后者是支配性经济单位产生外部经济能力的函数。一种支配性经济单位产生外部经济能力愈大，其推动效应愈大。一般说来，经济单位生产外部经济能力是与其前向、后向联系的大小成正比例的。为此，佩鲁引进了推动型单位的概念，在他看来，推动型单位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支配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强大的推进效应的单位。也就是说，推动型厂商一般不仅规模大，创新力高，而且产生外部经济能力强，

并隶属于快速增长的部门；推动产业，它不仅规模较大，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而且具有广泛的前后向联系，因而产生外部经济的能力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型单元是不断更替的。由于创新，支配和推动活动的产生，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由一个系列不平衡机制组成的过程。因此，经济空间的极化过程是存在的。由于推动型单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佩鲁把它形象地称为增长极，也正因为这样，其经济理论被称为增长极理论。虽然后来佩鲁也把地域集聚作为极化过程的形式，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包括推动产业、地域集聚的产业极和活动极的相对主动体系与包括受影响产业，依赖于地域集聚的相对被动体系的综合。但从总体上看，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属于一种部门增长理论。1966年，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扩展到内容更为广泛的区域范畴，认为极化过程既可以是功能性的，也可以是地域性的。“一个区域增长极是指区位在一个城市区，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推动性产业”。这样，增长极既可以是部门的，也可以是城市的，便基本上成为人们经济分析的一般规范。

熵指数（Entopy Index） 是度量企业经营多角化程度的一种指标。该指数定义为：

$$E=-\sum_{j=1}^{K}\frac{X_j}{X}\ln\frac{X_j}{X}$$

其中：K为企业经营的产业数，X为企业在K个产业中的经营活动总量，X_j为企业在j产业的经营活动量，E为熵指数。在企业完全非经营多角化情况下，指数值为零；在企业完全经营多角化即将其经营活动均等地分散于所有K个行业的情况下，指数值为lnk。

额外雇工（Featherbedding） 见超员雇用条。

潘塔莱奥尼，马费奥（Maffeo Pantaleoni，1857—1924） 意大利经济学家。曾担任过意大利许多大学（包括罗马大学）的教授。他精心撰写的《纯粹经济学》（1889年）一书相当有名，帕累托就是受其影响而转向经济学研究的。他比较注重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赞成数学方法对于经济分析具有重要作用，并进行了大量数量研究工作。他一般被看作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基本学说，但实际上试图把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与边际效用理论相融合，甚至怀疑效用理论对宏观经济问题是否有用。故有人认为他持调和的立场，在附和古典学派或新古典学派。从他的价格理论来看，又吸收了瓦格纳一类新历史学派学者的思想，如他提出的“政治价格”，就是依据买卖双方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方面的地位和状况而确定的特别价格。潘塔莱奥尼关于租税转嫁问题的著作因出版很早和分析深入而颇具声名。总的来说，尽管他当时在意大利颇负盛名，但其学术成就并不显著。

十六画

激进政治经济学（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又称“激进派经济学”或“新左派”，是60年代以后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为其显著特征。

历史渊源　激进政治经济学主要指那些不接受正统经济学而又带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思想。从这个角度讲，这一派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上这些反资本主义思潮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其直接来源则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制度学派，以及40—50年代活跃于经济学界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诸如，英国经济学家M·道布、比利时经济学家E·曼德尔、美国经济学家P·斯威齐等人。50年代后期美国的黑人反歧视、反迫害斗争、60年代的美国青年反越战的运动，以及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开始的要求改革的学生运动，是6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高涨的社会背景。正是在这些高涨的革命运动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经济学流派。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这一派的成员颇为复杂，其中有早已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老左派，如美国经济学家P·斯威齐和P·巴兰，斯威齐的代表作有《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以及与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1968）。还有60年代出现的一些激进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R·爱德华兹与A·麦克尤恩，他们的代表作有《激进派对经济学的探讨：一门新课程的基础》（1970），R·爱德华兹与M·赖克、T·韦斯科合编的《资本主义制度：激进派对美国社会的分析》（1972），H·布雷弗曼及其《劳工与垄断资本》（1975），M·林特及其《反萨缪尔森论》。这一派还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其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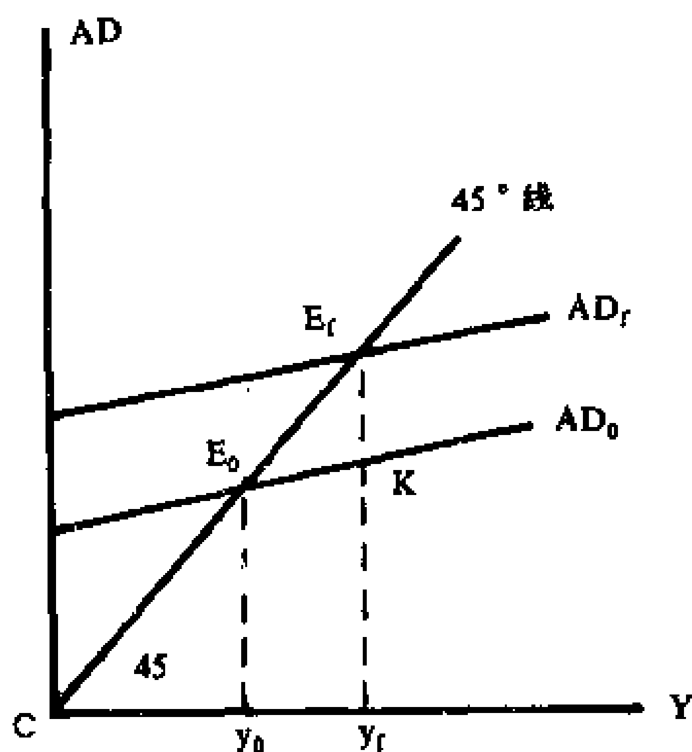
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该联盟出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此外，《每月评论》杂志也反映了这一派的观点。

基本理论　这一派在理论上并不统一，但他们具有这样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制度不是以人类本性和技术特点为基础，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第二、任何具体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又以"社会—经济阶级"的特定结构为其特征。在任何社会中，"社会—经济阶级"结构都是极不平等的。第三、为了实现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必须借助于阶级斗争对这种环境进行改造。他们的这些基本观点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这主要是：第一、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的缺点在于不重视各阶级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不注意生活质量问题，不研究经济制度的历史变动性，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样正统的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第二、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问题的研究。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滞胀问题、跨国公司和资本跨国问题、美国社会阶级对立问题、垄断资本统治的实质与特点问题、资本积累规律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揭露与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少激进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们在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与思想的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例如，他们研究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并用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中工人受剥削的处境。此外，他们还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危机理论、工人贫困化等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但并不一定正确）的观点。例如，美国激进经济学家 H · 金蒂斯提出了不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剥削理论；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探讨了价值转形问题，等等。

政策主张与运用　激进经济学家大都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大。而且，他们也缺乏具体的政策主张，因此，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并没有什么影响。

评价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关的。当 60 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较多，矛盾激化时，这一派影响较大，但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缓和之后，这一派则处于低潮时期。从 80 年代以后的情况看，这一派的影响很小。正统经济学派认为这一派不是经济学，而是政治学。因此，经济学界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膨胀性缺口（Inflationary Gap）　当实际总需求高于充分就业总需求时，实际总需求与充分就业总需求之间的差额，如附图所示。在附图中，横轴 OY 代表国民收入，纵轴 OAD 代表总需求，45°线上任何一点表示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即国民收入的均衡。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为 OY_f，实现这一国民收入所要求的总需求，即充分就业总需求是 AD_f。但现在实际总需求为 AD_0。这时，由于已经实



现了充分就业，国民收入无法增加，实际总需求大于充分就业总需求。实际总需求与充分就业总需求之间的差额，即 KE_f，就是膨胀性缺口。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当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的总需求时，由于总需求过度就会引起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膨胀性缺口反映了过度总需求的存在及其程度。因此，当经济中存在膨胀性缺口时，就必然存在着通货膨胀。由此得出，要消除通货膨胀就必须消除膨胀性缺口。而消除膨胀性缺口的政策就是以抑制总需求为中心的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赠予经济学（Gift Economics）　美国经济学家 K · 博尔丁（K · Boulding）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赠予经济是出于政治目的经济行为，赠予经济学正是研究这种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博尔丁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非全部由自经济目的，由于受到威胁或出于爱心而产生的赠予行为是一种出于政治目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属于非市场交换行为，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例如，在美国，赠予经济占全部经济活动的 20—50%。赠予经济的来源是爱、怕和无知。亲人之间的赠予行为出于爱。由于某种压力而产生的赠予行为出于怕。当知识与地位不相称的双方进行交换时，较弱的一方受的损害就是出于无知的

赠予行为。赠予经济不按市场交换规律进行，有其特殊的经济规律，赠予经济学正是要研究这种赠予经济行为的，换句话来说，传统的以价格为中心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赠予经济行为。赠予行为根源于个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特点与变化，根源于制度因素。因此，赠予经济学实际上是制度经济学的一部分。博尔丁强调，以交换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并不能代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部，所以，传统的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赠予经济代表着政治经济的心脏，所以，赠予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整数规划（Integer programming） 旨在从各种不同的方案中选出"最佳"行动方案的一种数学方法。整数规划与线性规划很相似，两者都有目标函数，或者取目标函数的极大值，或者取目标函数的极小值；两者的约束条件类似。但两者有区别，主要的区别是：整数规划要求答案只能是整数。整数规划在投入或产出是不可分割的情况下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假使一个公司或企业的目标函数是确定购买拖拉机的台数，因为谁也不能只购买拖拉机的一部分，也不能只雇佣大半司机，所以最令人满意的回答必须是整数，由此可见整数规划是有用的，线性规划却不然，例如，选择什么样的配料来生产具有一定营养价值的最便宜的饲料，配料的多少则是可以分割的，可以细化到所要求的比率。

霍金斯—西蒙条件（Hawkings—simon conditions） 在一个由几个工业部门组成的具有工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的列昂惕夫系统中，每个工业部门只生产一种产品，没有联合产品，规模收益不变，按固定比例使用几种产品做为投入，这时，各种物品的需求与供给是用下列线性方程组来表示的：

$$x_i=\sum_{j=1}^{n}a_{ij}x_j+C_i,\quad (i=1,2,\cdots,n)$$

其中 a_{ij} 是第 j 个部门的非负的投入系数，x_j 是第 j 个部门的产出水平，C_i 是对第 i 种商品的最终需求 $(i=1,\cdots,n)$。如果用 A 表示 a_{ij} 组成的投入系数矩阵（a_{ij} 处于矩阵的第 i 行第 j 列），用 x 表示 x_j 组成的产出向量（x_j 是第 j 个分量），C 表示最终需求向量（C_i 是第 i 个分量），则上述方程组可用矩阵形式表示成方程：

$$x=Ax+C$$

如果第 j 个部门（j=1，…，n）能生产出 x_j 个非负单位的产出，可以满足正的最终需求 c_i（i=1，…，n），那么上述系统就是具有生产性的，足以产生使产出大于投入的净产出。

这个系统的生产性等价于下述条件：n 阶方阵 I−A（这里 I 是单位矩阵）具有逆矩阵 $(I-A)^{-1}$，而该逆矩阵的所有元素非负。这种生产性依赖于并完全决定于投入系数的数值。对这种生产性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是用投入系数数值的不等式条件来表示的。这个条件就是霍金斯—西蒙条件，是由霍金斯和西蒙这两个人在 1949 年提出的。这个条件要求矩阵 I−A 的所有主子式为正。它等价于一个看上去较为弱些的条件：矩阵 I−A 的顺序主子式全大于零，即

$$\triangle k=\begin{bmatrix}1-a_{11} & -a_{12} & \cdots & a_{1k}\\ -a_{21} & 1-a_{22} & \cdots & -a_{2k}\\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a_{k1} & -a_{k2} & \cdots & 1-a_{kk}\end{bmatrix}>0$$

霍金斯—西蒙条件与生产性在数学上的等价性是很容易证明的。对方程 X=AX+C 移项，得 (I−A) X=C，通过高斯消去法，可得三角形式：

$$b_{11}x_1+b_{12}x_2+\cdots+b_{1n}x_n=d_1$$
$$b_{22}x_2+\cdots+b_{2n}x_n=d_2$$
$$\cdots\cdots\cdots\cdots$$
$$b_{nn}x_n=d_n$$

其中 $b_{ij}<0(i<j),d_i>0,\quad (i=1,\cdots,n)$

而 $\triangle k=b_{11}b_{22}\cdots b_{kk}(k=1,\cdots n)$

因为霍金斯—西蒙条件保证了系统的生产性，所以它们是列昂惕夫系统以及将之做为内在子系统的扩大了的系统得以良好运行的基本条件。该条件也使列昂惕夫系统动态地良好运转。

在离散时间的乘数过程里

$$x_i(t+1)=\sum_{j=1}^{n}a_{ij}x_j(t)+C_i,\quad (i=1,\cdots,n)$$

当且仅当满足霍金斯—西蒙条件，方程解收敛于使净产出等于最终需求 $C_i(i=1,\cdots n)$ 的均衡产出水平。这个稳定性与下列几何级数收敛于逆矩阵 $(I-A)^{-1}$ 是等价的：

$$I+A+A^2+\cdots+A^t+\cdots\cdots$$

对于连续时间的乘数过程：

$$dx_i/\alpha t=\alpha i(\sum_{j=1}^{n}a_{ij}X_j+C_i-X_i)\quad (i=1,\cdots,n)$$

霍金斯—西蒙条件是方程解收敛于同样的均衡产出水平的充分必要条件，它等价于矩阵 A−I 的特征根的实质部分是正的。

霍特里，拉尔夫·乔治（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1） 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英国的斯劳夫，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专业。1903 年进英国海军部工作，一年后转入财政部，一直工作到 1945 年退休。此后担任过皇家经济学会主席（1946—1948

年）和皇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47—1952年）。1952年后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霍特里论著颇多，主要有《通货与信贷》（1919年）、《产业与信用》（1928年）和《货币的改造》（1923年）等。在经济学史上，霍特里是作为剑桥学派货币理论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而闻名的。他从货币数量说出发，对现金余额说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认为银行贷款余额和每个经济单位所持的现金决定着价格水平和单位货币的财富价值。同时他又认为收入分析方法应与上述理论很好地协调，主张货币数量之所以影响物价水平，关键在于消费者的支出额（即收入中对商品和证券的支出额）。因此，应当通过中央银行调整利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再经由这种贷款量来影响消费者的收人和支出，从而实现变动存货量和物价水平的目的。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他针对人们低估货币作用的倾向，提出现代货币信用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即现金交易对通货的需求落后于信用的扩张或收缩，是第一次大战之前经济波动周期性的基本原因。据此，他强调了贴现率在货币政策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思想都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产生过较明显的影响。

霍布森，约翰·阿特金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1940）　英国经济学家。曾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担任过大学讲师，后长期为刊物撰稿人和职业作家。主要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1894年）、《分配经济学》（1900年）和《帝国主义：一种研究》（1902年）等。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过较详尽全面的分析，列宁在论帝国主义时曾大量引用过。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必然趋势缺乏正确的认识。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看成是消费不足的结果，即生产过剩是由于消费品的社会需求赶不上它的增长，并认为其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当所造成的富裕者的过度储蓄，因此只要收入分配得以改善，危机和失业现象自会消灭。由于他对分配理论作了系统完整的阐述，并在接受马歇尔的福利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将他所谓的"剩余价值"用于社会福利或由工人运动加以分配，为以后福利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料，故又有福利经济学的先驱的声誉。总的看，霍布森是一个鼓吹社会改良的经济学家。

霍吉斯金，托马斯（Thomas Hodgskin，1787—1869）　19世纪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出生于英国海军文职官员家庭。12岁进海军学校，曾担任海军军官。19世纪20年代起，成为英国杰出的激进主义经济理论家、政论家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他的主要经济著作有《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1825年）和《通俗政治经济学》（1927年）。他认为，人类历史是自然所有制和人为所有制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存在着自然所有制，而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都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人为所有制，它们都是剥削制度，最后将必然被自然所有制所取代。但是他错误地把资本家剥削工人看成是暴力即超经济强制的结果。他明确批判了资本具有生产力的庸俗理论，认为"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按他的说法，流动资本并不代表任何劳动积累，而只是并存的劳动，如制鞋工人能进行工作，是因为食品工人和缝纫工人同时在劳动而向前者提供了食物和衣服；固定资本虽是过去的劳动，但在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现在的劳动。由于霍吉斯金不懂得资本代表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虽则看到不具生产力的资本能获取利润在于它有支配劳动的权利，却把它解释成是通过暴力得到的，从而无法正确说明劳动的生产力是如何转化成"资本的生产力"的。

操纵价格（Adminstered Price）　操纵价格一词最早由美国的米恩斯（G·C Means）在1933年的一份题为《产业价格及其相对非灵活性》的文章中提出。它是指价格被固定在某一水平，并在一段时间内和一系列的交易中保持不变。这一价格的确定者可以是私人企业或私人企业的联合，也可以是政府。操纵价格不仅指市场物品价格，而且还指这样的工资率。它由厂方确定或以劳工与厂方的合同确定或以其他方式确定。"操纵"一词意味着不顾能使市场供需相等、从而使市场出清的价格水平而对价格的人为处理。也就是将市场对价格的决定权操纵在某些集团手里。这样价格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会随供需发生波动。此时到彼时的市场出清靠生产方存货的变动，或顾客的排队来解决。也常常由产量的调整来解决。严格地讲，存在操纵价格时，存货的大变动和排队现象的存在就意味着市场是不出清的。供给方对价格的操纵可能是由于其特有的目的，比如为新加入者设置障碍、为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或干脆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但厂商或供给者能否通过对价格的操纵使自己的利润达到最大，理论界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操纵价格是伴随着市场垄断力量（或者对市场供应的垄断，或者对产品供应的垄断，也可能是由于政府的某项经济政策）的出现而出现。传统经济理论总是假定市场竞争是充分的，价格有充分弹性，从而经济可以进行自我调整，但这离经济现实越来越远。操纵价格的提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宏观方面，它为人们对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和七十年代的滞胀的解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

默契的合谋（Tacit Conspire） 寡占企业协调价格，以限制竞争，获得寡占利润的行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领导价格制，二是有意识的平行调价。领导价格制是随着某企业的价格调整，其它企业也相应调整价格。一般在有下列条件时较易成立：1.企业数越少；2.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越均等化；3.各企业的成本越同一化；4.情报交换越频繁；5.新企业进入越受到严格的限制；6.各企业的产品差别越小；7.需求越没有弹性；8.技术进步率越稳定；9.市场需求成长率越稳定。其中，前三个因素是基本的。根据市场结构不同，领导价格制又可分为支配性领导价格制和强制性领导价格制。支配性领导价格制指的是在某个市场上存在一个支配市场的企业，它成为领导价格制的价格先导者。其典型市场是部分垄断市场，即指一方面市场上有一个明显地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另一方面有或多或少的小企业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上，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不仅有显著的占有率上的差距，而且在费用条件上也有明显的差距。所以，该大企业是可以决定市场价格的"市场支配性企业"，小企业则根据大企业决定的价格来调整价格。强制性领导价格制指的是市场上有几家具有较大优势的大企业，都能起到强制性作用，诱导价格变动的领导价格制。按照市场份额和费用条件的差异，又有不同的默契合谋的方式。如果核心企业的市场份额和费用曲线都很接近，则其中任何一个核心企业都可以成为领导价格的企业。随着一个企业调价，其它的核心企业和核心外的中心企业也会相应调价。若核心企业轮流领导价格调整，就会出现"轮流涨价"或"轮流降价"。如果核心企业市场份额接近，但费用条件有一定的差别，费用条件有利的企业就可以接受较低水平的价格。如果由其率先减价，费用条件不利的企业往往难以接受较低的价格，因此，率先调价的往往是费用条件不利的大企业，而后费用条件有利的大企业才相随调价。当企业市场份额，费用条件不同时，特别是当首位大企业市场份额相对较大，费用条件较好，而其余几家大企业市场份额相对较小，费用条件较差时，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条件好的大企业调整价格，其余大企业不得不跟随调价，并同时加快技术革新。由于大企业革新条件较好，在竞争压力下革新的主动性高，成功的可能性大，最后可能接受较低的价格；另一种情况是，价格下调时，条件不好的大企业不能自救，甚至可能破产，这时率先调价的大企业考虑到会因此导致市场垄断程度过高，有可能受到企业分割之类的反垄断措施处置（国外反垄断法规定企业市场份额超过一定比例，就可以考虑对其处置），便会按共同生存原则控制价格不超过条件较差企业能够接受的范围。此外，默契的合谋还有一种方式是伪装卡特尔。即表面上是一家企业先行变更价格而另一家在一定期间加以追随的价格领导制，实际上企业间有价格协定，只是没有被发现或确认。

穆勒，詹姆斯（James Mill，1773—1836） 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英格兰一鞋匠家庭，早年生活十分清贫。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神学后曾获牧师资格。1806年起费时十载写了《英属印度史》，赢得很大声誉。1808年认识边沁，成为他的学生及其思想的宣扬者。1819年开始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24年起还从事议会改革运动。其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要义》（1821年）。詹·穆勒第一个提出了经济学的"四分法"，即把经济学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部分。他从地租收入看到地主不劳而获的剥削性，进而主张对土地私有权采取较激烈的政策。作为李嘉图的朋友和学术支持者，他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的形成和问世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在19世纪20年代的大辩论中，他还是李嘉图学说的坚定捍卫者。但是，他非但没有能够解决李嘉图体系中的两大矛盾，反而对劳动价值论作了庸俗的释阐。按他的说法，劳动和资本共同生产价值，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一部分属于工人，而资本家用预先支付的工资将它们买下了；资本作为一种蓄积的劳动也创造着价值，葡萄酒在窖藏期间尽管活劳动已经结束，但包容在酒中的蓄积劳动还在继续作用，从而仍然增加着价值。这类掩盖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和否认利润剥削性质的"捍卫"，阉割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和精髓，自然只能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解体。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英国经济学家。他是英国著名经济学者詹姆士·穆勒的长子，自幼受到其父的严格教育。15岁时开始接受通才教育，认真研读了经济学、哲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诸多著述。1823年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直至1858年该公司结束才退休。晚年还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约·穆勒信奉传统的经济学说，并以李嘉图经济学和边沁功利主义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十分庞大的新理论体系，故素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代表"之称。但他后来又同情和关心劳工运动的发展，甚至怀疑私有制，成为一名较激进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这就使得其经济学说具有较明显的调和色彩，既吸收发挥了许多庸俗的经济理论思想，又力图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害。因此马克思批评其经济学说的特征为"一种没有生气的折衷主义"。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后一本书在很长时期里被西方国

家的大学当作经济学教科书。

约·穆勒的经济学说继承着英国古典学派的许多思想，同时又综合了不少庸俗的理论观点，显露出某种程度的折衷主义倾向。这首先集中反映在生产规律同分配规律的区别上。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生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规律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不依社会制度而改变；分配是人类的制度问题，分配规律则由人的意志所决定，即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据此，约·穆勒幻想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改变分配关系，如征收土地税以使地租社会化、限制遗产继承权、推行自耕农经济等。这样，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劳资对立，真诚同情广大劳动者的贫困处境，却只能是个社会改良主义者。

约·穆勒的价值理论同样有着明显的折衷色彩。按他的说法，除了少数稀少性商品（如古董、名画等）的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外，大多数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其生产费用。生产费用通常由工资和利润所构成，而利润来源于劳动生产力即工人的剩余劳动，在数量上同工资成反比，但它又应成为资本家节欲的报酬。此外，构成生产费用还有一些偶然因素，包括租税和生产短缺商品所花费的一切多余的费用。可见，表面看来，他仍试图继承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但实质上阐述的是一种以生产费用论为主，同时吸收供求论和节欲论的庸俗的价值学说。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约·穆勒的有些理论和思想是有积极贡献的。他充分重视抽象的推理分析所固有的局限性，这在经济方法论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在继承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相互需求说"，完善和精致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参见相互需求理论条）。他区分了经济静态学与经济动态学，并探讨了后者的内容，无论对经济发展理论或经济分析方法都提供了有益的成果。他还第一个在货币理论史上深入分析信用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正确指明信用所执行的货币有关职能。另外，他宣传共产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各种攻击共产主义的论调作了坚决反驳，这无疑是应充分肯定的。

第二篇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　画

一二三产业　又称第一、二、三次产业，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按照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顺序划分的社会产业部门。第一次产业，指产品直接取之于自然界、或者以未经加工的自然资源为劳动对象的生产部门。它包括农业、林业、牧业、矿业（也有把矿业当作第二次产业的）。第二次产业，指对经过初次加工的自然资源进行加工或再加工的生产部门。它包括制造业、建筑业等（也有把运输业算作第二次产业的）。第三次产业，指同消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或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部门和服务性行业。它包括商业、金融、保险业、运输业、服务性行业、科学、教育、卫生以及行政、国防等部门，有的把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也列为第三次产业。

一个枢纽　两个扇面　两个扇面即对内幅射和对外幅射的两个扇面。这是赵紫阳于1984年11月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视察工作时提出的。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能够吸引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并扩散到整个内地。同时，国内经济也能通过特区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在这里，特区发挥了国内和国外这两个市场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外引内联形式实现的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　中国经济学家陈云提出的一项指导经济发展的原则。1982年1月陈云在同中国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以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将陈云这一思想规定为指导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一经济发展思想，依据我国仍是低水平人均收入和人口众多的不发达国家情况，把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求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所以，第一强调的是吃饭。但是，从长远看，要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又需要用余力来进行经济建设，所以第二要建设。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既要坚持先安排吃饭，后安排生产建设的次序，又要兼顾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　画

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政权。

人民民主专政是近代中国国情的必然产物。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腐朽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变革生产关系并建立新政权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由于其软弱性、妥协性，决定了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有强烈的要求革命的愿望，但由于它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及其阶级局限性，也不可能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这样，变革生产关系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身上。近代中国的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进程和革命胜利后即将诞生的政权的历史特点。正是根据这样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逐步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同年3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又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1949年10月，新中国政权建设就是依据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进行的。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郑重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初期，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对生产资料

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过渡时期结束后，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

人才交流中心 为开发人才，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调节人才供给和需求的一种对话场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力流动的必要性增加，我国在劳动制度改革中，为了搞活劳动力流动，一些城市的劳动部门创立了为技术工人、技术人材流通服务的这种对话场所。在人才交流中心，劳动力供需双方直接见面，互相选择。双方如果满意，可以通过行政组织办理调动手续或招工手续。目前，人才交流中心有定期组织交流和长年开放两种形式。人才交流中心通过登记、对话，为人才和人才需求单位牵线搭桥，尽可能使人才供需双方各得其所。人才交流中心的建立为促使人才合理流动起到了一定作用。

人民币 中国的法定货币

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开始发行的。发行后，国家陆续收回了各解放区发行的地方性货币、肃清了国民党伪币，禁止了金银、外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取缔了金融投机活动，有效地制止了旧中国遗留的通货膨胀，逐步使人民币成为新中国统一的稳定的货币。为改进旧人民币面额过大，票面价值过低，不便核算和流通的缺点，1955年3月开始发行新人民币，1元折合旧人民币1万元，人民币的单位为元（圆），1元等于10角，1角等于10分。元为本位币即主币，角和分为辅币。人民币以"￥"为符号，取"元"字汉语拼音"YUan"的首字Y加两划而成。

人民币是纸币，我国目前没有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但人民币仍以黄金为价值基础，代表黄金发挥作用，实际上执行着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蓄手段等职能。人民币是世界上少有的比较稳定的货币之一，国家掌握的按计划价格投放市场的大批商品和国家日益增多的黄金储备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可靠保证。

八级工资制 指按照各种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把工资定为八个等级，并规定相应工资额的一种工资制度，是我国工人工资制度的基本形式。工资等级以一级为最低，八级为最高。八级的工资标准一般为一级工资标准的3倍；少数技术比较复杂的企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和煤矿的井下工人，可以达到3.2倍；有些技术比较简单的行业（工种），如糖业、烟、酒部门，则为2.5倍。为区别不同工种技术上的差异，按工种规定若干等级线。一些技术复杂的工种最高等级达到八级；另一些技术比较简单的工种，最高等级则要低一些。如机械制造业钳工等级是四级到八级，而钻工则由三级到七级。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工种、不同规模和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虽然同是实行八级工资制，但各自的工资等级标准是不同的。

八级工资制是50年代从苏联引入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工资制度也将进行改革。

"二次调节"理论 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思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形式之一。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并存着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机制的二元机制。只要有商品货币关系存在，那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的自行调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既然要有计划地发展，那么就必然会存在着政府的调节。政府调节机制的作用是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存的、互补的、配合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替代另一方，这就是二元机制的含义。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必然会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发生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有局限性，所以需要有政府的调节。但政府的调节不能不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依据，不能不以市场上自然形成的各种价格为出发点。市场调节可以称为第一次调节，政府调节可以称为第二次调节。只有在第一次调节不能达到社会经济发展预定目标的场合，才需要第二次调节。即使如此，仍应当认识到，离开了市场机制，第二次调节也就发挥不了作用。"二次调节"理论强调指出：与其是不考虑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观主义的、以行政命令包揽一切的政府调节，还不如不要政府调节，或干脆由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正如不遵循和不运用价值规律的、非科学的、瞎指挥的计划管理，还不如不要计划管理，而干脆由市场本身来安排一样。

三 画

"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总称。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尔后不久，又发动全国人民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作为党的方针政策提出来的，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胜利的动员令，是指引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三面红旗"。1958 年至 1960 年，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表现得十分高涨。但是，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建设中瞎指挥，刮"共产风"，搞浮夸，盲目追求高指标，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时的经济组织形式。三级所有，即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队为基础，即在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中，生产队一级的所有制是基本的。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地域范围大体相当于一个自然村，农户十几家至几十家（参见本卷"农村人民公社"）

"三自一包"　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简称。它是中国六十年代初期，面对国民经济发展遇到的严重困难，特别是农村出现的严峻形势，所提出的一种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主张。作为当时在中国农村不少地区复活和发展的经济形式，"三自一包"同时是对"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大锅饭等"共产风"的反弹。在中国"十年动乱"期间（1966—1976），"三自一包"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批判。

"三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的简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指经中国政府批准，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我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投资举办、共同管理和共负盈亏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指合作双方不按比例投资，也不按比例分红，而是按双方商定的合同办事，由投资双方共同投入资本所组成的经济实体。国际上把合作经营称作契约式合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是指经中国政府批准，由境外商人在中国境内单独投资设厂、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三资企业"出现在中国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一种形式。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发展、世界性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更迫切需要加强同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更需要以更大的步伐和更多样、灵活的形式实行对外开放，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对外开放的一种形式，"三资企业"从 80 年代中以来发展非常迅速。截止 1988 年，在中国境内的"三资企业"协议数目达到 5945 个，协议金额为 52.9 亿美元。"三资企业"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1) 引进了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2) 伴随着外资的引进，引进了外国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有利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管理制度的完善；(3) 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联系的能力，促进了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和壮大；(4)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市场，满足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5)"三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市场竞争的参与，鞭策了国内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素质、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总之，"三资企业"的发展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会消失的。"三资企业"作为有外国资本参加的经济组织形式，不论有无中方资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但是，由于它们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按中国的法律程序登记注册，接受中国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依法向中国政府上缴税款和履行必要的义务，以及同中国公有制经济发生一定程度的联系，因此，"三资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三资企业"存在"剥削"等资本主义经济共有的消极现象，但是，它同中国"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它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是民族资本，更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指 1951 年 12 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从性质上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五反"运动是指 1952 年 1 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这是建国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运动。

1951 年，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并不满足已获得的利润，不少资本家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竭力想摆脱国家的限制。他们违背《共同纲领》，采用种种不法手段，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破坏抗美援朝。他们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民内部特别是向财政经济机关内部派遣和安置他们的经济坐探，放肆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实行猖狂进攻。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腐蚀下，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经济部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有所滋长。这不仅给我国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使工人阶级队伍和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经济部门的不少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腐蚀，一些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资产阶级腐蚀利诱下，堕落成大贪污犯，毒品吸食者的。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 月 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开始了。1952 年 1 月 2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以期反掉资产阶级的"五毒"，配合党政军内部的"三反"斗争，2 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了高潮。根据对全国大城市工商户的审查和处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占 95%左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 5%左右。1952 年 10 月 25 日，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消除了内部的一批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纯洁了党的机体，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加强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人工商业中，加强了党的工作，建立了工人、店员监督生产的制度，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在"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中，发生过斗争面过大和逼供信现象，但在定案处理中，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三大平衡 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财政、信贷、物资三者的综合平衡，具体说来就是由财政、信贷收支所形成的货币购买力与物资可供量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三大平衡是实现和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三大平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 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综合平衡。这是货币资金运动内部的两种资金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平衡。财政和信贷是用于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的两条渠道。它们的收支运动，集中地反映出国家的货币收支状况。两种资金的运动各有各的渠道和特点，但又有密切的联系，相互影响。国民经济在货币总量上的平衡，总量要由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来调节。因此，要实现国民经济中货币资金供求之间的平衡，必须在保证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各自平衡的基础上，进行二者的综合平衡。孤立地谈财政平衡或信贷平衡，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货币供求之间的平衡。(2) 财政、信贷资金与物资的平衡。这是资金运动与物资运动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平衡。从理论上说，资金是物资的代表，物资是资金的载体。资金和物资的运动是统一的。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资金运动和物资运动的不同渠道，以及各自的运动特点，两者之间不仅会出现总量上的失衡，还会出现结构上的失衡。因此，要实现国民经济中资金运动与物资运动之间的平衡，就必须用财政支出、信贷支出所形成的社会购买力，使物资供给在数量和结构上相适应。

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物资平衡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财政平衡是物资、信贷平衡的前提；物资平衡则是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的基础；信贷平衡又是财政平衡和物资平衡的集中反映。财政、信贷和物资之间的平衡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平衡关系之一。搞好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三大平衡"也常常被当作"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的简称。(参见本卷"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

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四种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略称。来料加工是利用外商提供的原材料，根据外商提供的款式、规格等生产成品，来样加工是根据外商提供的款式、式样、规格生产成品，所用原材料和包装物料由生产成品单位提供。来件装配是由外商提供装配线，零部件，由承揽方装配成成品由外商销售。补偿贸易是买方以贷款形式购进机器设备、技术等，建厂后逐步用产成品偿还贷款。开展"三来一补"业务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有利于解决本国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矛盾，带动外贸发展，对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经济地带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东部沿海地带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九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带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九个省、自治区。正确处理三大经济地带的工业发展的关系，是我国工业布局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东部工农业发达，交通方便，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信息灵通，商品经济发达，与世界经济联系密切，经济效益较高，是我国中、短期发展的重点。中部能源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工业、科技力量和其它设施已有一定的基础，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捷，是东靠西移，南北交汇的中心地带。在本世纪内，我国将重点开发中部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西部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交通运输不够发达，自然气候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国家对这一地带的要求是，发挥现有的产业优势，重点开发能源和国家急需的资源，为远期开发作好准备。我国制度的性质和上述客观条件决定了处理三大经济地带工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充分发挥三个地带各自的优势，进一步发展它们相互之间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技术联系，把东部地带工业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带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达到经济全面振兴，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 是对我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劳动方针的一种形象说法。"三个人饭五个人吃"和"低工资，高就业"实际上是党在工资制度上依据我国情况，对于扩大就业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两者统筹兼顾的通俗说法。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是人浮于事，"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变成了"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就业扩大了，劳动生产率也下降了，"低工资、高就业"，实际转变为"低效率、多浪费"，反而削弱了进一步扩大就业的基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①使经济进入"高就业—低工资—低效率"循环陷井。高就业必然是低工资，低工资导致低效率，低效率又要求增加人员，提高就业。②使中国人的勤劳传统逐渐丧失，勤奋之人变得懒惰。③组织纪律涣散，生产组织指挥困难。企业和机关里人浮于事，纪律松驰，遇事互相推诿，事故责任不清。④一个单位人员过多，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增大了人力的内耗。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安排职工就业，在企业内部实行优化劳动组合，逐步清理和减少企业的富余人员，在此基础上使就业量与劳动需求量和劳动供给量相一致，实现适度的人口、就业和工资的增长。

三角贸易 多边贸易的一种形式，常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间，当作一个整体，保持彼此贸易收支平衡的贸易。为便于相互清算和确保贸易平衡，参加多边贸易的国家，通常都签订贸易协定或支付协定，具体规定贸易额、清算的范围和办法等。进行多边贸易，可以克服双边贸易中由于彼此提供的商品不对路、进出口不能平衡，存在外汇支付困难，难以达成协议等不利局面。把贸易谈判扩大到第三国或多国地区，在多国之间相互搭配商品调节供需，从而使贸易平衡，解决外汇支付困难。只在三国间进行的贸易，称为三角贸易。

三高政策 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政策的简称。所谓高工资，是与不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和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工资水平相比有所提高，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工人的收入已经非常高，成为高收入阶层，也不是说工人已经获得了他们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不存在剥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虽然较高，但与经理阶层的收入相比还是较低的，与资本家的利润相比，就更低了。高福利是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各种失业保险、贫困救济、退休补助，医疗补助等等。用于福利措施的物质财富归根到底还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高消费是指工人将全部收入用于消费，甚至通过消费信用贷款将未来的收入也消费掉，"寅吃卯粮"，实行超前消费。三高政策是企图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尖锐的劳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让步，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其次，资本主义经济是受需求约束的经济，要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必须要刺激有效需求。工人的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部分。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是刺激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但是，三高政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局面。相反，它使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扭曲和变形，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和膨胀并存的两难境地。最后，三高政策也难以继续推行下去。

"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 指建立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这是我国80年代的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目的在于改变过去的僵化的商品流通体制，以加速商品流通，提高经济效益。多种经济形式是指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等经济形式参加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活动。多种经营方式是指商品流通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可以是商业专营、工业兼营、农业兼营、工商联营、农商联营、工贸联营等。每个企业可以自销、联销、代购、代销、

代储、代运、代加工等。多条渠道是指商品进销货渠道，计划内商品由国家统一调拨，计划外和非计划商品可以合同购销，自由购销等。少流通环节是指取消一、二、三级批发体系后，可以由市场组成批发体系，减少中间环节。这种新的流通体制有利于发展集体、个体商业，有利于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使城乡开通、产销见面，充分调动国家、集体、个人和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三边工程 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基建工程的简称。三边工程忽视前期工作，不按基建规律办事，极易造成大量损失、浪费，甚至工程全部报废。因此，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自然灾害等，可以进行三边工程外，在正常条件下，工程设计要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的程序办事，以保证基建投资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角债 亦称"多债"、"连环债"是我国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一种非正常的资金拖欠现象。多指企业间彼此无力偿还产品、半成品或原材料等款项而形成的相互债务。许多企业在三角债中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在生产和销售上往往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所以，一方还不上债，便会导致各方运转失灵，甚至还会威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目前我国的三角债务额达千亿元，各地的讨债公司；催债公司也应运而生。产生三角债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市场购买力疲软，造成产品积压和资金不足。法律机制不健全也是构成拖欠债务不还的一个原因。

"三结合"就业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解决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而提出的"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在国家统筹规划的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简称为"三结合"就业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不仅及时解决了大批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且对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促进安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针的实行，为劳动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长远方针。它打破了劳动就业方面长期统包统配的局面，开辟了城镇集体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门路，为在新时期中开创劳动就业工作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随着经济体制包括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入，国家介绍就业的比重将逐步缩小，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要依靠个人通过劳务市场去自谋职业。

工业学大庆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在1964年向全国发出的号召。60年代初期，根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科学理论，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在缺少经验、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质条件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千里冰封的大草原上，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严格的科学态度，高速度高质量地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庆油田在实行岗位责任制方面取得了宝贵经验，其作法是：按照生产工艺和工作量的大小划分岗位，明确规定每个岗位的责任，做到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大庆工人的岗位责任制包括岗位专责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设备维修保养制、质量负责制、岗位练兵制、安全生产制、班组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岗位责任制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多方讨论，由群众自己订，自己执行，自己总结经验，自己修改完善。

工业是主导 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工业是主导主要指重工业而言，这是因为，重工业主要是生产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劳动资料的部门。重工业的发展，对于推动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着领导和关键的作用。表现在：重工业为农业提供农业机械、电力设备、化肥、农药等，这是农业实现机械化、现代化的保证；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料，促使轻工业技术改造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重工业为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通讯业等部门提供技术装备，是这些部门发展的物质条件；重工业是发展现代化国际工业的基础工业。此外，重工业部门主要实行全民所有制，而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不能作片面理解。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使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按比例发展。不然，重工业不仅不能发挥其主导作用，而且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引起严重后果。1962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曾把工业是主导的思想作为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主要内容之一明确提出来的。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的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时所出现的差额。将这种情况绘制成图表，其形状如同张开的剪刀，故称剪刀差。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量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小，则叫缩小剪刀差。剪刀差一词最早出现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中

国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存在的剪刀差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更是不断扩大，建国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逐步缩小剪刀差，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等。但是由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快慢程度不同，还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它与过去的剪刀差有所不同，但也反映了不等量的价值交换，差额过大则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协调发展。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根本方法是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还需要通过价格杠杆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但这时要注意统筹考虑，以免引起轮番提价，必须考虑到市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平衡。另外，通过兴办农工商联合企业，以及农产品加工利润部分返回农业的办法，增加农民收入；放开农产品价格，积极开展农产品议购议销业务，开放集市贸易，这些也是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的重要方面。

工分 亦称劳动工分。即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前计算劳动成员劳动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通常把一个中等劳动力从事一般农活一天完成的劳动量定为10个工分。10个工分折合成一个劳动工。工分原是农业生产互助组组员互换工的计算单位，后被农业生产合作组和农村人民公社借用来计算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量和劳动报酬。工分是根据劳动成员完成作业的数量和质量评定的，是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

工业产权 亦称工业所有权，它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产权制度是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实质，就是把创造发明和商标作为一种财产，并按照法律的规定，确认和保护这种财产的所有权。工业产权既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又是一种法律制度。工业产权制度的建立，对于工业技术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创造发明的专利权是工业产权的主要内容，创造发明具体又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权是工业产权的另一内容，利用商标权管理经济，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互相竞争，能够达到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维护消费者利益等目的。我国于1984年和1982年分别颁布了专利法和商标法。标志着我国工业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工业三废 指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三废"中的有害物质，不经过处理，任意排放、超过环境自净作用的容许量，就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搞好对工业三废的综合治理，不仅可以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而且还可以收回一部分原燃材料，变废为宝，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在有计划发展工业中，应把防治三废，综合治理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企业投产的同时，作到防治三废设施同时投产；在讲求企业经济效益时，更要考虑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力求不再重复工业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国于1973年和1977年分别颁布工业三废排放标准及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对综合治理三废，保护环境等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工业内部比例关系 指各工业部门之间或各部门内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它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主要比例关系有：(1) 产业结构。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原材料与加工业之比等；(2) 技术结构。自动化、半自动化、手工业之比等；(3) 产品结构。初级产品、加工产品与高精尖产品之比等。研究工业部门的比例关系的规律性，选择最优的部门结构对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是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原则建立起来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但也应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断自觉地调整各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以保证各工业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而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保证经济稳定发展。

工人岗位责任制 是企业中岗位责任制的重要形式。其基本原则是实现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人管，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把各项生产和工作任务具体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职工。工人岗位责任制一般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1) 岗位专责制。明确每个生产工人的工作岗位和各个岗位应承担的基本任务和责任。(2) 交接班制。规定各轮班工人在上下班时应交接的事项。(3) 巡回检查制。规定对生产过程，重点设备和设备的重要部位进行检查的时间、内容和方法。(4) 设备维护保养制。规定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的时间、内容、方法和标准。(5) 质量负责制。明确每个岗位的工作质量或对产品质量应负的责任。(6) 岗位练兵制。规定各岗位工作人员应达到的技术标准和达到这些标准的训练方法。(7) 安全生产制。规定各工种和岗位的安全要求和技术操作规程。(8) 岗位核算制。规定每个岗位应核算的经济指标和各项指标应达到的标准。通过这些责任制度，使工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担负一定的责任。

工资利润率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时期产品销售利润总额与劳动者工资总额之比。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工为国家提供利润的多少。一般情况下工资利润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生产部门的利润总额与其工资总额之比，称为部门平均工资利润率，它的大小，说明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社会物质生产部门的利润总额与其工资总额之比，称为社会平均工资利润率。社会平均工资利润率还可以用来间接测定各种产品的近似价格。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工资利润率=\frac{产品销售利润总额}{职工工资总额}\times 100\%$$

社会平均工资利润率＝全社会产品年利润总额／全社会年工资总额

产品价格＝产品部门平均成本+产品平均耗用工资数×社会平均工资利润率

工资结构 或称结构工资。将职工的工资分为固定部分和变动部分的一种工资形式。它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工资形式。其特点是职工工资与劳动报酬相结合，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与社会生产的发展相结合，国家和企业的利益相结合。从理论上讲结构工资一般由以下两部分构成：第一，固定部分。这是职工最基本的劳动收入。每个职工无论其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只要他参加了社会规定的劳动，就可以取得基本生活工资，同时，由于职工随着工作年限（工龄）的自然增长，劳动积累的不断增加，其基本生活需要也相应地提高，作为实现这种需要的基本生活工资也就相应地增长。第二，变动工资。它随着劳动者所担任的职务和实现提供的劳动量而变动。它与职工的劳动成果直接相联系，同时它还与固定工资、集体和个人福利相互制约。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相互制约。中国从1985年7月起，实行结构工资制，将职工的全部工资分解为四部分：(1) 基础工资，这是职工从事劳动得到的基本劳动报酬，工资定额是统一的。(2) 职务（岗位）工资，这是因职工提供不同复杂程度、不同熟练程度，不同强度以及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工作而得到的劳动报酬。它可以通过职务、职称、岗位责任和劳动条件等反映出来。(3) 工龄工资，是以职工的工龄长短来确定的劳动报酬。(4) 效益工资，又叫奖励工资，是根据职工提供的劳动量决定的。各企业由于经营水平和经营收益不同，效益工资有较大差别。对这部分工资，有的企业采取浮动升级制，有的企业采取奖金制。

工业地域综合体 又称工业区域组合。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工业企业所组成统一协调的企业群体。他们在空间上占据一定范围的完整地域，内部结构上受自然、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并且同综合体外部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工业的集聚现象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多个企业的集中布置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共同利用资源、共同利用基础设施以及工艺上的联系等途径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工业的集聚产生了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类型的工业地域综合体。如工业点、工业区、工业城镇、工业枢纽、工业地区等都是工业综合体的空间表现形式。工业点是工业地域综合发展的初级阶段和简单形式，是指在较小的区域范围内集聚少数几个工业企业，且规模不大，结构简单。工业区是工业地域综合体的最基本形式，指在一个较大范围的地域上，以一个较强大的工业联合企业为骨干形成的工业企业群。一般来讲这个企业群内部结构比较协调，彼此之间联系密切，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统一整体。工业城镇是以工业为主要职能的城镇居民点，它既是城镇的类型之一，也是工业地域综合体的形式。通常是在规模不大的城镇中由多个工业点或工业区与工业点结合而成的类型。工业部门之间不仅存在广泛的联系，而且被纳入到整个城镇系统中，成为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技术经济基础。工业枢纽即大中型工业城市，指在一个较大范围的地域上由相邻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业区联合而成的工业地域综合体类型。它们在地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并在整个国民经济地域分工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工业地区是在共同利用矿产资源较优越的生产技术、经济条件和悠久的工业生产历史基础上形成的，由若干工业城镇、工业枢纽甚至工业区联合而成的大范围的区域，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地域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土洋结合 中国经济建设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中的一种，指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它可以是指同一类产品的传统生产方式与先进、新式生产方式的结合，也可以是指同一类产品的手工劳动生产方式与机器生产方式的结合，还可以是指用国内设备进行生产与用国外设备进行生产的结合。

土地承包 在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条件下，适应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改变集中劳动、集中经营传统体制所带来的弊端而于80年代初实行的把公有的土地承包给农户的一种土地管理制度。它是以包干到户的形式出现的。农户承包集体基本的生产资料即土地自主经营，并包上交国家的任务（包括交纳国家农业税、完成国家各项农副产品收购、派购任务），还要包交大队提成（包括大、小队

干部、民办教师、乡村医生补贴、照顾军烈属、五保户费用），交纳生产队积累的提留，其余产品则全部归承包户所有。在我国土地承包的实行中，基本是按照"人分口粮田，劳包责任田"的"人头均田"办法进行的，这就是"均田承包"，随着各户人口的增减而定期进行调整，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已基本上实行了这种土地管理制度。土地承包制既保持了土地的公有制，又彻底改变了传统体制中集中劳动、集中经营的弊端，根除了"大呼隆"、"大锅饭"等弊端，使农民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下自主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当然这种"均田承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而且是自给自足经济观念的反映，它的唯一出路是规模经营。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是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广大农民能够接受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土地的适当集中，达到规模经营，否则就会重走老路。

土地转让　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有偿或无偿地转给他人的行为。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有偿转让包括土地买卖、土地出租等；无偿转让包括土地赠与、遗赠等。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后，国家禁止非法租赁、转让、买卖或变相买卖土地。国家建设、城镇兴办集体企业事业及社队联营办企业等需占用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土地征用方式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社员使用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其所有权属该集体组织，原则上禁止社员个人转让。

土地出让　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将使用权有偿或无偿地转给他人的行为。在中国，土地实行公有，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当前，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的管理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被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在农田承包户之间的流动，即土地转包，这就是我国普遍意义上的土地出让。在我国实行均田承包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一些承包农户由于转营他业或其他原因，不再耕种土地，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再所难免。除非是承包农户把承包土地退还给集体，否则，一般是由农户个人协商解决，个人协商出让土地，不得擅自改变原来承包合同的内容，接受土地的农户承担一切由合同规定的上交任务，并给出让土地的农户一定数量的出口粮。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出让一般是有偿的，而且是有期限的。出让户还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均田承包"，农民并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在土地的使用权转化为土地承包权后，它逐渐成为一种政权，具有一定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在土地使用权让渡时要求得到承认和实现，这就使土地出让成为有偿的。

我国农村目前以土地转包形式出现的土地出让，有如下三个特征：1普遍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现象；2多样性，土地出让形式多种多样；3缓慢性，由于受现行土地制度以及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土地出让虽然普遍，但很缓慢。

土地出让是我国农村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农民拥有对公有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垄断权，而土地的适当集中又是发展规模经营的必由之路。如何解决土地所有者——集体，与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垄断者——出让农户，以及与耕种者的矛盾与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成片开发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一种新的经济开发模式，即出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由企业投资、成片开发的模式。土地成片开发的含义是指，在国家划定的区域内，由企业通过有偿受让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成片承包一定规模的土地，并按照政府批准的规划，进行系统开发，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并再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经济活动。这一含义包括六个方面的要点：（1）国家规划。成片开发是"在国家划定的区域内"，"按照政府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经营的一种经济行为。（2）企业投资。成片开发的主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开发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中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该企业必须具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实行"市场化"的经营运行机制。（3）有偿受让。土地的使用权有偿受让给企业，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属于国家。（4）成片承包。即成片开发，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其面积大小应当足以使区域内的生产和生活自成相对独立的体系。（5）系统开发。在服从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对土地实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包括"七通一平"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一个具有多方面功能的整体性"小社区"。（6）综合补偿。土地成片开发的目的，在于以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手段吸引多个投资者，即再行转让土地的使用权。而使成片开发者用于土地建设的投入及其相关的利益得到综合补偿，同时也派生出新的投资者。土地使用权的再转让是成片开发的重要内容。目前土地成片开发实践中的模式有：境外中资企业的成片开发模式—蛇口工业区模式；中外合资企业成片开发模式—赤湾开发模式；外商独资成片开发模式—天津MGM开发模式和拟议中的海南洋浦开发模式；国内资本成片开发的模式—中信大津工业区模式等四种。

千里马运动 朝鲜劳动党领导下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民运动。它的实质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高度发挥革命干劲和创造才能，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千里马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国家不断地深入发展千里马运动，以最大限度地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千里马运动最初由金日成在1956年12月提出。1958年，朝鲜人民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开展"千里马作业班运动"，把千里马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朝鲜劳动党提出了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金日成在1975年11月又亲自发起了"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这是千里马运动的新发展。

大安工作体系 朝鲜劳动党领导下依靠生产者大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是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方法在工业管理方面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是金日成于1961年和1962年两次视察大安电机厂以后提出和完善起来的。大安工作体系的实质，就是在经济管理中贯彻群众路线。它要求：(1) 实行党委的集体领导，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企业管理；(2) 集中统一地领导生产；(3) 上级帮助下级。大安工作体系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党委会的集体领导体系。党委会在每个经济单位中实行集体领导。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由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并组织和领导决议的执行。党组织负责政治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行政经济部门负责行政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先行，通过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加强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加生产活动和企业管理。2) 集中统一的生产管理体系。以总工程师为参谋长，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生产的参谋部。厂长负责工厂的全盘工作，懂技术的总工程师任参谋长，统一指挥全厂的生产。总工程师根据党委会的决定和厂长的部署，直接领导工厂的计划部、生产指导部、工务部和技术部的工作，并直接指挥各车间的生产活动。3) 送货上门的原材料供应体系。即建立由上而下的原料和材料供应体系，从中央到企业、一级一级把材料送上门、企业材料供应部门将各车间所需要的材料直接送到车床前。4) 全面负责职工生活的后勤供应体系。工厂所在地的商店、农牧场、合作农场等单位的领导人组成工人区经济委员会，统一负责工人区的职工及家属的生活福利事业。在企业内部，后勤负责人领导副食品管理、劳动用品供应、粮食供应、福利设施和住宅管理，并同工人区经济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

"大跃进" 1958年至1960年，中国左倾冒进经济建设路线和实践的别称。"大跃进"的主要表现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大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在农村成立公有化程度高、生产规模大的人民公社；在城市限制和取消个体经营，把集体工商业并入或转为国营经济；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大刮"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否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在经济建设方面，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作用，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强调"以钢为纲"，忽视经济结构合理化。积累持续居高不下，实际消费水平下降。投入不断增加，有效产出减少。同时，还不切实际地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在思想建设领域，背离实事求是原则，搞唯意志论，搞浮夸，说假话。错误地开展思想斗争，把人民内部正常的不同意见争论当作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对待。总之，三年"大跃进"给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中国经济实践中，有关处理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原则的表述。意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特别象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范围内，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经济活动，如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重要比例关系，工农业主要产品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局，国家预算收支，银行信贷规模，货币发行量，国际收支和利用外资，主要产品和物资的收购、调拨和分配，进出口贸易总额和主要商品的进出口量，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科技成果推广项目，教育、文化、卫生及其他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等，必须由国家统一计划，全面安排，集中决策，也就是"大权"必须"独揽"。至于其他一些不涉及国民经济全局的经济活动，则应由省、市、自治区、地区和县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财力、物力、人力的具体状况自主安排，也就是说"小权"应当分散。"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毛泽东"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论十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6年单行本第11页）的思想的一种概括。

大包干 即包干到户，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到1984年底，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占全部农户总数的96.6%。包干到户是农户承包集体基本的生产资料自主经营并包上交国家的任务（包括交纳国家农业税、完成国家各项农副产品

收购、派购任务），还要包交大队提成（包括村、生产队干部、民办教师、乡村医生补贴，照顾军烈属、五保户费用），交纳生产队积累的提留，其余产品则全部归承包户所有。群众把这种方式概括为："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都是自己的"。并赞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大包干实行"人分口粮田、劳包责任田"即"人头均田"，随着人口的增减定期进行调整。大包干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农户承包，自主经营；二是集体统一经营与承包户分散经营相结合。

大锅饭　是人们对分配制度上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叫法。在企业之间的表现为：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不管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好坏，不论经济效益高低，不分盈利还是亏损，不看是否完成国家计划，一样发放职工基本工资，甚至在奖金上也没有差别或差别不大。在职工之间的表现为：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不分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职工都照拿各自的基本工资，升级靠年头，奖金人人有，轮流坐庄。其结果是先进的得不到鼓励，后进的受不到教育，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挫伤了大部分企业和职工生产的积极性，给企业发展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造成"大锅饭"弊病的原因很多，有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也有认识方面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近几年来，在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分配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实行的各种经济责任制，发放奖金同企业的经营成果、职工的贡献大小互相挂钩，在企业中实行浮动工资制，这些改革措施已显示了一定的成效。

"小过渡""中过渡""大过渡"　关于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划分的不同认识（参见本卷"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小农经济　亦称"农民个体经济"一般指以家庭为单位，完全或主要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独立经营小规模农业，以满足自身消费需要为主的经济。有的以自有土地经营，有的以租入土地经营，也有的兼有这两种情况。马克思指出："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小农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在奴隶社会初期曾大量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是农业中的主要经济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向贫富两极分化，使大批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小规模经营的农业依然很多，但其中的劳动者已不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而是资本控制下承担着社会总劳动一部分的劳动者；他们不是"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是从事高度专业化、商品化的生产。因此，这种经济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其中相当多的部分实际上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产农产品的"车间"。在我国，小农经济从春秋战国以来，存在了几千年。毛泽东指出："在农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5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但农村中存在的仍是汪洋大海般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只是在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小农经济被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

小康水平　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小康水平"的概念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来的。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引用了这一概念。所谓小康水平，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由满足温饱要求，提高到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新水平。其基本内容包括：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得到满足；食物结构和营养素质改善，衣着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耐用消费品有较多增加；城乡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城镇和绝大多数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高中的职业教育，人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采；医疗卫生条件和环境质量有较大改善，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小康水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既积极可靠又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确定，广泛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情和干劲。

小商小贩　没有或有少量资金，从商人或小生产者批发购入商品，向消费者出卖，不雇请工人或店员，以自己从事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为生活的全部或主要经济来源的人，称为小商。经常流动行走的小商称为小贩。小商、小贩是个体劳动者。在旧中国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本小利微，生活贫困，经常受到破产的威胁。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留和发展少量的小商、小贩，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国营和集体商业不可缺少的必要补充。

小商品市场 主要由个体手工业者、个体商贩，街道或乡镇集体参加的，生产和销售价值比较低的小百货、小五金、小日用杂货、小家具、小食品以及家庭副业产品等的经营活动和购销场所。小商品市场的特点是品种繁多，需求量大，利润较小，联系千家万户，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恢复和新开辟了一大批小商品市场。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中，要求各地在有利于搞活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保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原则下，实行比较灵活的价格，允许部分小商品的价格随行就市，进行市场调节。

乡镇企业 中国现阶段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兴办的各种企业的总称。从所有制性质来看，乡镇企业包括乡办、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部分农民集资或筹股合办的企业，集体与个人、集体与集体、国营、集体或个人合作兴办的企业，以及个体企业等五种形式。从行业特点来看，乡镇企业经营的范围几乎涉及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外贸、服务业、咨询业等所有领域。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创建于50年代合作化运动高潮中。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逐渐解体，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合作经济迅猛发展，原先形式单一、规模较小、经营范围狭小的社队企业已经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形势，"社队企业"的名称也不反映农村企业的发展状况，终于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乡镇企业"。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是因为：1）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家庭承包制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村劳动组织的合理化，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中国城市生产力难于全部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离土不离乡，从事其他领域的经营；2）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民集体和个人的资金积累增加，从而使兴办乡镇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有了保证；3）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乡资金、技术、人力、物资、信息等方面的交流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着具有浓厚自然经济色彩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迅速提高，所有这一切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人才、物资和市场方面的条件；4）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特点、历史传统差异明显，这就使得乡镇企业能够充分发挥本地区资源优势，获得较大收益，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不仅能够得以生存，而且求得发展；5）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富民政策以及一系列鼓励和扶植乡镇企业发展的措施，使得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扶植下，并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快速发展。截止1988年底，乡、村两级兴办的乡镇企业已经发展到159万个，从业人员4894万人，总收入4232亿元，是1976年社队企业总收入的近16倍。目前，乡镇企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总值1／4左右，占农村总产值近一半。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1）促进了农村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2）为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找到了一条好的出路，减轻了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3）由于不少乡镇企业围绕着农业办工业，使务工与务农紧密结合，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积累的增加，使得有可能用其中的一部分支持农业发展的需要，做到以工补农。4）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本地区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迅速转化为物质财富，对于满足社会需要和外贸出口，丰富市场有重要意义。5）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的协作、联合和竞争，不仅可以使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矿产品、零配件得到满足，而且由于乡镇企业参与了市场竞争，可以对大工业的发展形成外部环境压力，有利于城市大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乡镇企业的灵活经营、应变能力、收益与经营成本的直接挂钩，以及其他一些经营机制值得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借鉴，从而有利于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效益的提高。6）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使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且通过增加上缴税收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是于国、于民、于企业自身都有利的好事。7）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农村地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遍布全国各地的新型农村集镇正在形成和发展。这样，有利于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逐步缩小。总之，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中国乡镇企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务工与务农的矛盾，与大工业争原料的矛盾，环境污染与职工劳动保护问题，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益问题，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某些违法行为和腐败现象问题，乡镇企业发展中民办与官办的关系问题等，都有待于在今后发展中加以解决和完善。

个体工商户帮工 受雇于个体工商户主，以自己的劳动谋取报酬维持生计的劳动者。个体户帮工有常年帮工、季节帮工和临时帮工之分。帮工的主要来源

是当地待业青年和流入城乡的外地"过剩"农村人口，也有少数退休职工和在职领薪人员。个体户雇工的存在是现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个体靠挂集体企业 中国经济改革后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同某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发生联系，并以这个企业的名义从事经营的较大规模的个体所有制企业（包括某些私营企业）；或者是指同某个集体企业联营，但还保留相对独立性的个体企业；也指假集体所有制名义，实际上从事个体甚至私营的企业。个体经济靠挂集体的原因很多：在经营业务上同集体企业有联系，这是其一；在资金、技术、人事关系上同某个集体企业有牵连，这是其二；借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这是其三。此外，靠挂集体企业，以避发展资本主义之嫌，这是某些个体工商户靠挂集体企业的心理因素。

上缴利润递增包干 是我国1983年4月利改税对税后利润包干的一种形式，是大中型企业推行承包经营制的一种形式。即企业上缴产品税后，在核定上缴利润基数的基础上，逐年规定的递增率向财政上缴的利润。其主要特点是：(1) 上缴国家的利润额是固定的，国家财政收入有保证，超过部分全部留给企业。因此利益机制的激励作用大。(2) 承包期一定几年，企业对自己的财力心中有数可以统筹安排，有利于端正企业短期行为。(3) 通过企业自身努力可以获得比较充裕的资金，使企业有条件进行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保持后劲。(4) 这种办法对企业来说风险大、压力大，因税后利润不足核定递增包干上缴数的，由企业专用基金补足上缴，因此能够促使企业加强管理、挖掘内部潜力。

亏损包干 亦称亏损企业利润包干，是指国家对企业下达亏损指标可完成指标后，减亏部分由国家和企业进行分成或个业全部留用。这种形式对亏损企业有利于扭亏为盈。它适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欠佳，设备条件差，产销不对路，生产经营处于由逆境向顺境转变状态的企业。

马钢宪法 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它是苏联的大型黑色冶金企业。按20年代末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钢铁公司格里工厂的模式设计，在美国和德国的帮助下建成。1929年动工，1933年投产。以乌拉尔—库兹涅茨铁、煤矿为原料。包括采矿、冶炼、轧制、成品等生产单位，以及炼焦、动力、耐火材料等配套工厂。生铁、钢和轧钢产量约占全苏产量的十分之一（1981年）。它实行的一套管理办法，在苏联企业中具有权威性。毛泽东1960年在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中，把它概称为"马钢宪法"并对之进行了批判。

马克西莫维奇，伊万（Mrksimovic, Ivan 1924—） 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1924年4月21日生于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49年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1950年任该系经济科学教研室助教。1957年以"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获得博士学位。1958年任讲师，1963年任副教授，1968年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并长期担任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经济科学教研室主任。1978年当选为塞尔维亚科学系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马克西莫维奇还担任过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和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任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还是许多经济学会的委员、联邦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和塞尔维亚执行委员会委员。马克西莫维奇还是《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部委员，《经济思想》杂志的责任编辑和《经济小百科》、《自治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等的编委。马克西莫维奇曾先后到英、美、苏、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保加利亚、奥地利等十多个国家进修、访问和讲学。1979年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来华访问和讲学。

马克西莫维奇自1951年以来一直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共发表文章和著作200多篇（种）。他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有过大量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论现代经济学理论》；《经济科学的对象》；《政治经济学导言》；《现代经济科学的危机和抉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当代各种经济学派和经济思想也很有研究，代表作主要有《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对南斯拉夫经济制度、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它们同经济政策的联系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公有制的理论基础》和《南斯拉夫的长期发展和经济制度》。尤其是在《公有制的理论基础》一书中，他从分析所有制经济范畴的实质入手，系统地考察了公有制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实践，指出了以苏联为代表的集中的行政计划领导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虽有其合理性，但它本身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必然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为更先进的公有制形式所取代，这种公有制形式就是自治的社会所有制模式。马克西莫维奇接着在该书中阐述了自治经济制度下社会所有制模式的诸

方面内容，指出了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自治形式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参〕马克西莫维奇的自治社会公有制理论

马克西莫维奇的自治社会公有制理论 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通过对苏联式传统公有制的批判和对自治社会占有关系的诸方面的研究而提出的有关自治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的一系列理论思想。这些思想较集中地反映在他1975年出版的《公有制的理论基础》一书中。

1.所有制范畴的经济内容和实质。马克西莫维奇认为，所有制范畴的经济内容是有关财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经济关系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把所有制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因素统一起来看，所有制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表现为经济主体对经济财富的一定占有方式。但是，要进一步揭示所有制的实质，必须遵循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从经济意义上把所有制作为分配关系即占有关系来解释。这是因为：第一，分配作为先于生产的生产条件(资金和劳动的分配)，已经处在生产结构之中；第二，产品(或收入)的分配，能最充分和最显著地综合表现所有制的经济实质。把所有制作为分配关系即占有关系来理解，有利于区别法律范畴的所有制与经济范畴的所有制、区别法律形式的所有制占有权与经济的实际占有。一个经济主体（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或经济机制的作用）实际占有经济财富或部分收入，它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真正所有者，虽然从法律上讲，这些财富和收入的承担者可能是其他经济主体。因此，任何经济所有者都是实际占有某些经济财富（收入、使用价值）的人，正是这种占有使主体同生产领域及生产关系发生了联系。换言之，任何主体如果拥有某些生产要素或掌握那些有助于保持、创造或增加现有经济财富的经济职能，就是经济所有者，它们能依据相应的权力和职能的合法性参加占有部分或全部社会劳动的经济成果。

2.占有关系的构成要素。主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所有制的占有主体；二是所有制的对象或客体。占有主体是所有制实质的构成要素，因为占有主体实际上也就是对经济意义上使用生产要素以及经济权限(职能)实施法律监督的主体。通常，生产要素的法律所有者和经济所有者并不一致，直接生产者是自己劳动力、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所有者，但并不是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另一方面，对生产要素实行法律监督的经济主体可以占有这些要素对生产过程所作的贡献，从而在经济上肯定自己的法律所有权。但是，如果从宏观经济和阶级整体范围来看，把所有制看成阶级的所有制，生产要素的经济所有者和法律所有者还是一致，所有制（生产关系）的经济内容和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之间也具有原则上的一致性。不过由于所有制的各个主体总是某些具体的人，而不仅仅是经济阶层的人格化；且由于政治机构对所有制的法律制度有影响，从而也对经济制度有很大影响。所以，南斯拉夫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表明：社会各级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明显的所有制性质和法律权限，它们容易变为经济占有者和部分地实现经济占有，也即转变为对自己的否定—从非所有制转变为所有制，从公有制基础上的管理者变为占有者。所以，马克西莫维奇认为必须从下述含义上来理解占有主体的特点：占有主体既包括具体人，也包括生产因素的法律所有者；既包括直接生产者，也包括那些产生于经济制度的职能需要的所有的社会主体（机构）。至于所有制的客体，一般指经济财富。物质上看它是生产领域劳动过程的结果，包括必需产品和剩余产品。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就包括着对这些产品尤其是剩余产品的占有。由于作为占有主体的各个阶层之间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存在很大差别，他们与占有客体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分析占有关系体系时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更全面、深刻地反映占有关系的面貌。

3.国家的历史地位与公有制的发展。马克西莫维奇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是决定所有制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回顾总结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历史，首先指出了以苏联为代表的集中的、行政计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出现的合理性，但它本身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必然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为更先进的公有制形式所取代。马克西莫维奇认为，在苏联模式中，国家或代表国家的各种机构，是国家所有制的基本占有主体，这不仅是由宪法在法律上确认的国家所有制，而且也是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即国家支配和占有社会产品的大部分，把这些产品分配到各个生产领域或分配到国家机关和机构主体的直接消费中去。在这里，国家占有、分配、使用和进一步将社会产品再分配成各种最终消费形式的主要机制是国家计划，整个社会生产尤如一个大工厂，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的雇员，企业经理是国家生产组织的直接工具，具有颁布法令的职能，因此它体现和象征着国家的主权和主体，同时为国家执行占有的职能和管理的职能。作为占有权及其经济内容的承担者，国家主体的实质还表现在：国家决定经济活动的目标（制度和某些需求结构），从而也决定占有的物质内容。马克西莫维奇还认为，国家作为影响所有制性质的基本

要素，其作用还表现在一些间接的形式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 在按劳分配的前提下，国家不仅对个人收入和居民总消费作出计划决定，而且还决定零售价格的一般水平，实际上也就是决定形成个人按劳占有的实际比例。这显然是分析所有制性质时应加以考虑的因素。(2) 在国家所有制中，生产资料按照计划价格而不是经济价格定价，因而实际生产费用、产品转移价值和新创造价值同其实际的经济价值都或多或少是相偏离的。这种情况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作为公有制主体的国家不仅要根据经济原则，而且要考虑政治目的和其他战略目的，即根据政治权力的原则，而不是根据经济学的原则来完成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和占有；二是作为个人占有主要对象的消费品的交换也不是建立在真正的等价交换原则上，因而占有也不完全是根据劳动（多少有些偏离）来进行。(3) 苏联模式虽然开创了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原则，并通过"劳动权"（它是联系社会资金和占有主体的纽带）和"选择职业和技艺自由"（它使人们有可能自由安排劳动，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获取收入）等法律规定来确认和实现，但由于国家对劳动岗位和职业选择自由都有规定，这些原则的实行受到了限制。并且由于国家把一般管理社会资金和专门经营职能同支配和占有社会产品结合在一起，使得作为主体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社会，即代替了直接生产者和劳动者集体去进行占有，从而使他们对公有制的关系带有间接、派生的性质。总之，马克西莫维奇认为，可以把公有制的苏联模式评价为具有国家所有制性质的一种所有制的特殊历史形式：在理论上，这种模式把国家和社会等同起来；在经验上，则把个别占有和国家占有以及国家管理社会所有的资金的经济职能等同起来。在这种模式中，还由于实行了双重分配原则，即国家及其主体的政治、意志对计划、劳动成果和实现以及整个社会的需要作出数量和质量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按劳分配原则，从而实际上限制了该模式的主要公有制职能。

4. 自治经济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所有制理论模式。马克西莫维奇在这里着重阐述了自治经济制度的构成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阐明了自治经济制度与苏联模式的根本差别。(1) 所有制主体的转变，即在自治关系体系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只承担由社会通过宪法及根据宪法引伸出来的其他法令委托的职能，也就是劳动者及其经济组织自己不能直接承担的职能。为了发挥经济或一般的社会职能，国家参与占有社会产品的一部分，因而客观上仍表现为实际的占有主体。这意味着国家的自治关系体系中仍是"准所有制主体"，同时也意味着原先作为统一的所有制和占有主体的国家发生了分解，所有制关系主体产生了某种二重性：一方面是社会，也即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的代表"的国家，亦即政治制度中的各级社会政治共同体。与此相适应，自治社会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上越来越倾向于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占有与社会（共同体）的需要不协调一致，从而国家作为占有主体就象直接生产者不是根据自己的劳动贡献而占有他人的一部分劳动一样，同样是不合法的"所有者"。马克西莫维奇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某种剥削形式，其起源就在于某个占有主体或实际起作用的主体（准主体）对社会资金实际上实行的垄断。(2) 自治关系体系中计划与市场的矛盾。马克西莫维奇认为，自治关系体系是建立在商品关系基础上的，因而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种矛盾。这是公有制和商品生产共存而发生的理论上的矛盾，也是实现社会所有制再生产条件的矛盾：一方面在历史发展阶段上，要实现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只能使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完全从属于价值规律和自治关系特有的商品经济的其他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同商品经济规律并不完全适应，因为价值规律及商品生产其他规律（如价格、市场垄断等）而产生的自发无政府过程造成了经济利益的差别和激化，必须加以引导和校正。因此，社会所有制存在的条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看作是两种制度实际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自治制度和两极即商品关系（"发生论"一极）和计划指导及协调（"目的论"一极）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目的论"一极，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显然非常重要。(3) 自治社会所有制的构成。马克西莫维奇认为，自治社会所有制同其他任何所有制范畴一样，包括三个基本因素，即所有制的主体、客体和自治经济占有。首先，从所有制占有主体来看，其构成包括直接生产者的大多数（社会）和作为社会代表的国家及其管理机构。在这里，所有与完成共同需要有关的一定经济职能，并据此进行占有的机构（如联合劳动组织、复合劳动组织、国家等）都可以称为"准主体"，其任务关系到维护整个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条件，实质上是制度性内容和经济政策内容方面的任务，其最初的和基本的职能是保证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资金和劳动）能"自由结合"，亦即每一劳动者能直接地作为占有主体（不再以国家雇佣者的身份）通过联合劳动自由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这样，在自治关系体系中，社会所有制的法律主体和经济主体二者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离：一方面，1963 年的宪法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社会所有制的所有者，这也就是有关社会所有制是"非所有制的制度"的理论；另一方面，如果把所有制理解

为经济占有，那么一般就不可能取消社会所有制经济范畴中占有主体的存在，因为占有主体是占有实质本身的组成部分。如果说社会所有制资金原则上不能成为经济意义上占有的法律根据，因而也不存在这个意义上的法律占有主体的话，那么经济意义上占有的法律根据可以从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中产生，这些文件规定了各个主体的主权和职能，而那些主权和职能的后果是：进行经济占有，或根据使用和管理社会所有制基金的情况建立经济主体。因此，在社会所有制下，既存在经济占有主体，也存在主体多元性，尽管任何人都不拥有社会资金的所有权。第二，社会所有制的客体即资金。对此，马克西莫维奇赞同按社会所有制资金的经济效能和效率来给资金下定义，即认为它们应包括"决定社会产值和国民收入数额及发展中的生产力的一切根据和经济财富的一切源泉"。第三，自治的经济占有，自治经济占有的基础是以社会所有制或以"社会占有"（前提是用社会资金共同劳动）为根据的生产关系，它也是自治占有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实质的重要构成要素。在这里，体现社会所有制实质内容的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不论哪个自治占有主体都不能根据社会资金以生产、消费和分配职能的任何形式占有社会产品，而实现这一原则的途径是使所有主体参与管理和占有社会资金的机会均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可以把机会均等理解为"自由进出"，即与社会所有制资金自由联系和分离，并使这个经济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完全处于竞争的状态中。在统一和自由市场的背景下，竞争的社会资金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一价格，是自治经济制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体现社会所有制自治关系经济内容的第二个原则是人类劳动作为基本的占有标准，即劳动首先作为个别主体参加在经济上使用社会财产的根据，其次作为经济过程中所有经济部署的根据，再次作为劳动组织的产品（即收入）个人占有的根据和准则。体现社会所有制经济实质的第三个根本原则是根据社会需要实行占有，这种占有准则以承认某些需要的集体性质而产生，但总体上说这些需要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满足一定社会文化和文明程度以及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共同需要。

5.社会所有制资金价格存在的必要性。关于社会所有制资金是否有价格，即资金利息是否有存在必要的问题，南斯拉夫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马克西莫维奇在评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之后指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明，利息作为社会资金的使用价格是自治社会所有制实质内容不可缺少的要素：一是没有社会资金价格（利息）就不能对社会所有制的各个要素的贡献（即它们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影响）作出经济估价，社会容易发生根据劳动生产力资金的边际贡献而不是劳动者本人的贡献进行实际占有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所有制公有性质的否定；二是没有利息就不可能合理分配社会所有制资金，即有抉择地使用"社会资本"，只有通过"社会资本"市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使社会所有制资金的边际生产率与短期市场资金价格趋于相等，并使所有社会资金的需求者面临相同的资金价格，才能使依据资金垄断获取收入成为不可能，从而有利于实现资金及相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马克西莫维奇认为，取消公有制资金的利息及对取消的原因所作的理论解释都是不能接受的；把利息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残余或国家社会主义的残余，看作是国家或私人所有者占有生产性劳动收入，或解释为是由资金占有的私有制形式产生的收入，并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利息范畴也将消失，这一系列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的商品经营关系，已经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所有制资金的不足，其合理和有效利用的必要性、社会所有制资金对劳动生产力发展、对一定劳动量所能实现的价值量或收入量、对宏观和微观经济水平产生的影响，以及根据劳动平等对待资金和分配的要求，这一切都把作为社会资金价格的利息提到了重要的地位，无论人们在理论上如何解释它，这个客观事实都是存在的。马克西莫维奇还进一步谈到，在自治关系体系中，利息是基层生产者主体（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及它们的复合劳动组织占有社会所有的资金而应向社会支付的价格，因为它们不是在所有制基础上支配这些资金，对这些资金也没有垄断权。而利息率的高低则取决于这些资金所能实现的经济价值量，在存在竞争性的社会资金市场条件下，这种利息率会与资金边际生产率趋于一致，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新增价值量作出估价，这个新增价值量是由社会资金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引起的，其变化量（利息的变化量）则由社会资金客观的供求平衡价格来衡量，由于竞争性资金市场的存在，资金价格对所有社会资金的需求者而言都是相同的。总之，马克西莫维奇认为，从社会所有制的实质来看，在自治关系下承认社会所有制特殊职能中的资金利息是极其重要的，但另方面也要注意，由于市场并不能最优地完成一切安排、选择和分配职能，也不能在实际经济（社会）生产费用、价格和按劳分配之间确定理想的巩固的经济关系，因此，必须有整个社会或广泛经济集团一级的社会计划，以保证社会资金的实际经济价格或保证按社会需要对它们作正确的分配，对那些建设期长的项目的建设投资，还需要由社会基金予以保证。至于经济实践中出现的同资金占有有关的垄断，如国家机关或国家本身对资金的垄断等，实际上是自治关系不发

达，以及没有解决使公有制避免各种暂时私有化形式的制度问题的表现。

四 画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 1927—1937年，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行土地革命，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是革命根据地经济的核心；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多种成分并存，是革命根据地经济的基本特征；解放农业生产力，打破经济封锁，积极推动苏区工、贸、财经济发展，支持革命战争，是革命根据地经济的主要任务。革命根据地经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工业化道路 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途径和措施。所谓工业国，就是指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优势地位，并且推动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从历史上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另一条是首先发展农业，其次是发展轻工业，在农业、轻工业得以发展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早在1952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就明确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中国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1953年，在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从而为工业化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956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工业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了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这一思想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的。但是，1958年，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工业化又走上了"以钢为纲"的道路，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中国工业化受挫。总结中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原则：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健康发展和最终完成的保证。2）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与此同时，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3）正确处理好积累和消费、基建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工业现代化、特别是重工业基本建设的进行，要同国力相适应，既不能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消费，又不能挤压现行工农业生产。4）正确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要牢固树立农业是基础的思想，要遵循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十分注意工业结构的合理化。

中国土地改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通过了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6月3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接着，在新解放区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中70～80%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约占农村人口总数90%的贫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土地，贫雇农和大多数中农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压迫、陷于穷困落后的根源，是中国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切彻底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得到巩固，农村的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我国已有1.45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但是拥有3.1亿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则尚未实行土地改革，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必须完成对这些地区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中，党中央明确地规定了土改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改的主要的直接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新解放区土改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改变了1947年10月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上关于征收富农的多余的土地和财产的规定，改为保护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保存了富农经济。这样，有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长期战乱破坏了的农业生产，有利于孤立地主和保护中农。此外，对小土地

出租者也采取了保护的政策，不征收其出租的土地。整个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团，投入了这场伟大斗争。到1952年9月为止，除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全国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完成土改的地区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

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的一场伟大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的改革。新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交纳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农民真正从经济上作了主人，从而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改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以后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见本卷"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农村试验区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于1987年初开始创办的农村经济改革试验区。办试点区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意在先突破改革的僵持局面，即总结完善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熟经验，使之制度化，法规化，同时也以改革进程中的难点作为突破口，先从点上试验切入，进而为面上推广提供可资参照的操作过程。这样可克服过去完全依靠发文件或层层开会等老的行政手段统一指挥的弊病，从而探索出对农业商品经济发展进行法规调节和分类指导等宏观决策的新路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指一定地区范围内，在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和重大措施。

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一般应遵循下列原则：(1) 要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总战略的指导下进行，有利于维护全国一盘棋；(2) 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条件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体现地区经济特色；(3) 要维护地区内部经济结构合理化，实现主要经济指标的综合平衡；(4) 要在维护相互独立的地方区域性经济体系利益的同时，加强同相邻地区和经济关系的比较密切地区之间的联系，按照外向型的原则，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各个地区经济条件和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加强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对于因地制宜地执行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战略、总政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就要进一步扩大各级地方的经济决策权力，为发展地方区域经济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指经我国政府批准，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我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投资举办，共同管理和共负盈亏的企业。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一种形式。按1979年7月1日颁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原则是：(1) 在无损国家主权和经济独立的前提下，有选择地与外资实行经济合作，其经营范围应有适当限制；(2) 贯彻以我为主，合营企业应经我国政府批准方能设立，其产供销活动要在国家有关部门指导监督下进行；(3) 必须做到双方有利，不能只对一方有利。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投资的技术和设备必须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企业的正副经理（或厂长）由合营双方分别担任，企业净利润按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分配等。

中准价格 亦称中价。它有两个含义：1) 浮动价格的基准价格，一般指国家统一定价，它由国家物价部门和生产主管部门统一规定，各地区、企业及管理部门必须贯彻执行，是指令性计划价格。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国家统一定价。制订这种价格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并考虑供求因素和国家的经济政策，需要变动时应按价格管理分工权限，由订价部门调整，其他任何部门和企业无权变动。企业可以在这一价格基础上、在规定浮动幅度范围内，自行制订和调整自己产品的价格。浮动定价产品要经国家批准，兼具了统一定价和自由价格的好处。例如某一产品国家定价为每个100元，允许企业在国家定价基础上上下浮动20%，这样，企业就可在80—120元间自行制订和调整其价格。2) 制订同类商品品质差价所依据的标准品价格。标准品价格乃同种不同质量商品中被选择为比质比价标准的商品的价格。商品社会中各种商品必须按质论价，在合理划分商品种类的基础上，适当选择某一质量的商品为标准品并合理制订其价格，其它商品通过与标准品比质比价制订价格。同种商品的质量差别表现在品质、式样规格及等级等差别上，标准品应选择产量大、正常生产、质量稳定、行销面广的商品，以提高其代表性。标准品价格应充分考虑价值、供求、国家政策及变动趋势

而确定。

中心城市 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具有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行政中心等作用，对该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发挥巨大影响的城市。中心城市是在长期的历史变化中形成的。它一般拥有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齐全的产业门类、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便利的交通通讯条件、较大的城市规模等优越条件。经济中心是中心城市的主要功能。根据形成中心城市的条件不同，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性质不同，可以划分为多功能或综合性的中心城市与单一功能的中心城市两大类型。按照中心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又可分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出现，是人口、经济活动、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各种社会交往向某一特定地域聚集，以实现聚集效益的必然产物。我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需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1978 年以来，我国通过政策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初步建立和正在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和经济网络。

中间产品 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各物质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该期内已经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再被加工，可供最终消费和使用的产品，称最终产品；另一部分是作为原材料、燃料等劳动对象继续参与生产过程，进行进一步加工的产品，称为中间产品，它的价值要计入观期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去，是转移价值的一部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应有合理的比例，要使中间产品的生产能足够满足最终产品的需要。一般讲，最终产品包括：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即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消费品；用于总积累的产品即用于积累产品与用于补偿已磨损的固定资产产品之和，以及用于出口的产品等。

中苏边境贸易 中苏两国在边境毗邻地带及其纵深地区所进行的一种贸易。最早的形式是从 17 世纪民间开始的边境小额贸易，俗称"边民互市"。指两国通过协议，允许边民在一定的范围内（一般离国境线两边各 15 公里），在所指令的开放地点和集市上进行以生活资料为主的、规模较小的一次等值性易货交易，一般都互相给予减免关税和简化海关手续等优待。以后发展为较高层次的边境地方贸易，统称"中苏边贸"。是指中苏两大邻国为满足双方边境地区及其纵深地区的生活和生产需要所进行的易货贸易和易货项目下的经济技术合作。

中央集权 "地方分权"的对称。国家统治权力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制度。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授予，服从中央政府领导，接受中央政府的指导和监督，按照中央政府的法令、政策办事。中央集权制在中国开始于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封建国家，以后相继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保证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处理国家事务，又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地方享有一定自主权。在欧洲，15 世纪后期到 16 世纪初，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资本的集中要求政治权力的集中，更趋向于中央集权。采用单一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实行中央集权；采用联邦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府虽有相当的权力，但国家大权仍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比学赶帮超" 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超先进的简称。中国"大跃进"时期（1958—1960 年）工业战线上总结出来的一种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形式。"比学赶帮超"曾经极大焕发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和献身精神。但是，由于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干扰和冲山，这种热情没有得到科学保护和利用，没有充分起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的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专政；作为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它又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主要表现在：1）对内镇压已被推翻但仍企图复辟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活动；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他们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积极运用各种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手段，组织和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促使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方向迈进。2）对外防止和打击外部敌人的颠覆和侵略活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职能会因不同的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形式。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执行政治职能，而且执行直接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本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无产阶级专政执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不断

弱化，正在向"政企职责分开"方向变革。

无缺点运动 亦称"无缺点计划"、"无缺点管理。"是美国马丁公司于1962年首创的一种质量管理方法。要求全体职工都能注意并设法防止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减少到零，作为目标的计划管理，以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降低成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它的主要内容是：(1) 不仅限于发现缺点，更重要的是首先发现缺点；(2) 使每个人充分认识提高产品信誉所负的责任；(3) 经常及时地交换企业内上层人员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意见；(4) 改变职工的工作态度，发挥他们的潜在力量，改变"人难免犯错误"的习惯思想；(5) 使职工了解企业的计划，鼓励他们勤奋和创造精神；(6) 它强调管理中的心理影响，以弥补单靠监督和组织管理的不足；(7) 对无缺点地完成任务者，或达到无缺点目标的给予物质奖励。无缺点管理的开展，可以使最小的投资，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节约资金、节约时间。此运动1965年转入日本，及时地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无烟工业 指旅游业。由于这个行业不需要生产性的原材料、燃料及动力的投入，故名。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均处于不发达、不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参看本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正当竞争 在营业中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如作假广告，对竞争对手的企业或商标，采取以假乱真的手法，散布流言蜚语破坏竞争对手的威信，损害竞争对手及其顾客的利益。很多国家对防止不正当竞争都采取了一定措施，如在日本，对此已有商法上的商号保护、专利法等方面的工业所有权的保护、刑法上的信誉诋毁及业务妨害罪等规定。此外，还制定了不正当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规定了对加害者停止该项行为的请求权，赔偿损害的请求权以及为恢复信誉所需措施的请求权等。

包产到户 农村集体经济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把农业生产任务按产量完全包给农户负责，超产奖励、减产受罚的一种做法。在中国，包产到户最早出现于60年代初期，后来，被作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加以否定。在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包产到户再次受到肯定，并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形式。

公有制经济股份化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中的一种思路和措施，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份化。在中国，这种思路集中出现在80年代中期，目前还处在探索之中。作为一种改革措施，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化问题还处于局部试点阶段。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化的具体作法有不同的思路，主要有三种类型：1) 把全民企业转变为国家股、企业股、劳动者集体共有股、个人股、社会股组成的股份企业，国家股居于控股者地位，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不变；2) 把全民企业积累归企业全体职工所有，变成企业股，由此带来的收益由全体职工分享，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不变；3) 把中小全民企业的资产折股分配给职工个人，或向本企业职工，向社会拍卖，形成以个人股为主体的股份制企业。上述作法的目的在于使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明确分离，责、权、利紧密结合，搞活经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股份化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索。

公私合营 (见本卷"国家资本主义")

公积金 我国城乡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进行扩大再生产，每年从集体收益中按规定比率提存的公共积累。这项资金是用于购置固定资产、进行生产性基本建设和扩充营业需要的专用基金。公积金是集体经济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公积金不能作为股息或红利进行分配，也不能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用于非生产方面的需要，必须专项专用，不得随意挪作它用。

公益金 我国城乡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每年从集体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提留的公共福利基金。它主要用于举办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如建设福利设施、举办合作医疗、发放困难补助、兴办文教等。公益金的提留和使用需经集体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公益金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关系密切，它随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增长。它的设置为职工解除了后顾之忧，对于调动集体所有制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起着积极作用。

计划经济 有计划地领导、组织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的对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由于它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的消极性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使生产符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生

活需要的目的，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按照计划规律作用的条件和特点不同，计划调节的范围、形式和程度不同，以及计划机制运动的方式和特点不同，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计划经济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及运行特点。在中国现阶段及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计划经济将有以下这些特点：1）由于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对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形式和程度不同。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虽然国营企业的经营权和国家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但是，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有权通过经济的、行政的乃至法律的手段影响或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拥有独立经营自主权的法人，固然有权根据市场的需要和本身的物质利益组织经营活动，并相应承担经济责任；但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具体承担者，必须接受国家的计划领导，包括必须完成国家下达的直接计划的形式——指令性计划和各种间接的计划形式——指导性计划。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国营企业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它们完全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家除了以税收的形式直接从集体企业无偿征收一定数量的税金以外，一般不同集体企业的经营活动发生直接联系。国家一般不能向集体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而只能通过间接计划的形式，对它们的部分生产经营活动实行计划指导，也就是说，国家并不直接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提出指导性计划，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出要求，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包括信贷、价格、税收等）引导和影响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把它们纳入有计划发展的轨道。由此可见，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对于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形式和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计划性是不同的。至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计划规律对它们基本上不起作用。2）在计划管理形式上，在现阶段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搞好，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的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是因为：从中国的目前情况来看，生产社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比较低，全国40多万个工业企业，大中型企业只有5000多个，绝大多数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较低、规模较小、生产分散进行，这是其一；中国农业生产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分散进行，这是其二；中国幅员广大，经济条件差别大，内地、边疆和沿海、各个部门、行业、企业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这是其三；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水平发展较低，这是其四；需求千变万化，市场瞬息万变，这是其五；缺乏必要的计算技术和手段，这是其六；中国的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是其七。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把一切经济活动都通过计划管起来，也没有必要统统管起来。3）由于现阶段还存在着不断发展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这一特点，要求把计划规律的调节作用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计划排斥市场，或用市场排斥计划的作法都是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属性相悖的。

计划管理 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要求，并适应一个时期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计划形式来组织、领导调节国民经济各项活动的管理制度。长期以来，它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曾于1984年对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点作如下概括：第一，就总体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是按照上述要点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改革的，其基本思路是：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计划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中期和长期计划上来，适当简化年度计划，并相应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两种基本调节形式。所谓计划调节，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其他规律的要求，根据一个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事先的、自觉的、有计划的领导和管

理，使社会劳动按照客观需要的比例合理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使社会生产适合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计划管理，对生产和流通实行计划调节，特别是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如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总基金规模及其比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必须由国家计划严格控制。重要产品（特别是紧缺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重大建设项目的安排、骨干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必须接受国家的计划领导。所有这一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计划调节必须建立在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计划调节要自觉利用市场机制。计划调节有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主要形式。所谓指令性计划，就是计划指标带有强制的命令性质，国家直接依靠行政权力保证它的实施，生产经营部门必须执行和完成，在现阶段，这种计划管理形式只适用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极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但是，由于这种计划形式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颁布实施的，因此，容易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管理太死，不能调动企业的经营积极性，甚至造成生产脱离市场，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或产品的严重供应不足。所谓指导性计划，就是国家的生产和销售指标不带有强制性，它只供生产和销售部门参考，销售部门参照计划和市场需要与生产部门签订订货合同，生产部门按照合同和市场需要组织生产。这种计划不是依靠行政手段，而主要是依靠各种经济杠杆来保证计划任务的实现，如价格、税率、信贷、利率等杠杆。指导性计划比指令性计划较为灵活，它既可以通过合同等形式把生产和销售纳入计划轨道，又能够发挥生产和销售单位的积极性，较好地反映市场需要，做到产需挂钩，按需生产。无论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必须充分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和其他客观经济规律。指导性计划本身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手段来实施，它必须充分考虑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指令性指标，虽然有国家行政权力加以保证，但是，它也必须考虑和符合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的要求，否则，单纯依靠行政权威来维持计划的实施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

所谓市场调节是指生产单位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和价格的涨落来确定生产和流通的方向、规模的一种调节形式，市场调节也就是价值规律的调节。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自觉加以利用的，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调节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和实现的。市场调节由于把生产者同市场联系起来，生产和销售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适应性，能够直接从物质利益上刺激商品生产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可以避免传统僵化模式所带来的弊病。由于市场调节是在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单纯的市场调节所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及由此而来的危害可以缩小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尽管如此，由于实行市场调节还是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和自发性，有可能干扰国家的计划和造成生产力的浪费。在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也还有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包括个体、私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营活动）基本上不受国家计划指导，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的生产和流通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辅助性的补充。

无论是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都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中，必须既要坚持整个生产和流通的计划调节，又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板块式"结合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形式之一。亦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思路。"板块式"结合形式是将国民经济活动即调节的对象分成两块，分别由计划或市场进行调节。由计划调节的那部分经济活动和由市场调节的那部分经济活动之间的界限划分、范围大小，取决于一个时期的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和人们对客观经济过程的认识程度。也有的人主张国民经济活动可以分成三块：一块是指令性计划调节的部分，在这一块中市场不起调节作用；一块是市场调节部分，在这一块中没有计划调节；另一块是指导性计划调节的部分，主要依靠各种经济杠杆，其中也包括市场机制来实现，它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方式的结合部。不少人认为，"板块式"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无疑都是对传统体制的一个重要突破。然而，这种主张囿于在"板块"上做文章，不能从经济运行的全局把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渗透式"结合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形式之一。亦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认为，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计划调节中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市场的供需状况，而市场调节则是在计划指导下进行的，要有赖于计划调节加以实现。一些同志认为，"渗透式"结合强调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在现代商品经济和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基本作用和相互联系，突出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

的基础作用，但是，这种主张多带有理想化的色彩，难以付诸实际操作，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中模拟市场活动，实为“虚市场实计划”。

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又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的形式之一。亦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认为，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中，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民经济中全部主要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社会再生产中的重大比例关系，而且包括绝大部分国营企业和一部分大集体企业的产供销活动都由计划调节，只是一些小商品生产和农贸市场等由市场调节。不少人认为，这种结合与改革前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差别不大，因为即使在传统体制下，“计划一切，一切计划”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总有一部分经济活动没有被包括在计划管理之中，而只能实行市场调节。这种计划与市场的“主从式”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是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市场调节看成是异己的东西，把市场机制排斥于国民经济各主要活动之外，只是留下极次要的部分由市场调节。因此，它不可能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思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又一种提法。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概括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正式提法。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它既遵循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商品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那些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通用做法，但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决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计划经济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改变过去那种忽视市场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做法，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国家的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究竟怎样结合，它的具体途径、形式、办法和措施究竟是哪些？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有待于在经济实践中作进一步的探索。

计划模拟市场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1904—1965）在30年代提出的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用模拟市场机制的试错法（或称“逐步逼近法”）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基本点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经理必须遵守两项规定，一是企业产品的边际成本要等于中央确定的价格，以保证中央要求的规模生产；二是要按平均生产成本最小的原则来选择生产要素的组合，以使企业在生产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在这种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决定价格的过程便类似于竞争体制中的市场价格形成过程。当中央的定价出现偏差时，产品和资源供给的数量便会出现短缺或剩余，中央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通过“试错法”修正价格参数，直到找到使产品供求达到平衡的均衡价格为止。（参看本卷“奥斯卡·兰格及兰格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 捷克和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1919— ）提出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它的基本点是：1）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因而社会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个人、企业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劳动者各自消耗的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也就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市场关系也就由此而产生。2）对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控制，将促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向着尽可能和谐的方向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就是在国民经济的范围内，在考虑到一切基本的内在的经济联系的条件下，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作出某种全社会的有目的的规定，并且要做到使计划中的经济活动同这种活动的未来的实际发展始终保持一致。3）市场机制在协调和解决利益矛盾，克服个别的或局部的耗费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之间差异的矛盾，调动企业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方面，是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替代的。以为可以通过制定更详细和更准确的计划来解决效率和利益矛盾，那只是幻想。但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市场从来就不具备完善的结构，市场信息的反馈不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未来发展，市场不能预示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也不能防止对社会再生产可能的干扰和破坏，单凭市场不能解决社会的长期发展问题（教育、文化、医疗、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等），等等。4）计划和市场必须结合起来。在宏观经济中，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实现收入分配计划来避免宏观紊乱，即宏观经济由宏观分配计划来控制和协调；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则在分配计划的框架内由市场调节，实行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参看本卷“奥塔·锡克及其经济思想”）

计划价格 由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制定的价格。计划价格的种类包括：(1) 国家统一定价。即由国家各级政府或管理部门统一制定的价格。它具有宏观计划性、严肃指令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2) 国家指导价格。即由国家各级物价部门，在自己管辖产品的范围内，与计划部门、生产部门、生产单位共同协商，并依据市场供求情况、价格变动状况等而制定的价格。它的特点主要是指导性，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指导，提供参考的作用。(3) 浮动价格，即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变动幅度，允许其在此幅度内依据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自由浮动的价格。浮动价格又包括最高限价、最低限价和中准价三种形式。计划价格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但要使之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也必须使之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准确地反映社会必要劳动的耗费，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完善，计划价格中国家统一定价的比例将逐步下降，而起主导作用的将是国家指导价格和浮动价格形式。

计划利润 企业在计划期内应实现的利润总额、利润分配和利润率的计划。它是企业财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核企业生产经营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正确编制和认真执行计划利润，便于国家有计划地安排财政收支，并促使企业合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改善经营管理，厉行增产节约，增加盈利。计划利润是由计划产品销售利润、其它销售利润和计划营业外收支净额等组成。它是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企业经营决策确定的利润目标以及市场预测进行编制的。编制计划利润的一般程序是：先确定产品销售利润计划，然后确定其它销售利润计划和营业外收支净额计划，再求得利润总额计划，并进而确定利润分配计划及各项计划利润率指标。最后编制出计划利润表。

计划外用工 指在国家劳动计划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招收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由其直接组织生产或工作，并支付工资的人员。这部分人员，不论其工资的经费来源和支付形式如何，不论其是否享受劳动福利待遇和吃商品粮，都应算作计划外用工。计划外用工的大量存在，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加以清理。计划外用工包括来自农村和城镇两部份人，重点是要清理压缩那些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

计划市场 自由市场、非计划市场的对称。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受国家计划管理和控制的市场。计划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主体。它综合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可分为国家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市场和国家指导性计划间接控制市场，两种市场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统一的计划市场。国家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主要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资源与需求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由国家向企业下达生产、收购、调拨等指令指标和计划价格，辅之以经济手段，实行严格的计划生产、计划供给、计划分配，以保证市场商品流通有计划地进行。国家指导性计划间接控制只对企业下达指导性计划指标，实行指导性价格，企业执行计划和制定价格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按照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和制定价格，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给予引导和控制，以加强市场流通的计划性。企业在国家宏观计划的间接控制下，按照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计划市场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方向。

五年计划 国民经济中期计划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基本计划形式之一。五年计划是为期五年的国民经济或个别部门、地区的发展计划。它是各种年度计划的前提和依据。中国从 1953 年开始编制和执行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 1953 年到 195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从 1958 年到 1962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从 1966 年到 1970 年，第四个五年计划从 1971 年到 1975 年，第五个五年计划从 1976 到 1980 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从 1981 年到 1985 年，第七个五年计划从 1986 年到 1990 年，第八个五年计划从 1991 年到 1995 年。

五小工业 我国县和县以下兴办的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小型工业的统称。是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规模较小的地方工业，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当地基本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有条件也为出口服务，具有投资少，建设周期短、速度快、生产灵活性大，便于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等特点。发展五小工业有利于促进大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利于方便人民生活。但一般生产技术低，经济效益差，常与大企业争原料、燃料、动力等，必须加强管理，以保证其顺利发展。目前我国地县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许多企业的规模已超出“五小”范围。因此，“五小”不能表现我国地、县工业状况。

互助组 （参见本卷“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税代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思路和政策，同"利改税"。(参见本卷"利改税")

专业户　中国农村中的主要或较多力量专门从事某种生产的农户。专业户从事专业性生产、商品率较高、专项收入在该农户的家庭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农村专业户的主要特征是：发挥自己的专长，从事小规模的专业化商品生产，由小而全的自给和半自给的经济状态向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方向转化，农村专业户按照行业分为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专业户等。专业户按照生产资料来源可分为承包专业户和自营专业户，即向集体承包项目生产的专业户和在家庭副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户。由于目前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专业化分工尚处于开始阶段，除种植业专业户外，其他专业户也大多承包耕地、兼营种植业，仍是一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但到80年代中期，不少地方出现了从事非种植业经营的专业户，为了更好地从事自己的专业经营，把承包的土地转让出去的情况，土地逐步转移到种田能手手里。专业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制的必然产物。专业户的大量出现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①专业户都是商品生产者或直接间接为商品生产服务的，大大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②专业户是农村生产走向广泛分工的产物，专业户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农村专业化和社会化。③专业户的发展将促进农业的现代化。

专有技术　亦称专门技术。指享有一定价值的，可以利用的，为有限范围的专家知道的，未在任何地方公开过其完整形式和不作为工业产权取得任何形式保护的技术知识、经验、数据、方法或者上述各项的组合。具体来说，专有技术包括产品设计，工艺流程，操作和测试方法，原材料配方成份，工程设计及与技术有关的企业管理知识等。专有技术与专利技术很相似，但又有区别：(1) 专有技术虽有先进之处，但不受法律保护，而专利技术受到专利法的保护。(2) 专有技术是未公开的技术秘密，是竞争者和社会公众不了解的，比专利技术具有更大经济价值的技术，它只能凭借保密而享有实际上的独占权，当出售时，合同上需订出对方必须承担的保密义务。而专利技术是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公开的技术，其内容已经在专利说明书中公诸于众。(3) 专有技术的范围极为广阔，而授予专利权的技术领域是有限的，即专有技术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须的全面知识，而专利技术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4) 专有技术没有时间约束和失效的问题，而专利技术有时间性，过了专利有效保护期即失效。实际上，在技术引进中，专有技术占有主要地位，它往往是专利许可证协议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现在单纯的专有技术的许可证协议的数量也日益增大，在我国的技术贸易中，已开始重视专有技术的引进。

专属经济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各国在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它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但不属于沿海领土的组成部分。沿海国对该区的主权只及于该区域的自然资源，而不及于该区域的所有部分。沿海国对该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养护享有主权权利，并对该区域内的人工岛屿、设施、结构的建造与使用、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享有专属管辖权。外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船舶航行、飞机飞越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但在享有这些权利时，须遵守沿海国有关的法律和规章。总之，专属经济区既非公海，也非领海，而是自成一类的第三种特殊法律地位的海域。

专利　专利权的简称。发明人的发明成果依法被核准后，在一定期限内拥有的专用或独立权利。根据1883年订立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权受到国际性保护，我国于1980年参加了这个公约。在实行专利保护制度的国家，一般均订有专利法。规定凡具备新颖性、实用性和创新性这三个条件的发明创造，可以申请获取专利。一项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必须公开发表其技术要点，征询异议、履行手续、专利得到批准后，发明人或单位就获得专利权。即在规定的期限内（各国不一，长的可达20年，短的只有5年，一般在15—20年之间）享有使用该专利进行生产和销售其产品的权利。专利权可以由发明人转让或出售，他人不得在规定时间内使用该项发明。国家法律保护专利权意在鼓励创造发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专利权的发明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专卖　亦即专卖制，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对某些商品的生产、分配和销售实行垄断，实行统一管理，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经营制度。我国的专卖制度主要包括：(1) 专卖品的生产、收购、调拨、销售由国家设立的专卖机构或特许的单位或个人经营。(2) 专卖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3) 专卖利润归国家所有，(4) 运输专卖品必须有专卖机构的证明。对违反国家专卖制度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专卖条例给予经济制裁或法律制裁。实行专卖制

度，有利于加强对高盈利商品的管理，使国家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并使烟、酒类有刺激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得到合理限制。

双重体制 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的体制。建国以来，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尽管这种体制和对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已逐步暴露出各种弊端。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新的经济体制建立之前，必然有一个新旧体制并存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体制必然相互对立、碰撞和摩擦，因而给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不少难题。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改革，来尽快结束双重体制，从而建立和完善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双层经营农场 即国营农场中办职工农场。通常把这种体制称为"大农场套小农场"的体制。80年代初，一些国营农场开始试行，到1985年已普遍实行。小农场是大农场中相对独立的单位，在国有土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向大农场缴纳一定数量的费用和利润。农场中的小农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 职工单家独产自营、自耕。其主要特点是由各职工家庭经营，完全或主要由家庭成员耕作。(2) 职工单家独户自营、代耕。其主要特点是由各职工家庭代耕。(3) 若干职工家庭共营、共耕。其主要特点是由若干职工联合起来经营，共同耕作，并共同购置生产资料、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公共财产、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酬。

双增双节 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双增双节的核心是从大力发展生产出发，提高经济效益、广开财源，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财政状况。

双密型产业 亦称高技术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统称。它是在生产的资源结构中技术知识所占比重较大的产业。双密型产业，一般需要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最新科研成果，技术装备比较先进、投资费用多，中高级科技人员比重大，操作人员也要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使用劳动力和消耗原材料较少，对环境污染较少等特点。目前公认的高技术产业有电子计算机工业、机器人工业、航天工业、生物技术工业、新材料工业等。高技术产业是战略性产业，它对其它产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高技术产业在一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判定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之一。

双轨价格 亦称双重价格。指在同一时间、同一市场，同一商品分别实行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价格管理制度。双重价格与计划管理体制和物质分配体制存在计划内和计划外之分相适应，对于计划内生产的商品和计划内分配的物质采用计划价格。对于计划外生产的商品和计划外分配的物质采用市场价格。计划内部分由国家定价，在计划机制的作用下形成计划价格，计划外部分由企业定价，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市场价格。在我国双轨价格是改革的产物。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双轨价格条件下，同一市场、同一商品存在两种不同的价格，这种状态很容易造成市场信号系统紊乱，导致流通领域中投机倒把现象泛滥，并且不利于各项经济核算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当前我们必须尽快实现价格体制的转轨。

双渠价格 亦称再生产价格，是价格形成基础的一种，指按部门平均成本与社会平均生产基金利润率及社会平均工资利润率分别以一定比例计算的利润额之和来制定的理论价格。这一理论于60年代初由苏联吉雅钦科创建，并提出价格构成中的利润额，70%应按平均生产基金（不含工资基金）盈利率确定，30%应按平均工资盈利率确定。认为这样能保证生产基金占用量较多的重工业和工资基金占用量较多的轻工业有相对均等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以及大体相同的人均留利。双渠价格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转化形态。7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也有人主张双渠价格。

"双紧"与"双松"政策 为达到充分就业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将财政与货币手段配合起来调节经济运行的需求管理政策。凯恩斯认为要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就业"和"繁荣"，必须依靠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节。即通过增加国家的财政支出，来补偿投资和消费的不足，或通过受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去扩大信贷，压低利率、增加支付手段，用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扩大。前者是财政政策，后者是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有多种具体措施，这多种措施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实际的应用中要根据各项政策的特点和经济形势的情况，将两种政策的多种措施配合使用。二者的结合是值得研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主要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松"指扩张性的政策，即增加财政支出、减税、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紧"指紧缩性的政策，即减少财政支出、增税、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等。若使用的两项政策都是扩张性的，

则称为“双松”政策。若使用的两项政策都是紧缩的，则称为“双紧”政策。而在具体应用时可紧中有松，松中有紧。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应加强合理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内外贸调拨价格　是指中国外贸进口拨交价格与供应出口拨交价格的统称。外贸进口拨交价格是外贸部门利用中央外汇或地方外汇统一进口的商品调拨给订货单位的结算价格，除少数商品外一般均低于国内市场零售价格或批发价格。中国这项价格曾采取过代理作价、加成作价和比照国内同类产品作价三种方法。供应出口拨交价格是指国营商业、供销社向外贸企业调拨出口商品的结算价格。它是根据商品的品质、规格、包装和经营上难易等要求，在国内调拨价格基础上适当加减来计算的。没有调拨价格的商品，可在供应价基础上加减。这样，不仅有助于内外贸之间的流通与合作，而且对降低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增加对外竞争能力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内部结算价格　工业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之间进行经济结算所使用的价格，又称厂内计划价格，由企业自行制订，仅在企业内部使用。在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核算中，由于经常受外部材料、备件价格变动的影响，产品材料消耗的计算、分析、管理中产生了很多困难。为了便于企业产品成本的核算，对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自制半成品、修理用备件等，企业自行规定了内部结算价格。一般由企业财务部门协同供应部门，根据计划成本制订，年度内很少进行变动。不同企业内部核算的对象、订价原则不尽一样。原材料燃料的内部结算价格，基本上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出厂价格、物资供应价格或市场零售价格，加上运杂费和正常的途中损耗制订。有些同一品种不同规格的材料，其单位差价不大的，一般只使用同一的计划价格。没有规定计划价格的材料，以第一次进货时的实际价格计。对于自制半成品，以产品成本——企业管理费用作为其内部结算价格。企业的计划成本是按照材料的实际价格计算的。把按企业内部结算价格计算的成本换算为计划成本时，需要进行材料成本差异的调整。通过调整计算在材料实际成本的准确程度上不如直接按实际成本计算。有些企业同时采用按实际成本计价和按计划成本计价两种方法。对于占成本比重较大的原材料，尤其是实际价格变动较大的原材料，按照实际成本计算，其他材料则按计划成本计算。

内招　也称“点招”，按招工对象划分的一种招工方式。在国家规定的四个企业（矿山井下、森林采伐、野外勘探、盐业生产）有招工指标时，可以招收本单位职工的子女，这种招工方式习惯上称为内招。有时因自然减员，有增员指标也可以在本单位职工子女中选招。在内招本单位的职工子女时，也包括家居农村的职工的子女，但只能招一人次。除上述行业外，其他单位不得实行内招。1980年以来，国家强调内招单位在招收职工子女时，应首先招收城镇青年，不足时才可以招收家居农村的职工子女（有的行业或工种还规定只招收男性）。

内向型经济　外向型经济的对称。指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靠本国的力量以自力更生来发展自立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必然限制贸易、资本、人员的流动，把跨国公司拒之于门外。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一般又存在着两种具体的发展形式：初级内向和次级内向。初级内向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努力，谋求在农产品上能够自给自足。次级内向是指通过进口替代，在国内制造原来需要进口的加工工业产品以求国内在这方面的自给自足。初级内向实际上并不能使经济有所发展，次级内向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即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减少了外汇支出，培养了技术管理人才，缓和了就业压力等等。但在次级向下建立的企业，由于国家实行保护而效率低下，设备、技术、原料的进口加重了外汇负担。同时，进口替代型经济亦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而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次级内向进口替代的基础上转而实行次级外向的出口替代。这样，这些国家的发展大抵经历了初级内向→次级内向→次级外向（或初级内向与次级外向同时发展）的过程。

内涵扩大再生产　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对称。指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生产要素质量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数量上不断扩大，质量上不断提高的扩大再生产。它是以向生产深度，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为特征的扩大再生产。内涵扩大再生产虽然与外延扩大再生产往往相伴而行，难以截然分开，但它更多的是向挖掘现有的企业生产潜力，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现有设备的效能，节约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改进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等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在不增加或少量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条件下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而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极为有效的途径。尤其在那些拥有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又缺乏建设资金，难以进行大量新的基建投资以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应当特别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利用现有基础，抓好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走一条花钱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的经济发展道路。

开放型城市　是一种适应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城市管理方式。其主要特点是遵循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按照经济活动规律，打破条条、块块的界线，充分发挥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开放型城市一方面对内实行多种经济联合，打破部门与部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界限，组织起专业化的协作，形成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联合体；另一方面，对外越过自己行政区划的界限，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扩大自己的经济活动范围，通过自己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与其他地区和城市结成广泛的联系，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和其他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采用新型的城市管理方式的城市叫开放型城市。

开放型经济　封闭型经济的对称。指与国外发生较多的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的经济。开放型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每发展一步，社会分工就扩大和加深一层；而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加深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当人类社会分工进入机器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时，社会分工就超出了一国的范围，从而形成世界性的市场。任何国家发展现代经济都不能脱离世界市场，只有通过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趋利避害，即充分发挥本国优势，又充分利用别国长处，才能更快地发展现代经济。开放型经济包括贸易往来，资金流动，技术交流，人力移动等，其中贸易往来，资金流动是考察开放型经济的主要方面。开放型经济有利于加快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促进国内合理分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标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超过 10%时，该国的经济就属于开放经济。

开发大户　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事开发经营的大户。它是目前农业开发性生产的主要经营形式。开放大户的发展一般经历了由家庭承包制到专业户，再到开发大户的演变过程。家庭经营是开发大户生产的基本条件。农户家庭经营发展后，逐步转向专业经营，但由于受到现在的资源和产业限制，专业户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缺乏投资场所，得不到充分利用。专业户开始把资金、劳动力和技术投向有广泛开发空间和发展潜力的开发性生产，扩大了经营规模，从而形成了开发性承包经营大户。有些开发大户是由原来从事开发生产的职工，如渔场职工、养殖场职工的承包经营发展起来的。开发大户因内部结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家庭开发大户。这类大户是由一个家庭的成员组成的经营大户，它利用家庭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统一承包，在家庭内部实行分工协作经营；第二、雇工开发大户。这类大户用雇主户的资金或技术雇请其他劳动力组成经营大户，承包开发性生产；第三、联产开发大户。这类大户一般以一家农户为主，吸收其它农户参加，合伙承包开发性生产。但农户之间有较大的独立性，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联合组织。开发大户既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利益一致性和家庭经营自主性的优点，又突破了家庭范围的局限，把经营规模在家庭范围内不断扩大，从而取得规模效益，因此，开发大户在农业开发性承包经营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开源节流　发展经济，增辟国家财力的来源，同时提倡勤俭节约原则，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源”即是财源，指国家的财力的来源，“流”则是指国家的费用开支。开源节流的理财思想最早记载于战国时期荀况《荀子·富国》中：“故田野县鄙者（指生产）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指贮备）财之末也，百姓时和（适时耕种）、事业得叙（序）者货之源也，等赋（按等征赋税）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开拓财流，充裕财力，是开源节流理财思想的落脚点。茂盛的财源，是财政平衡的首要条件。从国家财源的价值构成来看，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 M，即各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社会纯收入，并且还包括了 C 和 V 的一部分；从财源的部门构成来看，最主要部门来自社会主义工业部门，还有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部门。财源的开拓，取决于这些部门生产的发展。因此，努力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增加收入是第一位的任务。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开源和节流并举，大力节约和收缩各项开支，杜绝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的稳定和财政的平衡。

引进外资　又称吸收外资或利用外资。指利用国外的资金。其范围很广，包括利用外国政府的资金，国外私人银行、私人企业和私人资金，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以及本国银行吸收的国外存款等。中国还包括利用香港和澳门等地的资金。利用外资按其方式可分为三类：（1）对外借款。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买方贷款，外国银行现汇贷款，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等；（2）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和外资合资经营企业，与外资合作经营企业，与外资合作勘探开发以及外贸独资企业等；（3）商品信贷。包括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

引进外资主要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装配，有利于解决发展资金和物资的不足，弥补技术和设备的落

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增强产品竞争能力，增加劳动就业，扩大出口创汇。

分配不公 是指由于客观原因造成职工收入相差悬殊，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报酬的现象。目前我国分配不公的表现有：1高收入群体与广大职工之间收入分配不公。2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公。3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4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分配不公。5脑体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分配不公，不仅是挫伤人们积极工作的经济痼疾，而且是涣散人心和社会凝聚力的政治腐蚀剂，危害甚大。必须在完善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尽快加以克服。

文明经商 商业工作者在经营活动中，处理同消费者、企业和国家的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商业道德和行为准则。它是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商业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上的表现。其内容主要包括：（1）礼貌待客。商业工作者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熟悉和掌握业务技术知识，不断地改善服务态度，主动、热情、耐心地为消费者服务；（2）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物价政策、供应政策、税收政策和收购政策等；（3）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做到秤满、尺足、称准，搞好食品卫生，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和人民身体的健康，讲求店容整洁美观和个人卫生；（4）抵制商品流通领域里的各种不正之风，接受顾客监督；（5）加速商业现代化建设等。坚持文明经商，对于密切工商关系、农商关系，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商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中国在一个时期内发展农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于1958年8月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后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了粮食生产同多种经营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增加粮食生产，是发展多种经营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保证；多种经营发展了，反过来又会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根据国家计划，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处理好农、林、牧、副、渔五业的关系，安排好多种经营的生产布局，才能促进农业全面发展。但是，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形成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局面，只抓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放弃了"以粮为纲"的提法。实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在保证粮食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使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各项经济作物和其它农副产品得到普遍增长。

五 画

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出自1899年伯恩斯坦（1850—1932）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民主社会主义成为社会党国际的官方意识形态。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把民主社会主义定为各国社会党的共同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洲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有着广阔的市场。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1）自由、公正和互助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社会主义就是使所有人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享有充分自由、民主、人权、彼此关心和相互平等的新社会里。2）鉴于国家的镇压职能不断减弱以及它对各个利益集团的调节作用和对社会生活管理职能的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可以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来实现，可以通过实行多党制、议会斗争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3）在资本主义社会，国有制和私有制可以混合生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可以趋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实行社会公平分配，推行社会福利和全面的社会保障，通过建立"福利国家"以缓和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4）民主社会主义既反对垄断资本的统治给社会造成各种不公正和弊端，又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主张通过第三条道路去改造现实社会。

民办企业 "官方"（国营）企业的对称。指由城乡居民个人或集体自筹资金兴办的各种盈利性经济组织。它可以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经济，也可以是个体或私营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上述经济形式的混合体。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形式的民办企业发展十分迅速。

发达的社会主义 一般是指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别称。"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曾经在苏联被广泛使用。1918年，列宁曾经使用"发达的社会主义"一词来说明未来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1967年11月，前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到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再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有人对这一概念作了具体的描述。目前，"发达的社会主义"一词鲜为使用。（参看本卷：社会主义阶段划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我国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针对部分干部存在的不重视发展生产的片面财政观点，于1942年12月《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及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947年初，为了解决新形势下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这里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在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中继续贯彻执行。现在发展经济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各项服务行业，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保障供给就是保障现代化生产所需的物资和资金，保障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发展经济是保障供给的前提，而保障供给是发展经济的目的，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这一方针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科学地阐明了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的辩证关系。贯彻这一方针，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长期计划 亦称远景规划。多指十年以上的国民经济计划或某一部门、地区、企业的远景规划。长期计划一般是根据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任务制定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长期计划提出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总体部署。虽然这些目标和部署一般只是以框架的形式出现，但它会象灯塔一样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或某一部门有计划地稳步发展，并且鼓舞着人民群众朝既定目标前进。长期计划是制定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前提和基础，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则是长期计划的具体化，是长期计划得以实现的保证。

长途贩运 商贩从某地购进商品运输到距离较远的另一个地方出售的经济活动。一般指超出市（包括郊区，不包括市属县）或市与县、县与县毗邻地区之间的范围、距离较远的贩运活动。凡向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或临时许可证，并照章纳税，遵守市场管理规定，服从工商行政部门管理的农民、合作社、合作小组和有证个体商贩，在营业执照规定范围内，可以从事政策允许的贩运活动。其贩运商品一般是：完成统购、派购任务以及非统购派购任务的农副产品和计划外的小日用商品。其经营方式，可以个人经营，也可以三、五人合伙经营或集体经营；可以零售，也可以批量销售。其贩运方式，可以肩挑、自行车驮，也可以利用机动车船贩运。不受行政区划与路途远近限制。农副产品长途贩运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物资交流，有利于把分散、零星、细小的商品集中起来，满足城市消费者各层次需要，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我国1956年后曾取缔私人长途贩运，1979年后开始允许私人合法贩运。

长线产品 也称"长线商品"，与"短线产品"相对。指社会上需求量相对缩小，供大于求，积压、滞销的产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长线产品的主要原因有：（1）国家或地方计划安排过大，或计划脱离市场需求品种规格不对路；（2）价格不合理而造成产品利润过高，引起盲目生产；（3）产销脱节，信息不灵，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生产未能及时调整；（4）流通渠道阻塞，产品短时期局部过多等。长线产品的长期存在反映了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总体平衡和结构平衡。长线与短线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妥善安排计划，合理调整价格，调整产品结构，改革流通体制，使生产面向市场，面向消费，积极组织出口等措施，可使供求趋于平衡。

市场调节 市场机制对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自发调节。市场调节基本上就是价值规律的调节。市场调节应具备以下条件：（1）价格可以自由运动，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涨落。（2）商品货币形式是社会分配经济资源的基本的和积极的工具。（3）生产者有权根据市场价格变化进行生产。（4）消费者有权根据市场价格和自己的货币收入状况选购商品。市场调节的作用：（1）调节商品供求。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则上涨，这时商品的需求减少，供给增加，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

引起需求量的增加和供给的减少。(2) 调节经济资源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企业间的分配。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税率和利率等经济参数诱导经济资源流动，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3) 调节物质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市场调节以利益诱导为基本手段，任何经济参数的变化都会引起物质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市场调节的特征是：(1) 微观性。市场调节在单个商品的供求平衡方面具有灵活便利的特点，但难以自发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宏观平衡。(2) 事后性。市场调节以价格为基本信号，但价格的变动，只有在供求出现矛盾时才会发生，因此没有预先调节的功能。

市场机制　市场有机体内部各方面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建立的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内在有机联系形式。具体讲，市场主体在市场上进行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活动所形成的价格、利率、竞争、税率、供求、风险等方面联系和制约方式就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在不同社会形态下表现出不同特点，然而它们又具有共同的特点：(1) 关联性，即市场机制任何一方面的作用都引起其他方面的连锁反应。(2) 利益制约性，即市场机制的作用直接与每个经济主体的利益联在一起。(3) 市场机制的作用与一定的市场环境相联系，受一定环境条件制约。(4) 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自市场的内在的力量而非外部力量。(5) 盲目性，即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各经济个体利益牵引表现出相对无规则状态 (6) 迂回性或时滞性，即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和效果不是直接的，而是迂回和曲折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具有一些新特征：(1) 受计划机制的影响，因而其作用的盲目性，迂回性或时滞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2) 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受到一定限制。(3) 其调节作用以生产和消费的统一、国家和企业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相结合为最终目标。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市场机制具有普遍的或基础性的调节功能，因而完善市场机制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

市场经济　按照市场需求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是主要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提出的一种思路和改革目标模式。

市场价格　指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价格。通常，同一种商品在同一个市场上，只具有一种市场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应当以价值为基础，与价值相一致。但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存在着竞争和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平均利润率没有形成以前，市场价格经常以价值为中心，围绕价值而自发地上下波动；当平均利润率形成之后，市场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

市场战略　市场开发的总体谋划或设想。包括市场开发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市场战略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1) 集约发展战略。具体是指市场渗透、市场发展和产品发展。市场渗透是指增加现有市场的销售量，挤占竞争对手的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市场发展是指开辟新的区域或国际市场，扩大市场覆盖面；产品发展是指通过开发新产品或改进老产品，以满足用户的新要求和开拓新市场。(2) 一体化发展战略。包括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战略。后向一体化是指通过发展原材料或半成品生产、以达到占领和扩大市场的目的；前向一体化是通过发展制成品生产或提高产品的配套供应能力，以达到合并或扩大市场的目的。(3) 多样化发展战略。包括同心多样化、水平多样化和集团多样化。同心多样化是指围绕同一产品生产，向外拓展业务和市场；水平多样化是指同时发展性质相同，但品种，技术不同的产品生产，以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集团多样化是指通过跨行业生产和经营以达到扩大市场的目的。合理选择市场战略必须以企业产品生产的经济技术特点和市场开发能力为依据。

市场细分化　通过划分具有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群，把一个市场分成若干个“子市场”，找出消费者之间的差别，便于企业选择和确定目标市场，以取得最大经济效益。市场细分的依据主要有地理因素，人口、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1) 地理因素。即按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如国家、地区、城市及其规模、乡村等）来细分市场。(2) 人口、社会因素。即按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家庭规模、收入水平、职业、文化程度、宗教、民族、家庭生活周期等内容来细分市场。(3) 心理因素。即按照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个性、购买动机、商品爱好、以及对销售方式的感应程度等因素作细分市场的依据。市场的细分，在经营活动中有重要作用：(1) 市场细分有利于企业分析、发掘新的市场机会，使企业充分了解市场的购买量，潜在需要量、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及市场的竞争状况，为搞好企业经营提供必要的条件。(2) 市场细分有利于企业根据细分市场的特点，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避免力量的分散，取得比较大的经

济效益。(3) 市场细分便于企业发挥生产、经营上的优势，把企业的资源和生产经营能力用在满足不同的细分市场需求的差异性上，为市场提供越来越丰富的产品。(4) 市场细分有利于企业调整营销策略。

市场经济结构 指市场由哪些经济成分参加，这些经济成分在市场上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不同经济成分和不同行为主体在市场上经济力量的对比，通常表现为它们在商品流通额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市场经济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当时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这种结构的稳定性，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安定情况。具体说来，市场经济结构取决于：(1) 社会上不同经济成分总的力量对比。(2) 不同经济成分在流通中的投资比重。(3) 不同经济成分在不同流通环节中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在批发贸易中所占的比重。(4) 各种经济成分在流通网点和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5) 各种经济成分的流通机构的发育程度及其发挥功能的状况如何。(6) 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各种经济杠杆的运用。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企业从市场环境得到行为原则，完全实行自主决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原则有机组合的一种抽象图式。这是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历史发展过程时使用的一个概念。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企业自身只有扩大再生产的责任；企业自主决定纯收入的分留比例和使用方向；企业运行仅从市场环境得到行为原则，既不受中央计划决策所建立的总框架的限制，也不受上面规定的行为原则的指导。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病在于：因企业决定纯收入的分留比例和使用方向，导致积累率偏低，影响生产发展的速度；企业决定纯收入的分留比例和使用方向时，倾向于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率特别高的原因之一；企业倾向于尽可能少雇佣工人，是造成较高失业率的原因之一；国民经济缺乏全面的协调。

外商独资企业 经中国政府批准，由外商在中国境内单独投资设厂、进行独立经营、自销产品、自负盈亏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必须接受中国法律、法令和有关行政条例的管辖和监督，并依法按章纳税

外汇平衡 外汇是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用于国际结算的支付手段，包括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两部分。外汇平衡即外汇收支平衡，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发生的外汇收入总额和外汇支出总额的相互平衡，具体表现为收支相抵，略有顺差。外汇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持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国储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收支平衡与否，外汇资产储备充足与否，不仅是一国对外经济贸易地位和支付能力高低的主要标志之一，而且对本国货币的币值和汇率的稳定，对一国的国内外经济有直接的影响。一国的外汇收支如果长期不平衡，出现大量逆差时，不仅会使国家的国际支付能力恶化，影响正常的进口和国际信誉，而且还会危及国家的独立。若长期顺差过大，就等于把国内的商品和劳务提供给国外，为人所用，同时由于外汇需要占用国内资金，又会增加国内货币流通量，给市场供应带来压力，还要承担国外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的风险。外汇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一起构成货币资金运动的平衡关系，外汇收支是否平衡，最终会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保持外汇收支平衡，对我国经济建设，市场稳定，资金供求平衡等有着重要意义。"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是我国外汇平衡工作中的方针。

外汇市场 经营外汇买卖的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外汇的买卖，为国际间清算或转移债权债务提供重要媒介。主要形式有：(1) 在证券交易所内的一角设立外汇交易场所，各银行的代表规定一定的时间，集合于此从事外汇交易。(2) 没有具体的地点，买卖双方通过相互间的电话、电传、电报或其他通讯手段来进行交易。目前多数采取后一种形式。外汇市场的参加者一般为外汇银行、外汇经纪人、汇票商行、贴现商、进出口商、投机者及其他外汇供求者。有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当局为了干预汇率，也会介入外汇市场。外汇市场的交易主要有即期买卖、远期买卖、择期交易等。在国际间，主要的外汇市场在伦敦、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纽约、巴黎、布鲁塞尔、东京等地。据估计，1980 年世界各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量共达 2000 亿美元，其中 90%左右是银行间的交易。外汇市场的主要作用在于实现购买力的国际转移，提供国际性的资金融通，避免或阻止外汇风险的发生等。它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外汇市场的动荡，往往会引起世界各国经济的相应变化。

外汇兑换券 一国政府对外汇施行管制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既禁止外币的流通使用又便于来自海外的外国人、侨民在国内购买商品和支付费用。我国 1980 年 4 月 1 日起经国务院批准授权由中国银行发行的外汇券，是一种含有外汇价值的人民币代用券，

并只能在指定的范围与人民币等值使用，可视为有一定兑换性的人民币。按照我国外汇管理条例规定，入境的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同胞所随身携带的外币或旅行支票，不能在我国境内自由流通，入境后必须向中国银行兑换成外汇券，用于购买商品和支付各种劳务费用。上述人员离境时仍可凭兑换券换成等值的外币出境，也可将兑换券携带出境，以便再次携入使用。由于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国内经营单位收入外汇券视同创汇收入，并可按规定比例留成。

外贸顺差　外贸逆差的对称。亦称“出超”。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出口商品总值大于进口商品总值的差额。一般认为，外贸顺差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比较主动的、有利的地位。表明在和别国的贸易中，本国出口商品总值大于进口商品总值，别国欠了本国的债。但一国长期大量的外贸顺差必然造成其他国家国际收支的困难，引起他国对其出口商品采取限制进口措施。外贸顺差使国内货币流通量增加，利率下跌，致使投资和消费增加，国民收入也随之增加，因而导致进口增加；同时，利率下跌，使本国资金外流，外国资金不流入本国，从而引起本国货币汇价上升，削弱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使原来的顺差逐步减少，直至重新恢复平衡。一些国家在经济停滞和下降时，常采用一些鼓励出口的措施和在国内实行紧缩政策，缩减进口，这些都会使对外贸易出现暂时的顺差。所以，一国外贸顺差对本国利弊究竟如何，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外贸逆差　外贸顺差的对称。亦称“入超”。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出口商品总值小于进口商品总值的差额。外贸逆差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并可能成为国际收支恶化的主要原因。表明在和别国的贸易中，本国出口商品的总值小于进口商品的总值，本国欠了别国的债。当一国因出口减少而发生逆差时，必然导致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减少，使国民收入随之减少。国民收入减少自然要影响到进口，进口减少则会使国际收支逐渐趋于平衡。因此，在出现外贸逆差时，各国一般都要采取某些措施予以扭转。比如，实行出口信贷、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等措施以鼓励出口；实行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进口限额、外汇管制等措施以限制进口。由于外贸逆差，可能引起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大于对内贬值情况，这就为该国实行外汇倾销创造了条件。实行外汇倾销，可以加强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扩大出口，改善外贸收支情况，但也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外向型经济　亦称出口导向型经济。即经济运行以向外发展为重点，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资源，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出口商品产业，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再引进国内急需的技术和设备，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外向型经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 应该具备较大的出口创汇能力。一是指出口的数量较多；二是指出口的档次较高，高技术产品、深加工产品、附加值大的产品占出口产品的比重较大；三是指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较低，在国内同行业间相比换汇成本较低，进而在国际市场上换汇成本有较高的竞争能力。(2) 应该具备较强的引进技术的能力，对引进技术有掌握、消化、吸收和国产化的能力。(3) 应该具备较强的引进外资的能力。

外引内联　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采取的、在国际上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在国内实行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的经营策略。这是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战略的重要步聚。对外引进就是要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方投资或进行技术转让，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引进工作既包括单纯的技术引进，也包括中外合作进行生产和经营。通过兴办合资企业，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消化和创新的基础上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对内联合则是要加强沿海地区及经济特区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内联也包括本地区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合。内联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联合兴办企业、相互投资、进行技术交流和转让，共同研制和开发新产品，成立联合公司等。通过内联，沿海开放地区可以利用内地丰富的资金、技术、资源优势、发展本地区经济，并把本地区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和知识向内地转移和扩散，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发展。外引内联最初是对外开放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发展方针和经营战略的总结。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战略的深入推行，内地也加快了外引内联的步伐。

外延扩大再生产　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对称。指单纯依靠增加投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使生产在数量和规模上扩大的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一种类型，它以向生产广度发展为其特征。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决定于国民收入数量的大小，以及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所占的比重。外延扩大再生产由于以积累和投资增加为条件，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奠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合理配置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只重视外延扩大再生产，

忽视内涵扩大再生产，一味追求生产规模的扩大，热衷于铺新摊子，不从国力出发，结果必然导致经济效益差，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因而，在安排经济建设时必须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控制地进行处延的扩大再生产。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见本卷"国家资本主义"）。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组成部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采取合作化的形式。1949—1955年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稳步前进阶段，在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时，第一，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三种组织形式，首先从供销合作小组开始，供销合作小组是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级形式。它负责统一安排原材料采购、产品推销和统一接洽加工订货等业务，小组成员仍坚持独立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自负盈亏。与供销合作小组衔接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合作社除了统一经营销售业务外，有的还根据生产的需要统一组织集体生产和简单的分工协作，它是一种过渡的形式。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社员必须将自己全部的生产工具、设备折价归社，社员直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劳动报酬。第二，逐步割断了个体手工业同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1955年，有的地方，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占全部手工业人数的比重已达33%，且劳动生产率普遍比个体户高。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1956年1月7日，中央批转1955年12月21日到28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召开的第5次全国手工业合作会议的报告时指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速度显然就是落后了一步。因此要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毛泽东的推动下，1956年初，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迅速形成。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6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达到10万多个，人数达到500多万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实际上，1956年2月底，我国的个体手工业者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合作化。1956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工作出现了偏差，一是变化过快过急。二是过早地集中生产和集中经营，不适合手工业分散灵活的经营特点；三是对一些有特点的手工业者和民间老艺人照顾不够。四是有相当一批小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随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一起实行公私合营，并把小手工业者与"资产阶级工业者"一样对待。

对私营企业的工人监督 （见本卷"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

对外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展对外经济关系，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和政策。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其宗旨就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开发利用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改变民族经济自我循环的落后状况，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发展国际间进出口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劳务合作；对外援助和接受外援；发展国际旅游业等，同时，对外开放还包括文化领域里的开放。通过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传播我国的传统的民族文化，吸收国外先进科学的新文化成果，以有助于我国民族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有：试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扩大内陆地区直接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等。同时，在大力发展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国际间的人才交流，利用各种贸易形式扩大对外经济关系。

"四马分肥" 中国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措施。所谓"四马分肥"，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按所得税、福利费、公积金、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其实，"四马分肥"在1953年才正式实行，因为1950年到1952年间，我们还没有完全控制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权。企业利润分配的主要根据是《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国家通过加工费和产品的价格，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企业的利润，把资本家的利润率控制在10%，实际上不少行业超过了10%。为了计算方便，将1950年到1955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即"四马分肥"阶段。1953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每年结算的盈余，按四个方面分配，国家所得税采取累进税率，一般占30%左右；企业公积金一般占10—30%；企业奖励金约占5—15%；资本家股息红利占25%左右。这种利润分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据1950—1955年利润分配的统计，各部分所占的比例与上述比例不完全一致，从1950年到1955年6年间，据调查估计，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利润额共计31.07亿元（当年价格）。这

部分利润的分配：所得税占35.8%，资本家股息红利占19%，公积金占8.5%，职工福利占5.1%，盈余滚存占31.6%。

四个窗口　即特区应当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这是邓小平在1984年2月视察深圳时提出的。它表明，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我们可以吸收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向全世界展示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决心。

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见本卷“国家资本主义”）。

议价　由买卖双方协商议定的价格。它不受国家计划影响，基本上由市场调节。议价的变化情况较准确地反映了市场的供求状况。议价既要遵循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生产者又有权充分考虑产品的成本盈利和市场供求变化，随行就市，有涨有落，灵活掌握，适时调整。这有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生产适合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和提供劳动，调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开展竞争。原则上是高来高去，商业部门一般不能亏损经营。在我国，为了促进产需结合，工商企业之间实行部分商品议价。同时为了更好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除按国家规定价格有计划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外，农村在完成国家统购、征购、派购和超购任务后的多余产品，以及不实行统购、派购的其它农副产品，商业部门可以高于国家牌价议购，但应低于集市贸易价格。

生产价格　即商品的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社会不同的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率相同，但由于每个部门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相同时间内生产出的剩余价值量不同，从而个别利润率不同。同时，各个产业部门中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与流动部分比率不同，固定资本中各组成部分损耗快慢也不同，因而相同时间内不变资本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量不等，商品成本价格亦不同。在资本和劳动量可以自由转移的情况下，利润率较低部门的资本当然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转移，通过竞争，利润率会平均化而形成平均利润率。这样，各个产业部门实现并占有的利润不再是同各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相适应的利润，而是按平均利润率计算同各部门所投入的资本量相适应的平均利润。它和各产业部门商品的成本价格相加，就是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从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样，商品就不再按照价值，而是按照生产价格来进行买卖，价值规律也就以生产价格规律的形式发挥作用。商品的市场价格以生产价格为基础，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围绕生产价格这一重心上下波动。长期看，市场价格的上下波动会互相均衡，它同生产价格的偏离会趋于一致，从全社会看，生产价格总额会等于商品价值总额。生产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所以它的一切变化终归是以商品价值变化为基础的。价值规律不仅调节商品价值，也调节生产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被完全掩盖了，价值同劳动、利润同剩余劳动的关系就更模糊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价格的形成机制和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内容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价格，但是，它也是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生产价格也是价格形成的一个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形成既要以生产价格、长期均衡的生产价格为基础，又要以短期均衡的市场价格作参考。

生产力运动链　在生产力运动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生产、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和智能创造等诸功能性环节相继发生和不断转化的过程。所谓运动链，就是由若干种物质运动引起，制约和转化为另外若干种物质运动，又由后者引起制约和转化为其他物质运动的这样一种相继发生和发展的联系。生产力的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将若干物质属性按照适合人类物质生产目的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运动链，例如，在机器体系中，人们控制动力机构将热能和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引起齿轮、凸轮和连杆等活动机构作相应的运动，并将动力机构的运动和功率传递给工作机构。与此同时，贮存在人脑中的信息，传递到手等效应器官，作出一系列操作动作来控制工作机构完成预定的机械动作。中枢神经系统将感官和运动感觉器官传回的信息和它过去贮存的信息结合起来，对操作动作进行调节，使加工对象发生合乎目的的变化等等。所以，生产力的运动在本质上就可以概括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生产、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和智能创造等诸种功能性环节不断转化的运动链。

生产工具劳动功能化　人的劳动功能向生产工具转移的现象。在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生产工具各自的功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它们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一方面，人的劳动功能在劳动中不断形成、发展和深化；另一方面，生产工具则物化和凝结了人的相应的劳动功能，形成了手工工具—机器体系—自动机器体系等等不同历史类型的生产工具。并取代了人的诸种相应的劳动功能，表现为生产工具的不断“人格化”的现象。例如，人类发明机器以后，在劳动功能方面，人手直接掌握和操纵工具的功能就转交给机器去完成了。这种现象

在生产力经济学中称为生产工具劳动功能化。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生产是指以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通过改造自己，创造物质资料的过程。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生产消费是指生产过程中工具、原料和燃料等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消耗，它本身包含在生产之中。生活消费是指人们为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消费各种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通常所说的消费，就是指生活消费。生产构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消费则构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终点。生产和消费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首先，生产和消费具有同一性。一方面，生产也是消费，因为生产过程就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另一方面，消费也是生产，因为人们的生活消费实际上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其次，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一方面，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不仅为消费创造对象，从而决定消费水平，而且生产也决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同时，生产还通过生产出来的产品，引起消费者新的消费需要。另一方面，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这不仅表现在消费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从而使生产行为最终完成，而且消费创造出新需要，即为生产创造出动力。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活消费不仅是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而且是社会再生产的直接目的，从而消除了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

生产资料市场 指用于满足生产消费需要的生产资料商品的交换场所或流通领域，有时指生产资料的销路。生产资料市场是从产品的消费需要的角度来划分的市场，依据产品所能满足的生产消费需要的结构，又可分为工业生产资料市场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前者可以细分为工业原材料市场、工业设备市场、工业工具和零配件市场、基本建设材料市场等；后者可细分为农业机械市场、化肥市场、农用材料市场、种子市场、饲料市场、农药市场等等。生产资料市场的规模和发育程度取决于生产的发展状况、性质、积累基金比重和投资状况。生产力的水平越高，商品生产越发达，生产者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越强，生产资料市场就越大。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生产资料市场的结构随生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生产资料市场的供求关系是生产资料的产销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它取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和结构。生产资料市场技术性较强，这是由生产本身的技术性质所决定的。

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 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基本体现。生产担负着满足人民当前生活需要的任务，它是基本建设的物质基础。基本建设则是生产持续不断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保证。基本建设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又会造成对生产和生活的挤占或因建设物资供应不足而影响建设速度和投资效果。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甚至会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基本建设的规模必须适当。由于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就必须要求在处理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时，首先要在人、财、物上满足生产的需要，然后再根据需要与可能，合理安排基本建设的发展规模。也就是既能使现有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又能在可能的条件下使生产稳步扩大。

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这是邓小平最早提出来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总体构想。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中提出，我国到本世纪末要实现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 30 至 50 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这样的战略构想，党的十二大明确规定：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0 年的 7100 亿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28000 亿美元左右。党的十三大根据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提出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在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翻番是成倍增长的意思。用数字语言说，就是按几何级数（1，2，4，8，……）增长。翻一番即为基数的 2 倍，翻两番即为基数的 4 倍。

头脑外流 又称“人才外流”。指本国的人才流向国外。头脑外流的形式主要有：（1）外出留学人员毕业后不再回国工作；（2）本国毕业生流向国外工作；（3）本国人才在国内为外国企业工作等。头脑外流的趋向一般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头脑外流的说法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当时由于德、意法西斯对科学家的迫害，致使许多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纷纷逃往国外，流入美国，而当时

美国政府则采取大量吸收国外人才的政策。据统计，战后有20多万外国科学家、工程师、教授等流入美国。1950年至1970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又有14万多名。据估计，美国从1952—1975年间由于吸收外国人才，使它节省了150—200亿美元的教育投资，其中有50—60亿元是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这些人才对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1960—1970年的10年中，美国就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的科技人员身上获利300亿美元。头脑外流对流出国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它耗费了流出国的智力投资，加剧了流出国人才短缺，延缓了流出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注意采取种种优惠政策，一方面防止本国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尽量吸收别国人才到本国工作。

平均主义 要求平均分配或平均享受社会一切财富的思想，是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打着平均主义旗帜，要求平分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摧毁封建主义的所有制，这对于号召革命，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平均主义在封建制度无法实现，只是一种空想。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平均主义就变成了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思潮。平均主义抹杀人们的劳动差别，主张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不管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都给以同样的待遇和报酬。这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本对立。平均主义不是鼓励先进，而是鼓励落后；不是保护先进，而是保护落后。它在事实上承认了一部分人可以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培养一批好逸恶劳、不求进取的懒汉，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互助合作关系，挫伤了劳动者的劳动热情，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发展丧失基本的动力。要真正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平均主义。

布局经济 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空间组合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要求，科学地和自觉地选择生产力因素的空间布局而取得的增产或节约。生产力因素空间组合方式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因素趋优分布规律，即生产力诸因素总是客观地和必然地向着在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等方面有某种优势的地域空间聚集。这一基本规律制约着左右、宏观、中观和微观布局的某一侧面的其他规律，诸如指向性规律、地区经济水平趋向一致化规律、地域劳动分工（或称生产合理集中）规律、地区经济专业化与综合化规律等等。它们各自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并形成一股合力，支配着生产力布局的运动和变化。人们按照这些规律的要求，并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去规划自己的行动，就能实现比较理想的布局经济。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有利于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有利于科学地组织原料基地、能源基地、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的相互联系，提高社会生产率和宏观经济效益；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有利于老（老工业基地）、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远地区）、穷（人民生活比较穷困的地区）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以至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有利于国防的巩固。

布哈林的经济思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小学教员家庭。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进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学习，同时从事革命活动，后流亡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奥地利当局驱逐出境，先后侨居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美国。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回国，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历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真理报》主编等职。1918年春，反对列宁主持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1921年，在工会问题争论中，支持托洛斯基立场。192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主张降低工业发展速度、推迟农业合作化运动。后被撤消党内职务。1931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列宁称布哈林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布哈林作为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涉猎的范围很广。在其早期经济著作中，布哈林对奥地利学派、司徒卢威和杜冈一巴拉诺斯基的经济观点进行了批判。但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时，宣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说它已消灭了竞争、危机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一度把过渡时期的经济看成是一种自然经济，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很快就会消失，政治经济学也随之告终。在列宁从1921年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布哈林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反思，放弃了过渡时期的自然经济观，转变成新经济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捍卫者。在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内托洛茨基派的普列奥普拉德斯基等人连续发表著作反对新经济政策，主张取消新经济政策。布哈林挺身而出，发表《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论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论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等论著，与之公开论战，系统阐述了过渡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1928年，当他发现斯大林试图抛

弃新经济政策、推行加速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政策时，布哈林又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反对斯大林片面追求工业化速度的主张和做法，进一步阐述了其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

研究过渡时期经济的规律性，首先涉及到方法论上的困难。布哈林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特点归结为客观的社会观点、物质生产的观点和辩证历史的方法，分析过渡时期经济有必要应用这些方法，但要考虑过渡时期的特征。布哈林发现，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除以上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平衡的假说。他认为，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只要存在，就危害着平衡结构，这种平衡不仅包括现存的多种经济关系的平衡，还包括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及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没有平衡，社会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死亡的。找到平衡的规律，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在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布哈林发现，价值规律是简单商品生产体系的平衡规律。生产价格规律是变形的商品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平衡规律。市场价格规律是这一体系的摇摆规律，竞争规律是使被破坏的平衡不断恢复的规律。而危机规律则是定期使体系失去平衡和恢复平衡的规律。可以说，平衡论是布哈林全部理论的哲学基础。布哈林起初认为，平衡论对分析过渡时期经济是无效的，把适用于平衡状态的范畴和规律应用于过渡时期是不正确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使之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识到过渡时期的社会不仅是矛盾的，同时也是某一个统一体，因而包含着平衡结构。因此，在过渡时期有必要寻求平衡规律，按平衡论要求处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其他成员的关系，以确定工业化过程中的多种比例。

在苏联20年代有过一场关于工业化道路的争论。普列奥普拉德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主张用剥削小农的办法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主张国家利用垄断地位通过预算，信贷和价格手段再分配国民收入，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方面，以加速工业化。布哈林根据小农业优势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普列奥普拉德斯基展开论战，提出了工业化的另一抉择。这就是通过发展和扩大商品流转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在工业和农业共同增长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布哈林把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城乡关系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农民一贫如洗，国内市场的容量极小；二是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地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民市场容量较大；三是美国类型的，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土地"自由"，存在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布哈林认为，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是属第一种类型的。因此，在过渡时期形成了："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后，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农村大量的农民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活干，"农业的过剩人口"成为城市的一种可怕的压力。面对这种二元结构，布哈林认为，从农业抽调资金加速工业化的主张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目的而实行的，它对农村来说不是寄生性过程"，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巨大增长的手段。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是"从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约化的基础上同国家整个经济包括小经济的合理化而保证小生产得到的更多的收入中拿得更多"。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同农民经济中的积累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农民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的函数"。农业积累就意味着对工业品的需求的日益增长，农村市场容量的扩大，将会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可能使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反之，如果国营工业采取剥夺农民经济的部分剩余产品的途径进行积累，也许可以在最近几年内以破坏农民经济为代价获得相当高的利润。但是，在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这种政策就会悲惨地自食其果。在布哈林看来，工业化资金积累的可靠途径是加快和扩大商品流转，而不是提高工业品价格或压低农产品价格。而且，为了加快商品流转，还必须降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布哈林在阐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方式。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在空地上开始的，而是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进行的。由于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有不同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各不相同。在他看来，英国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相同，因此，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时间、途径乃至建成的社会主义上都各具特殊性。从过渡的时期看，经济落后的国家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相当长的。在这里，社会主义的发展应是循序渐进的，任何估计过早或强行加速都会破坏过渡社会的平衡；从过渡形式上看，落后国家不可能依靠"超经济"的强制来完成，而是要依靠经济刺激，利用商品货币形式，通过市场关系和市场竞争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即使是建成后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建设起来也将是比较落后的。布哈林在解释列宁提出的两个社会主义改造计划时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

基础是社会主义成分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命脉。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掌握了经济命脉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应加以改变。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受威胁的限度内，在保证其足够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下，放松缰绳，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具体可以通过市场关系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并使之走向社会主义。至于对广大的农民可以通过使农民关心的经济利益的办法，来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组织一合作社。布哈林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大生产最后排挤小生产的规律，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可以通过市场关系。市场竞争来排挤私人资本。而且，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能在买卖、货币、信贷、交易所等市场关系中压倒其他一切经济形式，并且通过市场把它们彻底排挤出去，那么市场关系将自行消亡。也就是说，一旦过渡时期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市场关系将寿终正寝。当然，由于落后国家农民和小生产者习惯于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强制，要靠经济利益的刺激，这就决定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漫长的。

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布哈林已意识到，在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并存着有组织的计划经济和无政府的商品经济。为解决两者的矛盾，他当时主张，立即取消市场，消灭非社会主义成分，立即转向计划经济。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布哈林从实践中发现，市场关系并不完全排斥计划经济，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并相互影响。过渡时期经济的相对计划性或相对无计划性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这种计划有三个特点：(1) 它并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比较完备的计划，它包含对自发经济的预测成分，因而可能出现错误。(2) 基本比例的严重破坏和与此相应的错误计算，决不是不可避免的。(3) 如果说任何好的计划都不是万能的，那么坏的计划和所有坏的经济调度则会把好事都办糟。尽管布哈林承认过渡时期计划的相对性和不完备性，但他十分强调计划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过渡时期中，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有三种类型：一是对分散的农民经济的调节，在这里计划的调节作用减弱；二是根据对农民经济的收获量的统计进行核算，以此为基础确定税收额；三是国营工业的大体准确的生产规划。实践中，由于计划失误或"经济领导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错误"使生产和消费等比例关系出现失调。有鉴于此，布哈林提出应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的结合起来，保持平衡，并确定动态的平衡条件。针对工业化建设过程中追求高积累高速度问题。布哈林认为，我们必须力求使工业化有一个尽可能高的速度，但不等于说必须把一切用于基本建设。这里有一个积累界限或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首先必须留有后备，后备问题既同生产性消费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同个人消费问题联系在一起。不留后备，弦绷得太紧，会使商品荒更加尖锐；其次，基本建设的物质因素必须有保证。为了使基本建设成为现实，而不是停留在官僚主义的数学游戏上，不仅应当保证表现对建筑材料等等的需求的相应的货币，而且应当保证这种建筑材料的相应供应。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在关于经济调节者的论战中，布哈林提出了"劳动消耗规律"。他认为"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是经济平衡的一般规律"，存在于多个社会并起调节作用。所不同的是在商品社会里，劳动消耗规律穿上了价值规律或其转形的生产价格规律的外衣。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多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在这里，运动的刺激力不是利润，而是在最大限度地节约活劳动的条件下满足群众的需要。为此，布哈林认为应当保持工业和农业、积累和消费、计划和市场等诸多比例关系的合理，以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保持经济平衡的发展。

其主要著作有：《食利者的经济学》、《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共产主义ABC》、《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等。

布鲁斯与分权模式　弗·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 1921—），波兰著名经济学家。二次大战前，他就学于华沙自由大学经济系。二次大战期间，大部分时间在苏联渡过。1956年以前，他继续在华沙计划统计学院学习，随后任教。曾任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被免去华沙大学教授职务，任住宅研究所研究员。1972年后出走波兰，移居英国，担任格拉斯哥大学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客座教授、高级研究员等。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1961)，"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197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与政治体制"（1975）等。他的最突出理论贡献是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集权和分权模式问题，他主张建立"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即分权模式。分权模式的基本思想是：计划和市场、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的并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标志。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没有直接的中央计划决策以调节宏观的经济过程（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向、收入分配结构的基本要素等等）就不存在。同时几乎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市场关系——至少在目前——能存在下去，而不管它的生产力发展

水平如何。

布鲁斯认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由三个经济决策层次来组织。第一层（最高层）是国家根本性的宏观经济决策，第二层（中间层）是企业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第三层（最低层）是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决策和职业选择决策。根据这三个决策层次的不同组织方式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种经济运行模式。三个层次均集中化的模式为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第一、二决策层集中化而第三层决策分散化的模式为集权模式。第一层次决策集中化，而第二、三层次决策分散化的模式为分权模式。三个层次决策均分散化的模式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在计划经济机制中导入市场因素，分权模式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模式。他认为，分权模式既能有效地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问题，又能保证宏观微观经济效率和经济的有效增长，优化信息结构，形成合理的动力结构，而且可以使经济决策的社会偏好和个人偏好、经济管理的宏观控制和微观自治、社会范围的利益均衡和个人或家庭选择决策等方面有机结合。布鲁斯提出的分权模式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分权经济模式的主体是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运行；2）经济决策多层性。表现在：第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央计划是第一位的，市场因素及其量是第二位的。在分权模式下，经济运行的一切重大的总量决策都应由中央计划决定，包括：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投资方向及其结构、消费基金在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之间的比例，生产规模，收入分配结构，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外贸及其结构等等。上述各类决策虽然由中央计划作出，但中央计划不具有强制性质，只供企业部门参考，并且通过市场参数来实现。第二，企业决策具有自主性。企业计划不必强行同中央计划一致，企业可以在市场上选择货源，也可以以卖方身份出售本企业产品。企业在生产组织、工种构成、工资制度上都具有自主性。利润将取代计划完成指标成为评价企业经营活动的标准。第三，在分权模式下，各种市场因素及其数量变化对经济运行起着调节作用，其中价格的调节作用尤其突出。价格结构必须反映出供求，必须和全部经济条件保持一致。但是，价格决策权不能全部交给市场，国家机关还必须对价格形成发生有效影响，同时，国家也没有必要也无可能明细规定一切产品的价格，尤其是那些生产数目很大、竞争能力很强、供求变异性很大的产品。第四，充分利用货币的积极作用来分配资源。在分权模式中，价值平衡（用G表现）起着重要作用，但并不排斥计划中的实物平衡。3）有限买方市场的形成。布鲁斯认为，分权模式的基本要求是：它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一种过渡买方市场、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引起资源浪费的现象，又不能产生社会主义集权模式下那样一种卖方市场、从而导致生产不足、资源不能有效利用的现象。在分权模式中，由于计划经济中导入市场机制，供给的灵活性会在市场给予的刺激下得以加强。同时，企业经营决策的自主性使企业生产应变力得以提高，企业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强，从而打破卖者对买者的绝对垄断地位。所有这一切，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趋于协调，保持购买力和商品量之间的基本平衡。在供求比例上，布鲁斯主张"需求稍微超过供给、从而造成一个有限的买方市场"，这样做，对刺激供给是有益的。

布鲁斯的经济思想 弗拉基米尔·布鲁斯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以研究苏联、东欧经济及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而闻名于世。布鲁斯1921年出生于波兰的帕劳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华沙自由大学攻读经济学。二次大战期间，其大部分岁月是在苏联度过的，并在那里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战后回到波兰，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华沙中央计划学院和华沙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教授、波兰统一工人党直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波兰计委经济调查局局长，波兰国家经委副主席等职。1968年3月，由于波兰发生了学生、知识分子抗议、示威事件，他被牵连被免去华沙大学教授职务，后任住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72年起，他移居英国，并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罗马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等任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1979年至1985年，布鲁斯曾多次来中国进行讲学和考察活动。

布鲁斯对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集中于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分析上，被誉为"东欧经济改革的首创人"。

布鲁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为了说明经济的范畴含义，布鲁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引用了奥斯卡·兰格的定义，并对这个定义进行了更为清晰的说明。他认为，"经济模式"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相区别的。经济制度反映社会基本的生产关系，而经济模式则显示经济的运行原则或运行机制。布鲁斯指出，为了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力，必须解决好经济运行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按社会的利益自觉地、有计划地决定经济过程的基础，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一种运行原则适合于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存在着采用不同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这表明，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之内，经济运行的不

同模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经济模式作为"提供经济运行的主要原则的抽象图式"，它必须撇开复杂的具体细节。所以，它也不应当同经济运行的具体体制混为一谈。这表明，经济模式的范畴不能与"某一国家在某一时间采用的管理组织、计划或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方法"等量齐观。在明确经济模式含义的基础上，布鲁斯根据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是如何决策的标准，划分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模式。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决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a）是宏观层次的决策。它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此是带有根本性的决策层次。如经济的增长速度、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投资的分配以及投资的技术水平标准的选择、消费基金在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分配等，均属于这一决策层次。

第二层次（b）是企业经常性经济活动的决策。它们涉及企业和部门的生产规模和结构、物质消耗的数量和结构、企业经营销售战略和原材料供应。较小的投资以及工资的具体形式等。布鲁斯强调，模式讨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于这一层次的决策活动，"如果这个模式应当实际地适应社会制度的原则，那么它们只能在这一类决策的集中和分散的问题上区别开来。

第三个层次（c）是家庭或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其内容基本上有两项：一个是在收入已定的情况下关于个人消费结构的决策；一个是关于职业选择和劳动岗位的决策。上述个人的决策应当是分散的并通过市场来实现的。

根据上述三个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决策主体情况，布鲁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模式进行了划分。最初，他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划分为集权模式和分散模式两种。这种"两分法"反映在他196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问题》一书中。1979年布鲁斯来华讲学的报告中又加进了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变成"三分法"。1980年秋，布鲁斯在为世界银行考察中国经济所写的背景文章中，开始使用更为完整的"四分法"，即在"三分法"基础上加进了一个"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其各自内容和特征如下：

1.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涉及上述（a）（b）（c）三个决策层次上均采用高度集中化的办法。在这种模式下，几乎全部经济活动（农业除外），包括雇员超过5人以上的小企业，都实行国有化。征收全部农业剩余，禁止私人的转换贸易；在消费方面，实行定量供应；在劳动力的分配方面，实行强制性派遣，不能自由离开；企业在国家高度管辖下完全没有自主权，既没有自己的基金，也无所谓盈利还是亏本；分配上实行高度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经济关系中出现取消货币的"自然化"；最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完全由国家进行控制。布鲁斯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作为完整的模式仅仅出现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但是，这种模式的意义超出了临时性的权宜之计的范围，它的痕迹则至今仍然可以找到。

2.集权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a）和（b）在决策上集中化、（c）在原则上分散化的模式。它的特征是：（1）生产资料采用几乎单一的公有制（国有制）。即使如此，由于有自留地—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存在而运行着一条比较微弱但又合法的私人经济链条。（2）经济决策基本集中于国家手中，但由于保留着家庭对消费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因而导致了消费品市场和劳务市场的存在。但由于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变得相当模糊。布鲁斯认为它是区别集权模式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重要原则。（3）企业仍然严格地从属于行政等级制度。不过，企业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有了自身的盈亏关系。显然，这是否能成为约束还大成问题。（4）物质刺激成为完全合法的东西，主要的计划工资制来强化在个人报酬方面的刺激。（5）国家完全垄断对外贸易。具体通过两种形式：一是对进口和出口的总量、总值、商品种类和地区分布等实行严格的中央控制；一是把国内的价格结构同世界市场的经济结构隔开来。（6）货币起着类似"经济计算"的消极作用，货币的流动服从于实物的流动，而且，货币在国营经济内的消极作用和其他领域的积极作用同时并存，并因此还导致了一个双重的价格体系。

3.分权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含有受控制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在这种模式下，（a）是集中化的，（b）和（c）是分散化的。分权模式直接产生于对集权模式的批判中。它的主要特点为：（1）部门中经济决策的集中化让位给经济决策的多层次化，从而形成中央和企业两级决策体制。（2）企业具有自主的计划，强制性的指标计划和等级从属的计划结构被废除，企业需要的生产资料不再由物资部门统一分配，企业经营状况不再以完成国家计划的状况来判断，而是取决于企业获取利润的多少。（3）货币也已经在国营经济中起积极的作用，因而价格形成机制的相互关系比较清楚：一方面价格的形成受计划指导，另一方面价格是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应着变化着的经济条件。（4）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已经建立了联系。（5）非国营经济变得更加面向市场，私人企业能够正常的经营，家庭对消费品市场和劳务市场发挥更大的影响。

布鲁斯认为，分权模式与集权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央计划和企业计划之间的联结类型方面。在集权模式中，将一个指标列入中央计划，就意味着将一个

命令发布出来。而在分权模式中，中央决策与企业决策之间并不是通过直接命令而是通过间接的经济手段取得联系的。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企业之间的水平联系，从而是市场关系。分权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侧面：一方面给企业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不失去国家对企业经济活动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的控制和管理。不仅如此，布鲁斯还指出了分权模式中中央计划得到保持和国家对整个经济控制得以实现的一些基本因素，它们是：(1) 带有根本性的中央决策为整个经济活动规定了一个总的框架和基本的发展方向。(2) 国家通过一系列目标函数为企业经济活动规定了"行为准则"，使企业对局部目标的追逐有利于实现全社会的总体目标。由于目标函数建立，不但能把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同个人的刺激联系起来，而且能把它同生产要素的供给及其发展的潜力联系起来。(3) 政府所控制的各种参数可以影响企业的经济活动。布鲁斯特别重视分散模式中参数的作用，把借助行政命令来管理的体制变成参数管理的体制是分权模式的中心思想。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市场信号量对企业决策具有参数性质，它们不被企业所操纵，企业的活动必须适应这种参数的调节；二是国家的计划信号对市场信号量具有参数性质。这样中央就可以从总的方面上指导经济的发展。

4.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 (a) (b) 和 (c) 都分散化的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同分权模式相区别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把扩大再生产（新资本形成）的责任从国家中央计划者手中转移到企业自己的手里。同时，企业纯收入的分配。留成比例以及提留下来的纯收入中多少用于储蓄或扩大生产能力，都由企业做主；其次，某种资本市场必然接替国家预算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再分配资本的职能；再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运行不仅没有由中央决策的总框架，而且也没有规定的"目标函数"从上而下指导企业。因此，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企业只是从市场环境中得到它们的"行为准则"。

比较而言，布鲁斯认为，历史的实践已证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局限性，集权模式的弊端也愈加明显，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出现比较严重的障碍，而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在理论上则是一种比较正确并可供选择的一种模式。

布鲁斯在对经济模式作抽象的理论分析时，严格地以经济因素作为评价标准，不考虑政治因素。但他认为，在实践中政治条件是无法回避的。主要是最初的出发点（目标函数）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在若干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行最终决定也属于政治决策的问题。因此，改革中的经济模式转移和运行原则的变动都必须也只能以政治决策的转变为前提条件。

基于模式的划分，布鲁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布鲁斯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商品关系，比曾经预期的更有持续性，扩大商品关系的范围和意义已成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争取的方向。但是，"即使完全承认在社会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扩大商品关系的领域和职能的必要性，也决不允许去掩盖可能带来（在某程度上一定会带来）与此有关的令人失望的这一方面的后果"。因此，布鲁斯反对把社会主义经济定义为商品经济，而只是强调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有意识地选择商品经济的机制。引入市场的机制的必要性。为了避免对利用市场机制的误解，布鲁斯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是指把商品货币形式用作基本的、积极的分配资源的工具。"在企业有选择自主权的基础上，市场机制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自由的市场机制，其特点是政府不干预市场过程，价格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在市场上自由波动。不过一切活动，特别是用于消费的收入的数量和分配方式，都是在中央机关建立的总的框架内决定的，因而这种市场机制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典型的竞争市场机制。二是有调节的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市场过程，价格不再自发波动自行决定，而由政府机构来决定。布鲁斯认为"有调节的市场机制……是达到社会经济合理的一种理论上可行的形式"。

布鲁斯通过对苏联、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研究分析，具体从模式转换和模式转换的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首先，从模式转换方面来看，布鲁斯认为改革必须注意下述问题：(1) 由于在分权模式中决策的各级具有自主制定的计划的机制，因此协调决策层次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央一级的计划以各总量形式包括了企业一级计划的许多重要问题，但中央一级的计划既不是以各企业计划的综合，也不是微观决策的消极的预先作出。它是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到经济和非经济等方面因素而制定的计划。另一方面，企业计划不是中央计划形式上的组成部分，它们包含对中央计划来说过分具体细微的要素，而且它们不必无条件地与中央计划相吻合。(2) 直接决策与间接决策是重要而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中央一级必须利用具有调节作用的市场机制，目的是借助一系列间接决策来确切地决定由直接决策的范围；另一方面，中央一级的间接决策者在造成这样的经济条件，使以取得最大限度利润为依据的企业一级决策按照重大的计划决策方向运动，并促进全社会目标的实现。(3) 在分权模式中开始使货币对资源分配产生积极作用，但同时实物单位的平衡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意味着，货币单位平衡与实物单位平衡是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的、不

可缺少的条件。与集权模式不同的是，分权模式把实物平衡限于宏观经济分析的层次。(4) 分权模式对价格有特别的要求。在市场具有竞争市场的实际性质并使企业不能对价格发生垄断影响条件下，在没有特殊的社会偏好要求有供给者价格和购买者价格之间的差额的地方，价格形式仍然取决市场机制的自由作用。为了防止结构因企业的特殊利益而变动无常时，保证中央政府对价格的形成发生有效的影响是更为重要的。其次，从模式转换的外部环境方面看，布鲁斯认为，在改革中要保持相当程度的国有领域，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程度要超过西方典型的财政金融管理。为此，他建议国家要加强三个方面的控制：第一、对投资过程的控制。在分权模式中，国家可能不是唯一的或最主要的投资者，但国家应在投资中保持充分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特殊项目的直接投资，以便控制未来生产能力和生产结构的形式；第二，对收入政策的控制要达到这样两个目标，一是确定收入的社会合理格局，二是创造宏观经济平衡的环境。使实际的产出接近于潜在的生产能力；第三，对非经济关系的控制。其要点是国家必须保持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相对独立，使国外经济的变动不能自动地全部输进并影响国内经济。而是要经过国家过境后方能输入国内。

其主要著作有：《价值规律和经济刺激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方向》等。

出口加工区　在一国或一个地区中划出一定范围，实行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以吸引外资，进行出口加工业务的地区。对出口加工区，一般实行减免关税，放宽海关管理的限制的优惠，并要求其产品全部或大部销往国外，以增加外汇收入。出口加工区是由17、18世纪的自由贸易区发展而来的。但出口加工区是以出口加工为主，自由贸易区则以实业贸易为主。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出口加工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并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1978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马尼拉召开世界出口区会议，讨论了出口加工区的发展问题，并成立了世界出口加工区协会。中国设立的经济特区，是类似出口加工区的经济地区。

出口许可　商品出口须事先提出申请、取得国家主管部门签发的许可证后方可办理出口的制度、是国家管理出口贸易的一种措施。这一制度规定：企业经营出口业务，商品出口都要经国家审核批准。许多国家对战略物资，国内供应紧张的物资或商品，以及文物等，都实行出口管制，这些东西出口、须持有出口许可证，海关才能放行。中国规定，对外贸易部及其授权的外贸局、是执行出口许可制度的机关。对于中、外企业、团体、个人等运往国外的货物，出国展销会的货物，未经外贸公司而直接出口的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商品；外国公民、旅游考察者超过自用合理数量的货物，都必须申领出口许可证，否则，不准出口。对于不符合国别政策、地区政策、双边贸易协定或由于外汇平衡、商品质量不合标准或合同等原因的出口商品，外贸部可以随时通知其停止出口，暂缓出口或减少出口。实行出口许可的管制措施，有利于外汇平衡、保护本国资源，保证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外贸信誉。

出口津贴　又称"出口补贴"或"出口奖励金"。是对外贸易中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经济杠杆之一，也是国际上通用的鼓励出口办法。它是指一国政府、垄断组织或同业公会对出口厂商在输出某种商品时所给予的现金补贴或优惠待遇。旨在降低出口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加强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出口津贴有两种形式：(1) 直接补贴。即直接付给出口厂商以现金补贴。其金额大小一般为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的差额，并随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差价变动而随时变化。(2) 间接补贴。即财政上的优惠待遇。政府对出口厂商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财政上的各种优惠待遇，如减免出口税和国内税，降低运费，提供出口信贷或简化出口手续等。

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各部门、各地区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根据出口需要，选择一定的地区、工厂（车间）和矿区等单位，进行出口商品生产。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适应国际市场需求，保证均衡稳定地供应出口；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增强创汇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内外销矛盾，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有两种：(1) 出口商品综合生产基地。在一个市或地区范围内建立多种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安排生产，为各专业出口公司提供货源。(2) 单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以生产国外畅销的经济价值高的出口商品为主的生产基地。

出口导向　优先发展出口品工业，以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和产品的生产的一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行这种战略的，大致有两类国家和地区。一类如日本、新加坡、香港等，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源贫乏、本国（地区）市场容量狭小，对国外资源、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很自然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出口品工业占主导地位，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另

一类如巴西、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长期坚持以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进口替代战略，工业成本高，效率低、资源配置不合理，所以进而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战略转变。要成功地实现这种转变，需具备一些先决条件，如国内某些工业部门已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生产管理水平，有较充分的熟练劳动力供给，产品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与国外市场联系密切。为创造这些条件，政府应制订一些利于出口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采纳这种战略，开始时应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以后逐渐转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通过发展出口品工业，以引进外资，加快资金积累，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并带动其他部门和产品的发展。但是，出口导向战略也使国民经济易受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尤其对实行这种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成为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对象，也加深了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

归口管理 按照工业管理对象具有的某种共同特性所实行的分类管理。通常指按经济部门或行业进行的管理，"口"即指部门。由于我国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对国民经济采取分部门、分级管理的办法，从事某一经济活动或某一类产品的生产，既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又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既有中央直属企业，又有地方企业。为了指导、协调这些企业的工作，它们的某些业务活动统一归由一个部门进行管理。归口管理是我国现行工业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计划，为本部门内主要企业规划出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保证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合理比例。制订行业的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实现产品的标准化、系统化、通用化、提高行业的装备水平和产品水平；建立行业的技术开发、情报、咨询中心，组织科研攻关，推动全行业的技术发展；制订统一的报表和统计制度，求得完整、准确的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为实现工业管理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代位求偿 亦称权益转移。指被保险人将其对责任方依法享有的权益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代替被保险人行使和享有这种权益。当保险标的发生的损失既属于保险责任，又属于第三者经济赔偿责任时，被保险人在取得保险赔款后，应将其向第三者责任方追偿的权益转移给保险人，由保险人代位行使。保险人只有在赔偿被保险人全部应得的损失补偿后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保险人所享受的权益不能超过所支付的赔偿额，其超过部分，应返还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在未经保险人许可的条件下，不得放弃对第三者责任方的追偿权，更不得与第三者通谋抛弃追偿权。否则，保险人不予赔偿，或追回已赔偿的保险金。规定代位求偿权，主要是为了避免被保险人在遭受损害后，获得双重赔偿的额外收益。同时，这也是保险人控制道德危险的一种经营管理手段。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和机体与一般财产的性质不同，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所以，代位求偿的规定不适于人身保险。

代理 受委托本人（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委托，根据代理协议，以本人或委托人的名义，代表委托人的利益，与第三者办理进行交易的有关事宜。委托代理关系不是买卖关系，本身不担风险，不负盈亏，以佣金收入为报酬。代理方式可分为总代理、独家代理和一般代理三种：总代理实际上是出口方或进口方在国外的全权代表，可以用后者的名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即在指定地区有权独家代表委托人签订买卖契约，处理货物，并办理一些其他非商业性事务。一般代理是不享有专营权利的代理，用于对代理商情况不够了解的试用阶段，或商品经营上不适于采用独家代理方式。一般代理时，委托方可以在同一市场、同一时期内委托一家或几家代理；也可以不通过代理商和其他客户成交，不付代理商佣金。使用代理方式，有利于开拓、巩固和扩大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通过信息反馈，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出口产品的不断创新，对出口产品的作价起参谋耳目作用；有益于产品的连续性生产；有利于合理解决贸易过程中发生的纠纷。选择代理商的条件是：政治上对本国态度友好；有较好的资信；有广泛的商业关系网；熟悉代理品种的有关业务知识；配备有开展业务活动的通讯、计算等设施。代理方的义务是：代理人必须向委托人公开有关客户的必要材料和商务有关的一切重要事实；不得受贿或背着委托人密谋私利；不得泄露与委托人有关的商业秘密；定期向委托人报帐。

主观均衡条件 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主观因素。这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兰格认为，决定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有效地运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主观因素有三个。第一，家庭的经济决策决定了消费品的需求量。家庭作为消费者，总是力图获得最高的收入，力图从购买的消费品中得到最大的享受。在消费品价格和消费者收入既定的条件下，消费品的需求量就被决定了。第二、企业的经济决策决定了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和生产规模。生产企业的经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而是根据国家制订的一定规则、来决定生产要素的最优结合和产量的最优规模。生产者对生产要素

的需求量和产品的产出量就被决定了。第三，国家以价格为参数制订某些规则来约束企业的行为。首先，规定企业要选择使平均成本最小的生产要素组合。在计算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每个企业所选择的工艺，必须使产品的平均成本达到最低限度。这才是最佳的生产要素组合。其次，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限定在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水平内。在计算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每个企业确定的产量规模，以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为界限。这样既界定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又避免了资源的社会性浪费。

立体农业　在时间、空间和产品等方面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农业。发展立体农业是人类向有限的土地资源获取更多生活资料以满足其需要的根本途径。从整个农业内部讲，就是要大力发展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建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的多层次的农业体系，以满足人们对粮、油、肉、蛋、奶等生活资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从农业的各个具体行业来看，同样要建立立体结构。以种植业为例，在时间上，立体农业要求在同一块土地上把生长期长的作物与生长期短的作物、越冬作物与非越冬作物等合理地搭配起来；在空间上，立体农业要求在同一块土地上把高秆与矮秆作物、地上与地下作物、深根性与浅根性作物、攀缘与非攀缘作物、喜光性与耐阴性作物合理地配置起来；在产品方面立体农业要求在同一块土地上获取多种农产品。总之，立体农业就是要利用生物方面和非生物方面的当代科技成就进行农业生产，在有限的土地（这里的土地包括农田、水面、草原、森林、气候、地上和地下）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农产品（包括林产品、畜产品、渔产品、粮食和油料、棉、麻等）。它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生产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立体林业　人类利用生物学原理人工建立的适合当地特点的多层次森林结构。如乔木、灌森、草类的立体组合，林下套种粮食、药材、果木的立体组合等。立体林业一般可分为两种型式：（1）自然式。即指利用山体的垂直带间气候、土壤、地貌的变化，配置最适宜的种植层次，以取得最大经济生产力和最佳生态功能，也可称为梯形林业。它的配置以林木为主，同时还包括有各垂直带内农牧资源的互利组合。（2）组合式。即在一块土地上种多种植物以组成立体楼层，也是垂直扩展多层次综合经营模式，是提高单位面积效益的集中形式。其具体方法有：林木、经济林、旱粮间作套种；经济林、油料作物间种；林木、药材的间作或混作；林木、菌类寄生；农田、林木间作以及林木、畜牧间作等。建立立体林业的好处是：（1）充分利用自然力（光、水、土、热），激发植物内在自然生产潜力。（2）利用植物（动物）间生物学特性，协调互利本能、发挥群体功能。（3）利用人的经营能力，调整内力、外力，使之协调统一，建立最佳结合。

东欧经济学理论　指东欧国家形成于本世纪50年代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实践中，掀起并有别于传统的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经济学理论的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和流派。该流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斯拉夫的卡德尔、马克西莫维奇、霍瓦特、科拉奇、基得里奇等；波兰的卡莱斯基、布鲁斯、泽林斯基等；匈牙利的科尔奈、涅尔什、奇利什、里斯卡等；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考斯塔等；德国的贝伦斯、米塔格等。东欧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形成，源于本世纪30年代兰格与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战。在论战中，兰格首次系统地探讨、阐述了中央计划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思想，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由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运行的经济模式，即著名的"兰格模式"。50年代后，伴随着东欧许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经济学家们积极投身其中并献计献策，进行理论创新，经过3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许多东欧国家，这一体系已经成为取代传统的苏联经济学理论的主流派，对我国经济学界和80年代以来的体制改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标志着一个既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又有别于传统的"苏联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理论体系—"东欧经济学理论"已经独立于世！。

东欧经济学理论的显著特点概括地说主要有：（1）指导思想上，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庸俗化，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核心，运用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矛盾性而不是绝对无矛盾的和谐体，主张对其进行改革并不断地加以完善。（2）研究对象上，以批判和审视的态度考察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关系，探索改革传统的苏联模式、建立多样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依据、目标体系和具体途径。（3）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在规范分析方面也突破了某些传统观点的束缚，并把现代科技进步中出现的新的方法如计量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等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之中，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如总量分析方法和边际分析方法等也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运用。（4）理论体系

上，跳出了传统苏联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线，强调价值规律及与其相关的经济手段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广泛调节作用，并着重研究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研究宏观调控机制与微观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等，试图建立一个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相融合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5) 理论功用上，极力论证和倡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对策性特征，避免了传统苏联经济学的纯理论性，从而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和现实感。

东欧经济学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性来看，它几乎涉及这一理论体系的所有方面。但如果从基本内容方面看，则主要包括这样五个方面：计划与市场理论；所有制理论；宏观计划管理理论；微观企业行为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下面依次对这些理论作一介绍。

1.计划与市场理论。在这方面，东欧经济学理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它批评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毫不相关的各种传统观点，逐步深入地探讨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实行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结合的基础、形式和具体途径等，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模式。这一理论探索起始于 30 年代兰格在同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战中。当时兰格针对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和竞争性市场机制，从而不能宏观地核算劳动消耗和有效地配置资源的观点，提出了计划模拟市场机制的假说，其思路是：企业遵循平均成本最小化和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价格的行为规则；中央计划局通过"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确定生产资料的均衡价格，从而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佳分配。兰格的这一假说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思想，为后来整个东欧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生长点，许多经济学家都从这里得到很大启发。比如南斯拉夫，在实行自治制度以前就有以基德里奇为代表的学者试图解决计划与市场机制的有关问题。其后则有马克西莫维奇、霍瓦特等人相继对计划与市场完全不相等的观点作了批评，并进而阐发了二者结合、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实践中，南斯拉夫更多地强调的是市场的作用。在波兰，兰格在自己早期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并设计了包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模型。布鲁斯则重点研究了市场机制，并指出市场是联系整个生产过程的媒介。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产品市场外，还有生产资料等要素市场。在捷克，锡克对计划与市场问题更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将整个这方面的理论推向了高峰。在匈牙利，科尔奈等则又从一种新角度来讨论，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以实现分权、提高管理效率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当然，在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的问题上，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又是不尽相同的，它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 计划与市场作用的范围。在这里，分歧首先表现在对计划概念的理解上，即计划是中央政府计划还是社会计划。兰格、布鲁斯、锡克等认为必须有中央计划；霍瓦特等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则认为真正的计划应是社会计划而不是中央计划，中央政府只起协调作用。在与此相关的市场问题上，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也走得最远，他们认为市场机制的调节是经济调节的主体，计划只处于从属和辅助的地位。而其他多数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至于限制多大，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如兰格，卡莱斯基等经济学家，他们划定的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较小。比如兰格更多地是从计算技术的角度来确定市场机制的范围的，尤其是到 60 年代时，他认为计划模拟市场的过程可以用一台电子模拟机来实施，因而市场的功能可限制在无法运用电子计算机的经济过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过程和验证计算机预测结果的过程。卡莱斯基则认为，利用市场机制是必要，但它只能作为一种从属因素，限定在主要发展方向由中央制定的限度内。布鲁斯、锡克、考斯塔和科尔奈等则属于另一类，他们限定的市场机制作用范围较大。比如布鲁斯认为，国家与企业分权后，国家对企业活动不能直接决策，因而有必要将有调节市场机制导入分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只在生产结构形成中起调节作用，而不能在决定经济发展基本方向的投资结构形成中起调节作用，因而市场机制不是生产比例和交换比例的绝对的和普遍的调节者，它只是在由中央决策、首先是投资决策所划定的界限内起调节作用。锡克则从解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平衡问题出发来引入市场机制。他把经济过程分为微观生产结构（市场供求结构）形成和宏观结构（两大部类比例等）形成两个过程，认为市场机制就其调节功能来说能够灵活地解决微观结构平衡问题、其中包括微观生产比例和投资比例的平衡，而对宏观结构的平衡则无能为力，因此宏观结构必须由宏观计划来调节。科尔奈认为，计划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和协调性进行事前的探索，计划确立目标并规定实现目标的手段；二是指中央控制或行政协调。他认为，与市场相结合的是第一层含义的计划；在这种结合中，市场协调将取代行政协调而在整个微观调节范围起作用。(2) 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大致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主张：第一，政府并不干预市场过程，价格根据实际的供求关系在市场上自由波动，在此前提下计划才有选择地发生作用。如霍瓦特认为，只有在市场不能很好发挥功能或

单独发挥功能所产生的结果不符合社会目标时，才引进计划因素。锡克主张，只有收入的分配方式、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形成限定在中央建立的总框架内决定。第二，政府干预市场过程，企业行为规则合乎市场竞争要求，但价格不再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的自发波动自行决定，而是由政府机构决定（直接决定或通过经济政策的特殊手段来决定），从而形成布鲁斯所说的"有调节的市场机制"，以克服暂时的行情波动给生产者造成的迷误。第三，对市场机制实行规范的计划参数调节。如科尔奈认为，象上述第二种主张那样的"间接的行政协调"在现实中仍会产生许多弊病；如果对市场进行单项的、零碎的干预，则不仅不能保证市场服从于计划，反而会破坏价格的有效性，使经营者丧失责任心，削弱利润的刺激作用。因此科尔奈主张国家对市场机制进行规范的计划参数调节，如税率统一并有法律保证，利润分配的比例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一般不挽救破产的企业等，以期使价格信号不扭曲并有效地对生产者发生刺激作用，让市场令人满意地进行。

2.所有制理论。东欧经济学家对所有制理论的研究是由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唤起的。首先是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直接从所有制改革开始，这推动了一部分经济学家较早致力于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其次是东欧其他一些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开始的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后受阻，启发了那些原先从事运行机制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转而研究所有制理论。布鲁斯就是这方面较典型的代表。撇开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不说，东欧经济学家们在所有制理论问题上确实提出了许多与传统的苏联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看法和主张。（1）对所有制范畴的重新考察。传统的所有制理论往往把所有制当作单纯的抽象的生产范畴，甚至把所有制当作独立于生产、交换、分配过程以外的法律范畴。东欧经济学家则认为，虽然在理论上有必要单独地考察所有制范畴，在现实中也有必要相对独立地改革所有制结构和形式，但所有制毕竟不是单纯的抽象的范畴，它是包含生产、交换、分配的总和范畴，有具体的实现形式。正如锡克指出的，所有制范畴首先是一个结果范畴，因此没有在生产资料的分配和交换之外的占有。南斯拉夫学者在解释社会所有制时，特别强调劳动者支配过去劳动，支配剩余劳动，认为分配关系比生产领域关系的结构更充分而明显地体现生产的所有制关系。对所有制范畴内涵的这种认识和规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它使所有和占有关系有了现实的内容。如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就是由收入分配制度来保证的，因为收入是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在经济上的体现。再如匈牙利改革国家所有制，承认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一个占有层次，企业自主权的实现形式便于承担经营利润的风险责任。其次，它规定了国家宏观控制和对企业经济刺激的宏观界限。如锡克提出了宏观控制的基本措施，即国家通过宏观收入分配计划调节企业的收入分配；布鲁斯也提出，利润的功能与企业本身劳动效益相联系是有效地利用生产资料的一种刺激形式。（2）对传统的国有制理论的批判。传统的国有制理论不仅把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相等同，而且还将国家所有制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相等同。主张改革国有制的东欧经济学家们具有的共同的理论前提是将国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分开，在此基础上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现行的国有制。比如南斯拉夫学者卡德尔、马克西莫维奇等认为，虽然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必须走国有制这一步，以完成剥夺私人资本的任务，但一当社会主义进入经济稳定发展阶段，国有制便成为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阻力。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定义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后者必须满足两个标准：一是必须按照社会的利益使用生产资料；二是社会必须具有对它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有效支配权。以这两个标准来评判国有制，布鲁斯认为国有化以后产生了官僚化，没能真正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锡克则从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入手批判国有制，认为在国有制中企业由官僚主义机构支配，不能独立地根据市场状况活动，从而不能具有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科尔奈认为，国有制的症结在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其根子是国家对企业的父爱主义。（3）国家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南斯拉夫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内涵发展是要消除劳动者同劳动的异化，因而改革的目标是社会所有制，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既不归国家所有，也不归集团所有，而归全体劳动者所有；联合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排除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占有，实行工人自治。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内涵发展的内容，包括按整个社会的利益使用生产资料和生产者有效地民主地参与生产资料的管理两个方面，因而由国有制向生产资料社会化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是政治民主化。锡克认为，国有制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劳动者集体股份所有制，其基本特征是企业的每个职工都是该企业资产和产品的股份所有者，职工除了得到工资外，还可根据持有的股份获取相应的利润分红，并从企业积累中增大自己的股份。科尔奈认为，国有制改革的目标在于解除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硬化预算约束，因为在这种硬约束情况下，即使企业经理自己的短期利润份额为零，他对利润也不会是漠不关心的。因此，科尔奈认为主要问题不是刺激的实现形式，而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规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里斯卡则根据匈牙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

现实，提出了深化国有制改革的内容是按照个人社会所有制的要求建立承包经营制的设想，其要点是：通过有计划的经营者市场投标来竞争性地选择社会资产的承包经营者，承包者以"社会继承"等个人财产的抵押承包社会资产，通过资产的社会评估来确定承包责任和承包成果，使承包者收入同承包责任和经营成果挂钩。

3.宏观计划管理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统一的社会中心作出的计划必须无所不包，整个社会是一座工厂，各个企业都只是它的一个个车间。东欧经济学家们对此提出了批评。(1)计划管理必须走向分权化。首先是兰格在50年代用信息论说明了计划管理实行分权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央计划的集中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计划机关管理信息的传递速度和可靠性程度；二是中央加工信息作出决策的能力。因此，在所有集中决策对情况反应太迟的情境中，经济计划必须分散，否则也会造成自发过程。布鲁斯在兰格规定的条件基础上又增加一个条件，即利益关系影响信息传递的可靠性。他认为，在现阶段这三个条件都不完全具备：信息系统的容量和中央处理资料能力的不能胜任，使得提供信息的速度减慢、内容失真，再加上现有的既得利益制度，会使信息失真度愈来愈大。因此，分权化是必须的。科尔奈认为，如果计划能在事前探测和协调社会活动，这将是十分吸引人；但如果是陷入生产、价格和投资项目的日常细小事务中，则又另当别论。东欧的其他一些重要经济学家如锡克、考斯塔等也提出了类似的分权思想，它表明计划管理分权化成了东欧经济学理论的主流。(2)分权条件下国家计划的范围。在分权决策的思路中，东欧经济学家大都没有否定一定范围的中央计划的必要性，认为它是分权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由于各自主张的分权标准不一样，对国家计划的范围和内容也就有不同的认识。兰格认为，国家必须影响和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包括决策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向。卡莱斯基的观点与此类似，认为中央计划应该决定经济发展的主线和主要方向。布鲁斯则提出了"三层次决策论"：第一层次主要涉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向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决策由国家作出；第二层次主要涉及当前经济运行问题的生产部门和企业的局部决策由企业作出；第三层次涉及个人消费结构决策和职业选择等由个人或家庭作出。锡克也认为，中央不能直接计划具体产品的生产，它能够做也应该做的是通过宏观收入分配计划控制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并以此来调节两大部类比例，使总的生产方向具有计划性。科尔奈认为，计划管理分权后，中央计划的重点应该从微观调节转移到宏观政策调节，尤其是在政府的价格政策和预算约束硬化以后，政府就能更有效地依靠宏观政策，如信贷、利率和汇率等来综合约束企业。(3)国家宏观计划管理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计划理论认为，国家自上而下给企业下达的实物形态的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唯一形式。但东欧经济学家们认为，指令性计划并非计划经济的唯一形式，在一定阶段上甚至也不是主要形式；国民经济计划实现的方法不仅有行政的，更主要的是还有经济的；国家对企业的宏观控制手段也不仅有直接的，更主要的是还有间接的。当然，在具体如何运用间接的经济手段来进行管理这一点上，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认识又有差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主张通过调节利益关系刺激企业来实现计划目标。比如兰格认为，运用经济手段就是建立一种刺激体系，利用人们对某些刺激和反应的自动性质，引导人们恰好去做计划要求的事情。第二，主张采用有调节的市场机制，为企业创造一定的环境，使之自动地按计划目标要求运行。如布鲁斯认为，在分权模式中，经济手段的作用就在于调节市场机制，使市场的各种量如价格、利率等按计划要求运行，从而使直接调节企业决策的市场机制成为"有调节的"，来自动地执行计划调节的职能。第三，主张通过调节收入分配过程来调节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形成。比如锡克认为，如果收入分配的调节使人们追求的未来需求同计划目标相一致，那么生产和投资也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无需去直接指挥，国家只需通过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严格控制国民收入分配的总量和结构，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4.微观企业行为理论。东欧经济学家在研究和论证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更多地是涉及前述的宏观计划管理、计划与市场理论及所有制理论等，但由于企业问题是整个改革的微观基础，尤其是它与所有制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微观企业行为理论也是东欧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还很不成熟和很不系统。(1)关于企业的概念。传统的苏联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只不过是计划的执行单位，是国家的附属物。对此，东欧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锡克、霍瓦特等提出了批评，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不能象过去那样是一种所谓由国家所有的，由居于企业之上的官僚主义机构来支配的被动组织，而必须独立地根据市场的方向进行活动。波兰的泽林斯基等也明确提出要根据商品经济原则重新组织社会主义企业，使企业职能还原，以构造出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模式。匈牙利安道尔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提到，企业是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分离的基层经济和组织单位，必须有经营活动方面的独立性和决策的自主性，因而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主要属企业的职能。(2)企业和组织原则：效率、民主与自治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认为，效率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

盾，因此企业组织的原则要么是效率最大化，要么是民主最大化。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霍瓦特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社会企业组织的目标应当是在实现效率的同时使决策中的民主最大化，只有实现最大化民主才能达到最大化效率。根据民主和效率的要求，霍瓦特提出了著名的“工人自治企业理论”，该理论包含如下一些组织原则：一是决策民主化，即决策的参与是直接的透明的，不公平和强制得以消除，舆论操纵不复存在；二是工人委员会作为企业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工人群众自由选举产生，并决定企业重大决策；三是作为从事具体的决策的个人或机构来承担决策责任；四是决策的实施属于专业权限问题而非民主问题，发生在专业技术领域而不是利益领域；五是为防止个人或集团滥用权力，必须建立制度和法律约束规则。锡克很赞成这种工人自治的思想，因为他提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一幅工人自治的图画。但是他也认为，在南斯拉夫人那里，对工人自治原则的评价有点教条主义意味，因为他们的工人自治原则要求只有工人自治委员会才能对企业的行动和发展作出决策，不允许任何外界的干涉，不允许任何外界规定企业的收入分配。而按照锡克的意见，企业和工资提高的速度只能由社会来规定，即通过宏观分配计划来确定。(3) 经理规则与集体企业家职能。在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兰格，他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中经理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是按市场运行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是按中央计划局规定的两条规则来行事：一是要素按平均生产成本最小原则作最优组合；二是产量和生产规模的决定须按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来进行。兰格认为，这两条规则所起的作用同竞争制度中私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所起的作用将是一样的。对兰格提出的这两条“经理规则”，锡克、科尔奈等人都持批评态度。按照锡克的意见，企业行为应当由企业来完成，无需中央计划者直接干预，而且企业经理同样应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经理在市场上既决定其创业活动又决定其是否有必要关闭企业，因而社会主义经济中经理的职能应当和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厂商职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经理行为反映的是工人的意愿；其二，由受市场制约的经理行为而产生的微观不平衡可以通过宏观分配计划来消除，不会导致经济的紊乱。科尔奈也认为，兰格的模式是建立在“计划者”和“经理”的错误假设之上，忽视了竞争问题。而与兰格的经理行为规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斯拉夫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集体企业家”的概念。比如霍瓦特在1964年出版的《计划经济理论指南》一书中提出，自治企业的行为本质上发挥着集体企业家的职能。这种集体企业家既不同于西方经济中的私人厂商，又不同于兰格经济中的企业经理，具体表现在：第一，自治企业中的经理由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选举产生，因而其行为不是对上级负责，也不是追求自身的一己利益，而是为整个企业集体负责；第二，自治企业中的经理是决策的执行者，因为企业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代表全体职工愿望的工人委员会集体作出的。经理只能在工人委员会指定的领域内制定实施技术或专业决策指令；第三，社会评价和承担风险是集体的职能，监督不是一种由上级官僚决定的行为，而是一种企业职工行为；第四，企业活动的协调是一个技术过程，它由本身是集体成员的专家来履行，中央计划当局和法律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规范的市场条件，不干预经理任免，不干预企业生产和分配活动；第五，企业的各种创新活动均属于集体行为，而不仅仅属于技术专家的活动。所以，集体企业家的基本特征是使原来集中在一个人即经理身上的管理职能集体化了：对企业外部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家，因为管理决策、创新活动、风险责任都由企业自己负责；对企业内部来说，它消除了权力障碍，实现了决策民主化，工人不是单纯的劳动者，而是具有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即既是职工，又是企业家。

5.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东欧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联系制度因素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而它所依据的实证材料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短缺状况，核心思想反映在它对增长和发展的平衡与和谐的强调上。(1) 卡莱斯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卡莱斯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从总体上说是供给约束型经济，因而经济增长模型要重视对供给问题的分析。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引入了各种经济结构关系，如资产结构、投资结构、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动的关系等，特别是充分研究了长期发展的瓶颈问题，他的增长模型还十分重视对投资的投资率限制因素的研究。他认为，确定经济增长速度要注意投资和消费、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只有在长期利益和短期损失之间的均衡点上确定的积累率，才能保证经济的最优增长。他还注意到了政府决策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也强调政府决策要受宏观经济过程的制约。他引入模型的“政府决策曲线”就是用以说明选择长期战略的主观的（政治的优先）因素和宏观制约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变动趋势的。(2) 科尔奈的“短缺均衡”增长模型。科尔奈认为，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变量，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受资源约束；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生产的增长不会受到需求不足的限制，因而资源利用可达到最大限度。但是，短缺总是和滞存并存：生产

的增长遇到资源供给瓶颈的限制，致使部分资源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宏观经济的这种状况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种种变量，如投资函数、生产和投资效率、资本产出率等，从而影响效率和经济增长率；而追求经济超高速增长造成的计划紧张和投资紧张，又会反过来加剧短缺。科尔奈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短缺均衡"增长的经济。(3) 实现平衡增长和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卡莱斯基在阐述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时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作为规律的观点，反对将这种优先增长绝对化。他提出的各部门要平衡增长和协调发展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科尔奈在分析增长问题时把经济增长政策分为强制增长和平衡增长两种类型，认为传统体制服务于强制增长政策，即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实行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经济增长政策将从强制增长转向平衡的、和谐的增长政策，但即使在这时，纠正以前的错误、弥补以前的不平衡，也决不能采用突进的方式，以免过快的变化导致类似强制增长政策的有害影响。

卡德尔的社会所有制和自治理论 南斯拉夫著名经济理论家和政治家卡德尔提出的有关国家所有制的历史作用和内在矛盾、社会所有制的本质特征及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自治制度中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及收入分配关系特征和诸经济关系再生产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一书中。

1.国家所有制的历史作用和内在矛盾。卡德尔有关社会所有制和社会自治的理论是通过对国家所有制的分析批判而逐渐形成的。卡德尔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成的历史过程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形式展现的，国有制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所有制都是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因而不能静止地超越空间和时间去评价公有制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历史作用。国家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阶段是必要的，因为在那时国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行为的直接体现，国家在组织新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不仅是为了使国家摆脱经济很不发达的状态，而且也是为了对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在改变社会关系方面别无他途，只有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通过革命的国家的力量强行解除资本主义所有者的权力，把私有资本宣布为国家财产，并通过相应的集中积累才能实现。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将经历或长或短的国家所有制关系的阶段。因此，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始形式。但卡德尔也认为，尽管国家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革命的作用，但就是在当时其本身也已孕育着一种基本矛盾和萌芽，它表现为工人及其劳动同对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其他客观条件的直接管理相分离，因而如果把最初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关系宣布为不可更改的信条，它就会造成使劳动者同公有制生产资料相异化的一定形式再生产条件。以此为基点，卡德尔还从南斯拉夫的实践经验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国家所有制的历史局限性和内在矛盾，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不可能消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产品相分离和相异化的状态，从而不能解决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动力和效率问题；(2) 党和国家管理机构可能滋生严重的官僚主义，使公有制由劳动者解放的条件变为奴役劳动者的工具；(3) 过份集中的管理体制还会阻碍生产集约化的发展，因为这种集中使劳动组织彼此隔绝和分散化，加强了经济的粗放经营程度，从而阻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公有制范畴和涵义及其实质。卡德尔认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把国家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范畴涵义的曲解有关，即他们总是把"国家"同"社会"等同起来，从而把"国家占有"和"社会占有"等同起来，并且把公有制看成人对物的静止的关系，而不是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公有制始终被认为是以劳动人民为一方，以社会资本集体所有者的某种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职务行使者即国家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卡德尔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公有制，不论其过渡的社会历史形式如何，归根到底是联合生产者的社会职能，而不是某个表面上代表直接生产者行使职能，而实际上不受直接生产者影响的所有者的职务行使者的社会职能。公有制的历史含义在于克服劳动同社会资本的异化从而克服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经济需要和外部强制所造成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同劳动者相分离的现象，使生产资料从奴役劳动者的手段变为劳动者自我解放的工具。卡德尔依据马克思关于"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论述，认为公有制的实质就是劳动者自身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讲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不是废除个人所有制，而是在使每个人和所有的人都能共同支配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意义上建立个人所有制；当代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解释公有制时的致命弱点是把生产资料看成同各个工人或劳动集体相脱离的社会资本，而不懂得公有制也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形式，不懂得没有这种形式，劳动者和他的劳动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3.社会所有制及其本质特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概念的特殊理解，卡德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

会所有制理论。他认为，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属于所有从事劳动的人所有，这是劳动者从事劳动和获得自由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但是，任何人对这些生产资料又都不能拥有私有权。这意味着社会所有制既是所有人的，又不是任何人的，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劳动者在总的社会劳动中从事个人劳动的手段，从而也是他取得个人收入的手段。因此，社会所有制不再意味着"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共同支配生产资料、劳动者个人占有自己劳动果实的关系；劳动者集体和自治体使共同的生产资料服务于从事联合劳动的劳动者个人和创造力和创造才能，以便在联合劳动中取得更多的共同成果。卡德尔指出，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在劳动基础上的占有，但可以联合、平等和有计划地使用共同的生产资料和不断扩大这一劳动和共同基础为条件；马克思所以强调社会所有制是社会劳动条件下个人所有制的特殊形式，首先是因为社会所有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克服劳动条件、劳动产品同劳动相脱节，克服这种脱节才能为人们相对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创造条件。卡德尔还强调，社会所有制不是集体所有制或集团所有制，更不是私人所有制，因为法律制止在支配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中实行任何垄断的统治。因此，社会所有制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1)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生产资料直接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而排斥任何中间环节；(2) 劳动（指联合劳动）是占有的唯一基础，排除任何脱离劳动过程即处于劳动过程之外的所有者来垄断地占有生产资料；(3) 劳动成果由劳动者根据经营状况和全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当然，卡德尔也承认，南斯拉夫现阶段的社会所有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构想的那种社会所有制，它是以自治、市场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

4.社会所有制产生的必然性和意义。卡德尔认为，实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一个历史过程，自治形式的公有制（即社会公有制的实践形式）虽然不可能超越国有制形式而出现，但它能作为替代国有制的新形式而形成，是国有制向前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因为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求实现所有从事劳动的人在支配劳动和创造的共同资料，亦即支配公有制资料的方式方面，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同等权利，这就必然要求向自治形式的公有制过渡。卡德尔认为，这种过渡在南斯拉夫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受到了各方面的抵制，但工人群众出于深刻的阶级本能，有力地支持自治制度的实现。随着自治的最初形式的出现，国家所有制关系本身在社会中已不再成为目标，因为自治开始使公有制的发展接受自治自身的规律和自治自身的形式。当然在从国有制向完全自治形式的过渡时期，仍然还保留着强弱程度不一的国有制关系因素，但正是由于余留下来的这种国有制关系因素在与自治形式的共存和冲突中，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公有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感受到公有制形式在发展和提高，从而使自治成为工人阶级的实际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尤为重要的是，了解了国有制余留和工人自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也就可以认识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即自治联合劳动的阶级的工人结构同国家所有制和专家治国论官僚主义的垄断因素以及其他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因素之间的冲突。这种认识有利于人们自觉地同复辟国家所有制和专家治国论的倾向、同复辟私有制和集团所有制的倾向作斗争。所以，卡德尔认为建立自治形式的公有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工人阶级、劳动者和创造者追求劳动和劳动者自身的解放这一历史愿望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得以创造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工人自己将能成功地克服与其劳动的客观条件、手段和成果的一切形式的异化。

5.社会所有制在发展中的矛盾和完善问题。卡德尔认为，就南斯拉夫目前的社会再生产状况而论，在社会生产、分配、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的经济关系制度方面，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自治关系还不彻底和不完善，因而还会产生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制度和国家所有制的因素；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所限，在客观上还具备这两种因素存在的条件。发展自治制度和复活国有制这两者之间不仅反映了进步和保守意识的矛盾，而且反映了公有制的各种表现形式进一步发展后在理论和实际政策上的分歧。再加上经济落后、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原因，就容易形成两种极端观点：其一是敌视一切管理职能和社会职能，敌视管理和调节公有制资料的任何权威，这是一种极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其二是认为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劳动具有的技术结构不允许实行工人自治，或者把工人自治仅仅理解为"参与管理"的形式，这是一种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针对这两种观点卡德尔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专门职能不仅没有减少，而且不断增强，只是在工人自治制度中，这些职能不再成为资本所有者的"职务行使者"，不再成为"共同财产"的权威代表和管理者的垄断主义代表，而是工人自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和实行自治的工具。鉴于构成工人同其劳动的整个成果相异化的因素还存在，自治制度并没有因实行权力开放而结束；特别是对社会资本的管理方面，工人及其劳动组织仍然没有对管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还没有参与或者十分有限地参与对社会资本取得收入的支配。这

一切表现，工人自治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能听凭自治和相反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之间自发形成的力量对比来摆布的，因为这种自发力量本身的发展就包含着潜在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源泉，即包含着成为国有制关系、集团所有制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复辟倾向的源泉。所以，自治不会自动地消除和防止使公有制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金同工人以及他的劳动相异化的倾向。为此，必须发挥起决定作用的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卡德尔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应当明确意识到，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取得使用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时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的质量和扩大其数量，才能够为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最重要的条件，从而才能使社会总产品中用于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生活、文化和创造所需要的部分不断增大。在现阶段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自治制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将取决于这种认识的力量和作用，即劳动者的自治觉悟。以此为基础，社会还必须确定和保证劳动者之间自由的、相互依附和相互负责的关系，这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基本的、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依靠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制度化的力量，工人在自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就不可能实现。而工人实行自治的组织原则是：在联合劳动中建立起稳定的相互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经济关系制度。卡德尔认为，只有这样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将自治原则制度化，采用自觉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才能完成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任务。

6.社会自治制度中的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卡德尔在这里论述了自治制度中联合劳动的体制。联合劳动是各个劳动组织之间在劳动、资金和收入分配的方面联合。在南斯拉夫，联合劳动组织分为三级：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联合劳动组织和联合劳动复合组织。这种体制在保证各单位自治的基础上，使每一个工人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从事劳动的同时，通过自己的个人收入，参与分配各级劳动组织的收入以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取得的成果，并通过联合劳动组织，参与社会经济的决策和管理，实现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卡德尔认为，在自治联合劳动中，公有制关系是通过有关劳动者在联合劳动中的权利及其相互义务和责任的制度来体现的，这是一种崭新的经济政治关系制度。但是，在这里公有制也包含着一种矛盾，即社会性和个人性的矛盾，它是自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否认这一矛盾将会导致劳动同独立的社会资本之间发生矛盾。在卡德尔看来，对社会资本的管理、监督和支配是关系到自治制度成败的关键问题，而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对社会资本这一重要领域，工人自治却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主要表现在：自治改革以后，取消了国有制，但对社会资本的管理和支配仍是由某个特殊的部门或专门机构来代替国家进行垄断。因此，必须在扩大再生产领域中建立起能保证在工人监督下实行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的经济关系，即通过改革，使生产资料的集中所有管理、支配社会资本机构都服从于自治地组织在联合劳动基层单位的工人的经济监督和政治监督、服从于工人的利益、需要和相互责任。卡德尔就此阐述了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的基本原则：从联合劳动的总收入中扣除用于社会消费基金以及各种后备基金和其他类似社会基金的部分（这部分收入是通过自治协议，或根据宪法权利和基于宪法权利之上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决定，从各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总收入中扣除以后，剩余的收入由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的联合劳动者管理和支配；工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这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把自己的劳动和收入联合在劳动组织、联合劳动系统、银行、批发商业、外贸公司等等之中，同时保留他们在支配总联合资金中"自己的"那部分资金方面的经济监督和政治监督。从这一原则出发，动用社会资本必须经过工人同意，具体程序是根据联合劳动组织的自治协议的条款行事。当然，承认对社会资本进行支配和管理是工人拥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和责任，并不意味在社会资本的集中过程国家可以无所作为。卡德尔认为，国家在自治制度中应该运用经济政策手段来协调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各方面的关系，从而达到维护劳动者平等地位和稳定经济条件的目的。相应地实现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的历史意义在于：当联合劳动者开始直接从其工作岗位，而不是通过某个政治代表（国有的调节作用和计划作用必不可少的除外）管理共同的社会资本时，那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国家消亡"过程的比较重要的开端了。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经济关系制度，公有制方得到巩固的自治形式。

7.社会自治制度中的收入分配关系。卡德尔认为，在自治的联合劳动中，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在共同支配社会资本方面，他们是独立的和自由的；但当他们作为工人，却仍然要依附于劳动的客观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所掌握社会资本的数量及性能等等。这表明，工人的劳动自由和经济自由是受其他工人同样自由所限制的，因而谈论自治社会工人取得收入、特别是支配收入和分配收入方面的绝对自由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劳动组织的收入或工人平均毛收入真正等于这个组织或工人的"个别劳动量"时，工人在支配和分配收入方面才可能有较充分的自由。但是，在经济生活中，要使"个别劳动量"客观化，即找到确切的衡量尺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自治制

度中，一个劳动组织的收入决不单纯取决于该组织的"个别劳动量"，而是在劳动的社会性和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在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社会计划、经济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对社会劳动产品分配起作用的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影响下形成。但无论如何，收入分配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点：(1) 能够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 必须引导实现自治的劳动和收入一体化；(3) 有助于在按劳分配基础上寻找尽量统一的个人收入的分配标准。卡德尔还指出，收入分配必须重视市场的作用，因为产品直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是衡量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协调供求关系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标尺，其作用是把更多的收入分配给那些劳动生产率较高且拥有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劳动集体，但这种更多的收入部分必须投入到发展生产力过程中，而不是用于扩大个人消费。只有这样，市场的作用才是有益的。从原则上讲，更多的收入应来自于劳动组织更多或更高质量的劳动，来自于经营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占据有利的市场经营条件。但在实际生活中，要想把收入作这样的区分是很难的，因而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劳动组织或各个工人连同自己的毛收入组合在一起是自成体系的单位，这种单位可以垄断地支配收入，并只是通过市场相互之间发生联系。卡德尔批评这是一种有害的集团所有制的观点，认为在自治形式的公有制关系中，工人对收入的支配权利决不能只依附于某个劳动组织之中，劳动组织之间也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自治的协议、互助和契约来构成收入关系；尤其是要确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就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自治一体化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关系制度。收入是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在经济上最重要、最具体的体现，因此制定收入制度和收入关系制度是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当然，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协调和分配收入，是原则上实现了按劳分配，并不可能绝对地公正，因而在实践中免不了会发生冲突。对此，卡德尔认为原则上也应通过自治的协商、调节和协议来解决。

8.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关系的再生产。卡德尔在此论述了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关系再生产的主要因素，其中重点是使工人自治地、直接地支配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收入，这也是解决公有制在实践中矛盾的关键。(1) 建立稳固的自治社会收入制度是发展自治形式公有制的重要因素和条件。卡德尔认为，联合劳动本身和相应的经济关系、相应的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关系制度再生产的决定性的源泉力量，而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则是自治经济关系再生产的基础。同时，对收入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普遍经济规律和社会计划来进行安排，这意味着既要反对由国家来决定消费基金与积累的比例关系、又要反对由工人无限地、对社会不负责任地把全部收入变为个人收入的作法。据此，卡德尔具体阐述了收入分配的基本过程：从总收入中扣除物质消耗和折旧费，形成基层组织的毛收入，首先拨出一部分归科学、文教、卫生保健等社会事业部门的基层组织所有；其次将一部分毛收入转入联合劳动共同的常设基金中；再次，一部分收入要用于满足整个社会发展需要，如联邦、共和国、自治省和区的财政预算；第四，抽出一部分积累基金，用于对社会事业部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需要；最后，剩下的部分成为劳动组织的净收入，包括用于工人共同消费基金和个人收入基金，以及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它由工人和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自己支配和作用。(2) 社会计划制度是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再生产的工具。卡德尔提出要重新估计经济制度、经济政策、计划制度、国家的调节职能以及自治联合劳动和政治制度等因素在实现自治经济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新作用和新形式，使它们从国家主义的工具转变为联合劳动和管理财产和调节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工具，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计划制度应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制定计划的主体是自治的工人和劳动组织；计划的职能是调节社会再生产的物质进程、筹划合理投资、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政策的实施；计划的形式是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等；计划的种类是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等。卡德尔强调指出，除国家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外，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无权给联合劳动组织规定计划义务，但凡是承担了计划义务而不履行者，必须承担责任。(3) 国家和专门职能机构在社会主义自治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卡德尔认为，国家的作用是确保经济稳定，对经济进程进行基本的协调，并调节在南斯拉夫统一市场上一律平等的经营条件。与此相类似的其他社会任务主要是：通过投资、信贷政策对社会生产进行鼓励或限制，以保持生产结构的稳定和合理发展；通过税收、价格来协调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以求得社会经济的基本平衡；通过收入政策对劳动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使用，以促进生产力结构更有效地发展；通过关税、汇率、外贸政策来调节对外经济关系，以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和各方面的友好合作，等等。为此，从专业上、政治上和干部上确保国家职能作用并提高它的效能，是进一步发展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再生产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参〕卡德尔，爱德华

卡德尔，爱德华（Kardelj Edvard，1910—1979）　南斯拉夫著名理论家和政治家。他1910年出生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卢布尔雅那市，1928年

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即南共联盟前身）。1930年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判处两年流放。1934年至1937年在苏联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任教。1937年被选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8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历届议会中他都当选为人民代表，曾任联邦政府副主席、联邦执委会副主席、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南议会主席、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书记、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南联邦主席团委员等职务。1979年2月10日，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逝世。

卡德尔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曾多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为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制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又是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曾主持制定南共联盟纲领、南斯拉夫宪法以及各个时期的基本法，其所著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一书被定为南共联盟十一大的纲领性文件。在经济理论方面，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一直是"南斯拉夫改革和试验"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首先，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论思想对国家所有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国家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阶段虽然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但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一开始实际上就孕育着一种基本矛盾的萌芽，它表现为工人及其劳动同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其它实现条件的直接管理相分离，因而要反对把最初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关系宣布为不可更改的信条，以免造成使劳动者同公有制生产资料相异化的一定形式再生产的条件。其次，他提出了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的理论构想，试图以此来从根本上克服国家所有制所包含的矛盾。他认为，在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的新型生产关系形式中，劳动和社会资本可以直接结合，工人能够直接管理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直接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当然，他也认为实现这样一种目标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第三，他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所有制制度中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以及自治经济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他认为，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的实现将使每一个工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从事劳动的同时，通过自己的个人收入，参与分配各级劳动组织的收入以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取得的成果，并通过联合劳动组织参与社会经济的决策和管理。而在这种自治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计划制度和国家有关专门职能机构将起重要的协调和保证作用。总之，卡德尔的经济理论冲破了有关国有制和国有集中管理经济的理论教条，为南斯拉夫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尤其是他首次提出的公有制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和手段的观点，对当今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卡德尔一生为人们留下了内容丰富的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不结盟的历史根源》等。

〔参〕卡德尔的社会所有制和自治理论

卡莱斯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波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为论证社会主义国家应如何正确地选择和合理地确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及相关的增长率以克服长期存在的投资膨胀倾向而提出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主要内容包括：(1)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卡莱斯基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中投资的生产效应、设备损耗的负效应以及改善设备利用程度的效应等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一般增长模型，即 $r=\frac{1}{k}i-\frac{m}{k}(a-u)$，从而阐明了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率 (i)、投资产出系数 (k)、生产性固定资本投资系数 (m)、折旧系数 (a) 和改进系数 (u)。这些因素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几条基本途径，构成了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即它们共同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率又存在一个由外生变量规定的最高限，即自然增长率，它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投资率和其他内生变量决定的实际增长率不可能突破这一界限。如果实际增长率达到自然增长率水平，则表示技术进步的好处，自然增长的劳动人口得到充分利用。不过事实上，就会在达到增长的这一自然界限之前，就会遇到种种限制。(2)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卡莱斯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在一个不太长时期里，增长模型中的参数 k、m、a、u 都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决定于投资率，而投资率与消费率成反比，因而投资率的提高具有两重性：一是决定长期增长率的提高，二是导致短期消费率的下降。这也就是积累与消费矛盾内含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卡莱斯基巧妙地利用了投资率变动的二重结果，即长期与短期利益的平衡关系，形成了适度增长率和投资率如何决定的思路，其基本点是：该投资率增加一个单位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的长期利益，同时导致的短期消费率下降增量为短期损失、适度的增长率和积累度，就决定于长期增长利益与短期消费损失之间的平衡。如果投资率变动带来的长期增长利益小于短期消费为之付出的代价，这种增长率和积累率决策是不适宜的，也是不现实的。二是劳动力供给状况。劳动力需求是经济增长率的递增函数，当增长率达到一定水平后，劳动力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资源储备耗竭，从而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

率。三是国际贸易状况。卡莱斯基认为，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会出现瓶颈，从而导致进口需求增加，而为了取得进口所需的外汇又必须相应扩大出口，但后者会遇到出口生产能力和国外市场需求的双重限制，克服这双重限制的途径包含了提高积累率和降低消费率的巨大代价。因此很明显，国际贸易状况的恶化限制了社会可能选择的增长率。(3)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途径。卡莱斯基认为，面对上述种种限制，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促进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而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他认为，技术进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资本集约化程度，即提高投资系数（m）；缩短设备生命周期，加速折旧与更新，即提高折旧系数（a）；改善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即提高改进系数（u）。从第一条途径来说，资本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会带来一个额外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其运动轨迹是：在技术变换过程开始时，这种额外的增长率最高；随着技术变换过程扩展，这种额外增长率逐渐缩小；变换过程完成时，新技术设备完全替代了旧技术设备，额外的增长率消失，整个社会增长率回到它的正常水平。从第二条途径来说，虽然其资金来源属折旧基金，但它同样也会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正常增长之外带来额外的增长，并且有类似的额外增长率的运动轨迹。不过，这种形式具有其两重性：一方面它缩短了技术设备更新周期，从而带来额外的劳动生产率的国民收入和增长；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有较高的潜在投资率，从而以较低的消费率为代价。加速折旧导致的这双重结果，形成了卡莱斯基关于适度折旧参数决定思想的基础。从第三条途径来说，它是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通过下列途径实现的：重新合理地组织生产过程，改善计划工具和计划经济功能；减少计划实现的各种程度的非比例性；消除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流动的障碍；经济地利用资源，消除浪费；减少工作停顿；改进劳动组织；等等。(4) 投资与增长结构的决定。卡莱斯基认为，如果增长模型中所有参数给定，国民收入就呈现出三种型式，即增长率不变、增长率上升和增长率下降。从而投资品生产部门与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比例及它们各自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比例也将会出现与此相应的三种不同型式。据此，卡莱斯基建立起了自己的投资结构决定模型，该模型表明：投资结构即总投资在各部门的分配比例，决定于投资率和投资品生产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之差。很显然，该模型不仅包含了总增长率与投资结构的相关关系，而且还包含了总增长率与增长结构和相互关系。在此，增长结构即投资品和消费品产出的相对增长速度成了决定投资结构的中介。(5) 制定社会主义经济长期计划的方法。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卡莱斯基提出了一套制定社会主义经济长远规划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的出发点，是选择国民收入增长率。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长远规划中，可以把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作为最重要的参数。因此，选择计划的正确方案，实际上等于选择适当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卡莱斯基认为，制定长远计划的第一步是参照以往增长经验中较高的增长率，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增长率。其次是参照经验投资系数，根据统计趋势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投资系数。第三是根据增长模型，估算出不同增长率和投资系数需要的各种可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组合、增长结构与投资结构组合。第四是估计消费结构发展以及它所要求的产业结构，从而确定对外贸易的结构。第五是检验各种可供选择的增长率、投资系数、投资率与消费率、增长结构和投资结构、进出口结构等各串计划量的可行性。一串计划量的可行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劳动力供求、国际贸易进出口、积累与消费矛盾导致的长期增长利益与短期消费损失之间平衡的水平上。最后一步是从多种增长率和投资系数形成的多串计划量中，选择能满足以上三个约束条件的最大增长率。否则，就必须调整增长率和投资系数的选择，直到由此形成的新的一串计划量达到劳动力供给、国际贸易和积累与消费矛盾的临界点为止。

〔参〕卡莱斯基，米哈尔

卡莱斯基，米哈尔（Kalecki, M · 1899—1970）　波兰经济学家。1899年生于波兰罗兹，父亲是一个小纺纱厂厂主。1917年进入华沙工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一年后因服兵役而中断学业。退伍后，转入格但斯克工业大学继续学习他原来的专业。1924年因父亲失业使家境恶化，只好中止学业求职。其第一个职业是在一家银行咨询公司供职，调查中小企业的借款偿还能力。这使卡莱斯基有机会接触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并引导他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后来他成了一名经济专栏作家。1929年底，卡莱斯基以其优秀的论文进入华沙的商业循环与价格研究所，正式开始了他毕生的经济学家生涯。1936年，卡莱斯基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出国进行学术研究，他先到了瑞典，与瑞典学派经济学家俄林、缪尔达尔和林达尔等人进行了交流。4月到达英国，在剑桥大学接触了凯恩斯、琼·罗宾逊等英国经济学家。1937年因故辞去在波兰的原有职务，留在剑桥大学工作，1940年底转入牛津大学统计研究所。1945年卡莱斯基去法国和加拿大工作，1946年接受了波兰政府邀请任中央计划处和财务部经济顾问，同年底去纽约联合国秘书处经济稳定与发展局担任领导工作，主要负责世界经济报告的准备工作。1955年初返回

波兰，曾先后任波兰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远景规划委员会主任等职，主持起草了被称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第一个最为模范的长期计划"的1961年至1975年的远景规划。1957年他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通讯院士。1960年以后，因政府方面的原因，卡莱斯基辞去了在波兰政府中的一切职务，回到波兰中央计划统计学院。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直到1970年4月病逝。

卡莱斯基的主要著作有：《经济波动理论文集》（1939年）；《动态经济学研究》（1943年）；《经济动态理论》；《论资本主义经济同期变动和长期变动》（1954年）；《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导论》（1969年）；《资本主义转变的最高阶段》（1972年）；《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经济增长文选》（1972年）；《资本主义经济动态学文选》（1971年）；《论发展中经济》（1976年）等。

卡莱斯基的理论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宏观经济问题。30年代初期，卡莱斯基在研究资本主义商业循环问题时，建立了一个包含凯恩斯"有效需求说"所有基本论点的理论结构模式。但是，卡莱斯基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式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式有两大重要区别：一是由于卡莱斯基把商业循环作为考察对象，因而其理论结构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故有别于凯恩斯的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分析；二是把微观经济的价格形成理论、宏观经济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同国民收入或就业理论有机的总合在一个理论结构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克莱因在1951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就曾明确指出，卡莱斯基的理论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凯恩斯；琼·罗宾逊夫人则认为，卡莱斯基的理论是"通论"的"通论"。（2）民主计划经济问题。卡莱斯基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包括计划和自治在内的经济非集权化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但又不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经过修正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基本内容包括：重要部门和企业实行国有化，次要工业部门及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仍可由私营企业起重要作用，中央计划则对银行和财政系统、投资和对外贸易以及主要物资和产品的分配实行公众监督；按产销全过程统一管理的方向调整工业组织，中央当局在此所关心的只是这些组织最终产品的供应情况，而不干涉它们的内部组织，以防止经济官僚化，尤其是在集中管理物资的分配上；以工人委员会形式普遍实行政治的非集中化，每个企业都可以作出有关生产组织的决定，从而达到在维持充分就业基础上的企业自治。因此，在卡莱斯基的模式中，民主化取代了市场化。（3）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问题。卡莱斯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决策者应如何正确地选择和合理地确定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以及能使社会经济有效地运行以克服经常存在的投资膨胀等弊病的一整套体制和方法等。此外，卡莱斯基还研究过发展中国家，即他称之为"混合经济"的采用一定的国家计划和国营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发展问题。

〔参〕卡莱斯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兰格，奥斯卡（Lange，O·1904—1965）　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1904年出生在波兰一个纺织厂主的家庭。中学时代，兰格特别爱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达尔文、海克尔的著作，并对人类学、宗教史和社会学发生兴趣，开始学习中文。1918年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纪念时，年仅14岁的兰格作了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1924年在克拉科夫的雅基伦尼大学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生产的极限》的论文，这是兰格用数学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问题的初次尝试，并成为他以后几十年的经济研究主流的开端。1927兰格加入波兰社会党。1928年兰格完成了博士论文《波兰的商业循环：1925—1927年》。1931年发表了《研究经济波动中的统计方法》，并以此获得大学统计学讲师资格。1933年，兰格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英美从事研究，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问题的一场大论战，提出了后来被称作"兰格模式"的基本思想。1937年回国后，自由波兰大学聘请他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于政治原因而受阻。兰格转而接受美国大学的邀请，于1938—1945年，先后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于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在这段时间里，兰格发表大量理论文章向新古典学派展开独特的论战，阐述自己对市场机制的见解，认为应抑制垄断并且建立对经济的民主控制。1944年春，兰格应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邀请访苏，会见了在波兰坚持地下斗争的祖国委员会的代表，并与斯大林交谈了波兰解放后的前途问题。1945年夏，兰格回国并恢复波兰国籍，同年担任波兰驻美大使。1946—1949年任波兰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7年底在社会党全国大会上，兰格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继而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新成立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0—1957年在党中央社会科学院讲经济思想史，1952年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1952—1955年任中央计划统计学院院长。1955年被选入国务委员会，1957年以后一直担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曾在印度担任第二个五年计划顾问几个月，回国后受聘为华沙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并

开始着手写作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卷于1959年出版。在国会中，兰格先后担任党团主席、外交委员会主席、计划、预算和财政委员会主席。1957—1962年任顾问机关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兰格的著作很多，在我国已翻译出版的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计量学导论》；《经济控制论导论》；《整体和局部——系统行为通论》等。其他著作还有：《统计学理论》；《经济计划论文集》；《价格弹性和就业》；《再生产和积累理论》；《最优决策》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作和学说。

兰格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通过新古典学派的论战，提出了独特的对市场机制的见解和有关经济均衡、非均衡以及经济民主控制的思想。兰格在论战中揭示了新古典学派关于经济均衡的思想的局限性，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而不象新古典学派那样不加分析地把它们作为前提条件。同时，他也吸取了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效率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2）在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的大论战中，提出了"错了再试"的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模式，即著名的"兰格模式"，并在尔后的研究中逐渐加以充实和发展。兰格的这一"竞争性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同他对市场机制的研究和对新古典学派思想的论战是分不开的。兰格在英国和美国研究和讲学期间，有机会能较充分地了解竞争性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力图把市场在组织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功能吸收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中来。如果说对新古典学派等西方经济思潮的论战是兰格经济思想的破的一面的话，兰格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模式的探索则是其它的一面。兰格设想的这种模拟市场模式的整个社会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而与此相应的分配制度则是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决策结构也是在中央计划局指导下的多层次的体系。这表明，兰格的模式设想首先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的。此前提下，兰格也充分考虑了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既不同于马恩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市场、根本没有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设想，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模式的新的经济运行模式。这是兰格整个经济理论中最具意义的部分，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引出了东欧各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问题研究的热潮、对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把现代科学知识和最新成果及时应用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中，形成了整套科学计划理论。兰格针对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可能性所提出的责难，把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新成果运用于计划理论，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原先的理论，使其有更强的现实可行性。同时也由于这种运用，他推动了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并创立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即经济控制论，从而为科学计划理论的建立和运用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参）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理论 兰格的科学计划理论

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理论 波兰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计划对市场的模拟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一系列构想，即著名的"兰格模式"，又称"竞争性社会主义模式"。

1.兰格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论战。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以后，能否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效率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运行等，在东西方经济学界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是奥地利学派的冯·米塞斯教授于1920年和1922年分别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和《社会主义：一个经济和社会学的分析》，以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实物分配体制为依据，断言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从而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理由是：合理的经济行为要以合理的成本核算为前提，而后者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及生产要素的价格，凡是没有自由市场的地方，就没有正确的价格制度，因而也就不可能用货币进行正确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中排斥了生产要素市场，因而也就无法确定生产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率，从而无法合理配置资源。米塞斯的这一观点遭到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尼的反驳，认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局也能够通过解联合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美国经济学家泰勒也撰文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依靠试错法来解决资源最优配置的具体方式。于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退到了"第二道防线"，即不否定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可能性，但否定其实际的可能性。如哈耶克和罗宾斯就认为，运用求解联合方程的方式需要有收集和处理庞大信息的能力，而这在实际中办不到。罗宾斯在《大衰退》一书中写道："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决是行不通的。它需要在几百万个预算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分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依据的信息可能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根据帕累托方程可能实际解决计划问题的提法只说明提出这种

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为反驳社会主义反对者们的观点，当时旅居美国的兰格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1936年10月号和1937年2月号上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文，提出了后人称作"兰格模式"的基本构想。瑞典经济学家曾评论说："现代经济政策理论的最迷人的贡献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斯卡·兰格和A·P·勒纳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行为规则。

2."兰格模式"的理论前提：对竞争性市场运行机制的分析。兰格认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取决于三个条件：(1)指导选择行动的优先秩序、即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量；(2)"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即要有作为各种生产要素费用指数的广义价格；(3)有关现有资源数量的知识。兰格认为第一、二条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都是已知的(前者通过计划，后者通过市场)，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是否具备第二条。米塞斯对此持否定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因而不存在生产要素价格这一选择指数，这样资源的配置必然是一种任意行为，不可能达到最优化程度，兰格反驳说，米塞斯在这里混淆了狭义价格和广义价格的区别：狭义价格是指市场上现有商品的交换比例，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确实还不存在；但为合理分配资源提供选择依据的是广义价格，在给定一、三项条件后，可以根据一种商品变换为另一种商品的技术可能性，即生产函数定出作为生产要素选择指数的广义价格，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同样目的。兰格进一步分析道，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资源配置优化就是达到均衡状态，其实现条件是：(1)主观条件，即根据均衡价格，每个个人都按照使各自的效用、利润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从而使当事人全部进入各自的均衡位置；(2)客观条件，即各种商品需求与供求平衡，它决定了实际参加经济体系的所有个人主观最大化要求的唯一一组价格；(3)经济制度的社会组织条件，即消费者的收入等于他们转让他们所拥有的最终生产资源(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的收入，加上企业家的利润(均衡时为零)，因此消费者收入由最终生产资源的使用价格和利润所决定，从而物价反过来又成为决定产品供求的唯一变量。兰格认为，一旦满足这三个条件，竞争市场的均衡就可以靠价格参数函数，通过一系列不断的试错过程，每个人不断地调节自己的行为来实现。其具体作用过程是：(1)根据一组随机物价，各个个人满足他们的主观均衡条件，并达到他们的最大位置，这时对每种商品就形成一个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2)如果每种商品的供求量相等，那么这一组物价就是均衡价格，如果有不相等，客观均衡条件就要起作用，买者和卖者的竞争将改变价格，结果就得到一组新价格；(3)以这一组新价格作为实现主观均衡条件的新基础，主观均衡实现后，人们又会形成一组新的供给和需求量，如果仍存在供求不等的情况，则又会重复前面的试错过程直到经济活动在变化过程中达到均衡状态。

3.兰格模式的核心：中央计划局应用"试错法"模拟市场。兰格认为，竞争市场上试错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调节中。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存在着消费选择自由和真正的消费品市场，价格由供求调节；第二，存在着职业选择自由和真正的劳动市场，工资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指示器；第三，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和资金市场，因而没有作为商品交换比例尺度的狭义价格，只有中央计划局规定的广义价格(亦称会计价格)，它是生产资料和资金分配的指导标准。兰格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均衡条件同竞争市场是很相似的。(1)从主观均衡条件来看，首先由于有消费选择自由，竞争市场的主观均衡条件即效用最大化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消费品市场，一定的消费者收入和消费品价格就确定了一定的消费品需求量。其次，厂长经理的决策不再由利润最大化目标指引，中央计划局规定了企业的生产决策：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必须使每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以保证生产要素投入的最低成本；企业要使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其价格，以促使企业按产品的最佳规模组织生产。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企业将象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行事，只不过动力不同而已。由于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是已知的，按这两条规定决策，企业的产量和生产要素的需求就被确定。第三，在自由择业条件下，劳动者将流向支付最高工资的产业或职业，公有生产资料和资金由中央计划局确定价格，并规定只能分配给能支付这一价格的产业或企业。这决定着最终生产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和流动。(2)从客观均衡条件来分析，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论是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劳动力的工资，还是生产资料的会计价格，都要服从一个条件，即需求等于供给。只要价格的确定符合这一条件，它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指导标准。消费品价格和劳动力工资是由市场决定的，因而其客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生产资料价格和资金利息率不是由市场直接决定，而是由中央计划局决定。它们是否具有客观性从而指导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兰格不同意米塞斯将它们看作是任意价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会计价格与竞争体制中的市场价格有十分相似的客观性质，因为中央计划局定价过程中的任何错误都会用一种很客观的方式即短缺或过剩来自我暴露，并且为了保持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不断加以修正，而由于一般地只有一

组商品客观均衡条件的物价，产品的价格和成本就被唯一地决定了。因此，中央计划局摸拟市场定价的机制，也能实现供求平衡，满足客观均衡条件。(3) 从社会组织条件来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消费者的个人收入包括提供劳务的收入和社会分红，前者由劳动量决定，后者由收入分配原则决定，即付给一个人的社会分红必须完全不依靠他的职业选择，而仅按人口、年龄等原则分配。后者一旦确定，个人收入也就基本由劳务量决定，因而只有物价是决定商品供求的唯一变量。根据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兰格认为中央计划局把物价作为参数指标，用与市场相类似的试错法来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是完全可能的。(4) 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基本过程是：首先，计划局随机选定一组物价（一般是历史上给定的），企业经理和作为劳动供给者以及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从而决定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第二，如果发现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不等于供给量，中央计划局就调整价格，从而形成一组新的价格。第三，以这一组新价格为基础，企业和个人调整决策，产生出新的供给量和需求量。这一试错过程不断进行，逐步逼近客观价格，使价格体系趋于合理，经济活动也逐步进入均衡状态。兰格认为，按照这一思路，中央计划局并不需要求解数百万个方程，这些方程是消费者的收入花费和生产者的生产决策分散“解出”的，中央计划局只要注意生产资源的需求和供给数量，并及时调整会计价格，就能最终找到一组使供求平衡的均衡价格。由于中央计划局能够总揽全局，掌握的信息比任何私人企业家都要更全面更可靠，因而试错的系列可以大大缩短，从而能更快和更有效地达到均衡状态。兰格由此证明，以消费者主权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更优于私有制经济。(5) 计划模拟市场理论的扩展。在分析了上述存在着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服务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兰格进一步将他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扩展到不存在任何真正市场的计划经济中。在这种条件下，资源分配不受消费者偏好的指导，而是由计划部门决定，即中央计划局“决定生产什么商品和生产多少数量，生产的消费品用配给方法分配给公民，而不同职业靠任命来充数”。因此市场功能完全为计划取代，整个经济活动根据计划规定的指标进行，其效益高低则由会计价格来衡量。兰格认为，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也可以运用试错法达到均衡，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其均衡过程同以前相似：中央计划局为每种商品规定一个价格，作为评价消费品的基础；规定生产者的生产要素组合必须使平均成本最小，生产规模按边际成本等于会计价格来确定；以中央计划价为指导分配生产资源；用试错法确定均衡价格，使每种商品供求一致。这一模式同前述模式的区别在于最终评价尺度不是消费者偏好，而是计划决策者偏好，因此客观均衡不是在市场上而是在计划中实现。兰格将他的构想扩展到这种极端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中，只在于进一步说明计划经济实现资源配置的可行性，而并非赞同这种体制模式。相反，他认为这种取消了劳动者选择职业自由和消费者选择消费品自由经济，“会被任何文明人民难以忍受”，因而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是不足取的。

5.兰格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计划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方法运行模式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逐步暴露出了它的一些弊端。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兰格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从而使著名的兰格模式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1) 在实现计划的方法中，要把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区分开来，并优先利用经济手段。实现计划的行政方法就是计划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资源采用行政分配的方式配置。这种方法应运用于那些具有政治性质的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决策，如计划中有关积累率的决策，国民收入中非个人形式的付出，社会主义企业利润上缴国家的部分，企业和个人的一切赋税，投资主要方向的基本决策等。经济方法则是利用经济手段建立一种刺激体系，引导人们恰好去做计划要求的事情，因而它是利用人们对某些刺激的反应的自动性质，让人们根据经济刺激而自动调节经济行为，以保证计划的实现。兰格认为，要使社会主义的计划有效，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少，但应优先利用经济手段，因为它是对“正常”变化作出反应的灵巧工具。只有当经济出现突然的扰动或“革命的变革”，经济手段不能保证计划有效执行时，才应使用行政方法来调节经济运行。因此，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经济手段是规则，而行政手段变成附属于经济手段”。兰格还认为，经济手段的运用需要在经济中建立某些自动过程，它们构成了实现计划的方法的一个有机部分，因而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中经济手段的运用同资本主义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不同的。(2) 处理好计划决策中的集权和分权问题。兰格认为，在计划中的决策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的集中决策，属计划决策的主体，应由国家掌握；另一部分是为保证计划有足够的灵活性而要求分散作出的附属性计划决策，它们应由企业掌握。因此，“多少决策在中央经济计划中作出，多少决策授权下级经济单位，如企业和行业作出，是一个实际上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在投资决策问题上，兰格认为为保证投资决策有较大的灵活性，企业或行业有必要获得一定的投资决策权。当市场需求扩大时，企业有权购买机器或进行技术改造，以便迅速增长产量。否则

都等待中央当局作出决策，将很难适应市场变化。为了保证企业的这部分投资决策权，其投资资金应由银行以信贷的方式提供，小企业的投资则要完全由银行信贷解决，完全不在中央计划中出现。当然，他认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权要进行控制，但应以间接方式来进行，如通过银行的信贷政策（包括贷款方向、贷款条件、贷款数量）等来间接影响企业和行业的投资决策。(3) 利用电子计算机更有效地模拟市场机制的运作。在6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兰格的模拟市场的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提出，市场机制和试验错误的程序实际上起了求解一个联立方程体系的计算装置的作用，这一过程在当代技术条件下可以用一套电子模拟机来实施。它模拟市场机制中所隐含的叠代过程，不仅可克服市场运行的繁琐和动作迟缓的缺陷，而且可避免在市场求解中物价波动造成的损失。但兰格同时也指出，电子计算机并不能完全代替市场，一是计算机的容量毕竟有限，二是市场仍作为一个"现行制度"而存在，电子计算机作出的预测"必须靠市场的实际运行来证实"。因此，即使在电子计算机时代，市场也仍是必要的。这种以计算机模拟市场的运行模式可称为原"兰格模式"的发展型。

〔参〕兰格，奥斯卡

兰格的科学计划理论 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能更有效地实现其原先提出的"计划模拟市场"的著名构想，从50年代起致力于把现代科学知识，尤其是现代数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活动而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方式方法的思想体系。主要内容包括：计划公有经济的目的论和方法论；合理活动效果学；经济控制论思想。它们标志着兰格的计划市场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科学计划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兰格著名的"计划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思想提出后，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责难，认为中央计划手段的有限性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不相适应，因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代替市场的功能，不可能模仿出逼真的市场分配资源的机制。例如，哈耶克当时在美国《经济学》杂志1940年5月号上发表的《评社会主义计算的竞争"解决方案"》一文中就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兰格当时也清楚自己理论上的这一弱点，知道如果不能解决计划手段问题，而仅仅靠中央计划局去对千百万种产品试错，那么他所提出的运行模式就会缺乏实际运用的价值。因此，他十分注意拓宽自己的思路，并注意到了二战前后期间出现的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和有关理论，如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运筹学、投入产出平衡等，它们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较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宏观理论分析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从而使经济学具有现代思维的特征，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所谓"精密科学的新阶段"。兰格对此十分关注，他在19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卷中指出，为适应国家干预经济和垄断经济管理的需要，"一些新经济科学产生了，而原有的经济科学被改造了，"计量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新的经济科学，"这门科学在研究市场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与经济统计学之间架起了桥梁"。统计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它研究所谓社会会计或称国民会计，即社会经济的平衡计算"。"现代工业中（以及军事部门中）自动控制设备的发展而产生的控制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门辅助科学而得到了应用"。但是兰格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经济管理的局部改革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矛盾，现代科学技术的输入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的命运。与此相反，这些新科学知识成果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社会主义经济平衡计算、计量经济学、控制论和规划学这样的科学，从本质上来说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才能实际解决问题，其实际效果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了全面的、有计划的领导和管理，有可能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因而经济组织的合理性、长远规划的最优化等问题要比以往任何社会都具有更广泛、更深刻和更现实的意义。同时，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也感觉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并不能代替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的解决，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仍有个提高经济效果的问题，它需要通过科学计划的方法来解决。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兰格建立起了自己的一整套科学计划理论思想。

2.计划公有经济的目的论和方法论。兰格把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描述为计划公有经济，认为计划性是实现公有经济合理性的基本方法。公有经济的合理性即资源的最佳利用，要求各个企业所追求的目的服从于整个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目的，各个企业的目的在共同目标的协调下联成一个整体，这一整体就是计划公有经济。在这一经济建立后，企业变为社会主义企业，最大限度的利润不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利润的范畴被保留着，但它变成了服务于整个社会计划的一个工具。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企业活动的目的是从属于公有经济计划规定的总目的。这种从属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企业活动的计划是总的公有经济计划的构成部分，企业计划的目的是实现总计划所规定的目的的手段；二是某些社会主义企业根本没有在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而是按照最大限度的利润来进行活动，

但对确定最大利润实现条件的控制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这些企业的活动效果，因而间接地使企业活动也从属于公有经济计划的目的。公有经济计划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目的体系中属最后的或第一层次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第二层次计划目的，为第二层次计划目的服务的则是第三层次计划目的，社会主义企业分别为完成一定层次的计划目的而服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制定就是要把各个计划目的协调起来，逐步形成最高目的，并把所有其他目的联合成为层次分明的目的结构。而要实现这样层次分明的目的结构，有赖于计划公有经济方法论的发展。这种方法论主要就是公有经济平衡表方法，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计算则称为"社会会计学"或"国民会计学"，它同现代数学知识的结合就形成国民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平衡计算是协调国民经济计划中各种任务的工具，也是从合理经营原则角度对计划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兰格还指出，从实践上看，把平衡方法首先用到整个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过程中去的是苏联，它在国民经济的实践中每年都制定包括国民经济最需要方面的一整套平衡表，这样平衡表构成了国民经济总平衡表的基础，而总平衡表则以综合的方式把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过程表现为国民收入的创造和分配的过程，并把其相应的部分用于消费和积累。

3.合理活动效果学及其方法论意义。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要十分重视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而有必要建立"合理活动的效果学"，以研究经济合理活动中的各种推论方法。为表述合理活动而运用的概念，如目的和手段、方法、行为、计划、有效性、效果、效率、节约等等，兰格通称为合理活动效果学的范畴；而合理活动效果学的原则就是经济的原则，即"人类要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原则"。从内容上看，合理活动效果学包括经济活动的各种分析法，主要是运筹学和规划学。运筹学和规划学首先产生于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军事问题中，但很快被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尤其是规划学，它吸收入投入产出分析法，从而使计划管理增加了新的手段。兰格认为，当生产要素可以用价值量来表示、经济活动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时，规划学就是研究选择适当资金来实现一定目的的问题，而这种选择资金的行动就成为规划。规划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确定能够用的各种资金使用的协调性，当资金的结构复杂并且还有前述的目的层次分明的结构形式时，方案内部的协调就必须解决所有目的结构的协调性，这就要求使用专门的数学方法。二是确定一套最好的使用资金方法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目的，这也就是最优方案的选择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中，兰格大胆地吸取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认为当从每项资金追加单位所得到的增长对全部资金都是相等时，就达到了经济活动目标函数的最大值，这时我们不能用某一项资金的单位（即改变方案）来增大目标函数的值，因而这个资金使用方案实际上就是最优方案；同样，由于减少一个单位的资金使用数量所引起的函数值减少对所有的资金来说都相等时，便达到了资金投入函数的最小值，在没有达到这点之前，总是可以用某一资金单位去代替另一资金单位来减少资金支出函数的值。兰格的规划理论集中表现在他于1959年完成的《经济计量学导论》一书中，由它可以看到其规划理论的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国家计划局的规划制定是以市场信息为基础的，亦即他的规划理论是建立在市场活动的基础上的；二是不仅注意实物量的分析，而且注意资金量的分析，即强调把实物量计划与资金量计划结合在一起来寻找国民经济活动的最优规化。从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兰格认为合理活动效果学同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联系。首先，合理活动效果学的有关构成部分，如数学、经济统计、计量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的辅助部分。其次，政治经济学是合理活动效果学在某一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具体体现，如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们的社会活动经济规律就表现在商品交换条件下合理经营原则的具体运用。正因为如此，兰格认为能够在广泛的范围内，根据合理活动效果学行动原则，用演绎法来认识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规律，走这条"捷径"的条件是所要研究的经济活动是合理的经济活动，而不是习惯性传统的活动，否则就应用归纳法来认识经济规律。

4.经济控制论思想。兰格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运行管理中，控制论可以在两种情况中应用：一是当人类的活动以间接的方式，亦即通过牵动与此有关联的原因—效果链环的方法来达到目的时，控制论可以对这个链环中产生的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二是在活动过程中外部条件改变时，特别是当外部条件的变化是由所进行的活动造成时，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改变活动的手段，在这一情况中控制论可用于分析这个过程和变化着的条件下活动的效果。兰格把控制论的这些原理应用于经济的计划管理中，并把经济控制定义为耦合系统的控制和调节的行为科学，从而首创了经济控制论这样一门新学科。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经济控制论导论》一书中。这里值得一提的首先是他关于控制论应用的意义的论述。他认为这主要有两大方面：（1）理论上的意义，控制论证明了结构类似性的存在，即存在着同构。在各种系统中，如技术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系统等，不管其本身的性质如何，它们在运行中都存在着共同的原理。

兰格正是这样把控制论运用于经济系统的运行中，认为经济系统也具有同样的的性质。这种运用无疑大大丰富了兰格以"计划模拟市场"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并使这一理论更趋科学化和实用化。(2) 实践上的意义，即根据这种耦合运行系统的相似性，人们可以在一个领域中设计另一个过程。兰格认为根据这一原理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某一社会经济过程的运转方式，用流体力学装置来模拟国民经济内各部门之间的流通过程等等。这无疑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其次，兰格还用控制论中的反馈原理把马克思的、凯恩斯的和列昂惕夫的经济增长理论统一起来，并以反馈原理作为它们的基础，把几种不同学派的再生产模型连接在一起。这是兰格在经济控制论领域中最杰出的思想和贡献。兰格先是对凯恩斯的经济增长模型作了控制论的解释，接着用控制论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作了新的解释，并从马克思的两部类静态模型出发扩展为它的增长模型，进而把这种模型扩大为多部门的模型，从而表明它与列昂惕夫模型是基本一致的，而后又引入时间因素，把凯恩斯模型和马克思的模型变成动态形式，并可以考察连续的或离散的模型。兰格由此证明了，不仅凯恩斯关于国民经济支出意义上的国民收入理论，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都能用一般调控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从而为将控制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打下了理论基础。

六 画

讲坛社会主义 19 世纪 60、70 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派别。因其代表人物大多是大学教授，故又称"教授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阶级矛盾，在不触及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亦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该派别鼓吹工会、劳动保护、社会立法的作用，主张通过对工人实行保险制度和确立工厂立法等方法来解决工人的问题。恩格斯曾批判他们"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110 页)。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个体经济转变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大经济，是继土地改革之后我国在农村生产关系方面的第二次大变革。其目的是要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的矛盾，防止产生两极分化；解决小农业与大工业的矛盾，为工业的有计划建设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和积累。1950—1954 年为积极稳妥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阶段。1951 年 9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2 年 9 月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于 1953 年 2 月 15 日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倡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积极性"。1953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的重点是以办好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带动互助组的大发展，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前进。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也就是说，采用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互助衔接的步骤和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保留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分为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开始农民大量参加的是临时性或季节性的互助组。互助组在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实行集中劳动和共同使用某些耕畜、农具，并积累了少量的公有财产。是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最初形式。截至 1952 年秋收时，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农村总户数的 40%。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既保留了部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又产生了部分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了较多的公有财产。这种合作社至 1955 年 6 月，发展到 60 多万个，入社农户达到 1600 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4.2%。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废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完全根据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实行分配，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转变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 1955 年 6 月，全国的高级社只有 500 多个，包括约 40000 农户，属于试办性质。1954 年冬 1955 年春，一些地区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甚至违反自愿互利的原则，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1955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浙江省委采取"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将合作社转为互助组和解散的农业合作社共有 14623 个。1955 年 7 月中共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农村

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他严厉批判了"小脚女人"和"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不是"赶快下马"，而是"赶快上马"。毛泽东的报告促成了当年冬天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入社农民达96%，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8%。1955年夏天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明显存在着组织形式改变过快和过于单一的缺陷。致使大批农业合作社不巩固，经营管理也没有跟上。

农业是基础　农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因为：首先．农业是人类社会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其次，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再其次，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和影响着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对于农业生产力落后的中国来说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所需原料的重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同农业直接或间接有关；农业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不仅轻工业产品大部分要在农村销售，重工业产品也越来越要以农村为重要市场；农业还是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农业是出口物资的来源，无论历史上看，还是从现状来看，农副土特产品以及乡镇企业的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什么时候农业发展较快，中国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获得较快发展；反之，发展就较慢。1962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把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作为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主要内容之一明确提出来。

农业学大寨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1964年向农业战线发出的号召。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单位。全队80多户，460多人、800多亩耕地。"文化大革命"前，人们对大寨经验的概括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大队以"大批判"开路，搞唯意志论，实行"一言堂"，推行评工记分，成为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典型。80年代以来，大寨群众开始摒弃以前的错误作法，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农村人民公社　简称人民公社。1958年，在中国农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人民公社产生初期，不少公社实行公社一级经济核算，甚至出现"县联社"。当时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公有化"程度高，生产规模大，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集中组织农业生产，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1961年以后，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一级集体所有为基础。土地．基本生产资料属于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坚持生产的社会主义方向，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并在公社、大队的领导下，统一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织生产和分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人民公社允许社员群众在不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少量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人民公社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本地资源许可，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并有计划地兴办社队工业。一般来说，人民公社就公社一级的地域范围而言，大体相当于一个乡；生产队一级的地域范围大体相当于一个自然村，或较大村镇的部分地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集体所有制　在中国农村现阶段，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其主要形式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经济形式是产生于中国农村经济实践，又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客观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第一，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着以手工劳动方式为特点的生产力，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分工不发达、商品率不高，与这样的生产力相适应只能是规模不大的合作经济；第二，农业劳动的对象主要是有生命的动植物，生产和经营的状况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而全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即使一个地区也存在着不同的自然条件（如水文地貌、土壤等），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不宜过大；第三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劳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以及其他历史的、社会的、经验的因素（如农村家庭几千年来是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得最严密的细胞，农业生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农民个人的经验、技能等因素的制约），需要建立一种能够调动农民个人、家庭积极性，同时又能唤起他们责任心的经济组织形式，这就决定了要求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第四，中国农村长期以来以小生产为基础，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缺乏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经验及干部，这也就决

定了农村集体合作组织规模不宜过大，只能以家庭为基础的格局。在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条件下，土地、大型水利设施、道路、大型农机具、农用建筑等生产资料属于集体所有；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统一经营，如下达必需下达的生产任务，与承包户签定合同，集体组织要参与纯收入分配等；还存在一定形式的协同劳动，如兴修水利，克服自然灾害等；举办集体的生产和福利，如乡镇企业、扶弱济贫等。因此，从以上这几方面来看，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出现并不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属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一部分生产资料如耕畜、农具、运输工具等归农民个人所有，农民在签定了承包合同后基本自主经营，同时又由于土地承包几十年不变，农民为了发展生产不断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追加投资(改良土壤、修建机井、购买化肥、农药等)，还有的农民除了承包土地外，还利用自有的生产资料、资金和剩余劳动力从事其他项目的生产经营，这就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加入了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因素。集体办的企业情况也是如此，如农民个人入股，按股"分红"，这也是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总之，中国农村现阶段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兼有个体经济因素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这种经济形式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个人的积极性，这种"统""分"结合的方式，使得每一个农民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是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力的一种有效形式。

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形式曾经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后，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以后，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普遍采取了"人民公社"的形式；60年代初期，农村集体经济的公有化程度降低，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资料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逐步解体，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并且得以普遍推广。

农业生产责任制 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中明确规定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和权利，并把责任、权利和劳动报酬结合起来的一种管理制度。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很多，按承担责任的期限，可以分为常年责任制、季节责任制、临时责任制；按承担责任者区分，有集体责任制、个人责任制；按承担责任的生产对象，可分为综合生产责任制和专业生产责任制；按承担责任应该完成的成果，则可分为作业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等。而实际上，一种具体形式，往往包含以上几种类型。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划分为不联系产量的作业责任制和联系产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作业责任制也称包工制，承担生产任务者只对作业项目的数量和质量负责，按定额计酬；包工制又分常年包工、小段包工、临时包工和作业组集体包工、个人单项包工等。联产计酬责任制又称包产制，承担生产任务者要对最终生产成果——产量或产值负责，联系产量，或以产量计酬。包产制中又有包产到作业组、包产到劳动力、包产到户，以及包干到户和综合性的联产承包专业承包等。目前阶段，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是指以农户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一定的生产任务，并对所承包的生产项目的产量(或产值)负责的一种经营方式，农户的劳动成果中，包产部分交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部或部分奖给承包户，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户的劳动报酬采取工分分配的形式；包干到户也是以农户为单位承包生产任务，它与包产到户的区别在于，在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上交集体的各项提留以后，剩余部分全归承包户所有，不再由集体按工分分配，由于这种办法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方便，到后来成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中国农业的生产责任制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集体经济组织的产生而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的。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废除；大跃进后和文化大革命前，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完全废除了。文化大革命后，一些地方如四川，安徽等地农民自发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1980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充分肯定并大力推广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践证明，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利于克服生产上无人负责现象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发展。

农工商联合企业 指把农业生产同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储运及与农业相关联的一系列部门联合组成一个整体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是农业专业化，集中化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综合利用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减少流通环节。举办联合企业要具备以下条件：①农业生产专业化达到一定程度。②有一定的加工生产能力；③有较大和稳定的销售市场。④较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

农贸市场 是我国集市贸易的形式之一，指设在城市，供农民及一部分城市个体商贩进行以农村产品

交易为主的交易场所，这种市场多实行全年全天交易。

农村剩余劳动力 指超过农业生产需要而又滞留在农村中农业生产领域的那部分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发生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向现代农业生产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原因有：①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要。②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大幅度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量。③非农业产业吸纳劳动力的速度低于农业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速度。

农业工业化 指在农业生产中采用工业部门的生产方法，把整个农产品的生产置于人类的完全控制下，排除自然条件的干扰和限制，采用现代化装备，技术和管理方法对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养分进行人工模拟。农业工业化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新现象，它可以使农业减少对自然的依赖程度，改善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工农差别。

农业工程 有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各种工程的总称，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化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农田整治、水土保持工程、农村能源工程、农产品加工、储存、运输工程等等。农业工程建设的目的在于为农业的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农业开发 对尚未被利用的农业资源进行开采、垦殖、发展新产业，应用新技术的经济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不同，农业开发主要指利用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和开发新资源的生产活动，所以农业开发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改变传统农业生产过度集中在老资源，老产业、旧技术的落后状况，对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化学化 是一种在本世纪初开始，40年代得到广泛发展的农业现代化措施，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无机化学肥料，高效农药、农产品生长激素、农用塑料制品、农产品化学加工，实行农业化学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程度，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根据历史经验，实行农业化学要注意它的污染后果。

农业生产区域化 是农业分工的一种形式，指农业生产地区根据本地区的气候，地理位置、海拔、土壤结构，技术相对优势等一系列条件，由多种项目的分散生产改变为区域内某种产品的相对集中生产，农业生产区域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利用，有利于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农业污染 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质量恶化，危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现象，造成污染的原因是：农业化肥、农药的使用不当，在生产过程中派生出来某种有毒物质，直接污染大气、水源、土壤、动植物、农产品等诸多方面。发生的后果是：农产品产量减少，质量下降、甚至报废，生态系统的破坏。农业污染一旦发生，面积大、扩散快，恢复慢。因此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农业现代化 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手段和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把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改造成先进生产方式的过程。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现代化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动态的范畴，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是不同的。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是：本世纪40～7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用当时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应用于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植物保护等方面；广泛采用大型的、系统的、自动化的、高效率的农业机械；普遍地将以石油、煤为原料的无机物用于农作物的生长；在农业企业管理中普及运用系统工程、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管理手段；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提高社会分工和协作水平，从而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整个农业现代化的特点是：科学化、机械化、电子化、自动化、化学化、水利化、规模化、农工商一体化。目前，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各种措施来推进这一过程。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起点比工业发达国家当初进行农业现代化的起点低。后者农业现代化的起点是近代农业。近代农业的特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本上转移到工业和其它产业；农业机械普遍得到应用；自然科学在农业也有一定的运用；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而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起点是传统农业，其特征是：农业生产凭借直接经验和畜力手工具；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较低，基本上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农业基础上进行农业现代化存在许多特殊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挤在狭小的土

地上，仅此一项就使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难以迅速进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在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并已取得一些成绩。但总体上看，今后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主要农产品商品率只有50%左右；自然科学有一定的应用，但很不普及；生产规模小；大部分地区仍使用畜力手工工具。我国也面临农业现代化起点低的困难。

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移动，就业于非农业部门的经济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表现为这样一个序列：农业生产发展——劳动力剩余——寻求、选择职业——非农业部门就业。农业劳动力转移是生产力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产物，是经济结构从低级向高级转化的标志。一般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其一是人口劳动力资源的变化；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一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工业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前者规定了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劳动力的数量；后者确定了实际能够容纳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劳动行业的规模。我国经济比较落后，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裕，农业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引导和调控非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把握人口经济结构未来的变化趋势，对经济的整体发展，较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主要采取"离土不离乡"的方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走小城镇化的道路来解决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问题。

农业多种经营 指农业的主导部门和辅助部门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多种经营的项目和生产结构因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而异。例如，粮食产区以粮食生产为主，兼营其它项目的生产；林区、牧区、渔区，则分别以林业、牧业、渔业生产为主，兼营其它项目的生产。"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是农业生产布局的一个原则，也是贯彻"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方针的具体措施。农业多种经营的作用是：(1) 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2) 有利于农业内部各业的互相促进和生产系统的合理化。(3) 克服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资金使用的季节性。(4) 满足市场需要。(5) 增加收入。

农业综合发展 狭义上指农业内部各生产部门的综合发展。广义上指农业、工业、商业及其它部门的综合发展，也称农村综合发展。在我国，农业综合发展有时指农业生产单位开展多种经营。农业综合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各种农业资源，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多方面需要。

农村产业政策 指在农村实施的能促进经济协调前进，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生产结构对策和措施。产业政策是人们对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设计和愿望，是国家干预农村经济的目的和手段的体现。农村产业政策主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建立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体系；二是已经看准的产业结构应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措施和步骤达到；三是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何进行防范。产业政策是通过限制和鼓励的方式达到经济目的。主要经济杠杆有税收、信贷、价格等，还有制度、法令等行政措施，如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法规等。产业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战略性，二是综合性。战略性表现在它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一定的政策将发生较长时间的影响。作用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综合性表现在为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不能只依靠某一项政策措施，而必须依靠多种政策措施。正确评价农村生产力现状，是科学制订农村产业政策的客观依据，因为只有准确地把握了生产力的状况后，才能使产业政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总的来说不是过剩而是不足，因而农业生产的总方向是要坚持发展生产，协调、扶持农业、减轻农民负担，这是制订现阶段农业产业政策的重要原则。

农产品商品基地 稳定地大量提供农产品商品的地区或单位。包括商品粮生产基地，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如棉花、烤烟、甘蔗、甜菜等），林特产品基地（如生漆、茶叶、桐油等），畜产品基地（如肉、奶、蛋、皮、毛等），水产品生产基地（如鱼、虾、蟹、贝等），副食品生产基地（如水果、蔬菜等）。建设农产品商品基地，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保证工业生产和城镇人民的需要。农产品商品基地通常分为全国性的、省级的和县级的。

农业集约经营 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运用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措施，通过精耕细作和科学管理，从而在现有自然和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条件下，取得最高产量和最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经营方式。它的核心是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来增加产品总量，同时最大限度地把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成就和管理成就集中起来运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马克思说："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760页）。集约经营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集约经营的程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并且受社会制度、自然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的影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属于粗放经营。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资金积累的增多、地租地价的上升、农业生产过剩危机的加深，集约经营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约经营对发展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集约经营的程度是由单项指标和综合指标来衡量的。单项指标包括单位耕地面积平均占用的农机具、肥料、牲畜、人力、电力的价值（费用）或数量。综合指标包括单位面积耕地或农业用地摊得的占用资金额、固定资产额、生产成本率、生产资料费等等。

农村产业结构　以农村为整体的农业、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行业的经济构成及其各业的内部构成。农村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是与农村的商品生产的发展相辅相承。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主要是小农经济，农村等于农业。农村的经济结构就是农、林、牧、副、渔业的构成。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农村出现了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形成农村经济的新的产业结构。农村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商品经济的存在形式。

农业内部比例关系　农业内部各生产门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在数量上的表现。农业内部各生产门类的划分，既要依据农产品再生产的特点，又要考虑到在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形成的各类生产之间的经济联系。目前，我国农业划分为农业（农作物栽培）、林业（造林营林）、畜牧业（畜禽饲养）、渔业（水产养殖）和副业。其中的副业并不具有农业的根本特点，但它在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形成附属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因此也列入农业的范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的副业生产将逐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农业的范围也将发生变化。为了使农业内部各生产门类之间实现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必须保持农业内部各门类之间的数量比例。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主要有：农、林、牧、副、渔五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各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等等。正确安排这些比例关系，对保证实现农业内部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对充分利用农业的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加快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更好地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专业经济群区　农业生产地区内由多种项目的分散生产转变为少数项目的集中生产。农业专业分工的形式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的社会分工不发达、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生产在地区上的分布基本上是“万物俱全式”，不同地区的农业无显著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交换的规模扩大，商品性农业迅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分工，逐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专业化地区，如粮食产区、棉花产区、肉牛产区、绵羊产区等。专业化地区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业中交换的发展。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村专业经济群区，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中形成的，具有盲目性、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长时期内，这一特点表现得特别明显，造成了对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破坏。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形成的，没有专业化的地区分工。以后，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形成一些农产品集中产区，如东北的大豆产区，黄河、长江流域的棉花产区，江浙的蚕丝产区等。但在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工仍不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有计划地改善了原有的农产品集中产区，并新形成了一批农产品集中产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将逐步形成农村专业经济群区。

农产品生产基地　亦称“商品农产品生产基地”。经过集中投资和建设所形成的商品率比较高的农产品集中生产地区。包括：粮食生产基地、棉花生产基地、油料生产基地、糖料生产基地、热带作物生产基地、林业生产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渔业生产基地，等等。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是发展我国农业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实现农业地域专业化生产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它有利于充分利用当地的生产资源，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科学的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实行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商品率，更好地发挥投资效果。目前，我国农业还比较落后，建立一批农产品生产基地，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商品粮、工业原料、油料、糖料、果品、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等，就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农业关联产业　亦称“农业综合经营体”或“农业综合经营系统”。指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输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信贷、保险等经济活动或从事这些活动的产业。包括：生产和供应农用工业品，如农业机器、化肥、农药以及种子，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企业；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与农业产、供、销有关的信贷、保险、运

输、包装、贮藏等企业；农场。农业关联产业依赖农业生产部门供给原料和以农业生产部门销售对象的产业部门（如农产品加工业与肥料工业等），称为"农业基础产业"；不全部依赖农业的部门（如银行和保险企业），称为"农业相关产业"。农业关联产业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的戴维斯（John · H · Davis）和戈德堡（Ray Goldbery）于本世纪50年代提出来，后来被普遍采用。

农村社会总产值 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农村社会产品生产总量，综合反映农村物质生产的总成果。它包括农业以及农村工业、农村建筑业、农村运输业和农村商业等部门的产值。根据我国农村现状，农村社会总产值统计范围包括全部农业总产值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活动所生产的产值，不包括农村中国营企业生产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产值。农村各部门产值计算各有特点。农业总产值按"产品法"计算。农村工业产值只包括乡办、村办和村以下的工业企业（即原生产队办的，农民联营的和个体的工业企业）的工业产值。农村工业产值按照"工厂法"计算，即按每个工业企业提供的最终成果计算产值，不包括企业内部本期生产又用于生产消耗的中间产品。对于工业性作业只按加工费计算产值。农村建筑业产值只包括乡、村建筑队和农村个体专业人员从事农村建筑活动所生产的产值。农村建筑活动主要是农村的房屋建筑、农民兴建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开垦荒地，不包括国家投资兴建的水利工程和开垦的荒地。农村运输业产值是指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民个人从事货物运输使产品增值的那部分产值，其产值按全部货物运输收入计算。农村商业总产值是指农村供销社、农村合作社经济组织和农户从事购销活动使商品增值的那部分产值，其产值按扣除运费后的商品附加费计算。农业、农村工业、农村建筑业、农村运输业和农村商业产值之和就是农村社会总产值。

农村经济总收入和纯收入 农村各种经济形式的企业和单位当年生产经营所得的各种收入的总和。这些收入可用于抵偿当年开支和进行分配，故又称可分配总收入。它由乡、村企业总收入、集体统一经营的总收入、新经济联合体总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总收入组成。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来源包括下列各业收入：(1) 种植业收入。(2) 林业收入。(3) 牧业收入。(4) 副业收入。(5) 渔业收入。(6) 工业收入。(7) 交通运输业收入。(8) 建筑业收入。(9) 商业饮食业收入。(10) 服务业收入。(11) 其它收入。总收入中既包括各种生产性收入，也包括经营活动中所得的利息、租金等非生产性收入。农村经济总收入是研究农村经济收入分配的基本指标，也是研究农村经济的规模、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的重要资料。农村经济总收入扣除总费用后的其余部分就是农村经济纯收入，又称农村经济的收益。它由乡、村企业纯收入、集体统一经营纯收入、新经济联合体纯收入和农民家庭纯收入组成。农村经济纯收入是农村各项分配的来源，它的分配包括：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农民个人所得。集体提留包括乡、村企业、集体、统一经营和新经济联合体提留的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基金和储备基金以及农户上交的承包任务和各种统筹款。农村经济纯收入是农村经济收入分配的基本指标，它综合反映农村经济增收节支情况，是研究农村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

农村城镇化 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成城镇地区的过程。这一转变的结果，城镇数目不断增多，城镇人口和用地面积不断扩大。城镇是农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农村城镇化后有利于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为城镇作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空间连接点，既具有凝聚作用——即把农村地区的零星技术和资金凝聚在一起，形成生产力，把分散的交换行为集中在一起形成市场，又具有吸收和扩散功能——即把大城市输出的技术、资金等吸收进来，同时又可以通过城镇将它们扩散到农村地区，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农村民间借贷 农民中自发的，未纳入国家金融体系的，非正规的资金融通行为。从广义上说，农村信用所贷款也属于民间借贷，但它是在国家宏观金融计划控制之下，按国家规定的统一利率发放的，所以，通常所说的农村民间借贷，主要是就狭义而言的。中国农村民间借贷有着悠久的历史，进入本世纪80年代之后更有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量增长很快，而有限的信用社贷款指标不足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同时，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货币，除满足自身经营和生活需要以外还有剩余，也需要寻求出路，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民间借贷发展的条件。民间借贷一般包括3种形式，即互助借贷，互利借贷和高利贷。其中主要是以借还本金为条件，以营利为目的，其资金投向于农村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利息受行业资金中等利润率制约的互利借贷。农民借钱大部分是用于生产经营，少部分用于建房、婚丧和消费。借贷的方式，可分为个人借贷和团体借贷两种。民间借贷所形成的农民间金融微循环系统由于未

纳入国家的金融体系，往往与国家的货币政策不符，不利于宏观上的调控。但在正规的信贷制度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时，非正规的民间资金得以充分利用，并补充了国家信贷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外一些学者曾提出过二元金融机构假设，其内容为：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大城市中有一些发达的金融关系网以外，广大乡村中存在的是表面上象高利贷的非正规的信贷制度。而这种民间的信贷制度并不一定是生产增长的阻力。

农村阶级成分划分　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同月20日公布。《决定》由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1933年瑞金民主政府公布的两个文件，政务院作了删改和补充，第三部分是"政务院的若干新规定"，主要内容是规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20余个阶级成份的划分标准和界限，地主、富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和工人的待遇，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子女相互结婚后改变成份的条件，以及地主改变成份的条件等。农村中被划定的阶级成份主要有（一）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人。根据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和剥削方式的不同、与反动政权的关系和对待革命的态度不同，分为①大地主；②中小地主；③破产地主；④豪绅地主，亦称"贵族地主"、"缙绅地主"，即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和享有政治特权的地主；⑤恶霸地主，即勾结官府，依靠或组成反动势力，称霸一方、有严重罪行的地主；⑥一般地主；⑦经营地主，即占有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靠雇佣劳动经营农业的地主；⑧不在地主，亦称"在外地主"，即长期不在本乡居住的地主；⑨二地主，即租入大量土地，转租给农民，收取地租，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中间剥削者；⑩地主兼营工商业者，即占有土地，以地租为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兼营工商业的地主；⑪租佃地主，即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完全或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二）开明绅士，亦称"开明士绅"，即旧中国农村中有势力、有资产和带有民主色彩的人士。（三）富农，有较充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有自己的土地，自己参加劳动，又经常靠剥削雇工为生的人，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把富农的剥削量定为25%，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30%。（四）半地主式富农，亦称"半封建富农"，即出租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的富农。（五）富农兼工商业者，即以剥削农业雇佣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同时兼营工商业的富农。（六）新富农，即抗战时期抗战根据地内和新解放区土改后新出现的富农。（七）小土地出租者，即拥有少量土地，因从事其他职业或缺乏劳动力不能自行耕种而将土地出租的人。（八）雇农，即完全或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劳动者，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九）贫农，即占有少量生产工具，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须租入土地耕种或出卖小部分劳动力维持生活的农民，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十）中农，即一般占有土地和相当的生产工具，生活来源全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的农民。农业合作化时期，由原来贫农上升的中农称为新中农，原来的中农称老中农；按其经济地位又分为下中农（包括中中农）和上中农（即富裕中农）。（十一）佃农，即全部或主要靠租入土地从事耕种的农民，又分为佃中农、佃富农、佃贫农。（十二）自耕农，即占有土地和相当的生产工具，自己从事耕种的农民，属于中农。（十三）半自耕农，即自有一部分土地，又租入土地耕种的农民。另外划定的阶级成份还有手工工人、手工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小业主等农村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

优先发展重工业　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贯彻的一个重要思想。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体现，是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必须在消费资料生产部门能够相应提供追加的消费资料条件下才可能。其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必须从根本上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制约，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不能为增长而增长，更不能用牺牲农业等生产部门的发展来保证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其三，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并不排除在特殊时期消费资料生产增长速度快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的可能。针对中国经济建设中曾经一度出现的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错误倾向，以及借鉴苏联等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曾多次提出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思想。

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基本成分有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适应，存在着三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同的经济成分代表不同的经济关系，它们之间的联合和斗争，决定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前途。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时期（1949—1956年底）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中小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中国政府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有步骤地引导它们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为了防止个体经济的两极分化，使广大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巩固工农联盟，中国政府采取积极慎重的步骤，帮助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通过合作化的途径，使它们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合作社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中国的合作社经济包括农业生产互助组、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业供销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等等。发展合作社经济，是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受人民政府管理的，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生多种形式联系的、接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初级形式是：在工业中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包销，在商业中有委托代购、代销、经销；其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包括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经过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

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尚未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必须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估计，这一过程大体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完成。但是，实践的结果是：1956年底，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法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它的根本思想，早在1949年2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不仅指出了我们的国家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具体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份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明确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到巩固，国民经济情况得到基本好转，国际形势也不断地朝着有利我们的方向发展。这样，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任务、总路线问题就迫切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1953年6月，他在中央统战部李维汉给中央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这个批语说：“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同年6月15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在审批一些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时，对总路线的内容的表述作了一些修改。使之不断地完善起来。这些修改主要是：（一）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提法；（二）将“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三）将“国家工业化”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于2月10日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1955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和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分别地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过程作了说明，阐明了这条总路线

指引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先合作化后机械化　1962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即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它的基本思想是，从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国情出发，通过实现农业合作化，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从而逐步积累资金，培养技术力量，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自留地　中国农业实现合作化以后，由集体经济分配给社员长期使用的小块土地。耕种自留地是社员经营的一项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规定："社员应该有小量的自留地，大约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作为菜园，或者用以经营某些补充的农作物和农副业。自留地的产品供给家用，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自留地的面积作了调整，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7%，高的可以达到15%。自留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社员不能出卖、出租或转让。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目的在于满足社员和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

自负盈亏　企业在独立核算、掌握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对自己的经营状况负全部经济责任，并享有相应的经济利益。在中国这一经营制度一直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所采纳，而且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以往统负盈亏，统收统支制度的努力方向。目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普遍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自负盈亏制度。

自负盈亏制度首先要求企业具备作为商品生产者经营上的独立自主权。自1978年以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证明，在目前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忽视责任机制、权力机制与利益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企业与劳动者行为上的惰性。无视市场，无视经济规律，甚至无视企业盈亏的现象严重阻碍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良性循环。因此在"两权分离"理论的指导下，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仍存在商品经济属性的同时，必须将企业——主要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对待，要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将商品货币关系明确地摆在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活力。

作为国家，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决不意味着对企业生产放任，相反，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国家要集中力量从法制上保证企业的经营权益和限制可能产生的对社会的破坏行为，以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发育。另外，国家还要运用计划、各种调控手段以及掌握的信息，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减少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在必要的情况下，国家还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解决某些问题，以保证国家整体利益不被损害，如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灾害、企业行为严重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等等。总之，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制度，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机制，另一方面仍然接受国家的指导和调控。

自由价格　亦称市场调节价格，与计划价格不同，它是由购销双方协商议定的价格，是自发形成的，随着商品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自发地涨落。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自由价格自发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价格要在计划指导和国家政策法令的约束下实现。在我国，根据不同生产者和不同产品的性质，自由价格分为：农副产品议购议销价格、工商协商定价和集市贸易价格。农副产品议购议销价格是商业部门按照国家或国家授权的主管部门规定的农副产品范围，同农业生产者协商议定的收购价格和对消费者的销售价格。工商协商定价是工商企业之间按照省、市、自治区规定的作价原则和方法协商议定的价格，主要适用于一般日用工业品。集市贸易价格乃城乡集市上农副产品的交易价格，由买卖双方自由议定。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除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由国家管理外，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都由市场调节。由国家制定的计划价格将逐步缩小，由市场调节的自由价格将逐步扩大。

自由市场　亦有两种含义，一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交易所，拍卖行，招标场所，以及现货、期货市场等，以上市场均可统称为自由市场。二是特指作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补充，从事一些不在国家计划管理范围之内，种类繁多，零星分散，需求变化快商品交易的场所。

地方所有制　对生产资料由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地方政府分管并支配使用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称谓。地方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的一部

分。属于地方分管的生产资料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的使用和经营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管理和有关方针、政策的规定。

地区差价 同种商品在同一时间的收购价格或销售价格因地区不同而形成的差额。以百分数表示，称为地区差率。地区差价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同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生产条件等的不同，其生产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也不等。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商品从产地运往销地，经营部门要支付一定的流通费用（主要是运输费用）和获得一定的利润，这些要在价格上得到反映和补偿。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区分，有不同的地区差价，如城乡差价、城城差价等。工业品和农产品都有地区差价。国家收购农产品时，距离城市近的价格要高些，距离城市远的价格则低些，表现为递远递减，这样城市附近的农民就取得了一定的级差收入，国家应通过税收来合理分配这种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带来的级差收入，工业品的销售则正好相反，距离生产工业品的城市比较远的农村，工业品的价格就比较高，表现为递远递增。这不利于边远地区的农民，为此要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合理的地区差价，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商品的正常流通，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地区间物资交流。

地区封锁 地区间经济活动的一种不正常行为，通常的地区封锁表现为商品封锁，技术封锁，信息情报封锁。商品封锁往往是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所采取的一种阻断措施，目的在于维护本地区产品生产，保护本地区产品市场。技术和信息封锁则是先进地区为了维护本地区经济优势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地区封锁严重的阻碍着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正常活动，它既不利于落后地区赶超先进，同时也不利于先进地区更加先进。

年度计划 按照远景规划、五年计划的要求，并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而制定的一年期计划。在理论上，它是长期计划的具体化，亦是阶段化了的长期计划。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年度计划的编制，还是年度计划的实际执行，它都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根据需要和可能，对长期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

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 又称"含有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波兰经济学家费·布鲁斯（1921— ）提出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模式。它的基本点是：宏观经济活动的决策由国家进行，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由企业自行决定，家庭或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则分散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再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国家和企业这两个层次分别独立地制定计划，国家计划侧重于全社会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可供企业参考，但不具有约束力；企业计划着眼于自身利益的发展，不必强行同中央计划一致，但要与中央计划制定部门保持沟通和交流。生产资料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给企业，统配被批发贸易所代替。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标准或尺度不再是计划指标完成状况，而由利润标准取而代之。在经营决策权分权的情况下，国家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通过下述三个途径进行：1）国家规定重大投资的方向，从而限定了企业的活动范围；确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从而也就确定了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例；国家制定消费基金的分配原则，从而也就影响了消费品需求与品种的构成，相应影响着企业的生产计划；等等。2）国家通过制定目标函数来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在分权模式下中央对企业的控制，不是表现在具体数量的控制，而是在于规定一些原则目标。例如规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就会努力降低成本，使投入和产出的差距最大。国家通过制定目标函数，并将它与奖金，物质刺激挂起钩来，从而达到控制企业活动方向的目的。3）国家通过各种参数来影响企业的活动。可供国家选择的参数有价格、工资、税收、利率等等。国家对参数的择用和确定，必须按照社会偏好，而不能让企业来操纵这些参数．企业只是通过调整自己的活动来适应参数。布鲁斯认为，用参数管理取代行政命令是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的重要特点。（参看本卷："布鲁斯及其分权模式"）

机器拖拉机站 苏联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为集体农庄提供有偿生产技术服务的国营企业。它是国家获取农产品和资金积累的重要手段。第一个拖拉机站建立于 1928 年，而后迅速推广和发展。1958 年，苏联决定撤消拖拉机站，把拖拉机和农机具卖给集体农庄，这一工作到 1959 年大体完成。

全额利润留成 企业财务体制改革曾试行过的一种方法。1979 年开始在部分企业中试行，其内容是把 1978 年的四项资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企业基金、国家拨给的科学培训费）加上一定数额的新产品试制费，同利润挂钩，计算出一个留成比例，企业按此比例提取利润留成。试行这种办法有利于调动企业积极性，促使企业加强管理、扭亏增盈。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原来利润少，职工多的企业则留成比例高，可以多提留成。而原来利润多、职工少、增产潜力小，则留成比例低，提留少。以后此方

法改成了基数利润留成加上增长利润留成。

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是一个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商品物资严重不足、长期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高涨的经济混乱局面，财政收入很少。但另一方面，为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统治而进行的大规模的革命进军，对一切被解放的旧军队和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对许多重点企业和交通运输进行恢复重建工作，又要有很大的财政支出。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私人投机资本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推波助澜。这样，就使物价连连上涨，国家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由于长期的战争，各个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各地财政和经济工作存在管理不统一、收支机构脱节等严重分散现象。如果不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势必进一步增加通货的发行，造成物价的波动，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国家政治局面的安定。这是一个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能不能巩固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坚决的重大措施。1950 年 3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22 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并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这些决定和措施，主要的有：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农业税(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规定所有仓库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并决定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业务范围的规定与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规定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并且规定外汇牌价与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使国家集中掌握了主要的收入、资金和重要物资，迅速改变了建国初期资金与物资管理上的混乱状态。从 1950 年 4 月起，物价即不再上涨。这对于扭转当时财政收支不平衡、税收工作不健全等困难的财政经济局势，对于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投机活动，控制和制止《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延续下来的通货膨胀，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全民所有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中国自 1978 年工业企业管理体制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型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国务院 1988 年 2 月 27 日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对这一制度的实施做了明确规定，指出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要求企业和企业管理机构做到：必须兼顾国家、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利益，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积极性，挖掘企业内部潜力，确保上缴国家利润，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应当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切实落实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合同双方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由国家审计机关及其委托的其他审计组织对合同双方及企业经营者进行审计。

承包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包上缴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其中包上缴国家利润的形式有：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微利企业上缴利润定额包干；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以及国家批准的其他形式。

这一制度的产生是中国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改革中带有实质性变化的一步，它初步实现了工业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为中国工业企业真正成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提供了制度保证。

国家建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改变以往产品经济模式下国家行政机构对企业经营统得过死所造成的企业经营状况僵化，改变由于国家与企业之间责权利不清所形成的企业缺少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等一系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局面。承包经营的实施给中国工业企业带来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承包制的优点是：1）一旦合同签字生效后，国家对企业不再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从而加强了企业的责任，保障了企业的自主权利，为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创造了条件。2）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和约束下进行的。纳入承包合同的产品结构，经营方向，质量标准和内部分配等，都要符合国家的政策规定，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同时，承包制也把企业推上了自负盈亏的轨道。企业在遵守国家计划和政策法令的前提下，有充分的自主权力，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参与竞争，获得利润。这样，承包经营就把计划的统一性和市场的灵活性结合到一起了。

3）承包经营可以确保国家财政经济的稳定增长。4）承包经营为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技术进步创造了一定条件。但是，承包制也在实践中暴露了一些矛盾，如：承包合同契约双方（发包方、承包方）责、权、利关系如何确定和协调问题，承包基数难以准确把握问题，承包企业存在短期行为问题，以及承包企业产权关系模糊的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待于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全民所有制企业租赁经营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企业经营形式，主要在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中推行。国务院1988年6月发布《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对这一改革形式进一步加强了指导和管理。条例明确指出租赁经营，是指在不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授权单位为出租方将企业有期限地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向出租方交付租金并依照合同对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的方式。

租赁经营形式在更大范围内下放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因此企业经营在获得更大灵活性的同时将更为小心地在市场上寻找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管理上更为自觉地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一方面为带动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市场提供适销产品和提供优质服务。租赁经营一般采用招标的形式产生承租方，并在法律的约束下履行合同，这样对企业领导人的经营能力的要求更为企业职工所关注，因此这种经营形式有利于企业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为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创造了施展才干的条件，并从经营者素质上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租赁经营的出租和承租双方有明确的权力与义务规定，因此在管理上比较容易实现规范化管理，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更多的在企业内部得到解决。租赁经营者有明确的利益机制，"大锅饭"现象比较好地得到解决，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目前的租赁经营制仍有许多缺陷和不完善之处，主要有：企业行为短期化；个人收入畸高畸低难以合理；企业经营失败时个人损失与国家损失相差悬殊，造成投机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国家财产损失无法弥补的局面；另外在投资，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等需要较长时期内显示效益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等。这些缺陷决定了实行租赁制国家所担的损失风险比承租人要大得多。但由于租赁制普遍在小企业中实行，因此并不对国家的根本利益构成威胁，而且小企业难以有效地纳入国家计划管理范围，更多地受市场自发调节影响，所以，在小企业中实行租赁制对国家来说还是利多弊少，几年来的实践也说明了这点。由于租赁经营需要严格地核定企业的生产能力、资产、债权债务、行为和企业资金利润率等用于确定标底的指标，以及要求承租人具有与租赁企业资产成一定比例的个人财产作为担保，因此，租赁经营只适宜于在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进行，而不宜于在大中型企业中推广。

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 全民所有制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形式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国家在对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招标招聘经营者承包经营，当企业收益大于规定资产收益指标时，超过部分在国家、企业和经营者个人之间分成；当企业收益不够缴纳国家规定的资产收益指标时，用企业奖励、福利基金补偿，直至扣发职工基本工资和改换企业经营者。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的优点是明确了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能促进经营者在承包经营期间注意资产增值。但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资产评估比较复杂，难以估价合理，这是其一；和承包制相似，承包期限一般为二至三年，期满后另行招标、评估，难以避免短期行为，这是其二；资产经营责任制主要体现国家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职工没有决策权力，却与经营者共担风险，难以体现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这是其三。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这种企业管理制度存在上述缺陷，因此推广面十分有限。

扩大企业自主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思路和做法。指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接受国家计划管理的前提下，在经营管理上拥有更多的、更为独立的权力，如人、财、物和产、供、销方面的指挥权，决策权、分配权等。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设想与实践是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体制过于集中，企业的经济活动失去活力的现象，首先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来的改革措施。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在此之前1978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帅先进行扩权试点，规定企业在完成增产增收目标以后，可以提留少量利润，此后试点企业在全国陆续出现。1979年7月国家为了加强对扩权工作的指导，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五个文件，为扩权试点工作稳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此，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也就成为改革的出发点。几年来不断出现的和正在探索的改革方式、模式、管理制度等，改进的基本点都在于逐步调整和改革国家机构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对于国家机构来说要逐步建立起做为上层建筑的主体以政治的、法律的和各种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行进行计划、调节和以企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指导。对于企业来说，则要担负起作为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经济实体所应承担的经济职能，在接受国家宏观计划调整、指导的基础上对微观经济行为自行决策和实施管理，并做为经济法人承担风险和利益，在企业行为合理化基础上增强了企业活力。

寻租理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从外国引进并援用的一种理论。寻租理论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进展。它的倡导者之一丁·布坎南还因此贡献而获得87年度的诺贝尔奖。寻租理论是以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政府干预或政府管理所导致的经济现象为现实基础的。它认为："寻租"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由于政府干预而产生的一类经济现象。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中引入政府干预后、私人利益（包括集团利益）与社会利益产生矛盾，从而必然导致各种不良的经济后果。这些不良的经济后果突出表现为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财力、人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以谋取由于政府垄断而存在的，无法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的"利润租金"。不论这些寻租活动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从经济观点看，都消耗了大量的稀缺资源，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归纳起来，寻租理论的要点有：1）"租金"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寻租理论的作者们大都把租金的形成归根于政府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干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只有政府才能借助于法律和行政权威，运用强制性手段，创造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并维持likewise一部分人享有的租金。2）寻租活动造成社会的浪费。寻租活动的目的在于谋取国家法令对私人或利益集团的商品生产和劳务价格的某些特殊权利，以便获得"法律保护"的垄断生产和利润租金，因此，寻租活动的中心内容不可能是增加生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正常的生产经营，而是讨价还价、贿赂、拉关系走后门等、把人力、物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从经济观点看，这些活动都消耗了大量的稀缺资源，却没有增加任何社会财富，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浪费。

寻租活动 即寻租行为，是指在实行政府干预或管制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谋取由政府干预和管制所形成，通过某种受国家法律或法规保护的"特殊权利"实现的利润租金而进行的、以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为目的的活动。寻租行为有三种方式：1）通过贿赂、讨价还价、拉关系走后门等手段直接获取；2）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府而设立限制别人与自己竞争的政策环境，如进口许可证、新的生产配额等的获取；3）进行表现上似乎为生产投资，但实际上是要力争达到政府规定的某些目标，由此可从政府获得某些补贴和优惠。由于寻租活动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花费在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因此从经济观点看，不论这种活动采取的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方式，都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浪费，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并日会造成特权阶层日益腐化，消费者利益日益受损，经济运行日趋失常等恶性后果。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人用寻租活动来概括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经济现象。

价格补贴 指国家按照价格政策给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经营补贴及生活补贴。价格补贴的主要内容有：1 农副产品购进价格高于销售价格而出现的购销倒挂补贴。2 个别工业产品固定价格偏低形成的亏损 3 进出口商品国外与国内市场差价形成的亏损。价格补贴是国家有目的支持价格背离价值，从而利用价值规律的一种做法。同时也是国家干预价格，违背价值规律的一种强制措施。价格补贴既有扶持生产，稳定市场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面，又有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妨碍商品流通、掩盖产销矛盾、虚构成本降低效果和增大财政负担的一面。

价格双轨制 指计划与市场并存下的混合价格体制，同一种商品既存在国家计划定价，又存在市场调节定价。在中国，价格双轨制是改革过程中的产物，正式形成于1985年1月，存在于多数商品，尤其是生产资料市场中，如中国目前钢材供应中，属国家计划供应的仍由国家定价，不属国家计划供应的计划外部分则由市场定价。作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产物，价格双轨制对于某些基础产品的生产发展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其弊端日益突出，表现在：损害了商品市场的统一性，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市场信号紊乱；损害了价值尺度的单一性，等量货币在两个市场具有不同的购买力；损害了竞争的公平性，软化了计划的严肃性，又破坏了市场规则；导致交易行为的投机性，成为投机倒把、腐败的温床。价格双轨制只是价格改革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双轨制"的消极影响并最终取消价格双轨制。从长期来看，双轨应转

变为单轨价格。就目前来看，由于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形成，市场与计划难以有机结合，完善的企业制度和合理的企业行为均未形成，市场发育不充分，缺乏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以合理调节资源配套等，双轨合一的条件尚不具备，全面解决双轨制价格只能是一个较长时间内的逐步过程。对于解决价格双轨制，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否应当成为当前价格改革的重点，意见不一。解决价格双轨制，应坚持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原则，基本生活必需品由国家定价，非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进一步放松，其中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价格完全放开，基础部门价格由国家控制。对于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解决的思路不同，主要有：①调整计划价格与放开价格相结合，分年度有重点地推进和分步推进相结合，提高计划内价格和调整计划比重相结合，分产品推进和分地域推进相结合。②根据不同产品品种、不同的市场竞争条件、资源稀缺程度、供需弹性大小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的并轨方式。通过经济、行政、法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为双轨合一创造良好环境，并缩小双轨的轨距和品种范围。③按行业、产品、地区和环节逐步推进，石油、电力、铁路等少数国家垄断经营行业的商品价格和收费实行调高国家定价，其他行业有调有放；上游产品调、中游产品调放结合，下游产品放；一地生产、全国分配且占相当比重的商品统一国家定价，边远地区放开；对生产领域价格放宽控制，对流通领域差率严格控制。还有主张消极并轨的，即不是条件成熟后马上并轨，条件不成熟的创造条件并轨，而是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只有计划体制彻底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合理了才能取消价格双轨制。

军工产品价格 指机械工业所生产的军事专用设备和动员产品（因国防需要动员民用企业生产的军工产品）的价格。军事专用设备是为了国防建设需要而单独设计、专门使用的主机产品、配套产品、设备以及部件。制订军工产品价格的基本原则是支持国防建设，满足国防现代化的需要。目前，制订军工产品价格的具体作法有：①按照计划成本定价。拟定计划成本要准确、合理、符合国家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拟定计划成本之后，按照国家所规定的军工产品盈利率和纳税要求，制订军工产品的价格。②按照个别成本定价。军工产品其生产任务不稳定，生产批量起伏变化大，并且多数带有新产品试制性质，废品损失相对较大，从而造成同一产品在不同企业、不同条件下生产成本差异很大，这样，在制订军工产品价格时，不能采取简单的平均成本，应根据企业的个别成本制订价格。③实行低利定价。④实行批量定价。⑤保持价格相对稳定。军工产品价格属于国家计划价格管理的范围，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国家各级管理和企业用户协商定价。

军事共产主义模式 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出现是同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相联系的。它的基本特征是：①在所有制方面，高度集中、全面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完全排斥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②经济决策高度集中；③废除商品和货币关系，禁止市场交易和私人交换，全部经济活动实物化；④征收全部农业剩余、消费品配给、生产资料无偿调拨，劳动力强制分配和义务劳动，非经济核算，外贸垄断。

企业的关、停、并、转、迁 在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中对企业所采取的几种措施的总称。关停——指效益、质量很差，投入浪费严重、污染严重的关闭，停产整顿措施。并——同类行业中重复生产的企业并入行业中其他企业、实行联合生产。或将相同工艺的企业合并为一个专业化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的一种调整措施。转——指把长期亏损、产品质量次，成本高，市场无销路的企业或原材料短缺，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改变原有生产方向，转向生产市场急需的产品的一种调整措施。迁——指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迁址，以减轻污染。

企业集团 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以大型骨干企业或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为主体，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由企业自主组建的高级形式的联合体。企业集团有利于各企业扬长避短、挖掘潜力、发挥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增强企业活力，有利于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实现生产经营的专业化、联合化、高级化，有利于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企业集团的特点是：(1) 紧密性、集中性的联合；(2) 是法人单位，其类型有二：一类叫"一体型"法人，即对外实行统一经济核算、统负盈亏，财政部门和银行只设集团一个户口，集团内部各厂类似于总厂的车间，对外不是"法人"；另一类是"混分型"法人，即在一个企业集团内部，有实行集中经营统一核算的工厂（一体型法人），有实行分类管理、分级核算的企业（两级法人）并存的组织形式。(3) 在经济合同、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股份制、合资经营、租赁制等。(4) 以生产名优产品大、中型企业为核心进行的联合，生产要素实行大部分或全部联合。集团本部和集团核心，在资金、技术、管理、产量等方面有较大实力，足以左右集团内的单个企业方向，具有实体性。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一般不要自上而下地组建企业集团，也不能指派企业集团的经营负责人，要防止把企

业集团变成行政性公司或由行政性公司翻牌变成企业集团。国家对企业集团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

企业群体　在横向经济联合的基础上，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以名优产品为"龙头"而组织起来的一种松散的联合体。它有利于各企业扬长避短，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实现产品结构合理化。企业群体的特点是：(1) 企业群体呈松散型，各自独立核算，内部凝聚力不同企业集团。(2) 企业群体内各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群体对企业不具有支配权，企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较大。(3) 企业群体内各企业都保持所有制、隶属关系、财政渠道三不变。(4) 企业群体大都以协议、合同、甚至厂际人际关系来组织联合生产和经营。(5) 生产的规模及范围要受"龙头"产品的限制。因此，企业群体联合的程度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及企业集团。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在企业党组织领导下，实行职工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劳动者主人翁精神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建立于1957年，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它列入宪法。职代会制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参加企业经营决策、监督干部、行使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技术民主和生活民主的权力机构，它在企业党组织领导下行使职权，其主要职权是：(1) 定期听取厂长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2) 审议企业的经营方针和决策；(3) 讨论通过企业的工资调整方案、资金分配方案、内部经济责任制方案、职工培训计划和重大的规章制度；(4) 讨论决定集体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及其它集体福利事项；(5) 评议监督企业各级干部，并提出任免和奖惩建议。职代会应正确行使自己的职权，注意处理好以下界限：一是审议决策，但不能取代厂长直接决策；厂长作了正确决策后，应以主人翁态度坚决执行；二是讨论通过企业重大规章制度，但不干扰厂长行使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职权；三是评议、监督、推荐干部，但不干扰厂长组阁，尊重上级任命和厂长意见；四是参加企业税后利润分配，但要支持厂长扩大再生产和重大措施计划的实施，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职代会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实行常任制，两年改选一次，连选连任，受选举单位职工监督。职代会闭会期间，由企业工会作为职代会常设工作机构，负责监督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实行职代会制，能够全面体现和保证职工当家作主，参与管理企业的权力；能够加强对行政领导的监督，有助于克服干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能够有效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统一职工思想，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这一制度，对于加强企业管理，促进企业管理现代化，振兴经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企业横向联合　指企业之间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形式，可以是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内部的联合，也可以是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企业横向联合打破了条块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封锁和分割，冲破了现有体制中阻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由之路。企业横向联合，要坚持扬长避短、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发展企业横向联合，要按经济发展的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搞好可行性论证，应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做到技术先进、布局合理、经济效益高。我国目前较有特色、有效益的联合形式有：(1) 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的专业化协作联合。(2) 围绕工程技术和设备成套发展的联合。(3) 围绕扩大产品出口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联合。(4) 围绕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实行生产单位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技术经济联合。(5) 实行加工工业企业与原材料生产企业的经济联合，以扬长避短、互为补充。(6) 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的经济联合。(7) 城市企业与县、区、镇企业的经济联合。企业横向联合的进一步发展，还有赖于计划、财政、金融、物资流通、人事管理制度的配套改革，建立保护企业横向联合的法规制度，并且制定和完善税收鼓励政策，价格优惠政策、技术鼓励政策、信贷扶持政策。

企业责任制　是明确经济责任、经济权力和确定经济利益分配的一种经营管理制度。它是整个工业经济责任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企业为完成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同时使自己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和自身利益的需要确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总目标，并按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将其层层落实到车间、科室、班组和每个职工。企业责任制的实质是改善企业内部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它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也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经济责任制在企业内部的延续。建立企业经济责任制，一方面要建立建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各项专门责任和岗位责任制，使企业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保证生产经营活动上下衔接，左右协调；另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处理好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落实责任制，关键要抓好四个环节的工作：一是划分经济责任；二是制定考核办法；三是进行严格考核；四是搞好利益分配。

企业行为自我约束机制　指企业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自觉接受国家宏观控制措施和政策的引导，对违背国家宏观管理目标的企业行为进行自我约束的职能和手段。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权力，同时自我承担风险。因此，企业的发展目标和行为，常常出现偏离甚至违背国家宏观管理目标和国民经济发展总方向的情况。为了使企业行为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意志，并有利于使企业的活力凝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强大生命活力，必须使企业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企业自我约束的要求和能力。建立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涉及改革和完善企业的经营形式、决策方式、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职能的合理配置，以及企业内部的监督方式等方面。其具体内容包括：(1)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实行厂长和经理任期目标制。(2)完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3)实行自负盈亏、自担投资和决策风险，硬化企业预算。(4)建立和完善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在各种管理职能间形成稳定的制衡关系。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改进企业内部的纪检、审计、经济技术论证和财务分析工作。

企业调蓄机制　调蓄机制是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系统调蓄各种潜能的机制。在比较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所必需的各种输入要素及其产品的市场关系处于不停变动之中，这种变动是企业无法控制的。为了使企业经济活动的稳定性不致受到市场波动的过大干扰，企业对生产的物质要素，精神要素等，须具有调蓄能力。调蓄机制的主要运行方式是存贮与蓄积。其一，指这种存贮与蓄积的能力。二是指存贮与蓄积在量的方面，必须控制在一个为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规律所决策的限度上。企业调蓄机制运行目标有：①生产资料调蓄。②资金调蓄。③劳动资源调蓄。④技术资源调蓄。⑤信息资源调蓄。⑥产品调蓄。

企业抗逆机制　企业抗逆机制是指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系统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保持系统性能稳定的机制。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着的。有些变化是常规的和渐进的，企业通过日常行为调整就能适应这种变化。而有些变化却是突发的、震荡的。企业必须具有抗逆机制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这些突发性、震荡性的变化有：自然灾害；经济上的"自然灾害"，如"石油危机"等；信用的突变；金融的突变；另外还有政治、社会环境的剧变。企业抗逆机制的主要运行方式有：调整或改变生产方向，扩大和缩小生产规模，更新产品结构，调整产品价格，发展经济联合，等等。

产业结构　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每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产业结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各产业之间在生产规模上的比例关系，直接涉及到结构均衡问题，如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均衡，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均衡，基础设施产业同制造业之间的均衡、能源，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均衡。二是指各产业之间的联系方式或关联方式，更直接涉及的是结构高度，结构效益问题。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构成产业结构量的方面，而产业的关联方式则构成产业结构质的方面。

产业倾斜发展模式　指在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选择一个或几个主导部门，从一系列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使它得到超常规的发展，以此产生的前向推动，后向推动，侧向关联效应来推动整个经济获得相应发展的一种发展模式。建立这种模式的关键是选好主导部门。作为主导部门应具备以下条件：①有相当长时间的市场稳定需求。②有成熟的技术保障体系。③具有较强的拉动和推动力。④生产资源有可靠的保证。⑤有规模效益的存在。⑥产品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⑦能够吸纳较多的就业。

产业疲劳　产业疲劳有两方面涵义：一是指产业的技术设备经过长时期使用磨损造成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性能的下降。二是指产业的劳动者在连续工作较长时期后产生的疲劳感觉和劳动机能下降。产业疲劳的后果将导致产业产品产量、产品质量下降，设备事故率，劳动者工伤率上升。为了避免产业疲劳造成的后果，应及时更新产业设备，改进原有技术设备的性能，积极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环境，劳保条件，合理安排劳动时间和调整劳动强度。

产值利润率　指一定时期的产品销售利润总额与同时期总产值的比率。表明单位产值所获得的利润，反映了产值与利润的关系和单位产值所获得利润的变化情况，计算公式为：

$$产值利润率(\%)=\frac{销售利润总额}{总产值}\times 100\%$$

产品"三包"　指企业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企业产品信誉，对不符合产品质量的产品实行的负责退可、调换、修理的措施，即包退、包换、包修。

产品寿命周期　指某种产品从投入市场到退出市场的全部销售变化过程，完整的产品寿命周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产品导入阶段，该阶段产品

未定型，存在技术垄断，产品成本价格高，产品未实行规模生产。第二阶段，产品成长阶段，在该阶段，产品工艺基本定型、市场已得到相当的扩展，生产厂家增多，竞争激烈；第三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在该阶段，产品普遍实行标准化生产、价格竞争日趋激烈、销售困难、销售量日益递减。第四阶段，产品衰退阶段，产品显得陈旧过时，销售量锐减，直至完全从市场上消失。分析产品寿命周期的目的在于，考察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研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利润率的变化，以确定不同阶段上的产品生产量和市场策略，做好产品发展的长远开发规划。

关税　国家对进出口贸易所征收的一种税，分为几类，按征收对象分为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三种。按征收标准分为从价税（按商品的价值征收）、从量税（按商品的重量、体积、数量征收、混合税（按商品的价值和数量同时征收）。按关税的制定方法划分，有自主关税（本国独立制定）、协议关税（根据国际间的条约、协议制定）。按征税的目的划分有：财政关税，保护关税和报复关税。关税是国家行使主权，保护本国市场，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

关税壁垒　国家用征收高额关税来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一种措施。由于高额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削弱了进口商品的竞争能力、限制了本国市场需求，从而保护本国的商品生产。由于这种高额关税如一堵高墙般挡住了进口商品的冲击。所以把它称为关税壁垒。关税壁垒有时也用于迫使其他国家在贸易方面让步的手段。

关税豁免　是根据1961年制定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制定的一国政府给予外国外交人员免除关税的特权。各国外交人员携带和邮寄的商品均可享受此种特权。

关税减免　海关根据有关规定对某些进出口业务给予的减征或免征关税的待遇。关税减免分三种：特定关税减免是海关根据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给予的关税减免待遇。法定关税减免是海关依照海关法规给予的关税减免待遇，临时关税减免是海关一案一批减免的关税。

考斯塔·吉里（Kosta，Jiri 1921　　）　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1968年改革中的经济改革委员会成员。1921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市，1947年毕业于布拉格商学院，并先后就职于捷克斯洛伐克商业部和企业单位。1956—1962年在布拉格的高等院校任教授，主讲政治经济学。1962—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在这期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5年，捷克斯洛伐克准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考斯塔参加了由锡克主持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制订工作，并成了锡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助手之一。1968年8月，布拉格事件发生后，考斯塔被迫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先后在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地从事研究工作。从1970年起，考斯塔在德国法兰克福市的歌德大学任经济学教授，除讲授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外，主要讲授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1974年考斯塔曾访问过中国。1982年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考斯塔来中国作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

考斯塔的主要著作有：《十字路口的文明》（与他人合著）；《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对马克思的理论和欧洲实践的思考》（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改革运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1974年）；《捷克斯洛伐克1945—1977年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978年）等。80年代以来，考斯塔发表了许多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并撰写了若干介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文章。他还曾先后发表过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即《旅行札记：关于人民中国的经济和社会》（1974年）和《人民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1976年）。

考斯塔在学术上深受锡克和布鲁斯的影响，但他的理论仍具有自己的特色，且涉及面也颇广。从1974年问世的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一书来看，他实际上试图解释和批判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所有制问题、商品生产问题、集权计划与分权计划问题、按量分配问题、经济民主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政治体制问题以及改革模式的选择问题等等。其中许多问题的论述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并且相互关联。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分权人与民主化的不可分割性，强调改革的社会效果应当体现在"平等原则"和"民主原则"的实现上，强调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依存关系。这些基本思想从他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种模式分类理论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模式即"计划—市场模式"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而这两方面理论正是考斯塔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具特色和富有启发性的部分。

【参】考斯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理论

考斯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理论　捷克斯洛

伐克经济学家考斯塔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生发展、体系构成、分类方法和改革目标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核心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三种模式划分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有关计划—市场目标模式构想。

1.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考斯塔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形成的最初形式是苏联的中央集权型行政计划体制。有三个因素对此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是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的设想；二是当时苏联的经济状况与国际政治环境；三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政治体制。首先，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坚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思想，如计划决策方面实行严格的集权化，以集中的物资平衡方式来实行实物产品计划，在无偿的社会劳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实行按劳分配等，这些原则都来自马、恩的目标设想。考斯塔认为，马、恩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既没有在职能上也没有在结构上描述生产资料公有化之后计划方式，但马、恩在各种不同的著作中也零散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的计划问题，对此不能照搬，尽管在初创期很难避免。其次，苏联当时处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实行经济封锁的险恶环境中，不得不强行实现工业化；国内困难的经济条件，也迫使国家对有限的资金与人力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方式。这一切都促进了集权式行政计划体制的形成。但考斯塔也指出，在实施这一集权式计划体制时曾出现过脱离这一模式的三种偏向：一是经济核算体制中采取了现金计算方法来确定成本，从而使商品货币工具如价格、税收、信贷、利息等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对计划制订和实施的机制产生了影响；二是由于行政手段不能长期有效地用来调节劳动，不得不用商品货币工具进行物质刺激，扩大工资差别；三是为了合理完成计划目标，必须把决策权从中央集权部门转移到分权的计划部门，如地方政府、企业等。但是，第三个因素即官僚的政治体制阻碍了上述分权化和商品货币工具的使用，从而重新使计划体制回到高度集权的轨道上去。考斯塔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集权计划体制总的看还是合适的，但由于它有三个职能上的缺陷而影响了计划的效果：一是集权计划不能使生产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因为企业没有生产的自主权；二是生产效率和经济效果差，原因是这种实物计划重数量轻质量，不重视经济核算；三是企业不愿实行技术更新和提高有机构成，因为企业的目标只是机械地完成上级下达的数量指标，而这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外延型途径。尤其是当经济发展由于遇到劳动力与其它资源的紧张而不得不从粗放增长过渡到集约化增长时，这些内在的缺陷便越来越严重。考斯塔认为，战后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集权模式固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但这并不表明除此之外便没有更好的选择了，相反地随着这些国家实现进一步的工业化或工业化的完成，集权模式的历史条件就不复存在，因而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得不面临改革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选择。

2.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系构成。考斯塔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分为四个并列的子体系，即计划目标体系、计划形式体系、分配体系和决策体系。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抽象地考察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或模式，都包含着这四个子体系。但是，通过具体地考察可以发现，同一个子体系在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即每个子体系都有不同的内容可供选择。正是这些子体系的差别，最终构成了总体系之间的差别，从而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表现为不同的模式。(1) 计划目标体系的选择问题。考斯塔认为，计划目标也就是发展战略，即国民经济应如何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应如何发展，计划中应确定什么。总的来看，有两种典型的计划目标可供选择：一种是把工业化作为目标，另一种是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但计划目标不是随便可以选择的，它首先取决于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追求高积累以实现工业化的计划目标是与苏联30年代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但问题在于不能把这种计划目标固定化，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唯一可供选择的目标。战后许多东欧国家生产力水平低，需要实现工业化，当时采取苏联模式的目标也无可非议，但对于已经具有工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来说，照搬苏联模式就非但不适应而且有害，如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与民主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考斯塔还指出，确定计划目标并不意味着排除商品生产，因为生产的发展，计划目标从工业化转向全面发展，即从生产积累转向广义的消费，无论是社会消费还是个人消费，都与发展商品生产相联系，并且计划目标的决策对于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商品生产有重要影响，即任何片面强调个人消费或社会消费的目标决策都会影响到商品关系的正确发展，尽管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的比例客观上并不最终取决于主观决策，而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2) 计划形式体系的选择：集权计划与分权计划问题。考斯塔认为，计划形式可以理解为计划控制的各种工具、结构和方法的总体，用以解决计划的组织技术方面、运行方面的任务。总的来看，有两种典型的(极端的)计划形式可供选择，一种是集权计划，一种是分权计划。这两种计划都要求在国民经济中实行事先管理，计划目标都有约束力，它们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力图把所有的经济过程都列入计划，而后者一开始就估计到计划外的过程，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

控制这些过程。不过，选择集权还是分权根本上来说也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时，决策所依据的信息量较少，中央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尖锐，所以集权计划能行之有效，使计划目标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与经济联系由简单变复杂，信息量大大增加，中央处理信息能力有限，不可能对全部信息都作出反应，因而，对日益复杂的经济过程的控制便显得力不从心，贻误了决策过程。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利益结构也复杂化了。劳动者、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会发生利益上的不一致，从而影响计划的提出与完成。计划、信息、利益三者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信息过程与利益结构对计划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反过来，计划对利益有反作用，过分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会对企业及劳动者的利益产生消极影响，因为人们生活在商品社会中，劳动的动机归根结底还是获取报酬。此外，信息与利益之间也会相互作用：不讲利益会导致信息的人为失真，而信息系统的毛病又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劳动动机。因此，解决的方法是实行计划决策的分权化。它能较有效地处理信息过程与协调利益关系。当然，计划决策的分权化是有一定限度的：就生产决策的细节化和具体化而言，工业发达的国民经济要求较高程度的分权化，如在企业手头掌握了必要的信息的情况下，关于企业的某些活动的具体问题，适合于企业自己单独决策，而诸如基础结构、地方和社会政策等重大决策，则应在中央一级制订计划。在分权化计划中，企业计划的制定以消费者的偏好为依据。与此相关，分权计划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商品生产体系，如分权计划中的价格、成本、利润等所起的"指示器"的作用以及货币关系、企业间的买卖关系和竞争等，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相类似，只不过对社会主义计划体系来说，追求利润并不是社会的最终目标，经济过程也不是由自发的市场机制决定的，尤其主要的是生产资料不是由私人占有，而是以共同占有为主，因而分权计划中的商品性质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性质仍有差别。(3) 分配体系的选择：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问题。考斯塔认为，分配体系中的分配原则如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最终仍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在现阶段，分配体系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过并不排除在次要方面考虑按需分配，如根据社会标准来满足个人的不同需要（社会福利、教育等）以及满足集体的需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这两个不以劳动的个人实际收入为转移的成分，将随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逐渐增加。考斯塔还指出，实行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原则需要解决如何计算劳动量的问题，但计量劳动标准的任务至今并没解决。另外，按劳分配还需要有物质刺激，因为现阶段劳动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谋生的劳动，以劳动收入为动机的劳动含有商品生产的要素；而在商品生产社会中，物质刺激是主要的动力，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就是强制地运用以劳动为主的物质刺激。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社会主义觉悟的精神鼓励也起一定作用，但不能因此把物质刺激看作是非社会主义的。(4) 决策体系的选择：领导层决策和集体民主决策问题。考斯塔认为，决策体系是指经济计划由谁来决定，即经济中的原则问题谁来决策，这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由个人或狭小的集团即领导层决策，另一种是由集体（如工人委员会）进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实行领导层决策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主决策有了物质基础，就应逐步转向由劳动人民集体决策。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集权的决策，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各个分散的集体都不可能具备各项决策所必须的全部信息和专门知识，这更需要由有专门知识的少数专家对国民经济中的专门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另外，有些决策时效要求高，也不可能等待各个集体作长时间的讨论。但无论如何，随着分权计划的实施，民主化决策将越来越普遍，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目标。

3.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分类问题。根据上述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子体系构成理论，考斯塔考察和比较了苏联、东欧国家实践中的经济体制，并将其分为三类：(1) 传统的集中行政体制（苏联模式）。这种体制选择的子体系是：计划目标为实现工业化；计划形式为中央行政集权计划；分配体系为按劳分配；决策体系为领导层决策结构。这种模式在二战后曾为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纳，尽管以后经历了一些变化。(2) 以市场经济为指导、以工人自治原则为基础的体制（南斯拉夫模式）。这是50年代初开始在南斯拉夫一国出现的体制，其在子体系方面的特点是：计划目标（增长模式）并非单一地决定；以分权的计划形式为主；以物质刺激为特征；实行工人自治。(3) 匈牙利模式。1968年后在匈牙利开始实施，其对子体系的选择是：计划目标为工业化；计划形式为分权计划；分配体系为物质刺激；决策体系为权威主义决策等级制。考斯塔的这种分类是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的，而该书写于1971—1973年，分析的仅是苏东国家60年代的改革情况。这以后，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又有了新进展，因而考斯塔在他原有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分类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虽然仍划分为三种，但偏重于理论抽象而不象以前仅对实际体制

进行分类。他提出的这三种模式：一是传统的苏联模式；二是分散的专家治理模式；三是分散的民主决策模式。考斯塔从上述四个子体系方面论述了三者的特征。(1) 在计划目标（发展战略）方面：第一种模式的特点是经济最大限度的增长，重工业优先发展，积累很高，农业受忽视。第二、三种模式都以经济均衡发展为目标，重视消费品和食品的供应，但二者亦有区别，前者注重个人消费，而后者除个人消费外还注重集体消费，即社会、文化和其他集体福利事业。(2) 在计划形式方面：第一种模式实行集权制和行政方法，或者说指令方法。第二、三种模式区别不大，都强调计划和市场，或者说"分散控制"，第二种模式是匈牙利改革中推行的模式，第三种模式的方案是 1965—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制定的方案。(3) 分配原则方面：前一种模式中按劳分配的意思是指企业的工资基金完全取决于计划量的完成情况，特别是取决于"总产品"指标的完成情况。第二种模式中的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工资基金取决于国家规定的等级工资和奖金，而奖金又取决于利润，第三种模式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另一种，它在某些方面同第三种模式很相近。(4) 决策体系方面：第一种模式采取的是权威主义的决策，即实行"一长制"，大多是由党和国家机构任命各级领导人。第二种模式中，"一长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专家决策结合在一起的，任命经理时十分重视他们的业务熟练程度与管理能力，同时专家受集体的监督。第三种模式实行民主的参与决策或者自治，但不同于南斯拉夫的自治体制，则更接近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方案，因为在这一方案中，集体组织、经理和专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力分配，而在南斯拉夫自治体制中经理与专家完全不起作用。经过上述四方面的比较，考斯塔认为他倾向于选择第三种模式。这是他与布鲁斯、锡克不同的地方。布鲁斯只分两种模式，即集权模式与分权模式，而考斯塔则把布鲁斯的分权模式进一步分为上述二、三两种模式，其中作为选择目标的第三种模式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至于锡克与他的区别，他认为锡克更重视市场机制，特别是锡克 80 年代的观点已不同于 1968 年与他共同设计和施行改革方案时的观点，对市场更重视了。不过考斯塔认为他自己在今天比以往更倾向于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方案，因为唯一能取得成果的改革方案就是把计划经济因素和市场经济因素结合起并保留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方案。正是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关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即"计划—市场模式"。

4.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计划—市场模式"。这一模式的具体内容是：(1) 国民经济的控制计划。考斯塔认为，国民经济的控制计划与集权计划的最重要区别在于，企业计划不再同中央的计划指标联系在一起。控制计划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指导性计划"，或称"信息性计划"、"方向性计划"，即计划只指出经济活动的方向，使人们了解到方向性的指标，它们只提供数据信息而不作为命令。但是，并不是对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实行这种控制计划，而应区别对待：对于消费品部门和生活资料部门，应完全实现控制计划，对于一般性的生产设备部门和原料部门，也应实行控制计划；对于生产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产品和设备的部门，则仍应下达指令性计划。此外，对于基础结构的最重要部门，如教育、卫生、科研、城市交通规划、对外经济关系等部门，应规定指令性任务。这些非经济部门的目标要服从社会发展的总的计划目标。另外，在中央的计划中必须规定经济发展目标，如各个部门的增长率、基本建设、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社会产品用于投资和用于消费的比例等等。最后，计划每层可能公开化，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研究机构制订。(2) 经济调节手段。考斯塔认为，经济调节手段在西方称为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运用得相当普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却很少研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际上，货币数量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应借鉴西方的方法和技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要阻止它，便不能把过多的货币投入经济。另外，货币政策也是间接影响和指导企业投资的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国家可以通过优惠的货币条件促进某些部门的发展，或通过严格的货币条件压缩某一部门的发展。这比行政命令的方法效果要好得多。此外，税收制度、对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都起着间接调控的作用，都是经济调节手段，可以起到代替指令性指标的作用。同时，经济调节手段对于自发的市场机制能起约束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调节，听凭市场机制调节，就会出现经济混乱，南斯拉夫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南斯拉夫能把市场机制同经济调节手段占国民经济控制计划协调起来，情况会好得多。(3) 市场经济控制或市场机制。考斯塔认为，市场机制包括以下五个基本要素：个人在消费与职业上有选择自由；企业独立决定生产项目和投入的要素；实行市场价格（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物质刺激，包括工资对工人的刺激和利润对企业家的刺激；企业之间的竞争。这五个要素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市场机制的最基本要素，而在"计划—市场模式"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原则是：不允许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平等参与决策、工资悬殊不能过大，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精神。因此根据这些原则，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要受到某些限制，具体表现是：第一，个人在消费与职业上的自由选择这一要素将予以肯定，并应创造条件使它尽早实现。第二，企业独立决定生产项目与投入要素这一条要有所限制，但这种限制只能通过经济调节手段进行，即国家用它来引导企业去适应社会客观计划，而企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行动是完全自由的和独立的。第三，实行市场价格是将来必须达到的目标，即应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争取实现自由价格。但在改革的过渡阶段，固定价格、限额价格仍是需要的，如对一些非常短缺的产品仍应由中央确定价格，对供求基本平衡的产品采用限额价格，对储备充足或过剩产品实行市场价格，采用这种折衷办法的目的是避免出现价格失控，引起通货膨胀。至于作为改革目标来说，应该是市场价格，当然这要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第四，物质刺激的作用也要有个限度，即社会主义需要物质刺激，但工资差别不能过大，还必须照顾那些因某种原因而不能提供很多劳动的人，如病人、老人、学生等。对于企业来说，利润作为衡量其成果的尺度十分重要，但要接受南斯拉夫的教训，不能把企业利润都变为企业集体工资的基础；工资完全取决于利润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会造成不同企业中工人收入差距过大。此外，利润是积累的主要来源，一部分留给企业作为积累，一部分则应作为国家积累上交，但企业留利部分不能过小，要使企业利用这部分"自筹资金"发展生产。第五，竞争要素应予以肯定和引进，竞争不会使社会主义企业分裂，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团结的原则还在起作用。社会主义竞争中失利的企业不能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倒闭，可以转产其它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竞争有利于促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也有利于消费者，总之，考斯塔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总体上要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因而要研究市场机制在什么部门中起作用，在什么部门中不应让它起作用。他认为一般地说，消费品生产、服务性行业、农业中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但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上，在战略原料和大宗投资上，应让计划机制发挥作用，至于在某些中间领域，如何运用市场机制还需通过实践来摸索。不过即使在中央集中计划的这些部门与项目中，也要充分运用经济核算杠杆来核算成本，确定合理的价格，这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

【参】考斯塔，吉里

七　画

社会主义　人类的一种思想体系，亦是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同伙的、同伴的。后注入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最先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上帝安排的一种传说制度。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获得了政治含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用"社会主义"来表达他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各种不公正现象的不满，以及对合谐的集体主义社会的追求。19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文主义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上出现了"社会主义"用语。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思想的本来含义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弊病，要求以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它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反映了还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对于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愿望和要求，但囿于唯心史观，不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不能指明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道路，主要代表人物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辩证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早期的有《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不下几十种，如民主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的基本特点从经济上来看主要是实行公有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从政治上来看是实行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路线指导。此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旧式分工仍然存在，以及其它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时，社会主义才能过渡到没有三大差别，没有商品经济、没有阶级斗争、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真正平等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

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并通过其先锋队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特征是：1）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2）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和动力；3）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4）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绝对统治，发展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深化和完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5）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阶级斗争，工农；脑体、城乡三大差别，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它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在历史上通常采取暴力形式。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形式的多样化，也出现了非暴力的革命形式。

社会主义生产实质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在一起，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劳动者个人和公共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参见本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统一。其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1 页）。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本质联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不是只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某一个别方面或某个个别过程，而是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个别方面或个别过程虽然各有其特殊的经济规律，但是，在这些方面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其他经济规律都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它的作用。例如，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对企业的生产和流通起调节作用，企业总是愿意把资金投向价高利大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商品生产和销售上。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经营决策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如果他们的行为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甚至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那么，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的计划、经济、行政、道德等方面的压力或干预，最终还因企业经营陷入盲目性而蒙受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反之，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决策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取得一致，那么，价值规律的作用就会充分得到发挥（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消耗，提高盈利率等），企业利益也就相应得到增长。

总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既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目的，又为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活动规定了一个总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社会主义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一目的，服从这一目的，实现这一目的。否则，违反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必将受到惩罚。

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关系。物质利益就是经济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关系就是经济利益关系。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是所有制关系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物质利益关系，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基本动因。由于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因此，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关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的广大劳动者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关系。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资产阶级的利润或其他剥削者的私利，而是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他们的物质利益将得到不断实现和增进。3）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关系集中体现为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又存在着矛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三者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内在的动力。

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在社会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把劳动者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

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使每个经济单位和劳动者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原则。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一项根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1）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代表着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2）劳动者个人利益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基础，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最终归宿；3 集体利益是劳动者的集团利益，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保证和发展的必要条件；4）归根结底，三者利益是劳动者利益的不同侧面表现，因而，从根本说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物质利益关系在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也还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是：1）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和个人各有其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因此，在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2）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和个人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需要，而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总量是一定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此长彼消的相互制约的矛盾。3）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竞争的关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中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这部分劳动者利益与那部分劳动者的利益的矛盾，没有根本利害的对抗和冲突，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自觉地加以调节而得到解决。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原则是：1）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对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实行直接或间接宏观控制的同时，必须充分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国家对企业的计划领导主要是通过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实现，直接的行政干预和指令性计划应当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2）社会主义企业必须自觉接受国家的宏观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必须把企业的物质利益同经营成果紧密结合起来。3）既要加强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协作，又要保护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4）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5）把企业的经济利益同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紧密联系起来。6）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集体利益也应服从国家利益。总而言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的原则是：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努力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企业和集体利益同个人的劳动成果、企业的经营效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保证劳动者个人和企业的物质利益同国家的物质利益都得到正确的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组织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千百万劳动者，围绕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开展富有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并通过劳动者之间的比、学、赶、帮、超，普及、推广和提高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苏联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列宁就写下了《怎样组织竞赛?》一文，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竞赛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明确指出："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 3 卷，1972 年出版第 392 页）。毛泽东历来提倡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他曾指出："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是提高生产的主要方法"。（转引自 1977 年 3 月 19 日《光明日报》）。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基本适应的，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还有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即矛盾的一面，这种情况或者因为生产关系本身不完善而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或者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曾经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变得不适应了。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可以表现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尽管这种不完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避免的过程，但它毕竟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加以不断地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大众生活的文化艺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国家机关和执政党内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社会

主义国家制度、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中的漏洞和不完善，又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从而影响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必须加以不断调整、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性质，它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加以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最早是由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唯物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曾经提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最根本任务是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没有涉及主要矛盾问题。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71 页，人民出版社 1966 年横排本）这里说的基本矛盾是指主要矛盾，但是，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矛盾存在于过渡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有关主要矛盾的表述曾经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情况。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目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从 1957 年到"文化大革命"的 20 年期间，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了反复。毛泽东在中共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八大"决议的提法是不对的。以后他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在实际上解决了主要矛盾问题，从而否定了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思想。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重新作出概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再次肯定了这个主要矛盾，并同时指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之间，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人民群众之间、外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与无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对抗和斗争。由于社会主义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国家政权已经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手中，因此，阶级斗争已经不成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也还没有从根本上铲除，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及其在执政党内的代理人还在顽强的表现自己，外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颠覆和"和平演变"的努力还在继续，因此，阶级斗争还将在社会主义的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斗争的形式将会十分复杂，斗争的程度将会相当激烈，而且会反复出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曾对当时的阶级斗争状况作出下述估计："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 13、15 页，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但是，后来他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在 1966 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作出明确估计："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

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56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内部、农民阶级内部，知识分子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一面，又有依附于它们并与之妥协、勾结的消极性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政策，其矛盾的对抗性得到恰当处理，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是属于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矛盾，后者解决的途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前者解决的方法则主要是民主、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及正确划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是毛泽东于 1957 年首先提出的，这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创造性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亦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否定。它的基本特点是：1）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且成为社会所有制结构的主体；2）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经济杠杆；3）社会产品按有利于劳动者的利益原则进行分配，其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形式主要是采取按劳分配；4）旧式分工、"三大"差别以及劳动群众之间富裕程度的差别还存在，但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和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在本质上，它较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在 1917 年建立的，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诞生。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诞生于 1949 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并在 1956 年底，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基本结束而获得全面确立。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亦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指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其他各个领域中所体现的进步性、创造性、积极性和效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其优越性主要表现在：1）由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这样，使劳动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2）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有可能做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3）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增长与劳动者的消费相对狭小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使社会主义生产和劳动者消费直接结合起来；4）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这样，使人们可以自觉地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为社会谋福利；5）归根结底，公有制是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是自发产生的。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需要三个条件：1）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取决于有没有适合生产关系各个环节的各种具体形式；2）要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还需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只有在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才能充分得到体现；3）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包括：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科学管理；要正确认识和善于运用客观经济规律，要有反映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发挥劳动者主人翁精神，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劳动者特别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人物能够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管理活动；切实建立能够保证各级政府及其成员勤政、廉政和高效率从政的一整套监督、保障制度和具体方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先进的制度，虽然只是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历史进程，但是，已经初步显示了她的优越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同时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毕竟还是一个尚未发育

成熟的新生事物，在她未来的发展中，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或那种反复、曲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还有待于她自身的不断发育、成长和完善，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经济规律总是同一定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经济条件的不同，决定着经济规律作用的特点和时间的长短不同。同各个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经济规律，是不同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如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经济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如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经济规律，是一切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社会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市场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同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相联系的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它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本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反映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经济规律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协调增长的规律；等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连同尚未发现或尚未充分揭示的经济规律组成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在于科学揭示和阐述这些规律形成的条件、作用的特点、运作的机制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经济规律既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因此，人们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社会主义制度为人们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要真正认识和驾驭客观经济规律，并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则决非易事。它要求人们必须坚定唯物主义立场，长时期的坚持经济实践，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比较和总结，才能逐步克服盲目性，实现揭示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的目的。

社会主义阶段划分 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同任何社会形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具有阶段性。之所以呈现阶段性特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运动的特点决定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思想体系，产生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实行单一公有制、没有商品经济、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但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中，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按照上述模式构筑自己的经济、社会机体的。在中国，实践表明，经济和社会模式越是硬性接近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模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力就越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这就说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具体经济、社会模式，不能硬套马克思主义个别经典作家远在一百多年前设想的模式，也不能照搬某一个国家曾经或正在构筑的模式，而只能取决于现实生活中的另一种客观力量即本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任何矛盾运动都有因自身运动量变质变规律引起的阶段性特点，因此，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使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规定的经济、社会运动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社会主义阶段划分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要不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分解为几个阶段，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阶段性，正如一个人的成长必然要经过幼年、成年、老年等阶段一样；也不在于把这些阶段表述为“初级”“高级”还是“不成熟”“成熟”或“不发达”“发达”阶段，因为上述语义上的差别并不妨碍阶段的本质内容差别；而在于如何划分阶段，在于不同阶段赖以划分的客观标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对抗性矛盾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曾对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作过某些描述。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是否就是社会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标准模式呢？还不能做这样的判断。他们的这些设想或许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许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转变后进入的初级阶段，或许其中的某些设想（如商品货币关系的消亡）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实践的验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对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及社会的阶段划分标准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不可调和的前提下产生的更高一级的经济、社会形态，因此，作为成熟社会主义（或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志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产力高度发达，准确地说，要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还要高。与此相联系，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超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第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善和提高，其富足程度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在公共消费生活方面，无论就其规模而言，还是就其质量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第三，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社会主义所有制无论在性质、形式和结

构上根本区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既能容纳又能推动新生产力的发展。第四，建立在新型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第五，社会产品的分配按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原则进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仍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被彻底破除，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基本得到消除，任何形式的剥削基本消失。第六，在上层建筑方面，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不存在，国家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外抵御可能的侵略上，对内指导和协调经济的发展和组织必须由国家承担的消费生活上。与此同时，科学、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大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有的新的社会公德、社会风尚已经蔚然成风。假如人们把符合上述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称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么未达到这些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处在中级阶段或初级阶段上。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资本主义不怎么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力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其他各个领域也相应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从总体上说，还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运动符合成熟社会主义应具有的标准，因此处在社会主义前高级阶段或前成熟阶段。就中国而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成熟程度远没有达到高级阶段（发达、成熟阶段），因此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之一。又称社会主义不成熟阶段，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表明这个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社会特征是：1）社会化生产有一定发展，但生产力发展总水平低，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一国范围而言，不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2）已经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公有化程度还不高。在公有制占主体的环境中并存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指"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各种经济成份在特定的环境中均有其特殊的优越性。3）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还不发达或很不发达。还存在着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4）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旧制度、旧社会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但从总体上说，劳动者的现有生活水平仍处在较低层次上。5）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主要形式是按劳分配，但同时存在着按股分红、按资分配、自产自销等非按劳分配形式，并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剥削现象。6）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了一定发展，但还很落后。7）在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民主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还有广泛影响。阶级斗争还存在，虽然它已经不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有时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尤其在思想领域更是如此。上述特征在处于初级阶段的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形式、程度会有所不同，但只要上述特征的基本内容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这些国家就仍处于初级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明确使用"初级阶段"范畴，并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则进一步系统、全面地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之一。又称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社会主义发达阶段。关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社会特征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所有这些表述尚有待于实践检验和历史的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充分发育和成熟基础上的阶段，是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准备阶段。（参见本卷"社会主义阶段划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元经济结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经济部分与非现代经济部分并存，发达经济地区与不发达经济地区并存，国民经济先进部门与非先进部门并存，传统经济部分与非传统经济部分并存。二元经济结构可以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来考察，也可以从部门经济、区域经济、再生产个别或总体领域来考察。二元经济结构根据其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类型。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1）经济中的较发达部分和较不发达部分二者在经济上基本处于彼此隔绝状态，除了有限的商品交换而外，其他联系很少，甚至不存在。并且在商品交换中，发达地区较多地向不发达地区出售工业品，而不发达地区较多地向发达地区输送农产品和矿产、原料等。2）经济中的较发达部分和较不发达部分各自有自己的经济活动方式：较发达部分的经济是商品经济，较不发达部分的经济带有较浓的自然经济的性质，商品性较弱。3）经济中的较发达部分和较不发达部分各自的发展途径不一样：较发

达部分的经济的发展不仅依靠自身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较不发达部分所作出的贡献或牺牲；较不发达部分由于要为较发达部分作出贡献或牺牲，加上自身力量本来有限，因而不得不处于衰落、分化、解体、分化使本身尚保存的部分得到发展。开放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1）经济中的较发达部分和较不发达部分之间除了存在商品交换关系而外，还存在着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交流。较发达部分不限于向较不发达部分出售加工制成品，较不发达部分也不限于向较发达部分出售农产品和矿产品，这两部分还相互提供资金、技术、人力，联合生产，联合经营。2）在开放条件下，经济中的较不发达部分由于受到经济中较发达部分的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两部分的联合生产和经营，它的商品性日益加强，自然经济的性质则不断减弱。3）在开放条件下，由于经济中的较不发达部分受到经济中较发达部分的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两部分相互提供资金、技术、人力以及联合生产和经营，较发达部分的经济的发展除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而外，要依靠较不发达部分的协作；而较不发达部分的经济的发展除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而外，也要依靠较发达部分的协作。这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中的较不发达部分并非通过自己的衰落、解体、分化而使本身尚存的部分得到发展，它将同较发达部分一样，在两部分交流和协作中得到发展。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自然、地理、人口、经济、文化等特殊环境，二元经济结构的种种特征在中国现阶段表现得十分突出。

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 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建立在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而不存在多种经济形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问题。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不同形式的公有制，而且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经济形式，对于象中国这样原先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在中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公有制，而且还存在着公有制占优势条件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形式，中外合资经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私营经济、各种形式的合作、股份、联合、混合经济形式。

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与之相应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客观要求。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总状况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生产力总水平不高，并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所有制形式不仅有可能多样化，而且公有制的公有化程度不可能太高；第二，生产力构成多层次，既有现代化、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大生产，又有半机械化、半手工劳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还有广泛存在的手工劳动方式，这就决定在中国必然会有不同形式的经济形式与多层次的生产力相适应。在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化程度很高、经营范围广泛的全国性行业和大型企业中，客观上要求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实行统一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农业，中等水平和中等规模的工商业以及手工业中，则适合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一些宜于分散经营的手工劳动和小型商业活动，则可以由劳动者个体经营或由私人雇工经营。由于中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资金缺乏，技术条件、管理水平落后，有必要允许和鼓励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适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了充分搞活微观经济，调动地区、行业、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商品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应该允许试验、推广和发展各种形式的股份经营、合作经营、联合经营、混合经营，等等。在上述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其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又居于主导地位；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

看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否优越，是否先进，不在于它的规模多大，公有化程度多高，而在于它是否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符合生产力的性质并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先进的、优越的所有制；不符合生产力性质并阻碍其发展的所有制就是落后的、不优越的所有制，就必须加以调整和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又称社会主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表现。社会主义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条件下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确立。后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在形成过程中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过渡时期，多种经济形式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结束，“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在过渡时期，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而在社会主义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而中外合资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均不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

社会主义公有制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劳动人民或部分劳动人民共同所有的一种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崭新的所有制形式，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直接结合，不再有剥削者横插其间，在公有制范围内，劳动者共同劳动，共同管理，使生产资料为劳动者的利益服务。第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各公有制经济单位之间还存在着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而使社会主义各公有制企业之间彼此以商品生产者相互对待。同时，由于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各公有制企业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关系。所以，社会主义各公有制单位之间既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又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关系。第三，劳动产品不再被剥削者所占有、所支配，而是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一部分产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另一部分产品则在劳动者之间实行按劳分配。第四，劳动者的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不再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条件。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劳动人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更快地共同富裕起来。以上四点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点，也是公有制的基本内容。不能把公有制仅仅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单纯归属关系，它应当是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总和。

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的规律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生产关系，它的发展、完善和巩固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有制的形式和某些具体内容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类型。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本质特点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并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新型生产关系。它的本质特点是生产资料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人和管理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生产和交换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劳动产品的分配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利益的原则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的规律的客观要求，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它的基本特点是：1）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2）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3）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4）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5）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实践认识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将不断得到调整、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归宿是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它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通过直接"剥夺剥夺者"建立起来，并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的。全民所有制的范围包括矿藏、水流和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森林、山地、、草原、荒地、滩涂等海陆自然资源，以及属于全民所有的工厂、农场、交通运输设施，银行、商业企业等全民财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同比较高的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实现了全体劳动者在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上的平等。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采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形式；第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及其他所有制并存，"全民不全"；第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常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因素，表现在：每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具有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商品生产者，不仅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有权支配、使用生产资料，而且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承担经济责任，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某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自有资金和集体组织认购的股金不仅存在而且在增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由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由于全民所有制采取了国家所有制形式，这样，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形成了国家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方面关系特别是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

重要问题。就全民所有制范围内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言，国家作为所有者，有权通过计划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企业集中必须由国家统一使用的纯收入，委派、任免或批准聘任大型骨干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员，并且可以决定企业的创建和关、停、并、转、迁。但是，国家不是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者、支配者和使用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这是因为：1）企业是整个社会分工体系的基础环节，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在生产上具有相对独立性。2）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复杂，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3）现阶段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企业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同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要承认企业的独立的物质利益，就必须授予企业必要的经营权利。这就是说，不能把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因此，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的产品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在中国现阶段，实现全民所有制企业两权分离的形式主要有：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形式。

就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言，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关系的原则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地方分级管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做到既要反对"条条专政"（中央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反对"块块专政"（地方政府垄断经济管理，排斥中央指导），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

社会主义国有制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又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见本卷：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通常指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严格意义上，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由国家组织直接经营的经济。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国营经济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国营经济分中央国营经济和地方国营经济两种类型。

社会所有制 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一种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剥削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将转归社会所有。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社会所有制中，全社会的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之间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是平等的；他们实现了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他们的劳动是"自由人的联合劳动"；生产资料的使用、支配和处置都服从于全社会的利益，任何个人或集体都不能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来谋取自己的私利；既然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消亡，人们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为价值，社会产品也不表现为商品；社会的产品在劳动者之间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来设想在一个根本点上是不同的，即社会主义不是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并且相继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样现实的所有制关系与他们原来的设想首先出现两点不同之处：第一，由于资本集中没有达到极高的程度，因此"剥夺剥夺者"而转交给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只能是一部分，即这种社会所有制没有包括社会全部生产资料，这样，在这种所有制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所有制关系。第二，在国家没有消亡的条件下，这种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不过是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在南斯拉夫，对社会所有制有另一种认识。他们认为，在社会所有制下，生产资料和其他社会劳动资料及矿藏等自然财富既不归任何个人、集体或集团占有，也不归国家所有，而是为整个社会所有。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只能用来满足劳动者个人的和共同的需要，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自治关系。在社会所有制企业里，劳动者有权直接使用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资金，直接管理这些生产资料和资金，并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认为原有的国有制形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50年代开始，决定实行社会所有制。1963年，南斯拉夫宪法正式把社会所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劳动者进行自由的联合劳动，实现社会主义自治。

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 始于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实行的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工人自治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是：1）用社会所有制

取代国有制。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个人占有，而是为整个社会所有。2）在社会所有制企业里，劳动者有权直接使用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资金，直接管理这些生产资料和资金，劳动者个人收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3）取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代之以计划指导下的市场机制。社会所有制企业之间实行竞争。4）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宏观运行进行调节。5）企业由工人管理，根据一人一票原则，由劳动群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民主地管理经济。6）工人分享企业收入。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工人收入最大化。7）社会福利事业均由劳动群众通过民主协商管理。8）在国家建设方面，工人自治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以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度作为各级政权组织的基础。国家建设实行联邦制、民主集中制、轮换制和集体领导等原则。9）实行党政分工的原则。不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使全体人民都能参与管理国家。进入8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部分劳动群众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它是与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同全民所有制相比，集体所有制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上的平等只限于一个集体经济内部，在不同的集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完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独立经济实体。在中国现阶段，不少集体经济组织中含有个体经济的因素。集体所有制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农业中主要的所有制形式，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在城镇，集体所有制普遍存在于工业、商业、服务业领域。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具有资金少、规模小、经营灵活、吸收劳动力多等特点。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满足人民需要、吸收待业人员参加生产和服务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集体所有制有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两种类型。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所有制　又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财产”。专指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消费品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和支配的制度。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财产主要包括个人的按劳分配收入以及银行存款收入，归个人及其家庭所有的各种生活资料。公有制经济劳动者从事家庭副业的收入，他们的投资收入，以及个体私营经济的收入，虽然也是个人财产，但不属于这里所说的个人所有制范围内的内容。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曾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7页）恩格斯在谈到个人所有制的内容时指出：“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0页）。

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　又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广泛使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代化生产力。任何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总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的规律的客观要求。封建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手工工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大机器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更进步的现代化生产力。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具体标志是：1）具有比资本主义物质基础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化程度，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普遍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全国各个地区，形成较为合理的生产力部门结构和生产力地区结构；3）能够适应并容纳世界最新科学成果和技术潮流，不断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应当建立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得到发展的国家必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起来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首先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很不充分发展，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高度激化的国家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些国家，必然面临着迅速发展生产力，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宏伟任务。就中国而言，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物质技术基础雄厚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　又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现代化。具体指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和管理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动态概念，它的内容是指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力已经达到的先进水平。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现代化的质和量的规定性是不同的。例如，本世纪初，电气化的广泛应用可以看作是当时现代化的生

产力，但是用它来界定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内涵就不够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生产力的现代化很难用一个或几个具体的静态的生产力标志去衡量，只能同处于同一时代的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比较中来衡量生产力现代化实现的程度。就中国而言，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已经接近或达到当今发达国家的水平（如航天技术、某些科研领域的研究成果等），因此，可以说这些方面已经现代化了。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的生产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还落后许多年。因此，衡量中国生产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准还不能停留在目前世界先进水平上（无疑，这也是奋斗目标之一），而是若干年后，中国在生产力总水平上已经接近或超过的同一时期发达国家所具有的那个生产力水平。

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使其逐步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断奠定物质基础；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有实现了现代化，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可见，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战略任务。

在国民经济现代化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手段装备农业，用先进的科学方法管理农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的高层次的农业。其目标就是要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善农业产品结构，使农业不仅全面增长而且适合社会需求结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而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在中国，由于人口多，耕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业发展不稳定，因此，加强农业建设，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尤为迫切和重要。当然，强调现代化建设中农业的基础作用，决不意味着工业现代化可以降到次要的位置。事实上，农业的现代化要以工业提供的现代技术装备为条件，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劳动对象的优化处置也要以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艺过程为前提。因此，农业的真正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不能脱离工业现代化的推动。工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

无论是农业现代化，还是工业现代化，或是作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保证的国防现代化，都离不开科学技术进步。从生产力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例如，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兴起正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化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也正是由于新科学知识、新技术成果的产生与应用推动的：核子物理学的建立与发展，推动了核能工业的发展；宇宙喷射技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纪元；人工智能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改变了整个工农业生产的传统工艺结构；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使劳动生产率迅猛增长，经济效益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巨大增长。总之，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此同时，必须看到，现代化的农业、工业和其他部门离不开科学管理。只有通过科学管理，才能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科学合理地组织起来，产生出最佳效益。而科技的发展和管理的现代化，乃至整个经济的振兴、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经济决策的某个失误，可能立即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失，损失可能是巨大的。而教育决策的失误，也许不会立刻给国民经济带来明显的损失，但它所造成的长久危害却是不可估量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程。它的基本内容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工业，并用它去装备农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使机器大工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占居优势地位。在物质技术基础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之后，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把工业、农业、国民经济建设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改变落后的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状况，使农业国向工业国方向转化。同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对内剥削和对外掠夺、扩张的基础上。它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依靠本国资源的开发和内部资金积累。在此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积极争取外援，引进外国资金、技术、管理，增强本国经济建设的能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各项措施的安排，要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切实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必须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要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1958年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的。按当时的解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途径，尽快地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在当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并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客观经济范畴。它的内容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有两个方面内容：1）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包括生存资料的需要，即维持生活、延续后代的需要；发展资料的需要，即发展体力和智力等方面的需要；享受资料的需要，即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娱乐等方面的需要。2）劳动者的公共需要，包括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和其它公共福利事业的需要。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对于生产的继续发展、社会的进步，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固然极其重要，但是，满足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内容；因为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一样，都是属于生产本身的事情，如果把扩大再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等于说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这在逻辑上陷入了同一命题的自我循环。更为重要的是，把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当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它会在客观上给"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作法提供理论依据。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国防，是社会主义现阶段及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维持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保证，须臾不可削弱和受到损害。但是，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也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是因为：首先，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尽管它们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毕竟是为经济基础和生产服务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保证和条件，而不是生产目的本身。其次，巩固国家政权和加强国防力量，是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共有的现象和共同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最后，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与巩固无产阶级和加强国防的需要，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前者是不断增长，而后者需要的程度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国防环境，从历史的总趋势来看，它们并不具有不断增长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 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必然性。它的特点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的内在联系，通过社会中心（在还存在国家的条件下，这个社会中心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有计划地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比例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分配，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任何社会化生产，客观上都要求各个生产部门、各个行业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革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369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客观比例关系是通过价值规律盲目作用，并通过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强制实现的。社会主义生产也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不仅使得按比例发展社会生产成为必要，而且为有计划的实现这种比例关系提供了可能，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成为客观必然，这是因为：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的状态。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生产再也不是私人的事情，不能完全听凭各个生产者"各自为政"。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既要求按照一定的统一的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活动，也为有计划地发展社会生产开辟了道路。2）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各个生产者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生产的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形成了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利益既要求社会对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以协调整体与局部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为社会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提供了可能。3）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社会的生产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少数剥削者的私利，而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各

部门、各行业、各企业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活动。为了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活动的需要，要求社会有计划的调节社会生产活动；而共同的生产目的又使这种调节成为可能。4）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全体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巨大的社会财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实行有计划调节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物质保证。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仅具有客观的必要性，而且具有实际的可能性。这种客观必要性和实际可能性的统一，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必然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方面，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也就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公有制两个经济条件决定的经济规律，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也存在着某种形式和程度的国家计划干预，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表现出来的计划发展不是计划规律作用的必然形式。

社会主义劳动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不受剥削的劳动者，为了自己和为社会有计划地进行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其他社会劳动。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劳动者的劳动由劳动者自己的组织来管理和指挥，是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的劳动，它与私人劳动不同，已经具有直接的社会劳动的性质。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劳动还处于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劳动产品的交换还需要通过价值形式加以比较和进行核算，社会主义劳动的社会性还需要通过价值形式来表现。

社会主义劳动，是不受剥削的自主的劳动，是解放了的劳动者为自己和为社会进行的劳动。劳动者不再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而是生产用来满足公共需要和劳动者个人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仅必要劳动属于劳动者自己，剩余劳动归根到底也属于劳动者自己。社会主义劳动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社会或劳动者自己的集体的自主劳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他们的劳动不但不受任何压迫，而且受到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支持、鼓励和保护，这就为劳动成为劳动者自觉的劳动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努力劳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断提高，使社会主义劳动在本质上成为社会生产过程主人翁的具有社会觉悟的劳动者的自觉的劳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劳动属于劳动者自己，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社会或劳动者自己的集体，是劳动者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劳动者还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从社会领取消费品，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还不能不是从事劳动的个人从社会获得消费品的手段，也就是说，劳动还是劳动者个人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劳动者究竟能够取得多少生活资料来满足自己及家庭的消费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他自己的事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还是有报偿条件的劳动，还不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者共产主义觉悟的极大提高，劳动才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全体劳动者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虽然具有共产主义劳动的因素，但它还不是成熟的共产主义劳动。

社会主义必要劳动 社会主义制度下从事物质生产和生产性服务的劳动者为满足本人及其家庭需要所进行的那部分劳动。它创造必要产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直接结合在一起，这就排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否定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但是，剩余价值的否定，并不是剩余劳动的否定，剩余劳动的存在使社会有可能从事维持生存所必要的产品以外的生产和科学文化艺术等活动，剩余劳动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是在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的，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既要用来满足他们个人需要和当前需要，又要用来满足他们共同需要和长远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劳动也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要劳动具有双重的含义，对劳动者来说，它是必要的，因为它给自己创造了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对剥削者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它再生产出劳动力，为剥削者提供一个继续剥削的对象，资产阶级总是设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具有对抗的性质。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要劳动获得了崭新的内容。在这里，劳动者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必要劳动时间不再由劳动力价值决定；同时，随着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抗性质的消除，必要劳动的范围也会不断扩大。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

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8页)。

社会主义剩余劳动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所提供的，超过维持自身与他所赡养的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以外的那部分劳动。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产品。

剩余劳动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劳动者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产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产生的。在阶级社会里，剩余劳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剥削阶级占有。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是阶级社会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废除了对剩余劳动的剥削。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劳动仍然分为必要劳动—即用于满足劳动者同他所赡养的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的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以外的其余部分。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社会主义剩余劳动的社会职能在于：(1)是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指示："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同上)；(2)用于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必要的社会储备基金和保证基金；(3)用于满足非生产性部门的职工的生活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范畴同阶级社会中的剩余劳动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归资本家占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归整个社会或集体占有，归根到底归劳动者占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成为进一步扩大对工人剥削的手段，另一部分剩余价值则成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为他们服务的政府官吏等享受奢侈生活的支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创造的社会纯收入，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用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对剩余劳动存有无限的占有欲望，往往把必要劳动压缩到最低限度以提高剩余劳动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剥削，已经"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同上书第23卷第578页)

社会主义必要劳动产品　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从事物质生产和生产性服务的劳动者及其家庭需要消费的一定量的产品。它是由社会主义必要劳动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把必要劳动产品限制在足够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狭小的范围内，以此来增加剩余产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成了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必要劳动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因此，必要劳动产品的内容和范围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扩大，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将逐步提高和改善。(参见本卷"社会主义必要劳动")

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产品　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和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产品。是总产品中扣除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维持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本身同他所赡养的家庭成员需要的生活资料以后的剩余。在价值形式上表现为社会纯收入。在我国，剩余劳动产品在国营企业中一部分通过上缴利润和税金形式归国营企业自主支配；在农村集体经济中，一部分通过上缴的税金和价格差额归国家统一支配，一部分以公积金和公益金等形式归集体单位自主支配。

任何社会形态，总产品在扣除用于补偿生产消费的部分以外，都要划分为必要劳动产品与剩余劳动产品。社会主义并不消灭剩余劳动产品这一范畴，而是根本改变了剩余劳动产品的社会性质。在阶级社会里，剩余劳动产品始终"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以剩余价值形式为资本家阶级占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版第40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剩余劳动产品转化为资本积累，用于进一步扩大对工人的剥削，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的奢侈享受。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劳动产品转化为积累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被用于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竭力降低工人的必要劳动产品而取得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产品，在那里必要劳动产品的存在只不过是增殖剩余劳动产品的一种手段，必要劳动产品和剩余劳动产品之间有着不可调和

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要劳动产品和剩余劳动产品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消失，社会能在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在保证归劳动者占有和享用的必要劳动产品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有计划地不断增加剩余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产品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源泉，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产品增长愈快，社会主义生产和科学文化及其它事业的发展的速度愈快，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增加剩余劳动产品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人们就能够在不断增加必要劳动产品数量的同时，不断增加剩余劳动产品的数量（参见本卷“社会主义剩余劳动”）。

社会主义劳动日 专指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单位计算劳动者的劳动消耗和劳动报酬的一种单位。一般几十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社员劳动一天应得的工分，一般是由其所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根据社员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定出底分，再根据他们完成的农活的数量与质量、劳动态度等条件、经过民主评议确定。实行计件工分时，则根据完成的劳动定额来确定。在年终分配时，由生产队统一计算出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然后据以计算每个社员全年应得的个人收入。社员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所做的劳动日的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劳动日值的高低，即等于二者的乘积。但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集体经济单位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生产单位，不同时期的劳动日值是不一样的，有的社队高些，有的社队低些，同一社队丰年高些，欠年则低些。

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劳动日概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所使用的劳动日概念是指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比较两部分劳动时间可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剥削的程度，而社会主义劳动日则是指社员为集体和个人劳动的时间的总和，为集体劳动的价值最终仍是为劳动者自己服务的。

社会主义劳动日制度最早出现在30年代苏联的集体农庄中，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都曾采用过这种制度。社会主义劳动日，不仅作为衡量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量的标志、而且作为按劳分配的计算单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开始阶段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管理手段、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劳动日制度存在着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端，不利于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包产到户由于仍以工分为计算和分配单位，后来就逐步为包干到户的经济责任制形式所取代，到80年代初，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都实行了包干到户，工分制度的使用范围已大大缩小，全国已基本上不再使用劳动日这一计算方式。

社会主义土地有偿使用 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中国从1987年起，在深圳经济特区及上海、天津、广州、福州、厦门、海口等城市先后试点执行。其具体内容是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则由政府以有偿转让的形式实地出租。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使用权定期有偿地出让给土地需求者，这实质上是土地所有者即国家定期出租土地，受让者即承租者要一次支付整个使用年期的租金，并按规定如期完成土地开发任务。第二个层次则是已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按租约规定完成土地开发任务后，再将规定使用年限内的余期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房地产需求者、以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使用年限期满，土地和地面上的建筑物都由当地政府无偿收回，需要继续使用的，可以申请续期，批准后要再付一次所续年期的租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对象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外商。出让、转让的形式有个别协议、招标、公开拍卖等。目前中国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在农村中试点推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社会主义土地公有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土地所有权，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应该最终实现全部国有化。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中，都很快消灭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而建立起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形式。主要包括：①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③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外，也存在少量的个人所有制。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是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之成为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然后，再通过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社会主义社会产权界定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明确化。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应该具有明确具体的表现形式，具有人格化的体现者，同时，这种所有制关系应具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表现，从而使所有制关系法律化、规范化。具体地讲，就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资产、债权及企业责、权、利和风险等相关权益的界定，其内容包括：1）现有企业物质资产的评价及归属；2）无形资产的内容、边界及归属；3）投资收益、资产经营收益和劳动收益的界定和分配；4）资产增殖的经济依据、增殖率、增殖效益的界定，5）企业债务、契约责任及其补偿原则的规定，6）企业破产及资产处置的原则和界限，等等。从广义上讲，产权是指所有权和债权，狭义上的产权仅指债权，即所有权在市场交易中的体现，其本质是与生产相关联的财产支配权与责任。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已使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了分离。所有权的权能中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已越来越多地分摊到不同的经济主体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传统的集权体制使所有权与使用权原始地统一起来，用行政组织管理经济、命令经济与大锅饭相结合，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低效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但是由于分工的存在，属于共同所有的社会财产，只能由个别企业来具体占有使用，因此，必须使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社会主义社会的产权界定，就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它要求企业具有独立的财产经营权、并承担相应的财产责任，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企业必须有偿使用公有财产，使企业的利益与公有财产的损益相联系，保证公有财产的完整与不断增殖，为使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人们行为的实际准则，必须通过法律形式建立财产经营的契约关系。保证企业独立的经营地位和财产占有者的权益。社会主义社会产权界定是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克服企业行为短期化的根本措施。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产权界定是困难的，它不仅要求一定的政治环境，而且要求相当程度的经济社会组织及机制的发育和完善。

社会主义社会产权兼并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权转让，是社会主义社会财产所有权及其所包括的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变换，或在财产所有权并未或者不完全转移的情况下，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转移。其内容既包括物质形态资产如厂房、机器设备、土地、原材料等的吸收和兼并，也包括企业的货币资产、债权债务、技术专利等非物质形态资产的合并。社会主义社会产权兼并，形式多种多样，有同一市场上从事同一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两个企业之间的横向合并，有同一市场上彼此产品系列相联系的不同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企业之间纵向合并，还有产品和市场毫无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兼并，此外，既有同地区、同行业之间的产权兼并，又有跨地区、跨行业之间的产权兼并，既有国营企业之间的产权兼并、又有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产权兼并等。

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产权兼并表现为通过市场竞争导致某些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有偿地转让给别的企业、但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产权兼并实际上是表现为企业资产的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有偿转让，只有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之间，才涉及真正的所有权的转让。社会主义社会产权兼并有利于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优化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国有资产硬约束机制的形成和国有资产的合理使用；有利于加速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有利于发展和壮大企业家的队伍。

社会主义股份制　指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发行股票或债券，筹集资金、调节社会资源分配并改革优化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种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制度。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发展起来的，由股份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组成，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股份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最发达形式，在股份制中，所有权远离生产过程而仅仅表现为对生产效益的关注即收益权，财产支配权则属董事会领导下的经营阶层，经理阶层则具有制定长远发展战略，管理企业的权力，所有权的权能中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日益分离。为了改革我国传统的集权体制，解决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大锅饭等弊端，中国借助于股份制的机制，想以此为基础构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内在机制。中国出现股份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是乡镇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试行股份制是随着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而兴起的。中国目前试行的股份制大体有三种类型：1）企业间的各种生产要素“参股”形式的联合型股份制企业，包括：固定资产投入股，即参股方对闲置的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折价后作为股份投入联合企业；资金入股，即参股方用自有资金或借用信贷入股；技术软件入股，即将技术软件折合成股份投入联合企业；2）企业原有资产核股和职工个人投股构成的股份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份一般由国家股、集体股和个人股构成，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股份一般由集体股、个人股构成；3）既吸收企业内部的职工股份，又吸收社会上其他事业单位的股份而组成的股份制企业。

不同类型的股份制企业，采用不同的利润分配和

利息分红方法。上述第一种类型的联合型股份制企业，一般是按照投资比例或按产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分配利润；第二、第三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一般国家股和集体股不计付利息，只参加分红，个人股则计息分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股票绝大多数是保本保息的。也没有形成真正的股票市场。股份制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股份制的作用仅限于动员和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尽快发展国民经济上，股份制并没有完全做到使所有制关系具体化，增强企业和个人对资产增殖的责任感，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国民经济超分配的一个渠道。

社会主义商品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出来的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同其他社会制度下的商品一样具有商品的共性。如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的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但社会主义商品又有自己的特点，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与私有制经济的商品相比，如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相比，又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社会主义商品反映的生产关系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商品是资本赖以存在的一种形式，反映的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商品所反映的是劳动者之间交换劳动的互助合作关系。其次，社会主义商品的内在矛盾的性质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决定着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等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商品内在矛盾表现为对抗性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商品内在矛盾的对抗性根源已经铲除，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社会主义商品的内在矛盾，仍通过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表现出来，而这种矛盾可通过有计划的调节加以解决，再次，社会主义商品的范围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关系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连人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都被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国有的自然资源也不再成为买卖的对象，商品是历史范畴，但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大力发展，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用于交换的产品生产。从历史上看，商品生产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除了社会分工这个条件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产品占有方面还有以下特点：（1）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它们相互之间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原则。（2）集体所有制之间，彼此也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所有制，劳动产品归不同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3）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虽然各个企业的所有权都归全民，但彼此之间又是作为独立的占有者、经营者、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发生联系，相互之间存在着独立的经济利益。所以各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也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发生经济联系。（4）还存在着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社会主义企业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只能是商品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和劳动者同企业之间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换。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商品交换。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和商品生产相适应，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存在于：（1）全民所有制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2）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3）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4）社会主义企业与非社会主义企业或非公有制经济之间。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除了具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共同点之外，还存在着自己的特点，它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相比，具有自己的本质特征：（1）目的性不同。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只是为了换取某种使用价值，以满足小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价值增殖，即给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生产日益丰富的社会产品，用来满足整个社会的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2）运行方式的不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在盲目竞争和全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价值规律作为市场上的一种自发力量强制贯彻，通过市场价格的涨跌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不仅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同时也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整个社会生产具有计划性。（3）结果不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结果是促使两极分化，大资本并吞小资本，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是使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为合理，实现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劳动者共同富裕。(4) 范围不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发展范围是无所不包，到了其发展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连劳动力，自然资源等都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商品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排除了劳动力，国有自然资源作为买卖的对象，并限制一切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论　把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自给自足经济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名义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来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是用自然经济的观点和办法来看待、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自然经济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可以一目了然，劳动产品不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重性，劳动不再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重性，全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归集中统一计划支配等等。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影响，表现在：(1) 没有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观点。经济管理只讲实物管理，不注重价值管理。(2) 没有等价交换观点。把价格看成为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价格论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3) 没有流通观点。把全民所有制经济看作一个大工厂，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实行无偿调拨，以配给和实物分配取代交换、流通。(4) 没有用最小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观点。资金无偿供给，不讲投资效果，生产不计盈亏。总之，在经济生活中，自然经济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排斥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经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企业与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自主权；排斥市场机制，用行政办法和实物指标进行经济管理；经济组织结构搞大而全、小而全、条块分割；利益动力方面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等。

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论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在这些国家中，缺乏社会化大生产传统，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占优势等等，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和论点，被用自然经济论的观点去理解，接受和解释。因此，清除自然论的流毒和影响，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工作。

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　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产品经济，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这种观点名义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来认识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它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很深的影响。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根除了商品经济存在的基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要逐渐消亡。价值规律不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作用，要用计划取代市场。价值，利润的范畴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是产品的实物管理，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1) 在所有制结构上排斥非公有经济，盲目追求公有制经济的"一大二公"；(2) 在经济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3) 否认企业的自主权，企业仅仅成为社会大工厂的生产车间；(4) 否定价值规律、不重视价值、利润等指标，不注重经济效益。(5) 不讲个人物质利益，以整体利益、全局利益取代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利益分配中搞"平均主义"。这种教条主义观点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认真彻底清除的错误理论。

社会主义必要产品价值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那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它相当于劳动者为满足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个人消费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代表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2—993页)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工作日也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劳动者创造的产品也包括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两部分。社会主义的必要产品同资本主义的必要产品相比，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社会主义的必要产品不再同劳动力的商品性和劳动力价值相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以及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劳动者不必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来获取自己的必要产品。劳动者获得必要产品不再采取劳动力买卖形式，而是由社会依据劳动者在社会总产品生产中付出的劳动数量与质量而分配的。尽管这个过程要靠工资实现，但这时工资并不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而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凭证或工具。其次，社会主义必要产品的内容也不再是由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不再仅仅局限在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

的生存资料以及少量为培养，提高劳动技能所必需的发展资料范围内。由于公有制的建立和生产目的的改变，劳动者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必要产品就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和家庭的个人消费而生产的那部分产品，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直接体现，其范围日益扩大。再次，社会主义必要产品的数量界限不再限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马克思曾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劳动者必需的消费资料的数量界限“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0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要产品的数量界限，主要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者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不限于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对生活资料的基本需要。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也必然相应提高，从而构成必要产品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将日益增加，质量将日益提高。同时，许多为劳动者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已经并将继续被纳入社会主义必要产品的范围。

社会主义剩余产品价值 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部门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那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即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价值。剩余产品是在一切存在剩余劳动的社会形态里都存在的。恩格斯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产品的社会性质和用途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社会相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剩余产品始终“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产品以剩余价值形式为资本家占有并将其中一部分或大部分再转化为资本，用于加强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因而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体现着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以及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就其社会性质而言，是劳动者为整个社会即整个劳动者集体所提供的劳动。因此社会主义剩余产品是整个社会或归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成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公共财产，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和先决条件，体现着劳动者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除保留一部分供本企业扩大再生产之用外，其余部分分别以上缴利润和税金两种形式上缴国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劳动者提供的剩余产品，则在上缴国家税金之后，主要以“公积金”形式留归本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等。由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的剩余产品，依据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通过财政预算形式，用于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再生产基金；2）非生产部门劳动者消费基金；3）非生产部门基金，其中包括国家管理基金；4）社会后备基金；5）社会保证基金等。

社会主义必要价值 一种理论表述，实际上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劳动者为满足自己和家庭成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力价值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它不再同劳动力的商品性和劳动力价值相联系，而是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相联系；其次，它不再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被压低到最低限度以内，而是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

社会主义额外价值 一种理论表述，实际上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是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价值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它不再为资本家私人占有，而归整个社会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其次，它不再是资本家阶级扩大和加强对劳动人民剥削的源泉，而是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积累源泉；再次，它的增长不再靠加强和扩大对劳动者的剥削而获得，而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它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源泉，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价格与价格体系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社会主义价格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形成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是在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下自发地形成，经常波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总的说来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表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因此市场价格必然以价值的转化形成的生产价格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以什么为基础，有不同意见，分歧主要在于价格转化中的盈利额

如何确定：(1) 按平均工资盈利率来确定；(2) 按平均成本盈利率来确定；(3) 按平均资金盈利率来确定等。但不管怎样，社会主义价格都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尽量符合社会必要劳动的耗费。当然，以价值为基础，并不等于说价格不能背离价值，因为价格除了以价值为基础外，还要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其他经济规律的要求等。

各种商品的价格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从而形成价格体系。社会主义价格体系结构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中国，按照价格管理体制对各种价格进行分类，社会主义价格体系应当包括计划价格、非计划价格或自由价格；按照不同部门商品在流通中的不同阶段来分类，社会主义价格体系包括工业品出厂价、农副产品收购价、批发价、零售价等。在社会主义价格体系中，正确处理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以及同一种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由于购销环节、购销地区、购销时间的不同和产品质量的不同而形成的差价关系有其突出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由于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价格体系存在严重扭曲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就不能正确评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不能保障城市物资的顺畅交流，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也会严重妨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价格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越来越显著，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也就愈益显得重要和紧迫。

社会主义影子价格 影子价格的含义有两种，广义的泛指一切与流行价格不同的计算价格；狭义的专指运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出来的反映资源最优配置的价格，也称最优计划价格。在评价投资项目和进出口活动的经济效果时广泛运用计算价格。进行这类评价要使用项目投入和产出物品的价格，而现行价格受各种因素干扰而常常偏离其质的规定性，用之评价经济效果会使结果失真，所以要借助于排除价格不合理成分的影子价格进行。这类影子价格视不同需要计算方法和经济内容不同，主要有：边际成本、扣除进出口关税影响的国际市场价格、考虑了税收和补贴的市场价格等。20世纪中期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丁伯根和苏联经济学家坎托罗维奇分别提出了狭义影子价格的计算方法，即通过解线性规划或拉格朗日函数，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极值而得到。自然资源、劳动力劳动产品对于一个企业或整个国民经济来说都不是无限的，最优计划应该能充分利用这些有限资源，取得最大经济效益。计算所得的一组影子价格反映了劳动产品、自然资源、劳动力的最优化使用。资源越是稀缺，其影子价格越高，充分满足需要的资源，其影子价格为零。最优计划价格理论（影子价格理论）在苏联计划价格形成理论中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在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学讨论中影子价格的概念引起注意，最初在可行性研究领域使用，后来有人主张中国的计划价格也应以影子价格为基础。但一般认为影子价格不能作为计划价格形成的客观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影子价格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社会主义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的结构和发展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商品交换的发达程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市场上交换关系的多元化，决定了市场结构的复杂程度，因此，市场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以不同标志来划分。我国的市场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它反映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特点，体现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交换关系。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结构既具有一般市场的共同性，又具有其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1) 从商品用途特点来看，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同，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有不同的用途，因而依据商品用途的自然属性相近的群体划分，可以把整个市场分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2) 从商品销售地域来看，由于人类社会第三次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商品交换集中的地方，逐渐形成了城镇。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城市脱离农村而独立，从而出现了与原来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城市市场；(3) 从商品交易方式看，商品交易的形成基本上分为二类，一类是零售，一类是批发；(4) 从市场管理方式来看，我国的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了商品交换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商品的计划程度是不一样的。按照商品交换的计划程度和依据不同计划程度所实行的市场管理方式，可以把市场划分为计划市场和非计划市场。计划市场又分为指令性计划商品市场和指导性计划商品市场。

按照不同标准划分的各类市场组成市场结构，综合起来构成我国的市场体系。

社会主义援外基金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中用于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或其他方面援助的基金。包括无偿援助和有偿援助，后者有无息和低息两种。其具体形式有提供贷款、提供物资、帮助修建工厂、铁路、公路、桥梁以及各种非生产性建设。我国在对外援助中，一贯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努力帮助受援国开发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

济，以实现其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社会主义财政 社会产品价值通过国家的集中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社会主义财政的职能是筹集资金、分配资金、监督资金的使用。财政分配的基本特征是：(1) 货币形式的分配；(2) 以国家为主体的集中性分配，即全国范围内的分配；(3) 具有无偿和强制的性质。社会主义财政的资金的主要来源：全民所有制企业创造的纯收入（税金和利润）；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经济上缴的税金。

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包括：国家预算和国营企业财务。国家预算是最基本的收支系统，企业财务则是财政分配的基础和源泉。国家通过积累和合理分配资金及监督资金的使用，促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社会主义财政收入的增长，依靠生产的发展和内部积累。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体现了社会主义财政的生产性、计划性和人民性。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社会净产品，即补偿同期内消耗的生产资料以后的那部分社会总产品。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包括该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和扣除补偿部分后的生产资料。以价值计算的国民收入就是该时期内投入物质生产部门的全部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

决定国民收入生产量的基本因素是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人数和劳动生产率，以及生产中的物质消耗。由于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国民收入的生产总量。国民收入的计算范围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邮电运输业和商业五个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收入没有按工厂法计算的工业总产值那样包含对社会产品中转移价值的重复计算，比工农业总产值能更全面地反映物质生产部门的经济活动成果。因此，国民收入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

国民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综合指标。它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制约着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之间在总量和构成上的平衡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国民收入在创造它的生产部门进行的分配。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是原始收入，包括国家集中的纯收入、生产单位的纯收入和生产者个人的收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分为职工工资和奖金、企业利润留成（扣除用于奖励基金部分）以及通过企业纳税、付息和利润上缴等形式由国家集中的纯收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创造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分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劳动报酬、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及向国家财政上缴的税金。除了农民自给性生产部分以外，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一般是通过货币形式进行的。在初次分配以后的货币和商品的交换过程中，部分原始收入将通过价格的再分配职能发生转移。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形成原始收入以后，经过国家财政、非生产劳务和价格杠杆实现的进一步分配。再分配形成的收入是派生收入。派生收入包括：基本建设单位和国家储备部门来自国家预算的收入；国家行政机关和国防部门来自国家预算的收入；教育、科研、文化、卫生部门来自国家预算的事业费收入；非生产部门由提供劳务而从企业或居民个人取得的收入；非生产领域职工的个人收入；社会赡养人员的个人收入。这些派生收入是保障国家建设，扩大社会再生产，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保证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得到社会赡养所必需的，但它的分配必然受国民收入总量的制约，因此，在分配时必须量力而行，统筹兼顾。由于价格背离价值而在商品交换中转移的收入也是一种派生收入。这种通过价格杠杆实现的再分配，不仅涉及生产领域内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国家、企业和个人收入的转移，也涉及非生产领域内部收入的转移。因此，国家在制定价格政策时必须注意正确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社会（主义）消费基金 社会主义社会用于满足社会消费性的一般需要和共同需要的基金。社会一般消费基金是国民收入中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的经常费用的社会消费基金。它是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但是，这类费用对社会来说是纯粹消耗性开支，因此，应该在厉行精兵简政的条件下力求节约。社会共同消费基金是国民收入中用于教育、科研、文化、卫生部门的经常费用和用于社会保障的社会消费基金。用于发展教、科、文及卫生事业的文教卫生基金是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它又是增进人们的脑力和体力的发展以及实现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的物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带有生产性的共同消费基金。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这类共同消费基金将逐步增加。社会保障基金是丧失劳动能力或需要社会救济的人们的生活来源，它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增长。

社会主义积累　指有计划地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进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和建立物资后备。与资本主义积累不同，社会主义积累从根本上排除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无论是用于积累的那部分产品，还是由于积累而增加的社会产品，都是广大人民的共同财富，被用来造福于人民群众。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社会主义得以发展的基础。积累的规模及增长速度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用于积累的基金叫积累基金。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叫积累率。积累率的高低受生产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改善程度的制约。

社会主义积累基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扩大公共设施和用作社会后备的那部分基金。它按照用途、可以分为扩大再生产基金，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和社会后备基金三部分。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

社会主义分配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社会在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内所生产的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它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社会主义分配的性质和方式，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因而，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分配上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社会主义分配，是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为目的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同时又存在着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非对抗性矛盾，因此，在分配过程中要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妥善处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以及积累基金内部和消费基金内部的比例关系，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保证。

社会主义统一市场　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它是与资本主义市场和封建市场相对而言的。其基本特征是：(1)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份并存；(2) 在国家统一组织和领导下进行，接受社会主义统一计划的指导；(3) 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4) 对外开放，对内自由流通。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1) 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场转化为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2) 将两重市场转变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目前，我国的市场也有多种经济成份，但这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市场，与解放初期的多种经济成份市场已根本不同，完全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处于统治地位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个体经济和其它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只起补充作用。

社会主义金融与金融市场　指货币、外汇、贵金属及有价证券的交易场所和一定空间内货币资金融通关系的总和。作为商品货币关系，金融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到资本主义获得了高度发展。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融合成了金融资本，金融市场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世界性的大金融市场。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和信用制度，有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是以融通社会资金，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为目的，通常亦称为"资金市场"。其基本作用是：(1) 挖掘社会资金潜力，提高资金信用效益；(2) 引导资金方向和规模，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3) 有利于生产经营企业自主选择资金来源和融资形式，增强企业活力；(4) 有利于打破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活动直接控制的局面，搞活整个国民经济。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应当做到结构完善，机制健全，经营灵活，管理规范，从而达到活跃资金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社会主义银行　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管理机关。它是信贷、结算、现金出纳和外汇收支中心以及联系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纽带。社会主义银行与资本主义银行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在我国，除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外，其他银行都是国家所有），为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全体劳动人民利益服务。它的活动价值以计划经济为依据，接受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社会主义银行的任务，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繁荣经济服务的。它的主要职能是：(1) 发行货币，执行现金管理，办理现金出纳业务；(2) 代理国家财政金库，并办理金库收支业务；(3) 负责全国信贷管理、办理信贷业务和城乡人民储蓄；(4) 管理金融市场；(5) 管理外汇，办理国际结算和国际信贷业务；(6) 办理国际国内保险业务；(7) 领导农村信用社。社会主义银行的资金来源：吸收各方面的存款，占全部贷款中的绝大部分；根据商品流通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适当发行货币；国家财政拨给银行的自有

资金等。

社会主义银行体系 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是管理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其它银行是管理各种业务的专业银行。

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由于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一种经济现象。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的特殊范畴，只要存在纸币流通，在纸币流通规律作用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也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因此，决定纸币流通的基本因素如果发生变化，同样会发生通货膨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通货膨胀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通货膨胀是有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流通处于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经济和财政危机无法避免。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加紧对外扩张，解脱经济和财政危机，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掠夺政策；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实行的是稳定货币政策，出现通货膨胀也是由于违背了某些客观经济规律和工作上的失误所造成，它不是执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结果。由于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是由国家有计划地安排的，这为实现货币流通正常化，避免和制止通货膨胀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同时，即使出现通货膨胀，也可以有效地将其不利影响缩小到最小限度。因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通货膨胀不是长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率 流通中的纸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的比率，是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数。由于一个国家虽可掌握所发行的纸币量的数字，但并不能确定流通中实际需要量的数字，因此通货膨胀率通常又用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率来表示，一般以年计算。如果膨胀率为 1–9%，称一位数通货膨胀率；如果达到 10–99%，称为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等等。马克思曾把"货币贬值，即物价上涨"作为鉴别通货膨胀的唯一标志。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价格是自发涨落的，因此物价上涨率即通货膨胀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价上涨仍是鉴别通货膨胀的重要标志，可以用物价数上涨率来测量。但根据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货膨胀的特点（纸币量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大部分商品不会立即涨价；而表现为物资缺乏，纸币沉淀，纸币流通速度减慢），还应把纸币流通速度减慢的因素考虑进去，因此可以考虑用如下公式表示：通货膨胀率

$$=\frac{\text{市场纸币流通量}}{\text{市场纸币需要量}}=\text{物价指数上涨率}+\frac{\text{因纸币流通速度减慢而增加的纸币量}}{\text{市场纸币需要量}}$$

当然，用什么方法来表示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率更为准确，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正常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和可能在组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和基本稳定，并且能够通过自觉地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制止通货膨胀。

社会主义信贷 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地动员和分配暂时闲置的货币资金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信贷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同时又对生产和流通有反作用。社会主义信贷是国家组织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杠杆。国家可以利用信贷积累和分配货币资金，增强国家的资金力量，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利用信贷对企业实行货币监督，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使用资金；可以利用信贷，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配资金，加速资金周转。社会主义信贷必须按批准的计划发放和使用，贷款必须有物资保证，并能按时归还。社会主义信贷与资本主义信贷存在质的区别。资本主义信贷是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产业资本家利用信贷来扩大生产和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把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给借贷资本家。而社会主义信贷是社会主义货币资金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银行吸收社会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一种信用制度。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扩大商品流通，改善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企业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独立核算的，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以盈利为特征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社会主义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生产或经营活动，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企业的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体劳动人民或部分劳动人民集体的公有财产。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他们相互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他们为社会、集体和劳动者自身的利益自觉地进行劳动。社会主义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上缴税利，努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消耗和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适销对路、价廉物美的产品和劳务。同时要提高企业素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现阶段由于存在着公有制的多种形式，因而有多种社会主义企业类型。如从所有制上分，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全民和集体联合办的企业；从企业形式分，

有多厂企业（总厂或公司）、单个企业等。

社会主义价格形成　社会主义价格形成基础、形成要素、形成过程及其规律性的总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因此社会主义价格一般是有计划地形成的。计划价格是社会主义价格的主要形式，这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重要特点。社会主义价格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产品的社会成本，它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最低限。一部分是盈利，即剩余产品的货币表现，包括税金和利润。产品价值是社会主义产品价格形成的一般基础，为了承认技术设备等物化劳动对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重视资金利用效果，不少经济学家主张以价值的转化形态生产价格作为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直接的客观基础，即以产品社会成本加按产品平均资金占用量乘社会平均资金盈利率确定的盈利额为基础订价。在实际订价中，还要考虑供求和其它政策因素。

社会主义地价　土地在出售或转让使用权时所形成的价格。地价的涵义不完全相同于一般商品的价格。一般商品的价格是其价值的反映，并在出售商品后转移所有权。土地没有劳动价值，而且我国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所以我国进入流通领域的土地是另一种形式的"买卖"，即土地所有者只出售一定时期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购买者"必须完全按照土地所有者或市政当局对土地用途的规定开发使用，土地使用期满后土地连同上盖物（即建筑物）全都还给土地所有者。我国最早这样出售土地的是深圳，1987年9月9日深圳市把一块53221.8平方米的土地以协议方式出让给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这块土地的使用期限为50年，地价为76.92元／平方米。但社会主义各国也不完全是这样，如匈牙利就把一些国有土地卖给私人。地价的计算方法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地价＝地租一利息率；（2）地价＝建筑物价格－建筑物成本－投资利润－贷款利息－设计费用－税收。地价是经济的"晴雨表"，如果经济繁荣，地价就上涨；反之，地价就下跌。

社会主义地租　马克思创始人曾经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地租仍然存在，"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5页）。社会主义地租，也是土地所有权及其规律存在和起作用的结果，地租的实体为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即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地租的形态也是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这些与以往地租特别是资本主义地租没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地租反映的阶级关系，则完全不同于以往地租所反映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于土地是全民（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是用之于民，而且是促进土地合理使用的经济杠杆，丝毫不具有剥削的性质。

社会主义级差地租　又称"级差土地收入"。农业生产者耕种较好土地或在同等条件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所获得的超额收入。由前者获得的超额收入称级差地租Ⅰ，后者称级差地租Ⅱ。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同样存在着承包土地条件不同（包括土地肥沃程度、离市场远近和交通条件的差别）投入同等劳动或承包同等条件土地投入更多劳动而获得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承包给自负盈亏的家庭经营，其中的级差地租Ⅰ原则上应通过承包基数和税收形态归集体和国家；级差地租Ⅱ原则上归承包者所有。在国营农场中也存在级差地租。

社会主义绝对地租　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取得的收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国家和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关系，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是产生绝对地租的经济基础。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国有的土地由各个企业使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归承包户使用。取得了土地使用权的企业或农户要将利润的一部分交给土地的所有者－国家或农村集体，即交付绝对地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的土地所有权之所以也会产生绝对地租，其经济本质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各个经济单位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有着各自的经济利益。国家和农村集体虽然代表了包括占用土地的经济单位在内的全体人民或整个集体的利益，但是全民或集体的利益并不能等同于各经济单位的利益。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绝对地租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绝对地租有着本质区别。首先，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不同，社会主义绝对地租体现的是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方面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差别关系；而资本主义绝对地租则体现了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共同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其次，它们的归属不同。社会主义绝对地租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权的实现形式，归国家和集体所有，最终用于全体人民和集体内的全体成员；而资本主义绝对地租是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的实现形式，归土地所有者占有。第三，它们的作用不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绝对地租问题，

能够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作用。例如，它可以为正确制订农产品价格提供依据；有利于合理地管理、利用和节约城市土地、工业用地及农业用地；可以确保国家和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保障全体人民和集体的经济利益，有利于国家积累资金；等等。而资本主义绝对地租则维护和巩固了土地的私有权。

社会主义保险 是对各个企业单位、居民个人财产因意外灾害或人身伤亡所致损失的一种社会互助性质的补偿方法。由国家保险机构按规定收取保险费，建立专门的保险基金，在发生灾害事故时给予被保险人以经济补偿，恢复正常的人民生活与社会生产。我国建立后备基金，保险基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国家物资储备、财政后备（国家预算总预备费、预算周转金和财政结余）、社会保险救济费、农业粮食储备，各经济单位自保基金，以及保险基金等。每一种后备都有其自己的形成方法和使用范围。社会主义保险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反映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直接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加速现代化建设服务，发挥着经济补偿、预防灾害、积聚资金和保险监督的作用。在我国，规定社会主义保险实行国家垄断，由全民所有制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执行保险监督职能。搞好保险监督工作，是强化国家保险在发展国民经济中作用的根本条件。

社会主义计划市场模式 是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内在地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1) 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生产方向、投资规模等宏观经济的决策权，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2) 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它的产、供、销，同日常经济活动有关的人权、财权、物权、基本上由企业掌握。企业作出日常经济活动的各种政策，主要参照的不是中央计划机构的计划指令，而是市场信号。市场机制调节着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调整着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向，促进企业以最小的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 (3)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转变为“交通警察”与“司机”之间的关系。国家不再直接干涉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企业的经营活动直接受市场信号的指挥，国家主要通过用经济杠杆，包括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来诱导企业完成国家计划。(4) 国家不统一规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仅仅控制工资总额。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范围内，企业有权根据销售收入自行决定收入分配，自行调整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结构。

计划市场模式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和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固有的缺陷。但是，这种模式也有它的问题，企业决策权的扩大有可能摆脱国家宏观计划的控制，而追求完全的自由经营；市场作用的扩大，有可能冲出计划经济的稳定性而产生比较大幅度的波动。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或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由于自然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传统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不存在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1) 所有制结构。有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结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以及在公有制主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2) 经济决策结构。有国家集中决策、分散决策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决策三种形式。(3) 经济调节结构。即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分配，有以行政指令直接实行的计划调节，有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来进行的调节。(4) 经济管理组织结构。通常有用行政组织进行管理和用经济组织进行管理，以及二者结合管理两种形式。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曾经出现过以下几种经济模式：(1) 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它在苏联 1918~1920 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表现最为突出。(2) 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我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采取这一模式。(3) 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它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时期都程度不同的存在过。(4)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经济模式；也称匈牙利模式。(5)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称南斯拉夫模式。此外，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如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希克模式、科尔内模式、孙冶方模式等等。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源泉 参见“社会主义积累。”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源泉就是社会主义积累。因此要保证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进行扩大的再生产，首先就必须正确安排国民收入在分配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和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基金的比例。积累基金比例太低，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太高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积级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消费 消费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是指人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使用掉，以满足社会生活的某种需要，它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个方面。生产消费是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和消耗，这种消费通常已被包括在生

产这个范畴中了。一般所讲的消费，即生活消费，指人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用于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具有一些基本特点：(1) 消费具有递进性，它表明人们的消费是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步扩展的趋势；(2) 消费具有示范效应；(3) 消费具有不可逆性。消费除了具有以上一些基本特点以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有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的基本特征是：(1) 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消费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生产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2) 社会主义消费受市场与计划的共同调节；(3) 社会主义消费是人们共同富裕的消费。

社会主义生活消费　指人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

生活消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生活消费就是把产品用于满足个人各种生理和精神需要的行为和过程，因此它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过程，反映着人与客观世界进行物质变换的一种自然过程。消费的这一方面，为生理学、营养学、商品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了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消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制约下，在人们相互经济关系中进行的社会行为和过程，从这一方面看，消费过程又都是一定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质。这是政治经济学最为关注的。

社会主义个人消费　个人消费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消费活动，比如，个人的衣、食、住、行、用以及文化娱乐等。个人消费的资料归个人所有。在社会主义时期，它主要是从集体劳动中，通过按劳分配取得的；此外，也从其它方面，比如从各种生活补贴（粮油补贴、房租补贴、取暖补贴等）以及社会救济和非劳动收入中取得一部分；农村居民还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中取得较多的生活资料。个人消费是现阶段人民生活消费中的主要部分。

人们的消费需要，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特点、兴趣、爱好和习惯，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同时，有一些消费资料，按其自然属性来说，也只适合于个人消费，因而个人消费的形式是必要的，也将是长期存在的。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消费资料归个人所有，个人消费，不仅可以满足个人的不同需要，而且也可以实现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社会主义工资　是全民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劳动者为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实现按劳分配的一种劳动报酬形式。从名称上看，社会主义工资与资本主义工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它们之间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体现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工资不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成，而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形式。工资的数量也不再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工资体现的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国家、集体（企业）、劳动者个人的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工资的基本形式是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劳动报酬的补充形式。

社会主义计时工资　指以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单位而支付的工资，也就是按照劳动者在一定时间提供一定质量的劳动支付的工资。劳动的质量即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等。在劳动质量既定的条件下，劳动时间就成为计量工资的单位，劳动时间长，工资就多，劳动时间短，工资就少。计时工资适应范围较广，任何企业、工种都可采用，特别是适宜于那些生产连续性较强，劳动工序不能相对独立，不易计算各个劳动者完成的产品件数的企业、工种以及生产任务经常变动的企业和工种。但是，计时工资也有一定局限性，它只能表示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可能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不能及时反映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实行计时工资必须确定合理的工资等级、级差、劳动定额等，并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以避免出工不出力等现象。

社会主义计件工资　指以完成劳动产品的数量或作业数量作为计量单位而支付的工资，也就是按劳动者完成一定质量的劳动产品的数量或作业量支付的工资。计件工资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它们只是劳动计量和工资支付形式上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计件工资将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直接联系起来，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劳动者完成合乎质量要求的产品数量或作业量多，工资就多，反之，完成产品数量或作业量少，工资就少。所以，计件工资只能体现按劳分配规律的客观要求。但是，计件工资适应范围不如计时工资广泛，它只适宜于劳动工序相对独立、产品数量或作业量能准确计算，并有明确的产品质量标准而又能用科学方法测定产品质量的劳动岗位。

社会主义再生产　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不断

重复，不断更新的过程。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社会主义的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统一。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

社会主义再生产具有如下特点：(1) 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2) 再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的；(3) 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解放了广大劳动群众，因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再生产能够以旧社会所不曾有过的高速度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再生产按其规模，可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超分配 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货币需求总量超过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可供使用的国民收入总供给量。从实物形态上看，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可能出现超分配，因为不可能分配不存在的东西。从价值形态上看，就价值本身来说也不可能超分配。但在实际生活中，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而执行货币职能的是纸币，这就产生了价值符号与价值在数量上分离的可能性。如原来是1元纸币代表1元价值，如果产品数量没有增加，而货币发行量增加1倍，则1元纸币就贬值一半，仅能代表0.5元的价值。在完全的市场调节条件下，商品价格就上涨1倍，经过通货膨胀使供需平衡，也不会出现超分配现象。如果价格的决策权限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家手中，价格不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动而自由地变动，当流通中的货币超过流通中的需要的货币数量时，产品价格又不能及时调整，就出现所谓的国民收入超分配。造成这种国民收入超分配的主要环节是：1、财政赤字；2、财政性货币发行；3、生产与流通的不正常现象导致财政虚收实支；4、银行信用膨胀；5、外汇收支逆差等。这种现象造成广泛的供求紧张状况，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类型 它有两种类型：一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指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扩大生产规模，其特点是向生产的广度发展。另一类型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指依靠生产技术进步，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依靠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资料利用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其特点是向生产的深度发展。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扩大再生产的外延因素和内涵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在理论上仍然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一般说来，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外延扩大再生产往往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形式，在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后，内涵扩大再生产便逐渐成为主要形式。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为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在迅速建立产业体系，奠定生产基础的过程中，往往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有着突出作用。在已具备较齐全的产业结构和一定的生产基础之后，扩大再生产应及时转向以内涵为主的道路。对于我国来讲，现在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劳动力资源，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同时，要加强原有产业的挖潜革新，进行两方面的扩大再生产，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

社会主义流通 社会主义社会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领域所经历的，由不断进行着的几万次交换所构成的经济过程，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是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重要阶段。流通有产品流通和商品流通两种形式。

社会主义流通是商品流通。商品流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总和。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作为客观的经济过程，它包括两方面的经济内容：商品价值的补偿和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代谢。

社会主义生产对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起到主导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及其发展程度、商品生产的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规模和方式，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国营经济为主导条件下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决定了商品流领域也必然是以国营商业为主导下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对社会主义再生产起到重大的反作用，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了，流通形式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规模才能扩大，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才能发达起来。

社会主义企业素质 用来表明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经营活动实体本身所具备的内在特性。它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

构成企业素质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1) 人员素质。它包括企业人员所具有在政治、思想、文化、技术、业务上的水平。(2) 技术素质。它包括硬技术素质（机器设备水平）和软技术素质（设计、工艺和试制新产品的工作质量和能力等）。(3) 管理素质。它包括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专业管理、管理基础工作等方面。一般说来，技术素质是现代企业的基础，管理素质是技术素质得以发挥的保证，而人员素质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

企业素质通常用企业能力作为衡量的标志，主要有：(1) 技术开发能力。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规模、速度和质量。(2) 扩大再生产能力。适应市场需要，企业能够自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3) 盈利能力和企业在品种、质量、价格、服务等方面的竞争能力。(4) 应变能力，即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5) 自我约束能力，即企业自觉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令，自觉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等方面的能力。

社会主义企业厂长负责制 厂长（经理）对企业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全权负责的一种经济责任制度。

建国以来，我国工商企业长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1981 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等，对企业领导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广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其核心内容是，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实行领导职能转换，企业的党组织不再领导企业的工作，确立厂长（经理）的领导中心地位和作为企业法人代表的地位，组成以厂长（经理）为首的决策和行政指挥系统。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能是，协助厂长（经理）端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和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做好党员和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职工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广大职工利益，组织职工教育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发动广大职工努力实现企业目标，同时职代会代表广大职工对企业领导实行民主监督。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它是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的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等各项管理活动的总称。其内容包括：组织管理，计划管理，生产管理，科技管理，新产品试制管理，质量管理，劳动管理、工资管理，物资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生活福利管理等。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主要职能是，根据需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结合市场调节，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及奖惩等。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合理地组织生产，正确处理企业内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企业与国家之间、企业同其它经济单位之间的联系，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社会主义企业全面质量管理 它是指企业为了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运用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手段和方法所进行的系统管理活动。具体地说，就是组织企业全体职工和有关部门参加，综合运用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成果，控制影响产品质量的全过程和各因素，经济地研制、生产和提供用户满意的产品的系统管理活动。全面质量管理的特点是：(1) 全面质量管理的对象—"质量"的含义是全面的，就是不仅要管产品质量，还要管产品质量赖以形成的工程质量和工作质量；(2) 全面质量管理的范围是全面的，即要实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3) 全面质量管理是全员性的质量管理；(4) 全面质量管理用以管理质量的方法是全面的，多种多样的，是综合性的质量管理。

社会主义商业道德 它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业工作者经营思想、经营作风和经营行为等方面的一套准则和规范，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对顾客一视同仁，公平交易；商品明码标价，按价出售，有陈列样品就有出售的商品；货真价实，按质论价，分等分级，不以次充好，不以副品顶正品，不掺杂掺假，不硬性搭配商品；计量准确无误，不短斤少两；清洁卫生，礼貌周到，热情服务，不出售有害身心健康和变质失效的商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地向顾客宣传介绍商品性能、质量、用途，不夸大优点，不隐瞒缺点；讲究个人卫生和店容整洁卫生等等。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商业同广大顾客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体现了商业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风尚。商业工作者必须自觉遵守商业道德，视顾客为"上帝"。

社会主义企业增长战略 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对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制定的规划。在这里，增长主要是指销售额和利润率的增长。企业增长战略主要有三类，各自又包括三种具体形式。第一类是密集化增长。它包括市场渗透、市场开发和产品开发；第二类是一体化增长。它包括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第三类是多元化（多角化）增长，它包括同心多元化、横向多元化和综合多元化。

社会主义企业增长战略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商业流通费用 社会主义商业企业在组织商品流通过程中，要耗费一定数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种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就是商业企业的流通费用。

商业企业的流通费用按其经济性质划分，分为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生产性流通费用，也

称追加费用，是同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内继续有关的费用，它包括商品的运输、保管、包装、批选整理等费用。纯粹流通费用，是同商品和价值形式转化有关的费用，它包括同商品买卖行为相联系的以及与商业企业管理核算有关的各种费用，如手续费、管理费、职工工资、广告费等。

节约商品流通费的途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积极开拓市场，扩大商品购销业务，经营适销对路的商品，做到货畅其流，减少商品积压，加速商品流转速度；(2) 合理选择进货地点和运输工具，合理组织商品运输，以较少的资金和费用支出完成较大的商品周转任务；(3) 加强资金管理，合理运用资金；(4) 加强商品保管养护，减少商品损耗，节约保管包装费用；(5) 改善劳动组织，提高职工生产和经管的积极性。

衡量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费用的考核指标是商品流通费率。即商品流通费用绝对额同商品纯销售额的百分比。其公式为：

$$\text{商品流通费用率} = \frac{\text{商品流通量总额}}{\text{商品纯销售额}} \times 100\%$$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流通 又称物资流通，指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过程中各种交换活动的总称。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流通同生活资料流通一样，都是商品流通。生产资料流通是联结生产和生产消费的中间环节，也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前提。生产资料流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它以生产为起点，又以另一个生产为终点，因此，生产的性质、规模和结构决定流通的性质、广度和深度。生产资料流通组织得合理与否，直接对生产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如果能使之快速、高效、经济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进入另一个生产部门，便能有利于保证生产建设需要和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物资调拨 指我国物资主管部门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之间实现物资分配和调度的一种形式。主要有两种情况：(1) 物资主管部门确定供应物资的企业或单位，落实需要单位计划分配的物资；(2) 有些单位由于生产任务变动或基本建设计划变更，，出现物资多余或不足时，物资主管部门通过调拨形式，对余缺物资进行调度。物资调拨具有指令性，通常采用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有偿调拨。

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渠道 指商品从生产者手中到消费者手中的流通过程所经过的路线、组织形式和环节。商品流通渠道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生产力布局和各种商品本身的自然特点来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的商品交换中，商品流通渠道大致可分为三类：(1) 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的渠道，即生产者直接把商品卖给消费者；(2) 完全由商业部门作中介的渠道；(3) 产销结合的渠道。

上述三种类型的商品流通渠道，按照具体的流转路线不同，又有各种具体组织形式。如在生产和消费直接联系的方式中，有城乡集贸市场，工业或农业生产者自销门市部，各种展销会等；完全由商业部门中介的渠道中有只经过零售环节的，有经过一道批发环节甚至二道三道或更多批发环节的；在产销结合的方式中，有生产部门的推销机构只管产地批发的，有即管产地又管中转地乃至销地批发等等。

在组织市场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必须根据生产、消费和各种商品的不同特点选择适当的商品流通渠道。任何片面地使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化的做法，都会给生产和消费带来消极的作用。但是，实现多渠道流通并不是主次不分，就社会商品流通总体来说，多数商品还是要通过商业这条主渠道到达消费者手中，这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W-G-W（商品-货币-商品），即包括各商品的两个形态变化。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它商品的循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所以，商品流通就成了商品生产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居于支配地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对生产又有反作用。起到促进或阻碍生产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虽然与资本主义生产有本质不同。但它仍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既然是商品生产，就一定有一个实现问题，即流通问题。流通顺利，货畅其流，生产就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就逐步提高；反之，流通阻塞，货不畅其流，就不仅会妨碍生产发展，也必然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

社会主义商业 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事商品流通的国民经济部门。

我国现阶段，商业按活动范围，可分为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一般所说的商业是指国内商业）；按经营方式，可分为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按所有制形式，可分为全民所有制商业、集体所有制商业和个体所有制商业。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业，对促进生产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企业协作　是各企业之间或工业部门为制造一定产品而发生的联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企业协作的主要形式有：各个企业之间在原材料、燃料供需关系的协作；产品生产和试制协作；劳动力和设备协作；科学技术协作。企业协作应遵循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实行等价交换。企业之间的协作内容以及有关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应该通过经济合同明确规定，并要认真履行合同条款。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协作，有利于发挥各个企业的优势，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促进更加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之间的协作，有利于集中力量在短期内迅速突破生产和基本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企业职工主人翁精神　它是企业职工积极参与管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主要是通过职工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体现出来，即职工代表大会制；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动职工讨论生产计划；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活动分析等等。认真实行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制度，可以增强企业职工主人翁感，与企业共命运，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社会主义货币流通规律　指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要与同一时期内用货币（包括现金和存款）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的周转速度相适应。用公式表示是：

$$\text{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frac{\text{待实现的商品总量}\times\text{商品的价格水平}}{\text{货币流通速度（次数）}}$$

从公式我们可以得出，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取决于三个因素：待实现的商品总量、商品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速度，前两个因素的乘积就是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在单位货币的价值已定的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商品价格总额越大，所需货币量越多，反之，所需货币量就小，二者之间成正比关系。由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退出流通领域，同一数量的货币可以媒介多次商品流通，一定时期内、单位货币媒介商品流通的次数，叫货币流通速度。在商品价格总额已定的条件下，货币必要量同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即货币流通速度越快，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越小，反之，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就越多。

当流通中的货币是纸币时，这时货币流通规律就变为纸币流通规律。一般来说，流通中的纸币应该等同于其表现的货币量。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时，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会相应地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社会主义责权利的统一　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责任、经营权利和经济利益相互协调，均衡对称的一种基本原则。

"责"是指企业经营者所负担的经营责任。经营者有维持国有财产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增殖性的责任；有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的责任；有保证本企业职工劳动就业和收入增长的责任；有承担企业经营失败的责任。"权"是指企业经营者享有的经营权利。经营者有自行组织本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有进行技术改造，增加产量，发展品种，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权利等等。"利"是经营者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包括经营者正常完成指标所获得的工资及超额完成指标所获得的奖金、红利等等。

责权利是经营企业的三要素。责任是核心，权力是条件，利益是动力，三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三者的有机结合，保证了社会主义企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失去国家宏观控制。在城市企业中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时，都要普遍地贯彻这一原则。

社会主义利息　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它是在借贷关系中，借方付给贷方的一种报酬。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息和资本主义的利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营工业、农业或商业等职能的资本家向借贷资本家借贷，是为了取得利润，利息只限于利润的一部分，它的来源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借贷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一样都是剥削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信用业务由国家统一经营，利息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不具有剥削的性质。社会主义的利息率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有计划地规定的，而不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竞争中由借贷资本的供求规律自发形成的。社会主义的利息是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金，节约、合理、有效地使用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手段；也是对各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加强领导和监督，积极改善和提高它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巩固经济核算制度，加速资金周转的有利杠杆。对广大储户给予适当的利息，可以鼓励人民群众勤俭节约，把资金存入银行，用于支援社会主义

建设。居民储蓄存款的利息，虽然归个人所有，但是由于占有利息的手段—存款，对绝大多数储户来说，主要是劳动收入。存进国家银行以后，是作为国家的建设资金使用的，利息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这种利息属于物质奖励的性质，也不具有剥削的性质。

社会主义企业利润　企业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和税金后的余额。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利润，是工人为扩大再生产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社会主义财富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积累的重要来源。

我国的企业利润是反映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综合指标。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利润包括产品销售利润、其它销售利润和营业外收支净额。企业的生产发展快慢，产品质量好坏，经营状况优劣，一般都会通过利润的增减反映出来。企业获得利润的多少，取决于产品销售和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它与生产成果的好坏成正比，与消耗的大小成反比。

按我国现行规定，企业利润的大部分上缴国家，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用于发展经济、政治、科学、文教、卫生和其他事业，并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留归企业支配，用以国家所规定的用途，以鼓励企业和职工搞好生产，增加企业的利润，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每个企业都要在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遵守国家计划和规定的价格水平、保证产品质量、完成经济合同的前提下，通过革新技术、增产节约、改善经营管理、不断降低成本，力求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

社会主义企业资金　国家交由国营企业支配运用以进行生产经营的那部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的货币形态。它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进行分配使用的。按分配形式分，有通过财政收支形式而分配的财政资金和通过银行信贷形式而分配的信贷资金。按其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周转情况分，有房屋、机器设备等固定资金和表现为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商品、应收款、银行存款、现金等的流动资金。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体现了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合作互助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国家同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全部经济联系。

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循环和周转　社会主义的资金运动形式。资金从货币形态开始顺次经过流通过程—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等三个阶段，并先后采取货币、生产、商品三种形态，最后又回到货币形态的运动过程，称为资金循环。资金循环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周期过程，由于生产经营活动不断进行所引起的连续不断的资金循环，称为“资金周转”。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是用来发展社会生产，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它顺次通过购买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形式，进入生产过程，又由生产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然后出售，再由商品形式回到货币形式。收回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补偿原材料的费用和补偿机器设备而形成折旧基金，以更新固定资产；另一部分，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给生产劳动者，变成他们的个人收入；其余形成社会的纯收入（利润和税金）。资金循环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资金循环的任何中断，整个循环就要受到影响，再生产便无法进行。资金周转是不断运动的资金循环周期过程。资金周转时间，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构成。资金周转速度通常用一年周转次数来表示。由于生产资金有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区别，它们处在生产过程的时间是不同的，因此，还要进一步计算资金的平均周转速度。其计算公式为：

$$\text{资金的平均周转速度} = \frac{\text{一年内固定资金的周转总额} + \text{一年内流动资金的周转总额}}{\text{资金总额}}$$

加速资金周转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任务。资金周转快慢反映资金利用效果。资金周转快，意味着节约了资金的占用，可以用较少的资金完成同样的生产任务，或者用同样多的资金完成较多的生产任务。

社会主义企业固定资金　固定资产的货币形态。固定资金是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指企业运用在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管理用具等劳动手段方面的资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较长，它们的价值是一次全部垫支出去，逐渐地、部分地通过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收回，从而得到补偿。固定资产的价值因在生产过程中参加周转而逐渐减少；但它的实物形态在更新前仍保持不变。除生产领域中有固定资金以外，流通领域中也有固定资金，如用于销售产品的门市部房屋和送货载重汽车等。固定资金分为生产性固定资金和非生产性固定资金。用于生产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以及一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和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上（如800元、500元、200元）的工具、器材、仪表等方面的资金是生产性固定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房屋、设备，如职工食堂、宿舍、医务室、托儿所等方面的资金是非生产性固定资金。

社会主义的企业流动资金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指企业生产经营中，处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供周转使用的资金。流动资金的实物形态，主要是劳动对象，即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等。它们通过一次生产过程，就丧失了原来的物质形态，其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下一个生产周期开始，又需要另一批劳动对象，如此周而复始，流动循环。流动资金按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可分为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资金，结算资金和货币资金；按其所处的领域，可分为：(1) 生产领域的流动资金，亦称“流动生产资金”，即生产流动资金，其实物形态主要包括原材料、燃料、备件、半成品等；(2) 流通领域的流动资金，即流通资金。此外，还可分为定额流动资金和非定额流动资金；自有流动资金和流入流动资金等。为了管好流动资金，企业在保持正常的生产前提下，应该尽量使处于流通领域的资金减少到最低限度。

社会主义企业成本　社会主义企业为生产和销售产品而支付的一切费用总和。包括：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的消耗；固定资产折旧；职工工资；行政管理费等。降低产品成本，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降低成本的途经是：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消耗；提高设备利用率；提高产品质量和成品率；精减非生产人员，节约管理费等。社会主义成本与资本主义成本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企业的成本是资本家为获得剩余价值而垫支的资本消耗量，体现着资本家对雇用工人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成本，是为生产和销售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所必须的实际耗费，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关系。

社会主义企业本位论　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一方面享受应有的权力，一方面确保完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其主要论点有，(1)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2) 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3) 企业应当有独立的经济利益；(4)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应是国家的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分离。国家从外部领导和监督经济组织，而不是作为经济组织内部的上层机构，直接指挥经济组织的日常活动。

社会主义经济结构　是社会主义经济构成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结构与生产力结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因此，经济结构既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构成。前者表现为所有制结构，后者表现为国民经济内部各要素之间质与量的比例关系。具体说，经济结构包括：第一，所有制结构。指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目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这是规定我国经济结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生产结构。指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生产性投资结构等的构成及相互关系；第三，分配结构。指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比例及其相互关系；第四，交换结构。指流通领域中商品的各种流通要素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第五，消费结构。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构成和实际消费支出的具体构成及其之间的关系；第六，教育与科技结构。指各类学校、各种教育形式的关系及内部结构；各种门类的科技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构成。此外还有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是上述各类结构的统一，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而生产关系结构与生产力结构是其基本的质的规定所在。

社会主义产业结构　也称为社会主义部门结构，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按一定比例形成的数量关系。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指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农业、加工工业、基础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此外还有各部门内部的构成与数量关系。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状况直接影响到产品结构状况，产业结构合理与否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关键环节，也是经济持续稳定按比例发展的基础。

社会主义产业结构调整　指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并按国民经济有规律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和发展战略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调整，通过调整，使产业结构符合经济生活本身持续稳定协调的要求和国家产业计划与发展目标要求。调整的手段包括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其中主要是财政金融手段的运用，国家通过信贷、税收、利率、汇率等经济参数作用于经济，影响资源配置走向使之趋向合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是：第一，坚持以农业为基础，重视和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第二，大力发展轻纺、食品等工业，扩大适销对路的日用消费品生产；第三，重视与发展国民经济重点部门和薄弱环节，特别要大力发展能源，交通运输业与基础工业。此外，在重视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第一、二产业发展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服务于物质资料生产过

程的第三产业，如商业、金融业、邮电通讯业等，从而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长期以来，产业结构的不尽合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突出表现在农业和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薄弱，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和制约因素，而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加工工业过于庞大。这直接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稳定产生了相当不良的影响。因此，目前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实现国家产业计划与发展目标的关键，也是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价格总水平 指社会主义国家全部社会商品价格动态的综合水平，以总指数表现为国民经济各类商品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其中包含三层涵义：第一，价格总水平所包括的商品范围是全部社会商品，即社会总商品；第二，价格总水平是社会总商品价格动态的综合平均反映；第三，价格总水平是以各类商品价格指数加权平均的总指数表现出来的。

编制价格总水平指数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状况；可以能动地反馈于个人消费、生产成本与收益、财政收支、信贷与货币流通等经济活动；它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参照；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实现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正确认识价格总水平的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物价政策和价格总水平发展计划，对于发展生产，促进商品流通，保证国家积累，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等都有重大影响。应该明确，我国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一般用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来反映价格总水平，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是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两类商品的零售价格的总水平，由于这两类商品在交换中处于最后流通环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价格总水平，但它不包括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因而有一定局限性。价格总水平是全部社会商品在相同流通环节上的价格水平，在没有价格总水平指数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各类商品在相同流通环节上的水平来反映价格总水平的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要求，必须在客观经济范畴内以价格总水平指数来反映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以成为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经济参数。

社会主义价格体系结构调整 指对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商品价格及其比价关系与差价体系的调整。商品的比价关系，是按国民经济各部门形成的价格体系，它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每个部门内各种商品价格的比例关系。商品的差价体系，是按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联系所形成的价格体系，它反映同种商品在不同流通环节所形成的不同价格之间的差价关系。价格体系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运动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和各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动，以及一定时期商品比价关系与差价关系的紊乱，都需要及时调整整个价格体系。合理的价格体系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影响和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

价格体系结构调整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价值规律原则。因为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格体系是价值规律的体现，国民经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各种商品价值的运动，是决定价格体系运动的基础性因素。第二，货币流通规律的原则。因为价格是币值的倒影。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数量的变动，直接影响币值，进而影响价格。第三，供求规律的原则。因为供求变动与价格变动存在互为因果的联系，供求关系是使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节 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要求，通过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系统进行管理、控制、协调和引导，调节国民经济供求总量平衡、资源配置走向以及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以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宏观经济调节的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与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其主要内容有：第一，通过宏观经济调节，保证稳定、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防止经济过热过冷与大起大落，在保持适当速度的同时，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与劳动生产率。第二，通过宏观经济调节，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包括价值总量与实物总量的平衡，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供给的短缺与需求的过旺，因此，必须在发展生产、大力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消费基金的膨胀，控制社会需求总量。第三，通过宏观经济调节，制定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协调发展，保证经济适当增长速度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是多样的，包括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要求，今后在调节手段的运用上，要逐步加大经济手段运用的比例，即国家通过宏观财政与金融工具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通过税收、信贷、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参数进行间接调控，同时辅之以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保持一定比例；在

何社会化大生产，都客观上要求对其进行宏观协调与控制。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要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注重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调节方式的运用，这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　即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生产的产品与劳务总量的不断增加，即用货币形式表示的 GNP 的不断增加。以 GNP 为基础，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标志或指标还有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工业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等的增加。一定的经济增长要用增长速度来衡量，通常，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借用国际上通用的 GNP 和人均 GNP 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增长速度来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其公式为：

$$GNP_t = GNP_b(1+r)^n$$

式中 GNP_t 代表期终的 GNP，GNP_b 代表基期的 GNP，n 代表基期至期终的年数，r 代表平均增长率，即增长速度。为了避免物价变动的影响，GNP 和人均 GNP 都采用不变价格计算。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所指向的某种目的，即通过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所要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个目标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第一，从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包括物质与文化生活在内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来反映；第二，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来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品和可供消费的各种劳务的种类、数量与质量来反映；第三，从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生产率来反映。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指标有一定时期内某个数量的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人及其增量。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规定，第一阶段，在 1980 年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阶段，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阶段，到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一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总揽全局的首位；二是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更要确立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三是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打人国际经济体系。通过战略重点的侧重，为进一步完成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打下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指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战略原则等的综合体系，是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纲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使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事业相互协调，综合发展；第二，从本国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既考虑历史因素，也考虑现实因素；既考虑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又考虑自然条件与资源条件；第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经济发展战略要积极稳妥，切实可行。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不断优化和高度化的演进的过程。经济发展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与经济增长比较而言，其外延要更广一些，内涵要更丰富一些，不仅涉及到物质产品的增长，而且涉及到非经济社会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经济发展同时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短期的外在因素引起的经济上升或下降，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再者，经济发展不仅着眼于经济规模外延上的扩大，而且着眼于经济活动效率的质的方面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第一，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的增强；第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断高度化或优化；第三，在人均收入有较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人们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第四，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国家用于科学、教育、卫生、文化、福利、环境治理等方面支出的较大增长，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与身体素质的显著提高。

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　是指社会主义国家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将其国民经济自觉纳入国际交换与国际分工、充分与别的国家与地区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过程或战略。对外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外经济关系的形式包括：第一，对外贸易，指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它国家与地区的商品交换关系，包括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第二，引进技术，指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有选择地对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借鉴与吸收；第三，利用外资，指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弥补建设资金不足，在主要依靠本国资金积累的同时，吸引外国投资，利用外资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吸收直接投资，包括合资经营、合作开发、合作经营、补偿贸易，租赁业务等；二是吸收国外间接投资，包括国外各种贷款、吸收国外存款，在国外发行债券等。此外还有来样，来料、来图加工，补偿贸易、发行国际债券和租赁技术装备等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展对

外经济关系的意义在于：第一，发展对外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要想高速发展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际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没有世界市场，社会化大生产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须参与世界市场；第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可以合理地利用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第三，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辅助手段；第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加快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第五，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也是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需要。

社会主义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是国际间的商品流通。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别的国家或地区间进行的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外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进口是指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重要的生产设备、国内缺乏的矿产资源与原材料以及一部分确实需要的消费品的买进；出口是指对本国产品的卖出。发展对外贸易，关键在于出口，因为不管进口机器设备、引进技术，还是利用外国资金等各种进口形式，都归根到底要依靠出口商品所得外汇来偿付。因此，进口是对外经济贸易的目的，出口是对外经济贸易的关键。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第一、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进口可以增强综合国力；通过出口可以使我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而且可以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第二，有利于协调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平衡，促进社会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第三，有利于调剂国内市场供应，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繁荣市场；第四，有利于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一部分资金。第五，也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需要。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化，适应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需要，要进一步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具体措施是：第一，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加强宏观管理，搞活企业经营，使外贸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第二，改革进出口商品经营体制，实行工贸、技贸、进出结合，推行代理制。第三，打破外贸财务"大锅饭"体制，建立进出口商品盈亏经济责任制。第四，改革外贸计划体制，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改进外汇留成办法，以鼓励扩大深加工产品的出口；第五，外贸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积极，慎重，同步，配套的方针。

社会主义总供给 社会主义总供给可根据不同总量指标确定其范围与内容。按社会总产品确定，总供给是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物质生产部门提供使用的产品总量，其物质形态是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总和，可以用社会总产值表示；按国民收入确定，总供给是指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部门新生产的全部净产品，包括本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它在价值上等于本期内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总和；按社会最终产品确定，总供给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全部最终产品的总和，其价值形态可由社会最终产值表示；按国民生产总值确定，总供给指除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全部最终产品总和以外，还包括劳务供给和净出口供给。上述社会主义总供给的测算方法在理论与实践上各有优劣，（参见"社会主义总需求"）

社会主义总需求 社会主义总需求也可根据不同总量指标确定其范围与内容。按社会总产品确定，总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对补偿生产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需求和对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需求以及劳动者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消费资料的消费需求的总和，可用补偿需求、消费需求与积累需求表示；按国民收入确定，总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积累需求与消费需求总和；按社会最终产品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需求指全社会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求，根据支付能力购买的全部最终产品，包括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消费资料的需求、扩大再生产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和固定资产更新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按国民生产总值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除按社会最终产品确定的总需求以外，还包括劳务需求与净出口需求部分。

上述测算和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指标各有利弊。比较而言，按社会总产品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较全面的考察，从供给上看，它包括本期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从需求上看，包括积累需求，消费需求和补偿需求，它考察了社会最终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而且也考察了本期生产过程因生产又被消耗的中间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因此，按社会总产品指标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有利于统一安排和正确处理产业之间、生产和建设、生产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确定方法只是对社会物质产品总供求的考察，社会劳务总供求未包括在内；以国民收入作为总量指标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并以此测算社会总供求平衡状况，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因为国民收入生产额是总供给的主要部分，国民收入在货币形态上经过分配再分配形成的积累需求与消费需求是社会总

需求的决定性部分。从我国情况看，总需求膨胀，无非是这两方面需求过大的结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国民收入在货币形态上分配所形成的积累需求与消费需求合计超过了实有的国民收入。所以按国民收入总量指标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可以反映我国社会总供求的基本状况，但这种计算方法范围偏窄，它未包括与折旧及劳务相关的供给与需求。另外按社会最终产品测算和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理论与实践上也不是最理想的方法。

按国民生产总值口径测算和确定总供给与总需求，以此来考察总量平衡状况，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较按国民收入指标测算考察总量平衡状况更为全面，更为确切。以国民生产总值（最终产品+劳务+净出口）作为总供给比以国民收入生产额作为总供给要全面，它包括了折旧产品供给与劳务供给，可以满足中间产品需求以外的全部供给。按国民生产总值口径计算的总需求是货币形态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比按国民收入使用额计算的总需求更能确切地反映需求总量，因为国民收入使用额只包括已经实现的需求，而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总需求，不仅包括已经实现的需求，而且还包括未实现的需求。如居民消费需求，除了已经实现的购买消费品和生活服务支出外，还包括手持现金和活期存款的增加额。其次，按国民生产总值口径考察总供求状况更能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宏观控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市场，而且还包括劳务、技术、信息等市场。社会生产与劳动者生活需求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需求，同时也包括劳务、技术、信息等非物质方面的需求，因此，在考察国民经济总量时，必须把非物质方面的供求容纳进去，这样才有利于搞好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和宏观控制。

社会主义集权模式 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原则有机结合的一种抽象图式。这是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历史发展过程时使用的一个概念。第一，集权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几乎是单一的公有制。在法律上存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实际上二者都由国家支配；在农业中自留地和与此相联系的自由市场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经济决策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既掌握宏观资源的分配，又掌握着微观资源的分配。但家庭基本上保留了选择消费品和职业的自由。第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企业占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并按照以收抵支的原则进行盈亏核算。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都属国家所有，企业无权将其转让。第四，物质刺激成为完全合法的东西，有了实际收入的差别。第五，货币起着消极的作用。中央计划包括经济中投入和产出的全部细节；来自上面的信息采取命令的形式，来自下面的信息采取报告的形式；计划指标采取实物形式；货币只是实现中央决策的一种加工工具，并不构成选择决策行为的基础。第六，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国家对进口和出口的总量、总值、商品种类和地区分布等实行严格的中央控制；把国内价格结构同世界市场的价格结构隔离开来。集权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能把资源集中地用于经过严格选择必须优先发展的部门，这一优点在战争或高速实行工业化的某个时期尤为明显。集权模式的主要弊病是：包罗万象的计划指标体系内部存在矛盾，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僵化，不能灵活地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浪费严重，成本太高；生产单位积极性受到压抑；产生官僚主义等。

社会主义分权模式 含有受控制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原则有机组合的一种抽象图式。这是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历史发展过程时使用的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分权模式的基本内容是用一系列上级规定的行为原则和经济手段来代替命令和行政手段，为计划的执行提供一种机制。分权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中央和企业的关系中，中央只直接作出基本的宏观经济决策，把经常性的、一般的经济决策权留给企业，中央的计划不作为命令下达给企业，企业自己的计划是自主的；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通过市场购买，企业的产品通过市场销售；货币起着积极的作用。价格必须反映成本，必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企业的经济成绩根据财务结果来衡量；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同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集体经济变得更加自主和更加面向市场，私人企业能够正常地经营，家庭对消费品市场和劳务市场发挥更大的影响。分权模式的优点主要在于它既保持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又利用了市场机制。国家计划摆脱繁琐的细节考虑重大的长远的问题，计划更为完善和科学，基层的积极性发挥得较好。在分权模式中，使中央计划的作用得以保持的主要因素是：国民经济的总体框架由中央确定了；中央给基层单位规定了行为原则，使企业对局部目标的追求既有利于实现全国的总体目标，又同对企业职工的刺激联系起来；中央对价格、税收、利息率、信贷、关税率、兑换率等参数实行有效控制，保证中央能从总的方向上指导经济的发展；还有必要的组织措施和政治措施。

社会主义待业 在我国城镇中新成长的劳动力和

社会青年达到就业年龄有就业要求，并在劳动服务公司或街道等有关组织进行登记，尚未实现就业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我国存在待业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过快，而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增长率之间比例严重失调，这是导致我国待业问题尖锐的根本原因；②我国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不合理，重工业投资大大超过轻工业的投资，加之不重视发展提供劳务的行业，直接影响了就业；③我国生产关系的改造过快、过急，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各种所有制一律升级，对个体劳动者采取了取缔政策，结果限制和堵死了劳动就业门路；④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也是造成待业现象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⑤十年内乱，大大地加剧了待业的尖锐性。社会主义待业与资本主义待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偶然的现象，后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经常的必然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大力发展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城镇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已逐步得到了解决。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 反映人口再生产与社会主义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本质联系的规律。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是：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它使人口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劳动力再生产同物质资料再生产协调发展，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并逐步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和人口构成的合理化。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仅要求人口生产数量与质量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而且也为两者相适应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根据统一的经济计划，能计算出社会需要的劳动力多少，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多少，科学文教事业发展规模应该怎样等，从而使人口再生产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另一方面，按照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调节人口的生产，使人口生产的数量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就能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提供必需的劳动力，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同时也可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 劳动力再生产是任何社会制度下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日益充分满足现有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使他们体力和智力上得到正常的恢复和发展；二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和训练新的劳动者的基础上，使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不断得到替换和补充。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劳动力再生产就具有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再生产的特殊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再生产出的劳动力可以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则又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发展资料。②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者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一方面劳动者就业是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计划调节，解除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劳动力再生产与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有机统一。③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而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则是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前提。④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提高劳动力素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 社会主义再生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劳动者以生产资料共同主人的身份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成果实行按劳分配。一次生产过程结束，劳动者只得到属于他的一份消费资料，不可能把生产资料占为己有，劳动者的个人消费把消耗掉的体力和脑力再生产出来，继续作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投入下一次生产过程，这样，就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过社会主义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种不断循环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社会主义物质资料再生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者是做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 对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占用、劳动消耗和劳动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对比和控制，保证以较少的资金占用和生产消耗，取得较多的产品和盈利。它是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一种办法，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包括两方面内容：①核算生产消耗的经济效益。将生产消耗量同生产成果进行对比，促使企业以收抵支，取得盈利；②核算资金占用的经济效益。将资金占用量同经营成果进行对比，促使企业少花钱，多办事，提高资金利用效果。在实际工作中，要进行生产成果核算、资金核算、成本核算和利润核算，为核算上述两方面的经济效益创造条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生产，经济核算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的有关范畴：①企业要以商品价值形式来核算生产成本，比较企业收支，衡量和确定盈利；②企业按照商品生产者的方式组织生产和交换，利用货币、资金、

成本、利润等商品经济范畴来进行经营管理，用销售商品的收入抵偿商品的耗费，取得赢利；③企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要根据生产商品是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统一标准来衡量，即以产品的价值来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按照统一的价格销售商品，赢利就会减少，甚至会亏损，影响企业的收入和职工的收入；相反，那些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按照统一的价格出售商品，赢利就会增加，并相应地取得较多的利润留成，使企业有能力扩大再生产和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因此，实行经济核算可以促使企业精打细算，厉行节约，进行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利用固定生产基金和挖掘企业内部的生产潜力。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把经济核算关系肯定下来所形成的国家管理企业和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制度，即在社会主义经济责任制基础上所建立的一种既保证国家的统一领导，又让企业有独立经营权利的经营管理制度。在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条件下，企业首先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严格遵守国家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服从国家的计划，及时完成财政上缴任务，同时在此基础上，企业必须有独立的经营权利，任何人不得任意干预企业的正常的经济活动。在经济核算制下，企业必须建立严格的核算制度，要求一切收入和支出要有严密的手续，各项财产和资金有严格的管理和记录，各种消耗要制定定额，不得任意突破，产品和劳务要进行成本计算，日常的经济活动要进行全面的核算，建立岗位责任制，并定期开展经济活动分析，借以检查国家计划执行情况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实行经济核算制，可以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

社会主义就业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相对稳定地参加某种有报酬或有收入的社会劳动。它包含以下四种涵义：①劳动者必须亲自参加某种劳动；②所从事的劳动必须相对固定，形成一种职业；③劳动者能从这种劳动中获取报酬或收入；④这种劳动必须对社会有益，属于正当、合法的社会劳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劳动就业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劳动就业是劳动者获取收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发挥和发展个人劳动能力，为社会提供财富、作出贡献的条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劳动就业的社会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劳动就业的形式和水平也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的就业是通过向资本主义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形式实现的，并且就业经常是不稳定、不充分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人都有平等的就业权，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解决劳动力就业主要是依靠"统包统配"制度，就业门路是单一的，即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就业。人们也习惯地认为只有到国营或集体单位当上正式的固定工，才算就业，否则就不算就业。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在劳动就业方面推选了"三结合"方针，即在国家统筹规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出现了就业门路多样化。按照我国现行的标准，劳动就业人口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职工、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以及农村集体和个体劳动者等。一个国家的劳动就业状况，受各种社会因素制约，如人口、教育、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特别是社会经济制度和就业体制、就业政策的制约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控制人口和统筹安排、解决就业问题，保证广大劳动者就业权利的实现。

社会责任会计 指从社会的角度测定和报告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的一种会计。其目的在于指导经济资源的最佳分配，以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社会责任会计从其应用的范围来看属微观会计，但从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来看则属社会会计的性质，该术语是1972年美国教授戴利在其学位论文中首创的，目前在西方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学者认为，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的影响；二是对职工的影响。企业除了自身盈利和生存以外，还要对社会承担责任。工业越发展，这个问题就越尖锐。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包括：环境污染的治理，能源的综合利用，产品质量的控制和改进，劳动保护措施和职工培训计划的实施，以及对企业所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所作的资助情况等。近年来，其内容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责任会计采用的方法有三种：(1) 仍使用现行的会计制度，只是更改会计科目；(2) 在传统会计报表后面附一份提示社会责任的报表；(3) 另立一套新的社会责任会计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责任会计已被介绍到我国并开始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

社会集团购买力 简称"集团购买力"。指一定时

期一定地区内社会上各单位（包括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全民和集体的社会组织），在市场上用公款购买其内部使用的公共消费品的货币支付能力，它是整个社会商品购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来源：工矿、企业是从本单位的经营收入中形成；国家机关、团体等事业单位则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形成。集团购买力购买商品的支出，一般属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所购买的内容主要包括家具、办公用品、文娱用品、书报杂志，交通工具、炊事用具、劳保用品等等。国家根据精简和勤俭节约的原则，通过计划管理、限额控制、专项审批、定额供应、银行监督等措施，严格控制这类开支，并在各个时期规定有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商品的目录，以防止一些单位随意开支，并减轻对市场的压力。形成集团购买力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 用公款购买。凡单位集体中个人的钱购买商品，或职工食堂购买副食、燃料等，不算在内。(2) 通过商品供应环节购买。凡通过物资部门调拨来的或直接从国外进口来的，除专项控制产品外，都不算社会集团购买力。(3) 非生产力的商品。凡购买直接用于支付劳务性和服务性的费用（如旅差费、邮电费等），也不算。只有上述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确定为社会集团购买力。

社队企业 通常指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中公社和大队一级兴办的独立经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社队企业最早起源于5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兴办社队企业的目的，在于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工业服务。兴办社队企业的途径在于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挥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地举办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机制造和修理业，采矿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因陋就简、由小到大、逐步提高。社队企业的发展，对于满足城乡需要、增加社队收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中国农村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都有重要意义。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队企业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获得了迅速发展。1984年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整套同时并举方针的形象概括。它包括：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提出这一方针的基本思想。1958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把这一整套方针列为社会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提出这样的方针，是为了充分动员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两权分离"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两权分离的主要形式有：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以税代利、全民所有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全民所有制企业租赁经营、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社会主义股份制，等等。（参见本卷"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两田制 即农村实行的口粮田和责任田制度。口粮田按人头划分，只交农业税，主要留作农民生产自己吃的口粮；责任田，除交农业税以外，还要交定购粮任务及土地承包金。它比较适宜于地少人多的地区。两田制是在受城市工商企业实行租赁的启发下产生的，它采取由集体和农户建立固定契约关系，通过地租这种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体现土地的所有权、让渡使用权，强化对土地的管理。实行两田制的积极作用是：1.增强农民的集体观念和土地有偿观念，租赁合同明文规定土地是集体的，使用权要通过有偿的形式才能取得。2.促进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租赁田的土地租赁费高于口粮田和原来的承包田，原来经营不好以及家庭主要劳动力已从事非农产业的，就开始不种田或只要基本口粮田，而会种田的、经营效果好的，就愿多种田。3.调动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由于租赁制把集体、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固定下来，增强了农民经营土地的责任心。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之一。"两头在外"指沿海加工业的原材料从国外进口，不与内地部门争原料，生产的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销售，不与内地争市场。"大进大出"是指对国际市场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抓紧时机，稳步而大张旗鼓地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业，大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学习别人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应力求其多，原料进口规模也要相应增大。实行这一战略，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优势，对拓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大有好处。它对于我国与外国互通有无，搞活经济起

着积极促进作用。

两极分化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人由于剥削而越来越富，多数人由于被剥削而越来越穷的趋势。两极分化一般发生在下列条件下：第一，在简单商品经济中，由于各商品生产者所掌握的技术、资金和生产资料不同，生产同一种商品所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不同，一部分具有优势的商品生产者就可以获得超额的价值，另一部分处于劣势的商品生产者可能连生产的成本也难以收回。这样，一部分小商品生产者越来越富，达到一定的程度，扩大生产规模，雇佣工人，成为资本家；另一部分人则贫困、破产、沦为无产者。第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作用，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人数越来越多。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分配方式还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人们的收入和富裕程度仍有差别。但是，两极分化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因此，大部分生产资料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也不会导致贫富悬殊。第二，由于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而导致收入差别的扩大，国家可以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社会福利等政策进行调节，使居民的收入差别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两层次按劳分配 国家间接管理个别职工收入水平的一种分配方式，它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具体形式。两层次按劳分配主要有三种模式：国家—企业，企业—个人；国家—个人，企业—个人；国家—市场，市场—个人。在传统的分配模式中，按劳分配的形式是国家对每一个别职工实行直接分配。每个职工的工资等级和工资水平都由国家统一规定。职工的工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可以随职工转移。这就叫做单层次按劳分配。实行两层次按劳分配的理由是：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和中国经济规模的巨大，情况千差万别，国家不可能准确地考察数以亿计的城市职工的劳动贡献，并据此来决定每个职工的劳动报酬，结果只能实行大体的平均分配。要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就必须承认在国家与职工之间，还存在企业这一层次，并通过企业这一层次对职工实行按劳分配。在实际工作中，两层次按劳分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固定工资与浮动工资相结合的形式。即职工的工资由国家决定，统一调整，奖金等由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效益，并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行决定和调整。第二，工资总额包干形式。即国家对企业核定一个工资总额，在这个范围内由企业依据不同情况决定每个职工的具体收入；第三，职工工资与企业的某项经济指标挂钩形式。具体又有与总产值、总产量、净产值，上缴利税等指标挂钩。企业工资总额随这些指标的增长而增长，企业内部分配由企业自主决定。

苏联农业集体化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把土地收归国有，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批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即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但是，由于1918年以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以及1921年以后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过程停顿了一段时期。1928年春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暴露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促使苏维埃政权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伐。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集体农庄成为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1930年，联共（布）中央确定农业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其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永远归集体使用，其他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共同劳动，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集体农庄允许庄员经营宅旁园地和家庭副业。1937年，苏联宣布完成了农业集体化。

苏南模式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类型之一。主要是指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乡镇企业的经营发展方式。其主要特征是：1）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规模大、技术力量雄厚、资金丰裕、经营范围广泛。2）不少企业与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的企业有着紧密的产、供、销联系，许多企业的技术、管理骨干力量或者是上海等大工业城市骨干企业退休返乡的专业人员和老工人，或者是从这些地方应聘而来的专业人才。3）劳动生产率较高，经济效益较好，产品更新换代周期较短，市场适应能力较强，产品富有竞争力。4）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苏南一带乡镇企业公有化程度较高，生产社会化程度也较高。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 苏联为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状况而从1926年开始、30年代末基本结束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程。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特点是：1）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工业化期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和增长速度均远远超过农业和轻工业；2）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其中包括农业税和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而从农业部门集中的纯收入。在工业化期间，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为26—29%；3）追求高速发展。工业化期间、

苏联工业增长速度平均为17—20%，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近30%；4）强调技术和专业人才的重要作用；5）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鼓励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

劳动者个体所有制经济 生产资料归个体劳动者所有，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由个人支配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体经济一般具有分散性、多样性、灵活性、传统性等特点。在中国城乡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对于丰富市场、满足劳动人民需要，以及吸收劳动者就业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中国现阶段发展个体经济，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必然过程：第一，在中国现阶段，广泛存在着以手工工具为特点的劳动方式，这就为劳动者从事分散的个体劳动提供了可能；第二，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公有制经济还不能提供充分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客观要求个体经营来拾遗补缺；第三，限于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公有制经济还不能吸收全部劳动力，一部分劳动力需要另谋出路，从事个体经营。只要上述条件长期存在，个体所有制经济的长期存在便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体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个体经济就是个体经济。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因此，个体经济一般不会普遍发展到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但是，由于个体经济毕竟是建立在小私有基础之上，在一些个体经营者当中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同时，由于个体经济是纯粹小商品经济，生产经营受价值规律支配，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自发性；所有这一切，有可能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正常经济秩序。因此，在充分扬其利时，还要运用各种手段避其弊，对它们加强管理和正确引导。在中国现阶段，政策还允许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户适当雇佣少数帮手来扩大经营规模。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 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界的一种理论观点。认为存在于人的身体内的劳动能力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属劳动者个人所有。由于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力不会因为不能同生产资料结合而不得不出卖给生产资料所有者，从而成为商品。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是因为劳动力属于个人所有，因此，社会必须把产品的一部分以劳动为尺度分配给劳动者，以弥补劳动者脑力和体力的消耗。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实行按照分配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就在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劳动力属于个人所有。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力虽然在本质上不是商品，但是，在形式上却是商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且应该允许劳动力流动，允许公有制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自由招聘或者辞退工作人员。

劳动力部分个人所有制 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界的理论观点之一。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存在于劳动者体内的劳动力只是部分属于个人所有，而不全部属于个人所有。这是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劳动者在全民范围内或集体范围内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和劳动过程服务于劳动者集体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因此，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属于劳动者的集体或劳动者的社会，它应当连同生产的另一要素生产资料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由社会或集体统一分配和安排。不能简单地认为劳动力属于个人所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囿于生产力水平不高，还不能无代价地向劳动者和他的家庭提供全部生活资料，也就是还不能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因此，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谋取以及恢复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能凭借自己的劳动来实现，也就是说，劳动仍然是劳动者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劳动者劳动能力大小不同，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劳动消耗不同，因此，不同的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不同。这就表明，劳动力在事实上还部分地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力部分个人所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劳动既是为社会、为集体的劳动，又是为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决定了社会产品一方面必须按照社会或集体的整体利益的要求在全社会或集体范围内统一分配，另一方面，个人消费品分配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制度。

劳务市场 商品经济中劳务商品的流通方式和交易场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以直接的、具体的劳动服务来满足人们消费需求和生产需要的部门，这就是劳务服务部门。劳务，即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需要的服务活动。劳务商品的供求关系，劳务的商品流通形成了劳务市场。劳务市场分生产劳务市场和生活劳务市场。劳务市场是商品经济市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务市场的流通内容、交换规模、交换关系不断扩大，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从事服务劳动的劳动者队伍不断扩大。在经济发达国家，劳务部门已经成为就业的主渠道。劳务市场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劳务市场的发展又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就业　是指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由此获得劳动报酬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就业就是实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就业的过程就是使这种可能性的生产因素变为现实的生产因素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就业规律是实现充分就业。建国以来到改革前，我国在劳动力计划、招收和使用上，逐步形成了以统包统配为内容，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为特征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中，我国提出了"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新的就业方针。我国劳动力招收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对大学、中专和技校毕业生和家在城镇的复员、转业军人由国家统一分配，即包下来；二是对社会上的劳动力采取有组织的招收，即招工单位根据国家批准的劳动力计划，编制招工计划，经主管部门批准，在指定的地点，按照规定的手续进行招收。目前有组织的招收对象主要是城镇待业人员，包括没有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返城待业的下乡知识青年。我国企业的用工制度形式有：固定工、临时工、季节工、亦工亦农。招工制度实行了公开招生、自愿报名、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方法；企业的用工制度方面，除原来的劳动制度不变外，逐步实行和推广了劳动合同制。劳动就业主要由劳动服务公司负责。它担负着组织、培训、输送、调节和吞吐社会劳动力的职能。

劳务出口　又叫劳务输出。是指劳动力富裕的国家向劳动力短缺的国家提供其所需要的劳动服务。它的实质是一种劳动力国际性交流。劳务输出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承包工程；(2)创办企业；(3)承包生产性作业；(4)从事服务性工作等。广义的劳务出口还包括科技知识出口、为国外提供运输、通讯、保险和旅游服务、承揽外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业务。

劳务出口对于出口国是有利的，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可以带动本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例如承包工程可以带动本国的建筑材料出口；可以缓解本国就业不足问题；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文化思想等。劳务出口是对外开放的形式之一。

我国的劳务输出可以追溯到近代的"华工出洋"。从19世纪中叶起，一部分贫苦的老百姓为了谋生，先后自愿、被迫或被骗卖到东南亚、美洲和世界其它地方。他们一般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倍受剥削和欺凌。今天我国开展的劳务输出活动，是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员出国工作。被派出国人员有社会主义国家作后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上都有保障，其性质和地位已与昔日"华工出洋"有着根本的区别。

劳动合同制　用劳动合同这种法律形式来确定和调整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用工制度。它较好地体现了用工管理上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企业与职工责、权、利相统一，使劳动力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合理的流动性的特点。劳动合同分长期合同和短期合同两种。前者适合于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后者适合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各种临时性、季节性、承包性的工作。

劳动合同制的实施是适合于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以及建立劳动立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从1985年10月起，我国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推行了劳动合同制。并规定，国营企业以后不再招收新的固定工人，新招职工一律实行合同工制。

劳动后备系统　对新生劳动力和暂时失业的职工进行组织、管理、培训并引导他们就业或再就业的制度和机构。我国的劳动后备系统由各级劳动服务公司、职业培训学校、人才交流中心和劳务市场等机构构成。

劳动后备系统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在平衡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1)为企业的富余人员提供一个"蓄水池"。中国城镇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过剩劳动力，估计数量占城镇职工总数的15—30%。劳动后备系统可以组织这些人进行学习、培训，并重新参加适当的工作。(2)向企业提供所需的合格人才。企业所需的人才，可以到劳动后备系统招聘，解决国家分配不足的矛盾。(3)培训新生劳动力，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4)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渠道和信息，促进劳动力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劳动形态　指人类作用于自然界或劳动在人类生产活动中所采取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劳动表现为三种形态：(1)潜在的劳动形态，指未实际发挥作用的、存在于劳动者体内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即劳动能力。可能的劳动力变为现实的劳动力尚需一定的条件。(2)流动的劳动形态，又叫活劳动，指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正在发挥的体力和脑力。(3)物化的劳动形态，又叫死劳动，指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

劳动形态对于按劳分配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潜在的劳动、流动的劳动、物化的劳动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所以，按劳分配不能单独考虑某一种形态的劳

动，必须统筹兼顾、综合考虑。在我国实际工作中，计时工资一般以潜在形态和流动形态的劳动为依据，计件工资一般以物化劳动为依据。为弥补这种计量的不足，还实行了奖金、津贴等补充形式。

劳动服务公司 在中国劳动力管理的实践中创立的社会劳动力管理综合机构，是同级劳动部门或当地政府领导下的一个新型的事业单位。它既担负着组织指导社会劳动力进行经济活动的任务，又承担着劳动部门的部分行政职能。其主要任务有：(1) 对待业人员进行统计、登记和调查研究、介绍和安排待业人员就业。(2) 掌握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及时输送临时工。(3) 自办生产、服务等集体经济事业，组织待业人员就业，指导民办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发展。(4) 建立培训中心，进行职业教育。(5) 为完善社会劳动组织，改革劳动制度创造条件等。

劳动服务公司有两种类型：一是省、市、县(区)劳动部门所办的劳动服务公司；一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机关以及街道和群众团体等所举办的劳动服务公司。从1978年全国第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创建以来，到1984年底已发展到2万多家。它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对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推动待业青年和暂时失业的劳动力进行职业训练和管理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劳动积累 不投入资金或只投入少量资金而主要靠大量投入人工(活劳动)，为社会创造长期具有使用价值的工程而形成的积累。社会再生产中的积累，一般划分为活劳动积累和物化劳动积累。物化劳动积累就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积累，其货币表现就是资金积累。活劳动积累，就是把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直接积存起来。劳动积累就是主要靠活劳动的积累。劳动积累也叫劳动投资，如农业生产中的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修桥铺路等，都包含有大量的劳动积累。劳动积累过程中并不直接生产出可供消费的商品和劳务，而是劳动的支出，是一种投入活动。但劳动积累所形成的基本建设工程投入生产，都可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国的劳动资源相对充足而资金相对缺乏，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扬其避短，增加劳动积累，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财富。

劳动密集型企业 与资金密集型企业相对称。它是指技术装备程度低，用人多，产品成本中活劳动消耗所占比重大的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划分：(1) 按投入的技术装备等固定资金与劳动力的配合比例划分，即单位劳动力使用技术装备等固定资金量少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2) 按产品成本构成划分，即成本中活劳动消耗所占比重大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3) 按有机构成划分，即有机构成低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要在近阶段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它既可增加社会财富又可扩大就业能力。

劳动券 马恩所设想的在消灭商品货币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按照所参加的公共劳动而得到的领取个人消费品的凭证。它不是货币，不具有货币的职能。

在马克思以前，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欧文曾提出并使用过劳动券，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但欧文的劳动券是以劳动小时为计算单位，只强调人类劳动这种自然的价值尺度，而忽视并且否认价值规律，所以不到两年就失败了。以后，欧文的追随者约翰·格雷，把欧文的劳动券变成"劳动货币"。他力图在保留商品货币的条件下消灭商品交换，因而也只能是经济学上的空想。

马恩关于劳动券的设想，是在分析和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关劳动券和"劳动货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认为，在公有的生产条件下，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那么社会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那么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以后就得到一个凭证，然后从社会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驳拉萨尔主义的"公平分配"的谬论时，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为了实现按劳分配，"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这种无需借助于产品货币关系来计量劳动和进行消费品分配的凭证，就是劳动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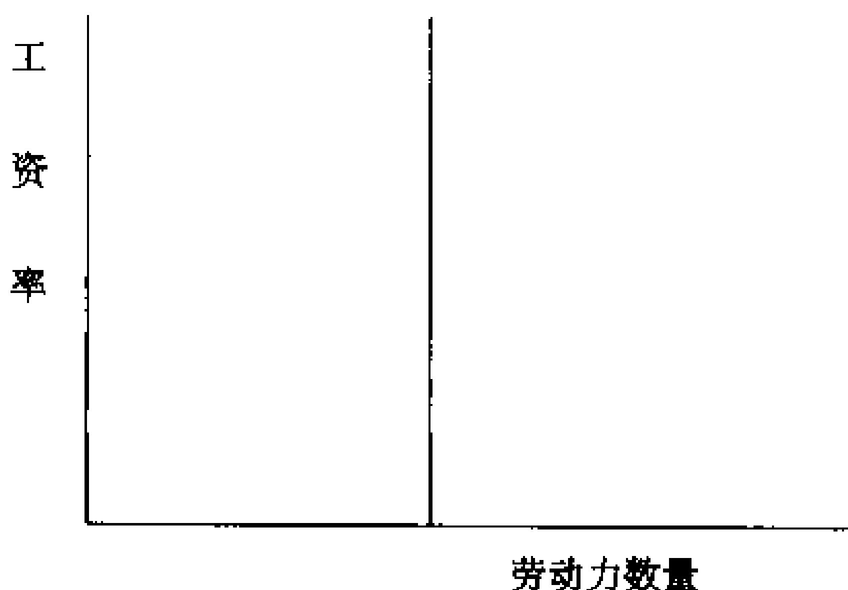
俄国和中国以及其它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并没有立即出现马克思曾经设想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仍然还存在商品经济，货币仍然保留下来了，但这种货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一定领域实际上已经在起劳动券的作用。

劳动收入 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而获得的报酬。劳动收入的大小是根据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量的大小，又

是通过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确定的。我国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形式：(1) 工资。是劳动者创造的必要产品的货币表现，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的劳动报酬形式。工资可分为固定工资、浮动工资，也可以分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等形式，它是目前我国劳动者取得劳动收入的主要形式。(2) 奖金。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采取的作为工资补充超额劳动报酬形式。(3) 津贴。如职务津贴、岗位津贴等。除此之外，承包、租赁企业经营者的部分风险收入和劳动者从事第二职业所获得的合法收入也是劳动收入。农民的劳动收入目前主要是采取农付产品收购后扣除生产成本后的余额。对于个体经营者和合伙经营者，他们的劳动收入主要表现为个体经济或合作经济所获得的盈利。

劳动密集型产业　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称。指投资少，技术装备程度低，需要消耗较多体力劳动的工业部门，如服装、玩具、家具等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企业生产的产品中凝结的活劳动高于其它工业企业。在劳动力资源丰富、建设资金不足、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特殊意义。它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上；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可以多生产一些在工艺上有特长，在品种质量上有特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国家换取外汇。我国在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在劳动力稠密的中部，东部沿海地区，结合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多发展一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工业。但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产业的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会逐渐提高。

劳动供给刚性　劳动供给在工资率变动后没有出现变化或变化很微小而呈现出一种无弹性状态。可用劳动力供给曲线表示（下图）。



产生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①与短期内出现的某些情况有关，即在此期间个人来不及调整他们的工作计划或者某些职业培训期较长。这时的劳动力供给主要由过去的而不是现在的经济条件所决定。②可能是全部劳动资源已被社会经济充分利用。当人们都在提供他们所愿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劳动时，即使增加工资也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

劳动供给价格弹性　用来衡量工资率变动比率所引起的劳动供给量变动的比率，即衡量劳动供给量变动对工资率变动的反应程度。劳动供给量变动的比率与工资率变动的比率的比值，就是劳动供给价格弹性的弹性系数。设 E_s 代表劳动供给价格弹性，P 代表工资率，ΔP 代表工资率变动量，Q 代表劳动供给量，ΔQ 代表劳动供给变动量，劳动供给价格弹性的表达公式是：

$$E_s=\frac{\Delta Q}{Q}\div\frac{\Delta P}{P}=\frac{\Delta Q}{\Delta P}\cdot\frac{P}{Q}$$

劳动供给的价格弹性有五种类型：①供给完全有弹性，$E_s\to\infty$，工资率既定，劳动供给量无限；②供给完全无弹性，$E_s\to 0$，无论工资率如何变化，供给量也不会发生变化；③单位供给弹性，$E_s=1$，劳动供给量的变动幅度与工资率的变动幅度相等；④供给富有弹性，$\infty>E_s>1$，劳动供给量的变动幅度大于工资率的变动幅度，⑤供给缺乏弹性，$1>E_s>0$，劳动供给量的变动幅度小于工资率的变动幅度。影响劳动供给价格弹性的因素主要有：①工资水平。工资水平越低，供给弹性越大；工资水平越高，供给弹性越小。②劳动力的培养费用。培养费用越高，供给弹性越小。③时间的长短。时间越短，供给弹性越小；时间越长，供给弹性越大。

劳动供给收入效应　根据时间经济假定，个人对闲暇的需求是由闲暇的机会成本，这个人的财富以及这个人的偏好这三个因素决定的。闲暇的机会成本假设就是这个人为闲暇放弃的收入，即工资率；这个人的财富假设就是各种收入的总和；这个人的偏好，在分析时可假定是一定的。那么反映闲暇的需求函数式是：

$$D_1=f(\overline{W}、\overline{Y})$$

其中：D_1 为闲暇需求；f 为闲暇需求与工资率和收入的函数，它由偏好决定；W 为工资率；Y 为收入。W、Y 上的符号表示这两个因素对 D_1 的作用方向。根据这一函数式，工资率不变，收入增加（减少），在假设时间用途只有工作与闲暇两者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将减少（增加），闲暇需求将增加（减少）。这种效应，经济学称之为"收入效应"。收入效应之所以

会产生，是因为根据时间经济假定，这个人在原有工资率和收入水平下做出的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安排是满足时间效用最大化要求的，现在闲暇的机会成本没有提高，收入提高（减少）了，那么工作时间的边际效用就降低（提高）了，闲暇时间的边际效用就相对提高（降低）了，因此，这个人想使时间效用最大化原则在新情况下再度实现的话，就必须增加（减少）闲暇时间，以降低（提高）其边际效用，减少（增加）工作时间，以提高（降低）其边际效用，直至两者边际效用相等。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增加，人们便想增加些娱乐，减少些工作，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劳动供给替代效应 劳动供给收入效应的姊妹效应。根据闲暇需求与工资率和收入水平的函数关系：

$$D_l = f(\overline{W}, \overline{Y})$$

如果收入不变，工资率提高（降低），必然会使闲暇需求减少（增加），工作时间增加（减少）。这种效应经济学称之为"替代效应"。工资率提高（降低）会刺激（抑制）人们增加工作时间，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难理解的。用时间经济解释，其原因是工资率提高（降低），收入不变，工作时间的边际效用增加（减少），闲暇时间的边际效用相对减少（增加）。这个人想在新情况下继续追求时间效用最大化的话，就应该增加（减少）工作时间，以降低（提高）其边际效用，减少（增加）闲暇时间，以提高（降低）其边际效用，直至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边际效用相等。

私营经济 中国现阶段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私营经济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现阶段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单纯依靠公有制经济尚不能解决社会市场需求和劳动者就业问题，应当允许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形式存在，第二，现阶段还存在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即剩余农村劳动力和公有制经济暂时吸收不了的待业劳动者，这就使得某些拥有较多资金的个体工商户有可能从事资本主义雇工经营；第三，私营经济的存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促使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提高竞争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适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但是，由于私营经济毕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雇工剥削为特点的经济形式，因此，对于它的某些消极作用（如盲目性、自发性、剥削性）必须加以限制，并引导它们健康成长。

私营企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以追求利润为基本动机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私营企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式，它既不同于公有制企业，也不同于个体工商业，它有自己特殊的内在规定性，具体表现为：（1）私营企业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这是私营企业区别于公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重要标志之一；（2）私营企业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这是私营企业同公有制企业的又一重要区别所在；（3）私营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利润；（4）私营企业也是一个经济组织，这是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业的区别之一。

在我国实际行政管理工作中，一般将雇工8人以上作为认定私营企业的标准。目前我国的私人企业大致有独资经营、合伙经营、集股经营三种类型。

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资本主义成份，它依附于公有制经济，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制约，受社会主义经济杠杆的调节，并接受国家的行政监督管理和宏观调节指导。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需要，缓解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增加社会财富等具有积极作用。

"穷过渡"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种错误政策主张和扭曲的经济现象。在文化革命中，左的错误思想和政治动乱给中国经济体制和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搞所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农村，生产小队核算升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升为公社核算。与此同时，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在城市，"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大集体"向国营过渡。与此同时，在一些地区，把城镇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合作社当作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横加砍伐。在流通领域，对集市贸易几度围剿，对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供销社则采取普遍升级为国营商业的作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和"过渡"，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国情，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结果造成工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和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所有制的盲目"过渡"和"升级"导致社会的贫穷，"穷过渡"一语也就由此得名。

"条条专政" 中国经济实践中，人们对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种扭曲的经济关系所给以的形象概括。指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活动几乎都由中央各个部门直接控制，集中决策，垂直领导，地方各级政府基本处于无权的地位。在"条条专政"下，地方

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经济利益的发展受到阻碍。

"条块"结合　中国经济实践中，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原则的表述。"条"是指中央及国务院所属各职能部门；"块"是指省、市、自治区、地区、县各级地方政府。从广义上说，"条块"结合就是指在国民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中，不仅要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维护和增进各自的经济利益，而且要求打破部门和地区之间("条条"和"块块"之间)，部门、地区内部之间("条条"之间、"块块"之间）的界限、分割和封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原则，实行各种形式的、不同程度的生产协作与经济联合，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协调、稳定、高效益地发展。

"条块"分割　中国经济实践中，人们对中央地方之间扭曲经济关系的一种表述，亦是一种经济现象。"条"是指中央及国务院所属各职能部门；"块"是指省、市、自治区、地区、县各级地方政府。从广义上说，"条块"分割是指在国民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中，不仅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而且在中央各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彼此封锁、相互排斥的现象。"条块"分割往往是高度集权型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是社会化大生产和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

没收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

官僚资本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产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在军事工业和民用工矿业方面均有所发展，并在新兴的银行业中占有很大的势力。辛亥革命后，官僚资本转到了北洋军阀手中。但是，只是在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开始以后，官僚资本才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使它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垄断性表现得那样强烈和直接，"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民党新军阀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依靠其政治军事力量，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地集中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首先通过筹措内战经费来增进他们的财富，而筹措战争费用的手段，则是通过发行钞票、增加赋税、筹借公款、乞求外债等来进行的。其次，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来取得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官僚资本借以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中心是金融垄断。四大家族依靠军事独裁政权的力量建立与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四行二局"，从而确立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凭借雄厚的金融力量，独占与控制了工业、商业等其他许多经济部门，并在各地购置地产，广泛掠夺各阶层人民。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发展到最高峰。他们接收了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在我国的敌伪财产，并在内战中大发战争财。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拥有291个工矿企业，掌握全国钢铁90%，煤33%，电力67%，水泥45%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的生产。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44%的轮船吨位，还有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随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国家没收了一切以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本企业。把大银行、几乎全部铁路、绝大部分有色冶金工业和其他重工业部门的大部企业，以及轻工业某些最重要的部门都收归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经过改造，便产生了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有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也具有两重性质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全部官僚资本，就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见本卷"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初级产品　亦称"原始产品"、"基本产品"。它指人们作用于自然界而获得的，未经加工或稍经加工的农、林、牧、渔、矿产品等。根据《国际贸易产品分类标准》，初级产品主要指，食品、饮料、农业矿业生产的原料、燃料、动植物油脂等。初级产品是中级产品、最终产品的基础和前身。初级产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商品。

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是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具体表现。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利用就是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就是克服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之所以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因为建国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占有重要的地位。1949年我国共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12.3万多家，总产值68亿多元（当年价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3.3%。就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私营工业所占比重在30—80%左右。私营商业在1950年共有402万户，占全国商业总户数的98.4%，从业人数662万人，销售总额182亿元（全年价格），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76.1%，零售额的85%。资本主义工商业所缴纳的税款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1950年占32.92%。这样，如果我们对这一部分私营工商业利用得好，我们就可以赢得时间，腾出手来，集中主要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一批国家急需的重工业建设。同时，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于能维护就业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技能，此外，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解放后，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而资本主义工商业就业和从业人员高达862万人，显然，利用私营工商业，可以维持这批人的就业。中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中，有20%左右的人是技术专家，这是一笔财富，应当加以利用。那么解放后，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利用又限制呢？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有两重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对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于唯利是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本性，必须加以限制。限制主要是通过劳动保护政策，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通过价格政策防止资本主义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剥削农民和消费者。此外，还通过税收政策和企业盈余的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国家实施利用和限制政策，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参见本卷"国家资本主义")。

利改税 是我国财政收入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我国从1978年起，对国营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进行改革，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但由此而形成的分配方式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不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需要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于是，在1983和1984两年分两步推行了利改税的改革。它共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实行以税代利，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交利润的形式，改为按照税法规定的统一税率，缴纳国营企业所得税。其二是改革流转税制度，将原先单一的工商税分解为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以加强其调节能力。具体分为两步。1983年6月起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将国营企业上交利润改为上交国营企业所得税，对国营企业的税后利润再按照不同的分成办法进行利润分成。1984年10月起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主要内容包括：①将工商税一分为三，对工业企业的不同产品分别征收产品税和增值税，对商业企业征收营业税。为了调节不合理比价关系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对征收产品税的不同种类产品实行了较大差别的税率。②对一步利改税的所得税征收办法进行了调整，规定大中型国营企业按55%的税率，小型国营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国营企业所得税，并对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作了新的规定。③取消税后利润分成办法，改为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税后利润征收调节税，税率由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同税务部门共同商定，一户一率，一定7年不变。其目的除了要调节非经营性因素造成的企业间利润差别，同时也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利改税形成了我国税收制度的新框架，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国营企业所得税制度，流转税开始向增值税过渡，这就为进一步的企业制度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利润包干 又称利润上缴包干或上缴利润包干。它是国营企业利润分配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改革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实践中，利润包干曾在许多地方进行试验。目前，国家尚无利润包干的正式法规，各地试验中的具体办法也有很大差别。利润包干的基本做法是，把企业应当上缴国家的利润作为任务固定下来，超额完成任务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好处。对于超收利润的处理，或企业全部留用，或企业按更大的比例留用。一般讲，利润包干办法比较简便，且对企业扭亏和增盈有更大的鼓励作用。但是，企业利润的大小由于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确定一个合理的利润包干任务相当困难。同时，采用利润包干办法应有所选择。一般讲，利润包干办法主要适合在长期亏损和长期微利的企业中采用。在采用利润包干办法时，要尽量把包干基数定得合理。同时加强对企业执行政策的检查。

利税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 是建立在利税分流理论基础之上，完善企业承包制的一种改革思路。利税分流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应区分利润上缴和所得税这两种形式。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具有双重职能，一是作为社会管理者施行行政管理，一是作为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利益代表者对国家财产施行所有者的管理。这两重职能也决定了国家向国营企业征集收入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是行

政管理者，享有行政权力并可据此向企业课征各项税收。另一方面国家是所有者，享有所有权并可据此向国营企业收取资产收益。因此，国营企业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和利润分成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基于此种认识，国有企业应当在按照低于现行所得税率的税率照章纳税之外，再根据企业盈利情况向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缴纳一部分利润，国内部分学者据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制的思路，其基本内容是①改变旧有承包制中以全部实现利润为承包指标的办法，恢复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但将旧有的55%的税率降到35%左右。②征税时，企业归还银行贷款的本息不再从应征所得税中扣除。也就是说企业只能用税后利润来归还贷款，改变企业用国家税收还贷的办法，保证国营企业所得税税基的完整性。此即税后还贷。③企业对国家的承包以税后利润为指标，企业对国家上缴利润的比例以税后利润为基础制定，从而企业是在缴纳所得税之后再向国家缴纳一部分承包利润，此即税后承包。

利润留成 从企业实现的部分利润或全部利润中，按规定比例提取一部分留给企业使用，是中国对国营企业在分配关系方面实行的一种过渡性办法。利润留成有3种基本形式：①全额留成。即企业实现的全部利润都按一定比例留成，其留成的比例，是按照前3年应得的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留成之和占前3年利润总额的比例，予以核定。②超额留成。即企业计划内的利润不留成，超过计划的利润按一定比例留成。③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即企业的当年利润分为基数利润和增长利润两部分，当年利润相当于或低于上年利润的部分为基数利润，超过上年利润的部分为增长利润，按照核定的比例提取基数利润留成资金，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增长利润留成资金。实行利润留成制度的企业，不再提取企业基金。基数利润留成比例的确定是根据企业在被批准实行利润留成制度时的上年有关数额计算，公式如下：

$$\text{基数利润留成比例}=\frac{\text{应纳入利润留成范围的5项资金上年数}}{\text{计算基数利润留成比例的上年利润总额}}\times 100\%$$

上式中分母为上年实现的利润总额减去上年用于归还筹措贷款的利润，加上占上年职工工资总额11%的职工福利基金，再加上上年实际支付的经常性生产奖金。分子包括：①新产品试制费；②科研经费和职工技术培训费；③职工福利基金；④职工奖金；⑤企业基金。

利别尔曼的经济思想 叶克赛·格里戈里耶维奇·利别尔曼是苏联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经济改革的倡议者之一。利别尔曼出生于乌克兰的斯拉乌塔。1920年毕业于基辅大学。1924—1925年留学德国，研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1933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后，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6年，发表文章提出了改革苏联计划管理的建议。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他在1962年9月9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即著名的"利别尔曼建议"。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苏联经济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大讨论。以后，他又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并完善他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思想。在这场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大辩论的基础上，1970年他又出版了《提高社会主义生产效果的经济方法》一书。利别尔曼的这些经济思想，对推动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也因此成为当时苏联、东欧经济学界一位很有影响的经济改革理论家。

利别尔曼建议的基本内容是：鼓励企业接受高计划任务，努力挖掘生产潜力，关心最大的经济效果；加强经济刺激，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新制度，根据企业的经济条件规定计划盈利定额，以此作为评价企业工作效果的唯一可靠基础；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下达给企业的生产计划指标主要是指品种的产量任务和交货期限，其他计划指标由企业自行制订；企业根据盈利利率的多少提取物质鼓励基金，并扩大企业运用奖金的权限；灵活规定制订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有利于克服国家与企业的矛盾，提高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归纳起来，利别尔曼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社会主义计划机制的理论

苏联长期以来坚持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方式。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这种计划管理方式日益暴露出它的许多弊端。因此，利别尔曼建议的第一条内容就是要改革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用新的计划机制去代替它。他说："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得企业迫切关心接受最高的计划任务。采用新技术和改进产品质量，总之，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这种新的计划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计划管理的内容，一是计划制定的方法。

苏联传统的计划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中央计划机构手里，中央计划机构下达任务的范围包括了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计划指标多达上千种。利别尔曼认为这种繁琐的计划必须摒弃。他把计划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计划指标，由中央计划局制定而下达给企业；另一类是企业计划指标，由企业根据中央计划指标的要求，自行决定，企业有制定自身生产经营计划

的自主权。他认为，中央计划局下达给企业生产单位的指令性计划只需要三项：(1) 按品种的产量计划；(2) 交货期计划；(3) 计划盈利定额。至于其它的各种计划指标，只要下达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就行了，不需要把它们摊派给企业。企业根据这三项计划要求，再制订出全面的生产计划，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工资、产品成本、积累、投资和新技术等。采用上述办法可以使国家的集中计划摆脱对企业的琐碎的监督，而集中主要精力管理"一切投入社会劳动的领域，一切生产部门和一切消费方面的发展上的总的比例，增长的速度和最优的对比关系。"不仅如此，计划改革的方向取消品种计划，不再规定实物量计划，而只有利润一项计划指标。工资计划也可以取消，不仅奖金可以浮动，而且工资收入也将随利润计划完成的好坏而浮动。这就是说，计划指标的核心就是盈利定额指标。利别尔曼认为，(1) 利润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检查企业经营好坏的最主要的指标，并要求把它同企业的奖励金额直接挂起钩来。这样，企业不仅有了执行计划的积极性，而且有了编制计划的积极性，并能克服企业压低生产指标的倾向，为了防止企业只生产有盈利的产品，而不生产没有盈利或微利的产品，利别尔曼还主张，要把完成产品品种计划状况作为企业获得奖励的前提条件。如果企业不能完成产品品种计划和交货期计划，企业就得不到任何奖励。

新计划机制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进计划制定的方法。过去，苏联的计划是由中央计划部门广泛运用产品平衡表法制定出来的，计划制定是自上而下的。利别尔曼建议计划的制定过程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实行纵横交织，使计划更加牢靠，"经济领导这块织物"更加结实。其中，第一过程是中央计划的制定。中央计划部门先用变量和逐步逼近的方法，制定出最优的国民经济物资平衡表。然后，在这些物资平衡表的基础上制定出价值形式表示的控制数字，并且把这些价值形态的控制指标交给企业。但这并不是精确的生产计划指令，而只是给企业本身制定具体计划提供了所需要的"指向针"；第二过程是企业具体生产计划的制定。企业根据中央计划部门下达的价值形态的控制数字，明确自己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保证的下限。在保证下限的基础上，把价值形式的指导性计划给以具体化，确定生产的具体品种、数量和质量，产品销售的价格，供货对象与供货时间安排，这一切都要用合同形式把它确定下来。企业有权根据同自己买主的合同关系自己编制总定货单。于是，各种横向的经济合同便成为企业的真正具体执行的生产计划。

2.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动力和利润的理论

利别尔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企业利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一部分是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企业对这两部分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以集体关怀和个人关怀相结合的精神实现列宁的物质鼓励原则。"因此，他坚持应当以列宁的方式来对待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在安排生产和经济活动中不仅要考虑精神刺激，而且要以物质鼓励来支持它。利别尔曼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也应该有其自身独特的经济利益，要承认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差别性，企业的利益应该同它的利润相联系，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应该同它们各自的工作成果相挂钩。"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就应当是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反之，不利于社会的，对任何企业的集体来说也应当是极不利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利益包含于企业的利益中，企业在实现自己的利益中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利益。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企业在实现利润的过程中也就向社会提供了消费者所需要的合格的劳动产品，企业在实现自己的生产计划时，也就同时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因为企业计划只是国家计划的具体化。根据这一原则，利别尔曼提出应该把利润指标作为计划指标的核心。以利润率为核心，建立新的计划体系。虽然他也强调以实物表现的，在应有期限内提供的，更高质量的产品指标是第一位的计划指标，但他认为这些都与劳动效果相联系，而衡量劳动效果最终的指标就是盈利率。利润是一个具体的，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现金数额，企业工作的一切主要方面，无论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是成本的降低，或是基金更好地被利用，都反映和集中在这个数额上。既然利润是企业劳动的综合成果，它集中了劳动者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因此，利别尔曼建议，要根据利润率完成的情况决定给企业集体的奖励基金。企业利益原则的具体含义有两个：第一，企业利润率越高，奖金就越多，从而刺激企业不断提高盈利率。而国家从中也可得到更大利益，保证社会财富有更迅速的增长，同时避免企业有过高的提成；第二，企业制订的计划利润率影响它的利润。当企业实际利润率高于计划利润率时，必须按两者平均数取得奖金。这既能促使企业编制积极的计划，同时又能刺激企业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利别尔曼认为，这一利润率——奖金为动力机制的计划方案可以大大简化并改进基层计划工作，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大大减少；企业为获得高盈利，就要最充分地使用生产能力和设备，不再建立过多的储备；企业会尽力降低生产成本，以提高盈利率，并始终保持高涨的积极性。此外，这种机制还有利于促进企业关心价格，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关心企业的技术设备更新。

3.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关系的理论

利别尔曼主张承认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关系，给企业以一定的独立地位。他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要按其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也要按照商品交换的办法来提供，收取利息费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列宁的经济核算的原则，利润才能有真实的意义。他所主张的新的国家——企业关系，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1）给企业以相当大的经营自主权和生产决策权，除产品品种产量，交货期和利润外，国家不再向企业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2）不仅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作为商品，按其价格在企业和国家之间进行交换，用批发贸易来代替调拨供应的办法。（3）在资金供给上，将拨款改为由银行贷款，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企业有资金使用自主权，成为自己的结算帐户的主人。（4）在利润分配上，采用企业按份额分享利润的办法，来代替按闲置利润定额的固定数上缴国家财政的办法。其中，关键的是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因为，将来企业同国家的相互关系将通过两个渠道，供货量和利润。供货可由商品交换关系和经济制裁来调整，所以要掌握的主要是利润的征收。利别尔曼主张采用利润分成制，把国家同企业集体的利益关系确定下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利润的分配方式很繁杂，它要求对企业的事务进行不断的行政干涉。更重要的是，它不能保证把社会的经济利益和企业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不能刺激企业挖潜增加利润的潜力。因此，利别尔曼建议采用按份额分享利润的原则。利润增长，国家和企业都能多得。企业上缴国家后，剩余的利润就由企业自主支配。他把这种分成办法比作累进的所得税制。具体来说，企业因生产基金和劳动资源而向国家缴税。其中，劳动资源的付税按累进率计算，工资利润愈大，上缴利润率也应愈高，但留给企业的利润额也将提高，虽然提高的程度是累进的。这样，利润的计算和分配也就变得简单而明确，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十分清楚。它保证企业对增加收入的关心，国家也将获得累进增长的利润提成额。这种分成制将排斥对企业进行不必要的行政干涉。

其主要著作有：《厂内经济核算制》、《论工业中的利润计划》、《工业中的经济核算和对工人的物质刺激》、《论工业生产计划和工业生产发展的物质鼓励》、《再论计划、利润和奖金》、《提高社会生产效果的经济方法》等。

财政平衡　即财政收支平衡，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个财政年度），财政收入总量与财政支出总量之间在数量上相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财政收支平衡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力求做到"当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是我国财政工作所遵循的一贯方针，也是我国财政收支平衡的标志。把收支相抵略有节余看成是财政平衡，这并不是人们主观的任意规定，它是财政收支运动规律的反映。财政收和支是财政分配活动的两个侧面，是从不同角度完成财政使命的同一过程。财政收入解决的是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过程取得资金问题，财政支出是解决将取得的资金用来满足各个方面需要问题。财政收入与支出所支配的是财政资金的同一量，两者只是在分配同一数量资金中处于不同层次的活动。收入是财政分配第一层次的活动，是支出得以实现的前提；支出是第二层次的活动，是财政使命得以最终实现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总量只能以财政收入总量为限，量入为出是财政分配的一条客观规律。

财政收入　国家通过财政各环节筹集的资金的总称，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其中预算收入占主要地位。预算收入主要分三大类：（1）各项税收，如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等；（2）企业和事业收入，如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和部分基本折旧基金，事业单位的缴款等；（3）其它收入，包括公产收入、规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种类较多，主要有各项附加收入、企业专项基金收入、经济文化事业收入、其它零星杂项收入等，我国的财政收入是国家通过财政集中的由劳动群众创造的一部分国民收入。它是为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各项需要，为人民群众的当前和长远利益服务的。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国家通过税收和强制公债等形式对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部分国民收入所进行的再分配。用于满足剥削阶级专政的需要。

财政支出　国家为行使其职能，通过财政各环节对筹集起来的资金所进行的分配和使用，我国财政支出包括预算支出和预算外支出，其中预算支出占主要地位。预算支出主要分四大类：（1）经济建设支出。如基本建设投资、流动资金支出、经济建设事业费、企业更新改造资金、支农支出等；（2）社会文教卫生支出。如科研、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支出；（3）国防支出；（4）行政管理支出。此外，还有援外、增拨银行信贷资金、总预备费、偿还债务等支出。在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维持国家机器和对外侵略，也有一部分资金用于经济和文化事业。其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保证垄断资本及其奴仆的高额剥削收入。

财政补贴　国家对某些发生政策性亏损的企业或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对某些生产经营活动给予的

资金补贴。在我国，财政补贴指国家对经营粮食、蔬菜、肉蛋、水产、农药、化肥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和支付农产品以及某些其它产品的国营企业，由于价格制度的原因发生政策性亏损时所给予的资金补贴。资本主义国家则指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一些垄断企业与产品的补贴，如拨付某些军火生产、出口和农业等的财政补贴。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垄断资本的竞争能力，使之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财政包干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管理办法。指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预算收支指标经中央核定后，由地方包干负责完成。除中央对地方新增加任务外，一般不作调整。在预算支出中，除一些专款专用项目外，其余各项支出都可由地方统筹安排，调剂使用。在执行过程中，收入超收和支出结余，都归地方支配使用。如果发生短收或超支，由地方自求平衡。遇有重大特殊问题，自求平衡有困难时，须报经国务院批准，方可作适当调整，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特殊照顾。财政包干是我国于1971年起实行过的，适应当时情况的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它扩大了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增大了地方的机动财力。这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作用的。为了贯彻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适应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从1980年起，我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中央和地方之间按收入和支出项目划分收支范围，工商税作为调剂收入，以1979年财政预算执行数为基础，确定调剂收入比例，定后原则上5年不变，地方多收就可以多支出。

财政超收分成 地方从超额完成国家核定的预算收入任务的份额中，按一定比例取得的分成收入。这是我国财政制度中的一项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较好办法。1972年中央规定，省、直辖市、自治区超收不满1亿元的，全归地方使用，超收1亿元以上者，其超过1亿元部分，50%留给地方，50%上缴中央，由中央用于各地区之间的调剂，进行必要的综合平衡。从1980年起，我国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中央和地方按收支项目划分收支范围，在调剂收入比例确定以后，原则上5年不变，地方多收就可多支出，中央不再另外分成。

财政体制 参与财政分配的各主体之间在财政收支及管理上的责、权、利划分的制度，即规定中央和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国家和地方各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之间收支划分及管理职权范围的制度。它包括：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国家税收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基建财务管理体制和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等。财政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方面，它与政权的行使和运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每级政府，每一个国家政务主管部门，每一个国家机关、组织都承担一定的国家政务或业务，也就是说都承担一定的职能，因而都必须有实现其职能所必需的一定财权，支配一定的财力，运用其掌握的财力，借助于货币基金以取得一定的人力和物力，来完成其所承担的责任。因此，要明确划分财政分配主体之间的责任和权力。由于财政收支主体之间责、权、利范围不同，形成了各种具体的财政体制模式。如我国传统的财政体制是集中模式，其根本特征是财政收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随着经济体制的开展，从1980年起，我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它扩大了地方的财政权力。

财政赤字 亦称"预算赤字"。指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会计上习惯用红字表示，故称"赤字"。一年的财政收入，代表当年国家可以集中掌握的一部分社会产品。财政支出大于收入，意味各财政支出所形成的社会购买力没有相应的社会产品作为保证。在实践中，为了弥补赤字，国家需增发纸币，增加没有商品保证的货币发行，这样，社会发生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缓解经济危机，经常扩大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使国家债务激增，通货膨胀加剧，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交织并发。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必然产生财政赤字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反，由于社会主义的财政经济工作是为人民造福，所以它能按计划要求，合理组织财政收入，并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安排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由于工作失误或者发生战争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也会出现财政入不敷出，形成赤字。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主义财政应当坚持"当年收入平衡、略有结余"。这是我国财政收支应当遵守的一条重要原则。

财政后备基金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建立国家储备和地方储备，保障财政平衡而设置的基金。我国的财政后备，包括当年后备和长期后备。当年后备指国家预算中设立的预备费。长期后备包括：(1) 中央财政以专款拨付的用以建立国家物资储备的资金；(2) 中央财政以地质勘探费和基本建设拨款形式拨付的，用以建立可供开发的矿藏资源储备的资金；(3) 地方财政拨付的用以建立地方储备的资金。此

外，金银外币由国家银行收购，构成国家的黄金外汇储备，其资金来源也是通过财政与信贷的统一平衡来解决。除财政后备基金外，我国还有国营保险公司的保险基金，国营企业后备基金和集体经济单位的储备基金，它们是财政后备的补充。

财政透支　透支是银行允许其存款户在双方约定金额范围内，超过存款金额开出支票并予以兑付的放款形式。财政透支是财政在银行帐户支款超过其存款数。我国国家金库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理，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通过银行帐户办理。当财政支出大于收入时，社会出现银行透支，由银行垫付款项，事后归还。但是，如果透支数额过大，时间过长、银行无力垫付，社会导致增发纸币，造成财政赤字，影响通货稳定，从而影响市场物价。所以财政透支过去在我国是严格控制的。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财政部门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

财政信用　国家为主体的信用关系的总称。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按照有偿原则筹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行为。历史上，财政信用的最初形式是公债。我国现阶段财政信用，包括在国内发行公债和专款债券、在国外发行政府债券、向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借款，以及对预算内资金实行有偿使用等一切以国家为债务人或债权人进行的信用活动。财政信用的基本职能是为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筹积和分配资金。

财政调节　指国家运用宏观财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运行、资源配置走向以及各经济主体利益进行调节，使之按照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综合手段的运用。财政调节包括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直接控制，即通过财政收支规模及结构变化来实现；第二，间接调节，主要通过财政的各种具体分配形式，改变人们在从事各项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状况来实现。财政调节与其它调节方式相比有如下特点：第一，手段的多样性。财政调节是一个由多种调节手段组成的复杂体系，其中包括税收、预算、财政拨款、财政补贴、经费、利润分成等等。第二，调节方式的灵活性。由于财政的调节方式众多，因而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就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因而在财政手段的选择上有很大灵活性。第三，调节范围的广泛性。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的中枢地位，因此，既可调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再生产的诸环节，又可调节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既可调节宏观经济，又可调节微观经济；既可以调节所有制结构，又可调节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既可调节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各种比例关系，又可调节非生产领域中的社会事业结构。第四，调节目标的总体性。由于财政分配是社会集中的分配，而财政分配的目的又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所以运用财政手段和目标选择上，更多具有社会宏观调节特征，更强调社会整体效益。财政调节与其它调节形式一起，组成社会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

"块块专政"　中国经济实践中，人们对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种扭曲经济关系所给以的形象概括。意指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经济组织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地组织经济活动，无视和排斥中央的统一计划领导。"块块专政"是经济地区分散主义的表现，是对国家全局利益的一种破坏。

进出口贸易平衡　进出口贸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经济活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就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进口商品总额与出口商品总额相适应、相协调。也称做输出入平衡。进出口贸易收支是外汇收支平衡中的主要项目。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不仅是实现外汇收支平衡，促进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保证货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都有重要意义。进出口平衡是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进出口贸易中，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支付进口需要的可靠保证。保持进出口贸易平衡，必须根据出口货源供应的可能和确实保证必需物资的进口，要考虑拥有或将要拥有的外汇支付能力以及国内外市场供求情况统筹安排，掌握进口与出口的比例关系，使二者互相适应，互相协调。

进出口许可证制度　国家管制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措施。此制度规定，商品进出口必须事先领取许可证，没有许可证一律不准进出口。进出口许可证的主要内容包括进出口的国别、货物名称、数量、金额和有效期限等。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非关税壁垒的重要手段之一。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曾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实行这种措施，它们利用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对外实行贸易歧视，限制某些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进口，对内维护大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发放进出口证时，充分照顾大垄断公司，对中、小公司则多方刁难，这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领域内的加强。战后，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进出口许可证

制度，以限制奢侈品及本国能生产的工业品进口，增强本国的出口能力，以维护民族经济的发展。进出口制度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管制的主要手段之一。一般来说，商品进出口也必须从国家指定的机关领取进出口许可证，否则，一律不准进出口。目前颁发许可证的机关是对外经济贸易部及其授权的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厅、局。为了简化手续，国务院批准的进出口公司，在其批准经营范围内的进出口商品，可被视为已得到进出口许可，不必另行申请进出口许可证。

进出口代理制 代理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习惯做法。在国际贸易中，委托人（即货主）一般都给予代理商在特定地区和一定时间内代销指定的商品权利。他们之间是委托代销关系。代理商有积极推销商品的义务和享有收取佣金的权利。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我们在外贸界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改革就是实行了进出口代理制。它主要是指我国各对外贸易专业进出口公司接受国内生产和用货部门的委托，代办出口和进口业务。专业进出口公司作为代理人，只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出口所得的外汇及进口所需外汇归委托人所有或提供，盈亏由委托人自负。这种制度改变了过去的自营收购出口和进口的经营方式，对活跃和繁荣外贸战线，减少外贸损失起着积极的作用。

批发价格 按一定货物数量为起点，大宗买卖商品所采用的价格。在中国，批发价格是批发企业向零售企业、生产企业或按照规定可以直接从批发企业进货的单位，以及个体中间商、零售商批售商品所采用的价格。它是处于最低价格（出厂价格或收购价格）和最终价格（零售价格）之间的中间价格。一般由批发企业的进货价格加上批发企业的流通费用和利润构成。它主要反映商业内部以及商业同工农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市场零售价格的基础。合理制订批发价格，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有利于减少流通环节、开辟流通渠道、加强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批发价格按产品划分，有农产品批发价格和工业品批发价格；按地区划分，有产地批发价格和销地批发价格。农产品产地批发价格等于收购价格×（1+购批差率）；农产品销地批发价格则为（调拨价格或进货地批发价格+直接费用×（1+综合差率）；工业品产地批发价格一般为出厂价格×（1+进销差率），少数工业品，事先规定了零售价格，则为零售价格×（1−倒扣批零差率）；工业品销地批发价格为产地批发价格×（1+固定地区差率）或产地批发价格+固定地区差额。

批零差价 同一时间在同一市场上同一商品的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批零差价的形成主要是因为零售商业企业要支付流通费用和税金，要获得利润。批零差价用百分数表示，称为批零差率。其中，批零差价占批发价格的百分比，称为顺加批零差率；批零差价占零售价的百分比，称为倒扣批零差率。现行的零售价格是以批发价格为基础，加上批零差率。规定批零差率要遵循的一般原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的批零差率应当小于一般商品；价值大的商品的批零差率应当小于价值小的商品；容易经营、周转快、损耗小的商品的批零差率应当小于经营难、周转慢、损耗大的商品。合理的批零差价，有利于国家适当地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有利于组织商品供应，加速商品流转，繁荣市场，稳定物价，满足人民需要；有利于协调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利益，促进开展经济核算，提高国民经济效益。

技术市场 指商品化的技术交换关系的总和及其交换场所。技术市场是随着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在我国，技术市场的提出及实践只有短短几年的历史。1985 年 6 月，全国首届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天津召开，这标志着我国技术市场开始出现。此后，全国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种技术交易活动迅速兴起。技术市场的范围包括技术转让或专利买卖、有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和技术承包等。技术市场按内容分有硬件市场和软件市场。技术市场的开发和形成，有助于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有效使用，使生产资料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

技术转让 技术供应方通过各种方式将生产技术、管理技术、销售技术以及有关的权利转让给技术承受方的行为。技术转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无偿转让，即供应一方将技术成果转让给承受方时不收取费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一种是有偿转让，即供应方在转让科技成果时按政府规定向承受方收取一定费用。在国际间技术转让也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非贸易方式，主要是指政府间以援助方式进行的技术转让；一种是贸易方式，即国与国之间通过买卖方式进行的技术转让，故也称为“技术贸易”。目前国际间的技术转让主要是通过技术贸易的方式进行的。

技术密集型产业 指拥有先进技术设备、需要较多脑力劳动、建立在很高科学技术成就上的产业。这类产业需要职工有较高的科学技术素质，需要投入较多高级复杂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叫知识密集型产业，是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言的。这类产业有如下特点：附加价值高，资源、能源

消耗较少；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产品小，品种多，批量生产；高级化，软件化，更新换代快。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各国都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信息工业、、新材料工业、航天工业等。我国为了改变生产技术水平低、经济管理较落后的状况，应注意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有计划的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技术咨询　组织专家或专家组对技术问题进行分析、诊断并提出解决意见或方案的活动。它是取得技术信息，推广交流科技成果，提高科研、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技术经济效益，解决技术力量不足和实现技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技术咨询已经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及企业的重视。在国外，技术咨询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或产业。在我国技术咨询活动也越来越普遍，并已出现部分专门从事技术咨询的活动的公司或企业。技术咨询的范围十分广泛。按层次分，有政府技术咨询和企业技术咨询；按内容分、有科技发展战略及科技政策咨询，工程项目及技术设备建设、引进咨询、工厂、车间的技术改造咨询，新产品研制开发咨询，管理技术方案咨询等。提供技术咨询意见的方式主要有：①提供信息、资料；②提供技术咨询报告；③提供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报告等。

技术贸易　通过买卖方式把某种技术从卖方转让给买方的行为。包括许可证贸易（技术专利、技术专门知识和商标使用权的买卖）和成套设备买卖两种方式。工业发达国家之间，技术贸易的主要内容是许可证贸易；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主要是成套设备买卖。有时在一笔交易中也同时包括两者。战后技术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

技术引进　指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取得先进技术的活动。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发展的情况下，引进技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它是发展经济，提高技术水平的主要手段。技术引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①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出国学习、参观或研究工作；②聘请外国专家到国内工作，指导或讲学；③购买成套设备或工程项目；④引进主机或关键技术、设备；⑤购买实验室技术或引进技术情报、资料；⑥购买专利权可进行技术咨询等。技术引进必须合理选择引进对象，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招标、投标的方式。要把引进技术与学习、消化、吸收、创造结合起来，要注意提高本国技术设备制造水平。

技术开发　人们在进行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将新的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的开拓过程。技术开发的类型，按开发的内容分，有资源开发、产品开发、工艺开发等；按开发的类别分，有国家安全类、发展生产类、生活福利类等；按开发的来源分，有国内技术开发、国外技术引进等等。技术开发的过程，包括6个相互衔接的阶段：①基础研究。旨在探索和深化科学的新理论和新原理。②应用研究。旨在研究如何把基础研究的成果具体应用于一定的目标上，把它转化为一种新的应用技术。③开发研究。即运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针对某项新产品、新工艺进行具体应用、中间实验和生产试验，使科研成果逐步转化为生产力。它是实用化的研究阶段。④工程技术。主要解决新技术的设计、工艺、设备等制造技术问题，把科研成果转变为实物形态。⑤制造。即按照一定的计划、工艺要求、质量标准等把新产品正式生产出来，或是把新技术，新工艺投入生产，正式使用。⑥推广。把新技术成果运用于一切需要这种新技术的部门、地区和单位。

技术输出　指一国向另一国出口技术的活动，主要方式有：①派遣专业技术人员或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去国外传授技术、工艺及先进操作技术和管理经验；②出售专利技术、或专用工艺，专用设备；③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熟练技工等全套人员去国外开办企业；④交换技术文献资料和国家允许出口的技术情报等。随着世界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技术输出在国际贸易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商品、资本输出相比，技术输出的比重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在输出技术时，应注意保持本国在技术领域的先进性和领先地位。

走私　指违反国家对外贸易管理、进出口物品管理和关税管理，非法运输、携带、邮寄货物、金银、货币、票据、有价证券以及其它物品进出国（边）境，逃避海关监管、逃套外汇、偷漏关税的行为。我国海关法规把走私分为一般走私行为和重大走私行为两种。前者指携带、邮寄违反海关法规的物品，数量不多，又不是以出卖、图利为目的的走私行为。后者指意图营利、非法运输、携带、邮寄货物、金银、货币、票据、有价证券或其它物品进出国（边）境，逃避海关监督的构成犯罪的走私行为。对一般走私行为由海关处理，没收走私物品，或同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重大走私行为，则构成犯罪，移交人民法院惩处。

走"后门"　指社会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违背商品购销正当原则和职业道德，为个别人

提供超出普通顾客的好处和便利的行为，这种行为又往往以牺牲普通顾客的普遍利益为特点。提供这种好处的行为被称之为开"后门"，谋求这种好处的行为称之为走"后门"。后门的本义是居家屋院之设，反映我国古代屋院建筑结构特点和人民生活习尚。至明代，后门一词本义尚存，但已开始引伸出不甚光明正大，须避众人耳目的意味。本世纪70年代，由于十年动乱等原因，"后门"一词被人们赋与了更广泛的涵义。人们怀着忧虑和愤慨的心情所批评的"后门"现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正之风，成了权利、人事、政治和经济等许多领域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违犯国法和党纪的严重行为。经济领域出现的后门现象根源于物质匮乏，政治领域出现的后门现象根源在于民主、法制不健全。

冷背呆滞商品 指商品质量及品种、样式、造型、花色等不受消费者欢迎，因而形成的商品积压、滞销现象。冷背呆滞商品大多数并不是从来就滞销的，它们以前可能曾得到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并为企业提供利润，或者是企业得以成长的基本商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情况的变化，畅销品也会变为滞销品。其具体原因与消费者收入的提高以及爱好的变化，更好的替代商品的出现，商品本身长期没有多大的改变等等有关。上述原因使得这类产品无可挽回地进入衰退期，如果加以维持，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反而将成为企业的一个包袱，造成人、财、物及时间等资源的浪费，并会影响企业的信誉，所以应及时采取适当策略，有计划地予以淘汰。还有一些商品，在外地是畅销品，但由于不适应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及消费能力，或不符合当地的民俗、社会风尚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滞销。对这种商品，一方面需尽可能事先做好商情预测、防止购进；另一方面对已购进的则进行加工改制，使之适合当地需要；或在商业企业之间，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开展物质交流，相互调剂余缺，使之成为畅销品。

沉淀货币 集体库存或个人自存的长期不投入流通系统的货币。这些货币在居民手中没有明确的预期用途。货币沉淀现象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表现。居民长期贮存人民币，有的人甚至将人民币置于床下或埋于土中达10年20年之久，致使人民币霉烂变质。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一部分人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强，另一方面也与银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吸引居民手中的现金有关。另外，由于商品供给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长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人们有钱不能及时购到商品。只能持币待购，这也导致一部分货币的暂时沉淀。沉淀货币既不能发挥作用又阻碍商品、货币的正常流转，是造成市场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数额过大时，甚至可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银行要采取多种措施，将居民手中的非日常生活待用货币变为储蓄存款，从而减少沉淀货币。

宏观控制、微观搞活 宏观控制是指对国民经济总体所进行的有计划的调节和管理。微观搞活是指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富有活力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宏观控制包括有：合理调节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向；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调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方向，控制消费基金总额；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控制货币发行量，保持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调节经济增长速度、比例和效益的关系；搞好外汇收支平衡等等。微观搞活包括有给企业扩权、松绑，推行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等等。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是发展商品经济、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两个基本前提。加强宏观控制，才能把全局的重要经济活动管住管好，防止经济失控和比例失调，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宏观控制是微观搞活的前提，微观搞活是宏观控制的基础。加强宏观控制，搞活微观经济，要遵循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宏观经济分配计划调节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通过整个国民收入的计划分配协调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宏观经济分配计划调节的主要内容包括7个调节手段。(1) 规定工资水平和工资标准。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决定了纯投资在利润中所占的比重。(2) 规定国家税收的税种和税率，国家的税收收入可以得到保证，企业所能拿到的净利润也就定死了。(3) 规定利润分红率。企业净利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给职工分红，剩下的部分用于投资。分红比例由全社会统一规定，这就定死了净利润中所分红部分和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部分。(4) 规定消费信贷总额不得超过个人储蓄余额，防止消费信用膨胀。(5) 规定投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企业存款余额，防止投资信用膨胀。(6) 规定劳务开支和福利开支的比例。(7) 定死由税收形成的社会收入的用途。以上7个调节手段得以实现，社会消费基金总额和积累基金总额这两大块，就按照计划划分出来了。只要计划原来规定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则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两大部类产品的供求之间的宏观平衡就有了充分保证。在这种

条件下，微观不平衡是可能经常发生的，但不难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

宏观分配计划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计划。它的基本内容包括：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个人消费水平、工资标准、积累基金的使用方向、生产增长的速度等。它的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的宏观平衡、调节生产的增长、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宏观分配计划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计委在对生产和消费进行科学预测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出2—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交有关领导部门通过，在科学论证后作出抉择。这样制订出来的计划具有立法性质。宏观分配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之间具有原则的区别。指令性计划是把计划指标分解开来，一一下到企业强制执行，在宏观分配计划中，中央计划机关不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它所规定的各种指标都是参考性和指定性的，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都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己决策。

宏观失衡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时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社会总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不相协调的经济现象，或者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或者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宏观失衡是由全社会生产资料的总供给同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不能协调或消费资料的总供给同对消费资料的总需求不相一致而引起的失衡；是第Ⅰ部类同第Ⅱ部类之间，由于c、v、m的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不相协调而产生的不平衡。产生宏观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宏观失衡经常发生，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宏观失衡时有发生，主要原因是忽视了宏观分配的计划调节，而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社会完全有可能对宏观分配进行预先的计划，以保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宏观平衡。

违约责任　经济合同中有关因当事人过错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所承担的经济责任既可在合同中体现，也可以事后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制定，有些则由经济合同根据现行法律约定。这些是解决经济合同纠纷或追究违约责任的重要依据。

违约责任具有如下特点：(1) 违约责任是在经济合同当事人因过错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产生的；(2) 违约责任是通过经济制裁实现的；(3) 违约责任一般是由有过错的当事人承担的，如果合同中有约定的保证单位时，则由合同中有约定的保证单位承担。违约责任是经济合同的重要条款，是合同义务得到履行的保证。经济合同中如果没有违约责任条款，经济合同的一方因对方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得不到补偿，经济合同就失去其约束力而成为一纸空文，就会使经济活动陷入混乱之中。

违约金　合同当事人一方因过错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由法律或合同预先规定的货币额，它是对违约责任者的经济制裁。

违约金的种类分为法定违约金、法定浮动违约金和约定违约金。我国经济合同违约金的偿付，只以合同一方因过错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决定，而不管是否造成经济损失。但如果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数额，违约责任者必须补偿其超过的部分。我国涉外经济合同违约金的偿付，则是由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决定的，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越大，违约金就越多，反之则少。如果约定违约金过分低于或高于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当事人可请求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予以适当增加或减少。违反经济合同支付违约金是保证经济合同得到执行的约束手段，对于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保障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积极的作用。

评工记分　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中，评定其成员的劳动量和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方法。即按照各个成员向集体提供的劳动量确定一定的工分，年终决算时，按照该集体经济单位的每一工分值和各个成员的工分总额，分得一定的劳动报酬。评工记分的方法愈科学，愈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各个成员参加集体生产付出的劳动量，愈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评工记分的具体办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产计酬等。

底分死记是按照各个成员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通常的劳动效率，评定出劳动力的等级，同时评定不同等级劳动力劳动一天应得的工分，以这个工分作为底分，每出勤一天，按底分记工分。

底分活评是以底分为基础，定期对各个成员的劳动进行评议，按实际劳动情况增加或扣减工分。

定额记工是根据事先制定的各项农活的定额和完成额应得的劳动报酬标准，每完成一定定额就按标准记一定工分。

联产计酬就是在定额记工的基础上，联系产量计算实际应得的劳动报酬。

报复关税 “差别关税”的一种，为抗议他国对本国商品、船舶或企业的歧视待遇，对从该国或通过该国输入的商品所课征的一种高税率关税或附加税。它可适用于从该国进口的全部商品或部分商品。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在下列三种情况下采用报复关税：(1)认定他国对本国货物所征关税不合理；(2)他国对另一些国家给予较本国高的优惠待遇时；(3)通商条约期限届满，他国对缔结新条约提出不正当要求。一般当对方国家取消歧视时，即行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关税方面相互进行报复，往往形成“关税战”，甚至引起武装冲突。

投资结构 是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投资分配的比例。它主要包括：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投资；新建企业投资和改建企业投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投资等。投资结构反映了投资的方向，合理的投资结构，体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它对于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有重大影响，也是决定投资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应当做到投资结构合理化、科学化，注意加强薄弱环节，保证重点建设。

投资规模 又叫投资总额，是一定时期投资的资金总量的多少和范围的大小。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率作为评价年度投资规模是否与国力相适应的综合指标。

从来源看，投资规模既包括国家预算直接的投资，又包括部门、地方、企业等用自筹资金安排的投资；既包括用积累基金安排的投资，又包括利用国内外贷款和利用外资安排的投资。投资规模既是一个变量，又是一个常量。从不同时期不同年份相比较而言，它是一个变量。但一定时期（如一年）它又是一个常量。一定时期投资规模要受到国力限制，如果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可能，就会出现经济的不稳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混乱和倒退。投资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经济就能获得持续、协调的发展，合理安排投资规模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

投资效益 也称投资效果。是一定量的资金预付同所形成的一定生产能力之间的对比关系。

投资效益可用投资效益系数来衡量，即投资所得到的经济效益与投资额之间的比例。评价国民经济投资效益，一般以国民收入作为计算标准。国民经济投资效益系数是指某时期国民收入增长额与引起这一增长的投资额之比。单位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是反映投资效益的最综合指标。部门和企业如果计算净产值，它们的投资效益可用资金盈利率测算。

投资饥渴 企业与非盈利机构对投资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发生、永远不会饱和的一种经济现象。这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考察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企业与非盈利机构投资行为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投资饥渴是指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没有一个企业或非盈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刚刚完成一次投资，很快又产生新的更强烈投资需要，正象生物机体内无法遏止的、持续不断冲动起来的基本需要那样。产生投资饥渴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扩张冲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企业与非盈利机构都力求不断增加投资以壮大自己，有把投资需求推向无穷大的趋势；第二，投资需求不会因亏损或破产而受到限止。短缺现象存在，产品不愁无销路，企业就不会破产。企业在国内外的销售中即使发生了亏损，也可通过国家补贴，价格调整或其它方法得到补偿。这一点对非盈利机构更加明显。有无投资饥渴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运行机制的主要区别之一。投资与否，是资本主义企业最大难题之一。如果风险太大，即使这个企业得到了必要金融保证，也可能自愿放弃投资打算。在社会主义经济传统管理体制下，不存在这种约束。

投入产出优化模型 由各种投入模型与数学规划相结合而建立的模型，其中最简单的是静态投入产出模型与线性规划的结合。国民经济是一个多部门组成的有机整体，每个部门既生产产品（产出），又消耗其他部门的产品（投入）；既是生产部门，又是消费部门。根据这一原理，应用高等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研究经济系统中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论，称为投入产出法或投入产出分析。它的内容包括理论基础、投入产出表和相应数学模型，用于经济分析、政策模拟、计划论证和经济预测。其优化模型的初始问题在：

$DX \leqslant R \qquad X \geqslant 0$

的约束条件下，使

$Z = P(I-A)X$

达到最大值。对偶问题：在

$WD \geqslant (I-A), \qquad W \geqslant 0$

的约束条件下，使

$Z' = WR$

达到最小值。式中 D—生产单位产品的资源直接消耗系数矩阵；X—总产值向量；R—资源向量；Z、Z'—目标函数，P—单位产品价格；W—资源影子价格。在初始问题和对偶问题拟好后，只需对其中

一个问题进行迭代求解，所得到的结果同时就是另一个问题的解。在我国建立优化模型时，会遇到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根据实际情况加约束条件，如规定各部门产值的下限，规定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等。这实质上是使国民经济在按比例发展基础上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投资包干　即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包干。是建设单位对国家计划确定的建设项目实行建设规模、投资总额、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和材料消耗包干的一种责、权、利相结合的基本建设管理制度。国家把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交由建设单位包干使用，接受投资包干的建设单位则对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建设任务承担经济责任，在建设规模、工程造价、施工期限、工程质量、设备材料等方面严格按照国家基建计划尽量降低造价、缩短工期、保证质量和节约资金。国家给包干建设单位以经营自主权，并把建设的经济效益与包干建设单位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以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达到控制建设规模、降低工程造价、提高工程质量和缩短建设工期的目的。

投资环境　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投资和吸引外来投资的条件。投资环境是专就国际资本而言的。国际资本总是流向最有利于自己生产并增殖的场所，而一国或地区的投资环境，会直接对投资的收益带来影响。因此，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主要有：第一，自然条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状况，气候环境，山水风景等；第二，政治条件，包括政局、社会安定程度、政策稳定性、法制健全程度等；第三，经济条件，包括通货、金融、物价、各种费用、税收、外汇管制等方面的状况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动向；第四，生产经营条件，包括交通、能源、场地、通讯、邮政、给排水、仓储及生活居住等方面的设施条件；第五，社会条件，包括娱乐、医疗、信息等服务设施，以及政府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劳动者的素质及其工资水平等；第六、市场条件；第七，当局的政策性优惠条件。

投资时滞　固定资产投资时间与固定资产形成时间之间的间隔。计算一个建设项目投资时滞公式如下：

$$I=\frac{a_1(n-0.5)+a_2(n-1.5)+\cdots\cdots+0.5a_n}{100}$$

公式中，I为投资时滞，a_1、a_2、……a_n为各年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n为项目建设周期（年）。计算国民经济投资时滞的公式是：

$$I=\frac{\sum_{i=1}^{n}I_iN_i}{\sum_{i=1}^{n}I_i}$$

公式中，i是第i部门的投资，n_i为第i部门的平均周期。有人把固定资产的整个服务年限也叫做投资时滞。

余暇产业　指专门生产人们余暇生活所需产品或为此提供服务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余暇时间逐渐增多，为满足空闲生活的需要，余暇业的门类日益齐全，规模日益扩大。现在余暇业已成为各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构成部分。余暇业的特点为人们日益丰富的闲暇活动提供物质与精神产品，以增进人们闲暇生活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它涉及的部门极为广泛，如生产电视机、录音机、录相机、体育运动器材、文娱活动用品的行业；电视、广播、制片业、剧团、剧院等部门；度假村、旅行社、游乐场等。因此，余暇产业并不完全属于第三产业，有些属于电子、轻工制造业，我国在建国后，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闲暇产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提高消费质量产生了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闲暇产业的门类将会更加齐全，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将愈加突出。

住宅商品化　由国家投资和集资建筑住宅作为商品出售，用户把住宅作为自有财产，住宅及其管理部门企业化，收回的资金用于住宅的维修和扩大再生产。

住宅是基本的生活资料，也是一项大宗商品。但是，我国城市住宅由国家统一建筑和分配，作为一种福利交给职工使用，造成城市住宅严重短缺，实行住宅商品化可以大大加快住宅建设速度，缓和住宅紧张状况；有利于避免用行政办法分配住宅而产生的官僚主义，特殊化，开后门等弊端，能起到限制多占住房，和打破住宅分配上的"大锅饭"的作用。也有利于企业专业化和减少社会服务性工作，大大减轻企业负担。

住宅商品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第一，房价完全由购买者负担，买房时一次付清；第二，购买者负担一部分，国家和企业给予适当补助；第三，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价等等。

住房券　住公房的职工工资中，以非现金形式发放，用于交纳新增租金以及作为个人购、建房基金的

部分。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改变资金分配体系，把住房消费基金逐步纳入正常渠道，使过去实际用于职工建房、修房资金的暗补转化为明补，并逐步纳入职工工资的一种办法。具体做法是，按照住房的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投资利息和房产税五项因素，合理确定公房租金标准，以改革公房低租金制度。在提高公房租金的同时，相当地给住公房的职工发放住房券。国家要求各个城市应坚持发放的住房券总额与新增加的租金总额持平。其主要资金来源是城市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住房基金。住房券的发放采取比例法：按全市职工平均使用面积、每平方米平均新增租金和职工平均发券工资基数，计算出住房券与工资的比例，即发券系数。发券系数乘职工本人计券工资基数，就是职工应得的住房券金额。随着工资调整，它将逐步纳入职工工资，进入企业成本（机关、事业单位列入财政经费预算）。发放住房券是采取转帐结算的办法。并不直接向个人发放现金。并且住房券只能用于交纳新增租金，不得抵交老租金，个人结余的住房券，可存入银行，作为个人购、建房基金。

囤积倾向　社会主义企业在作为买者力求积聚尽可能多的投入存货的行为。这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的概念。企业进行囤积的主要原因是：（1）企业力求增产的动机，促使其积累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2）生产和交换领域的不确定性。在科尔奈看来，囤积倾向与生产投入几乎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表示了企业从经济中"吸取"外部滞存（在这里是卖者的产出存货）的基本过程。这种情况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短缺状态的持续再生。这样也就形成了短缺现象的恶性循环，即数量冲动，囤积倾向和物资短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互相增强、自我维持的过程。囤积倾向表明一个事实，即企业向往的投入存货水平通常高于由期间平均数得出的正常水平。结果造成事前理想水平很高，事后又总是抬高投入存货的正常水平。囤积倾向也有它的容忍限度或可接受的约束：（1）企业固有的储存能力有限；（2）上级限制囤积、中央银行也能限制为物资储存提供信贷；（3）企业可能根据自身判断，自愿限制物资需求，但是在企业行为方面有两类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亚微观层次上，瞬时初始需求总是确定和有限的；另一方面，把所有投入和所有企业总和起来，就一个长时期来说，需求是不可满足的，因而是无限的，因此囤积倾向也必然持续重复出现。

吸纳机制　持续抽取劳动力、物资、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各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及其功能。这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在分析短缺现象时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吸纳机制的主要动力因素是预算约束软化。吸纳机制的重要内容和作用形式是：（1）企业预算约束软化，不论盈亏，企业都不会倒闭，因此其投资无任何风险，这样就导致投资需求永无止境，从而造成对投资资源的无止境抽取；（2）预算约束软化，企业在作短期决策时，较少考虑资金的使用效益，总是力图在实物上尽可能多地囤积库存，以免物资供应不上，形成生产瓶颈，导致企业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这种囤积倾向必然引起对资源的持续抽取；（3）预算约束软化，企业对一切生产要素，包括进口的物资、技术和机械等都具有永无止境的需求。要进口就得出口，为了扩大出口物资生产，必然进一步抽取国内资源；（4）若干产品或服务是免费或半免费分配的，必然经常存在过度需求。吸纳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特有的，它引起普遍的长期的短缺现象。其中，第一种吸纳机制发生作用，是产生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其他各种吸纳机制发生作用是产生短缺现象的次要原因和附加因素。

佣金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也称"信息费"。它指在商品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向经纪人支付的报酬。经纪人在商品交易活动中向买卖双方提供有关产品、价格、交易条件等情况，为交易双方穿针引线，促进成交，支付了一定的劳动，佣金即是这种经纪活动的报酬。佣金的高低取决于成交额的大小，一般按成交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但比例较低。

县经济　亦称县级经济。它是指一个县管辖范围内的整个经济。是建立在以农村家庭为基础的，县城经济为主体、乡（镇）村经济为纽带，县城、乡镇、村户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开放性的地域经济。从行政组织层次上讲，它包括县城、乡镇、村屯和家庭四个级次的经济；从所有制形式上讲，它包括全民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经济管理上讲，它包括经济计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生产指挥、产品销售、利润分配等；从产业部门上讲，它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商业、建筑、交通运输以及饮食服务业；从组织领导上讲，它包括机构设置、组织原则、经营方式、管理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奖惩制度等。

县经济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序经济　人类根据生产力因素时间组合方式变

化规律的要求，通过自觉地和科学地安排生产力因素形成过程的先后顺序和生产力因素在生产力系统运行过程中持续时间的长短差别，而取得的增产或节约。时序经济是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一般说来，存在三种时序经济：(1) 宏观时序经济，指全社会范围内的时序，如农轻重时序、三产业时序、基础部门与制造部门的时序、原料部门与加工部门的时序等等；(2) 中观时序经济，指生产基地、中心城市或其他较小范围内的时序；(3) 微观时序经济，指企业内部的时序。

"旱涝保收"　它原指农业上由于抗旱能力的增强，不管是遇到干旱还是水灾，都可以确保收成。移植到经济学上，是指我国国营企业职工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如何，劳动贡献大小，都可以获得固定的收入。这是平均主义的表现，是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一大弊端。

纵向短缺　这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在分析短缺现象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在上下级之间，下级单位提出的物资需求、计划总量超过上级单位可分配的物资总量的一种经济现象，是短缺的一种具体形式。

纵向短缺与横向短缺的主要区别在于：横向短缺是处于同一级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主体之间的关系；纵向短缺是物资分配机关与企业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事前调节与事后调节　事前调节和事后调节都属于对经济活动的宏观管理范畴。事前调节是对经济活动在一定时限内的超前型预测、规划、防范、运筹等管理行为或调控方式；事后调节则是对一定时限内的经济活动结束以后对其效果进行协调、补正、总结等管理行为和调控方式。事前调节和事后调节对一定时限内的经济活动是必需的，前者是一种提前行动或预期行为，后者则是一种补充协调与总结完善。这种超前的功能与滞后性的作用对一定时限内经济活动的规范与调整，是计划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观点认为事前调节就是计划调节，事后调节就是市场调节，其实，计划调节既可以是事前调节，也可以是事后调节。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调节要通过价值规律，即通过价格信号等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计划调节也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即依据市场情况进行调节。从这一点说，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都是事后调节，而对下一个时限内的经济活动来说，又都是事前调节。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它们的区别不在于事前事后调节，由于市场调节只能对商品生产的微观平衡起自动调节的作用，不能自动地导向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平衡，同时，市场调节中的信息传递是直接的或快速的，不同的时期的市场价格只能反映市场的短期动态，不能反映供需长期动态，因而需要计划调节发挥作用。所以，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主要是宏微调节之分，而无事前事后之别。

事业部制　是按产品、业务或地区把企业所属工厂分别组成各个事业部，实行集中决策领导下分散经营的一种管理形式。每个事业部都是实现企业总目标的基本经营单位，实行独立核算，统一管理其产品、业务或地区的产、供、销等全部经济活动，在产销分开的企业中，事业部只负责组织和指挥生产，不负责经营管理。企业对事业部的管理主要表现为：规定经营方针；规定具体销售额或利润额；统一调度资金。事业部组织的内容为：事业部部长直属于企业执行总经理和委员会，受企业本部长期计划预算的监督，负有完成利润计划的责任；事业部长统一领导他所管辖的事业部，可以得到企业本部各职能部门和参谋部门的协助并进行必要的联系和协调；企业总经理和委员会负责企业的全盘计划、对有关事项作出最后的决策并对各事业部长实施监督；企业总经理或委员会摆脱各种具体业务，着重制定企业的重大决策。

村镇经济　以村镇为中心所形成的经济小网络，是县经济大网络中的直接与农业家庭经济联结的最基层结合点。村镇经济最初是从队办企业开始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以自己的村镇工业、商业、服务业为农业家庭经济或合作经济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或从事这些服务的中转工作，同时又以村镇经济所积累的资金、人才直接扶持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帮助农民致富。因此村镇经济是工农融合的经济，它对于农业的发展关系极大。

低工资、高就业　用压低职工平均工资的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需要就业的人口都有工作的一种就业方针。这是中国劳动就业制度的一个特点。低工资、高就业也是相对于发达西方国家劳动就业状况而言的。一方面，中国职工的工资水平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很低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就业率又远远高于西方国家。低工资、高就业的方针是传统经济体制和中国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这个基本国情的产物，它对于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保持社会安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这个方针侧重点是保证充分就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工作和劳动效率低的弊端：一是劳动力资源在企业里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二是人人都有铁饭碗，缺乏竞争压力，使一

部分劳动者缺乏积极奋进的动力。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一方针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来料加工　是国际贸易的一种方式。由外商提供原材料，有时也提供必要的设备，国内企业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品种、规格和样式的要求进行加工生产。一般把成品交给对方，收取加工费和有关费用。国内企业对于来料和外商提供的设备可以不支付外汇，而在成品贸易中扣除，因此带有延期付款的性质。来料加工通常在丰富劳动力和某些设备不能充分利用的条件下采用，可得到外商提供的国际市场需要和适销产品式样和规格及新颖材料、较先进的技术设备，有利于扩大出口和提高国内生产能力。

来料组装　国际贸易的一种方式。由国外厂商提供零件、部件和元器件，必要时还提供所需的技术和设备，国内企业按照要求进行装配生产，成品交给对方，收取组装费及有关费用。国内企业对外商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可以不支付外汇，以后用装配费逐步付清。来料组装通常在有丰富劳动力和某些设备不能充分利用的条件下采用。国内企业可以通过这项业务使贸易与生产更好地结合，增进供求双方相互了解，得到外商提供的国际市场适销产品的信息、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有利于提高本国的出口生产能力。

里斯卡的社会主义资产承包经营理论　由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一系列设想。主要内容包括：作为整个构想的理论基础的个人社会所有制思想；作为承包经营的必要条件的社会主义财产市场的运作问题；社会资产承包经营者的确定及相应的财产市场的运作问题。社会资产承包经营者的确定及相应的财产风险保证机制；资产承包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和相应的自我调节机制，与承包经营相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

1.作为承包经营构想提出的基础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理论。里斯卡认为，通过对社会主义传统所有制的深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也同私有制那样对效率的提高有限制作用，因而对传统的经济体制不能只修修补补，而是要彻底改变生产关系，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建立更加社会化的社会所有制。何谓社会所有制？里斯卡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按照下列顺序来排列现有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国家所有制、联合集团所有制（主要是合作社所有制和自治联合劳动组织的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在社会所有制条件下，任何个人、集团、国家，以及以国家名义进行活动的官僚主义阶层，都不能占有从而享受对于生产资料的特权（即支配上的垄断）。但是，每一个从私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人，都有权在信贷形式上得到社会资产存量的人均份额，他们从出生至死亡都拥有这种生息的个人社会所有制资产；同时，他们可以通过承包经营的行为方式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以便支配社会资产的某个组成部分，当然最后只有那些从长远看能够最大限度增加社会资产的人，才可以实际支配和经营它。里斯卡在这里提出的原则是：土地和其他所有资产都并不归现有的耕种者和经营者，而要归那些善于经营者来经营，归那些最能增加社会财产的人来经营。里斯卡把这种所有制称为“个人社会所有制”，并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所在，是社会主义经济要采取的“真正”模式，甚至也是未来世界要采取的模式。

2.关于社会主义财产市场的构想。里斯卡关于社会主义财产市场的构想，产生于他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独到见解。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直接为需要而是为市场进行生产的社会，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不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格格不入而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发展到超过资本主义的因素，因而当市场和竞争被取消时，就会出现垄断、官僚主义、特权、唯意志论、寄生现象等等，它们才是与社会主义真正格格不入的东西。因此，里斯卡主张建立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且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真正的货币和市场，主张国内价格制度要以世界市场价格为基础，并最大限度地参加国际分工，实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以便尽可能地排除对市场关系的各种限制，使价格在世界市场的影响下根据供求关系自由形成。在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社会主义的资产市场。在这个资产市场上，社会所有的公共资产都将有市场价格，并能象有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那样流通，从而使得社会所有制下的公共资产普遍成为信贷资本，每一个公民都有进行承包经营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营这一资产的人可以垄断这笔资产，因为任何时候别的人都可以提出更高的承包价格接手经营。里斯卡把这种社会资产市场称为计划市场，把社会主义经营所承包的社会资产价值称为计划市场资产价值，把经营者之间的承包经营竞争称为计划市场竞争。根据里斯卡的设想，在计划市场上，社会资产经营的供求关系是由信贷均衡利率来调节的。这一利率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求出：

$$P_{(t)}=\frac{\sum_{ij}F(t,i,j)-\sum_{ij}A(t,i,j)}{\sum_{ij}T(t,i,j)}$$

其中 $P_{(t)}$为均衡利率；i 表示社会主义承包经营者；j 表示社会主义承包经营活动；**T**（t，i，j）表

示社会主义承包经营资产的计划市场价值；F（t，i，j）表示实际上交，即资产再生产方面每天的全部流通；A（t，i，j）表示清偿，也即在t时间内，对j的承包经营，i承包者所完成的实际货币流通与应交利息的差额。均衡利率不仅调节货币市场，而且还调节已承包财产的市场。里斯卡认为，这种调节比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调节灵活、迅速得多，可以使社会资产的供求关系得到调整，从而避免社会主义承包经营资产市场的普遍波动。因此，这种市场是发达的并且超过了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但已陷入危机的各种资本市场，也超过了由官方对资本和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体制。

3.社会主义承包经营的行为方式设想。里斯卡认为，承包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营形式，但在以往的（包括改革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承包只是运用出租的形式，只是对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承包，再加上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观念造成的对资产承包期的限制，使得这种承包经营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出租或年度物质刺激制度刺激人们对社会资产的掠夺性使用；另一方面，对资产使用做出规定又会妨碍自主经营。据此，里斯卡认为承包经营的关键在于承包应是无限期的、对社会资产的承包，而不是有限期的、对日常经营活动的承包；同时还要取消传统体制下的各种垄断性限制，如人数限制、经营领域和经营的范围的限制等。里斯卡的观点是，任何适宜于承包的社会财产都可以承包，因为对社会资产的无限期承包经营并不是垄断性经营，而是随时可能通过计划市场竞争转到承担更高价值的人手中去经营。这样，社会主义承包经营者必须履行的是承担长期增殖社会资产的义务，他们在为自主经营进行竞争时提出的经营成果并不是每年可以交纳的利润或利息，而是资产价值。换言之，人们是根据随时变化的均衡利率和提出的承包财产价值交纳利息（经营成果）的。比如，在计划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承包者以1100万福林的计划市场价值计价承包开拍价为1000万福林的社会资产，在均衡利率为10%的年份每年要交利息110万福林，而在年均衡利率为5%的年份则当年只交55万福林。因此，认为社会主义承包经营者是力求获取最大利润，或认为要由取得最大经营收入的人来承包经营都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在这种经营中劳动者所得到的不是工资，而是经营成果的剩余收入，因而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他的经营能力。承包经营对社会的最大好处，不仅在于它会带来经济繁荣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在于它有助于造就有创造精神、全面发展、自我实现的社会主义新人。

4.社会资产承包经营者的竞争确定。按照里斯卡的想法，社会资产这个足球要始终控制在最会踢球、竞技状态又最佳的球员脚下。但是，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合适的球员呢？也就是说，应该谁合法地承包和自主地经营属于社会所有的公共资产呢？里斯卡认为既不能象传统经济体制模式中通行的那样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党的组织部门直接任命，也不能象南斯拉夫以集团所有制为基础的自治模式所通行的那样由一个集体选举产生，而是要由潜在的承包经营者在社会资产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来确定究竟谁承包经营企业和其他公共财产。按照里斯卡的设想，在自由、公开的社会资产市场即计划市场上，一方是代表社会财产的经营机构，另一方是任何愿意承包经营的劳动者。计划市场上所有的社会资产都有市场价格，代表社会资产的经营机构将通过公开拍卖和招标的形式把社会资产交给个人经营。社会资产（假设为新承包项目）的计划市场价值作为开拍价到底是多少，要根据其可能获取的收入及均衡利率的变化加以估算。一旦标出了“开拍价”，每个潜在的承包经营者便根据自己可能提出的保证和经营能力进行承包竞争，最后出给出最高承包价的潜在承包者取胜而成为实际的承包者。但现在这个实际承包者仍面临竞争对手的挑战，因为这些竞争对手在任何时候都有权提出更高的承包价格，使得这个实际承包者重新成为潜在承包经营者。当然，实际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也可以自身提高承包价来避免其他人的挑战。因此，就承包者来讲，对竞争者的害怕远远超过现在所有形式上的监督检查。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计划市场竞争可以保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并排除任何个人、集团、国家（特别是以国家名义进行活动的官僚主义阶层）在生产资料占有、支配上的特权，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没有垄断的、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有效活动。里斯卡认为，承包者的这种竞争肯定也将比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的计划经营使经济更具计划性。

5.承包经营者的承包风险保证问题。在上述承包经营体制中，任何人都可以对社会财产进行承包经营，但在并不出卖社会财产给个人的前提下，承包经营者的物质基础和资产保证来源是什么？社会如何防止诈骗和冒险？里斯卡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是经营风险的保证；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中，实际上是由国家承担一切风险；而在承包经营体制中，承包经营者的主要物质基础和资产保证是个人所具有的“个人资产”。这种个人资产具有重要意义，是经营民主化的基础和保证。它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每个人一出生就获取的“社会继承”；二是在人生过程中获取的“道义资本”。“社会继承”是里斯卡思想体系中的独特因素，其出发点是每个公民除去有可能接受家庭遗产外，还可支配其社会继承资产，这种资产是现有生产资料、基础设施等国民财富平均到每个公民

的份额，可以通过信贷形式分到每个居民的帐户上，但不能由家庭继承。里斯卡建议把目前普遍存在的诸如入托入学、廉价房租、公费医疗等隐蔽形式的补助的平均数作为生息的个人"社会继承"资本交给每个人，从而公民不再享受福利补助，一生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都得到市场上购买；今后人们从出生直至死亡都拥有这种生息的个人社会继承资本，但都只可以使用社会继承的利息部分。社会继承的一部分利息必须用于增加资本本身，这是承担经营风险的保证；由于整个资本的增加，另一部分利息也不断增加，可用于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这就一方面形成了一种严格的担保，如果经营不负责任就会对自己今后的生活水平带来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又使得承担的风险有一个限度，不至于使承包者陷入绝境。与"社会继承"相对应的另一部分个人资产就是已经提到的"道义资本"，它是个人在成功的承包经营中积累的，可以理解为社会资产现有计划市场价值与先前价值之间的差额。比如：假定承包项目的开拍价为1000万福林，承包经营者把它提到1100万福林，那么等于他在原计划市场资产价值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个价值，即100万福林的承包价值，必须是这个承包经营者所承担的道义资本，再假定均衡利率为10%，那么开拍价为1000万福林的社会资产就须交纳100万福林的利息，而现在承担了使这笔社会资产的计划市场价值增加100万福林的承包经营者，每年就须交纳110万福林的利息。由此增加的10万福林利息将转入承包者的"实现道义资本存款帐户"，一直到存款满100万福林为止。里斯卡认为，这些实现了的道义资本存款本身只能用于承担经营风险，而实现了的道义资本存款的利息则可以作为承包经营者的最终收入不受任何使用上的限制。那么，承包经营者会不会从这100万福林的储蓄中取款用于扩大家庭消费呢？里斯卡认为不仅不会，而且相反地会去增加社会继承资本，以便获取一生都可享用的、与积累同时增长的利息，这种利息高于存款利息。随着社会继承资本的增加，承包经营者与竞争对手相比实际上扩大了决策的自由，可以承担更大价值的经营项目，并提高贷款能力。因此，承包经营一般是从小规模开始，取得成功之后再扩大规模。

6.社会资产承包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在里斯卡看来，承包经营者是承担义务和拥有经营权的人，他必须履行所承担的长期增殖社会资产的义务，即必须保证根据均衡利率向作为社会资产监护人的管理机构交纳对计划市场资产价值所承担的利息。如果不能缴纳利息就要清偿资产的计划市场价值，或把资产转交给承担义务的人承包。承包经营者可以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地决定有关投入产出方面的各项决策，如根据市场条件自己决定价格和经营政策。承包经营者不存在对任何人的核算义务，进行簿记工作除少数统计所需的数字外，都是自己核算用的。承包经营者还拥有投资发展权，可以自己决定固定资产的折旧部分如何使用。但是，如果想退出承包就应该将这一部分交给社会资产管理机构；如果继续经营，则可把折旧费用于技术改造、设备现代化等。承包经营者也可以转产，但其他固定资产要利用已收回的资金和其他资金（如贷款）来购买。另外，承包经营者对自己所承包的项目也可以提出高于或低于原承包项目计划市场价值的拍卖价，但降价拍卖时其价值差额由承包人补偿，提价拍卖时新增加的利息要交到作为社会资产监护人的管理机构，并归入"实现道义资本存款帐户"。如果承包人只承担了较少的社会资产增殖义务，即该提价的不提，则其他人会提出更高的承包价格接手经营；如果在提价基础上进行的承包经营失败，则提价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承包经营者就会根据所承包项目的实际情况自己随时提高承包项目的计划市场资产价值，或者降低承包项目的计划市场资产价值。当然，承包者在下列情况下可以退出经营：(1)承包人死亡，企业回归社会；(2)完不成所承包的盈利要求时可根据其实现的道义资本借款如果不能维持就宣布破产，清算时若价值低于承包的计划市场价值，其差额部分由承包人负责支付；(3)如果承包者认为风险太大或效果不好，可以支付有关费用退出承包，由其他承包人接手经营。

7.经济运行的自我调节和社会资产的宏观管理。里斯卡认为，在社会主义承包经营体制中，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很少，因为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不再下达任何形式的指令，也不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并且取消了税收和所有的社会补助。这样做会不会使国家的收入减少呢？里斯卡认为不仅不会，相反地国家可以指望通过承包经营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通过承包经营，企业可以增加经营成果，这体现在较高的"开拍价"和更多的利息收入上，这种收入将远远超过国家现有的税收总和，同时行政费用的大部分也可以节省。那么宏观经济的调节由谁来进行呢？里斯卡认为应以货币和资本市场的自我调节为基础，它通过均衡利率来起作用：如果承包经营者认为均衡利率过高，可以退出承包；如果承包经营者认为均衡利率很低，则可以借贷款。新开投资项目和新承包项目的情况也一样，利率较高时可以增加储蓄以便推后投资避开高利率，利率较低时则借贷款。因此，均衡利率变化不仅会引起所借贷款利息的减少或增加，而且还会根据全部社会资产的供求情况调整所有承包项目的计划市场价值的价格。也就是说，不仅新贷款的利息，而且先前已承包的资产的利息也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增减。

里斯卡认为，社会主义承包经营体制下均衡利率的这种调节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和集团所有体制下的市场调节都要灵活，它对搞好社会主义承包经营具有重大意义。与这种调节作用相联系的特别机构是一个从事资产经营的管理的银行体系，其主要职能包括：完成作为社会"监护人"的任务，其中包括登记社会资产和确定这些资产的"开拍价格"；登记社会资产的"计划市场价值"及其变化；完成与承包经营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登记"道义资本"及其变化；登记和处理公民的"社会继承"向其支付利息；根据承包经营者"社会继承"的特定部分和"实现的道义资本"提供贷款；吸收社会储蓄；通过信贷市场实行利息政策、随时确定利率。

八　画

空头支票　指签发支票的票面金额超过在银行存款帐户余额或批准的透支限额，而不能兑付的支票。签发空头支票是套取银行信用、破坏金融稳定的一种违法行为。我国有关制度规定，各单位使用支票，只能在自己银行存款帐户余额内或已批准的贷款透支限额或预算拨款限额内签发。签发空头支票是违犯结算纪律的行为，一般给予以下制裁：对签发空头支票的单位，银行按支票面额的一定比例处以罚款；对屡次签发空头支票的单位，银行有权限制其使用某种结算方式，如停止使用支票结算等，以保证结算工作的正常进行。

空想社会主义　产生于16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其创始人为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德国的闵采尔。以后有意大利的康帕内拉、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人。19世纪初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是这一学说的突出代表。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尚不发展；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已经暴露但尚不深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已经出现但尚不充分；无产阶级不满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并渴望建立公正美好的社会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斗争方向和没有坚强的政党领导。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派别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相信会有一种真正美好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社会进行了详尽的描绘甚至实验，在他们看来，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共同管理、公平分配、和谐生活的理想境界。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因此他们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更忽视无产阶级在变革社会制度和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和天才人物身上，企图通过所谓理性、人性和知识的力量，通过规劝、说服和示范的方式，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由于对资本主义的鞭笞和主张人类解放而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国家社会主义　19世纪中叶德国出现的一个思想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拉萨尔、洛贝尔图斯、瓦格纳等。他们迷信国家、主张依靠旧国家政权的帮助并借助于立法的力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国民经济计划　社会主义国家（或地方）对计划期国民经济发展所作的全面部署和统一安排。它是由国民经济中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商业、邮电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进出口贸易财政等战线的长期计划（十年以上的远景计划）、中期计划（二至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组成的计划体系。国民经济计划赖以制定的客观依据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不断提高计划的科学性，还必须充分尊重价值规律等商品经济的规律，必须充分考虑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任务，必须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根本任务在于正确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速度、规模、合理配置资源，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稳定、协调、持续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依据，参照苏联建设经验和管理体制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1）以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发展农业

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3）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占支出总数的55.8%。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占总投资的58.2%，农业方面的投资占7.6%，运输和邮电部门占19.2%。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14.7%。私营工业的产值在五年内有一半要转变为公私合营。农业及副业的总产值年平均递增4.3%。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比重将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到1957年，钢产量将达到412万吨，粮食产量3856亿斤，棉花3270万担。计划规定，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五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420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约33%，农民的购买力将增长近一倍。

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快，还要大的胜利，使中国国民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基本建设方面，全国基建投资总额达到588.4亿元，用于工业部门的占52.4%。其中重工业占88.8%，轻工业占11.2%。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平均增长18.5%，超过计划原定的14.7%的速度。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按当时的需要，钢材自给率达到86%，机械设备自给率达60%以上。全国新建铁路33条，恢复3条，全国铁路通车里程比1952年增加22%。没有完成原定计划的有原油、机车、食用植物油、火柴、卷烟、糖等六种产品。农副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4.5%，超过原计划规定的4.3%的速度。粮食产量3901亿斤，棉花产量3280万担，都完成了原定计划。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2.9%，职工实际工资增长30.3%，农民收入增长20%左右。另一方面，到1956年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当时苏联为模式的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

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提出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有五条：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五年计划规定，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由"一五"计划的35%左右增加到40%左右，到1962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一五"计划规定的数字增长75%；工业总产值增长1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4800万担。职工和农民的平均收入将增加25—30%。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值"大跃进"期间。由于这个时期，"左"倾冒进错误在经济领域日益严重，"浮夸风""共产风"愈刮愈盛，导致计划指标竞相提高，经济体制盲目改变。例如，冶金部向中央报告说，1959年的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并预言到1962年可达8000-9000万吨。农业部门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长60—90%。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轻率地发动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短的二三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26425个人民公社，参加户数占全国总农户的98.2%。在计划、物资、财政等管理体制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不适当的改变。由于"左"的错误和若干重大决策上的失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迅速下降，经济损失巨大。例如，从1957年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农业总产值却下降22.7%。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58年为4000亿斤，1959年降为3400亿斤，1960年再降到2870亿斤，甚至低于1951年的水平，比1957年减少26.4%。鉴于中国当时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开始，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参看本卷"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并经过三年调整（1963—1965），从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求，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

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五年计划初步设想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850亿元，其中内地投资360亿左右。到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7%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5%，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8%左右，预计粮食产量4400—4800亿斤，棉花4400—4800万担，钢产量1600万吨，原煤2.8—2.9亿吨。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在前3年急剧恶化，如工农业总产值1967年比1966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了4.2%，钢产量从1966年的1532万吨下降到1967年的1029万吨，1968年又继续下降到904万吨。从1969年以后，经济秩序开始稳定，生产逐步回升。到1970年，"三五计划"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都完成或超额完成。粮食产量4700亿斤，棉花4554万担，钢产量1779万吨，原煤3.54亿吨。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人均140元。然而，由于"左"的错误路线，"三五"期间问题暴露不少，主要是基建规模骤然扩大，积累率急剧上升，消费与积累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益低下。职工人数增加过快，197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457万人，超过了"三五"计划原定的人数。

国民经济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开始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受当时特定形势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家用于大三线建设的投资和大中型建设项目均占全国计划内投资和大中型项目的一半以上。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四五"计划的制定又一次追求高指标。提出"四五"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2.5%，钢3500—4000万吨，粮食6000—6500亿斤，棉花6500—7000万担。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职工人数三年突破500万，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1970年，针对高指标难以实现，在周恩来主持下对原计划作了多次修改，适当改变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提出在重点建设内地战略后方的同时，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生产潜力，并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调整后的指标是：到1975年，钢产量3000万吨，粮食5500亿斤，棉花5000万担。1973年，工农业生产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到1974年，由于"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生产再度遭到破坏，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4%，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停滞和困难之中。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通过全面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总之，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动荡起伏。

国民经济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

第五个五年计划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一个阶段，由于"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纠正，继续搞"大干快上"，不适当的提出一些调整发展国民经济的指标。为了完成这些指标及1977年2月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规划纲要的要求，除了在国内全面推行"大寨经验"和一整套"左"的急躁冒进的做法以外，又不适当地从国外盲目引进全套设备，大量举借外债。仅1978年一年，就与外国签订了二十二个重大引进项目，金额达78亿美元，结果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沉重负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中的"左"的错误路线开始受到全面消除，第五个五年计划进入新的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在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引下，对国民经济作了调整。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由5—6%降为4%，1980年进一步降至3.8%；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由10—12%降至8%，1980年进一步降为6%。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由457亿元调减为360亿元，1980年继续调减为241亿元。与此同时，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工业生产速度得到调整。1980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7%，其中轻工业比上年增长18.4%，重工业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是：粮食32056万吨，棉花271万吨，钢3712万吨，原煤6.2亿万吨，原油1.06亿吨，发电量3006亿度，铁路货运量11.1亿吨。

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的简称。第六个五年计划是在中国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下制定和实施的。"六五"计划的制定所力求遵循的原则是：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求得国民经济按比例地长期稳定地增长；大力发展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使重工业密切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国防的现代化服务，保持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坚

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统筹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建设的发展；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使国民经济既集中统一，又灵活多样地发展。计划要求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五个部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按照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4%。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将达到4450亿元。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3%，将达到1274亿元，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增长8.7%。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36000万吨，增长12.3%；棉花产量达到360万吨，增长33%；钢产量为3900万吨，增长5%。

"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大大超过了计划4%的要求。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包括村办企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不包括村办企业）。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7%。"六五"期间，平均每年生产粮食37062万吨、棉花432万吨，比"五五"期间平均年产量分别增长21.4%和93.2%。钢产量由3700万吨增至4666万吨，原煤产量由6.20亿吨增至8.50亿吨。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提前1—2年完成计划规定的指标。财政状况逐年好转。"五五"末期，国家财政赤字较大，1979年和1980年合计近300亿元。"六五"期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2%，超过计划3.3%的幅度。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1980年至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9%。5年合计在城镇安排就业3500多万人。"六五"期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经济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开始抬头。

国民经济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的简称。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七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1）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5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础。2）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3）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七五"计划规定：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按照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16700亿元，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其中农业总产值为3530亿元，比1985年增长21.6%，平均每年增长4%，工业总产值为13240亿元，比1985年增长43.4%，平均每年增长7.5%（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6610亿元，重工业总产值是6630亿元，平均每年各增长7.5%）。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将达到11170亿元，比1985年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7.5%，其中第三产业为2810亿元，比1985年增长71.3%，平均每年增长11.4%。国民收入1990年将达到9350亿元，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全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将由1985年的404元提高到1990年的517元，平均每年增长5%。其中，城镇居民由736元提高到903元，平均每年增长4.2%，农业居民由325元提高到416元，平均每年增长5.1%。计划还规定，5年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为12960亿元。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费，平均每年增长8%，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国防经费和行政开支增幅受控。

在"七五"期间，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和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国民经济发展曾出现较大波动，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一度加剧，宏观经济出现某种失控。1988年9月，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出现某种失控和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决定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把建设和改革的重点放到治理整顿上来。随着治理整顿和经济紧缩方针的贯彻，尽管曾经一度出现市场疲软、流通不畅、生产滑坡等消极现象，但国民经济从总体上来看仍取得了积极进展，"七五"计划获得了圆满实现。据统计，1990年，农业总产值7382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2385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9%和7.6%。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国民收入为14300亿元，五年之中，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6%和7.2%，均超过原计划指标。1990年，城镇居民平均生活费收入为138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3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分别比上年增长8.6%和1.8%。1990年，主要农业产品产量获得可喜成果，进入世界前列：粮食产量达到4.35亿吨，钢产量为6604万吨，原煤10.9亿吨，原油

1.38亿吨，发电量6180亿千瓦小时，水泥2.03亿吨。与此同时、文、教、科、卫事业获得较快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 1991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组成部分。制定“八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正确处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八五”头一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要继续进行治理整顿，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在转入正常发展以后，还要继续完成治理整顿遗留下来的某些任务。在整个“八五”期间，都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现实条件的可能，在确保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深化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促进治理整顿和经济发展。“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1）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2）突出抓好经济结构调整，使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相适应；使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扭转；使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使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的倾向得到抑制。3）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地、有重点地推进现有企业技术改造。与此同时，要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加强重点建设，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4）在努力发展生产，全面厉行节约，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办法和步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有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并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补贴，逐步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同时，保持合理的信贷规模和结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5）进一步推动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并使之更好地为调整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服务。6）更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智力，巩固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把扩大对外开放同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7）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健全企业合理的经营机制为中心，协调配套地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物资、商业、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形成。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8）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妥善安排劳动就业。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继续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防御能力。

“八五”计划规定：按1990年价格计算，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250亿元，比1990年增长33.6%，平均每年增长6%。农业总产值达到8780亿元，比1990年增长18.9%，平均每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达到32700亿元，比1990年增长37.1%，平均每年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1995年比1990年增长53.9%，平均每年增长9%。“八五”计划还规定：1995年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18250亿元，比1990年的14300亿元增长27.6%，平均每年增长5%。五年合计，国民收入使用额为81050亿元。五年内，不包括物价上涨因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合计为260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7%。五年内，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3%。“八五计划”又规定：力争国内财政收入五年平均每年递增6.1%；国内财政支出，五年平均每年递增5.7%，重点增加农业、教育、科学、国防和国家重点建设等方面的开支。“八五”期间还对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指标提出要求：粮食平均年产4.47亿吨，1995年为4.55亿吨；棉花平均年产464万吨，1995年为475万吨；原煤1995年12.3亿吨；发电量1995年为8100亿千瓦小时；原油1995年为1.45亿吨，钢1995年为7200万吨。

第八个五年计划是同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结合起来考虑的。“八五”计划是十年规划的组成部分，是“九五”计划的基础。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1991—2000） 1991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组成部分。十年规划的奋斗目标和总体蓝图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表现在：1）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按照这个目标要求到2000年，以1990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1100亿元，10年平均每年增长6%。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1%。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8%。2）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3）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4）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

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5)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全。十年规划的基本指导方针是：1) 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3) 坚定不移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4) 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智力更好地同发展中国经济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结合起来。5) 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坚持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十年规划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指标是：1) 按照国民经济逐步现代化的要求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位置，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到 2000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5 亿吨，棉花产量 525 亿万吨，原煤产量 14 亿吨，发电量达到 11000 亿千瓦小时左右，钢产量 8000 万吨以上，乙烯产量 300 万吨左右，化肥产量 1.2 亿吨左右，铁路货运量达到 19 亿吨左右，纱产量 557 万吨，化学纤维产量 260 万吨左右。2) 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3) 继续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使我国经济增长逐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4) 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十年内，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12.5‰以内。5) 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6)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7) 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十年规划在具体实施中，大体分为前五年("八五"计划时期）和后五年("九五"计划时期）两个阶段。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九五"时期的发展打好基础。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在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产力布局、提高经济素质和理顺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全面实现到本世纪末各项目标和任务。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的形式之一。亦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思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提出。这种思路主张，国家有计划地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确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程序、影响和校正市场信号，监督市场活动，调节市场运行；市场通过供求、竞争、价格等机制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国家一市场一企业"的结合形式需要下列条件：1) 企业是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对市场信号作出灵敏反映，积极进入市场竞争。2) 具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市场功能。市场不应是狭隘单一的消费品市场，而是包括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技术市场—在内的完善的市场体系。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对资源配置起到调节作用，否则象传统体制那样，生产要素完全由行政主管部门掌握分配，企业也就无法摆脱行政机关的隶属地位，市场除了向居民供应消费品外也起不到调节和引导企业的作用。市场要能发挥引导企业的作用，还应具有完善的功能。市场引导企业，最终是价格引导企业，因此，价格形成机制应由单纯的行政主管部门转移到市场上来，由供求和竞争决定，这样才能理顺价格关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改善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3) 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不再向企业下达投入产出的行政指令，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国家的经济管理重心由微观转移到宏观经济的调控上来，管理形式由直接控制为主转移到以间接调控为主，即转移到主要是通过对市场的有计划的调控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由此可见，这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形式要求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国家经济管理水平和调控能力的极大提高。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成熟时，这种模式的调节也就难以有效地实现。

国民经济　一个国家所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的总体。它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也包括商业、服务业、邮电业、金融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虽然不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间接或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也被纳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之中。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0—1952 年，中国政府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这段时间，

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是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上进行的。中国的经济原来就极端落后，经过十多年战争，社会经济更加衰落破败。1949 年与历史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 50%，煤炭产量减少 48%，钢铁产量减少 80%以上，粮食产量减少 25%，棉花产量减少 48%。生产凋敝，通货恶性膨胀。人民贫困失业，生活下降到可怕的地步。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政府还面临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等一系列艰巨任务。1950 年 10 月，又开始抗美援朝。因此，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是在十分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时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促进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1) 没收官僚资本（见"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国营经济；(2) 实行土地改革（见"中国土地改革"）；(3) 统一财经工作管理，平衡国家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稳定物价"）；(4) 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见"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5)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见"三反"、"五反"运动）；(6) 紧紧抓住恢复生产这一中心环节。恢复交通事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工商业，通过调整的措施，扶持和引导他们发展生产。由于认真进行了上述一系列工作，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到 1952 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 年，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过渡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区分为初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经销，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其中公私合营的程度范围有大小之别，有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有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0—1953 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大部分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即加工、订货、包销、收购。这种形式发展很快，按总产值计算，每年平均增长 77%，到 1953 年，加工、订货、包销、收购已占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的 54%。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以后，企业仍属于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基本上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但是，私营工业的生产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与原料市场与产品市场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产前、产后的流通过程已被国家掌握；它的生产已经不仅为利润而生产，而主要是为着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了。并且，由于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所得到的加工费和产品售价，都是公私双方协商决定的，这就使资本家的利润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由于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这就需要改变资本家所有制，进一步把这些企业推向公私合营。公私合营企业由原来的私有制改变为公私共有制，这是我国私营企业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居领导地位的是公方，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因此，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再采取资本主义方式，而是逐步采用国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并把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之列。公私合营企业于 1949 年即已出现，1951 年 1 月，国家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后，公私合营企业有了明显发展。但直到 1955 年，我国的公私合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个别企业的合营上，为数众多的中小私营企业还没有合营。1955 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党和国家的团结教育下，首先是上海八个轻工业行业（棉纺、毛纺、麻纺、造纸、搪瓷、卷烟、碾米、面粉）于 1955 年 10 月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北京市于 1956 年 1 月间实现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全国各大城市都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6 年底，全国 8.8 万户个体手工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如按产值计算，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占私营和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 99.8%，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仅占 0.2%；按工业人数计算，公私合营工业的人数仅占 0.6%。到 1956 年底，全国 240 多万户私营商业中，82.2%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 14.6 万户转入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占全部私营商业户的 6%，40.1 万户转为公私合营，占全部私营商业户的 16.6%，144.4 万户组成合作商店和小组，占全部私营商业户的 59.6%。所以我们说，1956 年形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也就是在这一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是指国民经济在总体上的平衡，即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从总体上组织全社会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资源及其需求之间的平衡，组织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从而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以及各地区

之间实现最优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持续稳定地协调发展，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既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内在要求，又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方法。从经济实质上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是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从管理方针和方法上说，就是把综合平衡作为一种手段，用它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根据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和一定时期经济、政治任务的需要，运用现代宏观经济衡量体系，围绕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协调平衡，去研究和确定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社会总产品的生产、补偿、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国民收入分配所形成的积累（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国民经济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生产与建设、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比例关系；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等。为了保证上述各项比例的协调，就要适当安排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需要同资源之间的全面平衡，以及人力、物力、财力之间的相互平衡。要研究和做好以下几个重要的平衡工作：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外汇收支平衡；市场供求平衡；劳动力供求平衡以及财政、信贷、外汇、物资之间的相互平衡等。

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2）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3）瞻前顾后，把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确结合起来；4）重点和一般相结合，既保证重点，又兼顾一般；5）积极可靠，留有余地。

国营企业财务 从国家财政取得必要的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向财政上缴税金、利润，按照国家规定留存一定利润的折旧基金，接受国家银行对流动资金的管理，这形成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统一领导和相对独立经营关系的重要内容；从专业银行取得借款，向银行还本付息，这形成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存贷关系，同其它企业和单位结算购买原材料或商品，售出商品或提供劳动力等的价款，这形成企业和企业之间在协作基础上实行等价交换的资金结算关系；企业内部各部门、各生产环节之间的资金支付，这形成企业内部在组织资金运用中的权责关系和结算关系；以工资、奖金、津贴等形式支付职工劳动报酬，这形成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支付零星开支，这形成了企业和有关方面的结算关系。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主管部门和企业内部有关部门利用财务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可以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健全经济责任制，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国营商业 又称全民所有制商业，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商业。在我国现阶段，国营商业包括商业部系统的国营商业；农牧渔业部系统的木材公司、水产公司、农商联营公司；轻工业部系统的盐业公司、工业自销门市部；医药总局系统的医药公司、中药材公司；外贸系统的丝绸公司，以及文化部系统的新华书店等。在这些商业中，以商业部系统的国营商业为主导。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职工之间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个人劳动报酬。全民所有制商业是社会主义商业的核心力量，其一切经营活动必须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按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努力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国家预算 即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是国家对未来一定时期内财政收支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安排，是有计划筹集和分配由国家集中掌握的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它由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两个部分组成，按规定程序编制，并经立法机关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采取收支平衡表的形式编制。在我国，预算收入主要有来自国营企业的缴款，其主要项目包括：（1）企业收入，如工业收入、铁道收入、商业收入、外贸收入等；（2）各项税收，如工商税、关税、农业税等；（3）其它收入，如公产收入、罚（款）没（收）收入等；（4）中央财政集中的企业基本折旧基金。此外，还有发行国库券收入、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和国外借款收入等。随着利改税制度的实行，税收比重将逐步提高。预算支出，根据经济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等计划确定，主要项目有基本建设拨款、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援农业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国防战略费、行政管理费、对外援助支出、国外借款还本付息等。

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指利用国民经济各部分、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以及各种生产条件之间的有利因素，促成一个环节或一个局部的发展，使之推动其它环节、其它方面的发展，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例如，从加强农业的发展开始，建立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农业→轻工业增长→重工业增长→财政收入增加→支农资金增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再高涨。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起点应该是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加强薄弱环节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

向良性循环发展。

国际大循环　亦称国际经济大循环，是我国理论界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构想。在世界经济这一整体中，各国经济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发达程度不一，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世界各国都必须利用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发挥优势，弥补劣势，为各自的经济发展目标服务。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经济大循环的过程。它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的好办法。就我国而言，其基本内容是：（1）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裕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用换来的外汇支援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2）用重工业积累的资金反馈农业、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理由是：（1）我国当前重工业有机构成高，农业有机构成低。（2）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互争夺资金，将农村劳动力转移融人国际大循环中，一方面解决农村生产发展后，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要的资金。

国家经济调控职能　国家在制订正确的战略计划和决策的基础上，采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和方法来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职能。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计划的总体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对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进行调控，使国民经济基本的比例关系得到协调发展。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为了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控制，主要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措施，调节和控制市场各种经济参数、市场环境和市场信号，引导企业的经济行为，协调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

拉萨尔社会主义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曾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2）工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如果实际日工资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就会由于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而增进工人人口，从而增加劳动力供应，其结果就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水平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工资也不能长期地低于这个平均数，如果那样，就将导致"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其结果使劳动力供应短缺，促使工资重又回到原来较高的水平。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应当依靠国家的帮助并借助立法建立生产合作社，使自己成为企业主，获得全部劳动所得，摆脱贫困。4）工人阶级必须而且能够向国家争取实行普遍和直接的选举权。工人在争得选举权后，就可以把普鲁士专制国家变为"自由国家"。5）建立各种合法的组织，工人为了争得普选权，应该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各种互助会，进行合法的、不停顿的鼓动。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恩格斯曾尖锐批判了拉萨尔社会主义，并称之为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6页）。

治理整顿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就治理经济环境而言，它的具体内容是压缩过热的经济需求，遏制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1988年下半年发展到二位数字的通货膨胀，缓解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就整顿经济秩序而言，它的具体内容是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重点是清理整顿流通中过多、过滥、过乱的公司，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有的秩序。治理整顿的目的，在于克服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消极因素，消除引起社会不安定的种种隐患，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主要措施包括：1）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控制信贷规模、增加储蓄和稳定金融。3）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坚决刹住利用公款吃喝风和铺张浪费现象。4）开展全国性的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加强税收、财务和物价管理。5）整顿流通领域的秩序，清理整顿各类公司，加强对一些重要产品和紧俏商品的管理，对某些商品实行专营。6）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在压缩社会总需求的同时，从资金、物资、外汇和运输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粮、棉、油、肉、禽、蛋、蔬菜等农副产品的生产，支持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支持市场紧俏商品和出口创汇产品的生产。中共中央在提出治理整顿的同时，提出要在治理整顿中认真调整经济结构，在治理整顿中确保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在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和积极发展对外开放。

青山里精神 1960年2月，金日成在朝鲜平安南道江西郡青山里进行现场指导时亲自总结出来的一套贯彻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青山里精神的基本内容是：1）忠实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对人民的生活问题完全负责，并且教育和改造社会的所有成员，使他们革命化、工人阶级化。2）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发动群众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青山里方法的基本内容是：1）上级机关帮助下级人员，要经常深入现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2）在一切工作中使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先行，从而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在工作中分别轻重缓急，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4）领导工作要点面结合，突破一点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普遍推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一切工作中贯彻伟大的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方法：上级帮助下级，尊重群众的意见，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先行，鼓励群众自觉的积极性"。为了进一步贯彻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1961年建立了新的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大安工作体系，新的农业领导体系和一元化计划体系。

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手段 社会生产目的与实现生产目的的手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一致的，社会生产的目的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生产的目的决定实现这一目的手段，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目的，就有与它相适应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社会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都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实现生产目的的手段也是一个客观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只能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不能是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或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不外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增加投入到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劳动数量；二是提高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量，无论在物质形态上，还是在价值形态上都可以增加社会产品总量。但是，增加劳动量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即：劳动时间的长度和劳动强度、劳动者人数以及生产资料的数量。劳动生产率是指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效率。在社会总劳动量没有增加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以实物形态表现的社会产品等，这时，以价值形态表现的社会产品没有增加。但是，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社会产品量，那么，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以价值形态表现的社会总产品还是增加了。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重要途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劳动者的技术装备程度；生产过程和社会结合；自然条件；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思想政治工作和必要的行政措施。

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两条途径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主要途径。这是因为：1）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劳动数量是有限的，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无限的；2）增加劳动者人数固然可以增加社会产品总量，但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劳动者人均产量不变，如果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增长速度，还会造成人均社会产品量的下降。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会增加人均社会产品量，是保证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富足的前提。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体现的主要标志之一。可见，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发展社会生产的主要途径。不过，在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即要在充分利用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本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提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摒弃外国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努力扬弃中国以往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不合理的成分，在改革开放和新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熟形态，固然有待于今后的历史和实践去完成、去检验，但是，从原则上去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内容：1）在所有制结构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是主体，同时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2）在经济决策结构上实行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在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科学管理的前提下，充分搞活微观经济，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3）在经济调节体系方面，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各种经济手段的配合使用和各项经济政策贯彻落实来实现。4）在经济利益体系上，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兼顾三者的利益。在收入分配方面，把收入与经济效益联系起来。在个人收入分配形式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收入分配并存。5）在经济组织结构上，应当适应现代化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实行政企分开，横向联合与纵向指导协调相结合，发展以中心

城市为枢纽、经济区为扇面的网络化经济组织体系。6）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党的建设，完善政权机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7）总而言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是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合理、社会组织合理、健全、充满生机和活力、生产力得以充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不断提高的社会主义。

经济机制　指经济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环节有机结合，通过互相制约和影响，作用于经济机体的运行和发展。如价格机制，是通过价格的变动来推动和影响的经济运动，税收机制，是通过税种、税率的变化和减、免税收的政策来制约和影响的经济运动。机制一词，原意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意指机器、机械、机构，人们为实现预期目的而制造和供使用的工具或手段的总称。经济学借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表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个环节，互相结合和互相制约，构成密切联系的有机体。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是人们根据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自觉地制约和影响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作用过程的方式。它作为组织管理社会主义的有机体系，包括的主要内容有：经济管理的组织形式；指导经济活动的方针、政策和规定；制约经济活动的手段。等等。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以，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的。按其作用的方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计划机制，一种是市场机制，两类机制结合起来，自觉运用，制约和推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行和发展。

经济杠杆　国家掌握的用以调节经济运行、以期实现预定经济目标的各种经济手段。它具有下列质的规定：（1）它是包含于经济利益关系中的经济范畴。如参与初次分配的利益、工资资金、税收等，参与再分配的价格、信贷、利润、财政分配、货币发行等。（2）它们必须是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可控变量，并且必须处于经济运行之中，并与经济运行系统中的其它构成要素处于函数联系之中。如货币发行量与价格总水平有函数联系，利率与储蓄和投资有函数联系。（3）它们必须是社会劳动分配的选择条件和信号。如利率、税率、价格、工资、汇率的高低是调节资源在部门间流动的信号。经济杠杆是经济运行中灵敏有效的调节工具。它能克服计划调节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提高计划工作水平；它能刺激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保证实现计划的效率和质量。经济杠杆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正确运用，依赖于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最主要的是要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

经济手段　指国家通过价格、工资、利润、利息、税收、资金等经济杠杆，以及经济合同、经济责任制、经济核算等管理制度，去影响和调节各单位的经济活动，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运用这些经济杠杆和管理制度，可以从经济效益上组织引导和调节社会主义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经济手段的主要特征是：（1）它是以刺激、推动、诱导等方式来间接影响被管理者的意志和行动，而不是强制。（2）它所运用的经济杠杆，都是以价值形式表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以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基础的。（3）它的实质和核心在于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注意通过各种经济杠杆，从物质利益上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经济关系，使三者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企业和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和生产的发展，关心技术进步，讲究经济核算、经济效益、经济责任，充分调动企业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能忽视经济手段的应用，而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这样就影响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经济体制　亦称经济管理体制，它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或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国民经济的管理形式和管理制度。经济体制受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定和制约，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体现。经济体制因不同的国情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而具有差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可以因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具体社会历史条件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可以因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有所变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基本经济制度为依据，受经济制度的制约，是在巩固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科学与否，对经济制度的巩固、发展及其优越性的发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特区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划出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实行减免关税等优惠办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和吸收外商、外资兴办企业或其它事业，以收到一定经济效益为目的。我国政府自 1979 年以来，先后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以及海南省分别试办经济特区。特区的经济发展方向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安排确定。对愿来我国投资的外商，我方提供必要的土地、经营及生活方面的便利，但土地所有权仍归我国所有。来投资的外商必须尊重我国

的主权，遵守我国的法律、政策、法令，必须履行合同。在我国的经营方式主要有：外商独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共负盈亏，合作经营，即外商出资金、设备，我方出土地、人力、来料加工兼补偿贸易，即外商提供设备、来料、来样，我方出厂房和工人，进行加工与装配，赚取加工费，并用加工费分期归还设备的本息。通过经济特区，便于利用外资引进设备、管理经验和人才，增加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它是利用外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种形式。投入在特区内的外商资本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经济技术开发区 指在我国改革中实行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的老市区以外划出的有明确地域界限的特殊区域。这些区域可集中开办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以及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从速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出口创汇。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对"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优惠以及进出口贸易的经营等，都比开放城市更加接近经济特区的政策和管理方法。

经济发展战略步骤 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为了实现1981至2000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即把实现战略目标分为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1) 近期目标从1981年至1990年，这一时期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要继续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进行几次必要和可能的初步改革，为"七五"计划做好准备，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继续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个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2) 中期目标从1991年至2000年。在80年代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振兴时期。经过10年奋斗，中国将实现初步的现代化，城乡人民生活将提高到小康水平。

经济发展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对于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关键意义的、目前发展比较薄弱，需要特别加强的或具有特殊发展优势的部门、环节或地区。战略重点，也就是社会总劳动投入的重点。战略重点也是决策机关实行战略指导的重点。经济发展之所以有重点是因为经济发展本身总是不平衡的，在各部门、各环节或各地区之间，必然有的先进、有的后进，有的相对发达，有的相对薄弱，加上它们在经济生活中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来就不同，因此为了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对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要求就不应该"一切齐"、而必须特别加强那些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关键意义而目前发展又比较薄弱或具有特殊发展优势的部门、环节或地区。这些部门、环节或地区被称为战略重点。选择战略重点应根据以下原则：(1) 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而其战略重点必须是多元的，它不可能是单一的。(2) 能够作为战略重点的必须是对实现战略目标有重要关系，否则各部门环节或地区都可成为战略重点。(3) 战略重点应该是经济发展中比较薄弱需要特别加强的部门、环节或地区。(4) 战略重点应该是具有特殊发展优势的地区、环节或部门。(5) 战略重点应该是能够发挥起搏作用的部门、环节或地区。由于战略时期的不同，战略重点会发生转移。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只要农业上去了，其它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今后必须控制人口增长、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与此同时，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且全面发展林、牧、副、渔各业，以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当前能源和交通的紧张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保证国民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加强能源开发，大力节约能源消耗，同时大力加强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的建设。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样就要有计划地推进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推广各种已有的经济效益好的技术成果、积极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必须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并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关键性的科研项目进行"攻关"；必须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水平和企业事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必须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及扫盲在内的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经济过热 是指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状态。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比例关系和经济效益，必然会损害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后果。比如，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发展不是持续稳定，而是大起大落，起伏较大；经济效益较差，国家和人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等等。因此，必须把速度同比例和效益统一起来，根据条件和可能拟定最优发展速度，防止和避免经济过热。

定息 在公私合营期间，为赎买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付给他们的股息的形式，息率是按期固定

的。根据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亏，不分行业，统一定为年息五厘（即年息5%）。定息是资本家凭借原有生产资料占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股息仍是资本家的剥削收入。但由于息率固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受到严格的控制。并且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表现在取得定息上，企业和全部生产资料已由国家统一调配、管理和使用。定息是1956年实行的，用定息取代"四马分肥"的主要原因是：一，全行业公私合营意味着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基本上已转归国家掌握，国家不但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统一经营或管理这些企业，而且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调整、合并和搬迁。因此，已分不清哪一个企业有多少利润，显然，再按"四马分肥"的办法就行不通了；二，在"四马分肥"的企业里，资本家股息分红的增加与企业利润的增加成正比例，这就不合理，我们知道，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利润迅速提高，主要是工人积极性的发挥，国家的投资与扶助，和价格政策因素形成，与资本家无关。定息支付于1966年结束，先后实行了共10年。

定型价格 亦称"习惯价格"。它是指在市场上由于长期使用、为消费者所承认和接受的比较习惯和固定的商品价格。如火柴、邮票、冰棒等常用的消费品的价格，即有此特点。这种价格由于在生活中频繁接触和长期比较固定、从而形成价格心理定型化。当这些商品的价格略有变动时，价格的变量效应往往会引起消费者心理超变量的反映。企业在经营这些商品的时候，即使成本上升或发生通货膨胀，也不轻易变动价格，以免招致难以应付的社会压力和政府干涉。在西方企业，常采取以下的办法来加以解决：(1) 改善经营，节省开支、薄利多销、尽量保持定型原价水平。(2) 生产和经营新产品、新品种、新规格商品、以肥补瘦。(3) 采取改进包装、改换牌号，或以替代商品加以取代，并配合宣传和广告，培育新的消费习惯与偏好，创立新的定型价格。(4) 降低质量或产品份量，变相保持定型价格水平。(5) 收编退出这些商品的经营，以减少企业经营的困难。这是最不得已的办法。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头号掠夺者。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也夹杂其间。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迅速膨胀。它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中美商约"，得到独霸中国市场的权利。到1948年，美国在华企业近300个，美国资本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它有大型发电厂和拥有许多分支机构的银行、石油公司等。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合作"的掩盖下，通过投资和"贷款"的方式，控制了大批官僚资本企业，并使民族资本企业受到影响。美帝国主义还采取"美援"形式向中国大量输出其过剩产品，据海关统计，1947年从美国输进的商品额占当时进口总额的50%，使美货充斥市场，泛滥成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首先决定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所谓废除帝国主义特权，主要是指废除帝国主义过去强迫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接管帝国主义长期霸占的海关，收回我国在关税及管理海关事业方面的自主权，统治对外贸易和实行外汇管理，取消帝国主义利用进出口的不等价交换和特惠的关税条件攫取高额利润的特权。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冻结、征用和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和投资以及其他资产，从而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

固定价格 是计划价格的一种形式。即由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而制定的具有指令性、严肃性和稳定性的价格。在传统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制中，固定价格是计划价格的主要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它与指令性计划、物资统配三位一体构成了整个经济的运行基础。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中，指令性计划已缩小到一定范围内，固定价格也不再作为计划价格的主要形式起作用。但它仍是计划价格的形式之一，仍具有不可取消的作用。在当前，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仍有必要采用固定价格。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体系的完善，价格体系的合理，固定价格的范围要逐步缩小到最低限度。为了使固定价格更好地的发挥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在制定固定价格时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的要求，使之符合和准确反映社会必要劳动的耗费，反映一定时期内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等，还要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固定资产有偿占用 指国家按一定比例对企业固定资产征收占用费，这是企业提高固定资产利用效果的一项重要措施。改革以前我国企业对国有固定资产的占用是无偿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开始变无偿占用为有偿占用，明确规定企业占用固定资产必须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这样，有利于减少固定资金的占用量，提高机器设备的利用率和生产率，这也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物价改革 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格体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

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物价改革包括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其它许多方面的改革要以价格改革为前提，而价格改革又必须以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许多方面的改革为条件。它们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因此，价格改革即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的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各项改革协调一致。同时，价格改革要同税收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财政制度的改革、工资制度的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配套进行。

物资平衡 物资是物质资料的简称，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我国，为了与经营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商业部门相区别，把经营工业生产资料（不包括矿山、森林、铁路、厂房以及其他生产性建筑物）的部门称为"物资部门"，因此，物资也就被约定俗成地定为经过劳动加工的用于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

物资平衡是指物资的资源和需要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其内容包括：物资资源和需要之间总量的平衡；物资资源和需要之间在品种、规格上的平衡；物资资源和需要在时间上的平衡，物资资源和需要在地区间的平衡等。实现物资平衡，也就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矛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资资源；合理安排物资的使用方向，改变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物资平衡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季节差价 同种商品在同一市场上不同季节之间的价格差额。季节差价形成的原因是：在生产季节生产的产品，为了在非生产季节消费，需要花费一定的储存费用和劳动，有些产品，在不适于生产的季节生产，其成本比较高。这部分多耗费的生产成本或储存费用，需要在价格上得到反映和补偿。我国在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953年和1954年实行的统购统销，有计划地取消了工业品和主要农副产品的季节差价，但对于少数时令性强、容易腐烂变质、保管费用和损耗较大的鲜活产品，如蔬菜、水果、鲜蛋、水产品等仍然保留了季节差价。由于农产品具有季节生产而常年供应的特点，季节差价主要是就农产品而言。合理的季节差价有利于农产品的均衡收购和供应，有利于调节生产和消费。

质量差价 也称为品质差价。指同种商品因质量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商品的质量差价主要有品质差价、品种差价、等级差价、花色差价、式样差价、规格差价等。同种商品，其使用价值是可以互相比较的。质量差价反映同种商品在使用上的耐用、适用程度的不同。同种商品质量的不同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主要有：生产技术条件、劳动者熟练程度、经营管理水平、栽培或饲养方法不同，原材料、矿藏资源和自然条件不同等。总的说来，商品质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不同而形成的。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价值量大、质量好的商品，价格应该高些；价值量小、质量差的商品，价格应该低些。但有些商品质量的差异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别所决定的。对于同种商品按其质量不同分等定价，实行优质优价、劣质低价、同质同价的原则，能够鼓励生产者生产优质产品，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增加新产品，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否则，生产者就不关心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甚至粗制滥造，这是从价格上保护落后。质量差价占标准品价格的百分比，称为质量差率。规定合理的质量差价，要正确制订和研究商品的质量标准。应以国家正式颁布的质量标准为依据，国家没有正式颁布质量标准的，由工商企业通过共同协商确立。

拨改贷 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简称。即，将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由无偿贷款改为由建设银行贷款供应。拨改贷是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旨在通过有偿使用资金，使建设单位树立资金周转观念、利息观念和投入产出观念，提高投资效益。1979年以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均以国家预算无偿拨款方式办理。1979年以后，试行拨改贷制度，1985年全面推行。同时，对无偿还能力的建设项目，规定可经审批后豁免偿还本息。1986年又调整为：凡行政、事业单位等非营业性的无偿还能力的建设单位恢复无偿拨款制度。按此规定，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分别为国家预算内拨款投资和国家预算内"拨改贷"投资两部分。实行拨款的建设项目与实行"拨改贷"的建设项目，在资金渠道上分别管理、分别核算，不相混同，不相挪用。属于"拨改贷"项目的资金，按建设项目的隶属关系和计划安排权限，分别由中央财政预算和地方财政预算并拨建设银行，由建设银行对符合条件的"拨改贷"项目单位贷款。与此相适应，建设银行收回的贷款，其中属于中央预算安排的，上缴中央财政；属于地方预算安排的，原则上缴地方财政部门。"拨改贷"实行差别利率。对能源、交通、原材料、农业等重要的和微利的行业实行低利率，对长线产品的建设项目和在能源紧张地区搞的高能耗产品的建设项目，

则实行高利率。

非法收入　指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范围内的收入，包括非法的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如逃税抗税、贪污、受贿、走私、诈骗、盗窃、抢劫、"官倒"和其他各种违反国家法令所得的收入。牟取非法收入的行为，污染经济环境，扰乱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市场的稳定，使一些不法分子不劳而获，造成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为此，对非法收入行为必须依法严加制裁。但要根本解决非法收入问题，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包括发展生产，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相对平衡，从而减少非法活动的余地；理顺价格体系，逐步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严格税收制度；加强市场监督以及加强守法教育等。

非劳动收入　指不是凭借劳动所获得的收入。非劳动收入，可以是合法的收入，也有非法的收入。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和企业为了解决资金短缺，发行债券和股票筹集资金，持有债券的债权人就可凭债券取得利息，而股票持有人则可取得股息和红利，这些都属于非劳动收入。近年来，我国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小型企业推行租赁制，承包人和承租人的收入中，除按劳分配所得外，还包含一部分所谓的风险收入，也属非劳动收入。城乡居民储蓄所得的利息，也是一种非劳动收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也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中，凡是合法的，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凡是非法的收入，都要依法受到制裁。

房地产市场　指以房产和地产作为经营交易对象的场所，是流通领域中房产和地产交换关系的总和，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是房产和地产的简称。其中，房产即房屋产业，包括人们的生活居住用房和非住宅用房，非住宅用房包括厂房、仓库、商场、商店等生产、流通领域的用房，以及办公、文化、卫生、体育等行政、事业方面的用房。地产，即土地产业，包括住宅和非住宅附着物的土地以及已开发或待开发的可作为建筑地段使用的土地。房屋和土地由于所有制和隶属关系等的不同，可以分别进行交换或经营，也可以根据二者的不可分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交换或经营。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房地产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就形成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经营交易方式有买卖和租赁两种形式。

居民购买力　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内城乡居民购买商品（主要是消费品）的货币支付能力，是社会商品购买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居民购买力等于居民货币总收入减去非商品支出（包括生产服务性支出、义务缴纳性支出和文化娱乐性支出），再减去或加上储蓄、手存现金的增减额。居民购买力水平可以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及其改善程度，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

供销合作社（商业）　农民群众自愿入股，并由国家扶助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合作商业。由入股社员和供销社职工组成的社员代表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其一切重大问题；日常工作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的理事会和理事会的正副主任负责；其财产为社员公有；利润收入除上缴国家税收外，都归社员集体所有，每年规定一定的积累，并提一定比例的现金按股分红和职工劳动分红。供销合作社商业实行农民自愿入股，在组织上体现群众性；实行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在管理上体现民主性；充分发挥并自觉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经营上体现灵活性。

供销合作社商业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渠道。它对农村供应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组织农村重点户、专业户和广大农民开展多种经营，实行多层次的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和服务的联营，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和出口服务，并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

卖方市场　一种特定形式下形成的市场局面。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因商品供不应求而出现的对卖方有利的市场局面。在卖方市场中，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在经营中往往会出现商品质量差、品种少、忽视服务态度以及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买方极少有挑选商品的余地。

知识产权　指知识财产所有权，即公民或者法人对脑力劳动创造的物质财产所享有的所有权。知识财产为非物质财产，它与物质财产不同。有形的物质财产，如房屋、机器、设备等，看得见，摸得着，占据空间，不易退出所有人的占有，并只能同时为一人使用，使用后整个物质有损耗，而无形的非物质财产（知识财产）没形体，不占据空间，易于退出所有人的占有，可以同时为很多人使用，使用后没有损耗。知识产权具有以下特点：（1）具有法律上的专有性。为使非物质财产得到切实保护，国家专门授予它以专有权，赋予它以特殊的保护形式；（2）具有时间上的有限性。知识产权是创造性脑力劳动成果，其本身更新快，在不长时间内对它设置特别保护，同时，知识产权本身有极强的社会性，不允许为少数人长期垄断；还具有空间上的区域性。即一国所确认和

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范围内有效，对其它国家不发生效力；(4) 具有与创造者人身的紧密联系性。知识产权是特定人创造性脑力劳动的成果，创造者享有署名权或者注明自己为发明人的权力等人身权。知识产权包括两大类：一是版权，指作者对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依法享有的署名、发表、出版、转让获得报酬等所有权。二是工业产品，指发明人设计人对发明、外观设计、商标等依法享有的有关制造、使用、销售、转让等的独占权。长期以来，我国对知识产权不够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摒弃了"左"的思想，承认技术是有价值的无形财产商品。1980 年通过了民法通则，对知识产权第一次作了明确规定。民法通则不仅把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包括在知识产权内，而且还将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它科学技术成果权包括在内，赋予知识产权以中国特色。

知识密集型产业 指较多地使用具有高层次知识性的生产要素的产业，一般包括具有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性质的各种产业。有时也等同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提出一般认为与"里昂惕夫之谜"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余额之谜"有关。所谓"里昂惕夫之谜"指 50 和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等人根据美国的进出口统计资料，对赫克歇夫—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进行检验后得出的有关贸易结构的反论。所谓"增长余额之谜"，是指 6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对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时不能解释的一个增长余额的来源。有趣的是，在后来这两个"谜"的求解过程中，有一些经济学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谜底"—技术进步或知识使用量的大大增加。由此，一些学者便把那些必须使用大量知识或依靠技术进步才能发展的产业称之为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其产品称为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但"知识密集"或"技术密集"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则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人们在对新技术革命的深入讨论中才出现的。一些学者还把知识密集型产业划分为四种类型：(1) 研究与发展的产业，如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航天航空工业等；(2) 高加工和装配工业，如环境保护设备的制造业，教育用品设备的制造业，工厂化住宅业等；(3) 新技术产业，如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4) 知识性产业，如软件开发与设计、信息处理与经营业等。

苦乐不均 也叫收入分配不公。指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职工收入相差悬殊，等量劳动不能获取等量报酬的现象。按劳分配规律要求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由于各企业所占有资金数量的不同，技术装备的不同，所使用的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不同，原材料计划内外的比重不同以及价格扭曲等原因，等量劳动支出在不同的企业不能获得等量报酬。苦乐不均的重要表现：第一，在奖金的发放上。奖金的发放是由企业的盈利状况所决定，但企业获取利润的多少，不仅取决于企业的主观经营，还取决于企业的客观条件。第二，在福利享受上。主要就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各企业职工在住房、医疗、补贴等方面的差别。第三，生产和生活条件上。由于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的不同所造成的企业和职工的收入的差异。对于由客观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国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

"近亲繁殖" 原指生物界双亲相同或相近的个体相互交配、生产后代的一种繁殖形式。人类血缘相近的男女结婚生育，也属近亲繁殖。生物界证明，近亲繁殖，其后不藩。因此要尽量避免近亲繁殖。人才学上借用这一术语来指在某些单位人才世代相袭，缺乏交流和创新的一种现象。

产生"近亲繁殖"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毕业生留校制度。我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愿意留用本校的毕业生；第二，缺乏人才流动机制，一次分配定终身。结果，有很多院校的系和专业的教师毕业于同一学校，几代同堂。因此造成这些教师在知识结构、治学方法，学术观点上的相同或相似，不能互补和提高，类似于生物近亲繁殖造成的后果。

克服"近亲繁殖"的办法是加强人才的横向交流，让各院校、各学派的毕业生到一起工作，形成"杂交优势"，促进人才增长。

级差收益 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客观条件的差别而带来的额外收入。

级差收益的形式主要有：第一，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带来的级差收益。由于土地优劣、矿藏贫富以及地理位置不同，耗费同样的劳动所带来的收入都不一样。这种收入与他们的劳动无直接关系，其性质类似于级差地租Ⅰ。第二，资金和生产资料等物化劳动带来的级差收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而且被各企业所占有和使用。各个企业占有的资金数量以及技术装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产量和收入，在同样条件下，那些有机构成高，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企业，可以获得一种超额收入。其性质类似于级差地租Ⅱ。

从理论上讲，级差收益应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带来的级差收益应归集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全民所有的土地、矿藏和资金带来的级差收益应上缴国家，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级差收益一般是在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配。

试销 在新产品尚未投入大批量生产之前，向消费者介绍新产品，以期引起消费者注意和兴趣，并征求消费者意见，以便使新产品批量生产并进入市场的一种推销方式。

生产部门的新产品试制出来，在消费者未认同以前，必须广泛地将它介绍给消费者，充分显示这种商品的特色和吸引力，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并且在初步销售的同时，广泛征求消费者的意见，反复改进产品质量、性能、外观，包装等，争取批量生产。商业部门积极配合生产部门组织新产品的试销工作，有利于促进生产部门生产更多的、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以满足市场需要。

官倒 指利用在政府职能部门掌握的人、财、物等权力为手段进行非法或不正当经商以牟取暴利的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行为。现今中国存在的官倒现象，就是依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官办公司，凭借职务与权力，非法倒卖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中间盘剥，牟取暴利。以这种方式谋利的渠道一般有三种：一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将计划内物资转为计划外倒卖；二是利用职权、关系非法经营、违章经营；三是以物换物，投机倒把。官倒活动的类型包括：一是政企合一、兼有政府职能与经营职能；二是职能转换，把管理职能由政府移到公司；三是党政干部与离退休干部直接办公司，在公司任职或兼职，参与经营。

官倒现象由来已久，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都有官倒滋生与蔓延。当今中国的官倒现象产生于新旧体制转机时期，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新旧体制交叉与摩擦的一部分“真空地带”的存在，客观上成为官倒生长的温床。官倒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权力与企业经营活动相结合，以行政权力参与经营活动。实质上旧的经济体制对新的经济体制的抵触与冲击，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一种表现。

官商作风 用官僚主义态度与封建衙门式作风来经营社会主义商业的一种恶劣风气，是封建残余思想与官僚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一种反映，具体表现为：作霸主生意，独家经营，非我不可；凭借手中权力，排斥公平竞争，搞封建垄断；对市场需求心中无数，对经济状况心中无底，亏损不着急，浪费不心疼；不钻研业务，不研究行情，以空头政治对付商业经营活动，甘于充当外行，得过且过；不讲究商业道德与经营艺术，对顾客粗暴无礼，搞庸俗的市侩作风。

现阶段我国官商作风存在的原因是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混乱与无序；人事干部制度与劳动工资制度的严重弊端，社会主义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等。要扫除官商作风，就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多形式、多渠道的生产与联合，改革商业管理与经营体制，改革干部人事与劳动工资制度。最根本的办法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

顶替 通过补充职工自然减员从而解决就业的一种方式，即在职工退休、退职或死亡以后，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条件的子女成为新工人，也称“顶替招工”或“接班”。

我国的顶替制度始于70年代中期，起先在部分省、市、自治区试行。1978年6月2日《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正式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就业子女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家居农村的退休、退职工人，……本人户口迁回农村的，也可以招收他们在农村的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

这种采取子女顶替的办法解决就业与职工队伍，在一定时期内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加速了原有职工队伍的更新，解决了职工队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减轻了城镇就业压力，但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顶替无严格标准或标准很低，致使部分企业骨干青黄不接，严重影响工作质量与职工队伍素质；在一些科学、教育、文化单位或知识技术较密集的企业，顶替人员文化素质低，影响工作效率，人浮于事，因期待顶替就业，致使一部分在校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不利于下一代成长；顶替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裙带关系与弄虚作假，使其扭曲变形。因此，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正式取消国营企业职工的子女顶替制度。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近年来所实施的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其基本特征是：抓住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利用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低廉、素质较高、交通方便、基础设施比较好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发动劳动密集型产业，搞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使得我国沿海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能够真正走到国际市场上去参与国际交换与竞争，真正转到外向型经济轨道上来。通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能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势必带动中西部的发展，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软预算约束 这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指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都具有收缩性，不能事先有效地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软预算约束的主要特征是：企业生存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投人成本和销售盈利；企业技术进步和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内部资金的积累；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用不着去适应价格，对价格的反映麻木；企业自己不承担风险，可以将外部环境和自己行为的不利后果转移给购买者和国家；企业对投人品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

科尔奈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由于下列5个条件存在，使企业不能在实际领域即生产和交换的活动中受到预算的硬约束：第一，大多数企业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对价格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企业可以影响税法的制定，并能得到税收的减免和缓征，而且税赋征收并不严格；第三，企业可以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得到国家的无偿拨款和短期、长期补贴；第四，信贷制度也是软的，即使企业不能完全保证具有以其销售收人如期归还贷款的能力，也仍可以得到贷款；第五，为了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国家可以无条件给予其投资资金。

软预算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与僵化，即所谓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父爱主义”关系，像父母保护孩子、孩子依赖父母一样，国家不会对企业的困境熟视无睹，企业也因国家的无时无刻的保护和帮助而有恃无恐，因此在实际领域即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不能有效地对企业进行行为的硬约束。软预算约束是产生短缺的根本原因。

软科学 也称“科学指挥学”，因借用电子计算机软件而得名。泛指对科学技术体系及其各个环节进行预测、规划、组织、管理指挥和监督，使之有机地配合协调，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功能与优势的科学。它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与哲学的理论与方法，积极解决现代科学技术和实践活动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研究各社会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它重点研究各个系统、层次的战略性问题，以群体的高度职能进行协同攻关。软科学包括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一是宏观咨询研究，如科技、经济社会等发展战略研究；区域性综合开发规划的研究制定；能源、资源、环境等综合研究；二是微观研究，主要包括要求工程和企业管理咨询研究等。软科学的特点是直观性、跨学科性、系统性、对策性和预见性。

最早运用“软科学”这个术语是1971年的日本《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本世纪下半叶这门学科日益成熟并发展起来。我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对软科学予以了极大重视，国家和各省市都相继建立了“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从事软科学的综合研究与运用。软科学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其运用范围日益扩大。

规模结构 也指经济规模结构或企业规模结构，指从事生产、流通或劳务性活动的独立核算经济单位的规模及这些不同规模的经济单位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历史表明，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是：第一，平均企业规模逐步扩大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企业规模呈现大型化趋势，大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逐步增加，因此企业的平均规模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二，大、中、小型企业共存发展的趋势。从技术不断进步的角度讲，大型化和小型化都是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特点，特别是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日益超越大量生产的阶段，出现了小批量、多品种的发展趋势，因此大、中、小型企业的并行不悖是规模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

环太平洋合作设想 日本提出的关于太平洋沿岸各国从开展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紧密合作、直到最终形成某种一体化组织的一种设想。60年代初，欧共体的建立在亚太地区尤其是日本引起了一定反响，1963年5月，日本经济调查协会综合了日本官方和财界的意见，写出了《太平洋合作方向》的报告，主张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进行合作。1964年2月，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1967年，日本外相三木武夫倡议成立“亚太经济圈”，同年4月由太平洋地区的发达国家（美、日、澳、新，加）企业界人士组织的“太平洋经济委员会”在东京成立。1968年1月，上述各国学者建立了“太平洋贸易发展会议”。大平正芳就任日本总理大臣后（1968年）成立了以大来武佑郎为首的“环太平洋合作研究组”，并于80年代初提出了日本关于环太平洋合作的全面主张。在大平正芳与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的倡议下，1980年9月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召开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时称太平洋共同讨论会），该合作会议至今已召开过5次（我国已参加了第五次会议，并成为该会议16个正式成员国之一）。这一构想反映了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合作的要求，但由于地区内各种矛盾的存在，短期内尚未形成共同体式的一体化经济。

环境会计 估量某个特点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的会计。环境会计是把有关某一个别经济主体的环境问题同对这个单位财务上的经营成果的估计加以区别或分开衡量的报告的会计。环境会计涉及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方面，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的保护、公害的防止与消除、对某地区的贡献等社会问题。其具体任务是从企业的社会会计责任这个观点出发，谋求对企业经营方面的环境计划以及对保护环境和防止、消除公害等的控制活动实施会议会计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环境与生存质量的问题日益被重视，环境会计工作遂成为会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责任会计 指以企业内部各责任单位为基础，以保证企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主要利用价值形式，通过建立各级责任中心进行目标管理、差异分析、责任转帐、编制责任报告和责任报表等，对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耗费，占用和成果进行核算和监督的一种管理活动。在西方现代管理会计中，责任会计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门。责任会计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成本会计有了迅速发展，但是，会计管理仍不能适应企业要求不断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遂产生责任会计。到了本世纪40年代，责任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一个分支，其理论方法便日趋成熟。

责任会计的对象是企业内部各级各单位的价值运动，责任会计的范围限于企业内部价值方面的管理控制，而会计学、决策学、行为科学和组织管理学是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责任会计的方法可以归结为：第一，建立各级责任中心的方法；第二，目标管理的方法；第三，差异分析的方法，即将计划与实际进行比较，分析与评价的方法；第四，责任转帐的方法，如制定企业内部转移价格，建立厂内银行等；第五，编制责任报告的报表的方法。近几年，我国的责任会计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已成为对企业进行价值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指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不同层次的决策或行为主体正确处理其经济责任、经济权限、经济利益三者的关系，把责权利有机协调和统一起来，以完成各自既定经济责任，实现既定经济权限并取得相应的经济利益的原则。这是建立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至中央，下至各级地方和部门，每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与单位，企业内部每一个环节和劳动岗位，都是不同层次的决策与行为主体，承担着不同分工与经济责任，有着相对独立的经济权限与经济利益。建立科学的经济管理体制，就要使各级主体按照分工负责、相互协作的原则，明确规定各自的经济责任，合理划分经济权限，正确处理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使之紧密结合，落实到每一个管理者、经营者与劳动者身上。在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中，经济责任是第一位的，因不同层次主体之间、同一层次不同主体之间建立的经济责任制要求上下左右互相承担经济责任。经济权限的合理划分，是保证经济责任的必要条件，要根据经济责任的范围、性质和内容，确定各决策与行为主体的自主权限。经济利益是依据一定的经济责任和权限，依靠正当经营获得的经济收益。责权利的核心是责，以责定权，以责计利。

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 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内容的主要方面，直接计划是国家对某些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生产经营与事业活动，通过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规定任务，实行计划管理的一种方法，用直接计划管理和指导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要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另一方面要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必要条件。直接计划的特点是指令性，执行单位必须按规定的规格、质量、数量、期限完成。直接计划的对象限于有关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活动与科技、教育等事业活动，限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部门与企业。间接计划指国家对众多的中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等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有关指导性计划、政策法令、经济参数等进行间接的管理，影响和制约其经营活动，使其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国有的产业计划与发展目标轨道。间接计划的特点是指导性，主要通过市场等中介发生效力，其对象是除指令性计划控制以外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里也排除一部分由市场直接调节的消费品生产部门和企业）。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的要求，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将缩小直接计划的控制范围，而越来越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由间接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

现金支票 是存款人用以向银行或支付给收款单位现金的一种凭证，是同城结算方式之一。作为转帐支票的对称，它不同于转帐支票，现金支票是用来向银行提取现金的，但也可以转帐；转帐支票只能转帐，不能提取现金。因此，使用现金支票结算，要按照我国现金管理制度和结算方式的规定，只能在国家允许的现金使用范围内进行，并且要写明款项用途，接受银行的监督。同时，要严格按照支票结算程序办

理，一律采取记名式，不签发空头支票，并限于支票有效期限范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目前，为加快银行结算改革，扩大支票使用范围，逐步推行到城镇的周围地区和一些经济区域使用支票，先在上海、广州、武汉和沈阳等大城市试行支票背书转让。为适应电子化要求，支票实行单联式。

九画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由于生产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是孤立地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也就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正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象的这一特点，使得人们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还要研究政治，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甚至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首先是政治。这种意见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阶级斗争、战线斗争，政治口号再加上一些当时的方针政策，充塞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变为某种"政治学"、"政策学"。这种意见和主张出现在60年代初期，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于统治地位。目前，这样一种认识和作法已经基本上得到克服。另一种意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仅有生产关系，还有生产力，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方式。主要理由是：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经指出该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是生产方式。2）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过去和现在之所以内容空泛和缺乏生气，其原因在于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3）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迫切需要加强对生产力的研究，如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满足这种需要，而且可以改变目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内容干瘪和脱离实际的状况。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作过某些科学的设想和预见，这些思想仍然是今天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但这些思想毕竟产生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前，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规律性的特点，还不能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也作过一系列科学的预见，列宁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思想本身不能称之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诸多领袖人物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作过各种论述，其中不少思想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关内容，但这些论述本身不能称作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从1954年苏联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问世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建设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展，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生了实际作用，但是，这些"体系"还存在严重不足，或带有根本性的特点。1984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中共十三大、十三大五中、七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决定，对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发展起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作用，但这些决定连同有关理论、方针、政策不能说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建设。迄今为止，完整的、科学的、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客观过程本质必然联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还没有诞生，还在形成和发展中。这种状况的产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客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还很不成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处在幼年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人们的认识还常常停留在事物的表层，对纷繁的经济现象和人们的经济行为缺乏相关认识和实质了解，当然也还存在其它一些束缚人们思想创造和发展的历史的、政治的和环境的影响，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真正形成，恐怕不是一个短时期所能够实现的。

政企职责分开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是指明确国家行政机关与生产企业之间既有关联又各不相同的管理职责。中心点是要将原来掌握在国家行政机关手中的企业经营管理、指挥、调度等权力交给企业，使之具备充分的活力以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生产的需要。

中国的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社会大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受到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调节。旧的体制下，国家集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职能于一身，企业失去活力，市场机制被压抑到最小限度，因此使整个社会生产陷入僵化局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中来。日趋复杂的社会生产体系，再也不是国家机关单靠行政手段所能调节的了，政企职责分开，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也是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功能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在管理体制中的具体表现。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同样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国家在其建立的管理体制中应当采取变实物指数控制为主为价值指数控制为主，变直接管理为主为利用经济杠杆间接调控为主，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条件的同时要将企业经营所必要的各种权力下放给企业，使企业自觉地将经营的注意力放在市场上而不是放在如何满足上级行政机关的要求，在宏观上使计划调节借助市场机制得以实现，在微观上使市场在计划机制的控制下健康发展。

应当指出，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主体，代表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生活的同时，也具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对企业行为进行超经济干预，以保证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但这一职能应当是国家在特殊情况下的强制手段，并不能成为经济活动正常运转时的管理手段。与此相应，企业在特殊情况下接受国家和行政指挥也是社会主义企业应当具有的职能之一。

政策性亏损　指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属于国家政策规定所允许的亏损。国家由于某种特定的需要，规定企业生产经营以下产品可以有政策性亏损：①商业、粮食企业由于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商品进价大于销价、进销合同价中进销差价不足以支付合理的流转费而发生的亏损；②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经批准开采低品位、低热值、高灰分以及其它经济价值较低的矿产品和由于地质构造复杂，开采任务重等原因，矿产品的成本高于国家规定价格而出现的亏损；③生产某些农业资料的企业，生产初期，产品成本暂时高于国家规定价格而发生的亏损；④其它经国家批准的政策性亏损。政策性亏损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有政策性亏损的企业，有义务改善经营管理，降低产品成本，流通费用，努力减少亏损或扭亏为盈。政策性亏损是国家有计划管理经济的一种必要形式，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价格体系的不断完善，政策性亏损的范围要逐步地缩小。

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亦称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欧洲一些国家确立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走上历史舞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研究的合理成果，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学说，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转变。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和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合理成分和积极主张，但从根本上扬弃了它的糟粕和各种消极因素。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点在于：前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剩余价值规律是支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科学社会主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化的根本途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其基本经济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没有三大差别、没有阶级斗争、国家已经消亡、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科技进步综合纲要　经互会成员国1985～2000年科技合作的总规划。是《经互会成员国2000年前科学技术进步综合纲要》的简称。1985年12月，经互会第41次（非常）会议通过。该纲要提出的科技进步目标是：力争2000年苏联东欧国家在科技和生产方面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并为进入21世纪奠定最好的经济科技基础。《纲要》规定：15年内，各成员国要集中力量优先对现代高科技的五个关键领域进行攻关。即（1）集中力量研制第四代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及各种微型机、统一数控信息传递系统、光导纤维通讯设备、最新超大规模和超高速集成电路。（2）研制和采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工艺设备和流程装置、高精度测试技术设备。（3）建造高级核电站、研究核电站保险方法及快中

子反应堆等核动力装置。(4) 研制各种性能的新型合成材料、超导材料、超硬材料和工艺激光器等。(5) 发展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研制微生物农药、医用新型活性物质和药品、细菌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列入《纲要》的课题共有90多个。《纲要》还规定了各成员国应将其承担的义务纳入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及年度计划。各国必须保证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该《纲要》将在完善苏联东欧国家科技合作机制、提高高技术水平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科尔内的经济思想 亚诺什·科尔内是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经济研究所教授。他1929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61年，获匈牙利卡尔·马克思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年获匈牙利科学院科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过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会长和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还曾在美国、英国、瑞典等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并且是这些国家的科学院或经济学会的国外成员或名誉会员。他曾到中国进行考察和讲学。科尔内著述甚丰，尤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论著而闻名于世。1957年发表的《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一书，系统地描述和剖析了匈牙利当时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主张，从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对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遭受匈牙利当局错误批判后的一段时期内，科尔内主要转向数理经济学的研究。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匈牙利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空气逐渐得到恢复，科尔内又重新有机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投入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第一线。60年代后期，科尔内的理论创造进入了黄金时代，先后发表了《结构决策的数学规划》(1967年)、《反均衡论》(1971年)、《突进与和谐的增长》(1972年)、《短缺经济学》(1980年)、《非价格控制》(1981年)以及《短缺增长和效率》(1982年)等一系列著名理论著作。他所提出的许多分析意见和概念范畴为各国经济学家所广泛接受并得到普遍的采用。他所使用的实证性的描述方法也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经济学家的效法。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是科尔内对经济理论的最主要贡献。"引而不发"，是科尔内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

1.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

科尔内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抽象和总结描述的科学理论。经济学的一项新任务就是要客观地描述现行经济的运行状况，以克服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科尔内所描述的客观现实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特点。只有对传统体制的"正常状态"有了深刻的理解，才可能通过改革而使之向新的体制转变。科尔内指出，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就是在联合国改革前的经济运行状况。所谓"正常状态"也就是一种均衡状态。广义的均衡是指一个系统的状态可以由于自身的规律性而总是恢复原状，它所描述的一种客观现实，其本身不包括任何价值判断的意思。根据上述均衡理论，科尔内认为狭义的均衡(即瓦尔拉斯均衡)所描述的供求相符，既不存在超过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也不存在超过有效供给的有效需求，只是一个特例，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处于存在剩余(滞存)和挤压现象的，即供给大于需求的均衡轨道上，它的经济增长最终受需求的制约，是一种需求约束型经济；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处于存在短缺和吸纳现象的，即需求大于供给的均衡轨道上，它的经济增长最终受供给(资源)的制约，是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所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就必须抓住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短缺，这就如同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就必须抓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剩余一样。

2.企业的瞬时和短期调节行为

科尔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问题的根源在生产领域中，所以，企业行为研究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分析重点。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一种是没有价格条件下的调节，另一种是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调节。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前一种调节——非价格信号和非市场控制起着重要作用。企业根据各种外界的调节信号，可以使自己作出各种相应的反应。从时间和度上划分，企业的反应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瞬时调节，即企业对瞬时出现的情况不断作出适应性的反应。瞬时调节的条件是，企业生产计划、投入产出组合、固定资金存量以及资源和投入要素的存量都是既定的。

第二种类型是短期调节，即生产者计划对今后几个月预期情况的适应。短期调节的条件是固定资金既定不变。

第三种类型是长期调节，即生产者计划对今后几年的预期情况的适应。在长期调节中可以通过投资活动而改变固定资金。

企业在增加生产的过程中会遇到三种类型的约束，即资源的约束、需求的约束和预算的约束。资源约束的形式是：一切生产活动的第i种实际投入不可能大于第i种资源瞬时可用的数量。需求约束的形式是：第i种产品的销售不可能大于买者对既定价格下

第i种产品的需求，预算约束的形式是企业支出不可能大于企业货币存量和企业收入之和。资源约束是物质约束，它不可逾越，十分坚硬。需求和预算约束则不是物质约束而是行为的规律性，所以有可能被违背，即发生约束的软化。科尔内认为，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企业面临的约束是不同的。对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预算约束是硬的，需求约束几乎总是有效的，而资源约束很少有效。而对于传统社会主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的，资源约束几乎总是有效的，而需求约束很少有效。在以需求约束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每一种资源都存在滞存。所谓滞存，是指不能即刻利用的资源即剩余或储备。而在以资源约束为特点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各种资源的短缺。企业为适应短缺而进行的瞬时调节有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使产量与当前的"瓶颈"、即此刻最稀缺的资源相适应；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强制替代，即改变工艺，以其他类型或型号的投入品代替短缺的投入品，从而偏离最初规定的投入组合，强制替代的危害之一是使产品质量下降；第三种基本形式是根据现有投入而强制调节产出构成。这往往成为货物品种不全，不能与顾客需求相适应的一个原因。

企业的短期调节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季度或年度的总量生产计划的紧度。"计划的紧度是一个随机范畴。计划越紧，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企业碰到的资源约束，实行强制替代，以及被迫偏离计划的产出构成的可能性就越大。"在传统社会主义活动中，企业计划的确定总是要经过计划制定者（企业的上级机关）和执行者（企业）对计划指标的讨价运行。但最后确定的计划总是紧计划，而企业本身也有强烈要求扩大生产总量的现象——"数量冲动"。科尔内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各种数量冲动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而且直接反映在市场过程中。具体在存在普遍滞存的经济中，卖者排队等待买者，市场上就存在着挤压现象，即卖者都尽可能把产品推向市场。而在存在普遍的短缺的经济中，买者排队等待卖者，市场上就存在着吸纳现象，即买者尽可能把市场上的投入品吸到自己方面来。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在生产资料交换方面吸纳占优势。企业如果买不到原先想买的东西，如果它不愿强制替代，就只能继续在市场上搜寻。搜寻不到，就只得等待。等待的一种形式就是排队。而企业本身则具有囤积倾向，以造成越来越大的虚假需求，使短缺现象更为严重。不仅如此，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滞存和短缺是稳固地存在的，卖者见优势已成为一种正常状态，即处于一个持续偏离凡尔拉斯均衡的状态中。科尔内强调指出，短缺引起价格上升，但结构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减轻正常的短缺强度。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价格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必然是价格的稳定，而且，主管部门不是用财政和集中政策，而是用价格和工资政策来抵抗企业内部产生的"价格漂浮"倾向。

3.企业的长期调节行为

企业的长期发展首先依赖于投资，所以，企业的长期调节主要涉及投资资源的分配问题。科尔内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作为投资的要求者，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所以，存在一种长期的"投资饥渴"现象。企业对投资的永远不可满足的需求并不意味着投资要求是没有上限的，超过上限是不能被批准的。投资的分配者（国家计划部门）与要求者（企业）之间，必然出现投资的讨价还价。每个要求者都一再声称自己的投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投资要求者往往把申请一笔投资作为今后不断申请追加投资的一种策略手段。因为开拓要求一笔较少的投资额而使项目开工，以后则不断以种种理由要求上级对已开始的投资追加投资额。加之其他种种复杂和意外的情况，投入总是经常地和大量地超出计划水平。所以，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投资过程机制必然导致投资紧张。科尔内认为，投资紧张包括这样三种现象：（1）投资要求者和投资额之间存在着紧张，即在正式审批投资项目的过程中，投资总要求总是大于规定的投资额。（2）投资计划很紧，即许多已批准的投资项目，不能靠计划的投入——产出组合、按照计划程序进行。（3）在初始需求和实际可得到的物质资源之间存在着紧张，即生产和销售投资品以及提供服务的企业，不能提供实际供给的充分满足投资项目已被正式批准的企业和营利机构的初始需求。不仅如此，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紧张被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一方面短缺导致投资紧张，因为短缺感是扩张冲动和与此相联系的投资饥渴的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投资极为紧张又导致进一步的短缺，因为，投资饥渴不可满足，就产生了不可满足的需要，需求一直扩展到投资极为紧张的程度，而投资紧张，就感觉到需要把资源从其他领域转入投资领域，从而加剧了普遍的短缺。

在投资紧张和短缺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过程中，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扩张冲动在客观上总会遇到限制，投资的增加总会达到一定的社会容忍限度，所以，投资活动表现为一种周期性波动。

科尔内指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选择和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价格的反应减少，而主要只是数量控制过程。因为，投资既然是一种不需要担风险的赠品，所以，把投资资源分配给哪一些要求者，就不必依据用现行或预期的价格来计算的盈利标准，而主要只依据非价格标准了。更何况，在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格本身就是相当扭曲的。其结果，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投资并未流向急需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却流向了那些对计划制订者或投资分配者能施加最大压力或影响的企业或非营利机构。这样形成的投资结构，往往会造成某些部门的产出长期严重短缺，而另一些部门则存在较多滞存。所以，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存在普遍的短缺，而且短缺总是与滞存并存着。

4.消费基金膨胀和消费品短缺

科尔内指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虽然限制企业开支总额的总预算约束很软，但对工资的预算约束却很硬。但是，国家对于工资的严格控制并不意味着企业和工人对工资水平的确定完全只是被动的。相反，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自下而上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或工资漂浮是一种基本的倾向。

无论工资的水平如何，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总货币收入总是既定的，所以，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但是，许多消费品是通过行政配给方式免费或几乎免费供应的。对这些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往往是永远不能充分满足的，所以，在这方面存在长期短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住房。同时，现实经济生活中无不存在着消费者和企业及各非营利机构间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是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而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它们可以容忍较高的价格，从而对消费品产生一种强大的虹吸效应，把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大量地从消费品市场上吸收过去，造成消费市场的短缺。科尔内认为，短缺不是一国经济落后的结果，短缺经济可以存在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和产出水平都高的地方。反过来，较高的实际消费水平也不能消除短缺。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的消费者，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排队，搜寻、等待，和粗鲁的售货员打交道，人们不仅要承受不能得到物品的消费损失，而且还要经常忍受卖者的漫不经心和粗暴无礼，这些都不会使消费者因为认识到消费水平已经年复一年的提高而得到安慰。短缺不是产生于实际物流的不足，而是产生于需求的过度增长。科尔内强调指出，由于对投入品价格提高的反应不敏感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可以不顾价格的增长，所以，提高价格以至通货膨胀都无助于消除短缺。

5.短缺的原因和改革的方向

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之一，生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人，每时每刻都可以感受到短缺的存在。科尔内认为，产生短缺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企业具有强烈的数量冲动和无限的扩张冲动，造成了不可遏制的投资饥渴。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使企业自动限制投资，遏制投资饥渴的经济机制。增加投资可以获得好处，而无需承担相应的风险，从来不必担心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关键在于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造成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对企业的"父爱主义"关系。科尔内把"父爱主义"分为五个程度等级：程度0为自立——无助，即企业完全靠自己，国家不给予任何帮助和保护；程度1为自立——有助，即企业基本靠自己，自负盈亏，但遇到困难时，国家给予一定帮助和保护；程度2为货币津贴，即企业可以讨价还价从国家那里获得经常的帮助和保护，但企业经营活动基本上是独立的；程度3为实物信号——主动表示愿望，即企业通过向国家要求，有时也要"讨价还价"，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各种东西；程度4为实物给予——被动接受，即企业经营完全依赖于国家，企业不必向国家提出要求，而只需被动地从国家那里接受国家给予的一切。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和国家间的父爱主义程度达到了程度3和程度4。这是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其结果必然是持久的短缺。

科尔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现象是可以改变的。要彻底消除短缺，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国家和企业间的"父爱主义"，使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赋予企业以真正的自主权，改变"一切都由国家兜着"或最终仍由国家承担企业经营的风险和亏损后果的状况。科尔内提出：计划的重点应该从微观调节移到宏观改变手段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他认为在很多领域中，用市场机制代替行政调节还是利大于弊的，应该尽可能缩减行政协调的范围而尽力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科尔内坦率地说：作为改革的建议者，他倾向于较激进的改革，希望改革朝着彻底割断企业和国家间的垂直依赖关系、减少官僚主义的行政干预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者，他不敢对改革的前景持过高的热望。

6.短缺条件下的经济增长

科尔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是对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的直接延伸和重要补充。其增长模型具体由26个变量和26个方程组成。其中，11个方程描述实际领域，15个描述控制领域。实际领域的11个方程描述了库存、投资、就业、生产率、劳动力供求以及短缺等等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15个控制方程则描述了各种控制变量的常规值和起反馈作用的信号的正常值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10个方程）。并描述各种变量（例如，投资量、产量、购买等）。科尔内指出，模型中最基本的变量有六个，即产出库存、投入库存，同始投资量、企业购买、家庭购买以及实际短缺与它们的正常的离差$\overline{Z}=Z-Z^*$。以这六个变量建立六个方程可以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概要模型"。

在科尔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中，他始终应用了"存量——流量"分析方法，既描述了现实领域，也描述了指导现实过程的控制领域。所谓现实领域，是指经济运行中的实物过程，包括生产、投资、交换和消费的一系列实际过程，而控制领域则是指经济运行中的智力过程，包括信息的观测、传递和加工，以及决策的准备和形成等一系列控制过程。科尔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中，对现实领域的描述主要反映经济增长过程的一般性质，而对控制领域的描述则主要反映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制度特征。其中，短缺起着中心作用，所以，科尔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就是一个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资源约束经济的宏观动态模型。

其主要著作有：《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结构决策的数学规划》、《反均衡论》、《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短缺经济学》、《非价格控制》、《短缺、增长和效率》等。

"洋跃进"　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到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别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饱经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工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又一次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1977 年 1 月，国务院转发《关于 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到 1980 年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同年 2 月又提出了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1976—1985 年）规划纲要，规定 1985 年粮食产量达到 8000 亿斤，钢产量要达到 6000 万吨。为了实现这样的规划，在农村继续推广"大寨经验"、"普及大寨县"；在城市则继续搞"大干快上"。与此同时，大量举借外债和引进全套设备。仅 1978 年一年，就与外国签订了 22 个重大引进项目，金额达 78 亿美元。由于形成新的跃进形势和实现十年规划的基点放在了外国力量的基础之上，"洋跃进"一语由此得名。

战时共产主义　苏联在 1918 年到 1920 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一种战时经济政策，亦称"军事共产主义"。这是在特殊经济政治环境下采取的特殊经济措施，其主要特征是：1）不仅对大型工业企业，而且对中小工业企业也一律实行国有化，并由苏维埃政权实行严格监督；2）国民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国家对工矿企业采用实物供给制，生产资料由国家无偿供应，产品全部发给国家，由国家直接分配；3）日用消费品配售制度（有一部分供应实行免费），禁止私人贸易；4）实行余粮收集制，把农民的余粮全部征收到国家手中，由政府垄断粮食贸易，禁止私人交易；5）实行普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上述措施，对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赢得战争胜利，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重大作用。列宁肯定了这种作用，但同时认为这种政策是被迫实行的临时办法。1921 年以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为新经济政策。

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　由城镇劳动群众自筹资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城镇集体经济一般具有资金少、经营灵活、吸收劳动力多等特点，是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城镇集体经济广泛存在于城市工业、商业、服务业及其他领域之中。城镇集体经济的来源主要有二部分：一部分是由原先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经过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转化而来，另一部分是由待业青年或闲散人员自筹资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之上组合而成，大量的是由大型工矿企业、市、区、街道等地方政府筹措资金并吸收劳动力组织起来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所谓"大集体"，不是指生产规模大，而是指隶属于市、区一级政府行政管辖的集体经济。"大集体"在管理体制上通常移植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管理方法，而在经济、社会、政治待遇上却又逊于全民企业一等。所谓"小集体"不是指生产规模小，而是指隶属于街道管辖的集体经济。"小集体"通常是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集体经济组织。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大集体"的国营企业色彩逐渐淡化，已经开始恢复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本来面目。

城市经济中心　指在特定区域内自然形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高度集中的并能通过其经济活动对周围地区产生较强影响的地方，经济中心的形成必然要依托于城市的建立，这是由城市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①先进性。城市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聚集地；②商品性。城市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③聚集性；④高效性；⑤开放性。城市经济中心按功能的多寡可分为综合经济中心和专业经济中心；按影响和作用的范围大小可分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区域性经济中心和地区性经济中心。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经济发展的经济网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城市经济的辐射力　与城市聚集力的方向和作用相反的一种经济力量。城市是分工的产物，分工不仅

表现在城市内部的分工，而且表现为整个社会的分工。城市的经济活动越出行政区域划分的界限与其它城市和地区发生广泛的联系就是城市经济的辐射性。它表现为城市的商品、货物、资金、人才、信息向外界的输出而形成扩散型客体流。城市的开放性决定了它在运动过程中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相互的，又由于城市是经济、技术、信息、人才、文化的集中地，所以在对外进行交流时就呈现出由高密度地向低密度地的辐射性。辐射是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缩小城市乡村差别的的重要途径。

城市经济聚集力 城市特有的一种经济力，其作用类似于磁石的吸引力，使客体从某城市以外的其它地区向该城市进行聚集运动，形成定向的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以满足城市运转和发展的需要。城市经济产生聚集力是因为聚集在一定条件下能带来巨大的外在经济效益，即规模效益。这种效益以其特有的凝聚力促进着城市的运行和发展。聚集力与城市的规模成正比。一般说，城市规模越大它所具有的吸引力就越大，反之就小。

城镇待业青年 指在中国城镇内具有正式的城镇户口，年满16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无职业而到有关单位登记要求就业的青年。它不包括等待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技术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等。城镇待业青年是构成我国城镇待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尤其对城镇待业青年的就业给予很多优惠政策，使城镇青年的待业率大大降低。中国的城镇待业问题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一定时期内生产发展同劳动力增长之间的平衡状态引起的，不反映任何阶级剥削和压迫关系；后者则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

指令性计划 计划调节的一种形式。政府对经济进行直接计划管理的一种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计划指标带有强制的命令的性质，国家直接依靠行政权力保证它的实施，生产经营部门必须执行和完成。(参见本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指导性计划 计划调节的一种形式。政府对经济进行间接管理的一种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计划指标不带有强制的、命令的性质，它只供生产经营部门的参考，计划指标的发展不是依靠行政手段，而主要是依靠价格、税率、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参看本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指导性价格 国家物价部门依据价值规律并考虑一定时期的供求变化趋势所制定的具有指导作用的价格。它兼有不完全国家定价和不完全的生产经营者自主定价的特征，属于计划价格的性质。它是实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一种较好的价格形式。它符合商品的价格既要反映价值又要反映供求变化的要求，体现了灵活性和统一性的结合。指导性价格有以下几种具体形式：(1) 幅度浮动价格，由国家规定中准价和浮动幅度，由生产经营者在规定限度内自主定价。(2) 限制价格，由国家规定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由生产经营者在限定范围内自主定价。协议统一价格，由产地物价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工业、商业、外贸和农业等产需各方协商定价，在产地统一执行。(4) 衔接协商价格，由毗邻地区有关部门协商衔接，在毗邻地区执行的价格。指导性价格具有以下作用；(1) 有利于及时调节生产，对短线产品和长线产品可分别规定不同的限价和浮动价，调节供求关系。(2) 有利于促进商品流通。(3) 有利人们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来实现社会生产与需要的平衡。(4) 有利于商品生产者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管理水平。(5) 在某种程度上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6) 有利于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因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它将成为一种主要的价格形式。

重点户 着重从事某一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并兼营其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农户。重点户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许多原来的单一的种植粮食的农户开始从事多种经营，如养猪、养鸡或农副产品加工等，以后又把重点放在某一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上。这种农产品在其全部生产和经营的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般在60%左右，重点户与专业户的区别：①从其产品的比重上看，专业户生产的某项产品在其全部生产的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大大高于重点户，重点户一般要完成粮食生产任务，而专业户除粮食专业户外一般不承包粮食生产任务。②从生产来看，最初的专业户是专业承包的产物，而重点户则是在多种经营中发展起来的。二者联系在于：重点户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专业户。

重点建设 指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重点建设方针安排的建设项目。保证重点建设方针是在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时就提出来的。在当时，国家一方

面面临着要消除战争造成的创伤，进行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国家的财力、物力及人才严重不足。所以，国家只能分清主次，区别轻重缓急进行有重点的建设。事实上，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都必然存在着重点，重点一般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薄弱环节或能带动经济全局发展的行业或技术。重点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动的，重点建设项目是由国家根据全局的长远利益，经过综合平衡后确定的。重点项目一般是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如兴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大型厂矿等。由某个地方、某个部门、某些企业去兴办这些项目常常有许多困难，所以当国家选定重点后，组织重点建设时，必须适当集中全国的力量，由国家统一规划兴办。

统负盈亏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种分配关系。主要内容是：在国家对企业实行全面集中管理的条件下，企业收入在扣除了国家规定的成本项目后，全部纯收入以利润和税金的形式上缴国家，如发生亏损，也由国家补贴。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在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秩序混乱，同时面临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下曾对国民经济速度稳定和走上发展轨道起到良好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制度的稳定以及国际环境的改善，这种"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模式所固有的弱点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提高的桎梏。其主要表现为：企业作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政企职责不分，利益机制淡化，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严重影响企业和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由于忽视商品生产，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生产中无视经济效益，不思改善管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企业经营失去活力。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使国营企业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目前进行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已将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改为：企业依法纳税，税后留利归企业按国家政策使用支配，除个别确属政策性亏损企业外，亏损自负。这一分配形式被认为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自负盈亏，在"国家所有，企业经营"、"国家所有，承包经营"、"国家所有，租赁经营"等企业管理模式中实行。

信贷平衡 即信贷收支平衡，是指信贷资金来源和信贷资金运用保持相协调的对应关系，是指在市场货币流通量同商品流通需要量相适应的前提条件下，信贷资金收支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是平衡的。信贷收支的总量平衡，是指银行的自有信贷资金，加上非现金货币必要量（即存款的必要量），再加上市场流通的货币必要量三者之和，即银行正常必要的信贷资金来源总量，同银行信贷资金运用（各项贷款加上其他信贷资金占用量）总量的平衡。信贷收支的结构平衡，是指短期信贷资金来源要同短期信贷资金运用相适应，长期信贷资金来源要同长期性的资金运用相适应。此外，还包括根据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不同，确定不同的信贷种类，以及这些产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产品之间的信贷结构平衡。

信贷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服从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而且又直接制约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如果信贷收支总量和结构都平衡了，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量就相适应。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就基本平衡。因此，实现信贷收支平衡，对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信托业务 凭信用接受他人委托经营代办业务的一种经济行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信用关系的发展壮大使由原来的无偿服务逐渐变为有偿，进而发展成为专门从事信托业务的机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信托公司、银行的信托部等都是从事信托业务的专门机构，它们一般从事对社会的代办投资，代发证券和股票，业务咨询等。对个人的有代管财产，代管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执行遗嘱，管理遗产等。我国解放后除旧货寄售、经营处理品的信托业务外，其它信托业务都基本停办。从 1979 年以后，又陆续开展了一些信托业务。

这些从事信托业务的单位主要是国家银行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信托公司。现阶段开展的信托业务主要有财产信托、租赁、代理、代保管、担保和咨询等。

信用卡 银行或者专门机构对具有一定信用的消费者所发行的一种信贷凭证。持卡人可以凭卡在当地或外地的指定商店或旅店等单位赊购商品或支付劳务费，并在购买帐单上签字确认。事后由有关赊销单位凭帐单向发卡单位收帐。银行垫支到一定数额后，凭帐单向持卡人收取赊款及其利息。持卡人还可向发卡单位透支小额现金。信用卡有与支票联用的保证卡和单独使用的信用卡。在前者的情况下，银行把信用卡和有限定金额的支票同时发给持卡人，持卡人在赊购商品或劳务时要有支票作保证，超过支票限定金额的部分，不能赊购。在后者的情况下，银行只把信用卡发给持卡人，持卡人赊购商品或劳务时，不要支票作担保。这种信用卡被世界各地广泛采用，发展迅速。

信用卡的出现和使用是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高速发展的产物。它有利于促进商品流通，给消费者带来方便，对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都有一定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陆续有机构发放了信用卡。

信用膨胀 由于信用扩张，所提供的通货供应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通货需要量而造成通货膨胀的经济现象。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尤其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交易中，通货包括了现金、支票、信用卡、经银行承兑或贴现可以作为贷款使用的商业票据、据以签发支票的活期存款以及可以随时提取的定期存款。这其中，现金并不占主要部分。所有这些仍为支付、购买或流通手段的通货都是由信用渠道投放到市场上去的。因此，信用的过度扩张，使投放的通货量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时就造成信用膨胀，进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一般说，信用膨胀是指银行信用膨胀。因为，无论是商业信用膨胀、消费信用膨胀还是国家信用膨胀，只有在银行信用的支持下才能得以发生。商业银行信用膨胀表现为过多地签发商业票据，而商业票据要经过银行的承兑或贴现才能发挥信用货币的作用。消费信用膨胀则是过多地运用分期付款和发放信用卡，而这些也是靠银行给买方提供信用来实现的。国家信用膨胀，如滥发公债，在西方它也不是直接吸收社会的闲置资金，而主要是由银行承购并在政府的帐户上记一笔相应的存款（派生存款）。政府需要时，开支票来支取使用。即使是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的纸币，也是通过向银行透支这一信用膨胀的渠道投放出去的。就银行本身作用来说，它之所以有可能过多地发放贷款，形成信用膨胀，主要是靠派生存款的增长来平衡信贷收支的。发行银行（通常为中央银行）也可通过增发货币来取得信贷收支平衡。信用膨胀的实质也就是通货膨胀。一般说，信用膨胀是构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但因二者交织在一起，有时会发生互为因果的情况。在现代银行制度中，商业银行须按规定比例向中央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同时也可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通常是，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的帐户上记一笔相应的存款，即派生存款。商业银行就可以从中央银行支取而转为给企业贷款。一笔贷款，相应的就转化为一笔存款，随着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增加，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也就不断地增加，商业银行又可用来增放贷款，从而导致信用膨胀。在商业银行的信贷收支平衡表上，作为信贷来源的自有资金加上各种存款（包括派生存款）同信贷资金的运用是恒等的；在中央银行方面，构成信贷资金来源的自存资金，各种存款（含派生存款）及货币发行数同信贷资金的运用也是恒等的。从而，在帐面上就显示不出信用膨胀。但是，通过信用膨胀提供过多的通货所导致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则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在可兑现的银行券流通的情况下，信用膨胀程度还受可兑换的金属铸币的限制，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信用膨胀就不再有什么限制了。本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袭击下，纷纷放弃金本位制，普遍采用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政策，试图克服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作为"反危机"的重大措施，以刺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做到使银行贷款的发放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不存在产生信用膨胀的必然性，但并非没有可能性。如果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同样会发生信用膨胀。

信贷杠杆 银行用来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和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种经济手段。是国家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一种形式。银行通过运用贷与不贷、贷的多少，贷期长短及利率的高低等的决定权，对生产和流通施加影响，进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在我国，这种调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微观调节，即通过贷款在不同企业间的分配和差别利息率，区别对待，择优扶植，促使企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并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生产和经营；二是宏观调节，即通过贷款在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和差别利率，压缩长线产品的生产，确保短线产品的发展，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的比例关系，优化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信贷杠杆的运用实质上就是在经济上造成某种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以达到某种预期的目的。由于它直接影响到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就促使生产者和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和经营状况，为企业提供一种内在动力，对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方向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信贷杠杆的运用也有失效的时候，尤其是当企业贷款失去利益约束的情况下，调节就可能失灵。

信息产业 进行信息的整理、加工、贮存传导和提供信息服务的行业。信息产业一般包括：信息软件业，信息处理服务业和信息提供业等。信息产业多属知识密集型产业。随着现代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信息产业的发展已引起了产品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信息产业的各种产品如电子计算机、光纤通讯设备、机器人、数控机床、语言处理机、自动照像机、遥控遥感设备等在工业产品构成中的比重大幅度地上升。据统计，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到70年代，美国西欧等国、从事信息产业领域的人数已超过其它行业，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产业必将使社会生产和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有的经济学家主张把信息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第四产业。

信贷资金约束软化　指的是银行的信贷条件松弛，即使企业不能完全保证具有以其销售收入如期归还贷款的能力，也仍然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的一种现象。企业在增加生产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约束，如资源约束、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等。企业在一定时期里的总收入及货币存量之和，就构成了对该时间内企业总支出的约束，即预算约束。信贷资金的约束即指这种预算约束。企业的总收入中包括有企业获取的信用贷款，如果贷款者（银行等）只是在企业完全能够担保以其销售收入偿还贷款时，才发给该企业贷款，而企业要严格履行贷款协议，如期还本付息，那么这种信贷资金的约束就是"硬"的；反之，如果贷款者在企业不能保证具有以其销售收入如期还本付息时仍然发放给其贷款，企业以拖欠贷款的方式弥补自己的亏损，那么，这种信贷资金的约束就是"软"的，或是说"软化"了。信贷资金约束软化这一概念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和使用的，现在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接受和使用。

建议价格　上级主管部门对于所属下级部门定价的商品提出的建议性价格。建议价格是指导性价格，属指导性计划范畴。其目的在于：保护上级定价商品和下级定价商品之间的合理比价，平衡各地商品之间的地区差价。建议价格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下级主管部门可以按建议价格定价，也可以在建议价格上下定价。制定合理的建议价格有利于下级机关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政策要求，灵活掌握定价标准和浮动幅度，有利于各种商品比价、差价平衡衔接。

结关　由货物、行李物品、运输工具等所有人或代理人，依法办完海关进口或出口手续，海关准予进出国境，结束对进出口对象的监管。进出口货品的结关，要求办完纳税或免税手续，由海关在进口提货单或出口提货单上加盖放行章，报关人据以向仓库提货或托运。进出口运输工具的结关，要求在完成装卸货物后，向海关送交离境报告单，由海关发给批准离境证件。

退关　出口货物经海关放行后，因故不能装运出口，由所有人或代理人向海关办理中止出口手续。在办理退运手续时，先由报关人提出申请，运输工具负责人在装货单和出口货物清单上批准退关后由报关人向海关申报办理有关手续。

流动资金金额信贷　简称金额信贷。指国营企业定额内外的流动资金统一由银行以信贷方式供应和管理的制度。1959～1961年6月，我国曾实行过这制度。把原国家拨给企业的流动资金转到银行作为信贷基金，需增拨的流动资金也拨作银行信贷基金。企业按国家核定的流动资金定额减去定额负债额后，向银行申请定额借款，并支付利息。由于当时"大跃进"中银行信贷工作只讲服务不讲监督使用，使贷款失去控制，企业也不按规定使用，使国家资金蒙受严重的损失。实际上虽名为贷款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从1961年7月1日起，重新实行定额内流动资金由国家财政拨给，银行只提供超定额贷款的制度。1979年，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又进行了金额信贷的试点工作。经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实行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的制度。从198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推广实行了这一制度。

挖潜、创新、改造　我国现有企业挖掘内部潜力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产品创新的简称。是指在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的情况下，通过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技术组织措施，充分利用和改进现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以达到增加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经济效益的一种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方法。挖潜是指采用各种生产技术和组织措施，把现有企业中尚未发挥出来的生产能力挖掘出来加以利用以扩大生产能力。创新是指对现有产品、设备、工艺、操作技术等进行新的改进和提高。改造就是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对现有技术装备进行改造，使企业的生产技术有重大的提高和突破。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颁布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中明确规定"所有工业和交通企业都要立足现有基础，把挖潜、创新、改造作为工业发展的首要途径"，并指出"今后新增生产能力，除为了改变布局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建设新厂外，都要在现有的企业上做文章。首先是挖潜、革新，必要时进行改扩建"。

适度人口　一定空间范围内能够带来最大社会效益和最大经济效益的最适宜的人口数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达最大值的人口数量为理想的适度人口数量。客观上人口和物质资料生产（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全部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存在着一个同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人口数量。超过这个适度的数量或达不到这个适度数量都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人口越多越好"已被实践证明是片面和错误的,"人口越少越好"也是站不住脚的,只有适度人口才能促进生产的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适度消费 适合于本国国情及个人收入水平的一种消费水平。从宏观角度看,只要国民消费与本国资源的开发利用结构相适应,或者虽不相一致但本国有能力通过进出口调剂而又不影响国家外汇资金积累,就属于适度消费。从微观角度看:个人或家庭能够做到量入为出,并保持收支平衡,这就是适度消费。个人、家庭间的举债都属于非适度消费。但只要在一定的许可时间内,具有偿还能力的个人、家庭举债也属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水平要和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合理的消费方式相适应。消费过度(或叫超前消费)或消费不足都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一国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消费模式要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不同的阶段来选择。

适应农业 以适应自然为主,改造自然为辅的农业生产方式。其内容包括:(1)对于农业生产上的障碍性因素,主要采取调整生产结构的措施,建立适应本地区自然条件的最优农业生产体制。比如,在黄土高原建立以牧业为主体的"牧林农"混合模式;在半干旱高原发展旱地作物和旱地耕作法;在大山区建立以林为主的"林牧农"混合模式;在易涝地区建立以水体农业为主的"农渔牧"混合模式等。(2)对于常年性自然灾害,采取以避灾为主,抗灾为辅,生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的方针。我们的祖先,在长期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当中,创造了许多适应性的耕作制度和生物措施,如多旱地区的"阴畦",多雨地区的"高牍",山区的"等高种植",湖区的深水栽培等,这些都是发展适应农业的宝贵遗产。适应农业是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它将逐步向生态农业阶段过渡。

柔性制造系统 亦称柔性生产线(英文简写为FMS)。由统一的信息控制系统、物料储运系统和一组数字控制的加工设备(如电子计算机、机器人和数控机床等)组成,能适应加工对象变换的全自动化的机械制造系统。它按照成组加工对象来确定工艺过程,选择相应的数控加工设备和工件、工具等物料储运系统,并由计算机进行控制,能自动调整、实现一定范围内多种工件的成批和高效生产。这种系统兼有加工制造和部分生产管理两种职能,因此能综合提高生产效益。柔性制造系统的工艺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可以进行毛坯、制造、机械加工、装配和质量检验等。8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的FMS大都用于切削加工,也有用于冲压和焊接的。FMS1967年首次出现于英国和美国。初期的柔性自动化设备在形式上与传统的自动生产线相似,所以叫柔性生产线(简写为FML)。1976年,日本展出了由加工中心和工业机器人组成的柔性制造单元(简写FMC),为发展FMS提供了重要的设备形式。由于柔性制造系统具有许多优点,它的发展十分迅速,现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提高中小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除本分成制 亦称净产值分成制。是我国集体所有制企业试行的一种新型分配制度,其基本作法是:将企业的销售收入扣除工资以外的多项成本支出和各项缴纳之后,剩余额按分级超额累进(退)分成比例在企业和职工之间分成。企业所得部分主要用于上缴所得税。上缴合作事业基金和留成利润,职工分得部分为工资总额,这是第一次的按劳分配。然后,企业把工资总额按职工个人所得工分进行差额分配,这是第二次按劳分配。这一分配办法最早(1981年初)由四川省成都西城区工业二局首创试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之后,这种分配制度逐步推广到湖北、河北、南京、黑龙江等省市。这种制度与固定工资制的差别在于:它不是在产品销售之前用流动资金来预付,而是在产品实现了价值以后从销售收入中支付,其实质是一种效益工资制。它对于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持久比例准则 以上年度投资额为依据和标准进行本年度投资额分配的一种投资分配原则。这是匈牙利科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分析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投资行为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持久比例准则的基本内容是:每一个要求投资的单位都应得到与上年度投资额相等的份额。它的优点就在于简单和便利。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习惯和行为,投资分配者和投资要求者都习惯于这种依靠简单的经验估算法所作出的决定。持久比例准则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使比例僵化,增加了长期调节的困难。一旦投资份额分配完毕,想要把计划外的、原来的投资要求安排进去就十分困难,已获准投资的单位要获得比往年大的投资额也不容易。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价值平衡 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一个方面。指的是价值形态的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表现为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表现为市场上错综复杂的商品货币运动。在这里,人们对社会劳动量也必然是从价

值形态去把握，社会对社会劳动量的需求也必然是价值形态的需求。因此，社会经济活动的平衡首先表现为价值形态的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价值平衡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实物平衡的关键；是保证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与消费资料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也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首先要做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价值平衡。〔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实物平衡〕

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物平衡　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的一个方面。指的是物质形态的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表现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社会总产品的供求平衡以价值形态来表示，其平衡公式为：

社会产品国内可供量＝社会产品最终使用量＝社会产品生产量+进口额−出口额

要以实物形态来反映产品的供需平衡，由于各不同实物之间无法进行累加，所以就只能选择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来具体分析它们的供需平衡。生产资料供需平衡是指进入流通领域的生产资料总体及其主要品种的供应量应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及生产者个人对生产资料需要量（用生产资料购买力表示）之间的平衡，是全社会生产资料的供需平衡。它是物力平衡的关键部分。消费资料供需平衡是指进入流通领域的消费资料总体及其主要品种的供应量与城乡居民、社会集团对消费资料需要量（用消费品购买力表示）之间的平衡，是全社会消费资料的供需平衡。它是物力平衡的重要部分。全社会做到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需平衡，就可以做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实物平衡。在产品经济条件下，更多的是强调实物平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要求实物平衡。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实物平衡，是人力平衡、财力平衡的物质基础；是确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各部门比例的重要依据，保证按劳分配的实现的重要条件；有利于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有利于合理组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提高经济效益。

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物平衡与价值平衡的统一　社会总产品是社会总产值的物质承担者，社会总产值是社会总产品的货币表现形式，二者是相互对应和一致的，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对社会经济总量进行考察，实现了实物平衡也就意味着价值的平衡，实现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价值平衡也必然要求实物的平衡，因此，二者是统一于国民经济总量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这一过程中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价值平衡推动实物平衡，价值平衡促进实物平衡，价值形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搞不好，实物平衡就难以实现。但是侧重价值平衡，并非不要实物平衡。它是通过价值平衡引导实物平衡来实现实物平衡的，从而达到国民经济协调、按比例运行的目的。脱离开实物平衡，单纯强调价值平衡，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分析就失去了意义。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　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一个层次。是社会生产和需求在数量上的均衡、对等和适应。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表现为实物形态的商品运动和价值形态的货币运动两个方面。从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关系来看，资金流向引导物资流向。因此，商品经济中的总量平衡表现为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货币支出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同各生产要素提供的用货币表示的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量的平衡。在社会主义国家，总量平衡指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和通常以社会总产品为代表的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综合反映国家资金活动的计划，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社会的资金来源与资金的全貌，通过该计划，对社会资金的运动进行引导和控制，保证资金的收支平衡。资金的基础是物资，资金的收支平衡最终要表现在物资供求平衡。总量平衡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由于种种原因，经济中会发生总量不平衡现象。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失衡　是社会主义经济失衡的一种形式。指的是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总量不平衡而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现象。总量失衡，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出现了足以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缺口，它有两种表现：1.社会总供给过剩或社会总需求不足，从而造成企业产品销售困难，实际存货水平上升，就业水平下降。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没有增长或只有少量的增长，甚至下降。即造成经济停滞。2.社会总供给不足或社会总需求过大。从而造成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商品脱销，或供应紧张，乃至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造成大的震荡和冲击。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自身的矛盾运动，即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分开、分别独立的运动而造成的。由于使用价值和价值运动各自经过的环节、影响因素最后在市场上及交换过程中，很可能数量不等。从而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平衡　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一个层次。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国民经济各方面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一

个部门都不能脱离与之相关的其它部门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在经济学中，把国民经济有机体中的各个方面、环节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之为经济结构，用以表示国民经济由哪些部门和环节构成，又怎样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结构平衡指的就是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最符合战略指导思想的方式排列组合。既能发挥各自的长处，又能相辅相成，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较大的内在发展力量。结构平衡的实质就是商品物资及劳务的需求结构与商品物资及劳务的供给结构一一相对应，价值数量上相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平衡的主体和基础，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的结构和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力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与总量平衡相比，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平衡是一个更为困难的任务。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管理中，结构调节并不占重要地位，宏观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促进企业结构管理化，进行结构调整主要依靠市场经济中平均利润规律这个自动调节机制。然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绝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价格、投资、财政、金融等体制还有待完善、市场发育程度低，平均利润规律几乎不起多大作用。故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合理产业结构的建立和调整要靠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要有国家的宏观管理才能不断促进结构的合理化，保持各种宏观经济结构的平衡。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社会主义经济失衡的一种形式。指的是由于国民经济中部门结构不协调，而生产生产资料部门和生产消费资料部门之间出现了若干主要产品（或关键产品）的需求与供给比例不适当而影响社会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现象。它有两种表现情况：1.某些关键性产品的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会造成这些产品的存货增加，超过市场所需的正常存货水平，从而使这些产品滞销的企业缩减产量，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引起那些生产与之有关的企业也缩减产量，于是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降，使社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2.当某些关键性产品的供给不足或需求过大时，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将带动其它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引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给经济造成震荡和冲击。国民经济中出现了结构性失衡，要进行调整就没有总量的调整容易。主要受国家的财力、物力等条件的限制，如我国当前出现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落后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受投资等限制，短期内难以拿出很多投资用于这方面的建设。即使有资金，也不可能很快奏效，还有一个建设“时间差”，另外，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还取决于价格、税收、金融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性平衡〕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并存 社会主义经济失衡的两种形式。在国民经济中，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失衡，它们可以单独发生，也有可能同时发生。当这两种失衡在国民经济中同时发生了，就是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并存。在社会经济中表现在：1.由总量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经济停滞和由结构方面原因所导致的经济停滞并存；2.由总量方面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与由结构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并存；3.由总量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停滞与由结构失衡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并存；4.由总量失衡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与由结构失衡所引起的经济停滞并存。总量失衡，结构必然失衡，但并非所有的结构失衡都是由总量引起的。同样，引起总量失衡的具体原因可能是由结构失衡造成的，也可能是由总量失衡直接引起的。国民经济中出现了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并存现象时，单靠市场机制是无法恢复平衡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助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恢复，但作用很有限，政府通过有效地利用价格、财政、金融、汇率等宏观调节手段配以其它必要的行政，法律手段的综合作用，才是消除国民经济失衡的重要保证。

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统一 是国民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重要特点和本质要求。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相互制约，总量平衡是结构平衡的前提。总量一旦失衡，必然引起结构秩序的紊乱。结构平衡是总量平衡的基础。结构不平衡，一般说，总量也难以维持真正的平衡。如在我国长期存在的“高投资、多积累、高速度”畸型运行机制下，往往是由投资领域供求严重失衡触发财政发行、信用膨胀、通货膨胀，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和总量失衡，所以，总量平衡最终必须落实到结构平衡上来，只有实现了包括结构平衡在内的总量平衡才能达到稳固的平衡。

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 按劳分配中存在的一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的权利，在按劳分配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以劳动为尺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是，由于劳动者的劳动不同，所赡养的人口不同，同一劳动尺度用于不同条件的劳动者，必然造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同。这就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因此，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只是这种

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权利，不体现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是在劳动者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消费品占有上的差别。这是一个"弊病"，但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还存在着旧的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以及三大差别的逐渐缩小，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实质上的平等"（《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才会由此消失。

十 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0年秋冬，针对"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实行的一种调整方针，简称"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旬，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从这时开始，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调整经济的目的，在于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采取的重要措施有：1）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克服无计划状态和分散主义。2）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使基本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3）上收一批下放不当的企业。4）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管理。5）收回一部分物资管理权，加强物资的统一管理。6）精减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增加农业第一线劳力，减少粮食征购量，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7）允许农村实行小段包工，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形式，个别地区出现了分田单干。8）破除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9）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10）调整价格。提高了粮食、生猪、蛋禽、油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了部分工业品主要是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敞开供应高价糕点、高价糖果以及高价自行车、手表、针织品等工业品和高级副食品。尽管在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但是，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调动了劳动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197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宗旨在于纠正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行改革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健康的发展。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经济问题，决定从1981年起，用较长的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要求真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贯彻八字方针所采取的基本措施有：1）国务院决定从1979年开始较大幅度提高十八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借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加速农业发展。2）1980年，中国共产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为特点的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进一步统一农村工作中一些主要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82、1983和1984年的1月，连续三年发布了关于农村政策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三个"一号文件"的下达，使中国农村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形势。3）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中国经济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二番。在"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中国人民为开创社会主义而迈上了新的征程。4）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内搞活、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从1979年开始，中国在深圳、汕头、珠海和厦门先后开辟了经济特区，并于1984年3月，进一步开放大连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5）1984年10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改革在全国展开。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各项政策的正确，经济调整的见效，改革开放的进行，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朝着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

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手段体系　为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按照既定的目标协调而稳定的发展所建立起的一套相互补充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主要由以下几种手段所组成：1.经济手段，指人们在利用经济规律过程中，采用与物质利益直接相联系的经济杠杆，如物价、税收、信贷等，以及国家直接掌管的财政资金、物资货币等手段来调节经济。经济手段是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是整个经济运行调节体系的中心，是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它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等特点，但也有作用过程缓慢、作用结果不确定性等缺点。2.行政手段：一般指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由国家政府制定，按行政隶属关系控制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政策、命令、规定、条例的总和。它具有直接性、权威性、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但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不当，违背经济规律，不利于搞活经济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3.法律手段，指国家通过立法和司法机构，制定法律、法令、条例等调控经济活动，调节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工具。法律手段具有强制性、明确性、规范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但只能解决一般性和经常性问题，缺乏必要的灵活性。4.思想教育手段。指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想、信念、意志、伦理道德和行为动机，从而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如果说，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调节的话，那么，思想教育手段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约束手段。各种调节手段各有其优缺点和相应的作用范围和效果，在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只有综合运用才能取得满意效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为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其它各种手段的调节体系，将是改革的主要方向。

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以后，由于物价趋于稳定，市场上虚假购买力消失了。因此，过去依靠投机发财的钱庄和商号纷纷停业和转业，多年来习惯于囤积居奇的私营工商业，普遍遇到了存货滞销和资金周转的困难。为此，政府从1950年6月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调整。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关系，有三个基本环节：①调整公私关系；②调整劳资关系；③调整产销关系。其中，重点是调整公私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国家用扩大加工订货的办法，以重点扶持那些社会需要的私营工业企业的生产，克服它们的无政府状态，并在原材料分配和其他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用扩大农产品收购、开展城乡交流和组织工业品出口等办法，开导工业品的销路；组织和联合公私力量，解决某些工业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同时，通过组织各种加工订货会议和采取劳动保护政策及管理企业盈余的分配，调整公私关系和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对于私营商业，政府一方面限制他们的投机活动，同时在价格（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和工农业范围方面给以活动余地，使私人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城乡交流、内外交流服务。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相比，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产值大约增长了54%；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大约增加了20%。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有利的作用。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见本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家庭副业　原指中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从事集体劳动以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包括耕种自留地，在宅旁养花种草植树，饲养家畜家禽，从事编织、刺绣等家庭手工业，以及渔猎、养蜂、养蚕、采集等。家庭副业的产品归个人所有，自由支配。家庭副业连同自留地经营均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发展家庭副业，对于调动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生产积极性，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增加个人收入有着重要意义。家庭副业就其实质而言，属于个体小私有经济性质。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农民商品意识的增强，家庭副业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家庭副业实际上成为承包户“家庭主业”的补充，它的活动空间也明显扩大。从广义上理解，家庭副业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是乡村农民，还是城市职工）在从事本职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所从事的某种生产经营活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者对生产的最终成果负责，并按实现的产量（或产值）获得劳动报酬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种形式。包产到户是生产队把生产任务包到户，即每户按人口、劳力的多少承包耕地和农作物产量，包产数以内的农产品交生产队按规定评记工分，参加队里的统一分配，超出包产数之外的产品收益归农户所得；包干到户，是生产队把耕地按每户的人口、劳力承包到户的同时，也把每户应完成的农业税和出售给国家的农产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每户应上缴给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等落实到户。农户的产品收益，除了完成上述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外，剩余部分全归农户所得。由于包产到户仍然是生产队

统一分配，实行工分制度，不但与分户经营存在矛盾，而且办法繁琐，仍有大锅饭的弊端，所以，包产到户虽然在改革初期广泛实行，但后来就逐步为包干到户所取代，1984年底，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已占全部农户的96.6%。

以包干到户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经营和劳动上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过去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生产瞎指挥和无人负责，以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弊端。这种以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形式，既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又能调动农民个人的积极性，适合当前中国农业生产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实际状况，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经营为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它和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①这种家庭经营是建立在土地、水利设施等基本农业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②国家通过农户与生产队签订的经济合同对农户的生产实行着计划指导；③农民要向生产队集体交纳公积金、公益金和干部补贴等提留。家庭承包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

浮动价格　浮动价格是由国家规定一定价格及其变动幅度，由企业在此幅度内灵活决定具体水平的价格形式，实际上它是由国家和企业共同决定的价格。浮动价格包括最高限价、最低限价和中准价三种形式。最高限价是规定了价格的最高限度和变动幅度，只允许向下浮动的价格；最低限价是规定了价格的最低限度和变动幅度，只允许向上浮动的价格；中准价是规定了基准价格和变动幅度，允许围绕基准价自由上下浮动的价格。

浮动价格从其性质上说属于计划价格的范畴。首先，实行浮动价格的商品，必须经国家批准；其次，实行浮动价格的商品，其基价也由国家统一制订；再次，浮动价格的浮动幅度也是由国家规定的。但浮动价格又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企业一定的订价权，使企业可以根据商品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在一定幅度内自行调整本企业产品的价格。因此，它既能使国家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通过计划的调节作用，防止价格的大涨大落，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又能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发挥，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给予企业一定程度内的经济动力和外部压力，是我国目前计划价格的基本形式。

积极平衡　指在综合平衡中，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使平衡资源的组织和需要的安排两个方面的指标既积极又可靠。"积极"的含义是指指标要定得相对先进，要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考虑进去，包括通过人们的努力而实现的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的因素。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因此，平衡指标又不能过高，超出客观条件的允许；采取的措施一定要落实可靠，确保能够经过努力而实现。因此，积极平衡是有别于那种不顾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不顾客观实际的约束，把指标定得很高，看似积极，但最后根本无法实现的所谓"积极平衡"的。只有从实际出发，平衡指标既先进又可行，采取的措施经过努力最终能够实现的积极可靠的平衡，才是真正的积极平衡。积极平衡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消极平衡　是相对于积极平衡而言的国民经济管理原则。凡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起着消极作用的平衡，都应视为消极平衡。它有两种具体表现：一种是思想保守，看不到各种有利因素，不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指标下得很低，使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放在低水平上，不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所谓平衡；另一种则貌似积极，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顾国民经济客观因素的制约，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指标定得过高，留有缺口，从而带来人、财、物的长期紧张，顾此失彼，互相冲击挤占，搞乱了国民经济计划，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结果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危害的所谓"积极平衡"。不论是哪种表现，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着破坏消极的作用，实际上都是消极平衡。

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　指积累和消费在社会主义国民收入中各自所占的份额。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积累主要是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而发展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积累和消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总量是一定的，用于积累的数量多了，用于消费的数量就会减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会慢些；反过来，用于消费的数量多了，积累就会减少，社会生产发展速度就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两者又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的比例关系，它所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它既关系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又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能否稳定高速发展。在计划工作中，安排消费时，要保证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低于前期的水平，这是消费的

最低界限，也是积累的最高界限；安排积累时，要保证已经达到的社会生产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降低，这是积累的最低限度，也是消费的最高界限。也就是说，要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防止积累过高和消费增长太快的片面性，尤其是要防止积累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

庭院经济 农民以自己的庭院为场所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内容是：农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和环境条件，在住宅基地范围内，以家庭院落为生产场所，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分散经营为特征，以专业分工为标志，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以家庭剩余劳动力为主体，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庭院经济主要是种植业和工副业。庭院经济具有以下的特点：(1) 经营多样性，产业涉及农、林、副、渔、工商饮食业等；(2) 生产分散性，庭院经济活动是在农户中进行的；(3) 生产转向灵活、规模小、转产速度快；(4) 成本低效益高，庭院经济多为手工劳动，系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应市场能力强，成本低、投资少，经济效益比较好。庭院经济具有很多优越性：①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形式，是农民致富的途径之一；②它能利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实行集约化经营；③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④庭院经济是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实行精耕细作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

双层经营 是把集体的统一经营和农户的分散经营结合起来的一种经营方式，农业经济活动中，日常的生产活动由农户完成，其他事关全局的经济活动由原有的集体单位来完成。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基本上确定了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对许多地区来说，这种确立是以原有经济模式中集体经济功能的消退为前提的。随着农村变革的不断深化，家庭经营暴露出种种弊端，如规模小，效益不高，对自然条件依赖大，扩大再生产资金不足，技术匮乏等，同时也解决不了农村经济中的全局问题，诸如分户包干后的各种农业生产服务需要，土地的承包方式及其选择、水源分配、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福利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借助于集体经济的职能。而集体经济的职能则主要是计划协调，进行必不可少的规划指导。双层经营打破了原来的集体经济模式，集中了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的优点，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

消费结构 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消费结构是一定时期内、一定社会的人们的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

消费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系统的重要部分，它在总体上可分为宏观消费结构和微观消费结构，前者指一个国家或整体社会的消费结构，后者指单个消费者或家庭的消费结构。

我国经济学界对消费结构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可分为：第一，按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不同层次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第二，按人们实际消费支出的不同方面分为吃、穿、住、用等。第三，按消费主体、消费活动的不同领域分为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等。西方经济学家对消费结构的分类，则常用以下几种：第一，按吃、穿、住、用分。第二，按消费品的耐用性分，在非耐用品中包括劳务。第三，按消费的社会功能分，分为生理的消费和社会的消费。第四，按消费结构水平分为饥寒型、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等。消费结构的变化反映消费水平的变化。

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很多。影响宏观消费结构的因素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增长速度、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价格变化、消费习惯和心理、民族特点、地理环境、流通环节、进出口贸易等。影响微观消费结构的因素主要是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有就业人数、就业者的工资水平、家庭人口数量等。

消费攀比 不同的消费者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等方面互相比较，试图赶上和超过别人的心理和行为。

消费攀比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消费者个人和家庭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单位之间。它有两种互相联系的比较明显的表现方式：一是力图使自己的消费和别人一样，对周围的消费者所拥有的高档消费品和时髦的消费方式，尽量仿效，力图赶上消费的新潮流。另一种是力图使自己在消费上和别人不一样，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等方面总是标新立异、超过别人、突出自己，以使自己显得比别人富有、优越。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日常的消费活动中，而且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婚丧嫁娶等活动中。

消费攀比现象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后果比较复杂。如果消费者有攀比的心理欲望，并且通过努力工作，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来获得更多的收入，以使攀比行为付诸实施，则这种攀比是无可指责的。如果消费者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盲目攀比，为追求高档消费品和时髦消费方式，以至债台高筑，减少家庭成员中老幼病残者必要的开支，造成家庭生活的矛盾和家庭生活质量的下降，甚至为此走上犯罪的道路，则是非常错误的。

从全社会来看，比较强的普遍的消费攀比对经济

的发展是不利的。首先，它会从社会心理方面支持平均主义分配政策，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促进生产的发展；其次，在各企业单位具有收入分配决策权的情况下，会导致各企业单位竞相增加消费基金，引起社会消费基金的膨胀。因此，在积极引导消费、帮助广大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同时，注意运用各种有效的经济杠杆和其它措施，合理地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避免盲目的消费攀比。

消费发展趋势 一定时期内，人民生活消费变化的倾向性和规律性。消费的发展趋势以生产发展趋势为基础，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有：①社会购买力水平及其增长速度；②消费品价格的变化；③市场商品供求变动情况；④产业结构的影响。从我国来看，我国的消费发展趋势是：①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生存资料的增长速度；②实物消费的比重将相对下降，劳务消费的比重趋于上升；③由于生理限制，吃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小，而穿、住、用的需求弹性极大，故吃的比重将逐步下降，穿、住、用的比重将逐步上升。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类型将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

消费资料市场 亦称生活资料市场，是生活消费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它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消费资料市场的商品不需要经过工业加工，就可以直接用于消费，为最终产品。购买者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因此，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手段。其特征主要有：(1) 购买者多。全社会人口都是它的顾客；(2) 购买者差异大。不仅有年龄、爱好的差异，还有民族、地区、性别之分；(3) 购买额小、次数多，变动频繁；(4) 大多数购买者没有认购商品的专门知识，属非专家购买；(5) 购买力流动性大。经营者在营销活动中要针对消费品市场的特点，在运用产品策略、订价策略、渠道策略及推销策略上都要适应这些特点的要求。

消费心理 指消费者在接触商品到购买商品满足需要的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活动。大体经历了感知、注意、兴趣、欲望、评价、决断、买后感受等阶段。消费者接触商品，先是通过感觉器官有所感知，进而对某种商品引起注意，并根据需要和情绪，对商品发生兴趣而产生购买欲望。接着对商品进行评价，如商品是否美观实用、价格是否合算、社会上是否流行以及是否符合使用者身份等的评价。通过评价，在一定的购买动机驱策下，作出购买决定，最后采取购买行动。购买商品以后，通过实际使用，重新考虑购买这种商品是否明智，商品效用是否满意，形成买后感受。它往往决定着消费者是否会重新购买或扩大购买。消费者的心理活动，主要表现在购买商品的心理需要动机，不同的消费者群，有不同的心理需要动机，掌握消费者心理活动过程及其心理需要动机的变化规律，了解顾客的愿望、要求和爱好，是商业企业做好商品推销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增加竞争能力的重要条件。

消费水平 一定社会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已经达到的水平和满足的程度。它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实际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劳务的质量和数量状况。

消费水平从量的方面反映人们的消费状况，它可以用实物指标和劳务指标来表示。如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吃、穿、住、用等项消费资料的数量；每人平均居住面积；每百户家庭平均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城镇居民每千人的饮食、服务、商业网点数；入学年龄中大、中小学的入学比率；医院中每一病床负担的人口数等。也可以用价值指标表示：社会总消费额和人均占有的价值消费额，每人年平均货币收入，购买力等。还应包括人民生活舒适、方便、安全程度，如社会环境的改善、平均寿命、社会安全保障以及闲暇时间。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有：(1) 国民收入总额及其增长速度。(2)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过高会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3) 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在国民收入和消费基金既定的条件下，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决定消费水平。(4) 物价水平、工资增长幅度低于物价上涨的幅度，会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

消费力 一定的社会生产满足消费者物质与文化需要的程度和能力。是消费者同消费资料（包括服务）两方面的统一和结合。

消费力从形态上可以分为：(1) 自然消费力，即消费者为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能力；(2) 有购买和支付能力的消费力，即消费者所具有的运用自己的货币收入购买商品和服务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3) 社会消费力、即消费者受整个社会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的支配所具有的消费能力；(4) 绝对消费力，指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能够满足现有消费人口的消费需要的能力，消费力从内容上包括：(1) 消费力实体，它由消费者、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三个因素构成；(2) 消费力三因素的结合比例和结构，三因素的比例合理、则消费力强，人均消费水平就高。消费

力组织得不合理，消费力则差，人均消费水平就低。

消费力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范畴，任何社会都存在消费力及其合理组织的问题，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由于生产关系的区别和组织管理水平的差别，消费力的构成和水平不同。要提高消费力，就要合理组织消费力的内部结构，努力发展生产，使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适度的比例。

消费率 消费基金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其公式为：$消费率=\frac{消费基金}{国民收入}\times 100\%$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率的高低主要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即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积累率的高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率的高低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成正比，与积累率的高低成反比。

资金市场 资金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互相接触，自由买卖各种金融工具或证券，实现资金的自由流动和有偿使用以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自由转移的场所。

在商品经济中，经常会出现有的单位或个人急需资金，同时有的单位或个人手头有富余资金的情况，他们之间必然会建立起信用和借贷关系。资金富余者作为债权人，资金不足者作为债务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融通资金，调剂余缺，直接融资方式即资金富余者以购入对方股票成债券等形式与资金不足者直接发生借贷关系；间接融资则是资金富余者通过各种金融媒介体与资金不足者发生关系。金融媒介体是指发行各种间接证券的金融机构，它们向资金富余者出售银行存款、金融机构股票和人寿保险单等间接证券，并将所得的资金进行放款和投资，购入资金不足者所发行的股票、债券、借款合同等证券。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需借助于各种金融工具或信用工具，这些工具在现代大都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发行和流通。为了保证这些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即可以转手买卖）和变现性（即随时可以转化为现款），就需要一个能够自由买卖各种金融工具的场所即资金市场。

资金市场通常可以分为：(1) 短期资金市场，以期限在一年以下的证券和金融工具进行交易活动，它具有偿还期限短、变现力强和风险较小等特点，近似于货币交易，故也可以称为货币市场；(2) 长期资金市场，以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证券和金融工具进行交易活动，也称为资本市场；(3) 外汇市场，以外汇作为交易对象。

资金利润率 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额与同期内所运用的资金额之比。包括全部资金利润率、固定资金利润率、定额流动资金利润率和国家资金利润率，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text{全部资金利润率}=\frac{\text{利润总额}}{\text{固定资金平均总值}+\text{定额流动资金平均占用额}}\times 100\%$$

$$\text{固定资金利润率}=\frac{\text{利润总额}}{\text{固定资金平均总值}}\times 100\%$$

$$\text{定额流动资金利润率}=\frac{\text{利润总额}}{\text{定额流动资金平均占用额}}\times 100\%$$

$$\text{国家资金利润率}=\frac{\text{利润总额}}{\text{国家资金平均总额}}\times 100\%$$

资金利润率反映企业运用全部资金、固定资金、定额流动资金、国家资金所取得的财务成果，并用来计算企业投资的回收年限。用资金利润率考核企业的经营成果，有利于促使企业节约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利润率，加速资金周转。但资金利润率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的生产类型和生产规模的影响，故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类型和生产规模大致相仿的企业间进行比较。

资金密集型产业 在生产的资源结构中，资金所占比重较大的产业。其特征是这种产业人均占有资金多，资金的有机构成较高，容纳的劳动力较少，投资周期一般较长。产业的资金密集程度可用资金与劳动力或资金与产量的比率来衡量。如石油、基本金属、化学等工业都属资金密集型产业，它在产业结构演进的工业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国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比重大小是衡量一国工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要以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以较为充裕的资金为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味追求资金密集型产业是不现实的和有害的，但在一定时期内有选择地发展一些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以推动国民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则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

瓶颈产业 在构成产业关联的产业系统中，不能适应其它产业发展的产业。产业与产业之间存在着投入产出的关系，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也是相互依存，互相衔接的，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应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即从原产品到最终产品这一生产序列中，只有保持相互适应的比例，产业之间才能正常运行。如果某产业或某些产业在产业部门序列中，出现了规模大小倒置即比例上不协调，某些产业的产品供给不能满足其它产业的需要，就说出现了供给瓶颈。如果这种产业的供给瓶颈长期存在，制约了其它产业的正常发展，就称之为瓶颈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冶金、建材、交通、通讯、能源等产业一直是属瓶颈产业，它影响和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消除这

些瓶颈产业的存在，我国已采取了多种措施，使之尽快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瓶颈产业的消除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瓶颈产业还可能出现，这就需要制定长期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尽量避免出现瓶颈产业。

预算外资金　在社会主义国家，指根据国家财政制度规定，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自收自支、自行管理的财政奖金。在我国包括：(1) 地方财政部门管理的各项附加收入和集中的有关资金，如工商税附加、农牧业税附加、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集中的县办企业利润留成、公产租赁收入等；(2) 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管理的各处专项资金，如折旧基金、职工福利基金、油田维护费、矿山开拓延伸费等；(3) 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所属不纳入预算的企业收入，如以煤代油能源发展基金、超产石油能源基金，以港养港收入，以电养电的小水电收入，预算外企业收入等。(4) 事业和行政单位管理的收入、勘察设计收入、育林基金、水库收入、市场管理收入、园林管理收入、招待所收入、房产管理收入、中小学学杂费收入等。预算外资金是国家预算资金的必要补充，它对调动各地方、各部门管理财政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举办一些必要的事业，解决国家计划、国家预算照顾不到的问题，有重要作用。但是，预算外资金如果规模太大，放任自流，也会产生消极作用，故必须对其加强管理，积极引导，合理地安排并加以使用，管好、用好预算外资金是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十一画

混合所有制经济　由全民、集体、个体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投资而组合成的经济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相对于纯粹的、单一的所有制经济而言的。中国现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产生是由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和不同所有制之间跨地区、跨行业联合的结果。混合所有制主要有四种形式：1) 全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混合。2) 全民与集体和个体、私营企业之间的混合。3) 全民与个体、私营企业之间的混合。4) 集体与个体、私营企业之间的混合。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混合会使一个经济单位之中的所有制关系发生某种新的变化，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和作用是同它自身构成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经济性质和作用大体吻合的。

部门所有制　对生产资料由中央各职能部门分管并支配使用的一种公有制形式的称谓。部门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的一部分，属于部门分管的生产资料尽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的支配和使用在总体上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执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必须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商品比价　指同一时间同一市场上不同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商品经济中，总的说来，各种商品是按照其价值量进行交换的，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价，应该基本上反映各种商品的社会必要量即价值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以体现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商品的比价要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反之，商品比价对供求又有反作用。在我国，国家为了满足生产消费的需要，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往往制订有关方针政策，通过调高或调低价格来调节生产和流通，指导企业的投资方向，对商品比价产生影响。这样，各种商品比价关系同各种商品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不会完全一致的，但各种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仍然是商品比价关系的基础，商品比价主要有农产品比价、工业品比价和工农业品比价三种。合理规定商品比价，有利于促进工农业之间、农业内部和工业内部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防止和消除社会经济中的总量不平衡或结构不平衡。

商品差价　同种商品因其质量购销地区、购销季节、流通环节等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商品差价主要有：购销差价、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和品质差价等。商品差价是对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差异的货币表现和价格补偿，也是国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反映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商品差价占计算基价的百分比为差价率。差价率分为加价率和折扣率。在出厂价和收购价等基础上形成的差价率为加价率，在销售价和批发价基础上形成的差价率为折扣率。商品差价是我国价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常运用规定加价率和折扣率的办法，控制商品差价以及相关的价格水平。合理的商品差价，有利于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扩大

商品流通，加强商业经营管理，正确指导消费。

理论价格 指国家有关部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根据价格构成因素和有关的作价原则，运用合理的成本和利润数据，用理论公式计算出来的价格。理论价格是与实际价格相对而言的。计算理论价格并非直接用以制订商品的实际价格，而是用来考察实际价格和理论价格的偏离程度，衡量实际价格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调整。理论价格中用以表现商品价格的货币只有理论上的意义，是一种理论上的货币。关于是否需要测算理论价格，认识不一。一种观点认为理论价格很难测算，也没有必要。另一种观点认为理论价格是国家制订和调整实际价格的科学依据，是从价值方面比较和衡量企业、部门、外贸，基本建设等方面经济效益大小的重要依据，只要实际价格与价值有偏离，测算理论价格就是必要的，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理论价格的含义，解释不同。一般认为，它是一种基础价格，是商品价值或价值变化形态的货币表现，不考虑由于国家政策等因素引起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其构成是，由正常生产合理经营条件下的平均成本，合理的流通费用，加上应纳税金和合理的利润。对于按照何种利润率来分配社会盈利，学术界意见也不一致，基本的主张有按照工资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成本利润率、综合利润率分配社会盈利和计算理论价格等几种。

基数利润留成 指当年利润仅相当于上年利润或少于上年利润的企业，以当年利润为基数，按核定的比例从利润中提取各项资金的办法。见于1980年1月国务院转批的《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

企业基数利润留成比例，参照下列五项资金占同年利润总额的比例核定：第一，新产品试制费一般按1%计算，少数试制任务较多的企业，按2%计算，机械工业企业按3%计算，没有新产品试制任务的企业不计算此项费用。第二，科研经费和职工技术培训经费，按国家拨给企业的实际数额计算。第三，从成本中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按照工资总额的11%计算。第四，从成本中开支的职工奖金，一般企业按标准工资的10%计算，少数先进企业最高不得超过12%。第五，企业从利润中提取的企业基金，在最多不超过工资总额5%的范围内，由企业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确定。基数利润留成比例，核定以后，原则上3年不变。从利润中留成的各项资金，国家不再另拨给。

强制替代 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企业因资源短缺而被迫改变最初规定的投入组合的一种经济现象。这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分析短缺现象时使用的一个概念。

强制替代是指企业生产计划的完成碰到资源短缺的限制，被迫用别的资源来代替原工艺标准要求使用的资源，结果使新的投入组合偏离了最初规定的投入组合，是企业生产者的非自愿改变，是生产中瞬时调节的最经常和最重要的形式。它是在生产者碰到资源约束时，避免工作停顿的一种特殊解决办法和应急措施，其作用在于可以使生产者在碰到资源约束时不会束手无策。强制替代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用品质更高的资源替代原先规定的原材料进行生产，这将带来由于材料成本的增加，进而使企业的财务状况面临困难，并造成资源浪费；另一个是用较差质量的材料替代进行生产，虽然因此材料成本"节省了"，但产品质量因此而下降，这是短缺带来的最有害的影响之一。而且会产生短缺已经克服的假象。实际上，强制替代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短缺指标之一。

教育与经济的比例关系 教育的发展水平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按一定比例相互适应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教育经费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教育投资是一种周期性较长的生产性投资，它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而可以拿出更多的教育经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经费在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要适当，比重过小，教育经费增长过慢，教育事业就难以得到发展，也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要；比重过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国家的财政赤字，这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教育和经济只有在适当的比例下，才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综合利润率 亦称"复合利润率"，将资金利润率和工资利润率综合起来而形成的利润率。有两种计算方法。(1) 以资金、工资合计为基数的综合利润率，亦即利润额占资金占用额加上工资额合计数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text{综合利润率}=\frac{\text{利润额}}{\text{资金占用额}+\text{工资额}}\times 100\%$$

(2) 以资金、工资各占一定比例的复合数为基数的综合利润率，亦即利润额占资金占用额和工资额的比例复合数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text{综合利润率}=\frac{\text{利润额}}{\text{资金复合比例}\times\text{资金占用额}+\text{工资复合比例}\times\text{工资额}}\times 100\%$$

式中的资金、工资复合比例，是计算综合利润率的基数中资金与工资各占的百分比。以上两种综合利润率可分别按企业、按部门、按社会平均计算。经综合利润率确定计划价格中的利润，既反映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又反映活劳动的经济效益。

银根松动　银根是旧中国商业用语，指的是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应量。银根松动就是市场资金供应充足，利率较低，有大量的通货可供利用的情况。一国货币管理当局为了刺激生产和需求，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往往采用松动银根的货币政策，以提供数量充足的市场货币供应量。如，政府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债券，降低法定储备率和贴现率等手段，为商业银行创造松动的资金条件从而使商业银行能以较低的利率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达到扩大市场货币资金的供应量之目的，并刺激资金的高需求。银根松动与银根紧缩相对应。

银根抽紧　和"银根松动"相对称。指货币管理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减少市场货币供应量。银根松动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一旦出现经济过热过快的增长，社会需求过大而产生了通货膨胀，国家货币管理当局往往要采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如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储备率和贴现率，迫使商业银行减少信贷资金供应，提高贷款利息，从而达到减少市场货币资金的供应与需求的目的。现代经济的发展与货币供需状况关系密切，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并配合其他总量政策的运用，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康托罗维奇的经济思想　列昂尼德·维塔耶维奇·康托罗维奇（1912—1986）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1912年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医生家庭。193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物理数学系。1935年，未经论文答辩便获得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45—1960年为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高级研究员、研究部主任。1949年因数学研究成绩卓著荣获斯大林奖金。后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院士。1965年同涅姆钦诺夫、诺沃日沃克一起，因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就而荣获列宁奖金。康托罗维奇还担任过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最优核算法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75年，他因"创建和发展了线性规划方法，革新、推广和发展了资源最优利用理论"，与美籍荷兰经济学家库普曼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

康托罗维奇的突出贡献是，建立和发展了线性规划方法，在苏联首先提出用线性规划方法配置有限资源，提出最优计划模型、最优计划的估价等理论。他首先提出用数学方法解决企业的组织和生产的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提出经济效果概念并指出了衡量经济效果的标准，即通过把产品的劳动消耗同效果进行比较，来选择合理的社会生产结构，确定最经济的经济决策。他还提出了最优价格理论，以"客观制约估价"作为价格形成的基础。康托罗维奇被认为是苏联经济学中新的主要流派——"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计划和管理学"的奠基人和苏联经济数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1."解乘数法"

1938年，列宁格勒全苏胶合板托拉斯在拥有8台具有不同生产能力的机床，生产五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而无法求得一个令人满意的最优方案时，求教了年轻的康托罗维奇博士。他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问题。这类问题在企业制订生产计划时常常会碰到，其实质是在一定的线性约束条件下使资源处于最优利用状态。换言之，就是根据企业拥有资源的数量，各种产品消耗资源的多寡以及所创造价值的大小作全盘考虑，制订最合理的分配方案，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寻找线性约束条件下能达到目标的最优方案的方法。

康托罗维奇知道，若用拉格朗日乘数的古典数学分析方法或任何其他已知方法是几乎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的。因为这需要从成千上万个，甚至几百万个联立方程组中求解。因此，必须创立一种新的求解方法。不久，他便发明了"乘数法"这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圆满地解决了如今已载入数理经济学中的"胶木板托拉斯问题"。"解乘数法"的创立，导致了应用数学中一个崭新的分支——线性规划的诞生。这是康托罗维奇的一项重要创新。这一研究成果为线性规划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

"解乘数法"是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关键是选择一个适当的乘数，用它来变换效率表（即由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排列而成的表格），通过对变换各效率的比较，制定旨在发挥各生产要素最大效率的生产组织计划，然后逐步调整，逐次逼近，直至最后找到满足配套要求的效率最高的方案。康托罗维奇把这个乘数称为平衡指标。1939年，论述"解乘数法"的专著——《生产组织和计划的数学方法》一书问世。康托罗维奇在书中指出：企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仅要改进技术，而且要改进生产组织和计划方法，使之合理化、科学化。"这项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研究一种方法，用来解决从大量不同的情况和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这

一类问题……，迄今为止，这一类技术经济问题的求解还是十分偶然的，人们只能用眼睛、凭感觉来解题，所得的解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是最优的，同时，甚至还没有人提出寻求最优解的问题，从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而现在已经具备了可能性，即不再是偶然地使这一类问题得到解答，而是通过某种有科学依据的方法求得最优方案。”在这一篇幅不大的小册子中，所涉及的生产实际问题十分广泛，包括各机床间加工零件任务的分配，在规定品种条件下的保证最大限度完成计划的目标组织生产、机器的最充分利用，综合原料的最大限度利用，燃料的最合理利用，在不同建筑材料条件下建筑计划的最优完成，播种面积的最优分配，运输的最优计划等等。显然，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如何利用有效的数学方法，最优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在无需增加投入的情况下，便可增加产出，提高效益。

康托罗维奇用切实可行的数学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从而为现代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开创了广阔的前景。令人遗憾的是，康托罗维奇提出的“解乘数法”在苏联长期受到冷遇，甚至连胶合板厂本身也未能用上。直至 1950 年，，列宁格勒的一家列车车厢制造厂首次应用这一方法进行合理投料，获得明显经济效果后，康托罗维奇的“解乘数法”才陆续被应用于经济实践中，并开始为世界学术界所知。

2.客观制约经济理论

30 年代末，康托罗维奇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的资源最优利用问题上，“解乘数法”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企业范围内合理组织资源和计划生产的问题。40 年代初，他觉察到不仅就一个企业、一个生产单位而言，有一个最优计划问题，而且就一个部门内各企业之间，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及整个国民经济，也都存在着最优计划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后一类问题要比前一类问题更为复杂。但是，若从数学角度来看，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企业内部的资源分配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分配都属于最优规划问题，即所谓的极值问题。顺着这一思路，他把“解乘数法”这一线性规划方法的应用范围从微观经济领域扩展到宏观经济领域。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康托罗维奇发现被他称为“平衡指标”的乘数具有更为深刻的经济意义和更为重要的作用，用它可以衡量某种资源的稀缺程度。借助这一乘数，不仅可以寻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最优计划，而且同时可以获得各种资源和产品的“最优价格”系统。1943 年，他在《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一书中，把“解乘数法”所得乘数改称为“客观制约估价”。它相当于以后西方经济学界进行同类研究时提出的“影子价格”。

康托罗维奇认为，所谓“客观制约”是指估价实现的条件，即这种估价不是随意作出的，而是在实行最优计划的客观条件下决定的。所谓“估价”就是估算、评价的意思。这就是说所谓“客观制约估价”是指在最优计划条件下所得到的对产品和资源的估价。他指出，在制定各种可能的计划时，总会有一种最好的计划。在各种计划中，各种产品品种的比例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与其它任何符合品种比例的计划相比，其产出更大，但单位产品的耗费却更小。因此，这种计划中的产品成本最小而获得的利润最大。最优计划是用数学方法——线性规划方法求得的。根据最优计划可以确定每种产品的估价，确切地说，就是可以确定出制造每一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量，这就是“客观制约估价”。这种估价使最优计划遵循盈利原则，即在这一计划中，每个企业都生产净产值最大的产品。康托罗维奇解释说，这里的盈利原则不同于通常的概念，而是指在一种用价值形式的指标所表示的效果的基础上，选择经济、经营和计划决策。具体说，就是选择成本最低的生产工艺，选择在规定的耗费下保证最大限度的产量或保证最大限度积累的计划，选择最低廉的原材料等。而要遵循这样的盈利原则，主要取决于客观制约估价体系。

康托罗维奇认为，客观制约估价体系包括：(1) 对不同专业和技能的劳动力的估价；(2) 对产品（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估价；(3) 对各种原材料的估价；(4) 对电力的估价；(5) 对设备的估价（租赁估价）；(6) 对自然资源（如土地、矿藏）租金的估价；(7) 对各种劳务（运输、邮电）的估价，等等。其中，对产品的客观制约估价是指在最优计划下生产每种产品所必需的完全劳动消耗量。它包括转移的物质消耗部分和活劳动消耗部分。在最优计划下加入产品中的劳动量是必要劳动消耗量，对它的估价称为对净产品的客观制约估价，它是对产品估价的关键。对资源的客观制约估价是指在最优计划条件下节约一个单位的某种资源所需多消耗的劳动量，或者反过来说，是指在最优计划下使用一个单位的这种资源所能节约的劳动量。对资源客观制约估价是随这些资源使用时的具体条件（现有资源总量、产品产量与品种、企业数目及生产率等）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而体现出具体性的特点。当某种资源的稀缺程度提高时，对它的估价也就相应上升，因为它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增加了；反之，则下降。当所使用的资源不再稀缺，而出现剩余时，对它的估价便等于零。这样，客观制约估价便成为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一个尺度。同样，对生产过剩的产品，其客观制约估价也为零。在对土地的估价中，由于优等土地稀缺而劣等土地剩余，所以前者估价较高而后者的估价为零。对于剩余的劳动力也如此，当熟练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其

估价也相应提高。当某种劳务（如运输）短缺时，其估价便大大提高。由客观制约估价所确定的比例关系不是虚拟的，而是现实的。这种现实性表现在它提供了一种等价物，即某种资源的一个单位数量，可以用另一种效率相同的资源相应数量来代替。当条件只发生局部或较小变化时，对资源中产品的客观制约估价或者不变，或者变化很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康托罗维奇认为，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存在着不少弊病。传统的计划方法不能解决企业的局部利益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之间相互不协调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建立新的管理方法。按照他的理想，集中计划不是通过向企业下达详细繁多，面面俱到的指标来实现的。中央计划机关只需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和总的生产任务，灵活地确定和下达各种资源和产品的客观制约估价指标。各个分散的企业将以客观制约估价来制订自己的最优生产计划，这种计划必然使企业选择耗费最少而盈利最大的生产方法。这样，便很自然地将国家集中计划与企业分散决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与企业的局部利益互相协调一致。不仅如此，康托罗维奇还认为，客观制约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还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他反复强调，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在本企业内部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润，但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资源最优配置。而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从整个国民经济利益出发，利用客观制约的估价方法，借助客观制约估价体系，解决如何在各企业、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生产任务，编制国民经济内部及整体的最优计划，使每个企业都实现最小的耗费和最大的产出，从而使社会总产量得到增长；可以比较不同的生产方法，正确解决新的生产方法是否合理可行的问题；可以按照资源最优利用方向，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最优分配和使用，从而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充分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此外，康托罗维奇还从资源最优利用角度提出完善计划的一系列建议。他指出，为了保证最优计划和计算效率方法的实现，必须改变和完善现有的主要统计指标和经济指标体系，用净产值指标代替传统的总产值指标；他主张改革传统的价格形成方法，以客观制约估价为基础制定价格。并提出应当提高稀缺资源的价格，以利于企业节约使用稀缺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

其主要著作有：《生产组织和计划的数学方法》、《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最优计划的动态模型》等。

十 二 画

斯达汉诺夫运动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之后出现的，以掌握新技术为特点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全国性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这一运动的最初发起人是顿巴斯煤矿采矿工人斯达汉诺夫。由于他积极采用并掌握了提高采煤效率的新技术，1935 年 8 月 30 日他在一个工作班的时间内采掘了 102 吨煤，超过当时定额的 13 倍，高于当时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工种工人的定额，创造了当时采煤世界纪录。斯达汉诺夫的这一纪录，鼓舞和激发了苏联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积极性，他们纷纷以斯达汉诺夫为榜样，努力改进技术，采用新技术，掌握新的工作方法，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为提高生产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群众性的劳动竞赛热潮。斯达汉诺夫劳动竞赛运动首先在采煤工作部门开展起来，接着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引导下，在全国推广、展开，并命名为斯达汉诺夫运动。

温州模式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模式之一，主要是指浙江温州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形式。其主要特征是：1）以家庭及各家庭联营的乡镇企业为发展主体。2）各个家庭企业生产规模较小，但由于有一大批专门从事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采购员的业务活动，把彼此独立生产的千家万户的企业织成一个个联合起来的协作供销网，家庭企业在这张供销网中不仅得以生存，而且迅速发展壮大。3）乡镇企业在数量和产值规模上迅速膨胀，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触角几乎遍及中国城乡各个角落，并逐步向海外延伸。

联营经济 由两个以上的经济组织按照契约规定联合起来经营的经济形式。它是各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在生产和流通中实行直接结合的一种协作形式。其目的是扩大生产规模，疏通流通渠道和增加购销网点。联营经济一般不受所有制、地区、行业、行政隶属关系等条件的制约。

联产计酬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在保留集体经济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经济责任制形式。一般是集体经济把土地、山林、草场等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承包给生产作业组或农户使用，明确规定双方的责、权、利，通过包产量或产值，按照超产分成或超产归己的办法进行分配。由于承包指标一般是根据承包地块近几年平均产量加上可靠的增产幅度确定的，基本上能反映承包地块所需要投入的社会平均劳动量。农户依据承包的产量或产值，按统一的比例扣除上交国家的税金和集体提留之后，其收入大体同承包者投入的劳动量成比例。所以，联产计酬可以把农户支出的劳动量与其获得的产量、应得的报酬直接联系起来，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割资本主义尾巴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种错误作法。文革期间，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和政治动乱的干扰和破坏，一些地区一些人大搞所谓的"穷过渡"，即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大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所谓"升级"、"过渡"。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农村社员在从事集体生产之余开展的编织、养殖、饲养家畜家禽、房前屋后的植树种菜等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必须加以砍掉；认为自留地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须加以铲除。此外，他们认为农村的集市贸易、城市的个体经济和一些运输业、建筑业、手工业合作社也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必须加以限制或取消。由于上述这些经济形式被他们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主义残余或尾巴加以砍伐，"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就由此得名。

智力开发 就是把人的智慧和能力、聪明与才智这种特殊"能源"，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加以开拓、发掘和利用，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造福于人类。智力开发旨在提高人的科学文化水平、专业技能、劳动熟练程度和思想道德水平等，它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手段。

智力开发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 要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才资源，让全体劳动者，包括每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都开动脑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不拘一格，量才录用，择优选拔。(2) 要做到人尽其才，除了合理安排和使用人才以外，还要尽最大可能为这些人创造发挥其所长的各种条件，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条件。智力是大脑的功能，只有给广大脑力劳动者创造劳动条件，大脑的创造性活动才能发挥出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进展，"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对人才不能只是使用，而必须经常进行"再培养"，进行"知识更新"。(3) 智力开发还应包括不断增加教育投资，不断培养新的人才。

智力开发的主要手段有正规教育、就业前培训、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等。

智力投资 为使人们获得知识和技能而进行教育所支付的一切费用。主要包括：(1) 正规公共教育的经费支出；(2) 私人学杂费支出；(3) 成人业余教育的经费支出。

智力投资能从多方面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1) 向社会提供科学技术人才，不断更新生产技术，充分发挥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作用，保证社会生产稳定持续地高速度增长；(2) 向社会提供适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管理人员，在微观和宏观经济运动中，使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优结合和充分利用，取得最经济效果；(3)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造就高质量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提供保证。

智力投资的特点是：(1) 投资的成果，体现在达到一定文化技术标准的后备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现有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储存于劳动者身上，不能用投资回收期指标衡量；(2) 劳动者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将在劳动者的整个劳动期间长期地起作用，不能把追加智力投资所取得的成果直接用国民收入的增加量表示出来；(3) 投资者不能象对待物质产品那样对待增加了知识和技能的受教育者，知识和技能的受教育者不归投资者所有。

评价智力投资效果主要看：(1) 为社会培养出更多达到一定文化技术水平的劳动者；(2) 缩短培养劳动者所需要的时间；(3) 各种类型的劳动者按比例地增长，满足经济发展对各种人材的需要；(4) 使社会上现役劳动者与后备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高质量的人才比重增大。

短缺 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一种生产者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家不能足量供应企业生产的现象。

造成短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经济体制的主体，在进行经济预测时缺乏足够的信息，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产生失误，在执行经济计划时出现偏差，结果引起短缺。这是产生短缺现象的一般原因。第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由于国家和企业的父子般关系，使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不断增加投资的需要永无饱和之日，直至把生产推进到资源约束的限度；这种现象又驱使企业力求囤积更多的存货，结果

造成企业对资源的需求永无止境。这是导致短缺现象的根本原因。

短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横向短缺，它反映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由于需求大大超过供给，买者的初始意图往往得不到实现。第二，纵向短缺。由于物质供应采取分配调拨的方式，下级部门和企业提出的申请数量总是大于上级部门的可供量。第三，内部短缺。由于企业和生产单位得不到完成计划所必需的物资供应，故内部经常发生某些物质短缺，使得企业的生产无法顺利进行。

短缺的主要后果是：第一，损害消费者利益。在短缺条件下生活的人，倍感不便和苦恼，由短缺造成的各种浪费和负担大多由消费者来承担。第二，影响经济效益。在短缺条件下，生产单位可能会因得不到生产要素而中断生产，或因被迫采用别的资源来代替原工艺标准要求使用的资源，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第三，影响了人们的相互关系。在短缺条件下，由于需求总是大于供给，故助长了"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第四，影响技术进步。在短缺条件下，产品供不应求，生产者之间缺乏竞争，削弱了企业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短缺现象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可能存在。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他的《短缺经济学》(1980年)中，第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固有短缺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

短缺经济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总需求长期大于总供给的经济。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他的《短缺经济学》(1980年)一书中，对传统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概括。

短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经济生活中的物资和服务缺乏现象是长期的，人们被迫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这种状况，消费者购物经常排长队，初始需求得不到满足；生产企业的采购员满天飞，仍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被迫进行强制替代。第二，在大部分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不起主要作用，货币的职能被削弱，经济运行主要依靠各种非价格信号来调节，即通过产量指标、投入定额、物资调拨等数量信号来调节。第三，数量冲动和扩张冲动强烈。企业总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把产量扩大到资源约束的"瓶颈"状态，并力求不断增加投资以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第四，物资缺乏和物资剩余同时并存，互为因果，浪费不可避免，损失大多由消费者承担。第五，物资缺乏取决于需求过大，不在于供给过小，只要需求总量表现为趋向无穷大，则供给总量总是小于需求总量，表现为短缺经济。

衡量一国经济是不是短缺经济的标志是购买者能不能用他的货币购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人均消费水平的高低。短缺经济不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落后的标志，强制替代、数量冲动、囤积倾向是短缺经济的突出表现。迄今为止，短缺经济的典型形式只存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

短期调节　是生产者计划对今后几个月预期情况的适应。即计划者尽量考虑预期的情况，包括企业的生产潜力和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并根据这些情况调整生产指标，从时间上来看，这是一种短期现象，即这种计划的效力是短暂的（例如几个月）；同时，这里的"短期"一词也是在马歇尔用语的意义上被使用；这种调节是在固定资金不变条件下进行的。

短期调节有三个在理论上可以分开但又彼此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1>总量生产计划的决定。这里的问题是企业可用的总资源与它所生产的总产品是什么关系？存在不存在资源约束？需要不需要通过强制替代来完成生产计划？和可利用的资源相比，计划是松还是紧？<2>投入组合的决定。即企业根据明显持久的资源短缺存量，对投入组合进行较持久的改变，但是不变动固定资本。<3>产出组合的决定。在决定产出组合时，生产者从产出存货的动态和未交付订货量的情况得到重要信号，对产出组合的比例进行调节。在确定投入组合方面，企业灵活性较大，比较愿意作出调整，它更多的是向环境让步；但在确定产出组合方面，企业则比较僵化和保守，它更多的是对依赖于它的买者发号施令。所以，投入组合比产出组合对非价格短缺信号的反映更敏感。

短期调节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对经济中出现的"数量"调节过程进行考察时使用的一个概念。

短线产品　生产不能满足需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适销对路而又时常脱销的产品。对短线产品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发努力扩大其生产量以满足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要求。短线产品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才有其特定的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变，短线产品也可能变成非短线产品，因此，对短线产品的发展应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并结合市场教训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科学地安排。

惩罚价格　对劣质和陈旧、落后产品实行的一种其个别价值的、使生产者或企业无利甚或亏损的价格。1983年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国家经委《关于进一步贯彻工业品按质论价政策的报告》中规定，对陈旧淘汰产品实行惩罚价格。凡决定淘汰的技术性能落后的陈旧产品，物价部门要撤销原

定价格，将其出厂价格降至生产无利以至亏损水平，以限制其生产，促使企业积极研制新产品。对先限产后限用的淘汰产品，剩余部分按生产成本价或低于生产成本价处理销售；对既停产又停用的淘汰产品，产销企业的现货均按废品处理，药品、农药等淘汰产品，按有关规定报废。对于有些陈旧淘汰产品降低销价反而会扩大使用的，可不降低价格，而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如重点试行对企业税后留用利润征收陈旧淘汰产品惩罚费的办法。

惩罚价格是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因为企业生产劣质产品以及陈旧、落后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或者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劳动，或者是超过社会分配给该部门的劳动时间，故个别劳动时间虽较多，个别价值虽较高，但社会价值却是较低的，故实行惩罚价格，正是对价值规律的运用。

惩罚价格的实行，有利于企业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

集权模式 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运行原则有机组合的一种抽象图式。这是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历史发展过程时使用的一个概念。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一级，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经济活动都是由中央决策，只有家庭或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分散决策的。第二，计划采取严格的等级结构。第三，信息传递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第四，货币的作用是消极的，主要以实物形式分配资源。

这种模式是本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在苏联形成的一种经济模式。二战以后，东欧各国普遍采取过这种模式，我国在改革之前也基本上属于这类模式。

集权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能把资源集中地用于经过严格选择必须优先发展的部门，这一优点在战争或高速实行工业化的某个时期尤为明显。其主要弊病在于：包罗万象的计划指标体系内部存在矛盾，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僵化，不能灵活地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浪费严重，成本太高；生产单位积极性受到压抑；产生官僚主义，效率太低等。

集市贸易 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国家管理的、农民与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以互通有无为主要内容的商品交换。集市贸易是在改造原有集市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商业的补充形式。它不属于国家计划调节，而主要受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

集市贸易包括城市农副产品贸易和农村集市贸易。目前我国城市农副产品贸易，主要以农副产品为主，同时包括轻工业产品、水产品及花、鸟、鱼观赏品。参与集市贸易的成员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营农场、农民、集体商业、个体商业、集体工业企业以及城镇居民等。集市贸易对于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促进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都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集市贸易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必须加强对集市贸易的引导和管理，以限制其消极作用，保证它的健康发展。

集体所有制商业 简称集体商业，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商业。在我国，现阶段包括供销合作社商业、乡镇商业、街道商业、知青商店以及附属于全民所有制商业的合作商业等，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所有制商业具有点多面广、经营灵活、方便群众等特点。其主要任务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活跃城乡经济，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集体所有制商业遵循自愿组合、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的原则；所需资金主要依靠群众自己筹集和经营的积累，经营成果归集体单位的劳动群众所有，国家支持和鼓励集体所有制商业的设备、资金、商品，也不能无偿地使用其劳动力。不同的集体所有制商业，由于各自的经营成果不同，劳动群众所得的报酬可以不一样。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集体所有制商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税赋转嫁 纳税人将其所纳税款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交易或其他手段转移给他人负担的过程。

税赋是税收负担的简称。是国家征收加给纳税人的负担程度或水平。国家对商品流转额课征所得税时，虽然商品的卖方是纳税人，但他可以将自己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其他人。转嫁的方式主要有：第一，向前转嫁、将税金附加到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去，把税赋转嫁到商品的买者身上，这种税赋的向前转嫁现象通常发生在市场上比较紧俏的商品上面。第二，向后转嫁，纳税人在转售商品的过程中，买进商品时尽量压低进价、从而把税赋转嫁到在他之前的商品卖者身上。

税赋转嫁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概念，一般认为间接税比直接税具有更大的税赋转嫁可能，并且税赋能转嫁多少，要视课税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状况而定。

税后还贷 税前还贷的对称，指在计缴所得税时，必须按企业的实现利润计算，各项生产性措施贷款必须用上缴所得税后的企业留利归还的规定。根据财政部门规定，对于未经财税部门审批同意的国营企

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只能在实现利润计征所得税以后，再归还各项生产性措施贷款。对于农村乡（镇）村工副业单位一律实行税后还贷的办法。税后还贷只应适用于新增贷款，原有贷款仍宜于采用税前还贷，以保证归还原有贷款的资金来源，并利于国家对新增贷款的宏观调控。

税后还贷与税前还贷相比，对于强化企业的信贷约束，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都有重要意义。

税收杠杆　国家通过给予税收上的有利或不利条件，来影响管理对象的经济利益，对其经济行为施以诱导，从而起到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和影响作用的一种手段。

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途径。税收的主要职能就是积累资金、调节经济，加强经济监督，税收杠杆主要是针对其调节经济的职能而言。从宏观上讲，国家运用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促进产品、产业结构合理化，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从微观上讲，调节企业的不同盈利水平，把由于客观因素（如资源价格）带给企业的利益收入，利用税收形式收归国有，使所有企业能够在公平合理条件下开展竞争。具体地讲，税收杠杆调节经济的功能体现在各个税收法规的构成要素和税收分配全过程，通过不同税种的设置，规定调节的领域和层次，规定税目，明确调节的范围和广度，规定税率，明确税收调节的深度，税目税率配合运用以及规定减免税政策，体现鼓励与限制，平衡利润水平及合理负担精神。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有力工具。

与其他经济杠杆相比，税收杠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权威性和严肃性，它以法律形式实施自己的职能，体现了国家意志；第二，统一性和广泛性，税收杠杆作用范围大，国家颁布的税法对全国作出统一规定，地方税法是对一个地区作出的统一规定；第三，稳定性，税法一经颁布，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随便地加以修改；第四，及时性，税款必须按时缴纳。

税收杠杆的运用有四个原则：第一，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原则；第二，合理税赋和区别对待的原则；第三，效益和公平相结合的原则；第四，税收杠杆和其它杠杆综合配套使用的原则。

税后利润　我国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以后，国营企业按照税法规定，缴纳产品税、增殖税、工农业税、资源税、地方税、所得税等各项税金后剩余的利润。企业的税后利润可由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和自身情况，设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的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增加职工的福利待遇。

税前还贷　在计算应纳所得税额时，对经批准的专项贷款项目所实现或新增的利润，允许部分或全部用于归还专项贷款之后，再计征所得税额。

为了照顾城镇集体企业的归还贷款能力，支持集体企业进行技术设备改造，扩大再生产，财政部在1980年8月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使用各种专项措施贷款，在归还贷款本息期间，可以用贷款项目投产后所增加的全部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归还。归还贷款本息后剩余的利润，再按税法规定交纳工商所得税。1983年11月5日以后，又改为只准用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利润归还贷款本息的60%，其余40%用税后利润归还。少数有较大困难的企业经审批可酌情放宽税前还贷的比例。

为了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乡镇集体企业使用的贷款，也可按上述还贷规定办理。

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之后，为了照顾企业资金较为困难的情况，促进经济发展，本着归还贷款由国家和企业分担，投资增加的收益也由双方分享的原则，并对贷款及其归还加以适当控制，财政部规定从1984年10月18日起，国营企业在申请技术措施贷款时，一般要有10%—30%的自有资金用于借款项目，国营企业在计算应纳所得税额时，允许扣除用基本建设改扩建借款项目投产后新增利润归还的借款以及用技措性项目投产后新增利润归还的借款。

税前还贷实际上是对企业所得税的一种带有优惠性质的减免，其弊病是：第一，它是企业经济行为短期化和消费基金膨胀的重要原因；第二，它是固定投资膨胀的重要原因；第三，它对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规范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　社会主义条件下由社会根据个人提供的劳动量直接对个人进行分配的一种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社会公有，人们的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因而社会可以直接对个人进行分配，在整个社会范围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生产资料公有制还采取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基本形式，并且还有其他一些所有制；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生产者的个别劳动还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因此，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要求只能在企业范围内实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却难以完全实现。

最终产品 可供社会最终使用和最终消费的产品。最终产品是与中间产品相对应的概念。由于说明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最终产品有三种理解和划分：第一，指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而在同期不再加工，可供最终使用和消费的产品。包括个人消费品和公共消费品，作为固定资产和作为储备、后备增加的产品及净出口产品。这个意义上的全部最终产品的价值即最终产值等于国民收入加折旧费。第二，指体现一定时期国民经济最终成果的全部消费资料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的全部最终产品等于社会总产品扣除本期生产中消耗的产品的剩余部分，其价值即为国民收入。第三，指直接用于个人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的消费资料，这个意义上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即等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消费基金。

最终产品的数量和发展速度是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成果的最基本的经济指标。所以计划工作应当以增加最终产品作为出发点，使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之间，各个产业之间以及不同产业内部之间保持恰当比例，协调发展，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最惠国待遇 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通常是在航海条约或贸易协定中规定这种待遇。条约或协定中所规定的这种待遇的条文，叫"最惠国条款"。

最惠国待遇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最惠国待遇两种。前者指缔约国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第三国的一切优惠，应无条件的自动适用于缔约国的另一方。后者指缔约国的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第三国的优惠，缔约国的另一方必须提供同样的补偿才能享受。

最惠国待遇导源于自由贸易原则，原文在于消除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中的歧视，彼此享有平等的地位。早在15世纪的贸易条约中已出现最惠国待遇的内容，当时主要用以反对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以后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常以此作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扩张和掠夺的工具，在发展中国家单方面地享受最惠国待遇。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旧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均有此条款。现在我国在对外贸易条约或协定中也规定有最惠国待遇，其目的是为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往来，促进双方经济发展，避免歧视待遇。

超计划利润留成 企业计划内利润不留成，超过计划的利润按一定比例留成。具体的留成比例由主管部门和企业协商确定，各个企业不同，一般最高不超过计划利润的30%。这种办法主要运用于有些地区和部门由于生产任务饱满或生产任务不足而利润不稳定的企业。

黑市 指未经政府批准，非法形成的以交易不许上市商品为特征的市场。主要经营计划票证、外币、珠宝、金银、文物、走私物品、淫秽物品等。黑市并非一定存在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可以采取无形或流动的形式。黑市通常在政府限制贸易、价格等情况下形成，并同社会商品的供求不平衡状况相联系，价格也往往大大高于正常的市场商品价格。黑市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有破坏作用，故在我国，人民政府对黑市应采取坚决取缔的政策。

"搅拌机"理论 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某种形式和比喻，"二次调节"理论的形象化表述。"搅拌机"是指市场，"搅拌机"内的各种原料是指各种资源。"搅拌机"搅拌的时间越长，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也就越充分，资源越有可能做到均衡地、合理地配置，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搅拌机"的运作可以看作第一次调节，即市场调节。"搅拌机"的管理者的操作和管理可以看作是政府调节。当"搅拌机"出现"故障"，或需要调整"搅拌机"的速度、规模、配料时，管理者的维修和调整行为可以看作是政府的第二次调节，目的在于让"搅拌机"搅拌得更均匀，效果更好，也就是使资源配置合理化，并符合社会的需要。(参看本卷"二次调节"理论)。

十 三 画

新民主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团结中国各民族人民在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反动统治革命运动中创立的一种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其它革命阶级的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没收大资产阶级的大银行、大企业归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经济、政治特权，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文化纲领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提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建立统一战线是组织革命力量的必要条件，开展武装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加强党的建设是取得革命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

新民主主义经济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建立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和形式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特点。具体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国营性质的厂矿、银行、商贸等企业；组织生产、消费、商业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保护私人工商业。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一方面，在解放区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各种经济成分；另一方面，在抗日根据地对土地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变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从而既照顾到雇农的利益，又保留了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政策的调整旨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新民主主义经济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不断壮大。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废除一切封建剥削，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政策，在解放区实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取消外国在华企业特权；逐步统一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否定。

新经济政策 苏联在1921年以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和平建设开始时所实行的经济改革。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而得名。新经济政策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要之点在于：前者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业已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大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通过市场竞争把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582页）。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主要标志是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国家允许农民在按照规定纳税以后，余粮全部由自己支配，可以自由出卖，或用于交换工业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列宁主张利用外资和私人资本恢复和发展国内生产力，采用租让制、租借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经营，以便吸收外国资金、引进新技术和管理知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租让制和租借制企业在苏联没有得到多大发展。

新人口论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以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措施的理论。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先生著名的《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认为，人口多，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但由于人口素质较差，加上中国的经济基础薄弱，这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人口增长过快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1）同加速资金积累之间的矛盾。人口多、消费大，积累小，不利于国家建设；（2）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的矛盾。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赖于人口的控制；（3）同提高人民生活之间的矛盾。人口增长过快，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迅速提高；（4）同发展科学事业之间的矛盾。人口数量过多，增长过快，无力实行质量的提高。要保全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就必须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此，马寅初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确定国家的人口政策，把人口列入国家计划之间；二是要大力宣传，提倡晚婚，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可以采用有效的行政力量、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三是节制生育，在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

新人口论是我国人口学领域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产物。这否定了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主义观点，提出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的新

思想，指明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向及控制人口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本质的区别，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新兴工业化国家 亦称"半工业化国家"、"半发达国家"、"中进国家"，指60、70年代以来工业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79年6月发表了新兴工业化国家报告书，把拉美的巴西、墨西哥，亚洲的新加坡、南朝鲜，我国的香港、台湾，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家和地区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目前，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划分标准不一，但一般都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在1500美元以上。第二，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本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日本5%的增长率。第三，经济结构变化显著，工业比重超过农业。第四，工业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制造业产品在国内或地区生产总值和出口总值中的比重在25%以上，并有继续提高的趋势，摆脱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状况。

粮棉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是中国政府在建国以后陆续实行的对粮食、棉花、油料等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一项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出现了一个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物资的供应，打击、限制奸商抢购和囤积居奇等行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关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规定，在1951年1月4日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规定"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棉花纱布公司统购"。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并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11月23日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十条具体办法。其主要内容有：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地，有计划地在农村收购粮食，而后统一地，有计划地向需要粮食的城乡输送供应；收购和供应的价格，由粮食部门按照各地情况作出合理的规定。此后，对棉布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5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财委关于实施棉布计划供应、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并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4年9月14日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为了贯彻执行粮食这种最重要物资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5日，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于8月25日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这样，国家就对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以及糖料、烤烟、生猪、重要木材、茶叶等其他农产品做到了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供应。

简政放权 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机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减少行政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下放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使企业真正作为富有活力的经济实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公有制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但如何认识和实施国家的经济职能，如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调整国家机构与企业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则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倍受关注的问题。集权化的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期广泛为各国所采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家面临着的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秩序混乱，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封锁和破坏，以及曾经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的国家主要经济活动的恢复和社会稳定对经济活动的巨大要求等。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类似的环境下，也不同程度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实践中，集权化的管理也为经济环境的稳定和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起到良好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比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较为简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关系也使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控制成为可能。

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这种由国家从国家宏观计划直至企业微观经营活动都统一纳入管理之下的管理体制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阻碍，使经济生活出现种种僵化呆滞现象，主观主义、官僚作风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产物。简政放权不但是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也同样是国家以政治的、法律的以及包括价格、税率、利率、汇率等在内的经济杠杆调整企业行为，使国家经济发展走上规范化管理的道路的要求。

简政放权不仅仅是权力下放，同时也是责任和利益下放，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仍存在着相互独立互相区别的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要求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明确

应有的责权利，只有这样才可能发挥出企业和职工群众所具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简政放权的最终结果就是在调整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基础上，使企业成为国家可调控的，具有自主经营权力，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

零售价格　指零售企业或工农业生产者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所采用的价格，为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最终价格。它由批发价格加零售商业企业的流通费用、利润以及税金构成。在中国，按照零售价格出售的商品主要有日用消费品、大多数农业生产资料和一部分消费性材料。大部分工业品的零售价格是由批发价格加上合理的批零差价制订的，其计算公式为：批发价格×（1+批零差率）。批零差率为批零差价占批发价格的百分比。少数商品如手表、丝绸等，由于先规定了零售价格，则根据倒扣批零差率计算，公式为：批发价格÷（1−倒扣批零差率）。批零差价占零售价格的百分比称为倒扣批零差率。各类商品的批零差率，一般由国家有关物价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商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考虑各种商品的经营难易、价值大小、损耗多少、周转快慢等因素分别确定。中国零售价格采取分级分类管理，有些商品由国家规定统一价格，有些商品允许各地在规定幅度内根据流通费用等情况自行安排。国家并不具体规定每种商品的零售价格，只是通过规定各类商品的批零差率来控制零售价格。农村集市贸易价格和城市农贸市场价格也属于零售价格，它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议定的。零售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积累和人民的生活。合理制订零售价格，有利于扩大商品流通，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繁荣市场，稳定物价。

微观经济市场调节　借助于市场机制协调各种具体产品或品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均衡分析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微观经济市场调节的具体过程是：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一致而各种具体产品或品种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一致时，生产者可以从市场价格的变动中获得信息，并在利益机制的推动下，改变生产结构及供给结构，使各部类内部各种产品或品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起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微观失衡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解决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市场机制才能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第一、市场应纳入宏观分配计划，避免纯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第二，采取反垄断措施，克服市场的垄断性，抑制工资的增长，克服卖方市场。第三，采取措施增强市场的透明度，通过计划机关、统计机关和银行密切观察市场情况，掌握动向，经常分析企业的生产情况和财务情况，让全社会了解市场的近期预测和远期预测情况，并利用市场信息指导企业自觉同宏观分配计划相配合。

微观失衡　各种具体产品或品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相协调的经济现象。

微观失衡是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已经一致的条件下，各种具体产品或品种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一致而产生的失衡。产生微观失衡的原因是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而生产结构未能及时相应地发生变化，造成有些产品或品种过剩，有些产品或品种不足，解决微观失衡的办法有两个：第一，如果有足够的库存，可以由库存变化来达到平衡，以增加库存办法解决产品或品种过剩的问题，以减少库存的办法解决产品或品种不足的问题。第二，如果库存不足以满足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达到平衡，即生产者可以从市场价格的变动中获得信息，在利益的推动下改变生产结构，使供求达到平衡。

微观失衡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均衡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

数量冲动　同紧计划相联系的企业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把生产推进到资源约束限制的一种经济现象。又称数量态度。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考察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时使用的一个概念。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计划确定之前，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会存在对计划的讨价还价行为，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就企业整体来说，正好把计划“校准”到正常的可以接受的紧度上，即把总量生产计划确定在资源约束的水平上，同紧计划相联系的这类经济现象被称为数量冲动。

造成数量冲动的要素有三个：第一，短缺的影响。企业作为卖者，受短缺现象的影响，感到自己有责任尽可能扩大短缺产品的生产量，直到资源约束的“瓶颈”状态为止；企业作为买者，感到正是资源短缺阻碍了自己的生产增长，强烈要求尽量扩大投入品的生产。第二，上级的压力。上级常常以各种非正式的形式对企业施加压力，说服企业更多地生产，企业要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意味着把生产推进到资源约束的“瓶颈”为止。第三，企业自愿追求产量增加。各种经济刺激机制引进企业，企业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也是符合企业本身利益的。

数量信号调节　依靠产量指标和投入定额的实物

量计划等非价格信号来调节经济运行。

数量信号调节的特点是：第一，经济运行由计划来调节，计划主要以产量指标和投入定额的形式从中央层层下达到企业；第二，资源配置主要采取实物调拨形式，实物的价格一般不提供市场情况，不反映资源、商品、服务的供求情况和相对稀缺的信息；第三，价格对计划和经济运行的影响是轻微的。调节的具体过程是，估计原订计划的完成会经常遇到资源约束，就调低计划指标，反之，计划指标就提高；如企业屡次不能达到计划指标，可能表示计划订得太高，下一期计划指标就降低，企业超额完成了预定的指标，表明计划订得太低，下期就会提高计划指标，数量信号调节的主要问题是：首先，调节信号的刺激作用微弱，因为决策者进行经济决策时，一般不涉及决策者的直接利益，必然削弱决策者对数量信号的重视程度，对数量信号所产生的不利后果考虑不足。其次，缺乏判断和权衡数量信号的客观标准。以实物形式表示的产量指标和投入定额，缺乏可比性和客观性，难以比较不同计划方案的实际得失。其优点在于它是事前决策，但由于经济动力不足，这一优点在实际计划中难以充分利用，所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数量信号调节弊多利少。

十四画

稳定物价 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东北、北京、天津等地的物价有几次大的波动和上涨，如果以1948年12月为100，到了1950年3月，物价指数为4200，即1950年3月的物价水平为1948年12月的42倍。其中，1949年一年内，物价四次大波动，共上涨19倍。上海也是这样，1949年5月27日批发物价指数为2079.9。全国物价都在上涨，上海物价涨风更重。造成这次物价大波动、大上涨的原因有以下这些：1.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在起作用，物资普遍短缺，工业严重破坏，农业歉收，投机倒把成风；2.美蒋的封锁和轰炸；3.人民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赤字庞大，不得不过量地发行钞票，这是物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消除物价大上涨给人民生活、国民经济、新生政权带来的极大危害，人民政府采取了如下重大措施以稳定物价：(1) 运用行政手段，打击投机的大本营——证券交易大楼，捕获首要投机分子238人，基本制止了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2) 集中抛售物资，尤其是集中抛售粮食、棉纱，投机商人遭到致命打击，投机风终于煞住了。国营公司夺取了商品市场的领导权。(3) 争取财政收支平衡，整理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节约支出，统一财政收支管理。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于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起着重要作用。经过了平衡财政收支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之后，1950年3月份财政赤字比1月份减少80.2%、4月份财政收支接近于平衡，从3月份开始，物价基本稳定，4月份开始下降。

稳定物价方针 指保持市场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这是我国物价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方针要求，在保持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及主要商品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合理调整。物价基本稳定，不是绝对地稳定，不是冻结物价，而是相对稳定。物价相对稳定，目前主要有四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个别商品价格有升有降，但物价总水平本年度同上年度相比，上涨或下降幅度不超过0.2%。第二种的解释是从一个或几个年度来看，物价总水平上升或下降幅度较大，但从较长时间内平均上升或下降水平看，物价总水平变动不大。第三种解释是只要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快于物价上涨，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于平均工资增长率，物价就是基本稳定。第四种解释是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小于银行存款利息率，就算物价基本稳定。

稳定物价的方针，是党和政府根据下列原则制订的：(1)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2)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劳动生产率低、人民收入少、消费水平低的客观现实。(3) 商品价值量变化、商品供求变化和国家财政政策的要求。

稳定物价方针，已深入人心，坚持这一方针，有助于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有助于巩固人民币的币值，有助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滚动式计划 亦称滚动计划，是在起止年限上不断增减的一种中长期计划。这种计划是将计划时间自动向前延伸，使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在时间上紧密地连贯起来，以保持发展的连续性。

滚动式计划的编制办法是，把计划按年度分别列出，每过去一年，随即修订一次，同时续补上新的1

年计划，亦即每过去1年，追加1年，依此类推。

编制滚动式计划的优点是：第一，有利于提高计划的可行性。滚动式计划比较适宜于5年计划的编制。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原来未曾预料到的因素，如科技创新、体制变动、市场变化等因素，因此要不断进行修改。实行滚动式计划，可以把这些变化反映到新的5年计划中去，从而有利于提高计划的可行性。第二，有利于使长、短期计划相互衔接，保持协调。以5年计划为例，由于5年计划分年度执行，不断向前移，前面总有一个5年计划，从而可以使长期计划与短期计划保持衔接。第三，5年一滚动，计划工作人员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调查研究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满负荷工作法　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创造的，以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的企业管理方法。它以高效率、高效益为最终目的，以国内外同行的先进水平为追赶目标，以综合运用各种有效管理方法为实现手段，体现了企业积极进取，向高标准看齐、追求最佳成果的企业精神，是精神和方法的统一。

满负荷工作法，首先对企业各项工作提出比较先进的目标，然后由低到高分步实施、层层落实，形成保证体系，并与个人报酬挂钩。总的考核目标是人均效率、人均效益和资金利税率。主要内容有：(1)质量指标满负荷，以产品质量和品级率为考核内容。(2)经营工作满负荷，以设备生产能力的90%核定产品销售指标和原辅材料供应指标，达到产、供、销高度协调。(3)设备运转满负荷，除了正常维修占用时间外，所有设备的平均开动率必须达到95%以上。(4)物资使用满负荷，主要是原辅材料、工房和场地的充分利用。(5)资金周转满负荷，要求流动资金周转天数逐年缩短。(6)能源利用满负荷，要求万元产值的耗电、耗煤、耗水量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7)费用降低满负荷，要求单位产量或万元产值中的可变费用含量逐年降低。(8)人员工作量满负荷，推行标力定额，把每个职工的工作量安排饱满。(9)八小时工作满负荷，实行岗位工作系列化、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要求人人紧张工作，达到标准，完成任务，有效劳动时间逐步提高到7个小时以上。

实行满负荷工作法，可以促进生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干部职工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促使企业逐步向专业化过渡，促进职工收入和福利待遇的逐步提高。

锡克·奥塔（Sik, Ota1919—）　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1968年改革的主要设计者。191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普里森市，曾就读于布拉格的一所中等专科学校。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6—1940年在一家电器工厂工作时参加抵抗运动，1940年被德国占领军逮捕，关入集中营，大战结束时始获释放。1947—1952年在布拉格政治和社会科学大学学习，并开始其学术生涯。1952—1958年任捷共中央党校教授，1958年当选为捷共候补中央委员，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1962年任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1968年任捷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主持设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1968年4—8月“布拉格之春”期间，任杜布切克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领导了捷克的经济改革。同年8月21日苏军入捷，锡克当时正在国外访问，因无法回国而流亡瑞士，1969年10月被开除出党。1970年出任瑞士圣加伦大学经济制度比较学教授。目前仍在那里生活和工作。1981年3—4月，锡克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曾来华访问和讲学。

锡克1951—1952年参加了马克思《资本论》捷文版的工作。此后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著述甚丰，主要有：《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1954年)；《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58年)；《经济—利益—政治》(1962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1964年)；《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1965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1969年)；《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1971年)；《第三条道路》(1972年)；《第三条道路的论据》(1973年)；《共产主义的权力体制》(1975年)；《人道的经济民主制》(1979年)等。

锡克在上述论著中根据苏联东欧经济发展的实践，对苏联式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指出了它的缺陷和弊端，并相应地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锡克经济理论的显著特点在于：一方面系统地审查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偏离，分析和批判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及其对实践的危害；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在实践中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并以大胆、科学的探索精神研究了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从而为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新模式奠定了基础。因此，锡克的理论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概括起来说主要有(1)所有制理论。锡克从分析批判斯大林的所有制定义入手，重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所有制范畴，提出了正确把握

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方法论原则，认为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实质是一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过程，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从而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其它一系列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2) 经济利益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理论。经济利益理论是锡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最基础部分，正是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利益矛盾入手，锡克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源，从而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基础得以确立。(3) 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理论。锡克认为，社会计划调节是必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必须由市场机制来补充，而市场本身又有它的局限性，因此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必然性。结合的方式是计划调节宏观不平衡，市场调节微观不平衡。(4) 新经济体制模式及其过渡理论。锡克以前述的三方面理论为基础提出的新经济体制模式的特点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它有三大理论支柱：一是以职工共同点作为特征的公有制新模式；二是国民经济的宏观分配计划；三是有管理的市场机制。向这一目标的过渡必须慎重地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要有总体规划并适时地进行价格改革，尤其在改革之初须把工资奖金等消费基金控制住，以防通货膨胀。

〔参〕锡克的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

锡克的"第三条道路"思想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提出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式集中型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理论。该理论首次较系统地提出是在他1972年所著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其后又在其它著述中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阐述。其思想起因在60年代，当时他致力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建立"有管理的市场经济"作了广泛的探讨，并领导设计了改革的具体方案。但1968年8月改革受阻，他被迫移居瑞士，并在该国巴塞尔圣加伦大学从事比较经济学教学工作。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并同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问题作比较研究。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自己决定离开故乡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即进一步专心致志地从理论上加深和完善改革思想。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正式形成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并带来整个经济的周期性危机、通货膨胀和失业；苏联式的中央集权型体制则导致生产和管理的高度垄断，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和经济落后。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都有缺陷，都不能完全解决各自制度产生的弊端，必须对它们实行彻底的改革，创造一种发展现代经济的人道的和民主的新社会模式，亦即介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的这一新模式提出后，受到国际思想界和舆论界的重视，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人指责锡克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另一些人则因为锡克没有宣布赞成资本主义而不快。锡克自己则明确宣布：这既不是背叛共产主义，也确实不是赞扬资本主义！

锡克认为，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多数人已逐渐要求改变或者说实行某些制度原则，这些原则可以看作是未来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说最突出的有四方面：(1) 由于多数人日益要求消灭那些与企业相脱离的资本所有者，要求克服通货膨胀，从而产生一种强烈要求资本集体化的利益。通过资本集体化，雇佣者对资本发展的漠不关心、劳动者与其生产基础的异化以及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无责任感将趋向消除。同样，这种多数人的利益也必然反对教条主义的国有化企图，因为生产的国有化将导致普遍的官僚化，即经济发展将屈从于官僚们的政权利益，劳动者将再次并极度地与他们的生存基础相异化。(2) 对宏观经济实行民主的方向性的计划管理，这是已经出现的符合现实利益的要求。通过这种计划安排，将保障非生产者的利益与生产者的利益获得同等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将受到控制，使之趋于人道的目标。由于多数人的利益愈来愈要求实行社会发展的人道化，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必然遭到拒绝，因为它不能使民主得到加强，它是一种官僚机关压制多数人利益的管理制度。这种计划管理不仅使经济效果大大降低，而且同时限制了个人和社会的消费发展。(3) 保持市场的基本职能，对宏观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这也是现实存在的多数人的利益所在。通过建立在集体资本利益基础上的国家收入政策、贯彻始终的国家反垄断政策、外贸政策等等，市场的范围及其基本结构的发展将得到调整，通过市场反映出来的和不能通过市场反映出来的需求也将有意识地得到同等的满足。这样，消费利益也就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保障。这种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必然要拒绝一切企图消灭市场的乌托邦思想，因为它只能导致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单方面统治，并埋没生产者使生产获得有效、高质量和结构灵活的发展的兴趣。(4) 政治民主必须进一步加强，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使一切政治和经济机关不再为政党和政治利益所垄断，使非生产者的利益也能得到同等的重视。民主的加强还意味着：允许各种利益可以更自由地组合，提出各种社会改革和计划的建议；通过有意识的机构改革，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对权力的依附；使民主的代议制与科学的利益分析相结合；使宣传机器宏观化以及加强公众的监督和讨论等等。锡克有关"第三条道路"的上述构想在后来撰写的《人道的经济

民主制》一书中又得到了具体详尽的阐述。

锡克的宏观分配计划理论　锡克经济理论模式的三大支柱之一，阐述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想制度中为避免宏观经济紊乱而必须实施的宏观经济分配计划的目标体系、组织方式、过程内容和相应的经济政策等。锡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体系中的计划与市场应该恰当地进行分工：国民经济中的微观不平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因为这种不平衡取决于产品的需求结构，而需求结构复杂多变，不可能由统一的计划来解决，市场则是调节的有效手段；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同两大部类的生产不协调而产生的宏观不平衡则恰恰相反，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而必须通过把指令性的生产计划改为宏观分配计划来解决。

1.宏观分配计划的目标体系。锡克认为，宏观经济分配计划并不象社会主义控制计划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旨在取代市场机制，而是要用以补充市场机制以调节经济的发展。这特别适用于市场机制无法得到应有控制、或者只有通过经济过程受重大破坏的情况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宏观分配计划和许多西方工业国家现行的计划制度大不相同，它远远超过仅仅限于充当市场所运用的以保持动态平衡的一种辅助工具：除了其他各点之外，首先应该作为使经济人道化，使某些社会和超经济的目的更加牢固地统一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具。与此同时，它还应该成为这样一个主要工具：全体居民能够根据充分的情报资料有意识地和民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未来。锡克认为，每一个计划的特征都有一定的双重性：一方面，这里包括过去发展方面的统计和证据，从而提供了知识的现有水平，并为未来形势的发展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推断，因此这是一个把过去的宏观发展规律和根据它们作出未来的推断等同起来的问题，亦即是一个有关发生论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计划也定下经济政策所面向的目的（这并不需要按照权威规定的目的，经济政策可以通过经济手段直接保证其实现），这是一个目的论结构的问题。因此，每一个计划实际上既包括自主经济发展的预测，也包括对确定的目标的计划。而计划的目的，一般说来就等于一个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即必须依靠一个计划体系的所有一切子计划来实现的那些目的。因此它实际上代表多个计划时期的特殊计划的具体化、特殊化的完整目的的共同实质。由此，锡克认为可以把宏观分配计划的一般目的表述如下：（1）保持宏观经济平衡；（2）按照生活质量所寻求的发展对消费的发展作出宏观比例的调节；（3）调节经济增长的步伐；（4）维护或改造个人收入政策；（5）维护或保证合宜的劳动时间、职务升迁、再训练（重新取得合格证明）和医疗福利；（6）实现不同民族和地区经济合宜的平等发展；（7）创立合宜的健康的环境条件和工业与城市的大综合企业；（8）保证经济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和能源基础；（9）达到社会范围的合宜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2.宏观分配计划的组织方式。锡克认为，如果预期的发展不致变成仅仅是一场幻梦，那么每个计划时期的子计划所列的这些目的就将开始被认为是生产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计划一方面总是要根据对现成的生产力和对计划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可能性的分析来制订；另一方面要根据纳入计划的需求和利益以及决定未来经济发展的具体目的来制订，因而需求和利益将对计划的制订和选择发生决定性影响并表现于计划的具体目标之中。对于计划的准备、提出和选择的组织则必须这样来进行，即要使居民中的广大群众都能参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各种基本方案的讨论，而大众宣传媒介能够为这种讨论服务，每种利益集团能够结合起来，它们的代表将能积极参与计划的准备；尤其是必须能容许少数利益集团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且必须把每种不同的计划方案与它们协商。因此，要紧的是对宏观分配计划的制订必须民主地加以安排，决不容许不该出现的权力集团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计划，或者把它们自己的局部利益强作代表全社会的利益。锡克还认为，分配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尤其是在新制度中，分配过程将能把一定的消费及生活目标同生产的最佳发展结合起来，并使这两种基本过程协调起来。如果说通过民主组织制订的计划目的决定只代表计划的目的论的一面的话，那么分配过程决定就不仅要适合于目标要求，而且还必须是根据有关生产的可能机会的宏观可靠的情报作出，这涉及到计划的发生论方面，即必须检查以科学分析方法制订的计划所提出的目标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究竟能否实现。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计划工作的组织必须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即必须把有科学根据的分析方法同通过民主程序以制订计划的准备阶段开始起就提出的目标结合起来。这就要求采用特殊的计划方法，并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单独由政府最高级机关依靠官员和专家（由科技人员出身的行政官员制订计划）的帮助制订经济计划是不够的，而必须强调从一开始起合作计划就要有各种专门委员会参与工作。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就完全不需要由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专家们提供的计划模式，实际上两种方法是结合起来的，虽然合作方法起着决定作用，因为从制订计划阶段一开始就单靠它来推动作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民主结论。根据锡克的设想，负责计划制订的一些主要委员

会包括：(1) 生活质量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从制订计划的目的论方面去促进发展目标（生活质量目标）的形成。(2) 生产部门总委员会或生产委员会，任务是从计划工作的发生论方面通过对生产性质变化的实际发展趋势和可能性的明确认识来达成生产发展计划目标。(3) 总计划委员会，它居两个综合性部门委员会之上，宗旨是协调各部门委员会各方面的计划工作、并承担制订宏观计划的实际准备工作。(4) 经济委员会，它是政府主管经济政策事务的机关，负责每个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计划的准备和计划的执行，因而总计划委员会从属于该会。以上各委员会之下又分设若干子委员会，以具体负责各方面的工作。每个专门委员会和子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具备以下两项条件者担任：具备特殊的专门知识和特殊利益的代表性。

3.宏观分配计划的制订过程和内容。锡克把宏观分配计划的制订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预测生产的增长，由此可以计算出需要增加多少投资、多少劳动力；然后根据人们所希望的计划目标以及增长和投入之间的宏观比例决定产品的使用方向，即多少用于补偿性投资，多少用于纯投资，多少用于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在此，锡克强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先进工业国家的居民究竟是否成熟，或者说他们能否对不同方案的某种选择作出判断。锡克指出，任何一个对人民关于不同发展方案的统计判断能力表示怀疑的人，必然会反对由人民自己作出取舍的宏观经济计划的任何公众的政治选择，而实际上正是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不仅是使群众朝向对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越来越关切的一个决定步骤，而且又是防止将来过激的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即使这可能有危险，即在以后可能证明居民大众对未来的抉择并不比另外的决定更为有利，但这毕竟比把未来的决定权留在少数权势上层分子手中强，因为后者也同样可能是错误的。而关于宏观分配计划的内容，锡克列举了五大项：(1) 计划必须强制规定统一的工资等级表，同时也就确定了工资在国民收人中所占的比例。国民收人＝工资+利润，确定了工资的比例，也就可以确定利润的比例。(2) 计划必须规定税收在利润中所占的比例。税收一般用于社会消费（包括劳务和社会福利），确定了税收，也就确定了社会消费的规模。(3) 计划必须规定职工分红在利润中所占的比例。由于利润＝纯工资+利润中的储蓄+税收+利润分红，规定了税收和利润分红，也就等于规定了纯投资在利润中的比重，也就可以调节生产的增长。(4) 计划必须预测个人储蓄在工资中的比重，同时对消费信贷总额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以保持信贷总额和个人储蓄余额的平衡。(5) 计划必须保证投资信贷总额与利润中的储蓄余额相平衡。此外，计划还要对税收和使用进行细分，如多少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多少用于劳务支出，以及劳务支出中多少用于行政开支、多少用于国防费用，等等。

4.宏观分配计划与国家经济政策。锡克认为，宏观分配计划的目标应该通过间接操纵工具来实现，也就是基本上采用一种国家经济政策，并自始至终地加以贯彻，因而实现计划目标的工具并不是对生产和投资的严密组织，这种组织的任务将由企业面向市场发展的条件和宏观计划公布的消费方向的目标及政府的计划统治政策措施来完成。这表明，符合市场情况的经济政策，通过对收人的调节，将能指导适应计划目标的生产和投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经济政策实际上构成了宏观计划的关键性要素。概括起来说，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六项：(1) 工资政策。它必须保证把计划中规定的计划平均工资增长率作为五年计划中每一年的平均增长率，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劳动人民已经按照他们实际从事的工种划分出工资类别，并把它们分别纳人了规定的工资级差。工会为各个部门拟订的工资标准，以及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工资增长率和纳入宏观计划的工资标准，将是有约束力的政府工资政策的基础，因而坚决执行这些工资标准和条例正符合工会本身的利益，故由工会来进行管理可能要比政府当局来执行更为合适。(2) 利润分成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利润分成系数和宏观计划中规定的计算方式来执行的，目的是要保证全体共有企业职工的利润分成。为此就有必要在企业中按照记录利润的相应条款统一计算利润额，把它们变成统计数据，并对这些利润进行控制；让人人都可以看得见利润的发展情况，从而使任何暗中掩盖利润的花招都能够揭发出来，并加以取缔。(3) 企业主利润政策。企业主利润将通过鉴定企业主纯利的最高额，确定来自利润盈余的中性化资本发展的系数和用于过低利润的税务补助这三项措施的结合使用来由计划决定，目的是要对企业主的经营形成刺激力。(4) 财政政策。其职能是确定和保证计划所决定的国家收支。比较长期的税务制度将由计划来规定，并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税收和其他国家收入。财政政策的任务在于：第一，建立长期税务制度；第二，确定并保证计划规定的短期全国税收，并维持计划规定的工资和利润税的执行。(5) 信贷政策。其任务是要使信贷与储蓄结合发展、贴现率的变动和国家向生产方面提供信贷能全部保持正常。整个银行系统发放的信贷如果能在符合于每个收人使用集团的信贷偿还和净储蓄形成方面得到确保，那就可以防止通货膨胀。国家中央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将起主要作用。(6) 货币政策。它承担着在一国内反对外来经济破坏和保护政策的首要任务。通

过对货币升值或贬值的调节可以十分有效地使进口额适合于出口方面预料不到的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的变动。最后，锡克认为经济政策不仅要设法保证计划确立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促使其实现，而且还要不断的将经济的实际发展同计划的预期指标进行对比，当发现原来估计错误时要及时进行干预并避免对于平衡竞争产生更大的影响。

5.宏观分配计划的进一步拓展问题。锡克认为，宏观计划必须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因为以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是遍及全国的活动。此外，还有相当部分生产用于满足外国要求，因而如果能够发展一个全世界体系的宏观计划就更是求之不得了，虽然这在政治上不可能。但是，即使能够有一个包括整个欧洲共同市场的宏观计划也将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幸的是现在连做到这一点也有重大障碍。当然，通过计划维持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收入和生产的平衡只能有利于这个地区的人民。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限制各国人民的民族自主权，因为他们都能够民主地参与最后协作团体，并参与可供选择的联合计划的制订。即使每一个自主的国家都有其自己的宏观计划，经济发展的相互协作也是值得提倡的。但在今天，欧洲经济共同体还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它的经济和制度很可能使它放任自流。因此从长远观点来看，宏观计划从一国乃至数国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是必要的，问题只在于时间和条件。

〔参〕锡克的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

锡克的有管理市场机制理论　锡克经济理论模式的三大支柱之一，主要阐述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想制度中市场机制的发生和运作机理，如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作用的必然性、作用的条件和特点，以及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相应的反垄断措施等。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必然性。锡克认为，那种把市场自动地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市场即早已有之；资本主义市场是空前发达的市场，但还不是市场的最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也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存在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信息问题。锡克认为，任何一个中央计划机关，即使依靠电子计算机系统，也不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从而对于百万种不同种类、不同规格的产品做出统一的安排。比如，它至多只能计划钢铁和棉纺织品这样的总目，而不可能计划钢材的品种规格或衣服的花色款式等细则。如果要制定这样一个包括若干细则的具体计划，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在这种计划制定出来时，社会需求早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计划也就早已过时了。因此，国家只能提出一个粗线条的总的生产增长计划，关于微观发展和技术发展的具体决策，必须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二是利益问题。锡克认为，信息不足还不是社会主义市场关系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更重要的，也是以往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利益矛盾。这些矛盾中有一部分，如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可以通过计划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来解决。但另一类利益矛盾则不可能依靠计划手段来消除，它们主要有以下几对：(1)从使用价值角度来看的具体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锡克不赞同那种把从价值角度来看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作为商品交换关系存在基础的"分配论"，认为强调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强调等价交换，只是阐述了这种一般必要性，而还远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实质。"分配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人们即使以等价交换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仍可以把商品关系抽象掉，如国家可以从企业那里以取证方式取走产品，然后按照所耗费的劳动直接分配给劳动人民。这也就是说，"分配论"没有能说明为什么不能直接按照等价进行分配及为什么必须存在货币和价格。实际上，货币和价格不仅在分配领域中发挥一种特有的职能，而且还解决了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内部的特定矛盾，后者单靠不同劳动产品的等价交换是解决不了的。那么，究竟具体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表现在哪里呢？锡克认为，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而言，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各种各样物质产品的需要，但在计划管理体制下，中央计划管理机关借助于各种指标只能控制产量的发展，亦即计划只涉及既有质量条件下的产量增加，而不能解决使用价值的发展和改进。这就使得传统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呈粗放型并积累起具体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2)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矛盾。锡克认为，只有使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处于最佳协调状态，才能保证社会消费的最迅速的和不断的增长。但是，仅仅依靠计划管理并不能实现生产的最佳发展，即不仅追求产量的增长，而且注重质量（包括品种、花色和新产品）的改进。这是因为：首先，中央以及地方计划管理机关，不可能掌握社会各方面对产品的具体要求，也不能掌握众多的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的情况和潜力。即使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计划工作中的时滞，待到上级机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时，现实的需求也已发生了变化。其次，在旧的行政管理制度下，生产企业服从于上级机关的行政指向和利益指向，从而追求以牺牲使用价值发展为代价的数量型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唯上级指令是从，而置消费者的需求于不顾，往往损害消费者的

利益。因此，只有当人们作为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狭隘生产者利益支配下的生产决策直接造成了他们自身消费的贫乏时，他们才会有兴趣去寻求最佳的生产决策。针对此，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必须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它不断迫使人们在作出生产决策时尊重消费者的利益，使每个生产者作为消费者从否定的方面感受到他自己的片面决策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从而从肯定方面感受到他自己的最佳决策。(3) 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矛盾。锡克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的普遍一致性，以往被人们绝对化了。实际上，在这种一致的内部还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偶然的管理上的错误所致，而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耗费的宏观条件中，亦即产生于社会主义现阶段劳动和消费的性质。现阶段的生产仍然要使用较多的人类劳动，而这种劳动与其说是人的创造性的活动，不如说只是机器的附属物。因此这种劳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部分生产劳动还不是创造性的劳动，还不能成为生活的需要，大量单调的、片面的、令人精神紧张和易于疲劳的劳动还只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因而劳动本身还不能成为完成这种劳动的直接刺激，相反地还必须有其他的劳动刺激；二是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人们生活的相当一段时间要花费在劳动上，这种状况造成了僵化的劳动分工和劳动者的片面发展，大部分劳动者不得不终生从事于同一种职业。由此，锡克确认决定劳动刺激形式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分配和消费关系，因为除了少数科学家、发明家一类的劳动其本身创造性足以引起人们极大的劳动兴趣以致分配和消费过程对劳动的刺激只有很小的影响外，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发展状况的影响，亦即多数人直接感兴趣的是要达到最大限度的物质消费，逐渐满足越来越高的需要。这样，如果不把所有人的消费同他们参与社会情况联系起来，也许大多数就不会从事这种劳动，这也就是现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劳动与消费的上述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以下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企业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呢？锡克反对那种依靠觉悟、道德等精神方式来解决的观点，而主张以经济的方式来解决，理由是：一定条件下，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的方向是一致的；精神鼓励不是万能的，社会主义觉悟本身并不能产生或改变人们的直接利益，相反地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直接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普遍地和长期地增长下去，以致劳动人民根据自己的反复经验而确信只有按他们的直接利益行事才较为有利，则教育就会毫无用处，觉悟也会成为空话。而经济的方式是什么呢？锡克认为就是市场关系或市场机制。

2.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和特点。锡克认为，市场关系的一般内容可以表述为：其外部形式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交换，在交换中供货者和受货者可以比较独立地作出决策并具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非迫于法律强力而购买或出售，而只是经济上的买卖；其实质是按一定的交换比例通过货币价格进行的使用价值交换，使作为最一般的交换比例的基础得到实现，而所耗费的劳动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因此，市场关系的作用归根结底是解决经济矛盾：首先解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其次是调整生产者和消费者、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锡克也指出，市场关系从属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也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 买方市场。买方市场的存在是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第一个条件，因为只有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消费者才能成为主人，才能迫使生产者特别注意需求的发展，使生产计划能灵活地适应需求。(2) 竞争和市场价格。同买方市场相联系，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需要有一定的竞争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价格形成，若生产和价格由国家垄断，没有竞争的压力，市场机制便难以起作用。(3) 利润差别。不同的利润发展和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取得的不同成果的表现，也是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企业的经理和企业家比另一个企业的领导善于经营，这个企业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这种由提高经济效果而获得的利润增加同由垄断利益而产生的利润增加是有区别的。为了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保证由经济效果所决定的利润差别得到宏观的反映。(4) 平衡价格。市场平衡价格的形成也是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条件之一，因为只有在价格迅速反映供求之间的每一变化并通过价格的涨落平衡市场的供求双方时，才能防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必要的损失。一般地说，只要不发生巨大的宏观经济的紊乱，潜在的价格波动依靠灵活的生产变动和调整就足以保持商品供求之间的相对平衡。(5) 投资发展。市场机制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就不仅要影响生产的发展，而且要影响投资的发展，因为生产的发展决定于先于生产发展的投资。同时，投资的主体必须与投资效益有切身利益关系，否则投资者就不会对生产的具体发展承担责任，也不会关心生产的未来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投资决策的权力应该放给企业，这样在市场机制的刺激下，将会产生出比国家垄断的计划投资体制更高的投资效益。(6) 创业活动。在市场机制中，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充满着风险，需要对未来的市场有更可靠的预测，这就要求企

业和创办者具有现代化企业家的精神：一方面他必须知道未来生产应具备什么样的最低限度要求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真正感到未来的赢利或亏损将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这样他才能对创业活动具有必要的责任心。(7) 企业的关闭。市场机制的运行还要求实行企业关闭和破产制度，即企业经营不善，利润减少以至没有偿付能力，就必须实施破产，否则市场机制也将不能起积极的作用。锡克认为，以上七方面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中也应该具备，并且还会具有自己的特点，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有管理的市场机制，是计划和新经济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总特点决定的。而且由于新制度下工资和利润利益之间的社会对抗已基本被克服，市场机制的发展将比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显得更好：一方面，所有生产者关心的将继续是尽可能高的利润率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所有个别企业的实际利润率偏离国民经济的相应利润率，都必然只能反映它们的效益和它们经营所创造的使用价值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而并不反映垄断优势、对市场的统治、对生产的操纵和信息优势或任何类似的劣势。

3.社会主义市场的完善化问题。锡克指出，要建立上述有管理的市场机制，使它有效地发挥调节作用，就必须注意市场的完善问题。锡克认为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方面：(1) 努力消除市场的垄断性。锡克说，只有在供过于求、买方占优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存在生产企业之间真正的竞争，企业才不能靠采取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办法（如抬高价格、降低质量）获得高额利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发展，市场的某种程度的垄断性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竞争不能为垄断所消灭，但垄断可以使竞争条件变得不均等，从而也使每个商品生产者获得的经济收益大不相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就是生产者处于垄断地位、产品不愁卖不掉的卖方市场，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产品越是缺乏，消费者的需要越是不能得到满足，占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就越是不注意改变生产结构和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这种垄断条件下，市场就起不到积极作用，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努力消除市场的垄断性。为了不致混淆这种垄断与另一种垄断的关系，锡克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宏观垄断与微观垄断的概念。锡克说，如果我们把“垄断”定义为在对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或购买）中的一种优先权或占有权，那么微观垄断就是专指对市场上某种个别产品的独占权。独占的原因是这种产品至少在目前还不能仿造，并且也很难替代，因而这种产品往往能按有很高利润率的垄断价格出售。锡克不认为这种垄断是有害的，也不相信它对市场机制有多大不利影响，相反地认为这种专利产品或名牌产品类型的垄断所实现的较高利润是对创造发明活动的一种重要鼓励。会促进竞争的开展、而真正成问题的是宏观垄断。宏观垄断指的是大公司（康采恩）在某些生产部门的优势，其产品包括广大的产品门类。更极端的一种情况则是绝对宏观垄断，它一般出现在国家垄断的条件下。因此，真正要消除的实际上是宏观垄断。那么如何消除垄断呢？除了严格控制大公司的规模，适当地把国际市场的竞争引人国内市场等措施外，锡克认为还可以通过反垄断委员会采取以下措施促进竞争：一是国家支持局外企业进入垄断化部门；二是支持在垄断化部门中创立新公司；三是支持低价产品进入垄断化部门。此外，锡克还着重提到了垄断税问题，认为虽然采取了以上措施，但由于资金在各部门间的流动还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有时还会形成某些垄断收人。因此他主张对这种收人征收垄断税，具体做法是：由国家在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之上规定一个盈利率的上限，如果企业连续几年超过上限，就意味着出现了垄断利润，这时就要对该企业征收垄断税，使企业盈利率降下来。(2) 提高市场的透明度。锡克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营业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各个企业的生产、销售和盈利情况都处在严格保密状态中，公众不了解，市场透明度低，因而市场调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社会利益的根本一致，有条件且应该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的这种缺点，保持和提高市场的透明性。具体办法是：计划机关、统计机关，特别是银行这个社会的簿记中心，要密切观察市场情况，经常公布每个企业的生产和财务状况、市场的近期和远期预测等。社会的这种信息指导将使企业的活动能更自觉地同宏观范围的计划相配合，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锡克的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

锡克的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理想模式，简称锡克经济理论模式或锡克模式。这一模式有三大理论支柱：一是作为其微观基础的以资本中性化和企业职工共同占有为特征的理想的公有制模式；二是国民经济宏观分配计划；三是有管理的市场机制。而这一模式提出的理论基础是锡克的有关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为避免重复，这里着重介绍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再概述锡克经济理论模式的诸要点。

1.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必要性。锡克认为，社会主义计划调节不是万能的，必须由市场机制来补充，但市场本身也有它的局限性（即使消除了垄

断和具备了较高的透明度)，主要表现在：(1) 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后期，它表现出由于垄断而造成的严重的不平等和其他缺陷，一部分人通过他们的市场活动取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利益，即超额垄断利润；当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以后，还导致了生产者对消费者的"专政"。(2) 市场体系本身不能单独反映市场的未来。市场反映的只是在过去的生产和分配基础上出现的需求结构，至于将来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生产价格、贸易情况、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将会怎样，以及未来生产结构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需求结构的问题，既有的市场很难做出回答。(3) 市场本身不能防止那些经常会出现的、对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具有很大危害的干扰，这种对再生产的宏观经济的干扰将导致大的经济损失。(4) 单就市场而言，它已不再能影响社会的某些重要需求的发展，不能迫使生产结构作相应的改变，因为自发的生产和市场的发展具有一种经常性倾向，即重复产生现存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制造不必要的消费，而其他社会需要，如教育、文化、医疗、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需要则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上述情况表明，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应当反对那种对市场作用过高的、片面的估计，尤其要反对那种认为市场机制万能从而否定计划管理作用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性的本质在于，一般的基本的经济联系不是必然要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自发地实现的，而是可以并且必须预先科学地加以认识和考虑的。这正是计划管理存在的必要性之所在，具体地说就是：(1) 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的事后调节迥然不同，它是以未来的经济发展为依据，对资源配置和投入产出的一种预测和安排，可以避免因比例失调、经济波动所付出的不必要的代价。(2) 计划调节不仅可以反映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而且还可以及时地预测出影响该种商品生产的其他种类商品的间接需求和供给的变化。(3) 各种适应需求发展而自发发生变化的生产结构，不一定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生产结构，因为在每一种经济社会中，不论从满足最终需求的角度看，还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都存在着许多替代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可能对所有各种选择进行衡量和比较从而找出最佳方案，生产结构的形成往往就会受完全偶然的因素所支配，这种结构也就很难是合理而有效的。(4) 某些种类的消费在社会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其形成取决于整个国家的某些政治决策和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干预，例如社会消费、分配和国家投资等，这种需求不会在市场上自发地形成，因而不能靠市场机制来满足。根据计划与市场作用的上述这些特点，锡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长远看，单靠没有市场的国民经济计划都不能保证经济有效和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发展，因而出路在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2.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具体方式。锡克认为，不是任意形式的计划都能实现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同市场机制就是互相排斥的，因而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必须把指令性的生产计划改为宏观分配计划；通过宏观分配计划不可能使生产结构和社会需要相适应，借助这一计划来确定未来的国民收入分配，确定个人的市场需要与社会消费发展之间的比例，并进而影响生产条件和其他社会需要进程的发展。循此思路，锡克论述了计划与市场两者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体系中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即计划管理的是国民经济中的宏观不平衡问题，而市场机制则用来解决微观不平衡问题。所谓宏观不平衡，是指由生产资料的总供给同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不相协调，或消费品的总供给同对消费品的总需求不相协调而引起的不平衡。换言之，是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所讲的第一部类同第二部类之间，由于 C、V、M 的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不协调而发生的不平衡。所谓微观不平衡，则是指在宏观平衡已经建立的条件下，由于各种具体产品的供给结构同需求结构不协调而产生的不平衡，即在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相协调的情况下，一个部类内部各种产品或产品品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这两种不平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果宏观不平衡，就不可能实现微观的总体平衡；微观不平衡最终也必然影响到宏观平衡。锡克认为，两种不平衡产生的原因不同，解决的手段也就不一样。(1) 微观不平衡取决于产品的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复杂而多变，不可能由统一的计划来解决，而市场则是调节这种不平衡的有效手段。市场机制就象控制系统一样，能够自动地发挥作用，其积极的方面表现在：生产过剩，利润就会减少，积累下降；反过来生产得太少，不能满足需要，利润就会增加，积累就会扩大。锡克不赞成把资本主义比例失调、宏观紊乱都归罪于市场机制。他指出：过去某些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巨大的比例失调、宏观紊乱以及危机的发展只能用一个办法来解决，这就是用指令性的生产计划来代替市场。实际上这里存在着基本的逻辑错误，按照这种错误的逻辑，似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市场机制引起的，但其实市场机制基本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引起宏观紊乱的原因不是市场机制而是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结论，即社会主义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并且社会主义依靠市场机制可以比依靠指令性的生产计划运行得更好。当然，社会主义必须保证收入分配能够避免宏观紊乱，保持社会经济的宏观平衡。(2) 宏观不平衡产生的原因不在于需求结构的

变化，而在于工资和利润的分配间两大部类的生产不协调。工资与消费资料相联系，而利润一般与生产资料相联系，二者的变动必然影响到两大部类的平衡。这种由于宏观分配原因而产生的不平衡或紊乱，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不应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加以排斥的理由之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可以做到通过更完善的市场机制实现微观上的平衡，又通过宏观分配计划保证客观上的平衡。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这样一种新体制下，企业不会再向计划机关提供假情报，也不会再无休止地争原料、争投资，因为企业是面向市场的生产者，它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它们要取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提高经济效益。

3.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体制的原则和目标。锡克指出，改革后实现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经济制度有三个基本支柱，即资本中性化、宏观分配计划和有管理的市场机制。这种经济制度应当而且能够贯彻下列新的原则和目标并建立新的经济结构：(1) 考虑到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而制定出来的宏观分配计划，将会使工业化社会实现进一步的意义深远的民主化，从而为后工业社会的人道化做出贡献，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吸引力。(2) 宏观分配计划能够使社会的经济发展超出纯粹创造利润的范畴，因为增长本身将不再是一种目的，而成为达到民主决定的目标的一种自觉的管理手段，经济未来进而将不再是人们所面对的盲目的命运，而可以使经济的基本发展得到有计划的管理。(3) 任何经济活动的目标，即不断改善人类需要的满足，不应当被降低，而应当被有意识地加以强调。而且，改革将防止发生垄断生产集团单方面操纵需要的现象，并为经济领域中人们的非经济利益的数量不断增长奠定新的基础。(4) 人的多种需要，如更强的安全感、工作满足、个人充实感和自我实现、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设置更符合人道的工作条件、机会均等和缩小社会不平等、增加闲暇时间和丰富个人兴趣等，将愈益补充人们的物质需要，而这些需要的满足和实现只能通过宏观和微观经济领域中制度上的改革来完成。(5) 人们真正的机会均等，只有在个人之间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生活条件的差异被缩小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在利润分配方面实行有计划的决策，扩大社会保险，通过计划协调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进行增加闲暇时间的调整，以及工人共有企业中人们自我意识的变化等等，这一切都有助于缩小社会不平等和实现更大的机会均等。(6) 经济增长能够通过那种使多种不同的目标并不相互冲突的方式得到有计划的管理，如人口的发展最终将要求不仅对经济增长实行管理，而且也要对人口增长实行管理，没有客观计划，这些相互矛盾的发展目标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冲突局面。(7) 充分就业和每个人的工作权可以通过按计划提供投资资金和确定经济目标和途径得到保证，而充分就业并非必然地要求经济增长，只有在对其他目标的追求使充分就业变为迫切需要的情况下，投资的发展才能保证创造所需要的工作职位。在社会选择缓慢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低投资活动没有为大家创造足够的工作职位的情况下，应当有计划地缩短工时；而无论社会选择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投资和工时的管理都应按照能够保证基本充分就业的方式来进行。(8)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没有个人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社会便不能前进。即使在实施宏观计划的制度下，依然需要有一些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活动。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不但要利用利润动机，而且还要保证私有财产。当然，生产价值的私人所有权和利润占有权并非就等于依靠资本收入无限地积累财富。实际上，由于相应的保证将扫除被没收财产的疑虑，必不可少的企业家主动性会大大增强。(9) 在面向市场的企业中为劳动者创造利润利益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的投资和效益，因为资本和利润不再是与工资利益相对立的异化的经济力量，而是转变为劳动者利益的当前目标并与他们的工作利益联结在一起；劳动者将把资本视为他们自己的经济基础，他们对资本使用、增长和投资活动漠不关心的态度将会改变；投资将不再与工资和消费利益发生冲突，而是可以有计划地与这些利益协调一致。(10) 劳动阶层将愈益把利润看作是剩余产品的货币形式，要求进行净投资以实现有计划的经济增长和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这种利润观念的形成出自于诸如在企业中以公开利润分配和使用计划、对私人占有利润实行限制，以及开展关于利润使用方面的教育等因素，而公开利润的发展情况能够消除人们对利润状况的怀疑，并使人们的利益与其企业的目标乃至整个经济的目标达到一致。(11) 工资的提高将不再必须通过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进行斗争来取得，而将根据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由计划决定。其中工会将参加计划委员会和生活质量委员会并在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职责是根据整个经济情况制定工资类别标准，提出工资增长的选择性方案。(12) 社会保险被公认是人们在社会中的重大权利，是根据工资发展状况有计划地实施的。由于不存在生产和收入的周期波动以及大量失业的现象，必要的社会保险收入能够通过比较稳定的年度税收得到保证。这样，社会保险收入不足以满足需求的现象将不再会发生，个人在老年时期和患病期间所面临的一种不符合人类尊严的不安全感将被消除。(13) 由社会满足的需要在将来具有愈益重要的意义，因而尽管在不远的将来收入和消费的差

距作为完成不同强度的工作的动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个基础上平等化趋势将以集体满足需要的形式出现。(14) 生产活动必须把效率原则当作最重要的原则，因而实现利润的最佳化仍将是主要的动力。但与此同时，社会活动的新的目标将获得重视，这些目标将在工作过程的民主化和人道化的支持下为提高人们的工作满足程度并使他们与企业的紧密结合得到发展，从长远看这也能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15) 在职工所有制企业中建立自我管理工作小组并形成民主管理风气，能够最有效地消除生产过程中人与工作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因为人们在工作小组中获得信任和支持，就最容易克服自己的孤立感和在同事面前的卑微感。(16) 完善的市场机制能够使收人形成更符合企业的行为并使生产要素更有效地配置，因为市场机制形成了一种能够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经济中自动协调起来的自然的控制体系，对这个体系最大的威胁是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垄断化和官僚主义化，而市场机制的完善特别要求强化市场透明度、促进竞争和有计划地限制宏观垄断利润。(17) 在征收垄断税的基础上降低宏观垄断利润率，实际上取代了各部门和各企业间利润率平均化这一业已消失的趋势。这样，利润的发展将始终如一地反映出企业不同的经营水平，并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起刺激作用。

4.实现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的步骤。锡克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在实施改革时必须慎重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采取妥善的改革步骤，以保证比较顺利地从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据此，锡克认为改革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 改革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最糟糕的是想要不断实行改革，而又没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和规划。没有总体规划的改革必定很混乱，有时前进一步，尔后又退了回来，例如，改革中注意到了利润增长的刺激，但忽视了其他的制约条件，如不能消除旧的垄断性机构，允许卖方市场的存在等，结果是甚至比没有利润刺激更糟糕。(2) 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步骤。在中央用行政手段规定价格的体制下，价格不能为企业的生产决策和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因为这时的价格结构既不符合生产成本，又不符合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大大影响了生产和投资效率，造成了供需脱节。因此，要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改变旧的价格结构。但锡克也认为，价格改革必须极其慎重，要做好充分准备后有步骤地进行。而在价格体制没有根本改革以前，应充分利用税收手段给不同类型的企业规定不同的分成率的办法来克服由于现行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生产价格）造成的苦乐不均现象。(3) 在改革之初，必须把工资（包括奖金）严格控制住，否则就会陷于被动。因为在改革前就已经存在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如果在改革还没有收到实效以前就贸然提高工资奖金，势必会扩大供求之间的差距，加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的后果，这反而会给改革造成困难，使群众对改革失望。(4) 改革过程中必须慎重、稳妥地处理好个人和每个社会集团间的利益关系，以减轻改革的阻力。

〔参〕锡克·奥塔

锡克的资本中性化理论　锡克经济理论模式的三大支柱之一，阐述改革后理想制度中企业微观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及相应的一系列运行规则。从所有制上看，这些企业属职工集体股份所有制性质；从运行状态上看，则可通称工人共有企业或职工所有制企业，或简称资本中性化企业，因为资本中性化是这些企业最主要的特征和运行的基础。而所谓资本中性化，是指建立那种使企业中的资本所有权既不属于个人，也不能在个人间分割的财产形式，因此它首先是指新制度中资本的形成所要经历的过程，进而是指资本形成后所具有的全新属性。从过程上看，它们有源于私人资本的，也有源于国有资本的；但从属性上看，它们都完全脱离了这两种资本的运行轨道，并且也不同于传统的集体所有和抽象的社会整体占有，而是一种新的中性资本，由企业的每个职工共同占有，并集体地使用和支配。

1.建立资本中性化企业的必要性。锡克对此开宗明义地指出：理想的制度改革需要某种形式的企业和生产资本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两种制度中所固有的倾向，即劳动人民对其企业的异化和他们对资本的漠不关心。这里讲的两种制度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国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权型计划经济。就前一经济来说，其微观领域的突出问题是资本所有权的异化和劳资双方利益的激烈对抗，后来出现的股份公司虽然代表着向资本所有权民主化道路迈出的一步，但这只是一小步，并未能解决制度的两大困难问题，因为：(1) 这种形式并没有阻止大宗股票的集中或多数股权掌握在少数股东手里，从而公司中的大量小股东实际上毫无发言权，他们被大股东按自身利益任意操纵；(2) 在工资收人者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什么也没有改变，对他们来说股份资本仍然是异化的所有权，他们与它的关系仍纯粹是劳工与工资的对应关系。当然，近几十年来在欧洲许多企业的经济实验中曾创造出诸如共同决策、资本分享和财产形成这样一些不同的概念，虽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但其实际效果却令人怀疑，因为诸如把一定比例的利润拨给职工和留作跨企业的资本基金之类的做法并不能改变职工与资本的关系及他

们在工资方面的排他利益；如果采取一种彻底的方式来实施跨企业资本基金的这种使用方法，则其结果将使该基金变得不为任何具体个人所有，以至它实际上会无异于投资基金的国有化，从而对这些资本的使用一无所知和毫无发言权。所以，锡克在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已经朝着资本主义所有权民主化迈进的逻辑发展必然要求两点：第一，必须使财产权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情况加以分散化；第二，一切工资收入者要克服他们的异化就须成为他们公司的所有者。

就第二种经济即以资本国有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权型计划经济来说，锡克认为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上述弊病，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从而从总体上看更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根据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实际情况，锡克将资本国有化所包含的严重问题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1) 职工与企业疏远化，原因是在国有化条件下，职工与生产资料处于实际分离状态，即无权参与企业生产管理、收入分配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决策，从而他们不但不关心企业的长期利益，而且对企业的近期利益也无从关心，能关心的只能是自身的工资利益；(2) 企业领导官僚化，原因是在国有化体制中，企业领导由国家任命并作为国家的化身行使对企业的决策权，因此他们的行为是只对"上"负责而不受企业职工制约，他们中的厂长或经理可以象资本家老板一样对待其职工，而职工不得不服从，实际上依然处于被雇佣的地位；(3) 企业经济效益低水平化，它是前两大问题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因为既然职工对企业经营状况漠不关心，企业对工人也没有直接的利益约束，企业领导的收入也与企业利益无关，则企业成员将普遍缺少责任感，仅有的资金刺激也不能根本解决责任、动力和利益约束问题，其最后结果是企业效益普遍低下，即使完成了上面下达的数量指标，也并不表明社会经济效益会高，因为一方面这些数量指标可能本身就并不符合社会需求状况，另一方面企业有可能弄虚作假，应付了事。正因为如此，锡克主张彻底抛弃资本国有化模式而实行资本中性化所有制模式，即建立工人共有企业或职工所有制企业。

2.资本中性化企业建立的途径。锡克认为，这种理想的企业应该有计划地逐步建立和扩展，而不是一下子全部完成，这是因为工人共有企业是一种在不剥夺前所有者情况下产生的财产形式，它使中性化资本能够从现有企业的利润中得以形成，步骤是在一个预定时间内按法定比例提取相应的利润份额。而那部分被用作中性化资本的利润，对企业来讲并没有损失，仍旧是它们自己的资本，能够用来进行净投资，所不同的只是其所有制形式改变了。这种有时序和分层次地按利润比例使中性化资本形成的做法有利于保护主要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中小企业的企业主的利益和他们的积极性，即中性化资本的形成在这类企业中只能在一定的利润水平上比较缓慢地进行，而在大公司中，中性化资本则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因为大公司的企业主职能早已从资本所有者那里转移到指定的经理手中，从而来源于相对较大的利润份额的中性化资本的形成与迅速增长将不会对管理活动发生很大影响。如果想进一步加速将公司转变为工人共有企业的进程，则全部的净投资乃至全部总投资均可采用中性化资本的形式进行，只是这样一来，支付给前股东的红利届时将不增加或可能减少，这一点具体可在企业收入分配方案中详细加以规定。总之，锡克认为资本中性化这种新的财产形式有利于克服工资收入者与资本的异化和消除劳资之间为分配而斗争的利益冲突，但是展开这一过程的方式要避免公式化的简单做法，比如就形式和时间上来看，大公司的解决办法很可能就不同于中、小型企业，因而也更可能不同于小的、个人所有的企业，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3.资本中性化企业的主要特征。锡克认为，资本中性化企业这一新的制度形式旨在建立一种与个人在其中工作的每一生产机构相联系的具体的和符合经验的财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的劳动成果对其收入水平起直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劳动者个人的情感也将最终与这种关系融为一体。在这样一种总关系下，企业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 企业的目标在于通过建立一种新的财产关系来克服劳动者的利益只与工资挂钩的现象，因而该目标也可以扼要地定义为生产体的人道化，即劳动者不再把企业仅仅看成是进行被经济力量所强迫驱动的劳动的场所，而看成是使自己能与社会机能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机构，他们能够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活动，能够发挥较大的主动性和获得较高的工作满足程度，从而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2) 企业由资本管理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两方面组成，每个生产集体（人员）则构成这两个协会的社会基础，生产集体本身有权选举、支配甚至撤销两个协会，而从职能分工上看，资产管理协会是以信托方式管理资本，生产性使用资本的实际管理则由企业管理协会负责，所以资本中性化工人共有企业实际上是一种由全体职工作为所有者的职工股份所有制企业；(3) 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这是资本中性化企业与锡克原先主张的工人拥有分享企业集体资产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也通过个人债券或证券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个人权力的企业形式的重大区别，在资本归属个人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发生困难，因为在工人自由变换工作时间时抽回债券本金的过程中，每个企业资本价值的差异会给变换工作设置障碍，并促使发生投机性很强的涌向其他企业的现

象，资本中性化企业则可以较好地克服这些毛病。

4.资本中性化企业的决策结构。资本中性化企业的机构调置及相应的决策结构都有些类似于股份公司形式，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1）企业的最高法律机构为共有企业工人与共同所有者全体会议，其职能类似于一家公司的全体职工大会，因而所具有的权力大体上包括：通过和修改企业管理协会制定的规章；选举管理委员会成员；定期审议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审议企业的年度帐务；撤销管理委员会和总经理；采纳关于企业经营的建议；批评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并撤换其成员等等；（2）企业和资产代表者为资产管理协会，它由企业中的每一成员自动构成，并通过全体会议来选举资产管理委员会，以协助资产管理协会对资产进行管理，但无权在会员间分配资产，即使企业破产时，所余资产也不能分给会员，而必须用于公共目的（如慈善事业）。（3）企业的资产支配者为企业管理协会，其代表者为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部等），由它具体负责有效地使用资本资产，因而管理部门代表企业管理协会实际上是企业的生产组织，其任务就是保证企业的生产发展。（4）企业活动的监督者为企业监督委员会，其少量成员可从企业外的专家中选举，基本任务是确保企业长期的有效管理，决定利润分配分享基金的使用原则及本企业是否向新兴行业投资等，但无权干预经理人员的日常工作。（5）企业职工的当前利益主要由企业工会代表，这些利益包括工作环境、工资报酬、社会和文化需要等。这样，工会在企业管理协会中就和经理部门及监督委员会一起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以确保企业职工的长、短期利益。

5.资本中性化企业的收入分配。首先，企业实际的收入分配必须与国民经济层次上关于收入分配的计划方案和工资协议保持一致，在此前提下，每个企业对收入分配的实施拥有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决策权。其次，采取一定的调节措施（如征收垄断利润税等）来使企业的收入与其经营水平相一致，即保证企业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差别只是企业实际经营水平差距的反映，从而确保平等竞争的环境。第三，所有企业都按政府主管机构的规定来制定职务工资标准，而计时工资、奖励工资也要依照整个国民经济中通行的同等工作的等量劳动换取等量工资的原则来确定，除此之外的一些辅助性工资形式，如奖金、红利、酬金、佣金、小费等，其分配方式和额度由企业自主决定，并不计算在国民经济层次上所决定和控制的基本工资之内，因而这部分实际上是从企业利润中支付报酬形式，企业因此只会按真正必要的和最合适的数量来进行发放。这样，企业总收入的分配情况就是：总收入－工资＝毛利润；毛利润－税收和社会福利捐款－支付给外来资本利息＝净利润（税收平衡利润）；净利润－利润分享基金（辅助工资、利润分成）＝剩余企业收入（净投资、储备基金、储蓄、新行业投资）。第四，利润分成基金按企业监督委员会自主的决定在共有企业工人与共同所有人中间进行分配，其可行的办法包括：（1）一视同仁地分配给所有共有企业工人与共同所有人；（2）按工资差别分配；（3）根据共有企业工人的个人表现或整个小组的表现分配；（4）按工龄分配；（5）以上办法的不同综合。

6.资本中性化在其他特殊部门的拓展。锡克认为，尽管利润标准对商品生产企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其他部门都如此，这些部门包括国家政府机构、安全机构和国防机构以及公共教育系统，很大程度上还包括公共医疗服务、社会保险等机构。这些机构本身虽然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其工作人员将根据计划，平均得到与生产部门的工人以工资和利润分成形式获得的收入同样多的工资。在论述过程中，锡克将这些机构分为两大类，即公共服务部门和经济服务部门，并对后者作了重点分析。锡克指出，象银行和保险公司这样的经济服务机构尽管须列入商品生产部门，但其性质是边缘性的，与公共服务部门相交叉。对银行来说，它自然须从有效地使用信贷中发展自己的利润为目标的利益，但其中性化资本的配置却会与生产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在生产领域，新形成的中性化资本将主要用于生产企业本身的净投资；银行则只能用很少一部分净利润进行新银行建筑和开设分支银行，其余大部都将用于信贷扩充或工业发展。再如保险公司，其净利润也将在一定水平上被转化为中性化资本，这些资本将以信贷形式用于工业企业的创建。

7.资本中性化企业运行的基本原则。锡克认为，改革后形成的新企业中，除上面所讲的效率原则外，人道原则是其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特有的原则。这里的人道原则，概括起来讲就是首先考虑并满足人们高度发展的非经济需要，如工作满足，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与工作小组和企业紧密结合，安全感和有意义的生活前景，共同参与企业发展决策，等等。人道原则并不否定以满足经济需要为特征的效率原则的决定性作用。由于生产活动的人道化首先意味着应改变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意义，因而从长远看，向工作人道化的转变必将使效率得到提高。当然，从短期看，两者有时可能会发生矛盾，但资本中性化这一企业制度形式将为解决这种矛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十五画

鞍钢宪法　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一套基本经验。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3月22日对该报告的指示中，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即企业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是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鞍钢宪法"对当时开展技术革新的技术革命，加强企业管理，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中包含有忽视按劳分配原则和经济规律等"左"的错误，后来又到处机械地搬用，并且流于形式，起了不好的作用。

影响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物质生产部门劳动量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入生产领域的劳动量愈多，国民收入的增长就愈快；追加到生产领域的劳动量愈少，国民收人的增长就愈慢。增加劳动量可以用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和增加劳动者人数的办法达到，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增加劳动者的人数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第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增加国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增加实物形式的国民收入数量，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依靠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及生产组织管理的科学化，所以，它不象增加劳动量那样受众多条件的限制。第三，生产资料的节约。它意味着用同量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燃料动力，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所以，它也是保证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途径。

增长利润留成　我国部分全民所有制企业曾试行过的一种利润分配方式。企业按国家核定的留成比例，从当年实现利润超过基年利润的部分中，提取一定的资金。亦称"定比增长利润留成"。其特点是：一，基年固定，基数不变；二，留成比例不变。留成的比例按不同行业分别确定为：石油、电力、石油化工和国外配套设备等利润水平较高的企业，留成比例为10%；冶金、机械、化工、轻工、纺织、建材、铁路、交通运输等企业，留成比例为20%；煤炭、邮电、民航和农机企业等，留成比例为30%。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增产增收潜力较大以及生产正常、利润比较稳定的企业。

横向联合　国民经济中的各部门、各行业、地区、企业之间，根据经济发展的自身内在联系，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原则，打破部门、地区、行业及所有制的界限，在经济方面进行的渗透或融合。主要形式有：全国范围内的联合，区域性联合，城市群体之间的联合；城乡之间的联合及企业之间的联合等。其中，企业之间的联合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它或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组成"一条龙"式的联合生产；或者通过投标招标实行"满天星"式的零部件扩散，或者在资源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方面进行联合；或者在资金、技术、能源、原材料、设备、人材和信息方面进行交流与协作。此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式也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的一种横向联合方式。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有利于企业摆脱行政隶属关系的羁绊，冲破部门、地区及所有制的约束，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有利于部门、城乡和企业之间发挥各自优势，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转移，缩小城乡之间、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有利于减少投入，增加产出，提高全社会的综合经济效益、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三篇　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

字 母

AIC 准则（AIC Criterion） AIC 准则是 Akaike 应用极大似然法的原理所提出的一种回归模型选择标准，称为 Akaike 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简称为 AIC 准则。

在选模型（参见“全模型和选模型”）

$$Y = X_q \gamma_q + e \tag{1}$$

中，假设误差 $e \sim N(0,\sigma^2 I)$，则 γ_q 和 σ^2 的似然函数为

$$L(\gamma_q, \sigma^2 | Y) = (2\pi\sigma^2)^{-\frac{1}{2}} \exp\{-\frac{1}{2\sigma^k} \|Y - Y_q \gamma_q\|^2\} \tag{2}$$

容易求得 γ_q 和 σ^2 的极大似然估计为

$$\tilde{\gamma}_q = (X_q' X_q)^{-1} X_q' Y$$

$$\sigma_q^{*2} = \frac{RSS_q}{n} = \frac{Y'(I - X_q)(X_q' X_q)^{-1} X_q')Y}{n}$$

代入(2)并取对数，得到对数似然函数的极大值

$$\log L(\tilde{r}_g, \sigma_q^2 | Y) = \left[\log\left(\frac{n}{2n}\right)^{\frac{n}{2}} - \frac{n}{2}\right] - \frac{n}{2}\log(RSS_q)$$

略去与 q 无关的项，得到

$$\log L(\tilde{\gamma}_q, \sigma_q^{*2} | Y) \propto \frac{N}{2}\log(RSS_q) \tag{3}$$

由于残差平方和 RSS_q 随着自变量个数 q 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如按极大似然途径势必导致全模型。可见，如果把似然原理应用于变量选择，应该加以适当的修正。

Akaike 提出：对一般的统计模型，设 $Y_1,\cdots,Y_n$ 为一组样本，如果它们服从某个含 k 个参数的模型，对应的似然函数最大值记为 $L_k(Y_1,\cdots,Y_n)$，应选择使 $\log L_k(Y_1,\cdots,Y_n)—K$ 达到最大的模型。这个量称为 AIC 统计量，即

$$AIC = \log L_k(Y_1,\cdots,Y_n) - k$$

可见，AIC 统计量就是在对数似然函数量大值上添加了对变量个数的惩罚项。

对于选模型（1），从（3）式可以看到

$$AIC = -\frac{n}{2} \log(RSS_g) - q$$

等价地，可取

$$AIC = n\log(RSS_q) + 2q \tag{4}$$

于是，AIC 准则归结为：选择使（4）式达到最小的自变量子集。

Almon 多项式变换（Almon Polynomial Transformation） Almon 多项式变换是一种研究分布滞后模型的方法。这种方法把分布滞后模型

$$Y_t = \beta_0 + \beta_1 X_t + \beta_2 X_{t-2} + \cdots + \beta_j X_{t-j} + \cdots + u_t \tag{1}$$

的系数 β_j，近似地用一个关于 j 的适当阶数的多项式来表示。例如

$$\beta_j = \alpha_0 + \alpha_1 j + \alpha_2 j^2 \tag{2}$$

这是一个关于 j 的二阶多项式。

还可以假定 β_j 是 j 的三阶多项式：

$$\beta_j = \alpha_0 + \alpha_1 j + \alpha_2 j^2 + \alpha_3 j^3$$

把它写为更一般的形式，则有

$$\beta_j = \alpha_0 + \alpha_1 j + \alpha_2 j^2 + \cdots + \alpha_m j^m$$

如分布滞后模型是有限的，最大滞后长度是 k，则必须假定多项式的阶数 m 小于 K。

为了简便起见，假定 β 的变化趋势可以用二阶多项式加以近似地反映。若最大滞后长度为 k，将（2）式代入（1）式得：

$$\begin{aligned} Y_t &= \beta_0 + \sum_{j=0}^{k}(\alpha_0 + \alpha_1 j + \alpha_2 j^2) X_{t-j} + u_t \\ &= \beta_0 + \alpha_0 \sum_{j=0}^{k} X_{t-j} + \alpha_1 \sum_{j=0}^{n} j x_{t-j} + \alpha_2 \sum_{j=0}^{k} j^2 X_{t-j} + u_t \end{aligned} \tag{3}$$

令：

$$\beta_0 = \alpha$$

$$Z_{0t} = \sum_{j=0}^{K} X_{t-j}$$

$$Z_{1t} = \sum_{j=0}^{K} j X_{t-j}$$

$$Z_{2t} = \sum_{j=0}^{K} j^2 X_{t-j}$$

(3)式可写为：

$$Y_t = \alpha + \alpha_0 Z_{0t} + \alpha_1 Z_{1t} + \alpha_2 Z_{2t} + u_t$$

在 Almon 模型中，Y 不是对原来的变量 X 回归，而是对重新构造的变量 Z 回归。只要模型服从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就可以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 α 的估计值后，再通过它们算出原来的参数 β 的估计值。

$$\overline{\beta}_0 = \overline{\alpha}_0$$

$$\vec{\beta}_1 = \vec{\alpha}_0 + \vec{\alpha}_1 + \vec{\alpha}_2$$
$$\vec{\beta}_2 = \vec{\alpha}_0 + 2\vec{\alpha}_1 + 4\vec{\alpha}_2$$
……
$$\vec{\beta}_k = \vec{\alpha}_0 + K\vec{\alpha}_1 + K^2\vec{\alpha}_2$$

在具体应用 Almon 方法时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

1.滞后的最大长度必须事先假定。在实际应用中，K 不应太大。

2.在确定 K 值之后，多项式的阶数 m 也必须确定，一般说来，确定多项式的阶数 m 要依靠主观判断，而且总是希望较低阶数的多项式就能够得到较好的结果。

3.因为 Z 是由 X 构造而成的，Z 是 X 的线性组和，所以这个模型容易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C_p 准则 它是回归分析中选择自变量的准则之一。和 (n+p) RMS_q 和 S_q 准则(参见“预测偏差的方差准则”和“平均预测均方误差准则”)一样，C_p 统计量也是从预测观点出发，基于残差平方和的一个准则。

对于选模型(参见“全模型和选模型”)

$$Y=X_p\gamma_p+e \quad (1)$$

C_p 统计量定义为

$$C_p=\frac{RSS_q}{\bar{\sigma}_2}-(n-2q) \quad (2)$$

其中，RSS_q 为在模型(1)下的残差平方和，$\overline{\sigma^2}$ 为从全模型

$$Y=X\gamma+e \quad (3)$$

中导出的 σ^2 的最小二乘估计，q 是选模型 (1) 中设计矩阵 X_q 的阶数，即包括常数项在内的自变量个数。$X=(X_p\vdots\ X_t)$，$\gamma=(\gamma_p\vdots\ \gamma_t)$。

设 x 是 X 的一个点，如果采用选模型 (1)，那么在任何一点 $x'(x_q',x_t')$，用 $\bar{y}=x_q'\bar{\gamma}_q$ 预测 $y=x'\gamma+\varepsilon$，则量

$$\alpha=E(\bar{y}-E(y))^2$$

度量了这种预测的优劣。对 n 个试验点 $x'=(x_{qi}',\gamma_{ti}')$，$i=1,2,\cdots,n$，计算出 d_i 并对它求和，除以 σ^2，可得

$$T_q=\sum_{i=1}^{n}d_i/\sigma^2$$

可以证明，在最小二乘估计中:

$$T_q=q+\frac{\gamma_t'D^{-1}r_t}{\sigma^2} \quad (4)$$

其中: $D^{-1}=X_t'X_t-X_t'X_q(X_q'X_q)^{-1}X_q'X_t$

显然，T_q 是采用选模型(1)时，对 n 个试验点预测优劣的一个总度量，它反映了选模型的好坏。但 (4) 式中包含未知参数，还不能直接作为自变量选择的标准，由于残差平方和

$$RSS_q=(n-q)\bar{\sigma}_q^2$$

又因为

$$E(\bar{\sigma}_q^2)=\sigma^2+r_tD^{-1}r_t/(n-q)$$

所以:

$$\frac{r_t'D^{-1}r_t}{\sigma^2}=\frac{E(RSS_q)}{\sigma^2}+q-n$$

则 T_q 可以写成

$$T_q=\frac{E(RSS_q)}{\sigma^2}-(n-2q)$$

在上式中，用 RSS_q 代替 E (RSS_q)，以 σ^2 在全模型的估计 $\bar{\sigma}^2$ 代替 σ^2，便得到 (2) 式。可见，C_p 统计量是作为 T_q 的一种估计产生的。

对于每个选模型，或者说对每个子集计算出对应的 C_p 统计量。将点(q,C_p) 标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这些点构成的散点图称为(q,C_p)图，简称 C_p 图。C_p 图是应用 C_p 准则选择自变量的有效工具，依 C_p 准则应造点(q,C_p)最接近第一象限角平分线上的点，它说明选模型将是对全模型的一个很好的估计，同时，它还要求 C_p 的值为最小，它说明选模型预测结果较好，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条件并不在同一个点上达到，此是要根据具体情况以及一些附加信息，来决定究竟选哪一个模型。

C_p 统计量的这种思想也可以用到 LS 估计以外的其它一般线性估计。

设在全模型中，将 $\gamma'=(\alpha,\beta')$代入，得到

$$Y=\alpha 1+X\beta+Mu,\ E(Mu)=0,\ Cov(e)=\sigma^2I$$

这里，把 β 对应的设计阵仍然记作 X，并假定 X 已中心化。对常数 α，用$\hat{\alpha}=\overline{Y}=\frac{1}{n}\sum_{i=1}^{n}Y_i$ 考虑 β 的某个线性估计 $\beta_L=LY$，这里 L 是给定的，依赖于 X。对于这样一个线性估计，也存在着一个变量选择问题。为了估计 β，只需讨论形如 $C\bar{\beta}=C(X'X)^{-1}X'Y$ 的估计，即考虑形如 $L=C(X'X)^{-1}X'$的 L_g 但由 X 的中心化知 $X'1=0$，所以 $L1=0$，用$\vec{\beta}_L=LY$ 估计 β，其残差平方和为

$$RSS_L=\|Y-\overline{Y}1-X\vec{\beta}_L\|^2$$

作为$\vec{\beta}_L$ 的优良性指标，对应于 T_q，有

$$T_L=\sum_{i=1}^{n}\frac{d_i}{\sigma^2}$$

可以证明:

$$T_L=\frac{E(RSS_L)}{\sigma^2}-[n-2(1+tr(XL))]$$

用$\bar{\sigma}^2$ 代替 σ^2，去掉 E (RSS_L)的均值符号，得到 T_L

的估计

$$C_L=\frac{RSS_L}{\bar{\sigma}_2}-[n-2(1+tr(XL)]$$

C_L 有两种用途，其一是变量选择，这和进行 LS 估计时的情况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其二是用作在某一估计类中选择最优估计。

例如，β 的岭估计（参见"岭估计"）定义为

$$\bar{\beta}(k)=(X'X+kI)^{-1}X'Y\triangleq L_kY$$

因为 $X'X$ 为 P 阶对称方阵，所以，存在着正交方阵 P' 使

$$P'X'XP=\wedge=diag(\lambda_1,\cdots,\lambda_p)$$

可以证明，对于岭估计，有

$$RSS_{LK}=\sum_{i=1}^{n}(Y_i-\bar{Y})^2-2\sum_{i=1}^{p}\frac{{}^{*}Z_i^2}{k+\lambda_i}+\sum_{i=1}^{p}\frac{\lambda_iZ_i^2}{(K+\lambda_i)^2}$$

其中：

$$\begin{bmatrix}Z_1\\ \vdots\\ Z_p\end{bmatrix}=Z=PX'Y$$

所以，岭估计的 C_L 统计量为：

$$C_{LK}=\frac{1}{\hat{\sigma}^2}\left[\sum_{i=1}^{n}(Y_i-\bar{Y})^2-2\sum_{i=1}^{p}\frac{Z_i^2}{k+\lambda_i}+\sum_{i=1}^{p}\frac{\lambda_iZ_i^2}{(k+\lambda_i)^2}\right]+2\sum_{i=1}^{p}\frac{\lambda_i}{\lambda_i+k}-(n-2)$$

Durbin-Watson 检验　Durbin-Watson 检验是一种检验回归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的方法，由 Durbin 和 Waston 在 1951 年提出，是一种在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方法。

D-W 统计量定义为：

$$d=\frac{\sum_{t=2}^{n}(e_t-e_{t-1})^2}{\sum_{t=1}^{n}e_t^2}$$

式中的 e_t 是第 t 期的剩余项。可以看出，当 n 很大时，d 渐近地趋向于 Von Neumann 比。

将 d 的分子的二项式展开，可得：

$$d=\frac{\sum_{t=2}^{n}e_t^2+\sum_{t=2}^{n}e_{t-1}^2-2\sum_{t=2}^{n}e_te_{t-1}}{\sum_{t=1}^{n}e_t^2}\approx 2-2\frac{\sum_{t=2}^{n}e_te_{t-1}}{\sum_{t=1}^{n}e_t^2}$$

由于残差项 e_t 是随机干扰项 u_t 的估计值，且 $\bar{e}_t=0$，所以

$$\bar{p}=\frac{\sum e_te_{t-1}}{\sum e_t^2}$$

为干扰项自相关系数的估计值，易见

$$\frac{\sum_{t=2}^{n}e_te_{t-1}}{\sum_{t=1}^{n}e_t^2}\approx\bar{p}$$

于是

$$d\approx2(1-\bar{p})$$

由于 $\bar{p}$ 是衡量 u_t 自相关程度的一个数量指标，它介于 −1 和 1 之间，即 $-1<\bar{p}<1$，所以：

$\bar{p}=-1$　d=4　负自相关

$\bar{p}=0$　d=2　无自相关

$\bar{p}=1$　d=0　正自相关

这就是 D-W 统计量的含义。显然，D-W 检验最适用于一阶自回归型式的自相关。

2.D-W 统计量的上限和下限。一般地说，用作假设检验的统计量，必须了解它的统计分布，但是，D-W 统计量的精确分布是无法知道的。Durbin 和 Watson 找到了一个上限 du 和下限 dc,如果计算的 d 值落在这两个临界值之外，就可以认为存在正的或负的序列相关。而且，这两个上下限仅仅与观测值的数目和解释变量的数目有关，而与解释变量 X 的取值无关。可以通过查表找到解释变量在 5 个以内、样本数据在 15 到 100 个之间的上限 du 和下限 dc。

3.Durbin-Watson 检验的过程。建立原假设 H_0: $\rho=0$（即 d=2）；对立假设 H_1: $\rho\neq0$（即 d≠0）.

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出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值，从而可计算出残差数值 $e_t(t=1,2,\cdots,n)$。并根据 e_t 计算 D-W 统计量的实际值。

其次，根据样本数量 n，被估计的参数个数 K 和显著性水平 α，从 D-W 检验临界值表上查得 d_L^* 和 d_U^*；

最后，将 d 的实际值与 d_L^* 和 d_U^* 进行比较，可得如下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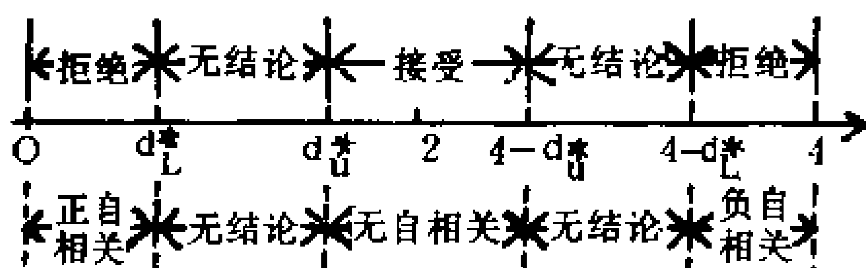
（1）当 $d>d_L^*$ 时，拒绝原假设 $\rho=0$，认为扰动项有正相关（因为 d 接近于 0）；

（2）当 $d_U^*<d<4-d_U^*$ 时，接受原假设 $\rho=0$，认为扰动项无自相关（因为 d 接近于 2）。

(3) 当 $d<4-d_L^*$ 时，拒绝原假设 $\rho=0$，认为扰动项有负自相关（因为 d 接近于 4）；

(4) 当 $d_L^*<d<d_U^*$ 或 $4-d_u^*<d<4-d_L^*$ 时，不能作出结论（因为 d 不接近 0，2，4 中的任何一个）。

以下关系可以从数轴上看出：



D-W 检验虽然存在无结论区域，但是只要增大样本，其无结论区域就会缩小。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检验扰动项有无自相关，所以这种方法被广泛地应用。

F-分布（F-Distribution） 设 X 和 Y 是相互独立的 x^2—分布随机变量，自由度分别为 m 和 n，则称随机变量

$$F=\frac{X/m}{Y/n}=\frac{X}{Y}\cdot\frac{n}{m}$$

所服从的分布为 F 分布，(m,n) 称为它的自由度，且通常写为 F～F (m,n)

F 的分布密度函数是：

$$f(x;m,n)=\begin{cases}\frac{T[(m+n)/2]}{T(m/2)T(n/2)}\cdot\left(\frac{m}{n}\right)\left(\frac{m}{n}x\right)^{\frac{m}{2}-1}\left(1+\frac{m}{n}x\right)^{-\frac{m+n}{2}} & 当x>0\\ 0 & 当x\leqslant 0\end{cases}$$

当 n>2 时，数学期望

$$EX=\frac{n}{n-2}$$

当 n>4 时，方差

$$D_x=\frac{n^2(2m+2n-4)}{m(n-2)^2(n-4)}$$

F 分布在估计、检验和方差分析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PASCAL 滞后分布模型 PASCAL 滞后分布模型可以说是几何滞后分布模型的一种推广。几何滞后分布是指各期滞后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力，从本期开始，随着滞后期的增加以几何速度递减，而 PASCAL 滞后模型除了反映这种情况外，还能通过调整参数的方法反映另一种类型的滞后分布，即滞后解释变量的影响力先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而递增，直至某滞后期达到最大，然后随滞后期的增加而递减。

PASCAL 滞后分布模型可表示为：

$$Y_t=a+b(w_0X_t+w_1X_{t-1}+\cdots+w_jX_{t-j}+\cdots)+u_t \quad (1)$$

式中

$$w_j=\frac{(j-r+1)!}{j!(r-1)!}(1-\lambda)^r\lambda^j \quad (j=0,1,2,\cdots)$$

其中 r 是给定的正整数，$0<\lambda<1$，待估计参数是 a、b、λ。

下面讨论两种情况：

当 r=1 时，$w_j=\frac{j!}{j!}(1-\lambda)\lambda^j=(1-\lambda)\lambda^j$，有

$$\sum_{j=0}^{\infty}w_j=(1-\lambda)\sum_{j=0}^{\infty}\lambda^j=1$$

模型为

$$Y_t=a+b(1-\lambda)(X_t+\lambda X_{t-1}+\cdots+\lambda^jX_{t-j}+\cdots)+U_t$$

可见，在 r=1 情况下的 PASCAL 滞后分布即为几何滞后分布，

当 r=2 时，

$$w_j=(j+1)(1-\lambda)^2\lambda^j$$

$$\sum_{j=0}^{\infty}w_j=(1-\lambda)^2(1+2\lambda+3\lambda^2+4\lambda^3+\cdots)$$
$$=(1-\lambda)^2\frac{d}{d\lambda}(1+\lambda+\lambda^2+\lambda^3+\lambda^4+\cdots)$$
$$=(1-\lambda)^2\frac{d}{d\lambda}\left(\frac{1}{1-\lambda}\right)$$
$$=1$$

可以看出，若 $\lambda>0.5$，w_j 将随着 j 的变化先是逐渐增加，然后逐渐减少，总和为 1。但如果 $\lambda<0.5$，w_j 将随着 j 的变化逐渐减少，但不呈几何速度减少。在 r=2 的情况下，PASCAL 模型为：

$$Y_t=a+b(1-\lambda)^2[X_t+2\lambda X_{t-1}+\cdots+(j+1)\lambda^jX_{t-j}+\cdots]+u_t$$

显然，随着参数的不同，PASCAL 模型可以反映多种不同的情况。

对 PASCAL 模型的参数 a、b 和 λ 进行估计，可以使用类似于考伊克变换的方法。假设 r=2，由于

$$Y_t=a+b(1-\lambda)^2[X_t+2\lambda X_{t-1}+\cdots+(j+1)\lambda^jX_{t-j}+\cdots]+u_t \quad (2)$$

$$Y_{t-1}=a+b(1-\lambda)^2[X_{t-1}+2\lambda X_{t-2}+\cdots+\lambda^{j-1}X_{t-j}+\cdots]+u_{t-1} \quad (3)$$

$$Y_{t-2}=a+b(1-\lambda)^2[X_{t-2}+2\lambda X_{t-3}+\cdots+(j-1)\lambda^{j-2}X_{t-j}+\cdots]+u_{t-2} \quad (4)$$

将 (2) 式-2λ (3) 式$+\lambda^2$ (4) 式得：

$$Y_t-2\lambda Y_{t-1}+\lambda^2Y_{t-2}$$
$$=a(1-\lambda)^2+b(1-\lambda)^2X_t+u_t-2\lambda U_{t-1}+\lambda^2U_{t-2}$$

即

$$Y_t=b_0^*+b_1^*X_t+b_2^*Y_{t-1}+b_3^*Y_{t-2}+u_t^* \quad (5)$$

其中 $b_0^*=a(1-\lambda)^2$

$b_1^* = b(1-\lambda)^2$

$b_2^* = 2\lambda$

$b_3^* = -\lambda^2$

$u_t^* = u_t - 2\lambda u_{t-1} + \lambda^2 u_{t-2}$

由于模型（5）中的随机干扰项是自相关的，并且它同解释变量也是相关的，因而对它的估计需要适当的计量经济方法。另外，由于我们只需求三个未知数a、b、λ，但b^*却有4个（即有4个方程）。一般不能得到a、b、λ的唯一估计值，因此，对PASCAL模型的估计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Stein估计 对线性回归模型

$Y = \alpha 1 + X\beta + e$，$E(e) = 0$，$Cov(e) = \sigma^2 I$

（其中，nxp的设计阵假定已中心标准化，且$Rank(X) = P$）记$\vec{\beta}$为回归系数β的LS估计，称$\vec{\beta}_s(c)$为$c\vec{\beta}$的Stein估计，这里，$0 < c < 1$称为压缩系数。当c在[0,1]区间变化时，就生成了一个估计类。Stein估计具有以下性质：

(1) 当$c \neq 1$时，$\vec{\beta}_s(c)$为β的有偏、压缩估计。

(2) 存在$0 < c < 1$，使$MSE(\vec{\beta}_s(c)) < MSE(\vec{\beta})$，即Stein估计比LS估计具有较小的均方误差。

Stein估计是由Stein于1955年提出的，它是最简单、提出最早的一种有偏估计。虽然它的应用不如岭估计等有偏估计，但却在有偏估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UV表 在一般的投入产出表中，总是假定每一个生产部门是和每一类商品相对应的，A部门生产A商品，B部门生产B商品，等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统计调查的单位往往是基层单位（如企业、农场等），只要某一个基层单位的主要产品属于哪个部门，该单位就整个地划入这个部门。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部门生产多种产品的现象，如钢铁厂的自备电厂发电，而钢铁厂被整个地划入钢铁工业，钢铁部门就会同时产生钢铁和电。同样，在生产普查时，经常可以了解到的是某一个部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的数量，如钢铁厂生产过程中投入了煤，但不一定能了解投入的中间产品用于生产哪些商品，如有多少煤用来炼焦，有多少煤用于发电。针对这种情况，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把产业部门产出的商品和商品对产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分别列出，这样得到的投入产出表就是UV表。

表1列出的就是一个UV表

表中，矩阵U称为消耗矩阵，记录的是各产业部门所购买或消耗的各种商品的价值。矩阵v称为制造矩阵，记录各产业部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的价值。g是各产业部门的产出，它的各个元素是矩阵v的各行元素之和，q是各种商品的产出，它的各个元素是矩阵V中各列元素相加的结果。y是各产业部门支付的要素收入，即各产业部门最初投入的价值。

表1 uv表

	商品	产业部门	最终需求	总计
商品		U	e	q
产业部门	V			g
最初投入		y'		
总计	q'	g'		

UV表虽然在列示调查资料上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不适合于进行投入产出分析，还必须对这个表进行变换，将矩阵v调整为商品对商品的投入，这样得到的表，称为"纯"投入产出表。

目前，对UV表中的投入和转出进行转移得到"纯"产业部门表或"纯"商品表，主要有三种方法，即商品技术假定、部门技术假定和混合假定。这里，分别说明在这三种假定下得到的"纯"商品表的方法。

1. 投入产出关系

投入产出关系指的是在表1中的各个流量之间的关系，利用这些关系，将UV表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变换，就可以得出"纯"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分析根据的是六个关系，其中三个是算术上的恒等关系，三个是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假定。

第一个关系是

$$q = Ui + e \quad (1)$$

其中i指单位列向量，所以Ui指的是U的各行之和。方程式（1）说明国内各类商品的生产额将被作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净额。

第二个关系是

$$q = V'i \quad (2)$$

第三个关系是

$$g = Vi \quad (3)$$

这两个关系在表（1）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四个关系是

$$u = B\hat{g} \quad (4)$$

其中，B是一个商品X部门维数的系数矩阵，$\hat{g}$是指一个在对角线上带有g元素的对角矩阵，方程式（4）说明商品的中间投入同它们所进入的这个部门的出或比例。

第五个关系是

$$V' = c\hat{g} \quad (5)$$

其中，c是一个商品x部门维数的系数矩阵，方程（5）说明每个部门都按照它自己的固定比例制造各类商品。

第六个关系是

$$v = D\hat{q} \quad (6)$$

其中，D是一个部门x商品维数的系数矩阵。方程式（6）说明各种商品按它们自己之间的固定比例来自不同的产业部门。

2. 商品技术假定。

根据（1）、（2）、（4）和（5）可以写出

$q=Ui+e$ （根据(1)）

$=B\hat{g}i+e$ （根据(4)）

$=Bg+e$ （由(5)得 $V'=C\bar{g}i$ 由(2)得 $q=Cg$

$=BC^{-1}q+e$ （$g=C^{-1}q$）

$\therefore q=BC^{-1}q+e$

$(I-BC^{-1})q=e$

$q=(I-BC^{-1})^{-1}e$

与投入产生关系式:

$q=(I-A)^{-1}e$

比较系数，得:

$A=BC^{-1}$

这种假定认为同一类商品都具有相同的结构，而不管它是由哪个部门生产的。

3. 部门技术假定

根据（1）、（3）（4）、（6）可以写出:

$q=Ui+e$

$=Bg+e$(由(6)得 $V_1=D\bar{q}i$，由（3）得 $g=Dq$)

$=BDq+e$

$=(I-BD)^{-1}C$

比较系数，得

$A=BD$

这种假定认为在一个产业部门中，不论它的产品组合怎样，它的投入结构都是一样的。

商品技术假定和部门技术假定都是极端的假定，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还可以有一种混合假定。

χ^2—分布（χ^2 distribution） 设 $x_1,x_2,\cdots,x_n$ 是相互独立，且同服从 N（0,1)分布的随机变量，则称随机变量

$$\chi_n^2=\sum_{i=1}^n x_i^2$$

所服从的分布为 χ^2—分布。

它的分布密度函数是

$$\chi^2(x,n)=\begin{cases}\dfrac{1}{2^{\frac{n}{2}}\Gamma\left(\dfrac{n}{2}\right)}e^{-\frac{x}{2}}x^{\frac{n}{2}-1} & 当x>0\\ 0 & 当x\leqslant 0\end{cases}$$

其中参数n称为自由度，它表示 x_n^2 中独立变量的个数。

它的数学期望和方差是

$Ex=n$

$Dx=2n$

如果总体x服从正态分布 N（u,a²)，$x_1,x_2,\cdots,x_n$ 是从该总体抽取的一个容量为n的简单随机子样，则统计量

$$\chi^2=\sum_{k=1}^n(x_k-u)^2$$

的分布密度是

$$f(x)=\begin{cases}\dfrac{1}{2^{\frac{n}{2}}\sigma^n\Gamma\left(\dfrac{n}{2}\right)}e^{-\frac{x}{2\sigma^2}}x^{\frac{n}{2}-1} & 当x>0\\ 0 & 当x\leqslant 0\end{cases}$$

这时，χ^2 也称为 χ^2 统计量。

设 $y_1\sim\chi^2(n_1)$ 和 $y_2\sim\chi^2(n_2)$ 且 y_1,y_2 相互独立，则 $y_1+y_2\sim\chi^2(n_1+n_2)$。

χ^2—分布在小样本估计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 画

一阶自回归型式（First-order Autoregressive Scheme） 线性回归模型中干扰项的自相关，通常出现的形式是:

$u_t=\rho U_{t-1}+\varepsilon_t$ （$t=1,2,3,\cdots$）

式中 ρ 称为自回归系数，$|\rho|<1$；ε_t 是剩余干扰项，常假定它满足下列条件:

$E(\varepsilon_t)=0$

$E(\varepsilon_t^2)=\sigma_\varepsilon^2$

$$E(\varepsilon_t\varepsilon_{t-s})=0 \qquad (s=1,2,\cdots)$$

由于

$u_t=\rho u_{t-1}+\varepsilon_t$

相当于 u_t 对 u_{t-1} 的回归方程，而两者相差一期，所以称为一阶自回归型式。也有二阶和高阶自回归型式，如

$u_t=\rho_1u_{t-1}+\rho_2u_{t-2}+\varepsilon_t$

$u_t=\rho_1u_{t-1}+\rho_2u_{t-2}+\rho_3u_{t-3}+\cdots+\varepsilon_t$

等等。

对一阶自回归形式通过逐期迭代，可得:

$$u_t=\sum_{r=0}^{\infty}\rho^r\varepsilon_{t-r}$$

根据对于 ε 的假定，有

$$E(u_t)=\sum_{r=0}^{\infty}\rho^r E(\varepsilon_{t-r})=0$$

$$Var(u_t)=E(u_t^2)$$

$$=\sigma_\varepsilon^2\frac{1}{1-\rho^2}$$

$$=\sigma^2$$

即 u_t 具有期望值为零和等方差性的性质。但

$$e_{ov}(u_t,u_{t-1})=E(u_tu_{t-1})=\rho\sigma^2$$

$$Cov(u_t,u_{t-1})=E(u_tu_{t-2})=\rho^2\sigma^2$$

$$\vdots$$

$$Cov(u_t,u_{t-s})=\rho^s\sigma^2$$

协方差不等于零，这正是自相关的涵义。

在这种情况下，回归模型

$$Y=X\beta+u$$

干扰项的方差一协方差矩阵为

$$Var-Cov(u)=E(uu')=\sigma^2\Omega$$

$$=\sigma^2\begin{bmatrix}1&\rho&\rho^2&\cdots&\rho^{n-1}\\ \rho&1&\rho&\cdots&\rho^{n-2}\\ \rho^2&\rho&1&\cdots&\rho^{n-3}\\ &\cdots\cdots&&&\\ \rho^{n-1}&\rho^{n-2}&\rho^{n-3}&\cdots&1\end{bmatrix}$$

一阶移动平均型式（First-order Moving-Average Scheme） 一阶移动平均型式是除了一阶自回归型式之外，干扰项自相关的另一种常见形式。它可以表示为:

$$u_t=\varepsilon_t+\mu\varepsilon_{t-1}$$

式中的 u 称为移动平均系数，$0<u<1$: 常假定 ε_t 满足下列条件:

$$E(\varepsilon_t)=0$$

$$V_{ar}(\varepsilon_t)=E(\varepsilon_t^2)=\sigma_\varepsilon^2$$

$$E(\varepsilon_t\varepsilon_{t-s})=0 \qquad (s=1,2,\cdots)$$

显然，在一阶移动平均型式下，干扰项 u_t 是由另一个随机变量 ε_t 的前后两期的值合成的。

随机干扰项 u_t 的期望、方差及协方差如下:

$$E(u_t)=E(\varepsilon_t)+\mu E(\varepsilon_{t-1})=0$$

$$V_{ar}(u_t)=E(u_t^2)=E[(\varepsilon_t+\mu\varepsilon_{t-1})^2]=(1+\mu^2)^2\sigma_\varepsilon^2=\sigma^2$$

$$C_{ov}(u_t,u_{t-1})=\mu\sigma_\varepsilon^2=\frac{\mu}{1+\mu^2}\sigma^2=\lambda\sigma^2$$

$$C_{ov}(u_t,u_{t-2})=0$$

$$\vdots$$

继续推算，可得:

$$C_{ov}(u_t,u_{t-s})=0 \quad (s>1)$$

因此，在自相关是一阶移动平均型式时，也仍然满足均值为零，同方差的假定；而前后相差一期的干扰项之间的协方差不等于零，前后相差两期以上的干扰项之间的协方差都等于零。于是，干扰项的方差一协方差矩阵为:

$$E(uu')=\sigma^2\Omega=\sigma^2\begin{bmatrix}1&\lambda&0&\cdots&0\\ \lambda&1&\lambda&\cdots&0\\ 0&\lambda&1&\cdots&0\\ &\cdots\cdots&&&\\ 0&0&0&\cdots&1\lambda\\ 0&0&0&\cdots&\lambda 1\end{bmatrix}$$

二 画

二元正态分布（Bivariate Normal Distribution） 若二元随机变量 ξ 和 η 具有分布密度:

$$p(x,y)=\frac{1}{2\pi\sigma_1\sigma_2\sqrt{1-r_2}}exp\{-\frac{1}{2(1-r^2)}\cdot[\frac{(x-a)^2}{\sigma_1^2}-\frac{2r(x-a)(y-b)}{\sigma_1\sigma_2}+\frac{(y-b)^2}{\sigma_2^2}]\}(1)$$

则称 ξ 和 η 服从二元正态分布，在（1）式中，a，b，σ_1、σ_2，r 为常数，$\sigma_1>0,\sigma_2>0,|r|<1$。

可以证明，在二元正态分布中，有:

$$E\xi=a \quad E\eta=b$$

$$D\xi=\sigma_1^2,\ D\eta=\sigma_2^2$$

r 为相关系数，即:

$$r=\frac{cov(\xi,\eta)}{\sigma_1\sigma_2}$$

换句话说，二元正态分布的协方差阵为:

$$B=\begin{bmatrix}\sigma_1^2 & r\sigma_1\sigma_2\\ r\sigma_1\sigma_2 & \sigma_2^2\end{bmatrix}$$

二元正态分布具有以下特性:

（1）二元正態分布的边际分布密度仍为正态分布，即:

$$p_1(x)=\frac{1}{\sqrt{2\pi}\sigma_1}e^{-(x-a)^2/2\sigma_1^2}$$

和

$$p_2(y)=\frac{1}{\sqrt{2\pi}\sigma_2}e^{-(y-b)^2}/2\sigma_2^2$$

(2)二元正态分布的条件密度仍为正态分布，在给定$\zeta=x$的条件下，η的分布为:

$$N(b+r\frac{\sigma_2}{\sigma_1}(x-a),\sigma_2^2(1-r^2))$$

这时的条件数学期望$m=b+r\frac{\sigma_2}{\sigma_1}(x-a)$是x的线性函数。

(3) 当$r=0$时，服从二元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相互独立。

(4) 二元正态分布可经适当的坐标旋转化为两个独立正态分布之积。

二阶平稳过程 (Second-order Stationarity) 如果将平稳过程的限制条件放宽，设一个过程的均值为常数，自协方差函数只与时滞τ有关，即

$$E(X(t))=u \text{ 和 } Cov[X(t),X(t+\tau)]=r(\tau)$$

则称该过程为二阶平稳过程(或弱平稳过程)。

由于许多平稳过程的性质只取决于一阶矩和二阶矩描述的过程结构，所以，弱平稳进程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过程。正态过程就是上述过程中的一类重要过程。对所有的$t_1,\cdots,t_n$，其$X(t_1),\cdots,X(t_n)$的联合分布就是多维正态分布。多维正态分布的特征完全由其一阶矩和二阶矩来决定，因此，对于正态过程来说，二阶平稳就是严格平稳。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Two-stage Least-squares 2SLS)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是一种估计联立方程模型参数的单方程方法。由于这种方法把求解结构参数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在每个阶段各用一次最小二乘法，故此称为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它特别适合估计过度识别的结构方程。

例如，在一组结构式中，结构方程

$$Y_2=b_{23}Y_3+c_{23}X_3+u_2 \quad (1)$$

是过度识别的，这时，内生变量Y_3可将被排斥的前定变量X_1和X_2选为工具变量。对这一结构方程的估计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内生解释变量表示为全部前定变量和随机扰动项的函数:

$$y_3=\Pi_{31}X_1+\Pi_{32}X_2+\Pi_{33}X_3+V_3$$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上式得:

$$\overline{y}_3=\overrightarrow{\Pi}_{31}X_1+\overrightarrow{\Pi}_{32}X_2+\overrightarrow{\Pi}_{33}X_3$$

第二阶段：变量替换。由于$\overline{y}_3+e_3=Y$，用$\overline{y}_3e_3$替换(1)式中的内生解释变量Y_3，则有

$$Y_2=b_{23}\overline{y}_3+c_{23}X_3+u_2' \quad (2)$$

其中

$$u_2'=u_2+b_{23}e_3$$

再用最小二乘法估计(2)式，就可得出b_{23}和c_{23}的最小二乘估计量。这里，由于y的最小二乘估计量$\overline{y}_3$被选为它的工具变量，所以，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也是一种特定的工具变量法。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要求联立方程模型中的各个随机干扰项满足最小二乘法的通常假定。由于简化式方程的随机干扰项是结构方程随机干扰项的线性组合，在前面的假定满足的情况下，它们也满足最小二乘法的假定。

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量是有偏的，但却是一致的估计量。

二项分布 (Binomial Distribution) 在n重贝努里试验中，每次试验成功的概率为p，失败的概率为$q=1-p$，则在n次试验中，恰好成功x次的概率为:

$$p(X=x)=\binom{n}{x}P^xq^{n-x}$$

这个分布就称为二项分布，它的数学期望

$$Ex=np$$

方差

$$Dx=npq.$$

贝努里分布可以看作是$n=1$时的二项分布。

当n比较大，p又比较小的情况下，二项分布可以用普阿松来近似。

几何分布 (Geometric Distribution) 在贝努里试验数列中，以F表示失败(概率为$q=1-p$)，S表示成功(概率为p)，则事件$\frac{x-1}{F\cdot F\cdots F}\cdot S$发生的概率分布为:

$$p(X=x)=q^{x-1}p \quad x=1,2,\cdots\infty$$

这一分布称为几何分布，其数学期望

$$EX=\frac{1}{p}$$

方差

$$DX=\frac{q}{p^n}$$

几何滞后分布模型(Geometric Distributed Lag Model) 几何滞后分布模型是指在滞后分布模型中，滞后解释变量X_{t-j}对被解释变量y_t的影响随滞后期j的增加而按照几何速度减小，直至消失。设滞后分布模型为线性滞后分布模型

$$y_t=a+b_0x_t+b_1x_{t-1}+\cdots+b_jx_{t-j}+\cdots+u_t \quad (1)$$

滞后变量x_{t-j}的系数可表示为

$$b_j = b\lambda^j \quad (j=0,1,2,\cdots) \qquad (2)$$

其中 b 为非零常数，$0<\lambda<1$，λ 数值的大小决定递减速度的快慢，λ 值愈接近于零，递减速度愈快。将(2)代入(1)式得几何滞后分布模型:

$$y_t = a+b(x_t+\lambda x_{t-1}+\lambda^2 x_{t-2}+\cdots+\lambda^j x_{t-j}+\cdots)+u_t$$

或

$$y_t = a+b\sum_{j=0}^{+\infty}\lambda^j x_{t-j}+u_t$$

对于几何滞后分布模型，直接进行估计比较困难，往往通过 Koyck 变换解决这一类模型的估计问题。

几何平均数 (Geometric Mean) 几何平均数是变量观测值的对数的算术平均数，用公式表示为:

$$\log MG = \frac{\sum_{i=1}^{n}\log x_i}{N}$$

或

$$MG = \sqrt[N]{\prod_{i=1}^{n} x_i}$$

其中，x_i 表示变量数值，N 表示总次数。

变量数值具有比率关系的数量差异，是应用几何平均法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这一条件的统计数列，才能计算几何平均数。因此，几何平均数常应用的领域为:(1)计算经济动态的平均发展速度;(2)计算静态条件下某种比率(如价比)的平均比率。

三 画

广义岭估计 (Generalized Ridge Estimate) 广义岭估计是 Hoerl 和 Kennard 提出的岭估计的一种推广形式。

首先考虑线性回归模型的典则形式。对于线性回归模型

$$y = a1+X\beta+e,\ E(e)=0,\ Cov(e)=\sigma^2 I \qquad (1)$$

(其中，假定 nxp 的设计阵 X 已经中心标准化，且 Rank (X) = p，设 $\varphi_1,\varphi_2,\cdots,\varphi_p$ 为 $X'X$ 对应于特征根 $\lambda_1>\cdots>\lambda_p$ 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记 $\Phi=\varphi_1,\varphi_2,\cdots,\varphi_p)$，$\Lambda=diag(\lambda_1,\cdots,\lambda_p)$，则

$$y = a_1 1+X\beta+e$$
$$= a_0 1+Z\alpha+e \qquad (2)$$

这里，把(1)式中的常数项记为 a_1，$Z=X\Phi$，$\alpha=\Phi'\beta$ 称(2)为线性回归模型的典型形式，α 称为典则回归系数。因为 X 已中心化，所以 Z 也是中心化的，于是对于模型(2)，常数项的 LS 估计为 $\hat{\alpha}_0=\bar{y}=\frac{1}{n}\sum_{i=1}^{n}y_i$。因 $Z'Z=\Phi'X'X\Phi=\Lambda$，所以从(2)式导出的 α 的 LS 估计为

$$\hat{\alpha} = \Lambda^{-1}Z'y \qquad (3)$$

原回归系数 β 的 LS 估计可表为

$$\hat{\beta} = \Phi\hat{\alpha} \qquad (4)$$

相应的岭估计(参见"岭估计")分别为

$$\hat{\alpha}(k) = (\Lambda+kI)^{-1}Z'y \qquad (5)$$

和

$$\hat{\beta}(k) = \Phi\hat{\alpha}(k) \qquad (6)$$

若在(5)式中，以对角元素不必都相等的对角阵 $k=diag(k_1,\cdots,k_p)$，$(k_i>0)$代替 kI，可以期望均方误差能够进一步下降。基于这种考虑，定义估计

$$\hat{\alpha}(k)$$

代回到原回归系数 β，得:

$$\hat{\beta}(k) = \varphi\hat{\alpha}(k)$$
$$= \varphi(\Lambda+k)^{-1}\varphi'X'y$$
$$= (X'X+\varphi k\varphi')^{-1}X'y \qquad (8)$$

称(7)和(8)分别为典则回归系数和原回归系数的广义岭估计。显然，当 $K=kI$ 时，广义岭估计就变为一般的岭估计。

广义岭估计具有和一般岭估计类似的性质。

(1) $\hat{\beta}(k)=\beta_k\hat{\beta}$，其中，$B_k=(X'X+\Phi K\Phi')^{-1}(X'X)^{-1}$，即广义岭估计也是 LS 估计的一个线性变换。

(2) $E\hat{\beta}(k)=B_k\beta_0$，可见，只要 $B_k\neq I$、等价地，$k\neq 0$，广义岭估计就是有偏估计。

(3) 对于任意 $k=diag(k_1,\cdots,k_p)$，$k_i>0$，$\|\hat{\beta}\|$ 0，总有 $\|\hat{\beta}(k)\|<\|\hat{\beta}\|$，即广义岭估计也是 LS 估计向原点的一种压缩。

(4) 存在 $k=diag(k_1,\cdots,k_p)>0$，使得

$$MSE(\hat{\beta}(k))<MSE(\hat{\beta})$$

这说明广义岭估计可以比 LS 估计具有更小的均方误差。

广义最小二乘法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广义最小二乘法是在回归分析中，当高斯—马尔可夫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如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时所采用的一种估计参数的方法。

该线性回归模型为：

$Y=X\beta+u$

假定 $E(u)=0$

$E(uu')=\sigma^2\Omega$

式中 σ^2 为未知常数，Ω 为对称且正定的已知矩阵，它可以将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情况都包括在内。

由广义最小二乘法求得的 β 的估计值 $\vec{\beta}$ 为：

$\vec{\beta}=(X'\Omega^{-1}X)^{-1}X'\Omega^{-1}Y$

它具有最佳线性无偏的特性。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Three-stage Least-squares, 3SLS）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是一种方程组估计方法，它是利用所有可用的信息同时估计联立方程中的所有结构方程，这种方法也称为完全信息估计方法。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假设：

1.每个结构方程都是能够识别的，特别允许是过度识别的。如果模型中有某些结构方程不能识别，那么，该模型要重新加以设定，以便使得除了恒等式以外的全部方程都能识别。

2.对模型中所有的结构方程都必须正确设定。不仅要正确地设定各方程中的变量，而且要正确地设定各方程的数学形式。

3.每个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满足零期望，同方差和序列无关。

4.不同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是同期相关的。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步骤：

第一阶段，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简化式方程。

设模型的所有内生变量可以表示为全部前定变量和随机扰动项的函数。联立模型包括 G 个内生变量和 K 个前定变量，模型中第 i 个结构方程为：

$$y_i=Y_i\beta_i+X_iT_i+u_i \quad i=1,2,\cdots,G \tag{1}$$

其中，y_i 是第 i 个结构方程中的内生变量，y_i 是一个不包含 y_i 在内的其它内生变量组成的行向量，β_i 是一个系数列向量，X_i 表示该方程中的前定变量组成的行向量，T_i 是一个系数列向量。令

$$Z_i=[Y_i,X_i],\ \alpha_i=\begin{pmatrix}\beta_i\\ T_i\end{pmatrix} \quad T=1,2,\cdots,G$$

则(1)式可写成：

$$y_i=Z_i\alpha_i+u_i \quad i=1,2,\cdots,G \tag{3}$$

用模型中所有前定变量的观察值矩阵 $X_{n\times k}$ 的转置矩阵 乘以(3)得：

$$X'y_i=X'Z_i\alpha+X'u_i \tag{4}$$

记 $y^*=\{X'y_i\}$

Z^* 表示以 $X'z_i$ 为对角元素的对角矩阵，

$u^*=\{X'u_i\}$

$i=1,2,\cdots,G$

则由(4)式构成的完整体系可写成：

$$y^*=Z^*\alpha+u^* \tag{5}$$

u^* 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

$\theta=E(u^*u^*)$

$=\{\sigma_{ij}(X'X)\} \quad i,j=1,2,\cdots,G$

由于(5)式中的随机扰动项可能具有异方差性，因而对它的求解应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这就需要首先求出 Q 矩阵的估计量，即求出各个 σ_{ij} 的估计量 S_{ij}，它可以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量 $\vec{\beta}_i$，$\vec{T}_i$（参见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S_{ij}=\frac{(y_i-y_i\vec{\beta}_i-X_i\vec{T}_i)'(y_j-Y_j\vec{\beta}_j-X_j\vec{T}_j)}{u-g-k}$$

$i,j=1,2,\cdots,G$

所以

$\vec{\theta}=\{S_{ij}X'X\}$

如果 $\vec{\theta}$ 是可求逆的，则模型结构参数 α 的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量为：

$\vec{\alpha}=(Z^{*'}\vec{\theta}^{-1}Z^*)^{-1}(Z^{*'}\vec{\theta}^{-1}y^*)$

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量在小样本情况下是有偏的，在大样本情况下是一致的。由于它在估计过程中使用的信息比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要多，它比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更加有效。

亏损付酬表（Loss Payoff Table） 亏损付酬表是以支出费用作为付酬额编制的付酬表。设某公司的产品每千件一箱，每箱的不合格品率可能为 5%、10%或 15%。如开箱挨件检验，每件检验费 0.10 元，全箱检验费为 100 元。如不检验，则每退换一件产品支付的费用为 1.25 元。对于这一情况就可以编制一个亏损付酬表（表 1）。

表 1 亏损付酬表 单位：元

不合格品率（自然状态）	行动	
	开箱检验(a_1)	不开箱检验(a_2)
0.05(θ_1)	100	62.5
0.10(θ_2)	100	125.0
0.15(θ_3)	100	187.5

大中取小亏损标准和小中取大收益标准（Minimax Loss Criterion and Maximin Profit Criterion） 大中取小亏损标准是在进行不确定型决策时所采用的一种决策准则。这种准则的基本思想是：假设在可能的状态中，都是最坏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

况下，决策者作出的决策就是使他的损失最小。应用这种决策准则，决策者可以从他的报偿矩阵中，分别找出每一种行动方案的最坏报偿，然后再从中找出这些最坏报偿中最好的结果，与其相应的方案即为最佳行动方案。

小中取大收益标准与之相似，也是一种保守的决策标准，即在择优时，从各行动方案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最小收益中，取其最大的。

这两种决策都是从最坏处着眼，把最坏状态的概率视为1，显然，这是一种悲观者的观点，所以，这两种标准也常称为"悲观准则"。

大中取大收益标准（Maximax Profit Criterion） 这是在不确定型决策中采取的一种决策准则.这种准则的基本思想是：假设在状态空间中，最好的自然状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作出的决策是使他的收益为最大。应用这种决策准则，决策者可以从他的报偿矩阵中分别找出每一种行动方案的最大报偿，然后再从中选择最大者。与其对应的行动方案即为决策者的最佳决策。

与这一标准相似，还有一种小中取小亏损标准。它在用货币亏损或效用亏损决策时，从各行动的最小亏损中，取其最小者。

这两种标准都把最好的情况发生的概率看成是1，是一种乐观的决策标准，所以，它们常被称为"乐观准则"。

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 大数定律研究的是某种具有特殊形式的随机变量

$$S_n=\sum_{i=1}^{n}\zeta_i$$

在一定条件下，当n趋近于无穷大时的极限性质。由于当n很大时，s_n一般也很大，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研究都转化为对$\frac{S_n}{n}$的研究。大数定律在概率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于随机事件的频率稳定性在理论上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它是联系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一座桥梁。

大数定律可以定义如下：

若$\zeta_1,\zeta_2,\cdots,\zeta_n,\cdots$是随机变量序列，令

$$\eta_n=\frac{\zeta_1+\zeta_2+\cdots+\zeta_n}{n}$$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常数序列$a_1,a_2,\cdots,a_n,\cdots$，对任意的$\varepsilon>0$，恒有

$$\lim_{n\to\infty}P\{|\eta_n-a_n|<\varepsilon\}=1$$

则称序列$\{\zeta_n\}$服从大数定律。

(1) 车贝晓夫大数定律　设$\zeta_1,\zeta_2,\cdots,\zeta_n\cdots$是由两两不相关的随机变量所构成的序列，每一随机变量都有有限的方差，并且它们有公共上界

$D\zeta_1<c,\ D\zeta_2<c,\cdots,D\zeta_n<c,\cdots$

则对任意的$\varepsilon>0$，皆有

$$\lim_{n\to\infty}\{|\frac{1}{n}\sum_{k=1}^{n}\zeta_k-\frac{1}{n}\sum_{k=1}^{n}E\zeta_k|<\varepsilon\}=1$$

这个结果在1866年被俄国数学家车贝晓夫所证明，它是关于大数定律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结论，许多大数定律的古典结果是它的特例。

(2) 贝努里大数定律　设S_n是n次贝努里试验中事件A出现的次数；而P是事件A在每次试验中出现的概率，则对于任意$\varepsilon>0$，都有

$$\lim_{n\to\infty}P\{|\frac{S_n}{n}-p|<\varepsilon\}=1$$

贝努里大数定律是最早的大数定律，它首先研究了随机现象的频率稳定性，说明了在贝努里概型中，频率将趋于常数p.

(3) 普阿松大数定律　如果在一个独立试验序列中，事件A在第k次试验中出现的概率等于p_k，以s_n记在前n次试验中事件A出现的次数,则对任意$\varepsilon>0$，都有

$$\lim_{n\to\infty}\left\{\left|\frac{S_n}{n}-\frac{p_1+p_2+\cdots+p_n}{n}\right|<\varepsilon\right\}=1$$

(4) 马尔柯夫大数定律　马尔柯夫注意到在车贝晓夫的论证中，只要

$$\frac{1}{n^2}D\left(\sum_{k=1}^{n}\zeta_k\right)\to 0$$

则大数定律就能成立。这一条件通常称为马尔柯夫条件。因此，马尔柯夫大数定律可表述为：

对于随机变量序列$\zeta_1,\zeta_2,\cdots,\zeta_n,\cdots$，若马尔柯夫条件成立，则对于任意的$\varepsilon>0$，都有

$$\lim_{n\to\infty}p\left\{\left|\frac{1}{n}\sum_{k=1}^{n}\zeta_k-\frac{1}{n}\sum_{k=1}^{n}E\zeta_k\right|<\varepsilon\right\}=1$$

(5) 辛钦大数定律　以上的各种大数定律，都假定了方差的存在性，但是在独立同分布场合，并不需要有这个要求，辛钦大数定理证明了这一点。

设$\zeta_1,\zeta_2,\cdots,\zeta_n,\cdots$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服从相同的分布,且具有有限的数学期望

$a=E\zeta_n$

则对于任意的$\varepsilon>0$，有

$$\lim_{n\to\infty}P\{\left\{\left|\frac{1}{n}\sum_{i=1}^{n}\zeta_i-a\right|<\varepsilon\right\}=1$$

(6) 波雷尔强大数定律　以上的大数定律都只要求依概率收敛，若把收敛性提高为以概率1收敛，则得到的大数定律称为强大数定律。若强大数定理成

立，则通常的大数定律也一定成立。反之不然。有时为区别起见，把依概率收敛意义下的大数定律称为弱大数定律。波雷尔强大数定律是波雷尔在对贝努里试验场合建立的第一个强大数定律。

设 S_n 是事件 A 在 n 次独立试验中的出现次数。在每次试验中事件 A 出现的概率均为 p，那么当 $n\to\infty$ 时，

$$P\left\{\frac{S_n}{n}\to p\right\}=1$$

(7) 柯尔莫哥洛夫强大数定律　它是更为一般的强大数定律，它扩展了波雷尔强大数定律，放宽了它的限制条件，这一强大数定律可表述为:

设 $\{\zeta_i\}$, $i=1,2,\cdots$ 是独立随机主量序列，且 $\sum_{n=1}^{\infty}\frac{D\eta_n}{n^2}<\infty$，则成立

$$P\left\{\lim_{n\to\infty}\frac{1}{n}\sum_{i=1}^{n}(\zeta_i-E\zeta_i)=0\right\}=1$$

柯尔莫哥洛夫还给出在独立同分布场合下强大数定律成立的充要条件:

设 $\zeta_1,\zeta_2,\cdots$ 是相互独立相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则

$$\frac{1}{n}(\zeta_1+\zeta_2+\cdots+\zeta_n)$$

以概率 1 收敛于 a 成立的充要条件是 $E\zeta_i$ 存在且等于 a.

柯尔莫哥洛夫的这个结果是辛钦大数定律的加强，只有它才能保证在每次试验中当 $n\to\infty$ 时，子样均值 $\frac{1}{n}\sum_{i=1}^{n}\zeta_i$ 将最终趋于母体均值。

工业总产值　它是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一定范围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产品总量。工业总产值最初是在工业企业中计算的，将一定范围（地区、部门或国家）内各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直接相加，可以得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的计算原则是：(1) 工业总产值采用工厂法计算。所谓工厂法，是以工业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按企业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来计算产值，而不是将企业内部各个车间的生产成果简单相加。因此，工业企业内部所有再度加工的产品（即生产自用量）的价值，都不允许重复计算。但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全国的工业总产值，是各企业工业总产值直接相加的结果，包括重复计算。(2) 计算工业总产值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有关的质量标准，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就用什么价格计算。(3) 工业总产值所包括的工业产品产量，应该是本企业本期生产的产量，不论是已结束本企业整个生产过程的成品还是需要在本企业进一步加工的半成品、在制品，都应计入总产值．而不是本期生产的产品价值，则不应包括在内。当然，在实际统计工作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些变通。但必须前后时期对等处理，如某些企业可以不统计半成品、在制品，但不统计就都不统计，不能有些时候不统计，另一些时候又统计。

工业总产值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 实物产品价值，具体包括:①成品价值：指已经完成本企业的生产过程，经检验合格，包装入库的工业产品价值（不论企业自备原材料生产还是用订货者原材料生产）;②已经销售或准备销售的半成品价值;③企业自制设备已构成固定资产，并转入财务帐目的产品价值;④供本企业非工业生产部门（如供本企业基本建设部门、生活服务部门等）使用的工业产品价值。实物产品按产品的全部价值（出厂价值）计入工业总产值。

(2) 已完成的对外承做的工业性作业价值，具体包括:①对外承作的工业品修理;②对外来材料、零部件及未完成制品所做的个别工序的加工;③对外来产品所做的分包和分装工作;④对外来零件，配件所作的装配工作。工业性作业按加工价值或修理费计入工业总产值。

(3) 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结存的差额价值：报告期生产的报告期尚未消耗的半成品、在制品价值，是报告期工业生产活动的成品，应计入工业总产值；报告期消耗的上期结存下来的半成品、在制品价值，因已计入上期工业总产值内，应从报告期总产值中扣除。因此，只应将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结存量价值计入总产值。

工业净产值　它指的是一定时期内一定范围内工业生产活动新创造的价值。各工业企业净产值的总和就是工业部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一个工业企业的净产值能够较好地反映该企业在工业生产活动方面的净成果。当然，它的数额会受到国家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影响。

工业净产值可以用两种方法计算：一种是生产法，一种是分配法。

(1) 生产法。就是从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减去工业生产物质消耗的价值，求得企业的工业净产值。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工业净产值＝工业总产值－工业生产物质消耗价值。工业生产物质消耗价值，指的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性劳务的费用。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①求企业的全部物质消耗的价值。它通过将企业生产费用表中的外购材料、外购动力、外购燃

料、折旧费、提取的大修理基金，以及其它支出中的物耗（如办公费、水电费、外部修理费、外部加工费、厂外运输企业的运输费等）加总求得；②从企业全部物耗中，扣除非工业生产物质消耗价值（如企业的生产车间为企业专项工程，生活福利部门提供劳务作业所发生的费用），求得工业生产物质消耗价值；③调整工业生产物质消耗的口径，使之与工业总产值的计算口径一致。凡在生产费用中包括，而在工业总产值中不包括的项目，其物质消耗应予扣除；凡工业总产值包括而生产费用表中不包括的项目，如订货者来料的价值，应加入工业生产物质消耗价值之中。

（2）分配法。这是从企业工业生产活动新创造价值初次分配的角度，将工业净产值各构成要素直接相加求净产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工业净产值＝应得的产品销售利润+应缴纳的产品销售税金。为了正确地计算各个构成要素，要划清以下两个界限：第一，划清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界限。初次分配是指净产值在工业生产有直接关联的各个方面的分配，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国家预算、生产者支付费用等途径再次进行的分配。第二，要划清本期生产与本期实现的界限。工业净产值是报告期的新创造的价值，它是本期生产出来的，这一点，和本期销售额不同。本期生产的产品不一定都在本期销售，而本期销售的产品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上期生产的。因此，利用财务上的有关资料来计算净产值时，必须加以必要的调整。例如，对于产值利润（应得的产品销售利润），就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估算：

$$应得的产品销售利润＝本期现价总产值\times\frac{本期产品销售利润}{本期产品销售收入}$$

净产值可以同时用生产法和分配法计算。从理论上说，这两种计算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使用了各种估算方法，计算结果不免会有一定的误差。

工序控制　它指的是通过编制控制图，对生产工序实行控制，预防次品率超过一定标准，以保证产品质量。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是很多的，如机器设备的性能、原材料的质量、工人的技术及熟练程度、生产环境等。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造成质量差异的原因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称为系统性原因。这是指对产品质量造成系统性影响的原因。这类原因往往比较单一，而且影响较大，造成的质量偏差有偏倚性，如原材料质量不合规格、机器运转失常等，然而一经查明原因并加以纠正后，产品质量即可恢复正常。

第二类为偶然性原因。由偶然性原因造成的误差也称随机性误差。这类原因往往是由许多微小的偶然原因综合而成的，但又不能完全排除。这种随机误差的特点是：（1）不经常系统地起作用；（2）由于因素较多，即使在正常生产情况下也无法彻底排除；（3）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偏差，有的偏高，有的偏低，方向不完全一致，因此，它们所造成的偏差可以相互抵销，使产品质量围绕某种水平上下波动。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同时出现，而系统性误差是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原因，工序控制的目的就是要对造成产品差异的原因加以辨别，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一般说来，在生产正常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中只有一些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是轻微的，这时，就称生产过程是处于控制状态中。反之，若有系统性的因素在影响产品质量，就称生产过程脱离了控制状态，应采取措施消除它。

要检查是只有偶然性因素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还是系统性因素在起作用，其方法是通过各种控制图来实现。

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　在回归分析中，如果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干扰项之间是相关的，那么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系数的估计量将是有偏的。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可以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

首先假设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X_{ki} 与干扰项 u_i 相关，这时，可选择另一个经济变量 Z_i 替代变量 X_{ki}，它满足两个条件：

（1）Z_i 与 u_i 高度不相关，即

$Cov(Z_i,u_i)=0$

（2）Z_i 与 x_{ki} 高度相关，即

$Cov(Z_i,X_i)\neq0$

称经济变量 Z_i 为变量 X_{ki} 的工具变量。

对于一元回归模型，可将其写成离差形式：

$$y_i=b_1x_i+(u_i-\bar{u}) \tag{1}$$

其中：$y_i=Y_i-\bar{y}$，$x_i=X_i-\bar{X}$

用 $z_i=Z_i-\bar{Z}$ 乘以（1）式的两端，然后对所有观测值加总，得

$$\sum z_iy_i=b_1\sum z_ix_i+\sum z_i(u_i-\bar{u}) \tag{2}$$

在（2）式中的误差项 $\sum_{i=1}^{n}z_i(u_i-\bar{u})$ 的期望值为0，如在该式中舍去误差项，得到 b_1 的估计值 b_i^* 所满足的方程组，称为拟正规方程组

$$\sum z_iy_i=b_i^*\sum z_ix_i \tag{3}$$

由（3）式求得的估计量 b_i^*，称为 b_i 的工具变量法

估计量:

$$b_1^* = \frac{\sum z_i y_i}{\sum z_i x_i}$$

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得到二元或多元回归模型的工具变量法估计量。

工具变量法的估计量仍然是有偏的，但却改善了估计量的偏倚程度。同时，在大样本情况下，它是一致的估计量。

工具变量法不仅可以用于单个回归模型的估计，而且还是一种估计联立方程模型的单方程方法，它适用于恰好识别的联立方程模型。例如，在一个包含有内生变量 Y_1,Y_2,Y_3 和前定变量 X_1,X_2,X_3 的结构式模型中

$$Y_{1t}=b_{12}Y_{2t}+C_{11}X_{1t}+C_{12}X_{2t}+u_1$$

是恰好识别的。这时，就可以看出内生解释变量 y_2 有唯一的前定变量 X_3 作为其工具变量。它满足:

(1) $\text{Plim}_{n\to\infty}\frac{1}{n}\sum_{t=1}^{n}X_{3t}u_{1t}=0$;

(2) $\text{Plim}_{n\to\infty}\frac{1}{n}\sum_{t=1}^{n}X_{3t}Y_{2t}\neq 0$;

利用拟正规方程组，就可以得到 b_{12}、C_{11} 和 C_{12} 的工具变量法估计量 $\vec{b}_{12},\vec{C}_{11}$ 和 $\vec{C}_{12}$。

马尔可夫过程（Markov Process） 马尔可夫过程是一类重要的随机过程。考虑取值为整数（或它的子集）的随机变量序列 $\{X(n),n=0,1,2,\cdots\}$。假若它具有如下性质：若对于任意的非负整数 $t_1<t_2<\cdots<t_r<t$，只要

$$P\{X(t_1)=i_1,\ X(t_2)=i_2,\cdots,X(t_r)=i_r\}>0$$

就有

$$P\{X(t)=j|X(t_1)=i,\ X(t_2)=i_2,\cdots,X(t_r)=i_r\}$$
$$=p\{X(t)=j|X(t_r)=i_r\}$$

就称 $\{X(n)\}$ 具有马尔可夫性，或称无后效性。如果把 $X(n)$ 的参数看为时间，t_r 作为“现在”，则 $t>t_r$ 就是“将来”，而 $t_1<t_2<\cdots<t_{r-1}(<t_r)$ 就是过去。因而上式也可表述为：在现在 $X(t_r)=ir$ 已知的条件下，$\{X(n)\}$“将来”的情况与“过去”的情况是无关的。换句话说，$\{X(n)\}$ 的将来只是通过“现在”与“过去”发生联系，一旦“现在”已知，“将来”和“过去”就是无关的了。

为了强调 $\{X(n),n=0,1,2,\cdots\}$ 的参数是非负整数，对具有马尔可夫性的这一随机过程也称作是马尔可夫链。又因为 $X(n)$ 的取值为整数，也称它为可列状态的马尔可夫链。

马尔可夫过程 $\{X(t),t\in T\}$ 的可能取的值的全体，称为过程的状态空间，其中每一元素，即 $\{X(t),t\in T\}$ 所可能取的值称为状态。对于马尔可夫过程 $\{X(t),t\in T\}$ 来说，最重要的概念是转移概率 $P(s,x;t,A)$，其中 S，$t\in T$，且 $s<t$，A 是状态空间的子集，它表示在 $X(s)=x$ 的条件下，$X(t)\in A$ 的条件概率，即

$$p(s,x;t,A)=p\{X(t)\in A|X(s)=x\}$$

四 画

方程式（Equation） 经济计量模型都是由一个或一系列方程式构成的。这类方程根据经济理论的判断和分析，参照实际需要和可能，把变量、参数、随机干扰项组成数学表达式，借以反映各个经济变量之间以及各种外部条件之间的联系。一般地说，经济计量模型中的方程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 行为方程式。这种方程式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揭示经济行为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特定规律性。例如，研究某个经济中人均消费 C 和人均收入 Y 的关系，列出如下的关系式:

$$C=\beta_0+\beta_1Y+u$$

它说明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线性依存关系。人均收入每增加一元，将导致人均消费增加 β_1 元。其它如投资函数、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等，都属于行为方程式。

(2) 技术方程式，它描述了在某个经济系统中存在的技术关系。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就是这样的一种方程式，它反映了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出成果之间的工艺技术关系模型。

$$Q=AK^{\alpha}L^{\beta}U$$

说明了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与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依据关系。式中，Q 是产量，K 是资本，L 是劳动，U 为随机干扰项，A、α、β 为参数。

(3) 制度方程式，也称为法规方程式。它是根据法律、制度、政策等规则所确定的反映经济变量间数量关系的方程式。例如:

销售税金＝销售收入×销售税率

其中税率是由政府制度明确规定的。

(4) 定义方程式。它说明了一些经济变量的定

义范围或相互之间的数量换算关系。例如：

可支配收入＝个人收入－所得税

这就是一个定义方程式。

方差的性质　随机变量的方差具有以下性质：

(1) 常量的方差等于零，即

$$D(c)=0$$

(2) 随机变量与常量之和的方差就等于这个随机变量的方差，即

$$D(\xi+c)=D\xi$$

(3) 常量与随机变量乘积的方差，等于这个常量的平方与随机变量方差的乘积。

$$D(c\xi)=c^2D\xi$$

(4) 两个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方差，等于这两个随机变量方差的和。若 ξ 和 η 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D(\xi+\eta)=D\xi+D\eta$$

这个结论可以推广到任意有限个随机变量的情况。

(5) 任一随机变量的方差等于这个随机变量平方的期望与其期望的平方之差。即

$$D\xi=E\xi^2-(E\xi)^2$$

方差分析（Variance Analysis）　在经济分析、经营管理和科学试验中，经常要遇到对两个以上的平均数是否相等进行假设检验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类问题，可以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加以解决。

方差分析的作法是，首先，按照有关标志（称为因素）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小总体，然后再对这些不同的小总体（称为处理）的观测值进行加工，分别计算处理内部的方差（组内方差）和处理之间的方差（组间方差）并进行 F 检验，得出各种处理的平均数是否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的结论。

例如，某商店为了检查四个售货员的工作能力，登记了他们在五天内的销售额：

观察值	处理(销售额：元)			
	甲	乙	丙	丁
第 1 天	265	312	279	308
第 2 天	287	283	251	296
第 3 天	251	308	285	324
第 4 天	291	279	242	317
第 5 天	272	296	265	328

现在的问题是，这四种不同的处理（四个售货员的销售量）之间是否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从直观上就可以知道，售货员之间销售量上的差别，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由于工作能力上的差别，一是由于偶然因素的影响。方差分析就是要分析这两种因素的影响。

可以把上表中的各个观察值记为 x_{ij}。它们共有 k 列（k 种处理），每一列的观察值有 n_j 个（$j=1,2,\cdots,k$）。即

$$\begin{matrix} x_{11} & x_{12} & \cdots & x_{1k} \\ x_{21} & x_{22} & \cdots & x_{2k}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x_{n_1 1} & x_{n_2 2} & \cdots & x_{n_k k} \end{matrix}$$

这时，可以计算全部观察值的离差平方和，并把它们分解成“处理”内离差开方和与“处理”间离差平方和。即

$$\sum_{i=1}^{n_j}\sum_{j=1}^{k}(x_{ij}-\bar{x})^2=\sum_{i=1}^{n_j}\sum_{j=1}^{k}(x_{ij}-\bar{x}_j)^2+n_j\sum_{j=1}^{k}(\bar{x}_j-\bar{x})^2$$

等式左边是总离差平方和；等式右边的第一项是“处理”内离差平方和，它是各组的观察值与组平均数离差的平方和，反映的是由于偶然原因而引起的试验结果的差异；等式右边的第二项是“处理”间离差平方和，它是各种处理的平均数和总平均数离差的平方和，反映的是由于系统性原因（如售货员的工作能力）而引起的试验结果的差异。

如果观察值 x_{ij} 是服从正态分布的独立随机变量，$E(x_{ij})=u_j$，$D(x_{ij})=\lambda^2$，在原假设 H_0：$u_1=u_2=\cdots=u_k$（对立假设为 u_j 不全相等）成立的条件下，则等式右边的第一项除以 λ^2 将服从自由度为 $\sum_{j=1}^{k}n_j-k=n-k$ 的 χ^2 分布，等式右边的第二项除以 λ^2 将服从自由度为 k−1 的 χ^2 分布。由于这两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将它们各自除以自己的自由度并加以对比，有

$$F=\frac{[\frac{1}{\sigma^2}\sum_{j=1}^{k}n_j(\bar{x}_j-\bar{x})^2]/(k-1)}{[\frac{1}{\sigma^2}\sum_{i=1}^{n_j}\sum_{j=1}^{k}(x_{ij}-\bar{x}_j)^2]/(n-k)}=\frac{\text{处理间方差}S^2_{间}}{\text{处理内方差}S^2_{内}}$$

它是一个服从自由度为（k−1,n−k)的 F 分布的随机变量。如果原假设成立，各组平均数和总平均数间的方差将不会显著地大于各组内观察值和组平均数间的方差，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 α 下，F 将小于临界值 $F_\alpha(k-1,n-k)$，它说明观察值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由于偶然原因而引起的。如果 $F>F_\alpha(k-1,n-k)$，说明小概率事件发生了，我们将拒绝原假设，即认为 u_j 之间不全相等，存在着系统性的误差。在上面的例子中，$F=10.49>F_{0.05}(3,16)=3.24$，故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四位售货员的工作能力之间有差别。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 从方差分析的目的看，是要检验各种“处理”的平均数 $u_1,u_2,\cdots,u_k$ 是否相等，而手段则是通过检验它们之间的方差。根据方差分析的假设条件，观察值之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各种“处理”之间的差异，即进行各种“处理”时形成条件不同，所以也称其条件误差。另一部分是同一“处理”内观察值之间的差异。尽管试验条件相同，但仍然不能避免一些细小原因的影响使结果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也称为试验误差。这二者的差别在于条件误差是系统性的，而试验误差的是随机性的。方差分析就是要确定各组观察值之间有没有条件误差存在，也就是在不同的“处理”之间有没有系统性因素在起作用。这两种差异都通过方差来计量，S_B^2 表示“处理”之间的方差，以 S_w^2 表示“处理”内部的方差。显然，当假设 H_0: $u_1=u_2=\cdots=u_k$ 为真时，即没有系统性误差，那么，$\bar{x}_j$ 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由于随机的原因引起的，因此“处理”之间的方差和“处理”之内的方差就不会相差很大，其比值 S_B^2/S_w^2 将在 1 左右。反之，若“处理”之间的平均值不同，就意味着有系统误差。S_B^2 就会明显地大于 S_w^2，或 S_B^2/s_w^2 明显地大于 1。由于原假设为真的情况下，$F=S_B^2/S_w^2$ 将服从 F 分布，可以利用 F 分布来进行假设检验，检验不同的处理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计件控制图 计件控制图也称为计数控制图，它主要用于用合格不合格这两种属性反映产品质量的场合。所以，有时也称其为属性控制图。在使用这种图时，人们从一批产品中抽取 n 件检查，观察不合格品的数量，并把它们反映在计件控制图上，看其是否超过规定的标准。在计件控制图中，一个样本中的次品数是可数的。设在容量为 n 的样本中，含次品的个数为 x，则 x 是一个离散型随机变量。若总体 N 很大而抽样比例 n/N 很小时，就接近重复抽样，x 可以看作是近似服从于参数为 n、p 的二项分布。即

$$P(x)=\binom{n}{\lambda}P^x(1-p)^{n-x}$$

其中：p 为总体中次品所占的比例。

二项式分布的数学期望为 np，方差为 np(1−p)，所以控制图中心线为 np，控制上下限分别为 $np\pm3\sqrt{np(1-p)}$。这种控制图适合于每次抽取的样本容量相等的场合。这种图也称为不合格品数量控制图。但在实际工作中，反映一批产品质量好坏常常用不合格品率（p）来表示，其中$p=\frac{x}{n}$，这时，可用控制图控制不合格率的大小，这种图也称为 P 图。p 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bar{p}$和$\sqrt{\bar{p}(1-\bar{p})/n}$。因此，

$$p\text{ 的控制上限 }(UCL_p)=\bar{p}+3\sqrt{\frac{\bar{p}(1-\bar{p})}{n}}$$

$$p\text{ 的控制下限}(LCL_p)=\bar{p}-3\sqrt{\frac{\bar{p}(1-\bar{p})}{n}}$$

这时，控制上、下限控制在 3 个标准差范围内，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虑到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点（在 99%以上）都将落在这个范围内。

p 控制图的编制和分析和计量控制图是相似的（参见“计量控制图”）。

计点控制图 有些产品的质量是用每单位产品中有多少缺陷来表示的。计点控制图就是用来控制单位产品上的缺陷数，使之不超过规定的界限的。一般地说，在生产情况正常时，可以假定在单位产品上的缺陷数遵从普阿松分布。

$$P(x)=\frac{\lambda^x e^{-\lambda}}{X!}\qquad x=0,1,2\cdots$$

普阿松分布的数学期望和方差都是 λ，所以其标准差为$\sqrt{\lambda}$。普阿松分布也可以用正态分布来近似计算。在绘制控制图时，其中心线为$\bar{c}$

$$\bar{c}=\frac{\sum_{i=1}^{m}c_i}{m}$$

其中，c_i 表示在第 i 个单位产品上的缺陷数。

控制上界为

$$UCL_{\bar{c}}=\bar{c}+3\sqrt{\bar{c}}$$

控制下界为

$$UCL_{\bar{c}}=\bar{c}-3\sqrt{\bar{c}}$$

计点控制图的编制步骤及分析方法和计量、计件控制图是类似的。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是以数理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科学，它是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的结合。

在经济学研究中引进数学方法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他之后，古诺于 1838 年出版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开始用数学函数形式描绘经济现象以及现象之间的关系。但在经济研究中大量应用数学方法，提出系统理论的则是 19 世纪的经济学家瓦尔拉斯、马歇尔、帕累托等人，一般认为这些人是计量经济学产生的先驱。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十分迅速，现在成为数理统计学中心内容的统计推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二、三十年代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这就为计量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较好的

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基础。

在应用研究方面，在1923～1930年的大萧条时期以前，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计量经济研究，如英国的庇古利用家庭收支材料所作的关于消费的需求弹性的计量，美国的穆尔应用产量和价格资料所作的关于某些农产品和生铁的需求弹性的计量。后来又出现了舒尔茨对一些农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所作的计量，柯布和道格拉斯关于生产函数的研究，等等。

1930年底，美国成立了计量经济学会，1933年出版了定期的《计量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可以认为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它的创始人弗瑞希在创立这门学科时，模仿计量生物学（Biometrics）这个词，提出了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的概念。

在计量经济学发展的初期值得提出的主要著作有：弗瑞希的《用完全回归体系的统计合流分析》，哈维尔莫的《经济计量学的概率研究法》。

在这之后，计量经济学就沿着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迅速发展起来。在理论方面，经济计量学与数理统计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它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度量经济关系的方法，并逐步完善它们。在实践方面，主要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各方面的经济预测和分析工作。

计量经济学的具体计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四个连续步骤：(1）建立模型；(2）估算参数；(3）验证理论；(4）使用模型。

(1）建立模型：根据经济理论的指引，人们对客观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假说，并且用某一具体的方程式来表示。例如，消费支出和收入是正向的函数关系，在简单情况下，可以假设为：

$$Y=\alpha+\beta X$$

式中

Y——消费支出

X——收入

α、β——未知的参数

这是单方程的情况，称作单方程模型；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往往是多方程或联立方程模型。

从计量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上面这个模型所能说明的问题是十分有限的，它假设在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确定性的关系。用这种方法描绘经济现象是很不完善的，因为在客观世界中影响因素众多，现象之间的关系复杂，很难说经济现象之间存在严格的函数关系。所以在计量经济学中出现的都是带有误差项的方程：

$$Y=\alpha+\beta X+\mu$$

方程中的μ称为干扰项，它代表没有包括在方程中的一切其它因素对Y的共同影响。这个干扰项是随机变量，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这样定义的模型就是计量经济学模型。

(2）估算参数：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之后，就需要根据统计资料估算出模型中的参数，例如α和β这些参数的数值。进行参数估计首先需要合适的、精确的统计资料，估算参数的基本方法是数理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方法及其它估计方法。

(3）验证理论：参数估算出来之后，必须找到一个准则来判断估算的参数与理论上预期的结果是否一致。完成这一任务就要依据数理统计学的统计推论方法，特别是假设检验方法。

(4）使用模型：这主要是指使用模型对经济现象的未来值的预测和政策模拟。在这一阶段，计量经济模型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检验的结果可能是部分地修改模型，也可能是从根本上推翻原有的模型，重新建立新的模型。在检验结果良好时，就可以相对稳定一个时期，应用这一模型去解决具体实际问题。

计量控制图　计量控制图是在企业工序控制中使用的一种控制图。这种控制适用于产品的质量指标是物理度量的场合，如机器零件的尺寸；砖、水泥等建筑材料的抗压强度；皮带、钢丝绳等拉力强度，等等。这些变量是属于连续的随机变量，如果生产过程完全正常，即只存在偶然性误差，那么，可以假定这些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并依此建立控制图进行工序控制。

计量控制图的种类很多，其中最常用的是平均数控制图（简写为x图）和全距控制图（又称极差控制图，简单为R图）。

1.$\overline{X}$控制图

$\overline{X}$控制图是利用平均数对产品质量实行控制的控制图。该控制图的编制和应用步骤如下：

(1）选择产品需要控制的变量，如选择零件直径作为控制变量。

(2）决定每次检验的取样大小和取样的间隔时间，如决定每次取5个零件，每半个小时取一次样。

(3）搜集资料，检验产品质量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如不服从正态分布，就不便于使用$\overline{X}$控制图实行工序控制。

(4）确定初步的控制界限。控制图主要是由中心线和控制上下限组成。中心线数值可根据生产处于正常状态时获得的各组样本平均数的平均数求得（至少应首先取得25个样本），控制上下限是根据正态分布原理确定的。由于在正态分布下，样本平均数落在3个标准差以内的概率为99.7%，所以控制上下限用中心线±$3\sigma\bar{x}$求得。控制的上限一般用UCL表示，下限用LCL表示，则

$$UCL_{\bar{x}}=\overline{X}+3\sigma_{\bar{x}}\quad LCL_{\overline{X}}=\overline{X}-3\sigma_{\overline{X}}$$

根据小样方差与总体方差的关系，有$\sigma_{\bar{X}}=\sigma/\sqrt{n}$。但由于总体方差常常也是未知的，可用样本方差$\hat{S}=\sqrt{\sum(X_i-\bar{X})^2/n}$代替，但由于质量控制中样本容量比较小，因此用来估计σ可能有较大的误差。为了避免上述困难，统计学家研究了全距R的分布及全距和总体标准差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全距的数学期望$E(R)=d_2\sigma$，这样，用全距的算术平均数$\bar{R}=\frac{\sum_{i=1} R_i}{n}$作为E（R)的无偏估计，$\bar{R}/d_2$就是$\sigma$的一个无偏估计，其中，$d_2$是一个随样本大小而变动的数，$d_2$可以在有关数表上查到。表1列出的是当n从2到10时d_2的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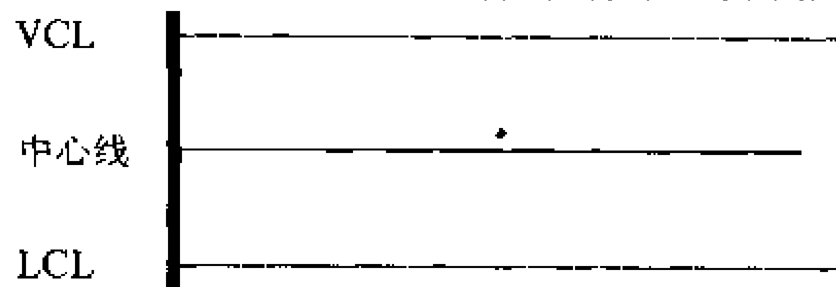
表1　d_2表

n	2	3	4	5	6	7	8	9	10
d_2	1.128	1.693	2.059	2.326	2.534	2.704	2.847	2.970	3.078

把$\bar{R}$代入上下限控制公式，可得：

$$\bar{X}\pm\frac{3\bar{R}}{d_2\sqrt{n}}$$

（5）绘制控制图和修正控制界限。求出了控制图的上下限以后，就可以绘制$\bar{X}$控制图（见下图）。



并把初步试验得到的数据画在控制图上。然后，进一步分析初次绘制的控制图是否合适，合格的控制图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使样本的数据均匀地分布在中心线的两侧，且都不超出控制界限。如果大部分样本点偏在中心线一侧或出现一些超出控制限的样本数据时，应该进行分析，必要时剔除这些点以后再重新计算中心线和控制上下限。

（6）控制图的使用和分析。当控制图完成之后，将每次取样的检验结果（如五个零件的平均直径）画在控制图上，当生产过程处于控制状态时，大部分样本点应在中心线附近，只有少数点靠近控制界限，所有的点不规则地在中心线上下波动，但位于中心线两侧的样本点个数基本平衡，即所有样本点围绕中心线形成正态分布。根据经验，控制图上出现下列情况是不正常的，需要对生产过程加以控制和调整：（1）样本点超出控制界限；（2）样本点集中在中心线的一侧；（3）点虽然不在同一侧，然而呈现一种连续上升或下降的趋势；（4）控制图的点出现跳跃式上升；（5）出现循环波动；（6）大量的点靠近两边的控制界限。

2.R控制图

R控制图是利用全距（或称为极差）对企业生产过程实行控制的控制图，R控制图的步骤和$\bar{X}$控制图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在R控制图上，中心线为平均全距，上下控制线为：

$$UCL=D_4\bar{R}\qquad LCL=D_3\bar{R}$$

D_3和D_4反映了全距和它的标准差之间的关系，表2给出了当n从2到10时D_3和D_4的数值。

表2　D_3和D_4表

n	2	3	4	5	6	7	8	9	10
D_3	0	0	0	0	0	0.076	0.136	0.184	0.223
D_4	3.267	2.575	2.282	2.115	2.004	1.924	1.864	1.816	1.777

区间估计（Interval Estimation）　点估计利用样本资料计算统计量估计总体参数，虽然能得出具体的估计值，但是无法了解这一估计值与总体参数之间的偏差，也不能回答这一估计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大，区间估计对于总体参数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值估计，而是以一个区间来表示它，并说明总体参数落入这一区间的概率，如我们用样本平均数估计总体的数学期望u时，当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布为正态分布时，$\bar{x}$落入u的两侧各一个抽样标准误差的概率是0.683，即P（$u-\sigma_{\bar{x}}<\bar{x}<u+\sigma_{\bar{x}}$）=0.683。落在$\pm2\sigma_{\bar{x}}$范围内的概率是0.9545，如此等等。但在实际估计时，我们对总体平均数（数学期望）是不知道的，而是反过来要以抽到的样本平均数来推断总体平均数。由于当n确定以后，抽样平均误差$\sigma_{\bar{x}}$是固定的，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如果样本平均数$\bar{x}$落入以总体平均数为中心的$2\sigma_{\bar{x}}$范围内，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总体平均数被包括在以$\bar{x}$为中心的$\pm2\sigma_{\bar{x}}$范围的区间里。同理，若$\bar{x}$以95.45%的概率落入（$u+2\sigma_{\bar{x}}$,$u-2\sigma_{\bar{x}}$）区间内，即抽样100次，约有95次计算出来的$\bar{x}$会落在（$u+2\sigma_{\bar{x}}$,$u-2\sigma_{\bar{x}}$）区间内，那么，反过来说，抽100个样本，约有95个样本的$\bar{x}\pm2\sigma_{\bar{x}}$区间内包括了总体平均数。换句话说，如果只抽样一次，那么$\bar{x}\pm2\sigma_{\bar{x}}$区间就有95.45%的可能包括总体参数，这就是区间估计的思想。

区间估计的大致步骤如下：（1）计算出样本统计量，确定该统计量的抽样分布，如总体是正态分布，那么，样本平均数也服从正态分布。（2）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置信水平，即可靠性或把握程度。常用的置信水平有0.9，0.95和0.99等。有时置信水平也用可能犯错误的概率来表示，如可靠性为95%，则可能犯错误的概率为5%，它也称为风险率或风险水平，记为α。（3）按照要求的置信水平查出相应的概率度，如在正态分布条件下，对于双尾检验，95%

的置信水平所对应的概率度为 1.96。(4) 计算抽样平均误差。(5) 最后，作出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戈德菲尔德—坎特 (Goldfeld-Quandt) 检验 这种检验是 Goldfeld 和 Quandt 在 1965 年提出来的一种检验回归模型异方差的检验。这是一种大样本检验，要求观测值的数目至少是所要估计的参数的二倍；并仍然假定干扰项 u_i 是服从期望值为零的正态分布，且 $E(u_iu_j)=0(i\neq j)$。由于所要检验的是 u_i 的异方差性，故有：

原假设 H_0：u_j 是同方差的；

备择选择 H_1：u_i 是异方差的（不妨认为具有递增方差）。

我们以一元回归模型 $Y_i=\beta_0+\beta_1X+u_i$ 为例说明该检验的步骤。

1.观测值按照解释变量 X_i 的大小顺序排列：

X_1，X_2，…，X_n

Y_1，Y_2，…，Y_n

2.删去正中间的 c 个观测值，将剩下的 n−c 个观测值划分为容量相等的两个子样本，使其中一个包含 x 的较小值，另一个包含 x 的较大值。

3.对两个子样本分别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回归方程，这里当然要保证 (n−c) /2 要大于待估计的参数个数。

4.分别求出两个子样本回归方程的剩余平方和 $\sum e_{1i}^2$ 及 $\sum e_{2i}^2$；其中 $\sum e_1^2$ 表示 X 较小值的子样本的剩余平方和，$\sum e_{2i}^2$ 表示 X 较大值的。

5.建立统计量 F：

$$F=\frac{\sum e_{2i}^2/[(n-c)\div 2-2]}{\sum e_{1i}^2/[(n-2)\div 2-2]}=\frac{\sum e_{2i}^2}{\sum e_{1i}^2}$$

它服从第一自由度和第二自由度都为 (n−c) ÷2−2 的 F 分布。如果是多元回归模型，两个自由度均为 (n−c)÷2−K，K 是所要估计的参数的个数。

根据 F 检验理论，可选定某个置信度 1−α，查 F 分布表，得到对应于上述自由度的临界值 F_α。若计算得到的 $F>F_\alpha$，就拒绝原假设，即存在异方差性；若 $F<F_\alpha$，则接受原假设 H_0，U_i 是等方差的。显然，F 值越大，异方差性越强。

边际概率分布和条件概率分布 (Marginal Distribution and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对于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可以将它的取值和相应的概率列在一个表上，并分别求出各行概率和各列概率的和。

在这个表中，g(x)表示在不考虑 y 的情况下，x 的分布；h(y)表示不考虑 x 的情况下，y 的分布，我们称 g(x)、h(y)为 x、y 的边际概率分布。

	y_1	y_2	…	y_2	行合计[g(x)]
x_1	$f(x_1,y_1)$	$f(x_1,y_2)$	…	$f(x_1,y_l)$	$\sum_y f(x_1,y)$
x_2	$f(x_2,y_1)$	$f(x_2,y_2)$	…	$f(x_2,y_l)$	$\sum_y f(x_2,y)$
⋮	⋮	⋮	…	⋮	⋮
x_k	$f(x_k,y_1)$	$f(x_k,y_2)$	…	$f(x_k,y_l)$	$\sum_y f(x_k,y)$
列合计[h(y)]	$\sum_x f(x,y_1)$	$\sum_x f(x,y_2)$	…	$\sum_x f(x,y_l)$	

同样，在连续随机变量的情况下，我们有边际分布密度：

$g(x)=\int_{-\infty}^{+\infty}f(x,y)dy$

$h(y)=\int_{-\infty}^{+\infty}f(x,y)dx$

对于多维随机变量，也可以作类似的推广。

而条件概率分布则是在某一个随机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另一个随机变量的条件概率分布，对于离散随机变量，在给定 Y＝y 的条件下随机变量 x 的条件概率分布为：

$$f(x|y)=\frac{f(x,y)}{h(y)}$$

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上述的概率分布要变成分布密度。

双对数模型 (Double-Log Model) 在计量经济分析中，对于总体回归模型

$$Y_i=\beta_0X_i^{\beta_1}e^{u_i}$$

两边取对数后，有：

$$\log Y_i=\log\beta_0+\beta_1\log X_i+\mu_i$$

设 $\log\beta_0=\alpha$，则上式变为：

$$\log Y_i=\alpha+\beta_1\log X_i+\mu_i$$

这个模型对参数 α 和 β_1 是线性的，对 X 和 Y 的对数也是线性的，因此称为双对数模型或对数线性模型。

令 $Y_i^*=\log Y_i$，$X_i^*=\log X_i$，则上式可再进一步写成下面的形式：

$$Y_i^*=\alpha+\beta_1X_i^*+u$$

如果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满足的话，α 和 β_1 不难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出来，而估计的结果 $\overline{\alpha}$ 和 $\overline{\beta}_1$ 分别是 α 和 β_1 的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但必须注意，由于 $\overrightarrow{\beta}_0$ 是 $\overline{\alpha}$ 的反对数，所以 $\overrightarrow{\beta}_0$ 是 β_0 的有偏估计量。

双对数模型的特点是斜率系数 β_1 正好是 Y 关于 X 的弹性，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所以这个模型又称为常数弹数模型。

长期趋势 (Long Term Trend) 长期趋势指的是时间数列数量变化发展的"规则性"，它表现为长期

过程中不重演的连续性变动。频繁和骤然的变动，或重演的变动，都不属于长期趋势。长期趋势本身虽然是一个均匀连续的变动过程，但它却常常潜伏在所观察到的年与年、月与月之间的不规律变动中，其它几类要素（季节变动、循环变动及不规则随机变动）则被认为是外加于长期趋势之上的，原有的观察数列所体现的不过是长期趋势与其它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从分解方法而言，常常是首先提出长期趋势的测定，长期趋势可以通过与坐标图上将时间数列描点后，配合长期趋势线后测定，配合长期趋势线的方法很多，最小率方法是较为常用的方法。

风险型决策（Risk Decision） 风险型决策是指在进行统计决策时未来的状态是不确定的，但根据以往经验又有若干信息可以利用。例如，某单位要进一批空调机在夏天销售，那么，上一年的秋天就要订货，但销路则取决于次年夏天的气温。气温高，空调机就卖得快，如果天气凉快，空调机就卖得慢。这时的决策，就是一种风险型决策。如果该单位认为天气炎热，多进了空调机，但实际上很凉快，就会积压资金；如果认为天气凉快，少进了空调机，该赚的钱没有赚到，也是一种损失。无论怎样预测天气，都有一定的风险。风险型决策中最常用的标准是期望值标准。它把经济后果和出现的概率结合起来，要求期望的收益最大，或者是期望的损失达到最小。

分布的假设检验 分布的假设检验也称为吻合性检验，它是一种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它利用样本信息对总体分布作出推断，检验客观现象是否服从某种理论分布。其方法是把样本分为 k 个互斥的类，然后根据要检验的理论分布，计算出每一类的理论频数 $f_e=np_i$，与实际观察频数 f_0 比较，计算

$$\chi^2=\sum_{i=1}^{k}\frac{(f_{0i}-f_{ei})^2}{f_{ei}}$$

的值。当假设 H_0 为真时，即研究对象服从该理论分布时，该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 k-1 的 χ^2 分布。显然，f_0 与 f_e 之间的差别应比较小，即 χ^2 值比较小，反之 χ^2 值就会比较大。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 α 下，查和自由度 k-1 相对应的 χ^2_α 值，如果 $\chi^2>\chi^2_\alpha$，则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实际观察值不服从该理论分布，反之，则接受原假设。

应该注意，在进行这种检验时，应满足以下条件：(1) 试验频数应比较多，一般 n 应大于 50，(2) 在频数分组时，每一组的理论频数 f_e 不应小于 5。遇到这种情况时，应在相邻的组之间作一些合并调整。

中心极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 设 $\xi_1\xi_2\cdots\cdots$ 为独立的随机变量序列，$\{s_n=\sum_{i=1}^{n}\xi_i, n=1,2,\cdots\cdots\}$为一随机变量的部分和的序列，$E(S_n)$ 为其数学期望，$D(S_n)$为其方差。中心极限定理研究的则是$\frac{S_n-E(s_n)}{\sqrt{D(S_n)}}=\frac{S_n-E(S_n)}{\sigma(S_n)}$的概率分布的收敛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它才会收敛于正态分布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期内形成了概率论研究的中心课题，因此得到了中心极限定理的名称。

(1) 德莫威尔—拉普拉斯极限定理

中心极限定理最早由法国数学家德莫威尔（De Moivre）所研究，他提出的定理是：设 $\xi_1,\xi_2,\cdots\cdots,\xi_n$ 为相互独立并具有相同分布的贝努里随机变量，令 $p[\xi_i=1]=p, p[\xi_i=0]=q$，$s_n$ 代表其和，即$s_n=\sum_{i=1}^{n}\xi_i$，则当 n 趋向于无穷大时，$\frac{S_n-np}{\sqrt{npq}}$趋向于标准正态分布 N(0,1)。

德莫威尔最先只讨论了 $p=\frac{1}{2}$时的情况，后来，拉普拉斯把它推广到 $0<p<1$ 的场合，所以，这一定理又称为德莫威尔—拉普拉斯极限定理。

(2) 林德贝格—勒维极限定理

林德贝格和勒维进一步把极限定理推广到相互独立相同分布，但分布函数为任意的随机变量序列的场合。林德贝格—勒维中心极限定理为：

若 $\xi_1,\xi_2\cdots\cdots,\xi_n,\cdots\cdots$ 为一串相互独立相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且

$E\xi_k=m,\quad D\xi_k=\sigma^2$

则对于标准化随机变量和

$$\xi_n=\frac{1}{\sigma\sqrt{n}}\sum_{k=1}^{r}(\xi_k-m)$$

若 $0<\sigma^2<\infty$，则

$$\lim_{n\to\infty}P\{\xi_n<x\}=\frac{1}{\sqrt{2n}}\int_{-\infty}^{x}e^{-t^2}dt$$

林德贝格—勒维定理有广泛应用。在实际工作中，只要 n 足够大，便可以把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和当作是正态变量。

(3) 林德贝格条件与费勒条件

设 $\xi_1,\xi_2,\cdots\xi_n,\cdots$ 是一个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序列，它们具有有限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a_k=E\xi_k,\quad b_k^2=D\xi_K\quad(k=1,2,\cdots,n,\cdots)$

记

$$B_n^2=\sum_{k=1}^{n}b_k^2$$

作和数

$$\xi=\sum_{k=1}^{n}\frac{\xi_k-a_k}{B_n} \quad (1)$$

林德贝格在1922年提出了和数ξ_n的分布函数趋于正态分布函数的充分条件，费勒则在1935年指出，这个条件也是必要的。与独立同分布场合比较，这里保留了独立性的假定，但是去掉了同分布的要求。为了使极限分布是正态分布，还要求（1）式中的各个加项"均匀地小"。林德贝格指出，只要对于任何的$\sigma>0$，成立

$$\lim_{n\to\infty}\frac{1}{B^2}\sum_{k=1}^{n}\int_{|x-a_k|>\sigma B_n}(x-a_k)^2dF_k(x)=0 \quad (2)$$

就可以保证总和（1）中各加项"均匀地小"。条件（2）就是著名的林德贝格条件，它是和数（1）的分布函数趋向于正态分布函数的充分条件。费勒进一步指出，假如条件

$$\lim_{n\to\infty}\max_{k\le n}\frac{b_k}{B_n}=0$$

则林德贝格条件也是中心极限定理成立的必要条件。在费勒条件中，量$\frac{b_n}{B_n}$可以看作是分量ξ_n对总和ξ_n的贡献，因此，费勒条件相当于说，总和是大量"可忽略的"分量之和。

（4）李雅普洛夫定理

如果对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序列$\xi_1,\xi_2,\cdots\xi_n,\cdots$,能选择这样一个正数$\xi>0$，使当$n\to\infty$时，

$$\frac{1}{B_n^{2+q}}\sum_{k=1}^{n}E|\xi_k-a_k|^{2+\delta}\to 0$$

则

$$P\{\frac{1}{B_n}\sum_{k=1}^{n}(\xi_k-a_k)<x\}\to\frac{1}{\sqrt{2\pi}}\int_{-\infty}^{x}e^{-\frac{t^2}{2}}dt$$

李雅普洛夫定理给出了$\frac{1}{B_n}\sum_{k=1}^{n}(\xi_k-a_k)$的概率分布弱收敛于正态分布的充分条件，可以证明，这一条件满足林德贝格条件。所以，林德贝格条件给出了中心极限定理成立的普遍条件。

中位数　(Median)　如果把各变量数值按大小加以顺序排列、处在数列中的中点位置上的数值，就是中位数。中位数是按全部变量的位置决定的，因而变量数值的多少与中间位置的决定有直接关系。当数列中有极端数值时，中位数的数值不会受到很大影响。但由于它只取在中间位置上的那个变量数值，数列中的许多信息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作为一个独立的平均数，中位数常用来测定人口年龄分配中的平均年龄。这是因为：人口的年龄分配，虽然也是数量分组的次数分配，但年龄分配不是正态对称的，而是Y字型的。如果计算算术平均数，则会由于老年人岁数的影响，使结果偏大，因此，应按全体人口出幼至老排队，计算中位数。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吸取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长处，正在探索实行的一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9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公布，标志着这工作进入了实践阶段。

这个核算体系，是按照社会再生产过程设计的，它共包括六大部分十九张表：

第一部分，社会再生产条件的核算。包括人口、劳动力、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这些都是再生产的基本要素。这部分共有"人口平衡表"、"劳动力平衡表"、"资产负债表（1）（实物资产）"、"资产负债表（2）（金融资产）"、"自然资源"等五张表。

第二部分，生产与使用的核算，即社会生产成果及其使用的核算，主要是以国民生产总值反映全社会各行业的劳动成果、包括物质生产和劳务活动增加的价值，同时还反映国民生产和劳务活动增加的价值，同时还反映国民生产总值使用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的情况。这部分核算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物质产品生产与使用"、"投入产出"、"物质产品与劳务综合价格指数"等四张表。

第三部分，分配与流通的核算、包括"资金流量表（1）（实物交易部分）"、"资金流量表（2）（金融交易部分）"、"主要商品资源与使用平衡表"三张表。

第四部分，积累与消费的核算，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与使用"、"总消费"两张表、主要反映投资资金来源与固定资产形成，消费基金的用向等情况。

第五部分，国民收支核算，反映在国际交往中以什么形式得到收入，以什么形式对外进行支付，收支结果和外汇储备情况。

第六部分，国民经济循环的核算。是以矩阵表现的表。它把前面各部分的主要指标全面的排列在一张矩阵表中。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般的数据体系。通过期初资产负债、本期生产、分配、再分配收支、总消费、总积累国际收支、期末资产负债等指标，反映国民经济总的运行情况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联系。

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和前定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s、Exogenous Variables and Predetermind

Variables) 在联立方程模型中，经济变量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外生变量，这类变量的影响因素不在模型之内，它们是在模型外部决定的，属于自变量；另一类称为内生变量，它的数值由模型本身来解释。内生变量又可分为本期内生变量和滞后内生变量，外生变量与滞后的内生变量一起又可称为前定变量。本期内生变量的数值由模型加以解释，因而是被解释变量，属于应变量，而模型的解释变量就是前定变量。

某个变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并不是先验确定的，而应该考虑分析的目的和它在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以下简化的宏观经济模型中，

$C_t=\alpha_1 Y_t+\beta_1+u_{1t}$

$I_t=\alpha_2 Y_t+\beta_2 Y_{t-1}+\beta_3+u_{2t}$

$Y_t=C_t+I_t+G_t$

C_t、I_t、Y_t 分别表示第 t 年的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是模型中的内生变量；G_t 是第 t 年的政府支出，是外生变量。由于引进了 Y_{t-1} 这一滞后的内生变量，表示投资 I 是 Y_t 和 Y_{t-1} 以及随机扰动项的函数。

一般地说，内生变量是具有某种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它的参数是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的元素，满足下列条件：

$E(Y_t,u_t)\neq 0$

内生变量 Y_t 和随机干扰项的乘积的数学期望不等于 0。内生变量是由所研究的联立方程系统确定的，它不仅影响所研究的系统，而且也受系统的影响。

外生变量或者是已知数的集合，即没有概率分布的固定变量，或者是具有临界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其参数不是系统研究的元素。在线性系统中，外生变量往往满足下列条件：

$E(X_i u_i)=0$

这是对外生变量 X_i 和扰动项 u_i 施加的条件。外生变量对系统有影响，而它不受系统的影响。

贝叶斯决策（Bayes Decision） 贝叶斯决策又称为期望收益决策，它是以各行动的期望收益作为择优的标准，选择期望收益最高的行动，即最优行动 (Optimal Act)，也称为贝叶斯行动（Bayes Act）。

表 1 收益决策表 单位：百元

温度(自然状态)	概率 P	作物(行动)			
		小麦(a_1)	番茄(a_2)	甜菜(a_3)	芦笋(a_4)
干燥(θ_1)	0.3	20	20	23	30
适宜(θ_2)	0.5	35	40	30	25
潮湿(θ_3)	0.2	40	20	45	20
期望值	—	31.5	30.0	30.9	25.5

例如，如果对表 1 中的四种作物（行动），进行选择，可先计算各种行动的期望值（EMV）然后进行比较，作出决策。

显然，小麦的期望收益(即加权平均收益)最高，种小麦为最优行动。假如择优不当，没有选中 a_1（种小麦）而误选 a_2（种番茄），则为一种不合理的决策。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决策而付出的代价称为"不合理代价"（Cost of Irrationality）。因误选 a_2 而付出的不合理代价为

31.5−30＝1.5（百元）

贝叶斯决策的优点是把全部自然状态下的全部可能结果都考虑在内了。缺点是对某些特定的情况（如同一行动在不同自然状态下差别很大，有正有负）可能不适应。另外，如何确定概率并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除了按期望收益决策外，还可以按期望亏损和期望机会亏损进行决策。在这两种决策中，将以最小期望亏损或最小期望机会亏损作为选择最优行动的标准。

贝叶斯统计学（Bayes Statistics） 贝叶斯统计学的基本思想，源生于英国学者贝叶斯（1702—1761）对于后验概率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贝叶斯公式由后世的学者发展成为一整套关于统计推断的系统理论。信奉这种理论的统计学家，就组成了贝叶斯学派，他们所研究的统计学，就称为贝叶斯统计学。贝叶斯统计学与传统理论在两个方面有根本的区别：一是否定概率的频率解释，这涉及与此有关的大量统计概念，而提倡给概率以"主观上的相信程度"这样的解释；二是"先验分布"的使用，它被解释为在抽样前对推断对象的知识概括。按照贝叶斯学派的观点，样本的作用，在于且仅在于对先验分布作修改，然后过渡到"后验分布"。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个学派一直未获得重大进展。但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信奉者越来越多。贝叶斯统计学派与传统统计学派之间的争论，是战后统计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种争论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促使人们进行研究，其中有的是很根本性的，例如，对统计推断和主观概念这种基本概念的深入研究，就促进了统计学的发展。贝叶斯统计学与统计决策理论相结合，产生了"贝叶斯决策理论"，它构成了统计决策理论在实际应用上的主要内容。

不变价格法 在一个按照实际价格或现行价格计算的总量指标时间数列中，数量指标的增长往往同时包括价和物量这两个因素的增长。而不变价格（也叫可比价格、固定价格）则是过去某一年的实际价格，

所谓不变价格法就是把过去某一年的市场价格作为不变的东西固定下来。用这个价格来计划各个年度的数量指标，从而消除动态计量中的价格因素，使各期数量指标可以直接对比。

"不变"价格只是就一定时期而言的，它并不是永久固定不变。随时生产的发展，各个时期价格水平将变化。如果一种价格沿用的时间太长，就会和现实出入太大。因而，经过一定时期，就要采取新的不变价格，我国曾经以 1950 年、1952 年、1957 年、1970 年和 1980 年的实际价格作为不变价格。

实际编制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时间数列时，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编制各种产品的不变价格目录，然后用目录上的各种价格乘以产品的实际数量，然后汇总得到总的价值指标。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计算结果较为精确，困难在于工作比较复杂。编制目录工作量较大，实际工作中还要同时计算两种指标。如计算产值指标，就要同时用不变价格和现实价格计算两次。还有一种方法是编制分类的价格指数，然后将现行价格计算的价值指标换算成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指标。这种方法较为简单。

我国目前较多采用的是前一种方法。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大多采用后一种方法。

五　画

主成分（Principle Components）　主成分是多元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假设 x 为 p×1 随机向量，$Ex=\mu$，$Cov(x)=\sum>0$，这里 μ，$\sum$ 皆已知，设 $\lambda_1\geqslant\cdots\geqslant\lambda_p$ 为 $\sum$ 的特征根，$\varphi_1,\cdots\varphi_p$ 为对应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即 $\Phi=(\varphi_1,\cdots,\varphi_p)$ 为正交阵，且使

$$\Phi'\sum\Phi=\wedge=\begin{bmatrix}\lambda_1 & & \\ & \lambda_2 & 0 \\ \vdots & & \\ 0 & & \lambda_p\end{bmatrix}$$

称

$$z=\begin{bmatrix}z_1\\ \vdots \\ z_p\end{bmatrix}=\Phi'(x-\mu) \qquad (1)$$

为随机向量的主成分，称 $z_i=\varphi_i'(x-\mu)$ 为 x 的第 i 个主成分，$i=1,\cdots,p$。

主成分有以下性质：

(1) $Cov(z)=\wedge$。即任两个主成分都不相关，且第 i 个主成分的方差为 λ_i。

(2) $\sum_{i=1}^{p}V_{ar}(z_i)=\sum_{i=1}^{p}V_{ar}(x_i)=tr(\sum)$，即主成分的方差之和与原随机向量的方差之和相等。

(3) $\underset{a'a=1}{S_{up}}V_{ar}(a'x)=V_{ar}(z_1)=\lambda_1$

$S_{up}V_{ar}(a'x)=V_{ar}(z_i)=\lambda_i,\quad i=z,\cdots,p$

$\varphi'ja=0,\quad j=1\cdots,\ i-1$

$a'a=1$

这个性质说明，对任意单位向量 a，在随机变量 a'x 中，第一主成分 $z_1=\varphi_1'(x-\mu)$ 的方差最大。而在与第一主成分不相关的随机变量 a'x 中，第二主成分 $z_2=\varphi_2'(x-\mu)$ 方差最大。一般说来，在与前 i-1 个成分不相关的随机变量 a'x 中，第 i 个主成分 $z_i=\varphi_i'(x-\mu)$ 的方差最大。

在应用上，μ 和 $\sum$ 已知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如果 $x_1,\cdots,x_n$ 为一组随机样本，则用 $\bar{\mu}=\bar{x}=\frac{1}{n}\sum xi$，$\bar{\sum}=\sum(x_i-\bar{x})(x_i-\bar{x})'/n$ 分别估计 μ 和 $\sum$，记 $\bar{\lambda}\geqslant\cdots\geqslant\bar{\lambda}p$ 和 $\bar{\Phi}=(\bar{\varphi}_1,\cdots,\bar{\varphi}_p)$ 分别为 $\bar{\sum}$ 的特征根和对应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那么类似于 (1)，称向量

$$Z_{(i)}=\bar{\Phi}(x_i-\bar{x}),\quad i=1,\cdots\cdots,n$$

为样本主成分，而

$$z=\begin{bmatrix}z_{(1)}\\ \vdots \\ z_{(n)}\end{bmatrix}=\begin{bmatrix}(x_1-\bar{x})'\\ \vdots \\ (x_n-\bar{x})'\end{bmatrix}\bar{\Phi}$$

为样本主成分组成的矩阵。和总体主成分一样，$\bar{\lambda}_1,\cdots,\bar{\lambda}_p$ 度量了各样本主成分对总方差的贡献大小。如果后面的几个 $\bar{\lambda}_i$ 比较接近于零或它们在总方差中所占的比例很小，那么它们所对应的主成分就可以略去。在一般讨论中，样本主成分中的"样本"二字在不易混淆时常常略去，提到主成分时往往是样本主成分。

半对数模型（Semi—log Model）　半对数模型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

$$\log Y_i=\alpha_0+\alpha_1X_i+\mu i$$

式中的 α_1 代表 Y 的相对变动与 X 的绝对变动的比率，即

$$\alpha_1=\frac{Y的相对变动}{X的绝对变动}$$

如果观察到这样的现象，X 发生绝对量的变动时，Y 以一个固定比例相应地变动，就可以用这个模型去拟合。这种模型又可以比作增长模型，它可以描述一个经济现象随时间变化而变动的趋势。令 $\log Y_i=Y_i^*$，这个模型就可以写成一般线性模型的形式，如果它满足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就可以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第二种模型的形式是：

$Y_i=\beta_0+\beta_1\log X_i+\mu i$

这里的斜率系数表示相对于 X 的一个相对变动，Y 会发生多大的绝对变动。

古典正态线性回归模型 在回归分析中，当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时，关于干扰项 μi 的分布情况可以不作任何假定，仅仅假定它的数学期望为 0，不存在序列相关，具有常数方差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得到回归系数 $\beta_0,\beta_1,\cdots\beta_k,\sigma^2$ 的点估计，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希望通过这些点估计量对真正的总体回归函数进行统计推论。如果随机干扰项 μi 服从正态分布，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统计推论，如进行区间估计假设检验等。这样的模型就称为古典正态线性回归模型。

古典正态线性回归模型假定：

$\mu i\sim N\ (0,\ \sigma^2)$

即 μi 服从数学期望为 0，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且有

$\mathrm{Cov}\ (\mu i,\ \mu j)\ =0 \qquad i\neq j$

对 μi 作出正态分布的假定有以下几点理由：

(1) 因为 μi 代表大量相互独立的变量的综合影响，这些变量的影响一般是很小的，而且是随机的。按照中心极限定理，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当变量数目无限增加时，它们的和趋近于正态分布。对中心极限定理的进一步研究可知，即使变量的数目不十分大，也不严格独立，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这说明正态分布的假定具有广泛的应用基础。

(2) 正态随机变量的线性函数仍然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所以由 μi 是正态分布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最小平方估计量的抽样分布，如 $\vec{\beta}_0,\vec{\beta}_1,\vec{\beta}_2\cdots\vec{\beta}_k,\vec{\sigma}^2$ 等的分布。从理论研究上看，数理统计对于正态分布的研究也比较完善。

冯·纽曼 (Von Neumann) 比 Von Neumann 比就是下述统计量：

$$\frac{\delta^2}{S^2}=\frac{\sum_{t=2}^{n}(e_t-e_{t-1})^2/(n-1)}{\sum_{t=1}^{n}(e_t-\bar{e})^2/n}$$

式中，e_t 即第 t 期的剩余。它可以用来检验回归模型中是否存在自相关。在大样本情况下（即 n 很大），如假定残差 e_t 是从一个正态总体中随机抽取的，Von Neumann 比接近于正态分布，且

$$E(\frac{\delta^2}{S^2})=\frac{2n}{n-1}$$

$$V_{ar}(\frac{\delta^2}{S^2})=\frac{4n^2(n-2)}{(n+1)(n-1)^3}$$

于是，对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α，就可以根据正态分布表查出临界值，当统计量

$$Z=\frac{\frac{\delta^2}{s^2}-\frac{2n}{n-1}}{\frac{4n^2(n-2)}{(n+1)(n-1)^3}}$$

落在临界值之外时，就否定原假设，即认为回归模型存在着自相关；反之，则接受原假设，认为不存在自相关。

应该说明，对小样本来说，这种检验方法是不适用的。

平均发展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 平均发展速度是某一阶段中各环比发展速度的平均数，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在一定发展阶段内各个发展时期发展速度的一般水平的统计指标。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方法有水平法和累计法两种。

(1) 水平法，又称几何平均法。它是对各个环比发展速度求几何平均数的结果。设 $x_1,x_2,\cdots,x_n$ 分别为某一阶段内各年的环比发展速度，则平均发展速度为：

$$\bar{x}=\sqrt[n]{x_1\cdot x_2\cdots x_n}=\sqrt[n]{\prod_{i=1}^{n}x_i} \qquad (1)$$

如以 $a_0,a_1\cdots,a_n$ 代表各期的实际发展水平，有：

$$x_1=\frac{a_1}{a_0},\ x_2=\frac{a_2}{a_1},\cdots x_n=\frac{a_n}{a_{n-1}}$$

则 (1) 式又可写成：

$$\bar{x}=\sqrt[n]{\frac{a_1}{a_0}\times\frac{a_2}{a_1}\times\cdots\times\frac{a_n}{a_{n-1}}}=\sqrt[n]{\frac{a_n}{a_0}}$$

(2) 累计法，又称为代数平均法。它通过研究某一阶段内各年实际发展水平之和对基期水平之比所确立的代数方程，求计算平均发展速度。设$\bar{x}$是平均发展速度。则：

第一年的发展水平为 $a_0\bar{x}$

第二年为 $(a_0\bar{x})\bar{x} = a_0\bar{x}^2$

……

第 n 年为 $a_0\bar{x}^{n-1}$

各年的总水平则为：

$$a_0\bar{x} + a_0\bar{x}^2 + \cdots + a_0\bar{x}^n = a_1 + a_2 + \cdots a_n \quad (2)$$

解方程（2），求出它的正根，就是所求的平均发展速度。

在一般情况下，用累计法和水平法分别计算的平均发展速度是不同的。水平法取决于末期水平与基期水平之比，不考虑中间各时期发展水平的变化。累计法取决于各时期发展水平之和对基期水平之比，即（2）式可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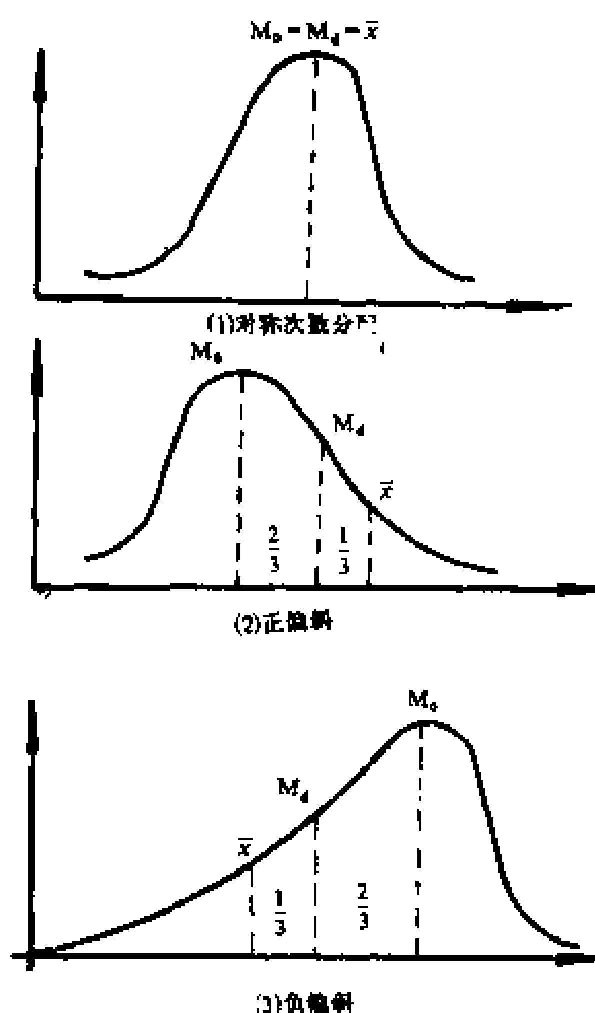
$$\bar{x} + \bar{x}^2 + \bar{x}^3 + \cdots + \bar{x}^n = \frac{a_1 + a_2 + a_3 + \cdots a_n}{a_0}$$

它虽然反映某种现象在较长时期内按平均发展速度发展，可以达到各时期发展水平的总和，但不能象水平法那样确切地反映最末时期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研究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在统计实践中，水平法使用较多。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平均法　测定集中趋势的统计方法称为平均法。统计学中的平均数，主要是对数量分组的统计数列应用平均法后所得的数字。由于计算这种平均数的目的在于描述大量现象数量差异的集中趋势，进而估计平均数量变化的规律性，因此，计算这种平均特征的次数分配就必须属于一个纯一的同质总体。否则，所计算的平均数就缺乏代表性，当然也就不能反映总体分布的数量特征。但也应该指出，实际计算平均数中，尤其在经济统计工作中，许多平均数的计算只是为了把统计资料加以概括和抽象，以便对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统计数字加以比较和分析。这时，平均法的用途，就在于计算典型的平均水平（如计算家庭的平均收入）和对两个经济数字相除计算平均分摊数字（如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这两种用途计算的平均数，并不注意客观现象的数量差异的统一性，因而，它们的应用也不是为了探索某种现象本身的数量规律性。除了计算平均数之外，要很好地描述一个次数分配，还需要计算它的离散程度，这样才能完整地了解次数分配的全貌。一般地说，描述次数分配的集中趋势所使用的平均法包括以算术平均法为中心的五种平均法。从平均法的性质和作用来看，它们可以分为两套平均法体系：一为算术平均法及其派生的平均法体系，即算术平均法、几何平均法及倒数平均法（或调和平均法）；另一种是以算术平均法为中心，配合使用的平均法体系，即算术平均数，中位数及众数三个平均数的体系。

对于第一套体系而言，可以看出，几何平均数和倒数平均数方法，都是从算术平均数配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构成一个体系。但是，它们各有自己的应用条件，一定空间、时间下的某一数量分组的统计数列，同时运用三种平均法求三个平均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从纯粹的数值计算而言，任何一个变量数列，其算术平均数大于几何平均数，其几何平均数必然大于倒数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和中位数、众数，构成第二套体系。这是因为，利用算术平均数反映集中趋势，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平均对象具有的集中趋势必须是接近对称的。只有纯一而又对称的次数分配，才能通过算术平均抵销掉由于偶然性带来的数量差异，从而获得接近必然原因下产生的真实数值的结果。但是，在社会经济现象方面，种种数量分组中的次数分配，不一定是对称的，甚至有些属于 Y 字型（如人口的年龄分配）和 U 字型（如各年龄级的死亡率）。如果只计算算术平均数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时还应该计算中位数和众数，对次数分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1）当某一次数分配属于对称的类型时，三个平均数的数值是相等的，即：

$$\bar{x} = Md = M_0$$

其中 $\bar{x}$ 代表算术数，Md 代表中位数，M_0 代表众数。（2）当次数分配不对称时，三种平均数的数值相互

不同，愈不对称，三个数字的差别愈大。根据应用三种平均数的经验，中位数的数值属于算术平均数数值与众数数值之间，它距众数的差量约为它距算术平均数差量的两倍。因此，三种平均数之间的数量关系，可列为公式如下：

$$M_0 = \bar{X} - 3(\bar{X} - Md)$$

(3) 不对称的次数分配按其在几何图形上的偏态，可分为两类：一是正偏斜，高峰在左，长尾在右，这时，众数最小，中位，算术平均数最大；二是负偏斜，高峰在右，长尾在左，这时，算术平均数最小，中位数次之，众数最大。

平均残差平方和准则（Residual Mean Squares Criterion） 平均残差平方和（RMSg）准则是对回归模型选择自变量的准则之一。设选模型（参见"全模型和选择型"）为

$$Y = X_q Y_q + e \qquad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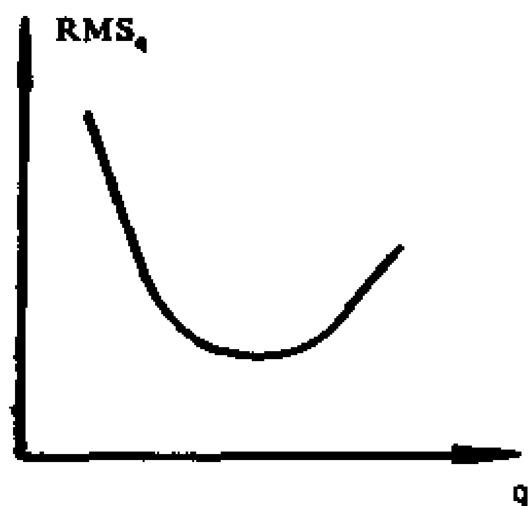
平均残差平方和为

$$RMS_q = \frac{\text{该模型残差平方和}}{n-q} = \frac{RSS_q}{n-q}$$

而选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则为：

$$RSS_q = Y'(I - X_q(X_q'X_q)^{-1}X_q^1)Y$$

这里的 q 为选模型（1）中设计矩阵 X_q 的列数。RMS_q 实际上就是从选模型（1）中给出的误差方差的估计值。因子$\frac{1}{n-q}$随着自变量个数 q 的增加而增加，它体现了对变量个数的增加所施加的惩罚。RMS_q 的图形大致如图 1 所示：



由于 RSS_q 随着 q 的增加而减少，所以，当 q 增加时，RMS_q 先是减少，而后稳定下来，最后又增加。这是因为，在刚开始时，随着自变量个数的增加，虽然因子$\frac{1}{n-q}$增大了，但此时 RSS_q 减少很多，总起来看 RMS_q 还是减少的。当自变量增加到一定程度，重要的自变量基本上都选上了，此时再增加自变量，RSS_q 减少不多，以致于抵销不了$(n-g)^{-1}$ 的增加，最终还是导致 RMS_q 的增加，按 RMS_q 准则，就是按"RMS_q 愈小愈好"的准则选择子集。

在回归分析中，还经常采用"修正的决定和数准则"选择自变量，即要求"修正的决定和数(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R_2 越大越好。由于

$$\bar{R}^2 = 1 - \frac{n-1}{n-q} \cdot \frac{RSS_q}{TSS} = 1 - \frac{n-1}{TSS} \cdot RMS_q$$

其中，$TSS = \sum_{i=1}^{n}(Y_i - \bar{Y})^2$

所以，这个准则等价于 RMS_q 准则。

平均预期寿命 平均预期寿命，又简称"平均寿命"，是指在一定年龄死亡率水平下，活到确切年龄 X 岁后，平均还能继续生存的年数。例如，0 岁（即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表示同时一批人出生后，平均一生可存活的年数，或预期活到年岁数。当然，也可以计算其它年龄组的预期寿命。一般地说，通常使用的平均寿命指某一年出生婴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平均预期寿命通常通过编制生命表计算而得。

平稳过程（Stationary Process） 平稳过程是一类重要的随机过程。直观地说，如果一个时间序列中，均值和方差都没有系统的变化，而且所有严格的周期变化已被去掉，那么它就是平稳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的概率理论大多数是有关平稳时间序列的。因此，时间序列分析常常要求把非平稳序列化为平稳序列，以便使用这些序列。例如，可以先从数据中去掉趋势和周期变化，然后再用平稳随机过程的方法对残差的变化建立模型。

平稳过程可定义如下：

一个时间序列，如果对所有的 $t_1, \cdots, t_n$ 和 t，其联合分布 $X(t_1), \cdots, X(t_n)$与联合分布 $X(t_1+2) \cdots X(t_n+2)$ 相同，则称之为严格平稳的，换句话说，严格平稳随机过程的联合分布不受时间原点移动（到 T 处）的影响而只取决于 $t_1, t_2, \cdots, t_n$ 之间的间隔。上述定义对任何 n 值都成立。特别地，如果 n=1 时，则意味着 X(t)分布对所有时刻必须相同，因而，

$$\mu(t) = \mu$$
$$\sigma^2(t) = \sigma^2$$

都是常数，都与 t 值无关。

进一步，如果 n=2,，则 $X(t_1)$和 $X(t_2)$ 的联合分布仅取决于时滞$(t_2 - t_1)$。因此，自协方差函数 $\gamma(t_1, t_2)$ 也仅取决于$(t_2 - t_1)$，并记为$\gamma(\tau)$，

$\gamma(\tau)=E[(X_{(t)}-\mu)(Xt+\tau)-\mu)]$

称为时滞τ的自协方差系数。

x_t 的分布对所有的 t 都相同，似乎不容易作到，但是，有许多随机过程，在 $t\to\infty$ 时都具有 ou 作平衡分布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的分布函数，即 X(t)的概率分布趋向于一个与初始条件无关的极限。因此，只要这种过程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X(t)的分布就很少变化。如果把初始条件确定为与平衡分布相同，那么该过程在时间上是平稳的，于是平衡分布就是该过程的平衡分布。

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　正态分布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中一种最重要的分布。这一分布最早是由法国数学家德·威尔（1667—1754）求二项分布的极限分布时求出来的，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又由德国数学家高斯（1777—1855）和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分别于 1809 和 1812 年推导出来，所以也称高斯—拉普拉斯分布。在自然界和社会领域，许多随机现象都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如测量误差、人体的身高和体重、农作物的收获量、产品的尺寸、炮弹弹落点，等等。这些随机变量的共同特点是在其数学期望的附近的区间里取值，概率比较大。平常所说的"中间大，两头小"就是这一分配的特征之一。一般地说，若影响某一数量指标的随机因素很多，而每个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太大，则这个指标就服从正态分布。另一方面，正态分布具有许多很好的数学性质，很多分布都可以用正态分布来近似。在经济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中，它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正态分布是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它的密度函数为：

$$f(x)=\frac{1}{\sqrt{2\pi}\,\sigma}\theta^{-\frac{(x-a)^2}{2\alpha^2}},\quad -\infty<x<+\infty$$

其中 $\sigma>0$,a 与 σ 均为常数，相应的分布函数为：

$$F(x)=\frac{1}{\sqrt{2\pi}\,\sigma}\int_{-\infty}^{x}e^{-\frac{(y-a)^2}{2\alpha^2}}dy,\quad -\infty<x<+\infty$$

简记为 $N(a,\alpha^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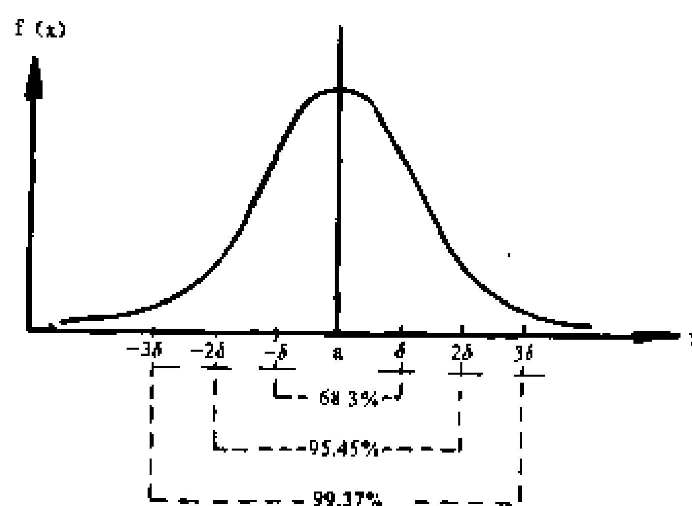
其数学期望

EX＝a

方差

$DX=\sigma^2$

一旦 a 与 α^2 确定，正态分布的形状也就确定了，a 表示正态分布的中心位置，α 表示分布的集中与分散程度。正态分布密度函数 f（x）的图形如下。



可以看出，在 a 这一点上，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取值最大，这说明离 a 越近，随机变量 X 落在一个同样长度的区间内的概率越大。由于整个钟形的面积说明的是随机变量落入（$-\infty$，$+\infty$）区间内的概率，所以它等于 1，落入〔-3σ，3σ〕、〔-2σ，2σ〕、〔$-\alpha$，α〕区间内的概率分别为 99.97%、95.45%，68.3%。显然，α 越大，钟形越为扁平，α 越小，则越为陡峭，这正好说明，方差 α^2 是说明随机变量离散程度的指标。

如果 $a=0,\alpha=1$，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也就简化为：

$$\psi(x)=\frac{1}{\sqrt{2\pi}}e^{-\frac{x^2}{2}},\quad -\infty<x<+\infty$$

称为标准正态分布，简记为 N(0,1)。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的曲线具有以下特性：

1.$\psi(x)$ 为偶函数，即 $\psi(-x)=\psi(x)$，曲线关于 y 轴对称；

2.$\psi(x)$处处可导，所以曲线为连续光滑的；

3.当 $x=0$,时，$\psi(x)$ 取得极大值 $\psi(0)=\frac{1}{\sqrt{2\pi}}$，曲线是单峰的；

4.$\psi(x)$在$(-\infty,0)$ 区间内 $\psi'(x)>0$ 是增函数，在 $(0,+\infty)$ 区间内 $\psi'(x)<0$ 是减函数。这说明 x 离数学期望 0 越远，$\psi(x)$的值越小。同样长度的区间，若离数学期望越远，随机变量 X 落在该区间内的概率越小，随机变量在其数学期望周围比较稠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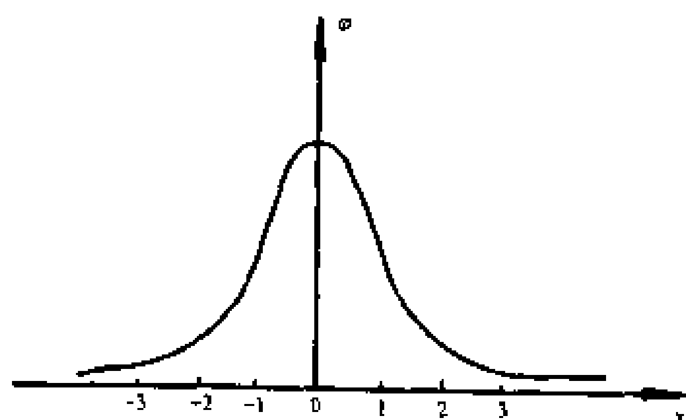
5.$\psi(x)$ 的二阶导数 $\psi''(x)=\frac{2}{\sqrt{2\pi}}e^{-\frac{x^2}{2}}(x^2-1)$。当 $-1<x<1$ 时，$\psi''(x)<0$，曲线上凸；当 $x<-1,x>1$ 时，$\psi''(x)>0$，曲线下凹；当 $x=\pm1$ 时，$\psi''x(x)=0$，所以 $x=\pm1$ 为曲线的拐点；

6.当 $x\to\pm\infty$时，$\psi(x)\to0$，所以 $\psi(x)$以 $y=0$ 为渐近线。

根据以上特性，可作出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的图形：

可以看出，标准正态分布的图形，和一般正态分

布是十分相似的。一般正态分布，可以通过线性变换化为标准正态分布，这将使许多问题变得更加容易处理。



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是：

$$\Phi(x)=\int_{-\infty}^{x}\frac{1}{\sqrt{2\pi}}e^{-\frac{t^2}{2}}dt$$

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可以通过标准正态分布的面积表查到，对于一般的正态分布，则有：

$$F(x)=\int_{-\infty}^{x}\frac{1}{\sqrt{2\pi}a}e^{-\frac{(y-a)^2}{2a^2}}dy$$

$$=\int_{-\infty}^{\frac{x-a}{\sigma}}\frac{1}{\sqrt{2\pi}}e^{-\frac{t^2}{2}}dt$$

$$=\Phi(\frac{x-a}{\sigma})$$

正态分布假定下最小二乘估计量的性质 在线性回归模型

$$Y_i=\beta_0+\beta_1X_{1i}+\beta_2X_{2i}+\cdots+\beta_kX_{ki}+\mu_i$$

满足古典线性模型假定情况下，设随机干扰项 μ_i 服从正态分布，由此获得的最小二乘估计量 $\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cdots\overline{\beta}_k$ 及 $\overline{\sigma}^2$ 具有下列统计性质：

(1) 它们仍然是最小方差无偏估计量。

(2) 具有一致性，即随着样本容量的无限增加，估计量收敛于它们的真实总体参数。

(3) 由于 μ_i 服从正态分布，Y_i 也服从正态分布。

$$Y_i\sim N(\beta_0+\beta_1X_{1i}+\cdots\beta_kX_{ki},\sigma^2)$$

(4) $\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overline{\beta_k}$，均为 Y_i 的线性函数，因此，它们也都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且相互独立。

(5) $\overline{\sigma}^2=\frac{\sum_{i=1}^{n}ei^2}{n-k-1}$ 是随机干扰项方差的无偏估计，且 $\frac{(n-k-1)\overline{\sigma}^2}{\sigma^2}=\frac{\sum_{i=1}^{n}ei^2}{\sigma^2}$ 服从自由度为 n-k-1 的 χ^2 分布。

正交多项式 (Orthogonal Polynomials) 实际应用中，相当广泛的一类曲线可以用多项式去逼近，把这个思想用到回归分析上，就产生了多项式回归。如果 x 和 y 是非线性关系，考虑

$$\overline{Y}=a_0+a_1X+a_2X^2+\cdots a_mX^m \qquad (1)$$

其中，M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在 (1) 中，令 $X=x_1,X^2=x_2,\cdots\cdots,X^m=x_m$。这个多项式回归的问题就可以转化为多元线性回归问题来解决。多元线性回归是一种很有用的统计方法，但它有两个基本缺点，一是计算比较复杂，二是回归系数间存在相关性，以至于剔除一个变量后，还必须重新计算。

如果把 $x,x^2,\cdots,x^m$ 适当变化一下，变成 $f_1(x),f_2(x),\cdots,f_m(x)$，每个 $f_i(x)$ 是 x 的 i 次多项式。使方程 (2) 变为：

$$\overline{Y}=b_0f_0(x)+b_1f_1(x)+\cdots+b_mf_m(x) \qquad (2)$$

它具有如下性质：

$$\sum_x f_i(x)=0 \qquad i\neq 0$$

$$\sum_x f_i(x)F_k(x)=0 \quad i\neq k \qquad (3)$$

满足条件 (3) 的多项式称为正交多项式。

设 x 等间隔取值，不失一般性可认为 x 取 1，2，…，n，这时，这一族多项式为：

$$f_0(x)=1$$

$$f_1(x)=x-\overline{x}$$

$$f_2(x)=(x-\overline{x})^2-\frac{n^2-1}{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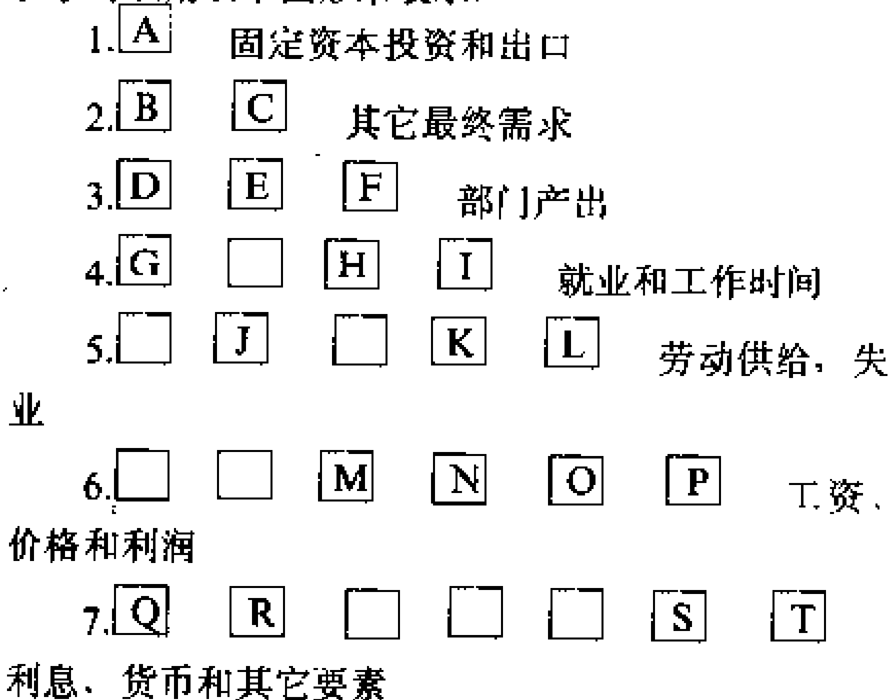
$$f_{k+1}(x)=f_1(x)f_k(x)-\frac{k^2(n^2-k^2)}{4(4k^2-1)}f_{k-1}(x)$$

布鲁金斯模型(The Brookings Model) 布鲁金斯模型建立于本世纪 60 年代前期，当时，它是最大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在它的"标准"版本中，这个模型包含有 176 个内生变量和 89 个外生变量。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美国建立宏观经济模型的水平。在这一模型中，一方面，模型得到了进一步的分解，另一方面，许多在从前的模型中未被包括的部门被包括了进来。它已经在经济循环和增长的结构分析和政策评价中发生了很大作用。

布鲁金斯模型是用从 1949 年到 1960 年的经过了季节调整的季节资料估计的，包括近 60 组观察值。从统计方法上看，在这么大的一个模型中只用这些观察值似乎违背了关于自由度的假设，但是，由于

它采用了分块递推结构，它仍然可以用计量经济技术来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模型被分解成各种相互联系的块。在各个块内，可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或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得到单个方程的一致估计。然后，再估计整个模型来说明各个块之间的相互联系。

模型中的各个块的递推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用以下图形来表示：



起点的块 A 是关于固定资本投资和出口的。第二块是关于其它最终需求的，它包含 B 和 C 两个小块，其中，B 中的变量只和第二块内部的变量有关，C 中的变量除了依赖于第二块内部的变量，还和第一块中的投资和出口相联系。依次类推。最后得到整个模型。

生命表　人口统计学中通常把同时出生的一批人（也就是同年龄的一批人）随着年龄增长而陆续死亡的情况列成一种表格形式，称为死亡表。由于它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着这一批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所以也叫作生命表。又由于根据这个表可以计算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有人也叫它寿命表。

生命表主要考察一批人在各个年龄时的死亡情况，反映年龄和死亡的关系。由于男子和妇女在各个年龄上的死亡率不同，因此，生命表一般都按男女分别列出。

生命表中一般对各个年龄组计算这样几个指标：死亡概率、尚存人数、各年龄组内的死亡人数、各年龄组内平均生存人年数、未来生存人年数累计、平均预期寿命。假定在某一年出生的女婴是 10 万人。按年龄分组以一年为间隔，那么，在这一年，（即 0 岁组）的尚存人数就是 10 万人，假设在这一年死亡的婴儿数是 2362 人，那么，这一年的死亡概率就是 $\frac{2362}{100000}=23.62‰$，1 岁组的尚存人数就是 $100000-2362=97638$，如果该组的死亡人数为 1046，该年龄组的死亡概率就是 $\frac{1046}{97638}=10.71‰$。依次类推，将可以计算出这批女婴从出生到全部死亡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尚存人数、死亡人数、死亡概率。设最高的那个年龄组为（W−1）岁组（即没有一个人能活到 W 岁），把从 0 岁到（W−1）岁各年龄组的平均人数（即各年龄组内生存的人年数）L_x 相加（$x=0,1,\cdots,w-1$），即可得到这一批人所活的总人年数。用 T_0 代表，有

$$T_0=\sum_{x=0}^{w-1}L_x$$

与此相似，达到任何一个年龄 X 的人，在此以后可以活的总人年数 T_x，都可以表示为以本年龄组起往后各年龄组的生存人数之和

$$T_x=L_x+L_{x+1}+\cdots+L_{w-1}$$

对于活到 X 周岁的人（即 X 年龄组的尚存人数）来说，还可以再活 T_x 年。每人平均还可以活的年限为

$$e_x=\frac{T_x}{\text{尚存人数}}$$

这就是 X 岁的平均预期寿命。

在实际编制生命表时，由于对一批人实际进行观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常用的是截面的资料。另外，还必须在计算过程中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

母函数（Probability Generating Function）　若随机变量ξ取非负整数值，且相应的分布列为

$$\begin{bmatrix}0, & 1, & 2, & \cdots\\ p_0, & p_1, & p_2, & \cdots\end{bmatrix}\qquad(1)$$

则

$$p(s)=\sum_{k=0}^{\infty}p_k s^k\qquad(2)$$

称为ξ的母函数，即

$$p(s)=ES^{\xi}$$

因为母函数由分布列完全决定，因此也称它为该概率分布的母函数。由于

$$\sum_{k=0}^{\infty}p_k=1$$

由幂级数的收敛性知道 p（s）至少在 $|s|<1$ 时一致收敛且绝对收敛，因此母函数对任何整值随机变量都存在。

母函数在十九世纪初被拉普拉斯引进，它是在概率论中第一个被系统地应用的变换法，对后来在概率论中引进其它变换法（如特征函数）有启发作用。

母函数具有以下性质：

1.唯一性。由分布列（1）用（2）定义母函数，

这是唯一确定的。反之，可以证明，由母函数也能唯一确定分布列。

2.可以利用母函数求得概率分布的数字特征。若

$$p(s)=\sum_{k=0}^{\infty}p_k s^k$$

则

$$p'(s)=\sum_{k=1}^{\infty}kp_k s^{k-1}$$

$$p''(s)=\sum_{k=2}^{\infty}k(k-1)p_k s^{k-2}$$

这两个级数至少在$|s|<1$是收敛的。

当数学期望$\sum_{k=1}^{\infty}kp_k$存在时，

$$p'(1)=\sum_{k=1}^{\infty}kp_k=E\xi$$

当数学期望$\sum_{k=1}^{\infty}kp_k=\infty$时，$\lim_{s\to 1}p'(s)=\infty$

同样，当方差$D\xi$存在时，

$$E\left[\xi(\xi-1)\right]=\sum_{k=2}^{\infty}k(k-1)p_k=p''(1)$$

所以

$$D\xi=E\xi^2-(E\xi)^2=p''(1)+p'(1)-[p'(1)]^2$$

3.两个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母函数是这两个随机变量的母函数的乘积。若随机变量ξ与η相互独立，它们都是整值随机变量，概率分布分别为$\{a_k\}$及$\{b_k\}$，而相应的母函数为A（s）及B（s）。显然，$\varepsilon=\xi+\eta$也是整值随机变量，若证$C_r=p\{\varepsilon=r\}$，则

$$c_r=a_0b_r+a_1b_{r-1}+\cdots+a_rb_0$$

记 $C(s)=\sum_{r=0}^{\infty}c_r s^r$

利用母函数在$|S|<1$的一致收敛性及绝对收敛性，

$$A(s)B(s)=\sum_{k=0}^{\infty}a_k s^k\sum_{l=0}^{\infty}b_l s^l=\sum_{k+l}a_k b_l s^{k+l}$$

$$=\sum_{r=0}^{\infty}\left(\sum_{k=0}^{r}a_k b_{r-k}\right)s^r=\sum_{r=0}^{\infty}c_r s^r$$

因此

$$C(s)=A(s)B(s)$$

用矩阵表示的线性回归模型 对于具有K个解释变量的总体回归模型：

$$Y_i=\beta_0+\beta_1X_{1i}+\beta_2X_{2i}+\cdots\beta_kX_{ki}+ui,i=1,2,\cdots,n$$

如果将它完全展开，有

$$Y_1=\beta_0+\beta_1X_{11}+\beta_2X_{21}+\cdots+\beta_kX_{k1}+u_1$$
$$Y_2=\beta_0+\beta_1X_{12}+\beta_2X_{22}+\cdots+\beta_kX_{k2}+u_2$$
$$\vdots$$
$$Y_n=\beta_0+\beta_1X_n+\beta_2X_{2n}+\cdots+\beta_kX_{kn}+u_n$$

这一模型可以用矩阵表示为：

$$\begin{bmatrix}Y_1\\Y_2\\\vdots\\Y_n\end{bmatrix}=\begin{bmatrix}1&X_{11}&X_{21}&\cdots X_{k1}\\1&X_{21}&X_{22}&\cdots X_{k2}\\&&\cdots&\\1&X_{1n}&X_{2n}&\cdots X_{kn}\end{bmatrix}\times\begin{bmatrix}\beta_1\\\beta_2\\\vdots\\\beta_k\end{bmatrix}+\begin{bmatrix}u_1\\u_2\\\vdots\\u_n\end{bmatrix}$$

令

$$Y=\begin{bmatrix}Y_1\\Y_2\\\vdots\\Y_n\end{bmatrix}\quad X=\begin{bmatrix}1&X_{11}&X_{21}&\cdots X_{k1}\\1&X_{21}&X_{22}&\cdots X_{k2}\\&&\vdots&\\1&X_{1n}&X_{2n}&\cdots X_{kn}\end{bmatrix}$$

$$\beta=\begin{bmatrix}\beta_1\\\beta_2\\\vdots\\\beta_k\end{bmatrix}\quad u=\begin{bmatrix}u_1\\u_2\\\vdots\\u_n\end{bmatrix}$$

则方程组可表示为：

$$Y=X\beta+u$$

利用矩阵符号可以使表达式大大简化，使问题的处理十分简明。这时，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为：

1.$E(u)=0$ 其中：0为$n\times1$列的零向量

2.$E(uu')=\sigma^2I$ 其中：I为$n\times n$阶的单位阵

3.$n\times(K+1)$矩阵X是非随机的

4.X的秩是K+1，即该矩阵的列数

这表明X矩阵中的列是线性独立的，也就是在变量X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令

$$\vec{\beta}=\begin{bmatrix}\vec{\beta}_1\\\vec{\beta}_2\\\vdots\\\vec{\beta}_k\end{bmatrix}\quad e=\begin{bmatrix}e_1\\e_2\\\vdots\\e_n\end{bmatrix}$$

具有K个解释变量的样本回归方程可以写为：

$$Y=X\vec{\beta}+e$$

而计算β的最小二乘估计量$\vec{\beta}$就是要使

$$e'e=(e_1,e_2\cdots e_n)\begin{bmatrix}e_1\\e_2\\\vdots\\e_n\end{bmatrix}=\sum_{i=1}^{n}e_i^2$$

为最小。

因为

$$e'e=(Y-X\vec{\beta})'(Y-X\vec{\beta})$$
$$=Y'Y-2\vec{\beta}Y'X'+\vec{\beta}'X'x\vec{\beta}$$

求它对$\vec{\beta}$的微分并令其等于零得:

$$\frac{\partial(e'e)}{\partial\vec{\beta}}=-2X'Y+2x'x\vec{\beta}=0$$

有

$$(x'x)\vec{\beta}=X'Y$$
$$\vec{\beta}=(X'X)^{-1}Y$$

这就是 β 的最小二乘估计量。显然，它是 Y 的线性函数，当

$$U\sim N(0,\sigma^2 I)$$

时，$\vec{\beta}$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向量，它的方差协方差矩阵是：$\sigma^2(X'X)^{-1}$，即:

$$\vec{\beta}\sim N(\beta,\sigma^2(x'x)^{-})$$

由于在实际上σ^2是未知的，常用$\overline{\sigma^2}=e'e/n-k-1$代替，这样，$\vec{\beta}$的每个元素将服从 n-k-1 个自由度的 t 分布，就可利用 t 分布对它们进行假设检验和建立置信区间。

付酬表（Pay off Table）　在统计决策中，为了便于对各种方案的决策结果进行比较，需要将各种不同方案和各种自然状态分别按行与列排成棋盘式的表，在行与列的交错处将产生的结果用数字列出。这种表就称为付酬表，也称为决策矩阵。

一个商店准备购入空调机，用于第二年夏天销售，如果购进 50 台，天气又恰好炎热，就能盈利 5 万元；如果天气凉快，只卖出 30 台，就要积压 3 万元；如果购进 30 台，天气恰好凉快，就能盈利 3 万元；但如果天气炎热，则少赚了 2 万元（称为机会损失）。这些状态和方案就可以构成一个付酬表。

表 1　付酬表

方案 \ 自然状态	θ_1:夏天热	θ_2:夏天凉
d_1:进 50 台	5	−3
d_2:进 30 台	−2	3

从该表可以看出，构成一个付酬表的基本要素有三项，即自然状态、行动和付酬。在有概率的决策中，还要增加一项先验概率。

在付酬表中，付酬可分为货币付酬和效用付酬。货币付酬中又分收益付酬、亏损付酬和机会亏损付酬。按付酬状态又可以把它们分为不等状态行动表和等状态行动表。

乐观系数准则（赫维茨准则，Hurwitz Alpha Criterion）　在不确定型决策中，悲观准则过于保守，乐观准则过于激进，风险性太大。因此，人们提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带有折衷性质的决策准则，即乐观系数准则。在这个准则中，关键在于乐观系数 α 的选取，它是一个介于 0 和 1 之间的数。若 $\alpha=0$，则这种准则就是悲观准则；若 $\alpha=1$，则这种准则就是乐观准则。一般情况下，$0<\alpha<1$，它表明决策者对好的自然状态出现的情况所持的态度。若决策者比较乐观，则 α 值可以定得高一些，如 $\alpha=0.9$，若不太乐观，则 α 值可以定得低一些，如 $\alpha=0.4$，乐观系数的值确定上来以后，决策者首先应求出报偿矩阵中与每种行动方案相对应的最大报偿和最小报偿，然后根据乐观系数 α 的值求每种行动方案报偿的折衷值 H_i:

$$H_i=\alpha(\max X_{ij})+(1-\alpha)(\min Y_{ij})$$

最后，在各种方案报偿的折衷值中求出最大值，记为 $\max H_i$。与最大折衷值相对应的行动方案为最优方案。

发展水平和增长量　时间数列中原有的各项数值，就是发展水平。它可以用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平均指标来表现。根据发展水平在时间数列中所处的位置，通常把数列中的第一项数值称为最初水平，最后一项数值称为最末水平，其余各数值称为中间水平。在对比两个时间的发展水平时，把要研究的那个时间的发展水平称为计算期水平。把用来作为比较基础的时间的发展水平叫基期水平。而增长量则是通过比较两个时期的发展水平所得的差数。计算的一般公式为:

增长量＝计算期发展水平−基期发展水平

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　发展速度是表明被研究现象发展程度的相对指标，它是数列中两个时间的发展水平相比的结果。其计算公式为:

$$\text{发展速度}=\frac{\text{计算期发展水平}}{\text{基期发展水平}}$$

发展速度由于对比时所采用的基期不同，可分为定基发展速度和环比发展速度。

定基发展速度是用各个计算期水平与某一固定基期相比，用符号表示为:

$$\frac{a_1}{a_0},\frac{a_2}{a_0},\cdots\cdots,\frac{a_n}{a_0}$$

其中 a_0 表示最初水平，a_n 表示最末水平，a_1，a_2⋯⋯a_{n-1} 表示中间水平。

环比发展速度是用各计算期水平与前期对比，用以表明被研究现象逐期发展变化的情况，用符号表示

为:

$$\frac{a_1}{a_0},\frac{a_2}{a_1},\frac{a_3}{a_2},\cdots\cdots\frac{a_n}{a_{n-1}}$$

定基发展速度等于相应的各环比发展速度的连乘积，例如:

$$\frac{a_n}{a_0}=\frac{a_1}{a_0}\times\frac{a_2}{a_1}\times\frac{a_3}{a_2}\times\cdots\cdots\times\frac{a_n}{a_{n-1}}$$

反之，已知两个相邻时间的定基发展速度将其相除可以推算出相应的环比发展速度，如

$$\frac{a_4}{a_3}=\frac{a_4}{a_0}\div\frac{a_3}{a_0}$$

发展速度不仅表明发展的程度，而且表明其发展的方向，当发展速度大于1时，说明发展趋势是上升的，小于1时，说明发展趋势是下降的。

增长速度（或下降速度）是用来说明被研究现象增加（或降低）程度的相对指标，它是增长量与基期水平相比的结果。其计算公式为

$$增长速度=\frac{增长量}{基期水平}$$

$$=\frac{计算期水平-基期水平}{基期期水平}$$

$$=\frac{计算期水平}{基期水平}-1$$

可见，增长速度等于发展速度减1。当发展速度大于1时，增长速度为正值，当发展速度小于1时，增长速度为负值。

与发展速度相类似，由于对比时所采用的基期不同，增长速度可分为定基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度。它们的一般公式分别为:

定基增长速度=定基发展速度−1

环比增长速度=环比发展速度−1

必须注意，定基增长速度不等于各年环比增长速度的连乘积。如果进行换算，必须将环比增长速度加上1变成环比发展速度后连乘，然后将所得结果再减1，即为定基增长速度。增长速度和发展速度说明的问题是不同的。增长速度说明报告期水平比基期水平增加了百分之多少，而发展速度则说明报告期水平是基期水平的百分之多少或增加到百分之多少。

六 画

异方差（Heteroscedastic Disturbances） 古典线性回归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假定，是每个干扰项 u_i 的方差都等于某一固定的常数。这个假定叫作等方差性，用符号表示为:

$$E(u_i^2)=\sigma^2 \qquad i=1,2,\cdots,n$$

在给定解释变量的值后，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布的方差就等于干扰项 u 的分布的方差。它的大小与解释变量的取值无关。

在一元回归方程的情况下，等方差性可用图1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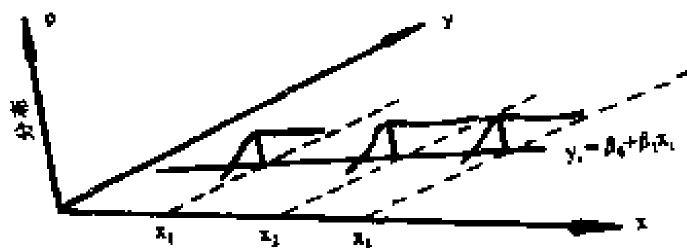


图1等方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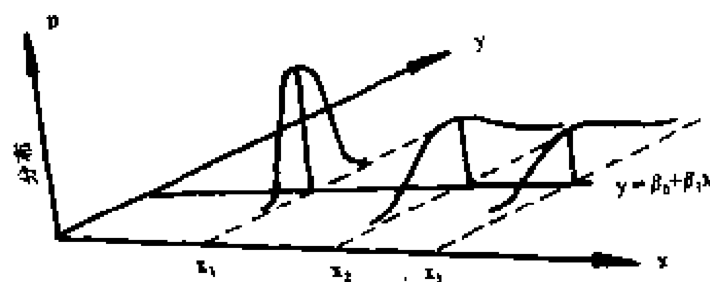
从图1可看出 Y_i 的条件分布的方差随着 X 值的增加而增加（表现为分布曲线随着 X 的增加而变得扁平）。Y_i 的方差不同就称为异方差性。用符号表示:

$$E(u_i^2)=\sigma_i^2$$

σ^2 的下标 i 说明了 ui 的方差（与 Y_i 的条件方差相同）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在学习一误差模型中，异方差是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随着某种技艺的提高（如打字的熟练程度提高了）出错的可能性就会减小，这时，σ_i^2 可望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减小。

再看图2:



在实证经济研究中，经常在与收入有关的问题上遇到异方差性。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可随意支配的收入也增加了，人们对如何支配这笔收入的选择余地也大了。例如，储蓄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可变化的余地就比过去大得多，这就会出现异方差

性。

如果回归模型满足除了等方差性以外的一切古典线性回归模型假定，那么，最小二乘估计量仍然是无偏估计量和一致估计量，但它们不具有最小方差，也就是说，不再是有效估计量。

异方差性的补救方法　从估计理论的观点出发，异方差性存在的后果是：它们并不影响最小二乘估计量的无偏性和一致性，但有效性即最小方差的性质受到影响。在大样本情况下渐近有效性也不再存在了。这就需要补救的方法。补救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 σ_i^2 已知的情况下使用，一类在 σ_i^2 未知的情况下使用。

在 σ_i^2 已知的情况下，用加权最小二乘方法。考虑一元回归方程的总体回归函数：

$Y_i=\beta_0+\beta_1 xi+ui$

在普通最小二乘法中，通过 $\sum e^2 i$ 为最小的办法估计未知参数 β_0 和 β_1。显然，每个 e_i^2 的权数是 1。而在加权最小二乘法中，可令

$$\sum e_i^2=\sum W_i e_i^{*2}=\sum W_i(Y_i-\beta_0^*-\beta_1^* X_i)^2$$

为最小来估计未知参数的。而 β_0^* 和 β_1^* 就是加权最小二乘估计量。W_i 的选定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方法，即使那些极端的观察值具有较小的权数。如果随机误差项 u_i 的方差 σ_i^2 已知，那么，可令权数 W_i 与方差 σ_i^2 有下列倒数关系：

$$W_i=\frac{1}{\sigma_i^2}$$

这样加权的结果就使得总体中具有较大方差的观测值在计算估计量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大减弱。通过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相类似的方法，可得到：

$$\beta_0^*=\frac{\sum W_i Y_i}{\sum W_i}-\beta_1^*\frac{\sum W_i X_i}{\sum W_i}$$

$$=\overline{Y}^*-\beta_1^*\overline{X}^*$$

式中的 $\overline{Y}^*$ 和 $\overline{X}^*$ 都是利用权数 W_i 计算的加权样本平均数。

$$\beta_1^*=\frac{\sum W_i y_i^* x_i}{\sum W_i x_i^2}$$

式中：$y_i^*=Y^i-\overline{Y}^*, X^i=X/i\ -\overline{X}^*$，它们代表 X 和 Y 分别对自己的加权样本平均数的离差。

在 σ_i^2 未知的情况下，通过对模型的变换来估计参数。

在计量经济研究中，预先就知道 σ_i^2 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对 σ_i^2 提出一些假定，而这些假定往往又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回归模型进行一定的转换，使之能够满足等方差性的假定。下面就以一元回归方程：

$Y_i=\beta_0+\beta_1 X_i+u_i$

来说明这种变换的方法。

假定 1：

$E(u_i^2)=\sigma^2 X_i^2$

这个假定确信 u_i 的方差与解释变量 X_i^2 成正比(通过 Park 检验或 Glejser 检验发现这种关系)这时，就可以用 X_i 去除方程的两边：

$$\frac{Y_i}{X_i}=\frac{\beta_0}{x_i}+\beta_1+\frac{u_i}{X_i}$$

$$=\beta_0\cdot\frac{1}{X_i}+\beta_1+V_i$$

式中的 v_i 是变换后的随机干扰项，它等于 $\frac{u_i}{X_i}$。很容易推导出：

$$E(V_i)=E(\frac{u_i}{X_i})^2=\frac{1}{x_i^2}E(u_i^2)=\sigma^2$$

这样的变换结果，V_i 的方差就具有等方差性，从面可以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去得到 Y_i/X_i 对 $\frac{1}{X_i}$ 的回归方程。

假定 2：$E(u^2)=\sigma^2 X_i$

这个假定确信 u_i 的方差与 X_i 本身成比例。这时，可用 $\sqrt{X_i}$ 去除方程的两边，得：

$$\frac{Y_i}{\sqrt{X_i}}=\frac{\beta_0}{\sqrt{X_i}}+\beta_1\sqrt{X_i}+\frac{u_i}{\sqrt{X_i}}$$

$$=\beta_0\frac{1}{X_i}+\beta_1\sqrt{X_i}+V_i$$

式中 $v_i=u/\sqrt{X_i}$，$X_i>0$。很容易推导出：

$$E(V_i^2)=E(\frac{u_i}{\sqrt{X_i}})=\sigma^2$$

这时，就可以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β_0 和 β_1。

假定 3：$E(u_i^2)=\sigma^2[E(Y_i)]^2$

这个假定表明 u_i 的方差与 Y_i 的期望值的平方成正比。由于

$$E(Y_i)=\beta_0+\beta_1 X_i$$

可以利用下述方法变换方程：

$$\frac{Y_i}{E(Y_i)}=\frac{\beta_0}{E(Y_i)}+\beta_1\frac{X_i}{E(Y_i)}+\frac{u_i}{E(Y_i)}$$

$$=\beta_0\frac{1}{E(Y_i)}+\beta_1\frac{X_i}{E(Y_i)}+v_i$$

式中 $v_i=u_i/E(Y_i)$，很容易证明 $E(v_i^2)=\sigma^2$

但由于 β_0 与 β_1 都是未知的回归系数，上列变换实际上无法进行，这时，可以利用它们的估计值

$\overrightarrow{\beta_0}$和$\overrightarrow{\beta_1}$来得到EY_i的估计值

$$\overrightarrow{Y_i}=\overrightarrow{\beta_0}+\overrightarrow{\beta_1}X_i$$

来代替EY_i。首先不考虑异方差问题，用最小二乘法得到$\overrightarrow{\beta_0}$、$\overrightarrow{\beta_1}$和$\overrightarrow{Y_i}$，然后用$\overrightarrow{Y_i}$去变换模型得到下述结果：

$$\frac{Y_i}{\overline{Y_i}}=\beta_0\left(\frac{1}{\overline{Y_i}}\right)+\beta_1\left(\frac{X_i}{\overline{Y_i}}\right)+v_i$$

式中$v_i=(u_i/\overline{Y_i})$。接着，再按上式建立回归方程，得：

$$\frac{Y_i}{\overline{Y_i}}=\overrightarrow{\beta_0}\left(\frac{1}{\overline{Y_i}}\right)+\overrightarrow{\beta_1}\left(\frac{X_i}{\overline{Y_i}}\right)+e_i$$

这时，虽然$\overline{Y_i}$并不严格等于$E(Y_i)$，但是它的一致估计量，也就是说随着样本容量的无限增大，$\overline{Y_i}$收敛于$E(Y_i)$。在样本容量足够大的情况下，上述方法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

完全消耗系数矩阵（Completed coefficient Matrix）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反映的只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情况，例如，对于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A=\begin{bmatrix}0 & 0.1 & 0.3\\0.3 & 0 & 0.2\\0 & 0.4 & 0\end{bmatrix}$$

而言，它反映的投入只是直接投入，在生产过程中，还有一种投入称为间接投入。从A中看，每生产1单位的A部门产品需要B部门投入0.3，而B部门产出这0.3又需要A部门投入$0.3\times0.1=0.03$和C部门投入$0.3\times0.4=0.12$，这是第一次间接投入。第一次间接投入的A部门的0.03单位的产品又需要B部门的投入。C部门的0.12单位的产品又需要A部门和B部门的投入。这种投入称为第二次间接投入。它是一个无穷的但却是收敛的级数，能够通过对它不断逼进而计算出来，对直接消耗系数和各次间接消耗系数求和将得到完全消耗系数。用一个矩阵可以将它们都表示出来，称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一般地说，以bij表示第j个部门的单位最终产品对第i个部门的产品的完全消耗参数，有：

$$b_{ij}=a_{ij}+\sum_{k=1}^{n}a_{ik}a_{kj}+\sum_{s=1}^{n}\sum_{k=1}^{n}a_{is}a_{sk}a_{kj}+\sum_{t=1}^{n}\sum_{s=1}^{n}\sum_{k=1}^{n}a_{it}a_{ts}a_{sk}a_{kj}+\cdots$$

上式也可以用矩阵形式表示出来：

$$B=A+A^2+A^3+A^4+\cdots\cdots$$

其中A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2,A^3,A^4\cdots$等则分别表示各轮的间接消耗系数矩阵，当矩阵A的幂$m\to\infty$时，由于矩阵A的特征根的绝对值都大于0小于1，$A^m\to0$所以

$$A+A^2+A^3+A^4+\cdots=(I-A)^{-1}-I$$

即$I+A+A^2+A^3+A^4+\cdots=(I-A)^{-1}=I+B$

这个等式说明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列昂场夫逆阵和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之间的相互关系。

决定系数（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决定系数是反映配合的直线与数据资料的发展趋势的配合程度的系数，它是衡量回归直线的拟合优度的重要指标。在回归分析中，如果所有的观测值都在回归线上，那将是一个完美的拟合，但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得到完美的拟合，总是有一些正的和负的残差e。这些残差越小，直线的拟合程度就越好，决定系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它在一元回归分析中写成r^2，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写成R^2。

在回归分析中，样本观测值Y与它的样本平均数的离差平方和$\sum_{i=1}^{n}(Y_i-\overline{Y})$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估计的Y值$\overline{Y_i}$和它的平均数的离差平方和$\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与残差的平方和$\sum_{i=1}^{n}ei^2=\sum_{i=1}^{n}(Y_i-\overline{Y}_i)^2$，用公式表示为：

$$\sum_{i=1}^{n}(Y_i-Y)^2=\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sum_{i=1}^{n}(Y_i-\overline{Y}_i)^2$$

总离差平方和＝回归平方和+残差平方和

回归平方和是用解释变量X来加以解释的平方和，又称为可解释平方和；残差平方和是不能由X解释的平方和。将以上等式两边同除以总离差平方和，有：

$$1=\frac{\sum_{i=1}^{n}(\overrightarrow{Y_i}-\overline{Y})}{\sum_{i=1}^{n}(Y_i-Y)}+\frac{\sum_{i=1}^{n}(Y_i-\overline{Y_i})^2}{\sum_{i=1}^{n}(Y_i-\overline{Y})}$$

而样本决定系数就可以定义为：

$$r^2=\frac{\sum_{i=1}^{n}(\overrightarrow{Y_i}-\overline{Y})}{\sum_{i=1}^{n}(Y_i-\overline{Y})}$$

它反映回归直线的拟合优良程度，具体地说，它代表在Y的离差平方和中可以由回归模型解释的那部分所占的比例。R^2或r^2是一个非负的量，它在0和1之间变化，当$R^2=1$时，是完美的拟合，当$R^2=0$时，在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没有关系。

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计算r^2可以利用下面

的简便公式:

$$r^2=\frac{\beta_1^2\sum_{i=1}^{n}(X_i-\overline{X})^2}{\sum_{i=1}^{n}(Y_i-\overline{Y})^2}$$

对于多重决定系数，公式是同样的，有

$$R^2=\frac{\sum_{i=1}^{n}(\hat{Y}_i-\overline{Y})^2}{\sum_{i=1}^{n}(Y_i-\overline{Y})^2}$$

具体计算时，可用公式:

$$R^2=1-\frac{\sum_{i=1}^{n}e^2}{\sum_{i=1}^{n}(Y_i-\overline{Y})^2}$$

决策函数、损失函数和风险函数（Decision Function, Loss Function and Risk Function）　在古典的决策中，主要是根据样本的观测值来对总体 θ 作出判断。这时的样本统计量 d 是样本观察值 $x_1,\cdots,x_n$ 的一个函数，$d=d(x_1\cdots,x_n)$就称为决策函数。在管理决策中，θ 可以看作一个状态空间，d 看作是在取得一定的自然状态信息下采取的一种方案。

当参数的真值为 θ，而决策的结果为 d，二者的不一致会带来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是一个随机变量，用 L（d，θ）表示，称为损失函数。在决策问题中，设 di 是方案的集合中最后采取的方案，θ_j 是状态空间中出现的某一个状态，则对于所有的方案和状态有：(a) L（d，θ）≥ 0；(b) 对于状态空间中每个 θ，至少有一个方案 d，使得 L（d，θ）＝0。当损失函数为零时称为正确的决策。常见的损失函数有 $L(d,\theta)=C(\theta-d)^2$ 和 $L(d,\theta)=c|\theta-d|$，前者称为二次损失函数，后者称为绝对误差损失函数，其中 C 为一个加权系数或称为损失系数。

由于损失函数是随机变量，损失函数的期望值 R（d，θ）＝E[L（d，θ）]就称作风险函数。在决策中，每一种自然状态 θ_j，都会产生一个风险值 $R(d,\theta_j)=\sum_{i=1}^{k}L(d_i,\theta_j)\cdot P(di|\theta_j)$，决策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一个决策方案 d，使对各个 θ_j，其风险值均为最小。因此常常对 θ 确定一个概率分布，并使其平均的风险值 $r(d,\theta)$ 达到最小，其中

$$r(d,\theta)=E[R(d,0)]=\sum_{j=1}^{l}R(d,\theta)P(\theta_j)$$

决策树（Decision Tree）　决策树是一种通过绘制树枝图来进行决策的方法，它所采用的决策原则也是期望值决策原则，但能够给人们以更加直观的印象。用决策树方法进行的决策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单阶段决策，另一类是多阶段决策。单阶段决策也叫一级决策，它研究的只是对于一组不同方案的决策。有些决策要包括两级及以上的决策，这类问题叫作多阶段或多级决策。

表 1　付酬表　单位：千元

自然状态 / 方案	θ_1：销路好 $P(\theta_1)=0.3$	θ_2:销路一般 $P(\theta_2)=0.5$	θ_3:销路较差 $P(\theta_3)=0.2$
d_1:大批量生产	20	12	8
d_2:中批量生产	16	16	10
d_3:小批量生产	12	12	12

决策树是根据报偿矩阵的资料绘制的，设有一个企业根据市场调查，预测到某种产品销路好、一般、较差这三种可能的自然状态（分别记为 $\theta_1,\theta_2,\theta_3$）发生的概率分别为 0.3，0.5，0.2，其付酬表为表 1:

决策树的图形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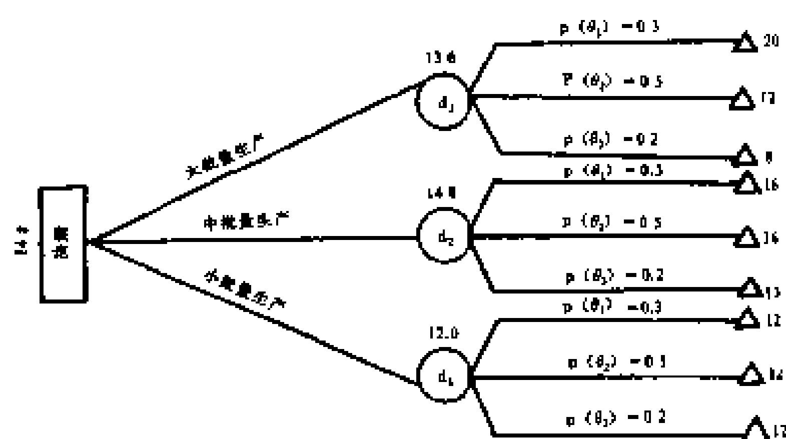


图 1 决策树

在图中，各种符号的含义是:

□表示决策点，由它引起的线段叫方案分支，线段的数目代表可能的行动方案的数目。决策点上面的数字代表最优行动方案的收益的期望值。

○表示行动方案的节点，它上面的数字代表该方案的收益期望值，由它引起的分支叫概率分支，每条分支上标明对应的自然状态及其出现的概率，分枝树表明可能的自然状态数。

△表示结果结点（或称“末梢”）它旁边的数字是每一种行动方案在相应的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

决策树的决策方法如下：(1) 先画出决策点，(2) 根据行动方案的数目引出相应数目的方案分枝，并把每一个行动方案标在方案分枝上；(3) 从方案节点上引出和自然状态数目相同的概率分枝，并将每一种自然状态及其出现的概率标在概率分枝上；(4) 在概率分枝的末端标上结果结点，并在旁边标上该种行动方案在相应的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

(5) 计算每种行动方案收益的期望值，并把它标在方案节点上；(6) 比较每一种方案收益的期望值，把最大的收益期望值标在决策点上，与其相应的方案定为最优方案，同时，在其它的方案分枝上画上“‖”，表示舍弃这些方案。

次数分配 (Frequency Distribution) 次数分配也称为数量分组数列。如果将原始资料按照一定的数量标志分组，把属于某一区间的变量都归在一起，形成的就是次数分配。如果把次数分配用统计表表现出来，就是次数分配表。

假设某个班组 5 个工人的工资分别为：95、105，110，110，130 利用这个资料就可以编制一个次数分配表：

某班组工人工资次数分配表 (1)

月工资 (元)x	人数(次数) f
95	1
105	1
110	2
130	1
合计	5

这里的工资是标志变量，表明各组标志值的大小。工人数是各组单位数（即变量个数），表明相应的各标志值分配的次数。

更进一步，可以把相邻的组按照一定的规律性并起来，如：

某班组工人工资次数分配表 (2)

月工资 (元)	组中值(x)	人数(f)
80—100	90	1
100—120	110	3
120—140	130	1
合计	–	5

通过这种分组，可以使统计数字精简成较为有用的分组形式，呈现出它的数量变化特点。但如果分组不恰当，又会使得某些有用信息在归并中消除掉，因此，建立一个好的次数分配，是作好许多统计分析的基础。

显然，次数分配说明的是总体单位的分配情况，它由两个要素组成，变量数值和变量个数。当每个组的变量数值由单个变量组成时（表 1)，这种变量数列称之为单项变量数列。组距变量数列则是把全部变量依次划分为几个区间，把一段区间内的变量划为一组所形成的次数分配。在单项变量数列中，变量数值 X 就取各个标志值；而在组距数列的情况下，变量数值往往取各组的组中值。变量个数或次数可以用绝对数表示，也可以用相对数表示。用相对数表示时，要计算各组单位数在总体单位数中所占的比重，通常称为频率。这时，次数分配也称为频率分配。

产品的抽样检验 产品抽样检验也称为成批产品的抽样验收，它通过抽取部分样本来进行检验，来决定是接收还是拒绝某批产品。在抽样之前需要有一个方案，对一批总量为 N 的产品，规定从中抽取多少单位 n 作为样本来进行检验，并规定一个抽收界限 c，如果检验的结果是不合格的产品数小于或等于 c，就接收这批产品，否则，就拒收这批产品。这种抽样一般适用于需要进行破坏性检验的场合和检验全部产品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的情况。抽样检验可以节约人力物力，但有一定风险，把不该接受的“批”接受了，或者把应该接受的“批”拒收了，因此，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确定抽样的方案，既能节省人力物力，又能控制“错误”的程度。

动态投入产出模型 (Dynamical Input—Output Model) 动态投入产出模型把投资引进了投入产业模型，是静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扩展。在静态模型中，一般只考虑把经济中的一些主要变量调整到所要求的水平，而不注意这些变量变化的实际途径。而动态模型则可能在某一目标函数所给定的最优化的未来增长模式下，从基年到目标年跟踪经济发展的途径。

一个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最纯粹的形式可写成：

$$\overrightarrow{q_t} = A\overrightarrow{q_t} + K\overrightarrow{q_t} + \overrightarrow{C_t}$$

其中，$\overrightarrow{g_t}$ 是产出对时间的变化率(dq／dt)的向量，K 是资本系数矩阵，$\overrightarrow{C_t}$ 是除资本形成以外的最终需求 C 对于时间的变化率(dc／dt)的向量。

如果把 dq／dt 离散化，那么，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可以用一系列反映计划期各年的方程所表示：

$$q_1 = Aq_1 + K\triangle q_1 + c_1$$

$$q_2 = Aq_2 + K\triangle q_2 + c_2$$

……

$$q_t = Aq_t + K\triangle q_t + c_t$$

其中，资本系数矩阵

$$K = V\overrightarrow{\triangle q}^{-1}$$

在这个等式中，V 是投资矩阵，它记录了各行产业部门把资本货物售给各列购货的产出部门的情况，$\overline{\triangle q}$ 是一个以产出的增量△q 的元素为主对角元素的对角矩阵。上式又可写成

$$V=K\overline{\triangle q}$$

它反映了投资矩阵 V 和产出之间必要的联系。

若假定产出在时间上按线性增长即$\triangle q_1=\triangle q_2$，则可获得（1）式的解：

$$q=(I-A)^{-1}[c+k(I-A)^{-1}\triangle c]$$

在这个方程中，产出水平的高低，既依赖于产业部门供应的现期消费，又依赖于产业部门为未来消费增长所供应的资本商品。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

存量调整模型（Stock Adjustment Model）　存量调整模型是一种分布滞后模型。这个模型假定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个长时期的所需资本存量的最优值。可以把这个所需要的资本存量Y_t^*看作是产量X_t的线性函数

$$Y_t^*=\beta_0+\beta_1X_t+u_t \qquad (1)$$

由于Y_t^*无法直接观察，可利用如下假设：

$$Y_t-Y_{t-1}=\delta(Y_t^*-Y_{t-1}) \qquad (2)$$

这就是存量调整假设或称为部分调整假设。等式的左边Y_t-Y_{t-1}是资本存量的实际变化，它等于本期的新投资，其中，Y_{t-1}是上期末的资本存量，Y_t是本期末的资本存量。等式右边的$Y_t^*-Y_{t-1}$是本期所需要的资本存量与上期的实际资本存量之差。Y_t-Y_{t-1}和$Y_t^*-Y_{t-1}$之间保持着固定的比例δ，称为调整系数，它的取值在 0 到 1 之间。如$\delta=1$，就表明实际资本存量与需要的资本存量相等；如$\delta=0$，表明实际资本存量在时间 t 与时间 t-1 之间没有变化。一般地说，δ不会取这些极端值，而有$0<\delta<1$。(2) 式还可以改写为：

$$Y_t=\delta Y_t^*+(1-\delta)Y_{t-1}$$

这个方程表明在时间 t 观察到的资本存量是在那一时点所需要的资本存量与前一期实际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加权平均，权数分别为δ和$1-\delta$，将（1）式代入（3）式得：

$$Y_t=\delta(\beta_0+\beta_1X_t+u_t)+(1-\delta)Y_{t-1}$$
$$=\delta\beta_0+\delta\beta_1X_t+(1-\delta)Y_{t-1}+\delta u_t$$

这个模型就称为部分调整模型。在模型中把因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它表明本期的实际资本存量不但与同期的产量有关，而且与上期实际资本存量有关。

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Limited—information Maximum—likelihood）　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是一种估计联立方程模型中结构参数的方法，它可以采取两种不同形式，一是采取有约束的似然函数极大化的过程，另一是采取方差比极小化的过程。两种过程所获得的结果是一样的。前一种过程通常就直接称为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LIML 法），后一种过程常称为最小方差比法（LVR 法）。它们特别适用于过度识别的模型。

现以结构方程

$$\begin{cases}Y_1=b_{12}Y_2+C_{12}x_2+u_1\\Y_2=b_{23}Y_3+C_{23}X_3+u_2\\Y_3=b_{31}Y_1+b_{32}Y_2+C_{33}X_3+u_3\end{cases} \qquad (1)$$

为例说明这种方法（最小方差比法另列条目）。

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是一种单方程方法。它的计算步骤为：

(1) 求简化式方程。即把结构方程（1）中所包含的内生变量表示为全部前定变量和随机干扰项的函数。如对于Y_2，可列出：

$$Y_2=\pi_{21}X_1+\pi_{22}X_2+\pi_{23}X_3+V_2$$
$$Y_3=\pi_{31}X_1+\pi_{32}X_2+\pi_{33}X_3+V_3$$

这两个简化式应满足最小二乘法的全部假设，且服从正态分布。

(2) 求结构式参数和简化式参数π的关系式。

由于在本例中，结构式参数 B 和 T 分别为：

$$B=\begin{bmatrix}1&-b_{12}&0\\0&1&-b_{23}\\-b_{31}&b_{32}&1\end{bmatrix}$$

$$T=\begin{bmatrix}-c_{11}&-c_{12}&0\\0&0&-c_{23}\\0&0&-c_{33}\end{bmatrix}$$

简化式参数为：

$$\pi=\begin{bmatrix}\pi_{11}&\pi_{12}&\pi_{13}\\\pi_{21}&\pi_{22}&\pi_{23}\\\pi_{31}&\pi_{32}&\pi_{33}\end{bmatrix}$$

由于$B\pi=-T$，所以

$$\begin{cases}\pi_{21}-b_{23}\pi_{31}=0\\\pi_{22}-b_{23}\pi_{32}=0\end{cases} \qquad (2)$$

$$\pi_{23}-b_{23}\pi_{33}=C_{23} \qquad (3)$$

简化式参数与结构式参数应满足约束条件(2)。如果求出b_{23}的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那么，将它代入（3），就可以求得C_{23}的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

(3) 建立似然函数。由于每个简化式方程的随机干扰项是序列独立且服从正态分布的（这当然首先要求每个结构方程的随机干扰项是序列独立且服从正态分布的），如果v_2和V_3同期相关，似然函数 L 表示为：

$$L=-n\log(2\pi)-n\log\bar{\sigma}_2-n\log_{\sigma_3}-\frac{n}{2}(1-\rho_{23}^2)$$

$$-\frac{1}{2(1-\rho_{23}^2)}\sum_{t=1}^{n}[-\frac{(Y_{2t}-\sum_{j=1}^{3}\pi_{2j}x_{jt})^2}{\sigma_2^2}$$

$$+\frac{(Y_{3t}-\sum_{j=1}^{3}\pi_{3j}X_{jt})^2}{\sigma_3^2}$$

$$-\frac{2\rho_{23}(Y_{2t}-\sum_{j=1}^{3}\pi_{2j}X_{jt})(Y_{3t}-\sum_{j=1}^{3}\pi_{3j}X_{jt})}{\sigma_2\sigma_3}]\quad(4)$$

其中，σ_2^2和σ_3^2表示 v_2 和 v_3 的方差，ρ_{23} 表示它们的相关系数。

(4) 求参数的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

这里，参数的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是指对于 Y_3,Y_3,X_1,X_2,X_3 的特定样本，在满足约束条件 (2) 下，使似然函数 (4) 达到极大值。因此，估计问题就归结为似然函数在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问题。

设拉格朗日函数为

$H=L+\lambda_1(\pi_{21}-b_{23}\pi_{31})+\lambda_2(\pi_{22}-b_{23}\pi_{32})$

分别对 σ_2、σ_3、ρ_{23}、$\pi ij(i-2,3;j=1,2,3)$，λ_1、λ_2 求偏导数并令它们等于 0，即可得出使 H 极大化的必要条件并进而得到以上各值的估计量$\bar{\sigma}_2,\bar{\sigma}_3,\bar{\rho}_{23},\bar{\pi}_{ij}$ $(i=2,3;j=1,2,3),\bar{b}_{23},\bar{\lambda}_1,\bar{\lambda}_2$。将 $\bar{\pi}_{23},\bar{\pi}_{33}$ 和 $\bar{b}_{23}$ 代入 (3) 得

$\bar{c}_{23}=\bar{\pi}_{23}-\bar{b}_{23}\bar{\pi}_{33}$

$\bar{C}_{23},\bar{b}_{23}$ 便是结构式参数的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它们具有一致性的特性。

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Continous Random Variable） 连续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也称为连续的概率分布。由于连续的随机变量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所以它需要用一个数学函数形式 f (x) 来表示随机变量 X 在不同情况下的概率分布，f (x) 称为连续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它具有以下性质：

1. $f(x)\geq 0$，对所有的 $X\in R$ (R 代表实数)
2. $\int_{-\infty}^{+\infty}f(x)dx=1$
3. $P(a<x<b)=\int_a^b f(x)dx$

头两个性质为非负性和规范性，这是所有的概率都必须具备的性质。第三个性质说明的是求随机变量 X 落在某一个区间内的概率。当 a=b 时，我们有：

$P(a=x=b)=\int_a^b f(x)dx=\int_a^b f(x)dx=0$

它说明连续随机变量取某一个具体数值的概率为零。

连续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F (x) 定义为：

$F(x)=P(X<x)=\int_{-\infty}^{x}f(t)dt$

根据这一定义，有

$P(a<x<b)=F(b)-F(a)$

$f(x)=F'(x)$

该分布函数也具有和离散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相同的三个性质：

(1) 单调性：若 $a<b$，则 $F(a)<F(b)$；

(2) $\lim_{x\to-\infty}F(x)=0,\lim_{x\to\infty}F(x)=1$；

(3) 左连续性：$F(x-0)=F(x)$

列联表（Contingency Table） 列联表是用来反映某种试验或观察的结果的表式，用它可以研究两组或多组资料是否关联的问题。如果不是相互关联，就称为独立，所以用列联表进行的分析也叫作独立性检验。

例如，一种原料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质量分成三种不同的等级，随机抽取 500 件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一级	二级	三级	合计
甲地区	52	64	24	140
乙地区	60	59	52	171
丙地区	50	65	74	189
合计	162	188	150	500

要求检验各地区和等级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或者换句话说，原料的等级究竟受不受地区差别的影响。利用列联表所要进行的独立性检验，回答的就是这样一类问题。

上表的资料可以一般化地用符号表示出来，可以通过计算各个和 O_{ij} 相对应的理论值 E_{ij}，构成 χ^2 统计量，进行独立性检验。

		列					合计
		1	2	3	…	k	
行	1	o_{11}	o_{12}	o_{13}		o_{1k}	n_1
	2	o_{21}	o_{22}	o_{23}		o_{2k}	n_2.
	3	o_{31}	o_{32}	o_{33}		o_{3k}	n_3
	⋮	⋮	⋮	⋮	⋱	⋮	⋮
	r	o_{r1}	o_{r2}	O_{r23}		O_{rk}	n_k
合计		$n_{.1}$	$n_{.2}$	$n_{.3}$	…	$n_{.k}$	n

各个理论值可以用以下公式求得：

$$E_{ij}=\frac{n_{.j}\times n_{i.}}{n}$$

因为如果各行与各列是相互独立的，那么，随机变量 x_{ij} 出现的概率应为 $P_{ij}=P_{i.}\times P_{.j}=\frac{n_{i.}}{n}\times\frac{n_{.j}}{n}$而

其出现的数值应为 $np_{ij}=n\cdot\frac{n_i\cdot n_j}{n_2}=E_{ij}$

然后，将 O_{ij} 与 E_{ij} 相比较．计算 x^2 统计量：

$$X^2=\sum_{i=1}^{r}\sum_{j=1}^{k}\frac{(O_{ij}-E_{ij})^2}{E_{ij}}$$

它服从自由度为(r−1)(k−1)的 x^2 分布。如果具体计算出来的 x^2 值大于临界值 x^2_α，则拒绝原假设，认为二者是有关联的，如小于 x^2_α，则接受原假设。在上面的例子中，$x^2=19.825>x_{\alpha=0.05}(4)=9.488$，应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原料质量和地区来源之间有关联。

成品产值、商品产值和销售产值　成品产值的计量是与社会产品的成品、非成品划分相联系的。从企业来看，成品产值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完成的、以货币表现的产成品总量，它包括产成品的价值和发售到生产范围以外的半成品价值，是企业总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部门来看，成品产值是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可供其它部门使用的，以货币表现的产成品总量。因此，部门的成品价值中要扣除企业成品产值总和中用于本部门内部调转的那部分成品产值。从国民经济来看，成品产值是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以货币表现的，可供社会最终消费和使用的社会产成品总量。所以，它又应该扣除部门产值总和中那部分在物质生产部门间相互周转的部分。

商品产值也可以在不同的范围上计算，从基层来看，商品产值是商品生产单位在一定时期预定发售到其基本生产活动范围以外去的以货币计算的产品价值。这里，商品产值与其它产值指标相比，有两个基本特点，(1) 它统计的是报告期所完成的产品的数量。这就是说，它不象成品产值那样只计量实物产品，也要计算生产性劳务这样的产品，它又不象总产值那样要计算非成品的期初期末差额价值，只要是报告期完成的，统统包括在内。(2) 它要能构成商品生产单位的经济收入。这样，商品产值可以包括自备原材料生产的全部成品价格。而来料加工的成品价值中，商品产值只能计算其加工价值，由部门范围计算的商品产值，应该扣除部门内部流转的部分。在国民经济范围内计算的商品产值，要扣除部门间流转的部分。

销售产值是企业在本期内从购买者那里收到款项的商品产值，它主要包括：(1) 本期生产、本期收到货款的商品产值；(2) 本期以前生产、本期收到货款的商品产值；(3) 本期以后才能生产，本期收到购买者预付货款的商品产值。销售产值从它的构成要素来看，与商品产值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商品产值主要从本期生产的角度说明产出情况，销售产值则是从社会承认的角度，说明价值的实际情况。

考伊克（Koyck）变换　考伊克变换是一种处理几何滞后分布模型的方法。由于几何滞后分布模型

$Y_t=a+b(X_t+\lambda X_{t-1}+\lambda^2X_{t-2}+\cdots+\lambda^jX_{t-j}+\cdots)+u_t(1)$

在 t 时刻成立，在 t−1 时刻上有

$Y_{t-1}=a+b(X_{t-1}+\lambda X_{t-2}+\lambda^2X_{t-3}\cdots+\lambda^{j-1}X_{t-j}+\cdots)+u_{t-1}(2)$

将 (2) 两边乘以 λ 得：

$\lambda Y_{t-1}=\lambda a+b(\lambda X_{t-1}+\lambda^2X_{t-2}+\lambda^3X_{t-3}+\cdots+\lambda^jX_{t-j}+\cdots)\lambda u_{t-1}(3)$

(1) 减 (3) 得：

$Y_t-\lambda Y_{t-1}=(1-\lambda)a+bX_t+u_t-\lambda u_{t-1}$

移项得

$Y_t=(1-\lambda)a+bX_t+\lambda Y_{t-1}+u_t-\lambda u_{t-1}(4)$

令 $(1-\lambda)a=\beta_0,b=\beta_1,\lambda=\beta_2,u_t-\lambda u_{t-1}=V_t$，则 (4) 式可写成：

$Y_t=\beta_0+\beta_1X_t+\beta_2X_{t-1}+v_t$

在这个模型中，解释变量是 X_t 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 Y_{t-1}。

通过对这个模型的估计，可获得 $\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 和 $\overline{\beta}_2$ 并进而求出了 $\overline{a}$、$\overline{b}$ 和 $\overline{\lambda}$。

机会亏损付酬表（Opportunity Loss Payoff Table）　机会亏损，又称悔惜（Regret），指的是在一定的自然状态下，由于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而失去了取得最好付酬机会而造成的损失。换句话说：就是"该赚的没赚，不该赔的赔了"。例如，在"收益付酬表"条中的表 1 中，如果"自然状态"为干燥，应选择的行动应为种芦笋，这时，机会亏损为 0，如选择小麦、番茄、甜菜或土豆，机会亏损则分别为 10，10，7，10。又例如，在"亏损付酬表"条目中的表 1。如自然状态为 0.05，则应选择不开箱，如果开箱了，机会亏损就是 37.5。这说明，机会亏损付酬表可以通过对收益付酬表或亏损付酬表的数字加工计算而得。所得到的表就是"按收益"或"按亏损"计算的机会亏损付酬表。根据"亏损付酬表"条目中的表 1 计算的机会亏损付酬表为：

表 1　　机会亏损付酬表

不合格率（自然状态）	行动	
	开箱检验(a_1)	不开箱检验(a_2)
0.05(θ_1)	37.5	0
0.10(θ_2)	0	25.0
0.20(θ_3)	0	87.5

效用付酬表（Utility Payoff Table）　效用付酬

是按人们对可能的经济得失或其它事物得失的主观估计所计算的付酬。当主观估价的对象是经济得失时，就是对一定货币量的估价。对同等数量的货币收益或亏损，不同人的主观估价不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估计。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用效用付酬作为决策标准，有它特定的优点。

效用的测定是用效用函数计算的，即效用是货币量的函数，需要对某个人进行调查，要求他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从他的回答中掌握他对风险的态度，拟以测定他对应于一定的货币量或其它事物的效用值。进而确定他的效用函数。

用效用单位编制的付酬表就是效用付酬表。

机械抽样（Systematic Sampling） 机械抽样又叫等距抽样，使用这种方法时，是按照空间或时间排列等距地间隔抽取样本的。例如，要在一所大学中抽取一个由5%的学生构成的样本，研究他们的身体状况，就可以以学生名册为序，在最前面的20人中随便选一人作开头，以后每隔20人抽选一人，就得到一个机械抽样的样本。等距抽样的随机性表现为抽取第1个样本单位上，当第一个样本单位确定后，其余各单位也随之确定了。因此，当总体单位的排列呈现周期性时，不宜采用机械抽样，以免抽样间隔与现象本身的周期性相重合引起系统性误差。

机械抽样的抽样平均误差的大小，与总体单位原来的排列顺序有关，如果总体单位的排列顺序完全是随机的，那么，机械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实质上没有差别，因而机械抽样的抽样平均误差也与简单随机抽样基本一样。如果总体单位按照与调查标志有关的标志排列，然后每隔一定距离抽一个单位，就相当于把总体分为几类，那么，机械抽样的抽样平均误差就接近于类型抽样的抽样平均误差。如果全部单位按有关标志排列的顺序，与它们按调查标志的数值排列的顺序恰好一致，那么，用机械抽样方法得到的样本就能十分准确地代表总体，误差很小。总之，机械抽样的抽样平均误差的大小依赖于总体单位的排列顺序的标志与调查标志的密切程度。一般来说，在总体单位排列顺序与调查标志无关时，可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平均误差公式估计抽样平均误差；在总体单位排列顺序与调查标志相关时，可按类型抽样的平均误差公式来估计。

扫描运算（Sweep Operator） 扫描运算是一种代数运算方法，在回归分析中可以利用它进行自变量的选择。

设 $A=(a_{ij})_{n\times n}$，若 $a_{ii}\neq 0$，定义一个新的方阵 $B=(b_{ij})_{n\times n}$，其中：

$b_{ii}=1/a_{ii}$

$b_{ij}=a_{ij}/a_{ii}, j\neq i$

$b_{ji}=-a_{ji}/a_{ii}, j\neq i$

$b_{kl}=a_{kl}-a_{il}a_{ki}/a_{ii}, k\neq i, l\neq j$

称由A到B的这种变换为以 a_{ii} 为枢轴的扫描运算，或称为S运算，记为 $B=a_iA$。

容易验证S运算具有下列性质：

(1) $S_iS_iA=A$；

(2) $S_iS_jA=S_jS_iA$（可交换性）。

第一条性质说明，以同一对角元为枢轴的S运算连续作两次等于没有作S运算。把这一条和第二条可交换性结合起来，可以推知，在任意形如 $S_{i1}S_{i2}\cdots S_{im}A$ 的表达式中，若某一足标出现偶数次，则只保留一个，且对剩下的S可按任意次序排列。

(3) 将n阶方阵A分块为

$$A=\begin{bmatrix}A_{11} & A_{12}\\ A_{21} & A_{22}\end{bmatrix}$$

其中 A_{11} 为r阶可逆阵，则

$$S_1S_2\cdots S_rA=\begin{bmatrix}A_{11}^{-1} & A_{11}^{-1}A_{12}\\ -A_{21}A_{11}^{-1} & A_{22}-A_{21}A_{11}^{-1}A_{12}\end{bmatrix}$$

可以把上述结果应用于线性回归计算。

考虑线性回归模型

$$Y=\alpha 1+X\beta+e,\ E(e)=0,\ \mathrm{Cov}(e)=\sigma^2 I$$

假设 $X_{n\times p}$ 已经中心化，于是 $X'Y=X'(Y-\bar{Y}1)$，将X分块；$X=(X_q\vdots X_t)$，假定 X_q 有q列、X_t 有t列，$q+t=p$，记

$$S=(X'X)=\begin{bmatrix}X_q'X_q & X_q'X_t\\ X_t'X_q & X_t'X_t\end{bmatrix}=\begin{bmatrix}S_{11} & S_{12}\\ S_{21} & S_{22}\end{bmatrix}$$

$$A=\begin{bmatrix}S & X'Y\\ Y'X & \|Y-\bar{Y}1\|^2\end{bmatrix}$$

$$=\begin{bmatrix}S_{11} & S_{12} & X_q'Y\\ S_{21} & S_{22} & X_t'Y\\ Y'X_q & Y'X_t & \|Y-\bar{Y}1\|^2\end{bmatrix} \tag{1}$$

假设 $q<p$，依性质(3)，有

$$S_1\cdots S_rA=\begin{bmatrix}S_{11}^{-1} & * & S_{11}^{-1}X_q'Y\\ * & * & *\\ X & * & \|Y-\bar{Y}1\|^2-Y'X_qS_{11}^{-1}X_q'Y\end{bmatrix}$$

其中“*”表示没有必要写出的一些子块。注意到

$S_{11}^{-1}X_q'Y$ 是从选模型（参见"全模型和选模型"）

$$Y = a1 + X_q\beta_q + e$$

得到的 β_q 的最小平方估计 $\overline{\beta}_q = (X_q'X_q)^{-1}X_q'Y$，而

$$\| Y - \bar{Y}1 \|^2 - Y'X_qS_{11}^{-1}X_q'Y$$

是该选模型对应的残差平方和 RSS_q，S_{11}^{-1} 是估计 $\overline{\beta}_q$ 的协方差阵（除去因子 σ 不计），更一般地，对于回归分析中的扫描运算，有如下定理：

设 $1 \leq i_1 < i_2 < \cdots < i_q \leq p$，对（1）式定义的矩阵 A 施行 S 运算 $S_{i1}, S_{i2}, \cdots, S_{iq}$，得 $B = S_{i1} \cdots S_{iq}A$，则 B 的结构为

（1）B 的 $i_1, \cdots, i_q$ 行和 $i_1, \cdots, i_q$ 列交叉处元素组成的子阵为 A 的相应子阵的逆。

（2）$b_{i1,p+1}, b_{i2,p+2} \cdots, b_{iq,p+q}$ 为选入回归的自变量 $x_{i1}, x_{i2}, \cdots, x_{iq}$ 的回归系数 LS 的估计；

（3）$b_{p+1,p+1}$ 为对应于所选自变量子集的残差平方和。

（4）将（1）中所说的 B 的子方阵乘以 σ^2，等于（2）中所说的回归系数最小平方估计的协方差阵。

根据这个定理，可以利用 S 运算来作回归自变量的选择。假定自变量 $x_{i1}, \cdots, x_{iq}$ 已选入回归模型，下一步无论是引入或剔除一个自变量，只需对 $X_{i1} \cdots S_{iq}A$ 作一次 S 运算。例如，如要把 $x_l, l \neq i, \cdots, i_q$ 引入回归模型，只需让 S_L 等于 $S_{i1} \cdots S_{iq}A$ 就够了。反过来，如果要把某个自变量，例如 x_{i1}，从回归方程中剔除，那么根据前面 S 运算的第一条性质，只需施 S_{i1} 运算到 $S_{i1} \cdots S_{iq}A$，得到 $S_{i2} \cdots S_{iq}A$。根据上述定理，$S_{i2} \cdots S_{iq}$ 就给出了以 $x_{i2}, \cdots x_{iq}$ 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的主要统计量的最小平方估计。

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　对于二元及多元回归模型应用最小二乘法，除了保留一元回归模型中的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即 $E(u_i)=0$，$Var(u_i)=\sigma^2$，$Cov(u_i X_{\cdot i}) = Cov(u_i x_{1i}) = \cdots = Cov(u_i, X_{ki}) = 0$，$Cov(u_i, u_j) = 0, i \neq j$）之外，还要增加一个新的假定，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这也就是说，在解释变量之间没有严格的线性关系。以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Y_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mu$$

为例，多重共线性表示，存在着 λ_1 和 λ_2，在它们不全为 0 时，下列等式成立：

$$\lambda_1 X_{1i} + \lambda_2 X_{2i} = 0$$

如果这个线性关系存在，就说 X_2 和 X_3 是共线的，或线性相关的，反之，如果它只在 $\lambda_1 = \lambda_2 = 0$ 时才成立，就说 λ_1 和 λ_2 是线性独立的。无多重共线性的假定要求在总体回归方程中包括的任何解释变量都不能表示为其它解释变量的线性函数。

"多重共线性"这个词是由弗瑞希首先使用的，最初它仅指前面提过的严格的线性关系，后来，含义逐渐广泛。今天，它不仅包括严格的线性关系，还包括另外一种情况，即解释变量 X_i 之间存在着交叉相关，而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即 $X_1, X_2, \cdots X_k$ 之间存在下列关系：

$$\lambda_1 X_{1i} + \lambda_2 X_{2i} + \cdots + \lambda_k X_{ki} + u_i = 0$$

其中，u_i 是一个随机误差项。

多重共线性在经济变量中是经常出现的，通常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被解释变量 Y 是产值，解释变量是资本 K 与劳动力 L。一般说来，大型企业有较多的资本和劳动力，小型企业资本和劳动力都比较少，所以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也就是存在着多重共线性。截面数据中的多重共线性，多半是由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引起的。

2.经济变量在时间上有同方向变动的趋势。各种经济变量受同一个决定因素的影响时，会在时间上显示出同一形态的变动。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增长因素或趋向因素是造成多重共线性的主要原因。

3.将某些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单独的因素，引入模型，当成新的变量。

当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完全的线性关系或称为完全相关时，其回归系数是无法估计的。设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u_i$$

若 X_{1i} 与 X_{2i} 之间的线性关系为：

$$X_{1i} = KX_{2i}$$

则可引入某个任意常数 β_1^*，得到下列回归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 \beta_1^*)X_{1i} + (\beta_2 + K\beta_1^*)X_{2i} + u_i$$

它和上面的回归模型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

$$\beta_1^* X_{1i} = K\beta_1^* X_{2i}$$

使得公式中 X_{1i} 和 X_{2i} 的系数具有任意性，从而无法得出唯一解。

如果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系数，由于 X_{1i} 与 X_{2i} 成比例，$|X'X| = 0$，而 $(X'X)^{-1}$ 不存在，参数估计值 $\overline{\beta}$ 就无法求得。

在非完全相关的情况下，一般地说，将发生下列几方面问题：

（1）参数估计的精确性降低，估计值的方差变得很大，因而不能正确判断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2）对回归系数进行假设检验 H_0：$\beta = 0$ 时，由于估计值的不精确，可能接受原假设，这就使得我们容易将本应保留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舍弃掉。

多重共线性的出现，不改变参数估计的无偏特性。这是因为即使解释变量之间出现了多重共线性，

但并不影响扰动项 u_i 以及被解释变量观察值的特性，如果它们仍满足古典线性模型的其它假定，仍然有：

$$\begin{aligned}E(\bar{\beta}) &= E[(X'X)^{-1}X'Y]\\ &= E[(X'X^{-1}X'(X\beta+u)]\\ &= \beta+E[(X'X)^{-1}X'u]\\ &= \beta\end{aligned}$$

多重共线性的经验解决办法 多重共线性总的来说是一个样本问题，有一些经验规则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但是否有效，还决定于多重共线性是否严重。

2.利用“事前信息”

事前信息包括从经济理论以及实际统计资料所获得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假定所研究的回归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而发生多重共线性的那些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可由事前信息得到，则可以把这个事前知道的关系考虑进正在研究的问题，克服多重共线性。

例如，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出数的估计过程中，由于资本 K 与劳动力 L 之间常存在着相互关系，将

$$Y = AK^{\alpha}L^{\beta}u$$

转换成双对数形式

$$\log Y = \log A+\alpha\log K+\beta\log L+\log u$$

后，logK 和 logL 之间常常也是高度相关的。如果加入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即

$$\alpha+\beta=1$$

则

$$\log Y = \log A+\alpha\log K+(1-\alpha)\log L+\log u$$

整理后可得：

$$\log\frac{Y}{L} = \log A+\alpha\log\frac{K}{L}+\log u$$

这时，$\log\frac{Y}{L}$ 为被解释变量，$\log\frac{K}{L}$ 为解释变量，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当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这样，就可以用最小二乘法得到 α 的估计值 $\bar{\alpha}$，进而得到 $\bar{\beta}=1-\bar{\alpha}$。

2.把横截面资料和时间序列资料结合起来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事前信息”方法的一种变形，两类结合起来的资料可称为合并资料。

假设我们要研究居民对某种消费品的需求，所建立的模型为：

$$\log Y_t = \beta_1+\beta_2\log P_t+\beta_3\log I+u_t$$

其中，Y_t 表示该种消费品的售出量，P 表示平均价格，I 表示收入，t 是时间。在时间序列资料中，价格和收入一般是高度共线的变量。我们在估计 β_2 和 β_3 时，就会面临多重共线性问题。但我们可以利用由家计调查获得的横截面资料，首先去获得一个收入弹性系数的估计值 $\overline{\beta}_3$，并认为它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数。那么，利用这个估计结果，上述时间序列回归方程就可以写为：

$$Y_t^* = \beta_1+\beta_2\log P_t+u_t$$

其中，$Y_t^* = \log Y_t-\overline{\beta}_3\log I_t$

这个 Y_t^* 值可以认为是已经消除了收入的影响。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获得价格弹性 β_2 的估计。

3.去掉一个或几个变量

在多重共线性严重的时候，往往最简便易行的方法是去掉一个或几个存在共线性的变量，由于它们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已由留下的变量所反映，如果留下的解释变量选择得好，原先统计检验不显著的偏回归系数就会变得高度显著。但在进行这种处理时，应考虑设定误差（或称设定偏倚）问题。

4.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代替解释变量的滞后值

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引入模型后，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现设模型为：$Y_t=\alpha+\beta_0X_t+\beta_1X_{t-1}+\beta_2X_{t-2}+\cdots+u_t$ 这时，解释变量的逐次值 $X_t,X_{t-1},X_{t-2}\cdots$ 很可能是高度相关的。一般说来，时期越前的滞后值 X_{t-3} 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愈小，如果我们令 $\beta_s=\lambda^s\beta_0$ $(0<\lambda<1)$，于是，我们有：

$$Y_t=\alpha+\beta_0X_t+\lambda\beta_0X_{t-1}+\lambda^2\beta_0X_{t-2}+\cdots+u_t$$

继而有

$$Y_{t-1}=\alpha+\beta_0X_{t-1}+\lambda\beta_0X_{t-2}+\lambda^2\beta_0X_{t-3}+\cdots+u_t$$

将二式相减，得

$$Y_t-Y_{t-1}=(1-\lambda)\alpha+\beta_0X_t+(u_t-\lambda u_{t-1})$$

即

$$Y_t=\alpha_0+\beta_tX_t+\lambda Y_{t-1}+V_t$$

式中，$\alpha_0=(1-\lambda)\alpha$，$V_t=u_t-\lambda u_{t-1}$；大量实测资料证明，$X_t$ 与 X_{t-1} 相关程度要低于 X 滞后值之间的相关程度，所以使用这种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避免多重共线性。

5.增加或更新资料

由于多重共线性基本上是一个样本现象，而参数估计值的方差与样本容量成反比。因此，增大样本容量可以减少参数估计值的方差，也就减轻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先后验分析（Pre-posterior Analysis） 先后验分析是在进行后验概率关系决策之前进行的一种策略决策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在于判明就某一特定的决策问题而言，是否值得进行条件概率资料的搜集；在决定应搜集试验资料之后，还要估计试验的各种可能结果，并在各种可能结果中，应如何采取最优行动。这就是所谓的策略分析（Strategy Decision）。可见，先后验分析要解决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要

不要进行试验，二是如果试验，应采取什么策略行动。先后验分析有两种形式：一是标准式，为正向分析，用表格的形式进行；另一是扩展式，为反向分析，用决策树形式进行。

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　先验概率又叫主观概率。它是凭个人的主观意志、经验和对决策背景的了解分析后，对自然状态出现的可能性的一种估计和判断。因为它是通过调查、试验获得样本信息以前确定的，因此称为先验概率，以别于后验概率的概念。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认识不同，判断不同，所以对同一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的估计和推断也不同，以致于作出的决策结果也不同。

虽然主观概率是人们对自然状态出现的可能性的一种信任程度，是由决策者个人决定的，但它的确定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而是根据事件已有的信息所作出的一种判断。随着有关事件的信息量的增加，对事件出现的可能性的判断的准确性也在提高，主观概率应趋近客观概率。

年率　它是从某一个月或季度的统计数字出发，通过推算所获得的年度规模的统计数字。例如，某月某种产品的生产数字为 15 吨，将 15 乘以 12，得 180 吨。180 吨即为所计算的年率。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计算年率数字，以便在日历年度尚未结束之前，通过把短时期的社会经济数字概算为全年的水平，提前进行各种经济分析。常发表的年率数字有：直接按年率计算的数字和按季节调整后的年率数字。

后验概率（Posterior Probability）　由于先验概率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它不能完全地反映客观现象。这时，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在已知状态的主观概率的基础上，进行抽样调查或试验，增加样本信息，并对主观概率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概率就叫后验概率。

例：对一台自动机床，经分析，出现各种废品率的概率为：

废品率 \ 概率	X_1 0.01	X_2 0.04	X_3 0.08	X_4 0.10	X_5 0.12
$P(\zeta=x_i)$	0.32	0.45	0.17	0.05	0.01

现随机抽取 20 件产品，结果发现一件废品，就可以利用样本信息对先验概率进行修正。

因为抽样的结果服从二项分布，抽取 20 件产品出现一件废品的概率为

$$P(B|x_i)=C_{20}^1x_i^1(1-x_i)^{19}$$

即当 $x_1=0.01$ 时，有

$$P(B|x_1=0.01)=C_{20}^1(0.01)(0.99)^{19}=0.1652$$

当 $x_2=0.04$ 时，有

$$P(B|x_2=0.04)=C_{20}^1(0.04)(0.96)^{19}=0.3683$$

等等。

$$P(B)=\sum_{i=1}^{5}P(\xi=x_i)P(B|x_i)=0.2901$$

利用贝叶斯定理，可计算后验概率：

$$P(x_i|B)\frac{P(\xi=x_i)P(B|x_i)}{P(B)}$$

具体计算结果见下表。

废品率	$P(\xi=x_i)=p_i$	$P(B\|x_i)$	$P_i\cdot P(B\|x_i)$	$P(x_i\|B)$
0.01	0.32	0.1652	0.0524	0.1824
0.04	0.45	0.3683	0.1667	0.5712
0.08	0.17	0.3282	0.0559	0.1927
0.10	0.05	0.2701	0.0135	0.0465
0.12	0.01	0.2115	0.0021	0.0072
合计	1.00	—	P(B)=0.2901	1.0000

自协方差函数与自相关函数（The Autocovariance Function and th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描述随机过程可以用联合概率分布来进行，但这种方法比较复杂。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给出随机过程的矩，即期望，方差和自协方差。

自协方差函数 $r(t_1,t_2)$ 的定义为

$$r(t_1,t_2)=Cov(X_{t_1},X_{t_2})$$
$$=E\{[X_{t_1}-u(t_1)][X_{t_2}-u(t_2)]\}$$

方差函数是自协方差函数 $r(t_1,t_2)$ 在 $t_1=t_2$ 时的特殊情况。

自协方差系数的大小与 X_{t_1},X_{t_2} 有关，如果将自协方差函数标准化，令

$$\rho=\frac{Cov(X_{t_1},X_{t_2})}{\sigma(t_1)\sigma(t_2)}$$

则称 ρ 为随机过程的自相关函数。

自适应过滤法（Adaptive filtering method）　自适应过滤法是寻找加权滑动平均预测模型的权数的一种方法。加权滑动平均预测的一般公式可写为：

$$S_{t+1}=w_1X_t+w_2X_{t-1}+w_3X_{t-2}+\cdots+w_nX_{t-n+1}$$
$$=\sum_{i=1}^{n}w_iX_{t-i+1}$$

式中：S_{t+1} 为 t+1 期的预测，w_i 为各期观察值的权数 $(i=1,2,\cdots,n)$，X_t 为 t 期观察值，n 为权数项数。

权数 w_i 可以有不同的测定方法。自适应过滤法的作法是：在初步规定适用于资料初始若干项的一套

权数后，据以求出下期的预测值，待有了新观察值后，求出该值的预测误差，用它来调整原来那套权数以缩小误差，这样递推下去，可以不断更新权数和减少预测误差。递推到数列末尾后，再返回重作一遍。经过若干次反复调整后，可把预测误差降低。自适应过滤一词来自电讯工程，原指在无线电话传输过程中滤除噪音的一种程序，现借用于统计预测程序。

用自适应过滤法调整权数的公式是：

$$w_2' = w_i + 2ke_{t+1}X_{t-i+1}$$

式中：t 可取 n+1,n+2,⋯,等，表示新的一轮资料。w_i' 为调整的第 i 项权数，w_i 为第 i 项的权数，k 为学习常数，e_{t+1} 为 t+1 期预测误差。

这个公式表明：调整一套权数应等于旧的一套权数加误差调整项，这个调整包括三个因素，一是预测误差，二是原观察值，三是学习常数。学习常数的大小决定权数调整的速度。

自适应期望模型（Adaptive Expectation Model） 自适应期望模型是由 Cagan 和 Friedman 提出的一种特殊的几何滞后分布模型。它假设影响被解释变量 Y_t 的因素不是解释变量当期的实际观测值 X_t，而是它的当期预期值 X_t^*：

$$Y_t = b_0 + b_1X_t^* + u_t \qquad (1)$$

如 Friedman 的消费理论认为本期消费水平不是取决于本期实际收入，而是取决于预期收入或长期固定收入。又如本期商品需求量取决于本期价格的预期值。

由于 X_t^* 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因而要对 X_t^* 提出如下自适应期望假设：

$$X_t^* = X_{t-1}^* + (1-\lambda)(X_t - X_{t-1}^*) \qquad (2)$$

其中 X_{t-1}^* 是解释变量第 t−1 期的预期值，X_t 是解释变量第 t 期的实际值，$0<\lambda<1$。(2) 式表示解释变量本期预期值 X_t^* 是在前期预期值的基础上根据本期实际观测值 X_t 加以修正得到的。如果 $\lambda=1$，则 $X_t^* = X_{t-1}^*$，即本期预期值等于前期预期值，没有进行修正，如果 $\lambda=0$，则 $X_t^* = X_t$，那本期预期值等于本期实际值，没有产出预测误差。一般λ介于 0 和 1 之间。

(2) 式可改写成如下等价形式：

$$X_t^* = (1-\lambda)X_t + \lambda X_{t-1}^* \qquad (3)$$

即本期预期值是前期预期值和本期实际值的加权平均值。将 $X_{t-j}^*(j=2,3,\cdots,S,\cdots)$ 逐步展开并代入 X_{t-j+1}^* 中，上式可表示为：

$$X_t^* = (1-\lambda)(X_t \lambda X_{t-1} + \cdots + \lambda^j X_{t-j} + \cdots) \qquad (4)$$

将 (4) 代入 (1)，则 (1) 式等价于几何滞后分布模型：

$$Y_t = b_0 + b_1(1-\lambda)(X_t + \lambda X_{t-1} + \lambda^2 X_{t-2} + \cdots + \lambda^j Y_{t-j} + \cdots) + u_t$$

利用考伊克变换（参见考伊克变换）可将上式转化为如下形式：

$$Y_t = b_0(1-\lambda) + b_1(1-\lambda)X_t + \lambda Y_{t-1} + u_t - \lambda u_{t-1} \qquad (5)$$

虽然在模型 (1) 中包含抽象的不可观测的预期变量 X_t^*，但利用对 X_t^* 的假定 (3)，可将其转化为 (5) 式的形式，其中的解释变量是可以观测的 X 的本期实际值和前期被解释变量 Y_{t-1}。

自相关（Autocorrelation） 自相关是在时间序列资料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观察值之间的相关或在横截面资料中按空间顺序排列的观测值之间的相关。

在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中，曾假定干扰项 u_i 中不存在自相关，即

$$E(u_iu_j) = 0 \quad i \neq j$$

这个假定的含义是，与任何给定的观测值有关的干扰项不受与其它任何观测值有关的干扰项的影响，如果存在这样的影响，就认为存在自相关问题。用公式表示是：

$$E(u_iu_j) \neq 0 \quad i \neq j$$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把自相关和序列相关作为同义词。但也有一些计量经济学家把自相关看作是在一个时间序列中各个时间的干扰项之间的相关，而把两个时间序列之间的相关叫作序列相关。

产生自相关或序列相关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经济时间数列中表现出来的惯性作用。例如 GNP，价格指数等经济变量都有从某一时间开始逐步增加的趋势，而且这种增加带有一定的规则性，它很可能反映到干扰项当中去。

2.设定偏倚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设想一个回归方程形式：但是，这个回归方程形式不一定是最合理的，如果在这个模型中不合理地排除了某些解释变量，那么，这些因素的影响就可能反映在干扰项中，产生自相关。

3.使用处理过的统计资料。对统计资料最常见的处理是内插和外推。例如人口普查，在许多国家都是每隔五年或十年进行一次，为了获得两个时点间的资料，就需要在某种假定的前提下利用内插的方法获得所需的资料，这样，在原先的资料不存在自相关的情况下，加工后的资料会出现自相关。

如果除了非自相关外，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仍能满足，那么，由最小二乘法获得的估计量将有以下性质：

1.它们仍是无偏估计量，即在固定的 X 的取值条件下，重复抽样使得它们的平均数值等于总体的真实数值。

2.它们是一致估计量，即随着样本容量无限地增

加，它们收敛于真实数值。

3.它们不再是有效估计量，甚至不是渐近有效的，即无论是在小样本还是大样本的情况下，都不一定具有最小方差。这样，区间估计的区间会比较大，显著性检验的效力就会降低；而利用残差获得的 σ^2 的估计量 $\overline{\sigma}^2$ 往往会低估真实的干扰项方差 σ^2，即使没有被低估，回归系数的方差和标准误差也会被低估，使得常用的显著性检验方法 t 检验和 F 检验失去效力。

自相关的解决方法　解决自相关，要根据自相关的形式，变换回归模型，使其干扰项消除自相关。

设线性回归模型为：

$$Y_t=\beta_0+\beta_1 x_t+u_t \qquad (1)$$

干扰项的自相关为一阶自回归型式：

$$u_t=\rho u_{t-1}+\varepsilon_t \qquad (2)$$

式中，ε_t 的期望值为 0，等方差，不存在自相关。

由（1）式可得：

$$Y_{t-1}=\beta_0+\beta_1 X_{t-1}+u_{t-1}$$

两边同乘以 ρ 得：

$$\rho Y_{t-1}=\rho\beta_0+\rho\beta_1 X_{t-1}+\rho u_{t-1} \qquad (3)$$

由（1）减（3）得：

$$Y_t-\rho Y_{t-1}=(1-\rho)\beta_0+\beta_1(X_t-\rho X_{t-1})+(u_t-\rho u_{t-1})$$

令 $Y_t^*=X_t-\rho Y_{t-1}$，$X_t^*=X_t-\rho X_{t-1}$，$\beta_0^*=(1-\rho)\beta_0$

$u_{t-\rho}u_{t-1}=\varepsilon_t$ 再根据（2）式，有：

$$Y_t^*=\beta_0^*+\beta_1 X_t^*+\varepsilon_t$$

这个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满足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设，可以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出参数的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

将模型变形后，消除了干扰项的自相关。但是在计算 Y_t^* 和 X_t^* 时要用到 ρ 的值，所以必须先对 ρ 进行估计。一般可采用下列几种办法：

1.根据事前信息或经验来估计 ρ 值。这时，研究者往往运用自己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解和直觉，作出有关相关系数 ρ 的"合理"估计。通常假定 $\rho=1$，于是 $u_t=u_{t-1}+\varepsilon_t$；这就意味着本期扰动与前期扰动有几乎相同的效应。在这一假定下，前述的变换等价于对数据取一次差分：

$$Y_t-Y_{t-1}=\beta_1(X_t-X_{t-1})+\varepsilon_t$$

其中 $\varepsilon_t=u_t-u_{t-1}$。

根据假定，ε_t 是无自相关的。这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普遍采用一次差分来解决自相关问题的道理。

2.由 D-W 统计量估计 ρ。在进行自相关检验时，都要求出具体的 d 值，记成 d^*。经检验后，若确存在自相关，可根据等式 $d\approx 2(1-\rho)$ 得到 ρ 的估计值：

$$\overline{\rho}=1-\frac{d^*}{2}$$

但这种方法适用于样本较大的情况，因为关系式 $d\approx 2(1-\rho)$ 只对大样本渐近有效。

3.Cochrance—Orcutt 迭代法。

第 1 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出（1）式的估计式：

$$\overline{Y}_t=\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 X_t$$

从而得到第一轮剩余：

$$\overline{e}_t=Y_t-\overline{Y}_t=Y_t-\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 X_t$$

$$(t=1,2,\cdots,n)$$

这样，可得到 ρ 的"第一轮"估计值 $\overline{\rho}$：

$$\overline{\rho}=\frac{\sum_{t=2}^{n}\overline{e}_t\overline{e}_{t-1}}{\sum_{t=1}^{n}\overline{e}_t^2}$$

第 2 步：用 $\overline{\rho}$ 得到变换后的模型。

$$Y_t-\overline{\rho}Y_{t-1}=(1-\overline{\rho})\beta_0+\beta_1(X_t-\overline{\rho}X_{t-1})+(\varepsilon_t)$$

式中 $\varepsilon_t^{(1)}=u_t-\overline{\rho}u_{t-1}$。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上式，得到"第二轮"的 $\hat{\beta}_0$ 和 $\hat{\beta}_1$。由于在上式中，截距项 $\beta_0^*=(1-\overline{\rho})\beta_0$，所以：

$$\overline{\beta}_0 和 \overline{\beta_0^*}/(1-\rho)$$

接着，用 $\hat{\beta}_0$ 和 $\overline{\beta}_1$ 可算出"第二轮"剩余：

$$\overline{\overline{e}}_t=Y_t-\overline{\overline{\beta}}_0-\overline{\overline{\beta}}_1 X_t$$

从而得到 ρ 的"第二轮"估计值 $\overline{\overline{\rho}}$。

然后，仿照第 2 步的方法，得到"第三轮"的 $\overline{\overline{\beta}}_0$ 和 $\overline{\overline{\beta}}_1$，由此产生"第三轮"的剩余 $\overline{\overline{e}}_t$ 和 ρ 的估计值 $\overline{\overline{\rho}}$。重复这一迭代过程，可以得到"第四轮"，"第五轮"，…，"第 n 轮"的 ρ 的估计值，当前后两次 $\overline{\rho}$ 值之差的绝对值小于给定的标准时，迭代停止。最后的 $\overline{\rho}$ 值就是所求的 ρ 的估计值。

优势原则（Dominance Principle）　优势原则是在统计决策中筛选可替换行动的一种原则。按优势原则筛选可替换的行动，就是观察某一行动在各自然状态下的收益是否普遍地高于或等于另一行动（或亏损是否普遍地小于或等于另一行动的亏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前一行动就处于优势地位，后一行动就处于劣势地位，这时，就应淘汰后一种行动。这时，被淘汰的行动就称为"不可接受的行动"（Inadmissible Acts），保留下来的行动称为"可接受的行动"（Admissible Acts）.一般地说，在进行决策分析前，应对所有的行动都进行一次这种检查，凡有不能接受的行动，就从付酬表中剔除。这种筛选法称

为优势筛选法。

农业总产值 它是以货币表现的一定时期内一定范围的农业生产成果的总量。农业总产值按照"产品法"进行计算，即以各种产品的价格乘以其总量，再加总求得农业总产值。

具体地说，农业总产值包括以下五项内容:

(1) 农业产值，即农作物种植业的产值，它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它各种农作物的主副产品的产值。饲料作物、绿肥作物按播种面积乘以每亩种植成本计算产值。其它主副产品按产量乘以单价计算产值。有的副产品缺乏产量数字，可按主副产品比例推算。

(2) 林业产值，包括人造林木生长量产值、人造林木产品产值和农村竹木采伐的产值。人造林木生产量产值按育苗、造林、零星植树、迹地更新、幼林抚育、成林抚育的费用计算。其它的林产品按产量乘单价计算产值。

(3) 牧业产值，包括大小家畜、家禽的繁殖、增长、增重的产值以及各种畜禽产品的产值。

(4) 副业产值，包括采集野生植物和捕猎野禽野兽的产值，村办工业产值等。

(5) 渔业产值，包括人工养殖水生动物和海藻的产值和捕捞天然水生动物和海藻的产值。

计算农业总产值采用的价格有现行价格和不变价格两种。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反映的是在当年的价格水平下农业生产的总成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则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通过农业总产值的对比反映农业生产的规模、水平等的动态变化。

农业净产值 它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范围的农业生产活动新创造的价值，反映农业生产的净成果。计算农业净产值的方法也有两种，生产法和分配法。生产法就是从农业总产值中减去农业生产物质消耗价值求得农业净产值。农业物质消耗包括：(1) 生产中各种劳动对象如种子、饲料、肥料、农药、燃料、电力等的消耗；(2) 农业生产用固定资产如设备、农机具、耕畜、库房的折旧；(3) 生产性劳务的费用支出。农、林、牧、副、渔各业物质消耗价值之总和就是整个农业生产的物质消耗价值。分配法是根据农业净产值的各个构成要素计算农业净产值。首先计算出各个要素项目的数额，然后加总求得农业净产值。农业净产值的构成要素包括：国营农业企业的职工工资、税金、利润、利息支出以及其它不属于物质消耗的支出；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农业税金、公积金、公益金等。

农村社会总产值 指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以货币表现的全部产品价值总量。我国目前农村社会总产值包括的范围是：乡村及村以下各级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从事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饮食活动所生产的产值和国营农场的农业总产值两部分的产值。凡是在农村的国营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所生产的产值均不包括在内。国营农场及县镇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饮食业的产值，也不包括在内。集体和国营联营的企业产值，凡场址在农村，又以乡镇合作经济组织的劳动力，资金、土地或生产用房为主的企业，其产值包括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与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按照我国计划管理体制，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其它固定资产投资三个部分；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包括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包括城市、县城、镇、工矿区所辖范围内的个人建房及农村个人建房和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单位价值在 30 元以上的生产资料）的投资。

全距（Range） 全距也叫极差，是变量数列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是测定离散程度最简单的指标，它的优点是简便易行，缺点是没有充分利用变量数列中的所有信息。

全模型与选模型 假定根据实际问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初步认为一切可能与因变量有关系的变量共有 p 个，它们与因变量一起适合线性回归模型。设模型为:

$$Y = X_{\gamma} + e,\ E(e) = 0 \quad Cov(e) = \sigma^2 I \qquad (1)$$

其中，Y 为 $n\times 1$ 观测向量，X 为 $n\times(p+1)$ 的设计矩阵。当模型含有常数项时，可以约定 X 的第 1 列元素皆为 1。如果把常数项也视为自变量，在 (1) 中，自变量的个数就是 X 的列数。

将设计矩阵 X 写成分块形式 $X = (x_q \vdots x_t)$，相应地将 γ 分块为 $\gamma = (r_q \vdots r_t)$，于是，(1) 式可改写为

$$Y = X_q \gamma_q + X_t \gamma_t + e \qquad (2)$$

其中，X_q 中包括了常数项，且 X_q 和 X_t 分别有 q，t 列，$q+t = p+1$。并且 X_p 和 X_t 都是列满秩矩阵，即 $R(X_q) = q$，$R(X_t) = t$。

对于(2)这种写法，可以作双重解释：

1. 真实模型为 $Y=X\gamma+e$，而被误认为 $Y=X_q\gamma_q+e$，这时，一些自变量将被错误地丢掉。

2. 真实模型为 $Y=X_q\gamma_q+e$，而被误认为 $Y=X_\gamma+e$，这时，一些不必要的自变量被错误地引进了模型。

可以称(1)式为全模型，而称

$$Y=X_q\gamma_q+e \tag{3}$$

为选模型。通过对这两种模型关系的分析，可以对回归自变量的选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在全模型下，γ 和 σ^2 的最小平方(LS)估计分别为：

$$\vec{r}=(X'X)^{-1}X'Y$$

$$\vec{\sigma}^2=Y'(I-X(X'X)^{-1}X')Y/(n-p-1)$$

而在选模型下，γ_q 和 σ^2 的 LS 估计为

$$\vec{\gamma}_q=(X_q'X_q)^{-1}X_q'Y$$

$$\vec{\sigma}_q^2=Y'(I-X_q(X_q'X_q)^{-1}X_q')Y/(n-q)$$

对 $\vec{r}$ 作相应的分块：

$$\vec{r}'=(\vec{r}_q':\vec{V}_t\ )$$

对于全模型和选模型的关系，有以下结论：

结论1　假设全模型(1)正确，则

(1) $E(\vec{\gamma}_q)=\gamma_q+A\gamma_t$，其中 $A=(X_q'X_q)^{-1}X_q'X_t$

(2) $Cov(\vec{r}_q)\geq Cov(\vec{r}_q)$

结论1说明，$\vec{r}_q$ 作为 r_q 的估计，通常是有偏的(除非 $Ar_t=0$)。丢掉一部分自变量之后，总使剩下的那部分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LS 估计的方差减小，但由于此时的估计是有偏的，很难评价估计的效果。对于这样一类有偏估计，衡量估计精度的更恰当的标准应该是平均平方误差矩阵(Mean Square Error Matrix)而不是协方差阵。

结论2：即使全模型正确，但如果有一些自变量的影响很小或难以估计，则丢掉这些变量之后可以使预测精度提高。而如果模型中包含了不必要的自变量，就会使预测精度降低。

结论3：丢掉了一些与因变量有关的变量之后，误差方差的估计 $\vec{\sigma}_q^2$ 会偏高。这从直观上也较容易理解，因为丢掉的那些变量的影响进入了误差项，使得误差方差的估计偏大。

总的来说，在选择回归自变量时，原则应该是少而精。在具体选择时，需要确定一些准则，这些准则有：平均残差平方和、预测偏差的方差、平均预测均方误差、C_p 统计量、PRESS 和 AIC 准则。

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The Theorem of Total Probabilities and Bayes' Theorem)　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是利用概率的加法定理和乘法定理导出的两个重要公式。

全概率公式可表述如下：

设事件 B 能而且只能与有限个互不相容事件 $A_1,A_2,A_3,\cdots,A_n$ 之一同时出现，即有：

$$B=B(A_1+A_2+\cdots+A_n)=BA_1+BA_2+\cdots+BA_n$$

且　$P(A_i)>0\quad i=1,2,\cdots,n$

则　$$P(B)=P(A_1)\cdot P(B|A_1)+P(A_2)\cdot P(B|A_2)+\cdots+P(A_n)\cdot P(B|A_n)=\sum_{i=1}^{n}P(A_i)P(B|A_i)$$

这个公式就是全概率公式。

由条件概率公式和全概率公式可以得到贝叶斯公式：

如果事件 B 能而且只能与有限个互不相容事件 $A_1,A_2,A_3,\cdots,A_n$ 之一同时出现，

且

$$P(A_i)>0,\quad i=1,2,\cdots,n$$

$$P(B)>0$$

则

$$P(A_k|B)=\frac{P(A_k)\cdot P(B|A_k)}{P(A_1)P(B|A_1)+P(A_2)P(B|A_2)+\cdots+P(A_n)\cdot P(B|A_n)}=\frac{P(A_k)\cdot P(B|A_k)}{\sum_{i=1}^{n}P(A_i)\cdot P(B|A_i)}$$

其中，k 为 1、2、…、n 中的某一个数。

收益付酬表(Profit Payoff Table)　收益付酬表是以收益反映的付酬表。由于收益表中的付酬额都是利润数，所以又称为利润表，表中有时会出现负值，也就是亏损。收益表还可以进一步分为等状态行动表和不等状态行动表。

1.不等状态行动表(nm 表)。

常用的收益表是不等状态行动表，它可以包括 n 项行动和 m 项自然状态。表1就是一个收益付酬表。

表1　收益付酬表　单位：百元

湿度	先验概	作物(行动)				
(自然状态)	率 P	小麦(a_1)	番茄(a_1)	甜菜(a_3)	芦笋(a_4)	土豆(a_5)
干燥(θ_1)	0.3	20	20	23	30	20
适宜(θ_2)	0.5	35	40	30	25	20
潮湿(θ_3)	0.2	40	20	45	25	20

表中反映的是某农民在一块土地上考察五种作物中的任何一种，在三种可能的湿度条件下所可能取得

的收益。

2.等状态行动表（nn表)。

表2 等状态行动收益表 单位：千元

产品需求量(只)(自然状态)	产品生产量(只)(行动)			
	10000(a_1)	11000(a_2)	12000(a_3)	13000(a_4)
100000(θ_1)	20	18	16	14
11000(θ_2)	20	22	20	18
12000(θ_3)	20	22	24	22
13000(θ_4)	20	22	24	26

在等状态行动表中，状态和行动都是用同一变量表示的。而且分组和排列顺序也一样，实际上是一种变量数列的棋盘式表。在这种表的每种自然状态下，只有一个唯一的最佳行动，那就是状态值与行动值相等时的行动。表2列出的就是一个等状态行动收益表。

它反映的是某个企业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和可能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表中列出的就是可能的收益数。

众数（Mode） 众数是在一群变量数值中，出现得最多的数值。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利用众数代替算术平均数来反映一般水平。例如，为了掌握集市上某种商品的价格水平，不一定要全面登记该种商品的贸易量和贸易额，再平均计算，而可以采用该日市场上最普遍的成交价格，众数的计算有一定的条件，即单位数比较多，而且有明显的集中趋势。如果不将变量数值组织成为次数分配，或已组织成次数分配而不具有集中趋势，一般很难测定众数。

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回归分析是一种统计研究方法，它研究一个因变量与一个或几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估计或预测在解释变量的数值已知或固定的基础上因变量的值。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与函数关系不同的统计关系。函数关系一经确立，就可以明确地把握住所要研究现象的运动规律或变化规律。但在统计关系中，所需要处理的是随机变量而不是普通变量，它们具有一定的概率分布。例如农作物的产量高低与温度、降雨、日照、肥料等有关，这些因素确实重要，但人们并不能根据这些因素就确切地预测产量。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测量这些关系时总会有误差存在，一方面是还有一些相互因素未被考虑在模型中。

在回归分析中，一般地说，因变量定义为具有一定分布的随机变量，解释变量常定义为取固定值的普通变量。如果研究的是一个变量对另一个解释变量的相互关系，就称这种研究为一元回归分析。如果研究的是一个变量对一个以上解释变量的相互关系，就称为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的方法以至于“回归”这个名称的起源，统计史上一般归功于英国生物学家和统计学家高尔顿（F · Galton 1822～1911），他研究了人体的某些指标（如身高）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联系，发现身体较高的人，子代的身高有可能降低，较矮的人，子代的身高有可能增加，这就是子代指标“向中心回归”的现象，也就是“回归”分析的由来。

回归分析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利用因变量（Y）和解释变量（X）的观察值，对回归函数进行统计推断；包括对它进行估计以及检验与它有关的假设等。为在理论上进行讨论并导出种种具体方法，需要引进一定的假定。这些假定产生种种回归模型。有的一般些，有的性质则较为特殊。容易理解：较弱的假定产生比较一般的模型，其适用面较广，但针对这种模型而构造的统计推断方法，性能可能较差。反之，较强的假定产生性质特殊的模型，针对它构造的统计推断方法性能较好，但适用面较小。

回归分析中的显著性检验（The Significant Test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在回归分析中，进行假设检验与一般的假设检验的思想是一致的。例如通过理论或经验的分析确定消费和收入的线性关系时，原来考虑β_1应该等于1，但估计到的$\overline{\beta_1}$却等于0.5，这个估计值与假设数值是否一致？这主是假设检验所要回答的问题。

通常利用所谓显著性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回归分析中的假设，即利用样本资料去证实原假设是否真实。在这个程序中，需要构造一个检验统计量，并找到在待检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检验统计量的抽样分布。最终根据从样本资料中计算出来的检验统计量的值决定接受H_0还是拒绝H_0。

对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正态分布假定下，统计量

$$t=\frac{\overrightarrow{\beta_1}-\beta_1}{\overline{\sigma}_{\beta_1}} \quad 其中\overrightarrow{\sigma_{\beta_1}}=\overline{\sigma}\cdot\frac{1}{\sqrt{\sum_{i=1}^{n}x_i}}$$

服从自由度为n−2的t分布。如果以β_1^*作为β_1的待检参数，即原假设H_0: $\beta_1=\beta_1^*$，H_1: $\beta_1\neq\beta_1^*$，那么，在原假设为真时，统计量t在显著性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

$$P[-t_{\alpha/2}\leqslant\frac{\hat{\beta}_1-\beta_1^*}{\overline{\sigma}_{\bar{\beta}_1}}\leqslant t_{\alpha/2}]=1-\alpha$$

略加整理后得:

$$P\left[\beta_1^* - t_{\alpha/2}\cdot\hat{\sigma}_{\hat{\beta}_1} \leq \hat{\beta}_1 \leq \beta_1^* + t_{\alpha/2}\cdot\hat{\sigma}_{\hat{\beta}_1}\right] = 1-\alpha$$

这就给出了一个区间，在原假设为真时，$\overline{\beta}_1$ 有 $1-\alpha$ 的概率保证落在其中，如 $\overline{\beta_1}$ 落在这个区间之外，小概率事件发生了，我们将拒绝原假设。在实际检验时，当统计量 $t<-t_{\alpha/2}$ 或 $t>t_{\alpha/2}$，就拒绝原假设。

对于二元及多元回归模型，在 u_i 服从正态分布的假定下，我们也可以证明，$\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cdots\overline{\beta}_k$ 也都是 Y_i 的线性函数，也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这样，利用 σ^2 的无偏估计 $\overline{\sigma}^2$ 代入各自的方差，它们将都是服从自由度为 n−k 的 t 分布的随机变量，即

$$T=\frac{\overline{\beta}_j-\beta_j}{\overline{\sigma}_{\beta_j}}\sim t(n-2)$$

就可以利用 t 分布对它们进行显著性检验。

回归分析中的方差分析（The Variance Analysis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在回归分析中，总离差平方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回归平方和与残差平方和，即:

$$\sum_{i=1}^{n}(Y_i-\overline{Y})^2=\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sum_{i=1}^{n}(y_i-\overline{Y})^2$$

总离差平方和　　回归平方和　　残差平方和

回归分析中的方差分析，研究的就是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元回归模型，在干扰项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下，我们有:

$$\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overline{\beta}_1\sum_{i=1}^{n}x_i^2$$

$$\sum_{i=1}^{n}(Y_i-\overline{Y})^2=\sum_{i=1}^{n}e_i$$

对二者取期望值，有:

$$E(\overline{\beta}_1\sum_{i=1}^{n}x_i)=\sigma^2+\beta_1^2\sum_{i=1}^{n}x_i^2$$

$$E\left(\sum_{i=1}^{n}e_i\right)=(n-2)\sigma^2 \text{ 或 } E\left(\frac{\sum_{i=1}^{n}e_i}{n-2}\right)=\sigma^2$$

可以看出，如果 $\beta_1=0$，那么，两项平方和反映的就都是随机因素的影响。反之，如果 β_1 不是 0，对两项平方和除以各自的自由度后的结果取期望值，就会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 Y 的一部分变差将要由 X 来解释，因此，我们可以将 $\beta_1=0$ 作为原假设，即：H_0: $\beta_1=0$，H_1: $\beta_1\neq0$，在原假设为真时，$\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 服从自由度为 1 的 X^2 分布，$\sum_{i=1}^{n}e_i^2$ 服从自由度为 n−2 的 χ^2 分布，将二者的均方相比，统计量

$$F=\frac{\hat{\beta}_1^2\sum_{i=1}^{n}x_i^2}{\sum_{i=1}^{n}e_i^2/n-2}$$

将服从自由度为 (1，n−2)的 F 分布。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 α 上，当 $F>F_\alpha(1,n-2)$时，就拒绝原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

通常，分析过程要列出方差计算表，计算出 F 值，再用该值与临界值 F_α 比较,以作出结论。一元回归模型中的方差分析表为:

变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回归平方和	$\sum_{i=1}^{n}(\overline{Y}-y_i)^2=\overline{\beta}_1^2\sum_{i=1}^{n}x_i^2$	1	$\overline{\beta}_1^2\sum_{i=1}^{n}x_i^2$	$F=\frac{\overline{\beta}_1^2\sum_{i=1}^{n}x_i^2}{\sum_{i=1}^{n}e_i^2/n-2}$
残差平方和	$\sum_{i=1}^{n}(Y_i-\overline{Y}_i)^2=\sum_{i=1}^{n}e_i^2$	n−1	$\frac{\sum_{i=1}^{n}e_i^2}{n-2}$	
总平方和	$\sum_{i=1}^{n}(Y_i-\overline{Y})^2$	n−2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在干扰项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下，原假设为 H_0: $\beta_1=\beta_2=\cdots=\beta_k$，备择假设为 H_1: β 不全为 0，这时

$$F=\frac{\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k}{\sum_{i=1}^{n}e_i^2/n-k-1}$$

用 R^2 表示的方差分析表

变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回归平方和	$\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R^2\cdot\sum_{i=1}^{n}(Y_i-\overline{Y})^2$	K	$R^2(\sum_{i=1}^{n}(Y_i-\overline{Y})^2/k$	R^2/K
残差平方和	$\sum_{i=1}^{n}e_i^2=(1-R^2)\sum_{i=1}^{n}(Y_i-\overline{Y})^2$	n−K−1	$(1-R^2)(\sum_{i=1}^{n}(Y-\overline{Y})^2/(n-k-1)$	$(1-R^2)/n-K-1$
总平方和	$\sum_{i=1}^{n}(Y-_i\overline{Y})^2$	n−1		

服从自由度为 k，n−k−1 的 F 分布，可以利用这个分布进行方差分析。

对于多元回归的方差分析，也可以直接用决定系数 R^2 来进行，由于

$$F=\frac{n-k-1}{k}\cdot\frac{\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sum_{i=1}^{n}e_i^2}$$

$$=\frac{n-k-1}{k}\cdot\frac{\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sum_{i=1}^{n}(Y_i-\overline{Y})^2-\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

$$=\frac{n-k-1}{K}\cdot\frac{\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sum_{i=1}^{n}(Y_i\overline{Y})^2}{1-\sum_{i=1}^{n}(\overline{Y}_i-\overline{Y})^2/\sum_{i=1}^{n}(Y_i-\overline{Y})^2}$$

$$=\frac{R^2/k}{(1-R^2)/(n-k-1)}$$

R^2 与 F 的变化密切相关，当 $R^2=0$ 时，$F=0$，当 $R^2=1$ 时，$F\to\infty$，因此，F 检验民可以用于 R^2 的显著性检验。

将 F 值与显著性水平为 α 的临界值比较，就可以作出拒绝或接受原假设(H_0: $\beta_1=\beta_2=\cdots\beta_k=0$)的决定。

回归诊断（Regression Diagnose） 回归诊断是指进行回归分析时，对于数据资料所存在的问题的诊断。在古典线性回归模型中，假定其随机干扰项具有零期望，等方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有时还进一步假定随机干扰项服从正态分布。在这种情况下，高斯一马尔可夫定理保证了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模型具有良好的分析性质。回归诊断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具体场合，在占有数据后，如何考察这些假设是否全合理。如果实际数据与这些假设偏离较大，那么，又可以如何对这些数所进行修正，使它们能够满足或近似地满足这些假定。回归诊断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探查对统计推断(如估计或预测)有较大影响的试验点，这些点称为强影响点（Influence Case），人们希望每组数据对未知参数的估计或其它推断有一定影响，但不要过大。这样，所得到的估计关于数据就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个别一、两组数据是强影响点，在去掉它们之后，新得到的估计或者是经验回归模型与原来相比变化很大。那么，人们就可能产生对原有经验回归模型的不信任感，怀疑它是否真正刻画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互关系。如果对获得数据的全过程作了检查之后，认为强影响点产生于试验或记录中的失误，这种数据就应该剔除掉。否则，就应考虑收集更多的数据，或采用稳健估计以缩小强影响点对估计或其它推断的影响，以求得更稳定的估计和经验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的方差—协方差阵 考虑线性回归模型

$$Y=X\beta+u$$

其中，X 为 n×p 的设计矩阵，Y 和 u 为 n×1 的随机向量，β 为 p×1 的系数向量。

根据定义，$\overline{\beta}$的方差一协方差矩阵是:

$$\text{Var-Cov}(\overline{\beta})=E\{[\overline{\beta}-E(\overline{\beta})][\overline{\beta}-E(\overline{\beta})]'\}$$

在最下二乘估计下，由于

$$\overline{\beta}=(X'X)^{-1}X'Y$$
$$=(X'X)^{-1}X'(x\beta+u)$$
$$=\beta+(X'X)^{-1}X'u$$

所以

$$\overline{\beta}-E(\overline{\beta})=\overline{\beta}-\beta$$
$$=(X'X)^{-1}X'u$$

回归系数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

$$\text{Var-Cov}(\beta)$$
$$=E\{[(X'X)^{-1}X'u][(x'X)^{-1}X'u)'\}$$
$$=E[(X'X)^{-1}X'u][(X'X)^{-1}X'u']\}$$
$$=(X'X)^{-1}X'E(uu')X(X'X)^{-1}$$
$$=(X'X)^{-1}X'\sigma^2IX(X'X)^{-1}$$
$$=\sigma^2(X'X)^{-1}$$

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在回归分析中，如果对回归模型的干扰项作出正态分布假定，那么，就可以对模型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设回归模型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_i=\beta_0+\beta_1X_i+u_i\quad i=1,\cdots,n$$

当随机干扰项 u_i 服从正态分布假定和最小二乘法的其它假定时，可以证明，回归系数的 LS 估计$\overline{\beta}_0$与$\overline{\beta}_1$也都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这时，有

$$Z=\frac{\overline{\beta}_1-\beta_1}{\sigma_{\overline{\beta}_1}}\sim N(0,1)$$

其中，$\sigma_{\overline{\beta}_1}=\sigma\cdot\frac{1}{\sqrt{\sum_i(X_i-\overline{X})^2}}$

在 σ^2 已知时，就可以利用正态分布去构造置信区间，但 σ^2 一般都是未知的，实际研究中都以它的无偏估计

$$\overline{\sigma^2}=\frac{\sum(Y_i-\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X_i)}{n-2}$$

来代替，这样定义的随机变量

$$t=\frac{\bar{\beta}_1-\beta_1}{\bar{\sigma}_{\bar{\beta}}}\quad (\text{其中：}\bar{\sigma}_{\bar{\beta}}=\bar{\sigma}\frac{1}{\sqrt{\sum(X_i-\bar{X})^2}})$$

服从自由度为n-2的t分布。在显著性水平为α的情况下，β_1 的置信区间可表示如下：

$$P(\bar{\beta}_1-t_{\alpha/2\bar{\sigma}_{\beta}}\leqslant\beta_1\leqslant\bar{\beta}_1+t_{\alpha/2\bar{\sigma}_{\beta_1}})=1-\alpha$$

同理，对于 β_0 的置信区间，可先设统计量

$$t=\frac{\bar{\beta}_0-\beta_0}{\bar{\sigma}_{\bar{\beta}_0}}\sim t(n-2)\left(\text{其中}\bar{\sigma}_{\beta_0}=\bar{\sigma}\cdot\sqrt{\frac{\sum X_i^2}{n\sum(X_i-\bar{X})^2}}\right)$$

这时，在α的显著性水平下，β_0 的置信区间为：

$$P(\bar{\beta}_0-t_{\alpha/2\bar{\sigma}_{\beta_0}})\leqslant\beta_0\leqslant\bar{\beta}_0+t_{\alpha/2\bar{\sigma}_{\beta_1}}=1-\alpha$$

回归系数的主成分估计　讨论线性回归模型

$$Y=\alpha_0 1+X\beta+e,\quad E(e)=0,\quad Cov(e)=\sigma^2 I\qquad(1)$$

假设X已经中心化，那么常数项 α_0 用 $\bar{\alpha}_0=\bar{Y}=\frac{1}{n}\sum_{i=1}^{n}Y_i$ 来估计。记 $\lambda_1>\cdots>\lambda_p$ 为 $X'X$ 的特征根，$\varphi_1,\cdots,\varphi_p$ 为对应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记 $\Phi=\varphi_1,\cdots,\varphi_p)$，那么上面模型的典则形式（参见"广义岭回归"）为

$$Y=a_0 1+Z\alpha+e,\quad E(e)=0,\quad Cov(e)=\sigma^2 I\qquad(2)$$

这里 $Z=X\Phi,\alpha=\Phi'\beta$。如果把原来的p个回归自变量 $x'=(x_1,\cdots,x_p)$ 视为随机向量，设计阵X的n个行作为x的n个中心化了的随机样本，那么 $X'X/h$ 就是x的协方差阵一个估计。而 $Z=(Z_1,\cdots,Z_p)$ 就是样本之成分组成的设计阵。可见，所谓线性回归模型（1）的典则形式就是以原回归变量 $x'=(x_1,\cdots,x_p)$ 的主成分 $Z_1,\cdots,Z_p$ 为新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如果设计阵呈病态（参见"最小二乘估计与均方误差"），那么 $X'X$ 的特征根 $\lambda_1,\cdots,\lambda_p$ 中有一部分很小，不妨设后p-r个很小，即 $\lambda_{r+1},\cdots,\lambda_p\approx0$，这时，后p-r个新自变量（即主成份）$Z_{r+1},\cdots,Z_p$ 在n次试验中取值变化很小。记 $Z_i'=(Z_{1i},\cdots,Z_{ni})$，$\bar{Z}_i=\frac{1}{n}\sum_{i=1}^{n}z_{ji}$，因X已中心化，可推知 $\bar{z}_i=0$，但第i个新自变量(即第i个主成分)在n次试验中取值波动大小为

$$\sum_{i=1}^{n}(z_{ji}-\bar{z}_i)^2=\sum_{i=1}^{n}z_{ji}^2=Z_i'Z_i=\varphi_i'X'X\varphi_i=\lambda_i\approx0\qquad i\geqslant r+1$$

这些新自变量的作用就可以并入常数项，也就是说，新自变量 $Z_{r+1},\cdots,z_p$ 可以从模型中剔除。

基于上述思想，若 $\lambda_{r+1},\cdots,\lambda_p\approx0$，将∧、α、Z、Φ作相应分块：

$$\Lambda=\begin{bmatrix}\lambda_1 & 0\\ 0 & \lambda_2\end{bmatrix},\ \text{其中}\wedge_1:\ r\times r$$

$$\alpha=\begin{bmatrix}\alpha(1)\\ \alpha(2)\end{bmatrix},\ \text{其中}\ \alpha_{(1)}:\ r\times1$$

$Z=(Z_{(1)},Z_{(2)})$，其中 $Z_{(1)}$：$n\times r$

$\Phi=(\Phi_1,\Phi_2)$，其中 Φ_1：$p\times r$

于是（2）式变形为

$$Y=a_1 1+z_{(1)}\alpha_{(1)}+Z_{(2)}\alpha_{(2)}+e,\ E(e)=0,\ Cov(e)=\sigma^2 I$$

剔除 $Z_{(2)}\alpha_{(2)}$ 这一项，即用 $\bar{\alpha}_2=0$ 估计α（2），然后求得 $\alpha_{(1)}$ 的LS估计

$$\bar{\alpha}^{(1)}=\wedge_1^{-1}Z_{(1)}'Y$$

最后利用关系 $\beta=\Phi\alpha$，得到β的估计

$$\bar{\beta}=\Phi\begin{bmatrix}\bar{\alpha}_{(1)}\\ 0\end{bmatrix}=\Phi_1\bar{\alpha}_{(1)}=\Phi_1\wedge^{-1}Z_{(1)}'Y$$

称为β的主成分估计。

主成分估计具有下列性质：

（1）$\bar{\beta}=\Phi_1\Phi_1'\bar{\beta}$，即主成分估计是LS估计的一个线性变换。

（2）$E\bar{\beta}=\Phi_1\Phi_1'\beta$，只要r<p，主成分估计就是有偏估计。

（3）$\|\bar{\beta}\|<\|\bar{\beta}\|$，即 $\bar{\beta}$ 的分量的绝对值小于 $\bar{\beta}$ 的分量的绝对值，说明主成分估计 $\bar{\beta}$ 是压缩估计。

（4）当设计阵病态时，适当选择r，可使

$$MSE(\bar{\beta})<MSE(\bar{\beta})$$

对于主成分估计，有一个选择保留主成分个数的问题。应用上应通过数据来确定。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略去特征根很接近于零的那些主成分；其二是选择r，使得前r个特征根之和在p个特征根总和中所占的比例达到预先给定的值。例如，选择r，使

$\sum_{i=1}^{r}\lambda_i/\sum_{i=1}^{p}\lambda_i>75\%$ 或80%，等等。这里，选择r的问题实际上是典则形式（2）中选择自变量的问题。

回归系数的有偏估计（The Biased Estimates of Regrssion Coefficients）　在回归分析中，最小二乘法（LS）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方法。高斯—马尔可夫定理证明了在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LS估计在线性无偏估计类中方差最小。如果进一步假定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LS估计还有许多更

好的性质。但是，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假设条件是十分严格的，在实际中这些假设条件并不能都得到满足。这时，LS 估计就可能不很理想，有时甚至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学家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从模型或数据角度考虑问题，创造条件使最小二乘法的条件得到满足，因而获得较好的估计。另一方面就是寻求一些新的估计。Stein 于 1955 年证明了，当维数 p 大于 2 时，正态均值向量 LS 估计的不可容许性，即能够找到另外一个估计在某种意义下一致优于 LS 估计。以此为开端，在后来的二十年中，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估计，其中主要的有岭估计、Stein 估计、主成份估计以及特征根估计等。这些估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偏性，即它们的均值并不等于待估参数，于是人们把这些估计统称为有偏估计。

回归预测（Regression Prediction） 根据样本资料估算的样本回归方程用于预测，称为回归预测。这种预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条件平均数的预测；一种是对单个 Y 值的预测。分别称为平均预测和单一预测。现在，以一元回归模型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1) 平均预测

假设根据样本资料获得了收入 X 和消费支出 Y 的样本回归函数：

$$\overline{Y}_i = 24.4545 + 0.5091X_i$$

现假定 $X_0=100$，要预测 E（$Y_0|X_0=100$，利用样本回归方程可以得到这个平均预测的点估计：

$$\hat{y_0} = 24.4545 + 0.5091 \times 100 = 75.3676$$

因为$\hat{y_0}$是一个估计量，它并不一定等于它的真实数值，两者之间存在预测误差。为了确定预测误差，必须找到$\hat{y_0}$的抽样分布，可以证明：

$$\overline{Y}_0 \sim N(\beta_0+\beta_1X_0, \sigma^2_{\overline{Y}_0})$$

其中，

$$\sigma^2_{\overline{Y}_0} = \sigma^2\left[\frac{1}{n} + \frac{(X_0-\overline{X})^2}{\sum_{i=1}^{n}X_i^2}\right]$$

用方差 σ^2 的无偏估计量$\overline{\sigma^2}$代替$\sigma^2_{\overline{Y_0}}$ 的 σ^2，可得：

$$t = \frac{\overline{Y_0} - (\beta_0 + \beta_1X_0)}{\overline{\sigma}_{\overline{Y_0}}} \sim t(n-2)$$

因此，可用 t 分布来构造 E（$Y_0|X_0$)的置信区间和进行假设检验。

(2) 单个预测值

如果希望预测在 $X_0=100$ 时的单个 Y_0 值，点估计的公式是和进行平均预测时相同的，所不同的在于 Y_0 所服从的分布和$\overline{Y}_0$略有不同，这时：

$$Y_0 \sim N\left(\beta_0+\beta_1X_0, \sigma^2\left[1+\frac{1}{n}+\frac{(X_0-\overline{X})^2}{\sum_{i=1}^{n}X_i^2}\right]\right)$$

显然，它的方差大于平均预测时的方差，如果用$\overline{\lambda^2}$代替 σ^2，则有统计量：

$$t = \frac{Y_0 - (\beta_0+\beta_1X_0)}{\overline{\sigma}\sqrt{1+\frac{1}{n}+\frac{(X_0-\overline{X}}{\sum_{i=1}^{n}x_i^2}}} \sim t(n-2)$$

可以利用它进行区间估计和假设检验。

协方差（Covariance） 对于多维随机变量 $X=(x_1,x_2,\cdots,x_n)$。定义它的方差为（$DX_1,Dx_2,\cdots,DX_n$)[参见方差]。方差反映了随机向量的各个分量对于各自的数学期望的离散程度，它对于了解随机向量的分布有一定帮助。但对于随机向量，我们除了关心它的每个分量的情况外，还希望知道各个分量之间的联系，这光靠数学期望与方差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还需要引起协方差的概念。令

$$b_{ij} = Cov(x_i,x_j) = E(x_i-Ex_i)(x_j-Ex_j)$$
$$i,j=1,2,\cdots,n$$

称 b_{ij} 是 x_i 与 x_j 的协方差。显然，当 $i=j$ 时：

$$b_{ii} = D\xi_i$$

矩阵

$$B = \begin{bmatrix} b_{11} & b_{12} & \cdots & b_{1n} \\ b_{21} & b_{22} & \cdots & b_{2n}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b_{n1} & b_{n2} & \cdots & b_{nn} \end{bmatrix}$$

称为 X 的协方差矩阵，简记作 DX。它是一个对称矩阵。

为了更好的反映随机向量的各个分量之间的联系，更常用的是“标准化”了的协方差：

$$r_{ij} = \frac{Cov(x_i,x_j)}{\sqrt{DX_i}\sqrt{DX_j}} \quad Dx_i \neq 0,\ Dx_j \neq 0,$$

它称为 x_i 与 x_j 的相关系数。

七　画

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Full-information Maximum-likelihood, FIML**）　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是使整个模型的似然函数最大化来获得全部结构参数估计量的一种估计方法，它也是一种系统估计方法。

它的假定条件是：

1.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每个结构方程是可识别的。

2.每个结构方程的随机干扰项应满足普通最小二乘法通常的假定。

它的估计方法是：

设联立方程模型为：

$$\beta Y_t+TX_t=u_t \qquad t=1,2,\cdots,n$$

假定 u_t 服从正态分布，$u_t\sim N(0,\Phi)$，Φ 是一个正定矩阵。在 u 向量无序列相关的假定满足时，n 个向量 $u_1,u_2,\cdots,u_n$ 的似然函数为：

$$P(u_1,u_2,\cdots,u_n)=(2\pi)^{-\frac{nG}{2}}(|\Phi|)^{-\frac{n}{2}}\exp\left(-\frac{1}{2}\sum_{t=1}^{n}u_t'\Phi^{-1}u_t\right)$$

$$=C\exp\left(-\frac{1}{2}\sum_{t=1}^{n}u_t'\Phi^{-1}u_t\right)$$

则 $(Y_1,Y_2,\cdots,Y_n)$的似然函数是：

$$P(Y_1,Y_2,\cdots,Y_n)=C\exp\left[-\frac{1}{2}\sum_{t=1}^{n}(\beta Y_t+TX_t)'\Phi^{-1}(\beta Y_t+TX_t)\right] \qquad (1)$$

令　$A=(\beta T)$,　$Z_t=\begin{bmatrix}Y_t\\X_t\end{bmatrix}$

即　$\beta Y_t+TX_t=(\beta\ T)\begin{bmatrix}Y_t\\X_t\end{bmatrix}=AZ_t$

则(1)式的指数部分可写成：

$$-\frac{1}{2}\sum_{t=1}^{n}Z_t'A'\Phi^{-1}AZ_t=-\frac{1}{2}t_r(ZA'\Phi^{-1}AZ')$$

$$=-\frac{1}{2}t_r(\Phi^{-1}AZ'ZA')$$

其中：

$$Z'Z=(Y\ X)\begin{bmatrix}Y_1' & X_1'\\Y_2' & X_2'\\\vdots & \vdots\\Y_n' & X_n'\end{bmatrix}$$

它是一个 n×（G+K）阶矩阵，由所有内生变量和前定变量的观察值组成。

令

$$M=\frac{1}{n}Z'Z$$

则有　$t_r(\Phi^{-1}AZ'ZA')=n\cdot t_r(\Phi^{-1}AMA')$　　(2)

将(2)代入(1)并取对数得：

$$L(A,\Phi)=\log C-\frac{n}{2}t_r(\Phi^{-1}AMA)$$

对 L 求 A 的偏导数并令其等于 0，得：

$$\frac{\partial L(A,\Phi)}{\partial A}=-\frac{n}{2}\frac{\partial\log|\Phi|}{\partial A}+n\frac{\partial\log|\beta|}{\partial A}=0 \qquad (3)$$

将样本数据代入（3）式中，可求得结构参数的估计值$\overline{A}$：

$$\overline{A}=[\overline{\beta},\overline{T}]$$

完全情报期望价值（**Expected Value of Perfect Information**）　在风险性决策中，如果能取得完全的情报，即不论出现什么状态，都能选择相应的最优方案，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期望利润。这实际上就把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变为确定性情况下的决策。用确定性情况下的期望付酬减不确定情况下的最大期望付酬，其差额即为完全情报期望价值（EVPI）。

计算完全情报价值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估计由于不肯定性的存在，使得期望收益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差距有多大，或期望亏损不能减到最低水平的差距有多大。为了缩小这个差距以提高决策收益，有必要多方面收集补充资料，包括各种抽样资料和非抽样资料。搜集补充资料要支付一定费用，完全情报期望价值就是支付这种费用的极限，因为权衡得失，超过这个限度就得不偿失了。

例如，根据"贝叶斯决策"表 1 中的资料，如天气干燥，就应选择种芦笋，如果适宜，就应选择种番茄，如果潮湿，就应选择种甜菜，这样，在确定性情况下的期望付酬为：

EMVC＝30×0.3+40×0.5+45×0.2＝38(百万)

而完全情报期望价值(EVPI)为：

EVPI＝EMVC−EMV＝38−31.5＝6.5(百万)

序贯抽样检验（**Sequential Sampling Insepection**）　在抽样检验中，人们总希望在不影响判断正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样本容量，为此，华尔德提出了序贯抽样方法。这种方法对样本的容量事先不作规定，而是逐个抽样检验，直到抽出的样本及其检验的结果能够作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为止。

设有一批产品，其不合格品率为 P_0 时表示质量较好，可以接收，其不合格品率为 P_1 时表示质量较差，应予拒绝，并规定 α 为弃真的概率（第一类错误），β 为取伪的概率（第二类错误）。设 dn 为检验第 n 个产品时，累计的不合格品数，则在全部产品中，恰好出现 d_1 个产品的概率近似地服从二项分布，

如出现的不合格品为 d_1，则 $C_n^{d_1}P_1^{d_1}(1-P_1)^{n-d_1}$ 表示产品不合格品率为 P_1 时，抽查 n 个产品，正好出现 d_1 个不合格品的概率。同理 $C_n^{d_1}P_0^{d_1}(1-P_0)^{n-d_1}$ 表示产品的不合格品率为 P_0 时出现的不合格品为 d_1 的概率。令：

$$L_1=\frac{C_n^{d_1}P_1^{d_1}(1-p_1)^{n-d_1}}{C_n^{d_1}P_0^{d_1}(1-p_0)^{n-d_1}}=\frac{P_1^{d_1}(1-P_1)^{n-d_1}}{P_0^{d_1}(1-P_0)^{n-d_1}}$$

L_1 越大，说明产品的不合格品率为 P_1 的可能性越大，当 L_1 超过一定界限，就应该拒收；L_1 越小，说明不合格品率为 P_0 的可能性越大，当 L_1 小于一定界限，就可以接受。因此就需要确定 L_1 的界限，它与规定的 α 和 β 有关。令：

$$A=\frac{\beta}{1-\alpha}$$

它是"取伪"的概率和"取真"的概率之比。当 $L_1<A$ 时，判定为合格批而接受。令：

$$B=\frac{1-\beta}{\alpha}$$

它是"弃伪"和"弃真"的概率之比，当 $L_1>B$ 时，就判定为不合格批而拒收。

当 $A<L<B$ 时，则尚不能作出判断，需要继续抽验，一直继续到发现 dn 个不合格品能作出决定时为止。华尔德证明了在有限步后终止的概率为 1，即在有限步以后必然能作出接收或拒收的判断。序贯抽样在实际应用时，因每次计算 L_1 比较困难，往往预先计算出抽样到第 n 个产品时不合格品的临界值，把 dn 与临界值直接比较，就能作出接收或拒收的决定。

由于第 n 次抽样后合格批的判断规则为：

$$\frac{P_1^{d_n}(1-P_1)^{n-d_n}}{P_0^{d_n}(1-P_0)^{n-d_n}}\leqslant A$$

两边取对数得：

$$d_n\log\frac{P_1}{P_0}+(n-d_n)\log\frac{1-P_1}{1-P_0}\leqslant\log A$$

整理后得：

$$dn\leqslant\frac{\log A}{\log\frac{P_1}{P_0}-\log\frac{1-P_1}{1-P_0}}-\frac{n\log\frac{1-P_1}{1-P_0}}{\log\frac{P_1}{P_0}-\log\frac{1-P_1}{1-P_0}}$$

令：

$$h_1=-\frac{\log A}{\log\frac{P_1}{P_0}-\log\frac{1-P_1}{1-P_0}},$$

$$S=\frac{\log\frac{1-P_0}{1-P_1}}{\log\frac{P_1}{P_0}-\log\frac{1-P_1}{1-P_0}}$$

上式可简化为：

$$d_n<h_1+ns$$

同理，令

$$\frac{P_1^{d_n}(1-P_1)^{n-d_n}}{P_0^{d_n}(1-P_0)^{n-d_n}}\geqslant B$$

为拒绝域，则拒绝规则应为：

$$dn\geqslant h_2+ns$$

其中，

$$h_2=\frac{\log\frac{1-\beta}{\alpha}}{\log\frac{P_1}{P_0}-\log\frac{1-P_1}{1-P_0}}$$

纯随机过程（Purely random Process） 若 $\{Z_t\}$ 中的随机变量是一列互相独立、相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则称该离散过程 $\{Z_t\}$ 为纯随机过程。纯随机过程的均值和方差为常数，自协方差函数为

$$Y(k)=Cov(Z_t,Z_{t+k})=0$$
$$k=\pm1,\pm2,\cdots,$$

由于均值，自协方差函数与时间无关，所以该过程为二阶平稳过程。它的自相关函数为：

$$P(k)=\begin{cases}1 & k=0\\0 & k=\pm1,\pm2\end{cases}$$

显然，该过程还是严格平稳过程。有时，称纯随机过程为白噪声。

识别（Identification） 所谓识别，就是根据一套方法来判断是否能从简化式的参数中得出结构式的参数。如果能够得出，就说模型可以识别。如果不能够得出，就说模型不可识别。在可识别中，又分为恰好识别和过度识别二种。恰好识别，就是能够从简化式参数中获得唯一的结构参数。过度识别，就是从简化式参数中获得的结构参数不止一个。实际上，对于模型的识别就是把由结构式获得的简化式看作是一个线性方程组，从而判别这个线性方程组有解或无解，是有唯一解或有无穷多组解的问题。如果有解，则模型可识别，如有唯一解，则模型恰好识别。

为了判断模型是否可识别，一般是先把结构式方程化为简化式方程，然后再分析是否能通过简化式的参数得出结构参数。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方程组的变换和求解来解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比较复杂的。通常的作法，是利用识别条件来判断模型

是否能够识别。

不能识别的模型是无法估计参数的。如果能够识别，则因为识别的情况不同，要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如采用单方程估计方法，即对联立模型中的方程逐个进行估计，从而获得整个联立模型的估计，那么，对于恰好识别的模型，可采用间接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对于过度识别的模型，可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如果采用方程组方法，即对整个模型系统中的所有方程同时进行估计，从而能够同时决定所有结构参数的估计量。那么，不论模型是恰好识别还是过度识别的，均可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

识别条件（Identification Conditions）　识别条件是判断模型能否被识别的规则，它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考虑，即模型结构式的识别条件和模型简化式的识别条件。而在这两种情况中，又有阶条件和秩条件两种，识别的阶条件是识别的必要条件，识别的秩条件才是识别的充分必要条件。

1. 结构式的识别条件

(1) 阶条件

设模型的结构式为

$$BY+\Gamma X=u$$

在模型中

G＝模型系统中内生变量的个数（模型中方程的个数）。

M＝模型系统中变量的个数（等于内生变量数+前定变量数）。

H_i＝模型系统中某个待定方程中变量的个数（内生变量数+前定变量数），$i=1,2,\cdots,G$。

结构式识别的阶条件为：

$$M-H_i \geqslant G-1$$

如果等号成立，为恰好识别；大于号成立为过度识别。

(2) 秩条件

在结构参数矩阵

$$B\Gamma=\begin{bmatrix}\beta_{11} & \beta_{12} & \cdots & \beta_{1G} & \Gamma_{11} & \Gamma_{12} & \cdots & \Gamma_{1k}\\ \beta_{21} & \beta_{22} & \cdots & \beta_{2G} & \Gamma_{21} & \Gamma_{22} & \cdots & \Gamma_{2k}\\ & & & \cdots & & & & \\ \beta_{G1} & \beta_{G2} & \cdots & \beta_{GG} & \Gamma_{G1} & \Gamma_{G2} & \cdots & \Gamma_{Gk}\end{bmatrix}$$

中，划掉第 i 行（第 i 个结构方程的参数所在的行），同时划掉第 i 行上非零元素（包括在该方程内的变量的系数）所在的列，剩下的元素按原次序所组成的矩阵记为 A，显然，A 是 G−1 行 $M-H_i$ 列的矩阵。

识别的秩条件为

$$r_{ank}(A)=G-1$$

如果秩条件成立，第 i 个结构方程是可识别的；如果秩条件不成立，第 i 个结构方程不可识别。

2. 简化式的识别条件

设前述结构式所相应的简化式为

$$Y=\Pi X+V$$

(1) 阶条件

与结构式的阶条件同，即

$$M-H_i \geqslant G-1$$

等于号成立，为恰好识别；大于号成立，为过度识别。否则，则不能识别。

(2) 识别的秩条件

在简化式参数矩阵

$$\Pi=\begin{bmatrix}\Pi_{11} & \Pi_{12} & \cdots & \Pi_{1k}\\ \Pi_{21} & \Pi_{22} & \cdots & \Pi_{2k}\\ & \cdots & & \\ \Pi_{G1} & \Pi_{G2} & \cdots & \Pi_{Gk}\end{bmatrix}$$

中，划掉第 i 个结构方程所排斥的内生变量（即不包含在该方程中的内生变量）对应的行和所包含的前定变量对应的列，剩下的元素按原次序所组成的矩阵记为 D，则第 i 个结构方程式可识别的秩条件为：

$$r_{ank}(D)=G_i-1$$

其中，G_{i1} 表示第 i 个结构方程式中所包含的内生变量的个数。

社会商品购买力　指零售商品购买力，即在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和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在零售市场购买商品的货币支付能力。它包括居民消费品购买力、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力三部分。社会商品购买力分为已实现的社会商品购买力和未实现的购买力（又称为结余购买力）。已实现的社会商品购买力是指一定时期居民和社会集团在零售市场上实际购买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货币支出，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未实现的购买力表现为城乡居民期末储蓄在款和手存现金比期初的增加额。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量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指各种经济类型的商业、饮食业、工业和其它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售给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农民直接售给非农业居民的消费品总额，不包括农民之间的商品销售。售给国民经济各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全民所有制农

场）生产经营用的各种原材料、燃料、建筑材料、设备、工具等，不包括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

社会消费品零售量，指某一种消费品由各行业售给居民生活用和社会集团公共消费用的数量，以及农民售给非农业居民数量的总和，不包括农民之间的消费品销售量。它反映一定时期零售市场上某一种消费品的供应总量，也就是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商品性消费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量，除了包括某种消费品的直接零售量外，还包括零售其加工品所耗用的该种消费品数量，但不包括售作工业生产用量和服务行业用量。

间接最小二乘法（Inderect Least-squares） 间接最小二乘法是一种用于估计联立方程模型参数的单方程方法。它适用于恰好识别的模型，并要求随机干扰项满足最小二乘法的通常假定，而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它的估计步骤为：

第一步：求出结构方程

$BY+TX=u$

的简化式

$$Y=\Pi X+V \quad (1)$$

其中：$\Pi=-B^{-1}T$，$V=B^{-1}u$

第二步：对联立方程模型（1）中的每个方程逐个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

$$\vec{Y}_{1t}=\vec{\Pi}_{11}X_{1t}+\vec{\Pi}_{12}X_{2t}+\cdots+\vec{\Pi}_{1k}X_{kt}$$

$$\cdots$$

$$\vec{Y}_{Gt}=\vec{\Pi}_{G1}X_{1t}+\vec{\Pi}_{G2}X_{2t}+\cdots+\vec{\Pi}_{Gk}X_{kt}$$

第三步：由于模型中的结构方程是恰好识别的，因此把估计的$\vec{\Pi}_{ij}(i=1,2,\cdots,G;j=1,2,\cdots,k)$代入简化式参数矩阵 Π 中，并解$-B^{-1}T=\Pi$ 所构成的线性方程组，即可得出结构参数的间接最小二乘估计量。这种估计量在小样本情况下，是一致估计量。由于这种估计量是通过简化式的最小二乘估计间接获得的，所以称为间接最小二乘法。

克莱因 1 号模型（Klein Model Ⅰ of Klein Interwar Model） 克莱因 1 号模型，也称为克莱因两次战争间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L·R·Klein）在对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共包括六个方程式，有 6 个内生变量，4 个外生变量。六个内生变量将由模型同时决定。6 个内生变量是：产出(Y)，消费（C），净投资（I）、民间工资(W_p)，利润(Π)，年终资本存量（K）。4 个外生变量是：政府非工资支出（G），政府工资(W_G)，经常税（T），时间(t)。六个方程式是：

(1)$C=16.79+0.8(W_p+W_G)+0.02\Pi+0.235\Pi_{-1}$

(2)$I=17.78+0.231\Pi+0.546\Pi_{-1}-0.146K_{-1}$

(3)$W_p=1.6+0.42(Y+T-W_G)+0.164(Y+T-W_G)_{-1}+0.1356$

(4)$y=C+I+G$

(5)$\Pi=Y-W_p-T$

(6)$K=K_{-1}+I$

在这六个方程式中，前三个是估计的行为方程式，分别说明了消费、投资和民间工资的情况，后面三个是关于收入、利润，净投资的定义方程式。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The Klein-Goldberger Model）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是一个关于美国经济活动的中型模型，时间跨度从 1929 年到 1952 年（不包括 1942—1945 年）它包括 20 个方程式，其中 15 个是行为方程式（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5 个是定义方程式。它包括 34 个变量，其中，20 个是内生变量，14 个是外生变量。这个模型对以后的各种计量经济模型的影响很大，表 1 列出的就是这个模型的变量的情况。

表 1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中的变量

20 个内生变量	14 个外生变量
5 种收入	政府支出
消费	4 种直接税
总私人投资	间接税
折旧	5 种人口和劳动力
进口	工时
公司储蓄	剩余储备
公司剩余	进口价格
私人雇员	
资本存量	
工种流动资产	
3 种价格	
2 种利率	

沃顿模型（The Wharton Model） 沃顿模型是一个有关美国经济的中型宏观经济模型,它继承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一些特点，但在三个方面与其存在着区别：首先，它利用的是季度资料而不是年度资料，使用了从 1948 年到 1960 年的 68 组观察值；第二，它和以前的模型不同，是专门为经济预测，尤其是为国民收入的各个部分以及失业的预测而设计的；第三，它对模型的分解更为细致，尤其是在定义方程式的表述、货币机构部门的研究方面比过去有很大进展。

沃顿模型共包括 118 个变量，其中有 76 个内生

变量，42 个外生变量。方程式也有 76 个，其中 47 个是行为方程式，29 个是定义方程式。使用的估计方法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技术进步与生产函数（Technical Charge and Production function） 技术进步的程度可以通过生产函数来分析和估算。如果技术进步是随着时间变动而使生产函数反映出更大的效率，这种技术进步即称为不体现的技术进步。这种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f(L,K,t) \qquad (1)$$

或 $(y)t=f(L(t),K(t),t)$

其中，y 是产出，L 是劳动，k 为资本，t 是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动，产出的变动为：

$$\frac{dy}{dt}=\frac{\partial f}{\partial L}\frac{dL}{dt}+\frac{\partial f}{\partial K}\frac{dk}{dt}+\frac{\partial f}{\partial t} \qquad (2)$$

等式右边的头两项表示分别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所引起的产出的变动，最后一项表示由于非体现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产出变动。这种技术进步之所以称为"非体现的（disembodied）"，是因为它不体现在投入的生产要素中，但它包括对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织。在增加和不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时，都会发生这种技术进步。

对（2）式的两边同除以产出 y，得：

$$\frac{1}{y}\frac{dy}{dt}=\left(\frac{L}{y}\cdot\frac{\partial y}{\partial L}\right)\frac{1}{L}\frac{dL}{dt}+\left(\frac{K}{y}\frac{\partial y}{\partial k}\right)\frac{1}{k}\frac{dk}{dt}+\frac{1}{y}\frac{\partial y}{\partial t} \qquad (3)$$

在（3）式中，所有项目都以变化率的形式表出。等式右边的头两项是两种投入的变化率，并以产出对于投入的弹性加权，第 i 项是非体现的技术进步的变化率。

如果投入间的边际替代率不发生变化，技术进步称为中性技术进步。从几何图形上看，在价格比不变的情况下，中性技术进步意味着生产函数的等产量线一致地发生移动，不改变等产量线在沿着由原点出发的射线上的斜率。假设产出对于劳动和资本的弹性分别为常数 α 和 β（如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中那样），并进一步假定非体现的技术进步的变化率也是一个常数 m，（3）式可写成：

$$\frac{1dy}{ydt}=\alpha\frac{1dL}{ydt}+\beta\frac{1}{K}\frac{dk}{dt}+m$$

其中，m 就是中性的非体现的技术进步。

利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可以把规模参数表示为时间 t 的幂函数，即

$$y=(A_0e^{mt})L^{\alpha}K^{\beta}$$

两边同取对数，有

$$\log y=a_0+\alpha\log L+\beta\log K+mt \qquad (4)$$

其中，$a_0=\log A$

对（4）求 t 的微分，有

$$\frac{d\log y}{\alpha t}=\frac{1}{y}\frac{dy}{dt}=\alpha\frac{1}{L}\frac{dL}{dt}+\beta\frac{1}{K}\frac{dK}{dt}+m$$

m 就反映了中性非体现的技术进步。它可通过求余值的方法计算，即

$$m=\frac{1}{y}\frac{dy}{dt}-\alpha\frac{1}{L}\frac{dL}{dt}-\beta\frac{1}{K}\frac{dK}{dt} \qquad (5)$$

将变量对时间的导数离散化，（5）式可写成：

$$m=\frac{\Delta y}{y}-\alpha\frac{\Delta L}{L}-\beta\frac{\Delta k}{K}$$

这就是著名的索洛余值法。

利用 CES 生产函数，也可以分析和估算中性技术进步。

和不体现的技术进步相对应，还可以计算体现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将和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改善联系在一起，估算和分析都比较复杂，Intriligater 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

折扣最小二乘法（Discounting Least Squares 简称 DLS） 折扣最小二乘法指的是对误差平方进行指数折扣加权后，使其总和达到一个最小值。指数加权是统计预测中特有的一种加权方法，它用加权平均代替简单平均，用加权总和代替简单总和，近期值权数大，远期值权数小。在指数平滑法中用的是加权平均法，折扣最小平方法用的是加权总和法。

折扣最小二乘是用指数折扣的方法，对由近到远的误差平方 e^2 进行加权，其数学表达式为：

$$S=\sum_{r=0}^{t-1}a^re_{t-r}^2$$

然后对 S 求最小值。

用指数折扣加权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可以通过对折扣因素 a 值的控制来调整权数 a^r，以求取得所需要的最佳权数。以直线方程为例，预测方程式为：

$$\overline{X}_t=\overline{\alpha}+\overline{\beta}_t$$

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中，求$\overline{\alpha}$和$\overline{\beta}$的公式分别为：

$$\overline{\beta}=\frac{n\sum tX_t-\sum t\sum X_t}{n\sum t^2-(\sum t)^2}$$

$$\overline{\alpha}=\frac{\sum X_t}{n}-\overline{\beta}\frac{\sum t}{n}$$

在折扣最小二乘法估计 α 和 β 时，两式中的变化为：用$\sum a^r$ 代替 n，用$\sum a^rx_t$ 代替$\sum X_t$，用$\sum a^rt$ 代替$\sum t$，用$\sum a^rtX$ 代替$\sum_t X_t$，用$\sum a^rt^2$ 代替$\sum t^2$，则公式变为：

$$\overline{\beta}=\frac{\sum a^r\sum a^rtX_t-\sum a^rt\sum a^rX^t}{\sum a^r\sum a^rt^2-(\sum a^rt)^2}$$

$$\bar{\alpha}'=\frac{\sum a'X_i}{\sum a'}-\bar{\beta}\frac{\sum a_i'}{\sum a'}$$

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 投入产出

表1 简化的投入产出表

		中间消耗			最终需求	总产出
		A	B	C		
中间投入	A	0	20	45	35	100
	B	30	0	30	140	200
	C	0	80	0	70	150
最初投入		70	100	75	245	
总投入		100	200	150		450

表，是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扬夫建立的一种反映国民经济部门间联系的表式。它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可以进行许多重要的经济分析。

表1列出的是一个只有三个部门的简化的投入产出表。

在这个表中，对于任何一个部门或产品，都有：

总投入＝总产出

与此同时，由于各个部门的最初投入都可以表示为：

最初投入＝总投入－中间投入

各个部门的最终需求又可以表示为：

最终需求＝总产出－中间消耗

由于总投入等于总产出，各部门中间投入之和等于各部门中间消耗之和，因此，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又有：

∑最初投入＝∑最终需求。

当然，对各部门来说，最终投入和最终需求却可以不等。

表1中的内容可以用符号表示，表2列出的就是一个具有几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

表2 用符号表示的投入产出表

	中间消耗	最终需求	总产出
中间投入	$W_{11},W_{12},\cdots,W_{1n}$	e_1	q_1
	$W_{21},W_{22},\cdots,W_{2n}$	e_2	q_2
	……	…	…
	$W_{n1},W_{n2}\cdots W_{nn}$	e_n	q_n
最终投入	$Z_1,Z_2\cdots Z_n$	$\sum_j z_j=\sum_i e_i$	
总投入	$q_1,q_2\cdots q_n$		$\sum_{i=1} q_i$

从表2看，可以看出中间消耗、最终需求和总产出之间的关系

$$W_{11}+W_{12}+\cdots+W_{1n}+e_1=q_1$$

$$W_{21}+W_{22}+\cdots+W_{2n}+e_2=q_2$$

$$\cdots\cdots$$

$$W_{n1}+W_{n2}+\cdots+W_{nn}+e_n=q_n$$

方程组说明，一部门的总产出，将用于各部门作为中间消耗和社会的最终需求，具体包括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储备的增加、净出口等。

再看中间投入与总投入的关系。表2的每一列说明，产出 q_j 的产品，需要各部门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以及最初投入的情况。显然，每个部门生产出1个单位的产品，需要各部门的投入为 $a_{ij}=W_{ij}/q_j$。例如，A部门每生产出一个单位的产品，就需要投入B产品 $a_{21}=\frac{W_{21}}{q_1}=\frac{30}{100}=0.3$。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计算出所有的 a_{ij} 的数值，它们为：

$$A=\begin{bmatrix}a_{11}&a_{12}&a_{13}\\a_{21}&a_{22}&a_{23}\\a_{31}&a_{32}&a_{33}\end{bmatrix}=\begin{bmatrix}0&0.1&0.3\\0.3&0&0.2\\0&0.4&0\end{bmatrix}$$

矩阵A中的每一个元素 a_{ij} 称为直接消耗系数，也称为投入系数。它反映的是某一部门生产过程中总产出和各种投入的关系，矩阵A称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令 $e=(e_1\ e_2\ \cdots\cdots e_n)'$

$q=(q_1\ q_2\ \cdots\cdots q_n)'$

方程组(1)可表示为

$$Aq+e=q$$

移项整理得：

$$q-aq=e$$

$$(I-A)\ q=e$$

$$(I-A)^{-1}e=1$$

其中，I为单位阵，$(I-A)^{-1}$ 称为列昂扬夫逆阵。

列昂扬夫逆阵反映着最终需求和总产出之间的变换关系，通过它，在已知总产出的情况下，可以求出最终需求。反之，已知最终需求，可求出总产出。

根据表1的资料计算的列昂扬夫逆阵为：

$$(I-A)^{-1}=\begin{bmatrix}1.077&0.257&0.375\\0.351&1.171&0.340\\0.141&0.468&1.136\end{bmatrix}$$

假设投入产出关系不变，每个部门的最终需求都增加10%，这时，总产出应达到的水平为：

$$q^*=(I-A)^{-1}\cdot e\times110\%=\begin{bmatrix}109.0\\220.0\\165.0\end{bmatrix}$$

显然，这是一种很有用的分析方法，利用投入产

出表，除了进行需求分析外，还可以进行价格成本分析、生产率分析等许多分析。

投入产出表与价格成本分析　用矩阵 $A=\{a_{ij}\}$ 表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sum=(\sum_1,\sum_2\cdots\sum_n)'$ 表示各种商品的每单位产品的最初投入支付率构成的向量，$P=(P_1,P_2\cdots\cdots P_n)'$ 表示各种商品的价格构成的向量，有

$$P=A'P+\overline{Z}$$

或写成分量形式

$$P_1=a_{11}P_1+a_{21}P_2+\cdots+a_{n1}P_n+\overline{Z}_1$$
$$P_2=a_{12}P_1+a_{22}P_2+\cdots+a_{n2}P_n+\overline{Z}_2$$
$$\cdots\cdots$$
$$P_n=a_{1n}P_1+a_{2n}P_2+\cdots+a_{nn}P_n+\overline{Z}_n$$

解此方程，得

$$P=(I-A')^{-1}\sum$$

这样，已知最初投入或成本（固定资产损耗，工资和税金，间接税，工农业盈余）的支付率以及它们的变化。由于这里的 P_i 表示的是每单位产品的价格，而每单位产品在以价值形式反映的投入产出表是一个货币单位，因此，这里的价格实际上是各种商品的价格指数。在 $\overline{Z}$ 不变时，各个 P_i 均为 1，在 $\overline{Z}$ 变化后，P_i 是各种商品变化之后的价格和原价格之比。

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MSE）　对于一般的参数估计问题，设 θ 为 $P\times1$ 未知参数向量，$\vec{\theta}$ 为它的某种估计。$\vec{\theta}$ 的均方误差定义为:

$$MSE(\vec{\theta})=E\|\vec{\theta}-\theta\|^2$$
$$=E(\vec{\theta}-\theta)'(\vec{\theta}-\theta)$$

它度量了估计 $\vec{\theta}$ 与未知参数 θ 偏离的大小。一个好的估计应该有较小的均方误差。

$MSE(\vec{\theta})$ 可以作进一步分解

$$MSE(\vec{\theta})=E(\vec{\theta}-\theta)'\ (\vec{\theta}-\theta)$$
$$=E[(\vec{\theta}-E\vec{\theta})+(E\vec{\theta}-\theta)]'[(\vec{\theta}-E\vec{\theta})+(E\vec{\theta}-\theta)]$$
$$=E(\vec{\theta}-E\vec{\theta})'+(\vec{\theta}-E\vec{\theta})+\|e\vec{\theta}-\theta\ \ \|^2$$
$$=t_rCov(\vec{\theta})+\|E\vec{\theta}_i-\theta\|^2$$

若记 $\vec{\theta}=(\vec{\theta}_1,\vec{\theta}_2,\cdots,\vec{\theta}_p)$，则（2）式中的第一项

$$t_rCov(\vec{\theta})=\sum_{i=1}^{p}Var(\vec{\theta}_i)$$

它是估计 $\vec{\theta}$ 的各分量的方差和。第二项

$$\|E\vec{\theta}-\theta\|^2=\sum_{i=1}^{p}(E\vec{\theta}_i-\theta_i)^2$$

它是估计 $\vec{\theta}$ 各分量偏差的平方和，若要均方误差小，这两项都应该比较小。

均方误差与最小二乘估计　考虑线性回归模型

$$Y=\alpha 1+X\beta+e\quad E(e)=0\quad Cov(\theta)=\sigma^2I$$

假设 $n\times p$ 的设计矩阵已经中心标准化，且 $Rank(X)=P$。于是 α 的 LS 估计 $\vec{\alpha}=\overline{Y}=\frac{1}{n}\sum_{i=1}^{n}Y_i$，$\beta$ 的 LS 估计为 $\vec{\beta}(X'X)^{-1}X'Y$。

因为 $\vec{\beta}$ 是 β 的无偏估计，于是在均方误差

$$MSE(\vec{\beta})=tr(Cov(\vec{\beta})+\|E\vec{\beta}-\beta\|^2$$

中，第二项等于零，所以

$$MSE(\vec{\beta})=\sigma^2tr(X'X)^{-1}$$

记 $\lambda_1\geqslant\cdots\geqslant\lambda_p>0$ 为 $X'X$ 的特征根，因为 $X'X$ 可逆，所以 $(X'X)^{-1}$ 的特征根为 $\lambda_1^{-1},\lambda_2^{-1},\cdots,\lambda_p^{-1}$，故上式变为

$$MSE(\vec{\beta})=\sigma^2\sum_{i=1}^{p}\frac{1}{\lambda_i}$$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 $X'X$ 至少有一个特征根非常小，即非常接近于零，那么 MSE（β）就很大。这时，尽管高斯—马尔可夫定理保证了 $\sigma^2tr(X'X)^{-1}$ 与线性无偏估计类中很小，但它本身的值却很大，在这种情况下，$\vec{\beta}$ 就不一定是 β 的一个好的估计。

如果 $X'X$ 至少有一个特征根很小，即很接近于零，则称设计阵 X 呈病态。可以证明，当 X 呈病态时，X 的列向量之间存在着近似的线性关系，即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在存在多重共线性条件下，以均方误差的评价标准，最小二乘估计常常是一个不好的估计。

均匀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　若 a、b 为有限数，由下列密度函数定义的分布称为[a,b]上的均匀分布，常记作 U[a,b]。

$$f(x)=\begin{cases}\frac{1}{b-a} & a\leqslant x\leqslant b\\ 0 & x<a\text{或}x>b\end{cases}$$

相应的分布函数为:

$$F(x)=\begin{cases}0 & x\leqslant a\\ \frac{x-a}{b-a} & a<x\leqslant b\\ 1 & x>b\end{cases}$$

它的数学期望

$$EX=\frac{a+b}{2}$$

方差

$$DX=\frac{b-a}{12}$$

若随机变量 X 服从[a,b]上的均匀分布，则 X 在[a,b]中取值落在某一区域内的概率与这个区域的测度成正比。

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是美国统计学家费暄1912年提出的，是参数点估计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设样本$(x_1,x_2,\cdots x_n)$抽自分布密度为$f(x,\theta)$的总体x，θ为参数。由于样本观测值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则随机变量$(x_1,x_2,\cdots x_n)$的联合分布密度是

$L(x_1,x_2,\cdots,x_n;\theta)=\prod_{i=1}^{n}f_i(x_i\theta)$。我们称L为似然函数。

当θ已知时，似然函数L $(x_1,x_2,\ldots,x_n;\theta)$描述了样本取得具体的样本值的可能性。如果把x看成常量，把θ看成是变量，则对于一组取定的样本值使得似然函数为最大的$\vec{\theta}$，叫作θ的极大似然估计，即对θ的一切其他可能取值θ'，均有

$$\prod_{i=1}^{n}f_i(x_i,\vec{\theta})>\prod_{i=1}^{n}f_i(x_i,\theta')$$

根据求函数极大值的方法，对函数求θ的偏导数并令其等于0，即令

$$\frac{\partial L(x_1,x_2,\cdots,x_n;\ \theta)}{\partial\theta}=0$$

或

$$\frac{\partial \lg^L}{\partial\theta}=0$$

就可以求出θ的极大似然估计。

极大似然法的思路是很直观的，在已经了解总体的分布后，要估计总体的参数θ，有理由认为所得到的观测值，都是在一定的参数下所最可能出现的数值。根据这种思路再反过来求总体参数，得到的就是极大似然估计。

极大似然法与线性回归模型 当线性回归模型满足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且u_i服从正态分布时，可利用极大似然方法得到β和σ^2的极人似然估计。在一元回归模型的情况下，假设抽取一个容量为n的样本 $(X_1,Y_1),(X_2,Y_2)\cdots,(X_n,Y_n)$，对每一对$(X_i,Y_i)$来说，有：

$$Y_i\sim N(\beta_0+\beta_1x_i,\sigma^2),\ i=1,2,\cdots N$$

因为$Y_1,Y_2\cdots Y_n$相互独立，故它们的联合概率密度为：

$$L=\sum_{i=1}^{n}\frac{1}{\sigma\sqrt{2\pi}}e^{-\frac{1}{2\sigma^2}(Y_i-\beta_0-\beta_1X_i)^2}$$

$$=\left(\frac{1}{\sigma\sqrt{2\pi}}\right)^n e^{-\frac{1}{2\sigma^2}\sum_{i=1}^{n}(Y_i-\beta_0-\beta_1X_i)^2}$$

根据极大似然原理，要使L为最大，只要上式右方指数的平方和部分为最小，即只需要函数

$$f(\beta_0,\beta_1)=\sum_{i=1}^{n}(Y_i-\beta_0-\beta_1X_i)^2$$

取最小值，从函数形式可以看出，β_0和β_1的极大似然估计量和最小二乘估计量是完全一致的，即

$$\begin{cases}\vec{\beta}_1=\dfrac{\sum_{i=1}^{n}x_iy_i}{\sum_{i=1}^{n}x_i^2}\\ \vec{\beta}_0=\overline{Y}-\vec{\beta}_1\overline{X}\end{cases}$$

为了获得σ^2的极大似然估计量，求LogL对σ^2的偏导数并令其等于0，有：

$$\mathrm{LogL}=-\frac{n}{2}log\sigma^2-\frac{n}{2}log(2\pi)$$

$$-\frac{1}{2}\cdot\frac{\sum(Y_i-\beta_0-\beta_1x_i)^2}{\sigma^2}$$

$$\frac{\partial\log L}{\partial\sigma^2}=-\frac{n}{2}\cdot\frac{1}{\sigma^2}+\frac{1}{2\sigma^4}\sum(Y_i-\beta_0-\beta_1X_i)^2$$

$$=0$$

$$\vec{\sigma}=\frac{\sum_{i=1}^{n}e_i^2}{n}$$

这个结果与σ^2的最小二乘估计量$\overrightarrow{\sigma^2}=\frac{\sum_{i=1}^{n}e_i}{n-2}$略有差别，是$\sigma^2$的有偏估计量，但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二者将不断接近。

在多元回归模型中，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求得$\beta_0\beta_1\cdots\beta_k$的极大似然估计。设：

$$Y_i\sim N\frac{1}{\sigma\sqrt{2\pi}}e^{-\frac{1}{2\sigma^2}}(Y_i-\beta_0-\beta_1X_i-\cdots$$

$$-\beta_kx_{ki}0)^2$$

根据极大似然原理，要使L为最大，只要上式右方指数的平方和部分为最小，这样计算出来的$\vec{\beta}_0,\vec{\beta}_1\cdots\vec{\beta}_k$，和最小二乘估计量是一样的，但是，$\sigma^2$的最小二乘估计量

$$\vec{\sigma}^2=\frac{\sum_{i=1}^{n}e_i^2}{n}$$

这是一个有偏估计量。

劳动生产率（Labour Productivity） 劳动生产率是生产成果与相对的劳动消耗量之比。它可以有两种形式：

(1) 劳动生产率$=\dfrac{\text{生产量}}{\text{劳动消耗量}}$

(2) 单位产品劳动需要量$=\dfrac{\text{劳动消耗量}}{\text{生产量}}$

公式（1）称为劳动生产率的正指标。比率越大，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公式（2）称为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比率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

在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中，生产量和劳动消耗量都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R径。例如，生产量可以采取实物量、增加值、净产值、总产值等，称为：按实物量（增加值、净产值、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消耗量可以取一定时间（年、月、周、日）的人时数，就业人数（就业人数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全体人员、生产人员等）等，称为每人时劳动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二者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计算出具体的劳动生产率，如按总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为了进行动态分析，可以通过指数法将两个时期同一范围（企业、部门、国民经济或某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加以比较计算劳动生产率指数。如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数、部门劳动生产率指数等。而对于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指数的计算，往往采取间接的方法。如在美国计算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数的形式为：

$$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数=\frac{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就业指数}\times 100\%$$

两个平均数之差的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要了解两个总体平均数之差，在不能直接了解的情况下，就要通过抽样以两个样本平均数之差去推断总体平均数之差。

1. 已知总体为正态分布和两个总体的方差。

在这种情况下，有 $E(\overline{x_1}-\overline{x_2})=u_1-u_2, \sigma^2_{\overline{x_1}-\overline{x_2}}=\frac{\sigma_1^2}{n_1}+\frac{\sigma_2^2}{n_2}$，　而　$\overline{x_1}-\overline{x_2}\sim N(u_1-u_2, \frac{\sigma_1^2}{n_1}+\frac{\sigma_2^2}{n_2})$。

即：

$$P((\overline{x_1}-\overline{x_2})-z_{\alpha/2}\sqrt{\frac{\sigma_1^2}{n_1}+\frac{\sigma_2^2}{n_2}}<u_1-u_2<(\overline{x_1}-\overline{x_2})-z_{\alpha/2}\sqrt{\frac{\sigma_1^2}{n_1}+\frac{\sigma_2^2}{n_2}})=1-\alpha$$

其中，$z_{\alpha/2}$ 表示在正态分布表中和 α 相对应的概率度

2. 已知正态分布总体，未知总体方差

这可以分成三种情况讨论。

(1)大样本（$n>30$）总体方差相等．这时，在 $1-\alpha$ 的置信水平下，u_1-u_2 的置信区间为：

$$(\overline{x_1}-\overline{x_2})\pm Z_{\alpha/2}\sqrt{\frac{s_1^2}{n_2}+\frac{s_2^2}{n_1}}$$

其中：

$$S_1=\frac{\sqrt{\sum_{i=1}^{n}(X_{i1}-\overline{x_1})^2}}{n_1-1}, S_2=\frac{\sqrt{\sum_{i=1}^{n}(X_{i2}-\overline{x_2})^2}}{n_2-1}$$

(2)大样本总体方差不等。这时 u_1-u_2 的置信区间为：

$$(\overline{X_1}-\overline{X_2})\pm Z_{\alpha/2}\sqrt{\frac{S_1^2}{n_1}+\frac{S_2^2}{n_2}}$$

(3)小样本（$n<30$）总体方差相等。

这时 $\overline{x_1}-\overline{x_2}$ 服从自由度为 n_1+n_2-2 的 t 分布．在 $1-\alpha$ 的置信水平下，u_1-u_2 的置信区间为：

$$(\overline{x_1}-\overline{x_2})\pm t_{\alpha/2}\sqrt{\frac{(n_1-1)s_1^2+(n_2-1)s_2^2}{n_1+n_2-2}}\cdot\sqrt{\frac{1}{n_1}+\frac{1}{n_2}}$$

其中，$t_{\alpha/2}$ 是在 t 分布表中自由度为 $n_1+n_2>2$ 时和 $\alpha/2$ 相对应的概率度。

(3) 从两个正态总体抽取成对观察值之差的估计。

有时两个总体之差可以通过成对的观察资料加以比较。如经过一定的工艺变更前后产量的比较，在实验时将对象分为两半，一半加以某种处理，然后再分别观察比较，等等。要求出这种成对资料差别的置信区间，可以先求出每一个差别 $d_i=X_{i1}-X_{i2}$，然后求出平均差别 $\bar{d}=\frac{\sum d_i}{n}$，n 为观察的对数，样本方差用 S_d^2 表示，$S_d^2=\frac{\sum(d_i-\bar{d})^2}{n-1}$。当这一总体服从正态分布时，$u_d$ 的置信区间为 $\bar{d}\pm t_{\alpha/2}\frac{sd}{\sqrt{n}}$，$t_{\alpha/2}$ 表示在自由度为 $n-1$ 时在 t 分布表上与 $\alpha/2$ 相对应的概率度。

两个总体平均数的检验　对于两个总体平均数进行检验，就是要通过检验研究两个总体平均数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假设，即

(1)$H_0: u_1=u_2, H_1: u_1\neq u_2$

(2)$H_0: u_1<u_2, H_1: u_1>u_2$

(3)$H_0: u_1>u_2, H_1: u_1<u_2$

在第（1）种情况下是双尾检验，在第（2）种和第（3）种情况下是单尾检验．只是在第（2）种情况下拒绝域往往在右边，在第（3）种情况下拒绝域往往在左边。这里只讨论第（1）种情况，其它情况下的处理规则是类似的。

1.两个总体服从正态分布，方差已知且相等。

这时，在假设 $u_1=u_2$ 的情况下，有统计量

$$Z=\frac{\overline{x_1}-\overline{x_2}}{\sigma\sqrt{\frac{1}{n_1}+\frac{1}{n_2}}}。$$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 (0, 1)。在显著性水平 $\alpha=5\%$ 时，接受域为 $-1.96<Z<1.96$。若 $Z<-1.96$ 或 $Z>1.96$，说明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否定原假设。

2.两个总体服从正态分布，方差已知但不相等。

这时，在 $H_0:u_1=u_2$ 成立的条件下，统计量

$$Z=\frac{(\overline{x_1}-\overline{x_2})-(u_1-u_2)}{\sqrt{\frac{\sigma_1^2}{n_1}+\frac{\sigma_2^2}{n_2}}}$$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其接受域和拒绝域同上。

3.两个总体服从正态分布，方差未知，小样本。

这时，在 $H_0:u_1=u_2$ 成立的条件下，统计量

$$T=\frac{(\overline{x_1}-\overline{x_2})-(u_1-u_2)}{\sqrt{\frac{(n_1-1)s_1^2+(n_2-1)s_2^2}{n_1+n_2-2}\cdot\left(\frac{1}{n_1}+\frac{1}{n_2}\right)}}$$

服从自由度为 n_1+n_2-2 的 t 分布，利用 t 分布表查出自由度为 n_1+n_2-2 时的临界值，就可以进行 t 检验。式中:

$$S_1=\frac{\sum(X_{i1}-\overline{x_1})^2}{n_1-2},S_2=\frac{\sum(X_{i2}-\overline{x_2})^2}{n_2-1}$$

两因素方差分析 (**Two—Factor Analysis 0f Varance**) 在按两因素进行方差分析时，应该把两个因素的各种“处理”进行交错排列，每种情况进行一次试验，例如 A 因素有 k 种处理，B 因素有 n 种处理，就需要进行 nk 次试验，其试验排列见表。

A因素 B因素	1	2	…	k	T_i $\overline{x_i}$
1	x_{11}	x_{12}	⋮	x_1k	$T_1\cdot\overline{x_1}$
2	x_{21}	x_{22}		x_2k	$T_2\cdot\overline{x_2}$
⋮	⋮	⋮		⋮	⋮
n	x_{n1}	x_{n2}		x_nk	$T_n\bar{x}_n$
$T_{\cdot j}$ $\bar{x}_{\cdot j}$	$T_{\cdot 1}$ $\bar{x}_{\cdot 1}$	$T_{\cdot 2}$ $x\bar{x}_{\cdot 2}$	… …	$T_{\cdot k}$ $\bar{x}_{\cdot k}$	$T_{\cdot n}$ $\bar{x}_{\cdot n}$

表中：K—A 因素的“处理”数。

n—B 因素的“处理”数。

$T_{\cdot j}$—A 因素第 j 个处理变量（即观察值）的合计数。

$T_{i\cdot}$—B 因素第 i 个处理变量的合计数。

$\bar{x}_{\cdot j}$—A 因素第 j 个处理变量的平均数。

$\bar{x}_{i\cdot}$—B 因素第 i 个处理变量的平均数。

模型为：$X_{ij}=u+b_i+a_j+\varepsilon_{ij}$

其中，a_j 代表 A 因素在第 j 次处理中带来的效应，b_i 代表 B 因素在第 i 次处理中带来的效应。ε_{ij} 为随机干扰项，$\varepsilon_{ij}\sim N(0,\sigma^2)$，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两因素方差分析的原假设有两个：(1) 原假设 H_{01}:A 因素的各种处理的效应无显著差别；备择假设 H_{11}:A 因素的各种处理的效应不完全相等。在原假设为真的情况下，我们有 $a_1=a_2=\cdots a_k=0$，否则，a_j 则不全为 0。(2) 原假设 H_{02}:B 因素的各种处理的效应无显著差别，即 $b_1=b_2=\cdots b_n=0$，备择假设 H_{12}:B 因素的各种效应不完全相等，则 b_i 不完全为 0。

在两因素方差情况下，总离差平方和 SST 被分为三个部分:

$$\sum_{i=1}^{n}\sum_{j=1}^{K}(X_{ij}-\overline{x_{..}})^2=\sum_{i=1}^{n}\sum_{j=1}^{K}(\overline{x_{.j}}-\overline{x_{..}})^2$$

$$+\sum_{i=1}^{n}\sum_{j=1}^{K}(\overline{x_{i.}}-\overline{x_{..}})^2$$

$$+\sum_{i=1}^{n}\sum_{j=1}^{n}(X_{ij}-\overline{x_{.j}}-\overline{X_{i.}}+\overline{X_{..}})^2$$

其中，右边第一项是 A 因素处理间离差平方和记为 SSA，第二项是 B 因素的处理间平方和，记为 SSB，第三项为剩余平方和，是由于随机误差引起的，记为 SSE。它们的相互关系可简化为：SST＝SSA+SSB+SSE

方 差 分 析 表

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F 统计量	临界值
A 因素	SSA	k-1	$S_A^2=SSA/(k-1)$	S_A^2/S_E^2	$F_\alpha(k-1,(n-1)(k-1))$
B 因素	SSB	n-1	$S_B^2=SSB/(n-1)$	S_B^2/S_E^2	$F_\alpha(n-1,(n-1)(k-1))$
剩余	SSE	(n-1)(k-1)	$S_E^2=SSE/(n-1)(k-1)$		
总和	SST	nk-1			

式中各项的简化公式为:

$$SST=\sum_{i=1}^{n}\sum_{j=1}^{K}X_{ij}^2-nk\overline{X}^2$$

$$SSA=\frac{1}{n}\sum_{j=1}^{k}T_{\cdot j}^2-\frac{T_{..}^2}{nk}$$

$$SSB=\frac{1}{k}\sum_{i=1}^{n}T_{i\cdot}^2-\frac{T_{..}^2}{nk}$$

SSE＝SST－SSA－SSB

方差分析表为：

最后，将F统计量和临界值对比，当F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时，接受原假设，即认为不同的处理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否则，将拒绝原假设。

两点分布（贝努里分布 Bernouui Distribution） 在一次试验中，试验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种只有两个可能结果的试验称为贝努里试验。掷硬币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贝努里试验的例子，我们把出现正面称为成功，记为事件A，出现反面称为失败，记为事件$\overline{A}$，则它的概率分布为：

$P(A)=P \quad P(\overline{A})=q$

显然$P>0$，$q>0$，且$P+q=1$

如果在一个贝努里试验中，将成功表为1，将失败记为0、它的概率分布为：

$P(X=x)=P^x(1-P)^{1-x} \qquad x=0,1$

其数学期望

$EX=P$

方差

$DX=P(1-P)$

这一分布称为两点分布，又叫贝努里分布。

更新改造投资 更新改造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对原有设施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以及相应配套的工程和有关工作（不包括大修理和维护工程）。更新改造投资是以货币表现的更新改造完成的工作量。根据我国现行统计制度，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的划分是：（1）列人基本建设计划的项目作为基本建设投资，列人更新改造计划的项目作为更新改造投资；（2）更新改造计划与基本建设计划结合安排的项目和未列人计划的项目，根据工程性质分别作为基本建设投资或更新改造投资。属于对企业、事业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的项目和增建的主要生产车间、分厂等，其新增生产能力尚未达到大中型标准的项目，以及由于城市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需要进行的迁建工程，作为更新改造。

灵敏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 所谓灵敏度分析，指的是在统计决策中，对影响因素微小变动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考察影响因素的微小变动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对决策起根本性的影响。并计算出临界值。

在贝叶期决策中，影响期望值决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概率，概率定得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决策结果。但是，把概率测得准确和适当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未来。因此，先验概率有一定的主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用灵敏度分析来说明概率的变动对决策的影响程度。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某工厂考虑发展生产的两个方案，进取的和保守的，收益视市场有利或不利而不同（见表1）。

表1　收益付酬表

市场状态	概率 P	行动	
		进取(a_1)	保守(a_2)
有利θ_1	P	30	5
不利θ_2	1−P	−8	15

两个行动的期望收益是：

$EMV(a_1)=30P+(-8)\times(1-P)$

$=-8+38P$

$EMV(a_2)=5P+15(1-P)$

$=15-10P$

使这两个期望值相等的概率，就是边际概率，也就是平衡点概率，令$EMV(a_1)=EMV(a_2)$，得：

$P=0.48$

当P值大于0.48时，市场有利于采取积极进取的发展生产的行动(a_1)，反之，如P值小于0.48，则采取保守行动(a_2)有利。

这里说明的只是一个两行动两状态的例子，对于更多行动更多状态的情况，分析起来要更复杂一些。

时间数列（Times Series） 时间数列是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对于某种现象的观测值，也叫动态数列。在经济统计分析中，经常需要处理的都是一些有关经济现象的时间数列。

经济现象的时间数列按其排列指标的不同可分为：总量指标时间数列、相对指标时间数列和平均指标时间数列。

总量指标时间数列，是由一系列总量指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形成的时间数列。时期数列中的总量指标，都是反映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在一段时期内发展状况的。一般地说，时期数列具有以下特点：（1）数列中各指标数值是在一段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结果，是通过连续登记取得的；（2）数列中各指标数值可以相加，各指标数值大小与其所反映的时期的长短直接关联；（3）通常情况下，指标数值所反映的时期越长数值越大，反之越小。

时间数列中的总量指标，反映的都是某种社会经济现象与一点时间下所达到的水平。一般地说，时点数列具有以下特点：数列中各指标表明的是某种现象在一定时点上的状态，指标数值往往通过一次登录取得，各时点上的指标不宜相加（没有实际意义）。各

指标数值的大小与时点之间间隔长短无关，时点之间间隔可大可小，决定于所研究的问题。

相对指标时间数列是由一系列相同种类的相对指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形成的时间数列。它反映现象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

平均指标时间数列是由一系列相同种类的平均指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形成的时间数列。它反映某个总体内各个单位在某个数量标志上的一般水平的发展过程。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指的是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从各种收入来源中经过一定的价值分配后获得的货币收入；财政支出指的是各级政府与一定时期内用于国防、社会行政管理、文化教育、保险卫生、债务利息等方面的货币支出。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的差额，称为财政盈余；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支出的差额，称为财政赤字。

在我国，财政收入包括

(1)企业收入，包括各部门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上交国家的利润和事业收入。

(2)各项税收，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盐税、关税、农牧业税、屠宰税、牧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以及有关罚税补税收入等。

财政支出包括：

(1)基本建设拨款，是指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拨款，不包括国家预算外自筹的各种基本建设资金。为加强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控制，我国从一九八五年起，对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实行拨款改贷款的新的管理方法：即由原来的直接无偿的拨给建设单位，改为拨给建设银行视同信贷基金管理，建设银行根据国家预算安排的基建项目，给予有偿贷款，用投产后新增利润还本付息。

(2)增拨流动资金，是指国家预算增拨各部门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增拨银行的信贷资金。

(3)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费医疗、体育、通讯和广播、地震、海洋、文物、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事业费。

条件期望（Conditional Expectation） 对于离散型二元随机变量（ξ,η），在ξ取某一定值，如$\xi=x_i$条件下，求η的数学期望，称此期望为给定$\xi=x_i$时η的条件期望，记作E（$\eta|\xi=x_i$）。

$$E(\eta|\xi=x_i)=\sum_j y_j p(\eta=y_j|\xi=x_i)$$

同样地定义

$$E(\xi|\eta=y_j)=\sum_i x_i p(\xi=x_i|\eta=y_j)$$

为给定$\eta=y_j$时ξ的条件期望。

对于连续型二元随机变量，定义

$$E(\eta|x)=\int_{-\infty}^{\infty}y\Phi(y|x)dy$$

$$E(\xi|y)=\int_{-\infty}^{\infty}x\Phi(x|y)dx$$

其中，$\Phi(y|x)$及$\Phi(x|y)$分别是在条件$\xi=x$下η的条件概率密度和$\eta=y$下的ξ的条件概率密度。

条件概率与统计独立性（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al Independence） 在事件A出现的条件下，事件B出现的概率叫作事件B发生的条件概率，记为P（B／A）。

例：盒中有3个白球、3个黑球，不放回地连摸两个球，问在第一次摸到白球的条件下，第二次摸到黑球的概率。

设摸到白球为事件A，摸到黑球为事件B，在第一次摸到白球后，盒中还剩2个白球，3个黑球，这时，摸到黑球的概率为：

$$P(B/A)=\frac{3}{5}$$

如果两事件任一事件的发生不影响另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则称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如在前面的例子中，则称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如在前面的例子中，第一次无论摸到什么颜色的球都放回去，那么，第二次摸到黑球的概率将不受第一次摸到白球的影响，它们之间就是相互独立的。即

$$P(B/A)=P(B)=\frac{3}{6}=\frac{1}{2}$$

估计（Estimation）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许多现象的统计研究都不可能掌握总体的资料，但人们却希望了解全面的情况，这时，就需要从总体中抽取一部分单位作为样本，通过对于样本的研究，估计总体的数字特征，以及不同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就是统计估计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

近代估计理论是由随机变量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在已知某个随机变量的分布形式的情况下，它的具体分布将由其未知参数θ所决定。而根据样本的观察值，则可以估计总体的参数，并且了解总体的具体分布。

估计可以分为点估计和区间估计两种。点估计是对未知参数作单值的估计，常用的方法有矩法和极大似然法，各种方法采取的选优标准不同，但也可能取得相同或接近的结果。区间估计是在一定的概率保证下，对未知参数所在的区间进行估计。

估计量的评价　进行统计估计就是要利用样本的资料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并且使我们所估计的结果和总体参数间的误差尽可能地小。但由于统计量是一个随机变量，随着抽样结果的不同，计算出来的估计值就可能不同，因此不能从一次具体抽取的样本所得到的结果对估计进行评价，而必须从总体上看，也就是说从大量试验结果来看哪一个指标较好，这就要从统计量的分布与总体参数的关系上考察。在统计估计理论中，对于估计量的评价，常用的标准有无偏性、有效性、充分性和一致性。

(1) 无偏性。个别样本由于随机原因可能偏大或偏小，但一个好的估计量从平均的意义上说，应该等于所估计的那个参数，从直观上看也就是样本估计量的数值应该在参数的真值周围摆动而无系统性偏差。

无偏性的定义是：设 θ 为被估计参数，若有估计量 $\vec{\theta}(x_1x_2\cdots,x_n)$ 对于一切 n 及 $\theta\in\Omega$，有 $E(\vec{\theta})=\theta$，则称 $\vec{\theta}$ 为 θ 的无偏估计量。若 $E(\vec{\theta})-\theta=b$，则称 b 为估计量 $\vec{\theta}$ 的偏差。若 $b\neq0$，则称 $\vec{\theta}$ 为 θ 的有偏估计量。如果 $\lim\limits_{n\to\infty} b=0$，则称 $\vec{\theta}$ 为 θ 的渐近无偏估计量。

如样本平均数 $\overline{X}$ 就是总体数学期望的无偏估计量：

$$E(\bar{x})=E\frac{\sum\limits_{i=1}^{n}x_i}{n}=\frac{nEX}{n}=\mu$$

而样本方差 $S_n^2=\frac{1}{n}\sum(x_i-\bar{x})^2$ 则不是总体方差 σ^2 的无偏估计量，因为：

$$E(s_n^2)=E\left[\frac{1}{n}\sum_{i=1}^{n}(x_i-\bar{x})^2\right]=\frac{1}{n}E\{\sum_{i=1}^{n}[(x_i-u)-(\bar{x}-u)]^2\}$$

$$=\frac{1}{n}E\{\sum_{i=1}^{n}(x_i-u)^2-Z\sum_{i=1}^{n}(x_i-u)(\bar{x}-u)+n(\bar{x}-u)^2\}$$

$$=\frac{1}{n}\{\sum_{i=1}^{n}E(x_i-u)^2-2nE(\bar{x}-u)^2+nE(\bar{x}-u)^2\}$$

$$=\frac{1}{n}\{n\sigma^2-n(\frac{\sigma^2}{n})\}=\sigma^2-\frac{1}{n}\sigma^2$$

这时，估计量的偏差为 $-\frac{1}{n}\sigma^2$。为了得到 σ^2 的无偏估计，可令 $S^2=\frac{\sum\limits_{i=1}^{n}(x_i-\bar{x})^2}{n-1}$。这时 $ES^2=\sigma^2$，S^2 是 σ^2 的无偏估计量。

(2) 有效性。同样是符合无偏性要求的估计量，相互之间如果要进一步选择，就需要对它们的离散程度进行比较，方差较小的估计量当然要比方差大的好。

有效性的定义为：设 $\vec{\theta}_1$，$\vec{\theta}_2$ 是未知参数 θ 的两个估计量，若对于大于 0 的任意常数 C，有 $P(|\vec{\theta}_1-\theta|<C)\geqslant P(|\vec{\theta}_2-\theta|<C)$，则称 $\vec{\theta}_1$ 比 $\vec{\theta}_2$ 有效。可以看出有效性反映了估计量分布的集中程度，估计量的分布越是集中在参数真值附近，其效率越高。

为了方便，常常不直接利用上述定义来检验估计量的有效性，而是采用更直观的提法：若 $\vec{\theta}_1$、$\vec{\theta}_2$ 是未知参数 θ 的两个无偏估计量，若 $D\vec{\theta}_1<D\vec{\theta}_2$，则称 $\vec{\theta}_1$ 较 $\vec{\theta}_2$ 有效。

一般地，若 $\vec{\theta}_1$ 是 θ 的一个无偏估计，它对于 θ 的任一无偏估计 $\vec{\theta}_2$ 成立 $D\vec{\theta}_1<D\vec{\theta}_2$，则称 $\vec{\theta}_1$ 是 θ 的最小方差无偏估计。

(3) 充分性。如果一个估计量充分地利用了样本中所包含的，用以估计参数的全部信息，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估计量。即若 $\vec{\theta}$ 是 θ 的充分统计量，那么，就没有其他的统计量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 θ 的信息。统计量 $\vec{\theta}$ $(x_1,x_2,\cdots,x_n)$ 可以看作是对原始资料加工的结果，这种加工应该抓住问题的实质，丢掉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满足这种要求的统计量，就是充分统计量。

其数学定义如下：令 $x_1,x_2,\cdots,x_n$ 是抽自分布密度为 $f(x,\theta)$ 的总体 x，θ 为参数，若给定统计量 $\vec{\theta}_1$ 时，其他统计量 θ^* 的条件分布 $P(\theta^*/\vec{\theta})$ 与总体参数 θ 无关，则称 $\vec{\theta}$ 为 θ 的充分统计量。

(4) 一致性。它指的是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统计量将不断趋近于所估计的总体参数。在 $n\to\infty$ 时，估计值与总体参数完全一致。显然样本平均数这一统计量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因为根据切比雪夫不等式 $P(|\bar{x}-u|>\varepsilon\leqslant\frac{\sigma_{\bar{x}}^2}{\varepsilon^2}=\frac{\sigma^2}{n\varepsilon^2}$，当 $n\to\infty$ 时，$\frac{\sigma^2}{n\varepsilon^2}\to0$，也即 $P(|\bar{x}-u|<\varepsilon=1$。

一致性的数学定义如下：设 $\vec{\theta}$ $(x_1,x_2,\cdots,x_n)$ 为未知参数 θ 的估计量，若对于任意的 $\varepsilon>0$ 和 $\theta\in\Omega$，有 $\lim\limits_{n\to\infty}P(|\vec{\theta}-\theta|<\varepsilon)=1$，则称 $\vec{\theta}$ 为 θ 的一致估计量。

八　画

经济周期指示数字（Cyclical Indicators）　这是美国经济分析局编制和公布的一套指示数字，以反映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套数字分为三个部分：周期指标、综合指标、扩散指数及变动率。

1、周期指标

周期指标可以按经济活动划分为7大类，它们是：1.就业和失业；2.生产和收入；3.消费、商业、订单和交货；4.固定资本投资；5.库存和库存投资；6.价格、成本和利润；7.货币和信贷。它包括111个单个项目。如在"生产和收入"类中，包括了个人收入、工业生产指数等。

2. 综合指标

它是反映经济周期的一套指标。它又可以分为三套指标，即领先指标、大体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这里的所谓领先、大体一致和滞后都是针对经济周期的参考转折点而言的。参考转折点由国民经济研究局确定，它反映总体经济活动达到经济周期的高点（繁荣）或低点（萧条）的时间。领先指标常能预示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到来。大体一致指标则可以说明经济发展处于周期中的哪个阶段，滞后指标则说明某一个阶段已经过去。

综合指标和周期指标是交义分类的，只是选择的指标通常是更为常用的指标，只包括22项。表1列出了这22项指标以及它们按经济活动分类时的归属。

表　22个综合指标

经济活动 综合指标	1.就业和失业	2.生产和收入	3.消费、商业、订单和交货	4.固定资本投资	5.库存和库存投资	6.价格成本和利润	7.货币和信贷
领先	A_1		A_3	A_5 A_6	A_7	A_8	A_{10}
指标	A_2		A_4	A_{12}		A_9	A_{11}
大体一致指标	B_1	B_2 B_3	B_4				
滞后指标	C_1				C_2	C_3	C_4 C_5 C_6

这22项综合指标的具体名称是：

领先指标：

A_1.制造业生产工人或非管理人员平均每周劳动小时数。

A_2.每周平均初次申请失业保险金的人数。

A_3.制造业消费品和原材料新订单（1982年价格十亿美元）。

A_4.卖主向公司推迟交货占的比例（%）。

A_5.厂房和设备的合同及订单（十亿美元）。

A_6.地方当局批准建筑的私人住宅数（1967＝100）。

A_7.手头库存和未交货库存变动（年率，十亿美元）。

A_8.敏感材料价格变动（%）。

A_9.500种普通股票价格（1941～1943＝100）。

A_{10}.货币供应量（M_2）（1982年价格，十亿美元）。

A_{11}.企业及消费者未偿还信贷变化（年率，%）。

A_{12}.企业净增数，指数。

大体一致指标：

B_1.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

B_2.工业生产指数；

B_3.个人收入（不包括转移付款）。

B_4.制造业及商业的销售额。

滞后指标：

C_1.平均失业时间（周）；

C_2.制造业和商业存销比例（%，按1982年价格计算）。

C_3.制造业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

C_4.平均优惠利率（%）；

C_5.工商业未清偿借款（百万美元，1982年价格）。

C_6.消费者分期付款信贷占个人可支配收入比例（%）。

综合指标中的各项指标几经变动，排列顺序也几经修改，这里列出的是美国《商情摘要》1987年12月所公布的指标。

3. 扩散指数及变化率。

所谓扩散指数，是由许多数列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组数列。假设某项指标（如工业生产指数）只包括

四种产量。

产品	上年产量	当年产量	当年与上年变化
A	12	11	0
B	38	40	1
C	50	60	1
D	70	70	0.5

这里的变化，不是将两年的产量相除，而是下降用0表示，增加用1表示；相等用0.5表示，四项相加为2.5。

四种产量的扩散指数为：

2.5÷4=0.625=62.5%

如果多数数列是上升的，则指数在50%以上；如果多数是下降的，指数则在50%以下。因此，上述结果表示多数产品的产量是上升的。扩散指数最多不超过100%，最低不少于零。

变化率是对综合指标及其它指标（如GNP）的时间数列，计算的变化率。

扩散指数及变化率可以按不同时间间隔计算，如1月、3月、半年等。

经济增长模型 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经济增长的模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按照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和投资等于储蓄、供求趋于均衡的观点，一定时期的储蓄量将全部转化为投资量，即：

投资量（I）＝储蓄量（S）

或：投资率＝储蓄率，用公式表示，为

$$\frac{I}{Y}=\frac{S}{Y}$$

其中，Y表示为总产量或国民收入。

设经济增长量为△Y，经济增长率为$\frac{\triangle Y}{Y}$,则有

$$\frac{\triangle Y}{Y}\times\frac{I}{\triangle Y}=\frac{I}{Y}=\frac{S}{y}$$

经济增长率×资本系数＝储蓄率

这就是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表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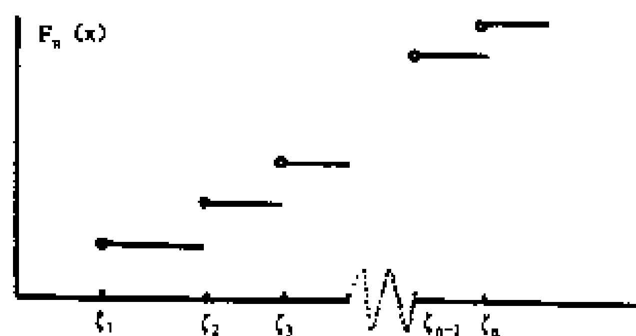
经验分布函数（Empiric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对随机变量ξ进行一系列独立观察，把所得到的ξ的观察值依大小次序排列为：

$\xi_1<\xi_2\cdots<\xi_n$

那么下面的函数

$$F_n(x)=\begin{cases}0 & x<\xi_1\\ \frac{K}{n} & \xi_k\leqslant x<\xi_{k+1}\quad(k=1,2,\cdots,n-1)\\ 1 & x>\xi_n\end{cases}$$

称为经验分布函数或样本分布函数。它的值等于样本观察值ξ中不超过x的个数除以n。其图形为一阶梯曲线（见图）。



由大数定律可知，当n→∞时，某一事件发生的频率将趋近于它的概率。设F（x）为总体的分布函数，格列汶科定理证明：当n→∞时，$F_n(x)$与$F_{(x)}$之间在所有的x值上的最大的差（一般用D_n表示）以概率为1收敛于0。即：

$$D_n=\sup_{-\infty<x<+\infty}|F_n(x)-F(x)|,P(\lim_{n\to\infty}D_n=0)=1.$$

试验设计（Experiment Design） 试验设计是统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由英国统计学家费歇尔与他的合作者叶茨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奠定和发展起来的。

试验设计，其对象是获取数据，它与分析数据的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在某一设计之下，获取的数据有良好而方便的统计方法，则该设计就是好的。试验设计的目的，在于在试验中消除系统性干扰因素的影响，而尽可能缩小随机性误差的影响，使试验者能在耗费较少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得到科学的分析结论。试验设计广泛用于企业生产、农业田间试验等领域，所使用的方法有完全随机化设计、随机区组设计、平衡不完全随机区组设计、拉丁方设计、等等。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在方差分析中，人们把对象划分成几个不同类型的小总体，称为"处理"，分别用ξ_1，ξ_2，…，ξ_k表示，划分的标志称为因素和因子。只按一个因素分类的方差分析，称为单因素方差分析，如将同一种种子播种在不同的地块上，分析不同"处理"间的差别。处理可以是主观确定的，也可以是随机选择的。前者称为固定效应模型，后者称为随机效应模型。在进行方差分析时，在不同的处理$\xi_1,\cdots\xi_n$中，将同时安排若干个实验或抽取若干个样本进行观察，因此，它也是以部分来推断总体的一种方法。在单因素分析时，设ξ_j的总体平均数为u_j，则方差分析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的假设检验。

$H_0:u_1=u_2=\cdots=u_j,H_1:$这j个平均数不完全相

等。

为了检验上面的假设是否成立，我们在各个 ξ_j 中安排 n_j 个试验或随机地抽取若干容量为 n_j 的样本，各样本的观察值用 X_{ij} 表示，X_{ij} 表示第 j 种处理中的第 i 个样本单位的观察值。假设共有 k 种处理，那么，各种处理的样本数据如表所示

	处理					
	1	2	…	j	…	k
观察值	x_{11}	x_{12}	⋮	x_{1j}	⋮	x_{1k}
	x_{21}	X_{22}		x_{2j}		x_{2k}
	⋮	⋮		⋮		⋮
	$x_{n_1}1$	$x_{n_2}2$		$x_{n_j}j$		$x_{n_k}k$

其中：$n_1,n_2,\cdots,n_k$ 之间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相等。

方差分析模型有以下假设条件：

1.设观察值 X_{ij}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常数项 u_j，一部分是随机误差 ε_{ij}，因此，X_{ij} 也是一个随机变量。

2.观察值的随机误差 ε_{ij} 是一个独立的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因此，X_{ij} 也是独立的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3.各种处理中，$E(\varepsilon_{ij})=0$,，所以 $E(X_{ij})=u_j$

4.各个观察值的方差相同，即 $D(X_{ij})=D(\varepsilon_{ij})=\sigma^2$

综合以上假设，可知 $X_{ij}\sim N(u_j,\sigma^2)j=1,2,\cdots,K,i=1,2,\cdots,n_j$ 并且 $X_{ij}=u_j+\varepsilon_{ij}$ 称为方差分析的线性模型。

在进行具体分析时，首先计算观察值的总离差平方和。

$$SST=\sum_{i=1}^{n_j}\sum_{j=1}^{K}(x_{ij}-\bar{x})^2$$

其中：$\bar{x}=\sum_{i=1}^{n_j}\sum_{j=1}^{K}x_{ij}\Big/\sum_{j=1}^{K}n_j=\frac{T}{N}$

将公式简化后得：

$$SST=\sum_{i=1}^{n_j}\sum_{j=1}^{K}x_{ij}^2-\frac{T^2}{N}$$

其中：$T=\sum\sum x_{ij}$，$N=\sum_{j=1}^{K}n_j$

处理间平方和用 SSA 表示：

$$SSA=\sum_{j=1}^{K}n_j(\bar{x}_j-\bar{x})^2$$

$$=\sum_{j=1}^{K}\frac{T_j^2}{n_j}-\frac{T^2}{N}$$

其中：$T_j=\sum_{i=1}^{n_j}X_{ij}$

处理内平方和用 SSE 表示：

$$SSE=\sum_{i=1}^{n_j}\sum_{j=1}^{K}(X_{ij}-\bar{x}_j)^2=\sum_{i=1}^{n_j}\sum_{j=1}^{K}x_{ij}^2-\sum_{j=1}^{K}\frac{T_j^2}{n_j}$$

或 $SSE=SST-SSA$

然后，将 SSA 和 SSE 分别除以其自由度，得到方差 $S_{间}^2$ 和 $S_{内}^2$。将这些结果列成一个表，就是方差分析表。

方差分析表

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方差	F 值	临界值
处理间	K-1	SSA	$S_{间}^2$	$\frac{S_{间}^2}{S_{内}^2}$	$F_\alpha(K-1,N-K)$
处理内	N-K	SSE			
总和	N-1	SST	$S_{内}^2$		

最后，作出统计判断。(1) 确定显著性水平 α 后，查第一自由度 k-1，第二自由度 N-K 的 F 分布表，得 $F_\alpha(K-1,N-K)$.(2)若实际计算的 $F<F_\alpha$，接受原假设 H，结论为差异不显著，即不能推翻 k 个"处理"的总体平均相等这一假设。(3) 若 $F>F_\alpha$ 时，拒绝 H_0，推断为有显著差异、即 K 种处理的总体平均数亦非完全相等。

非参数回归（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没有 α 维自变量 X 与 1 维因变量 Y。X、Y 都假定为随机的。以 $(X_1,Y_1)\cdots,(x_n,Y_n)$ 记 (X,Y) 在 n 次观察中所取的值，并假定它们是独立同分布的。

假定 Y 的均值存在，即

$E|Y|<\infty$

则回归函数

$f(x)=E(Y|X=x)$

存在。对 f (x) 的形状不加任何限制，就是说，对 f (x) 一无所知，要利用样本 (X_i,Y_i)，$i=1,\cdots,n$.对指定的 X 值，去估计 f(x)。在这里，由于 f 不只是依赖有限个参数，故不存在参数估计的问题，因而也没有相应的参数检验问题。

在统计学上，这种形式的回归称为非参数回归。"参数"和"非参数"构成的统计问题的一种分类：如果样本分布的数学形式已知，而只包含若干个未知参数，则有关的统计问题（或统计模型）称为参数性的，否则是非参数性的。

非参数统计（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非参数统计是对应于参数统计而言的。在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中，都要求我们对于总体分布有所了解，并在这个前提下利用样本统计量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或检验，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对于总体分布是不了解的，这就要考虑在不了解总体分布的情况下进行估计和检验。在统计学中，对这样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法称

为非参数统计方法。

非线性回归（Nonlinear Regression） 在许多实际问题中，所构造的模型是非线性的（即对于参数是非线性的），而且也无法采用任何变量变换使之变为线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回归分析称为非线性回归。

一般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可以表述为下述形式

$$Y = f(x_1, x_2 \cdots, x_p, \beta_1, \beta_2, \cdots, \beta_k) + u' \quad (1)$$

这里，参数的数目 k 不必等于解释变量的数目 p。如果了解函数 f 的形式，那么，当给定观察值（$x_{i1}, x_{i2}, \cdots, x_{ip}, Y_i, i=1,2,\cdots,n$）之后，就可以估计参数 $\beta_1, \beta_2, \cdots, \beta_k$ 的值 $\overrightarrow{\beta_1}, \overrightarrow{\beta_2}, \overrightarrow{\beta_k}$。在非线性回归的情况下，经典的最小二乘法经常不能直接引用。因此，非线性回归问题就是在满足一定的特别准则下求得参数 $\beta_1, \beta_2 \cdots \beta_k$ 的估计问题。对样本数据，有

$$Y = f(x_1, x_2, \cdots, x_p, \overrightarrow{\beta_1}, \overrightarrow{\beta_2}, \cdots, \overrightarrow{\beta_k}) + e$$

如果仍以 $\sum_i e_i^2$ 达到最小为准则求解 $\overrightarrow{\beta_j}, j=1,2,\cdots k$ 即为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对于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由于其导出的正规方程无法直接求解，所以在具体计算上常采用逐次线性化的方法，逐步迭代逼近。例如，可先给出 $\overrightarrow{\beta_j}$ 的初始值 $\overrightarrow{\beta_{j0}}$，然后把 f 在 $\overrightarrow{\beta_{j0}}$ 的领域内用泰勒级数展开的方法予以线性化。然而，对于非线性估计问题，目前还找不出一个最好的估计方法，因为一个方法既要收敛性能好，又不需要太多的计算，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对非线性估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事件（Event） 在随机试验中所可能出现的结果称为随机事件，简称为事件。试验中所出现的不可再分的事件称为基本事件。包括一个以上基本事件的随机事件称为复合事件，在试验中必定发生的事件称为必然事件，在试验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称为不可能事件。

例如，抛掷一枚骰子可能有 6 种结果，即出现 1，2，3，4，5，6 点，那么，每抛掷一次骰子所出现的结果就是一次随机事件。因为我们事前不知道会出现几点，1，2，3，4，5，6 点都为基本事件，抛掷的结果大于 3 点就是一个复合事件，它包括 4，5，6 点三个基本事件；出现大于等于 1 和小于等于 6 的点数就是必然事件；出现 7 点则为不可能事件。

一个随机试验往往包含多个事件，这些事件之间会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1.包含：若事件 A 的发生必然导致事件 B 的发生，则称事件 B 包含事件 A，记为 $A \subset B$。如在掷骰子中，事件 A 为出现 1 点，事件 B 为出现奇数点，则出现 1 点时，奇数点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所以 $A \subset B$。

2.等价：若事件 A 的发生导致事件 B 的发生，事件 B 的发生也导致事件 A 的发生，即 $A \subset B$ 且 $B \subset A$，则称事件 A 与事件 B 等价，记为 $A = B$。如在掷骰子时，事件 A 为出现 1，3，5 点，事件 B 为出现奇数点，则 $A = B$

3.和（并）：事件 A 与事件 B 至少有一个发生的事件称为 A 与 B 的和或 A 与 B 的并，记为 A+B 或 $A \cup B$。如在掷骰子时，事件 A 为出现奇数点，事件 B 为出现小于 3（不包含 3）的点，则事件的和 A+B 为出现 1，2，3，5 点。

4.差：表示事件 A 发生而事件 B 不发生的事件称为事件 A 与事件 B 的差，记为 A—B。如在掷骰子时，事件 A 为出现奇数点，事件 B 为出现小于 3 的点，则事件的差 A—B 为出现 3，5 点。

5.积（交）：表示事件 A 与事件 B 同时发生的事件称为事件 A 与事件 B 的积或交，记为 AB 或 $A \cap B$。如在掷骰子时，事件 A 为出现奇数点，事件 B 为出现小于 3 的点，则事件 A 与事件 B 的积 AB 为 1 点。

6.互斥：若事件 A 与事件 B 不可能同时发生，即 AB 是一不可能事件，则 A 与 B 是互斥的，或互不相容的，记为 $AB \neq 0$。如在掷骰子中，A 为出现奇数点，B 为出现偶数点，则二者不可能同时发生，即为互斥的。

7.对立：若事件 A 与事件 B 互斥，则在每次试验中事件 A 与事件 B 必有一个发生，则称事件 A 是事件 B 的对立事件，或称事件 B 是事件 A 的对立事件，记为 $A = \bar{B}$ 或 $B = \bar{A}$。如在掷骰子时，事件 A 为出现奇数点，事件 B 为出现偶数点，二者就是对立的。

抽样分布（Sampling Distribution） 利用估计量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就需要知道估计量的分布。由于估计量是用于估计的统计量，而了解这些统计量的分布就成了抽样判断的基础。

在统计学中，对于抽样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对于任意的一个自然数 n，要找出给定的统计量 $U_n = f(x_1, x_2, \cdots, x_n)$ 的分布，这种分布称为这个统计量的精确分布。当样本容量比较小的时候，这类分布尤其有用，这就是统计学中的所谓小样本问题。我们常用的 t 分布、x^2 分布、F 分布等，都属于这样一类分布。一般地说，要确定一个统计量的精确分布是比较复杂的，但对于正态总体，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第二类问题是，不对任何个别的 n 求出统计量 U_n 的分布，而着眼于当 $n\to\infty$ 时，统计量 U_n 的极限分布，这种分布对统计研究中的所谓大样本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类分布中，正态分布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其统计量精确分布的数学分析比较容易，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对许多领域的统计研究中所遇到的总体，正态分布都是一个很好的近似。中心极限定理则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

抽样平均误差与样本容量　在简单重复抽样的情况下，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平均误差 $\sigma_{\bar{x}}$ 的公式为：

$$\sigma_{\bar{x}}=\frac{\sigma}{\sqrt{n}}=\frac{\text{总体标准差}}{\sqrt{n}}$$

由于对于指定的总体来说，σ 总是一个常量，所以要想缩小 $\sigma_{\bar{x}}$，就必须增加样本容量 n。假定总体标准差 σ = 100，当样本容量 n = 30 时，$\sigma_{\bar{x}}=\frac{100}{\sqrt{30}}=18.26$，当样本容量 n = 3000 时，$\sigma_{\bar{x}}=\frac{100}{\sqrt{3000}}=1.826$。这就是说，要把 $\sigma_{\bar{x}}$ 缩小到原来的 $\frac{1}{10}$，就必须把 n 扩大 100 倍。

抽样单位数越多，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越大，但是与此同时，又可能增加调查费用。因此，在试验之前，常常先给出一个允许的误差范围，以满足精确性和费用开支两方面的要求。设允许的误差 $\triangle_{\bar{x}}=h\sigma_{\bar{x}}$，则可以由此推出必要的抽样数目：

$$\triangle_{\bar{x}}=h\sigma_{\bar{x}}=h\sqrt{\frac{\sigma^2}{n}}$$

$$n=\frac{h^2\sigma^2}{\triangle_{\bar{x}}^2}$$

对于其他的抽样组织方式，也可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处理。

抽样误差与抽样平均误差　总体参数与样本统计量之间的差异称为抽样误差。若用样本平均数作为总体平均数的估计量，它们之间的差异 $\bar{x}-\bar{X}$ 就是抽样误差，它是由抽样的随机性引起的。由于抽样误差是随着抽取的样本变化而变化的，它是一个随机变量。

若将总体中所有可能样本都取出来，并对各个样本的抽样误差求其平方和，然后再除以所有可能的样本数目，将所得到的值开平方以后得到的结果就叫作样本平均误差。对于纯随机抽样来说，抽样平均数的抽样平均误差为：

$$\sigma_{\bar{x}}=\sqrt{\frac{\sum(\bar{x}-\bar{X})^2}{\text{可能的样本数}}}$$

由于所有可能的样本平均数的平均数正好等于总体平均数，因此，$\sigma_{\bar{x}}$ 实际上是样本平均数的标准差，也叫作抽样标准误差。利用 $\bar{x}$ 和 $\sigma_{\bar{x}}$ 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可以用正态分布表估计总体平均数 $\bar{x}$，并在一定的概率保证下给出其置信区间。例如，$\bar{X}$ 落在 $\bar{x}\pm1.96\sigma_{\bar{x}}$ 这个区间内的概率是 95%。

类型抽样（Stiatified Sampling）　类型抽样也叫分层抽样。类型抽样不象纯随机抽样那样直接从总体中抽取样本，而是先把总体按一定的标志划分为许多性质相似的类型或组别，然后在每种类型或组别中抽取样本单位。

从各类型中抽选样本单位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方法是按各类型在总体中所占的比重，来分配样本单位，然后在各类型中按所分配的数目随机地抽取单位。设总体单位数为 N，将总体分为 M 组，每组的总体单位数为 Ni（i = 1、2、n…M）由于抽取的样本容量为 n，则在各类型组中应抽取的样本单位数为 $n_i=\frac{Ni}{n}\cdot n$。由于各类型组中应抽取的样本的数目是按各类型组占总体的比重来分配的，这种方法称为类型比例抽样。

另一种方法是在各类型中随机地抽取相同数目的单位。如将总体单位数为 N 的总体分为 M 组，从中抽取容量为 n 的样本，则不论大小每组一律抽取 $\frac{n}{M}$ 样本单位。

如果总体分布不均匀，各单位间的差别较大，或者所获得的有关资料是分组资料，那么，采用类型抽样比较合适。因为通过分组，将使总体中性质比较接近的单位归为一组，这样，虽然总体中各单位性质差异较大，但对于各组而言，各组内的差异却是比较小的。这样，就能提高估计的准确性。

在类型抽样条件下，由于从各组分别取样，要先计算各组的样本平均数。

设将一个总体容量为 N 的总体划分为 M 组，则在 M 组中每一组的单位数为 $N_1,N_2,\cdots,N_M$，且 $N_1+N_2+\cdots N_M=N$。

从中抽取容量为 n 的样本，则每一组中抽取的单位数为 $n_1,n_2,\cdots,n_m$，且 $n_1+n_2\cdots+n_m=n$。

这时，各样本组的组平均数为：

$$\overline{x_i}=\frac{\sum_{j=1}^{m}x_{ij}}{n_i}\qquad(i=1,2,\cdots,m)$$

在各样本组平均数的基础上可以得到总的样本平均数：

$$\overline{X_{st}}=\frac{\sum_{i=1}^{m}\overline{x_i}N_i}{N}$$

抽样平均误差为：

$$\sigma_{\bar{x}}=\sqrt{\sum_{i=1}^{k}\frac{\sigma_i^2}{n_i}(\frac{N_i}{n})^2}$$

其中，σ_i 为第 i 组的总体标准差。

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从所研究的总体中抽取一部分样本，用于推断总体情况的一种调查。从总体中抽取样本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随机抽样，又叫概率抽样；另一种是不随机抽样，即非概率抽样，又叫作代表性选择。概率抽样的特点是，总体中的任何单位都有被抽做样本的均等机会，即按照随机原则从总体中选取样本；而代表性选样则是抽样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的要求，从总体中有目的地选择一些单位作为样本。在随机抽样中，由于知道总体每个单位出现的概率的大小，所以可以运用数学方法，根据样本统计量估计总体参数。随机抽样的组织方式可分为四种：简单随机抽样、机械抽样、类型抽样、整群抽样。随机抽样在我国农产量调查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代表性选样是按一定标准，有意识选择若干合乎标准的调查单位，作为代表的选择，通过对这部分有代表性的单位加以调查，分析计算，推论总体。编制价格指数时就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限制性生产和综合性生产（Restrictive and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限制性生产和综合性生产，指的是在计算国民收入时对于生产这个概念的两种不同理解。在今天，限制性生产观点指的是在计算国民收入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才生产国民收入。而综合性生产观点认为，不仅物质生产部门生产国民收入，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服务也生产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这个概念总的来看是一个生产概念，它起源于威廉·配第（1665 年）利用英国的居民的收入对于英国生产规模的估算。虽然称为“收入”，反映的却是“生产”。威廉·配第的估算中，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也包括服务。是最早按综合性生产观点估算的国民收入。

限制性生产的观点主要起源于法国十八世纪的重农学派，其代表人物费朗索瓦·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中，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收入，其它部门的活动都是对农业收入的再分配，这是最早的限制性生产的观点。后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此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物质产品的生产都创造价值，生产国民收入。这是发展了的限制性生产的观点。在威廉·配第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早期进行的国民收入统计，坚持的都是限制性生产观点。但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演变，限制性生产的观点逐渐被西方经济学家们所放弃，各国在进行国民收入统计时，都开始采用综合性生产的观点，即在国民收入中，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价值，也包括服务的价值。

苏联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国民收入统计时，坚持的是限制性生产的观点，即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新创造的价值才能计入国民收入。中国在建国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按这个口径统计国民收入。这样做的原因，是苏联经济学家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的就是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国民收入也是物质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但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从整体上看，是属于综合性生产观点的，只是在前三卷《资本论》中，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抽象掉了非物质生产的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的经济管理和国际对比客观上需要一个指标，来综合地反映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领域的总的生产活动的成果。因此，中国现在不仅按限制性生产观点计算窄口径的国民收入生产额，也按综合性生产的观点计算宽口径的国民收入生产额，即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国内生产总值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对于经济活动产出额的一个基本计量。它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国家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中，首先要回答的是什么是经济活动。在 SNA 中，经济活动首先包括那些以在市场上出售货物和服务为目的的生产，也包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管理活动、国防、司法、教育、公共服务等。一旦经济活动或生产的界限被确定，就可以用三种方法计算它。

第一种方法是生产法，即从各个生产者的总产出中扣除掉中间消耗部分（不包括折旧），剩下来的就是各位生产者的增加值。将各生产者的增加值按部门归类后再汇总，再加上或减去一些调整项目，得到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表 1 列出的就是英国 1982 年的按生产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 1　英国 1982 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
（生产法）　　单位：百万英镑

1.农业、狩猎业、林业、渔业	5752
2.采矿业和采石业	17869
3.制造业	57105
4.电力、煤气、水	7555

5.建筑业	13480
6.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饮食和旅馆业	29971
7.运输、储藏和通讯业	17164
8.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经营服务业	43730
9.公共、社会和个人服务业	12368
产业部分总计	204994
政府服务生产者	36493
其它生产者	3480
合　计	244967
减：估算的银行服务费用	12258
加：进口税	26260
加：增加值税	14255
加：统计误差	50
等于：国内生产总值	273274

第二种方法是成本法。它考虑的是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即雇员报酬、间接税、固定资本损耗和营业盈余的情况，将这些项目加起来，就是生产者的增加值。而如果将全社会的同类项目先归并起来，再进行汇总，就得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它的成本构成。表2列出的就是用成本法计算的英国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

表2　英国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

（成本法）　单位:百万英镑

1.间接税净额	40515
A.间接税	46024
B.减：津贴	5509
2.固定资本损耗	33057
3.常住生产者支付的雇员报酬	155339
付给：A 常住居民	155041
B 国外	298
4.营业盈余	44314
A：公司和准公司企业	17552
B：民间非公司企业	24072
C：一般政府	2060
统计误差	50
等于：国内生产总值	273275

第三种方法是支出法，它从最终使用的角度研究国内生产总值的去向，即从私人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方面来研究国内生产总值的作用。表3列出的，就是英国1982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支出。

表3　英国198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的支出

（按现价计算）单位:百万英镑

1.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60179
2.私人最终消费支出	165916
A.居民	162635
B.为居民服务的民间非营利机构	3281
3.总资本形成	41010
A.储备增加	−1162
B.总固定资本形式	42172
4.货物和服务的出口	73703
5.减：货物和服务的进口	67534
等于国内生产总值	273274

由于三种方法从不同侧面分项列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只要再增加一些补充资料，就可以顺利计算出与之关联的其它指标。表4列的就是一系列与之有关的国民经济的总量指标以及它们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这些指标都属于广义的国民收入指标。

表4　英国1982年国民经济总量指标间的联系

单位：百万英镑

国内生产总值	273274
加：由国外获得的要素收入	9476
减：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	8222
等于：国民生产总值	274528
减：固定资本损耗	33057
等于：国民收入	241471
加：由国外获得的现期转让净额	−2112
等于：国民可支配收入	239359
减：最终消费	226059
统计误差:	−50
等于：净储蓄	13214
减：国民在现期交易的剩余	5311
统计误差	50
等于：净资本形成	7953

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s GNP）

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来的货物跟服务的总额。由于在国民生产总值内未扣除固定资本损耗，它仍然是一个“总”额数字。如果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固定资本损耗，就获得了国民生产净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它被称为按市价计算的国民收入。

表1　美国1989年国民生产与生产帐户总表

单位：十亿美元

雇员报酬	3079.0

业主收入	379.3
个人租金收入	8.2
公司利润及库存估价调整	311.6
净利息	445.1
等于：国民收入	4223.3
加：工商间接税及非税负担	414.0
加：统计误差	-17.0
减：津贴减当前政府企业盈余	6.3
等于：国民生产净值	4646.4
加：固定资本损耗	554.4
等于：对国民生产总值支付的成本	5200.8
个人消费支出	3450.1
私人国民总投资	771.2
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	-46.1
政府购买的货物和服务	1025.6
等于：国民生产总值支付的成本	5200.8

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别，在于它是按照"国民"原则计算的。只要是一个国家的常住居民生产的货物和服务所带来的收入，不论它是在国内生产还是国外生产的，都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而国内生产总值是按照"国土"原则计算的，只包括国内的产值，而不论他是哪国的常住居民生产的，如果对一个国家从"国民"的角度考察它的生产总额，就应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付给国外的要素收入，加上得自国外的要素收入，这样获得的结果，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这是全国经济统计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目前，许多国家公布国民生产总值都采取复式帐户的形式，例如，美国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在国民收入与生产帐户（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中公布国民生产总值数字，表1列出的就是美国1989年的国民收入与生产帐户总表。

国民财富（National Wealth） 国民财富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资料的总和，它包括自然资源和国民财产两大部分。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的产物，不能用货币单位计量，只能用实物单位分别计算。国民财产，指的是某个时点上，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各种财产的总和。

在经济统计上，各国的国民财富和国民财产的处理有所不同。我国计算国民财产、只包括具有实物形态的社会劳动产品，不包括现金、存款等货币形态的金融资产，所以，国民财产只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两大部分。苏联对国民财富的解释有时采取广义的概念，财富不仅包括积累的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而且包括一切文化和精神财富，以及国家居民所积累的生产和技术方面的经验。日本经济统计则把国民财富的范围限制于积累的物质财产，而不包括自然资源。美国经济统计中，国民财富的范围也限于财产，但不仅包括有形财产（即物质财产），也包括无形的财产（如股票、证券等）。

国民收入（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国民收入指的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的劳动所新创造的价值，具体地说，这个概念的涵义可以表述如下：国民收入，从价值方面看，是全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总量；从使用价值方面来看，国民收入是新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有生产法、分配法和最终使用法。采用生产法和分配法的计算对象是国民收入最终使用额。

（1）国民收入生产额计算的"生产法"。

用生产法计算国民收入生产额，就是从各部门的总产值中，分别扣除其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分别得到各部门的净产值，然后，再把各个部门的净产值加总在一起，所获得的就是国民收入生产额。

（2）国民收入生产额计算的"分配法"。

根据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指标倒算国民收入生产额的方法，通常称为"分配法。它包括两大部分的计算，一是物质生产领域内劳动者的原始收入，二是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纯收入及农村经济纯收入。

劳动者的原始收入，指的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取得的劳动报酬，它包括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职工的工资和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农村居民净收入和城乡个体经济净收入。

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纯收入指的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提取的税金、利润、利息支出和其他纯收入。农村经济纯收入主要指的是农村经济的集体提留和交纳的税收。

将以上两大部分相加，得到的就是国民收入生产额。

从原理上说，用生产法和用分配法计算的国民收入生产额，结果应该是相等的，但在实际计算中，常常由于各种具体处理上的原因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种误差，称为统计误差。

（3）国民收入最终使用额计算上的"最终使用法"。

国民收入生产额经过分配与再分配，形成最终收入总额。最终收入总额加上进口额减去出口额，就是国民收入可供使用额，国民收入可供使用额减去本期损失，就等于国民收入最终使用额，国民收入最终使用额按其最终使用的用途，则可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

消费基金是当年生产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是以

货币表现的用于居民个人和社会集团实际消费的那部分物质产品，它的实物形态是消费品。积累基金是当年生产的国民收入中的另一部分，是以货币表现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非生产基金和建立物资储备的那部分物质产品，它的实物形态是扩大再生产用的生产资料和当年未消费的消费品。

用最终使用法计算国民收入，就是分别统计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数额，然后加以汇总，得到的就是国民收入最终使用额，将它加上本期损失，就可以倒算出国民收入可供使用额，在可供使用额中减去进口加上出口，得到的就是国民收入生产额的数字。

国民收入（市场经济国家）（National Income in the Market Economies） 在市场经济国家，"国民收入"统计数字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广义的国民收入，它指的是和一个国家和生产，支出和分配有关的一系列统计数字，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支出，国民收入，等等。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经常提到的国民收入统计，指的就是对这样一系列统计数字的核算。经济学中讨论的国民收入，指的常常就是这种广义的国民收入。二是狭义的国民收入，它是广义的国民收入中的一个具体指标，它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一切国民通过提供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管理、劳动）而获得的收入。

国民收入的核算起源于1665年威廉·配弟对英国国民收入的估算。它首先根据英国的人口和估算的人均收入，估计出英国的食物、服装等方面的支出，然后，又估计出财产带来的收入，最后，由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的假定出发，从总支出中扣除财产收入，计算出劳动收入。这个估算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综合性生产观点，二是复合帐户，三是平衡估算。这三个特点在今天的国民收入核算中都被保留了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虽然称为收入，但从广义上看，它不仅是一个分配指标，而且是从不同侧面反映生产（不同的生产要素取得不同的收入，如劳动收入，财产收入等）和支出（居民用收入购买服装，食物等）方面的情况。从原理上说，这三个方面的总量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经济分析的需要，在确定指标口径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再加上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处理上的问题，由三个方面核算所得到的数字常有出入。

狭义的国民收入，也称为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民收入。指的是劳动和财产从生产货物和服务中获得的全部收入。它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一切个人及企业所获得的收入。这一总额计算数字可以直接将各种形式的雇佣人员报酬，业主收入，租金收入，利息收入净额和公司营业盈余汇总求得，也可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间接税，工商转让支付，折旧，再加上津贴与政府企业盈余之间的差额，来计算国民收入。

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分类 这是世界各国在经济统计中采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它根据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同发展阶段，将国民经济依次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来看，封建社会的生产重点为农业，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之后，生产重点又逐渐转移到矿业、制造业及建筑业。而到了现代，生产重点又从工业转移到服务生产领域。目前，世界各国三次产业的划分大体如下：

第一次产业，也称为初级生产。内容一般以农业为主，包括林、渔、猎等等。

第二次产业，也称为次级生产。内容一般以制造业为主，包括采矿业、建筑业等。

第三次产业，也称为第三级生产，内容一般以服务业为主，包括运输、交通、电力煤气、公用事业等的服务；商业、金融、保险等流通方面的服务；科研、教育、新闻、广播、电视等信息方面的服务；娱乐、饮食、旅游等个人生活消费方面的服务等。

在具体划分上，各国有一些具体的区别，例如，有人认为矿业产品直接取自于自然界，与农产品类似，应归人初级生产；对于公用事业（煤气、水、电等），有人认为应列为次级生产。

我国现行三次"产业"划分的内容是：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第三产业，除上述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它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又具体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即：第一层次为流通部门，包括交流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与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国民经济部门分类（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把国民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人口以及生产成果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称为国民经济部门分类。一般地说，对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分类，可以有三个划分标准，一是生产成果使用价值的接近性，一是生产过程的接近性，一是使用原材料的接近

性，而在进行国民经济部门分类时，通常是以生产过程的接近性进行一级划分，如划分采掘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然后再按其它标准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各国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了自己的分类体系，以便于搜集整理统计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为了国际比较的便利，联合国还公布了《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部门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简称 ISIC）。该分类共分为四级，第一级为部门，以下再继续细分，一级分类为：1.农业、狩猎业、林业、渔业；2.采矿业和采石业；3.制造业；4.电力、煤气、水；5.建筑业；6.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饮食和旅馆业；7.运输、储藏和通讯业；8.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经营服务业；公共、社会及个人服务业。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部门分类使用的是 198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代码》。在这个分类中，国民经济各行业划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小类四级。共有十三个门类，99 个大类，310 个中类，600 多个小类。十三个门类是：Ⅰ、农、林、渔、水利业；Ⅱ工业；Ⅲ地质普查与勘探业；Ⅳ建筑业；Ⅴ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Ⅵ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质供销和仓储业；Ⅶ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Ⅷ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Ⅸ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Ⅹ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事业；Ⅺ金融、保险业；XII 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XIII 其它行业。

国民资产负债表（National Balance Sheets）

国民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有关一国经济在某时期终了时的资产、负债和净值的存量及国民财产的存量，它是生产与收支、储蓄与投资、贷出与借入的结果。一个经济在资产上的增值，是净产出的未被消费的部分在存量上的投资，它通过一切部门的储蓄来筹措资金。但由于每一单位、每一部门的储蓄与其所投资的有形资产往往是不相对应的，于是资金有盈余的部门或单位就直接地，或是通过金融中介间接地将多余的资金贷给资金有所不足的部门或单位，由此引起金融债权债务的变动。结果，资金流量表上有形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变动就反映到了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上，而借款和储蓄的变动则反映到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与净值上。

如果已具备期初的国民资产负债表，那么还可以把期初情况和本期的流量结合起来，编制期末资产负债表，表（1）所列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期初资产与期初负债和

表（1）　　期初和期末国民资产负债表

	期初资产	资产的获得	资产重估计	期末资产		期初负债和净值	负债的发行	负债重估计	期末负债和净值
通货和存款	275	12	0	287	通货和存款	296	14	0	310
证券	457	3	−25	435	证券	442	8	−26	424
其它金融债权	517	43	4	564	其它金融债权	479	37	3	519
有形资产净额	661	28	42	731	净值	693	27	44	764
总计	1910	86	21	2017	总计	1910	86	21	2017

净值的总额是相等的，资产的获得与负债的发行的总额（这一部分实际上是资金流量表的内容）是相等的，重估计是一个调整项目。这里列出的，只是某一个部门的情况，项目也很少，在实际编制时，部门可以按照资金流量表中的机构部门分类，项目也可以进一步细分，那样得到的国民资产负债表将要复杂得多。

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s）　它是用货币反映的一个国家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全部经济往来的记录，采用复式记帐的原理编制。借方用（－）号表示，指付出款项，例如，进口商品要支付货币，就记入借方，出口收入货币，就记入贷方，用（+）号表示，借方与贷方之间的差额，记入收支差额。但也有的时候，不逐项计算收入差额，而建立一项总的"错误和遗漏"，如借方总和大于贷方总和，该项记入贷方，反之记入借方。

一般地说，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平衡项目三大项。

1.经常项目，也称作经常帐户（Current Account），它包括三项收支，贸易收支、非贸易收支和转让收支。

（1）贸易收支，为商品出口和进口所引起的货币收支。出口记入贷方，反映收入；进口记入借方，反映支出。

（2）非贸易收支，是提供服务和使用服务所引起的货币收支。具体包括三项：一是运输服务，二是旅游服务，三是国际投资（或称为财产服务）。对于国际投资，在经常帐户中反映的只是利润、股息、利息等方面的收支，投资本身属于资本帐户。

（3）转让收支。它指的是不等价的物品、服务、金钱等的交换或转让。这方面的往来收支包括：政府和私人的汇款，国家政府间的援助，赔款，私人捐赠等。

2.资本项目，也称资本帐户（Capital Account）

主要指资本的输出和输入，可分为私人和政府两部分，政府和私人的资本又分为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

(1) 长期资本，指向国外购买或出售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有价证券。它主要包括：①政府贷款；②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或外国公司企业的股票、债券（或向国外出售股票、债券）③直接投资；④企业信贷，如中长期出口信贷、银行信贷等。

(2) 短期资本，指期限不到一年的资本。它主要包括：①各国银行之间的调拨、拆放；②国际贸易的短期融通及清算结算；③逃避外汇管制和货币贬值的资本外逃；④套汇、套利、抵补保值等的外汇买卖。

3. 平衡项目（Balancing on Settlement Account）这个项目包括：

(1) 分配的特别提款权。

(2) 官方储备资产，包括黄金、外汇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

(3) 错误和遗漏。在这一项中，实际上包括了部分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

帕克（Park）检验　帕克检验是一种检查回归模型中是否存在异方差的方法。

帕克认为，在存在方差的情况下，σ_i^2 可能是解释变量 X_i 的某种函数。他提出了下列的函数形式。

$\sigma_i^2=\sigma^2X_i^{\alpha_1}e^{U_i}$

两边取对数后

$\log a_i^2=\log a^2+\alpha_1\log X_i+U_i$

式中的 U_i 是随机干扰项。

由于 σ_i^2 是未知的，帕克提议 e_i^2 作为 σ_i^2 的代表，进行下列的回归运算：

$\log e_i^2=\log a^2+\alpha_1\log X_i+U_i$

$=\alpha_0+\alpha_1\log x_i+U_i$

对这个回归方程进行统计检验，如果 α_1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那么就说明数据资料中存在异方差性。如果统计检验不显著，那么，等方差性的假定就被接受。

由此可见，帕构检验由两步组成，第一步是不考虑异方差性，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运算得出回归方程。从这个方程中得到 $\overline{Y_i}$ 的值，并计算出 e_i^2 的值。有了 e_i^2 的数值就可以求它对 X_i 的回归方程，再对 α 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 β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那么，回归方程中就存在着异方差，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变换，消除异方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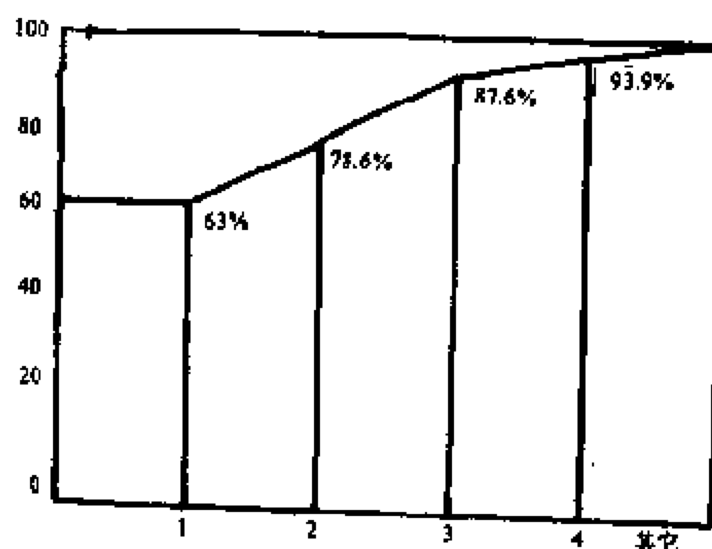
帕克检验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误差项 e_i 进行回归运算时可能并不满足最小二乘估计的假定条件，而且 e_i 本身也可能存在异方差性。这些问题表明帕克检验只能在一定的可靠程度上加以使用。

帕累托（Parato）图　帕累托图是在经济分析和管理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主观因素排列图。这种图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来分析财富分布情况的。他发现了少数人占有社会上的大量财富，而少数人只占有少量财富的情况。后来，美国的质量管理学家朱兰把它的原理用到质量管理中，作为选择关键问题的一种工具。表1列出了某企业不合格品的分类情况，利用这个表的资料就可以建立一个帕累托图。

表1　某企业不合格品情况

原因	数量(个)	占不合格品的比重	累计百分比
1	371	63.0	63.0
2	92	15.6	78.6
3	53	9.0	87.6
4	37	6.3	93.9
其它	36	6.1	100.0
合计	589	100.0	

根据表1的资料就可以画出一个帕累托图（图1）。图中的横坐标表示各种因素。按影响的主次自左至右排列。纵坐标表示频率。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各种原因对不合格品的数量的影响程度。



固定资产　可供长期使用、多次地参加生产或消费过程的劳动资料和消费资料，如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役畜，等等。固定资产应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 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2) 单位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上。限额一般是根据各部门特点和各单位规模大小来分别规定的。不同时具备上述两条件的称为低值易耗品。固定资产按其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使用分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两大类。生产性固定资产包括已使用的生产用固定资产、以及未使用和不需用固定资产中按原定或预定用途属于生产性的固

定资产。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包括已使用的非生产用固定资产，以及未使用和不需用固定资产中按原定或预定用途属于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生产用固定资产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它由于使用而发生的价值损耗，通过折旧分期计入产品成本或商品流通费，并随着产品销售的实现而得到补偿。非生产用固定资产是用于居民消费、社会消费的长期使用的物质资料，如住宅、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建筑物、设备等。未使用固定资产是指新增尚未开始使用和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不需用固定资产则指不适合本单位需要尚待处理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可分别按原值和净值计算。原值指购买或建筑各种固定资产时实际支出的金额，及以后改建或扩建所追加的投资合计。净值指从原值中减去历年提取折旧后的价格。

固定资产投资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或分类标志，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1.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分。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分为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它投资四种：

(1)国家预算内投资。指列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并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包括拨改贷）完成的投资。基本建设国家预算内投资包括国家预算内拨款（中央财政中的基本建设拨款和地方财政中由国家统筹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和由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形式完成的投资、中央财政中的其它专项建设拨款。更新改造国家预算内投资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内更新改造拨款完成的投资。

(2)国内贷款。指利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及其它国内贷款进行的建设工程实际完成的投资。

(3)利用外资。指利用国外资金（包括设备、材料、技术在内）在本国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由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国外贷款完成的投资、利用中国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筹集的外国资金在国内进行的投资，但不包括用我国自有外汇购置的国外设备、材料，也不包括由东欧国家记帐进口的国外设备。

(4)自筹和其它投资。指国务院各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市）、县和企（事）业及行政单位自己筹集的资金（包括各级地方财政贷款）和上述各项以外的资金完成的投资。

2.固定资产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建设项目归哪个行业，按它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用途及社会经济活动种类来确定。基本建设按建设项目归分国民经济行业，更新改造、全民所有制单位其它固定资产投资及城镇集体投资根据整个企业、事业单位所属的行业来划分。一般情况下，一个建设项目或一个企业、事业单位只能属于一种国民经济行业。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各行业间的比例关系，联合企业（总厂）所属分厂属于不同行业的，原则上按分厂划分行业。

3.固定资产投资按建设性区分。建设项目的性质一般分为新建、扩建、改建、迁建、恢复。基本建设按建设项目划分建设性质，更新改造、全民所有制单位其它固定资产投资及城镇集体投资按整个企业、事业单位的建设情况确定建设性质。目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是根据我国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区分的，所以，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都可以分别按新建、扩建和改建等划分。

(1)新建。一般是指从无到有，“平地起家”新开始建设的单位。有的单位原有的基础很小，经过建设后其新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原有固定资产价值（原值）三倍以上的也算新建。

(2)扩建。一般是指为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厂内或其它地点增建主要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独立的生产线或总厂之下的分厂的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在原单位增建业务用房（如学校增建教学用房、医院增建门诊部或病床用房、行政机关增建办公楼等）也作为扩建。

(3)改建。一般是指现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了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以及劳保安全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包括相应配套的辅助性生产、生活福利设施）。有的企业为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进行填平补齐而增建不增加本单位主要产品能力的车间等，也属于改建。

4.固定资产投资按用途分。固定资产投资按不同用途分为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基本建设投资、全民所有制单位其它固定资产投资及城镇集体投资的用途按单项工程确定，现有企业、事业单位更新改造投资的用途按更新改造项目确定。

(1)生产性建设。指直接用于物质生产或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建设，包括农、林、牧、渔、水利建设，工业建设，地质普查和勘探业建设，建筑业建设，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建设，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质供销和仓储业建设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建设等。

(2)非生产性建设。指用于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建设以及其它非物质生产的建设，包括住宅建设，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建设，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建设，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建设，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

电视事业建设，科学研究建设，金融保险业建设，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建设及其它建设。在非生产性建设中，住宅建设是指未供居住使用的房屋，包括职工家属宿舍、职工单身宿舍、学生宿舍等。

5.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它费用三个部分。

固定资产估价 即估算固定资产的价值。固定资产估价要考虑到两个因素，即估价时期和估价时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从估价时期讲，按购置或建设当时的价格水平为准计算的称原始价值，按重新核算时期的价格水平为准计算的称为重置价值。从新旧程度讲，按固定资产全新状态估价称为完全价值，按扣除磨损的情况估价称为残存价值。实际进行固定资产估价时，上述两个因素需要结合起来，这样便形成以下四种价值：完全原始价值（简称原值）、残存原始价值（简称净值）、完全重置价值、残存重置价值。

固定弹性需求模型（The constant elasticity Demand Model） 固定弹性需求模型可表示为：

$$\log q=\alpha+\eta_1\log y+H_1\log p$$

其中 q 和 p 是需求和价格向量，$y=p'q$，α 为参数，η_1 和 H_1 为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矩阵。

这一模型不满足古典静态理论，而且参数较多，但在实际分析中仍有很大用处。

拉斯佩雷斯公式（Laspeyres Formula） 为拉斯佩雷斯于 1864 年提出的，其公式如下：

$$I_{01}=\frac{\sum p_1q_0}{\sum p_0q_0}$$

其中，q 代表销售量。

拉斯佩雷斯公式经过简单变换，可体现为加权算术平均数指数公式：

$$I_{01}=\frac{\sum p_1q_0}{\sum p_0q_0}=\frac{\sum\frac{p_1}{p_0}\cdot p_0q_0}{\sum p_0q_0}$$

其中权数 p_0q_0 为某种商品基期的销售额，$\frac{p_1}{p_0}$ 为该种商品的个体指数。

派煦公式（Peasche Formula）为派煦于 1874 年提出，其公式如下，

$$I_{01}=\frac{\sum p_1q_1}{\sum p_0q_1}$$

派煦公式经过简单变换，可体现为调和算术平均数指数的形式：

$$I_{01}=\frac{\sum p_1q_1}{\sum p_0q_1}=\frac{\sum p_1q_1}{\sum\frac{1}{\left(\frac{p_1}{p_0}\right)}p_1q_1}$$

其中权数 p_1q_1 为某种商品计算期的销售额。

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就是从被研究对象中，有意识地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进行调查。这种调查与其它调查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调查单位少，有可能用少量人力、物力，深入基层，解剖麻雀，对调查对象作深入、具体、细致的调查研究。典型调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通过调查既可搜集有关的数字资料，又可掌握有关现象具体生动的情况。

岭估计（Ridge Estimate） 岭估计是 Hoerl 和 Kennard 于 1970 年提出来的一种回归估计方法。

对于线性回归模型

$$Y=aI+X\beta+e,\quad E(e)=0,\quad Cov(e)=\sigma^2I$$

这里，假定 nxp 的设计将 X 已经中心标准化，且 $R(x)=P$。

这时，回归系数的岭估计定义为

$$\vec{\beta}(k)=(X'X+kI)^{-1}X'Y \qquad (1)$$

这里，$k>0$ 称回岭参数或偏参数。如果 k 取与试验数据 Y 无关的常数，则$\vec{\beta}(k)$为线性估计，不然的话，$\vec{\beta}(k)$就是非线性估计。取不同的 k，得到不同的岭估计，所以（1）式定义了一个很大的估计类。特别地，取 $k=0$，$\vec{\beta}(0)=(X'X)^{-1}X'Y$ 就是 β 的 LS 估计。

与 LS 估计相比，岭估计是把 X'X 换成 X'X+kI 得到的。这样做的直观理由，是因为多重共线性存在时，X'X 的特征根至少有一个非常接近于 0，而 X'X+kI 的特征根 $\lambda_1+k,\cdots,\lambda_p+k$，接近于零的程度将会得到改善，使岭估计比 LS 估计有较小的均方误差。

岭估计具有以下一些性质：

(1) $\vec{\beta}(K)=A_K\vec{\beta}$，这里，$A_K=(X'X+kI)^{-1}X'X$，$\vec{\beta}$表示 LS 估计。这表明岭估计是 LS 估计的一个线性变换。

(2) $E\vec{\beta}(k)=A_K\beta$，只要 $A_K\neq I$，岭估计就是 β 的有编估计。而 $A_K=I\Leftrightarrow k=0$，所以，岭估计类中除了 LS 估计之外，所有估计都是有偏估计。

(3) 对任意的 $k>0$，$\|\vec{\beta}\|\neq0$,(即$\vec{\beta}$的每一个分量的绝对值不等于 0),总有 $\|\vec{\beta}(k)\|<\|\vec{\beta}\|$。这个性质表明，$\vec{\beta}(k)$是$\vec{\beta}$向原点的压缩。

(4) 存在 $k>0$，使得

$$MSE(\vec{\beta}(k))<MSE(\vec{\beta})$$

即存在 $k>0$，使得在均方误差的意义下，岭估计优于 LS 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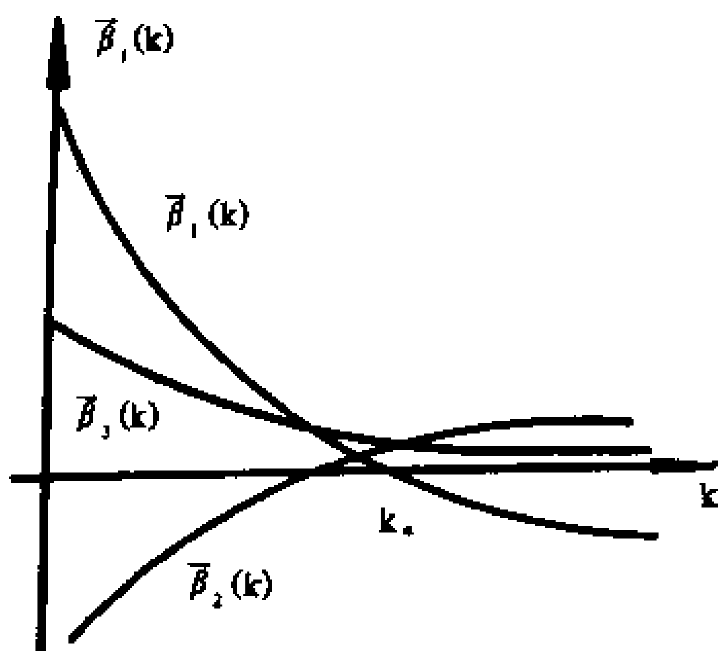
岭参数的选择 (Selection of Ridge Parameters) 引进岭估计（参见"岭估计"）的目的是减少均方误差，所以，对于岭估计

$\beta(k)=(X'X+kI)^{-1}X'Y$

中岭参数 k 的选择应该使均方误差 $MSE(\vec{\beta}(k))$ 达到最小。由于 k 的最优值不但依赖于模型的未知参数 β、σ_2，而且这种依赖关系没有明显表出，这就使得 k 值的确定比较困难。目前，选择岭参数常用以下几种方法。

(1) 岭迹法。

岭估计$\vec{\beta}(k)=(X'X+kI)^{-1}X'Y$的分量$\vec{\beta}_i(k)$作为 k 的函数，当 k 在〔0,+∞〕变化时，在平面直角坐标系所描出的图形称为岭迹 (Ridge Trace)，选择 k 的岭迹法是：将 p 个分量$\vec{\beta}_i(k)$的岭迹画在同一个图上，如下图。



选择 k 使得各回归系数的岭估计大体稳定，并且兼顾回归系数没有不合理的符号，残差平方和上升不太多等。在图 1 中，在 k^* 附近三条岭迹就大体稳定了，可以考虑取 $k=k^*$。

岭迹法的一个缺点是，缺少严格的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k 值的确定有一定程度的主观随意性。

(2)、方差扩大因子法。

方差扩大法（参见"方差扩大因子法"）也度量了多重共线性的严重程度，一般当 $Cjj>10$ 时，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就很严重，对于岭估计$\vec{\beta}(k)$，它的协方差阵为：

$$Cov(\vec{\beta}(k))=\sigma^2(X'X+kI)^{-1}X'X(X'X+kI)^{-1}$$
$$=\sigma^2(C_{ij}(k))$$

对角元 $C_{jj}(k)$ 就是岭估计的方差扩大因子。不难看出，$C_{jj}(k)$ 随着 k 的增大而减少。应用方差扩大因子选择 k 的经验作法是：选择 k 使所有方差扩大因子 $C_{jj}(k)<10$。

(3) C_p 准则

在岭估计中，度量岭估计优劣的 C_p 指标是 C_{LK}（参见"C_p 准则"）。

$$C_{LK}=\bar{\sigma}^{-1}\left[\sum_{i=1}^{n}(Y_i-\bar{Y})^2-2\sum_{i=1}^{p}\frac{Z_i^2}{\lambda_{i+R}}+\sum_{i=1}^{r}\frac{\lambda_iZ_i^2}{(\lambda_i+k)^2}\right]+2\sum_{i=1}^{r}\frac{\lambda_i}{\lambda_i+k}-(n-2)$$

其中 $Z'=(Z_1,\cdots,Z_p)=\Phi X'Y$；$\Phi=(\psi_1,\ \cdots,\ \psi_p)$ 为 X'X 对应于特征根 $\lambda_1>\cdots>\lambda_p$ 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作为 C_p 统计量的推广，C_{LK} 愈小愈好。因此，应该选 C_{LK} 达到最小的 k。应用上可以采用数值解法或图解法求解。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估计方法，如 Hoerl Kennard 公式，McDonald—Garurneau 法，双 h 公式等。所有这些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方法能够一致地优于其它方法。

建筑业总产值 它指的是建筑业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以货币表现的建筑生产的总量。在核算建筑业总产值时，通常以施工单位（建筑安装企业和自营施工单位）、独立的勘察设计单位及地质勘探单位为基层核算单位。施工单位的总产值，包括各种建筑工程、设备安装工程、房屋构筑物修理工程和现场非标准设备制作工作的施工产值（即自行完成工作量），企业内部核算的预制构件厂、机修厂等附属辅助生产单位和运输机构等为外单位提供的建筑制品价值、工业性作业价值、运输价值和施工机械租赁收入，以及施工单位内部的勘察设计机构为外单位提供设计、科研和技术等的劳务收入等，独立的勘察设计单位和地质勘探单位的总产值，包括与具体建设工程项目有关的勘察设计和地质勘探工作的价值。资源地质勘探单位的地质普查工作一般不是为具体的建设工程项目服务的，故不计入建筑业总产值。

建筑业净产值 它是建筑业在一定时期的建筑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价值，是全社会国民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筑业净产值以施工单位、独立的勘察设计单位和地质勘探单位为基层核算单位，计算范围与总产值的计算范围一致，建筑业净产值的计算方法分为生产法和分配法两种。生产法是从新创价值的生产角度出发，即从报告期中直接扣除建筑生产过程中物质消耗的转移价值来计算净产值的方法。分配法则是从

新创造价值初次分配的角度出发，把其各个构成要素相加来计算净产值的方法。

线性支出系统（Linear Kxpenditure System） 线性支出系统是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和罗宾在1947年研究固定效用指数时提出的一种需求函数，它可以表示为：

$$P_iX_i = p_i\gamma_i + \beta_i(y - \sum_{i=1}^{v} p_i\gamma)\quad 1,2,\cdots,3\qquad(1)$$

或 $$X_i = \gamma_i + \frac{\beta_1}{P_1}(y - \sum_{i=1}^{n} p_i\gamma_i)$$

在这个模型中，X_i是某一种商品的现期需求，r_i可以被解释为基本的需求，$y=\sum_{i=1}^{n}p_ix_i$是总消费支出。β_i是消费预算份额，$\sum p_i=1$。因此，可以认为：某一种商品的现期的消费支出P_iX_i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P_i\gamma_i$，是消费者对于该种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第二部分$\beta_i(y-\sum_{i=1}^{n}P_ir_i)$是增长的消费支出，它反映在总消费支出超出总的基本消费支出的那一部分中，有β_i份将用于i商品的购买。

线性支出系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符合古典静消费理论的需求函数。它的效用函数为：

$$U = \pi_{i=1}^{n}(X_i - \gamma_i)$$

在收入约束$y=\sum_{i=1}^{n}P_iX_i$之下，利用拉格朗日函数，即可得出（1）。可以证明，（1）式满足非负性、零阶齐次性、可加性和斯鲁茨基条件。

线性支出系统的估计较为复杂，因为在（1）式中，β_i和γ_i都是未知的，所以对参数而言，线性支出系统实际上是非线性的。英国经济学家斯通在1954年提出了一种方法。先给定一组β_i，用最小二乘法估计γ_i的估计值C_i，然后，再把C_i代入原方程，用最小二乘法估计β_i的估计值b_i，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剩余平方和收敛为止。这时，所得到的就是估计的线性支出系统。

线性回归函数（Linear Regression Function） 在回归分析中，"线性"一词实际上包含着两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变量来说存在着线性函数关系，即Y的条件平均数是X的线性函数。在这些函数中，幂指数和开方指数都是1，没有两个不同变量之间乘法与除法的运算，也就是说，方程中不包括X^2、$\sqrt{X}$、$X\cdot Z$、X/Z这样的项。如果把这些函数表示在坐标图上，回归线是一条真正的直线。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线性"一词，是它原来的意义。"线性"的第二层含义，是对参数来说的，即Y的条件平均数E（Y|X）是参数β的线性函数。这一解释所包括的范围显然和第一层含义不同，它使得$E(Y_i|X_i)=\beta_0+\beta_1X_i^2$这样的模型也成为线性回归模型，但象$E(Y_i|X_i)=\beta_0\sqrt{\beta_1}X_i$这样的方程就不是线性的了。对于回归分析来说，第二层含义更加适用，因为在估计参数时，X_i、X_i^2、$\sqrt{X_i}$常直接作为解释变量，如果把参数和因变量关系设为线性的，估计出来的结果就可以直接作为参数。从估计方法来说，$E(Y|X)=\beta+_0\beta_1X, E(Y|X)=\beta_0+\beta_1X^2$等用的是第一类，而$E(Y|X)=\beta+_0\sqrt{\beta_1}X, E(Y|X)=\beta_0+\beta_1^2x$等则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选用不同的方法。因此，在计量经济分析中，所说的线性函数和一般情况下不同。

货运业总产值和净产值 货运业的总产值（即货运总产值）是一定时期内货物运输业生产活动的总成果，它按照运输企业从事的货物运送、装卸及经营仓库业务所取得的收入（即货运收入）计算。货运业的净产值是货物运输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货运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从货运业总产值中扣除相应的物质消耗（即转移价值），即为货运业的净产值。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通常简称为MPS，是在苏联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套东方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1984年，经互会统计合作常设委员会制定了名为《编制国民经济统计平衡表的基本方法原则》的文件，这是MPS的最新版本。MPS的最大特点，就是适应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同时，在国民收入统计上，坚持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的劳动才创造新的价值，形成国民收入。

具体地说，MPS具有三个特点：

1.在国民经济部门分类上，首先把国民经济分为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然后再在它们下面进行进一步的分类。

2.在指标计算上使用了总产值、净产值、国民收入、最终产品等一系列反映物质生产领域活动的指标，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被归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3.在核算方法上，使用了这一系列的平衡表，其中，不仅包括用价值量进行核算的平衡表，也包括用非价值量进行核算的平衡表。这些平衡表包括：社会总产品的生产、消费和积累平衡表（物质平衡表），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再分配和最终

使用平衡表（财政平衡表），部门联系平衡表（即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国民财富和固定资产平衡表，劳动力平衡表，非物质服务平衡表，居民物质财富和非物质性服务总消费表等。

参数和统计量（Parameter and Statistic） 描述总体分布的某些常量称为参数，在概率分布已知的情况下，随着它们的变化，概率分布的具体形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总体参数决定了总体的具体分布。在许多情况下，总体的参数直接就是某个分布的数字特征。如在正态分布，普阿松分布中的数学期望和方差就是如此。由于这些数字特征和一般参数的密切关系，它们也称为总体参数。把样本中所包括的所关心的事物的信息集中起来，针对不同的问题构造出样本的某种函数，就称为统计量，用公式表示可写为 $u=f(x_1,x_2\cdots,x_n)$，其中，$x_1,x_2\cdots,x_n$ 表示样本，u 为估计量。由于每次抽样的结果都可能不同，统计量是一个随机变量。统计量在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在估计中，我们就是要利用样本资料构造统计量，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而在假设检验中，我们常常要利用统计量的分布，检验总体参数是否等于某一个估计值。

季节变动（Seasonal effect） 季节变动指的是，在时间数列变动中，以每年十二个月（或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为周期，在年与年之间重复发现的变动，由于季节变动在时间序列分析中被认为是在长期趋势及循环变动之外另外附加的一种变动，因而，季节变动的分析，常常就是考虑如何在时间序列中，分解出季节因素的影响。

对时间序列进行季节变动的分析，将依赖于我们的研究目的而采用不同的方法。一般地说，进行这种分析一是为了计量这种变动，一是为了消除这种变动。对于长期趋势不明显的时间序列，常常是简单地计算各月的平均数（或是各季的平均数），再将它与总的平均数比较，求出差或是比率。对于那些表现出明显的长期趋势的时间序列则需要使用稍微复杂一些的方法。对于月份资料，测定季节影响的最常用的方法是先计算移动平均数。

$$S_m(X_t)=\frac{\frac{1}{2}x_{t-6}+X_{t-5}+X_{t-4}+\cdots+X_{t+s}+\frac{1}{2}x_{t+6}}{12}$$

然后通过各月观察值 x_t 与移动平均数 $S_m(xt)$ 的比较测定季节变动。如果设立的模型反映的是相加关系，就用 $x_t-S_m(xt)$。如果设立的模型反映的是相乘关系，就用 $x_t/S_m(xt)$。一般地说，如果季节变动不管平均水平的变化态样，都保持大体一致的水平，用相加关系较好，如果与平均水平的变动成正比，就应考虑用相乘关系。

计算出季节差或季节比率（还可以在季节比率的基础上对各年的同一个月份的比率求平均数，算出季节指数）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些季差或差率消除季节变动的影响，进而估计时间序列中的长期趋势，循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对于季或几个月的季节变动，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

适时修正法（R·A·S法） 适时修正法，也称R·A·S法，是英国经济学家斯通在1960年提出来的整理投入产出表数据的一种方法。

由于编制一个新的投入产出表要耗费较多的人力和物力，事实上不可能每年都编制新的投入产出表。但根据每年的国民收入统计，却都能够得到各个部门的总产出、总投入、最初投入和最终需求的数字，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各部门的中间投入和中间消耗的合计数。R·A·S法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根据过去的年度的投入产出表的数字和根据上面的计算得出的现期的控制数字，推算出现年的投入产出表。

假定投入产出系数矩阵 A 的每个元素 a_{ij} 受到两种影响：(1) 代替的影响，由生产过程中商品之被其它商品代替，或代替其它商品的程度来测定；(2) 制造的影响，反映商品在其生产中每单位总投入（或总产出）吸收入中间投入的变化程度。然后，进一步假定每种影响一致地发生作用，沿各行运算的各个代替乘数用向量 r 表示，沿各列运算的各个制造乘数用向量 s 表示，基本矩阵 A。(即过去年份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每相元素受到这两种影响之后，产生现期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A_1=\overline{r}A_0\overline{s}$$

式中的$\overline{r}$和$\overline{S}$是分别以 r 和 s 的元素为主对角线元素的两个矩阵。

假设 W_1 是现期的中间消耗流量矩阵，向量 u 和 v 分别表示它的行合计数和列合计数，即有：

$$U=W_1i$$

和 $$V=W_1'i$$

其中，i 为单位列向量

由于

$$W_1=A_1\overline{q}=(\overline{r}A_0\overline{S})\overline{q_1}$$

有：

$$\begin{cases}U=\overline{r}(A_0\overline{q_1})S\\ V'=r'(A_0\overline{q_1})\overline{S}\end{cases}$$

联立解这两个方程，就可得出向量 r 和 s 的值，从而算出 $A_1=\overline{r}A_0\overline{s}$和 W_1。

对这些方程最通常、最方便采用的解是迭代解。这样，从 $W_0=A_0\overrightarrow{q_0}$ 得出 W_1 的过程实际上不过是对基本矩阵沿着它的各行和各列逐次进行按比例的调整，直到收敛。

假设现年可得到的投入产出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现年的投入产出数据

		中间消耗 A B C	合计 u^*	最终需求	总产出
中间投入	A		160	40	200
	B		150	250	400
	C		120	180	300
合计 u^*		100 250 80	430		
最初投入		100 150 220		470	
总投入		200 400 300			900

基年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

$$A_0=\begin{bmatrix}0.250 & 0.333 & 0.000\\ 0.150 & 0.167 & 0.100\\ 0.100 & 0.167 & 0.150\end{bmatrix}$$

就可以利用 R · A · S 法推算出现期的 W_1

当先计算 $A_0\overrightarrow{q_1}$ 和第一次行乘数：

	A	B	C	u_1	u^*	$r_1=u^*$
A	50	133.3	0	183.3	160	0.873
B	30	66.7	30	126.7	150	1.184
C	20	66.7	45	131.7	120	0.911
V_1	100	266.7	75			
V^*	100	250	80			

方框中的数字即为矩阵 $A_0\overrightarrow{q_1}$ 中的元素，可以看出，现在的各行合计数已经不等于控制数 u^* 了，将 U^* 的各个元素除以 U_1 的各个元素得 r_1，再将它的各个元素乘以矩阵 $A_0\overrightarrow{q_1}$ 的各行。得：

	A	B	C	$U_2=u^*$
A	43.6	116.4	0	160
B	35.5	79.0	35.5	150
C	18.2	60.8	41.0	120
V_1	97.3	256.2	76.5	
V^*	100	250.0	80.0	

$s_1=V_1$:

1.027　0.976　1.046

现在各行的合计数与控制数字相等了，但各列的合计数却不等于控制数字 V^* 了。将 V^* 的各个元素除以 γ_1 的各个元素得 S_1，再将它的各个元素乘以方框内的各列，得：

	A	B	C	U_2	U^*	$r_2=U^*:U_2$
A	44.8	113.[illegible]	0	158.4	160	1.010
B	36.5	77.[illegible]	37.1	150.7	150	0.996
C	18.7	59.[illegible]	42.9	120.9	120	0.992

$V=V^*$　100　250　80

这时，列合计数和控制数字相符了，但行合计数又不相符了，可以继续以上过程，直至矩阵收敛。最后，可得到以下结果：

	A	B	C	行乘数 r
A	45.3	114.7	0	0.884
B	36.2	76.6	37.2	1.177
C	18.5	58.7	42.8	0.902
列乘数 S	1.025	0.974	1.054	

这就是所要求的矩阵 W_1，制造乘数 S 和代替乘数 r。

R · A · S 法的数学性质曾由巴卡拉克作了探索。他指出这个方法会得出一个唯一解，不由先调整行还是先调整列而决定。如果基本矩阵中有某一个元素是零，在最后矩阵仍然是零，并且最后矩阵中没有任何元素会是负数。

净产值　在总产值中，扣除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得到的就是净产值，它是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净产值可以在基层企业计算，也可以在部门计算。因为净产值是新创造价值，不包括重复计算，所以，部门净产值就是该部门所有基层单位净产值之和，地区或国家的国民收入生产额，就是所有部门净产值之和。

净产值的计算通常可采用两种方法，生产法和分配法。

按生产法计算净产值，就是在总产值中，扣除各种物质消耗，从而获得净产值。在计算中，通常掌握两条原则：(1) 物质消耗在计算口径上与总产值保持一致；(2) 物质消耗只限于生产过程中的消耗。

按分配法计算净产值，则是将构成新增价值 v+m 的各个项目逐个相加，如工资、利润、税金等。它的计算结果，和生产法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计算中，可能还因具体处理上的问题，产生统计误差。

九　画

测定时间数列变动的传统方法　测定时间数列变动的传统方法，是将时间数列中观察值的变动归因于四种要素的影响，并分别测定这四种要素的影响程度。这四种要素是：(1) 长期趋势，它表现为长期过程中不重演的连续性变动；(2) 季节变动，它指的是以每年十二个月（或春、夏、秋、冬四季）为周期，在年与年之间重复发现的变动；(3) 循环变动，它指的是超过年度范围，周期年数大致相当的循环波动；(4) 不规则变动。它是由于各种不规则的随机因素所造成的波动。

总产值(Gross Output)　总产值是用货币单位计量的、一定范围内的某一时期的产品价值的总和。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包括转移价值和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两大部分。就某一个基层生产单位来说，它所计算的总产值和它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的价值量是相等的，不包括单位内部的重复计算。如一个企业生产了100张桌子。每张桌子出厂价100元，该企业的总产值就是100×100＝10000元。但如果在比基层生产单位更高的规模（如公司、地区等）上计算，由于扣除企业间周转额上的困难，通常只是将各基层单位的总产值进行简单加总，获得总产值，这时，该总产值除了包括各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和它所包括的范围内投入的转移价值外，还包括各基层单位间转移价值的重复计算。例如，计算某纺织公司的工业总产值时，往往是将该公司所有企业的总产值相加，由于棉花厂纺棉纱，织布厂用棉纱织布，印染厂染花布、服装厂由花布制成服装，这时，把各个企业的总产值汇总，就包括棉花（四次）、棉纱（三次）、棉布（二次）等的重复计算。总产值可以在不同的范围（如企业、公司、管理局、地区等）上计算，也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如工业、农业、建筑业等）中计算。

目前在我国，总产值主要有三方面应用：

1.反映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虽然总产值的计算中包括转移价值和一定程度的重复计算，但由于这种转移和重复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地说，对于动态比较和分析，总产值仍然是一个方便的指标。

2.反映和考察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这主要是计算各种比例、分析结构，在投入产出分析中，也需要计算总产值。

3.用于计算各种分析指标，如劳动生产率指标等。

总产值指标应用中的问题是：

1.受产品中转移价值大小的影响，所以，不同类型的企业间的总产值是不可比的。

2.由于重复计算，在社会上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企业组织结构有较大变动的情况下，即使实物产出量未发生变化，总产值也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3.不能直接反映生产过程中新增价值的情况。

在我国，总产值主要在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物质供销业，运输邮电业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计算。各部门的计算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　对于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可分为对一个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和对两个总体方差间相互关系的假设检验。

1.一个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

这种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样本方差

$$S^2 = \frac{\sum_{i=1}^{n}(x_i - \bar{x})^2}{n-1}$$

为总体方差 σ^2 的估计量，检验总体方差 σ^2 是否等于一个估计值 σ_0^2，由于统计量

$$\chi^2 = \frac{(n-1)S^2}{\sigma_0^2}$$

在 $H_0: \sigma_0^2 (H_1: \sigma^2 \neq \sigma_0^2)$ 为真的情况下，服从自由度为 n-1 的 x^2 分布，可以利用它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 α 下进行假设检验，在双尾检验时，拒绝域在两侧，若

$$\chi^2 > \chi^2_{\frac{\alpha}{2}}(n-1) \text{或} \chi^2 < \chi^2_{1-\alpha/2}(n-1)$$

时，就拒绝原假设，否则就接受原假设。

若是单尾检验，拒绝域分布在一侧。当 $H_0: \sigma^2 < \sigma_0^2, H_1: \sigma^2 > \sigma_0^2$ 时，拒绝域为 $\chi^2 > \chi^2_\alpha$，当 $H_0: \sigma^2 > \sigma_0^2, H_1: \sigma^2 < \sigma_0^2$ 时，拒绝域为 $\chi^2 < \chi^2_\alpha$。

2.两个正态总体方差之比的假设检验

检验两个正态总体的方差是否相等，可以通过检验两个方差之比是否等于1来进行。设有两个正态总体，其方差分别为 σ_1^2 和 σ_2^2，其估计量为样本方差 S_1^2 和 S_2^2(样本容量分别为 n 和 m)，其中，

$$S_1^2 = \frac{1}{n-1}\sum_{i=1}^{n}(n_{i1} - \overline{X_1}),\quad S_2^2 = \frac{1}{m-1}\sum_{i=1}^{m}(X_{i2} - \overline{\overline{x}_2})$$

要检验 $H_0:\sigma_1^2=\sigma_1^2,H_1:\sigma_1^2\neq\sigma_2^2$，其检验统计量为

$$F=\frac{S_1^2}{S_2^2}$$

在 H_0 为真的条件下，统计量 F 服从自由度为(n−1,m−1)的 F 分布，拒绝域为：

$$F=\frac{S_1^2}{S_2^2}\leqslant F_{1-\alpha/2}(n-1,m-1)$$

和

$$F=\frac{S_1^2}{S_2^2}\geqslant F_{\alpha/2}(n-1,m-1)$$

在计量统计量 F 时，一般令较大的样本方差为 S_1^2（即作为分子），较小的样本方差为 S_2^2（即作为分母），这将为查 F 分布表带来便利。

总体比例的估计 总体比例的估计就是根据样本中具有某种特征的单位所占的比例来推断总体的比例，它和平均数的估计十分相似。如果在总体单位只有两种取值的情况下，令具有某种特征的单位取值为 1（如令废品取值为 1），否则取之为 0（如令正品为 0），而在一个样本中，取值为 1 的单位有 m 个（即有 m 个废品），这时，计算的算术平均数 $\frac{\sum_{i=1}^{n=1}x_i}{n}=\frac{m}{n}$ 就是一种比例（废品率）。对于总体比例的估计，可以分几种情况讨论。

(1) 大样本，重复抽样

这时 $\overline{P}=\frac{m}{n}\sim N(P,\frac{P(1-P)}{n})$ 在 1−α 的置信水平下，总体比例 P 的置信区间为：

$$\overline{P}\pm Z_{\alpha/2}\sqrt{\frac{P(1-P)}{n}}$$

其中，P 为总体比例，$Z_{\alpha/2}$ 为正态分布表中和 α/2 相对应的概率度。

由于总体比例 P 是待估计值，可以用 $\overline{P}$ 来近似地代表 p 进行区间估计，这时只要 $n\overline{P}>5$ 就可以用

$$P(\overline{P}-Z_{\alpha/2}\sqrt{\frac{\overline{P}\overline{q}}{n}}<P<\overline{p}+Z_{\alpha/2}\sqrt{\frac{\overline{P}\overline{q}}{n}})=1-\alpha$$ 对总体比例进行估计。

(2) 当 $n\overline{P}<5$ 时，用普阿松分布估计总体比例。

当 n 很大，P 很小，np＜5 时，二项分布并不近似正态分布，而是近似普阿松分布，这时，就可以通过查普阿松表对总体比例进行估计。方法和前面是一样的。

(3) 有限总体不重复抽样

这时，应该在重复抽样的抽样平均误差上再乘上一个有限总体的修正系数 $\sqrt{\frac{N-n}{N-1}}$。当置信水平为 1−α 时，P 的置信区间为：

$$\overline{P}\pm Z_{\alpha/2}\sqrt{\frac{p(1-p)}{n}}\cdot\sqrt{\frac{N-n}{N-1}}$$

一般情况下，可用 $\overline{P}$ 代替 P。

总体比例的假设检验 总体比例的假设检验分为单一总体比例的假设检验和两个总体比例的假设检验。

1.单一总体比例的假设检验

这种检验，是检验总体单位中含有某种特征的单位数所占的比例是否为 P，设在容量为 n 的样本中，具有某种特征的单位数为 m，则样本的比例为 $\overline{P}=\frac{m}{n}$。在小样本情况下，常采用二项分布来进行检验。其检验规则如下：

(1) 当 $H_0:P=P_0,H_1:P\neq P_0$，显著性水平为 α 时，观察值 $m=\sum_{i=1}^{n}X_i$（当样本单位中包含某种特征的 X_i 取值为 1，否则取 0）在 H_0 为真时，应有

$$1-\sum_{i=K_1}^{n}C_n^iP_0^i(1-P_0)^{n-i}\approx\frac{\alpha}{2}$$

$$(\text{或}\sum_{i=0}^{K_1}C_n^iP_0^i(1-P_0)^{n-i}\approx\frac{\alpha}{2})$$

和

$$\sum_{i=K_2}^{n}C_n^iP_0^i(1-P_0)^{n-i}\approx\frac{\alpha}{2}$$

当 $\sum_{i=1}^{n}X_i\leqslant k_1$ 或 $\sum_{i=1}^{n}X_i\geqslant k_2$ 时，即认为小概率事件发生，拒绝原假设，否则接受原假设。

(2) 当 $H_0:P\leqslant P_0,H_1:P>P_0$ 时，为单尾检验，临界值 K 由下式确定：

$$\sum_{i=k}^{n}C_n^iP_0^i(1-P_0)^{n-i}=\alpha$$

当 $\sum_{i=1}^{n}X_i\geqslant k$ 时，否定原假设。

(3) 当 $H_0:P\geqslant P_0,H_1:P<P_0$ 时也为单尾检验，这时，临界值 k 由下式确定：

$$\sum_{i=0}^{k}C_n^iP_0^i(1-P_0)^{n-i}\approx\alpha$$

当 $\sum_{i=1}^{n}X_i\leqslant k$ 时，否定原假设。

在大样本情况下，样本比例就渐近地服从正态分布。这时可设立统计量

$$Z=\frac{\overline{P}-P_0}{\sqrt{\frac{P_0(1-P_0)}{n}}}$$

在 $H_0:P=P_0$ 为真的条件下，统计量 Z 渐近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0,1)。利用正态分布表查到临界值 $Z_{\alpha/2}$，则拒绝域为 $Z<-Z_{\alpha/2}$ 和 $Z>Z_{\alpha/2}$

2.两个总体比例的假设检验

设两个总体都服从二项分布，它们的具有某种特征的单位数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P_1 和 P_2，但 P_1 和 P_2 未知。现从两个总体中分别抽取了容量为 n_1 和 n_2 的样本、样本的比例分别为 $\overrightarrow{p_1}=\frac{\sum_{i=1}^{n_1}x_{i1}}{n_1}$ 和 $\overrightarrow{p_2}=\frac{\sum_{i=1}^{n_2}x_{i2}}{n_2}$。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它们检验两个总体比例是否相等。这个问题，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先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H_0:P_1=P_2$(或 $P_1-P_2=0$),$H_1:P_1\neq P_2$(或 $p_1-p_2\neq 0$)

检验的统计量为

$$Z=\frac{(\overrightarrow{p_1}-\overrightarrow{p_2})-(P_1-P_2)}{\sqrt{\frac{P_1(1-P_1)}{n_1}+\frac{P_2(1-P_2)}{n_2}}}$$

在原假设 H_0 为真的条件下，$P_1-P_2=0$ 又由于 P_1 和 P_2 是未知的，可以用两个样本合并起来作为 P 的估计量，即

$$\overline{P}=\frac{\sum_{i=1}^{n_1}X_{i1}+\sum_{i=1}^{n_2}X_{i2}}{n_1+n_2}$$

这时，统计量 Z 可写为：Z=

$$\frac{\overrightarrow{P_1}-\overrightarrow{P_2}}{\sqrt{\frac{\overline{P}(1-\overline{P})}{n_1}+\frac{\overline{P}(1-\overline{P})}{n_2}}}=\frac{\overrightarrow{P_1}-\overrightarrow{P_2}}{\sqrt{\overline{P}(1-\overline{P})\left(\frac{1}{n_1}+\frac{1}{n_2}\right)}}$$

在大样本以及 np≥5 的情况下，Z 渐近地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0,1)，且不包含未知参数，可作为检验 H_0 的统计量。

总体平均数的估计　利用样本资料计算算术平均数对总体平均数（或称数学期望）进行估计。根据估计时的条件不同：

(1) 总体为正态分布，已知总体方差。

这时，由于

$$\bar{x}\sim N(u,\frac{\sigma^2}{n})$$

即

$$P(|\overline{X}-u|<Z_{\alpha/2}\sigma_{\bar{x}})=1-\alpha$$

在给定 α 后，可通过正态分布表查到概率度，如当 α=0.05 时，$Z_{\alpha/2}=1.96$，则

$$P(\bar{x}-Z_{\alpha/2}\frac{\sigma}{\sqrt{n}}<u<\overline{X}+Z_{\alpha/2}\frac{\sigma}{\sqrt{n}})=1-\alpha$$

对于某一具体样本平均数 $\bar{x}$，若规定置信水平为 1−α，则 u 将以 1−α 的概率落入 $(\bar{x}-Z_{\alpha/2}\frac{\sigma}{\sqrt{n}},\bar{x}+Z_{\alpha/2}\frac{\sigma}{\sqrt{n}})$ 这一区间内。

(2) 总体为非正态分布，未知总体方差，利用大样本对总体平均数进行推断。

如果在实际中所遇到的总体，不服从正态分布，也不知总体方差，这时，只要样本足够大、样本内各单位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就可以借助中心极限定理，用样本方差代替总体方差，并利用正态分布通过样本平均数估计总体平均数。

(3) 已知正态总体，未知总体方差，用小样本对总体平均数进行推断。

在正态总体情况下，如果未知总体方差，可利用样本方差估计抽样标准误差。这时，$\frac{\bar{x}-u}{\frac{\sigma}{\sqrt{n}}}$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而 $\frac{\bar{x}-u}{\frac{s}{\sqrt{n-1}}}$ 则服从自由度为 u−1 的 t 分布，当样本容量小于 30（小样本）时，可利用 t 分布表进行估计，当样本容量大于 30（大样本）时，t 分布以正态分布为极限，这时，可直接利用正态分布表进行估计。在小样本情况下，进行总体平均数估计的公式为：

$$P(\overline{X}-t_{\alpha/2}\frac{S}{\sqrt{n-1}}<U<\overline{X}+t_{\alpha/2}\frac{S}{\sqrt{n-1}})=1-\alpha$$

其中：$t_{\alpha/2}$ 是对应于 α/2 的概率度，$S=\frac{\sqrt{\sum_{i=1}^{n}(x_i-\bar{x})^2}}{n-1}$

总体平均数的假设检验　对于总体平均数的假设检验，根据检验时所具备的条件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方法。

1.已知总体服从正态分布，且方差 σ^2 已知。这时，统计量

$$Z=\frac{\bar{x}-U_0}{\sigma_0/\sqrt{n}}$$

在原假设 $H_0:u=u_0$ 为真的情况下，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0,1)。在 α=0.05 时，拒绝域为 Z<−1.96 和 Z>1.96。

2.总体分布及方差 σ^2 未知，大样本且样本单位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时，统计量

$$Z=\frac{\bar{x}-u}{S/\sqrt{n}}$$

渐近地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决策规则同上式中

$$S^2=\frac{\sum_{i=1}^{n}(x_i-\bar{x})^2}{n-1}$$

3.总体为正态分布，方差 σ^2 未知，抽样的样本为小样本。这时，若原假设 $H_0:u=u_0$ 为真，统计量

$$T=\frac{\bar{x}-U_0}{s/\sqrt{n}}$$

服从自由度为 n−1 的 t 分布。可根据规定的 α 水平确定 T 的临界值 T_α，然后利用样本资料计算统计量 T，对原假设作出判断。

总体和样本（Population and Sample） 在一项研究中，由性质相同的基本单位所组成的全体称为总体，而组成总体的每一个个别单位称为总体单位。例如，要研究当前我国农村农民家庭收支的状况，全国农村的所有农民户就构成一个总体，其中每一个农民户就是组成总体的总体单位。若某个总体是由无穷多个总体单位所组成的，这样的总体就叫作无限总体。若组成总体的单位是有限的、可数的，这样的总体就叫作有限总体。

从总体中抽出部分单位，由这部分单位组成的全体称为样本，组成样本的每一个单位称为样本单位。从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单位的数目叫作样本容量。样本容量可大可小，一般地说来它要比总体单位的数目要小得多。样本容量等于或大于 30 的为大样本，30 以下的为小样本。

总体回归函数(Population Regression Function) 回归分析就是要在解释变量固定在已知值时，对因变量的平均值进行预测。这时，由于因变量是一个随机变量，对应于一组固定的解释变量 X_i，因变量 Y_i 就有一概率分布 $p(Y_i|X_i)$ 与之对应。

显然，对应于固定的 X_i，因变量 Y_i 可能与不同的概率取不同的值，但如果对于 Y_i 和数学期望 EY_i，则 X_i 与 EY_i 之间可以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如二者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就可以用下式表示出来：

$$E(Y|x)=f(x)$$

若假定 X_i 是一维普通变量，$E(Y_i|X)$ 是 X_i 的线性函数。这个关系就可以写成：

$$E(Y|X)=\beta_0+\beta_1X \quad (1)$$

在这个式子中，β_0 和 β_1 是未知的参数，称为回归系数，方程本身则可称为总体回归函数或总体回归方程。回归分析就是要估计各种形式的总体回归函数。在（1）中，也就是在对 X 和 Y 的观察值的基础上得到未知参数 β_0 和 β_1 的估计值。

总体标准差及方差的估计 利用样本资料对总体标准差 σ 及方差 σ^2 进行估计，根据情况不同，将采取不同的方法。

（1）大样本情况下总体标准差的区间估计。只要样本足够大(n≥30)，样本标准差

$$S=\sqrt{\frac{\sum_{i=1}^{n}(x_i-\bar{x})}{n-1}}$$ 的分布也为正态分布，有：

$$S\sim N(\sigma,\frac{\sigma^2}{2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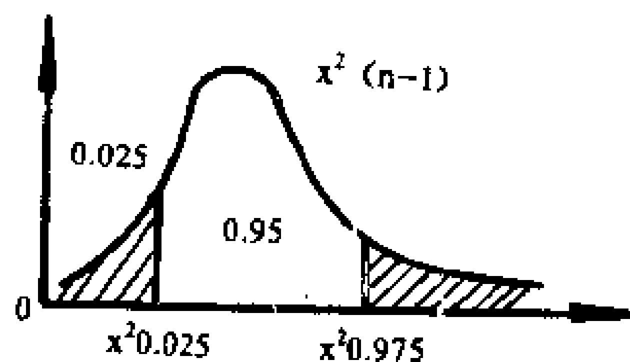
这时，对 σ 进行区间估计，有：

$$P(S-Z_{\alpha/2}\frac{\sigma}{\sqrt{2n}}\leqslant\sigma\leqslant S+Z_{\alpha/2}\frac{\sigma}{\sqrt{2n}})=1-\alpha$$

其中，$Z_{\alpha/2}$ 为正态分布表上与 $\alpha/2$ 相对应的概率度。由于 σ 实际上是未知的，对抽样标准误中的 σ 可用 3 代替。

（2）在小样本情况下正态总体方差的区间估计。

由于 $\frac{ns^2}{\sigma^2}\sim\chi^2(n-1)$，即自由度为 n−1 的 χ^2 分布，由于 X^2 分布是非对称的，所以，为了取得 $1-\alpha$ 的置信区间，必须取两个概率度 $\chi^2_{\alpha/2}$ 和 $\chi^2_{1-\alpha/2}$。如 $\alpha=0.05$，ns_2/σ 的置信区间可以用图表示为：



即

$$P(\chi^2_{0.025}\leqslant\frac{ns^2}{\sigma^2}\leqslant\chi^2_{0.975})=0.95$$

经过变换得

$$P(\frac{ns^2}{\chi^2_{0.025}}\geqslant\sigma^2\geqslant\sigma\frac{ns^2}{\chi^2_{0.975}})=0.95$$

查表求得 $\chi^2_{0.025}$(或 $\chi^2_{\alpha/2}$)和 $\chi^2_{0.975}$($\chi^2_{1-\alpha/2}$)后，即得 σ^2 的置信区间。

总贸易和专门贸易(General Trade And Special

Trade) 总贸易和专门贸易是国际贸易统计中使用的概念。总贸易基本上以某一国家的地理边界为统计区域，专门贸易则以该国的海关边界为统计区域。对那些地理边界与海关边界相一致的国家来说，总贸易和专业贸易是一致的。但对于那些建有海关保税仓库和自由贸易区的国家，这两个概念则有所不同。

1.总贸易。

(1) 进口：包括进入该国领土的所有商品和货物，但不包括直接过境商品，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为国内消费而直接进入国内市场的商品。另一部分为进入海关保税仓库和自由贸易区的进口。

(2) 出口：是本国产品的出口和外国商品货物的再出口之和。

2.专门贸易。

(1) 进口：包括为国内消费的直接进口和从海关仓库及自由贸易区提出的为国内消费用的商品之和。

(2) 出口：是指国产商品（全部或部分在国内加工制造）和本国化商品（指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后，不经加工又重新出口）的出口之和。

专门贸易额一般可以用来考察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地位，而总贸易额则可用来考察一个国家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各国在计算世界贸易总额时，有些国家只采用专门贸易的概念，有些只采用总贸易概念，还有些两者都算。联合国所发表的世界贸易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按近似于专门贸易的概念计算的。但对于香港和新加坡的数字则按照总贸易的概念计算。

指数分布(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指数分布的分布密度函数为：

$$f(x)=\begin{cases}\lambda e^{-\lambda x}, & x\geqslant 0\\ 0, & x<0\end{cases}$$

分布函数为

$$F(x)=\begin{cases}1-e^{-\lambda x}, & X\geqslant 0\\ 0, & x<0\end{cases}$$

这里，$\lambda>0$，为一常数。

指数分布的数学期望

$$EX=\frac{1}{\lambda}$$

方差

$$DX=\frac{1}{\lambda_2}$$

指数分布常用来作为各种"寿命"分布的近似，例如无线电元件的寿命；动物的寿命，打电话的通话时。随机服务系统中的服务时间等都常假定服从指数分布。

指数公式的偏误 指数公式的偏误有两种，一是型偏误，二是权偏误。

型偏误指的是指数公式因平均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偏误。在简单平均指数公式中，简单几何平均数指数公式为无型偏公式，简单算术式为上型偏误的公式，简单调和式为下型偏误的公式。

权偏误指的是加权指数公式由于权数不同而产生的偏误，在通常情况下，以$p_t q_0$或$p_0 q_1$加权的指数产生权偏低。以$p_1 q_0$或$p_1 q_1$加权的指数产生权偏高。

指数平滑法(Exponential Smoothing) 指数平滑法是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尤其适用于短期预测。它是移动平均法的改进和发展。指数平滑法的基础是对过去资料进行移动加权平均。

设已知序列为$X_1,X_2\cdots,X_t$。要预测t+1时期的值或者对t时期的值进行修匀，可以用以前各项X_1，$X_2,\cdots X_n$的加权平均数代替。在确定各项权数时，从逻辑上讲，近期的数值影响较大的应给以较高的权数，距离间隔愈远的数值影响也愈小，当然权数也应小一些。设W为一正数，$0<W<1$，那么t+1时期的预测值$\overline{X}_{t+1}$可以写成

$$\overline{X}_{t+1}=\frac{X_t+WX_{t-1}+W^2X_{t-2}+\cdots+W^{t-1}x_1}{1+W+W^2+\cdots+W^{t-1}}$$

因为$0<w<1$，W^t随着t的增大而减小，$\lim\limits_{t\to\infty}W^t=0$，又因为$(1-W^t)/(1-w)=1+w+W^2+\cdots W^{t-1}$，当t很大时，$1+w+w^2+\cdots+w^{t-1}=1/(1-w)$，所以上式可写成

$$\overline{x}_{t+1}=(1-W)(X_t+WX_{t-1}+W^2x_{t-2}+\cdots W^{t-1}X_1$$

$$=(1-W)X_t+W(1-w)(X_{t-1}+WX_{t-2}+W^2X_{t-3}+\cdots W^{t-2}x_1)$$

$$=(1-w)X_t+W\overline{x}_t$$

习惯上常令$1-w=\alpha$，则公式变为

$$\overline{X}_{t+1}=\alpha X_t+(1-\alpha)\overline{X}_t$$

这就是经常用的指数平滑公式。其中$\overline{X}_{t+1}$表示第t+1期预测值；α为指数平滑时选择的一个常数，也称为平滑系数；$\overline{x_t}$为第t期预测值，也就是根据以往资料计算的加权平均值；X_t为t时期的实际观察值。如果用来平滑数列时，$\overline{X}_{t+1}$就作为第t期的平滑值。

从指数平滑公式中可以看出，当平滑系数α较大时，近期观察值对预测值的影响比较大。相反，若α较小时，在平滑过程中，远期观察值就具有相对较大的权数。如果要求平滑的程度强一些，α取值就应小一些，这就相当于求移动平均数多包括几项。

指数特性 这是西方统计学家在对统计指数的特性进行讨论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一个好的指数公式，应该具有以下六种特征，即单位共通性，简单性，敏感性，时间互换性，因素互换性和循环性。

单位共通性指的是计量单位的变化不应影响指数公式的计算结果。

简单性指的是指数公式应方便易行，不能过分复杂。

敏感性指的是在指数所要反映的商品中，任何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化，都应在指数数值中得到表现。

时间互换性和因素互换性指的是指数公式满足时间互换测验和因素互换测验的特性，这两种测验，是美国经济统计学家I. 费希尔提出来的，所谓时间互换测验，即将原指数公式中的基期和计算期交换后，再乘以原指数，如果结果等于1，就是一个好的公式，如果大于1，则称存在着上型偏误。如果小于1，则认为存在着下型偏误，所谓因素互换测验，即将原来的价格指数中的价格与物量互换后所得到的指数和原指数相乘，如果结果等于价值指数

$\frac{\sum p_1q_1}{\sum p_0q_0}$，就是一个好的价格指数。

循环性指的是指数满足循环测验的特性。即指数公式具有以下特征：

$$I_{12}\times I_{23}\times\cdots\times I_{n-1,n}=I_n$$

其中I表示价格指数，前一个下标反映基期年分，后一下标反映计算期年份。

逐步(Stepwise)型回归 逐步型回归是一种不计算所有可能子集回归的变量选择算法。具体地说，逐步型回归方法还可以分为三种：向前法，向后法和逐步法。它们的共同点是每一步只引入或剔除一个自变量，所以都归入逐步型方法。

1.向前法

这个方法是从回归方程仅含常数项开始，把自变量逐个引入回归方程。第一步，把与因变量Y有最大简单相关系数的变量，作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若它显著地异于零，则把该自变量选入方程。而后在余下的自变量中，考虑在已消除了已选入变量的影响之后，对与Y有最大相关系数（即偏相关系数）的变量，作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如用F统计量进行检验），以决定是否选入。这样做下去，一直到在排除已选入变量对Y的影响之后，未选入变量对Y的回归系数的检验都不显著为止。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由于各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关的关系，因此后续变量的选入可能会使前面已选入的自变量变得不重要。这样最后得到的"最优"回归方程可能包含一些对Y影响不大的自变量。

2.向后法

向后法与向前法正好相反，它是先将全部变量选入回归模型，然后逐个剔除对残差平方和贡献较小的变量。这里，贡献大小可以用F统计量来度量。若一开始，所有自变量的F-统计量经检验后都显著，则"最优"回归方程就是全模型。不然，若有若干个F值不显著，则剔除具有最小F值的变量。然后对剩下的变量建立新的回归方程。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剩下的自变量都不能剔除为止。

3.逐步法

逐步法即通常所称的逐步回归（Stepwies regression），本质上是向前法，但吸收了向后法的作法。在逐步法中，在每一步增加了对已选入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即在每一步，经F-检验选择进入方程的变量，而后又作F检验，看是否需要剔除某些变量。这个过程一直进行到既没有变量需要引入，也没有变量要剔除为止。

重点调查 重点调查是一种非全面调查。它是在全部单位中选择一部分重点单位进行调查。这里所说的重点着眼于现象量的方面，重点单位是指这些单位所要调查的标志值之和，在全部单位的该标志总量中占有极大的比重，而这些重点单位占全部调查单位的比重往往很小。调查这部分重点单位的情况，就可以反映被研究现象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例如，只要调查几个重点茶叶产区的生产情况，就可以掌握全国的情况，因为这些产区的茶叶产量占全国的产量的绝大部分。

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它是反映两个变量X与Y间线性关系的程度以及方向的系数。设有X、Y两个相关变量，则总体相关系数ρ的定义是：

$$\rho=\frac{Cov(X,Y)}{\sqrt{Var(X)Var(Y)}}=\frac{Cov(X,Y)}{\sigma_x\sigma_Y}$$

ρ代表两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的程度。

对于样本相关系数，设$(X_1,Y_1),(X_2,Y_2),\cdots(X_n,Y_n)$是容量为n并分别取自总体X，Y的样本，

则相关系数的定义是:

$$r=\frac{\sum_{i=1}^{n}(X_i-\bar{X})(Y_i-\bar{Y})}{\sqrt{\sum_{i=1}^{n}(X_i-\bar{X})^2\sum_{i=1}^{n}(Y_i-\bar{Y})^2}}$$

其中，$\bar{X}=\frac{\sum_{i=1}^{n}X_i}{n}$，$\bar{Y}=\frac{\sum_{i=1}^{n}Y_i}{n}$

样本相关系数 r 具有下列性质:

(1) 它所在的范围为

$-1<r<1$

(2) r 为正值时，两变量间为正相关，反之为负相关。

(3)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r|越大，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越密切，当 r=1 时，为完全正相关；当 r=−1 时，为完全负相关；当 r=0 时，完全无关。

(4) 它具有对称性，即 X 与 Y 的相关系数与 Y 与 X 的相关系数相同。

(5) r 的大小与 X、Y 取值的原点和单位无关。

(6) 如果 X 和 Y 在统计上独立，相关系数为 0，但 r=0 并不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独立。

(7) 它说明的仅仅是两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密切程度，不能用于说明非线性的相关关系。

(8) 虽然它能够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但并不能表明存在因果关系。

设 X 与 Y 之间的样本回归函数为:

$$Y=\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X_i+e_i$$

则样本相关系数为

$$r=\overline{\beta_1}\frac{S_x}{S_Y}$$

其中，S_x 和 S_y 分别代表 X 和 Y 的标准差。

设总体 X、Y 服从二元正态分布，则利用样本相关系数可推断总体相关系数 ρ 的置信区间。设 U 统计量为:

$$U=(Z-\zeta)\sqrt{n-3}$$

其中，

$$z=\frac{1}{2}\log\frac{1+r}{1+r}$$

$$\zeta=\frac{1}{2}\log\frac{1+\rho}{1-\rho}$$

则当置信程度为 1−α 时，ζ 的置信区间为

$$Z-\frac{U_{\alpha/2}}{\sqrt{n-3}}<\zeta<Z+\frac{U_{\alpha/2}}{\sqrt{n-3}}$$

其中，$U_{\alpha/2}$ 为显著性水平为$\frac{\alpha}{2}$时的标准正态分布的临界值。

对于总体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可利用 t 分布进行，也可利用正态分布进行。

(1) 总体相关系数 ρ=0 的检验。

设：$H_0:\rho=0$ 和 $H_1:\rho\neq0$。

取 t 统计量（自由度为 n−2），

$$t=\frac{r\sqrt{n-2}}{\sqrt{1-r^2}}$$

设显著性水平为 α，由 t 分布表查得 tα／2，则当

$|t|>t_{\alpha/2}$ 时拒绝原假设。这一检验是和对回归系数的检验相通的。

(2) 总体相关系数 ρ≠0 的检验。

设 $H_0:\rho=\rho_0\neq0, H_1:\rho\neq\rho_0$

取统计量 U 为

$$U=(z-\zeta_0)\sqrt{n-3}$$

其中:

$$\zeta_0=\frac{1}{2}\log\frac{1+P_0}{1-P_0}$$

设显著性水平为 α，由标准正态分布表查得 $U_{\alpha/2}$。当

$|U|>U_{\alpha/2}$

时，拒绝原假设。

相关指数(Correlation Index)　它是表示两个变量之间以某一回归曲线为准，某一变量对另一变量相关程度的系数。若回归线是 Y 对 X 的回归曲线，则所求的即为 Y 对 X 的相关指数。

相关指数的公式为:

$$R_{yx}=\sqrt{1-\frac{S_{yx}^2}{S_Y^2}}$$

其中，S_{yx} 代表 Y 对 X 的回归曲线的估计标准误，S_y 代表 Y 的标准差。

相关指数具有以下性质:

(1) 相关指数随回归曲线的形状不同而异。

(2) 相关指数的所在范围在 0 与 1 之间。

(3) 相关指数的数值越大，则两变量间的曲线相关程度也就越密切。例如：当 $R_{yx}=1$ 时，表示两变量间有完全的以某一 Y 对 X 回归线为准的曲线相关；当 $R_{yx}=0$ 时，表示两变量之间完全无关。

(4) 相关指数不小于用同一批资料所求得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R_{YX}\geq|r|$$

相关表和相关比(Correlation Table and Correlation Ratio)　设变量 X、Y 的 n 对观察值为:

$$(X_1,Y_1),(X_2,Y_2),\cdots,(X_n,Y_n)$$

按次数分配表的编制方法，将这些资料编入一个二重分组的次数分配表，有：

	Y_1	Y_2	…	Y_j	…	Y_l	合计
X_1	f_{11}	f_{12}	…	f_{1j}	…	f_{1l}	f_1
X_2	f_{21}	f_{22}	…	f_{2j}	…	f_{2l}	f_2
⋮	⋮	⋮		⋮		⋮	⋮
X_i	f_{i1}	f_{i2}	…	f_{ij}	…	f_{il}	f_i
⋮	⋮	⋮		⋮		⋮	⋮
X_k	f_{k1}	f_{k2}	…	f_{kj}	…	f_{kl}	f_k
合计	$f\cdot 1$	$f\cdot 2$	…	$f\cdot j$	…	$f\cdot l$	n

表中，X 按上小下大排列，Y 按左小右大排列，以反映 X 与 Y 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就是相关表。编制相关表的作用有二：一是由表内的次数排列了解两变量之间的非直线相关关系，二是利用表内资料计算相关比。

相关比为表示两个变量间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不以直线为标准的相关程度的系数。如计算 Y 对 X 的样本相关比，则其计算公式如下：

$$\eta_{YX}=\frac{\sum_{i=1}^{k} f_i(Y_i-\overline{Y})^2}{\sum_{j=1}^{l} f_{\cdot j}(Y_j-\overline{Y})^2}$$

反之，X 对 Y 的相关比的计算公式为：

$$\eta_{XY}=\frac{\sum_{j=1}^{l} f_{\cdot j}(X_j-\overline{X})^2}{\sum_{i=1}^{k} f_i(X_i-\overline{X})^2}$$

相关比具有以下性质：

(1) 相关比的所在范围在 0 与 1 之间，例如：

$$0\leqslant\eta_{YX}\leqslant 1$$

(2) 相关比的数值越大，表示两变量间的非直线相关越为密切。当 $\eta_{YX}=1$ 时，表示两变量间有完全的非直线相关；$\eta_{YX}=0$ 时，表示两变量间完全无关。

(3) 相关比不小于对同一批资料所求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即 $\eta_{YX}\geqslant|r|$。

η_{YX} 的性质与 η_{YX} 完全相同，但在通常情况下，二者并不相等，仅当完全相关或完全无关时，二者才相等。

样本相关比可用来对总体相关比进行假设检验。设原假设为：

H_0：总体上 Y 对 X 之相关比等于 0。

取下列统计量：

$$F_0=\frac{\eta_{YX}^2}{1-\eta_{YX}^2}\cdot\frac{n-k}{k-1}$$

其中，第 1 自由度为 K−1，第 2 自由度为 n−K.

设显著性水平为 α，查 F 分布表得 F_α. 则拒绝域为 $F>F_\alpha$。若 F_0 在拒绝域内，则否定原假设。

利用相关比还可以对总体回归线是否直线进行假设检验. 设原假设为：

H_0：总体 Y 对 X 的回归线为直线。

取下列 F 统计量：

$$F_0=\frac{\eta_{YX}^2-r^2}{1-\eta_{YX}^2}\cdot\frac{n-K}{K-2}$$

其中，第 1 自由度为 K−2，第 2 自由度为 n−K。

设显著性水平为 α，查 F 分布表得 F_α. 则拒绝域为 $F>F_\alpha$。若 F_0 在拒绝域内，则否定原假设，即认为总体 Y 对 X 的回归线不是直线。

威尔科克森 W 检验(Wilcoxon Test) 这是一种比较两个总体是否抽自同样的总体的检验。这种检验主要是利用样本的等级求和，所以也叫等级和检验。

威尔科克森 W 检验的具体方法，是对两个总体分别独立地抽取两个随机样本，令 n_1 为较小的样本的容量，n_2 为较大的那个样本的容量。然后，按变量数值的大小混合排列成由小到大的序列，再对每个观察值编上 1，2，…，n_1+n_2 的等级。当观察值的大小相同，可以用两个观察值等级的平均数代替。例如第 7 个和第 8 个观察值的数值相同，它们的等级就分别为 7.5。接着，分别求出两个样本的等级和，为 W_1 和 W_2。显然，当 n_1 和 n_2 确定后，W_1 和 W_2 是一个固定的值。

$$W_1+W_2=1+2+\cdots+(n_1+n_2)=\frac{(n_1+n_2)(n_1+n_2+1)}{2}$$

由于 n_1 和 n_2 是分别在两个总体中抽取的随机样本，所以 W_1 和 W_2 可以看成是随机变量 W_1 和 W_2 的观察值. 当原假设（H_0：两个样本得自相同的总体）成立时，W_1 和 W_2 的大小应和它们的样本容量大小相适应，若样本容量相等，W_1 和 W_2 也不该相差太大。否则，就要拒绝原假设。在小样本情况下，人们已根据不同的 n_1、n_2 编制成了威尔科克森检验临界值表。以 W_1 大于或小于某一临界值作为接受或拒绝原假设的标准。

在大样本情况下，当原假设为真时，w_1 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其数学期望为：

$$Ew_1=\frac{n_1(n_1+n_2+1)}{n}$$

方差为：

$Dw_1 = n_1n_2 \cdot (n_1+n_2+1) / 12$

威尔科克森带符号的等级检验(Wilcoxon Rank Test) 这种检验是对符号检验改进后提出的一种检验。它不仅考虑符号的正负，还考虑某种处理所带来的数量变化的大小，具体地说，这种方法是把经过某种处理后的增加的数量或减少的数量，按绝对值的大小排列并编上等级，最小的等级为1，最大的等级为n，当两个差数相等时，就用平均等级代替，如第7个增量和第8个数值相同，它们的等级就都是7.5。然后，恢复这些等级的正负号，增加的用正号表示，减少的用负号表示，再分别将同样符号的等级相加，用T_+和T_-表示，取较小的T值为检验的统计量。从逻辑上讲，若H_0为真，即处理前后的数值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时，T_+和T_-应该相等，而且由于

$$|T_+|+|T_-| = 1+2+\cdots n = \frac{n(n+1)}{2}$$

和

$$\overline{T} = \frac{n(n-1)}{4}$$

所以较小的T值总是小于$\overline{T}$，当接近T时，应接受原假设，反之则拒绝原假设，威尔科克森带符号的等级检验已编成表可查。当样本容量较大时，T值趋近于正态分布，这时：

$$ET = \frac{n(n+1)}{4}$$

$$DT = \frac{n(n+1)(2n+1)}{24}$$

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是统计学所研究的对统计数字资料搜集和处理的方法，它包括对于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估计、检验、分析，等等。利用这些方法，可以通过对大量随机现象数量差异的研究，从掌握的数字资料中，得到对研究课题有用的信息。

具体地说，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 实验设计，研究如何通过对于实验方案的设计、以较小的实验或观察费用，获得较多的统计分析成果。(2) 抽样方法：研究抽样技术，样本分布、样本平均数和方差的估计等；(3) 估计理论和方法：分为点估计和区间估计，其基本问题为样本的分布函数和总体分布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抽样资料估计总体参数以及估计它们的置信区间等；(4) 假设检验：包括如何设立假设、测验方法的选取，以及如何在一定的概率保证下对假设进行检验，作出是否拒绝原假设的结论；(5) 非参数统计：主要研究在不对总体分布作出假设的条件下，如何进行统计检验；(6) 相关和回归分析，主要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密切程度；(7) 方差分析：主要研究在不同的处理间，各种处理的平均数量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问题；(8) 序量分析：其特征是所选取的样本为一随机变量，它不在抽样前决定，而是根据所抽取的样本是否满足了分析的需要而决定；(9) 决策方法：它从主观概率和各人对事物的不同偏好而得到的效用函数为主要概念，研究如何利用统计资料中获得的信息进行统计决策；(10) 时间序列分析：主要研究如何对按时间先后形成的统计数列进行分析，包括古典方法和现代方法；(11) 多元分析：它是讨论多维随机变量的统计方法的总称，它既包括含有单变量常用统计方法在多变量情况下的推广，也包含多变量本身的一些特殊问题，例如对多指标的样品能否以较少的综合指标去近似地描写，以及对多指标样品进行分类等。

统计分组 统计分组就是根据研究的任务，按照一定的标志，把所研究的总体分成若干个性质相同的部分或组。换句话说，统计分组就是把总体中性质相同的单位归并在一起、把性质不同的单位区别开来。依据所使用的分组标志不同，统计分组可以概括地分为按品质标志分组和按数量标志分组。

品质标志主要是指被研究现象的品质属性或特征。例如，人的性别就属于品质标志。把某个时点下某个范围（如一个地区）的人口按性别这一标志分组，就是把全部男子（这些人的性别属性或标志为男）归为一组，把全部女子归为另外一组，分别得到男女人口数。按品质标志分组常称为分类，分类结果能够形成两种数列：一是空间分类数列，如全国各地区的人口数形成的数列；一是质量分类数列，如按性别分类的人口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值数字等。

数量标志是指所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按数量标志分组能够直接反映总体单位之间数量上的差异。按数量标志分组形成数量分组数列或称为次数分配。按时间顺序分组也可以说是一种按数量标志分组的数列，只不过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数量标志，因此，它被称为时间分组数列，也叫动态数列。

空间分类数列，质量分类数列，数量分组数列和时间分组数列这四类统计数列，概括了一切系统地反映客观实际情况的数量序列。正因为它们分别反映着四类不同的、客观存在着的具体数量关系、才决定了人们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相应的统计描述分析。如果统计数列是由样本资料构成的，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统计推断分析。

统计决策（Statistical Decision） 统计决策主要是指经济管理中的统计决策方法，它研究如何利用统计资料提供的信息，在存在着多个方案时，从中选

择一个比较好的行动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等人在对管理科学的研究中，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理论、运筹学和计算技术等新的科学内容和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决策理论。而统计决策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按决策问题所处的条件不同，分为确定型决策、不确定型决策和对抗性决策三种。

确定性决策是指可供选择方案的条件已确定，关键在于如何选择。

不确定决策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知各种可能情况出现的概率，因此可以结合概率来作出判断，选择方案，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所以又称为风险型决策。另一种是未知任何信息的决策，称为完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

对抗性决策的特点是在决策中要考虑两个或几个人之间的竞争，并且不是所有的决策都在决策人的直接控制之下，而要考虑到对方的策略。

确定型和对抗型决策都形成了独立的数学分支，如数学规划和对策论，因而不属于统计决策研究的范围。统计决策主要研究不确定情况下决策的有关问题。

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决策，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决策人要求达到的一定目标。如利润最大、损失最小、质量最高，等等。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往往有不同的决策标准。

2.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

3.存在着不以决策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状态，或称自然状态。所有可能出现的自然状态构成状态空间。

4.在不同情况下采用不同方案的结果是可以计量的，所有的结果构成一个结果空间。

5.风险型决策还要求知道状态出现的概率。

统计决策可以分为传统的决策和贝叶斯决策两种。传统的决策是指根据样本的结果来推断总体。如假设检验中根据统计量的估计值作出拒绝还是接受原假设的决策，它不考虑任何主观的先验信息。贝叶斯决策则主张利用主观的先验信息，通过样本资料，利用贝叶斯的逆概率公式进行决策。

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是我国定期取得统计资料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调查文件，每隔一定周期，连续进行的统计调查。统计报表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各基层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调查项目、表格形式、报送时间和程度，自下而上，逐级如实向上报送统计资料的报告制度。

2.它包括一整套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的报表体系，成为统计部门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各方面，如工业、农业、建筑业以及文教、卫生保健、人口、劳动等定期搜集资料的网络。

3.它是以连续登记的原始核算为基础，可以定期地，连续地提供比较准确、及时的统计资料。

我国的统计报表已经成为全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取得统计资料的重要组织形式。

统计图 统计图是将统计资料整理图示而得到的结果，能给人以直观的印象，在经济分析中具有很大的作用。

(1) 直角坐标图。在直角坐标图上，横轴常表示变量，如时间，分组区间等，纵轴表示次数或水平，如以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某种产品的产量。当这种产品每年的增长量相等时，图上将表示为一条直线。

(2) 半对数图，半对数也采取直角坐标图的形式，但横轴用算术尺度表示，纵轴用以10为底的对数表示。这种图比较适合于图示时间序列的资料。当每年的某种产品的增长率相等时，将这种产品的产出量取对数后描在图上，图上将表示为一条直线。

此外，还常用条形图，直方图，比例图等对统计资料进行图解。

统计表 统计表是列示统计资料的表格，它能够将统计资料系统地表现出来，便于统计分析的进行，统计表大多包含以下特征：

(1) 标题：写在统计表的上方，必须说明时间(when) 谁 (who) 和内容 (why) (常称为三个W)

(2) 计量单位：常写在表的左上方或右上方，当表中各栏的计量单位不一致时，记在相应的栏目里。

(3) 项目：一般地说，横栏表示分组或分类，纵栏反映次数、比率及其它内容，但不硬性规定。

(4) 数字：数字填写在有关的表格里，没有可能出现数字的填"—"，暂时未搜集到数字的填"…"。

(5) 资料来源：属于次数资料时，应标明资料来源。

(6) 边线：一般只画上下边线，不画左右边线。

统计学 (Statistics) 统计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对可以计量的客观现象进行试验或观察、搜集整理有关数据，探索这些现象的数量变化、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现象都不可能严格

地重复发生，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不可控制的外界的因素的影响，可能是在计量或观察过程中发生了误差，也可能是试验或观察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可以统称为非确定性因素，它将使所研究的对象在数量上显现出差异。而统计学提供的方法，就是要通过对于存在着差异的数字资料的分析，分析不确定性对现象的影响，探索这些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以及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

统计学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它可以分为分布理论统计学和应用统计学。理论统计学常常被称为数理统计学，它以概率论为基础，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规律性。它的研究内容，从大的方面看，可以分为概率论、数理统计方法和随机过程三个方面。而应用统计学则是结合各个研究领域的实际，将数理统计学的研究成果加以具体化，研究如何从各种有差异的实际数据探索现象的数量变化、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经济统计学就是这样一门应用统计学，它是数理统计学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应用统计学可分为描述统计学和推论统计学两个方面，描述统计学主要研究数据的搜集和整理，研究怎样取得各种统计资料，制表作图，计算比率、指数以及某些典型参数（如平均数，方差等），推论统计学主要研究以概率为基础的各种统计方法的应用，如抽样方法、方差分析方法、非参数方法，决策方法等在实际分析中的应用。

统计学的发展　统计学形成于19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依赖于三个方面的发展，即概率论、国势学和政治算术。

概率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赌博问题的研究。在但丁的《神曲》中，就记载了投掷三个骰子所可以出现的各种结果。伽利略也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但直到1713年，瑞士数学家贝努里（Jacques Bernoulli）的著作《推测法》问世，概率论才作为一门理论初具雏形。这本书所阐述的贝努里定理，是大数定理的早期形式。在统计学中占有重要地位。1718年，法国数学家德·莫威尔（Abraham D Moivre 1667—1754）出版了《机会的学说》一书，提出了概率的乘法运算法则，后来，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他又提出了一项后来被称为“德·莫威尔—拉普拉斯定理”的证明，这是对正态曲线最早的研究。1764年，英国数学家贝叶斯（Thomas Bayes1702—1761）的论文《机会原理题解》发表，他在这篇论文中研究了如何将归纳推理法用于概率论，为后来的贝叶斯统计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势学也称记录学。1660年，德国的大学教授康令（Hezman Corning 1606—1681）撰写了名为《现实政治上最重要事件》的著作，作为讲授“当前欧洲学”的讲义，这是国势学派最早的著作。1749年，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阿亨瓦尔（Gott fried Achenwall）进一步扩大了“国势学”的范围，用文字记录各国国情，并将其编成著作，起名为“统计”（statistik）后来的英文“统计学”（statistics）只是文字记载，后来才发展出了数字和图表。

在英国，最早研究大量现象的数量规律性的是格兰特（Jonh Graunt 1620—1674）。于1662年出版了《关于死亡表的自然和政治的观察》一书，发表了他对人口出生、死亡数字的研究结果。和格兰特同时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弟（Willion Petty 1623—1687）也对统计方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政治算术》一书和国民收入估算，对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后人因此把他们称为政治算术学派。他们虽未创立“统计学”之名，但所用于探索社会和经济现象的数量规律性的方法，则具有“统计学”之实。

将这三方面成果融为一体而创立了统计学的，是比利时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人口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统计学家凯特莱（Adolph Pecetlet 1796—1874）。他在所研究过的所有领域中，几乎都有所建树。在统计研究方面，他先研究天文、气象方面的统计资料，后来又利用统计数字研究植物界和人类社会。在研究过程中，他以概率论作为理论基础，采用对集体现象大量观察和综合平均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社会大量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从而把概率、国势学派、政治算术三派观察大量现象进行数量分析的方法，融合成为一门作为统计方法的科学，凯特莱因此被后人誉为“统计学之父”。

由于统计学是一门以概率论为基础的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性的科学，因此，统计学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其本身的发展外，还要依赖于概率论的发展。一般学者认为，统计学的发展，有赖于英美统计学家的努力，而概率论的发展则归功于俄、法数学家的贡献。

19世纪末叶，俄国数学家切比雪夫（1821—1894）提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大数法则，并提出了利用矩法作为估计随机变量数字特征的方法。他的“切比雪夫不等式”可以使“贝努里定理”得到更加简单的证明。他的学生马尔柯夫（1856—1922）则研究了构成所谓“马尔柯夫链”的随机变量数列，并阐述了大数法则用于依赖性随机变量的一般条件，切比雪夫的另一个学生李雅普诺夫（1857—1918）则利用他拟定的“特征函数”证明了“李雅普诺夫中心极限定理”。

1933年，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1903—）出版了《概率论基本概念》一书，以测度论和集合论

为工具，奠定了现代概率论的理论基础，给出了概率的公理化系统，并提出了"柯尔莫哥洛夫大数法则"。1936年，法国数学家利维（H·Levy）和罗思（L·Roth）合著的《概率原理》一书出版，又进一步发展了现代概率论的理论。

在统计学方面，1867年，德国数学家威梯斯坦（T·Witlstein）在汉诺威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数理统计学及其在经济学和保险学中的应用》，首次提出"数理统计学"（Mathmatical Statistics）这种方法，指的是用数学方法描述和研究统计方法。以后，这种用法越来越普遍。而数学方法在统计学中的大量应用，则促进了统计学的迅速发展。

当代统计学权威涅曼（Jerzy Splawa Neyman 1894—1981）以R·A费希尔（R·A·Fisher1890—1952）为界，把统计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大量观察阶段和解析统计学阶段。这两个阶段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其发展是渐进的、错综的，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在前一个阶段，研究的基本统计问题，在于求得一套通用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待研究的整体，经过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K·波尔逊（Karl Peazon1857—1936）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ath1845—1926）等人的努力，研究出数套频率曲线，以代表各种总体的分布。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卡尔·波尔逊。他发展了一系列频数曲线，将复相关和回归理论扩展到许多领域，并为大样本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第二阶段，R·A费希尔将卡尔·皮尔逊的工作进一步发扬光大，由他创始的工作有"实验设计"、估计理论、方差分析等。此后，涅曼在30年代与E·皮尔逊所进行的假设检验理论的研究、美国统计学家A·瓦尔德对决策理论的研究，都对统计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在这一阶段，样本分布理论、多元分析、方差分析、非参数统计、时间序列、随机过程等方面的研究，都获得了重大进展。

统计指标 统计指标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数量表现的概念和数值。它是统计工作对客观存在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按其具体名称（如人口数、钢产量等），在一定的空间、时间条件下，进行科学计量的数字结果。一个完整的统计指标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统计指标的名称，一是统计情况的数值，如某公司去年的钢产量800万吨，就反映了这个公司（空间）在去年一年内（时间）生产的钢产量（指标名称）为800万吨（指标数值）。概括地说，统计指标可以说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可量性，也就是说，形成指标的现象必须是可以用数量表现的；二是总体性，统计指标是由若干个单位汇总整理后得到的说明总体的数值。统计指标习惯上都是指单项指标，它只反映事物的某个侧面，如果用几个有联系的指标来综合地反映某种现象（如同时用身高、体重来反映一班小学生的发育情况），那么，这些有联系的统计指标所构成的体系就形成了一个统计指标体系。

统计指标说明的是总体的数量特征，而各种现象的数量特征又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统计指标也就有了多种表现形式。概括地说，可以把统计指标分为三种，即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1）总量指标：它是各种现象总量的表现，反映一定条件下总体现象的规模水平。总量指标是用绝对数表示的，也叫绝对指标。总量指标按其所说明的总体的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总体单位总量（或称为总体单位数）和总体标志总量。总体单位总量是总体内各个单位加总的结果，它说明总体规模的大小。总体标志总量是总体各单位标志数值的总和，它说明总体单位特征的总数量。假设某个生产班组，共有11个工人，日产某种零件的总数量为242件。这时，这个总体的单位总量就为11，而标志总量为242，它是各个工人生产零件数的总和。总量指标按其所反映的时间状况的不同，可以分为时期指标和时点指标。时期指标是个流量，时期越长指标数值越大，如出生人数指标；时点指标是个存量，不同时点的数值相加没有意义，如常住人口数。（2）相对指标：相对指标是由两个有联系的指标相比所得到的数值，习惯上也称为相对数。从具体应用而言，相对数主要有三种：动态相对数、部分对全体相对数和两个有联系的现象之间的相对数。（3）平均指标：平均指标又叫平均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静态上的平均数，又叫总体单位平均数；另一种是动态平均数，又叫序时平均数。

统计资料的搜集（统计调查） 统计资料的搜集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即对所需要的资料直接向被调查的单位进行登记或调查取得，这种调查一般就被称为统计调查，它是搜集统计资料的主要方法。另一种情况，是对各个机构组织已加工的现成的统计资料的搜集，如从政府机构、研究机关、报刊杂志等方面搜集，一般称为次级资料的搜集。

统计资料的搜集是统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大多数的应用统计学的教科书中，都对统计资料的搜集方法（主要是统计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对于应用经济统计学来说，统计方法的应用依赖于研究者手头占有资料的情况，而这些资料归根结底必须通过统计调查获得。统计资料的搜集方法因而成为应用经济统计学所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统计调查按其涉及的范围分，可分为全面调查和

非全面调查，按其具体组织方式分，则可分为普查、统计报表制度、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专题调查）等。

统计调查方案　统计调查方案是为进行统计调查所制订的方案。它包括以下内容：(1) 调查目的。它是指通过某项调查，需要弄清的情况和解决的问题；(2) 调查对象。它是根据调查目的所确定的需要调查的现象的全体（即总体）。如人口普查的对象是"具有中国国籍并在中国国境内居住的人"。(3) 调查单位。它是构成调查对象的每一个单位即总体单位。人口普查的调查单位就是符合人口普查对象条件的每一个人；(4) 调查项目。它指的是所要调查的内容，说明调查单位的特征。调查单位的特征在统计上称为标志，说明总体单位的属性。调查单位的标志有数量标志和品质标志两类：数量标志反映调查单位的数量特征（如一个人的年龄）；品质标志反映调查单位的品质特征（如一个人的性别），只能用文字表示。可见，标志就表示具体的调查项目。调查项目常常不止一个，如人口普查时要了解各个人的年龄、性别、职业等，把这些项目列在一张表上就构成了统计表。(5) 实施计划。

统计预测(Statistical Forecasting)　统计预测就是利用搜集到的统计资料，通过一定的预测方法，对某一现象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

统计预测主要有三种方法，直觉法、因果法和外推法。

直觉法是古典的预测方法。这类方法主要是在占有一定资料的基础上，由个人或较多数的人根据自己的直觉对未来进行预测。

因果法是根据对有关事物的原因的了解来预测结果的方法。如果某一种现象因果之间的关系很明确，因果之间的时差又很小，但由于某种原因在结果形成后有一段时间仍取得不了数据。就可以通过因果关系的研究，确定它们之间的数量联系，并对原因进行预测，由此推断结果。

外推法是根据过去有关统计资料所显示的特点外推到将来。这些方法通常具有数学的或统计的性质，是统计预测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利用外推法进行预测一般包括四个步骤：收集资料，简化资料、构造模型和模型外推。

统计预测模型　统计预测模型种类很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混合的统计模型，另一类是纯随机性的统计模型。所谓混合的统计模型指模型是由确定性的数学模型加随机项而成的，主要有8种，是统计预测模型的主体。纯随机性的统计模型专指随机项本身的模型。这类模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白噪声(white noise) 模型，另一种是滑动平均模型。

1.固定平均数模型。

它的方程式是：

$X_t=\mu+\varepsilon_t$

其中，X_t 表示 t 期的观察值；ε_t 表示随机误差。

2.直线趋势模型。

其方程式是：

$X_t=\alpha+\beta_t+\varepsilon_t$

其中，α 和 β_t 是参数，α 是常数，β_t 依赖于时间 t。

3.非直线趋势模型。

这种模型很多，其中常用的是指数增长曲线模型。它的方程式是：

$X_t=\alpha e^{\beta t}+\varepsilon_t$

4.直线回归模型。

其方程式为：

$X_t=\alpha+\beta Z_t+\varepsilon_t$

其中，Z_t 是自变量。

5.非直线回归模型。

这种模型很多，一般可通过一定的变换转化为直线模型。其中的一种双曲线回归模型的方程式为：

$$\frac{1}{X_t}=\alpha+\beta Z_t+\varepsilon_t$$

6.自回归模型。

它是本期观察值与前 K 期（k＝1，2，3，…）观察值的回归，是一种随机模型（Stochastic Model)。

7.周期性季节模型。

季节模型的特点是，它的轨迹每隔一个固定周期 T，变量值重复出现一次。

8.趋势季节模型。

这种模型中、长期趋势与季节变动同时存在。

9.随机正态模型（白噪声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变量值的大小完全是随机的、其期望值是一个常数，变量值在此常数水平线上下呈正态分布。白噪声数列的期望值常数如果定义为零，就是零值平均白噪声，它不能用来进行预测，因为它表明数列没有可预测的轨迹。但是，如果一个随机数列的期望常数不是零，就成了非零值的噪声数，其平均数则是一个很好的预测值。从预测的观点看，一个零值平均白噪声数列用途不大，但是在评价一个预测结果以检查剩余变动中是否还有未被反映出来的系统因素时，白噪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10.滑动平均随机模型。

纯白噪声数列的波动较大，如对它取滑动平均，则可得出比较平滑的滑动平均模型。这种模型的方程

式是:

$X_t=\varepsilon_t+\beta\varepsilon_{t-1}$

滑动平均模型(MA)和自回归模型(AR)是著名的ARMA高级预测模型的基础。

统计质量管理 统计质量管理指的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用统计方法对于产品质量进行管理。运用统计方法检验工业产品质量开始于本世界20年代，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休哈特首先用统计方法对工业生产过程进行管理，稍后，道奇和罗明提出了用抽样检验代替全面检验的方法，这可以说是应用统计质量管理方法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计质量管理得到了迅速发展，战后，质量管理的方法引进日本，并结合日本的管理方法形成了全面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中要用到的统计方法是很多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方面：工序控制、产品的抽样验收检验和试验设计。

复相关(Multiple Correlation) 它是两个以上变量间的相关。复相关可分为两种，复直线相关和复非直线相关。常用的复相关是复直线相关。表示复直线相关的统计量有两种，即复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

复相关系数(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复相关系数是表示两个以上变量中某一变量对于其它变量直线相关程度的系数。

设有Y、X_1、X_2三个相关变量，它们的n组观察值为:

(Y_i,X_{1i},X_{2i}) $\quad i=1,2,\cdots,n$

Y对X_1和X_2的回归方程为:

$\overline{Y_i}=\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X_{1i}+\overline{\beta_2}x_{2i}$

则复相关系数为

$$R=\sqrt{\frac{\sum_{i=1}^{n}(Y_i^{-}-\overline{Y})^2}{\sum_{i=1}^{n}(Y_i-\overline{Y})^2}}$$

复相关系数具有以下性质:

(1) 复相关系数的所在范围在0到1之间。

(2) 复相关系数的数值越大，则变量间直线相关的程度越大。当R=1时，变量间完全相关，当R=0时，变量间完全不相关。

(3) 复相关系数的平方为决定系数。因此，可以利用决定系数来进行显著性检验等统计分析。

结构式(Structural Equations) 联立方程模型的结构式是依据经济理论设定模型时所采取的形式。模型中每个随机方程式相应的内生变量可表示为其它内生变量、前定变量和随机干扰项的函数，称为结构方程式，其中包含的参数称为结构参数。结构参数表示经济关系或经济结构稳定的特征，表示以它为系数的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其符号表示这种直接影响的方向，其绝对值大小表示这种直接影响的程度。

假设联立方程模型具有G个内生变量$Y_{1t},Y_{2t},\cdots,Y_{Gt}$和K个前定变量$X_{1t},X_{2t},\cdots$，$X_{kt}$的G个方程构成:

$\beta_{11}Y_{1t}+\beta_{12}Y_{2t}+\cdots+\beta_{1G}Y_{Gt}+$
$\quad r_{11}X_{1t}+r_{12}X_{2t}+\cdots+r_{1k}X_{kt}=U_{1t}$

$\beta_{21}Y_{1t}+\beta_{22}Y_{2t}+\cdots+\beta_{2G}Y_{Gt}+$
$\quad r_{21}X_{1t}+r_{22}X_{2t}+\cdots+r_{2k}X_{kt}=U_{2t}$

………

$\beta_{G1}Y_{1t}+\beta_{G2}Y_{2t}+\cdots+\beta_{GG}Y_{Gt}+$
$\quad r_{G1}X_{1t}+r_{G2}X_{2t}+\cdots r_{GK}X_{kt}=U_{Gt}$

用矩阵表示，可写为

$BY+TX=U$

其中: $B=(Bij)_{GXG}$, $\Gamma=(rij)_{GXK}$

$Y=(Y_{1t},Y_{2t},\cdots,Y_{Gt})^1$, $X=(X_{1t},X_{2t},\cdots,X_{kt})^1$

则出现在方程组中的每一个方程都称为结构方程式，它说明相应的内生变量可以表示为其它内生变量、前定变量和随机干扰项的函数。当前定变量的数值给定时，可以通过解联立模型获得所有内生变量的数值。一般说来，联立方程模型所包含的方程的个数应等于内生变量的个数。

结构关系模型(Structural Relationship Model) 在古典线性回归模型中，一般假定自变量X是非随机的。但在不少情况下，自变量可能是随机的。这时，X的取值$x_1,\cdots\cdots,x_n$本身就是随机变量。当一个统计量(如回归系数)涉及这些x_i时，该统计量的分布就应该结合x_1，$\cdots\cdots,x_n$的分布去考虑，而不能把它们看成常数。

在实际问题中，X为随机的情况，可分为以下两类:

1. (X,Y)是从一个总体中随机地抽得的个体上的某些指标值。身高和体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这种情况来说，X、Y的地位可以说是平等的，只是由于指标的具体含义及问题的着重点等等的不同，才把其中的一个变量(即Y)突出出来作为因变量。(X,Y)的样本，就是从该总体中随机抽出n个个体的指标$(X_1,Y_1),\cdots,(X_n,Y_n)$，一般可以假定它们是独立同分布。

2.X就其本性来说，在试验中的值可随人控制，不过控制不准或者说测量不准，这种测量误差的存

在，使自变量X成为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中，虽然X、Y同属随机，其本性却有所不同。Y的随机性的来由，是因为自变量X不包括影响Y的全部因素，因而X之值不能唯一决定Y之值。至于X，其随机性纯来自量测。相对比起来，量测误差在一般应用中不甚重要，故为一般目的，可以把X视为非随机的。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它值得重视，a.X的量测误差大到可以与Y的随机性相比的程度；b.Y的随机性主要也是来自量测误差，换句话说，在应用所要求的限度内，X、Y其实是有严格函数关系的，例如，有严格的线性关系，只是由于X、Y都存在测量误差，故在观察数据的表现上，二者无严格关系。这种模型，常称为结构关系模型。对结构关系模型的研究，是近几十年来数理统计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点估计（Point Estimation） 点估计就是以单个数值对总体参数值作出估计，所以也称定值估计。若未知的总体参数为 θ，是一个未知的常数。我们进行估计就是要构造一个统计量 $\overline{\theta}(x_1,x_2,\cdots,x_n)$，根据抽样的结果 $x_1,x_2,\cdots,x_n$ 来估计总体参数。由于抽样的随机性，统计量 $\overline{\theta}$ 是一个随机变量，而点估计就是将 $\overline{\theta}$ 的具体值作为 θ 的估计值。

点估计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矩法和极大似然法。

所谓矩法，就是在确定总体参数估计值时，以样本矩作为相应的总体矩的估计，以样本矩的函数作为相应的总体矩的矩数。

所谓极大似然法，就是假设样本 $(x_1,\cdots x_n)$ 抽自分布密度为 $f(x,\theta)$ 的总体X，有理由认为对于一组取定的样本值，θ 应使联合分布密度 $\prod_{i=1}^{n} f_i(x_i,\theta)$ 达到最大，由此求出的 θ 的估计值 $\overline{\theta}$，就是极大似然估计。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和非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我国的工业生产单位，从核算形式的角度，按其行政和财务核算是否独立，分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和非独立核算工业生产单位。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应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①行政上有独立的组织形式；②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编制独立的资金平衡表或资产负债表；③有权与其它单位签订合同，并在银行设有独立户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不论是单一性生产或联合性生产的企业，均以整个企业作为一个基本填报单位。

非独立核算工业生产单位，是指不具备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三个条件，附设于其他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科研机构、部队等单位的工业生产单位。但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①有固定的生产场所和生产设备；②有固定的生产工人和学徒在十人以上；③一般单位常年生产，季节性生产的单位全年开工时间在三个月以上。

十 画

高斯—马尔柯夫定理（Gauss—Markov Theorem） 最小二乘估计量从估计理论角度来说具有很多优良性质，这些性质可以概括为高斯—马尔柯夫定理。

在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假定满足的情况下，最小二乘估计是最小方差线性无偏估计量。

这个定理说明最小二乘估计量是回归模型中因变量Y这样一个随机变量的线性函数，它们是无偏的、又具有最小方差，所以是有效估计量。对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最小二乘估计量有以下特性：

1.最小二乘估计量是Y的线性函数。

因为

$$\overline{\beta_1}=\frac{\sum_{i=1}^{n}x_iY_i}{\sum_{i=1}^{n}X_i^2}$$

$$=\frac{\sum_{i=1}^{n}X_i(Y_i-\overline{Y})}{\sum_{i=1}^{n}X_i^2}$$

$$=\frac{\sum_{i=1}^{n}x_iY_i}{\sum_{i=1}^{n}X_i^2}-\frac{\overline{Y}\sum_{i=1}^{n}X_i}{\sum_{i=1}^{n}X_i^2}$$

$$=\frac{\sum_{i=1}^{n}x_iY_i}{\sum_{i=1}^{n}X_i^2}\quad 因为\sum_{i=1}^{n}x_i=0$$

$$令\frac{\sum_{i=1}^{n}x_i}{\sum_{i=1}^{n}X_i^2}$$

那么$\overrightarrow{\beta_1}=\sum_{i=1}^{n}k_iY_i$

对于$\overrightarrow{\beta_0}$,则有:

$$\overline{\beta_0}=\overline{Y}-\overline{\beta_1 X}$$

$$=\overline{Y}-\overline{X}\sum_{i=1}^{n}K_iY_i$$

$$=\sum_{i=1}^{n}(\frac{1}{n}-\overline{X}K_i)Y_i$$

2.最小二乘估计量是其参数的无偏估计

因为:

$$\overrightarrow{\beta_{.}}=\sum_{i=1}^{n}R_iY_i=\sum_{i=1}^{n}k_i(\beta_0+\beta_1X_i+\mu)$$

$$=\sum_{i=1}^{n}k_i\beta_0+\sum_{i=1}^{n}k_i\beta_1X_i+\sum_{i=1}^{n}k_iu_i$$

$$=\beta_0\sum_{i=1}^{n}k_i+\beta_1\sum_{i=1}^{n}K_iX_i+\sum_{i=1}^{n}K_i\mu_i$$

$$=\beta_0+\sum_{i=1}^{n}k_i\mu_i$$

其中:$\sum_{i=1}^{n}k_i=0$,$\sum_{i=1}^{n}K_iX_i=1$

则:

$$E(\overline{\beta_1})=E\beta_0+\sum_{i=1}^{n}k_iE\mu_i$$

$$=\beta_0$$

对于$\overrightarrow{\beta_0}$,则有

$$E(\overline{\beta_0})=E\sum_{i=1}^{n}(\frac{1}{n}-\overline{X}k_i)Y_i$$

$$=\sum_{i=1}^{n}(\frac{1}{n}-\overline{X}k_i)(\beta_0+\beta_1X_i+E\mu_i)$$

$$=\sum_{i=1}^{n}(\frac{\beta_0}{n}-\overline{X}k_i\beta_0+\frac{\beta_1X_i}{n}-\overline{X}k_i\beta_1X_i)$$

$$=\beta_0-\overline{X}\beta_0\sum_{i=1}^{n}k_i+\beta_1\frac{\sum_{i=1}^{n}X_i}{n}-\beta_1\overline{x}\sum k_ix_i$$

$$=\beta_0$$

3.最小二乘估计量是最小方差无偏估计。

根据方差定义和最小二乘法假设:

$$Var(\overline{\beta_1})=E(\overrightarrow{\beta_1}-\beta_1)^2$$

$$=E(\sum_{i=1}^{n}k_i\mu_i)^2$$

$$=E(\sum_{i=1}^{n}k_i^2\mu_i^2+\sum_{i\neq j}^{r}k_iK_j\mu_i\mu_j)$$

$$=\sum_{i=1}^{n}k_i^2E(\mu_i^2)\quad 因为E(\mu_i\mu_j)=0,i\neq j$$

$$=\sigma^2\sum_{i=1}^{n}ki^2$$

$$=\sigma^2\frac{1}{\sum_{i=1}^{n}x_i^2}$$

另外再定义一个β_1的线性估计量。

$$\beta_1^*=\sum_{i=1}^{n}W_iY_i\quad 且\sum_{i=1}^{n}W_i=0,\quad \sum_{i=1}^{n}W_iX_i=1$$

式中W_i也是权数,不一定等于k_i,那么:

$$E(\beta_1^*)=\sum_{i=1}^{n}W_iE(Y_i)$$

$$=\sum_{i=1}^{n}W_i(\beta_0+\beta_1x_i)=\beta_0\sum_{i=1}^{n}W_i+\beta_1\sum_{i=1}^{n}W_iX_i$$

$$=\beta_1$$

然而:

$$V_{ar}(\beta_1^*)=V_{ar}\sum_{i=1}^{n}W_iY_i$$

$$=\sum_{i=1}^{n}W_i^2\,[V_{ar}(\beta_0+\beta_1X_i+\mu_i)]$$

$$=\sigma^2\sum_{i=1}^{n}W_i^2$$

$$=\sigma^2\sum_{i=1}^{n}(W_i-\frac{x_i}{\sum_{i=1}^{n}X_i^2}+\frac{X_i}{\sum_{i=1}^{n}x_i^2})^2$$

$$=\sigma^2\sum_{i=1}^{n}(W_i-\frac{X_i}{\sum_{i=1}^{n}x_j^2})+\sigma^2(\frac{1}{\sum_{i=1}^{n}X_i^2})$$

这个结果中的最后一项是常数,为使β_1^*的方差最小,只能令

$$W_i=\frac{X_i}{\sum_{i=1}^{n}x_i^2}$$

所以,$\hat{\beta}_1$是最小方差无偏估计。对于$\hat{\beta_0}$、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加以证明。

对于二元以至于多元的回归模型,也可以证明高斯—马尔柯夫定理成立。

高斯(Gauss)消去法 高斯消去法是一种代数运算方法,可以在回归分析中用于计算残差平方和RSS_q。

设有方阵 $A=(aij)_{n\times n}$，所谓以 A_{ij} 为枢轴的 Gauss 消去运算（简称 G 运算)。是指这样一个运算

$$b_{kj}=\begin{cases}a_k-a_{ki}a_{ij}/a_{ji}, i+j\leqslant k, j\leqslant n\\ a_{ij} \quad 其它\end{cases}$$

从定义容易看出，若 $1<i_1<\cdots<iq<n-1$，依次以 $a_{i1}, 1, \cdots, a_{iq\cdot iq}$ 为枢轴对 A 作 G 运算，对 a_{nn} 的作用与 S 运算（参见"扫描运算"）$S_{i1},\cdots,S_{iq}$ 对 a_{nn} 的作用相同，因此，G 运算也可用来计算 RSS_q。

调整后的决定系数（The Adjusted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决定系数是模型中包括的解释变量个数的非减函数，随着解释变量数目的增加，R^2 总是增加而不减少，这是因为：

$$R^2=1-\frac{\sum_{i=1}^{n}e_i}{\sum_{i=1}^{n}(Y_i-\overline{Y})^2}$$

式中 $\sum_{i=1}^{n}(Y_i-\overline{Y})^2$ 与模型中包括的变量 X 的数目无关，而 $\sum_{i=1}^{n}ei^2$ 与模型中包括截距项在内的解释变量的数目有关，随着解释变量数目增加，$\sum_{i=1}^{n}ei^2$ 将减少，至少不会增加，所以在比较两个 R^2 时，就应该考虑模型中包括的变量 X 的数目，引进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overline{R}^2$：

$$\overline{R}^2=1-\frac{\sum_{i=1}^{n}e_i^2/(n-K)}{\sum_{i=1}^{n}(Y_i-\overline{Y})^2/(n-1)}=1-\frac{\overline{\sigma^2}}{Sy^2}$$

式中 K 是模型中包括截距项在内的参数的个数。所谓调整，就是指 $\overline{R^2}$ 中的 $\sum_{i=1}^{n}ei^2$ 和 $\sum_{i=1}^{n}(Y_i-\overline{Y})$ 都用各个的自由度去除，得到 $\overline{\sigma^2}$ 和 S_y^2，$\overline{\sigma}$ 是干扰项 ui 的方差的无偏估计量，S_y^2 是 Y 的样本方差。

差分—指数平滑模型 差分方法在统计预测中是消除长期趋势的重要方法，将它和指数平滑方法结合，可以改进指数平滑方法和预测结果。

1.一阶差分—指数平滑模型

在时间序列的一次差分基本稳定在一个水平，即发展为线性增长时，可运用一阶差分—指数平滑模型预测，其公式如下：

$$\triangle Y_t=y_t-y_{t-1} \quad (1)$$

$$\triangle\hat{y}_{t+1}=\alpha\triangle y_t+(1-\alpha)\overline{\triangle y_t} \quad (2)$$

$$\hat{y}_{t+1}=\triangle\hat{y}_{t+1}+y_t \quad (3)$$

其中，△是差分记号。(1) 式表示对呈线性增长的原序列作一阶差分，构成一个平坦的新序列；(2) 式表示对这个新序列运用指数平滑法，(3) 式表示把经过一阶差分后的新序列的指数平滑值同变量现期的实际值迭加，作为变量下一期的预测值。

2.二阶差分—指数平滑模型

当现象的发展为非线性增长时，可用二阶差分—指数平滑模型预测，其公式如下：

$$\triangle Y_t=y_t-y_{t-1} \quad (4)$$

$$\triangle^2 y_t=\triangle y_t-\triangle y_{t-1}$$

$$\triangle^2\overline{y_{t+1}}=\alpha\triangle^2 y_t+(1-\alpha)\triangle^2\overline{y_t}$$

其中，$\triangle^d$ 表示二阶差分。一般地说，符号 $\triangle^2$ 表示对原序列 y_t 作 d 阶差分。

从实用上说，差分—指数平滑组合模型保留了指数平滑法计算量不能递推延续预测的优点。由于存在着差分项，使组合模型具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能较敏感地在发展出现转折的第二期上作出响应，因为这时 $\triangle y_t=y_t-y_{t-1}$ 已经改变了符号。

柯尔莫哥洛夫检验（Kolmogoroff Test） 柯尔莫哥洛夫检验是一种拟合优度检验，它检验的是一个样本是否服从某种理论分布。

首先假设样本经验分布函数 $F_n(n)$ 得自于分布函数为 $F^*(x)$ 的总体，其备择假设则是 $F_n(n)$ 并不属于 $F^*(X)$。即

$$H_0:F_n(x)=F^*(n) \qquad (-\infty<x<+\infty)$$

$$H_1:F_n(x)\neq F^*(n)$$

设统计量

$$D_n^*=SUP|F_n(x)-F^*(x)|$$

$$=\max\{|F_n(x_k)-F^*(X_k)|,|F_n(x_{k+1})-F^*(x_k)|\}$$

显然，如果样本的经验分布函数得自于 $F^*(x)$，即 H_0 为真时，D_n^* 比较小；二者不一致时，D_n 比较大。柯尔莫哥洛夫证明了 D_n^* 这一统计量的分布对于任意的连续型分布函数 $F^*(x)$ 都是一样的，不依赖于所研究的具体分布。其分布函数为：

$$\lim_{n\to\infty}P(\sqrt{n}D_n^*\leqslant t)=1-2\sum_{i=1}^{\infty}(-1)^{i-1}e^{-2i^2t^2}$$

对于不同的样本容量，D_n^* 的临界值已经制成专门的表供查阅，可以直接检验 $\sqrt{n}D_n^*$，当它大于临界值时，就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 α 下拒绝原假设。

在大样本的情况下（一般要求 n>40），$4nD_n^{*2}$ 渐近地服从自由度为 2 的 X^2 分布。可利用 x^2 分布表进行假设检验。

格雷舍（Glejser） 检验格雷舍检验和帕克检验（参见"帕克检验"）一样，也是一种检查回归模型是否存在着异方差性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利用残差 e_i 的绝对值$|e_i|$对解释变量 X_i 进行回归运算，从而考察模型中异方差存在的情况。这时 $|e_i|$实际上是作为$|\sigma_i|$的估计值处理的。其具体步骤如下:

1.Y 对解释变量 X_i 进行回归，然后计算剩余 $e_i(i=1,2,\cdots,n)$（设回归模型为 $Y_i=\beta_0+\beta_1X_i+u_i$）。

2.用$|e_i|$对解释变量 X_i 进行回归。这一回归模型的形式通常是未知的，所以，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进行试验。如:

$$|e_i|=\alpha_0+\alpha_1X_i^2+V_i$$

$$|e_i|=\alpha_0+\alpha_1\frac{1}{X_i}+V_i$$

$$|e_i|=\alpha_0+\alpha_1\sqrt{X_i}+V_i$$

等等。利用决定系数，选择拟合最佳的回归形式。

3.对$\overrightarrow{\alpha_0}$和$\overrightarrow{\alpha_1}$进行显著性检验。若 α_0 和 α_1 都显著地不等于 0，就接受 u_i 是异方差的。如果 $\alpha_0=0$，$\alpha_1\neq0$，被称为"纯异方差性"；如果 $\alpha_0\neq0,\alpha_1\neq0$，则被称为是"混合异方差性"；如果 α_0 和 α_1 都等于 0，则无法判断，因为这时只能认为所试验的回归形式不成立，并不能证明$|e_i|$和 X_i 之间不存在其它关系。所以，有的学者用十多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回归形式进行试验。格雷舍检验的优点和帕克检验一样，提供了异方差形式的信息，它对校正"异方差"干扰项是很重要的。如果把这个检验和其他检验结合起来（如先用 Goldfeld—Quandt 检验来检查是否存在异方差，再用这种方法探索异方差的具体形式），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异方差的问题。

样本方差和标准差（Sample Varianc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样本方差和标准差是用来测定一个样本中变量的离散程度的最常用指标，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为:

$$S=\sqrt{\frac{\sum_{i=1}^{n}(x_i-\bar{x})^2}{N}}$$

其中 s 代表标准差，x_i 代表变量数值，又代表变量数列的算术平均数。

s 的数值越小，说明现象的离散程度越小。s^2 被称为方差，有时也用来说明变量的离散程度，但由于在实际应用时，s 有许多优越之处，如便于数学上的推导等，所以常把 s 作为主要的指标。

样本方差和总体方差 σ^2 是相对应的。如果用样本方差值估计总体方差，则有:

$$E(S^2)=E\left(\frac{\sum_{i=1}^{n}(x_i-\bar{x})^2}{N}\right)=\frac{(N-1)\sigma^2}{N}$$

即 S^2 是 σ^2 的有偏估计。所以，如果将样本方差用于估计总体方差，常采用

$$S_{N-1}^2=\frac{\sum(x_i-\bar{x})^2}{N-1}$$

就是总体方差的无偏估计。

样本回归函数（Sample Regression Function）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可能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即对每一组 X 的固定取值 $X_i=(X_{1i},X_{2i},\cdots,X_{ki})$ $i=1,2,\cdots,n$ 不可能了解到随机变量 Y_i 的所有取值以及它们的概率，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 Y_i 的某一些观察值，而所有的观察值则构成了一个样本。一般地说，由于存在着抽样波动，无法利用这个样本资料精确地估计出总体回归函数，但是，由于样本资料来自于总体，可以利用它来近似地估计总体的回归函数。这种利用样本资料得到的回归函数，称为样本回归函数。例如，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研究中，用 Y_i 代表消费支出，X_i 代表收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overrightarrow{Y_i}=\overrightarrow{\beta_0}+\overrightarrow{\beta_1}X_i$$

在这个式子中，$\overrightarrow{Y_i}$是 $E(Y_i|X_i)$ 的估计量，$\overrightarrow{\beta_0}$是 β_0 的估计量，$\overrightarrow{\beta_1}$是 β_1 的估计量。

而$\overrightarrow{Y_i}$与 Y_i 之间的离差

$$e_i=Y_i-\overrightarrow{Y_i}$$

则称为样本残差项，它是总体回归方程中随机干扰项 μ_i 的估计量。

一般地，样本回归函数可表示为:

$$\overrightarrow{Y_i}=\vec{\beta}_0+\vec{\beta}_1X_{1i}+\vec{\beta}_2X_{2i}+\cdots+\vec{\beta}_kX_{ki}$$

或 $Y_i=\vec{\beta}_0+\vec{\beta}_1X_{1i}+\vec{\beta}_2X_{2i}+\cdots+\vec{\beta}_kX_{ki}+e_i$

样本回归函数

$$Y_i=\vec{\beta}_0+\vec{\beta}_1X_{1i}+\vec{\beta}_2X_{2i}\cdots+\vec{\beta}_kx_{ki}+e_i$$

和总体回归函数

$$Y_i=\beta_0+\beta_1X_{1i}+\beta_2X_{2i}+\cdots\beta_KX_{Ki}+u_i$$

之间是存在着误差的。为了使两个函数尽可能地接近，就要使$\overrightarrow{\beta_0}$尽可能地接受 β_0，$\overrightarrow{\beta_1}$尽可能地接近 β_1，等等。这样，就把研究的任务归结为找到 β 的尽可能好的估计值$\overrightarrow{\beta_i}$，只要能作到这一点，即使根本不知道总体回归函数的真实情况，也能够很有把握地用样本回归函数去近似它。

预测平方和（Prediction Sum Error of Squares, PRESS）准则 这是由 D·M·Allen 在 1971 年提出的一种在回归分析中选择自变量的方法。

考虑线性回归模型

$Y=X\gamma+e,\quad E(e)=0,\quad C_{ov}(e)=\sigma^2 I$　　(1)

这里的设计矩阵 $X'=(x_1,x_2,\cdots,x_n)$。剔除第 1 次试验，得到模型

$Y(i)=X(i)r+e(i)$　　(2)

其中，$Y_{(i)}, X_{(i)}, e_{(i)}$ 分别表示从 Y、X、e 中删去第 i 行得到的向量或矩阵。

利用模型（2）获得的 γ 的最小二乘估计 $\bar{\gamma}(i)$，然后利用这个估计对第 i 个试验点 x_i 处的因变量作预测，得到预测值 $x_i^1\bar{\gamma}(i)$ 及预测偏差：

$d_i=Y_i-x_i^1\bar{\gamma}(i)$　　(3)

对每一个点都这么作，得到 $d_1,d_2\cdots,d_n$，其平方和为：

$$PRESS=\sum_{i=1}^{n}d_i^2 \qquad (4)$$

这就是全模型的预测平方和（参见"全模型和选模型"），它度量了全模型的优劣。对于选模型

$Y=x_q r_q+e,\quad E(e)=0\quad ,Cov(e)=\sigma^2 I$　　(5)

用 x_q 代替（4）式中的 X，得到该模型的预测平方和，记为 $PRESS_q$。PRESS 准则是，选择使 $PRESS_q$ 达到最小的选模型。

预测偏差的方差准则　它是回归分析中选择自变量准则之一，从预测角度考虑自变量的选择问题，记 $x_q'=(x_{q1},\cdots,x_{qn})$。考虑选模型（参见"全模型和选模型"）

$Y=X_q r_q'+e$　　(1)

下，n 个试验点 $x_{qi}(i=1,\cdots,n)$ 预测的偏差 $U_{qi}=y_i-x_{qi}r_q$ 的方差之和，有

$$\sum_{i=1}^{n}V_{ar}(U_{qi})=\sigma^2(n+g)$$

因为 RMS_q（参见"平均残差平方和准则"）是从选模型得到的 σ^2 的估计，用它代替上式中的 σ^2，得到 $(n+q)RMS_q$，这个准则是按照"$(n+q)RMS_q$ 愈小愈好"选择自变量子集。因为

$$(n+q)RMS_q=\frac{n+q}{n-q}RSS_q$$

可见，它的惩罚因子为(n+q)／(n−q)。它对变量个数增加的惩罚要比 RMS_q 准则更严厉些。应该说明，这个准则只考虑了预测方差，而未能兼顾预测偏差。对于选模型，预测往往是有偏的，所以，预测均方误差对预测精度的度量更为全面。

平均预测均方误差准则　它是回归分析中选择自变量的准则。和预测偏差的方差准则类似，它也是从预测角度考虑问题的，但考虑问题的方法略有不同（参见"预测偏差的方差准则"）。

对于选模型（参见"全模型和选模型"）

$Y=X_q r_q+e$

平均预测均方误差定义为

$$S_q=\frac{1}{n-q-1}RMS_1$$

这个准则按"S_q 愈小愈好"的原则选择自变量子集。它既考虑了预测方差，又兼顾了预测偏差，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自变量的准则。

十一画

随机干扰项（Disturbance term）　在回归分析中，随机变量 Y_i 和它的期望值 $E(Y_i|X_i)$ 之间的离差 $U_i=Y_i-E(Y_i|X_i)$ 称为随机干扰项或随机误差项。其中，$X=(X_1,X_2\cdots,X_k)$ 是一个向量，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有 $X=(x)$。显然，U_i 也是一个随机变量。

随机干扰项反映的是所有那些没有包括进方程的变量对 Y 的总合影响，如果 $E(Y_i|X_i)=f(X_i)$，有：

$Y_i=f(X_i)+\mu$

这时，如果回归线通过 $E(Y_i|X_i), i=1,2,\cdots,n$，则有：

$E(Y_i|X_i)=E[f(xi)]+E\mu_i$

$=E[f(x_i)]$

即 $E\mu_i=0$

之所以要在回归方程中设置这样一个随机干扰项，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1.描述 Y 这个变量的变化状况的理论往往是不完整的，例如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回归分析中，可能只知道收入水平 X 影响消费支出 Y 的情况；但并不能确定其它变量对 Y 是否也影响，因此，可以用 μ_i 来代表这些排除在模型之外的变量。

2.即使知道某些被排除在外的变量也对 Y 在施加影响，人们也希望建立一个多元的回归方程来代替仅仅考虑一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但是由于缺乏可用的数字资料而使方程的估算工作难以进行。例如在考虑消费者行为问题时，应该考虑每个家庭的财产状况，把它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包括进模型是很合理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不

得不把这个在理论分析的角度看来很有意义的解释变量从模型中排除掉。

3.虽然其它一些因素也可能对因变量起作用，但作用较小，或不系统，无规律可循，出于对计算时间与费用的考虑，也不值得将这些变量引入模型。在这种情况下，用随机误差项代表所有这些变量的共同影响，既是实用也是合算的。

4.即令能够把所有的的变量都引入模型中，单独的 Y 的取值也有其随机性。

5.按照一般处理原则，应力求模型与处理方法简单，当可以用少数解释变量就足够满意地解释 Y 的变化情况，而模型的各项统计特征也令人满意，就不必引入更多的变量，以简化处理。这时，这些未引入的变量对 y 的影响就可以用随机干扰项来反映。

随机干扰项方差的最小二乘估计 古典线性回归模型假设在总体回归模型

$$Y_i=\beta_0+\beta_1X_{1i}+\cdots+\beta_kX_{ki}+u_i$$

中，$V_{ar}(u_i|X_{1i},X_{2i}\cdots X_{ki})=\sigma^2$。但对于总体回归模型常常是无法观察到的，只能通过样本回归方程：

$$y_i=\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X_{1i}X[li]+\cdots+\overline{\beta}_kX_{ki}+e$$

来估计。由于利用最小二乘法，已经得到了对于 $\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cdots,\overline{\beta}_k$，这时，就可以利用

$$\begin{aligned}e_i&=Y_i-\overline{Y}_i\\&=Y_i-(\overline{\beta}_0+\overline{\beta}_1X_{1i}+\cdots+\overline{\beta}_kX_{ki})\end{aligned}$$

来估计 σ^2。

可以证明：

$$E\sum_{i=1}^{n}e_i^2=(n-k-1)\sigma^2$$

所以

$$E\frac{\sum\limits_{i=1}e_i^2}{n-k-1}=\sigma^2$$

因此，

$$\overline{\sigma}^2=\frac{\sum\limits_{i=1}^{n}e^2i}{n-k-1}$$

是干扰项 u_i 的方差的最小二乘估计，它是一个无偏估计量。

当 $u_i\sim N(0,\sigma^2)$时，有

$$x^2=\frac{(n-k-1)\overline{\sigma}^2}{\sigma^2}=\frac{\sum\limits_{i=1}^{n}e_i^2}{\sigma^2}\sim x^2(n-k-1)$$

利用 x^2 分布，可以构造 σ^2 的置信区间：

$$P\left(\frac{\sum\limits_{i=1}^{n}e_i^2}{x^2_{\alpha/2}}\leqslant\sigma^2\leqslant\frac{\sum\limits_{i=1}^{n}e_i^2}{x^2_{1-\alpha/2}}\right)=1-\alpha$$

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 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中，研究的主要是一个或有限个随机变量。在极限定理中，虽然涉及了无穷多个随机变量，但它们之间经常是相互独立的。在随机过程中，将要研究一族无穷多个、相互有关的随机变量，记为$\{X(t),t\in T\}$，其中，T 是一个无穷集合。最常见的有：(1) $T_1=\{0,1,2,3,\cdots\}$，(2) $T_2=\{\cdots,-3,-2,-1,0,1,2,3,\cdots\}$，(3) $T_3=[a,b]$，其中 a、b 可以是$\pm\infty$。由于 t 一般表示时间，通常就称它们为随机过程。所以，随机过程就是一族无穷多个随机变量$\{X(t),t\in T\}$，也可称它为随机函数，其中的 T 又称为参数集。当 T 为 (1)，(2) 两种情形时，也称为随机序列。随机过程的理论产生于本世纪的初期，是由于物理学、通讯与控制，管理科学等方面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研究领域包括马尔可夫过程、二阶矩过程、平稳过程、时间序列分析等。

随机向量的变换 若随机向量$(\zeta_1,\cdots,\zeta_n)$,的密度函数为 $P(x_1,\cdots,x_n)$,求 $\eta_1=f_1(\zeta_1\cdots,\zeta_r)\cdots\cdots\eta_m=f_m(\zeta_1,\cdots,\zeta_m)$的分布。这时，就要对随机向量进行变换。在这种情况下，有

$$\begin{aligned}G(y_1,\cdots,y_m)&=P\{\eta_1<y_1,\cdots,y_m<y_m\}\\&=\int\cdots\int_{\substack{f_1(x_1,\cdots,x_n)<y_1\\ f_m(x_1,\cdots,x_n)<y_m}}P(x_1,\cdots,x_n)dx_1\cdots dx_n\end{aligned}\qquad(1)$$

(1)式说明的是一般场合的情况。当 m=1 时，(1) 式说明的就是随机向量函数的情形，当 m=n-1 时得到的就是单个随机变量函数时的情形。这里的随机向量的变换，主要考虑 $(\zeta_1,\cdots,\zeta_n)$与$(\eta_1,\cdots,\eta_m)$有一一对应变换关系时的情况，当然，这时 n=m。

若对于 $y_i=f_i(x_1,\cdots,x_n)$存在唯一的反函数 $x_i(y_1,\cdots,y_n)$，i=1,…,n，且$(\eta_1,\cdots,\eta_n)$的密度函数为 g $(y_1,\cdots,y_n)$，那么，

$$G(y_1,\cdots,y_n)=\int\cdots\int_{\substack{u_1<y_1\\ \cdots\\ u_n<y_n}}g(u_1,\cdots,u_n)du_1\cdots du_n\qquad(2)$$

比较(1)与(2)可知

$$g(y_1,\cdots,y_n)=\begin{cases}p(x_1,\cdots,x_n)|J|,\text{若}(y_1,\cdots,y_n)\text{属于}f_1,\cdots,f_n\text{的值域}\\0\qquad,\text{其它}\end{cases}$$

其中 J 为坐标变换的雅可比行列式

$$J=\begin{bmatrix}\frac{\partial x_1}{\partial y} & \cdots & \frac{\partial x_n}{\partial y_1}\\ & \cdots & \\ \frac{\partial x_1}{\partial y_n} & \cdots & \frac{\partial x_n}{\partial y_n}\end{bmatrix}$$

这里，假定上述偏导数存在而且连续。

随机变量(Random Variable)　很多随机现象，其试验结果都是可以用数来表示的。表示试验结果的数是一个随试验结果而变的变量，这个变量就称为随机变量。如果随机试验的结果不直接表现为一个数，如掷一枚均匀硬币，出现的是正面或反面，则可以按一定的方法对各种结果赋值，如把正面记为0，反面为1，这样的试验结果，也是随机变量。

按随机变量所可能取得的值，通常把它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离散型随机变量，一种是连续型随机变量。离散型随机变量只有取有限个或无穷可列个数值，如布上的疵点数、每分钟接的电话数、每分钟来公共汽车站候车的人数等；连续型随机变量则可以取某一区间内的一切实数，如一群人的身高、弹着点与靶心的距离、每亩地的产量等。

要描述一个随机变量，不仅要了解它的取值范围，更重要的要知道取这些值的可能性的大小，也就是取这些值的概率。这就是概率分布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

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设 f (x) 是定义在随机变量 ζ 的一切可能值 x 的集合上的函数。如果对于 ζ 的每一可能取值，有另一随机变量 η 的相应取值 $y=f(x)$，则称 η 为随机变量 ξ 的函数，记作 $\eta=f(\xi)$。

1. 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一般地说，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求它的函数的分布并不困难。例如，若 ξ 的分布列为

$$\begin{bmatrix}x_1, & x_2, & \cdots, & x_n, & \cdots\\ p_1, & p_2, & \cdots, & p_n, & \cdots\end{bmatrix}$$

则 $\eta=f(\xi)$的分布列可由下法得到，列出

$$\begin{bmatrix}f(x_1), & f(x_2), & \cdots, & f(x_n), & \cdots\\ p_1, & p_2, & \cdots, & p_n, & \cdots\end{bmatrix}$$

这里的某些 $f(x_i)$可能是相等的，应该把它们的概率进行归并。

若 ξ 与 η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都取非负整数值，其概率分布分别为$\{a_k\}$及$\{b_k\}$，则随机变量 $\varepsilon=\xi+\eta$ 的概率分布为：

$$c_r=P\{\varepsilon=r\}=a_0b_r+a_1b_{r-1}+\cdots+a_rb_0 \quad r=0,1,2,\cdots$$

这就是求独立随机变量和的分布的公式——离散卷积公式。

2. 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律。

单个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律。

一般地，若 ξ 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其密度函数为 p (x)，而 $\eta=f(\xi)$，可以有两种情况：

(1) 若 f (x) 严格单调，其反函数 $f^{-1}(y)$有连续导函数，则 $\eta=f(\xi)$ 是具有密度函数

$$P[f_{-1}(y)]|f^{-1}(y)'|$$

的连续型随机变量。

(2) 若 f (x) 在不相重叠的区间 $I_1,I_2,\cdots$上逐段严格单调，其反函数分别为 $h_1(y),h_2(y),\cdots$，而且 $h_1'(y),h_2'(y),\cdots$均为连续函数，那么 $\eta=f(\xi)$ 是连续型随机变量，其密度函数为

$$p[h_1(y)]|h_1'(y)|+p[h_2(y)]|h_2'(y)|+\cdots$$

3.随机向量的函数的分布律。

若 $\eta=f(\xi_1,\cdots,\xi_n)$，而$(\xi_1,\cdots,\xi_n)$的密度函数为 $p(x_1,\cdots,x_n)$，则

$$G(y)=p\{\eta<y\}=\int\cdots\int_{f(x_1,\cdots,x_n)<y} p(x_1,\cdots,x_n)dx_1\cdots dx_n$$

(1) 和的分布

若 $\eta=\xi_1+\xi_2$，而 (ξ_1,ξ_2)的密度函数为 $p(x_1,x_2)$，则

$$F(y)=p\{\eta<y\}=\iint_{x_1+x_2<y} p(x_1,x_2)dx_1dx_2$$

$$=\int_{-\infty}^{\infty}\int_{-\infty}^{y-x_1} p(x_1,x_2)dx_1dx_2 \qquad (1)$$

特别地，当 ξ_1、ξ_2 相互独立时，有 $p(x_1,x_2)=p_1(x_1)p_2(x_2)$，这里，$p_1(x_1)$为 ξ_1 的密度函数，$p_2(x_2)$ 为 ξ_2 的密度函数，代入 (1) 式得：

$$F(y)=\int_{-\infty}^{\infty}dx_1\int_{-\infty}^{y-x_1}p_1(x_1)p_2(x_2)dx_2$$

$$=\int_{-\infty}^{\infty}dx_1\int_{-\infty}^{y}p_1(x_1)p_2(z-x_1)dz$$

$$=\int_{-\infty}^{y}[\int_{-\infty}^{\infty}p_1(x_1)p_2(z-x_1)dx_1]dz$$

因此，η 的密度函数为

$$p(x)=\int_{-\infty}^{\infty}p_1(u)p_2(x-u)du \qquad (2)$$

也可以写为

$$p(x)=\int_{-\infty}^{\infty}p_1(x-u)p_2(u)du \qquad (3)$$

(2) 或 (3) 称为连续卷积公式。

(2) 商的分布

若 $\eta=\frac{\xi_1}{\xi_2}$，而(ξ_1,ξ_2)的密度函数为 $p(x_1,x_2)$，则

$$G(x)=p\{\eta<x\}=p\left\{\frac{\xi_1}{\xi_2}<x\right\}$$

$$=\iint_{x_1/x_2<x}p(x_1,x_2)dx_1dx_2$$

$$=\int_{0}^{\infty}\int_{-\infty}^{2x}p(y,2)dydz$$
$$+\int_{-\infty}^{0}\int_{2x}^{\infty}p(y,2)dydz$$

η 的密度函数为

$$y(x)=\int_{0}^{\infty}p(2x,2)zdz-\int_{-\infty}^{0}p(zx,z)zdz$$
$$=\int_{-\infty}^{\infty}|z|p(2z,2)dz$$

随机变量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Random Variable） 如果二维随机变量的条件分布 f(x|y)（在连续型随机变量情况下为概率分布密度）并不依赖于 Y，即在 Y=y 条件下 x 的条件分布等于 x 的边际分布 f(x|y)=g(x)对于所有的 x,y 成立，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在连续型随机变量情况下为概率分布密度）为 x、y 的边际分布密度 g（x），h（y）的积，即 f(x,y)=g(x)h(y)，则称随机变量 X 和 Y 为相互独立。

随机现象（Random Phenomenan） 在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系列试验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就个别的试验而言，它会时而出现这种结果，时而出现那种结果，呈现出一种偶然性，就象掷硬币，在掷硬币前，我们不知道出现的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这种现象称为随机现象。对于随机现象通常关心的是在试验中某个结果是否出现，这些结果称为随机事件，简称事件。

随机试验（Random Trial） 对于随机现象进行观察称为随机试验，一次观察就称为一次试验。一般地说，可以把随机试验的特点概括为：第一，每次试验的可能结果不止一个，在试验之前可以明确试验的所有结果或试验结果所在的范围；第二，在一次试验之前，无法确定会出现哪一种结果；第三，试验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

随机游动（Random Walk） 设$\{Z_t\}$是一个均值为 μ，方差为 σ_z^2 的离散随机过程。当 X_t 过程有

$$X_t=X_{t-1}+Z_t$$

时，称 X_t 过程为随机游动。随机游动过程通常从 0 开始，当 t=0 时，有 $X_1=Z_1$ 和

$$X_t=\sum_{i=1}^{t}z_i$$

因此，该过程的均值为 $E(X_t)=t\mu$，方差为 $Var(X_t)=t\sigma_z^2$。由于均值和方差随时间 t 变化，所以随机游动是非平稳过程。

随机游动的一阶差分

$$Z_t=X_t-X_{t-1}$$

它构成一个纯随机过程，因而是平稳的。

股票价格是一个接近于随机游动的时间序列的例子。

随机解释变量（Random Explanatory Variables） 在古典线性回归模型假定中，假设解释变量 X_t 是固定变量，这样，在其它假定也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获得的参数的估计量是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如果解释变量为随机变量而其它假设仍然成立，那么，所得到的回归系数的估计量的性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里，针对一元回归模型的情况进行说明。

在 X_t 和 u_t 相互独立的情况下，$\vec{b}_0$ 和$\vec{b}_1$ 仍然是无偏的，且具有最小方差。但$\vec{b}_0$ 和$\vec{b}_1$ 不再是 $Y_1,Y_2,\cdots,Y_n$ 的线性函数，从而它们不再是最佳线性无偏估计。

在 X_t 和 u_t 是同期无关即

$$Cov(X_t,u_t)=Cov(X_{t-1},u_{t-1})=\cdots=Cov(X_1,u_1)=0$$

的情况下，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计值不满足小样本特性，即它是有偏的；但满足大样本特性，即它是一致估计量。

在 X_t 和 u_t 相关的情况下，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计值既是有偏的，也不是一致的估计量。

特征分析法（Characteristic Analysis）和条件数（Condition Number） 考虑线性回归模型

$$Y=\alpha 1+X\beta+e,\ E(e)=0,\ Cov(e)=\sigma^2 I$$

(其中，假定 n×p 的设计阵已经中心标准化，且 Rank(X)=p)。

当 X 呈病态时，X 的列向量之间存在着近似的线性关系，即存在着多重共线性。记 $X=(X_1,\cdots,X_p)$。若 C 为对应于 $X'X$ 的特征根 λ 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且 λ=0，则

$$X'Xc=\lambda c\approx 0$$

上式两边左乘以 c'，得到

$$c'X'Xc\approx=0$$

从而有

$$Xc\approx 0$$

若 X 呈病态，则 $X'X$ 至少有一个特征根很接近于零。不妨设后 p−r 个特征根 $\lambda_{r+1},\cdots,\lambda_p\approx 0$，记 $\varphi_{r+1},\cdots,\varphi_p$ 为它们对应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由（1）可知，对这些 φ_i，有

$$X\varphi_i\approx 0,\quad i=r+1,\cdots,p$$

若令 $\varphi_i'=\varphi_{1i},\cdots,\varphi_{pi}$)，则有

$$\varphi_{1i}X_1+\cdots+\varphi_{pi}X_p\approx 0,\ i=r+1,\cdots,p$$

这是 p−r 个多重共线关系。可见，$X'X$ 有多少个特征根非常接近于零，设计阵 X 就有多少个多重共线关系，并且这些多重共线关系的系数向量就是接近于 0 的那些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这种分析多重共线性

的方法，就是特征分析法。

特征分析法计算简单，且很容易地给出了全部的多重共线关系。但是，$X'X$ 的特征根很接近于零"却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条件数的提出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帮助。

方阵 $X'X$ 的条件数定义为

$$k=\frac{\lambda_1}{\lambda_p}$$

条件数从直观上度量了 $X'X$ 的特征根散布程度，可以用来判断多重共线性是否存在以及多重共线性的严重程度。在应用经验中，若 $0<k<100$，则认为没有多重共线性；若 $100\leqslant k\leqslant 1000$，则认为存在中等程度或较强的多重共线性；若 $k>1000$，则认为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特征根估计（latent Root Estimate） 回归系数的特征根估计是由 Webster 等于 1974 年提出的，它是主成分估计的一种推广。在特征根估计中，当考虑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时，不象主成分估计那样只限于自变量部分，而是把因变量也放在一起考虑。这是特征根估计的一个特点。

考虑线性回归模型

$$Y=\alpha 1+X\beta+e,\quad E(e)=0,\ Cov(e)=\sigma^2 I \qquad (1)$$

假设 $n\times p$ 的设计阵已经中心化、标准化，则 α、β 的 LS 估计分别为 $\overline{\alpha}=\overline{Y}=\frac{1}{n}\sum_{i=1}^{n}Y_i$，$\overline{\beta}=(X'X)^{-1}X'Y$。现在将 Y 也中心化、标准化，即以

$$\overline{Y}=(Y-\overline{Y}1)/S_y$$

代替 Y，这里 $S_y^2=\sum_{i=1}^{n}(Y_i-\overline{Y})^2$，记 $A=(\overline{Y}:\ X)$，则

$$A'A=\begin{bmatrix}\overline{Y}'\overline{Y} & \overline{Y}'X\\ X'\overline{Y} & X'X\end{bmatrix}=\begin{bmatrix}1 & \overline{Y}'X\\ X'\overline{Y} & X'X\end{bmatrix}$$

记 $\lambda_0,\lambda_1,\cdots,\lambda_p$ 为 $A'A$ 的特征根 $\psi_0,\psi_1,\cdots,\psi_p$ 为 $A'A$ 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响量，于是若记

$$\psi=(\psi_0,\psi_1,\cdots,\psi_p)$$

则有

$$\psi'A'A\psi=\wedge=diag(\lambda_0,\lambda_1,\cdots,\lambda_p)$$

再记

$$\psi_i'=(\psi_{0i},\psi_{1i},\cdots,\psi_{pi}),\ i=0,1,\cdots,p$$

$$\overline{\psi}_i'=(\psi_{1i},\cdots,\psi_{pi})\quad i=0,1,\cdots,p$$

如果 $\lambda_i=0$，则因 $A'A\psi_i=\lambda_i\psi_i\psi_i=0$ 左乘 ψ_i 得

$$\psi_i'A'A\psi_i=\lambda_i\psi_i'\psi_i=\lambda_i=0$$

于是 $A\psi_i=0$。这个事实说明，从现有 n 组数据看，因变量 $\overline{y}$(记 y 为因变量，$\overline{y}=(y-\overline{Y})/s_y$)和自变量 $x_1,x_2,\cdots x_p$ 之间有严格的线性关系：

$$\psi_{0i}\overline{y}=\psi_{1i}x_1+\cdots+\psi_{pi}x_p=0 \qquad (2)$$

这时可能发生如下两种情况：

(1) $\psi_{0i}\neq 0$

这时，$\overline{y}$ 可通过 $x_1,x_2,\cdots,x_p$ 线性表出，将 $\overline{y}=(y-\overline{Y})/s_y$ 代入，得

$$y=\overline{Y}-\frac{s_y}{\psi_0}(\psi_{1i}x_1+\cdots+\psi_{pi}x_p) \qquad (3)$$

因为 n 组数据严格满足这个方程，所以残差平方和为零。因而 (3) 式是一个理想的经验回归方程。这时，可以通过加权方法获得一个较好的预测方程，考虑预测方程

$$y=\sum_{i=0}^{p}w_i\psi_{0i}(\overline{Y}-\frac{s_y}{\psi_{0i}}\sum_{j=1}^{p}\psi_{ji}x_j) \qquad (4)$$

其中 $w_i\psi_{0j}$ 为权数，满足

$$\sum_{i=0}^{p}w_i\psi_{0i}=1$$

改写 (4) 为

$$y=\overline{Y}-s_y\sum_{j=1}^{p}(\sum_{i=1}^{p}\psi_{ji}w_i)x_j \qquad (5)$$

可以证明，(5) 式中 x_j 的回归系数的估计就是 LS 估计 $\vec{\beta}_j$。

(2) $\psi_{0i}=0$

这时，由 (2) 知，自变量 $x_1,\cdots,x_p$ 有严格线性关系，

$$\psi_{1i}x_1+\cdots+\psi_{pi}x_p=0$$

在应用上，若 $\lambda_i\approx 0$，则有近似关系：

$$\psi_{0i}\overline{y}+\psi_{1i}x_1+\cdots+\psi_{pi}x_p\approx 0$$

再若 $\psi_{1i}\approx 0$，上式即变为多重共线关系

$$\psi_{1i}x_1+\cdots+\psi_{pi}x_p\approx 0 \qquad (6)$$

这也就是说：对每一对 $\lambda_i=0$，$\psi_{0i}\approx 0$，设计阵就有一多重共线关系 (6) 存在。如果至少有一对这样的 λ_i，ψ_{0i} 存在，LS 估计的性质就显著地变差。

在 $\lambda_i\approx 0$，$\psi_{0i}\approx 0$，$i=0,1,\cdots,k-1$ 时，对这些 i 就没有方程 (3)，于是在推出 (4) 时，求和就不包括这些 i，即

$$y=\sum_{i=k}^{p}w_i\psi_{0i}\left(\overline{Y}-\frac{s_y}{\psi_{0i}}\sum_{j=1}^{p}\psi_{ji}x_j\right)$$

现假定

$$\sum_{i=k}^{p}w_i\psi_{0i}=1 \qquad (7)$$

上式就变为：

$$y=\overline{Y}-s_y\sum_{j=1}^{p}\left(\sum_{i=k}^{p}\psi_{ji}w_i\right)x_j \qquad (8)$$

在(7)的约束下使得(8)的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就得

到

$$w_i=\frac{\psi_{0i}}{\lambda_i\sum_{j=k}^{p}\psi_{0j}^2/\lambda_j},\quad i=k,\cdots,p \tag{9}$$

此时相应的残差平方和为

$$RSS=s_y^2\left(\sum_{i=k}^{p}\frac{\psi_{0i}^2}{\lambda_i}\right)^{-1}$$

这样导出预测方程或者说求回归系数估计的方法称为特征根法，所得到的估计叫作特征根估计。显然，回归系数的特征根估计为：

$$\beta_j^*=-s_y\sum_{i=k}^{p}\psi_{ji}w_i$$

其中 w_i 由(9)式定义。

在应用上，Webster 建议当 $\lambda_i<0.05$，$|\psi_{0i}|<0.1$ 时就可以认为它们近似地等于零。

特征函数（Characteristic Function）　若随机变量 ξ 的分布函数为 $F_\xi(x)$，则称

$$f_\xi(t)=Ee^{it\xi}=\int_{-\infty}^{\infty}e^{itx}dF_\xi(x)$$

为 ξ 的特征函数。

这里，$e^{it\xi}=\cos(t\xi)+i\sin(t\xi)$

特征函数是一个实变量的复值函数，由于 $|e^{itx}|=1$，所以它对一切实数 t 都有定义。

可以证明，特征函数与分布函数是相互唯一确定的，它有许多良好的分析性质。

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若其分布列为

$$\begin{bmatrix}x_1,x_2,\cdots,x_n,\cdots\\p_1,p_2,\cdots,p_n,\cdots\end{bmatrix}$$

则其特征函数为

$$f(t)=\sum_{j=1}^{\infty}p_je^{itx_j}$$

特别地，对于整值随机变量，若其母函数为 p（s），则 f（t）$=p(e^{it})$。

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若其分布密度为 p(x)，则其特征函数为

$$f(x)=\int_{-\infty}^{\infty}e^{itx}p(x)dx$$

这时，特征函数是密度函数 p（x）的富里埃（Fourier）变换。

特征函数 f（t）有如下性质：

（一）$f(0)=1$，$|f(t)|\leqslant f(0)$，$f(-t)=\overline{f(t)}$

（二）特征函数在$(-\infty,\infty)$上一致连续。

（三）对于任意的正整数 n 及任意实数 $t_1,t_2,\cdots,t_n$ 及复数 $\lambda_1,\lambda_2,\cdots,\lambda_n$，成立

$$\sum_{k=1}^{n}\sum_{j=1}^{n}f(t_k-t_j)\lambda_k\bar{\lambda}_j\geqslant 0$$

这个性质称为非负定性，这是特征函数最本质的性质之一。

（四）两个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之和的特征函数等于它们的特征函数的乘积。

这个性质可以推广到 n 个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场合。

（五）设随机变量 ξ 有 n 阶矩存在，则它的特征函数可微分 n 次，且当 $k\leqslant n$ 时：

$$f^{(k)}(0)=i^kE\xi^k$$

这个性质使得各阶矩可以方便地求得。

（六）设 $\eta=a\xi+b$，（a、b 为常数），则

$$f_\eta(t)=e^{ibt}f_\xi(at)$$

倒数平均数（调和平均数）（Harmonic Mean）　倒数平均数是变量数值的倒数的算术平均数的倒数，用公式表示为：

$$M_h=\frac{N}{\frac{1}{x_1}+\frac{1}{x_2}+\cdots+\frac{1}{x_n}}=\left(\frac{1}{\frac{\sum_{i=1}^{n}\frac{1}{x_i}}{N}}\right)$$

其中，M_h 表示倒数，x_i 为变量数值，N 为总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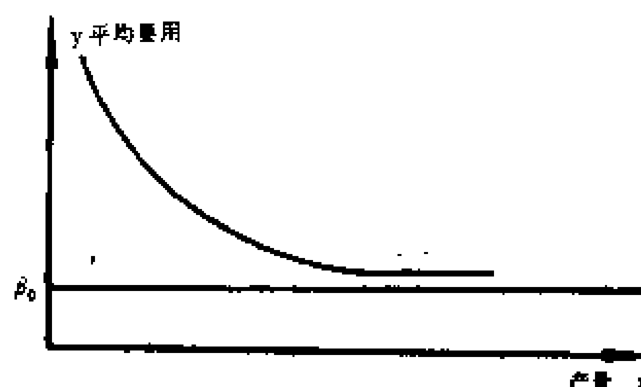
变量数值具有倒数性质，是应用倒数平均法的前提条件，如提供的数值不具有倒数的性质，就应该直接用算术平均数来平均。在经济统计分析中，倒数平均法主要应用于：(1) 按倒数表示的价格数字（如一元钱买几斤水果）；(2) 按倒数表示的速度数字。

倒数变换模型（Harmonic Transformation Model）　倒数变换模型的形式是：

$$Y_i=\beta_0+\beta_1\left(\frac{1}{X_i}\right)+u_i\quad i=1,2,\cdots,n$$

令 $\frac{1}{X_i}=X_i^*$，这个模型就可以表示为一般线性模型的形式。如果最小二乘法的各种假定得到满足，就可以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在这个模型中，如果 β_0 和 β_1 都是正的，那随着 X 的增加，Y_i 将会非线性地减少，在研究生产的平均费用与产量的关系时，就可以利用这种模型。在这种模型中，X 代表产量，Y 代表生产的平均费用（见下图）



从图形中可以看出，平均费用随产量增加而不断减少，最终接近一条渐近线 $Y=\beta_0$，而平均固定费用 $\beta_1\frac{1}{X_i}$ 则趋向于0。

矩法（Method of Moments） 矩法是英国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于1894年提出的一种点估计方法。它在确定总体参数估计值时，以样本矩作为相应的总体矩的估计，以样本矩的函数作为相应的总体矩的函数。这是因为样本矩来自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总体矩的特征。此外，许多分布的参数都是矩的函数，例如正态分布的参数就分别是该分布的一阶原点矩和二阶中心矩。人们自然会想到用样本矩对总体参数作出估计，所以这种方法称为矩法。

在估计总体参数时，总体参数往往不止一个，如在正态分布中，就有两个参数。若总体X的分布函数为 $F(x,\theta_1,\theta_2,\cdots,\theta_n)$，$x_1,\cdots,x_n$ 是抽自总体的一个样本，假设该分布R阶原点矩存在，$u_k=E(x^k)$。显然，$u_j(j<k)$ 都存在，并且是 $\theta_1,\theta_2,\cdots,\theta_k$ 的函数 $u_j(\theta_1,\theta_2,\theta_3,\cdots,\theta_k)$ 样本 $(x_1,x_2,\cdots x_n)$ 的j阶矩为 $\bar{x}^j=\frac{1}{n}\sum_{i=1}^{r}x_i^j$。在用矩法估计时，设

$u_j=(\theta_1,\theta_2,\cdots,\theta_k)=\overline{x^j}$　$j=1,2,\cdots,k$ 就会得到含k个未知数 $\theta_1,\theta_2,\cdots,\theta_k$ 的k个联立方程组。解这k个联立方程组，就可以得到 θ_1、$\theta_2,\cdots,\theta_k$ 的一组解。

$$\vec{\theta}_i=\vec{\theta}_i(x_1,x_2,\cdots,x_n)\qquad i=1,2,\cdots,k$$

这时，这组解就是 $\theta_i(i=1,2,\cdots,k)$ 的矩法估计。

资金流量表（Flow-of-Fund Table） 资金流量表反映一个国家的各个机构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资金来源和应用。对于资金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系统研究，并编制成资金流量表，最早是由美国柯普兰教授开始的。以后，按季按年在联邦储备局的公报上发表。日本1954年后定期编制。加拿大和南斯拉夫也先后在1959年和1960年编制了资金流量表。1968年联合国修订SNA时，也把资金流量表结合到统一的核算体系内。

资金的流动，是通过各部门之间的借贷关系实现的。这些借贷关系，有着很多不同的形式，称之为金融债权。各国金融债权的主要形式有：黄金；外汇和特别提款权；货币；存款；证券；各种贷款；居民对人寿保险准备金和养老金基金的净产权；商业信用和预付（收）款等。金融债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但活动形式却是类似的，每当出现储蓄同投资背离的情况，就必然会产生资金的流动。当一个部门的储蓄大于投资时，这个部门就可以通过占有金融债权的手段，例如用存款购买股票或债券，来把多余的资金提供给其它部门，这些金融债权就是债权人的金融资产。当一个部门的投资需要大于储蓄时，这个部门就会发生金融负债。例如吸收存款、发行股票或债券，以取得需要的资金来实现投资。任何时候一笔金融债权的发生，对一些人是金融资产，同时必然对另一些人是金融负债，而金融机构在调剂资金方面起独特的作用。资金流量表所反映的，正是社会上的这样一种经济关系。

应该说明，在资金流量表中的部门，和一般的部门分类不同，称为机构部门分类，主要根据不同的单位在财务金融活动中的地位分。按联合国的分类，整个国民经济被分成六个大的部门：即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一般政府居民户、私人非营利机构和国外。资金流量表所反映的，正是这些机构部门之间的资金流动情况。表（1）所列出的是一个简化了的资金流量表，它反映的就是各个机构部门以及国外之间的金融往来。

莫里希玛—塞托模型（The Morishima-Saito Model） 莫里希玛-塞托模型是一个长期增长模型，反映了1902—1952年（不包括1941—1945）美国经济发展情况。这个模型已经被用于结构分析和政策评价，尤其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的研究。它包括9个内生变量，6个外生变量。9个内生变量是：国民收入（Y）、消费（c）、资本损耗补偿（D）、年终资本存量（k）、就业（L）、价格水平（p）、工资率（w）、公司债券收益（Y）、每人每年工作时数。6个外生变量是：总投资（I）、货易平衡（B）、现金平衡（M）、15岁以上的人口（N）、时间（t：1927=0），虚拟变量（1941年以前=0，1949年以后=1）。模型通过以10为底的对数，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了包括9个方程式的宏观经济模型，其中，7个是行为方程式，包括消费函数、流动偏好函数、生产函数、相对份额等式、工资决定方程、工作时数方程和折旧方程式；另外两个是定义方程式。

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者价格指数（或称为生活费用指数、零售物价指数）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变化程度的指标。在大多数国家，消费者价格指数都采用固

定加权算术平均公式计算，即先用各代表商品的个体价格指数k，乘上各个代表商品所在组的权数（根据该类商品基期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估计而得，即$w=\frac{P_0q_0}{\sum p_0q_0}$），加权求出类指数或组指数（如食品类、房租类指数），用公式表示为：

$$I_i=\sum kw$$

然后，再用类似的方法求出总指数，公式为：

$$I=\sum_{i=1}^{n}I_iw_i$$

其中，w_i表示各类商品的权数。

概括地说，消费者价格价格指数主要起着这样的作用。它使消费者得以了解因价格上升而造成的购买力下降的程度，同时，它还是衡量各国通货膨胀程度的一种经济指示器。

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The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function） 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常称为CES生产函数，它的形式是：

$$y=A[\delta L^{-\beta}+(1-\delta)k^{-\beta}]^{-1/\beta} \quad (1)$$

其中，L为劳动，K为资本，A为规模参数，A>0；δ为分配参数$0<\delta<1$，β为替代参数，$\beta>-1$。显然，(1)式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在CES生产函数中，替代弹性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

$$\sigma=\frac{1}{1+\beta}$$

由于替代弹性具有非负性，所以有

$\beta>-1$

当β取极端数值$\beta=-1$时，CES生产函数成为线性函数

$$y=A[\delta L+(1-\delta)K]$$

这时，$\sigma\to\infty$。

如$\beta\to\infty$，即$\sigma\to0$。CES生产函娄接近于投入产出生产函数。

如$\beta\to0$，即$\sigma\to1$，CES生产函数将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极限（对(1)应用罗比达法则即可得出）：

$$y=A_0L^{\delta}K^{1-\delta}$$

CES生产函数可以被扩展为非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形式。

$$y=A[\delta L^{-\beta}+(1-\delta)K^{-\beta}]^{-h/\beta} \quad (2)$$

其中，h是各次函数的阶次。

如果将(2)式取对数后用泰勒级数展开，并舍去高阶项，有

$$\log y=\log A+h\delta\log L+h(1-\delta)\log K$$

$$-\frac{\beta h\delta(1-\delta)}{2}\left(\log\frac{L}{K}\right)^2 \quad (3)$$

令$\log A=B_0$，$h\delta=B$，$h(1-\delta)=B_2$，$-\frac{\beta h\delta(1-\delta)}{2}=B_3$（3）式可写为：

$$\log y=B_0+B_1\log L+B_2\log k+B_3\left(\log\frac{L}{K}\right)^2 \quad (4)$$

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取对数后相比，(4)式多了一项$\left(\log\frac{L}{K}\right)^2$，因此，可以说它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推广。由于在(4)式中，logy是参数的线性函数，可以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估计这一生产函数。

商业总产值与商业净产值 商业总产值又称为商业附加费，它是一定时期内商业部门通过采购和销售活动为物质产品增加的一部分价值，它是商业流通费、税金和销售利润（或亏损）的总和。商业净产值是从其总产值中扣除商业部门在生产活动中的物质消耗后的余额。商业物质消耗包括的项目有：燃料、包装材料、修理消耗的材料、办公用品、固定资产折旧等内容。

商品流转 商品流转也称为商品流通，它指的是作为商品的工农业产品，通过买卖行为，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移。商品流转统计的基本指标为：商品购进，商品销售、商品调拨和商品库存。

商品购进有总购进和纯购进两个指标。商品总购进包括商业部门从商业部门以外的其它部门和个人购进的商品，也包括商业部门内部的商品调入。商品纯购进是指商业部门代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而向商业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的商品，商业部门的商品纯购进还可以分为国内纯购进和接收进口两个指标。

商品销售有总销售与纯销售两个指标。商品总销售是指商业部门向商业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商品与商业部门内部调拨商品的总和。商品纯销售是指商业部门向商业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他所经营的商品。与商品纯购进相对应，商业部门的商品纯销售也包括国内纯销售和供应出口两个指标。

商业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有计划，有组织的商品买卖行为，称为商品调拨。从卖方来看，称为商品调出；从买方来看，称作商品调入。它们又可以具体分为三种，地区间的商品调拨、各商业系统间的调拨和商业各流转环节间的调拨。

商品库存指的是商品部门已经购进尚未销售的商

品。

离岸价格和到岸价格（F.O.B and C.I.F）　离岸价格和到岸价格都是在国际贸易中对商品估价的方法。

离岸价格又称船上交货价格（f.o.b.即 free on board）为出口国国内市场的卖价加上运到输出国口岸或边境上的费用（包括装船费和出口税）。

到岸价格又称为进口商支付成本、运费和保险费的价格（c.i.f.即 cost insurance freight）。它包括进口商购买的商品的价值，运到进口国口岸或边境的运输费用与保险费之和，所以，到岸价格等于离岸价格加上运费和途中保险。

联合国规定，各国向联合国提供统计数字时，出口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按到岸价格计算。

离散系数（Variation Coefficient）　离散系数是为了补充标准差在应用中的不足所建立的指标。标准差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变量数值间离差的大小，而且和变量数值的平均水平有关。常用的离散系数就是以标准差与算术平均数对比，计算出来的相对指数，它同时考虑到了离差和平均数两个因素，计算公式为：

$$离散系数=\frac{标准差}{算术平均数}$$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是指随机变量只能取有限数值的概率分布，每个随机变量可以列出其相应的概率。它可以用列表的形式表示，即对应于随机变量所取的每个数值，列出它们各自的概率；也可以用数学函数的形式表示，记作：

$$P(X=x)=f(x)$$

并给出随机变量 X 取值的定义域。显然，我们有：1.f（x）$\geq$0，2.$\sum$f（x）=1.

而对随机变量 X 小于给定的某一个取值 x 的概率，则称为随机变量分布函数，记作：

$$F(x)=P(X<x)=\sum_{t<x}f(t)$$

显然，我们有：

$$P(a\leq X<b)=F(b)-F(a)$$

分布函数 F(x)具有下列性质：

(1) 单调性：若 a<b，则 F（a）$\leq$F（b）；

(2) $\lim\limits_{x\to-\infty}F(x)=0$，$\lim\limits_{x\to+\infty}F(x)=1$

(3) 左连续性：F(x−0)=F(x)

离散程度　也称为标志变动度，是反映总体各单位某一标志值差异程度的指标。把离散程度和平均数结合起来观察问题有重要意义，因为平均数将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抽象化了，用以反映现象的一般水平，而离散程度则把总体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反映出来。同时，平均数是一种代表性的指标，平均数的代表性大小是与离散程度的大小有关的。离散程度越大，平均数的代表性愈小；离散程度愈小，平均数的代表性就愈大。在统计中间来测定离散程度的指标主要有：全距、平均差、标准差和离散系数。

鹿特丹模型（The Rotterdam model）　鹿特丹模型是由塞尔（Theil）和巴坦（Barten）提出的一种需求模型，它可以检验消费者理论的限制条件是否满足。这一模型可写成：

$$w_i\left(\frac{dq_i}{q_i}\right)=w_i\,d\log q_i \qquad i=1,2,\cdots,n \qquad (1)$$

其中，q_i 是需求量，p_i 是价格，i 表示第 i 种商品，$w_i=\frac{p_iq_i}{\sum_{i=1}^{n}p_iq_i}=\frac{p_iq_i}{x}$。

w_i 表示在总支出中，有多大比例被支付在第 i 种商品上，即预算份额。这样，原先在许多需求函数中用 q 表示的需求就改成了用相对数的形式表示。一种预算份额有仅受 q_i 变化的影响，也受价格 p_i 和总支出 x 变化的影响，即

$$dw_i=\frac{\partial w_i}{\partial q_i}dq_i+\frac{\partial w_i}{\partial p_i}dp_i+\frac{\partial q_i}{\partial x}dx$$

$$=\frac{p_i}{x}dq_i+\frac{q_i}{x}dp_i-\frac{p_iq_i}{x\partial x}\quad dx^2$$

$$=w_i\frac{dq_i}{q_i}+w_i\frac{dp_i}{p_i}-w_i\frac{dx}{x}$$

$$=w_i\log q_i+w_i\log p_i-w_i\log x_i \qquad (2)$$

由于总支出和价格的变化是给定的，所以，在上式右边，唯有第一项可以被认为是内生变量。这使得 $w_i\log q_i$ 成为一个较为合适的需求模型中的因变量。

设需求函数为

$$q_i=q_i(p_1,p_2,\cdots,p_n,x) \qquad i=1,2,\cdots,n \qquad (3)$$

对上式的两边求全微分并同乘以 w_i/q_i，得：

$$w_i\,d\log q_i=\sum_j\Pi_{ij}\,d\log p_j+\mu_i\sum_j w_j\,d\log q_j$$

$$i=1,2,\cdots,n \qquad (4)$$

其中，$\mu_i=p_i(\partial q_i/\partial x)$是消费商品 i 的边际倾向，$\Pi_{ij}$ 是 w_i 和商品 i 的需求对于商品 j 的价格的收人补偿弹

性的乘积。在(4)式中，$\sum w_j d\log q_i$ 是实际收入的一种变量，反映了总支出的变化。(4)式给出的是一个由(3)式导出的一般形式，没有对需求模型给出具体的形式。因此，它可以对任何有关的效用函数求解。由于它用需求的变化代替需求本身构造需求模型，它实际上是一个"微分需求函数系统"。

(4)式中的 μ_i 和 Π_{ij} 一般来说依赖于总支出 x 和各种商品的价格 p_i。但在鹿特丹模型中，它们被进一步"参数化"，即假定它们都是常量，这对于估计出一个具体的需求模型来说是必要的。这样，在可加性、齐次性、非负性、对称性等约束下，需求模型仍可以写成具体的函数形式，这些函数对各种不同的总支出和价格都能保持不变。以 μ_i 和 Π_{ij} 表示，消费理论的约束条件如用一阶导数的关系列出，有：

可加性：

$$\mu_1+\mu_2+\cdots+\mu_n=1$$

$$\Pi_{1j}+\Pi_{2j}+\cdots+\Pi_{nj}=0$$

零阶齐次性：

$$\Pi_{i1}+\Pi_{i2}+\cdots+\Pi_{in}=0$$

非负性：

$$\Pi_{ii}<0 \quad i=1,2,\cdots,n$$

对称性：

$$\Pi_{ij}=\Pi_{ji} \qquad \text{对所有的 } i\neq j$$

这样，复杂的约束关系就变成了简单线性关系，如果用估计所得的结果进行检验，就可看出对上述条件的满足程度。鹿特丹模型通常采用的形式是用 $w_i(\log q_{it}-\log q_{it})$ 来近似(4)式，并用极大似然法进行求解。

基本建设投资 基本建设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以扩大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新建、扩建工程及有关工作，包括工厂、矿山、铁路、桥梁、港口、农田水利、商店、住宅、学校、医院等工程的建造和机器设备、车辆、船舶、飞机等的购置。

基本建设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基本建设完成的工作量，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基本建设规模和建设进度的综合性指标。它是根据工程的实际进度按预算价格(编制施工图预算时所用的价格)计算的工作量。没有形成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和没有开始安装的设备，都不计算投资完成额。

理想公式(Ideal Formular) 美国经济统计学家 I.费希尔将拉斯佩雷斯公式和派煦公式求几何平均数所获得的指数公式。具体形式为：

$$I_{01}=\sqrt{\frac{\sum p_1q_0}{\sum p_0q_0}\times\frac{\sum p_1q_1}{\sum p_0q_1}}$$

这个公式能够同时满足费希尔提出的时间互换测验和因素互换测验，因而被称为理想公式，在实际应用中，它常用于各种资料比较齐全的场合。

符号检验(Sign Test) 这是非参数方法中应用比较早而且比较简便的一种方法。如果要比较两个总的均值是否相等，而且数据并不是在两个总体中独立抽取的，而是对同一种对象在某种"处理"前后进行观察的结果，就可以利用符号检验。

在这种成对数据的比较检验中，每对数据之差用 d_i 表示，若 d_i 为连续型随机变量且服从正态分布，一般可以用 t 检验。但若 d_i 的总体不是正态分布且为小样本时，就必须要用符号检验。这时，不必计算 d_i 的具体数值，若 $d_i>0$，可用正号表示；若 $d_i<0$，则用负号表示，于是可根据样本的大小与正负号出现的数目，对处理前后是否有差别作出判断。

若假设某种处理不起作用，那么，正负号应各为一半，即 $P=\frac{1}{2}$，这时，在几次试验中正号恰好出现 k 次的概率应服从二项分布，我们就可利用二项分布计算出小概率事件出现的概率，在单尾检验时我们有：

$$\alpha=\sum_{i=1}^{n}C_n^i\left(\frac{1}{2}\right)^i\left(\frac{1}{2}\right)^{n-i}$$

当正号的数目大于 l 时，我们就否定原假设，即认为某种处理有用，否则，就接受原假设。

综合指数 指数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将平均和对比相结合而计算出来的相对数。综合指数可以概括地分为简单综合指数和加权综合指数。简单综合指数的公式为：

$$I_{01}=\frac{\sum p_1}{n}\div\frac{\sum p_0}{n}=\frac{\sum p_1}{\sum p_0}$$

其中，I 代表价格指数，0 代表基期，1 代表计算期，P 代表商品价格，n 代表商品种类，$\sum$ 为求和符号。

从上式可以看出，简单综合指数是先求出全部商品的平均价格，再加以对比，求出反映价格变动的相对数。简单综合指数有两个问题，一是计量单位的变化会使指数数值发生变化，如有一种商品的重量单位由公斤改成磅，指数数值就可能发生变化，二是把各种商品的重要性都同等看待了，为此，就应该计算加权综合指数。

加权综合指数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以基期加权的拉斯佩雷斯公式，一种是以报告期加权的派煦公式。

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 假设检验是统计估计之后，统计推断的另一方面重要内容。具体地说，它可以分为参数的假设检验和非参数的假设检验。

在参数的假设检验中，我们对总体的分布函数形式已有一定了解，但对于它的某些参数却缺乏了解，这时，就要对分布函数的某些参数作某种假设，然后抽取样本，集中样本中的有关信息，对假设的正确性进行判断。这时，就把预先作出的假设称为原假设，记为 H_0，而对于否定这一假设而得到的结果所作的假设，称为备择假设，记为 H_1。例如，已知总体服从正态分布，但对于总体的数学期望我们不了解，这时，我们可以作出原假设，让它等于某一个具体数值，如：H_0: $u=3$，而备择假设则可以是 H_1: $u\neq 3$。然后，再通过样本提供的信息，检验原假设是否成立。

但在许多场合，事先对于总体的分布形式了解很少，比如说，只知道它是连续型的分布，而不知道它的具体分布形式。这时，统计假设只能直接给出在未知分布函数的形式上，或者是它的某些数字特征上，这种检验称为非参数假设检验。

有时，在进行检验时，只提出一个统计假设，但也有的时候，往往需要提出两个甚至多个假设，而且统计检验的目的也是同时判断多个假设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如果睛个统计问题中仅提出一个统计假设，而且我们的目为也仅仅是判断这一个统计假设是否成立，并不同时研究其他统计假设。这类检验问题称为显著性检验。

假设检验中的小概率原理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是"概率性质的反证法"。为了检验一个假设是否成立，先假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并看一下由此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导致了一个不合理的现象的发生，就表明原假设不正确，因此拒绝原"假设"。如果没有不合理的现象发生，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这里的所谓不合理，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认为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观察中几乎不会发生。具体地说，如果某一事件出现的概率很小，如在一万件产品中只有一件次品，那么，随机抽取一件恰是次品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这一概率是很小的，因此，可以将这一事件看成是"不合理的"。若这一事件确实发生了，就有理由怀疑原来的假设，即产品中只有万分之一次品的假设是否成立。这时，就可以推翻原来的假设。当然，推断也可能会犯错误，即这一万件中确实只有一件次品，而恰好在一次抽取中抽到了。在这个例子中，犯这种错误的概率是万分之一，也就是冒万分之一的风险来作出这一决策，至于多小的概率为小概率，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Error of First kind and Error of Second kind） 在假设检验中，我们是根据小概率事件几乎不可能发生这一原则来进行检验的，这样，当然有可能发生判断错误。这种错误归结起来不外是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原假设 H_0 为真，却被拒绝的错误，也称作弃真。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就是根据情况确定的小概率 α，常用的有 1%，5%等，也叫作 α 风险或风险率。第二类错误是指原假设 H_0 是假的，却被接受的错误，也叫作取伪，常用 β 表示，所以也叫 β 错误。这两类错误可归纳如表中所示。

	接受 $H_0$3C	拒绝 H_0
H_0 为真	判断正确 $1-\alpha$	第一类错误 α
H_0 为假	第二类错误 β	判断正确 $1-\beta$

α 和 β 是相互对应的.在样本容量不变的情况下，要使弃真的错误减小，取伪的错误就会扩大；反之，减小了取伪的错误，就会扩大弃真的错误。一般的显著性检验，都只考虑限制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α，而 α 则称为显著性水平。

偏相关系数（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它是在多个变量中，对其中的任意两个变量在除掉其它变量的影响后，反映其线性相关程度其方向的系数。

按照相互系数的定义，在二元回归模型中，可以先计算三个相关系数。设变量 Y,X_1,X_2 的 n 组观察值为：

$$(Y_i,X_{1i},X_{2i}) \qquad i=1,2,\cdots,n$$

并设：

Y_{01} 是 Y 和 X_1 之间的相关系数；

Y_{02} 是 Y 和 X_2 之间的相关系数；

Y_{12} 是 X_1 和 X_2 之间的相关系数。

它们可以被称为简单相关系数或零阶相关系数。则偏相关系数可以通过简单相关系数计算出来。先计算 $r_{01.2}$，有：

$$r_{01.2}=\frac{r_{01}-r_{02}r_{12}}{\sqrt{(1-r_{02}^2)(1-r_{12}^2)}}$$

它表示在 X_2 保持不变时 Y 和 X_1 之间的相关系数。

同理，可计算 $r_{02.1}$ 和 $r_{12.0}$，它们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r_{02.1}=\frac{r_{02}-r_{01}r_{12}}{\sqrt{(1-r_{01}^1)(1-r_{12}^1)}}$$

和

$$r_{12.0}=\frac{r_{12}-r_{01}r_{02}}{\sqrt{(1-r_{01}^2)(1-r_{02}^2)}}$$

按这三个等式得到的相关系数又称为一阶相关系数。

偏相关系数可与普通相关系数一样对变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1) 偏相关系数的范围在-1和+1之间。

(2) 当 $r_{01.2}$ 为正值时，表示在 X_2 固定的情况下，Y和 X_1 之间存在正相反，为负值时，则为负相关。

(3) 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偏相关程度越大，当偏相关系数绝对值为1时，表示存在着完全的偏直线相关，当它为0时，则表示完全无关。

(4) 偏相关系数所反映的两个变量间的偏相关程度和方向，与对这两个变量所求得的简单相关系数，有可能不同。

曼—惠特尼U检验（Mann-Whitney） 曼—惠特尼U检验也是一种检验两个样本是否得自同样的样本的方法。它要求首先计算出威尔科克森等级和 w_1 和 w_2，然后计算U统计量：

$$U_A=n_1n_2+\frac{n_1(n_1+1)}{2}-w_1$$

$$U_B=n_1n_2+\frac{n_2(n_2+1)}{2}-w_2$$

选择其中较小者为U值，与U的临界值 U_α 比较，若 $U>U_\alpha$，则接受原假设，即认为两个样本来自相同的总体，否则拒绝原假设。

在大样本情况下，U的分布趋近于正态分布，且

$$EU=\frac{n_1n_2}{2}\qquad DU=\frac{n_1n_2(n_1+n_2+1)}{12}$$

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s） 在回归分析中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除定量因素还有不能定量的质的因素。虚拟变量就是把质的因素定量化的结果。例如，在建立某种产品的需求模型时，就应考虑城市和农村对这种产品的需求模型可能不同。所以，除了其它解释变量外，还可以把地区这个质的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通常把这类品质或属性"量化"的方法就是构造取值为"1"或"0"的人工变数，如以"1"表示城市，"O"表示农村。取值为0与1的变数就称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虚拟变量如同数量变量一样，可以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十二画

滞后变量（Lag Variables） 在一些经济关系中，经济变量不仅受本期因素的影响，而且受非本期因素的影响。例如生产者往往根据上期价格决定本期产量；商品库存量往往受上期销售量的影响；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往往受本期收入和上期收入的影响；各部门的投资额不仅影响本期生产量，而且影响以后各期的生产量。经济变量对于依存因素的影响作出反应落后一段时间，称为时间滞后现象。时滞的期数称为滞后期。对于时间t而言，变量 $X_{t-1},x_{t-2},\cdots,X_{t-s}$ 称为滞后变量，并依次称为一期滞后变量，二期滞后变量，…，S期滞后变量。

滞后分布模型（Lag Distribution Model） 被解释变量 Y_t 同解释变量 X_t 以及滞后变量 X_{t-1}，$X_{t-2},\cdots,X_{t-s}$ 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

$$Y_t=f(1_t,x_{t-1},\cdots,x_{t-s})$$

称为滞后分布模型。

线性滞后分布模型表示为

$$Y_t=a+b_0X_t+b_1X_{t-1}+\cdots+b_sX_{t-s}+u_t$$

在实际问题中，最大滞后期S往往是给定的有限数值。为了讨论方便，常将最大滞后期视为无穷，因此滞后分布模型一般表示为：

$$Y_t=a+b_0X_t+b_1X_{t-1}+\cdots+b_jX_{t-j}+\cdots+u_t$$

或

$$Y_t=a+\sum_{t=1}^{\infty}b_jX_{t-j}+u_t$$

其中 b_j 称为作用系数，其含义可描述为当X变动一个单位而其它各期的X均保持不变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力。如 b_2 可解释为在 $\Delta X_t=1$，$\Delta X_{t+j}=\Delta_{t-j}=0(j=1,2,\cdots)$时，对 Y_{t+2} 的影响力。这时，滞后分布模型可表示为

$$Y_{t+2}=a+b_0X_{t+2}+b_1X_{x+1}+b_2X_t+\cdots+u_t$$

显然

$$\Delta Y_{t+2}=b_2$$

将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因素引入模型是使模型动态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超几何分布（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

对一批产品进行不放回的抽样检查，该产品共有N件，中间包含M件次品，现从中随机地抽取n件，则在这n件产品中恰发出现x件次品的概率为：

$$P(X=x)=\frac{\begin{bmatrix}M\\x\end{bmatrix}\begin{bmatrix}N-M\\n-x\end{bmatrix}}{\begin{bmatrix}N\\n\end{bmatrix}}\quad 0\leqslant x\leqslant n\quad x\leqslant M$$

若随机变量X具有上述概率分布，则称X服从超几何分布。其数学期望

$$EX=nP$$

方差

$$DX=\frac{N-n}{N-1}\cdot npq$$

当N很大而n较小时，它可用二项分布来近似。

普阿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　普阿松分布的概率分布为：

$$P(x=x)=\frac{\lambda^{x}}{x!}e^{-\lambda}\quad x=0,1,2,\cdots$$

它的数学期望为

$$EX=\lambda$$

方差

$$DX=\lambda$$

在历史上，普阿松分布是作为二项分布的近似（令$np=\lambda$）于1837年由法国数学家引入的。近几十年来，它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许多随机现象（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都服从普阿松分布。

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普通最小二乘法，也常称为最小平方法，是由德国数学家高斯创立的。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最小二乘法有许多很好的统计性质。这些性质使得最小二乘法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回归分析方法。

这里，用一元回归分析说明普通最小二乘法。考虑一元回归总体模型：

$$Y_i=\beta_0+\beta_1X_i+\mu$$

最小二乘法常要求满足下列假定条件：

假定1：

$$E(\mu_i|X_i)=0$$

它说明对应于给定的X_i，μ_i的条件期望为零。

假定2：

$$Cov(\mu_i;\mu_j)=E[u_i-E(u_i)][u_j-e(u_j)]=E(u_iu_j)=0\quad i\neq j$$

它说明干扰项u_i和干扰项u_j不相关，即协方差等于0。这个假定又叫作无序列相关或无自相关假定。

假定3：

$$Var(\mu_i|X_i)=E[\mu_i-E(\mu_i)]^2=E(u_i^2)=\sigma^2$$

它说明对于任一给定的X_i，u_i的方差都是一个固定的常数σ^2。这个假定又称作等方差性的假定。

假定4：

$$Cov(u_i,X_i)=E[u_i-E(u_i)][X_i-E(X_i)]=0$$

即干扰项u_i与解释变量X_i不相关。

满足这四项假定的线性回归模型称为古典线性回归模型。

对于一组满足以上假定的样本资料：

$$X_1,\ X_2\cdots X_n$$
$$Y_1,\ Y_2\cdots Y_n$$

可将样本回归方程写成下式：

$$Y_i=\vec{\beta}_0+\vec{\beta}_1X_i+e_i=\overline{Y_i}+e_i$$

移项得

$$e_i=Y_i-\overline{Y}_i$$

最小二乘法的原则，就是要使残差的平方和为最小，即：

$$\min\sum_{i=1}^{n}e_i^2=\sum_{i=1}^{n}(Y_i-\overline{Y})^2=\sum_{i=1}^{n}(Y_i-\vec{\beta}_0-\vec{\beta}_1X_0)$$

分别对式中的$\overline{\beta_0}$与$\overline{\beta_1}$求偏导数并令其等于零，有：

$$\frac{\partial\left(\sum_{i=1}^{n}e_i^2\right)}{\partial\vec{\beta}_0}=2\sum_{i=1}^{n}(Y_i-\vec{\beta}_0-\vec{\beta}_iX_i)\cdot(-1)=0$$

$$\frac{\partial\left(\sum_{i=1}^{n}e_i^2\right)}{\partial\overline{\beta_0}}=2\sum_{i=1}^{n}(Y_i-\vec{\beta}_0-\vec{\beta}_iX_i)\cdot(-X_i)=0$$

整理后得：

$$\begin{cases}\sum_{i=1}^{n}Y_i=n\vec{\beta}_0+\vec{\beta}_1\sum_{i=1}^{n}X_i\\ \sum_{i=1}^{n}X_iY_i=\vec{\beta}_0\sum_{i=1}^{n}X_i+\vec{\beta}\sum_{i=1}^{n}X_i^2\end{cases}$$

这个联立方程组称为一元回归方程的最小二乘估计量正规方程组。解联立方程组得：

$$\begin{cases}\widehat{\beta_1}=\dfrac{\sum_{i=1}^{n}X_iY_i-\sum_{i=1}^{n}X_i\sum Y_i}{\sum_{i=1}^{n}X_i^2-\left(\sum_{i=1}^{n}X_i\right)^2}\\ \quad=\dfrac{\sum_{i=1}^{n}(X_i-\overline{X})(Y_i-\overline{Y})}{\sum_{i=1}^{n}(X_i-\overline{X})^2}=\dfrac{\sum_{i=1}^{n}x_iy_i}{\sum_{i=1}^{n}x_i^2}\\ \widehat{\beta_0}=\overline{Y}-\widehat{\beta_1}\overline{X}\end{cases}$$

其中：$\overline{X}=\dfrac{\sum_{i=1}^{n}X_i}{n}$，$\overline{Y}=\dfrac{\sum_{i=1}^{n}Y_i}{n}$，$x_i=X_i-\overline{X}$，$y_i=Y_i-\overline{Y}$

这样得到的估计量，将有许多很好的分析性质。

对于二元以至于多元的回归分析，也有类似的假定条件和求解方法。所不同的是还要加上无多重共线性的假定。

普查（Census） 普查是专门组织的一次性全面调查，所调查的内容，既可以是一定时点下的状态性现象（如人口、固定资产存量等），也可以是一定时期的过程性现象（如一年的生产量、销售量等）。普查多在一个国家或较大范围内进行，涉及面广，需要动员较多的人力物力，因此普查只能间隔多年才举行一次。在普查年度之间的资料则通过非全面调查取得。普查得到的统计数字称为"标志性统计数字"；非全面调查得到的统计数字，称为"现实性统计数字"。

博克思—詹金斯模型（Box-Jenkins Models） 博克思—詹金斯模型是一大族统计预测模型的总称，可以分为三种基本模式：自回归（Autoregressive）模型，简称AR模型；滑动平均（moving Average）模型，简称MA模型；自回归滑动平均（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模型，简称ARMA模型。

MA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y_t=a+b_1e_{t-1}+b_2e_{t-2}+\cdots+b_ke_{t-k}+e_t \quad (1)$$

在（1）式是因变量 y_t 表现为各时期误差项 $e_t,e_{t-1},e_{t-2},\cdots,e_{t-k}$ 的函数，a 和 $b_i(i=1,2,\cdots,k)$为系数。

这个公式的来历，是指数平滑法，如利用平滑预测的误差改正公式，有

$$\overline{y}_{t+1}=\overline{y}_t+ae_t \quad (2)$$

其中，$\overline{y}_{t+1}$ 和$\overline{y}_t$ 分别是 t 和 t+1 期的估计值，e_t 是实际值 y_t 与$\overline{y}_t$ 的误差，$e_t=y_t-\overline{y}$，同理有：

$$\overline{y}_t=\overline{y}_{t-1}+a_1e_{t-1} \quad (3)$$

代入(2)式，有

$$\overline{y}_{t+1}=\overline{y}_{t-1}+a_1e_{t-1}+a_0e_t$$

依次类推，有

$$\overline{y}_{t+1}=\overline{y}_{t-2}+a_2e_{t-2}+a_1e_{t-1}+a_0e_t \quad (4)$$

等等。这个公式的意义是，t+1 期的预测值等于初始预测加过去各期预测误差的一个比例之和，将这个公式写成一般形式，就是（1）式。这里的滑动平均或移动平均的意义和原来在指数平滑法中用的已有所有不同。

AR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overline{y}_t=a+b_1y_{t-1}+b_2y_{t-2}+\cdots+b_ky_{t-k}+e_t$$

这里，预测值$\overline{y}_t$ 是滞后变量 $y_{t-1},y_{t-2},\cdots,y_{t-k}$ 的线性函数。

把MA模型和AR模型结合起来，就形成一整套用途十分广泛的ARMA模型体系。

博克思—詹金斯预测模型体系的正式符号是ARIMA（p，α，q），符号 I 表示 Integration（结合），模型全称是"结合的自回归滑动平均过程"。所谓结合或总和指的是数列 d 次差分的总和。所以，括号内的 d 表示差分的次数；d＝2 就表示二次差分，p 表示 AR 模型的阶次，q 指 MA 阶次。从理论上讲，p、d、q 的阶次都是无限的，但在实际应用中，一般只使用 0 阶、1 阶和 2 阶，再高阶就很少了。常用的 ARIMA 模型有：

1.ARIMA(0,0,0)

这是一种简单的随机模型，公式是：

$$Y_t=u+e_t$$

其中 u_t 是常数。

2.ARIMA(0,1,0)

这是一种稳定的一次差分随机模型，其公式是：

$$y_t-y_{t-1}=e_t$$

这里的稳定性，指的是数列的平均数或方差是否稳定不变。如果一个时间数列长时期围绕一个水平线平均数上下波动，则称该数列有稳定的平均数；如果一个时间数列的方差在长时期内保持不变，则称该数列有稳定的方差。常见的经济时间数列的平均数是不稳定的，可利用一阶差分剔除这种不稳定性。

3.ARIMA(1,0,0)或 AR(1)

这是一种稳定的一阶自回归模型，其公式是：

$$y_t=\Phi_1y_{t-1}+\mu+e_t$$

式中系数 Φ_1 在−1 与 1 之间，u 是常数。

4.ARIMA(0,0,1)或 MA(1)

这是一种稳定的一阶滑动平均模型，其公式是：

$$y_t=u+e_t-\theta_1\theta_{t-1}$$

式中系数 θ_1 值也限定在−1 和+1 之间。

5.ARIMA(1,0,1)或 ARMA(1,1)

这是一种简单的稳定混合模型，AR 和 MA 都

是一阶，其公式是：

$$y_t = \Phi_1 y_{t-1} + u + e_t - \theta_1 e_{t-1}$$

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equation Model） 单一方程模型是用一个被解释变量和若干解释变量之间的单一关系式来描述某一种经济联系的。然而，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单一方程模型很难全面地提示实际经济过程中多种复杂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应用若干个单一方程构成的方程系统。这种方程系统就是联立方程模型。

联立方程模型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程，它的特点是：其中任一个方程的参数估计必须考虑这个系统中其它方程提供的信息才能作出。如果对每个单一方程都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不仅会发生偏误现象，还可能获得不一致的估计量。因此，对于联立方程的估计，必须采用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目前，常用的估计方法有：间接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等。

例如，常见的简化的宏观经济模型

$$c_t = \alpha_0 + \alpha_1 Y_t + u_{1t}$$
$$I_i = \beta_0 + \beta_1 Y_t + \beta_2 Y_{t-1} + u_{2i}$$
$$Y_t = C_t + I_t + G_t$$

就是一组联立方程模型。其中，第一个方程是消费函数，第二个方程是投资函数，第三个方程是定义式。Y_i 表示收入，C_t 表示消费，I_t 表示投资，G_i 表示政府支出。

对于这样一个模型的估计，就不能简单地对各个方程分别用最小二乘法加以估计，而应该使用联立方程组的估计方法，以得到反映宏观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的一组模型。

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是一套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流量和存量的统计体系。它的第一个版本公布于1935年。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为各国为国际机构提供国民收入资料提供依据。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这个版本还不成熟，表现的只是国民收入和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些流量。在此之后，随着各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计量经济模型的广泛应用和电子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的进步，这一版本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联合国组织了一个由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斯通教授任主席的专家小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1968年推出了新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A sysy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为新SNA）。新SNA用会计核算的方法，为完整系统地记录了国民经济的各种价值流量和存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结构，它既包括了旧SNA中的有关国民收入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全部帐户，也包括详细的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和国民资产负债表，把综合程度不同的数据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清晰而互相联系的体系。同时，它还对各种流量如何用不变价格表示出来作了细致的讨论，以便把各种数据组成为可以进行动态分析的时间数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书中指出：新体系的提出，象旧SNA那样，是为那些愿意改进、详尽描述和扩大它们的国民经济核算和它们的基本统计体系的各国统计机构提供国际准则。由于它把全部流量和存量的定义和分类都结合起来并连接到一个统一的结构之中，新SNA就成为一个极好的工具，用来从事计划经济和社会分析所需大批有关的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现在，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都根据新SNA的要求，向联合国提供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资料，在1981年的《国民经济核算年鉴》中，有144个国家或多或少地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现在，联合国统计处又在对这一版本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以适应各国更广泛的需要，新版本将在90年代前期公布。

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 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以会计帐户反映国民经济价值流量和存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体系。

假定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十项大的流量，它们分别为：

(1) 增加值255;
(2) 进口品购买额54;
(3) 消费品销售额210;
(4) 资本物销售额47;
(5) 出口品销售额52;
(6) 储蓄27;
(7) 向国外现期转移净额4;
(8) 固定资本损耗准备19;
(9) 来自国外的已分配要素净额5;
(10) 向国外贷出净额-1。

这些流量分别发生在生产、消费、积累和对外往来领域，可以用四个帐户来反映。表1到表4就是四个记录了这些流量的帐户，从这四个帐户中可以看到，对于国民经济中的十项流量，可以通过把它们记入不同帐户的方法，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每一个项目都被记录了两次，在一个帐户中反映为收入，另一个帐户则表现为支出（每一项登录后的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其在对应帐户中的序号）。这样，在每一个帐户中，可以通过收入和支出的关系观察某一领域的经济活动发生过程；在不同帐户中，则可以通过

同一笔流量在不同帐户中的位置观察不同的领域间的联系。

表 1　生产(国内生产帐户)

支　出		收　入	
1.总收入支付额(增加值)(9)	255	3.消费品销售额(6)	210
2.进口品购买额(18)	54	4.资本物销售额(12)	47
		5.出口品销售额(16)	52
总　计	309	总　计	309

表 2　消费(收入和支出帐户)

支　出		收　入	
6.消费品购买额(3)	210	9.自国内生产得到的总收入(1)	255
7.储蓄(15)	27	10.减:固定资本损耗(13)	−19
8.向国外现期转移净额(19)	4	11.来自国外的已分配要素收入净额(17)	5
总　计	241	总　计	241

表 3　积累(资本交易帐户)

支　出		收　入	
12.资本物购买额(4)	47	15.储蓄(7)	27
13.减:固定资本损耗(10)	−19		
14.向国外贷出净额(20)	−1		
总　计	27	总　计	27

表 4　国外(国际收支平衡帐户)

支　出		收　入	
16.出口品购买额(5)	52	18.进口品销售额(2)	54
17.已分配要素收入的支付净额(11)	5	19.现期转移净额(8)	4
		20.借入净额(14)	−1
总　计	57	总　计	57

在这四个帐户中，第一个帐户进行的实际上是国民收入的核算，第三个帐户反映的则是资金流量表的内容，第四个帐户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收支平衡表，如果把国民收入帐户加以扩展，使之包括中间消耗的内容，再把国民资产负债表结合进来，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不仅包括了国民收入核算、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民资产负债表这五种最重要的国民核算，还反映了消费领域的收入支出情况。

但是，用这种帐户反映各个领域间的联系，也存在着一个缺点，这就是不同领域间的联系观察起来比较费力。当然，在只有十项登录的情况下，这样做问题还不大，但如果要与成千上万笔登录打交道，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事实上，可以用一个更好的形式反映这种联系。考虑一个矩阵，在这个矩阵中，行表示收入，列表示支出，每一个帐户都由一行和其对应的列构成。这样，每一笔流量只用一个数值就能表示，它的性质则由它所在的位置所表明。表 5 列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矩阵表示的核算体系。

表 5　矩形形式的国民经济四大帐户

	1	2	3	4	总　计
1. 生产		210	47	52	309
2. 消费	255		−10	5	241
3. 积累		27			27
4. 国外	54	4	−1		57
总计	309	241	27	57	

这个表的第 1 行和第 1 列反映的就是表 1 的生产帐户，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对每项交易的说明不象表 1 中那么清晰明白外，反映的内容则是完全一致的。但从反映帐户间的关系上看，这个形式却清晰得多，把生产帐户的五项交易（或者说五个流量）都系统地表现出来。将四个帐户的十项交易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反映整个国民经济十项流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虽然比较简单，却很好地说明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原理。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表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利用资金流量表和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关系把国民经济的各种存量也包括进来，简单地说，一个经济的期初和期末的资产和负债关系可以简单表示如下：

资产＝负债+净值（或称为股本）

而从动态上看，则有：

期初资产+本期新增资产+资产的重估价盈余＝期末资产

期初负债和净值 + 本期发生的负债和净值 + 对本期负债的重估价 = 期末负债和净值

我们在表中以行表示资产，以列表示负债，增加三个有关帐户。同时，再在第 2 行与第 2 列交叉的地方加上一项由生产帐户对生产帐户的支付，表示在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消耗。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见表 6）。

表 6　矩阵式的国民经济帐户

	1	2	3	4	5	6	7
1. 期初资产净额				693			
2. 生产		300	210	47	52		
3. 消费		255		−19	5		
4. 积累	693		27			44	764
5. 国外		54	4	−1			
6. 重估价				44			
7. 期末资产净额				764			

在这个表中，第 2 行和第 2 列反映的是国民收入核算和投入产出核算，第 3 行和 3 列反映的是收入支出的核算，第 4 行和第 4 列反映的资金流量核算与国民资产负债核算，第 5 行和第 5 列反映的则是国际收

支平衡核算。当然，这里表现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实际上，这里的每一对帐户都可以进一步细分，使之反映更为纷繁复杂的经济联系，例如，在生产领域，可以将各种流量按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分类；对于消费品，可以按使用去向分类；对于资产和负债，可以按性质分类等，这样，这个矩阵表就可以大为扩大，从理论上说，它可以无限细分。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书中列出的 88×88 的矩阵帐户，就是这种扩展的结果。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要列出这样的矩阵表是不方便的，例如对一个 500×500 的矩阵，把它印出来就很困难，即使印出来，阅读起来也不方便。所以在各国公布资料时，还是常常使用复合帐户、统计表、分部门表的形式表现国民核算的资料，但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以这样一个矩阵帐户为思路搜集、整理和公布统计资料的。

与国民经济帐户有关的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的领域

	1	2	3	4	5	6	7
1				国民财富研究生产率分析			
2		投入产出分析生产率分析；	消费者需求分析；政府支出研究	建立储备和固定资本形成的模型；投资政策	出口需求分析		
3		生产函数；生产率分析要素份额分析		折旧分析；投资补助	外国投资收益研究；双重税收政策		
4	净值研究		储蓄行为分析	货币政策和流动偏好	国际金融和清偿能力；长期外援政策	资本收益和损失研究；资本利益税政策	净值研究
5		进口需求分析	短期外援政策	国际金融和清偿能力；长期外援政策	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分析		
6				资本重估价			
7				国民财富研究；生产率分析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资料是为了进行各项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而搜集、整理和分布的。那么，这些资料应该怎么用呢？这就需要根据研究的任务，选定合适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方法、数学方法等，对这些资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在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书中，按七个帐户矩阵列出了这些资料可进行的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见上表）。

这个表的横行左边的数字 1 至 7 和纵列上方的相应数字是“期初资产（纵列为负债）”、“生产”、“消费”、“积累”、“国外”、“估价调整”和“期末资产（纵列为负债）”这七大帐户的代号。而各行与各列之交的方块则说明利用相应的帐户的资料所能进行的经济分析或政策研究，例如，在第 2 行与第 2 列相交的方格上就列出了两项内容，投入产出分析和生产率分析，这说明利用第 2 行和第 2 列所给出的生产帐户的资料，就可以进行这两项研究。又例如，在第 2 行和第 3 列相交的方格上，列出了消费者需求分析和政府支出研究这两项内容，这说明将生产帐户中的横行内容与消费帐户中的纵列内容结合起来，可以进行这两项研究。在全表的 24 个方格上，共列出了 34 项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这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研究。

联合概率分布（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对于二维的离散型随机变量，假设随机变量 X 具有 k 个不同值，随机变量 Y 具有 l 个不同值，即：

$$X:\ x_1, x_2, \cdots, x_k$$

$$Y:\ y_1, y_2, \cdots, y_l$$

那么二维随机变量就有 $k \cdot l$ 个取不同值的成对的值，如果用 $f(x_i, y_j)$ 表示 x，y 这一二维随机变量取不同值时的概率函数，则

$$f(x_i, y_j) = P(X = x_i, Y = y_j) \quad i = 1,2,\cdots,k;\ j = 1,2,\cdots,l$$

这就是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它具有以下性质：

1. $f(x_i, y_j) > 0$，对所有的 x_i, y_j；
2. $\sum_{i=1}^{k} \sum_{j=1}^{l} f(x_i, y_j) = 1$
3. $P[(x, Y) \in A] = \sum_A \sum f(x_i, y_j)$

对于二维的连续随机变量，X、Y 的概率分布密度 f(x)具有以下性质：

1、对于所有的(x,y)，均有 $f(x) > 0$，
2、$\int_{-\infty}^{\infty} \int_{-\infty}^{\infty} f(x,y)\,dx\,dy = 1$
3、$P[(X, Y) \in A] = \iint_A f(x,y)\,dx\,dy$

二维条件下的联合概率分布可以推广到多维的情况上去。

就业和失业（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所谓就业人口，一般指在劳动资源中的人口，在规定的调查时间内，从事某项工作，以取得收入者。一般地说，在各国经济统计中，就业时间都有一定的规定，达到了这个标准，就算就业。例如，在美国的每月经常人口调查就规定，在调查周内工作一个小时以上，就算就业。

所谓失业人口，一般指达到劳动年龄又有劳动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调查期间没有找到有收入的工作，并且确系在寻找工作的人。

实际统计工作者常计算两种就业人口。一种是既包括雇员雇工，也包括全部雇主与个体专业人员的全部就业人数，另一种是就业的全部雇佣人员人数。

鲍威尔线性支出系统（Powell's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鲍威尔的线性支出系统是一个大致满足古典静态理论的需求函数系统，它从需求函数出发，设法对系数加以一定的限制，从而得出较为实用的需求函数系统。

假定线性支出系统为：

$$\overline{p}q=y\beta+Ap$$

其中，A 为任意的 n×n 矩阵，p 为 n 维价格向量，$\overline{p}$为对角矩阵，q 为商品为 n 维的商品需求量向量，$y=\sum_{i=1}^{n}p_iq_i$。

设效用函数具有可加性，即商品间既没有替代性也没有互补性，则有：

$$u=u(q_1,q_2,\cdots,q_n)=\sum_{i=1}^{n}u_i(q_i)$$

这时，在一定假定下，可导出

$$A=(I-\beta i')(\overline{q}+\sigma\overline{\beta}\overline{p}^{-1})$$

其中，β 为边际预算份额向量，$\overline{q}$和$\overline{p}$代表样本平均数的向量，σ 为参数。则可得

$$p_iq_i=p_i\overline{q}_i+\beta_i(y-\sum_j p_j\overline{q}_j)$$

$$-\sigma\beta_i\left[\frac{p_i}{\overline{p}}-\sum_j\beta_j\frac{p_j}{\overline{p}_j}\right]\quad i=1,2,\cdots,n$$

斯米尔诺夫检验（Smirnoff Test） 斯米尔诺夫检验是在哥尔莫哥洛夫检验的基础上，推广到两个样本之间的比较，检验两个总体是否有显著差异的一种检验。如果从一个总体中抽取样本容量为 n_1 的样本，其总体分布 F(x)是未知的，另外从另一个总体中抽取样本容量为 n_2 的样本，其总体分布 G（y）也是未知的，斯米尔诺夫检验可以通过两个样本的比较，检验 F(x)与 G(y)的分布是否一致。即

$$H_0:\ F(x)=G(y)\quad(-\infty<x<+\infty)$$

$$H_1:\ F(x)\neq G(y)\quad(-\infty<y<+\infty)$$

分别利用 $F_{n1}(x)$与 $G_{n2}(y)$代表样本观察值经验分布函数。令

$$D_{n1n2}=\sup_{\substack{-\infty<x<+\infty\\-\infty<y<+\infty}}|F_{n1}(x)-G_{n2}(y)|$$

则用哥尔莫哥洛夫检验的临界值表可以进行检验，其中$n=\frac{n_1n_2}{n_1+n_2}$。在大样本（n>40）时，

$$4\left(\frac{n_1n_2}{n_1+n_2}\right)D^2\sim x_2(2)$$

可利用 x^2 分布表进行检验。

期望付酬（Expected Pay off） 在统计决策中，在某一确定的方案下，根据不同状态可能出现的概率，计算的期望值称为期望付酬，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E(d_i)=\sum_{j=1}^{m}x_{ij}P(\theta_j)$$

其中，E（d_i)表示第 i 个方案的期望付酬。x_{ij} 是报偿表上第 i 行第 j 列上的数值，它表示采取第 i 个方案，出现第 j 种状态时的报偿。$P(\theta_j)$表示第 j 种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

期望付酬如果用货币量计量，就是期望货币收入(Expected Monetary Value, EMV)。

最小方差比法（Least Variance Ratio, LVR） 最小方差比法是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中的一种处理方法，它仍然是一种单方程估计方法。

它的假设条件为：

1.联立模型中各结构方程的随机干扰项 u 须满足普通最小二乘法的通常的假定；

2.模型中的前定变量间不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设联立模型具有 G 个内生变量和 k 个前定变量，用矩阵表示，有

$$\beta Y_t+TX_t=u_t$$

假设要估计的第一个结构方程为：

$$Y=Y_1\beta_1+X_1T_1+u$$

令

$$Y_\Delta=[Y\ \ Y_1],\quad \beta_\Delta=\begin{bmatrix}1\\-\beta_1\end{bmatrix}$$

则上式可写成：

$$Y_\Delta\beta_\Delta-X_{11}=u_1$$

令

$$Z=Y_\Delta\beta_\Delta$$

分别对 X_1 和 X 进行回归，求残差平方和得：

$$e_1'e_1=(Z-X_1\overline{T}_1)'(Z-X_1\overline{T}_1)$$
$$=\beta_\Delta'Y_\Delta'Y_\Delta\beta_\Delta-\beta_\Delta'Y_\Delta'X_1(X_1'X_1)^{-1}X_1'Y_\Delta\beta_\Delta$$
$$=\beta_\Delta'W_{\Delta\Delta}^*\beta_\Delta \qquad (1)$$

和

$$e'e=\beta_\Delta'w_{\Delta\Delta}\beta_\Delta \qquad (2)$$

其中：$W_{\Delta\Delta}=Y_\Delta'Y_\Delta-Y_\Delta'X(X'X)^{-1}X'Y_\Delta$

可以证明，(1) 式的值不会比 (2) 式的小。因为，(1) 式的值依赖于部分外生变量 X_1，而 (2) 式的值依赖于全部外生变量 $X=(X_1,X_2)$。因此，最小方差比在于求出 β_Δ，并使由此产生 $e_1'e_1$ 尽可能地小，也就是使下列比率极小化：

$$l=\frac{\beta_\Delta'w_{\Delta\Delta}^*\beta_\Delta}{\beta_\Delta'w_{\Delta\Delta}\beta_\Delta}$$

求 l 求一阶偏导数并令其等于 0，有

$$(W_{\Delta\Delta}^*-lw_{\Delta\Delta})\beta_\Delta=0 \qquad (3)$$

为满足上式，则有

$$|w_{\Delta\Delta}^*-lw_{\Delta\Delta}|=0$$

解这个多项式，得出最小的根 $\overline{l}$，将 $\overline{l}$ 代入 (3) 式，并令 β_Δ 的第一个元素等于 1，就可以得出 β_Δ 的估计量 $\vec{\beta}_\Delta$。再利用 $Y_\Delta\vec{\beta}_\Delta=\overline{Z}$，又可以求得 T_1 的估计量：

$$\overline{T}_1=(X_1'X_1)^{-1}X_1'Y_\Delta\vec{\beta}_\Delta$$

$\vec{\beta}_\Delta$ 和 $\overline{T}_1$ 就是结构参数的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它们的结果和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等可能性标准（Rationality Criterion）　等可能性标准也叫纯理性准则或拉普拉斯准则，是一种无概率决策标准。当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对每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毫无所知，同时又没有充分理由认为某种自然状态较另一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为大，此时，对它们一视同仁似乎是合理的，即认为每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相等。如果有 n 种自然状态，则可认为每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为 $\frac{1}{n}$，然后根据报偿矩阵，求每种行动方案的报偿的期望值。期望值最大的行动方案为最佳行动方案。

等级相关系数（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等级相关系数也是一种非参数统计的方法，它的计算方法和普通相互系数相类似，所不同的是其变量用顺序的等级来代替，亦称为斯皮尔曼等级相互系数，一般相互系数公式是：

$$r=\frac{\sum_{i=1}^{n}(x_i-\bar{x})(y_i-\overline{Y})}{\sqrt{\sum_{i=1}^{n}(x_i-\bar{x})^2\cdot\sum_{i=1}^{n}(Y_i-\overline{Y})^2}}$$

若 x_i 的等级排列用 R_i 表示，y_i 的等级用 S_i 表示，则等级相互系数（用 r_{sp} 表示）的公式为：

$$r_{sp}=\frac{\sum_{i=1}^{n}(R_i-\overline{R})(s_i-\bar{s})}{\sqrt{\sum_{i=1}^{n}(R_i-\overline{R})\cdot\sum_{i=1}^{n}(s_i-\bar{s})}}$$

由于 R_i 和 S_i 均为顺序等级，所以：

$$\overline{R}=\overline{S}=(1+2+\cdots+n)/n=\frac{n+1}{2}$$

$$\sum_{i=1}^{n}(R_i-\overline{R})^2=\sum_{i=1}^{n}(s_i-\bar{s})^2=(1^2+2^2+\cdots+n^2)-n\left[\frac{n+1}{2}\right]^2$$

$$=\frac{n(n+1)(2n+1)}{6}-\frac{n(n+1)^2}{4}$$

$$=\frac{n(n^2-1)}{12}$$

代入等级相关系数得：

$$r_{sp}=\frac{\sum_{i=1}^{n}\left(R_i-\frac{n+1}{2}\right)\left(S_i-\frac{n+1}{2}\right)}{\frac{n(n^2-1)}{12}}$$

若将每一对变量之间的差用 D_i 表示，即 $D_i=R_i-S_i$，则：

$$\sum_{i=1}^{n}D_i^2=\sum_{i=1}^{n}(R_i-S_i)^2=\sum_{i=1}^{n}(R_i-S_i)^2=\sum_{i=1}^{n}R_i^2+\sum_{i=1}^{n}S_i^2-2\sum_{i=1}^{n}R_iS_i$$

$$\sum_{i=1}^{n}R_iS_i=\left(\sum_{i=1}^{n}R_i^2+\sum_{i=1}^{n}s_i^2-\sum_{i=1}^{n}D_i\right)/2$$

$$\because\sum_{i=1}^{n}R_i^2=\sum_{i=1}^{n}S_i^2=1^2+2^2+\cdots+n^2=\frac{n(n+1)(2n+1)}{6}$$

$$\therefore\sum_{i=1}^{n}R_iS_i=n(n+1)(2n+1)/6-\sum_{i=1}^{n}D_i^2/2$$

将此结果代入等级相关公式并化简，得

$$r_{sp}=\frac{n(n+1)(2n+1)/6-\sum_{i=1}^{n}D_i^2/2-n(n+1)^2/4}{n(n^2-1)/12}$$

$$=1-\frac{6\sum_{i=1}^{n}D_i^2}{n(n^2-1)}$$

如果 x_i 与 y_i 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则 r_{sp} 接近于 1，如关系很弱，则 r_{sp} 接近于 0。根据 r_{sp} 的数值，可以判断两组变量联系的紧密程度。

集中趋势（Central Tendency） 在某一总体中，一群随机变量的观测值所具有的向中心位置集中的趋势，称为集中趋势。测定集中趋势的统计方法，称为平均法。根据所研究的总体的特性和研究的任务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平均数来反映现象的集中趋势，这些平均数是：算术平均数、几何平均数、调和平均数、众数和中位数。

循环变动（Cyclic Changes） 统计方法中的循环变动，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指的是环绕着某一曲线上下所形成的周而复始的变动形势。所不同于季节变动的地方，主要在于这种循环变动并非在一年四季中上下波动，而是超过年度范围，周期年数大致相当的循环变动，经济统计学家在时间序列分析中所提到的循环波动，则主要是指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商情波动，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循环出现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种"商情波动"，是社会经济领域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它是在长期趋势之外独立存在并重复出现的，虽然它不象季节变动那样严格地周而复始地出现，但仍然是比较规则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曾经对各种"商情波动"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种这种波动的循环周期，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基欣周期，库茨涅兹周期等。

目前，对于循环变动的测定常用的方法有按相乘关系和按相加关系测定方法，现设：

Y＝原有的观察数列

T＝长期趋势

C＝循环变动

S＝季节变动

I＝不规则的随机变动

如果 T，C.S.I 是彼此相交叉的相互影响，它们就是按相乘关系来形成 y，即

$$Y=T\cdot C\cdot S\cdot I$$

这时，就要以长期趋势线（见长期趋势）与移动平均（见季节变动）相结合的方法，测定循环变动。一般地说，对时间序列的资料配合曲线后，就可以得出各个时期的长期趋势值 T，而经过移动平均得到的数值则可以认为是 T 乘以循环变动 C 后的结果，将移动平均值 TC 除以 T，得到的就是循环变动的程度，而移动平均的结果 TC，通常认为已消除了季节变动和不规则变动的影响。

按相加关系测定循环变动时，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类似的，它的区别在于假定四个因素为相加关系，即：$Y=T+C+S+I$

十三画以上

数学期望（Mathematic Expectation）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可定义如下：

设 x 为一离散型随机变量，它取值 $x_1,x_2,\cdots$ 对应的概率为 $P_1,P_2,P_3,\cdots$,如果级数

$$\sum_{i=1}^{\infty}x_iP_i$$

绝对收敛，则把它称为 X 的数学期望或均值，记作 EX。

当 $\sum_{i=1}^{\infty}|x_i|p_i$ 发散时，则说 X 的数学期望不存在。

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它的数学期望的定义是：

设 X 为具有密度函数 f(x)的连续型随机变量，当积分 $\int_{-\infty}^{+\infty}xf(x)dx$ 绝对收敛时，物它为 X 是数学期望或均值，记作 EX，即：

$$EX=\int_{-\infty}^{+\infty}xf(x)dx$$

数学期望是由随机变量的分布唯一地决定的，因此，它是随机变量的一个重要数学特征，在许多情况下，只要用它和一些其它的数字特征（如方差）结合起来，就可以很好地描绘一下分布的情况。

数学期望的性质 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具有以下性质：

(1) 常量的期望就是这个常量本身，即

$$E(c)=c$$

(2) 随机变量 ξ 与常量的数学期望等于 ξ 的期望与这个常量之和，即

$$E(\xi+c)=E\xi+c$$

(3) 常量与随机变量乘积的期望等于这个常量与随机变量期望的乘积，即

$$E(c\xi)=cE\xi$$

(4) 随机变量线性函数的数学期望等于这个随机变量期望的同一线性函数。设 b 和 k 都为常数。则：

$$E(k\xi+b)=dE\xi+b$$

(5) 两个随机变量之和的数学期望等于这两个随机变量数学期望的和，设 ξ、η 是两个随机变量。则

$$E(\xi+\eta)=E\xi+E\eta$$

这个性质可以推广到任意有限个随机变量的情况。

(6) 两个相互独立随机变量乘积的数学期望等于它们数学期望的乘积。即：如 ξ 和 η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则

$$E(\xi\eta)=E\xi E\eta$$

(7) 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可用以下方法计算：

1.如果 ξ 是离散型随机变量，有概率函数 $P(\xi=x_k)=p_k(k=1,2,\cdots)$.则它的函数 $\eta=f(\xi)$的数学期望可按下面的公式计算：

$$E\eta=E[f(\xi)]=\sum_k f(x_k)P_k$$

2.如果 ξ 是连续型随机变量，有概率密度 $\Phi(x)$，则 $\eta=f(\xi)$ 的期望可按下面的公式计算：

$$E\eta=E[f(\xi)]=\int_{-\infty}^{\infty}f(x)\Phi(x)dx$$

数据资源公司模型（The DRI Model）　数据资源公司模型是一个高度分解的有关美国经济的大型模型。它的建立受到了布鲁金斯模型、沃顿模型和其它早期模型的影响。1976 年的 DRI 模型包括 718 个内生变量和 170 个外生变量。而且内生变量中反映了产业部门分类。特别地，在产业部门、金融系统和最终 GNP 需求方面，该模型都进行了高度分解，其中产业部门的模型结合了一个具有 51 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并计算了反映部门间联系的投入产出系数，同时，把系统的长期趋势和经济循环的因素考虑进了这些系数。

DRI 模型还具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把居民和非金融企业的资金流量表和收入支出的流量结合了起来。第二个特征是建立了一个反映通货膨胀过程的逐步模型，它可以反映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影响。第三个特征是考虑了入口构成对于失业和就业的影响。第四个特征是将地方政府部门作为内生变量，反映它们的行为对于宏观条件、人口因素、金融情况的依赖。

表 1　DRI 模型中的方程式

	行为方程式	定义方程式	总数
Ⅰ. 最终 GNP 需求	66	110	176
消费	14	24	38
投资	22	44	66
政府	11	20	31
国外	19	22	41
Ⅱ. 收入	11	20	31
Ⅲ. 金融	103	99	202
货币和储备总量	8	15	23
利率	23	1	24
商业银行贷款	5	3	8
存量价格,价格预期和其它	9	2	11
资金流量：居民	20	18	38
资金流量：非金融公司	24	48	72
资金流量和抵押活动	14	12	26
Ⅳ. 供给,生产能力和操作率	6	4	10
Ⅴ. 就业、失业和劳动力	56	25	81
Ⅵ. 产业部门	128	80	208
生产	51	24	75
投资	48	20	68
资本存量	0	32	32
就业	29	4	33
总计	378	339	318

表 1 列出的，是 DRI 模型中方程式的基本情况。

DRI 模型每年都根据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发现加以修订。它被用于估计各种乘数和弹性的结构分析；它的细致结构描述了许多经济过程，包括循环因素和金融条件，探索了宏观和微观之间的相互联系。它还被用于短期预测，提供 12 个季度关于主要宏观变量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的预测。而利用这个模型的动态模拟则跨越了 15 个年度。最后，这个模型还被用于政策评价，用于估价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失业、价格稳定情况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概率（Probability）　通俗地说，所谓概率，就是反映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一个数值。它的定义，是随着概率理论的不断发展而完善的，而概率理论，则是统计学的理论基础。

(1) 概率的古典定义。

概率的古典定义是由瑞士数学家雅各布·贝努里(Jacob Bernulli 1654—1705)和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 1749—1827)分别提出来的。它可以表述如下:

若试验的结果一共由 n 个基本事件组成，这些基本事件的出现有相等的可能性，而某事件 A 是由这些事件中的 m 个事件所构成的，则事件 A 发生的概率 P(A) 为:

$$P(A)=\frac{m}{n}=\frac{A包含的基本事件数}{基本事件总数}$$

古典型概率具有三个基本性质:

(i) 对于任何事件 A，P(A) ≥0;

(ii) P(Ω) =1，即必然事件的概率为 1;

(iii) 若 $A_1,A_2,\cdots,A_m$ 两两互不相容，则

$P(A_1+A_2+\cdots+A_m)=P(A_1)+P(A_2)+\cdots+P(A_m)$

第一个性质称为概率的非负性，第二个性质称为概率的规范性，第三个性质称为概率的(有限)可加性。

(2) 概率的几何定义

在古典概率中利用等可能性的概念，可以成功地计算许多类问题的概率，但是，由于它要求可能场合的总数必须有限，有些结果无限多但又是等可能性的场合，就需要扩展原有的概念。概率的几何定义为:

若以 Ag 记在某区域 Ω 中随机地取一点，而该点落在区域 g 中这个事件，则其概率定义为:

$$P(A_g)=\frac{g的测度}{\Omega的测度}$$

几何概率具有以下性质:

(i) 对任何事件 A，P(A) ≥0;

(ii) P(Ω) =1;

(iii) 若 $A_1,A_2,\cdots$ 两两互不相容，则

$$P\left(\sum_{n=1}^{\infty}A_n\right)=\sum_{n=1}^{\infty}P(A_n)$$

前两性质与古典型概率相同，(iii) 则要求对可列个两两互不相容的事件成立，这性质称为可列可加性。

概率的古典定义要求试验的结果有限，并要求某种等可能性，几何定义虽然在结果有限这一点上作了扩展，但仍然要求等可能性。这样，就把相当一部分概率问题排除在外，这是它们的不足之处。

(3) 概率的统计定义

概率的统计定义为:

在不变的条件下重复地进行 n 次试验，事件 A 发生的频率$\frac{m}{n}$围绕着某一常数 P 上下摆动，且随着 n 的增大，摆动的幅度随之减小，逐步趋于稳定。这个频率的稳定值 P 称为事件 A 出现的概率。

概率的统计定义比较直观，容易理解，但对于 n 的增大如何使频率趋于稳定，在理论上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解决的实际上就是这一类问题。

(4) 概率的公理化系统

概率的公理化系统是由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于 1933 年提出来的，这个系统综合了前人的成果，明确定义了基本概念，使概率论成为严谨的数学分支。

概率的公理化系统为:

定义在事件域 F 上的一个集合函数 P 称为概率，如果它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i) P(A) ≥0，对一切 A∈F;

(ii) P(Ω) =1;

(iii) 若 $A_i\in F$，i=1,2,⋯且两两互不相容，则

$$P\left(\sum_{i=1}^{\infty}A_i\right)=\sum_{i=1}^{\infty}p(A_i)$$

性质(iii)称为可列可加性或完全可加性。

概率加法定理 (The addition Theorem of Probability Theory) 概率的加法定理是有关随机事件的和的定理。它可以表述如下:

(1) 两个互不相容事件的和等于这两个事件的概率之和，即:

$$P(A+B)=P(A)+P(B)$$

(2) 若两个事件对应(互逆)，则其概率之和为 1，即:

$$P(A)+P(\bar{A})=1$$

(3) 对任意两个事件 A 与 B，有

$$P(A+B)=P(A)+P(B)-P(AB)$$

概率乘法定理 (The Multiplication theorem of Probability) 对于任意两个事件，概率的乘法定理为:

在一次试验中，事件 A 与事件 B 同时出现的概率等于其中一事件的概率与另一事件在前一事件出现下的条件概率的乘积。即:

$$P(AB)=P(B)P(A|B)$$

若两事件是相互独立的，即:

$$P(A|B)=P(A)或P(B|A)=P(B)$$

则

$$P(AB)=P(A)P(B)$$

频率 (Relative Frenquency) 考虑重复进行的随机试验，共试验 n 次，事件 A 发生了 m，比值 F(A)就称为事件 A 的频率。如抛掷了 10 次硬币，正面出现了 4 次，出现正面的频率就为 0.4。当 n 比较

小时，事件A的频率波动往往比较大，但随着n的数量不断增大，频率会逐渐稳定下来。例如，如果掷硬币的次数不断增加，出现正面的频率就会逐渐稳定在0.5左右。这种情况称为频率的稳定性，它是在大量试验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统计规律性，原因在于现象本身的性质。硬币每一面出现的频率将为0.5左右，是因为它只有两面，质地均匀。概率的统计定义就来自于频率的这种稳定性。

简化式（Reduced Equations） 简化式是指通过一定的代换将联立方程模型中的内生变量表示为前定变量和随机干扰项函数的方程式，简化式中的参数称为简化式参数。一般来说，简化式参数是结构参数的非线性函数，是结构式随机干扰项的线性函数。

获得模型简化式有两条途径：

1.直接列出模型的简化式。直接列出模型的简化式不是根据一定的经济理论设定模型，而是在已知模型所包含的全部前定变量的前提下，将每个内生变量直接表示为前定变量的函数。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列出简化式往往是整个参数估计过程中的一个中间步骤。

2.由模型的结构式导出模型的简化式。由模型的结构式导出其简化式就是从模型的结构式出发，通过推导过程将每个内生变量都表示为前定变量和随机干扰项的函数。

如果在结构方程式

$$BY+TX=U$$

中，结构参数矩阵B是可逆的，那么，用B^{-1}乘上式两端，并经整理得

$$Y=-B^{-1}TX+B^{-1}U$$

于是模型简化式就可以一般表示为

$$Y=\Pi X+V$$

其中

$$\Pi=-B^{-1}T=(\Pi_{ij})_{G\times k}$$

$$V=B^{-1}U=(V_1,V_2,\cdots,V_G)'$$

如写成分量形式，有：

$$Y_{1t}=\Pi_{11}X_{1t}+\Pi_{12}X_{2t}+\cdots+\Pi_{1k}X_{kt}+V_{1t}$$

$$Y_{2t}=\Pi_{21}X_{1t}+\Pi_{22}X_{2t}+\cdots+\Pi_{2k}X_{kt}+V_{2t}$$

$$\cdots\cdots$$

$$Y_{Gt}=\Pi_{G1}X_{1t}+\Pi_{G2}X_{2t}+\cdots+\Pi_{Gk}X_{kt}+V_{Gt}$$

简单指数 简单指数就是不加权的指数，常见的简单指数公式有：

(1) 简单综合指数，公式为：

$$I_{01}=\frac{\sum P_1}{\sum P_0}$$

其中，I代表指数，O代表基期，1代表计算期，P代表商品价格，$\sum$为总和符号。

简单综合指数受商品计量单位的影响，不能唯一地反映商品价格的综合变动。

(2) 简单算术平均数指数，公式：

$$I_{01}=\frac{\sum\frac{P_1}{P_0}}{n}$$

(3) 简单几何平均数指数，公式为：

$$I_{01}=\sqrt[n]{\Pi\left(\frac{P_1}{P_0}\right)}$$

其中，Π为连乘符号

国外普遍认为，在三种简单指数中，几何平均数指数是较好的简单指数公式。

简单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 简单随机抽样，又叫纯随机抽样。它的组织原则是，在抽取样本时，必须保证总体中每一个单位都有同等机会被选中，当总体单位的变异程度很小，或者具有某种特征的单位均匀地分布于总体的各个部分时，用这种方法较为适宜。

简单随机抽样有两种抽取单位的方法：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重复抽样是从总体中抽取第一个单位后，把这个单位放回总体，再抽取第二个单位，依次类推，直至抽足样本所要求的单位数。不重复抽样则在每抽取一个单位后，不再将它放回。重复抽样能够保证每次抽取时总体的成份不变，即各单位被抽到的概率保持不变。但在重复抽样的情况下，同一个总体有可能被多次抽到一个样本中去，不重复抽样则能保证每个总体单位在一个样本中最多只能出现一次。在实际操作中，不重复抽样使用得较为普遍。

设$x_1,x_2\cdots x_n$是一个由总体单位为N的总体中抽取出来的容量为n的样本，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只要n充分大（一般地说，大于30即可，即为大样本），总体单位之间的差虽不是非常大，无论原来的总体服从什么分布，样本平均数都近似地服从以总体平均数$\overline{X}$为数学期望，以σ^2/n(总体方差/n)为方差的正态分布。即：

$$\bar{x}=\frac{\sum_{i=1}^{n}x_i}{n}\sim N\left(\bar{x},\frac{\sigma^2}{n}\right)$$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不是对总体平均数作出估计，而是希望对总体比例进行估计（如对总体的废品率P进行估计），这时，若以P表示样本的废品率，P表示总体的废品率，当n充分大时，P也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即：

$$p\sim N\left(P,\ \frac{P(1-P)}{n}\right)$$

利用这两个关系，就可以在重复抽样条件下估计总体的平均数（或比例）并估算抽样平均误差。但是，由于我们对总体平均数进行估计时，对总体方差常常是不了解的，所以，常常还要同时计算样本方差，并以此估计总体方差。这时，总体方差 σ^2 的估计值 $\vec{\sigma}^2$ 为样本方差 S^2 乘以 n，用公式表示为：

$$\vec{\sigma}^2 = ns^2$$

而抽样平均误差为：

$$S = \frac{\vec{\sigma}}{\sqrt{n}}$$

若已知总体方差 σ^2，则可以直接计算抽样平均误差：

$$SX = \frac{\vec{\sigma}}{\sqrt{n}}$$

在比例抽样的情况下，只要用 $\sigma^2 = P(1-P)$ 代入公式即可。

如果是按照不重复抽样的方法进行抽选，随着抽样的进行，总体的成份不断发生变化，即对于每次抽取而言，总体各单位被抽中的概率在不断变化。因此，在计算抽样平均误差时，必须对公式进行修正：

$$\sigma_x = \frac{\sigma}{\sqrt{n}} \cdot \sqrt{\frac{N-n}{N-1}}$$

其中，$\sqrt{\frac{N-n}{N-1}}$ 叫作修正系数。当 n 和 N 相比很小时，修正系数趋近于 1，这时，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的结果误差很小，就可以用重复抽样公式代替不重复抽样。

同理，可以计算有限总体不重复抽样的抽样比例的抽样平均误差为：

$$\sigma_p = \sqrt{\frac{P(1-P)}{n} \cdot \frac{N-n}{N-1}}$$

解释变量的边际贡献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对于样本回归函数

$$Y_i = \beta_0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cdots + \beta_k x_{ki} + e_i$$

如果它的总体回归模型满足古典线性模型的假设且干扰项 u_i 服从正态分布，就可以分别进行 t 检验说明 $X_1, X_2 \cdots X_K$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是否显著地不等于 0。但也可以序贯地引入 $X_1, X_2, \cdots X_K$，先建立 Y 对 X_1 的回归方程，考察它的显著性，然后将 X_2 加进模型中去，考察这一新加进的变量是否有贡献（上述步骤当然也可以颠倒过来），依次类推。这里的贡献就称为一个解释变量的边际贡献，它指的是新变量的加入对于 R^2 或回归平方和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用方差分析的技术来加以解决。

首先建立 Y 对 X_1 的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vec{Y}_i = \beta_0 + \beta_1 X_{1i}$$

这时，在待检假设 H_0: $\beta_1 = 0$ 为真的情况下，如干扰项 u_i 服从正态分布且模型满足古典线性模型的假设，有统计量：

$$t = \frac{\vec{\beta}_1}{\vec{\sigma}_{\beta_1}} \sim t(n-2)$$

其中：$\vec{\sigma}_{\beta_2} = \vec{\sigma} \cdot \frac{1}{\sqrt{\sum_{i=1}^{n} x_{1i}}}$。$x_i = x_{1i} - \overline{X_1}$

$$或F = \frac{\sum(\hat{Y}_i - \overline{Y})^2 / 1}{\sum_{i=1}^{n} e_i^2 / n-2} \sim F(1, n-2)$$

这样，就可以用 t 统计量或 F 统计量进行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为拒绝原假设，即 β_1 显著地不为零。则可以把 X_2 加入模型而获得二元回归模型。我们想知道的是：(1) X_1 已在模型中，X_2 的边际贡献是多少，是否与 Y 显著相关？(2) 边际贡献在统计上显著吗？(3) 根据什么准则来决定是否将一个变量加到模型中去。可以利用以下的方差分析表来解决这些问题。

确定一个变量边际贡献的方差分析表

变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sum_{i=1}^{n}(\vec{Y}_i - Y)$ 仅与 X_1 有关	$Q_1 = \vec{\beta}_1^2 \sum x_{1i}^2$	1	$Q_1 / 1$
$\sum_{i=1}^{n}(\vec{Y}_i - \bar{Y})$ 与 X_1, X_2 有关	$Q_2 = \vec{\beta}_1 \sum_{i=1}^{n} y_i x_i + \vec{\beta}_2 \sum (y_i x_{ij})$	2	$Q_2 / 2$
由于 X_2 加入所增加的 $\sum(y_i - \bar{Y})$	$Q_3 = Q_2 - Q_1$	1	$Q_3 / 1$
$\sum_{i=1}^{n} l_i^2$（与 x_1, X_2 有关）	$Q_4 = Q_5 - Q_2$	n−3	$Q_4 / n-3$
总平方和	$Q_5 = \sum (Y_i - \bar{Y})^2$	n−1	

在考虑了 X_1 的贡献之后再考虑 X_2 的边际贡献，为此，令：

$$F = \frac{Q_3 / 1}{Q_4 / n-3}$$

在 u_i 服从正态分布的假定下，设定原假设为 H_0: $\beta_2 = 0$，那 F 值将服从 F（1,n−3），如果在显著性水平 αF 原假设被拒绝，则说明 X_2 的引入显著地减少了残差平方和 $\sum_{i=1}^{n} e^2$，也就是显著地增加了回归

平方和或 R^2，X_2 就应该加入模型，否则就接受原假设

，不将 X_2 加入模型。

如果原假设被拒绝，则可以再加入一个 X_3，继续进行分析，依次类推。

算术平均数（Arithmetic Mean）　算术平均数的定义为：变量的数值之和除以数值的总次数，即：

$$\text{算术平均数} = \frac{\text{标志值总量(变量数值之和)}}{\text{总体单位数(总次数)}}$$

用公式表示为：

$$\overline{X} = \frac{\sum_{i=1}^{n} x_i}{N}$$

其中，符号$\bar{x}$代表平均数，$\sum$表示总和，x_i 代表变量数值，N 代表总次数。

如果变量数值已组织成为次数分配，就要以次数分配表为基础，计算加权算术平均数。这时，若以 x_i 为次数分配中的各组的组中值、f_i 代表各组的次数权数，则有：

$$\overline{X} = \frac{\sum_{i=1}^{n} x_i f_i}{\sum_{i=1}^{n} f_i}$$

算术平均数是通过综合平均，抵销一切变量的数量差异中反映的偶然差别，从而求得接近于由客观必然原理影响而产生的数值的结果。应该注意，应用算术平均法时，只能平均抵销由于偶然性原因的作用而产生的差异，而不应该将必然原因所导致的差别平均掉。例如，美国家庭收入分配是不对称的，收入大的家庭组中包括的收入既有就业收入，又有财产收入，而收入小的家庭组中大多数是以就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由于必然原因造成的财产收入，就不应该在计算家庭平均收入时，简单地和就业收入一起平均。

增加值（Value added）　增加值指的是经济活动中新增加的价值，等于总产生减去中间消耗（不包括折旧）的价值，不同部门的增加值的计算略有不同。

（1）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直接按其生产成果计算增加值，对于企业而言，他们的增加值为总产出的价值减去其中间投人的价值，从价值上看，它包括工资和薪金、营业盈余、间接税和固定资本损耗这四大部分。把一个部门所有企业的增加值加在一起，就可以得到部门的增加值。

（2）商业、运输业、生活服务业等部门，则从企业的工农业总收入中减去为营业用而购自其它部门的产品和服务后，剩下的就是企业的增加值。

（3）对于卫生、教育等部门及非营利组织（如慈善机构），政府部门（行政管理，国防、司法等）均以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金来计量工作服务的产出，作为部门的增加值。

（4）对银行及类似的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的增加值的计量，是一个值得特别说明的问题，这一种增加值的特别处理，是各国在统计实践中创造的，现在已被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采用。从本质上说，银行进行存款和贷款活动，可以取得两种收入，一种是发放和收回贷款以及其它银行业务的服务费用，一种是利息收入。服务费用只占银行收入的一小部分，它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它们所收到的财产收入超出它们所付出的财产收入的部分，基本上由利息构成。由于银行办理存款和取款业务不收费或收费很少，同时，还需支付各种为存款或取款而发生的各种费用，这样，如果把银行的交易也象其它产业部门那样处理，它们的营业盈余可能会是负数。

在各国统计实践中，这种异常现象常常通过在实际支付的费用之外估算一种服务费用加以避免。它等于银行根据掌握的存款所作的投资和贷款所取得收入超过在这些存款上支付的利息的部分。在原则上，这笔服务费用不包括由银行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所得到的财产收入，但在实际处理中，考虑到各种具体困难，这笔收入往往也同时包括在内。

估算的服务费用一方面是银行的产出，另一方面当然也应该看成是各个产业部门的中间消耗，因此，各产业部门和银行支付的利息减去由银行获得的利息得到的净利息收入，按理应该从各部门的增加值中扣去，但在实际中这不容易做到，所以，在将各部门增加值加总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要把估算的银行服务费用从总额中扣除，以避免重复计算。

（5）此外，还对一些企业、机关、单位组织的活动，如房屋租用（包括自用）、家庭服务工人等也分别按服务的产值计算增加值。

整群抽样（Cluster Sampling）　整群抽样是把总体分为许多群，然后再在这些群中抽取几群作为样本。当总体单位分布区域较广时，采用整群抽样能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节约时间和费用。虽然类型抽样和整群抽样都是把总体单位按一定标志划分为许多组后再选样，但它们适应的条件不同。当每个组内部的差别比较小，而各组之间差别较大时，采用类型抽样效果比较好。当每组内部差别比较大，*而各组之间却非*常类似时，则适宜采用整群抽样。

设将全部容量为 N 的总体划分为 R 群，每群中包括的总体单位数为 $N_i(i=1,2,\cdots,R)$，$N_1+N_2+\cdots$

$+N_c=N$。若从 R 群中随机地抽取 r 群（显然，$r<R$），则第 i 群的样本平均数为：

$$\bar{x}_i=\frac{\sum_{j=1}^{n_i}x_{ij}}{N_i}$$

r 群的总的样本平均数$\bar{X}$为：

$$\bar{X}=\frac{\sum_{i=1}^{r}\bar{x}_i}{r}$$

若用 δ^2 代表总体的群间方差，有：

$$\delta^2=\frac{\sum_{i=1}^{R}(\bar{x}_i-\bar{x})^2}{R}$$

将群间方差代入抽样平均误差公式，就得到整群抽样的抽样平均误差．考虑到整群抽样是不重复抽样，应加修正系数，我们有：

$$\sigma_i=\sqrt{\frac{\delta^2}{r}\left(\frac{R-r}{R-1}\right)}$$

第四篇　综合经济学

二　画

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国法定货币—纸币和金属辅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同时，陆续回收各解放区发行的地方性货币，收兑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并禁止金银外币流通。这样，人民币成为中国唯一使用的货币。建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新中国的币值，消除通货膨胀的遗迹，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以取代原面额较大的旧人民币，新人民币1元折合旧人民币1万元；任何人手中的旧币都可按这一比率无限制地兑换；物价、工资和一切债务也都按这个比率折算。为了改善辅币的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金属辅币。

人民币以元（圆）为单位，1元等于10角，1角等于10分。人民币符号为"￥"，为人民币单位"元"字汉语拼音的字首Y加两横，读音同"元"。目前人民币的票面额、主币有壹佰元、伍拾元、拾元、伍元、贰元、壹元；辅币有伍角、贰角、壹角的纸辅币和伍分、贰分、壹分的纸辅币和金属辅币。

人民币没有规定的含金量，是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关于人民币的价值基础和人民币是不是黄金符号，有两种对立的观点。(1) 认为是黄金的符号，因为货币只能由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来承担，纸币所以能计价，是因它代表了一定数量的货币商品。人民币与旧中国的货币（由历史上的白银逐步过渡到抗战的黄金）符号有着历史延续关系，并与世界上采用黄金为货币商品的各种货币符号时刻发生联系，所以人民币是黄金的代表。(2) 认为人民币与黄金不存在什么联系。因为人民币与黄金无法定联系，黄金在国内也不起货币作用，黄金作为货币商品只存在于国际经济联系中，况且在国际经济联系中，黄金非货币化的趋势也已十分明显。关于不代表黄金的人民币的价值基础问题，有人认为，人民币的购买力靠国家掌握的大量物质来保证，因而其代表的价值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称之为"百物"；也有人认为，人民币所代表的价值是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或认为实质是劳动时间。

人民币与外币兑换价，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公布。人民币汇价采用直接标价法。目前人民币的汇价制定采取"一篮子货币"法，即选择国际贸易中通用的几种可兑换货币，按其在中国对外经济往来中的重要性和在国际市场上汇率变动的情况，计算并调整人民币的对外汇价。

入库　是国家预算收入缴入各级国库。国库经收处不是国库机构，所收款项是代收性质，不能视为入库。

三　画

广义货币流通　"狭义货币流通"的对称。是指以现金、活期存款、可转让存款、短期政府债券、银行券、可转让票据、外汇券等作为价值符号代表货币进行的流通。这种以广义的货币为媒介为商品交换服务的货币流通即称广义货币流通。

三角债　指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商品经济运动中，企业间相互提供信用，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一旦社会再生产过程出现严重失调，资金流通发生阻滞，一系列债务支付关系就要受到破坏，到期债务不能及时清偿又引起社会上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形成由相互拖欠构成的债务链，使企业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三角债既是这种债务危机的表现，也是这种债务危机的结果。三角债一般是由多种原因造成。在宏观上，三角债形成同宏观经济失衡和宏观政策的失误有关。比如，我国经济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交织在一起，由于宏观政策的失误和体制的原因，经济总是处于时热时冷，由膨胀到收缩的循环过程之中。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经济政策时紧时松，经济时而膨胀，时而收缩的条件下，必然出现债务危机。在微观上，三角债由不合理的企业行为造成。比如，由于企业缺乏约束机制和自我积累的动机，总是过多地依靠银行和其它信用形式来解决营运资金不足，一旦银行信用收缩，就会陷入

三角债之中。我国三角债拖欠货款主要有三种类型：(1) 基本建设项目拖欠；(2) 滞销产品赊销，紧缺商品预付货款；(3) 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造成拖欠。三角债对经济运行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它使资金流通受阻，正常的经济秩序受到破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导致社会经济效益下降。清理三角债，使企业摆脱债务危机，可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同时通过改革消除三角债产生的深层原因。

三自纳税 企业自行计算应纳税款，自行填写缴款书，自行缴纳税款的一种纳税方法。通常对这些企业称为"三自纳税户"。实行三自纳税的企业，须经税务机关批准。

三财之道 生财、聚财、用财之道的总称。其基本内容是：(1) 生财之道，即指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从根本上说，只有经济发展了，财源才能茂盛，财政收入才有可靠的来源。(2) 聚财之道，即指根据国家的分配政策，通过组织收入，形成国家集中掌握的财政资金。(3) 用财之道，即指在使用财政资金时，要注意厉行节约，讲究社会经济效益。具体对生产领域来讲，用财之道就是要以最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三财之道既是客观经济规律在财政工作中的具体反映，又是各级财政部门在管理中应坚持的原则。

大修理基金 专用基金的一种。企业按照规定的大修理基金提存率提存的基金。它是用于固定资产大修理所需的资金。大修理基金提存率由企业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企业不得任意提高或降低。企业提取的大修理基金是为以后年度进行大修理建立的货币准备金，应专款专用。其使用范围主要包括：对机器设备进行全部拆卸和部分更新主要部件、配件；对房屋及建筑物进行翻修（不包括房屋及建筑物增加层次，扩大面积）和改善地面工程等。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大修理时结合进行技术改造的，在保证正常大修理的前提下，折旧基金可以同大修理基金结合使用。

大修理借款 在我国，人民银行为保证企业按计划及时对固定资产进行大修理而发放的贷款。企业如需要这种借款，应事先编制大修理借款计划送交银行审批。借款时提出大修理借款申请书，还要附送企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大修理基金提取和支出计划，供银行审批用。借款额原则上相当于计划大修理用款扣除企业提存的大修理基金后的余额。以后按月提存大修理基金，再分月归还银行。大修理借款的特点是：一次借入，按月分次归还，借入数应为计划大修理费用的不足数，归还数则为按月提存的大修理基金数。大修理借款应当在借后十二个月内全部还清。

大财政，小银行 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银行对财政的依附关系的形象比喻。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产品经济思想的指导下，经济管理体制日益集中化，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财政调节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大，银行的作用则日益降低，这主要表现在，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大，银行信贷资金来源日益缩减；银行无贷款发放与收还的权力，变成仅以信贷方式拨付一部分财政资金的出纳机构，银行没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来调剂货币量的力量，银行通过贷款、利率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作用很小；财政收支出现失衡，便向银行透支，银行只能增发票子或增存款，因此，银行实际上成为社会各部门的货币出纳机关，成了消极地附属财政的，用信贷方式分配一部分财政资金的信贷机关，不能成为一种聚财、用财、调节国民经济和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工具。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开始后，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工商税 中国对一切从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农产品采购、进口贸易、商业经营和服务业的单位和个人，就其产品销售收入，采购支付的金额和进口商品总额所征收的一种税。我国从1973年开始至1984年9月底废止的一种税。它是由原来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合并而成的。这是当时我国的主要税种。根据1972年3月30日国务院批准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工商税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为征税对象，以一切从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农产品采购、进口贸易、商业经营和服务性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义务人，按行业划分税目，共有税目44个，其中工业30个，农、林、牧、水产品采购行业9个，商业服务行业5个。采用差别比例税率，最高税率66%，最低税率3%，共有税率82个。1984年10月，实行工商税制改革时，工商税废止，将工商税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

工商税收 是对从事工商业经营的经济单位和个人，就其产品或业务收入征收的一种税。它是我国1958年以前的主要税种。内容包括：(1) 对固定工商业按营业额征收营业税，按其所得额征收所得税；(2) 对临时商业按每次营业额征收临时营业税，对摊贩业按营业额和所得额征收摊贩业税。1973年，

国家进一步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合并税种，调整税率、简化税目，把原来对工商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同时取消了对中间产品征税等规定，实行两次课征制，对工业产品，只在其生产和商业零售时征税，对列举征税范围的农产品，其税收则分别在采购和零售时课征，以保证税款入库与税金实现的环节一致。工商税是我国对流转额征税的主要税种，具有税源大、征税范围广等特点。征税范围包括：工业、交通运输、农、林、牧、水产品采购、商业零售服务及其他业务等。主要是按其商品销售收入的多少征税，纳税单位只要取得销售收入，不论其盈利与否，都要按规定缴纳工商税，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工商税采取比例税率的征税办法，方法有三：一是由纳税单位自行计算纳税数额，然后上交税务机关，税务机关辅导检查；二是纳税单位自算纳税数额上报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审核后，再由纳税人缴纳；三是城、乡、个体纳税户自行申报纳税数额，经纳税评议小组讨论评定，最后由税务机关审查核定后，向个体纳税户定额定期征收，纳税期限由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经营情况和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工商税在调节生产与消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正确利用价值规律，调节企业盈利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工商所得税　国家对非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非农业个体经济的所得额征收的一种税。目前，对个体经济和没有纳入预算管理的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所得也要按规定缴纳所得税。所得额是指以上所述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经营收入总额扣除各类生产成本和税收外，企业获得的纯利润额。工商所得税原则上每年征收一次，一般实行分期预征，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工商所得税在1958年以前是工商税收的组成部分，1958年国家税制改革后，工商所得税从工商税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工商所得税根据不同的纳税人以其全年所得额为征税对象，采取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获利多的企业多征，获利少的企业少征，无利的企业不征。工商所得税征收方式因纳税人的情况不同而异，对企业财务制度健全，产品成本、企业利润管理较好的企业，采取按季预征，年终核算清交，多退少补的办法；对无帐薄记录，单据不全的个体户则采取分季评定、按月征收，年终不核算清交的办法。工商所得税对不同的经济成分起着不同的作用。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工商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是私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工商所得税的纳税人主要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工商所得税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对积累建设资金，增加财政收入，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工商统一税　我国对从事工业品生产、交通运输、农产品采购、商品零售、外货进口和服务性业务的单位或个人，根据其经营商品的流转额和业务收入所征的税。是1958年税制改革时合并而成的。这次改革基本上是在原税负的基础上简化税制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其主要内容是：(1) 简并税种。即将工商企业原来交纳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改为四税合一的工商统一税。(2) 将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改称工商所得税。(3) 在基本保持原税负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产品的税率；并简化了征收办法，对继续生产的中间产品，除保留少数继续征税外，一般均不再征税。依据税法规定：纳税人是一切从事工业品生产、农产品采购、外货进口、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和服务业的单位和个人，课税对象是商品销售收入额、购进商品支付金额或服务性业务收入金额，方法是采用比例税率、并按实际价格征收。

亏损　利润的对称。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经营所形成的净损失。它是综合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生产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企业发生亏损，不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且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亏损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由于国家为了扶持生产和安定人民生活特定的需要，必须生产某些亏损的产品，或某些商品的销价低于进价（或进销价持平，或销价略高但不足以抵偿流通费用）而发生亏损，这叫政策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财政实行计划补贴办法，超亏不补，减亏分成，补贴数额和减亏分成比例，可以商定。二是由于国营企业对于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亏损，叫经营性亏损。经营性亏损是企业主观因素造成的，应认真分析造成亏损的原因，采取有效的措施。企业主管部门要责成企业限期扭亏。在规定限期内，由财政部门适当核给补贴，超亏不补，减亏分成；超过限期的，一律不再弥补。到期扭亏为盈的，实行利改税。

亏损补贴　通常是指国家对企业发生的政策性亏损按核定的亏损额给予补贴的一种财政分配形式。有定额补贴和计划补贴两种办法。前者按产品核定单位亏损额，乘以实际产量（或销量）给予补贴。后者按核定的计划亏损总额给予补贴。我国一般均实行"超亏不补，减亏分成，一定三年不变"的办法。对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由企业主管部门责令企业限

期进行整顿。在规定的期限内，经财政部门审批后，适当给予补贴。超过期限的，一律不再弥补。

个人所得税 是对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个人取得的所得和不在我国居住的个人从我国取得的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它是适应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从1980年开征的一个新税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同其他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比较，具有税率低、扣除额宽、征税面小、计算简便的特点。征税的所得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及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它所得。凡在我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我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都应按规定纳税；不在我国境内居住或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只就其在我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纳税。个人所得税按照不同来源的所得分别计算征收，规定两种税率。对工资、薪金所得、每月收入减除800元费用后的余额，按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最低为5%，最高为45%；对其它各种所得，采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满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然后就其余额征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其它所得、按每次收入征税。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没有扣缴义务人时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个人所得税按月申报缴纳；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应在年度终了后申报缴纳。

个人收入调节税 指对个人取得的现金收入和实物及有价证券收入征收的一种税。国务院于1986年9月25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后，国内个人不再依照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纳税。原个人所得税仅适用于来我国工作的外籍人员。主要内容有：(1) 纳税人。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取得个人收入的中国公民，都是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纳税义务人。(2) 征税范围。包括：工资和薪金收入，即指从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业户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以及各类津贴、补贴的收入；承包和转包收入，即指对国营、集体、联营企事业单位实行承包、转包、承租取得的个人收入；劳务报酬收入，即指从事设计、法律、会计、音乐、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等项取得的收入、财产租赁收入；即指出租房屋、机器等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专利权的转让收入；投稿与翻译收入；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其他收入。(3) 税率。根据收入的来源，分别按照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计征。(4) 应纳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计算公式：应纳税额＝综合收入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四　画

计算货币 又称"观念货币"。人们在观念或想象中表现商品价值的货币。是实在的货币的客观反映。可以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发挥计算货币的作用。由于货币执行这一职能时只是表现、衡量商品的价值，把商品价值表现为价格，还不是实际的流通，因此并不需要现实的货币。虽然可以用计算货币表现和衡量，商品的价值，但不能随心所欲地规定商品的价格。由计算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是以现实交换中的实在货币为依据的。诸如成本、产值、售价、国民收入、资产总值等经济范畴中所使用的货币，都是观念上的，都作为计算货币而发挥作用。

计税依据 计算应纳税额的依据。计税依据主要有收入额、效益额、所得额、财产额、资金额等。它是从量的方面对征税的规定。计税依据可分为：(1) 计税金额即采取从价计征的计税依据。计税金额＝征税对象的数量×计税价格，应纳税额＝计税金额×适用税率，由于征税对象不同，计税金额所包括的内容也不同。例如：从事工业生产的以产品销售收入和加工业收入为计税金额；从事农产品采购的，以收购所支付的金额为计税金额。(2) 计税数量即采取从量计征的应纳税额的计税依据。应纳税额＝计税数量（征税对象的数量）×适用税率。由于征税对象不同，计税数量所包含的内容也不同，即分为重量、容积、面积等。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国家用于发展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费用。主要包括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业费，不包括国家财政用于以上事业的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用于经济各部

门、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经费和干部培训费，以及由企业、部队、群众团体、个人举办的各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费用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是我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事业费是用于文化艺术活动的宣传教育、知识传播、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费用。包括各级文化部门所属的文化馆、图书馆、艺术表演团体，以及其他文化事业部门的事业费。教育事业费，是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费用。它除国家批准设立的中央、各省、自治区所属的各类高等学校和教育部、所属各类学校的经费外，还包括国家给予民办学校的补助费以及业余教育、出国和来华留学、以及其他教育事业经费等。教学事业费是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以及科学普及的费用，它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家科委系统、全国科协系统和地方所属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费、干部培训费和所属企业经费等。卫生费是用于防治各种疾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费用。包括国家卫生部门所属各类医院、疗养院、保健站、卫生所、独立门诊部、各种防治所、防疫站等费用的支出，以及各级公费医疗计划生育支出和其他卫生事业费，在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中，还包括体育事业费。体育事业费是用于各级体育部门的费用和各级体委举办的体育竞赛费、体育场所以及其他体育事业费用。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合理安排和使用文教科学卫生等事业费，对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改善，以及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文教、科学、卫生事业与经济建设事业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因此，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必须使两者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从而才能保证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稳步发展。

不兑现纸币　亦称“不兑换纸币”。“兑换纸币”的对称，是在金属货币制度下发行的一种不能兑换金币或金块的纸币。一般由政府发行，用于解决财政上的困难。这种纸币，有的由政府直接发行，但多由国家银行出面间接发行。由于这种纸币的发行全凭法律强制流通，故又称“命令纸币”。这种纸币可以同金币、银币，或同可兑换硬币的纸币等区别开来。公元十一世纪，我国北宋的交子就是典型的纸币，它是由国家印制，强制行使的不兑现的货币符号。在西方，十七世纪开始发行的银行券虽然以纸币的形式出现，但它是可以兑换的信用货币。在不兑现信用制度下，流通中的纸币都是不兑现纸币。虽然由国家规定了单位货币的含金量，但持有者无权兑换黄金。我国对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亦属于不兑现纸币。

开源节流　发展经济，增辟国家财力的来源，同时提倡勤俭节约原则，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源”即是财源，指国家财力的来源；“流”则指国家的费用开支。开源节流的理财思想最早见载于战国时期荀况的《富国篇》中：“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其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边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开拓财源，充裕财力，是开源节流理财思想的落脚点。茂盛的财源，是财政平衡的首要条件。从国家财源的价值构成来看，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 M，即各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社会纯收入，并且还包括了 C 和 Y 的一部分；从财源的部门构成来看，最主要部分来自社会主义工业部门，还有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部门。财源的开拓，取决于这些部门生产的发展。因此，努力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增加收入是第一位的任务。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开源和节流的并举，大力节约和压缩各项开支，杜绝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的稳定和财政的平衡。

支付货币　亦称“结算货币”。国际贸易和非贸易往来中支付货款或偿付债务使用的货币。支付货币的种类包括：(1) 本国货币；(2) 对方国家的货币；(3) 第三国货币。究竟使用哪种货币作为支付货币，由有关各方协商确定。

支票货币　指“活期存款”。因为活期存款可以用支票提取，故名。支票货币算作货币供应量的一部分，而且占极大的比重。

支票结算　付款单位通过签发支票，通过银行从其存款中对收款单位或个人支付款项的一种结算方式。适用于同城结算。支票是付款单位通知银行支付款项的凭证。在我国，支票分为“现金支票”和“转帐支票”两种。前者主要用于向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作转帐之用。后者只能用于划拨转帐，不能提取现金。付款单位开出支票时，应注明收款单位和支款用途。任何单位都不准签发空头支票；不准签发远期支票；不准出租出借支票或流通转让；不准将支票交给销货单位代为签发；一般不准由采购人员携带空白支票外出使用。支票规定一定的金额起点，不足金额起点的不能采用支票结算。违反规定的，应按情节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直至停止其使用支票结算。对签发空头支票的单位，还要按票面额处以百分之一罚金。支

票结算手续简便，使用灵活，应用广泛，但必须加强管理。

支出转变政策 是指用来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措施。按照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的逆差，是由于本国的国民支出过多地用于进口或购买外国有价证券。故调节国际收支逆差，要使用那些能够使本国国民支出从进口、购买外国证券转变到购买国内商品、劳务和资产的政策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汇率降低使货币贬值和对进口与资本输入的直接限制等。

支出减少政策 是既用来调节国际收支逆差又避免或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按照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国际收支逆差是由于本国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以致一部分国民支出不得不用于购买外国商品、劳务和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使用支出转变政策，则将引起或加重国内通货膨胀。因此，必须使用支出减少政策，以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收缩总需求。当然，如果问题不仅是需求过多，而且是支出对象不当，则完全可以支出减少政策与支出转变政策并用。何者为主、如何配合，视具体条件而定。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国家财政用于支援农村乡、镇集体经济和专业户改善生产条件的各项生产性支出。一般为无偿援助。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的使用方向和重点不尽相同。1966年以前，此项支出除少量用于经济困难的社队发展社办企业外，主要是帮助穷队发展农业生产。1967年以后，为加快经济贫困社队农业机械化步伐，此项支出的大部分用于为社队添置各种农业机械及维修设备，少部分则用于购买牲畜等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内容包括：(1)抗旱经费以及农村兴建小型水电站的补助费；(2)用于扶持经济困难的农村社队和农业生产专业户、扶持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生产；(3)用于农村社队发展农业机械化，帮助社队购置各种农业机械及其维修设备，添置小型机具、牲畜等，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4)农村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和植物保护补助费；(5)用于农村的造林、林业保护、草场以及水产、畜禽保护的补助费、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1978年以来，国家对某些支援项目采取周转金方式，用款单位有偿使用，并签定合同，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归还借款部门，以便继续周转于其他项目。支援农村生产支出采取周转金方式，对增强用款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根据国务院1980年2月发布的《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由中央预算专案拨款，用于援助老革命根据地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边远地区以及经济穷困地区发展地区经济的专款。1984年11月国家财政部颁发了《关于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资金的分配、使用原则以及使用方式作了具体地规定：(1)对资金的分配原则，按省、自治区为对象进行分配；优先安排革命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地区中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根据轻、重、缓、急，有选择、分重点地安排使用资金；资金的分配不能按地区平均使用或按部门划分资金使用比例。(2)资金的使用原则，以支援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边远地区和经济穷困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公共设施为主，开支方面主要应用于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建设以及农村水利、电力等方面的建设，可根据不同情况分重点地给予贫困地区、农村乡镇企业、乡村道路以及桥梁、农业科技、农村文教卫生事业适当补贴，要加强对资金的管理，扶贫资金一律不得用于行政事业机构的开支，不得用此项资金弥补乡镇企业亏损、修建楼、堂、馆、所进行城镇基本建设(经法定程序批准已纳入基本建设计划，按规定可以用于小型基本建设投资的除外)，以及提高各项福利费用、开支标准和用于弥补预算亏损和支付银行利息等。(3)资金的使用方式，对无直接经济收益的项目实行无偿使用方式，对那些长期穷困地区也可以在规定时期内，全部实行无偿使用，对那些有经济收益的项目，实行有偿使用方式，在规定期限内收回，免息。发展资金原则上由县财政统一安排使用，对跨县的工程项目，则由省、自治区或专区、市在所属范围内统筹安排，按规定发展资金应全部存入各专业银行，由银行根据省、自治区批准的发展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资金的监督使用。用于贫困地区基本建设的资金部分应存入建设银行，并开立专户，剩余部分则应在农业银行中开户。

专业银行 是只集中经营法定范围内的业务和提供专门性的金融业务的银行机构。商品经济的发展表明，不仅需要一个统一货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央银行和众多的商业银行，而且还需要一些专门执行特殊的金融政策的专业银行，以完善宏观调控。各国的专业银行都有自己的特点。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银行制度，其特点是全能银行多，专业银行少；在美国，由于法律规定，各类银行从事不同业务，互不交叉；英国则由于传统的关系，银行分工较细，业务也不交叉。专业银行按服务对象设立的有农业银行、储

蓄银行、外贸银行。如美国的互助储蓄银行、英国的信托储蓄银行，其业务主要是吸收中小储户的存款；前苏联的对外贸易银行和美国的进出口银行则专门从事外贸信贷和结算。专业银行按贷款用途或贷款方式设立的有投资银行、外汇银行、贴现银行、不动产抵押银行等。如前苏联的建设银行专门从事基本建设投资，英美国家的投资银行则专为工商企业代办发行和包销证券，进行中长放款，德国的投资银行则经常直接投资于工商企业并参与其业务管理。东京银行是日本外汇专业银行，代理日本政府接受外汇存款，办理对外债务和证券。现代中国专业银行的设置，并非单一地按这两种方式之一来建立的，而是包括了这两种划分方式。如中国工商银行主要办理城镇储蓄、企业存款，对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也办理少量的外汇信贷和固定资产贷款业务。中国农业银行主要办理农村金融业务，也办理少量城镇信贷和外汇业务。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专门管理和办理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以及建筑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也少量涉足城镇储蓄和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中国银行则是关于中国外汇、外贸信贷和结算的专业银行。我国的专业银行除经营一般商业性业务外，还负担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协助中央银行，调控宏观经济。

专案拨款 亦称"专项拨款"。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划分中，解决用于专门用途不宜在正常的收支划分范围内开支的拨款办法。在我国，有重大灾害救济费、抗洪防汛中堵口复堤费、大规模移民垦荒费等。实行专案拨款制度，主要是为了便于各级地方财政计算和掌握其正常开支，不致因发生大宗的特殊性支出而影响其预算的稳定和实行财政包干。有时也为某一特定目的而实行，如1961年为了适应调整国民经济需要，适当缩小专区以下的财权，规定专区、县、市以下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专案拨款。1958年起实行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规定：特大自然灾害救济、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用中央集中的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安排的挖潜改造资金，特大抗旱防汛补助费等支出，作为中央专案拨款。中央对地方的专案拨款支出，则列入地方预算、决算。但不计算在地方包干范围内。在地方财政上下级收支划分中也有类似的拨款办法。

专用借款 亦称"专项借款"。"专项贷款"的对称。我国企业从银行借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各种借款的统称。包括为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大修理而借的更新改造资金借款和大修理借款；为提高生产引进技术组织措施而向银行借入的"小型技措借款"、"轻纺工业技措借款"，"出口工业品生产专项借款"、"国内配套设备短期外汇借款"、"进出设备人民币借款"、"进口设备短期外汇借款"等。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借款和大修理借款用企业提取的专用基金归还，其他专用借款按规定用工程投产后所增加的利润归还。

专用基金 又称"特种基金"。我国企业中除经营资金外，具有特定用途，可供企业按照规定支配使用的各种资金。如更新改造资金、大修理基金、企业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等。有的由企业依照国家规定按期提存而形成，有的由国家拨给企业。各项专用基金应先提后用，专款专用，不挪作他用。设置专用基金有利于贯彻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

中性货币 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只使绝对价格水平及所有的名义值随之变动，而经济中的真实变量，如实际收入，就业水平及实际利率等不变。这种货币对经济不起影响作用的特殊情形就称为"中性货币"。

萨伊等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实物部分能自我均衡，货币对实物部分不起作用。经典的一般均衡分析遵循这一思想，认为商品需求函数的变量不受货币影响，货币数量只决定商品的绝对价格。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认为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形。一般情况下，货币对经济实体部分是有影响的。为了区分货币的不同状态，他首先提出了"中性货币"的概念，把货币不起作用的特殊情形称之为"中性货币"。新古典学派承认货币不总是中性的，只有在如下假定下货币对经济是中性的：(1) 价格具有完全的伸缩性；(2) 没有货币幻觉；(3) 不存在分配效应。缺少这些条件，货币对经济就会起作用。G·格和S·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指出，由于价格预期弹性，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存在，政府发行有息债券等原因，即使在这些假定条件下货币也不是中性的。布尔曼和哈渥里莱斯基在《货币供需及总体经济模型》一书中，把下列条件作为货币中性的必要条件：(1) 所有市场价格与工资均具有完全伸缩性；(2) 支出或货币需求函数均无货币幻觉存在；(3) 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不致引起分配效应；(4) 价格预期弹性为1；(5) 所有货币皆为外在货币；(6) 政府没有发行有利息的债券。

中性货币政策说 亦称"中立货币政策说"。是一种主张使货币保持严格中立，不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以实现经济均衡的政策学说。该学说起源于瑞典学派创始人威克塞尔提出的"中性货币"概念，是指在

真实分析或静态分析中，必须除去货币的干扰作用，货币只是作为表现价值的计量单位。但是，将货币中立作为政策目标加以着重强调的则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他在1931年出版的《物价与生产》一书中系统地阐释了这一思想。这一学说问世后，曾赢得了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和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斯的赞誉和支持。但由于这一学说自身的缺陷，又遭到不少经济学家的责难。

中性货币政策说认为，现代经济的困扰主要来自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它破坏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使经济陷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泥潭。相反，如果货币数量保持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就可能稳定不变，经济就会完全处于零通货膨胀或零通货紧缩的理想状态中。此时货币对总产出、总购买、总销售以及商品和劳务价格均不产生干扰，起着严格的中立作用。中立货币政策说还认为，如果多出的增加是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即使不改变货币工资额，劳工的实际工资收入也会随着物价的降低而上升。既然如此，那么，在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使"有效"货币量保持稳定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稳定。为此，威克塞尔主张采取一定的货币信用措施，以使市场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相一致，借以保持货币中立，消除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哈耶克反对弹性通货政策而拥护弹性较少的金本位制度，以稳定货币数量，使货币对经济保持中立。

中立货币政策存在着以下缺陷：（1）它是建立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之上的。而实际上，即使在货币保持中立时，价格水平也会因交易量的改变或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产生波动；（2）中立货币政策说只适合于静态社会，它不适合于人口、技术等因素不断变化的动态社会；在动态社会中，如果货币供应量恒定不变，就会产生可怕的通货紧缩后果；（3）中立货币政策说认为，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价格下降是有益的。然而即使技术进步、成本降低，商品价格也可能不会下降。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仍然保持在原有水平上，那么中立货币政策的效果将迫使那些成本未发生改变的商品价格趋于下降；（4）中立货币政策缺乏操作性，不能付诸实施；（5）即使货币供给停留在特定水平上，中立货币政策也不能确保价格和产出的稳定；（6）中立货币政策具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中立货币政策思想的设计是以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为基础的。但经济的基本变化又要求货币当局时常调整货币供给，以实现货币中立的目标。而货币当局的管制与自由放任的思想又是互相抵触的；（7）中立货币政策过份强调了货币对经济的负作用。而从实践上看，货币在当代经济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8）中立货币政策的另一个弱点是，它无法检测商业循环的发生。

中央预算 即中央政府的预算。我国的中央预算是由中央各部门单位预算和财务收支计划汇总组成，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预算在国家预算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国家重要的经济建设、文教科学、国防和外交等所需的资金，均由中央预算拨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以及对各地方预算的调节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救济等，也由中央预算拨款。中央预算集中了国家预算资金的主要部分。

中央税 又称"国家税"。"地方税"的对称。属于中央政府固定收入的税种。由于我国各个时期财政管理体制不同，中央税收包括的税种也不同。1984年以前的情况是：除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这五种地方税收外，其余税种都属于中央税收。实际执行情况是：除关税外，多由中央和地方比例分成。1984年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时规定，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四种地方税。另外，还划出部分税种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税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以满足中央财政支出需要的。在我国，由于中央财政担负着经济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防外交等重要任务，中央税应是一些收入量较大的主要税种。

中间产品征税 在税收工作中，所谓中间产品，是指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经过本企业工艺处理，已经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制品。中间产品不是本企业生产目的的最终产品，一般不直接对外出售，只供本厂连续生产使用。现行工商税对中间产品的征税问题有单独规定。如工商税规定对用自制的酒、糖、饴糖等连续生产的产品，其中间产品税率高，产成品税率低的，最后销售的产成品，应按中间产品适用的税率征税。又如，棉纺企业自1983年1月20日起实行纱布、印染分段征税办法，其连续生产过程中的纱、布中间产品，在车间移送时征收工商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对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而课征的一种税。课税对象为纳税人在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成本、费用及损失后的所得额。纳税人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合理利用外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1980年9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用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权限、

义务和职责。《税法》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采取比例税率、税率为30%（除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合营企业），另按其应纳所得额的10%征收地方所得税，实际负担率只为课税对象的33%，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税收水平。同时规定，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合营者，将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国外时，应按汇出额10%交纳所得税。为鼓励外商在我国投资，国家对中外合资企业采取优惠从宽的原则：（1）凡合营企业的合营者将从企业获得的利润在我国境内再投资者，期限不少于5年的，经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交纳所得税税款的40%；如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投资的，应退回已退税额。（2）对新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减免政策，从其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所得税，第二年、第三年按50%征收。（3）对农业、林业以及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开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除按规定前5年减、免税后，并可在以后10年内继续享受减征所得税15%至30%的待遇。（4）中外合资企业发生年度亏损时，可从下一年度所得中提取相应的数额弥补，下年度所得不足弥补的，可逐年提取所得继续弥补，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采取每季终了15天内预缴，年终后3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方式进行。1983年9月，国家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对《税法》作了部分修改，进一步放宽了优惠幅度，其中规定：（1）将原来对中外合资企业的合营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的免减税规定改为，第1年、第2年免征所得税，第3-5年减半收所得税。（2）将原来对中外合资企业的缴税方式，改为每年度终了后5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同时，对中外合资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有关报表的期限也作了进一步放宽的调整。

内部融资　"外部融资"的对称，指某一特定企业（或经济单位）的投资，其资金来源于企业内部利润和生产者个人积蓄。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制度，特别是资本市场的缺陷，通过外部融资来集资较困难，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内部融资是较普遍的集资方式。在内部融资的情况下，储蓄者和投资者合二为一。由于技术变革和投资的不可分割性，因此，企业在通过内部融资进行投资时，必须先有一个时期的内部积累，才能进行跳跃式的投资。内部积累可采取实物形式，但成本高、损耗大；也可以非货币性金融资产作为积累对象，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故这种行为不普遍。因此，只要人们持有货币能获得一定的利益，内部积累一般就采取货币形式。该收益率为存款的名义利息率减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之差。在该收益率的一定范围之内，实际货币需求与储蓄、投资、实质资本需求是互补的。如果实质资本需求即投资的意愿越高，则货币积累的需求也就越大。同时，假如投资机会较广，则若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提高，资本积累较快，那么靠内部融资的投资项目就有可能进行，这样，货币积累就会相应扩大。如果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或名义存款率较低，在内部融资的情况下，企业投资需求和生产者的储蓄倾向将较低。当然，若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提高到一定限度之后，即超过内部融资投资可获得最佳边际收益之后，企业将宁愿持有货币而不愿投资。可是，在内部融资的情况下，各企业的投资效率和资本收益率是不一样的。因此，较高的货币收益率将阻止低效率投资和资源的浪费。不过，这时社会总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下降的。由于资本质量的提高和浪费的减少，总产出有可能增加。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通货膨胀率和低利率，这在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主要靠内部融资情况下，将导致低储蓄率和投资低效益。

内部融资在投资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面临技术创新时，将限制新技术的传播；在各个投资主体的收益率不一致时，将导致整体投资低效益。因此，需解除金融抑制，开放金融市场和提高利率，解除对利用外部资金的限制。参见"外部融资"。

内债和外债　一个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债务。所谓债务，是具有契约性清偿义务的负债。一国政府或当局对国内人民的债务称为内债；对外国政府、企业或个人以及对国际组织、机构的债务称为外债。

形成内债的债务人一般是政府财政部，债权人包括本国居民、企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内债的主要凭证是政府发行的国库券和中长期债券。形成内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随着二战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理职能的加强，财政支出在数量和种类上迅速增加，而以税收和发行货币为收入来源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两种传统的收入形式在数量上的局限性使得政府越来越依靠发行债券这种收入形式。国家债券所确立的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特点是：自愿性、偿还性、高信誉、稳定收益、流动性强。因此对广大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数量巨大的政府债券具有完善的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使投资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而对于政府来说，可以大量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弥补收入不足，并且可以利用在证券市场上的买卖活动影响供求关系和信贷规模，实施财政金融政策。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积累了巨额的内债，每年要应付大量的还本和付息，而为了还本付息又不断地发行新债券，即借新债还旧债，使政府成为一个"负债政府"。西方国家几乎所有都是负债政府，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内债规模一

般较小。

对外开放的国家由于对外贸易和外资、技术的引进都会形成对外债务。债务人包括政府及其机构、公司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人是外国的政府、商业银行及国际组织机构。形成外债的原因主要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外汇支出多于外汇收人，当一国商品出口所得外汇和对外投资收益不能弥补进口外汇支出和偿还投资本息时，就形成对外债务。在经济开放和发展时期利用外资是一条有利途径，形成外债也就是正常现象。但外资不等于外债，例如直接投资形式是一种不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对外负债，即不形成外债。形成外债的主要途径有：银行借款、外国政府贷款、出口信贷、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发行国际债券、租赁信贷、补偿贸易、延期付款等等。吸引外资形成外债对一国经济有积极作用，它可以弥补外汇收人不足和国内投资一储蓄缺口，缓解国际储备紧张状况，并可以随着资金流人带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经济发展走一条"捷径"。但外债积累过度则适得其反，对经济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当外债在"量"和"质"上突破一定界限，即数量超过承受能力或使用效益低下造成资金浪费时，就会使一国陷人偿债困难或危机，借新债和还旧债困难，本国资信下降，影响商品和技术进口，影响经济正常运行。因此，借外债必须以本国承受能力和偿还能力为基础。衡量一国偿债能力的指标有许多，包括宏观经济发展、储蓄率、国际收支差额、国际储备资产等等，但最直接的是偿债率指标：

$$偿债率=\frac{年还本付息总额}{出口外汇收入(商品+劳务)}\times 100\%$$

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都是一国的资金来源，而资金是经济运行的"血液"，所以发展经济利用内债外债筹集资金是一条有利的和必需的途径。但这种资金来源是以未来偿还为条件的，即有约束的资金使用权，这有别于形成财政收入的税收和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或外国援助，因此资金期限内的效益问题成为内、外债运用的关键所在，使用得当可促进经济发展，使用不当则陷人债务危机，阻碍经济运行。8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内爆发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国在50—60年代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曾提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口号，搞片面的"独立自主"经济，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害。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扩大和深人，我国广辟资源，既利用内债又利用外债，对经济增长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形成了政府的债务负担，因此制定合理的内债、外债政策，有效地利用和管理、控制债务成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资金市场 是1年以上资金借贷或交易形成的市场，即长期的金融市场。又称为"资本市场"。具体包括：银行中长期资金借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资金来源于各种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的中长期资金、各种基金、居民个人中长期存款、公司企业的中长期证券投资等，银行吸收的短期资金沉淀部分也是中长期资金的一部分来源。资金运用主要对各种工商企业和公司、政府机构等。长期资金市场与短期资金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1）资金周转期长，流动性小，因而由通货膨胀率、利率、政策等因素而带来的投资风险大，借贷成本也较高；（2）长期市场的职能不在于加速社会资金的短期周转速度，而在于调节社会资金中长期的供求关系，为生产和投资提供资金，为经济发展服务，但有价证券的二级市场（证券交易所）的发展，解决了长期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问题，为长期投资者实现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以及投资多样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长期市场高风险、低流动性缺陷。（3）长期资金市场的利率以短期利率为参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不同条件附加一部分利率。条件有：期限长短、数额大小、债务人资信、通货膨胀预期等等。长期市场利率主要有借贷利率和债券利率两种，为避免长期风险，除传统的固定利率借贷外，已产生和发展了浮动（可调整）利率债券以及利率掉期等新金融工具。

长期金融市场 参见"长期资金市场"。

长期资本流动 指期限在1年以上的资本在国际间的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58年以后，西方各国陆续放松或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适应生产国际化要求的资本国际化发展。其结果，资本国际间流动速度加快、规模扩大、方式也呈多样化。长期资本流动的方式主要有：（1）直接投资。这是一种传统的资本输出人方式，伴随着一国公司企业或银行到海外设分支机构进行经营引起中长期资本投资，这种方式是接收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之一，但不形成其应付外债；（2）中长期借贷。这是传统的金融方式，也是金融业银行业的主要活动。这种资金的流人是要提供外资但同时形成外债。中长期借贷主要通过资本借贷市场进行，是国际间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3）债券融资。属于新的融资方式，是作为间接融资补充的直接融资方式，由此引起的中长期资本移动也形成国际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它主要是通过国际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进行的；（4）延

期付款信用：实际是为进口商提供的一种中长期贷款，这种贷款与贸易中的商品数量、投资期限有密切关系，也形成债务方的外债。长期资本流动融通了国际间的中长期资金，缓解了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使债权方实现其海外投资利润，债务方实现其筹资目的，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一国国际收支来说，长期资本移动是重要项目，其流入形成收支顺差，其流出形成收支逆差，因此一国可通过吸引资本流入来改善逆差，但多数资本流入均形成一国外债，所以改善逆差效应是短期的。

比例税 指税率不因纳税人应课税的收入或财产价值的多少而变更，都按一定比率课征的税。如我国1958年试行的工商统一税条例规定，凡从事商业零售的纳税人，在商品销售后，不论收入多少，都根据销售金额按3%的税率计征。我国现行税制中，采用比例税的有：产品税，营业税，关税和牲畜交易税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例税一般适用对流转额的课征，一是不论流转额大小；都按照同一比例计税，有利于商品流转的扩大，二是对生产经营同一种产品只规定一个税率，便于相互比较经营成果，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三是简单易行，便于计算交纳。

比例税率 对同一征税对象，不论数量或金额多少，只规定一个比率征收的税率制度。比例税率分为：(1) 单一比例税率，即一个税种只规定一个比例税率，如牲畜交易税采用的税率。(2) 差别比例税率，即一个税种或同一征税对象分别采用不同比率的比例税率。差别比例税率，按其使用范围又可分为：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如农业税；产品差别比例税率，如工商税中烟、酒、糖等等；行业差别比例税率，如工商税中的铁道运输和一般运输等等；纳税人差别比例税率，如工商所得税原来规定中对农村社队企业，基层供销社采用不同的税率。(3) 幅度比例税率，又称弹性比例税率。在国家规定最高和最低的比例税率幅度内，各地可因地制宜地自行确定一个比例税率。(4) 有免征额的比例税率，即从纳税人的收入中扣除免征额后的其余部分，使用同一个比例税率。比例税率计算简便，纳税人负担比较稳定，主要适用于按流转额征税的税种。

分税制 是分级预算的一种体制形式。根据各国的实践，分税制大体分为两种类型：(1)"联邦型"分税制。具有如下特点：中央税和地方税是两套相互独立的税收系统；中央和地方有相同性质的税种共享同一税源而非同一税种共享收入；各级税收管理权限划分较彻底，中央税征管权限和收入归中央，地方税征管权限和收入归地方；中央和地方分别具有税收立法权。这种分税制有助于地方因地制宜和实施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税收政策，税收杠杆作用十分明显，同时也有效避免了地方擅自截留中央收入的现象。但实行这种分税制的外部环境比较严格，需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和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国家、企业、居民都具有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等。(2)"结合型"分税制。具有如下特点：中央税和地方税系是相互独立的；中央和地方不仅有相同性质税种共享同一税源，而且就同一税种共享其收入，共享税的管理权归中央；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大部分归中央；中央税的管理权限归中央，地方税管理权限（立法权除外）归地方。这种分税制是与中央集中和地方自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其主要优点在于把中央集中与地方自主结合在一起，协调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对市场的要求不是很高。具体到每个国家，由于各国国情存在差异，上述两类分税制的特征与各国的实践存在一定的差别。两种分税制在国际上都有十分成功的经验，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宜的分税制模式。我国预算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分级预算。因此，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模式将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分灶吃饭 1980年起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形象说法。这种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做法是：第一，划分收支，即按照企业、事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收支范围。收入预算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中央对地方的调剂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4种。支出预算划分基本上是按照企业、事业的隶属关系确定。第二，分级包干，即按照划分的收支范围，各地以历史上一定时期（一般为预算年度前一、二年）的实际收支水平为基数，平衡自己的预算。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多余部分确定一定比例上缴中央；支出大于收入的，由中央从调剂收入中确定一定比例进行调剂；个别地方调剂收入全部留给地方后，收入仍小于支出的，由中央给予定额补助。收入上缴和调剂的比例以及定额补助的数量，一定几年不变，由地方包干，多收多支，少收少支。原来的财政体制，财权集中在中央，每年由中央给地方核定收支指标，这种统收统支办法，就好象由中央一家烧饭、然后分给各地方吃一样，所以叫"吃大锅饭"的财政体制。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把财政收支明确划分开了，各组织各的收入、各安排各的支出，自己平衡自己的预算，不再吃"大锅饭"了，所以叫做"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分类分成 亦称"收入分类分成"。我国预算管理

用语。是我国预算管理体制的一种形式。1953年后，为适应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由高度集中转移到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分级管理，实行"分类分成"的预算收入划分办法。"分类分成"就是把国家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三种。(1) 固定收入是指中央与地方各自享有的收入，中央固定收入有中央所属企业收入、关税、盐税、中央其他收入；地方固定收入有地方所属企业收入、地方税收、地方其他收入。(2) 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是指中央和地方按规定比例共享的收入，其收入来源包括农业税、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3) 调剂分成收入是指用以上两种收入尚不能平衡本级预算支出时，由中央按指定的收入范围和分别确定的比例予以调剂而形成的收入。实行"分类分成"的办法是：在平衡地方预算收支时，先是由地方用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抵补其支出，有余者上缴中央，不足者再划给调剂收入来弥补地方预算的收支差额。如仍不足以弥补时，则由中央拨专款予以解决。

分层货币总量 按各种货币定义或按不同货币层次计算的货币量。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信用工具或流动资产种类繁多，各自均有一定的"货币性"，究竟哪种工具或资产可视为货币，至今经济学家仍争论不休。据多数西方经济学者对货币的具体定义，按金融资产的变现能力为标准，目前西方国家大致将货币分如下几个层次：

M_1=现金+活期存款

M_2=M_1+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

M_3=M_2+储蓄机构的储蓄存款

M_4=M_3+短期国库券和其他短期债券等。

对货币进行分层次研究和计算总量，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分析各种不同量度的货币对商品流通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更有利于国家货币决策机构对货币量进行控制和对经济进行有效的调节。

公债 政府以信用形式向本国居民和单位或向国外取得收入而形成的一种债务，反映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

公债体现分配关系 公债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财政分配范畴，在社会产品分配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公债既可参与社会产品的初次分配，又可参与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既能从社会产品的剩余部分M取得财政资金，又能从补偿部分C和消费部分V取得财政资金，甚至还可在财政再分配的基础上，将通过财政支出分配的而处于暂时闲置状态的那部分货币资金再并入政府的财政资金。

公债的类型和种类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下，每一时期发行的公债总有一个目的为主，以这个主要目的为标志，可以将公债分为四种类型：(1) 君主消费型公债，指用以弥补由于君主自身消费所造成的财政赤字而发生的公债；(2) 筹措战费型和宏观调控型公债，是处于完备形态上的现代意义的公债，属于真正的政府负债；(3) 半封建半殖民地型公债，是资本主义公债的畸型产物，既带有帝国主义侵略的痕迹，又具有很大的封建性，对社会和经济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4) 建设型公债，是至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债类型，目的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提供资金。一个国家的公债是由许多不同形式的具体公债构成，单一的公债形式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也比较少见。公债的种类划分可以有不同的依据：(1) 按发行区域公债可分为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2) 按偿还期限公债可分为短期公债、中期公债和长期公债；(3) 按债务主体公债可分为国家公债和地方公债；(4) 按流通与否公债可分为可转让公债和不可转让公债；(5) 按举债方法公债可分为强制公债、爱国公债和自由公债。

公债的产生和发展 恩格斯指出："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用了，国家就发行公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据文献记载，在奴隶制时代，国家公债就已经产生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和古罗马出现了国家向商人、高利贷者和寺院借债的情况。公债在封建社会仍继续向前发展，但仍具有规模小和不经常的特点。现代意义的公债制度是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指出："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2页)。从12世纪末期到16世纪初期，产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公债，逐步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16世纪末期以后，西欧各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当时的荷兰、法国、英国等都广泛运用公债筹集战争经费，并发展了公债的形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现代公债制度进一步发展壮大，不仅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大规模发行公债，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利用公债筹集建设资金。

公债的作用 公债发行的作用有以下几种：(1) 弥补财政赤字；(2) 调剂国库出纳，发挥预算临时周转金的作用；(3) 筹集建设资金，取得财政收入；(4) 设置汇兑基金；(5) 调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熨平经济周期，以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公债的主要作用是筹集资金和调剂宏观经济。

中国公债的历史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财政支出需要基本是通过赋税徭役等方式来满足，政府举借公债只是偶然才发生。因此，公债在我国封建社会没能发展起来，而是随生随灭。进入19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在中国逐渐产生畸型的现代公债，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公债。它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 从1853年至1894年，是清政府从尝试到决定借款的阶段。(2)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期。(3) 从1912年至1927年，其中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4) 从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总的来看，旧中国的公债发行主要是为了用以军阀混战和进行国内战争，比资本主义公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落后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公债发行的历史。它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1) 在50年代，通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和国外公债。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进行提供了部分财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 60年代和70年代，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公债发行曾一度中断了二十多年。(3) 80年代以来，我国公债发行进入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公债重新作为筹集建设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杠杆之一。

公债货币化 西方国家用增加公债的办法来增加流通中的通货。当银行系统购进政府发行的新的证券来增加准备金时，公债就货币化了。利用新增加的银行准备金来支持更多的活期存款，从而在经济中创造更多的支票货币，也能使公债货币化。前一种方法所能增加的货币供应量等于新增公债的数量，而扩大银行信用所能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则要大得多。如果准备金的比率为20%，则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为新增加公债的五倍。

公债经济学 是研究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公债的运用与管理及其规律的经济科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 公债范畴的意义、特征及其历史发展；(2) 公债的用途及其运用中的抉择原理；(3) 公债的负担规模及其合理数量界限；(4) 公债的种类及其合理结构的设计原则；(5) 公债的应债来源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经济条件下采取的政策；(6) 公债推销的条件及其可供选择的制度方法；(7) 公债还本付息的方式、资金来源以及减少或延缓本息负担的途经；(8) 公债管理的政策目标及其公债管理作为一种调节工具所具备的功能和作用，等等。公债经济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经济科学。

公积金 我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从每年的总收入或税后利润中按规定比例提存、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一项专用基金。在我国，农业集体经济的公积金主要是在每年收益分配时，根据分配政策从总收入中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公积金的其他来源还有：国家征用土地的补偿费，出售固定财产的变价收入，清理固定财产的残值收入，以及其他规定的收入来源等。公积金主要用于购置固定财产和兴办基本建设项目。使用时，应根据需要和可能，按规定用途，有计划地节约开支。农业集体经济提取的公积金一般不上缴上级。基层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为了加强该项基金的管理和核算，随着管理体制的改革，自1956年起分别把"公积金"改为"国家基金"或"专用基金"。该项基金除上级按规定调剂外，不准任意抽调、挪用。

公益金 我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从每年的总收入中或税后利润中按规定比例提存的用于集体福利事业的一项专用基金。提取标准可以是总收入，净收益或利润的一定百分比，也可以是工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公益金，主要是在每年收益分配时，根据党的分配政策，从总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此外，举办福利事业收支的结余，也是公益金的来源。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公益金，主要用于五保户，困难户和因公负伤社员的补助，有困难的烈军属及残废军人的照顾，因公死亡的社员家属的抚恤金，合作医疗以及计划生育的开支，集体举办的文教卫生事业的开支等。有条件的合作组织支付退休社员的生活补助，也在公益金中开支。使用时应根据需要和可能，按规定用途有计划地节约开支。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提存的公益金一般不上缴上级。

公司所得税 简称"公司税"，亦称"法人所得税"，简称"法人税"。指对公司企业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征税对象是公司的经营所得以及利息、股息、红利、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其他所得。其课征范围各国不尽相同，主要是有法人资格的公司组织，有的包括其他组织单位的法人；有的包括非法人的组织单位。在税率上有实行比例税率的，也有实行累进税率的。在资本主义财政收入中，公司所得税远远低

于个人所得税，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司组织形式的发展，于20世纪初逐步建立的，在实践中各国已逐步确立单独征税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公司所得税还规定有种种优惠措施，如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资源损耗等等。

从价税　"从量税"的对称。税收按其计税依据是价格或数量为标准，分为从价税和从量税两类。从价税是以征税对象的价格或金额为标准，按一定税率计征的各种税，如我国的工商税，牲畜交易税等。

从量税　"从价税"的对称。税收按其计税依据是价格或数量为标准，分为从价税与从量税两类。从量税是以征税对象的重量、件数、容积、面积等数量为标准计征的各种税。如我国的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

升水与贴水　表示即期汇价与远期汇价之间的差价。当远期汇价（或称期汇价）高于即期汇价（或称现汇价）时，即为升水；当远期汇价低于现汇价时即为贴水。

造成外汇升、贴水的原因主要是不同货币（或货币市场）利息率水平的差异：高利率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现汇需求大，以赚取一定时期的高利息，但为避免到期后的汇价下跌风险，人们在买入此种货币现汇的同时会卖出其一定时期的期汇，因而远期汇价会下降，从而低于其现汇价，因此高利率的货币往往贴水；同样道理，低利率的货币往往有升水。根据利率差异可以计算出外汇升、贴水的幅度，公式为：

升(贴)＝现汇汇价×两地利差×月数／12

在现代外汇市场上，除了利息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外汇的升、贴水：对某种货币汇价变化趋势看涨，它的远期汇价往往有升水；货币汇价趋势看跌，它的远期汇价往往有贴水。但汇价升值贬值与外汇升水贴水是不同的（前者参见"升值与贬值"条）。此外，由于各种因素造成远期外汇的求大于供，均会导致其升水，远期外汇供大于求均会导致其贴水。

在外汇市场上通过某种外汇的升、贴水幅度可以计算出其远期买卖价。但不同标价法下计算方法不同。在直接标价法下：

$$远期汇价=\begin{cases}现汇汇价+升水（当货币升水时）\\现汇汇价-贴水（当货币贴水时）\end{cases}$$

在间接标价法下：

$$远期汇价=\begin{cases}现汇汇价-升水（当货币升水时）\\现汇汇价+贴水（当货币贴水时）\end{cases}$$

由于外汇市场上现汇买卖和期汇买卖均有买入价和卖出价，买、卖价之间总保持一定差价，并且现汇买卖差价与期汇买卖差价总是不同的（后者大于前者），因而外汇升水或贴水也分别有买入价升（贴）水和卖出价升（贴）水，并且水平不同，具体地说：当外汇升水时，买入价的升水幅度总是小于卖出价的升水幅度；当外汇贴水时，买入价的贴水幅度总是大于卖出价的贴水幅度。

反补贴税　又称抵销或补偿税，它是对于接受津贴的外国商品进口所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凡进口商品在生产、制造、加工、买卖、输出过程中所接受的直接或间接的奖金或补贴都构成征收反补贴税的条件，而不管给予这种奖金或补贴是来自外国政府，还是垄断组织。反补贴税的税额一般按该商品所得的奖金或补贴的数额征收。征收这种关税的目的在于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抵销其所享受的补贴金额，削弱其竞争能力，使它不能在进口国的市场上，与进口国的同类商品进行低价竞争或进行倾销，以保护进口国的生产和市场。例如，1975年美国垄断资本曾根据《1974年贸易法》要求美国政府对西欧共同市场和日本等国给予出口补贴的商品征收反补贴税。

反倾销税　是针对外国倾销出口的商品，由进口国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在于抵制外国倾销，保护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各资本主义国家征收反倾销税的规定很不一致。美国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是：如外国出口商品的到岸价格（CIF）低于出厂价格时即认为是不公平价格，须另征附加税。英国规定，如果外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低于该商品生产国或出口国的平均市场价格，而危害英国工农业生产时，即可对之征收反倾销税。而按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凡是一个国家将其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市场时，即构成倾销。进口国就可以对倾销商品征收数额不超过这一产品的倾销差额的反倾销税"。

反周期货币政策规则　参见"逆风向"规则。

欠税　纳税义务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没有按时缴纳而发生拖欠税款的行为。拖欠税款必须限期补缴，并从拖欠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金。经多次催缴无效的，由税务机关通知银行，连同应缴的滞纳金，一并扣缴入库。欠税分为滞纳，新欠和陈欠三种。当月的欠税称滞纳，年内的欠税称新欠，上年及以前的欠税称陈欠。对滞纳和新欠的税款，应及时催缴，催缴无效的，就通知银行按财政制度规定扣缴税款，并从拖欠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金。对陈欠税款，应摸清欠税情况，分析欠税原因，督促欠税单

位或个人制定清交欠税计划，确定清交欠税的措施和日期，尽快清理陈欠税款。

双重征税　在我国一般是指国际间的所得税重复征收问题。国际间双重征税问题主要由于双方都同时采取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并用的原则确定税收管辖权的范围，或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确定税收管辖权而产生的。国际上解决双重征税问题的方式，有采取单方免除重复征税的，有通过两国政府签订税收协定解决的。解决重复税的措施一般有抵免法和免税法两种。也有的采取扣除法的，即在计税时允许将国外已纳所得税款作为一个扣除项目，从全部所得额中扣除。

双增双节　"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简称。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增产节约，即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通常指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在保证或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不增加或少增加生产要素，使产量大幅度提高，用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的办法使资金和物资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省。增收节支，即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增收节支，既要求财税部门努力，也要求企事业单位努力。首先，从宏观角度看，要求财税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把该收的收上来，增加财政收入，并精打细算，节约财政支出；其次，从微观角度看，各企事业单位要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赢利，或者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增加收入，并通过坚决制止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种种挥霍浪费，奢侈成风现象的办法，节约非生产性支出。双增双节是贯穿于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长期运动，对于提高经济效益，缓解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保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双重目标论　是关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的一种主张，即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应当是双重的，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稳定货币和价格。该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货币政策调控不能绝对地偏向任何一方。只能因时因地根据这两者的变化情况相机抉择，通过适当放松或紧缩银根，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和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从而将这两个指标的变动幅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双重目标论比较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各国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目标时也采用了这一主张。各国货币政策目标基本上是双重乃至多重的。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经济效益"。

双重目标论操作起来难度较大。由于时滞的作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的效果可能不甚理想。双重目标论操作时很可能滑向单一目标，主要是变为单纯地刺激经济增长，而不顾通货膨胀的恶果。这种情况在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稳定通货作为辅助目标的国家里最有可能发生。西德的经验表明，采取把稳定通货放在首位、同时兼顾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论能带来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双重金融机制　指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并存于货币信用领域，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共同作用于金融活动。双重金融机制与金融体制、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连。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中以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里普遍存在着这种机制。它具体体现为：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信贷活动既存在着再贷款规模调节，又存在贷款规模的指标管理；专业银行的业务在追求企业化经营时，要受国家存贷计划的指导，必须承担一部分政策性贷款，其固定资产贷款规模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必须购买国家有关部门发行的一定份额的债券，开展中央银行规定的保值储蓄业务；专业银行的存贷利率由中央银行制定，专业银行只有一定限度的浮动权。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规模和贷款总规模双重调节，决定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通过专业银行对各单位的现金收支进行监督管理，决定现金发行量。在存在双重金融机制的情况下，直接融资不甚发达，其发展受到金融当局的严格限制。只有在间接融资占全体的条件下，货币当局才能通过行政干预控制金融中介机构的业务活动来调节货币供求和信贷资金的供求，双重金融机制才得以存在。

双重金融机制干扰了专业银行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不利于资金的合理配置，不利于宏观控制，是产生金融领域腐败现象的重要根源之一。尽管它在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过渡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打破了计划金融机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基层银行的积极性等，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弊端日显，必须加以改革。这一改革必须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育特别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如企业体制、价格体制、流通体制改革相配套，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五 画

汇兑结算 异地结算的一种。付款单位委托开户银行将款项汇给外地收款单位或个人的结算方式。适用于异地单位之间的资金调拨、清理交易旧欠、往来帐款和自提自运的商品交易，以及采购资金和不足托收金额起点的小额货款支付等。汇兑结算分为：信汇和电汇两种。信汇是用邮寄汇款委托凭证划转款项。电汇则由汇出银行用电报通知汇入银行拨付。这种结算方式手续简便，款项划拨迅速，但不利于银行事前监督，故一般商品交易结算不宜采用。

主币和辅币 是一种货币制度下所使用的两种本质相同，形式不同的货币。主币是本位货币，其材料即本位币所规定的材料，例如在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下，主币就各为黄金铸币和白银铸币，在纸币制度下，主币就是纸制货币。主币的单位是相对较大的整数单位。而辅币则是本位货币单位以下小面数的货币，其作用在于辅助主币的流通周转，用于零星支付和找零之用。辅币的币材不同于主币，一般都是金属铸币、所用材料多为价值较低的金属或合金如铜、镍、铅、银等或其合铸而成。但辅币实际价值往往高于其铸币价值，即不足值铸币。在金本位制下，辅币不能自由铸造、熔化，具有有限清偿，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纸币制度下，辅币与本位币具有同样的无限法偿能力，具有同样职能，而只是币材形式不同以及适用的场合不同而已。

可兑换货币 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地、不受管制地兑换或转换成其他国家货币或其他支付手段的货币，这些货币的兑换买卖及流通范围基本上不受本国货币当局的限制，可在国际贸易支付、清算结算中广泛运用，而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充分信誉。目前，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多数为可兑换货币，如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英镑、法国法郎、瑞士法郎、加拿大元、新加坡元、港币等等；实行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货币多为不可兑换货币，即不能自由出境和兑换成其他货币及支付手段，例如中国的人民币、前苏联卢布等。一些经济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往往也是不可兑换货币。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或清算结算中往往需用其他国家的可兑换货币，本国居民出境也需用本币按官定的价格和数量兑换成可兑换货币。

正税 据以加征地方附加或附加税的税，谓之正税。"附加税"的对称。如我国现行税制中的工商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关税、农业税、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以及地方各税等，均属正税。有的税种除正税之外，还规定随正税附征一定比例的地方附加或"附加税"，如所得税附加。

平均税率 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各单位的纳税总金额和计税总值的比率。它是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时规定的中准控制性税率。我国农业税规定全国平均税率为15.5%。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省、市、自治区的不同农业经济情况，分别规定各省、市、自治区不同的平均税率。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区的平均税率，结合所属各县（自治县）的不同农业经济情况，分别规定各县（自治县）的不同平均税率……。规定平均税率是为了控制农业税的负担水平、实现地区之间农业税合理负担的重要措施；税收计划和税收统计用的数据。即使用不同的税率计征的税额与其相应的课税对象数额的比例。

四马分肥 我国对私改造时期规定的私营工商业利润分配的原则。从1953年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每年所得的利润，规定按所得税（约占34.5%），企业公积金（约占30%）职工福利奖金（约占15%）和资方股息红利（约占20.5%）四部分进行分配。，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股息红利再按公私比例分配。这种办法称之为"四马分肥"。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再实行"四马分肥"，而按合营时核实的私股股额，每年给资本家以固定的利息，通常称为定息。

业务预算 指企业各项具有实质性的基本活动的预算。业务预算是全面预算的基础，涉及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包括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采购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工厂间接费用预算、单位工厂成本预算、推销及管理费用预算等。其中销售预算是企业编制全面预算的关键。例如，西方国家的企业一般是以销定产、产品的生产数量、材料、人工、设备、资金的需要量、推销、行政管理费和其他财务支出等，都要受预期的商品销售量制约。

出口信贷　是一国政府为支持和扩大本国商品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对本国的商业银行给以利息贴补并提供担保，以鼓励本国商业银行对本国出口商或外国进口商（或其银行）提供利息较低的贷款以解决买方支付货款的需要。由于出口国政府对贷款提供利息补贴，所以出口信贷是一种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信贷，从而也成为许多国家利用外资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接受出口信贷的不同划分，出口信贷分为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卖方信贷是对卖方即出口方提供的信贷。由政府向本国商业银行提供贴补和担保，后者再向本国出口商提供一定期限贷款，出口商取得贷款后可以为进口商提供延期付款信用，解决进口商大宗商品进口的现款需要（进口商需交纳货款的15%作为定金，所以延期付款的部分是货款的85%）卖方信贷对出口商来说既可以完成出口同时又能获得贷款不至于影响资金周转，因此是有利可图的；对进口商来说可以不付现款便能进口，待项目产生效益后分期付款，因此也比较有利，不利之处在于延期付款合同的货款由出口商报价，其中包括了货价、利息、费用、风险费等等，因而可能报价过高，使进口成本太高。还因为这样，卖方信贷越来越多地被买方信贷所代替。买方信贷是，由出口国的商业银行向进口商（买方）或其代理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以促使其与出口商达成现货交易合同，到期后直接由进口方向出口国商业银行归还贷款。目前的买方信贷一般是在两国商业银行之间进行的，进口方银行为进口商出具保函，使贷款偿还具有保证。买方信贷对各方都是有利的，既能使进出口交易容易地完成，又能使贷款偿还具有保证、货款明确、贷款优惠，因此成为目前世界上广为流行的一种信贷方式。

出口信贷根据商品性质的不同分为短期出口信贷和中长期出口信贷。短期的在1年以下，中期的1至5年、5年以上为长期，但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利率水平，视期限长短和接受国的贫富程度而不同，并根据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变化进行调整。

由于出口信贷可被用来促进本国商品出口，提高海外竞争能力，因此早在30年代时就被西方国家运用。为了协调西方国家的贸易竞争，避免相互损害，在1934年资本主义国家就成立了一个“伯尔尼联盟”，对各国政府提供信贷担保加以平衡和约束。到60年代，协调出口信贷利率和担保工作转由“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间进行。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金融竞争更为激烈，矛盾更为尖锐。为了协调各国出口信贷政策，限制以出口信贷手段加强本国产品的出口，有关国家于1975年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对中长期出口信贷做了三方面规定：①最低的现金支付额，即必须交纳15～20%的现汇，享受最高的信贷额为全部货款的80～85%；②最长的贷款偿还期，即最长不得超过10年；③最低的信贷利率，按借款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为富国、中等国、穷国三档，每档使用不同利率，具体如下：

区别＼利率＼期限	2～5年	5～8年	8年以上
富国(人均3000美元以上)	7.75%	8%	不定
中等国(人均1000～3000美元)	7.25%	7.75%	不定
穷国(人均1000美元以下)	7.25%	7.5%	7.5%

1980年7月1日以后，由于国际市场利率水平升高，“君子协定”中的利率也进行了调整，富国、中等国、穷国利率分别提高了0.75%、0.50%、和0.25%。

对于出口信贷的接受国来说，这是为商品进行的一种资金融通，因其条件优惠、信誉和安全性高，是一种较有利的利用外资方式。但由于这种方式总是伴随着商品进口，所以利用也是有限度的和有选择的。

包干结余　①指我国实行经费包干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年终结余。为了鼓励行政、事业单位节约支出的积极性，使行政事业单位有一定的机动资金，因地制宜地办一些计划内安排不上的事项，把包干结余留归单位，于下年度按照规定自行安排使用。②我国实行投资包干的建设项目的投资结余。除按规定上缴财政的部分以外，均留归建设单位按规定范围作用。

外部融资　“内部融资”的对称。指通过向金融机构借款或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来筹集资金以弥补本单位投资和储蓄间的缺口。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制度特别是资本市场的缺陷，外部融资是比较困难的集资方式。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为资金赤字单位筹集外部资金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任何生产单位只要其经济效益高，声誉好都能从外部获得资金。特别是生产单位的库存现金或流动资金越充沛，就越能吸引贷款者和投资者的兴趣。在一定范围之内，当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之差额）提高时，外部融资将增加。但实际利率太高，企业无法承受

时，企业外部融资需求量将缩减。通过外部融资，企业能克服技术变革和投资不可细分给投资带来的限制，也能使企业避免错过良好的投资机会，特别是能使全社会资金得到合理的配置和运作。为此，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甚发达的地方，必须解除种种对外部融资的束缚，建立合理的金融体系，提高资金运用效益。

生产发展基金 凡实行独立经济核算而有盈利的企业，可以按国家核定的比例，从利润中提取的用于发展生产方面的专项资金。它是根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设立的。按现行规定，生产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技术组织措施，购置设备，新产品试制、科学研究和职工技术培训等。生产发展基金还包括企业从生产成本中留存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基金和大修理基金。设立生产发展基金有利于调动企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一办法目前正在部分企业中试行。

加成征收 在依率计征税额的基础上，加征一定成数的税款。加成可能加征一成或数成，一成即10%。为了配合国家的方针政策，限制某种经营活动，或调节纳税人过高的收入或所得，税法规定，以原纳税款为基数，再加征一定成数的税款，这是税率的延伸，是对纳税人加重征收的一种措施。我国现行税制中加成征收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某些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加重课税的措施；一种是为了贯彻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政策，对个别利润特大的纳税人所采取的调节收入的措施。前者如我国工商税条例（草案）中规定："为了同城乡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可以酌情加成或者加倍征税"。1977年国家规定，加成幅度为一成到十成。后者如1963年我国工商所得税规定：对合作商店和个体经济，其全年所得额超过规定数额的，分别实行四级超额累进加成征税和四级全额累进加成征税的办法。四级累进加成，即从一成累进至四成。此项加成办法，已分别自1979年和1980年10月起暂停执行。

六 画

关键货币 在国际结算中广泛用作支付手段而被各国所普遍接受、并与世界大多数国家货币定有汇率的货币。国际上通常以美元、英镑、法国法郎等货币作为关键货币。世界各国货币很多，一国货币若同时与众多外币定出汇率，困难较大。因此，必须先选择特定国家的货币作为对象，并与这种关键货币对比制定出基本汇率。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有特殊地位，各国一般将美元作为关键货币，把美元的汇率作为基本汇率。通过基本汇率可套算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

关税 是由设在边境、沿海口岸或国家指定其他水、陆、空国际交往通道的海关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对进出国境的货物和物品所征收的一种税。按征税对象分，有进口税，出口税和过境税。按征收目的分，有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按征收标准分，有从量税和从价税，按税率的制定分，有固定关税或自立关税和协定关税等。我国现在征收的关税有进口税和出口税。我国关税征税对象主要是贸易性进出口的货物和非贸易性进出口的物品。关税的纳税人，进出口货物是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进口行李物品和邮递物品是物品的所有人、收件人或他们的代理人。现行关税按照进出口货物的自然属性、成分和用途、分为17类939个税号，主要采取从价计征。我国的关税在增加财政收入，配合对外贸易政策，保护和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关税水平 指一国平均进口税率而言。资本主义国家计算平均进口税率的方法有三种：①进口税额占总进口额的百分比；②进口税额占有税商品进口额的百分比；③有税商品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百分比。通常是按第一种方法计算。关税水平既可以按一国的平均税率计算，也可以就各类商品分别计算平均进口税率。把计算的结果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各国间的差异，关税水平的高低。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常设机构发表的材料表明，各国总的平均进口税率，以美国最高，其次为日本、英国、加拿大、西欧共同市场六国最低。就各类商品来说，以工业制成品最高，半制成品次之，工业原料最低。

关税战 提高关税阻止或减少外国商品进口，是保护国内市场、降低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一国提高关税，往往引起其他国家采取报复关税，也用提高关税来抵抗。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为争夺市场，彼此之间相互采取报复关税，这种现象被称作关税战。关税战是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形势下的一种必然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及其竞争规律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反映。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多。为了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国内市场进行倾销，或者为了防止别国对我国的出口商品进行高关税限制，我们也要重视使用"关税"这一经济武器。不过，我国运用"关税"杠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税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只是为了保护正常的国际贸易。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税战"则是为了达到它们霸占世界市场的目的。

关税减让　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竞相提高关税的同时，往往不通过谈判，取得暂时妥协，实行关税减让。这是因为各国相互提高关税，其结果反而妨碍了垄断资本的扩大出口。战后 30 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间关于关税减让的谈判，主要是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范围内进行的。采取的方法是：由各类商品主要进出口国家进行多边谈判，订出减让税率，然后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于所有协定参加国。关税减让的形式约有以下五种：①直接减低关税税率；②缩小最惠国税率与特惠税率间的差距；③固定现行税率不变；④在谈判期间现行税率不得提高，免税项目不得增减；⑤规定税率最高限，即使将来提高，也不得超过。在关税减让谈判期间，各国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相持不下，进展缓慢。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国家关税水平，和战前相比，有相当程度的降低。

关税减免　根据《暂行海关法》第 118 条的规定，减免进出口关税的权限属于中央。各地海关，一般是按照海关法和税则的规定以及中央的指示等执行减免。根据税则减免关税的货品主要有下列几种：①进出口关税在最低征收额人民币一元以下者，免征关税。②在国外运输途中或起卸时遭受损失的，可以酌情减免进口关税。③进、出口广告品和专作化验用的进口货样，以及国家机关、企业收购的和免费赠送给国外的货样，免征关税。④暂时进口保证复运出口或暂时出口定期复运回国的货样、展览品，免征关税。⑤专为制造特种外销商品的主要进口原料，减税或免税。⑥对于非贸易性自用物品的关税减免，只要在关税人民币 150 元以下的，可以由关长酌情核定。⑦科教用品，进口直接用于科学研究、实验、教学等用品及其样品，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关税退补　关税的退税补税是针对溢征短征来说的。关税的退补，主要有下列几种：①关于国外发货错误或者帐单价格错误所造成的短征或者溢征。②货物在征税后如果发现有符合《暂行海关法》第 120 条规定的残损、短少情况，属于承运机构或者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可凭有关证件办理退税。征税后发现有短卸、溢卸的，也可凭有关证件办理退税、补税。③因货物的税则归类不当造成的溢征、短征，应根据情况办理退、补。④按照上述规定办理关税退、补时，如果发现海关代征的工商统一税也同样有溢征、短征时，可与关税同时办理退、补。⑤进口邮包或者行李等非贸易性物品，在脱离海关监管后，如发现残损、短少、次劣等情况，概不退税。退税和补税的期限，应该按照《暂行海关法》第 139 条和第 141 条的规定办理，即自纳税之日起一年为限。如有特殊情况可以上报核定。

决算的编制程序　国家规定的编制国家决算的工作顺序。国家决算的编制应坚持自下而上地汇编程序，先由执行预算的基层单位在预算年度终了时编制各自的单位决算草案，然后，按照法定程序经过逐级审查后汇编成各级总决算草案。最后由国家财政部汇总，编制成国家决算草案，报国务院审查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家决算编制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编制前应作好准备工作。①预算年度末。财政部应在总结上年决算编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预算年度的方针、政策以及财政管理体制和有关决算编制原则，拟定和下达决算草案的编制办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在国家决算编制办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和逐级下达决算编制的具体办法，主要包括：决算编制的质量要求，编制汇总决算的方法，预算年度内决算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报送决算报表的份数和期限，做好预算年度末清理的若干原则。②制定颁发具体的决算表格。其原则：一是决算表格既要符合预算年度的预算管理要求，又能照顾到下一年度预算管理和设计的需要；二是保证国家决算的统一汇编和决算表格的相对稳定；三是简便易行。③进行年终清理，其主要内容：一是核对年度预算收支数字；二是结清预算拨借款；三是清查本年度预算应收与应支数；四是往来款项的清查；五是财产物资的清查；六是决算收支数字的对帐工作。通过编制国家决算，能从财政方面总结一年来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主要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党和国家决策部门研究问题、制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进一步提高我国预算管理水

平创造条件。

决算的审批程序 国家规定的审查和批准国家决算的工作顺序。其审查程序是：①各级总预算系统在预算年度终了时，按照规定要求，在其系统内，从预算执行的基层单位开始，编制行政、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单位决算草案和财务决算草案，自下而上地逐级审查汇总后报送其主管部门。②主管部门将汇总编成的各部门的汇总单位决算草案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审核后，汇编成各级总决算草案上报国家财政部。③财政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的总决算草案进行审查，其审查内容：一是决算收支总数和结余或超支总数；二是按规定应上解款或应补助款，三是结算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上解或补助的预算数与决算数的差额。各项借垫款的数字，计算出预算资金多退或少补的最终差额，结清全年预算资金帐；④考核其全部资金来源和去向、年终滚存结余及其中净结余数，算出最后的平衡结果。我国决算的批准程序是：①按国家法定程序对各级决算审查完毕后，报同级国家权力机构讨论通过。②经逐级审查后，汇编形成的国家决算草案连同决算说明书报送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全体会议审查通过后，将国家决算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③国家决算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由国务院批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决算，同时，财政部负责批复中央各主管部门的单位决算。④地方各级总决算由地方财政部门报送同级政府审核通过后，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⑤地方各级单位决算，根据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总决算，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逐级审批。

存款 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吸收社会闲置货币的信用活动，是企业、机关、团体和个人以银行帐簿上一笔分录为凭的一种财产权利，是银行及其他信用机构所负有的债务，也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银行根据一定标准付给存户利息。

根据存期和取款方式不同，存款可划分为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前者可随时存取，后者则要根据事先约定的存期，到期才能支取。由于定期存款能为信贷资金提供较稳定的来源，故其利率高于活期存款。活期存款由于可供开列支票用于支付，所以又和现金一起被称为狭义货币 M_1。根据存款对象的不同，还可将存款划分为企业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财政存款等。根据存款本身用途的不同，存款又可分为基本建设存款、专用基金存款等。在中国，银行存款被划分为企业存款、财政存款、基本建设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城镇储蓄存款、农村存款、信托存款等。

存款起源于金属货币的保管。最初，货币经营业为货币持有者保管货币（存款）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后来，由于保管业务的扩大，货币经营者可用此放款谋利。在现代银行体系中，就单个银行来说，是存款决定贷款；就整个银行体系而言，则是贷款决定存款。存款作为一种货币性的金融资产，既媒介着整个商品流通，又通过平衡存款者的资产负债结构，媒介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存款准备金 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按一定比例持有的库存现金和交存于中央银行的存款。它由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两部分构成。最初实行准备金的目的是保障金融业的经营安全、限制商业银行过度贷款和维护存款人的利益。从30年代起，存款准备金被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用来作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调整信用规模的政策手段。

起先只有交存于中央银行的存款才能作为法定准备金。60年代以来，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也可作为准备金。两者之和占存款的比率称为"准备率"。中央银行一般根据存款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种类的存款上交不同比例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例如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要高于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各国中央银行一般对交存的存款准备金不计息。中央银行控制着准备金数量。中央银行可通过改变准备金数量和法定准备率来调节商业银行的存款规模和资产规模。由于调节法定准备率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对经济的震动太大，故中央银行一般不轻易使用准备率来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并且还对中央银行调整准备率的上下限加以法律约束。但中央银行可通过使用其他手段来影响准备金存量，进而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规模和资产规模。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中超过法定准备金部分为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需保留一部分超额准备金供结算之用。超额准备金减去向中央借款后为自由准备金。由于超额准备金不计息，而借入中央银行资金要付息，故自由准备金更能反映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与投资倾向。中央银行的其他政策工具，如公开市场业务和调整再贴现率均是以变动准备金为中介环节，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

1984年中国在确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后随即实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其目的是保证中央银行掌握一定数量的信贷资金，以保证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和宏观金融调节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对收缴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法定准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调整。

存款准备率 存款准备金与存款的比率。以百分

比表示。存款准备率越高，则银行吸收的存款中可用于贷款和其他资产业务的比率愈低；反之则越高。中央银行将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率作为紧缩或扩张信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各国货币当局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和不同种类的存款都规定不同的准备率。一般定期存款准备率低于活期存款准备率，投资银行的准备率低于商业银行的准备率。

存款通货　使用支票可以随时提取的活期存款。在一般信用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支票可以流通转让，具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同货币没有什么区别。在计算货币供应量时，活期存款也包括在内，一般把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活期存款的总和称为M。我国在分层次研究货币总量时，也把活期存款视作存款通货，包括在货币流通量内。

存贷合一　"存贷分户"的对称。商业企业在银行开立存款贷款合一的往来帐户，俗称"透支户"。中国曾长期采取过这种商业贷款管理办法。商业企业具有购销活动频繁、资金占用数量和升降幅度大的特点，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强的产品收购，需要大量集中投放资金，为保证能迅速及时地供应资金，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中，都是由银行为企业单位核定贷款限额，开立存款合一往来帐户，"活放活收"，进货贷款，销货还款。往来帐户中既有贷款的发放与收回，又有存款的存入与支取。收付相抵后，帐户的差额若表现在付方时，说明存款额小于贷款额；差额表现在收方时，说明存款额大于贷款额。存贷合一的方法，能保证资金供应的及时性，并使贷款手续大大简化。但是，由于这种方法容易造成企业无偿占用银行资金，不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节约资金使用，助长企业重购轻销，造成物资的积压和资金的浪费，同时，也不利于银行的信贷监督，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贷款管理办法也由存贷合一逐步改为"存贷分户"。

划拨资金　预算拨款的一种方法。是指财政部门通过银行将预算资金划给同级主管部门并逐级转划给所属用款单位。在我国，采用这种方法时，财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要根据年度预算和各单位的申请，开出拨款凭证，通知金库支付库款或通知银行计拨存款。金库或银行据以将财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的存款划转到各单位存款账户中，供其使用或转拨。年终如有结余，实行预算包干的单位归其留用，不实行预算包干的，应上缴财政。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拨款，除基本建设拨款以外，多采用这种方式。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我国1980—1984年实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其内容是：在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之间，划分各自的收支范围，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实行包干使用。从1980年开始我国多数省实行这种预算管理体制，其目的是进一步下放财权，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责、权范围，增强其财权的自主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使国家财政管理体制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1980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按照国家经济管理中的隶属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收支是在确保中央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将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严格区分开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国家预算高度集中的办法。改革后，在财政收入方面，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中央与地方的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中央与地方的调剂收入。属于中央预算收入范围的收入是：①固定收入部分，包括中央所属企业收入，关税、公债、国外借款和其他收入；②中央与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部分，包括各地方划给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的80%；③中央与地方调剂收入部分，包括按规定比例工商税应上缴中央财政的部分。属于地方预算收入范围的收入是：①地方固定收入部分，包括地方所属企业收入，盐税、农、牧业税，工商所得税、地方税和其他收入；②中央与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部分，包括各地方划给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的20%；③中央与地方调剂收入部分，包括按规定比例工商税应上缴地方财政的部分。在预算支出方面，按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和开支性质划分，中央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中央的投资（如基本建设投资、中央企业的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等），地区勘探费、中央各部门事业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对外援助费、国家物资储备及其他支出等，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对地方各项投资、事业费、城市维护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地方行政管理费以及其它支出等，分级包干是地方预算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包干使用。地方财政的包干基数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计执行数为基础。地方财政支出原则是当地各项预算收入之和大于地方预算支出时，多余部分按比例上缴中央；地方各项预算收入之和小于地方预算支出时，国家按工商税的一定比例留给地方；对个别地方收入较少，工商税全部留给地方仍不能满足地方预算支出时，由国家根据情况给予定额补助，以保证地方预算大体收支平衡。各地分成比例和补助额一经确定后原则上五年不变。地方可在划定收入的范围内，包干使用，统筹安排、自求平衡，多收可以多支出，少收必须少支出，因地制宜地搞好本地区的建设，保证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划分收支，分

级包干”是我国预算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基本上适应了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对扩大地方财权，搞好地方经济，调动地方管理财政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预算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上的盲目性，以及中央与地方预算收支划分不够清楚等问题。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我国1985年起实行的预算管理体制。是在原“划分收支、分级包干”预算体制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1984年我国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后，为适应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由原来的利税并存变为以税收为主的变化，国家改进预算管理体制，从税种上划清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征收界线，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个税收体系。“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基本上按“利改税”后的税种设置，并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作了明确规定：在收入方面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在支出方面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在上述财政收支范围内，各地以收定支、包干使用，自求平衡。如果地方固定收入大于支出时，超出部分上解中央；如果地方固定收入小于支出时，将中央与地方的共享收入按规定比例拨予地方，不足者，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方；如果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方仍不足以弥补者，由中央给予定额补助解决。收入分成比例，上解以及补助数额一经确定后，五年不变，由地方统筹安排，因地制宜地使用。各地收入包干数以1985年财政决算收入数加有关政策分成比例数为基础。为加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央决定除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哈尔滨、西安、广州等城市也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为体现我国民族政策，对各民族自治区和视同自治区待遇的省，统一按中央财政核定的定额补助数在最近5年内，继续实行每年递增10%的办法（1987年停止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各级财政的预算管理体制，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策根据“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这种体制办法，自行制定。

有价证券 一种表明债权债务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凭证。是商品经济中股份制度所必需的资本形式。它主要包括两种：股票和债券。这两种证券是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金融投资工具，均有面额或名义价格并且在买卖中又重新形成其市场价格，因称“有价证券”。但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大差别。

股票是一种证明投资者在所投资的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并拥有相应的所有权和投票权的权益证书。股东即股票持有者根据投股数量比例获得其对公司的投票权和所有权。股票与其他证券不同的是它给债权方的是权益，这种权益表现在：①对公司利润分享权利，即定期或不定期地取得红利或股息；②对公司选举投票权，即公司董事会董事长通过股东投票而选出；③对经营的决策权，即每个股东都有权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一般通过董事会进行；④优先承购新股权，即当公司增发股票时首先允许原股东承购，并以优惠价购买，如果股东不购新股也可将这种权利在市场出卖；⑤对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即当公司破产倒闭清理资产时股东有最后的分配权。股东的种种权利不是所有都比其他债权人优惠的，例如在分红、分配剩余财产上要次于债券持有者，但债券持有者在分配数量上是固定的，而股东所得红利、财产只在比例上固定而数量不固定。股票的价格有三种：一是票面额，即名义价格。是发行时印在票面上的，一般较低，如5元一股，10元一股。面值仅能代表股东投资股份多少，并按此分红，无大实际意义，股票一入市买卖，市价马上会脱离其面值。二是帐面价值。它代表每股所代表的公司资产的价值多少，它等于：（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优先股总面值）÷普通股股数。三是市场价格。这是股票的关键所在，因为股票一上市就是溢价出售的，并在多次转让买卖中形成多种价格，所以投资者是以市价投资并获利的。股票市价每天都在频繁变动，影响股市变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公司经营现状及前景、市场利率水平、宏观经济发展、市场投机、心理预期、计算机程序、信息传播，政局和政策的变化等等。股票投资的收入主要有两种：一是红利或股息，即公司每年向股东支付的利润，它根据公司不同时期盈利多少和再投资需要而定，公司之间的差别也较大，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公司盈利高分红也多，这些公司股票在市场上行情看好，称“蓝筹股”。另一种收入是来自市场的资本利得、即购入股票时与出售股票时两种市价的差价，以获得此种盈利为目的的投资风险性大，市价变动是主要因素，收入不稳定，带有投机性质。股票投资的总收益是上述两者之和。西方国家股票投资是一种普遍形式，股息收入也是一种收益较高的收入形式，并且利用股票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投机利润，进行股票投机的方式有：股票期货交易，认股权证投资、股票期权交易等等。

债券是一种证明债权人（投资者）有权定期获得利息、到期收回本金，债务人有义务支付本息的债权债务凭证。与股票不同，债券有固定到期日，固定利率，发行时面额也较大。它所确定的双方关系仅仅是在资金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牵涉其他权益。债务

公司必须在对股东分红之前完成债券本息的支付。债券是西方国家中一种普遍的投资方式，各种类债券层出不穷。按照期限划分，所有债券都可分为：①短期债券。1年及1年以下的国库券；②中期债券。1～5年或10年以下的各种债券；③长期债券。10年以上债券。按照发行主体划分，可分为：①政府债券。由政府发行的以弥补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和用途的国库券和中、长期债券；②公司债券。由公司、企业或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中、长期债券。按照国别界限划分，可分为：①国内债券。即发行者、发行地点、所用货币均属同一国家，投资者也以本国居民为主的债券；②外国债券。即一国筹资者到另外一国以后者国家货币为面额所发行的债券，如外国人到美国发行的美元债券，称："扬基债券"，外国人到日本发行的日元债券，称"武士债券"，③欧洲债券。即一国筹资者到另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以这些国家以外的境外货币所发行的债券。根据发行公开性划分，分为：①公募债券。即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的债券；②私募债券。即通过某一特定渠道，不公开发行，也不能上市进行交易的债券，这种往往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或用途发行的。根据债券抵押性划分，分为：①抵押债券：即以设备、厂房、其他证券等为抵押发行的债券；②无抵押债券：即不附带抵押品的普通债券。有价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形成有价证券市场，它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价证券市场分为发行市场（一级市场）和交易市场（二级市场、证券交易所）。为保证投资者资金流动性和证券的变现性，证券均有十分活跃的二级交易市场，即证券交易所，这促使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人金融市场，提高了金融社会化程度。目前有价证券的投资者涉及各个阶层，既有机构投资者，又有个人投资者，包括：政府及政府机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企业、各种基金会、个人等等。

有价证券形式是一种直接金融方式，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这种形式日益增强，在一定程度上赶上或超过了以银行为中介的传统借贷方式。因此8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融资"证券化"的趋势，在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有价证券市场也逐渐产生并迅速发展。这一趋势是现代金融业中资本竞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各国对金融业管制放松的结果。

有支付能力需求　人们在持有货币额的限度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即一定时期内的社会购买力，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大小和构成，取决于人们的货币收人水平和商品价格水平，而这两个因素又与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国民收人及其分配情况有密切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受到很大限制，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增加的趋势发生尖锐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人的增长而逐步增长，劳动人民需求的增长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

再贴现　又叫"重贴现"。指商业银行接受了商人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后，当急需周转资金时，又将其持有的未到期票据拿到中央银行要求贴现，实际是要求中央银行以这些票据为抵押对其发放一定额的信贷资金，与贴现同样的是中央银行也要按票面额的一定比例扣除后兑现，因票据进行第二次贴现，故称"再贴现"。再贴现是由中央银行发放信贷，因此这就成为中央银行控制信贷总量的一道"闸门"，因而再贴现政策（简称贴现政策）已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各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贴现率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持有的未到期票据进行再贴现或重贴现时所规定的利息扣除比例，亦相当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提供票面金额贷款所收取的利息。这个利率对一国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制约着商业银行的放款利率，也制约着商业银行的贴现率。再贴现的抵押品主要是商业票据，也可以是国库券等短期有价证券，贴现期限一般较短，三个月以内为多，因此再贴现率一般按月计算。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3个月或6个月期的再贴现率是国家利率水平的参照标准或代表性利率。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通常简称为中央银行贴现率。

地方税　"中央税"的对称。由一国的地方政府征收的税。属于地方财政固定收人。地方税收对于保证地方财政收人，使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解决地方的特殊问题有重要意义。我国建国以来，明确划为地方税收的有：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契税等。世界各国地方税的管理权限的划分，大体有三种类型：①管理权完全属于地方，地方政府可以决定课征地方税收。②管理权仍属于中央，征税办法由中央制定，地方政府只是负责征收。③基本的管理权限仍属中央，但给地方留有较大的机动权限。例如，在中央确定的地方税种范围内，决定开征停征，核定本地区适用税率、确定某些减税免税，制定具体征收管理办法等等。我国地方税收的管理权限，基本上属于第三种类型。

地方附加　一般是指税收附加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的总称。在税收上是指根据税法规定，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随正税加征的地方收人。是地方政府财政收

入重要来源之一。如我国有城市房地产税附加、工商营业税附加、工商统一税附加、工商所得税附加、农业税附加等。城市房地产税附加，1953年税制修正时并入正税征收；工商营业税附加，1958年税制改革时，因工商营业税并入工商统一税，不再征收；同时规定工商统一税按正税的1%征收附加。工商统一税附加，1973年税制改革时，因工商统一税并入工商税，不再征收；但地方财政这部分附加收入仍予保留，即工商税入库后，再以退库手续按正税的1%退给地方财政。工商所得税附加为正税的1%。农业税附加的比例规定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15%。经济作物区和园艺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可以高于15%，但最高不得超过30%。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只限于经国务院批准设市的城市征收，县镇一律不准征收。批准设市的城市所属县镇，已发展成为工业区的可以征收，非工业区一律不准征收。城市公用事业征收附加的项目有：工业用电、工业用水、公共汽车、公共电车、民用自来水、民用照明用电、电话、煤气、轮渡等九项。工业用水、电两项附加，原则上全国各城市均可开征，附加率东北地区各城市为10%，其他地区5%—8%，由各省、市、自治区在此幅度内确定。公共电汽车、民用水电、电话、煤气、轮渡等七项附加，主要对城市居民征收，附加率最高不得超过10%。

地方总预算 指各级地方政府的预算，是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我国地方预算包括省（市、自治区）、县等各级预算。我国国家预算收入大部分由地方预算组织征收，国家预算支出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通过地方预算分配。地方预算担负着保证地方行政管理支出，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建设和发展城市、集镇等重要任务。它在国家预算中占有重要地位。

地方预算固定收入 我国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新的预算管理体制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作的具体规定，是在原"划分收支、分级包干"预算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收入项目基本上按税种设置，其内容包括：①地方国营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以及承包费；②集体企业所得税；③车船使用牌照税；④城市房地产税；⑤农牧业税；⑥屠宰税；⑦牲畜交易税；⑧集体交易税；⑨契税；⑩税款滞纳金；⑪补税罚款收入；⑫地方包干企业收入；⑬城市维护建设税；⑭地方经营的粮食、供销、外贸企业的亏损补贴及其他收入；⑮石油部、电力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企业上缴的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的30%等。

共享税 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享有，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的税种，称为共享税。共享税税种有：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资源税、建筑税、盐税、个人所得税、国营企业奖金税、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所得税。共享税由中央政府开征，但收入的一部分留给地方。这是在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后，为了解决一些地方财政上入不敷出而采取的一项补充办法。共享税的范围，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不是固定的，都会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而调整。

协定税则 指凡是一国与其他国家通过贸易谈判，以条约或协定方式协定，或在修改时要受对外条约约束的税则。协定税则的税率低于国定税则的税率，适用于订有关税贸易协定的国家。如一国与其他国家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即使没有签订关税贸易协定，也同样适用协定税率。但一般来说，协定税率仅适用于协定的商品，对非协定商品仍适用于国定税率。协定税则又可分为自主协定税则与片面协定税则两种。自主协定税则指订立协定的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对双方贸易上有利害关系的若干税目，通过协商制订较低税率，作为贸易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片面协定税则指税则中的税率由一国强迫另一国接受，它是帝国主义强国欺凌弱小国家的产物。鸦片战争后，旧中国曾被迫接受列强规定的"值百抽五"的片面协定税则。

扣缴义务人 又称"代扣义务人"。税法规定直接负有扣缴税款义务的企业或单位。实行源泉课税法的税收，税法除规定纳税义务人外，还规定有扣缴义务人。例如：个人所得税以支付各项个人所得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存款利息所得税，以支付存款利息的银行为扣缴义务人。委托加工的烟、酒、鞭炮等产品的产品税，以承受委托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等。扣缴义务人直接负有税款的扣缴义务，应按税法规定代扣税款，并按规定期限缴库，否则依税法规定要受法律制裁。采取扣缴义务人代扣税款的办法有利于控制税源，保证税款及时入库，并简化纳税手续。

当年平衡，略有节余 国家当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数量上大体相等，并做到收大于支，略有节余。财政收支在运动过程中，会出现三种情况：收大于支，于是形成财政节余；支大于收，于是形成财政赤字；收支恰好平衡，既无节余，也无赤字。一般而言，收支数额绝对相等，恰好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实际工作中很难达到，因此只要收支大体相等，略有节余，就可以视为财政收支平衡。当财政支

大于收，出现赤字时，表明财政入不敷出，有一部分开支没有收入来源和缺乏物质保证。财政赤字的最终结果，是使流通领域的货币购买力增加过多，从而导致对库存的压力增大，或迫使银行进行财政性发行。如果资源以及商品的供给处于短缺状态，那么过多的货币发行势必引起物价上涨，市场出现混乱，对国计民生都会带来危害。当财政收大于支时，形成财政节余。节余有略有节余和大量节余之分。财政上的大量节余意味着有大量的资金和物资处于积压状态而得不到充分利用，其结果是国民经济的增长低于应有的速度，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将被延缓。财政赤字和大量财政节余都破坏了收支之间的平衡关系，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国财政工作一贯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

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是在复本位制度下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即流通中一种货币排挤另一种不同货币从而使后者退出流通领域。具体说就是在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面额价值相同的两种通货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通货（即良币）必然会被人熔化、输出而退出流通；而实际价值较低的通货（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在复本位制度下，这一规律是如此表现出来的：当金、银两种通货的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发生偏差时，法律上评价过低的金属所铸成的铸币就会退出流通界，而市场上流通的则是法定较高的另一种金属所铸成的货币。例如，金银的法定比价为 1∶15（在确定这一比价时是以当时或过去一定期间的金银市场比价为根据的），如果由于采银技术进步或其他原因而使银价跌落以致市场比价变为 1∶16，这时把金币熔为金块（在金本位制度下是可行的），把金块在市场上按市价换成白银，再把白银铸成银币，把银币按法定比价换为金币，再把金币熔成金块……如此反复进行就会获得巨额利润，其结果金币被熔化而退出流通，而由白银铸成的银币则充斥市场。如此的规律反之也成立。这一现象被 16 世纪英国政治家和理财家汤姆斯·格雷欣在给英国女王的改铸货币建议中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因而被英国经济学家马克里奥在其所著《经济学纲要》一书中加以引用并命名为"格雷欣法则"。因此，在复本位制下，虽然法律规定两种金属铸币可以平行流通，但实际上市场上主要只有一种铸币在流通。

同城结算　亦称"本埠结算"。同一城市范围内两个企业之间的非现金结算。我国常用的结算方式有：支票结算，委托收款结算、委托付款结算等。支票结算是指付款单位通过签发支票，通知银行从其存款中对收款单位或个人支付款项的一种结算方式。委托收款结算是指收款单位委托其开户银行向付款单位收取款项的一种结算方式。委托付款结算是指付款单位签发付款委托凭证，委托开户银行从其帐户中把款项划给收款单位的一种结算方式。大中城市中的银行分支机构，如果没有条件参加同城票据交换，也可采用异地结算方式，但同城结算方式不能用于异地结算。

同城托收无承付结算　是收款单位填写"托收无承付结算凭证"委托银行收款，不需要付款单位承付，即由银行将款项从付款单位的存款户转入收款单位存款户的一种结算方式。它适用于同城公用事业单位向企业收取电费、自来水费、煤气费、电话费等款项，不能用于一般商品交易。因为这种结算，是收款单位供应产品或劳务在前，并按用量计价后才能收款，一般不发生拒付，所以不需要承付。企业收到银行送来的托收无承付结算凭证支款通知联，财会部门即可据以入帐。

收支挂钩，增收分成　是指我国于 1978 年实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其特点是在实行"总额分成"的同时，对地方机动财力的提取，按当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的部分和规定比例进行分成。这种体制保留了"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体制的优点，使地方财政的权责结合；同时，地方所需机动财力，既不是按固定比例提取，"旱涝保收"，也不是按超收数字分成。这就有利于调动地方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也缓和了过去实行总额分成时年初争预算指标的矛盾。但是实行"增收分成"体制的重要前提是，生产、流通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只有这样，地方才能获得稳定增加的收入来源。

农业税　国家向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是国家参与国民经济中农业部门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征税范围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农作物方面的收入。凡从事农业生产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近年来，在我国农村广泛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税的纳税人主要是承包后的农户。我国农业税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发展和完善的，1928 年在江西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开征的农业税是新中国最早的农业税，1950 年，国家颁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随后，国家在 1951—1952 年为适应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进行了重要修改，1958 年 6 月国家新制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开征农业税，我国农业税的性质

决定了农业税税收政策。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税主要采取"稳定负担和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稳定负担"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农业税的征收额保持不变。1971年，国家又制订了农业税的征收额继续稳定5年不变的政策。同时，针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于1979年2月作出规定：凡属粮食产区低产缺粮的生产队，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免征农业税。建国以来，农业税计征标准一直以常年产量为准计征。常年产量是指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一般经营情况，在正常年景下所收获的产量，标准一经确定，若干年内保持不变，增产不增税，减产不减税。1958年以来，我国农业税一直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农业税条例》规定，我国农业税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在这个基础上分别制订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税平均税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根据国家规定的平均税率，分别制订各级地方具体农业税适用税率。农业税以征收粮食实物为主，交纳实物有困难的，可以折征代金。同时，我国对因遭受各种严重自然灾害和因其他原因纳税确有困难者，给予减、免税照顾，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订。

农业贷款 各种农业贷款的总称。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企业和农户提供货币资金的信用活动形式。国外农业贷款，多属抵押性质的放款。旧中国农业贷款为官僚买办资本的金融机构所操纵，1935年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经国民党特许，垄断了农贷业务，贷放的资金又为地主阶级所利用，成为高利盘剥农民的手段。解放以来，农业贷款由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发放，多属信用无抵押贷款，贷款利息较低甚至无息。目前的农业贷款对象包括国营农业企业，集体农业企业和农户。农业贷款按其用途分有对国营农业企业的固定资金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对集体农业的生产费用贷款和生产设备贷款以及开发性贷款等。农业贷款的对象和种类是随着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国家规定，农业贷款不准用于财政性开支，另设财政贴息贷款支援具体农业项目，农业贷款不准挤占和挪用，不准任意豁免。农业贷款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统一安排，合理及时发放，不误农时，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农村资金 一般指农村生产经营单位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特定目的和用途的资金。包括生产单位的资金，如固定资产、原材料、产成品，在产品及货币等；流通单位的资金，如经营用的各类物资手段、商品及货币等。广义的农村资金则指农村经济中全部用货币计量的财产物资。包括农村生产经营单位的资金、社会待用资金与闲置资金、自给自足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等。

农村信贷 农村信用活动的总称。农村金融机构将吸收的存款贷放给各类经济单位和农户个人。农村存款包括单位存款和个人储蓄存款。单位存款包括国营农业企业、事业单位存款，农村商业企业和其他企业存款，设在农村的机关、团体、学校和驻地在农村的部队存款，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存款。单位存款是国家法令规定的强制性存款。各单位都必须把超过国家规定的本单位现金持有额以上部分存入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农村居民储蓄存款是自愿性存款。它来源于农民和其他居民准备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和用于生活消费的资金，贷款对象包括对国营、集体企业以及其中承包户，农村居民中的个体户等。贷款种类按生产经营内容分有农（林、牧、渔）业贷款、工业贷款、商业贷款等。按资金周转时间长短分有设备贷款和费用贷款，前者用于固定资金、后者用于流动资金。农村贷款与城市信贷不同，其面广领域多、信用授受关系复杂。其特点是：①贷款对象多，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②贷款投向广，有各种性质的产业；③贷款用途多，既有生产性贷款，又有生活性贷款；④贷款回收期长，这是由农业生产周期长和受自然灾害影响决定的；⑤授信渠道多，既有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发放贷款，又有民间合作信用组织以及私人发放贷款。

农村金融 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吸收农村存款，发放农村贷款，办理农村现金收付和转帐结算，发展农村合作信用等活动。再生产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构成，农村货币流通属交换环节，农村信用属分配环节，通过农村金融活动可促进农村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农户和农村工业化进程中资金分布不平衡，通过农村信用活动，可聚集和分配农村货币资金，扩大农村各产业规模，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通过管理农村资金，调节农村货币流通，平衡市场供求，稳定农村经济。

旧中国的农村，存在着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它包括官方组织、民间固有的，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多种高利贷形式。1935年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经国民党政府特许，垄断了农村金融业务。解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国家农业银行为领导，信用合作社为基础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以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还涌现了许多民间合作信用组织，对弥补信用社服务不足，调剂农户间的资金余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生产方式和经济结

构的调整，农村金融将不断扩大活动领域和作用范围，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村储蓄存款　农村居民存入农村信用机构的生活节余款和暂时未用货币资金，是农村存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它分为定期储蓄和活期储蓄两种形式，前者的利率要高于后者，定期储蓄存期长、较稳定，可较长时间的利用；活期储蓄简便灵活，但稳定性差。我国农村储蓄的原则是："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银行开展吸收农村储蓄存款工作，有利于积聚农村的闲散资金，有利于资金投向经济效益好的项目，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村现金流通　指农村商品流通以及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和商品不断换位的运动。农村现金流通既反映了农村商品流通，又反作用于整个农村经济运动。因此，必须有计划的组织和调节农村现金流通，使农村现金需要量和现金流通量在总量和结构上保持一致。农村现金流通渠道是现金从银行流入市场和从市场流回银行的途径。我国现阶段农村现金流通渠道有：(一) 货币从银行流入市场，即银行的现金投放渠道有①商品收购；②劳动服务；③消费分配；④财政拨款；⑤信用贷款等。(二) 货币从市场流回银行，即通过市场回笼的货币渠道有①商品销售；②服务业收入；③居民储蓄；④财政与税收收入；⑤贷款回收。上述货币流通渠道虽多种多样，但却是密切联系的。货币从一个渠道流向另一个渠道，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货币流通，使得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得以实现。

农村现金流通受农村经济运动的影响，有其自身的特点：①数量将适度超经济增长，因为农村经济将从单一的发展农业到同时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进程将会加快。②季节差异大，受农业生产季节性影响，年初年末是货币投放最集中时期。③零量分散，因为农业生产中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占主导地位。④速度较慢。⑤地区之间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商品化程度高、农业比重小，农村居民收入高的地区货币流通量大、周转快；反之即可。⑥渠道灵活性大，现金既可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又可购买生活资料。⑦投放多、回笼少，因为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在县和县以上城市。上述特点随着农村经济的运动变化而变化。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曾使农村现金需要量有一个大量增加的过程，但当农村经济体制基本稳定后，这一因素就会减弱。又如，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占农村经济的比重会降低，农村现金流通的季节性差异会缩小等。因此，了解了农村现金流通的特点及其变化，能够更好地调节货币流通。

农村货币流通　指农村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和商品不断换位的运动。它包括现金收支和转帐结算两个方面。农村货币流通是农村经济运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农村经济不同于城市经济，农村货币流通有其自身的特点：①数量将超前增长，因为我国农村经济将在一方面发展农业的同时，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进程会加快，因此，我国农村经济商品化、货币化、信用化的进程将加快，对广义货币供应量提出了适度超前增长的要求。②零星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中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占主要地位决定的。③速度较慢，这是由农业生产周期长，家庭经营单位数量多，从而用作生产周转金和生活储备金滞留在农民手中的货币数量较多引起的。④地区之间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商品化程度高、农业比重小，农村居民收入高的地区货币流通量大、周转快；反之亦然。⑤农村居民的货币流通既与购买消费资料有关，也与购买生产资料相关。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货币流通还将呈现出新的特点。改革之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和农村商品流通的迅速发展，农村现金流通曾有过很大的发展，以前通过转帐结算进行的货币流通转变为现金流通。但随着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伴随着转帐结算进行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因此，必须对农村货币流通进行适时适地的调节，保持货币需要量和供给量在结构和总量上的一致，使农村商品流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运行顺利进行。

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各种金融机构及其活动组成的有机整体。我国目前主要由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建国以来，我们一方面在人民银行设置经营农村金融业务的机构，或建立相应的专业银行；另一方面又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由农民集资联合组成的信用社，初步建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为领导、以信用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体系。这种体系基本上适应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农业生产组织分散的特点，既发挥了国家银行在农村金融领域内的主导作用，又发挥了信用社点多面广，方便群众生产和储蓄的长处。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生产方式的调整，我国农村还出现了民间信用合作组织，该类组织对于调剂农户间的资金余缺、促进资金合理流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些新出现的私人借贷现象，既有促进生产、缓解群众生活困难的作用，也冲击了正常信用秩序和信用活动，须积极加以引导。

农村资金商品化 一般指农村货币资金中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的增殖现象。在我国，随着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货币资金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资金向增殖多、增殖快的地区、部门、行业、企业流动；保本、有息、分红等多种合作集资方式得到广泛推广采用；调节货币资金供求的各种各样的民间借贷活动纷纷兴起；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信用合作社在政策规定的幅度内对利率进行浮动。这些现象有利于搞活农村资金，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党和政府不仅允许农村资金的自由流动和向商品化发展，而且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是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农村资金活动分析 对农村生产经营单位的资金活动所进行的研究和评价。在我国分析的范围大体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营农业企业、农村商业企业，改革以后，还应涉及乡镇企业和个体农户，这样才能较全面地反映现阶段的农村资金运动。分析的内容一般包括资金来源分析、资金运用分析、资金使用效果分析。分析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是专题的。分析时，则要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以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大量原始资料为基础，采取专门的分析方法，对企业资金的形成、周转、耗费、积累和分配过程进行分析研究，揭露问题，找出原因，提出措施，以提高资金运营和配置效益。分析方法可主要采取指标对比分析法和连锁替代分析法。指标分析法是将本期实际指标与计划指标、上期指标或同类企业的先进或平均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其发生差异的原因；连锁替代法是指标分析法的继续，又称因素分析法，它在许多因素影响指标对比分析所得差异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程序，逐个地把一个因素当成可变，而固定其他因素，以分析确定各因素对指标差异的影响程度。银行对农村资金活动进行分析，有利于统筹安排财政支农资金、信贷资金、企业自有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使之得到配置和营运，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全额预算 差额预算的对称，指单位预算的全部开支由国家预算拨付，收入（除特种资金外）全部上缴国家预算。它是我国现行单位预算管理的一种方法，适用于行政机关或收入数额很少且不经常、不稳定的事业单位，如科研单位、学校、广播电视台、文化馆和博物馆等。

全额预算管理 “差额预算管理”的对称。单位预算管理的一种方法。即以单位预算收入抵拨单位预算支出的部分或全部后，按其收支差额列入国家预算管理。适用于行政单位及没有经常性收入的事业单位，如学校、文化馆等。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单位，一般是有经常性业务收入的事业单位。

全额累进税率 累进税率的一种，即将课税对象按数额大小划分为若干等级，每级规定一个税率，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按其相应等级的税率计算税额。课税对象数额增大需要提高一级适用税率时，全部数额要按高一级税率计征。1950 年 12 月，政务院修正颁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对所得额部分征收的所得税，即采用 21 级全额累进税率。1963 年 4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调整工商所得税负担和改进征收办法的试行规定》，对个体经济征收的所得税实行 14 级全额累进税率。1980 年 10 月，财政部发出《关于改进合作商店和个体经济缴纳工商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对个体经济暂不执行 14 级全额累进税率。全额累进税率比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简便，但累进速度较为急剧，税负不够公平、合理，主要表现在累进分界上下的负担差距悬殊。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条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精神。”1949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税务会议，统一了全国税政，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要则》规定，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的税收共 14 种：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此后，政务院陆续颁布了有关税种的暂行条例，建立了新型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

自然人 “法人”的对称。自然人和法人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人是指依法可以独立地享受民事上的权利，并承担民事上义务的公民个人。民事法律关系主要是财产（经济利益）关系。自然人和法人依法对国家负有纳税义务。我国公民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民事法律地位上与自然人同居住在所在国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也属于自然人，均依法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承担一定的民事义务。

自有资金 “借入资金”的对称。社会主义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经常占有、使用、并无需偿还的资金。例如：由国家拨给企业无偿使用的固定和流

动资金，以及由企业内部形成的企业基金等。在实际工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经常参加资金周转的应付款项，也视同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又称"自筹基本建设资金"。国家财政制度允许各级地方财政和各部门、各企业、各事业单位用于基本建设的若干机动财力和专项基金。地方财政自筹资金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自筹资金和地、县财政自筹资金，可用于基本建设的有，上年财政预算结余、当年财政超收分成和总预备费以及地方掌握的预算外资金，如工商税附加，城市公用事业费附加、农业税附加、城市房地产税、城市公房租金收入等。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来源主要有：企业生产发展基金，饮食服务企业的利润留成，基本建设收入留成。自筹资金来源，要符合国家规定，不得截留国家财政收入，挪用企业流动资金和其他专用资金、不得向企业摊派或以银行贷款作为自筹投资。所有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均须专户存入建设银行，先存后用，由建设银行监督拨付使用。

自然利息率　西方经济学用语。西方经济学家有不少人使用过"自然利息率"的概念。但含义各不相同，并且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权威性意见。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丁·洛克在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使用了"合法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这对概念。他认为，自然利息率是指在货币平均分布条件下，现在的货币缺乏情况所自然决定的利息率。而合法利息率则是指国家法律允许或规定的利息率。他指出，自然利息率会因一国货币缺乏而与其居民彼此间的债务和全国贸易情况不相适应时提高。可见洛克的自然利息率是指由借贷资金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市场利息率。洛克提出自然利息率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法定利率，尤其是为了反对降低法定利率的政策。英国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马西在1750年匿名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一书中认为，自然利息率，由个人营业的利润调节。即在假定利息和总利润的比率不变的情况下，职能资本家能够并愿意与利润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较高或较低的利息。可见马西所说的自然利息率是同工商企业的利润决定的。瑞典经济学家K·威克塞尔认为，借贷资本的需求与储蓄的供给相一致时的利率，从而大致相当于所形成的资本的预期收益率的利率叫正常的或自然的利率。在《利息与物价》一书中，他指出："自然利息率是对物价完全保持中立，既不使物价上涨，也不使物价下落的利率；它与不使用货币交易而以自然形态的实物资本来进行借贷时为其需求与供给所决定的利率恰恰相等"。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利息用货币支付。在借贷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率完全一致。这时的货币是中立的，它既不会使物价上涨，也不会使物价下跌，经济便处于均衡状态。威克塞尔在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自然利息率含义不尽相同，主要有如下三种意思：(1)自然利息率是实物资本的收益率，即资本利润率；(2)自然利息率是借贷资本的需求（投资）与供给（储蓄）相一致时所形成的利率；(3)自然利息率是使货币保持中立的利率。英国经济学家丁·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认为，一定时期内储蓄量与投资量保持相等时的利率就是自然利息率。但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又认为、唯一的，重要的利率是"中立利率"（又称为"最适度利率"）。所谓中立利率是指，经济体系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在一组自然利率中，有一个自然利率与充分就业不悖，该自然利率即为中立利率。由于自然利率是储蓄与投资得到均衡、物价不发生变动时的利率，因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又把自然利率称为"均衡利率"。马克思认为，在经济领域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利息率"。因为总利润的多大部分为利息，并没有一个"自然"的界限，它完全是由借贷双方的竞争决定的。

负税人　税款的实际负担人。负税人和纳税人是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又有密切的联系。有的税种，税款由纳税人自己负担，纳税人就是负税人。有的税种，税款虽由纳税人交纳，但实际上由别人负担，纳税人并不是负税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往往通过提高物价，加强劳动强度等办法，将所缴纳的税款进行转嫁，故纳税人虽为资本家，而负税人实际上是劳动人民。消费税、营业税、增值税等税收，税款包含在商品价格之中，交纳税款的公司企业并不负担所交的税款，负税人是广大消费者。

企业基金　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从企业利润的分配中提取一部分归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自行支配的资金，叫做企业基金。企业基金主要用于举办企业的集体福利事业、一部分可作为对职工的奖金。企业基金是一个不定的量。完成国家计划好，上缴利润多的企业，提取的企业基金就多；没有完成计划，甚至亏损的企业，就不能提取企业基金。所以，实行提取企业基金制度，不仅关系到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而且直接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责任，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开展劳动竞赛，

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企业财务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所发生的货币关系。它表现为货币资金的形成、分配和运用。企业因从事供、产、销等活动而发生货币关系，构成企业财务，如企业因销售产品获得收入，企业从国家获得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企业向国家缴纳利润、税收和折旧基金，企业间因提供产品，劳务和原材料等所进行的货币结算，企业对职工支付工资，以及企业内部各独立核算单位间的货币结算等，都属于社会主义企业财务的内容。此外，机关、事业单位等因取得和使用经费而发生的货币关系，亦称财务。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主管部门和企业内部有关部门利用财务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可以促进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健全经济责任制，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财政用于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支出，是企业一项专用基金。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根据我国国情，把立足点放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进行挖潜、革新、改造、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能，实现企业内涵扩大再生产。1967年以前，我国国营企业挖潜、革新、改造资金是由国家预算通过三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和劳动保护）及四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安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实现的。从1967年起，国家实行更新改造资金制度。更新改造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费、财政不再拨给“四项费用”，同时，增设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以满足重点企业更新改造的需要。按1984年规定，企业挖潜改造资金除财政拨给各部门挖潜改造资金外，还包括拨给各级建设银行的企业挖潜改造贷款基金。同时，为农业服务的县办“五小”工业技术改造资金补助以及国家补贴挖潜改造贷款利息支出等也作为企业挖潜改造的资金来源，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对原有固定资产和其他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实现新技术、新工艺的综合利用，开发原材料，对企业现有设备进行小改小革等。对原有企业进行挖潜改造革新，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所以，在安排固定资产投资时，应按照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扩建的顺序进行，同时，要注意专款专用，防止挪用的现象发生。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对发挥企业生产经营潜力，改进产品质量和劳动条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都具有重要作用。

优惠税率 是两个国家之间或几个集团国家之间，所实行的低于对其他国家的税率。如互惠关税、特惠关税等等。互惠关税是指两国间为了发展贸易关系，双方协定在关税方面相互给予优惠待遇的关税。即两国协定各自对于从对方进口货物，相互免征关税或采用较低的进口税税率。特惠关税是指两个国家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缔结协定，在关税方面单方或相互给予特别优惠待遇的关税。

优惠利率 指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使用的一种比普通贷款利率稍低的利率。在西方国家，当商业银行对一些资信较高、业务关系密切、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公司或企业发放贷款时，往往使用较低的利率，因为这种贷款收回的风险很低，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与安全性。而对其他普通客户进行的贷款则在此基础上向上浮动。因此，优惠利率又成为商业贷款利率的基准利率，当信贷资金紧张时，商业银行首先提高优惠利率，带动其他利率的上浮，反之下调优惠利率，带动其他利率下调。但商业银行优惠利率的变动又受中央银行再贴现率的制约，随再贴现率的上下而浮动。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又称为“商业银行优惠放款利率”。另外，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如果政府或中央银行规定对某些项目或某些部门、企业实行优待政策，也会规定由银行对它们提供优惠贷款利率，但这种优惠利率不带有普遍性和标准性，因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

名义利率 参见“货币利率”。

名目货币 “实价货币”的对称，是实价货币的价值符号，为不足值的货币，但它按法定的足值价值流通。名目货币的币面价值高于实际价值，如辅币等。

名义货币供给 以货币单位来表示的货币供给，表现为通货净额与存款净额之和。一般而言，决定一国名义货币供给的是该国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控制名义货币供给的程序是：中央银行将准备金输入商业银行，然后通过多级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活动，商业银行创造了扩大的整个社会的名义货币供给。当然中央银行拥有的只是控制强力货币，即商业银行存于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及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钞的总和。但在相对稳定的货币余数下，中央银行可以完全控制名义货币供给，其控制与调节的手段通常有：公开市场业务；调整法定准备率；调整贴现率三项。经济萧条时期，中央银行向公开市场买进政府债券，使名义货币供给增加，利息率水平下降，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导致生产和收入增长；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卖出债券导致银行体系存款额多倍紧缩，使名义货币

供给量减少，与此同时，债券价格下跌，利息率提高．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减少，导致生产和收入减少。同样，降低法定准备率，可使商业银行在活期存款额不变时扩大放款，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反之，则提高法定准备率。贴现率的调整效果与法定准备率类似。

名义货币需求　人们在当前价格水平下对货币的需求。它以货币单位来表示。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注重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认为货币的价值纯粹源于其交换价值，因此，大众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对交换媒介的需求。对货币的名义需求与价格水平的涨跌作同比例变化。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与庇古将名义货币需求定义为按现价计算的国民总产值，即名义国民总产值的一个份额，是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社会愿持有的货币额，而且大众对名义货币需求稳定地占其年收入的一定比例。他们利用剑桥方程式对货币的名义需求与币值、物价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名义货币需求与货币价值成同比例不同方向变动，货币价值与物价成反比，物价水平又与货币供应量依同一比例同一方向变动，所以货币供应量成为名义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且在均衡状态下，名义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应量。凯恩斯首次强调了货币作为资产或价值储备的重要性。在凯恩斯的货币数量论中，大众的名义货币需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交易需求，由名义所得的多寡决定；另一部分是资产需求，由利率的高低决定。名义货币需求与名义所得依同一方向变化，而与名义利率成相反方向变动。弗里德曼进一步发展了视货币为资产的核心思想，具体分析了影响名义货币需求的多种因素，将名义货币需求定义为受一系列变量的综合影响的函数，它的确定比古典数量论的名义货币需求的确定远为复杂。

后备购买力　即"结转购买力"。亦称"潜在购买力"。通常指一定时期内居民暂不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那部分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从资金运动的形式看，这是现期或往年的购买力结转以后实现，因此，这种结转的购买力又是后备的购买力。结转的后备购买力，分当年结转和历年结转两种。在一定条件下，结转购买力越多，实现的社会购买力就越少；反之，就越多。结转购买力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作用。当居民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基本适应时，结转购买力可以使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用于生产建设，加快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在居民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时，结转购买力可以使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在新的基础上求得平衡，对于减轻市场压力、稳定金融物价有一定的作用；在居民购买力小于商品可供量时，往往形成市场滞销、商品积压；在居民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而同时由于商品和结构、品种和质量不符合市场的需要时，一方面是结转购买力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市场滞销、商品积压，出现所谓"市场疲软"。由于结转购买力是潜在的购买力和后备的购买力，它可以随时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因此，在市场商品供应比较紧张或市场商品的结构存在明显问题的情况下，过多的后备购买力的存在．会加大对市场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压力。不少人把过多的后备购买力视为"笼中虎"。

行业税　中国在1970年前后试行的一种税。它是按行业确定税率，实行一个行业一种税、一个税率的征税办法。在天津试点的基础上，1970年有湖北、上海、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北京、河北、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进行了试点。征收政策的主要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何划分纳税行业和设计税率两个方面。按照财政部1970年12月发出的《关于国营企业试行行业税中划分行业、设计税率的几点意见（草稿）》，划分行业原则上是按照生产行业来确定纳税行业，有些需要在税收上支持、照顾的行业，或国家需要多拿纯收入的行业、可以单独划分出来，但本着精简精神，行业不宜划分得太多、太复杂。税率的设计原则是：①必须体现党的政策。原则上重工业轻于轻工业。重工业中采掘工业轻于原料工业；原料工业轻于加工工业。轻工业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行业轻于生产消费品的行业。对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税率应低一些，对产品价格高、国家需要多拿纯收入的行业，税率应高一些。②照顾大多数。在设计税率时，要适应沿海、内地企业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照顾企业的大多数。③税率设计力求精简，一个行业一般设计一个税率，一个企业一般按一个税率征收。各行业的税率，能简并的尽量简并。④烟、酒、糖等少数高税率产品，可以保留按产品征税的办法。经过试点认为，行业税较之综合税虽能解决相同的企业使用不同税率的矛盾，统一了税收政策，但有些产品是跨行业生产的，特别是在大搞综合利用和大协作的情况下，出现了同一种产品，由于在不同行业生产就按不同税率征税，不利于企业按产品核算和按产品定价。有些行业产品品种较多，使用的原料不同，原来的税率和税负高低悬殊，也难于按行业定税率。因而不久就停止了行业税试点。

行政管理费　国家预算拨款中用于国家机关的费用。行政管理费是国家机关行使职权，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社会科教卫生事业以及进行外事活

动的物质保证。行政管理费主要用于行政支出费、公安支出费、司法检查支出费以及外事支出费。行政支出费包括:①国家机关经费，这是行政管理费中一个重要项目，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费，各级党、政机关经费，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经费。②行政业务费，包括人大代表大会会议费、人民代表视察费、政治宣传费、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遣费。③干部培训费，包括行政干校和培训班经费、党校和团校经费。④其他行政费，包括居民委员会补助费，党政机关、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调干人员未分配工作期间的费用，以及老红军生活困难补助费等。公安支出包括：公安机关活动经费、业务费、警校和干训经费，以及其他公安经费。司法检察费用包括：司法检察机关经费、司法检察业务费、司法学校与干训经费，以及其他司法检察经费。外交支出包括：国家进行对外交往来活动所需经费，如驻外机构经费、出国费、外宾招待费、国际组织会议费等。行政管理费属非生产性支出，在预算分配中，应在确保国家机关费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在使用中应遵循厉行节约的原则，尽可能地减少费用开支。

行政事业财务 是指国家机关和各类事业单位为完成国家行政任务和事业计划而进行的资金收支及管理活动，并通过一定的核算形式对资金的收支及其成果进行及时、全面、具体的反映、计算与监督。行政事业财务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①财务管理，即经费收支管理、定员定额管理、费用开支标准管理，预算外收支管理，资金、财产、物资管理等。②单位预算管理，即单位预算的编制、执行和调整。③财务活动分析。④财务监督检查。行政事业财务的任务是：贯彻节约原则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果，积极促进事业发展，保证完成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计划必要的资金供应，监督检查资金的筹集、供应和使用情况。

异地结算 亦称"埠间结算"，指不在同一城市的两个企业之间的非现金结算。我国常用的异地结算方式有：异地委托收款结算、汇款结算、信用证结算、托收承付结算、限额结算等。异地委托收款结算是指由收款单位向开户银行提供收款依据，向异地付款单位收取款项的结算方式。汇款结算是指付款单位委托其开户银行或邮电局将款项汇给指定的收款单位或个人的一种结算方式。信用证结算是指购货单位委托银行开发信用证通知异地销货单位开户银行代为结付货款的一种结算方式。托收承付结算是指收款单位根据经济合同发货后，委托银行向购货单位收款（托收），经付款单位承付后，由银行办理款项划拨转帐的一种结算方式。限额结算是指购货单位凭开户银行签发的限额结算凭证购货，并由银行办理转帐付款的一种结算方式。

异地托收承付结算 是指收款单位根据购销双方签订的经济合同发货后，委托其开户银行向外地购货单位收取货款，付款单位根据经济合同核对单证或验货后，向其开户银行承认付款的一种结算方式。这种结算方式适用于国营企业、事业、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供销合作社等单位之间的商品交易以及由于商品交易而产生的劳务供应的款项结算。采用异地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应具备以下条件:①收、付双方订有符合《经济合同法》的经济合同;②收、付款双方信用较好，都能遵照合同规定办理;③要有货物确已发运的证件（如铁路、航运、公路等承运部门签发的运单、运单副本等);④每笔货款金额必须在1000元以上。

年终结余 财政年度终了时各级预算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在我国有:①各级预算历年的累计结余。其中包括结转下年支出和净结余两部分，称为"年终滚存结余"。②各单位预算的年终结余，在实行经费包干的行政、事业单位，称包干结余，留归原单位按规定范围继续使用。不实行经费包干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年终结余，称拨款结余，这种结余应缴回国家预算。③地方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掌管的年度预算外资金结余，称预算外年终结余。

年终清理 各级财政部门和预算执行单位（如企业、建设、事业、行政单位等）年终对预算收支、会计帐目，财产物资等进行的全面核对和清查。是保证决算数字准确、完整和及时编好决算的基础工作。在我国，主要内容包括:①核对年度预算收支数字;②结清预算拨款、借款、补助款和上解款;③清理本年度预算应收、应支;④清理往来款项;⑤清查财产物资;⑥进行决算收支数字的对帐工作。通过年终清理，保证各级财政总决算，行政事业单位决算、企业财务决算、基本建设财务决算、国库年报、税收年报等有关决算数字核对一致。年终清理期一般规定在年度终了后10天至20天。

价格补贴支出 经国家法定程序批准，由国家财政拨付的政策性补贴费用。包括政策性亏损补贴和对城镇居民因肉食价格上涨所给予的补贴等。政策性亏损补贴包括:①给予从事粮食、食油企业的粮油价差补贴，以弥补其因收购粮、油价提高而超过销售价所

发生的亏损。②给予收购粮食、食油部门的粮油加价款，即向农民收购粮食，食油超过定购任务而对超购部分给予的加价款。③按照国家规定为平抑市场肉食、蔬菜等市价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稳定而给予经营者的资金补贴。④给予煤炭经营部门因供应平价民用煤所发生亏损的补贴等。1985年以前、企业的政策性亏损主要作为冲减国家预算收入处理，这样不便于国家加强对各种价格补贴的管理和监督。1986年，国家改进预算管理办法，将对原企业的政策性亏损采取预算收入退库的办法改列为国家预算支出，使国家预算能直接明了地反映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支援以及对人民生活的稳定所给予的保障。

多种货币储备体系　同时用若干种货币充作国际储备资产的一种储备制度。它是70年代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后出现的新现象。多种货币储备体系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如美元不断发生危机，主要货币汇率经常发生变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发展，国际清偿能力的迅速扩大和储备资产缺乏适当的国际管理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连续两次贬值，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以美元为最主要外汇储备和进出口结算货币的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使各国美元储备的购买力随之下降；而以日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硬货币承担的债务负担增加；另外，相对用于出口计值的美元，英镑等软货币构成的外汇收入而言，从硬货币国进口的商品并以硬货币计值的外汇支出增多；1973年后，石油输出国的美元储备大量积聚，更增加了各国单一持有美元储备的风险。因此，许多国家纷纷将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换成日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硬货币，以便储备中各种货币的升值和贬值互相抵消，从而减少汇率变动对进口及外债所造成的损失。此外，主要发达国家对美元的态度的转变，也是多种货币储备体系产生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取的外汇协定和经济政策；石油美元回流的方式和途径；欧洲货币市场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基金份额的增加；欧洲货币单位的数量增大和作用提高，都加速了多种货币单位的数量增大和作用提高，都加速了多种货币储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多种货币体系一般包括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特别提款权以及欧洲货币单位等。美元仍占主要比重，但地位下降；日元、西德马克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多种货币储备较之美元储备体系，具有以下优点：(1) 可以使各国摆脱对美元的过份依赖，不会因美元汇率的急剧变动而造成较大的损失；(2) 使一国能够比较容易地调节其外汇储备；(3) 国际金融不受一国的操纵，可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与政策的协调。但是，以国际储备多元化和分散化为特征的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较之单一货币储备体系，它又有以下不利影响：(1) 一种依赖几个储备中心经济政治稳定的制度是不易稳定的。一个储备中心管理不善，将殃及整个储备体系；(2) 多种货币储备体系易造成各国汇率频繁波动；(3) 在多种货币储备体系下各国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货币政策更难贯彻；(4) 储备分散化会加剧世界性通货膨胀；(5) 加剧外汇市场的动荡。目前，储备分散化的进展虽已变缓，但储备分散化的过程已难以逆转。

观念货币　"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观念的货币"。由于在衡量商品的价值、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商品价格即一定量的货币时，并不需要现实的足值的货币，货币只是作为计算货币和想象的货币发挥作用的，所以称为观念货币。虽然观念的货币可以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但它必须以实际交换中的现实货币或实在货币为依据，即价格完全取决于实在的货币材料。在现实经济中，诸如成本，产值售价，国民收入等经济范畴所使用的货币都是观念货币，都是作为计算货币而发生作用的。

七　画

沉淀货币　专指不兑现信用货币现金不参加流通和支付的现象。现金发行后成为货币收付各部门的购买与支付手段，但其中也有一部分现金离开流通，成为沉淀货币。它包括居民自行积蓄现金形成的一部分"箱底钱"；由于遭灾或丢失等以外的其他原因而损失的现金；从全社会来看，正常的居民手持现金的平均余额和企事业单位最低库存现金余额也应算做沉淀货币。信用货币中的存款通货，由于其随时可被客户提取和用于支付，不具有离开流通，静止不动的性质，所以不会产生货币沉淀现象。货币沉淀不同于货币贮藏，货币贮藏是具有十足价值的金属货币才具有的功能。当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超过其必要时，它会自动

退出流通，执行贮藏职能。金属货币执行贮藏职能时，并不影响其价值和购买力。当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小于其必要量时，退出流通的贮藏货币又会回到流通中来。

信用货币的沉淀可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偏多时，货币沉淀可减缓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供应紧张的压力；货币供应量不足时，沉淀货币的减少可以减轻市场上商品滞销等现象。信用货币沉淀时，它并不执行价值贮藏职能，而只执行储蓄职能，其购买力并不能得到保证。沉淀货币数量的变化取决于物价水平、市场利率、支付方式、产品的商品化程度等因素。一般而言，当这四种因素分别上升，沉淀货币将减少；反之，沉淀货币则增加。

启动资金 有两层含义，其一指企业经营的初始资金；其二专指国家银行部门面对着经济萧条或市场疲软所发放的一种贷款或投放的货币，其目的在于启动经济复苏，刺激经济繁荣。通常所说的启动资金指后一种含义。

社会购买力 社会商品购买力的简称。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各方面在零售市场购买商品的货币支付能力，即能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总额。它反映该时期有支付能力的商品需求和商场容量的大小。在我国，由居民消费品购买力、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力这三部分组成。其中前两部分称为消费品购买力。社会购买力从商品购买的主体来划分可分为国家购买力、企业购买力和居民购买力。这三种主体购买力主要指它们对用于各自消费的购买力，不包括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购买力。但在我国，把对农用生产资料的购买力列入了社会购买力之中，这主要是出于安排市场供需平衡的需要作出的。社会商品购买力是通过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正确计算社会购买力是编制商品展转计划和安排市场的重要依据。

社会商品可供量 在一定时期内（比如一年）可以通过零售市场供应的生活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商品总量（额），包括商业部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售给农村和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社会商品可供量的计算，一般是通过资源平衡表进行的。其基本内容为：资源部分（包括：商品购进加上国家财政和国家储备拨出部分、进口、其他资源和期初商品库存）减其他部分（包括：拨给财政、军需和国家储备部分；供应出口、供应工业生产、其他用途和期末商品库存）等于市场零售商品供应量。市场零售商品供应量即社会商品可供量。就一个地区来说，商品可供量还应加进商品调入部分，减去商品调出部分。社会商品可供量的大小及其构成，直接决定着社会商品购买力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所以计算社会商品可供量，安排好社会商品可供量与社会商品购买力之间的平衡，对于保证市场供应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集团购买力 亦称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或称集团购买力。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区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集团在市场购买办公用品、书报杂志、家具、文化体育用品、交通工具等非生产用消费品的货币支付能力。是社会购买力的组成部分。其资金来源或为国家财政拨款，或为各社会团体自身经营的收入。其用途是为工作需要，属于集体消费。我国对集团购买力历来采取保证需要、加强管理、适当控制的办法，以免造成浪费和影响居民购买力。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根本措施应是精减国家行政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以及实行行政经费包干制，还要消除"人山会海"的现状，从而缩小社会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缺口，保证居民购买力的实现。

社会主义信贷资金运动规律 社会主义信贷收支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与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包括如下几层含义：(1) 社会主义的信贷收入量制约着它的支出量，一定时期，信贷支出量有多大，看它的资金来源有多大；(2) 信贷的收入结构制约着支出结构，如信贷资金的来源中长期的稳定存款和银行自身结益很多，那么信贷支出就可以用于长期的项目投资，否则只能用于短期贷款；(3) 信贷资金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使用性质，由于信贷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社会大众的存款，是一种负债，是社会闲散资金的集中，这就决定了它的使用具有周转性、有偿性、灵活性的特征。违背了这种规定性，必然要破坏信贷资金的正常周转，导致金融的混乱；(4) 社会主义信贷资金的运动要符合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要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信贷资金运动与资本主义信贷资金运动的本质区别。最后，信贷资金运动只不过是客观的物资运动的价值反映，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的信贷资金使用既要与物资总量相适应，也要与物资的结构（包括地区结构，时间结构）相适应，否则的话，就会破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社会主义信贷资金与财政收支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财政收支差额过大，靠信贷资金来弥补，就会破坏信贷收支的平衡，从而破坏信贷收支价值量上与物资供给量的平衡。此外，社会主义信贷收

支与货币流通有着紧密的联系。现代社会，任何货币都是通过信贷渠道注入流通中去的。尽管我们承认信贷收入制约着支出和使用结构，但信贷支出也制约着收入。存款转化为贷款，贷款又转化为存款，只要这种转化是严格按照信用经济的原则来进行的，那么它就符合商品流通的正常要求，但一旦超出商品流通的正常要求，用净发行货币方法满足信贷支出要求，就会使信贷资金脱离商品流动而运动，这是对信贷资金运动规律的破坏。由此看来，社会主义信贷资金运动规律就是在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其它规律的制约下，信贷收支平衡与物资运动之间相互制约的规律。

社会减免　纳税人除因自然灾害以外造成的纳税确有困难，按照农业税条例规定，对其依率计征税额给予适当的减免。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第一老革命根据地，生产和生活有困难的农民，生产落后、生活困难以及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瘠山区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第二，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废军人及其他纳税人，因缺乏劳动力或者其它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批准，可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第三，为了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第四，为了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就业，对待业青年举办的生产和服务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减征或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

应纳税额　纳税单位和个人按照税法规定应当交纳的税款数额。它是纳税人或税务机关根据各种税种的计税依据和适用税率计算出来的。例如资源税是以产品的销售收入额为计税依据的，应纳资源税税额＝应税产品销售收入×适用税率；盐税规定进口盐的输入单位的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进口盐的吨数×单位税额。正确计算应纳税额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主要内容，也是填开纳税票证的重要依据。

应税所得额　税法规定的作为计征所得税依据的所得额，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一般是企业的所得额或个人的各种所得。计征所得税依据的所得额，各个所得税法都规定有具体的计算原则和标准。如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对工资薪金所得规定按每月收入减去税法规定的800元费用后的余额，作为征税的所得额；对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则规定以每次收入不满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每次收入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后的余额，作为征税的所得额；利息，股息，红利和其它所得，则以其每次的收入额作为征税所得额。又如工商所得税规定，征税所得额为企业的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销售税金和上缴管理费后，再加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损失后的余额。同时还规定应计的收入项目及应减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正确计算征税所得额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与纳税人的负担问题，而且关系到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政策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重要问题。

应纳税所得额　指税法规定的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税依据。它是以纳税人的利润额为基数，按照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范围，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计算出来作为计税依据的那部分所得额。例如集体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是以纳税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各项收入总额减去成本、费用、国家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的税金和营业外支出后的余额。其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其他单位分得未征所得税的利润－允许扣除项目的金额。应纳税所得额是指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生产经营所得指纳税企业从事物质生产、交通运输、商品经营、劳务服务和其他盈利事业取得的纯利益；其他所得指股息、利息、租赁所得、转让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等项所得，以及营业外收益和其他收入等所得。

灾歉减免　纳税人的农作物因遭受水、旱、风、雹或者其他自然灾害而歉收的，对其农业税给予适当减免的办法规定。如农业税减免的原则是"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灾全免"。具体减征免征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灾情减免，既照顾了灾歉地区人民的生活，又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是贯彻农业税政策的重要措施。对灾情较重地区的村镇工副业应纳的工商税和所得税也可给予必要的减免。

补税罚款　对偷税、抗税等严重违章行为采取的经济制裁。所谓偷税是指纳税人有意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的违法行为。比如：伪造、涂改、销毁帐册、票据或记帐凭证；少报、隐瞒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利润数额；转移资产、收入和利润的帐户，逃避应纳税款等，都是偷税行为。抗税是指纳税单位和个人抗拒按照税法规定履行纳税义务的违法行为。例如：拒不缴纳税法规定应该缴纳的税款；以各种借口抵制税务机关的纳税通知，拒不纳税；拒不按照法定手续办理纳税申报和提供纳税资料；聚众闹事，威胁围攻税务机关和殴打税收干部等，都是抗税行为。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对有意偷税，抗税的行为，除追缴应纳税款

外，还应根据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补偿性财政政策 现代资产阶级的财政学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汉森所主张。认为失业和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即社会对于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需求不足。主张由国家增加支出来补偿私人需求和私人投资，以保证有效需求的充裕，并断言即使非生产性的国家支出亦可刺激经济高涨，消灭失业和危机。这种学说旨在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和扩军备战作辩护。补偿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1) 扩大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提高购买水平（如举办公共工程，修高速公路、公园、水利工程等）；(2) 增加政府的社会福利费用，提高转移支付水平（如增加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3) 政府采取减税措施，给公众多一些可支配收入；(4) 发行公债、弥补可能出现的财政赤字。

两税法 中国唐朝建中年间实行的税收制度，在唐德宗即位后，由宰相杨炎（公元727–781年）创建。它以当时各地推行的地税、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整理成为两税法，实行以资产多少为标准的地税和户税，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名称的由来，一说是指地税和户税，一说是指夏、秋两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亩为准，按田亩的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分等税率。户税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根据财产情况规定税额。行商于所在州县按资产的1／30的税率纳税。两税法从按人丁课税转为按财产课税，体现了租税发展规律。唐代实行两税法，简化了税制，并采取以现居定籍办法。对户籍的整理、社会的安定，以及确保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均有一定的作用。但其目的并不是为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

扶持生产资金 是用来扶持商业，供销部门归口经营的某些重点或短线土特产品生产发展而建立的一项专用基金。其资金来源，商业部门是由商业部拨付，由省、市、自治区商业主管部门掌握专款专用；供销部门按1976年规定，每年从基层供销社缴纳所得税后的盈余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扶持生产基金。商业和供销部门是以借支的方式帮助资金有困难的单位，待借款单位有了收益之后，再行一次或分期收回。扶持生产基金主要用于：扶持农业社队发展国家需要而当年又不能收益的某些重点和短缺的土、副产品生产（以种植、养殖为主）：购置种籽、种苗、化肥、农药、小农具等和生产管理费支出；开展土、副产品综合利用和科学研究的试验费；为了开发远山毛竹资源，以民办公助方式，帮助社队修筑林道和简易公路、疏浚河道、修建现场简易房屋、购置加工工具和设备所需要的资金。这项资金必须集中使用，保证重点，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亦称"收入来源管辖权"。是一国对来源于其本国境内的所得课征税收的权力，来源地税收管辖的权力来自国家主权的属地性。它的确立是以征税对象与征税国领土之间存在某种经济利益的联系为依据的。就各国税收实践来看，国家在确定某一具体的征税对象与本国是否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联系时，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通常有：不动产所在地，常设机构所在地，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租金等所得的发生地，债务人或支付人所在地等。把那些在来源国没有税收居所，但因取得上述所得而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则称为来源国的非居民纳税人。依据所得来源地这一联系因素，来源国有权要求那些在境内虽无税收居所但却有收入来源的非居民纳税人，就其在该国境内获得的收益承担有限的纳税义务。由于非居民纳税人的这部分所得位于来源国的领土管辖范围内，纳税人只有履行了纳税义务，才能将有关财产或所得转移出境。因此，尽管非居民纳税人本身可能不在来源国境内，来源国的这种税收管辖权无疑是可以实现的。在国际税法上，这种根据纳税人的所得与本国的经济利益联系而对在其领域内的财产或所得征税的原则，称为"来源原则"或"地域原则"。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由国家预算拨款，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方面的费用。抚恤费是指国家财政对革命军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退伍、离休、退休、残废或牺牲、病故时，给予本人或家属的一种物质帮助。包括：①牺牲病故抚恤费。这是指革命军人、工作人员、参战民兵等牺牲病故后，由国家一次性发给其家属的费用，抚恤金的标准，则是根据受抚恤人原来的职位和其对国家的贡献区别情况具体确定。②残废抚恤费。由国家民政部门掌握发放的残废金和各种残废补助费。③残废军人休养院、疗养院和烈士陵园的维修和管理费。④部队复员军人生活补助费以及安置费。⑤各类离、退休人员的离休费和退休费。⑥烈军属补助费。即对符合有关规定的优抚对象给予的定期、定量补助费和临时补助费。⑦优抚事业单位的经费以及国家对集体优抚事业单位的补助费等。社会福利事业费是国家财政用于解决城乡人民生活困难以及用于福利事业单位的经费。包括：①对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和社会残废人的救济费。②退职老弱职工及城市困难户的救济费。③民政部门举办的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经费和集体社会

福利事业单位的补助费。④火葬场等殡葬以及其它方面的福利事业经费。自然灾害救济费是国家财政用于解决灾区人民吃、穿、住困难救济费以及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时，用于灾民的抢救、转移、安置、医疗等费用，包括城镇自然灾害救济费和农村自然灾害救济费。我国规定，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由国家各级民政部门统一管理。

更新改造资金　"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的简称。指用于对固定资产进行更新、技术改造、技术措施等的专用资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企业按比例留用的折旧基金，有偿调出的固定资产价款收入，固定资产报废清理时收回的残料变价收入，出租固定资产的租金收入以及上级从集中的折旧基金中拨回企业的那部分资金。更新改造资金是保证企业固定资产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它的使用范围，包括：机器设备更新和厂房、宿舍等建筑物的重建和改造；结合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试制措施；综合利用和治理"三废"等措施；劳动安全保护措施，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和零星土建工程。

间接税　"直接税"的对称。间接税与直接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税收的分类，间接税被认为是能转嫁的税收。资本主义国家对以商品、营业收入或劳务收入等为征税对象的消费税、营业税、销售税、增值税、关税等称为间接税。间接税一般通过提高售价、压低进货价格等办法，最终转嫁给消费者负担，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负担。间接税的转嫁主要有"前转"和"后转"两种途径。前转是指纳税人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把税负向前转嫁给商品购买者；后转是指纳税人作为购买者，通过压低商品价格，把税负向后转嫁给商品供应者。我国社会主义税收在总体上不存在税收转嫁问题，所以基本上没有间接税。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税收可以直接从作为生产者的纳税人身上扣除，而不必通过迂回的间接税的办法，让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来负担。

足值货币　亦称"实价货币"。"名目货币"的对称。币面价值同实际价值相符的货币。如金属本位制下的本位货币，其币面价值与所含的金属的价值完全一致。足值货币可作为价值贮藏手段，能自发地调节货币流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

财政　国家凭借政权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财政反映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在参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同有关社会各阶级、集团和个人之间所发生的分配关系。在历史上，财政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国家财政，封建制国家财政、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和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四个阶段。除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财政外，前三个阶段的国家财政，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阶级专政国家的财政，都是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而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都反映着剥削阶级专政国家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不仅具有专政的职能，而且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所决定，还具有有计划地组织与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职能。为了实现这些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财政这一分配工具，筹集和供应资金。筹集资金是把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用税收等形式集中起来，形成财政收入；供应资金是把筹集起来的资金，在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作有计划的分配，形成财政支出。因此，社会主义的财政收支是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关系。社会主义财政不仅体现生产领域以外的再分配关系，而且体现生产领域内的分配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比以往各种社会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义财政分配关系。

财政随着社会阶级的划分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不同性质国家的更迭而发展。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在氏族公社内共同劳动，共同占有产品，平均分配；当时虽有分配关系，但没有财政。原始社会末期，尤其是到了奴隶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剥削，产生了国家。当国家出现以后，同时也出现了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集中分配一部分剩余产品的财政关系。在财政关系出现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决定财政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财政收入看，最初的财政收入只能是来自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一土地，财政收入的形式也是由土地所有制决定的。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下，地租与税捐合为一体，不再另外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税收。封建社会虽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逐步发展和扩大，随之也出现了不同税源和不同课征对象的多种税收。现代资本主义财政的主要收入形式是所得税，而所得税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从而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利润、地租三种基本收入的产物。从财政支出看，任何国家的财政支出，都不能超越由该国经济条件决定的一定的客

观限度。从各个年度看可能有升有降，但从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趋势看，则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即支出的额度直接受收入规模所制约，而收入的规模又是由生产发展水平决定的。从财政同货币的关系看，财政收支是采取实物形式还是采取货币形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物征收是以封建制为基础以自然经济为前提的，而货币征收则是以商品货币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的征收形式。在以农业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财政货币化的程度虽然逐步扩大，但在全社会范围的货币化，只有到了商品货币经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财政具有三项经济职能：①配置的职能。政府通过支出和税收等措施，决定或影响资源配置的数量和方向。②分配的职能。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并改善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分配，改善分配状况。③稳定的职能。政府通过预算收支调节总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我国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以后，财政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发挥调节作用。①调节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其中主要是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②调节国家与企业、集体、个人的分配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③调节或提高社会经济效果。

财政学 是研究财政规律的一门科学。资产阶级财政学体系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列述了政府支出、收入和公债，把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来研究，首创了资产阶级财政学。至今两百年来，资产阶级学者对财政和财政学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①财政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管理，从而财政学就是政府收支管理的科学。②财政是货币事务及其管理，财政学则是研究货币事务及其管理的学问。③财政是公共部门经济，财政学是公共部门经济的科学，尤其着重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④财政学不仅论述公共部门经济，而且包括公私部门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综观现代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发展，虽仍不外收入、支出、公债、预算等几个范畴，但资产阶级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已远远超过了"财政收支管理"和"货币资金管理"的范围，扩大到公共部门经济（甚至论及私有部门经济）的实证的和规范的分析，其理论基础的出发点为"财政的经济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和"社会经济福利准则"（效率准则、公平准则）。这些基础概念，是现代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贯彻到财政学的整个体系。

马克思主义财政学研究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国家集中分配一部分剩余产品的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时，提出了财政学的科学体系和科学方法。指出，财政是一个分配问题，分配的对象是生产过程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产品价值。社会产品脱离生产过程以后，必须经过价值分配与商品交换相交叉的实现过程，因而财政分配与商品交换紧密相联。财政又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最终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因此，必须从社会再生产出发，即从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统一、各个分配环节的统一、价值与使用的统一，来研究财政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科学体系是一件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

财政信用 即国家信用，是指国家财政按照信用原则，采取有偿方式，筹集资金和调节社会资金的一种借贷方式。财政信用的资金来源包括：国债（内债和外债），预算内安排的有偿使用资金，预算外资金中可以动用的部分，财政的间歇资金，部分社会闲散资金，财政发放贷款收回的利息和资金占用费等。财政信用的资金运用包括：支持重点企业和出口创汇企业的技术改造，支持新产品开发，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支持农业扩大再生产，支持商业网点改造，支持地方公用设施建设，支持风险性行业的发展，支持旅游开发、劳务承包、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发展。

财政信用对国民经济具有五个方面的调节功能。①调节财政收支。在财政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当财政年度内发生临时性或季节性的收不抵支时，可发行短期债券来弥补；如果根据发展规划或战争需要，若干年内将出现财政收支不平衡，则可采取发行中期或长期公债的办法。这样，把社会闲置资金变为集中性资金，化暂时无用之财为有用之财，措调不急需的资金以应国家急需，既缓解了增税的压力，也为闲置资金找到了投资的场所。②调节积累和消费。在积累与消费失调而财政本身力量不足或无力调节时，可利用财政信用进行调节。当消费需求不足时，可利用财政信用进行调节。当消费需求不足时，国家可通过财政信用，把从社会各方面吸收来的闲置资金，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公共投资，从而增加就业和消费；当积累需求不足时，则国家可通过财政信用，把吸收来的闲置资金，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生产投资，从而扩大建设规模，增加生产。③调节供给和需求。当供需不平衡时，国家把筹集到的公债收入按照计划分别用于急需的和适销对路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上，以增加供给；也可用于各种公共设施，以增加就业，增加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实现对供给和需求的调节。④调节银行信用。当银行信用膨胀，货币流通量增多，物价不断上涨时，政府可以利用财政信用吸收社会闲置资金，使膨胀的信用趋于紧缩。⑤调节

外汇收支。国家可借助财政信用、向国外发行公债、举借外资，弥补本国外汇之不足；还可以向国外投资和购买外国债券，以取得赢利和债息，增加一国的外汇积累。

发展财政信用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既是健全国家宏观间接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集中财力、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从中国目前的财政状况看，发展财政信用可以拓宽理财领域，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困难；同时，也可以增强用款单位的效益观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使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政发行　为弥补财政赤字而由国库发行强制行使的国库券等各种形式的货币。这种发行意味着从经济周转中取走社会产品归财政使用，对经济发展来说是消极的因素；同时，投入流通的纸币除了国家通过征税等途径予以回收外，则只能停留在流通之中成为破坏货币流通稳定的因素。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国家财政发生赤字已经不再由国库直接发行纸币，而主要是通过由银行系统承购的途径发行国债或向银行透支，从而是通过银行信用程序进行的。由此投放到流通中的货币，不论是增发的现钞还是增多的存款，都是银行的负债，已经失去信用投放和财政投放的痕迹。

财政透支没有经济增长为基础，完全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我国预算的原则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在一般情况下，预算不出现赤字，也不出现财政发行。但如果财政在银行有大量透支，直接占用银行信贷资金，或企业把银行贷款用于财政性开支，造成银行信贷收支不平衡，由此而发行的货币发行，也属于财政发行的性质。此外，没有物资保证的短期贷款和超过可以用于长期投放的信贷资金来源的长期贷款，尽管是由银行发放的，但按其性质也属于财政发行。由财政发行而增加的纸币往往成为超经济需要的过多货币量，导致市场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

财政制度　指财政收支活动的规范和所采取的形式。财政制度包括收、支及其管理等各方面的制度。从历史上看，财政制度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它以国家政权为依托能够对经济发展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旧的财政制度逐渐由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变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新兴的阶级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摧毁和变革旧的财政制度，建立新的适合自己阶级需要的新制度，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从而推动历史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财政制度，主要包括国务院的有关财政工作的规定，财政预算管理制度，企业财务制度，工商各税、农业税，基本建设财务制度，农业财务制度和社会文教行政财务制度等。这些财政制度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的贯彻执行，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地区、单位和个人严格遵守财政纪律，有保证地积累资金、合理地分配资金和使用资金。

财政体制　指国家、集体和个人分配剩余产品的具体形式，体现各个财政主体的权力和利益的相互关系及运行规则。财政体制由四个因素构成：①参与分配的财政主体。②分配的形式。分配形式体现各种经济主体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条件，与经营形式密切相关。③分配的比率。它构成财政体制的主要矛盾，该比率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各个财政主体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优势。④利益和责任的制约关系。在财政体制中权力和责任是不可分的，各个财政主体在得到财权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它所承担的责任。财政体制依据客观存在的财政关系确定财政主体，规定具体分配形式和分配比例，明确各个财政主体的权力和责任规范，构成了财政运行机制。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财政体制有不同的性质。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财政体制反映的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以及剥削阶级内部，国家与各剥削阶级集团之间，各剥削阶级集团之间，在掠夺和瓜分剩余价值方面的矛盾。因此，在资本主义各国，其财政分配体制上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劳动人民之间，劳动人民与国家及各级政府之间，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财政体制反映的是国家及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国家与企业之间，在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分配活动中，责、权、利协调一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调节好财政分配中各方面的责、权、利关系，是财政体制的根本使命。

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频繁的变化过程，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①高度集中式的分级管理时期；②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时期；③重新强调财政集中管理时期；④再次扩大地方和企业财政自主权的改革时期。这一变化过程表明，几十年来，我国财政体制基本上是在统收统支的范围内，围绕确定支出基数划分收入的形式而变化；财政收支基数是随着企业事业隶属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逐渐缩小了统收统支的范围，使相当大一部分剩余产品变成预算外的收入，降低了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所占的比重。因此，财政体制改革应注意协调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正确划分财权与事权，依法规范和科学核定收支基础，使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在责权利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财政政策 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的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财政政策具体包括财政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效应三方面内容。

财政政策目标是国家（或政府）通过预定的财政措施的实行所期望达到和实现的目的，是财政政策中具有决定意义和核心作用的实质性内容。影响财政政策目标的因素主要有四个：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财政政策目标的最终归宿。财政政策目标及其实现为哪个阶级服务，这是由所有制性质决定的。②国家的职能制约着财政政策目标的范围。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国家的性质及其职能的变化决定着财政的职能及其变化，也制约着财政政策的目标。③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着财政政策目标的大小及实现程度。④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还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政府总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条件，确定适当的财政政策目标并制定某一时期的重点目标。

财政政策工具是为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所选择的组织方式和操作方式，也可以说是为实现既定政策目标所选择的具体途径或具体实现的方式方法。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所需要的，二是政府可以直接控制。在现实经济中，可供选择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税收、公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预算和折旧等。政府为达到一定的财政政策目标而对不同财政政策工具进行的操作，就是财政政策措施。政策措施是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有机结合，它通常表现为在一定目标下多种财政政策工具的混合运用。

财政政策效应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有效作用；二是在财政政策的有效作用下，社会经济作出的反应。财政政策在其作用过程中主要产生五种效应：①"内在稳定器"效应。指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自动发挥作用，使宏观经济趋向稳定。表现在累进的所得税制和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②乘数效应。指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以及税收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程度。③奖抑效应。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各种奖惩措施、优惠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某些地区、部门、行业、产品及某种经济行为予以鼓励、扶持或者限制、惩罚而产生的有效影响。④货币效应。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投资、公共支出、财政补贴等本身形成一部分社会货币购买力，从而对货币流通形成直接影响，产生货币效应；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在公债上。公债政策的货币效应又取决于公债认购的对象和资金来源。⑤社会效应。指财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在社会上（包括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引起的反响。

财政政策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分类。①按财政收入、支出和管理活动分，财政政策可分为税收政策、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信用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国有资产政策等；②按财政收支活动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分类。财政政策可分为总量政策和个量政策（或结构政策）；③按财政政策的长短期目标分类，可分为长期财政政策和短期财政政策；④按调节方式分类，财政政策可分为自稳定政策和相机抉择政策；⑤按政策调节客体分类。财政政策可分为存量财政政策和增量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 也称"预算赤字"，指在年度国家预算或决算中，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在会计报表上，一般用红色字体表示，故称。

从赤字产生的历史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虽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极力主张"廉价政府"、保持收支平衡，但当时也已出现了财政赤字。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根据其有效需求理论，公开鼓吹赤字财政政策，主张由国家出面干预经济，扩大政府开支，以刺激投资，繁荣经济，由此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货币和举债来加以弥补。这一套政策主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所采用。中国在处理财政收支问题上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不打赤字预算。但在历年的财政决算中，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也曾多次发生赤字，这主要是由于在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过程中决策或计划发生失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建设规模超过客观的财力物力可能，以至经济发展出现暂时的失调现象所造成的。

在不同国家的财政实践中，财政赤字有不同的测定方式。我国的财政预算实行单式预算，财政赤字是政府将某个财政年度内经常性收入和债务收入结合起来，减去相同财政年度内的财政支出得出的支大于收的差额。这种赤字也称"小口径赤字额"或"硬赤字"，它反映了经济体制特别是财政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性和政府经济行为的高度垄断性。其公式为：

财政赤字（盈余）＝经常性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性支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则不把债务收入列为正常的财政收入，而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

来源，或作为特定财政年度赤字的表现形式或存在形态。因此，财政赤字是指政府在特定的财政年度内经常性收入与经常性支出的差额。这种赤字一般称之为“大口径赤字额”或“软赤字”。它表明了赤字依托于一定财政年度内的债务形式，经济体制（包括财政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分散性，政府经济行为具有灵活性。其公式为：

财政赤字（盈余）＝经常性收入－经常性支出(2)

在特定的财政年度内，如果不将债务收入视为经常性收入，也不把债务支出归属于经常性支出，债务的自身调节和削减均在债务收支表范围内进行，则可以得出计算财政赤字的第三种公式。它是结合财政收支与债务收支而形成的：

财政赤字（盈余）＝经常性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性支出－债务支出
＝（经常性收入－经常性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　(3)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不仅赋予了政府组织财政收支和债务收支的职能，而且赋予了政府参与信贷收支平衡的功能。政府通过财政信用的形式可以完全介入信贷收支活动；通过财政存款或金库存款的形式充实信贷资金的来源；通过财政借款调节财政收支的平衡而暂时改变信贷收支的运行。这样，可以得出测定财政赤字的第四种公式：

财政赤字（盈余）＝经常性收入＋债务收入＋政府所特有的货币增量－经常性支出
＝（经常性收入－经常性支出）＋（财政存款－财政借款）＋债务收入　(4)

公式表明，在一定的财政年度内，可以通过信贷收支来校正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可以通过两种以上的渠道，即银行信贷渠道（透支）和政府债务渠道。

另外，测定财政赤字必须在整个社会的货币收支过程中进行。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债务收支都是货币收支活动的重要内容。用政府所持有的货币增量部分对公式（2）和公式（3）分别进行信贷校正，又可得出其他两种类型的测定财政赤字的公式：

财政赤字（盈余）＝经常性收入－经常性支出＋政府所持货币增量　(5)

财政赤字（盈余）＝（经常性收入－经常性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政府所持货币增量　(6)

在社会主义财政活动中，还往往存在一种隐蔽性赤字，即表面上有结余或平衡，而实际上有缺口的预算或决算。这种情况是由于预算和决算收支不实，虚收短支造成的。虚收是指财政帐面上的收入与真正的收入不一致，帐面收入大于真正收入，存在着没有实际物资保证的收入。短支是财政帐面上的支出与实际必须支出的数量或实际已支出的数量不一致，帐面支出也少于实际支出，存在着已经开支而没有列支的支出。这样，用夸大收入和缩小支出的办法形成的财政收支平衡或收支节余，很显然是虚假的，如果把这些收入与支出落实了，就会立即出现赤字。隐蔽性赤字和公开性赤字一样，都会导致社会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造成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国民经济计划受到冲击，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财政赤字对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消积因素。

财政补贴　指在某一确定的经济体制结构下，政府支付给企业和个人的，能够改变既有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无偿支出。财政补贴按政策目的分，有价格补贴、亏损企业补贴、房租补贴和税收补贴等；按受影响经济活动分，有对生产的补贴和对消费的补贴；按接受主体分，有对企业的补贴和对个人的补贴；按受补者的感觉分，有明补和暗补两种形式。

财政补贴是财政调节经济过程派生的一种形式，是财政调节经济的特殊手段。它的调节作用具有两个特点：①覆盖面宽、选择性强。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是原生的职能，因此，它的调节作用范围没有界限，它能够覆盖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因而它也就可以选择任何对象进行调节。②调节作用具有单向性。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只局限在被调节的客体上，一般不会发生向调节客体相关方面弹跳现象，它是通过国家以被调节对象单方面给予利益的形式来实现调节作用，并不直接影响与之相关方面的利益。

财政补贴手段的使用程度，受财政负担能力的限定。在运用财政补贴手段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财政承受能力的限度，无限制地使用，就会给财政带来拖累，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财政承受补贴支出能力又是由财政收支数量变化规律决定的。财政收入客观可行限量和财政维持性支出客观限量、以及财政发展性支出最低限量，是制约财政对补贴支出承受能力限度的基本因素。财政收入可行限量扣除财政维持性支出客观限量之余额，就是财政所能承受补贴支出总量的最大限度。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还应扣除财政发展性支出最低限量，即与生产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发展性支出数量之后的余额，才是可行的财政补贴支出的客观限度。

在我国现阶段，财政补贴主要指国家对经营粮

食、蔬菜、肉蛋、水产、农药、化肥等人民生活必需品，支农产品和某些其他产品的国营企业，由于价格制度的原因发生政策性亏损时所给予的资金补贴，也包括对城镇居民的住宅补贴和物价补贴。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价格改革和价格体系的逐步合理，应制定合理的标准，调整补贴环节，实行定额管理，逐步缩小补贴范围，减少补贴金额。

财政透支 财政出现赤字以后向银行借款来弥补，而借款额超过其在银行的存款额的一种银行放款办法。

财政赤字向中央银行透支具有世界普遍性，而且，从透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财政赤字靠中央银行透支弥补的比重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财政向银行借款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短期借款主要是解决年度中先支后收的矛盾，长期借款则是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我国建国以后，财政上大部分年份是结余，至于发生赤字的年份，主要是动用财政结余或举债来弥补，有时也开始向银行借款，特别是80年代以来财政向银行借款或透支有所增多。财政向银行借款或透支，如果是在年初编制预算时通过财政与信贷的综合平衡有计划安排的，那么这种形式的放款是有物资保证的，它是用一部分信贷资金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从而是财政与信贷的综合平衡所允许存在的一种形式。财政向银行借款或透支如果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临时采取的措施，当信贷资金没有结余，或结余不足以满足透支需要时，银行不得不扩大贷款指标或通过增发货币加以弥补。由于银行增发的货币没有相应的物质保证，必然会导致社会购买力超过商品可供量，引起市场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因此，在安排财政计划时，应坚持量力而行，积极组织财政平衡，不打赤字预算。

财政资金 是指国家预算所筹集、分配和使用的资金。在我国，根据规定筹集的预算外资金，也属财政资金。它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纯收入，此外，还有一部分农业税和其他的工商业税的收入等。财政资金由国家统一筹集和分配。它与信贷资金的不同特点是：取得信贷资金需要按期偿还，取得财政资金无需偿还。

财政周期 指财政收支结余的波动周期，即财政赤字和盈余的循环时期。由财政收入周期和财政支出周期共同作用而形成。决定财政收入周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波动的周期。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民收入，因此，经济波动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财政收入变动的方向，当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时、财政收入也随之增加；反之，则下降。二是国家与企业的分配体制。在不同的分配体制下，国家财权集中和分散的程度不同。集中与分散的选择往往导致财政收入较大的变动。财政支出周期同财政收入周期相联，特别是坚持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原则条件下，财政支出在变动的方向、速度和规模上基本与财政收入保持一致。同时，财政支出周期又受投资支出的影响。财政支出的扩张和收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投资支出的扩张和收缩引起。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财政周期可以从适应经济周期转变为反经济周期：当经济高速增长时，适当控制财政支出的速度，允许财政收支出现一定规模的盈余；当经济增长缓慢时，则适当用盈余来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相应地，财政收支便由坚持当年平衡转变为周期性的平衡。

财政效果 是指财政分配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益之间的比较关系。具体包括财政分配活动的比例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的数量关系。财政分配的比例性，指财政资财集聚及财政资财的支拨结果合乎客观数量界限的程度，以及各项社会共同需要满足的状况。财政分配活动的有效性，指一定的财政资财的耗费，其所完成的社会共同事务的数量和质量。财政分配的比例性及财政资财耗费的有效性的统一，构成财政效果的内涵。财政效果这一质的规定性，是由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必须注意劳动分配的目的性与劳动消耗的有效性程度的客观要求决定的。

财政效果具有四个特点：①总体性。财政的每项收支，都涉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涉及中央与地方、国家与部门、国家与各个企业和事业单位，涉及各阶层，各阶级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着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切方面；②多样性。社会共同需要包括生产建设需要，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需要，社会行政管理需要和国防安全保卫需要等。财政效果要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财政的综合效果只能从观念形态上加以概括。从指标上看，它只能是一个指标体系，而不能用任何一个单一的指标来评价。③多层次性。这是由社会共同需要的多层次性决定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层次性，使财政分配活动产生层次性，从而形成财政效果的层次性，形成了社会总财政效果，中央财政效果，地方财政效果等。④外在性。财政效果在许多情况下，要借助财政分配活动的直接效果之外的，各相关因素的效果表现出来。

财政效果的评价方法。

1.财政资财集聚效果的评价方法。可先找出财政收入的客观数量界限，把财政收入实际形成量 S_U 与

财政收入客观限量K_S相比较，这种比较可用偏离度P_l表示；再根据财政收入的客观数量界限，比较财政资财集聚过程中的劳动耗费量X_O与形成的财政收入量S_U。公式分别为：

$$P_L=\frac{S_u-K_s}{K_s};\qquad \frac{X_0}{S_u}\text{ 或 }\frac{S_u}{X_0}.$$

2.财政资财支拨效果的评价方法。一般用需要平均满足程度指标$\overline{M}_d$表示，它由各项需要N和各项需要的满足度md的比较表示；也可用财力配比平均偏离度$\overline{P}$表示，它由各项需要量与财力实际供给量之比P和各项需要N的比较表示。公式分别为：

$$\overline{M}_d=\frac{\sum_{md}}{N}\times 100\%;\qquad \overline{P}=\frac{\sum P}{N}.$$

3.财政资财支用效果的评价方法。财政资财的支用过程主要由执行社会共同事务的各职能部门来实现。各个部门从事的社会共同事务的具体性质不同，其财政资财支出的成果也就表现各异。研究财政资财支用效果时应分类进行。

①基本建设支出的财政效果。主要由回收期指标表示。以T表示回收期，K表示投资总额，M为预计项目建成投产后的年平均收益额（税金及利润），其公式为：

$$T=\frac{L}{M};$$

②科学事业费支用的财政效果。一般以科研成本费用K与科研成果的价值量G进行比较。公式为：

$$\frac{G}{K}\text{ 或 }\frac{K}{G}$$

③教育事业费支用的财政效果。一般以教育事业费用量F_g与教育的最终产品量，即培养出合格的学生量W相比较，并用培养出的学生种类和数量符合社会需要的系数A加以调整，公式为：

$$\frac{WA}{F_g}\text{ 或 }\frac{F_g}{WA}\quad;$$

④卫生事业费支用的财政效果。主要以万元费用形成住院治疗员容纳量指标表示。这一指标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以卫生事业费支出总额F_w与形成病床张数B_n比较；一种是以费用总额与年实际容纳病员人数B_i比较。公式分别为：

$$\frac{B_n}{F_w}\text{ 或 }\frac{F_w}{B_n},\quad \frac{B_i}{F_w}\text{ 或 }\frac{F_w}{B_i};$$

⑤行政管理费支用的财政效果。行政管理费按内容看包括两类：一类是社会经济管理的费用；一类是社会行政管理的费用。前一类费用支出的财政效果表现为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可通过费用与国民经济效益的比较来评价；后一类费用支出的财政效果表现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及安全程度的提高，原则上可以通过费用与秩序度和安全度的比较来评价。

⑥国防事业费支用的财政效果。主要由两项指标来表示：一是单位战斗力平均费用量指标H，它由费用总量D和战斗劳动力量E的比较表示；一是战斗力装备率指标R，它由综合装备量S和战斗劳动力量E的比较表示。公式为：

$$H=\frac{D}{E}\quad,\quad R=\frac{S}{E}.$$

财政年度　亦称"预算年度"。国家预算收支起迄的有效期间，通常以一年为标准。许多国家的财政年度采用历年制，即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如：中国、瑞典、法国和苏联等国家都采用历年制。也有不采用历年制，而采用跨年制的，如美国的财政年度，从10月1日起至下年9月30日止；意大利的财政年度从当年7月1日起至翌年6月30日止；英国和日本等国的财政年度则从当年4月1日起至翌年3月31日止。采用历年制的财政年度与当年日历相同，如1988年1月1日开始的预算，称1988年度预算，采用跨年制的则使用起迄两个年度作为预算年度，如1988年7月1日（或4月1日）开始的预算，称1988—1989年度预算。

财政关税　又称"收入关税"，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而征课的关税。通常多选择本国不生产而又无代用品的消费品作为课税对象。财政关税的税率比保护关税低，过高就会阻碍进口贸易的进展，达不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财政关税已逐渐为高税率的保护关税所代替。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有征收财政关税的。

财政包干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中执行过的一种具体管理办法。从1971年起，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预算收支指标，经中央核定后由地方包干负责完成。在预算支出中。除一些专款专用项目外，支出都可以由地方统筹安排，调剂使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除中央对地方增加新任务外，一般不作调整；收入超收或支出结余，都归地方支配使用。如果发生短收或超支，由地方自求平衡；遇有重大特殊问题，自求平衡有困难时，须报经国务院批准，方可作适当调整。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特殊照顾。

财政结余　国家年度预算执行结果，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在我国，财政结余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银

行的财政性存款，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相应的未动用的物资。我国在编制年度国家预算时，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为原则。因为财政略有结余，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收支实现的程度和时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往往会出现一些事前难以预料的变化，从而打破原计划的收支平衡。因此，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各经济主管部门，增加生产，节约开支，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

财政制裁 国家财政机关对部门、单位或个人违反国家财政政策，法令、制度、纪律的行为所进行的经济处理。其办法包括课征滞纳金、加重征税、罚款，没收非法资财，退赔赃款、赃物，通过银行强行扣缴应缴国家的财政收入，停止或追回不应拨付的财政资金，扣减奖金或津贴，等等。财政制裁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资财的完整，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同时，使财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国家严格财政监督、加强财政法制的一种重要手段。

财政统计 对于财政分配活动中数量和质量辨证关系的数量反映。它是整个综合经济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统计是根据各种财务、财政报表资料，通过研究财政资金运动中的各种数量指标，如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产值、每百元销售额提供的利润、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资金利润率，等等，反映财政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及其经济效益的变化规律；反映国家同各方面财政分配关系的变化情况，为国家制定财政方针、政策、制度、措施提供参考资料，为提高管理财政的水平服务。

财政后备基金 国家在一定财政年度内，有计划地分配一部分财政资金作为专项货币基金，用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其它一些临时性的特殊需要。通过国家预算建立的财政后备基金，包括国家总预备费、预算周转金和历年财政节余等项。国家预算总预备费包括中央预算预备费和各级地方预算预备费，它是当年的机动资金，可以动用，但一般不宜轻易动用。预算周转金是为了平衡季节性收支，暂供周转之用的资金，只能作垫付之用，年终要恢复原数。财政结余也是一种财政后备，动用时须慎重考虑，否则易引起信贷、货币和物资的不平衡。因此动用财政结余必须结合信贷收支、货币流通和物资供求状况进行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建立必要的财政后备基金，在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收支平衡 预算年度内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总量相等。计划年度内，在预算执行中对财政收支平衡的要求是：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并要略有结余。财政收支平衡反映了国家计划年度内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财政收支矛盾运动规律的客观要求；财政收支平衡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准则；财政收支平衡表明了国家财政分配与国家物资分配相适应。只有财政收支达到平衡，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财政收支矛盾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出现财政赤字。财政收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财政收入，所以为保证一定时期财政的收支平衡就必须努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合理控制费用的使用，尽量保证计划年度内财政分配的社会产品或国民生产总量，不超过财政可供分配的社会产品或国民生产总量，以求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财政收支平衡包括：国家预算收支平衡和预算外资金平衡两个部分。国家预算是国家有计划地集中和分配资金的重要工具，因此，国家预算收支平衡在财政收支平衡中占主导地位。国家预算收支平衡影响和制约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收支平衡，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起着决定性作用。预算外资金是国家预算资金的补充，因此，预算外资金收支平衡在财政收支平衡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必须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要坚持预算外资金同预算内资金综合平衡的原则，统筹安排，保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平衡，以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财政性存款 各级财政部门及以财政拨款为其经费或支出的单位存放于人民银行的资金。包括：(1) 国库存款，人民银行代理国库，办理财政收支的出纳业务。在执行过程中，收大于支的部分构成国库存款。(2) 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由地方各财政部门具体掌握。(3) 部队存款。(4) 行政、事业单位存款，包括农业银行县支行及其在县城内机构吸收的行政、事业单位存款。(5) 基本建设存款中属于财政性存款的部分。财政性存款是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逐渐扩大，已达到预算内资金的 90%以上，所以财政性存款近年来也日益增加。在以上五类财政性存款中，只有国库存款可由财政部进行直接的有计划的支配，而后四类财政性存款，却经常不是由财政直接支配的，而是

由各具体使用单位来支配使用的，财政部门只能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手段加以调节。

财政超收分成 超额完成国家财政收入任务的地区、其超收部分，按一定比例留归地方作为机动财力，自行安排。这是鼓励地方积极组织收入，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收入计划的一项重要措施。从1972年起，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超额完成中央核定的预算收入任务的份额中，按一定比例取得分成收入。如超收不满一亿元的，全归地方使用，超收一亿元以上的，其超过一亿元的部分，50%留给地方，50%上缴中央，由中央用于各地区之间的调剂，进行必要的综合平衡。从1980年起改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具体办法将相应地改变。

财政政策准则 是政府财政活动所遵循的规范。西方对财政政策准则主要有四种看法：①年度平衡预算准则。是指政府预算在12个月期间的总收入与总支出必须相等。这个概念为古典学派所倡导，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均为政府财政活动奉为标准。②机能财政准则。是用经济机能或经济效果作为判断财政措施的原则，认为政府预算只要是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无需财政平衡。政府预算的首要目的是提供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即经济平衡。机能财政所产生的大量公债不同于私债，政府有征税的权利，可筹措资金以弥补赤字；同时，经济发展了，税收会自动增加，赤字对促进国民生产净值平衡产生良好的效果。③周期平衡预算准则。这一准则发挥了政府反危机的作用，又可使预算平衡，预算不按年度平衡，而是在经济循环的前提下实现平衡。在经济萧条期间，政府应减少税收，增加支出，有意识地使其产生预算赤字；在通货膨胀加剧时，政府要增加税收，紧缩开支，有意识地使其发生盈余，利用通货膨胀时期的预算盈余以弥补经济衰退时期的政府赤字。④高就业预算准则。指在实现充分就业条件下，预算所可能提出的政府实际支出、计划和税率，它是建立在财政自动稳定因素的基础上，坚持稳定预算原则，特别强调税收和支出的自动调节。在现实经济中，上述各项准则也可以综合加以运用。

财政运行机制 一般指一定财政体制下财政总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制约、有机结合和自动调谐所形成的内在关联的运行方式，是社会经济机制的特定的组成部分。

财政运行机制是财政机体各组成部分功能运行的综合表现，它主要由五个系统构成：①财政分配机制，包括以企业财务为基础的初次分配机制，以国家预算为主导环节的再分配机制和以财政信用为补充的市场分配机制，构成财政运行机制的主体和基础；②财政利益机制，包括财政体制利益机制、财政政策利益机制和财政效益利益机制，构成财政机制的动力和纽带；③财政平衡机制，包括财政资金供需平衡机制、财政利益平衡机制和财政收支平衡机制，是财政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④财政调控机制，从对象分有宏观调控、中观调控和微观调控，从方式分有计划调控和市场调控，从手段分有政策调控、体制调控和杠杆调控，是保证财政运行目标的重要手段；⑤财政约束机制，包括法制规划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和行为约束机制，它保证财政运行的合理性和规范化；⑥财力增长机制，包括生财机制、聚财机制和用财机制，构成财政运行机制的目标和结果。

中国传统的财政运行机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基础上，它使财政运行长期局限于收收支支、点钱记帐和分多分少等方面，制约了财政运行机制功能的发挥，传统财政运行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转换财政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整个机制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的全部能量，为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就成为财政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财政运行软化 指国家财政的诸多分配环节出现严重的软化和脱円现象，国家通过财政所体现的意志和方向受到障碍。内容包括：①国家预算软化。主要表现在有的地方、部门和企业把应该纳入国家预算的收入，通过各种手段截留，转作各自的小金库或帐外资金；把应在预算外资金列支的项目在预算内列支。②国家税收软化。表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偷税漏税严重；违反税法规定，层层减免税收；以各种理由截留和拖欠税款。③利润上缴软化。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下，企业往往包盈不包亏，企业利润增长额绝大部分归企业所有，而亏损增长额却绝大部分要由国家财政承担；与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相关联的财政补贴，也增加了国家财政的负担。④企业财务软化。表现在企业财务不按规定结算成本，把应在税后留利中列支的项目在成本中列支；不按规定结算销售收入、成本、税金和利润，通过各种手段，不经销售收入分配，直接归企业和个人所有，减少对国家的上缴。⑤规费软化。表现在有的部门、单位可以自行收费，不受财政府机关约束；收费名目繁杂；绝大部分收费既不上缴财政，也不作收入抵支部分。引起财政运行软化的原因主要有：①缺乏强有力的法制约束，预算管理的权与责得不到有效的统一；②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不受

限制地扩张；③削弱了必要有效的行政监督管理；④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解决财政运行软化问题，对于缓解财政困难，完善和加强财税杠杆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与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财政调控机制 是国家自觉依据客观经济规律，运用财政手段作用于国民收入分配，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有效方式。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财政具有国家权力所有者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因此，财政调控具有权威性和全面性。一方面，财政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依托，可以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向各种经济成份、各方面、各环节、各种行为寻求调控对象，从市场外部通过主体利益的调控，实现对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另一方面，财政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为依托，作为市场主体的一员参与市场活动，运用财政投资杠杆在市场内部对资源配置进行全局性的直接调控。充分发挥财政调控机制的作用，首先应确立财政部门作为财政调控主体的地位，树立正确的全面的财政调控目标和财政调控对象，合理地运用财政调控手段；其次还要培育市场机制，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特别是财务自我约束机制，搞好财政调控机制与其他宏观调控机制的综合配套，使各种机制相互促进和制约，从而推动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协调、高效地运行。

财政支出刚性 指压缩财政支出规模的难易程度。财政支出容易压缩，财政支出刚性就小；反之，财政支出刚性大。按支出刚性的大小可以把财政支出分为三类：第一类支出主要是直接和扩大再生产有关的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拨款、流动资金、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费，以及支援农业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拨款和流动资金等项目。其中基本建设拨款所占的比重最大。由于这类支出不会直接妨碍现有生产能力的发挥，可压缩的余地较大。因此，这类支出的刚性最小，表现在当财政困难，赤字较大时，首先压缩这类支出；当财政形势比较好，财政结余比较多时，这类支出率先增加。第二类支出主要是一些公用经费，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中的公用经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中的公用经费，行政管理费中的公用经费和国防费等。这类支出不具有基建拨款那么大的伸缩余地，但又具有一定的可压缩性。因此，这类支出的刚性比第一类支出要大一些。第三类支出主要是关系到居民个人切身利益的财政支出项目，包括各类事业中的人员经费、价格补贴、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以及用于还本付息的债务支出。由于这类支出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压缩余地很小。因此，这类支出的刚性最大。在一定时期的财政支出结构中，上述三类支出所占的比重互为消长，由此影响到整个财政支出刚性的大小，并进而决定了控制财政支出目标的难易程度。

财政发展战略 是国家在较长时期有关财政的全局性部署与决策。财政发展战略应包括：财政宏观调控发展战略、财源发展战略、财政收支结构与管理发展战略、财政体制发展战略、区域财政发展战略等主要内容。

财政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看，经济发展战略是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它对各个具体部门的发展起着指导和制约的作用。财政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的。在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部署的安排、战略措施的选择上，财政发展战略都应与经济发展战略协调一致，否则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从经济与财政的相互关系看，经济发展战略制约着财政发展战略，财政发展战略的实现又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从财政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作用看，它在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之下，从国家财力分配的角度，对其他部门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经济发展战略与财政发展战略之间既存在着全局与局部、指导与服务的关系，同时又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只有在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制定出相应的财政发展战略，才能使财政工作的发展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

制定财政发展战略要适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财政体制是政治体制同经济体制的结合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变化，必然影响到财政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又必然受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需要财力的支持和配合，财政资金的筹集和使用都要为实现政治、经济任务服务。

财政收支与货币流通 在现阶段，世界各国的财政收支主要是货币形态的收支，因此，财政收支自身构成了货币流通的一个部分。由于财政收支是整个货币流通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部分，它对货币流通全局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财政以货币形式集中了收入，无论来自企业还是个人，都意味着财政掌握了相应的商品支配权；财政货币形式的支出形成社会购买力，也相应要从流通中取走商品。财政收支是否平衡、收入是否可靠、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货币流通是否正常。在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由财政所形成的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是适应的，它不会对整个货

币流通产生不利影响。假如财政收支有结余，还可对其他原因引起的货币流通不正常起到缓冲和调节作用。如果财政收支不平衡，发生了赤字，就是财政支出形成的购买力大于应由财政支配的商品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货币流通的不正常。财政收入是否可靠也对货币流通量产生影响，如果在一个时期存在大量的虚假财政收入，尽管财政收支是平衡的，它也会对货币流通产生不利影响。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即财政支出中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积累中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的比例是否与物质资料供应量在结构上相适应，也会对货币流通产生影响。在一定时期，尽管财政支出总量上是平衡的，但由于支出结构不合理，积累过大，不但会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引起流通领域紊乱，出现有钱无物，或有钱买不到所要求的物资。财政收支与货币流通的关系还表现在财政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因为财政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一个来源，而现代社会货币都是通过银行信贷程序投放到流通中去的，这就说明，财政存款为银行投放有物资保证的信贷或货币，是适应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求的。如果财政收支出现赤字，靠发行公债不能弥补而要向银行透支来弥补，会直接导致银行提供虚假的无物资保证的信用，导致货币流通量的扩大。为要使货币流通正常化，必须做到财政收支的平衡，或略有结余。

财政信贷物资综合平衡　指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通过合理安排财政收支、信贷收支与物资供求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产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货币资金运动与物资运动互相协调适应，以实现全社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全面平衡。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1) 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平衡。这是货币资金运动内部的两种资金之间的衔接和平衡关系。一般认为，财政收支平衡是信贷收支平衡的前提。因为财政金库存款本身是信贷资金的一个来源。在传统体制下，财政每年还要拨付信贷资金，是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果财政出现赤字，不但不能给银行提供信贷资金，反而有可能向银行透支，减少信贷资金来源。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财政收支平衡并不必然是信贷收支平衡的前提条件，二者有可能同时平衡，同时不平衡，或者双方有一个是平衡的，而另一个是不平衡的，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各自承担的职责与资金来源如何。如果信贷过多承担了财政应该承担的任务，财政又不拨付流动资金，那么即使财政是平衡的那么信贷也会不平衡．反之，如果信贷资金充裕，即使财政收支不平衡，也不会影响到信贷的平衡。这种分析并不是说这两种平衡之间没有联系，而应该看到各自承担职责和资金来源如何。在安排制定财政、信贷计划时，应该统筹考虑尽量做到各自的平衡，如果有一方面不平衡就应使另一方有盈余足以弥补对方的差额，保证不超量发行货币或不致使信用膨胀，就是二者大体处于平衡状态。(2) 财政、信贷资金与物资的平衡。国家通过财政和信贷的形式把货币资金集中起来再分配出去，形成了社会的购买力，产生了对物资的需求，它必须与国家通过财政和信贷所能支配的物资在总量上、构成上求得平衡。财政信贷是否真正平衡，最终还是要看它们与物资可供总量以及物资结构是否平衡。从理论上说，只要财政信贷收支真正做到统一平衡，物资供应总量与货币购买力之间大体上也应是平衡的。但实际上会有许多复杂情况影响总量上的平衡，如财政信贷计划的失误，不符合实际，财政收入有虚假、流通领域存在大量积压物资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总量上的平衡。即使总量上达到了平衡，由于多种原因，如物资生产与财政收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相适应，信贷资金流转与物资流转不相适应，财政信贷与物资也有可能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要使财政信贷收支与物资供求在构成上平衡，就要求财政信贷支出中形成的对各种物资的需求与各种物资的生产和供给相适应。为了实现三者的平衡，在财政收支和物资供求的安排上，不仅不能留有缺口，而且要留有必要的后备。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得以稳定合乎比例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近年来，理论界有人主张用社会总供需平衡代替以上三者平衡，认为"三平"已不适应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分析的需要。其实"三平"与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分析是统一的，并无矛盾之处，"三平"是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具体化，并且提供了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具体操作方法和实现途径。

财务管理　指贯彻执行国家的财经制度，利用货币形式，对企业各项资金的形成，运用和分配情况进行反映和监督。财务管理的内容包括：固定资金管理、流动资金管理、专用基金管理、销售收入和利润、财务计划管理等。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合理而节约地使用资金、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财务管理所进行的工作是：①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编制和执行财务收支计划；②合理组织产供销各环节的资金平衡，保证和促进企业再生产均衡地有节奏地进行；③处理好各方面的责权利关系，实行资金分管成本控制，建立经济责任制，加强经济核算；④研究和制定节约资金占用、降低产品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的措施和办法；⑤实行全面财务监督、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⑥执行国家的分配制度和有关制度，及时如数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在企业内部正确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财务收支计划　指预计企业在计划期内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及反映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支出、财务成果及其分配情况的计划。根据财务计划和其他有关计划、预算，结合当月的具体情况编制。例如，在工业企业里，主要根据当月的生产作业计划、材料采购计划、费用预算和产品销售计划等编制。工业企业的财务收支计划一般包括：固定资产计划、流动资金计划、专项资金计划、销售收入计划、利润（或亏损）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总表等。商业企业的财务收支计划一般包括：流动资金计划、商品流通费计划和利润（或亏损）计划等。财务收支计划按时间划分，可分为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季度财务收支计划、月度财务收支计划。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是总括反映企业全年财务规模和生产经营的财务成果、规定企业同国家预算的缴拨款关系。季度财务计划是年度计划的执行计划，是年度计划的具体化，对年度计划的实现起保证作用。财务收支计划能以货币形式综合反映计划期企业生产经营财务收支的情况，是企业方面生产经营活动的反映，是进行财务管理、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正确编制和执行企业的财务计划，有利于挖掘资金潜力，堵塞漏洞，促进增产节约，有利于促进企业供、产、销之间和货币收支之间的协调，从而争取增加收入，合理减少支出。

财产清查　也称"盘存"。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经济组织，对其各项财产物资所进行的实物盘点，以及对其债权债务所进行的查询和核对。按清查的范围，有全部清查和局部清查；按进行的时间，有定期清查和不定期清查。编制年度会计报表以前，应进行全部清查。财产清查时，如果发现帐实不符，应查明原因，按有关会计制度，调整帐簿记录，使其符合实际情况。通过财产清查，可以确定各项财产物资、债权债务的实有数，确保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加强财产管理，发掘物资潜力，保障财产物资的安全、提高经济效益。

利率　利息率的简称。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存入或贷出本金的比率。有年息率、月息率和日息率。年息率按本金的百分之几表示；月息率按本金的千分之几表示；日息率按本金的万分之几表示。我国的利息率习惯称为几厘几毫。如年息五厘，即本金100元，每年得息5元；月息五厘，即本金1000元，每月得息5元；日息五厘，即本金1000元每日利息5角。我国规定的利息率多为月息率。资本主义利息率的变动通常取决于以下因素：(1) 在长期内，利息率的变动依存于平均利润率的变动。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利润率愈高，利息率也愈高；反之，也就愈低。在危机时期，利息率也可能高于平均利润率。(2) 当平均利润率一定时，利息率的变动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当借贷资本供过于求，或者借贷资本供给增加，需求不变时，利率就会降低；当借贷资本供小于求，或供给减少，需求不变时，利率就会上升。(3) 国际金融市场信贷资金的供求状况。(4) 受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如贴现率、储备金率政策的影响。利率的变动受到上述诸种因素的影响，其实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是有计划运用、调节利率的变动的，但也必须遵循利润规律，借贷资金的供求规律，以及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供求情况和国内的经济状况，来决定利率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

利率政策　指国家有意识的或有计划的利用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以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利率客观上与经济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时，国家可以利用结构性利率政策以促进短线产品的生产或抑制长线产品或供大于求的产品的生产。如通过优惠利率政策以刺激短线产品生产或支持某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反之对某些产业的贷款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可以抑制其发展，从而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当国家面临着普遍的投资过热或通货膨胀时，可以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以抑制投资，从而也抑制了对投资品的需求。调高利率也可以增加储蓄，推迟人们的购买力，这样可以降低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在一国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调高利率还可以吸引外资的流入，从而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当经济处于相对萎缩阶段，国家可以调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增加对投资品的需求，它同样也可以降低储蓄，刺激消费，从而促进经济走向繁荣。

利率战　西方国家官方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以及其它民间金融机构之间为了本国和本企业的利益，人为调整利息率争夺资金和市场的竞争。本世纪30年代，美国各银行为了争取更多的存款，以增强对外贷款和投资的能力，纷纷提高存款利率，致使筹资成本大大提高，导致30年代的银行危机。50年代初，国际利率战开始出现。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恢复战后经济，需要大量资金，因此不惜以高昂的利率吸引外资。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开工不足，投资需求减弱，过剩资本需要寻找出路，又竞相输出资本。国际利率战日趋激

烈。另外，在国际贸易战中，各国政府也广泛利用利率手段来争夺市场。80年代以来，国际利率战又有了新的特点：(1) 一些国家的政府或企业在对国际资金的需求增加时，就竞相提高利率，以吸引国际游资，用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或财政赤字，或用于增加国内投资；(2) 各国盛行通过调整利率来调节汇率水平。西方国家为扩大资本输出竞相降低利率，或为刺激本国商品出口而提供优惠低利贷款，对资本输入国是有利的。因为这降低了筹资成本。为出口提供的优惠贷款有助于维持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因优惠贷款的利差由政府负担，这将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出现竞相提高利率吸引外资的情况时，资金就会从低利国流向高利国。资金大量外流，就会使资金流出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影响该国货币的稳定。如在国内出现利率大战就会造成国内金融体系的混乱，降低贷款质量，银行利润减少甚至出现亏损，从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利率倒挂 贷款平均利息率低于存款平均利息率的经济现象。当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以利润为直接经营目标的金融企业时，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某项贷款利率低于同期限存款利率的现象，但不会发生各项贷款平均利息率低于各项存款平均利息率的问题。即使有时会出现局部利率倒挂，但不会出现整体利率倒挂的现象。在我国银行既是经济组织，又是代表国家管理有关经济业务的国家机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为了扶持某项事业的发展或为了解决某些现实经济问题（如启动市场），有时实行政策性的利率倒挂。存贷利率倒挂的负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存贷利率倒挂会打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有人会从银行借款再存入银行。以坐收利率倒挂的差额；(2) 不利于借款企业节约使用资金。当存贷利率倒挂时，企业的资金使用会浪费，甚至有货币资金闲置时也不归还银行贷款，引起信贷资金周转不灵；(3) 不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济核算。利率倒挂的情况下，银行吸收存款越多，发放贷款规模越大，则亏损越大，不利于银行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

利率歧视 指银行在贷款或投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不同客户实施不同利率的行为。通常以不同的折扣、回扣或不同的贷款条件等方式，表示利率差别。利率歧视在形式上与差别利率相似，但利率歧视并不是因贷款成本不同而产生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偏倾行为。利率差别本身并不构成利率歧视，只有同类贷款在同时发放而且成本的差别小于利率差别时，利率差别才成为利率歧视。而尽管贷款的成本不同、但在同一时间发放同一类贷款时，却对不同的贷款者予以相同的利率，这也属于利率歧视。利率歧视的经济意义在于：(1) 中央银行通过利率歧视，可控制货币信贷的投量与投向，特别是不同业务性质的金融机构对货币资金的占有，从而实现调整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意图；(2)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利率歧视加强资金的安全性，并通过利率歧视，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公司和企业，使之依附于银行，从而以更有利于银行的方式分享企业利润；(3) 利率歧视的实行会产生严重的反竞争的影响，它会导致顾客在不公平的利率水平展开竞争，并会排斥利率竞争。

利率补贴 亦称"贴息"。贷款到期后借款人只归还本金，或者除归还本金外还偿付部分应付利息，而全部或部分利息由财政部门或其他事业单位支付的特种利息支付制度。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都要求在尽量减少风险的情况下，按市场利率获得既定的利息。对于那些具有较大风险、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经济效益差的项目，大多需要财政投资解决。当国家财政资金紧张，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又相对有余时，国家便要求银行等提供资金帮助，即发放"政策性贷款"。为解决贷款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又较差的矛盾，国家财政便对这种政策性贷款实行贴息制度。财政部门对某些特别行业、企业和产品实行贴息办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 对当时当地特别需要鼓励发展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提供了一种手段；(2) 在经济比较困难的地区可以为借款人减轻一些利息负担，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开发与发展；(3) 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和名优产品的增产。贴息制度的缺点表现在：(1) 淡化了借款人的利息观念，削弱了利率调节经济的作用；(2) 由各级财政补贴利息，会产生一些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从而不利于保证贷款的经济效益；(3) 在财政资金本身较紧张的情况下，会加重财政负担；(4) 当应贴利息不能按期落实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济利益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利率体系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各类利率的总和。利率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利率的管制方法可分为法定利率、限制利率和自由利率；按借贷的主体划分，可分为银行利率、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率、有价证券利率和市场利率；按利率的作用可分为基准利率、优惠利率和普通利率；按期限可分为货币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各类利率之间和各类利率内部都有一定的数量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各类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利率结构。一般情况下，同类利率期限长的利息高

于期限短的利率，风险程度小的借贷主体的利率低于风险大的借款主体的利率；存款利率要低于贷款利率，商业银行的利率要高于中央银行的再贴现利率，市场拆借利率要低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政府债券利率要低于银行的存款利率；普通贷款利率要高于优惠利率。在一定的利率总水平下，各类利率的变动取决于基准利率的变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按借贷主体可分为：银行利率、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率、有价证券利率和市场利率。银行利率分为中央银行利率和专业银行利率。中央银行存款利率有：缴存准备金利率、在人民银行存款利率、农村信用社在人民银行特种存款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有：铺底资金利率、基数贷款利率、年度性贷款利率、季节性贷款利率、日拆性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老、少、边、穷"开发性贷款利率、发展地方经济贷款利率和购买外汇人民币贷款利率。专业银行存款利率有：单位活期存款利率，单位定期存款利率；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率，包括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等存款利率；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专业银行贷款利率有：(1) 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其中有：国营工、商、农、建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城镇集体工商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城镇个体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国营工业结算贷款利率，乡镇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农户贷款利率。(2) 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包括：一般固定资产贷款利率、预算内拨改贷基建投资贷款利率、农村开发性贷款利率、乡镇企业生产设备贷款利率。(3) 各种优惠贷款利率。包括：平价粮油贷款利率、中药材贷款利率、小商品生产企业贷款利率、知青集体企业贷款利率、民政部门福利工厂贷款利率、生产民族用品企业贷款利率、生产民族品集体所有制手工业贷款利率和民族贸易"三照顾"县地方国营商业、中药材（医药）公司贷款利率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率有：农村信用社利率、城市信用社利率、信托投资公司利率、保险公司利率、财务公司利率等。有价证券利率有：国库券利率、金融债券利率、公债利率、企业债券利率和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市场利率有：同业拆借利率、民间借贷市场利率。

利率的罗莎效应 利率的轻微升降会引起贷款者持有政府证券价格的跌涨，从而导致其能提供信用量的减少或增加。利率的这一效应由美国的R·V·罗莎（R·V·Roosa）提出，利率的政策效果长期被经济学家们忽视。1951年，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的罗莎发表了《利率与中央银行》一文。文章指出，利率的政策效果在过去之所以被忽视，其原因在于中央银行重视了利率变化对借款者的影响，只注意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而忽视了贷款者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及其提供信用的可能性。因此，罗莎试图根据贷款者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来证明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罗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金融领域显著的变化，就是负债工具供给的变化，负债工具需求的变化和货币市场的组织和机能趋于完善。这对贷款者有两方面的直接影响：(1) 由于金融机构所持有的政府证券与银行超额准备金之间具有极高的替代性。因此，当中央银行要求提高准备金比率时，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政府证券转移至中央银行。(2) 由于金融机构不再只限于授与短期信用，而将一半以上的资金运用于一年以上的长期放贷和长期政府证券，这使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直接作用于市场利率，从而影响贷款者提供的信用供给量。他断言，政府证券重要性的相对提高以及可贷资金逐渐集中于收益敏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强化了货币市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因此，中央银行通过调节长短期利率，从而影响贷款者可能提供的信用量，能够对整个经济的循环变动产生适当的约束作用。由于短期证券和短期贷款占了贷款者流动资产的绝大部分，而贷款者的行为和预期的变化也来自短期部门。长期利率的变动除了来自短期利率变化以及贷款者对长期利率的预期外，还来自中央银行对长期证券利率的干预。关于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关系，罗莎认为，短期利率的变动对长期利率的变化有一种示范效应，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的小幅度变化都将极为敏感。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的差异可能导致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一般说来，只要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那么，贷款者将其资金作为长期性投放的兴趣将下降。

利改税 中国财政税收制度的重大变革。把全民制企业向国家上交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1983年6月，国务院决定对全民制企业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对有盈利的全民制企业征收所得税，税后余利超过企业合理留利水平的，再上交利润或交纳资金占用费，形成税利并存的格局。从1984年10月1日起，进行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将第一步利改税设置的所得税和调节税加以改进。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面开征。利改税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收形式固定下来，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为使企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创造条件。它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免征额 根据税法，对纳税人的收入或财产价值

课税时，规定其中一部分不予征税的数额。例如我国对工商所得税规定，农村社队企业全年所得额3000元以下的部分不征税，仅就超过3000元的部分征税。又如：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免征额为800元，如果某纳税人的应税所得额为900元，则仅就超过800元的100元部分征收所得税。规定免征额可以照顾纳税人的最低需要，体现税收合理负担的原则。有免征额的按比例征税，带有累进税的性质。

免税法　是指居住国对其居民纳税人来源于境外的并已向来源国纳税的所得，允许从其应税所得中扣除，免予征税。这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解决国际双重征税的办法。免税法包括以下两种形式：①全额免税法，即指居住国对本国居民纳税人课税时，允许从其应税所得额中扣除来源于境外并已向来源国纳税了的那部分所得。这种免税法目前在国际税法实践中已很少被采用。②累进免税法即指居住国从居民纳税人的应税所得中的除其来自国外的并已纳税了的那部分所得额，但对纳税人的其他所得仍适用其免税所得额未加扣除前本应适用的税率征税。就各国的实践来看，采用这种免税方法的国家较多，例如，奥地利、比利时、联邦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士等国都在有关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中采用累进免税法。免税法的实质是居住国对本国居民纳税人的跨国所得或收益，已由来源国按地域管辖权征税的部分，按照一定的条件免予征税，放弃行使自己的居民管辖权。这就避免了两国税收管辖权的交叉行使，使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不致发生。但是，免税法的实用，是建立在居住国事实上承认来源国税收管辖权独占这一基础之上的，其适用的结果必须使居住国的财政利益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居住国采用全额免税法的情况下，如果来源国的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则居住国不仅放弃了对居民纳税人的国外所得的课税权，而且还将减少对居民纳税人的国内所得的课税数额。

私营企业所得税　指对城乡私营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国务院于1988年6月25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自1988年度起施行。私营企业所得税的主要内容：①纳税人。凡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城乡私营企业，都是纳税人。②税率。私营企业所得税依照35%的比例税率计算征收。还规定对私营企业投资者将税后利润用于个人消费部分，按4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③应纳税所得额。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成本、费用、国家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的税金和营业外支出后的余额，为私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④所得税的缴纳。私营企业所得税按年计算，分月或者分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纳税人必须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向当地税务机关编送财务报表和进行纳税申报，并按规定的缴纳期限由纳税人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为了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还实行了鼓励的税收优惠政策。私营企业如果在纳税年度发生亏损，经税务机关批准，允许用下一年度利润抵补。下一年度的所得额不足弥补的，可以递延逐年提取所得继续弥补，但连续弥补期限不得超过3年。

纸币　由国家发行作为法定流通手段的货币符号。它和信用货币—银行券不同，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产生的，而银行券则是从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的。

纸币本身并没有价值或只有微不足道的价值，它代替金银货币来执行流通的职能。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只是充当可以转手的商品交换的媒介。商品交换者所关心的只是它是否能够起到媒介的作用，并不需要知道货币材料本身是否具有价值。马克思说："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独立表现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马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因此，在纸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8～149页）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最初是由磨损了的金银铸币所引起。人们见到磨损了的不足值的金银铸币一样流通，就有意识地发行贱金属铸成的辅币，进而发行本身完全没有价值的纸币来代替它。在西方各国，以纸币形式出现的银行券始于17世纪。那时的银行券是可以兑换的信用货币，并且发行银行要定期将银行券收回，它和现代不能兑换金银的纸币不同。在我国，早在汉武帝时出现的皮币，已具有某些类似纸币的特征。11世纪时，宋金的交子、会子和交钞已是纸币。元、明、清三代还发行过宝钞，后来都成为不兑现的纸币。

纸币代替金银货币来流通，其数量相当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货币量，不论发行多少纸币，它只能代表商品流通中实际需要的金或银的数量，当纸币的发行量过多时，即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货币量时，纸币面额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减少，纸币就会贬值，引起物价上涨。在现代不再规定纸币的含金量情况下，在纸币流通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纸币所能购买的商品价值量决定于全社会的纸币流通量与全社会可用于交换的商品总量的对比状况。由于纸币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一般认为纸币不具备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但现实经济运行说明，只要一国经济发展处于比较平衡的状态，纸币确实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有些纸币象美元还

能起世界货币的作用。

纸币流通规律 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决定纸币流通量的规律。马克思说："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7页）这一规律表明，纸币发行额如果相当于没有纸币流通情况下商品流通所需要的具有内在价值的金（或银）币的数量，每张具有一定面额的纸币就代表相应数量的金币。例如，商品流通需要1万元金币，国家发行1万元的纸币代替金币流通，这样，总额1万元的纸币就代表1万元金币的价值，每1元纸币就代表1元金币。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上述限度，较大的纸币总额仍只能代表流流中所需要的金币的价值，每张纸币所代表的金币就相应减少，造成纸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纸币流通规律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同样发挥作用。

纸币流通所特有的这一规律，是由纸币的本质决定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可以是价值不足的货币，后来逐渐发展到用完全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来代替，从而产生了纸币。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在流通中作为金或银的符号，才象征地代表相应的金、银铸币的价值。纸币离开了它所能代表的货币，只是一张纸片。国家可以利用权力把过量的纸币投入流通，但不能改变纸币的本质和客观经济规律。

纳税人 即"纳税义务人"。税法规定直接对国家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否则按照税法规定要受法律制裁。纳税人是按不同税种分别确定的。如，产品税纳税人是从事生产经营和进口应纳产品的单位和个人。牲畜交易税的纳税人是购买应税牲畜的单位和个人。工商税的纳税人是从事工业生产、农产品采购、外贸进口、商业经营、交通运输和服务性业务的单位和个人。

纳税环节 应税商品在其整个流转过程中，税法规定应当缴纳税款的环节。一般商品从生产到消费往往需要经过许多环节，在税收上只选择其中一定环节，规定为缴纳税款的环节，即谓纳税环节。选择纳税环节的原则是：①要配合价格制度，根据纯收人中各个流转环节的分布状况；②要符合不同经济部门和不同产品的经营特点、有利于经济发展；③要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便于征收，管理和监督。按照纳税环节多少，税收可分为三种课征制度：①只在一个流转环节课征的税收；②在两个流转环节课征的税收；③在每个流转环节都课征的税收。

纳税期限 税法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的限期。各税种的纳税期限不同，一般可分为两种：①按期纳税，是指企业发生纳税义务的一定期间为纳税期限；②按次纳税，是指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次数为纳税期限。由于纳税人对纳税期内取得的应税收入，需要进行计算和办理纳税手续，对税款的交纳还要规定一个缴纳限期。纳税期限，是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及时入库的原则下，根据各个税种的特点确定的。税法规定，纳税人不按纳税期限缴纳应纳税款的要加收滞纳金。

纳税登记 税务机关对纳税义务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情况进行登记管理的一项制度。纳税登记可以使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的基本情况，切实掌握税源，以利于进行征收管理。纳税登记的具体办法：凡是根据税法规定属于应该纳税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持批准开业的证件或其它证件，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企业在营业期间，如有变更名称、改变经营业务种类及经济性质的，或发生转业、歇业、改组、合并等情况时，应向原登记的税务机关办理变更纳税登记手续，停业的应当办理暂停营业登记。迁移营业地址的，应向迁往所在地的税务机关重新办理纳税登记。

纳税鉴定 是税务机关帮助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一项制度，是税务机关按照税收法规对纳税人纳什么税，如何缴纳税款等纳税事项作出的书面鉴定，是税务机关把税收政策和法规落实到纳税人的一种具体形式。它既是纳税人纳税的具体依据，也是税务机关征税的依据之一。因此，通过纳税鉴定，不仅可以促进税务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宣传税收政策法令，划清征免界线，提高政策水平。同时，也可帮助纳税人了解税收政策，熟悉有关税收法令，加强法制观念，做到正确计算和及时缴纳、防止错漏。实行纳税鉴定，对征纳双方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纳税申报 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将本期的纳税事项向当地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报的一种法定手续。是基层税务机关办理征收业务、核算应征税额，填写纳税凭证的主要依据。税法规定，纳税人必须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统一格式的申报表，如实地填写纳税事项，准确地计算应纳税款，然后经过税务机关审定后，再填写纳税缴款书，据以缴纳税款。缴纳所得税的纳税人，除报送纳税申报表外，还需向税务机关报送有关财务报表。通过纳税申报，有利于纳税人正确计算应纳税款、防止错缴、漏缴，也使基层税务机

关便于掌握税源变化和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及纳税情况，它对控制纳税义务的发生，加强税务监督，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地征收入库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凡是具有申报义务的纳税人，都必须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手续。

纳税年度　又称"征税年度"。所得税征收工作中，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以一年为单位的起迄期间。中国税法的纳税年度均采用公历制，即从公历年的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为一个纳税年度，纳税年度与国家的预算年度和企业的会计年度一致。

纳税地点　纳税人申报纳税的地点。主要适用于涉及两地申报纳税的税种，如增值税的纳税地点，根据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分别规定如下：①生产应纳增值税产品的纳税人，在生产企业所在地交纳；②进口交纳增值税产品的纳税人，在进口的口岸所在地向海关申报交纳；③委托加工交纳增值税产品的纳税人，如果是工业企业委托加工的产品，于产品收回后，在本企业所在地视同本企业自制产品，用于生产的不纳税，用于非生产的纳税；如果是商业、外贸、物资供销企业委托加工的产品，在委托方所在地，于加工收回后纳税；如果是基本建设单位、使用单位和个体经营单位委托加工的产品，由受托方就地代收代交税款。

纳税程序　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定手续。不同税种的纳税程序不完全相同，一般的程序是：纳税人开业前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税务机关根据税法规定对纳税人的纳税事项作出鉴定，纳税人发生纳税业务以后按期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对纳税申报进行审核，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按照纳税期限交纳税款。对各种不同的纳税人，其具体纳税程序也不相同。财务会计制度健全的企业，自行计算申报，自行交纳税款，无须经税务机关审核。财务会计制度不够健全的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行计算申报，经税务机关审核后交纳税款。个体工商业者由个人申报，经民主评议和税务机关核定后交纳税款。

纳税检查　税务机关按照国家税法规定，检查和监督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税务机关执行税收政策情况的一种手段。它是征收管理的重要环节，税务机关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会计帐簿及其它有关纳税资料进行必要的检查，是为了正确地贯彻税收政策，严肃纳税纪律，纠正错漏，保证财政收入及时、准确、足额地入库；并通过纳税检查，揭露企业管理中的矛盾，端正企业经营方向，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厉行节约，降低成本，促进生产发展。纳税检查的方法，应根据检查的目的和要求，被检查对象的生产经营特点和财务管理水平，检查的内容和范围以及检查的深度和广度等采用不同的方法。一般有：顺查法、逆查法、全查法、详查法、抽查法、重点查法、联查法、侧查法、比较分析法和控制计算法。

八　画

法人　自然人的对称。是指依法成立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和负担义务的社会组织。具备法人资格的条件有：①必须正式在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经批准的；②具有能够独立支配的财产，并能独立进行核算的；③能独立承担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并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活动。法人与自然人一样依法对国家负有纳税义务。在我国列入国家预算并单独进行预算经费核算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各种自负盈亏的集体经济组织，经国家批准享有独立财产的社会团体以及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的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等等，均为法人。

法定利率　亦称"官定利率"，是中央银行规定的放款利率。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定利率指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即商业银行以政府债券或其它票据为担保，向中央银行借款时所支付的利率。它是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影响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利率，从而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活动的目的。法定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资金的借贷成本和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借款额，影响贷款者对未来市场利率的预期，进而影响其提供信贷的条件，使之较紧地或较松地提供信贷，市场利率相应随之升降。当中央银行认为有必要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可以提高法定利率，迫使银行减少或停止向中央银行的借款，使中央银行最终达到减少信贷和货币供给的目的。一般说来，当需要抑制投资活动，制止或减缓通货膨胀，阻止本国资本外流，促使外国资本流入，使外汇汇率作有利于本

国货币的变动时，中央银行常常提高法定利率。当需要鼓励、刺激投资，抑制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往往降低法定利率。从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利用法定利率控制通货膨胀较有成效，但对付经济衰退则成效不大。主要因为中央银行可以降低法定利率以促使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央银行的借款，补充其准备金。但是中央银行不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是否增加借款或借款多少，也不能决定商业银行借款后是否增加其放款。即使商业银行增加了对中央银行的借款，如果商业银行愿意保存较多的超额储备，或者工商业没有增加借款的要求，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利率，依然难以达到刺激投资、对付经济衰退的目的。

实物税 “货币税”的对称。税收以其征收的实体为标准，分为货币税与实物税两类。实物税是国家以实物形式征收的税。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一般多采用实物税的形式，古代的税收主要是征收实物，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的发展，实物税逐渐为货币税所代替，现在征收实物的已极少。目前我国只有农（牧）业税是以征收实物（粮食或牲畜）为主的，目的是有利于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储备粮的需要，同时也符合我国历史习惯，便于农民缴纳。

定率税 “配赋税”的对称。税收以税款的确定方法为标准，分为定率税和配赋税两类。定率税是国家事先在税法中按照征税对象规定税率，征税时即依率计算应征税额，定率税目前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采用这种课征方法的主要优点，一是国家事先能大致预知可征收的税款；二是纳税人事先也能大致预知应纳的税额。

定额税率 又称“固定税额”，按每一单位征税对象，直接规定固定税额的一种税率制度，如我国盐税即采用定额税率，按吨规定固定税额，实行从量计征。定额税率又可分为：①地区差别定额税率，如盐税。②幅度定额税率，如车船使用牌照税中乘人汽车，规定每季度车辆税额为15—18元。③分类分级定额税率，如车船使用牌照税中机动船，规定净吨位50吨以下，每季每吨税额为3角；51—150吨，每季每吨税额为3角5分；……3000吨以上；每吨税额为1元1角。

定额借款 我国国营企业根据定额流动资金的定额数或其一定百分比向银行取得的借款。在我国，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实行过由财政银行分别供应，分口管理的办法。定额流动资金由财政部门核拨，作为企业的自有资金；超定额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为了充分发挥信贷经济杠杆的积极作用，国营企业的全部流动资金，统一交由银行管理。定额借款，就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周转所需要的最低限额资金。在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后，原来财政拨给企业的流动资金，仍然留给企业作为自有流动资金，只是由银行统一管理。国家拨给企业的流动资金仍然留给企业，是因为企业是一个独立经营的核算单位，应当有一定的自有流动资金。

定额流动资金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按照上级规定占用的流动资金的数额。它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核定，既要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又要力争减少流动资金的占用。一个企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定额，取决于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生产量、单位产品成本水平和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根据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企业所需的包括定额流动资金在内的全部流动资金，将逐步实行由银行贷款或由财政拨款交银行，按信贷方式供应，使用时支付利息，把由原来的“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

定期存款 是固定日期的存款形式，与“活期存款”相对应。存款者按银行规定的若干期限存入一定金额，原则上到到期日方可支取，银行按高于活期存款利率水平的利率支付利息。这是银行贷款的一项重要来源，因为存款期限固定，银行可将其运用于相应期限的贷款。一般来说，在未到期之前，客户也可以提前支取，但要求或者提前若干时间通知银行，或者凭客户的证件支取。在我国，定期存款的期限有3个月期、6个月期、1年期、3年期、5年期和8年期等。在西方一些国家中规定的期限长短不等，但短期的如7天，半个月、1个月等的定期存款业务也较普遍。

定期存款比率 亦称“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是指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如果设商业银行中定期存款数额为TD，活期存款数额为DD，则定期存款比率和t为：

$$t=\frac{TD}{DD}$$

影响定期存款比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①定期存款利率的相对收益水平。如果定期存款的利息收益较其他金融资产形式的利息收益水平高，则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而少选择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这样t随之提高。反之，如果定期存款的利息收益较其他金融资产形式的利息收益水平低，人们就会倾向于少选择定期存款而愿意多选择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则

t随之降低。②人们的收入或财富增长速度，一般情况下，收入或财富的增长速度快，数额多，用于日常零碎支出的数额比重减少，则人们就会多将收入的货币定期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收入，这样定期存款的比率就会增大。一般来说，财富的增长与定期存款比率量正方向变化。③国家的福利制度及生活消费的水准。人们在银行存入定期存款可用于未来购买高档消费品、如汽车、住宅等，也可用于应付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如伤病治疗，天灾人祸等。因而一国的福利制度、生活消费水准对定期存款的比率也有影响。④追求交易的便利。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放弃定期存款的利息收益而选择活期存款或现金的形式，以便顺利完成各种交易，如果追求交易便利的倾向得到强化，显然，t会降低；反之，则会提高。t值的变化，对货币扩张乘数有一定的影响。一般地说，定期存款的比率愈高，则货币乘数越小；反之，定期存款比率愈低，则货币乘数越高。定期存款比率与法定准备率和商业银行的意愿一般呈反向变化。

实际货币供给　经过当期产品价格指数调整后所体现的货币供应量，表示名义货币供应量的购买力总额。实际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取决于名义货币供应量和价格水平的变动。实际货币供给$=\frac{Ms}{P}$。

一般认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变化名义货币供应量，尽管价格变动较慢，因而实际货币供应增加，但价格终会上升到抵消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保证实际货币供应量不变的程度。但是总额货币论认为，在货币构成既有内在货币又有外在货币，或即使只有内在货币，但货币系统买卖几种未清偿证券，改变某些经济单位的资产构成时，名义货币扩张，将通过影响利率和实际资本量，从而影响收入的增长，而物价只是有些上涨，因而实际货币供应量亦会上升；在货币为外在货币时，政府的支出（同时发行货币）构成便影响社会总支出中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而影响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和实际货币供应量。

在未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若名义货币量增加，将使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就业扩大，或直接增加总支出和总产量，并伴随价格上升，但实际收入和实际货币供应量也上升。新古典理论则认为，若价格下降，即使名义货币量不变，实际货币供应量将上升，从而消费增加，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即价格下降后，实质现金余额效应将保证产量上升和实现充分就业。

均衡状态下的实际货币供给量是与一定比例的实际国民收入相等的。以动态来看，实际货币供给量与实际国民收入保持同步增长。一般认为，通过增加名义货币供应量而不是通过价格下降，实际货币供应量随实际收入增长而增长，将保证经济增长，否则将阻碍经济增长。名义货币量的增长应考虑影响货币流通速度正常变动的因素。人口增加、利率下降会减慢货币流通速度，支付手段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产的分化将降低货币流通速度。但如名义货币供应量过多，将导致通货膨胀；名义货币量过少，价格又无法调整的话，将导致经济萎缩。

实际货币需求　指由经济中的一系列实际变量所决定的，受价格水平变动因素影响对货币的需求。

设M_d为名义货币需求，P表示价格水平、Y表示实际国民收入，K表示人们持有货币量占实际国民收入的比重（人们持有的货币量并不完全来自于收入，可以来自于债务），则实际货币需求$=\frac{Md}{P}=KY$。必须指出，同实际货币供应不同，价格水平变动并不是通过影响名义货币需求来影响实际货币需求的，而是通过影响K来影响实际货币需求的；同时，名义货币需求（Md）是由实际货币需求($\frac{Md}{P}$)和名义货币供给所决定的，而不是名义货币需求决定实际货币需求。

决定实际货币需求的因素，在新古典学派看来，主要由K和Q（为国民所得）决定。K由人们对持有货币的利弊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和对价格预期所决定。首先，人们将通过对比持有货币所能获得的便利和所能避免的风险与将货币用于商品消费所得到的满足，或对比将货币用于实物投资和股票投资所获得的收益，来决定持有货币的比例K。其次；当人们预期价格上涨时，将尽量减少持有货币量。新古典学派认为，在短期内，K比较稳定；Q也比较稳定。因为短期内，经济资源和效能都不易变动，价格机制将保证充分就业，Q为充分就业时的产量。因此，实际货币需求在短期内可视为一恒值。

凯恩斯认为，实际货币需求由实际收入和利率决定。实际货币需求与实际收入成正比，与利率成反比。若实际收入提高，而货币供应量不变，则要维持货币市场均衡，须提高利率。他还认为，实际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变动甚为敏感，甚至有发生流动性陷井的可能，即当利率降到再也不能下降之时，货币需求会无限大，因此，K极不稳定；同时，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充分就业，因此，实际货币需求在短期内极不稳定。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一种资产，人们持有货币的量取决于总财富（用实际国民收入衡量），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用各种资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衡量），货币、债券、股票的预期的名义收益

率，预期物价变动率，和其他影响实际货币需求的各种因素等。他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极稳定的，可预测的函数，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甚低，实际货币需求的实质所得弹性为1.8。

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完善，投资来源要通过内部融资来获得。由于技术变革和投资不可细分，因此需通过内部融资将资金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才能进行跳跃式的投资。在实际货币收益率为正的情况下，可通过货币积累来进行内部积累。这样，实际货币需求就与储蓄和投资倾向呈正相关，是互补的。实际资本投资倾向越强，实际货币需求就越多。进一步看，伴随实质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实际货币需求要增加。同时，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率越高，即名义利率越高和通货膨胀率低，实际货币需求也就越强。这或是由于货币收益率高，有利于资本增值，从而有利于内部积累和投资，导致的投资倾向提高和实际货币需求增加；或是由于货币收益率超过一定限度后，实际资本投资和实际货币需求互为替代，导致的实际货币需求增加。

实征税额 向纳税人实际征收到的税额，即纳税人全年实际交纳的税额（包括正税和地方附加，也包括实际补交的以前年度的尾欠税额）。

单位预算 是指各级政府直属机关就其本身及其所属的机关的年度收支所汇编的预算。如我国省、市直属局的单位预算，即由局本身的预算，及其所属机关、单位的预算汇编而成。除行政和事业单位的单位预算外，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单位还要编制企业财务收支计划，并由和主管厅、局汇编为厅、局的财务收支计划。行政和事业主管厅、局的单位预算和企业主管厅、局的财务收支计划同本级总预算发生缴款和拨款关系。因此，单位预算和财务收支计划是编制本级预算的基础。

单一税制 “复税制”的对称。单一税制和复税制是税收制度的一种分类。单一税制，即一个国家只实行一种税的税收制度。在税收理论上，曾有主张实际单一土地税制、单一所得税制、单一资本税制和单一消费税制等税制的。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实行过单一税制。

单一中央银行制 一个国家单独建立中央银行机构，作为发行银行、银行的银行和国家银行，全面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并领导全部金融事业的制度。单一中央银行体系又分为一元的、二元的和多元的中央银行体制三种类型。一元中央银行体制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只建立一家统一的中央银行，全面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任务，成为全国金融事业的核心。这种中央银行设有总行和分支机构。绝大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实行这种体制。二元中央银行制是在一个国家内建立中央和地方两极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机构，联邦德国和南斯拉夫的中央银行体制属这种类型。多元的中面银行体制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较多的中央银行机构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任务。美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据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为该地区的中央银行，各联邦储备银行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分行。在各联邦储备银行之上有联邦储备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各储备银行，制定全国的货币信用政策。

单本位制和复本位制 以一种金属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称为单本位制；以两种金属同时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称复本位制。在货币历史上，黄金和白银需分别和同时作为本位币流通使用，因而形成不同阶段的货币制度—金本位制、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三个阶段。典型的金本位制指的是金币本位制，它的主要特点是：本位币用黄金铸造，金铸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流通、自由输出入、自由熔化，金铸币和以黄金准备而发行的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金铸币和银行券有无限法偿。1816年英国的《金本位法案》标志着金本位制的诞生，此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制，使其成为国际通行本位制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使金本位制受到严重冲击，严重的信用危机导致许多国家陆续放弃金本位制，取而代之以纸币制度。银本位制也称为银单本位制，是以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制度。银铸币也是可以自由熔化、自由改铸、自由输出入，银铸币有无限法偿。在货币制度发展史上，银本位制实行的时间较长，在纪元前及纪元初期欧洲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均有银币流通。但银本位制有其缺陷，主要在于白银价格不稳定，价值较低，不适于大额支付。因此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并向金单本位制过渡。

复本位制是金本位制与银本位制之间的过渡，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初期过渡时期，许多银本位制国家受到银价不稳、银价值较低而大宗交易增多等限制，开始实行金、银两种金属并行为本位币制度。但

是货币本身具有排他性，两种货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不符合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要固定在一种商品上的客观要求，因此，随着金、银两种金属市场价格的波动，金、银市价与法定名义价格之间出现了较大偏离，市场上流通的越来越多的是法定价格较高而实际价格较低的所谓"劣币"，而另外一种法定价格较低实际价格较高的金属铸币即所谓"良币"则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储存起来，熔化、改铸，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此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复本位制下银币逐渐将金币这种良币赶出流通领域。因此，复本位制从本质上不是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到 19 世纪末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了金单本位制度。从银单本位→金银复本位制→金单本位制，这一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表明了货币这一"特殊商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选择，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对不同金属物品的选择，而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流通需要而产生的不同结果。

净额货币论　货币理论中与"总额货币论"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该理论主张在较窄的范围内计量货币和分析货币供求。它把内在货币与其在私人国内初级债务中的对应物合并抵消，因而只剩下外在货币，以此来分析货币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该理论认为，私人国内债务和它的对应物—内在债务和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数量和质量、与总量分析（即货币需求和货币存量无关。它认为，在只有内在货币的场合，货币是中性的，且价格是不确定的；名义内在货币的变动不仅在长时期里不影响经济中的实际变量，而且在短时期里也不因产生债权人和债务人间的收入和财富变动而影响总需求、劳动力和当期产出品。所以，它认为可随意合并私人支出单位的金融帐户，只保留他们对政府和外国的净债权；又随意拆散合并后的金融帐户，引进债券，以便对决定货币需求因素之一的利率进行分析。该理论还认为，非货币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总体行为，特别是对货币市场的分析毫不相干。参见"总额货币论"。

非银行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它们和银行一样，融通资金盈余单位和赤字单位之间的资金供求，将社会储蓄资金引导到生产领域。但是，它和专业银行一样，其业务范围和性质较狭窄。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能接受活期存款，所以它吸收储蓄定期存款后，虽可增加贷款，却不能产生派生存款。因为借款人得到贷款后，不能将款项以活期存款方式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供随时使用，也不能以储蓄定期存款方式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多为原始存款，几乎没有派生存款，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创造信贷和存款的能力。因为商业银行体系在信贷扩张中会发生现金泄漏，即存款人会提出一部分现金存于其他金融机构，这样商业银行将被迫紧缩信贷，非银行金融机构将扩张信贷。因此，他们认为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并无本质差别。

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体上有以下几类：①美国的储蓄贷款协会、英国的屋贷款会社，它集合会员的资金以抵押方式贷给会员建屋。②信用合作社，其资金来源于社员的股金，除对社员个人放款外，还用部分资金投资于不动产和政府公债。③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每年缴纳保费，如在保单期间死亡，其家属可获得赔偿保障，期满后本人亦可提回本金和利息。人寿保险公司之保费收入，一般投资于政府公债、企业证券、不动产抵押放款和保单放款。④退休及信托投资基金，退休基金一般为政府或私营企业为其雇员所设。雇主及雇员按期缴纳薪金的固定百分比给退休基金，该基金则运用所积累的资金投资于公债、债券、股票等。雇员退休后，可领取一次付清的退休金或按月支付的养老金。信托基金则由团体及个人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管理。⑤邮政储蓄制度是除美国外主要工业国极通行的金融机构。其目的是利用遍设各地的邮局，吸收小额储蓄。中国邮政储蓄所吸收的资金归中央银行支配。⑥财务公司，多数经营耐用品的租赁或分期付款销货业务，其资金来源于吸收定期存款。

非商品流转额　中国营业税和涉外工商统一税用语。"商品流转额"的对称。在税收上通常是指服务性行业企业取得的服务收人金额。如我国过去的工商统一税和现行的工商税中的服务行业，就是以非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

非定额流动资金　指在企业中，不规定定额的流动资金，如结算资金和货币资金等。它们在流动资金中所占比重较小，数量也不够稳定，有的已经有了必要的管理措施。因此对它们不再制定定额。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占用，相反，由于不列入定额范围，不核给资金来源，所以企业必须尽可能减少非定额流动资金占用量。为维护财经纪律、提高资金利用效果，应加强非定额流动资金管理，揭露其不合理部分（如逾期未收应收款，不符合规定的赊销和预付货款等）。

现金　指具有现实购买力或清偿力的法定通货或现钞货币，包括主币和辅币。其基本用途是：由银行

投放、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收购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价款；对农村社员的分配；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规定限额以内的经费支出；支付个人汇款；兑换金银外币以及人民群众提取的储蓄存款等的货币。我国对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

现金结算 是结算方式的一种。就是用直接支付现金的办法来结算商品交易、劳务供应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它适用于国家、集体对个人之间、以及单位间不够转帐结算金额起点的小额款项支付。

现金流通 指国家法定通货的周转流通。在铸币流通制度下，实行金单本位制则为金币的流通，实行银单本位制则为银币的流通。在纸币流通制度下，通称现钞货币流通，简称现金流通。各国流通中作为现金的纸币和硬辅币的种类和样式各异，中国则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票券和硬辅币。

在西方国家经济中，企业、单位都有大量现金收付，形成众多的现金收付中心。中国实行现金管理制度，现金主要适用于个人有关的货币收支，为消费品交易及零星交易服务。银行开户各单位的现金收入则要及时送存银行，所需大额现金支付需要到银行领取。这样，经济中大部分现金收付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特点。现金流通以银行为中心，从银行通过不同渠道流出，然后又从不同渠道流回银行。现金从银行流出的渠道主要有：(1) 国家和集体单位发放工资和对个人的其它支出，这是城市投入现金的主要渠道；(2) 行政管理费支出，用于购买零星用品所支用的现金；(3) 农副产品收购支出，这是农村现金投入的主要渠道；(4) 农村财政信贷支出，包括财政和金融部门对农村的投资拨款和农业贷款；(5) 储蓄存款支出。现金流回银行的渠道主要有：(1) 商品销售收入；(2) 服务行业提供劳务而收入的现金；(3) 财政部门对个人和集体单位征收税款收入的现金；(4) 储蓄存款和收回农业贷款的现金。

现金管理 是指国家银行根据国家规定，对一切国营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城乡集体经济单位的现金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根据现金管理的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及城乡集体经济单位，必须在国家银行开立帐户，严格实行现金管理。其内容包括：(一) 现金使用范围的规定。规定现金使用范围的原则是：单位之间的货币收付，应该采取转帐结算方式，除小额零星开支以外，不准使用现金，单位对个人之间的货币收付，应该使用现金。具体来说，下述情况可以使用现金：(1) 对职工个人发放工资、奖金、福利费等；(2) 对城乡居民的劳务报酬和其他支付；(3) 收购农副产品必要的现金支付；(4) 出差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的旅差费；(5) 各单位间在同城转帐结算起点以下的零星现金支付。(二) 核定单位库存现金限额。货管单位要保留一定数额的现金库存，以备日常开支用。国家对每个单位核定一个现金库存的最高额度，目的在于保证现金集中在国家银行，防止分散浪费、节约使用资金、核定库存现金，原则上一个独立核算单位核定一个现金库存限额，具体核定可以根据单位的不同类型，采用三种方法：(1) 经费性现金库存的核定；(2) 业务性单位现金库存的核定；(3) 采购单位现金库存的核定。(三) 规定单位现金送存银行的期限。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加速现金归行，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货币发行。也便于银行及时了解各单位的业务活动和市场情况，有利于银行有计划的安排现金调拨，组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规定现金送存银行的期限，应该参照各种不同性质单位业务经营的特点，以及距离银行远近等条件，参照历史资料，与单位商定送存期限与方式。一般采用三种方法：(1) 限额法；(2) 限期法；(3) 限额限期结合法。(四) 坐支。有现金收入的单位，从现金收入中直接支取现金，称为坐支。现金管理制度规定，一般各单位不准在现金收入中坐支现金。情况特殊，必须坐支现金的，经银行核定，在规定的用途、时间的额度内坐支的金额，叫坐支限额。规定坐支限额有两种方法：(1) 按单位现金收入的百分比计算，如按每天（月）销售收入总额的5%计算坐支额；(2) 规定一个坐支的最高限额，主要用于业务比较正常，支付幅度有一定规律的单位。(五) 采购资金的现金管理。采购资金是各单位派人到外地采购物资所需用的款项。目前，我国的转帐结算办法与商品交易还不能完全适应，在利用转帐结算有困难的情况下，只要在国家经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利于生产和商品流通，有利于繁荣经济，银行应根据具体情况，允许单位携带一定数量的现金到外地采购。现金管理是我国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控制货币投放，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集中闲散资金，稳定金融物价，节约现金使用，维护财经纪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金计划 “现金收支计划”的简称。国民经济中银行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计划，反映银行现金收入和支出的来源、用途与数量，以及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增减变化。编制现金计划的目的，在于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金周转需要，控制货币发行，有计划地组织货币投放和回笼，使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相适应，以稳定市场供应，并有利于国家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合

平衡。现金收支计划采用收支平衡表的形式。现金计划收入方按照从市场流通领域返回银行的渠道设置若干项目，主要项目有商品销售收入，服务事业收入、税款收入等；现金计划支出方按照从银行投入市场流通领域的渠道设置若干项目，主要项目有工资支出、农副产品采购支出等；现金计划收支差额表示计划期现金收入总量与现金支出总量的轧差数。收入大于支出的差额为现金净回笼计划数，表示市场现金流通的减少量。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为现金净投放计划数，表示市场现金流通的增加量。我国现金收支计划由各级银行自下而上逐级编制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民经济有关指标和下级编报的计划，编制全国现金收支计划。经国家计划机关审查、平衡，报请国务院批准，下达各省、市、自治区贯彻执行。

现金收支差额 指银行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轧差后的余额。现金收入是交款单位向银行送存的货币资金，包括商品销售收入，服务事业收入，税款收入，农村信用社收入、乡镇企事业收入、城乡个体户收入，储蓄存款收入，汇兑收入、其他收入等。现金支出是银行支付收款单位的货币资金，包括国家工资支出，国家职工奖金及个人其他支出，部队存款支出，城镇集体单位工资性支出，农副产品采购支出，工矿产品收购支出，行政企业管理费支出，农村信用社支出，级镇企事业支出，城乡个体户支出，储蓄存款支出，汇兑支出，其他支出等。在现实经济中，现金收入等于现金支出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多数情况下，或者是现金收入大于现金支出，或者是现金支出大于现金收入。通常把1年的现金收入与支出相抵，收入大于支出称为"货币回笼"，支出大于收入称为"货币投放"；1年之内的某一时期收入大于支出称为"货币净回笼"，支出大于收入称为"货币净投放"。

现代货币 本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使得所谓"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界限日趋模糊。一些昔日的"非货币"的东西如今变成"货币"，形成了"现代货币"的概念。现代货币具有如下特征：①现代货币是一种购买力凭证，直接代表购买力，即凡是容易变为现金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商品，都可视为现代货币，而不管这些金融商品和工具是银行、政府还是企业提供的。②现代货币是一种债务凭证，不论是通货，还是存款或短期债券，都表现为银行、政府或企业的负债。③现代货币因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变化快，替代性强，每隔一段时期，便要进行修正，所以现代货币的度量较为复杂。④金融创新使货币流通更趋加快和复杂，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呈现不稳定状态。有效调控现代货币量是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重要方面。现代货币的未来是电子化，电子货币传送系统将最终导致现金和支票的消失。但货币的主要功能并不受到影响。金融商品和工具的普遍电子化，必将引起现化货币的构成和控制发生最大变化，也将推动着金融业向三大目标和三大趋势发展。金融业的三大目标是：先进的工作效率；优良的经营管理水平；完善的服务质量。金融业的三大趋势是：银行成为超级金融市场 金融商品众多，顾客自助自选；银行信息化一由管理货币为主转为管理信息为主；银行由以利差收入为主转为服务费收入为主。

现实流通的货币 "潜在货币"的对称。市场流通中的货币（保存于"发行库"或进入"发行库"的货币被认为退出市场流通）发挥着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这些流通中的货币，有的则正在用于购买和支付；有的则被用于准备购买和支付；有的则被持有者（团体、个人）作为目标不很明确又比较遥远的用途。用于正在购买和支付的货币，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就时间而言是一瞬间，是以分、秒为单位计算的；用于准备购买和支付的货币，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就时间而言可以是以天、以周、以月、长者以年为单位计算。至于被持有人作为目标不明确又遥远的用途的货币，发挥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就时间来说可能是以年、几年、甚至几十年为单位计算的。因而，通常就把流通中的正在用于购买和支付，处于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一瞬间的正在流通的货币和用于准备购买和支付，处于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阶段的准备流通的货币总称为现实流通的货币。而把流通中的被持有者用于目标不明确又比较遥远的面对着流通而又暂不流通的货币称为潜在的货币。现实流通货币和潜在货币两者是很难绝然割裂的，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般说来，潜在的货币都是从现实流通的货币转化而来。如工资收入，这是现实流通货币，将其中的一部分存入定期储蓄，则转化为潜在的货币。同样，潜在货币也会转化为现实流通的货币。如父母把多年的储蓄分给等钱用的子女，潜在货币就转化为现实流通货币。在正常情况下，现实流通的货币转化为潜在货币的金额大于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货币的数额。

直接税 "间接税"的对称。直接税与间接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税收的分类，他们认为，直接税一般是不能转嫁的，纳税人就是负税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以收入、企业利润和财产作为征税对象的税收、如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土地税等，都属于直接税。课征于劳动人民的直接税，由劳动人民负担，而课征资产阶级那部分的所谓直接税，

实际上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手段，如降低工资、延长工时等，把税负转嫁出去，主要是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负担。

直接金融调控　中央银行通过对各种金融机构创造货币和信用业务活动进行各种直接性的行政干预，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金融调控的特点是时间短，见效快，功效强。其弱点是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利益。

在实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分离的体制中，中央银行进行直接金融调控的手段主要有银行放款量的最高限额和银行存款率的最高限度。其它还有：①信用分配，指中央银行根据金融市场状况和客观经济需要，权衡轻重缓急，对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加以合理的分配和限制等措施。②直接干预，即中央银行直接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进行合理的干预，如规定银行的业务范围，放款政策等。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实行指令性控制。③利率最高限额，即规定商业银行对定期及储蓄存款所能支付的最高利率，防止银行为吸引资金而抬高利率，以有利于银行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④流动性比率，即规定商业银行流动性资产对存款的比例，以防止商业银行信用规模的过度扩张和因谋取高利而进行风险投资和放款。⑤开设特种存款，即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存入一定比例的特别存款，付给一定的利息，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

在实行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合一的大一统银行体制中，银行既发行货币、又发行贷款和创造存款货币。货币当局实行直接金融调控的手段是对现金发行、存款创造和贷款发行总额实际指令性计划控制。基层银行吸收的存款要上交，贷款按分配的指标发放。在这种体制中，无派生存款机制，控制了贷款也就控制住了货币供应总量。各类贷款的发放分别由指标进行控制，不得相互挪用。

直接金融市场　即以有价证券融资投资而形成的市场。它与间接金融市场的区别在于不是通过银行这一中介机构进行资金的借贷，而是由资金的供、求双方直接联系，协商资金的借贷或买卖，从而形成由资金供求双方为主体的金融市场。这种市场有两层：一是直接金融工具发行的市场，即一级市场，主要完成借贷双方的借与贷活动；二是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即二级市场，主要完成金融工具的流通转让活动，实现债权方的资金流动性。由于直接金融市场无需中介机构的参与，所以必须有各种信用工具—有价证券、票据等作为凭证，因而也必须有使其流转的二级市场。无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金融工具的价格均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自发地形成，一级市场以借贷为主，其价格主要体现于利率水平，二级市场以交易为主，其价格即有价证券或票据的市价，利率和市价形成借贷或交易双方的成本或利润，因而对直接金融的双方来说，风险和收益都是不确定的。相对于间接金融来说风险和可能性收益均较高。正因此，在直接金融市场上对借贷或交易双方的资信要求也较高。由于直接金融工具包括不同种类的有价证券和票据，直接金融市场也分为以下几种：①债券市场（政府债券市场、公司债券市场、欧洲债券市场、外国债券市场等）；②股票市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③大额存单市场（发行及转让市场）；④商业票据市场（国内商业票据及欧洲商业票据的发行和转让市场）。随着直接金融形式的日益重要，以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为主体的直接金融市场已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　两种不同形式的融资方式。不通过银行等中介机构，资金的供、求双方直接接触，融通资金，实现供求的融资方式称为直接金融。通过银行等中介机构，组织社会资金的来源与运用，资金的供、求双方不直接接触，而分别与银行进行资金的借贷活动完成资金供求的融资方式称为间接金融。

传统的金融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关系和活动的主体，起重要的媒介作用，各种闲置资金的存款方式汇总到银行中，银行通过贷款将其运用出去。在这种形式下，资金的供求数量、价格、期限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融资的效率和职能。中介机构在金融业发展初期对缓解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加快资金流动周转的速度和提高其效率，从而推进贸易与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金融业的扩大和发展，资金规模日益增大，金融的社会化和独立性程度不断提高，对资金融通的速度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银行业本身的限制，加之各国政府对银行的层层管制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金融业的阻碍，不通过银行进行的直接金融方式产生并得到飞速发展，直接金融方式主要是运用有价证券这种金融工具，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的。当资金需求者需要筹资时，便到证券市场上发行特定条件的债券、股票先进票等。它们或自己到市场上公开发行筹资，或委托某个金融机构代理发行。资金供应者根据市场不同工具的价格进行投资选择。有价证券发行及交易的价格通过资金供求的竞争自发地形成，使筹资与投资得以实现。

直接金融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有价证券这种金融工具对筹资、投资双方的有利特点：对筹资者来

说，筹资自由灵活，不受银行的种种限制，在筹资数量、期限、投向运用等方面均可自由选择；对投资者来说，也是一种较灵便并且收益较高的投资方式，他们可根据发债企业的信用和前途以及证券市场价格来作不同选择，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能将持有的证券在二级市场转手卖出，资产流动性高。另外，投资于有价证券收益率要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所以越来越多的闲置资金涌向证券市场投资于直接金融，为筹资者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

随着金融业社会化和独立性程度的提高，直接金融的规模日益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间接金融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现象在西方金融市场上尤为明显。据统计，从1986年开始，欧洲货币市场上以证券融资的规模已超过了国际银行（团）的商业贷款数量。当然，间接金融在目前国际上仍占重要地位，因此，目前是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两者并行时期。

垄断税　对连续多年获得垄断利润的企业所征收的一个特殊税种。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问题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完善市场机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克服市场的垄断性。征收垄断税可以使连续几年得到垄断利润的企业的盈利降下来，达到抑制垄断的目的。开征垄断税的具体做法是：首先计算出国民经济利润率，然后再规定一个利润率的上限。经营情况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利润率，有的低于国民经济利润率，有的等于国民经济利润率，有的高于国民经济利润率。如果企业利润率不仅高于国民经济利润率，而且连续多年超过国家规定的利润率上限，就意味着该企业得到了垄断利润，应对它征收垄断税，使它的盈利率降下来。奥塔·锡克建议：允许企业在3年内利润率超过规定的上限，第4年企业利润率继续超过规定的上限时征收垄断税，直至该企业的利润率降至国民经济利润率时为止。征税一停止，企业利润率又可能提高到上限，3年之后再征收垄断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种垄断税可能不会发生，垄断企业可能在第四年就降低了价格。但价格降低使生产者失去的好处会转到消费者手中，这就达到了征收垄断税的目的。

抵免法　是指居住国按本国的居民纳税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所得汇总计算其应纳税款，但允许其将因境外所得而已向来源国缴纳的税款在本国税法规定的限度内从本国应纳税额中抵免。税收抵免法是一种最普遍最常用的方法。具体的抵免方法有两种基本形式：①全额抵免法。按照这种抵免方法，居住国允许居民纳税人因境外所得而向来源国缴纳的税款从本国应纳税额中全部给予抵免，不管纳税人向来源国缴纳的所得税额是否超过了按居住国的税率计算应缴纳的税额。②限额抵免法。按照这种抵免方法，居住国对居民纳税人在来源国已缴纳的税款所允许抵免的数额，只限于纳税人按来源国所得应向居住国缴纳的税额，超过部分不能从本国应纳税额中扣除，如果低于应纳税额，则只能按纳税人实际向来源国缴纳的税额扣除。在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国家，抵免限额分为综合抵免与分国抵免两种。所谓综合抵免是指将居民纳税人向所有来源国缴纳的税款合并起来计算可以抵免的限额。其限额计算方式为：

综合抵免限额＝

$$\frac{\text{来自国外的全部应税所得额}}{\text{来自居住国内外的全部应税所得额}} \times \text{抵免前按国内外全部应税所得额应向居住国缴纳的税额}$$

分国抵免是把应抵免的外国所得税限额分国单独计算，其限额计算公式为：

分国抵免限额＝

$$\frac{\text{来自某个应抵免国的应税所得额}}{\text{来自居住国内外的全部应税所得额}} \times \text{抵免前按国内外全部应税所得额应向居住国缴纳的税额}$$

在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国家，则采用分类不分国抵免和分类分国抵免两种限额抵免方法。分类不分国抵免是把居民纳税人就某一类所得在各个来源国所缴纳的税款合并起来计算抵免限额。其限额计算公式为：

分类不分国抵免限额＝

$$\frac{\text{来自国外某一类应税所得额}}{\text{来自居住国内外的全部应税所得额}} \times \text{抵免前按国内外全部应税所得额应向居住国缴纳的税额}$$

分国分类抵免是对居民纳税人就某一类所得向某个来源国缴纳的税款单独计算抵免。其公式为：

分国分类抵免限额＝

$$\frac{\text{来自某个抵免国的某类应税所得额}}{\text{来自居住国内外的全部应税所得额}} \times \text{抵免前按国内外全部应税所得额应向居住国缴纳的税额}$$

拨改贷　某些原来由财政以拨款形式无偿供应的资金改为由银行以信贷形式有偿供应。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曾长期实行长短期资金分口供应和管理的办法，企业短期周转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企业长期占用的资金，基本上由财政拨款解决。经济建设资金由财政拨款无偿供应，引起了争机器设备、争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差的问题，也是促成基本战线过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克服这一弊端，从1979年起，国家对企业长期占用资金的供应办法进行了改革，逐步将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举办中短期设备贷款和大修理贷款，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中的定额部分

也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改为以信贷方式有偿供应。此外，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部分支出也由无偿拨款改为有偿无息周转金办法，长期农业贷款则由财政拨给银行，再由银行贷出。资金占用者必须按期支付贷款利息和偿还本金，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关心资金的使用效益，另一方面通过贷款的收回可形成银行长期信贷资金来源，由此改变长期资金的供应完全由国家预算解决的状况。

转帐结算 亦称非现金结算，就是通过银行将结算双方应结算的款项，从付款单位的存款帐户转到收款单位的存款帐户。转帐结算按照收款单位和付款单位所在地点不同，可分为同城结算和异地结算两大类。同城结算是指购销双方同一城镇范围的转帐结算。异地结算是指购销双方不在同一城市的转帐结算。通过银行转帐结算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优点：①通过银行转帐结算，有利于银行加强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促使购销双方认真执行经济合同，及时结算贷款，维护购销双方的正当权益，加强企业的资金周转。②通过银行转帐结算，有利于银行把各单位暂时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银行信贷充分加以利用，以利于调节各单位的资金余缺，充分发挥资金的作用。③由于银行转帐结算的手续严密，因此，有利于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和完整。

软通货和硬通货 即市场上币值趋于下跌的货币和币值趋于上升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由于各种因素诸如经济实力、国际收支差额、贸易差额、利率、投机、心理等等的作用，造成货币在一定时期内（包括短期及中长期）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某些货币供不应求，汇价趋于不断上升，则这种货币币值坚挺，称为硬通货；某些货币供大于求，汇价趋于不断下跌，则这种货币币值疲软，称为软通货。硬通货和软通货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时间上，同一种货币在不同时期由于作用因素的差异有时是硬通货有时变为软通货。在币种上，某种货币之所以为硬通货是它相对应其他一些货币或大多数货币的汇价来说是上升的，而对应其他的硬通货（指更坚挺的）来说币值可能是下降的，因而也就成为相对疲软的货币。

软预算约束 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都具有伸缩性，不能事前有效地限制经济主体的行为。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主要特征是：企业的生存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投入成本和销售盈利；企业技术进步和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内部资金的积累；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用不着去适应价格，对价格的反映极弱。企业自己不承担风险，可以将外部环境和自己行为的不利后果转嫁给购买者和国家；企业对投入品的需要几乎是不可满足的。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使企业预算约束变软的方法主要有五种。第一，价格不是外生的。大多数企业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订者，常常能按生产费用调整销售价格，把增加的成本强加在买者身上。第二，税收制度是软的。企业可以影响税则的制订，企业能够得到税收的减免或缓征；收税不严格。第三，存在国有的无偿拨款。企业得到投资拨款不承担偿还义务；企业长期亏损可以不断得到长期补贴。第四，信贷制度是软的。企业不具有偿还能力可以得到贷款；可以不履行信贷协议中规定的偿还义务；可以单方面的任意推迟付款。第五，存在外部的货币投资资金。预算约束变软的直接原因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父爱主义"关系，象父母袒护孩子，孩子依赖父母一样，国家袒护企业，企业依赖国家。国家不会看着企业有困难而不管，企业知道国家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会自动地帮助它，弥补其亏损，心里非常踏实，行为缺乏有效的限制。软预算约束是产生短缺现象的根本原因。

国库券 是由国库或间接通过银行发行的一种不兑换的政府纸币，是由国库发行的、用以弥补财政收支不平衡的一种债券。我国于 1981 年开始发行的国库券，按规定不准当货币流通或自由买卖。单位购买的国库券，不能转让，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允许无偿赠送亲友，但不准买卖。国家为了调整与稳定国民经济，通过发行国库券，适当集中各方面的一部分财力，对于弥补财政赤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市场物价，均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后，机动财力增加，国家有计划地发行国库券也有利于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国库券每年发行总额由国务院具体确定。

国家银行 在金融体系中，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旨在专门执行国家金融政策、调节经济发展的银行。国家银行的典型形式是中央银行。现今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不论其资产全部或部分为国家所有，或由私人股份组织起来的，都是该国的国家银行。但它们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有的是国家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如中国；有的受政府控制隶属于财政部，如英国、法国；有的独立于政府，直接向国会负责，如美国、德国。我国最早的国家银行是清政府在光绪 31 年（1905 年）设立的户部银行（1908 年改称大清银行）。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是"中央银行"。我国现在的国家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起中央银行的作用）。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的特殊职能在于：垄断银行券发行权，或受国家委托发行货币，它

是发行银行；集中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并对它们提供信贷，它是"最后贷款者"，是银行的银行；执行国家金融政策，代理国库，代国家发行公债券，并对国家提供贷款，是执行国家金融政策的银行。

国家信用　国家以债务人身份取得或以债权人身份提供的信用，通常指前者。基本形式是发行政府债券，包括国内公债、国外公债等。国家信用的产生是由于通过正常的税收等形式不足以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马克思说："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22 页）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国家信用制度是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债券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大银行或在公开金融市场上发行的。银行不仅可以从中取得大量回扣，而且，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还为银行和股份公司提供大量的虚拟资本和投机的重要对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加深，通过国家信用取得的收入，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弥补亏空的主要手段。尽管国家财政信用的产生是源于财政的困难，但在现代西方国家，国家信用不单纯是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且已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的经济杠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密切联系的加强，国家信用也从国内发展到了国外，即一国政府以国家名义向另一国家政府或私人企业、个人借债以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政府债券，它既成为弥补一国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成为调节国际收支，调节对外贸易的有力杠杆。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国家信用，它主要不是用于弥补经常性财政收支出现的赤字，而是聚集资金用于经济建设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对国外发行政府债券，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还可以调节国际收支。国家不仅可以利用信用手段取得收入，也可以用信用手段扩大经济建设性支出，如我国通过财政给予集体农场的贷款、以及支援集体农业经济贷款等。对外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是为了帮助债务国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发展民族经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互相支援。

国债制度　国家对公债的发行、流通、偿还等方面的法律规定或政策规范。在现代各国财政收入中，公债收入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财政支出中公债的还本付息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公债不但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已成为国家借以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的经济杠杆。这样就要求对公债的发行、流通与偿还的全过程实施控制和引导，从而既能保持财政收入的增加，又能按期偿还，还能发挥它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国债制度可具体分为公债的发行制度、公债的流通制度、公债的偿还制度。公债的发行制度包括公债发行的数量、发行的种类、发行的主体、发行的条件等方面的规定。一定时期公债能够发行多少，既要考虑到财政的需要程度，又要考虑到经济的可接受程度。如果发行过大，会导致将来还本付息过重，财政难以承受，在发行时期，超过了人们的购买能力，就会影响到发行任务的完成，另外公债向谁发行，也要作出规定。公债发行种类也很重要，是发行赤字公债，还是发行建设公债，是长期还是短期公债，是内债还是外债等，都必须明确。发行主体是指由中央发行还是由地方发行，各自能发行多少公债在世界各国一般也有规定。发行条件是指减价发行、溢价发行、还是平价发行等等。公债的流通制度是指对哪些公债可以进入二级市场，哪些不能进入二级市场等方面的规定。公债偿还制度是指对公债偿还方法等方面的规定，如是用抽签偿还法，购销偿还法、调换偿还法，还是用减债基金法。历史上的"减债基金制度"是典型的公债偿还制度。国家对公债发行、流通、偿还等方面所做的法律规定或新形成的政策制度是确保公债对经济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保证。

国家预算　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预计，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查和批准，是国家有计划筹集和运用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是国家的基本财政计划和社会主义财政分配体系的主导环节。国家所有制形式和职能决定了国家预算的性质和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其国家预算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映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关系。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基本上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它的预算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其次是国债，它的预算支出主要用于军事支出和暴力机关的支出。由于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以及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果，收入来源日益枯竭，支出又随着扩军备战而恶性膨胀，它的预算通常是支大于收、赤字不断。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预算，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实现国家职能，有计划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再生产方式的重要手段，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主要财政分配关系。国家通过预算这一分配工具，将分散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集中起来，根据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规划，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有计划地统一进行分配，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从财力分配上保证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社会主义国家预算也是建立国家物质储备的重要工具，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

自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纯收入，反映了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增长速度和盈利水平。预算支出的大部分用于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事业，以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反映了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发展速度以及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预算的组成是与国家政权的结构和行政区域的划分紧密相联的，国家预算按照我国政治结构的构成分为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两个基本环节。地方预算又划分为省预算、自治区预算和直辖市预算。中央预算在国家预算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国家金库 又称"国库"或"金库"。国家财政收支的保管出纳机关。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中央金库条例》，决定设立中央金库，其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理。随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1985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规定了我国金库的基本职责。①负责收纳各级预算收入款项。②办理各级预算收入的划分和分解。③办理各级预算支出的拨付。④编报各级预算收入和库存情况的金库报表，向上级国库和同级财政部门提供预算收支执行情况。⑤协助各级财政税务机关督促有关经济单位及时向国家缴纳各种应缴款项等。此外，地方财政机关负责掌管的预算外资金的出纳，也由国家金库代为办理。我国规定，国家金库收纳库款，以人民币为准，支拨款只办理转帐，不支付现金。国家金库的组织结构，原则上实行一级财政设立一级国库，划分为总金库、分金库、中心支库和支金库四级，中央金库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金库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支库设在地（市）中心支行；支金库设在县（市））支行。国库以支金库为基层，支金库以下设国库经收处、其业务由当地专业银行办理，受支金库领导。各分金库、与金库既是总金库的分支机构，也是地方国库。总金库，分金库、中心支库可直接对外办理各项国家金库业务，按照国家规定，国家金库具有以下监督管理职能：①有权检查各经收处和征收机关是否按规定及时将收缴款项足额上缴国库。②对不按规定上缴国库的款项，要认真追究，严肃处理，对擅自变更各级财政之间收入划分范围，分成留解比例或任意调整库款帐户之间存款余额的，有权拒绝执行。③对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退库的有权拒绝办理。④对财政存款在银行的开户和财政库款的支拨有权进行监督。⑤有权拒绝受理不符合规定的财务凭证。国家金库工作是国家预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家决算 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是国家预算执行的总结，也是国家经济活动在财政上的集中反映。国家决算，由中央级决算和地方总决算组成。地方总决算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市辖区；乡、镇三级决算单位。同时，由财政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经营的预算外收支也应列入国家决算范围，编制国家决算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认真对待。国家决算收入以缴入金库的实际收入数编报，决算支出以银行的支出数编报。根据国家决算的编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和预算执行单位在预算年度终结时，都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编制本地区、本部门决算，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自下而上的审查汇编，逐级上报，最后形成国家决算，国家决算由财政部负责组织编制，报国务院审查核定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地方各级总决算由地方财政部门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报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国家决算数是否准确，取决于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提供的决算数据，因此，名级预算管理部门都要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决算工作，在编制决算前，要做好本地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清理工作，要认真核对年度预算收支数字，清理本年度预算应收应支数，结清预算拨借款以及清理往来，清查财产，进行决算收支数字的对帐工作等，保证决算工作的完整性、准确性。国家决算是国家一年来各项经济活动的集中反映，通过对国家决算的分析和研究，能及时总结预算年度内的预算执行、预算管理以及预算监督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发现问题，制定改进措施，为国家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为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创造条件。

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 指我国对实行工资总额随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国营企业，就其增长工资超过一定限额部分，按一定比例征收的一种税。1985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当年起征。开征此税的目的是为配合企业工资制度改革，从宏观上对企业工资增长进行必要的制约和调节，使企业工资增长与生产的增长相适应。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其主要内容有：①纳税人。经批准实行工资总额随上缴税利挂钩浮动，并在银行单独设立工资基金（包括工资增长基金）专用帐户的国营企业。工资总额随上缴税利挂钩浮动的国营企业，其上缴税利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所得税、调节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②征税范围，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规定，报经国家批准，实行工资总额随上缴税利挂钩浮动的国营大中型企业。③征税对象。企业当年增发的工资总额超过国家核定的上年工资总额7%以上的部分工资额。④工

资调节税按年计征、按次预缴、年终汇算清缴。"按年计征"是指纳税人缴纳工资调节税时，应按年增发的工资总额和适用税率计算缴纳。"按次预缴"是指纳税人在年度内累计增发的工资额超过国家核定的上年工资总额的7%时，纳税人每次增发工资，都应按规定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工资基金（工资增长基金）表和纳税申报表。税务机关审查核实后，填发纳税缴款书，限期入库。"年终汇算清缴"是指纳税人应于年度终了后35日内填报纳税申请表，经税务机关审查核定，其少缴税款应补交入库多缴税款由税务机关办理退库手续或冲抵次年应纳税款。⑤税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⑥工资调节税的计算公式：

应纳工资调节税额＝工资增长总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率×核定工资总额

国定税则　又称自由税则。指凡是由一国国家政权机关自主规定、无需同别国协商，也不受对外条约义务约束的，并有权加以变更的税则。国定税则的税率高于协定税则的税率，适用于没有签订关税贸易协定的国家。从依据这种税则的税率形式来看，该税则有单式税则和复式税则两种：国定单式税则是各国最早实行的税则，它对所有国家均适用同一税率；国定复式税则有最高最低税则和多栏式税则。我国现行的是最高最低税则的国定税则。

国防支出　又称国防战备费。是国家预算用于国防建设需要的资金。它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财力保证。包括国防费、民兵建设事业费、国防科委事业费和人民防空费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技术，还必须要有现代化国防，以保卫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必须加强军事建设、巩固国防。建国以来，我国国防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军事人员的供给和训练，以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购置必要的军事装备和修建营房以及国防战备工程，以不断改善部队的装备水平，进行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以实现国防现代化。国防支出必须在财政总支出中占合理的比例，注意保持国防支出与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防力量不断增强的前提下，使国家能集中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资金来自于国民经济创造的纯收入。国防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只有以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作后盾，才能建设强大的国防。此外，国防建设资金必须贯彻厉行节约的原则。建国以来，在历年国家预算中，国防支出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但从总的趋势看，它在国家预算支出总额中的比例是下降的，使国家能集中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国家预算收入　即国家财政收入。国家为了保证实现其职能的需要，通过国家预算，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所获得的归国家集中掌握和使用的资金。国家预算收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对劳动人民的税收，体现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积累，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社会创造的纯收入。国家预算收入，不仅体现了国家同集体经济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还体现了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各种分配关系，是国家与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反映。1983年我国实行第一步"利改税"之前，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各种税收收入以及债务收入（如发行公债和国库券收入、国外借款收入等）和其他收入等。1984年国家开始第二步"利改税"之后，税收成为我国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预算收入的来源，从各种经济成分上缴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看，约90%的预算收入来自全民所有制经济，其次是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只占极小比重，从国家预算收入来源的部门结构看，工业部门上缴部分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主导地位（1982年占75%），其余则来自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筹集社会主义建设资金，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挖掘本国的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依靠科技进步和增收节支来积累建设资金。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效益提高了，国家财力才有了保证。财政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资金的积累水平，同时，要注意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使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适当比重，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国家预算支出　即国家财政支出，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把筹集起来的集中性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再分配，是国家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巩固国防和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财力保证。其中，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发展经济的费用占总预算支出的一半以上，我国财政支出分类如下：①根据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划分，可分为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②根据财政支出与再生产的关系划分，可分为补偿性支出，积累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三类；③根据财政支出的用途划分，可分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流动资金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支

出、地质勘探支出，发展农业支出，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城市维护支出，科、教、文、卫事业费用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国际战略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对外援助支出以及武警部队支出和总预备费支出等：④根据国家职能和活动范围分类，财政支出可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和其他支出；⑤根据财政支出的使用部门分类，可分为工业、农业、水利、交通、水产、邮电、商业、物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支出。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主要是采用无偿拨款的办法，体现了财政的无偿性。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支出无偿供应的办法已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财政支出的无偿供应已逐步改为财政支出的有偿贷款办法，如 1985 年，对全国基本建设全面推行"拨改贷"，即按照资金有偿的原则，将原来基本建设的预算拨款改为以贷款的方式向建设单位供应资金，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中的定额部分由原来的财政无偿供应，改为通过银行以信贷的方式有偿供应，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也由无偿拨款改为采用有偿无息周转金的办法。我国经济起步晚，底子薄，因此，财政支出必须坚持量入为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认真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各项支出间的比例关系。

国家税收管辖权 是指一国政府行使的征税权力。它是国家主权在税收方面的具体体现。一主权国政府有权通过制订法律，确定自己的税制，决定纳税人和纳税对象及征税税率，并可以对一切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和物行使征税权力。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征税权力，而不受任何外来意志的干预。凡属于一国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纳税人，都必须服从该国的税法和国家税务机关的监督管理，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国家税收管辖权的独立原则，是维护国家权益，平等互利地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但一国税收管辖权的行使，必须尊重他国的主权，必须符合国际法的规定，而不能侵犯他国的主权。具体来说，①除非有关国家另有协议，一国的税务机关不得在另一国境内实施征税行为，包括向外国境内的企业递送纳税通知书；为课税目的在外国境内搜集调查税务情报资料；或要求居住在外国境内的非居民纳税人提交会计帐簿和经营情况报告等。第二，一国政府也不能对享有外交税收豁免权的国际组织机构和个人行使税收管辖权。

国营企业调节税 对大、中型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后的利润，超过企业合理留利的部分征收的一种税。是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实行"利改税"的设置的新税种，"利改税"试行之后，每个税种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营企业的利润水平不仅取决于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受制于价格、设备、外部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国营大、中型企业按规定缴纳了所得税后，企业间留利水平高低悬殊很大，生产经营好的企业留利不一定多，经营不好的企业留利也不见得少，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苦乐不均的现象，影响企业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企业挖掘潜力，加强经济核算，以及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因此，国家于 1984 年发布了《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用立法的形式将调节税固定下来，既解决了企业间分配不均的问题，又能保证国家财政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办法》规定：凡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均为调节税的纳税义务人，调节税的计税依据是国营企业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联营企业以分得利润的各方为纳税人，国营小型企业不缴纳调节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采取按日、旬、或月预缴本月税款，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办法征收，具体纳税期限由当地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缴调节税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国营企业调节税税率由财政部门商同企业主管部门核定，具体方法是：以企业核定的基期利润，扣除企业按规定税率（55%）计算上缴的所得税和 1983 年合理留利后的余额占基期利润的比例，即为核定的调节税税率。国营企业调节税纳税期限由各级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税额大小分别核定，同时为调动企业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国家制定了调节税减免规定，对企业当年实现利润超过基期增长的部分，减征 70%的调节税，利润增长部分按定比计算，一定七年不变。征收国营企业调节税，对增加财政收入，调节企业留利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营企业所得税 对我国国营企业就其利润所征收的一种税。是我国第二步"利改税"的关键性税种。课税对象是国营企业全年总收入扣除成本、费用以及国家允许在所得税之前列支的税金和营业外支出后的余额。凡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并取得利润的国营企业都是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联营企业在分配各方所得后，以各投资方为纳税人，国营企业所得税税率根据企业类型不同而异，国营大、中型企业按 55%的固定比例征收；国营小型企业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国营企业所得税采取按年征收、分期预缴，就地缴纳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一部分企业由它的主管部门集中后统一缴纳，以适应企业跨地区和财务管理上的特殊要求，国营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期限根

据纳税人应缴税额的大小，由当地税务机关审查核定。

国营企业奖金税　对未实行工资总额随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国营企业当年发放的各种形式的奖金，超过一定限额的部分，按其超过数额的大小，实行超额累进办法征收的一种特定目的税。1984年开征、其后因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多次降低税率和提高免税限额。现行奖金税税率按应纳税奖金额每超过1个月标准工资为级距，依次为20%、50%、100%、200%。免税限额规定为4～5个月标准工资的奖金。同时，规定对发放给矿山采掘、搬运、建筑工人和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人的奖金，以及国家规定的创造发明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自然科学奖、原材料燃料节约奖、外轮速遣奖等，免缴奖金税。奖金税按年计征，按次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开征国营企业奖金税，是国家运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保证奖金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对限制消费基金膨胀，适应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解决企业间苦乐不均的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营企业上缴利润　国营企业实现利润中上缴财政的部分，是我国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把分散在国营企业纯收入的一部分集中到财政的一种主要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70年代，国营企业利润基本上是全部上缴国家，企业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1983年我国实行"利改税"前，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占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第一步利改税的实行，将企业上缴利润的一部分改为所得税的形式缴纳，国家规定对盈利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除征收55%固定比例税率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外，税后利润按规定比例上缴一部分给国家。1984年10月1日国家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企业不再上缴利润，对国营企业开征产品税、增殖税、营业税、国营企业所得税以及地方税、税后利润按规定除由企业留用外、改以调节税、承包费等形式上缴，1986年，国家修改预算项目，原"企业收入类"改为"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类"，将原列企业收入中的国营企业调节税改为单独一类，原列企业收入中的事业收入和外事服务收入改列"其他收入类"。将国家批准的政策性价格补贴和企业计划亏损补贴，由冲减企业收入改列预算支出。"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类"内容包括：①未实行"利改税"的企业上缴的利润和资金占用费；②"利改税"后小型企业上缴的承包费；③小型国营企业转让收入。

国家预算编制程序　法定的编制国家预算的过程和顺序，国家规定，各级财政都要拟定详细的总预算，各企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都要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各行政事业单位都要编制单位预算。为了保证各级财政总预算，企业财务收支计划以及单位预算和国家预算编制的及时准确、完整和统一，国家预算的编制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国家预算的编制程序，一般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逐步汇编。具体作法是：先由各地区、各部门提出预算收支建议数，报送财政部；财政部根据有关方针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参照收支建议数，拟定预算收支指标，经国务院批准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根据中央下达的预算收支指标和本地区、本部门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经过详细核算，拟定本地区、本部门预算和财务收支指标，逐级下达；各省、市、自治区所属各部门和县（市）财政部门，根据上级下达指标自下而上逐级汇编单位预算（财务收支计划）草案和总预算草案，报省、市、自治区汇总成省、市、自治区总预算草案送财政部；中央名部所属企事业单位根据上级下达指标，自下而上编制单位预算草案和财务收支计划，由主管部门汇编，送财政部；财政部对各省、市、自治区总预算草案进行审核，汇编成地方总预算草案；将各部报送的单位预算（财务收支计划）草案审核汇编成中央预算草案，然后将地方总预算草案和中央预算草案汇编成国家预算草案，报国务院审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成为国家预算。

国家预算审查和批准　保证国家预算编制质量，使国家预算具有法律效力的步骤。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审核与国家预算的审查批准。财政部对中央和地方总预算的审核主要内容是：①预算收支的安排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对编制预算草案的基本原则和指示精神。②预算收支的安排是否符合我国预算管理体制的要求。③预算收支的安排是否贯彻了收支平衡的要求，是否与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一致。④预算编制的内容是否翔实，材料是否完整，数据是否准确，有无技术性错误等。审核过程中要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对照以上内容进行认真的核查，如有不同意见或发现问题，要及时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商或修改。各级预算草案经过层层审核汇编后，最后由财政部汇编成国家预算草案，报国务院审查通过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核批准，国家预算草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即为正式的国家预算。

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国家财政对经核定的国营企业财务计划所列亏损给予的补贴。是我国预算内的一切政策性支出。1985年以前，"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包括政策性亏损补贴、政策性价格补贴和

对限期扭亏企业经营性亏损的补贴，补贴数在企业收入中冲减。从1986年起，"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中取消了价格补贴，将其改列预算支出，在预算科目内新设"价格补贴支出类"，同时增设"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类"，改变过去那种亏损补贴不列预算科目，而由预算收入暗扣的方法。使国家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各项财政补贴支出的数据资料。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中央预算收入中的专项资金。征收"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一部分社会资金来加强能源和交通的重点建设。长期以来，能源供求关系紧张，交通运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正常发展，为筹集必要资金，加快能源、交通重点建设的发展，国家于1982年12月发布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决定从198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国营企业、事业、行政单位所属的城镇集体企业上缴所得税后的利润，按规定比例征收"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上缴中央预算，统筹安排。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设立、为缓解能源、交通供求紧张的矛盾，推动经济建设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家物资储备支出 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建立国家物资储备的部分。物资储备主要包括：粮食、主要经济作物、重要原材料以及设备等。物资储备是由国家直接掌握用于解决国民经济发生重大脱节和重大意外事件所形成的物资缺口，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各类物资储备主要由国家储备部门负责储备，它的动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不允许临时调节性动用。由商业部门储备的消费资料，属于商业库存，不属于国家物资储备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是直接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是不参与经常性物资周转的专项储备。所以，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重要的后备力量。国家安排财政预算时，财政与计划部门应根据国家物资储备部门的物资储备计划，从本国财力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国家物资储备支出预算。在我国，除国家储备外，还有地方性储备、企业储备和集体经济的储备作为补充。

周转税 在商品流转过程中一次课征的税收，它是苏联1930—1932年在税制改革中确立的一种税收制度，也是苏联国家预算的主要收入项目之一。规定：周转税只对商品的一个流转环节课征，实行部门统一的税率，采用同预算集中结算的方式，由联合组织交纳。周转税是苏联国家预算的主要收入之一。其征税对象是生产、销售或采购商品的流转额。纳税人是生产、销售或采购应税商品的国营企业、工艺合作社、商业批发销售站、农产品采购组织等。其税率和计算方法有三种：①按零售价格与批发价格的差额计征，即价格差额法。②按流转额的百分比税率计征，即从价比例税率。③按单位产品的固定金额计征即从量定额税率。按照苏联的价格制度，周转税分别包含在工业品批发价格或农产品批发价格之中，纳税人在商品销售以后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周转税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便于配合价格体制进行计划管理，有利于企业的经济核算。

固定比例留成 是指中央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全年财政收入指标，确定一个比例，留给地方一部分收入，作为一项比较稳定的机动财力。这是1974年至1975年实行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具体做法。留成比例按收入规模和需要与可能的情况计算，全国最高为6%，最低为1.6%。这种做法后来被"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分灶吃饭"的预算管理体制所代替。

固定资产折旧 简称"折旧"。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磨损，其价值以折旧形式逐渐转移到产品成本中。按照我国现行财务制度，企业的房屋、建筑物、设备、工具等，凡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二百元或五百元、八百元以上的就构成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是企业的老本，老本的消耗应该及时得到补偿。补偿生产中垫支的资金，一般视固定资产有效使用年限而逐年提取。对于企业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损耗并转移到产品成本或商品流通费用中的那部分价值，从产品销售收入中提取出来，故称为固定资产折旧。我国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分为基本折旧和大修理折旧。基本折旧指固定资产原始价值的损耗，根据原始价值和预计使用期限平均计算。大修理折旧指用大修理来恢复的那部分价值的损耗，根据预计大修理支出和预计使用期限平均计算。正确确定折旧原则，正确计算折旧，对加强经济核算，保证固定资产的再生产有重要意义。

货币 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有许多种商品充当过货币，但最后逐渐固定到贵金属金和银上。充当货币的金或银的使用价值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有由其自然属性决定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有由其一般等价物的社会职能产生的使用价值，即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五种职能，是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媒介和命脉。货币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首先是商品交换关系的反映。货币与商品相交换，实质上是人类不同

劳动的交换，这种交换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货币还是自发核算社会劳动的工具，反映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货币体现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国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实行一种多元化的货币制度，其中以铜铸币为主币，杂用金银珠玉和谷帛及纸币。

货币税　"实物税"的对称。税收以其征收的实体为标准，分为货币税与实物税两类。货币税是国家以货币形式征收的税。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的发展，税收逐渐采用了征收货币的形式，以货币形式征税，便于纳税人纳税，又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支管理，同时货币税能广泛地介入商品经济，从而扩大税收对经济的调节和制约作用。现代各国税收基本上采取征收货币的形式。我国除农（牧）业税以征收实物为主外，其它各税均采取征收货币的形式。

货币本位　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指法律规定以何种货币商品作为本位币。如法律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即以银铸币为本位币，则货币制度为银本位制；如法律规定黄金为货币金属，即以金铸币为本位币，则货币制度为金本位制。货币本位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银本位、金银复本位、金本位、金块本位和金汇兑本位等类型。金本位制崩溃以后，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货币平价　用货币表示的官方规定的黄金价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一款规定："各会员国货币的平价应以黄金作为共同单位，或以1944年7月1日所含黄金重量与成色的美元"表示之。这里的美元是指1934年1月美国实行币制改革时所规定的1美元含金量为0.88671克，1盎司黄金＝35美元这个黄金官价的美元。各会员国有各自不同的货币平价，会员国的货币平价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后，不得任意变动。如果会员国的国际货币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方可变更货币平价。但调整幅度在10%以内，可事后追报。建立会员国货币平价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主要内容之一。这一规定实际上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了美元霸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8年3月31日正式宣布，从1978年4月1日起，有关肯定浮动汇率制和取消黄金条款的决议正式生效。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彻底崩溃了。

货币基数　英文 Monetary Base 的意译。亦译"货币基础"、"基础货币"。西方货币银行学概念。指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与社会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和。是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变量，也是银行体系的存款扩张、货币创造的基础。其数额大小会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变化，所以也称"高能货币"。当中央银行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时，各商业银行就要调整资产负债项目，相应增加或减少它交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这会在银行体系内引起一系列变动。按照西方货币银行学中关于辗转存款、派生存款的乘数理论，调整货币基数就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紧缩或扩张的作用。社会公众持有现金的变动也会引起派生存款的变化，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扩大或缩小。当公众将现金存入银行时，银行就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发放贷款，从而在银行体系内引起一系列的存款扩张过程；当公众从银行提取现金时，又会使银行体系内不断进行的派生存款过程部分中止。但一般来说，除季节性变动外，公众持有的现金额度比较稳定。

货币单位　国家法定的本位货币名称和其含有的贵金属重量的货币计量单位。是一个国家货币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量不同的商品，其价格表现为不同的价值量，即表现为不同的金量或银量。为了计算金银的重量，就要把定量的金银确定为计量单位，并贯之以名称。货币单位依国家不同的金融制度而不同，也依各不同的国家而不同。例如，英国的货币单位定名为"英镑(Pound)"按1870年铸币条例，规定1英镑的含金量为123.27447格令（7.97克）；美国的货币单位定名为"美元（Dollar）"1971年12月，美车政府宣布1美元的含金量从0.888671克降为0.818513克；联邦德国的货币单位为"马克（Mark）"1969年10月，联邦德国政府宣布马克升值9.29%；由原来1马克含金量为0.222168克上升到1马克含金量为0.242806克；1910年中国货币单位为"银元"，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合六钱四分八厘，一元分成十角，一角分成十分。在纸币制度下，货币单位一般只具有货币单位名称和货币计量单位的意义而已。显然，不少国家也曾规定了货币单位的含金量，但因为不能兑换黄金，所以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货币管理　泛指货币政策、货币制度、货币流通、货币结算以及货币市场的管理。1954年以后，我国分别实行现金管理、结算管理、信贷管理等，不再统称为货币管理。1950年12月25日，我国颁布的《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包括：①现金管理。货币管理范围内原所有单位，除规定的库存现金限额外，其

余一切现金集中于国家银行，使用现金必须编制现金收支计划，经批准后按计划支付。②划拨清算。国家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合作社的一切交易活动，除规定使用现金者外，必须通过国家银行，使用特定的方式，划拨清算。③集中短期信用。国家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合作社之间不得发生赊欠和借贷，一切短期信用集中于银行。④监督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使用情况。

货币保值 国际收支中防止汇率风险的一种方式。对国际收付中的货币运用其他货币定值以防止汇率变动可能发生的风险损失。目前国际上运用货币保值的方法主要有“一篮子”货币保值、特别提款权保值和以欧洲货币单位保值。上述三种保值方法，亦即多种货币保值。在签订经济合同时，首先确定以哪种货币成交，并规定保值货币种类以及各种保值货币在支付总金额中所占的比例，按当时汇率计算出保值货币的数额，到期支付时再按支付时的汇率折成支付货币。这样，在货款实际收付时的总金额就会高于或低于合同规定的总金额，防止支付货币因汇率变动可能产生的损失。特别提款权保值和欧洲货币单位保值的方法与“一篮子”货币保值的方法相同。

货币利率 亦称“名义利率”。以货币为标准计算的利率。它是相对于实际利率而言的。计算利率有两种标准：一是以货币为标准计算利率，称“货币利率”或“名义利率”；二是以财货为标准计算利率，称“实际利率”。划分货币利率和实际利率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分析通货膨胀下利率变动的工具。在经济管理中，能操作的是货币利率，对经济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则是实际利率，而实际利率的高低又决定于货币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所以考察货币利率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利率水平的一般因素是在平均利润率限度内，受借贷资金供求、历史传统、国家政策的影响。这对货币利率和实际利率都是适用的。但货币利率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密切。从长期趋势看，物价上涨率越高，货币利率水平也越高；但从近期看，两者的增长幅度不完全一致。有时货币利率增长低于物价上涨。其原因可能是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投资疲弱，资金供过于求，或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有关；或与时滞有关。但不论什么原因，如果长时间货币利率增长低于物价上涨率，导致实际利率成负值，则利率的积极作用会消失殆尽，甚至出现负作用。

货币制度 简称“币制”。一国用法律确定的该国货币流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主要内容包括：(1) 有关货币金属的规定。这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白银曾被广泛用作货币金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黄金逐渐排挤白银，独占了货币金属的地位；(2) 有关货币单位的规定。规定货币单位的名称与所含的货币金属重量；(3) 各种货币的铸造、发行与流通程序。即规定金属货币、辅币、信用货币、纸币的发行和流通程序，以及主币和辅币的种类等；(4) 金准备制度。指国家集中金准备于中央银行或国库的有关规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实行过复本位制、单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我国规定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并坚持高度集中统一的发行原则。国务院每年在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核准货币发行指标，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货币回笼 货币投放的对称。银行的货币收入大于货币支出的部分。指银行通过各种途径从市场货币流通中收回一定量的现金。货币回笼是国家通过银行调节货币流通的方式之一。国家根据市场货币流通状况，通过各种渠道，将多余的货币吸收回流到国家银行，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同国民经济对货币的实际需要相适应。货币回笼主要是靠增加货币收入来实现的。主要回笼渠道有：(1) 商品回笼，即国营和集体商业出售商品所得价款，这是现金回笼的主要渠道；(2) 服务回笼，即各种服务性单位的收入，如车船票、影剧票、房租、水电费、饮食服务收入以及其他劳务收入；(3) 信用回笼，即通过信用渠道构成的银行现金收入，主要是城乡人民的储蓄和借款者用现金归还银行贷款（如农贷收回）；(4) 财政回笼，即财政的现金收入，主要是向居民征收的税款，如车船牌照税、屠宰税、农贸市场交易税等。

货币幻觉 英文 Money Illusion 的意译。亦译“货币错觉”。当货币的名义价值发生变动如价格变动或货币存量变动，而其他真实价值如实际收入、相对价格、实际利率以及包括实际现金在内的实际财富等皆未变动时，个人由于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产生错觉，从而改变其对商品或劳务的需求。货币幻觉来自对币值的错误估计，是个人（或企业）的一种非理性行为。职员往往容易发觉货币工资增加与减少的变化，而较难察觉物价水平的升降变化。当物价与工资按同一比例提高时，他们会把货币工资的增加看成实际工资的增加。短期内，货币幻觉对消费也有影响。假定实际工资不变，货币工资与物价等比例上升，职员较强烈地感到的是名义货币收入的增加，从而增加消费支出，使实际消费水平上升。反之，当货币工资和物

价等比例下跌，货币幻觉会使消费者认为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减少消费支出。货币幻觉对个人或企业的投资也有影响，当利率下降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幅度时，投资者却可能因名义利率下降，而大量借入资本进行投资。相反，即使利率上升幅度小于通货膨胀时，他们也会减少投资。此外，个人所得税体制也会产生货币幻觉效果。因为税率和纳税等级都是以货币为依据的。如果货币收入和物价都下跌而实际收入不变，纳税人所属的纳税等级会相应降低，他们的实际税收负担也下降。货币幻觉只能在通货膨胀一定的幅度内出现，当通货膨胀普遍化和加速后就不复存在。

货币幻觉作为经济学术语，首先由费雪提出，他用这个词指"未能觉察币值变动"。即指人们只注意货币的名义数量而没有注意到物价水平的变动已引起货币购买力发生变动。但自费雪以后，货币幻觉的含义已有些变动。许多经济学家把它视为与经典经济学中商品需求函数的零阶齐次性同义。在经典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商品需求函数只与商品的相对价格有关，而货币数量只影响商品的绝对价格，不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因为货币数量的变动不影响商品需求函数，这些经济学家把商品需求函数的这种性质（零阶齐次性）视为正代表没有货币幻觉，并由此得出结论：货币是实物部分的"面纱"，而不是一种资产。唐·帕廷金对货币幻觉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限定，认为，如果把不存在货币幻觉视为零阶齐次性同义，必须加上一个前提，即个人的手持名义现金余额随物价作同比例变动。这样定义的货币幻觉，才会使没有货币幻觉代表：只是物价水平变动，其他不变，不影响对商品的需求。如果个人还持有有价证券，那么，为了避免财富效应，货币定义中的前提条件还需加上"其他财富不受物价变动的影响"，这样才会在更真实的情况下使没有货币幻觉与零阶齐次性同义。"货币幻觉"一词不仅体现在商品需求函数；在有价证券需求函数和劳动供给函数中，它的存在与否也是一个重要的假定。

货币升值　亦称"货币增殖"或"通货升值"，"货币贬值"的对称。是某国货币的法定含金量的增加对黄金或别国货币的比价的提高、以及为此而施行的措施的总称。如 1969 年 10 月，联邦德国政府宣布马克升值 9.29%，含金量由原来的 0.222168 克增至现在的 0.242806 克，对美元法定汇率由 1 马克 0.25 美元提高到 0.273224 美元。又如 1971 年 12 月，日本政府宣布日元对美元的比价由 360 日元兑换 1 美元提高到 306 日元 1 美元。某国货币的升值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国的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国际贸易实力的增强。从表面看该国的货币更值钱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对该国经济也有不利之处。首先，提高本国货币对黄金或外币的比价，并不表明本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提高，相反，还削弱了本国商品出口的竞争能力，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其次，本国的外汇储备和从国外调回的资产折合成较少的本国货币，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一般来说，随着某国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贸易，外汇收支出现顺差的扩大，该国的货币都要升值。

货币贬值　亦称"通货贬值"。"货币升值"的对称。是某国货币法定含金量的减少对黄金价格或别国货币比价的降低，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如 1971 年 12 月美国政府宣布美元含金量由原来的 0.888671 克减少为 0.818513 克，美元对黄金贬值 7.89%，即由 1 盎司黄金等于 35 美元改为 38 美元。1973 年 2 月美元再次贬值 10%，即由 1 盎司黄金等于 38 美元改为 44.2 美元。某国的货币贬值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国的外汇收入减少和国际贸易实力减弱，但从另一方面看，某国的货币贬值，对该国经济也会有一定好处。这是因为，货币贬值可以降低该国商品在国外的价格，增加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扩大出口；同时，货币贬值还可以增加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成本，因而可以减少进口，扩大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另外，货币贬值可以使得外汇储备和国外调回的资产折合更多的本国货币，这意味着一种盈利。

货币贬值有时也泛指一国货币因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国内购买力的下降或由于汇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跌落而导致的贬值。

货币政策　由中央银行管理的一国货币供应，以保证信贷的供应在数量和利率方面与国家的特定目标相应的一种经济杠杆。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货币供应量政策，储备金率政策，贴现政策等。世界各国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主体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主要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国家所要实现的整个经济政策目标而制定适当的政策，根据现实运用货币政策情况来看，它又可分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放松性的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时期通常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如或者直接降低货币供应量，或者提高中央银行的储备金率和提高对商业银行票据的再贴现率，后两者运用的结果也达到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起到了紧缩的作用。而在经济萎缩的年份，可以运用放松性的货币政策，或者直接扩大货币供应量，或者降低储备金率或贴现率，其结果都会扩大货币供给量，刺激经济回升。货币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它和财政政策密切配合，可以调节一国的经济发展。

货币干预 又称"货币干涉"，指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或私人金融机构，通过买卖外国货币、有价证券，以影响或操纵外汇、证券行市的手段。当外汇市场上本国货币汇价低落时，就抛售外汇，买进本国货币，促使外币汇价下跌，本国货币汇价上升；如果是外币汇价过低，则抛售本国货币，买进外币，促使外汇价格上升，本国货币汇价下跌。

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迫使西方一些国家不得不放弃金块本位制，货币失去了黄金的保障，外汇市场风波迭起，各国政府除实施外汇管制外，并加强对汇价的干预。英国于1932年，法国于1936年先后设置的"外汇平准帐户"，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建立的"外汇稳定基金"，目的都是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的汇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对所有国际贸易和资本调拨都由政府管理当局按固定的汇价办理结算。到1945年战争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告成立，按各成员国货币的含金量制订了相互之间法定汇率和波动的上下限。但由于幅度仅为上下各10%，而各国通货却在不断地膨胀，货币汇价动荡日益激化，政府的干预活动也更加频繁。以英国为例，战后由于经济萎缩不振，失业和通货膨胀严重，英镑不断受到冲击，汇价经常跌近官订下限，因而政府不得不动用黄金外汇储备和大量举借外债，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尽管如此，依然没能逃脱1949年1967年英镑两次贬值的厄运。直到1972年6月放弃固定汇率，实行了有管制的浮动，干预活动才告结束。1973年2月美元再次贬值后，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币汇率普遍实行浮动。同年3月19日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组成的联合浮动集团以及由共同体创立，自1979年3月13日起生效的欧洲货币体系，虽然内部各成员国相互之间仍保持固定汇率，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货币有强有弱，对汇率的干预仍时有发生。

货币层次 依据流通中货币的流动性或其他特征对各种形态的货币所进行的分类或划分。流通中的货币，从经济上看，有作为资金的货币，有作为收入的货币；从具体形态上看，有现金，有存款货币；等等。所有这些形态的货币，虽然同为流通中的货币，然而它们各有自己的特定性质和运动规律，在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统一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影响，产生不同的作用。从货币流通的不同形态和特征对货币作出划分，其目的在于对货币流通作出分类调控，保持货币流通结构与商品流通结构相适应。对货币层次的划分最常见的是根据货币作为购买力的活跃程度来进行的。通常分为M_0=现金（硬币+纸币），这是最活跃的具有现实购买力的货币；M_0=M_1+活期存款（不含居民活期储蓄存款）+企业专用基金存款；M_2=M_0+M_1+活期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它定期存款。以上三个层次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M_3、M_4等层次。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货币第一个层次的通常是现金+活期存款，而不把现金做为一个单独层次，因为在他们那里，以活期存款签发的支票是可以流通的，在一般情况下支票同钞票没有什么区别。从我国情况来看，现金作为一个单独层次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支票不能象现金一样流通转让，只可以做一次性支付，而且支票的使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在我国现金主要用于购买消费资料，因此设立这个层次，有助于分析消费资料购买力同消费资料可供量之间的平衡状况。M_1中包括的各种存款，是随时可用做购买和支付的货币，但与现金不同，这部分货币的运动是通过银行转帐进行的，主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它要受到银行的监督和国家计划，物资分配制度的约束，其活跃程度就次于现金。M_1中的各项存款是推迟了的购买力，但就实际来看，这部分存款的流动性最差。

货币流通 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不断地转手于商品的买者与卖者之间的运动。货币流通由商品流通引起，并为商品流通服务。"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是货币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移到另一个商品者手里，或者说，就是货币流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4页）商品交换是货币流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由商品流通决定的货币流通，又具有与商品流通不同的特点：首先，货币不象商品流通一样，复归到它的出发点，而是总是不断地离开这个出发点；其次，商品经过交换退出了流通领域，而货币则停留在流通领域不间断地流通；最后货币流通总是和商品流通的方向相反。不同性质的商品流通，决定不同性质的货币流通。简单的商品流通和相应的货币流通是以卖开始，以买告终。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商品。运动的内容体现着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交换，以满足不同的需要，这里，货币仅起媒介作用。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却相反，是以买开始，以卖结束。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运动的内容，是反映价值的增值或者剩余价值的实现，这个运动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商品成为全过程的媒介，货币则是作为资本而不断地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它对于保证商品流通的正常进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的形式也在变化，最初是以金属条块流通，后逐步发展为铸币，信用货币以至于

纸币流通。货币流通不是消极地被商品流通所决定，它也会对商品流通，以至对生产发生反作用。

货币发行　货币发行当局向流通领域投放的货币数量超过从流通领域回笼货币发行当局的货币数量。按其性质可以分为经济发行、财政发行（包括隐蔽的财政发行）、信用发行三种。经济发行意指货币发行当局为适应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扩大的需要，有计划地发行、投放货币，旨在保证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转的货币需要量相一致，保证市场货币流通正常、币值稳定。这是货币发行的正常方式。财政发行则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者财政假平衡真赤字而导致的货币发行。它一般是由于财政虚收和脱离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而被迫进行的货币发行。大量的财政发行将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影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紊乱。信用发行则是通过信贷的方式进行的货币发行，为了满足流通和生产发展的需要，适当进行信用货币发行是必要的，但如果由于银行贷款掌握不严，发放贷款超出生产发展和商品流转扩大的需要，也会造成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而形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国家固然可以把任意数量的纸币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9—140页）因此，货币发行必须符合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我国的货币发行，贯彻执行稳定货币的方针，坚持货币发行集中于中央和有计划地发行的原则。人民币的发行，是在每年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经国务院核批最高发行额，由中国人民银行具体负责执行。

货币供给　即一国经济中货币投入、存款货币创造、基础货币扩张（或收缩）形成的货币供给的全部过程。其主要内容有：货币供给量的定义及货币层次的划分；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因素。货币供给量的定义及货币层次划分。货币供给量是指某国家某时点（如年末）流通中货币量的总和。货币层次一般是按照货币的流动性原则，存款和信用工具转换为货币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详见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创造过程。在现代货币信用制度下，货币供给主体是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一般地，货币发行均由各国中央银行垄断经营，其他部门、企业、个人均不能擅自发行货币。中央银行通过具体从事存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将货币供应给各部门、企业和公众，以及个人。一切部门、企业、居民个人只能在其所具有的支付能力内支配它的货币权力，不得超出支付能力任意滥发各种支票和信用工具，当然他们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换言之，除银行系统之外的任何部门、企业、个人不能自己额外地供应货币。商业银行从事客户存贷的具体业务，可以多存多贷，在贷款以转帐形式的条件下，客户取得银行贷款并不立即提取现金，而是将款项转入其在银行中的存款帐户，相应地其开户银行就取得了一笔存款，可以用于发放贷款，因此同一笔贷款就可以多次反复地通过贷款—存款—贷款—存款不断地进行下去，同一笔原始存款或贷款就可以产生出若干笔存款或贷款来，这种由第一笔原始存款辗转存贷而产生的存款通常称为"派生存款"。不过这种派生存款并非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它受到以下条件限制：(1) 法定存款准备率，即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交纳的准备金和活期存款的比率；(2) 提现率（或现金漏损率），即客户提取的现金占存款的比率。(3) 超额存款准备率，即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交超额准备金占活期存款的比率。(4) 定期存款准备率，即将存款转存定期的总额占活期存款总额的比率。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能力都会受到向中央银行缴纳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储备金、公众提取现金、转存定期存款的影响，随着以上几个比率的增大而削弱。原始存款经过"派生"之后，成倍扩张（或缩小），这个倍数称为货币乘数。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是决定货币供给量的重要因素（详见货币供给理论模式）。

货币供应量　亦称"货币存量"，指某一时点（如年末）一国流通中的货币量。它是各国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所要掌握和控制的重要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由于各国各派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定义解释不同，又由于各国经济金融历史、金融体制和经济现状不同，各国各派经济学家对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按计算的层次和口径可以分为"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给量"。

"狭义货币供应量"通常用 M_1 表示，一般是指流通中的现金（M_0）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总和。这里的现金（M_0）是由纸币（银行券）和硬币（辅币）构成，小部分留存银行作为银行的现金准备，以备存款人提取，不构成货币供应量。而这里的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是指"存款通货"，存款人可据以开出支票、转帐等进行流通和转让，具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

"广义货币供应量"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_1）加上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以及其他各种可以变成购买力、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货币"（如可转让大额存单、易脱手的政府债券等流动资产）。按其流动性程度，广义货币供应量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

$M_2=M_1$+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定期储蓄

$M_3=M_2$+“准货币”（其他流动资产）

各国中央银行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具体划分和规定不尽相同，在一国中广义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也随金融体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例如，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划分层次如下：

M_1=纸币+硬辅币+商业银行活期存款

$M_2=M_1$+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定期储蓄

$M_3=M_2$+其他银行和储蓄机构的定期存款和定期储蓄

$L=M_3$+其他流动资产

英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划分层次如下：

M_1=现金（纸币和硬辅币）+私人部门持有的英镑存款

$M_2=M_1$+私人部门小额英镑存款+私人部门在建筑协会的小额股票和存款+国民储蓄银行普通帐户

英镑 $M_3=M_1$+私人英镑定期存款和公用部门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

$M_3=M_1$+英镑 M_3+英国居民持有的各种外币存款

中国对货币供应量划分层次的意见至今也不统一，一般都认为：

$M_1=M_0$（现金）+企业、单位活期存款

$M_2=M_0$+专业银行全部存款

关于货币供应量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及关系，西方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1) 货币供应量对货币国民收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根据他们的“新货币数量论”的公式$M=\frac{1}{U}PY$。这一公式中 py 为货币国民收入，M 为货币供应量，U 为短期中仅仅可以作出轻微的波动而在长期中是不变的量。根据这一公式，M 的大小就直接影响 py（货币国民收入）的大小。(2) 在长期中，货币数量的作用主要在于影响价格以及其他用货币表示的量（如货币工资等），而不能影响就业量和实际国民收入（y）。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自然率假说”，即就业量（从而实际国民收入 y）是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因为从长期看劳动力所有者会意识到，增加货币供给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使他们实际工资下降，因此他们调整预期，减少劳动力供给，进而减少国民收人。这样从长期看，增加货币供应量不能增加实际国民收入和就业量。反之亦然。所以，公式 $M=\frac{1}{U}PY$ 中的 Y 与 M 无关，而按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U 是一个常数，所以 M 所能够影响的只能是 p 以及由货币所表示的数量。进而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是不能单纯靠货币因素纠正和解决的。(3) 在短期中，货币供应量可以影响实际变量，如就业量和实际国民收入。因为在短期内，通货膨胀条件下的货币工资可能会落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雇主感到工资的下跌就相应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而劳动力所有者则幻觉货币工资的提高就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因而愿意增加劳动力供给，即增加就业量，相应就会增加实际国民收入。(4) 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所固有的特点就是这部分私营经济的运行的稳定性，国家政策使它的稳定性遭到破坏。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他们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即人们的消费需求取决于从长期看比较稳定的“持久性收入”。因此，人们的货币需求大体是稳定的，由货币需求决定的货币供给也应该是保持稳定的，因而这一部分经济是稳定的。从以上的观点出发，M·弗里德曼的唯一政策建议即“单一政策原则”便是使货币供应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政策的目的在于使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自然增长。例如每年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通货膨胀率为 2–3%，则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 5–7%，这样就可以使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两个宏观经济目标同时实现。

对于 M·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议和观点，许多经济学家都持批评的态度，批评的焦点都集中在“新货币数量论”的“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货币的流通速度（U）在短期内可以预测，在长期可以认为是常数”的假定上。如凯恩斯主义者就指出，货币需求函数是不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 U 在长期和短期都是变动的，因而货币主义者的各种推论不正确，不可靠。相应地，凯恩斯主义就不赞成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宏观经济的运行经常会有很大的波动，国民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投资量的变动，利率的变化对投资量的影响不大，从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执行“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才是控制国民收入变动的最有效的方法，可以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关系。

货币需要量 亦称“货币必要量”。商品流通客观需要的货币数量，由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一定时期，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待流通的商品数量、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的速度。前两项的乘积是商品价格总额。当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流通中所需货币数量同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即商品价格总额愈大，所需的货币量愈多，反之就愈少。当商品的价格

总额不变时，流通中所需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即货币流通速度愈快，所需货币量愈少，反之，则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货币需要量=\frac{商品价格总额}{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

随着商品经济和信用关系的发展，出现商品赊销，这样便发生债权债务的冲销和延期支付等情况，从而引起货币需要量的变化。因此，要在商品价格总额中减去延期支信部份，加上本期需支付部份，再减去债权务相互抵销部份。即：

$$货币需要量=\frac{商品价格总额+到期支付总额-本期赊销商品总额}{单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frac{互相抵销支付总额}{平均流通速度}$$

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通过贮藏职能自发调节实际货币流通量，使之与客观需要相适应。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流通中纸币总量所代表的价值量决定于在金属货币条件下货币需要量的规律，是货币流通规律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47页）这一规律表明，纸币发行额如果相当于没有纸币流通情况下商品流通所需要的具有内在价值的金（或银）币的数量，每张具有一定面额的纸币就代表相应数量的金币。例如，商品流通需要1万元金币，国家发行1万元纸币代替金币流通，这样，总额1万元的纸币就代表1万元金币。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上述限度，较大的纸币总额仍只能代表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币的价值，每张纸币所代表的金币就相应减少，造成纸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纸币流通规律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同样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需要量也是由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货币的需要量决定的。

货币净流量　亦称"净货币供应量（供给量）"，是指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作用的那部份货币总量。由于经济学家对货币的认识和见解有所不同，对货币的划分标准、层次亦不尽相同，因而通常把货币净流量分为狭义货币净流量和广义货币净流量。狭义货币净流量亦称现金货币净流量或现金净流量，是指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那部分现金总量，它不包括银行出于业务需要库存起来以备存款人提取的那部分现金，也不包括在流通中因各种原因而沉淀下来的那部份现金。一般来说，现金净流量等于货币发行当局发行的现金总量减去（扣除）银行业务库存现金和流通中沉淀下来的现金，用公式可表达为：现金净流量＝现金发行总量－（银行业务库存现金+沉淀现金）。广义货币净流量是现金净流量加上可用支票提取或转帐的活期存款。即：广义货币净流量＝现金净流量+可用支票提取或转帐的活期存款。或者可以用式子表示为：广义货币净流量＝现金发行总量－（银行业务库存现金+沉淀现金）。

货币流入量　"货币流出量"的对称。通常指一国范围内一个地区从其他地区流入货币的数量。货币在地区间的流动，主要是由于经济往来和人员流动引起的。一个地区货币流入（或流出）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一般来说，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交通枢纽的大中城市和旅游胜地，货币流入量多；在工矿地区、初建工业基地和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货币流出量多。地区间货币流动的渠道有：交通运输渠道，即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现金收入；职工携带渠道，即因公出差旅费、工资流入（流出）等；贸易渠道，即购买商品等。测算货币流入（流出）量，一般根据地区货币流动的主要渠道，采用匡算与典型调查全面推算相结合的方法。掌握地区货币流入（流出）的情况和数据，有利于分析地区经济形势，加强现金管理和市场管理，安排好商品和相应的劳务供应，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

货币流出量　"货币流入量"的对称。通常指一国范围内一个地区的货币流向其他地区的数量。参见"货币流入量"。

货币升值率　亦称"货币增殖率"或"通货升值率"，"货币贬值率"的对称。是反映货币升值幅度的指标，它表明货币升值后，单位货币增加的含金量占单位货币原有（或现有）含金量的比例，计算方法有两种：

$$(1)\ 货币升值率=\left(\frac{单位货币现有含金量}{单位货币原有含金量}-1\right)\times 100\%$$

$$(2)\ 货币升值率=\left(1-\frac{单位货币原有含金量}{单位货币现有含金量}\right)\times 100\%$$

请注意这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不同。例如：1969年10月马克的含金量由0.222168克增至0.242806克，相对于单位货币原有含金量（公式1），则马克的升

值率为$\left(\frac{0.242806}{0.222168}-1\right)\times 100\%$等于9.29%；而相对于单位货币现有含金量（公式2），则马克的升值率为$\left(1-\frac{0.222168}{0.242806}\right)\times 100\%$，等于8.5%。

货币贬值率 亦称"通货贬值率"，"货币升值率"的对称，反映货币贬值程度的指标。它是指货币贬值后，单位货币减少的含金量与单位货币原有（或现有）含金量的比例，计算方法有两种：

(1) 货币贬值率$=\left(\frac{\text{单位货币原有含金量}}{\text{单位货币现有含金量}}-1\right)\times 100\%$

(2) 货币贬值率$=\left(1-\frac{\text{单位货币现有含金量}}{\text{单位货币原有含金量}}\right)\times 100\%$

请注意这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不同。例如：1971年12月美元的含金量由原来的0.888671克减少为0.818513克，相对于单位货币现有含金量（公式1），则美元的贬值率为$\left(\frac{0.888671}{0.818513}-1\right)\times 100\%$，等于8.58%；而相对于单位货币原有含金量，则美元的贬值率为7.89%。

货币购买力 单位货币能买到的商品量或劳务量的能力。货币购买力的高低，由货币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对比决定。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货币购买力就下降；反之，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提高时，货币购买力就提高。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只是价值符号，必须根据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量发行，才能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货币必要量，纸币的购买力就会相应下降，即发生纸币贬值。

货币扩张论 泛指各种主张通过增加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由于各人对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的论述并不相同，货币扩张论可分为以下几类：(1) 增加货币、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加国民收入。具体包括：①增加货币，降低借贷利率，资本家将采取迂回生产法，促进资本形成，从而增加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刺激商品生产者增加投资，扩大生产；②增加货币，降低证券利率，引起投资增加，通过乘数作用使国民收入倍增；③增加货币，降低利率，使得公众的资产偏好转向真实资本的证券市场，导致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高于所代表的真实资产的重置价格，致使真实资产投资扩大，真实产量增加；④增加货币，利率降低，批发商大量订货，生产者扩大生产，消费者增加收入，总需求扩大，价格上升，批发商进一步扩大订货，生产和消费者收入由此得到扩张。

(2) 增加货币，价格水平上升，生产部门受价格幻觉影响误认为是本部门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生产。

(3) 增加货币，价格水平上升，劳动者的名义工资虽然增加，其实际工资下降，劳动者受货币幻觉的影响，愿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本家因劳动成本下降愿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致使就业扩大，产量增加。

(4) 增加货币，信贷扩张，中间产品需求上升、价格上涨，产量扩大，生产要素从消费品生产部门流向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消费品生产减少，价格上涨，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由此产生强制储蓄。

(5) 增加货币，价格上涨，导致私人财富再分配，或者收入在政府和私人部门间的再分配，从而使储蓄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增加。

(6) 增加货币，雇佣边际劳动生产力较低的劳动力，扩大就业，增加生产。同时，当新增劳动力购买原有数量的消费品时，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

(7) 实行价格管制和消费品配给，强制居民储蓄，导致广义货币和信贷规模扩大，生产增长。

(8) 货币扩张和赤字财政相结合，扩大消费需求，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乘数，促进国民收入增长。

上述这些主张有些是针对发达国家资源闲置情况而言的；有些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稀缺情况而言的；还有些是针对调节经济波动而言的，但它们的共同点是认为增加货币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均衡论 关于货币利率或自然利率的变动会影响投资和消费需求，进而影响物价水平，最终促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趋于一致，实现经济均衡的理论。该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创立，并得到K·G·缪尔达尔的继承和发展。

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就是金融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利息率。自然利率是借贷资本的需求与供给相一致时的利息，这个利率等于不使用货币而一切借贷都由实物资本的供给与需求所决定的利率。在威克塞尔看来，由于自然利率是任何时候，在任何经济情况下都存在的均衡利率，它既不使物价上涨也不使物价下跌，而是使投资和储蓄保持均衡状态的利率。因此，维持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一致，从而实现货币均衡就主要取决于货币利率。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家将感到投资有较大收益，从而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企业家对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所造成的价格上涨，必然会增加原材料生产

者、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在货币利率较低的情况下，人们收入的增加不会增加储蓄而只能带来消费品的需求增加，结果，资本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增加，从而物价的上升，导致了经济的扩张，这个过程一直会持续到因储蓄不足和资本的需求过大而使货币利率上升；或者因工资和租金上升而使资本预期收益下降，企业家不愿意增加投资，导致自然利率下降使投资与储蓄相适应的新水平，从而最终促成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经济趋于均衡为止。相反，如果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则会导致经济收缩，这个收缩过程一直会持续到因储蓄过剩，资本供给过多，资本需求少而使货币利率下降；或者因工资和租金减少而使资本预期收益上升，企业家愿意增加投资，导致自然利率上升到投资与储蓄相适应的新水平，从而最终促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经济趋于均衡为止。威克塞尔认为，当货币均衡实现，经济趋于均衡时，不仅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平衡，物价稳定，而且储蓄量等于投资量。不论是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所造成的价格下跌，还是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导致的物价上涨，都将对经济产生危害。威克塞尔认为，维持货币均衡有三个条件，(1) 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2) 对资本的需求与资本的供给相等，即投资与储蓄相等；(3) 维持一个稳定的物价水平，特别是消费价格水平。为实现这三个条件，他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

瑞典学派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研究货币均衡采用的是一种比较静态的方法，即在静态的经济中，把两个均衡状态进行比较，研究均衡实现和消失的原因。他认为应该把时期与时点分开。在某一时点上的均衡是暂时的、静态的均衡，而从一个时点到另一个时点的均衡则是动态的、长期的均衡。缪尔达尔在接受威克塞尔货币理论的根本特点，并在假定他的说明基本正确的前提下，发展了静态货币均衡体系，建立了动态货币均衡体系。他把收入、成本、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类。前者指分析期间开始的预计数值，后者指分析期间结束时的实现数值。他利用这两个概念说明货币均衡的条件，说明投资与储蓄如何从"事前的"分离趋势发展为"事后的"均衡。在缪尔达尔看来，"自然利率"是指实际资本的收益率或企业的预期利润率。而代替"自然利率"的是计划投资的收益率。出于实用的考虑，他又用现有实际资本的净收益和现有实际资本的再生产成本去分别代替计划实际投资净收益和计划投资的生产成本。而现有实际资本的净收益＝整个经济的总收益 B−属于参与合作的生产手段的总营业成本；M−预期折旧减升值的价值变动 D。这样，全部经济的实际投资收益率（即自然利率）$Y_2=[B-(M+D)]/R_1$。为此，缪尔达尔把威克塞尔的第一个均衡条件表述为：$i=Y_2=[B-(M+D)]/R_1$ i 为市场利率，R_1 表示整个经济现有实际资本的再生产成本。在动态经济中，货币均衡的标准并不是利润界限(C_1-R_1)为 0，而是刺激能够出可供利用的自由资本来维持投资的利润界限。因此，他把威克塞尔的第二个均衡条件表述为：$R_2=W=(S+D)$，即实际投资总额 R_2 与可供利用的自由资本总值 W 相等，也就是等于储蓄 S 加上实际资本预期价值变动总额 D。他认为，要实现这两个条件，从而维持货币均衡，必须通过推行信用政策、贴现率和信用限制来调整 C_1 和 R_1 的关系，以满足 $R_2=W$ 的条件。他认为，储蓄与投资的分离趋势要发展成为事后的平衡，必须经过不能列入事前计算的三种得益与损失这两个纯粹动态的因素。三种不同的收益与损失是：(1) 资本的得益与损失。这是由于企业家对于未来收益和成本的预期有了变化而引起的。(2) 收入和成本中的得益和损失。它们是实际实现的收益和成本与以前估计价值的差额。(3) 投资得益和投资损失。这是构成新的实际资本已经实现的价值与其预期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由于第一种得益与损失是现有实际资本的资本价值的变化，它在开始时就提高或降低了资本的帐面价值。因此，这些资本得益与损失不能代表 W 与 R_2 之间事前差异的事后补偿。第二种得益与损失由于在事后的计算中是被当作收益和成本构成因素，因此可以弥补 R_2 与 W 的事前差额，在威克塞尔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的经济扩张中，这种得益往往超过损失而被事后算作储蓄。结果，事后计算的储蓄大于事前计算的储蓄，其差额可以补偿事前计算的 W 小于事后计算的已经投资的 W（即 R_2）的差额。相反，在经济收缩过程中，所发生的损失则可以由事前计算的 W 大于事后计算的已经投资的 W 的差额来补足。他还认为，在某种程度上，W 与 R_2 的平衡还可以由投资得益与损失来实现。在投资得益与损失中，由于新构成的实际资本的价值和它的实际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被计人 $R_2=W$ 的两边，因此，该差额对于 W 与 R_2 的事后平衡没有直接影响，但实际资本的预期生产成本与实际实现成本之间的差额则能促使 R_2 与 W 的事后均衡。在经济扩张过程中，由于价格的上长，该差额通常为正值，即意味着已实现的 W 需求大于预期 W 需求的投资损失，该损失必须由收人和成本的得益所带来的事后计算的储蓄增加弥补。相反，如果发生经济紧缩，实际资本的预期生产成本小于实际实现成本的得益则可以补偿收入和成本的损失所产生的储蓄减少额。

货币经济论 一种以货币功能说明经济活动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需要货币来实现。货币不仅是交易媒介，而且是价值贮藏的手段，货币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一直是货币理论中研究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18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R·康梯龙就明确提出了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影响经济的发展。18世纪中叶，D·休谟又认为，当一国的货币开始增长时，货币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到了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初步建立了货币经济理论——累积过程理论，进一步认识到了货币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但是货币经济学说由异端变为正宗，则始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所论及的问题，如收入、支出、消费、储蓄、投资等都是一个货币问题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意指的实物问题。他试图把货币理论发展为社会总产量论，为此，凯恩斯建立了更为一般的货币经济理论。他认为，人们需求货币不仅在于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而有还受投资动机的支配。从而预期未来利率的变化而贮藏货币。因此，货币不仅充当交易媒介，而且具有价值贮藏的职能。在凯恩斯看来，如果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人们会意识到手中贮藏货币超过了自愿贮藏的货币数量，于是，他们会以多余货币购买债券，从而导致利率的下降。较低的利率意味着资本边际效率的相对上升，这将促使投资增长，进而通过乘数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和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率》一书出版不久，就认为，从整体上看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研究了决定利率的几个因素—投资、储蓄、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但凯恩斯认为利率决定于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的交点，由于流动偏好表随收入水平的变动而左右移动，除非我们事先知道收入水平，从而知道货币的交易需求是多少，否则，我们无法知道货币的资产需求是多少，因而也就不能决定利率的高低。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利息理论同"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一样，并没有解决利率的决定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们把"新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同凯恩斯的利息理论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利率理论"，即IS—LM模型。他们认为，IS曲线决定了与一定利率相适应的投资和储蓄相等的国民收入水平，LM曲线则决定了与每一个国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一致时的利率，而利率和收入共同决定于IS—LM两条曲线的交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经济学家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和30年代大危机的教训，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失业和危机，他们根据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主张货币当局通过大量增发货币，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和较高的消费需求，以避免危机和失业的发生。然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导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到70年代中期发展成为"滞胀"。在战后这种经济环境中，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都致力于货币经济问题的研究。凯恩斯主义通过分析货币经济问题来发展凯恩斯的理论，而货币主义则在货币经济问题上反对凯恩斯的理论。早在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D·帕廷金就认为，凯恩斯用流动偏好理论来否定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主张把货币数量理论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综合起来。他在1956年出版的《货币利息与价格》一书中，巧妙地把货币数量理论引入希克斯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真实余额效应作为凯恩斯货币理论与货币数量理论结合的媒介。他指出，不论是通过政府直接把新货币投入商品市场，还是通过银行体系将新货币注入经济体系，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都将引起价格水平的同比例上升，但不会改变利率水平，这一分析的方法是现代的收入支出法，而分析的结果却是传统的货币数量学说。同年，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学说的新解说》一文，他利用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数量论和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来重建货币数量学说。他认为，货币数量与所得、价格和利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并强调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重要性。在弗里德曼的倡导下，美国在60年代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反凯恩斯流派—芝加哥学派，该学派强调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或可控性。他指出，在众多的金融资产中，货币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实际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极小，即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引起的利率下降不会导致人们增加多少其自愿贮藏的货币，因此，为了使得已经增加的货币供给量适应于既定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货币供给量将有绝大部分直接作用于现有资产的价格，从而导致名义收入的增加，物价水平的上升。据此，他断定，货币当局只要将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大体保持一致，即推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就完全可以保证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使物价水平趋于稳定。

凯恩斯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汉森曾指出，当利率高达一定程度时，交易余额也有利率弹性，在此界限之上，利率越高，交易者就越愿意节约现金余额。托宾进一步指出，货币的交易需求不仅随所得的增减而增减，而且随利率的升降而减增。其原因是现金与盈利性资产之间存在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是指盈利性资产的收益与支付"经纪人"费用之间的差额。显然，利率越高，该差额越大，交易成本越大，节约交易余额、扩大盈利资产

的动机也就越强烈。因此，正是由于决定于利率的交易成本的存在，货币的交易需求也有明显的利率弹性。为揭示货币的交易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托宾与鲍莫一起建立了"货币需求的存货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如企业保持存货一样，经济单位保持现金旨在应付不时的交易需求。由于持有现金会负担一定的机会成本，因此，任何经济单位将尽可能地把现金持有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假定未来的交易量以稳定的速度增长。那么，作为交易需求的最适当现金存量与交易总量所得的平方根呈同一方向但不成比例地变化；与利率的平方根呈相反方向但小于利率的变化幅度而变化。这个理论又被称为"平方根定律"或鲍莫—托宾模型，即$C=\sqrt{\frac{2bT}{i}}$。在托宾的领导下，美国在6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与芝加哥学派相抗衡的耶鲁学派，该学派则强调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托宾把社会经济分为金融部门和真实经济两部分。他认为，金融部门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资产债务市场组成的复合体，而真实经济则是现实生产中的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复合体。由金融部门所决定的资产的价格、利率和数量既会影响真实经济，又会受到真实经济的影响。他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增减所导致的利率升降，会使货币与真实资产的相对吸引力发生变化，从而改变真实资产乃至收入水平。其传递机制：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下降→公众的资产偏好转向真实资产的证券市场→真实资产的市场价格上升→真实资产投资扩大→真实产量增加。反之，当货币供给量减少时，同样的传递过程将引起真实产量的减少。作为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宾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张，政府当局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

当代两个主要的货币理论流派，芝加哥学派和耶鲁学派在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相互对立，尽管两派在货币影响经济的程度及其途径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但是，两派中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几乎都一致认为，货币对整个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

货币需求函数　货币需求量与影响其变动的各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货币需求量与影响其变动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货币需求函数式表示出来。由于现实中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不易把握，因而货币需求量与影响其变动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易以简单的数学符号或数学式子表达出来，而只能在对进入函数关系中的各变量的函数关系式本身做出一定的假设的条件下选择那些对货币需求量影响较大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又由于不同时期经济学家对货币功能有不同的认识，对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也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对货币需求理论也有不同的论述。

十八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休谟认为：货币本身并无内在价值，而只有交换价值，即对商品和劳务的实际购买力，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取决于待交换的商品劳务数量。即：fM＝f（W），其中M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W为待交换的商品劳务的数量。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把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分别归结为：交易的需求和谨慎（或资产）的需求。前者指随个人收入增长而扩大交易额所需的货币；后者指人们出于谨慎储蓄财富而需要的货币。交易的需求与个人收入密切相关；谨慎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利润率的高低和风险的大小，以及出于投机的动机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率）所作的预期。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对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并且相应地建立了函数式。凯恩斯认为：人们需要货币，是出于三种动机：①交易动机。即人们为应付日常交易而持有一部分货币的动机。②谨慎动机。即指人们为了预防意外的支出而持有一部分货币的动机。③投机动机。是指人们为了抓住有利的购买生利资产例如债券等有价证券的机会而持有一部分货币的动机。并且因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引起的全部货币需求量都只和人们的货币收入有关，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引起的全部货币需求量是收入Y的函数。如果用L_1表示交易和谨慎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量、Y表示收入则这种货币需求量和收入的函数关系为：

$$L_1=L_1(y)\ 或\ L_1=Ky=KPy$$

其中K是人们为了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同收入的比例关系，K被假定是一个常数。例如已知收入为50000美元，$k=\frac{1}{5}$，则$L_1=50000$美元$\times 1/5=10000$美元。一般说来L_1是收入的递增函数，同利率无关。

凯恩斯主义还认为：投机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量和利率有关，即由投机动所引起的货币需求量是利率的函数。因为债券等有价证券的价格一般都随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利率提高，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下降；利率降低，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上升。投机者会利用利率水平和有价证券价格水平的变化进行投机。现在假如利率已经提高而有价证券市场价格水平在下降，人们认为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已经降到正常水平以下，预料很快会回升，或者说，利率已经提高到正常水平以上，预料很快会回跌，因而及时抓住机会买进有价证券，这样，人们手中出于投机动机而持有货币量就会减少。相反，假如利率在降低、而有价证券

市场价格在上升，人们认为有价证券市场价格下降到正常水平以下，预料很快会回升，因而及时抓住机会卖出有价证券，这样人们手中出于投机动机而持有货币量就会增加。为满足投机动机而持有的货币量的多少，取决于人们自己对未来的价格水平，特别是对未来的有价证券价格水平的预期。利率低，持有货币所损失的利息少，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大；利率高，持有货币所损失的利息多，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小。

用 L_2 表示投机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量。用 r 表示利率，这种货币需求量和利率函数式可以表示为：

$L_2 = L_2(r)$

因而全社会因交易、谨慎、投机动机所引起的全部货币需求量为 L，则

$L = L_1 + L_2 = L(Py) + L_{2(r)}$

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需求函数式。

后来，鲍克尔和托宾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函数式中的 L_1 进行了修改，认为 L_1 不仅是收入(py)的递增函数，而且是利率(r)的递减函数，此外还对 L_2 进行了修改，认为个人行为模式不是"要么持有证券，要么持有货币"而是"证券和货币都占一定的份额"以便用无风险的货币和风险大的证券安排，使总资产的风险较小而总收益较大。修改后的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式为 $M = f(py, r)$，其中 M 是 py 的递增函数，是 r 的递减函数，而且是价格水平 P 的一阶齐次方程式即 $\frac{M}{P} = f(y, r)$。

现代货币主义代表人物 M · 弗里德曼认为：影响人们持有货币的因素有四：①财富的总额。即包含货币在内的各种资产的集合体。但由于财富总额较难以直接计算，故以收入作为财富的代理变数，又由于年度收入常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时有变动，以之作为代理变数，要不适当，故弗里德曼提出恒久性收入的概念以代之。此恒久性收入较为稳定，故可认为是较适当的变数。②财富为各种资产所构成，其中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则系个人在将来获得收入的能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两种资产所得的收入比例也是决定货币需求量所应考虑的一个变数。此变数以 W 表示。③人们持有货币及其他资产所期待的收益率。货币的收益率为零，其他资产如债券、股票、实物资产均有可预期的收益率。④与保有其他资产相比人们保有货币所得的效用及影响此效用的其他变数。此变数用 U 表示，U 是人们的嗜好，趣味的函数。由以上的四种因素考虑而得出的货币需求的函数为：

$$M = f_{(p,\ r_b,\ r_e,\ \frac{1}{p}\frac{dp}{dt},\ w,\ y,\ u)}$$

上式中 M 表示货币需求量，P 表示价格水平，Y 表示货币收入，W 表示物质资产在财富中所占的比例，r_b 表示债券的预期收益率，r_e 表示股权的预期收益率，$\frac{1}{p}\frac{dp}{dt}$ 表示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率，即物质资产的预期收益率，U 是影响保有货币的效用的其他因素变数。

并且，上面的函数关系是 P 和 Y 的一阶齐次函数，两边除以 P 得：

$$\frac{M}{P} = f_{(r_b,\ r_e,\ \frac{1}{p}\frac{dp}{dt},\ w,\ \frac{y}{p},\ u)}$$

$$\frac{M}{P} = f_{(r_b,\ r_e,\ \frac{1}{p}\frac{dp}{dt},\ w,\ \frac{y}{p},\ u)} = \frac{1}{V_{(r_b,\ r_e,\ \frac{1}{p}\frac{dp}{dt},\ w,\ \frac{y}{p},\ u)}}$$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 Y 和 r 的函数，即货币需求函数可以简化为：

$$M = P \cdot L_{(\frac{y}{p},\ r)}$$

货币流量分析 亦称"资金流量分析"。以西方宏观经济学为基础，运用复式簿记的原理，对社会各经济部门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进行记录，从而对全社会货币资金运动进行统计，分析和预测。资金流量分析通过编制资金流量帐户体系（或资金流量表）进行。与资产负债表不同，资金流量表不反映一定时点（如年终）货币资金存量，而是反映某一特定时期内金融流量的帐户体系。资金流量帐户体系（表）采取矩阵方式，如社会分为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共四个部门，则简化的矩阵式资金流量表如下：

类别	部门Ⅰ		部门Ⅱ		部门Ⅲ		部门Ⅳ		总和	
	资金运用	资金来源	资金运用	资金来源	资金运用	资金来源	资金运用	资金来源	资金运用	资金来源
储蓄(ΔNW)		S_1		S_2		S_3		S_4		S
实际投资(ΔRA)	I_1		I_2		I_3		I_4		I	
借款(ΔL)		B_1		B_2		B_3		B_4		B
金融投资(ΔEA)	F_1		F_2		F_3		F_4		F	
现金余额(Δm)	H_1		H_2		H_3		H_4		H	
$\sum=\sum$ $\sum=\sum$ $\sum=\sum$ $\sum=\sum$ $\sum=\sum$ $\sum=\sum$										

式中：S＝储蓄，I＝投资，B＝借款，F＝资产，H＝现金窖藏。运用资金流量分析的目的是使储蓄能够有效地用于投资，通过流量表可以分析：①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是否基本平衡；②投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供应；③借贷资金的供求是否平衡；④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是否有足够的财政资金保证；⑤国际收支是否平衡；⑥增加货币供应和扩大信用的需要与可能等。通过分析，使各部门之间保持互相联系，检验其合理性，从而成为国民生产和国民收入核算分析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份。资金流量分折法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美国经济统计学家 W · 米契尔提出。1950 年美国经济学家首创资金流量分析模型。1955 美国联帮储备局开始按季公布美国的资金流量帐户。之后其他各国中央银行或金融当局也纷纷效仿这一新型的会计制度。联合国从 1969 年起将此项指标列入经济统计资料和统计报表。

货币流通规律　决定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需要量的规律。即“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42 页）按照这一规律，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三个因素：(1) 参加流通的商品量；(2) 商品的价格水平；(3) 货币的流通速度，前两项的乘积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当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流通中的货币量同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即商品价格总额愈大，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愈多；反之，则愈少。当商品价格总额不变时，流通中所需货币与流通速度成反比，即货币流通速度愈快，所需货币数量愈少，反之，则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用公式表示如下：

$$\text{货币需要量}=\frac{\text{商品价格总额}}{\text{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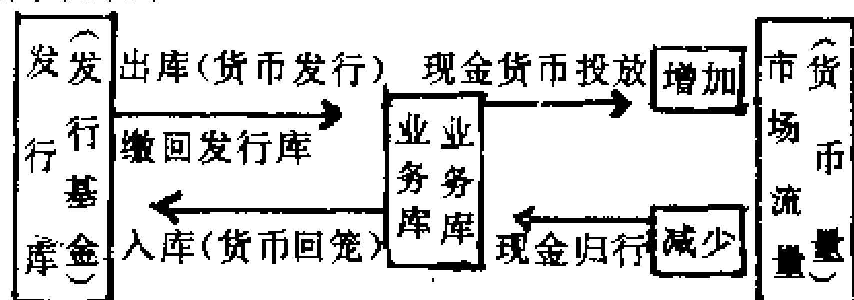
随着商品经济和信用关系的发展，出现商品赊销，这样便发生债权债务的冲销和延期支付等情况，从而引起货币需要量的变化。因此，要在商品价格总额中减去延期支付部分，加上本期需支付部分，再减去债权债务相互抵销部分，即：

$$\text{货币需要量}=\frac{\text{商品价格总额}+\text{到期支付总额}-\text{本期赊销商品总额}-\text{互相抵销的支付总额}}{\text{单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平均流通速度}}$$

在采用金银铸币的私有制商品社会里，货币流通量是自发地调节的。由于金银器、金银块的价格的也受供求影响而自发地围绕价值波动，当商品总量增多而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铸币显得不够时，金铸币会比金块贵，人们便拿金块去铸币局要求换取金币；反之，当金币过多时，金铸币会比金块贱，人们便把金铸币熔为金块或贮藏起来。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这是靠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来实现的。在纸币流通条件下，流通中全部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等于流通中货币需要量，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货币需要量，就会出现纸币贬值，通货膨胀。

货币流通渠道　货币从货币发行当局进入流通领域为商品流通服务和货币从流通领域回到货币发行当局所经过的途径。分为“货币投放渠道”和“货币回笼渠道”。在我国货币投放渠道主要有：(1) 信用投放。如国家银行系统的储蓄存款支出；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存款支出；其他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支出。(2) 非信用投放。如个人的工资支出后对个人的其他支出；农副产品收购支出；工矿产品收购支出；乡镇企事业支出；城乡集体个体经营支出；行政事业管理费支出；汇兑、债券及其他支出。货币回笼渠道主要有：(1) 信用回笼。如金融系统储蓄存款收入。(2) 非信用回笼。如商品销售收入；税务部门的各项现金税款收入，债券、汇兑及其他收入。货币就是通过上述渠道投入流通领域，又从流通领域流回银行。

货币发行业务　货币发行当局从事货币发行各项工作的统称。货币发行业务主要由以下几部份组成：(1) 发行库业务。建立发行库（全称为“发行基金保管库”）、发行重点库、战备库，保管好要发行的货币基金，办理与业务库的款项调拨工作。(2) 业务库业务。建立业务库，按规定办理与发行库的款项调拨和日常现金的收付。发行基金从发行库拨入业务库，然后再通过业务库把货币投放市场。把发行基金拨入业务库，叫出库，又叫货币发行。业务库库存的货币超出限额要及时交回发行库（同级）。业务库将超限额货币交回发行库，叫入库，又叫货币回笼。从市场（或流通领域）回到银行业务库的货币在未上交发行库前，可以周转抵用称为现金归行。归行的货币，超出业务库存限额部份必须交入发行库。上述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3) 发行帐务业务。建立发行帐务，对发行库发行（出库）的货币数量、回笼（入库）的货币数量要及时，准确地在未设的发行帐务上反映出来，以便管理的监督货币的发行、回笼活动。(4) 发行报表业务。设各样的专业性发行业务报表，(目前主要：发行基金对帐单，发行基金库存月报，发行基金券制季报）使于上级发行库掌握其所辖的下级库的货币基金的发行动态，了解库存的分布和券别的调剂等发行业务的全面情况。

发达国家银行发展初期，许多私人银行都办理货币发行业务，发行各种各样的价值符号和银行券，没有专门的发行银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不断扩大，客观上要求货币成为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一般信用工具。于是货币发行业务逐步集中到信誉较

好的大银行手中。最后，发行业务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特权。各国中央银行成为货币发行银行，其他银行则不再能够发行货币。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禁止中国人民银行以外的任何地区，任何单位发行任何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办理货币发行业务。根据货币发行业务的需要，都设置了发行库、业务库、发行帐务、发行报表等，制定了一系列的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在总行设总发行库，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行设发行分库，在各地市中心支行设中心发行库，县、市支行设支库，支行以下的基层处不设发行库。各级库的主任均由同级行的行长兼任。总行为了便于调拨基金，还在部份省市分行设发行重点库，代总发行库保管待发行的基金。为了适应战备需要还在部份省分行设置战备库。

货币周转次数 一定时期内，货币所进行的交换次数。商品进行交换之后，便退出流通而进入生产或生产消费领域，而货币则还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为商品交换服务。在一定时期，同一货币就可能若干次地为商品交换服务，实现若干商品的交换。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货币为商品交换的实现而进行的交换次数就是货币周转次数，货币周转次数多，表示货币流通的速度快，在其他条件不变下，需要的货币量就少，反之，则多。货币的流通速度就指一定时期内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通常用次／年为单位表示。货币流通速度与经济制度、金融体制、行为习惯等许多社会历史的因素有关。

货币收支循环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有收有支、此收彼支、彼收此支，连绵不断的货币运动。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现实的货币运动由各种不同性质的货币收支构成，按货币收支的主体划分，可概括为五个部份：(1) 以基层经营单位为中心的货币收支，(2) 以个人为中心的货币收支，(3) 以财政为中心的货币收支，(4) 以银行为中心的货币收支，(5) 一切对外的货币收支。以上五种收支主体的收支是紧密相联，一个主体的收就是另一个主体的支。比如，个人购买商品的货币支出同时是基层经营单位销售的货币收入、个人、基层单位缴纳税款和进行储蓄等货币支出同时是财政、银行的货币收入；等等。

货币滞后作用 亦称“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现代货币主义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从发现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到最终针对问题而执行的政策全部产生效果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步骤，而其中每一步骤都需要时间才能完成。因而，就把货币当局采取货币政策作用之日起，经若干时间之后才显示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的效果的时间滞后现象称为货币滞后作用。我们通常这样说，今天已采取货币政策“行动”，4个月后政策的作用30%生效，10个月后60%生效，15个月后政策90%生效，24个月后政策的作用100%生效。

货币政策的时间滞后作用大体经过这样的几个过程：①认识问题过程，了解经济运行中是否存在问题或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时间来进行观察和研究。②对策的制订与决定过程。一旦问题被识别以后，还需要时间来制订相应的政策。如果存在着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还得在方案之间进行选择并且在决策人之间还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③政策效果的实现过程。政策的效果不是马上全部实现的，而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效果。至于究竟存在着多少滞后过程，每一步骤过程又需要多少时间，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一般说来，货币政策滞后时间长短主要与①货币当局对问题发现的及时与否以及货币当局选择对策的时间快慢有关。这是与国家的经济体制、金融制度、统计制度、工作程序、工作效率等因素密切相联的。②被调节作用对象即经济主体、企业、个人等接纳信号的灵敏程度以及接到变动信号后的反应快慢程度有关。这也与企业制度、货币管理当局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利益制度、工作效率等相联。③变动实体的变化难易程度。比如正在上马的大型项目，不一定能立刻停工，因为这样损失会更大。西方经济学家在对政策的制订作全面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识问题平均来说需要5个月左右的时间；作出对策的过程平均来说需要3个月左右；政策效果实现过程至少需要6个月，加起来，各个过程造成的滞后时间大约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何准确计算货币时滞依然是计量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

米尔顿·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的时间滞后作用，不能起到熨平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有时反而会造成加剧经济波动的后果。例如，当经济出现衰退到达低谷时，国家开始设法制订和执行熨平经济活动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必须是扩张性的（因为要刺激经济的增长）。由于一方面，经济活动本身会按其特有的规律，在没有任何干预的的条件下，自发地经过某一段时间从衰退走向高涨；而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的时间滞后性质、政策效果也经过一段时间后正好部份或全部地发挥出来。这样就意味着当经济活动本身达到高涨时，国家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也正好发生作用，就会进一步强化和推动经济活动的扩张性，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或“推波助澜”，因而这样的货币政策却往往起着相反的作用。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常会加

剧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波动。造成不良的后果，因而弗里德曼不赞成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微调”，即反对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斟酌经济政策”。

货币政策工具　运用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手段或措施。在西方发达的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法定储备金率，贴现和再贴现以及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储备金是指中央银行对各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规定要交一定比例的存款存放于中央银行满足社会的一般存款者能够及时安全提取存款的一种手段。法定储备金率越高，商业银行放款能力就会相应越低，反之，则越高。由于法定储备金率提高和降低对商业银行放款能力影响很大，时滞也短，收效快，因此法定储备金率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但西方一般不常用这一工具，因为使用它往往会引起经济过度紧缩或过度放松。贴现是指商业银行对社会一般公众的各种票据，债券等转化为现钞的一种制约行为。当提高贴现率时，就会限制人们去贴现，从而保有更多的债券，起到紧缩银根的作用，反之，降低贴现率，人们就更愿去贴现，把手持的各种债券转化为现钞，客观上起到了放松银根的作用。中央银行利用贴现工具主要是对商业银行持有的各种债券，票据进行再贴现，来实施它对货币流通量乃至整个经济调节作用的。中央银行提高贴现率，就会抑制商业银行去贴现，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放款能力，反之，就会增大商业银行的放款能力。因此，一般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会提高贴现率，以便紧缩银根，反之，在经济萎缩，银根紧的时期，中央银行会降低贴现率，起到放松银根的作用，以便刺激经济回升。贴现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经常使用的具有很大灵活性的一种调节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美国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金融市场买卖各种证券以影响货币流通量，调节经济发展的一种最重要，影响力最广泛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因为：第一，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把银行储备金控制在自己希望的规模内；第二，公开市场业务是按照中央银行的主动意愿进行的，并非象银行贴现那样，中央银行只能鼓励或限制贴现，而无法明确地控制其数量；第三，公开市场业务可按较小的规模，如果需要甚至可以按非常小的步骤进行。这使得中央银行能够准确地调整储备金；第四，公开市场业务使中央银行可以根据中央银行确定的利率情况或有关市场因素，而不断地调整法定储备金比率；最后，公开市场业务很容易逆转。虽然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业务成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在我国目前阶段却不是这样，因为我国既没有多少债券，也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因而限制了我国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甚至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还不存在这项业务。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中央银行，有了储备金和少量的贴现业务，但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因此这两种工具运用效果也很有效。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货币政策的这三大工具的作用，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开放证券市场，为充分利用这些工具以调节经济运行创造条件。

货币政策目标　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所要实现的较为重大长远的目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有着相当的总目标，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除了有着这样一些总的目标外，还有一些它特殊的目标，包括利率稳定，防止银行倒闭和金融恐慌等。货币政策目标之所以与宏观经济运行有着相同的目标，是因为货币政策在发达的货币信用经济社会中，它已成为国家赖以调节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的这些总目标经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如要求物价稳定往往又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的增长，要实现充分就业往往又不能实现物价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西方经济学家经常用菲律浦斯曲线来说明工资物价与失业之间的矛盾。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既然不能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往往根据一定的经济形势，以某一目标为主、而又尽量不使其它目标处于可接受的限度内。如当通货膨胀成为经济的主要问题时，就把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又尽量不使失业率过高，并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和使国际收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如果失业率过大，超过了社会可接受的限度（西方一般把4%的失业率视为正常的可接受的失业率），那么维持充分就业就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至于货币政策自身的特殊目标如保持利率稳定，防止银行倒闭等，它们不过是实现货币政策总目标或最终目标的手段，因为利率不稳定，银行大量倒闭会破坏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阻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目标也有着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同的总目标，因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国家赖以调节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不过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更好地利用货币政策，使它的各项目标处于协调状态，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政策目标有一定矛盾，也有主次之分，但总是围绕经济增长这个主要目标来协调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

货币供应量统计　对一定时期向流通领域供应货币的数量的统计。它是掌握货币供应量，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所必需的。参看“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指标 参见"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指货币供给主要取决于它包括金融体系（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各经济部门、企业、居民个人的共同作用，这些是货币当局难以直接控制的。

在决定货币供给量的五个因素，即基础货币(B)、法定存款准备率(rd)、超额准备率(e)、定期存款比率(t)，通货比率或现金漏损率(K)之中，超额准备率、定期存款比率，通货比率是货币当局难以直接控制的，它们主要取决于各经济部门、企业、居民个人的作用。这些比率主要取决于银行将超额准备金用于投资和持有超额准备金所得到的好处哪个大，取决于硬通货的机会成本，取决于与活期存款和证券收益率相比较的定期存款利率。而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当局能直接控制的。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是金融体制发展的结果，表现为：(1)金融机构多元化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用。以前只有商业银行可以凭其资产债务任意创造货币，也是人们唯一可以广泛接受的支付手段。因而，货币当局只要实行法定存款比率和基础货币管制，就可以对整个货币供给加以控制。伴随着金融体系的日益发达及其内部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区别日渐消失，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储蓄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都是满足人们的货币需求。这样，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资产规模受到人们货币需求，银行的存款投资机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货币创造能力会随其贷款融资活动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使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就货币创造能力而言，除了程度上的差异以外，已经不再存在"货币创造者"和"非货币创造者"的严格区分，银行机构的货币创造能力是货币当局无法控制的。(2)资产选择的多样化也使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在发达的金融制度下，人们已经保有资产的选择，既可以用货币形式持有资产，也可以保有其他资产。所有货币可及时满足需要，而且避免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但不能获得收益，所有其他资产可获得较大的收益，但风险也大。因此，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受其对货币，其他资产的偏好制约，而资产偏好是由经济发展来决定的，也不是货币当局能直接控制的。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由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托宾提出的，也是他与弗里德曼货币供给理论分歧的关键所在。弗里德曼认为定期存款比率，超额存款比率，通货比率可看作固定不变的参数，因而货币当局只要调节基础货币和法定存款准备率既可控制货币供给总量，而托宾则认为其实不然，以三个比率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是不能视为固定参数的，因而中央银行单调节基础货币和法定存款准备率是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供给量的。上述三个比率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会大大降低货币当局的货币控制效果。

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指货币供给主要由货币当局直接决定。弗里德曼认为，法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1)交能货币；(2)法定存款准备率；(3)通货比率。这三个因素中，通货比率从长期看是变动的，是货币当局不能直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公众的偏好程度。但从短期看，它是变动不大可以作为固定参数看待，货币当局可以左右的。因此，货币当局可以直接控制货币供给量，当需要实行扩张政策时，货币当局只要增加基础货币即高能货币，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货币供给量就可$M_s=\frac{1}{r+k}B$（r为法定存款准备率，K为常数）进行供给。反之，当需要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时，只要减少高能货币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货币供给则可按$M_s=\frac{1}{r+k}B$成倍减少。

需要注意的是，弗里德曼对货币供给量是有严格限制的，只是指M_2即公众所有的通货量和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而不涉及其他流动资产。而且，还严格区别货币与信用，银行体系与非银行的其他金融机构。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弗里德曼整个名义货币理论的首要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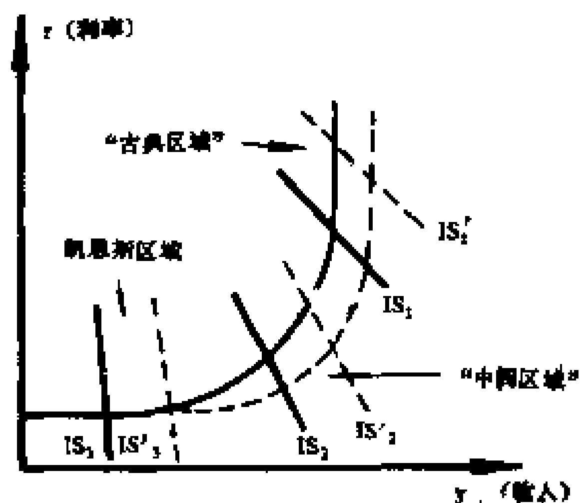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外生性有其局限性，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除高能货币和法定存款准备率可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外，其他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都是货币当局不可控制的。弗里德曼也承认真实经济活动对货币供给会产生内在的影响，只是他认为这种影响远不如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的外在控制和调节。

货币流通量统计 对流通中的实际货币数量的统计。由于各国对货币管理的制度不同，因而，各国对货币流通量的统计范围也不相同。在我国，货币流通量统计是指对流通中的实际现金的统计。流通中现金主要有：①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持有的现金；②城乡居民所持有的现金；③少量遭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损失的现金。根据我国的现金管理条例：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库存现金都要核定限额，一般为3～5天的日常零星开支，（限额以上必须交回银行）边远地区交通不发达地区的现金库存限额最多不得超过15天的日常零星开支。商业银行和服务行业的库存现金限于找零备用。城乡居民持有的现金包括：①先收后支处于待购待支过程中暂时性手持现

金。②家庭成员手头的结余现金。③"箱底钱"和"私房钱"带有贮存性现金。因遭受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损失的现金，都已丧失货币职能。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由于各种原因，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时不能达到或不能完全达到货币政策制订者的预期效果。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的涵义是：货币政策的实施部分或全部达到货币政策制订者的预期。具体地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使正在衰退的经济复苏回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经济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减少等目标得以实现；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使"过热"的经济"降温"，通货膨胀率减少，实际国民收入增加等目标的实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的因素主要有两个：①货币政策时滞性(见"货币政策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以及"货币滞后作用")②货币流通速度。由于现代信用制度条件下，当货币供应量既定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货币供应的变化。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则等量的货币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就会增大，产生类似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反之，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则等量的货币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就会减少，产生类似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而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当局不易直接掌握的，对它的变化幅度也较难准确地预测和结算。因而，它时常会抵消货币政策的效果。

凯恩斯主义者还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体系，用数学方法建立"凯恩斯的货币市场均衡模型"，得出收入—利率之间关系的"LM 曲线"图，并按"LM 曲线"的斜率的大小把"LM 曲线"分成三个部分：①"凯恩斯区域"；②"中间区域"；③"古典区域"，并根据凯恩斯的理论：①在"凯恩斯区域"内，货币政策没有用，有用的只是财政政策；②在"中间区域"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有用。两者作用孰大孰小则依据具体条件而定，③在"古典区域"内，财政政策没有用，只有货币政策有用。



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从衰退中复苏方面，不如在控制繁荣和通货膨胀方面有效，而在控制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方面，不如控制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更为有效。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利息率的高低和货币供给量的大小来影响社会投资和消费，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使其趋于平衡。它包括所需达到的政策目标和可运用的政策工具以及作用过程等内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说来主要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实现最终目标，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有的政策的实施不是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决定或控制的；同时，这一最终目标，是金融当局要为之长期奋斗而争取达到的一种较为抽象的境界，它是一个长期而非数量化的，是含糊不清又不易掌握的；而且，从货币政策的实施到最终目标的实现是要有一定的时间过程的，在这段时间中仅靠政策工具并不能作为社会经济宏观目标发挥发生作用，因而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的定期的、数量化的、较精确的、易于掌握和控制的、作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中介或桥梁的指标叫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要能有效、迅速地反映货币政策的效果。从技术上而言，这种中介指标的选择必须满足具备四个条件：①可控性：即该变量必须与货币政策措施具有极密切的连动关系，并且，中央银行能迅速有效、较准确控制和影响该指标变量的增减变化。②可测性：即该变量必须概念清晰，易于统计和测定、检验、以便金融当局能据以分析和控制。③相关性：即中介指标必须以货币政策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具有极密切的关系，同时又要与货币政策工具、措施有密切的连动关系，通过这一中介指标，能使货币政策措施达到影响，实现最终目标。④抗干扰性：即选择的中介指标，应该不受或少受货币当局以外和货币政策以外的因素的影响，可以比较独立地发挥其职能，顺利有效地实现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作用。

各国货币当局常采用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①利率：利率是中央银行用以控制货币供给量，调节市场货币供求，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中介指标。它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能较敏感地反映经济的变化。当经济繁荣而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时，利率上升；反之，当经济衰退而出现通货紧缩时，利率呈下降趋势。利率的上升或下降，是货币当局可以调节和控制的。利率中介指标的缺点是政策原因和非政策原因、政策效果和非政策效果混合在一起，容易使货币当局产生错觉，采取错误的措施。②货币供给量：货币供给量也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指标，通常是指包括现金和活期存款在内的货币量。货币供给量能反

馈正确信息，而不因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的混淆，致使发生错误信息；并且它能直接影响投资和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也可以直接控制。③基础货币：亦称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它由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及公众手持的现金之和构成。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就是货币供应量的总和，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控制基础货币，进而控制货币供给量。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当局如果不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量很难有什么变化；相反，如果基础货币有微小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货币供给量的多倍变动。货币当局较易掌握这一指标。这一指标的缺点在于会因货币乘数的短期波动而有不可靠的成份，且流通中的现金不易控制。④自由准备金。亦称超额准备金，即商业银行实际持有的超过法定准备金的部分。货币当局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调整，能控制这一指标。它的增减变化，反映着客观经济过程对信用需求的强弱，它同经济的升降变动方向正好相反。货币当局抽紧银根，自由准备金必趋于减少，银根放松，则自由准备金趋于增加这一指标的缺点与利率的缺点相似，它的增减变化易使货币当局产生错觉。

与我国的金融、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比较适宜用作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货币供给量、信贷规模、货币流通量和基础货币量四项。

货币的时间价值 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货币价值”。一定数量的货币，如果及时投入生产或存入银行，就会带来一定的利润或利息收入。如果不及时利用，就会失去这笔收入。例如，某企业有100万元货币，若投入生产，该年盈利率为20%，第二年就变为120万元。如果企业生产经营暂不需要，存入银行，年利息率为6%，第二年就变成106万元；如果企业既不将这100万元货币投入生产，也不存入银行，则企业就失掉相应20万元或6万元的收入。这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货币价值，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货币的时间价值有两种表现形式：现值和将来值。前者是货币的现实价值，后者是货币经若干时间后的价值，两者可以按复利原理互换，其计算公式如下：

货币将来值＝货币现值×（1+利率）^{年数}。例如，货币现值是1000元，按复利率6%计算，则三年后的将来值是：

$1000\times(1+6\%)^3=1191.06$（元）

货币现值的计算公式是：

货币现值＝货币将来值×[1÷(1+利率)^{年数}]例如，三年后的货币数额（价值）为10000元，按复利率为6%计算，其现值是：

$1000[1\div(1+6\%)^3]=840.02$(元)

货币供给理论模式 指货币供给量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模型。设 M_s 代表货币供给量；B代表基础货币；R代表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R_d、R_t、R_e 分别代表活期存款准备金、定期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C代表流通中的现金；D代表活期存款总额；T代表定期存款总额；r_d 为 R_d 与D的比率即活期存款准备率；r_t 为 R_t 与T的比率即定期存款准备率；e为 R_e 与D的比率即超额准备率；K为C与D的比率即现金漏损率或提取现金比率；t代表定期存款总额T与活期存款总额D的比率。

根据货币供给量定义：

$$M_s=C+D+T \qquad (1)$$

准备金 $R=R_d+R_t+R_e=r_dD+r_tT+eD$

$$=r_dD+r_ttD+eD=(r_d+r_tt+e)D$$

根据基础货币定义

$$B=C+R=KD+(r_d+r_tt+e)D=(r_d+r_tt+e+K)^D$$

$$\text{或 } D=\frac{1}{r_d+r_t\cdot t+e+K}\cdot B \qquad (2)$$

将(2)式代入(1)式得到：

$$M_s=C+D+T=KD+D+tD$$

$$=\frac{1+t+K}{r_d+r_tt+e+K}\cdot B \qquad (3)$$

这个模型就表明了货币供给量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其中 $\frac{1+t+K}{r_d+r_tt+e+k}$ 通常叫做货币乘数，若用m表示，则(3)式可简化为：

$$M_s=m\cdot B$$

由该模型可以看出，要想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就应控制五个变量：即基础货币(B)、法定存款准备率(r_d)、超额准备率(e)、定期存款比率(t)、通货比率(或现金漏损率K)。其中前两个变量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控制，后三个变量则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具体地说，如果中央银行认为必需增加货币供给量时，可以直接增加基础货币(B)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r_d)，如果要减少货币供给量，则可直接减少基础货币和提交法定存款准备率。而要改变其他变量，则需要各部门、企业、个人的协调配合才能生效。

货币供给超前增长规律 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的规律。货币供给增长速度即指银行的信贷投放量及社会的货币保有量（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增幅。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国家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如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一国货币供给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密切

相关的，但两者又都受着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其增长速度也不同。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货币供给增长幅度超过经济增长幅度的这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货币供给超前增长现象在中国也是长期存在的。1952—1982 年全国货币总量平均每年以 12.1%的速度增长，而社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则仅以每年7.9%的平均速度增长。1982 年后，随着我国商品经济机制的引入及其进一步发展，这种现象尤为明显，货币增长速度较之经济速度快出一倍以上。

引起货币供给超前增长的因素很复杂，其中主要的有社会商品率的提高、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而预垫资金、劳务交换的扩大和第三产业的兴起、通货膨胀、统计方法所造成的一些错觉等等。判断货币供给超前增长的利弊，要视其由何种因素引起、对经济增长发生何种影响而作具体的分析。

货币信用制度危机　某种原因或事件使整个信用制度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而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货币信用制度危机是货币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加剧，但二者不是同义语。货币信用危机主要表现在：存款人涌向银行挤兑，货币流通失控。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借贷资本短缺，利率幅度上升，有价证券行市跌落、国内信贷收支失衡，国际收支恶化、汇率大幅度变动等现象。而货币信用制度危机表现为：金本位制崩溃，借贷资本长期过剩，信用制度的寄生性增加，国际收支危机日益加深，外汇行市剧烈波动、银行的稳定受到威胁并开始削弱等。引发货币信用制度危机的原因很多，如政治动乱，战争、自然灾害等，最主要的就是经济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尖锐和加剧造成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瓦解，就是美国国内、国际经济贸易收支恶化的结果。

货币调节传导机制　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或手段影响中介指标进而对总体经济活动发挥作用的途径和过程的机能。货币传导的途径和过程是不直观的，所以有关其机制的分析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理论假说。货币调节传导机制理论分析的前提是货币对总体经济运行作用的假说。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在货币传导机制理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最早从总量分析的角度摒弃萨伊定律和二分法，把货币分析与实物经济活动相结合，探究性地研究了货币传导机制。他从供求矛盾分析入手，以货币和利率机制为主线，创立了货币调节传导机制理论。他认为，供求矛盾关系不仅决定了商品的个别价格和相对价格，而且还决定了商品的一般价格和绝对价格。他主张将决定物价水平的供给因素分为消费品的生产与投资，将需求因素分为消费支出和储蓄，而在这四个数量相对关系中，可以得出物价水平或货币价值，并由这四个因素的矛盾关系决定。但这四个因素的相对关系的决定因素又是利率。所以，他认为利率是物价水平的调节者，主张以利率的理论修正货币数量说。

本世纪 50—60 年代，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间曾在货币数量总体经济的影响问题上，也展开过激烈论战。极端的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不起作用。极端的货币主义认为只有货币才起作用。多年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上述见解过于简单和极端化，他们都承认，货币对实体经济是起作用的，但在作用发挥的途径及作用程度上仍有不少分歧。不过，通常认为，货币存量变动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和扩散作用过程可用简式表述如下：

货币量供求失衡→传导机制→支出总量→国民收入或物价等变数

西方经济学家已提出的货币传导机制假说有以下几种：货币存量变动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财富效应、预期效应、资本成本效应等。

货币政策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　从发现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到针对问题而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最终到所执行的货币政策全部产生效果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这种货币政策实现过程的时间间隔性叫货币政策时滞。货币政策时滞可以分为：货币政策内部时滞和货币政策外部时滞。货币政策内部时滞是指货币政策制订者从认识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和存在什么问题，到制订相应的对策和政策所需的时间间隔。这个间隔取决于货币政策制订当局发现问题和选择对策的速度，该速度与国家的经济、金融、统计制度相关，也与当局的工作程序、工作效率有密切的联系。货币政策外部时滞是指货币政策制订当局从采取行动之时到货币政策全部产生效果的时间间隔和分布。一般说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是发生在某同一个时点上的，货币政策效果的实现连续或间断地逐步发生。比如说，货币政策效果在 4 个月后实现 35%，一年后实现 60%，两年后实现 100%。这种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主要取决于被调节对象（如企业、个人等）接纳政策信号的灵敏度以及接到政策信号后的反应快慢程度；亦取决于变动实体（如项目、投资等）的变化难易程度。这与企业制度，当局、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利益比较关系、工作效率、项目的规模大小相关。西方经济学家根据①企业厂商投资建项目所需的大致时间；②货币增长率改变后，利率回复到原来水平所需的大致时间；③规章、制度等因素对时间的影

响程度等因素，测定货币政策时滞的大致时间。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内部时滞的大致时间为5—7个月；货币政策外部时滞一般需6—12个月。

货币政策时滞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货币政策具有时滞性质，因而，货币政策使用得当，也许还能对经济有促进的积极作用，如果运用不当，反而会造成加剧经济波动的后果，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认为：按现在人们认识水平，对货币政策时滞的估算是很困难的，选择货币政策实施的时机也是困难的。如果依照凯恩斯主义的反经济周期规则行事而无视时滞的存在，那势必会出现当经济从衰退走向高涨时，货币政策则正好产生其效果，因而会造成"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经济的波动幅度。因而，弗里德曼反对使用"斟酌的货币政策"而提出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单一规则—稳定货币增长率规则"。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质广被人们所接受，但货币政策时滞时间如何计算，时滞多长，影响如何，人们还不得而知。

货物税 指对应税货物按其流转额征收的税。我国建国以后修订了货物税。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将应税货物原缴纳的印花税、工业营业税、商业批发营业税及其附加，并入货物税内征收，相应调整货物税的税率。进一步简并税目，由原来的358个税目简并为174个，改变货物税的计税价格，由原来按不含税价格，改为含税在内的国营公司的批发牌价计税。税法规定：①纳税义务人是应税货物的产制人或购运人。②征税范围包括本国产制或国外输入的货物，除另有规定的以外，均应交纳货物税。③征税环节。国内产制的应税货物在产制、起运、移送本厂加工部门时纳税。国外输入的应税货物，由进口商在进口货物交纳关税时一并纳税。④税率，货物税按产品类别列举品位，采用比例税率，从价计征。⑤征税方法，国内产制的货物实行驻厂征收、查定征收、起运征收。国外输入的货物由海关代征。1958年税制改革时，货物税并入工商统一税。

金融 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活动的总称。亦可概括为货币资金和货币信用的融通。它包括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货款的发放与收回、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认购与转让买卖，保险、信托、国内、国际货币结算等。有金融媒介参加的融通方式，叫"间接金融"；当事人之间直接融通的，叫"直接金融"。现代世界各国从事金活动的机构主要有：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租赁公司、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金银交易所等。金融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随着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最早的金融活动是货币充当交换媒介和发展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发展过程。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扩大，币货兑换、借贷、汇兑业务相继产生，金融活动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对于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促进作用。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信用为中心的金融活动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的广泛建立，对加速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形成金融资本，控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脉，其金融活动以各种形式在国际间迅速发展，形成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金融工具 亦称"信用工具"或"交易工具"。资金缺乏部门向资金盈余部门借入资金，或发行者向投资者筹措资金时，依一定格式做成的书面文件，上面确定债务人的义务和债权人的权利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金融工具是金融市场交易的对象。它是随着信用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在现代错综复杂的资金融通关系中，为适应多种信用形式的需要，产生了商业票据、银行存款凭证、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任何金融工具都具有双重性质：对于工具的发行者它是一种债务；对于投资者它是一种金融资产。每种金融工具，适应交易的不同需要而有其特殊的内容，但也有些内容是共同的，如：票面金额、发行者签章、期限、利率等。

金融中心 具有发达的、多功能的金融市场的城市或地区。它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①金融中心是经济中心的进一步深化，经济中心高度发展的生产和经贸活动，有强烈的融通资金的需要；金融机构的建立和证券交易活动，又必须依赖于经济中心先进的交通、运输，现代化的通讯、信息、生活设施等方面的条件。而金融中心的形成，又会促进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发展。一个城市成为金融中心的标志是：银行林立，其他金融机构汇集，款项结算和资金融通方便、及时；票据贴现、股票和债券发行、转手买卖，信托投资、租赁、信息、咨询，保险等业务形式灵活多样。现代国际金融中心，除了需要具备一般金融中心的条件外，还必须政局稳定，允许外国银行设立机构，有较自由的外汇制度，以及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货币条件等比较松散的经济政策。现代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有：纽约、伦敦、苏黎士、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东京、新加坡以及香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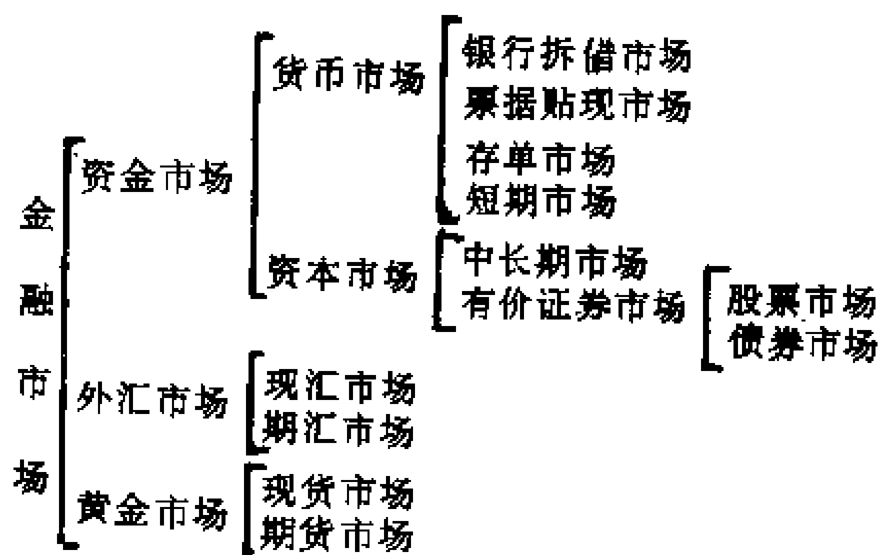
金融资产　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包括：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银行存款凭证、股票、债券、保险凭证等。这是与实物形态存在的资产相对而言的。金融工具对其持有者讲就是金融资产。金融工具分为所有权凭证和债权凭证。股票是所有权凭证。票据、债券、存款凭证均属债权凭证。投资者在市场上决定购买哪一种金融资产，总会全面考虑它们可能带来的权利和义务。概括起来，有四个要点：偿还期、流动性、本金的安全和收益率。

金融汇率　亦称"非贸易汇率"。非贸易往来买卖外汇所使用的汇率。某些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常对非贸易往来所发生的外汇收支，另行规定一种或多种汇率，用于非贸易往来买卖外汇。如资本输出输入、旅游、侨汇、驻外机构经费、交通运输、邮电、银行、保险等业务收支外汇的买卖。

金融市场　是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融通资金的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参与者以金融工具为媒介，汇合各种货币资金，共同决定资金交易的价格（包括利率、汇价、有价证券价格等），展开金融商品交易，由市场来沟通资金的供需各方，从而实现全社会资金的周转与流通。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共同构成市场经济的主体，金融市场通过资金与货币的融通来促进商品交易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现代发达的商品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限于为商品流通和产业经济服务，而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行业来自行运转，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运转。

广义的金融市场不仅仅是资金供求双方通过借贷或交易融通资金的场所，而且包括由一切金融工具和资金供求者所形成的供求关系。因此金融市场可以划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由金融工具和供求双方所构成的借贷或交易的场所表现为"有形市场"，而由一切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市场范畴则是抽象的"无形市场"。从金融交易的直接性划分，金融市场可分为直接金融市场与间接金融市场。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沟通资金借贷或交易双方，完成社会资金的供求活动，称为间接金融市场，不需要媒介机构，由借贷或交易双方直接接触完成资金的供求活动所形成的则是直接金融市场。从金融工具的期限划分，金融市场可分为短期金融市场和中长期金融市场。期限在1年及1年以下的交易是在短期金融市场完成的；期限在1年以上的交易则在中长期金融市场上进行。按照金融市场的地域界限划分，可分为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均是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发展起来的，但并非所有的国内金融市场都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包括各种不同工具的借贷和交易，按照不同种类或内容划分，金融市场的结构如下：



金融市场的主体是资金，但市场参与者非常广泛，包括政府、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企业、个人、各种基金会等等。金融市场的价格有多种：借贷利息率、贴现率、汇价、股价、债券价格、各种期权期贷价格、金价等等。这些价格均是在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求关系。政府、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经济杠杆或政策来影响这些价格的变动，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行。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突飞猛进，不仅有量的扩大而且有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①市场环境迅速现代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已普遍运用于金融业，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②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日益放松，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取消了对利率、经营范围和种类、经营方法等限制，从而使效率提高，竞争性增强；③市场竞争激烈，风险性提高，银行破产倒闭屡见不鲜，这是自由化的结果，也是现代金融市场的要求；④市场经营方式方法日新月异，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这是竞争中生存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得之于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放松；⑤金融市场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市场间信息传播迅速，业务往来频繁，已建立起密切相连的全球金融网络，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已起步并初具规模。现已包括同业拆借市场、资金借贷市场、国库券转让市场、股票市场、外汇调剂市场等等。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各个金融市场必将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金融机构 亦称"金融中介机构"或称"金融媒体"。金融机构是居于最后贷款人(即原始储蓄者)与最后借款人之间的中间人。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资金供给与需求密切配合，发挥调节资金的作用。金融机构种类繁多，按金融活动的方式划分，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存款式金融机构，一是非存款式金融机构。存款式金融机构是以存款和放款形式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金融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中央银行、投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非存款式的金融机构，是不办理存款形式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人寿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金融公司等。

金融政策 国家为影响或干预货币资金的流向而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总称。金融能使资金由多余的地方向不足的地方流动。但国家对货币资金的流向不是任其自然，有时需要有意识地使货币资金供应的数量有所增减，信用的投向有所变动，使利息率上下波动，以调节经济。国家正是通过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起到上述作用的。金融政策包括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利率政策、保险政策、结算政策等。金融政策的目标随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要而异。通常一个国家制订金融政策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要达到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维持高度就业。在金融制度方面要督导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健全地开展业务，维护和保障存款人的安全，保护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西方国家，金融政策主要是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它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干预经济、控制经济，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处理经济和稳定货币的关系。为此，各国都规定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三十年代以前，它的目标只限于能提供一种有弹性的通货，维持一个能发挥机能的货币制度，防止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金融政策的目标已经超出货币领域而面向经济，成为干预经济控制经济的重要手段。西方国家追求的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解决高失业率、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停滞以及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因而大都在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目标中进行选择。

我国金融政策的调节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有了新的表述："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总规模；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合理确定信贷资金的投向。并有效地运用利率、准备金、再贷款、汇率等金融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防止通货膨胀"。这是我国现阶段及今后十年的金融政策目标和需要运用的主要政策工具。

金融体制 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组织、管理制度。包括各类金融机构的设置方式、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职能划分，基本行为规范和行为目标，以及货币、信贷、利率、外汇、清算的基本管理制度和宏观调控方式等。当前，世界各国的金融体制有许多共同点：(1)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以银行为金融体系的主体。(2)一般均设有中央银行，并以中央银行作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和宏观调控机构。(3)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金融活动进行比较严格的管理。(4)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由于多种因素，各国的金融体制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资本主义国家，除中央银行和少数国营专业金融机构外，金融机构均以私营企业为基础，微观金融单位和经营活动主要受市场所控制。这些国家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管理，以及对金融的调节，主要采取经济和法律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国营金融机构为主，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管理，以及对货币信用的调节，除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外，计划、政策和各种行政手段发挥着较大的作用。金融体制中的货币、信贷、利率、外汇、清算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制度，除货币发行普遍实行集中统一外，其它方面则与各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而有所不同。在较重视计划管理和集中控制的国家，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量和投向，往往实行自上而下的系统控制；而主要实行市场调节的国家，则重视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不对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投量与投向作系统控制。对利率的管理也基本与上相同。外汇管理体制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进出口贸易状况密切联系。经济贸易发达的国家，一般实行外汇自由兑换和自由经营制度；而经济贸易不发达的国家，一般实行外汇管理制度。在银行间相互清算方面，一般国家都实行由中央银行集中组织清算的制度；但也有实行相对分散的清算制度，如中国在1985年起实行的各专业银行各自分别设立联行的做法。可见，金融体制没有固定的模式，它依各国的国情而定。

金融制度 关于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组织管理制度。包括各类金融机构的设置方式、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职能划分、基本行为规范，以及货币、信贷、利率、外汇、清算的基本管理制度和宏观调控方式等。

各国目前均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因此各国的金融制度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主要表现在：①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但以银行为金融体系的主体；②一般

均设有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最高机构和宏观调控机构，国家可通过中央银行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③国家一般对金融机构的设置及金融活动进行比较严格的管理。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因为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各国的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存在着不同的模型。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市场机制起主要调节作用，金融机构绝大部分为私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国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调节主要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计划机制的作用较大，金融机构基本上为国营或集体单位，它们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行企业化经营，国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理和对货币信用的调节，除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外，还采取计划、政策和各种行政手段，各金融机构在执行国家计划时，还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即使实行同一制度但管理体制不同的国家金融制度也会发生相当大的差异。在实行传统经济体制的中国，几乎没有直接信用；除银行外，也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性质的金融机构；银行业务也较为单一；特别是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为一家银行；大一统银行体制中的银行既发行货币，也发放贷款；基层银行无经营自主权，统收统支等。上述情况在改革后的今天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又由于历史原因，各国银行业的分工也有所不同。例如，英国的银行业务分工就不同于德国，在英国，商业银行只对工商企业发放短期性和自偿性贷款；而德国则有全能式银行的传统。再就银行组织形态而言，美国的商业银行实行单元制，各州通过的银行法禁止或限制开设分支行，而英国则普遍实行分支行制度。

同样，各国金融制度中的货币、信贷、利率、外汇、清算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制度，也会因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和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重视计划管理的国家，一般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量以及投向进行自上而下的系统控制；而主要实行市场调节的国家，除对货币供应量较重视外，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量和投向一般不作自上而下的系统控制。同样，重视计划管理的国家一般对利率控制较严；而实行市场调节的国家一般对市场利率干预不多，主要通过再贷款利率或再贴现率去影响市场利率。经济发达，实力较强、国际贸易兴旺的国家一般实行外汇自由兑换制度；而与此相反的国家一般都实行外汇管制，就银行间清算而言，一般都实行由中央银行组织清算的制度。中国自1985年以来，实行由各专业银行各自设立联行进行清算的制度。

金融体系　最终贷款人和最终借款人根据债权债务关系交换资金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是实现货币借贷、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的场所，它包括短期资金市场（又称货币市场）、长期资金市场（又称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中介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又包括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也有人把中央银行也归入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极为敏感，是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途径。中央银行通过操纵货币政策工具，经过金融体系对实际经济的传导，才能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当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市场较为发达时，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较平缓，时间较长；当金融体系中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时，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较直接，时间较短，冲击较大。金融体系也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工具。完善的金融体系既能提高储蓄率，实现适度积累率；又能提高资金的运作效率，促进资源的最佳配置。

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格局、发展及其完善程度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因素、和经济体制的性质以及经济政策制约的。例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融通借贷资金的比例一直很高，二次大战后的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人为低利率政策和经济的非国际化更是强化了这一特征，只是到了70年代后，这种格局才有所变化。发展中国家为集中资金实现工业化，普遍地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银行来筹集资金。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积累与投资主要由财政来承担，通过信用关系来筹集资金的比例较小；价格体系混乱、企业预算软约束，信贷、利率杠杆根本无法发生作用，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无足轻重；银行机构一统天下，金融市场几乎不存在。改革以来，上述局面有所改观。但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完全建立以前，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无法全面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并不消极被动，其健康的发展将促进经济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

金融调节　金融当局通过对全社会融资活动的调节来保持整个经济和金融业的稳定发展。金融调节的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特点有关。在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度里，或在通过财政集中社会资金，进行积累和投资的经济体制中，金融调节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在经济较发达、通过信用方式来筹集资金和进行建设的国家里，金融调节在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

当代各国货币基本均为信用货币，同时金融又影响货币供求。因此，只有通过金融调节才能实现对货币供求的调节、实现价格稳定。金融调节的目标是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健全

银行体制和金融秩序，防止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对于前四者来说，金融当局难于直接操作。需选择一定的指标，以反映这些目标，又易于为金融当局所调控。这些指标应符合相关性、可度量性、可控性三项要求，如利率、货币供应量、贷款规模等。相应的金融调节手段有四类：①一般性的控制工具，如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制度、再贴现率等；②择类性调控工具，如消费信贷管制、住房信贷管制等；③直接信用控制工具，如贷款限额、最高存款率、信用分配、直接干预、流动性比率、利率限额等；④间接信用控制工具，如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各类金融调节手段的选用与一国的金融体制有关，不存在统一的模式。

金融风险 在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贷出款项都是有一定风险的。所谓金融风险指贷出的资金遇到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四类风险：(1)信用风险。这里指借款人不履行契约或合同，不能按规定日期还本付息的风险。(2)市场风险。这是指直接投资的证券或资产，由于市场价格下跌或汇率变动形成损失，资金无法收回。(3) 利率风险。这是指由于利率的变动对证券市场价格的影响。(4) 国家风险。这是指由于借款国政治变动或战争等原因，引起借款人无法履行到期还本付息的义务的风险。为了减少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都积极设法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预防。这些措施主要是 (1) 做好债务人的信用调查。目前世界各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信用调查标准是"五C"调查：即分析借款的品德、能力、自有资金、担保品和企业经营情况。按调查结果，分别确定贷与不贷，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2) 对大额贷款项目，采取多家银行联合贷款方式，即银团贷款。这样可以将本身承担的风险，固定在一定限度之内。(3) 签订并严格控制借款合同，规定企业最高贷款额度。(4) 明确借贷担保品或担保人责任。(5) 采取浮动利率，避免由于利率变动引起的损失。(6) 银行贷款和存款应保持正常比例，在长短期限上尽可能做到契合，使不对称的风险减至最小限度。(7) 为预防汇率风险，银行应随时注意各种外币之间出现的差额，运用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进行抛补。(8) 对国家风险，银行除对借款国政治经济状况作好调查外，应对该国贷款数量规定贷款限额，注意借款国的债务比例。

金融风潮 由于经济、政治、军事或投机等原因引起的金融市场严重波动混乱现象。在旧中国，曾经发生过贴票风潮、橡皮风潮和信交风潮，引起当时金融市场严重混乱。贴票风潮是1897年发生在上海的一次金融风潮。最初经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业务的协和钱庄，为了高利吸收资金，开办了一种贴票业务。它是由钱庄开出面额为一百元，一个月后到期的远期庄票，换取九十元现金，到期由持票人凭票取还现金一百元。这种贴票由于利息比一般存款高，很容易吸收社会上的现金。一时贪图高利者竞相向钱庄贴票，投机商也争设钱庄，抬高利率，共开出空头庄票约二万银元。由于利息过高，贴票钱庄难以周转，于1897年11月24日发生到期不能兑现，引起贴票存户争提存款，结果大批经营贴票的钱庄纷纷倒闭，酿成严重金融风潮。橡皮风潮是1910年发生在上海的又一次金融风潮。1908年，有外国冒险家以高利为诱饵，宣称在澳大利亚创设橡皮公司，发行橡皮股票，大事招股，并在暗中哄抬股票价格，麦加利、汇丰、花旗等在上海的外商银行也与之勾结，承做该项股票抵押贷款。当时中国商人、钱庄和居民竞相争购，出现投机狂潮。至1910年7月外国冒险家佯言回国，一去不返，终于暴露骗局，外商银行亦同时宣布停止抵押贷款，并追索以前放出的抵押贷款。一时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成为废纸。上海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购进的橡皮股票无从出售，遂致倒闭；商人和居民受害更多，酿成严重金融风潮。信交风潮是1921年在上海发生的一次金融风潮。1920年下半年工商业出现第一次大战后经济停滞状态，产业资本一时找不到出路。这时证券交易和信托公司事业在中国开始兴起，投机家利用群众发财心理，于1921年夏秋之交成立了136家交易所和12家信托公司，自己发行股票，并在暗中哄抬股价，一时股票大量上市，形成投机狂潮。不久，市面银根日紧，股价暴跌，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纷纷倒闭，形成所谓"信交风潮"。

金融危机 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它既可伴随经济危机而产生，也可独立地发生，并触发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生产活动的扩张导致投资膨胀，由此带来信用的高度膨胀，信用膨胀的规模远远超过生产的增长，这样，一旦生产萎缩，出现企业倒闭现象，就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剧烈震荡，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是：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烈缩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存款，部分金融机构连锁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有价证券发行锐减，货币短缺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急剧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有些金融危机并非经济危机引起，而可能因某种特殊事件，如战争、政变、灾荒等引起。这类危机被称为特殊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金融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通货膨胀的普遍蔓延和日益严重，以及各国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和因此而产生的各国货币汇率的激烈波动，直至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和改组。金融危机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 加剧经济危机的深度。(2) 促进资本进一步集中，加强垄断集团的势力。(3) 受害最大的是破产企业的工人和一般民众。(4) 使金融制度发生剧烈变化，金融机构因此将重组。(5) 加剧社会动乱，甚至危及政权的稳定。(6) 严重的金融危机还会导致货币制度发生变化。如1929—1933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造成了金本位制的崩溃。

金融寻租　是指在国家干预或调节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手段或政策工具的作用效应与现实经济运转机制的客观需要产生反差，使社会经济各单元通过非市场化或非生产性、经营性活动寻求非生产性、经营性利润的现象。从理论上讲，这种寻租不仅包括寻求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而产生的级差收入或某种经济优惠，也包括旨在通过逃避管理而寻求不合理收入的活动。金融寻租现象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本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普遍应用凯恩斯理论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同时对某些微观经济活动施加管制，金融寻租活动由此产生和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国家利用一系列政策干预和影响经济的效果，也使得社会利益不合理流动的现象更加严重。

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单位以及劳动者基本处于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之中，不具有寻租行为或寻租动机产生的条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改革中的不稳定因素导致的体制性摩擦以及政策或政策工具的不协调，导致社会利益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逆客观经济规律流动或转移，从而使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层次以及各经济单元之间产生金融寻租行为。其形式表现主要有三个层次：企业寻租、金融机构寻租及地方政府寻租，其中，企业寻租是我国目前金融寻租的典型形式。金融寻租作为一种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现象必须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问题、政策调节与行政干预的替代问题以及经济法制的健全与监督问题。

金融流量　指融通国民经济各部门资金余缺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金融工具在一定时期的变动量。媒介债权债务关系的金融工具对债权人来说是金融资产，以债务人来说是金融负债。金融流量既体现为金融资产的变动量，又表现为金融负债的变动量。任何一时点上的金融资产总量恒等于金融负债总量。其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动量，即两个时点间的金融资产存量变动额也等于金融负债存量的变动额。源于同一笔融资活动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虽然相等，但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部分。同时，金融工具多种多样，一个部门及其单位，可能既持有某种金融资产，又负有另一种金融债务，通过在融资活动中保持一个良好的金融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来盈利和避免风险。但一个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和负有的金融债务不可能相等；同时，在一定时期内，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变动量也不相等，两者之差额即为该部门向其它部门筹集或融通的资金量。

金融流量分析，是对全社会的融资活动进行统计、分析和预测，构成资金流量分析的主要内容。资金流量分析通过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资金流量表不同于资产负债表，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各经济部门之间金融交易的总量，即金融流量，表明了两个时点上的资产负债表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存量的变动情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信用化，商品经济中的信用交易和金融流量的比例不断提高，单纯研究实物流量的国民收入核算已存在明显缺陷，它不易了解金融变动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以金融流量分析为重点的资金流量分析，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民经济各领域之间的财务关系。通过考察从储蓄到实物资产形成过程中的金融交易，可以分析一个部门的储蓄如何转化为其它部门的投资和转化过程金融交易的形式与效果等问题。进行金融流量分析，还能够了解货币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作用的具体途径，从而为科学地制订货币政策提供基础。

金融流量分析方法研究的先驱者是美国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切尔·柯普兰教授，1952年发表的《美国货币流量研究》，则是该领域的第一本著作。美国联邦储备局在1948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1955年首次发表了《1939—1953年美国的资金流量表》。从1958年开始，每季发表资金流量帐户。世界其他各国在这期间也开始纷纷编制资金流量表。1968年，联合国修订SNA体系时，把资金流量统计纳入为整个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近年来也开展了金融流量分析，并在部分地区开展了资金流量统计的试点的工作。

金融创新　是指开始于70年代贯穿于整个80年代，发生在国际金融领域内的一场金融大变革。构成80年代金融发展的主潮流。广义上的金融创新既包括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包括市场环境的创新、法规制度的创新等方面。具体内容有以下三方面：

(1) 金融工具创新：是以银行为主体进行的各种业务和融资工具的创新。进入80年代后，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迅速扩展，各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由于市场汇率、利

率等因素的不稳定，给投资者带来了各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作为金融业主体为取得有利的地位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对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陆续创新出许多传统金融业中所未有的新工具、新方式。这些新工具按其性质分为三类：①在利率灵活选择方面，包括浮动利率债券（FRNs）、零息债券、利率掉期、可转换证券等，它们可以避免市场利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②在期限灵活选择方面，包括票据发行便利（NIFs）、NOW帐户、ATS帐户，期货、期权、掉期等等，其目的在于为客户提供可转换的、可选择的不同期限的投资方式，它们或者方便了客户，或者为其提供了避免风险和增加收益的机会；③在汇率灵活选择方面。包括多种（双重）货币债券、币种掉期等，其旨在通过不同币种的转换使客户避免汇价变动带来的风险。上述种种金融工具创新亦被看作是狭义上的金融创新。

（2）金融法规创新。是西方政府对其金融业、银行业所制定的传统法规制度的大变革，体现为法规制度的管制程度放松、管制范围缩小。这一变化又称为金融自由化或金融管制放松化。自由化或管制的放松主要有：①利率限制的放松。以80年美国新《银行法》为代表，取消了银行对客户存款支付的利率最高额或者银行对活期帐户不支付利息的规定，等等，提高了银行业务的吸引力，使银行参与各种金融机构的平等竞争；②银行业务范围的管制放松。使银行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限制中摆脱出来，可以与其他金融机构一样可进行有价证券业务，抵押贷款、存单业务、咨询服务及其他投资活动。这些规定扩大了银行业务，为其创新和提高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③证券业管制的放松。几大证券市场和交易所经营的证券种类、交易方式、参与机构等限制均有所放松，这体现在许多国家政府对其证券法的修改，如美国80年新《银行法》、英国、日本等对证券业管制的新规定等等，尤以证券业变革在伦敦证券市场引起的“大震”为代表。种种金融法规的变化表现出西方政府对金融业竞争和效率的鼓励支持，这在客观上促使了金融创新的产生。

（3）融资市场创新。是传统的借贷方式和活动范围的突破，体现在两方面：①融资方式证券化。传统的以银行为中介机构进行借贷的间接融资方式日益被以证券融通资金的直接融资方式所取代，传统银行业务面临新的挑战；②市场环境国际化、全球化。金融业务的范围和信息传播高度国际化，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割离已逐渐消除，无论是创新、竞争还是法规改革、证券化均是全球性的，这方面的变革是以经济的国际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

发生于80年代的以金融创新为标志的这场金融业变革可总结为：金融管制放松化（或自由化）、融资方式证券化、市场环境国际化（或全球化）、金融工具创新化。它们互为前提条件，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共同构成80年代金融发展的主潮流。金融创新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宏观方面看，它提高了金融业对经济运行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提高了金融业的独立性和自我运转机能；对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政府必须提高货币政策的应变性和效力，以应付金融创新给政策带来的干扰和竞争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难度提高，弹性增强。从微观方面看，金融创新改变了银行业的结构，也改变了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结构，也改变了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结构，使金融业务多样化、新工具层出不穷，参与者日益增多，这些都充实了传统的金融业内容，提高了竞争力与效率。

金融压制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当局过份干预金融，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使两者无法真实地反映资金和外汇的供求情况，而政府又不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从而造成经济恶性循环的理论，即：金融业的落后阻碍了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停滞又制约着金融业的发展。这一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R·I·麦金农提出。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企业、住户、政府机构等经济单位相互隔绝，使得经济被分割。在这种被分割的经济中，实际收益率差异很大，并反映出现有资本配置不合理，新资本积累受到阻碍，没有有效的分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极为落后和不完善，几乎不存在债券、抵押契据或普通股票这些初级证券的“有组织”市场，而通过银行系统的间接金融机构本身又很微弱。因此，众多的小企业和住户要进行投资或技术革新，只能依靠内源融资（经济单位的投资由其内部积累的储蓄提供资金），并且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必须积累很大一部分货币。于是，计划的投资规模越大，所需积累的实际货币余额就越多。所以在发展中国家，货币与实质资本不是相互替代而是同步增减的互补品。内源融资的主导地位不仅使企业在资金融通上孤立无援，技术革新受到完全限制，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盈余”工业企业的某些内部投资将产生负数的实际收益，这使企业容易陷入一个低水平的均衡陷井。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压制现象；存贷款利率管得过严和压得过低，银行信贷能力低下并成为某些飞地（如大规模稀有矿物出口，被高度保护的制造业，大企业以及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大量的小农户和城镇企业资金融通困难等。当发展中国家受到通货膨胀困扰时，政府当局所采取的种种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反而加剧了“金融

压制"，造成了经济的衰退。政府当局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通常是控制名义货币供给量，这必然导致实质现金余额的减少以及银行体系的严重脱媒（即货币大量地流出银行体系），从而使依赖银行的企业减少投资，特别是减少流动资本。结果经济衰退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以及人为地压低利率，还使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为负数，这必然导致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大量减少以及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并发生金融衰退。这时，政府当局往往计划分配资金，特别是强制性地把信贷资金的投放从工业转向农业。这不仅造成了银行实际规模的收缩，而且造成了工商业的停滞，从而出现滞胀。所以，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当局所采取的这些金融压制措施，往往造成商品和劳务总供给的下降快于总需求的下降，从而最终导致稳定物价政策失败。麦金农认为，由于汇率被人为地压低而高估本国币值，使出口商对外汇支付很低的价格，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外汇的过度需求，增加进口配给和出口补贴，扭曲对外贸易。再加上发展中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战略，这不仅加剧了经济的分割和生产率的普遍下降，更重要的是这种战略使整个间接税体系征得的税收变得更加没有弹性，而政府的开支对于收入增长又具有弹性，这又很可能加剧金融压制。此外，麦金农还认为，在税收管理不完善从而财政能力很有限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往往导致预算赤字，而弥补这种赤字的办法是占用银行体系发行通货所产生的铸币税，或强制银行购买低收益的政府债券。这不仅降低了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从而加剧金融压制，而且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西班牙经济学家V·加尔比斯用模型进一步说明了有关金融压制的状况。

金融深化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R·I·麦金农和E·S·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必须放弃"金融压制"政策，推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亦即政府当局应该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其充分反映资金和外汇的实际供求情况；并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使金融和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在麦金农看来，提高利率是扩大银行实际规模，缓和金融压制，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由于货币与实质资本互补，货币积累是投资的先决条件，而货币的积累是建立在实质现金余额需求M／P增加基础之上，要增加M／P，则必须提高利率。所以，他认为，货币供给条件d−P*的提高是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第一推动力；而提高银行的贷款利率，则是扩大货币体系实际规模和缓和金融压制的一个必要条件。提高利率带来货币实际收益率的提高，从而有效地增加了实质现金余额需求M／P和货币积累，刺激了储蓄和投资增长。提高利率的这个过程，被麦金农称为"渠道效应"。此外，他还认为："如果对金融资产支付的利率，大大高于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投资边际效率，金融资产就会吸引一些企业家从落后的生产过程中抽出资金，来为进行先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其他企业提供资金。"（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页）麦金农的上述观点被西班牙经济学家V·加尔比斯用模型作了进一步阐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J·弗赖教授用图型对麦金农的这些观点加以了说明。麦金农还通过批判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储蓄倾向将受实际利率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从而论证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肖则认为，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会产生四大效应：（1）收入效应。当经济单位所持平均实际货币余额增加后，投资和市场将扩大，由此会引起收入的增长。同时货币体系的存在和发展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所以，还存在着实际货币增长的负收入效应。（2）储蓄效应。在储蓄倾向和税率一定时，收入的增长意味着储蓄的提高。同时，金融深化意味着提高存款利率和降低通货膨胀率，这也将促进储蓄。（3）投资效应。当收入和储蓄增加后，投资会相应增加。此外，提高贷款利率可以淘汰低收益的投资项目，从而增加高收益的投资，并提高投资的平均收益率。（4）就业效应。金融深化将使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这会使人们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从而增加就业。麦金农揭示，为了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当局也应提高利率，增强货币持有者的预期收益，以增加实际货币需求，在人们急于得到现金余额时，商品需求就会减少。结果，降低了物价上涨率。他认为，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时，政府还应全部取消国内的价格管制、税收补贴工具和配给制。为了促进金融自由化，他还主张普遍的税收自由化，特别是采用统一的增值税，这避免了有差别的商品税收或多重税收，对收入的增长富有弹性。他还认为，汇率也应正确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因此，他主张放松外汇管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让汇率自由浮动。这不仅能够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流入，而且可以限制不必要的进口。

金融自由化　指一国政府和货币当局对金融领域的不同方面进行的不同程度的管制放松政策及措施，亦指国际金融领域中在各个方面体现出的管制或限制放松、经营更加自由的趋势。金融自由化现象主要出现于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和国际金融领域。但实际上，从二战后的1958年西方各国恢复了战后

经济开始就已采取了放松资本管制和货币兑换等措施。作为这种金融自由化开端的结果，欧洲货币市场出现并得以迅速发展，资本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而这一发展又使国际资本对进一步放松管制和提高竞争与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西方国家政府的实际做法也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和支持了这一要求，其中影响最大的放松管制措施有：①1980年美国颁布新的《银行法》，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33年《银行法》做了大量修改，其中主要是放松了对联邦成员银行即商业银行的存贷利率、经营业务范围、种类等等许多方面的限制和约束，以提高其生存和竞争的能力，这对80年代美国金融业银行业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②从80年开始，日本在内外双重压力下走上了日元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道路，政府的一系列法规条令都体现出对货币自由兑换的支持和开放市场的努力。到1985年，日元已完全国际化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硬通货，金融市场的开放使东京立即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仅具有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借贷市场，而且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了各种票据市场、金融期货市场等。③80年代中期英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大震"是英国金融界改革中的一大转折。"大震"体现出对证券交易所中各种限制的放松，从而使其更具竞争性和高效率。④西方金融自由化的同时，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也在改革中不断取消或放松阻碍其改革与开放的种种条令限制，例如南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拉美一些较发达的国家。

金融自由化是生产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它的出现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与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将来的影响会是更深更远。首先，它促使了西方金融业80年代的创新高潮。种种管制的放松，经营的日益自由化，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竞争程度，因此市场参与者不得不寻求新的方法来保持自己和发展自己，产生了以保值和获利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其次，它使金融日益国际化。金融自由化是西方国家的普遍趋势，其结果是国内业务扩大为国际业务、国内竞争发展到国际竞争，市场和业务以及信息国际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自由化在促使竞争和效率提高促进国际化发展的同时，又使得金融业银行业的脆弱性增加，表现为银行经营风险性高，破产倒闭层出不穷，许多银行在自由化的环境下缺少约束和保护，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寻求竞争中的生存。

金融经济学 是研究资金运动的一门基础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①根据资金运动系统性的要求，研究国家金融机关，如何根据国民经济系统运行的目标和计划的要求，进行货币控制和调节，并与各类金融企业独立自主的金融活动相结合，实现货币发行总量和信贷总规模在数量、时间、空间和结构上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以保证和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和稳定地发展。②根据资金运动具有方向性的要求，研究如何制定正确的信贷政策，选择优化的信贷行为，调整信贷结构，搞好资金的融通和分配，保证经济效益好、贷款风险小、信誉可靠的部门、地区以及企业进行生产和建设的资金需要，以使给国家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资金。③根据资金运动具有计划性的要求，研究如何从价值形式上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资金的投放上解决产业结构、产业地区布局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④根据资金运动开放性的要求，研究国际金融的规律性，资金在国际间运行的环境，一国利用外资的有利条件及制约因素，以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一国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⑤根据资金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性的要求，研究资金的来源、资金运行的环境、资金决策、资金运行中的信息反馈、资金市场、资金结构、资金使用效果的考核与分析等资金管理问题。

金融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是对金融工作的实践经验科学总结和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它由一系列的金融理论、金融工作的原理、原则、规律和方法所组成，对金融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具有指导作用。金融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及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要求，揭示银行信贷资金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的职能资金融合一体的形式、结构及其运动的规律性，为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结构合理基础上的平衡，提供资金融通和管理决策的理论依据，探讨解决经济结构合理化和实现一国经济发展战略所需要资金问题的途径。

金融期货交易 是现代金融市场的一种交易方式。买卖双方在期货交易所内达成协议，规定在将来某一时间、按约定的价格和数量交割某种金融工具的交易。金融期货交易是商品期货交易的延伸和发展，在交易规则和程序上与商品期货交易一致，只是交易的种类不同，具体价格形式也就不同。作为期货交易，其目的主要是保值和投机。其参与者涉及三个基本方面：买方、卖方和清算银行。最早出现的金融利率期货是在芝加哥进行的美国国民抵押协会凭证的期货交易，随后，3个月期美国国库券也成为重要的期货工具。目前的金融期货种类有：

①外汇期货交易。即在期货交易所内双方通过公开叫价、买卖在未来某一时间、按协议价格交割标准数量外汇的合同的交易。外汇期货首创于1972年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初仅有8种外汇参加交易，后

来在伦敦和其他国家一些市场也开始了外汇期货交易。虽然也是一种远期外汇交易，但与外汇远期交易不同，外汇期货交易有严格的标准。包括数量、币种、程序、参与者的地位等等，而且必须在规定的交易所内进行，必须有清算银行作为中介机构清算双方的交易差额。

②利率期货交易。即在期货交易所内买卖双方通过公开竞价，达成协议，在将来某一时间按协议价格成交标准数量特定的金融凭证的交易。这些特定的金融凭证包括抵押证券、国库券、国债券等，均属有息证券，所以期货交易具体规定了将来交割时的利率，这一规定利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将来市场实际利率水平，所以利率期货是防止和避免利率变化带来的风险的一种方式，而用于进行交易的工具则实际是附带不同利率的有价证券。

(3) 股票指数期货。即以股票市场不同的股价指数为工具进行期货交易的买卖合同。这种合同规定买卖双方在将来某一时间，按特定的价格、交割某种指数包括的一篮子股票。例如标准普尔股票指数所包括的 500 种股票、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综合指数 1500 种股票等等。由于指数所包括的股数可能很大，所以期货交易并不进行股票的实际交割，而是按市价折合成现金进行清算，清算银行对买方或卖方的收付只是交易的差价。股票指数期货的目的一方面是保值，为避免股价下跌带来的风险做空头即卖出期货，为避免股价上升的风险做多头即买入期货；另一方面，也是许多投机者利用期货价格和将来现货市场价格变动之间的差价进行投机的有利形式。

金融期货均在交易所内进行，买卖双方必须向清算银行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并有一定的存款准备，当天交易当天结算，收付盈亏，这是期货市场的"无负债制度"。金融期货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是金融市场交易的一大进步，它扩大和丰富了金融市场的内涵，提高金融市场现代化程度，提高了金融工具的使用范围、功能和效率。同时也使金融市场的风险性大幅度提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价格变动更加频繁，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减弱、脆弱性增强。

金融调控目标　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通过金融调控所要达到的最终调节目的。金融调控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财政政策目标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特殊之处。中央银行进行金融调控既分担着宏观经济总政策的各种目标，如高就业、价格稳定、汇率稳定、经济高速增长等，还承担着一些特殊目标，如稳定利率、防止金融恐慌、便利政府证券销售、维持有秩序的金融市场、发展一个健全的银行制度、防止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等。不同的国家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控还承担着一些其他目标。在短期内，对任何一国而言，企图通过金融调控同时达到上述目标是困难的。各目标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最明显的就是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间的矛盾。货币当局只能在这些相互矛盾的目标间进行抉择、取舍和协调。

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价格体系扭曲，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资金短缺，银行机构僵化，资本市场不发达等困难。中央银行在进行金融调控时，需把建立合理的金融体系，迅速筹集资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推进工业化作为自己的调控目标。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中，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要为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为此，要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总供求环境，维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以及适时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等。

金融调控手段　货币当局为达到其调节目标而采用的各类工具。可分为：一般性的控制工具；择类性的控制工具；直接信用管制工具和间接信用控制工具四种。

一般性的控制工具是指那些经常运用的，能对整体经济发生影响的工具，如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率等。择类性的控制工具是针对个别部门、企业或特殊用途的信贷而采用的工具，如优惠利率、证券放款的最低法定保证金比率，消费信贷管制和房地产信贷管制等。直接信用管制是中央银行基于质与量的信用控制目的，以行政命令方式对银行的信用业务活动进行干预，其中最为普遍的工具是银行贷款的最高限额和银行存款率的最高限度。另外还有信用分配、直接干预、流动性比率、利率最高限额等。间接信用控制是指用各种间接措施引导商业银行的信用活动，其工具主要有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

由于各国金融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各类金融调控手段的使用情况并不一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体系较完备，一般性的控制工具是其主要调控手段。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大一统的银行体制，贷款计划是其主要调控手段。在双重经济体制中，贷款规模和再贷款限额是主要的调控手段。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调控手段的使用也有影响，发达国家一般很少采用存款准备率作为其调控手段，因为它影响面广，对金融业和经济的震动太大；而在发展中国家通常可把它作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因为它便于宏观控制，又有利于集中资金。

许多货币银行学理论中一般不区分金融调控手段和金融调控工具。在新近出版的西方货币银行学教科

书中则有将两者区分开来的倾向。认为，即使设立了金融调控指标以反映不易直接控制的目标，仍不能直接通过工具来实现这些指标，为此还需设立一些介于工具和指标间的近似指标或叫次级指标，这些近似指标可为中央银行所控制，如联邦资金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等。因此可把这些近似指标称作手段或手段指标。选择的手段变量需具有可度量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等特征。

金融发展机制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国内货币资金运动规律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深化间的有机联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该国的投资率和投资效率。投资率决定于储蓄率，投资效率决定于资源配置效率、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素质等。储蓄率的高低取决于政府、企业、居民三个部门的储蓄额。储蓄手段对储蓄额的高低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同时，各部门在进行投资和消费时存在着资金余缺，因此，需要通过各种资金筹集方式，将资金从盈余部门转移到短缺部门，以实现全社会的储蓄和投资。通过高税收和压低农产品价格实现高积累是许多国家曾经采用过的筹集资金的方式。但这些方式有可能通过扭曲产业结构和恶化资源配置，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借助于金融工具，通过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信用活动，将资金从盈余部门转向短缺部门则是一种较好的筹资方式。它既有利于提高各部门的储蓄水平，提高投资率，又有利于资金的合理使用和配置，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融资活动筹资需要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既能满足不同储蓄者的需要，又能为储蓄者提供避免和分散风险的机会，从而促进储蓄的增长；同时，又为投资者提供了不同的筹资方式，将投资风险的一部分由储蓄者承担，刺激投资的增长。金融工业的多样化，还有利于矫正被扭曲的资金价格，正确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刺激企业开展竞争和进行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益。

当一国建设资金面临不足时，还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发展生产，它包括吸引直接投资和借款两个方面。引进外资不仅能扩大一定时期内的资本投入，还能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当然，一个国家能够吸引多少外资要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一个国家需保持一个合理的偿债率和债务率。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在这些国家里，货币化程度低，银行机构一统天下，没有证券市场，实行利率限制，利率水平低，银行信贷资金实行行政性分配等，同时通货膨胀严重。这样一方面导致国民储蓄水平低下，引起资金外逃；另一方面贷款质量下降，投资效益降低，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也曾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只是靠着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积累与消费品分配的集中计划体制，维系着一个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由于投资效益低下，与较高的积累率相比，实际经济增长并不快。同时，还伴随着产业结构恶化、劳动生产率低下等后果。在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金融抑制现象并没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伴随着放权让利的改革，国民收入迅速向企业和个人方向倾斜，财政储蓄份额下降，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从而维持着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但由于专业银行还不能实行企业化经营，国家各类计划对信贷资金运用的干预仍然很强；价格体系并没得到调整，企业软预算约束状态依在存在，利率杠杆无法发挥其正常作用；初步放开的金融市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较为混乱，整个信用资金乃至整个资金的运作效益并不高。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储蓄向投资的顺利转换，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中介机构说 关于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创造信用、影响投资、储蓄、产出和物价等方面具有与银行体系同样地位和作用的学说。该学说由美国经济学家J·G·格利和E·S·肖创立。他们首先对"货币净额论"提出了异议。该理论认为，银行体系以外的非货币金融的发展不会影响货币市场上的货币需求与供给，因而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政府当局只须控制银行体制而不必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他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非货币中介机构也能创造金融资产并对宏观经济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资金的融通方式有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种。在他们看来，直接金融的手段是分配技术，间接金融的手段是中介技术。他们将运用中介技术的金融中介机构分为货币系统和非货币系统。前者是指购买初级证券和创造货币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后者是指购买初级证券创造非货币的债权的金融中介机构，又称为非货币中介机构，如美国的储蓄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信用社和人寿保险公司等机构。他们认为，货币系统购买赤字部门的初级证券时，创造出多倍于初级证券的货币。由于非货币系统归初是买进通货和活期存款，因此，这些非货币中介机构也可以按照货币系统创造货币的方法，创造出多倍于通货或存款余额的非货币的金融资产。"并且由于中介机构还能出售货币换得初级证券，因此它们亦可依据它们持有的任何一种资产的某种倍数来创造负债。"（格利、肖《金融理

论中的货币》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2页）所以，货币与非货币中介机构都能创造金融资产，从而把未支用的收入从盈余部门转移到赤字部门。正是出于货币系统与非货币中介机构存在上述共性，以及私人部门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增长，再加上政府对货币系统存贷利率的限制，对非货币中介机构的初级证券的保险，非货币中介机构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货币系统的有力竞争者。他们认为，非货币中介机构的发展造成了初级证券需求的膨胀，这不但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给量，而且创造出了流动性很高的巨额金融资产。在货币当局只对货币系统中的商业银行进行严格管制的情况下，非货币中介机构的发展就自然地削弱了金融政策影响物价与产量和能力。结果，货币当局虽然控制了货币的供给量的增长，却未能抑制物价的上涨。为此，他们建议货币当局：（1）控制商业银行的名义准备金量、准备金余额利率和存款利率。（2）统一管理公债与货币。（3）控制非货币中介机构。美国经济学家托奥在资产选择理论分析中也曾认为，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能力与银行一样也会随其贷款融资活动的增加而增强。因此，就货币创造能力而言，二者之间除了程度上的差异外，已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金融统计资料的结构　我国金融机构是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体系。为了适应国民经济管理与信贷资金管理的要求，需要统一编制一系列金融统计资料。其结构由综合金融统计资料、各银行信贷收支统计资料、其他金融机构金融统计资料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统计资料四部分组成。（一）综合金融统计资料，包括综合信贷收支统计和国家银行现金收支统计。（1）综合信贷收支统计。反映了金融机构从社会集中闲散资金的来源和数量，对社会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发放贷款的数量和使用方向。以及流通中货币投放或回笼的数量。这是国家观察全社会存款水平与结构、贷款规模和贷款运行情况的主要资料。综合信贷收支统计又分为全社会信贷收支统计、银行信用社信贷收支统计、国家银行信贷收支统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信贷收支统计四个层次。（2）国家银行现金收支统计，反映了国家银行现金收入的来源和数量。现金投放的方向和数量，以及货币发行或回笼的数量。是国家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控制货币发行的重要依据。（二）各银行的信贷收支统计资料，既包括各银行从社会集中闲散资金的来源和数量、对社会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发放贷款的数量和使用方向，以及流通中投放或回笼货币的数量，也包括国家专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业务，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国家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业务，其他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业务等。（三）其他金融机构统计资料。此类资料是为了加强对其他金融机构的领导、管理、协调、监督和稽核而编制的。包括：农村信用社信贷和现金收支统计、城市信用社信贷和现金收支统计、信托投资机构信贷收支统计。（四）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统计资料。目前编制的此类统计资料有保险业务统计。

征税范围　又称"课税范围"。税法规定的课税对象的具体内容。反映一个税种征税的广度。如我国农业税的征税对象为农业常年的产量，其征税范围包括粮食作物和薯类作物收入，棉花、麻类、烟叶、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收入，果园、菜园、瓜园、花圃等园艺作物收入，以及经国务规定或批准的其他收入。不属于征税范围的农业收入，如农民的副业收入、农业副产品收入、不征农业税。又如我国曾经有过货物税、商品流通税、工商统一税等都规定有税目，税目实际上也是课税范围，即具体的课税根据。

征税对象　亦称"课税对象、课税客体"。是税收课征的目的物，也就是对什么东西征税。它在税收制度的诸要素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同税种名称的由来，以及这种税和那种税的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征税对象。按征税对象划分，我国现行税收可分为四大类：①商品课税，即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营业额为课税对象的税收；②所得课税，即以所得额为课税对象的税收；③财产课税，即以财产的数量或价值额为课税对象的税收；④特定目的和行为课税，即在特定经济条件下，为达到特定的目的，对特定的行为课征的税收。

征收管理　是税务机关依据税法规定，对纳税单位和个人，进行税收宣传，贯彻税收政策，掌握税源、积极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是国家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征收管理，对正确贯彻税收政策法令，严肃税收法纪，维护国家利益，加强财政监督，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财政收入，为四化建设筹集资金起着重要的作用。税收征收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执行税收法令，加强监督检查，掌握税源情况，促进生产发展，把应收税款及时足额地组织缴入国库。税收征收管理的主要内容：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纳税辅导，纳税检查；税款征纳；发货票管理等。

征管形式　基层税务机关对其税收管辖地区的纳税人及各项税源，所采取的征管形式，一般根据各基

层税务机关的干部力量和税收管辖区的税源分布，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地理交通条件等因素，本着有利征管、方便纳税、因地制宜的原则确定。根据各地经验，目前一般分为"统管"和"分管"两种形式。"统管"是指对各种税收进行统一管理，包括按地区管理、按行业管理、按地区和行业结合管理、驻厂管理、巡回管理及查辑管理。"分管"是按各税种的不同情况、分工管理。

征管制度 根据国家税收政策法令建立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的总称。征收管理制度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共同遵守的规范，是搞好征收管理的重要手段。它的主要内容有：税务登记制度、纳税鉴定制度、纳税辅导制度、纳税申报制度、纳税检查制度、发票管理制度、专管员责任制度、纳税资料积累制度、代扣代缴税制度、代征税制度等。

所得 指个人、法人和其它社会团体在一定期间内，由于劳动、经营、投资或把财产、权利供人使用而获得的利润、劳务报酬或其它一切收入。所得，分狭义的所得和广义的所得，狭义的所得，仅限于运用资本，从事营业和提供劳务取得的收益、利润和报酬等；广义的所得，视一切收益均为所得，而不问其来源、方式、有形或无形，合法的或是违法的、经常的或临时的，在税法上对应税所得作出概括规定，是明确所得税征税对象的重要法律依据。各国税法确定的"所得"，一般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①以合法来源的所得为主；②以连续性的所得为主；③以净所得为主；④应税所得以实际取得的所得为准。

所得额 所得税用语。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一般指纳税人的纯收人或总收人。不同类型的所得税对所得额的范围有不同的规定。如中国集体企业所得税的所得额是企业在纳税年度内的营业收人总额，扣除成本、费用、税法准许扣除的税金，及其它项目，加减营业外损益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额；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所得额包括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财产租赁收入等。

所得税 国家对个人或企业的各种所得所征收的税。1799年创行于英国，十九世纪后，各国相继仿行，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税收。旧中国国民党政府曾开征各种所得税。解放后，废止旧的所得税。1950年政务院公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规定有：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和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薪给报酬所得税未开征；存款利息所得税1950年12月改为利息所得税，1959年起停征；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原和营业税同属于工商业税的组成部分，1958年税制改革时成为独立的工商所得税。从1980年9月至1983年又先后开征了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和国营企业所得税。

所得额级距 通常简称"级距"。所得税累进税率表中，按所得额数额大小划分的各个等级所得额起止数间的距离。规定所得额级距，以便按级规定各个级距的适用税率，各级的税率是随着所得额级距数额的增大，逐级提高的。

弥补亏损 国家按规定对企业亏损的退库弥补。监缴机关按照企业财务制度和金库条例施行细则，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或经营性亏损，从金库办理退库弥补亏损手续。对计划内亏损，可以按计划进行弥补；对计划外亏损和超计划亏损要由企业写出检查报告，提出措施，经企业职工讨论和监缴单位提出意见，并报上级机关批准，才能给予弥补。

经济税源调查 对社会经济情况和税源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工作。它是编制税收计划的基础工作，也是保证税收计划顺利实现、研究改进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加强征收管理的重要措施。内容包括：①国家在经济方面采取的重大政策或措施对税收的影响。②主要税种和重点税源的发展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对税收的影响。③税收制度变动和重大税收政策措施对税收的影响。④税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查方法分为经常调查和专题调查两种。经常性调查是单位掌握每个时期的经济税源的经济资料，进行定期分析研究；专题调查是针对经济税源方面某一专门问题，进行深人的调查研究。

经营资金 社会主义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用的资金。按其所处领域分，有"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流动资金"，按其周转性质分，有"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按其取得来源分，有"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

承包费 国家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从国营小型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和利润部分提取的一种收入。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规定在核定企业1983年基期利润时对国营小型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利润数额较大的，国家可以提取一定数额的承包费，收取承包费的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工业企业承包费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商业企业

的承包费可留一部分给主管部门。近年来，在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部分国营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上交国家利润采取承包费的形式，原则上企业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后再交纳承包费。

限额拨款　核定用款单位从银行取款限额的一种拨款方式，是我国预算拨款的主要方式之一。具体作法是：财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在向用款单位拨付经费或基本建设资金时，在核定的年度预算范围内，按季或按月核定一个用款额度，开出限额通知单，并分别下达到用款单位及其开户银行。用款单位在核定的限额范围内，在其开户银行取款支用或向所属单位转拨限额。银行对用款单位的限额使用情况按月报告财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并办理有关结算手续。年终，用款单位未支取的限额余额，除按规定可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外，一律由各开户银行自行注销。1952年我国基本建设拨款全部实行限额拨款制，1956年11月起，对中央及部分行政、事业经费试行限额拨款制，1959年除个别经财政部特许实行划拨资金制者外，我国全面地实行限额拨款制。实行限额拨款制，银行成了直接参与国家财政支出的预算执行机关，它不仅要控制经费限额帐户的余额，还要对用款单位的业务、财务活动进行财政监督，实行这种方法，可有效地避免财政资金的分散和积压，合理调度财政资金，便于财政部门及时掌握预算支出的执行情况，集中分散的财政资金，同时可简化拨款手续，有利于年终清理结算。

居民税收管辖权　亦称居住国税收管辖权。是指一国对其本国的居民在世界范围内所得征课税收的权力。居民税收管辖权的效力来自于国家主权的属人性，它的确立是以纳税人与征税国之间存在某种属人的联系为依据的。就各国的税收实践来看，国家在确定纳税人是否与本国存在属人联系时，其所要考虑的因素，就自然人来说，主要有住所（或居所）和习惯居留地、国籍等；就法人来讲则主要有公司的注册成立地、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以及公司的总机构所在地等。凡是与某个国家有这种税收居所联系的纳税人，就是该国的居民纳税人，而这个国家就是相应地称为该纳税人的居住国．根据纳税人在一国有税收居所这一事实，居住国可以要求居民纳税人就来源于国内和国外的所得承担无限的纳税义务。尽管纳税人的来源于国外部分所得并不在居住国的领域内，但纳税人居住在该国境内这一事实，足以使居住国通过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税收管辖权。

"逆风向"规则　亦称"反周期货币政策规则"。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美国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上张的货币政策规则。其内容是：在经济危机时，放松银根，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扩大就业，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高涨时，若发生需求上的通货膨胀，则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以减少投资和需求，减缓通货膨胀。

该规则源于凯恩斯理论。凯恩斯认为，总供给决定了总需求，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投资取决于利息率和资本预期利润率；货币需求决定于收入和债券利率；货币供给增加通过影响债券市场利率，刺激投资。由于消费倾向递减，灵活偏好和资本预期利润率较低，故总需求经常不足，需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但因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高，甚至有可能出现"流动性陷井"，投资的利率弹性较低，故货币政策无效，宜采取财政赤字政策来刺激需求。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与货币主义的争论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凯恩斯理论。该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上的利率绝非政府债券利率一种，还存在着多种金融资产及其收益率，因此货币对经济的影响要通过一个复杂的金融市场来传递。决定资本的金融成本的是各种证券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决定投资的是实质资本在当期证券市场上的市值与其当期重置成本的比率（即Q比率）。所以，该学派并不否认货币对投资和经济的作用。但他们更主张采用财政政策来解决失业和总需求不足，在使用财政政策时配合运用货币政策；当面临总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时，应主要运用货币政策，通过紧缩银根来减少总需求从而降低价格水平的上涨率。

与货币主义者不同，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并不认为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他们认为，由于经济周期和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存在，仍需要采取逆现行经济风向而动的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时应以利率作为中间指标。而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由于受货币政策时滞因素影响和货币当局无法预测多变的时滞因素，以及利率决定于多种因素、它既是一个政策变量，又是一个内生变数，因此实行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成功的可能性较小，反而会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

同时，从长期看，随着预期的调整，并不存在失业与通货膨胀交替关系，失业基本上是自愿性的，只存在过渡时期的摩擦性失业现象，因此，应执行"单一规则"，即货币供应量应稳定的按一定比例的增长。

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长期采用"逆风向而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进入70年代后，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使这种主张陷入了困境，若扩张货币增加就业，就会加剧通货膨胀；若紧缩货币抑

制通货膨胀，则会加剧失业。因此，各国货币当局纷纷转向采用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但事实上，这一主张也未得到彻底贯彻，各国货币当局一般按一定幅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时对利率变动进行调节。

九 画

总预算 是指各级政府汇总本级及其下级政府的年度收支所编成的预算。即国家总预算由中央财政部汇编、地方总预算由地方财政部门汇编。各级总预算由本级单位预算和所属下级总预算组成。如：国家总预算、包括中央级单位预算和地方总预算。我国的省总预算，包括省级各部门的单位预算、企业财务收支计划和所属县（市）总预算。

总预备费 简称"预备费"。国家预算中为应付某些临时发生难以预料的开支而设置的专项基金。是财政后备的一种形式，也是预算平衡的一种保障。总预备费分为中央总预备费和地方总预备费两种。一般不宜随意动用，须启用时，必须按规定办理批准手续，动用中央总预备费须经国务院批准、动用地方总预备费须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根据我国规定，中央总预备费和地方总预费分别列人国家总预算和各地方预算，分别按各级支出预算总额的一定比例设置。为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家制定了特殊政策，规定民族自治区按较高的比例设置预备费，对其它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个别省区，也规定比照民族自治区的办法办理。备用基金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国工农业生产水平低，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自然好坏，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由于社会再生产本身存在供求之间的不平衡，因此，在编国家预算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基金，以应付经济建设中各种临时急需资金的需要，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地发展。

总额分成 是我国预算管理办法的一种形式。在确定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划分时，以地方的总收入和总支出来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其内容是：总额分成比例确定后，地方收入按比例留成，用于地方各项开支，如果地方总收入小于总支出数，其差额由中央定额补助。例如 1959 年，我国预算管理体制规定：在收入方面，除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事业收入和铁道、邮电、外贸、海关等收入外，其他各项收入包括各种税收，全部划给地方、不再按不同类别，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支出方面，也不再划分正常支出和专案拨款支出，除中央各部门直接办理的少部分经济建设支出、中央以及行政和文教支出与国防、援外、债务等支出外，一律按隶属关系，哪级支出列入哪级预算。地方的总收入与总支出经中央核定后，确定总额分成比例。此种办法，扩大了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将地方的收入和支出挂钩，有利于发挥地方认真负责地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总额货币论 货币理论中与"净额货币论"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该理论在分析货币供求时不舍象私人国内债权和债务，反对金融帐户的归并，主张以总体货币（包括内在的货币和外在货币）来分析经济。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 J·格利和 E·肖、其观点集中反映在出版于 1960 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

总额货币论认为，名义货币量是支出单位持有的通货加上可开取支票的活期存款，剔除虽已开出但尚未以存款帐户付款的支票。它包括外在货币和内在货币。内在货币指货币的创造是以货币系统持有私人国内初级证券为基础的；外在货币则指货币创造是以货币系统持有黄金、外国债券和政府债券为基础的，或是由政府在赤字条件下购买商品、劳务或转移支付而产生的，其创造是以私人国内部门持有对政府的一部分净债权为基础的。该理论认为，货币需求是对现存全部内在和外在货币合在一起的需求。在只有内在货币的场合，货币需求取决于支出单位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和债券）的实际持有量、实际收入水平、债券利率、实际租金率以及投资者初级债务与它们有形资产的关系。初级证券和金融机构的增长是实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投资储蓄间分工的增强，某种程度的经济分散是货币需求和货币存量的前提条件，初级证券的差异影响货币需求。该理论反对内在债权债务积累不影响货币实际总需求的观点，反对将内在债权债务相抵销的做法。反对随意将金融帐户合并，变成一个无债券的世界后，又随意引进债券利率来分析货币需求的轻率态度。该理论还认为，在只有内在货币的场合，只存在一个确定的均衡利率和价格

水平。当存在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组合时，内在货币的名义变动对经济有实际影响；即使经济中只存在内在货币，若考虑初级证券的差别情况，则名义货币变动也具有实际影响。这样，剔除内在货币及其变动，忽视由此引起的财富转移对实际经济的影响，而只分析外在货币的变动，必然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参见净额货币论）。

差额预算　全额预算的对称。指单位预算以收抵支后按收支差额列入国家预算。它是我国现行单位预算管理的一种方法，适用于有经常性业务收入的事业单位，如剧团、体育馆、医院等。国家为了充分调动这些单位的积极性，加强财务管理，合理节约地使用资金，更好地完成事业计划，在编制预算时就确定其差额，将其收入抵补支出后多余的部分上缴国家，收入少于支出的差额部分由国家预算拨款。这种方法，在财政机关对事业单位的全部收支进行全额管理的前提下，分别实行①定额补助，即财政部门对事业单位的全部收支进行全额管理，其收支之间差额不论变化如何，都按年初核定的定额，由预算拨款补助，自求平衡，节约归己，超支不补。②定项补助。即财政部门对事业单位的收支进行全额管理，根据单位收支的安排情况，对支出中的一项或几项，由预算拨款补助、其余支出由其收入抵补。③差额补助。即财政部门对事业单位的收支实行全额管理，按年初核定的收支差额，由预算拨款补助。年终结余，缴回预算。

差额预算管理　"全额预算管理"的对称。即以单位预算收入抵拨单位预算支出的一部或全部后，按其收支差额列入国家预算。预算单位实行以收抵支，差额列入国家预算管理，支大于收的差额，由国家预算拨款；收大于支的差额，作为预算缴款。实行差额管理的单位，财政机关对其全部收支仍进行管理。在我国这种管理形式或方法依各单位的不同情况主要分为："全额管理定额补助"和"全额管理定项补助"。

派生存款　是"原始存款"的对称。指商业银行或其他银行由于对外贷款或证券购买等业务而派生出去的存款。在现金结算制度下，银行吸收多少资金贷放多少资金，社会存款总额即原始存款额。但在非现金的转帐制度和信用工具流通制度下，银行对原客户签发一定数额票据用于支付流通，而客户将此票据又可转到其他客户的银行帐户上，又形成其他银行的资金来源，银行根据这笔存款又可进行贷款……，循环下去，一笔资金可形成无数笔存、贷款，即社会信用规模可在原始存款基础上无限扩张下去。但为了限制信用制度下存款的无限扩张，各国中央银行都对商业银行贷款规定了限制，即吸收的存款按存款准备率交纳准备金，然后再进行贷款，这样派生存款的扩张在原始存款基础上一笔笔减少，信用规模扩大也就是有限度的。如下所示：

原始存款 100 万在交纳 10%准备金后依次贷放出去的是 90 万、81 万、72.9 万……，派生存款就是 90 万+81 万+72.9 万+……。其规模大小取决于中央银行存款准备率的高低，准备率越高，派生存款越少，准备率越低，派生存款越多。当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派生存款总量还会受其他因素干扰而进一步缩小，如现金漏损或银行超额准备金都会使其贷出量缩小。综上所述，派生存款总量公式：

$$派生存款=\frac{原始存款}{存款准备率}$$

若考虑进其他因素：

$$派生存款=\frac{原始存款}{存款准备率+现金漏损率+超额准备率}$$

由于派生存款量意味着信贷规模的大小，从而影响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发展，因而各国政府均实行准备金制度，通过准备率的调整来控制全社会的信用规模，这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越发达，它就显得越发重要。

洼地积水效应　"高地缺水效应"的对称。这两个概念是用来描述当社会货币分布、需求结构与商品结构发生错位时，在经济的某些地方造成货币量过多而商品量不足，或者相反，以至于货币购买力在不同的地方并不均质的情况。它是纸币特有的规律。

洼地积水效应是指，在某些地方由于商品不足，呈现为商品洼地，而货币过量，在洼地形成积水，造成单位货币价值含量减少，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现象。高地积水效应则是相反的情况。

洼地货币的购买力弱，高地货币的购买力强，这是由经济供求结构不平衡引起。但货币购买力的强弱又通过引致货币流动调整经济供求结构的错位，最后使得货币购买力在不同的地方趋向均匀。货币流动遵循二条原则：一是生产领域的货币遵循由购买力强的地方向购买力弱的地方流动的原则。这是因为虽然洼地的货币购买力弱，但洼地的商品交换力强，而生产领域的货币是追求商品的交换力，所以生产领域的货币是由高地流向洼地的。二是消费领域中货币遵守由洼地向高地流动的原则。这是因为消费领域的货币遵循的是货币购买力，而高地的货币购买力强，能买到更多的商品，所以消费领域的货币总是由洼地流向高地。生产货币和消费货币的对流，将使商品洼地抬

高，商品高地削减，经济供求结构得以平衡，货币购买力趋于一致。

洼地积水效应和高地缺水效应的存在，即货币购买力不匀，使得货币需要量的确定复杂化了。首先，两个效应同时存在，给出了货币需求量的相反信号，洼地货币太多，高地货币不足，使货币需求量的确定处于两难抉择。这样，货币需要量就不是一个清晰的确定量，而是一个处于两种信号之间的模糊的有弹性的量，这也就为货币政策的运用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其次，即使选择了一个理想的货币购买力和价格水平指标来供应货币，仍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如增加货币供应量，虽能减缓高地缺水效应，却增加了洼地积水效应，这样，就很难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调整来保持经济的均衡和稳定。

政府银行 由政府设立或控制的银行。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设立的银行均为政府银行。政府银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为控制某些特定的金融业务而投资创设的专业银行，如美国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输出入银行等；二是对私营银行实行"国有化"，如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和三家大存款银行（巴黎国民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兴业银行）等。政府银行与中央银行不同，其一它不是发行货币的银行，其二，它并不总是专门执行金融政策的银行，而是仍有经营目的的银行。政府银行组织形式有政府经营、政府同私人合营、私营等，但都受到政府的控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银行有了显著发展，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深，这些银行在各国银行体系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法国的39家国有化银行和受政府控制的银行占本国银行的半数以上。日本开发银行和输出入银行，在配合政府经济政策、推动出口贸易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政策性贷款 指银行为配合国家经济政策需要而不是按照盈利原则给予工商企业和经营农副产品部门的一种贷款。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于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存款，是银行的一种负债，这就决定了银行资金的使用应遵循有偿的原则，而且贷款的利率应高于存款的利率。但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却主要不是为盈利，它甚至有时以低于存款的利率发放贷款，以促进某些新兴产业和某些事关国计民生的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在我国政策性贷款主要有农副产品采购贷款、对经营粮油部门的贷款和某些国家规定的国营企业政策亏损性的贷款。政策性亏损贷款尽管有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一面，但也要注意其数量界限，不能任意扩大这项贷款，否则的话，就会使金融企业即银行部门陷入长期亏损状态，不利于银行的正常经营。

城市维护建设税 以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按照纳税人所在地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率，向缴纳以上三种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地方税。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维护建设费全靠国家拨款来解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种依赖国家财政拿钱的办法已不能适应城市维护建设的需要，不利于地方规划城市发展、搞好城市维护建设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解决地方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加快新兴城镇的开发和老城镇改造的步伐，1984年10月国家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时，决定设置城市维护建设税，1985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此税。城市维持建设税按纳税人所在地不同，制定了不同的税率：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镇的，税率为1%。按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对无固定纳税地点的流动经营纳税人，均按其产品销售地的纳税税率缴纳城市维护建设费。为吸引外商在我国投资，我国有关税法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因此，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也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专款必须专用，开支范围仍按原城市维护建设"三项资金"（即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取5%、工商税附加1%以及国拨城市维护费）的使用范围执行。按1%税率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专用于乡、镇的维护建设，具体规定由当地人民政府制定。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使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有了一个稳定的来源，对调动地方因地制宜地搞好城市的维护和建设，加快新老城市的开发和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按计划（利润）缴库 我国"利改税"之前实行的财政管理制度。即国营企业根据其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计划利润指标以及缴款的季度分月计划，按月逐次上缴，每月月终后10日内，上级财政部门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利润数结算，上缴利润未达到计划指标时，企业应积极补缴，上缴利润超过计划指标时，其超过部分可作为企业下月应缴利润计帐。年终后，企业上级财政部门应将企业上年多缴的利润数退还给企业，不得截流。我国工业、交通企业的利润一般也采用以上办法，实现按计划（利润）缴库的办法，使得国家财政能及时、均衡地取得预算收入，有利于企业加强计划管理工作。

按实际（利润）缴库　我国"利改税"之前实行的财政管理制度。即国营企业单位按照其实际实现的利润缴库。按实际（利润）缴库适用于那些销售额变化大，流动资金占用多的企业单位。例如我国商业企业和物资供销企业一般都采用此种缴库办法。同时，我国对一些实现利润数额较小的工业企业，也采用这种办法。对那些因特殊情况难以计算企业单位实际利润数的，可先参照其上月实际利润数估计缴纳，情况弄清后，再按实际利润数结算。

贴现　商业银行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形式。指票据的持有人（公司、企业、个人等）在票据到期之前需使用资金时，将未到期的票据拿到商业银行去兑现。对商业银行来说，相当于对票据持有人发放一笔相当于票面金额的贷款，贷款期限为未到期的这段时间，因此要收取一定的利息，利息从兑现的票面额中扣除。持票人得到的现金是票面额扣除利息后的余额，是贴息后兑现，故称"贴现"。目前，提供贴现业务的一般都是商业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但在过去的英国，是由专门的贴现商号进行票据贴现。贴现的票据主要是各种商业票据，也可是未到期的国库券和其他有价证券。

贴现率　银行对票据贴现时从票面金额中扣除的利息占票面额的比率。亦即银行提供相当于票面额资金融通时的贷款利率。其计算公式为：（贴现利息／票面金额）×100%（年率）。贴现率的高低并不等于银行发放的同期限、同金额的贷款利率水平，一般要低于后者，因为贴现是先扣利息，贷款是后付利息；票据贴现者所使用的实际金额低于票面额，而贷款是全额使用的。贴现率的高低与贷款利率又有着很密切的内在关系，前者根据后者来确定，而贷款利率水平高低又受制于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

贴现率政策　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政策或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利用再贴现手段和再贴现率的制定与调整来控制社会信用规模的机制或职能。贴现率政策是西方国家三大货币政策之一。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利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生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利率水平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的优惠贷款利率上，这个利率的变动与商业银行的贴现率是一致的，而商行的贴现率取决于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水平。因此，再贴现率就成为确定社会利率水平的标准，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变动再贴现率影响利率水平和信贷规模。当经济出现萧条或衰退时，中央银行就需降低再贴现率，以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而当经济增长过快、信贷规模扩大，尤其是通货膨胀率高昂时，提高再贴现率对抑制过多需求、控制信贷和物价是十分有效的措施。在资本国际间流动管制不严格的国家，中央银行提高贴现率和利率水平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这对于缓解资金不足、弥补国际收支的暂时逆差可起到较大作用。但是贴现政策在对内与对外两个目标和所起的作用上是有矛盾的。提高贴现率以增加资本输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同时会限制国内生产和投资，从长远来看对一国经济不利；而当为刺激经济而降低利率时，则会影响资本流入。贴现率政策在不同国家中的运用程度也有所不同，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贴现率是中央银行的一项有力的政策手段，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则往往作为其他货币政策的一项配合政策。中央银行的贴现率一般是短期的，以3个月和6个月为多，因此政策对目标所产生效应往往也是中短期的。

临时商业税　我国对无固定营业场所的行商及固定工商业户在外埠销售本业以外的货物征收的税。它是我国工商业税的组成部分。在货物销售地按营业额征收，采用比例税率。1951年9月公布的《临时商业税稽征办法》规定，以营业总收入额为征税对象，采用比例税率，征收办法由税务机关指定行栈或收购货物的工厂、商号为代扣义务人，不属上述代缴义务人代缴的由纳税义务人缴纳。农民、渔民、牧民、猎户出售自产物品免税。1973年税制改革，将临时商业税改为工商税的"临时经营"税目。1984年，工商税改革时，改为营业税中的"临时经营"税目。

罚没并处　对严重违反税收法规的违章案件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税务机关按规定对严重的偷税漏税案件，除补税罚款外，还没收其有关货物和物品。我国《货物税暂行条例》曾规定对某些应税商品的产制人或购运人，如果违章情节严重，除按偷漏税款处以罚金外，同时将货物予以没收。如《私盐查缉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对私制私运原盐者，情节严重的，除补税罚款外，还要没收其原盐及运盐制盐工具。

复税制　"单一税制"的对称。单一税制与复税制是税收制度的一种分类。复税制是一个国家同时实行由若干税种组成的税收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实行的也是复税制。复税制可以在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的配合下，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可以利用各个不同税种的特点相辅相成，发挥各自的作用，它可以从各个方面选择征税对象，控制税源，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需要。

复合中央银行制　一个国家没有专门行使中央银

行职能的银行，而是由一家大银行既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又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银行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以苏联的国家银行为代表。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国家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主导力量，专业银行是它的补充，它集中了中央银行和一般银行的职能和业务。这种体制在苏联经济建设初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暴露出种种弊端：没有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调控作用，信贷和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也被削弱，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自80年代后，苏联对金融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把国家银行转变为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逐步建立起单一的中央银行体制。建国后，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了中央银行和一般银行的双重职能和业务。从1979年后，我国陆续恢复和分设了一些专业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并建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原由人民银行承办的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至此，中国结束了复合的中央银行体制。东欧各国的银行体制也实行复合中央银行体制。60年代后，有的国家已陆续摒弃了复合的中央银行体制，建立起单一的中央银行体制。

选择性信用控制 亦称"特种信用管理"。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控制信用规模的手段之一。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用管理分为总量信用控制和选择性信用控制。前者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改变贴现率、改变法定准备率这三个传统的政策工具的实施以达到调节信用总量的目的；后者在于强化货币政策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影响，从而影响特定领域外的其他经济部门。这种控制相互配合使用，以谋求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选择性信用一般在股票市场信用、消费者信用和房地产信用这三个重要领域实行。

狭义货币流通 "广义货币流通"的对称。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不断地转手于卖者和买者之间的运动就是货币流通。由于各国对货币的定义和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对货币种类和层次的划分也有不尽相同的标准。因而货币流通可以分为"狭义货币流通"和"广义货币流通"。在我国，狭义货币流通仅指现金的流通，即仅以纸币和硬辅币为价值符号代表货币进行的流通叫狭义货币流通。而在西方国家，狭义货币流通通常是指现金（纸币和硬币）加上可用支票提取或转帐，或以信用卡、电汇等方式结算的活期存款为价值符号代表货币进行的流通。

贷款 即"放款"。是指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按一定的利息贷出货币资金的一种信用活动。贷款可按不同标准进行划分：按条件分为需要提供押品的抵押贷款和不要押品的信用放款；按期限可分为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和数年甚至十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按用途可为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金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按对象分为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农业贷款等。广义的贷款还应包括贴现、透支、押汇以及银行之间拆借头寸等信用活动。

贷款制度 指银行对客户发放贷款过程中必须遵循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的总称。建立健全贷款制度，对于搞好银行的信贷管理，充分发挥银行信贷的调节和监督作用，提高贷款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50年代就建立了以"三查"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谓"三查"制度是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制度的总称。贷前调查是对客户的情况和资金需求量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预测，以便为有效地控制贷款方向和数量，优化贷款决策奠定基础。内容包括：①调查贷款的对象；②调查同行业同类产品的消耗、成本和利润情况；③调查同行业各企业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④调查了解该行业发展前景和产品竞争能力；⑤调查企业的信用状况及资金使用安排等。通过贷前调查选择贷款最佳投向和支持对象，以避免贷款决策失误。贷时审查是在贷前调查的基础上，对企业实际申请使用贷款时的金额和用途等进行审查。主要内容包括：①贷款原因的审查；②贷款额度的审查；③贷款期限的审查；④贷款用途的审查。贷时审查是贷款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它直接决定了贷与不贷，多贷或少贷的问题。贷后检查是对企业贷款使用情况和效果进行检查。主要内容包括：①贷款是否按规定的用途使用；②贷款是否有适用适销的物资作保证；③贷款能否按期归还；④企业的物资储备或商品库存的结构和周转状况是否合理；⑤生产和销售计划是否完成；⑥企业的流动资金有无挪用或其它不合理占用等。对贷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以避免发生不应有的贷款损失。贷款"三查"制度中的各项内容都是互相联系的。"三查"过程实际上是根据信贷资金运动规律控制贷款方向，数量和结构的全过程。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贷款制度不断完善。

贷款利息率 也称"贷款利率"。是贷款利息与贷款之比。设 L 为贷款，I 为贷款利息，i 为利息率，则 $i=\frac{I}{L}$。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利息率是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自发决定，受资本主义竞争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

件下，银行的信贷活动及利率的确定要受国家计划的制约。我国贷款利率的确定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①平均利润率。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在确定利率时，要考虑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②银行经营发展的需要。应使银行能够取得合理的利差收益，以保持自我发展的能力。③价格的变动。在名义利率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与实际利息率呈反方向变动。要根据价格变动情况，确定利率的水平。④党和国家一定时期内的经济任务和经济政策。

贷款作为货币资金，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是企业预付资金的一个组成部分。贷款利息则是企业取得这部分货币资金使用权而付出的代价或资金价格。贷款利率调节着信贷资金的供求。贷款利率低意味着资金便宜，刺激资金需求。贷款利率高相应会抑制资金需求。由于利息是企业利润的一种分割，所以贷款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当银行贷款利率提高时，企业利润会相应减少；贷款利率下降时，利润则会相应增加。银行可以运用贷款利率调节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

贷款利率的变动影响企业利润的分割，但企业能否对此作出灵活反应，企业行为能否发生符合利率调节意图的相应变化，还取决于企业预算约束是否有效及有效的程度。预算约束软化，企业不可能对利率的变动作出积极有效的反应，企业行为很难发生符合利率调节意图的变化。只有硬化企业预算约束，贷款利率才能有效地影响企业行为，从而使利率成为引导企业行为，调节投资需求的有效手段。

贷款产值率 指企业贷款量与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对比关系。它是考核贷款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贷款产值率的计算方法为：

$$贷款产值率=\frac{工业总产值\times 资金贷款率}{贷款平均余额}\times 100\%$$

公式表明，贷款产值率取决于工业产值、资金贷款率和贷款平均余额三个因素。在贷款余额一定的条件下，贷款产值率的变化同工业产值和资金贷款率的变化成正比；而在工业总产值和资金贷款率一定的条件下，贷款产值率的变化同贷款平均余额的变化成反比。银行要从提高企业和自身经济效益出发，加强贷款管理，促进企业合理有效地利用贷款，提高贷款产值率，以充分发挥银行贷款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促进和调节作用。

贷款税利率 指企业贷款额与所实现的税收利润额的对比关系。贷款税利率是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也是考核贷款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计算方法为：

$$贷款税利率=\frac{税利总额\times 资金贷款率}{贷款平均余额}\times 100\%$$

公式表明，贷款税利率由税利总额、资金贷款率和贷款额共同决定。在资金贷款率和贷款额一定的条件下，贷款税利率取决于税利的多少。税收和利润都是企业的纯收入，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集中表现。由于贷款税利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资金占用与其经营成果的对比关系，所以它从贷款资金使用的角度体现了企业的盈利能力，银行应把提高贷款税利率作为提高贷款经济效益的中心问题来抓。

贷款周转率 指银行贷款累计发放额与贷款平均余额的比例关系。用公式表示如下：

$$贷款周转率=\frac{贷款累计发放额}{贷款平均余额}\times 100\%$$

贷款周转率是衡量银行贷款周转速度的指标，也是考核贷款经济效益的一种指标。贷款周转次数说明了贷款周转速度的快慢。贷款周转次数多，表明贷款周转速度快，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表明贷款效益好。相反，贷款周转次数少，表明贷款周转速度慢，同时也表明贷款效益差。提高贷款周转率，增加贷款周转次数，是银行节约信贷资金的重要途径。

贷款经济效益 银行贷款后企业生产经营成果与其贷款占用量的对比关系。贷款经济效益是衡量银行贷款作用的客观尺度。贷款经济效益的评估受社会制度和贷款目的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银行资本家通过信贷活动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其放款的目的就是获得利息收入。因此，银行利润率成为借贷资本经济效益的具体体现和唯一标志。社会主义制度下，银行的信贷活动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银行贷款的目的，决不仅仅是取得利息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使企业以较少的资金占用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创造更多的价值。贷款经济效益要从宏观和微观及银行自身经济效益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为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贷款经济效益的考核指标体系。我国通常采用如下指标考核贷款经济效益：①贷款指标利用率和贷款周转率。这两项指标从银行资金分配的角度考核贷款经济效益；②贷款销售率、贷款产值率和贷款利税率。这三项指标从贷款使用的角度考核贷款经济效益。贷款经济效益的好坏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有很大影响，银行应把提高贷款经济效益作为信贷管理的中心工作。

科目流用 亦称"经费流用"、"预算流用"。是指预算支出科目间经费用途的改变或调整。即一个科目的经费不足，另一科目的经费有余，可以在规定的流用范围内，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以有余补不足。合理的流用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但科目流用可能影响宏观平衡，例如基本建设资金与流动资金、教育经费与一般经费之间互相流用，会打乱比例关系，不利于国民经济与社会的正常发展。因此，进行科目流用，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流用范围，并经过一定的批准程序。

科技三项费用 国家预算规定用于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重要科研补助费三项专款的费用。新产品试制费是指用于我国境内从没有生产和试制过的产品和对老产品的结构、性能的改进等方面确有突破性进展，而需要进行重新试制所发生的费用。使用范围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试制新产品必须配备的非主要设备和建造相应的土建设施，以及试制新产品的必要仪器工具、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的试验费、样品和样机购置费等。中间试验费是指为使科研成果尽量转化为生产力，对已取得科学研究结果但尚未获得必要的技术数据，不能直接用于生产和建设中，还必须配备一定的设备仪器，新建中间试验车间和试验场地，以便进行扩大规模试验或较长期验证改进，经有关部门批准纳入计划项目的费用。使用范围包括，为新产品进行中间试验而必须修建的土建工程支出，设备仪器的购置和安装费以及新产品中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其他费用等。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是我国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由于承担全国性的重大科学研究任务，由国家财政拨予的专项补助资金。合理使用科技三项费用，对于不断增加新产品生产，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研经费 是指除重要科学补助费用之外，用于企业一般性科学研究、新技术研究所需的费用。企业进行新技术研究所需的各项费用的资金渠道，是根据1982年4月14日《财政部关于企业新产品试制费和科研经费开支的决定》来解决的。①企业内部科研机构所需用包括人员工资和各项研究费，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实行利润留成办法的企业，由生产发展基金解决，不能列入企业管理费。②为进行科学研究必须购置的仪器、设备和相应土建工程支出，在企业更新改造资金和生产发展基金中解决。资金不足的可以按规定向银行申请技措借款，用以后提取的更新改造资金、生产发展基金归还。③企业支付的技术转让费（包括从外国引进和国内转让的），属于协议商定一次支付费的，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如费用较大可采用待摊办法处理）；协议商定的按销售量或利润一定比例分成的，从该项产品利润中支付。

信贷 货币持有者将货币暂时贷出，借款人须在一定时期后还本付息的信用活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信贷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高利贷体现高利贷者与奴隶主或封建主共同剥削奴隶或农民的生产关系，以及高利贷者对小生产者的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信贷是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体现借贷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瓜分剩余价值、共同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信贷则是我国有计划地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的一种形式，体现国家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

信用 商品买卖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的借贷。一般说来，它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特殊运动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90页）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条件下，这种借贷行为表现为以偿还为条件的货币或商品的让渡形式，即债权人用这种形式贷出货币或赊销（即延期付款商品），债务人则按约定日期偿还借款或贷款，并支付利息。

信用是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在原始社会解体时就已产生了高利贷信用。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着信用范畴。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信用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高利贷是信用的基本形式。在高利贷资本的重利盘剥之下，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下去，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高利贷瓦解着自然经济，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准备了某些前提条件：一方面通过高利贷而积蓄的大量货币财富，成了资本积累的来源之一；另一面，受高利贷剥削的小生产者大批破产，又促进了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信用是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拥有货币的借贷资本家把闲置的资本，通过信用形式，转让给职能资本家使用。职能资本家除按期归还借款以外，还必须把剥削到的剩余价值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分给借贷资本家。资本主义信用主要分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两类。此外还有国家信用、消费信用及高利贷信用等。资本主义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利润率的平均化，加速了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加速了资本的积聚、集中和

垄断，使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助长了企业经营中的投机活动，加速了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盲目扩张，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更加尖锐，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具有广泛性。

社会主义信用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汇集和支配货币资金的一种形式，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经济杠杆之一。社会主义信用的基本形式是银行信用，此外还有国家信用，商业信用。社会主义信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起重要的作用：（1）有计划的调剂和筹集闲散资金，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2）以银行信用为主体的信用体系，有利于有计划调节货币流通，使货币流通总量与结构和物资供应总量与结构相适应，有利于实现供求平衡和物价稳定。（3）将国家财政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通过信用形式，变无偿为有偿占用，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信贷资金　银行用以发放贷款的货币资金。信贷资金来源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的存款和城乡居民的储蓄，国家财政历年拨给银行的信贷基金和银行本身的部分利息结益。就中央银行而言，因它同时又是发行货币的银行，货币发行也是信贷资金的来源之一。信贷资金的运用，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发放贷款，以满足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信贷资金运用的规模、方向，调节着社会生产的比例和结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不同，以有偿性为其基本特征。银行的各项存款是银行对社会大众的负债，这就决定了它的使用必须是有偿的。因此，信贷资金不能用于弥补企业亏损、上交尚未实现的利润和税金；也不能垫交被挪用的利润和税金、专用基金超支或其他财政性开支。信贷资金与生产、商品流通具有内在的联系。信贷资金决定于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和企业资金流转速度的状况：企业货币收入增加，财政收支额扩大，居民收入提高，引起银行各项存款增加；市场货币需要量增加，引起银行货币发行增加。它们都使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增加。随着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对各项贷款的需要也增加，而增加的贷款反过来又用于支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转的扩大。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信贷资金运动的重要特点。

信贷差额　信贷资金运用大于信贷资金来源所形成的负差。信贷收支差额与货币发行有密切的联系。银行贷款额大于存款和自有资金之和的差额，就是货币发行额。因此，信贷差额可以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用贷款额与存款和自有资金之和相比，前者大于后者的差额即为信贷差额，这时把必要的货币发行作为一个平衡项目；另一种是把必要的货币发行作为信贷资金来源，贷款大于存款和自有资金以及必要货币发行之和的差额，即为信贷差额。我们可以看到，前者的信贷差额属正常的差额，它对经济发展不会产生消极影响，而后者差额是不正常的，应该发行的货币已经发行了，仍然有差额再靠净发行货币来弥补，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了实现信贷收支平衡，消除后者的差额，必须加强信贷管理，财政管理和货币流通的管理，实现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综合平衡。

信贷平衡　指银行信贷资金的运用与信贷资金来源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具体内容包括：（1）信贷资金来源和运用之间数量的平衡；（2）信贷资金来源和运用与物资构成之间的平衡；（3）通过信贷动员的资金和运用在时间上的平衡。信贷平衡是国民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平衡工作，积极保持信贷平衡，对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信贷收支是否平衡与财政收支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财政性存款是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财政收支不平衡，差额过大单靠发行公债不能弥补的情况下，会直接挤信贷，向银行透支，会导致信贷收支的不平衡。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资的运动只有借助于货币才能实现。银行的存款与放款都代表着相应的物资。信贷支大于收，就会引起货币投放，如果没有物资保证，增加的这部分货币支出，就会打乱物资的平衡，甚至会诱发通货膨胀；信贷支小于收，就会回笼货币，货币资金不能满足企业生产发展的正常需要，同样会妨碍物资平衡的实现。

信贷杠杆　银行用来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经济手段。银行通过贷与不贷、贷多贷少、时间长短，利率高低等办法，对生产和流通施加影响，进而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在我国，这种调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微观调节，通过贷款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和差别利率，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促进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并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生产和经营；（2）宏观调节，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通过贷款在不同部门、行业和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和差别利率，扶植新兴产业的发展，压缩长线产品或供大于求的产品的生产。信贷杠杆的宏观调节作用还表现在总量的调节上，当社会总供需出现矛盾时，可以提高存款利率吸收储蓄压缩消费，同时降低一部分贷款利率以支持生产的发展扩大供给。当然这种升降要以

银行的经营承受能力为限。

信用货币 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信用证券。包括期票和汇票、银行券、支票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由于金银开采掘跟不上商品生产和流通发展的需要，以及商业信用的产生，就逐渐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信用货币，以代替金属货币，实现商品交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流通中对金银需要日益增加的矛盾。此外，由于货币分布经常出现不平衡，需要商品的人不一定有现金，出售商品的人不一定都要求现金，交易就受阻，妨碍再生产的进行，这是代替货币的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等信用货币存在和产生的原因。信用货币的产生，使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流通中金银铸币的束缚，从而在大宗交易领域里采用信用货币，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节约了金银铸币的流通费用。信用货币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本来包含着的引起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增大了。因为联结商品买卖双方的货币同商品自身的交换相分离了。一旦从事商品交易中有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导致生产中断，以致企业破产。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着信用货币，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调节信用货币的流通范围、规模和方向，使其为促进商品流通服务。

信用经济 商品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指信用成为经济组织之间，国家与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联结方式的经济形式。在商品货币经济中，商品所有者通过债权债务关系的建立和消除来实现商品交换。这种交易方式仍然要利用货币的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所以信用经济必须以货币的存在为基础。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并以银行信用的充分发展为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信用活动频繁，这种交易方式在国民经济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信用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信用经济依然存在。但信用经济本身并不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只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较高阶段的特征。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如德国的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B·希尔德布兰德以交易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时期标志，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自然经济阶段是物物交换，货币经济阶段是以货币为媒介来进行交换，信用经济阶段是以信用为手段来完成交换。这种划分方式是错误的。因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都产生于商品经济，这二者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不能与自然经济对立；划分经济时期或社会形态，不应当以交易方式，而应以生产方式或人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

信用制度 有关信用和信用事业的各种规定、准则的总称。包括信用形式的确认、信用工具的采纳，信用活动的组织，信用法规的建立，信用机构的设置等内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信用制度取决于并服务于借贷资本运动，信用形式主要是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其中商业信用是资本主义信用的基础。由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产生的汇票、期票、支票、本票等信用工具，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作为货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加剧资本主义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信用是国家分配资金并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工具。银行信用在社会主义信用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国家信用，商业信用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社会主义信用制度将适应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向着多样化、管理横向化方向发展，其目的在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商品经济对信用形式和信用方式多样化的要求。

信用紧缩 信用扩张的对称，其基本含义是收缩信贷供给量，也即收缩货币供应量。资本主义国家收缩信用的主要措施是通过中央银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再贴现率和抛售有价证券。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其所吸收的存款按一定比率缴存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会扩大商业银行所吸收的存款中用作存款准备金部分，从而相应缩小了商业银行用于贷款的部分。中央银行还可以提高再贴现率，使商业银行以较高“价格”从中央银行获得贷款，以迫使商业银行缩减其对客户的贷款。在中央银行抛售有价证券时，就能使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从而迫使商业银行收缩工商企业的信用。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信用紧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和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着信用紧缩的现象。当信用和货币流通量超过了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量时，就需要紧缩信用，回笼货币，或直接控制着货币发行量和各专业银行的信贷额度，以稳定物价，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信用膨胀 由于信用扩张所提供的通货供应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的通货需要量，造成通货膨胀的经济现象。在近现代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大量的商品交

易中，所谓通货，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各种票据。其中主要部分并不是现金，所有这些作为支付手段，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的通货都是通过信用渠道投放到市场上去，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因此，过度的信用扩张，必然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导致通货膨胀。信用膨胀通常指银行信用膨胀，而商业信用膨胀、消费信用膨胀或国家信用膨胀，最终都要表现为银行信用的膨胀。就银行本身的作用机制而言，它所以有可能过多地发放贷款，形成信用膨胀，主要是靠派生存款的增长来自动平衡信贷收支；发行银行即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取得信贷收支平衡。而国家信用、商业信用等往往使银行信用膨胀更加剧烈。资本主义滥发国债，在社会一般公众购买不能满足国家推销要求时，往往由中央银行直接承购，国家直接要求中央银行提供信用。信用膨胀在本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导致信用膨胀的一个重要根源。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信用膨胀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计划工作失误，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为弥补大量财政赤字所导致的。为了避免信用膨胀，必须注意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综合平衡，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减少决策失误。

信用政策　指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为了对社会货币资本的运动进行宏观控制和管理而实施的调节措施。其目的在于保持货币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信用政策实施的方式分作两种：(1) 一般的或量的控制和管理；(2) 选择的或质的控制和管理，即对某种信用的方向和用途进行干预，其干预着重于结构性的而不是全面的。信用政策的特点是间接地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到利息率，然后通过利率的升降来增加或减少投资，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一致，保持货币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信用政策工具主要有三个，即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其具体运用参见“货币政策工具”词条。

信用机构　从事资金融通活动主体的总称，包括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如保险公司、信托机构、信用社、某些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储蓄协会、房屋贷款协会，基金会等等。信用机构还可根据其主体性质以及经营活动目的划分为政府信用机构和民间信用机构。在我国，各级专业银行事实上既是政府的信用机构，也是具有企业经营性的机构。只有在少数地区存在着某些民间性的银行信用机构。这些不同种类的信用机构共同构成了金融体系的一环，起着融通资金的作用。

信用风险　资金借贷过程中或商业赊销过程中债权人可能遭受违约偿还以及其他损失的可能性。只要有资金的借贷和商业的赊销，就会存在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同报酬通常是正方向变动，即信用风险越大，所得报酬也越高，所谓高风险高收益就是这个意思。但风险越大，遭受损失程度也越大，债权人通常在风险与报酬、以及与资金安全性、流动性之间进行权衡。为了避免过大的风险，一般通过财产（物质资产、有价证券等）抵押和社会保险来实现。信用风险一般分为国内的银行信用风险、商业信用风险，以及对国外的信贷风险等。一国在对外的借贷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通常都存在因汇率变动而承担的风险。如一国向外借款，如果借款所用的货币升值，那么将来偿还就需要更多的外汇，同样，如果借款货币贬值，原债权人也会承担汇率下降的损失。所以在对外借款中，借款人通常尽量减少债务的集中程度，而要考虑借款的币种结构，以便在将来汇率变动时，分散风险。

信用结构　各种信用工具或金融资产的比例构成，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现状、特征和相对规模构成一个国家的信用结构特征。在典型的商品经济中，信用结构因时因地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信用结构。第一种信用结构：它存在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和美洲。其特征是：信用工具相对于国民财富规模很小，其中债券压倒股票占支配地位，金融机构在全部流通的金融资产中份额较低，而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处于实际地位，这些都是金融发展初级阶段的特征。这时纸币补充并逐渐取代了金属货币、生产和分配由占主导地位的小型企业和家庭业所引导。第二种信用结构：它普遍流行于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具体形式取决于各国的历史。这一类型与第一种类型的相似之处在于：金融资产规模较小，债券规模远超过股票规模，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处于支配地位。与第一种类型的区别是：(1) 政府和政府金融机构发挥较大作用、反映了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混和特征。(2) 在某些情形中存在拥有大型股份企业的部门。(3) 在资金融通中，银行发挥较大作用。但国内储蓄和投资规模较小。第三种信用结构：自 20 世纪初以来广泛流行于发达工业国家。其特征是：(1) 金融资产规模较大。(2) 股票规模扩大，金融机构占全部金融资产份额较高、金融机构趋于多样化。这导致银行系统份额下降以及储蓄机构和各种保险组织地位相对上升。衡量信用结构的标准主要有：金融资产总额与实物资产总额的关系；各种金融资产和负债在金融工具总量中的结构分布；金融工

具在金融机构中非金融经济单位中的分布等。

信用证结算 异地转帐结算的一种。购货单位开户银行为保证在交易合同所规定的范围内代付货款，向销货单位开户银行签发信用凭证，据以办理货款的结算。在签发信用证以前，购货单位主动把款项预先交存银行，委托银行开出信用证，通知异地销货单位开户银行转知销货单位，销货单位按照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条件发货（或购货单位将商品自提自运），并委托银行办理货款结算，销货单位开户银行代购货单位付清货款后，通知购货单位开户银行转知购货单位。这种结算方式适用于订有合同的商品购销和劳务供应等款项的结算。开出的每份信用证只能对一个收款单位，在信用证的有效期不得变换收款单位。开出信用证的金额起点，每份为100元，每次结付款项的金额起点为30元。信用证的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60天，信用证的结算只能转帐，不能提取现金。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能保证销货单位在按照合同和信用证付款条件发货后立即取得货款，不会发生拒付、延付和拖欠货款的情况，对于履行合同有着积极作用。

信用保证制度 授信人为了减少和避免信用风险，确保信用清偿或在信用不能清偿时取得补偿而采取的防护措施所形成的条例和规定。信用制度有：信用分析与管理制度、授信限制制度、违约补偿制度三类。(1) 信用分析与管理的内容包括受信人的信用状况和授信前的调查分析。中国目前采用的是信用评估制度，其作用在于评价信用可能面临风险及其变化，以及所授信用是否按照授信条件使用，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信用评级是由权威机构对受信人的资金信用、经济效益、经营管理能力、企业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其信用等级，作为授信依据。授信时据此区别对待，扶优限劣。(2) 信用限制，指授信人为减少信用风险，对授信种类、数量等实行限制。为了分散风险，授信人常确定单个授信最多不得超过自有资金的一定比例。中国对国营大中型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采取不同的贷款政策，采取保重点，分类排队，择优扶持的贷款办法，通过信贷收放贯彻产业政策，引导资金投向。(3) 违约补偿制度是指受信人因某种原因不能或不愿清偿债务时，授信人借助于一定的追索手段取得补偿的措施和办法。违约补偿是信用保证的最后防线。最常见的补偿制度有抵押、担保和信用保险。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 国家对各级银行使用信贷资金权限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它规定了各级银行系统在信贷资金管理上的职权范围。我国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几经变化。1950年制定《中国人民银行业务及计划编制办法草案》后，开始了信贷资金的计划管理。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实行中央工业和中央商业由主管部门和银行分口管理、分级负责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1958年至1959年实行全额信贷和差额管理的办法。这时，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一律由银行供应和管理；对企业资金需要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银行系统内下放放款审批权限。结果扩大了信贷差额，增加了货币投放。1963年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和分口分级负责相结合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是：一切存款上交总行，一切贷款指标由总行分指标，层层落实。总行下达的贷款指标，各级银行不得突破，而存款指标要争取超额完成。这种统收统支的信贷体制一直延续到1978年。1979年我国经济体制开始了改革，银行信贷管理体制也由过去的统收统支逐步改为“差额控制”的信贷管理体制。所谓差额控制就是核定各级贷款银行的存贷差额，多存可以多贷，对于核定的贷款大于存款差额由总行负责，对于超过核定的差额，由各级贷款银行负责，一般不得突破贷差。这项管理体制对于调动银行组织存款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85年开始，适应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全面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收支、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信贷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专业银行按计划向中央银行贷款，并先存后贷，同时鼓励专业银行互相拆借，调剂资金余缺。从过去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来看，直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没有突破指令性的计划信贷体制，中央银行仍然没能有效行使储备金、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各个专业银行仍然没能成为企业化经营的银行，这种体制仍然不能很好地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方向是在保持信贷的计划性控制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储备金、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专业银行应逐步向企业化经营过渡，做到计划调节和经济操作手段调节相结合。

保值储蓄 储蓄的一种方式，提存款到期时，银行支付本息相加后的购买力等于存入时的购买力，即保证存款人不因存款期间的物价上涨而受损。

中国曾在50年代治理通货膨胀时期办理过居民折实储蓄和保本保值储蓄业务，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的消除，此类储蓄就自然取消了。1988年夏季，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出现了全国性的提款抢购风潮，为了稳定市场和金融，中国人民银行从1988年9月起，在全国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业务。由专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具体办理。保值范围是城乡居民

3年（含3年）以上的定期储蓄存款。企事业等单位的存款不予保值。定期存款包括整存整取、存本取息、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定活两便储蓄存款，有奖储蓄等不予保值。

保值储蓄的关键在于选择物价指数。我国目前保值储蓄采用的物价指数具有两个特征：①采用专供计算保值储蓄用的“社会商品零售和服务项目价格总指数”。这一总指数比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总指数包括的范围要广，兼顾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特点。②采用月物价指数，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是以年为周期的，通过将12个月的物价指数相加再除以12求得。由于保值贴补率要在每月到来之前公布，而当月价格指数还没有出来，故只能使用上一个月的价格指数计算贴补率。同时，基数价格指数也相应地向前推两个月。

月保值贴补率的计算公式为：

某月贴补率(年率)＝

$$\frac{\left[\frac{\text{存款到期前两个月的物价指数}}{\text{存款存入时前两个月的物价指数}}-1\right]-[\text{年利率}\times\text{存期}]}{\text{存期}}\times 100\%$$

由于每年存款到期日不同，享受保值贴补天数也就不一样，所以还要将年贴补率折算成日贴补率。

百元存款日贴补率＝年贴补率÷360

应付储户保值贴补金额＝存款金额×百元存款日贴补率×存款天数

保值贴补率随物价浮动，若物价指数下降到按银行规定的3年、5年、8年定期存款利率以下时，仍按原规定的储蓄利率计息。参加保值储蓄的储户如提前取款，则不予保值贴补，按实存期限利率计息。到期不办理转存手续的存款，存款到期后保值贴补自动停止，但仍按规定利率计息，直至提取存款或办理转存日止。

保有货币的潜在收益　货币持有者由于其具有随时可以购物的便利性，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即当选购其他资产可能遭受收益损失时，所能从这种相对的资产收益关系变动中获取的潜在收益。货币保有者的潜在收益主要来源于其随时可用于购买的便利性，这种便利优势是其他资产形式所不具备的。只要这种便利优势能在资产选择行为中很好得到发挥，在其他资产的自身价格及相对价格发生较大变动时，货币持有者就能获取潜在的收益。

退税　税务机关由于某种原因或特殊情况，依据税法规定把已经征收入库的税款按规定的程度和程序退给原纳税人。退税原因很多，通常有：多征误征的税款；按规定提取的地方附加；按规定提取代征手续费；财政部专案批准的退税。退税应由纳税人，或交税单位，于交税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并经县级以上税务局长审查批准后，按照《中央金库条例施行细则》中规定的有关退库规定办理。10元以下的小额退税，由税务所长批准，在自收税款内退还。

退库　是指将已入库的预算收入退还原缴款单位或缴款人。退库属于减少国库收入，需要严肃对待。退库应按预算收入的级次分别办理。除个别特殊情况（如退还个人缴款）可以支付现金外，退库一般应通过银行转帐。国库经收处不办理退库。按我国制度规定，属于下列情况，可以办理退库：①企业按计划上缴税利，超过应缴数需要退库的；②改变企业隶属关系办理财务结算需要退库的；③由于工作疏忽，发生技术性差错需要退库的；④财务部明文规定或专项批准的其他退库项目。凡是不符合规定的收入退库，各级财政机关，税务机关，不得办理审批手续，各级国库对不符合规定的退库有权拒绝办理。

统收统支　亦称“满收满支”、“收支两条线”，是一种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它是把国家收入和支出的支配权集中在中央。统收统支的内容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国家预算管理中，央央集中掌握预算管理权，地方的一切收入全部上交中央，一切支出均由财政部统一拨付，地方的收入和支出之间基本上不发生联系。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发的《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中，就曾采用这种财政管理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使财政收支脱离了地方的经济利益；削弱了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随着当时经济情况的逐渐好转，这种管理体制的缺点逐渐显露了出来，所以从1951年起，逐步改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办法，但直到1979年之前，财政管理体制虽然多次发生变动，却基本上未能突破统收统支的原则，只是逐渐缩小它的范围。在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关系方面，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表现为：企业的利润原则上全部上缴财政，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增加流动资金由财政拨付，企业的亏损由财政予以补贴。从建国起直到1979年以前，除1958—1961年以外，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体制的。它导致管理过分集中，企业的经营成果同企业的责、权、利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分配上吃“大锅饭”，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核算，不利于经济效益

的提高，因而从1979年起，中国对这种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

结构调整贷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种类之一。基金组织于1986年3月设立的一种贷款，旨在帮助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克服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发生的国际收支困难。这种贷款的资金来源于基金组织以前发放的信托基金贷款的偿付额，共有27亿特别提款权。规定在1986—1991年使用。申请该项贷款的条件是：（1）会员国政府已准备实施经济调整计划来解决国际收支困难。（2）要由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协助会员国政府制订实施调整计划。这种贷款的最高额度为份额的47%，分3年提供，以特别提款权计算。但以美元发放和归还。期限为10年，宽限期为5年，第5年后每半年偿还一次本金。

结算资金 社会主义企业由于销售商品、供应劳务和其他原因发生的应收而尚未收到的资金。它是流动资金的组成部分。包括发出商品后，委托银行收款而尚未收到的款项，其他往来结算代垫款项等。严格遵守结算纪律、及时检查货款结算、做好在途资金及各项往来悬帐的催收清理工作，可以减少结算过程中的资金占用。

十　画

浮动利率 以统一的基本利率为基准在一定幅度范围内上下浮动的利率。利率浮动高于基本利率而低于最高浮动幅度，叫利率上浮；低于基本利率而高于最低浮动界限，叫利率下浮。在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利率就是风险最小、流动性最大的放款利率。各银行根据其具体情况在最高和最低浮动范围内选择贷款利率。由于各银行具体情况不一样，其利率的浮动幅度不尽相同，有的浮动幅度大，有的浮动幅度小。我国从1987年1月开始，实行浮动利率，各专业银行可根据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自己的具体情况，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基础上向上浮动，浮动幅度不能超过20%。实行浮动利率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利率这一经济杠杆的作用，使之能够灵活有效地调节资金供求关系；同时使银行便于区分正常的资金需要和不正常的资金占用，把利率的杠杆作用与择优扶植原则结合起来，以合理调节资金投向，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

通货比率 公众所持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比率。设公众所持有的现金数量为C，在商业银行中的活期存款数额为DD，则通货比率为：

$$K=\frac{C}{DD}$$

影响通货比率K的大小的主要因素有：①交易成本和便利程度。由于进行交易，特别是通过银行开支票，转帐等需按一定程序进行，交纳一定费用，花费一定时间，即交易是要花费一定成本的。如果通过银行开支票、转帐等手续进行交易所花的成本大，则公众就愿意多持有现金以用于交易，而不愿意存活期存款用于交易，则K就大；反之，如果通过银行开支票，转帐等手续进行交易所花的成本小，甚至微乎其微，则公众还是愿意用活期存款进行交易，则K就小。②交易隐蔽性程度。由于交易需要交纳各种税款和费用，有的交易还为法律、法规所不容，通过银行开支票，转帐等手续用活期存款于交易，容易将交易性质，交易种类、交易数量金额等暴露于有关机构，被有关机关发现和监督，被迫交纳各种费用和税款，甚至受限制查处。因而当交易隐蔽性大时，公众愿意多持现金用于交易，以便可以逃避交纳各种税款和费用，甚至进行不法交易。这样，通货比率K就大；反之，则小。③流动性和安全偏好。使用现金从来不用证明身份，具有最充分的流动性。在出现金融恐慌或危机时，存款货币，不管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总有一种随某些银行倒闭而遭受损失的危险，因而持有现金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人们都较倾向于持有现金。而且人们持有现金的多少，与人们对现金"偏好"也有关。所以流动性与安全性偏好是影响K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货比率是货币乘数、货币供给总量分析中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变量。一般在基础货币量为一定的条件下，通货比率越高，货币扩张乘数越小；反之，通货比率越低，货币扩张乘数越大。

通货膨胀效应 指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收入分配效应。由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来源特性极不相同，因此，在物价水平上涨时，有些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会下降，另一些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反而会提高，这种由物价上涨造

成的收入再分配，就是通货膨胀的收入效应。(2)财富分配效应。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往往是，有的家庭的货币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物价上涨速度，但其财产价值的增长速度却落后于物价上涨速度甚至出现下降；而另一些家庭的货币收入增长速度慢于物价上涨速度，但财产价值增长速度却高于物价上涨速度。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一个家庭的财产价值的增减取决于：①它的资产如何划分为可变价格资产和要求按固定金额偿还的资产。②它的要求按固定金额偿还的资产额与它全部要求按固定金额偿还的债务额两者的比较。各个家庭的财产与负债结构、数量不同，通货膨胀就会对其产生不同的财富效应。③产量和就业效应。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实际产量和产业水准明显低于潜在产量和充分就业水平的条件下，慢性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如果未被预期到，就能对产量和就业起到刺激增长的作用。因为在非预期性通货膨胀发生时，物价的上涨快于工资率的上升，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为企业雇主提供了增雇工人、扩张产量、获取利润的动力。有的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也有许多人虽对此进行了肯定，但同时附加了若干约束条件。不过大家都一致认为，急剧的通货膨胀会引起消费者的大量购买和囤积行为，企业也会出现努力增加存货、大量购买机器设备、追求借款的现象，最终将由经济过热引向强制调整、产量下降和经济减速。

通货膨胀的度量　通货膨胀程度的计量。目前世界各国度量通货膨胀的标准主要有三个：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批数；国内生产总值减缩指数。(一)消费物价指数。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用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程度，该指数的变动直接与公众的生活费用支出有关。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发达工业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采用的固定加权算术平均公式，即用各种商品单项物价指数，乘上各种商品在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然后综合平均求得总指数。二是苏联、罗马尼亚等国采用的总值法。即计算期的商品销售总额和以报告期的商品销售量按基期价格计算的销售总额的对比。我国现行广泛使用的消费物价指数指标有两种：一是零售物价总指数；二是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零售物价总指数采用算术加权平均公式计算，每年根据住户调查资料调整一次权数。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自1957年以后根据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与服务项目价格指数汇编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二)批发物价指数。这是商品进入零售形成零售价格之前，由批发企业或中间商所订的价格的指数。在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中，批发价格的确定要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批发价一般介于收购价和零售价之间，它的水平主要决定于出厂价格或收购价格，对零售价格有决定性的影响。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批发物价指数比消费物价指数有更广泛的物价变动代表性。(三)国内生产总值减缩指数。与前两种指数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减缩指数是一个有更广泛代表性的物价指标。其计算步骤是，用计算期购买时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除以按不变购买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目前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即以这一指标度量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　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可能由一国影响另一国或由世界市场影响某个国家。北欧学派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货膨胀国际传递机制的假说。现代货币主义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一种通货膨胀国际传递机制分析。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根据货币数量理论，世界的货币供应量等于各国货币供应量的总和，因此，如果别的国家货币供应量不变，一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这个世界货币供应量的假定导致三个值得注意的结论：(1)在固定汇率、充分就业、一体化的商品劳务市场的假定之下，个别国家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将引起世界货币存量的增长，而后者意味着较高的世界物价水平将出现。(2)货币供应量的均衡分配是内部原因所决定的，它与各国由货币收入周转率的倒数所衡量的实际收入保持比例。(3)世界货币存量的一定增长对于世界物价水平的效应，不依赖于世界货币存量的增长究竟起源于哪一个国家。不过，西方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限于上述两种理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73年发表的《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一文中，就对在既定的固定汇率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的渠道进行了分析：(1)价格效应。是指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变动及其相互影响而在国际间的传递。从价格效应的角度看，各国的通货膨胀率有趋于一致的可能。但在现实中各国贸易结构和国内经济发展的特殊状况，阻碍了各国通货膨胀通过价格效应趋于一致的过程。(2)需求效应。是指由于一国的过度需求的出现而使其他国家受到影响，从而形成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3)流动效应。是指一国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动影响货币供应量，结果又对货币收入产生影响。在一个封闭经济体系中，过度货币供给形成的膨胀性需求，只可能被本国的价格水平提高所消除；在开放经济体系中，在固定汇率条件下，就会通过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动来消除一国的过度需求或过度货币供应。这种流动效应起作用的结果，也就相应在国际间传递了通货膨胀。(4)国际通货膨胀预期和“示范”效应。是指通过人们心理上的反应而使通

货膨胀在国际间传递。一般情况下，当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时，人们会预测国内市场价格也会发生相应变动。这种心理上的反应会导致一些促使国内原来经济条件发生改变的微观行为，这就有可能造成价格波动。以上四种效应都是以固定汇率为假定条件的。如果在改变为浮动汇率的条件下，过度需求的国际传递会受到限制。

资金 指垫支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断运动并发生增殖的价值。资金按其运动的范围，具体表现为个别资金和社会资金。资金按其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转移方式，又分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社会主义资金与资本主义资本有本质的区别。资本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物质手段，体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主义资金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自己的财产，是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手段，体现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结成的新型经济关系。资金是运动着的价值，它要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发生增殖。社会主义资金运动的形式是资金的循环和周转。资金循环一般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相应采取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三种形态。企业资金只有按比例分配于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三种职能形态上，使三种职能形态在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才能保持资金运动的连续性；否则必然发生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中断。资金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就是资金的周转。社会主义资金运动具有垫支性、周转性、补偿性和增殖性的特征。再生产过程总是以垫支一定量的货币资金开始，经过不断的循环与周转，垫付的资金不仅得到补偿，而且得到增殖。资金在循环和周转运动中得到补偿和增殖，是由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创造出使用价值，同时也创造出新的价值。管好用好资金、加快资金的循环和周转，最大限度地节约资金的占用和消耗，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金流量 亦称“货币流量”。指运转于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社会资金。货币流量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M·柯普兰1952年在其所著《美国货币流量之研究》一书中首先提出，后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自1955年开始，每季发表美国的资金流量帐户，随后，许多国家的金融当局也效法采用资金流量分析这一新型会计制度。资金流量分析，是将整个经济划分成若干部门，以便明确了解整个社会资金的脉络。资金流量分析是在国民所得分析存在着难以表明实物与货币的关系、不易了解金融变动对国民经济产生哪些影响等缺陷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较国民所得分析更全面，更有利于考察国民经济各领域之间财务关系的全貌。资金流量分析方法对于分析各种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转情况的影响有很大的作用。

资金调拨 指各单位之间不直接伴有商品交易和劳务供应而单方面进行的资金转移。资金调拨主要发生在下列两种情况：①各级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之间的预算收支缴拨。一般的程序是，由财政部门根据主管部门的申请，按计划分月拨给主管部门，再由主管部门按照隶属关系层层下拨至基层用款单位。划拨的资金在实行预算包干的单位，其年终结余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未实行预算包干的单位，其年终结余要如数上缴财政。②各级主管部门与所属单位之间的各种款项征集和拨付等。资金调拨不同于再生产过程中资金的循环运动。资金调拨只是单方面的资金转移，而没有实物运动相伴随，属于资金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资金调拨有临时性的资金调拨、定期资金调拨和不定期资金调拨三种。临时性的资金调拨主要解决临时性的资金需要；定期和不定期资金调拨主要发生在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之间。合理的资金调拨对于资金的合理分配与调节，保证资金循环运动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金平衡关系 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两者在总额上处于相等、依存的关系。从一个企业或单位的资金来说，有多少资金占用，必有其相应的资金来源，反之，有多少资金来源，也必有其相应的资金占用。没有无资金来源的资金占用，也没有无资金占用的资金来源，两者反映了同一资金的两个侧面，而且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此，两者的总数，在任何时期永远是保持相等的。资金运动的量变有四种情况：①一种资金来源增加，一种资金占用增加，数额相等；②一种资金来源减少，一种资金占用减少，数额相等；③一种资金来源增加，另一种资金来源减少，数额相等；④一种资金占用增加，另一种资金占用减少，数额相等。不论资金如何运动，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在数额上总是相等的。因此，它是各类会计处理帐务，登记帐簿的理论基础。资金平衡表的结构，就体现着这种关系。

资金体外循环 不经过财政、金融系统而进行的社会资金的筹集、分配和流通。资金体外循环主要表现在，非现金流通减少，大批现金交易增加，且流通中过多的现金不能回流银行；社会闲散资金的融通不通过银行媒介而直接融通，以现金为财富的象征保存价值等。资金体外循环是金融领域的不正常现象，它

违背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当代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并且以银行信用为主，在资金借贷和货币流通方面表现为以银行信用为核心。资金体外循环导致现金流通大量代替和排挤了非现金流通，软化了银行、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资金体外循环的原因有通货膨胀、现金管理松弛、银行信用关系僵硬、贷款结算阻滞等，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过程中，各项改革措施不配套，没有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建立健全必要的管理规章制度，由此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经济行为短期化。另外，僵化的银行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把一部分资金流通排除在本系统外。解决资金体外循环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正常的经济运行机制。

资金流量统计　亦称"金融流量统计"。运用复式记帐原理，对社会各经济部门的资金来源和运用进行记录，从而对全社会融资活动所进行的统计、分析和预测。资金流量统计通过编制资金流量表进行。资金流量表记录的是一定时期内社会各经济部门之间金融交易的总量。资金流量表主栏为机构部门划分。通常将国内金融交易者划为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非盈利机构、居民户等5个部门。资金流量表的宾栏结构为金融资产名称，通常按照其流动性不同将各类金融资产分大类列出。资金流量表的表式有不同的列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既包括实物交易又包括金融交易，另一种只包括金融交易。实物交易部分实际是国民收入帐户的分部门列示。无论是否包括实物交易，其实物交易的结果都是资金流量表必不可少的内容。非金融交易差额构成实物交易向金融交易过渡的桥梁。资金流量统计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本世纪40年代由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统计学家威斯利·密契尔提出。1955美国联邦储备局开始按季公布美国的资金流量帐户。之后，其他各国中央银行或金融当局也纷纷效仿这一新型的会计制度。1968年联合国修订SNA时，把资金流量表纳入到统一的核算体系之中。资金流量统计对于分析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总的运转情况的影响很有意义。它对于我们了解国民收入生产与分配，储蓄与投资形成，政府、企业、居民户收支，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各种金融工具状况，以及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平衡状况的原因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分析工具。

资金流量统计分析　对记录全社会金融交易状况的资金流量表进行的分析。资金流量表记录了企业、家庭、财政（政府）、团体（为居民服务的非盈利机构）、金融等部门的融资活动，还记录了一国与国外的融资活动。扩展的资金流量表还包括实物交易部分，这样的资金流量表，不但给了我们完整的金融信息，也给了完整的国民收入生产和分配信息。宏观经济活动的中心问题是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与此相联系，衍生出消费、投资、就业、价格水平、财政、货币、国际收支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资金流量表将这些宏观变量汇集起来，以严密的矩阵表形式展现它们之间的客观关系。因此，资金流量表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通过资金流量表的分析，(1) 可以掌握国民收入的状况包括它的总量和构成，这在该表的实物交易部分一目了然。(2) 可以了解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与积累比例，从而为消费和积累政策调整提供依据。(3) 可以了解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原因或掌握总需求与总供给调整情况。(4) 可以看到国民经济金融深化程度和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程度。(5) 可以掌握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工具所占比重的变化，从而为调节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结构提供依据。(6) 可以掌握各部门融资规模和整个社会融资方式，进而掌握各部门的融资方式和途径，对于整个社会的信用调节十分重要。(7) 可以观察全社会融资构成变化情况，从而确切掌握银行融资在整个社会信用中的地位。

资金流量统计的部门分类　资金流量统计是对经济各部门金融交易的记录。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是针对不同的经济主体的不同经济行为特征而采取的，因此，对资金流量的掌握，只按不同的经济行为划分为几大部门。在国民经济帐户核算体系（SNA）中，对于经济交易者有两种分类：（一）生产活动部门分类。这种分类与货物和服务的流量相联系，以能够作出生产决策的生产单位为分类对象。它将社会各生产活动部门划分为4类：(1) 产业部门。包括所有生产商品的基层单位或类似单位，如农业、狩猎业、林业和渔业；采矿和采石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供水；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饮食和旅馆业；运输、仓储和通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性服务；政府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服务等。(2) 政府服务生产者。包括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有组织、所属各部门和各基层单位。这些组织、部门和单位由国家预算提供资金，从事行政、立法、国防、保健、教育、社会服务，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工作。(3) 为居民服务的私人非营利机构。包括所有免费或廉价为居民提供诸如教育、医疗和福利、宗教、文化、娱乐以及其他社会设施等方面服务的私人组织。其经费来源靠捐赠和收费。(4) 居民户。指家庭部门，其生产活动指一个居民以女仆、厨师、园丁等身份提供的

服务。这种生产活动部门分类适用于生产，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帐户。（二）机构部门分类。这种分类与金融流量相联系，以能够作出财务决策的单位为分类对象。将各财务决策部门划分为5类：（1）非金融法人和准法人企业。指从事金融和保险业务以外的生产活动的法人和准法人企业。如公司、股份公司、合作团体、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等。（2）金融机构。如货币当局、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一些基础组织等。（3）广义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组织、所属部门和基层单位，还包括不作为准法人的政府企业。（4）为居民服务的私人非营利机构。（5）居民户。指取得收入和支配收入的私人居民户和生活在一起的集体户。机构部门分类，适用于收入和支出帐户及资本筹集帐户。在SNA体系中，资金流量帐户属资本筹集帐户的次级帐户，资金流量表的部门分类采用机构部门分类法。

资金流量统计的金融交易分类 资金流量统计是对经济体系中各部门之间金融交易的记录。它反映整个社会金融交易状况。金融交易是以金融工具为对象的交易。资金流量统计的金融交易分类，实际是指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它既是金融债权的分类，也是对金融债务的分类。西方金融债权形式主要有：黄金、通货和可转移存款、其他存款、短期票据和债券、长期债券、公司产权证券、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居民在人寿保险金和养老金方面的净产权、商业信用和预付（收）贷款等。中国的金融工具形式比较简单。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经济体制改革前办有存款、贷款，改革后逐渐发展了债券、股票、商业票据、保险等形式。目前中国金融工具的主要形式有：流通中货币、企事业机关团体活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企事业等单位定期存款，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财政存款、借款、国库券、债券、外币存款、贷款，金银、外汇储备，商业信用及预付（收）款等。金融工具形式多样，在各国不尽相同。它一般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表现。

资金流量统计的理论基础 资金流量统计是对一定时期内各部门金融交易的综合记录。作为资金流量统计对象的金融交易，是以储蓄与投资的存在为前提的。理解资金流量统计的理论基础，必须了解储蓄与投资。储蓄是推迟的消费行为。宏观经济学对储蓄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减消费后的剩余。投资指获得生产设备、建筑和存货的行为。储蓄和投资可以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也可以从分部门的角度看。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如果家庭部门把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全部生产要素收入都用于购买消费品，而企业部门又把向家庭部门出售产品所得的全部销售收入都用于购买生产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储蓄和积累（投资）发生。如果家庭部门只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另一部分储蓄起来，这部分储蓄就可被企业用来扩大再生产。这样就在生产和消费之外形成了一个积累即投资过程。全部生产成果（收入）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于投资，消费等于收入减储蓄，因此储蓄等于投资。其关系如下：Y＝C+I，C＝Y−S，所以，S＝I（Y—收入、C—消费、I—投资、S—储蓄）。如果再引进对外经济关系，上述经济平衡就发生了变化。如果进出口贸易是平衡的，那么情况仍和上面所讲的一样。当进口小于出口时，国内储蓄外流；反之，国外储蓄内流。本国储蓄流到国外，形成外国的投资；外国储蓄流入本国，形成本国投资。这时本国储蓄与投资不再相等。当本国储蓄外流即进口小于出口时，本国储蓄大于本国投资；当外国储蓄流入本国即进口大于出口时，本国投资大于储蓄。储蓄与投资差额等于进出口差额。即S−I＝X−M（X—出口、M—出口）变形为S＝I+（X−M）即储蓄等于投资加进出口差额。由此便得出了资金流量的统计的第一个理论基础：在经济封闭的条件下，储蓄等于投资；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与投资差额等于进出口差额，资金流量表和实物交易部分遵循的就是储蓄与投资差额由国外部门收支来平衡的原则。再从分部门角度看。封闭经济条件下，总储蓄等于总投资。但分部门看，各部门的储蓄与投资是不相等的。这是由不同部门的行为特征决定的。家庭部门通常是净储蓄部门，企业部门通常是净投资部门，政府部门收支赤字或盈余经常存在。各部门储蓄与投资不相等，于是产生了资金在部门间流动的必然性。在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资金的部门间流动借助于金融工具完成。尽管从分部门看，各部门拥有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是不同相等的，但从全社会看，各部门金融资产的总和与各部门金融负债总和是相等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在部门与全社会的上述不同关系，构成了资金流量统计的第二个理论基础。资金流量表的金融交易部分体现的就是上述原则。

资源税 是对从事国有资源开发因资源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征收的一种税。它是198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时新开征的一个税种，征税对象为应税产品的销售收入。国家资源税条例《草案》中规定：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品和其他非金属矿产品，凡从事开采应纳资源税产品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是资源税的纳税人；对开采企业自产自用的应纳资源税的产品，则应视同销售，按产品的销售价格计税；在未正式立

法之前，对外国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暂不征收资源税。我国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各地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等差别较大，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开发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在盈利上的差异，收入极为悬殊，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反映，妨碍了企业生产主动性的发挥。开征资源税，运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因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将部分企业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所获得的那部分盈利收入的多数上缴国家，解决企业间因自然条件不同所造成的利润分配上苦乐不均的问题，使开发自然资源企业能真正在较为合理的盈利水平上开展竞争，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更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国有资源。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的办法征收。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由财政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纳税人所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资源状况，在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资源税的减免税范围如下：①开采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修井的原油，免税。②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酌情决定减税或者免税。③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减税、免税项目。

资本外逃　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因素而引起的国内资本外流。属于资本外逃的外流资本往往是由偶然性，突发性因素或对某些政策的恐惧而引起的，与由于对海外投资、购买外国资产等引起的正常的资本外流在表现形式上难以区别，仅在引致原因上是不同的，所以往往很难划分资本外流与资本外逃的界限和规模。引起资本外逃的原因主要有：①摆脱国内金融限制和资本管制；②寻求比国内市场效率更高、收益更大的国外投资场所；③逃避财政政策变化而引起的税收、价格的不利影响；④预期国内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的变革会对资本的自由安全经营产生影响。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一样，也是使用国内储蓄来购买外国资产从而同样减少用于国内投资的本国资源，其结果是投资——储蓄缺口更加扩大，使该国更加依赖外国资本。

从六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但在不同时期资本外逃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不尽相同。60、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实行私有化，对资本的管制逐步放松，促使部分资本逃向海外寻求更高的收益场所（例如新兴起的离岸金融市场），以摆脱国内汇率偏离、利率限制、通货膨胀、信用管制及资产征税等等不利因素。但这些资本外逃被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所抵销，这些国家能以其他方式从国际市场上筹得资本用于国内投资，因而资本外逃没有产生不利影响。进入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发展中的债务国家内部私人资本继续试图摆脱种种限制和新的对债务危机后果的恐慌而抽逃资本，另一方面国际银行业不愿再对危机中的债务国继续提供资金以保全其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从而造成债务国资本流入大幅度减少。其结果是，资本外逃变成了真正的实际资源转移，这些国家从资本净输入国变为资本净输出国，国内投资、消费受到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对付资本外逃的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法令、行政手段加以严格限制，不允许或者有限度地允许资本外流数量；二是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来引导资本对内投资，如对外投资征收高税、提高国内利率水平、降低国内投资成本、放松金融市场交易等等。

调整预算　经过法定程序，在原核定预算的基础上，改变预算收支的规模和用途。包括全面调整和局部调整。全面调整只用于在预算年度内，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需对国民经济各项重要比例进行调整时使用。局部调整是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具体情况，随时组织新的预算平衡而经常发生的调整。局部调整在我国大致可分为：预算的追加减、预算的划转、经费流用、预算调剂以及动用预备费等。以上调整，除预算追加减外，其余方式的调整，都不改变原预算的收支规模。

调入资金　财政部门从预算外调人预算内的那部分资金。在预算安排收不抵支时，将部分原作为预算外的资金或单位的结存资金，调人到预算内统一安排，是保证预算年度内预算收入平衡的重要手段。同时，对那些由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合建的工程或项目，也可将预算外资金并人到预算内统一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

调节性交易　又称“事后交易”或“补偿性交易”。指在自主性交易发生不平衡时弥补逆差或顺差的交易行为。是国际收支调节的一种方式。西方经济学家将国际收支所包括的所有交易项目划分为两种：一是商品贸易、劳务、单方面转移以及各种中长期资本移动而构成的“自主性交易”。这部分交易在金本位制下受市场机制作用和黄金输出入影响可以自动平衡，不致于产生过大差额。但在纸币制度下，上述项目则难以自动平衡，因而产生了第二种即“调节性交易”，包括国际收支项目中除自主性交易之外的短期资本移动、官方储备资产的变动和错误与遗漏项目。当自主性交易发生差额时，如：贸易逆差、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外流等，可以通过短期资本借贷、变动本国黄金和外汇储备等调节性措施加以平衡，发生在国际收支平衡

表上的最终差额则以错误与遗漏项目加以平衡。由此，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一国政府不必采取其他的政策来过多干预国际收支差额，通过表内项目，或可以自动达到平衡，或通过调节性交易达到平衡。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当局不对其国际收支进行全面的多种形式的干预，因为靠国际收支项目本身（不管是自主性交易还是调节性交易）是不可能满意地达到均衡的，何况调节性交易中所包括的短期借贷和动用官方储备措施都有很大的限制性，因此调节性交易也只是一国调节和干预国际收支各种措施的一部分。

调换资金融通 将不同货币或不同利率类型的债务进行相互交换的业务。亦称掉期交易或互换交易。调换资金融通市场的起源可追溯至本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英国的外汇管制办法限制了英国居民跨越国境的投资。为了逃避这种限制，英国人开始利用背靠背贷款。但整个60至70年代，许多人认为，掉换融通不过是套汇的一种形式，因而这种业务发展较慢。1981年世界银行成功地将2.9亿美元的固定利率债务同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瑞士法郎和西德马克债务进行调换，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调换技术的重视。经过80年代的不断演变，它已逐渐发展成适用于任何机构经营管理资金的一种可靠而有价值的工具。银行等中介机构在调换资金融通的交易过程中，担当调换中间人，保证双方借款人履行调换资金融通的义务，承担付款的责任。近年来调换资金融通的二级市场有了明显发展，希望交换资金的人不再局限于对等的双方，许多规模较大的投资公司和银行，都设有专门小组，拥有大批可互换的资金，能按各借款人的需求进行交换，促成不少三角或多角调换。调换业务的专业化，使为客户完成交易所花费的时间缩短，交易成本也不断降低。调换资金融通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利率调换。是指两笔货币与金额相同，期限一致的借款的不同付息方法的互换，一个能以优惠条件获得固定利率资金，却需借入浮动利率资金的借款人，与另一个能以较低利率获得浮动利率资金，却需借入固定利率资金的借款人，可以通过借款互换而双双获得好处。利率调换、业务的实质是借款者们在某种类似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现在，不仅是固定利率债务与浮动利率的债务能进行调换，不同类型的浮动利率债务，也可进行调换。（2）货币调换。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借款人将不同货币的债务或投资进行对各方均有利的交换。（3）双重调换。即不同类型的利率和不同货币二者结合的调换。随着通讯和电脑业的发展，调换资金融通交易可允许三个或更多借款人，通过银行居中安排，各取所需。这样，双重调换业务才得以盛行，形式也日益增多。调换资金融通的功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通过利率调换交易，可降低双方筹资成本；可以重新安排债务而无须举借不必要的新贷款，这使财务管理人员有更大的灵活性。（2）货币调换交易可使借款人对现有的外币资产或负债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以防止汇率长期波动的影响。货币调换交易可使大量集中性举债分散化，既有利于降低成本，又能提高借款人的知名度。（3）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重债国来说，调换资金融通也是一条可行的减少债务负担的途径。

调节性货币政策 指西方国家货币当局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货币信用规模的变化而采取的调节货币需求和利率的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信用规模、利率水平等不可能加以硬性政策规定，控制货币流通和利率水平必须采取变动其他经济因素的办法来影响它们。调节性政策主要有：①调整准备率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信贷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是中央银行通过紧缩成员银行（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来减少信用规模的措施，反之，降低存款准备金则是扩大信用规模的措施。②通过调整贴现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优惠放款利率，进而调节全社会的信用规模和货币数量。调节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货币和利率水平，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正常运转。目前西方大多数国家货币当局均采取调节性货币政策，将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部分。从中央银行角度来说，它有义务执行一种稳定的货币政策，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也有必要对货币需求和利率进行适时适当的调节。

与调节性货币政策相对应的是非调节性货币政策的主张，即：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没有必要频繁地调节其货币手段，而应使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相对固定，当它们出现波动和不均衡时会在短时期自动调节以恢复均衡，因而不致于影响到经济运行。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非调节性货币政策的代价是货币供求和利率水平的经常性波动因而它们最终还是倾向于调节性货币政策。

离岸金融 指国际货币市场上以离岸货币或境外货币进行的各种借贷活动形成的借贷关系。50年代末期，随着以美元为主的"离岸存款"（参"离岸存款"条）增多，以离岸货币进行的借、贷、拆放、投资成为国际金融领域中越来越重要的活动。这些业务和活动因以欧洲地区为中心，所以又称"欧洲货币业务"。离岸金融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必要性，它的产生是国际资本领域中金融管制和逃避管制矛盾与斗争的结果。西方国家政府为了本国统治的利益不得不对日益扩大和频繁的资本移动加以限制，以避免对

经济和政府政策的干扰冲击；而另一方面，作为私人资本，则追求资本的盈利性和流动性当种种限制使其不能顺利实现在国内和海外盈利时，必然通过各种机会来冲破管制，而欧洲货币市场则正提供了这一机会。私人资本在境外进行活动时，既不受本国政府的管制，又不受所在国的严格限制，这一时期正是欧洲地区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和投资限制、亚洲地区及加勒比地区实行投资减免税优惠的时期。这就为资本外流提供了良好场所和宽松环境。从国际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历史看，欧洲货币市场与业务也是生产国际化发展的结果和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不仅要求国际金融市场的服务和配合，其多渠道的跨国经营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资本国际化的发展。

离岸存款　又称"境外存款"。原指一国居民为避免某些国内限制，将其持有的本币存款转移到本国境外的其他国家银行中去。对于接受存款的国家来说，就是设在本国的银行（包括本国银行和外国设在本国的银行分支机构）所吸收的非居民的外币存款。随着离岸存款的不断增多和普及，存款者已不局限于货币所属国的居民，而可涉及任何一国的居民（除接受存款国的居民以外）。离岸存款兴起于5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国际收支和贸易状况开始恶化，美国开始对资本转移、投资等实行金融管制，这就造成大量境内境外美元不愿受其约束，纷纷到一些管制较松的地区去投资。比如，一部分投资者选择到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巴哈马群岛、巴拿马、开曼群岛等"避税乐园"去存放经营；一部分则在欧洲地区辗转存贷形成"欧洲美元"；还有一部分资本流转到新加坡、香港、巴林等亚洲金融中心，形成后来的"亚洲美元"。这些均统称为"离岸美元"或"境外美元"，而吸收这些存款的地区就成为"离岸金融中心"。随着"境外美元"的发展，其他货币的离岸业务也逐步增多，形成了一个范围广阔、规模巨大的"欧洲货币市场"。因存在欧洲地区的离岸货币占绝大部分，所以，这些"离岸存款"也统称为"欧洲存款"。包括：欧洲美元、欧洲日元、欧洲西德马克、欧洲英镑，欧洲瑞士法郎等等。实际上，这里的"欧洲"概念只是"离岸"或"境外"的意思，既包含欧洲地区，又包含着欧洲地区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如加勒比地区、亚洲地区等。

高地缺水效应　"洼地积水效应"的对称，是指在某些地方由于商品量多、呈现为商品高地，而货币量太少，在高地形成缺水，造成单位货币价值含量升高，货币购买力增强的现象。参见"洼地积水效应"。

准货币　亦称"准现金"。"现实货币"的对称。它是一种以货币来计算价值，并易于转化为现实货币的资产。该种资产为金融机构、企业团体及个人所拥有。准货币最重要的形式是银行储蓄、定期存款、政府债券及某些信誉好的公司的债券等。在兑换成通货之前，它们不能直接媒介交换，但它们易于转换成通货，故称"准货币"。准货币与现实货币间的这种关系，使得它对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有很大的影响。准货币增加，现实货币就减少；准货币减少，现实货币就增加。它作为一种潜在货币量，和现实货币量一起构成市场货币流通总量中的两个不同部分，其变化既能缓和，又能威胁货币流通的正常运行。通货膨胀严重时期，人们追逐通货，放弃准通货，会加剧信用领域和货币流通的混乱。其次，在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有多种金融资产可供个人选择，当个人以准货币形式保存的财富越多，表示其用自己的货币收入进行购买的欲望则越大。准货币的高度流动性，即变现力，使它成为估算一国货币供应量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准现金　参见"准货币"。

准备金　亦叫"储备金"或"法定储备金"，是指商业银行对于吸收的原始存款按中央银行规定的比率存放于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是中央实施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之一。中央银行调高或调低准备金率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它是调节货币流通的重要手段。由于运用储备金手段见效快，时滞短，力度大，一般在通货膨胀时期和通货紧缩时期使用它，而平时较少使用。参见"货币政策工具"。

准备银行　亦称"储备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有权集中保管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国家黄金、外汇储备，故称"储备银行"。如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印度储备银行等就分别为该国的中央银行。准备或储备的本意是指货币发行准备。任何银行发行货币，必须持有一定比例的黄金、外汇储备。实行存款准备金，交由中央银行集中保管后，法定存款准备金逐渐成为货币发行的主要准备，而存款准备金和准备率也都由中央银行自由调节。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就规定成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集中管理存款准备金和黄金储备等。

消费信用　对个人消费者提供的信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人向个人消费者用赊销方式出售商品，就产生了消费信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信用得到广泛的发展，它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消费信用的提供方式有：（1）赊销。这是零售商对消费者提供的短期消费信用。一般西方国家多采用信用卡方式。（2）分期付款。多用于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或房屋、汽车等，属中长期消费信用。（3）消费贷款，属中长期消费信用。按接受贷款的对象不同，又分为买方信贷卖方信贷两种方式。消费信用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消费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消费信用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消费者有限的购买力与不断提高的生活需求的矛盾，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也能开拓市场，促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但是，由于消费信用是对未来购买力的预支，会造成一时虚假需求，容易掩盖消费供求之间的矛盾。同时过量的消费信用还会导致信用膨胀。因此，对消费信用还需适当控制。

涉外税收　是一个国家的国家税收中涉及外国纳税人的部分。涉外税收负担是一国政府加在它所管辖下的外国纳税人身上的纳税责任。外国纳税人是一个跨国纳税人，要同时受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涉外税收政策的影响，必将承受双重或多重的税收负担。因而其不仅是一个国家本身的税收立法及涉外税收政策和税率设计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税收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国政府所制订的涉外税收负担原则，一般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优惠原则、最大负担原则和平等原则。由于涉外税负担原则不仅同跨国外国纳税人的利益紧密相连，而且通过跨国外国纳税人的中介作用，还广泛涉及到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关系，从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

流动负债　指公司必须在一年内偿还的债务。它是衡量一个公司的全部短期债务的尺度。这些债务或由于购置商品，或由于获得劳务而产生。流动负债包括信贷债务和应付利息。特别是它们的数量与其他一些财务指标的关系提供了一家公司的流动性状况的图象。

流动性资产　企业资产中的货币以及其它能迅速变为现金而无很大损失的资产。资产的流动性取决于：（1）是否易于变现；（2）买卖所需的费用多少；（3）价格的稳定程度。据此标准判断，流动性资产除货币外，还有银行活期存款、储蓄存款和政府的短期债券等。由于西方国家国内的存款与有价证券种类繁多，因而很难确定流动性资产与非流动性资产的界限。除货币和活期存款外，其他项目则因时因国度而异。如美国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有些可自动转入活期存款帐内，有些则要扣除部分利息才能转，后一种就不作为流动性资产。又如，有的公司发行的短期商业票据，其流动性往往等同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一般列入流动性资产项目之内。

流动购买力　亦称"流出流入购买力"。指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的对商品和劳务的货币支付能力。通俗地说，就是该地区货币收入转移到外地购买商品和劳务，或外地货币收入转移到该地区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那部分社会购买力。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广泛的社会经济联系，货币收入在各地区之间经常大量地流入流出。一地区货币流出大于流入部分，称为流出购买力；流入大于流出部分，称为流入购买力。货币的大量流入流出，对当地的市场供应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改变货币流通量的地区分布。货币流入多而流出较少的地区可能出现市场供应紧张，而货币流入少而流出多的地区则可能出现流通手段紧张的现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生产和流通的进行。为了准确把握各地区社会商品购买力状况，需要计算地区间货币流入，流出的差额。它对于合理组织商品供应，合理调节货币流通，使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地区结构上相互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流转额征税　以商品流转的销售收入额和非商品流转营业额为对象，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及服务领域课征的税种。其特点是：税款作为产品或劳务价格的组成部分随商品交换的实现而同时实现，不受产品成本，费用和企业利润水平变化的影响，因而能够保证国家及时地，稳定地取得收入。我国现行的产品税、营业税、关税等都属于这类税种，其收入要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

流动资产投资　企业用于购买、储存劳动对象以及占用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在产品、产成品等周转资金。它与固定资产投资共同构成投资。流动资产的价值形态为流动资金，按其计入成本的方式，可划分为：垫支于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等劳动对象的资金；垫支于支付职工工资的资金；垫支于各项管理费用的资金。按其占用形态，可分为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资金、货币资金、结算资金。按管理的需要分类，可分为定额内流动资金和超定额流动资金；定额流动资金和非定额流动资金。按资金来源分类，可分为自有流动资金和非自有流动资金。流动资金投资与固定资金投资的区别在于：（1）它们在生产流通中的作用不同。固定资金的物质形态是劳动手段，流动资金的物质形态是劳动对象、待加工成品和库存产成品。流动资金只是为生产流通过程提供必要的周转物资的储备，固定资金的投入旨在增加生产能力扩大生产流通规模。（2）周转方式不同。固定资金随

固定资产的逐渐损耗，将其价值渐次转入产品价格中去，并由产品的售卖得到渐次地补偿。流动资金的物质形态是在生产中一次全部地被消耗掉，其价值也是随着产品的售卖得到全部补偿。我国基本上根据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周转方式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将一部分价值较低又容易损耗的劳动手段划为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选择说　资产选择分析是1959年由美国经济学家H·马科威茨首先提出的。他在其《有价证券选择》一书中对含有多种有价证券的案券进行了具体分析，并阐明了分析技术。60年代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大量积累和金融资产的日趋多样化，这种有价证券的组合对汇率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作为一种新的汇率理论，流动资产选择说正式产生于70年代浮动汇率制实行以后，由美国经济学家J·托宾作了大量研究，才使这一学说引起西方理论界的重视。流动资产选择说的国际金融背景是，各国中央银行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各大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也拥有大量外币金融资产和欧洲货币存款，由于利率、国际收支、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各种因素的关系，各国货币比价经常变动，于是保持什么外币资产以获得最大收益，就成为投资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此说所指的流动资产既包括现金，又包括各种有价证券，而有价证券利率高低不同，风险各异，所以投资者根据理性行为准则，不断调整其资产组合，直至各种资产预期边际收益率相等为止，而预期收益率的变动也就引起汇率的变动，所以金融市场对汇率的影响较货物与劳务市场的影响更为重要。这样，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是由于投资者调整其外币资产比例关系所致，这种调整又往往引起资金在国际间的大流动，对汇率发生很大的影响。80年代初，此学说获得进一步验证。当时美国持续的高利率和开始下降的通货膨胀率，使以美元计值的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逐渐提高，因而引起国际证券资产的大规模重新转换和组合，国际投资者拥有的美元金融资产逐渐增产，使美元持续坚挺。流动资产选择说与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为全面。然而流动资产选择说也有其局限性：(1)因为它抽象了真实收入与真实财富及其相互作用，它完全不考虑货物与劳务的流动，因此从长期看，它不可能从整体上说明汇率运动的全貌，而只是侧重于短中期内汇率的决定。(2)此说必需具备一定的前提，即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十分发达，资本流动方便，外汇管制松弛，自由浮动汇率制普遍实行，所以，如果说这种理论足以解释具有上述条件的发达国家汇率的短、中期变动，那么对多数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运动的解释就很难有指导意义。

原始存款　派生存款的对称。可以形成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存款，即商业银行接受客户的现金和中央银行对商业的初始贷款所形成的存款。商业银行获得原始存款后，除按法定储备金率存放于中央银行一部分储备金外，其余的可用于发放贷款或购买证券，从而创造出超过原始存款若干倍的派生存款。由于原始存款是商业银行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款的基础，因此，控制原始存款的数量和规定可运用的程度，是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流通的重要手段。控制原始存款数量可通过提高储备金率，减少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以及降低贴现率来达到，这三种方式都会使专业银行或商业银行的原始存款下降，从而降低了原始存款的扩张倍数。

速算扣除数　用速数法按超额累进税率计税时需要扣除的常数。它是根据全额累进税计算的税额和超额累进税分级计算的税额两者之"差额"的原理，依照税法规定的级距和税率预先计算出来的一个固定扣除额。只要级距和税率不变，速算扣除数也不变。如现行工商所得税规定，手工业合作社适用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其税率表第一级为全年所得额在300元以下的部分，税率7%；第二级为全年所得额超过300元至600元的部分，税率10%；第三级为全年所得额超过600元至1000元的部分，税率20%；……第八级为全年所得额超过80000元的部分，税率55%。例如某手工业合作社全年所得额为1000元，如按全额累进计算税额时，其税额应为：1000元×20%＝200元，按超额累进进行计算税额时，其税额为131元。其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级 300×7%＝21元

第二级 300元×10%＝30元

第三级 400元×20%＝80元

全年所得额1000元的应纳税额为：

21元+30元+80元＝131元

第三级速算扣除数，即为200元−131元＝69元其余各级速算扣除数依此类推。

配赋税　"定率税"的对称。税收按其税款的确定方法，可分为配赋税与定率税两类。配赋税是指不按课税对象的一定比例规定税率和税额，而是由国家预先规定某税应征税总额，然后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税种。世界不少国家在历史上都曾实行过这种税，旧中国的各种地方捐，也有很多是采取摊派法征收的。

格雷欣法则 参见“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起征点 又称“征税起点”。税法规定课税对象开始征税的数额。课税对象数额未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达到起征点的就全部数额征税。确定起征点，可以免除一部分收入低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有利于缩小征税面，实行合理负担。我国的农业税为了照顾低产缺粮的单位，规定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或收入）未达到起征点的生产队，免征农业税。达到起征点的生产队，才征收农业税。

借贷资本市场 亦称“货币借贷市场”。金融市场若以资金交易的内容划分，可分为借贷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借贷市场按其办理借贷资本业务的期限，又可分为办理短期借贷资本业务的货币市场和经营中长期借贷资本业务的资本市场。借贷资本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相比，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单一性。在借贷资本市场上供应与需求的都是货币资本这种单一的商品。二是集中性。借贷资本的所有者并不是直接把货币资本贷放给别人，一般是把货币资本存入金融机构，然后再由金融机构集中地贷放给借贷者。借贷资本市场的利息因借贷期限长短不同和安全可靠的程度不同而不同。在同等条件下，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资金供求的变化。借贷资本市场的利息率的波动，也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债务支出 国家预算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的支出。我国国内债务支出，包括偿还国内发行的公债、国库券和国家财政向人民银行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支出，如我国1981年发行国库券的利率为年息四厘，自发行后第六年起，一次抽签将总发行额按五年分五次还本付息，每次偿还数为总发行额的20%。国外债务支出主要包括偿还国外政府贷款，国际组织贷款及其他国外贷款的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内建设资金主要靠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积累，同时也必须适当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近年来，国家多次在国内发行国库券，并向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借入外债，这对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社会效益和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国家财政每年都要安排一定数额作为还本付息的债务支出。

特惠关税 又称优惠关税。是指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对某些国家的一切商品或一部分商品的进口所规定的一种特别优待的关税。优惠关税可以是互惠的，也可以是非互惠的。特惠关税最初是适用于宗主国与殖民附属国之间的贸易，而且往往是非互惠的，即宗主国产品输入到殖民地享受优惠关税，而殖民地产品输入到宗主国则不能享受优惠待遇。后来才逐步改变为互惠的优惠关税。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美国等国与其殖民地附属国之间都曾实行过这种关税。最有名的优惠关税是英帝国特惠制，它是英国确保获取廉价原料、食品和推销其工业品，垄断殖民地市场的有力工具。后来随着英国殖民地变成了英联邦，英帝国特惠制也变成了英联邦特惠制。1973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以后，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优惠关税从1974年1月起逐步取消，此后即实行共同市场的共同对外关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同市场的国家与非洲诸国之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集团之间，也实行了优惠关税。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所称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纳税人提供或转让专利权、版权以及其他特许权利所获得的所得。我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中所称的所得，是指在中国境外的外国企业提供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各种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版权等所取得的收入。

积极货币 企业、非营利机构或家庭所支配的对其决策和实际行为起着积极影响和制约作用的货币数量。积极货币这一概念是中国经济学界根据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货币思想提出的。科尔内在1980年出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货币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思想，并把发挥消极作用的货币称之为“消极货币”。与此相对应，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把科尔内提出的发挥积极作用的货币称之为“积极货币”。在该书中，科尔内认为，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性。预算约束硬度和货币作用积极程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t期间的总支出≤m(t)初始货币量+t期间的总收入

公式右边是供微观组织使用的货币。如果预算约束是硬的，公式的左边即微观组织对货币的需求就不得不去适应公式右边既定的货币供给，货币便发挥积极作用，即是积极货币。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公式右边即货币的供给就会很容易调整到与公式左边微观组织对货币的既定需求相适应，那么货币的作用就是消极的，它只是起到会计记帐的作用，并不对微观组织的支出起限制作用。科尔内指出，货币并非要么积极、要么消极，货币的积极程度可以用连续的等级来表示，在完全积极和彻底消极之间存在着一些过渡阶段。因此积极货币和消极货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在该书中，科尔内把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参与者

抽象为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三个部门。货币在这三个部门中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在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中，预算约束或多或少是软的，货币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作用是相当消极的。首先从企业的短期信贷资金来源看，短期信贷的总供给总是被动地满足企业的信贷需求。这表现为：①企业极少因缺乏资金而无法购买它需要而又愿意购买的某种投入。②企业之间信贷的迅猛增长。③企业不会发生全面无力偿还债务或破产的现象。其次从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投资资金来源来看，投资的预算约束更软，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投资活动中，货币只起消极作用。表现为：①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遇到困难，就会提前使用以后的钱。②投资者极少因缺少货币而停止购买所必需的投入品。③从财务意义上讲，任何投资都是有意义的，没有失败的投资。这个事实说明了在投资过程中，货币的作用是消极的。而家庭的支出一般取决于家庭的收入和它所支配的货币数量。家庭预算约束是硬的，家庭内货币的作用是完全积极的。

透支　银行允许存款客户在约定的期限和额度内，超过其存款额开出支票，予以兑付并随时以存款抵还的一种放款方式。透支放款一般分信用透支和抵押透支两种。信用透支由银行和存户事先签订契约，议定透支限额，透支利息率，还款期限及其他附则，在透支契约条款内进行透支和归还业务。抵押透支，即是客户向银行透支时，必须用财产（房地产、商品、有价证券等）作为抵押品，并签订透支契约，按契约办理透支和收贷业务。此外，透支也作为银行同业之间通融资金的一种方式，叫做同业透支。我国银行制度规定，存款户签发支款凭证，不得超过其存款余额，超过了余额即为透支。超过存款余额的支票称为空头支票，是不允许的。在对商业企业存款户采用存贷合一的形式时，允许“银行存款”帐户在核定的贷款限度内，发生付方大于收方，习惯上也称为“透支”，其额度称“透支额度”。

预算　是指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政府、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在一定期间（年、季、月等）的收支预计。如国家预算、中央预算、地方预算、单位预算等。预算的另一种含义是指建设、生产费用的预计。如基本建设预算、企业生产费用预算、流通费用预算、管理费用预算等。

预算法　指国家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受国家权力机关保证强制执行的关于国家预算管理的行为规则。属于财政法体系。预算法的内容包括：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国家预算组成体系，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管理预算的权责，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程序，国家预算的执行，国家决算的编制、审查、批准程序和预算监督与检查等。预算法是编制和执行预算的法律依据，体现国家对预算工作的约束，也是国家财政步入法治轨道的重要标志之一。

预算拨款　亦称“财政拨款”。是由财政机关根据各主管部门的申请，在计划确定的限额内，按月拨付到主管部门，再由主管部门按照拨款隶属关系层层下拨到基层用款单位。按照预算的领拨关系，支出机关可以分为三级：一级机关（即中央和地方主管机关）同财政机关发生领拨关系；二级机关，同一级机关发生领拨关系，并负责转拨所属机关经费；三级机关（即基层机关）同二级机关发生领拨关系（没有二级机关的，同一级机关发生领拨关系）。拨付的原则是：按计划、按事业进度、按支出具体用途拨款。拨款方式有二，①划拨资金。即财政部门在核定年度预算用款数额内签发拨款凭证，通知国库将预算资金直接划入用款单位的主管部门在银行开立的经费存款帐户，然后由主管部门通过开户银行将预算资金转划到所属用款单位的经费存款帐户，供其支用。②限额拨款，即财政机关将核定各部门的限额通知人民银行和申请机关，通过银行办理限额转拨。

预算资金　国家为实现其职能通过国家预算集中、管理和使用的资金。根据预算，按规定的来源组织收入并按规定的用途安排支出。在预算资金的收支过程中，经常有预算资金的结存，包括已收未用的货币资金以及各种财产物资。为了对预算资金的收支进行核算，一般设置“预算收入”、“拨入经费”、“经费暂存”、“固定资产基金”等帐户，以反映预算资金的来源情况；设置“预算支出”、“经费支出”、“经费暂付”等帐户，以反映预算资金的运用情况；以及设置“金库存款”、“库存现金”、“经费限额”、“固定资产”、“经费材料”等帐户，以反映预算资金的结存情况。

预算管理　指国家预算编制及预算执行全过程中各项计划、制度、业务工作的总称，是国家财政管理的中心环节。预算管理的基本内容包括：①不断完善和改进预算管理体制和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各地方、各部门和各方面当家理财的积极性，把加强宏观控制同搞活经济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②不断组织国家预算的平衡。预算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民经济的平衡。编制预算的过程，就是反复平衡的过程。国家预算是国民经济活动在财力上的一个集中反映。③积极组织收入，保证必要的支出，防止浪费，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不仅善于聚财，还要善于用财，注

重开辟财源，关心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关心资金的投入和产出，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预算调整　经法定程序对原定国家预算收支指标或项目所作的改变。即由于国民经济计划、行政事业任务的改变或其他原因，改变原核定的预算收支规模和用途。它包括：①动用预备费。动用预备费的结果，必然改变原定的某些预算支出指标或项目，因而引起预算的调整。②追加或追减预算。③科目流用，即预算科目之间经费的调整。④预算划转，即改变预算的隶属关系，将原预算划归新的部门或地方。

预算划转　亦称预算划拨。由于企业、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改变或行政区划变更等原因，需改变其预算的隶属关系，将原预算收支在地区或部门之间重新进行调整，划拨原预算到新的主管部门或地区。企业、事业单位在隶属关系改变后，按规定各单位应上缴的各种预算收入以及应获得的各项预拨款，应当按照预算年度划转全年预算。同时，年度过程中已执行的部分也应随之划转。

预算包干　又称"单位预算包干"、"经费包干"。我国国家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实行按预算包干，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管理办法。1980年起正式实行。分为①全额预算包干，适用于全额预算管理单位，即按核定的经费预算数额全部包给行政、事业单位，超支不补，结余留用。②差额预算包干，适用于差额预算管理单位，即根据核定的收入数和支出数，确定对单位的补助额或单位上缴额，包干使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包干单位年终如有结余，除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外，可按规定比例从中提取集体福利基金和个人奖励基金，但不得用于增加人员工资，提高开支标准，扩大补助、津贴或其他违反财经制度的开支。

预算执行　按照批准的预算组织实现的活动。包括各级执行预算的机关、单位组织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预算平衡。在我国，国家预算的执行机关是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具体执行机关是财政部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财政部是国务院组织实现国家预算的职能部门，除负责组织中央预算执行外，并指导和监督地方预算的执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本级预算的执行，并指导和监督所属下级预算的执行。中央和地方各主管部门负责执行和监督本部门的财务收支计划和单位预算。组织预算收入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切应缴入国家预算的收入，按照政策、法令、条例的规定，及时、足额地收入国库，并按照财政体制的规定正确划分报解。组织预算支出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批准的预算和事业计划、行政工作任务进度，适时地拨付和正确使用各项资金。组织预算平衡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编制和执行季度，月份收支计划，及时地调整，保证年度预算收支的平衡。

预算定额　社会主义国家（或有关部门、地区）统一制定，完成一定计量单位的分部分项工程或结构构件的人工（工日）、机械（台班）和材料的消耗数量标准。是编制工程单价表和施工图预算的依据。按工程种类，可分为土建工程预算定额，通用设备安装预算定额和其他专业工程预算定额。

预算收入　指国家为建立预算资金而筹集的收入。我国预算收入，主要有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各项税收和其他收入等。其中国营经济缴纳的利润和税收，是预算收入重要来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我国国家预算收入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预算收入的特点，我们不单是依靠国家权力，同时又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双重身份，有计划地直接组织和分配国营企业的纯收入。所以，我国预算收入，不仅体现了国家同集体经济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且还体现了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分配关系。

预算支出　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对通过国家预算所集中的那部分资金进行的有计划的分配。它是国家用以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财力保证。国家的职能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决定了国家预算支出的内容和方向。现阶段，我国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拨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支援农业支出、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国防费支出及其他支出等。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财政支出的内容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但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国安排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讲究效果，力求节约。

预算分析　指预算执行过程中，结合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对预算收支完成情况进行解剖。预算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及重大经济措施，分析财政收支计划的完成情况，及时掌握工作进度、解决矛盾，制订措施，保证国家预算任

务的圆满实现。预算执行情况分析的基本办法，是运用各种财经资料，通过分析对比，找出预算与实际、现在与过去、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差距，分析各项财政收支增减变化的原因，研究收支动态和发展趋势，发现问题，采取措施，指导工作。从企业生产、销售、成本（费用）、价格等变化情况对利润的影响，分析企业收入增减的原因；从工业产品销售、课税数量、商品零售和农村产品收购等完成情况，以及税率、税种变化对税收的影响，分析工商税收增减原因和税源动态；从各种生产建设、事业计划的完成情况与相应财政支出的比较，分析财政支出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勤俭节约的原则，等等。预算分析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一般是定期进行全面分析，但对某项重大问题也可进行专题分析、典型分析和重点分析。有时根据工作需要，也可提出分析内容，进行临时分析。

预算约束　指资金来源和运用条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限制。与资金来源和运用有关的限制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条件有：价格因素、拨款制度、税收制度、信贷制度、货币投资资金来源等。企业，非盈利机构和家庭都存在预算约束。预算约束存在硬预算约束和软预算约束两种极端的形式。硬预算约束是经济单位资金的运用不能超过资金的来源，是事前发生的对经济主体行为的有效限制。软预算约束是经济单位资金的运用和来源都具有伸缩性，不能有效地事前限制经济主体的行为。预算约束并非一定存在于两种极端的形式上，在二者中间还有各种不同硬度的预算约束。衡量企业预算约束硬度的尺度主要有两个：(1) 企业的寿命。在纯粹硬预算约束条件下，是否盈利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国家起着恰如保险公司一样的作用，保证企业长生不灭。(2) 企业发展与是否盈利的关系。在硬预算约束体制下，企业的发展与它是否盈利密切相关。在软预算约束体制下，企业发展与它是否盈利关系不大，甚至产生没有盈利的企业得到发展，有盈利的企业得不到发展的现象。预算约束的硬度，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规模企业之间都存在区别。

预算外收入　不列入国家预算，由各地区、各单位、各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单独提取、单独管理、自收自支的收入。它是财政资金的组成部分，是国家预算的必要补充。预算外收入主要有三种：①纳入地方财政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如各项附加收入、地方集中的更新改造资金收入，公产公房租赁收入等。②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收入。如交通、养河、养路费收入，农、林、牧、水利事业收入，文教、卫生、广播、科研收入、民政部门的福利事业收入、城市园林收入、宾馆招待所收入、房租收入等。③全民所有制企业掌管企业专项基金收入。如企业更新改造资金、育林基金、油田维护费、企业利润留成、农业企业包干结余、民族边缘地区贸易利润留成等项收入。由于预算外收入的范围广、项目多、因此，应该加强管理。首先，预算外收入项目和收支范围，应切实按照财政部制定的预算外资金收支科目和国家财政、财务制度的规定执行。各地增设的预算外收入项目，一律报经国务院或授权单位批准。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不能擅自增加项目，扩大范围和提高征收比例。其次，各项预算外收入，要单独设帐核算。各单位收到的预算外收入，应如数存入银行专用存款户。凡根据规定，用预算外收入弥补预算内支出项目时，其支出的金额仍在预算外资金支出项目内反映。此外，各级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的预算外收支计划要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地方财政部门掌管的预算外收入也要编制计划，由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汇总，报送财政部。

预算外资金　"预算内资金"的对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按照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的规定，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各地方、部门、企业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财政资金。在我国，包括：①地方财政部门管理的各项附加收入和集中的各项资金，如工商税附加和集中的县办企业利润留成等；②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管理的各种专项资金，如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等；③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所属的不纳入预算的资金，如超产石油能源基金和预算外企业收入等；④事业和行政单位管理的收入，如养路费收入和中小学学杂费收入等。预算外资金是国家预算资金的一个必要补充，它对调动各地方、各部门管理财政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举办一些必要的事业，解决国家计划、国家预算照顾不到的问题，有重要作用。但对预算外资金要认真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的范围安排使用，放任自流必产生消极作用。改革以来，预算外资金与预算内资金之比，已由1978年31.0%发展到1988年91.2%，既刺激了各利益主体的形成，也成为投资膨胀、消费膨胀，产业结构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必须对其加强管理，积极引导，进行监督。参见"预算内资金"。

预算内资金　"预算外资金"的对称。国家为实现其职能，通过预算收支计划，由财政集中管理，分配使用的资金。在我国表现为预算缴款、国库存款、预算拨款或贷款等形式。我国预算内资金，主要来自

于通过财政预算方式集中的国营企业上交利润、城乡各项税收和基金，少部分来自于内外债；主要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各项经济建设、科教、卫生、国家行政管理、国防和对外援助的拨款等。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预算的基建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交由建设银行办理，贷款对象为有还款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对无还款能力的由国家安排的科研、学校、行政单位的建设项目，仍实行拨款。国家预算作为我国财政的主导环节，是国家筹集和分配使用财政资金的主要渠道。预算内资金是财政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为调动各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国家财政实行了各种放权让利的措施，预算外资金迅速增长。到 80 年代末，预算外资金已占预算内资金的 80%左右。预算内资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改革前 30%多下降到 20%左右。参见“预算外资金”。

预算周转金 是指我国各级总预算为调剂预算年度内现金收支而设置的基金，这是国家预算后备基金的一种形式。在总预算收不敷支时，用以周转，年终必须归还。此项资金按规定长期保持，逐年结转。这项基金只能周转使用，不能安排支出，年底需补足数额，以保证国家预算正常执行和圆满实现。

预算的追加减 在国家原核定的预算总额以外，按法定程序对原核定预算总额的增加或减少。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或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方针的调整或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必须追加减预算时，应先由主管部门提出追加或追减预算草案、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提请同级人民政府或转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中央各单位追加或追减预算由财政部核实后报国务院批准。预算的追加，必然增加财政新的支出，这部分款项，必须有相应的资金来源作保证，预算的追加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量力而行。预算的追减，一般须相应减少预算执行单位的支出，减少支出则要相应地调整各项事业计划，国家预算是国家的基本财政计划，制约着国民经济各项计划的执行，国家预算的变化，对其他各项资金收支计划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在编制和审核追加或追减预算时，必须考虑到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供求各方面的综合平衡。

预算资金调度 是指上下级财政预算之间的临时资金调剂。各级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或收支的季节性等原因，临时发生支大于收而预算周转金又不敷使用时，即须进行预算资金调剂。如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款，各级地方财政向上一级财政借用预算资金，或借用预算外资金等，以保障预算资金的及时供应。预算资金调剂应于年内归还结清，并不改变已核定的各级预算总额。

预算调拨支出 在预算年度内，各级预算之间的资金调入或调出。即上级总预算给予下级总预算的财政支援或下级总预算按规定上解给上级总预算的资金。上级总预算对下级总预算的财政支援包括：中央预算对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的“补助地方支出”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对所属地方总预算的“补助地区支出”或“补助县（市）支出”，下级总预算上解给上级总预算的资金支出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的“上解中央支出”和县、市总预算向省总预算的“上解省、自治区、直辖市支出”。

预算管理体制 指根据国家政治结构，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在各级预算之间划分预算管理权限和资金收支范围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导环节。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的实质，就是要在经济分配和预算管理职权上处理好集权和分权、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我国预算管理责任和权限的大小，主要是通过预算收支的划分来体现的。正确划分预算收支，关系到正确处理预算资金分配的集中和分散问题，是预算管理体制的一项主要内容。预算收支划分必须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既要保证中央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以保证国家职能的实现，同时也要照顾到地方和企业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和发展企业生产。社会主义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的基本任务，就是正确处理各级预算之间的权责关系，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管理预算的积极性，努力增收节支，保证预算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加速发展。

预算收支控制指标 是国家下达给各地区和各部门编制各地区、各部门总预算和单位预算的收支控制数字。在我国，由国务院按预算年度层层下达，作为各级编制预算草案的依据。控制指标的制定，应体现党和国家在该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经济和事业指标的要求和测算，同时考虑本预算年度预算收支预计执行结果和各地区、各部门提出的对下年度控制指标和建议数，以及影响下年度预算收支的各种有利或不利因素。

十　一　画

商业银行　是以经营工商业存贷款业务为主以盈利为目的的银行。在西方国家，这些银行主要吸收短期或活期存款，并向工商企业提供短期为主的商业性贷款，故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是存、贷款，现代商业银行除此之外还经营其他方面的业务，如信托、租赁、代理、咨询等等。①负债业务。商业银行的负债形成其资金来源，资金来源是银行盈利和生存的根本所在。构成负债的有存款和借款。为了吸收更多资金，商业银行存款方式也不断增多，主要有活期存款、支票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款单业务等。银行还借入一些资金，有同业拆借、发行债券、票据再贴现等。②资产业务。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形成其资金的运用，资金的运用形成其收入和盈利。资产业务主要有现金资产、各种期限的贷款和证券投资，其中对企业贷款是主要运用项目。③结算业务。在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下，银行承担主要的转帐结算业务。结算业务主要是通过各种票据等工具进行的，包括票据签发、承兑、背书、汇款、托收、信用证结算等。④信托业务。商业银行作为受托人代委托人管理或经营各种财产，如有价证券，不动产等等；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条件代为保管、转让、买卖、择换或进行其他形式的经营，从中收取一定报酬。⑤租赁业务。商业银行出钱购买机器设备等转租给企业，收取租金，这是商业银行将资金信贷与实物信贷相结合的形式。(6) 贴现业务。商业银行通过对企业的票据贴现进行资金融通。过去西方国家有许多贴现商号进行贴现业务，后来逐步转到商业银行进行，取代了贴现商号。

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主要有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三方面。虽然盈利性是首要原则，但它同安全性和流动性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商业银行经营体现出的经营原则也是不一样的，例如80年代爆发的国际债务危机对西方商业银行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后它们普遍重视起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管理，对外贷款规模缩小，步伐谨慎。各国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控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80年代以前，各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限制较严，例如许多都规定了存款的最高利息支付额，以保证资金安全性；另外，对商业银行经营存贷款以外的其他业务，如有价证券代理、买卖等也都有限制。这些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发展，在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储蓄贷款协会、信用社、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80年代开始各国中央银行在对金融放松管制的同时，逐步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利率和经营范围等方面的管制，促进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的潮流下发展了许多新型业务，如一些资产负债表外业务，从而使其竞争力又有所增强，但商业银行的发展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来自以证券融资为主的直接金融的发展，使银行这一间接金融的中介机构地位相对下降；二是来自层出不穷的各种金融机构的竞争，商业银行的发展还需中央银行对其限制的进一步放松和更多的保护。

商业信用　在商品买卖中，企业之间采取赊销和预付方式实行延期付款或提前付款而相互提供的信用。以商品的实物形式提供信用，到期以货币进行债权债务的清偿，这是最早的、也是基本的商业信用形式；在商品买卖中，采取预付方式，这是发展了的、派生的商业信用形式。商业信用在经济发展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①可促进商品销售，从而促进再生产的及时进行。②它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比较固定的经济联系网络，从而有利于生产和流通的发展。③它可以较充分地发挥企业之间相互监督作用。④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商业信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①商业信用是直接信用，受企业资金规模的限制，因此其总规模也是有限。②商业信用受企业资金周转时间限制，因此商业信用的期限也是较短的。③受借贷双方了解程度和信任程度的局限。商业信用的发展使参与者结成紧密的支付链条，如果其中个别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影响一系列支付，形成拖欠局面。所以商业信用也是加剧经济危机和信用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商业汇票　是一种短期无担保票据，一般由信誉较好的大公司、企业或银行签发，明确表明债权债务关系，并约期清偿。商业汇票所涉及的当事人主要有收款人、付款人和承兑人三者。由收款人签发的是一种要求付款人定期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支付命令；由付款人签发的则是一种承诺在一定时间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许诺凭证（亦称本票）。商业汇票均需经过承兑方有意义。承兑人是票据的主债务人，对票据

的清偿支付有无条件的责任。承兑可由公司或企业进行（此称商业承兑汇票），也可由银行进行（此称为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中对付款时间的规定有四种：①见票即付；②见票后定期付款；③出票后定期付款；④定期付款。据此，见票即付的称为即期商业汇票，其他三种称为远期商业汇票。另外，商业票据在使用过程中往往附带有其他有关的单据和发货票、运输提单、保险单等，这种汇票称为跟单汇票；如果汇票不附有如上单据，则称为光票。商业汇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确立的是买卖双方即债权债务方在延期支付货款条件下的清偿义务与权利，因此，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信用的不断发展，商业汇票也日益成为一种商品交换中清偿支付的重要工具。

商品流通税 我国1953年至1958年实施的一个税种。它是选择国家大量生产和国家统购统销或定量收购的二十二种应税商品按其流转额征收的一种税。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把商品在生产环节应纳的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以及在商品批发及商业零售环节缴纳的营业税及印花税合并为一种税。实行一次课征。凡已纳商品流通税的商品，不再征收其他各税。纳税义务人及纳税环节是：工矿企业产制应税商品，由国营商业机构出售者，以国营商业机构的纳税义务人，于商品第一次批发或调拨时纳税；工矿企业产制应税商品，自行出售或自行加工、使用者，以该工矿企业为纳税义务人，于商品出厂或移送加工、作用部门时纳税；采购应税农村畜牧产品者，以采购人为纳税义务人，于商品集中起运时纳税；由国外进口的应税商品，以报运进口人为纳税义务人，于商品报运进口时由海关代征。计税价格规定本国生产国内销售或国外进口的按当地国营商业机构牌价计税。一般实行差别的比例税率，最低税率为5%，最高税率为66%，对个别商品（啤酒）采取定额税率。征收方法采取由纳税义务人依照规定自行计算缴纳的方法。商品流通税于1958年9月税制改革时，并人工商统一税。

商品流转额 “非商品流转额”的对称。税收上所说的商品流转额通常是指商品销售者销售商品（产品）后所取得的货币金额，即商品销售额，如工业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金额，零售商业的商品销售收入金额等。我国涉外税收中沿用的工商统一税，国内现行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其中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部分，就是以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

减税、免税 税法中对某些特殊情况给予减轻或免除税负的一种优待规定。减税是指按照政策、法律规定减征一部分应纳税款。它是为了鼓励某项事业的发展，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按税法规定或国家授权机关决定，对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的一种特殊照顾。免税是指按照规定免征全部应纳税款，是对某些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它是把税收的严肃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制定的措施。减税、免税规定是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了促进、鼓励某些事业的发展或扶植某些产品的生产、或照顾某些纳税人的暂时困难所采取的一种税收措施。

清算货币 亦称“记帐货币”。贸易协定或支付协定项目下作为双边清算的记帐外汇所使用的货币。进行贸易、经济援助、经济技术合作的两国政府缔结贸易协定或支付协定后，在两国中央银行或其指定银行设立双边清算帐户，以协定规定的货币为记帐货币，两国之间发生的外汇收支均以记帐货币记人清算帐户。出口商收取货款由本国清算银行用本币付款；进口商支付货款用本币与本国清算银行清算。两国清算银行以相互抵销方式清算债权债务。记帐外汇所使用的货币可以是协定国任何一方货币，也可以是第三国货币。究竟使用哪种货币，由协定国在支付协定中加以规定。

基金 国民经济中具有特定用途的物资或资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根据国家、企业和居民的特定需要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如积累基金、消费基金、生产基金、流通基金等。在企业财会工作中指具有专门用途的各种资金来源，如：企业基金，折旧基金、更新改造基金等等。

基础货币 参见“货币基数”。

基础银行 南斯拉夫主要商业银行的通称。依据南斯拉夫银行法，所有企业、内部银行及其他法人均可参加基础银行的创建。基础银行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代表会，执行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另外还设有信贷委员会其他专职机构。基础银行是南斯拉夫唯一能全面办理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是比较典型的商业银行。它能全面办理银行业务，可在全国分设机构，部分基础银行经特许还可经营外汇业务。由于基础银行的成员对银行负债负有无限责任，因而中央银行对基础银行的管理严格，基础银行必须建立储备基金，必须按规定缴存法定准备金。政府对基础银行的贷款等业务都有具体的规定。

基准利率 指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利率。

基准利率是中央银行根据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市场资金供求情况确定的。当中央银行认为有必要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就把基准利率规定得高些，使得专业银行减少或停止向中央银行借款，最终达到减少信贷和货币供给的目的。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在整个利率结构中处于轴心地位。各专业银行以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为基础，根据各自的经营情况自行决定存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可以对专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限定浮动范围来直接影响专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并进而影响其向中央银行的借款能力。建立以基准利率为轴心的利率结构，改变现行的各种存贷款利率皆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制度是我国银行利率改革的方向。由于中央银行只负责基准利率的调整，改变了利率决定上包揽一切的做法，从而使中央银行能够从日常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研究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情况，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各个时期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合理引导资金投向；同时也有利地调动各专业银行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

基本建设拨款　指建设部门、建设单位为了完成计划年度基本建设工作量和新增为以后年度储备所需要的拨款。它反映完成基本建设工作量计划年度需要拨多少款。它可分为建设安装工程拨款、设备拨款、其他建设费用拨款等。基本建设拨款统一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理。建设银行代表国家向建设单位供应建设资金并监督其使用。为了充分利用基本建设库存物资，节约建设资金，国家规定建设单位上年结余资金中当年可以利用或处理的库存物资以及清理债权债务等收回的资金，应抵充预算拨款。因此，基本建设拨款即指当年计划所列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减去动员内部资源数，再加上为下年度储备所需要的预算拨款。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首先通过计划和预算进行分配，多次、逐笔地把建设资金拨给建设单位，用于各项工程。做好基建拨款工作，对于保证按国家计划规定的建设任务，实现基本建设资金分配的预期目的，充分发挥基本建设投资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基本建设支出　国家预算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即我国财政用于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和一部分简单再生产的投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要受到国民经济建设宏观规划的制约，必须保持与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致；基本建设投资必须同国家预算年度内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适应，按照审编的综合财政计划和国家预算，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使用；基本建设投资要区别不同情况根据轻重缓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确保重点工程建设的落实，要优先完成配套工程的施工，尽快发挥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效益。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了国营企事业单位、国家行政机关的最主要的基本建设投资来源于国家财政。国家预算通过建设银行发放的基本建设贷款是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1979年前，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完全由国家预算无偿划拨。实践证明，这种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方式，不利于投资效益的充分发挥，为改变这种状况，1979年国家按照资金有偿使用的原则，试行由建设银行以预算拨款资金为来源改为以贷款方式向建设单位供应，1985年在国内全面推行。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的放矢地组织进行。近年来，我国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和方向也不尽合理，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因此，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控制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调整投资方向，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基建资金供应“四按”原则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在办理基本建设拨款、贷款时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其基本内容是：①按国家批准的基本建设计划供应资金。无论拨款或贷款，都要先弄清对象，划分计划内、外的界限，积极支持计划内项目，严格制止计划外工程。②按基本建设程序供应资金。为了促使建设单位遵守基建程序，资金的供应要按工程审批的进程来掌握。③按基建支出预算供应资金。即对计划内的基建项目，只能在年度基本建设财务计划确定的预算拨款范围内供应资金，全年的拨款、贷款数额，不能超过核定的年度供应指标。④按基本建设工程进度供应资金。即根据“完成多少工程给多少钱”的要求，对计划内的已完工程，在建设预算范围内，按规定的预算价格，办理结算，拨付工程价款。以上四条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全面贯彻，才能确保基本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教育费附加　指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按规定的附加率征收的教育经费资金。目前我国尚未规定为正式税种，而是以附加的形式征集教育经费来源。其主要内容为：①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除按照《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的规定，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以及海关对进口征收的产品税、增值税，不征收教育费附加外，都应当依照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②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附加费为1%。③教育费附加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征收的原则和地点，原则上与征收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规定一致而一并计

征。④教育费附加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缴教育费附加额=(产品税税额+增值税税额+营业税税额)×1%

营业税 在我国境内对从事商业、物资供销、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金融保险、邮政电讯、公用事业、出版业、娱乐业和各种服务经营的单位和个人的营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我国在建国初期曾实行过营业税，1950年国家把工商企业交纳的营业税并入工商统一税。1973年国家进一步简化税制，把工商统一税同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房地产税合并为工商税。1984年，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进行税制改革，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恢复了营业税税种。营业税税源大、涉及面广，凡在我国境内经营上述业务并取得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除另有规定外，不论是全民、集体还是个体，不论是批发还是零售，都必须按规定缴纳营业税。营业税纳税对象具体包括:①商业零售时的销售收入;②商品批发时获得的销售额减去购人商品原价后的差额;③交通运输、邮政电讯等行业的营业收入。营业税纳税环节因征税对象不同而异，主要在商品的零售和批发环节征收，对邮电、交通运输和服务性业务则在业务收入的结算环节征收。为充分体现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营业税根据行业的不同和经营业务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税率。我国营业税免税范围包括:①国营粮食企业按国家规定平价销售粮食、食油的收入;②农业机械站、排灌站的机耕和排灌收入;③外贸出口商品的调拨和出口销售收入;④医疗保健、育婴托儿、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农、牧保险的收入;⑤博物馆、文化馆、体育馆、展览馆、公园的门票收入;⑥企业在国外提供技术服务和劳务取得的收人。开征营业税，对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职工奖励基金 凡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按国家规定比例，从利润中提取的用于鼓励在生产或工作方面较先进的个人或集体的专用款项、根据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凡经批准试行利润留成的企业，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利润留成比例，企业用利润留成的一部分建立职工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利润愈多，职工奖励基金也愈多，有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建立职工奖励基金的具体办法也将有所变化。

职工福利基金 指企业为发展职工集体福利事业而设立的一项专用款项。主要用于职工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和困难补助等方面，以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根据国家规定，1979年以前，职工福利基金按每月工资总额的11%从生产成本中提取。根据1979年国务院颁发的《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经批准实行利润留成试点的企业的职工福利基金改由企业利润留成来建立。这样，职工福利基金和企业利润直接挂钩，可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争取多创利润。职工福利基金的设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职工的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利改税"制度的实施，建立职工福利基金的具体办法也将发生相应的改变。

黄金市场 由黄金在世界范围内交易和供求所形成的市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形成的市场必定也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它属于国际金融市场，但由于目前黄金部分地执行货币职能而部分地具有商品性质，所以黄金市场的组成既有商品市场的特点，又有金融市场的特点。战后黄金市场的发展之所以历久不衰，其吸引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作为世界动荡局势的"避难所"，无论是政治局势、金融政策、汇价利率、战争等什么样的动荡都会使大量投资者转向黄金市场这一保值场所，因而这些时期世界金价都是高昂的。二是来自对各国通货膨胀的恐惧，纸币的泛滥、货币形势的跌宕起伏使各国面临或大或小的通胀难题，对纸币价值损耗的恐惧使黄金市场前景可观。除此之外，由于历史和传统形成的某些地区对金首饰的需求以及工业用金的需求也使黄金市场大有用武之地。因此，黄金市场活动具有三方面的目的：一是为保值而进行的交易，会随着其他投资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以及政局、政策的变化增加这方面的交易。二是对实物黄金需求的目的，这类交易所占比重不大，而且具有相对稳定性。三是利用黄金市价波动来满足投机需要，这类交易一直是黄金市场的重要部分，而且由于投机的需要而诞生了期货市场。投机目的的实现得益于金价短期波动、汇率变化、黄金不同市场间的差价、成色差异等因素。

黄金市场的发源地和集中地在英国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伦敦黄金市场在世界黄金交易中占绝对垄断地位；二次大战使其遭受破坏。但从1954年到1961年，伦敦重新恢复了黄金市场。60年代的黄金恐慌曾使伦敦黄金市场一度中断交易，瑞士苏黎士取而代之成为世界主要黄金市场；76年国际货币制度中美元的崩溃和"黄金条款"的取消，再度引起黄金市场波动。但在70年代已出现了多个黄金市场平分秋色，各自为政的局面。到目前来看，世界主要的黄金市场在欧洲有伦敦、苏黎士、法兰克福、巴黎等;

在美洲地区有纽约、芝加哥、墨西哥、巴拿马等；在中东地区有贝鲁特（因战争而中止）、巴林、阿曼、科威特、迪拜等；在远东地区有香港、东京、新加坡等。这些黄金交易活动中心形成了一张全球性黄金交易网络。值得注意的是黄金期货市场的产生与发展，自1975年后在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了期货交易，并形成期货市场。这与实物交易的黄金现货市场相对应，更能满足一些黄金投机商的需要。期货市场的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短期金价的波动，而期货价格的变化则主要受制于对通货膨胀、利率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的预期。

黄金输送点　在金本位制度下，当外汇市场汇价波动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引起黄金的流出流入，汇价波动的这个界限就是黄金输送点。引起黄金流出一国的汇价上限叫黄金输出点，而引起黄金流入一国的汇价下限叫黄金输入点。由于黄金输出输入点的限制，外汇市场上汇价波动就不至于过大，汇价达到黄金点则外汇供求者就不再以低价卖出或以高价买入外汇，而代之以输送黄金按法定的含金量所确定的平价（铸币平价）来清偿债权债务，因此，汇价波动就总是被界定在黄金输出点和输入点的限度以内，汇价制度就比较稳定了。以金本位制下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价为例：两种货币法定含金量之比为1：4.8665，即美元与英镑的铸币平价为1英镑＝4.8665美元，这是决定汇价的基础。但如果外汇市场上对英镑需求增大，英镑汇价就会超过4.8665，英镑需求者需用高于4.8665的价格兑换1英镑。而金本位制度下允许黄金输出输入，人们便可以用相当于4.8665美元的黄金输送到英国去清偿1英镑债务或兑换1英镑，这需要附加上约6‰的各种运送费用（运费、保险费、包装费、改铸费、代理费、利息等等），即0.0292美元（4.8665×6‰），总成本为4.8957美元。因此，当外汇市场上英镑比美元汇价高于4.8957时，即会引起黄金从美国输出到英国，这一点就是美国的黄金输出点即英国的黄金输入点。反之可计算出美国的黄金输入点即英国的黄金输出点为4.8372（4.8665—0.0292）。由此可得出，一国的黄金输出（入）点即为铸币平价±黄金输送费用，这是金本位制下汇价稳定的重要保证。

黄金双价制　在国际货币制度与黄金制度历史上出现的黄金同时存在两重价格的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双挂钩"制度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变化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而逐步发生动摇，到1968年3月美国黄金储备已下降到121亿美元，同期对外流动负债则增至331亿美元。美元信誉一落再落，其结果，在伦敦、巴黎和苏黎士黄金市场上均爆发了战后空前规模的抛售美元、抢购黄金风潮。半个月内美国黄金储备流失达14亿美元，巴黎金价一度涨到44美元兑1盎司黄金，远远超出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固定官价。美国政府难以继续维持这一局面，被迫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要求英国自1968年3月15日起暂时关闭伦敦黄金市场，宣布停止在伦敦黄金市场按每盎司35美元官价兑换黄金；二是解散1961年由美国为首的八国组成的"黄金总库"；实行"黄金双价制"。其内容为：美国不再按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官价在黄金市场上出售黄金，听任金价在自由市场自由波动，私人买卖黄金的价格完全按市场上供求关系所确定的价格进行。同时，仍然维持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但这一官价只在各国官方结算时才使用。这样，就形成了双重的价格体制。这一机制既是美国在迫不得已时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是黄金价格从"挂钩制"走向自由浮动的一个客观必然步骤，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仍会被新的制度所代替。"黄金双价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美元危机仍频繁爆发。1971年和1973年美国最终难以继续维持"双价制"中的35美元官价，美元两次对黄金贬值，幅度分别为7.89%和10%。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牙买加会议"，最终废除了黄金官价，中央银行间不再以官价进行清算和交易，并决定以特别提款权来代替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资产。"黄金双价制"至此结束了其短暂的历史。

黄金货币化　指黄金从普通商品的地位脱离出来，成为特殊商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执行货币职能的过程。黄金并非天生的货币，而是在各种不同的物物交换过程中，因其特殊的优良的自然属性，慢慢地越来越多地充当起价值手段职能。从1816年美国《金本位法》颁布开始，金本位制在国际上诞生，即开始了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制度，黄金作为货币手段从法律上确定下来。1879年美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黄金作为货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金本位制度有所动摇，1929年～33年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性货币信用危机使金本位制在有的国家崩溃，大量银行券、纸币充斥流通领域，通货膨胀日益严重，金本位制难以维持。1936年英国废除金本位制，国际货币制度面临新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汇兑本位制取代金本位制，黄金部分地执行货币职能，开始从完全的货币化向部分货币化以致于非货币化过渡。

黄金之所以能成为货币执行其职能，是因为它具有天生优良的自然属性，使其能充当货币五个方面的职能：黄金本身具有价值，稳定且不易磨损，因此可

自然地参与交换并可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黄金品质优良，易分割、铸造、溶化，因此用黄金可铸造成金铸币多次在交换中使用，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黄金易于保存，不会腐烂、贬值、自我损耗，所以自然成为人们进行未来支付的贮藏手段；黄金的性质是无国别差异的，在任何国家均可进行购买、支付与贮藏，因此也是作为世界货币手段的最佳选择。在金本位制下，黄金作为货币的五大职能逐步地执行并完善的过程，就是黄金货币化的过程。

黄金之所以能在一个世纪时间内充当货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流通中对货币需要量是有限的，商品交易规模不大，国际间贸易量也很小，以黄金铸成的货币足以满足流通中的支付需要，商品价格和汇价通过供求关系在市场上自我调节以达到均衡。但这一基础到20世纪后逐渐消失，经济迅速发展商品交易规模急剧扩大，国际间贸易量也随之增加，有限的黄金铸币远远不能满足流通需要。这样，黄金的货币职能随着纸币制度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退化。因此，黄金货币化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和产物。

黄金非货币化 指在货币领域内黄金的货币职能逐渐减少、退化，向着商品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两方面：一是由其自然属性和客观规律发展而决定的自然转化过程，二是由人的主观意愿而决定的促使黄金作用从货币转化为商品的主张和行为。

黄金作为货币有着悠久的历史，黄金本身也具备作为货币手段的天然的优点。因此，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金本位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唯一的货币制度。但随着商品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流通中对货币需求数量倍增，而黄金铸成的货币数量却不可能相应扩大，因此，在某些国家出现了以白银铸币、纸制银行券甚至纸币等流通以代替和补充黄金的不足。黄金本位制开始分解、动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灾难性的货币信用危机，各国货币制度在战争和危机中摇摇欲坠，黄金本位制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被部分地或全部地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确立的布雷顿森林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代替了陷入混乱的不统一的旧金本位制。其中心内容是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样，其他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与黄金相联系。黄金仍保持部分货币职能，但已不是健全的金本位了。这种制度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这是黄金非货币化的重要转折。美元的中心地位在60年代期间开始动摇，市场多次出现抛美元抢黄金和硬通货的风潮，黄金与美元之间的联系难以维持，美国政府被迫于1971年和1973年对美元实行两次大幅度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制定了“牙买加协议”，对货币制度进行了重要修改：废除“双挂钩”制，废除旧的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黄金不再是各国货币的定值标准，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地在黄金市场进行买卖，取消它们之间以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黄金已不再是国际货币制度中的内容，它与各国货币之间的联系已结束，它已被排除出货币领域。牙买加协议的内容从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意味着黄金从法律上正式地结束了其货币历史，完成了非货币化的过程。

黄金非货币化在法律上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黄金已完全地非货币化了。金本位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了黄金完全退出货币领域的艰难性和长期性，非货币化需要一定时期的逐步演变而达到，并非只经过一时的主观行为和法律程序来完成。从历史上西方国家关于黄金的地位就有分歧和争执。70年代美国极力主张黄金非货币化，率先在黄金市场上抛售黄金以削弱其价格和实力，并促成基金组织黄金条款的取消，但也招致法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的反对。法国极力坚持黄金的货币地位和重要性，不但不抛售黄金反而借机收购黄金，使其黄金储备剧增。黄金市场价格不但没有因美国等国的努力而下降，反而在取消官价后一路上升。尽管价格不但上涨，各国收购黄金增加官方储备的势头仍不减，因此，不管肯定与否定，黄金还残留着其作为储备手段的货币职能。

另外，在黄金非货币化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制度。“特别提款权”是在美元与黄金制度陷入危机时出现的并企图代替黄金作为国际货币（因而称为“纸黄金”），这是黄金非货币化过程中的一项具体措施。但“特别提款权”仍是一种纸制信用凭证，优点在于其建立在集体信用基础上，它本身并无价值，所以尽管不同于美元等纸币，在内在价值和储藏功能上是不能与黄金相比拟的。

对于黄金是货币还是非货币，至今尚无定论。实事表明，从70年代到现在，坚持恢复黄金制度的企图是一种幻想，坚持把黄金完全排除出货币领域的目的也未达到。何去何从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黄金再货币化 是指在黄金非货币化之后提出将黄金再度纳入货币领域充当货币手段和职能的一种主张或行为。几乎在黄金非货币化的同时，存在另一派观点，主张维持黄金的地位与作用。其根据是黄金废除后的纸币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汇率制度不稳定，而这两个后果则是影响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尽管这种不太现实的设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在经过70年代抛售黄金风潮之后，民间和官方又普遍关心并重视

起黄金的价值，纷纷增加黄金储备。按1981年12月的价格计算，世界各国的官方储备中黄金份额占49%，发达国家的黄金份额占官方储备的59%。美国在70年代率先在市场上抛售黄金没有达到弥补赤字和削弱黄金地位的预想效果，1981年国会为重新研究黄金问题成立了黄金委员会，并决定保留黄金储备。美国的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经济学家也主张恢复黄金地位。同时，欧洲也有一些国家呼吁恢复金本位制。这些愿望是良好的，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①作为货币手段，必须有充分的可供数量，以满足流通中不断扩大的需求。而黄金的储量和开采量是有限的。正是由于可供量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其从金本位走向复本位再向金汇兑和纸币制度过渡。黄金可供量的有限性和纸币可供量的无限性，使纸币最终取代黄金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今后黄金在这方面的限制也只会加深而不可能扭转。②作为一种资源，黄金世界各国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这就失去了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公平基础。③黄金的定价问题。货币本身是不应有价格的，如果给黄金定价并以此发行货币，则有一个定价过高或过低的问题：定价过高，货币流通手段不足，定价过低，则货币过多也会产生通货膨胀，而定价不变则更是不可能的。可见，黄金从普通商品到一般等价物再到普遍商品的转化是一个客观过程，当然，黄金由于其本身的优良属性，以及长期在货币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目前完全排挤出货币领域也是不可能的。在某些方面，黄金仍然在国际货币制度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累进税率　"累退税率"的对称。凡是按征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的等级税率，征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的，称为累进税率，累进税率分为全额累进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两种：全额累进税率是将纳税人的计税收入的全部数额按照与之相适应的等级的税率计征。例如，假若规定：所得未满120元的，税率为7%；120元以上未满180元的，税率为8%，180元以上未满260元的，税率为10%……等。如果某纳税人所得额为250元，则这250元全部都按10%的税率计征。超额累进税率是将纳税人的计税收入，按照规定的税额分为若干级，每超过一级，仅就超过部分按提高一级的税率征税。这种税率一般适用于收益课税和财产课税。

累退税率　"累进税率"的对称。它是根据课税的对象数额大小划分若干等级，并随着等级提高、规定逐步下降的税率，形成课税对象数额越高而税率越低的趋势。

偷税　纳税义务人有意违犯税收法令规定，以欺骗、隐瞒等方式逃避纳税的违法行为。比如：伪造、涂改、销毁帐册、票据或记帐凭证；少报、隐瞒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利润数额；转移资产、收入和利润、逃避应纳税款等，都是偷税行为。指使，授意和怂恿进行上述违法行为的，也是偷税行为。偷税是违法行为，它不仅损害国家经济利益，而且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对有偷税行为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除按税法规定追补税款并酌情处以应补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外，情节严重的，还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进行法律制裁。

银根　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应状况。中国旧时采用银本位制，市场上用银交易，所以习惯上称资金的供应为银根。如果市场上资金需求大于供给，市场紧张，就叫"银根紧"；如市场上资金供大于需，就叫"银根松"。现代对于国家货币当局采用的提高利率、减少信贷供应、紧缩货币的政策，通常称之为银根紧缩政策，反之则称为银根松动政策。

银行　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特殊经济机构。其主要业务是存款、放款、汇兑、结算，充当信用中介和结算中介。银行一词源于拉丁文 Banco，意为"长凳"，16世纪以前，意大利的货币兑换商是坐在长凳上营业的。英语转化为 Bank，原意为存钱的柜子。中国的银行一词是从英文 Bank 翻译而来的。因旧时中国曾以银为本位货币，较大的商品贸易机构称行，故译为银行。银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前资本主义货币经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起初的货币经营业主要从事金属铸币的兑换、保管、收付等业务，并相应的收取一定的费用。当货币经营业集聚大量货币后，发现并不需要随时保留所有保管的货币，可贷放其中一部分货币谋利，而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货币资本经常不足，需借入资本，这样货币经营业的借贷业务便日渐发达起来，随之，货币经营业便逐步发展成为银行业。

近代最早的银行是建立于1580年的意大利的威尼斯银行，相继建立的还有米兰银行（1593年）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汉堡银行（1619年）等。这些银行放款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又带有高利贷的性质，其实质仍是处于向现代银行转化中的货币经营业。只是到了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才标志现代银行的开始，该银行是政府支持、私人创办、最早出现的一家股份银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规模巨大的股份银行纷纷建立。各个银行不仅经营存贷业务，而且还发行银行券等信用货币。银行业务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在宏观上就需要

建立中央银行，以作为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代表国家来管理银行业。1844年改组后的英格兰银行，由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被认为是中央银行的鼻祖。到了19世纪下半叶，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了中央银行。早期的资本主义商业银行，主要是办理工商企业存款和短期抵押贷款、贴现等业务。现代商业银行有向全能化发展的趋势，证券投资也已成为主要业务，此外还发展起信托、租赁、中长期信贷、咨询等其他业务。各国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专业银行。目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已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中心、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各类银行并存的银行体系。20世纪以来，还建立了一批世界性或区域性的银行组织，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成立于1946年的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资本主义银行是特殊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货币资本，充当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通过利息形式瓜分剩余价值。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银行由简单的中介人演变为万能垄断者，在国内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外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银行等形式，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中国明代出现的钱庄，清代出现的票号，实质是银行的雏形。但它们都为独资和合资经营，其业务管理和资金力量均无法与股份制的银行相比。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49年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即"四行二局一库"官僚资本银行是当时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新中国成立后，在没收官僚资本银行的基础上，结合组织各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和改造私营银行，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机构和改组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既发行货币，又办理信贷业务，建立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1979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专门办理工商信贷业务，恢复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等专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等综合性的股份制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银行并存的银行系统，以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

银行系统 指各类银行机构的有机组合。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历史因素等影响，各国的银行系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各国银行系统又有其共同点：①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的货币信用政策、监督和管理各类银行和金融机构，控制货币及信贷总量。②以商业银行为基础，商业银行是各类银行机构中唯一能接受活期存款的机构，具有创造存款货币的功能，商业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向工商企业发放贷款。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其业务正朝着全能化的方向发展，证券投资和黄金买卖占有重要地位，并开展了中长期信贷、消费信贷、租赁、信托、咨询等业务，事实上已成为"百货公司式"的银行。③都存在种类繁多的专业银行，专业银行只集中经营指定范围内的业务。如政府创办的开发银行和私营的投资银行，其主要业务是接受定期存款，发放中长期贷款，为工商企业代办发行或包销证券等。又如储蓄银行，其主要业务为吸收中小储户存款，发放不动产抵押贷款，投资于政府公债等。从而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专业银行等多种银行机构并存的银行系统。

现阶段中国的四大专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既有其各自特定的业务范围，又普遍吸收活期存款。此外，还有交通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和少数中外合资银行，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银行机构并存的银行系统。

银行贴现 持票人持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和国库券向银行转让兑取现款，银行从票面额中扣除从兑现日到票据到期日之间利息，将余额支付给持票人的资金融通行为。票据到期后，银行凭票向最初发票的债务人和最后背书人按票面额索款。

票据贴现付现额计算公式为：

$$贴现付现额 = 票据面额 \times \left(1 - 年贴现率 \times \frac{未到期天数}{360}\right)$$

贴现利息即银行办理贴现时，从票据面额中扣除的利息，其计算公式为：

$$贴现利息 = 年贴现率 \times \frac{未到期天数}{360}$$

年贴现率是由商业银行根据中央银行再贴现率、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和票据的信用度来确定的。

贴现是西方商业银行主要放款业务之一，在中国由于商业票据使用不够发达，贴现还够不成专业银行的主要放款业务。银行贴现的票据期限较短，属流动性资产。票据到期，银行即可收回款项。在票据到期日之前，银行可持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或到其他银行办理转贴现。

银行体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银行组织与管理体制。它包括银行主体的性质，银行的组织方式，银行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种银行的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职能划分以及银行的基本行为目标等。

一个国家和地区银行制度的形成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这些历史条件包括经济和历史的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等。由于形成银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很难按某一标准对现行世界各国的银行体制加以归类。鉴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银行体制类型的多样性，只能通过归纳加以分类：①以对政府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国有中央银行为核心，以私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少数垄断性大商业银行为骨干，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具有资本主义传统的银行体制。该体制以英国为代表。瑞典、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也属此种类型，其差别在或是金融机构多元制，除中央银行外，还有其他管理机构；或是中央银行兼营商业银行业务；或是国家直接拥有商业银行。②以对政府具有较大独立性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储备银行为核心，以联邦储备体系为主体，以单元制商业银行为基础，国民银行体系和州银行体系并存，多种金融机构林立，多种金融管理机构参与管理的银行体制，该体制以美国为代表，这与其联邦制政体有密切关系。③由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对银行进行管理，中央银行对执行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发挥主导作用，大商业银行为主体，政府和私营的专业金融机构起重要作用，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银行体制。该类体制是日本、意大利、法国为代表。④以对政府具有较大独立性的中央银行为核心，州中央银行和州立银行具有相对独立性，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少数垄断性大商业银行为骨干，专业银行或其他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银行体制。该体制以联邦德国、瑞士、南斯拉夫为代表。⑤以既具有中央银行职能，又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在全国普设分支机构的国家银行为主体，辅之以少量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银行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前的中国、苏联、东欧各国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均属这类体制。该体制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该类体制正被逐步取消。⑥以作为政府组成部门的中央银行为核心，多家全国性的国营专业银行为主体，辅之以少量股份制全能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益为基本经营目标的银行体制。改革后的中国、苏联等国的银行体制均属该种类型。⑦以国有中央银行为核心，国营商业银行为主体，辅之以合作银行和各种专业信贷机构的银行体制，该体制的代表为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独立后，纷纷实行银行国有化，以保证国家独立和更好地执行国家经济政策。⑧跨国的中央银行，即一些国家本身不设中央银行，而参加某个国际或区域性的货币联盟，由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对参加国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而这些国家设立为数不多的商业银行。非洲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部分加勒比海发展中国家属这种体制。⑨不设中央银行，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金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外国银行比重较大，少数大商业银行为核心，并行使部分中央银行职能的体制。该类体制的代表是香港、新加坡、巴林。

银行承兑　银行接受持票人的付款委托，同意承担支付票据全额的义务，并以文字记载于票据上的行为。该票据为银行承兑汇票，是商业汇票的一种。它是由收款人签发或承兑申请人签发，并由承兑申请人向开户银行申请，经银行签章，承认到期支付的票据。承兑申请人在向其开户银行申请承兑时，应持银行承兑汇票与收款人签订的购销合同。银行审查符合承兑条件后，与承兑申请人签订承兑协定，办妥承兑手续后，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承兑申请人转交收款。银行在银行承兑汇票上签署"承兑"字样，并经签字或盖章，确认汇票的付款责任后，即为承兑人，成为银行承兑汇票的主债务人。承兑银行对承兑的汇票负有到期无条件支付的责任。银行办理承兑时，按票面金额的1‰向承兑申请人收取手续费，每张不足10元时，按10元计收。银行承兑既是银行对票据的票据行为，又是银行的信用行为。因为银行承兑时，没有以得到相等的对价为前提，而只是通过承兑契约，获得承兑申请人于汇票到期前交存票款的承诺。因此，银行既是汇票债务人，又是承兑申请人的债权人。银行有权对不交票款的承兑申请人执行扣款，并对尚未扣回的票款按每天5‱计收罚息。

银行信用　指银行机构提供的信用。银行把分散在社会各部门、各角落的闲置货币和未用的储蓄，通过各种方式集中起来，然后再以各种方式贷放出去，以满足社会各方面对资金的需求，起到在全社会范围内调济资金余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

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有：①自有资金。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来源于股本和盈余积累等，中国专业银行的自有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和盈余积累等。②各项存款。③借人资金。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借人资金来源于发行长期资本债券和短期借人款，后者包括同业拆人资金、购回协议、中央银行再贴现或借款、欧洲美元借款等；中国专业银行的借人资金主要指向人民银行借款和少部分同业拆人资金。中国专业银行还发行金融债券筹集资金和利用内部资金如汇兑在途资金作为其资金来源一部分。④银行券的发行。中央银行成立前，各银行都有发行银行券的权力；中央银行成立后，银行券的发行集中于中央，成为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大一统银行体制中，人民币的发行即作为整个银行系统的信贷资金来源。银行的资金运用有：①各项贷款，在中国，各项

贷款占信贷资金运用的大部分，1989年曾占到89.3%，而西方国家一般占50%左右。②投资于具有较高流动性的资产。这部分资产在西方商业银行总资产中占有较高比例，中国银行购买债券等投资业务由国家计划分配购买数额。③各项现金资产。如库存现金、准备金、备付金等。④整个银行体系的资金还运用于财政借款、金银外汇占款等。

银行信用是间接信用，银行是存款中介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克服了商业信用的局限性，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成为信用主体。但商业信用依然是整个信用的基础，银行贷款一般是针对票据进行抵押贷款和贴现。

在旧中国历史上，商业票据市场并不发达，传统的信用放款方式占主要地位。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禁止企业之间发生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一统天下，信用放款居主导地位。体制改革后，商业信用、证券、民间信用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信用制度的基础，票据抵押和贴现在银行信用中也不会占有很高的地位。银行信用在中国信用体系中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银行利率 银行制定的、适用于银行系统和与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客户之间的利率。银行利率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①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专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以中国为例，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利率有存款准备金利率，备付金利率，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有年度性贷款利率、季度性贷款利率、日拆性贷款利率、基础性贷款利率、铺底资金利率、再贴现利率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一般对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存款不计利息。各国中央银行一般对商业银行、专业银行欠交法定存款准备金给予罚息加息处理。②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对业务往来客户的存贷款利率。以中国为例，存款利率有活期存款利率、定期存款利率、零存整取、定活两便和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利率等，从1988年9月起，还对定期3年及其以上储蓄存款给予保值补贴，大额定期存单和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利率较同期定期存款利率上浮5—10%。贷款利率有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进一步区分为1年以下、1～3年、3～5年、5～10年、10年以上几种）。中国银行的存款贷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公布。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规定的幅度内，有一定的利率浮动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33年制订的Q项条例曾规定，禁止其会员银行对它们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并对其所吸收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规定了利率上限。1986年，Q项条例被正式取消。③专业银行系统内利率。以中国为例，有上存、上借汇差资金利率，邮政汇兑资金利率等。④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即商业银行、专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在进行短期资金融通时所执行的利率。在美国又称"联邦基金市场利率"。⑤中央银行兼营商业银行业务时的利率。在中国，中央银行有专项贷款业务，因而有"老、少、边、穷"开发性贷款利率、发展地方经济贷款利率、购买外汇人民币贷款利率和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利率等。

银行国有化 指国家政权把主要银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把银行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银行国有化的设想。列宁也曾指出：大银行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只是砍掉使这个机构产生资本主义畸型发展的东西，使它成为更民主、更巨大、更包罗万象的机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即开始接收私人银行，到1918年就基本完成了银行国有化。我国银行国有化道路不同于苏联，其途径多种多样，有合并解放区银行；取缔帝国主义银行；没收官僚银行；改造民族资本银行；发展农村合作信用。银行国有化，有助于国家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但也带来一系列弊端，特别是银行资金营运效益低下。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建立单一中央银行实行两级银行体制后，改革国有银行的管理体制，实现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分离，实现专业银行的企业化经营等，迄今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具体的模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实行银行国家化，但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原则区别，它们通常采取收买、参与入股、有偿接收等措施将私营银行逐步改造成为国家银行。一些殖民地国家在独立以后，也纷纷对原有的外资银行和本国私营银行实行国有化，有助于国家独立和摆脱外部控制，有利于积累资金和实现工业化，但也带来资金配置效益低下，贪污腐化等一系列弊端。

银行负债业务 银行以负债方式筹集信贷资金的业务，是银行开展资产业务的基础和前提。银行开展负债业务的方式主要吸收存款和借款，其中存款是最主要的。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和储蓄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可供开列支票用于提取现款和转帐支付。对活期存款一般不支付利息，有些国家还对活期存款客户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所以，银行不能以利率为竞争工具，只能以服务来争取客户，开展此项业务。60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占其整个资金来源的比重

有下降趋势。以美国为例，已由1960年的61%下降到1983年的19%。中国是少数几个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国家之一。储蓄定期存款主要包括存折储蓄存款和定期存单。使用存折储蓄存款帐户的客户，可以在任何时提款，但需要在提款前30天通知银行。定期存款的存款者如提前提款，则要被取消利息。但由于定期存款利率较高，特别是大额可转让存单发明后，定期存单的增长率要大大高于存折储蓄存款的增长率。银行在开展储蓄定期存款业务的时候，可以利率为竞争工具，但存款利率的高度一般受到金融当局的限制。就单个银行而言，很难以增加利率来扩张存款。银行一般通过提供广泛，有效的服务来争取客户。银行通过借款来筹集信贷资金的方式主要有：①向中央银行申请贴现或借款。②同业拆借，即需要准备金的银行向有超额准备金的银行借款；③购回协议，银行出售证券获取资金，并承诺在未来某日购回该项资产；④向国外分支行、持股公司、附属机构等借款；⑤长期资本债券，即银行承诺活期付息、定期还本、期限一般为25年的债券；⑥通过发行期票和商业票据借款；⑦中国专业银行向城乡个人发行、按期还本付息的金融债券。

银行经营业务必须兼顾资产和负债的盈利性和流动性。60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逐步盛行通过"负债管理"保持银行的流动性，通过积极出售债务，从不同渠道借入资金，来调整负债结构，以适应既定的资产增长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推销可转让存单。进入80年代以来，西方各商业银行纷纷流行"资产负债管理"，或称"相机抉择的资金管理"，把资产和负债结合起来，根据比较成本和比较风险，通过资产和负债项目内替代物之间的选择来筹集和安排资金。

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指社会各团体和个人拥有的对中央银行的债权，它大体包括：①财政性存款，主要指金库存款，中国还包括机关团体等存款；②国内金融机构存款，主要指法定存款准备和超额准备金；③国外存款；④其他存款，如中国邮政部门的邮政储蓄；⑤流通中现金，这是中央银行最大一项负债项目。在中央银行负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变动其内部各项目的具体数额，将影响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整个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的负债总额由中央银行的资产运用所决定。

银行资产业务　银行运用信贷资金的业务。商业银行、专业银行运用信贷资金的主要形式有：①现金资产，它是银行资产中最富有流动性的部分，但其盈利性较差，有些几乎为零。包括库存现金、存放于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入于同业的存款和各种应收支票和票据等；②具有较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如政府国库券、短期贴现的票据、同业拆放；③放款，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其盈利率高，但风险大；④证券投资，购买政府发行或公司企业发行的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有价证券。银行在开展资产业务时，要兼顾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西方商业银行是股份制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但它不可能把信贷资金都运用到盈利率较高、流动性较低的放款形式上。银行的负债结构不同于一般企业，它需要流通性，需要一些能很快变成现金而其价值几乎不会损失的资产应付存款者提现和支付需要。因此，银行需要将其资金运用到除放款以外的其他形式上。但银行也不能把其信贷资金全部运用到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上，这样将无法补偿其经营成本；特别是放款不同于证券投资，放款牵涉到银行与客户、银行与其竞争行的关系。银行贷款后，客户除将存款存入该行外，还会加强其他方面的业务往来，如汇兑、信托等；银行若拒绝贷款，则与企业间的一系列业务往来将流入其他银行，因此银行十分重视放款业务，并提供各种服务来配合放款业务，如分期付款和租购业务等。为避免利率变动给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银行对贷款客户实行浮动利率制。

60年代以前，西方商业银行主要通过"资产管理"来实现银行的流动性。即通过将银行的资产与负债的偿还期保持高度对称关系，持有较高比例的流动性资产，特别是短期政府证券，来实现银行的流动性，通过将证券和放款的种类分散，避免集中于某种证券或放款，来避免银行的风险。60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逐步盛行"负债管理"，即通过积极出售债务方式来调整负债结构，以适应资产增长的目标，但这种方式风险较大。在美国商业银行开展的资产业务中，以现金形式和持有政府证券形式的资产占其资产总额的比例已大为下降，而各类贷款占资产总额的比率却由1960年的46%上升到1983年的56%。银行流动性下降，风险增大，贷／存比由1960年的51%上升到1983年的73%。进入80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逐步推行"资产负债管理"，又称"相机抉择的资金管理"，把资产和负债结合起来，根据比较成本和风险，在替代物之间进行选择，以最低的成本来筹集资金，或以最大的利润来处置剩余资金。

中国专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主要有：①各项贷款；②购买有价证券；③备付金；④向中国人民银行缴准备金；中国各大专业银行在开展资产业务过程中，要受到中央银行关于贷款限额、固定资产贷款限额、购买国家有关部门发行的证券计划额的限制，各大专业银行在实行企业化管理中，还要按照有关部门的计划，发放一部分政策性贷款。

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大体包括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和再贷款；对财政和国内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

款；黄金外汇储备占款；购买各种证券，其他资产等；中国人民银行没有购买各种证券的业务，但有对某些地区、行业、项目发放专项贷款的业务。中央银行的资金运用决定资金来源。中央银行通过开展资产业务，来改变其资金来源及其中的基础货币，从而达到影响货币供应量的目的。

银行中间业务 银行经营的一些不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附属业务和提供的与银行业务密切相关的服务，并赚取一部分手续费收人。银行最重要的中间业务是信托业务。银行设立信托部，信托部作为受托人，代他人持有资产。它或者受客户委托代客户管理各项财产、资金和遗产；也可受托代客户运用资金并投资于不同形式的资产；对某些信托基金，则仅仅提供投资建议。银行通过这些活动，收取服务费或佣金。受托资产不属于银行资产。保管箱是银行的另一项重要的中间业务。商业银行设置大小不同的保管箱，供客户租用保藏贵重饰物和重要文物；或设夜间保管箱，供客户在银行休息时能暂存现金。银行控股公司除控制着一家或一家以上的独立的银行公司外，常常也还控制着银行之外的公司。银行控股公司拥有各种非银行附属机构，从事与银行有关的各项活动，如对消费者放款、购进工商企业对消费者的债权；发起、销售、办理房地产抵押；提供经济和金融分析与咨询；对进出口供应资金；购买卡车、飞机等设备，并将出租等。银行的这些中间业务增强了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

银行信贷管理体制 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上下级行之间关系信贷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权责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全相同，信贷管理体制也有较大差异，即使一国之内，不同时期的信贷管理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从高度集中管理走向权限下放。建国以来，我国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大致经历过以下四种形式。

统收统贷。即基层银行的一切存款上缴总行；一切贷款由总行按项目核批指标给分行，各分行又将指标分批给支行，各支行在指标范围内贷款。各项贷款指标不能相互调剂使用，“打油的钱不能买醋”。除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如突破指标，基层银行可边贷边报外，其他贷款如额度不够，须按程序，事前申请追加指标，经批准方可增加贷款。我国从建国初到 1979 年，中间除 1959 年至 1961 年一段时期外，基本上都实行这一套体制。这与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

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动。即除了由总行管理一部分存、放款外，其余存、放款都交由省级分行统筹管理。总行对分行实行差额包干办法，按计划分行存款大于贷款的，多余资金上缴总行，放款大于存款的，资金缺口由总行调剂解决。该办法从 1959 年起实行，其目的是调动地方政府部门管好信贷资金的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益。但由于不少地方借此滥放贷款，致使信贷规模膨胀，货币超量发行、产品积压、基建膨胀，财政虚收实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衡。因此，1961 年 4 月取消了该办法。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即总行对分行下达年度信贷计划时，同时下达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有关项目的差额。资金来源大于运用的差额为存差，多余资金上存总行；资金运用大于来源的差额为借差，不足部分向总行借用，无论对总行是上存或借用资金，均按联行计息。各分行在不突破差额包干的前提下，工商业贷款指标可相互调剂使用；多吸收的存款和节约的信贷资金，可用于增加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该体制在 1980 年在全国推行。该体制与“统收统支”体制相比，能促进各级银行积极组织存款和合理运用信贷资金，提高它们的经营管理水平。该体制的主要缺陷是，在现代银行制度贷款决定存款的条件下，若存贷挂钩没有限制，“多存多贷”可能变为“多贷多存”，通过派生存款扩大信贷规模，不利于货币流通的稳定。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该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在①财政性存款划为人民银行的信贷资金；专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按一定比例交存人民银行并归其使用，这实际上就是交存法定存款准备金，这样也可对专业银行信贷规模加以控制了。②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各类信贷计划指标的管理分两类：一类为指令性指标，如存贷差额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年末计划和年内发放计划、农业贷款年末计划和年内最高额计划，该类计划未经批准，不准突破；另一类是指导性计划，如各项存款计划、工商流动资金贷款计划等，该类指标在存贷差计划内，实行多存多贷，各类贷款指标可调剂使用。

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1985 年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就是各专业银行的人民币信贷资金，必须全部纳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由人民银行综合平衡，并核定各专业银行信贷资金计划和向人民银行借款计划。划分资金，就是各专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和其他各种信贷资金，经人民银行总行核定给专业银行总行后，作为各行的营运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实存实贷，就是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改变计划指标层层下批的办法，实行上贷下存的实贷实存办法。相互融通，就是允许资金的

横向调剂，地区内各银行之间可相互拆借。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贷款和专项贷款为指令性指标。

实行这一新体制时，人民银行还同时确定了贷款总规模，并通过专业银行总行逐级下达。贷款总规模，在一般情况下为指导性计划指标，多存可以多贷，但其中的固定资产贷款规模实行指令性控制。1985、1988、1989年实行银根紧缩时，对贷款总规模又恢复指令性控制，未经上级批准，不准突破。从1989年起，贷款规模改为最高贷款限额，实行"限额管理、以存定贷"方法。贷款最高限额为控制贷款总笼子。各银行金融机构，在核批的贷款限额内，主要通过组织存款来实现这一限额。以省级和计划单列城市为单位，从全年考核"以存定贷"。对这一贷款最高限额，实行"全年亮底、按季监控、按月考核、适时调节"的办法。这套方法既有利于打破资金大锅饭，又有利于控制贷款总规模增长。但也给专业银行带来了有资金无指标、或有指标无资金等问题。

弹性货币供应　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货币政策主张，即通过放松或抽紧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变动，进而影响市场利率升降，投资相应增减，使总需求达到预期的水平。凯恩斯主义认为对于经济发展的一定速度和市场物价稳定的一定要求来说，货币流通的容量有一定的幅度。有时，货币发行量可能超过或少于流通中客观需要的增长量，但不会影响物价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甚至还需要超过客观需要量增加货币供应，以推动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在弹性限度内对流通中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即为弹性货币供应。在货币弹性限度内，货币发行量与客观必要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属于正常的货币流通。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许多国家采用这一政策主张，通过中央银行调整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卖出政府债券及改变对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率等措施来控制和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

弹性货币　能适应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灵活地增加或减少其供应量的货币。现代各国发行的货币，都是不兑现的纸币，这是一种发行上可以伸缩自如的货币，因而是富有弹性的货币。在纸币流通条件下，没有货币金属和金准备量限制，纸币发行量可以充分满足商品流通对于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要。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操纵货币供给，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按经济发展的需要，放松或紧缩银根。但是，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就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应当指出，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实际的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可以存在一个货币容纳弹性区域。当货币供应量在一定范围内超过或低于货币必要量，在这个区域内，价格不会随之上涨或下跌，货币流通依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目前，对于弹性货币的含义还有另外一些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弹性货币专指足值货币。足值货币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具有弹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弹性货币是指典型的银行券。典型的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黄金，也可代替金属货币在流通中发挥作用。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弹性货币是指能灵活转化存在形式的货币。流通中的现钞和存款货币可互相转化，都具有一定的弹性。由于存款方式不同，转化频率不同，弹性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活期存款弹性较大，定期存款弹性较小。

弹性预算　又称"变动预算"。为"固定预算"的对称。指企业在不能准确预测业务量的情况下，根据收入、成本同业务量之间有规律的数量关系，按一系列业务量水平编制的具有伸缩性的预算。由于弹性预算是按照一系列业务量水平编制的，所以，它能够在不同的实际经营活动水平下保持它的适用性。只要各项消耗标准、价格等编制预算的依据不变，弹性预算就可以连续使用下去，不必每月重复编制。

隐性征税　特指不依据税法规定而实现的一部分资源转由政府所有和支配的现象。在现实经济中，隐性征税主要有五种形式：（1）铸币税。在较早的贵金属铸币时代，一般作法是降低贵金属铸币的成色和重量，其实际币值低于名义币值的差额便构成隐含的税款。在货币符号时期，增加货币本身的发行成为铸币税的演化形式。在资源总量既定时，铸币税使政府吸收了纳税人原有的一部分资源，这相当于对纳税人进行了隐蔽性征税。（2）政府专卖产生的隐性征税。政府专卖条件下实行垄断经营和垄断价格，可以将税款加于专卖物品的垄断价格之内。这样，购买者在支付专卖物品价格时就隐蔽性地向政府缴了税款。（3）差价税。一般的差价税是由政府对农副产品的统购形式。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统购价向农民统购农副产品的过程，就是隐蔽性地向农民征税的过程。（4）通货膨胀税。货币既是政府的一项负债，也是公众的一项资产，降低其实际价值相当于减少了政府的未偿实际债务。这样，公众持有的货币资产实际价值降低所形成的净损失额，便转化为政府的"收入"，使政府受益。这是现代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隐性征税形式。（5）对固定资产存量的隐性征税。表现为少计折旧带来的虚增利润中的相当部分通过征收所得税隐蔽性地转为政府的税款，实质上是以折旧成本补偿不足为基础，有损于赋税的经济潜力。

从历史上看，隐性征税是政府弥补一般赋税手段

不足以满足财政开支的一种辅助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失为筹措财政收入的一条重要渠道。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会对经济和财政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综合财政 是研究国家财力综合管理的科学。它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国家总财力及其投向、国家财力各组成部分（环节）之间必要的量和质的相互关系，以寻求国家财力分配的最优比例和使用的最佳效果，为国家制定合理的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综合财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所特有的经济管理范畴；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它往往以计划的形式出现，成为国家对国民经济全部可支配财力进行综合平衡的重要手段。

加强对综合财政的科学管理，要求对综合财政各类资金的收支情况和运动规律分别进行研究。综合财政资金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如下若干种分类：1.按资金的性质进行分类，可包括国家预算资金，预算外资金，城乡集体企业税后利润，银行信贷资金，国外债款，城乡居民存款和手持现金等。这种分类能够全面反映不同性质资金的收支情况，按照目前的统计体系也比较容易取得数据资料。2.按资金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进行分类，包括①中央财力，即由中央各部门直接支配的财力，其中有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央各主管部、局直接支配的资金和中央统借统还的国外资金；②地方财力，即由各级地方政府掌握和支配的财力。这部分资金分散在省一级政权、市一级政权、县一级政权和乡一级政权手中；③各单位自行支配的财力，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农业、商业、外贸、交通、建材等企业的专用基金和税后利润，各种形式金融实体的自有资金以及行政事业单位自行支配的预算外资金；④信贷资金，即掌握在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手中的非财政性存款；⑤个人财力；⑥外商直接投资。这种分类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有助于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特定政策，在不同的资金所有者和支配者之间确定合理的财力划分，也有助于国家针对不同资金具有不同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的特点，制定适当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资金纳入计划的轨道。3.按增量资金和存量资金进行分类。包括：①国民收入，即当年新创造的财富；②历年滚存财力，表现为银行的债权债务和财政的结余赤字；③企业固定资金；④库存物资占压的资金。这种分类把存量资金纳入综合财政资金的范围，它有利于扩大综合平衡的视野，有利于国家和企业深入挖掘资金潜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综合财政理论最早出现在苏联专家的学术论著中。我国是在50年代初提出综合财政问题的，并几次试编过综合财政计划，对平衡全社会财力，加强宏观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资金的运动呈现出相互交错、纷繁复杂的局面。因此，研究综合财政理论，充分发挥综合财政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合财政计划 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反映和平衡各种资金的计划。综合财政计划包括国家预算收支、预算外资金收支、银行信贷收支、现金收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企业的财务收支、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等。编制综合财政计划，是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更好地组织财力、物力、人力的综合平衡；可以分析国民经济计划是否同各种财力相适应，是否同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适应，可以反映国民经济计划中各种比例关系是否协调，促进和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综合平衡 指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和再生产各环节的重要比例关系进行统筹安排，以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平衡。综合平衡不同于单项平衡，也不同于局部平衡，它是宏观上的平衡，是从宏观上组织、安排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使社会生产的各种经济技术联系，在时间上前后衔接，在空间上相互协调。综合平衡既是计划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是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是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综合平衡。⑴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平衡。财政和信贷是国家有计划筹集和分配货币资金的两种形式。两种形式之间既有明确的分工，有不同的特点，又相互制约，相互联系。财政性存款是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同时，国家预算也要向银行增拨信贷资金。只有在财政收支平衡，能够提供财政性存款和按预算保证增拨信贷资金的情况下，信贷收支才能平衡。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赤字，往往导致信贷收支不平衡；信贷收支不平衡，必然增加没有物资保证的货币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可见，财政收支状况对信贷收支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信贷收支对财政收支也有积极的反作用。信贷机构积极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合理发放贷款，按期收回贷款，缩小信贷收支差额，从而减少财政增拨信贷资金，这无疑有利于财政收支平衡。为保证财政、信贷的平衡，必须对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统一安排，做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各自平衡，在此基础上进行两者的综合平衡。

②财政、信贷资金与物资的平衡。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都是货币资金的运动形式。国家通过财政和信贷的形式把货币资金集中起来再分配出去，形成社会

购买力，形成为物资的需求。为了使物资运动与资金运动协调起来，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所形成的货币购买力与国家所能支配的物资必须在总量上，构成供求得平衡。如果通过财政和信贷分配出去的货币资金在总量上或结构上和物资供应不平衡，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和国民经济的波动。财政、信贷资金和物资的平衡对于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至关重要。

③外汇平衡。外汇收支也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物资运动的，外汇收支状况对社会商品的供求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及使用，对信贷收支和货币流通都有直接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由国家统一管理。进出口贸易的盈亏由国家财政统一负责，外汇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信贷计划外汇占款的增减，也影响财政预算和物资分配计划。外汇收支必然通过财政、信贷和物资计划平衡反映出来。因此，实现外汇收支平衡，才能为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提供条件。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外汇平衡和物资平衡四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搞好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综合平衡，是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绿色货币　欧洲共同体国家为实施共同农业政策而采用的一种象征性通货。是一种专门用来计算共同体各国农产品的共同价格的计价货币。共同体理事会为了统一农产品价格管理，制订了目标价格、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三种价格，且均以欧洲记帐单位来计价，由于各国货币的升贬值情况不一致，因此，用欧洲记帐单位计算的共同价格难免发生变动。为了维持共同价格，共同体理事会几经调整对策，最后在60年代末形成了脱离市场汇率的、专门用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农业产品贸易计价的专用汇率，当时称为绿色汇率。以后，各成员国的货币贬值或升值时，均采用这一方法。于是，共同体各成员国在实施共同农业政策时，就专门采用一种以绿色汇率同欧洲记帐单位挂钩的，用于国内农产品计价的象征性通货，它们被称为绿色货币。如法国法郎以绿色汇率与欧洲记帐单位挂钩，用来计算法国农产品的共同价格时，该法郎就被称为绿色法郎。

十二画

窖藏　亦称“货币窖藏”或称“货币埋藏”。朴素的货币贮藏形式。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把剩余的财产化为货币（金或银），作为财富埋入地下或藏入地窖。由于将货币埋藏起来，市场货币数量减少，引起金银从国外流入本国市场。

滞纳金　对不遵守纳税期限纳税的单位和个人，依税法规定，按其滞纳税款加收的一定比例的款项。滞纳金应按缴款书上的纳税期限的次日算起，按日计划加收。现行各税税法规定，有按滞纳税款按日加收千分之一的，有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计算公式为：

滞纳金金额＝滞纳税款×滞纳金比率×滞纳天数

税收滞纳不仅是违反税收纪律的行为，而且占用了国家资金，影响了财政资金的调度使用。在追缴税款和加收滞金时，如税务机关催缴无效的，可以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扣缴入库。

游资　是国际资金市场上短期的、流动频繁的、不稳定资金，又称“热币”。这种资金的特点是非常活跃，转移不受限制，移动速度快、对外界因素的敏感性强，因而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资金市场的冲击干扰作用较大，政府对其进行约束管制的效力不大。游资的规模和游动速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有：①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为其进行的短期资金交易增多；②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缩短了国际资本投资的期限，短期不确定性投资增多；③利率、汇价、金价、油价等的不稳定性增强促使流转于各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大量增多；④各国外汇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及交易的自由化为游资的活动提供了宽松条件。对于一国来说，游资的过多必然会影响本国资金市场的利率和外汇市场的汇价，干扰货币金融当局的货币金融政策，并影响该国国际收支差额的稳定性。因此，尽管货币当局对游资不可能施加严格管制有效控制，但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各种间接手段对其进行引导和利用，以减少它的干扰性和不稳定性。可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利率政策或贴现率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降低利率促使外资流出；其他如改变税收政策、调节汇率水平等措施也有一定效果。计划经济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来严格限制资金的短期频繁移动。

超额准备 亦称“超额准备金”。总准备金减去银行或存款机构按货币当局规定必须保留的法定准备金后的剩余部分。超额准备对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规模有很重要的影响。超额准备的增加，意味着该银行的潜在放款或投资能力增强，但在这部分准备金未动用之前，超额准备越大，潜在的利息损失也越大。由于超额准备的形成实际上是银行有扩张能力却没有扩张到最大限度的结果，同时保留超额储备大都是以预防意外的大额提现，或是为了购买证券，所以，在西方有许多经济学家又把超额准备称为风险准备。

超额准备金 参见“超额准备”。

超额准备比率 商业银行超过法定要求数量保留的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超额准备比率在货币扩张中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超额准备比率决定于商业银行在诸多因素下形成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又取决于其决策意向，所以，许多货币经济学家在分析超额准备率时总是将实际超额准备比率与意愿超额准备比率相区别，同时又常常假定银行实际保有的超额准备大体等于其意愿超额准备比率，这实际上是在分析中暂时撇去超额准备调整可能障碍和时滞。对银行意愿超额准备比率有影响的经济因素主要有：利率、再贴现率、准备金流量与法定准备金的变动、大众持有现金或定期存款的偏好等。在货币扩张中，超额准备比率的变动与货币乘数的变动呈负相关关系。由于超额准备金的相对增加，会提高银行非盈利资产对生产资产的比重，所以超额准备比率，也是货币政策变动和货币存量调整中的一个重要中介环节。

超收分成 指地方当年实现的收人超过中央核定的年度指标的部分，由中央与地方按规定比例分享，其中地方所得作为地方机动财力。1976 年开始对超收分成比例作了如下规定：凡地方总额分成比例在 30%以下的，超收部分按 30%分成；总额分成比例在 70%以上和受补助的地区，超收部分按 70%分成。1979 年又将其比例改为：地方总额分成比例在 50%以下的，按 50%分成；在 50%以上的，在确定的分成比例的基础上再加 10%

超额累进税率 指对征税对象的全部数额，分别按规定的各个级距的适用税率计算征收的一种累进税率。即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分为若干个等级。各等级分别适用相应的等级税率征税。当征税对象超过某一级距时，仅就超过的这一部分按较高一级的税率计税。而不象全额累进那样全部都按较高一级税率计税。由于超额累进税率累进速度较为缓和，世界各国的所得税多采用这种税率。

超定额借款 在我国，指企业为解决由于季节性和临时性原因造成超定额的流动资金需要而从银行取得的借款。企业须事先提出计划，由银行根据贷款原则，结合企业的产供销情况和经济合同，逐笔核定借款数额和规定归还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企业借人超定额借款，必须按计划使用，有适用适销物资为保证，借款到期或借款条件消失，必须及时归还和支付利息。例如，在规定的期限内，超定额储备的物资一经使用和销售，企业应即归还借款，以保证借款的增减与物资储备的增减相一致。

超倍累进税率 从超过税基的一定倍数起计算征税，按不同超倍数采取的不同累进税率。我国 1987 年开征的个人收人调节税对部分收人来源采取了超倍累进税率计征。即将个人收人按全国不同类别的工资地区（工资类别按国家统一规定）划分为 4 个档次，每个档次都确定一个计税基数，以这个基数为 1 倍，未超过基数 3 倍的部分不征税，从超过基数 3 倍的部分起，按不同超倍数采用不同累进税率计征。

超率累进税率 以销售利润率或企业工资总额增长率超过一定标准为依据，规定若干征税级距和等级税率，各就其超过部分，分别适用相应等级税率的征税制度。我国现行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采取的就是这种税率制度。就同是对利润所得的征税来说，超率累进税率与超额累进税率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利润率的高低为依据来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而后者是以利润所得的绝对数金额大小为依据来确定高低不同税率的。因此，利润所得金额大，而利润率低的纳税人在超额累进制度下，缴税较多，负担较重；在超率累进税率制度下，则缴税较少，负担较轻。而利润所得金额小，利润率高的纳税人，在这两种不同税率制度下，则情况正好相反。

超储积压贷款 流动资金贷款的一种。银行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超储积压物资所引起的资金需要而发放的贷款。临时贷款按有关利率上浮计收。

超级货币市场 即“欧洲货币市场”。亦称“国际货币市场”、“境外货币市场”、“欧洲市场”。经营欧洲美元和一些主要国家境外货币交易的国际借贷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种新类型。广义的欧洲货币市场不仅包括欧洲各主要金融中心，而且包括中东、远东、加勒比地区、加拿大和美国的主要金融中心。狭义仅

指伦敦、卢森堡、法兰克福、巴黎等欧洲金融中心的境外货币市场。

从 50 年代起，美国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大量美元流入西欧各国，逐步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此外，西欧其它各大金融市场逐渐开始经营欧洲美元业务。随着美元危机的频频爆发，一些可以自由兑换的西方主要货币也逐渐成为经营对象，出现了欧洲英镑、欧洲西德马克、欧洲瑞士法郎、欧洲法国法郎、欧洲荷兰盾等一系列欧洲货币。人们就把这种扩大了的欧洲美元市场统称为欧洲货币市场。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各种货币的存放、借贷都是在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境外进行的，这些国家对之无从加以管制，不仅调拨方便，还可以获得比国内优惠的利息收入；同时欧洲货币市场所在国为了吸引大量外资，又都采取免税和不征收存款准备金等一系列鼓励措施，这些都为欧洲货币市场业务的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欧洲货币市场的业务包括银行同业之间的交易和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交易两部分。就资金借贷的期限、方式和业务性质而言，又分为欧洲资金市场和欧洲资本市场。欧洲货币市场在国际资本转移中起了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与其它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资本转移的渠道相比，其规模也是首屈一指的。在欧洲货币市场上经营借贷业务最为活跃的是国际收支出现困难的一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和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也参与了这个市场的活动，我国吸收的一部分资金也来自这个渠道。应该看到，欧洲货币市场是一个活动量巨大的国际性市场，不受任何国家的法律约束和限制，具有极大的竞争性、投机性和破坏性。(1) 经营欧洲货币业务的银行承担的风险大。由于银行发放的长期信贷资金大部分是从客户吸收来的短期存款，一旦银行信用出现问题，引起客户大量提存，不会使它陷入绝境；(2) 欧洲货币市场的业务可能影响各国金融政策的实施。西方国家为了遏制通货膨胀，采取提高利率，紧缩信用的政策，但各商业银行却从欧洲货币市场借入大批资金，在国内投放；如果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改行降低利率、放松信用的措施，各银行又把资金调往国外。这样就使政府的金融政策受到削弱，预期目标难以实现；(3) 欧洲货币市场还会加剧外汇市场的动荡。欧洲货币市场上庞大的资金具有极大的流动性，时而抢购黄金，时而抢购硬币，还通过套汇兴风作浪，进行投机，造成外汇市场的剧列动荡。

硬预算约束　指资金运用不能超过资金来源的原则对经济主体行为的限制。企业硬预算约束的主要特征是：投入成本和销售盈利是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企业技术进步和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只能靠内部积累；企业必须适应价格，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必须承受外部环境和自己行为的后果；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受购买价格和收入的限制。保证企业硬预算约束的条件至少要 5 个。第一，外生价格。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不是价格的制订者。第二，税收制度是硬的。企业不能左右税则的制订，不能得到任何例外的税收减免，税额按规定条款无条件地征收。第三，不存在无偿的国家拨款。第四，不存在信贷。全部投入品的购买都必须用现金支付。第五，不存在外部的货币投资资金。企业所有者从企业提取的利润不能再投资到企业中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五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永远难以得到完全满足的，纯粹硬预算约束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少见，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也存在预算约束软化的倾向。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企业和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或比较硬的；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家庭的预算约束也是硬的。

硬贷款和软贷款　指世界银行组织对其成员国发放的条件不同的两种贷款。世界银行为了资助其发展中的成员国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开发落后经济，从而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向其会员提供贷款（其另一机构，国际金融公司，主要从事成员国私有经济的开发援助）。由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条件一般较严格，因而称为“硬贷款”。其具体条件为：全部为有息贷款，利率依据市场利率水平而定，并实行浮动利率，定期调整；期限从 15 年到 25 年不等，平均偿还期为 17.5 年，宽限期为 4 年；对已承诺而尚未支付的贷款额收取 0.75%的承诺费。而由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贷款因其条件极为优惠，属开发性质，称为“软贷款”，又称“开发信贷”。其条件为：贷款全部为无息的，仅收取年率为 0.75%的手续费；对已承诺尚未支付的贷款收取 0.5%的承诺费，转化为年率约 0.41%；贷款期限长，可达 35 年，其中宽限期为 10 年。因此贷款总成本是相当低的。世界银行贷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贷款一般为“项目贷款”，用于基础设施、能源开发、农业发展、环境改善、教育、公共工程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有较大促进作用。但贷款的提供程序和周期较复杂，每笔贷款的取得从申请到投入生产往往需要 1～2 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且，条件越优惠，取得越困难。开发协会的“软贷款”只提供给最贫穷的成员国，信贷有明确的分配标准。包括：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借款国的信誉、受援国的经济成就、人口规模等，并规定，能以合理条件从其他途径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贷款的国家不能获得此项贷款。对于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410 美元以下的国家有条件取得“软贷款”；

在410—806美元之间的国家只能得到部分"软贷款"和部分"硬贷款"；在806美元以上的只能取得"硬贷款"，随着受援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发协会可以逐渐取消对受援国的贷款。

期货交易 是商品、外汇、有价证券等交易的买卖双方签定协约，约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地点按约定的价格和数量进行交割和交易。期货交易最早起源于商品期货交易，19世纪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成为第一个期货市场，经营的期货商品种类不断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已包括各种农产品、畜产品、矿产品等几乎所有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从70年代开始，出现了外汇、有价证券、利率等"金融商品"的期货交易，从而期货交易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进一步扩大。

期货交易均是按照严格程序在交易所内完成的，并且必须有交易所中的会员公司（即清算银行）参加。买卖双方通过交易所的经纪人（有时由清算公司代理或指定）达成协约，签定合同，在清算公司监督下到约定的一定时间后进行实际交割，交割往往也是分别与清算银行进行的，期货交易的双方必须向清算银行或经纪人支付一定比例的佣金。期货交易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保值，避免将来市场价格变化的风险。例如，一家公司需要在3个月后购进一批棉花投人生产，但预计3个月后是棉花旺季，价格将上升，这家公司现在便可以从市场上买入3个月期棉花，双方确定的价格虽不是现货价，但也不是交割时市场上已上升的价格，从而起到保值作用。二是投机，期货交易为许多投机者提供了有利机会，他们不从实际需要出发，而纯粹为了赚取市场价格变动所带来的价差利润。例如，某商人预计6个月后石油价格上升，便在市场上以特定价格买入6个月期货，3个月后油价现货已涨，这时他可抛出其期货合同，赚取利差。投机者还可以通过现货与期货之间的价差及其变化预期进行买空卖空活动。

期货交易的产生是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高度发展的产物，它丰富和完善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业务和种类，既为生产和投资提供了方便，又为资金所有者提供了更多投资或投资机会，因此自产生以来便迅速发展。目前的期货市场已不仅仅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东京、纽约、法兰克福、香港等其他金融市场也开始建立了期货交易市场。但是，期货交易的发展同时也对金融业产生了较大冲击，大量投机活动的存在，使金融市场价格频繁波动、市场风险丛生，脆弱性增强，对经济稳定起了不良影响。为此，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采取措施、制定立法来管理期货交易及其参与者，从而保护市场，稳定经济。

赔偿准备金 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之一。准备用于赔偿保险事故的资金。包括财产险准备金、人身险准备金和总准备金。财产险准备金和人身险准备金均按一定比例提存，分别存储，不得挪用；总准备金是从经营收入中提存，只有在当年保险费收人和准备金不敷使用时，方能动用。为了确保履行保险责任，国家规定了各种准备金的提留比例，并规定总准备金必须达到足够补偿的一定额度后才能上交财政。地方各级保险公司提留的各种准备金，应按一定比例逐级上交总公司统筹使用。

集中纳税 指进出口总公司（对外贸易部所属，下同）进口合同货物应向订货部门收取的关税，由进出口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计征关税、集中向中央总金库交纳的办法。这是为了简化纳税手续、保证税款及时人库和便利国营企业单位经济核算而制定的。具体办法是：进出口总公司进口的国家合同货物，一律由总公司根据收取货款的单据或国外帐单（补收货款的，同样办理）计征税款。总公司在向订货单位办理收取货款的同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代替海关计算关税，填写在收取货款的单据上，送交订货单位，各订货单位在收到该项单据后，将税款按照"交纳贷款办法"的手续和期限，连同货款一并通过银行结算，拨转总行（中国银行总行）总公司的帐户内。但是，各进出口公司订购进口的货物，如属于按统一作价办法作价的，在进口时，仍按现行集中纳税办法办理申报交验手续。如属于不按统一作价办法作价的，则由各进出口总公司按现行办法向海关管理机构办理纳税手续。以后，为了便于工作，又将向海关管理机构办理纳税手续的规定改为向北京关办理纳税手续。因此，今后各总公司订购进口的货物，凡是不按统一作价办法办理的，一律向北京关交纳关税，并在向进口地海关申报进口时，应在进口报关单或明细单上注明"非统一作价货物，在北京关交税"字样，以示区别。

集中缴库 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的一种方式。由企业主管部门或主营企业机构为缴库单位，集中解缴利润的方式。企业将应解缴的预算收人，按时汇解到主管部门或主管企业机构，由主管部门和主管企业机构集中就地解缴金库；企业的亏损，亦由主管部门或主管企业机构，集中就地办理退库弥补。集中缴库方式适用于那些企业效益统一由其主管部门核算的企业。如铁路、邮电、外贸等。由于集中缴库方式是由少数特定企业的主管部门将所属企业的缴库款项集中汇总后上缴国库，客观上就存在着其主管部门将所属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的盈亏相抵后人库的可能，这就不利于亏损企业挖掘潜力，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所以，

对集中缴库单位的范围要严格控制，不得随意扩大，未经同级财政部门的批准，任何单位的主管部门不得随意将就地缴库改为集中缴库，以确保国家收入的稳定。

集团购买力　又称"社会集团购买力"。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用于购买公用物品和劳务的货币支付能力。包括购买办公用品、文娱用品、书报杂志、交通用具、劳保用品、炊事用具等方面的支出。集团购买力是社会商品购买力的组成部分。从集团购买力的来源来看，厂矿企业主要来源于经营收入，其他单位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就性质来看，集团购买力基本属于管理费用支出。集团购买力主要是各单位的管理费用支出，同时它同居民购买力争夺货源，在社会商品可供量一定的条件下，集团购买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居民购买力的实现程度。因此，对集团购买力应加以严格控制。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有利于调节社会商品购买力与社会商品可供量的平衡，有利于减少国家财政支出，保持货币流通和物价的稳定。对企业来说，减少这方面的费用支出，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集团持币量　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保留的库存现金。按照我国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单位必须把收入的现金及时送存银行，支出的现金要通过银行提取，一般不准坐支。为了保证现金管理单位日常现金支付的需要，国家规定在库存现金限额内，单位可以保留一定数量的现金。加强集团持币量的控制与管理，防止现金流失和非法挪用，是我国现金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集市交易税　对在集市上出售税法列举征税的应税产品，由出售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一种税。集市交易税是为了配合集市贸易价格，加强市场管理，平衡税负，保护农民合法交易，于1962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集市交易税试行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征税办法而开征的一个地方性税种。1966年后，财政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对集市交易税保留税种，暂停征收。目前多数地区已停止征收，只有个别地区还在继续征收，征收品类极少。集市交易税的纳税人是在集市上出售税法列举应纳税产品的单位和个人。集市交易的征税对象是税法列举的家畜、家禽、肉类、蛋品、干鲜果、土特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等7大类。具体征税对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选择产品列举品名征收。采用比例税率，按实际成交价格计征。

储蓄　储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储蓄指收入用于消费后的剩余部分。没有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无论是存入银行、还是购买有价证券或者以现金形式保存，都称为储蓄。在西方国家，储蓄涵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个人净储蓄。指个人可支配的收入中没有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②公司储蓄。指没有被公司作为股息支付出去而再投入企业的那部分利润；③政府净盈余。即政府税收超过支出的部分。个人储蓄水平取决于收入水平和个人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一般说来，收入增加，储蓄额会相应增加。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倾向愈高，储蓄水平就愈低；反之，消费倾向降低，储蓄就会相应提高。因此，储蓄额与收入的变化成正比，与消费倾向的变化成反比。在西方经济学中，储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变量。

我国通常所说的储蓄是狭义的储蓄，即银行的储蓄存款。就其来源来看，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是由消费基金转化而来的。对银行来说，储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当银行把储蓄存款作为信贷资金贷放出去投入生产和流通时，这部分消费基金就转化为积累基金。积存的货币就转化为生产建设资金。我国储蓄存款的形式和种类很多，主要有：活期储蓄存款、定期储蓄存款、华侨定期存款、其他储蓄存款等。其中定期储蓄存款又分为整存整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和整存零取四种。其他储蓄存款包括有奖有息储蓄、定活两便储蓄、住房储蓄、旅游储蓄等形式。储蓄存款对于调节社会购买力和货币流通，积累建设资金，促进生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一贯实行鼓励和保护储蓄的政策，坚持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和为储户保密的原则，推动了储蓄事业的稳定发展。储蓄的增长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发展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储蓄业务在城市由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办理，在农村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同时，为了弥补储蓄网点的不足，更广泛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国家还恢复了邮政储蓄业务。储蓄存款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市场的供求。

储蓄货币　指存入银行的货币，有时也称存款货币。我国的储蓄货币主要是由居民收入中的消费结余、积累购物和生息保值的货币构成。储蓄货币的形式有活期存款货币和定期存款货币两种。储蓄货币是我国流通货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货币可以随时提取、转化为现实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基本等同于流通中的现金。在西方国家，活期存款可以用支票提取，存款者持有银行存款支票薄，当购买商品和劳务时存款人可以用他签署的支票付款。支票还可以用来偿还债务，因此发挥着现金货币

的职能和作用。与活期存款不同，定期存款有约定的存期，一般不能提前支取。在这种条件下，定期存款货币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形式存在，如果考虑到货币是一种资产，能够执行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则定期存款也是货币。定期存款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特别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所以这种形式的储蓄货币依然发挥货币的作用。利率是影响储蓄货币量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提高，储蓄货币的收益相应提高。这时人们就会减少手持货币，或紧缩消费支出，或把其他形式的储蓄转化为存款，从而增加储蓄货币量。反之，利率降低，就会减少储蓄货币量。因此，国家能够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储蓄货币量。

储蓄结构 与储蓄的两种含义相对应，储蓄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储蓄结构指各种不同储蓄形式的构成方式及相互关系。储蓄是收入扣除当前消费的剩余部分，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形式有：①存款储蓄，即把货币存入金融机构。存款储蓄一般具有风险性小，易于变现，收益弹性较大的特点。存款储蓄是我国居民的主要储蓄形式。②证券储蓄，即通过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进行的储蓄。不同证券储蓄的风险和收益不同。一般说来，购买债券进行储蓄风险较小，收益较为稳定。购买股票进行储蓄风险较大，收益不稳定。③购买储蓄，即通过购买并不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进行的储蓄。购物储蓄具有保值、安全的特点。购物储蓄行为主要发生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时期。④持币储蓄，即以持有现金的形式进行的储蓄。持币储蓄具有流动性强，安全的特点。各种不同储蓄形式之间常常相互转化。由于不同储蓄形式在风险、收益、流动性和安全性等方面存在差别，人们要根据不同储蓄形式的特点和自己的偏好选择储蓄形式，并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变储蓄形式。合理的储蓄结构对于稳定货币流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狭义的储蓄结构，是指各种不同性质、不同期限、不同形式的储蓄存款的构成。在我国储蓄存款就其组织系统来划分有银行储蓄存款和邮政储蓄存款两个体系。银行储蓄存款主要由下列形式和种类构成：①活期储蓄存款。这是一种不规定期限，随时可以存取的储蓄。活期存款流动性较大，变动较为频繁。这部分存款可以随时变为现实的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②定期储蓄存款。这是储户同银行约定存款期限、到期支付本金和利息的一种储蓄存款形式。定期储蓄又分为整存整取定期储蓄、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本取息定期储蓄、整存零取定期储蓄四种形式。③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这是专为华侨和港澳同胞开办的一种储蓄。华侨和港澳同胞把从国外或港澳地区汇人或携人的黄金、白银、外币卖给中国银行取得人民币，再以人民币参加这种储蓄。④其他种类的储蓄。如定活两便储蓄、住房储蓄等。对储户来说选择何种形式的储蓄主要取决于存款的目的和存款收益的大小。因此储蓄存款构成受利率结构的调节，利率结构是影响储蓄结构的主要因素。

储蓄缺口 指由于国内储蓄不敷投资之用而形成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投资来源于储蓄，当储蓄小于投资时，就会出现储蓄缺口。发展经济学家把储蓄缺口运用于客观经济分析说明不发达国家利用国外资源的必要性。设 Y 为国民收入，C 为总消费，I 为总投资，X 为出口、M 为进口，S 为总储蓄，则有：

$$Y=C+S \quad ①$$

$$Y=C+I+(X-M) \quad ②$$

$$C+I+(X-M)=C+S \quad ③$$

$$I-S=M-X \quad ④$$

公式①代表总供给；公式②代表总需求；公式③是开放经济条件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公式；公式④中 I-S 表示投资与储蓄之差额，即储蓄缺口，M-X 为进出口之差额，即外汇缺口。当储蓄不足出现储蓄缺口，即 $S<I$，要取得两端平衡，出口必须小于进口，即 $X<M$，储蓄缺口要靠外汇缺口来平衡。当外汇储备不足，即 $M>X$ 时，出现了外汇缺口，就要用扩大国内投资消除外汇缺口。不发达国家最为常见的是储蓄缺口，即 $S<I$ 和外汇缺口，即 $X<M$ 储蓄缺口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水平低，由此导致储蓄不足引起的，它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储蓄缺口是必要的。然而，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依靠国外资源弥补其储蓄缺口；同时，如果利用外资不当也无助于提高国内的储蓄能力。这样，当引进外资逐渐减少时，这个国家依然面临储蓄缺口。解决储蓄缺口问题，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引进外资对国内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强本国的储蓄能力。

储蓄存款 储蓄存款包括银行储蓄存款和邮政储蓄存款两大类。通常所说的储蓄存款主要是指银行储蓄存款，即人们的货币收入暂时不用于消费支出而存入银行的部分。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和种类主要有：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华侨定期存款和其他储蓄存款。不同形式和类型的存款具有不同的特点。

活期储蓄存款是不规定期限、随时可以支取的一

种储蓄。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随时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因此被看作为流通中货币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之一。虽然活期储蓄存款没有约定的存期，流动性很大，但由于银行集中广众多储户的存款，这些储户存取时间有长有短，总是有存有取、存取时间上的差别和存取交错进行使得银行在不断存取过程中，能够经常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存款余额，从而构成相对稳定的信贷资金来源。

定期储蓄存款是储户同银行的约定存款期限，在此期限内一般不得随意提取存款，到期支取本金和利息。定期储蓄存款来源于居民货币收入的结余、或为购买高档耐用生活用品或其他用途而进行的货币积累。由于定期储蓄存款具有约定的存款，所以能够为银行提供稳定的信贷资金来源。为了有效地集中动员资金，银行开办了多种形式的定期存款业务。目前定期储蓄存款有四种具体形式，即整存整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和整存零取。

华侨（人民币）定期存款，是专为华侨和港澳同胞开办的一种储蓄。华侨和港澳同胞把从国外或港澳地区汇入或携入的外币、黄金和白银卖给中国银行，用取得的人民币参加这种储蓄存款。存款到期支取时只能支取人民币，不能支取外币或外汇。华侨定期储蓄存款和普通定期存款一样，通常只能到期提取。对于华侨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优惠利率。华侨定期储蓄存款也分为整存整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等储蓄种类。

除以上储蓄存款形式外，我国银行还开办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储蓄业务，如有奖有息储蓄，住房储蓄，定活两便储蓄，旅游储蓄等。

储蓄存款来源于人们的货币收入，一般说来，收入水平愈高，储蓄愈多，储蓄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水平提高引起储蓄存款的增加；反过来，储蓄存款的增加通常也反映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存款常常在不同种类及不同档次的存款形式之间发生数量转移，从而引起储蓄存款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存款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有：①利率结构和利率水平的变动；②物价水平的变动；③收入水平的变动；④消费结构的变动；⑤经济预期；⑥政治局势等。储蓄存款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它一方面调节着社会购买力和市场货币流通量，从而对市场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构成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大力发展储蓄事业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储蓄银行　专门经办居民储蓄业务、以储蓄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进行经营活动的专业银行。与商业银行不同，资本主义的储蓄银行一般靠收受居民储蓄存款融集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以购买政府和企业的债券或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发放住宅抵押贷款、或者将其转存商业银行，以赚取利息差额。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业的发展，储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界限愈来愈模糊。一些国家的储蓄银行现在不仅提供可开列支票存款服务（可转让提款单与超级可转让提款单），而且提供消费信贷和工商信贷。商业银行也参与了原来属于储蓄银行的储蓄存款业务和住宅抵押贷款业务。在旧中国，专门经营储蓄的储蓄银行很少，储蓄业务主要由商业银行兼营，兼营储蓄业务的商业银行按规定要对其储蓄存款业务单独核算，并对储蓄存款负无限责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储蓄银行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是国家动员、集中闲散资金的金融机构之一；储蓄银行的储蓄存款也成为国家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储蓄能力　亦称“储蓄潜力”。指居民货币收入中可能转化为储蓄的货币量。居民的货币收入一部分用于当前的消费支出，其余部分就变成待用和节余的闲置货币积存起来。这部分闲置的货币量决定了储蓄能力的大小。居民手中待用的和节余的闲置货币量是我国银行编制储蓄存款计划的重要依据。年度全国储蓄能力，可根据计划部门编制的年度居民货币收支平衡表加以计算。具体计算方法是从城乡居民货币总收入中（包括国家机关，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奖金、福利等货币收入、其他职业者的货币收入，农村乡镇和社会的净货币收入，国家对居民家庭和个人的各种补贴性货币收入，如抚恤金、救济金、助学金等、侨汇收入等），减去城乡居民的货币总支出，再根据居民手持货币量的增减情况加以调整。对于一个地区的储蓄能力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加以计算。也可以利用家计调查法加以匡算。国家用调查中各类居民典型户的货币总收入减去其货币总支出及手持现金的变化额，推算出各种类型居民的储蓄能力，在此基础上推算出该地区的储蓄能力。

储蓄能力同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消费倾向和持有现金的偏好程度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收入水平愈高，储蓄能力愈大；反之则愈小。储蓄能力和消费倾向呈反比关系。假定居民持有现金的偏好程度不变，消费倾向提高，储蓄能力就会下降；消费倾向降低，储蓄能力会相应提高。在现实生活中，居民持有现金的偏好程度常常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短缺经济环境中居民持币待购的现象很普遍。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愈小，持币待购的现象就愈严重，储蓄能力相应受到的影响也就愈大。提高储蓄能力对于积累建设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储备资金 企业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用于物资储备的资金。它包括原材料、辅料、燃料、包装物、修理用备件低值易耗品、外购配套产品等占用的资金。一些企业主管部门还视管理的需要，把原材料资金划分为原料及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外购半成品和修理用备件等四个项目。储备资金占用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规模、物资消耗水平、供应条件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储备资金管理，调节与控制各种物资储备量，避免储备过量和过少，是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储备货币 指一个国家可以用作外汇储备的货币。储备货币必须是在国际上广泛作为计价支付、结算和储备等手段使用的货币。何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主要取决于该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和该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使用的普遍程度以及该货币的坚挺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曾被世界各国普遍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地位衰落，美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因此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上的主要储备货币。进入七十年代后，美国经济实力趋于下降，美元危机频繁发生，美元地位不断下降。而西德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日趋坚挺，因而世界各国相继把西德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硬货币作为自己的储备货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了特别提款权，并以此作为储备货币，于是出现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局面。

储备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其名义价值和所代表的实际价值并不一致。储备货币的实际价值受储备货币的汇率变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储备货币所代表的实际价值随着该货币的贬值和汇率下跌而降低，使保有该种储备货币的国家遭受贬值损失，储备货币发行国因该货币贬值而减少债务负担，从中得到利益。储备货币贬值常使不发达国家遭受巨大的损失。因为在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储备中，储备货币占有较大比重，黄金储备所占比重较小。1971年8月以前，除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可以按一美元代表0.888671克的金量向美国兑换黄金外，其余储备货币都不能直接兑换黄金。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任何储备货币都不能兑换黄金，只能兑换成其他外币。

储备货币依据其坚挺程度可区分为硬币和软币。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因为无论硬币、软币，都受到贬值的威胁。硬币、软币只有贬值程度大小或贬值速度快慢的区别。一般来说，硬币贬值程度较小，贬值速度较慢；而软币贬值程度较大，贬值速度较快。为了减少储备货币贬值的损失，各国通常把外汇储备中的软通货换成硬通货，并根据该国贸易与非贸易的收汇、用汇情况和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变动趋势以及利息率水平，灵活调节其外汇储备中的储备货币的构成，同时采取其它措施加速储备资产的利用。

储蓄存款周转率 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储蓄存款支出总额与储蓄存款平均余额的对比关系。是反映储蓄存款周转速度的一个指标。储蓄存款周转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储蓄存款周转率=\frac{年储蓄存款支出总额}{年储蓄存款平均余额}$$

储蓄存款周转率体现了储蓄存款周转速度的快慢。由于储蓄存款支出额和储蓄存款余额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储蓄存款之间存在着差别，因此，不同时期的储蓄存款周转率以及不同类型的储蓄存款周转率是不同的。通过对不同时期储蓄存款周转率及不同类型储蓄存款周转率的比较分析，可以反映储蓄存款稳定情况，一般情况下，储蓄存款周转率提高，储蓄存款周转速度加快，表明储蓄存款稳定性差，存款余额下降；反之，储蓄存款周转率下降，储蓄存款周转速度放慢，反映储蓄存款稳定性增强，存款余额上升。不同种类储蓄存款周转率反映不同种类储蓄存款的稳定程度；不同种类储蓄存款周转率的变化能够反映储蓄存款结构的变化和储户对储蓄种类的选择，进而为观察社会闲散资金流向，把握储蓄存款变化的动向提供参考。另外，由于银行存款特别是活期存款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储蓄存款周转率能够反映货币流通的状况。在国外，常用储蓄存款周转率指标来衡量货币总流通速度。同时，存款周转率的变化一般同经济周期波动相一致，因此，存款周转率也被作为考察经济周期的一个指标。

储蓄存款平均增长速度 亦称"储蓄存款平均递增率"。是衡量储蓄存款在较长时期内平均增长程度的相对指标。设 μ 为储蓄存款平均增长速度，其计算公式为：

$$\mu=\sqrt[n]{\frac{a_1}{a_0}\cdot\frac{a_2}{a_1}\cdots\cdots\frac{a_n}{a_{n-1}}}-1$$

$$或=\sqrt[n]{\frac{a_n}{a_0}}-1$$

公式中 n 代表计算时期数；a_0 代表基期储蓄存款额。$a_1a_2\cdots\cdots a_n$ 代表计算期的储蓄存款额。储蓄存款平均增长速度说明储蓄存款在一个较长时期变动的平均速度。当 μ 为正值时，表明在这个时期内储蓄存款递增的平均速度；当 μ 为负值时，则表示储蓄存款递减的平均速度。运用储蓄存款平均增长速度指

标，可以反映储蓄存款在较长时期内增长水平。把储蓄存款平均增长速度同各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储蓄存款增长均衡与否。储蓄存款平均增长速度是银行编制储蓄存款计划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短期资本　国际资本交易中期限在一年以内或见票即付的债权，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之一。国际收支中，短期资本收支状况反映短期资本的流入、流出状况。短期资本收大于支说明有短期资本净流入，反之则是短期资本净流出。国际间流动的短期资本主要有：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和储蓄（定期）存款、银行贷款、短期政府有价证券、公司的短期期票和有关的商业票据、以及银行承兑的期票等。国际间的短期资本的交易主要是通过融通贸易、银行贷款和电汇进行的。造成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移动的主要原因有：①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参与贸易的有关各方相互提供的信贷随之增加；②各国银行为了逃避外汇管制，防止货币贬值，不断调拨外汇头寸；③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造成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频繁移动；（四）为避免政治不稳定造成的损失，所有者将其资本转向安全地带。目前，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移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它对国际收支和国际金融市场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由于规模巨大、移动频繁，短期资本交易极易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混乱，加剧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另外由于短期资本收支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往往作为投机交易发生，因此短期资本移动常常成为扰乱有关国家国内金融的重要原因之一。

短期资金市场　指1年及1年以下的资金借贷所形成的市场，即短期的金融市场。又称为"货币市场"。具体包括：银行短期存贷款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企业间短期资金拆借市场、国库券市场、大额存单市场、商业票据承兑贴现市场等。与长期资金市场或资本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①资金运行的周期短、流动性变现性强，市场利率和价格波动性强；②对经济和社会资金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短期资金市场的职能和作用主要在于解决短期闲置资金的供求困难，实现短期资金的流动性。短期金融市场对一国资金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有很大影响，存贷款的数量、贴现率的高低、短期票据和国库券发行与转让规模都直接增加或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或信贷规模。因此，短期资金市场也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节信用规模的重要渠道。短期资金市场的参与者很广泛。资金来源包括：公司企业的闲置资金、银行及金融机构的自有资金、居民个人存款或投资、各项基金、政府及其机构的资金等；资金的运用主要有：公司企业借款、各种金融机构借款、国家财政借款（从银行或国库券市场）、部分个人借款。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媒介是短期金融市场的主要成分，汇总各种资金加以不同运用。各种短期资金来源并非全部用于短期贷款，部分沉淀资金可被银行用作长期贷款，因此，短期资金市场在业务上与长期资金市场有许多业务交叉联系。短期资金市场的利率是金融市场的代表性利率，例如西方国家3个月的国库券利率、中央银行3～6个月贴现率、商业银行3～6个月的优惠贷款利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日拆率）等等，均是全国利率水平的代表，中长期借贷利率在此基础上确定。因此，短期资金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金融活动的重要场所和保证。

短期金融市场　参见"短期资金市场"。

稀少货币　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七条规定，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某种货币将要发生全面性的稀少时，得提出报告，建议解决办法。稀少货币国家的代表可以参加报告的起草；需要增加稀少货币时，一是在基金组织与稀少货币会员国同意的期限和条件下，把该国货币借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基金组织用发行债券的办法，在该国金融市场筹借；二是商请会员国把该国货币售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易取基金组织的黄金。

税收　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利，运用法律手段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无偿地征收实物或货币取得稳定的财政收入，用以维系国家的各种职能需要。税收在本质上是体现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税收与其他财政收入方式相比，在形式上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特征。税收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阶级，出现了国家以后产生的。税收最终来源于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它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税收，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税收，它主要课征于劳动人民，资产阶级缴纳的一部分税收，也采取各种手段将税负转嫁给劳动人民负担；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收入，用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它体现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一种超经济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它主要课征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科学、文教卫生和国防事业，以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它体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的税收现阶段的作用，主

要有：为国家积累财政资金，保证国民经济建设事业的需要；按照国家经济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配合价格政策，调节企业利润，促进企业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调节集体和个体经济的收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进行税收监督，打击投机倒把，限制非法经营活动，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促进国际贸易往来等。目前我国的主要税种有四大类：(1) 按流转额征收的税类，包括产品税、增值税、盐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2) 按资源、财产、行为征收的税类，如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3) 按利润所得征收的税类，如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4) 按企业留利及其使用征收的税类，如建筑税、国营企业奖金税等。

税源　各种税收最终的出处。税源归根结底是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但每种税收都有各自的经济来源。如，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源，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税源，是个人取得的各种收入……等等。各个税种都规定了具体的征税对象，各有其不同的具体税源，因而每种税的税源与其课税对象是不同的概念。但有的税种税源与课税对象是一致的，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税源和课税对象，都是纳税人的各种所得或收入；有的税种，税源与课税对象并不一致，如：各种产品税，课税对象是财产的数量或价值，税源则是财产带来的收益；在税收征收管理中，开辟和保护税源，对于保证税收，增加财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税种　国家税收制度中规定的税收种类。税种是国家税收制度中的核心，不同的税种规定有不同的征税对象，各有其特点和作用。我国现行税收制度（截止 1983 年 10 月）规定的税种有：工商税（包括盐税）、增值税、烧油特别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工商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建筑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关税和农（牧）业税。

税法　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税收的各种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法》等。税法规定每种税的课税对象、征税范围、纳税义务人、税率、纳税环节和纳税期等等。是国家征税的法律依据，是纳税义务人纳税的准绳。税法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或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国家机关制订公布。税法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征税的依据，规定了国家同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我国税法是根据宪法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定的。它是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工具。税法具有严肃的法律效力，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均须遵守执行，违反税法规定的、要受法律制裁。

税率　税法规定计算每一单位征税对象与应纳税额的比例。它是计算应征税额的尺度，体现征税的深度，直接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税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负担水平，是国家税收政策的具体体现。税率一般有三种形式：①比例税率，不论课税对象数额大小，只规定一个税率；②累进税率，数额越大，税率越高；③定额税率，按单位课税对象规定固定的税额。我国大部分税种如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等均实行比例税率，一部分税种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如奖金税、工资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实行定额税率如盐税、资源税等。正确设计税率，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税目　税目是征税对象的具体化，反映具体的征税范围，代表征税的广度。如我国农业税的课税对象为农业常年应产量，其课税项目包括：粮食作物和薯类作物收入，棉花、麻类、烟叶、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收入，果园、菜园、瓜园、花圃等园艺作物收入，以及经国务院规定或批准的其他收入等。规定税目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征税范围，规定征税的广度，便于制定不同的税率，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

税额　又称"税金"。指纳税人交纳税款的数额。税额一般分为应纳税额（也叫依率计征额）和实纳税额两种。应纳税额是指依照税率计算的税额；实纳税额是应纳税额扣除减免税额以后实际交纳的税额。正确计算税额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合理负担；正确计算税额是执行国家税收政策的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

税则　税法的一种名称。是根据国家的关税政策，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订和分布实施的应税货物的税目税类分类表。税则包括税号、货品名称、税率三个部分。其中，税号是商品分类的编号，货品名称一般按自然属性（如植物产品、动物产品、矿产品等）和加工深度（如原料、半制成品、制成品等）分

类顺序排列。它包括一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进出口货物，其中的每个商品项目称为税目。税率是根据每一项目商品订立的，具体体现了国家的关税政策。从税则确立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固定税则和协定税则两大类。从税则采用的形式分，税则亦可分单式税则和复式税则两种。在税则中，商品的分类方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同一商品如归属不同的项目，其课税也不相同。为了防止各国利用商品分类进行歧视，避免各国海关任意制订商品分类，欧洲主要国家于 1950 年制订了《布鲁塞尔关税税则目录》，在该税则目录中，全部商品共分为 21 类，99 章，1100 多个税目。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采用了这个税则。除美国和加拿大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关税则都采用了这一分类法。随着保护贸易政策的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税税则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税则中规定征税的商品越来越多，商品的分类越来越细，税率的变动越来越频繁。另一个趋势是由单式税则向复式税则发展，对于同一商品规定不同税率，商品来自不同国家适用不同税率，以便实行关税歧视待遇。

税基　亦称"计税依据"或"征税依据"。征税的客观基础，即税法规定具体计算应征税额的依据。比较常见的课税对象有以下几种：收入（所得课税）、纳税人的财产（财产课税）以及商品的售价（销售课税）。有的税种、其税基与征税对象相一致，如我国的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有的税种，其税基与征税对象不一致，如城市房地产税和农业税等。税基的具体性质对各种税的负担的着落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扩大税基是指对课税对象的更大部分实施课税，通常采用的办法是降低以前规定的免税额。税基侵蚀是指税基缩小，通常是由于设置特别的免税项目，从而增加对某些人的税收优待。

税收成本　税收的征管费用。是由政府部门在实施各种税收计划、征管各个税种过程中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它包括税务机关的人员工资、薪金、办公用具、交通工具、宣传费用和设施支出；税务部门在征税中采取的各种办法、措施所支付的代价，改变税种和设立新税种所付出的代价；还包括其他有关部门所提供的但不用支付费用的各种服务。

税收杠杆　"税收经济杠杆"的简称。是国家运用特有的税种、税率、减免税等措施，对社会经济生活施以各种不同的影响，以调整、节制、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手段。税收杠杆要素的主要内容包括税种、税率、纳税人、课税对象、计税依据、征税范围、减免税等。税种的开征，是税收杠杆发挥作用的首要条件，税率是税收杠杆的中心环节。纳税人和课税范围的确定，关系到税收杠杆作用的方向和范围，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是税收杠杆调节的目的物，减税免税是税收杠杆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通过有效地运用税收杠杆，可以将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引向预定计划的方向，达到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目的，可以计算劳动耗费和成果，比较投入和产出，平衡需要与可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还可以监督企业的劳动消耗，检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也可以鼓励人们进行合理消费。

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应协调各税种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复杂多样的经济情况下，需要有不同的税种在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从整体出发，分别就生产、流通、消费、资金、利润等各个领域设置相应的税种，同时，还要注意各税种之间的功能协调，以防其杠杆作用相互抵销。税收杠杆是要调节纳税对象之间的物质利益，如果某一税种调减，而另一税种却给予补充，某一税种调增，而另一税种又加以抽走，这样互相克制，就会完全抵销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因此，运用税收作为杠杆调节经济，不仅要考虑它可能取得的收入，还应该考虑它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它自身如何活动，还应该考虑它和其他税种的分工配合。应该切实遵照国家的经济政策，全面安排，各得其所。

税收转嫁　纳税人将所缴纳的税款，通过市场交换或其他办法转移给他人负担的过程。资本主义税收转嫁的方式，有以提高商品价格或劳务价格转嫁给买方或消费者的，有纳税人以压低原料或商品进价转嫁给生产者或卖方的；有利用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工时或提高劳动强度等办法，把税负转移给生产劳动者负担的等等。通常对能转嫁的税收称之为间接税，对不能转嫁的税收称之为直接税。

税收转嫁按商品交换过程中税负转移的不同途径，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形式是前转（或称顺转），即纳税人通过提高商品销售价格，把税负向前转嫁给商品购买者。如果纳税人是生产厂商，课税商品是消费品，生产厂商就可以通过提高商品出厂价格，把税负转嫁给批发商，批发商再把税负转嫁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又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和前转相反的另一种形式是后转（也称逆转），即纳税人作为购买者，通过压低商品价格，把税负向后转嫁给商品供应者。例如，某一商品在零售环节征税，但零售价格由于市场供求关系难于提高，这时零售商就要设法通过压低进货价格把税负逆转给批发商。批发商再

逆转给产品生产厂商。生产厂商又通过压低原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工资）把税负转嫁给原料供应者和雇佣工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转嫁的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前转或后转，也可能是同一税额，一部分通过前转转嫁出去，另一部分则通过后转转嫁出去，这就是所谓的混转，也称散转。在西方税收理论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转嫁形式，即""消转"。例如，在一些资本品的交易中，把税收后转的特殊形式叫税收资本化。即购买者将该资本品未来应纳的税额从所购资本品的价格中作一次性扣除，如征收土地税，土地购买者将预期应纳的土地税折入资本，将税负转嫁给土地出卖者，从而表现为地价下降。不过，本来意义的税收转嫁只是指纳税人通过提高或压低价格的途径，把税负转嫁给他人。但是，由于西方有的学者把转嫁的范围扩大到以利润变化为标志，以至于把一切能够抵消税负保持利润的办法，都归结为税负转嫁。随之就出现了所谓"消转"的转嫁形式。其实，在"消转"的形式上，纳税人即负税人，因此即使按西方关于税收转嫁的标准来衡量，"消转"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转嫁。

社会主义税收在总体上是不存在转嫁问题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税收可以直接从作为生产者的纳税人身上扣除，而不必通过迂回的税收转嫁的办法，让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来负担。不过，在我国现阶段，也存在某些局部性的税负转移和转嫁现象。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两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机制，即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这两种机制作用于价格与税收的关系上是不完全相同的。在计划价格条件下，存在由价格与价值背离而产生的税负转移问题。而在自由价格条件下，则存在由价格变动而形成的税负转嫁问题。

税收负担 简称"税负"。通常对纳税人依法向国家缴纳的各种税款的负担水平，表明负担程度。它通常以税收负担率表示，即纳税或征税对象的实纳税额同课税对象数量的比率。税收负担率愈高，税负就愈重；税收负担率愈低，税负就愈轻。税收负担通常是根据税率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综合考察的。实行比例税率，由于不论征税数量大小、统一按一个比例税率征税，其税收负担就被称作等比负担。实行累进税率，它根据纳税人负担能力的状况，收入多的多征税，因而称作按能负担。实行固定税率，由于对同一种数量不等的征税对象都按照其单位固定税额确定税负，所以称为等量负担。税负轻重直接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以及各个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再分配。在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最终来源于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是由全体劳动人民按照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利益和合理负担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担的。但是由于我国税收种类很多，每一种税的性质作用及其运动归宿又各不相同，并且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又要通过税负的适时调整得到实现，在国民收入为一定量时，国家的税收和纳税人负担之间必然呈相互增长关系，在国家税收的一定量时，不同纳税人之间对于国家课税的负担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税收负担适度与否，是衡量一种税乃至整个税制合理与否的重要因素，古今中外的税收原则一般都强调以税收负担的公平、合理、适度为宗旨。

税收政策 是指导国家制定税收制度和从事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是根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治经济形势确定的。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工商税收实行了"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政策，使税收一方面更多地积累资金，保证国家重要建设；另一方面调节各经济成份的收入，成为保护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商税收按照合理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调节企业利润，促进企业经济核算；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农业税方面，一贯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和轻税政策，使农民在农业生产增长的基础上，收入不断增加，以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党的税收政策的制定，体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和国家的分配政策，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正确执行税收政策，是做好税收征管工作的重要标志。

税收会计 国家预算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税务机关进行核算、监督和反映税收收入的一种会计。它以合法凭证为记帐依据，以货币为计量单位，通过一套完整的记帐、结帐和编制会计报表的制度和方法如实核算和监督税收的征收、解缴、退税等全过程，正确反映组织收入的活动情况和工作成果。因此，税收会计是一种征解会计，也称收入会计，它的特点是不做会计分录。税收会计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税收政策，坚持依法办事，依率计征，监督税款及时足额入库，严格退库，保护国家税款和票证的安全，同违犯财经纪律和贪污盗窃行为作斗争的重要工具。其基本要求是：①严格监督及时足额入库；②健全会计记录，正确反映收入成果；③加强凭证审核，贯彻税收政策；④做好票证管理工作。

税收统计　是税务机关对税收、税源和税政等方面的情况所进行的一项专业统计。其主要任务是：及时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和提供准确的税收、税源统计资料，如实反映税源发展变化情况以及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和税收计划执行情况，作为制订税收政策、编制和检查税收计划的依据。税务统计的内容由税收、税源、税政三个部分组成：①税收统计，根据税收会计月报表年报表编制，内容包括税种、地区、时序等。主要反映税款征收入库情况。②税源统计。根据税法规定的不同征税对象和征收结果，按所有制和业务要求进行统计。内容包括税种、地区、时序、计税数量（销售收入额）、平均单位税额、所得税额等。主要反映经济、税源变化情况。③税征统计。根据考核税收工作需要进行的统计。内容包括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干部配备及纳税户数、查补漏税，违章处理等。主要反映机构、人员和纳税户数的变化情况。

税收票证　简称"票证"。税务机关征收工商各税、盐税使用的各种专用票证的统称。包括完税证、缴款书等等。它是一种特殊的凭证，在未填用以前是无价证券，填写以后凭它可以无偿取得现金。税票对内是税收会计的原始凭证，又是税源统计的原始资料；对外是证明纳税单位或个人已纳税款的凭证。由于税收票证是征收税款的法定凭证，它与征、纳双方密切关联，因此，它是税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税收票证的作用主要有三：①它是检查和证明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情况的依据；②它是考核征税人员是否正确贯彻执行税收政策的依据；③它是税务机关征收解缴税款的重要凭证和反映经济税源变化情况的资料。

税收计划　税务机关在一定时期内组织税收收入的计划。是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国家通过税收调节收入的政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预算收入和建设资金的增长速度与积累水平，而且是组织动员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重要工具。税收计划也是税务机关在一定时期内组织收入的奋斗目标，是考核和检查各级税务机关工作的重要依据。税收计划一经批准分配下达，税务机关在正确贯彻执行税收政策的前提下，大力促进生产发展，积极组织收入，保证税收计划的实现。编制税收计划，应当遵循从经济到财政的方针，反映党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的要求，以国民经济计划为基础从实际出发，按照既积极又可靠的原则进行，使税收计划具有客观的科学依据。税收计划分为年度计划和季度税收执行计划两种：年度税收计划的编报程序采取"两上一下"的编报程序。首先由下而上提出建议数，分级编制，逐级上报。然后由上而下分配指数，再按上级分配的指标，自下而上编制年度税收计划，并据以执行。季度税收执行计划的编报程序采取"一上一下"的编报程序。首先由下而上提出建议数，经省、市、自治区税务局核定，下达执行。税收计划检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本期收入与计划、上期、上年同期比较，分析增减变化情况和特点，以及超短收的原因。②经济税源变化情况，特别是重点税源产、供、销方面出现的问题对税收收入的影响。③经济、财政、税收、政策、措施以及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税收收入的影响。④组织收入工作的措施和经验、征收力量的安排，促产挖潜，以及征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税收收入的影响。⑤对下期收入的预测和改进意见等。

税收饶让　指居住国不仅对本国居民纳税人已向来源国实际缴纳的税额给予抵免，而且对来源国为鼓励外国投资而减免的那部分税额也给予抵免。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前来投资，在国内税法中对外国投资往往规定了许多减税和免税的优惠措施。然而在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实行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在来源国取得的利润尽管在来源国受到减免税收的待遇，但在居住国却仍须按照法定税率补足应纳税额。这样，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单方面税收减免，并不能使外国投资者真正身受其惠，而只是转移作为居住国的发达国家的国库收入。因此，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并通过与发达国家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要求发达国家实行税收饶让。目前，这种税收饶让条款已出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的许多双重税收协定中。

税收制度　国家的各种税收法规、税收管理体制以及征收管理制度的总称。税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是国家向纳税单位和个人征税的法律依据和工作规程。税收制度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规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剥削阶级国家的税收制度，体现了少数剥削阶级的意志，是为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则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税收制度是由税制要素构成的，内容包括税种、每种税的征税根据、课税对象、纳税义务人、征税范围、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纪律、减税、免税、征收办法、税收管理体制等。社会主义税收制度制定的原则是：必须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及时、均衡和

稳定的前提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实行合理负担和简化税制的原则。

我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一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这个阶段，根据当时存在多种经济成份的情况，采取了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在负担政策上，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规定了不同税率。同时，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造的需要，实行了"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这个时期的税收政策，在有的方面，如实行商品流通税的一次课征制，虽嫌过于简化，但总的说来，同当时的经济情况是基本适应的，税收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第二阶段是1958年到粉碎"四人帮"。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了绝对优势，思想上受了左倾错误的影响，片面强调简化税制和保持原税负、忽视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甚至对国营企业一度搞过"税利合一"的试点，打算取消税收。十年内乱期间，把已经简并了的税制，又作为"繁琐哲学"来批判。结果，税种越来越少，税目越来越粗，征管办法越来越松，使税收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了，严重地影响了税收应有的经济杠杆作用。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政治经济上出现了新的形势，税收经济杠杆作用重新被人们所重视，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税收制度先后进行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以及分税制的改革，税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已发挥得越来越充分。

税收的强制性 指纳税是不以纳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应纳税而不纳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税收的强制性是以国家的法律为标准的，国家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税收法律和法令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征税，纳税人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缴税。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税收强制性得以实现的条件。税收的强制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反映阶级对抗关系；在我国由于国家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税收强制性主要体现了国家依法征收与纳税人的自觉缴纳相结合的对立统一关系。

税收的无偿性 国家向纳税人征税后的税款形成国家财政收入，征纳双方对对方均不承担或承诺任何物质利益的先决条件，即：征方不需向纳税人偿还或支付报酬；纳税人不得向征方清偿或索要任何报酬。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收入，不但不再归还纳税人，反而用于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收入，通过国家预算安排，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巩固国防，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总体上说，则具有返还性。

税收的固定性 国家在对纳税人征税之前，对课税对象、税种、税率都预先作了法律上的规定，排除了主观随意性，使税收具有相对固定性。这既使纳税人易于接受，又能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性。资本主义国家征税范围与征税数额表面上虽是固定的，但常常开征新税或提高税率，增加人民负担，我国社会主义税收负担则是比较稳定的。

税收豁免待遇 各国按照国际惯例或有关协议，在税收上相互给予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外交机构以及外交人员的一种外交特权待遇。税收豁免待遇是外交豁免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对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外交代表机构以及外交人员，给予以免征进出口关税、关税附加税以及直接税的待遇，但间接税一般不给予免税待遇。我国198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具体规定了享受税收豁免待遇的人员、税种以及适用的原则等。

税收管理体制 依法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管理权限的制度。是国家税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权限包括：税法（包括税法、税收条例、征收细则等）的制定和颁布，税法的解释，税种的开征停征，税目税率的增减和调整、减税免税等。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即在实行中央统一领导，执行统一税法的原则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管理权，在规定权限内，地方可根据当地情况灵活机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管理，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我国的税收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配合国家对社会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税收管理体制实行较大程度的集中，各项税法统一由中央制定，税种的开征、停征、税目、税率的增减调整都由中央集中掌握。减税、免税的批准权限也基本在中央，只对一部分地方性税收的减税、免税等事宜授权地方在全国统一税法的范围内具体确定。这种税收管理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2) 1958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改进财经管理体制的同时，也进一步改进了税收管理体制，相应的扩大了地方管理的权限。

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有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某些纳税单位或个人采取减、免税的措施；对某些利润较大的土特产品开征地区性税收；对自然灾害地区的减税、免税问题，授权省、市、自治区自行处理。(3) 1961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税收管理体系作了一些调整，由中央适当地收回了一些管理权限。(4) 1973年，国家又进行了工商税制改革，把一部分工商税收管理权限、如个别产品和纳税单位的减税、免税交地方掌握，扩大了地方的管理权限。(5) 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1977年11月，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该规定明确指出，税收政策的改变、税法的颁布和实施，税种的开征和停征，税目的增减和税目的调整，都属于中央的管理权限，一律由国务院统一规定。关于减税、免税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对某一种应税产品，某一行业以及烟、酒、糖、手表四种产品的减税、免税、须报财政部批准。其余如对县办"五小"企业、社队（乡镇）企业的减税、免税照顾等，可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省、市、自治区根据体制的规定，因地制宜地处理。此外，还规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税收管理权限。现行税收管理体制还强调，除税收管理体制规定的权限以外，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无权自行决定减税、免税，无权下达同税法相抵触的文件。

税利分流　是国家参与国营企业利润分配的一种形式。指把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分解为两个层次：①国营企业实现利润的一部分以所得税形式上交国家；②国营企业实现利润的另一部分以利润形式上交国家，其余部分留给企业自主运用。税利分流将体现国家政权收入的税收和体现国家资产收益的利润分离开来，实行税收与利润的分流、分征和分渠道管理。因此，它是相对于利改税、税改利这种税利合流形式而言的。税利分流的核心是企业必须依法交纳所得税，国家对企业依率计征所得税，对所得税不搞承包。逐步取消用交纳所得税前利润归还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制度，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借款由企业用可以自主运用的资金归还。实行税利分流有利于理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国有资产有效增值；同时，为促使企业微观经营制度的形成，再造微观经济基础提供了外部条件。税利分流对一般商品经济中的企业来说，是一种比较规范、通用的做法。

税前还贷　在计算所得税时，对企业实现的利润，允许先按规定归还各种专项生产措施贷款，再计征所得税，称税前还贷。根据税法，现行国营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经过财政税务机关审批，其基建扩建和技措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加的利润，允许按规定比例先归还贷款，然后征收所得税。税前还贷曾经在80年初对推动利改税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当企业实行承包制之后，税前还贷就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其主要缺点是：(1) 软化了对企业预算约束，造成投资饥渴症。因为税前还贷实际上用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贷款，所以企业会争着向银行要贷款；(2) 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由于企业是先还贷款后交税，这必然要减少"税基"，从而减少国家税收。税前还贷的这种消极作用决定了它最终要被税后还贷所取代。

税制体系　又称税制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的税制选择哪些税种组成，各税种的职能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简单地说，税制体系就是税制结构的布局问题。税制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作用的首要前提，它决定税收作用的范围和深度。只有税制结构合理了，才能从整体上做到税制合理，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税制结构是税制设计的根本战略问题。但是税制结构并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安排的，而是受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税收既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国民收入实行社会扣除的形式，因而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归根到底是决定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从税制发展的历史来看，税制结构也是不断变化的。这说明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必须根据经济结构的情况来设置和调整。税制结构必须适应经济结构。当今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可分两大体系，一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一是以流转额课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采取以流转额（或商品）课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直到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之后，税制建设向商品课税和所得课税双主体的税制体系的方向发展，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它各税为辅助税种的复合税制体系。

税制要素　又称"税收要素"。构成一种税收课税制度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①纳税人。即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②征税对象。即征税的标的物。③税目。指征税对象的具体征税项目，反映征税对象的课征范围和征税广度。④税率。指税额与征税对象或征税依据之间的比例。⑤纳税环节。指在商品流转过程中，纳税人应当交纳税款的环节。⑥纳税期限。指纳税人在发生纳税行为后，向税务机关交纳税款的时限。⑦减税免税。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或征税对象给予照顾和鼓励的一种特殊规定。⑧违章处理。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违反税法行为，依法给予处罚和制裁措施。

税制改革 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总结我国税收制度历史经验，借鉴外国税制的精华，兼顾当前需要与今后的发展，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合理调节各方面的收入、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税制改革的原则包括：①适应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经济性质和经营方式的多样性，建立多种税、多次征、多层次的调节税制结构。②正确处理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③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区分不同的行业、产品、设计不同的税率和缴纳政策。④缓解价格不合理而形成的利润高低悬殊的矛盾。⑤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税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①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对国营企业实现的纯收入，过去采取税利两种形式上缴国家财政的办法，即一部分除依法向国家缴纳工商税外，剩余部分都全部上缴国家预算。通过改革则把企业上交利润也改为上交税金的方式，其好处是：使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法规范化；税后自负盈亏使企业扩大了自主权，有了动力和压力；有利于企业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国家增加财政收入。②把原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四个独立的税种，并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把产品税目划细，适当调整税率；发挥税收调节生产、流通和指导消费的服务作用。③开征资源税，以调节由于自然资源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有效利用和合理开发自然资源。④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四个地方税，以有利于合理地节约使用土地、房产等，适当调节收入。⑤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后，还要征收调节税，既解决企业之间的留利高低悬殊的问题，又保证了财政收入。我国现在共有28种税，但具体到一个企业则只纳几种税。

税务登记 又称"纳税登记"。纳税单位和个人在开业、歇业前，以及经营期间发生较大变动时，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登记的一项法定手续。它是征收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掌握税源，组织税收的必要前提。根据规定：纳税单位和个人，应于开始营业或发生应税行为的30日内，持工商营业执照或有关证件，向经营核算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税务登记应由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并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或其他直接纳税的单位和个人负责申报办理。跨省、市、县的非独立经济核算的分支机构，除由其上级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统一申报登记外，还应向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登记。纳税人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领取《税务登记表》，办理纳税登记，按照要求如实填写企业名称、负责人姓名、经济性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及其他登记内容，然后报送税务机关。税务机关接到登记表，应予以认真审查，并报上一级税务局批准，发给《税务登记证》。纳税单位和个人办理税务登记后，发生变更企业名称，改变隶属关系，改变生产、经营范围，迁移营业地址等事项，应在变动后15日内，持有关部门批准的证件和书面报告，向税务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对有合并、转业、联营、分设、改组的，应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结清以前应纳税款，重新办理税务登记。纳税单位和个人停业时，应在停业前30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停业原因，并送验有关终止业务活动的批准文件，在清理应纳的税款和有关事项后，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税务罚款 又称"税务罚金"。简称"罚金"或"罚款"。对纳税人不按税法规定办理税务登记或纳税申报以及偷税、漏税或抗税等违反税法行为，所处以的行政罚款。如《工商税条例（草案）》中规定："纳税单位和个人偷税、漏税的，除补纳偷漏的税款外，应按照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以五倍以下的罚金。"《关于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对不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及报送会计报表和所得税申报表的，税务机关可酌情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隐匿所得额不报或少报，偷税、抗税的，税务机关除限期追缴税款外，并可根据情况轻重，处以应补税款一倍以下的罚款。

属地主义 以纳税人的收入来源或以其经济活动地为标准，确定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范围的一种原则。按照属地主义原则确定的税收管辖权，称为地域管辖权，又称收入来源管辖权。属地主义原则是，只对纳税人来自本国境内的收入或在本国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依照本国税法规定征税；而对其来自国外的收入则不予征税。

属人主义 以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国籍和住所为标准，确定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范围的一种原则。按照属人主义原则确定的税收管辖权称为居住管辖权，又称居民（公民）管辖权。属人主义原则，即凡是本国的公民、居民或法人，其来自本国境内和国外的收入及其在本国境内和外国的财产，均应依照本国税法规定纳税。属人主义通常适用于直接税的所得税、遗产税等。按照属人主义的原则，确定税收管辖权范围的标准有两种：①以纳税人的国籍为标准，即以是否本国公民身份为标准。凡是本国公民，

不问其本国有无住所，也不问其收入是来自本国境内或国外，均应依照本国税法纳税。②以是否居民身份为标准，居民是指在本国有住所或在本国居住一定时间以上的人。对这些人来自本国境内和国外的收入，都应按本国税法纳税。居住时间的规定，各国不尽相同，如有的国家规定为一年以上的，有的国家规定为半年以上的。对在本国没有住所或居住不满规定时间的非居民，一般多采取属地主义原则。

十三画

滚动预算　亦称连续预算。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延长预算的有效期，以保持其一定的视野的预算。一般预算的时间视野将随着有效期的缩短而缩短，直到下年再编制预算。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可采用滚动预算。当时间每过去一个月，就将一年的预算延伸一个月，使任何时候都有包括今后12个月预算。这样就能保证决策者不管在年内的什么时候，都能知道以后12个月的需要，从而使计划工作能够稳定而有秩序的进行。

概算　政府、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拟编一定时期预算的粗计数字。是编制国家预算的基础。概算一般是由财政部门依照国家的方针政策，计划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和事业指标，影响预算收支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如价格、工资、税率等因素的变化，以及历年预算执行情况等制定的。

十四画

漏税　指纳税单位和个人无意中（非故意）而发生的漏交或少交税款的行为。例如，由于不了解、不熟悉税法规定和财务制度，或因工作粗心大意，错用税率，漏报应税项目，少计课税对象，少计应税流转额，收益额以及应税财产和应税行为等情况，都属于漏税行为。对漏税行为，是由纳税单位和纳税人自查发现并主动申报补税的，只补税不罚款；经税务机关检查发现或经检举揭发的漏税，只要纳税单位和纳税人改正错误，也可以只补税不罚款。但经税务机关屡次劝告，仍继续漏税的，应按税法规定追补税款、加收滞纳金，并酌情处罚。

稳定货币增长率规则　亦称“单一规则”。西方经济学中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规则。该规则的主要内容是货币供应量应按一个固定的比率增长。这一规则的倡导者认为，预算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财政政策在反通货膨胀中是无效的，而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增长率会保证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稳定货币增长率规则提出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同反响。赞成者从各国的经济管理条件，货币当局控制货币经济的能力进行分析，认为这一规则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反对者则就该规则本身进行分析，指出了该规则的诸多缺陷，从而否定了这一规则效用。由于存在上述不同的意见，于是产生了三种对稳定货币增长率规则的修正规则：①对货币当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给出一个幅度，而不是一个单一值的指标，并且在特殊情况下还允许超出这一幅度。②每一季度都调整货币增长率，以抵消最后几季度货币流通的速度变动。③货币当局规定一个方程式作为它的政策，该方程式把货币存量增长率与不久前的收入变动率联系起来，以求得一个比固定增长率规则运行得更好的规则。

稳定货币政策说　亦称“安定货币政策说”。一种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稳定的政策主张。这一主张是弗里德曼率先提出的，这一政策主张最早出现在他1951年撰写的《对货币政策的评论》一文中。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另两篇文章《货币供给与价格、产出变动》和《资本主义与自由》的问世，则标志着这一政策思想的成熟和完善。这一学说认为，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他指示：“为了使价格水平在数十年内维持合理的安定，总货币存量应与产出及人口的增长保持相同的增长率。过去的经验显示，维持长期价格安定所需要的货币存量年增长率约为3～5%。”按他的观点，如货币存量的

增长率大大地超过或小于这一幅度，就会导致通货的膨胀紧缩。相反，如果货币存量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率，不在短期内猛烈波动，就不致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在经济稳步增长的过程中，货币增长率的温和波动是难免的。稳定货币政策说反对用"相机选择"的货币政策来压制或减轻这些温和的波动，认为，这是反生产的，其结果将引起更大的不安定。总之，安定货币政策提倡那种简单的货币政策，认为这既便于操作，又能产生相当程度的安全性。由于安全货币政策说赖以建立的基础前提的谬误，这一学说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唐·帕廷金和保罗·戴维森的批评。稳定货币政策说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影响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水平的最主要因素，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水平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依附关系。反对者则认为，国民经济活动水平是受多种影响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活动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明白无误的数量关系。只有绝对价格水平同货币存量成比例变化，而相对价格水平与货币存量则是彼此分离的。另外，稳定货币政策说主张将货币供应增长率控制在与预期经济增长率相一致的水平上，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率相一致的水平上，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均衡，这实质上是一种考虑长期均衡的中立货币政策。从实践上看，1979年10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用弗里德曼的稳定货币政策，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一政策对通货膨胀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利率上升和经济萧条。稳定货币政策主张对货币供给增长率实行有限制的管理，强调稳定货币，这一反通货膨胀的思想，为各国货币当局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因而先后曾被一些国家所采用。

管理通货政策说 由国家金融机构公开操纵货币系统，实行货币管理，以维持币值，稳定物价的主张。管理通货政策是J·M·凯恩斯在其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提出的政策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币值崩溃、物价高涨的困境中，而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则是纸币发行过多。在此形势下，许多经济学家又对金本位产生了幻想和迷恋，主张恢复金本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针对这些陈腐的偏见，凯恩斯提出了他的管理通货政策思想。管理通货政策说的宗旨有两个：其一，战后几乎所有的金本位制都已经被管理通货所取代，管理通货本位在当时已取得了相当巩固的地位。管理通货是一种由国家统制发行，准许兑现，并在某种客观标准下保持一定价值的国家货币形态。管理货币有别于名目货币和商品货币等其他国家货币形态。从现代货币制度的发展态势看，管理货币日渐失去其商品货币要素而日益增大其管理要素。在管理通货已起着主宰作用的情况下，恢复金本位制实无必要，即使请回了金本位，它也只能作傀儡君主。其二，管理货币政策认为，在管理通货制度已经稳固建立的条件下，可以通过由国家金融机构来调节利率，操纵货币数量，稳定币值的办法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标。凯恩斯并用现金余额方程式对此作了解释。管理通货政策是凯恩斯对经济学的一大突出贡献，目前世界各国所实行的货币制度都是凯恩斯所谓的管理通货制度。管理通货政策还表述了通过由国家金融机构操纵利率，以促使储蓄与投资均衡，并最终达到物价稳定的一般均衡思想及稳定物价的思想。

十 五 画

潜在的货币 "现实流通的货币"的对称。是面对着流通而又暂不流通的货币。参见"现实流通的货币"。

潜在购买力 即"后备购买力"。

增值税 增值税最先于50年代初在法国实行。由于实行这种税可以体现合理负担政策，有利于促进工业实行专业化和稳定财政收入，近30年来，已被不少国家所采用，现已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新税种。增值税是以企业通过本身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增加价值——增值额为课税依据的一种税。其特点是可以解决按销售金额计税带来的全能厂和非全能厂税负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专业化协作生产的发展。1984年10月我国公布了《增值税条例》，由于增值税是按企业生产、经营后的增值额为对象征税，改变了原工商税按产品销售金额纳税的办法，从根本上排除了重叠计税的可能，对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企业间税收负担不平、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值额根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产型"，它是以企业的销售收入减去企业所购的各类材料及其他费用后的余额作为课税依

据的增值额；二是“收人型”，它是将“生产型”增值额减去折旧费后的余额作为课税依据的增值额；三是“消费型”，它是将“生产型”增值额减去当期购置的全部生产设备支出后的金额作为课税依据的增值额。增值税根据工业产品的不同类别主要采取两种计税方式：①扣额法，是从产品销售收人中，扣除为生产应税产品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和计人产品售价之内的包装物后的余额为征税增值额，据以计算应纳税额。它适用于机器机械、农业机具等产品。②扣税法，是先以企业产品销售收入金额依率计算出应纳税额，再扣除购进零配件已纳税款，即为企业实际应纳税额。它适用于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等产品。增值税的征收方法，规定有三种：一种是按征收期分期结算的方法；一种是定率分期征收、年终结算的方法，还有一种是由当地税务机关调查研究核定增值率，按期征收的方法，增值率在一个年度内一般不作调整，增值税采取比例税率。我国规定：甲、乙两类应税产品的最高税率为16%，最低税率为6%，共设12个税目，13种税率。同时，国家对鼓励出口的应税产品，如由生产单位直接出口的和列人国家计划试制的新产品给予减、免税照顾，对其产品因某种特殊原因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减税、免税的，按税收管理权限办理。

十六画

缴库　指预算缴款单位或缴款人向国库缴纳税金、利润或其他应当缴纳的款项的行为。我国的大宗预算缴款是税收和国营企业上缴收入。缴库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具体体现在各级税务机关按季分月编制的税收执行计划和国营企业编制的季度分月的利润等缴库计划之中。国家金库条例规定，国家各项预算收入，分别由各级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和海关负责征收、组织管理并监督缴人国库，任何单位不得截留，坐支或自行保管。国库收纳库款以人民币为限，如缴款中有金银、外币等，须由缴款单位或缴款人向当地银行兑换成人民币缴纳。

第五篇　产业结构

三　画

工业化　系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建立的过程。它分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进程，称作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个进程开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以后在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也相继展开。资本主义工业化一般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竞争中自发实现。从轻工业开始的原因是，轻工业投资少，资本周转快，可迅速获得大量利润。只有当轻工业发展到对机器和动力等设备提出大量需要时，重工业才成为有利可图的部门，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剥削本国人民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巨额财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了强大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同时也使资本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促使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指机器大工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进程。即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工业，并用它去装备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使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的过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下，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有计划按比例持续稳步实现的，是在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依靠人民群众，利用本国的资源，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同时有计划地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外部力量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不断完善，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是为了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农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影响到它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

整个工业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 由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推进，即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2) 在重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又表现为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演进，即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3) 在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进一步表现为技术集约化的趋势。

夕阳产业　是"新兴产业"的对称。系指 17 世纪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工业。如钢铁工业、纺织工业、机械工业、造船工业等。亦称"结构性不景气产业"。即在产业结构中的有利地位已丧失，发展前景暗淡，日益衰退的产业。夕阳产业主要由产业结构的变动所引起。在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由于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出现替代了某些产业的产品地位，使这些产业的演进出现衰退的症兆。这些产业的资源出现一种慢性过剩。这些资源慢性过剩的产业容易触发破坏性的价格竞争，从而使该产业的企业变得非常脆弱，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陷于停滞状态，产业的发展前景江河日下，越来越不景气。如化纤工业的急速发展曾使棉纺织工业受到很大冲击；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石油取代煤炭的地位曾使煤炭工业一蹶不振。产业的盛衰消长不断衍生出"朝阳工业"和"夕阳工业"。产业组织理论家认为，如对"夕阳产业"不管不问，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转移"夕阳产业"部门的资源，或者强制地推进这些产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请参见"朝阳产业"和"新兴产业"。

四　画

反回头效应　它是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在研究国际贸易对工业结构的影响时提出的概念。弗农根据国际贸易对高度发达的工业先行国的工业结构的影响，以本国工业开发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为起点，认为从

新产品问世，扩大市场直至饱和，这是第一个过程；尔后将这一产品出口到国外，开拓国外市场，是第二个过程；第三个过程是，由于国外市场的形成，使有资本技术出口到国外，使国外形成成本更低的新产品；尔后，当国外形成生产能力时，反过来又以更低的价格输入到先行工业发达国市场，而发达工业国不得不开发新产品，从而放弃原来的产品，这样就产生了"反回头效应"。从产品循环的四个过程可以看出，后起国可利用先行国的资本和技术，避免风险大、花费多的技术开发过程，以利用比较优势打回先行国市场。而发达国可利用这样的压力，不断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

中间投入率 指各产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和总投入之比。它是投入产出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的是各产业在本产业的生产活动中，为生产单位产值的产品，需从其他产业购进的原料所占的比例。减去中间投入率等于附加价值率（净产值率）。中间投入率越高，附加价值率越低。中间投入率越高的部门，就是附加价值越低的部门。一般认为中间投入率小的部门有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如渔业、运输、商业和服务业，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如农业、林业、煤炭、金属采矿、石油及天然气、非金属采矿、电力等。中间投入率大的部门包括中间产品型产业和最终需求型产业，它们包括钢铁、纸及纸制品、石油产品、有色金属冶炼、化学、煤炭加工、橡胶制品、纺织、印刷及出版、造船、皮革及皮革制品、食品加工、粮食加工等，还包括运输设备、机械、木材、木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其他制造业等。中间投入率是投入产出结构分析的核心内容，是反映投入结构和销售结构的重要参数指标。参看"中间需求"：又称"中间产品"和"中间投入"，它是和"最终需求"相对而言的。投入产出表中的重要概念，指社会总产品中当年生产、当年消耗掉的产品，包括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其他辅助材料。中间产品价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效益高低的重要标志。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产品，是由国民经济各部门属于生产性消费的劳动对象所构成，某一部门的中间产品等于该部门的总产品扣除其最终产品的余额。由于中间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一般要求尽可能降低中间产品在整个社会产品中的比重。参看"最终需求"。

中间需求率 指各产业部门的中间需求和该产业部门的总需求之比。这个指标反映了各产业部门的产品有多少作为原料（中间需求）为其他产业所需求。中间需求率越高，这个产业部门就越带有原料产业的性质。中间需求率是投入产出表中的重要概念，是进行结构分析的重要工具。运用它可以分析各产业的投入结构和销售结构，亦可提供反映各产业技术、经济特征的重要信息。一般认为中间需求率大的部门是钢铁、纸及纸制品、石油产品、有色金属冶炼、化学、煤炭加工、橡胶制品、纺织、印刷、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中间需求率小的部门包括最终需求型产业，如皮革及皮革制品、食品加工、粮食加工、运输设备、机械、木材、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还有渔业、运输和商业等。参看"中间需求"。

支柱产业 指产值和就业人数分别占国民经济总产值和就业人数10%左右的产业。它是指那些推动经济增长，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在实现的国民收入中占有较大份额，支配着产业结构方向的产业。这种产业有如下特点：一是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二是产业相关度大，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三是出口贡献大，占一国对外出口贸易总额的10%以上；四是技术进步率高，代表着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方向，能推动科技进步的应用和发展；五是对国民经济有决定作用。一般认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依次是钢铁、汽车和建筑业。就日本而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和耐用家用电器为其支柱产业；而南朝鲜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支柱产业产造船业和钢铁业。

"公害对策基本法" 这是日本1967年至1970年修定的公害对策法律。它的主要内容是防治公害。它将公害的表现形态分为七大类：(1) 大气污染。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物质有一氧化碳、亚硫酸气体、氮氧化合物、碳化氢、铅化合物、雾态硫酸有机氯化物、过氧化合物、重金属等。这些物质形成有毒气体、烟雾、尘埃等。(2) 水质污染。是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大量排入河流，近海造成的。这些污水中的有毒物质有镉、氰、有机磷、铅、铬（6价）、砷、汞亏还有大量有机物排入水中造成的污染，石油和石油产品的跑漏对海洋、河流的污染等。(3) 噪音污染，(4) 震动，(5) 地面下沉，地面下沉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汲取地下水。地面下沉能够造成建筑破坏、地下各种管线的断裂、雨季积水难排等灾害。(6) 恶臭。造成恶臭的物质有氨、硫化氢、硫化甲基、三甲胺、二硫化甲基、乙醛、苯乙烯等，(7) 土壤污染。从公害发生源来分类可划分为产业公害、都市公害、交通公害。如何防治公害。该法认为首先要增加"社会性资本"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立完备的环境监测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交通系统等。要综合治

理。地区开发，城市建设和工业布局全盘考虑。要控制公害三大发生源即工业、人口密集的城市、交通工具等三大方面。

公害出口　在现代西方国家把公害较重又较难治理，因而在本国办不下去的工业，投资到外国，特别是拿到发展中国家去办，造成这些国家产生同量于发达国家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严重污染。这就是“公害出口”。对此，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事业时，应高度警惕。

比较优势　依照生产成本相对差别而实行的国际分工的一种自由贸易理论。其基本论点是：比较优势的差异是比较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或相对稀缺，是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决定因素。生产某些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在某一国家的供给相对最多，这个国家在这类生产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生产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并且会出口这些商品；生产某些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在这个国家的供给相对最少，这个国家在这类生产要素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上就会处于比较劣势，就会进口这些商品。

斯密首先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斯密以两个国家同时生产一种商品为例，如果甲国的成本小于乙国，那么在这种商品生产中甲国就具有优势，乙国就没有优势，认为“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 366 页）。斯密又认为，富国在制造业和农业方面都居绝对优势，穷国在制造业和农业方面都居绝对劣势，但是富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比农业的更大，而穷国在农业方面的绝对劣势比制造业的要小。因此，富国应当专业于制造业，穷国应当专业于农业。这样形成的国际分工，就是以相对或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国际分工。

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斯密的相对优势概念发展成系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强调即使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李嘉图认为如果甲乙两国的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甲国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均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而乙国则处于绝对劣势，两国间仍然存在着互利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可能。因为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等同的。处于绝对优势的甲国，不必对所有这些商品都生产，只应生产最大优势的商品。反之，处于绝对劣势的乙国，也不必对所有这些商品都停止生产，只应停产最大劣势的商品。这样，甲乙两国各自生产比较成本相对有利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节省了劳动，都得到了好处。他举例说，假设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只需 80 人的一年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只需 90 人的一年劳动；而英国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需要 120 人的一年劳动，生产同量毛呢需要 100 人的一年劳动。按照比较成本原则，葡萄牙只应专门生产酒以换毛呢（等于 80 人的年劳动产品换回自己的要 90 人一年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毛呢），英国只应专门生产毛呢以换酒（等于用 100 人的年劳动产品换回自己要 120 人一年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酒），彼此都可得到比较利益。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我们通过对外国人的贸易取得他们的商品，而花费的劳动和资本，往往少于他们自己为这些商品所花费的。然而，这种贸易对外国人还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从我们这里换得的商品；如果他们自己去生产，就要花费较高的代价，尽管我们为它花费的代价较少”（《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伦敦 1944 年版，第 2—3 页）。穆勒断言，在比较富有的国家同比较贫穷的国家进行贸易时，比较富有的国家得到的利益较少，而比较贫穷的国家得到的利益较多。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俄林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各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比例”。即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土地、劳动、资本三者的构成各不相同，一些国家土地相对较多而劳动和资本的比例相对较大，而另一些国家劳动相对较多而土地、资本相对较少，还有一些国家资本相对较多而土地，劳动相对较少。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要素比例的区别。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密度”，商品生产中使用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三者的比重不同，生产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数量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组合。商品可以按照不同的要素密度区分为不同的要素密集型式；要素比例和要素密度相结合，便形成了比较优势，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谋求要素比例和要素密度的一致性。即一个国家如果某一生产要素相对充裕，就应当生产这一生产要素密度大的商品。原因是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价格低，这种生产要素密度大的商品的比较成本就低，在国际市场上就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大自然对两个不同地区赋予不同的生产要素，那么，在每一地区的内部把一种商品转换成另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比较成本很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土地广阔的地区在食品和其他土地密集型物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力众多地区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物品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第 70 页）。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他们认为古典学派关于生产要素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是不妥当的。认为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可以从价格低的国家流向价格高的国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结

果，最终会使各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出现均等化趋势。这种国际流动是以商品形式进行国际流动。俄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把优势问题仅仅归结为生产要素领域的问题。他们用比较生产要素成本定义比较成本，用生产要素禀赋来说明优势的形成，用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成因。

总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就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古典优势原理以一系列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而萨缪尔森则否认比较优势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形成的。对此日本经济学家则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说"，德国经济学家则提出了"扶持幼小产业说"。参见"扶持幼小产业说"和"动态比较费用说"。

比较劳动生产率 指整个产业中不同产业所占有的国民收入与所占有的劳动力之比。即

$$比较劳动生产率=\frac{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劳动力相对比重}$$

由此可以了解（1）国民收入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构成；（2）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分布；（3）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状况；（4）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相互关系程度。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衡量产业结构效益。每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全部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比较，可以看出该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参见"相对国民收入"。

比较利益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比较利益（比较成本）。按照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贸易的条件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商品的生产是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的。李嘉图认为，尽管葡萄牙生产呢绒和酒的效率都比英国高（见下表），

	呢线生产成本	酒生产成本
葡萄牙	90	80
英国	100	120

但相对于英国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呢绒为 90%，酒为 67%，即两方面比较，它在酒的生产方面更有优势。同样，从英国方面看，虽然两种产品的成本都比葡萄牙高，但呢绒为 110%名酒为 150%，相比之下，英国生产呢绒的效率较高一些，在生产呢绒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或比较利益。李嘉图认为，如果英国的劳动全部用来生产呢绒，而葡萄牙的劳动力全部用来生产酒，也就是各国分工只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样不但各种产品的产量可以增加，而且通过贸易双方都可获利。假设在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之前，葡英两国一年中共生产工单位的呢绒和工单位的酒。在国际分工后，英国的 220 人一年全部用来生产呢绒。则可以得到 2.2 单位的呢绒。葡萄牙的 170 人一年全部用来生产酒，则可生产 2.125 单位，两种产品的生产水平都提高了。假定两国商品交换的比例是 1：1，葡萄牙出口 1.1 单位的酒，并从英国进口 1.1 单位的呢绒，则英葡两国国内消费量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贸易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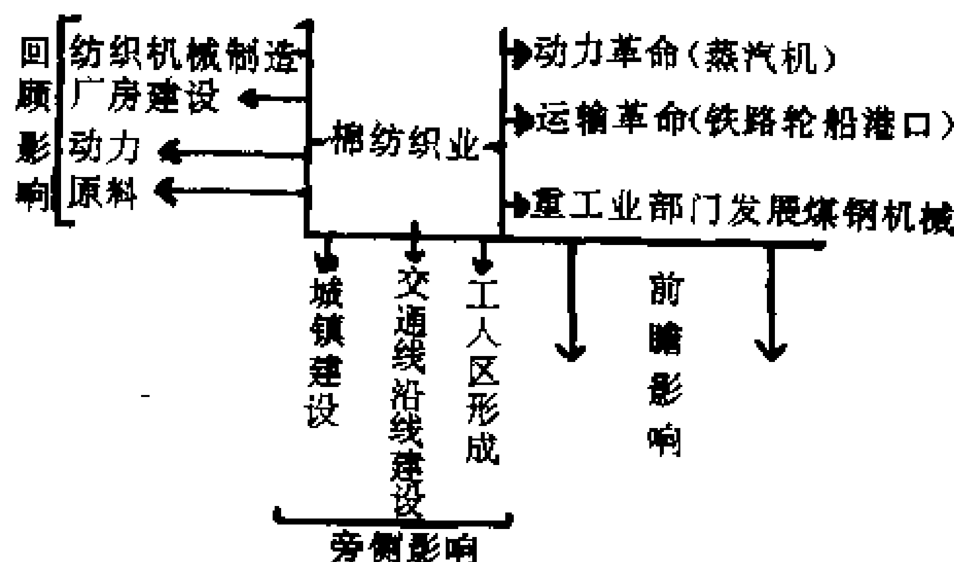
	英国		葡萄牙	
	分工前	分工后	分工前	分工后
呢绒	1	1.1	1	1.1
酒	1	1.1	1	1.025

国际分工和贸易，英葡两国都能增加相对优势产品的产量和国内的消费量。与亚当·斯密的理论相比较，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指出了无论一个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也不管它的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水平上的差距有多大，它仍然是有自己优势的，仍能通过外贸生产比闭关自守时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多的社会消费总量。这个理论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它把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尽管从短期看是正确的，但从长期的动态观点分析则是不符合现实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的，只会越用越少，而劳动力（包括量和质）和资本则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增长和积累。如果考察一个后进国走向现代化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一开始时，它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具有比较利益的是土地密集的农产品；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逐步积累，土地的相对稀缺程度在提高，劳动力的富裕程度相对突出，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逐步转向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而随着工资的进一步提高和资本的进一步积累，资本的富裕程度相对突出，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参看"比较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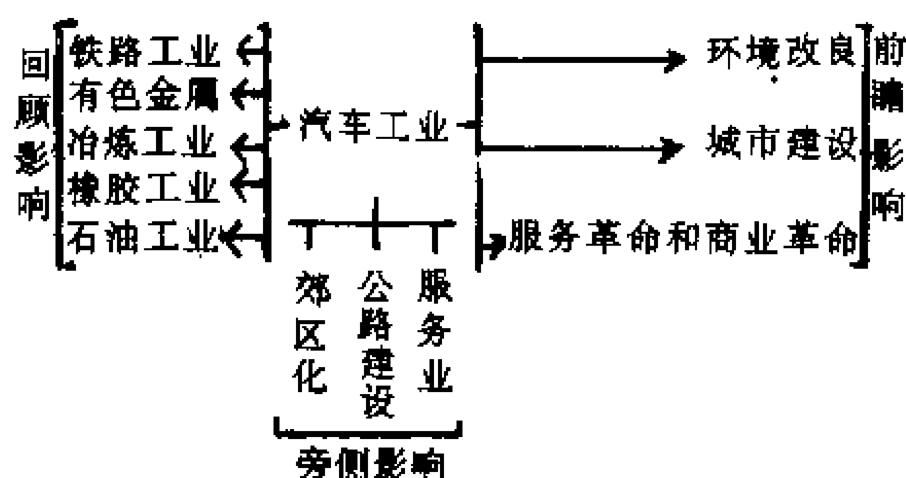
五　画

主导部门扩散机制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发展阶段》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罗斯托认

为，一个或更多的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一部强有力的和主要的发动机。该发动机的力量来自它自身的冲击形式的多样性，而此时社会正准备对这一冲击作出积极反应。在这些具有高生产率的新生产函数的部门中出现的增长，本身倾向于提高人均产量，在这些部门中出现的增长还把收入送到不仅仅把增加的收入的很高的比率储蓄起来，而且把它投入到富有生产性的投资中去的人们的手里；它还为制造业部门的其他产品提供了一条有效需求的链锁；也向扩建了的城市提出了要求，城市地区的资本可能很高，但城市的人口和市场组织有助于使工业化的进程继续下去；最后，这些制造业部门中出现的增长还释放了一系列的外在经济效应，这些效应在起飞的主导部门的原动力开始减弱的时候，最终将有助于产生新的主导部门。主导部门的扩散机制是（1）回顾影响。根据其技术性特点，新部门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会对原材料和机器产生新的投入需求，这些投人，反过来又要求现代设计观念和方法的发展。这些投入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人为的；也可能是制度方面的。（2）旁侧影响。主导部门还引起它周围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趋向于在更加广泛的范围上推进工业化进程。现代工业活动围绕在城市人口、服务和各种制度的周围，这些制度加强了工业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基础：围绕着由技术决定的等级制度建立起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处理法律问题和投入和产出市场各种关系的专业人员；城市先行资本投资；银行和商业制度；满足驾驭新工业结构的人员的需要而必须的建筑业和服务业。新的主导部门改变了它们所在的整个地区。（3）前瞻影响。现代工业活动创造了能够引起新的工业活动基础，或者通过削减其他工业部门的投入成本，提供吸引企业家们进一步开发的新产品和服务，或者产生一个瓶颈问题，解决瓶颈问题会吸引发明家和企业家，并对主导部门产生一种刺激力，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并为另一个重要的主导部门的产生创造条件。以棉纺工业为例，其扩散机制如下图：



以重型机器制造业作主导部门，其扩散机制如下图：



主导部门扩散效应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两书中提出的分析产业结构的概念。罗斯托认为，在经济自我持续增长阶段，经济中形成一种自发力量，它带动了经济的成长，产生了相应的企业家或企业家群体，使新技术开始了一个产生、吸收和扩张的进程。这个进程的核心是各工业部门中企业家群体的规模和质量，这种质量和效能是根据缩短现行经济中的相关技术与起飞前技术之间差距的速度来衡量的。一个新兴产业的最大增长率很可能要等到它的规模足以大到引起扩散效应时方能出现，这种扩散效应是起飞的关键。一个社会能积极有效地对服务增长的潜能作出反应，增长便肯定是一个自动进行的进程。罗斯托在1963年出版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主导部门扩散效应的概念。他认为，一个社会要维持较高的平均增长速度，必须要不断进行反减速的运动，现代科学技术的流动也许会提供这种潜力，它抵抗着李嘉图的收益递减规律，这样，希望开发这种潜力的社会就必须不断重复这个痛苦的创造过程，在旧的主导部门出现减速时引入新的生产函数；这个社会必须显出它有能力发挥出新的主导部门的潜在扩散效应。在这种意义上，持续的增长要求起飞过程的重复；持续的增长要求围绕着新的技术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要求新型的工人，新兴的融资和销售方式。罗斯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为起飞创造条件的整个过程就是对初始条件的陈述。一个社会要吸收新的生产函数并要产生出起飞所依赖的扩散效应，就必须要对传统社会进行大量先的改变。这个创造条件的过程在技术上包括交通建设以使国民经济的各个市场迅速而有效地相互影响，在可容忍的费用水平上开采国内原料；在劳动队伍中有最低限度的识字和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最低限度的动力资源。

罗斯托认为，主导部门的扩散效应是可以区分的，这就是回顾，旁侧和前向三种效应。当一个新部

门在飞速发展时，必然对原材料和其它部门产生需求，包括物质的和人为的需求，这就推动了这些部门的发展。包括观念，制度，文化传统的变革。同时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还对与这一部门有联系的其他行业产生旁侧效应，推动了服务、交通、银行、劳动力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并且，主导部门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刺激力，改变了原有的工业基础，吸引了企业家进一步开发新产品；这样，新兴工业部门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原材料供给上，都产生了前向效应，由于新边疆的开发，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促使铁路发展起来，在铁路沿线连接丰富的矿物资源；反过来，这些充裕的矿物资源又建立起一条部门扩张的链。罗斯托认为，由于来自增长部门的扩散效应的组合，便产生了新的生产函数，形成了新的主导部门。

主导部门潜能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主导部门在起作用的这一时期，能够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并对其它部门产生三种潜能。这三种潜能是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前向效应。罗斯托认为，一个或多个现代产业部门首次诞生，它们具有高的增长率，不仅带来新的生产函数，而且能通过回顾和旁侧联系对经济规模发生扩散效应，而且社会经济有能力利用前向联系，在旧的主导部门衰落时，新的主导部门便会诞生，这种能力使主导部门从旧的转向新的，从而将真正的起飞同过渡时期中衰落的工业高潮区别开来。对社会经济这种职能上的要求，决定了起飞要有相当长时间。一个社会要显示它有能力克服最初的增长高涨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并且不断引进持续增长所依赖的新技术，必须具有时间的长度。这样的长度所表现出的潜能同该部门所需要的技术有关。罗斯托认为，自我持续的增长与旧的主导部门出现减速时引人的生产函数所发挥出的潜能有关。持续的增长要求围绕着新的技术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要求新型的工人，要求新的融资和销售方式。罗斯托认为，新部门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时会对原材料和机器产生新的投人要求，可能引起物质的、人力的、制度方面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发挥出的潜能与回顾效应有关，主导部门还引起周围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趋向于在城市人口、服务和各种制度方面推进工业化进程。新的主导部门的出现对于解决该主导部门所影响的基础设施、人员培训、各种机构的设立、商业、建筑业等问题，有重要的旁侧效应而这种潜能发挥的程度与主导部门本身的素质有关。而新的工业活动会引起新的工业部门的产生，会引起新产品的开发和服务业的诞生，会吸引一大批发明家和企业家。又会引发新的主导部门的产生。这部分前向效应所发挥潜能的程度由主导部门的性质所决定。

生产的最终需求依赖度 某产业各最终需求项目的生产诱发额与该产业各需求项目的生产诱发额之比。即不仅考虑各个产业的生产直接依赖的需求，而且考虑各个产业的生产间接依赖的需求。例如，粮食有一部分直接用于家庭消费，其余还有一部分用于酿造酒和食品制造业，这些产业的产品又多半是进人家庭消费。因此，生产粮食的产业不仅直接依赖最终需求的程度高，而且间接依赖最终需求的程度也很高。有些产业从直接的关系上看，似乎同最终需求没有关系。但间接依赖最终需求的程度却很高。如钢铁工业的生产，通过小汽车、住宅、家用电器等制造业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间接依赖于最终需求。根据各个产业的生产最终需求依赖度系数，可以把各个产业部门划分成为“依赖消费型产业”，如纺织工业、家用电器、食品等轻工业；“依赖投资型”，如钢铁、机械等重工业；“依赖出口型产业”，如手工艺品，日本的汽车制造和电子工业等等。

生产波及效果分析 指运用投人产出表推算出来的系数，研究表中的某一数据发生变化时，对其他数据可能发生的影响。在一个国家发展某一个产业部门时，必须了解这个产业部门的兴起对其它产业发生的波及效果，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发生多大的影响；或者某一地区建设新工厂，由于这一新工厂的建立，会对这个地区的已有产业产生多大的波及效果，以及这种波及效果对增加地方收人的有利程度。这种预测分析不仅包括投资本身的波及效果，而且还包括在投资以后产生的波及效果。也就是原材料的消费造成的生产波及效果。如果一国没有这一产业，这时需要根据这一新产业可能达到的生产水平，依据有关信息分解投人为各产业的产品，然后将其作为最终需求放到模型中进行计算，便可得出这个产业的建立对原有产业体系的波及效果。如果一国本来有这一类产业，并且投人结构也是相同的，那么，简便的计算方法是先从原有投人产出表的逆阵系数表上算出一个次逆阵系数，即将该产业下的纵列各系数除以该主业横行和纵列交叉点的系数，其各得之商就是这个产业生产1个单位时对各产业生产的波及效果。但生产波及效果分析也有局限性。首先通过产出量模型计算最终需求对各产业的波及效果，但在实际上，这种波及效果能否为各产业所吸收都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某产业的产品有大量库存，这时尽管有增产的波及要求，但有可能放出库存后不必再生产或可以减少产量，这时可能中断或减弱由这个产业增产时所造成的波及效果。

生产增长率基准 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

平提出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筱原三代平认为，那些生产率上升快，技术水平高的产业应作为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是选择主导产业的基准之一。筱原基准提出以后，很快为政府所采纳。1963年日本产业结构审划会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以及1965年制定“中期经济计划”时都使用了筱原基准。按照筱原基准，1965年的中期计划将普通钢、船舶、家用电器、光学仪器、摩托车、合成纤维作为重点产业扶持。把小轿车、石油化工、大型电机、电子计算机、大型工业设备、大型高性能机床等作为中远期战略产业扶持，而这些产业都是生产率上升大的产业。计量各产业生产率上升大的公式为比较劳动生产率，或某产业劳动劳动生产率与全部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之比率。主导部门应有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计算公式为:

$$t_i=\frac{S_i}{Q_i}=\frac{Y_i/Y}{L_i/L}=\frac{Y_i}{L_i}\bigg/\frac{Y}{L}$$

其中 t_i 为比较劳动生产率;

Y_i 为第 i 产业部门的净产值或增加值;

Y 为全部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

S_i 为第 i 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

L_i 为第 i 产业部业投人的劳动力数;

L 为全部产业投入的劳动力总数;

Q_i 为第 i 产业劳动力的相对比重。

计量产业技术上升率差异的另一方法是，如果将影响产出的各种要素归结为可定量刻画的资金 K 和劳动 L，则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模型为:

Y＝F（F，L，U）

其中 U 为随机扰动项，根据1928年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AL^{\alpha}L^{\beta}$$

其中 α、β 分别为劳动和资金对产出的弹性。

测量中性技术进步的公式为（1）技术水平反映某个时期相对于基期技术水平提高的幅度。技术水平年度量的具体函数形式为:

$$A(t)=\frac{Y(t)}{F\{K(t);\ L(t)\}}$$

（2）技术进步速度。它反映一定时期内技术进步快慢的综合指标，其函数形式是

$$\frac{\Delta A}{A}=\frac{\Delta Y}{Y}-\alpha\frac{\Delta K}{K}-\beta\frac{\Delta L}{L}$$

或 $\alpha=\acute{Y}-\alpha\acute{K}-\beta\acute{L}$

其中 α 表示技术进步速度;

$\acute{Y}SS$ 产出增长率;

$\acute{K}SS$ 资金投入增长率;

$\acute{L}SS$ 劳动投入增长率;

总之，我们可以用许多计量公式准确计算出哪些产业生产率上升幅度大。

主要增长部门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概念。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主要增长部门是指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革新创造的可能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的或至今尚未开发的资源的可能，将造成很高的增长率并带动这一经济中其他方面的扩充力量。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发展费用　国民经济发展所消耗的资源实物量，主要包括能源、钢材和其它原材料的消耗。国际上用每万美元国民收入所消耗的能源和钢材实物量指标来表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投入和产出比例的重要指标。发展费用越低，表明某国的经济效益越高，技术进步率越大，经济结构越合理。

六　画

收入弹性基准　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的选择主导产业的一种理论。筱原三代平认为那些需求大，收入弹性高，有巨大的社会购买力的产业应作为政府扶植的重点对象。筱原三代平提出这一基准以后，很快被政府所采纳。1963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以及1965年制定“中期经济计划”时，都使用了筱原基准。政府把需求弹性大的普通钢、船舶、家用电器、光学仪器、摩托车、合成纤维等作为重点产业扶持。日本政府还大力扶持了符合收入弹性基准的传统产业和衰退产业，如农业、煤炭工业等。对于具体计量收入弹性的方法是，定义 S_i 为人均国民收入每增长10%、某产业需求变化的百分比。即:

$$S_i=\frac{\Delta Q_i}{Q_i}\bigg/\frac{\Delta Y}{Y}$$

其中 S_i 为 i 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

Q_i 为 i 产业的总需求量;

ΔQ_i 为其增量；

Y 为人均国民收入；

ΔY 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量。

在一般情况下，某一产业的需求量可用计量经济模型 $Q_i=f(y,p,t)$估计而得到。其中（p 为价格水平，t 为时间）。收入弹性基准对于研究产业结构，选择主导产业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一国选择主导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原则是依据收入弹性基准，选择收入弹性大的产业作为重点产业，那些技术进步率大，收入弹性大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后工业化社会 是以知识、技术和变革为轴心的社会形态。它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一份预测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概念。贝尔认为，后工业化的第一个最简单的起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以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在后工业社会里，其基础是庞大的服务业。这时起主导作用的已经不是纯粹的体力或能源，而是信息。贝尔在1973 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种探索》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后工业化理论。他在此书中认为，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理论知识。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理论知识将处于中心地位。在后工业化社会中，每个领域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理论工作的优先发展，它汇集整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为经验指明了方向。理论和知识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等知识部门的汇集，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贝尔认为，技术的变化首先是一场经济革命，而且还是一场社会革命。技术进步是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后工业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智能技术的兴起。智能技术的特点就是用规划系统代替直观判断。贝尔从技术分析为起点，以理论知识和技术为中轴，逐一揭示了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以及管理体制的变化趋势。一般认为，后工业化社会有五大特征：(1) 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2) 社会的领导层主要由企业主组成转变成主要由科研人员组成；(3) 理论知识和技术成为社会最推崇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两大中轴，是社会变革和决策的依据；(4) 社会将按计划来推进技术进步，特别重视技术评价；(5) 活跃的智囊团广泛参与制订各项政策。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所提出的社会实际上与贝尔提出的后工业化社会，同属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产业 产业可有三种解释。一是指各种物质生产部门。主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各部门。有时专指工业。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泛指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行政管理等部门。产业比较系统的划分，最早见于 20 世纪 20 年代国际劳工局的分类，它把一个国家的所有产业分为 (1) 初级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垦殖、畜牧、渔业、园艺、林业等），矿业（指采矿，不包括冶炼）；(2) 次级生产部门，即制造工业，包括木材制造、家具制造、冶炼、机械及金属制品、交通用具、土石制造、建筑工程、动力、化学、纺织、衣着、皮革、饮食、印刷、饰物仪器以及其他等；(3) 服务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行政、国防、自由职业、家庭及个人服务业等。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将产业划分为三次产业。第一次产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狩猎业和采矿业；第二次产业包括制造业、供水等部门；第三次产业，又称为“服务产业”。三次产业分类法最早由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提出。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 1940 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首次运用了三次分类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规律。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科林·克拉克定理”。并使该分类法得以普及，扩大了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影响。

除了以上两种解释以外，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另外一种更为狭义的产业定义，即产业的经济计量学上的定义。它指在产品上或生产技术上具有密切相关关系的厂商所组成的结合体。它与市场行为理论密不可分。即市场或产品准则，按厂商生产的产品的替代性分类，若厂商间的产品有某种程度的替代性，同这些厂商属于同一类产业；按厂商在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技术的相近性，或使用原料的相似性来划分，若相近性达到某一程度，则诸厂商属于同一产业。上述二类指标准的制定，要看市场结构与实证研究的目的而定。产品的替代性又用需求交叉弹性来衡量。即：

$$\eta_{ji}C=\frac{\Delta q_j}{\Delta p_i}\cdot\frac{p_i}{q_j}$$

式中 p_i 代表第 i 厂商产品的价格；

q_j 代表第 j 厂商产品的生产量；

$\eta_{ji}C$ 代表需求交叉弹性。

当 $\eta_{ji}G$ 愈高时，第 i 和第 j 厂商愈属于同一产业。

总之，产业一词的中性概念系指国民经济的各行业，不仅包括生产部门，也包括流通部门，一般的服务部门，包括文化教育等行业。从国民经济的宏观角度定义“产业”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使用价值。由于国民经济活动极其复杂，在任一确定时期，将有限的劳动量和其他经济资源分配到社会活动的各部门，会

受到经济关系所制约的比例关系和效率关系的影响。如果只重视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关系和效率关系，而忽视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之间、各个非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效率关系，就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和揭示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彼此交换关系与比例规律、效率规律，也就不可能完整地把握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参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产业分类　是按照某种标准对产业结构划分的方法。经济学家为了研究的需要，将构成一国或地区或全世界的产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种类，以有目的的对产业结构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这种产业分类大致有5种，即三次产业分类法；标准产业分类法；生产结构产业分类；工业结构的产业分类法；资源密集度产业分类法。它是关于国民经济全部活动或部分活动的分解和组合的一种方法。由于技术进步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尤其是经济计量技术的发展，产业分类越来越朝着经济统计和计量的方向发展。由于现代经济运动的复杂性，考察不同产业的不同层次的变化越来越重要，因而产业分类的重要性也日趋突出。产业分类对于研究经济总量尤其是部门经济总量的变动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产业分类对于研究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部门，产业变动量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经济计量学的发展，产业分类也日趋发展成为一门统计学科。

产业分类法　是对构成国民经济的各种活动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解和组合以形成多层次产业分类的划分方法。产业分类是分析各产业部门经济活动的前提，是分析各产业部门相互联系和比例关系的基础，是进行产业经济管理的必要条件。迄今为止，比较重要的产业分类大致有6种：

1.最早的产业划分法。20世纪20年代由国际劳工局制定的。它把一个国家的所有产业分为①初级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垦殖、畜牧、渔业、园艺、林业等），矿业（不包括冶炼）；②次级生产部门，即制造工业，包括木材制造、家具制造、建筑工程、动力、化学、纺织、衣着、皮革、饮食、印刷、饰物仪器以及其他等；③服务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行政、国防、自由职业、家庭及个人服务业等。

2.三次产业分类法。所谓三次产业分类，即把全部经济划分为第一次产业（（Primary industry）、第二次产业（Secondary industry）和第三次产业（Tertiary industry）这种分类法最初由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阿·格·费夏在1935年发表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的。并以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的名字命名。因此，它又称为"克拉克大分类法"。

"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术语最早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把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矿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制造业称为第二次产业。费夏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书中，又提出了"第三次产业"的术语。费夏的划分以社会生产发展阶段为依据，以资本流向为主要标准。他把初级生产阶段称为第一次产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和林业；把第二阶段生产称为第二次产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电力和煤气业等；把第三阶段的生产称为第三次产业，包括商业、金融业、饮食业以及科学、卫生、文化教育、政府等公共行政事务等。

克拉克的划分标准有三个：（1）产业距消费者的远近程度。距消费者远的为第一次产业，近的为第三次产业，介于二者之间的为第二次产业。（2）产品是否有形。产品有形的分为第一次或第二次产业。无形的分为第三次产业。（3）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是否可以分离。可以分离的划为第一次或第二次产业，不可分离的划入第三次产业。根据这一划分标准，划入第一次产业的有：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第二次产业有：制造业和矿业；第三次产业的有：建筑业、运输与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专业性服务和个人生活服务、政府行政和律师事务、军队等。克拉克与费夏划分的主要区别在于：运输、通讯、建筑、煤气、电力等是划入第二次产业还是第三次产业，军队是否算作第三次产业。

三次产业分类法在应用中受到各国普遍重视，它们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划分各自的范围。为了统一各国的划分标准，由美、英、法、意、西德、澳大利亚、日本等24国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自己的划分方法：农业为第一次产业，其生产活动是直接利用资源的活动，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和林业；工业为第二次产业，其生产活动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或再加工，主要包括制造业、采掘业和矿业、建筑业、公用事业（煤气、电力、水等）；服务业为第三次产业，其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高于物质需要的需要，主要包括运输业、通讯业、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教育、广播电视、公共行政、和国防以及社会事务、娱乐和个人服务等。目前，欧美许多国家都采用这类方法。联合国的标准产业分类与此密切相关。

3.标准产业分类。标准产业分类是指为了统一国民经济统计的口径而将产业分类标准化的过程。标准

产业分类必须具备三个特征：(1) 权威性；(2) 完整性；(3) 广泛的实用性。

联合国为了统一世界各国的产业分类，颁布了《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索引》。这种标准产业分类把"全部经济活动"分为若干大部门，在每个大部门下面又分成若干部门，每个部门下面又分成若干组，最后又将组分成若干项，由此形成了大部门、部门、组、项四级结构，并规定了相应的统计编码。

表（一）引录表（一）按照经济活动种类的分类*

部门	大组	每类的名称
大部门 1		农、猎、林、渔业
11		农业和狩猎业
	111	农业和畜牧业
	112	农业、服务
	113	狩猎、诱捕和猎物繁殖
12		林业和伐木业
	121	林业
	122	伐木业
13	130	渔业
大部门 2		采矿和采石业
21	210	采煤
22	220	原油和天然气生产
23	230	金属矿开采
29	290	其他采矿
大部门 3		制造业
31		食品、饮料和烟草
	311	食品业
	312	
	313	饮料业
	314	烟草业
32		纺织、服装和皮革业
	321	纺织业
	322	服装业，鞋类除外
	323	皮革和皮革制品、皮革代用品和毛类，鞋类和服装除外.
	324	鞋类，硫化或模压橡胶或塑料鞋类除外
33		木材制造业和木材产品，包括家具
	331	木材制造业与木材和软木产品，家具除外
	332	家具和固定装置，主要属于金属的除外
34		纸张和纸张产品，印刷和出版
	341	造纸和纸张产品
	342	印刷、出版和有关各业
35		化学制品与化学、石油、煤、橡胶和塑料制品
	351	化学工业产品
	352	其他化学产品
	353	石油精炼厂
	354	石油和煤的杂项产品
	355	橡胶产品
	356	未归入其他类别的塑料产品
36		非金属矿产品，石油和煤除外
	361	陶器、瓷器和瓦器
	362	玻璃和玻璃产品
	369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37		基本金属工业
	371	铁和钢基本工业
	372	有色金属基本工业
38		金属加工产品，机器和设备
	381	金属加工产品,机器和设备除外
	382	机器，电机除外
	383	电机、仪器、器械和供应品
	384	运输设备
	385	专业、科学、计量和控制用的设备（未归入其他类别的）和照相及光学器材
39	390	其他制造业
大部门 4		电、气、水
41	410	电、煤气、蒸气
42	420	自来水工程和供水
大部门 5		建筑业
50	500	建筑业
大部门6		批发和零售商业餐馆和旅馆
60	610	批发商业
62	620	零售商业
63		餐馆和旅馆
	631	餐馆、咖啡店及其他饮食店
	632	旅馆、寄宿所、野营和其他供寄宿的地方
大部门 7		运输、仓储和通讯
71		运输和仓储
	711	陆地运输
	712	水路运输
	713	航空运输
	719	与运输有关的服务
72	720	通讯
大部门 8		金融、保险、不动产和商业服务
81	810	金融机构
82	820	保险业

83		不动产和商业服务
	830	不动产
	831	** 自有住宅
	832	商业服务机器设备租赁除外
	833	机器设备租赁
		大部门9 政府社会和个人服务
91	910	政府行政和防务***
	1	一般政府服务
	2	防务
	3	一般行政经济政策和服务
	4	一般行政、保健政策和服务
	5	行政、社会保险和补贴
	6	行政、住房和社会发展政策与服务
92	920	卫生和类似服务
93		社会的和有关的公众服务
	931	教育服务
	932	研究和科学机构
	933	医疗、牙科、其他保健和兽医服务
	934	福利机构
	935	商业、职业和劳动社团
	939	其他社会和有关公众服务
94		娱乐和文化服务
	941	电影和其他娱乐服务
	942	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和未归人其他类别的文化服务
	949	未归入其他类别的娱乐服务
95		个人和家庭服务
	951	未归人其他类别的修理服务
	952	洗衣店、洗衣服务和洗染工厂
	953	家庭服务
	959	杂项个人服务
96	960	国际的和其他享有治外法的机构

*大部门、部门、大组和编号及每类的名称，除在本表其他脚注中列出的各类外，均录自《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部门分类》，Senes. M、No.4, Rev.2，联合国，纽约，1968年。各类的内容在该出版物中作了详细规定。

** 在《国际标准部门分类》没有自有住宅一类。

***在《国际标准部门分类》中没有政府行政和防务下的几个小部门

于最近出版的《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部门分类》(ISIC)，通过它可以大体把握标准产业分类的特点和要求。

标准产业分类与三次产业分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标准产业分类的大部门可以很容易地组合为三个部分而与三次产业相对应，三次产业分类的三个部分可以更详细地划分为不同的产业分支而与标准产业分类相对称。

4.生产结构产业分类。指以研究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间关系和比例为目的的产业分类法。在这种分类中，产业单位是以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确定的，因而没有统一的规范。在这种产业分类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

其一是霍夫曼的分类法。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出于研究工业化及其进程的目的，把产业分为三类：①消费资料产业，它包括食品业、纺织业、皮革业、家具业等；②资本品产业，它包括冶金及金属材料工业、运输机械业、一般制造业、化学工业等；③其他产业，它包括橡胶、木材、造纸、印刷等工业。霍夫曼分类的原则是，某产业产品的用途有75%以上用于消费的归人消费资料产业，75%以上用于资本投人的归人资本品产业，介于两者之间的归人其他产业。

其二，"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采用的生产结构分类法。它把产业分为七大类：①基础材料产业，包括矿业、化学工业（不含化纤和化纤原料），石油及煤炭工业、水泥、玻璃、建筑用陶瓷、石料业、钢铁业、有色金属工业等；②加工组装产业，包括一般机械、电气机械、运输工具、精密仪器工业；③生活消费品产业，包括食品、纺织（含化纤和化纤原料）、造纸等工业和其他制造业；④建筑业；⑤商业；⑥服务业；⑦其他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水产业、电力、煤气、供水、金融、不动产、运输、通讯等等。

5.工业结构的产业分类。这是专门用以研究工业结构（尤其是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的产业分类法。通常的作法是，把工业划分为重工业、化学工业和轻工业三大类。其中划分轻重工业的根据在西方往往是产品单位体积相对重量，产品单位体积重量大的工业部门属于重工业、重量轻的属轻工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根据产品用途来划分，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称为重工业，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称为轻工业。

6.资源密集度的产业分类。这里的"资源"是指投人生产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总和，它包括资本、劳动、技术、自然资源等等，这种产业分类是根据不同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某种资源的依赖度大小划分的。例如，对劳动依赖度大的称作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依赖度大的称作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技术依赖程度大的称作技术密集型产业等。这种产业分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很强的相对比较性。但这种划分的标准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例如，电子计算机产业，既可看作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可看作劳动密集型产业。

产业公害 是从生产和流通活动中发生的公害。

人类面临的三大产业公害第一是大气污染。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物质有一氧化碳、亚硫酸气体、氮氧化合物、碳化氢、铅化合物、雾态硫酸、有机氯化物、过氧化合物、重金属等。这些物质形成有毒气体、烟雾、尘埃等。其中硫的氧化物危害最大，因为它能够形成酸雨。第二是水质污染。是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大量排入河流、近海造成的。要特别注意的水中有害物质是镉、氰、有机磷、铅、铬、砷、汞等。第三大产业公害是垃圾和废物造成的污染。尤其是塑料废物的猛增，对生产造成了严重危害。公害是和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的批量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大量流通和大量消费方式，造成了大量工业废物和大量垃圾。又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和生产性投资失去平衡，于是大量企业就要群聚于基础设施和其它经营条件相对有利的地区，造成产业的过度密集，致使公害更加集中。公害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伴而生的，"公害"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有效防止公害必须控制它的发生源。其措施是首先要增加"社会性资本"投资，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特别是涉及防治公害方面的设施投资，如建立完备的环境监测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交通系统等。应特别注意包括各种投资与防止公害投资之间的重大比例关系。

产业布局 根据生产力因素空间组合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要求，使各产业部门的配置符合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趋势的一种产业分布。产业分布实际上是指的在某国范围内的生产力在空间地域上的分布和组合。它是国民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方面的反映，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国的产业布局的主要原则是：(1) 按照产业分布的省时省料原则，使工业接近原料和燃料供应地区，如冶炼工业应接近燃料资源丰富的地区，制糖工业也应接近原料产地；(2) 使产品不宜长途运输的产业部门接近消费地区，如家具工业，玻璃器皿工业、食品工业应接近消费区；(3) 应注意经济发展地区的滴水效应，促使发展极的辐射效应充分发挥；(4) 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扬长避短，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发挥优势；(5) 产业布局应有利于国防。产业布局的特点和规律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它也受自然条件、人口、历史、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先进程度等具体条件的影响.

产业布局分散度 是分析产业布局结构程度的重要指标。它是指全国工业地区总构成中前三名地区比重的绝对值减去其余各地区比重平均值的差，与其余各地区比重平均值之比。其计算公式是：

$$V_{\bar{x}} = \frac{\frac{\sum x_j}{n}}{\sum x_i - \frac{\sum x_j}{n}} = \frac{\sum x_j}{n\sum x_i - \sum x_j}$$

式中$V_{\bar{x}}$为工业地区布局分散度的相对系数；

$x_i(i=1,2,3)$为前三名地区的比重；

$X_j(j=1,2,3\cdots\cdots n)$为其余地区的比重；

n,为去掉前三名的其余地区数。

参见"产业布局集中度"。

产业布局过密 指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分布集中，农村人口大量减少，而经济活动、人口以及文化、教育、社会活动过度密集于城市，其结果造成城市中的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产业布局过密的弊端是由城市本身的私人资本同社会性资本不均衡、城市投施和人口密度的不均衡、企业中的生产设备同防止公害设备的不均衡造成的。由此也表明人口和产业的集中超过了过密地区可利用的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绝对限度。

产业布局过密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聚集的效应引起的。对企业来说，城市中存在大量、集中的需求，便于人与人的接触、联络和商谈。有高度丰富的信息和信息服务可供利用等外部经济，便于从同行的消费者那里了解情况。此外，大量需求，多种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水平，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生活上方便等因素，吸引产业向需求量大的城市集中。但是产业布局过密，随着城市的巨大膨胀，必然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如地价上升、运输效率降低，社会性资本投资效率下降等，还有公害和混乱使城市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供水不足，供电不足，交通拥挤，交通事故频繁等副效应产生。解决"过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把人口控制在容许的限度内，要分散人口，发展地方经济，完善地方的基础设施。

产业布局过疏 系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农村和边远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动大量减少，产业很少，无法形成合理的行业规模和企业结构，同样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即"产业布局过疏"。人们对产业布局过疏的认识要晚于产业布局过密问题的认识。开始时仅注意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过疏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后来还发现过疏地区不仅是人口和生产活动相对减少，而且还存在着生产和生活发生绝对困难的问题。过疏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聚集的效益而产生的。由于城市中存在大量，集中的需求，便于人与人的接触联络和商谈，有丰富信息可供利用等，人口从农村大量地游离出来，企业也不断迁移出来，使某些地区的产业布局

无法形成规模经济，解决产业布局过疏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对过疏地区的投资，努力发展经济，改善过疏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加强社会性资本建设。

产业布局集中度　它是指某产业全国总构成中前三名地区的比重的总和，以及最大比重与最小比重之间的极差。其计算公式为：

$$V_x=\frac{\frac{\sum x_j}{n}}{\sum x_i-\frac{\sum x_j}{n}}=\frac{\sum x_j}{n\sum x_i-\sum x_j}$$

式中V_x为工业地区布局分散度的相对系数；

$x_i(i=1,2,3)$，为前三名地区比重；

$x_j(j=1,2,3\cdots n)$，为除去前三名地区其余地区的比重；

n为去掉前三名的其余地区数；

V_x越趋近于零，表明集中度越大；V_x越趋近于1，表明分散度越大。

产业体系　由各产业所组成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它是一个有序的内在统一的结构。经济是由第一、二、三产业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大体系中，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在组成社会体系的每一个产业中，又有若干有机的子系统。如在第二产业这个系统中，又有机械、电子、冶金、电力、交通、运输等若干产业。而在每个子产业中又有若干子产业。产业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序列。在这个系列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相对下降，但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该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不再下降。而第二产业的发展也有本身的特点，从起初所占的经济产值和就业人口比重的大幅度上升，发展到停滞和经过一定阶段后再上升的过程。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就业人口的比重却不断上升，而其产值则由上升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停滞甚或下降。

产业关联　各产业之间的联系方式或关联方式。产业关联是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产业结构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各产业之间的量的比例关系。它关系着在特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的各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二是各产业在质上的联系方式。即产业关联，它直接涉及的是结构效益问题。分析产业关联，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1)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方式。某一产业的生产成果如何在其他产业流动交换，是采取计划调拨方式，还是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流动；还是二者兼而有之；(2)在产业体系中，某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每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成长阶段，往往会出现某一产业带动或牵引其他相关的产业发展的情况，并使该产业与技术和经济发展趋势发生顺向或逆向的变化态势。(3)同国外产业关联程度和波及范围的大小。即属于内向型经济，还是属于外向型经济。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判断一国的产业结构所达到的层次和程度、结构变化的类型、以及结构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的潜力。

产业革命　又译工业革命。指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以工场手工业的革命。它既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

17至18世纪，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建立了政治前提。由于刚刚确立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生了以机器大生产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重大变革。这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进程上的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新兴的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必须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革新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技术，革新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这在客观上产生了革新的要求。而进入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国内外市场迅速扩大，原来的工场手工业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工业品的需求，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而16—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生产技术的革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文艺复兴以来民主思想的传播和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扫清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封建束缚；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建立机器大工业准备了必要的大批自由的劳动力和巨额的货币财富；而工场手工业的长期发展，使分工日益发达，生产工具日趋专门化，为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工具机的发明和使用是产业革命的开端。1733年，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发明了纺纱机，从此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是由于手工工具转变为机器的标志。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纺织机被普遍采用，到八十年代制成了实用蒸汽机随着蒸汽机应用范围的扩大产业革命迅速扩展到各个部门。恩格斯说："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页）由于机器制造业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使机械化生产遍及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等部门。到19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国已基本上完

成了工业革命。随后，美、法、德、俄、日等国也于19世纪内，先后开始并完成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的革命，而且也导致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从此，资本主义的生产真正进入了狂飚猛进的时期。产业革命的完成，机器大工业以及工厂制度的建立，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了封建制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确立并巩固起来。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于尖锐化。

产业革命不仅是一场生产技术上的巨大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资本家阶级，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资本家阶级的产业无产阶级。恩格斯认为"产业革命的最重要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产业革命"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机器的使用，加强了劳动强度，扩大了工作日中的无偿劳动部分，把工人家庭的全部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并终身依附于机器，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机器的使用，一方面排挤工人，另一方面却壮大了工人队伍，使小生产者纷纷破产，这样，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并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而由于资本家利用机器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使无产阶级陷入穷困失业和饥饿的境地，同时又为无产阶级的团结创造了条件。这样产业革命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基本矛盾日趋尖锐化，又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创造了掘墓人。

产业重组 是指通过政府政策迫使或诱导某些产业部门形成少数企业垄断竞争的市场组织结构，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形成产业的组织机制，使企业能够通过追求自己利益的活动不断地使市场组织结构向效益更高的经济结构转化。不同的国家产业重组的政策可以有所不同。对我国来说，产业重组的基础是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重新构造。必须推行法人企业所有制，完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扩大企业对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产业重组的条件是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必须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帮助提供比较正确的市场信息。

产业结构 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内部构成及其相互比例关系。农业中的农、林、牧、副、渔各业之间的关系；工业中的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工业中的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等生产部门与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其他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内部构成等等。在西方国家，它表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如原材料、燃料工业、加工工业以及各类服务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合理的经济结构才能使经济效益提高。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产业结构所决定。只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使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所谓合理的产业结构，就是各物质生产部门之间，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各部门之间以及两者之间的最优比例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应用，新部门不断出现，原有的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会不断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一国的产业结构受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水平的发展阶段以及该国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一国的居民生活习惯、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和经济政策也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技术水平、需求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不断变化。从发展趋势看，近30年来，工业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极为迅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加，逐渐超过了第一、二次产业的总和。如1960～1975年，美国的第一、二次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从原来的62%上升为68.4%。目前已达到74%。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63%上升为1990年的75%。日本也是如此。促成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最根本的是这些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这要求第三产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

产业结构动态分析法 从较长时期动态地去考察产业产值构成、产业资产构成、产业劳动力构成等产业要素分配比例表示的产业结构，就是产业结构动态分析法。通过观察产业结构发展的绝对水平，可以得出一种对比分析结论。但这种一般化的比较不可能全面掌握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和程度。产业部门间结构变化的方向并非一定异向延伸，有可能表现出趋同型倾向。产业结构动态分析法的一般方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业结构变动指标，另一类是产业结构联系指标。

1.产业结构变动分析方法。要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程度。有三个指标可供我们使用，即产业结构变动值指标，产业结构熵数指标和Moore结构变化值指标。(1)产业结构变动值。计算公式为

$$K=\sum|q_{i1}-q_{i0}|$$

其中K为产业结构变动值；q_{i1}为报告期构成

比；q_{i0}为基期构成比；q_{i0}为基期构成比。（i：年份；l：报告期、o：基期）计算出K的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幅度越大。如果以产值（国民收入）或资产表现产业结构，也可以计算出产业结构变动值。只是这种变动程度反映的不是劳动力的构成变化，而是反映产业产值或产业资产的变动。但在计算产值或资产的K值时，由于是以货币表示的，故应在剔除物价波动因素之后才能进行。（2）产业结构熵数。它是应用信息理论中干扰度的概念，将结构比变化视为产业结构的干扰因素，来综合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程度大小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e_t=\sum_{i=1}^{n}W_{i,t}l_n(1/w_{i,t})$$

式中e_t为t期产业结构熵数值；$W_{i,t}$为t期第i产业所占的比重；n为产业部门个数。

一般来说，e值的变动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动，但在说明产业结构的质和量的变动方面是有区别的，具体地说，此指标并不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各产业在数量上的关系，原因是计算出的e_t值一般波动性不太大、难以表现现实产业结构在数量上的变动程度。但e_t是一个表示产业结构质变关系的指标。假设全部产业共有n个部门，产业结构熵数的最大值便为$e_t n$。若各产业的结构非常均等，则产业结构熵数值便越大；反之则越小。e_t越小，说明产业结构发展型态愈趋于多元化；相反地，产业结构熵数e_t越小，则产业结构发展型态越趋向于专门化。（3）Moore结构变化值。该指标用空间向量测定法，以向量空间中夹角为基础，将产业共分为几个部门，构成一组几维向量，把两个时期间两组向量的夹角，作为表示产业结构变化指标，该指标称作Moore结构变化值。计算公式为：

$$M_t^{+}=\sum_{i=1}^{n}w_{i,t}\cdot W_{i,t+1}/(\sum_{i=1}^{n}W_{i,t}^{2})^{\frac{1}{2}}\cdot(\sum_{i=1}^{n}w_{i,t+1}^{2})^{\frac{1}{2}}$$

式中M^{+}表示Moore结构变化值；$w_{i,t}$表示t期第i产业所占比重；$W_{i,t-1}$表示t+I期第i产业所占比重。

2.产业结构联系分析方法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在产业部门间的相互联系过程中产生的，产业结构间的联系程度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本质原因。分析产业结构联系的指标主要有结构相似系数和霍夫曼比例。（1）结构相似系数。此系数是指同种产业结构的相近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S_{ij}=\frac{\sum_n X_{in}X_{jn}}{(\sum_n X_{in}^2\sum_n X_{jn}^2)^{\frac{1}{2}}}$$

其中S_{ij}表示两种产业结构（i与j）的相似系数。

X_{in}表示n部门在i种结构中所占比重；

X_{jn}表示n部门在j种结构中所占比重。

（2）霍夫曼比例，这是研究工业产业结构联系的重要指标。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对近20个国家的资本资料和消费资料净产值变动比值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他发现这个比例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下降，这个比值一般称为霍夫曼比例。

$$霍夫曼比例=\frac{消费资料工业部门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部门净产值}$$

霍夫曼比例中的消费资料和资本品资料部门可以近似地当作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霍夫曼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见下表：第一阶段基本可以说工业化水平较低，或尚处在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时期，第二三阶段，工业化程度有所加强，

工业化阶段	霍夫曼比例
第一阶段	5(±1)
第二阶段	2.5(±1)
第三阶段	1(±0.5)
第四阶段	1以下

该比例值后面的括号内的数字，表明判断时所允许的误差。

或者说正处于工业振兴时期，初步迈入了工业化国家行列。第四阶段，生产资料生产超过了消费资料生产，基础工业高度发达。一般说来，工业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表明产业结构从以原料工业为中心，转移到以加工组装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这就是高加工度化。从技术角度而言，这就意味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霍夫曼比例是我们掌握工业产业部门结构联系和变化的“指标器”。

产业结构合理化　这是一个动态概念。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根据本国国情、资源禀赋条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之间的联系程度等因素，通过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尤其是产业结构政策，或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使各产业协调、稳定、健康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可以用以下标准来衡量。（1）各产业间的产出是否均衡，是否存在瓶颈产业；（2）各产业间投入与产出比例的大小；（3）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合理地开发与利用；（4）国内外的成熟技术是否得到了广泛运用，其产生的经济效果是否相对最佳；（5）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是否获得了较高的

经济效益；(6) 劳动力是否充分运用并发挥其作用；(7) 生态环境是否合理，有效保护的程度如何；(8) 对外贸易额的大小，进出口比例是否平衡，是否发挥了本国的优势等等。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

产业结构优化 系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合理化，即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与相互补充；另一个方面是高度化，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高效化方向演变。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结构，如果产业结构不与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相适应，产业结构将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同时，由于人们的消费结构不断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必然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所以，由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结构也必须发生变化，必然要求改变产业结构，使之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参见“产业结构规划”。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应具备的适时适宜地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能力。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否，正确与否，强有力地规定了转换能力的高低。这种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一个国家如果有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而政府的指导，和参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与产业结构转换是不可分离的。正确的产业结构政策又是被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实际上，产业结构政策及其转换能力，是一国经济体制状况的反映。如果没有国家对经济的有效干预，没有国家对“幼小产业”的扶植和保护，产业结构的转换只能放任自流，难以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重要的，而且对发达国家来说也同样是重要的。

产业结构规划 指为了使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种“高附加价值化”的趋势。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的政策设计。产业结构规划所遵循的原则是 (1) 国情原则。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有阶段的有序过程。人们在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观作用，只能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空间所给定的条件下发挥出来。因此，正确把握一个国家在一定时点上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是规则产业结构的出发点。1957 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第 8 卷第 4 号上发表了题为“产业结构与投资分配”的著名论文，提出了规划产业结构的基准。认为日本是一个缺少资源和能源的国家，国际贸易对日本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必须考虑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并把它作为日本产业结构规划的基点。(2) 基准原则。由于人们难以预料经济发展的详细情况，诸如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消费需求变化多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能从战略的高度去规划产业结构。因此，最关键的是，根据世界贸易的产品结构趋向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的实际情况，确定产业结构中、长期的演变趋势和方向；二是明确带头的工业部门，确定主导产业。由此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长。

产业结构规划的基准有 4 条：(1) 收入弹性基准；(2) 生产率上升基准；(3) 防止过度密集基准；(4) 丰富的生活质量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是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提出的。他认为，强调收入弹性基准是考虑了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化趋势。根据这两个基准选择战略产业，通过政府的多种经济措施促其发展，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是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基石，并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效果。根据筱原两基准，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战略产业的有普通钢、船舶，家用电器、光学仪器、摩托车、合成纤维等。这一产业结构规划的优点是，为具体规划现在和未来的产业结构提供了明确的依据。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规划产业结构的基准又加上了防止过度密集基准和丰富的生活质量基准。这实际上是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准。一般认为，产业结构规划的基准，还应该加上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赫西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基准。即一国根据实际发展的所达到的阶段，重点发展那些前后项关联效应大，能带动其它产业发展的产业。此外对外贸易基准也是必不可少的。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这是分析产业结构联系的一种方法。它是指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相近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S_{ij}=\frac{\sum_n X_{in}X_{jn}}{(\sum_n X_{in}^2\sum_n X_{jn}^2)^{\frac{1}{2}}}$$

其中

S_{ij} 表示两种产业结构 (i 与 j) 的相似系数；

X_{in} 表示 n 部门在 i 种结构中所占的比重；

X_{jn} 表示 n 部门在 j 种结构中所占比重。

以就业结构为例，中国 1952 年与 1872 年日本的就业结构相似系数为 0.9987。即中国的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日本 19 世纪后期的水平。中国与日本 1980 年的就业结构相似系数是 0.3472，基本没有什么相近可言。但中国 1980 年与

日本1920年的就业结构相似程度较高，为0.9502。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同类产业结构也可用此系数进行比较研究，以了解不同时期产业结构的关联程度。

产业结构高度化　是日本经济学家在产业经济研究中首先提出的一个术语。产业结构高度化包括以下几个含义：(1) 产业高附加价值化，即产品价值中所含剩余价值比例大，具有较高的绝对剩余价值率和超额利润；(2) 产业高技术化，即在产业部门中广泛应用高技术（包括高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复合）；(3) 产业高集约化，即产业组织合理化，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4) 产业高加工度化；(5) 结构转换能力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上述含义表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经济发展达到较高阶段，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原材料工业比较发达，对外贸易具有很高的水平时，才有可能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措施　推行产业结构政策是促使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本措施。它一方面取决于产业结构转换目标设计的准确性与可行性，另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强弱。它除了包括市场竞争力量以外，还包括政府推进产业结构适时适宜的转换的素质、功能、手段等综合性力量。其措施包括：(1) 它包括建立几大产业银行，在现阶段可由产业银行接受国家投资，按照国家确定的投资方式以贷款形式投放给企业；向社会发售金融债券或企业股票，积聚资金，推动整个产业结构迅速完成固定资产更新。中央政府依据产业结构模型，先直接控制某些大区或某类产业的银行，这些银行接受国家投资向社会发售债券、股票的权利，以保证主导产业、"瓶颈"产业和某些重点地区的技术改造首先完成。(2) 兼顾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因素的基础上，按经济区域划分成几个大产业调节区。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各产业区的优势产业。(3) 建立没有行政级别、不具有行政职能的行业协会，用行业管理逐渐取代现代的部门行政管理。(4) 推行产业结构的第一层次转换的措施有：用产业政策从投资、就业方面进行引导和保护第三产业，允许农民有权承包、租、买小型国营企业，有权购买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的股票。以此推动城市金融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的形成和股份制的实行。使用各种经济杠杆，制定明确的行业规划和发放许可证，用各种政策吸引大量农民合同工到城市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服务业、商业以及第二产业中的轻纺工业部门中来，促进城乡经济中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为形成我国劳动力非商品化下的劳动市场创造条件，以造成城市经济部门中生产效率的增长高于工资增长的趋势向。支持和推动城市产业部门以各种经济联合形式、协作形式、承包形式向农村辐射扩展，提高城市工业企业和农村商品生产专业化、集约化水平，继续采取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办法，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和发展。(5) 指导主导产业选择的措施有，对机械工业进行重点扶持和重点改组，通过国家补助、社会集资、银行优惠贷款，扶持机械电子工业在近几年内完成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重点扶持机电一体化生产方面的技术引进，尽快实施《机构工业标准法》。对钢铁工业部门明确规定近十年内上新项目，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各大公司的生产分工与协调上。对能源、交通部门中的电力、矿源勘探、公路、铁路港口建设和邮政通讯等在提高投资效益的基础上给予重点投资，并通过银行发行债券；使社会资金流入这些部门，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

产业结构政策　是指根据本国国情，客观地确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规划产业结构逐级演进的目标，并阶段性地确定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引导一国的经济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政策系统。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决定经济建设总体布局成败的关键之所在。规划产业结构演进的目标可分为纠正产业结构的扭曲、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方面。

我国的产业结构扭曲有三个表现。第一，农业的发展水平难以稳定地承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规模。第二，基础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发展比例失调，出现基础结构超负荷承载现象。第三，加工工业脱离能源、原材料工业等基础工业的发展，超前发展。纠正我国产业结构的扭曲是产业结构政策的首要目标。

规划我国产业结构的第二个目标，是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改变经济资源在产业间分配的相对比例，推动经济向广义和深度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大产业间的投入的相对比重和产出的相对比重都发生很大变化。第一次产业将逐步缩小，第二、三次产业将逐步扩大。不论社会制度的差异，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呈现出同一规律。除了三大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以外，各大产业内部的结构也会发生重大变化。简而言之，在工业化过程中，多由轻工业发展为先导，尔后由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进而向耐用消费品工业发展带动的一批加工组装工业方向发展。产业结构规划的落脚点，必须落实到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上。例如，我国"七·五"计划建议规定了产业结构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地位，加快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通信事业的发展；二是以推动结构升级为目标，"七·五"计划提出了以汽车工业和建筑工业为发展我国战略产业的设想。

产业振兴 是日本为促进产业的合理化，谋求某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并以此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政策。振兴一个产业，需要考虑多种因素，需具备各种条件。谋求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振兴产业的许多措施，最终要归结在解决产业组织的合理化上。日本产业振兴的主要指导思想是走贸易立国道路，依靠建立加工贸易型的产业结构，依赖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改变日本落后的产业结构，扶持一批在国际贸易中占优势的“战略产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建立大批量生产体制，不单纯依赖市场经济而由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日本在战后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对手，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必须扩大企业规模，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在产业振兴的选择上，首先选择了机械工业。通过实施产业振兴法规，如“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的颁布，有力增强了日本产业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优势。通过税制、金融，财政一系列措施，增强了产业的实力，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产业结构静态分析 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的一种方法。产业结构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的状况如何，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一国产业结构现状，而且是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基本依据。各产业内部经济要素的组合是由劳动力、资产（固定和流动资产）和收益构成的，因此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或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和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就形成了产业结构的静态格局。虽然这些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数量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但从某一时点某一时期来观察，此三项要素在产业部门中所占的比重，则是相对稳定的。

（1）产业产值构成是相对稳定的，某一时点上社会总产值的产业部门构成比，以及国民收入的产业部门构成比，可以从生产的结果方面，综合地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这两种形式的指标，在反映产业结构方面各有优点。其中各部门的国民收入构成比重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产业结构的新创价值的构成情况，以国民收入比重代替社会总产值比重更具有科学性，因为它排除了转移价值的干扰。以产业部门的产值构成在各种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比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不同产业的技术设备、劳动力构成均具有各自的特点，况且各产业部门的规模和市场需求状况都有天然的差别，存在着众多不可比因素。以产业部门产值结构来表现产业结构的方法，可以作为了解产业结构状况的标尺，这个状况代表了产业部门创造价值水平的标准。

（2）产业资产构成也是相对不变的。产业资产包括各产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是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各产业部门由于其自身的生产特点所决定，其资产构成在客观上是不同的。第二产业所需固定资产相对较多，第三产业所需流动资产相对较多；农业只需少量的资产投入，而工业却必须具有较多的资产来作为生产条件。除了各产业资产结构的客观差别外，还存在因技术水平高低造成的产业资产结构的差别。不同国别相同产业部门的资产结构比较，可以反映出科技和装备水平的差距；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产业部门资产结构比较，可以了解技术进步的程度和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及盛衰情况。在农业部门分类已确定的前提下，资产分配比例在不同期间，不可能发生同比例提高的情况。即若有某产业资产装备水平相对提高，必伴随其他产业资产装备水平的相对下降。产业资产结构是个必要的分析方法，它可以了解各产业的资产构成现状；可以了解产业部门之间的产业部门内部的技术装备情况。

（3）产业劳动力构成状况也是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数量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比例形成产业劳动力结构（亦称为就业结构）。劳动力分配结构的形成，主要受制于以下三个因素：a 劳动力生产率因素。在某一产业部门内部如果劳动生产率高，则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就会相对小些，反之则会增加。b 技术装备水平因素。在高技术产业，自动化半自动化程度较高，所需劳动力较少；而对那些技术装备低的产业，劳动力需求量相应要高。c 产品和工艺的性质。产业部门有自己的生产特点，包括生产周期、生产工艺等。这样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也不一致。通过劳动力构成状况，可以比较清晰地分析产业劳动力结构情况。利用劳动力结构进行静态分析的优点是，可以自然清除不可比因素，包括时期和国别造成的不可比，劳动力是产业部门中不可或缺的生产因素，将劳动力和上述的产值和资产要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还可以了解产业效率的状况。柯林·克拉克就是利用劳动力指标来研究产业结构状况的。

产业政策类型 针对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市场失败而采取的政策性干预的类别。其内容依市场失败的性质不同，分为三种类型：（1）培育及发展新兴产业型；（2）干预个别产业特定活动型；（3）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型。其中第二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又细分为三种，培养和扶植对外国独占企业的竞争力。原有产业的重整和现代化；对个别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关系的干预。对三种类型的产业政策，政府的相应配套手段为：进口配额的分配；引进技术的政府核准；关税及税收的优惠，如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等；补助金或低利融资；限制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促

进企业的合并及协调，行政指导等；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使用提供诱因型的与直接限制型的政策手段。

产业联系理论　指借助产业联系表（即投人产出表，或叫里昂惕夫表）对产业之间在生产、交换、分配上发生的系列联系进行分析研究的一种方法。由于它能够运用于认识一国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比例关系及这种比例关系的特征，能为经济预测和经济计划服务，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产业联系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创立的，通常也叫投入产出经济学。

动态比较费用说　这是日本经济学家研究后发性国家在改变其产业结构时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它认为从某一时点上看（静态地观察）在国际贸易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产业，是极其片面的；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有些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业，比较生产费用是可以变化的。对这些产业不但不应该抛弃它们，而且应该扶植它的发展。"动态比较费用说"提出的背景是后发性国家如何面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以及当时世界的现状而提出的。根据李嘉图的"比较生产费用说"，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生产要素不能跨国移动，生产条件各异，生产同类商品的各国别费用是不同的。确定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的根据是一个国家在生产某一类商品时，其生产费用比其他国家"相对有利"还是"相对不利"它是从静态角度考察国际贸易分工的。但是，如果后发型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那么后发国家就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因此，日本学者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扶持幼小产业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性国家发展经济的"比较生产费用说"。李斯特认为，要用贸易保护的政策扶持弱小的德国工业，他认为在当前虽还不可能成为出口产业的幼小部门。在一段时间以后，经过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可以成为出口产业的重要部门。依据"动态比较费用说"扶持幼小产业而获得最大成功的典型例子是日本的汽车工业。日本汽车产量1955 年不过 6.5 万辆，当时日本为美国汽车产量的1/135，而 1980 年，日本汽车辆竞达到 1140 万辆，美国汽车产量才为 801 万辆。"扶持幼小产业说"在重视市场机制作用的现代经济学里，虽然不受欢迎，但日本却获得了成功。发达国家将其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收入弹性相对较高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只生产和出口需求增长和技术进步率较低的产品，在存在南北收入差距的情况下，"比较生产费用说"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因为在国际贸易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的不平衡、不公平贸易中，势必要付出更多的资源和巨大的代价。后发性国家必须一方面在发展自己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必须扶持幼小产业，借鉴"动态比较费用说"的理论，发展本国经济。

传统部门　一般指农业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把传统产业作为他的"起飞前提"阶段的一种概念。在没有建立起现代社会的国家里，其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而要使农业部门为现代部门服务，必须建立起政治制度，有与该社会制度须臾不可分离的阶层—企业家集团。必须找到跨越城市各个附层和农村之间的现有鸿沟。才能使传统农业部门转化成为现代部门，为现代部门服务。

回波效应　又译作"回荡效应"。指自由的国际贸易对不发达国家经济生产的不良作用，它由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他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对发达国家经济起到进一步促进的作用，而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则起着影响其发展的作用。在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由于增加了工业品的出口，其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就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教育随之改进，文化进一步发展，其结果是经济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良性循环。而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情况完全相反，由于本国工业缺乏竞争力，发达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占领国内市场，本国生产逐步衰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减少，农业人口不仅不能转移到工业部门，而且工人不得不返回农业部门，而高技术工人不得不流向国外，这样就形成了城市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无法提高的结局。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称为"扩展效应"，对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则称为"回波效应"。缪尔达尔主张不发达国家要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以避免国际贸易对本国经济产生不良作用。

产品循环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提出的学说。这个理论认为：象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新的工业品从问世、投入市场到退出本国生产经历了 4 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新产品问世，扩大市场，直至饱和；第二个过程，这一产品出口到国外、开拓国外市场。第三个过程，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便有资本和技术出口，促成资本与技术同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形成与其他资源相联合的态势；第四个过程，国外生产能力的形成，使这种产品

以更低的价格打入本国市场，而本国市场的先期产品的生命周期业已结束，这就使开发了新产品的工业先行国不得不放弃这种产品的生产而去开发更新的产品。即形成新产品开发→国内市场形成→出口→资金和技术出口→进口→开发更新的产品→不断循环……。按照这种产品顺序不断循环，不断上升，就是"产品循环说"。弗农总结了国际贸易对象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的工业结构的影响，提出了关于国际贸易对工业结构影响的理论。弗农的分析是以本国工业品的开发以及在新市场上的出现为起点的。由于先行国在海外的投资使先行国的已有产业受到国外竞争压力的威胁的影响，叫作"反回头效应"。弗农通过对产品循环的研究，认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有"后起国优势"，后起国发展的关键是要善于利用"后起国优势"和具备利用"后起国优势"的条件。

价格波及效果 是指运用投入产出表进行价格均衡模型的分析，从投入产出表的纵向关系中使用同样的方法推导出一个价格均衡模型。

$$P=[I-A']^{-1}=[(I-A)^{-1}]_1V$$

其中P是价格向量，V是毛附加价值向量；

A'是将投入系数矩阵A的第（ij）元素变换为第（ji）元素的转置矩阵。

利用均衡价格模型可以作两种价格预测：一是预测附加价值变动对价格的影响。附加价值的变动△V对价格的影响△P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triangle P=[(I-A)^{-1}]\triangle V^1$

因此，可借用产出量均衡模型计算出逆矩阵系表。利用这个公式可预测工资上升或间接税（产品税）和政府补助金对价格的影响。

二是预测某一特定产品价格P_n的变动$\triangle P_n$对其他产业部门价格的影响。预测这种影响的方法是：

$$\begin{bmatrix} \triangle P_1 \\ \triangle P_2 \\ \vdots \\ \triangle P_{n-1}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dfrac{b_n,1}{b_n,n} \\ \dfrac{b_n,2}{b_n,n} \\ \vdots \\ \dfrac{b_n,n-1}{b_n,n} \end{bmatrix} \cdot \triangle P_n$$

其中$(b_{ij})=(I-A)^{-1}$

当计算出

$$\begin{bmatrix} \triangle P_1 \\ \triangle P_2 \vdots \\ \triangle P_{n-1} \end{bmatrix}$$

以后，还很容易推算出各产业部门的价格上升率。利用投入产出表，对价格的波及效果分析，可以认识经济中的各种规律，也可以具体分析价格的变动对产业部门发生的具体影响。

机械工业核心论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的以机械工业发展、变动、逐步高级化为中心的趋向。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以机械工业作核心而发展的。机械工业的水平，机械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的地位的变化直接决定和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包括结构水平）；从而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又总是同机械工业在该国工业结构中的地位直接相关的。换言之，机械工业在工业结构中比重高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一般就高，反之，一般则低，收入水平的提高，总是伴随着机械工业在工业结构中比重的提高。在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传统加工工业和劳动对象工业增长最快，在工业结构中占的比重也是最大（但传统加工工业和劳动对象工业的地位发生着相互转化，即传统加工业由增长速度和产值比重所占的第一位转化为第二位，劳动对象工业则由第二位上升为第一位）。作为制造劳动资料的机械工业在这个期间虽然自身的增长速度和所占比重在逐步加快，但与前两类工业比较，却不能不占第三位。

在工业化进程的第二阶段，这三类工业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制造劳动资料的机械工业增长速度和产值比重逐渐上升为第一位，而劳动对象工业和传统加工业则分别下降为第二位和第三位。与劳动对象工业相比较，传统加工业增长速度更加放慢，产值比重更为缩小。

在工业化进程的第三阶段，制造劳动资料的机构工业在增长速度和产值比重上继续占据第一位，而劳动对象工业增长放慢的速度和产值比重减小的幅度则加快变大。与此相反，传统加工业的增长速度放慢和产值比重缩小的幅度变小。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的这种转变是同人类生产的发展的三次重大科技革命相对应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气化和化学作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造成了提高能源、原材料利用率和对有关机器设备的大量需求。尤其是电气技术革命造成了所有工业部门广泛采用机器生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造成了机械工业的大发展，机械工业占据主导地位，传统加工业和劳动对象工业所占比重下降，便成为世界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第二阶段的特征。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末，发生了以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在这个新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高技术产业群，进一步提高了原材料和各种能源的利用率，并逐渐改造了机械工业。因此，新的工业部门耗用的不变资本费用大幅度低于原有工业部门，从而造成了劳动对象工业比重

的进一步下降和新型的机械电子工业比重的进一步上升。用机械工业为核心来分析和判断工业结构的水平正是上述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理论性概括。

机械工业振兴法　是指日本1956年公布的《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这个振兴法规包括目的、合理化基本计划、合理化实施计划、计划的改变、资金的保证、有关采取共同行动的指示、共同行动的内容、共同行动指示的改变、共同行动的报告、禁止私人垄断和保证公正交易法律的例外、与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关系、公布提高企业生产技术的标准、机械工业审议会、征收报告、法则等15节共24条。这个法规是在以下指导思想下制定的：日本经济发展只能走贸易主义的道路，即依靠建立加工贸易型的产业结构，依赖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必须改变日本当时落后的产业结构，扶持一批在国际贸易中占有和将能占有较大比重的"战略产业"，进入国际经济舞台，在"战略产业"中，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建立大量生产体制。以上的目标难以单纯依赖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地完成，必须由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机械产业振兴法规的制定就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具体化，并采取了立法这种强硬形式。

机械工业振兴法制定的程序是，首先进行需求预测，制定与此相适应的供应计划。在制定这个计划时把着眼点放在注重规模经济上，并考虑如何通过政策来利用它。目标放在使成本下降的百分率的大小上。为此采取的政策措施是税制、金融上的一系列优待等等。

"机振法"的制定者主要考虑了两个问题：第一，建立产业水平上的大量生产体制，改变机械工业品种多、批量小和生产过于分散的状况。由于日本机械工业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是机械工业的基础部分脆弱，即工作母机、通用件部门等不仅分散且集中在许多中小企业；这就需要在提高中小企业素质的同时把中小企业引导到品种少、批量大和集中生产的方向上去。"机械工业振兴法"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如下措施，对企业实行"四限制"。

1.限制生产的品种；

2.限制各品种的生产数量；

3.限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技术；

4.限制零件和原材料的采购方法。

限制品种是指实行标准化，减少同类产品的品种，并减少一个企业生产的品种。在向企业分配生产品种和数量时，通产省规定了八项标准。

(1) 企业过去有生产某种产品的经验，产品有较高信誉；

(2) 企业对生产某产品有较高的积极性；

(3) 企业对提高某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有较高的积极性；

(4) 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好；

(5) 有生产骨干和生产技能；

(6) 设备情况好，

(7) 产品本身的重要性和出口的可能性；

(8) 同一品种的生产厂商应少于4家。

所谓限制技术，就是不许用落后工艺、技术进行生产。

所谓限制零件和原材料的采购方法，是控制流通环节的多品种小批量的方法。

"机振法"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推进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保证措施是依靠进口，解决技术问题，保证资金供应，主要是加速折旧，靠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的支持。通过贯彻"机械工业振兴法"日本达到了四个目的，挤掉了落后企业，挤掉了企业中的落后产品；促成了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和企业的大批量生产，为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为使用大型、高效、高精度的专用设备和生产线创造了前提，使机械工业成为日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主导工业部门，使日本机械工业产品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机振法"的实行，使日本机械工业形成三个层次，一是产生了大量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生产零部件的中小企业，这类企业规模不大，但由于品种少，批量大，具有很高的规模经济效益；二是形成了拥有特殊技术专长的、专业生产某种品种整机的较大企业和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在专长的品种上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三是逐渐形成了一些以大量生产、大量销售为特点的机电产品的大型组装企业和多角化经营的巨型企业。

关联效应　又称"连带效应"。指某一产业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产业投入产出水平的波及程度和影响能力。连带效应可分为前向连带效应和后向连带效应。假定A、B、C三个产业部门。当A产业扩张时，一方面诱发把A产业的产品作为中间产品的C产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又诱发向A产业提供中间产品的B产业的扩张。前者叫前向关联效应，后者叫后向关联效应。与连带效应的分类相适应，衡量某一产业关联效应大小的指数有两个：前向关联度和后向关联度。前向关联度指一个产业向其他产业提供的中间产品占该产业需求的比重，后向关联度是指一个产业所使用的由其他产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与该产业产出的比重。这两种关联度可根据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如果某一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度都比较大，则表明该产业是位居核心地位的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比较密

切。这样的产业必须优先扶持，加速发展。在规划产业结构时，应将能最大限度诱发其他产业扩张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机制不同，计算前向关联度和后向关联度时的标准也应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关联效应是制定产业结构规划，选择主导产业，发展支柱产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把它作为判别主导产业的第三个基准。但是，筱原三代平认为，这个基准对封闭经济更为适宜。参看"旁侧关联"，"前项关联效应""后项关联效应"。

自然垄断产业　凭借对自然条件或自然力的独占而经营的行业。这是根据不同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依赖度的差异，划分产业的一种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以及和土地相联系的自然条件或自然力（如瀑布、水域、矿山、建筑地段等），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这种占有，便形成垄断，形成同类的技术近似性，和产品的位似性。进而形成某种自然垄断产业。自然垄断产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产生超额利润，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自然力本身并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不合理的价格体制，也产生自然垄断产业，这也是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之一。

七　画

技术进步率　又称"技术进步速度"。如果用生产函数表示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与产出之间的一种技术关系，则技术进步率就是单位等产量曲线随时间向原点移动的速度。假设产出 Y 和作为投入要素的劳动 L 与资本 K 都是时间 t 的变量，则一般生产函数的形式为（道格拉斯函数）：

$$Y(t)=F[K(t),L(t),t]\cdots\cdots \quad (1)$$

两边进行全微分得：

$$\frac{dY}{Y}=\alpha\frac{dK}{K}+\beta\frac{dL}{L}+\frac{L}{Y}\cdot\frac{\alpha F}{\alpha t}dt,\cdots\cdots(2)$$

其中 $\alpha=\frac{\alpha F}{\alpha K}\cdot\frac{K}{Y}$；$\beta=\frac{\alpha F}{\alpha L}\cdot\frac{L}{Y}$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2) 式右端第三项为技术进步率。它只是体现了技术进步的静态结果，未体现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动态变化，它表示了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全部要素（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体现的技术进步除外）作用的结果。因此又把它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或综合要素生产力。利用此生产函数 (1) 和 (2) 式能计算出技术进步的贡献率。

结构性不景气产业　见"夕阳产业"。

近代部门　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的概念。罗斯托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起主导作用的部门为近代部门。它指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建立了现代国家以后，要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任务，其阻力来自于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贵族社会结构，以及原先的殖民势力，或二者之间的结合。为此，必须建立近代部门，发展经济，让知识参与社会政治和法制上的改革．而这些部门主要是指作为起飞前提的食品、饮料、烟草、水泥、砖瓦等部门，以及替代进口货的消费品制造业综合体系，主要是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如纺织工业等．

近代部门还有一种概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产业经济学定义上的近代部门指纺织、钢铁、传统机械、交通等工业部门。

技术密集型产业：　指需要用先进的、复杂的、尖端的科学技术才能进行生产的产业。如微电子产业、航空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新材料工业、新能源工业、空间工业等。其特点是：(1) 技术密集，技术装备高，产品设计复杂，工艺过程先进，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产品的附加价值高；(2) 智力密集：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大，工人技术水平高；(3) 资金密集：单位产品的资金占用量大，资金投入高；此外，由于它是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必然带动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因此研究开发费用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一国产业中所占的比重的大小，是衡量一国工业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社会先行资本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论述经济成长阶段时所使用的概念。即指在一般的产业投资以前一个社会应具备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它是社会性资本投资形成的资产。其特征如下：它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服务于经济活动领域，构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它所提供的服务是由国家、公共机构或受国家委托的私人机构，无偿地或

以公定的价格提供的；它所提供的服务是不能从国外进口的；社会性资本的投资有不可分割性；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来实现。这种社会先行资本的投资一般包括环境卫生、学校、公路铁路、医疗保健、公共租赁住宅、港湾、航空、电信等方面。它是整个产业的基础，是提高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社会先行资本的最基本方面是交通方面的投资。参见“社会经营资本”。

社会经营资本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概念。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认为，一国起飞的初始条件必须具备：(1)对传统社会进行大量改造，包括交通建设和市场机制的形成；(2)在可以承受的费用水平上开采国内资源；(3)最低限度的为经济启动提供动力的资本和其他社会先行资本。罗斯托认为，在为一个社会创造前提条件时期，社会经营资本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处于发动阶段以前和正处在发动阶段的社会，总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必须用于运输和其它经常开支。社会经营资本有三大特征：第一，它同一般投资不同。它投资时间长，见效慢，利润收回期长；第二，社会经营资本的投入量大，且是整体性投入；第三，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从社会经营资本得到的利润常常是通过许多间接的因果关系回到整个社会，而不是直接回到投资者手中。因此，社会经营资本必须让政府投资。罗斯托认为，筹集数额巨大的创业资本，是创业时期的政府的极为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社会基础设施　指社会性资本投资形成的资产。社会性基础设施一般是有服务范围广、涉及的经济领域宽，不可替代性，不可分割性等特点。以日本为例，社会性资本的投资及形成的基础设施，具体包括的内容和范围是：(1)环境与卫生。其中包括：下水道、简易下水道，垃圾处理设施（包括工业废物处理设施），城市公园；(2)公共租赁住宅。包括公营住宅、“日本住宅公团”住宅、“地方住宅供给公社”的租赁住宅等单位的投资；(3)医疗和福利。包括保健医疗设施、自然公园、社会福利设施；(4)学校设施；(5)公路、日本国有铁路；帝都高速交通营团等单位投资设施。(7)港湾，港湾基本设施、港湾设备；(8)航空，机场及导航设备；(9)电信、电话通信业；(10)国土保护。包括整治河流，建造水坝、防砂固堤，修整海岸、治理山河等；(11)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草地改良、林道、造林、渔港、渔场建设、生产的公用设施和设备，流通设施。(12)自然灾害后的复原、政府机关设施的维修，职业训练设施、劳保福利设施、学校设备、社会教育设施、社会体育设施、文化设施、开拓工业用地、自来水、工业用水、国营电力、国营煤气、国营交通事业（包括地铁）、邮政设施、电源开发公司的投资，政府系统各事业单位的设施（包括电话和铁路等），对国有森林、草原等的投资，城市停车场、交通安全设施等。

社会性基础设施具有产业基础的职能，比如公路、港湾、铁路、航空、通讯、工业用水、农田水利建设、渔港、电力、煤气是进行生产活动不可缺的条件。社会性基础设施还具有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的机能，医疗机械和设施，修建上下水道，废物处理、环保卫生、修建公园，是改善人的生活的必要条件。港湾、航空设施和通讯设备则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社会基础设施对现代化工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性基础设施不完备会造成外部不经济的后果，如公害泛滥成灾和人口与经济活动过度密集在少数地区恶化了人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住宅难、交通难、使公害进一步猖獗等后果。

劳动密集型产业　指技术装备程度较低，需用大量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的产业部门。如农业、林业以及工业中的家具工业、皮革工业、玩具工业等。这类产业具有投资少、单位投资吸收劳动力较多，技术操作要求低，单位产品中活劳动消耗所占比重较大等许多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资本的有机构成会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转化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混合型产业。

补差制度　指先使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一致，即任凭国内价格随国际市场浮动，同时，政府规定一个比国际市场更高的“保证生产价格”，然后，政府向生产者支付其差额，即（保证生产者价格—市场生产者价格）生产该年度的销售量，这就是农户直接从政府领取的价格补贴。它是英国对小麦价格的支持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政策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促进农产品的增产；二是保证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但是农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程度，“增产”效果和“保证收入”效果会发生矛盾。因为保证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就要出高价，出高价促进增产，增产超过了需求就产生生产过剩，一方面农产品积压在仓库；另一方面使财政负担加重，造成生产资源和财政资源的浪费，因此采取“补差制度”要慎重。但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保证农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扶植幼小产业说　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list)提出的一种理论。它是关于后进国家改变产

业结构，发展国际贸易的一种学说。19世纪初叶，德国是一个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对德国的工艺化持悲观态度。李斯特则主张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扶持弱小的德国工业。他认为，某些在当前还不可能成为出口产业的幼小工业部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政府的扶植和保护下，肯定能够成为很好的出口产业。因此，完全应该采取的贸易保证主义政策。"扶植幼小产业说"的特点是：（1）用发展眼光看待产业的优势和劣势。在国际贸易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产业从发展的眼光看完全可能转化为优势产业。因而，对目前看来处于劣势，而在今后可能成为优势的产业，不但不放弃它的发展，而且应予以支持。（2）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般工业品都要依次经历发明研制、引入市场、成长、成熟、饱和、衰退、消亡几个阶段。在研制阶段，企业必须进行大量投资而不能获得收入；在引入市场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少，生产效率低，销售收入往往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只有在进入成长阶段以后，产品销售额才能迅速扩大，生产效率才能大幅度提高。产业是同类产品生产的集合，其动态变化也遵循产品寿命周期规律。如果静态地考察收入弹性高低和生产率上升的快慢来决定投资和产业结构，投资往往优先于处于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的产业。投资经过一段建设时期形成生产能力时，该产业可能已经步入饱和衰退期。"扶植幼小产业说"，认识到了这一周期性变化规律。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认为，日本明确地采用了扶植幼小产业说。并以明确的形式予以坚决地执行。李斯特的"扶植幼小产业说"对产业结构的发展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局限性。首先扶植幼小产业并不包含对其前途的判断。实际上幼小产业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业，二是处于劣势地位永远处于劣势地位，远远赶不上同类产业已处于优势的别国产业。很明显，幼小产业是否值得扶持，要看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有没有成长的条件。也就是问题的关键是要善于利用"后起国优势"和是否具备利用"后起国优势"的条件。其次，从整个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配置看，一个国家既应发展扶植有成长空间的幼小产业，也应发展已有发展优势的产业部门。

余暇产业 指为人们的业余活动提供设施或用具，以及提供方便及各种服务的行业。比如旅游业只包括旅馆和组织观光旅游、饭馆、电影、职业体育比赛、戏剧演出、高尔夫球场、滑雪场、游泳池、网球场、游乐园等。据认为，这种产业的勃兴是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样化、超物质化的趋势有关。它说明第三次产业的繁荣是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进展的结果，同时它也是经济进步的条件。余暇产业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发展，余暇产业越来越向着科技化、电子化、智力化方向发展。

八 画

现代工业部门 是指广泛运用先进工艺，新材料并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部门。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大量文化素质高、操作技术熟练的生产工人；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在工业职工中占有较高比重；电子计算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管理；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实现了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具有先进的科学管理水平，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并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能获得较高利润，在产业市场结构中产品占有绝对份额。现代工业部门是一个国家生产技术发展到现代先进水平的标志。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工业部门的标准也会随之变化，并不断提高。

供给结构 与生产技术水平和状况相适应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的保有量及相对价值的结构。供给结构是制约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它也制约着一国的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在一定的供给价格下，工业各部门中的生产率上升率的差异，对工业结构造成很大的影响。由于产业各部门的自然性质不同，以及各部门的需求结构不同，必须出现生产率在各部门、各产业中的不同变化这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的差异现象，叫作"生产率上升率不均等增长现象"。造成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原因，是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技术进步率快的产业部门，其生产费用下降也大，成本降低额也较大，于是这一产业在相对国民收入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资源便向这一产业转移，供给结构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具有较高生产率上升的工业部门，将在工业结构中占有更大的优势。产业结构理论认为，这是工业化、工业结构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参看"需求结构"。

经济结构　它有多重含义：(1) 指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种经济结构主要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个体所有制企业各占多大比例）来表现。

(2) 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主要包括：(a) 产业结构。如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构成；工农业各部门内部的构成（例如农业中的农、林、牧、副、渔各业之间的比重，工业中基础产业与加工行业之间的比重）。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高技术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比重，机械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等，资本主义国家把产业分为三个产业部门，来表明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第一产业部门包括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第二产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电力煤气、公用事业、商业、金融业和政府机关等。(b) 交换结构。如商品流转结构（如各类商品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价格结构（如工农产品比价、工业品内部各产品之间的比价）、进出口结构（如装备产品和一般机械品之间的结构，制成品与半成品之间的结构、高、精、尖产品与一般产品之间的结构，初级产品和一般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消费结构。（吃、穿、用之间的比例）、技术结构（如现在高技术和一般技术之间的关系，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关系，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操作部分各占多大比重等）。(c) 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各内部的构成比重；非生产性费用如国防、行政费用和总消费之间的比例等。

根据研究者的角度和目的，经济结构可以有所交叉，如可以从中单独划分出经济组织结构（例如专业化组织、联合化组织各占多大比重，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各占多大比重，国营企业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所占的比重等）、产品结构（例如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各占多大比重）、劳动力构成结构（如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构成如何，第二产业中机器制业与一般产业的劳动力分配比重等）、就业结构（就业与失业人数之间的比例，就业人数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分配）、投资结构（如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之间的投资分配，产业各部门之间的投资分配）、能源结构（例如煤、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原子能、风能、核能等各占多大比重、一、二次能源的比重）、材料结构（如木材、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化学材料、非化学材料等各占的比重大小）等等。

经济结构从地域范围划分，可分为世界经济结构、南北结构、东西方经济结构。从一国范围讲，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又分为部门经济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以及企业经济结构。

从分析方法角度分析，可以分为动态经济结构和静态分析结构。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以不同规模和速度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是经济发展长期沉淀的结果。影响经济结构的因素很多，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是决定经济结构的根本因素。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动是科学技术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每当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都会导致科学技术在各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便是形成了新的产业，淘汰了旧的产业，譬如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产业部门，促成了新技术产业的诞生。

一定社会的经济技术条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一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一般都存在着普遍联系的。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主要看它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充分利用了国内外一切有利条件，能否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否协调发展；能否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既有利于促进生产的短期增长又有利于促进生产的长期增长。而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不能尽快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使经济结构最大限度地吸收科学技术，使资源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获得科学技术的不断吸收和创造的动力机制，是判断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志。

九　画

重工业化　系指工业由轻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推进的阶段，这里的重工业，更严密地是指重、化学工业，其划分的根据是单位产品体积的相比重量。产品单位体积的重量大的工业部门属于重工业。一般包括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金属材料工业和机械工业。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化学

工业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化学工业便独立成一个行业，与重工业并列。因此重工业化亦可称为"重、化学工业化"。重、化学工业代反映了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过程本身的发展趋势。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它首先从轻工业开始起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产业革命，它首先发生在纺织工业。然而，由于社会需求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工业各产业部门的自然生产率的差异，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发达工业大国的重工业比率大都在60%到65%左右。例如1970年，美国的重工业化率是57.4%，英国为61.0%，法国为65.2%，西德为62.4%。重工业化是各国工业发展中的一般性趋势。对重工业化进行过典型研究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他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品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并将这一比例称之为霍夫曼比例。参见"重工业化率"。

重工业化率　指在工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中，重工业所占的比例。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初期是轻工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各部门中的生产率上升的差异，以及人们需求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变化，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是从轻工业开始的，产业革命也是从纺织工业起步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发展，重工业在工业创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现在工业发达的大国中，重工业化率大都在60%到65%之间。例如，1970年，美国的重工业化率为75.4%，英国为61%，法国为65.2%，西德为62.4%，意大利为51.7%，日本为64.3%。参见"重工业化"。

资本品产业　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研究工业化及其进程时所提出的概念，意指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它包括冶金及金属材料工业、运输机械业、一般制造业，化学工业等。霍夫曼在产业分类法中把产品75%以上用于资本投入的产业归入资本品产业。所谓资本品就是形成固定资产的生产资料。霍夫曼认为，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有统治地位，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是不发达的；在第二阶段，与消费资料工业相比，资本资料工业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消费品工业的规模，显然比资本品工业的规模大得多，在第三阶段，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规模达到大致相当的状况。在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的规模将大于消费品工业的规模。参见"消费品产业"。

资本集约度　每一个劳动者所需配备的资本品价值额的大小。又称为劳动的资本装备率。从理论上讲，资本品不仅包含固定资本，而且还包含流动资本，但有时仅将固定资本作为资本品价值额计算。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把以现行货币工资率计算的资本品价值额称为实际资本，把每一个劳动者的实际资本称为实际资本率。因此，实际资本率等于以现行货币工资计算的资本集约度。一般说来，劳动人口的增加速度低于资本积累的增加速度，因此，资本集约度有提高的倾向。而资本集约度的提高，又将造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以现行货币工资计算的资本集约度，即实际资本比率一般并不一定提高。因为若资本集约度的上升比例与实际工资率的上升比例相等，则实际资本比率不变，在现实经济中，随着资本集约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工资率也将上升。因此，实际资本率往往不变。马克思最早研究了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并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马克思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有机构成。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集约度和罗宾逊的实际资本比率概念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集约度也是阐明经济结构效益高低的重要参数。

派生增长部门　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经济发展阶段》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所谓派生增长部门是在带动经济起飞和发展的主导部门的影响下而发展的增长部门。这些部门由于和实际总收入、人口、工业生产或其他一些一般性的适度增加的可变因素的增长有某种相当稳定的关系而得以发展。以重型机械制造业为例，在重型机械制造业作为主导部门的这一时期，由于它本身的性能必然带动其它部门的发展，并产生广泛的旁侧影响，因而势必派生出农业机构化部门的增长，并且会带动大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其他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改造。而这些部门的发展是由主导部门的带动影响下派生而来的，因此称为派生增长部门。罗斯托认为，派生增长部门的发展与国民实际总收入之间有稳定的联系。

相对国民收入　又叫"比较劳动生产率"。系指某产业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和劳动力相对比重之比。用公式表示为

$$\underset{\text{(比较劳动生产率)}}{\text{某一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 = \frac{\text{该产业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text{该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

这是克拉克在研究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产业间分

布结构的演变趋势时提出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利用横断面分析方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了三次产业演进和变化的规律。这三个结论是：(1) 第一次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在大多数国家都低于1，而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都大于1。并且从时间分析看，农业国民收入下降的趋势说明，在劳动力相对比重和国民收入相对比重都下降时，国民收入相对下降幅度超过了劳动力相对下降幅度。因此，大多数国家农业劳动力减少的趋势没有停止。这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上的普遍现象。(2) 第二次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是普遍现象。20世纪以后，在欧美诸发达国家，劳动力相对比重大体不变。而从相对国民收入看，只有第二产业才是上升的。它表明在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方面，第二次产业有较大贡献。(3) 第三次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从时间序列看一般表现为下降的趋势，但劳动力的相对比重是上升的。它说明虽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但吸收劳动力较多。参见"比较劳动生产率"。

前向关联效应　与"后项关联效应"对称。也称为"前向连带效应"。指一个部门的扩张和发展对吸收它的产品的部门的波及和影响。就波及和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而言，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前向关联系数。比如，初级产品部门的前向关联效应波及范围广，程度较深，而专业设备制造产业部门的前向关联效应范围则相对较窄，至于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除了与商业发生某种联系，不再与其它物质生产部门发生前向关联。前项关联效应概念，对于确定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主导工业部门，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是对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有重要意义。参看"关联效应"和"旁侧关联""后侧关联效应"。

后向关联效应　又称"后项连带效应"。与"前向关联效应"相对而言。一个部门的扩张和发展对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的诱发作用，叫作"后项关联效应"。就诱发作用的程度和范围而言不同，不同部门的后向关联效应各不相同。比如，初级产品部门的后向关联效应在范围和程度上有限，近乎没有关联效应，它仅与向它提供专用设备的部门发生后向联系；而加工制造业部门的后向关联效应却很大。正在地把握后向关联效应，对于确定个国家某一时期的主导产业，对于正确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发展对外贸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看"前向关联效应""关联效应"和"旁侧关联"。

柯林·克拉克定理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进步，农业的就业人数相对于制造业的人数会趋于下降，随后，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也趋于下降。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所阐明的工业化进程和趋势的规律。柯林·克拉克在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产业的需求价格、收入弹性、对每个产业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收入等进行测算基础上得出的。克拉克得出的结论是农业中的劳动力所占比例有长期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速度却不相同。在人口高度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对下降趋势可能仍然意味农业就业量的绝对上升。先进国家就业人口也在绝对下降。克拉克认为，在低收入水平上，服务业的生产率能够同产品生产率同步上升；但是达到某种程度后，服务业的生产率上升就不那么迅速了。服务上具有高收入弹性，价格需求弹性也很大。工资上升，服务业的价格也肯定会相应提高，在先进国家，这几乎决定了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并对餐旅业的预期需求增长起控制作用。克拉克自己认为，他的上述思想来源渊于17世纪的经济学家配第的观点，即在就业和对国民生产额的相对重要性上，农业将下降；相对于服务业而言，制造业的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因此后人把这个定理也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参见"配第—克拉克定理"

资金密集型产业　又称"资金密集型工业"。指单位产品所需投资较多，每个工人占有的固定资金高的工业部门。它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工业，通常用资金同劳动力的比率来衡量，比率高的为资金密集型产业，它包括钢铁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冶炼业等。它一般具有单位劳动生产率高，工艺复杂，设备占用率大，能耗高，投资额大的特点。它吸纳的单位投资大，但吸收的劳动力少。资金密集型产业是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和发展，生产自动化程度广泛提高，以及计算机、机器人在工业生产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化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资金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较大，它们凭借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发展中国家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的资金密集型工业。

战略产业　指可以迅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效地发展生产，迅速扩大出口，对国民经济有长远的深刻影响的产业。根据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特定时期的发展重点不同，各个产业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也显著不同。具体说来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产业如

电力、钢铁、石油、化工、电子工业一般为战略产业。

结构高度 是指制造产品的高级和高效化程度。结构高度所反映的是现有产业部门所达到的层次程度。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手段，对产品进行制造的手段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便自然而然地制约着这种加工和制造的整个规模、结构和水平。整个工业的发展进程便自然而然地以生产这种加工手段或制造手段的机械工业的发展作为核心而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高度就是指机械工业所达到的规模和水平。因为整个工业结构中，任何一个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和大规模实际应用，都是通过机械工业制造出相应的设备而实现的。工业结构中任何重大的技术革新或技术革命，都首先通过机械工业的技术进步而实现。机械工业所具备的这种结构性功能，决定了其技术进步速度是最快的。机械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各个部门的相互依存关系网络里，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果都比较高。对整个产业的波及效果大，诱发系数高。并且在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高度化过程中，只有机械工业同时兼容这三类产业的技术特征。产业结构高度化实际上是指制造业所达到的结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1) 劳动就业在第一产业部门比重下降；(2) 生产部门构成中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所占比重上升；(3) 在各种产品价值构成中，知识技术、信息的比重日趋提高，原材料比重下降；(4) 在就业人员构成中，从事脑力劳动的比重上升，从事体力劳动的比重下降。这种结构高度化的趋势的 4 个方面集中体现在机构工业上。

结构效益 是指各产业部门组合的优劣度。产业结构的优劣或合理与否，需要一系列指标和评价标准，以便对产业结构效益进行测度和分析。分析产业结构效益的方法是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和产业结构增长波动分析指标进行的。由整个产业中不同产业所占有的国民收入与所占有的劳动力相比叫比较劳动生产率。它可以看出国民收入在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分布；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相互关系程度。评价结构效益的一般准则是：每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全部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比较，它标志着该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评价结构效益的指标体系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对于所有评价指数而言，指数越大，说明产业结构情况越好。具体的评价指数是：

(1) 产业结构增长的波动指标是：

$$\sigma=\left[\frac{\sum(X-X_0)^2}{n}-\left(\frac{\sum(X-X_0)}{n}\right)^2\right]^{\frac{1}{2}}$$

$$V_\sigma=\frac{\sigma}{\bar{X}}\times100\%$$

$$\left(\bar{x}=X_0+\frac{\sum(X-X_0)}{n}\right)$$

其中 σ 为标准差；

X 为分析期内各年增长速度（标志值）；

X_0 为分析期内任意假定的平均增长速度；

n 为项数（分析期内年数）；

V_σ 为标准差系数（离散系数）；

$\bar{X}$ 为平均数（平均增长速度）。

产业增长主要体现为结构增长，而结构增长是以均衡增长为标志的。

(2) 结构劳动生产率指数。

其公式是：

$$I=\sum_{i=1}^{n}W_iP_{i/P}$$

式中 I 表示结构劳动生产率指数；

w_i 表示产业部门权重；

i 表示部门编号（=1，2，……，n)；

P_i 表示某一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该产业部门增加值与该产业劳动力之比）；

P 表示全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这个公式可以反映出各产业劳动使用效率。

(3) 结构资金产值率指数。这是一项从资金运用的效率的角度来观察的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指标。通过它可以反映出各产业在资金使用效率方面，产业结构的状况如何。其计算公式为：

$$Z=\sum_{i=1}^{n}W_iF_{i/F}$$

其中，Z 表示结构资金产值率指数；F_i 表示某一产业部门的资金产值率（该产业部门增加值与该产业占用的平均资金之经）；F 表示全部产业的资金产值率。

(4) 结构技术进步率指数。它是把广义的技术进步因素融进产业结构效益分析和评价中去的指数。可以反映出各产业在技术进步速度方面、产业结构的状况如何。其计算公式为

$$T=\sum_{i=1}^{n}W_iA_{i/A}$$

其中 T 表示结构技术进步率指数；A_i 表示某一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A 表示全部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

(5) 结构出口效益指标。出口效益应用单位资金的出口额来反映，即占有资金相同，但相对出口额

比其他产业部门大的产业，是出口效益好的创汇产业。如果通过结构调整，能用一定的资金取得更高的出口额，则产业结构就趋向于整体优化方向。因此结构出口效益指数是各产业部门出口效益的加权平均值与全部产业出口效益的比值：

$$E=\sum_{i=1}^{n}W_iR_{i/R}$$

其中E表示结构出口效益指数；R_i表示某一产业部门出口效益（出口额与占用资金之比，当然还可以采用其他综合反映出口效益的指标）；R表示全部出口效益。

(6) 结构消耗产出系数。它是一项从物质消耗（劳动对象消耗）产出成果方面来观察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X=\sum_{j=1}^{n}W_j\frac{1}{\sum_{i=1}^{n}a_{ij}}\Big/\frac{1}{\sum_{j=1}^{n}\sum_{i=1}^{n}a_{ij}}$$

其中X表示结构消耗产出率指数，$\sum_{i=1}^{n}a_{ij}$表示第j产业部门对第i产业（i=1、2、……，n）部门产品的中间消耗之和（j=1，2，…，n$\sum_{j=1}^{n}\sum_{i=1}^{n}a_{ij}$表示全部产业的中间消耗之和，即全部劳动对象消耗率之和。该指标的分子代表了各产业部门中间消耗产出率之加权平均；分母代表了全部产业中间消耗产出率，两者之比反映了在消耗与产出的关系上，产业结构分理化的程度。该指标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能以一定的消耗取得更多的产出。

(7) 结构能源消耗产出率指数。专门用于观察能源消耗产出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指标。它从各产业对能源消耗的产出方面，表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效益其计算公式为

$$N=\sum_{j=1}^{n}W_j\frac{1}{\sum_{i=1}^{n}\Big/\frac{1}{\sum_{j=1}^{n}\sum_{i=1}^{n}a_{ij}}}$$

其中：

N表示结构能源消耗产出率指数；

$\sum_{i=1}^{n}a_{ij}$表示第j产业部门单位产值对电力、石油、煤炭及炼焦三个产业部门（均属能源生产产业）产品的消耗数（j=1，2，……，n）；

$\sum_{j=1}^{n}\sum_{i=1}^{3}a_{ij}$表示国民经济所有产业生产单位产值对上述三个产业产品（能源）的消耗额。总之，评价产业结构效益有许多计量指标。

结构调整　是指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质态组合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要求，自觉调整生产结构，提高各种投入产出链的内部适应性，促使生产内部的组织体与外部环境相适应，使经济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配合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调整第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如果这些宏观层次产业比例关系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就不会协调稳定发展。结构调整的措施最主要的是体制改革，建立使各产业内部各微观层次的企业组织协调发展的机制。结构调整的方式是存量调整和流量调整相结合，而最根本的是存量调整。结构调整涉及到各阶层的利益和各种经济关系，因而结构调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结构调整的政策手段最直接的是采用产业政策，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结构调整的结果与检验调整的效果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与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效益相适应，看投入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结构调整应重视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产品的结构的调整。

重点产业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重点发展的产业。重点产业是根据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产业关联、技术进步、创汇作用的大小，经济效益和国际对比、对外贸易等因素决定的。随着经济发展，重点产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顺序，各国不尽一致。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产业是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能增加有效供给的产业和大型成套机电设备、机电一体化产品等。重点产业的名称在国外名目繁多，有的叫"先导产业"，"带头产业"，有的叫"支柱产业"等。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战略重点产业是石油化工和钢铁。进入70年代以后，是汽车工业，80年代以后是微电子工业，耐用家用电器工业等。

信息产业　亦称第四产业。指与信息的采集、存贮、传播、利用以及信息设备制造、信息系统建设等活动有关的产业部门的总称。人们最早把计算机产业（包括集成电路业）和信息处理业（包括软件业）称作信息产业。以后人们又把传播报道业（包括音像视听业）、信息流通业（包括通讯业、咨询业等）、知识产业（包括科研、教育等）都称为信息产业。根据信息经济学的权威波拉特的定义，信息产业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 直接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并以信息商品的形式出卖的信息提供业；(2) 政府或非信息企业为了内部需要而进行的信息活动；(3) 包括电子计算机、通信、电话、电台等信息工业的制造业。目前，以开发信息资源、经营信息产品为主要内容的信息产业正迅速发展起来，它将超过第

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还对其它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其它产业的信息化，使之向知识密集型发展、向附加价值高的方向转化，也促进了信息业和其它产业的有机结合，并促使更加高级的复合产业形成。它必将促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标准产业分类法 在产业结构研究中，为统一国民经济统计的口径而制定的产业分类方法，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由权威机构编制并颁布，具有权威性；其次，标准产业分类尽可能详尽，不遗漏，具有完整性和全面性；第三，便于用来进行各种目的的分析和研究，便于进行比较，具有广泛的实用性。联合国为了统一世界各国产业分类，颁布了《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索引》。这部标准产业分类(1971年版）把"全部经济活动"分为10个大项，在每个大项中又分成若干个中项，每个中项下面又分成若干小项；又将小项分成若干细项。大、中、小、细共有四级。各大、中、小、细项都规定有统计编码。其中10个大项是：(1) 农业、狩猎业、林业和渔业；(2) 矿业和采石业；(3) 制造业；(4) 电力、煤气、供水业；(5) 建筑业；(6) 批发与零售业；餐馆与旅店业；(7) 运输业、仓储业和邮电业；(8) 金融业、不动产业、保险业及商业性服务业；(9) 社会团体、社会及个人的服务；(10) 不能分类的其他活动。这种分类所作的统计有很高的可比性，可在各种产业结构分析中应用，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一般以它为基础。但这种分类法也有过分繁杂之虞。参见"三次产业分类法"。

十 画

部门结构 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对比关系和结合状况。国民经济可分为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由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和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内继续的商业等物质部门组成。非物质生产领域由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生活、服务、行政管理部门构成。

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对比关系和结合状况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方面。前者是后者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对前者有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比重将日益增加。尤其是科学和教育部门的发展更为迅速。

就物质生产领域来说，各物质生产部门的对比关系和结合状况，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另一基本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也相应的发生变化。一般说来，从事农业的人口向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逐渐转移，在社会劳动分配的比例中，农业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非农业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各物质生产部门的对比关系和状况，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同时也受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另外，它还取决于一国的自然状况，譬如地理、资源、气候、国土面积等。各物质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结合适当，是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它们之间的比例失调，则会为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障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部门结构的影响日趋重要。并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国民经济部门结构。

部门替代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概念。罗斯托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转换的过程。当一个部门兴起以后，在它作为主导部门的这一时期，通过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潜能，其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会充分发挥作用。但当这个主导部门的潜能发挥出来以后，该主导部门必然会诱发新一代主导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而旧的主导部门便被新的主导部门所代替。而这一新的主导部门经过一定发展阶段以后，便必然被新一代主导部门所代替，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部门发展的过程。而新的主导部门所派生的辅助增产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性质。旧的辅助增产部门逐渐被新的辅助增长部门所代替。派生增长部门也有类似的替代性质。部门替代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他的周期理论。库兹涅茨用主导部门更替分析了不同部门的增长趋势。

高加工度化 系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而出现的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工业结构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重心的结构发展的趋势。高加工度化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不断深入，表明了加工组装工业的发展大大快于原材料的发展速度。重工业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以原材料工业的发

展为重心的阶段和以加工组装工业为重心的阶段。高加工度化说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经济对原材料的依赖性会大大减小。从而对原材料和资源的依赖趋势也不断下降。生产结构将多层次化。中间产品的价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

高技术产业　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现在无统一的划分标准。一般认为，高技术产业有电子计算机工业、机器人工业、航天工业、生物技术工业、新材料工业、新能源工业等。美国劳动统计局为统计方便，在标准产业分类表中，将研究试制费和科技人员比例高出全美制造业平均数一倍以上的行业，划归"高技术产业"，这些产业有制药、计算机、电子器件、飞机、实验设备、计算机软件、资料处理、研究试验室等36种。将研究试制费和科技人员比例高出全美制造业平均数一倍以下的行业，划为"高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有石油化工业的大部分、印刷、电气、医疗设备等56种。一般将这两类产业泛称高技术产业。其特点是发展速度快，变化迅速，以人工智能、大规模集成电路、生物工程、新材料、遗传工程等产业为核心。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对各国经济的影响空前增大。高技术产业产值在一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判别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之一。参见"知识产业"。

旁侧关联　即旁侧影响，也叫旁侧效应。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于1960年提出。系指某一主导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对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棉纺织业作为主导部门的旁侧影响是带动了城镇建设、交通沿线建设、工人区的形成和发展（包括生活、文化供应等设施）；在工业发展的成熟阶段，重型机器制造业作为主导部门的这一时期，其旁侧关联是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实行，以及其他部门的技术改造等；当经济发展进入群众高额消费阶段时，耐用消费品工业作为主导产业的这一阶段（如汽车工业作为主导部门），其旁侧效应是郊区化和公路建设、服务业随之发展。这种关联效应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主导工业部门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与其它有联系的若干部门一起，共同兴起、共同发展的。它既是其它部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又以其它部门的发展为基本条件。主导部门的兴起与发展及其对其他部门的影响，构成了一个主导部门综合体系，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参看"前项关联效应"和"后项关联效应""关联效应"。

消费品产业　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研究工业化及其进程时所提出的概念。霍夫曼将产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消费品产业，即消费资料工业。它一般包括食品业、纺织业、皮革业、家具业等。根据霍夫曼的划分方法，某产业产品的用途有75%以上用于消费的归入消费资料产业，75%以上用于资本投入的归入资本品产业，介于两者之间的归入其他产业。霍夫曼认为，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品产业占统治地位，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是不发达的；在第二阶段，与消费资料工业相比，资本品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消费品工业的规模比资本品工业的规模大；在第三阶段，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规模大致相当。在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的规模将大于消费品工业的规模。参见"资本品产业"。

配第—克拉克定理　英国济学家C·G·克拉克提出的有关经济发展中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结构和如何变化的规律。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根据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的时间序列分析，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会不断下降，而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会不断上升。克拉克认为，由于经济发展中各产业之间会出现相对差异，就业人口总是向高收入的产业移动，这样会造成因收入水平不同而就业的流向不同。生产率高，收入弹性大的产业会有更多的收入，因而使各产业之间的变化差异很大。克拉克自己承认他所发现的规律只不过是证明了配第的观点，因此他称之为"配第规律"，后来人们改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十一画

第一次产业　本世纪20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家，在对国民经济按产业分类时，按产品生产与流通过程所处阶段，把直接由国土中收获或采掘产品的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矿业称为第一产业。各国的第一产业所包括的范围不完全一致。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用的方法，第一产业包括矿业；而按美国和

日本的分类方法，则不包括矿业。我国所称的第一产业指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也不包括采矿业。"第一产业"的术语，最早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第二次产业 指西方经济学家对国民经济按产业分类时，所使用的一种术语。这一术语最早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国对第二产业的分类方法不一致。由于分析目的不同，经济学家对第二产业的划分范围也不尽一致。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划分方法，第二产业系指制造业和运输业，不包括矿业；按日本所使用的方法，第二产业指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按美国的划分法，第二产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煤气、自来水、运输业和通讯。我国第二产业为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第二产业中采矿和能源工业，直接依赖于国土资源，而加工制造业则在环境问题上与国土有密切关系。参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第三次产业 在本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国民经济按产业分类时，按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所处的阶段不同，把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产业称为第三产业。1935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阿·格·费夏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第三次产业"的术语。国际上对第三产业的划分不尽一致，通常泛指除第一、二次产业以外的所有行业。也有的把建筑业作为第三产业。还有的把知识密集型产业，从第二、三次产业中分离出来，称为第四产业。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美国的第三产业，都包括商业、金融业、保险业、不动产和服务业，所不同的是美国的第三产业还包括政府公务和国防事业，而日本则把运输、电力、通讯、煤气等行业划分为第二产业。参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辅助增长部门 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概念。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认为，由革新创造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的或至今尚未开发的资源而带动经济发展的部门引起的相关部门的增长部门是辅助增长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是过去许多部门发展的结果。如以汽车工业为例。在汽车工业作为主导部门的这一时期，它带动了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工业、橡胶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使这4大部门的工业必然伴随着主导工业部门的成长而逐步发展。这4个工业部门便是辅助增长部门。罗斯托认为，由于辅助增长部门直接适应主导部门的发展，或者作为主要增长部门发展的条件，因而得到迅速发展。

基础产业 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承载作用的产业。包括能源、原材料工业、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以及电力工业等。这些产业是为人类生活、生产和建设提供基本的原料、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一般生产周期慢，建设周期长，占用资金多，因此必须提前安排建设。基础产业承载量的大小与经济技术发展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必须与基础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如不注意这些部门的发展，容易引起产业结构的失调，而使这些部门形成瓶颈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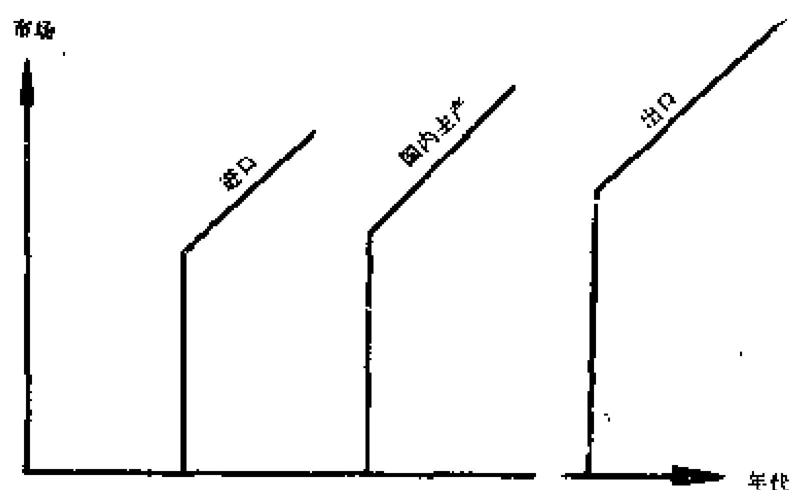
十 二 画

朝阳产业 与"夕阳产业"相对称。指微电子、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新能源等一系列新兴产业。这些产业部门由于发展快，影响大，生产增长幅度高，犹如初升的太阳，因而被喻为"朝阳工业"。而那些传统部门，如钢铁、纺织、造船业，则处于生产下降、日趋衰弱的困境，如同西下的夕阳，因而被喻为"夕阳产业"。"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只不过是一种形象比喻，无法准确描述当前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趋势。一般认为，"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概念比"朝阳产业"的概念更为准确。参见（"新兴产业"和"夕阳工业"）。

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 这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提出的理论。赤松认为日本棉纺工业的发展受国际贸易的影响，曾出现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明治初年，即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由于棉纺工业发展技术落后，现代装备缺少，向西方开放的结果，导致了西方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第二个时期，是西方棉纺品的涌入迅速开拓了日本的棉纺市场，并使这一市场不断扩大的时期，纺织市场的逐渐形成，又为日本发展棉纺市场准备了条件。这时，使由日本本国国内的低技术和低工资成本相结合促成了本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并且规模不断扩大。第三个时

期，国内棉纺织工业加速发展，走向国际市场，不断占领海外市场。这时的棉纺织业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实现了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赚取了利润。而由于低工资成本的优势，使日本的棉纺产品获得了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便迎来了棉纺产品出口的新局面。国际市场的开拓又反过来促进了本国棉纺业的巨大发展。

上述三个阶段可用下图来说明：



上述所述进口、国内生产和出口的进展过程，在图上用三支大雁在飞翔来表示，故称为“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第一支雁”是进口的浪潮，在进口的冲击下，有“第二支雁”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支雁”表示国内生产的浪潮，“第三支雁”是出口的浪潮，每一支雁都比“第一支雁”来得更为大些，后来，“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也用来表示后起的工业国实现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过程。

温室产业　系指那些刚刚成长还十分幼小，需要政府的扶植和保护的产业。由于社会需求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加之人们消费欲望的多变性，一些产业在刚刚诞生时，由于其投资、生产、需求各个方面都受到其他业已发展起来的强大产业的制约和限制，必须需要政府的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像处在温室中的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抵抗力的植物一样，需要严格的保护，故称作温室产业。这些产业，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以后，可能成为属于优势的生产部门和出口部门。

最终需求　即最终产品。是“中间产品”的对称。它是投入产出表中的主要概念。一般指当年不再进一步加工，用于固定资本更新、大修理的产品，以及用于积累和消费的产品。它包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生活消费品。从最终产品中减去投资品（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得到最终净产品。它是动态投入产出表中的重要概念。最终产品价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是衡量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在已知最终产品的条件下，计算出各部门的总产品。参看“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率　又称“最终产品系数”和“里昂惕夫逆系数”。即里昂惕夫逆矩阵 $(I-A)^{-1}$ 中的元素 $\bar{b}_{ij}$。它描述了社会总产品与最终产品之间的比率。元素 $\bar{b}_{ij}$ 表示单位第 j 种最终产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量应分别为 $\bar{b}_{ij}$ （i=1，2，……n）个单位，里昂惕夫逆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仅差单位最终产品。参看“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

短缺基准　是一些学者提出的选择主导产业的一种标准。它的基本要点是，价格是商品稀缺程度的正比函数，供不应求的商品生产者，可以获得超过平均利润水平的超额利润。在我国，由于价格改革刚刚起步、供求矛盾难以用价格完全表示出来，只能通过产品的稀缺程度来反映。最稀缺的产品最具有发展的理由。因此，在我国，主导产业的选择应放在最为短缺的产业方面，因为这些产业的需求大，供给不足，优先发展这些产业最有利于缓解整个短缺经济状况。因此短缺标准应成为选择主导产业的基准。但是，在市场机制还未完全形成的条件下，由于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变革、各产业的宏观结构还不协调，尤其在各产业内部还没有在规模效益的引导下形成统一的产业内部良性循环的情况下，短缺的标准无法用统一的尺度衡量。因为体制本身造成了短缺状况，如果充分发展这些短缺产业部门，又会形成其它产业的短缺状况，因而只能产生“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恶性循环。因为用短缺标准来确定主导产业无法证伪。在逻辑上只能是简单地重复。它无法用来判别哪些是主导产业，因而短缺标准是无法成立的。

筱原三代平　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他以提出著名的筱原两基准而闻名于世。筱原三代平在 1957 年的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第 8 卷第 4 号上发表了题为“产业结构与投资分配”的著名论文，为规划日本产业结构提出了两个理论基准：（1）需求的收入弹性基准；（2）生产率上升率基准。根据这两个基准所选择的产业考虑了产业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和产业的技术进步因素，很快被政府采纳为选择主导产业的依据。按照筱原基准，是把那些收入弹性大、有巨大社会需求量，且生产率上升快，技术水平高的产业作为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1963 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制定的产业结构政策时，以及 1965 年在制定“中期经济计划”时都采用了筱原基准。此外筱原三代平还提出将产业关联作为选择主导产业的第三个基

准。筱原三代平的著名著作有《产业结构论》等。

十 三 画

感应度系数 其他产业的生产发生变化使某产业的生产也发生相应变化的系数。这一系数是通过投入系数逆矩阵表来表现的。在逆矩阵系数表中，某产业横行上的数值即反映该产业受其他产业影响的程度，横行系数的平均值可看作该产业受其他产业影响的一般的趋势。由此可计算出某产业感应度系数的公式：

$$\text{某产业的感应度系数} = \frac{\text{该产业横行逆阵系数的平均值}}{\text{全部产出横行逆阵系数的平均值的平均}}$$

该投入产出的逆阵为Q，$Q=(I-A)^{-1}$

用公式表示为：$Q_{F_i}=\sum_j Q_{ij} / \frac{1}{n}\sum_i\sum_j Q_{ij}$

如果某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大于1，则说明该产业感应度程度高；如果小于1，则表明该产业和感应度较低。根据1970年日本的投入产出表计算表明，基础化工、钢铁、造纸等产业感应度较高，而这些产业一般都为基础产业。在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一般都是感应度系数较高的产业。经济增长率较高时，发展快的产业一般都是感应度系数较高的产业。有些产业（如机械制造业）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少系数都大于1，在经济发展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是对经济增长速度最敏感的产业。

新兴产业 与传统产业相对而言。系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的工业领域，如微电子工业、航天工业和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而形成的新型材料、新能源以及海洋开发等一系列新工业。新兴工业是以新技术革命为动力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革命，使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各个生产领域，使物质的有形的经济占主导地位，使劳动、能源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因此，导致了新的产业革命，使许多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参看“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革命 又称“第四次工业革命”。指目前世界上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新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它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提出。他认为，由于当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从本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其标志是遗传工程、激光、微电子计算机和新工业材料的出现。现在以电脑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已日益应用在工农业生产、科研教学、交通运输、银行、商店、医院、广播、通讯等各个方面，在不到一寸大小的半导体硅片上，已能放置100万个元件。美国、日本正在研制第五代电脑，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计算速度和存储量，而且具有判断推理等人工智能。新工业材料异军突起，象具有记忆功能的合金，可以代替金属的塑料以及人造皮革，无机纤维等。这些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是已经来临的产业革命的强大动力。以遗传工程为先导的生物工程，是新产业革命的第三动力。科学可以重组遗传基因，创造新的物种，21世纪将是生物工程的实用化阶段。此外，日新月异的宇航技术，新能源技术、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技术等，都会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催化剂。由于新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着业已形成的产业经济结构，而且还以新的形式，对社会组织结构、管理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必然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十 四 画

赫希曼非均衡 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概念。赫希曼认为增长应该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增长率的产业部门之间，由于投入—产出关系，某一部门的增长，常对其它部门产生一种压力，以诱导其它部门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过程通常是由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它部门传导，即由主导部门向从属部门，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一个厂家向另一个厂商传递开来的。这种跳板式的不平衡前进，较之各行各业的齐头并进的平衡增长的好处是，给引致投资的决定带来了

相当可观的机会，并由此经济地利用了不发达国家稀缺的资源。总之发展是一条不平衡的链条，平衡的恢复是压力、诱导和强制的结果，走向经济发展的有效道路必然是无序的，其布满技术、设备、劳务和产品的瓶颈与短缺，由于不平衡是经济进步的动因，导致平衡破裂的序列就成为发展的理想模式。其目的是保持而不是消除不平衡，发展政策的任务是保持经济的紧张、不协调和失衡。均衡的实现是一种对发展进程大有裨益的机制。如何实现非均衡战略，赫希曼提出了"社会间接资本"短缺的战略。不发达国家的投资战略面临三种选择，"社会间接资本"与直接生产活动平衡的战略；"社会间接资本"过剩的战略；"社会间接资本"短缺的战略。只有走"社会间接资本短缺"的道路，才能强化投资动机，即使不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受制于"社会间接资本"的短缺，也似乎不会影响增长，那是因为不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平衡发展过程。

需求结构 社会需要的各种物质消耗资料构成的比例。需求结构会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之一。它也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因。社会需求结构的层次有三个：①在人们还处在较低收入水平阶段时，人们首先是对衣食的穿暖和吃饱的需求。消费需求处在"生理性的需求占统治地位的阶段"。随着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中用于饮食的部分将减少，穿、用的比例会逐渐上升，这是工业化过程理论所揭示的工业化首先从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开始发展的理论。②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进入"追求便利和机能的阶段"，要求逐步增加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工业投资的急剧增加，资本密集型的原材料的发展，必然要求资本品工业大发展。③追求时尚与个性的阶段。人们的消费欲望出现多样性，人们的消费也呈现出多变性，变得极不稳定。工业生产方式亦由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替代了少品种大批量的生产方式。消费结构出现的这一特点，是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根据之一。参见"供给结构"。

十 六 画

霍夫曼分类法 生产结构产业分类法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分类方法。是由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所发明的。这一产业分类法把产业分成以下几类：①消费品产业，包括：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工业、家具工业；②资本品产业，包括：冶金及金属材料工业、运输机械工业、一般机械工业、化学工业；③其他产业，包括橡胶、木材、造纸、印刷等工业。这种分类的主要目的在于区分资本品产业和消费品产业，以利于研究两大类产业之间的运动变化规律。分类的原则是某产业产品的用途有75%以上是消费品，则归入消费品产业，有75%以上是资本品的就划入资本品产业。难以用上述定量原则确定归属的产业便列入其他产业。

霍夫曼定理 又叫霍夫曼比率。是由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发明的。它描述的是工业结构"重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对比及其变化规律。霍夫曼根据近20个国家的时间系列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表现为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和资本品工业的净产值之比，后人称为"霍夫曼比例"。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断下降的。根据霍夫曼比例的变化趋势，霍夫曼将工业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有统治地位，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是不发达的；在第二阶段，与消费品工业相比，资本品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消费品工业的规模，显然还比资本品工业的规模大得多；第三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规模达到大致相当的状况；在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的规模将大于消费品工业的规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经济学大辞典
作者＝梁小民　雎国余　刘伟　杨云龙
页数＝１３６１
ＳＳ号＝１０１０３６０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9月第１版